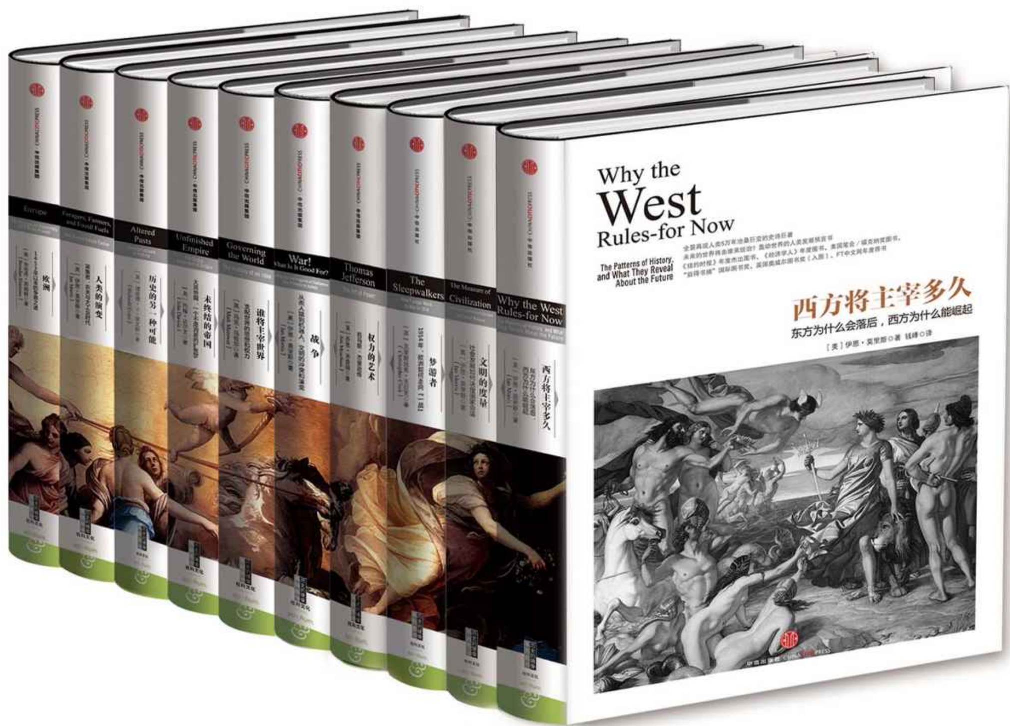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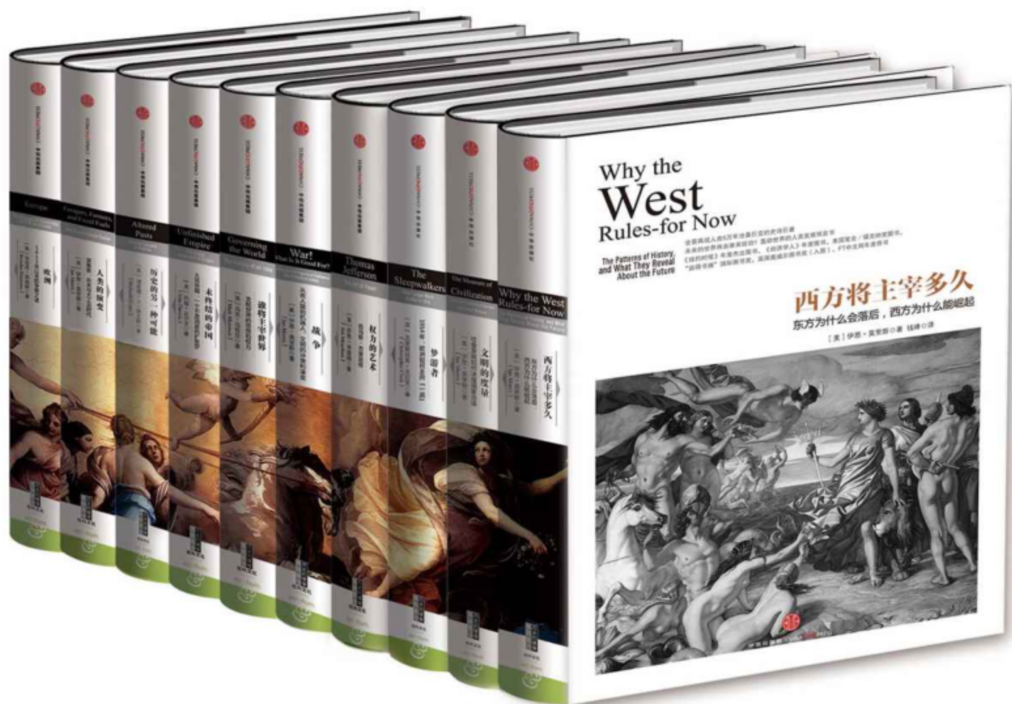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美] 伊恩·莫里斯 ◎ 著 钱峰 ◎ 译
Europe
欧洲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人类的演变
Altered Pasts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Unfinished Empire
未终结的帝国
Governing the World
谁将主宰世界
War! What Is It Good For?
战争
Thomas Jefferson
权力的艺术
The Sleepwalkers
梦游者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度量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西方将主宰多久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目录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梦游者

权力的艺术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

未终结的帝国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系统剖解东西方密码，轰动世界／激起东西方发展大辩论，重塑历史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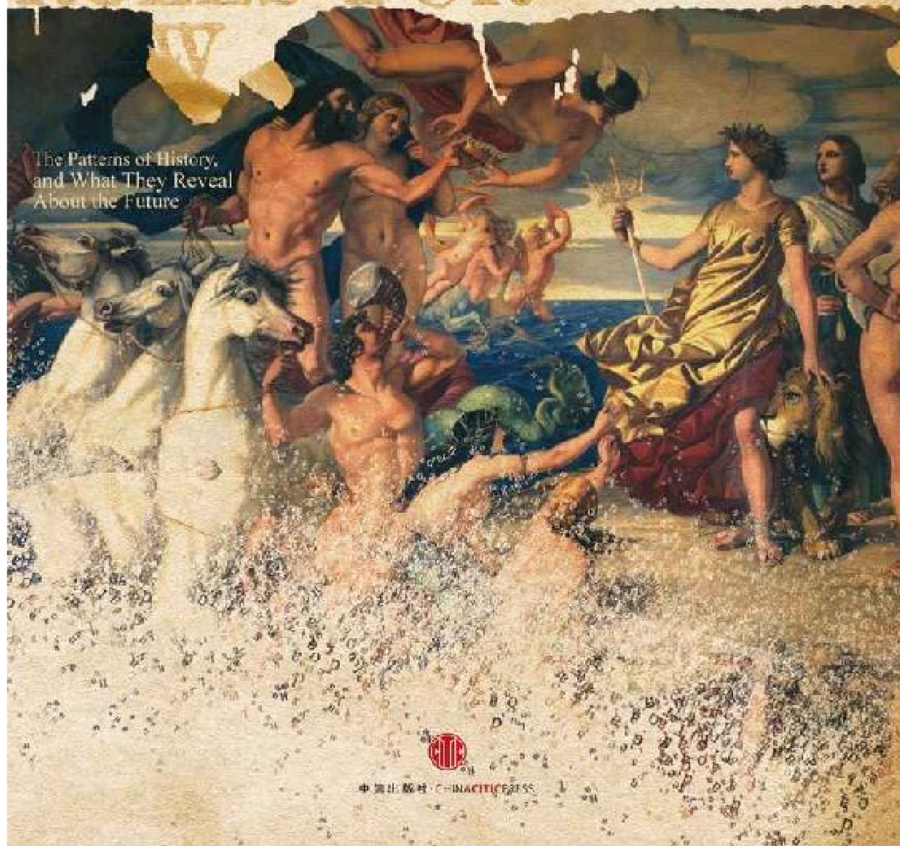
首部全景再现人类5万年沧桑巨变的史诗巨著

西方将主宰多久

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

[美] 伊恩·莫里斯◎著 钱峰◎译

WHY THE WEST RULES—FO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美）莫里斯著；钱峰译.—2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ISBN 978-7-5086-4461-5
I.西…II.①莫…②钱…III.西方国家 - 历史IV.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148号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0 by Ian Morris
Maps and graphs copyright © 2010 by Michele Angel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Inc.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著者：[美]伊恩·莫里斯

译者：钱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600千字
版次：2014年5月第2版
京权图字：01-2010-444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461-5/K·370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电子书排版：济南斯麦尔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钱峰 译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文明，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以公元11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标志，西方再次逐步“赶超”中华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统治世界。西方的优势在于它在长期的赶超中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治理体系不仅被视为有效的，而且还被视为普适的；不仅被视为富强之理，而且被称为正义之道。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西方在21世纪将被中国赶超，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但是，中国也不能因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来自军事、社会和环境生态，而且来自制度。

它前所未有地使我们认识到：再次全面赶超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正在步入新的秦皇、汉武和贞观之治的时代，这个灿烂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因为《资治通鉴》创作于中华文明第一次世界辉煌的尾声，这部书则预示着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的先声。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

前言

艾伯特亲王在北京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她这样脸贴地跪在木码头上已经有20分钟了。她强忍住泪水，既愤怒又恐惧，并且已精疲力竭。现在，天开始下起雨来。绵绵细雨浸湿着她的衣裙。她只希望，没人误以为她是因恐惧而战栗。

她的丈夫就在她身旁。如果她伸出手臂，就可以将手搭在他肩上，或者为他理顺被雨打湿的头发，赋予他力量，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要是时间能够静止不动就好了，或者匆匆过去。要是她和艾伯特亲王在别的地方就好了，只要不在这里。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威灵顿公爵和大半的朝臣——双膝跪地等在雨中。看得出来，河上出了点问题。由于中国舰队的旗舰过于庞大，无法驶入东印度码头，总督耆英大张旗鼓的伦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装甲汽船，此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可即使是耆英号，对于布莱克沃尔的码头来说，还是嫌大了些。6只拖船牵引着耆英号进港，场面一片混乱。总督耆英面无表情。

透过眼角的余光，维多利亚女王可以瞥见码头上的小型中国乐队。一个小时前，乐手们的丝质长袍和怪异的帽子看起来还非常华丽，现在被英格兰的雨水打湿了，凌乱不堪。以为耆英的轿子即将上岸，乐队四度奏起嘈杂的东方乐曲，又四度戛然而止。第五次，乐手们终于奏至曲终。维多利亚女王心中一颤。耆英终究要上岸的，这事真的发生了。

接着，耆英的随从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此贴近，维多利亚女王都能看清他鞋上的针脚。鞋面上绣着小小的龙、升腾的云烟和火焰，比她的侍女的女红要精致得多。

随从以单调低沉的声音，朗读着来自北京的官方声明。维多利亚女王已知晓上面的内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颠女王向宗主国致敬的意愿；维多利亚女王乞求向清帝国进贡和纳税，并顿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

但在英国，人人皆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起初，中国人受到了欢迎。中国资助过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者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但1815年后，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越来越廉价，最终导致兰开夏的纺织厂破产倒闭。当英国人抗议并提高关税时，中国军队将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一举击溃，将纳尔逊海军上将击毙，并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线的各个城镇。近8个世纪以来，英国无人

能侵，可是如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永远记入耻辱的史册。她的统治时期充斥着凶杀、洗劫和绑架，充斥着战败、耻辱和死亡。现在，耆英，这个道光皇帝的奴才，亲自来了，越发显得伪善和不怀好意。

这时，跪在维多利亚女王身后的翻译轻咳了一声，只有女王能够听到。这是一个信号：耆英的下属已讲到赋予她“儿皇帝”身份的部分了。维多利亚女王从码头上抬起前额，起身恭受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那象征着英国的耻辱。她这才第一次端详起耆英来。

她不曾料想，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如此充满才智，如此活力四射。他难道真是那个令她畏惧的怪物吗？这时，耆英也第一次看到维多利亚女王。他看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的画像，但她比想象中更为健硕、更为寻常，并且十分年轻。她浸在雨水中，浑身都湿透了，甲板上的泥点溅了她一脸。她甚至不知道如何规矩地叩头。多么粗鄙的人啊！

最可怕的、无法想象的时刻到了。两名中国官员深鞠着躬从耆英背后走出，扶艾伯特亲王起身。维多利亚女王知道，她既不能出声，也不能动弹——事实上，她僵在原地，抗议不得。

他们把艾伯特亲王领走了。艾伯特亲王庄严地走了，他步履蹒跚，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维多利亚女王。那一眼里，仿佛有整个世界。维多利亚女王昏倒了。她还未倒在甲板上，就被一个中国侍从扶住——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女王，即使是一个外国的邪恶女王，晕倒受伤也是不妥的。艾伯特亲王仿佛梦游一般，失魂落魄，他的表情凝固了，他喘着粗气，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他登上踏板，走进深锁的豪华船舱，踏上了去中国的航程。在那里，他将作为道光皇帝的陪臣幽居在北京城中。等到维多利亚女王苏醒过来，艾伯特亲王已经走了。终于，她忍不住呜咽起来，浑身都在颤抖。艾伯特亲王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到北京，回来也要同样长的时间。他还要在那些野蛮的中国人中生活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她能做什么呢？孤身一人，她将如何保护自己的人民？在这一切暴行之后，她将如何面对这个万恶的耆英？

艾伯特亲王一去不返。他到了北京，在那里，他以流利的中文和对儒家经典的了如指掌震惊了天朝。就在他走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起义，砸毁打谷机，起义风潮席卷英国南部，血腥的巷战在半数欧洲国家的首都爆发。几天后，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上书，建议将艾伯特这样有才能的亲王幽禁在中国，保障其安全。这一暴动是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华帝国也曾经历过，但面对如此骚动的民众，不应心存侥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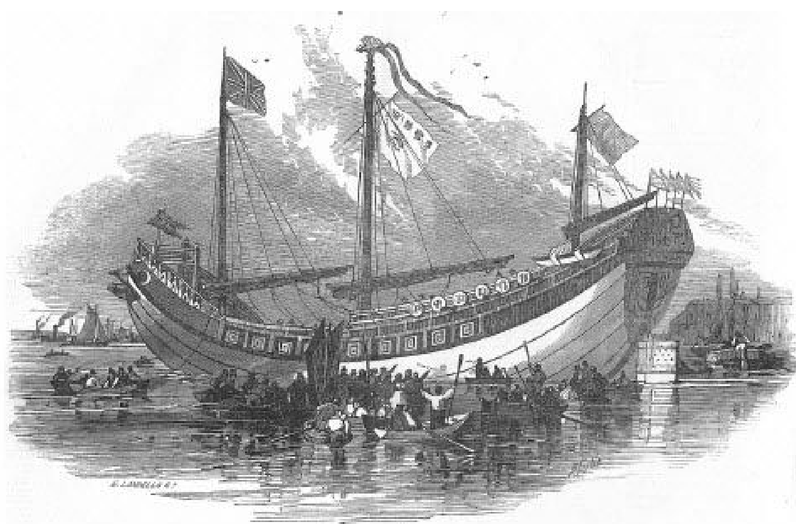
于是，艾伯特亲王幽居在北京城中。他丢弃了英国人的装束，留起了满族人的长辫子，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他对中国的经典日渐谙熟。他独自在中国生活，终日与佛塔为伴，垂垂老矣。在这金笼子里被幽禁了13年之后，他终于弃世而去。

在世界的另一面，维多利亚女王把自己关在白金汉宫寒冷的房间里，对她的殖民宗主不闻不问。英国完全由耆英治理，数不胜数的所谓政客匍匐着乞求与他做交易。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的时候，没有举行国葬，人们只是耸耸肩，带着讽刺的微笑看着这一中华帝国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件老古董湮没于史册。

从圆明园中抢走的京巴狗

当然，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至多只发生了一部分。确实存在一艘叫“耆英号”的中国船只，它也确实曾在1848年4月驶入伦敦的东印度码头（见图1），但那并不是艘装甲舰，也并未载着一名中国总督到伦敦来：真实的耆英号只是一艘装饰华丽的木质帆船。几个英国商人几年前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买下这艘小船，他们觉得，将它送回故国会是一大笑料。

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威灵顿公爵确实曾驾临泰晤士河畔，但并不是来给他们的新主子叩头的。相反，他们是作为游客来观赏在英国所见的第一艘中国船的。这艘船确实是以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耆英并没有在1842年中国水师摧毁英国皇家海军后接受英国的臣服。真实情况是，他在那一年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军求和。在此之前，一支英国海军中队摧毁了其所到之处的所有中国战舰，使中国的海防炮台寂然无声，封锁了联系京城和鱼米之乡江南的大运河，使京城陷于饥荒之中。1848年，道光皇帝确实统治着中国，但他并没有使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劳燕分飞。事实上，女王夫妇十分恩爱地继续生活在一起，维多利亚女王不时发点儿脾气，直到艾伯特亲王1861年辞世。实际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使得道光皇帝夫妇劳燕分飞。



图**A-1** 真实的耆英号：**1848**年成群结队的伦敦人划船争相观看。（《伦敦新闻画报》载图）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不可思议。维多利亚女王的同胞打垮道光皇帝，使他的帝国摇摇欲坠，为的是最具英国特色的事物——一杯茶，或者确切地说，是几十亿杯茶。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南亚地区，将其视为自己的封地，该公司每年从中国运往伦敦的茶叶价值达2300万英镑。虽然利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无意于进口英国制造的商品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只需要银子。东印度公司感到筹措可维持贸易的资金颇为困难。当商人们意识到，不管中国政府需要什么，中国人民总会需要些别的东西时，他们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鸦片。最好的鸦片种植在印度，而印度正是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在广州——一处外商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港口，商人们出卖鸦片换取银子，再用这些银子去购买茶叶，最后再在伦敦高价销售茶叶。

然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导致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在贸易中同样如此。印度人食用鸦片，英国人则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大约消耗10～20吨（有些是用于镇静婴儿）。这两种食用方式只产生轻微的镇静作用，足以使古怪的诗人灵感大发，或者刺激公爵、伯爵们沉湎于酒色，但不足为虑。可是，中国人吸食鸦片。其中的差异，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一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战争，不久便演变成了个人对决——在道光皇帝的禁烟力将、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舰长之间。当义律意识到自己行将失败，他怂恿英国毒贩向林则徐交出令人咋舌的1700吨鸦片，并向这些毒贩保证，英国政府将补偿他们的损失。毒贩们并不知道义律是否有权做出如此保证，但他们还是将补偿诺言照单全收了。林则徐收缴了鸦片，义律保全了面子，也维持了茶叶贸易，而毒贩们则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补偿（加上利息和运费）。每个人都是赢家。

这里说的每个人，要除去英国首相墨尔本。墨尔本不是赢家，他得找到200万英镑来补偿毒贩的损失。区区海军舰长让堂堂首相如此难堪，听来未免匪夷所思，但是义律清楚，他可以依靠财团游说议会以弥补损失。于是，围绕着墨尔本，各种复杂的人际、政治、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使得墨尔本别无选择，唯有先付清这笔钱，然后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迫使中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被缴造成的损失。

这可不是大英帝国最为辉煌的时刻。要寻找当代的例子进行类比是不可能准确的，就好比为了反击美国禁毒署突击搜查毒品的行动，蒂华纳贩毒集团劝说墨西哥政府一路杀进圣迭戈，要求白宫赔偿毒品大亨被缴可卡因的损失（加上利息和运费），并承担远征军的开支。试想，就在我们身边，一支墨西哥舰队占领了卡塔利娜岛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基地，并威胁封锁华盛顿，直到国会给予蒂华纳毒品大亨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毒品专卖权。

当然，其中的差异是，墨西哥绝不可能炮轰圣迭戈，而在1840年，

英国却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英国战舰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中国的海防，耆英被迫签订了一份屈辱的条约，开放中国的通商口岸并允许传教士进入。道光皇帝的后妃并没有被掳去伦敦，如同作者在本书开头所假想的艾伯特亲王进京那样，但是，鸦片战争还是击垮了道光皇帝。他使3亿臣民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背叛了两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传统。他应该感觉一败涂地——中国四分五裂，毒品成瘾者人数大幅飙升，整个国家如脱缰之马失去控制，传统习俗土崩瓦解。

在这个风云动荡的世界上，一个科举落榜的书生洪秀全崭露头角。他在广州城外长大，四次进城赶考，又四次落榜。最后，在1843年，他心力交瘁，被抬着回到了家乡。在高烧的幻梦中，天使带着他翩然飞升到了天堂。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据说是他兄长的人，他们在长须飘飘的父亲的注视下，并肩与魔鬼战斗。村里没人能解读他这个梦的含义，好几年了，洪秀全似乎忘了这个梦。直到有一天，他翻开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他在去广州应试途中别人发给他的。



图A-2 并非最辉煌的时刻：**1842**年，英国舰船炸毁长江上的中国战船。图中最右端是“复仇女神”号，世界上第一艘铁甲战舰

那本小册子是对基督教《圣经》的诠释，洪秀全意识到，其中蕴藏着破解他那场幻梦的钥匙。显然，梦中的兄长正是耶稣，而洪秀全则是天父的中国儿子。梦中，洪秀全和耶稣齐心协力将魔鬼逐出了天堂，这个梦似乎昭示着天父希望洪秀全将魔鬼逐出人世。洪秀全将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与儒家学说杂糅在一起，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愤怒的农民和游民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云集响应。到了1850年，他的乌合之众击垮了前来镇压的组织涣散的清军。他顺应天父的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他分田地，立法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甚至禁止缠足。

在19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人在枪炮声中自相残杀，打响世界上第一场现代战争时，中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用的是大刀和长矛，打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场传统战争。这场传统战争的残忍恐怖程度，使得那场现代战争难以望其项背。战争共造成20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西方外交家和将军利用这场混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东亚地区。1854年，为了寻求加利福尼亚与中国之间的装煤站，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口岸。1858年，英、法、美三国又从中国攫取了新的特权。可想而知，咸丰帝对毁了他父亲道光帝的洋鬼子恨之入骨，现在则忙于镇压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军，设法逃避新条约的束缚。但是咸丰帝举步维艰，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提供了他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英法联军开进北京城，咸丰帝颜面尽失地逃往热河。

英法联军随后放火焚毁了风景秀丽的圆明园，这让咸丰帝认识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对紫禁城也可以一焚了之。咸丰帝投降了，他的颓废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此蛰伏不出，也不面见群臣，终日沉湎于大烟与女色之中以求慰藉。他于一年后驾崩。数月后，艾伯特亲王也离开了人世。艾伯特亲王长年累月地告诫英国政府糟糕的排污系统会传播疾病，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死于温莎城堡肮脏的下水道带来的伤寒。更悲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这位与她的丈夫一样深爱现代管道系统的女王，在她丈夫去世时，正在盥洗室里。

痛失一生的挚爱，维多利亚女王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但她也并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英国军官向她献上从北京圆明园劫掠来的珍玩——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叫这只狗“洛蒂”。

苏格拉底和孔子：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吗

为何历史会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把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让它与维多利亚女王相伴终老，而不是让艾伯特亲王去北京研习儒家学说？为什么在1842年，是英国舰船横冲直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国舰船驶入泰晤士河？或者更明确地说，西方缘何主宰世界？

要说西方“主宰”，可能语气上听起来有些强硬，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西方”（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述及），自1840年以来，西方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运作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许多年长者一定还记得，1975年美国人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撤兵，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厂将它们的西方对手挤出行业。很多人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购之物皆是中国制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那样：“我穿着你们的衣服，说着你们的语言，看着你们的电影，就连今天是什么日期，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派去的部队抢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经史无前例地主宰了全球。

乍看起来，这一任务似乎并不艰巨。几乎人人赞同西方主宰世界，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8世纪，是英国企业家释放出了蕴藏在蒸汽与煤炭之中的无穷威力。工厂、铁路和舰炮给予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全球的能力，而飞机、电脑和核武器则使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巩固了这一统治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义律舰长没有迫使首相墨尔本插足发兵，英国可能不会在那年攻打中国；如果钦差大臣林则徐更注意加强海防，英国军队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得手。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论时机何时成熟，不论哪位君主在位，不论谁赢得选举，不论谁领兵打仗，西方终将在19世纪操得胜券。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1898年总结得恰到好处：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故事终。

然而，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西方拥有马克沁机枪，而其他地方没有？这是我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告诉我们，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然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关注西方缘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一现状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存在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即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当20世纪缓缓过去，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在21世纪早期，它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每6年就会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指望着中国，而非欧美，重新点燃世界经济的引擎。2008年，中国主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两个中国“太空人”成功进行了太空行走。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西方战略家担心美国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还能保持多久，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之差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大多拒绝谈论未来。

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学者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

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我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无长物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我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

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就算历尽波折，往往最后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瞄准中国的军舰。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1]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30，85英尺[2]的船长还不及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舵杆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著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3]（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孟特儒[4]（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理论。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我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Bin Wong）[5]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

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却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6]，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

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英亩[7]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的形态。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籍。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

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组织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己动手，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著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我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我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

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间，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我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1775年的1000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几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程。然而，描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能够揭示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本身。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是傻子。”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8]，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

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型类人猿到变形虫的更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9]。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定义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

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个眼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有时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下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发展停滞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10]。

地理因素也会如此重要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在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很多年来，人物——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

人组成，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作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做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动物和植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大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

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集中之地。由于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我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11]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我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我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大陆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我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我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理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

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000年，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12]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东部的核心地带。

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后发优势”[13]，它同社会发展一样历史悠久。当农业村寨开始转变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在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为商路的大河。当国家不断扩张，拥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后来居上的是拥有金属矿藏、更长的贸易线路，或者人力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所需资源也发生了改变，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也蕴藏着优势。

蕴藏于落后之中的优势是如何逐渐展现出来的，往往很难预见，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可以等量齐观的。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种植园要比北美农场更有前景。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海地变成了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地区，而美国则最为富裕，但要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十分困难。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每个核心地带最为

发达的地区总是因时而异的。在西方，在早期农业时代，最发达之处是侧翼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它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和埃及；再后来，随着贸易与帝国地位的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之处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时起时伏，部分是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动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带的分布各不相同；部分是因为在这两个核心地带，扩张和抢占新资源的过程既猛烈又动荡，将发展的悖论推演至极致。例如，公元前2000年西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贸要道，而且也成为毁坏之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移民、亡国、饥荒和瘟疫引发遍及核心地带的崩溃。而并不拥有这种内海的东方，则未经历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严重动摇。

在后来的3000年中，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结果不断变化。地理因素决定了在世界什么地方社会发展脚步最快，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刻，连接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极为重要的。当17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的时候，那些处于开发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们——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还有以前曾被英国人殖民的美国人——创造了全新种类的帝国和经济，并释放出蕴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将会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洞悉世界进程的脉络

随后的章节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讨最为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西方？我们的故事从何讲起？主宰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判断谁处于领先位置或者主宰位置？在第一章中，我从故事的生物学基础讲起，评述人类如何进化，以及现代人类如何遍布地球。在第二章中，我追踪冰河时期之后原始东方核心地带和西方核心地带的形成和发展。在第三章中，我宕开一笔，界定社会发展的含义，并且解释将如何用社会发展来衡量东西方差异[14]。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我将详细追踪东西方的历史，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解释了东西方的相似与差异。在第四章中，我将审视国家最初的兴起，以及公元前1200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带遭受的巨大破坏。在第五章中，我将思考最初的东西方大帝国的社会发展如何逼近农业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然后，在第六章中，我将讨论公元150年以后横扫欧亚大陆的大崩溃。在第七章中，出现了转折，东方核心地带开拓新的疆域，引领社会发展。到了大约1100年，东方再次逼近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看到，这将如何导致第二次大崩溃。在第九章中，我将描述在恢复过程中，东西方如何在干草原上和跨过海洋开拓新的疆界，并考察西方是如何缩短与东方的发展差距的。

最后，在第十章中，我们将看到，工业革命是如何将西方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主宰地位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转向对史学家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又怎样？在第十一章中，我将从过去15000年的万千历史细节之中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两套法则——生物学法则和社会学法则——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形态，而第三套法则——地理学法则——决定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正是这些法则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长期注定的因素，或者短期偶然的因素，把京巴狗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

这不是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在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或者盲目的随机事件中寻找解释，而不是关注确凿的物质现实世界，少数人一谈起规律法则就哑口无言。但是，在考虑并剔除某些备选因素之后，我将更进一步，在第十二章中指出，历史的规律事实上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到了西方主宰阶段，历史并没有终结。发展悖论和后发优势仍然在起作用，创新推动着社会发展，而毁坏则使之倒退，这两股力量仍然在角逐。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角逐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的类型的发展和毁坏预示着——或者威胁着——它们不仅会改变地理学，而且会改变生物学和社会学。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

[1] 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船员早在15世纪就到达了美洲。但是，正如我将要在第八章中论述的，这一说法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这种假想的航程，最可能作为证据的是一张世界地图，2006年曾在北京和伦敦展出。主办方声称，这是一幅1418年中国原作的复制品，绘于1763年。这张地图与真正的15世纪的中国地图迥然不同，而与18世纪法国的世界地图极为相似，比如将加利福尼亚描绘成一个岛屿。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位18世纪的中国地图绘制者综合了15世纪的中国地图和新近得到的法国地图绘制而成。绘图者或许并不想欺骗任何人，但是21世纪那些汲汲于耸人听闻的发现的收藏家们，却心甘情愿地欺骗了他们自己。

[2]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3]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译者注

[4] 孟特儒二世，阿兹特克人的第九代首领，西班牙占领墨西哥初期的统治者。——译者注

[5] 王国斌2005年离开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但只搬迁了40英里（1英里≈1609米），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还有个合著者：詹姆斯·李（James Lee），后者任教的地方离欧文分校也只有40英里，即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7] 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8] 作为学术的生物学是一片极为广阔的领域，本书采用的是生态/进化视角，而不是分子/细胞视角。

[9] 我使用“社会学”作为缩略术语，用以描述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主要是那些概括所有社会如何运转的分支学科，而不是那些聚焦于社会差异的学科。这条定义超越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传统的学科界限，着重强调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尤其是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

[10]地理学，同生物学和社会学一样，是个庞大而定义宽泛的领域（事实上，它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纷纷取消了地理系，因为这些大学认为地理学根本算不上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我更多地采用的是人类/经济地理视角而不是物质地理视角。

[11] 19世纪以来，人们将这一地区误称为“中东”。

[12]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国境内。习惯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用美索不达米亚来指称公元637年阿拉伯入侵以前的这一地区，之后则称为伊拉克。

[13]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国境内。习惯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用美索不达米亚来指称公元637年阿拉伯入侵以前的这一地区，之后则称为伊拉克。

[14] 我从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处借用了这一术语，尽管后者使用这一术语的方式与我略有差异。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溯源：东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长岁月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后来居上：东方领先的世纪
第五章 东方的周朝、秦朝，西方的亚述帝国和罗马帝国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溯源：东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长岁月

西方是什么

“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他便厌倦了生活，因为生活所能提供的，伦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种思潮，每一种新奇的发明，都使约翰逊博士的家乡充满活力。伦敦有大教堂和皇宫，公园和河流，高楼大厦和贫民窟。最重要的是，伦敦有可以购买的商品——花色之齐全，种类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时代的人们最为天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致的淑女和绅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马车，选购新奇的商品，如雨伞（这是18世纪60年代的发明，英国人立刻发现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两者都是那个10年里的新产品）。不仅仅是富人在享受这种新的消费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惊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里消磨时光，穷人把下午茶称为“必需品”，而农民的妻子则在购买钢琴。

英国人开始感到，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苏格兰智者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国称作“小店主之国”，但他的本意是赞美。斯密坚信，英国人对自身福利的重视使得每个人更加富有。他说，只要想想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反差就知道了。长久以来，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土地丰饶，文化灿烂，人民勤劳，人口众多”，但是已经“在法律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富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也没有余地”。简而言之，中国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境地。“劳动力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预测道，“将很快使他们沦落到普通人类生存的最低水平”，结果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程度，将远远超过欧洲最为贫困的国家……任何腐肉，例如死猫死狗的残骸，虽然臭气熏天，招人厌恶，但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食物一样”。

约翰逊和斯密是言之有理的。虽然在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但在英国，人们的平均收入比中国更高，收入分配也更均衡。关于西方主宰地位的长期注定理论往往是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的，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我们需要上溯更长的时间——或许要长得多——来解释它。

我们需要这样做吗？历史学家彭慕兰（我曾在前言部分提到过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坚称，亚当·斯密和他之后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拿错误的东西进行比较。彭慕兰指出，中国的广袤和多样与

整个欧洲大陆相当。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单独挑出来，同整个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英国将胜出。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长江三角洲地区（18世纪70年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与整个欧洲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长江三角洲会胜出。彭慕兰认为，较之将英国与欧洲不发达地区相比，或者将长江三角洲与中国不发达地区相比，18世纪的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处——产业主义萌芽、市场繁荣、有着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思考太过草率，长期注定派理论家们把事情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如果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是如此相似，彭慕兰评论道，那么对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解释就必须是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提出这一问题，事情就复杂了。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西方”这一问题，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是出于一种本能。有些人将西方等同于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还有一些人想到的则是世俗的理性主义。事实上，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种关于西方的学术定义，并用他所称的“弹性地理”统一在一起。每一种定义都赋予西方不同的形态，而这一定会造成混乱，关于这一点，彭慕兰曾在书中抱怨过。戴维斯说：“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戴维斯的意思是，当我们着手定义西方的时候，“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知识建构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不过是任意地选取某一价值观来定义西方，声称某些特定国家是这一价值的典范，然后将这些国家与一些同样任意的“非西方”国家相比较，以得出我们想要的任何自圆其说的结论。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可以直接选用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西方性的典范，拿一些不同的国家来代表这一价值观，再选取一个不同的对照组，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不同的但是同样自圆其说的结论。

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我想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径，我不会一开始就从结论出发，先臆断西方价值观，然后回溯历史寻找其根源。我将从最初开始探寻，一路往下，直到我们看见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从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现。然后，我将把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区中最西端的称为“西方”，最东端的称为“东方”，以地理标记来区分东西方，而不是通过价值观进行判断。

想要从头开始是一回事，可要真正寻找到这个源头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将看到，在遥远的过去，学者们曾多次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定义东西方，这些学者否认我在前言部分提出的观点，即群体的人类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认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在基因上要优于其他地方的人。一些持类似观点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某些地区自洪荒之时起便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地区。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些观点，因为如果我们

一开始就在这里走错一步，那么在关于历史形态以及未来形态的问题上，我们就会谬以千里。

元初之时

关于万事万物的起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说。但是在过去一些年内，天体物理学家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科学解释。现在大多数专家认为，时间和空间开始于130亿年前，虽然关于时空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他们之间还存在争议。在众多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宇宙膨胀理论，该理论认为，宇宙最初从一个极其致密微小的点开始膨胀，膨胀速度超过光速；而与宇宙膨胀理论相抗衡的周期循环理论则认为，这个宇宙的出现始于上个宇宙的坍塌。两个理论一致认为，我们的宇宙还在继续膨胀。但是，宇宙膨胀论者认为，膨胀仍会继续，恒星会湮灭，最终永恒的黑暗和寒冷会降临。而周期循环论者则认为，宇宙会自行收缩，然后再度爆炸，开始另一个新的宇宙。

除非接受过经年累月的高等数学训练，否则很难弄明白这些理论的意义，但幸运的是，我们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追溯至那么早。当方向和自然的法则都不存在的时候，本无所谓东方或者西方。在45亿年前，也就是太阳和地球形成之前，东方和西方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概念。或许在地壳形成后，或者至少在大陆漂移到了它们现在的位置之后（那是在几百万年前），我们才能谈论东方和西方。但是事实上，以上这些讨论都偏离了主题。对于本书的问题来说，只有加入另一个要素——人类之后，东方和西方才有意义。

研究早期人类的古人类学家比历史学家们更喜欢争论。他们研究的领域十分年轻，并且瞬息万变，新的发现不断地推翻已经确立的事实。如果两个古人类学家同处一室，他们可能带着三个人类进化理论走出房间，而就在关门的刹那，一切又都落伍了。

人类与前人类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一旦猿能够直立行走，就意味着人类的诞生。从髋骨和趾骨的化石来看，某些东非猿类从六七百万年前便已开始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专家觉得这一标准太低了。事实上，生物学上准确的人类界定标准是，脑容量从400～500立方厘米增至大约630立方厘米（我们的脑容量通常是其两倍），并且能制造粗糙石器（这是直立行走猿人的第一证据）。大约距今250万年前，这两个过程发生在了两足东非猿类身上。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从事发掘工作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将这些脑容量相对较大并且使用工具的生物称为“能人”。

当能人行走于大地之上的时候，东方与西方的区分还没有多大的意

义。首先，这是因为这些生物只生活在东非的森林里，还没有演化出区域性的变种。其次，因为“行走在大地上”这一表述过于笼统了。能人同我们一样有脚趾和脚踝，当然也能行走，但他们有长臂，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在树上。这些只是想象中的猿人，仅此而已。能人制作的石器留在动物骨骼上的印记表明，他们既食用肉类，也食用植物，但是看起来他们仍然处于食物链的低端。有些古人类学家坚持狩猎者理论，认为能人既聪明又勇敢，仅凭棍棒与石头便能杀死猎物。但另一些人（或许更可信）则认为能人是食腐者，追随诸如狮子等真正的杀手，以它们丢弃的残余食物为食。显微镜下的观察表明，能人所使用的工具在动物的骨骼上留下的印记至少在鬣狗牙齿之前。

25000代来，能人奔跑穿梭于世界一隅的林间，他们削制石器，互相梳理毛发，求偶交配。然后，在大约180万年前，他们消失了。目前所知道的是，他们消失得很突然，但是很难精确地确定消失的时间，而这正是研究人类进化史的一大难题。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化石或工具所在的岩石层中含有不稳定的放射性同位素，这种同位素的衰减速度是已知的，因此，通过测量同位素之间的比例，就能确定具体的时间。然而，这样确定的时间的误差范围可以有上万年，所以当我们说能人突然消失，“突然”一词既可能指几代人，也可能指几千代人。

当19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尔文思考自然选择的时候，他认为，进化是通过微小变化的自然累积实现的。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认为进化是这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化都十分细微，然后某一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大变化。进化论者现在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渐变论（这被批评者讥称为“匍匐式进化”）更符合进化的一般模式；另一派则赞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跳跃式进化”）。但是，在能人绝迹的问题上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大约180万年前，东非的气候变得更干燥，开阔的热带大草原取代了能人先前居住的森林，正是在那时，新型猿人[1]取代了能人的位置。

我暂不为这些新型猿人冠名，现在仅仅指出，他们的脑容量要大于能人，通常为800立方厘米。他们不像能人那样拥有长长的、黑猩猩般的手臂，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地上活动。他们的身材也更为高大。从肯尼亚的纳利奥克托米出土的一具150万年前的骨架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5英尺高的孩子，他如果活到成年，身高能达到6英尺。他的骨骼不仅更为修长，而且不如能人的骨骼坚固，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同代人更多的是依靠智慧和工具而生活，而不是倚仗蛮力。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聪明不言自明是好的。那么，既然能人有变聪明的潜力，为什么却在“突然”转变为更高大、脑容量也更大的生物之前，白白消磨了50万年之久？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使一个硕大的脑袋运转，代价是高昂的。我们的大脑重量一般占我们体重的2%，却要消耗我们能量的20%。大脑袋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需要一个硕大的颅骨才能装得下大脑——事实上，由于脑袋太大，

现代女性分娩时胎儿的脑袋很难顺利通过产道。因此，事实上妇女通过早产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胎儿在子宫里待到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如同其他哺乳动物那样），那么他们的脑袋就会大到无法分娩。

但是，充满风险的分娩、经年累月的滋养、消耗掉1/5食物的大脑，这些我们都能接受——无论如何，这要比消耗同样多的能量去发育爪子、更多肌肉或者巨大的牙齿要好。比起这些因素，智力对人更有益。但不太明了的是，为何几百万年前会发生基因突变，赋予猿人更大的大脑，使他们获得了足以弥补多消耗的能量的优势。如果变得更聪明得不偿失，聪明的猿类将无法赛过他们蠢笨的亲戚，他们的聪明基因也将很快从种群中消失。

或许我们应该将原因归结为天气。当久旱不雨，猿人们栖身的树木开始枯死，更聪明合群的变异体会比他们那些更像猿类的亲戚占优势。这些聪明的猿类没有在草原上绝迹，而是设法生存了下来。然后，就在一眨眼之间（从进化的时间量程上来看），一小撮变异体将他们的基因扩散到了整个种群，最终完全取代了脑袋愚笨、身形瘦小、喜爱居住在树林中的能人。

东西之始？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太狭窄了，还是因为群内纷争，或者仅仅是因为好奇，这些新型猿人是第一批离开东非的此类生物。从非洲大陆南端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到处都发现了他们的骨骼。但是，我们不应把大批猿人的迁移想象成类似西部片中的场景。猿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不自觉的，并且穿越这么漫长的距离需要花费非常漫长的时间。从奥杜威峡谷到南非的开普敦是很长的一段距离——足足有2000英里，但要在10万年内（显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走完这么长的路，猿人们只需要平均每年将觅食范围拓展35码[2]。以同样的速度向北迁移，他们将到达亚洲的门户。2002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德马尼西出土了一块170万年前的颅骨，这块颅骨兼具了能人和新型猿人的特征。在中国发现的石器和在爪哇岛（那时与亚洲大陆相连）发现的化石年代可能差不多同样久远，这说明离开非洲大陆后，猿人加快了迁移，平均速度达到了每年140码。[3]

实际上，要想区分东西方生活方式，只能等到猿人离开了东非，散布到远至中国的温暖的亚热带地区。东西之别可能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到160万年前，在考古记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东西方模式。问题是，这些对比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我们应当设想其背后是两种判然有别的生活方式。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哈勒姆·莫维斯（Hallam

Movius）注意到聪明的新型猿人骨骼往往与新品种的石器碎片同时发现，此时考古学家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方的差异。考古学家们将这些石器中最具特点的称为阿舍利手斧（称其为“斧”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斧头，尽管它们显然是用于切割、戳刺、捣碎和劈斩的；称其为“手斧”是因为它们是手持的，而不是捆在棍棒上；称其为“阿舍利手斧”是因为此类石器的首次大量发现是在法国小镇圣阿舍尔）。把这些工具称为艺术品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它们简单对称的外形比能人的粗糙石片和石刀要美观得多。

莫维斯注意到，尽管阿舍利手斧在非洲、欧洲和西南亚极为普遍，在东亚和东南亚却未曾发现。而在东部地点出土的工具要较为粗糙，很像前阿舍利时期与非洲能人有关的发现。

如果所谓的莫维斯分割线真的标志着区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开始，这也可以算是个令人惊奇的长期注定理论——认为猿人离开非洲后，他们的文化便分裂为两种：一种是在非洲和西南亚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技术上领先的文化；另一种则是在东亚以石片和石刀为代表，技术上落后的文化。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难怪今日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已达150万年之久。

然而，发现莫维斯分割线比解释它要容易。发现于非洲的最早的阿舍利手斧，距今约有160万年，但在那之前10万年，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便已有猿人存在。显然，在阿舍利手斧变成最初猿人的日常工具之前，他们便已离开非洲，他们带着前阿舍利时代的技术穿越亚洲，而西方/非洲地区则继续发展阿舍利时期的工具。

但是，莫维斯分割线并没有把非洲同亚洲分割开来，这条线实际上穿越了北印度。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在阿舍利手斧发明之前，最初迁移的猿人便离开了非洲，所以肯定有后续的移民浪潮涌出非洲，把手斧带到西北亚和印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后续移民浪潮里的猿人，为何没将阿舍利时期的技术带到更远的东方？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莫维斯分割线并不是技术领先的西方和技术落后的东方之间的界限，而仅仅分割了易于获取制作手斧所需石材的西方地区，和不易获取此类石材，却容易获得竹子（它结实耐用却不易保存，因而考古发掘中不易发现）等其他材料的东方地区。根据这一解释，当手斧的使用者们跨越了莫维斯分割线，他们便逐渐放弃了阿舍利时期的工具，因为旧的工具坏了以后无法更新。他们继续制造石刀和石片，因为这类工具用旧卵石就可以制作，而原来需要用石质手斧完成的工作，他们现在则可能用竹器取而代之。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中国南部的百色盆地的一些发现支持这一论点。大约80万年前，一块巨大的陨石撞击了这里。这一撞击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灾难，大火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在撞击之前，生活在百色盆地的猿人像其他东亚地区的猿人一样，使用石刀、石片和（假定）竹

器。大火之后，他们回到百色盆地，开始制作和阿舍利时期十分相似的手斧——根据这一理论，有可能大火燃尽了这一地区的竹子，同时将可用的鹅卵石暴露于地表。几个世纪后，当植被又重新生长起来，当地人便不再制作手斧，重新使用竹器。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只要条件允许，东亚的猿人也完全可以制作手斧，但是他们通常不这么做，因为其他材料更易获得。石质手斧和竹器只是做同样工作的两种不同工具，并且不论是在摩洛哥还是马来半岛，猿人的生活方式都大致相同。

这一说法言之成理，但是，既然是史前考古学，还有其他看待莫维斯分割线的思路。到此为止，我尚未给出使用阿舍利手斧的猿人的命名，现在，给他们命名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古人类学家把这种大约18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的新型猿人称为“直立人”，并断定这些生物在亚热带地区漫游，并到达了太平洋沿岸。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开始研究非洲发现的直立人颅骨与东亚地区发现的直立人颅骨的微小差异。这些专家怀疑，他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猿人。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名称——“匠人”，用于指代那些18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然后一直散布至中国的猿人。他们认为，仅当匠人到达了东亚地区，直立人才从匠人进化而来。因此，直立人是个纯粹的东亚人种，区别于遍布非洲、西南亚和印度的匠人。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莫维斯分割线就不仅标志着使用工具类型的细微差异，还是区别两种不同的早期猿人的基因分水岭。事实上，这一论断所提出的可能性，可以称为长期注定理论之祖：东西方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100多万年以来，东方人和西方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种类的人类。

最早的东方人：北京人

这一关于史前人类骨骼分类的技术争论，有着令人警醒的潜在影响。种族主义者往往急于抓住这一细节大做文章，为偏见、暴力甚至种族灭绝正名。读者可能会感到，花时间论述此类理论仅仅是为顽固的偏见提供依据，或许我们应该直接将之忽略不提。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仅仅将种族主义理论宣称为可鄙的，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摒弃这些理论，并且得出结论说，（群体的）人们事实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必须是因为种族主义理论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些理论。

基本上，我们并不清楚，在大约150万年以前，地球上是否仅存在一种猿人——意思是说从非洲到印度尼西亚，（群体的）猿人是大致相

同的——或者，在莫维斯分割线以西与莫维斯分割线以东，分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猿人，即匠人与直立人。要想澄清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毫无疑问，在过去100万年内，在东方与西方，确实进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猿人。

地理因素很可能发挥了很大作用。大约170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出来的猿人十分适应亚热带环境，但是当他们向北漫游，深入欧洲和亚洲时，他们不得不面对更为漫长、严寒的冬季。当他们行进到大约北纬40度的地方（这条纬度线横贯葡萄牙顶端到北京）时，像他们的非洲祖先一样露天而居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据我们所知，他们当时的智力还不足以建造棚屋和制作衣物，但是他们可以想出一种应对之策——栖身于洞穴中。这样，我们儿时所闻的穴居人就诞生了。

穴居生活对于猿人来说是福祸交加，他们常常不得不与熊和大如狮子的鬣狗相处，后者的牙齿足以咬碎骨头。但这却给考古学家们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因为洞穴能够很好地保存史前堆积物，使我们得以追寻猿人是如何在旧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开始分化演进，最终成为寒冷气候中的不同变异体的。

要想理解东方猿人，最重要的考古地点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周口店正好位于北纬40度纬度线上，从距今41～67万年前，断断续续地有猿人居住于此。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可以称得上是部史诗，这也构成了谭恩美（Amy Tan）的出色小说《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的部分背景。1921～1937年间，正当欧洲、美国和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中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那里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派国内军阀残酷内战的前线。考古发掘人员常常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工作，并且不得不躲开强盗和哨卡，把他们的发现运回北京。当日本侵略中国时，这一考古发掘计划最终付诸东流，周口店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基地，日本军队还残害了三名考古队的成员。

形势江河日下。1941年11月，日本与美国即将开战，这些考古发现资料被运往纽约保管。技工将资料装入两个大板条箱内，等待装到美国使馆派来的车中。没人确切地知道，那辆车来了没有，或者，如果那辆车真的来了，它又将那两个大板条箱运到了何方。有一种说法是，正当日机轰炸珍珠港之时，日本士兵截获了护送资料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他们逮捕，并丢弃了无价的资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生命如草芥，没人关注几箱石头和骨头。

但并非一切尽失。周口店考古队巧妙地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并将猿人骨骼的石膏模型送到了纽约——这是证明数据备份重要性的早期案例。这些发现表明，到了距今60万年前，北京人（这是考古发掘队员对周口店猿人的命名）已经从图尔卡纳男孩那样身材高大瘦长的非洲人中分化出来，变得更为矮胖结实，以更好地适应寒冷气候。北京人的身高通常在5英尺3英寸，毛发比现代猿类要少，尽管如此，如果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个北京人，你一定会张皇失措。北京人的脸短而宽，前额又低又

平，有着粗大的眉骨，下颚很大，几乎没有下巴。

北京人之间的交流很困难。据我们所知，直立人的基底核（大脑的一个部位，负责使现代人一系列小的嘴部动作组合成无数言辞）发育很不完善。保存完好的图尔卡纳男孩的骨架显示，他的椎管宽度（脊髓所在之处）只有现代人的3/4，这表明他无法精确地控制呼吸，像我们一样随心所欲地交谈。

尽管如此，其他发现间接地表明，生活在旧世界东方的猿人能够互相交流，但只是勉强为之。1994年，在爪哇岛附近的一个叫弗洛勒斯的小岛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批石器，看起来有80万年的历史。80万年前，弗洛勒斯一定是个小岛，12英里的海域将它与大陆分隔开来。这一切似乎意味着，直立人一定能够很好地交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制造船只，驶过地平线，移居弗洛勒斯岛。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则不赞同直立人制造船只这一说法，他们反对说，这些“工具”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工具，只是被自然作用撞击成了一定的形状，从而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这一争论本来很可能陷入僵局，因为考古学的争论往往如此，但是在2003年，弗洛勒斯岛又有了更令人震惊的发现。深度探测发现了8具骨架，年代都在公元前16000年左右，都是成人的骨架，身高都在4英尺以下。那时，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电影《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刚刚推出了第一部，记者们立刻把这些身材矮小的史前人类称为“霍比特人”，这一名称取自该电影原著作者英国作家J·R·R·托尔金（J.R.R.Tolkien）笔下覆着毛发的半身人。当动物种群被隔绝于岛上，又没有天敌，它们往往进化成身材矮小的模样，据推测，这可能就是霍比特人身材如此矮小的原因。如果在公元前16000年，他们身材已经缩小至霍比特人这么大，猿人一定在此之前数千万世代就已移居到弗洛勒斯岛上了——据1994年发现的石器显示，可能早在80万年前他们便已移居至此了。这再次说明了，直立人能够很好地交流从而越过海洋。

周口店的猿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效果应该比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要好得多，山洞中的沉积物显示，他们还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至少有一次，北京人烘烤一匹野马的头。野马颅骨上的切痕表明，北京人食用马舌和马脑，这些都是马头上富含脂肪的部位。他们可能也喜欢食用同胞的大脑：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掘人员从骨头破裂的痕迹判断，他们甚至同胞相食，享用人脑。但是20世纪80年代对北京人骨骼石膏模型的研究则表明，颅骨上的大多数裂痕是由史前巨兽鬣狗的牙齿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北京人留下的，不过有一块颅骨——1966年又出土了它的另一块碎片——确实带有石器的印记。

你当然不可能在现代大街上撞见一个北京人，但你可以乘坐时光机器返回50万年前的周口店，那将是一次令人迷惑而惊恐的经历。你将看到穴居人类互相交流，可能是边打手势边嘟哝作声，但是你无法与他们

交谈。你也无法通过画画与他们交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艺术对于直立人的意义比对于黑猩猩的意义大多少。在旧世界的东方进化的北京人与现在的我们迥然不同。

最早的西方人：尼安德特人

但是，北京人与在旧世界的西方进化的猿人也有所不同吗？年代最久远的发现来自欧洲，是1997年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一系列洞穴中发现的，距今大约80万年（与直立人可能造船移居弗洛勒斯岛的时间大致相当）。在某些地方，阿塔普尔卡的发现与周口店的发现颇为类似，很多骨骼上留有纵横交错的石器刻痕，很像是出自屠夫之手。

猿人可能存在同胞相食的消息登上了报纸头条，但是古人类学家对于阿塔普尔卡人与周口店猿人的区别更为激动。阿塔普尔卡人颅骨上的凹处比直立人更大，他们的鼻子和颧骨也更接近现代人。古人类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一种新的人种出现了，他们把这种人称做“前人”。

前人的出现使得1907年以来的一系列发现有了意义，当时技工在德国的一处沙坑中翻出了一块奇怪的下颚骨。这一人种以发现地附近的一个大学城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看起来很像直立人，但是他们的头更像现在的我们，有着又高又圆的颅骨，脑容量大约为1000立方厘米——比直立人800立方厘米的平均脑容量要大得多。看起来，80万年前猿人穿越旧世界进入寒冷的北方，遭遇了迥异的气候条件，结果产生了大量随机的基因变异，从而加快了进化的步伐。[4]至此，我们终于有了些无可争议的事实。到了60万年以前，当海德堡人登上历史舞台，北京人统治着周口店的栖息地之时，在旧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人种：在东方有脑容量较小的直立人，在西方则有脑容量较大的前人和海德堡人。

说到大脑，容量并不是一切。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脑容量并不比海德堡人大。但是，海德堡人看起来确实比更早期的猿人，或者与他们同时期的北京人要聪明得多。在海德堡人出现以前的100万年间，石器几乎没发生多少变化，但到了公元前500000年，海德堡人开始制作更薄也更轻便的石器，用软锤（很可能是木制的）打造更为精巧的石片，而且仅仅通过撞击石头制作石器。这意味着更好的手眼协作能力。海德堡人会制作更专门的工具，他们开始准备形状特殊的石核，并进一步加工成适当的工具。这意味着，在思考他们需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方面，他们比直立人进步得多。海德堡人能在海德堡这个北纬40度线以北很远的地方生存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是聪明得多的猿人。

在距今41～67万年之间，居住在周口店的猿人变化很少，而西方的

猿人在这一时期则持续演进。如果你深入西班牙阿塔普尔卡阴湿的洞穴，匍匐行进数百码（主要是爬行，有时也使用绳索），你会在一个40英尺骤降处进入名副其实的“万骨坑”——有史以来发现的猿人遗迹最为丰富密集的地方。在这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发现了超过4000件猿人骨骼碎片，年代在距今56.4~60万年之间。这些骨骼大多数属于青壮年。他们在地下这么深处做些什么，始终是个谜，但和更早的阿塔普尔卡遗址一样，万骨坑也有着十分多样的人类遗骸。西班牙考古发掘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类为海德堡人，但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他们看起来更像另一种人种——尼安德特人。

这些最著名的穴居人是在1856年首次被确认的，当时尼安德谷（德语中称为Tal或Thal）采石场的工人们向一名当地教师展示他们发现的一块头盖骨和15块骨头（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工作从当时的废石堆中又出土了62块猿人骨骼碎片）。这名教师将这些残骨给一名解剖学家看，后者判定，这些骨头属于“日耳曼人以前”的时期。

阿塔普尔卡的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是在25万年间逐渐演化而来的。这可能只是一个遗传漂变的案例，许多不同种类的猿人同时进化，而不是由于气候变化或者扩张进入新的区域为一些变异体更快繁衍提供了条件从而取代了海德堡人。“标准的”尼安德特人在20万年前出现，在接下来的10万年之内，他们散布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东至西伯利亚，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并没有到达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有多大的差异？他们与东方猿人的身高大致相当，看起来更原始，前额倾斜，颏骨无力。他们有硕大的门牙，因为经常当工具使用而磨损。面孔前突，可能是为了适应冰河时期欧洲寒冷的空气。他们的鼻子很大。尼安德特人比北京人身材更为健硕，臀部和肩膀都更宽。他们同摔跤运动员一般强壮，拥有马拉松运动员的耐力，看起来似乎是凶残的斗士。

尽管尼安德特人的骨头比大多数猿人要重得多，他们还是经常受伤；如果为他们骨断裂的方式找个最近似的现代的例子，那就是职业骑手。由于10万年前他们不太可能从猛然弓背跃起的野马背上摔下来（现代马类直到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出来），古人类学家坚信，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搏斗而受伤的——既同彼此搏斗，也同野生动物搏斗。他们是专心致志的猎手，他们骨骼中的氮同位素分析显示，他们大量进食肉类，从中获取数量惊人的蛋白质。长期以来，考古学家怀疑尼安德特人吃的有些肉是通过同胞相食的方式获取的，就像北京人一样，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发现表明，6个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和5只马鹿的骨骼混杂在一起。这些猿人和马鹿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被用石器切成小片，然后他们的肉被从骨头上削下来，最后他们的脑壳和长骨被敲碎以取出脑和骨髓。

迄今我强调的细节使得尼安德特人听起来和北京人相差无几，但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点是，尼安德特人脑容量很大——比我们

的脑容量还大，事实上，他们的脑容量平均在1520立方厘米左右，而我们的脑容量大约为1350立方厘米。他们的椎管也比图尔卡纳男孩要宽，这些粗大的脊髓赋予他们更为灵巧的手艺。他们的石器比北京人制作的更为精良，种类也更为丰富，有专门的刮器、锋刃和尖端。在叙利亚曾发现过一块石器的尖端，嵌在一头野驴的颈部，上面有柏油涂抹的痕迹，表明这曾是一个缚在木棒上的矛尖。石器上的磨损痕迹说明，尼安德特人主要用石器来切割木头，而木头很难保存下来，但在被水淹没的德国考古地点舍宁根，在堆积的野马骨旁，发现了4根雕工精美的7英尺长矛。长矛很重，被用于戳刺，而不是投掷。虽然尼安德特人很聪明，但他们还没学会互相协作使用投掷武器。

可能是因为尼安德特人要靠近恐怖的动物，所以他们身上才会留下骑手般的伤痕，但是有些发现，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的发现，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启示。一具骨架表明，一名男性在一条手臂萎缩、双腿变形的情况下生活了数年，他还失去了右前臂和左眼[在琼·奥尔（Jean Auel）的畅销小说《洞熊家族》（*The Clan of the Cave Bear*）中，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克莱伯——一位生活在克里木半岛的残疾的尼安德特部落精神领袖——就是以这具骨架为原型的]。在沙尼达尔发现的另一名男性，右踝因关节炎而致残，但他也挺了过来，直到因一处戳伤而丧命。有更大的脑容量无疑有助于虚弱受伤的人们自力更生。尼安德特人能够随意生火，很可能还会用动物皮制作衣物。同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身体健全的朋友和家庭的帮助，沙尼达尔人将如何渡过难关。即使最一丝不苟的科学家也赞同，尼安德特人——与早先的人类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周口店猿人相比——表现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道”的精神。

有些古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硕大的大脑和粗大的脊髓使得他们多多少少能够像我们一样交谈。像现代人一样，他们有舌骨，这样就可以固定舌头，使得喉咙可以做发言所需的一系列复杂动作。但是，也有些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虽然硕大，却比我们的更长，也更扁平，所以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可能发育得不是那么完善。他们还指出，虽然只有三块颅骨，但相关区域还是残存了下来，看起来尼安德特人的喉在颈部很高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尽管他们有舌骨，但只能发出为数很少的声音。或许他们只能嘟哝单音节（我们可将之称为“我泰山，你简”模式），或者他们可以通过边打手势边发声表达重要概念，如“过来”、“我们打猎去吧”、“我们做石器/做饭/做爱吧”（我们可将之称为《洞熊家族》模式，其中尼安德特人有复杂的符号语言）。

到了2001年，遗传学似乎可以解决问题。科学家发现，一个英国家族三代人都患有一种被称为语音产生不能的言语障碍，他们都有一个变异的基因FOXP2。研究表明，这一基因为影响大脑处理语音和语言的蛋白质编码。这并不意味着FOXP2是“语言基因”：言语是极端复杂的过程，无数基因协同工作，其原理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明了。FOXP2基因之所以引起遗传学家的注意，是因为只要一处出了差错，整个系统就会崩

溃。只要一只老鼠咬断了价值两美分的电线，我那价值两万美元的汽车就没法发动；FOXP2基因出了故障，大脑复杂的言语网络就运转不灵了。有些考古学家则认为，可能就是产生FOXP2和相关基因的偶然变异，赋予了现代人类语言能力，而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早前的物种都不曾拥有这一能力。

但是事情到了这里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基本构成，2000年，遗传学家们成功绘制出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序列图。但鲜为人知的是，退回到1997年，发生了类似于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中的一幕，德国莱比锡的科学家从1856年尼安德谷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手臂上提取出了古老的DNA。这实在是惊人之举，因为人一旦死亡，DNA便开始分解，在如此年代久远的材料上，只有少量碎片残存。据我所知，莱比锡小组并不想克隆穴居人，建一个尼安德特人公园[5]，但在2007年，绘制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过程（于2009年完成）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尼安德特人也有FOXP2基因。

这可能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像我们一样爱闲聊；也可能意味着，FOXP2基因不是言语的关键所在。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但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关注尼安德特人互动的结果。他们生活的群体比早先的猿人更大，狩猎更为有效，占据地盘的时间更长，互相关心的方式也是早先的猿人所不能企及的。

他们也会慎重地埋葬一些死去的同伴，甚至可能还举行某些祭奠仪式——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的话，这意味着精神生活，这是最早的属于人类的最显著特征。例如，在沙尼达尔，几具遗骸明显是经埋葬的，有一个墓中的泥土富含花粉，这可能意味着，有些尼安德特人将他们亲爱的逝者的遗体安放在铺满鲜花的花床上。也有些考古学家不那么浪漫地指出，这个墓被老鼠挖成了蜂窝状，而老鼠经常将花朵运回它们的巢穴。

在第二个案例中，在罗马附近的奇尔切奥山，1939年，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在5万年前被大量落石封存。工人们告诉考古学家，在地上的一圈石头中间有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颅骨，但是因为在专家看到以前，工人们动过那块颅骨，很多考古学家对此存疑。

最后，还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特锡克塔什的案例。在那里，哈勒姆·莫维斯说，他发现一具男孩的骨架被五六副山羊角环绕着。但是，特锡克塔什的遗址满是山羊角，而莫维斯从未发表过关于该发现的计划或者照片，以说服怀疑者那些特定的山羊角组成了有意义的排列。

要想让这个问题尘埃落定，我们还需要更为明显的证据。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无风不起浪”，尼安德特人确实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生活。或许，他们甚至有像《洞熊家族》中的伊萨和克莱伯那样的女医生和巫师。不管那推断正确与否，如果我早前所说的时间机器能带你到沙尼达

尔和周口店，你将看到东方北京人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真真切切的行为差异。你可能很难避免做出如下论断：西方比东方更发达。

当160万年前莫维斯分割线形成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事实了，而10万年前这一定是事实。种族主义的长期注定理论的幽灵再一次抬头了：西方今天主宰着世界，是否是因为欧洲人是基因上占优势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而亚洲人则是更为原始的直立人的后裔？

欧洲人的祖先和亚洲人的祖先

不是的。

历史学家们喜欢对简单的问题做出长而复杂的回答，但是这次，问题似乎真的是简单明了的。欧洲人并不是优等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亚洲人也并不是劣等的直立人的后裔。大约从7万年前开始[6]，一种新的人类——我们——迁移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种[7]。这种人种，即“智人”，将其他人种一扫而空：现在我们都是非洲人了。当然，进化还在继续，从我们开始散布遍及地球起，两千代人之间，肤色、脸形、身高、乳糖耐受度以及无数其他方面都在发生着本土化变异。不过当我们认真研究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做些什么，（群体的）人们总是大致相仿的。

我们这个人种进化并占领了地球，使得人类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就为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提供了基础。人类生物学上的统一性否定了这些基于种族立场的理论。但是，尽管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许多问题仍然不甚明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们知道，与我们相仿的骨架最初出现于距今15万年前左右的东南非。新人种与早先的猿人相比，有着更为扁平的面部，前额之下缩得更明显。他们较少用牙齿做工具，四肢更修长而且上面的肌肉更少，他们的椎管更宽，喉咙的位置更利于言语。他们大脑的凹处比尼安德特人要小些，但头盖骨更高，形状更接近于穹顶，这样就为大脑更大的语音和语言中心留下了空间，也更利于安放层层叠叠同时进行大规模运算的神经元。

骨骼表明，最早的智人可以像我们一样行走，但奇怪的是，考古发现表明，有10万年的时间他们顽固地拒绝像我们一样说话。智人的工具和行为很像早先的猿人，并且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是，早期智人似乎只有一种行事方式。不管考古学家们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们总是获得同样的、不那么令人激动的发现，除非他们发掘的智人遗址年代在距今5万年以内。在这些年代较近的遗址，智人开始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并且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埃及的尼罗河谷，考古学家们至少发现了6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使用中的石器，年代在

公元前50000 ~ 公元前25000年之间，而在此之前，从南非到地中海沿岸只流行一种样式的石器。

人类发明了样式。把石器这样切割，而不是那样切割，使一群人和他们的邻居区别开来；把石器以第三种方式切割，使一代人和他们的长辈区别开来。按照我们习惯的标准，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拿出一部用了四年的手机，不能拍视频，不能查地图，不能收邮件，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老古董，但与过去的一切相比较，这种变化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回到家，头发染成了绿色，身体上又新穿了孔，他会告诉你，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是装饰自我，但直到5万年前，似乎没有人这么看。后来，显然每个人都这么看。

在年代为公元前50000年之后的一个又一个非洲考古地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装饰用的骨骼、动物牙齿，还有象牙。这些还是有迹可循的活动。其他我们所熟知的个人装饰形式，如发型、化妆、文身、服饰等，很有可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一个令人不快的遗传研究显示，生活在我们衣服中并吸我们血的体虱，在大约5万年前进化而来，像是给最初“时尚人士”的礼物。

“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当哈姆雷特的朋友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来监视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么的高贵！禀赋多么的无穷！行动多么的迅捷，外形多么的可赞！举止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上帝！”在这么多方面，人与猿人有多么不同。到了公元前50000年，现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似乎发生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平素清醒持重的科学家都开始使用浮夸的言辞。有些人说起了大跃进，还有些人说起了人类文明的曙光，甚至还有人说是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尽管如此具有戏剧性，这些理论总是有点不那么令人满意。这些理论要求我们设想两大转变，而不是一大转变，即在大约15万年前，第一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塑造现代人类的行为；到了大约5万年前，第二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发生改变。最广为人知的解释是，第二次转变仅仅从神经方面的变化开始，重塑了大脑的内部线路，使得现代的言语成为可能，进而推动了行为的革命。但是这次对大脑内部线路的重塑包括哪些内容（以及为何颅骨没有发生相应变化），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果说进化论科学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留有某些余地的话，某种超能力将一点神性之光吹入猿人迟钝的泥坯之中，显然就是在这里。当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亚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令人难忘、难有后继的电影版开篇的那个故事。神秘的水晶巨石从外层空间坠入地球，使得我们星球上的猿人在饿死灭

绝之前跳跃式进化。夜复一夜，月球守望者，这个地球居民中的猿人首领，当巨石发送给他幻象并教会他投掷石块的时候，感觉到克拉克所说的“好奇的卷须状物沿着大脑未曾使用过的通道悄悄爬下”。克拉克写道：“他简简单单的大脑中的原子被扭曲，构成新的模式。”于是，巨石的使命完成了：月球守望者捡起一根丢弃的骨头，用它敲击一头小猪的脑袋致死。令人沮丧的是，克拉克眼中的人类意识大爆炸仅仅包括杀戮，以月球守望者杀死敌对部落的猿人首领单耳告终。读者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们处于太空时代。

克拉克把他的2001年设置在300万年以前，可能是为了把能人发明工具涵盖在内，但是我经常感到，一块巨石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应是在完全现代的人类出现之时。到了我上大学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已经知道不应做此评论，但是这样一种感觉仍然很难动摇，即专业解释比起克拉克的解释来，要无趣得多。

在我读大学本科的那些遥远日子里，考古学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发掘出很多年代在距今5～20万年之间的考古遗址。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发现的积累，一切开始变得明朗起来，我们毕竟不需要巨石。事实上，大跃进也开始分解为一系列的向前蹒跚学步，跨越数万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知道几处年代在公元前50000年以前的考古遗址，那里有令人惊奇的、看起来颇为现代的行为迹象。就以平纳克尔角为例，这一山洞在南非海岸，发掘于2007年。大约16万年前，智人移居这里。这本身就颇为有趣：早期猿人一般忽视沿海地点，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在此找到食物。然而，智人不仅向海滩走去——这是极为现代的行为——而且当他们到了海边，他们足够聪明，会采集、打开并烹制贝类。

他们还把石头削成又小又轻的尖头，考古学家们将之称为似石叶，很适合作为标枪或者箭矢的尖端——这是北京人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从未做过的事。

在其他的一些非洲考古遗址中，人们从事着不同的、但是看起来同样极具现代感的活动。大约10万年前，在赞比亚的蒙布瓦洞穴，人们在一组壁炉边排上石板，营造舒适的小角落，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们坐在一起讲故事的情形。从非洲南端到北边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甚至在非洲之外的以色列），在几十个非洲沿海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当时的人们耐心地将鸵鸟蛋壳切割琢磨成小珠子，有些珠子的直径只有1/4英寸。到了9万年前，刚果卡坦达的人们已经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渔夫，他们会把骨头雕刻成鱼叉。然而，最有趣的考古遗址还要数非洲南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那儿除了蛋壳制作成的珠子，考古发掘者还发现了一根有7.7万年历史的赭石棒（赭石是一种铁矿石）。赭石可以用来把东西粘起来，制作防水帆，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用途。但近来赭石特别流行的用途是画画，它能在树皮、洞壁和人体上绘制令人满意的粗重的红色线条。在平纳克尔角共发现了57根赭石棒。到了公元前100000年，大多

数非洲考古遗址都有赭石棒出土，这很可能意味着早期人类喜爱画画。但关于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赭石棒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上面刻了一个几何图形，这使得它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品——并且它是用来制作更多艺术品的。

在这些考古遗址中的每一处，我们都发现了一两种现代人类行为的蛛丝马迹，但并不是公元前50000年后我们熟悉的一整套活动。现在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看起来极具现代感的行为是与日俱增的，它们逐渐累积，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寻找答案，来解释这些走向完全现代人类的蹒跚学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气候变化所致。

地理学家们意识到，回溯至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发现的蜿蜒数英里的碎石带，一定是冰盖推动碎石形成的（而不是像以前推测的那样由《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形成）。“冰河时期”的概念由此产生，虽然科学家们要弄明白冰河时期为何产生，还要再过50年。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并不是标准的圆形，因为地球还受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在10万年间，我们地球的公转轨道从近乎正圆形（如同现在的样子）到椭圆形，然后再循环往复。地轴的倾斜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周期是2.2万年；地球围绕地轴自转也会呈现周期性变化，周期是4.1万年。科学家们将这些周期性变化称为米兰柯维奇循环，以计算出这些周期的塞尔维亚数学家米兰柯维奇（Milankovich）的名字命名。米兰柯维奇在“一战”被软禁期间，一笔一画计算出这些循环周期（这是个宽松的软禁，米兰柯维奇有充裕的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中工作）。这些循环周期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大约每隔10万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从接受比平均量稍多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稍有不均，到接受比平均量稍少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较为均衡。

米兰柯维奇循环如果不是与其他两个地理趋势相互作用，它可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第一个趋势是，在过去5000万年中，大陆漂移使得赤道以北陆地更多，北半球以陆地为主，南半球以海洋为主，这就扩大了日照的季节性变化效应。第二个趋势是，在同一时期火山活动减弱。（目前）我们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比恐龙时代要少，因为这一原因，地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直到不久前——逐渐降温。

在地球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冬季非常寒冷，两极降雪，雪水冰冻起来，但是一般来说，每年夏季太阳都会将冰雪融化。但是到了1400万年前，火山活动的减弱使得地球急剧降温，导致在有着大片陆地的南极，夏季的阳光无法融化冰雪。北极没有陆地，冰雪更易融化，但到了275万年前，气温已经降到了连北极也常年积雪的地步。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一旦米兰柯维奇循环使得地球接受的日照更少，全年日照分布更为平均，北极冰盖就会扩张至北欧、亚洲和美洲，锁住更多水分，使得地球更为干旱，海平面更低，反射更多日照，气温进一步降低。然后地球便随着这一循环进入冰河时期，直到地球摇摆，倾斜，运

转至更温暖之处，冰川后撤。

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已经历的冰河时期的数目在40～50个，其中跨越公元前190000～前90000年的两个冰河时期——这是人类进化史上至关重要的几个千年——特别的严寒难熬。例如，马拉维湖今天的水量仅有公元前135000年时的1/20。更为严酷的环境必然改变了生存的规则，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变异大量产生。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特别少，很可能大多数人类始祖死亡殆尽。事实上，有些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估计，在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存活于世的智人可能仅有两万人。

如果这一新理论成立的话，人口危机会产生几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基因库的缩水，更易产生大量变异；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智人群落变得更小，他们就更易灭绝，任何变异带来的优势也就随之消失了。如果（从这一时期数量极少的考古遗址看来）智人群落数也减少了，群落间相遇的频率就会降低，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的机会也就更少。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10万年间，在非洲恶劣难测的环境中，人类始祖的小小群落挣扎度日，勉强维生。他们并不常相遇，不常互相通婚，也不常交换物品和信息。在这些相互隔绝的群体中，基因变异层出不穷，有些产生了很像我们的人类，有些则不。有些群落制作鱼叉，有些制作小珠子，但大多数群落这两样都不做，灭绝的幽灵始终萦绕着这些群落。

这是智人的黑暗岁月，但大约7万年前，他们的运气发生了改变。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变得更为温暖和潮湿，这使得狩猎和采集更容易，人类同他们的食物来源一样快速增长。现代智人已经进化了10万年，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灭绝危险，但是一旦气候条件改善，那些拥有有利的基因变异的人群就会更快速地繁衍，超过不那么聪明的人类。没有巨石，也没有大跃进，有的只是大量的性爱和婴儿。

在几千年间，早期人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既是人口统计学上的转折点，也是生物学上的转折点。早期人类再也没有如此频繁地灭绝，相反，他们的群落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早期人类可以经常保持联系，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变异开始积累起来，智人的行为很快从其他猿人中分化出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西方生物学差异的出现便指日可待了。

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吗

气候变化往往是很复杂的，当7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智人的家乡变得更为湿润时，北非则面临干旱。我们的祖先在家园范围之内迅速繁衍，决定不向北非散布。智人的小群落从今天的索马里出发开始漫游，跨越大陆桥到达阿拉伯南部，然后到达伊朗。至少，我们认为他们做到

了。南亚的考古探索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有些现代人类的群落也朝这个方向迁移，因为到了公元前6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尼西亚，并乘船穿越50英里的开阔水面，漫游至澳大利亚南部的蒙戈湖。这些移居者的移动速度比直立人/匠人离开非洲时要快上50倍，与早期猿人每年35码的移动速度相比，他们的速度超过每年一英里。

在距今40万～50万年前，第二次移民潮很可能穿越埃及，到达西南亚和中亚，并从那儿进一步散布至欧洲。这些现代人类足够聪明，会制作精巧的石刃和骨针，他们用猛犸象的象牙和毛皮缝制合身的衣物并建造房屋，在西伯利亚这样一个寒冷的荒原上建起了家园。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人类跨越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然后/或者沿着大陆边缘作短程航行。到了公元前12000年，他们在俄勒冈州的洞穴中留下粪化石，并在智利的山间留下海藻。（有些考古学家认为，人类还沿着当时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冰盖边缘穿越了大西洋，但目前为止这仅仅是个推测。）

东亚的情形不甚明了。在中国柳江出土的一块完全现代人类的颅骨可能有6.8万年的历史，但是关于这一时间的确定还有些技术问题，没有争议的时间最多仅能上溯至公元前40000年。现代人类到达中国的时间是较早还是较晚，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证明[8]，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公元前2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日本。

不管新的人类到达哪里，他们看来都带来了大破坏。当智人到达的时候，那些早期猿人从未涉足的大陆有着丰富的大型猎物。最早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人类，遭遇了400磅[9]重的不会飞的鸟和一吨重的巨蜥；到了公元前35000年，这些动物灭绝了。蒙戈湖和其他几处考古遗址的发现表明，人类到达那里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00年，这意味着人类和巨型动物群共存了2.5万年，但是有些考古学家对于这一时间尚有争议，他们把人类到达的时间推后至距今4万年前。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那么巨兽在人类到达以后十分可疑地迅速消失了。在美洲，1.5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移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遇到了骆驼、大象和地面生活的大型树懒。在短短4000年之内，这些动物也全都灭绝了。智人的到来和巨兽的灭绝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巧合。我接下去将述及这一问题。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人类狩猎这些动物从而导致它们灭绝，或者人类将这些动物赶出它们的领地。而且关于它们为何灭绝的其他解释（如气候变化，或者彗星撞击）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当现代人类进入了猿人占据的环境，猿人便灭绝了，关于这一事实的争议较少。到了公元前35000年，现代人类进入了欧洲，在一万年内，欧洲大陆除了边远山区之外的其他地方，尼安德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0年。在统治了欧洲15万年之后，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然而，现代人类如何取代猿人的细节问题，对于决定西方主宰的种族解释是否成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尚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主动杀

死了智力不如我们发达的猿人，还是仅仅在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赛过了他们。在大多数考古遗址，现代人类遗迹直接取代了那些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遗迹，这意味着改变是在突然之间发生的。主要的例外是法国的驯鹿洞穴，在那里，在距今3.3万～3.5万年之间，由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交替占据，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残留层包括棚屋的石基、骨具，还有动物牙齿制成的项链。考古发掘工作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向现代人类学习，正迈向尼安德特人觉醒的曙光。在法国的几处尼安德特人考古遗址发现的赭石（在其中一个洞穴里发现了20磅之多）可能也指向这一点。

很容易想象，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尼安德特人看到动作灵敏、言谈自如的新到访者在身体上绘画并建造棚屋，于是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这些动作，或者用猎物的肉与新到访者交换首饰。在《洞熊家族》中，琼·奥尔想象现代人类傲慢地将尼安德特“平头家伙们”赶走，而尼安德特人则试图对“他者”敬而远之——除了艾拉，一个现代人类的小女孩，5岁的孤儿，尼安德特人的洞熊部落接受了她，结果是翻天覆地的。当然，这些都只是想象，但是这同任何其他人的猜想一样貌似可信（除非我们接纳那些一点也不浪漫的考古学家的观点，认为考古发掘工作匆忙草率，是造成驯鹿洞穴尼安德特人遗迹和现代人类遗迹交错模式的最合理解释，意味着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平头家伙们”向其他人学习）。

要点在于性。如果现代人类没有通过异种繁衍取代旧世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直立人，种族主义理论将现代西方的主宰地位上溯到史前的生物学差异，便肯定不能成立。但果真如此吗？

在20世纪30年代，即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坚称，现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原始，因为他们的颅骨与北京猿人近似（头顶有小的隆起，脸的上半部分相对扁平，颌骨不突出，门牙呈铲状）。这些人类学家还指出，澳洲原住居民的颅骨同100万年前的印度尼西亚直立人近似——同样有着附着颈部肌肉的背后脊状突起，像搁架似的眉毛，后缩的前额，还有硕大的牙齿。这些（西方）学者总结道，现代东方人一定是更为原始的猿人后代，而现代西方人则是更为先进的尼安德特人后代，这就解释了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今天没人如此草率地做出论断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探求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便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智人与前现代人类异种通婚繁育后代，而东方人则在生物学上比西方人原始。我们不可能发掘出正在交媾的穴居人化石，以证明智人是否与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交流基因，或者与东方的北京人交流基因，但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如此做。如果这样的约会的确发生过，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观察结果。

我们每个人都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DNA，这意味着遗传学家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在世的人的DNA，利用画族谱的方式追溯到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但事实上，由于你身体里的DNA有一半来自你母亲的家族，另一半则来自你父亲的家族，这使得破解遗传信息困难到了不可能的地

步。

遗传学家们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绕开这一问题，这就是关注线粒体DNA。线粒体DNA不像大多数DNA那样有性繁殖，而是仅通过母本继承（男性继承他们母亲的线粒体DNA，却不遗传下去）。我们曾经一度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所以线粒体DNA在你我身体中的任何不同一定是偶然变异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有性繁殖导致的。

1987年，遗传学家丽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领导的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全世界在世的人的线粒体DNA。他们在数据中区分了大约150种类型的线粒体DNA，并且意识到不管他们怎样处理统计数据，总会得到三个关键结果：第一，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基因更为多样；第二，世界其他地方基因多样性仅仅是非洲基因多样性的子集；第三，最深远也就是最古老的线粒体DNA谱系都来自非洲。他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最近一个女性始祖一定曾经生活在非洲——这个女性始祖被冠名为“非洲夏娃”。通过卡恩和她的同事的观察，“非洲夏娃”是个“幸运的母亲”。在对线粒体DNA的变异率进行标准估测后，他们得出结论，“非洲夏娃”生活在20万年以前。

整个20世纪90年代，古人类学家们就卡恩小组得出的结论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方法（制作族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理论上一样有效），也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证据（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多数“非洲人”事实上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不管是谁重做样本和数据，得到的结果都大致相同。唯一确实的变动是将“非洲夏娃”的生活年代后推到了距今15万年前。问题的解决在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技术的进步允许遗传学家们检验Y染色体上的核DNA时，“非洲夏娃”有了伴侣。同线粒体DNA一样，Y染色体上的核DNA是无性繁殖的，但仅通过父本遗传。研究发现，Y染色体上的核DNA同样在非洲有最丰富的多样性和最深远的谱系，这些证据指向一个生活在距今6万年至9万年前的“非洲亚当”和一个大约在5万年前的非非洲变种祖先[10]。基因数据似乎完全支持这样一个论断：每个今天在世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没有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尼安德特人或者北京猿人的血液。

但是有些古人类学家还是不予置信，坚持认为遗传学的可信度不如他们观察到的西方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东方智人与直立人骨骼上的近似度。他们提出一个“多区域模型”以取代“走出非洲”模型。他们不情愿地承认，或许人类最初的蹒跚学步确实发生在非洲，但是在此之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间的人口迁移造成了快速的基因流动，某个地区有益的基因变异很快在几千年内到处扩散。结果是，略有差异的现代人类在世界几个地方同时分别进化。这可以同时解释骨骼和基因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东方人与西方人在生物学上确实是不同的。

和许多理论一样，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是模棱两可的。有些中国科学家坚称，中国是个例外，因为正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所载的：“现代中国人类发源自现在中国的所在区域，而不是非洲。”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证据逐渐不利于这一论断。在欧洲，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与我们的线粒体DNA完全不同，这似乎否定了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异种通婚的假说。甚至连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异种通婚，后来偶然灭绝了，所以我们的基因库里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一说法看起来也不能成立：2003年，遗传学家在欧洲从距今2.4万年的智人骨骼中提取出了线粒体DNA，它与我们的线粒体DNA高度一致，却与尼安德特人的毫不吻合。

在东亚，关于远古的DNA的分析要少些，但是已经完成的研究似乎也排除了异种通婚的可能性。一项Y染色体核DNA研究的作者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数据表明，原始人类完全不可能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东亚现代人的始祖。"基因数据看起来是明确的了。智人从非洲进化而来，并没有——或者不能——与猿人异种通婚。

争论还在进行着，直到2007年，周口店新出土的牙齿和许昌新出土的颅骨碎片，还被作为现代人类是从中国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证据。然而，即便这些发现公开发表，其他学者还是给了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通过极为复杂的多元回归分析，分析了从6000多个颅骨上测得的数据，分析表明，当控制了气候因素这一变量，全世界颅骨类型的变异事实上与DNA分析所得证据是一致的。我们都是非洲人。在过去6万年内，我们从非洲散布出去，把过去50万年内出现的所有基因差别一扫而空。事实上，种族主义理论将西方主宰地位归结为生物学因素是毫无根据的。不管在哪里，群体的人们总是大体相同的，我们从非洲祖先那里继承了相同的躁动不安、善于创造的头脑。生物学本身无法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

史前毕加索们

那么，如果种族主义理论不能成立，东方与西方到底从何处开始？100多年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没有生物学这个因素，他们也已经自信地断言，自从现代人类出现以来，欧洲人便在文化上比东方人优越。使他们确信的证据在1879年开始出现。达尔文发表于之前20年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使得寻找化石成了绅士们一项体面的爱好。像与他同一阶层的许多人一样，唐马塞利诺·桑斯·德·索图欧拉（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在他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上寻找穴居人。有一天，他和女儿探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对于8岁大的小孩来说，考古并没有多大乐趣，所以当索图欧拉的眼睛紧紧盯着地上的时候，他的女儿小玛丽亚开始跑来跑去玩起了游戏。很多年以后，她对一位记者说："突然，我认出了洞顶上的外形和轮廓。"她喘着气惊呼："爸爸，看，公牛！"

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梦想着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那一

刻，面对着令人敬畏的惊人发现，完全难以置信，时间停下了脚步，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事实上，没有多少考古学家有过这样的一刻，甚至或许没有一个有过类似的一刻。索图欧拉看到了野牛、鹿，层层叠叠的色彩丰富的动物图案覆盖了洞穴顶部20平方英尺的面积，有些蜷缩着身子，有些在互相嬉闹，还有些则在欢快地跳跃（见图1-1）。每一个都绘制得优美而生动。当毕加索多年后造访这一考古遗址时，他惊得目瞪口呆。“我们中没有人能够那样作画，”他说，“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

玛丽亚回忆道，索图欧拉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但很快他变得“非常兴奋”，“几乎不能作声”。他渐渐说服自己，这些壁画真的是远古时期留下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有些壁画的历史在2.5万年以上）。但是，回到1879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事实上，1880年，当索图欧拉在里斯本的国际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大会上提交他的这一发现的时候，专家们哄笑着将他轰下台去。那时候，人人都知道，穴居人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精湛的艺术作品。他们一致认为，索图欧拉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索图欧拉将这嘲笑视为对他尊严的攻击。8年后，他精神崩溃，离开了人世。他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毁了他的人生。



图1-1 “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8岁的玛丽亚·桑斯·德·索图欧拉在1879年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壁顶公牛岩画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毁了她父亲的人生，也使毕加索惊叹得无法呼吸

直到1902年，索图欧拉的主要批评者才实地造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并且公开认错。自那以后，又发现了数百个绘有史前壁画的洞穴。壁画最为壮观的洞穴之一是法国的肖维洞，直到1994年才被发现。洞内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看起来好像壁画作者刚刚出门去看一眼驯鹿，随时都会回来似的。肖维洞穴的一幅画作有3万年历史，它是西欧现代人类的最早遗迹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发现过与这些洞穴壁画类似的东西。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泯灭了莫维斯分割线带来的一切差异，也将先前猿人种族间的差异一扫而空。3万年以前，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一种独具创造性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史前毕加索，我们应当从中探明独特（而优越）的西方传统吗？

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或许藏在严寒的南极洲荒原。那里每年都降雪，将先前的雪覆盖，积压成层层的薄冰。这些冰层就像是远古时候天气的编年史。通过将它们分离，气候学家可以测量这些冰层的厚度，告诉我们下了多少雪；建立氧同位素间的平衡，揭示温度；比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阐明温室效应。但是在冰盖上钻芯取冰是科学上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2004年，欧洲的一个小组成功提取了差不多两英里深的冰芯，年代可以上溯到75万年前，时间之久远令人吃惊。尽管冬季的气温骤降至零下58华氏度[11]，并且从未高于零下13华氏度，并且在1999年，钻头卡住了，科学家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在最后的几百码还不得不用一个装满乙醇的塑料袋权且替代钻头，但他们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这些科学超人从冰芯中提取出来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情：阿尔塔米拉的艺术家们生活的世界是很寒冷的。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气温又开始骤降，大约两万年前，即用赭石和木炭在洞穴壁上涂鸦的艺术家数量多得空前绝后之时，最后一个冰河时期达到了严寒的顶点。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4华氏度。这导致了惊人的变化。数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亚洲北部、欧洲和美洲，锁住了大量的水分，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300英尺以上。你可以从非洲走到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却看不到海洋。你不会希望造访这些地方，在冰川边缘，狂风呼啸，卷起的沙尘暴肆虐广袤贫瘠的干草原，这些干草原冬季寒冷，夏季荒芜。甚至在最适宜人居住的地区，即赤道南北40度范围之内，夏季苦短，降水稀少，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下降，阻碍了植物生长，也使动物（包括人类）种群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情况的严峻程度，与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前不相上下。

当时，在今天的热带地区，生活不像西伯利亚那样艰难，但是不管考古学家们审视哪个地方，他们发现，人们适应冰河时期的方式都大体相似。他们结成小部落而居。在寒冷的环境中，12个人就算得上一个大部落了；而在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聚居部落的规模可能是前者的两倍。他们知道了不同的植物什么时候成熟，在哪里能找到这些植物；动物何时迁徙，在哪里能截获这些动物。他们到处追踪搜寻这些动物和植物。不知道这些的人就会挨饿。

这些小部落挣扎求生，繁衍后代。像现代边缘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们一样，他们一定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交换配偶，交易物品，讲述故事，或许还对着他们的神、鬼怪和祖先说话。这些聚会将会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社交大事。当然，我们仅仅是在猜测，但是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西欧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每个人都披上他们最好的兽皮，戴上最好的珠子，脸上画

上画，竭尽所能装饰他们神圣的聚会地点，使这些地方非同寻常。

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果纵观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都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只在西欧发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传统的回答是，欧洲人比其他人在文化上更具创造力，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还能更进一步，改变这一观点。欧洲艺术史并不是从肖维洞穴到夏加尔（Chagall）一脉相承，放眼尽是旷世之作。公元前11500年之后，洞穴壁画便绝迹了，到我们所知的能与之媲美的画作出现，又过去了许多个千年。

在3万年以前的欧洲创造力传统中寻找源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传统已经断绝了几千年。或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洞穴壁画传统为何断绝了，因为我们一旦提出这一问题，便会意识到，史前欧洲的这些惊人发现，同任何特殊的西方文化一样，与地理和气候因素大有关系。

冰河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是绝佳的狩猎之所，在那里，一群群驯鹿从夏季牧场迁徙到冬季牧场，然后再返回。但在大约1.5万年前，当气温开始回升（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有更多论述），驯鹿冬季不再向南迁徙到这么远的地方，猎人们也随之北迁。

就在这时，西欧洞穴壁画衰落了，这不能说是个巧合。提着油脂灯，拿着赭石棒，在地下艰难行进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大约在13500年以前，最后一个艺术家也离开了。当时这名最后的艺术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在那一天，古老的传统断绝了。洞穴中黑暗降临，几千年来，只有蝙蝠和滴水打破坟墓般的死寂。

公元前11500年之后，为何美丽的洞穴壁画没有随着猎人追踪驯鹿的步伐一路向北，穿越欧洲？或许是因为北欧的猎人没有如此方便的洞穴可以绘画。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有着为数众多的幽深的石灰石洞穴，而北欧要少得多。史前人类对他们聚会之所的装饰很少能保存下来，留待我们去发现，除非狩猎之处正好有幽深的洞穴。如果不巧狩猎之处没有幽深的洞穴，人们的聚会场所就会更靠近地面，或者就在地面之上。经过两万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淋，他们的艺术作品能残存于世的，已经很少了。

但是，“遗迹很少”不等于“荡然无存”，有时我们还是能很幸运地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纳米比亚的阿波罗11号洞穴，绘有犀牛和斑马的石板从洞壁剥落，掉落到地上，在距今19000～26000年形成的沉积物之下得以保存。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发现的年代甚至更为久远。在桑迪河洞壁的一处雕刻上形成的矿物沉积物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0年前，而颜料残迹则有26000～32000年的历史。在卡彭特山口，绘有岩画的洞壁部分掉入有4万年历史的居住区碎石土中，这块壁画的历史甚至比肖维洞穴还要久远。

从美学意义上讲，非洲与澳洲发现的例子都无法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最好作品媲美，还有很多西欧以外的幽深洞穴没有壁画（如周口店，两万年前又有猿人在此居住）。如果声称人类对于洞穴绘画艺术都投入了同样多的精力，这显然是个愚蠢的说法，更不必说所有的艺术传统都同样成功了。但是鉴于保存条件，以及考古学家们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寻找的时间更长，也更努力，其他大陆保存下来的作品说明了，现代人类，不管身处何方，都有创造艺术的强烈愿望。当洞穴壁画的条件不像西欧那么理想时，人们就把精力投入其他媒介上。

当洞穴绘画艺术在西欧兴盛之时，石制、黏土制还有骨制的人体和动物形态在东方区域更为普遍。如果条件允许，我可以展示几十幅精美绝伦的小塑像的照片，发现地从德国到西伯利亚，处处都有。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仅介绍最近的发现，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见图1-2）——一尊两英寸高的女性小雕像，无头而巨乳，雕于35000年前，以猛犸象牙雕刻而成。大约在相同的年代，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的马来亚思雅——那肯定是地球上最不宜居住的地点之一——猎人们在骨头上雕刻动物图案；到了公元前25000年，在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120多人的群体聚集在用猛犸象牙和象皮搭起的棚屋里，制作成千上万的小雕像，有雕动物的，也有雕巨乳女性的。东亚的艺术纪录还不多，但最早的发现——一尊鹿角雕刻的小鸟，或许有1.5万年的历史，是2009年在许昌发现的——雕工非常复杂，我们相信，进一步发掘将会揭示，中国也拥有欣欣向荣的冰河时期艺术传统。



图**1-2** 创作的冲动：一尊两英寸高、有**3.5**万年历史的巨乳无头“维纳斯”雕像，以猛犸象牙雕成，**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

冰河时期西欧以外的人类，虽然没有肖维洞穴和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条件，但他们显然为他们的创造力发现了其他宣泄渠道。关于较早期的猿人是否有创作的冲动，证据少得可怜，但是智人的想象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到了距今5万年前，人类的智能已经足以寻找世界的意义，而人类的技艺也足以将这些意义通过艺术（很可能，虽然我们无法观察到）、诗歌、音乐以及舞蹈表达出来。这再次说明了，（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尽管阿尔塔米拉洞穴艺术壮丽非凡，但它并不能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

在第一个猿人离开非洲的150万年后，技术、智力和生物的差异累积起来，将旧世界分为尼安德特人/智人的西方和直立人的东方。大约10万年前，西方以相对先进的技术和一丝人性之光为代表，而东方似乎愈加落后。但是当6万年前，完全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他们将这些差异一扫而空。当两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到达顶峰时，“东方”和“西方”只是日出日落的方位而已。人类的小部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散布于从英国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并且（相对）不久以后，跨入美洲——而不是互相分离。当植物成熟时，动物往来迁徙，各个小部落搜寻粮草，四处狩猎，在广大地区漫游。每一个部落一定会立刻熟悉自己的区域，讲述关于每块石头、每棵树的故事；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艺术和传统、工具和武器、神灵和魔鬼。每一个部落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神爱着他们，因为尽管有着诸多苦难，他们毕竟还活着。在这样一个寒冷、干旱的世界上，人类已经走得够远了。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脚下摇摆的地球，万物都将是静止的。

[1] “猿人”一词有泰山和简（Tarzan-and-Jane）的言外之意，我年轻时，这在教科书中颇受欢迎。现在古人类学家们认为这个词是屈尊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词很好地抓住了这些前人类/古人类的模棱两可性，并且很简洁。

[2] 1码≈0.9144米。——编者注

[3] 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一次跃进几英里寻找新的觅食之处，然后在那儿待上几年。

[4] 据此，海德堡人确实既在欧洲生活过，也在非洲生活过。有些古人类学家设想，海德堡人起源于欧洲，后来又散布到了非洲。而其他古人类学家则认为，海德堡人同能人和匠人一样，由于当地气候变化而在非洲进化，后来又向北散布。在中国也曾发现过极其类似海德堡人的骨骼，但那个证据颇受争议。

[5] 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祝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发布时说，只要投资3200万美元，我们就可以改造现代人的DNA，并将之注入一只黑猩猩的细胞中，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尼安德特人婴儿。所需技术还不成熟，但是，即使技术成熟了，在考虑是否运用它时，我们也会踌躇再三。正如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之一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质问一名记者的：“你想要把（尼安德特人）放在哈佛大学，还是放在动物园里？”

[6] 这一时间点的确定，综合了放射性碳定年法和所谓的分子钟法测得的证据，后者基于DNA的变异速度。就在2010年上半年，一些遗传学家争论说，我们把分子钟校错时间了，智人迁移出非洲的时间应在两万年之后，但迄今这只是少数派的观点。

[7] 有些孤立的种群，如弗洛勒斯岛上的霍比特人，可能不久以前还残存于世。当16世纪葡萄牙水手到达弗洛勒斯岛的时候，他们声称看见了身材矮小、毛发浓密的穴居者，这些穴居者几乎不能交谈。100多年后，据说类似的矮人在爪哇岛还存在。最近有人展示了他们的一根毛发，但是DNA测试表明，那完全是人类的毛发。有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会在爪哇岛的丛林中最终遇见这些前现代人类的最后残存。对此我心存疑虑。

[8] 有些中国考古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在中国独立进化。

[9] 1磅≈453.592克。——编者注

[10] 如果说“非洲亚当”的生活年代要比“非洲夏娃”晚10万年听起来很奇怪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名字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是最早的智人男性和女性，他们只是今天在世的人在基因上可以追溯的最近的祖先。平均算来，男性与女性拥有同样数量的后代（显然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但是每名男性拥有的孩子数量在平均值上下波动的幅度要比每名女性拥有的孩子数量波动更大，因为有些男性是几十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孩子的男性数量相对较大，这意味着男性的基因谱系比女性更容易断绝，所以在世的男性谱系交汇在比女性谱系年代更近的一个祖先身上。

[11] 1华氏度＝32＋摄氏度×1.8——编者注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两万年前那些颤抖地围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已经开始变暖了。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里，气候的变化加上他们迅速进化的大脑改变了地理，产生了直至今天都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的生活方式。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开始有了意义。

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两三个世纪里，由于覆盖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40英尺。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区域，即现在的黑海，在冰河时期曾是一个地势低洼的盆地，但是冰川径流将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这么大的洪灾需要诺亚方舟[1]才能拯救。在某段时期，海平面每天上升6英尺。每一天，湖岸都会向前推进一英里。现代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能与之相比。

地球的运行轨道变化使得气候冷热交替，收成时好时坏。图2-1显示了南极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后——此时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开始逐渐变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气候变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时间里，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5华氏度左右，直到变成现在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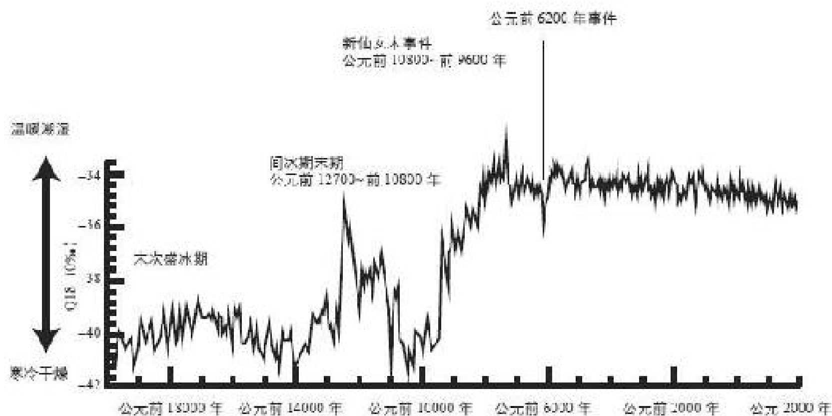


图2-1 冰里的故事：南极冰盖上气泡中的氧同位素比例，显示了两万年前温暖潮湿与寒冷干燥的气候在不停交替

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喜欢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从

伟大的上帝到最卑微的蚯蚓。无论是城堡里的富人，还是家徒四壁的穷人，他们在永恒的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过，我们最好想一想绝非永恒的能量之链。重力能构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汤变成了氢和氦，然后再把这些纯元素变成恒星。我们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将重力能变为电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则通过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电磁能转化成了化学能。动物吃掉植物，发生新陈代谢，把化学能变为动能。太阳和其他星球之间的相互引力决定了地球的运行轨道，从而决定了我们将得到多少电磁能，植物将产生多少化学能以及动物将从中转化多少动能。这些又决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链的形成。太阳光越多，意味着有越多的动植物，人类也就有越多的选择——选择食物的数量、工作的强度以及繁衍后代的数量。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小团体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选择结合起来，但是总体而言，人类推动能量之链的方式和动植物的方式极其相似：他们进行繁衍。公元前18000年左右的每一个人（可能有50万人），到公元前10000年时就有12个后代了。

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不同感受依赖于他们生活的不同区域。在南半球，海洋缓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北半球就不一样了。对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采集者来说，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对那些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们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冰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气候变暖意味着海平面的上升。每一年，当海浪淹没他们祖先的捕猎场所时，他们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2]。不过对于北半球的大部分人来说，提升能量之链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追寻动植物，前往原先过于寒冷的区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体时间还无定论），人类已经遍布美洲——这里之前没有猿人的足迹。人们在公元前11500年到达了美洲南端，登上了这里的山峰，进入了这里的雨林区。人类得到了这片土地。

伊甸园

全球变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这个纬度大约是欧亚大陆的北纬20～35度，以及美洲大陆的南纬15度到北纬20度。冰河时期聚集在这个纬度带的动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后迅速繁衍生长，尤其是在亚洲两端。在这里，野生谷物——西南亚大麦、小麦以及黑麦和东亚的稻和粟的前身——进化成了大颗种子，采集者可以将这些种子煮成粥或者捣碎了烘烤成面包。这些采集者要做的事只是等待这些植物成熟，然后摇晃它们，收集种子。对现代西南亚的野生谷物的实验表明，2.5英亩的植物就能结出一吨可食用的种子。只要消耗一卡路里的能量收割就能获得50卡路里的食物。这是采集者的黄金时代。

在冰河时期，由于食物稀少，几个狩猎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处游

荡，但是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拥有大脑的动物那样（无论是蜜蜂、海豚、鹦鹉，还是我们的近亲猿），人们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善于社交的。

也许拥有大脑的动物之所以过着群居生活，是因为他们知道群体相对个体而言，有更多的眼睛观察周围，有更多的耳朵聆听四周，也就能更快地发现敌人。又或者，正如一些进化学家认为的那样，在大脑进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开始了大脑科学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说的“认知军备比赛”。在这场竞赛中，那些能够猜出其他动物在想什么的动物——能够跟踪朋友和敌人以及那些同属一个群体或者不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动物想法的动物发展得更快。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已经进化得彼此相像，并且我们的祖先通过形成更大的固定群体来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链。到了公元前12500年，规模达到四五十个人的群体一同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并且还有一些群体超过了100人。

在冰河时期，人们搭起帐篷，吃光他们所能找到的动植物，然后再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我们歌唱着自己是一个游牧民，就像鸟儿一样自由等，但是，当能量之链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定居下来的时候，还是壁垒和家园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制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的话，这并不是一个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左右，秘鲁高地的狩猎采集者已经筑起围墙，并保持洁净——对高度流动的人口来说，这毫无意义，但是对那些连续几个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在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区的地方，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出早期人类的群居和定居生活。侧翼丘陵区是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本章节我会花大量的笔墨讨论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区见证了人类首次摆脱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见证了西方的诞生。

位于现在以色列的恩·马拉哈（也称为埃诺恩）最能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公元前12500年左右，一群不知名的人类在这里建立了半地窖式的圆形房子。有的房子宽约30英尺，用石头砌墙，用修剪过的树干做房梁。烧焦的食物残渣表明他们曾收集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各种坚果及植物，把它们储存在防水的坑里，然后用石浆封存起来。他们居住的村庄到处都是鹿、狐狸、鸟儿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瞪羚的骨头。考古学家对瞪羚的牙齿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牙齿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是死于什么季节的。恩·马拉哈地区瞪羚的牙齿有着两种颜色，这很可能意味着人们常年居住在那里。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找到像侧翼丘陵区这样的地方。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大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周围

的世界。在过去，人们只能跟着食物不断更换地方。他们肯定能说出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就是死在这个洞穴的，我的儿子在这里烧毁过一个小屋，诸如此类。但是，恩·马拉哈不仅仅是人们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恩·马拉哈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他们现在不再把尸体放在一个多年以后他们都不会再来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与房子之间，有的甚至还把尸体埋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把他们祖先的根扎在了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们小心呵护着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房子进行重建。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卫生问题。冰河时期采集者的生活并不整洁，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食物残渣。因为当蛆和食腐动物出现时，人们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寻找下一处食物来源。不过，恩·马拉哈的人们不是这样。他们哪儿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些垃圾。考古学家在恩·马拉哈发现了大量的老鼠骨头——这些老鼠与冰河时期的老鼠长得并不一样。早期的食腐动物也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寻找食物。如果人们将所有的骨头和坚果都放在洞穴里，这对那些动物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赖这些食物过活的话，它们很可能早在人类回来增添食物之前就饿死了。

永久性村庄改变了老鼠的生活。一天24小时中，它们有7个小时可以吃到一大堆美味的垃圾。那些瘦小的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在人们的眼皮底下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一个世纪的时间则显得太长了），老鼠就已经能够和人类共处了。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们的祖先，就像人类代替了猿人一样。

家鼠对人类的这种“恩赐”也给予“回报”：它们把大小便排在人类储存的食物和水里，加速了疾病的传播。人们出于这种原因开始厌恶老鼠，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老鼠非常可怕。不过，最为可怕的食腐动物是狼，它们也难以抵挡垃圾的诱惑。大多数人认为，那些像《野性的呼唤》（*Call of the Wild*）中一样的狼就像老鼠一样可怕，只不过老鼠长得更小，也没那么危险。

长久以来，考古学家都认为人们积极地驯养狗，把较温顺的狼当成宠物来养，让它们生出更加温顺的狼崽——它们喜欢人类就像人类喜欢自己那样。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选择再一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不管怎样，狼、垃圾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们称为“狗”的动物，这些狗可以杀死携带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与狼作战，从而成了男人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有一位年老的妇女被埋葬在恩·马拉哈。她的一只手搭在一只小狗上，他们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3]。

懒惰、贪婪创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将科幻作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俏皮话“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扩展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即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这个准则在冰河时期末期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快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点归功于（或者归咎于）女人。在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妇女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人主要负责狩猎。男人的墓中主要是矛头和箭头，女人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前发生在东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提示了目前为止本书主要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提到西方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时，该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起——约15000年前，侧翼丘陵区妇女的聪明才智。

野生谷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季节里生根发芽，最后枯萎，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它们的种子长成新的植物。当植物成熟时，它的叶轴（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小茎）就会变得脆弱，然后这些种子就会纷纷落到地面。种子落到地面时，外壳会摔碎，然后就会发芽。对于15000年前的采集者来说，收集种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着篮子，摇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种子晃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每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如果这些采集者来得晚了，大部分的种子已经掉落，生根发芽或者被鸟儿吃了。如果他们来得太早，叶轴还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种子摇落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会失去大部分的谷物。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停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

我们不知道懒惰（不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贪婪（想要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惧（对饥饿的恐惧或者恐惧他人抢先获得食物）是否真的给了人们灵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种子重新种植在特别肥沃的土壤里。之后，她很可能这样想：如果我们照料这些种子——翻土，拔草，甚至给这些植物浇水，那么我们每年都可以得到它们的果实，甚至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果实。生活非常美好。

侧翼丘陵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证据，对此我们要间接地感谢社会复兴党。社会复兴党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下，在伊拉克发动了恐怖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首先于1963年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取得执政地位。在清除对手后，他们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水坝，形成一个长约50英里的阿萨德湖——阿萨德湖目前供应着叙利亚大部分的电力。叙利亚文物总局预测洪水将会淹没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因此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研究可能会受到破坏的地区。1971年，一支英国考察队发现了阿布胡赖拉丘。阿布胡赖拉丘上的发现表明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里曾经有一个村庄，考古学家也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书面证

据。不过有一道地沟显示，这个村庄是建立在更早时期的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上，这个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发掘者开始与时间赛跑，因为洪水正在逼近；他们还要和战争赛跑，因为叙利亚的军队正在召集工人与以色列交战。当洪水淹没这个地方的时候，挖掘队已经挖掘了5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虽然只是一小片区域，但这却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发现。他们发现了半地下的环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炉以及几千个烧焦了的种子。这些种子主要是野草的种子，但是其中一部分饱满、沉甸甸的黑麦种子尤其引人注目。

这些种子表明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锄头耕地了。他们把种子埋在土里，而不是仅仅把种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触空气。如果史前的耕种者把自己种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么这一点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些种子保存起来，以备来年再种，那么大种子的数量就会比小种子略多。最初的时候，这个差异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种者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的话，随着种子的平均尺寸越来越大，他们对“正常”种子的标准也会逐渐提高。古植物学家（那些专门研究现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学家）将这些大颗的种子称为“栽培种子”，与那些野生的谷物以及我们现在所食用的完全人工种植的谷物区分开来。

公元前11000年，当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埋葬老妇人和她的小狗时，他们早就已经频繁种植黑麦，收获更大的种子。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却是西方发展的萌芽。

失乐园

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出现小狗与黑麦，有的只是冰川在不断地融化。大约一万年前，融化的冰川冲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现在这些冰川的融化将这个树木日益增多的平原变成了一块沼泽之地，蚊虫滋生。生态学家将此称为“喝醉了的林地”——地面太潮湿了，那些树木根本就无法直立。巨砾和还未融化的冰块将冰川径流困在了大湖里。其中最大的冰川湖是阿加西湖，它是以一位瑞典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科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性冰河时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几乎占了西部平原2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是现在苏必利尔湖的4倍。接着，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导致阿加西湖最终枯竭。

与现在的很多灾难相比，阿加西湖的枯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可信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丹尼斯·奎德（Dannis Quaid）扮演了一个名叫杰克·霍

尔的科学家（显然也是唯一的科学家）。他意识到全球变暖将在第二天导致冰盖崩溃。总统召见了他。在白宫里，他告诉总统，一场超级风暴就要发生，到时温度会降到零下150华氏度，阻断墨西哥湾暖流——正是这一暖流将热量传递到北欧沿海地区，使得英国伦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伦敦市那么寒冷。霍尔认为，这场超级风暴将引发新的冰河时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毫无疑问，总统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小时之后，暴发了超级风暴，霍尔的儿子被困在了纽约。后来就是一系列的英雄事迹。

我不会把故事的结果告诉你，但我要说的是，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没有超级风暴，但是当湖水流入大西洋时，整个世界在12000年里，都进入了冰河时期（地质学家将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性植物，用来命名北欧地区出现的寒冷事件）。侧翼丘陵区永久性村庄的人们食用野生谷物，使得食物剩余成为可能，老鼠和狗长得不那么肥壮了，种子也变得更少、更小了[4]。

人类从伊甸园里被赶了出来。大多数人放弃了常年居住的村庄，形成了更小的群体，然后继续在山坡游荡，寻找下一顿的食物，就像冰河时期最冷时他们的祖先那样。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动物骨头显示，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变得越来越小。早期人类牙齿上的釉质说明他们从小就缺乏营养。

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面临同样规模的灾难。事实上，要找到可以与之相匹敌的，我们就要来看看科幻小说了。1941年，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发表了名为《夜归》（*Nightfall*）的科幻小说，当时他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故事发生在拉加什，这个星球有6个太阳。无论拉加什星球上的人民去哪里，都至少有一个太阳照耀着，并且总是白天——除了每2049年发生一次日食，此时太阳排成一条线，月亮位于太阳前方。天空变黑了，星星出来了，恐惧的人们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日食结束的时候，拉加什的人们也摧毁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蛮的状态。在接下来的2049年中，他们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发生的时候，又开始了这个过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修订版的《夜归》：地球的运行变化使得冻川融化不断交替，每隔几千年就发生诸如阿加西湖枯竭这样的悲剧，把历史抹得一干二净。虽然《夜归》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票选《夜归》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说，我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它并不是用来思考历史的绝佳例子。在真实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夜归》那样将过去完全抹去。事实上，我们不妨追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阿西莫夫成为作家前的2500年——他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一个著名的悖论：当你第二次踏进这条河的时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经不是你

上次踏进去的那条河了。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两次同样的冰河时期。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消失的时候，侧翼丘陵区的社会已经和冰河时期前的社会不一样了。与阿西莫夫笔下的拉加什星球的人们不同，当自然界使人类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地球上的人类并没有发疯。相反，他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技巧和聪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仙女木事件并没有让时光倒流。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时光倒流。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没有使人类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创新的发展。就像所有的科学技术一样，用来鉴定阿布胡赖拉丘最早进行人工种植黑麦的年代的科学技术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阿布胡赖拉丘的发掘者指出，虽然先前提到大颗黑麦种子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新仙女木事件发生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后，人们才开始收获黑麦种子——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也许阿布胡赖拉丘的妇女不是出于懒惰或者贪婪才去种植黑麦的，也许她们只是出于恐惧。由于气温降低，野生动植物减少，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很可能在尝试种植作物后，发现精心种植的作物能够产出更多、更大的种子。一方面，寒冷、干燥的天气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种植谷物；另一方面，天气越恶劣，人们越有动力去人工种植谷物。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新仙女木事件时，采集者扛着几袋种子，将这些种子撒在看起来容易生长的地方，防止它们受到自然界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观点的真实性与否。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侧翼丘陵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四处寻找食物来应对环境灾难的。法国发掘队在穆赖拜特——就在阿布胡赖拉丘的上游，发现了建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一个村庄。在阿萨德湖淹没这个村庄前，发掘队只挖掘出了25平方英里的面积，但是已经足以看出这里的村民曾一起努力获得大量的野生植物和瞪羚。在一个建于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房子内，考古学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个泥土制成的凳子里，嵌着欧洲野牛的角和现代公牛的祖先的肩胛骨。

发生新仙女木事件前，没有哪一个地方会有这么奇怪的事，但是发掘者在建于公元前10000年后的村庄中，发现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事情。例如，1986年发现的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柯尔梅斯·德雷。人们只挖掘出了两个小地沟，一个地沟的位置正好对着一个煮食野生食物的区域，就像恩·马拉哈或者阿布胡赖拉丘那样，而另一个地沟则没有任何室内活动的迹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间圆形小屋，每一间宽12～15英尺，距地面5英尺。第一间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紧密排列，因此要在房内走动显得比较困难。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浇注，抹上石灰，一端逐渐变窄，在靠近顶部处有奇怪的突起，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是人体躯干。这间房间里有大量泥土（显然是特意的），泥土里是一些动物的骨头和诸如石珠这样不寻常的物品。然后人们几乎在同样的地点挖掘出了另一间房间。和第一间房间一样，这间房间也抹上了石灰，装满了大量泥土。第三间房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这个房间里

发现了六个人类颅骨。这些颅骨没有下颌骨，刚刚露出地面。这些颅骨很不完整，表明它们在四处流传很久之后才被埋在这里。

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么？在考古学家中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每当我们无法确定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说这与宗教有关（当我在西西里岛挖掘出一个我认为与宗教相关的遗址时，我不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了）。当然，问题是，我们无法挖掘出过去的信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考古学家谈论史前宗教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编造。

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对强大、超自然而且往往无形的神秘力量或者实体的信仰——这些神秘力量或者实体关注人类，同时也希望人类能够关注它们——那么我们就能认出（如果不一定要理解的话）宗教仪式的废墟，人们通过这些仪式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

宗教仪式因文化而异。例如在某些地方，只有当你把一只活着的白羊的鲜血倒在某一块石头的右边，或者只有当你脱下鞋子，双膝跪下，朝着某一个方向朝拜的时候，或者当你向牧师忏悔你的罪行时，那些强大的神秘力量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行为。虽然宗教仪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许多宗教仪式要求有特殊的地点（山顶、洞穴和不寻常的建筑等）、物体（雕像、图案、珍贵或者外来的物品等）、运动（游行、朝圣等）以及衣服（要非常正式）。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斋戒，目的是使人们进入全身心的静修状态。失眠、疼痛、反复唱诗、唱歌或者吃药都具有一样的效果，可以使真正圣洁的人产生幻觉。

这些遗址包括一切：奇怪的地下房间、像人一样的支柱、没有下巴的颅骨——虽然在对宗教的考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推测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人类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应。整个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濒临死亡，瞪羚正在消失。这些使得人们很自然地会向上天、神灵以及祖先寻求帮助，人们也很自然地选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地点来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柯尔梅斯·德雷的那个圣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扩音器，放大人们寻求帮助的声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世界变得暖和，此时侧翼丘陵区与3000年前的情形并不一样，当时世界在经历了冰河时期后也开始变得暖和。全球变暖也没有两次踏进同样的社会。在早期的温暖时期，诸如恩·马拉哈地区的人们开心地享受着自然界的丰富资源，而公元前9600年后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则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后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类和野牛的颅骨，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公共圣坛的大型地下房间。在叙利亚的杰夫阿玛地区，法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大的地下房间周围发现了10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张凳子上摆放着一个人类头颅，在房间的中间，是一个没有头的骨架。这看起来就像是活人献祭。

最令人惊讶的要数哥贝克力山丘。它坐落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土耳

其南部。自1995年以来，德国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经挖出了四个凹陷的房间，高10英尺，宽30英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柯尔梅斯·德雷发现的更小、更早的房间一样，每一个房间都特意填满了东西。房间里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7英尺高，雕有动物纹饰。根据古地磁测年法，至少还有15个巨石遗迹埋在地下。这个遗址可能总共有200个石柱，其中许多都不止8吨重。挖掘者还在一个矿场发现了一个重达50吨、高约20英尺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类仅靠打火石完成了这些工程。虽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的山顶会如此的神圣，但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宗教圣地。也许它是一个欢度节日的地方，几百个人在这里一次聚上几周，雕刻石柱，然后把石柱拉到房间立起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合作。

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希望在面对灾难时获得神灵和祖先的帮助。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怀疑这些神灵以及祖先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仪式却可以被当做社会黏合剂。毫无疑问，那些相信通过宗教仪式会获得神灵帮助的人会更加坚强地面对困难，并且无论情况多糟，都能团结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10000年，侧翼丘陵区的发展早已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间变换着住处，就像2004年在中国的龙王发现的遗迹那样，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活动的就是一些烧土遗迹。在这个遗址发现的一块破碎的页岩或许只是一块普通的石铲，意味着人工种植谷物的时期开始了，但是这里没有像阿布胡赖拉丘那样饱满的黑麦种子，更不用说诸如穆赖拜特和柯尔梅斯·德雷那样的遗址了。美洲最广为人知的遗址要数一间装满了弯弯的小树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细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尔德发现的。在印度，考古学家还没有更多发现。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证明有人类活动的证据。

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变化的天堂：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变得暖和。这一次，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已经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们马上（所谓的马上，是在当时看来）又开始了耕种。到了公元前9300年，约旦河谷地区种植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比那些野生的种子要大得多，人们也开始修剪无花果树，以提高产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谷仓——黏土建造的小屋，宽和高各10英尺——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出现在约旦河谷的。在那个时候，人工种植已经在侧翼丘陵区至少7个地区发展起来了，从现在

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饱满的谷物种子在整个地区都已经很常见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变化发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侧翼丘陵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植物的基因，使得这些植物只能人工种植，必须依靠人类来生长。就像狗一样，这些植物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它们那样。

像动物一样，这些植物进化了，因为它们的DNA传到下一代时发生了随机突变。植物的突变偶尔会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当环境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相当普遍，就像永久性村庄的产生使得小型、温顺的狼比那些庞大、凶猛的狼更受欢迎，或者就像人工种植使得饱满的种子比个头小的种子更具优势。我之前已经提到过，野生谷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种子成熟后落到地面，外壳破碎，然后种子才能生长。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万分之一或者两百万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会发生随机突变，而这个基因加固了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叶轴，也加固了保护种子的外壳。当这些种子成熟后，它们并不会落到地面，外壳也不会破碎。这些种子会等着采集者来把它们拾起。但是每一年在采集者到来之前，那些变异的植物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们的种子无法进入土壤，从而使这个突变成为不利的突变。如果人类摇晃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种子，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突变的种子不会掉落，它们会再一次死亡。

考古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但是这往往涉及人类的贪婪。妇女（再一次，我们认为是妇女）花了大量的精力给最好的草地锄地、除草和浇水，她们想尽量多地从她们种植的植物中获得食物。这意味着她们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摇晃几次那些植物，然后她们肯定会意识到，无论她们摇得多么用力，一些固执的种子——那些叶轴坚硬的突变植物——就是不会掉落。所以人们很可能就会直接把这个令人讨厌的植物连根拔起带回家。毕竟，小麦和大麦的植株并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那时妇女从一堆种子中随意挑选一些种植，那么这些种子中就会既有突变的种子，也有正常的种子。事实上，突变的种子会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正常的种子在掉落后消失了。因此每一年她们种植植物的时候，所种植的突变植物的数量就会略有增加。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的人们觉察不到这个过程，但是它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像垃圾对老鼠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她们在几千年里，而不是一两百万年里，就从基因上改变了植物。挖掘发现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还没有出现完全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不过，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们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植物中有一半有着坚硬的叶轴；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坚硬的叶轴了。

懒惰、贪婪和恐惧往往带来进步。人们发现，在园子里第一年种植

谷物，第二年种植含蛋白质丰富的大豆的话，土壤就会变得肥沃，同时也令自己的饮食更加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种起了小扁豆和鹰嘴豆。人们把小麦和大麦在粗糙的磨石上捣碎，去除杂质。之后，他们发明了新的饮食方式——他们利用黏土烘制出防水的锅，用来煮食。如果我们可以将当时的妇女与现代的农学家进行对比的话，正是她们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说全部的创新，同时，她们也知道了如何将亚麻织成衣服。动物的皮和毛已经不受欢迎了。

当妇女在种植植物的时候，男人（很可能是男人）开始养殖动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现在的伊朗西部成功养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后来得以进化，个头变得更大，性情变得更加温顺。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欧洲野牛驯养成了今天温顺的奶牛，把野猪驯养成了家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他们渐渐知道，不应屠杀所有的动物来获得食物，而应留着一些来获取羊毛和牛奶，并且——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们拉车[5]。以前，人们搬运东西只能用肩扛，自从给牛套上挽具之后，人就省力多了，因为牛能运载的货物是人类所能运载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养融合在一起。人们继续忙碌着，直到又过了6000年左右，人类才在工业革命中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这些新能源。

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乘坐长途航班时，往往害怕旁边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但是我们不妨想想早期的妇女采集者，她们每年都要背着孩子走上几千英里的路途去采集植物。显然，她们并不想要太多的孩子。无论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会用母乳喂养孩子到三四岁，从而减少怀孕次数（产生母乳会阻止排卵）。冰河时期的采集者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但是随着她们渐渐定居下来，她们开始不需要这么做了。事实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个优势，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农村妇女通常待在同一个地方，储存着食物，生七八个小孩（其中可能有四个能存活到一岁，三个存活到生育年龄），而她的祖先只会生五六个小孩。人们种植的作物越多，就能养活越多的孩子。当然，他们养的小孩越多，就要种植越多的作物。

于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庄甚至有500个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恩·马拉哈等村庄的10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现在土耳其的恰塔勒胡由克，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人。这些村庄急剧膨胀，因此，它们也就面临着潜在的问题。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对恰塔勒胡由克的沉积物进行分析，发现人们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粪便倒在房子之间，堆积如山，然后这些垃圾和粪便被踩成了尘埃和烂泥。这些脏东西会吓退采集狩猎者，但是显然会对老鼠、苍蝇和跳蚤有利。我们可以从被踩成泥地的几小块粪便中看出，人们也在室内饲养动物。约旦艾因加扎勒遗址发现的人类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时，肺结核已经从牛群传染到人类。人们定居下来，种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养活更多的人，会产生更多的细菌，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个农村在刚形成时的几代往往会迅速发展，直到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

率达到平衡。

虽然很肮脏，但很显然，这就是人们想要的生活。采集狩猎者群体有着广阔的地理活动范围，但是社会活动范围却很狭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人类没有改变。早期农民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圣坛，有盛大的节日和宴会，有住在坚固房子里的爱说闲话的邻居，他们的房子抹上石灰，屋顶还是防水的。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小屋既拥挤，又烟雾缭绕，还散发出恶臭，但是它们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因为人类不用再居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也不用在下雨时在树下缩成一团。

早期的农民改变了环境，把它变成了同心圆——在圆的中心，是他们的家，然后往外依次是邻居、耕地和牧场。牧羊人在冬夏季节的时候，把饲养的动物赶到这些牧场。在这些牧场之外是一个野生、不受约束的世界，在这里，有着吓人的动物和野人等。一些挖掘者发现了一些刻有几条线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学家看来，这些线条画的就是林间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杰夫阿玛地区的村民和现在被阿萨德湖淹没的一些地区的人们似乎已经开始书写原始文字了，他们把蛇、鸟、农场动物和一些抽象的符号刻在石头上。

我们可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通过将这些心理结构作用于他们的世界，也驯养了自己。他们甚至给“爱”赋予新的意义。夫妻之间的爱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很自然的，在人类身上延续了几百万年，但是农业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新的力量。采集者原先总是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动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农民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更具体。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现在需要财产——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说诸如水井、墙壁以及工具这样的东西。显然，第一批农民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共同分享食物，甚至还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们建起了面积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专门的储藏室和厨房。他们还有可能把土地变成了私有田地。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为几代人之间传递财产的最小单位。孩子需要这种物质的继承，否则的话，他们会变得非常贫穷。财产的传递成为关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迹象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产生祖先崇拜。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柯尔梅斯·德雷地区没有下颌的头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祖先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死去的几代人的尸体埋在房子下面变得很常见，这种方式似乎能够充分表现出财产与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还不仅仅将尸体埋在地下，他们会在尸体腐烂之后再挖出来，把头颅拿走，然后再把无头尸体埋入地下。他们利用石灰，在头颅上制作出面容，在眼眶里装上贝壳，然后画出一些诸如头发这样的细节。

考古行业是男人的天下，而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学家。她在西岸的杰里科遗址进行挖掘时，率先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风俗。不过现在考古学家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抹上

石灰的头颅。人们究竟对头颅做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只发现了那些重新被埋起来的头颅。大多数头颅被放在了深洞里，不过在恰塔勒胡由克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位埋葬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妇女，她将一个头颅抱在胸前，这个头颅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灰和涂成红色。

早期农民与尸体如此亲密的接触会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恶心，但是显然，这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有着重大意义。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遗留下了财产，使活着的人不至于饿死，活着的人因此对他们表示敬意。财产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进行的，这样就能说明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人们也有可能利用头颅来召唤祖先的灵魂，问他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耕种，去哪里捕猎或者是否袭击邻居。

整个侧翼丘陵区都出现了祖先崇拜。在恰塔勒胡由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尸体埋在房子下面，祖先的头颅也被抹上了石灰。在艾因加扎勒，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处深坑，坑里有真人大小的塑像和半身像，是用涂上石灰的芦苇做成的。一些雕像有双人头，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土耳其东南部恰约尼地区的人们建起了被挖掘者称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坛后面，藏着66个头颅和400具骷髅。化学家检测出，祭坛里的沉积物是人类和动物的血红蛋白结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并且另外两个房子里也有沾满血污的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还刻着人头。这相当令人难以置信。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受害者被绑到祭坛上，挣扎着，牧师用锋利的火石割开他们的脖子，然后把他们的头锯下，储藏起来，敬奉者喝着他们的鲜血……

或许不是这样。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证实或者推翻这样的假想。不过，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现了宗教专家，他们用某种方式令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许他们能够进入昏睡状态，也许他们能够更好地描述幻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牧师可能是第一个享有制度化权威的人。也许，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起源。

无论正确与否，等级制度在家庭内部发展得最快。我已经说过，在采集狩猎社会，男人和女人各自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男人主要进行狩猎活动，而女人主要负责采集活动。不过现代研究表明，驯养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分工，把妇女限制在了家里。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数妇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怀孕以及照顾小孩上。农业的变化——很可能是妇女带来的变化——更加强了这种现象。人工种植的谷物比野生谷物需要更多的加工处理。因为妇女可以一边照看婴儿，一边在家打谷、研磨和烘烤，所以这些就变成了妇女的工作。

当出现土地辽阔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如早期的耕种时期），人们往往开垦大片土地，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和拔草。如果出现人口增长，而农田的产量却没有增加的情况（就像公元前8000年后的侧翼丘陵

区那样），人们就会更努力地耕作，通过施肥、犁地，甚至灌溉从每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样强壮，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人负责户外工作，女人则负责室内工作。成年男人在农田里耕作，男孩照料牲畜，妇女和女孩做着比以前更加明确的室内工作。考古学家在阿布胡赖拉丘发现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髅，通过研究，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性别差异。男人和女人的上背椎骨都变大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头上经常顶着沉重的物体，但是只有女人的脚趾有关节炎，这是因为她们在研磨谷物的时候，长时间跪着，用脚趾发力。

除草、清理石块、施肥、浇水和犁地都能增加产量，并且继承一块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仅仅是任意的一块土地，对一家人的财富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公元前9000年后宗教的发展方式表明人们开始在意祖先和继承，我们不妨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把宗教仪式与其他制度结合起来。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现代农民想要确保将来继承自己财产的人是他们的亲生孩子。采集者对性的随意态度使得男性产生了对女儿婚前贞洁以及妻子婚外行为的诸多担忧。传统农业社会的男性一般在30岁左右结婚，也就是在他们继承财产之后，而女性一般在15岁左右结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模式是在农业产生的同时产生的，但是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个女孩往往是在父权下成长的，到青少年时期，她从父权手中被移交到夫权手中。婚姻可能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例如一个已经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与另一个财产相当的人结婚时，就会巩固他们已有的财产。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就意味着有值得被偷的东西。公元前9600年之后，侧翼丘陵区的防御工事和有组织的争斗迅速增多，这显然并非巧合。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充满暴力，由于没有真正的等级制度约束他们，年轻的狩猎者往往认为杀人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在很多集体中，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住在一起，人们不得不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那些能够处理这些暴力的人将发展得很好，并且能够利用暴力从其他部落夺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在杰里科遗址发现的。史上关于杰里科的各种记载，莫过于《圣经》里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约书亚率以色列大军围攻杰里科，鼓号齐鸣六天六夜，终于在第七天城墙倒塌，大军摧毁了杰里科。50年前，凯瑟琳·凯尼恩在这里挖掘的时候，她确实发现了城墙——但是，不是约书亚摧毁的那堵墙。约书亚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凯瑟琳·凯尼恩所发现的像堡垒一样的城墙比这还要早8000年。凯瑟琳·凯尼恩认为，这些高12英尺，宽5英尺的堡垒是用来防御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显示，凯瑟琳·凯尼恩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所谓的“堡垒”实际上是由不同时期建造的几堵小墙组成的，当初修建这些墙也许是为了阻挡河流。不过，她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一个25英尺高的石塔很可能就是用来防御的。就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言——将一块磨尖了的石头绑在棍子的一端，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堡垒。

除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有这么多要防御的东西。在公元前7000年，这个区域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是采集者，根据季节的变化转移地点，他们建立村落的地点，例如现在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和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以杰里科的标准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采集狩猎者能够被空运到恰约尼或者恰塔勒胡由克，我想，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他们那样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城镇，镇上有坚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储存，以及让人惊叹的艺术和宗教遗址。他们会发现自己劳作辛苦，寿命短，而且还养着一群令人讨厌的细菌；他们会和那些富人以及穷人接触，对男人的权威以及父母的权威感到恼怒或者高兴；他们甚至还可能发现，一些人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杀死自己；他们也可能疑惑，为什么人类要让自己遭受这一切？

前进和繁殖：农业的延伸

让我们从产生等级制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侧翼丘陵区快速前进一万年到1967年的巴黎。

对于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校园的中年男管理员来说（源自于恰塔勒胡由克地区的父权制），他们管理的女学生不能进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显然不能理解这样的规定，但是300代以来年轻人不得不遵守这样的规定。不过现在不再是这样了。随着冬季的来临，学生们对长者的权威发起挑战，希望决定自己的爱情生活。1968年，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现在欧洲议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绿党成员，以前曾经是一个学生激进分子，被称为“红色丹尼”）发动了“五月风暴”，开启了一连串学生运动的序幕。学生走上街道示威，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路障和焚烧的汽车使得巴黎瘫痪。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见了他的上将，想寻求军队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密歇根大学年轻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萨林斯早年因写过一系列关于社会进化的书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批判而闻名。现在他放弃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将安娜堡称为“一个只有小巷的小大学城”）学习的机会，转而去法兰西学院求学，法兰西学院是人类学和学生激进主义的圣地。随着危机的加深，萨林斯向《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投了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有史以来人类史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在楠泰尔的墙上潦草地写着：“打开托儿所、大学以及其他牢笼的大门。由于教师和考试，我们的竞争从6岁就开始了。”萨林斯的文章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不是答案——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并不想要答案，但至少是某种鼓励。萨林斯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不可实现的事物——无限的需求建立了圣地”。我

们遵从资本主义的准则，努力赚钱，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购买那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无限的需求。萨林斯建议，我们可以学学采集狩猎者。他解释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并不贫穷。”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矛盾的观点：萨林斯认为采集者一般一周只工作21～35个小时——比巴黎工厂的劳动者，甚至可能比学生的工作时间还短。采集狩猎者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的收入很少，但是他们的需求更少，萨林斯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会”。

萨林斯提到了关键的一点，他问道：如果得到的报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战争的话，为什么农业社会要取代采集社会？但农业社会确确实实取代了采集社会。到了公元前7000年，侧翼丘陵区的采集业已完全被农业取代。公元前8500年之前，人工种植的谷物就已经传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500年，就传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就已经传到了以上所有的地区，并向东传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公元前6000年到达了希腊、伊拉克南部和亚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达埃及和欧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达大西洋沿岸。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对事情发生的原因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在最近一个权威评论的末尾，剑桥大学的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给出了他所能给出的最好结论，农民“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出于不同的理由代替了采集者，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似的”。

虽然整个过程杂乱无章——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穿过了几个大陆，怎能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只是关于地球获得能量之链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轨道的变化意味着地球能获得更多的太阳能，光合作用将一部分太阳能转化成了化学能，新陈代谢将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动能，农业使得人类能够从动植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害虫、肉食动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还是有很多剩余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主要通过有性繁殖来释放多余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着新的村庄可以迅速发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种，然后出现疾病和饥饿，最后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庄就这样稳定发展，总是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而在另一些村庄，则有一些大胆的人决定重新开始。他们也许会走上一个小时到同一个村庄或平原上的一块空地（也许不太合人意）——或者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寻找他们听说过的绿色牧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漂洋过海。毫无疑问，很多冒险家都失败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到死亡率赶上了出生率。

当大多数农民扩张到新的领土时，他们发现采集者已经生活在那里

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老电影中的场景：农民抢掠牛群，剥去采集者的头皮，双方用弓箭互相攻击。不过现实可能没这么戏剧化。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首批农民往往定居在与当地采集者不同的区域。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最好的农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叠的。至少，在初期，农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视。

当然，最后，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纳或者东京郊区已经看不到狩猎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过的地方觅食了。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仅仅几个世纪就占领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入侵（在他们眼里）采集者生活的边缘地带。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农民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富足的社会。疾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庄毫无疑问使得农民没有采集狩猎者那样健康。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传染病与1942年之后夺取几百万美洲原住民性命的传染病相比。农民与采集者只是隔着几英里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们之间疾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数量的多少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决定和农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现代殖民地那样，他们就有可能摧毁奇怪的农业村庄，不过，会有更多的农民前来，攻破他们的防线。另外，采集者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无论他们撤退多远，新的一批农民最后还是会出现，他们会砍掉更多的树，到处传播细菌，直到采集者被打败，而这片土地农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那样。

第二个理论认为，以上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大部分区域出现的首批农民并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定居下来的当地采集狩猎者，最后自己成了农民。萨林斯的观点使得农业与原始富足的社会相比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并没有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不会进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会首先进入一个没有像他那样精耕细作的村庄（也许没有开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程度更低的村庄（可能烧毁森林，种植植物，直到长出野草，之后他们继续迁移），最后，他会进入那些完全依赖于采集狩猎的社会。思想、人口和细菌在这个广阔的接触带不停地来回流动。

当采集者意识到他们的邻居能够以更加集约的办法杀死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时，他们没有对农民发动进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强了自己的耕作。人们并没有用农业完全取代采集业，而是决定少花一点时间进行采集，多花一点时间种植。之后，他们可能要决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过——重复之前提到的情景——这只是从原始富足社会迈向繁重劳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体说来，在经历了几百年，跨越了几千英里后，那些向农业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数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传统方式的人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界”延伸了。没有人选择等级制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妇女也不喜

欢患有关节炎的脚趾，这些东西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

无论考古学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烧过的种子或者地基，他们都无法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不过基因学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帮助。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对欧洲血型和核DNA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从东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频率的变化相当一致。他们指出，这证实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农业传播方式。他们得出结论：在亚洲西部的移民把农业带到欧洲后，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余的采集者逼退到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语言学也支持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农民不仅用西南亚的基因替代了欧洲的基因，还用侧翼丘陵区的印欧语系代替了欧洲的本土语言，出现了诸如巴斯克语这样孤立的语言。农业社会对原始富足社会的取代在欧洲人的血液和语言中体现了出来。

起先，这些新的证据只是引起学者们更多的争论。语言学家马上就挑战了伦福儒的观点，认为如果欧洲语言真的是在六七万年前从同一个祖语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更大。1996年，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带领的牛津团队在基因学方面挑战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赛克斯研究的是线粒体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扎研究的核DNA。他发现，传播路线并非像斯福扎所说的那样自东南向西北传播，而且由于这个传播路径太混乱，无法轻易地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赛克斯发现六组基因宗谱，只有其中一组能够与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相联系。赛克斯认为，其他五组的历史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总结道，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了欧洲第一批农民主要来自那些决定定居下来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后代。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之后，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0%。要说每三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猜测与预言：东西方的生产活动对比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还是伦福儒，又或者是赛克斯的观点——即使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妥协——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农民将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

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愿。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史前欧洲人很可能会停止耕作——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抵制人工种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从现在的波兰传播到巴黎盆地之后，停止了传播。在1000年里，几乎没有农民进入巴黎盆地与波罗的海之间五六十英里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集约的耕作。在这儿，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采集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点和被钝器杀死的年轻人的骨骼，骨骼左边是他们的头颅——如果他们是面对面搏斗，用手抓着石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大型的坟墓甚至就是发生屠杀的地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采集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和盛宴的残余物，这些东西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集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采集者可以对抗农民，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人工种植和养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那样的话会很愚蠢，虽然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

> 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

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显然，在这里，逆境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间，采集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着美洲驼，采集着变异的奎奴亚藜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种植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特色鲜明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所谓“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作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时期末期驯养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的观点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包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统治着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解释：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穿过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

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传递了下来。1500年之后，欧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这些就是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几百种可以人工种植。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是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亚洲东部只有6种，美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2种，欧洲西部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左右进入北美洲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贪婪，他们种植类蜀黍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西方，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西方，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大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大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6]时，大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养动物方面，机遇再一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100磅），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亚洲西南部。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在侧翼丘陵区都有野生原种。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只有1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到处都是野生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因此，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驯养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

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民。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一些可以种植的植物，但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000年才能发展为农民，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不像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那样，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养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了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养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经历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养和种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给了每个人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够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做改变、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就会排挤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伊甸园之东：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别

也许宣扬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任何地方的人们真的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地理因素确实对西方更加有利。但是，历史不仅仅是由天气和种子的大小决定的。显然，人们在劳动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很重要。故事的结局往往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也许今天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区的文化都更有潜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于中国的记载最为详细、历史最为悠久，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最为强大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农业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否导致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为什么西方社会得以统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农业还是知之甚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中国最主要的食物——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1984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水稻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种植过水稻，但是依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问题是，虽然面包师总要烤一些面包，留下一些烧焦了的小麦或者大麦的种子，从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但是煮食水稻却很少会有烧焦的种子留下。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要恢复古代水稻更加困难。

不过，考古学家们不久就攻克了这个难题。1988年，挖掘者在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发现，公元前7000年左右，制陶工人开始将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壶在窑中破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了。

不过，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当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合作（麦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实地考察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开始挖掘的时候，在地沟里待了5683天，令人惊叹——几乎是我的10倍；2001年，当他在伯利兹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生事故身亡，享年82岁。据说，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护车司机说着考古学）。麦克尼什不仅给中国同行带来了研究早期农业的专业技术，同时还带来了生物考古学家德博拉·皮尔索尔（Deborah Pearsall）。这位考古学家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尽管在考古发现中我们很难找到水稻的踪迹，但是所有植物都从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硅。一些植物细胞中富含硅质，当植物腐烂的时候，就会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对植物岩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大米是否被食用，还能让我们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种植的。

严文明和麦克尼什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沟。皮尔索尔通过研究植物岩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经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小麦、大麦和黑麦迅速生长——这对采集狩猎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植物岩无法表明稻向人工种植发展的过程与黑麦在阿布胡赖拉丘发展的过程一样，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对长江流域的破坏和对西方的破坏一样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环几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后气候变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现。那个时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来自煮食谷物的容器）已经很常见了，这比侧翼丘陵区的第一个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经消失。

自2001年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进行的一系列挖掘证实了这条时间线。到了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小麦。黄河和长江之间有一个名为贾湖的重要遗址，这个地方的人们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种植水稻和小麦了，也可能已经驯养野猪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场大火烧焦了近25万磅重的粟米种子，这些粟米种子被储存在8个坑里。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面埋着狗和猪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

于祭祀），这是有关中国驯养动物的最早记录。

像西方一样，东方种植植物、驯养动物以及发展科技的过程跨越了几个世纪。长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让考古学家们惊喜不已，这里保留着大量被水浸过的大米、木制品和竹制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经完全被人工种植，像西方的小麦和大麦一样，等着人类来收割。河姆渡人还驯化了水牛，用它们的肩胛骨当做铲子。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开始慢慢地从狩猎转向农业。这在人们使用的工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人们从开垦森林土地变为在农田上耕种，工具也从斧头变成了石铲和锄头，并且由于农民翻地翻得越来越深，铲子也变得越来越大。在长江流域，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早期的中国村庄，像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贾湖地区，看起来和侧翼丘陵区首次出现的村庄非常相像，都是又小又圆的半地下小屋，小屋之间有磨石和尸体。

有50～100人居住在贾湖，其中一间小屋比其他小屋略大。但是研究发现，当时人们还很贫穷，性别差异也不明显，煮食和储存的食物都是公有的。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一些村庄有150个村民，并且有一些地沟保护。在这个时期记录最全的遗址姜寨，小屋面向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两大堆灰烬，这些灰烬很有可能是宗教仪式遗留下来的。

姜寨的这些祭品——如果它们是的话——与西方几千年前建起的圣坛相比，显得相当温和，但是贾湖坟墓中的两个重要发现表明，宗教和祖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很重要。第一处发现中有三十几支用丹顶鹤翼骨雕刻而成的长笛，它们均出现在比较富裕的男性的墓葬里。其中5支还可以吹奏。最早的长笛源自公元前7000年，只有五六个孔。虽然它们并不十分精致，不过可以用来吹奏现代的中国民歌。到了公元前6500年，长笛上一般有7个孔，制造长笛的人也对音调制定了标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笛手在共同吹奏。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一个坟墓中，有一个8孔长笛，能够吹奏现代所有的旋律。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24个富裕男性的坟墓时，我们才能明白长笛的全部意义。这些坟墓中有龟壳，其中有14个龟壳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在一个约公元前6250年的坟墓中，死者的头已被移走（让人想到了恰塔勒胡由克），取而代之的是16个龟壳，其中两个还刻上了符号。其中一些符号——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与中国最早的象形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5000年后中国商朝的皇帝开始使用这些象形字。

在第四章中，我会再一次提到商朝的碑文，但是，我现在只想说明，虽然贾湖符号（公元前6250年左右）和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1250年左右）之间的差异就像叙利亚杰夫阿玛的奇怪符号（公元前

9000年）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系统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但是中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其连续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刻有符号的奇怪陶壶，尤其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同样，对于这些贾湖地区的符号是否是商朝文字系统的直系祖先，专家们也各持不同观点。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最重要原因是很多商朝文字也是刻在龟壳上的。商朝的皇帝在宗教仪式中利用这些龟壳来预测未来，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贾湖遗址的挖掘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龟壳、文字、祖先、预言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读过孔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结合在一起，那么贾湖坟墓中的长笛、龟壳和文字能否作为证据证明仪式专家能够与五千年前的祖先对话呢？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平行性。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曾提过，在约旦艾因加扎勒发现了一尊独特的塑像。这个塑像有两个人头，眼睛很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美术史学家丹尼丝·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指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描绘的神灵形象和那些塑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批农民的宗教中有一些部分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甚至早在发现贾湖遗迹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认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巫师，他们能够令别人信服，他们能够和动物及祖先对话，能够在几个世界之间穿梭，也只有他们能够与老天交流。20世纪80年代，当张光直提出这个理论时，当时的证据只能显示这些巫师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些群落已经有两三千名成员，和3000年前恰塔勒胡由克和艾因加扎勒的人口一样多。一些群落已经能够动员劳动者用一层层夯土建造堡垒（好的建筑石料在中国很少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西山的城墙。这个城墙厚10～15英尺，长度超过1英里。即使到了今天，这堵墙还有8英尺高。地基下面陶土罐中的小孩骨头也许就是祭祀品。在定居点的很多坑里都是骨灰，一些人的姿势表明他们曾做过挣扎。这些骨灰有的还和动物的骨头混合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活人祭祀，就像土耳其的恰约尼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仪式在公元前5000年传到中国。

如果真如张光直所说的那样，公元前3500年确实是巫师起着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巫师有可能居住在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考古学家常常把这些房子称为“宫殿”，虽然有一点夸张）。这些房子的地板抹上了石灰，还有大壁炉和装有动物骨头（不知是不是祭品）的灰坑。其中一个坑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物体，看起来就像一根权杖。最有趣的“宫殿”在案板，坐落在城镇中间的高地上。这个“宫殿”中有石柱，周围都是灰坑。有的灰坑里装着被染成红色的猪下巴，有的装着用布包着的猪骨头，还有一些装着陶土雕像。这些雕像有大大的鼻子、胡须，还有尖尖的帽子（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巫婆）。

关于这些小雕像，有两个方面令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第一，制作这些雕像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考古学家在“宫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雕像的帽子上还刻有中国的汉字“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所有的这些小雕像，包括在案板发现的，全都代表着巫师。第二，很多小雕像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中国人。类似的雕像从案板一直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都曾发现过，这条路后来成了丝绸之路，连接起中国和罗马。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还是非常有势力，为了获得金钱，狂热的幻想家仍会召集神灵，为冒险的旅游者预测未来。案板的小雕塑也许能够说明，公元前4000年左右，来自中亚偏远地区的萨满和中国传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公元前10000年时侧翼丘陵区的萨满对东方也有着某种影响。

其他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完全不知道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国家地理》、《考古学》和《科学美国人》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干尸也具有高加索人的特点，这似乎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确实从中亚甚至亚洲西部进入中国的西北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那些埋葬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不仅像案板雕像那样有胡须和大鼻子，而且他们也偏爱尖尖的帽子（一个坟墓中有10顶羊毛帽）。

对于一些异常的发现，人们总是过于激动，但是，即使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边，看起来宗教权威对早期中国而言就像宗教在侧翼丘陵区那样重要。如果还有人心存怀疑，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惊人发现应该能够驱散他们的怀疑。在西水坡挖掘的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约在公元前3600年的一个坟墓中躺着一个成年男子，他的旁边放着一些刻有龙虎图案的蛤壳。在坟墓的周围，还有更多刻有图案的蛤壳。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有着龙头的老虎，背上有一只鹿，头上还有一只蜘蛛，另一个图案是骑着龙的男人。张光直认为，死者是一个萨满，周围的这些是帮他游走于天地之间的动物神灵。

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更加惊讶。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一系列占地两平方英里的宗教场所在牛河梁发展起来。这个地点的中心被挖掘者称为“上帝的庙宇”。这是一个长60英尺的半地下走道，房间里有人、猪龙混合体以及其他动物的泥土雕像。至少有六尊雕像是裸体的妇女，有真人般大小，盘腿坐着，保存最好的塑像有红色的嘴唇和用翡翠镶嵌的淡蓝色眼睛。翡翠是一种少见、难以雕刻的宝石，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奢侈品。蓝眼睛在中国很少见，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雕像与案板和塔里木盆地那些看起来像高加索人的塑像联系起来。

虽然牛河梁与外界隔绝，但是有6个坟墓群散布在这个庙宇周围的山上。一些坟墓有100英尺宽，并且坟墓中的物品还包括一些翡翠饰物，其中一个刻有猪龙混合体的图像。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埋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到底是牧师还是首领，很有可能他

们中既有牧师也有首领。不过，无论他们是谁，用翡翠为一小部分死者——往往是男性——陪葬在整个中国都变得非常流行。公元前4000年时，对死者的真正崇拜开始出现。看起来，东方核心地区的人们和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一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它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但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都将最多的资源投入到与神灵和祖先有关的仪式上。第一批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似乎是那些能够与祖先和神灵交流的人。

公元前3500年东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在西方创立的农业生活方式极其相似——都需要辛勤劳动，储存食物，建立堡垒，进行祭祀，还包括女人对男人、小孩对老人的从属——这种农业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在东方的核心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传播到其他地方。东方的农业传播和西方的农业传播过程非常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东西方的专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进行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人们迁移的时候，穿过东亚，传播了农业；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当地的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且迅速在大范围内发展类似的文化。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和在欧洲一样引起争议，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基因数据来说明一切。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中国东北的采集者就生活在大村庄里，种植着黍类。公元前40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已经种植水稻，水稻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种植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在泰国和越南的种植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那时，水稻的种植已经传到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进入菲律宾和婆罗洲。

像西方的农业发展一样，东方的农业发展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植物岩表明在公元前4400年，水稻就传到了朝鲜，黍则是在公元前3600年传到朝鲜，公元前2600年传到日本。但是史前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并没有重视这些新鲜事物。像欧洲北部一样，朝鲜和日本的海岸有着丰富的海底资源，能够支持永久性的大型村庄。这些村庄被大量废弃的贝壳包围着。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采集者发展了先进的文化，显然并不急于开始发展农业。再一次，就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间的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那样，他们有足够多的人（也足够坚定）去驱赶那些试图强占他们土地的人，但是当饥饿迫使他们从事农业时，他们的人数则显得不够多。

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人们转而发展农业都与金属武器的出现有关——公元前1500年在朝鲜出现了金属铜，公元前600年在日本出现了金属铁。就像欧洲的考古学家争论究竟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结束了波罗的海富足的采集社会那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武器来自那些带来农业的入侵者，而另一些亚洲学者则认为由于采集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农业和金属武器突然变得具有吸引力。

到了公元前500年，稻田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农业发展在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受到了挫折。又过了1200年，农业才

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发展起来，这里食物采集的机会尤其多。但是最终，就像西方一样，东方的农业活动完全替代了采集活动。

烧煮和烘烤，头颅和坟墓：东西方的其他不同之处

我们该如何弄懂这一切？当然，西方和东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人们的饮食还是他们敬畏的神灵。没有人会把贾湖当成杰里科。但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这些文化传统会不会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

表2-1总结了这些证据。我想，主要说明了三点。第一，如果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由这个文化发展出了西方社会）确实比东方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具有潜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从表2-1中看到东西方存在的一些巨大差异。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上，东西方发生的事情基本一样。西方和东方都驯养了狗，种植了植物以及驯养了大型动物（这里我所说的大型动物指的是体重超过100磅的动物）。它们都见证了“成熟”农业（指的是高产量、高强度的体系，有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以及财富和性别等级）的发展，以及大型村庄（指的是超过100人的村庄）的兴起，并且在两三千年之后，发展成了城市（人数超过1000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建造了精致的建筑和堡垒，发明了原始的文字系统，在陶壶上绘制漂亮的图案，建起了巨大的坟墓，崇拜祖先，用人类当祭品，并且逐渐扩展了农业生活方式（起初是缓慢的扩展，2000年后加速发展，最后甚至完全取代了最富足的采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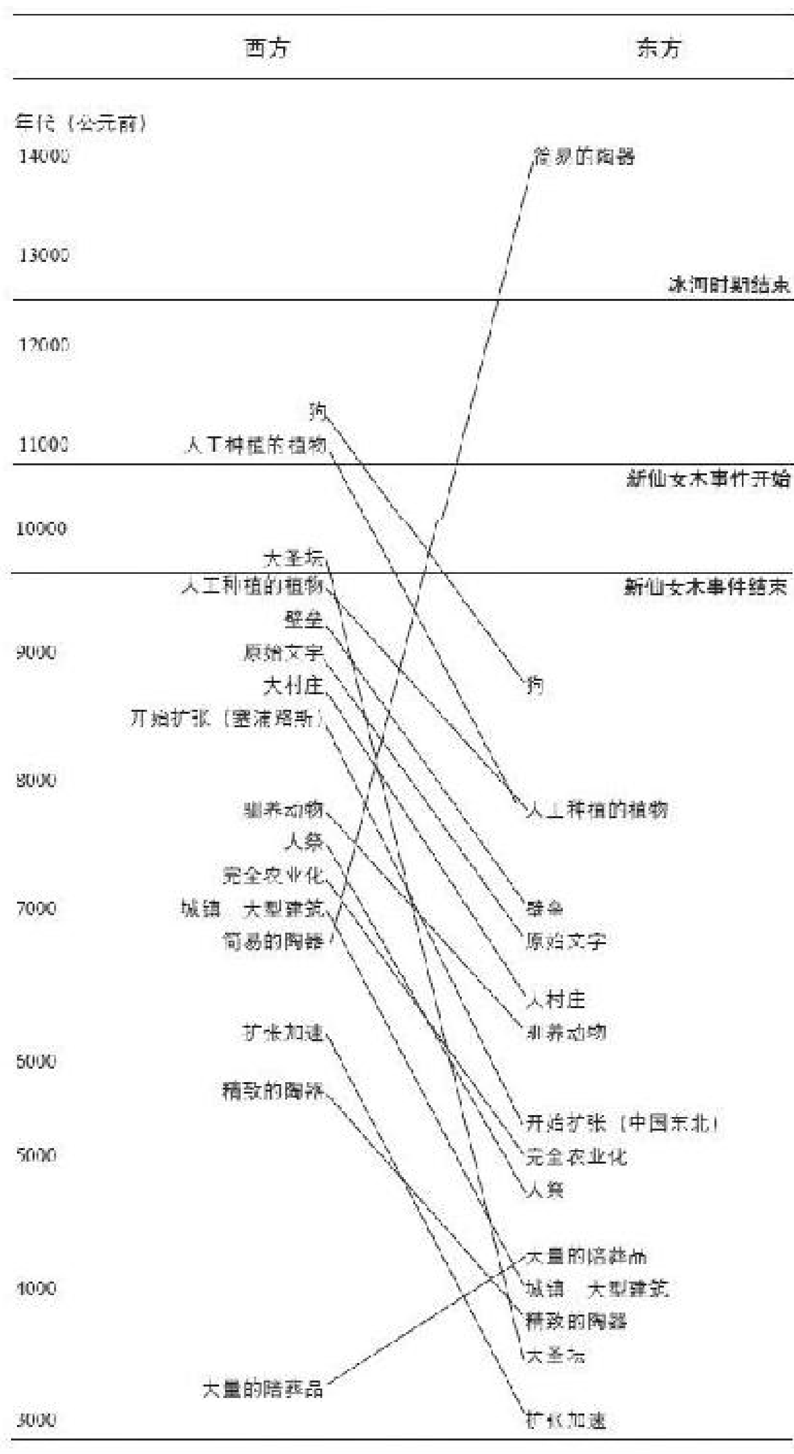
第二，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我已在表2-1中用连线表示。图中大部分直线的斜度都是差不多的。西方先开始发展，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开始发展。这有力地表明了东西方的发展遵循同一个文化逻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唯一的区别在于西方比东方早2000年开始这个过程。

第三，我的前两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总有例外的情况。东方比西方早至少7000年开始制造陶器，也比西方早1000年开始建造大型坟墓。另一方面，西方比东方早6000年建造大型圣坛。如果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东西方的文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巨大的文化差别能够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解释为什么陶器、坟墓和圣坛的意义这么重大，而那些认为这些并不太重要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东西方会分道扬镳。

对于陶器这么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原因，考古学家大都达成一致看法：因为东方的食物使煮食变得非常重要。东方人需要能放在火上的容器，因此也就很早地掌握了制造陶器的技术。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

我们不应该关注陶器本身，而应该问问是否是烹饪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或许西方人的烹饪方法会留住更多的营养，因此造就了更加强壮的人民。不过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骨骼研究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很暗淡：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此时的生活描述为贫穷、肮脏和物资缺乏。在东西方，农民都缺乏营养，身材矮小，背负重担，一口坏牙，而且寿命很短；在东西方，农业的发展都逐渐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在东西方，最终都出现了了不起的烹饪技术。东方人对煮食的依赖只是其中的差异之一，但总体说来，东西方营养方面的相似点还是远远大于它们的不同点。

表**2-1** 东西方起源的对比



或许从长远来看，不同的烹饪方法产生了不同的饮食方式和不同的家庭结构。但是再一次，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明显的证

据。在东西方，最早的农民似乎都共同储存、烹饪甚至食用食物，几千年后才发生改变，这些事情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再一次，东西方之间的相似超过了它们的差异。东方早期对陶器的制造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差别，但是这似乎与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东方早期精致的坟墓和西方更早些时候精致的圣坛是否有关系呢？我想，这些只是各自发展中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所见，东西方都曾对祖先非常崇拜，当时农业的发展使得对逝者土地的继承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东西方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向祖先表示感谢，与他们联系。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四处传递他们亲属的头颅，把公牛的头和脊柱放于屋中，以及把其中的一些人作为祭品就能达到目的；而东方人一般将刻有动物图案的翡翠作为陪葬品，并砍掉其他人的头，把它们扔在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但是结果却是相似的。

我想我们能够从表2-1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早期东西方核心区域的发展非常相似。我不想掩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石器的类型、人们吃的动物和植物，但是，这些差异都不能为我们先前提到的理论提供支持，即在冰河时期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它比东方文化更具潜力，从而解释为什么世界是由西方统治。这看起来并不真实。

如果任何长期注定理论能够经得起表2-1的检验，那么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得益于地理因素，西方领先东方发展2000年，这个领先优势足以让它先开始工业革命，然后得以统治世界。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将东西方的比较放到离我们更近的时期，看看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从表2-1中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跨文化比较很难。在两栏中列出重要的发展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要了解表2-1中的异常现象，我们就需要将煮食、烘烤、头颅以及坟墓放在当时的背景中考虑，找出它们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将会把我们带到人类学（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去。

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牧师收集了殖民帝国的人们的信息，他们报告中所描述的奇怪风俗使很多学者感到震惊。人类学家对比了这些活动，推测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从而推断出人类更高文明行为（他们指的是更像欧洲人的行为）的进化。他们派遣渴望成功的学生前往奇异的地方搜集更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优秀年轻人，他是一位在伦敦学习的波兰人。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当时，马利诺夫斯基没有船回家，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他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在岛上交了一位女朋友。因此，到1918年，他已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文化了如指掌了。他了解到了专家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人类学其实是解释不同的习俗如何变成一个整体的。要进行比较，对象必须是有完整功能的文化，而不是脱离背景的零碎习俗，因为即使是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意

义。例如，拍脸的动作在堪萨斯代表你不同意，而在新几内亚却代表你同意。同样的，相同的想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像史前东西方分别用传递头颅和用翡翠陪葬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一样。

马利诺夫斯基不会喜欢表2-1。他会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对两个功能文化进行评判，说哪一个文化更好。我们也不能把“西方领先”作为一本书的开头。他有可能会问，“领先”是什么概念？我们究竟如何理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那些特别的习俗，并将它们互相对比？即使我们能够理清事实，我们怎么知道该衡量哪些部分？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学家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心力交瘁。带着一些不安，我将试着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给出答案。

[1] 地理学家威廉·瑞安（William Ryan）和沃尔特·皮特曼（Walter Pitman）在他们的著作《大洪水》（Noah's Flood）中提到，正是由于黑海的洪灾才有了《圣经》中的这个故事。他们认为这场洪灾发生在公元前5600年左右，不过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个盆地在公元前16000～前14000年之间就被淡水淹没了，然后在公元前7400年左右，由于地中海的注入，海水变咸。这样早期的一次洪灾不可能是诺亚方舟这个故事的素材。古代文献中对现在波斯湾地区洪灾的描述更为可信。

[2] 有人认为一些比亚特兰蒂斯更为发达的文明在冰河时期繁荣于沿海平原，但是在公元前12700年之后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文明被吞没，之后就被遗忘了。考古学家一般不认同这个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掩饰真相，而是因为这并不可信。抛开其他原因，要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必须相信在内陆高地（就是那些在水平面以上的区域）没有人和那些消失的城市进行贸易或者模仿它们的成就。尽管我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考古挖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来自这些文明的遗迹。人们常常在河床上发现冰河时期的石器以及哺乳动物的骨头，但却从来没有发现先进的人工制品。

[3] 这是一个感人的情景，只要我们不去想这只狗是怎么和它的女主人埋葬在一起的。

[4] 一些考古学家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在北美的一些地方——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发现的玻璃、碳和铱表明，它们是由于酷热产生的——这种热量只有在彗星残骸撞击地球时才会产生。这些考古学家不仅描绘出了冰川的逐渐融化，还描绘了北极一股突然的气流使得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不过，即使是那样，也不会产生《后天》中那样的超级风暴。

[5] 这听起来就像显而易见的事，但是给动物上轭，使得动物在拉车的时候不会勒死自己，同时还要使动物听从人们的控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6] 与非粮食作物相反——2005年的一份DNA研究发现，美洲的第一批殖民者从亚洲带来了栽培的葫芦，他们将此作为容器。

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考古学的进化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样，当进化还是个很新的概念时，文化人类学家就对其发起了反抗。世界的现代意识仅仅能追溯到1857年，那时，一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了一篇题为《进步的法则与原因》的文章。斯宾塞性格古怪，他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在当时刚问世的杂志《经济学人》当过技术编辑，还曾是女小说家乔治·埃利奥特的情人。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结婚。然而，这篇文章却使他一夜成名，轰动一时。斯宾塞在文中解释道："从科学所能理解的最遥远的过去，直到刚刚过去的昨天，进步在本质上都是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变。"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是对一切事物任何变化的解释：

> 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是通过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表现在我们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导的宇宙万物最初的变化中；表现在地球地质和气候的进化上；表现在其表面每一个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种类的增殖中；表现在人类的进化中，无论是文明开化的单独个体，还是种族的群体；表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进化上；还表现在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人类活动的无数具体和抽象的产品的进化之中。

在之后的40年里，斯宾塞致力于把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融合到一个进化理论里。斯宾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使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了。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时，翻译的首选就是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伟人们都尊敬他的思想。达尔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包含"进化"一词，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没有，甚至连第四版和第五版里也没有出现。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时，达尔文觉得有必要借用这个由斯宾塞创造并推广的词条。[1]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经过了四层变化，由简单体（无首领的游牧群体），到复合体（拥有政治领袖的固定村落），以及双倍复合体（拥有教堂、政府、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学术研究），直到三倍复合体（像罗马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伟大文明）。这种说法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如何标记划分这些发展阶段上，理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有人说进化是从野蛮到蒙昧，再到文明开化；有的则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从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学。到1906年，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浩如烟海的术语感到十分厌烦，他抱怨："现在有些作家太过虚荣，对待别人使用的术语就像是用过的牙刷一样嫌恶。"

不论进化论者使用的是何种划分标记，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本能地感觉自己肯定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一门新兴的学科——人类学——便开始着手提供数据资料。有的社会相对而言进化的程度较低，譬如非洲或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殖民地民族，当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着丰富有趣的习俗，堪称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时代三倍复合社会里的文明人的样子。人类学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疟疾、体内寄生虫和不友好的原住民）只是做好笔记，然后他（那时人类学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来填补进化史中的缺口。

马利诺夫斯基反对的就是这个知识性项目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出现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进化论者想要记录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研究史前社会留下的实际遗址，而要间接地通过对当代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来推断他们是不是其后裔呢？答案是：一个世纪前考古学家知道的还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化论者只能结合考古报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学作品中偶有的细枝末节以及随机的民族志的记载——这就很容易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怀有类似想法的人类学者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进化论者对历史的重建只是投机的推测，是精心编造的故事。

考古学是门新兴的科学。仅三个世纪前，我们关于历史最久远的证据——中国的五经、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以及希腊诗人荷马——只能勉强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录之前，历史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挖掘这一简单的动作改变了一切，当然花了一段时间。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随身带去一队学者，他们抄写并带走了几十份古代铭文。19世纪2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揭开了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们不甘示弱地挖凿隧道，进入了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城市遗址，悬吊着绳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铭文。19世纪40年代还没结束，学者们就已经能读懂古波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遗产。

19世纪50年代，当斯宾塞刚开始写关于进化的文章时，考古学仍然比科学更有冒险性，充斥着真人版的印第安纳·琼斯。直到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把地层学的地质原理（常识性原理，诸如遗址的最上层泥土肯定晚于下层泥土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沉积土的顺序来重建事件发生的次序等）运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纪20年代地层学分析才成为主流。那时，考古学家们仍然是依据遗址与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联系，来给出土物标记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发现都笼罩着浓厚的推断和臆测色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核物理学家们发现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日期，通过研究骨头、木炭和

发现的其他有机物中的不稳定碳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学家们开始给史前时期排序，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资深的教授说，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曾建议，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礼服和一个小型左轮手枪。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但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到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邦德时代肯定已经走到了终结的边缘。真正的突破来自专家们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实材料，把史前时期推向更早，足迹遍布全球。

博物馆储藏室里充斥着工艺品，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技术性专题论文，但一些考古学家担心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解答。那就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与19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论寻求数据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数据需要理论来总结。满载着来之不易的成果，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准备好迎接另一波理论的冲击。

有些社会科学家称自己为新进化论者，以显示他们比斯宾塞等守旧的“古典”进化论者更加先进。他们表示，虽然手边有充分的史实资料可供使用，可这一大堆证据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没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凌乱混杂的陈述记录或历史文档里。简而言之，科学性还不够。为了从纷繁的19世纪类型学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们认为需要将这些故事转化成数字。通过测量差距、分配分值来给各个社会排名分等，然后寻找分数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解释。最后，他们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些问题，使花在考古学上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社会的进化是只有一种方式，还是多种方式并存的；在离散进化阶段，社会是否发生集群现象（如果发生了的话，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个单一的特征，如人口、技术（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地理特征），能够解释一切问题。

人类学家劳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从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的大型数据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谓的社会发展指数。纳罗尔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择30个工业化前期社会（有现代的，也有过去的），他翻遍档案，查找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会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规模大小、劳动分工的程度，以及隶属组织的数量上。纳罗尔把结果转化为标准格式，提交了分数报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惊叹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程度之低，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在满分63分的情况下只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兹特克，得分58分。

之后的20多年中，其他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数据集、数学模型和计分手段，但他们对结果达成一致的概率高达87%～94%，这对社会科学来说是件好事。斯宾塞去世50年

后，也是他那篇关于进化的文章发表100年后，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可以泰然自若地证明社会进化的法则。

人类学的退化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做了交代，解释了有关社会进化的一切，那我们应该已经听说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对水平有关。究竟是像长期注定理论家宣称的那样，西方遥遥领先已经很久了，还是像短期偶然理论家认为的那样，西方的领先只是最近才发生的？如果新进化论者们能够测量社会发展，我们就不必在那些复杂的图表上浪费时间了。只需要计算冰河时期结束之后不同时间点上东西方的得分，进行比较，看看哪套理论更符合实际即可。那么为什么还没有人这样做呢？

我怀疑，这大体上是由于新进化主义出现了内乱。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拿起他的计算尺之前，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测量社会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评论家们这样称呼纳罗尔及其同伴），手里拿着印有编码数据的穿孔卡片，对统计资料进行深奥难懂的争论，在足有仓库大小的电子计算机前忙活，这些似乎与忙于挖掘发现的考古学家们以及采访狩猎者的人类学家们所知的现实格格不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进化主义渐渐变得不再那样荒诞可笑了。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作品《原始富足社会》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时是个进化论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却认为“对越南反抗斗争的同情甚至是钦佩情绪，加上对美国战争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满，可能会削弱经济决定主义和进化发展的人类学基础”。

到了1967年，萨林斯在巴黎争辩狩猎者们事实上并不贫穷时，新一代人类学家们提出了更强硬的观点。这些人在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依照他们的说法，进化论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按照与西方人的相似程度来给非西方社会划分等级，而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人总是给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迈克尔·桑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写道：“进化理论很容易滑入自圆其说的思想意识，或是主张西方在与其他文化关系中的优先地位，认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补充。”许多评论家感觉，这种对数字的自信不仅仅是西方人满足虚荣心的游戏，也是我们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给我们带来的是地毯式轰炸、越南战争和军工企业联合体。瞧啊，约翰逊总统要下台了，那么，民族优越感泛滥的教授们带

着他们的傲慢和数学，也该滚蛋了。

静坐抗议和侮辱谩骂把一场学术辩论转变成了摩尼教的一决雌雄。在一些进化论者看来，他们的批评者们是道德败坏的相对主义者；而对某些批评者来说，进化论者则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在聘用、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等方面钩心斗角，破坏了研究事业，导致学术的两极分化。美国最著名学府的人类学系衰退堕落了，就像一对婚姻不幸的夫妻，多年的互相责难终于爆发，两人开始分居。“我们（甚至）都不叫对方名字了，”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1984年遗憾地说。最极端的例子在斯坦福，我的母校。那里的人类学家们在1998年决裂，正式分裂成支持进化的人类学科学系和反对进化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每个系开始独立地招聘、解聘和招生教学。组织之间成员互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他们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动词，让自己的院系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悦，这取决于说话者——让人类学家们在好几年的学术会议上津津乐道，可是对于解决社会科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斯坦福化没有多大帮助。[2]若想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在这一问题上正视双方的论点。

社会进化的批评者们认为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目中无人，这当然是没错的。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本人，试图解释一切事物的任何变化，很可能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关于新进化论者到底在测量什么，存在着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们对社会内部进化发展的本质达成了一致（这大多发生在他们坚持斯宾塞的变化观点的情况下），这种在积分排行表上给全世界的不同社会划分等级的行为实际意义也不明显。

批评者们认为，评分表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它掩盖了文化个体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时，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创造这种管理形式的古希腊的确很奇特，那里的很多居民打心眼里相信，发现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牧师询问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争论一番，然后投票。给古希腊的变化打分并不能解释民主的由来，而用社会发展指数掩盖了希腊人的特色，分散了人们对其独特成就的注意力，从而实际上加重了任务的困难程度。

不过，那并不代表设计社会发展指数是在浪费时间，只是对于那个具体问题来说用错了工具。西方统治世界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们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观察万顷的土地，汇集上亿的人来进行比较的巨大工程。对这个任务来说，社会发展指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毕竟，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的争议之处在于出现东西之分后的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理论者们并没有专注在这一点上，直接对质对方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不同的历史部分，使用不同的证据，用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的术语。跟随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把浩如烟海的史实证据缩减为简单的数字得分，有其缺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相同的

证据，并得出惊人的结果。

我们需要测量什么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们到底需要测量什么。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

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当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导致西方统治世界。1840年跟随英国舰队的另一位长官阿迈恩·芒廷（Armine Mountain），把定海的中国武装比喻成中世纪编年史中的插图。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里的物件复活了，恢复了生机和颜色一样，”他回想着，“在我面前动来动去，完全不晓得世界已经前进了好几个世纪，也全然不知现代兵器的使用方法、发明和改进。”

芒廷领悟到炸毁舰队和堡垒只是西方统治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系列优势长链中的最后一环而已。更深层的原因是英国工厂能够大量生产炸弹、大炮和战船，而英国政府能够筹集资金，支持覆盖半个地球的远征。那天下午英国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闯进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全都归结为西方人不仅在能量链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与历史上的早期社会不同，他们的高度可以使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投射自己的力量。

这种在能量链上攀爬的过程，遵循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之后的进化论人类学家们的传统，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主要是一个团队掌握其物质和精神环境以达到目的的能力。[3]说得更正式一点，社会发展就是人们赖以衣食住宿的技术、物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类以此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以及保卫自己应对其他集体拓展势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衡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

在做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想郑重申明一下：衡量和比较社会发展并不是为了对不同集体做道德上的评判。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调和电脑化工厂，以及熙攘忙乱的城市，拥有汽车、飞机、图书馆、

博物馆和高科技医疗，居民教育程度很高。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他们的物质精神环境，远远超过1000年前的先祖们，那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这样看来，说现代日本比中世纪日本更发达就十分合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日本人是否比中世纪的日本人更聪明、更有价值，或更幸运（不用说更快乐了）。也没有对道德上、环境上，或是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代价做出什么暗示。社会发展是一个中性的分析范畴。衡量是一回事，褒贬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后将会讨论衡量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事实上，除非我们想出一个测量社会发展的方法，否则将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原则来指导指数的设计。

用现代最受敬仰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开始是最好不过的了。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要尽量做到最简，但不要过于简单。"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应该把想法蒸发成可以用事实检验的结晶，想出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检验，然后就这样，不要加什么，也不要再减什么。

爱因斯坦本人的相对论提供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相对论暗示引力会使光线弯曲，意思是，如果该理论正确的话，每当太阳经过地球和另一个恒星之间时，太阳的引力会使恒星发出的光线弯曲，使恒星的位置看上去稍微改变了一些。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检测了。只是太阳光线太强，我们无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过，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想出了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很符合爱因斯坦的那句格言。爱丁顿想到，在日食期间观察太阳附近的恒星，就能够测量它们的偏移距离是否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

爱丁顿动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系列观察，并宣布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尖刻的评论接踵而至，因为证明爱因斯坦正确和错误的结果差别甚微，爱丁顿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仪器。除去相对论的复杂性[4]，天文学家们在应该测量的对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见的。那么，关键就看爱丁顿的测量是否准确。还是从壮观的星体运动回到定海野蛮的轰炸上来，我们会立即发现，在面对人类社会时，问题要复杂得多。到底应该测量什么来给社会发展分配分值呢？

如果说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那么我们可以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寻求实践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我们需要的指数有很多相似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这一指数来衡量每个国家为公民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和表现。参加这一项目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讨论人类发展到底是指什么，然后总结出三个核心特征：人均寿命、人均教育程度（表现为文化水平和学校入学情况），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然后，他们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衡量系统，综合这些特征，给每个国家评出一个0～1之间的分数。0意味着根本没有人类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灭亡了的情况），1则表示在调查完成所在年份里现实世界中可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例如，在最近可用的指数中，2009年，挪威居于首位，得分0.971，而塞拉利昂垫底，仅有0.340。）

这一指数符合爱因斯坦的规则，因为这三个参数可能是联合国在抓住人类发展意义前提下所做的最简化处理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不仅是寿命、教育和收入而已。它们的优势在于方便定义和记载（较之其他特征，如幸福），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再调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业率、营养，或住房）。即便是最认同联合国的参数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不愿把它们并入一个人类发展分值。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就像是苹果和橘子，把它们捆在一起简直是荒谬。也有经济学家不排斥选择及合并这些参数，但是不喜欢联合国统计学家们衡量每个特征的方式。他们指出，这些分值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十分主观。还有些评论家对给人类发展打分这一概念本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造成一种印象，感觉好像冰岛和挪威人在通往极乐天堂的路上已经走了96.8%的路程，是塞拉利昂人们幸福程度的2.9倍——这两点都不大可能。

不过，尽管恶评如潮，事实证明人类发展指数还是大有用处的。它便于救援机构把基金拨给最需要的国家，即便是批评者们也同意，有个指数可以让一切更明晰，辩论也就更深入透彻。过去15000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联合国的指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也具备一些相似的优点。

正如联合国经济学家们，我们应该遵循爱因斯坦的规则。指数应该衡量尽可能少的社会维度（尽可能简单），而且抓住前文定义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能过于简单）。我们所衡量的每个社会维度都应该符合六项基本标准。第一，必须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必须与社会发展有所关联。第二，必须具有文化独立性。例如，我们或许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参数，可是我们对此类参数的判断具有严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这些特征必须相互独立。譬如，如果选用国家人口总数和财富总量作为特征，我们就不能使用人均财富作为第三个特征，因为这是可以由前两个特征推算出来的。第四，必须有足够的档案记录。由于是回顾几千年前的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因为各个特征可供使用的证据数量差距很大。尤其是年代久远，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某些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须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说，专家们大都同意证据的意义和价值。第六，必须具有便捷性。这或许是标准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是证据越是难以获得，或计算结果所需的时间越长，该特征的可用性也就越小。

任何特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选择的每个参数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几项标准上表现各有优劣。可是在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些参数之后，我选定了四个特征，在这六项标准上都表现不错。虽然它们加在一起，在为东西方社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描述上，较之联合国利用寿命、教育和收入特征告诉我们有关冰岛、挪威或塞拉利昂的信息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们确实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缩影，向我们展示了为理解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所需要解释的社会发展的长期模式。

我选择的第一个特征参数是能量获取。倘若不是从动植物中获取能

量以养活很少耕作的士兵和海员，从风力和煤炭中获取能量以发动船只驶向中国，从炸药中获取能量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开火，英国根本无法在1840年抵达定海，大肆破坏。能量获取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提出把人类历史缩减成一个方程式：E×T→C，这里E代表能源，T代表技术，C代表文化。

这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怀特的意思并不是说把能量与技术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图、荷兰画家伦勃朗或中国山水画家范宽的一切了。怀特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更像是我说的社会发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太过简单，对于解释定海事件还不够。

如果没有能力组织好，就算掌控了世上所有的能源，也无法把英国的海军中队带去定海。维多利亚女王的属下们能够召集军队，支付军饷，训练他们听从指挥，开展大量棘手的工作。我们需要测量这种组织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组织能力与斯宾塞的区分理论有所重合，但是新进化论者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想直接测量社会的变化，甚至是给出让评论家们满意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既与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同时又便于测量的替代参数。

我选择的是城市化。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毕竟，说伦敦是个大地方，并不能直接反映墨尔本勋爵的资金流，或皇家海军的指挥结构。然而，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选择就没有那么奇怪了。支持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负责把食物饮水运进来，把垃圾废物运出去，提供工作岗位，维持法律秩序，扑灭火灾，在每个大城市里，日复一日地进行各种活动。

当然，如今有些世界级大城市运作失常，犹如噩梦一般，充斥着犯罪、肮脏和疾病。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难免如此。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100万居民，那时市井歹徒时常阻碍政府运作，死亡率高到每个月仅仅为了维持人口总数，就有超过1000名乡下人要移居罗马。可是，尽管罗马有着各种卑鄙阴暗的方面（2006年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电视剧《罗马》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使这个城市得以运作的组织机构却是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管理的——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100万），或孟买（人口1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500万），也是远超罗马帝国的能力所及的。

这便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们经常使用城市化来大致反映其组织能力。这种测量并不完美，可是作为粗略的指导还是很有用的。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最大城市的规模不仅可以在过去几百年的官方数据中查找，还可以追溯考古学记录，因而能够对其自冰河时期以来的组织能力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

除了获取并组织好物理能量，英国还需要处理并传递大量的信息。

科学家和实业家们需要准确地进行知识转移；枪支制造商、船只制造商、士兵和海员们越来越需要读懂书面指令说明、计划和地图；亚欧之间需要传递各种信件。19世纪英国的信息技术与我们现在相比当然十分落后（从广州到伦敦私人信件需要3个月，政府急件因为某种原因需要4个月），可是较之18世纪的水平却已先进很多了，而18世纪与17世纪相比也有很大进步。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所以我把它作为第三个特征。

最后一点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组织和传递能量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是，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的话，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统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特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特征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5]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用树干雕刻出灰熊来。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敏捷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的头发更白，不过对不同的问题，需要规定不同的误差范围。对于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是，用数字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到处乱转要好得多。

如何进行测量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有各种项目公布每年的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320万千卡，

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000台互联网主机就有375台产自美国，只有73台产自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军事力量对比》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决定怎样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指数。

坚持最简原则，把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提出的四个特征。1956年，劳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多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特征更大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砝码在15000多年里始终有效，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网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释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特征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地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万人）；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档次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到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规模。

关注最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解决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如何定义城市的范围，如何把不同类别的数据证据结合起来。不过，这确实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这些数据时，我发现把城市的最大规模和其他标准（譬如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分布估测，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结合起来，会显著增加任务的难度，对整体分值却没有多大影响。那么，既然复杂的测量方式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时却存在更多的估测因素，我觉得还是使用较为简单的城市规模参数更合理。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拥有约2670万人口的东京。[6]那么，东京在组织力，或者说城市化参数上得满分250分，这也就意味着计算其他城市得分时，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万）。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纽约，拥有1670万人口，得了156.37分。虽然100多年前的数据没有这么准确，不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时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拥有大约

660万居民（得分61.80）；而在东方，东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175万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们需要结合若干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食物供应和税收、城市的物理面积、住房密度以及趣闻逸事的记录。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拥有约110万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伦敦，拥有约86.1万人口（得分8.06分）。

我们越往前追溯，误差就越大，不过在1700年之前的那几千年里，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紧随其后）。首先是长安，然后是开封，再后来，公元800～1200年，杭州拥有接近甚至超过100万居民（约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连一半的人口规模都没有。再往前几个世纪，情况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的几百万居民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长安大概只有50万人口。

我们越往前观察史前社会，其证据就会变得越模糊，数字也明显减小。可是结合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细致挖掘，我们还是能够对城市规模有个合理的大致感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很像电锯艺术。最普遍接受的误差估计达到10%，不过也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了。由于我们运用相同的估测手段测量东西方城市，大致的趋势还是相当可信的。根据这个体系，每获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过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说的，西方最大的村庄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东方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些年份之前，东西方都是零分（分数表见附录）。

再来谈谈能量的获取，该特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关于能量的获取，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人均能量获取，用每日获取能量的千卡数来测量。根据与城市化特征相同的步骤，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日人均获取能量约228000千卡。这个数字占据历史最高水平，得满分250分（本章前面提过，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评判我们掌控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对其进行测量而已）。2000年，东方最高人均获取能量是日本的104000千卡，得113.89分。

有关能量获取的官方数据，东方只能追溯到大约1900年，西方约为1800年。不过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补救。人体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从食物中得到约2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运作。（个子较高或运动量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国人均每日摄入3460千卡，正如特大号腰带无情地揭示的，这远超过了我们的人体所需。）如果你每天摄入的能量少于2000千卡，身体功能就会逐渐萎缩——力量、视力、听觉等，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长期低于2000千卡，也就意味着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过，实际上，最低的分值总是高于2分的，因为人类获取的大部分能量并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50万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经在周口店生火做饭了，10万年前，穴居人肯定是如此，并且还穿着动物毛皮。我们对穴居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测得不会太

准确，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来源，穴居人平均每天获取的能量应该多出至少1000千卡，这样总共就有大约3.25分。毫无疑问，较之穴居人，现代人类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并且使用木材、树叶、猛犸象骨和兽皮建造房屋——所有这些，又寄生于植物提供的化学能量，而后者又依赖于太阳的电磁能。即便是20世纪技术最落后的采猎社会，食物和非食物来源总量每天也至少有3500千卡。考虑到气候更加寒冷，他们冰河时期末期的远祖们每天肯定需要近4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会有哪个考古学家会在这些估测上纠缠不休，不过冰河时期的狩猎者的4.25分和现代汽油电力轰鸣的西方的250分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们群策群力，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们邀请地球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写一篇名为《工业社会的能量流》的文章。文中包含一个图，显示了对采猎者、早期农耕者（指第二章中提过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亚的农民）、后期农耕者（1400年左右的欧洲西北部农民）、工业人群（1860年左右的欧洲西部），以及后20世纪“科技”社会的人均耗能的推测，耗能方式分成四类：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饲料），家庭和商贸，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见图3-1）。这个图后来被多次引用。

库克的猜测经受住了近40年的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收集的结果比较的考验。[7]当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可以用东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详细证据，来研究实际社会与这些参数的背离程度。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证据，但大多数时期，一直到前几个世纪，考古发现更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动物的骨骸、房屋、农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迹、手艺人的店铺和商品、手推车、船只，以及承载这些的道路的遗迹。

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由空气传播的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前10年对泥炭田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3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公元1世纪时的9～10倍，其中隐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产品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中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由于钢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开封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喷涌黑烟的烟囱，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

计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罗马人比18世纪前的欧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猜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简略提到，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原因，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可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计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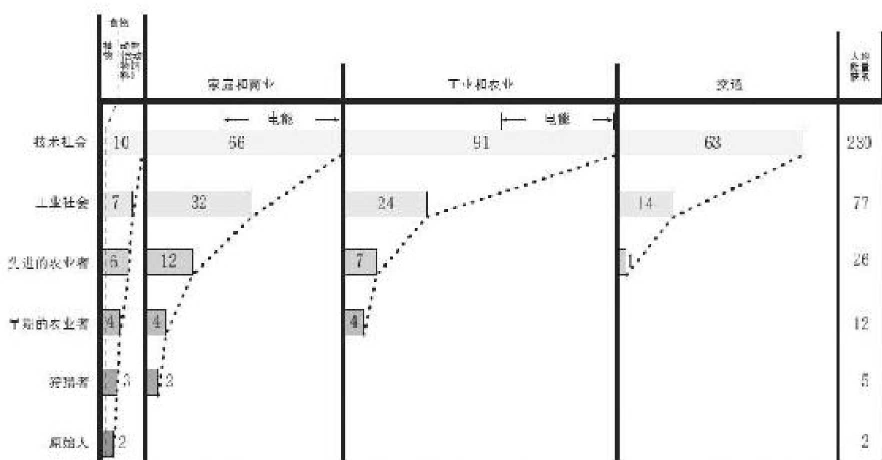


图3-1 数字能量链：地理科学家厄尔·库克关于从能人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日人均能量获取的估计（单位：**1000**千卡）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测量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个世纪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河时期末期，若是每隔一个世纪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减的方法。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会发展每1000年测量一次。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测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测量一次，最后，从公元1400～2000年，每个世纪测量一次。

这样做也有风险，最明显的是追溯历史越早期，变化就会显得越平缓。每1000年或500年才计算一次分数，我们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发现。不过，要为已知的信息标注日期，较之我所提出的时间范围，很难有更准确的方法了。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叙述中将会填补尽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处用到的框架在我看来确实为实用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进行测量。当你阅读前面的内容时，或许会吃惊我在给“西方”和“东方”生成数字时对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个部分会如此含蓄。有时候我说的是美国，有时是英国，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日本。在第一章里，历史学家彭慕兰抱怨比较历史学家们常常歪曲了对西方统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们草率地把面积很小的英国和领土辽阔的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就下结论说西方在1750年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比较规模相似的单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对此做出了回应，把西方和东方具体定义为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侧翼丘陵区的原始东西方农业革命的社会。不过现在得承认，那只是部分解决了彭慕兰的难题。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农耕开始后的5000年左右时间里，东西方地区令人惊叹的扩张过程，以及在侧翼丘陵区或长江流域等核心地区，和诸如北欧或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之间经常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为社会发展指数计算分值时，应该关注东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们可以尝试研究整个东西方地区，尽管那就意味着，譬如，1900年的分值将综合考虑工业时期英国浓烟滚滚的工厂和轰隆作响的机器、俄罗斯的农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亚的牧场工人，以及广阔西方地区各个角落的群体。我们需要为整个西方地区调配出一种平均的综合性的发展分值，对东方亦然，然后对之前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重复同样的过

程。这样做太过复杂，且不实际，我怀疑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当解释西方规则时，最重要的信息一般来自比较各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测量和比较的是这些核心地区内部的变化。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区会随着时间发生迁移和改变。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从公元前11000 ~ 公元1400年期间是很稳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东岸。在公元前250 ~ 公元250年左右，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吞并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区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里。从1400年起，核心区域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扩大到囊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到1900年，核心区域横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东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黄河长江地区，尽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黄河流域的中原转移，公元500年后又转向南方的长江流域，1400年之后又逐渐转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区域扩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国的东南部。目前为止我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社会发展分值都反映了这些核心区域的社会，这些核心区域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点讨论。

英国工业革命：三分靠判断，七分靠运气？

游戏规则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看一些结果。图3-2显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为冰河时期末期世界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这么多铺垫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坦白说，并没有看出多少东西，除非你的视力比我的好很多。东方和西方的曲线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难以区分，而且它们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强离开图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有大的变化，两条线几乎都是突然90度转折，直线向上攀升。

这个图看起来很让人失望，但事实上却告诉了我们两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差别。以我们所观察的尺度看，二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区分。第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迄今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转变。

要想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观察这些分值。图3-2的缺点在于，由于20世纪时东西方的曲线陡然攀升，为了在纵轴上显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东方565.44分），早期过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压缩到肉眼难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显示增长的加速较之以前是成倍增长而非简单增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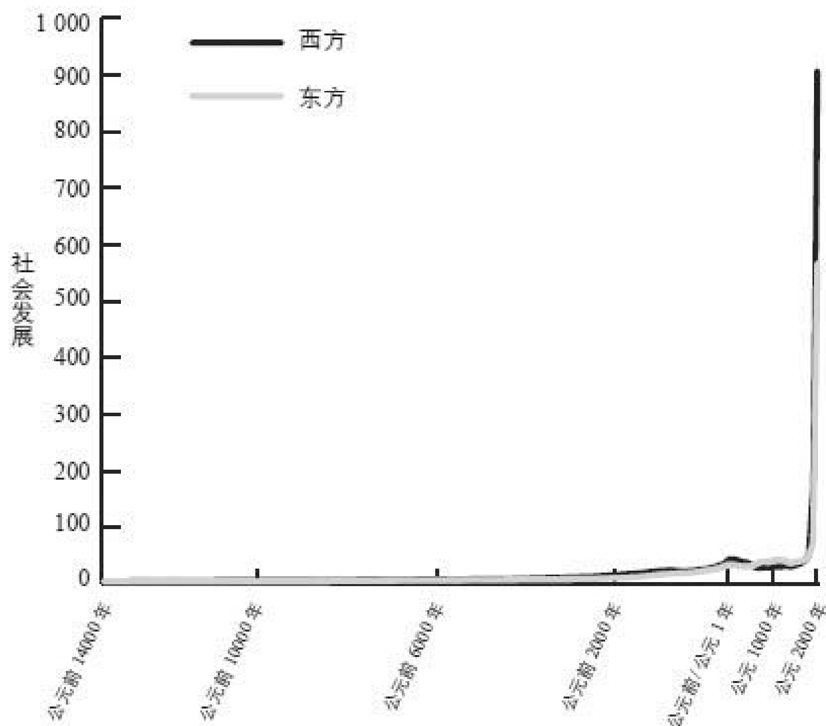


图3-2 计分：公元前1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社会发展

设想一下，我想买杯咖啡，却没有钱。我从本地的黑帮老大那里借了一美元（假设那时一美元还是能够买到一杯咖啡的）。当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只要我在一个星期以内还给他，就不收利息。不过，要是我超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每周翻一倍。不用说，我超过了期限，所以现在我欠他两美元。天生对理财少根筋，我又拖了一个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着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欠款变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图3-3显示了我的债务变化。正如图3-2，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大约第14周时，代表利息的曲线才变得清晰，而那时我的债务已经令人咋舌地累积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债务盘旋上升至32768美元时，曲线终于完全离开了图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帮找上门时，我已经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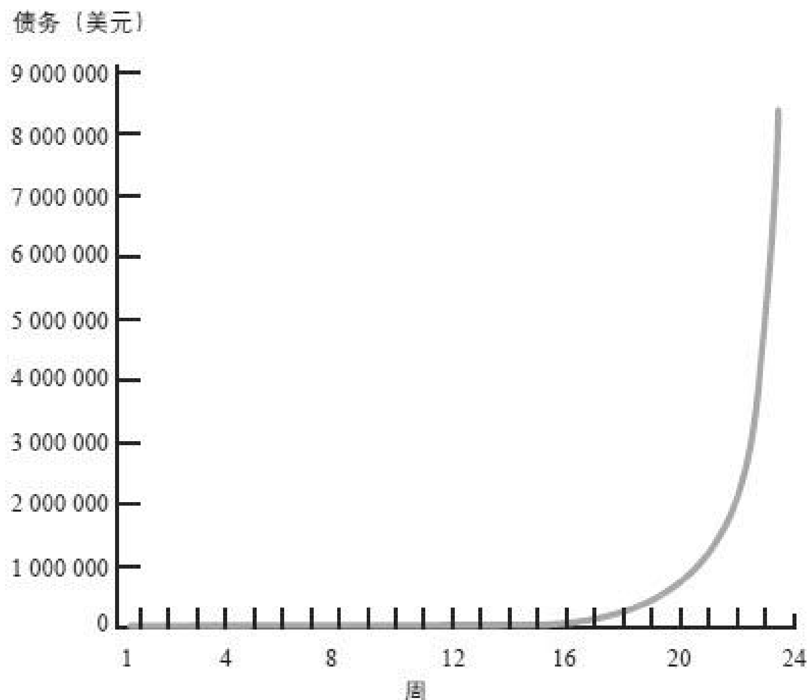


图**3-3** 一杯**800**万美元的咖啡：传统图表显示的复利。虽然咖啡的价值在**14**周内由**1**美元盘旋升至**8192**美元，在图中这场财务危机直到第**15**周才趋于明显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债务在前几个星期的增长实在是微不足道，从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买了那杯咖啡后的一个月左右，碰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喽啰，那时我的债务是16美元。假设我没有16美元，但给了他5美元。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坚持每周偿还5美元，持续了4周，可接着就又一走了之了。图3-4中的黑线代表没有任何还款的情况，而灰线则代表坚持5周，每周还5美元之后的债务增长情况。我那杯咖啡最后仍然花了不止300万美元，却只相当于一分未还情况下最终利息的一半还不到。这至关重要，然而在图中却无法看到。从图3-4中无法得知为什么在结尾处灰线比黑线低那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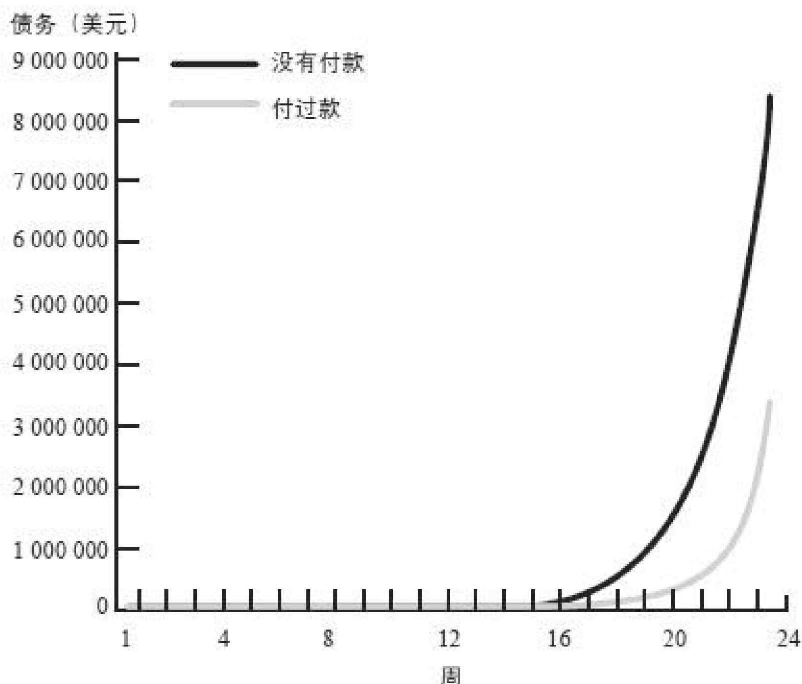


图**3-4** 一种不是很有力的表现方式：黑线显示的是与图**3-3**相同的债务累积情况，而灰线则表现了第**5**周～第**9**周的小额还款后的状况。该传统（线性-线性）图中无法显示这些还款情况

图3-5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我的破产。统计学家们把图3-3和图3-4叫作线性——线性图，因为每条轴上的刻度都是以线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每周在横轴上占据相同的长度，债务增长的每一美元在纵轴上也占据相同的高度。对比之下，图3-5在统计学中被称为对数线性。时间在横轴上也是以线性单元分配的，但纵轴是以对数的方式记录我的债务，意味着图的底部轴线和第一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代表了我的债务从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长，第一条和第二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意味着又涨了10倍，从10美元到100美元，然后再涨10倍，从100到1000，如此反复，一直到最顶部的1000万。

政治家和广告商们已经把用数据误导人们发展成了一项精湛的艺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有感而发，“谎言有三种：无伤大雅的小谎，糟糕透顶的大谎和统计数字。”图3-5或许就证明了他的话。不过与图3-3和图3-4相比，实际上只是关注了我债务的另一个方面。使用线性——线性刻度很好地表现了我债务的糟糕程度，对数线性刻度则清楚地显示了原因。图3-5中的黑线平滑，说明未作偿还时，我的债务稳定地增长，每周翻一倍。灰线显示4周的翻倍之后，我的一系列5元还款是如何减缓，却并没有停止债务的增长。当我停止偿还时，因为债务再一次每周翻倍，灰线再一次上升到与黑线平行，但最后并没有涨到那么令人眩晕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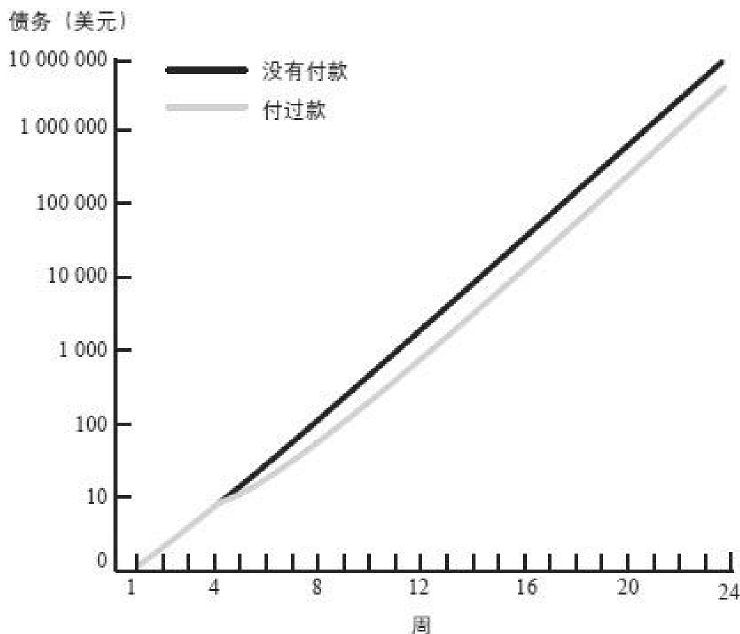


图3-5 预示破产的平滑直线：对数线性刻度表上的债务增长。黑线显示未还款时债务的稳定翻倍，而灰线表现了第5周～第9周小额还款的影响，以及之后停止偿还时又回到翻倍增长的状态

政治家和统计学家们并不总是在撒谎，只是根本没有一种完全中立客观的方式可以表现政治和数字。每句新闻陈述、每个图表，都强调了事实的某些方面，而低估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图3-6用对数线性刻度显示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分值，与图3-2的线性-线性版本相比，同样的分数却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图3-6比图3-2更有揭示性。近几个世纪里社会发展的飞跃十分真实，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统计手法也无法掩饰。但在图3-6中它并没有像图3-2里那样突兀。当曲线开始向上攀升时（西方大约在1700年，东方在180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分值已经比曲线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这个差别在图3-2里很难看到。

图3-6表明，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就意味着要回答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在1800年之后会突然发生飞跃，达到的水平之高，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向全球范围投射威力（接近100分）。

在发展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社会团体，也只能统领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区。然而，19世纪的新技术和制度允许社会把地方统治变成全球性的统治。当然，我们也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西方是第一个迈进这一门槛的地区。不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增长如此之巨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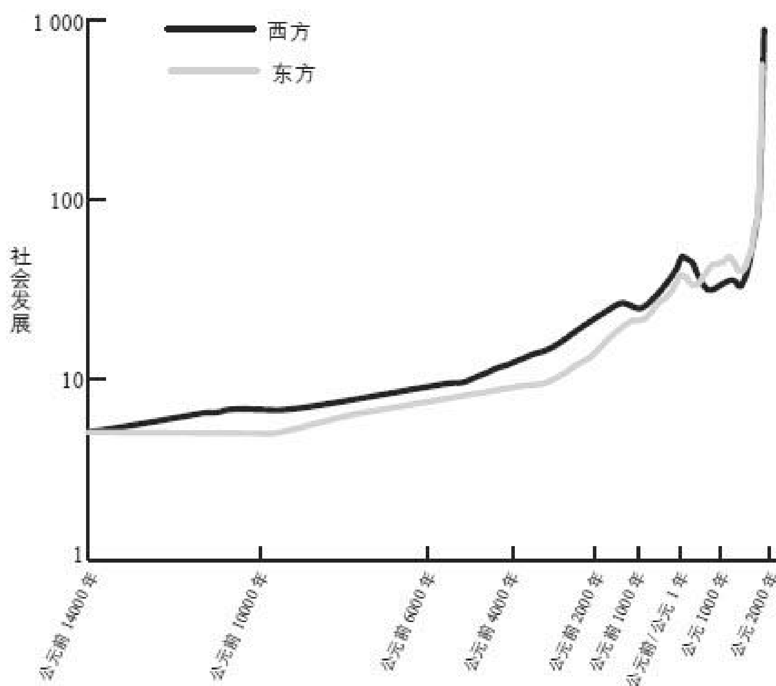


图**3-6** 对数线性刻度表现的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这种表现方式十分有效，突显了东西方的相对增长率，以及在**1800**年以前几千年的变化的重要性

图3-6显示的还不止这些。它还表明东西方的分值实际上并不是直到几千年前才开始有差别的：自从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时间里比东方高。这似乎是对短期偶然理论的一个挑战。西方自从1800年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是对长期注定理论的一种回归，并不是什么古怪的异常现象。

图3-6虽然并没有否认短期偶然理论，但的确意味着成功的短期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时能够解释冰河时期末期的长期模式，以及1700年以后发生的事。不过，从这些模式看来，长期注定理论家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图3-6清楚地显示出西方社会发展分值并不是始终领先于东方。两条线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不断趋近，在公元541年相交，之后直到1773年，东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日期精确到难以置信，前提当然是假设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值完全正确。最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东方的分值在公元6世纪中期超过西方，而西方在18世纪后期重获领先地位。）东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趋近，东方在社会发展上领先世界1200年，这些都不能证明长期注定理论的错误，正如西方在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几乎一直领先，也不能推翻短期偶然理论一样。但是，这些事实意味着成功的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详备，需要考虑到比目前所提供的还要广泛的证据。

在结束对这些图表的研究之前，还有几个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图3-6

里可以看到，而在图3-7中更加清晰。这是个普通的线性——线性图，不过只覆盖了从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500年。截去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们就可以伸展纵轴，从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缩短时间跨度，可以拉长横轴，使横向改变也更加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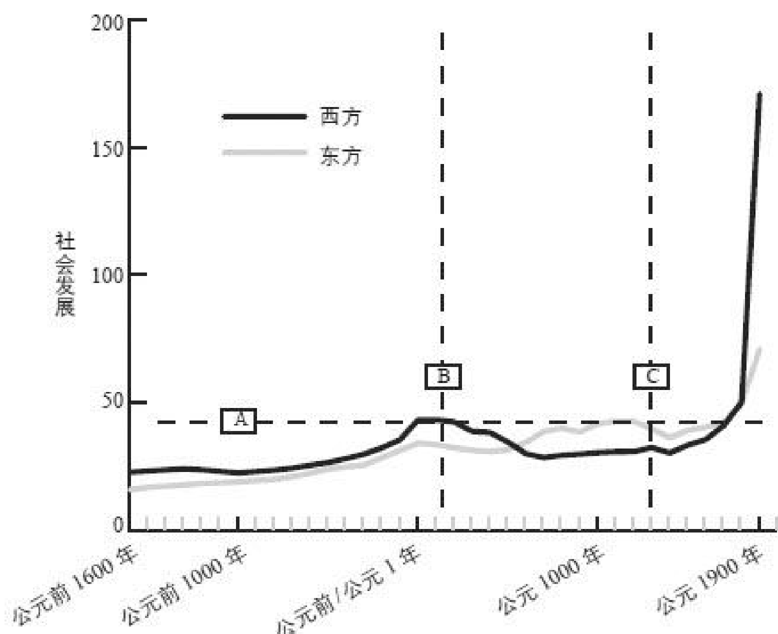


图3-7 跨越时空的曲线：线性——线性表现的从公元前1600～1900年的3500年里的社会发展。线A代表可能的43分门槛，阻挡了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西方罗马帝国以及1100年左右中国宋朝的持续发展。线B表现了东西方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里分数下降的潜在联系。线C显示了1300年左右开始的东西方的另一潜在关联

这张图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在公元1世纪，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紧接着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如果再向右边看一下，就会发现东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中国宋朝的鼎盛时期，然后是类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左右，东西方得分都降到了40分的底部，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停滞，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后，西方的曲线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攀升。

有没有某种“40分门槛”阻止了罗马和中国宋朝的发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过，彭慕兰在他的书《大分流》中主张，18世纪时，东西方都陷入一种生态瓶颈状态，这按理说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彭慕兰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英国靠三分判断和七分运气把掠夺新大陆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生态限制。有没有可能，罗马和宋朝的社会发展达到40分底部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却未能突破？若当真如此，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里，主导的模式或许是长期波动，庞大的帝国分值攀升到40分底部，然后又跌回来，直到18世纪特殊事件的发生。

图3-7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我们既可以在上面画横线，也可以画竖线。可以画竖线的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公元1世纪，东西方分数都处于顶峰，虽然东方得分与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与其只关注西方上升到40分底部，或许我们应该不管它们达到的水平，而是去寻找影响旧世界两端，致使罗马人和中国人的社会发展分数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左右我们还可以画一条竖线，东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类似的模式，尽管这一次是西方的分数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东方的分数已经下滑100年了，西方这时也加入了进来，直到1400年之后两条曲线才有所回转，在1700年左右开始加速上升。同样，与其关注18世纪早期触及40分底部的分数，我们或许应该寻找是什么全球性事件，在14世纪沿着相同的轨迹推动了东西方的发展。或许正如彭慕兰总结的，工业革命首先来到西方并不是纯属侥幸，而是东西方其实都在朝着这样一个革命的方向前进着，但西方对14世纪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使之稍稍超前一点，这微小的优势却对其领先到达18世纪的飞跃点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看来，图3-2、图3-6和图3-7说明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存在的一个缺点。一小部分理论家关注农业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数则研究最后的那500年。因为其中的几千年大体上被忽视了，所以当观察整个历史架构时，对突然出现的那些陡增、下滑、坍塌、会聚、超越，或水平顶部以及竖直连接等现象，他们甚至很少去尝试着解释。坦白说，那就意味着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这样一来，二者就都无法回答隐藏于其后的问题——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斯克鲁奇的疑问：未来依然扑朔迷离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的高潮部分，圣诞未来之灵把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带到一个杂草丛生的教堂墓地。圣诞未来之灵静静地指向一个无人打扫的墓碑。斯克鲁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出现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将长眠于此，孤独清冷，被人遗忘。“这些幻影是一定会实现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呼喊道。

我们也可以对图3-8提出同样的问题，它突显出了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增长率。[8]东方曲线在2103年与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统治地位就将结束，其繁盛将如尼尼微和提尔一样成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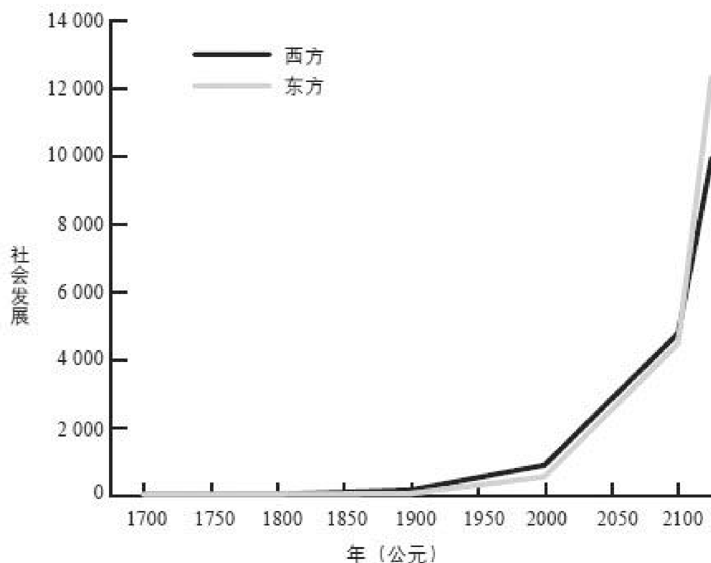


图3-8 即将发生的？如果把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延伸至22世纪，可以看到东方于2103年重获领先地位（在对数线性图中，东西方曲线从1900年起都是直线前进，表明增长率不变。这里是线性图，所以两条线都急剧上升）

西方的墓志铭同斯克鲁奇的一样清晰：

西方统治

1773～2103

愿灵安息

这些幻影真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圣诞过去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1] 虽说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观与斯宾塞的其实存在很大差异。斯宾塞认为进化适用于一切事物，是渐进性的，会不断地完善宇宙万物。达尔文则把进化局限在生物学范畴，定义为“有改变的传代”，认为改变的原因是随机的基因突变，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有时会由简单结构生成复杂体，有时又不会。

[2] 斯坦福大学在2007年承认了这件事，并举办了一次强制的“复婚”，把两派人类学家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学家使用的“社会进步”有很大区别，是用以指代孩童学习成长环境中的社会习俗。

[4] 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一位成员试图赞美爱丁顿，说世上仅有三个人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学说，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爱丁顿沉默了，最后说：“我只是好奇，那第三个人是谁？”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单位的人口规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筑物的规模等数据资料。这些特征与我最后选择的4个相比，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其他特征存在重复部分，数据资料不足），不过好消息是这些特征与我选的那4个大致遵循同样的模式。

[6] 我在前面给出的数字3500万是针对2009年而言的，意味着在2000～2009年，东方在组织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飙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将继续讨论21世纪社会的加速发展。

[7] 对于库克的数据，我只做了一个实质性的修改。我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植物驯化初期西南亚地区的能量占有增长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农业”时期数字，应该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为2000年设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发展水平。通过我的计算，在2000～2010年，在我编写本书的时候，西方发展指数从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东方从565分升至680分。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后来居上：东方领先的世纪

盲人摸象：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的片面之处

南亚有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一个人抓住象鼻，说这是一条蛇；另一个人摸象尾，认为这是一根绳；第三个人靠着象腿，得出这是一棵树的结论，如此等等。关于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有两个理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读到这些理论时我们不免会想到这个故事，长期注定理论拥护者和短期偶然理论拥护者就像那些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却误认为这就是整个大象。相比之下，社会发展的特征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面目，因此也就不会再有关于蛇、绳、树的错误判断了。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摸到了长牙象的一部分。

图4-1总结了第二章留给我们的印象。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气候和生态因素导致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起步早，虽然新仙女木事件使西方发生了气候灾难，但是西方还是明显地领先于东方。不可否认，早至公元前10000年前，我们的电锯艺术的确十分粗糙。在东方，很难发现4000年内有任何可衡量的社会发展变化，西方社会在公元前11000年比公元前14000年发展程度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无法找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微妙痕迹。虽然这些社会发展指数不能反映出什么，但是有数据总比没有强，而且这些指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如长期注定理论所预测的，西方一开始就抢先了一步，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图4-2就没有图4-1那么简单了，图4-2继续描述公元前5000～前1000年的社会发展。它和图4-1的差别就像绳和蛇的差别一样。两幅图像绳和蛇，有相似之处：两幅图中，东西方都继续向前发展，相差不大，西方的发展总是领先于东方。但是，两者的差别也一样显著。首先，图4-2的发展曲线比图4-1上升更快。在公元前14000～前5000年的9000年间，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东方上升了2/3，但是在接下来的4000年间——是图4-1所覆盖时间段的一半不到——西方发展水平增至3倍，东方增至2.5倍。其次，我们看到，公元前1300年后，西方社会发展势头在历史上首次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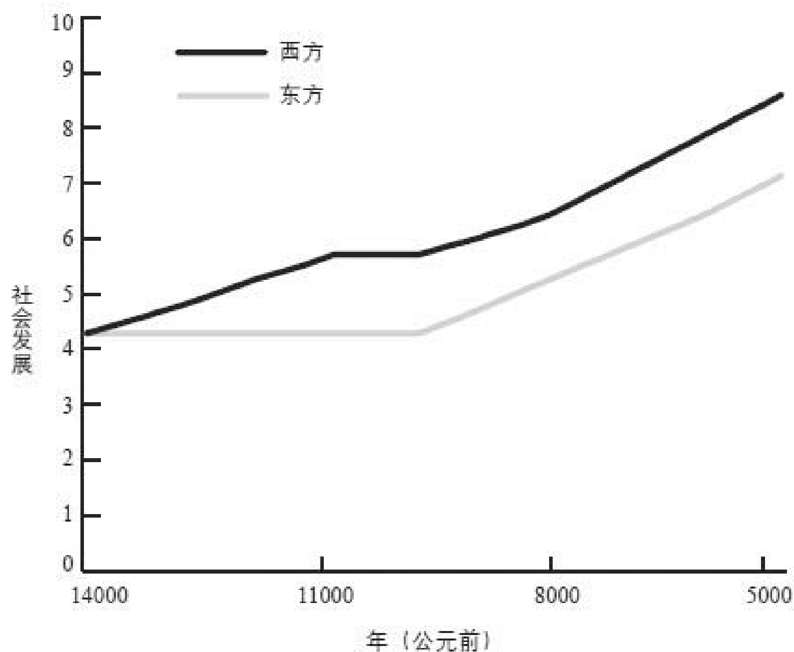


图**4-1** 至今的发展形势：公元前**14000**～前**5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章已对此做出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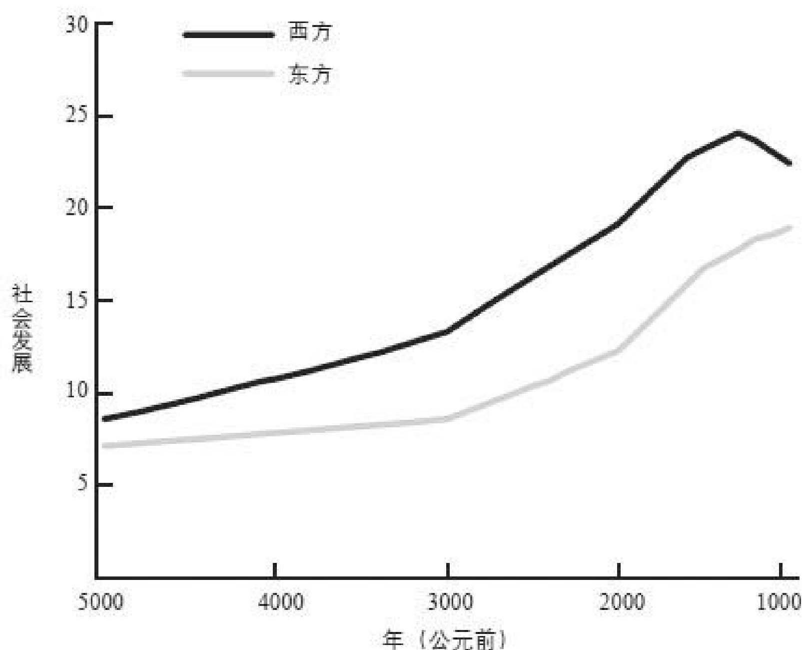


图**4-2** 东西方继续向前发展，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公元前**5000**～前**10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差距扩大和缩小

我试图在本章解释这些事实。我认为，西方的加速发展和公元前1300年后的下滑，事实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发展悖论。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会看到，在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时，在这些解释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这个悖论的规律发挥主要作用。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研究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

伊拉克地区：逝去的辉煌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间，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农村从侧翼丘陵区发展蔓延至亚洲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然而，公元前5000年，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离侧翼丘陵区相距仅数天步行路程，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是几乎没有出现农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片“两河流域的土地”现在是伊拉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现在的伊拉克，这并不奇怪。2003年以来，因为各种新闻报道，我们对伊拉克的恶劣环境十分熟悉。夏天气温高达120华氏度，几乎不下雨，周围呈现荒漠化。很难想象农民居然会选择在那里居住，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甚至更热、更潮湿，农民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寻找水源，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水。印度洋季风会带来一些雨水，这些雨水刚好能促进农业发展。然而，如果农民能控制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夏季洪水，在恰当的时候将这些水导入他们的田地，灌溉庄稼，那此地发展前景光明。

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一些人选择农业生活方式，邻国人学到农业耕作并依靠农业生活，他们都不断修正传统农艺，适应新的环境。但是，有些农艺只适用于侧翼丘陵区的旱作农业，要让其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灌溉农业，仅仅进行“修正”是不够的。农民不得不从零开始。经过20代人的努力，他们改善了沟渠、渠道和蓄水池，不但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边缘耕地渐渐充满生气，而且使其比侧翼丘陵区更多产。他们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经济学家有时候把这个过程叫作探索后发优势。当人们将一项适用于发达核心地区的技术用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时，他们改善这项技术有时候能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好的应用，以至于边远地区变成了新的核心地区。公元前5000年，这样的事情在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生了，纵横交错的沟渠滋养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村庄，供养了大约4000人。这么多人可以建造更精致的神庙。在一个村庄埃利都，我们就发现了层进式神庙，这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以砖为平台的神庙，这些神庙总是采用相同的基础建筑方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越造越大，装饰得也越来越华丽。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积累了如此多的优势，以至于古老的核心地区侧翼丘陵区开始效仿这个泛洪平原上充满活力的新社会。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伊朗西南靠近侧翼丘陵区的平原上的苏萨居民甚至超越了埃利都居民，用砖块建造了一座长250英尺、高30英尺的平台。虽然19世纪的挖掘者考古技术还不够精湛，在挖掘这个遗址时破坏了证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这个平台在当时可能支撑着一座宏伟的神庙。然而，即使是这些挖掘技术不够精湛的考古学家，也不会错过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铜饰，标志着行政控制的印章或黏土压痕，以及一些图像，专家认为这些图像是“僧侣王”。考古学家常常想象这样的情景，区域首领住在苏萨，苏萨比周围的村庄都大，偏僻村庄的村民可能到苏萨来崇拜神灵，感谢神灵，并用食品交换饰物和武器。

当然，村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从如此粗糙的遗址中很难看出这一点。但是考古学家不得不依靠苏萨来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村庄经历了6000年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洪水，被深深地埋在了淤泥之下，让考古学家难以研究（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自从伊朗于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或者自从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这里几乎再没有新探索）。公元前4500年后，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类似的改变可能正在发生，但是直到公元前3800年，考古学家才看到了这些改变。

关于为什么村庄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中还存在争议。公元前6000年，当农民开始搬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时，由于地球公转时不断改变围绕太阳的轨道，自转也不稳定，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达到了史上最热、最潮湿的顶点，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世界又开始降温。你可能认为这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你错了。更凉爽的夏季意味着能带来降雨的印度洋季风越来越弱。降雨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预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炙烤之地，正如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看到的一样。问题一个个出现：春季降雨减少，意味着庄稼生长季节变短，庄稼在每年夏天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洪水前成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2000年来辛勤建立起来的农作系统再也无法适用。

气候变化使美索不达米亚人面临艰难的抉择。当沙尘来袭，侵入他们的田地时，他们可以逃避现实，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是有代价的，饥饿、贫穷，甚至饥荒会接踵而来。或者他们也可以迁移到不太依赖季风的区域，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要让他们放弃照料得很好的土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如何，侧翼丘陵区很明显是该去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有很多村庄了。2006年，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布拉克的考古学家挖掘出两座公元前3800年的集体墓地，埋葬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明显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因此，让农民搬回拥挤、充满暴力的侧翼丘陵区，这也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都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都逃跑了，那这个新的核心地区就会瓦解。但这时出现了第三种选择。人们可以抛弃他们的

村庄，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一些较大的地区聚集。这看起来违反常理，因为如果庄稼收成减少，更多人来到更小的地方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一些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想出了办法：如果更多人齐心协力，他们可以建造更大的灌溉系统，储存洪水，灌溉庄稼。他们可以向更多的矿工提供食物，让他们从地下开采铜，让更多的铁匠制造饰物、武器和工具，让更多商人将这些商品带到周边地区。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成功，到公元前3000年，青铜（铜和小部分锡的合金）大量代替了石头，成为新的武器和大多数工具的原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战士和工人的效率。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组织。集中管理就能解决问题。到公元前3300年，人们在小泥板上刻画他们的活动的记录，大多数考古学家将这些复杂的记录称为书写符号（即使现在也只有一小部分研究符号的精英才能看懂）。无法书写符号的小村庄发展碰壁了，但是有一处遗址——乌鲁克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约有两万居民。

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管理、会议和备忘录——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是祸根，但却是人类成就的标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些事物往往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组织促使侧翼丘陵区的村庄、黄河两岸的村庄成为城市、国家和帝国；组织失败则导致这些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失败。组织的有些管理者是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有些也是恶棍。

随着季风的停止，管理的诞生肯定造成了创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颓废又饥饿的败兵纵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没精打采地向乌鲁克行走，就像连破车都没有的贫困移民，更不用提新政了。我们还可以想象愤怒的村民拒绝将权力交给高傲的官僚，那些官僚企图征用他们的田地和庄稼。结果往往是使用暴力。这样乌鲁克就很可能分裂，很多竞争城镇确实已经分裂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古代管理者如何帮助乌鲁克度过危机，但是考古学家怀疑，他们依靠了神庙。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一点，这些证据互相支持，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一样。比如说，考古学家在神庙遗址挖掘出成堆的大小相同的碗碟，这些碗碟被称做“斜沿碗”，可能被用来分配食物。最早刻有符号的陶片主要来自神庙，陶片上代表“配额”的符号就是斜沿碗的图画。当书写系统发展至人们可以记录这些信息时，这些符号告诉我们，神庙控制着大片灌溉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劳动者。

神庙迅速发展成为名胜古迹，使建造这些神庙的群落相形见绌。长长的阶梯通向上百英尺高的坛庙，专家在坛庙内与神灵进行交流。我们在第二章提到公元前10000年的圣坛，如果说这是人们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那这个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的宏大神殿就是一个扩音系统，这套扩音设备能让齐柏林飞船乐队大显身手。如果这样神灵们还不能听到人们的呼喊，那他们肯定是耳聋了。

正是这些对神灵的呼喊让我开始对考古产生兴趣。1970年，我的父母带我去看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电影——爱德华时代的经典《铁路少年》（*The Railway Children*）。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之前放的纪录短片更让我心潮澎湃（那时人们常这么说）。那天晚上，我迷上了阿波罗11号，想成为一位宇航员，但是这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一部根据埃里克·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的书《众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改编的纪录片（勉强称得上纪录片）——让我意识到考古是我必走的道路。

和亚瑟·C·克拉克在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声称的一样（类似出版于1968年的《众神的战车》），冯·丹尼肯也声称外星人在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并告诉人类天大的秘密。然而，冯·丹尼肯与克拉克不同，他强调他没有胡编乱造，外星人会经常回到地球。外星人激发了人们建造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希伯来《圣经》和印度史诗描述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与核武器。冯·丹尼肯坚持认为，早期文明中，一些国王声称自己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原因是他们的确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过。

虽然证据不足（委婉地说），但是这个论证说服了许多人，很多人对它坚信不疑，冯·丹尼肯卖了6000万册书。他现在仍有很多粉丝。几年前，我站在烤肉架旁考虑着自己的事情时，我被他的粉丝——非常严肃地——指控为密谋掩盖这些事实。

人们常常批评科学家将奇迹从世间带走，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揭示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就是我们不需要太空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王，我们更不需要《2001太空漫游》中的场景来解释智人的进化。自从农业出现后，宗教专家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当神灵要抛弃人类，停止给人类雨水时，美索不达米亚人会本能地依赖牧师的帮助，这些牧师声称自己有特殊方法能与神灵交流，然后转告人们应该怎么做。在这些艰难的时代里，组织是生存的关键，因此，有越多人按牧师说的做，事情就会变得越顺利（前提是牧师给出合理的建议）。

两个过程互为因果，其逻辑和冯·丹尼肯的论证逻辑一样，都是循环的，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野心勃勃的人声称自己有特殊方式可以和神灵交流，他们说他们需要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才能让神灵听到他们说话。一旦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和神灵亲近，因为他们有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毕竟，神灵只会把这些财富给他所爱的人。公元前2700年左右，当记录员正在记录这些事件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王们甚至宣称，神灵是他们的祖先。有时候，将权力委任给与神灵交流的人会创造奇迹，比如在乌鲁克（但是我怀疑），但是当他们失败时——失败是常有的事——留给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就寥寥无几了。

乌鲁克不仅成了一个城市，而且成了一个国家，有中央机构征税、为整个社会做决策，并依靠军队维护社会秩序。一些人有最高地位（但

是明显不包括女士），还有一大队勇士、地主、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僚辅佐他们。几乎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但是在艰难的时代，这是成功的代价。与国家形成前的社会相比，付出如此代价的社会能聚集更多人口、财富和权力。

公元前3500年后，城市和国家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社会发展，然后向外延伸，就像侧翼丘陵区曾经的农村一样。乌鲁克式的物质文化（斜沿碗、书写陶土片、华丽的神庙）被传播到了叙利亚和伊朗。关于它们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和农业最初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很相似。人口密集、组织严密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可能曾对人烟稀少、权力分散的北部地区进行殖民，这些殖民地包括北叙利亚的哈布巴凯比拉，这看起来像有人复制了一个乌鲁克街区，并将它丢弃在1000英里外。相反，早在斜沿碗发明之前，布拉克就是一座大市镇，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方社区，对乌鲁克的风俗挑三拣四。村民努力依靠微薄收入为生，他们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繁荣，于是允许当地牧师成为国王；野心勃勃的牧师看到乌鲁克的宗教首领飞黄腾达，可能就和他的村民交谈，或者哄骗他们，或者威吓他们，让村民允许他们拥有类似的权力。有些人更喜欢村庄生活，但是他们肯定会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国家的形成是大势所趋，就像几千年前觅食者发现农耕时代的到来是大势所趋一样。

埃及的法老为什么如此成功

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第一批农民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汗流浃背地种植庄稼的时候，更多勇敢的人从约旦河谷向西奈沙漠走去，到尼罗河流域去碰运气，寻找肥沃的土地。埃及几乎没有可驯育栽培的本土植物，在农业发展方面也落后于侧翼丘陵区，但是一旦引进合适的种子和动物，埃及就繁荣发展起来。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时候刚好是灌溉庄稼的季节，大面积的绿洲受雨水滋润，在沙漠中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然而，这些优势意味着，公元前3800年季风的退去对埃及造成的影响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影响还要大。很多埃及人离开了他们的绿洲，来到了尼罗河流域，那里水源充足，但是土地缺乏，尤其是在上埃及尼罗河流域变狭窄的地方[1]。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通过管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挖掘出的坟墓表明，上埃及的村庄首领既要管理军事，又要管理宗教事务。成功的首领在村庄获得更多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失败的首领不知去向。公元前3300年，形成了三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安葬国王——如果“国王”这个称谓不是太高贵的话暂且用之——的富丽堂皇的墓地，这些墓地模仿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建筑风格，墓地内还埋葬有黄金、武器和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口的物品。

这些国家互相战斗，直到公元前3100年统一成一个国家。那时候皇家宏伟建筑物的规模迅速扩大，独特的埃及象形文字突然出现。和美索

不达米亚地区一样，书写可能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但是埃及的文字记录一开始就不光包含叙述性文字，还包含官僚的账目。一个引人注目的文本描述道，一位叫那尔迈的上埃及国王在公元前3100年征服了下埃及，还有一个文本写到了一个叫“蝎子王”[2]的国王。后来还有文本提到了征服者美尼斯（可能和那尔迈是同一个人）。虽然细节方面令人困惑，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经清晰：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一了，约有100万名臣民。

公元前3100年后，上埃及的物质文化迅速向尼罗河流域传播。几千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乌鲁克文化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和乌鲁克文化的传播方式一样，下埃及人可能仿效了（或是自愿，或是不得不以这种方式与之竞争）上埃及的生活方式。有明显证据表明，组织成国家的上埃及比以村庄为基础的下埃及发展得更快，政治统一含有一些南方征服北方的意味。

公元前35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进行扩张，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也进行扩张，两者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却有着不同的结果。首先，当那尔迈/美尼斯/蝎子王于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的时候，乌鲁克的扩张突然终结。乌鲁克城被烧毁，很多刚刚发展起来的有着乌鲁克式物质文化的地区也被遗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谜。公元前2700年左右，象形文字开始记录更多信息时，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了35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神圣的国王，那时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称呼自己为苏美尔人。因为乌鲁克管理松散，统一的埃及成为主要的西方核心地区。

为什么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展不同，这仍然无法解释。可能因为埃及只有一条河流和三角洲以及一些周围都是沙漠的绿洲，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两条河流、很多顺畅的支流，周围还有很多山丘，这使得埃及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更易征服。也可能是因为那尔迈比乌鲁克国王做了更明智的决策，这个国王的名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其他关键因素。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苏美尔国王宣称自己像神灵，而埃及国王宣称自己就是神灵。电影和电视剧《星际之门》改编自冯·丹尼肯的书，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尔迈一行人是真正的太空人，而乌鲁克国王只是太空人的朋友。虽然这个解释引人注目而又直接易懂，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很多人认为，事实上法老（埃及国王的称号）在提升自己的神圣形象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自我神化是疯子的行为，在5000年前也不是容易的事。那这些国王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尔迈和他的朋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神灵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根据后来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们有了最佳线索。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宣称自己是法老。在和他的将军争夺权力的时候，他发现传播一个谣言很有用，这个谣言就是，他也是神灵，就像之前的法老一样。几乎没有

马其顿人去认真核实这个谣言，这为亚历山大增加了筹码。当他的军队到达现在巴基斯坦的地方时，他召集了10位当地的智者，并命令他们回答他提出的最深奥难解的问题，违者处死。当轮到第七位智者时，亚历山大问："一个人如何变成神灵？"这位哲学家很简单地回答道："做一件凡人无法完成的事。"很容易想象，亚历山大假装搔头不解：最近有人做了凡人无法做到的事吗？答案非常明显，他可能已经告诉自己了：是的，那就是我。我刚刚推翻了波斯帝国。没有凡人可以做到。我是神，所以当我的朋友反对我时，我杀死他们不应该感到不安。

事实也可能是亚历山大和他的支持者编造了整个故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故事的真假没有公元前4世纪20年代的这个现象重要：一个国王宣传自己是神的最好方法是展现非凡的军事威力。对于3000年前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是在统一尼罗河流域这件事上，蝎子王、那尔迈或者美尼斯的确做到了人们所认为的凡人做不到的事。可能将一个神圣的国王和一位伟大的征服者结合在一起能让自我神化听起来更可信。

这也不是法老唯一成功的政变。上埃及的首批国王们肯定发展了乌鲁克式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让人们向他们提供资源，让人们接受中央管理，但是法老们从整个尼罗河流域吸收了当地精英，让他们担任管理者。法老们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颇具策略性地将其建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中间，让地方贵族加入他们。法老们在孟菲斯分配恩惠，小贵族对这个政体有所贡献，法老们给予他们一些奖励，让他们继续巩固这个体系。当地的领主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在让农民能勉强生存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多地征税，然后将收入上交，以此换取法老的恩惠。

法老的成功一部分依靠政治活动，一部分依靠他们和贵族之间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一部分依靠华丽的粉饰，比如假装是神灵而不只是神灵的朋友，这些手段当然更容易成功。哪位当地的权贵不想为神灵服务？然而，为慎重起见，法老也创造了强大的符号语言。公元前2700年后不久，卓瑟法老（King Djoser）的艺术家设计了篆刻象形文字的样式，描述存在了500年的神王。人们看到一位不朽之人死去，卓瑟理解了其中神学的微妙，因此他设计了埃及王权的根本象征——金字塔——来保存神圣的法老的尸体。高450英尺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550年左右，在1880年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超过它的高度前，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迄今它仍然是最重的建筑，重约100万吨。成千上万的劳工花了几十年建造金字塔：采石，让石头沿尼罗河漂下，然后拖到建筑地。金字塔脚下的所谓工人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给工人提供食物、指挥他们行动需要增加大量的官僚，加入工人群对于那些可能从未离开过家的村民来说肯定是一次变化非常大的经历。如果有人在金字塔建造之前怀疑法老的神圣性，那他们在金字塔造好后肯定不会怀疑了。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邦的发展趋势和埃及相似，但是它发展得更慢、更谨慎。根据象形文字记录，每个城市被分为很多"家族"，

每个家族包含很多一夫一妻制家庭。每个家族有一户家庭作为首领，组织土地和劳力，其他家庭按等级负责不同的事务，有些家庭在田地里工作，有些家庭制作工艺品，完成安排的工作份额，以此换取口粮。规模最大、最富有的家族理论上由神灵领导，可能管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和成百上千的工人。为神灵管理这些家族的人通常是城市的首领，由国王领导城市的守护神家族。保护守护神的利益是国王的工作。如果国王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守护神也会发达；如果国王没有做好，守护神也会没落。

公元前2500年以后，这成了一个问题。农业的发展让人们可以供养规模更大的家庭，人口的增长促使人们为了更肥沃的土地而争斗，也促使争斗方式变得更有效。有些城市战胜并占领了另外一些城市。其中的神学意义和埃及神王的死亡一样棘手：既然一个国王保护他的守护神的利益，那如果另一位自称是其他神灵的国王占领了这个城邦，这又意味着什么？有些牧师提出“庙城”理论，使宗教等级制度和守护神的利益独立于国王。成功的国王为回应这种理论，声称自己不仅仅是神灵的代表。公元前2440年左右，一位国王宣布他是他的守护神的儿子，还有人创作了诗歌，描写吉尔伽美什国王如何在世界之外旅行以寻求永生，这些诗歌开始传播，成为《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的一部分，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巨著。

统治者寻找新的场所显示他们的威严，因此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宏伟的建筑，乌尔皇家墓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墓地中华丽的金银殉葬物像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一样，暗示着死者绝非凡人；74人被毒死给普阿比王后陪葬，这暗示着统治者为与神灵的关系而争斗对苏美尔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噩耗。

公元前2350年左右，冲突开始白热化，出现了暴力政变、武力征伐，还有革命性的财产和神权的再分配。公元前2334年，一个叫萨尔贡（Sargon）的人（意思可能是“合法的统治者”，虽然这很可疑，他可能是在夺权后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名为阿卡德。现在这座城市可能埋于巴格达地下，还没有挖掘出土，这毫不奇怪。但是其他遗址的陶片记录着，萨尔贡并没有和其他苏美尔国王战斗，他劫掠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直到有足够的财富组织一支5000人的全职军队。然后他攻打了其他苏美尔地区，通过外交手段和暴力征服了那些城市。

教科书常常称萨尔贡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创立者，但是公元8世纪前，埃及也有统治者统一国家，他们的做法并无二致。萨尔贡本人并没有成为神，但是在镇压公元前2240年左右的一场叛乱后，他的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宣布，八位苏美尔神灵想让他加入他们的行列。苏美尔艺术家开始描述纳拉姆辛为尊贵的、超越生命和传统性质的神明。

到公元前2230年，西方有了两大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它们使侧翼丘陵区原来的核心地区黯然失色。为了应对生态问题，人们创建了城市；为了应对城市之间的争斗，他们创建了有百万人口的国家，这

些国家由神灵或者神王统治，由官僚管理。随着核心地区的争斗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城市网络蔓延至叙利亚和黎凡特更原始的农村，经过伊朗蔓延到现代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在克里特岛，人们不久也开始建造宫殿，马耳他建起了巨石庙，西班牙东南沿海开始零星出现要塞城镇。在更远的西北方，农民在每个可生存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在西方世界最边远的地方，大西洋海浪拍打着不列颠的寒冷海岸，人们投入了大约3000万小时的劳动，建造了最神秘的不朽建筑——巨石阵。公元前2230年，冯·丹尼肯的故事中访问地球的太空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星人没有必要继续介入人类的发展了，因为这些聪明的猩猩正在促使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荒野西部：核心地区的分裂和斗争

如果太空人50年后重返地球，他们会感到震惊。西方各个核心地区都在分裂，人们互相斗争，颠沛流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一个听起来比较中性的词，却包含了各种恐怖的屠杀、痛苦、逃离和通缉）将西部地区的人们逼向荒野。当我们问是谁或者是什么扰乱了社会发展时，我们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答案：这可以归咎于社会发展本身。

人们试着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往往是传播信息、传递物品和四处迁移，因为在一个地方富足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稀有而珍贵。这使结果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住在一起，组建社会，按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管理。4000年前，神庙和宫殿占有最好的土地，中央官僚机构没有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家庭，因为每户家庭都试图种植他们需要的所有作物，中央官僚机构规定哪些农民应该种什么。拥有肥沃庄稼地的村庄可能只种小麦，而山区的村庄种植葡萄树，还有的村庄专门制作金属制品。然后官僚就可以重新分配这些产品，从中拿去一些官僚所需要的，储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将其余的作为配额口粮分配给臣民。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就开始实行这种分工分配，1000年后这成了社会规范。

国王之间也互赠自己喜欢的礼物。埃及法老们有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他们将这些物品送给黎巴嫩城市的次级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则赠予雪松木作为答谢，因为埃及缺乏上等木材。无法赠送合适的礼物是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心理原因，同时出于巩固地位的考虑，再加上拉动经济的需要，埃及法老互赠礼物这个现象就约定俗成了，而且这使物品运送、人们的迁移和观点的传播变得十分有效。在这些传播网络终端的国王和中间的很多商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现在，我们往往认为指令经济肯定效率低下，因为指令经济由国王、独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大多数早期的文明都依靠这种经济体制。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里，市场经济无

法运作，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皇室卑微的独立商人总能依靠皇家和牧师的事业而飞黄腾达。邻里之间用奶酪交换面包，或者帮助别人挖茅坑来换取照顾小孩的服务。城镇和国家人民在集市进行交易。修补匠用驴子装载着坛坛罐罐，来往于集市。在国家的边境地区，耕地慢慢退化成沙漠或山川，村民用面包和青铜武器与牧羊人或觅食者交换牛奶、奶酪、羊毛和牲畜。

关于这些交易的最有名的记述来自希伯来《圣经》。在希布伦附近（现在的约旦河西岸）的山丘上，雅各是一名成功的牧羊人。他有12个儿子，但是他偏宠第11个儿子约瑟，送给他一件多彩服。约瑟的10个哥哥一气之下把约瑟卖给了去往埃及的奴隶贩子。几年后，希布伦缺乏粮食，雅各派他的10个儿子去换取谷物。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那遇到的埃及宰相正是他们的兄弟约瑟，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服侍法老的过程中得到提拔（不可否认，是在强奸未遂被判入狱一段时间后，当然，他是被陷害的）。当时商人不可信，因此当约瑟假装认为他们是间谍而把他们关入大牢时，他们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但是故事结局很圆满，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所有的后裔来到了埃及。“于是他们在埃及有了社会地位，”《圣经》写道，“在那里繁衍生息。”

约瑟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那时人们已经追随这部《圣经》长达2000年之久，这些人到现在姓名已经失传。亚摩利人来自叙利亚沙漠边界，库提人来自伊朗的山区，他们以商人或者劳工身份来到埃及，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里的熟面孔；来到埃及的还有尼罗河流域的“亚细亚人”，埃及人用这个带有轻蔑性的词指亚洲。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核心地区与毗邻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使核心地区不断扩大，人们对环境的控制力增强，从而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是有代价的，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始终是社会发展悖论的核心部分。

神王纳拉姆辛有一个同样神圣的儿子沙尔卡利沙利，公元前2200年左右，当他在阿卡德的正殿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时，问题开始出现。耶鲁大学的哈维·韦斯（Harvey Weiss）是挖掘出叙利亚的恩利尔遗址的考古学家，他认为自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恩利尔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萨尔贡时期是一座有着两万人口的城市，但是一个世纪后却成了一座被人遗弃、荒无人烟的城镇。为了寻找原因，韦斯研究小组的地质学家通过地质沉积物的微观研究发现，公元前2200年前，恩利尔和毗邻地区的土壤中的灰尘数量剧增。灌溉渠被淤泥堵塞，这可能是因为降水量减少，人们渐渐离开此地。

1000英里以外的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问题。在约瑟的故事中，法老依靠解梦人来预测农业收成，但是真正的法老有一种测量工具，叫作尼罗河水位计，用来测量河水的流量，并预示收成好坏。记录测量读数的文字显示，公元前2200年左右，河水流量大量减少，埃及也变得越来越干旱。

公元前3800年左右，干旱的天气促使乌鲁克发展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且发动战争统一了埃及，但是在这个复杂、互相关联的世界里，舍弃恩利尔这样的城市也意味着，亚摩利人和亚细亚人所依靠的商业活动会随之消失。就好像约瑟的兄弟来到埃及买谷物，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谷物。他们本可以回到希布伦，告诉父亲不得不挨饿了，或者他们也可以继续走入法老的领地，如果可行的话就买食物或者用工作来换取食物，如果不可行就抢夺或者偷窃食物。

在其他情况下，阿卡德和埃及民兵组织可能已经杀了这些令人讨厌的人（经济移民或者罪犯，就在于你怎么看了），而公元前2200年，这些武装力量本身就很松散。有些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阿卡德国王看作残暴的征服者。当假装神圣的沙尔卡利沙利未能处理好公元前22世纪9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很多牧师家庭不再与他合作。他的军队慢慢解散，将军宣称自己是国王，亚摩利帮派占领了所有城市。在不到10年内，帝国瓦解了。每个城镇各行其是——正如一位苏美尔编年史家描述的："那谁是国王？谁又不是国王？"

在埃及，宫廷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升温，国王佩皮二世已经在位60年，面对质问，他证明宫廷和贵族是不平等的。当他的朝臣一个个密谋反对他时，当地的上层人士却自行其是。军事政变爆发，公元前2160年左右，下埃及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时几十个独立领主和难以统治的亚细亚人团伙在乡村胡作非为。更糟糕的是，下埃及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的大祭司逐渐使用越来越响亮的头衔，最终与下埃及发生内战。

到公元前2150年左右，埃及和阿卡德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为了争夺农民手中逐年减少的粮食，这些国家互相争斗。一些武装团体因此发财，但是少数保留下来的记录大体上都是描述当时令人绝望的情况。还有记录显示，这个危机还波及了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考古学家很难判断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何时与另一地区产生联系，况且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时候不起眼的巧合也含有重要的信息，但是希腊最大建筑的灰飞烟灭、马耳他神庙的终结、西班牙海岸线上要塞的废弃都发生在公元前2200～前2150年之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

西方核心地区要建立更加庞大和复杂的社会体制，需要依靠人口、商品和信息的定期流动，而气候或社会局势的突变——比如恩利尔的气候突然干旱，或者佩皮二世年迈时期社会的动荡——同时也破坏了这些社会体制。一些破坏性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比如公元前2200年后的气候干旱和移民，但是这些事件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至少在短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佩皮有一位像约瑟那样的顾问，那他或许能扭转乾坤；如果沙尔卡利沙利妥善处理他与将军和牧师的关系，那他的帝国就不会灭亡。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乌尔城利用阿卡德的瓦解，建立了一座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比阿卡德小，但是因为官僚强行征税，留下了各类税单，我们对该国的了解更多。4万份税票被公开，还有更多的等待专家去研究。

舒尔吉（Shulgi）于公元前2094年登上了乌尔的王位，宣称自己是神灵并实行“个人崇拜”。他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体裁“舒尔吉圣歌”，来赞美他各方面的能力，从唱歌到预言，让人们敬畏他。虽然舒尔吉才华横溢，但是在他死去（公元前2047年）后的几年内，他的帝国也开始衰落。公元前21世纪30年代，乌尔频遭袭击，问题严重，因此这里的人们建造了100英里长的城墙来抵御亚摩利人，但是公元前2028年，很多城市开始抵制乌尔的税收制度，因此国家财政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破产了。当一些将军企图为乌尔征收谷物，还有一些将军宣布独立的时候，乌尔面临严重的饥荒，就像是阿卡德没落过程的重演。苏美尔诗歌《乌尔哀歌》（*The Lamentation over Ur*）中写道：“饥荒就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城市。臣民像被洪水包围，费力喘息。国王在宫殿孤独一人，呼吸沉重，人们放下武器……”公元前2004年，袭击者洗劫乌尔，俘虏了乌尔最后的国王。

当美索不达米亚四分五裂时，埃及又统一了。当时上埃及的底比斯大祭司当了国王，在公元前2056年击退了主要敌人，并于公元前2040年统治了整个尼罗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西方核心地区看起来非常像它1000年以前的样子，埃及在神王的统治下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很多城邦，由国王统治，这些国王最多只是“像神”而不是神。

4000多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区的野蛮社会形势令人目眩，到那时，一些促使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已经很明显。社会发展不是克拉克书中的巨石或者冯·丹尼肯书中的外星人施与人类的礼物或者诅咒，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出的，归根结底，因为人类懒惰、贪婪、恐惧、总是寻找又简单又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社会才不断发展。从乌鲁克的崛起到埃及底比斯的统一，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但是人们无法以自己的意愿推动社会发展，每次社会发展都以之前所有的发展成果为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含各个前进阶段，必须以正确的顺序进行。乌鲁克的首领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无法实施乌尔1000年以后在舒尔吉的统治下才发展成熟的官僚体制，就像征服者威廉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无法制造电脑一样。正如美国人所说，你无法一下就从这到那。这种积累的社会发展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每次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创新的基础上，并且为后人做铺垫，这意味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发展越快。

然而，创新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创新意味着改变，会带来同样多的欢乐和痛苦。社会发展造就赢家和失败者，造就新的富有和贫穷的社会阶级，造就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新关系。因为后发优势理论，之前被边缘化的人被赋予了权力，这时社会发展甚至还创造出新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扩张，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难管理。同时，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能威胁到社会发展本身。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悖论：社会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危害社会发展本身。当这些力量失去控制——特别是变化的环境使不确定因素大量增加——社会的混

乱、毁灭和瓦解就会随之而来，正如公元前2200年发生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发展悖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长期注定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

越过国界线：由贸易和战争塑造的时代

虽然公元前2200年后，社会动荡横扫西方核心地区，但是这也不是“黄昏时刻”。公元前2200年后的衰落甚至没有在图4-2中表现出来[3]。这可能低估了破坏性事件的规模，即使是这样，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确的：到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比公元前3000年快50%。社会发展不断向前，西方社会发展规模扩大，形式更复杂。

核心地区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0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再也不宣称自己是神灵，甚至在埃及，人们也不再那么信任法老。公元前2000年，雕像和诗歌将法老刻画为比公元前3000年更好战、厌世和令人失望。国家权力肯定也因此缩水：虽然宫殿和神庙还是很重要，但是更多的土地和贸易掌握在私人手中。

然而，破坏性事件之所以没有使历史发展倒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核心地区不断扩张，吸引边缘地区的加入，这些边缘地区在倒退时发现了新优势，于是加入了核心地区。从伊朗到克里特岛，这些地区都依靠雨养农业，边境线常常剧烈变动，人们在此建造埃及式或美索不达米亚式的宫殿，并采用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系。总的来说，边境地区的国王比依靠灌溉农业的核心地区的国王更需要依靠军事力量，并且更少宣称自己是神灵，可能是因为埃及和苏美尔的统治者看上去太庄严，以至于伊朗和克里特岛的国王很难让自己看起来像神灵。

社会的不断发展再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对社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有更大的优势。现在乌克兰地区的牧人在公元前4000年驯化了野马，2000年后，在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驯马人在强壮的马身上套上绳索，来驾驭轻便的二轮马车。一些草原牧人驾着马车出行，他们不关心核心地区的情况，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购买4000辆马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马车不是坦克，可以压垮敌人的阵线（很多历史巨片的导演喜欢这样描述），但是登上马车，弓箭手队伍能迅速移动，这使行进缓慢的老式步兵部队彻底过时。

马车的优势看起来十分明显，但是在一种战略系统下运筹帷幄的军队往往很难采用另外一种战略系统。如果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驾驶战车的军队，等级分明的纯步兵军队就会陷入混乱，一群新的精锐部队就会被授权。虽然缺乏证据，但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埃及人和美索

不达米亚人似乎慢慢地采用了这种新的战略系统。北方的新城市则更灵活，比如神秘的胡里安人所居住的城市，很明显，他们在公元前2200年从高加索移居至美索不达米亚北方地区和叙利亚。胡里安大草原让他们能更有效地使用新武器，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松散，或许他们更容易采取新的战略系统。胡里安人、伊朗西部地区的加喜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4]、现代的以色列和约旦地区的西克索人以及希腊的迈锡尼人都没有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巴比伦城组织严密，但是严密的组织一时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有了马车，这些之前被边缘化的人们就有了更好的作战方针，他们就能侵略，甚至占领历史更悠久、更富有的邻国。西克索人不断向埃及迁移，在公元前1720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在公元前1674年夺取了王位。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侵略了巴比伦，不久加喜特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到公元前1500年，胡里安人创建了一个王国，名为米坦尼，迈锡尼人征服了克里特人。

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但是从长远看，那些动乱使核心地区扩张，而没有使社会发展倒退。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为奴役、放逐、屠杀和劫掠，北方的移民取代了当地的统治者。在埃及，底比斯人领导的叛乱于公元前1552年终结了西克索王朝，社会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新的王国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形成，它们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一个扩大版的旧核心地区。这些大国互相联系紧密，因此历史学家将接下来的300年称为国际化时代。

贸易蓬勃发展。皇家的记录文本充满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阿马那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书信显示，巴比伦、埃及、亚述、米坦尼和赫梯等新兴强国的国王谋取更高地位，索取礼物，嫁出公主。他们创造了共同的外交辞令，并互称“兄弟”。二级统治者被排除在强国俱乐部之外，强国俱乐部的国王称他们为“仆人”，但是等级是可以重新商量的。比如说，阿希亚瓦（可能是希腊）是一个陆地边界的强国。在阿马那的记录中没有阿希亚瓦的书信，但是赫梯国王在一份公元前13世纪的条约中列了一张“和我等级相当的国王”的列表，他列了“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和阿希亚瓦国王”——为了完善这张列表，他把亚述国王从列表中除去。

这些兄弟国家之间的交往越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激烈。公元前8世纪的西克索侵略使埃及的上层人士受到创伤，无法逾越的沙漠会保护他们不受攻击的想法被粉碎，他们决定防止这样的侵害再次发生，因此他们将松散的民兵组织升级为永久军队，配备职业军官和当代马车军队。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沿着地中海岸征伐至叙利亚，沿途建筑要塞。

公元前1400年爆发了军备竞赛，落后者遭殃。在公元前1350～前1320年之间，赫梯和亚述人吞并了米坦尼。亚述干涉了巴比伦的内战，到公元前1300年，赫梯打败了另一个邻国阿尔查瓦。赫梯和埃及国王发动了一场殊死的冷战，派出了很多间谍，发动了很多次秘密行动，控制叙利亚的城邦。公元前1274年，冷战变成热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支

军队——估计每支有3万名步兵、5000辆战车——在卡叠什发生冲突。很明显，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困境。既然他被人们视为神灵，这个困境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拉美西斯二世在7座以上的神庙张贴了以下告示，告诉我们他发动了史泰龙的电影中兰博式的狂暴行为：

> 国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歼灭了我们的敌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个军队，还有他们的军队首领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们同伙的国家的所有首领、步兵和战车骑兵，他们一个个倒下。国王陛下以牙还牙，将他们杀死。他们横尸于他的马前，而且国王陛下独自征战，并没有他人陪同。

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说的，“哈梯的卑鄙首领”后来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从神王的夸大言辞中得出军事史实，这很困难，但是所有其他的证据都显示，事实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嘘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点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着海岸线不断向前行进，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们因为遇到了新的战斗而停止前行，一场是与亚述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山脉交战，另一场是与希腊的冒险家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交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5个世纪后希腊的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希腊的盟军围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远在东南地区，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围攻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以亚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伦告终。

这些都是野蛮的搏斗。失败意味着被歼灭——男人被屠杀，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残破不堪，渐渐被人遗忘。因此，为了赢得胜利，人们不惜牺牲一切。更多武装上层人士出现了，他们比之前的更富有，他们的内部宿怨发生了变化。国王们在他们的宫殿修筑防御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阶层人士烦扰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税收和强制劳役剧增，而且随着贵族依靠借贷保证奢华的生活方式、农民抵押粮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负债不断增加。国王们将自己描述为人们的牧者，但是他们花更多时间去剪人们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护他们。国王们控制劳动力，迫使人们为他的建筑工程工作。为法老的城市辛劳工作的希伯来人、雅各儿子们的遥远后代，只是这些奴隶人口中最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后，国家权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区随之扩张。人们在西西里、撒丁岛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腊制造的陶器，这表明，其他更值钱的（但是考古更难发现）的商品也被带到遥远的地方。考古学家深入安纳托利亚海岸，发现了当时的贸易机制，这令人惊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乌鲁布伦失事的船只装载着大量铜和锡，这些铜和锡能够锻造10吨青铜，还装载着从热带非洲运来的乌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松木、叙利亚的玻璃、希腊和现在以色列地区的武器。简而言之，能赢利的东西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员来自各行各

业，他们在轮船航行路线的各个港口，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区逐渐开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铜武器的富有者的坟墓显示，在撒丁岛和西西里，村庄首领慢慢成为国王。记录文本显示，年轻人离开这些岛上的村庄，就像核心地区战争中的雇佣兵那样，去寻求自己的财富。撒丁岛人在巴比伦停了下来，甚至还到了现在的苏丹。在这里，埃及军队为了寻找黄金向南行进，沿路袭击当地的国家，建造神庙。在更远的地方，瑞典的军队首领们不断被战车埋葬，战车是西方核心地区的地位象征，瑞典军队还使用其他进口的军事武器，尤其是锋利的青铜剑。

随着地中海变成了新的边界，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4000年，因为灌溉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河流域开始变得比侧翼丘陵区的旧核心地区更发达，在公元前2000年，远距离贸易迅速发展，使地中海广阔的航路创造更多价值。公元前1500年后，动荡的西方核心地区进入了扩张的新时代。

天下万国：中国为什么没有金字塔

考古学家往往会遭受这样的烦恼，我认为这个烦恼是埃及嫉妒症。无论我们在何处挖掘，挖掘出何物，我们都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埃及挖掘的话，我们会找到更好的东西。埃及嫉妒症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很宽慰。1995年，中国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正式访问了埃及。考古学家告诉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国的年代更久远。回到北京后，他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4年后，该工程宣布了发现成果：埃及古物的确比中国的年代久远。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久远多少时间。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农业生活方式就开始在西方发展，足足比中国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农业传播至边缘地区，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公元前3800年季风开始转而向南吹时，这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国家。东方也有很多干旱的边缘地区，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们才开始接触农业，因此更寒冷、更干旱的天气没有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崛起。如果温暖潮湿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更干旱一些、更易控制一些，可能会使两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长江流域的大片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亚热带森林，这在现在很难想象。在北京现在堵车严重的地方，那时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没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发展并建立城市和国家，但人口缓慢增长。人们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庄，老村庄发展成城镇。人们获取能量的能力越强，人口增长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大。因此，他们像西方人一样，不断改进，不断试验，寻找新方

法，从土壤中获取更多东西，更有效地组织自己，并从别人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更大的区域周围出现了用夯土建筑的坚固要塞，这意味着当时有战争；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组织，这意味着出现了群落规划；房屋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房屋里面发现了更多物品，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这可能意味着富有的农民正在将自己同邻居区别开来。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房屋内工具的分配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东，一些人的最后容身地——大坟墓中比别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别是男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中甚至还有精致的玉雕饰物。

虽然这些玉饰很漂亮，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国公元前2500年的遗址时，还是很难避免埃及嫉妒症带来的说不出的痛苦。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实上，他们的发现更像是考古学家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遗址，在城市和国家出现不久之前。东方走着像西方一样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后1500年。按照这样的模式，东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经历了社会转变，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经历的转变一样。

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周围，社会变化加速，但是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最快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最广阔的有着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狭窄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人们在村庄内为抢夺资源而斗争失败或者战争失败，就很难逃跑，很难重建家园。比如说，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在山东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个大城镇发展起来，这个城镇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围分布着较小的卫星镇，每个卫星镇又有各自更小的卫星村。调查发现，伊朗西南地区的苏萨在1500年前也有着相同的模式。当一个群落取得政治控制权时，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模式。

有些人的葬礼上会有奢华的祭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公元前2500年之后，真正的国王在山东可能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一些坟墓中有十分豪华的玉饰，其中有一座坟墓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皇冠的绿松石头饰。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也只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简陋的陶瓷碎片。这片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瓷碎片刚刚出土时，挖掘人员只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里，但是当他们回到实验室清洗这块陶瓷碎片时，他们发现在碎片表面刻有11个符号，这些符号和中国后来的文字有关，却又与之不同。挖掘人员提出疑问，这是不是广泛流传、写在易毁坏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东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统治者一样，有官僚帮他处理事务？事实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字的鉴定非同寻常，他们怀疑日期鉴定错误，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伪造的。只有之后的发现才能解释这些疑问。无论有没有这些文字，掌管山东群落的人肯定权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类献祭变得很寻常，有些坟墓还有祖先崇拜。

这些掌管者是谁？陶寺[6]是400英里以外汾河流域的一处遗址，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这是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村落，大约有1万居民。一

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撑起了中国第一座宫殿，虽然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是被毁坏的墙上的一片装饰碎块，碎块是在一个考古坑穴中被发现的。

在陶寺，成千上万的坟墓被挖掘出来，这些发现暗示，当时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10座坟墓中有9座是小坟墓，只有很少的祭品。10座坟墓中约有一座较大的坟墓，但是约100座坟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坟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坟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画龙的花瓶、玉饰和整猪，这些猪被用来献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丽的坟墓还含有乐器：黏土或木质鼓，鼓皮用鳄鱼皮制成，还有大石钟、外形奇特的铜铃，这和第二章已经谈论过的史前墓地贾湖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讲述贾湖时提到了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理论：东方的君王从史前的萨满发展而来，这些萨满用酒、音乐和重复的仪式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与神灵交流。当张光直提出这个想法时，贾湖遗址还没有被挖掘，而且他只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证据。但是说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遗址时，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被具体化。

2000年后，一本关于礼仪的儒家著作《周礼》列出了在陶寺的坟墓中发现的所有种类的乐器，将其列为上层人士仪式中演奏的乐器。

张光直认为，和《周礼》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这是一部包含很多实用知识的著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于公元前239年编撰。吕不韦宣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据说圣王是地神的后代，最后一位圣王禹通过开凿水渠，抵御黄河的洪水，拯救了人类。有文本记载："苟非禹，吾属皆为鱼矣。"[7]充满感激的人们让禹成为他们的大王，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

吕不韦对自己编撰的《吕氏春秋》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悬赏，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他就赏黄金千两。（幸运的是，现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这么干了。）虽然吕不韦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听起来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缺乏可信度，诺亚方舟是拯救人类使其逃离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圣王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张光直认为吕不韦的书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实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有点歪曲。在那个时代，类似王权的权力在东方正在形成。

吕不韦书中描述，圣王将天圆地方作为他们立天下的法则，张光直认为，这和一种玉卮"琮"有关系。公元前2500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富丽的墓地里就有琮，后来传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圆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统一。方圆一直代表着皇权的强大，一直到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拥挤的人群中探视昏暗的宫殿内部，你就会看到同样的符号——

方形王座、圆形藻井——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形状。

古代的僧侣王宣称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并且将琮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张光直指出，这些记忆一直保留至吕不韦所处的时代。张光直将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段时期称为“玉琮时代，在这段时期萨满教和政治活动联合起来，上层阶级出现，用萨满教来控制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琮当然是皇家财富，比如，最大的琮刻着神人和动物，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琮王（他们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张光直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宗教专家们就把自己变成了统治精英，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000多年前的宗教专家一样，他们还将夯土平台上的庙宇作为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一处遗址甚至还有一座形状似琮的圣坛（不可否认，虽然很小，斜边长只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来就像发展中的乌鲁克，他们有了完整的宫殿、平台，当地的首领正要成为天子。很突然的，他们没有成功。上层阶级的宫殿被摧毁，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宫殿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垃圾坑里发现的一块墙壁碎块，我之前提到过。40具尸骨被扔进当时宫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尸骨被肢解，有些尸骨上还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夺。陶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在几英里开外，一座新的大城镇发展了起来。

考古学家感到最沮丧的是，我们常常能发现事情的结果，却找不到原因。我们可以编造故事（野蛮人烧毁了陶寺！内战摧毁了陶寺！内部争执让陶寺分裂！新的邻国侵略了陶寺），但是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认为，陶寺的衰落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东最大的地区也被废弃，中国北部地区人口减少——这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然也在遭受干旱和饥荒灾害。气候变化会造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吗？

如果像埃及的尼罗河水位计那样，陶寺也用一个黄河水位计来记录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像叙利亚恩利尔的考古学家那样进行微观研究，那我们就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些证据。这些事件发生2000年后，有相关文字记录，我们可以搜寻这些记录来找到相关信息，就像我们从《吕氏春秋》中找到关于圣王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些文字的作者对如此久远的年代了解多少。

《吕氏春秋》中写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国”指的是“酋邦”，是一个城墙包围的小型政治单位，他们觉得这个词能十分恰当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情况。还有些学者主张，禹王的确存在，他终结了万国时代，并建立了夏朝。文献资料甚至还提供了气候原因：黄河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风沙中心，黄河流域10年中有9年会下倾盆大雨，这也是为什么禹需要疏导黄河的水。当然，这些学者的推测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黄河有些地方

开始干旱，人们经常把黄河干旱叫作“黄祸”，因为大多数年间黄河都会发洪水，使大批农民遭受苦难。

禹的故事可能的确是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场真正的灾难，也可能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又一次发现，虽然我们不清楚发生社会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结果却很明显。公元前2000年，山东和汾河流域的城镇再次发展起来（陶寺甚至还有一座高20英尺，对角线长200英尺的大平台），后发优势开始显露——这个理论在西方历史中如此重要，在从前的穷乡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纪念性建筑开始建立起来。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伊洛人为什么不模仿陶寺的建筑，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建筑风格。之前的1000年，中国北方流行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筑，陶寺的建筑代替了这种建筑，宫殿变成封闭式的，庭院被有顶的走廊包围，只有几处入口，然后用高高的夯土墙将宫殿隐蔽起来。解释建筑风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筑风格可能意味着，随着僧侣统治传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断变化的边缘地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级制度变得更森严。

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东方的乌鲁克时代，一个群落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强行做出决策，强行征税。这个群落就是二里头，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里头迅速发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是夏朝都城，传说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国家的学者大体上都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指出，到二里头废弃以后1000多年才有关于夏朝的文献资料。可能他们认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们编造的。这些学者指责中国的学者，说得好听点，就是认为他们轻易相信这些神话；说得难听点，就是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利用这些神话进行宣传鼓吹，以提升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毫不奇怪，这些争辩变得很令人讨厌。

这些争论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就我来说，即使关于禹的故事大多数是民间传说，我也倾向于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看到，当我们想要证实它的准确性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学家非常善于将名人代代相传，我无法想象禹和夏是凭空编造出来的。

无论事实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统治二里头的人可以指挥更多劳工来建造一系列宫殿，可能还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闭式宗庙。支撑一号宫殿的平台总共花费了10万个工作日的劳动来完成。在距离此地0.25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从青铜铸件中发现了熔炉、渣滓和铸模。公元前3000年，人们就发现了铜，但是铜对人们来说一直是新事物，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小饰品。当二里头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发展起来时，武器还不常见，石头、骨头和贝壳还只是农业工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里头的铸造工艺较之早期的工艺有了重大突

破，产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这帮助这个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时也生产出了非凡的礼器——陶寺早期的铜铃、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和直径一英尺多的青铜觚。在二里头发明的这些器物（青铜斝、青铜鼎、青铜爵、青铜盉）成为东方人传达宗教旨意的终极扩音器，它们代替了琮，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伟大的器物只能在二里头找到。张光直认为，皇室的权力是由这些礼器和超自然世界来体现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青铜礼器对二里头的神权来说可能和青铜剑同样重要。二里头的国王有最大的扩音器和神灵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国领主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最能向神灵传达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对于国王来说，青铜器皿是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青铜器异常昂贵，需要无数工匠，一吨又一吨的铜、锡、燃料——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里头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一些考古学家通过定居的格局，猜测这个国家占地2000平方英里），还派出殖民者去掠夺原材料。比如，东下冯地处丘陵，有丰富的铜矿，在二里头以西100英里，有二里头式陶瓷和大量炼铜残渣，但是没有宫殿、富丽的坟墓或者铸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说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学家挖掘错地方了，虽然他们在东下冯寻找了很长时间。最可能的原因是，铜在东下冯被开采并提炼，然后被送到二里头这个东方第一殖民政权。

从二里头文化到甲骨文的发掘

后发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也有不利之处，尤其是当一个周边国家进入一个旧核心地区时，它就会面临新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和它一样想进入旧核心地区。公元前1650年，二里头是东方最耀眼的城市，庙宇中闪耀着青铜鼎，悦耳的钟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有大胆的二里头城里人走出黄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会置身于一个充满军事要塞和敌对领主的暴力世界。在离二里头4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两具被剥掉头皮的尸骨。

二里头和这些荒野边界的关系，可能很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帝国和亚摩利的关系，贸易和劫掠对双方都有利，一直到这个平衡被打破。偃师建于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头5英里，这个军事要塞的出现意味着东方出现了动荡。后来，文献资料显示，在这段时期，一个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师发现的最早文物结合了二里头式的物质风格和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的考古学家（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认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黄河，击败了二里头，建立了偃师来统治那些更卑下却更久经世故的敌人。当二里头逐渐衰退时，偃师迅速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

朝的君王可能不想离之前的敌人二里头人太近，于是迁都50英里以东的新城市郑州。

看起来，人们在二里头能做的事，在郑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规模更大。郑州的内城和二里头差不多大小，郑州还有1平方英里的市郊，每个郊区有各自的夯土墙。据估计，这需要1万劳工花费8年建造完成。后来一首诗这样描述建造这类墙的劳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8]那时郑州肯定萦绕着轰轰、噔噔、乒乒的建造之声。郑州需要不止一处的青铜铸造间，其中一处就留下了8英亩的废料堆。郑州的礼器延续了二里头的传统，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为战乱）的一座青铜鼎高约3英尺，重约200磅。

郑州同时也扩张了二里头的殖民范围。在长江之外400英里，矿工为了寻找铜矿，挖遍了铜陵的山谷，开采了上百个竖井，破坏了当地的山水，留下了30万吨残渣。他们留下的物品（保存相当完善，考古学家甚至还找到了他们的木质和竹质工具，还有芦苇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当乌鲁克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后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时，有些遗址看起来就像乌鲁克的复制品，甚至连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样。同样，商朝的殖民者在盘龙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郑州，商朝式的宫殿、富丽的葬礼、青铜礼器一应俱全，开通了从铜陵到商朝中心城区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荣起来。根据传说，1899年，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的亲戚得了疟疾，派人去买一剂中药龟甲[9]。这位生病的亲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看到仆人带回的龟甲上刻有一排符号时，他猜测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他把龟甲送到王懿荣家，询问他的意见，王懿荣猜测，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荣买了更多龟甲，在译解这些符号上有了很大进展，但是进展还不够迅速。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使人们对西方的愤怒爆发。皇太后支持这些人对西方的反抗，并派包括王懿荣在内的朝廷官员掌管民兵队伍。义和团团民包围了外国大使馆，但是两万外国军队——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突袭了北京。王懿荣的家在这场灾难中被掠夺殆尽，他和他的夫人，还有长媳一同服毒跳井自尽。

王懿荣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传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手中。10年内，这位朋友被发配到中国荒凉的西部地区，忍辱负重，最后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书。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甲骨狂热。国内外的学者纷纷抢购龟甲，有一位学者出价每字3盎司白银，而那时北京的劳动者每天只能赚到1/6盎司的白银。坏消息是，这股热潮导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装团伙在西红柿田里为了抢夺龟甲碎块而决一死战。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荣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这些甲骨文还记录了中国到商朝为止的历代帝王，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不谋而

合。

古董商试图将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们很快就知道它们来自安阳。1928年，国民政府在那里启动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一样，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军阀和强盗在附近争斗，盗墓者用自制手枪向警察射击，日本军队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将要结束前一小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甲骨文龟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学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将这些龟甲挖出土，他们知道这些龟甲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入土了。在接下来战乱的10年，他们的大多数发现都消失了，但是青铜器和甲骨文龟甲在1949年被运往台湾。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阳的挖掘改变了中国早期的历史。

这几次挖掘表明，安阳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建于公元前1300年。安阳用城墙围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占地约3平方英里，但是像郑州一样，安阳的市郊使城区相形见绌。庙宇、墓地和铸铜间在周围10平方英里以内都可见到，整个面积相当于曼哈顿的1/3。一处在2004年被挖掘的铸造间占地10英亩，但是这个用来举办仪式的地方的中心处正在举行一项不同的活动：国王通过举行仪式祈求祖先保佑，这些仪式在甲骨文记录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根据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当时仪式的各个阶段拼凑在一起。国王会向祖先提出问题，在流经安阳的河流对岸，国王从华丽的坟墓中召唤祖先的灵魂。他将一根烧烫的木棒压在龟壳或骨头上，然后解释碎裂的声音的含义，专家就会在甲骨上记录下结果。

这些仪式使武丁王成为祖先首领，负责为最近死去的国王举办祭祀活动，将这些国王的灵魂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召集并招待各自的祖先，这些祖先——为了特别严肃的事情——会召集所有祖先的灵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灵“帝”。不会说话的乌龟能让人们听到祖先的旨意，这种思想在6000年前的贾湖就存在了，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规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2万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斗古德炜（David Keightley）计算，当时大约制造了200万～400万片，用去了10万只乌龟和牛。仪式还包括饮酒狂欢，可能是为了让君王和巫师进入状态，和神灵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后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葬礼，下一任君主会传承这个传统。考古学家发现了八座皇家坟墓，从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坟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灭亡的时候，帝辛还在位。所有坟墓都被掠夺，但是墓地仍然规模宏大——每座坟墓挖出几千吨泥土，根据埃及的墓地规模标准来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商朝葬礼的特色：暴力。

中国古代文学讲述过人们为社会上层人士“陪葬”，但是安阳的挖掘者在挖掘出这么多残酷的发现之前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1001号坟

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里有200具尸体——竖井底部有9具尸体，每个坑穴放一具尸体和一条狗，还有一些被故意折断的青铜剑，在竖井周围的壁架上还有11具尸体，坟墓封土的斜面上还分散着73～136具尸体（很难从这些破碎的尸体残骸判断精确数量），坟墓表面附近还有80具尸体。坟墓周围大约共有5000个祭祀坑，每个祭祀坑里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数是男人，有些人因为苦役而伤了关节）和动物（从鸟类到大象）。这些被命运诅咒的人没有安详地死去。有些人被砍头，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斩，还有些人被绑得身体扭曲，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甲骨文记载了13052次仪式性凶杀，如果像古德炜说的那样，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5%～10%，那么受害人总共有25万人。平均算来，150年内，每天有4～5人死于非命。然而，事实上，他们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礼上。在这场贵族的狂欢会上，他们被刀劈，哭喊着死去，墓地的确是用鲜血建造成的。大约3000年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国王为了向他们嗜血的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提供战俘的血，发动了战争。商朝的君王可能为了祖先，做了同样残忍的事，尤其是对羌族人，在甲骨文记载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伟大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建造墓地，同时和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灵交流。因为个人崇拜和战争，他们成了君王，葬礼使死去的君王变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这充满了军事象征意味。第1004号坟墓（可能是廪辛的墓地，廪辛死于公元前1160年左右）虽然被掠夺，但仍然有731支矛头、69把斧头和141只头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关于战争的。甲骨文记载：“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佑。”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商朝的军队规模很小。甲骨文记载的最大军队有1万人，是卡叠什罗马军队的1/3。甲骨文记录的地名显示，武丁王直接管理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土地，还有一些遥远的殖民地，比如盘龙城。很明显，他管理的国家不像埃及那样完整、有税收、官僚制度健全，而是一些分散的同盟，这些同盟会向安阳进献贡品——用来祭祀的牲畜、白马河兽骨，甚至是用来献祭的人。

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商王写入他编纂的历史中，他编写的历史使早期的中国历史听起来很简单。在圣王（禹王时代达到顶峰）时代之后，中国建立了夏朝，然后是商朝，接下来是周朝（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三个朝代）。中国自这三个朝代起发展起来，其他信息都不值一提。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和安阳在当时是无可匹敌的，同时也发现，司马迁的记录使历史过于简单化。夏朝和商朝周围还有几十个邻国，就像埃及和巴比伦那样。

考古学家才刚刚开始发掘其他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尤其是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直至1986年，我们还毫不知晓，一个富有的国家于公元前1200年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兴旺发展起来。但是考古学家不久就在

三星堆发现了埋有宝藏的坑穴，其中有几十座青铜钟，一些六英尺高的人像，大眼，戴冠，还有精致的青铜“神树”，是人像的两倍高，枝叶繁茂，硕果勾垂，枝上立鸟栖息。挖掘者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失落的王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于2001年在金沙附近被发现。据估计，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将建造世界上一半的房屋和高速公路，我们难以预测抢救遗迹的考古学家是否会在这些挖土机前抢先一步，发掘新的遗迹。

我们很容易认为赫梯人、亚述人和埃及人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古代的记录文本显示，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习惯地认为，西方被分为很多国家。然而，在东方，根据司马迁编写的历史，中华民族始于夏朝，并向外辐射，这个想法如此吸引人，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中国之外的其他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古代东方和西方都包括众多国家，它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习惯和文化形式，但又有着不同之处。它们进行贸易、战斗，互相竞争，不断扩张。随着我们的证据不断增加，古代东西方的发展历程看起来越来越相似。可能在当时，安阳有一座木质大厅放置文件，这些文件写在丝绸和竹子上，记录与外国统治者的外交往来，就像埃及阿马那的陶土片一样。可能金沙的君王在和武丁王讨论是否平等对待山东的君王时，称呼武丁王为“兄弟”；可能武丁王甚至将商朝的公主嫁到长江流域的一个小朝廷，让公主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地方生儿育女。这些事情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

国家开始分裂：连外星人都会感到吃惊

我又要提到冯·丹尼肯的太空人的故事。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200年瓦解了，虽然这使外星人感到吃惊，这一点我之前提到过，但是如果他们到公元前1250年中国的武丁王时代和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看一下，他们就会十分满意，这样他们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这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得到24分，是公元前5000年的3倍。

平均每个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每天获取2万千卡能量，相比之下，公元前5000年每人每天获取8000千卡，最大的城市可能有8万居民，比如埃及的底比斯或者巴比伦。规模最大的军队可以召集5000辆战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一个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赫梯）可以建造一个核心范围内的帝国。新兴国家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发展，有着各自的宫殿、神庙和圣王，然后核心地区的帝国会吞并这些国家，并不断扩张。东方的发展继续落后于西方一两千年。东方可能会像西方那样遇到发展障碍，而西方可能会遇到更多动乱，但是这些动乱仅仅是放慢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像之前讨论的那样。西方社会发展将会保持领先态势，几千年后西方发现化石燃料，继续统治世界。

因此，西方核心地区的每个主要城市，从希腊到我们现在称为加沙地带的地方，在公元前1200年都被付之一炬，外星人会认为这是又一次浩劫，像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那样——很确定地说，是一场很大的浩劫，但是长期来看，这不需要担心。甚至在历史记录员还没来得及记录，灾难就十分突然地席卷宫殿的时候，那些外星人也毫不担心。

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希腊的皮洛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不同寻常的陶土片，陶土片上有一行文字“守卫者正在守护海岸”。考古学家还在相同的地方找到了另一块陶土片，上面的文字明显写得很匆忙，写到一半就终止了，这些文字看起来是在描述为防止不测而举行的人祭。在乌加里特——叙利亚海岸上的一座富有的贸易城市里，考古学家在一个烧窑里发现了一些陶土文件，在把这些文件归档之前，记录员打算在烧窑里烧干陶土。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文件带走，乌加里特就遭到洗劫。在乌加里特即将瓦解的时候，这些文件读来让人感到事情十分严重。文件中有一份来自赫梯的国王，他乞求食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另一份文件中，乌加里特的国王写道，当他的军队和战船在支援赫梯人时，“敌人的战船来到了这里，我的城市被烧毁，他们在我的祖国作恶”。

到处都被黑暗笼罩，但是只要埃及仍然挺立，希望就仍然存在。拉美西斯三世法老以他的名义建造了一座神殿，里面立了一块碑，碑文看似是在讲述乌加里特的故事：“外国人在他们的岛上密谋，在他们武器的威力下没有国家得以幸存。”这些外国人——拉美西斯称他们为海人——击败了赫梯、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公元前1176年，他们又来到了埃及。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埃及的神王，神王说道：

> 那些胆敢侵犯我国边境的人，他们将会断子绝孙，他们的身心、灵魂将万劫不复……他们被拖到海滩上，在海滩上被包围、征服、杀戮，尸体成堆……我（甚至）只要提及埃及这个名字，就能从他们手中夺回原来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呼喊我的名字时，就会燃烧殆尽。

拉美西斯三世所说的海人也可能是皮洛斯和乌加里特故事中的恶棍。拉美西斯说，这些恶棍包括Shrdn、Shkrsh、Dnyn和Prst。埃及的象形文字不记录元音，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Shrdn应读做“Sherden”，这是撒丁岛人的古代名字，Shkrsh读做Sheklesh，是Sikels（西西里）的埃及文名字。历史学家还不是很清楚Dnyn指什么人，可能是指Danaan，后来诗人荷马用这个名字指希腊人。我很确定Prst指什么人，是指Peleset，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埃及文名字，他们在《圣经》中很出名。

这些都是不同的地中海人，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历史

学家还在不停地争论。证据不是很完整，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原因是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所有地方都气温过高，降水量太少。他们指出，旱灾重现了公元前2200年的景象，使人们迁移，国家因此瓦解。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地震使西方核心地区陷入混乱，在边境地区为掠夺者和袭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人们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来自边缘地区的大批轻装步兵原来纪律涣散，有了用来砍杀的新式刀剑和更致命的标枪后，这些步兵部队就能打败核心地区的战车队伍，这些战车部队表面光鲜，实际上却笨重而不灵活。疾病也有可能是人们迁移的原因之一。公元前14世纪20年代，一场可怕的瘟疫从埃及传到赫梯。一位祈祷者说："赫梯之地，每个角落，都在死亡。"虽然幸存的史料没有再次提到这场瘟疫，但是，如果在史料记载更完善的时代，此类瘟疫会不断地在史料中被提及。到公元前1200年，核心地区人口明显减少。

虽然潜在的动态机制看起来已经足够清晰：核心地区和扩张的边境地区的关系突然转换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具体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和之前讨论的事情一样，扩张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中海沿岸的新边境地区促进了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新的后发优势，并且引起了社会动荡——人们迁移、变得唯利是图、使用难以控制的新策略——这些都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旧秩序的挑战。公元前13世纪，核心地区看似已经对他们建立的边境地区失去了控制。

不管人们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不管原因是气候变化、地震、战场的改变还是瘟疫，人们开始大量向核心地区迁移。在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拉美西斯二世已经加强了埃及的边境防御，将移民安置在受到严密管制的城镇，或者让他们参军，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前1209年，梅内普塔法老不仅要与撒丁岛人和西西里人作战（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就与他们作战），还要同利比亚人和阿凯瓦沙人战斗——希腊语可能是阿希亚瓦——这些人联合起来从西方袭击埃及。

梅内普塔胜利了，他十分欣喜，割下了死去敌人的6239个未受割礼的阴茎，以此来计算敌军死亡人数，但是就在他数这些阴茎的时候，风暴席卷了北方地区。希腊、赫梯和叙利亚的城市被摧毁。后来有传说讲述，这时埃及有移民迁移去希腊，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暗示了可能有向外迁徙的移民。加沙是非利士人公元前12世纪定居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和希腊的陶器别无二致，这表明非利士人一开始是希腊迁移过去的难民。更多的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定居。

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受灾地区迁移出去，移民数量迅速增长。这看起来是一场无组织的迁徙，因为到处都充满劫掠和斗争。很明显，叙利亚的瓦解促使阿拉姆人移民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虽然拉美西斯已经宣布了胜利，之前的海人还是在埃及定居了。和希腊一样，埃及人不但向外移民，还有人向内移民。圣经故事中讲到摩西和犹太人逃出埃及，并最终在现在所称西岸的地方定居，这些故事可能就反映了这些混乱年代的现实。梅内普塔在公元前1209年的碑文中提到以色列，说他离开了

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这是《圣经》以外史上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而已。

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其规模之大，让之前的社会动荡相形见绌，但是到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在飞碟里监视人类的外星人可能仍然希望这个阶段和之前的动荡一样。毕竟，埃及并没有被洗劫，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述人在对手国屈服的时候扩张了领土。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动乱仍在继续，但是这个阶段的动乱和之前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慢慢开始变得明显。

在希腊，公元前1200年遭到破坏的宫殿没有再次被占领，旧官僚体制消失。希腊富有的贵族确实像以前一样保存了一些物品，将它们转移至易守难攻的地方，比如山上或小岛上，但是他们在公元前1125年遭到了新一波的破坏。我在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来到这些遗址之一进行挖掘（不但考古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在那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这个遗址在派洛斯岛上的库库纳里的一座山顶上，防御坚固[10]。这些贵族的首领享受了优越的生活方式，他的居住地风景优美，能看到美丽的海滩，王冠装饰华丽，还内嵌象牙。但是在公元前1100年，灾难发生，他未能幸免于难。希腊的村民采集了石头来攻击袭击者，并且把他们的牲畜带到城墙后（我们在废墟中发现驴的尸骨），但是他们在有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谁——攻击堡垒的时候，在战斗发生之前就逃走了。在希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公元前11世纪，幸存者只建造了简单的泥坯屋。人口减少，工艺水平降低，平均寿命也减少了。黑暗时代来临了。

希腊的衰落是一个特例，但是赫梯帝国也衰落了，埃及和巴比伦艰难地控制移民和袭击者。随着村民不断遗弃他们的田地，饥荒越来越严重。因为农民没钱交税，国家就无法征兵；因为没有军队，袭击肆虐，当地强人建立公国。公元前1140年，位于现在以色列的埃及帝国衰落了。警备部队不再从军，有的成了农民，有的成了强盗。《士师记》（*The Book of Judges*）中讲述了这次埃及衰落中犹太人的状况：“以色列在那时没有国王，所有人都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做事。”

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四分五裂。底比斯人离开了，移民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公国。不久，拉美西斯十一世这位官方神王竟被自己的大臣控制——这位大臣在公元前1069年篡位。几个世纪内，埃及无足轻重的法老几乎都没有组建军队，建造纪念性建筑，甚至都没有记录多少历史。

亚述早期看起来像个大赢家，但是随着阿拉姆人不断迁徙，它也对农村地区失去了控制。到公元前1100年，田地继续休耕，国库资金用尽，亚述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饥荒。我们很难了解这种情况，因为官僚越来越少记录历史，到公元前1050年，这种记录突然终止了。那时候，亚述的城市被遗弃，整个亚述帝国成为人们的记忆。

到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缩小了。撒丁岛、西西里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和广阔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勇士首领分割了赫梯和亚述帝国留下的土地。叙利亚和巴比伦王国的城市幸存了下来，这些城市，比如乌加里特，在公元前2000年是大城市，但是后来不幸地衰落了。在埃及，一些小国家幸存了下来，但是这些国家相比辉煌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帝国，十分弱小，十分贫穷。在这个阶段，社会发展首次倒退。所有社会发展参数都下滑了：到公元前1000年，人们获取的能量更少，城市规模更小，军队更弱，比公元前1250年的前人留下的资料更少。社会发展指数又下滑到600年前的水平。

战车：商朝上层人士的陪葬品

公元前1200年左右，当武丁王还在位时，商朝的上层人士又有了新的陪葬物品：战车。公元前12世纪和13世纪，安阳上层人士的坟墓中就有几十辆战车（不用说，当然是完整的战车，被宰杀的马和人都被埋葬）。商朝的战车和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前的战车十分相似[11]，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种战车都源自哈萨克斯坦公元前2000年发明的战车。经过两三个世纪，战车制造工艺传到了胡里安人的手中，胡里安人也有了战车，西方强国的平衡格局被打破，战车制造工艺传到黄河流域需要8个世纪。

就像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商朝的人在接受使用新武器方面发展缓慢。他们肯定是从西北方的鬼方族人和羌族人那里学到战车的制造方法，甲骨文记载了这些邻国的人在战争中使用战车。在武丁王时代，商朝人只用马车进行捕猎，而且还不能驾驭自如。有记录描述武丁王在捕猎犀牛的时候翻车了。武丁王幸免于难，但是某位皇子伤得很重，甲骨文花了大篇幅描写如何驱散引起他痛苦的鬼神。几百年后，商朝人开始在战斗中使用少量战车，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梯人和埃及人那样大量使用，而是分散在步兵队伍中，可能是让官员乘坐的。

商朝人和西北方邻国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像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和胡里安人与赫梯人的关系。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商朝人和邻国人进行交易，进行战斗，还使邻国人互相战斗。其中一群人——周人于公元前1200年在甲骨文中首次被提到，他们被描述为商朝人的敌人。后来他们成为商朝人的同盟，但是到公元前1150年，他们又变成了敌人，那时他们居住在渭河流域。当周人不断和商朝人建立然后又终止友好关系的时候，周人也在汲取适合他们的商朝文化。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宫殿、青铜器、占卜仪式和富丽的坟墓。一位周人贵族在死去的时候杀死一队战车部队用来陪葬，这是商朝的传统，周王甚至娶商朝的公主。像美索不达米亚面对胡里安人和赫梯人的战车那样，商朝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明显，周人与西北部地区的人们结成同盟，在公元前1050年威胁着商朝都城安阳。

就像西方古代的国家一样，商朝面临动乱时很快就瓦解了。据甲骨文记载，自公元前1150年，商朝的上层社会内部就发生了动乱，君王权力增强，却失去了很多贵族支持者。到公元前1100年，商朝南部的殖民地脱离了商朝统治，很多离商朝很近的同盟（比如周）叛变了。

公元前1048年，商王帝辛还能召集800位领主来抵挡周人的袭击，但是两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绕到安阳城后攻取安阳。在一首描述武王伐商的诗歌里，周王的战车听起来所向披靡：

檀车煌煌，驷彭彭。

……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12]

帝辛后来自杀了。武王任用了一些商朝的官员，处决了另一些官员，留下帝辛的儿子让他做藩王。武王实施的政治后来遇到了麻烦，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但是，到这时，东西方社会发展差距大幅缩小。西方一开始在农业、村庄、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这几方面领先东方2000年，但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差距逐渐缩小至1000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知道中国为什么开始赶上西方：因为中国几乎从西方复制了所有的物质文化——农业、陶器、建筑、冶金和战车。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ith）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在埃及开罗，他满腔热情，甚至成功地给埃及嫉妒症冠以恶名。无论他在世界上看到什么，无论在何处看到——金字塔、刺身、巨人和侏儒的故事——艾略特·史密斯都会认为它是以埃及为原型的复制品，这是因为，他坚信埃及的“太阳之子”在全世界都传播着“太阳巨石”文化。我们不但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埃及人。

这些理论甚至在当时看起来也相当疯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逐渐证明艾略特·史密斯的所有论点都是错误的。东方的农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东方人使用陶器比西方人早几千年，东方有自己的纪念性建筑的传统，甚至人祭也是东方独立发明的。但是即使如此，东方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想法来自西方，尤其是青铜铸造。青铜在二里头非常重要，但是青铜并不是首先在发达的伊洛河流域被发现，而是在西北方干旱贫瘠、狂风侵袭的新疆，可能是由那些长相像西方人的人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传播到新疆，我在之前提到过，这些人埋葬在塔里木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车可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传入中国，在战车被传入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后，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中国。

虽然一些西方的技术向东方传播解释了中国社会发展为什么赶上了西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绝对不是东方复制西方，而是西方的倒退。东方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200年仍然落后西方1000年，但是西方内部的突

然瓦解很快就抹去了6个世纪的成就。到公元前1000年，东方的发展只落后西方几百年。西方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倒退是我们要讲述的第一个转折点。

五大天启骑士[13]

为什么西方社会发展出现倒退，这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如果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我肯定早就说出来了，但是事实是，除非有幸能意外搜集到新的证据，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

尽管如此，本章描述了社会发展中的动荡，我们系统地审视这些动荡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表4-1总结了我认为最重要的特征。

公元前3100年西方的乌鲁克，以及公元前2300年东方的陶寺都停止了扩张，是怎样的动乱造成它们发展的停滞，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也许不应该去讨论这些，但是东西方的四场动乱可以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西方在公元前1750年的危机和东方在公元前1050年的危机——也许可以说是人为的。战车参与的战争改变了强国的平衡格局，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征伐到核心地区，暴力、移民和政权更迭不断发生。东西方这两次危机的主要结果就是，政权转移到之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手中，社会继续发展。

表**4-1** 天启骑士：列出的各种灾难（公元前**3100**～前**1050**年）

年代（公元前）	移民	国家的灭亡	饥荒	疾病	气候变化
西方					
3100		×			
2200	×	×	×		×
1750	×	×			
1200	×	×	×	?×	×
东方					
2300		×			
1050	×	×			

第二组——西方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危机和东方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危机——却迥然不同，很明显是因为自然因素使人类看上去更愚蠢。人类基本上无法控制气候的变化，气候变化至少是造成这段时期饥荒的原因之一（如果圣经中约瑟的故事能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缺乏农耕计划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第二组社会危机比第一组严重得多，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试验性结论：当天启四骑士

——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灭亡和移民——走到一起，特别是当第五位骑士疾病加入他们的时候，社会动乱会变成社会瓦解，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

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社会的瓦解。西方核心地区遭受的旱灾在公元前2200年比在公元前1200年更严重，但是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间，该地区只是稍有动乱，而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间，该地区四分五裂。公元前3800年发生的旱灾可能比公元前2200年或者公元前1200年的更严重，但是相对来说，那次旱灾对东方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还使西方社会向前发展了。

以上论述又表明了第二个可能的结论：社会瓦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得更详细：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核心地区会发生规模更大、更具威胁性的社会动荡，使一些破坏性因素更危险，比如，气候变化和移民会引发彻底的社会瓦解。公元前2200年，西方核心地区已经有很大规模，有宫殿、神王和重新分配的经济体，包括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区域。旱灾频频发生，人们从叙利亚沙漠和扎格罗斯山脉迁徙出去，这两个因素彻底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内部以及外部关系，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但是因为西方的两个核心地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联系并不紧密，所以每个核心地区都单独衰落。到公元前2100年，埃及部分地区瓦解，而美索不达米亚恢复发展；而当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瓦解时，埃及恢复发展。

对比之下，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扩展至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到达了亚洲中部的绿洲，甚至到达了苏丹。移民明显是从动荡的地中海地区开始的，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从伊朗到意大利都有移民。因为移民造成的社会动荡比之前任何时候的规模都大，并且席卷至互相联系的核心地区，在这些地区，社会发展更容易遭到阻碍。入侵者烧毁了乌加里特的庄稼，因为乌加里特国王派军队支援赫梯。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又加重了另外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这样的情况在1000年前从没有发生过。当一个国家灭亡时，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公元前11世纪到处都充满着动乱，最终拖垮了每一个人。

社会发展悖论——社会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危害社会发展本身——意味着，越大的核心地区会给自己带来越大的问题。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再熟悉不过了。19世纪，国际经济不断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团结到一起，使社会迅速发展，发展速度史无前例，但是这也导致了美国股票市场在1929年产生泡沫，使所有国家受到严重打击；过去50年，组织严密的国际金融发展速度令人吃惊，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这也导致了美国2008年新的经济泡沫产生，几乎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这个结论令人惊恐，但是从这些国家早期动乱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得出第三个结论，这个结论更乐观一些：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核心

地区会发生规模更大、更具威胁性的社会动荡，但是也能采取更多、更严谨的措施来应对这些动荡。世界金融领袖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其手段若在1929年是难以想象的，在我编写本书之际（2010年年初），他们看似已经解决了这场金融危机，就像解决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一样。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乱，与之相应会有更精确有效的解决方法，两者的关系就像一场竞赛。有时平定动乱的解决方法落后于这些社会问题，就像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在西方发生的一样。无论是因为领导者犯了决策错误，或者社会制度瓦解，还是因为组织机构和技术还没有产生，社会问题都有可能不断加剧直到失控，社会动乱演变成社会瓦解，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

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之间西方社会瓦解之前，西方社会发展领先东方13000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社会发展将永远领先于东方。在这次瓦解之后，东西方差距缩至很小，如果西方再次发生这样的动乱，那东西方就没有差距了。社会发展悖论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长期注定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

[1] 我们的现代地图中，北面在上方，而埃及人认为，尼罗河从南面的“上埃及”流向北面的“下埃及”，这点我们可能会混淆。

[2] 很遗憾的是，电影《蝎子王》和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蝎子王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3] 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考古数据资料十分粗糙，部分是由于技术原因。因为数据资料不完整，所以我在描述公元前3000年前的社会发展时，以250年为间隔，很多公元前2250年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事件都没有涉及。而且，西方有两个核心地区，一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个在埃及，这两个地区都曾面临不同节奏的衰退。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社会发展比公元前2200年慢，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从衰退中恢复；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再次分裂，而埃及恢复发展。

[4] 古历史学家通常将这片现在土耳其的土地以希腊语命名，叫作安纳托利亚，意思是“东部的土地”，因为本来从亚洲中部地区来的土耳其人在公元11世纪才在安纳托利亚定居下来。

[5]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市苑城镇丁公村东，距今约2000～5500年。——译者注

[6] 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距今约3900～4500年。——译者注

[7] 意思是，如果不是禹王，我们就都变成鱼了。——译者注

[8] 出自《诗经·大雅·绵》。翻译成现代诗歌：盛起土来满满装，填起土来轰轰响。噔噔噔是捣土，乒乒乒是削墙。——译者注

[9] 我说“根据传说”是因为周口店遗址（第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史前遗址）的线索差不多也是以这种方式在同一年开始发现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因为国内动乱而被困在北京的时候，他辨认出一家药店的“龙骨”为早期的人类牙齿。这样的巧合稍有可疑。

[10] 我想再次感谢雅典考古协会的迪米特里厄斯·斯基拉尔迪（Demetrius Schilardi）博士，他十分慷慨地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挖掘团队，挖掘工作从1983年开始直到1989年。

[11] 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战车比西方的战车有更多的轮辐。

[12] 诗歌出自《诗经·大雅·大明》，节选部分的意思是：檀木战车光彩又鲜明，驾车驷马健壮又雄俊……袭击讨伐帝辛，一到黎明就天下清平。

[13] 在《圣经》的《启示录》中有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但是对于四骑士的解释略有争议。——译者注

第五章 东方的周朝、秦朝，西方的亚述帝国和罗马帝国

东方和西方并驾齐驱

图5-1可能是最单调的图表了。不像图4-2，在图5-1中，两条线并没有交叉、中断或汇合，而是保持平行将近1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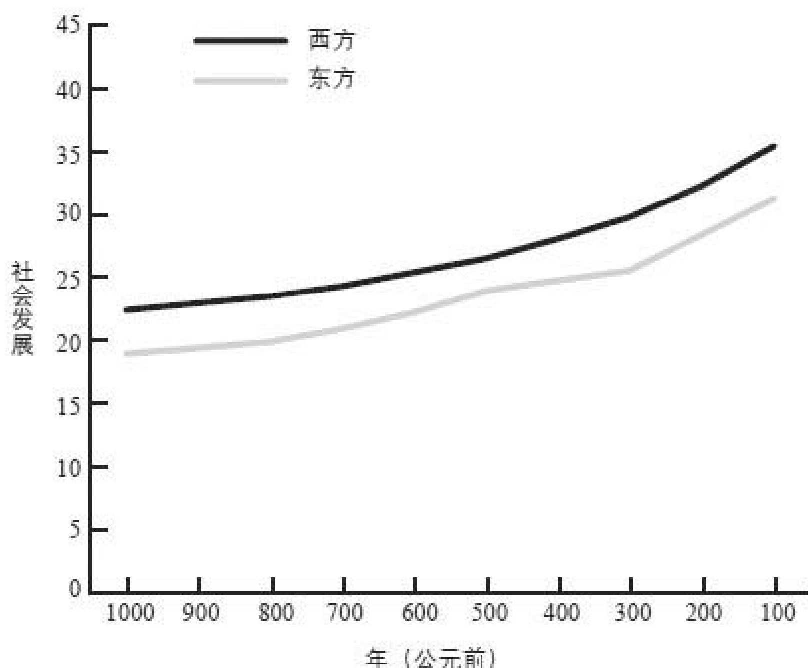


图**5-1** 历史上最单调的图表：公元前**1000**～前**100**年间的社会发展

尽管图5-1结构比较简单，但这个时期那些未发生的事对我们的整个故事非常重要。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瓦解，导致社会发展迅速倒退。花了5个世纪的时间，才把社会发展指数拉回到公元前13世纪左右就达到的24分。如果在这个水平再次倒退的话，就能将东西方的差距抹平了。但如果在24分时东方社会瓦解，东方将会重蹈西方公元前1200年的覆辙。事实上，正如图5-1显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并驾齐驱。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社会发展并未倒退。

但是图5-1期间发生的事也非常重要。在公元前1000～前100年间，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几乎都翻了一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35分，

尤利乌斯·恺撒跨过卢比肯河时的分数要比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时的还要高。

为什么西方文明核心不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达到24分时瓦解，或者东方文明核心相应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瓦解？为什么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00年时达到如此高的分值？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明核心如此相像？我将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紧跟着大家会问的问题是：如果在公元前100年时社会发展程度如此高，那为什么古罗马或者古中国不在新世界开拓殖民地，或者发生工业革命呢？这些问题需要等到第九章和第十章，我们对1500年后发生的事和之前发生的事进行比较后才能回答。现在我们先看看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朝国王和西方的君主们

总体来说，东西方文明核心都在公元前1000年中进行了内部重组，创造了新制度，避免了因持续扩张而造成的瓦解。

统治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和低端策略。高端策略比较昂贵。统治者在政府机构或军队中雇用人员进行有偿服务，通过雇用或解雇这些人员将权力集中。支付这些人员的薪酬需要大笔收入，但是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税收产生收入，军队的任务就是执行这个过程。目标是达到平衡：大笔税收收入支付出去，然后可以收到更多税收，统治者和他们的雇员以此差额为生。

低端策略比较便宜。统治者并不需要巨大的税收收入，因为他们没有大笔支出。他们让其他人来支付这笔费用。统治者依靠地方贵族（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属），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这样他们自己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统治者通过和这些领主分享利益来犒赏他们。统治者屡战屡胜，结果达到了一个低端的平衡：没有大笔收入，但是支出更少，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属以此差额为生。

在公元前1000年中，东西方最大的事件都是统治策略从低端转向高端。这个转变从乌鲁克时期开始。公元前3000年中期，埃及法老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建造金字塔，1000年后，他们的继承人建造了复杂的战车军队。在公元前1000年中，当时国家的规模和领域都比先前的国家大得多。因此，本章将主要介绍这些国家的管理方式和战争。

在公元前1000年中，东西方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达到高端统治，但都是困难重重。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的出现要晚得多，在公元前1000年时还处于低端统治。商朝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盟国把乌龟和马匹进贡到安阳，需要出兵打仗时就出兵。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推翻商朝，当时的周朝可能更加松散。武王并没有吞并商朝，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对其进行管制。武王在商都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之后就回到了渭河流

域。

这是控制前朝残余势力成本较低的方法，但是很快，在低端统治中常见的手足竞争出现了。武王的家族也未能避免这种竞争。公元前1043年，武王薨，留下三个兄弟和一个儿子。根据史官记载（当然是由胜者编写的），因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他发动了叛变）。武王的另外两个哥哥联合商朝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周公。

公元前1041年，周公平定叛乱，杀死了两个哥哥，但是他意识到他不能像武王期望的那样统治商朝，也不能任由敌人密谋造反，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但低端的解决方法：派皇亲贵戚到黄河流域建立独立的城邦（关于数目，不同史书有不同记载，从26～73个不等）。这些城邦不用向他缴税，也能留守在黄河流域。

周室像个家族企业，与做家族生意最有名的黑手党有很多相似点。君主相当于周室的黑帮老大，以大规模的地产为生，用初步的官僚制度统治国家；那些次级统治者相当于黑帮大人物，住在自己坚固的城池中。当君主号召开战，诸侯就带着战车和军队来帮君主打败敌人。当战争结束，“歹徒们”分享战利品，然后各自回家。每个人都很开心（除了被掠夺的敌人）。

与黑帮老大一样，周王用精神及物质来奖励下属使其保持忠诚。君主将大量金钱用于立法，这是区分君主和歹徒的唯一区别。他们使次级统治者深信：君主作为一家之长、预言者及人与上天的沟通者，有权力号召他们。

君主对亲属的忠诚依赖度越高，相应的对掠夺财物的需求就越小。周王积极推动了一种新王权理论的形成：地，天界至高的神，因商王道德败坏而鄙弃他们，选择并委任周王做人间的统治者。关于武王的美德故事如此详细，以至于到公元前4世纪思想家孟子认为，武王没有攻打商朝，只是对民众说了一句“我不想打仗，只想给你们带来安定”，立刻“人们（因归顺而）磕头的声音像山崩地裂一样”。

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诸侯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言论，但这个德配天命的理论确实起到了鼓励他们去追随君主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周王道德败坏，上天可以撤回对他的天命，并选择他人。除了这些领主还有谁能判定君主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天的标准呢？

周朝的贵族喜欢在祭祀祖先所用的青铜器上铭刻他们所获得的荣誉，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物质和精神奖励的结合。例如，有篇题词介绍了成王（公元前1035～前1006年在位）如何在一个烦琐的仪式上给一位追随者封爵赏地。这篇题词写道：“晚上领主收到的赏赐有：许多樵夫，二百佃户，皇家马车，青铜马具马饰，一风衣，一长袍，布料和鞋履。”

周朝的这个骗术非常有效。国王庞大的军队机动性很强（公元前9世纪时拥有数百辆战车），并达成先辈遗愿，向周朝周围的“野蛮敌人”收取“保护费”。周朝领土内的农民受到保护，辛勤劳作，促进城市发展。诸侯不向农民征税，而要求他们提供劳役。理论上很美好，农田被划成3×3九格，如井字棋盘那样，8家佃户分别耕作外面的8块农田，并轮流为中间第九块领主的农田干活。现实无疑要混乱得多，但贵族通过结合农民的劳动服务、掠夺和勒索，开始变得富有。他们修建壮观的陵墓，活人陪葬的数目比商朝要少，而用更多的战车陪葬。浇铸和铭刻数目惊人的青铜器（约1.3万件青铜器已经发掘和公布），尽管文字仍然是贵族的工具，但它的传播超越了其狭隘的用途。

但这个体系有一个缺点，它依赖于战争的胜利。王位传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在公元前976年昭王战败。失败不是任何人都想写下来的，我们了解的内容来自一部被遗弃的竹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公元前296年随墓葬埋入地下，在近6个世纪后坟墓被盗时才被发现。据史书记载，两个诸侯支持昭王与周朝南疆的楚国开战。编年史上写道，“天空黑暗，狂风暴雨，”“野鸡野兔都吓坏了。昭王的6支军队在汉水全军覆灭，昭王战死”。

周朝突然失去了军队、君主以及天命的神奇性。也许就像诸侯们总结的那样，周王的品德也不是那么高尚。他们的问题更加复杂：在黄河东端发现的公元前950年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已不再表达对周室的忠心。君主努力去控制诸侯，但却失去了对西疆“野蛮的敌人”的控制，他们开始威胁周朝的城池。

新掠夺的土地不够肥沃，贵族间因土地而发生的矛盾明显上升。面对低端统治瓦解的危机，穆王转向了成本更高的解决方案，在公元前950年后，他建立官僚体系。几位周王（不确定是哪几位）通过行政官员转让土地，大概是为了奖励忠诚并惩罚背叛，但贵族做出了反击。将青铜器的铭文拼凑起来大概可以得知，在公元前885年，要不是许多诸侯坚持，夷王就会被废黜。夷王与最大的诸侯齐侯开战，在公元前863年将齐侯在铜锅里活煮。公元前842年，像黑帮老大被手下背叛并铲除一样，许多领主奋起反击，厉王流亡。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方的君主们也在公元前10～前9世纪建立了低端统治的国家。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的瓦解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之后是如何恢复的，都不为人知，但是在绝望中产生的发明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长途贸易的瓦解迫使人们转而依赖于当地资源，但一些重要商品，尤其是制作青铜的重要原料锡，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1]，西方人因此用铁来代替。塞浦路斯的铁匠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技术，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知道如何从地中海地区常见的其貌不扬的红黑色铁矿石中提取有用的金属，但是只要还有青铜，铁就不会被广泛应用。锡供应的中断改变了这一切，使铁或其他金属成为主导。到公元前1000年为止，从希腊到现在的以色列，新且便宜的金属被广泛应用。

在20世纪40年代，欧洲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廉价的铁器使农业、工业和战争都民主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后60年的发掘并未给出更明确的答案，但柴尔德肯定是正确的，由于铁器容易获取，这使金属武器和工具在公元前1000年要比在之前1000年中常见得多。即使在贸易恢复后，也没有人再用青铜做武器或工具了。

西方文明核心的恢复首先在以色列出现。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公元前10世纪，大卫和所罗门国王创造了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联合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迅速发展，所罗门国王宴请来自远方的示巴女王（也许在也门）并向地中海地区派出贸易代表团。尽管比一些国际性王国要弱小，但相比同时代的周室家族生意，联合王国更加中央集权化，向各地征税及收取贡品。如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没有在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后突然分裂，这个联合王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除非这些事情都没有真正发生过。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不存在联合王国。他们认为这全都是幻想，是几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因当时形势糟糕而杜撰出来的，用以自我安慰。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圣经》中提及的大卫和所罗门建造的宏伟建筑时遇到了困难，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即使最敬业的考古学家也会在关于古贮存容器年表的研讨会上打瞌睡，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个考古学家却提出，通常被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罐子其实是在公元前9世纪被创造的。这意味着先前那些被认为是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国宏伟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也必须向后推100年，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所罗门王国贫穷而普通，希伯来《圣经》的故事不正确。结果他引起了犹太人的公愤，不得不雇用保镖。

在我看来，《圣经》与第四章中提及的关于夏商朝的中国古典文献一样，可能被夸大，但也不可能全部是想象出来的，也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末西方文明核心开始复苏。在公元前926年，利比亚诸侯舍松契一世夺取了埃及王权。为恢复埃及帝国，他进军犹大（即现代以色列南部和约旦河西岸），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北部地区，更强的国家也出现了。经过100年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934年，从国王阿舒尔丹二世开始，亚述帝国再次崛起。亚述帝国恶行累累，相比之下周朝如同天堂一般。

阿舒尔丹很清楚亚述帝国正从黑暗时代复苏过来。“亚述帝国的人民曾因饥荒而流离失所，远离家乡，现在我把这些疲惫的人带回来了，”他写道，“我将他们安顿下来……他们生活安定。”在某些方面阿舒尔丹很传统，把自己看作亚述的守护神阿舒尔在人间的代表，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在过去2000年中所做的一样。不过，因为大多数凡人都没有认识到他是至高的神，阿舒尔在黑暗时代后成了一个非常愤怒的神。阿舒尔丹的任务是通过掠夺使凡人认识到阿舒尔神的至高地位。只要亚述帝国变得富有，一切都在所不惜。

在亚述中心地带，国王建立了一个小型官僚体系，任命管辖者为天子，赏赐大量土地和劳动者。这些都是高端统治策略，但亚述国王的实际权力来自低端统治。国王并不向人民征税，而依靠天子们提供部队，像周王一样，用爵位和战利品来奖励他们。天子们任期30年，爵位实行世袭制，并将劳动者转化成农奴。

和周王一样，亚述帝国的国王也都是贵族的傀儡，只要战争获胜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天子们提供的军队要比周朝的诸侯们提供的更庞大（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870年有5万步兵，在公元前845年有10万，外加几千辆战车），国王的相对高端的官僚体系给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不出意料，亚述周围弱小的邻国为了防止被亚述消灭掉而愿意向其支付保护费。亚述帝国的提议往往令它们难以拒绝，尤其是因为亚述帝国常常会在当地立一个傀儡国王，而不像周朝那样赶走当地人，用本国人取而代之。战败的国王也可以获利，如果下次他们将军队借给亚述帝国，那上缴的钱财可以有所减免。

有些代理国王可能会不遵守协议，因此亚述人想出了很多恐怖政策。代理国王并不需要膜拜阿舒尔神，但他们必须承认，阿舒尔统治天国及他们自己的守护神。结果导致了其他国家在宗教及政治方面发生叛乱，亚述人别无选择，只有严惩他们。亚述国王用刻有暴力场景的雕刻来装饰宫殿，面对屠杀他们已经麻木。举个例子，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在公元前870年左右对叛乱者的惩罚是：

> 我在他的城门外建一座塔，我要把叛乱的首领都剥皮，用他们的皮来盖塔。把有些人关进塔内，把有些人钉在柱子上，把其余的处以火刑。
>
> 许多俘虏被处以火刑，许多俘虏苟且活着。但是一些人，我把他们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切掉，还有许多人我把他们的眼睛挖掉了。我把活着的人堆成一堆，人头再堆成一堆。把他们的头挂在市里各个地方的树干上。年轻人和姑娘处以火刑。活捉到20个人，我把他们在宫里剥皮了……其余的战俘我让他们在沙漠里渴死。

在公元前9世纪，东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命运向着不同方向前进：周朝瓦解，亚述帝国在黑暗时代后复苏。但两者都经历了不断的战争、城市的发展、贸易的增长和新型但低端的统治策略的运用。在公元前8世纪，又出现了一些共同点：两者都发现了低端统治的局限性。

叛乱的诸侯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凡事有利也有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地球的轴线产生轻微摆动，造成北半球狂风肆虐。在欧亚大陆西部，冬季吹的主要是从大西洋来的“西风”，这意味着冬季降雨量上升。这对于地中海盆地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在当地造成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一直是在炎热干燥天气中肆虐的肠道病毒，而且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冬季风不够大，就没有足够的雨水带来好收成。寒冷和雨水比疾病和饥饿要好得多。

但是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居民来说，新的气候很糟糕。当地造成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由寒冷和潮湿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主要的农业问题是夏季生长季节过于短暂。由于公元前800 ~ 前500年间的气候变化，欧洲北部和西部人口减少，但地中海周围地区人口增加。

中国的冬季风主要来自西伯利亚，所以在公元前800年后，冬季风变得更强烈，天气变得干燥寒冷。这样的气候有利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所以该地区的人口上升，但是对于生活在黄河以北、人口增长但气候却日益干旱的高原居民来说，日子更为艰难了。

在整体的大变化中，当然也存在着局部差异，但主要结果和第四章中我们看到的气候变化结果一样。区域间的平衡被打破，迫使人们做出反应。据一位撰写古气候学教科书的专家说：“如果这样的气候变化发生在今天，将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东西方土地面积差不多，且都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了冲突和革新的出现。这两者对统治者都有利，更多的冲突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帮助朋友并惩治敌人，更多革新意味着财富增长。推动两者发展的是人口增长，这意味着更多劳动者、士兵和收益。

那些掌握实权的君主确实能获益，但对于公元前8世纪采用低端统治策略的君主来说，要想获益有些困难。最大的赢家，即最有可能利用新机会的是低端统治君主所依赖的地方老大，即地方长官、地主和驻军指挥官。这对于君主来说是个坏消息。

在公元前770年，东西方的君主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埃及在公元前945年差不多都统一了，但在公元前804年分裂成了3个王国，到公元前770年分裂成了12个独立的公国。在亚述，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经过争斗才在公元前823年继承王位，但是他丧失了对代理国王和领主的控制。有些天子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动战争。亚述研究者将公元前783 ~ 公元前744年这段时间称为“间隔期”，在这段时间内，君主无足轻重，叛乱四起，领主肆意妄为。

对于地方贵族、小君主和小城邦，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最有趣的例子是腓尼基，位于现今的黎巴嫩海岸。由于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0世纪复苏，腓尼基因埃及和亚述间的贸易活动而繁荣。他们的财富引起了亚述人的注意，不过，到公元前850年，腓尼基人开始上缴保护费。一

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推动了腓尼基人冒险到地中海地区赚钱以谋求和平，其他人却认为，人口增长及地中海地区新市场的驱动更为重要。无论何种原因，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已开始航海远行，在塞浦路斯设立贸易点，甚至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小神社。到公元前750年，希腊诗人荷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读者知道（但并不相信）“腓尼基人以船而闻名，为了营利，他们用船载来无数漂亮的东西”。

希腊人口增长最快。腓尼基的探险家和商人使饥饿的希腊人觉醒了。公元前800年，有人携带希腊陶器到意大利南部；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部长期定居。双方都喜欢通过河流连接内陆市场的港口，但希腊人比腓尼基人多，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定居，抢占了沿海最好的土地。

原住民有时也会抵制。有些人，如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和撒丁岛的部落，在殖民者到来前就已经有城镇和长途贸易了，现在他们建造城市和纪念碑，组织低端统治的国家，使农业密集化。他们根据希腊字母创造出了字母表（希腊人反过来又在公元前800 ~ 前750年间根据腓尼基语调整了希腊字母）。这些字母比以前拥有上百个符号的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加元音音节）更容易学习和使用，比拥有几千个符号的埃及象形文字或中文（每个符号代表一个不同的字）都要简单。乐观估计，在公元前5世纪，10%的雅典男性能阅读简单的文章或写自己的名字，数目远远超过之前东西方的任何地区。

我们对欧洲公元前1000年城市、国家和贸易发展的了解，相比对之前四五千年中农业发展（在第二章讨论过）的了解要多得多。但是对于两者相关问题的争论却很相似。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殖民化使城邦从地中海东部向西部延伸；有人反驳说，原住民为了抵抗殖民主义而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后者主要是年轻学者，指责前者在宣扬他们所谓的现代殖民体系的文明任务；而前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学者，他们回应说，这些批评者意在扮演被压迫者的捍卫者，而不是真正想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与以色列考古学家引起的公愤相比（据我所知，暂时还没有人需要保镖），上面的论战明显要温和许多，但也算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足以吸引我。为了解开这个问题，2000 ~ 2006年的每个夏季我一直在西西里的一个叫蒙特帕里卓的发掘点工作。[2]这座原住民的古城在公元前650 ~ 前525年被厄力密亚人占领。它非常接近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地，从我们所在的山顶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检验到底是殖民化还是本地发展导致地中海西部崛起的理想地点。经过7年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然这与考古学家们对几千年前农业扩张得出的结论类似。在每种情况下，不论在核心或周边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所上升。商人和殖民者因受竞争对手排挤或是被机会吸引，离开核心地区；在周边地区，一些人积极效仿核心地区或形成自己的风格。结果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

从核心地区向外扩散，覆盖早期的体系，并不断转化，因为周边地区的人们在转化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新方法，并发现了他们的后发优势。

蒙特帕里卓当地的一些新举措很重要。一方面，我们怀疑我们的发掘点被来自塞吉斯塔的厄力密亚人所破坏，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但是希腊殖民者的到来也很重要，因为塞吉斯塔国家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要和希腊竞争土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塞吉斯塔的贵族努力和希腊抗争，借鉴希腊的做法。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建的希腊式神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他们当时一定雇用了设计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建筑师。塞吉斯塔人也把自己融入了希腊神话，声称（罗马人也同样）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后人。到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西部的殖民城市，如迦太基（腓尼基人移居地）和锡拉库扎（希腊人移居地），已经能和旧的核心地区相媲美。伊特鲁里亚的社会发展也不甘落后。几十个民族，如厄力密亚人，也不落后。

西方核心地区国家的瓦解与周边地区扩张的进程与东方相似，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在公元前810年，周宣王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诸侯日益强盛，觉得没有必要再服从君主。周朝的都城陷入了派系斗争，西北方的犬戎长驱直入。宣王的儿子幽王在公元前781年即位，他试图结束这种困境，决定跟叛乱的诸侯和权倾朝野并与太子及太子生母勾结的大臣们一决雌雄。

在这一点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公元前1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讲述了一个离奇故事：周朝有个君王曾打开了一个装有龙涎的千年古盒，一只黑色虫子爬了出来。司马迁并没有讲为什么君王让几个宫女脱光衣服，并对怪物吼叫。虫子没有逃跑，而是钻入了其中一人体内。这个宫女生下一个像爬虫的女婴后将其遗弃。一对避难的夫妇将这女婴带到了叛乱的诸侯国褒国。

故事的关键点是：龙女长大后成了一个美女，叫褒姒。公元前780年，褒国人为了与幽王达成一项协议，把褒姒献给了幽王。幽王宠爱褒姒，次年，褒姒诞下一子。这就是为什么幽王想杀太子和他生母了。

之后国家太平，直到公元前777年幽王流亡的儿子回到叛乱的诸侯国，并与幽王的权臣勾结。众多诸侯和西北方的犬戎结盟。

幽王只顾博宠姬褒姒一笑（褒姒不爱笑，考虑到她的背景，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有一事行得通。周朝设立了烽火台，如果犬戎突袭，鼓声和烽火可以通知诸侯出兵救援。司马迁说：

> 幽王命人点燃烽火台并打鼓。烽火台只有在外族入侵时才能点燃，许多诸侯赶来。但他们抵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入侵者，狼狈撤离。看到这个场景，褒姒就笑了。幽王大喜，于是命人又点了几次烽火台。三番五次，各个诸侯慢慢开始不听幽王的命令，不来勤

王。

幽王作茧自缚。当犬戎和申侯真的在公元前771年造反时，许多诸侯看到烽火却不愿再被戏弄，决定不发一兵一卒。叛军杀了幽王，烧毁都城，立其子为周平王。

这个故事很难当真，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确实保留了部分真实情况。在公元前8世纪70年代，西方的埃及和亚述统治者陆续丧权，中国的君主制也因人口增长、地方权力复苏、派系斗争和外族入侵等内外压力结合而受到重挫。

在公元前771年叛乱的诸侯们也许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立了一个傀儡国王，继续无视君主。他们决定把自己的青铜礼器埋在渭河河谷里（考古人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在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等犬戎掠走宫中财宝退兵后再取回。但是他们想错了。犬戎没有退兵，诸侯立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位于黄河流域）。[3]原本的天子周室在丧失大片故土后已衰落，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诸侯国中最强的郑侯开始挑战王权。在公元前719年，周王被迫将太子送到郑国当人质，在公元前707年，另一个诸侯故意用箭伤了周王。

到公元前700年，诸侯国（据一古书记载有148个）基本与周室脱离关系。为首的诸侯仍然打着周室的旗号行事，但实际上无视周室，相互争霸，私订盟约。在公元前667年，当时雄霸一时的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承认他为盟主。次年齐桓公逼迫周王封他为伯侯，代表周室的利益。

北有戎狄，南有蛮族。齐桓公攘夷狄，创霸业。但这些战争的主要结果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殖民的结果类似，都是造成外族入侵，并迅速扩张。

在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国家与戎狄通过联姻而结盟。齐、晋、秦与许多精通周朝文化的戎狄首领结盟，扩张势力。南蛮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楚国，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与晋齐大战。到公元前7世纪50年代，楚国入盟。与西方的塞吉斯塔和自称是埃涅阿斯后代的罗马人不同的是，楚国的首领认为他们与中原的国家一样，是周朝的一个州。结合中原及南方特色的楚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出现。

楚国实力大增，在公元前583年，晋国决定与其他蛮族结盟以对抗楚国。公元前506年，盟国之一吴国实力大增，打败楚国。到公元前482年，吴国称霸，与楚王一样，自称周室后代。另一个南方国家越国，此时也实力大增。越王勾践自称是大禹后代，卧薪尝胆，力图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越国攻陷吴国，夫差上吊自杀，越国成为霸主。尽管政治体系瓦解，但东西方文明核心都急剧扩张。

西方的亚述帝国与东方的战国七雄

公元前750～前500年是历史的转折点。在公元前75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与其在公元前1200年文明核心瓦解前相当，逼近24分；公元前500年，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24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化，人口迁移，冲突不断升级，新国家成为文明核心，老国家开始瓦解。文明核心似乎完全有可能再次瓦解，但两个文明核心都进行自我调整，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来应对它们所面临的挑战。这就是图5-1如此单调但又有趣的原因。

改革最先在亚述出现。公元前744年，新贵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在一场政变后登上王位。刚开始，他和先前几位篡位的君主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之后短短20年间他使亚述从一个破落低端的国家蜕变成了充满活力的高端国家。在此期间，与黑手党的合法化一样，他从一个“黑道老大”变成了伟大（但残忍）的国王。

他的秘诀是废黜天子。提格拉·帕拉萨建了一支常备军，由他支持，只听命于他一人，而不需要领主提供军队。他迫使战俘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没有记载他是怎样做到的。当他的军队取胜时，提格拉·帕拉萨直接把战利品赐给军队，而不再和领主分享。倚仗军队，他瓦解了贵族的势力，细分国家高等行政机构，并将俘虏的宦官安排在这些机构中。宦官有两个好处：他们不可能有后代来袭位，且通常被认为他们不可能会叛乱。最重要的是，提格拉·帕拉萨通过扩大官僚体系来统治国家，废黜天子并选用忠于他的行政官员。

面对高昂的开支，提格拉·帕拉萨调整了国家财政制度。他主张定期上缴贡金，基本上就是税收，而不是不时地掠夺外族。如果代理国王有异议，提格拉·帕拉萨就用亚述官员代替他。例如，以色列王比加在公元前735年与大马士革城和其他叙利亚城市一起发动抗税起义。提格拉·帕拉萨狠狠惩治了他们。他在公元前732年攻破了大马士革城，派官员驻守，并吞并了以色列北部肥沃的山谷。提格拉·帕拉萨不得人心，结果被暗杀，比加人立何细亚为亲亚述的国王。

直到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727年去世，亚述一直都国泰民安。何细亚认为新亚述体系将随着提格拉·帕拉萨的死而消亡，于是他就停止上缴贡金，但提格拉·帕拉萨设立的机构即使在最高层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下去。亚述的新国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年攻陷以色列，杀了何细亚，派官员驻守，并将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驱逐出境。从公元前934～前612年，亚述强行让450万人迁徙。部分人口被充军，建城池，参与提高帝国生产力的项目，如筑坝、栽树、培育橄榄树、挖运河等。被驱逐的劳动力进入尼尼微和巴比伦后，两座城市的人口都增加到10万，它们吸收各地资源，规模空前。社会发展高涨，到公元前700年时，亚述成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历史是不是因为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阻止了国家瓦解而改变了发展轨迹？曾经有段时间历史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一点，但现在他们都不会把结果只归因于这位独特的伟人。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伟大的提格拉·帕拉萨可能是很残酷，但绝不是唯一的。所有公元前8世纪晚期西方文明核心中的统治者都采用了中央集权化来应对他们的困境。在埃及，来自现今苏丹的努比亚人甚至在提格拉·帕拉萨夺取王位之前就已经统一了全国，并在之后的30年中进行改革。甚至到公元前8世纪10年代，犹大国王希西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历史并非仅由一个天才改变，当时的情形更像是绝望的人们想尽办法生存下去，其中最好的方法是获胜。要么中央集权，要么灭亡，未能成功控制地方领主的统治者被那些成功的统治者击败。希西家担忧亚述，感到有必要壮大犹大王国；亚述的新国王森纳赫里布也担忧希西家，感到有必要阻止他。公元前701年，森纳赫里布侵略犹大王国，俘虏它的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因为（据希伯来《圣经》）上帝的天使击退了亚述人，或是因为（据森纳赫里布传记）希西家同意上缴更多的贡金。

不管原因究竟如何，森纳赫里布的胜利给他带来了一个严酷的新现实：每次亚述获胜就产生了新敌人。当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30年代早期吞并叙利亚北部时，大马士革和以色列联合反对他；当亚述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前732年间征服大马士革和以色列时，犹大王国就成了前线；在公元前701年犹大王国灭亡后，埃及就面临威胁了，所以在公元前7世纪70年代，亚述占领了尼罗河流域。最后亚述人发现埃及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远了。10年后亚述人从埃及撤兵，前线都出现了问题。摧毁北方劲敌乌拉尔图后，他们就常受到高加索毁灭性的袭击；击溃南方劲敌巴比伦后，他们开始与东南方的伊勒姆作战；在公元前7世纪40年代战败伊勒姆后，居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米底人成了威胁，而且他们使巴比伦恢复了实力。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说：在过去的500年中，战争迫使欧洲国家过度扩张，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导致最后垮掉。尽管达到了高端统治模式，拥有巨大的收入、专业化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击败了所有对手，最终亚述帝国作为过度扩张的典范而难逃垮掉的厄运。到公元前630年，亚述全部撤兵。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组成的盟军洗劫了尼尼微并分割了帝国。

亚述帝国的突然崩塌导致了第四章中的情况再次发生。军事动乱使以前处于外围的民族有机会成为文明核心。米底借鉴了亚述的机构和政策，巴比伦再次成为强国，埃及试图在黎凡特重建帝国。分割亚述领土的争斗也促进了它们的扩张。米底的中央集权使另一个外族，即伊朗西南部的波斯变得强大。在公元前550年，波斯诸侯居鲁士推翻了米底。米底的派系斗争为他铺平了道路。（米底国王先前曾逼迫一位将领吃他自己儿子的肉，之后他又愚蠢地把攻打居鲁士的军队派给了这位将领。

该将领之后叛变，军队垮掉，居鲁士顺利接手。）

像先前的亚述国王一样，波斯统治者认为他们是由上帝委派的。他们的家族阿契美尼德代表着与黑暗和邪恶斗争的光与真理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他们相信其他民族的神灵看到他们的正义性后也希望他们获胜。因此，当居鲁士在公元前539年夺取巴比伦时，他（表面上真诚地）说这样做可以让那些被巴比伦腐败统治者压制的神灵得到释放。他随后把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抓来做俘虏的犹太人送回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圣经》的作者也对居鲁士的自命不凡有所证实。他们相信自己的神，认为居鲁士是“我的牧羊人……我的救世主……我抓住他的右手来征服其他国家”。

居鲁士率领他的军队到达了爱琴海和现在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远地区。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并统治埃及。接下来发生的事与司马迁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离奇，最后在公元前521年，他的远房亲戚大流士继承了宝座。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冈比西斯做了一个梦，误以为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想谋反，于是他派人暗杀了司美尔迪斯。有个牧师也叫司美尔迪斯，且和死去的司美尔迪斯长得一模一样。这个牧师假装是真正的司美尔迪斯，继承了王位。冈比西斯发现这件事后，尽管有些害怕，但还是骑马赶回王宫说出了真相（谋杀兄弟的事实），但因不小心刺伤了自己的大腿而去世。与此同时，假司美尔迪斯也因没有耳朵而被他的妻子识破（假司美尔迪斯在早期因受刑罚而被削了耳朵）。于是7名贵族杀了假司美尔迪斯，并开始争夺王位：每人带着马到指定地点，谁的马在太阳升起时先叫，谁就成为国王。最后大流士赢了（事实上他作弊了）。

值得一提的是，事实证明这是选国王的好方法。[4]大流士很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新一代的提格拉·帕拉萨。他向全国3000万人征税，将收入最大化。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称大流士是一个商人……他尽可能谋利。”

大流士来到了社会发展已复苏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500年时，商人不再为宫殿和庙宇服务，而为自己谋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商人将海运成本降低，通过船运输奢侈品及食品等大宗货物来谋利。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铸币。到大流士统治时，铸币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商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到公元前400年，平均每个希腊人要比他们三个世纪前的先辈多消费25%～50%。房屋更大，饮食更多样，人们更长寿。

大流士通过雇用腓尼基人成立波斯第一支舰队，开凿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并控制希腊城市来介入地中海繁荣的经济。据希罗多德记载，他派间谍监视意大利，甚至考虑过攻打迦太基。

大流士死于公元前486年，这时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已比公元前1200年的24分整整高出了10%。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产量已稳步

增加；巴比伦大约有15万居民（据希罗多德说，这个城市如此之大，以至于居鲁士占领它的消息花了几天才传到每家每户）；波斯军队规模庞大，甚至把整条河都喝干了（这也是希罗多德说的）；多达1/10的雅典人会写自己的名字。

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了24分。从公元前8世纪以来，东方国家与西方一样也进行了重组并实行中央集权化。公元前771年周王朝的瓦解让诸侯们喜忧参半。没有周王朝，他们可以肆意征战。诸侯们原本听命于周王，不过他们发现周王依赖他们的军队，而且自己的权臣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解决办法是废黜贵族，引进外族人，像提格拉·帕拉萨那样用囚犯组建军队。与周朝毗邻的大国（晋、齐、楚、秦）在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这么做，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相比黄河流域的其他国家，楚国受到周室的管制较少。早在公元前690年，楚国就创建了新直辖区，行政长官直接向楚王汇报。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在公元前7世纪60年代，晋献公采用了更激烈的策略，屠杀国内名门望族的首领，并提拔顺从他的臣子。其他国家也争相效仿。在公元前594年，鲁宣王采用了新策略：让农民对自己耕作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不用再服劳役，但是前提是他们需要服兵役或缴税。不用多说，其他国家当然也群起仿效。

这些采用新统治策略的君主与西方国家的君主一样，创建更大规模的军队，面对更强劲的对手，并从经济发展中获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更愿意努力耕作，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发明了牛拉犁。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使用。到公元前5世纪，铁匠们学会使用风箱，将铁矿石加热到熔点2800华氏度后再铸造。[5]吴国的铁匠甚至能控制铁中的碳含量，造出真正的钢铁。

城市蓬勃发展（到公元前500年鲁国临淄的居民人数可能已达到5万）。和西方一样，需求促进商业发展。在公元前625年，鲁国的一位大臣为了促进贸易，取消了边境检查站。水上贸易兴旺，晋国及位于洛邑的周室推行铜币（但与西方无关）。与西方相似的另一点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平等也在加剧。税收增加，从公元前6世纪初的10%上升到了100年后的20%。诸侯在宫殿里建冰室，而农民却陷入贫困状态。

在西方，经济在公元前6世纪迅速扩张，且国王已重掌权力，但在东方，经济的发展却加剧了君主的烦恼，因为取代诸侯的往往是权倾朝野的卿大夫。卿大夫往往能比他们的君主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常常成了竞争对手。在公元前562年，鲁国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军，各领一军。公元前537年，鲁国由三桓中的季孙氏专权。晋国的卿大夫韩、赵、魏发动内战，持续了50年，最终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地。

但在这个时候，君主（及那些篡位的卿大夫）找到了解决办法。如

果卿大夫和他们取代的诸侯一样成问题，为什么不从其他国家招募臣子呢？这些臣子被称为“士”，常翻译成gentleman（君子），因缺乏政治关系而不可能权倾朝野。其中许多士出身卑微，这就是他们选择仕途的原因。士这群人的出现及壮大证明了中央集权化和知识的传播。数以千计的士穿梭于各国间，担任一些卑微的职位。

只有少数幸运的士得到了君主的重视，并加官晋爵。有趣的是，与西方不同，这些士而不是他们效忠的君主成了当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扮演以德服人、辅弼君主的良臣。《左传》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都是关于这些士的。我最喜欢的是赵盾，晋灵公的权臣。《左传》描写道，晋灵公不行君道，他在高台上用弩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弩箭的样子。[6]一次因为熊掌没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拿去扔掉。

赵盾多次劝谏，使晋灵公生厌，晋灵公便派去刺杀赵盾。一大早就去了赵盾家，只见赵盾早就穿戴好上朝的礼服，忙于政事。不愿杀害这样一位忠臣，也不愿违背国君的命令，最后他选择了唯一的出路，一头撞死在树上。

晋灵公再次刺杀赵盾。灵公设下埋伏，结果赵盾手下一拳打死了袭击他的狗，且灵公的一名武士是赵盾多年前救助的饿汉，通过两人的协助，赵盾最终得以脱险。最后，与《左传》中其他故事一样，晋灵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赵盾也常被指责没有对此事进行阻止。

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表现较好的）君主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建筑风格展示了他们国力的日益强盛。周天子将宫殿建在三四英尺高的平台上，但后来的诸侯将建筑向垂直方向发展，达到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最高高度。据说，有一座楚国的宫殿坐落在500英尺高的平台上，高到甚至可以碰到云端。另一座在中国北部的宫殿叫作“空中平台”。统治者对他们的宫殿严密设防，如同害怕敌国一样害怕自己的国民。

到公元前450年，东方的统治者像西方的一样征税建军，并通过不会因君主的死亡而瓦解的国家机构来处理这些复杂的事务，使国家走向了高端统治型。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在西方，文明核心扩张，波斯帝国统一了其大部分地区；在东方，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公元前771年周朝灭亡后出现了148个国家，但到公元前450年，只剩下了14个，其中4个（晋、齐、楚、秦）占主导地位。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冯·丹尼肯的外星人预测说，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时东西方文明核心会继续扩张，两个地方都将会出现一个大帝国。如果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时他们再回来，可能他们会觉得预言属实。毕竟预言的内容没有错，只是时间错了。



思想经典：从孔子、墨子和庄子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外星人也可能会很有兴趣地发现，地球人曾持有的人能与上天交流的观念正在消失。几千年来，君主像天神一样，用祭祀来维持道德秩序，以此将卑微的平民与统治者联系起来，通过在通灵塔上献祭或在坟场屠杀战俘来与上天取得联系。但现在，原来神圣的君主将自己的角色变成了行政首长，他们的统治“魔法”消失了。“要么让我早点死，要么让我生得晚点，”7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抱怨说，“因为现正处于铁器时代……正义之神和愤怒之神身着可爱的白色长袍，离开了凡间。他们遗弃人类，加入了奥林匹斯山永生的众神，把苦痛留给凡人，这样就没有援助来对抗邪恶了。”

但这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从爱琴海海岸到黄河流域，其他思想家开始对世界运行的方式提出了新观点。他们之所以从边缘地区谈起，从社会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从地理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来自文化核心边缘的小国。[7]他们（可能）说，不要绝望，我们不需要神圣的国王统治这个已被玷污的世界。救赎要靠我们自己，而不在腐败、暴力的统治者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二战”结束时试图搞清当时的道德危机。他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称为“轴心时代”，意味着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雅斯贝斯称在轴心时代，“据我们今天所知，人类才形成”。轴心时代的著作——东方的儒家和道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西方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衍生出的《新约》和《古兰经》）——成了定义生活意义的经典及永恒杰作。

对于那些本身没有或者很少留下书面作品的人来说，佛陀与苏格拉底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传人（有时并不是嫡系）记录、润色或完全编造他们的言语。通常没有人真正知道创始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因此，他们的继承人激烈争斗，举行议会，把对手逐出教门，驱逐到外面黑暗的世界。现代哲学最大的成功在于揭示了：继承人在分裂、对抗、咒骂和迫害彼此的同时又多次写或改写了他们神圣的书籍，结果使文本几乎不可能保持原意。

轴心时代的著作各种各样。有些是晦涩的格言集，有些是诙谐的对话，还有很多诗歌、历史故事或论证法，有些文本则结合了所有这些类型。经典著作一致认为，他们的最终主体，一个超越堕落世界的超然境界，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佛陀说，涅，字面意思是“吹灭”，一种像熄灭蜡烛一样将这个世界的激情熄灭的心境，难以用言语描述，甚至连尝试也是不适当的。对于孔子，仁（常译为“人性”）也难以用语言描述。“我越仰望它，它就越高；我越了解它，它变得越难；我看到它在我前面，突然又在我背后……谈论它时，有谁能一点都不犹豫？”同样，苏格拉底放弃了给美下定义，他说：“我理解不了，如果我去尝试只会让我

出洋相。”他只能用寓言来表达：美像火焰，投射出我们误以为是现实的影子。同样，耶稣也只是间接提到天国，他也喜用寓言。

最难定义的是道，道家的理解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此两者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经典著作一致认同的第二件事是如何实现超越。儒家、佛教、基督教等的教义远比保险杠上贴的标语来得重要。但当我在最喜欢的咖啡馆写这一章时，外面有辆车上贴着一条标语，很好地做了总结：“同情是革命。”遵循道德准则，放下欲望，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这样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经典都敦促我们要容忍，并提供提高自身修养的一些方法。佛陀用冥想；苏格拉底青睐对话；犹太教祭司呼吁学习；[8]孔子也提倡学习，并注重礼乐。在每种文化传统中，有些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另一些人更务实、通俗。

这个过程总是一个自我塑造、内部调整的过程，不依赖于神圣的国王，甚至神。事实上，超自然的力量与轴心思想偏离。孔子与佛陀拒绝谈论神灵；苏格拉底尽管自称虔诚，但最终因信奉雅典的神而被指责；犹太教祭司警告犹太教徒，上帝神圣而不容称呼或过多赞美。

在轴心思想中，君主面对的情况甚至比神还要糟。道家和佛陀对君主主要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而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公开指责道德缺失的统治者。轴心评论困扰着善人和伟人，新出现的关于出身、财富、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明显是反传统文化。

在指出东方、西方和南亚经典中的相似点时，我不会去掩饰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人会把三藏（“三篮”）佛经误以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孔子的《论语》，但也不会有人把孔子的《论语》误以为是与之相媲美的其他中国经典，如道家的《庄子》或法家的《商君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我想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一区域出现的多种思想流派。

孔子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作为美德的榜样，把重建周朝礼制，恢复当时的美德作为目标。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考古发现其实孔子对遥远的周公时代所知甚少。并不是周公，而是后来在公元前850年左后发生的大规模的“礼制改革”使周朝恢复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后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霸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用大量财宝陪葬，礼制再次发生变化。

孔子是士，受过教育，但不是特别富有。他可能会反对第二个变化，将公元前850～前600年间的礼制理想化，并将其追溯到周公时代。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这意味着重生者而非祖先，重真诚敬畏而非炫耀伪善，重美德而非出身，用简单的礼器正确行礼，遵循先例。孔子坚持认为如果他能说服一个统治者实行仁爱，大家都会模仿他，世界就会和平。

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家墨子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孔子误解了仁爱。他提倡行善，而不是人为善；是对每个人行善，而不只是家人。墨子拒绝礼乐和周公。他说，即使民不聊生，儒家却还“像乞丐一样，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那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墨子身穿粗布衣服，席地而卧，吃稀饭，过穷苦的生活。他倡导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他提倡“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爱人若爱其身”。他认为“灾难、侵占、不满和憎恨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墨子用外交来避免战争，四处奔波直到把鞋磨破。他甚至派了180个年轻的追随者誓死捍卫一个受到不义侵略的国家。

通常被归为道家的思想家对墨子和孔子的观点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道无为”：夜晚到白天，喜悦到悲伤，生到死，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难以定义。人吃牛肉，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谁能说哪个最好？道家指出：儒家认为是正确的，墨子的追随者却认为是错的，但实际上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人知道天道通向何方。我们必须达到天人合一，但切不可操之过急。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庄子讲述了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事。列子多年求道后，觉得还是没学到东西，就回家了。

> （庄子说）三年不出家门。替妻子做饭，像侍候人一样喂猪。对任何事物都不分亲疏远近，去除雕琢，返璞归真，损弃心智，独以形体存在。在纷纭的大千世界中，保持真朴，以此终生。

庄子认为列子故事让孔子与墨子的实践主义看起来既荒谬又危险。庄子设想有人对孔子说：“你忍受不了这一代人的痛苦，于是你离开，却给今后世世代代造成了困扰。你是打算造成这个悲剧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错的不一定有害，有效的也可能不对。”相比之下，庄子称墨子“真正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却把生活的乐趣都抛弃了。“墨子信徒穿毛皮粗布，穿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刻苦自励为最高理想。”墨子主张“人生时应勤苦，死时要薄葬”，但“即使墨子自己能忍受”，庄子问：“怎么使天下众人也这样生活呢？”

墨子反对孔子，庄子反对孔子和墨子，而所谓的法家反对他们全部。法家反对轴心思想，比马基雅维利更不择手段。法家认为，仁、兼爱和道都没有抓住重点。试图超越现实是愚蠢的：神圣的君主只能屈服于那些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人才，民众也应该采用这个体系。商鞅是公元

前4世纪秦国的丞相，法家的指引之光，他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人道，而是“使国家富裕，兵力增强”。商鞅说：“敢于做敌人所不齿的事，则可得利。”不用为善也不用行善，因为“用强权统治的国家往往更有秩序也更强大”。不用把时间浪费在礼制、实践论或宿命论上，而要将法律和酷刑（斩首、活埋、苦力）结合起来统治国家，并将法制强加于人民。法家认为法律就像木匠的矩尺一样，可以将杂乱的原料变得符合规则。

中国的轴心思想范围涉及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并不断地发展。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学者荀子将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并与法家相对抗。许多法家弟子支持墨子的工作伦理与道家的包容万物。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思想相结合，之后又经历千变万化的复杂重组。

南亚和西方的轴心思想也大致相同。我不会再详细谈论这些文化思想，但只要稍稍看一下希腊这块小土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就能想象出当时思想的大锅沸腾的样子。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神圣的王权可能比之前的西南亚古国都要孱弱，于是到公元前700年，希腊人决定反抗这种王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比其他轴心时代的民族更加直接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一个美好的社会该是怎样的？

希腊人的其中一个对策是通过集体政治来解决问题。既然没人能拥有超然的智慧，一些希腊人问，为什么不集中每个人有限的知识来创建一个（男性的）民主社会呢？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甚至墨子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长期以来理论家普遍认为男性民主的发明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决裂。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能会有质疑。14000年来，在希腊人开始实行民主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就一直比东方高。在公元前5～前4世纪，即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西方的领先地位也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有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采用民主政策，才使西方的领先地位急剧上升。希腊决裂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细谈）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2000年后民主在西方完全消失，这一点就是古希腊民主与美法两国革命的区别。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发现古雅典为关于现代民主国家如何运作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方观点，但是我们需要选择性地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才能看出从古希腊到美国开国之父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延续。（顺便说一句，这些开国之父利用“民主”一词来代表权利滥用，与暴民统治只差一步。）

不管怎样，希腊对轴心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些民主派，而在于苏格拉底引导的对民主的批评。他认为，希腊并不需要民主，民主只会加强那些靠外表作判断的人的无知；希腊需要的是像他一样的人，知道自己对善的本质这一关键点一无所知。只有这样的人通过哲学辩论磨炼出理性后才可能理解善（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苏格拉底也不确定）。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将苏格拉底的美好社会模式分成了两个版本：对儒家来说足够理想的《理想国》以及足够让商鞅称心的

《律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之一）的思想也涵盖了类似的范围，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到逻辑分析的《政治学》。关于相对主义，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诡辩家可以和东方的道家相媲美。就如在神秘主义方面，有远见的帕尔米尼底斯能和恩培多克勒相当。作为普通人来看，普罗泰戈拉的成就和墨子相当。

在介绍这本书时，我谈到了另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今天西方之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唯一合理的动态文化，而古代中国却采取了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9]我认为这种理论也是错的。这个理论将东方、西方及南亚的思想夸张化了，并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化。东方思想可以像西方思想那样理性、自由及愤世嫉俗，西方思想也可以像东方的那样神秘、专制、相对和模糊。轴心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东方、西方及南亚思想的差异，观念、论点及冲突的范围都很相似。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不论是身在黄河流域、恒河平原抑或地中海东部城市，都为辩论开辟出了新疆域。

与过去真正的决裂是由于这片知识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如古希腊哲学）的形成。没有人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首次达到24分时提出轴心论。公元前1364～前1347年，埃及法老阿肯纳顿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他推翻了传统的多神信仰，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即他、他的妻子奈费尔提蒂及太阳神阿顿。阿肯纳顿敬拜阿顿神，为之谱写赞歌并建了一座满是神庙的新城，促进了怪异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00年来，埃及历史学者一直在争论阿肯纳顿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是试图创造一神教，一个和弗洛伊德相当的著名学者认为，当希伯来人还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剽窃了阿肯纳顿的想法。当然，阿肯纳顿“为阿顿神谱写的赞歌”与希伯来《圣经》中《诗篇》第104篇“给造物者上帝的赞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阿肯纳顿的宗教革命并不属于轴心思想。它并不包括个人的超然性，事实上，阿肯纳顿禁止平民膜拜阿顿神，这使法老作为凡间和神界桥梁的角色更加突出。

对阿顿神的崇拜只能证明在君主依靠神灵而稳坐宝座的社会里要做出思想方面的重大改变有多困难。他的新宗教并没有赢得大众支持，他一死，以前的多神信仰就又回来了。阿肯纳顿的庙宇被毁坏，直到1891年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他的城市，那次被遗忘的变革才重新为人所知。

那么，是不是由于轴心思想的影响使得图5-1如此单调？是不是因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由于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引导人类跨越了智慧的障碍，社会发展指数才达到了24分？是不是因为在之前1000年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所以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

可能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说法与年代图表不符。在公元前8世纪，西方的亚述达到了高端统治，使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

但是苏格拉底时代在3个世纪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方思想中基本上没有明显属于轴心思想的内容。东方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秦、楚、齐和晋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24分，当时也正好是孔子最活跃的时期。但东方轴心思想的主要浪潮是在随后的公元前4～前3世纪才到来。如果南亚人把佛陀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是正确的，那高端统治应该在轴心思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其次，这个说法与地理也不符合。最重要的轴心思想家来自小的边缘国家，如希腊、以色列、佛陀的故国萨迦或孔子的故国鲁，而且很难看出，在一个政治落后的强国中，政治上的超越性突破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最后，这与逻辑也不符。轴心思想是对高端统治的回应，往往和伟大的君王及他们官僚的权力相冲突，最多也是对其保持中立态度。我怀疑，轴心思想对提高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是在后来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所有的大国都利用这一思想为它们服务。在东方，汉朝将儒学改造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指引官僚忠于职守。在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显然是真的被自己的暴力血腥吓到了，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佛教，但他仍旧不愿放弃战争。而在西方，罗马人先是改变希腊哲学的原有立场，然后再将基督教变成他们的国家支柱。

轴心思想最理性的部分就是其促进了法律、数学、科学、历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所处世界的信息。但图5-1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建造更强的国家、到更远的地方做生意，并在更大的城市定居的过程中，懒惰、贪婪及恐惧的人们发现了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做事方法。在之后五章中会多次提及一种模式，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新时代相应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当高端统治的国家出现，人们对世界也不再抱有幻想，轴心思想也就相应出现了。

秦国和罗马帝国成功的秘诀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轴心思想是国家重组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只需要看看秦国，一个位于东方文明核心西部边缘的强国。《战国策》是一本有关外交策略的著作，作者不详，书中描述说：“秦国与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暴好利，不守信用，不知道礼仪德行。”尽管秦国与儒家的主张全然相反，但它在公元前3世纪从东方文明核心的边缘一直扩张到了整个文明核心地区。

在欧亚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来自西方文明核心边缘，且常被比作狼的罗马人摧毁了文明核心，奴役了把他们称为蛮族的哲学家。在公元前167年，希腊人波里比阿被送往罗马做人质，他写了40卷的《通

史》（*Universal History*）来向他的同胞解释这一切。他问："谁这么狭隘或懒惰以至于不想知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公元前220～前167年）罗马人是如何史无前例地统治了几乎整个已知世界？"[10]

秦国和罗马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把在旧核心区域实行的新组织方法和在烽火前线磨炼出的军事手段结合了起来，是两个后发优势的典型，两者都屠杀、奴役并驱逐对手，且两者都促使社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秦国和罗马还是我们称之为暴力悖论的典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血河干涸，他们的帝国让人民变得更加富裕。

秦国和罗马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只是数字而已。两者走了不同的路线，但它们都比对手更善于招募士兵、军事武装以及休养生息。

几个世纪以来，秦国一直是东方战国六雄中最弱的。[11]后来，它开始走向高端统治，在公元前408年实行土地税。无情的战争迫使其他国家向国民征兵征税，并用法家的手段来进行处罚。统治者们千方百计增加收入，高效的治国策略迅速流传，因为不效仿的话就会被消灭。公元前430年左右，魏国开始聚集劳动力挖灌溉渠以提高农业产量，其他国家，（最终）包括秦国，纷纷效仿。赵国与魏国修建长城以保护水田，其他国家也效仿。

在公元前4世纪，秦国国力追上了其他国家。在40年代，商鞅说服秦国国君实行管制和惩罚，将秦国变成了噩梦般的国度，他自己也因此而扬名：

> （商鞅）命令居民以5家为"伍"、10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责令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

这并不是独裁主义幻想，从秦国司法官员陵墓中发掘出的竹简表明，秦国向所有野蛮人强制实行律法。

值得慰藉的是，商鞅作法自毙，最后车裂而死。当时，采用高端统治及法制政策的秦国取得了大胜，东方文明核心成了一个武装阵营。在公元前500年，3万人的军队已经算大规模了，但到公元前250年，10万大军也算正常，20万大军也没什么特别的，真正强大的军队规模还要再翻一倍。人员伤亡数相应也变得巨大。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64年，秦军灭了魏国6万大军。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想到秦国士兵以头颅数领赏（字面上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们以上缴敌人的耳朵封赏），所以也不会太离谱。

毫无约束的军队引起了恐慌，在公元前361年，超级大国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它们之间的分歧。被称为"说客"的雇佣外交官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出现。一个人可能穿梭于几个大国间，并同时担任这些国家的重

臣，和亨利·基辛格一样编织着阴谋的大网。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争吵不休总好过争战不休”，但在公元前4世纪蛮力还是击败了谈判。问题在于秦国。秦国以绵延的群山做掩护，难以攻克，并利用核心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吸纳来自西方的无国家社群，使其军队不断向核心地区逼近。《战国策》称“秦国是‘天下万物’的死敌”，它想“吞下整个世界”。

其他国家意识到它们需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是四个世纪的战争让它们互不信任，相互背叛。公元前353～前322年，魏国建立联盟，但是盟国打了几场胜仗后，因害怕魏国实力比它们强，于是开始攻打魏国。魏国像是被抛弃的情人或领导人，转而投奔秦国。公元前310～前284年，齐国建立了新联盟，结果重蹈魏国的覆辙。之后赵国接过了盟主的衣钵。在公元前269年，赵国战胜秦国。希望在每个人心中萌动，但这个希望太小、太晚了。秦王嬴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战略：只要杀很多人，其他国家就不可能重建军队。秦国发明了敌尸清点计数。

接下来的30年里，秦国将领杀了约100万的敌军。关于这段时期的史书充斥着屠杀的凄惨，但在公元前234年秦国斩首10万赵人后，屠杀停止了。之后，秦国就没了劲敌，其他国家选择投降，放弃杀戮。

秦国的残敌走投无路，打算谋杀秦王。在公元前227年，一名刺客绕过秦王的护卫，抓住秦王的手臂，把涂有毒药的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只割断了秦王的袖子。秦王用柱子做掩护，趁机从剑鞘中拔出长剑，把刺客刺死了。

齐国，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公元前221年也被消灭了。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他规定：“我是一世皇帝，我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对此没人敢反对。

罗马建立帝国的过程与秦国不同。公元前521年，大流士登上王位时，波斯已经统一了当时西方文明核心的大部分地区。大流士想瓜分地中海地区财富的欲望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最终摧毁了整个波斯帝国。当时的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已经很发达，能充分利用能源和信息技术，但组织和军事能力不强。所以大流士将它们一一攻破后，用武力威逼它们屈服，但正是武力威逼使这些城邦结合起来，并促使它们提高了组织和军事能力。

因此，当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大军攻打希腊时，雅典和斯巴达放下分歧，一致抵抗。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电影《300勇士》不同）记载了这次使雅典成为联盟之首的大捷战。和东方国家结盟对抗秦国那样，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超过了波斯，于是可怕的雅典——斯巴达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修昔底德记载，但迄今未拍成电影）。公元前404年，受到重创且饥饿难耐的雅典人被迫投降，撤除海军，拆毁从雅典城到出海口的工事，此时西

西里和迦太基也卷入了战争；战争也使部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马其顿，成了希腊经济腹地。

马其顿可以说是个古老的香蕉共和国，资源（尤其是木材和银）丰富但混乱。50年来一直受希腊城邦的摆布，其政治就像是充斥着通奸、乱伦和谋杀的肥皂剧，但在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得到王位，成了马其顿的提格拉·帕拉萨。腓力二世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来解释什么是后发优势：他本能地理解并借鉴希腊人的制度来统治其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动荡混乱的王国。他挖掘银矿，任用雇佣军，并与不可一世的贵族合作，无视希腊城邦。如果没有在公元前336年被神秘刺杀，他一定也会无视波斯。传言说，腓力二世喝醉后，因儿女恩怨而轮奸同性，之后便丧命了。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在短短4年内（公元前334～前330年）就完成了腓力二世的计划：征服波斯帝国，焚毁波利斯城，东征至印度边界。直到他的军队拒绝继续远征，他才停止扩张。

亚历山大生于幻想破灭的新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是他的导师之一），没有意识到做一个神圣的国王有多困难。[12]虔诚的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是与黑暗永恒斗争的阿胡拉玛兹达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亚历山大肯定是邪恶的代表。毫无疑问，这个形象问题就是亚历山大努力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的背后原因（第四章中提过）。也许，假以时日他会成功，但他越是想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就越觉得他疯狂。但是时间短暂，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亡——很可能是中毒而死，几位将领互相混战，分割帝国，建立三大王国（也向神权靠拢）。

要是和秦国一样的话，其中一个王国应该会征服其他王国，但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和这位伟大的国王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与希腊开战，借鉴希腊制度并打败希腊，之后又征服了波斯帝国，但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几乎将其全部吞并。

罗马是通过将殖民与发展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扩张的典型例子。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罗马就深受希腊影响，在与邻国的战争中逐渐变得强盛，建立了高低端相结合的组织模式。最重大的决定由贵族参议院做出，议会以农民为主，通过投票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秦国一样，罗马处于由低端向高端统治模式发展的晚期。罗马从公元前406年开始发放军饷，可能也在同时开始征税。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收入大多靠掠夺而来，与战败的敌国达成协议，向其征兵而非征税。

虽然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反对神圣的王权，但他们很清楚征服与神权的联系。凯旋的将领驾着装饰圣洁的白马战车在罗马城内游行，陪同的奴隶在其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只是凡人。”胜利使神圣的王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强大的征服者可以做一天神，但仅此而已。

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机制并不新鲜，但其高低端统治相结合产生的劳动力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与秦国匹敌。在公元前

480年，波斯20万大军入侵希腊，战败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国力。罗马没有遇到这种限制。一个世纪的战争带动了意大利全部的劳动力，参议院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权。

迦太基人将罗马的第一支舰队引进一场风暴中，结果10万罗马水兵葬身海底。罗马于是建了一支更大的舰队。两年后这支舰队在狂风暴雨中惨遭覆没，所以罗马建了第三支舰队，结果第三次失去了海军。在公元前241年，罗马的第四支海军终于打败了迦太基，因为迦太基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迦太基花了23年来恢复国力，之后汉尼拔将军率领战象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后方攻击意大利。公元前218～前216年，他俘虏或屠杀了10万罗马人，但罗马军队源源不断地增兵，最后通过消耗战将他打败。和秦国一样，罗马对暴行进行了重新定义。波里比阿说："罗马人的风格是消灭见到的一切形式的生命，一个不留……所以当罗马人攻下一座城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看到人的尸体，还可以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被砍下的四肢。"迦太基最终在公元前201年投降了。

争战比争论要更受参议院的青睐。仅仅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罗马就开始进攻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王国，公元前167年将其全部吞并。后来经过与当地部落的连年苦战，罗马军队深入到了西班牙、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罗马成为西方唯一的超级大国。

秦始皇建长城与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

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自冰河时期以来再次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大城市由多产的农民供应食物，由复杂的贸易网络提供补给。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都比公元前1000年高出了50%。

本章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原理：民族总体来说是一样的。虽然中间隔着广阔的中亚和印度洋，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主要的区别在于西方仍勉强保持了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西方的社会发展依赖于冰河时期末期由栽培植物和饲养家禽形成的地理位置优势。

本章还阐释了第二个原理：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文明核心的扩张缩小了东西方间的差距，将东西方糅合进了一部全球史，造成了戏剧性的后果。

即使到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到旁遮普时，受过最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亚历山大向手下保证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包围世界的海洋中沐浴（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

海洋，而是固城林立的恒河平原，于是士兵开始叛乱）。

亚历山大于是掉头回家，将很多叛乱者留了下来。一群人在现在的阿富汗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公元前150年，该王国征服了部分恒河平原，融合了希腊和印度文化。一本印度史书记载了一个佛教和尚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间的对话，对话之后国王和他的随从都改变了信仰。

巴克特里亚王国值得一提：它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瓦解，这是同时在东西方史书中被提及的最早的历史事件。一两年后，一位来自中国的使节踏上了王国的废墟，回国后将他的精彩经历禀告了皇帝，特别提及了中亚的马匹。在公元前101年，一支中国的远征军踏上了这片土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地反抗的军队可能包括罗马人以及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俘，他们经过多次易手后，最后被卖到了中亚山区与中国军队作战。

缺乏浪漫色彩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人和中国人要再过200年才会接触。据一本中国史书记载，一位中国将军在公元97年“派副官甘英前行到西海海岸后返回”。尽管不知这片遥远的海岸具体在哪儿，但可以确定的是甘英到达了大秦王国——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大秦”这个名字体现了中国人眼中自己帝国宏伟遥远的倒影。西海是不是地中海？大秦到底是不是罗马？这两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反浪漫派历史学家认为，大秦国王安敦（应该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公元166年派遣使臣至中国首都洛阳，才使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相遇。

很可能在此之前，东西方就已经有了更富有成果的接触。但因为参与接触活动的人对受过教育的史书编撰者来讲太卑微了，不值一提，所以不曾在史书中提及。其中一群人是商人。在罗马贵族老普利尼（死于公元79年，因痴迷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结果未能及时逃开熔岩）的鸿篇巨制中，他描写了世界及其特殊性，提到每年有一支商船队从埃及的红海海岸驶向斯里兰卡。实际上有一份叫作《红海旅记》（*The Voyage on the Red Sea*）的希腊语商业文件流传了下来，类似贸易手册，粗略地描述了印度洋的港口和风向。

罗马商人在印度留下了踪迹。18世纪，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刚在印度定居，就从当地人手中获得了古罗马钱币，但直到1943年，罗马对印度影响的程度才变得清晰起来。那年夏天，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英国殖民者眼看统治即将结束，决定重新发掘被忽视几十年的印度文化遗产。准将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从意大利的萨勒诺前线被调遣至新德里，监管150万平方英里和埃及一样文物丰富的领土。

惠勒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足迹遍布三大洲。他对罗马古迹严谨的发掘工作使英国考古学得到了彻底改革。他的职位变动同样令人诧异。对此，印度爱国主义者质问道：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要派个对印度不如对英国本土罗马古迹那样了

解的，且已退役的老顽固来呢？

惠勒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证明。一抵达孟买，他就开始了考古之旅。到钦奈（殖民地马德拉斯）后，他发现政府机关因为即将到来的高温酷暑都已关闭，于是决定到当地博物馆消磨时间。“在一个作坊的橱柜内，”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 我的手紧握着一个陶器的瓶颈和长手柄，这个陶器与当地的热带风格迥异。当我看到它时，我想起了那个在新德里议会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与印度有什么联系？”完整的答案就在这里。

惠勒拿着的是一个在离海岸80英里的阿里卡梅度（彭地治利）挖出的罗马酒缸的碎片。他搭了通宵火车，在小镇的法国餐馆吃过早餐，喝过小酒后，开始寻找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

>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套间内存放着三四个博物馆的箱子。我满怀希望，大步走过去，用黏黏的手臂拂去灰尘，仔细观察。一个月内第二次，我的眼睛开始放光。堆在一起的是十几个罗马双耳细颈高罐（酒坛子）的碎片，一盏罗马灯的部件，一块罗马凹雕（浮雕胸针），大量印度陶片——陶瓷碎片、小珠子以及赤土陶器——以及任何学过古典考古学的人都不会搞错的红釉面陶瓷碎片。

惠勒把一块赤土陶器带回新德里后，他拜访了几个从事战争航空摄影的英国考古学元老。“我偶然间得到了一块赭色黏土陶片，”他指的是从阿里卡梅度博物馆得到的红釉面陶瓷，“结果令人满意，有人能理解是多么美好的奖励！”

据考古发现，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三个世纪内不断增加。最近在埃及红海海岸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干枯的椰子、大米和黑胡椒，这些食品只可能来自印度。到了公元1世纪，中国与印度开始贸易往来，两地同时也与东南亚地区有货物流通。

东西方在越过汪洋大海后得以牵手，这么说有点夸张。与其说两者间存在着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将两端串了起来。一个商人可能通过海运把红酒从意大利运到埃及，另一个可能通过陆路运到红海，第三个可能运到阿拉伯，第四个可能越过印度洋运到阿里卡梅度。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当地的丝绸商人，出售来自黄河流域，被转手更多次的丝绸。

虽然这只是个开始。《红海旅记》提到了一个叫“Thin”的国家，可

能是“秦”不标准的发音；后来有个叫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自称到访过“支那”，很可能就是中国。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军队行军到巴克特里亚，丝绸和香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流通，而金银向东流通。只有轻巧、昂贵的商品，如丝绸等，在历经6个月5000英里的运输后仍可以赢利。在一两个世纪内，所有罗马贵族死后都会披一条丝绸披肩。中亚商人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

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对于那些统治核心地区的贵族来说很值得庆祝，但对那些将贵族视为比商人还要卑鄙的人来说，却值得担忧。约在公元前390年，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肥头圆耳，丑陋畸形，像两只脚的野兽。”他还写道：

> 他们的外形尽管可怕，却仍是人类，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艰苦，不用火，不食熟食，靠吃树根、草根和在他们大腿和马背上稍微温热后半生的肉为生。

这些人是游牧民族，对于地主阿米亚努斯来说完全陌生。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们的祖先，中亚的游牧民。他们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驯养马匹，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将马匹套在推车上，促进了马拉战车的出现。战车使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750年后陷入混战，500年后被传到了东方。骑在马背上要比驾驶马车更方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匹更大，马具改进，可从马鞍上发射的小型强劲弓箭被发明出来，三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马背上的游牧生活。骑马使地理再次发生彻底改变，逐渐使蒙古一直延伸到匈牙利（都是游牧民族命名的）的干旱平原变成了连接东西方的“草原通道”。

在某些方面，这些草原游牧民类似大帝国边缘相对落后的居民，与希伯来《圣经》中雅各和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用动物和毛皮去换回定居居民的产品。双方都会获利：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和波斯的地毯被用来装饰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的豪华陵墓，而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从游牧民那里引进马匹和弓箭，用骑兵取代战车。

但也有问题存在。巴泽雷克墓葬中除了丝绸地毯外，还有成堆的铁制武器和用敌人颅骨镀金后制成的奖杯，暗示贸易和战争互不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前800年后，寒冷干燥的天气使草原牧场骤减，那些能迅速迁徙，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牧场后还可以作战的牧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所有部落都开始骑马，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冬季和夏季牧场间穿梭。

他们的迁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公元前8世纪，马萨格泰人向西迁移，越过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遇上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与史前被农民侵占觅食栖息地的采猎者及西西里岛居民在希腊殖民者登陆后遇到的选择一样：他们可以坚守阵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击，甚至推举出国王，或者逃跑。那些放弃的人跨过伏尔加河，导致当时已定居在那里的西米里族人也面临了战斗或逃跑的选择。

在公元前8世纪初，西米里难民开始迁徙到西方的核心地区。他们数量不多，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在农业国家，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劳作来供给军队。在战争高峰期，罗马和秦国军队对平民征兵，每6人征一人；在和平时期，每20人征一人。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个男人（也有许多女人）都是战士，从小就与马和弓箭打交道。这是不对等战争最初的例子。大帝国实力雄厚，设有军需官，军队装备有攻城武器，但游牧民族移动迅速，常进行恐怖活动。事实上，他们不迁徙的时候往往忙于互相争斗。

多年的气候变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相结合，致使西方文明核心的边缘地带陷入了暴力和动乱。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仍是西方最大的帝国，邀请西米里人到核心地区并帮助他们打败对手。起初确实行之有效，在公元前695年，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亚国国王弥达斯，据希腊传说称可以点石成金，被西米里人包围都城后自杀了。

虽然消除了像弗里吉亚那样的缓冲国，但是亚述人将自己的心脏地带暴露给了游牧民族。到公元前650年，斯基泰人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们“行为暴力，无视法律，最终导致了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他们像强盗，来回奔走，窃取每个人的财产。”游牧民族破坏了亚述帝国的稳定，且在公元前612年协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了尼尼微，之后立即转而攻打米底人。直到公元前590年左右，米底人想出方法来对抗这些诡计多端、移动迅速的敌人。根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个方法就是等他们的领袖在宴会上喝醉后再杀他们。

米底、巴比伦和波斯的国王尝试去应付游牧民族。一种方法是什么也不做，但后来游牧民族洗劫了边疆省份，税收收入因此减少。买通游牧民是另一种方法，但上缴的保护费和洗劫造成的损失一样巨大。第三个方法是先发制人，进军草原并占领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牧场，但这个做法的支出和风险都更大。无须再防卫，牧民可以撤退到寸草不生、干旱的荒原，使入侵者因不能及时补给而垮掉。

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试图在公元前530年对马萨格泰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像之前的米底人一样，他用了葡萄酒战略：先让马萨格泰人先锋部队洗劫他的阵营，在他们喝醉后再将其屠杀，虏获了他们女王的儿子。“你如此嗜血，”托米丽司女王在写给居鲁士的信中说道，“把我的儿子还给我，这样你的军队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不同意，我以太阳神起誓，我会让血多得让你喝不完。”女王的话应验了，她打败了波斯人。居鲁士的首级被割下，浸在盛血的革囊里。

先发制人的战略一开始比较糟糕，但在公元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证明了这个策略行得通，他击败了波斯人称为“尖帽斯基泰”的联盟，向其征收贡金并设立了傀儡国王。5年后，他再次尝试，跨过多瑙河，将其余的斯基泰人追击到了乌克兰腹地。和现代很多不对等的战争一样，很难说到底谁赢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大流士幸运地逃生了，但斯基泰人再也不是波斯人的威胁，所以很明显，有些事开始步

入正轨了。

在东方，草原骑兵的诞生需要更长时间，正如在东方，战车的普及要比在西方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当游牧民连锁反应影响到东方的时候，产生的效应一样强烈。游牧民族的东扩很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犬戎袭击周朝时就已开始了。北方的民族吸纳了新来的游牧民族，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被秦、晋吞并。游牧民族的入侵和东方国家的扩张相结合，减少了缓冲国家，和西方的情况一样。

此时赵国位于边缘地区。和亚述人对斯基泰人所做的一样，赵国招募游牧民骑兵攻打邻国，并将臣民训练成骑兵。赵国采用了一项在西方不常用的战略——消耗战，建立长城阻止牧民入内（至少在贸易和突袭的路线上）。这似乎比战争或付保护费更有效，于是在公元前3世纪各国大量建造长城。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长城绵延2000英里，成本（根据传说）是每建一码要死一人。[13]

秦始皇并不为此担心。事实上，他重视城墙的建造，将这个防御性战略转化成了武器，用长城将游牧民族传统放牧的草场圈入了自己的疆域。后来在公元前215年，他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

长城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地理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图5-1中推动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动力——更多能源的获取、更有效的组织、广泛传播的知识、更致命的军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各自由一个大帝国统治，两方的军队和商人甚至深入了两方之间的地区。大草原再也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而成了一个连接两方的通道。东西方核心的历史尽管相互独立但却非常相似，并开始结合起来。尽管只有极少数的商品、人员或思想从欧亚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却形成了新的地理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在公元前200年时统治核心地区的大帝国因此而瓦解，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被扭转，西方的领先地位被终结。矛盾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1] 西方核心的锡资源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

[2]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塞巴斯蒂亚诺·图萨（Sebastiano Tusa，原为特拉帕尼省考古主管）、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哥德堡大学）、克里斯托弗·普雷斯科特（Christopher Prescott，奥斯陆大学）、迈克尔·科尔布（Michael Kolb，北伊利诺伊大学）、埃玛·布莱克（Emma Blake，亚利桑那大学）、罗塞勒·吉利奥（Rossella Giglio）和卡泰丽娜·格雷科（Caterina Greco）以及塞勒姆人，尤其是乔瓦尼·巴斯科内（Giovanni Bascone）和妮古拉·斯帕尼奥洛（Nicola Spagnolo），各位捐助者以及所有参与这个斯坦福项目的学生和工作人员。

[3] 历史学家通常把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至洛邑到公元前481年，或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不同历史学家观点不同）称为东周。

[4] 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无可厚非。但大部分历史学家怀疑事实上是大流士谋杀了真正的司美尔迪斯，并推翻了拥护他的神职人员。

[5] 到公元前1世纪，铸铁技术已在中国普及。将铁矿石加热到1650华氏度，并多次锤击制成熟铁，这一技术直到14世纪才在西方出现。

[6] 这里有一个问题：赵盾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10年左右，但弩在5世纪中叶才开始普及。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左传》实际上是民间故事的集合，只表达了故事大意，关于士和君主真实情况的描写却很少。但这么说可能太武断了。尽管赵盾的故事有很多荒诞的地

方，但《左传》的编撰者显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且看得出来这个故事至少是做过修改的。

[7] 但并不是全都这样。耆那教创始人大雄（Mahavira，约公元前497～前425年）来自印度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大致生活在公元前1400～前600年（当时波斯还在西方文明核心边缘），尽管这样，这位伊朗人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归为轴心时代的大师。（我这里不讨论琐罗亚斯德是因为历史资料太混乱。）

[8] 犹太教学校在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尤为迅速。

[9] 一些理性的历史学家和许多新时代的拥护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他们仍同意东西方存在区别，但他们认为东/南亚的思想解放了人类心灵而西方的抽象主义却将其抑制。

[10] 这只是波里比阿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他根本不知道秦国的存在。

[11] 公元前6世纪有4个大国（晋、齐、楚、秦），之后晋国内战，分裂成3个国家（韩、魏、赵），于是就有了6个大国。一些历史学家把燕国（位于当今北京附近）也算做大国，即第七大国。

[12] 有记载说：亚历山大比波斯国王矮1英尺，当他第一次坐上波斯国王的宝座时，他的脚够不着地面。他的脚晃来晃去，庄严全无，直到侍臣给他垫了脚凳，问题才得以解决。

[13] 秦长城并不是北京一日游中参观的长城（这个是16世纪的）。从外太空看不到长城，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最美好的归宿：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然是最完美的归宿。”在伏尔泰的经典喜剧作品《老实人》（*Candied*）中，导师邦葛罗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他的乐观主义哲学。在书中，邦葛罗斯先后遭遇一连串的厄运：感染梅毒，一只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溃烂，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绞刑，甚至接连遭遇两次地震。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一切皆善”的说教。

当然，邦葛罗斯这个人物是伏尔泰跟读者开了一个小玩笑，用来讽刺当代哲学的愚昧无知，但是历史上确实曾经涌现出许多真实的“邦葛罗斯”。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东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强大帝国所主宰。一位中国诗人曾这样描写：“帝王出游，场面极尽奢华。欢愉无尽，绵延数万年。”对于罗马帝国，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热情洋溢地赞叹：“为了帝国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齐祈祷。请求所有的神一起赐予这个帝国，赋予这个城市永恒的繁荣，永不消逝，直到石头漂浮在海面上，直到草木再不发芽。”

那么这些“邦葛罗斯”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导致了图6-1中的情形？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达到巅峰，随后不约而同地出现衰退。这种衰退与之前相比又更进一步。它不仅范围更为广泛，波及欧亚大陆两端，而且影响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长达数个世纪。截至公元4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衰退程度超过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倒退了20%。据统计，西方世界社会发展占据领先地位长达14000年，本章旨在向广大读者展现其末尾阶段，并探讨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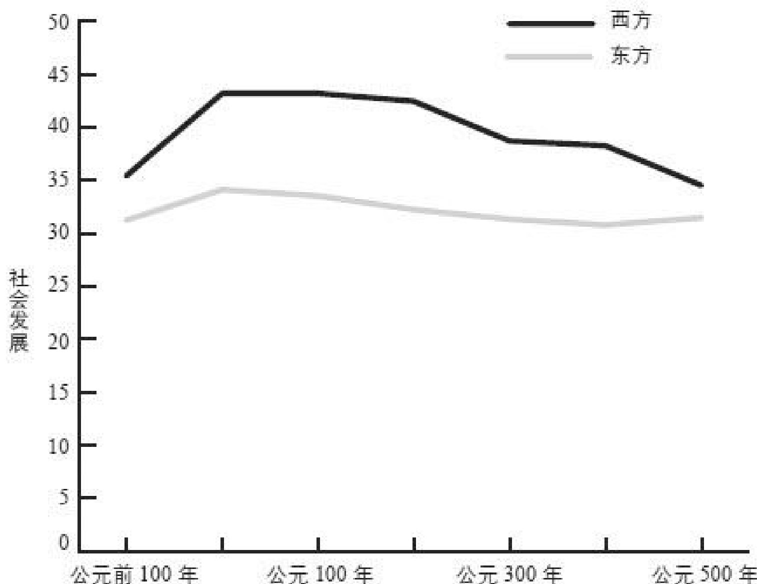


图6-1 一个旧世界——大规模衰退：古代帝国的巅峰时期、衰退时期以及瓦解时期（公元前100 ~ 公元500年）

秦汉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国也不全是“邦葛罗斯”式的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论”——战争最终引导和平繁荣的事实——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统一战争刚结束，秦国和罗马帝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在血腥残暴的内战中诞生。秦国很快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而罗马帝国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过程。

在征服战争中，秦朝中央集权的强制机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和平统治阶段，这种机构的运作结果并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最后的敌人，但是秦始皇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征召男丁，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派遣他们修建自己的陵寝。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他们修筑了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和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作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为“天子”，并寄希望于一些招摇撞骗之徒，靡费大量钱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也许就像现代人买保险那样，他花费36年时间，命令70万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学家已经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数百人的殉葬坑。）

这个占地20平方英里的中国墓葬建筑群（大部分还未被开掘）与埃及金字塔遥相呼应，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个工作队于1974年挖掘水井时无意中发现的，现在已闻名遐迩。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

卫着整个陵寝，它们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司马迁描述秦始皇陵时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名震四方的兵马俑。司马迁将兵马俑略去，转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码宽、周围环绕着水银仿制的秦国河流的青铜宫殿。（1981～2003年的探测调查发现，陵寝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银。）司马迁还补充说，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将他所有未生育过的嫔妃、知道陵寝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国数百名高级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抵抗。王公贵族加以指责，秦始皇强制将其遣送回都城；知识分子站出来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农民发动起义，他残忍地将叛乱者腰斩。[1]

由于秦始皇在国内实施恐怖统治，他刚驾崩就发生了大规模内乱。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开了帷幕：两名下级官吏必须及时将征召文件送去卫戍部队，但是由于突发暴雨，导致他们无法完成任务。而根据秦律，延误军务必定招来杀身之祸。根据司马迁记录，其中一人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发动起义。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两名起义者很快被处死，但是他们的义举很快传遍全国。不出几个月，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之前各国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叛乱演变成可怖的内战。经历四年的野蛮屠杀之后，农民出身的刘邦掌握了局势，随后建立了汉朝。他将8万名俘虏全部处死，宣告从此天下太平，史称汉高祖（或汉高帝）。[2]

罗马与秦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秦国的问题在于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发展步伐，而罗马最棘手的问题是组织机构过于松散。在罗马帝国内部，由富有的年长男性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贫穷市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一个城邦国家的运作来说绰绰有余，但是它们无法胜任对一个帝国的管理，导致战利品堆积如山、成群的奴隶无人处置、国家对那些因战功而极其富有的军事将领疏于防范。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议会成员由于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元老院的元老们居然砸碎他们坐的长凳，互相拳打脚踢，拼死互殴。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是谁在统治罗马帝国。

尽管罗马在接下来的50年间内战频发，但至少没有像秦朝那样顷刻崩塌。越来越多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将领，不再遵从为国尽忠的原则。元老院为了遏制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领袖，只好派他们攻打更为弱小的邻国（反而使得这些将领实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军事将领来讨伐旧将领（结果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到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历史的车轮重新开始转动。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埃及抓捕了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他们最终被迫自杀。此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对于长期征战已经深恶痛绝，于是达成一致意见：私底下，他们将对屋大维（后命名奥古斯都）唯命是从，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又假装把他当做普

通市民对待。通过这个诡异的协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面子。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国，成为这个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东方和西方两个核心都处于独立王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并非毫无悬念。事实上在公元前203年，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曾经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与他最后的敌人分享东方核心的统治权，但他随后违背承诺，将对方杀死，并且掠夺其所有财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似乎即将分裂，一边是来自罗马的屋大维统治下说拉丁语的西部，另一边则是来自埃及的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统治下的说希腊语的东部。如果汉高祖信守承诺，或者安东尼不那么沉迷于酒精和性爱，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将会彻底改写。然而，当时南亚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公元前1000 ~ 前600年间，位于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国家不断发展，最后成为类似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先进国家。公元前3世纪，这些城市和国家被庞大的孔雀王朝吞并，建成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秦朝很快就会赶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没有像罗马和秦国那样不断壮大，反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逐步分裂。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整个南亚再一次分裂为众多彼此交战的小国。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分裂灭亡有无数种方式，比如战场失利溃败，君主昏庸无道，贵族脱缰失控，百姓暴动叛乱以及政府运作不良。但是保持国家统一只有一个方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汉朝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与其他诸侯达成一项协议：将他“国家领土”的2/3分别赏赐给10个诸侯，作为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存在，从而结束内战。汉高祖深知，为了防止新的内战发生，国家需要根除这些诸侯的威胁。如果下手过快，惊动了这些诸侯的话，可能会引发帝国原本想要阻止的战争。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会导致这些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然而，汉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几次突发的叛乱活动，彻底解除了来自诸侯的威胁。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汉朝皇帝们显然要收敛得多，但他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面。例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时，也有众多兵马俑随葬（数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只有其1/3）。尽管汉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样，坚信自己是连接人间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伟大的征服者汉武帝之外，汉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称自己长生不死或君权神授。

他们小心谨慎地维持统治。皇帝们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需要抛弃皇家信仰（尽管也可以采取比较实际的做法，即把贵族的财富与宫廷自身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安抚士绅学者，就需要将皇位纳入一个理想化的儒家等级制度模型（在此也有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做法，就是把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认知程度作为入仕的考量标准，而非凭借贵族关

系网络）。而在广阔的乡间，维持皇家的权威需要运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轴心时代，皇帝曾经充当世人和祖先、神灵之间的桥梁角色，现在他们要将这种角色与更加现实的措施相结合，诸如减少赋役、缓和严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种妥协带来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并逐渐将东方核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东方核心的统治者们称之为中国（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国”）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为在他们看来，边境线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至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东方核心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的意义，并且由于近代西方人的发音错误，将“秦”（Qin）读做“China”，因此西方开始用“China”来称呼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东方核心已经开始向中华民族演变。

罗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妥协。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结束，胜利者奥古斯都遣散了征召来的士兵，派遣职业军人驻守边防。和汉朝的皇帝一样，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中国统治者用犯人和外国人补充军队，意图将其驱逐出主流社会；而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定将军队安置在较近的范围内，将军队改造成核心社会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战争成了专业人士的专利，其他人都转投和平之路。像中国一样，罗马吞并了其他的附庸国，并将贵族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皇帝们如履薄冰，步步谨慎：对待贵族阶层时表现出高不可攀的气势，处理军队问题时要扮演他们的最高统帅，与那些将统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众接触时又要变得神圣庄严。他们运用一种“死后上帝”的策略来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协办法。这种理论声称，皇帝们在死前都只不过是杰出的人类，死后方被拥入神性的怀抱。有些皇帝认为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例如维斯帕先。他在弥留之际还与朝臣戏谑道：“我想我正在变成神。”

在公元1世纪以前，一种希腊罗马式的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当时的富人们可以在约旦到莱茵河区间内的城市游历：他们在风景似曾相识的城市停留，用几乎相同的金制餐具吃饭，观看相似的希腊悲剧，用巧妙的方法间接提及荷马和维吉尔，四处寻觅对其良好教养表示欣赏的志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来越多地得到长老院的认同，本地权贵篆刻碑文时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甚至连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也开始认同自己是罗马人。

这种妥协平息了抵抗行为。在这一点上，当属1979年的喜剧《布莱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总结得最为全面。雷吉（由约翰·克立斯扮演）是犹太人民阵线的主席，当时的追随者大多对革命毫无热情，因此他试图激起他们内心对罗马统治的反抗怒火，结果却发现他们更倾向于谈论罗马帝国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罗马帝国的著名问题：“那么好吧。除了环境卫生以外，医药、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愤怒、净水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罗马人

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些自由的捍卫者沉思片刻，随后有一人试探性地举起手说：“他们还带来了和平？”雷吉被这个愚蠢至极的回答惊呆了，回复说：“哦，和平……你闭嘴！”

雷吉并未意识到：和平改变了一切，和平带来了横贯欧亚大陆两端的繁荣富强。两大核心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据我们统计——社会总产量、每单位土地的产量或每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农业产出呈上升趋势。汉朝和罗马的律法不仅为地主的财产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对待农民的财产也一视同仁。各阶层的农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们致力于扩大灌溉面积，改进排水系统，购买奴隶或者雇佣劳动力，并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进的工具。埃及相关史料表明，罗马时代的农民每播种1磅种子就能收获10磅小麦，这对尚未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农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项傲人的成绩。虽然尚无任何中国农业的相关记录，但是在农业手册中保留下来的农业发现和农业记录表明，中国当时的农业产出也相当高，尤其是在黄河流域。

就这样，农民和工匠将能量获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当时贵族撰写并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却鲜少提及这些，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保持沉默。事实上，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来自动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当时的人类已经发现四种潜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气、水力和风力。

前面两种能源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当时中国有一小部分铁匠将煤炭用于铸铁作坊，四川的制盐者用竹管将天然气抽上来，通过燃烧来蒸发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后两种能源的发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纪，罗马和中国都发明了水车，为磨坊提供动力研磨谷物，以及加热熔炉。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当属公元100年后建于法国巴贝格地区的水车，它拥有16个互相连接的轮子，可以产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于100头公牛（或者两辆全速行驶的福特T型车）所产生的能量。这种水车轮子大多较小，但是一个普通的罗马磨坊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10个壮年男子用脚踩轮子产生的能量。

然而，风力和水力的广泛使用并非来源于新型水车，而是来自对旧航海技术的革新。除非能够找到将生产出来的数千吨小麦、数百万加仑[3]酒和几十亿颗铁钉运送到潜在买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则根本没有人会生产这些东西。因此，规模更大、条件更好且价格低廉的船运（以及港口、运河）几乎和耕地、水车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贸易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

图6-2很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西方发展状况，将不断增长的海难船只数量和2005年针对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沉积物调查研究中记录的铅污染水平对比。（之所以调查海难船只，是因为缺少现存的关于古代船运的书面记录，因此——除非随着时间推移，船长们莫名其妙地变得笨拙，因而经常在驾驶船只时发生触礁事故——海难船只数量最能体现出当时船运发展的程度；之所以调查铅污染水平，是因为作为银加工业

的衍生物，铅对于地球化学家来说是最容易展开研究的同位素。）图中，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这体现出当时贸易和工业发展的紧密联系（以及对于环境发展来说，古罗马时期绝非黄金时代）。

我们还无法将图6-2与东方发展的相应图表做比较，因为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搜集到可以计量的足够数据。然而现存资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后东方核心的贸易发展相当繁荣，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发展程度高。举例来说，近期一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马帝国当时流通的货币数量大约是汉代的两倍，并且当时罗马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中国富人财产的两倍之多。

这种贸易发展的差异性很可能与两者不同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在罗马帝国，9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地中海10英里范围内。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方核心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持续性破坏。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完成对整个海岸线地区的征服之后，罗马帝国立即终结了这种破坏行为。当时的地中海已经构建起四通八达且价格低廉的水路运输系统，得益于此，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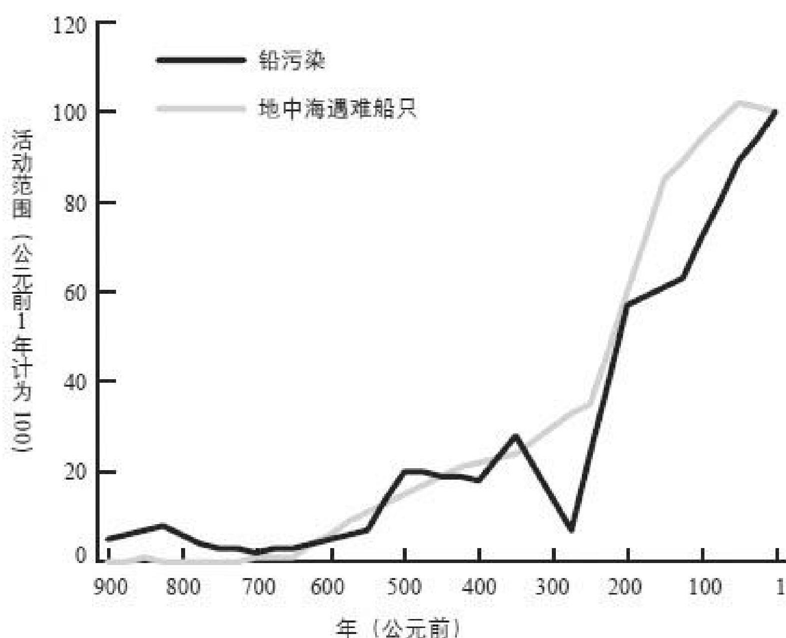


图6-2 商品和服务：地中海海难船只数量和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铅污染水平的平行增长趋势。沉船数量以及铅含量已经做过标准化处理，因此能够在同一纵坐标上对两者进行比较，公元前1年两者数量均计为100

然而，对于汉朝来说，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随时保持畅通无阻。罗马的军事扩张保证了一个新经济疆界的稳定发展，那里的农民能够将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在

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后再卖出农作物，满足意大利和希腊城市的粮食供应。然而秦朝和汉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样的水运通道，因此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一些汉朝皇帝通过疏浚黄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运河绕开难行区域等手段，试图提升中国的交通运输水平，但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也就一直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

在东西方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两股相似的力量，分别起着拉动和推动作用。所谓拉动作用就是指国家的发展壮大。罗马和汉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广泛征税，并将多数税收收入用于扩充边防军队（当时罗马大约拥有35万军队，中国拥有至少20万军队）和建设庞大的都城（罗马都城大约有100万居民，而汉代都城长安大约拥有50万居民）。东西方核心都需要将食物、商品和钱财从富裕、纳税的地区运送到穷困、消耗国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奥山（也称“碎陶片之山”）是位于罗马郊区的一个遗址，它充分展现了西方这股拉动力影响范围之广。和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这座仅有150英尺高、杂草丛生且到处散布着破损陶片的土堆实在是相形见绌，但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就是建造于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长达3个世纪的岁月里，共有2500万个储藏罐被丢弃至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罐子大多用于储藏橄榄油——共两亿加仑的橄榄油——并将其从西班牙运至罗马，那里的城镇居民将橄榄油广泛应用于烹饪、沐浴[4]以及燃烧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奥山上，你会深切体会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几乎无所不能，从而心怀敬畏。而这不过是罗马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个。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动作用，其运作原理大致与气候变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冷，使得落后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引发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扩张运动。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续性的地球轨道变更带来了气候学家口中的“罗马暖期”。冬季风不断减弱——对于地中海和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农民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从先前的全球变冷趋势中孕育而生的先进国家来说，东西方社会已经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不仅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够进一步对气候变化加以利用。尽管世事艰难，但逆境也加速了人类的多元化进程和开拓创新的步伐。人们重新开始使用水车和煤炭，并且通过船运将货物送往各地，从而发掘当地的独特发展优势。先进国家为贸易发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运活动的利润，还提供了军队支持和法律条款，以确保利润的安全性。它们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称：富人应该支付更多税款。

高端国家还将统治范围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扩展到受暖期影响而更加多产的地区——例如西部的法国、罗马尼亚和多雨的英格兰，以及东部的中国东北、朝鲜和中亚地区。尽管他们自身并未意识到，但实际上东西方的皇帝们选择两面下注，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对温暖地区造成了一定损害，但同时也为寒冷地区带来了诸多效益。在罗马，商人们依托地中海将商品运往各地，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而在中国，大河往往不如地中

海便捷通畅，因此利润也相对较少。但就整体来说，东西方贸易发展程度相差并不大。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历经各种战争、奴役和屠杀，孕育出一个富足的时代，也酝酿出本章开头提到的民众的过分乐观情绪。尽管富裕的成果并没有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因为当时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哲学家或者国王的数量，但是当时存活下来的大城市人口已经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居民数量，而且整体来说这些人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拥有更多的财产。

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从事考古挖掘工作，曾经发掘出几处罗马时代的遗址。当时的考古工作相当艰苦，我们需要用镐清理出混凝土（另一项罗马人的发明）浇灌而成的巨型房基，并且必须赶在更多发现堆积如山之前，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记录。之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腊社会，并在1983年展开针对那个时代遗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曾拥有任何物品，如果能找到一大块生锈的铁板已经算是大发现了。与更早期的人类相比，罗马人可以说是身处消费天堂。公元前800年左右，罗马帝国西部的人均消耗仅仅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六七百年之后人均消耗量增长超过了50%。

当时的东方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尽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数据还不够充分。如果依据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么当时生活在东西方核心的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有一半幼儿不足5岁就夭折，几乎没有人能活过50岁，长期饮食不良使得古人比现代人身高足足矮了6英寸——但是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当时可以算是黄金时代。因此，古代国家到处遍布“邦葛罗斯”式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抗击匈奴与东西方的交流

然而，这些“邦葛罗斯”并未意识到，核心内部加速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国界线以外的世界。当帝国强盛时，统治者可以把他的意志肆意强加于边境线上的居民，以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和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为例，他们都将中亚的大片草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当帝国衰微时，游牧民族就会进行反击。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们纷纷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新的国家，但都无法与他们伟大祖先建造的强大国家相提并论。而塞西亚人很快入侵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北部，另一群来自中亚的帕提亚人也开始向伊朗渗透。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向马其顿王国发起猛烈攻势，最终导致马其顿王国灭亡，而帕提亚人却从中渔翁得利。

帕提亚人与之前深入西方核心的游牧民族有所区别。当时的游牧民

族——例如塞西亚人——都是通过掠夺或者向农耕国家勒索保护费获取财富，他们基本等同于强盗，而且对于征服先进国家以及管理自身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毫无兴趣。相反，帕提亚的骑手们只能被称为半游牧民族，他们来自中亚大草原的边缘地区，而非大草原贫瘠的腹地，他们世代与农耕者毗邻而居，他们的统治者深谙如何从备受压迫的农民手中榨取税收，同时竭力维持其军事权力所依附的“马背上的传统”。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之前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松散统一的落后国家。

帕提亚王室喜欢以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后裔自居，并竭尽全力去适应西方的先进文化，但事实上，他们的国家一直停留在松散统一的落后形态。尽管曾经给罗马帝国带来短暂而猛烈的冲击——当时的罗马人已然忘却游牧民族骑兵的巨大威力——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威胁罗马帝国的存在。帕提亚的骑兵以“回马射”闻名于世，即指骑兵佯装退却，随后返身向追捕者发射弓箭。凭借类似的战术，帕提亚骑兵于公元前53年向罗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导致这支军队全军覆没，甚至杀死了罗马大将军克拉苏。帕提亚国王对西方文化极其推崇，在他的手下呈上克拉苏的人头时，他还在观赏希腊的悲剧，他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理解戏剧对话所表现的主人公的宿命悲剧。

与东方核心的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相比，西方核心的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人之间的争端显然相形见绌。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非但没有对游牧民族产生胁迫效果，反而激起了大草原上的一场政治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得长期争斗不止的匈奴部落统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国家。和帕提亚人不同，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没有向农民征税，以支撑日益完备的贵族体系，相反，他展开了对中原的疯狂掠夺，并用抢夺来的丝绸和美酒买通不断减少的游牧首领，让他们对其效忠，从而建立了极端落后的国家。

冒顿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公元前209年，冒顿接管了匈奴部落，在接下来的9年中，利用中原的内乱肆意洗劫。汉代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决定结束这种局面，他在公元前200年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直入大草原。这一行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对游牧民族发动战争与王位争夺战截然不同。面对汉朝的强劲攻势，匈奴人采取暂时撤退的战略，把汉朝军队留在荒野之中忍饥挨饿，然后冒顿伺机发动突袭，而当时汉朝士兵中有1/3已经冻掉了手指，再也无力迎战。汉高祖勉强得以全身而退，多数士兵却未能逃过一劫。

汉高祖终于意识到，和匈奴士兵相比，汉朝的军队损耗严重、兵将反应迟缓并且不擅长先发制人，因此他提出了第四种战略：与冒顿和亲。于是，汉高祖将他的长公主许配给冒顿，命令她即刻起程离开长安。这位公主被迫放弃原本优渥的生活条件——经过打磨的精致石板房以及珍珠镶嵌的精美床罩[5]，匆匆赶往大草原，在毡帐里凄凉地度过余生。1000年后，仍有中国诗人为这位汉朝公主赋诗，感慨她孤苦伶仃，

被迫与野蛮粗鄙的牧民为伍的无尽悲戚。

这次皇家联姻开创了中国学者所说的“和亲政策”。除了和亲以外，汉高祖每年将大量黄金和丝绸赏赐给冒顿。然而，封赏并非长久之计。匈奴越发贪得无厌、索取无度，随后开始在各地肆意掠夺。他们深信，只要破坏的成本低于开战的成本，汉朝的皇帝们就不会贸然战争。

这种和亲政策持续了60年，汉朝国库日渐空虚。公元前130年之后，汉朝皇室愤而停止和亲政策。一些官员对公元前200年发生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提出对匈奴采取忍耐放纵的政策；另一些官员则强烈要求向匈奴开战，血债血偿。公元前135年，在一向持保守态度的皇太后逝世后，年轻的汉武帝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间，汉武帝每年派遣数十万精锐部队讨伐匈奴，但每次都铩羽而归，仅存半数残兵败将。战争消耗了巨额的人力和物力，于是汉武帝的批评者，即那些撰写史书的鸿儒们总结说：“这场由汉武帝率先发动的战争无疑是一场灾难。”

但是，如同400年前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对塞西亚人发动战争一样（也被史学家认为是失败的战争），汉武帝发动的战争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失去了汉朝的封赏，也无法将洗劫来的财富分给部下，匈奴统治者控制下的牧地不断受到威胁，游牧民族联盟最终解体，匈奴内部爆发动乱。公元前51年，匈奴承认汉朝统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匈奴分裂成两个部落，一个部落退居北方，另一个部落在汉朝内部定居下来。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都取得了对游牧民族的主动权。汉朝皇帝采取“以夷制夷”政策，赐予南匈奴稳定的居住地（以及长期的封赏），换取他们对其他游牧民族作战。由于受到森林、山脉和东欧农场的保护，罗马得以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他们只需要面对来自帕提亚（半）游牧民族的威胁。即便如此，罗马人在迎战帕提亚人时，仍然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和运河边作为战场，而非游牧民族占据优势的草原。只要罗马皇帝对战事加以足够的重视，罗马军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攻破帕提亚人的顽强抵抗。

尽管如此，在罗马东部和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战争并未真正平息。公元114年，罗马人将帕提亚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对整个西方核心地区的控制权，但在公元117年，他们只能再次放弃这片“河流之间的土地”（意指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2世纪，罗马人曾经四次意欲夺取美索不达米亚，但每次都被迫放弃。对于罗马人来说，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物产富饶，但毕竟地处遥远，难以驾驭。相反，汉朝统治者将匈奴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得汉朝版图上的边境线逐步转变成一块流动的边境区域。在这片北方荒野上，人员得以自由流动，政府也极少插手干预。由此可见，强大的军事威慑作用远胜于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款。

游牧民族和农耕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理状况，甚至导致整个世界范围缩小。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出现了大片由乌克兰向蒙古延伸的共享物质文化地区。通过这片区域的开放，商人和士兵不断流动，沿途传播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和武器。然而，在东西方之间航行着的最重要的“货轮”是无法用肉眼辨别出来的。

数千年间，随着旧世界农民不断在村庄聚居，逐渐出现了一群讨厌的病原体，它们大多具有高度传染性，相当一部分病原体具有致命性。由于吸入污浊的空气或者饮用受污染的水源，许多人染上瘟疫，并且交叉感染，导致疫病迅速蔓延。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并未感染疫病，由此证明这些人本身具有抗体，能够抵抗疫病侵袭。在1000年间，这些自带抗体的人群通过基因库将自身的防御力延续下去。尽管随机突变仍然可以将休眠的疾病转化为致命杀手，如野火燎原般肆虐人间，但随后宿主和病毒会自发构建起一种新的平衡，使得两者都能存活下来。

如果暴露在一群从未接触过的细菌中，人类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来抵挡这群静默的杀手。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由著名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命名的“哥伦布大交换”，它始于1492年，当时欧洲对新世界展开了一系列可怖的征服活动。完全分隔开来的病毒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发展变化。美洲本土也存在着可怕的疾病，比如梅毒，但是美洲本土疾病相对来说症状轻微、感染范围较小，完全无法与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相提并论。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在欧洲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诸如麻疹、脑膜炎、天花、伤寒等疾病——此类疾病数不胜数——就开始入侵他们的身体，摧毁他们的健康细胞，病人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哥伦布大交换至少将新世界3/4的人口从地球上抹去。一位16世纪的法国人总结说：“这一切灾难似乎是上帝的意愿，他希望（美洲本土居民）将土地拱手让与新来的殖民者。”

一个类似的“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在公元2世纪孕育而生，但分布更加均衡。在农业发展初始阶段的几千年间，西方、南亚和东方核心分别酝酿着各自特有的致命疾病组合。自公元前200年起，这些疾病仿佛处于不同的星球，发展趋势大相径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牧民在不同核心之间自由流动，不同的病毒逐渐合并，并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和阴霾。

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161～162年间，西北边境有一支军队正在与游牧民族对峙，但是军中突然发生神秘的瘟疫，大约1/3的士兵因此丧命。公元165年，同样有史料记载某个军营发生了类似的疫病。罗马史料也描述了罗马与帕提亚人战斗期间一个军事基地发生的瘟疫，而这个基地与中国的瘟疫发生地相隔4000英里。公元171～185年之间，中国接连发生了5次瘟疫，同一时期的罗马也遭受了几乎同样多的瘟疫肆虐。根据现存的详细记录，疫病在埃及夺去了超过1/4的生命。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古代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因为病毒在过去的2000年中不断发展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记录者在描述疾病时含糊其辞。现代社会中，作家们可以买到诸如《电影剧本创作入门》（*Screenwriting for Dummies*）这类书籍，随后套用书中公式，就能够制作出一部电影或电视节目。同样，古代的作家们也深知任何一本优秀的史书都需要包含关于政治、战争和瘟疫的相关内容。就像现代人观看电影一样，古代的读者们对这些情节发展有着很强的敏感性。作家在描述瘟疫时，必须涉及瘟疫来临前的征兆、发生时阴森可怖的症状和令人惊愕的死亡率、腐烂的尸体、崩坏的法治、心碎的寡妇、凄惨的父母及儿女。

如果想要描写瘟疫蔓延的惨状，最容易的方法是提取另一段史料并替换其中的人名。关于这一点，西方的原型出自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左右侵袭雅典的一场瘟疫的目击实录。尽管修昔底德的相关叙述并不清晰，但是2006年的一项DNA研究证实那是伤寒症的一种。在其后1000年间，其他史学家公开地反复引用这一描述，而且他们关于疫病的描述全都含糊不清。

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疑云，印度相关记录表明，公元2世纪的印度未发生任何瘟疫，这就与罗马和中国的史料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对数百万贫苦百姓的生死漠不关心，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瘟疫的确绕过了印度。这也说明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和大草原，而非通过印度洋的贸易航线，这也和瘟疫始于中国和罗马、始于边境线上的军营之中的事实一致。

不论微生物交换的机制如何，在公元180年后几乎每一代都要重演可怕的瘟疫。在西方，最严重的时期是公元251～266年，当时罗马城中每年有5000人丧生；在东方，最暗无天日的年代是公元310～322年期间，（根据史料记载）疫病又在西北部地区肆虐，几乎无人幸免于难。一名从瘟疫中幸存的大夫将瘟疫描述为类似麻疹或天花等疾病：

> 近来有许多人遭受传染性肿胀的折磨，这种肿胀开始于头部、面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后，这种肿胀蔓延到全身各处，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体的疮。当这些脓包干透之后，又出现了新生的脓包。如果病人早期没有得到治疗的话，通常会死亡。即便康复也会留下丑陋的紫色伤疤。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萎缩，贸易衰退，税收锐减，土地荒废。祸不单行，当时一切迹象——泥炭沼泽、湖泊沉积物、冰芯、树木年轮、珊瑚中的锶钙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学物质——都显示罗马暖期就此结束，气候开始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间，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2华氏度。另外，气候学家所说的“黑

暗时代寒冷期”导致夏天更加凉爽，减少了海洋的水汽蒸发，季风和降雨也随之减弱。

在其他条件之下，日益繁荣的东西方两大核心也许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像公元前2世纪罗马暖期开始时一样。但是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气候变化——第四章重点描述的天启五骑士中的两名——并驾齐驱，共同作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三骑士，即饥荒、移民及亡国是否会加入这一行列？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准备如何应对。

王莽、董卓和曹操：天命已尽的汉朝

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各自的特定问题。它们学会了如何打败对手，如何用简单的技巧统治广袤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如何将富裕地区的粮食和财富转移到边境线上的军队以及大城市中去。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解决问题时方法大同小异，但正是这些区别决定了它们如何应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挑战。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军队问题。公元前120年之后，为了抵抗匈奴的不断入侵，汉朝建立了庞大的骑兵队伍，并且越来越多地雇佣来自游牧民族的骑兵。公元1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将“以夷制夷”的政策运用得得心应手，使得许多牧民在汉朝境内定居下来。这带来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汉朝统治者减少了对边境的匈奴士兵的监督管理，使边境军事化，另一方面将境内非军事化。在中国腹地，人们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军队驻扎，雇佣军更是少见。中国的贵族阶层认为服兵役毫无意义，因为来自“蛮夷之地”的官员都驻扎在远离都城之地，而这些来自远方的外国人替汉朝打仗。

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这个政策有积极的一面，原本强大的贵族再也无力调遣军队，无法组织叛变。但这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因为统治者不再拥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制衡那些事实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的贵族。随着国家的军事垄断地位不断削弱，贵族们开始任意欺压当地农民，吞并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并把那里作为私有封地进行地主式管理。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财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远，而地主却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财富落入当地地主手中，只有少数作为税收送去长安。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汉朝统治者们对贵族建造府邸的规模以及拥有的农民数量进行限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自由民（且可征税的）小农，并通过国家对铁、盐、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积累资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称帝，宣布土地国有，废除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并宣称从此以后只有国家才能占有黄金，这一事件加剧了统治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王莽的集权很快瓦解，但是此后农民起义剧烈地撼动着整个国家。公元30年后，当汉朝重整秩序时，统治者的政策已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够攀上权力顶峰并非依靠旧皇室的裙带关系。为了恢复汉室的权威，光武帝必须与手下的巨贾富商紧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由此开创了地主们的黄金时代。逐渐的，地主们变得和皇帝一样富有，统领着数以千计的农民，事实上这些贵族几乎无视国家权威和那些讨厌的收税人员。之前的汉朝皇帝将构成威胁的地主迁入长安，这样就可以时刻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光武帝坚决要求迁都洛阳，而洛阳恰好是地主们最强势力的据点，在那里贵族形成了对皇室的监视。[6]

这个精英阶层开始掌控国家权力，并逐渐摆脱国家巨大的财政开销——军队。到公元1世纪后期，匈奴已经无法构成主要威胁，这就意味着为抗击匈奴而集结起来的庞大骑兵军团必须自生自灭，骑兵要生存就必须去掠夺他们曾经保护过的农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论上的附属地区——已经基本独立。

面对羌族——大致是当时中国西部边境所有的农牧民——造成的新威胁，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说重整军队。也许是得益于罗马暖期温和的气候，羌族人口接连几代迅速增长，并且一些小团体已经迁入中国的西部地区。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占领土地；如果条件不允许，他们就发动战争，四处偷窃。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汉朝需要建立起一支卫戍部队，而不是游牧民族骑兵，但是洛阳的地主们并不想为此埋单。

一些官员建议放弃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灭，另一些官员则担心这将引发多米诺效应。一位朝臣据理力争："如果失去凉州地区，那么三个附属国将会成为边境。如果这些附属国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弘农将会成为边境。如果弘农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洛阳将成为边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会到达东海边，这样一来东海就成了边境。"

汉朝政府最终被这种说法说服，决定维持原来的路线，花钱筹建军队，但是渗透仍在继续。公元94年和公元108年，羌族军队两次占领了西部省份的大部分地区。自公元110年开始，羌族不断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样摆脱了洛阳统治阶级的统治。当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御体系，将附庸的农民转变成民兵，那些受国家派遣又被国家遗忘的地方官员们也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他们在任职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来支付军队费用）。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朝天命已尽。公元145年相继发生了三次分散的起义，要求建立新政权。然而对于拥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阶层来说，这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汉朝版图缩小，税收锐减，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们的土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饶多产。同时，战火纷飞的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当地税收，战争阴云对他们来说也只是遥远的传闻。在他们眼中，似乎万物都

找到了最完美的归宿。

公元2世纪60年代，第一次东西方交流踏上中国土地，此后中国的“邦葛罗斯”以一种粗暴的形式觉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汉朝统治核心地区推进，进而席卷各地。汉朝非但没能力挽狂澜，反而爆发了内乱。

理论上来说，在洛阳任职的官吏有数百人，他们原本应该将皇帝的意愿转变为现实，但实际上（就像很多朝代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却干着以权谋私的勾当。这些官僚中有许多人来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们厌恶的事情时（比如为战争筹集资金等），他们通常都擅长寻找借口来逃避。但凡有些主见的皇帝都要学会与之周旋，一些皇帝开始任用皇亲国戚，尤其是众多嫔妃的亲戚；另一些皇帝转向宦官寻求帮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备的优势。精明的皇帝会将两者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并希望皇帝不要过于精明。公元88年后，由于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为，14岁以上的皇子们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沦为围绕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开的阴谋。

公元168年，当时正处在汉朝最需要领袖人物的紧要关头，然而年仅12岁的汉灵帝登基后不久，宦官就发动了反对外戚的政变。此后大约20年间，伴随着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断侵扰，宫廷却沉溺于清洗和反清洗的内部矛盾之中，夺走了数千人的性命，并导致整个宫廷机构瘫痪。宫廷的腐败无能此时攀至顶峰。不公平的现实引发了人民的叛乱，但是灵帝却无力集结和指挥军队，只能任命各地的铁腕人物组织军队，尽可能维持其统治。

国家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这是百姓无法理解的，而儒家礼仪和道教神秘主义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于是一群自称先知的人填补了空白。在黄河流域，一位内科医师宣扬罪恶导致疫病、忏悔带来健康，从而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公元2世纪70年代，他进一步总结说，这个朝代本身是罪恶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终根源，因此必须推翻它。他宣称：“当一个新的甲子开始，伟大的命运将会降临世界。”

但是伟大的命运并没有到来。相反，当日历翻到下一个甲子年，即公元184年的4月3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支持汉朝的军队镇压了叛乱（也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是指叛乱者头上所戴的头巾，黄色则是新时代的象征），但是类似的起义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现他的不满，黄河大规模泛滥，36.5万名农民流离失所。“五斗米道”运动（承诺人们只要忏悔自身罪过并献出五斗米，即可免受瘟疫）将四川变成独立的道教神权统治地区；羌族则利用了这场骚乱，再次洗劫中国西部地区；原本代表皇帝镇压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别指挥官变成独立的诸侯。当朝廷终于决定展开行动时，却事与愿违，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汉灵帝想召势力最强的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却回复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汉族军队和蛮夷军队都对我说：'如果你走了，我们的供给将被切断，我们的妻儿将会死于饥寒。'所以他们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让我离开。"在汉灵帝一再坚持下，董卓最终听从君命来到洛阳，但也带来了他的军队。就在董卓赶到洛阳之前，汉灵帝驾崩，外戚（拥立13岁的皇子为继承人）与宦官（拥立8岁的皇子为继承人）正式对立，两股势力互相杀戮。

董卓借机攻入洛阳，杀尽宦官，谋杀了较为年长的皇子，拥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称汉献帝。随后，董卓火烧洛阳，并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天下的统治权已然不在汉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属于董卓，因为当皇帝作为管理者的高级权力失效后，他们那含糊、天授的低级权力仍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汉献帝还活着，就没有人胆敢宣称自己是皇帝，也没有人敢谋杀幼帝。（诸侯争斗是无比残酷的，董卓于公元192年遇刺身亡。）权力掮客们不断上演着争权夺利的戏码，将汉献帝视作傀儡，整个国家分裂成数个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曾经坚不可摧的汉朝高级管理机构已然烟消云散。

公元197年后，曹操写下了《蒿里行》这首诗。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曹操一直抑制着这股悲愤之情，直至俘获汉献帝，随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

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恢复汉室，将自己打造成英明辅臣，名垂青史。但是他亲眼目睹诸侯对国家造成的破坏，因此他将士兵驻扎在领地，一些人从事耕种，另一些接受战争训练，以此解决军事问题，并且将乡绅阶层分为九个等级，根据精英领导制度决定各自的地位，以此解决政治问题。和一千年前亚述王国的提格拉·帕拉萨一样，曹操并不重视富商巨贾。这样看来，曹操似乎极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然而公元208年，曹操的水军在赤壁之战中毁于一旦，这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尽管曹操有不少功绩，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公元14世纪的鸿篇巨制《三国演义》）却被后世看作颠覆汉朝的恶魔。20世纪的京剧表演中，曹操脸谱为粉白色，眼睛描有黑线，是众人鄙弃的反面角色。到了20世纪90年代，曹操的形象添加了几分高科技色彩，跃入电脑屏幕中，摇身一变成为无数电脑游戏中的恶人。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曹操又进入了电视屏幕。随后曹操进入电影荧幕，出现在亚洲人出资拍摄、时至当日造价最昂贵的电影中（《赤壁之战》耗资8000万美元，该电影上部的上映时间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合）。

曹操之所以臭名昭著，更多是因为他死后所发生的事情，而非他自身犯下的罪行。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公元220年后，曹操的长子曹丕迫使汉献帝退位，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曹氏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强大的。公元263年，曹魏打败了其中一个对手，曹魏被司马家族取代后称晋朝[7]，公元280年，其又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舰队，灭掉了吴国，成功统一天下。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后汉的瓦解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短暂的反常现象，也许可以和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发生在西方核心的事件比较。当时气候变化、移民和饥荒三个因素导致国家灭亡，但是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事实上汉朝衰亡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衰落极其相似，并带来巨大的长期后果。

战场上的胜利本身能够消灭其他幸存的诸侯，但是它无法改变中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贵族阶层一如既往的强大，很快破坏了曹操的军事领地和精英领导制度。瘟疫仍在蔓延，“黑暗时代寒冷期”不仅使得黄河流域的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对匈奴和羌族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公元265～287年，25万中亚人口在西晋境内定居。有时候，西晋对移民带来的劳动力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时候，政府无法很好地安置这些移民。

在这一点上，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影响力，例如皇帝的感情生活。晋武帝共生育了27名皇子，当他于公元290年去世后，一些皇子雇佣了他们能找到的最野蛮的游牧民族士兵，用于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士兵也并不傻，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必满足于已支付的酬劳，他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公元304年，一个匈奴首领没有拿到理想的酬劳，于是宣称要建立新国家取而代之，导致矛盾进一步升温。之后，西晋没有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因此他的儿子在公元311年将洛阳城付之一炬，亵渎了西晋王室的祖坟，将晋怀帝囚禁起来，命令他在晚宴时倒酒。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获得的战利品与他们本身的价值不符，于是匈奴在公元316年将长安城夷为平地，并且捕获了晋愍帝，让这个阶下囚负责洗杯子和倒酒。几个月后，匈奴人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杀死了愍帝及所有皇亲国戚。

西晋由此灭亡。匈奴和羌族的军团继续在中国北方地区肆意洗劫，西晋朝廷置百万百姓于不顾，逃至长江边的建康（现在的南京），放弃

了中国北方这片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地区。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随着瘟疫袭击该地区）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双重影响，许多北方土地已经退化成荒漠。这一现实正好符合了从草原地区迁入的游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对于留下来的农耕团体来说，这意味着再次的饥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气的年代，当地乡绅或者国家可能已经介入并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灾吞噬了村民们勉强生产出来的少数作物。随后，草原移民带来的新型瘟疫给日渐困窘的农耕者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长安被焚后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现在中国境内。

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领发起更多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更像是大规模的奴隶抢夺运动，而非国家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们每次召集上万个农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围，命令奴隶们开垦土地来供给专门的骑兵军队。同时，骑兵们从草原引进新式武器，例如合适的鞍具、马镫，以及高大的马匹，这实际上淘汰了步兵部队。那些没有逃往南方的汉人贵族只得迁往山区，他们的附庸农纷纷涌入巨大的围栏之中，因为那里是躲避骑兵劫掠的唯一场所。

当时，中国北方新建立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称其为“五胡十六国”）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过激的种族清洗政策，导致汉人大肆屠杀中亚人，引发国家内乱。官方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超过20万，尸体堆积如山，远至城墙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这场内乱最后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地区，导致其他国家首领蜂拥而至。到公元383年时，出现了另一个诸侯，他似乎有能力统一中国。但是当他围攻建康时，一个很明显的小失误最终演变成惊慌失措的大溃败。公元385年，他的国家也不复存在。

从长安逃离出来的人们向南方迁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8]。与中国北方的强盗国家不同，东晋拥有奢华的宫廷，并保持汉室皇族一贯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创造出卓越的文学和艺术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朝代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

但在表面的光鲜背后，东晋帝国也和北方国家一样四分五裂。北方贵族逃亡南方后，对于遵从皇帝命令毫无兴趣。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为趋炎附势的寄生虫，依附皇室朝廷为生。另一些拓殖长江流域，并在这片炎热湿润的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本土居民驱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的水，让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在此定居。

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酝酿蔓延。从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贵族与南方旧贵族长期不合，各个派别的贵族共同打击中层富裕阶级，富裕的中层精英阶级压榨农民阶级，各阶层的汉人将本土居民驱赶至山区和丛林，每个人都在反抗危机四伏的建康朝廷。尽管写就了许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诗歌，逃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并不急于交税或是臣服于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势力。晋朝天命已尽。

罗马帝国与汉朝统治的不同之处

和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不同，由东西方交流引发的危机影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当时西方出现了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编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说，该书的主题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直至今日（18世纪70年代）仍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吉本是正确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会发展重新攀上了罗马帝国时期达到的高度。

罗马帝国和汉朝皇帝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运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的统治者恐惧内战，于是将军队中立化，导致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地主阶级；相反，罗马帝国统治者接管了军队，并将他们的亲属任命为军队首领，并用平民补充军队。这种做法导致平民很难反抗皇帝的意志，但对于士兵来说却正好相反。

这种体系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许多罗马统治者都有神志失常的倾向，周期性的冲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纵欲放荡，甚至让他的马成为执政官，这已经够荒唐了；而尼禄竟然强迫元老院议员当众唱歌，甚至杀害胆敢违抗他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68年，军队中三个不同派别分别宣称他们的首领为皇帝，最终一场残酷的内战平息了事端。史学家塔西佗记录说：“现在，帝国的秘密被揭开——皇帝可以在罗马之外产生。”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罗马采取的办法的确保卫了边疆地区。在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羌族人一样人口迅速增长。此后，部落之间互相争斗，与罗马的城镇开展贸易，并悄然经由河道进入帝国内部。为了完成这些事情，他们必须组织起更大的团体，推选出强势的首领。为了应对边境日渐松懈的问题，罗马帝国和汉朝一样建造起长城（最著名的是横贯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监督贸易，并且反击入侵活动。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成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似乎还处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而且马可·奥勒留对哲学充满热情。然而，他必须面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众多问题。在他即位当年，第一次严重的瘟疫在中国西北边境的军营爆发；来自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入侵罗马，迫使马可·奥勒留纠集军队来应对威胁。拥挤不堪的军营为疫病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于是在公元165年爆发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记载都含糊不清），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伴随着遥远北部和西部发生的人口变动，强大的日耳曼帝国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罗马。马可·奥勒留用他的余生——13年——与入侵者抗衡。[9]

和中国不同，罗马在公元2世纪取得了边境战争胜利。如果没有获

胜的话，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就会像汉朝一样陷入重重危机。尽管如此，马可·奥勒留的胜利仅仅影响了变革的步伐，而非结果，这也意味着单独靠军队的力量无法阻挡国家灭亡的命运。疫病引发了平民大规模死亡、国家经济崩溃、食品价格和农民工资飞涨。从这个角度看，瘟疫实际上为幸存下来的农民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机遇，他们可以抛弃原本贫瘠低产的土地，聚集在肥沃多产的土地上。但随着农耕范围收缩，税收和租金也随之下降，中国经济大环境进入自由落体阶段。公元200年后，地中海沉船残骸数量锐减。公元250年后冰芯中的污染水平、湖泊沉积物以及沼泽也大幅度减少（见图6-3），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艰苦与匮乏。公元200年后，发掘出来的牛、猪、羊骨骼明显变小、变少，这就表明当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到公元220年左右，富有的城市居民所建造的宏伟建筑与雕塑数量也不断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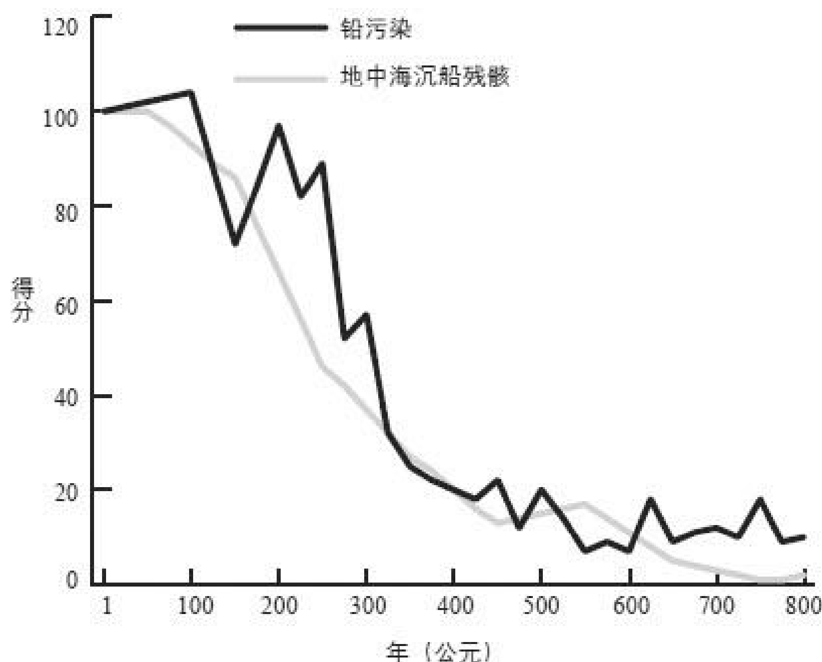


图**6-3** 衰亡与瓦解：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地中海沉船残骸数量以及西班牙佩尼多维洛湖床的铅污染水平。下降曲线与图**6-2**中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上升曲线相对应。和图**6-2**中一样，沉船数量和铅含量已被标准化，因此它们可以在同一纵坐标中进行比较，公元前**1**年两者数量均计为**100**

就在马可·奥勒留取得胜利的50年后，罗马失去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公元前1世纪，虽然汉朝战胜了匈奴，但对汉朝统治者来说，边境地区似乎变得更难驾驭。同样，当时罗马也接连取得胜利，重挫帕提亚军队，使得该政权在公元3世纪20年代波斯入侵前就已经灭亡。然而，新生的萨珊王国建立了更集权、更先进的国家，并在公元244年打败了罗马军队，杀死了领军的罗马皇帝。

大批军队和金钱被用于支撑坍塌的东部防线，导致罗马无力在多瑙河、莱茵河边界严密布防。入侵者没有以小团伙的形式偷越边境、抢夺

牛羊，而是作为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强大军团冲破脆弱的防线，烧杀抢掠，抢夺奴隶。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移民至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沿路掠夺直至希腊，甚至在公元251年打败并杀死另一位罗马皇帝。也许是人口流动的缘故，当时瘟疫爆发变得更为频繁。公元259年，罗马终于召集起一支军队对抗波斯入侵，可是结局更为悲惨：罗马皇帝瓦勒良不仅被俘，还被关进笼子长达一年，身着奴隶的破烂衣服，遭受极端可怕的折磨。罗马人坚称瓦勒良的刚毅不屈最终打动了捉拿者。但事实上，如同匈奴抓获汉朝皇帝一样，波斯人最终对折磨瓦勒良失去了兴趣，于是将他的皮剥下来，挂上城墙。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导致罗马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人口减少、经济停滞不前的紧要关头，罗马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钱和军队。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但并不明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贬值的手段来组建新的军队，结果导致货币价值下降，加速了经济崩溃。军队认识到中央政府的失败无能，于是决定自己掌握政权，很快就宣称新皇帝即位。这些新皇帝与之前的皇帝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完全没有天赋君权的观念。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强硬派军人出身，有些甚至是列兵出身的文盲，因此很少能够在王位上坚持两年以上，所有人最终都死于非命。

由于军队各派别之间忙于内乱而忽略了边境防御，罗马的地方贵族也和中国的地方贵族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将农民变成附庸，并将他们组织成民兵。叙利亚的贸易城市巴尔米拉最终成功地将波斯人驱逐出去，它理论上是代表罗马出战，但是最终该国女王（亲自带领军队并且时常穿戴盔甲参加市民集会）入侵罗马，并占领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在帝国另一端的莱茵河上，一位统治者宣称独立的“高卢王国”诞生，并将高卢（现在的法国）、不列颠和西班牙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公元270年，罗马和公元220年的中国一样分裂成三个王国。尽管四处兵荒马乱，但罗马的情形并没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公元3世纪60年代，巴尔米拉和高卢进攻波斯和日耳曼王国，这为罗马帝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地中海周边的城市——罗马帝国的财政支柱——基本上处于安全状态。只要保证商品能够经由海运送往各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帝国金库，这样一来，军人出身又注重实际的新皇帝就能够养精蓄锐，重建帝国。他们在统治区增加赋税，在佩戴盔甲的步兵周围建立突击队，随后对敌人发动攻击。公元272年，这支军队粉碎了巴尔米拉的入侵；公元274年使高卢覆灭；到公元282年为止，基本铲除日耳曼战团的威胁；公元297年，罗马占领了波斯帝国后宫，为瓦勒良报了一箭之仇。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利用这个转折点，迅速进行行政、财务和国防改革，旨在让罗马帝国更好地应对新世界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得罗马的军队规模差不多翻了一番。边疆地区的动乱几乎从未真正平息，但是当时罗马帝国用纵深防御抵挡日耳曼人的侵袭，又用围困策略拖垮波斯帝国，因此战胜的概率远超过战败的概率。为了

处理这些事务，戴克里先将工作分成四个部分，各派遣一名长官和一名副手处理西部和东部各省事务。不出意料，这些长官引发了两场、三场或四场内战，这几乎和他们抵抗外敌的次数一样多。但如果把这些内战与公元3世纪90年代中国晋朝爆发的27次内战相比，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是相当稳定。

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初步成型。随着西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边境地区的前沿转移，而东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一个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兴大城市转移，罗马已经不再是都城。但最终，任何机构重组都无法解决罗马帝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跨越数世纪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动摇。随着粮食、酒类和橄榄油的贸易开展，财富再次由上至下传播开来，东部地区在公元4世纪走上复兴之路，但是西部地区却逐渐脱离这个轨道。西欧的大地主对公元3世纪时获得的权力紧握不放，将“属于他们的”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并且将他们与国家税收分离。随着他们日渐自给自足，周遭的城市开始缩小，贸易和工业发展更是大幅下滑。而最棘手的问题超出皇帝能力范围之外：气温和降雨持续减少，瘟疫继续横行，草原移民也在持续增加。这些都不是皇帝所能改变的。

公元350年左右，一群匈奴人横跨哈萨克斯坦，向西迁徙，引发了周围各国的一阵动荡。人们一直在争论匈奴人为何能够引发如此多的恐慌。古代文人将其归咎于匈奴人特有的令人恐惧的气质，而现代学者通常归咎于他们使用的具有强大威力的弓弩。在此，我们需要从结果出发，寻求事件的缘由。为了逃避匈奴的威胁，游牧民族纷纷逃入印度、伊朗，或向西撤退至现在的匈牙利。这使得哥特人的生活愈加艰难，因为他们在公元3世纪入侵这个国家——即现在的罗马尼亚——之后就作为农民定居下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哥特人决定向罗马人寻求庇护，要求迁入罗马帝国。

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罗马制定了和汉朝类似的“以夷制夷”政策，原则上认可移民迁徙，并将他们分成小团体，随后征召入伍，或安排在农场定居，抑或作为奴隶买卖。这样不仅减轻了边境压力，提升了军队人数，而且增加了纳税人口。显然，移民们的想法与统治者截然不同，他们更青睐作为小团体在帝国内部定居，并继续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罗马需要时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移民产生威慑作用。

公元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岸边，这令身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部地区的皇帝瓦伦斯左右为难。一方面，迁居至此的哥特人人数过多，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接纳如此多的移民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尤其考虑到当时瓦伦斯最精锐的部队远在波斯作战。于是瓦伦斯决定允许哥特人迁入，但是哥特人刚一过河，那些指挥官们就如脱缰野马般失去了控制，因为比起分散安置移民，他们对牟取暴利更有兴趣。食不果腹的哥特人爆发了动乱，他们洗劫了现在的保加利亚，并要求在帝国内部建立自己的国家。对此，瓦伦斯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其谈判交涉。他让波斯前线的军队撤回并赶往巴尔干半岛。他没有等待西罗马

帝国皇帝支援，而是选择直接开战，尽管这又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公元378年8月，大约1.5万名罗马士兵（其中许多人是日耳曼移民）在阿德里安堡与大约2万哥特人展开激战。结果，包括瓦伦斯在内的2/3罗马士兵在接下来的溃败中战死。回想奥古斯都时代，失去1万军队并不是重大损失，甚至不会留下书面记录，因为当时的罗马有能力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团展开可怕的报复。然而，公元378年的罗马帝国已经日益衰微，这些死去士兵的空缺无人补充。于是哥特人抓住这一时机，顺利侵入罗马帝国。

就这样，两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僵持局面。哥特人不像游牧民族匈奴人，他们不会伺机偷盗一番，随后回到草原；他们也不是波斯人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意图吞并其他地区。哥特人想要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内建立自己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攻城装备，无法对城镇发动进攻，也没有行政机构来管理国民，因此他们需要罗马的合作。当这种期望破灭之后，他们就在巴尔干半岛四处破坏，试图威胁君士坦丁堡同意赐予他们自己的国土。东罗马帝国皇帝没有足够兵力驱赶哥特人，只得以国库空虚作为挡箭牌，收买哥特人，又不时与之发生小冲突。直至公元401年，他说服哥特人继续向更理想的西部迁徙，顺理成章地将哥特人变成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头等难题。

但是这个聪明的外交手段很快失效。公元405年，匈奴人继续向西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逼近罗马边境，导致更多地区沦陷。主要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罗马军团在一名半日耳曼将军带领下，进行着血腥的消耗战；外交官也施展外交手段，试图寻求更多外援。但在公元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冲过了冰封的莱茵河，罗马最终沦陷。自此，再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这些移民分散开来，到处抢掠。诗人西多尼乌斯原本是富裕贵族，他曾经描述了一群士兵冲进他的住宅并向他施加侮辱的情景。他与一位住在罗马的朋友通信时说："为什么要为维纳斯而唱？当我置身于长发的暴民当中，被迫聆听日耳曼演说，卑鄙的勃艮第人将腐臭的黄油涂抹在头发上，而我还要板着脸为他们唱赞歌……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人每天清晨朝你打嗝，散发出累积十天的大蒜和洋葱的恶臭。"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嫉妒西多尼乌斯。另一个目击者用更加直白的文字写道："整个高卢都弥漫着火葬柴堆散发出的浓烟。"

不列颠的军队爆发了起义，开始掌管自己的防御部队。公元407年，莱茵河防线的剩余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地区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引起灾难缠身的西罗马帝国注意，哥特人于公元408年入侵意大利，又在公元410年公开劫掠罗马。公元416年，他们终于得偿夙愿，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意：如果哥特人帮助他赶走日耳曼人并将篡夺者从高卢、西班牙清除，他们就可以获得部分领土。

和中国边境的情况类似，罗马边境也曾经成为蛮夷的（这些帝国以此称呼外族人）聚居地，之后这些人获取国家支付的酬劳，负责保护国

家不受其他蛮族入侵威胁。这对皇帝来说是双输的局面。公元429年，当日耳曼的哥特人（代表罗马而战）在西班牙打败了日耳曼的汪达尔人（反对罗马）时，汪达尔人被迫退至北非。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现今的突尼斯沙漠在当时是罗马的粮食基地，拥有上万平方英里的灌溉耕地，每年向意大利出口50万吨粮食。失去此地供应的粮食，罗马城将会饿殍遍地；没有此地的税收收入，罗马根本无力支付受雇攻打汪达尔人的日耳曼雇佣军费用。

在接下来的10年中，聪明的罗马将领和外交家（通常都是日耳曼人出身）成功遏制了汪达尔人，并稳定了高卢、西班牙地区，但在公元439年，情况急转直下。汪达尔人占领了迦太基的农业腹地，对罗马来说最糟糕的情况终于成了现实。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乐于看到他们在罗马的潜在竞争对手的种种惨状，但是西罗马帝国即将灭亡的悲惨前景也给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敲响了警钟，于是他集结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帮助解放现在的突尼斯地区。然而公元441年，当他的军队集结时，另一个打击从天而降。匈奴王阿提拉——罗马作家称其为“上帝之鞭”——入侵巴尔干半岛，他不仅带领着最勇猛精干的骑兵，还拥有先进的攻城装备。（可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难民将此技术带给他，一名狄奥多西的大使声称，公元449年时他曾在阿提拉的宫廷中见到这样的一个流放者。）

在匈奴攻城槌的猛攻之下，狄奥多西的防御体系简直不堪一击，于是他放弃攻打汪达尔人。他拯救了君士坦丁堡——仅仅如此——但对于罗马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日子。公元400年，罗马城拥有大约80万居民。到了公元450年，人口仅存3/4。税收枯竭，军队消亡，最糟糕的是出现了更多篡夺者意图谋取王位。阿提拉审时度势，在榨干巴尔干所有财富之后，决定继续西进。罗马西部军队的半哥特指挥官成功地使哥特人相信阿提拉也是他们的敌人，他带领的是全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他导致了阿提拉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阿提拉还没来得及展开报复行动就含恨而终：在他第无数次的婚宴上，他因饮酒过量导致血管爆裂，“上帝之鞭”最终去和他的主人见面了。

失去了阿提拉，松散的匈奴国开始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暂时摆脱了危险的境地，于是试图再次收复西罗马帝国，但是直到公元467年，他们才将所有的条件准备妥当，包括金钱、船只以及一位值得信赖的罗马铁腕人士。东罗马帝国皇帝倾尽国库所有，派遣海军上将巴斯里斯克斯（Basiliskos）带领1000艘军舰重夺北非，试图解决西部省份的财政危机。

最终，罗马帝国随风而逝。公元468年夏天，北非沿岸的风原本是西向的，推动巴斯里斯克斯的舰队逼近迦太基。但是就在登岸的最后关头，风向突然逆转，使得舰队无法靠岸。借此机会，汪达尔人放出火船攻击罗马密集排布的舰队，这正是1588年英国对抗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所采用的策略。罗马的旧式船只采用干燥易燃的绳子、木制甲板和布制风

帆，顷刻间舰队就成了炼狱火海。惊慌失措的船员们互相踩踏，争相用长杆把火船推向远处，然而无处可逃的罗马军队已然方寸大乱。汪达尔人趁乱登船，展开杀戮，战争由此结束。

在第五章我已经讲过了历史的伟人理论，该理论认为创造事件的是独一无二的天才人物——例如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而非强大的客观力量——例如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伟人理论的对立面是历史的蠢人理论：我们必须问，如果巴斯里斯克斯足够机智，想出了逃脱困境的办法，会发生什么呢？[10]他可能已经重新占领迦太基，但是这能够修复意大利——北非财政轴心吗？也许能。汪达尔人已经在非洲长达30年，罗马帝国也许能够很快重建其经济结构。又或者，不能。哥特国王奥多亚塞是当时西欧最铁腕的人物，他觊觎意大利已久。公元476年，他致信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说世界不再需要两个皇帝，因为芝诺的荣耀足以统治全世界，并提议让他以芝诺的名义统治意大利。芝诺深知奥多亚塞意在占领意大利，但他也明白没有必要与之争辩。

就这样，罗马的末日到来了。伴随罗马灭亡的并非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啜泣。如果当初巴斯里斯克斯收复了迦太基，那么比起公元476年的真实情况，芝诺保卫意大利时情况是否会改观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自此，再也无人能够拥有足够实力掌控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帝国，而公元5世纪时疯狂的幕后操纵、政治活动和暗杀都无法改变经济下滑、政治崩溃和移民流动的现实。古典世界就此结束。

更小的世界：东晋和拜占庭帝国对比

自此，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两部分。在中国，东晋王朝统治着前朝的南部地区，且自视为整个中国的正当统治者。同样，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这样称呼是因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位于古代的希腊城市拜占庭）统治着古罗马帝国的东部，并宣称拥有对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东晋和拜占庭帝国都是先进国家，拥有完备的官僚体系、税收制度和受薪军队。它们都拥有大城市和有学识的文人，而尼罗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前所未有的富饶多产。随着中国北部和欧洲西部渐渐脱离核心区域，它们的统治范围也不断缩小。

管理者、商人和金钱组成的网络曾将东西方核心国家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这一网络被疫病、移民和战争瓦解。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国家和公元5世纪的西欧国家一直处于低级阶段，它们的皇帝整日与将领们在抢夺来的大殿中饮酒作乐。这些皇帝乐于向被征服的农民征税，尽管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财富，因为他们不需要支付雇佣军的薪酬。他们极其富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试图对官僚机构进行管理，并从难以驾驭的手下那里征税，这些手段造成了诸多麻烦。

在中国北方和罗马帝国西部，有许多旧式的富有贵族家族携带财产逃往建康和君士坦丁堡，但他们中更多人选择留在旧帝国的废墟之中，也许像西多尼乌斯一样维持着贵族的骄傲姿态，但又与新统治者达成某种协议。他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用羊毛裤子换下丝绸袍子，消遣活动也从古典诗歌转向狩猎。

有些现实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之前，贵族所拥有的地产遍布整个汉朝或罗马帝国，但现在那些超级富有的贵族们都消失了。尽管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地主的财产受到国家限制，但他们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咋舌。古罗马和中国的精英阶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与他们的征服者通婚，并从破败的城市搬到乡下的领地。

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和5世纪的西欧，伴随着不断加速的向落后国家发展的趋势，皇帝们允许贵族向农民收取租金，而这原本是农民应当作为税金交给国家的盈余资金。随着人口减少，农民能够集中精力耕作最为肥沃多产的土地，盈余资金也不断增长。数世纪以来，农民非但没有忘记历代积累的农耕技术，反而自行创造了不少新技术。公元300年后，长江流域的排水系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得到长足的发展，牛拉犁在中国北方迅速推广，条播机、铧式犁以及水力磨坊也在西欧盛行。

尽管贵族们一再地粉饰太平，而农民不断地大胆创新，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汉朝和罗马曾经繁荣一时的官僚、商人以及管理者行列正在不断削弱，这就意味着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大环境持续衰退。这些人通常都是唯利是图、毫无竞争力的代表，但是他们确实完成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商品运往各地，从而发掘了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媒介，经济会变得更为本土化，也更倾向于自给自足。

贸易通道收缩，城市也在收缩。南方游客对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破落感到震惊，而在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衰败程度极其严重，以至于诗人开始产生这样的疑问：周围这些正在腐朽的巨石废墟究竟是不是人类建造的？公元700年左右的一首英文诗歌这样写道："断裂的屋脊，摇晃的高塔，这是巨人的杰作，霉变在城楼和炮膛蔓延。破碎的盾牌，倒塌的房顶。这都是岁月的痕迹。"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经吹嘘说，他将罗马从一个砖瓦城市改造成大理石城市。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欧洲又倒退成木头世界。在古罗马城镇房屋的断壁残垣之间，开阔地上四处散布着简易棚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些简陋棚屋有了一定认识，但倒退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格兰开始挖掘工作时，挖掘者仍试图运用新技术来谨慎处理有关这些房屋的蛛丝马迹。

在这个更加简单的世界，货币、计算和文字纷纷失去它们的功用。再也没有人去开采铜矿，自然也无法铸币，因此中国北方的皇帝首先尝试减少货币的金属含量（一些人声称由于货币的金属含量过低，货币轻

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随后索性停止发行货币。账务记录及人口普查被取消，图书馆被荒废。这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蔓延数个世纪。中国北部和西欧的人口大幅下降，荆棘和森林重新覆盖了农田，居民寿命变短，生活质量下降。

佛教与基督教：东西方宗教的盛行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大多数东方人和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陈旧观念不起作用，求神拜佛也无济于事。

在中国，一旦边境地区防卫崩溃，批评者就会开始控诉朝廷天命已尽，因此治病神力崇拜盛行，影响长达1000年之久。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间出现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人才，他们开始质疑儒家哲学的权威性。竹林七贤是活跃于公元3世纪的一群自由思想家，他们成了新感性主义的精神领袖。据说他们整日沉迷于交谈、诗歌、音乐、饮酒以及药物之中，却对研读经典、为国尽忠这类话题避而不谈。曾有故事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被认为严重违反了封建礼仪（在无年长妇女陪同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与他的嫂子同行），但是阮籍却不以为然，反而大笑说："难道你是要我遵从孔子推崇的礼，去遵从儒家学说？（礼岂为我设邪？）"他还抒发了自己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在当时，汉族宫廷诗人所具备的道德精神严肃性变得有些滑稽可笑，新一代的诗人更加青睐抒情诗歌，擅长描写田园牧歌，或者索性出世退隐。尽管这些美学家们事务繁忙，无法退居远山，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在自己府邸的花园里体验隐居感觉，也可以效仿王导（公元300年东晋的宰相），花钱雇人代表自己隐居。汉代的画家们开始尝试将山水野趣作为创作对象，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将山水画的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使山水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竹林七贤和其他理论家主张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倾向于研究绘画和书法的技巧，而不是其中隐含的道德含义。

公元3世纪，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但是这场反叛一味地嘲讽、拒绝传统，却没有提供积极有效的应对办法，大体上只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在世纪末有所改观。距当时800年前，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刚刚兴起，佛教也经由南亚传播到了中国大地。公元65年，佛教首次出现在中国的书面史料中，而对于佛教传播比较可信

的说法是：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推进，东亚和南亚的商人开始在中亚绿洲聚集汇合，最终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信奉佛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把佛教看作从草原传入的众多外来哲学之一。

公元3世纪晚期，这种局面开始逆转，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中亚的僧人翻译家竺法护。他长期在长安与敦煌绿洲之间游历，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再译，并在印度观念中添加了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元素，获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大多数轴心时代圣人一样，释迦牟尼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启示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佛教的早期形式强调严格的沉思和自我觉醒，但是竺法护推崇的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就使救赎的过程不再艰苦繁重。在竺法护的表述当中，释迦牟尼并非精神追寻者，而是永恒怔悟的化身。竺法护坚持认为，原初的释迦牟尼只是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中存在的众多佛祖中的第一位佛。这些佛被一群其他的圣人所围绕，尤其是菩萨。菩萨原本是通往怔悟的凡人，但却推迟了自身的涅，旨在帮助渺小的凡人实现圆满，从重生和遭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弥勒佛（也称未来佛）终有一天会引导众生走向极乐世界。但是公元401年，中国出现了一群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是神圣的佛祖，事实上却与强盗、暴民及反叛的官吏为伍。他们打着救赎的旗号，却到处滥用暴力，实施破坏，最后这场暴动在血腥杀戮中落下帷幕。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的繁重教规，并为众生打开了救赎之门。公元6世纪，盛行的“佛祖讲经”只要求信徒围绕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塑像步行数圈，崇拜圣物（一般是佛牙、佛骨以及据说曾经属于佛祖的化缘钵），诵读佛经，胸怀慈悲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经者坦言，这些行为并不会将信徒引向涅，但是至少会给他们带来健康、财富以及不断升华的重生之路。佛教中的“净土派”将这种观念更进一步，他们声称信徒去世之后，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向其解读生死轮回，并引导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尘世的烦扰，寻求涅。

在印度，佛教徒为了寻求涅之路，通常会选择上路流浪，沿途乞讨。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神圣的流浪者（与富有的隐士诗人相对立）无疑是异类，因此这种方式在中国并不盛行，但是印度信徒通往怔悟的第二条道路——修行——却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65年左右，道安——他并非中亚移民，而是一位被训练成儒家学者的中国佛教徒——起草了一份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规定和尚必须削发剃度，和尚、尼姑均要节制欲念，学会顺从，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并运用戒、定、慧来追寻自我救赎。和发展了千年的佛教一样，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常常走入极端：许多和尚、尼姑对修行的认识相当狭隘片面，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目的是仿效菩萨舍身拯救世人；甚至有人在数千人面前自

焚，以求洗涤自身犯下的罪孽。不论如何，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佛教修行行为塑造成固定的宗教组织，部分填补了公元4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崩溃所引发的机构空白。佛教寺院建造水力磨坊，筹集资金，甚至组织起防御力量。富有的教友把土地和佃户赠与佛教寺院，被驱逐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寻求庇护，这些佛教寺院在作为虔诚信仰的核心的同时，还成为社会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聚集的岛屿。公元5世纪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一位官员在公元509年写道："寺院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佛教在中国的征服行为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公元65年，中国仅有数百个佛教徒。到公元6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大约3000万人——成了佛教徒。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还有一个名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它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

西方古典传统的崩溃晚于东方，也许是罗马防线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缘故。公元160年后，瘟疫同样在罗马大肆蔓延，导致治病神力崇拜不断出现，但是罗马人并不赞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尽管如此，公元3世纪的骚乱确实动摇了西方的古老传统。那些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雄伟塑像静静地见证了一种全新艺术审美的诞生：艺术家抛弃了古典艺术中庄严肃穆的原则，转而欣赏古怪的比例结构和那些巨大的、向上凝视的眼睛，这就形成了塑像似乎在互相注视的效果。另外，不断有新宗教从东部的边缘地区传入罗马帝国，例如来自埃及的伊西斯、来自叙利亚的不败之日、可能来自伊朗的密特拉神（其追随者形象为地狱的杀牛者）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它们都宣扬生命永恒。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在烦扰动乱的现世中追寻救赎，忽略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

一些哲学家试图强调过去几世纪累积的学识仍然是相关的，以此回应这种价值观的危机。在他们的时代，波菲利和普罗提诺等学者为适应现代需求而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后者可能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他们成为西方闻名遐迩的学者。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寻找与之南辕北辙的新解。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督教给所有人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是建立在旧轴心时代思想基础上的新概念，它以更适应现代需求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看待核心思想的新角度。基督教取代了犹太教，宣称其创建者耶稣是预言中诞生于此地的弥赛亚。我们将大乘佛教与基督教称为"第二波"轴向宗教。与第一波轴向宗教先行者相比，第二波轴向宗教向更大范围的世人打开救赎之门，并且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改造得更加简单易行。同样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两个新兴宗教都是普世教会。因此，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不属于任何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使命是拯救所有的普罗大众。

耶稣和释迦牟尼一样，并未留下任何圣典。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50年代，当时使徒保罗（他从未见过耶稣）试图让基督徒们认

可一些关于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的核心观点。大多数追随者接受了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应该受洗、向上帝祈祷、抵制其他的神、周日聚餐、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而，一旦超越这些基本前提，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些人坚持认为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只不过是之前一系列神中最后降临（且最低微的）的一位；有人认为世界是邪恶的，因此上帝作为创世者也一定是邪恶的；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恶毒的犹太神，另一个是神圣（但不可知）的耶稣之父；有人相信世上存在两个耶稣，一个以逃离受难的精神形式存在，另一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形式；有一些人暗示耶稣可能是女人，并且女人和男人之间可能是平等的；有人认为新的启示或许可以否定旧的启示；有人推测耶稣即将重生，因此所有基督徒都要禁欲；有人说因为时间紧迫，基督徒必须自由恋爱；还有人认为升入天堂的唯一途径是以残忍可怖的方式完成殉道，因此性爱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人们普遍认为，释迦牟尼对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实用主义态度，建议人们选用最有效的方法，摈弃其他。另外，在寻求涅的过程中，佛教徒有许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基督教认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是否知道上帝和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想要做什么。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基督徒陷入了疯狂的自我定义。公元2世纪晚期，多数信徒开始认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主教应该被视为最初传道者的后裔，拥有评判耶稣意愿的权威。那些想法激进、近乎疯狂的传道者逐渐被世人遗忘，《新约》的内容变得更加明确具体，通往启示的窗户被关闭。除非得到主教的同意，否则没有人能够修改这本圣书，也没有人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启示；除非基督徒自己愿意，否则也没有必要恪守禁欲或成为殉道者。

到了公元200年，尽管人们仍然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一门有纪律的宗教信仰，并对救赎（合理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宣扬的思想亲切易懂，为身处乱世的世人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实用方法。博学的希腊人甚至暗示说，第二波轴向基督教与第一波轴向哲学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柏拉图（有人称之为雅典的摩西）已经通往真理，基督教也已知晓真理，但是真理却是相同的。

当先进国家的机构开始瓦解时，主教们就被用来填补机构空白。他们动员信徒重新筑造城墙，修补道路，并与日耳曼入侵者展开谈判。和佛教徒一样，基督教的圣人们也选择隐居郊外，超然遁世，并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国闻名的苦行者，他身着刚毛衬衣，居住在埃及沙漠中的墓穴，不吃不喝，不断与心中的魔鬼斗争。他的追随者坚称：“他从不用水沐浴身体，以祛除污垢，甚至从不洗脚。”还有一位圣人，他在叙利亚一座50英尺的塔中坐了40年。当时，还有一些隐退者用动物毛皮遮掩身体，以青草果腹。简而言之，他们成了“圣愚”，即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愚妄的人。

在挑剔的罗马绅士看来，这些都是奇异怪诞的行为，基督徒们也对这些引发众人狂热仿效，并且只回应上帝旨意的极端分子表示忧虑。公

元320年，一位来自埃及名叫帕科米乌斯的圣人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将当地隐士全部集中在第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使这些人处于他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并通过辛勤劳作和虔诚祈祷追寻救赎。帕科米乌斯和中国的道安并无任何交集，但是他们提倡的修道院形式却惊人地相似，并且两者都引发了类似的后果：公元5世纪，整个社会的经济大环境陷入崩溃，基督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成了拖垮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随着古典知识不断消逝，修道院成了知识聚集的中心；战乱时期，修道院可以将信徒转化成民兵，用以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定。

基督教的传播速度甚至超越了佛教。公元32年左右，耶稣去世，他当时只有大约几百名追随者；到了公元391年，当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时，已经有超过3000万罗马人改信基督教，尽管“改宗”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当时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此保持怀疑，他们在接受新的信仰之前，仍试图用强大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深刻探究教义内涵。然而只消一下午时间，基督教、佛教的能言善辩者就能使他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人心悦诚服。由于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很粗略，因此我们只能逐个进行剖析。我们不知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改宗”的步伐何时何地开始加速，又在何时何地开始减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在起步阶段只有数百名追随者，但最终都拥有了超过3000万信徒，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和罗马帝国。图6-4清晰地显示出数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平均增长率：中国佛教徒平均每年增长2.3%，这意味着每30年就翻一番；而基督徒每年增长3.4%，每2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图6-4中，曲线呈上升趋势。然而在图6-1中，表示社会发展程度的曲线却呈平稳下降态势。这两者到底有没有联系？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781年就由爱德华·吉本提出。他说：“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传入对罗马帝国的兴衰存亡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但是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影响程度并非基督徒本身相信的那样。他暗示说，基督教的传播导致罗马帝国的精力不断衰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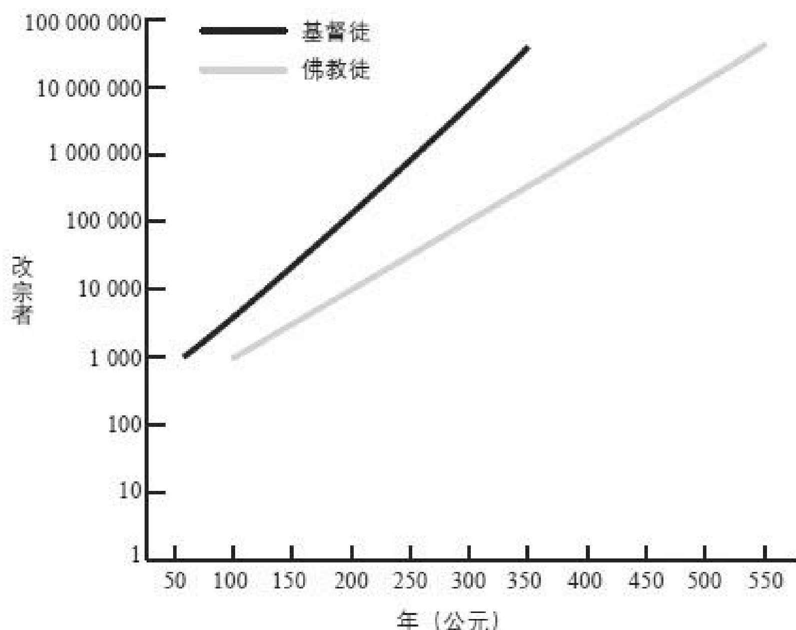


图**6-4** 统计人数：基督教和中国佛教的不断发展，假定发展速度恒定。纵坐标为对数，与图**3-5**和图**3-6**一致，因此发展的平均速度（基督教为平均每年增长**3.4%**，佛教为平均每年增长**2.3%**）导致图中出现直线

教士们卓有成效地宣扬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积极向上的社会美德遭到了压制，最后一点残余的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对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无止境的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公有、私有财富，而众多崇尚禁欲和洁身却碌碌无为的男女肆意挥霍着士兵的粮饷。

忍耐和自强同为基督教和佛教的美德。那么，我们能否将吉本的论点进一步延伸，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宗教思想——神职者的谋略战胜政治，心灵的启示战胜理智——终结了古典世界，导致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不断下滑，使得东西方差距不断缩小？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轻易解答，但是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轴向思想类似，第二波轴向宗教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根源。犹太教、希腊哲学、儒家学说、道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出现于公元前600～前300年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崩溃时所达到的水平（大约24分）。实际上，这些教派和学说的相继出现回应了当时先进国家的重组以及世界的觉醒。第二波轴向宗教起到了某种镜像作用：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不断发展，先进国家的统治根基不断动摇，于是人们发现第一波轴向思想有所欠缺，而推崇救赎的宗教适时地填补了空白。

图6-4中的曲线表明，两者的增长率最终实现了平衡。除非这些数据完全不准确，否则基督教和中国佛教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之前都只处于边缘地带。然而到了公元250年，当时有大约100万基督徒（大概占罗马人口的1/40），这个人数显然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当时基督教已经开始成为皇帝的燃眉之急，它在最艰难的时刻与国家争夺资金，而且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又否决了罗马帝国皇帝长期用以论证统治合理性的死后上帝说法。公元250年，皇帝德西乌斯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行动，但他不久之后就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57年，瓦勒良也着手进行迫害行动，但也为波斯人所杀。

上述事例表明：运用武力威胁人民的行为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些人希望追随耶稣痛苦地死去，并将之奉为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接下来的50年间，尽管罗马皇帝不断地试图扫清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基督教集会数量平均每年增长3.4%，公元310年左右，基督徒人数猛增至1000万人，几乎占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1/4。显然，基督教已经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公元312年，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深陷内战时，他发现了上帝所在。因此他没有动用武力镇压基督教，而是做出了妥协，如同500年前他的祖先对具有同等破坏力的第一波轴向思想做出妥协一样。康斯坦丁将大笔财富送往教会，免除教会赋税，并认可其等级体系。作为回报，教会也认可了康斯坦丁的统治权。

在接下来的80年间，罗马帝国所有的剩余人口都转变为基督徒，贵族掌握了教会领导权，教会和国家合力洗劫了帝国内部其他异教徒所拥有的财富——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基督教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公元310年左右，亚美尼亚国王皈依基督教。公元34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也许是因为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与基督教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所以波斯帝国皇帝们并没有跟随这个趋势。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临界点。图6-4表明，公元400年左右佛教徒突破百万，但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过大，佛教发展在这两个地区也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战乱纷争不断的北方，佛教徒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通常都在各国都城聚集，这就导致他们容易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到了公元400年，北魏成为诸国之中最强大的力量，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督管理佛教事务。到公元446年，这个部门开始对佛教徒施加迫害。中国南方则正好相反，那里的佛教徒们没有在都城建康聚集，而是沿长江流域散布开来，寻求当地权贵的庇护，以躲避朝廷迫害，并且逼迫皇帝让步。公元402年，僧人甚至得到皇帝特许，恩准他们在面见皇帝时无须跪拜。

图6-4表明，截至公元500年，中国大约有1000万佛教徒。当佛教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时，统治者（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皆是）做出了和康斯坦丁一样的妥协，因此佛教团体开始肆意挥霍钱财、免征税收、加官晋爵。中国南方的梁武帝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极力推崇盛大的佛教节日，甚至下令宗庙祭祀皆不用牲畜（可以用点心糕点代替），并派遣使

节前往印度收集经典。作为回报，佛教统治集团认可梁武帝是菩萨和救世主的身份。北魏皇帝的做法更为高明，他们获得了选择佛教团体首领的权力，随后通过该首领宣称自己是佛祖化身。如果康斯坦丁知道的话，一定会羡慕不已。

忍耐和自强并未导致东西方的衰落和瓦解，社会发展的自我矛盾性才是罪魁祸首。这种衰落和瓦解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正在扩张的核心引发了一连串无法控制的事件。然而到了公元160年，社会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通过中亚将东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细菌和移民不断流动的东西方交流，从而改变了整个东西方的地理版图。

到了公元160年，较之公元前1200年的西方核心国家，古典世界各国规模进一步扩大，势力日趋强盛，但同时这些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破坏效果也愈演愈烈。面对它们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古典国家显得手足无措。数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展进程每况愈下，文学、城市、税收和官僚机构失去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以往毋庸置疑的事情，当时已经变得无法确定，因此数千万人试图给中国的古老智慧带来全新的转折点，在这个扭曲变形的世界中寻求救赎。和第一波轴向思想一样，第二波轴向思想也是危机四伏，不断挑战着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三纲是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尽管这一波思想看似来势汹汹，但是最终再一次与权力和财富颠覆性地握手言和。到公元500年，这些国家日渐式微，而寺庙却日益兴盛，生活依旧继续。

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在每个千年中，都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自我阻碍作用，每向前行走两三步，随后就会向后倒退一步，这种破坏程度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到西方，而且已经侵蚀东方的社会发展，但其模式显而易见。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差距不断拉大；在倒退过程中，这种鸿沟相应缩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尽管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力不断变化，但仍然保有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我将写作时间向后推一个世纪，那么事情将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1] 至少，儒家学者们是如此描述的。许多现代的史学家怀疑，当时的乡绅阶层将整个事件进行了美化。然而，秦始皇将农民腰斩的事实似乎无可置疑。

[2] 中国皇帝一般都有众多名号。每一位皇帝都拥有一个或更多的称谓（例如，刘邦也被称为刘季），而且每一位皇帝都至少有一个庙号（例如，刘邦被称为汉高祖，或者汉高帝，意为“最高的祖先”）。为了避免造成读者的困惑，我将引用安妮·帕卢丹（Anne Paludan）在其编写的实用书籍《中国皇帝简史》（*The Chronicle of Chinese Emperors*）中所使用的皇帝庙号。

[3] 1加仑≈3.8升。——编者注

[4] 没有发明肥皂前，人们沐浴时会在身上涂满橄榄油，然后把它刮下来，起到祛除污垢的作用。这种近乎奢侈的做法要求使用者拥有一定的财力，而且可能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品位，但比起使用尿液做牙膏（曾有一个罗马诗人以讽刺的口吻提及这件事），这显然已经有所改进。直到1000年后，中国才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肥皂和牙膏。

[5] 这是《楚辞》中描写的公元前208年长安宫殿的奢华景象，尽管目前为止这样的情景并未

在挖掘现场出现。

[6]　史学家通常将公元前202～公元9年这段时期称为西汉，因其都城长安位于西边；而将公元25～220年这段时期称为东汉，因其都城洛阳位于东边。其他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前汉和后汉。

[7]　晋国是公元前8～前5世纪战国时期的一个国家。在公元220～589年这一分裂时期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大多选择沿用古国的名字，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上去更加正当合理，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会给今天的学生带来众多困惑。

[8]　称其为“东晋”是为了与“西晋”区别开来，后者在公元280～316年期间统治整个中国，都城为长安。

[9] 但是，他利用晚年撰写了《沉思录》，这是一部斯多葛派哲学的经典著作。

[10]　当然，这种说法假设巴斯里斯克斯是蠢人。罗马人更倾向于阴谋说，他们指控巴斯里斯克斯收受贿赂，并差点处死他。

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东方引领世界

根据图7-1所示，公元541年应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在那一年（考虑到一定的误差范围，也可以说是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旧格局，并且一举否定了所有简单化并且长期僵化的关于西方统治世界的理论。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将近40%的巨大差距超过西方占据发展优势的2500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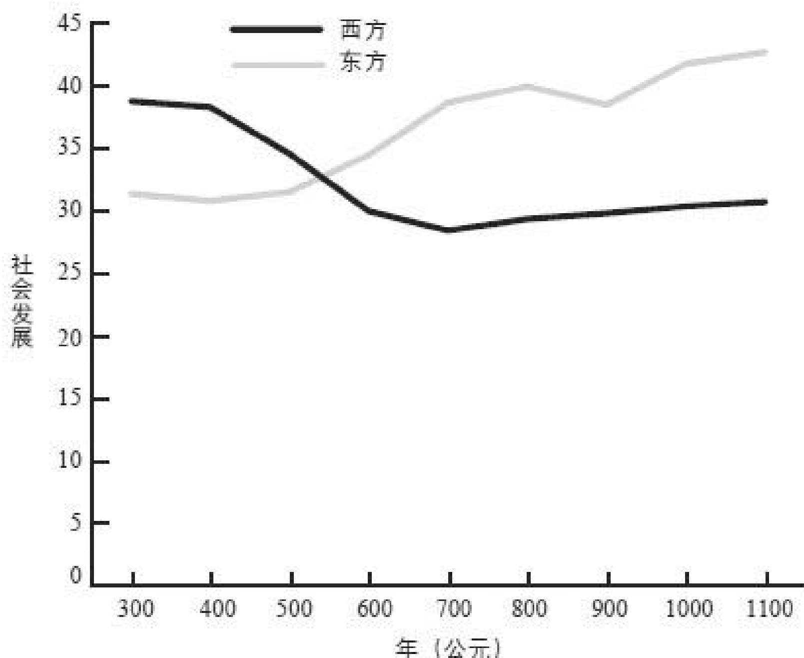


图**7-1** 巨大逆转：东方逆转了下降的颓势，并且史上首次赶超西方

为什么东方能够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领先于西方？为什么在西方发展持续性地落后于世界的同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却能够在接下来的500年里大幅提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当今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我们试图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涉及不少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他们或天资聪慧，或笨拙愚钝。但是在这些戏剧化

场景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也就是贯穿整个故事始终并且酝酿出东西方差异的因素——地理条件。

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

在公元100年之前，东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就开始趋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00年，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已经衰退到5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国家衰亡，城镇颓败，从亚洲内陆向中国北方地区以及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移民潮剧烈地震荡着整个东方的统治核心。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移民的出现，才使东方的复兴之船得以起航。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讲述了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是如何改变地理地貌，如何从落后困顿之中发掘出潜在的优势资源，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和广袤草原上开辟出条条通途的。然而，公元3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也可以反向作用：衰落的社会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地理地貌。随着罗马和中国的各个城市不断萎缩，文化水平退步，军队士气委靡，生活水平下降，统治核心地区在地理版图上不断收缩，而两者相同的萎缩现象的背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而西方的社会发展直到公元8世纪仍然处于颓势。

我们在第六章讲到，公元300年之后，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的东方核心腹地分裂，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居民开始了向南方迁徙的过程。大批的移民将长江流域以南的土地从汉代以来荒芜的边缘地区，转变成了焕然一新的边疆。这些避难者进入南方潮湿闷热且充满陌生感的地界，那里不适宜种植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小麦和粟米，但是水稻却长势喜人。大多数土地人烟稀少，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移民大相径庭。这种充满暴力的生存环境以及严酷艰辛的磨合，塑造了这些殖民式土地掠夺者们坚毅的性格，这些移民激增的人口数量以及更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逐渐将这片土地的早期居住者驱逐出去。

在公元280～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南部的纳税人口数量增长了5倍，但是移民对南方的作用不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根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已经为人所知的水稻品种超过了37种，而且移植技术（6个月期间在特殊的花坛内栽培种子，而后将种子转移到水田中去）也变得相当普遍。这需要极其艰苦的劳作，但是确保了好收成。《齐民要术》解释了如何使用肥料，使农民能够持续地耕作土地从而避免了土地闲置的问题；还解释了如何使用水车——尤其对于那些周围环绕着溪流并且拥有大笔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佛寺来说——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将谷物磨成面粉，研磨大米以及将种子榨成油。这一切使得整个新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这和罗马人创造的历史有些相似：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西欧，之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南方的农业落后面貌逐渐转变成了竞争优势。

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导致粮食价格也渐趋低廉。尽管中国的河流无法像地中海一样提供便利的水道，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逐步弥补了这一不足。虽然水下考古学家尚无法提供如同地中海沉船残骸那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显示当时的船只尺寸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明轮船于公元5世纪90年代左右在长江上出现，并往返于成都和建康两地，船上所载的水稻为发展中的城市提供了口粮，而这些城市的市场都鼓励经济作物买卖，比如说茶叶（在公元270年左右的现存记录中被首次提到，到公元500年时成了广泛传播的奢侈品）。社会上层的政客、商人和寺院都凭借长江流域行船的租金收入、船运事务和磨坊经营而变得富有。

然而，建康的统治阶级并未因此致富。这种情况和罗马帝国比起来，更像是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帝国，在那里，官员和地主掠夺了飞速增长的人口和贸易带来的成果，而非国家——直到提格拉·帕拉萨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国的南方从未出现过提格拉·帕拉萨。曾经有一位帝王成功地统领整个贵族集团，甚至试图再次征服北方，但是这些努力随着内战的爆发而付诸东流。在公元317～589年，陆续有多个政权统治了（遵循某种模式）建康。

《齐民要术》表明，直到公元6世纪30年代为止，北方一直保留着复杂的农耕体系。此后，随着盗匪数量剧增且活动日益猖獗，远距离贸易行为乃至货币系统都逐渐消亡。这种衰败现象一开始制造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骚乱，但新的统治者逐渐开始在北方恢复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来自东北大草原边缘的鲜卑族。和6个世纪之前统治伊朗的帕提亚人一样，鲜卑族人将游牧传统与农耕传统结合起来，世代以来凭借精湛的骑术征战四方，同时从农民那里收取保护费。

公元386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1]他们没有洗劫汉族贵族阶级，而是和他们签订了某种协议，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禄官僚和旧时高级国家形式之下的税收制度。这种做法使得北魏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暴行遍布的国家，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北魏的优势使之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据说，北魏与残余的汉族旧贵族之间制定的协议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这些骑手真正定居下来，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满足于攻打北方其他的游牧国家。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到达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可以打赢战争，掠夺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拥有大型船只、攻城战车以及强大军需供应的先进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缺少先进的军队体系，他们无法洗劫中国南方地区；由于他们已经统治了整个北方，他们侵吞北方其他国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此

北魏的统治者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来换取支持者的忠实跟随——这是落后形态国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公元5世纪80年代，孝文帝认识到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向先进的国家形态转化。他为此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他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愿意履行纳税义务和国民义务的人们。另外，为了使鲜卑人像先进国家的臣民一样思考和行动，孝文帝向传统发起了一场正面攻击：孝文帝禁止了鲜卑的传统服饰，用汉族的姓氏代替了鲜卑族的姓氏，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臣民说汉语，并且将几十万人口迁移至洛阳一处备受尊崇的圣地，建设起一座新城市。

一些鲜卑人放弃了他们祖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汉族贵族一样安定下来，但是另一些鲜卑人拒绝这么做。由此，文化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内战，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现代派）和西魏（传统派）。传统派坚守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吸收来自大草原的骑手。很快，他们的军事力量似乎足以压倒孝文帝施行的变革。绝望是变革的温床。虽然孝文帝试图将鲜卑的勇士转化为汉族的谦谦君子，他的继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汉族士兵免税优惠，任命汉族的贵族为将军，并且允许汉族士兵使用鲜卑名字。因此，汉族农民和文人学会了打仗，在公元577年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改革。虽然这次变革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但是孝文帝的远见卓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极端化的中国。北方是一个先进国家（在公元5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更名为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四分五裂、衰败落后的经济；而南方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机构涣散，尽管一直在尝试利用繁荣的经济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但是几乎都失败了。

这种现象听起来完全是不正常的，但事实上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起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遇。公元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舰队，纵横驰骋于长江流域，并且将一大批军队（可能有50万人）派驻到建康。由于南北的军事力量极端不平衡，南方城市在几周之内就被攻破。当他们意识到隋文帝实际上想要向他们征税，南方的汉族贵族大规模地揭竿起义，据史料记载，他们屠杀——甚至生吃——隋朝的官员们，但是这些叛乱最终在一年之内被扫清。隋文帝在没有发动残酷艰苦的战争，且当地的经济也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就征服了中国南方地区，自此东方的复兴大业开始起飞。

武则天统治下的唐朝

在重新构建起一个独立庞大的帝国的同时，隋朝立即着手两件事情。第一，隋朝这个立足于中国北方的强大国家，开始开拓南方新兴的经济前沿；第二，隋朝允许南方的经济繁荣扩展到全国范围。

这一切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当隋朝的帝王们修建那个时代最

宏伟的纪念碑——1500英里长、130英尺宽、连接长江和中国北方的大运河时，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修建一条向全国各地运送军队的超级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条运河成了中国的经济大动脉，将南方的大米运送到北方城市，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公元7世纪的学者总是这样抱怨："凿穿太行山脉，修建起运河之后，隋朝给人民施加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但是同时，这些学者也承认"大运河给人民带来了不计其数的福利……这些福利确实是巨大的"。

这条大运河的开通就像人工地中海一般，它使得中国像罗马一样拥有了一条便捷的水道，进而改变了东方的地理面貌。价格低廉的南方大米被运送过来，使得北方城市急速膨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人白居易这样描述面积30多平方英里的长安——这个中国的古代都城。数百万的人口熙熙攘攘，聚集于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这些道路的宽度是纽约第五大道的5倍。这一繁荣景象并非长安所独有，洛阳拥有大约长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几个城市也都拥有几十万的人口。

尽管如此，由于北方的国家政权运作与南方的水稻种植发展是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复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机勃勃的官僚组织管辖着城市的市场，使农民和商人致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过度的行政管理管制着贸易活动的每一处细节，极大地束缚了农民和商人的自由，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阻力。官员负责核定价格，之后再向人们宣布何时可以进行买卖，甚至规定商人应该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许骑马，那样被认为是过于高贵体面的行为，小商小贩不配享有）。

当时的政府官员将政治因素放在经济因素之前。政府不允许人民买卖土地，相反，他们声称土地国有，国家只是将土地租给农民使用。这一政策迫使农民登记纳税，并且限制了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很多年以来，历史学家都猜测，在这些土地法中，更多的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现实问题。当然，学者们也进行了推理论证，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处理如此多的文书工作。[2]然而，在戈壁沙漠边缘的敦煌这一干旱环境下保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公元8世纪的管理者们的确遵循了这些规则。

当然，农民、地主和投机者找到了规避法规的方法，但是行政部门的文件暴增，并逐渐堆积如山，由此引发了自身的一场变革。理论上来说，汉代以来的入仕考试使得行政机构保留了整个中国最优秀聪慧的人才，但是从实践来说，贵族家庭经常试图将政府要职变成世袭的福利。然而在公元7世纪，考试成绩的确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假定（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诗词歌赋和引经据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素质的最佳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发明了有史以来最为公正合理的行政公职人员的选择机制。[3]

随着旧贵族对政府要职控制的逐渐松弛，行政任命开始成为贵族们追寻财富与权力的必经之路，进入行政机构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考试通过率不到1%，而且不断出现考生重考数十年的悲喜剧。就像当今社会的家长想让孩子通过残酷的考试，进入众人梦寐以求的名校一样，那些野心勃勃的家族会雇用辅导老师，而新近发明的印刷术使数以千计的习题册得以问世。还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将范文写进衣服内衬。由于分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写作，那些年轻考生很快成了诗人。随着这些思维活跃的诗人不断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考试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新的开放观念延伸至两性关系，甚至有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原型女性主义”。我们不应该将这种趋势夸大化，在《太公家教》这本现存的8世纪古籍中出现了一些对妇女的建议，这对于1000年前的先辈们来说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新妇事父，

音声莫听，

形影不睹；

夫之妇史，

不得对话。

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嫁娶模式，以及针对女性能力的开明佛教观念（相较于孔子的观念而言），给予女性最大限度的自由，无视“祖父的训诫”。以武则天为例，她13岁时进入皇帝后宫，之后作为尼姑修行，后又成为前任皇帝儿子的宠妃。武则天的能力远胜她那平庸软弱的皇帝丈夫，于是她垂帘听政，涉足国事。据称公元683年她的丈夫驾崩之后，武则天毒死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后又罢黜了她两个亲生儿子（分别在6周后和6年后）。公元690年，武则天走到台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凭借自身能力登上帝位的女皇帝。

从一些方面来看，武则天是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她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来撰写《列女传》，并带领一支女性队伍前往泰山，进行中国最神圣的仪式——祭天，这震惊了保守派人士。但是妇女团体有其局限性——当她丈夫的贵妃和其他宠妃成为她攀向权力顶峰的绊脚石时，武则天（又一次残忍地）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借以陷害竞争对手，再砍下其手脚，将其浸入酒坛之中。

武则天的佛教信仰就和她的女权主义一样充满矛盾。她绝对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一度禁止肉店经营，甚至亲自迎出长安城去，只为面见一位从印度取经归来的僧人。然而她又公然地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公元685年，她的情人——另一个僧人——“寻得”一部《大云经》，其中预言了一位拥有统治整个宇宙能力的女性的崛起，称武则天为弥勒佛降生，传说龙门石窟精美绝伦的卢舍那佛像就是仿照武则天形象雕刻的

（见图7-2）。

武则天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同样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她推动科举考试制度凌驾于家族裙带关系之上，这引发了那些一直依赖于此的儒家文人们的强烈憎恨，而武则天也回应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她在文人队伍中进行大清洗，清除了那些借着撰写官方史料将她塑造成女性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大乱天下的反面形象以实施报复的文人。



图7-2 这反映了武则天的面容？这尊卢舍那佛塑像位于龙门石窟，雕刻于公元700年左右，传说它是以这位史上唯一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的女性为原型雕刻而成的

但是，即使这些文人也无法掩盖武则天统治的璀璨光辉。她号令百万雄师，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深入大草原。与汉代相比，当时的唐朝

更像罗马，主要在帝国内部进行招募，从贵族阶层中吸收政府官员。这样可以胁迫内部对手加强戒备从而保持指挥官的忠诚度。任何官员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即便只调遣了10个人，也要面临一年的牢狱之灾；如果调遣了一个团，那么就要被绞死。

这支军队将中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从未到过的东北、西北以及中亚地区，甚至在公元648年侵入了印度北部。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中国的软实力不断提升。与作为文化中心的印度相比，公元2～5世纪之间的中国显得黯然失色，印度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佛教思想向更远更广阔的范围传播，新兴东南亚国家的上流人士都沿袭着印度的服饰、经卷和宗教传统。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印中文化开始在东南亚盛行，中国的佛教学派将佛教思想重新塑造后传回印度，而朝鲜、日本等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则完全从中国学习佛教思想。他们仿照中国人的衣着服饰、城镇规划、法律准则和文字，并且承认自身从属于中国的附属国地位。

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自身对外来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接受新生事物并与之融合的能力。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许多有权有势者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移民，而且他们与草原——这条贯穿东西的通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来自亚洲内陆的舞者和乐师在长安城风行一时，追逐时髦的人们穿着波斯风格的服饰：紧身上衣、褶裙和长面纱。在当时，真正的“潮人”们只选用东非的“鬼奴”作为看门人。一位主人冷酷地说：“如果他们在运输途中没有死亡，我们就可以留下他们。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尽管仍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听懂‘人类’的语言。”

即使冒着摔断骨头的危险，中国大家族的子孙仍然热衷于游牧民族的独特游戏——马球；遵照中亚的风俗，每个人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不再坐于席上；时髦的女性游荡于异域宗教神坛附近，例如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这些事物经由聚集在中国城市的中亚、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传播到东方。2007年的一项DNA测试显示，有一个名为虞弘（Yu Hong）的人，在公元592年时被葬于中国北方城市太原，而他实际上是欧洲人（虽然仍不清楚这个人是自己万里迢迢地从西方移民至东方，还是他的祖先经历了更为漫长的移民历程）。

武则天统治下的世界是公元589年中国重新统一的结果，这次统一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开拓了南方广阔的经济发展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但是对于为什么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541年产生了交叉这一问题只回答了一半。要想得到完整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社会发展持续下降的原因。

最后的后裔：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衰败

从表面上来看，西方的复苏至少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还是和东方极其相似。在这两个核心地区，每当一个庞大的古国没落，就会出现一个更小的帝国，声称对整个地区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而另外一些“野蛮”国家会无视这些宣言。在经历了公元5世纪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之后，拜占庭帝国加强了边界防御体系，享有了相对和平。公元527年，一位名叫查士丁尼的君主即位。至此，一切迹象都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史学家经常把查士丁尼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精力充沛，统治期间彻底整顿行政机构，加强税收，并且重建君士坦丁堡（雄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他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像魔鬼一样工作。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他其实就是魔鬼——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样，从不吃饭、饮水或者睡觉，尽管他偶尔会有旺盛的性欲。一些批评家甚至说他们曾经看见查士丁尼脑袋与身体分离，当他的身体在夜间于走廊徘徊时，他的脑袋就四处乱飞。

根据传言，查士丁尼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他的妻子狄奥多拉（见图7-3），一个比查士丁尼更声名狼藉的人。狄奥多拉在婚前曾经是一位女演员（在古代，这是对妓女的委婉说法）。有谣言说狄奥多拉的性欲比查士丁尼还要旺盛，说她曾经与晚宴上所有的来宾做爱，之后当他们都筋疲力尽时，又去勾引他们的30个仆从。这些传言也许有真实成分，但是狄奥多拉的表现就像一位真正的皇后，比如，公元532年时，贵族为了反对查士丁尼的税收政策，试图利用球迷骚乱将其推翻，狄奥多拉阻止了查士丁尼逃跑。她指出：“每个人出生之后都必须面对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称我为‘伟大的君主’，我也不会再苟活于世。我的丈夫啊，如果你要寻求安全，那很容易……但是我更愿意重复一句老话——紫色（皇帝的颜色）是最好的保护罩。”于是，查士丁尼重新振作起来，调遣军队，并且以后从未重蹈覆辙。



图**7-3** 比武则天还要坏（更坏还是更好，这取决于你自身的角度）？意大利拉文那的一幅镶嵌图中描绘了皇后狄奥多拉的面容，这个镶嵌图是在公元**547**年制作完成的

就在之后的那一年，查士丁尼派遣将军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强行夺取了北非。65年前，汪达尔人的火船使拜占庭帝国重新占领迦太基的企图灰飞烟灭，但是如今轮到汪达尔人溃不成军了。贝利撒留横扫北非，之后穿过西西里，在那里，哥特人也随即被攻破。查士丁尼的贝利撒留将军在罗马欢庆公元536年的圣诞节，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然而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新一轮的征服又揭开了帷幕，帝国破败了，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然落后于东方。到底哪里出了错？

根据贝利撒留的秘书普罗科匹厄斯留下的一本名为《秘史》（*The Secret History*）的记录来看，这一切都是女人的过错。普罗科匹厄斯提供了可以与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反对派官吏相匹敌的复杂阴谋论。普罗科匹厄斯说，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是皇后狄奥多拉最好的朋友以及狂欢作乐的伙伴。为了使查士丁尼从她与安东尼娜的传言中分散注意力，狄奥多拉故意在查士丁尼面前诋毁贝利撒留。结果查士丁尼真的相

信贝利撒留正在密谋陷害他，于是将他召回，而他的军队由于失去主帅，迷茫无措，最终被击败。查士丁尼又将贝利撒留派回去拯救危局，之后却因偏执再度发作，再一次陷入了愚蠢的轮回（不止一次）。

没有人知道普罗科匹厄斯的记录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是对于再征服失利的真正解释似乎在于：公元6世纪，尽管东西方核心拥有众多的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起着更大的作用。从战略上来说，查士丁尼的地位与隋文帝统一中国时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所有的北方“野蛮”国家在公元577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联盟，而隋文帝则征服了富裕但薄弱的南方。相反，查士丁尼不断尝试从富有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征服众多的贫困却强大的“野蛮”国家。就像公元589年时隋文帝面对的情况一样，查士丁尼想要一举统一核心地区是不可能的。

查士丁尼还要处理波斯人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与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税收的争端以及宗教动乱使得波斯帝国的军事维持平静的状态，但是罗马帝国从废墟中崛起的前景迫使波斯人采取行动。在公元540年，一支波斯军队攻破了拜占庭帝国薄弱的防卫工事，横扫叙利亚，迫使查士丁尼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这也许是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东尼娜的私通丑闻）。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541年，据说有一种可怕的新型疾病在埃及肆虐。病人有发烧症状，并且发生腹股沟和腋窝部位肿胀。大约一天过后，这些肿胀部位会发黑，随即病人进入昏迷或者精神错乱的状态。在之后的一两天，大多数病人会在极度痛苦中咆哮着死去。

这就是黑死病。一年之后，这种疾病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约有10万人病死。由于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宣布：所有人在出门时都必须在脖子上挂一个标注姓名的牌子。

君士坦丁堡认定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大多数史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黑死病的病菌可能在距公元541年很久之前就开始在非洲的大湖地区进化，并通过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黑鼠身上的跳蚤四处传播。在很多年间，红海的商人们一定将许多埃塞俄比亚老鼠带到埃及，但是由于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68华氏度之间才能变得活跃起来，埃及的温度为这种传染病的传播制造了障碍——显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30年代末。

之后发生的事情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树木年轮显示，之后经历了好几年不同寻常的严寒天气，拜占庭帝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象观测者记录下了一颗巨大彗星的出现。有些史学家认为彗星的尾巴制造出了一个尘幔，从而降低了温度，使得瘟疫爆发，有些认为火山灰是温度降低的罪魁祸首，而另一些则坚持认为瘟疫爆发与尘幔和火山都无关。

但是在这一切传言和行为背后，导致公元6世纪西方社会发展下滑

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战略问题，甚至不是自身道德标准的松懈。东西方之间的最终差别，在于地理因素，而非人为因素，而这种差别决定了战争打击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查士丁尼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状况良好——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产，商人们仍然将谷物和橄榄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与东方不断开拓的水稻田新边疆不同。当隋文帝征服中国南方地区时，他派遣了至少20万军队；而查士丁尼即使是在公元551年，在他意大利战争的辉煌时期，也只招募到两万军队。隋文帝成功地夺取了中国南方巨大的财富，而查士丁尼仅仅赢得了更为贫穷、战乱纷飞的土地。如果再过几代时间，一个重新一统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已经把地中海打造成商贸的高速通道，从而开拓新的经济前沿，扭转社会发展的落后局面，但是查士丁尼并不拥有这种财力。

在较量开始之前，地理条件局限性就已经注定查士丁尼英雄主义又充满虚荣心的再征服会以失败告终，而他付出的努力也许只是让早已注定的失败更为凄惨。查士丁尼的军队将意大利变为一片废墟，而供养其军队的商人们又将老鼠、跳蚤和死亡带到了地中海。[4]这场瘟疫在公元546年之后逐渐消退，但是病菌已经扎根于此，因此每年瘟疫都会在某个地方爆发，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期间人口锐减高达1/3左右。就如400年前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引发的传染病一样，大规模的死亡最初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劳动力减少，因此幸存者的工资增长（与基督教信条明显不一致的是，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在公元544年抱怨说，大规模的死亡把洗衣服的成本抬高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查士丁尼的应对措施就是将工资限定在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一做法显然无济于事，此后，土地荒芜，城市缩小，税收减少，机构分裂。很快，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更为悲惨。

在之后的两代，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动乱。公元5世纪时，英国和高卢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退出西方核心地区；公元6世纪时，战争频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也步其后尘；随后分崩离析的浪潮翻滚着，从西北一直向东南蔓延，最终吞噬了拜占庭帝国的核心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3/4，农业、贸易和国家收入衰落，帝国末日近在咫尺。到公元600年时，只有一个人仍然幻想着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帝国的国王库斯鲁二世。

毕竟，罗马不是西方帝国中唯一可以被重建的国家。重回公元前500年，当罗马仍在停滞不前时，波斯帝国已经统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拜占庭帝国奄奄一息，似乎又到了波斯帝国重振雄风的时刻。公元609年，库斯鲁二世冲破了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边境防御工事，拜占庭的军队随即溃不成军。公元614年，库斯鲁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并夺取了基督教最为神圣的遗迹：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碎片、戳穿耶稣身体的圣矛以及使耶稣苏醒的圣海绵。5年之后，库斯鲁夺取了埃及。公元626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掌权的99年之后，库斯鲁的军队穿过博斯普鲁斯，瞭望着君士坦丁堡。而他雇佣的来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同盟——阿尔瓦人横扫巴尔干半岛地区，并且蓄势待发，等

待着从其他海岸发动攻击。

但是库斯鲁梦想破灭的速度甚至比查士丁尼还要快，公元628年，在库斯鲁去世之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四分五裂。拜占庭帝国的国王赫拉克利乌斯对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军队不予理会，而是从教会那里借来了金银财宝，并且航行到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凭借着那些财宝，从突厥[5]部落中雇佣了游牧骑兵，因为他推断骑兵将会是战争的关键，既然拜占庭帝国的骑兵所剩无几，那么不如雇佣一些骑兵。结果他雇佣的这些突厥骑兵将阻击他们的波斯士兵打得溃不成军，并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战败使得波斯帝国也卷入了分崩离析的浪潮之中。库斯鲁的亲生儿子将库斯鲁锁起来并且饿死了他，随即波斯帝国统治阶级分裂，之后又把库斯鲁征服的土地割让出去，将他夺取的文物送还回去，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整个波斯帝国陷入了内战的泥淖，在5年之内频繁更换了8位君主，而赫拉克利乌斯则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当时有人赞叹说："无边无际的愉悦感以及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充斥于天地之间，就让我们齐声高唱天使的赞歌吧！"另一个人写道："至高的荣耀归于神，让和平祥和落至人间，赐予人类幸福安宁。"

公元533年之后的这个世纪，西方古国的垂死挣扎就是命运之神的残酷判决。由于缺少像中国那样的新经济前沿，库斯鲁在扭转西方社会发展颓势的问题上和查士丁尼一样无能为力，他们越是努力尝试，结果就越糟糕。罗马和波斯最后的后裔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暴力、瘟疫和经济衰退，最终架空了整个西方核心。就在公元630年，也就是赫拉克利乌斯攻下耶路撒冷并在原地修复真十字架之后的10年，他们所有的荣耀和悲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变得无关紧要了。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

在事先并未觉察的情况下，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行为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某些古籍的准则。他们努力想要控制核心地区，结果却引起动乱，而且将更多边缘地带的人卷入僵局。库斯鲁把阿瓦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而赫拉克利乌斯将突厥人领入美索不达米亚。另外，两个帝国都雇佣了阿拉伯部落来守卫他们在沙漠地带的边境，因为这样做要比负担自己的卫戍部队成本更低。曾经将罗马的边陲德国化、将中国的边境地区匈奴化的同一想法，如今又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共有边界阿拉伯化。在公元6世纪，两大帝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分别建立起阿拉伯附属国：波斯帝国将阿拉伯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拜占庭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同盟侵占了也门来制衡两国力量。阿拉伯地区被引入统治核心，而阿拉伯人也在沙漠中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沿着商路构筑绿洲城镇，并且改信基督教。

大规模的波斯——拜占庭战争强烈撼动着外围的阿拉伯地区。这两大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坚强的阿拉伯人仍然在废墟上战斗。公元7世纪20年代，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为了贸易航路而展开斗争。为了便于互相照应，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沙漠中呈扇形展开，伏击对方的商旅队。古老的帝国边界对于这场战争来说无关紧要，当麦地那的领袖在公元630年攻占麦加时，他手下的入侵者实际上已经攻入巴勒斯坦。在那里，忠于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和忠于麦加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其他阿拉伯人则在君士坦丁堡的资助之下对这两支力量全都予以打击。

对于在同一片沙漠边缘生存的阿拉姆部落成员来说，这一切大体上与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灭亡时的情景相似：这些都只是国家灭亡时边境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阿拉姆人来说有一件事是他们所不熟悉的，那就是麦地那的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

当波斯于公元610年左右展开对拜占庭的灾难性战争时，这位穆罕默德就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大天使加百列已经现身并且命令道：“宣读吧！”穆罕默德陷入了慌乱之中，他坚称自己没有宣读者，但是加百列又接连两次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之后穆罕默德耳畔传来了这样一番话：

> 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

穆罕默德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者是被恶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抚了他的情绪。在之后的22年里，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欲昏厥，并通过这位先知之口传达真主的旨意。这些话语诉说着人世的美丽和传统，在听到的那一瞬间人们就被转化了。一位名叫欧麦尔的重要的皈依者说：“我的心变得柔软，我流泪了。伊斯兰教信仰进入了我的身体。”

伊斯兰教遵从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经典的第二波轴心时代宗教。其创始人来自精英团体的边缘（他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暴发户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国的边缘，他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古兰经，或者称为宣读，是在其死后被整理出来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的。他践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体恤同情的行事准则，并且把这一切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家分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有一种全新的身份：一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捍卫者。

与佛教、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诞生于衰败帝国的边缘地带，当时正处在持续征战的混乱年代。伊斯兰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战争是穆斯林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过，以真主

之名，打击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6]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

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

> （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

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图7-1清晰地表明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统一，并且在公元8～10世纪之间都经历了，或者说是遭受了类似的政治命运，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仍然快于西方。

可以证明的是，两个统一核心的政治统治都是风雨飘摇。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代和罗马时期统治者已经熟悉的课程，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是凭借欺骗和妥协实现的，但是当时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汉代一样，隋朝也要警惕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时是突厥人[7]，而非匈奴人），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不断强大，他们也要提防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当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开展秘密协商，讨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高句丽王朝，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保障以及残暴的将领指挥，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军队，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当他筹备第四支军队时，叛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转而颠覆了他的国家。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启骑士似乎挣脱了束缚。诸侯们瓜分了整个中国，突厥首领们则对他们的领地任意摆弄，随意洗劫。灾荒和疫病不断蔓延，传染病在草原之间不断传播，听上去就像是从海上带来的黑死病一样令人作呕。但是如同统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发灾祸一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出现足以结束灾祸。当时中国有一个称唐国公的诸侯，他成功地说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领们支持他攻打其他诸侯。当匈奴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时，他已经称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乱，将中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从未涉及的草原地区。国家掌控力得以恢复，人口流动扩大，疫病逐渐消失，这酝酿出了高速的社会发展，由此成就了之后的武氏天下。

唐朝运用了比隋朝更为强硬的手段，保证了统治核心的统一，但是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这种手段并不见得总是奏效。事实上，正是情感丰富的人们瓦解了唐朝。根据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所说，公元740年时，唐玄宗——“迷恋红颜祸水，最终祸国殃民”——疯狂地爱上了亲生儿子的王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并且将她封为自己的妃子。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图颠覆西周的蛇蝎美女褒姒之间的爱情一样令人生疑。但是尽管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杨贵妃宠信的人无数的荣誉，包括一个投向汉人的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唐玄宗忽视了对兵权的限制，纵容安禄山集结起庞大的军队。

考虑到宫廷争斗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当安禄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公然调动庞大的军队围攻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仓皇逃亡，但是途中愤怒的卫兵将内战的爆发归咎于杨贵妃，并要求唐玄宗处死她。唐玄宗为了防止自己的挚爱落

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着让近身的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这就是白居易所描写的“花钿委地无人拾”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根据传说，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岛追寻杨贵妃的灵魂。白居易在诗中以杨贵妃的口吻对玄宗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与此同时，唐玄宗的儿子平息了叛乱，但是他用的方法——给予其他军事统帅和安禄山一样广泛的权力，并且雇佣草原上的突厥人——为以后的灾祸留下了隐患。当时的唐朝边境瓦解，税收锐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唐朝在重建秩序和新的动乱、入侵、叛变之间循环往复，风雨飘摇。公元907年，一个诸侯杀死了年轻的皇帝，结束了唐朝的悲惨境遇。之后的50年里中国北方处在一个大诸侯国统治之下，南方则由8～10个小诸侯国控制。

玄宗的人生悲剧暴露了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强大的帝王拥有过多权力，以至于无视其他的组织机构。对于贤明的君主来说这是好事，但是考虑到能力分配的随机性以及面临的挑战之大，这意味着国家的灾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核心有着与中国完全相反的问题：帝王领导力太薄弱。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君主。穆罕默德只是先知，而非君主，人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坚信穆罕默德知道真主的旨意。当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之后，很明显人们再也没有理由追随任何人了，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联盟也面临解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几个朋友讨论了一整晚，选择了他们的成员之一作为哈里发，这个含糊不清的词语意为（真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然而，哈里发唯一的统领权来自他与前任先知的亲密程度。

考虑到阿拉伯首领难以驾驭的特性（一些人想要洗劫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有一些试图将国家领土进行分配，使其能够作为地主定居下来；另一些仍然致力于将新的先知神圣化），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可以说做得相当出色。他们劝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侵扰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将被征服的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们的领地上，把官僚留在账房内。他们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将帝国的税收分配到他们各自手中，借此为阿拉伯人——真主忠诚的捍卫者——提供有效的收入来源，并让他们居住在只有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它们是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战略点。

但是，哈里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哈里发这个指代不明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集中财富、发布命令的国王？是宗教领袖？是新征服的领地中为独立的族长提供建议的人？他们是代表前伊斯兰部落的

精英？还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选举人？还是信徒们平等主义团体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位哈里发能够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第三任哈里发在公元656年被谋杀之后，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当时还活着的，因此选举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还原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主张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互相杀戮。公元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的支持者们幻想破灭，但是他们没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相反，他们杀死了阿里。现在哈里发的头衔落到了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军队首领头上，他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进行了不太成功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情义——或者说缺少兄弟情义——招来了祸事。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将都城迁往巴格达，并且更加积极地追求集权主义。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斗使得哈里发马蒙的权力——即使在阿拉伯标准之下——异常衰弱。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没有教会阶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巨大的现世权力，但他们对真主旨意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多。马蒙决定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改变这一状况。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谋杀之后不到20年，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举起义旗，反对哈里发制度。当侯赛因被打败继而被杀死时，几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之后的100年里，一个小分支（什叶派）意识到现在的哈里发是依靠谋杀阿里而夺取职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这个分支——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鲜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真主特别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玛目这条血缘线的后代才能够引导伊斯兰教。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传统，即伊斯兰教教规——逊奈）认为这个观点荒谬绝伦，但什叶派教徒们继续宣扬他们的理论。到了公元9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这一支正将他们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间建立真主的王国的救星。

马蒙决定选择现在的伊玛目（侯赛因的来孙，即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将什叶派变成他专属的派别。这是聪明的做法，巧妙地处理矛盾且充满谋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兴趣，于是计划流产。勇敢无畏的马蒙展开了他的第二个计划：他在巴格达雇佣了一些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宗教理论家，宣称古兰经是一本由人创造的书，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手段，古兰经——以及所有的参与翻译的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裁判所[8]，逼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数强硬派的神职人员无视他的威胁，

坚持认为古兰经是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世间一切——包括马蒙的命令。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发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将他的统治撕成碎片。虽然宗教权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马蒙决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雇佣突厥骑兵作为奴隶军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发其实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奴隶军队的人质。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再也无法获取税收，最终只能把领地卖给埃米尔，这些军队将领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能够榨取的所有税收都保留下来。公元945年，一个埃米尔亲自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9]。

当时，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相同点，但是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且速度快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再一次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数以百万计懒惰、贪婪并且恐惧的人民，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并且更加安全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创伤，人民都要继续在世间得过且过，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环境完全迥异，两个统治核心的政治危机也分别以不同的结局收场。

在东方，公元5世纪以来的内部移民潮在长江以外创造了一个新边疆，并且成为东方社会发展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公元6世纪时，一个统一国家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进程，到公元8世纪时，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并安然度过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的年代。政治动乱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急剧下滑（见图7-1）就是敌军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夷为平地的后果。但是多数战争都远离主要的粮食生产地、运河以及城市，而且这些战争扫除了之前阻碍商贸行为的政府管理者，可能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发展的效果。在这种战乱年代，由于无法监管国有土地，行政人员开始从垄断者和贸易税收中敛财，也不再给商人们提供经商信息。此时权力从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向南方商人转移，被迫自生自灭的商人们由此发现了更多加速贸易发展的方式。

中国北方大多数的海外贸易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在中国宫廷和日本、朝鲜统治者之间通商。公元755年后，随着唐朝政权的颠覆，这些贸易联系随之丧失。通商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日本的精英文化开始脱离中国模式，向着更具独创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巨著，例如《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但是，海外通商的结果多数都是消极的，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国家覆灭。

相反，在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中国南方的独立商人们开拓了一条

新的自由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爪哇海发现公元10世纪时期的沉船残骸，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还有来自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陶器和玻璃制品，这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市场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区域。并且由于当地精英阶级对日益兴盛的商人们征税，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强大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也就是现今的苏门答腊岛地区和柬埔寨的高棉人居住区。

欧亚大陆以西拥有全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加上粮食产地的范围无法与东方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其政权解体也会导向全然不同的结果。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掩埋了曾经分隔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旧边界，开创了穆斯林核心的新繁荣。哈里发扩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工程，而移民将作物和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通过填闲作物的方法，农民们可以在土地上一年两收，甚至一年三收。在西西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甚至发明了经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虽然打破罗马和波斯的旧边界带来了收益，但是地中海地区出现的将伊斯兰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分隔开来的新边界又带来了损失，两者逐渐互相抵消。随着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家（公元750年时，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人民中只有不到1/10是穆斯林，截至公元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9/10），阿拉伯语成为通用语言，因此与基督教国家的联系减少了。之后，随着公元800年的哈里发王国分裂，埃米尔在伊斯兰内部也筑起了界限。一些穆斯林核心的强盛地区，比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凭借国内需求得以延续，而其他的地区则衰落了。

公元9世纪的中国战争大多避开了经济腹地，而伊拉克要与突厥奴隶军队抗争，同时非洲种植园的奴隶们在一个自称诗人、先知和阿里后裔的领袖领导下，发动了长达14年的起义，摧毁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网络。

在东方，在朝鲜和日本走向政权崩溃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统治核心也遇到了危机；同样的，在西方世界，随着伊斯兰核心的分崩离析，基督教边缘地区也开始了进一步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残杀，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并且因为新的教义问题（尤其是关于上帝是否认可耶稣、玛利亚和其他圣人的形象问题）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而日耳曼王国基本上与地中海地区隔断联系，开始创建自己的世界。

在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区，有一些人期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将这片土地变成核心地区。从公元6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成为一方霸主，北海周边相继出现了许多小的贸易城镇，以满足法兰克贵族对奢侈品永无止境的渴求。他们保持着征税少、行政管理少的落后国家形式。那些善于在好斗贵族之间调解矛盾的帝王能够迅速统一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庞大而松散的领土，而在无能君主领导之下，拥有相同条件的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如果一国的国王拥有太多子嗣，那么这个国家通常都是以众王子瓜分土地而告终——这又导致重新统一的战争。

公元8世纪末对于法兰克人来说是很好的时机。公元8世纪50年代，罗马教皇向其寻求帮助，以抵抗当地暴民；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10]甚至让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向他下跪，并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

查理曼大帝励精图治，试图创建一个与他头衔相匹配的王国。他的军队把火药、利剑和基督教思想带到了东欧，将穆斯林赶回了西班牙；同时他的官僚机构集中征税，在亚琛（一个宫廷诗人称之为“待建的罗马”）集结了一批学者，创制了稳定的货币体系，并监督贸易的复兴。这不禁让我们将查理曼大帝与孝文帝对比：三个世纪之前的孝文帝将位于中国贫瘠边疆的北魏帝国推向了顶峰，启动了东方核心迈向重新统一的历程；而查理曼大帝在罗马进行加冕礼，派遣使节去巴格达表示友好，同样表现出了如孝文帝一般的雄心壮志。法兰克编年史还记载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当时哈里发把一头大象送给了查理曼大帝作为回应。

然而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既没提到法兰克人，也没提到大象。查理曼大帝并不像孝文帝，而且显然在哈里发政权中无足轻重。查理曼大帝从未宣称为罗马皇帝，也没有让拜占庭帝国的女皇伊琳娜[11]让位于他。事实上，法兰克帝国从未向先进国家的方向深入发展。尽管查理曼大帝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没有机会统一西方核心，甚至没有机会把这个基督教边缘地区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幸的是，查理曼大帝唯一能够实现的成就就是将社会发展到足够程度，以引诱来自基督教外围地区之外更荒芜的土地上的入侵者侵略他的国家。公元814年他去世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长船沿河而上，直入帝国心脏地区，马扎尔人骑着强壮的草原矮种马洗劫德国，而北非的撒拉逊海盗正要独自劫掠罗马。亚琛备战不足，应对迟缓；当北欧海盗的船只靠岸后开始焚毁村落时，皇家军队姗姗来迟甚至索性踪影全无。渐渐的，村民们开始向当地有权势的人寻求庇护，而城镇居民们则向他们的主教和市长求助。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将帝国分成三份，国王这个称号对于他们的子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的陨落

这些劫难似乎还远远不够，欧亚大陆在公元900年之后又处于一种新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随着地球的轨道不断变更，大陆的大气压也在不断上升，减弱了由大西洋吹向欧洲的西风带以及由印度洋吹向南亚的季候风。在公元900～1300年，整个欧亚大陆平均温度大约上升了1～2华氏度，降雨量平均减少了10%左右。

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迫使人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人类自

已决定如何改变。在寒冷潮湿的北欧，所谓的“中世纪暖期”非常受欢迎，当地人口在公元1000～130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然而在更为炎热干旱的伊斯兰地区核心，它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总人口大约下降了10%。而一些地区，尤其北非地区的人口却大幅增长。公元908年，依弗里其亚[12]——大约在现在的突尼斯——脱离了巴格达的哈里发王国。激进的什叶派教徒[13]正式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法蒂玛的绝对正确的哈里发伊玛目阵线，因为他们宣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以及伊玛目）。公元969年，这些法蒂玛的后裔征服了埃及，在开罗建造了一座伟大的新城，并发明了灌溉系统。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已经拥有了当时西方最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埃及商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呈扇形扩散开来。

1890年，如果开罗的犹太人团体没有下定决心重塑延续了900年的犹太人集会，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群商人知之甚少。和许多犹太人集会一样，这里的集会也有一个储藏室，里面保存着信徒们不再需要的文件资料，从而避免了因损毁印有上帝之名的资料而亵渎神明。一般来说，储藏室会定期清理，但是这里的储藏室却堆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废纸。随着重塑运动的开始，旧文件开始在开罗的古董市场出现。1896年，两个英国姐妹将一大捆资料带回了剑桥。在那里，她们把两本书展示给剑桥大学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学者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Schechter）。谢克特一开始心存疑惑，随即大为惊叹：其中一本是圣经书籍《德训篇》（*Ecclesiasticus*）的希伯来残本，以前只有希腊翻译版本为世人所知。这位学识渊博的博士立刻于当年12月前往开罗，运回了14万册资料。

在这些资料中，有数百封公元1025～1250年期间的信件，最远是从西班牙和印度寄到开罗的贸易商行。当时随着人口增长，市场和利润也不断扩大，于是紧随阿拉伯的征服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日渐消弭。这对于通信者来说显然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更担心的是天气、家庭和如何赚到更多金钱，而非宗教和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有地中海商人的典型特点。尽管记载很少，但是很显然，商贸发展和依弗里其亚以及西西里一样国际化且利润丰厚，例如，穆斯林地区巴勒莫就成为与意大利北部的基督教地区通商的新兴城镇。

就连蒙特帕里卓，这个近年来我一直在调查挖掘的意大利西西里的偏远山村，也参与其中。正如我在第五章提到的，我曾经前往调查公元前7～前6世纪间的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地，但是当我们在2000年开始挖掘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古老的房屋之上又发现了第二层村庄。这第二层村庄大约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可能是由来自依弗里其亚的穆斯林移民所建，并且在1125年左右被焚毁。出乎意料的是，在对该遗迹出土的碳化植物种子进行仔细研究时，我们的植物学家们发现了一间曾经装满了被仔细保存的脱粒小麦的储藏室，里面几乎没有一根杂草。[14]这与我们找到的公元前6世纪的种子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时的种子总有许多杂草、谷壳混杂其中。这些被用于制作粗糙的面包，有可能是在某个简陋的农村中作为粮食：那里的村民从事耕作，自给自足，而且从不介意他

们的食物偶尔出现的不佳口感。12世纪发明的扬谷筛除去了小麦的杂质，当时的商业化农民已经开始为挑剔的城镇居民生产食物。

如果地域狭小的蒙特帕里卓能够与全世界商业网络相联系的话，那么地中海的经济一定会蒸蒸日上。但是在亚洲西南这块最古老的穆斯林核心地区，经济发展并不理想。自从公元9世纪60年代起，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伊拉克的哈里发带来充当军队的突厥奴隶们已然发动政变，摇身一变成了苏丹人，但是噩梦还在继续。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就开始向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扬穆罕默德的真理；到了公元960年，葛逻禄氏族——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据说当时大约有20万户人口——大部分人都被转化成伊斯兰信徒。这是信仰的胜利，但是很快演变成政治家的梦魇。葛逻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喀喇汗帝国，而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也追随着他们的信仰，进行了移民：他们一路洗劫，直入伊朗，并在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15]到1079年，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又将法蒂玛人赶出叙利亚。

很快，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世界与日益兴盛的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渐行渐远。塞尔柱突厥人集结起一个大国，但甚至比哈里发王国还要运转不良。1092年，这个国家的强权君主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遵循草原传统，将国家分为9部分，彼此交战。在他们的战争中，骑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塞尔柱国王们将大片土地赏赐给那些能够为其提供大批骑兵的军队首领。这些游牧民族将领，如预料的一样，导致政务荒废，商贸停滞，甚至连铸币活动也停顿了，城市萎缩，灌溉运河淤塞，大量村庄倾颓。在中世纪暖期炎热干燥的气候里，农民们必须持续性地艰苦劳作，却只能勉强保持原先的土地不变成草原或者荒漠，但是塞尔柱政策又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许多偏爱游牧生活多于城镇生活的征服者，对于农业的荒废并不担忧，并且随着12世纪逐渐过去，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加入突厥人当中，开始从事畜牧业。

在接连几年灾祸不断之后，由于对激进的什叶派理论的恐慌，伊朗东部的学者们开始建立学派，发展并传授连贯一致的逊尼派理论，这得到了塞尔柱贵族的支持，并在12世纪时大力推广。它的学术代表作——例如，安萨里（al-Ghazali）的《宗教学科的复兴》（*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of Religion*），其中运用希腊逻辑学知识来调和伊斯兰法律体系、苏菲神秘主义和穆罕默德的启示——一直以来都是逊尼派思想学说的基石。事实上，逊尼派的复兴非常成功，以至于一些什叶派教徒坚信谋杀逊尼派领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回应方法。撤退到伊朗的山区后，他们组建了一个被对方称为“刺杀者”的秘密组织（根据传说，用这个称呼是因为其成员借由吸食大麻，将思维引领向谋杀的“正确框架”之下）。

谋杀无法逆转逊尼派复兴的脚步，但是这场知识运动——尽管已获取成功——仍然无法维持一个塞尔柱国家的运作。缺少法蒂玛王国为北非提供的那种政治组织，塞尔柱的土地在中世纪暖期的重压之下不堪重负。时机选择不当，因为同样的天气情况为亚洲西南部制造了同样的挑

战，却为欧洲边缘伊斯兰核心地区的人们，即那些难以驾驭的袭击者、商人和侵略者创造了众多机遇。同样关键的是，更加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好的收成，这使得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将曾经的森林开垦成可供耕种的广袤土地，在西欧大约砍伐了一半的树木。

和所有从侧翼丘陵区传播开来的农业一样，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共同作用，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西欧带到东欧。一股力量是通常由教会领导的殖民统治，一般在边境地区建立有序的组织机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写道："给予僧侣们一块荒野或者一片野林，然后等待几年，你不仅会发现美丽的教堂，而且旁边还有人类居所。"扩张是贵族的工作：根据1108年开展的征兵运动，"异教徒是最低劣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最理想的，那里到处充斥着肉类、蜂蜜和面粉……在这里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通过强迫异教徒改变信仰），只要你愿意，还能够获得非常理想的用以定居的土地"。

有些异教徒逃脱了，有些屈服了，其结局并不比奴隶好多少。但是就像几千年前狩猎采集者遭遇了农业生产者、西西里岛人遭遇了希腊殖民者一样，有时异教徒们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随着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农民向东迁徙，砍伐树木，开垦牧场，一些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遥远的俄罗斯村民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利用更加有利的天气条件展开更为密集高效的耕作方式。皈依基督教的首领们劝说或强迫他们的臣民纳税，并且陆续展开对殖民者的打击活动。

欧洲的国家、教堂以及密集型农业的不断扩展与公元5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扩展很类似，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在新的农业边界和旧的城市核心之间构建主要的贸易通道。由于欧洲缺少像中国的大运河那样的水路运输方式，因此无法将波兰的粮食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运送到巴勒莫和开罗这样的大城市。西欧的城镇靠近这些农业边界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依旧存在数量不足、规模太小的问题，因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这些西欧城镇没有从东欧进口粮食，通常它们会通过提升当地生产水平、开拓新能源的方式来进行种植。

水力磨坊原本常见于伊斯兰核心地区，现在也传播到了基督教边缘地区。以公元10～13世纪为例，法国罗贝克山谷的磨坊数量增长了5倍。根据1086年编著的《土地调查册》（*Domesday Book*），当时的英格兰拥有5624家磨坊。农民也认识到了马匹的优势，尽管它们吃得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快并且工作时间更长。公元1000年之后，马的数量逐渐增加到牛的3倍，欧洲开始采用——由于第八章已经讲述过的原因——穆斯林发明的、用以减少摩擦的马蹄铁，又用脖圈马具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带马具，从而使马的牵引力提高了4倍。公元1086年时，英格兰贵族土地上仅有1/20的役畜；到了13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并且由于拥有多出的马力（更不用说多出的粪肥），农民有效地减少了荒废的土地数量，因而在他们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多财富。

尽管欧洲的农场相较埃及和中国来说不够多产，但也逐渐出现剩余产品可供卖给城镇，并且这些发展中的城镇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许多西北欧人民都是农奴，法律规定农奴必须为地主劳作，地主保护农奴不受强盗（和其他地主）的掠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地主像诸侯国君主一样，他们拥有土地，作为装甲骑兵为国家而战以报效国王，而国王服从于传达上帝指令的教会。但是地主、国王和教会都想获取更多财富，他们如今聚集于城镇之中，城镇居民通常能够用一部分财产换取摆脱封建义务的自由。

就像亚述和周朝以来的落后统治者一样，欧洲的国王们有效地经营着他们的勒索保护费组织，但是他们的管理甚至比多数前人更加混乱。城镇、贵族、君主和教会人员不断地互相干涉，并且由于缺少真正的中央权威组织，争端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元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称他拥有德国所有主教的任命权。他的目的是改革教会领袖的道德操守，但是由于主教控制着德国大片的土地，这个举措也起到了其他的作用，它使格雷戈里掌控了德国许多的资源基地。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在恐慌中回应，他宣称他是信仰的守护者，并且有权将格雷戈里免职。他坚称："现在，不再是教皇，而是我，亨利，托天之佑，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向你们宣布：免职！免职！"

然而，格雷戈里非但没有被免职，反而将亨利驱逐出基督教会。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的封建地主能够在法律上无视其统治者。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事无成，亨利不到一年时间就沦落到极其凄惨的地步，他要赤着脚在阿尔卑斯修道院之外的雪地里跪三天以祈求教皇的原谅。他这么做了，但随后又与教皇开战。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教皇格雷戈里在他的雇佣兵洗劫罗马之后，没有钱支付给雇佣兵，因此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国王为躲避亲生儿子的追杀，在逃亡过程中自杀。这个神学争议从未真正解决。

11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种乱成一团的挣扎，但是随着这些争端被解决，组织机构的实力逐渐强大，责任范围也日渐清晰。国王越来越多地在领土上进行组织、调动和征税。一位史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一个迫害社会的形成"：官员们说服人民，视自己为国家明确界定的一部分（英国人、法国人等），而非其他部分——即流放者，诸如犹太人、同性恋、麻风病人和异教徒，这些群体首次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国家保护之外，并且受到恐吓威胁。在这种不甚愉快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国家。

其他史学家对这个过程评价较高，称之为"教堂时代"，因为令人心生敬畏的纪念碑散布于整个欧洲。1180～1270年期间，仅法国就建造了80座教堂、500座修道院以及数万座教区教堂。当时，从采石场采集了超过4000万立方英尺的石料，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所用的石料数量。

随着罗马帝国一起衰败的还有西欧的学术水准，而且只有在查理曼

统治之下的法国得以部分恢复。然而公元1000年后，教师开始在新建大教堂周围聚集，并且像伊斯兰世界的独立法学者一样建立学校。赴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学习的基督徒们带回了阿拉伯宫廷学者珍藏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论述翻译。这一切充实了基督教的精神领域，帮助神学家以9世纪马蒙统治下的巴格达神学家那样复杂的方式看待上帝，但是这也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中制造了新的矛盾。

在这一问题上，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一个涉足新的知识领域的聪慧的年轻人，阿伯拉尔在1100年左右开始在巴黎为人所知。他不断地转学，并且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难他的那些迂腐学究派的老师，借此羞辱他们。诚实正直但是单调乏味的老师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事业陷于崩溃，因为二十几个像阿伯拉尔一样的学生运用他们如刀锋般锋利的辩论技巧，将惯例习俗（可能是每个人灵魂的归宿）变成重重疑团。阿伯拉尔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引诱了他的学生海洛薇兹（Heloise），并使之怀孕。海洛薇兹的家族颜面尽失，对他进行了报复。阿伯拉尔羞耻地说：“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熟睡时，他们切下了我用来做那件事情、他们厌恶至极的器官。”

阿伯拉尔和海洛薇兹羞愧难当，各自退居教堂，但他们在20年间保持通信，阿伯拉尔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又炽热地爱恋着海洛薇兹。在被迫隐退的期间，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Sic et Non*），一本将逻辑学应用于基督教矛盾的手册。如果说阿伯拉尔的名字变成了学习新知的危险的代名词，那么也是他迫使基督教神学家把卷宗权威性与亚里士多德唯理主义互相融合。1270年，阿奎那（Aquinas）在其著作《论基督教神学》（*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将其进一步升华，指出基督教的学术和逊尼派复兴的学术同样错综复杂。

其他欧洲人的做法与阿伯拉尔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没有从伊斯兰核心地区把思想和组织形式带回基督教边缘地区，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兰核心地区。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与来自开罗、巴勒莫的商人们争抢利润可观的地中海贸易，他们买入卖出，抑或偷盗厮打。在西班牙，那些来自日益拥挤的西北欧的移民帮助当地的基督徒，将穆斯林驱赶出去，而诺曼人（或许是古代挪威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引发了一系列的掠夺和征服。

诺曼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维京人的后代，公元9世纪时在欧洲西北偏远的边疆地区，他们曾经作为掠夺者盛极一时，但是在10世纪发展为更加文明形式的偷盗者。随着中世纪暖期北美洲北大西洋的水域逐渐开放，他们搭乘长船来到冰岛、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的文兰，大规模地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定居。公元912年时，他们的首领罗洛（Rollo）在法国北部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当的国王（现今的诺曼底）。

诺曼人在信仰的细节问题上一直都含糊不清，他们在公元931年的

罗洛葬礼上用100名俘虏做祭祀，但是他们的野蛮骁勇使他们成为理想的雇佣军，声名远播至君士坦丁堡。公元1016年，他们受雇参与攻打意大利南部的无止境的战争，却同时与交战双方作战，随后诺曼人构建起自己的国家，在公元1061年逼近西西里，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抵制穆斯林侵占者的近乎种族灭绝的战争。如果你现在游览西西里，你会发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统治的唯一纪念碑，这个岛屿曾是地中海地区的奇迹。

诺曼人对伊斯兰教并无特殊的敌意，他们对待基督徒也同样恶劣。一位意大利作家称他们为“一个无人性、野蛮、残暴且可怖的种族”。拜占庭的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对此更为震惊，她写道：“只要有战役和战争发生，诺曼人的心中就会发出咆哮声，他们无法克制自己。不仅士兵，就连首领们也无法抗拒地扑向敌方。”

拜占庭人艰难地认识到了诺曼人的特性。在公元9～10世纪，随着伊斯兰世界转向内部斗争，拜占庭帝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公元975年，一支拜占庭军队甚至攻入了耶路撒冷近郊（这支军队没能占领圣城，但是夺回了耶稣的便鞋和施洗者乔治的头发）。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拜占庭变得极度依赖诺曼雇佣兵，而诺曼雇佣兵的不可信赖（尽管他们很凶猛，但很多人在战时却临阵退缩）造成了公元1071年拜占庭灾难性地惨败于匈奴人手下。20年后，君士坦丁堡受到匈奴人的围攻，拜占庭的国王写信给罗马教皇，希望教皇出手相助，资助更多雇佣兵。然而教皇并不这么想。教皇寻求的是巩固自身地位以和欧洲的君主们抗争，因此他在公元1095年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了远征的想法——十字军东征——旨在将突厥人赶出耶路撒冷。

这引发了极度狂热，事实上这种狂热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帝国的预期。数万村民开始向东进发，洗劫中欧地区，沿途屠杀犹太人。只有少数人到达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当年突厥人屠杀他们的地方。除了奴隶以外，没有人到达圣城。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法国和诺曼武士组成的三支军队，由热那亚商人资助，公元1099年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合。他们的时间配合近乎完美：塞尔柱人疲于内战，无暇抵抗，因此他们在几轮惊险的试探之后，最终攻破了圣城的城墙。长达12小时的烧杀抢掠中，他们将犹太人活活烧死，或者将其肢解（据一名犹太妇女观察，这些基督徒至少没有像突厥人那样首先强奸受害者），残忍行径甚至使军中的诺曼人都瞠目结舌。最终，到了黄昏时分，征服者们过深及脚踝的血水，来到圣墓堂感谢上帝庇佑。

虽然东征规模浩大，但是这次针对核心地区的直接侵袭并未严重威胁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国家步步退缩，直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领圣城。之后还有多次东征，但是多数以失败告终。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由于无法承担船只费用，只得把军队借给威尼斯投资家，用以劫掠君士坦丁堡，而非耶路撒冷。东征和拜占庭帝国都再也没能从失败

中复原。

西方迫于中世纪暖期的压力，改变了地理形态。伊斯兰地区继续作为核心存在，但是随着西南亚的社会发展停滞，伊斯兰教的重心开始向地中海地区转移，甚至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各有成败。埃及成为伊斯兰统治皇冠上的宝石；拜占庭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最终陨落；粗鄙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区在所有地区中扩张最为迅速。

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

东方核心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公元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个将领，但是他认识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已经使许多精英阶级人士感觉到中国理应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只要时机恰当，他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响应他，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运用武力，他也及时地加以利用。但与前人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情况不同，当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官方史料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随后“杯酒释兵权”。表面上，他向这些将领敬酒，恭贺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将领事先完全不知情）。实际上，他将这些将领解职，撤销其兵权。就这样，宋太祖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时，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

宋朝从军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整个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核心。和之前的几个朝代一样，宋朝持续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并未真正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这与宋太祖的设想背道而驰。

一些将领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火药原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材料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寻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画作描绘了人们使用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的情景。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

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弹弓发射。然而，这种火药的杀伤力不强，而且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而敌人却几乎毫发无损——至少当时如此。

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使中国深陷动乱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热衷，他们认为这种热衷带给中国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会混乱。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坏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

公元819年，学识渊博的诗人韩愈写了《谏迎佛骨表》呈给皇帝，以表达他对于大众歇斯底里情绪的恐慌，这种情绪爆发是因为宪宗要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韩愈称：“佛者，夷狄之法耳。”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他就宣称：“当时群臣才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然而，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为优秀。知识分子们学着去思考、描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能力。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并且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对佛教的抵制是充满争议的，但也是合理的。佛教寺院已经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到了公元9世纪40年代，唐武宗开始灭佛时——解除僧职，关闭寺庙，掠夺财富，他更多的是基于财政压力考虑，而非被学者对佛教的严厉谴责所打动。官方的态度使得像韩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格外令人尊崇。数百万的佛教徒继续存在，但是还有数百万对这个外来宗教充满疑惑的中国人，他们认为佛祖关于人生的重大问题的答案——诸如，真正的我是怎样的？我要如何适应这个宇宙？——有可能隐藏在他们自己的儒家经典中某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并由此受到激励。

一种儒学复古运动横扫贵族阶层，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项人入侵时，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样挺身而出，为统治者提出宝贵建议。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忘却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时此刻就是一切，满足感来源于人世的行动。有人总结说：“真正的学者，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儒学复古运动将经典学说变成了完善社会的行动指南。他们宣称，拥有哲学和艺术技能，并且能够正确地理解古典文化的人，才能够运用古典道德，从而拯救当今世界。欧阳修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幼年时期偶然发现韩愈的文章，随后创造了他自己的“古代散文”风格，并成为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以及收藏家，一路加官晋爵，拥护财政和军事改革。

众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为卓越出众的当数考古学先行者、伟大的散文家以及宋朝宰相王安石。王

安石树敌众多（包括欧阳修在内），他们攻击他，说他是粗鄙、令人反感且卑鄙肮脏的，并最终导致王安石声名狼藉，惨遭流放。然而，王安石激进的新政策——相当于在11世纪将罗斯福新政与里根经济政策相结合——真正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王安石抨击税收制度，并实施了更为公正公平的税收系统，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他投资众多公共事业，提倡“青苗法”，国家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贷资金；他用更廉价的民兵替代昂贵的职业军人，由此平衡预算。当遇到保守官员的反对阻挠时，他就用新官员取而代之。他还在行政人员考试中加入了经济学、地理学和法学内容，建立新学校教授知识，并为通过考试者增加薪俸。

尽管儒学复古运动的成就非凡，但是与同时期盛行的第二波发展进程——一次可与古罗马媲美的经济繁荣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中国的几乎所有地区来说，中世纪暖期无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积物、石笋化学物和古籍记载都表明，半干旱的北部地区降雨量增加，这正是当地农民所希望的；而潮湿的南方降雨量减少，也符合该地区农民的期望。因此，到1100年时，中国人口大约上升至1亿人之多。

截至1100年，公元6世纪时《齐民要术》中提及的37种水稻全部被高产的变种水稻所取代，农民们有规律地将水稻与小麦相间种植，每年可以从受过灌溉和施过肥的土地收获三季作物。不断延伸的道路网络——城市内部的道路通常由石料筑成，有时甚至乡间道路都使用砖石——使得粮食向港口运输的过程更为便捷，并且水路运输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的造船工人模仿了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船只的长处，建造出拥有密封层、4根甚至6根桅杆以及多达1000个强壮船员的大型远洋航行船只。船运费用不断攀升，商人们因为大规模贸易活动而聚集起来。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家所说：

> 通过互相连通的河流与湖泊，人们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当一艘船驶离港口，行驶一万里之遥都无任何阻碍。每年，百姓将耕种和食用之外的剩余粮食用于交易。大商人囤积平常人家缺少的东西。小船从属于大型船只，并参与联合经营活动，来回往复，通过卖粮获得可观收益。

但是，这一切都要花钱，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试图铸造足够的铜币。结果，对新铜矿资源的挖掘（以及在铜币中掺杂铅的不甚光彩的行为）使得铜币的产量由公元983年的3亿枚飙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亿枚，然而依旧供不应求。

人的贪婪和懒惰拯救了危局。公元9世纪，在茶叶贸易开始大行其道、国家商业监管松弛的情况下，四川的商人开始在长安设立分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将买卖茶叶所得货币兑换成“飞钱”，也就是当时的纸质付款凭证。回到四川之后，这些商人可以在总部将这些票据换成现钱。设想一下，一袋飞钱价值相当于40袋铜币，这样一来飞钱的优势立现，随

后商人们开始凭借自身实力，普遍使用这种票据。他们发明了信用货币，即价值依赖于使用者的信用而非自身金属含量的代币。公元1024年，宋朝政府实施了合理的下一步计划——开始印刷纸币。很快，发行的纸币数量超过了铜币。[16]

随着纸币和信用货币深入乡间，买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更多的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收成最好的作物，将它们卖掉换钱，再购入他们无法轻易生产出来的物品。一个和尚在偶入一个偏远村庄小型集市后，这样描写道：

朝日还未从湖面升起，

荆棘丛生，一瞬间仿佛绵延无尽的松林。

幽暗中，古木伫立于悬崖之巅；

猿猴荒凉的呼喊随风飘荡下来。

山回路转，一座山谷映入眼帘，

在远处，有一处村庄隐约可见。

沿途到处都是笑声和叫喊声，

雇农们你追我赶，

准备在长达数小时的集市上斗智斗勇。

摊位和商铺众多，仿佛云彩一般，

他们带来亚麻织物和桑树皮做的纸，

或是向前驱赶着母鸡和乳猪。

条条道路上，遍布着刷子和簸箕——

各种家什不可胜数，简直难以用纸记录。

一位老者管理着这场繁忙的交易，

每个人都对他的一言一行心怀敬畏。

他谨慎小心地比较，

对交易物品一一检查，

在他的手中慢慢翻转。

当然，城市的市场更为广阔，吸引了半个大陆的商贩。西南亚商人将位于泉州的港口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印度洋群岛连接起来，然后从这些地方向中国所有城镇输送进口商品。为了支付其费用，家庭作坊生产出丝绸、瓷器、漆器和纸张，其中最成功的那些作坊进一步升级成工厂。甚至在村庄都可以购买到书籍这一类原本近乎奢侈的物品。到了公元11世纪40年代，雕版印刷生产出数百万册相对廉价的书籍，这些书籍随后大量发行，甚至进入平民百姓手中。当时中国的文化水平可与1000年前的罗马相抗衡。

然而，最重大的改变是在纺织和煤炭行业，准确地说是在那些推动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活动领域。11世纪的纺织者发明了脚踏缫丝机，1313年，学者王祯在其著作《农书》中描述了一种大型纺纱机，可以用畜力或水力带动。王祯批注说："这种机器成本比它所代替的女工成本要便宜得多，可以应用于中国北方生产麻布的大部分地区。"王祯将他的技术记录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借以抒发他的震惊之情：

车纺工多日百，

更凭水力捷如神。

世间麻欵乡中地，

好就临流置此轮。

把18世纪法国的纺织机设计图与14世纪王祯的设计对比之后，经济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不得不承认："法国纺织机与王祯所设计机器的相似程度惊人，以至于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疑惑——纺织机其实始于中国。"尽管王祯的纺织机不如法国的高效，但是伊懋可总结道："如果这部织机所代表的阵线能够进一步延长，那么中国将会比西方早400年进入真正的纺织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

由于缺少宋朝纺织生产和价格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考察该理论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获得了其他行业的相关信息。当时的捐税收入表明，铁产量在公元800～1078年间增长了6倍，高达12.5万吨——几乎和整个欧洲在1700年时的钢铁生产总量相同。[17]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开封城，炼铁厂围绕着主要市场聚集起来，炼出的铁（在多种用途中）被制成军队所需的武器。因为开封位于大运河畔，地理位置便利，因此被选为都城。尽管开封城历史并不悠久，没有绿树成荫的大道，没有以前的都城那样雄伟恢宏的宫殿，也没有吟诵开封的诗歌传世，但是在11世纪时，开封发展为一个繁华、喧闹且充满生机的大都市。从夜晚直到凌晨时分，吵闹的酒肆长时间供应酒水[18]，50家剧院各自吸引着数千观众前往，商铺甚至占据了城市的一条主要大道。在城墙之外，铸造厂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火焰，黑暗的作坊喷射出火苗和浓烟，消耗数万棵树木，将矿石熔化成铁水——事实上，燃烧的树木数量极多，铁器制造者买下整座山后将树木全部砍伐殆尽，因此将木

炭价格哄抬到普通家庭无法承担的程度。公元1013年，发生了一场由燃料引发的暴动，受寒冷侵袭的开封百姓有数百人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显然，开封进入了生态瓶颈阶段。在中国北方并没有足够多的树木，来同时供给数百万人吃饭、取暖以及维持炼铁厂数千吨铁的正常生产。眼下有两个选择：第一，开封人以及/或者炼铁业逐渐搬离此地；第二，有人能够发明或寻找到新的燃料来源。

在智人生存的时代，他们总是凭借对新的植物和动物的开拓，供给食物、衣服、燃料和居住地所需。之后，人类已经成为更有能力的寄食者。以公元1世纪的汉代和罗马帝国的臣民为例，他们每人获取的能量是其冰河时期先祖在14000年前获取的能量的七八倍之多。[19]汉代人和罗马人还学会了利用风和潮汐来发动船只，以获取他们生活所需的动植物，并且学会了在磨坊中运用水力。然而，公元1013年受寒冷之苦而暴动的开封人基本上还处在一种仅靠其他生物供养的阶段，在能量链条中他们并不比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者高多少。

在几十年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将开封的铁器制造者变成了变革者。1000年前的汉朝时期，已经有一些中国人开始利用煤炭和沼气，但是这些能源并未被广泛使用。只有当贪婪的炼铁工厂与炉灶、家用能源消耗争夺能源时，炼铁产业才实现了从古代有机经济向矿石燃料新世界的跨越。开封靠近中国两大煤矿储备地，又临近黄河，拥有便捷的交通，因此它并不需要天才——只需要贪婪、绝望以及反复尝试——来解决如何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铁矿石的问题。资金和人力在定位、挖掘以及搬运煤矿的过程中也极其关键，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商人（拥有资源的人）引领时代潮流，而非住户（不拥有资源）。

一首写于公元1080年左右的诗歌使我们对这次变革有了一定的认识。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骨干。

湿薪半束抱衾，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煤炭业和炼铁业同步发展。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四川的铸造厂雇用了3000名工人，每年将35000吨矿石和42000吨煤炭铲入熔炉，炼出14000吨生铁。到了公元1050年，煤矿挖掘范围扩大，家家户户都开始使用煤炭。政府在公元1098年重新修订贫困救济准则时，煤炭也成为官方唯一提及的燃料。在公元1102～1106年间，开封开辟了20个新煤炭市场。

到那时候，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以前古罗马时期的顶峰。而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两大核心仍然呈现分裂局面，远远落后于东方的发展进程，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中国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开封被煤灰熏黑的城墙下酝酿着，并且将把东方在社会发展上的领先优势转化成东方统领世界的局面。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是要将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而非将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

[1] 令人困惑的术语再次出现。鲜卑人的名字来自第五章提过的古代魏国（公元前445～公元前225年）。为了将鲜卑人与之前的魏国区分开来，一些史学家将鲜卑人称为拓跋魏国（名字源于统治国家的鲜卑氏族）；另一些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北魏，在此采用后一种说法。

[2] “文书工作”这一词语的使用是正确的。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发明了纸，真正的纸在公元7世纪开始普及。

[3] 当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重新构建行政机构时，自觉地引用了类似的考试机制，用以测试年轻人对希腊和拉丁文经典的了解程度，之后再将那些聪慧的年轻人送去统治印度。直到现在，英国的政府公职人员仍被称为Mandarins（说普通话的人）。19世纪的保守派将考试视为将英国“中国化”阴谋的一部分。

[4] 其实瘟疫是由人类传播的，而非老鼠。在两年的生命期限内，平均每只老鼠走过的距离只有1/4英里。如果老鼠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每个世纪瘟疫传播的范围都只能前进12英里。

[5] 史学家用突厥人这个词来描述现代土耳其人的草原游牧祖先，他们在公元11世纪才迁徙到现在的土耳其地区。

[6] 这个术语是指一性论，来自希腊语中的“一个本性”。

[7] 他们是突厥人的远方亲戚，这些突厥人居住在大草原另一端，曾经受雇于赫拉克利乌斯，并于公元7世纪20年代侵略美索不达米亚。

[8] 针对穆斯林于公元7世纪征服的、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命名问题，史学家一般将它的希腊名“美索不达米亚”转换为阿拉伯名“伊拉克”。

[9] 哈里发对巴格达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258年（在开罗的“影子哈里发”一直持续到更晚的时期），但是和公元前771年中国的周王一样，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埃米尔一般在他们周五的祈祷仪式上会提及哈里发，其他时候则无视其存在。

[10] 查理曼大帝的真名是加洛林（Carolus），查理曼是加洛林·马格纳斯（Carolus Magnus）的法语化版本，意思是“查理大帝”。

[11] 伊琳娜可以说与狄奥多拉和武则天棋逢对手：她在公元797年把亲生儿子的眼睛挖了出来，使他失去成为统治者的资格，由此夺取王位。

[12] 依弗里其亚是非洲的阿拉伯化说法，是突尼斯的罗马名字。

[13] 就激进的意义而言，这里指的是那些经常动用武力，反对他们所认定的逊尼派非法政权的伊斯玛仪什叶派，而不是指那些以更平和的方式等待隐藏着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归来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

[14]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汉斯-彼得·斯蒂卡（Hans-Peter Stika）为这些研究发现所做的分析。

[15] 在直译突厥名字时，有几种方法；一些史学家倾向于Qarluq、Qarakhanid和Saljuq，而不是Karluk、Karakhanid和Seljuk。

[16] 宋朝发行了大约10亿枚铜币以及价值12.5亿枚铜币的纸币。在国家3.6亿铜币储藏量的

担保之下，这些纸币可以完全兑换成铜币。

[17] 11世纪的税务登记极难解读，一些史学家认为增长没有这么多。然而，没有人否认当时的税收增幅巨大，并且最终被用于能源领域。

[18] 在1063年宵禁被解除之后。

[19] 在东方，人均能量获取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的每人每天（各种用途）大约4000千卡（社会发展指数4.29分）上升至公元前1世纪时的27000千卡（29.35分）；在西方，人均能量获取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几乎相同的水平上升至公元前1世纪时的大约31000千卡（33.70分）。

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中国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河流上的船只比基督教国家所有河流上的船只还要多，运载着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食物，这些食物精致得几乎令人无法相信。中国少女谦逊端庄，中国妻子善良美丽，杭州妓女的热情好客也让外国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中国的商业。“我可以非常老实地告诉你，”马可波罗说道，“中国的商业规模之大，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有人相信。”

于是，问题产生了。1295年，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那些等着听他故事的人，事实上并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马可·波罗大部分的描述还是和我们在图8-1中所见的一致。马可·波罗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正远远领先于西方的社会发展。

虽然马可·波罗惊叹于东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并不知道。首先，它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社会发展指数从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预见的那个情形——东方的铁器制造商和磨坊主将开始工业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并没有发生。虽然马可·波罗对中国火炕燃烧用的煤炭感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的肥鱼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样感兴趣。尽管他所描述的这片土地令人惊叹，但是它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模式。最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欧洲人就要来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声称自己到达了中国，虽然他到达的是美洲。1513年，哥伦布的侄子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为第一个真正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在哥伦布登陆和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过东方之间，经历了三个世纪。这一章揭示的漫长时期并不是东方时代的结束，甚至不是东方衰败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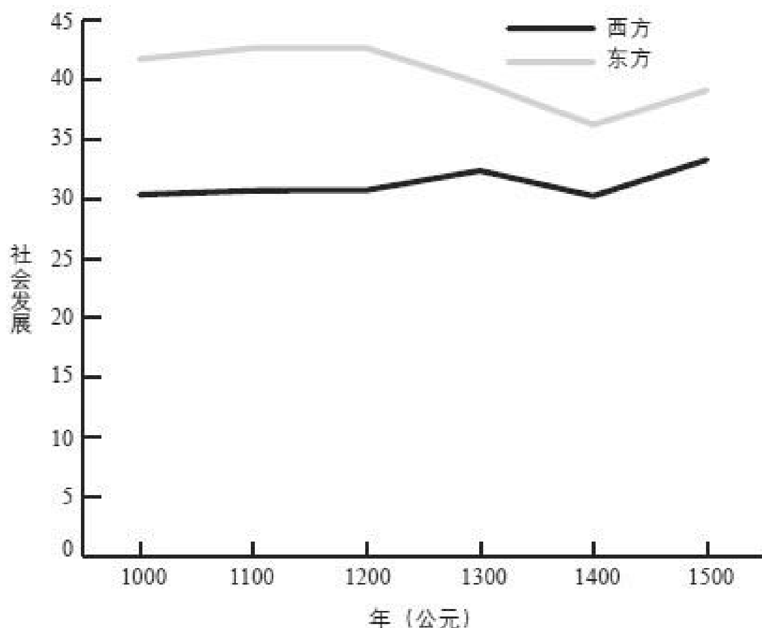


图**8-1** 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日益缩小的差距：贸易、旅游以及动荡时期再一次将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欧洲

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点在开封。这个城市的城墙在铁锤和炮弹的攻击下变得满目疮痍。没人知道在这场大风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城墙上的中国防御者们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开火，试图击退向他们逼近的敌军。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击——有的被烧，有的被比弓箭还锋利的石头砸伤——但是进攻者踩在尸体上继续前进，重整队伍。女真族是中国北部边界的最新威胁，他们习惯了面对糟糕的情况。在城墙内，虽然有100个人倒下了，但是四处遍布的尸体并没有令防御者失去信心。但接下来军官们逃散了，谣言四处散布。没多久，传来了攻城塔的声音以及毒箭的嘶嘶声。我们不知道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尖叫着从城墙里跑出来，拼命地四处逃散。敌人攻入了城内，烧杀抢掠。宫殿里的很多女人宁可投水自尽，也不愿忍受将要发生的事，但是皇帝就这么等着被俘虏。

开封的沦陷是意料之中的。尽管在11世纪，宋朝经济繁荣发展，但是与北部边境的契丹族无休止的战争给宋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历代皇帝只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方式进行赔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当“野蛮的女真族”提出帮助攻打契丹族时，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该担心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里已经从落后地区的农民变成了令

人闻风丧胆的骑士，但他并没有。宋徽宗精通音乐、绘画和书法，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们醉心于政治斗争，并不理会铁一般的事实。对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创造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后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残余的宋朝大臣没有坐船逃窜的话，他们也会被这个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当时控制中国北部）和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划分了边界。

开封的沦陷以及之后南北贸易受到破坏，意味着在整个12世纪社会基本没什么发展。虽然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并没有崩溃。开封迅速地从这场浩劫中恢复过来，甚至一度成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发展成了一个大都市，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南部的煤田产量虽然没有北方煤田的产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观。12世纪的工业家已经懂得如何在生产铁的过程中利用更加廉价、劣质的煤炭，甚至还懂得如何从铁加工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副产品中提炼铜。贸易、纸币、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

铁木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木真于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手中夺走了诃额仑，使她生下了铁木真。铁木真名字的由来是在他出生时，也速该正好俘虏了敌对部族的一位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当时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铁木真之名即由此而来。铁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离营地的时候，把他给忘了，直到一年后才回来找他。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儿族杀害，塔塔儿族还赶走诃额仑，偷了她的动物，使她挨饿。铁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给诃额仑充饥。他还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根据部落的规定，他的兄弟有权娶诃额仑为妻。之后，铁木真被贩卖为奴隶，等他逃出来之后，未婚妻已经被抢了，肚子里可能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铁木真把抢夺她的人杀了，把她夺了回来。[1]

铁木真是一个铁血铮铮的男子汉，否则的话，蒙古人也不会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无畏的领导者”——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心理专家都认为，他夺权的道路（杀死自己的胞弟札木合，无视亲族要求改变战争，以及在争吵中和他的酒鬼儿子反目）与他早期的家庭经历不无关系。

在某些方面，两千年里，蒙古草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和他之前的首领一样，成吉思汗一方面害怕宋朝，一方面又觊觎它的财富。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袭击宋朝北部的女真国，并且利用战利品贿赂其他的蒙古领袖，让他们追随他。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这个历史规律，即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半个世纪以来，定居在这里的中国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镇，引进了灌溉技术和犁。农民从游牧民那里获得土地，而游牧民从农民这里学会了制造武器。

很显然，在这样的交易中，游牧民占了上风。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成吉思汗——这个最了不起的游牧首领——知道如何将城里的技师和他的骑兵部队完美结合起来，使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经从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尔加河。根据一个波斯人所见，成吉思汗就像“从纸上抹去字迹”那样轻易地扫除障碍。蒙古人所经之处“都变成了猫头鹰和乌鸦的栖息地，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会发展指数来告诉他宋朝是个适合抢掠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试图偷走一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宋朝北部都变成蒙古马驹的冬季牧场。1215年的时候，他摧毁了90多座城市，放火烧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个月。不过，在他死后，统治者开始认为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并向他们征税，获得的回报更大。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实行这个新政策。宋徽宗与女真族联盟对抗契丹族，结果使得开封沦陷，自己被俘虏。然而宋朝新的统治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在1234年的时候和蒙古族结成了类似的联盟与女真族对抗。结果更糟：蒙古人吞并了女真人的金国，并且使得宋朝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时并没有灭亡。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他的儿子窝阔台接过了大权，尊称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为了继承汗位不久就开始了政治斗争。有些人担心，如果窝阔台征服宋朝的话，手中会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在汗位的继承中，对他的儿子会非常有利。因此，他们对主要的蒙古将领施加压力，让他们进行西征。1237年的时候，他们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变计划，向西前进。

欧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国编年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认为，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个谜。他说：“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马修错误地将鞑靼人（对蒙古人的称谓之一）翻译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狱深渊之神。他认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属一类的、面目可憎的一个大部落”。又或者，他们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个部落，最后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虽然马修知道，蒙古人并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马修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些犹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诫前，误入歧途，他们：

> 追随奇怪的神灵，有着不为人知的习俗，所以现在有着更加了不起的行为。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们的语言令人迷惑，变成了冷酷而且没有理性的禽兽。

蒙古人征服了德国和匈牙利的骑士，并远征至维也纳。但是他们掉头离开了——就像他们突然放弃宋朝那样，将他们的战俘驱赶到亚洲腹

地。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可汗的继任者，所以当窝阔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时候，欧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当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加富裕的目标——伊斯兰中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时间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位哈里发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后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当他拒绝这么做时，他和他的继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来，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队在加利利海岸边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但是那时蒙古人的四处征战已经使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伊斯兰的中心地带经济落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蒙古人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恰恰是他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开罗仍然是西方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到了1270年，就是马可波罗动身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欧洲的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这块地区是蒙古人没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驾崩之后，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战争。这是蒙古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时间围攻襄阳。到了1279年，当忽必烈把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海里的时候，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封从女真人的抢掠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它经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当时黄河决堤，摧毁了供养这座城市的运河——这条运河给开封运来煤炭，运走产品。在此之前，黄河就已经泛滥过很多次，与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坏放大了自然的残酷性。在蒙古军队入侵后，1230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开封周围100万人的生命，在四川这个人数也许更多。1270年时，死亡人数更多。总的说来，13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四大天启骑士——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人口减少了1/4左右。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十分赞叹，但到了129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停滞了。事实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枪炮、病菌和钢铁：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塑造力

在公元1～4世纪之间，东方的社会发展曾经衰退过。第一个千年中，东方社会发展迅速，有效地缩短了核心地区间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夺者建立了重叠的贸易区，他们穿过大草原，进入印度

洋。这种东西方交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产生了破坏发展的因素。当西方的核心地带无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时，天启骑士把东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纪，东方的发展已经恢复到可以开始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商人、传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过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叠区。在成吉思汗小时候，商人已经不仅带着诸如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还带着散装食物穿过印度洋，数量之多，令罗马人都会嫉妒；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国际化的商业城市正在兴起。

蒙古人对草原的征服给第二条东西干线带来了稳定，可汗窝阔台也急于把他在喀喇昆仑的新首都变为一个帝国之都。据说，他为了吸引商人到那儿，无论他们要价多少，都付给他们比要价高10%的价格。波斯学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写道："每天吃完饭后，他会坐在宫殿外的一张凳子上，在那儿有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牧师，这显示了蒙古人对宗教的开放态度。"就像上帝给了一只手不同的手指一样，窝阔台也给了人类不同的信仰方式。"窝阔台的继承者这么告诉一个基督徒。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决定在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这种事也只有在喀喇昆仑才会发生。

很多人围观，但是辩论进行得并不成功。根据蒙古传统，在辩论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给辩论者端上马奶酒。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们的争论偏离了重点。酒精磨钝了他们的善辩，基督徒唱起圣歌，穆斯林吟诵起了古兰经，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后大家都醉得不能继续了。

虽然这些宗教团体没能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西方人不断前来。穆斯林商人将东方的货物带到克里米亚的卡法，然后卖给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这些货物卖到北欧，还追踪这些货物的来源。马可·波罗的叔叔于1260年离开卡法，一路来到北京，然后在1274年的时候，又进行第二次旅程，带上了小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到来了。1305年，一位刚刚到达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过草原的这条路线比海上贸易路线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只是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了一些简单的联系，但是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却织起了一张真正的网，使得大量人口穿过欧亚大陆，为11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带来了第一次技术迁移。这对落后的西方国家来说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独轮手推车，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在中国发明出来了，于1250年左右传到了欧洲，公元5世纪在中国使用的马项圈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到欧洲。

但是，那时最重要的技术迁移却是廉价的铸铁工具。这些工具于公

元前6世纪在中国出现，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常见了。11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掌握了铸铁技术，不过1380年才传到欧洲。如果你曾经试着不用铁锹挖掘泥土的话，你就知道铸铁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腊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储藏室的钥匙丢了，我们没有任何铁制工具就开始挖掘。当你像1380年前的欧洲人那样徒手挖掘时，土壤似乎变得尤其坚硬。我可以肯定地说，第二次东西方交流解放了欧洲的能源生产。

同样重要的还有信息技术。公元105年，中国工匠首次用桑树皮制成纸张，到公元700年的时候，纸张已经变得十分常见。造纸术于公元750年传入阿拉伯（因为在中亚抓住几个中国造纸师），意大利在1150年之后从阿拉伯买进纸张，直到1276年，才开始自己制作纸张。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术和200年的活字印刷术。欧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进或者说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纪末，中国和印度发明的船桅和船舵，经由阿拉伯传到地中海地区。

除了诸如独轮手推车这样的古代发明，西方人也学习了最新的技术。1119年，中国的书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针；1180年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而火炮传播得更早。在13世纪，蒙古军侵略宋朝时，东方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令火药迅速氧化从而发生爆炸，而不仅仅是燃烧，接着他们将这个新技术应用到竹筒中，助推箭头。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火炮（也许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国东北，是一根一英尺长的铁管，能够装入铅弹。仅仅30年后，在1326年，佛罗伦萨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门铜炮，并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个插图中画出了两门做工粗糙，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西欧很可能是从蒙古人那里直接学到火炮技术的，然后将这个技术传给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过了30年（1360年），这些新武器才传到了埃及。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炮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和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一样，传播的最重要物品却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灾难性的瘟疫。瘟疫摧毁了国家，使人口急剧减少，”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Ibn Khaldun）写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们彻底消失。”这个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亚洲腹地变异，沿着丝绸之路扩散。一位阿拉伯学者（他自己就是死于瘟疫的）认为大草原约在1331年爆发瘟疫。同年，瘟疫沿着长江流域肆虐，据说每10个人中就有9个死于瘟疫。我们无法得知，在接下来的20年内是不是同样的病菌摧毁了欧亚大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这个。到了14世纪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几年，然后突然地到处都迅速爆发了瘟疫。1345年，中国东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军队将瘟疫带到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一个世纪前，马可·波罗的叔叔正是从这个城市离开，动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回到原点。

1347年，商人们把鼠疫带到了地中海的每一个港口。从英国到伊拉

克都出现了黑死病——“胳肢窝下或者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通常这两个地方都有肿块，”一位法国编年史家在1348年记载道，“死亡不可避免。”通过咳嗽传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们身上有很多血点，身上布满了红斑，然后死亡。”大马士革的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他本人于1363年死于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墓地都无法容纳更多的尸体，牧师正念着最后的经文就突然死去，整个村庄都空了。另一位大马士革诗人写道：“人类的灵魂变得非常廉价。”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经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于疾病，疾病从地中海地区扩散到俄国，然后又传播到中国。那一年，中国皇帝从亚洲内陆征用了“绿眼基督徒”与那些带来瘟疫的造反者作战。瘟疫杀死了一半的军队，之后中国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袭击，直到1360年。我们无法计算死亡人数，但这数字肯定大得惊人。

黑死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纪暖期接近尾声，开始了气候学家所说的小冰期。从挪威到中国，冰川开始形成。位于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自1350年后定期结冰。挪威人丢弃了他们在格陵兰的定居点，北极熊穿过冰桥前往冰岛，那儿对他们来说足够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罗的海就封冻过两次；1309～1310年，英国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结冰。1315～1317年，欧洲西北部降雨频繁，以至于谷物都在地里腐烂了，并且——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由于土地过于泥泞，骑士无法作战。

谷物歉收，亲人死亡，人们相信上帝正发出某种信息。在中国，匪徒发起了宗教叛乱，主要就是反对蒙古入侵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外族皇帝的纵酒狂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领导者宣称佛祖惩恶扬善，引导每一个人死后都进入天堂。到1350年的时候，这个帝国已经开始瓦解了。

对于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区之一伊拉克，我们知之甚少。那儿的蒙古统治者和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无能，不过在埃及和叙利亚，瘟疫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只是用来惩罚异教徒这个说法（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死于瘟疫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殉道），例如，编年史学家阿瓦第（al-Wardi）就写道：“我们请求上帝原谅我们灵魂里的罪恶，瘟疫就是他对我们的惩罚之一。”那些贩卖魔法防御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欢迎的做法还是集体祈祷会，游行到圣人的墓穴前以及对醉酒和道德沦丧所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事情看起来更加严峻。因为不仅看起来上帝在惩罚他们（一位意大利人悲叹道：“当我准备写上帝对人类的神圣审判时，我感到心烦意乱。”），而且教会本身看起来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国国王派人殴打教皇，并把他关进监狱。之后不久，教皇法庭转

移到法国的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成为腐败和堕落的代名词。一个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说耶稣曾是穷人。最后一些红衣主教转而支持罗马，选出了一位反对教皇的人，与阿维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进行争论。1409年后的几年，实际上有三位对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人们对教会失去信心后，开始依靠自己解决问题。1260年前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个主张极端苦行的鞭笞派：

> 该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过城市以及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他们在那儿围成圈，一面唱圣诗，一面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赎罪，并且劝人悔改……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妇女和虔诚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样，用这种方式进行苦修，唱着圣诗穿过小镇和教堂。

其他人选择更加传统的赎罪法，例如杀戮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样快（正如一位教皇于1348年指出的那样）。但是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围那些西方核心地区就这样迅速崩溃了。末日似乎就要来临。

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与朱元璋起义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演。公元1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面临着同样的灾难。如果冯·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来到地球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断面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样，他们可能也会犯错，因为另一条历史规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启骑士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时这些骑士所经过的核心地区与他们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所摧毁的核心地区大不一样，这意味着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结果与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结果差异巨大。

最为明显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面积都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的地理面积大，这个面积的差异非常重要。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受到的破坏也越大：我们很难给灾难量化，但是始于13世纪的瘟疫、饥荒和迁徙确实看起来比始于公元2世纪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也意味着越能承受冲击，越能迅速恢复发展。13世纪的日本、南亚、地中海盆地以及欧洲

大部分，都逃脱了蒙古人的摧毁；14世纪，日本和南亚还躲过了黑死病；中国的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过了这些灾难。

经济地理也发生了改变。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东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发达。但是到了1200年，则是另一种情形了：东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西方的任何事物与东方的商业网络相比（尤其是那些连接中国南部、亚洲东南部和印度洋的商业网络），都相形见绌。

政治地理的变化巩固了经济。还在公元100年的时候，每个核心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而到了1200年，贸易已经跨越了国界。政治上，东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乱得多。并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后，大国再一次巩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带，政治关系还是变得非常不一样。每一个大国都必须和周围的一些小国打交道。在东方，这种关系主要是商业和外交上的；在西方，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变化意味着，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这些核心地区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恢复得要快，恢复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奥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带迅速重建了一个帝国。蒙古人摧毁了原先的伊斯兰王国后，土耳其部落于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只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发生黑死病的几年后，他们已经比对手更占上风了，并建立起了一座欧洲桥头堡。到了13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开始欺凌拜占庭帝国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们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惧，以至于原先针锋相对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达成统一意见，联合起来，派遣十字军讨伐他们。

这是一个灾难，但是当帖木儿（一位蒙古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新的进攻时，基督徒获得了短暂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马士革；1401年，他们抢掠了巴格达，据说当时用巴格达9万居民的头骨在废墟周围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儿打败奥斯曼，把苏丹王关进笼子，苏丹王最后羞愧而死。但是之后，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儿决定不再留下来继续破坏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杀回中国，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儿却在骑马前往中国报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于难的奥斯曼人在20年里迅速恢复了商业，但是他们在巴尔干遭遇了惨痛的教训。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时候，蒙古弓箭手包围并射杀了行动不如他们敏捷的奥斯曼人。欧洲军队无法和这些骑士短兵相接，但是他们已经大大改进了他们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时候，一支匈牙利军队给了奥斯曼人狠狠一击。匈牙利人将武器绑在一起，然后将小炮装在车上作为移动的堡垒，阻挡了土耳其骑兵的攻击。如果匈牙利国王那天没有冲在军队的前面战死的话，他也许就能取得胜利了。

土耳其人学得很快，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应对办法：购买欧洲人的武器。这个新技术很昂贵，但是即使是欧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热那亚，也要比苏丹王贫穷得多。奥斯曼雇佣意大利人作为军官和攻城技师，将被奴役的基督徒训练成步兵精英，并且还招募欧洲枪手。不久之后，奥斯曼又重新开始进攻了。1453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时（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土耳其进攻的最大障碍）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枪手——一个匈牙利人。这个枪手为奥斯曼制造了一个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铁质加农炮，（根据编年史学家所说）它的声音大得会让孕妇流产。事实上，这个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裂缝，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坏了。但在这个大炮坏了之后，这个匈牙利人又制造了一门更小、更实用的加农炮。

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被攻破了。成千上万个惊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吉本称之为“人间天堂，第二个天空，最后的乐园和上帝的宝座”）——他们相信预言所说的，当异教徒攻击教堂的时候，会有天使出现，手握短剑，恢复罗马帝国。但是没有天使出现，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沦陷带来了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

随着土耳其人的逼近，欧洲国王更加残暴地互相对抗和镇压异教徒，爆发了真正的战争。先是1470年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他们用更厚的炮管制造加农炮，在加农炮中装入火药，并用铁质炮弹替代了石头炮弹。这样便产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于携带的加农炮，原先的武器被废弃了。新型的炮弹很轻，可以装在昂贵的新型战船中，这些战船是靠风帆行驶而不是靠船桨。加农炮的炮门很低，它的铁质炮弹正好可以击中敌军船只的吃水线。

除了国王，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么昂贵的技术。慢慢的，西欧君主买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来震慑贵族、独立城市以及主教，这些主教混乱、重叠的管辖范围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非常脆弱。君主们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国王的命令贯彻全国，并且这个国家第一次要求人们对它保持忠诚。一旦国王成功控制贵族，就可以建立官僚体制，直接向人民征收税收以及购买更多的枪支——当然这也会迫使邻国君主购买更多的枪支，从而迫使每一个人捐出更多的钱。

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斗争慢慢地将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们的先进却面对着一个劣势：要将诸如米兰和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国家变成意大利民族国家，它们显得过于富有和强大，但是要单独对抗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们却还不够富有和强大。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对这种自由非常高兴，但是当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时，这种代价就显而易见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那样，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已经变成“对其发动战争时毫无畏惧，继续战争时毫无危险，结束战争时毫发无损”。12支最新的法国加农炮扫清了路上的一切障

碍，法国军队只花了8个小时就把蒙特·圣乔瓦尼城堡炸开了，杀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国只牺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战争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东方的核心转移到了中国，商业和外交起着主要作用，虽然新的帝国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样，是以残酷的流血事件为开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新统一了中国。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当时蒙古力量正在衰败。朱元璋的父母（为了逃离沉重税收迁移到其他地方）卖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儿子朱元璋留给一位僧人抚养。这位老人给朱元璋讲了很多红巾军的英勇事迹，红巾军运动是诸多对抗蒙古统治的运动之一。老人坚持，报应就要到了，菩萨不久就会从天上下来惩治这些恶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面临着蝗虫和旱灾，疾病（极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夺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里打杂，但是因荒年寺院难以维持，方丈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在中国南部游历了三四年之后，朱元璋回到寺院，却见寺院已被烧成了平地。蒙古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国内战争。朱元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这冒着烟的废墟上游荡着，时常饥肠辘辘。

朱元璋长相奇丑，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满脸麻子。但是他很聪明、刚毅，能读书写字（这得归功于那些僧人），总之，他属于任何帮派都想拉他入伙的那种人。当一支红巾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红巾军首领对朱元璋非常欣赏。后来，他娶了首领的女儿为妻，并且最后成了这帮人的首领。

在12年无休止的战争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从一帮残忍的匪徒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将其他叛乱者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不过，他并不相信红巾军盲目的目标，而是组织了一个能够管理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1368年1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田园式天堂，在这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监督着自给自足的农民，商人只对不能在本地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并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样）没有人四处搬迁。朱元璋认为很少有人需要离开家8英里远，并且如果不经允许就离家超过35英里远，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担心商业和货币制度会腐蚀稳固的社会关系，曾三次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和政府批准的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甚至还禁止外国香料的流入，防止它们诱惑中国人进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为止，朱元璋的继承者三次更新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时候，由于害怕商人能够轻易地进行不必要的商业活动，皇帝禁止了白银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遗诏中写道：“31年来，我一直都努力地执行上天

的命令，担惊受怕，没有哪一天过得轻松。”但是，我们必须想一想，朱元璋的斗争有多少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法里，而没有实际行动。与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统治者相反，朱元璋急于把自己变为理想化的儒家统治者，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禁止过对外贸易。他的儿子永乐皇帝甚至还扩展了对外贸易，多次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进朝鲜处女（他说，她们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并没有坚持通过官方进行贸易。他们再三宣称这样是为了保护社会的稳定（理论上），让外国人显示应有的尊重。一个统治者解释道：“我并不喜欢外国的东西。我接受它们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来自遥远的地方，表达了远方人民的真诚。”“贡品”（指那些在国土之外的交易）填满了皇帝的金库这个事实也不值得一提。

尽管如此，贸易还是发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难的朝鲜人观察到，“杭州湾里的外国船只就像梳齿那么密集”。沉船遗骸考古学家发现，商船变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订关于贸易的法令，这有力地反映了人们正在忽略这些法令。

商业繁荣的影响非常深远。农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农民开垦了新土地或者去城里工作。遭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当地的有识之士修复了道路、桥梁以及运河，商人贩卖食物，人们都奔向市场，廉价出售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购买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员写道，人们“把谷物换成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商业将扩大了的东方核心联系起来，就像战争将西方国家联系起来一样。14世纪的日本在人口、农业以及金融方面都迅速发展。虽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制，但是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还是稳定增长。贸易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显得更加重要：从外贸中获得的税收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国的兴起提供了资金，麻喏巴歇控制着香料产业。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国寻求帮助。

所有的这些都不需要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那种残酷的暴力。除了试图在越南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权，早期的明朝皇帝只与蒙古人作战。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假如帖木儿没有在1405年驾崩的话，他可能已经将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虏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认为他们不需要先进的炮弹与蒙古人作战，只需要拥有大批的传统军队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当永乐皇帝入侵大草原时，他就动用了34万头驴、11.7万辆马车以及23.5万个车夫来运输供士兵食用的4800万磅谷物。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永乐皇帝于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国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商业与外交联系起来。不过和使臣们一起去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为了造这艘船，他召集25000个工匠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厂。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选出最好的杉树来制造船桅，榆树和雪松来制造

船体，橡树来制造舵柄，并且砍下整棵树，让它们顺着长江而下，到达造船厂。工匠建起几百英尺长的巨大干船坞，用来建造大船。他们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甚至给铁钉涂上了特制的防水层。

这艘船并不是军舰，但是建造这艘船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他国，令他国敬畏。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约有250英尺长，吃水2000吨；船头站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上将——穆斯林宦官郑和。据说郑和有7英尺高，腰围60英寸（一些记录中，郑和高9英尺，腰围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载着27870名船员。此行的计划是在印度洋周围的一些富裕国家上岸。这些国家的国王发现，一夜之间，宫殿的窗户外面到处都是中国的船只。他们交出大量的贡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交易。但是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险：船员们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贫困地区，在这儿，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他们看圣经上亚当的脚印；而在越南时，船员们认为他们必须躲过一些“僵尸头野蛮人”。

> 这个女鬼是人类家庭中一个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到了晚上，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飞走，吃人类婴儿的粪便。这些邪气进入婴儿的腹部，最后，婴儿因为受到邪气的影响而死亡。然后这个头就会飞回来，重新安到她的身上，与之前无异。如果人们知道了，等头飞走后，把她的身体移到其他地方，当头飞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到身体上的话，这个女人就会死亡。

不过，除了他们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胁外，船员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1405～1433年之间派出的7支宝船舰队有史以来最有力地显示了明朝国力。为了夺得马六甲海峡（它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而且时常有海盗侵袭），他们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们只在斯里兰卡内战中支持一方时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并没有给中国船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郑和的手下写道，“我们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是叹息的人们以及愠怒的眼神。整个国家除了山，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不过，麦加倒是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一位官员觉得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一样）。

宝船舰队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驶了9000英里，但是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开始。郑和的船上有指南针和地图，装有大量食物和饮用水，所以他们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这艘船到达过很多地方。孟席斯认为，郑和的手下周满率领船队穿过当时还未在图上画出的太平洋，于1423年夏天登陆俄勒冈州，之后沿着美国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认为，虽然在旧金山湾丢了一艘船，但是，周满还是

坚持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驶向秘鲁，最后才穿过太平洋返回中国。1423年10月，经过了4个月的绕道之行后，周满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周满的功绩（还忽略了更令人惊讶的航行——郑和的手下到过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因为郑和的航海日志在15世纪时就丢失了。并且由于很少有历史学家像孟席斯那样具有实际的航海知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发现隐藏在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中的线索。

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承认，郑和的航海日志确实已经丢失，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发出疑问：为什么现有的大量明朝文献——包括对郑和航行的两次现场目击——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发现？他们好奇，15世纪的船只如何能够达到孟席斯理论中要求的那种船速？郑和的船员如何像孟席斯声称的那样绘制世界的海岸线？为什么孟席斯收集到的证据无法经受学术检验？

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质疑者这一边。我认为，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与冯·丹尼肯的《众神的战车》不相上下。但是，就像冯·丹尼肯的猜想那样——或者像本书的简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样——《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生，西方现在很可能就不会处于主宰地位了。

郑和下西洋的“奇特经历”

时间是1431年的8月13日，地点在特诺奇蒂特兰。郑和的头疼痛不已。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派遣信使到燃烧中的城市，要求他的同盟停止屠杀阿兹特克人。但是，当阳光穿过烟雾时，他放弃了。他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因为这些屠杀责怪他。这些人野蛮、粗鄙而无知，他们甚至不知道铜是什么。他们在乎的只是用玻璃般光滑的黑色石头劈开敌人的胸膛，扯出敌人那还跳动着的心脏。

郑和和他的手下当然知道中国古代商朝的故事：几千年前残暴的商朝统治者以人做献祭，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太平洋之外是一个平行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僵尸头野人的国家还要奇特——那儿的时间是静止的，而且仍然由商王统治。郑和的手下猜想，上帝一定又给他们委派了和古代周朝一样的任务，郑和是新的吴王，是为了从这片土地的邪恶国王手中夺过上帝委任的统治权，是为了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当皇帝派他前往东洋时，郑和并没有预见到这些。皇帝说，你从东海进入蓬莱岛。自从秦始皇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岛屿。那儿的精灵住在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里。鸟儿和野兽都是全白的，还长着仙草。10年前，我们的上将周满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地方，我现在命令你给

我们带回长生草。

郑和比任何人见过的世面都要多，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惊讶。即使是碰见了传说中的龙和大鲨鱼，他也会镇定自如。但是他还是没能发现长生草。郑和的船队沿着日本的海岸线向上行驶，赐予当地武装派别一些头衔，接受了他们的贡品。他的船舰已经逆风行驶了两个月，驶向海天交融的地平线。他那些几乎就要叛变的手下发现了一块新土地，这块土地上都是树、雨水和山峰，情形比在非洲的时候更糟。

当他们沿着海岸线向下航行时，花了更长的时间。在那儿，他们发现了当地人。这些当地人并没有吓得跑开——事实上，这些当地人是出来迎接他们的，带着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的美食。这些好客、半裸的当地人并没有长生草，虽然他们吸食着会令人兴奋的药草。他们也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不过他们听起来好像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岛内。所以，郑和只带了几百个人、几十匹马，在对当地语言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动身寻找长生草去了。

有的时候他不得不与野蛮人进行搏斗，但是火焰炸弹起到了威慑的作用，这些野蛮人不敢进入他们的地盘。即使有的时候，没什么火力了，马匹和钢制短剑也一样能吓住这些野蛮人。不过，他最好的武器却是这些当地人。这些当地人把郑和和他的手下当做神明一样来对待，给他们搬运供给品，为他们打架。郑和聪明地利用野人来对付野人。郑和“手下”的这群野人自称是普雷佩查。这些原住民原先就对邻近的原住民阿兹特克充满仇恨，郑和让他们这种仇恨达到极点。虽然郑和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仇恨，但是这并不重要，慢慢的，原住民间的内战让他更加接近长生草。

直到他的同盟来到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之外时，郑和才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长生草。就特诺奇蒂特兰本身而言，它非常大：街道宽广、笔直，还有阶梯式的金字塔。但是，这儿没有白色动物，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当然也没有长生草。事实上，到处都是死亡。可怕的黄水疮和脓包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甚至在他们死亡之前就已经发臭了。郑和见过很多的瘟疫，但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可怕。不过他的手下中，100个人中只有一个得这种病，这显然是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直到最后一刻，瘟疫的危险性才显露了出来——郑和手下的原住民已经虚弱得不能攻击特诺奇蒂特兰人，特诺奇蒂特兰人也虚弱得不能防御了。但是，上帝又一次站在了郑和这一边。郑和的骑士通过堤道，用弓箭攻进了特诺奇蒂特兰。街上发生了一场胜负显而易见的恶战——阿兹特克人用石头和棉花对抗中国的铁质短剑和锁子甲——阿兹特克人放弃了抵抗，普雷佩查开始烧杀抢掠。当最后一个阿兹特克国王伊兹科阿图在宫殿门口抵抗时，他们用剑把他刺死了，然后把他扔进火里，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最为恐怖的是——他们把他的肉割下，生吃了。

郑和的疑问有了答案。这些人并不是不死之身。他这个开创了新时代的“吴王”也不是。事实上，这时候唯一的难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抢夺到的财物带回南京。

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而西方越来越愿意冒险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像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样。特诺奇蒂特兰人确实被洗劫了。它的邻居美索美洲人对其发动了多次进攻，并且还带来了致命的疾病。不过洗劫发生在1521年，而不是1431年；领导者是荷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而不是郑和；致命的细菌来自欧洲，而非亚洲。如果周满真如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现了美洲，如果故事正如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展开，而且墨西哥成为明朝帝国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话，当今世界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美洲就有可能与太平洋的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的经济联系起来；它们的资源可能推动东方的工业革命，而不是西方的工业革命；艾伯特就可能死于北京而不是巴尔莫勒尔堡。西方也不会占据主宰地位了。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他们的船长愿意的话，明朝的船只完全可以航行到美洲。事实上，1955年一艘仿制郑和时期的船只从中国开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虽然没有返回中国），在2009年时，另外一艘按明代原样复制的木帆船“太平公主”号从台湾启程，用了79天横跨太平洋，于10月9日抵达旧金山，可惜在回程抵达台湾的前夕被撞沉。“太平公主”号这次往返太平洋的活动，初衷就是利用科学实证法来证明明代的时候，中国人就有能力横渡大洋到达美洲再返回中国。

大多数人认为，历史之所以这样发展，是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对航海失去兴趣了，而欧洲的国王（不管怎么样，有一些）对此变得感兴趣了。就某个方面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当永乐皇帝在1424年驾崩的时候，他的继承者首先制定法令，禁止远洋航行。不出所料，印度洋上的国王停止了进献贡品，于是下一位皇帝于1431年派遣郑和再次前往波斯湾，只是后来的正统皇帝又废除了这项法令。1436年，朝廷拒绝了南京船坞要求招收更多工匠的再三请求，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大船都腐烂了。到了1500年，没有皇帝像永乐皇帝那样，派船前往各国，即使他们有这个想法也无法付诸实施。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皇族正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葡萄牙亨利王子是一位航海家，为探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他的一部分动机是出于自私的打算（例如觊觎非洲的黄金），一部分则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例如，他相信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约翰。这位

国王长生不死，守卫着天堂的大门，并且会将欧洲从伊斯兰教手中解救出来）。同时，亨利还为探险提供资金，雇佣制图师，帮助设计能够航行至非洲西海岸的新型船只。

葡萄牙的探险当然并非都是一帆风顺。1420年，一位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未来的岳父）发现了无人居住的马德拉群岛，他在波尔图桑塔岛放走了一只母兔和它的孩子。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们吃掉了所有的东西，迫使船员不得不迁移到马德拉（葡萄牙语中意为“树林”）一个森林茂盛的小岛上。这些殖民者放火烧这个岛，迫使“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躲避这场大火，都逃到海里去。海水没过他们的脖子，他们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喝”，一位编年史学家这样说道。

但是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之后，欧洲人发现这片烧焦了的土地非常适合甘蔗生长，亨利王子也出资让他们建立磨坊。在30年里，他们引进了非洲奴隶在他们的种植园劳作，到了15世纪末，这些开拓者每年都出口600多吨的蔗糖。

航行到大西洋更深处时，葡萄牙的船员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沿着非洲海岸，他们于1444年到达了塞内加尔河。1473年，他们首次穿过了赤道，并且在1482年的时候到达刚果河。船队在那里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苦于疾病和风暴的船员们多数不愿继续冒险前行，数次请求返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力排众议，坚持南行。船队在大洋中漂泊了13个昼夜，不知不觉间到达了非洲南端的“风暴角”（现在称之为“好望角”）。迪亚斯本想继续沿海岸线东行，无奈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归心似箭，迪亚斯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迪亚斯并没有发现祭司王约翰，但是他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向东方的海上之路。

与郑和的航海相比，葡萄牙人的探险规模既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个船员，而不是成百上千）又不体面（有兔子、蔗糖和奴隶，甚至没有从其他王室那里获得礼物）。但是事后看来，143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变得有可能主宰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刻，海上技术的发展将几大海洋变成了高速通道，连接起整个地球。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从这里开始，历史上关于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的理论似乎有了定论：这个地球的命运依赖于这两个男人所做的决定。

但是，是这样吗？亨利的远见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显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欧洲国王紧随其后，意大利无数的私人航海探险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亨利是以收集钱币而不是航海为兴趣的话，其他的统治者很可能会接替他的做法。当葡萄牙国王约翰拒绝资助冒险家哥伦布那个听起来疯狂的想法时——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介入了（虽然在她点头同意前，哥伦布已经向她说了三次这个想法）。不到一年，哥伦布回来了，宣布——他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他已经登上了大可汗的土地（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那里实际上是古

巴；第二个错误是，蒙古人已经被中国驱逐出去一个多世纪了）。卡斯提尔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路线，这引起了英国亨利七世的恐惧。于是在1497年时，亨利七世派遣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进行航海活动。卡波托到达了纽芬兰岛，不过他和哥伦布一样，犯了糊涂，坚持认为这片土地也是大可汗的土地。

虽然正统皇帝的错误今天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1436年，当他“决定”不派造船者去南京时，他才9岁。他的大臣们为他做了这个决定，于是在整个15世纪，正统皇帝之后的历任皇帝都在重复这个决定。有一个故事说，1477年，当大臣们重提派宝船舰队航行这个想法时，一些阴谋家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其中以刘大夏为首。他跟兵部尚书这样说道：

> 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

了解了刘大夏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后——刘大夏是故意“丢掉”这些资料的——兵部尚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统皇帝是不一样的人，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历史也仍然会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是由某一个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个决定，而是要问为什么当中国越来越保守时，西方的欧洲人反而更愿意冒险。或许只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无关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次，”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在1517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没别的原因——只是我预见一个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这个“黄金时代”，法国人称之为复兴，意为“重生”：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复兴就是指突然而又不可逆转地使欧洲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文化力量，使哥伦布和卡波托这样的航海家得以进行航海活动。意大利文化精英中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第一批现代欧洲之子”——使科尔特斯得以踏上特诺奇蒂特兰。

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复兴源于12世纪，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摆脱了德国和教皇的统治，发展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地区。他们的领导者希望摆脱受外国统治者统治的历史，开始寻找使城市发展成独立的共和政体的

办法。渐渐的，他们发现可以在古罗马文献中找到答案。到了14世纪，气候变化、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很多旧的确定性，于是一些学者将古代经典著作阐述为社会重生。

这些学者声称，古罗马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美德的土地，但是野蛮的“中世纪”介入古罗马与现代之间，腐蚀了一切。学者们建议，要发展意大利新的独立城市，就要往回看，他们必须建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这样就能复兴古代人的智慧，人性也会变得完美。

学术和艺术就是这座桥梁。学者们遍寻修道院寻找丢失的手稿，像罗马人那样全面地学习拉丁语，从而以罗马人的思维来思考、说话。这样，这些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自称）就可以重新抓住古罗马的智慧。同时，通过到处寻找罗马废墟，建筑者们能够修复古代文物，建造代表最高美德的教堂和宫殿。画家和音乐家没有罗马的例子可供学习，他们尽力地猜测古罗马的典范和统治者，迫切地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在努力完善世界。他们邀请人文主义者作为顾问，委托艺术家给他们画像，还收集了罗马文物。

文艺复兴有一个奇怪的方面是，这个表面上重修文物的行为事实上却产生了发明和开放式求知这样非传统的文化。当然，也有来自保守派的声音。他们驱逐激进的思想家（例如马基雅维利），威胁他们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们却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发。

回报是惊人的。通过将学术、艺术以及工艺的每个方面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以古代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诸如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人”把它们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这些令人惊叹的人物中，有的像阿尔贝蒂这样创立了伟大的理论，也有像达·芬奇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擅长一切事物，从肖像画法到数学。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可以毫不费力地游走于工作室和权力走廊之间，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来指挥军队、担任职务和给统治者提出建议（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喜剧）。游客和移民将新思想从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中心传播至葡萄牙、波兰和英国，于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复兴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插曲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重建罗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仍然比1500年前罗马的发展顶峰低了整整10分。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识字了，但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面积也只有古罗马的1/4；欧洲的士兵虽然配有枪支，但若与恺撒大帝的军团作战的话，也只是小兵小将而已；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有罗马最富有的行政区那么多产。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者确实彻彻底底地变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在保守的东方人安于现状时鼓舞了西方的冒险家征服美洲，那么这些量的差异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想法的话，会感到非常吃

惊。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放下砚台和毛笔向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解释的情形。他们向那些提出这个理论的历史学家说道，20世纪的意大利人并不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感到失望，并从古代寻求方法完善现代的民族。中国的思想家——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在400年前做着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过去的佛法来寻找汉朝文学和绘画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纪的时候通过过去寻求社会重生的道路，而中国人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1500年的佛罗伦萨人才辈出，这些人才精通医术、文学和政治，不过1100年时的开封就已经如此了。那时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名为沈括，其著作涵盖了农业、考古、制图、气候变化、古典文学、人种论、地理、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等，难道达·芬奇精通的领域会比沈括精通的领域还要宽，还要惊人吗？沈括和所有佛罗伦萨的发明家一样精通工匠技艺，而且还介绍了运河水闸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设计了新型的水闸，修建几个能抽干10万英亩沼泽的水泵；沈括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博学多才，而且还任职司天监，与游牧民商定协议。假如达·芬奇知道的话，也会惊叹不已的。

如果中国也对自己400年前的文化进行复兴的话，那么关于文艺复兴使得欧洲进入一个独特的发展方向这个理论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说中国和欧洲都是因为两次轴向思想浪潮才出现了文艺复兴，这样可能更合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有知识的人们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并且如果他们面临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方式解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11世纪的中国人和15世纪的欧洲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发展的时代，他们都了解第二波轴向思想结局很糟（东方的唐朝灭亡和对佛教的抵制、气候变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会危机）。他们都往回看“未开化”的过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轴向思想（东方的孔子和汉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罗和罗马帝国）。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将先进的学术应用到古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中，并以全新的方式解读世界。

询问为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冒险家前往特诺奇蒂特兰，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却安于现状、错失机遇这个问题，就好比询问为什么西方的统治者都是聪明人，而东方的统治者都是愚笨之人这个问题一样糟糕。显然，我们需要重新表述问题。我们应该这么问：如果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真的激发了探险活动，那么为什么中国11世纪的文艺复兴没有同样的影响呢？为什么中国的探险家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发现美洲呢？这个时代比孟席斯推断他们去美洲的时间更早。

直接答案是没有文艺复兴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险家前往美洲，除非他们的船能到达那里，而11世纪的中国船只很可能做不到。一些历史学家并不赞同，他们指出，1000年左右，维京人就乘坐比中国大船简陋得多的船只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看一下地球仪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达美洲，这些维京人要穿过法罗群岛、冰岛以及格陵兰岛，但是他

们从来没有穿过宽于500英里的公海。这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是将它与中国探险家穿过的海域相比，也就没什么了。中国的探险家必须从日本穿过5000英里的黑潮，经过阿留申群岛，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如果顺着赤道逆流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话，就要穿过两倍距离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后将要谈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欧洲人穿过大西洋比东方人穿过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风暴可能会将偶尔出现的中国船只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会将他们带回——11世纪的探险家即便被文艺复兴精神所激励，也不会找到美洲，然后告诉世人。

只有在12世纪，造船和航海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船只才可能完成南京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12000英里的往返航程。当然，这也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早了近400年。那么，为什么12世纪的中国没有出现征服者呢？

这可能是因为12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精神在衰退，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艺复兴精神这个词。12世纪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然后13～14世纪的时候出现下滑。随着文艺复兴先决条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趋于保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070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绝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由于1127年开封的衰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与这些完全无关。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虽然知识分子继续放眼世界，但是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人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卷入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于是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创办学校，并且虽然安排了讲课和阅读，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为秩序良好的村庄和家庭仪式制定规则；还有一些仍然关注自身，通过“静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纪的理论家朱熹所说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朱熹是那个时代的巨人。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这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因为牵涉国家政治，导致他被革职还乡，他毕生的理学研究也被批判为“伪学”。但是随着13世纪外在威胁的增加，以及国内大臣寻求各种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学看起来非常有用。他的理学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最后成为国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础。朱熹的思想成为正统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学者开心地说道：“因为朱熹，人们得以了解理学，不再需要书写，要做的只是实践。”

朱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有影响的思想家（仅次于孔子）。由于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人认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他使中国处于停滞、自满以及压抑的状态。但是这些褒奖或者指责都过

分夸大了。和所有最优秀的理论家一样，朱熹只是提出了时代需要的想法，人们觉得这些理论合适就使用了。

这一点在朱熹的家庭观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到了12世纪，佛教、原型女性主义以及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性别角色。有钱人家开始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给她们更多的嫁妆，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规定女儿和儿子一样能继承财产。甚至在一些贫穷人家，商业化的纺织生产使妇女的赚钱能力增强，也就使她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权。

12世纪男性富人开始反抗，当时朱熹还是个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贞操，妻子不能独立，并且妇女只能待在家里（如果她们必须出去的话，就要蒙上面纱，或者坐在轿子里）。批评者们尤其反对那些再嫁的寡妇，认为她们把财产带入了其他家庭。当13世纪朱熹的理学得到平反时，他的思想看起来就像给这些想法披上了哲学外衣。14世纪，那些官僚废除有利于妇女的财产法令时，他们宣布这些措施的基础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并没有给妇女的生活带来改变，只是对知识分子以及很可能没有读过朱熹文章的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丽的象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公元8世纪，佛教和原型女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陶瓷雕像类型是被美术史学家戏谑地称为“丰满女性”的雕像。据说受杨贵妃的启发——她的美貌引发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他们所展示的妇女都相当丰满。相反，到了12世纪，画家笔下的妇女一般都很苍白，憔悴，服侍着丈夫或者疲倦地坐着，等着丈夫回来。

这些苗条的美人也许是一直坐着，因为站着很疼。臭名昭著的裹脚习俗（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可能始于1100年左右，在朱熹出生前30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些诗指的就是裹脚这件事，在1148年后不久，一位知识分子写道：“女性的裹脚是最近开始的，在以前的任何书籍中均没有提到。”

关于裹脚的最早考古依据是在黄升以及周夫人的墓中发现的，她们分别死于1243年和1274年。她们的脚上都裹着6英尺长的裹脚布，穿着丝绸鞋，鞋头向上翘（见图8-2）。周夫人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畸形的脚：她的8个小脚趾头扭曲在脚掌下，两个大脚趾头向前伸着，使得这双纤细的脚能够穿进她那又小又尖的鞋子。

12世纪的中国并没有要求女性裹脚，改善女性的走路姿势似乎可以让所有人着迷（至少，让男性着迷）。但是，黄升和周夫人受到的折磨比其他国家的人们受到的折磨要大得多。穿细高跟鞋会让你脚趾起泡，裹脚则会使你坐在轮椅上。这个习俗带来的痛苦是——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死亡——难以想象的。就在周夫人被埋葬的那一年，一位学者对裹脚进行了批判：“还不到四五岁的无辜小女孩，却要遭受裹脚带来的无尽

痛苦。我不知道裹脚的用处何在。”



图**8-2** 小脚：黄升墓中的丝绸鞋和袜子。黄升死于**1243**年，是个年仅**17**岁的女孩。这是历史上关于裹脚的首个有力证据

确实，裹脚有什么用？但是裹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恐怖。13世纪的裹脚使双脚变得更瘦，而17世纪的裹脚却是使双脚变得更短，而且还要弓，要裹成粽子状，成为所谓的“三寸金莲”。20世纪深受裹脚之害的妇女双脚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朱熹就有点过分了。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使中国的核心文化变得更加保守，相反，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使他的想法受到欢迎。朱熹的思想只是军事溃败、紧缩以及社会发展下滑的最明显的

反映。12世纪世界衰退时，古代与其说是复兴的来源，还不如说是避难的场所。在1274年时，也就是周夫人死的那一年，全球探险的可能动力之一——文艺复兴精神已经极其缺乏了。

那么，1100年之后社会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衰退是否解释了为什么是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呢？这只是解释了部分原因而已。不过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2~13世纪没有伟大的探险航行。但是到了1405年，当郑和的第一支宝船舰队从南京出发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又一次加速。永乐皇帝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显示了他开放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再一次发展，15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可以替代朱熹思想的理论。

例如，王阳明就曾经非常努力地遵循朱熹的思想。在1490年时，像朱熹建议的那样，王阳明花了一周凝视着竹子的茎。但是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顿悟，反而使他生病了。就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认识到每个人直觉上都知道事实，而不需要几年的静坐或者学习孔子的言论。只要我们实践了，就能够获得智慧。这个顿悟非常适合发展中的社会。王阳明成为新的文艺复兴人，跻身于时代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行列。王阳明的弟子甚至更加反对朱熹的思想，认为街上都是圣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对错，认为变得富有是件好事。他们甚至——恐怖中的恐怖——提倡妇女平等。

结束郑和航海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保守主义衰退的背景下，而是在充满着扩张、创新和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没有证据显示是死板、保守的思想阻碍了15世纪中国的探险活动，而朝气蓬勃的文艺复兴则推动了欧洲人漂洋过海。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

欧洲人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优势是自然地理：季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都对他们非常有利。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东亚的探险家最后也一定会穿过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维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员总是会比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到达新大陆。

当然，在现实中，其他条件很难同等。并且，在15世纪时，经济和政治地理使原本就有自然优势的西欧更具有优势。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远高于西方，并且由于马可·波罗这样的人，西方人知道了这一事实。这刺激了西方人下决心要在经济上超过东方人，跻身于地球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相反，东方人却没有多大的动力前往西方。他们依赖于别人主

动走向他们。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西方路段以及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多个世纪以来，位于东西交通路线两端的欧洲人落后闭塞，靠威尼斯人从阿拉伯人的桌子上收集来的面包屑勉强生存。不过，十字军和蒙古军的征战开始改变了政治地图，令欧洲人更容易进入东方。贪婪战胜了懒惰和恐惧，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或者，就像马可波罗那样，穿过大草原。

当西方欧洲国家开始迅速发展，并且在黑死病之后频繁发动战争时，政治地理推动了经济发展。大西洋沿岸的统治者急于购买更多的大炮，想尽各种办法获得更多的财富（加强税收体制、抢劫犹太人、掠夺邻国等）。他们乐于与任何能够给他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的人进行合作，即使是游荡在海湾的那些贪婪、自私的人。

大西洋上的国家与红海以及丝绸之路的距离非常遥远，但是所有的船长都对自己了不起的新型船只有信心，利用礼物、借款以及贸易垄断作为交换，把原先地理上的孤立变成了一个优势。他们找到了从大西洋通向东方的路线。有一些人想要从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避免与威尼斯人和伊斯兰教徒做交易；一些人坚持他们会一直向西行，直到绕地球一周到达东方。（第三种方法是从北极穿过，很显然不太吸引人。）大多数欧洲人更喜欢向南行驶而不是向西行驶，因为他们计算出——正确地计算出——往西去东方的话，要航行非常长的时间。如果在这里要提到一个愚笨之人的话，那么非哥伦布莫属。他错误地估计了距离，并拒绝相信他把数字弄错了，因此他开通了一条通向特诺奇蒂特兰的路。相反，如果要提到伟人的话，那就是明朝皇帝周围的那些大臣们。在计算了成本和收益之后，他们在15世纪30年代停止了郑和不切实际的航行，并且在15世纪70年代“弄丢”了他的航海日志。

有时愚笨一点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愚笨和聪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地理令历史这样发展。当永乐皇帝在1403年掌权的时候，他需要修复中国在南亚的地位。派遣郑和的宝船舰队去卡利卡特和霍尔木兹花费巨大，但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派遣郑和向东航行进入空荡荡的大洋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那儿有多少长生草。15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最后会停止航行到印度洋这个代价高昂的航海活动，这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派船进入太平洋。经济地理使探险活动变得不合理。

但是欧洲的船员为了寻找通向东方财富的路线而穿过大西洋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美洲，这一点也令人费解。哥伦布和他的船员需要勇气来探索这片未知之地，他们顺着风，但是无法保证会有另一阵风把他们带回家。如果他们退缩了，在欧洲的港口也有很多勇敢的人会再一次尝试。并且即使在1492年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拒绝了哥伦布的第三次建议，欧洲人也不会停止向西航行。哥伦布要么会再找一个支持者，要么就是会出现另一个航海家——卡波托，或者是1500年发现巴西的葡萄

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发现这片新大陆。

地理使得一切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就像农民取代狩猎采集者或者国家取代村庄一样不可避免，太平洋沿岸大胆的船员会比南中国海同样大胆的船员更早发现美洲。

事情一旦那样发生了，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欧洲的病菌、武器和制度比美洲当地人强大得多，当地人和国家就这么崩溃了。如果蒙特祖马或者科尔特斯做出另外的决定，征服者可能就会死在特诺奇蒂特兰沾满鲜血的祭坛上，他们的心脏也会在他们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被挖出，然后敬奉给神灵。但是在他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征服者，带来更多的天花、大炮以及种植园。当地美洲人不能阻挡欧洲帝国主义者，就像七八个世纪之前欧洲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不能阻挡农民一样。

当欧洲人绕过南非进入印度洋时，地理位置也同样重要，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欧洲人进入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世界，有古代的帝王、创办已久的商行以及当地致命的疾病。距离和代价——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使得欧洲人入侵东方就像欧洲人入侵美洲一样不引人注目。149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绕过非洲进入印度的航行只有四艘船，船长瓦斯科·达·伽马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这次航行并不抱什么希望。

达·伽马是一个了不起的船长。他顺着风在公海航行了6000英里，到达了非洲的南端。但是，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所做的一切几乎让人对他失去信心。他绑架当地向导，鞭打他们，这在他离开非洲之前就差点酿成了灾难。当被他虐待的向导把他带到印度的时候，他因为把卡利卡特的领导者误认为基督徒，而得罪了这些领导者。他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礼物，进一步得罪了他们。最后他设法得到了一箱香料和宝石，然后不顾所有人的反对，逆风行驶。近一半的船员死在了印度洋上，而幸存者也因坏血病残疾。

但是，因为亚洲香料的边际利润超过100%，尽管达·伽马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他还是为自己和国王谋取到了大笔财富。在达·伽马之后，几十艘葡萄牙船只也穿过了印度洋，利用他们唯一的优势：火药。在进行交易、欺凌时，葡萄牙人发现没有什么能像枪支这么有效。他们把印度洋沿岸的海湾都当做贸易飞地（或者是强盗的巢穴，看出自谁的口中），还把辣椒运回葡萄牙。

这么小的规模使得葡萄牙的船只看起来更像是围绕在印度洋国家周围嗡嗡叫的蚊子，而不是征服者。但是在它们叮咬近10年后，土耳其、埃及、古吉拉特和卡利卡特的国王及苏丹王——受威尼斯的怂恿——觉得受够了。1509年，他们召集了100多艘船，在印度洋沿岸困住18艘葡萄牙战船，攻击他们，强行登上他们的船。葡萄牙人把他们炸成了碎片。

就像一个世纪前奥斯曼人进入巴尔干半岛那样，印度洋上所有的国家统治者争先恐后地复制欧洲人的大炮，却发现要射中葡萄牙人，仅仅依靠这些大炮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引进整个军事体系，变革社会秩序，培养新型的士兵。这在16世纪的南亚很难做到，就像3000年前西方核心国家的君主想让他的军队适应战车一样困难。那些行动缓慢的统治者不得不给凶猛的入侵者开放一个又一个的港口。1510年时，葡萄牙人胁迫马六甲的苏丹王，要求他把马六甲海峡的贸易权让给他们——马六甲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当苏丹王重新鼓起勇气，拒绝他们的要求时，葡萄牙人占领了他的整个城市。马六甲的第一位葡萄牙总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写道：“谁控制着马六甲，谁就控制着威尼斯。”并且，不仅仅是威尼斯。

> “中国”是一个重要且非常富裕的大国。要控制中国，马六甲的总督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武力，因为这里的人们非常软弱，因而也就很容易征服。经常去中国的船长宣称，只要有10艘船，占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就能沿着海岸占领整个中国。

1500年之后的几年，对于已经穿过大西洋和非洲南部的冒险家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既然他们已经到达东方，为什么不占领东方？所以在1517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决定派皮雷斯到广州与天朝讲和并进行贸易。不幸的是，皮雷斯和达·伽马一样不善于外交，皮雷斯坚持要见皇帝，但当地官员都予以拒绝。这样对峙了三年后，皮雷斯终于在1521年得以晋见皇帝。也就是在这一年，科尔特斯登上了特诺奇蒂特兰。

不过，皮雷斯的结局和科尔特斯大不相同。到达北京后，皮雷斯还要再多等几周才能见到皇帝，但是一切都变得糟糕透顶。当皮雷斯正在和皇帝商讨的时候，马六甲苏丹王寄来了一封信，谴责皮雷斯偷了他的皇位。还有很多信是来自皮雷斯在广州得罪的那些官员的，他们指责他是个间谍。最糟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皇帝驾崩了。在一片声讨和反对声中，皮雷斯一行人被戴上了镣铐。

皮雷斯后来怎么样了，至今还是个谜。和他囚禁在一起的船员在一封信中提到，皮雷斯死于狱中，但是另一份记录则写道，皮雷斯被驱逐到一个村庄，20年后，一位葡萄牙牧师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女儿。牧师坚称，这个女孩用葡萄牙语背诵主祷文以证实她的身份，并且告诉她皮雷斯和一位有钱的中国妇女结婚了，最近才死去。但是，总的说来，皮雷斯很可能和其他大使的命运一样。他们被戴上了镣铐，判处了死刑，并被肢解。每个男人的阳物都被割了下来，塞进嘴巴里。之后，他们的尸体会在广州示众。

无论皮雷斯的命运如何，至少他尝到了苦头，知道即使他们有枪支在手，在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无足轻重。他们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但是要给东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没

有那么容易。东方的社会发展仍然大大领先于西方，并且尽管欧洲有文艺复兴、船员以及火炮，1521年时，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西方将大大缩小差距。在我们看清楚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烧光特诺奇蒂特兰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前，还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

[1] 此处关于铁木真的事件与一般史实不完全一致，疑为作者错误。——编者注

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涨潮：西方超过了东方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水涨船儿都跟着高”。这一论断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此时连续三个多世纪东西方社会都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见图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庆祝新建大坝的演讲中发表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他的反对者们看来，这项计划是最糟糕的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在他们看来，谚语中所说的涨潮确实能够托起所有的社会之舟，但是在这股大潮推动下，一些社会之舟却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样，这一观点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东方社会发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是其两倍。在1773年（或者，考虑到合理的误差范围，大约是1750～1800年间）西方社会的发展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关于世界发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后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会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这两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的长期背景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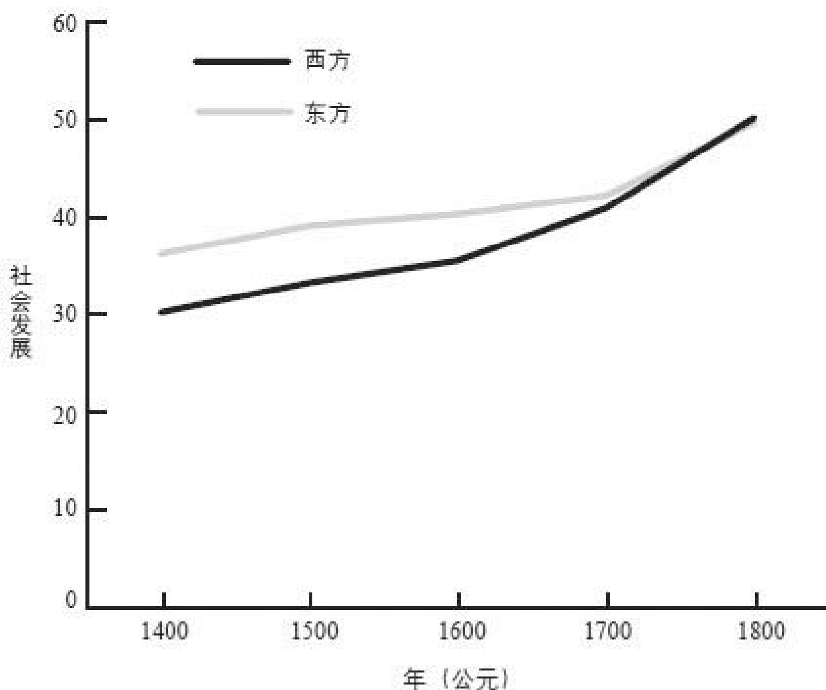


图9-1 一些地方的社会之舟上升得更快：18世纪社会发展的浪潮推动东西方社会达到经济发展的极限，但是这股浪潮却推动西方发展得更好、更远、更快。根据图中的指数可以看出，在1773年西方社会再次占据了领先位置

张居正、戚继光：他们挽救不了明朝的颓势

皮雷斯事件过了很久才在中国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国官员们才开始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尽管到1570年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后在远至日本长崎的亚洲海岸附近开设商店，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大陆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对大多数东方人来说，葡萄牙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些欧洲的冒险家们对于16世纪普通东方人的主要影响在于那些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生长，在恶劣的天气中存活下来，神奇地喂养了农民和他们的家畜。在整个16世纪，从爱尔兰到黄河流域，各地都种满了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来的时候可能正是一个紧要关头。16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90年代（无可否认的一个尤其好的年代）伦敦市民们能够看到最新上演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

《尤利乌斯·恺撒》和《哈姆雷特》，花费不多就能买一本宗教宣传册来读，如约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传》，被新出版社成千上万册地印制出来，里面充斥着宗教信仰者们的木版插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北京人能够观看汤显祖长达20小时的《牡丹亭》，此剧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他们还可以读《西游记》。

但是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外表之下，一切并不是都真的那么美好。黑死病曾经夺去了东西方核心地区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后的近100年间不断地反复爆发，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间，每个地区的人口反而都几乎成倍地增长了。1608年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说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无前例。"在遥远的法国，观察者们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正如一句民谚所讲的那样，人们繁衍之速就如"谷仓里的老鼠"。

恐惧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着要将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后代被排挤到寒冷的野外，并且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和争端。农民们要更经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坝，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编织并努力卖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远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间和沙漠中维持生活，而这些贫瘠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以前绝不会涉足的。一些人放弃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带，而选择到荒凉、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但是即使他们迁移到新大陆来种植庄稼，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四处流动。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纪对人们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模糊的回忆：欢乐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与啤酒，东方的猪肉与白酒。1609年中国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县官曾经说过，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当时好："每家每户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从山上砍柴来烧，有自家的菜园来种植蔬菜，每家都能够自给自足。"但是现在，"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曾在中国待过的一位德国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陈述更加直白："在过去，农民家吃的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肉类和食物都有着充足的供应。"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今天即使最为宽裕的农民家里吃的食物也要比过去长工和仆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顿笔下的英国童话故事里（和许多同类故事一样，也追溯到16世纪），一个贫穷的小男孩和他的猫一起从乡下漂泊来到伦敦并过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数百万逃难来到伦敦的饥民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从油锅跳进了火坑里，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图9-2展现了1350年后城市实际工资（即刨除通货膨胀后消费者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经历的变化，图中数据来源于经济历史学家们数年间艰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们从各种不同历史人物口中得出支离破碎的片段并做出解读。直到14世纪欧洲的文件档案才开始提供清晰连贯的数据以精确计算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实际收入，而在中国，直到18世纪以后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尽管有着数据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线，至少欧洲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说，在所有我们可以证明的地方，在

黑死病消失后的一个世纪内实际工资几乎都翻了一番，然后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发以前的水平。在15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人将石块运至高处，建成了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那高耸的穹顶，这时他们以肉类、奶酪、橄榄油为食物。而到1504年，他们的后代们运送安置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时却只能靠面包勉强过活。又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后代的后代能有面包吃就感到很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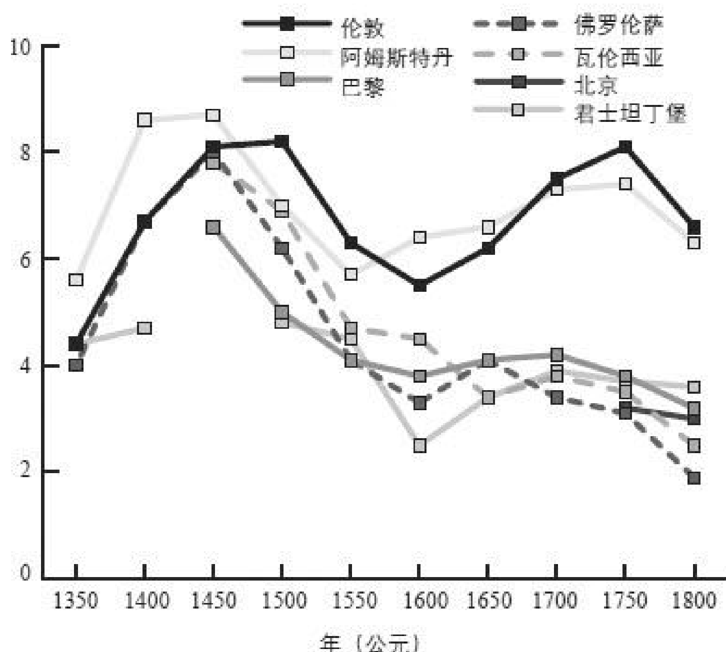


图9-2 1350～1800年间北京和6个西方城市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虽然每个城市每种行业情况各有不同，但是通过测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这一趋势：在1350～1450年间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翻了一番，但之后就开始回落，到1550年或者1600年时工人的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了1350年前的水平。1600年以后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逐渐和欧洲其他地方拉开了差距，这一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详细讨论（巴黎和瓦伦西亚的统计数据始于1450年左右，北京的统计数据始于1750年前后，还有，毫不奇怪的是，1453年前后君士坦丁堡的统计数据存在空缺，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洗劫了该城市）

那个时候饥饿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欧亚地区。收成不好，政策不对，或者仅仅是坏运气都能使得贫穷的家庭沦落到四处觅食果腹的境地（在中国是米糠豆荚、树皮野草；在欧洲是甘蓝残茬和各种杂草）。一次灾难就能使上千人涌到马路上来寻找食物，最虚弱的人会饿死。在欧洲那些最古老的民间传说（如迪克·惠廷顿笔下的那些）的原始版本中，农民出身的讲故事人经常梦想的不是金蛋或者神奇的魔法豆茎，而是实实在在的鸡蛋与豆茎，很有可能这一切并不是巧合，这些农民们想向神祈求的只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中等阶层逐渐对流浪者和乞丐们变得冷酷无情，将他们赶进救济院和监狱，或者将他们送到边境地区，或者将

他们卖为奴隶。当然这些做法都很冷漠无情，但是显然那些富裕的人觉得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有心思理会别人的事情。正如一位绅士1545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那样，当生活艰难的时候，“灾民们（也就是最穷的人们）被免于徭役赋税”，但是“富人们因此受到的赋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也变成了穷人”。整个社会的下滑速度使得那些出身显贵的人也感到了压力。

那些上流社会的后代们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争夺财富与权力，这些人对传统的不屑一顾使得保守主义者们非常恐惧。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警示说：“人们逐渐穿戴起了奇异的服装与帽子。”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甚至有书香之家开始经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颇受尊敬的家族“也疯狂追逐起了财富与显耀……他们以控告别人为乐，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诉讼案件施压，以至于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们追逐奢侈与精细巧妙的款式，以至于无法分辨尊卑贵贱”。

中国的文官制度成了一个爆发点。士族阶层不断扩张，但是行政职务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随着科举中榜的门槛越来越高，富人们发现谋生求财之道远比读书科举重要。一位县级官员曾经这样抱怨道：“寒窗苦读之士欲（在科举考场）得一方席位，却因穷困潦倒，被官员们当做难民一样拒之门外。”

即使对于社会阶层最顶端的皇帝们来说，也是艰难之世。理论上来说，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统治者大有益处——更多的人上交赋税，更多的士兵可以征募——但是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被逼到无以为继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可能就会起来反抗，而积怨已久、难以驾驭的显贵们经常会和这些农民达成一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特殊传统，失败的官员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会以叛乱者的身份重新出现。）

这些问题自从王权出现就一直存在，几乎和王权一样古老，而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们也选择以老办法来应对，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日本可能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权威在15世纪彻底崩溃，村庄、寺庙，甚至单个城市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雇佣暴徒来保卫自己的政权或者抢夺相邻地方。[1]到16世纪，人口的增长引发了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在众多的小领主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领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产的枪支被运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远渡重洋而来要早一个世纪），而到16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手工业者们已经可以制造出高级的滑膛枪，帮助大领主们扩张。1582年，一位叫作丰臣秀吉的首领统一了几乎整个日本群岛，成为幕府将军。

丰臣秀吉成功说服了他争论不休的同胞们将他们的武器统一上交，并承诺将会把这些武器熔铸成钉子与螺丝，以此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几乎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两倍。他解释说，这“不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于身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不为丰臣秀吉的话所动，在他看来，丰臣秀吉“诡诈狡猾难以想象”，“竟然以宗教献身为借口来剥

夺人们的武装”。）

不管丰臣秀吉的意图是什么，解除民众的武装确实是迈向中央集权政府的一大进步，极大地减轻了清点人口、测量土地、征收赋税与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丰臣秀吉表示军事扩张是解决他所有难题的办法，并决定入侵中国。5年后他的军队——可能有25万之众，全部武装有最新的滑膛枪——在朝鲜登陆，并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碍。

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华帝国：历任统治者们在扩张的优缺点上意见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一样，试图全面整顿帝国摇摇欲坠的财政，并对外扩张。他们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试图厘清每人应缴什么样的税，将复杂的徭役和田赋改为简单的银两赋税。但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却并不赞成。他们指出，数百年的传统显示理想的君主应该安静地（而且要不那么奢侈地）坐在权力的中央，作为道德的典范来引领民众。理想的君主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当然也不会从地主绅士阶层抽取赋税，获得钱财，因为这些正是官僚们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与税务登记是丰臣秀吉的骄傲所在，在这里却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长江流域的某个县城在1492年上报的人口数量和8年前调查的一样，又会怎样呢？学者们坚持说，不管它有没有对人口进行普查，这样的王朝可以延续一万年。

激进的皇帝们则陷在官僚体系的沼泽中艰难挣扎。有些时候结果颇具喜剧性，例如1517年明朝的正德皇帝坚持要对蒙古发动战争，但守卫长城的官员拒绝打开城门让其通过，理由是皇帝应该待在皇城北京。有些时候，事情却远不是有趣可以形容的，如正德皇帝因为顽固守旧而杖责其宰相，在这一过程中还处死了一些人。

皇帝们很少有正德这样的精力来整治政府和土地赋税，大部分人只是任由账簿慢慢腐烂。因为国库空虚，他们停止了军队的军饷供给（1569年，当时的兵部侍郎承认他只能找到花名册上1/4的士兵）。毕竟，贿赂蒙古人比和他们打仗要便宜得多。

皇帝们还停止了对海军军费的拨付，即使这些海军要承担镇压沿海黑市贸易这样的重任。自从14世纪明朝洪武皇帝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以后，这一地下黑市就逐渐发展起来。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南向北，中国、日本、葡萄牙的走私者们经营着利润丰厚的生意，购买最先进的滑膛枪并逐渐变成海盗，而且他们在武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那些拦截他们的海岸巡防军队。也许这些海岸巡逻队并没有真的试图拦截，因为来自走私者们的回扣是他们主要的额外收益。

中国的海防越来越类似于那些像《火线》[2]这样的警匪电视剧，金钱交易的流动，逐渐混淆了暴力罪犯、地方名流和腐败官员间的界限。一位正直而天真的政府官员曾经真的遵循法律处决了一个走私团伙，尽管这些人中的一个是一位法官的叔叔。然后有人动用了关系，这名官员

被解除了官职，后来他在皇帝宣布通缉他时选择了自杀。

在16世纪50年代，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对海岸防线的控制。走私者们成了海盗王，控制了20个城市，甚至扬言要抢掠位于南京的皇陵，最终由一群政治精明而且廉洁的官员将其打败。改革者们利用一支由3000名火枪手组成的秘密军队（因其统帅戚继光而被称为“戚家军”，是那些常胜军队中最有名的一支）打了一场战争。这支军队有时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有时却得到不到政府的资助，而是由一位扬州知府向当地富户征收额外税款并暗地里提供给他们。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表明，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大明帝国还是可以击败挑战者的，而他们抗倭的成功也开启了一个（短暂的）改革时代。戚继光后来被调派戍守北方，在此期间他改进了长城的边防，建造了敌楼，在敌楼之间调派了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像一个世纪前匈牙利人在与奥斯曼大帝的战争中使用的车轮堡那样将火炮架到马车上。

16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上最能干但又颇具争议的宰相张居正改革了税收制度，收清了所有的欠账，并改革军队使之更现代化。他提拔了许多能干的年轻将领，比如戚继光，并亲自监督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育。国库重新充实了，军队也再一次振兴，但是在1582年张居正死后官僚体系再一次反击。张居正死后遭到了贬黜，他派系下的官员也都被解除了官职，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死时孤独一人，一贫如洗，就连他的妻子也抛弃了他。

自从能干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每件政务上都备受挫折，最终失去了耐心，在1589年开始了罢工。他退缩到一个自我放纵的世界中，在服装上大肆挥霍，变得大腹便便以至于需要有人在旁搀扶才能站起来。其间有25年他都拒绝上朝，留下一帮大臣们对着空空的宝座叩头。这期间没有任何政策得到执行与实施，没有任何官员得到任用与提拔。1612年时大明帝国中一半的官位都无人担当，朝堂之上未办理的案件已经积压数年之久。

因此，当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征时他期待着轻轻松松就能胜利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不知是因为丰臣秀吉犯了错误，还是因为朝鲜海军的改革，还是中国军队（尤其是戚继光创建的炮兵）表现得异常勇猛，日本军队陷入了困境，裹足不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丰臣秀吉没有在1598年死掉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征服中国，但是实际情况是，丰臣秀吉手下的将领们立刻重新考虑了扩张的计划，他们放弃了对朝鲜的征服，很快退回到日本国内处理更为严重的内部争斗问题。万历和他的政府官僚们也恢复了无所作为的糟糕状态。

在1600年以后，东方核心地区的强国们默认了官僚们意见的正确性：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边境草原部落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欧洲海盗或者贸易者们在东南亚地区仍然不断制造各种麻烦，但是日本受到的威胁却如此之少——单就世界的历史而言——以至于它实际上完全停止了火药枪支的使用，那些熟练的制枪工匠

们又回到以前，开始制造刀剑（谢天谢地，不是犁头）。但是，在西方却没有国家能够有幸这样。

帝国的皇冠

在某些方面，16世纪的东西方社会非常相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地区（在东方，是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明朝，在西方是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且在它们的边缘地带都存在着商业发达的小国（在东方有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在西方有西欧诸国）。但是在这些边境邻国方面，东西方却各不相同。相对于明朝内部的争执不休，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是其臣属官僚们都一致坚信不疑地认为对外扩张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关键。经历过1453年奥斯曼军队的洗劫后，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一度降到仅仅5万人，但随着它再次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人口又很快地回升了。到1600年时这个城市共有40万人口，因此——像数百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他们需要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果实来供养自己。像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首领们一样，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认为对外征服是保证这一切给养的最好办法。

苏丹们制订了复杂的计划，犹如舞蹈一般，他们一只脚踩在西方核心地区，一只脚横跨草原。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所在。152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粗略估算，他的军队一共包括75000名骑兵和28000名禁卫军。骑兵中的大部分都是传统游牧部落中的贵族射手，而禁卫军则是由训练成火枪手的基督教奴隶和辅助的炮兵组成。为了使那些骑兵们高兴，苏丹们将征服后的土地作为封地一一分派；为了使禁卫军们满意——也就是说，按时按量分发工资——苏丹们制定了连丰臣秀吉都会印象深刻的土地测量制度并力图促进现金的最大化流通。

所有这些都需要良好的管理，而奥斯曼帝国逐渐膨胀的官僚制度确实发扬了帝国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时的苏丹们只需要灵巧地挑动各利益团体去互相争斗。在15世纪，苏丹们通常比较偏向于支持禁卫军、中央集权政府和都市文化；在16世纪，苏丹们倾向于贵族制度、权力下放和倡导伊斯兰教。但是，比这些灵活的政策变动更重要的是对外掠夺，因为正是对外掠夺提供了一切。奥斯曼帝国需要战争，而他们也总是能够在战争中取胜。

他们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东部边境。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应对着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小规模叛乱，这一地区的红发[3]什叶派武装分子痛斥他们为腐败的逊尼派暴君。当波斯国王于1501年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时，这一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什叶派的指责转向帝国内饥饿的、被剥削和压制的大众，他们狂热的做法甚至让久经沙场的士兵们也震惊不已：“他们摧毁了一切——男人，女人甚至孩童。”一位中士曾

经这样记录什叶派的叛乱：“他们甚至还要灭掉猫和鸡这样的动物。”土耳其的苏丹向宗教学者们施压，宣布什叶派为异教徒，因而在整个16世纪圣战从未停止过。

先进的武器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更具优势，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彻底打败过波斯军队，却使得波斯人裹足不前，然后他们就可以向西南方向入侵，在1517年征服更大片的土地——埃及。自从9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胜利以来，饥饿的君士坦丁堡人第一次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尼罗河出产的早餐供应。

但正如亚述人以来的每次权力扩张一样，奥斯曼人发现一场战争的胜利只是拉开了另外一场战争的序幕。要想恢复埃及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粮食贸易，他们必须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来保护自己的船只，但是当他们打赢地中海地区凶狠的海盗（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后，他们的舰队也航行得更远了。到16世纪60年代时，土耳其人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并和西欧海军开战。土耳其军队还向欧洲内陆推进，在1526年战胜了凶猛的匈牙利人，杀死了匈牙利人的国王以及大部分的贵族。

152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在维也纳城外安营扎寨。他暂时还不能攻下这座城池，但是围城本身已经使得基督徒们心惊胆战，害怕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吞并整个欧洲。“一想到（一场大战的）结果我就忍不住打颤，”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曾这样写道。

> 在奥斯曼帝国一方，他们拥有着无尽的财富、丰富的资源、战争方面的经验与训练、老练的士兵们、一连串从不间断的胜利……在我们这边，却只能看到空虚的国库、奢侈的习惯、枯竭的资源、沮丧的士气……而且，最糟糕的是，敌人已经习惯于胜利，而我们则是习惯于失败。我们还能对结果有任何的怀疑吗？

但一些欧洲人确实仍对结果抱有怀疑，尤其是查理五世。他是哈布茨堡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黑死病爆发后一直在争夺中欧统治权的几个超级宗族之一。由于精明的政治联姻，而他们的姻亲也“适时”地去世了，哈布茨堡家族逐渐挤到了从多瑙河到大西洋一带地区的宝座上，并且在1516年整个欧洲遗产——奥地利、德国的大部分和现今的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以及现今的比利时与荷兰——都落入了查理的手中。在这诸多地区拥有的王位使他拥有着整个欧洲最好的士兵、最富裕的城邦和最优秀的财务官。而且在1518年，德国王子也选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项称号，作为欧洲混乱的中世纪的一项奇怪的遗风，可谓好坏参半。正如伏尔泰在18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驾驭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子们并将他们聚到一起花费的力气远超过了王位带来的价值，尽管如此，原则上，任何坐在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上的人都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当集结整个欧洲来对抗土耳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观察家们预想西欧只有两种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征服，或者顺服于哈布茨堡家族——唯一一个足够强大可以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查理的大臣在1519年给这位皇帝的信中这样总结道："上帝对您一直都是很仁慈的。他使您凌驾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与王子们之上，并使您享有着自从您的祖先查理曼大帝以来任何君主都未享有过的至高权力。他促使您走向世界范围的君主制，走向在唯一上帝护佑下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

如果这位大臣正确的话，西欧会更加类似于世界上其他的核心地区，都是由一个伟大的皇帝所统治。但是被人领导驱使这样的想法却使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国王和王子们警惕起来，他们先发制人对查理发动了战争，想要使他下台。法兰西甚至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共同对抗哈布茨堡家族，法兰西与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甚至于1542年炮轰了法属里维埃拉（当时处于查理的统治下）——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迫使查理大帝更努力地尝试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

查理大帝与其儿子菲利普二世都将他们长期统治时间[4]的大部分用于和其他基督徒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将西欧变成一个伟大的陆上帝国，反而使得欧洲更加四分五裂，加深了旧的分歧，又造成了新的争端。举例来说，在1517年万圣节，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前发表其不满基督教会做法的《九十五项论纲》的时候，他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特别的事，这只是宣传神学辩论的一种传统方式（和黑死病以后许多关于教会的批评比较起来，路德更积极温和）。但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使他的宗教抗议变成了一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大地震，这一社会震荡经常被他同时代的人拿来和土耳其世界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分裂相提并论。

路德本来希望查理大帝会支持他，但是查理认为要想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教会。"当一个僧侣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一定是错误的，"查理曾这样对路德说，"我决意用我的所有属国与领土，我所有的朋友，我的身体、血液、生命、灵魂来与之对抗。"他也确实如此做了，但是当整个欧洲武装起来支持或反抗哈布茨堡的时候，否认基督教世界内存在的派系分歧就显得具有灾难性了。有时因为原则的问题，有时因为些微的优势，有时仅仅因为困惑，上百万的人们拒绝承认罗马教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新教徒杀害其他的新教徒，关于抗议的不同解读也成倍增加。一些新教徒宣扬基督复临、自由博爱，或者共产主义的思想，一些人的下场血腥凄惨。但总而言之，不管他们的抗议暴烈还是崇高，都使得哈布茨堡想要统一基督教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代价更为高昂。

民众一旦认定他们的敌人是敌基督[5]的代理人就很少会愿意和解，因此小冲突上升为大冲突，大冲突又拒绝终结，所以代价就这样螺旋增加。最终，哈布茨堡的底线就是底线本身：他们只是负担不起统一整个西欧的代价。

查理没能完成他统一西欧的事业，他在1555～1556年间从各个王位上退位，并将之分给了两个人：他的堂兄得到了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而菲利普则继承了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地区。这是很聪明的一项策略：将哈布茨堡统治等同于西班牙统治，菲利普能够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并集中精力解决真正的问题——钱的问题。

在40年的统治期间，菲利普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辛苦工作，试图改革哈布茨堡的财政状况。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马德里市外的办公室内工作，经常忙碌得没有时间去实地参观一下自己的领地。但是尽管他像丰臣秀吉一样满腔热情地统计人口，向民众征税，增加收入，并打败了法兰西与土耳其，他所追求的统一西欧的终极胜利却从来没有实现。他的税官们压榨得越严重，出现的问题就越多。菲利普的臣民们繁衍之快如谷仓里的老鼠一般，处在饥饿和国家税收的夹缝之间，而且看到他们上交的税收被用于和遥远的国家作战，但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人们一无所知，于是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反抗。

在16世纪60年代，菲利普甚至试图将基督教会与征税相提并论。本来很迟钝麻木的荷兰人，承受着哈布茨堡新教的迫害和严苛重税的负担，爆发了一场冲击祭坛、亵渎教会的暴烈行动。失去富裕的荷兰而将之置于一群加尔文主义者的手中，对菲利普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派遣军队前去镇压，而这只是促使荷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菲利普不断地赢得一场场战役的胜利，却总是不能赢得整场战争。荷兰民众再也不愿向哈布茨堡缴纳新的赋税，而且当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不管花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他们都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到16世纪80年代，菲利普在战争上花费的钱财远远大于整个帝国的收入，因为不能再负担胜利或者失败，菲利普向意大利金融家们借的钱越来越多。当他既不能支付军队的开销，也不能向债权人还钱时，他就宣布破产，然后再如此反复重演。而他的军队因为得不到俸禄，变得骚动起来，四处抢掠为生，因而菲利普的信用也一落千丈。但直到1639年（在海上）和1634年（在陆上）西班牙才被彻底打败。而当菲利普于1598年去世时，整个帝国已经濒于毁灭，所负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5倍。

200年后，又有一个西欧陆上帝国和哈布茨堡帝国非常相像，而到这时，其他的西欧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变革整个世界的工业革命。如果哈布茨堡或者土耳其人在16世纪统一了欧洲的话，可能这次工业革命永远都不会发生。或者说，在没能统一整个西欧的查理与菲利普身上，在没能征服西欧的奥斯曼·苏莱曼身上，我们终于发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拙劣傻瓜。

尽管如此，我们要再次提醒，这不能单单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那位担忧土耳其人入侵的欧洲大使曾指出：“唯一的障碍是波斯人，他们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方，使得（土耳其）侵略者们不得不小心提防。”打败波斯人、什叶派教徒和欧洲人对土耳其人来说都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相类似的，查理和菲利普之所以没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不是

因为他们输掉了一些决定性的比赛（实际上，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几乎每战必胜）或者缺少一些决定性的资源（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运气、才能和优势都比自己本来的份额要多），只是因为打败土耳其、统一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是超出组织架构与财富资源所能承受范围的。既然哈布茨堡拥有着众多的优势都不能统一西欧，那么就真的没有人能做到了。西欧注定要和那些从土耳其到中国之间的众多帝国截然不同。

暴动、革命、农民起义：风雨飘摇的东西方帝国

尽管每个帝国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东西方核心地区的社会发展一直都在进步，而且在1598年丰臣秀吉和菲利普去世后的数十年间，明显又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悖论再次出现。像以前的很多时候一样，气候变化导致了不断加剧的危机，虽然自从1300年后气候一直比较寒冷，但是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寒冷了。一些气候学家将之归因于1600年秘鲁境内的火山喷发，而其他人则将之归结于太阳黑子活动的减弱。但是多数人都同意大部分的旧大陆地区在1645～1715年间非常寒冷。从英国伦敦到中国广东，书吏和行政官员们都在抱怨冬天的冰雪天气和过于凉爽的夏天。

住在寒冷城市里的人们和贫瘠土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使得17世纪对那些毫不设防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不管这些民族的人们生活在森林、湿地、野外还是殖民地。有时政府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制定法律想要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但是那些试图将核心地区的边界往外扩展的殖民者却很少理睬这些法律。在中国，所谓的棚屋民族侵入了大山森林深处，在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种植甘薯和玉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他们将苗族等原住民族驱赶到了饥饿的边缘，但是当苗族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政府又派遣军队来镇压他们。日本北部的阿依努人、英格兰最早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人以及北美洲东部的原住民族都有过这样悲惨的遭遇。

殖民者们之所以如此大举入侵是因为他们本来所处的核心地区的资源正在逐渐枯竭。“每一寸土地都能压榨出利润来，”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坚持道。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与开发者合作，力图将灌木丛与湿地改造成牧场与耕地。另一位中国官员在17世纪20年代痛斥道：

> 请不要再去占有掠夺那些芦苇地和草场上的蝇头小利！……一些人因其惰性，不考虑长远之将来，而仅追逐于芦苇之地的蝇头小利，拒绝耕种庄稼所获得的更大利益。他们不仅不愿复垦土地，更因别人如此做法而恶之……商业集市因而日渐荒凉，政府收入因此

日益不敷。如此之境况孰能忍乎！

荷兰和英国的企业家们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对湿地进行拓荒开发。国家赞助的灌溉计划带来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之前生活于此的当地人却在法庭上、大街上掀起了激烈的抗争。他们（大部分是无名氏）的抗议之歌让人为之心酸：

看哪，这些排水工人正在破坏着造物主的伟大设计，

这些正在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并终成乌鸦与虫蠡的猎物；

因为这些确实意味着所有的沼泽地区都将枯竭，

所有的一切都将干涸，我们也将死去，

而一切只是因为埃塞克斯的牛犊们需要牧草。

鸟禽们尚且有羽毛翅膀可以迁徙到其他的国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类似的交通工具来帮助我们移居；

除非我们团结起来，用战争将他们驱逐，

我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故乡土地（啊！多让人伤心的事）

让给那些有角的野兽与牛畜。

侵略者以及他们带来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动植物，迫使当地物种迁移离开，或者大肆猎杀而终使这些物种灭绝，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垦栖居地，毁掉森林。在17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曾抱怨说日本4/5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有10%的土地尚有森林覆盖，但是到18世纪50年代时这些剩下的树木有一半以上已经消失了。对比之下，在1600年时爱尔兰仍有着12%的森林覆盖率，但是到1700年时殖民者已经砍伐掉了5/6的树木。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户附近地区，制盐制糖工厂、陶艺工人，最后甚至连普通家庭都开始用煤作为燃料，而在欧洲人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泥炭和煤来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国开封的人们一样，伦敦人欣然接受了这些化石燃料，因为它们的市场价格要比木炭低。虽然大部分英国家庭还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伦敦人每年烧掉的煤几乎达到了0.25吨，到1610年时这数字又增长了3倍，而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整个大不列颠的燃料有一半以上来自煤炭。“伦敦被包围在一团如云般密布的煤海当中”，1569年一位伦敦人这样抱怨道，以至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和地狱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大雾天气下火山一般的伦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其他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启示录中第一个冲破束缚的骑士，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压力也导致了政府的失败，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政权崩溃坍塌。如果君主们试图削减开支，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将士们；而如果他们试图从纳税者身上挤出更多的税收，他们就会失去所属的商贩和农民。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穷人的激烈抗争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种抗争变得更加剧烈了，因为那些被剥夺财产的贵族们、破产的商人们、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还有怨恨的官员们都加入了这一队伍。

随着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统治者们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叛乱成本，从而降低人们叛乱的可能性。这些统治者们更加坚定地重申他们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更积极地讨好宗教学者们，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则创立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他们宣称，国王的权威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议会、任何教堂、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根据法语中的一句名言，国王的权威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法律。挑战这一权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于挑战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许多不满的民众想要挑战这一权威。1622年，土耳其的苏丹和哈里发奥斯曼二世——分别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继承人以及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为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而试图削减步兵军队，最后这些步兵队伍的反应却是将皇帝从皇宫中拖出来勒死，然后还切割了皇帝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弟弟想要解决这一困境，于是他和那些严苛的教士们结成同盟，甚至通过禁止喝咖啡、制定对吸烟的死刑处罚来取悦教会。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苏丹宣称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648年，步兵军队和教会结成了同盟，处死了苏丹“疯狂者”易卜拉欣（这个绰号于他确实名副其实），由此拉开了持续50年内战的序幕。

17世纪40年代对所有地方的皇室来说都不啻一场梦魇。一场场反对专制统治的叛乱使整个法国陷入了混乱；而在英国，议会向顽固的国王宣战并最终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就如打开魔瓶释放出妖怪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如果连本来如神明一般权威的国王都能被审判并处决，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自从古希腊文明以后，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开始萌芽。“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和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可以展开，”议会领导的军队中有一位上校军官曾这样说，“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应该自己同意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

这些在17世纪的背景下都是颇有冲击力的言论，但是英国激进派的各个分支派系的言论甚至更为狂野。其中一个自称“平等主义者”的派系对所有的社会区分都持反对态度。“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受别人控制的，”他们指出，“更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驾驭别人。”而且，如果说社会等级是有悖于自然、不应该存在的，财富更是如此。在国王登上断头台的一年之内，一个自称“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派别分裂开来，分别建立

了10个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嚣派将上帝看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并宣扬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确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则上帝带来的灾难将会腐蚀并吞噬你们拥有的一切。”

> 平等主义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1644年一份关于平等主义者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平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犁锄打造成了刀剑，并为自己取了“和国王平等”这样的称号。他们宣称他们正在消除主人与奴隶、富人与穷人、达官显贵与底层人民的区别和差异。佃户们占有了地主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地主们跪下来为他们倒酒，他们会在地主们的脸上扇上两记耳光并且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称呼我们奴隶？”

然而，那些极力宣扬平等的军阀们却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猖狂活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文讨论过的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烈挑战——例如15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纪前10年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挑战那样，这些挑战和国家的失败一起形成了关于人的平等的新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

在中国，明王朝因为财政破产和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而当瘟疫——启示录中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爆发时，明王朝的皇帝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天意的授权。叛乱者们越来越觉得任何行动都不过分。在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据政权，而1644年，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皇宫大殿后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吊死了。“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他在衣袍上这样写道，“死去无颜见祖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西方世界国家政权的衰败所引起的暴力

则更为严重。在德国，宗教战争在1618～1648年间达到了糟糕的顶点。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庞大的军队，如果士兵们真有薪水的话也极不规律，他们和土地隔离开来，敲诈勒索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存的原始资料充斥着各种残忍野蛮的暴行。德国小镇贝利茨，不幸地因为位于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行进的路上，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极好（或者说极坏）的例子。一位海关官员曾写道，在召集了当地人之后，这些强盗和杀人犯们找到一截树枝，插进那些可怜的人的喉咙里，任意搅拌并往里倒进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类的粪便。这些人为了钱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个叫作大卫·奥特尔的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这样折磨后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将一个贝利茨人吊到树上，用火来烤，直到他答应供出自己的积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为听说他们的同伴将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钱财，又把这个人抓了回来，将他的脸对着火，“直到他死去，这个人的皮肤如一只被屠宰的鹅那样剥落下来”。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只是一种宗教宣传，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们很难想象它们竟是真实发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超过200万人死于暴力（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死亡人数都是无可匹敌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于紧随战争而来的瘟疫与疾病——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骑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欧地区，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场人为的黑死病那样。

瘟疫本身则以更为凶猛的变种席卷而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后写成的。他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1665年横扫整个伦敦的谣言、恐慌与痛苦。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形象。在1642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这样记述道，“有时很多人都因为甲状腺炎脖子肿了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的脸部和头部都膨胀起来”，或者“有时候很多人都遭受腹泻和间歇性发烧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脓疱、皮疹、结痂处发痒，或者疥疮”。

启示录五骑士中的四位都在争相角力，但是就像图9-1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社会崩溃。社会发展继续往前推进，西方于1710年（因为参考指数的准确性差异，可能要加减25年的时间），东方于1723年（同样，在这附近）分别达到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以前发展指数的顶点——43分。到1800年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都接近了50分。这时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社会发展会与历史潮流相悖呢？

草原时代的终结：沙俄和清朝的边疆政策

1689年8月22日，尼布楚。西伯利亚的夏天虽然短暂却出奇的美丽。每年的这个时候，随着地面解冻，新发出的草芽如绿色的地毯一般

铺满了整个徐缓起伏的山区，其间又点缀着各种红色、黄色、蓝色的野花与蝴蝶。但是今年的夏天却有一点不同：在石勒喀河河岸附近，出现了一个帐篷组成的小镇，数百名中国谈判人员与头发斑白的俄罗斯人一起坐了下来，一同商议一个共同的边界。这些中国人是通过让基督教传教士将他们的条件译成拉丁语来谈判的。[6]

这些俄国人此时距家乡万里之遥。在1500年时，俄国还只是荒凉的西欧众多公国中的一个，挣扎着试图在从南方大草原侵袭而来的蒙古人和西方日益推进的波兰、德意志、立陶宛等国家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凶狠的、未开化的王子们自称沙皇（即独裁者），从而表明他们像拜占庭帝国甚至罗马帝国一样自命不凡，但他们似乎常常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想成为欧洲式的国王还是蒙古式的可汗。直到16世纪50年代沙皇“恐怖伊万”——即使以俄国统治者们令人不安的标准来看也颇为暴虐——的时代，莫斯科才开始有一定的分量，但是伊万行动如此迅速，很快就补上了逝去的时间。冒险家们背负着滑膛枪，越过乌拉尔山脉，在1598年打败了当地的蒙古可汗，从而开启了通向西伯利亚之路。

西伯利亚最为人所知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关于古拉格（前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小说中冰天雪地的背景，但那个时候它在俄国人的印象中却是一个财富之地。对皮草的狂热紧紧攫住了他们：因为很久以前已经将他们境内的貂鼠、黑貂、鼬獾等捕猎灭绝，欧洲人现在很愿意为他们的皮大衣支付高昂的价格。在40年间，俄国的皮草商人在这片苔原上驰骋捕猎来供应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最远甚至来到了太平洋岸边。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寒冷森林的边缘上建起了一圈细细的栅栏，他们从这里出发冒险去诱捕水貂，或者从当地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手上敲诈毛皮。尽管以苏莱曼大帝或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的标准来看，这些空旷的荒野称不上一个帝国，但是从毛皮生意中获取的税收曾不止一次地使沙皇们免于灾难。

俄国的捕猎者们和中国的军队很快就在黑龙江边发生了冲突，但是到17世纪80年代时双方都准备好了开始谈判。每一方都害怕对方会像之前的许多决策失误的君主那样，邀请蒙古人作为同盟军并因此释放天启录中的第五骑士——迁徙，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来到了尼布楚协商谈判。

他们那一年夏天在西伯利亚达成的协定完成了世界史上的一大转变。2000年来这片干草原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大通道，很大程度上处在那些伟大的农业帝国的控制范围以外。移民、微生物、思想以及发明创造都随之涌来，将东西方捆绑到社会发展抑或崩溃的一致旋律上来。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征伐进取的国王会花费极大的代价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这片草原上，如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大帝、中国汉朝的汉武帝或者唐朝的太宗皇帝，但这些毕竟只是少数。历史上的规则是：农业帝国向游牧民族支付任何他们想要的和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以此来确保边疆的稳定。

但是火枪的使用却改变了这一切。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火器（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枪，是1288年在中国东北一个游牧地区发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蒙古人将火器从中国传入了西方。但是随着枪支制造得越来越好（射击得更快也更远），帝国建设得越来越有组织，那些有足够的财力征召上万名步兵，用滑膛枪和加农炮来武装他们，并训练他们连续发射的将军们逐渐开始击败那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在1500年前后，那些从草原上来的马上的弓箭手们还经常打败农业王国的步兵。但是到1600年，他们就只能偶尔取胜了。而到1700年时，胜利对他们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的事了。

俄国人在这一潮流中领先。在16世纪50年代，“恐怖伊万”的炮兵部队将软弱的蒙古汗国赶出了伏尔加盆地，而且在接下来的100年间，俄国、土耳其、英国和波兰逐渐用游击队、沟渠、栅栏等围住了干旱的乌克兰大草原。以滑膛枪为武装的村民们开始引导游牧民族的活动方向，并最终将他们隔绝开来。在尼布楚，沙俄和中国商定：没有人——难民、商人、逃兵，尤其是迁移的游牧民族——可以在未经两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这片大草原上自由迁移。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农业帝国的属民。

1644年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最后骚动向我们展示了改变之巨。那一年，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中国大明王朝的统治终于崩溃，而随着内战越来越失去控制，一位前明将领认为请满族人——来自东北地区的半游牧民族——越过长城来重建秩序可能是众多正在发生的罪恶中相对较轻的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将亚洲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带进帝国的内战中来，而这通常都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是和之前的入侵者不同，满族人不是以游牧民族骑兵的形式而来，相反他们带来的是一支和明朝相差无几的军队，都是由步兵组成，装备有从葡萄牙人那里仿造而来的滑膛枪和火炮。

满族人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北京城，其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他们宣称自己将建立一个新的大清王朝，并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四处征战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族人的这些努力和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结果大相径庭。满族人的入侵没有打开闸门，让更多的来自寒冷北方的游牧民族进来，他们的长期征战与努力只是将清朝军队磨炼得更为强大，并重新向中亚地区扩张。1697年，清朝军队在内蒙古草原深处击败了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武装，1720年，清政府又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多山的西藏地区。在18世纪50年代，针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清政府又实行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将他们的枪支、弹药、炮弹运送至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打败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农业帝国们——最先是，沙俄和大清帝国——高效地消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发展即将达到极限时的压力并没有像公元2世纪和12世纪那样引发草原移民的浪潮。而且，即使国家管理失败、饥荒、疾病以及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加起来，也没有使这些核心地区彻底崩溃。大草原作为高速通道已经被关闭

了，而伴随着它的关闭，旧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也落幕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是十足的灾难。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族人们被束缚得越来越紧。自由迁徙——他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所在——不得不依赖于遥远的皇帝们的一时兴起，而自从18世纪以降，那些曾经骄傲的草原勇士们越来越多地沦落为雇工、暴徒——例如那些被用来监督看管暴民们的哥萨克人。

尽管如此，对这些帝国来说，关闭草原通道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胜利。中亚地区长久以来都是外敌入侵等危险的主要来源，现在却已经成为帝国的新边境。随着来自游牧民族的袭击的减少，一两百万俄国人以及500万甚至多达1000万的中国人从拥挤的核心地区迁徙而来，定居于草原边境上的这片新的土地。而一旦移居到这里，那些吃苦耐劳的人们就开始开发分割这片土地，他们有的种田，有的采矿，有的伐木，源源不断地将原材料和上缴的赋税送回帝国的核心地带。草原通道的关闭不仅仅避免了帝国的崩溃，它还开辟了一个草原宝藏，突破了数千年来社会发展限制在40分这个低水平上的极限。

海洋时代的开端：西欧国家对财富的追逐

当沙俄和中国忙于关闭旧的草原通道时，西欧国家正在试图打开一个全新的海洋通道，这一通道的开辟将更剧烈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自从西欧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海域以后，100年来他们的海上帝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自从13世纪以后，威尼斯人就一直在通过开展和印度的海上贸易，远渡重洋跨过非洲南端而不是讨价还价地穿越土耳其帝国来聚集财富。葡萄牙的水手们同样在进行海上贸易，却更为迅速，成本也更为低廉。西班牙人在美洲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他们在那儿的所作所为和俄国人后来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颇为相似。

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俄国人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这些附属地对外承包。沙皇“恐怖伊万”给予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乌拉尔山脉以东所有事务的决断权，条件是只要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彩头；任何人提出要求保留自己在美国所得的一切，西班牙国王们都会多多少少给予他们，只要能保证哈布茨堡家族享有其中的20%。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美洲，都有小群的亡命之徒呈扇形四散开来，在这片地图上尚未标明的领土上四处设置栅栏，占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片区域，而且经常写信回国来交换更多的金钱和欧洲女人。

就像对毛皮的狂热驱使着俄国人一样，对金银的狂热同样驱使着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在1521年洗劫了特诺奇蒂特兰，首先将西班牙人领到了这条道路上，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他在1533年绑

架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作为赎金，他要求国王的臣民们将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9英尺的房子装满金银财宝。皮萨罗将这些印第安文明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艺术宝藏都熔化成了金锭——13420磅的黄金和26000磅的白银——最后还是扼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

到1535年，这些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不义之财逐渐耗尽了，但是对于埃尔多拉多——遍地都是财富的黄金国——的幻想使得残忍的行为不断发生。“他们每天都无所事事，只是幻想着黄金、白银还有秘鲁印第安人的那些宝藏，”一位编年史作家曾经这样感叹，“他们就像亡命之徒一样，疯狂，着魔，脑子里充满了对金银财宝的贪婪欲望。”

这些人的疯狂在1555年找到了新的出口。这个时候先进的银矿开采技术使得新大陆的采矿业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产出非常惊人：1540～1700年间大约有5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到了欧洲，其中有2/3来自现今的玻利维亚境内的波多西山脉，人们发现这一山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矿山。到1580年为止，欧洲的银库储备增长了一倍，而哈布茨堡家族所拥有的份额则增长了10倍之多——即使这样，正如1638年间一位从西班牙来到波多西的游客所注意到的那样，“在波多西所铸造的每一比索（中南美货币单位）硬币都是以1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和俄国颇为相似的是，哈布茨堡家族开始将他们所征服的殖民地作为开创欧洲陆上帝国的战争的财政来源。“波多西银矿的存在只是为西班牙不断扩张的野心而服务，”一名参观者这样写道，“它的存在旨在惩罚土耳其人，让摩尔人谦卑，使佛兰德斯人颤抖，令英格兰人畏惧。”

哈布茨堡家族将其从新大陆开采的银矿的绝大部分用于支付欠意大利金融家们的债务，而大部分的白银经由这些威尼斯商人之手又流通到了中国，因为中国需要银币来满足其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中国的皇帝们可以用在秘鲁开采后流通到中国的银条来建造一座宫殿，”一位商人曾这样认为。尽管哈布茨堡家族一直在对外出口银币，而中国明王朝一直在进口银币，在其他方面它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更关注做大整个经济蛋糕中自己的那一部分，而非做大经济蛋糕本身。这两个帝国都严格地将海上贸易限制在少数容易征税、有国家垄断支持的领域。

理论上，西班牙每年只允许一艘大型帆船满载银币越过大西洋对外流通，而且（再一次地，理论上而言）对其他货物的贸易规定也同样严格。但实际上，结果正如中国困扰不断的沿海地区一样，那些被排除在官方交易之外的人们开创了一个巨大的贸易黑市。这些“闯入者”就如中国当时猖狂走私的海盗一样，无视官方的征税规定，任意杀害反对的人们，低价抛售货物来和官方贸易者竞争。

那些16世纪20～30年代在哈布茨堡家族的欧洲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法国人，最先加入了这场关于海盗的争斗。最早的有记录的海盗袭击是在1536年，到16世纪50年代时海盗袭击就变得非常普遍了。“遍布整个海地的海岸边，没有一座村庄没有遭受过法国人的洗劫，”1555年一位官

员曾这样抱怨道。16世纪60年代，英国走私者也开始进行奴隶贩卖，或者在机会出现的情况下，登岸劫掠那些运送白银的骡队。由此劫掠来的不义之财颇为丰厚，因而在20年内西欧地区最野蛮、最不顾一切的男人们（还有一些女人）都聚拢而来，加入了这一行列。

像中国一样，西班牙对此的反应缓慢而又漫不经心。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帝国都认为忽略这些海盗要比打击他们代价更小，直到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才开始像中国一样真正地反击。一场全球范围内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打击海盗的战争就此爆发，从中国到古巴（同样还有地中海地区的奥斯曼帝国）都有军队用短刀、火炮作战。1575年，中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甚至在菲律宾群岛附近联手镇压海盗。

到这时为止，中国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打击海盗战争的胜利，但是西班牙仍然在与一种更加严重的私掠活动斗争——国家支持的海盗活动。私掠船船长们一般都有国家统治者颁发的许可证，甚至国家给予的船只来掠夺西班牙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没有适可而止的概念。在16世纪50年代，凶残的法国私掠船船长“木腿”勒克莱尔将古巴的重要城镇洗劫一空。1575年，英国的约翰·奥克斯纳姆将船驶入加勒比海地区，停在巴拿马附近，然后将船上的两门大炮拖出，面朝整个岛屿。当他行驶到太平洋一侧的时候，他下令砍伐树木，建造了一艘新船，招募了一群逃跑的奴隶作为船员，几周之内在秘鲁无人防守的海岸一带令人闻风丧胆。

奥克斯纳姆最后的结局是在利马城被吊死，但是4年以后他的老船友弗朗西斯·德雷克（同样是善于欺诈的盗贼，但有着远见卓识，总而言之，最完美高超的海盗）卷土重来，带着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航行绕过南美洲的最南端，将秘鲁劫掠一空。在他所率领的由6只海船组成的船队中，最终只有一艘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不过这艘船装备的武器弹药非常充分，因而很快就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英国舰队的权威地位。德雷克继续他的海盗事业，从一艘西班牙货船上抢夺了史上最大一批金银（超过25吨），之后意识到不能再原路返回，于是他镇静地满载着他的战利品环游世界。海盗的事业是有着丰厚的回报的：德雷克的赞助者们得到了47倍的回报，而伊丽莎白女王仅用她所享有的1/3的战利品，就还清了英格兰所有的对外债务。

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们分别将自己国家那些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们派往新大陆。但是这些进展却不怎么顺利。在一次希望战胜经验的巨大胜利后，法国人于1541年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希望在此找到金矿和香料。但他们后来发现，在魁北克这两种东西都缺少，因此殖民地的建立也就失败了。法国人接下来的努力也没有能够成功：法国殖民者模仿西班牙人，几乎就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要塞的隔壁定居，结果迅速地遭到了屠杀。

第一批英国的冒险家们也同样不切实际。在于1579年威慑整个秘鲁以后，德雷克沿美国西海岸往北航行，在加利福尼亚（也许就在现在被

称为德雷克湾的、旧金山附近风景如画的入海口处）登陆。在那儿他将当地人召集到海滩上，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的家乡现在被更名为新阿尔比恩——新英格兰——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属地。然后，他再次出发起航，再也没有返回。

1585年，德雷克的对手沃尔特·拉雷（或者像他的对手们习惯称他的那样，沃尔特·雷利）在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罗阿诺克。拉雷比德雷克更加务实，至少给殖民地带来了真正的拓荒者，但是他想将罗阿诺克作为劫掠西班牙船只的海盗巢穴的计划却是灾难性的。罗阿诺克岛的地理位置非常差，因此当第二年德雷克从岛边驶过的时候，饥饿的定居者们便搭载德雷克的船只回英国了。拉雷的一个副手把第二批人运到了罗阿诺克（他本应该把这些人带往切萨皮克湾一个更适宜的地方，但是却迷路了）。没有人知道第二批定居者们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的统治者于1590年返回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名字——克罗坦，定居者们对于罗阿诺克的称呼——刻在树上。

这些边境地区充满暴力，生命因而显得廉价，但无论何时美洲原住民的生命总是要比那些殖民者的廉价许多。西班牙人喜欢开玩笑，嘲弄位于马德里的君主们是如此的低效，以至于“如果死亡来自西班牙，我们所有人都会永生”，但是美洲原住民可能不会觉得这玩笑有趣。对于他们来说死亡确实来自西班牙。因为有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屏障，他们进化得对于旧世界的病毒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自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几个世代以来，他们的人口至少下降了3/4。这就是第六章中提到过的“哥伦布大交换”：欧洲人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而美洲原住民却染上了天花。虽然欧洲殖民者有时发现他们遇到的原住民有着令人恐惧的残酷，但大部分情况下死亡却是以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降临在原住民身上，就像人的呼吸或者体液中的微生物一样。而且这些病毒传播的速度要比在欧洲大陆上快得多，一旦从殖民者传播到原住民身上，只要这位感染了的原住民接触其他健康的原住民，病毒就会随之传播。因此，只要白种人露面，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去原住民不断缩减的人口。

在任何土地肥沃的地方，殖民者都会创建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克罗斯比所称的“新欧洲”——移植他们家乡的翻版，使他们熟悉的庄稼、杂草、动物四处遍布。而在那些殖民者不想要的土地上，比如新墨西哥，正如西班牙总督宣称的那样，“除了裸体的原住民，假的珊瑚，以及一些鹅卵石”，那里什么都没有，但这些殖民者的生态帝国主义（克罗斯比的另一妙语）仍然改变了这些土地的样貌。从阿根廷到得克萨斯的广大地区，牛群、猪群、羊群四处奔跑，变得更加野性，并繁殖了上百万的牲畜，占据了整片草原。

更妙的是，殖民者们还创造了“改进的”欧洲，在这里他们不用试图从粗暴的农民身上努力敛税，他们可以将幸存的原住民变成奴隶或者——如果原住民无法利用的话——运到欧洲做奴隶（证据证明第一批运送而来的黑人奴隶是在1510年，到1650年为止黑人奴隶的数量已经超

过了西属美洲的欧洲人）。“即使你是穷人，你在这儿过得也要比在西班牙富裕得多，”一位在墨西哥的殖民者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你总是负责的人，不需要亲自工作，而且你可以骑在马背上监督他人。”

通过建造升级版的欧洲，殖民者们开始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另一次革命。在16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们总是依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仅仅将新大陆作为劫掠的来源，用以资助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将美洲与旧世界分割开来的海洋就是一件麻烦事。但是到17世纪，地理上的分割开始变成一件好事了。殖民者们可以利用新旧大陆的不同生态环境，生产欧洲所没有的，或者在美洲出产效益更高的商品，然后将之销往欧洲市场。于是，大西洋不再是一种屏障，而更像是一条高速通道，使得贸易者们可以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1608年，法国殖民者们又回到了魁北克，只不过这次是作为毛皮商人，而不是为了淘金，他们由此繁荣发达起来。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们在1612年发现烟草在弗吉尼亚生长得特别好，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饿死。尽管这些烟叶没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质量好，但是成本非常低廉，于是很快英国人就开始大把地赚钱。1613年，荷兰的毛皮贸易商在曼哈顿定居，之后买下了整座岛屿。17世纪20年代，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从英格兰来到马萨诸塞的人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将用来制造船桅杆的木材运回国内。到17世纪50年代时，他们开始将牛群和鱼干送往加勒比海地区，在那里糖就像白金一样正掀起一轮新的热潮。殖民者们和奴隶们，开始是细水长流般缓慢地，然后如洪水般大批地向西跨过大西洋来到新大陆，而奇异的商品与赋税则向东流回欧洲。

在一定程度上，新边境的移民总是做着类似的事。古希腊人将小麦从西地中海地区运回国内，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定居者们将大米沿大运河一直北上运往京城，而大草原边上的殖民者们则将木材、毛皮与矿产运回莫斯科与北京。但是大西洋周围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海洋的广袤无垠——尽管很大但仍是可以管理的，考虑到复杂的现代航运的话——使得西欧的人们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一种由互相叠加的三角贸易体系连接起来的相互依赖的、横跨大陆的经济。

贸易者们不再是简单地将货物从A地运到B地，他们可以将西欧的工业制品（纺织品、枪械等）运到非洲西部，以此交换奴隶获取利润，然后他们可以将奴隶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并以之交换糖（同样，获取一定的利润），最终他们可以将糖带回欧洲出售，获取更多的利益，然后再购进一批新的制成品，再次出发去非洲进行交易。另外，定居于北美洲的欧洲人也可以将他们酿造的朗姆酒运到非洲来交换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至加勒比海地区以交换糖，然后再把糖带回北美洲以生产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可能会将食物从北美洲运到加勒比海地区（那里用于生产糖的土地非常昂贵，如果为奴隶们的生活需要而种植庄稼太不划算），他们在那里购买糖，然后将其运到西欧地区，最后带着北美洲所需要的各种制成品返回。

落后的政治体制也显示了其优越的一面，为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16世纪欧洲的大帝国，西班牙拥有最发达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政体通常将商人们看作赚钱机器，威胁他们缴纳钱财，还将殖民地看作用于掠夺财富的来源。如果哈布茨堡家族真的成功地打败他们的欧洲劲敌，将欧洲统一为陆上大帝国的话，大西洋经济肯定会像这样一直保持到17世纪。但是，相反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相对落后的西北边境的商人们，因为他们国王的软弱，将情形导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些人中最为领先的是荷兰人。在14世纪时荷兰还只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地区，被分割成一个个城市大小的城邦。理论上来讲荷兰人应该效忠于哈布茨堡王朝，但实际上那些遥远而繁忙的统治者发现，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欧洲西北地区要麻烦得多，显得很不值得，因此就将政权留给了荷兰本地城市的上层人士。为了生存，荷兰的这些城邦不得不改革创新。缺少木材，它们就开发泥炭作为能量来源；缺少食物，它们就在北海一带捕鱼，然后用渔业所得和波罗的海附近的国家交换粮食；因为缺少国王和贵族来统一管理国家，富裕的商人们尽力使城邦成为商业友好之地。充足的资金与更为完善的政策帮助荷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到16世纪后期，曾经落后的荷兰一跃成为欧洲的银行业中心。因为可以以低利率对外借款，荷兰一直为欧洲持续不断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支持，直到慢慢地削弱西班牙政权。

英国缓慢稳步地朝着荷兰人的方向发展。黑死病爆发之前，英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王国，但是其蓬勃发展的羊毛贸易使得英国的商人比除荷兰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更有影响力。在17世纪，商人们最先带头反对国王、挑起战争，甚至最终将那些软弱的统治者们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推动政府建立一支庞大的、最先进的舰队。当1688年一场政变将一位荷兰王子推到英国王位的宝座上时，商人们就是其中主要的受益人。

1600年以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逐渐削弱，与此同时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积极地向大西洋推进。如图9-2所示，1350年在欧洲西北部边境的英格兰和荷兰地区，普通民众的工资水平已经稍高于富裕但更拥挤的意大利的工资水平。1600年以后，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饥饿的人们所带来的无情压力使得工资退回到黑死病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在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工资却越来接近15世纪黄金时代的水平。

这一切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像以前的西班牙人一样，从美洲大陆榨取财富运回欧洲。当专家们就欧洲西北部的新财富有多少直接来自殖民与贸易展开辩论时，最高的估计也在15%以下（最低的仅为5%）。大西洋经济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工作的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曾好几次提到过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恐惧、懒惰以及贪婪。恐惧一般会战胜懒惰，因此当1450年后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全欧洲的人们因为对失去地位、挨饿甚至饿死的恐惧与焦虑而行动起来。但是1600年后，贪婪逐渐开始战胜懒惰，大西洋经济系统的多样性生态、成本低廉的交通、开放的市场使得小奢侈品成为欧洲西北部普通民

众负担得起的消费。到18世纪时，一个人只要口袋里有些余钱就可以做很多事，而不仅仅是买块面包。他可以买到进口茶叶、咖啡、香烟、糖或者自家制作的土烟管、雨伞、报纸一类的东西。大西洋经济体系不仅使金钱获得慷慨的回报，也使得人们愿意支付贸易商们所需要的现金，因为贸易商们会不惜价钱购买一切他们所能买到的帽子、枪支、毛毯并运往非洲或者美洲进行交易，而制造商们会付钱让人们来生产这些东西。一些农民整个家庭都从事纺纱织布的工作，一些人加入了手工作坊，一些人彻底放弃了耕种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人发现为这些手工业者提供食物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市场，从而使圈地、灌溉、施肥的集约化管理和购买更多的牲畜成为可能。

具体的细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欧洲西北部的人们确实越来越多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能够购买更多的糖、茶叶与报纸等生活用品——这也意味着有更多奴隶跨过大西洋被贩卖到美洲，更多土地被改成种植园，更多工厂和商店陆续开办。销售额逐渐增长，规模经济开始出现，物价下跌，这片遍地货物的新大陆更多地为欧洲人打开。

不论是好是坏，到1750年为止世界上第一种消费文化已经在北大西洋沿岸成形，并改变着上百万人的生活。这时的男人们一般都不敢在咖啡馆公然露面，除非他们能够大方炫耀自己的皮鞋和怀表——更不用说要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客人来访时不能在茶里加糖，自然不会悠闲地把几十天的宗教圣日当做假期一样度过，也不太可能会遵守“圣周一”的习俗，用这天来睡觉以摆脱周日狂欢的宿醉。当有那么多商品要买的时候，时间就如同金钱一样珍贵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经惋惜道，“以时针就能很好地分割一整天时间”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世界就像钟表一样，但中国的时间却是静止的

事实上两个指针的时钟只是新的时代对于人们的最低要求。西方人想要了解播种机和三角犁，想要知道真空与锅炉的原理，想要了解那些不仅有两个指针，而且即使带到世界的尽头也能准确显示时间的时钟。正是这样的时钟使得在海上航行的船长们能计算出经度。2000年以来——事实上，自从上次社会发展指数达到40分上限以来——古代人睿智、古老的声音一直都在为人类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提供指引与借鉴。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古人的经典不能为他们想了解的东西提供答案。

弗朗西斯·培根写于1620年的《新工具论》一书的书名就说明了一切。工具论是哲学家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6本逻辑学著作的称谓，但是培根却重新赋予它们以新的定义。培根坚持，“古代典籍所享有的荣誉和尊敬丝毫不变，从不消减”。他说，他的目标是“仅仅作为一种指导来指

引未来的道路”。尽管如此，培根也指出，一旦我们开始这项征程，我们会发现“只有一条道路……一定基础上对科学、艺术和所有人类知识的完全重构”。

但是什么又能提供这一重构的基础呢？非常简单，培根（以及越来越多的他的同辈们）说，那就是观察。哲学家们应该从理论的故纸堆中抬起头来，认真审视他们周围的一切——星星与昆虫、火炮与船桨、掉落的苹果和摆动的吊灯。他们应该和铁匠、钟表匠以及机械师这些真正懂得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们交流。

在培根、伽利略、笛卡儿以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们看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结论：和大部分古圣贤所说的相反，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有着自己愿望和意图的活着的、呼吸着的有机体。它实际上是机械的。事实上，大自然和时钟非常相似。上帝就像一个钟表匠，他拧开内部互相啮合的齿轮使自然运行，然后退到旁边观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类就应该可以像对待其他的机械装置那样揭开大自然的运作机制。毕竟，笛卡儿说：“一个由必要数量的齿轮组合而成的时钟会显示时间，就像由一粒种子萌芽而生的植物会结出特定的果实一样自然。”

关于自然的这一钟表模型——再加上一些非常聪明的实验与推理——所获得的收益非常惊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秘密被突然地、惊人地揭露出来。结果发现，空气实际上是一种物质而非虚无；心脏的跳动将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就如同河水的流动与咆哮一样；还有，最让人困惑的是，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这些发现都和古代的著作甚至圣典相违背，因而引发了一场场批判的风暴。伽利略对于天空的缜密观测的回报是，在1633年被拖到教皇法庭上，被恐吓威逼收回对于自己知道是正确的理论的宣称。但是所有这一切恐吓威胁最后的结果却是促进了新思想从旧地中海中心地区传播到欧洲的西北部。在这里，社会发展正在快速前进，因而古代思想的缺点也就最为显而易见，人们对于挑战古代权威的焦虑也最为轻微。

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始了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拒绝古典的思想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从中寻求答案。到17世纪90年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社会发展已达到顶峰，正在艰难地缓慢推进，巴黎的学者们一本正经地就现代人是否正在超过古代人展开了辩论。到那时为止，对任何有眼睛可以视物的人来说答案都再明显不过了。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使用他本人创立的微积分来表达他所构建的宇宙的机械模型。[7]这本书之深奥难懂（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言）不亚于爱因斯坦于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不过尽管如此，每个人都不得不同意（正如他们对于相对论那样）这本书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再夸张都不足以描述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功绩。当英格兰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被请求歌颂牛顿的时候，这位诗人这样颂扬道：

自然，以及自然的伟大法则隐藏于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于是瞬间到处充满了光亮。

但在现实中，从黑夜到白天的转变并不是那样瞬息而就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出版时，正值英格兰最后一桩吊死巫师的事件发生5年以后，而5年之后又发生了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巫师审判。而牛顿本人对于炼金术和地球引力同样热情，一直到最后都坚信他能将铅变成金子，这些因为1936年数千份他的私人信件被拍卖而为大家所熟知。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他不是唯一一位拥有在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逐渐用数学消解了神灵与魔鬼的传说，数字成为现实的衡量尺度。

根据伽利略的观点，哲学就交织在宇宙这本宏大的书中，连绵不断，供我们仰望观瞻……它是以数学为语言写成的，组成它的文字有长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类是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词的。如若没有数学以及这些数学图形，人类就如同在黑暗中漫步一样。

一些科学家推测，自然界的真理可能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们——尤其是金融家们——非常欢迎这一观点。同样，国家也可以被看作一台机器，政治家们可以计算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部长们也可以校准其内部复杂的齿轮。但是这种新的思考方式也非常令人担忧，自然科学通过揭露古代权威观点的任意性而获得了自己新的角色，社会科学会不会同样对国王与教会的权威加以颠覆呢？

如果这些科学家是正确的，观察与推理确实是理解上帝意愿的最好工具，那么说它们同样是管理政府的最好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认为自创世之初上帝就赋予了人类某些自然权利也是同样合乎情理的，他由此推断：“人类从出生起就拥有一项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就是他的生命、自由、资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与侵犯。”因此，洛克总结道：“人类结成联邦，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最伟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就是“生而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个人同意，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或置于别人的政治权利之下”。

如果这些观点只限于那些在象牙塔里用拉丁语高声辩论的知识分子的话，它们可能会非常让人困扰。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些观点首先兴起于法国，然后很快扩展到其他国家，富裕的妇女们赞助成立了许多沙龙，在那里学者们互相讨论，新的强大思想震荡着社会。业余爱好者创办了讨论俱乐部，邀请演讲家们解释新的观点，展示他们的实验成果。低廉的印刷费用、更好的发行制度、民众们越来越高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新闻报纸业的兴起，将新闻报道与社会批评和读者来信结合起来，将狂热与骚动传递给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星巴克出现的300年以前，有进取心的咖啡屋所有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提供免费的报纸以及舒适的椅

子，顾客们就会愿意在那儿坐下——读书、辩论、买咖啡喝——待一整天。一种新的东西逐渐形成了：公共意见。

舆论制造者们喜欢宣称启蒙运动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用智慧之光照亮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宗教迷信所蒙蔽的黑暗深处。但是到底何谓启蒙呢？德国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曾经这样直率地描述启蒙运动："敢于去了解！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由思考！"

这一运动对于既定权威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大部分18世纪的君主们选择了妥协，而非与之抗争。他们坚持说他们一直就是开明的、受过启蒙的专制者，他们的统治是合情合理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哲学家们应该不仅是世界人民的老师，也是各国王子们的老师，"普鲁士国王曾经这样写道，"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思考推理，而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来行动决策。"

但是，在实际中，王子们通常会发觉他们的臣民的思维与逻辑非常让人恼火。在大不列颠[8]，国王们不得不忍受臣民的这些逻辑；在西班牙，统治者们可以将之肃清消灭；但是在法国却有着足够的先锋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就来自法语），到处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各种批评家，以及足够多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将这些批评家们投进监狱并不时地将他们的著作列为禁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认为，这是"一种为批评与讽刺所缓和了的专制主义"——这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完美的温室花园，启蒙思想可以在这里兴旺发展。

在所有这些18世纪50年代启发了法国的社会批评与争论的书籍与妙语中，没有什么能比《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更能激励人心、更能给人以启迪了。"没有例外，也无须额外的告诫，一个人必须认真审视并触动所有的事情，"那部书的一位编辑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将所有过去的愚蠢浅见践踏于脚下，推翻那些不是以逻辑建立起来的障碍，重建宝贵的科学和艺术自由。"一场接一场的叛乱都坚持宣扬奴隶制、殖民主义、女性与犹太人法律地位的低下有悖于自然和理性。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在18世纪60年代于瑞士流亡期间，甚至公然挑战他称之为"臭名昭著的东西"——教会与国王的特权。

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知道欧洲应该到何处寻求更为开明的典范：中国。他坚持认为，在中国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贤明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通过和合理的官僚体系协商进行统治，竭力避免发动无意义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也找到了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和基督教义不同）儒家思想是一种对于理智的信念，不受任何迷信和愚蠢传说的影响。

伏尔泰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一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向专制统治提出挑战了。造纸印刷术的出现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比欧洲西部地区更广泛的、乐于接受新思想的读者群体，私人的学术团体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比伏尔泰更为直接

地与那些臭名昭著的事物对峙。在17世纪30年代，东林书院的领导人倡导自立，鼓励学者们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更古老的文本来寻求事情的答案[9]。因为大肆批评明朝廷的统治，一个又一个东林党的文士被关进了监牢，受到了残忍的折磨或者遭到处决。

当入关的清王朝在1644年开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时，知识分子们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了。数以百计的学者拒绝为满清朝廷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顾炎武，他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来没能通过最高的殿试。顾炎武将自己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地区，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干扰。在那里他背弃了从12世纪以来就一直统治着知识分子思想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而是像英国的培根一样，试图通过观察真实的人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情来理解世界。

顾炎武四处游历长达40年之久，将对农业、采矿业、银行业的详细描述都记录下来。随着他名声越来越盛，人们竞相效仿他，尤其是那些震惊于在17世纪40年代瘟疫爆发时自己竟然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这些医生收集病人的发病史，坚持要用实际结果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到17世纪90年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宣称这一方法有着“查考问题之根源，与普通民众切磋探讨，最后将之解决”的优点。

18世纪的学者们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即“实证研究”。它更看重事实而非推断，将条理的、严谨的方法应用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不断发展出评估证据的规则。在所有方面考证都可以和西欧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除了一点——它没有建立一个自然的机械模型。

和西方人一样，东方的学者们经常对他们从上次社会发展的高峰即指数高达43分的时期（就他们而言，是11～12世纪，处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所继承来的学问感到失望。东方人没有否定以气为主宰的宇宙观，或者幻想一个像机械一样转动的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回溯到更受尊敬的权威——古代汉朝的经典文本。即使顾炎武本人对于古代碑文的热情也不亚于采矿或者农业，而很多采集病例史的医生在用其证明汉代医学典籍的正确性时的兴奋也不亚于治病救人时的欢欣鼓舞。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改变文艺复兴的形式，而是选择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其中涌现了很多伟大的学者，但是这一选择也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伏尔泰错误的地方。他将中国树立为一种典范恰好是在中国要结束这种典范的时候——事实上，此时此刻，在欧洲的学术沙龙里伏尔泰的对手们正开始对中国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没有社会发展指数来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削弱了东方的领先地位，这些人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绝不是理想的开明帝国。相反，中国是欧洲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欧洲从古希腊文明中学习到了物力论、逻辑推理和创造性的精神，而且正在超过他们的老师，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时间却像是静止的。

西方优越性长期注定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孟德斯鸠认为气候是最终的解释：凉爽宜人的天气给予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力，使得他们富有耐心而又勇敢无畏，能够成就艰巨的事业”，然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的软弱性使得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奴性的精神，是他们一直都无法摆脱的”。

其他一些欧洲人在这一理论上发展得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仅是天生奴性，他们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遗传基因学之父卡罗鲁斯·林奈乌斯曾经宣称发现人类有四大种族——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红色皮肤的美洲人以及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在18世纪70年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只有白种人才有能力构建真正的文明。康德甚至怀疑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曾经这样认为，可能黄种人是印度人与蒙古人的后代。

很明显，欧洲白人更拥有敢于发问的精神。

康熙，伟大的傻瓜：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那年夏天的境况尤其艰难，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难民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到达的时候会受到多少欢迎。时至今日，剑桥的科学实验室里到处是中国学生的身影，但是在1937年的时候休谟和康德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帮助他掌握中国的语言以及古代历史。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安全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

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40年后当我结识他的时候（当时我的妻子正在鲁桂珍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人类学，我们租住了鲁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楼），李约瑟仍然在研究这一问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10]，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

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一位长期以来视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国诗人（此处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经满怀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传教士们知道历法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在错误的日子庆祝冬至日可以使整个宇宙陷入混乱，情况之糟糕不亚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搞错了复活节的日期。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16世纪80年代，耶稣会士出身的数学家们曾经深深地卷入了天主教历法的改革中，尽管他们的历法以欧洲西北部地区的标准来看已经过时了（他们顽固地坚持地球中心论的宇宙观），但还是要比中国的任何历法好得多。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1610年时，好几个朝廷要员因为对耶稣会数学的深刻印象，秘密地改信了基督教。他们公开地宣扬欧洲的学术要优于中国，并且翻译欧洲的教材。一些较传统的学者有时不禁对这种不爱国的态度感到反感，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耶稣会的主要支持者开始采取一种更微妙的策略。“将西方知识的内容融化，”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我们可以将它们融入（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模子里。”他甚至暗示，可能西方学术只是早期中国智慧的副产品。

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且在1656年的几个月中似乎皇帝本人也要改信基督教了。胜利好像已经在望，直到这位十多岁

的君主意识到基督教不允许一夫多妻制，因此他转而支持佛教。传统主义者们于是开始了反击，指责耶稣会是间谍组织。

1664年又举行了另一场关于天文望远镜的竞赛，耶稣会士、天文局以及一个穆斯林天文学家分别预测即将到来的日食的准确时间。天文局说，2点15分；穆斯林说，2点30分；耶稣会士说，3点。望远镜被架设起来，以便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2点15分到了，日食没有出现。2点30分，仍然什么也没有出现。几乎刚好就在3点的时候，一片阴影开始慢慢笼罩了这个火红的圆盘。

裁判们裁决道，不够好，就此禁止基督教。

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了——除了中国历法仍然是错误的这一让人烦心的事实。因此，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立即重新安排了一场比赛。耶稣会士再一次获胜。

康熙皇帝因此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见图9-3）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图**9-3** 伟大的笨手笨脚的统治者？清朝皇帝康熙，由意大利艺术家乔瓦尼·盖拉尔迪于**1700**年前后绘成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

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1773年：乾隆时期西方超越了东方

当康熙大帝于1722年去世的时候，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曾经有两次，分别是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帝国和1000年之后的中国宋王朝，社会发展指数曾经达到了43分，但是灾难随之而来，将社会发展再次带入低谷。尽管如此，到1722年草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已经死掉了，社会发展也没有在达到高峰的时候崩溃。相反的是，新的边境以及草原的边缘地带使得东方社会发展继续上升，而与此同时，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努力而免于草原民族迁徙的威胁，在大西洋上开辟了新的边境。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更为迅速，并且在1773年（或者在那前后）赶超了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可谓一个新的时代。

或许有人要问，是这样吗？如果罗马帝国时代或者中国宋王朝时期

的人们被放置到18世纪的伦敦或者北京的话，不论男女，他们肯定会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惊奇。比如说枪支，或者美洲新大陆，或者烟草、咖啡和巧克力。至于流行时尚方面——假发？满族人的大辫子？紧身衣？裹着的小脚？啊，什么样的时代！啊，什么样的习俗！他们会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像西塞罗过去喜欢说的那样。

但是很多方面，事实上非常多的方面，应该都看起来非常熟悉。现代世界以火药为装备的军队肯定比古代的要强大很多，而且比之古代，现代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识字，但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自豪地宣称拥有像古罗马或者中世纪的开封那样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11]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过去的人们会发现尽管社会发展比过去上升得越来越高，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却与罗马人和中国宋朝人们采用的方式无异。农民们在使用更多的肥料，开挖更多的沟渠，循环种植农作物，减少休耕。工匠们在燃烧更多的木材以铸造金属，当木材变得稀少的时候，又转而使用煤炭作为能源。人们饲养更多、更大的动物来帮助转动车轮、提拉重物或者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拖动更好的马车。风能和水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用来粉碎矿石，碾磨谷物，在改造的河流以及人工运河上拖曳船只。但是，尽管宋朝和罗马时代的人们很可能会承认18世纪的很多事物比1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时要更大、更好，但他们可能不会承认事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这就是麻烦之处。对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没有突破罗马人和宋朝人在43分左右所经历的瓶颈，只是将其推得更高一些，而到18世纪2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警示的信号，显示社会发展再次被拉到了极点。图9-2的左半部分所显示的实际工资，情形就不是很乐观。到18世纪50年代时，各个地方的生活标准都在下降，即使在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西北部地区也不例外。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极力想将这一极值推得更高，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北京的官僚们、巴黎出入沙龙的人们以及每位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都竞相抛出不同的理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因此开始劝说统治者对那些抽干沼泽或者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的农民们施以仁慈，减免他们的税收。从中国的云南到北美的田纳西，棚户和小木屋延伸到越来越远的、未开化民族狩猎的森林地区。其他理论则坚持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贸易，因此统治者们（经常是同样的那几个）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抢劫邻国的商业，使邻国变穷。

在这一点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体来说，西方的统治者们（自从15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东方的统治者们（通常战争打得不那么激烈）认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598年从朝鲜撤军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此决定对外征服没有任何利益，而到17世纪30年代时，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只会使他们流失诸如银和铜之类的贵重货物。中国和荷兰（1640年时唯一准许进入日本的欧洲国家）的商人们被限制在日本长崎狭小的贫民区里，而妓女是唯一允许进入这个地方的

日本女性，因此对外贸易的减少就毫不奇怪了。

辽阔蔚蓝的海洋保护了日本不受侵略，因而直到1720年日本社会一直繁荣兴旺。日本的人口翻倍地增长，江户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米饭、鱼和豆子代替了廉价的食物，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食谱中。和平主导着这片土地：普通日本民众自从在1587年将他们的枪支上缴给丰臣秀吉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武装自己。即使是脾气暴躁易怒的武士们也同意通过剑术来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点使得19世纪50年代恃强凌弱侵略日本的西方人士惊讶不已。“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少知道如何使用火枪，”一位西方人这样回忆道，“这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对武器的无知是一种反常，象征着原始的纯真和田园式的单纯，要知道，他可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孩子们举枪射击的。”

但是，1720年后情形就逐渐不容乐观了。日本的人口达到了极限，没有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想要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挤出更多的食物、燃料以及住房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没有对外贸易，日本人也无法从外面获得更多的物资。日本农民们展示了令人吃惊的独创性，日本的官员们也意识到燃料危机对他们的森林植被造成的损害并开始积极地保护森林，日本的精英文化因此转向一种朴素美丽的、旨在保护资源的简约主义。尽管如此，食物价格仍然不断上升，饥荒越来越多，饥饿的暴民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日本不再是世外桃源。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极端的道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日本国土安全的一大确实可信的威胁——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广阔的、开放的疆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会一直持续增长，但是清王朝还是不断地将大洋之外的危险世界拒之门外。1760年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这一通商口岸，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1st Earl Macartney）向清政府抱怨贸易的限制时，乾隆皇帝断然回复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更多的接触，他总结道，“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西方的统治者们很少会赞成乾隆皇帝闭关锁国的观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中国的清王朝那样由一个大帝国所主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争吵与不断的权力转换的世界。正如大多数西方统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的财富是固定的，一个国家也总是可以争抢到这个蛋糕中最大的一块。用于战争的任何弗洛林（英国旧货币单位）、法郎或者英镑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只要有一些统治者这样想，所有国家的统治者们就都不得不做好打仗的准备。西欧国家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洲的军火商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贸易工具（更好的刺刀、预先包装好的弹药盒、更快的发射装置），但是真正的突破还是来自更科学地管理、组织暴力。纪律——诸如制服、约定的军衔、为那些随心所欲的军官们而建立的行刑队（普通士兵与之相反，总是受到残忍的惩罚）

——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而全年制训练的增加更是创造了能够进行复杂的军事演习和稳定射击的战争机器。

这些井然有序且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为了掠夺更多的荷兰盾（荷兰及荷属殖民地的货币单位）而发动战争，造成了更多的伤亡。之前荷兰与它的敌对国家常常与私人签订合同，让签订者雇佣大群的暴民杀手，可是不定期甚至从不付给杀手们雇佣金，让这群乌合之众从普通老百姓那里敲诈。但是后来它们都相继摒弃这一廉价而肮脏的传统。虽然战争仍然可怕，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

在海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海盗横行，他们跳下海盗船，将抢来的宝藏埋藏在岛屿上。于是英格兰发起一场新的打击海盗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像中国在16世纪发起的那场战争一样，打着反对贪腐、振兴国家的旗号，但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摩根船长（一位17世纪来自威尔士的加勒比士兵，后来成为一种朗姆酒的代名词）无视英格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条约，在1671年对西班牙在加勒比的殖民地进行大肆掠夺。但是在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居然获得了骑士头衔，甚至爬上了牙买加总督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701年。那时同样臭名昭著的基德海盗船长抢劫了一艘来自英格兰的船。被发现后，他的船被强行拖到伦敦。在伦敦，当他获知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国王）不能或不愿意帮助他时，他用最后一先令买了一瓶朗姆酒。随后他就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绞刑架前他大声高呼“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声音大得几乎把绞索震断了。在从前这也许可以救了他，但在那时却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用第二根绞索来结束他的性命。

直到1718年，英国海军包围了黑胡子海盗（爱德华·蒂奇，18世纪横行加勒比海地区最臭名昭彰的海盗。著名的“黑胡子”这个外号就来源于他那满脸零乱而又尽显狂野的黑色长胡子。“黑胡子”在全盛时期拥有由4艘帆船组成的海盗舰队，其中“复仇女王”号是他的旗舰），而当时没有人愿意去救他。当时人们花了比处决基德更大的力气来对付他——对着他开了5枪并且捅了55刀，但最后还是那些水手结果了他的性命。虽然那一年在加勒比发生了50次海盗掠夺，但到了1726年，海盗掠夺只出现了6次。海盗横行的年代结束了。

打击海盗是要花钱的。只有财政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组织领导上才能提高。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每年士兵和水手巨额的供给。但是荷兰政府再一次找到了解决方法——信贷。俗话说只有钱才能生钱，荷兰有稳定的商业收入，有可靠的银行处理现金，同时那些商业大亨还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来更多的钱，可以用比那些爱挥霍的敌人更长的时间来还清债务。

英国曾经一度跟随着荷兰的步伐。到1700年时，两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并且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长期债券来管理公共债务。为了解

除放贷者的顾虑，政府通过征税来偿付基金的利息，其结果让人称道。正如丹尼尔·笛福（新海洋航道的史诗巨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

> 信贷制造了战争与和平，组建了军队，装备了海军，发起了战争，包围了城镇。总的来说，与其把它叫作金钱，还不如把它叫作战争之源更为合适。信贷迫使士兵战斗，却不付给他们报酬；让海军前进，却不给他们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兴或是有需要，它就会给英国财政部与银行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无穷无尽的信贷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大英帝国通过与荷兰长达20年的战争，才从后者手中抢来了最大的贸易份额。然而这个胜利只是为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争夺铺平了道路。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摆脱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英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他们担心“一旦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当时英国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坚持认为解除这一担心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德国来征服美洲”，同时为大陆联盟提供资金，使法国在欧洲受限，这样英国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一直都在交战。这一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国第一次侵略英国，却以失败而告终。1815年，威灵顿最终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英法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夺不过就是一场西方内战——一场为了争夺欧洲核心位置的战争。大批的军队在德意志拦击战斗，并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在暴风雨肆虐的法国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双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开厮杀。在美洲西部与孟加拉的丛林中，这些欧洲人特别是当地的联军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战斗。这些独立游击的战役使这场西方内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中不乏勇敢与背叛的事例，这些足以写出好几本书来。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镑、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钱利益当中，信贷持续不断地为英国军舰、军队提供补给，但是法国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国人自夸说：“胜利的钟声频频在我们国家响起，我们的钟因而被敲打得破旧。”到了1763年，法国别无选择，只好签署条约放弃他们大部分的海外领土。

尽管如此，西方社会的战争还没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国人也感觉到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因而不得不试图让美洲的殖民者们为英法战争埋单。而当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发起义的时候，法国人用金钱与舰船来资助起义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决心坚定的起义者们以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财政上的利益还是可以减轻失败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将美洲输给那些受法国启蒙运动启迪的革命者们本应该会使英国的大西洋经济破产，并在欧洲开创一个法国帝国的统治。皮特也曾经同样担心，警告英国民众说如果英国输掉战争，他预计英国的每一位绅士都要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贸易与信誉再一次拯救了英国。英国逐渐还清了欠款，保证它的舰队一直在海上巡航，继续运送美国人需要的各种物品。到1789年时英美贸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法国人来说，1789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六积欠了大笔无力归还的债务，因此不得不召集贵族、僧侣和富裕的平民们，请求增加新的赋税，但是结果却是平民们发动启蒙运动来反对他。富裕的平民们大声宣扬着天赋人权（两年之后，还有女人的权利），发现他们自己一边发动了这一反抗和内战，而一边又试图置身事外。“让恐怖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激进主义者大声叫喊着，然后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国王的家属以及成千上万他们的革命同胞们。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计被历史的现实打乱了。美国的革命没有使英国顺利成为西方的主宰，而是创造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其中令人兴奋的几年中，法国的天才将军拿破仑似乎将会最终开创一个欧洲大陆帝国。1805年，他召集法兰西帝国大军，试图进行自1689年来第四次对英国的入侵。“让我们坚持6个小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告诉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拿破仑没有得到那6个小时，尽管他将英国商人关闭于欧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为英国商人们的最大梦魇，他还是不能摧毁英国的经济实力。1812年时，拿破仑控制了欧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国军队最远还侵略到俄国的莫斯科。两年之后，他却已经失去了大权，而一支俄国军队（由英国人出钱资助）却打到了法国巴黎。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的外交官们通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些条款，而这些条款将在接下来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战争。

这些战争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不同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的。在英法冲突前夕的1683年，维也纳也曾处在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围攻之下，但是当英法两国于1815年在此集会的时候，西方战争却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火药、军队纪律以及经济发展，而土耳其军队也再未光临过。当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英国才能将其赶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000人的英国军队（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当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欧洲射击术方面的训练）在阿萨耶对人数是他们10倍的南亚人进行扫射。很明显，军事实力的平衡已经打破，优势转移到了西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许多的战争和轰炸，实际工资水平却在1750年以后持续下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一群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所有科学和启蒙的工具都用于解决

这个问题。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却不是很好：他们宣称，铁一般的规律统治着人性。首先，虽然帝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但人们却总是会将多余的财富转化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空空的肚子则会消耗掉额外的财富。其次，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会使工资降低到饥饿边缘的水平。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循环。如果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发展指数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指出尽管发展的极限瓶颈被稍微推高了一点，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撼动的。他们很可能会兴奋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数于1773年赶超了东方，但肯定会说这些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铁一般的规律禁止任何指数上升得更高。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情形却真的改变了。

[1]　这些是黑泽明的经典小说《七武士》（1954）的背景，或者——考虑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变动的情况——约翰·斯特奇斯改编导演的几近经典的《七侠荡寇志》。

[2]《火线》是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与犯罪团伙间的交锋。

[3]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头戴有着12道褶缝的高高的红帽子，这12道褶缝象征着在千年之时将会达到统治顶点的12位伊玛目（伊斯兰教领袖）。

[4] 跳过各种复杂情况，他们的统治从1516～1598年，共长达82年。

[5]　敌基督，统治末世的基督的主要敌人，在《约翰书》里首次提到。在中世纪，当教皇和皇帝争权时，便互指对手为敌基督。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等新教领袖认为教皇制本身为敌基督。——译者注

[6]　他们谈判的结果非常富有成效，现在的两国边界仍然是在他们当初决定的黑龙江上。最近一次协商发生于2008年7月，也只是将边境线向河上的一座岛移动了一两英里。

[7]　除了一种情况，那就是，事实上17世纪70年代致力于相似的数学方法的德国思想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首先创立了微积分，而牛顿只是剽窃了他的成果。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但是互相对剽窃的指责最终使他们的关系破裂。

[8]　1707年英苏合并法案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成一个大不列颠的统一王国，1800年又有一部单独的法案将爱尔兰加了进来。

[9] 他们的领袖人物陈子龙从王阳明的学说观点中汲取了灵感。

[10] 这本书的后继者《四库全书》于1782年编纂完成，多达36000卷。

[11]　在东方，1722年的北京大约有65万居民，而江户（现代的日本东京）很可能人口稍微多一些；在西方，伦敦可能有60万居民，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为70万。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世界180度大转变

有时，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脚下的土地。在西方世界中，1776年恰是这种情形。在美国，一场抗税起义演绎成了一次革命；在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首部鸿篇巨制《国富论》；在伦敦，爱德华·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的兴衰》出版发行，一夜之内震撼全城。此时，伟人们正成就着不凡的事业。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是奥金莱克的第九任领主。不过，在当年的3月22日，博斯韦尔并没有参加智者云集的聚会，而是登上了一辆马车，沿着泥泞的土地，驶往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外的一片领地——索霍区。

从远处看，索霍区的钟塔、车道、帕拉第奥式的建筑外表恰似乡村小屋，说不定哪天博斯韦尔也想进去沏上一杯茶，听几个笑话。可是走近一瞧才发现，这里锤子撞击声、车床嘶鸣声、劳工咒骂声嘈杂混乱、充斥双耳，他对此地的任何美好幻想随即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并非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场景，此处是一个工厂。虽然博斯韦尔特权在握，自命不凡，但是仍想一睹为快，因为索霍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索霍区展现的一切正如博斯韦尔所料——成百上千的工人、“高大宏伟、设计精巧的机器”。更重要的是，此地的主人是马修·博尔顿（博斯韦尔称他为“铁的领主”）。博斯韦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博尔顿先生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想要的东西——能源。’”

正是博尔顿这类人欺骗了政治经济学家，令他们做出悲观预言。从采集狩猎者巡游苔原觅食的冰河时期至博斯韦尔和博尔顿相识的1776年，西方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指数仅提高了45分。可是在随后的100年里，却提高了100分。进步之快难以置信，世界来了个180度大转变。1776年东西方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都只比43分——这一发展分值的上限高一点儿。一个世纪之后，能源交易将西方领先变成西方统治。“此乃真理”，诗人华兹华斯于1805年如是说：

……一小时的

世界在躁动，最温和的人都被激发了；

骚动、激情与观点的碰撞

充满了貌似平静的屋子。

普通的生活中却激荡着思想观点的碰撞。

我一直说：“历史真是讽刺啊，

过去就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的确，历史是讽刺的，至少过去是这样。但实际上，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世界的躁动才刚刚开始，在下个世纪西方世界将迎来超常规的发展。对于任何在纵轴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冲到906分的图表（见图10-1），都会将充斥本书前九章的上下沉浮、领先落后、胜败得失的社会变化贬得一文不值。而这些变化都是由博尔顿所出售的能源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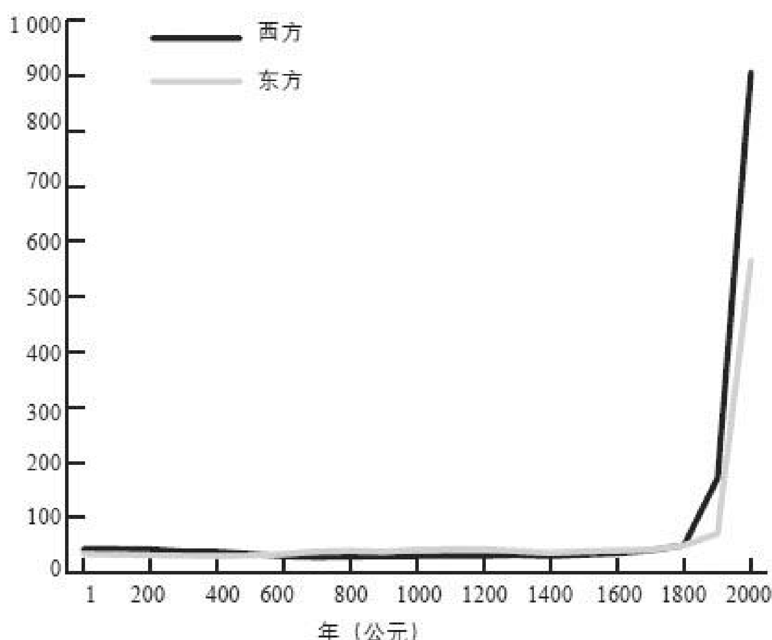


图10-1 世界躁动：过去2000年社会发展状况。此图展示了自1800年来西方引领的发展腾飞，这让世界早期历史中的所有事件变得无足轻重

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

其实，早在博尔顿之前，世界就有了能源，而他所出售的是更先进的能源。几百万年来，几乎所有驱动力都来自人力和畜力，虽然人力、畜力非常惊人——可以兴建金字塔、开凿大运河、描画西斯廷大教堂——但终究有局限性。最明显的就是，人力、畜力是动物身体的一部

分，动物需要吃，需要睡，还需不时地补给能量、添加衣物。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植物和其他同样需要吃、睡等活动的动物。并且，在这条相互依存的关系链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土地的支持。因此，当土地在18世纪中叶越来越紧缺时，人力、畜力也变得昂贵起来。

几个世纪以来，风能和水能推动轮船和磨石运转，助人力、畜力一臂之力。但是，风能和水能同样有弊端，它们只能在某些地方使用。蒸汽冬天凝结，夏天蒸发；而空气一旦凝重，风车的叶片就一动不动。

人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都能方便使用的能源，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能源，而不是将工作迁移到能源所在的地方完成。此外，这种能源来源要可靠，不会因天气的变化而改变供给；它占地适中，不会侵占百万顷树木和农田。11世纪中国开封的冶铁工场主发现，煤是种不错的能源。但它也有局限性，煤只能在发热时提供热量。

将热量转化为动力的突破始于18世纪，地点就在煤矿中。当时，洪水一直困扰着人们。虽然可以用人力、畜力和铲斗开采矿井（比如，有个聪明的矿主给500匹马套上轭，让它们来拉一条铲斗链），不过非常昂贵。事后，人们发现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用发动机（以矿井中的煤为动力）将水抽上来，而无须吃食物的动物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18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区都需要煤，都面临着矿井被淹的情况，但英国的发动机制造者想出了解决方法。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讲，这里是欧洲西北部最边缘的地方，大西洋经济体的国家鼓励具有某些科学性的补锅工作。补锅匠将商业的敏锐、实际操作金属的经验与一些基本物理知识相结合，来解决能源紧缺问题，他们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人在中国和日本也存在，不过凤毛麟角。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着修补过燃烧煤炭的发动机。

“矿工之友”是西方使用的第一台抽水机，于1698年在英格兰获得专利权。这台机器燃烧煤来煮沸水，然后将蒸汽在真空中冷凝。随后，操作人员打开阀门，在真空的作用下水从矿井中吸上来。如今，工人们关上阀门，移动灶火，同样可以将水煮沸，产生蒸汽，不断重复煮沸、冷凝这一有违万有引力的过程。

“矿工之友”运行缓慢，且只能将水提升40英尺。此外，它的明显不足之处就是易爆炸。不过，它仍比喂养上百匹马要便宜。这台机器也给予修补工作更多的灵感，但改进后的发动机依旧十分耗能，因为它们要用同一汽缸煮沸水，然后冷却形成真空。工人们在每次击打活塞的时候都得重新加热汽缸。即使是最好的发动机也只能将不到1%的煤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抽水的动力。

几十年来，这种低效率的转化限制了蒸汽动力的使用范围，使它仅在矿井中用于抽水工作。即使这样，一个矿主还抱怨说：“这些发动机使

用了大量的燃料，严重损害了我们矿井的利润……赋税太重与禁止采矿无异。”对于任何需要将煤炭从矿井运输到工厂的企业而言，蒸汽发动机真是太贵了。

但是，教授们对发动机却颇有兴趣。格拉斯哥大学购买了一个微型发动机样品，可是却没有哪一个学者可以将其发动起来。直到1765年，该校数学仪器制造师詹姆斯·瓦特在工场里成功将其发动。发动机虽然运行了，可是效率并不高，这让瓦特百思不得其解。在进行其他任务的时候，瓦特一直在思索蒸发、冷凝水的更好办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了出来，就如他写的那样：

>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我出门散步……正在此时，一个想法从脑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缩性，会冲进真空中。若能在（加热的）汽缸和耗尽的容器中间建立连接，蒸汽就会冲进去，这样可以不冷却汽缸而冷凝蒸汽……当整个过程在脑海中构建妥当时，我发现半晌的工夫已经过去了，我还没走到高尔夫球场呢。

那是个周日，对主虔诚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周一早上他以现有材料迅速组建了一个新模型，将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开。这样，汽锅保持高温，冷凝器保持低温，而不是加热冷却交替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用煤近8成。

此时，一系列新问题接连产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继续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产了，可发动机仍旧不能稳定地运转。1774年，就在瓦特准备放弃研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时，“铁的领主”马修·博尔顿前来帮助瓦特。他收购了瓦特负债累累的支持者，将发动机制造厂迁到伯明翰。为了解决瓦特的困境，博尔顿既投入了资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聪慧的金属制造工“钢铁疯子”威尔金森（Wilkinson）前来助阵。（威尔金森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铁来制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个月后，瓦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认为这是封有史以来低调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将谈谈最低调的信）。在信中，瓦特写道，他的发动机现在“相当成功”。1776年3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公开展览会。会上，瓦特和博尔顿的发动机只用60分钟就将水从60英尺深的矿井中抽了上来，而消耗的煤仅为旧机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韦尔访问索霍区时，博尔顿表现得自信十足。现在发动机在矿井外性价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个小发动机……外加20个大的共同运作，我们就能够把全部问题成功解决掉，”博尔顿给瓦特写道，“晒草要趁太阳好，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

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西欧并不产棉布，直

至17世纪，英国人一年四季都穿着破破烂烂、带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内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当商人开始从古印度进口轻便、色泽明丽的棉布衣物时，该有多么轰动。1708年，丹尼尔·笛福回忆道："棉布悄悄来到我们的屋子，进入壁橱、卧室。窗帘、地毯、椅子，连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制品，绝非他物。"

进口商发了大财，不过他们投资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国羊毛。因此，羊毛巨头们游说国会禁止买卖棉布衣物。于是，其他英国人进口生棉花（这仍是合法的），自己制造棉布。不幸的是，这些棉布织物没有印度货的质量好。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布市场的规模只有其羊毛市场的1/13。

但是，棉花的确有个好处，即可以用机械将纤维纺成纱，完成这一费力的工作。1万年来，纺织品的生产需要心灵手巧的女工（极少使用男工）将一小捆羊毛或纤维绕在纺锤上。我们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国的纺纱工人用水能或畜力为能源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机器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产量也稳步提高。但英国突然开始机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术相形见绌。1770年，一个纺纱工人用脚踏式纺纱轮要花2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线[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这些设备的名称轰动一时——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罗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锭细纱机诞生于1824年，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完成了）。机器不断进步，蒸汽动力日趋完善，织机在大工厂里聚集排布。第一个完全由蒸汽发动机供能的纺织工厂于1785年开张（当然，这里的发动机是博尔顿和瓦特提供的）。

织机使得英国棉花价格更低、质地更为纤细结实、粗细均匀，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印度产品。1760～1815年，英国出口的成衣数量增长了100倍。棉纺业，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产业，转变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产值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12。10万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时以上、一周6天奋战在工场，大批大批地生产棉布运到市场。纺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虽然价格下降，但市场扩张，利润仍在继续膨胀。

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棉纺业在英国蓬勃发展。棉花的原材料产于英国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国内争夺土地生产。相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钞票，他们将百万顷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园，让成百上千的奴隶在此劳动。美国的棉花产量从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万包，到1860年更是飙升至450万包。英国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促使美国在种植园生产上产生了新创意。例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它可以把棉花纤维从黏性种子上分离，这比雇佣奴隶用手来分要便宜。美国棉花供给增加，满足了英国的需求。这样，美国的棉花仍保持在低价位。工厂和种植园主富裕起来，棉花生产给大西洋两岸创造出庞大的劳动力新队伍。

回看英国，先进技术从一个产业扩展到另一个产业，促进了更多新技术的产生。最重要的飞跃就是制造材料以供其他新兴产业使用的制铁业。英国的制铁工人在1709年已经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炼铁（这比中国的冶金学家晚了7个世纪），但是如何让熔炉恒定高温，一直没有找到办法。1776年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发动机通过提供稳定气流解决了这一难题。在随后几年中，科特的搅炼法（这和棉纺业其他名称一样让人叫绝）成功解决了剩余的技术问题。和棉花的问题一样，制铁工人发现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同时就业、产值及利润陡升。

博尔顿和其竞争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虽然他们的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800年，英国制造商使用水车产生的能量是蒸汽发动机的3倍），然而这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变革了。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技术变革粉碎了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永远不可突破的神话。1870年，英国蒸汽发动机产生400万匹马力的动力，与4000万的人力相当。假如工业继续依靠人力的话，这些人所需的小麦将是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当地人喜欢称我的家乡——英格兰中部地区斯托克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地是制陶场的中心。18世纪60年代，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机械化推广至制瓶业。斯托克遍布颇具工业规模的制陶场。这甚至影响到200年之后，就连我小时候的考古经历都烙上了韦奇伍德的印迹。那会儿，我正在考察从威尔登工厂后面那大堆垃圾中挖出的一个破罐子，而韦奇伍德当年就在威尔登工厂学手艺。

斯托克是个以煤炭、钢铁和泥土为主的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大部分工人天没亮就起床，奔向矿坑、钢厂、制陶场。我的祖父是钢厂工人，父亲未满14岁就辍学下矿井了。在我念书的时候，不断有人告诉我，我们的祖先给英国添了彩，并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的勇敢、坚毅和富有创意。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峡谷成了工业启蒙地，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却是讨论中西方巨大差距之源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具体说来是在斯托克及其周边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如果没有必然关联，那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某种必然吗？或者说，工业革命必然会发生吗？

在本书开头，我谈道，即使这些问题的确是关于西方的领导地位是

否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对这些问题作答的专家们最多也就往后推四五百年来寻找答案。我认为，应把工业革命放到长远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前九章阐述的观点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解答。

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迅速地在大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发展。若不考虑这一点，工业革命与历史上早期的改良运动就无异了。与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对迅速）发动起来的运动一样，工业革命产生于历史上一个今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时期。自农业起源以来，主要的核心地带已经通过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经过整合并扩大了，边缘地区的人采用了核心地带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他们还将核心地带的理念融入环境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这一过程时而显示出后发优势：公元前5000年，农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谋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这样可以将这片平原变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带；公元前1000年，当城市和国家扩展到地中海盆地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形式；公元400年后，中国北方的农民向南迁徙，将长江以南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片沃土。以上这些时期无不体现了后发优势。

公元10世纪以后，当西方核心地带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向西扩展时，西欧国家终于发现新的海上技术可以将他们在地理上独居一隅、长期以来成为落后之源的劣势变成优势。与其说是按照设想，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机遇的垂青，西欧建造了一个新兴的海上帝国。此外，崭新的大西洋经济体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

没有谁可以保证欧洲会战胜这些挑战。罗马（公元1世纪）或中国的宋王朝（11世纪）也没有找到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方法。所有迹象表明，人力和畜力是动力的最终来源，识字的人不超过10%～15%，城市和军队的人数永远不会超过100万，社会发展指数永远都不会超过43分。但是，在18世纪，西方人却无视这些限制，他们出售能源，使以前发生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

在罗马和中国宋朝失败的地方，西欧却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那时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技术不断积累。每次社会发展衰退的时候，一部分技术就会消失，不过大部分技术不会，几个世纪过后，一些新的技术又会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条河踏进两次、同样的技术有新发展的原则继续起作用。任何一个在公元1世纪和8世纪之间逼近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社会都和它们的前辈不同。它们做的会比逝去的更好，这点它们都知道，并且相信可以做得到。

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积累，农业帝国现在已拥有高效的武器，这让俄国和中国清王朝关闭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终，在17世纪当社会发展指数逼近上限时，第五个天启骑士——移民——并没有到来。核心地区也成功地应对了其他四大天启骑士，避免了社会崩溃。假如没有这一变化，18世纪可能会和公元3世纪、13世纪一样成为一场灾难。

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的积累，船可以将人们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欧洲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西洋经济体了。罗马王朝和宋王朝都没能建设一个可以如此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度，因此，它们都不需要面对17～18世纪欧洲国家关注的那些问题。牛顿、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罗、沈括等人聪明，只是他们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方面，18世纪的西欧做得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好。在西欧，由于西北部区域国王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商人力量则更为强大，因而西北部发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国发展得最好。1770年，英国不仅薪水更高、煤资源更多、金融实力更强，而且那里实行了比其他地方更开放的制度（不管怎么说，对于中上阶层的男士是这样的）。另外，由于英国对荷兰和法国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它也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地、贸易和战舰。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容易发生的地方，不过并不是注定会发生。如果1759年是法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不是英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法国夺去了英国的海军、殖民地和贸易，而不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的长辈们就不会在小时候对我讲述斯托克是如何成为工业革命摇篮的故事了。在法国那些和英国同样烟尘密布的工业城市里（如里尔），长者们讲的故事或许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毕竟，法国有许许多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只要国家的要素禀赋或国王和将军的决策中有什么小小的改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无论是伟大的人物、笨拙的白痴，还是走霉运的人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发生有关，但是他们和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展开的关系却不甚清楚。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考察一些更强大的力量，因为一旦技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一旦西伯利亚大草原通道开放——比如说在1650年或1700年——我们就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某个地方发生。如果法国或一些低地国家而不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工业革命的进展就没有现在这么迅速了，它或许会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而不是18世纪70年代。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西欧仍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方仍会统领世界。这本书仍然可以继续写下去，只是我可能会用法语来写，而不是英语。

也就是说，除非东方率先独立地进行工业化，否则统领世界的就是西方。假设西方工业化进展变慢了，东方可以独立发展工业化吗？当然这里我列举的是种种假设，但是我想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即使到18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实力不相上下，也鲜有迹象说明如果独立发展，东方可以快速进行工业化，并于19世纪开始腾飞。

东方国家有广阔的市场和繁荣的贸易，但是它们和大西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同。虽然东方居民不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在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连欧洲最贫穷的国家都不如”）那样穷，图10-2同样表明他们也并不富裕。北京人[2]并不比佛罗伦萨人

穷，可却比伦敦人穷不少。中国、日本（及南欧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并没有激发他人和博尔顿一样用同样的激情去投资机器。在1880年，开一个雇佣600名中国工人的矿厂的成本预计为4272美元，差不多和一台蒸汽泵的价格一样。即使在他们有其他动力可供选择的时候，精明的中国投资商们通常仍会乐意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而不会购买昂贵的蒸汽机。

由于修补生意收入太少，东方商人、宫廷学者都没有对锅炉、冷凝器产生足够的兴趣，更别提珍妮纺织机、水力纺纱机和搅炼机了。要产生自己的工业革命，东方需要创造出一些与大西洋经济体相提并论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东方国家也可以产生出更高的工资，应对新的挑战，促进整个科学思想、机械修补技术的发展及廉价劳动力的诞生。

如果时间允许，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18世纪，在南亚，一群散居在外的中国人蓬勃发展起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大西洋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理关系可能在19世纪出现。可是其他条件不会相同。从英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到机械大师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如果东方处于极端隔绝之中，如果东西方在19～20世纪走同样的路，都在构建一个地理上多元化的国家，如果东方和西方走的路线大致相同，一个中国的瓦特或日本的博尔顿将会在这一非常时刻出现，并在中国上海或日本东京展示自己的首部蒸汽机。可是，这些“如果”一个都不会发生，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旦开始，它就主导了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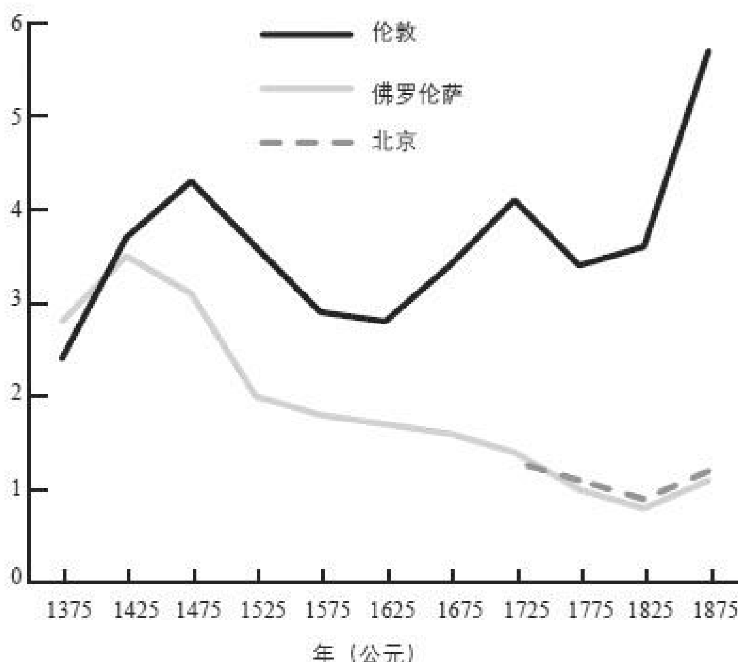


图**10-2** 世界各地的工人工资不同：虽然工人们并不乐意，但是在**1780～1830**年间，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国家工人的高。本图对伦敦、佛罗伦萨（代表南欧低收入群体）和北京（代表中国、日本劳工的收入水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了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直到175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在东西方并存，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划分复杂细致、贸易网络密集、制造业不断增长。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富有的地主们坚信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习惯和财富价值不会改变。每个地主都用详细的规则让他人服从，遵守礼节，每个地主都践行着文明的精华部分。除了在文体和叙述上有明显的不同外，我们不难发现18世纪出版的小说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比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和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就体现了某种密切的关系。

到1850年，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将所有这些相似性驱散得无影无踪，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西方，一个新兴的以蒸汽作为能源的铁之领主崛起。按照最著名的评论家的话，“混杂的封建关系将人和他‘自然属性的上一级’相联系，但铁之领主的崛起将这一联系无情地扯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这一新兴的阶级将最为神圣的宗教狂热、侠义的热情、无艺术修养的情感淹没，把它们投入自我本位主义的冰冷水域中。”

关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正在做什么，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都赞同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这个阶级改变了一切。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些利用能源、出售能源的百万富翁是英雄。他们的“能源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判断力的明确指引，但（只是）获得了一种普通的奖赏”。因此，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其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释道，“在早期，技术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而现在，最精致的工具和发动机都用于生产针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工厂主们是一群毫无人情味儿的衣冠禽兽，他们就像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葛擂梗先生一样。葛擂梗一直认为“生活中只需要事实。没有别的东西要种植了，把其他一切东西都根除掉吧”。狄更斯探索工业革命的方法并不轻松。他在一家制靴厂上班，父亲在债务人的牢房里卖命。就像狄更斯所看到的那样，工人无法在生活中发现美好，他们被驱赶到摧残灵魂的城市，比如小说中虚构的科克镇，“胜利实质上就是……一个机器密布和烟囱高耸的城市，烟尘冗长的尾巴不断地伸展着，伸展着”。

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葛擂梗一样的人。恩格斯在年轻

时描述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情况，并对科克镇工人的困境发表演讲。恩格斯说："一个商人耐心地听着，在街角我们分开了。他说：'但是，这里的确创造了很多财富。就说到这吧，先生。'"

这个商人说得没错：通过利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恩格斯也没错：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人只分享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780～1830年间，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幅超过25%，但是薪水仅仅上涨了5%。剩余的这些产值都被当成利润剥削了。在贫民窟里，愤怒呼声迭起。工人们组织了工会，要求执行《人民宪章》。激进分子则密谋推翻政府。雇农的生计受到打谷机的威胁。1830年，他们砸碎机器，烧毁柴垛，联名签署写给贵族的恐吓信，署名"斯温船长"，听上去像个海盗头子的名字。在每个地方，地方官员和牧师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给法国式起义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领主们全力向激进主义逼近。骑兵们踩踏示威者，工会会员被捕，砸坏机器的工人被押到大英帝国最远的殖民地接受刑事处罚。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一过程显得分外清楚：西方的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用一种反常的节奏演绎着发展的悖论[3]。资本家把劳动者仅仅看成"帮手"、磨坊厂和工厂里有血有肉却无足轻重的人物。同时，资本家也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将其变成了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所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用栅栏把农村围起来，将无产者驱逐进城市成为雇佣奴仆，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富有的地主并没有将农民驱逐出土地，而是婚姻家庭驱使农民来到城市。实际上，19世纪的集约型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劳工数，人们抛弃农场来到城市的真正原因是繁殖后代的需要。1750～1850年间，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3岁。但是，历史学家却未能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瘟疫减少了？营养食品更多了？水质更好、下水道变干净了？育儿经验更科学了？是棉质内衣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导致的呢？）人们多活的那些年可以用来养儿育女。这就意味着除非女士晚婚，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性行为，或是流产、饿死孩子，否则她们可以养育更多的子女。女士们确实改变了她们的行为，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她们的寿命变长了。在1780～183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1400万。约有100万多出来的人口在田间地头工作，600万人在城市寻觅工作。

这些关于人类繁殖的确凿事实说明工业革命的弊端是明显存在的：工业化带来创伤，但是其他的选择会更糟。16世纪人口增长之时，整个西方的工资体系全面崩溃。但实际上，1775年后英国的工资却开始增长，把其他国家抛在身后（见图10-2）。当英国人真的出现集体饥荒的时候（即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这也与贪婪的地主和笨拙的政

治家有关而和工业无关（爱尔兰的工业数量极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潮流将那些年里工人的热情转变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自1780年以来，资本家将很多利润用于庄园、贵族爵位和暴发户的服饰上，同时把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新机器和磨坊。大约到了1830年，这些在机械上的投资提高了每个脏兮兮、营养不良且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帮手”的生产率，使得这些“帮手”变得有利可图。老板常常撕毁与罢工者的条约，将其解雇，和其他老板展开竞争寻找新的“帮手”。在随后的50年里，工资和利润一同增长。184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英国工人的收入终于达到了黑死病之后工人工资的水平。

和其他年代一样，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随着工人身价的提高，中产阶级对被压制群体有了那么点儿同情心。一方面，失业似乎必然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贫者被驱赶至工场（中产阶级说这是为贫者好）；另一方面，狄更斯对这些工场的真实描述使得《雾都孤儿》成为畅销书，一时间“改革”一词成为标语口号。官方委员会谴责城市的肮脏环境，国会禁止工厂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并将13岁以下童工的每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此外，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推广全民教育。

在今天看来，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家似乎是伪善的，但是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具有革命性。这与东方核心社会的对比非常明显：在中国，工厂雇员数量仍然很少，有识之士按照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将亲手写的关于乌托邦改革构想的卷轴交至帝国官员的手中，这些官员同样保留了中国的传统习惯，那就是对此不理不睬。这些即将成为改革家的人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分化而来，并在继续分化。洪亮吉（因在社会问题上批判政府无能，被判“大不敬”罪，处以死刑）和龚自珍（他是一个怪人，衣着古怪，写着草书，沉迷赌场）被证明是最具建设性的社会批判家，两个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且在改革上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是非同寻常的实用改革方案也无人问津：比如19世纪20年代的改革方案，计划用船经海路调运粮食至北京，以避免途径大运河时食物腐烂变质。

在西方，也只有在这里，一个崭新的以煤和铁为主的世界就要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如此接近梦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851年发表评论：“在本世纪前50年，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并引以为荣的事。在过去的50年中，社会空前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进步之大令人吃惊。就文明的欧洲来看，在几个关键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这比公元1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西方世界迅速发展，把世界其他地方抛在了身后。

西方世界轰隆隆地前进，而东方世界却沉寂异常

1872年10月2日，晚上7点45分，伦敦。这里将要出现一个著名的故事场景："先生，我在这儿呢！"菲利斯·福格（Phileas Fogg）大步流星跨进俱乐部，叫喊着。虽然他在埃及被当成银行抢劫犯，在内布拉斯加受到北美印第安苏族人的攻击，在印度营救一个被迫自杀的漂亮寡妇，福格却做到了自己承诺的事。他在80天里环游地球，未耽误一分一秒。

这同样是个虚构的场景，但是和儒勒·凡尔纳的所有小说一样，《80天环游地球》也是以现实为依据的。1870年，一个名叫乔治·特雷恩（George Train）的人环游地球80天，"特雷恩"在英语中意为"火车"，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处。当科学技术不能为他所用的时候[4]，小说中的福格会转而依靠大象、雪橇和帆船以寻求帮助。但是如果没有崭新的工程项目的胜利完工——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旧金山——纽约铁路（同年完工）、孟买——加尔各答铁路（1870年完工）——福格和特雷恩都不可能顺利实现他们的旅行。正如福格出发前说的那样，世界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由于殖民主义者将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周边世界，边缘地区的人们相互效仿、抵制抑或背井离乡，在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核心区域总在不断地扩张。19世纪与前几个世纪的不同仅仅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但是这些不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以前，伟大的帝国占据了世界的各个部分，凭着自己的意愿兼并土地，但是新技术将这些界限淡化。社会发展领先的国家可以统治全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转化成动力彻底打破了距离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早在1804年，英国工程师展示了轻便高压的发动机，它可以推动客车沿着铁路运行。到了19世纪的头10年，类似的发动机可以开动划桨船。在另一代有灵感的人大胆尝试后，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著名的名为"火箭"的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的铁轨上运行，速度为每小时29英里[5]。用这台发动机开动的轮船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格局，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轮船不受狂风和海浪的限制，不仅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人们在哪里铺设了铁路，货物就可以通过陆路运送到哪里，成本和海运一样便宜。

科学技术改变了殖民现状。1851～1880年间，500多万英国人（当时总人口为2700万）移居国外，大部分迁至北美——这片他们最重要的新天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这次白种人的大规模迁徙为"白色瘟疫"。1850～1900年间，"白色瘟疫"队伍砍伐了美洲1.68亿英亩的森林，面积超过英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10倍。1799年，一位旅行者曾记录，美国的先驱们"对树木有着不可容忍的极端厌恶之情……他们不带丝

毫怜悯之心，砍伐了眼前所有的树……所有这些树遭遇着相同的厄运，经历着同样的浩劫”。100年之后，砍伐树桩的机器、喷火器和炸药让这伙人更为嚣张，他们对树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

一个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高峰期促进了进展同样迅猛的城市的发展。1800年，纽约城区只有7.9万人口，而在1890年达到250万。此时，芝加哥成为世界的奇迹。芝加哥是个平原城市，在1850年人口只有3万。到1890年，它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因为芝加哥的发展，科克镇成了上流社会。这让评论家大为惊叹，一位评论家写道：

> 对于芝加哥来说，在所有中部城邦内，在所有东北部城市中，交通和工业咆哮着，锯木厂嘶鸣着。工厂的浓烟染黑了天空，机器相互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汽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空。
>
> 此乃王者帝国。

在将工业化向东扩展至整个欧洲的过程中，竞争发挥的作用比殖民要大。1860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体，生产的铁和纺织品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但是比利时（这里有上等的煤和铁）率先步入了蒸汽和煤炭时代，沿着法国北部——德国——奥地利这条弧线紧随其后步入新时代。到1910年，德国以前的边缘地区和美国发挥了后发优势，逐步超过了领先于它们的国家。虽然德国的煤炭资源没有英国丰富，但它的利用率比英国高。当前这批德国工人的父辈是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缺少什么时候关闭阀门、什么时候收紧线轴的本能直觉。而今，德国推行了技术教育。

美国虽缺少能够聚集资本的家族企业，但却拥有另一个优势：出售股份来为现代大公司募集资本，从而有效地将资产所有者和雇佣经理区分开来。这些雇佣经理能够自由地对生产流水线和新的管理科学进行实验。所有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产业，诸如化学工业中，知道一点关于科学和管理理论知识却能比只凭感觉产生更好的结果。

历史学家通常称德国和美国领先的时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时科学更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这一切迅速将菲利斯·福格的功绩变得陈旧不堪，将20世纪变成石油、汽车和飞机的时代。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两人明白了如何在内燃机中有效地燃烧汽油（此时，灯具使用的是一种低价的煤油副产品）。同年，英国的机械师改良了自行车。此外，人们将轻便的新型发动机和稳固的新型底盘相结合，设计出了汽车和飞机。1896年，汽车的运行速度依然很慢，在美国首届汽车赛上，一些人起哄道：“让马来比赛

吧！”但是到了1913年，美国工厂生产出100万辆汽车。那时，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给汽油发动机装上了两翼，可以在天空飞行了。

石油改变了地理格局。一位英国石油商在1911年兴奋地说：“内燃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将代替蒸汽，速度之快让蒸汽机顿时黯然失色。”因为石油比煤炭轻便，产能更多，并且可以让机器运行得更快，因此那些坚持使用蒸汽机的人必然会被投资新发动机的人超越。英国首席海军顾问1911年坚持认为：“速度是重中之重！”温斯顿·丘吉尔——英国第一位年轻的海军舰队司令——也被先进的技术所折服，将皇家海军的动力来源从煤炭更新为石油。相对于俄国、波斯（今伊朗）、东南亚的石油，以及美国举足轻重的石油资源来说，英国无穷无尽的煤炭储备显得不值一提。

同样，通信手段也在快速发展。1800年，传递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船只运送信件，但是到了1851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通过海底电缆用电子信号传递信息。1858年，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打起了越洋电话。在《80天环游地球》中，我们多次发现每件事都取决于电报技术。在1866～1911年间，跨大西洋电报成本下降了99.5%，但当时这方面成本的降低是理所当然的。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曾畅想电话的诞生，仅仅三年后，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问世。1895年，无线电报诞生。1906年，无线电应运而生。

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财富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的分工。如果市场大，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并售出，用赚来的利润购买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斯密推断，这种经营方式要比每个人自给自足的生产利润更高。他还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经济逻辑要求推翻阻碍人们沟通的那堵墙，让人们沉浸在“用货车装运、物物交换、商品交易的活动中”。

不过，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些生产世界上最低价位商品的人（如英国实业家）都是为自由市场而生产的，而那些生产毫无竞争力的高价产品的人（如英国农民）通常认为游说国会对竞争者征收关税比转至新的生产线更好。为了说服英国统治者废除保护主义政策，流血冲突发生了，政府垮台了，饥荒不断。所幸，保护主义终于废除了（并且对进口商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825年前后的超过50%到50年后降至不足10%），全球市场蓬勃发展着。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英国制造商出口火车、轮船和机器，英国金融家借给外国人资金让他们去购买这些产品。英国建立起来的外国产业实际上挑战了自己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自由贸易者来说，他们的狂热中蕴涵着策略。通过在世界各地向竞争对手销售产品、借出资金，英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在此集中经营那些利润最丰厚的工业（以及正在不断增长的金融）技

术。而英国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英国的机器帮助美国和欧洲生产出英国本土需要的食物，通过向英国出售食物获得的利润又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

自由贸易者分析道，人人都会赢——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愿意接受这严厉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义逻辑。鲜有像英国这样富有热情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格外保护其年幼的工业，不与英国竞争），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核心国家都迅速和这个金融体系联系了起来。西方的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汇率限定在一个固定值，这让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预测性，政府通过市场规则为贸易服务。

但这仅仅是开始。自由化会跨国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却原封不动地将国家内部的贸易障碍保存了下来。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协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的那样：

>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传统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农奴身份、行业协会和其他对行动和职业的法律限制崩溃了。1865年，一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农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国家将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合法化了。越来越多的老板和员工相处融洽，1870年后，大部分国家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让所有男性参与选举，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随着工资的上涨，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开展公共健康服务、发放失业保险金。国民对政府的回馈就是愿意在陆军和海军中为国家服役。毕竟，国家给人们提供了这么多保障，还有谁不愿意为国而战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见。2000年来，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和不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突然间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没有理由剥夺这些异教徒的财产或选举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诸如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新的信条挤入了宗教长期把持的地盘。似乎将上帝废黜还不够，女性低等说——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

受到攻击。穆勒写道："调节现存男女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最终，没有一个奴隶最后还是奴隶，他们总会翻身，这话同样适用于妇女。"

电影和小说常常将维多利亚时代展示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里烛光闪闪、炉火熊熊、温暖人心，人们各司其职。不过，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像一个魔术师，再也不能控制下层社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动用自己的魔咒来召唤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狂欢，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教会表明立场（有的用粗鲁的方式，有的用灵活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拥有土地的贵族捍卫他们在阶级秩序中的特权。反犹主义和奴隶制度又冒了出来，戴上了新的面具。各类冲突变得激烈。实际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同阐述了其观点，因为在那一年，革命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会很快剥离了他们和东方社会极为相似的特征。通常，这种改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你不会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中发现性格果断的女主人公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充斥着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最能体现反对妇女受压迫的小说应当是李汝珍的传奇讽刺小说《镜花缘》，书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脚的地步。（李汝珍在书中写道，他的脚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状，血肉挤成浆状……脚上只剩下干枯的骨头和干瘪的皮肤，真的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寸。）在当时的中国小说中，狄更斯笔下向上奋进的形象难以寻觅，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无踪迹。沈复令人伤感的《浮生六记》虽说浪漫感人，但生活却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摧毁，更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市场不会沉睡，它必须扩张，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则工业这匹饿极了的猛兽就会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会内部及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间的障碍，没有哪种社会风俗、传统或皇帝圣旨可以保留令沈复如此压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准备就绪，这就是一个世界。

"复仇"号旗舰：西方对东方的压榨与欺凌

全球化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秘密——在这个新世界中，说西方仅仅在社会发展方面领先他国是毫无意义的。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原先的农业核心社会大部分已经独立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的发展稳步地改变着地理格局，将世界核心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早在16世纪，新型船舶就可以让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将新大陆上以前独立的核心区域转变成西方的外围区域。欧洲人在18世纪就开始将南亚的核心区域变成另一个类似的外围区域。到了19世纪，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将西方的触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变了地理格局。英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递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随着西方人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源，为了合理确定相互间的占有比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令人愤怒的是，东方的强大国家却对此不予理睬，它们把西方的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和长崎等几个极小的区域内从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当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于1793年来到北京要求开放市场的时候，乾隆皇帝坚决回绝了他——尽管如此，正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回忆的那样，普通中国人“都是做非法买卖的。在我们所停泊的几个中国海港里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驶入这些港口更让他们感到惬意的了”。

在19世纪30年代，问题越发凸显。300年来，西方商人一直都是乘船来到广州，兑换银元。银元似乎是唯一一件他们拥有同时中国官员也需要的东西了，他们可以用银元来买茶叶和丝绸。18世纪80年代，每年有将近700吨的银元从西方运至广州。但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这种种植于印度的神奇毒品。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国人）极大地推动了毒品交易。到1832年，他们运送了将近12吨的鸦片到广州，每年吸鸦片成瘾的人数保持在100万～200万（见图10-3）。购买毒品所需的钱将中国由白银流入国变成白银净支出约400吨的国家。这可是一大堆毒品，一大笔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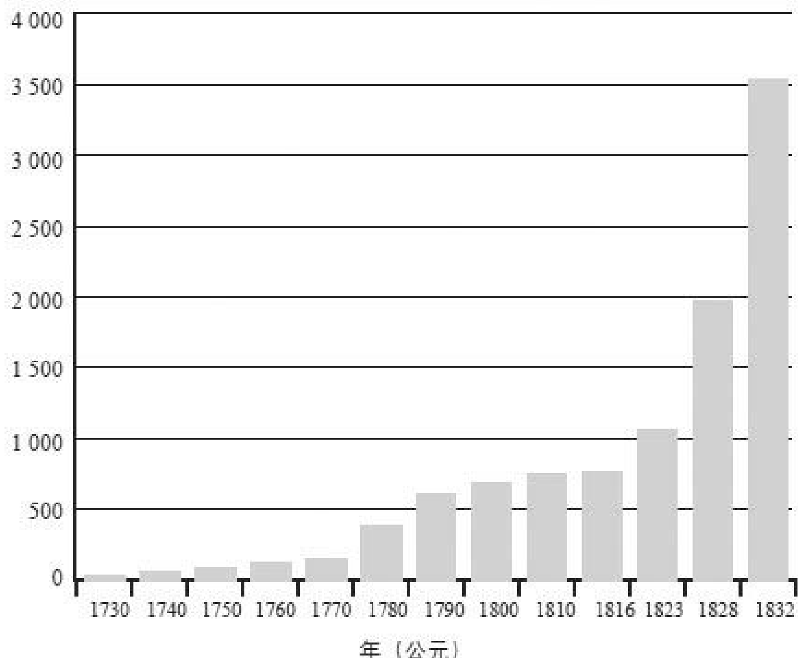


图10-3 1730～1832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鸦片销售量陡然增加

商人们坚称鸦片“只是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服务，就像英国白兰地和香槟是为上流社会提供一样”。但是，实情却并非如此，而且这些商人也心知肚明。鸦片使许多人的生活破碎，使这些人境遇悲惨。同样，这让一个从未见过鸦片烟枪的农民心碎，因为银元流入鸦片贵族手中增加了金属的价值，这就迫使农民销售更多的农作物以换得更多的银元缴纳赋税。实际上到1832年，税收增长到了50年前的两倍。

清朝道光皇帝的谋士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即将鸦片合法化，却遭遇了冷嘲热讽。鸦片本土种植后将会减少从英国进口的数量，这样就可以阻止白银外流，增加税收收入。但是道光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听从他手下大臣们的建议。他想从鸦片自身寻求解决方案。1839年，道光皇帝宣布禁烟。

我在此对第一次禁烟运动做一下简单介绍。起初，禁烟运动很成功。道光皇帝的禁烟大臣没收了数吨鸦片，并将其烧毁，投入大海中（之后写了一篇堪称经典的诗歌献给海神，对污染其领域的事件致以歉意）。但是随后，禁烟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英国的贸易专员发现，市场的神奇力量无法奏效的地方，枪炮却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将英国拖进了和中国的战争中。

随后，就到了工业革命展现其优势的时候了。英国的秘密武器就是军舰“复仇”号，一艘崭新的全铁制大轮船。不过，甚至连皇家海军都对这个巨大的武器持怀疑态度。就像其船长坦言的那样，“木头的漂浮性质

让其成为建造船只最天然的材料，因而我们无须考虑用什么形状的木头或是用什么方式来打造木头。而铁的下沉性质却使其一眼看上去并不能像木头那样，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这一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船的铁制外壳扰乱了指南针的正常运行。甚至还未驶离英国，“复仇”号就撞上礁石了，它在好望角附近还险些撞成两半。船长需要把几块木头和铁块拴在船侧才能保持船体漂浮于水面。但是，一旦到了广州，它就一扫往日的阴霾。“复仇”号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的内涵，它依靠蒸汽驶入了木船无法经过的浅水道，将所有敌对势力撞成碎片。

1842年，英国船队关闭了京杭大运河，将北京城逼到了饥饿的边缘。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握有与外国人和平谈判的权力，向皇上保证仍可以“解决这些小问题，完成国家宏伟大业”，但实际上他却允许英国船只驶入其要求开放的中国港口——随后美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提出相应要求。当中国人民对这些外国魔兽（见图10-4）的敌意奋起反抗，使得这些特权未能获得预期的利润时，西方人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图**10-4** 文化不一致：中国一幅简笔漫画——口中喷火的英国士兵（**1839**年）

西方人之间也相互引诱，吓唬对方说，商业中的竞争对手会获得更多的特权，会把英国的贸易商们从新市场中驱逐出去。1853年，英国与他国的贸易竞争扩展到日本。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乘汽船来到东京湾，要求获得让美国驶往中国的船只在东京湾补给能源的权力。虽然仅有四艘现代船只跟随，但是这些船只装备的军事火力比日

本所有枪支火力加起来还要大。它的舰队是“水域里自由移动的城堡”。当时有人目睹这一切后惊奇地说：“一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们还以为起火了呢，真的是这样！”最后，日本允许美国在两个港口通商。立刻，英国和俄国要求同样的待遇，日本也一一满足。

地位之争并未就此停止。1842年，在中英《南京条约》附件中，英国律师创造了一个关于法律地位的新名词，即所谓的“最惠国”，这意味着中国给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权利也要同样给予英国。中美于1843年签署的条约规定可以在12年后进行修订，因此，英国外交官于1854年也要求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是清王朝终止了这项权利，英国随即向中国宣战。

即使是英国国会，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过分了。国会严厉指责了帕默斯顿首相，其政府随之倒台，不过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却不断攀升。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将赃物送回巴尔莫勒尔堡。为了在修约时不让他国超过自己，美国总领事威逼日本答应另一个新条约，并威胁若不答应，英国的船队就会轰开日本的大门，输入鸦片。

1860年，西方像个巨人一样立于世界之上，所及之处无边无际。古老的东方核心在一个世纪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今与南亚和美洲以前的核心地带一样，已沦落成西方核心国家新的边缘地带。北美大部分人口来自欧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挤进了世界的核心区域。对于此次地理格局的巨大调整，欧洲则继续开拓新的边疆。他们驾驶着汽船将白人大批大批地运送至南非、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然后运回沉甸甸的谷物和绵羊。1870年，非洲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还是一大片空白的区域，等待开发。到1900年，它几乎已经全部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了。

回首这些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将其称为“黄金年代”，此时：

>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

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

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纪长期注定理论的成功应用中，却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帝国主义理念的逻辑性。正如市场曾经引导英国的资本家在其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基础建设一样，现在市场奖赏将资金、技术、经验投资于东方国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随时依照他们的喜好累积资本，但是资本对新利润的不断追求也给准备利用投资机遇的东方人提供了契机。

东方人抓住机遇进行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模仿西方的精华。他们将西方在科学、政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团去西方进行实地调查。西方人也迅速前来向东方人出售他们刚生产出的小玩意。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在农村开设工厂，也污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出人意料。东方人争先恐后地尝试促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的工具。其实，西方人600年前也是这么对待东方传来的先进技术的，如指南针、铸铁技术，还有各式枪炮。以前美洲、南亚的主要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已经沦落成西方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对西方统治的反应与中日等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

美洲原住民从未发展过本土工业，南亚在这方面做得比东亚各国还要慢。一些历史学家觉得文化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可以明确地说），西方文化十分鼓励努力工作、理性思考，而中日等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却很少强调，南亚文化提及得更少，其他地区的文化则几乎从未涉及过。但是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留下的产物确实需要这么做。

当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范围内观察东方国家对西方统治的反应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如东方的核心区域）工业化的速度往往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核心区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日本社会在1853年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发展，并且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而印度的社会发展较为一般，并且沦落成西方列强的完全殖民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现代化才开始起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展水平很低，也成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直至今日，那里才开始追赶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

由于19世纪的东方（按照工业化前的标准来看）是个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城镇发达、文化普及、军事力量强大，不少居民变通西方的方法，将其应用到新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有些东方人接纳了西方关于工业化的观点。对于每一个东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士在抱怨：“旧生活需要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无是处。但是新生活只需要有用的东西，虽然它们可能看上去并不赏心悦目。”虽然1900年城市实际工资上涨，但是中日两国的持异议者还是积极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各个国家对工业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时机成熟，不管是伟人、傻子、文明人还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会出来阻挠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和西方一样，这些力量却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

当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于1885年表演喜剧《天皇万岁》（*The Mikado*）时，他们将日本看成是东方异域国家的典型代表，在那里小鸟会为爱殉情，刽子手也会自杀。但实际上，日本的工业化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快。1868年内战后，他们将年少的新天皇扶上宝座。在东京，聪明的掌权人成功地使日本免于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主张主要利用本地资本投资工业，劝阻愤怒的人们对外国人先发制人。与此相反，中国于1884年和法国开战（在一小时内，中国昂贵的新型战舰大部分被摧毁），西方列强从中国拿走——准确地说是抢走——大量财物，中国遭到了破坏性攻击。

日本的政府中坚分子面对的事实是：自由化是个一揽子交易。他们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传来的服装。一些人建议采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张日本人学说英语。他们开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国的清王朝官员的做法与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员考虑的是各自集团的利益。46年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对任何危及清朝统治稳定性的现代化方案。有一次，她采纳了西方人的提议，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光绪皇帝于1898年试图进行百日维新运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创办大学、调节茶叶和丝绸生产、进行出口贸易、发展采矿、兴修铁路、西化陆军海军）时，慈禧太后宣布光绪帝请她回来摄政。随后将光绪幽禁于宫中，处决了光绪手下进行变法运动的大臣。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她用砒霜将光绪帝毒死。然而，光绪皇帝至死都是改革派的支持者。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裹足不前之时，日本正在赶超。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宪法，给予富有的男性选举权，允许组建西式政党，创建现代政府部门。中国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间钦定了一部宪法大纲，于1909年给予男性有限的选举权。日本将普及全民教育列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而中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全民教育。两国都于1876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上海政府于1877年拆毁了铁轨，因为担心叛民会利用铁路进行不法活动。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铁路，而中国仅有370英里。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体现在钢铁、煤炭、蒸汽机的拥有量及电报线路的数量上。

纵观历史，核心地带的扩张通常会在边缘地区展开激烈的战争，这将决定边缘地区的哪一部分会抵制（或同化）大国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为争夺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战争。在中国，随着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的扩张，楚、吴、越三国在南方同样展开了争夺战。19世纪，当东方成为西方的边缘地带时，争夺战再次上演。

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未果。自此以后，东方大国认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代价大于所获得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入侵推翻了东方人此前的想法。无论哪一个东方国家，只要它尽快进行工业化，重组经济，重振军威，它不仅会拒西方帝国主义者于国门之外，还会压制其余东方国家的发展。

最后，带给中国重创的是日本的工业化，而非英国的战舰。日本缺少自然资源，而中国供应充足。日本需要市场，而中国市场广阔。在日本，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争论很是激烈，甚至发展到暴力的程度，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日本逐渐变得依赖于中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好战分子已经下定决心征服整个东方世界的核心国家，将中国和东南亚变成其殖民地，赶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场东方大战打响了。

但是，这场东方大战和18世纪的西方大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东方战争发生时西方已经占据了全球的统治地位。这将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因此1895年，当日本无视中国对其侵占朝鲜的抵制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其表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幅令他十分害怕的画《黄色的危险》（见图10-5），敦促他“要教育亚洲人，要保护欧洲免受不凡的黄色人种的袭击”。因此，尼古拉斯夺取了日本从中国侵占的大片土地。



图10-5 “黄色的危险”：这幅画是根据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草图而绘制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此图的创作意图在于鼓励欧洲人联合抵制佛教教义、异教教义和野蛮的侵袭，保卫基督教

但是，其他西方国家却发现了与日本合作的好处，它们想利用日本处于萌芽阶段的力量来为它们维持东方的秩序。1900年，机会来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反帝国主义团体——义和团发动起义（他们宣称，

练习中国武术100天就能刀枪不入）。2万外国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其中参与镇压的大部分士兵来自日本，虽然西方的记载中不会对此进行记录——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北京55天》（*55 Days in Peking*）更是只字未提。英国对此十分满意，它们在1902年签订了海军同盟协定，认可了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日本坚信英国的中立立场，于1904年对俄国展开复仇战，击沉了俄国的远东舰队，与俄国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陆地战，击垮了俄国军队。沙皇尼古拉斯派遣自己的主力舰队航行两万英里来到日本意图扭转局势，日本战舰同样将其击沉。

虽然从东方掠夺财物返回伦敦还不到半年，但是古老的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似乎都可以颠覆西方帝国了。颜面尽失的俄国司令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Aleksei Nikolaevich Kuropatkin）总结道："1904～1905年间发生的事不过是和先遣部队进行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维护亚洲和平的共同认知才是重要的事。只有怀着这一愿望，我们才能遏制'黄色危险'。"但是，欧洲却忽略了他的建议。

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4～1991年间，西方大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决定了德国能否建立欧洲陆上帝国。其二是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三是1947～1991年间的冷战，目的是商定美国和苏联如何分割世界。这一系列战争加起来形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战争。它包含夺去上亿人性命、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东方战争。与此相比，18世纪战争的规模真是相形见绌。1991年，西方仍然统领着世界，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库罗帕特金的担心真的快要来了：东方蓄势准备夺去世界霸权。

人们常常说到新的西方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衰败是如何导致巴尔干地区滋生恐怖主义分子或自由斗士的，当时，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团伙专干坏事，虽然运气不好，但它是如何于1914年6月刺杀奥地利哈布茨堡家族继承人的（第一个刺客扔的炸弹没有扔到奥地利大公的车上，仅仅让司机拐错了方向，倒了车。车恰好停在第二个刺客的面前，这位刺客行刺成功），以及旨在维护欧洲和平的一系列条约是如何把每个人拖到崩溃边缘的。

随后的事情也同样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化城市是如何征召年轻人参军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些人装备上最新式的武器，将他们巨大的能量投入这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屠杀中。1914年前，一些学者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经济联系得太紧密。如果战争发生，所有国家都会受损，因此它们会阻止冲突产生。但是，到1918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广阔而多元经济形式的国家才可

以在20世纪的战争中求得生存。

战争似乎展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的人们全身心投入这场争斗中。公元前1000年，东西方人都明白，富有活力的帝国是发动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历史上，帝国是长期存在的政府管理形式，其中带有从亚述、波斯、秦朝等帝国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当今这个10年中，他们明白了这些富有活力的帝国与战争格格不入。

最先走向灭亡的帝国是中国的大清王朝。清王朝陷入债务、战争的泥潭中，政府管理混乱，小皇帝溥仪的大臣们早在1911年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不过，当袁世凯1916年称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同样不能掌控国家的局势。另一个军阀派别辅佐溥仪重新即位，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一架飞机在北京紫禁城上方投下炸弹，溥仪再次被罢黜，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几天之后中国的帝制结束。

随后灭亡的是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1905年，俄国与日本开战，尼古拉斯沙皇政府差点儿被日本推翻，勉强保住江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王朝彻底颠覆。1917年，尼古拉斯家族被自由派夺走了权力，并于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党枪决。德国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茨堡家族仓皇逃离自己的祖国，从而避免了像罗曼诺夫王室一样的命运。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到1922年终于灭亡。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破坏，但是也清除了欧洲古老的王朝帝国，中国一天比一天危弱，“一战”强化了西方统治。“一战”最大的赢家似乎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不仅侵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将大英帝国延伸至更远的非洲、太平洋以及古奥斯曼帝国的油田，此外还欺凌东方盟国日本，让日本交出其在战争中夺取的大部分德国殖民地。到1919年，世界上超过1/3的大陆面积和约1/3的人口在英国和法国的掌控之下。

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旧地图上仍然用彩色标示着这些帝国，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战争在增强西方力量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它们之间的权力。欧洲进行战争的花费超出了其本身的财力，战争的开销甚至超过了英国的贷款数额。1920年，通货膨胀率上涨至22%；1921年，失业率超过11%。8600万工人进行罢工。英国仍然是日不落帝国，不过它得挣扎着维持对商业的全球开放。

为了还清债务，英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是跨洋投资。战争就是地狱，而美国就有这么一场战争，它以世界工厂和银行的方式出现。回溯至15世纪，西方的核心区域从地中海地区转移至西欧；到了17世纪，核心区域又转至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帝国；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西北部海上帝国的崩溃，北美帝国崛起，西方的核心地带再次发生转移。

美国将自己改变成一种新的组织，我们可以称其为次大陆帝国。和

传统的皇室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古代压迫农民的贵族统治阶级。和欧洲各海上帝国不同的是，这个帝国没有工业化的较小的定居地来生产棕榈和松树。但是，在几乎消灭原住人口，进行了血腥内战，将上百万过去为奴隶的人变成实质的农奴身份后，欧美国家将民主公民身份从大西洋东岸散播至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富裕的农民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偏北地带广阔的工业化腹地上饲养牲畜，购买商品。1914年，这个次大陆的美洲帝国已经可以和欧洲的海上帝国相抗衡了。1918年后，美洲帝国的贸易走向了全世界。

欧洲富商们纷纷跑到美国吸收资本，这让他国大为吃惊。一位美国国务卿评论道："世界金融中心从幼发拉底河岸转至泰晤士河及塞纳河河岸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但是转移至哈德逊河河岸似乎只用了一朝一夕。"1929年，美国持有1500多万美元的外资，和英国1913年拥有的数量差不多。此外，美国的全球贸易增长约50%。

在美国的领导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复活，但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1914年以前，虽然凯恩斯说，"伦敦对全球信贷行业有显著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几乎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管弦乐队的指挥"，但是1918年后，美国担当了这一指挥角色，虽然它并不情愿。1918年以后，美国的政治家们逃避了欧洲的竞争及战争，离开了空空的指挥台，他们撤到政治孤立中，和18世纪的中国及日本情况相似。当时机不错的时候，管弦乐队即兴表演，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当时机不好的时候，演出的音乐就变成了刺耳的杂音。

1929年10月，事情进展得不怎么顺利，运气也不太好，乐队指挥也不在场，而美国的股市泡沫不断，全球金融随之崩溃。就像传染病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火速蔓延开来：银行倒闭，信贷蒸发，货币崩溃。虽然没多少人挨饿，但是到1932年圣诞节时，25%的工人失业。在德国，失业率接近50%。失业大军一列接着一列，探出灰白的脸朝外张望。英国记者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们凝望着自己的命运，就和动物在牢笼里的呆滞惊异神情一样，只是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自由民主党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似乎不仅是发展的悖论降低了西方核心世界的发展水平，而且后发优势在其他方面也显现功效了。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重组后它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一样，它将新兴工业和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苏联鼓励国有企业、集体农业及中央计划模式。苏联采用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方法来动员人民，而非用旧皇室帝国的方式。

与失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苏联发展成功了，不过其人民生活水平却很低。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确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因为当资本主义工业在1928年和1937年崩盘的时候，苏联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对美国人民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起效了。"[7]

1930年，对于许多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的教训并不是告诉人们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未来的社会形态：虽然主张自由主义，但依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联盟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自由主义获胜。其实，获胜的真正原因是次大陆帝国，它越是不自由开明，就越容易获胜。日本跟随主张自由的国家，获得了很大利益，但是当全球经济和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日本并未继续追随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飙升，民主制度步履维艰，共产主义势力增长，军国主义介入，强烈要求组建日本帝国，让日本人求生。军队，尤其是激进的初级军官失去控制，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混乱态势和中国内战吞并了中国东三省，直指北京。一名日本中佐解释说："只有通过日本——满洲间的合作和日中友谊，日本人才可以成为亚洲的统治者，进而发动对各类白种人的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

从某种程度而言，军国主义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了72%，钢铁产量增长了18倍。但是代价仍然很高。"合作"和"友谊"常常意味着封锁和屠杀。即使是以保守且具有欺骗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的野蛮行径依旧令人震惊。此外，时至1940年，征服者显然没有解决日本的问题，因为战争消耗资源的速度比获得资源的速度还要快。战舰和炸弹燃烧使用的每5加仑石油中，有4加仑是从西方购买的。军事计划——依旧征服他国——却没有任何减缓。随着中国的局势变得日益困难，日本提出了另外两个惊人的海上计划：即使意味着和美国开战，也要打入东南亚，摆脱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石油和橡胶的依赖。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来自德国。战败、失业、金融危机给歌德和康德的后人留下创伤。这伤痛是如此之深，他们甚至乐意听妇女数落犹太人，散播征服万能说。阿道夫·希特勒虐待、驱赶德国的犹太商人，将行业工会主义者打入监狱。此后，他向自己的财政部长保证："集中营是保持我们货币稳定的首要原因。"希特勒看上去举止怪异，但行事是合乎情理的：赤字支出、国有化、重整军队消除了失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带动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

希特勒公开吹嘘自己的计划，他想通过击败海上帝国夺取德国西部，并将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赶走，替代以强健的雅利安农民。希特勒有着以德国为中心建立次大陆帝国的野心，这种野心不仅是偏执狭隘的，而且发展到了种族屠杀的地步。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会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自欺心理带给他们一件他们最想避免的事——又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几个昏天黑地的月份中，一个陆上帝国似乎即将统一欧洲，虽说1812年已经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与拿破仑的做法不同的是，希特勒转身攻击英吉利海峡、白雪皑皑的莫斯科和沙漠成片的埃及。他想做到能力不及的事，希特勒试图将与日本的东方战争归入自己的西方战争中。但是他并没有将英国击败，而是将美国卷了进来。战争使美帝国和苏联结成同伙，虽然德国和日本抢夺欧洲和东方的矿物和劳动力，但是它们无法遏制这两大帝国联合起来所带来的金钱、人力和制造业的优势。

1945年4月，美军和苏联军队在德国会师，他们相互拥抱，喝酒跳舞狂欢。几天之后，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8月，天空中冒出团团火焰，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将其夷为平地。日本天皇一反常规，直接向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臣民：“战争的形势并不总是朝着有利于日本的一面发展。”然而，即使在此时，顽固的日本官兵仍企图发动政变，以期继续战斗。但是同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日本赢得东方战争、赶走西方帝国的计划和德国建立欧洲次大陆帝国的计划双双破产，西欧的海上帝国也被消灭。这些国家受到战争影响而无法对民族主义者进行反击，在二三十年内就灭亡了。欧洲被击碎了。一位美国官员于1945年沉思自问：“如果我们不考虑罗马帝国的倒台，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崩溃似乎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西方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在1945年崩溃，这是因为西方的核心世界如今已经很强大了，即使是最大的战争也不能将其全部毁灭。苏联已经重建了工业，这是德国所不及的，苏联的炸弹差点在美国国土爆炸[8]。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中国开战所造成的破坏及美国对日本的破坏却将东方的核心区域彻底毁灭了。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让西方的统治变得越来越强大。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的统治地位仍旧存在，不过问题在于谁是领导者——苏联还是美国。

这两大帝国将过去欧洲的核心区域在它们中间划分开来，把德国一分为二。随后，美国的金融家们给资本主义制定出一个低劣的国际金融新体系，并精心策划了马歇尔计划，这或许是有记录以来有关利己主义最明智的计划了。如果欧洲人的口袋里有钱，美国人想让他们用这些钱来购买美国的食品，进口美国机器，重建他们的工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可以让欧洲各国不去支持共产主义。鉴于此，美国给了欧洲135亿美元，占1948年总产值的1/20。

西欧人瓜分了美国的金钱。他们接受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加入了推行民主、主张贸易的欧盟[9]（美国劝说欧洲人建立在联邦德国工业化领导下的陆上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接受这一主张）。东欧人接受了苏联的军事领导，此外还接受了推行共产主义且转而向内发展的国会，以此来支持经济发展。苏联没有将资源输入东欧，而是将资源从东欧撤离，监禁或枪杀了其对手，即便这样，东欧的产值在1949年还是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美国控制的区域中，情况稍有好转，而且这里的监禁和枪杀数量很少，产值在1948～1964年间增长了一倍。

这并不是美苏之间第一次分配西方的核心国家，但是原子弹之类的武器使它们和以前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苏联于1949年试验了原子弹，到1954年，美苏双方都有了氢弹，这比炸毁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大了1000倍——甚至更高。丘吉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像克里姆林宫报道中总结的那样，“总的来说，原子弹创立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球新环境，它让生命无法生存”。

但是，这蘑菇云有一个银色的内层。丘吉尔对英国国会说："虽然这看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是我认为，它具有广泛的潜在破坏力，我们要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确保相互毁灭"已经产生，虽有一系列小摩擦，世界险些就要进入大决战的边缘，但是西方世界最终并未上演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问题，西方在第三世界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主要是通过委托战争代理人的方式发动的（对于苏联来说，代理人通常是农村革命，而对于美国来说是血腥的独裁者）。从表面来看，对美国而言这本应该是个走过场的比赛。现在美国占据的世界领土比英国一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盘还要大。尤其是在东方，美国显然掌握着整个局势。美国将5亿美元注入日本，建立了一个忠实的、经济繁荣的盟国。由于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国民党军队蓄势待发，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结束中国内战。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改变了局势。东方变成了当时西方冷战的兵家必争之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400万人丧生（毛泽东的一个儿子也丧身于此）。游击战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激烈进行。1968年，50万美国人投身越南战场，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这些战争是美苏西方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但是它们绝不是东方战争的重复。中国和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领土扩张获得的好处却很少。中国国内问题丛生，而日本——和西欧在欧洲的成功一样让人费解，这颇具讽刺意味——正忙于实现许多它在1941年苦心想出的目标。日本聪明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它利用旧工业被摧毁的机会，重组工业，并对其进行机械化，找到了有利可图之处。到1969年，日本的经济超过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稳步逼近美国。

此时，美国感觉到了冷战全方位竞争带来的压力。虽然美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比在德国多，但是却遭遇了战争的重创。在国内，美国人民对此褒贬不一，这损害了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苏联的战争代理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取得胜利，这将美国此前的胜利贬得一文不值。美国苦心建立的东方盟友国家现在发展很好，它们侵占了美国的市场，而美国花大价钱保护的欧洲盟友正考虑精简武装力量，形成不结盟国家。美国把以色列归为其盟友，导致阿拉伯国家政府投奔苏联。1973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作战时，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油价飙升，可怕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产生）一触即发。

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我和朋友们正在英国随意地聊着美国即将崩溃的情况，那会儿我们正穿着美国的牛仔裤，看着美国的电影，弹着美国的吉他。我记得，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此外，我非常确定，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不仅没有见证美帝国的灭亡，而且我们实际上在为美国赢得西方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很快就明白，具有决定意义的前线并不在越南或安哥拉，而是

在商店里。

东西方的竞争：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1957年，英国首相对选民说：“我们坦然面对吧。我们许多人民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美好了呀！”英国本来可能失去帝国的位置，失去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和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人口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拥有了很多物质。到20世纪60年代，100年前从未见过的奢侈品——如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汽车、电冰箱、电话、电灯（还有，深深印入我脑海中的塑料玩具）——都成为西方核心国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见图10-6）。

这让有些人恍然意识到这是个粗俗的物质时代。一位诗人曾经这么写道，在这个世界中：

……新房里走出来的居民，悄悄推着手推车

走在笔直的道路上回家，

从玻璃旋转门里自由经过，由着自己的意愿——

便宜的外套、温馨的厨房用具、新潮的鞋子、冰冻的棒棒糖[10]，

电动搅拌器、面包机、洗衣机、甩干机——

一个买便宜货的队伍，生活在城市但是活得简单，居住于

只有售货员和买卖关系出现的地方。

从美国的莱维敦到英国的泰尔福特，郊区和卫星城在每条便道和小路附近伸展蔓延，其方块状和没有变化的造型在美学家看来是大煞风景。但是，这些新兴的城区带来了人们想要的东西——小小的空间、室内管道设备，还有供闪亮的福特车停放的车库。



图**10-6** 生活不能再美好了：本书作者和身旁的玩具（摄于**1964**年圣诞节）

20世纪是什么都不缺乏的时代，物质之丰富是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用便宜的煤炭和石油生产出的电力供所有活动使用，只需一按开关，发动机就开始运作，房屋就亮起来。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奴隶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始终需要他们帮我们做事，除非我们拥有能够自动运转的机器。如今，他的设想实现了，电力给我们（甚至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温暖以及娱乐活动，而同样的工作量以前需要几十个奴隶才能完成。

能源革命将16世纪童话故事中描述的天天享受饕餮大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1500～1900年间，由于农事活动组织更为有效，饲料质量也更好，西方国家的小麦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也无法突破以前的农业产值。至此，增加畜力的使用可以提高产量，因而到1900年，北美1/4的农田用来喂养马匹。随后，汽油的使用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第一家拖拉机厂于1905年开业。到1927年，美国农场上拖拉机提供的能量和马匹提供的能量一样多。

1875年，半数美国人在田地里干活，而100年后只有2%的人从事农业。机器将人从农事活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离开土地。只需雇几个帮

手，点燃柴油发动机就行了，机器使得做农活的利润提高了。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称这些拖拉机为“塌鼻子怪物”。他写道：“这些怪物扬起灰尘，将长鼻子伸进去，横行农村，越过栅栏，穿越庭院，笔直地进出于溪谷中。”

斯坦贝克希望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发动革命，剥夺土地的大潮将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向西驱赶，将摘棉花的黑人向北驱赶。当这股汹涌的大潮减退的时候，许多移民都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这比他们所抛弃的农村工作薪酬更高。现在那些取代他们的农业商人向他们出售低价食品，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上投资获利，用电动马达抽水灌溉农田，而且还种植几乎可以抵挡任何侵害的转基因庄稼。到2000年，美国农田每公顷消耗的能源量是1900年的80倍，产值是1900年的4倍。

今天美国走到哪儿，世界明天跟到哪儿。1950～2000年间的“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产值增长了3倍。物价稳定下降，饮食中肉类所占比例增加。除去疾病、战争、暴乱等非常时刻，世界摆脱了饥荒。

和所有有机体一样，人类吸收了过多的能量，并将其用于繁殖后代。20世纪，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世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人类没有将全部能量用于哺育新生儿，而是将其中一些能量储存于自己的身体中。2000年，成人平均比1900年增重50%。人类的身高增加了4英寸，也长胖了，更有体力了。人们的器官更具活力，身体中的脂肪更多（在发达国家，肥胖更严重），这些大块头们能够抵御更多的疾病和创伤。很明显，现代美国人和欧洲人比他们的祖父辈能多活30年，他们的视力、听觉及其他器官的衰弱时间、关节炎发病的时间均向后推迟了一二十年。在余下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近40岁。甚至在艾滋病和疟疾肆虐的非洲，2009年人均寿命也比1900年增加了20岁。

在过去100年中，人类身体发生的变化比过去5万年要大得多。此外，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人们学会了改变不利因素。自1300年起，欧洲人就开始使用眼镜，而今眼镜已遍及全球。医生发明新的技术来拯救听觉，让心脏起跳，重新接上四肢，甚至干预细胞的生长。公共卫生计划消灭了天花和麻疹，它们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了。垃圾收集和清洁饮用水计划在呵护人类健康方面贡献更多。

图10-7显示的是美国退伍军人受哪些慢性疾病的困扰，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人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多少。考虑到其工作具有暴力性，退伍军人可能不是研究人类健康的理想样本。但是由于军队保留了大量记录，因而退伍军人这个集合成为研究的最佳子集，从中可以发现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惊人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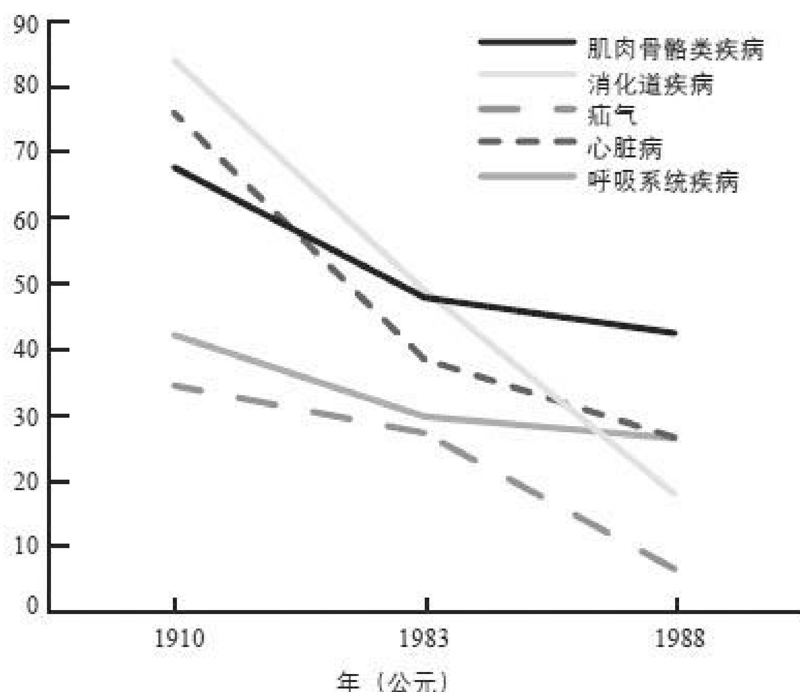


图10-7 能怎样就怎样：美军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1910～1988年）

这些退伍军人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的身体状况改变得更多。纵观历史，妇女曾经是生养孩子的机器。由于半数孩子在一岁前就会夭折（实际上，大多数在第一周），而能够平安度过儿童期的孩子中又只有一半能活到40岁。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口数（抚养两代人至成年后，妇女及其配偶才可退休养老），妇女一生中平均需要生育5次，也就是说她们成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要么在怀孕，要么在养儿育女，或者是一边怀孕一边抚养后代。但是在20世纪，这一高死亡率、低科技化的时代终结了。

在1900年以前，身材高大、脂肪多、壮实的妇女所生育的后代更强健，她们喂养的食物更多，对孩子的照顾也更周到。这类妇女的后代很少会夭折，因而人口迅速增长，直到妇女开始控制她们的生育能力。人们总是有避孕的方法（传说，18世纪风流浪子卡萨诺瓦将柠檬一分为二，自制避孕套），因而到1900年，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在20世纪，美国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1920年，橡胶避孕套问世；1960年，口服避孕药出现。在发达国家，出生率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即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两个孩子。

孩子健康状况的提高和良好的医疗设施将女性从需要辛劳一生的哺育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供熨烫衣物的廉价电子线圈、烤面包机、装在洗衣机上的小型发动机以及吸尘器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

来。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的乏味工作现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轻松解决。以前，妇女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但是到1960年，妇女可以驾驶汽车（基本上美国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前往超市购物（这里出售的食品量占全国的2/3），把买的东西存在冰箱里（98%的家庭有电冰箱），她们可以在孩子放学回家前启动洗衣机洗好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下来看电视。

经济正快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蓝领工人的人数减少了，对白领员工的需求陡增。这些变化让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的妇女离开家门出去工作。1960年后，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中，拥有工作和高学历的妇女比重稳步上升。和前面几个时代一样，这一时代也拥有其主导的思潮。诸如《女性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等书籍促使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跳出其传统角色，找到人生的成就感。1968年，100名抗议者制止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和女性共同分担了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任务（当然，女性通常做得比男性多）。

早在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尼龙战争”这个故事在赞扬的同时也嘲讽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他假设战略家们向总统建议“如果允许他们以美国富人为榜样，会发现俄国人将不再会容忍继续给他们坦克和间谍，却不给他们吸尘器的主人了”。如果美国在苏联市场中投下袜子和香烟，苏联共产主义立刻就会分崩离析了。[11]

现实和小说一样奇怪。苏联和美国都相信自己可以用工业化的力量威慑对方。1958年，这两个国家同意在对方国家举办工业博览会。首先，苏联运送拖拉机、卡车、火箭模型到纽约，让资本家们明白抗议是无效的。1959年，美国对其进行了漂亮的反击，派遣理查德·尼克松（时任美国副总统）去莫斯科指挥占地5万平方英尺的美国家电展览，其中包括按实物大小建造的新住宅样板。虽然莫斯科民众还在迷惑地观望，但是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已经在西屋洗衣机前摆好了打斗姿势。

尼克松发话道：“任何能减轻妇女工作的东西都是好的。”赫鲁晓夫反驳说：“你想把妇女关在厨房里，我们可不是这么想的，我们认为她们能做得更好。”此话或许有理，苏联妇女外出工作的人数比美国多。另一方面，此时距半数苏联家庭拥有洗衣机的年代还有十多年。坐公交车从工厂回来后，典型的苏联妇女每周还需做28小时的家务活。

尼克松用一首自由企业赞歌来回应。他解释说：“我们不会让一个政府高层官员来做出什么计划，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制造商，许多不同种类的洗衣机，所以家庭主妇们可以自由决定……竞争哪台洗衣机性能更优岂不是比竞争火箭的威力要好得多？”尼克松总结道：“我们不会把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到你们的生活中，但是你们的后代会看到这一点。”

尼克松说得没错。1959年，赫鲁晓夫否认了美国工人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后代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会亲眼看见，美国的发展更快。一个笑话在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有一天，一列火车正载着苏联的领导人穿越西伯利亚大草原。突然火车停了下来。和往常一样，斯大林跳起来叫着：“把司机打一顿！”司机被打了，可是火车还是没有动。随后赫鲁晓夫下令：“让司机继续开车！”司机回到了座位上，但是火车依然一动不动。然后，勃列日涅夫微笑着建议道：“让我们假装这列车在运行吧。”

苏联的民众可以打开电视机，看到像我一样的人们弹着吉他、穿着牛仔裤，但是糟糕的是他们会看到工业革命的崭新时代即将开始，这次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它给铁幕右侧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好处。美国的第一台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于1964年问世。它重达30吨，需要很多电力，启动这台计算机时甚至需要关闭费城所有电灯。在随后的30年中，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向西方企业出售仍然庞大但重量稍轻的电脑。1971年，在微处理器发明后，真正的转型开始了。

和以前一样，革新者是精英里面的边缘人物——在优化计算机上，这个人不是来自在信息时代大放光彩的IBM，而是如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一样，来自诸如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郊区的修车厂这类地方。沃兹尼亚克及其商业伙伴史蒂夫·乔布斯带领一帮思维怪异的朋友，用仅有的91000美元启动资金，在1976年推出了他们的第一代苹果电脑。到1982年，苹果电脑的销量达到5.83亿美元，随后，IBM发明了个人电脑与之竞争。那时，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立了微软公司，重新部署了西海岸的办公、生活格局。计算机化推广到了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户家庭，计算机一年比一年便宜、方便，而且功能也变得更有趣多样了。

计算机不仅改变了西方人娱乐、经营的方式，也改变了战争发动的方式。截至1985年，计算机进入了西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苏联除外。

在颠簸中前行：中国的发展转入快车道

东方也必须改变。美国的东方盟友迅速从中国撤出。日本紧随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之后，迅速将经济的利益链从20世纪60年代价值猛升的塑料玩具转向重工业和电子产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转型后，其他东方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处在了经济发展的底层。东方国家的工资普遍上涨，人均寿命延长，新生儿更加强壮。新的住宅小区配有各式电器。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持续一个世纪的战争使中国工业化的脚步落后于日本。但是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和平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正如公元6世纪隋朝统一中国，10世纪宋朝大一统和14世纪明朝一统中华一样，如今的和平环境也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复苏。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推行了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将中国的工业产值提高了一倍多，实际工资上涨超过三成，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提高至1957年的57岁。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增长。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受到1915年左右的一股思潮的影响。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以及斯宾塞）的书籍。他相信长期注定理论，坚信东方的劣势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下决心根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写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得这么想：“世界上最亲的人是我们的父母，但是他们再亲也比不上毛主席和共产党亲……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带给我们一切。”毛泽东宣布开展“大跃进”，以赶超西方国家。全国99%的人口去集体农场劳动，每个农场都有几千人。在有些地方，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四处散播：

>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

在其他地方，愤世嫉俗的思想盛行。有些人称之为“全部吃光”的时代：由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能量，许多人什么活也不干了。

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是上级下达指令必须汇报增产。一位代表坚持认为：“不是没有食物，稻谷其实很丰富，只是九成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虽然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仍然想赶上西方的钢铁产量。4000万农民离开田地，建造后院铸造厂，只要找到矿石就拿去熔炼，甚至连百姓自家烧菜用的铁锅、铁盘都用来炼钢。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使用，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这一实情。

农村变得越来越浮夸。据一名记者报道：“空气中弥漫着扩音器里发出的地方戏剧的高亢旋律，周边回荡着鼓风机的嗡嗡声、汽油发动机的晃动声、载重卡车的喇叭声以及老牛拉矿石和煤发出的咆哮声。”

农民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是天堂里有麻烦，因为当人们不唱的时候，他们就闹饥荒了。下面所写的是对当时的回忆，只是语调异常平静，让人感觉不太正常：

>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死掉。1960年2月，爷爷的腿全部肿起来了，头发也掉光了，身上到处都疼，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三只小山羊。婶婶悄悄地杀了两只来给爷爷补身体。不幸的是，干部发现了这件事，把死羊带走了。

就算是这样，爷爷还是幸运的。

1958～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挨饿。1960年前后，中国重新引进了一些私人资本。到1965年，农业产值已经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样经历了战后的婴儿潮，繁育出了一大群缺少持之以恒精神的青少年。西方社会的富裕年轻人利用手中的购买力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调节了他们在音乐、服装和性习惯上的理念，但是在中国，毛泽东依照自己的理念调整这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的观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百万青少年离开了学校，放弃了学业成为闹事的红卫兵。西方的青年歌颂革命，而中国的青年以革命为生。阶级憎恶让大众普遍变得狂躁。

1969年，事情明显朝病态方向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不断将中国大陆抛在身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也引发了冲突。最后，毛泽东放弃了激进的军事行为，他开始寻求改变不利局面。

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和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高兴地说：“正是这一周改变了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得没错。华盛顿——北京这两个轴心的联合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惊恐。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到3个月后，就来到莫斯科和苏联进行谈判。

通过与尼克松会谈，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渴求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者，反对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人士。当时有件事一时轰动全国。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却获得了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试卷中夹了一张纸条声称，革命的纯洁性比“这么多年来姿态悠闲却尽做毫无意义之事”的人更有价值。激进的大人物们（据说是这样）认为“晚点的社会主义的火车要优于正点的修正主义列车”，这对一些苏联人来说并不正确。

1972年后，实用主义者们退出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了名誉。他将敌对势力控制在外，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将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

实践经验表明，若有个和平、统一的政府，中国也可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中求得繁荣，但是邓小平进展得更多，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他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实行节育。在提高了资源占有量之后，他将中国领进了全球经济中。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放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甚至允许可口可乐公司在上海设厂。

到1983年，邓小平有效地消除了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农民推行“副业”，农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商人的部分利润得以保存。虽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可以承包土地30年，然后进行自主经营。在城市，房地产甚至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农业产量陡增，虽然保守主义者担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自由化并没有让社会倒退。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致富不是罪过。

类似的想法也在4000英里以外质问着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很好。在阿拉伯国家提高油价的时候，出口大国苏联也获利了。随着资金滚滚流入苏联，莫斯科资助并打赢了一系列代理国战争，此外，它于1978年在核武器方面超过美国。但是这一系列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高潮所致。一场支持阿富汗盟友政权的干预演变成一场延绵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持久战。油价下降了2/3，美国军事开支迅猛增加，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武器方面。

苏联中央政治局开始担心普通民众会发现他们的经济火车一动不动。它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却无法造出电脑和汽车（还有一个苏联笑话是这样说的。问：如何才能让拉达轿车价值增长一倍？答曰：装在坦克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一触即发。有人认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即将爆发，这让苏联的统治者大为惊恐。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他对妻子坦言说：“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在随后数小时内，戈尔巴乔夫将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可是花园是他唯一一处可以躲避侦查间谍的地方。和邓小平一样，他也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1986年，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随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其实这只是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早已知晓的道理：自由化将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全部消除，而不单单是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

戈尔巴乔夫什么也没有做。1989年10月，他访问柏林的时候，很多人再次欢迎他。在随后的几周里，民主德国人开始在柏林墙上跳舞，用铁锤和凿子攻击墙体，上千人越过墙进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政府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就这样，民主德国政权解体了。几个月后，苏联开始解体。直到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宣布退出苏联时，戈尔巴乔夫仍主张保留苏联，但他已沦落成一个已不存在的帝国的总书记。1991年的圣诞节，他终于迫于压力，签署法令，宣布苏联解体。

这样，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刮东风还是刮西风

当皇室帝国无法应对所有战争的时候，它们在1917～1922年间几乎全部消失，美国表明自己是个不好对付的庞然大国，但是当共产主义在1989～1991年间遭遇挫折时，美国准备填补这一空白。每两年，美国国防部在《国防规划导引》中修订其宏大战略。报告的初稿于1992年3月出炉，恰在苏联解体的三个月之后。这篇报告展示出了大胆的新设想：

>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对手的再次出现，不管这个对手是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它都会给苏联此前制定的秩序带来威胁。这……要求我们敢于阻挠任何敌对力量，别让他们去占领那些资源充足且可以为全球供给能源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国家和东南亚。

当“一位认为这个冷战后策略之辩应该在公开范围内展开的官员”（就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泄露这个计划的时候，政府很快缓和了自己的语气，但是一个和以前世界一样、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格局再次出现。

苏联解体了。破产并没有像打倒罗曼诺夫王朝的内战那么可怕，但是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的继承者，其产值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40%，实际工资收入下降45%。1970年，苏联人平均寿命为68岁，只比欧洲人平均寿命少4岁；但到了2000年，俄罗斯人平均寿命为66岁，比欧盟居民少了12岁。俄罗斯仍然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但是正如《国防规划导引》预期的那样，俄罗斯没能产生和苏联一样的威慑力。

欧盟也没能挑战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对于一些人来说，欧洲蹒跚向前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看上去像是建立一个次大陆帝国，并和平实现哈布茨堡皇室、波旁王朝、拿破仑和希特勒通过暴力没有实现的愿

望。但是实际上，欧洲不断分裂，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人口老龄化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使得欧洲离超级大国的差距还很大。

东南亚于1992年进入规划者的视野中，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出现敌对势力夺走该地区的油田，就像1990年的伊拉克那样。他们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不断滋长的宗教极端主义，并且（几乎和其他地方一样）该地区受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负面影响。但是规划者的推断最荒谬的是在东方。在《国防规划导引》公布于世的几周内，美国主要的东方盟国日本陷入经济危机，而其主要东方对手中国经济腾飞。

自西方开始将以前的东方核心国家变成边缘地带以来已经有150年了，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一个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接受西方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东方人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自己所用，转化巨大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在全球秩序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广东省某主题公园正中间的高尔夫球车的后面，这儿似乎不像个讲台。但是就在这里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红色资本主义的障碍倒塌了。当毛泽东和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会面的时候，美国的生产力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创造了全世界商品总量的22%，而中国仅占5%。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的生产力继续增长，而中国的生产力增长了2倍。到了2000年，美国的生产力仅为中国的7倍。美国占世界商品的份额为21%，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中国的占有率约增长2倍，为14%。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很多工厂随意倾倒废弃垃圾，污染主要河流。在排水沟附近生活的人罹患癌症的概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农业毫无节制地利用河流的水能，致使很多河流干涸了。伐木业疯狂地发展。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的沙化速度是以前的两倍。

但是，经济发展对社会是有回报的。邓小平的发展规划消除了饥荒现象，并带来收入的巨大增长。每年，占中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的工资平均增长6%。但是这些收益集中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区域，在贫穷的内陆农村，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仍然很落后。这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自20世纪90年代，1.5亿人民迁至城市，每年都创造出和美国芝加哥一样大的新城。来到城市显然可以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半，同时还给制造业带来劳动力，而其劳动力价格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

1992～2007年间，中国出口额增加了十几倍，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180亿美元飙升至2330亿美元。2008年，在美国诸如沃尔玛之类的折扣店里，中国商品通常占总货物量的9成。很多美国人身上的衣服至少有一件是中国制造的。《商业周刊》杂志评论道，“中国价格”已经成为“美国工业最害怕的四个字了”。那些不能与中国商品相抗衡的企业

纷纷破产倒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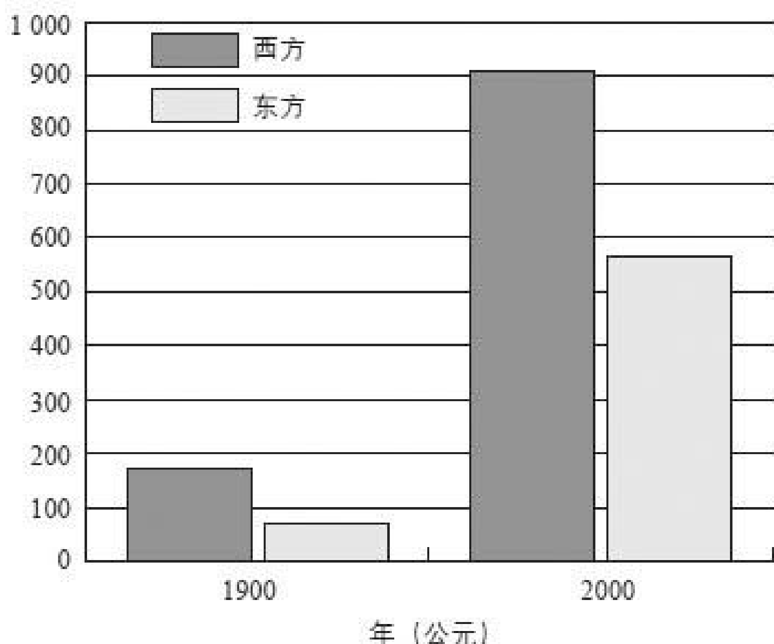


图10-8 风往哪个方向吹：20世纪既是西方统治的高峰也是其统治的终结吗？西方领先的社会发展，其发展指数从1900年的101分上涨至2000年的336分，但是东西方之间的分值比例从1900年的2.4：1下降至2000年的1.6：1，差距缩减了1/3

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成了世界工厂。金融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描述了在意大利偶然听到的两位中国商人的谈话，听上去特别像是狄更斯笔下葛擂梗夫妇的话语：

> 老板说他们“已经旅行一个半小时了，但几乎没有看到一间厂房”。另一位年轻的男士说：“外国人喜欢看风景。”老板停下来想了想，问道：“风景和产量，哪个更重要呢？”……老板的想法涵盖了好几个方面……为什么外国人这么懒？在欧洲没有剩下多少工厂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你真的能仅仅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的发展吗？欧洲的奶牛每天真的需要消耗两美元的津贴吗？

50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0世纪50年代，东方就在西方羽翼的控制下，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划分成了不同的派别而已。但是到了2000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西方的社会发展远在东方之前——其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东方300分——比任何时候的差距都大。不过，西方和东方分值的比例在1900年达到2.4：1，而在2000年，仅为1.6：1。20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

[1] 纺纱轮于12世纪传入欧洲，一个纺纱工人需要5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

[2] 在18～19世纪，东京、苏州、上海、广州的工人均比在北京工作的工人收入低。

[3]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术语，这样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增加了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也加剧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4] 但是，并不是热气球技术。这一细节因为电影主演戴维·尼文（David Niven）的精彩表现而在1956年补充上。

[5] 当火车空着的时候，的确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但是当载重13吨时，速度就会下降至每小时12英里。

[6] 现在人们可能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知道这句话。这是20世纪60年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维也纳对《黑暗的心灵》的改编。

[7] 斯蒂芬斯于1919年出访苏联，但是很显然，在出行之前他就说了这句话。不考虑这类细节，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共产主义者将此话奉为祷文。

[8] 除去日本袭击珍珠港，对美国领土的唯一一次进攻是在1942年。当时，一架日本飞机（从潜水艇上发射出去）在俄勒冈州的布鲁克林爆炸。

[9] 起初，这个组织是建立于1948年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8年重组后，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通过1993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改组成欧盟。

[10] 即冰棒。

[11] 1935年，杜邦公司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尼龙。“二战”后，商店开始销售尼龙长统袜，美国女人们为此疯狂。——编者注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做到的（除非人类没有推动社会发展）；地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过去的200年里统治着全球。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

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是高级动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周围环境获取能量。当能量不足时，我们就变得无精打采，最终死亡；当能量充足时，我们就精力充沛。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充满好奇，但是也很贪婪、懒惰和怯懦。我们与其他动物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够控制这些情绪的工具——进化给予我们更加聪明的大脑、更加圆润的嗓音以及可对掌的拇指。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以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对环境施加影响，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从而在全球建立起村庄、城市、国家和帝国。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认为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得以统治世界。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白人比其他种族进化得更快。他们错了。首先，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基因和骨骼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清楚的：大约10万年前，有一支人类在非洲慢慢进化，然后扩散到全球，使得原先的人类灭绝。全球各地，现代人的基因差别是非常小的。

其次，如果西方人在基因上真的比其他人优越，那么社会发展历史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了。在早期领先了一段时间后，西方应当继续领先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见图11-1）。在冰河时期末期的时候，西方确实领先于东方，但是它的领先优势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公元550年左右，西方的领先优势完全消失，并且在接下来的1200年里，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世界。

现在很少有学者宣扬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的种族论，但是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都会发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或者说东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更加优越，而公元8世纪的时候则失去了这种优越性。说得婉转些，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一切都显示，无论我们看哪里的人们——整体而言——他们看起来都完全一样。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不是由于生物方面的原因，虽然生物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保持前进，但是生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下一步要讲到社会学，它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迅速发展的。

如图11-1所示，社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言部分，我提到了“莫里斯定理”（由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个想法推演而来），以此来解释整个历史的进程——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我希望第二章至第十章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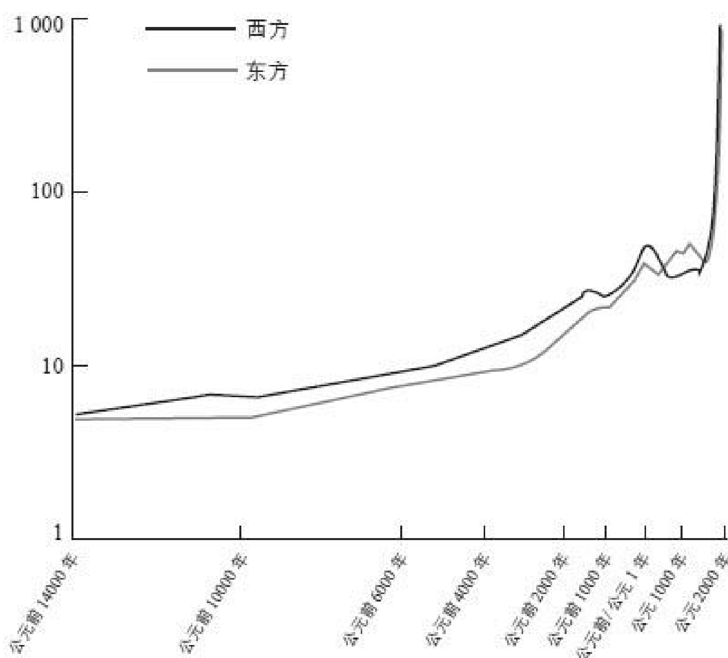


图**11-1** 历史的发展：东西方社会发展以及硬上限，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不停地忙碌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富裕，或者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想紧紧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一般说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不同帝国的创立以及工业革命——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忙碌而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危急时刻孤注一掷产生的。冰河时期末期，狩猎采集者发展迅速，这给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获得资源，他们对捕获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进行驯养，慢慢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一些农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又对资源造成了新的压力，为了生存——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们把村庄变成了城市和国家；一些城市和国家运转得很好，然后它们也遇到了资源问题，于是就把国家变成了帝国（首先是征服陆地，然后是草原和海洋）。一些帝国又重复了这个过程，它们变得非常强大，也给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于是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历史并不是一波接着一波发生。事实上，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世界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适应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发展的悖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削弱社会发展的因素。

人们每天都面临和解决这样的悖论，但是有的时候，悖论会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因此就会产生急剧的变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并且，随着社会接近悖论的极限，发展和崩溃之间就开始了竞赛。社会很少会保持在一个极限停滞不前。相反，如果它们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极限，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所说的五个天启骑士中，就会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饥荒、疾病、迁移和国家崩溃——尤其是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时——会使社会停止发展几个世纪，甚至会将社会带入一个黑暗世纪。

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左右，就会出现一个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水平停滞然后崩溃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是在43分左右，我称之为硬上限。公元1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硬上限，然后就崩溃了；大约10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硬上限严格限制了农业帝国的发展。突破这个硬上限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后的西方人那样。

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能解释很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并且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社会发展迅速，而其他时候却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们将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地理因素。

我已经强调过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从200年前起，这开始变得意义非凡。通过利用煤炭资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要迅速——以至于在19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资源。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论点。在本章，我会花大量的篇幅阐述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时期末期，全球变暖划出了几条幸运的纬度（在东半球约是北纬20～35度，在西半球约是南纬15度～北纬20度之间），在这里进化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可种植的植物。在这一广阔的地带中，亚洲西南部一个名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是最为幸运的。因为那儿有着最多适合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所以那儿的人们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容易变成农民。公元前9000年，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率先建起村

庄，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西方社会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大约200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这里适合驯养的动植物虽然没有侧翼丘陵区丰富，但种类也非常多——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起源于东方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近一半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每一次都开创了新的区域传统。

因为西方人是首先从事农业的，也因为（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悖论，首先掌握了我所说的后发优势。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强的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扩张和战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以牺牲那些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农业也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了使农业在新的土地上发展，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人们不得不重新改造农业。在灌溉农业出现之后，那些落后区域的农业甚至比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农业更加多产。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当侧翼丘陵区最大的农业村庄还在努力维持着农业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国家。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发展的悖论使得黄河流域的村庄具有了类似的后发优势。

新的国家要以新的方式与周围的地区打交道，这就在它们的边境产生了更具破坏力的社会矛盾。它们不得不试着应对这些矛盾，当它们把事情弄糟时——或许就像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公元前2300年左右中国的陶寺以及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西方——它们就陷入了混乱。每一次崩溃又带来一段时期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可以将这个天启骑士加入另外四个天启骑士。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糟糕的破坏和崩溃，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弹性和更强的恢复力。公元前1550年后，西方的城市以及国家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向地中海东岸发展。接着，东西方间第二大地理差异开始发挥作用：东方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地中海一样，能够提供廉价、便捷的运输。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地中海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的时候，它产生的破坏就无法控制了。并且在公元前1200年，天启骑士再次降临。西方核心地区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重创，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

由于发展的悖论，冰河时期末期，地理因素使得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长期领先，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崩溃无法预测。有的时候，一些不同的决定或者一点小运气就可以延迟甚至阻止灾难，我们的选择相当重要。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国家要重新进行组织，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来研判世界，从而创造所谓的第一波轴向思维。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社会发展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了；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他们并驾齐驱。

东方和西方一样，都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然后发展成为成熟的帝

国。公元前200年后，地理的意义又发生了变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40分。到公元1世纪，社会发展又达到了硬上限。不过同时，罗马帝国以及汉朝的兴起也改变了东西方之间距离的意义。欧亚大陆两端有大量的财富，商人和游牧民也就有了新的理由进行迁移。他们尝试着连接起核心区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天启五骑士首次同时出现在核心地区，带来货物和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病菌。罗马帝国和汉朝非但没有突破这个硬上限，反而在公元150年时都崩溃了。

东西方都进入了新的黑暗时期，在此期间，第二波轴向思想（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大乘佛教）替代了第一波轴向思想，但是它们崩溃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德国的入侵者攻入了地中海西岸相对落后的地区，核心地区在地中海东岸发展起来。在东方，亚洲腹地的侵略者摧毁了黄河流域较为发达的地区，核心地区转移到长江以南次发达的地区。

地理上的差异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公元450年，长江流域出现了发展稻作农业的区域；到了公元60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成为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地中海对于古罗马的意义。不过在西方，阿拉伯人虽然强大得可以摧毁地中海的核心地区，但却不足以重建这些核心地区，社会发展一路下跌，直到公元700年。

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于西方（这证明了西方并不是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到了11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由于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资源的再生速度，制铁工人开始利用化石燃料，发明者创造出新的机器，宋朝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求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但是就像1000年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宋朝也无法打破这个硬上限。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发生的事件和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事件是相似的，只不过要将东西方对调而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并且再一次解放了五个天启骑士。东西方的核心地区都衰退了，只不过在东方衰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在西方，地中海东岸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伊斯兰中心地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到了1400年，一个新的核心区域形成了，并且西欧开始了文艺复兴。

这些孤立的、原先边缘化的欧洲地区发挥了后发优势。西欧人利用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从东方学到的造船、火药及其他技术，把大西洋变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再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为了得到东方的财富，西方船员误打误撞地登陆了美洲，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15世纪的时候，东方人本可以发现美洲（一些人认为东方人确实发现了美洲），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总会比东方人更快到达美洲。对东方人来说，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收获

要大得多，并且将内陆向草原推进，收获也很大，因为近2000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7世纪，核心地区的扩张使地理的重要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帝国用火枪和火炮阻断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亚洲腹地的草原，结束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有效地扼杀了天启五骑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欧商人开辟的这条海上通道推动了新兴的市场发展，并就这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转提出全新的疑问。到了1700年，社会发展再一次达到了硬上限，但是这一次，天启五骑士并没有降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灾难，西欧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发现，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西方统治的必然性

你可能会问，是否有来自人类自身的影响呢？这本书大量地谈到了伟人和愚昧之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不断的冲突，难道最后，其中都没有一个有重要影响吗？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们都有自由的意愿，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决定确实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大部分的决定并不能使世界发生多大的改变。例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停笔，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狩猎采集者。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会失去我的家，并且，由于我对狩猎和采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会被毒死或者饿死。我周围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例如，你就会找点儿其他书来读。但是，世界还会继续。我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改变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如果上百万的美国人决定辞掉朝九晚五的工作，变成狩猎采集者，那么我的决定就会由一个疯狂的个人异常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运动，这样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决定。例如，“二战”后，约有5亿妇女比自己的母亲结婚年龄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于是人口激增。30年后，她们的女儿则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于是人口增长变慢。这些选择共同改变了现代历史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直接说道：“男人（和女人）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20世纪，妇女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后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们却常常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毫无选择——就像一万年前，那些决定从事农业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也一定常常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

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我们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那些忽略这些压力、做出奇怪决定的人。我们往往崇拜激进分子、叛乱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却很少会追随他们。我们大都非常清楚循规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处和配偶）。进化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常识。

即便如此，奇怪的决定很显然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以穆罕默德为例，或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公元610年前，这个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将与加百列天使的相遇归咎于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多年来，穆罕默德和大多数的先知一样，看起来荒谬可笑。但是后来，他统一了阿拉伯。他的继承者哈里发摧毁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认同穆罕默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于穆罕默德个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已经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战派入侵时，拜占庭和波斯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而且地中海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也许会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区。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也许会恢复得更加迅速，也许不会，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东方。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西方核心地区仍然是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也依然会在11世纪的时候入侵西方，然后蒙古人在13世纪的时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区也仍然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然后在15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无疑问，仍然会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现在也仍然会统治世界。

适用于穆罕默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我们所知道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权。但是大部分的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

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保持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们错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对外政治，也适用于对内政治。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但是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样。亚历山大于1874年2月14日为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就在同一天，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为他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博尔顿和瓦特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显得独一无二。约瑟夫在1774年发现了氧气，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氧气。同样，他们也不会比1611年各自发现太阳黑子的四位欧洲科学家更独特。

历史学家常常惊叹几个独立的个体常常会想到一起，例如发明灯泡的想法几乎同时在几个人的大脑中出现。与其说伟大的思想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群有着相同疑问和解决方法的思想家的逻辑结果。17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也是如此，一旦有人发明了望远镜（9个人宣称自己发明过望远镜），如果没有一些天文学家很快发现太阳黑子，那才令人惊讶。

很多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不止被发明一次。统计学家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甚至提出一条法则，他认为没有哪一项发现是以真正的发现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则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5年前发现的）。博尔顿和瓦特领先了，但是其他人也有可能领先。如果瓦特没有在18世纪70年代发明出蒸汽机，其他人以后肯定也会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瓦特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把其他人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话，蒸汽机会改进得更快。

伟人以及愚笨之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物决定了历史，使得有些时候产生伟人，而有些时候则产生了一群愚笨之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如此，例如，在他们看来，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真正原因是1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变得保守，放弃了整个世界，而此时欧洲的文化变得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直到到达美洲。

我在第八章花了一些篇幅阐述了这个想法，认为这个想法与现实并不符合。与其说文化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还不如说文化是一个市政厅，能让我们讨论我们的选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东西方思潮在过去的5000年里是如此相似。在东西方的核心地区，第一批国家的兴起——西方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引起了关于神圣王权的本质以及限制王权的讨

论。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西方是公元前750年后，东方是公元前500年——这些讨论产生了第一波轴向思想，思考个人成就的本质以及与世俗权威的关系。到了大约公元200年左右，随着汉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瓦解，这些问题就催生了第二波轴向思想，讨论有组织的教会如何能够在一个混乱而又危险的世界中拯救它的信徒。当社会复兴时——中国在1000年，意大利在1400年，如何跳出令人失望的过去从而获得第一波轴向思想中失去的智慧，这个文艺复兴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认为，长久以来，东西方的思潮发展得如此相像的原因在于，社会要保持发展只有一条途径。社会发展指数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东西方都要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第一波轴向思想。而这些国家的衰退又促使人们转向第二波轴向思想，它们的复兴几乎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文艺复兴。每一次巨大的变化都促使人们思考时代所需的思想。

但是，1600年左右，当西欧人迈向科技思潮而东方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大西洋沿岸核心区域外的西方人）却故步自封时，其中产生的巨大分歧又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思想方面划时代的转变是否反映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时代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

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如此。这些学者指出，当心理学家把人们绑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上，叫他们回答问题时，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将信息放在一个广泛的背景下而不是孤立看待的话，西方受试者大脑中的额叶和顶叶会更加活跃（意味着他们更努力来集中注意力）。东方人正好相反。

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脱离背景孤立地看待事实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就像常见的描述方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也许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大脑功能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人在逻辑和科学方面强于东方人。

但是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实验并没有表明东方人不能将事实和背景区分开来，或者说西方人无法从恰当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他们不大适应用对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东西方人都能够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

在每个时代的每片土地上，我们总会发现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前者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后者着迷于错综复杂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变化的只是他们面临的挑战。1600年左右，当欧洲人开始发展大西洋经济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带来了问题。机械模型和科学模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接下来的400年里，这些思考方式融入了西方教育中，并渐渐地成为默认的思考模式。在东方，大西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那么迫切，甚至到了19世纪，这个过程也没有走太远。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无法产生冒险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这两个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一群新的社会学家从日本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为集体自我牺牲的精神并没有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释了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理智的结论，那就是人们会促使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这个结论也许能够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弗林效应。自从有了智商测试，测试的平均分稳步上升（大约每10年提高3分）。想一想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真是令人兴奋，但是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以现代、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而这正是这些测试所要测量的。看书比听故事更能让我们变得现代化，而且，令很多教育家恐惧的是，玩电脑游戏能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现代化。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文化对变化的环境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例如，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一些非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条非常愚昧，令人们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都是伊斯兰教徒，以及为什么直到16世纪，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都无人能够超越。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后许多伊斯兰教徒对军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正如13～14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现在已经非常现代化，足以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不过，总的说来，随着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国家的核心变为外缘，它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令人感觉它是受害者。要结束这种局面，对伊斯兰教来说，任重而道远，但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

文化和自由意愿这两个因素，使莫里斯定理变得更加复杂——莫里斯定理认为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寻求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他们偏离了任何简单的理论。但是第一章至第十章的那些事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帖木儿摧毁了意大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既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依赖于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但是西方统治本身既不是一直存在

的，也不是偶然的，将之称为可能发生的事件更加准确。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理因素对西方都非常有利。我们不妨认为，西方统治往往看起来更为可能。

为了解释这些相当神秘的评论，我想借用一下罗伯特·泽梅基斯（Robert Zemeckis）在1985年的喜剧《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所使用的方法。电影的开头是一个疯狂的教授将巨大的吉他放大器、偷来的钚和一辆德罗宁汽车组装起来，发明了一部时光机器。当恐怖分子杀死教授后，年轻人马蒂（由迈克尔·福克斯扮演）开始追击，然后时光机器把他带回了1955年。在那儿，他遇见了他未来的父母，当时他们还只有他现在这么大。然后灾难降临了——马蒂未来的母亲没有爱上马蒂未来的父亲，反而爱上了马蒂。这在整个历史中，或许毫不起眼，但是对马蒂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他不能在电影结束前让过去恢复原样，那么他就无法出生。

我在这里不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即从开始讲到我们这个时代，我想，我们不妨像马蒂一样，回到过去，然后，就像电影那样，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阻止未来事件像现在这样发生。

我会从两个世纪前的1800年开始。我们处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个时候西方看起来就已经很有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科学发展欣欣向荣，欧洲的军事力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当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多一点运气，拿破仑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或者说只要少一点运气，英国的统治者就无法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挑战。无论怎样，英国的发展都有可能变得缓慢，或者——正如我在第十章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有可能转移到法国北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西方的工业革命受阻的话，18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一旦开始了工业化，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那贪婪的市场走向世界。1793年，当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使命时，马戛尔尼勋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要让中国关注人类知识取得的进步是徒劳无益的。"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或许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我们假设何种对西方不利的情形，例如想象它的工业化延缓了100年，或者说直到20世纪欧洲才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东方能够在西方之前开始工业革命。东方的发展或许需要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多样化的区域经济，而这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1800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我认为有95%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再倒退150年，回到1650年，当时的牛顿还是一个小男孩，那么西方的统治看起来就没那么确定，但是仍然是可能的。火炮打退了蒙古人，船只开拓了大西洋经济。工业化看起来仍然遥不可及，但是在西欧有了产生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如果17世纪50年代，荷兰在与英国作战时赢了英国；如果1688年，荷兰支持的英国政变失败；或者说如

果1689年，法国成功入侵英国，那么有利于博尔顿和瓦特的特殊机制就不会形成；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就会延迟几十年或者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看到，如果这样的话，165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如果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变慢，清朝的统治者也有不一样的表现，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快地跟上欧洲的科技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东方人要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还不仅仅需要这些。1650年时，我们还不能像1800年那样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这看起来仍然是最为可信的结果——有80%的可能性。

不妨再往回倒退150年，退到1500年，这个预测看起来更不可信。当时的西欧已经有能够航行到新大陆的船只，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新大陆进行抢掠。如果哈布茨堡家族更幸运一点儿的话（或者如果卢瑟从未出生过，或者查理五世指派了他，又或者如果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胜利，然后镇压了荷兰的独立运动），或许他们真的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这样的话，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许就会消灭诸如牛顿和笛卡儿这样激进的声音，而且任意征税就有可能像历史上破坏西班牙商业那样破坏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贸易。不过，这些只是假设，尽管我们知道哈布茨堡帝国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驱使更多的清教徒穿过大西洋，建立城市，开始开拓大西洋经济以及科学改革。

或许哈布茨堡家族会面临比现实更加糟糕的情况。如果奥斯曼帝国更彻底地击败了波斯什叶派教徒，那么土耳其就有可能在1529年占领维也纳，伊斯兰教徒就有可能入侵英国，并且，正如吉本所说的那样，牛津的学校现在就有可能教授古兰经。土耳其的胜利也许会使西方的重心留在地中海，从而把大西洋经济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假设的哈布茨堡的胜利，这也许会刺激一个更加强大的大西洋世界的形成。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厮杀得更为激烈，他们也许就无力击退蒙古人。如果这样的话，17～18世纪的时候，清朝的胜利也许就会把蒙古人驱逐到欧洲，使17世纪西方的危机转变为与罗马帝国末期所面临的危机一样严重。一方面，西方面临着新的黑暗时期；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足够长的几个世纪后，中国在其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时，就有可能发生科学和社会变革。谁知道呢？不过，有一件事非常清楚：1500年时，可以看出西方将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比1650年要低得多，最多有55%的可能性。

再往回退150年，退到1350年。这个时期黑死病流行，西方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渺茫。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过不了多少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从中亚一路入侵印度和波斯，然后在1402年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就在那个时候，帖木儿决定掉头前往中国报复中国皇帝，因为他认为中国皇帝侮辱了他。但是帖木儿在到达中国前就驾崩了。如果1402年后，他继续往西进军，那么他就有可能摧毁意大利，阻止文艺复兴，使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于1405年在东征的途中驾崩，而是多活几年的话，他就有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征服中国，使东方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

事情完全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战后有可能无法重新统一中国，那么中国在15世纪的时候，就会是地方割据，内战频繁，而不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成为东方的核心。那么谁又能说结局会是怎样呢？可能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独裁的高压统治，海上贸易或许就会受到刺激。我在第八章说过，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的话，东方的殖民者和商人有可能会在东南亚以及香料群岛开拓小型大西洋模式的经济。不过，底线是1350年的各种可能性要比1500年还要多。2000年时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最多只有25%的可能性。

我可以继续假设下去，做出各种假设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关键点很明确。西方能否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偶然性。我们往回走得越远，可能性就越多。1800年，不同的决定、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完全不可能阻止西方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1350年，这个结果仍然非常可信。但是，我们很难想象，1350年之后发生的任何事会使东方在西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这些事会阻挡东西方的工业革命。

如果要找到东方或许能够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迹象的话，我们就要倒退整整9个世纪，回到1100年。如果当时宋徽宗能够更好地对付女真人，避免1127年开封的沦陷，或者如果铁木真的父母在铁木真小时候真的把他丢掉，让他死在大草原上而不是长大成为成吉思汗，那么谁知道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距离和航海技术使得东方不能像18世纪的欧洲那样通过开拓大西洋经济开始工业革命，不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开拓类似的经济。如果宋朝没有受到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欺凌，那么中国的复兴文化就有可能发展为科学变革，而不是演变为自满和裹脚。一亿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南方农业区域和北方工业区域之间的贸易，以及亚洲东南部的殖民化都有可能扭转局势。当然也可能不会这样，要知道，在枪炮和军队封锁辽阔的草原之前，中国一直支持大规模移民政策。但也可能我们对清朝统治者同时应对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总之，我想，东方会在12世纪发展起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我们利用时光机器做最后一次旅行，从宋朝再往回退1000年，则又是另一种情况。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东方不能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而是要问罗马帝国能否在西方突破硬上限的1700年前突破硬上限。坦白地说，我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发生。像宋朝一样，罗马帝国不仅需要在没有大西洋经济的背景下，找到突破硬上限的途径，还要有足够的运气来躲过天启五骑士。当中国的汉朝在公元3世纪崩溃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被削弱了，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也崩溃了。当然，罗马人有可能战胜哥特人，在国内混乱的情况下继续支撑下去，但是罗马帝国能够摆脱17世纪的危机吗？即使能够摆脱这个危机，他们又怎么能够逃脱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公元100年后罗马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比公元1100年后的宋朝还要小。

以上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西方在2000年前得以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以来注定如此，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性。它更多的是长期的可能性。即使在1100年，东方也不太可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从而在全球施加它的影响，然后像现在的西方这样得以统治世界。不过，这些看起来总是可能发生的：火炮最终会被发明出来，将蒙古人击退，船只和市场能够开辟海洋通道。并且一旦事情这样发生了，新的地理因素会使得西方更可能在东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我想，唯一可能阻止这些发生的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夜归》中提到的夜幕低垂时：毁灭一切的大灾难摧毁了文明，使得人性又回归原始。

夜归：如果希特勒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西方统治的时代前，世界最接近崩溃的时候是在公元前10800年，当时有一大块冰湖变成了北大西洋，温度降低使墨西哥湾暖流转向。之后是长达1200年的短冰期，称为新仙女木事件。这次事件阻碍了社会发展，使得稳定的农村生活以及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业受到破坏。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期的最后一次寒冷事件。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候变暖，进入温暖的全新世。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假如发生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规模的事件，结果会非常恐怖：世界各地年年都将无法获得丰收；上百万的人会饿死；大量的移民将会使欧洲大部分、北美和中亚变为空城；战争、国家的灭亡以及瘟疫带来的巨大灾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是天启骑士将自己的坐骑变成了坦克。急剧缩小的人口规模将使赤道附近的村落荒废。人们祈祷下雨，在干燥的土地上勉强度日。社会发展将会因此倒退几千年。

其他灾难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天文学家曾计算出，假如有一个直径一英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效果就相当于1000亿吨TNT当量。人们对此产生的后果看法并不一致，但这肯定会导致高层大气充满尘埃，遮蔽阳光，导致几百万人饿死，还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破坏臭氧层，使人们暴露在致命的太阳辐射中。相反的，我们更容易对一个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进行模拟。它产生的效果相当于两万亿吨TNT当量，能消灭地球上的所有人。

很显然，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沮丧地想象事情会变得多糟糕。行星撞击以及冰期并不像战争或者文化：它们现在（或者应该说直到最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愚昧之人、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都不能产生另一片寒冷的巨大海域，使得湾流转向，这意味着不可能形成新的新仙女木事件。即使是最悲观的天文学家都认为直径几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几万年才会发生一次。

事实上，愚笨之人在历史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人类面临灭绝。

即使是最为血腥的战争，如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也只是加速了正在发生的趋势。1900年，美国这个新兴的次大陆帝国已拥有一个工业核心，挑战着西欧的海洋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决定谁将代替西欧。是美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迅速工业化的苏联？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试图征服次大陆帝国的德国？在东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试图征服世界，工业化为一个次大陆帝国，然后超过西方。日本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工业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萧条，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飞速发展。我们难以知道欧洲的海洋帝国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存活，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从非洲到中南半岛的民族主义浪潮、西欧逐渐减少的人口及其对手国家的工业时。

如果欧洲的大国没有在1914年和1939年参与世界大战的话，它们的海洋帝国肯定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没有在1919年逃避它的全球责任的话，这些海洋帝国也许会崩溃得更快；如果希特勒打败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又或许，情况不会发生改变。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祖国》（*Fatherland*）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事中的谋杀之谜发生在1964年的德国，但是——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件事都似乎出奇的不同。希特勒杀害了所有欧洲犹太人，而不是杀死了大部分的犹太人。他手下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将希特勒的想法变为现实，重建了柏林。柏林的胜利大道有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两倍那么长。胜利大道通向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这里的建筑高耸入云。随着故事的展开，场景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奇怪的熟悉感。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两国各自都有核导弹撑腰，彼此虎视眈眈，都争取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正慢慢走向缓和。在某些方面，一些结果和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能造成的唯一不同的结果就是演变为核战争。如果希特勒制造出了核武器，那么他肯定会使用，但是因为他在1942年取消了核研究，所以假设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是当苏联在1949年测试它的第一个核武器时，末日变得愈加可能。即使在1986年它们处于最顶峰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导弹的弹头加起来造成的破坏力也只有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的破坏力的1/8，但是这也足够毁灭现代文明了。

我们很难理解那些能够沉着冷静看待核战争的人物。

不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只有通过“确保相互毁灭”才能解决核武器的问题，即在核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中，每一方都应该做好毁灭对方城市和国家的准备。关于这场竞赛如何开始的细节，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当时美苏之间还有一些频繁的电话联系，尤其是在1963年秋，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试图制定美苏竞争规则的时候。赫鲁晓夫由于害怕美国的武力威胁，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肯尼迪出于担忧，武装封锁了古巴。苏联的战舰开到距离美国海域几英里的地方，肯尼迪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阻拦它们。肯尼迪认为此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达到了1/3甚至1/2。接着在10月24日星期三的早晨10点左

右，情况急转直下。肯尼迪和他顾问紧张得一言不发，此时手下报告说，苏联的潜艇挡住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路。如果苏联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它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肯尼迪的弟弟回想当时的情况：肯尼迪“将手抬了起来，捂着自己的嘴。他不停地攥紧拳头，然后又松开。他的脸看上去很疲惫，眼里透出痛苦”。他的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发射4000个导弹，但是苏联的潜艇并没有开火。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10点25分的时候，苏联的船慢了下来，然后掉头走了。灾难并没有发生。

30年来，边缘政策和荒谬的错误产生了一连串的灾难，但是最糟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1986年以来，世界核导弹的数量已经减少了2/3，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即2010年年初，核武器的数量有可能会大量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现有的几千种武器仍然能够杀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依照现在的局势，发生灾难的可能性还是比40年前“确保相互毁灭”时的可能性小得多。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继续编织着各自的网，历史还在继续。

基地

至少到目前为止，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夜归》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的发展，不过也许他的《基地》系列能够更好地做出解释。阿西莫夫在书中写道，在遥远的未来，一个名叫哈里·谢顿的年轻数学家乘坐太空船去川陀星。川陀星是已经存在了12000年的银河帝国的首都。谢顿在那儿的“10年数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学术文章，解释了心理历史学这个新科学的理论基础。谢顿认为，大体说来，如果我们将常规历史、大众心理以及先进的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驱动人性的力量，然后将其用于预测未来。

谢顿在川陀星最大的大学当上主任之后，他研究出了心理历史学的方法。他预见未来银河人将会经历一段长达3万年，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皇帝提升谢顿为第一部长。担任这个了不起的职务后，谢顿计划组建一个名为基地的智囊团。这些学者一边把所有的知识收录到银河百科全书中，一边密谋1000年后重建帝国。

《基地》系列小说在科幻迷中掀起了一股热潮，风靡了半个世纪，但是对那些听说过哈里·谢顿的专业历史学家来说，谢顿只是一个滑稽人物。历史学家坚称，只有在阿西莫夫疯狂的想象中，才有可能利用已经发生的事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否认过去有很多的发展轨迹可循，而那些认为过去确实存在这些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了解这些发展轨迹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例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他是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对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他认为：“有记载的历

史，最多也就追溯到200代前。即使在历史上有更大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目前为止还不能真正地从手头那一点历史记录了解这个目的。”

在这本书里，我曾经提到过历史学家往往低估自己。我们不一定要把目光局限于有着历史记录的这200代。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考古、基因以及语言学——本书前面几章中主要的证据——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历史。事实上，回到500代前就已经足够了。我认为，有这么充足的时间，我们真的能够从中得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现在就像谢顿那样，我想说，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可以利用过去预见未来。

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会结束

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恐惧地盯着那块铭记着“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墓碑。他紧紧地抓着圣诞未来之灵的手，拼命地问：“这些是表示未来一定会这么发生，还是说未来可能会这么发生？”

我想，我们不妨对图12-1提出同样的问题。图12-1显示，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就会在2103年的时候再一次超过西方。但是，由于17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图12-1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对这个图最好的解释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可能结束。

东方现在的城市规模已经和西方一样大了，并且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这也许是进行预测时最简单的变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战略家们认为，到20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赶上美国；高盛集团的银行家们认为这会发生在2027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甚至预测这会发生得更早（他们分别认为是2020年和2016年）。东方要在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以及能量获取方面赶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2050年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会迅速地赶上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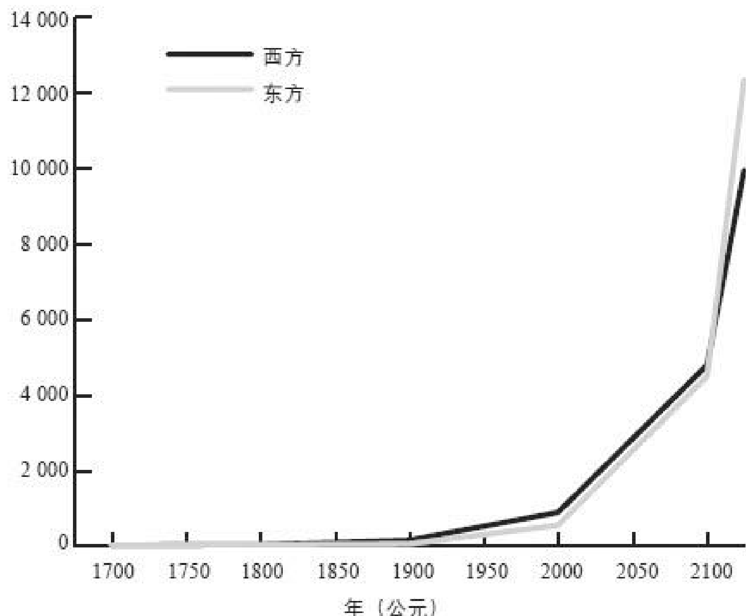


图**12-1** 亘古不变？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西方就会在**2103**年结束统治地位

不过，还是有人心存怀疑。以上所有专家的预测都是在2006～2007年之间作出的，当时东方正处于金融危机的前夕，而这些银行家、会计师和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应该知道，《圣诞颂歌》最关键的一点是，斯克鲁奇的命运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斯克鲁奇跟圣诞未来之灵保证道："我不会忘记从过去、现在和未来得到的教训。"然后，斯克鲁奇果然在圣诞节早晨起床的时候，变了一个人。他身上的杀气消散了，他的心从坚冰变成了热情的火焰，最终这团火温暖了整个城市，他成为这个城市最会过圣诞节的人。

和斯克鲁奇一样的西方是否能够在21世纪重新改造自己，继续保持领先？在本章中，我会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在这本书中提到，预言家在试图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看得不够远。他们在向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也只是回顾了几百年前的事情，这就像斯克鲁奇单单通过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来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按照斯克鲁奇的实际做法，牢记圣诞过去之灵的话，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们可以模仿哈里·谢顿，在研究银河帝国的未来时，先了解它的千年历史。像斯克鲁奇和谢顿那样，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现有的趋势将如何发展，还要了解这些趋势是否会产生削弱它们的力量。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发展的悖论，了解后发优势，并且预测地理因素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将如何改变地理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

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来，作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边缘的东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核心区域就已经扩展到世界，把它的影响力覆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原先独立的东方核心变为西方的新边缘地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历史上所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的规模更大一些。东方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富裕的西方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了后发优势，日本进行了重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发展起来。1978年之后，中国等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市场也有更大的弹性。早期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固执的知识分子是东方落后的因素，而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整个东方最终都开始了工业革命，东方的企业家们建起工厂，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销售廉价的商品。

以上这些都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并且十多年以来一直发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试图与廉价的亚洲商品进行竞争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产商发现——就像其他边缘国家的人们一样——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区也不能统购边缘国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东西关系变得不寻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后出现了新的解决办法。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中国还是能够借钱给西方，让他们持续买进东方的商品。中国常常把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诸如美国长期国债这样以美元标价的证券。中国购进几千亿美元，使得人民币看起来比美元廉价，从而令中国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关系相当于在一场婚姻中，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但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国停止买入美元的话，美元就有可能崩溃，那么中国持有的8000亿美元就会贬值。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停止购买中国商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信用也没有了。美国人一旦发起抵制活动，中国的企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但是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破坏美国的经济来实施报复。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金融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这个奇怪的关系称为“中美共同体”，认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但是，美国不能永远通过向中国借钱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中美共同体大量的低息贷款使双方的资产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泡沫经济开始崩溃。2008年，西方经济直线下滑，导致其他国家经济也出现下滑。到了2009年，13万亿美元的消费者财富化为乌有，中美共同体也出现了衰退局面。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干预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

大萧条的覆辙，但是中美共同体的崩溃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东方，失业人口剧增，股票市场崩溃，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国在2009年7.5%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高于西方核心地区在最好时期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586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不过它至少还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面临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在其现有的国债上又动用了787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但是2009年，它的经济还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反弹到8.5%，而美国只有0.8%。最令人恐惧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在2019年前，美国将无法还清它为刺激经济所借的国债，到那个时候，美国的老龄化将使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个经济强国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一句俏皮话开始流传起来："2009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句话有很大的真实性，1918年的情况可以拿来与2009年进行对比。当时，整个大西洋都面临着国家力量和财富的衰退——从欧洲原先的核心地区到美国新兴的核心地区。2009年，整个太平洋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衰退——从美国到繁荣发展的中国。中美共同体有可能只是通往东方统治道路上的一个停靠点而已。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预测。一些专家指出，美国就像斯克鲁奇一样，已经多次彻底地改造了自己。关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已经有太多的批评声，但是最后，美国的经济得以反弹，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打败了纳粹和苏联。这些乐观者坚称，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总能想出办法，并且即使美国在2010年确实陷入了危机，它也能在2020年时超过中国。

其他一些专家则强调中国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工资水平，中国正在失去一些后发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低端的制造工作开始从中国沿海转移到内陆，现在正集体转移到诸如越南这样工资更低的国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自然过程，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失去它的优势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由于低出生率和迁移率，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得比美国快，到204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要比美国严峻得多。中国自然资源的短缺也有可能减缓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只要发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现动乱。

西方一群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或许所有的这些猜测都不重要，因为它们都会被忽略。尽管在20世纪的时候，大西洋的财富和力量都经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欧人还是比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先

辈富有得多，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浪潮推动了西方各国的发展。在21世纪，太平洋上的国家有可能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并且预测在2003～203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增长两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只会上升50%，但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国人均收入将为58722美元，是中国的3倍。罗伯特·福格尔则更加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他说，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令人惊讶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乐观的看法是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说的“平稳版本”，即东方的繁荣发展将使得东方西方化。到那时，询问是否还是由西方继续统治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已变成了西方。1999年时，乔治·布什这样说道：“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一些人认为，使现代全球经济繁荣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变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区。不过，那些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却不认同东方在有能力统治全球的时候文化也会变得西方化这一观点。毕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核心国家的时候，它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并不一样。相反，欧洲人开始抱怨本国文化的美国化。

当中国的城市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时，他们喜欢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们脱下了中山装，创办了英语学校，甚至在故宫的星巴克里喝着拿铁咖啡。北京后海的昂贵酒吧里挤满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就像纽约和伦敦股民一样，手拿黑莓手机，关注股票行情。不过，问题是，当太平洋国家面临力量和财富衰退的时候，它们的西方化进程是否还会继续。

马丁·雅克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随着东方和南亚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应了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谓的“争鸣的现代性”的发展。雅克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将会代替西方统治，使得多种货币（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和经济/军事影响范围（就像美国对欧洲、亚洲西南部和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东亚和非洲的影响）都会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统治（欧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

雅克通过总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权力运用的方式推断得出，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

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一些战略学家认为中国的全球统治会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国，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军事侵略性。其他战略家却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们无法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统治者反对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贵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前几任皇帝。那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的谨慎与其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不如说是由于自身的缺点造成的。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军事开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标是要在21世纪20年代赶上美国。或许可以说，东方要在21世纪统治世界，其过程可能会比19～20世纪的西方更加血腥。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也许会有伟大的人物帮助美国，帮助西方多统治几代；也许会有一群愚笨之人暂时阻挠中国的崛起；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

这种自相矛盾的预测只会让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书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释西方统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会发展指数进行说明。我现在想要证明，用同一种方法也能帮助我们了解1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未来的社会发展速度会让你瞠目结舌

我们再来看看图12-1，尤其注意2103年，东西方交汇的这个点。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指数会超过5000分。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冰河时期末期到2000年间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上升了900分。根据图12-1，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还将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们从阿尔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画带到了原子弹时期，那么另外4000分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了解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5000分时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才能了解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访谈中

提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比过去的几千年面临着更为根本的变革。"或许，这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如果图12-1确实显示了未来的轮廓，那么里夫金的预测实际上却是过于保守了。根据图12-1，在2000～2050年之间，社会发展速度将是过去14000年的发展速度的两倍；到2103年，发展速度还将翻倍。这真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预言在此刻全部破灭。根据现在对未来的所有推断，我们得出意料之中的结果，即未来和现在基本一样，除了中国会变得更加富有。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都置于这个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圣诞过去之灵对话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接下来的社会发展速度将史无前例。

5000分的社会发展指数所蕴涵的意义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假设能源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到2013年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会出现拥有1.4亿人口的大城市（相当于将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孟买、德里和上海合并为一个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将会达到130万千卡。

战争能力的5倍增长则更加难以想象。我们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毁这个世界好几次。21世纪，我们不再是简单地增加核导弹、炸弹以及枪支的数量，相反，21世纪的科技会使武器变得无用，就像坦克使得骑兵失去作用一样。美国科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开发反弹道导弹，诸如《星球大战》里的情形肯定会变为现实。机器人将为我们作战，网络战争将会变得极其重要。纳米技术会把日常材料变为坚硬的盾牌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每一种新的进攻形式都会带来同样高端的防卫形式。

不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图12-1暗示的信息技术的变化。20世纪把我们从录音机和电话时代带到了网络时代，21世纪使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们的大脑就像（或者说变成了）一台大型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大脑和机器的计算能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听起来都不大可能。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根本无法运作。这个世界也没有足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来满足人均能量消耗达130万千卡的几十亿人口。纳米技术、计算机以及机器人战争会把我们全都消灭。我们的大脑会与计算机结合——我们将不再是人类。

我想，这就是图12-1最为重要，也最令人担忧的暗示。

在本书中，我主要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虽然地理因素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

倒退，但社会发展也决定了地理因素的意义。我现在准备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释。21世纪的社会发展指数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将改变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意义。我们正接近历史上最大的断层。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一名发明家，也是一名未来主义者，他将此称为“奇点”——“在未来时代，科技将会迅速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科技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其观点的基础之一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其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价格将降低一半。40年前，庞大的计算机每秒运行几千万次运算，要花几百万美元，而我现在使用的小型电脑，只需要花费几千美元，每秒能够运行几十亿次运算——在性价比方面提高了10倍，或者说每18个月就翻一番，就像摩尔预测的那样。

库兹韦尔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到2030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运行可以复制10000万兆电子信号的程序，即人类大脑220亿个神经细胞每秒发出的信号数量。它们能够存储一般大脑所能存储的10兆记忆。到那个时候，扫描技术将能够精确地描绘出人脑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技术拥护者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真实的人类思想上传到机器中。库兹韦尔认为，到2045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解析世界上的所有思想，从而有效地将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意识。这就是奇点——我们将超越于生物之上，进化成一个比人类更为先进的全新物种。

人们对库兹韦尔充满激情的想法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有人则对他的想法充满了敬佩之情。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预言家一样，他所犯的错误可能远远大于他做对的事。但是，库兹韦尔的所谓“来自怀疑的批判”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即不相信这么奇怪的事居然会发生。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常说的那样：“当科学家说某件事是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低估了事情发生所需的时间；但是，当他们说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错了。”人类正踉踉跄跄地迈向某种奇点，政府和军队也正认真对待奇点，并对此制订计划。

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我曾在第十章中指出，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意义发生了比农业革命时更为巨大的变化。纵观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饮食的改善使得人们的寿命变为原来的两倍，身高也比人类的祖先高了6英寸左右。现在妇女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而且与早期相比，很少有婴儿夭折了。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医生们似乎能够创造奇迹——他们能让我们保持年轻（2008年，在美国有500万例肉毒杆菌手术），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服用百忧解）并加强从软骨到阴茎的一切功能（2005年，美国医生开出了1700万份伟哥、犀利士和乐威壮等处方）。我想，古代那些年老的皇帝会认为这些紫色的小药丸和库兹韦尔的奇点一样奇妙。

21世纪的基因研究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修正了我们细胞中的复制错误，并且在我们的器官出现问题时培育出新的器官。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正接近“部分的永生”：就像亚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斧头（这把斧头换了三次把手、两次刀刃）那样，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更新，从而获得永生。

那么为什么要局限于修复已经坏掉的那些呢？你也许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电视一开始，就出现一位名为史蒂夫·奥斯汀（由李·梅杰斯扮演）的飞行员。他在一次空难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和两条腿。这时响起了画外音，说道：“我们可以改造他——因为我们有科技。”奥斯汀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仿生人，他跑得比汽车快，手臂上带着盖革计数器，眼里装着变焦透镜，并且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仿生女友（即林赛·瓦格纳）。

过了30年，运动员都变成仿生的了。2005年，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做了眼科手术后，他的视力变得比过去更好了；2008年，国际田径联合会临时禁止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参加残奥会，因为他的假腿似乎比那些真腿跑得快得多。

到了21世纪20年代，发达核心地区的中年人可能会比他们年轻时视力更好，跑得更快，样貌更好看。但是他们没有下一代那样犀利的眼神、敏捷的身手和漂亮的外表。基因测试使得人们能够选择打掉畸形胎儿，并且，由于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某种基因，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婴儿。一些人可能要问，如果你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婴儿类型，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自然的基因呢？

有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因为优生学——无论是受到像希特勒这样的种族狂热者还是消费者的驱动——是不道德的。同时，优生学也是危险的。生物学家喜欢说“进化比你聪明”，有一天我们或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试图通过去除自己的愚蠢、丑陋、肥胖和懒惰等特质来超越自然。批评者们认为，所有这些关于超越生物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据说，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这位率先给人类染色体排序的科学家对此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是扮演上帝，我们就是上帝。”

争论还在继续，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正如我们之前的那些时代——最后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一万年前，一些人可能会担忧种植小麦、驯养羊群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200年前，肯定有人对蒸汽机抱有同样的想法。那些抱有疑虑思想并能掌控自己的人才能获得发展，反之，则不能。将治疗性克隆、美容以及延长寿命宣布为不合法的做法听起来不太可行，而禁止对自然界的军事利用听起来更加不可行。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研究如何改变人类项目的最大赞助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正是该机构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当时被称为阿帕网）。现在它的大脑界面项目正在研究分子大小的计算机，利

用酶以及DNA分子，而不是硅，植入士兵的大脑中。2002年诞生了第一台分子计算机，2004年产生了更加先进的计算机帮助治疗癌症。不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提高士兵的染色体接合速度、增加记忆容量甚至提供无线网络连接，让士兵也具备计算机的一些优点。同时，该机构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无声通话项目”。在开口说话前，人脑首先把语言信息转换成神经信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对这些神经信号的分析，使士兵在战场上实现无声通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样的“网络传心术”将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

库兹韦尔关于奇点的最后一个看法是，能够复制生物大脑运转的计算机将发展得越来越快。2007年4月，IBM的研究者将蓝色基因/L超级计算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平行皮层模拟器，这个模拟器能够运行一个模拟老鼠大脑功能的程序。这个程序只有老鼠大脑的一半那么复杂，运行速度也只有老鼠的1/10，但是同年9月，这个实验室已经能够模拟更大、更复杂的老鼠大脑。

当然，老鼠的大脑远远不能与人脑相比。实际上，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要模拟人脑，需要比现在强大400倍的电脑，而凭借2007年的科技水平是无法达到能源、冷却以及空间方面的要求的。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计算机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IBM预测，蓝色基因/Q超级电脑将在2011年得以运行，并且至少能够实现1/4的目标。更加野心勃勃的小鹰项目连接起上千台蓝色基因超级电脑，能够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更加接近目标。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到2045年的时候，这些就相当于库兹韦尔的奇点，那就显得轻率了。不过，要是否认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断层，则会显得更加轻率。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哪里，科学家们都正在打破生物的界限。克雷格·文特尔的实验室已经利用单纯的化学物合成了单一的细胞染色体。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即2010年下半年，他们可能已经将人工染色体移植到细胞中，产生了地球上第一个合成的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基因学甚至有着自己的摩尔定律和卡尔森曲线：1995～2009年间，合成DNA的成本从每个碱基对1美元降到了不足0.1美分。一些基因学家认为，到2020年，创造出全新的有机体将变得非常普遍。虽然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趋势使人类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实现社会发展指数5000分所要求的大规模城市、巨大的能量储备、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科幻式的信息技术。

本书大量提到了社会的发展，讲述了很多早期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人类的进化消灭了早期猿人，农业的出现使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同样，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使史前人类担忧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关闭以及海洋路线的开通结束了限制东方两千年发展的不利因素，工业革命使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变革正在加快步伐，每一次变革都使社会发展的程度更深、速

度更快。如果社会发展正如图12-1预测的那样，在21世纪的时候，确实上升4000分，那么这次正在进行的革命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很多未来学家都认为，这次变革的核心在于将遗传学、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变革都结合起来，它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推翻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知识。

但是，虽然图12-1清楚地显示了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高于西方，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这个部分引用的每一个例子——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IBM、《无敌金刚》——都是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东方的科学家对新技术的研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机器人技术都很先进），但是目前为止，这些变革主要还是发生在西方。这意味着那些认为美国将会经历衰退而中国将会崛起的专家们是错误的：如果美国对新科技的主导像两个世纪前英国对工业技术的主导一样，那么基因/纳米/计算机革命将会比工业革命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将更多的财富和力量转移到西方。

另一方面，财富潜在地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意味着美国现在的统治只是20世纪末遗留下来的，意味着到21世纪20年代，这些巨大进步将会发生在东方的实验室里。中国正投入大量的资金吸引本国最好的科学家从美国回来，也许，在21世纪40年代，将是联想而不是IBM的主机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图12-1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或许，这个奇点会使“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存在了1万年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了地理，而是废除了地理。人类和机器的结合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获取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新的共处方式、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沟通方式。这意味着新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关爱方式以及微笑方式，也意味着新的出生方式、衰老方式以及死亡方式，这甚至还意味着所有这些事情的终止以及我们大脑所不能想象的新世界的诞生。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除非有什么事阻止了它们的发生。

最糟糕的情形：什么可以让世界毁灭

2006年年末，我和妻子受邀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会议，主题是“危机中的世界”。这次会议明星荟萃，其中一些还是世界上一流的决策者。这天明媚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股票市场、房价、工作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都是我们谈论的焦点。当时还是美国的早晨。

在吃早饭时，我们从国防部前秘书长那里得知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核威胁、生物威胁以及恐怖分子的威胁。吃午餐时，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环境恶化的惊人程度以及国际安全面临的巨大风险，同时，

我们还知道了全球性的瘟疫几乎不可避免。所有的事情都在恶化。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听着专家们报告一个个正在逼近的灾难。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但是，晚餐结束后，当主讲人宣布我们在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失败的时候，听众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那天听到那么多令人绝望的消息后，我开始思考（说得委婉些）。在公元1世纪以及公元1000年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限，并且社会发展本身产生了使东方社会崩溃的破坏力。我们现在是否在讨论一个新的极限，大约在1000分左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天启骑士们是否正在比我们更快地接近奇点？

那五个熟悉的因素——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崩溃、迁移以及疾病——似乎全都回来了。首先，全球变暖或许最能够说明社会发展的悖论，从1800年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化石燃料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令大气层吸收了大量的热量。我们的塑料玩具和冰箱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温室。自1850年来，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华氏度，其中最近30年上升得最为明显，温度计里的水银不断上升。

过去，较高的温度往往意味着农业收成更好，社会发展更快（如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暖期），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不相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表示“极端气候的变化频率和强度，以及海平面的变化，大多都对自然界以及人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全球变暖会产生突然且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说法已经比较委婉了，这份报告中的注释说明更令人惊慌。

冰盖中的气泡表明，在过去的65万年里，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在提高，从冰河时期的180ppm（百万分比浓度）上升到温暖的间冰期时期的290ppm。到了1958年，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破了300ppm。到了2009年夏天，这个数字达到了387ppm。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如果目前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的话，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550ppm——比过去的2400万年中的任何时刻都要高——平均温度将会上升5华氏度。如果能量摄取正如图12-1显示的那样保持持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热，而且变热的速度会更快。

即使我们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空气中已经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气温还将继续上升。我们已经使大气层的化学成分发生了改变。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北极都将融化。根据一些保守估计，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到2100年，冰盖将全部融化；最激进的学者认为，到2013年，两极在夏天时冰盖将全部融化。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将发生在2040年左右。

随着两极的融化，海平面将上升。现在的海平面已经比1900年时足足高了5英寸。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到2100年，海平面将继续上升两英尺。关于两极融化最为恐怖的预测是，届时海平面将上升50英尺，淹没地球上数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农田以及最富裕的城市。地

球在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迅速缩小。

但是，即使冰块融化成冰冷的水，由于海洋从大气层中吸收热量，它们的温度仍然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由于现在海洋冬天的温度没有以前那么低，飓风持续的时间将会更长，也将更加猛烈；潮湿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潮湿，也会发生更加猛烈的风暴和洪灾；干燥的地方会变得更加干燥，也会发生更多的森林火灾和沙尘暴。

全球变暖对我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就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早在加利福尼亚州火灾季节前，我们的房子就已经被充满灰尘的空气包围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消防直升机的旋翼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在下雨之前在房子周围挖了一条防火道，真是千钧一发。或许，我应该说，雨终于下了：现在美国西部的火灾季节持续的时间比20世纪70年代持续的时间要长78天，是30年前的5倍。消防队员认为，以后还会更糟。

所有这些都属于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可怕事物”。不过，他认为，“更可怕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弗里德曼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非线性的：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关，以异常复杂的方式进行反馈。当地球环境发生突然且不可逆的变化时，就会出现临界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临界点在哪里，或者说当我们达到这些临界点时，会发生什么。

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人类该如何应对。就像过去发生的所有气候变化一样，这次的气候变化也不会直接导致地球崩溃。2006年，英国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我们在2100年前，继续像现在这样破坏环境的话，气候变化将会使全球经济产量在现在的基础上下降20%——这个前景令人沮丧，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并且即使最可怕的预测真的实现了，即温度上升了10华氏度，人类也能够应对。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天气本身，而是2100年前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将会造成更多的灾难。

最明显的灾难就是饥荒。绿色革命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它使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前，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如果我们能够遏制独裁者和军阀的邪恶和愚蠢，我们就能消灭饥饿。但是10年后，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社会发展的悖论再一次发生了作用。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农民们用越来越廉价的谷物饲养动物，这样我们能够吃到昂贵的肉食；越来越多的农田开始产出生物燃料，这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不用耗油了。结果是：在2006～2008年期间，主食的价格上升了1～2倍，非洲和亚洲饥饿的人群发生了暴动。2009年，史无前例的谷物大丰收（23亿吨）以及金融危机使得价格下降，但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达到90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价格会波动得更加剧烈，食物也会变得更加紧缺。

21世纪，地理因素将继续对东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全球变暖将提高农作物在寒冷地区的产量，如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大国，但是将会对非洲及亚洲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从非洲延伸到亚洲的一条线称为“不稳定的弧形带”。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而且农作物产量下降会潜在地释放三大天启骑士。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在2008～2025年之间，面临食物或者水资源短缺的人口数量将由6亿上升到14亿，并且其中大部分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斯特恩报告》总结道，到2050年，饥荒以及干旱将产生两亿“气候移民”——是2008年全球移民总和的5倍。

西方核心地区的大部分人已经将移民视为一个威胁，虽然3个世纪前草原通道的关闭使得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威胁。200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指出，美国人认为移民是美国的第二大严重问题（仅次于伊拉克战争）。对很多人来说，墨西哥人走私毒品、争抢工作岗位所带来的威胁超过了所有利益。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对恐怖分子的恐惧也同样巨大。在美国和欧洲，本土主义者认为新来的定居者难以同化。

全球变暖甚至可能使反对移民的激进主义者的恐惧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成千上百万的饥饿者、愤怒者以及绝望者都将逃离伊斯兰世界，前往欧洲以及美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将使得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形见绌，再次产生过去草原通道上的各种问题。

疾病，作为天启骑士之一，可能成为这些问题之一。在公元2世纪以及14世纪，移民者在穿过草原的同时也传播了瘟疫，20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病——1918年的H1N1流感——在美国和欧洲的士兵间传播。H1N1在一年内杀死的人——可能有5000万——比黑死病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要多，是过去30年艾滋病导致死亡人数的2～3倍。

空中旅行使得疾病更加难以控制。自1959年非洲出现艾滋病毒后，20世纪80年代四大洲爆发了艾滋病；2003年，非典病毒（SARS）在中国东部变异后，数周内就传播到了37个国家。基因学家在31天内对这个病毒的DNA进行排序（给艾滋病毒排序则花了15年），国际上的迅速反应将其扼杀在了摇篮中。但是，到2009年，当流行病学家辨别出所谓的猪流感时（被称为“新型H1N1”，从而与1918年的流感进行区分），猪流感已经传播得太广，难以控制了。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果猪流感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流感像1957年的H2N2病毒那样——杀死了100万～200万人口——具有杀伤力的话，猪流感将杀死200万～740万人口；如果猪流感的致命性像1918年的流感那样，那么将会导致2亿人口死亡。当今世界比1918年时做了更好的准备，但是即使死亡人数只是当时的1/10，也会产生短期的经济衰退，这将使2007～2009年间的经济危机看起来微不足道。世界银行估计，

一场流行病将会使世界经济产量减少5%。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流感：你需要知道的10件事》（*T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andemic Influenza*）中列出的一些预测更令人恐惧：

·世界可能马上就会发生另一场流行病。

·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波及。

·药材供应将会短缺。

·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经济和社会将会受到巨大破坏。

当四大天启骑士——气候变化、饥荒、迁移以及疾病相继发生时，它们就会互相作用，从而释放第五大天启骑士：国家的崩溃。世界上一些最不稳定的政权正好位于不稳定的弧形带上。并且，随着压力的增加，一些政权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马里那样完全崩溃，增加人民的痛苦，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如果这些核心地区继续不稳定的话，它们的经济就会完全受到弧形带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当美国军队进入波斯湾时，他们就了解了这个核心问题。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的石油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奖品。"西方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不久就将它们的宏伟战略定位在了海湾石油上。20世纪50年代，当西欧的力量衰退的时候，美国开始介入，秘密或者公开地帮助盟国，对抗敌国，保持自己能够自由进入弧形带的权利。苏维埃政权虽然没有那么依赖海湾石油，但是它也一样积极地进行干预，目的是不让美国从中获利。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这场大博弈中。

中国对资源（大豆、铁、铜、钴、木材、天然气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着在21世纪初它与西方在不稳定的弧形带将会产生不断的冲突。中国的外交官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有人低调地称之为"和平发展"），但是西方对此产生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据2005年的一份民意调查，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稳定的第二大威胁，仅次于伊朗。

1914年，当欧洲的大国们还在努力应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的黑手党只需要一把手枪就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08年，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总结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大国们现在正努力应对不稳定弧形带上的复杂情况，我们无法想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组织将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这条弧形带上存在的问题比一个世纪前巴尔干半岛的问题还要可怕得多，因为这些问题随时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经建立起大型军火库；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原子弹进行了试验；自2005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就一直谴责伊朗试图制造原子弹的做法。大多数国际观察员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个时刻，伊朗就能够制造核武器了。这将促使半数伊斯兰国家寻求核威慑力量。以色列预测伊朗在2011年的时候已能够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但是以色列不会让伊朗实现。以色列的战机已经摧毁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反应堆，并且如果伊朗不停止制造原子弹的话，以色列也会对其发动进攻。

在不稳定弧形带上，美国在其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厌恶的敌人之间，无法就核冲突问题保持中立。也许，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罗斯和中国都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谴责，但是它们却让伊朗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遏制美国在中亚的势力。

当然，如果东西方爆发全面战争的话，将是人类的浩劫。对中国来说，这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美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美国能到达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许是中国能到达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100倍。中国在2010年1月进行了反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它的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也没有[1]，并且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

即便如此，就算美国赢得战争，它所面临的情况也将和战败一样糟糕。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可怕的代价。如果中美共同体突然分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金融灾难。核战争的结果更加可怕，它将把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放射性废墟，杀死上千万人口，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最糟糕的是，中美战争很容易就会把俄罗斯牵扯其中，而俄罗斯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发动全面战争都是疯狂的举动。幸运的是，一大批专业文献向我们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动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一位专家说道："没有什么自然力量能够忽视贷款的力量。"另一位专家认为："国际资金流动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证。"还有一位专家则认为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严重阻碍了贸易，所以战争之后，将是贷款和产业的全面崩溃"，这意味着"全面的损耗和贫困，工业和贸易将被摧毁，资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创"。

这令人欣慰——除了这些专家没有谈及21世纪初中美可能会发生冲突。1910～1914年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现代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联系紧密，因此欧洲完全不可能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还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许各国的政治家们能将我们从一个个悬崖边上拉回，也许我们能在30年或者50年内避免核战争，但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永远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们能否遏

制每一个统治者发动核战争的念头？即使我们把核武器增长速度限制在现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将会有接近20个核大国，其中一些还处在不稳定弧形带上。

每一年我们都要避免天启骑士不断带来的威胁。资源压力将会增加，新的疾病将会进化，核武器将会激增，并且——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气候变化难以预测。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成功应对各种危机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

我们似乎在接近一个新的极限。在公元1世纪，当罗马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情况是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会向前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时，天启骑士就会令社会崩溃。罗马的崩溃带来了6个世纪的衰退，使西方社会发展下降了超过1/3。11世纪，中国的宋朝也达到同样的极限，它也没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在1200～1400年间下降了近1/6。

在21世纪，我们达到了新的极限。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选择，但是情况却更加严峻。当罗马和宋朝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时，它们在崩溃前至少还有几个世纪的衰退，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将走向毁灭。

对于西方统治来说，奇点的意义饱受争议，不过毁灭带来的后果则更加明确。1949年，爱因斯坦告诉一名记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何种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武器——就是石头。"在末日之后，没有人能够进行统治。

接下来的40年非常重要：世界末日真的会来临？

通过与圣诞过去之灵对话，我们得到了令人惊恐的结论：21世纪将有一场激烈的赛跑。在一条跑道上，是奇点；在另一条跑道上，则是末日。二者必将决出胜负。我们要么马上（也许在2050年前）就会开始一场比工业革命影响还要深远的变革——这场变革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无足轻重，要么就会蹒跚地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溃。我们难以知道妥协是否会起作用，即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中国渐渐地超过西方，事情就像过去那样发展着。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0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采取以下行动来阻止末日的到来。首先，我们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就需要大国削减它们的核军火库。矛盾的是，追求全面裁军可能更加危险，因为核武器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大国们随时可能迅速地制造核弹，并且那些真正的破坏者——恐怖分子

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统治者——会忽视所有的协议。在未来的30～40年间，核武器激增将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最稳定的局势是，大国们有足够的核武器阻止进攻却没有足够的武器毁灭所有人。

原先的核大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二战”期间，集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他后来意识到天气研究对空军的重要性后，就不再研究气象了）身份为一身的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即2000年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有15%～20%。不过，在2008年，能源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作出了乐观的预测，他认为2050年前，发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远低于1%。2010年1月，《原子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刊载的一篇名为《末日的时钟》（*Doomsday Clock*）的文章提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末日了。

其次，我们要减缓世界气候变化的速度。在这点上，事情进展得没有那么顺利。1997年，世界各国领导者齐聚东京，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他们达成协议，到2012年的时候，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要比他们在1990年的排放量降低5.2%。但是，这个减排责任主要落在了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并且美国——20世纪90年代世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正如一位印度官员所说的那样），这就像是“身材肥胖的人要求那些体型瘦弱的人节食”。但是，美国的决策者提出，只有印度和中国（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也减排，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得到控制。

2008年之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它们还缺少达成广泛协议所需的政治意愿。《斯特恩报告》的作者们预测，在2050年前，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以内从而避免灾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森林保护等需要花费一万亿美元。但将这个代价与什么措施都不采取所导致的后果相比，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因此，它们对昂贵的减排方案的支持也就大打折扣。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核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实际上，它们都会带来相同的问题。五千年以来，国家和帝国是地球上最有效的机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这些机构已经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简洁地对此做出总结：“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大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一个‘中等’世界，但是这次的全球化（自1989年以来）则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世界。”6年之后，世界变化的程度之深使得弗里德曼又总结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次，他认为：“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正将‘小’世界变成一个‘迷你’世界，同时还使得地球变平。”

在这个迷你、扁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更不用提恐怖主义、疾病、迁移、金融、食物和水资源等）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国家和帝国只在本国内拥有主权，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爱因斯坦不到一个月内就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了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要拯救文明和人类，需要创立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被人们讥笑为一个涉足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的幼稚科学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无法成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么我们的未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人类对自己的完全毁灭。"

回首过去的15000年，爱因斯坦似乎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石器时代的村庄到乌鲁克和商朝这样的早期国家，再到亚述和秦国这样的早期帝国以及诸如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有着明显的趋势表明政治单位越来越大。据此产生的逻辑结果是在21世纪早期，美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或者，随着经济平衡越来越倾向于东方，21世纪中期或者末期，中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

不过，这个逻辑结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越来越大的政治单位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战争建立的，也只有爱因斯坦所说的世界政府才能够加以阻止。如果阻止核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如果建立世界政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中美核战争，那么我们的前景将十分暗淡。

不过，这两个前提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自1945年以来，非政府组织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这些组织包括慈善团体和跨国私人企业，它们处于国家或者联盟（如欧盟、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下。毫无疑问，国家依然是安全（联合国在停止战争方面，和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和金融（2008～2009年，政府提供资金拯救资本主义）的保障者，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但是接下来的40年里，阻止末日来临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让政府用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换取它们所不能单独实现的解决方法。

这将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局面。就像过去的很多情况一样，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思想。但是，即使我们在接下来的50年里能够建立可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构，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这也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情形与公元1世纪、11世纪以及17世纪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这个极限。我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罗马或者宋朝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做法那样，通过关闭草原通道以及打通海上通道改变地理格局。只有那样，它们才能重新获得安全，才能提出需要用科学方法解决的各

种问题，并且建立有利于工业革命出现的种种前提条件。当然，无论是罗马还是宋朝，它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迁移、疾病、饥荒、国家崩溃以及气候变化共同导致了欧亚大陆的崩溃。

17世纪，欧洲和中国确实改变了地理格局，它们提高了上限，虽然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它们并没有打破这个上限。到了1750年，社会再一次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英国的企业家已经利用改变的地理格局开始了能源储存的革命。

在21世纪，我们需要遵循相同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政治地理，为能够减缓战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步伐的全球机构腾出空间；其次，我们必须好好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发动一场能源方面的新革命，降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如果我们像20世纪那样继续使用石油和煤炭，那么我们可能在碳氢化合物耗尽之前就已经灭亡了。

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则提供了新的建议，希望人类能够回归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从而大量减少能源的使用以及阻止全球气候变化，但是这很难实现。2050年前，世界人口很可能将继续增加30亿，其中的上千万人口很可能会由于极度贫困而起来反抗，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能源。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是美国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Sun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他指出，如果每个人拥有一个功率为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使用4小时，那么整个世界需要近60个500兆瓦的发电站。国际能源机构预测石油的需求量到2030年时将从2007年的每天8600万桶增加到1.16亿桶。他们预测，即使到那时，仍然会有14亿人口要面临电力缺乏的情况。

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未来50年里能源需求不可能降低。如果我们使用更少的能源运输食物，那么上千万的贫民就会挨饿，这将使我们更快地面临末日。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挨饿的话，他们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单单在中国，马路上每天就新增1.4万辆汽车；2000～2030年之间，约有4亿人口（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将从低耗能的农村迁往高耗能的城市；越洋度假、乘坐飞机以及住宿旅馆的旅游者数量将由2006年的3400万上升到2020年的1.15亿。

除非灾难迫使我们减少能源需求，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做——这意味着，要避免资源耗竭和地球污染，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发新的可持续的洁净能源。

原子能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放射性物质的恐惧使得核计划一度搁浅，但是随着新的时代产生新的观念，人们的恐惧也许会消失。或者太阳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只有二十亿分之一，其中还有1/3被反射回去。即便如此，地球每小时还是会接收大量的太阳能，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前提是我们能够有效利用。或者，纳米技术以及基因学能够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当然，这些大部分听上去就像是科幻小说，并且要开启一个利用洁净能源的新

时代，我们需要大大提高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提高科技水平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面临末日。

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控制战争的爆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进行能源革命。我们要确保每一件事的发展方向都是正确的。只要其中一件事出现错误，世界末日就会赢得这场比赛。情形很不乐观。

未来该怎样：如何看待我们当前面临的威胁

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知道谁将赢得这场比赛，因为答案写在了恒星上。1950年的某一天（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起吃午餐。他们谈论着《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幅漫画，漫画上画着一个飞碟。于是他们谈到了外星人。突然费米问道："这些外星人在哪里？"和费米共进午餐的同事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费米仍然在思考着外星人。费米一边吃午饭，脑海中一边闪过一些数字。他突然想到，虽然银河系中2500亿颗恒星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适合居住，但是外太空仍然充满大量的外星人。我们的地球还很年轻，还不到50亿年，所以其中一些外星人比人类的历史更加久远，也更加先进。即使他们的太空船速度不比我们快，他们也需要花上5000万年的时间来开发整个银河系。所以，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1967年，天文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和卡尔·萨根（Carl Sagan）对费米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们计算出，如果每25万颗恒星中有一颗恒星被一颗适合居住的行星环绕着，那么在整个银河系中，就有100万个潜在的外来文明。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得到来自他们的任何信息，这一定意味着先进的文化总是会自我摧毁。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外星人在一个世纪内不断地制造核武器，然后自我毁灭，不然的话，宇宙中一定有来自他们的各种讯息，而我们也能得到这些讯息。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在2045年，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正是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100年后（令人不安的是，2045年正好也是库兹韦尔指出发生奇点的年份）。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观点，但是，要计算出这些数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100万个文明都将走向末日只是一种猜想，并且德雷克方程（由法兰克·德雷克于1961年提出，可以计算出宇宙中有几个星球有生命存在）的大部分解答事实上得出的是更低的数字。根据德雷克自己的运算，我们的银河系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只产生了10个先进的文明，其中外星人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存在着。

总之，费米的观点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不仅

依赖于恒星，还依赖于我们的过去。即使历史不能给我们准确的预测工具（像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想象的那样），但是它却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可靠的暗示。我想，这些暗示正是我们未来唯一的真正基础。

从短期看来，过去建立的各种模型表明了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是不可阻挡的。19世纪，原先的东方核心地区变成了西方的边缘地区，使得东方获得了后发优势。而且，中国现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依然还在进行。过不了多久——也许是2030年之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在204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美国。21世纪的某个时刻，中国会用尽自己的后发优势，但是到那个时候，世界的经济中心仍然还在东方，并将延伸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21世纪，财富和力量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和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

毫无疑问，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是目前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获取、科技以及军事实力方面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很有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持它的统治。只要美国还足够强大地作为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就和英国作为世界警察时期的概率一样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将削弱，正如1870年后的英国，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加不稳定因素，因为科技使得我们更容易制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我们将看到，如果美国之外的国家没有相同的技术，那么他们就会发展与之类似的科技，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都是现成的。现在，一些破坏分子完全不需要去发展技术，他们只需要买下技术就行了。"2001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军事冲突，因为到2020年后，中国可能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更为先进。"

美国也许将率先研制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机器人、纳米武器、能够控制敌人计算机和机器人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将太空军事化的卫星。可能的风险之一是美国会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国的领导者也有可能为了改变他们长期的战略下滑而去开发具有巨大优势的科技。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紧张局势下，美国也没有在苏联建立起核武库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风险是，那些害怕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来会产生突破的国家可能会选择首先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德国在1914年发动世界大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这种想法。

21世纪要维持和平的话，需要很强的政治手腕。在这本书中，我已经讨论过，伟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进程。即使是最糟糕的决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间拜占庭查士丁尼国王与波斯库斯

鲁国王开战的决定，也只是加快了崩溃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库斯鲁没有发动战争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也许能恢复得更快，不过就算他们发动了战争，社会发展最终也会恢复。

但是，自从1945年以来，领导者却真的有能力改变历史。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时候就差点改变了历史。核武器的产生容不得我们犯一点错误，也没有机会重来。过去我们犯错的结果是导致社会衰退或者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我们的灭亡。领导者有史以来第一次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时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时代那样，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对21世纪的大竞赛而言，更是如此。现在，我们的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时代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么奇点将很有可能取得胜利。

如果在接下来的50年里，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替代碳氢化合物，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很显然不是消除）大国在不稳定弧形带里相互争夺资源、争斗不休的风险。它们也将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弧形带里的压力，并且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如果机器人技术像很多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很大的进展，那么智能机器就有可能使发达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灾难，为它们国家的老年人提供廉价的照顾服务。如果纳米技术也能达到人们所宣传的程度，我们甚至在21世纪40年代前就可以净化空气和海洋了。

但是最后，我们只能依赖一个预测，那就是无论是世界末日还是奇点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没有终点线。即使到了2045年（这个时间是库兹韦尔认为奇点到来的时间，是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世界末日最早来临的时间，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宣布历史结束了，宣布哪一方赢得了比赛。如果——我认为这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中期，世界毁灭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社会发展指数也超过了2000分，新的奇点改变人类的意义远远超过结束这场比赛的意义。

我们不妨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威胁。这些令我们感到害怕的威胁似乎和过去那些不断推动变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对突然的多次环境变化会使得物种变异，改变它们的基因。180万年前，非洲东部森林的干旱完全有可能产生比能人更为先进的物种。现在的21世纪，某种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大规模的灭亡正在发生，每20分钟左右就有一种植物或者陆地动物消失。2004年的一份研究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就是，2050年之前，世界上的1000万种动植物中只有9%面临灭绝，不过大多数生物学家预测生物的多样性将减少1/3～1/2。一些生物学家甚至提到了第六次大灭绝，认为到2100年，世界上2/3的物种都会灭绝。人类可能就在这

些灭绝的物种当中，但是21世纪的残酷情况不仅仅是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那样简单，而有可能像180万年或者10万年之前那样，为具有新型大脑的生物体创造条件——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脑就融合了人脑和机器——从而替代人类。这时的天启骑士没有蹂躏我们，而是加快了我们步入奇点的步伐。

但是这个奇点也许和世界末日一样可怕。在库兹韦尔想象的世界里，随着人脑和机器智能在21世纪40年代的融合，奇点的发展也会达到高潮，并且我们当中有幸活到那个时候的人事实上就会长生不死。但是那些最有经验的人们——美国军队的技术专家们——认为事情并不会那样发展。例如，美国前上校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就认为战争已经超过了“人类空间”。因为武器变得“更快、更小、更多了，并且创造了人类难以控制的复杂环境”。他还认为，技术“正迅速地将我们带向我们不想去但又不能避免的地方”。人类和计算机的结合也许只是人工智能彻底代替人类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如人类代替了早期的猿人一样。

如果这就是21世纪末奇点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结束，同时结束的还有人类的懒惰、贪婪以及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谓的莫里斯定理——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最后也将被扭曲。

社会学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哪一种形式将统治机器人社会，但奇点肯定会彻底毁灭原先的地理格局。东西方之间原先存在的差异对机器人来说也毫无意义了。

当2103年的历史学家（如果到时还有历史学家的话）回望碳基智能到硅基智能的转变时，他们将惊讶地发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就像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的转化、从村庄到城市的转化、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化一样不可避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从原先的农业核心发展出来的地区传统注定要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后人类世界文化。现在看来，21世纪早期人们对西方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是否会继续的担忧有一点滑稽。

东西交汇：如果没有了东西之分

这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就做了一个假设，假设1848年中国皇帝将艾伯特带到北京作为人质，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一章里我解释了为什么事情没有这样发生。对于本书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地理因素：是地理而不是人类，将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在本章，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因为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就像地理决定了西方得以统治世界那样，它也决定了东方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西方，直到它的社会发展超过西方。但是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社会的不断发展总是改变着地理的意义，并且到了21世纪，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到时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奇点和世界末日之间的竞争。为了防止世界末日的来临，我们需要把越来越多的问题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关于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具有最高的社会发展程度这个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就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回答本书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将使得第一个问题失去重要性。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事情变得明朗（或许事情一直都很明朗）——即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不是关于西方，不是关于东方，也不是关于人类。真正重要的历史是关于进化和全球化，它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从单细胞生物走向奇点的。

在本书中，我提到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但是现在，我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从长远来看，在进化历史的时标上，无论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无足轻重。15000年前，在冰河时期结束前，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并没有多大意义。从现在起的一个世纪后，东西方的区分再一次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中间时代，东西方的重要性只是地理意义的副作用。这个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到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间处于2045～2103年之间——地理的意义将不再那么重要。东西方时期只是我们经历的一个阶段。

即使这个时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以与现实不同的情形发生——如果郑和真的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如果出现的是新型的太平洋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经济，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如果是艾伯特到达北京而不是洛蒂到达巴尔莫勒尔堡——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的强大力量仍然会推动历史像现在这样发展。美洲（或者我们现在可以将其称为“郑和之地”）本将成为东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核心地区；东方本可以统治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西方统治世界，但是世界依旧会越变越小，变成现在的“迷你型”。无论中美联合体是否崩溃，21世纪早期的世界仍有可能继续被中美联合体共同统治，世界末日和奇点之间的竞赛仍将继续。东方和西方也将慢慢地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早在1889年，当时世界正从“大”世界变为“中等”世界，一个名叫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年轻诗人就已经能看清楚部分真相了。从前线回到伦敦不久，吉卜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取名为《东西方民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名为卡迈勒的边境袭击者的故事，他偷了一个英国上将的驴。上将的儿子跳上自己的马，穿过沙漠追逐卡迈勒（“月

亮低垂，马蹄声招来了黄昏，他骑的马像一只受伤的公牛，而这头驴却像一只刚醒来的小鹿一样”）。不过，故事的最后，这个英国人没追上。卡迈勒进行了反击，他举起了来复枪。但是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这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发现彼此都没有错误，大家都是上帝之子”。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人们常用这个开头来说明19世纪西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满。当然，这并不是吉卜林真正想要表达的。事实上他写的是：

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

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了上帝的审判席上；

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

两个巨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虽然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

正如吉卜林看到的那样，人们（真正的人类）是完全一样的，是地理模糊了真相，要求我们走到世界的两端去了解事情。但是在21世纪，社会的急速发展和世界的缩小使得我们无须这么做。当我们超越了生物界限的时候，既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如果我们能够长久地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那么东西方就可以交汇了。

我们可以做到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1000年前宋朝面对的挑战以及2000年前罗马帝国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牵涉其中的因素。不像罗马和宋朝，我们的时代也许还没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溃》（*Collapse*）的最后一页提到，有两种力量能够解救地球于灾难之中：考古学家（他们发现早期社会的错误）和电视节目（传播考古学家的发现）。作为一个看过很多电视节目的考古学家，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不过我还想增加一个救世主，那就是历史。只有历史学家能够将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描述，只有历史学家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我希望这本书在这一进程中能有所帮助。

[1] 中国已在2011年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编者注

附录 社会发展指数：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的基本轮廓

社会发展指数作为连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的桥梁，是本书的重点。社会发展指数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西方能够统治世界，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历史的基本轮廓。在本书中，我详细介绍了社会发展指数。如有读者对书中的方法和详尽的证据感兴趣，可登录相关网站查看或阅读《文明的度量》[1]。本附录仅对主要的术语和基本的结论做出简要总结。

社会发展指数的四大异议

关于社会发展指数，主要有四大异议。

第一，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并且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做出比较，忽略了人类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该利用社会发展指数。

第二，对不同的社会进行量化和比较是合理的，但是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是不正确的。

第三，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能够有效地将东西方进行对比，但是作者用来测量社会发展的四大因素（即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适宜。

第四，这四大因素能够很好地测量社会发展，但是作者所列举的事实有误，因此测量并不准确。

我在第三章中已对第一个异议做出解释。对于很多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来说，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和比较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为什么由西方统治全球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和定量的问题。要对此做出回答，我们必须量化社会发展并做出比较。

在第三章中，我也对第二个异议做出过一些回答。或许有比社会发展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我还未想出。这个问题就留给其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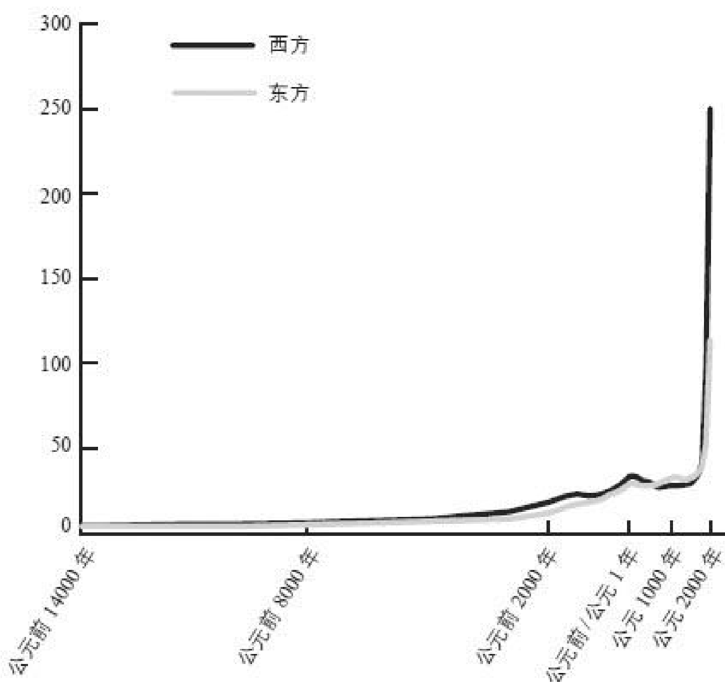
至于第三个异议，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我们可以在四大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因素；二是，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测量因素；三是，我们应当减少所使用的因素。在我撰写本书时，我确实还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最大的政治单位面积、生活标准、交通速度或者最大遗址的面积），但是，所有的这些因素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缺乏相互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因素在整个历史中都不断反复出现。对这些因素进行任何可信的组合都将得出极其相似的结

果。

对于这个反复出现的规律而言，主要有两大特例。我们将一个特例称为“反常的游牧民”，即大草原社会通常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上得分较低，但是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得分却很高。这种反常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游牧民族能够打败其他帝国，却不善于管理帝国[2]。虽然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但是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本书中对东西方核心之间的比较。

关于第三个异议的另一个说法则是只需要考虑能量获取，而不考虑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原因是这三者都只是利用能源的不同方式而已。图附-1显示如果只考虑能量指数，历史看起来将会如何。该图与图3-3有所区别，但是差异并不大。在只有能量指数的这个图中，在90%的历史时期，西方仍然领先于东方，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之间，东方还是赶超了西方；在公元100～1100年之间，一个瓶颈依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均每天获取30000千卡能量），后工业革命依然使得早期时期相形见绌，并且在2000年还是由西方统治世界。

如果我们只考虑能量，那么相比四个因素而言，确实更加简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二个特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大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线性。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在整个20世纪，城市的面积增加了3倍，战争能力增加了4倍，信息技术增加了7倍，而人均能量获取仅仅增长了1倍。假如我们仅仅分析能量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了，而且也扭曲了历史。



图附-1 仅有能量指数：如果我们只从人均能量获取方面来看，东西方之间的对比是怎样的

第四个异议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要判断我是否误解了事实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检验我用来计算东西方分值的所有信息来源。要在这个附录中对此进行检验显然不太可能，这只会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冗长，所以我已将相关信息放到网站上或《文明的度量》中。有时间和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证。

接下来我将总结数据，阐述自己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分值的，并对误差做出解释。

能量获取

我将首先阐述能量获取，因为这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回溯足够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以及信息技术这三大因素的分值均为零，这是因为那时人类活动的规模非常小，因此它们产生的价值指数还不到0.01。相反，能量获取的分值却从未降到零，这是因为人类如果没有能量获取的话，就将面临死亡。为了生存，每人平均每天就要消耗约2000千卡。现代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约为228000千卡（＝250分），因此在理论上，最低的分值应为2.19。在实际中，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分值一直在4分以上，这是因为人类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食用的（例如衣服、房子、工艺品和石油等）。直到工业革命前，能量获取分值大约占了社会发展指数的75%～90%。在2000年，能量获取在东西方分值中依然分别占据20%和28%。

有关能量获取的依据既有来自现代统计，也有来自文学作品中关于农业、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记载，还有来自考古学中关于饮食、工艺和生活品质的发现。如何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和其他作者一样，我也借鉴了先前研究者的成果。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释的那样，厄尔·库克在1971年关于能量流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基点，能够用来检验其他的估计。所有的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西方核心地区的当代水平，即每人每天获取23万千卡。库克将此大致分成了四类：食物（提供给人类和动物）、家庭/商业，农业/工业和交通。

瓦茨拉夫·斯米尔有效地将非食物消耗分解为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并将它们在西方核心地区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出来。要将他的数据转换为能量获取分值，需要几个步骤，得出的数据是在19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93000千卡；在18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38000千卡，正好将库克的估计（即工业化后的欧洲将在1860年人均每天获取77000千卡）包含其中（见表附-1）。

假如我们回溯到1800年以前，回顾的年代越久远，越难以得到官方数据。但是经济越依赖生物燃料，我们就越可能用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得出的对比信息代替官方文件。1700年，西方核心地区人均每天获取30000～35000千卡。我们得到的关于西方社会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我

们回顾的历史越久远，数字下降得越多[3]。对比数据显示，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从未低于30000千卡。虽然这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在公元8世纪，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也从未降到25000千卡以下。我将在后面给出解释，不过我认为这些猜测与实际的差距不超过5%～10%。

罗马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和遗址、遇难船只的数量、生产货物的总量、冰芯的工业污染程度以及聚居地惊人的动物骨骼数量，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公元1世纪西方的能量获取高于其在公元8世纪甚至13世纪时的水平，但是具体高多少呢？经济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公元300年时，西方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可与18世纪欧洲南部人们的实际工资相比；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则认为，罗马时期人们的工资比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要高；杰夫·克朗（Geof Kron）、尼古拉·克普克（Nikola Koepke）和约尔格·巴滕（Joerg Baten）收集的数据显示，公元1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几乎没什么变化；克普克指出，古代房屋比18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房屋都要结实。我估计公元1世纪人均每日获取能量31000千卡，在公元500年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发展，一直到公元700年。

表附-1 能量获取（单位：1000千卡）

年代（年）	西方	东方
公元 2000	230	104
1900	92	49
1800	38	36
1700	32	33
1600	29	31
1500	27	30
1400	26	29
1200	26	30.5
1000	26	29.5
800	25	28
600	26	27
400	28	26
200	30	26
公元前 / 公元 1	31	27
公元前 200	27	24
前 400	24	22
前 600	22	20
前 800	21	18
前 1000	20	17
前 1200	21	17
前 1500	20.5	15
前 2000	17	11
前 2500	14	9.5
前 3000	12	8
前 3500	11	7.5
前 4000	10	7
前 5000	8	6.5
前 6000	7	6
前 8000	6	5
前 10000	5.5	4
前 12000	4.5	4
前 14000	4	4

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能量获取不仅低于罗马时期的水平，甚至低于其在公元8世纪的水平。公元前300年后，能量获取剧增，

这是因为地中海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政治单位，以及罗马暖期增加了产出，不过大量的考古数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00年，能量获取就已经加速发展。我认为，公元前1000年，能量获取可能为人均每天20000千卡，与公元前2000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高于公元前3000年的水平。

史前早期的分值更低。在新仙女木事件末期，采集者大约人均每日获取能量5000千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人均每日获取能量剧增（相比之前的水平而言）。人们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来获得食物，同时还利用动物进行劳作。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侧翼丘陵区建立村庄的人们从衣服、燃料、农场动物、房屋、日常用品和遗址中获取的能量为人均每日12000千卡，虽然他们的饮食相比4000年前并没有多大改善。

计算东方的分值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诸如库克和斯米尔这样的学者只关注世界上能量获取最多的地区，并没有将地区之间进行对比。不过，我们可以从联合国2006年的一份统计入手。联合国统计，在2000年，日本人均每日获取能量104000千卡（还不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在1900年，东方的大部分核心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其中日本的石油利用和以煤为动力的产业才刚刚起步。日本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49000千卡（依旧不到西方的一半）。在之前的5个世纪，煤炭利用和农业产出稳步增长。在1600年，长江三角洲的产量比西方任何地方的产量都要高，但是到了175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迎头赶上，并且东方的实际工资只能与南欧相比，而不能与富裕的北欧相提并论。我估计在1400年和1800年，东方核心地区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分别为29000千卡和36000千卡，这个数字在18世纪的时候迅速增长。

关于1200年后的危机给中国的能源使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人们看法不一，不过很可能自宋朝鼎盛时期后，能源使用有所下降，当时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很有可能超过30000千卡。

在西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能量获取下降，但下降了多少，我们难以给出答案。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汉朝的能量获取比东方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但是低于同时代的罗马或者之后的宋朝；我认为公元1世纪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为27000千卡，之后略有下降，在公元700年时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相比西方而言，东方的能量获取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稳步增长，约在公元前500年后加速发展，并且由于运河的开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金属工具的传播，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00年后发展更为迅速。公元前1000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17000千卡；到了秦朝，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了26000千卡。

在史前时期，东方的能量获取似乎和西方经历了同样的门槛，但是之后的发展却落后了西方一两千年。

社会组织

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中，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始终是第二大重要因素。我在第三章对这个因素做了详细介绍，解释了我选择最大的城市面积作为社会组织代表的理由。引用的数据有很多歧义，专家也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模见解不一，因此定义也就相对灵活。我在网站上和《文明的度量》中对我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表附-2中，我总结了我的一些主要计算。

表附-2 东西方核心地区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数量（单位：千人）

年代（年）	西方	东方
公元2000	15 700（纽约）	26 700（东京）
1900	6 600（伦敦）	1 750（东京）
1800	900（伦敦）	1 100（北京）
1700	600（伦敦、君士坦丁堡）	650（北京）
1600	400（君士坦丁堡）	700（北京）
1500	100（君士坦丁堡）	600（北京）
1400	125（开罗）	500（南京）
1200	250（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	800（杭州）
1000	200（科尔多瓦）	1 000（开封）
800	175（大马士革）	1 000（长安）

续表

年代（年）	西方	东方
600	125（君士坦丁堡）	250（大兴城）
400	500（罗马）	150（洛阳）
200	800（罗马）	120（洛阳）
公元前/公元1	1 000（罗马）	500（长安）
公元前200	300（亚历山大）	125（临淄）
前500	150（巴比伦）	80（洛阳、临淄）
前1000	25（苏萨）	35（齐）
前1200	80（巴比伦、底比斯）	50（安阳）
前1500	75（乌鲁克、底比斯）	35（郑州、偃师）
前2000	60（孟菲斯）	15（二里头）
前3000	45+（乌鲁克）	2（大地湾）
前4000	5（乌鲁克、特尔布拉克）	<1（西坡、大地湾）
前6500	3（恰塔勒胡由克）	
前7500	1（贝达、巴斯塔、恰塔勒胡由克）	

战争能力

自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开始记载战争，并且自史前早期开始，人们就常常将武器作为陪葬品。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量的甚至是现代以前的战事。在给战争能力打分时，最主要的挑战不在于经验，而在于概念，即我们如何对比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体系，而且这些战争体系与以前的体系也无法进行对比。最著名的是，1906年当英国制造出“无畏”号战舰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它有着令人惊讶的枪支弹药，无论多少数量的19世纪90年代的船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艘1906年后的战舰。

不过，实际情况是，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在恰当的环境中，简易爆炸装置能够给高科技军队重重一击。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同一指数分值分配给完全不同的军事系统，虽然专家可能对这些分值看法不一。

在2000年，西方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达到了250分，显然比东方高了许多。东方的一些军队也很庞大，但是武器系统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的数字。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开销比例为10：1；在航空母舰和核弹头数量方面，中美之间的比例分别为1：11和1：26；中国落后的体系与美国的M1主战坦克和精确武器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东西方的比例应在1：10到1：50之间。我选择了1：20，即在2000年，西方达到250分的时候，东方仅有12.5分。

将2000年的分值与早期的分值相比，难度更大。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军队规模、移动速度、后勤能力、攻击能力、装甲和防御工事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就能做出估计。据估计，大炮的火力从1900～2000年增加了20倍；考虑到20世纪其他的变化，我认为，1900～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即1900年时，西方的分值为5分，而2000年时，其分值为250分。

1900年时，西方的军事力量远远高于东方，虽然差距没有2000年时大。1902年，英国海军的吨位几乎是日本海军的6倍，而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军队规模都比日本大；我将1900年东西方的比例设为1：5，即1900年，东方分数仅为1分（1900年西方的得分为5分；2000年，东方的得分为12.5分）。

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主观性的计算。但是，这里的重点是，200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显得其他分值（包括1900年西方的分值，甚至2000年东方的分值）都无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估计中的错误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19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分值全都翻倍或者减去一半，却不会对总体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大的影响。

西方战争能力在1800～1900年的变化虽没有1900～2000年的变化那么大，但影响也非常深远。它将我们从航海时代带到了机关枪时代，同时也即将带来坦克与飞机。19世纪，西方的战争能力很可能有了大幅度增强，我将18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设定为0.5分。当时的西方战争能力远远高于东方，因此此时的东方战争能力可能仅为0.1分。

1500～1800年，欧洲经历了历史学家称之为“军事革命”的时期，使得其战争能力增强了3倍。而在1700～1800年（1700年时，康熙开始征服大草原），东方的战争能力却倒退了。由于缺乏外部威胁，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寻求和平红利，往往减少本国的军备，忽视科技进步。1800年时，东方的作战水平并不比其1500年的水平高出多少，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英国军队轻而易举地入侵中国。

14世纪，火药的出现增强了东西方的战争能力，虽然其影响比不上19～20世纪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1500年左右，欧洲最好的军队比5个世纪前的军队强大了一倍左右。这些军队的强大依赖于军队规模、后勤能力以及火药技术。

我们难以计算出1500年左右的西方与国土辽阔、组织严密但还未使用火药的罗马帝国在战争能力方面的比例。据一项研究，2000年左右，一架轰炸机的破坏能力是一个罗马军团的50万倍。我们不妨由此推断，公元前/公元1世纪时，西方的分值是0.0005分。但是显然，罗马军团的数量远多于美国轰炸机的数量，因此，我将现代西方与罗马的战争能力的比例估计为2000：1，因此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西方分值为0.12分。因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其军队是15世纪时欧洲陆军和海军的一大威胁，但对“军事革命”时期的军队来说，并非如此。这也意味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其战争能力可与蒙古的战争能力相当，优于中国唐朝的战争能力。

表附-3 战争能力（单位：分）

年代（年）	西方	东方
公元 2000	250.00	12.50
1900	5.00	1.00
1800	0.50	0.10
1700	0.35	0.15
1600	0.18	0.12
1500	0.13	0.10
1400	0.11	0.11
1200	0.08	0.09
1000	0.06	0.08
800	0.04	0.07
600	0.04	0.09
400	0.09	0.07
200	0.11	0.07
公元前 / 公元 1	0.12	0.08
公元前 200	0.10	0.07
前 400	0.09	0.05
前 600	0.07	0.03
前 800	0.05	0.02
前 1000	0.03	0.03
前 1200	0.04	0.02
前 1500	0.02	0.01
前 2000	0.01	0
前 2500	0.01	0
前 3000	0.01	0

在东方，到了公元前200年，铜器依然是主要的工具。汉朝（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军事力量似乎没有罗马强大，虽然在第一次中西方交流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西方下降得多。公元6世纪，隋朝统一了中国。隋朝的军队比西方的任何军队都要强大。在公元700年左右，武则天在位期间，这个差距更大。

公元前东方的军事实力比罗马帝国时期和汉朝都要弱得多。我认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东方没有哪支军队能够达到0.01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方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很可能达到了0.01分。

信息技术

考古发现和文字记录展示了各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而我们也很容易估计这些媒介能够以怎样的速度传输多少信息，以及传输多远的距离。真正的困难在于估计多少人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这就意味着有多少人能够读和写，以及水平如何。

摩尔定律——自1950年以来，信息技术的成本效益每18个月就翻一番——似乎暗示着2000年的分值应该比1900年的分值高10亿倍。因此，有人认为1900年时，西方的分数为0.00000025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忽视了诸如书籍（现在受到了数码媒介的挑战）这样过时的信息储备形式的灵活性以及先进技术的变化。

在战争能力这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与早期信息技术之间差距巨大，但是两者之间的正确比例应该不到十亿比一。1900年之前的分值（甚至1900年之前的误差）应该更低。另一方面，关于多少人能够读、写和计算，以及水平如何，这方面的证据比战争方面的证据更模糊，因此我的猜想也就更加主观。

在表附-4中，我采用了多步骤方法来量化信息技术。首先，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我将人们的水平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每一个级别的范围按照读写能力划分如下：初级——能够读和写一个名字；中级——能够读和写一个简单的句子；高级——能够读和写结构紧凑的文章。这与中国在1950年的扫盲运动中的定义也颇为相似（有文化：能够认识1000个汉字；半文盲：能够认识500～1000个字；文盲：认识300～500个字）。

其次，利用现有的知识，我将不同时期的成年男性划分为3种类别。在高级水平中，每1%的男性就获得0.5分；在中级水平，这个数字为0.25分；在初级水平中，则为0.15分。之后，我将同样的分值标准用于女性。关于女性文化程度方面的证据比男性的少，在20世纪之前，能读书写字的女性显然比男性少（往往少很多）。尽管我对近代之前的数据基本靠猜测，但是我尝试对女性和男性使用信息技术的百分比做出估计。之后，我将基于信息技术的数量和水平对每一个时期计算出分数。

表附-4 信息技术分值

西方核心

年代（年）	类别（百分比）			男性得分	女性（%M）	文化得分	乘数	总得分
	高级 (@0.5 pts)	中级 (@0.25 pts)	初级 (@0.15 pts)					
公元2000	100 (50)	0	0	50	100%=50	100.0	×2.5	250.0
1900	40 (20)	50 (12.5)	7 (1.05)	33.6	90%=30.2	63.8	×0.05	3.19
1800	20 (10)	25 (6.25)	20 (3)	19.3	50%=9.65	28.95	×0.01	0.29
1700	10 (5)	15 (3.75)	25 (3.75)	12.5	10%=1.25	13.75	×0.01	0.14
1600	5 (2.5)	10 (2.5)	10 (1.5)	6.5	2%=0.13	6.63	×0.01	0.07
1500	4 (2)	8 (2)	6 (0.9)	4.9	2%=0.10	5.0	×0.01	0.05
1400	3 (1.5)	6 (1.5)	4 (0.6)	3.6	1%=0.04	3.64	×0.01	0.04
1300	3 (1.5)	6 (1.5)	4 (0.6)	3.6	1%=0.04	3.64	×0.01	0.04
1200	3 (1.5)	6 (1.5)	4 (0.6)	3.6	1%=0.04	3.64	×0.01	0.04
1100	2 (1)	4 (1)	2 (0.3)	2.3	1%=0.02	2.32	×0.01	0.02
1000	2 (1)	4 (1)	2 (0.3)	2.3	1%=0.02	2.32	×0.01	0.02
600–900	2 (1)	2 (0.5)	1 (0.15)	1.65	1%=0.02	1.67	×0.01	0.02
300–500	3 (1.5)	4 (1)	3 (0.45)	2.95	1%=0.03	2.98	×0.01	0.03
公元前100–公元200	4 (2)	6 (1.5)	5 (0.75)	4.25	1%=0.04	4.29	×0.01	0.04
前500–200	2 (1)	3 (0.75)	2 (0.3)	2.05	1%=0.02	2.07	×0.01	0.02
前900–600	1 (1)	2 (0.5)	1 (0.15)	1.65	1%=0.02	1.67	×0.01	0.02
前1100–1000	1 (1)	1 (0.25)	1 (0.15)	1.4	1%=0.01	1.41	×0.01	0.01
前2200–1200	1 (1)	2 (0.5)	1 (0.15)	1.65	1%=0.02	1.67	×0.01	0.02
前2700–2300	1 (1)	1 (0.25)	1 (0.15)	1.4	1%=0.01	1.41	×0.01	0.01
前3300–2800	0 (1)	1 (0.25)	2 (0.3)	0.55	1%=0.01	0.56	×0.01	0.01
前6000–3400	0	0	1 (0.15)	0.15	1%=0	0.15	×0.01	0
前9000–6100	0	0	0	0	0	0	×0.01	0
前9300–9000	0	0	1 (0.15)	0.15	1%=0	0.15	×0.01	0

续表

东方核心

年代（年）	类别（百分比）			男性得分	女性（%M）	文化得分	乘数	总得分
	高级 (@0.5 pts)	中级 (@0.25 pts)	初级 (@0.15 pts)					
公元2000	100 (50)	0	0	50.0	100%=50	100.0	×1.89	189.0
1900	15 (7.5)	60 (15)	10 (1.5)	24.0	25%=6	30.0	×0.01	0.3
1800	5 (2.5)	35 (8.75)	10 (1.5)	12.75	5%=0.64	13.39	×0.01	0.13
1700	5 (2.5)	20 (5)	10 (1.5)	9	2%=0.18	9.18	×0.01	0.09
1600	4 (2)	15 (3.75)	10 (1.5)	7.25	2%=0.15	7.4	×0.01	0.07
1500	3 (1.5)	10 (2.5)	10 (1.5)	5.5	2%=0.11	5.61	×0.01	0.06
1400	3 (1.5)	10 (2.5)	10 (1.5)	5.5	2%=0.11	5.61	×0.01	0.06
1300	3 (1.5)	5 (1.25)	5 (0.75)	3.5	1%=0.04	3.54	×0.01	0.04
1200	3 (1.5)	5 (1.25)	5 (0.75)	3.5	1%=0.04	3.54	×0.01	0.04
1100	2 (1)	2 (0.5)	3 (0.45)	1.95	1%=0.02	1.97	×0.01	0.02
公元前600–公元1000	2 (1)	2 (0.5)	2 (0.3)	1.8	1%=0.02	1.82	×0.01	0.02
前1000–700	2 (1)	1 (0.25)	1 (0.15)	1.4	1%=0.01	1.41	×0.01	0.01
前1500–1100	1 (0.5)	1 (0.25)	1 (0.15)	0.9	1%=0.01	0.91	×0.01	0.01
前7000–1400	0	0	1 (0.15)	0.15	1%=0	0.15	×0.01	0

2000年，东西方核心地区所有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均为高级[4]，因此东西方的信息技术的分值均为100分。1900年，在西方核心地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至少识一些字（50%为高级水平，40%为中级水平，7%为初级水平），并且女性得到几乎与男性同样良好的教育，这使西方核心地区在信息技术方面获得了63.8分。在东方，大多数男性也有一定的知识，虽然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高（我估计有15%为高级水平，60%为中级水平，10%为初级水平），而且有文化的女性可能只有男性的1/4。这样，东方核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分值只有13.4分。随着我不断重复这些计算，我的猜想中的误差也就逐渐增加，虽然这些误差的影响并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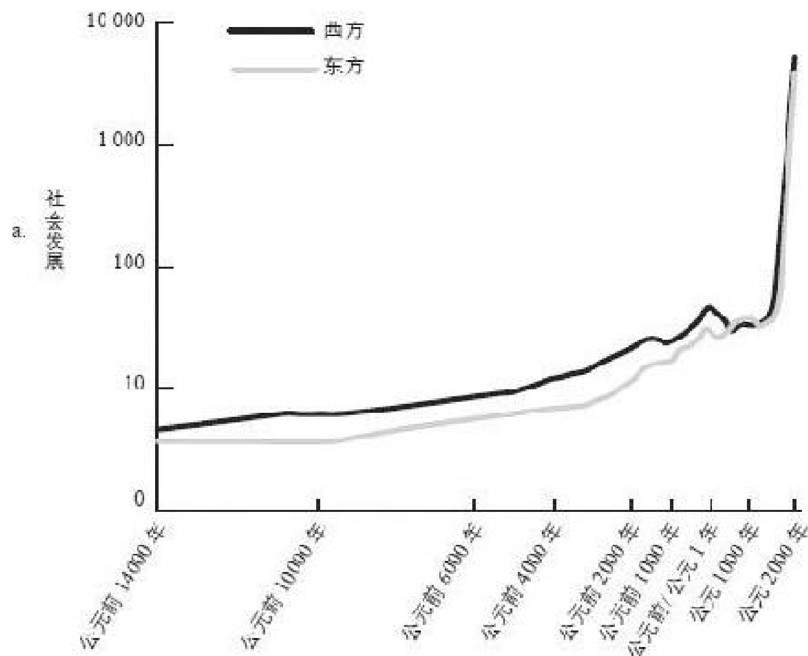
最后是根据通信科技的变化速度和覆盖范围计算出乘数。我将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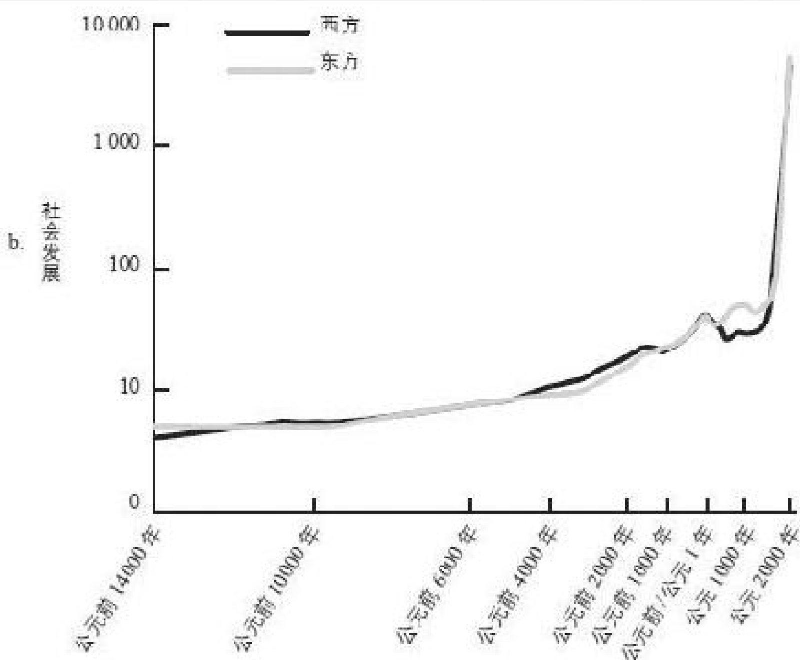
处理信息的高级工具分为三大类：电子类（到2000年，东西方均使用）、电气类（西方在1900年前就已经使用）和非电气类（在西方可能已经使用了11000年，而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000年）。

与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同，我不准备对比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时代。印刷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廉价的资料，而不是像电报或者互联网那样改变了通信方式。这些量的变化也已被考虑在内。至于电子科技，我认为东西方的乘数应分别为1.89和2.5，这反映了2000年东西方分别可利用的计算机和宽带数量。电气技术在1900年前就对西方有所影响，因此我用了0.05的乘数；非电气技术在其他时期均有使用，所以我在东西方都使用了0.01这个乘数。因此，在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最高值很可能达到了250分，而东方则达到了189分；在1900年，西方达到了3.19分，而东方达到了0.3分；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西方的分值就达到了社会发展指数的最低要求，即0.01分，而东方则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达到这一数值。

存在的误差

在上一节，我反复提到估计和猜想这两个词，这是因为要建立社会发展指数就不得不提到它们。这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没有任何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如何正确定义这个词。因此，要问我在计算社会发展指数时所得出的分值是否有误，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肯定有错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错误是大还是小？这些错误是否严重到扭曲了基本的历史，使得第四章至第十章的图表完全误导读者，因此这一整本书也就有着致命的错误？或者这些错误实际上非常小？





图附-2 显示的错误：社会发展指数出现系统性错误的含义。（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1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1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1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10%

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们只要问以下两个问题：（1）如果我们要使过去看起来与本书中提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对分值做出多大的改变？

（2）这些变化是否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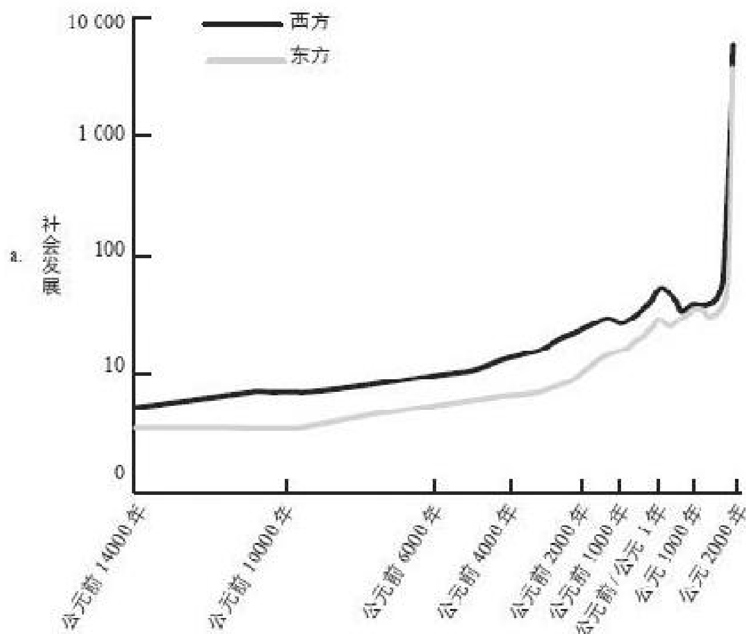
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网站中所列举的证据，检验我所做出的每一个计算。但是这里，我要简要说明一下，有可能会有系统性的错误影响了我对整个历史发展的看法。根据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在公元前14000年之后，西方得以领先。东方慢慢地追赶上来，并且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里，西方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领先的优势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进一步领先。但是在公元541年，东方领先西方，直到1773年。之后西方重新领先，如果在21世纪这种趋势继续的话，西方的领先优势将会持续到2103年。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在92.5%的时间里，西方的社会发展一直都领先于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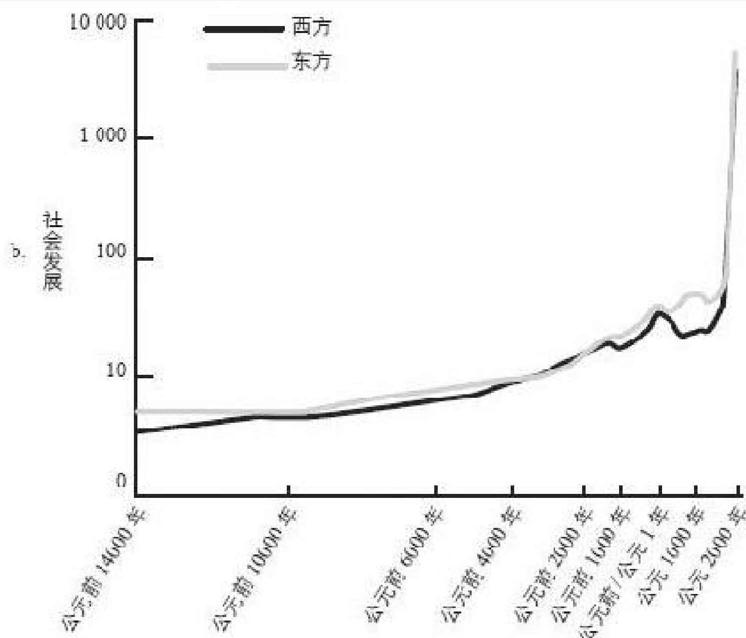
我曾在第三章指出，我的整体分值最多会有10%的浮动，但不会影响基本模式。图附-2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1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2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1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又是如何。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分数都十分不可信。图附-2a中，西方的分值被提高了10%，东方的分值则被降低了10%，我们在图中看到，1400年时，西方比东方更加先进，此时正是郑和下西洋的前夕；它还意味着公元前218年，当汉尼拔率领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已经高于东方。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够特别的话，这个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大帝被谋杀时，西方比1793年的东方更加先进，此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要求。

图附-2b也许更加特别。在图中，公元700年时的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低于东方孔子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显然不对。公元700年时，阿拉伯人控制着大量来自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在这张图中，1800年已开始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其发展指数低于1000～1200年间处于宋朝统治下的东方核心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更不可能。

即使历史学家能够忍受这些奇怪的结论，图附-2中所显示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图3-7中的差异还没有大到需要改变基本的模式。短期偶然理论依然证据不足，因为即使在图附-2b中，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西方的分值依然高于东方（虽然此时的“大部分”只有56%，而不是92.5%）；长期注定理论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在图附-2a中，东方也曾领先7个世纪。对于不断向前但却受到干扰的发展而言，生物学和社会学依旧是最合理的解释，而地理因素也仍然最能够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





图附-3 更大的错误：（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2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2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2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20%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的估计就要做出20%的改动。图附-3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2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3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2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又是如何。

这一次的模式非常不同。在图附-3a中，西方的分值始终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理论看起来非常可信，同时也让我的观点，即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变得不成立。图附-3b中的东西对比有效推翻了我的实际指数所得出的理论，使得东方自冰河时期以来有90%的时间都领先于西方。

如果图附-3a或图附-3b中有任何一个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在本书中所读到的一切均是错误的。不过，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都是错误的。在图附-3a中，西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东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我们看到，在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发展仅比1900年工业化的日本低5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图附-3b中，东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西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这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东方社会比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程度要高；这意味着，西方在1828年，即鸦片战争的前夕才赶上东方；同时还意味着，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在2003年）。以上这些都不可信。

因此，我在第三章中提出：我的估计出现的误差很可能低于10%，绝对不可能超过20%。即使误差达到了10%，我所阐述的历史基本框架依然成立。

结论

我在第三章中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制定社会发展指数是一种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指数能够给我们一个大概、足够好的估计，使得指数设计者的假想显而易见。我已说过，长久以来我们无法解释西方为何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学者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术语以及关注问题的不同方面。只要建立指数，就能帮助我们向前跨出一大步。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应该想出自己的测量方式。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

[1] 《文明的度量》，[美]伊恩·莫里斯，中信出版社。

[2] 诸如帕提亚人、鲜卑和满族人这样的半游牧民族最终发展为帝国统治者，但是像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却没能发展成帝国统治者。最例外的要数蒙古人，不过关于他们作为帝国统治者的记录却非常少。

[3] 中世纪学者可能会惊讶于表附-1中，西方核心地区在1000～1400年之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均保持在26000千卡。众所周知，当时西方的欧洲社会正在迅速扩张，但此时的西方核心实际上代表了东部地中海伊斯兰的核心地区，当时这个核心地区停滞不前（详见第七章）。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欧人均每天能量获取均低于25000千卡，直到15世纪才赶上地中海地区。

[4] 我需要再一次强调，我所划分的等级，即初级、中级和高级，其标准远比21 世纪的标准低。任何能够填写现代工作申请表或纳税申报单的人都被认为是具有高级水平的人。

致谢

和其他著作一样，如果没有很多人的付出，就不可能有这本书。要不是在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开放的思想氛围中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因为在这儿，我们不用受到传统学术的束缚。在此，我要感谢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伊恩·霍德（Ian Hodder）、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乔希·奥伯（Josh Ober）、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尤其是凯西·圣约翰（Kathy St.John），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鼓励与支持。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康斯坦丁·法佐尔特（Constantin Fasol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约翰·哈尔东（John Haldon）、伊恩·霍德、阿格尼丝·许（Agnes Hsu）、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巴纳比·马什（Barnaby Marsh）、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和理查德·萨勒帮我审阅了部分章节。在我完成本书后，埃里克·基斯基（Eric Chinski）、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阿尔·迪安（Al Dien）、多拉·迪安（Dora Dien）、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阿德里安娜·梅厄、乔希·奥伯、迈克尔·皮特（Michael Puett）、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凯西·圣约翰和沃尔特·沙伊德尔帮我审阅了全书。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鲍勃·贝拉（Bob Bellah）、弗兰切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伊懋可、伊恩·霍德、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马克·刘易斯、刘力（Li Liu），汤姆·麦克莱伦（Tom McClella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沃尔特·沙伊德尔，内森·希文（Nathan Sivin）、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查德·施特拉斯堡（Richard Strassberg）、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和张雪莲（Zhang Xuelian），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有幸读到许多未曾发表或者新近发表的文章。除了以上诸位，还有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戴维·克里斯琴（David Christian）、保罗·戴维（Paul David）、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戴维·格拉夫（David Graff）、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吉姆·希恩（Jim Sheehan）、史蒂夫·申南（Steve Shennan）、彼得·特明（Peter Temin）、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克丽丝·威克姆（Chris Wickham）、王国斌、加文·赖特（Gavin Wright）、维

克多·熊（Victor Xiong）、杨晓能（Xiaoneng Yang）、赵鼎新（Dingxin Zhao）、周逸群（Yiqun Zhou），与他们的交谈极大地启发了我。同时还要感谢参加“古地中海和中国帝国”以及“第一个大分支”会议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感谢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对我的资金支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感谢米歇尔·安杰尔（Michele Angel）为本书中的地图做了最后的修改，感谢帕特·鲍威尔（Pat Powell）为了让我合法使用他人的成果所付出的努力。

最后，我要感谢桑迪·迪迦斯特安（Sandy Dijkstra）和桑德拉·迪迦斯特安文学社，本书的编辑、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埃里克·基斯基和尤金妮娅·查（Eugenie Cha），以及Profile出版社的丹尼尔·克鲁。要不是他们的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本书。

再一次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方将主宰多久》续篇

颠覆历史研究的惯常思维：文明可用数据来度量

从上万年的历史角度探寻东西方世界文明兴衰的根源

解决"大历史"视角问题：文明何以兴起？又何以衰落

冒险性的研究成果：未来世界的文明将由东方还是西方主导

文明的度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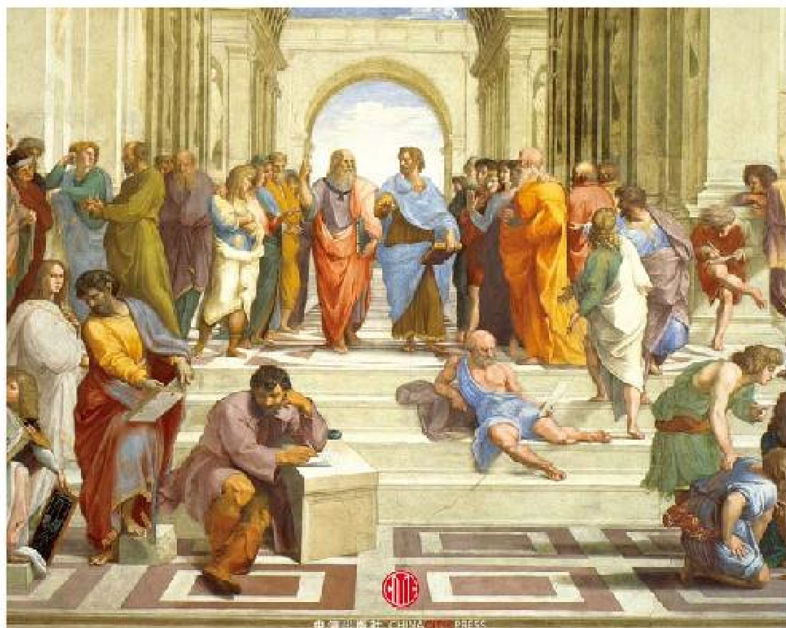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

李阳◎译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文明的度量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李阳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莫里斯著；李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ISBN 978–7–5086–4494–3
I.文… II.①莫… ②李… III.东西文化 - 文化史 - 研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9555号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著者：[美]伊恩·莫里斯
译者：李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什么是社会发展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反对者的声音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度量的单位
证据的本质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从姜寨到东京
多少人才够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难以评估的东方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信息技术记分牌
西方识字率
东方识字率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第七章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误差和讹误
指数的直观显示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社会进化的方向
致谢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算坏：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西方终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霸主。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是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期注定论的争议还要大。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先天条件、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才使欧洲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

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观点不同者很难就他们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智力等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4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但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将这样含糊的一种说法付诸使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希腊、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 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1 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得分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了。像19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的种类增长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的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在接下去的40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4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

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积累得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开端》（*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也回到了进化论的框架之内。

其中一些人像柴尔德一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左翼政论文章。不过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倾向，例如，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给他的经典著作《经济成长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起了个副书名“非共产主义宣言”（*A Non-Communist Manifesto*）。然而无论政治动机如何，美国人多倾向于像斯宾塞那样强调分化，而不是选择柴尔德的更人本主义的进化论。

这些思想者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了。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帕森斯不仅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的新类型学[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又可再细分为古代时期和晚近时期）和现代阶段]，而且提出了用以解释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的一种复杂的框架体系。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每种共性包括“各种结构形成的一种综合体，其相关发展过程会使特定种类的生命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获得极大发展，以致只有发展出这种综合体的系统，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一般适应能力”。首先产生的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差别，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差别），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帕森斯的思想在于意图将从人类进化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框架内，比柴尔德更雄心勃勃，但也因为其循环性，即认为分化既是进化的原因又是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因此，尽管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帕森斯的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有趣的，但仍然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对社会进化的解释。帕森斯之后，这些年来作品得到最广泛传诵的进化论者，似乎当属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了。他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像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怀特也将历史按阶段划分（他的划分法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然而与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的是，他提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C=E×T，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

这是对斯宾塞–帕森斯路线的重大背离，但是当怀特关注起能量利用提高的结果后，他的理念被认为更接近于社会进化论的正统了。他认为，从原始社会通过文明社会到达复合社会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分化的增长。正如他所解释的：

> 农业……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力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越来越高，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力可以从获取食物这一任务中分离出来，转向其他职业。于是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职业群体，如泥瓦匠、金属工、玉匠、织工、文

书、牧师等。其结果是加速了艺术、手工艺和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的进步，因为这些行业已掌握在专家，而不是“万金油”手里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更多的职业群体，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交换和销售（而不再像部落社会那样主要是为了使用），于是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商人、银行、典当行、放贷者、奴隶等。财富的积累和对有利之地的争夺引发了征服战争，促成了职业军人和统治阶级、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生。于是，存在于人力发展阶段的农业，使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美国思考社会进化问题的学者通常聚拢在“新进化论”的标签下，以便与（主要流行于欧洲的）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相区别。新进化论的讨论大多贯穿着两大观点：一种是回归于分化是进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也是进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希望对进化进行量化，以便做出更明确的对比。

用数值尺度来为社会进化分级的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鼎盛时期。在可靠的、跨文化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分级，最早的尝试也许当属泽巴尔德·施泰因梅茨（Sebald Steinmetz）的长篇大论《社会类型的分级》（*Classification des Types Sociaux*），是一篇主要关注生存技术的文章。汉斯·涅波尔（Hans Nieboer）在其经典的论文《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Slavery as an Industrial System*）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主张，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及其合作者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社会学家又发现大量的新证据，统计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使得那些早期的尝试显得毫无立足之地。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在一本大众教科书中所发的一番简短议论中，散布了这样的观点：通过统计一个社会中专家的数量、贸易量、企业集团的数量，以及机构的复杂程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值指标应当是可能的，然而第一个真正可用的指标却是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提出的。

纳罗尔是“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的一名研究人员。“人类关系地区档案”是耶鲁大学于1949年建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为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进行全球性比较创建一个数据库。纳罗尔从全球范围内随意挑选了30个工业化前的社会（既有当前的，也有历史上的），然后遍搜“人类关系地区档案”以探究它们的分化情况。

鉴于分化可能存在几乎无限的维度，纳罗尔为这一概念的运用设立了两个原则。首先，他认为必须将研究限制于部分特性，这些特性能以最小的数目涵盖斯宾塞关于“分化的大部分想法”；其次，选定的特性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准则。它们必须有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

见）、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以及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3个特性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3个特点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数。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Yahgan），就是在1832年令来访的达尔文惊叹为“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的那群人；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Aztecs），为58分。

几年后，当时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从社会心理学家们那里借来了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特性：（1）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2）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卡内罗挑选了8个这样的特性（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9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之为“量表”的表中（见表1.1）。

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特性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自夸为高于0.90的“复制系数”。

表**1.1**卡内罗的量表，显示了南美洲**9**个社会中**8**个选定的文化特性的有（+）与无（-）

石建筑	-	-	-	-	-	-	-	-	+
政治状况	-	-	-	-	-	-	-	+	+
金属矿石冶炼	-	-	-	-	-	-	+	+	+
社会分级	-	-	-	-	-	+	+	+	+
织布机纺织	-	-	-	-	+	+	+	+	+
酿酒	-	-	-	+	+	+	+	+	+
陶器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雅甘人			图皮南					印加人

舍伦特人	桂库鲁人	巴人	希瓦罗人	库马纳人	安萨马人	奇布查人

以会导致结果不同的不同统计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和得到的指数，在此后10年内大量涌现。其中大多遵循纳罗尔和卡内罗的模式，将反映大量不同的人类活动的特性聚拢在一起，试图得出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印象，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仅仅关注某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分化情况的特殊史料，比如丧葬情况或定居模式。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同，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数大多产生了近似的结果：根据卡内罗的统计，当时结论比较相近的分析家达到了87%~94%。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进化论变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部分要归因于两本书对基于分化的理论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释，分别是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和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的《政治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前者将社会划分为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者则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这些分类法（尤其是瑟维斯的分类法）多多少少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替换了帕森斯和怀特的术语。

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美国新进化论的高潮。然而，就像是20世纪头10年——当时古典进化论眼看着就要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大综合——的离奇再现，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钟摆突然远离一切近似于斯宾塞的理论而去。经济史和政治学是鲜有的例外，也许是因为制度分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了接近于过去的阶段理论，以及定量进化论在苏联依然受到青睐。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对于进化论所进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争论，也像20世纪头10年那样带着政治锋芒。关于派性偏见、招摇撞骗和劣质学术的指责，败坏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著述的形象。

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们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员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大约自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们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

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书非常得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外，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尽管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学术界的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写出能像《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那样畅销的书，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为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

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21世纪前10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于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分化

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长。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们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展示的是，埋葬者们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们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上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特性（定居点规模）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代表着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特性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普遍渐渐放弃了将分化作为分析工具，然而社会学家们却越来越倚重分化。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认为的最复杂的社会——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分化程度上还不及一些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国家。这些古代国家有着复杂的住宅区网络、秩序和等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分化是同质的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

这个过程对于现代性来说也不算独特：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一同质的市民社会，合法的分化程度也远不及此前古代时期的城邦。尽管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国家能力和繁荣程度有巨大增长，雅典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结构的复杂程度却显著下降了，这点众所周知。

蒂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化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普遍的、像法律规定一样的社会过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化”一词便从社会学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比从考古学讨论中消失得还要彻底。

复杂性

如果说“分化”太不一致，无法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的话，“复杂性”一词也必须随之丢弃，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正式定义中，这个词是完全依赖于“分化”的。然而，在过去20年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都提出，如果我们在斯宾塞的分化论基础上，以从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的复杂性理论来替代社会科学观念的话，“复杂性”可以保留为一个中心概念。

许多版本的复杂性理论都认为，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宏观的模式和结构，从作用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不依照任何观念行动的微观行为中显现出来。斯宾塞也许会欣赏这样的观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和毁坏是自然过程——通常被称为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简称SOC）——对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组织的形成同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观点已为人类学、考古学、管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采用。

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经常会吸收和利用新进化论者的分类法，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描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时。然而，他们也往往认为新进化论不严密、陷于经验主义和缺乏清楚的解释。

进化

虽然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们复兴了斯宾塞的进化观，将其作为一个能涵盖从地质学到法律程序等一切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一些社会学家逆向而行，拒绝再使用同样的标签，以生物有机体的改变和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多样化类型的变化来描述达尔文学说的派生理论。

最尖刻的批评也许是来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他提出任何自称为进化论的理论，“都必须至少与生物进化论有一些假定的概念上的连续性……（并且）社会进化论必须具体说明一些不只是一系列涉及某种特定条件的变化的东西，即某种能成为变化原理的东西”。他认为社会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的共性极少，特别是因为社会进化论依赖于将达尔文的变化原理——适应——不断扩展，直至其变得“无可救药地难以名状”。

许多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尤其直言不讳。他是一位将博弈论运用于生物进化论的先驱人物。他认为“进化理论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大假设：突变是非适应性的，后天属性是不可遗传的，遗传是符合孟德尔法则的——遗传是原子性的，我们平等地从我们的双亲那里继承原子，或者说基因，而不从任何其他人那里继承。而在文化类比中，所有这三大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一些考古学家对这类担忧的回答是，将人工制品视为人类表型的延伸，关注自然选择在它们古往今来的独特的持续状态中是如何运作的。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总结了自称“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的观点，解释说，“对社会进化论者来说，适应就是在环境中有功能的任何行为。对进化论者来说，适应是在很长时间内被自然选择所改变，以使其服务于某种重要的进化功能的一种表型特征。”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对于社会进化论往往比支持复杂性理论的学者们更为苛刻。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进化论在关于选择的单位方面呈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在论及适应时更是如此。

进步

今天已经很少有社会学家将“进步”这个词用作社会进化或分化的同义词了。但这是斯宾塞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需要做一短评。

斯宾塞一定会认为诸如帕森斯的“进化的共性”和卡内罗的“职能先决条件”等社会学概念，与他的“进步”概念所见略同，无论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如何费力地试图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虽然许多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似乎也赞同。例如，考古学家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提出，关于进化、分化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很容易滑入自认正当或主张西方优先等思想方式”。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进步的隐含假定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所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中。

阶段理论

实际上所有古典进化论者和新进化论者，从提出了从简单社会到三倍复合社会的类型学的斯宾塞，到提出了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交替论的瑟维斯，都创造了社会进化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它们具有能够预测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变量的可能性。比如说，假如所有营居群都的确是以小股、流动的群落生活，人口密度很低，只有最低限度的技术，等级观念很弱，性别秩序肤浅，那么对于对一个社会只略知一二，比如只了解其生存基础和聚落形态的考古学家们来说，也许就能设想出该社会一些无事实证明的特征，比如其法律或其亲属关系。

根据HRAF的数据，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奈特（Charles McNett）声称推测准确率可达50%，而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史前史学者都在辛勤地工作以阐明各阶段的考古关联，并在它们当中划分出具体的社会。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研究本身就会产生问题。个案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并没有按照阶段理论所宣称的它们应该运行的方式运行；而对HRAF数据所进行的要素分析，又不能证明变量间存在明确的关联，因为不同的轮转会产生极其不同的负载。

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更仔细的跨文化调查表明，统计问题反映了真正混乱的现实。对新大陆各社会的调查发现“每个检查过的属性……都有相当大的可变性。这些差异是连续性的，而非孤立个别的，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模式或子类型。而且，不同的组织特征之间也发现了不同强度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由于阶段之间清晰的分界线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模糊，很难知道经验数据什么时候会证伪任何具体的阶段理论。在一个事例中，同一会议文集的撰稿者们，就人口密度和定居地规模是否与政治制度有确定的关联，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些考古学家为澄清问题，试图将瑟维斯提出的4个原始阶段划分出子类型，或者主张酋邦和国家代表着交替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连续的阶段。瑟维斯本人对混乱的回答是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大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的“原始社会被划分为亲族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义的”，在分水岭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出现了等级制，由一股中央权威力量控制和指导——这股中央权威力量会创制成政府”。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却持相反意见，越发认为阶段只是速记描述，或者为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上进行启发而叠加的理想类型。

社会

伴随着对理论家们将社会聚拢在一起的阶段连贯性的挑战的，还有对“社会”本身的连贯性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社会”是通过实践而非一元化制度组成的群体。人们也许会根据种族、政治、宗教、文化或其他条件来规定自己的社会。通常一个人会同时属于好几个社会，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在它们当中做出选择（或者被选择）。迈克尔·曼将社会称为“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吉登斯则谈及“像浅浮雕一样从它们嵌入的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系统。它们之所以凸显，是因为确定的结构原理足以创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可具体指明的总体的‘制度的聚类’”。

人类学家也有这样的担忧。阿希尔·古塔（Akhil Gupta）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为批判他们称之为“陈腐地‘在某某’模式”，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人种学的思想，提出：

> 无论地方和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都必须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而不能被当作一个人为讨论的出发点而做的让步；文化的领域化（比如成为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为正在进行的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复杂且因情况而异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而不是先给定的文化领域实体，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

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社会”，通常与人类学家们研究的“文化”殊为不同，似乎与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为“文化”的人工制品的群集也不大相同。（考古学家们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以聚集物的形式持续而反复地出现的明确而广泛的人工制品种类的多元集合。”）

纳罗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文化单位”作为回应。他将“文化单位”划分为4个类型，因两种地质年代计算尺度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分析单位当真这样不稳定，那么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比较，似乎注定要走向失败。

量化

量化对于社会进化研究的大多数途径都极为重要。半个世纪前，纳罗尔和卡内罗就已经为如何将名词转化为区间数据这一基本问题绞尽了脑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独特的人类状况或历史情境转换为可供计算的序列数据这一愿望本身就受到了挑战。正如尚克斯和蒂利所看到的，将历史“数学化”是进化论者们把西方主宰合法化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指出，数学化背后错误的假设，就是当我们量化时，“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本来的数学上的自我，并且在对直接性和事实性的痴迷中发现了当前存在的必然性；这变成了客观必然”。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一篇经典的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家们被拽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倾向于将社会科学的主题“过度社会化”，在所有问题中都嵌入了太多的背景，给相互矛盾的意义建设和颠覆留下了太大的余地，以致任何解决方案都变成了不可能；另一个倾向是“社会化不足”，从背景中曲解细节，强加意义，因此得到的只能是肤浅的答案。

在抽象性和直接性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就成为挑战。不同学科往往青睐于天平上不同的点，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过度社会化方向上走得最远，而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社会化不足方向上走得最远。如果（本章前面所引用的）彼得·图尔钦的说法“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是正确的，那么社会进化论就需要更多（也更精致）的量化；如果尚克斯和蒂利以及那些与他们持同样见解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数学化和社会进化论就不过是社会化不足的极端版本。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这是一组可怕的批评攻势。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斯宾塞学派的社会进化论传统——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来解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所有希望——似乎都存在致命缺陷。

准备与批评者辩论以捍卫进化论的人为数并不少。不过，在本书中，我打算改弦易辙。过去半个世纪来出现的很多批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完全摒弃社会进化论的倾向也是正确的。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批评，是有可能建立一种更集中、更具说服力的指数的。这个指数将能够避免新进化论的许多缺点，真正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在第一章中，我提出，对于长达两个世纪的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争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社会发展指数，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行长期比较。我们只有确定了需要解释的历史的轮廓，才能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做出更好的解释。

继而我查看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研究，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其最新版本——新进化论——的批评。在本章中，我将描绘一种社会发展指数。这种指数回应了对进化论的最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忽视其中心目标——能够对社会发展进行跨越时空的度量和比较。

我的方法依赖于9个核心假设。首先，我会对它们进行阐述；其次，我将继续解释社会发展指数将如何运作。在本章结束时，我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指数完善了20世纪新进化论的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我做了9个基本假设，每个假设都需要开展不同程度的讨论。

定量分析

社会发展除非能够量化，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已经有好几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和定性的优缺点进行了争论，我不打算对这些越来越没有结果的争论老调重弹。

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定量分析就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的识别。第三章至第六章将详细介绍一些在这方面，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判断和识别。

也就是说，定量分析的办法应当比定性分析更清晰，因为定量迫使分析者专注于这些判定，并且要系统地阐明做出某个选择而不是另一选择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于打概念仗的泥沼之中。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数字指标，使得对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直接的比较变得可行。

简约性

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上，应当使事情尽可能地简单，直到不可能更简单了。”尽管没有人曾试图寻找这句引言的原始出处，但我认为，必须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人类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此而言，也并非所有自称社会科学家的学者都同

意。）

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应当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增加复杂性。无疑有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研究方面——需要能使我们的认知更加复杂、更加玄妙精微的方法，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使之晦涩难懂的代价，但在讨论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话题时，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复杂性太重了，使得中心议题在大量细节中被模糊了，分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误区。

特性

设定像“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要求我们先将其分解为更小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遵照HDI模式，我试图在为社会发展的形式定义时涵盖全部标准的最小数量的具体特性。任何特性列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挑选出最佳集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集合中增加更多的特性，就将经不起爱因斯坦的简单性的考验，因为那将使事情走向毫无必要的复杂；而如果我们减少特性，那么这份列表就将无法包含定义的全部要素，并将使事情过分简单化。

第一个HDI是在1990年由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Haq）设计的，旨在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核算上转移到人类福祉上。在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及一个联合国经济学家团队的合作下，哈克巧妙地设计出了HDI，为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们提供了一种单一分数，使他们能够了解各国在促使其居民发挥其内在潜力方面做得怎么样。

HDI利用3个特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知识和教育（以成人识字率占2/3的分数，以大中小学入学率占另外1/3的分数），以及生活水准[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署经常改变其计算方法，2011年变动尤为明显，其进行了大改变，为生成分数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计算器。

HDI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从对特性的选择、基础数据的差错、对教育和收入的看重，到对环保和道德的忽视，都是如此，然而它仍然被证明极其有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类发展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并不相同，但是确定一个易处理的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这一基本原则却是相通的。当然，HDI与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每个发表的HDI都是对一时的快照，不考虑历史变化。HDI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年度报告中单一国家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估量一段时间的变化，但由于其可能得到的最大分值总是1.0，HDI更适合于在图表中标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而不大适合于度量发展水平历经时间长河的变化。

总之，尽管HDI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目标大为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能够作为较为宽泛的概念的代表物——却是个极好的起点。

有用特性的标准

在社会科学中，就如何挑选好特性有很多讨论，大多数说法都关注6项标准：

（1）特性必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必须告诉我们一些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有关的情况。

（2）特性必须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例如，我们也许会认为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的尺度，但是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受到文化制约的。

（3）特性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如果我们以一国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数量为特性，就不能再以人均财富量为第三个特性了，因为这是前两个特性的产物。

（4）特性必须有充分的文件证明。当我们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时，这的确是个问题。特别是对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确可能对一些可能有用的特性知之不多。

（5）特性必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专家们对证据的判断多少是一致的。

（6）特性必须是便利的。这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原则，但取得证据越难，计算结果的时间越长，这个特性的用处越小。

关注东方和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对社会发展进行真正的全球考察，尽可能详细地评估世界所有地区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对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着实是个钝器，它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经不起简单的检验。

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遥远的古代就比世界其余地区的高，还是西方仅是在近代异军突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同样详细地调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出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西方将主宰多久》第二章中讨论的原因，在最近一次冰期的末期，大约公元前13700年时，“幸运纬度带”（大致为北纬20°～35°的旧世界和南纬15°至北纬20°的新世界，见图2.1）的地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社会发展开始加速，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图2.1 幸运纬度带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Michele Angel）制作

在过去数百年间，世界上仅有的似乎比较可能与西方匹敌的地区，是那些从新世界的核心地带发展起来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亚。这些地区在最后一个冰期的末期时，成为潜在的可用于家居的植物和动物聚集最稠密的地区。实际上，自最后一个冰期末期起，唯一在社会发展方面得分高于西方的地区是东亚。因而，遵照精简原则，我关注东西方的对比。

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使争论陷入了打概念仗的僵局。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计算，学术界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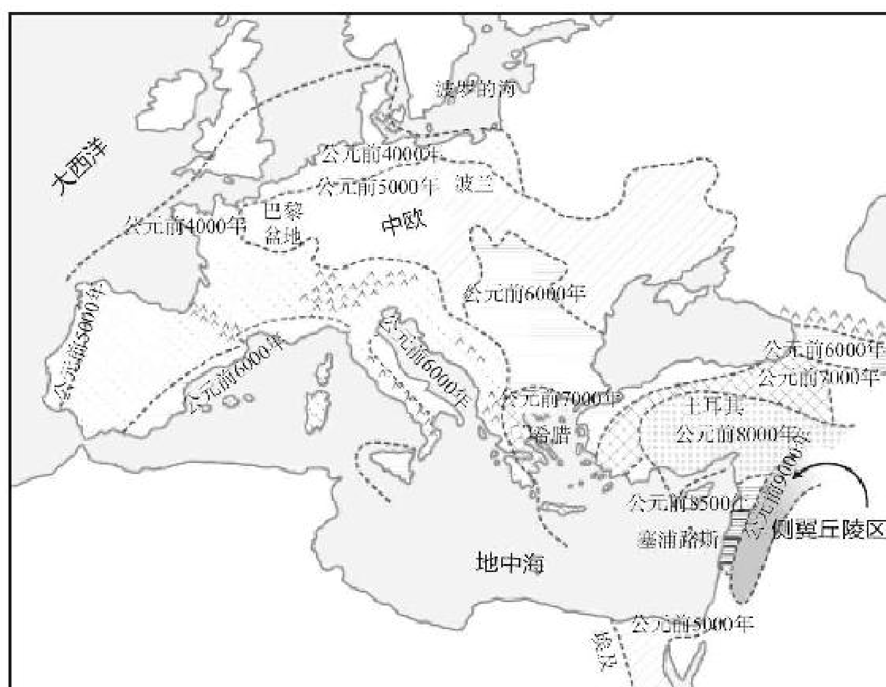
戴维斯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比如，民主、基督教、科学或自由，然后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再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再就差异提出一种解释。他们的困境在于，反对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很简单地将另外一些价值定为西方的精髓，提取另外一些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进行不同的对比，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能同样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

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见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天的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兼并了日本。

这种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带的社会的办法是常识。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度量的时间间隔

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关注核心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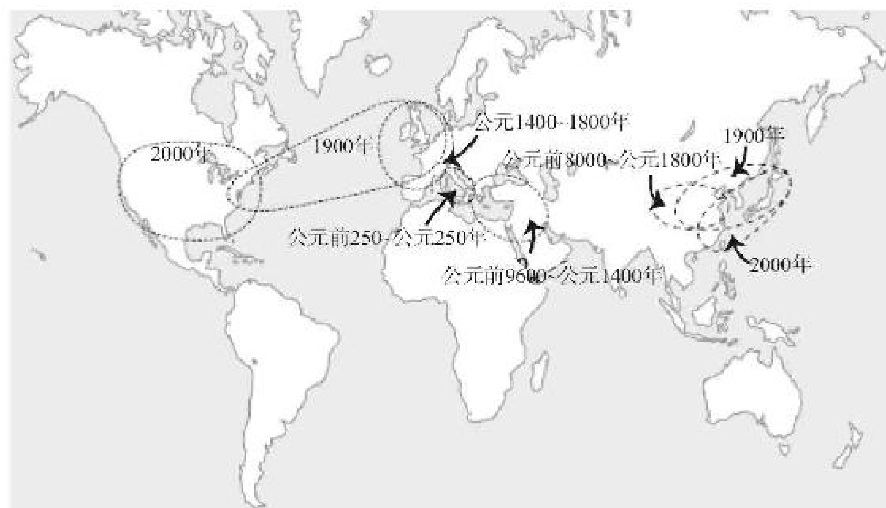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

因）。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公元1900年的分数，将把工业化的英国、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重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最强烈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带内发生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核心地带发生了极大的迁移和变化（见图2.3）。从公元前11000~约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非常稳定，一直安于地中海的东端，除了约公元前250~公元250年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扩张，纳入了意大利。否则，西方的核心地带就始终维持在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形成的三角形内。自公元1400年起，这一核心地带不断地向北和向西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又扩张至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公元1900年，该核心地带跨越了大西洋。到2000年时，牢牢地在北美洲扎了根。

图2.3 东方和西方核心地带的迁移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制作

在东方，核心地带始终保持在最初的黄河–长江之间地带，一直到公元1850年。尽管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重心北移至黄河流域的中原

地区，公元500年后又回到了南方的长江谷地，公元1400年后再次逐渐北移。到公元1900年时，该核心地带纳入了日本，到公元2000年时又纳入了中国东南部。

至于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的确切边界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专家们都会有不同见解。在表2.1中，我大致标示了核心地带。

表2.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和东方核心地带

西方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	侧翼丘陵区（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0～前35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30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2500～前13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1200～前10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900～前700年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6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500年	波斯帝国（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年	波斯帝国–爱琴海（亚洲西南部 - 非洲东北部 - 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300年	希腊化王国（亚洲西南部 - 非洲东北部 - 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200年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 - 非洲东北部 - 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100～公元200年	地中海中部（欧洲南部）
公元300～600年	地中海东部（亚洲西南部 - 非洲东北部 - 欧洲东南部）
公元700～8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叙利亚 - 伊拉克（亚洲西南部）
公元900年	埃及（非洲东北部）、西班牙（欧洲西南部）
公元1000～1400年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 - 非洲北部 - 欧洲南部）
公元1500～1600年	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西部）
公元1700～1800年	法国、英国（西北欧洲）
公元1900年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欧洲北部，美洲北部）
公元2000年	美国（美洲北部）
东方	
公元前14000～前2250年	黄河 -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前2000～前600年	黄河河谷（中国）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黄河 -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300～900年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000～1500年	黄河 -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600年	黄河 - 长江河谷（中国）、日本
公元1700～1800年	黄河 -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900年	日本
公元2000年	中国东部、日本

近似和讹误

理所当然的是，世上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精确的指数，无论是从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解释“精确”一词，使其意味着所有单个细节都绝对正确，还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使其意味着所有专家都会做出同样的估计，即使他们无法证明这些估计是正确的。在所有历史知识中，我们可

以完全确信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专家们能一致同意的更少。因此，如果问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数是否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当然是不正确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们有多不正确？它们是否大错特错，证明了我错误地识别了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形状，意味着我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所做的解释存在致命的缺陷？抑或这些误差实际上都微不足道？

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主要办法。一个办法是假设我犯了系统错误，普遍地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再问：（1）我们需要将分数改变多少，以使历史显得非常不同，使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不再适用？（2）这样的改变是否貌似合理？我将在第七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个办法是假设错误不是系统性的，高估或低估东方和西方分数的错误都是以随意和不可预知的方式犯下的。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自我修复我个人打分所基于的证据。我将在第三章到第六章详细说明这种办法。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第一项挑战是找到符合有用特性假设下所列6项标准的最小数目的特性。在试过几种组合之后，我选定了4个特性：（1）能量获取；（2）社会组织；（3）战争能力；（4）信息技术。

能量获取必须作为社会发展的所有可用的衡量尺度的基础。牛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物质的复杂组合使得其如果没有自身所处环境的补充能量的输入，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分解。人类如果不获取能量，也会（像植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死去。同样的，除非人类能从所处环境中获取能量，否则人类创造的社会也会瓦解。人类群体为了增强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精神环境的控制，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得不增加其能量获取。

然而，单是能量获取不足以衡量对社会发展重要的一切事物。甚至我所知道的对文明最简化的定义——莱斯利·怀特的C＝ E×T，都认为衡量人们对他们获取的能量的使用方式，与衡量能量本身同等重要，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怀特对“技术”的分类太过宽泛、太难以量化，所以我进一步将其细分为3个特性。

社会组织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斯宾塞的分化概念重合，但为了避开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关于定义和衡量尺度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学来了一招，以社会中最大永久定居地的人口规模，作为对社会组织的大致的间接度量。

这也许看上去像种奇怪的方式。今天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简直是

功能失调的噩梦，充满了犯罪、污秽和疾病。然而历史上的大多数大城市无疑也是如此。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有100万居民。那里也有街头犯罪团伙，时常会导致政府停转；城市人口死亡率过高，以至于每个月都不得不容许上千名乡下人移居罗马，以保持人口数量。然而尽管罗马有种种邪恶，保持其城市运转的组织，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早期社会所远远无法胜任的——正如管理像拉各斯（人口1 100万），或孟买（人口1 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 500万）这样的城市，要求有远高于罗马帝国的组织能力。

这就是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将城市化作为评估社会组织的大致尺度的原因。这样做有好几种办法。我们可以计算一个社会中居住在特定规模的定居点（10 000人是较流行的截断点）的人口的比例，也可以将定居点分成不同的等级，计算每个社会有多少个等级。然而我选择的办法，是只分别计算东方和西方社会最大的永久定居点的人口数量。我选择这种办法，一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将研究一直回溯到公元前14000年的话，我们必须使用一些证据，而这种办法看上去最适合于这类证据；二是因为我知道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这种办法比任何复杂得多的办法更不好用。

信息技术是能量使用方面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随着社会发展的推进，人们必然要处理和交流巨量的信息。任何社会如果没有文字和计算系统，都不可能发展得太远。为了发展得更远，要求有越来越成熟的媒体储存和传播信息，要求有专门的机构将读写和计算技能传授给越来越多的人。

战争能力也是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像植物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若想生存，必须竞争和合作。鉴于人类（像蚂蚁和黑猩猩一样）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物种，需要时常将其合作性的行动转为群体针对其他敌对群体的暴力竞争。在考古记录中，武器和堡垒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当信息技术达到能够记录细节的阶段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文字资料中，都充斥着对战争和战役的描写。

这4个特性并非合起来就构成了过去16 000年社会发展的总体画面，也没有比联合国的特性——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我们想了解的人类发展情况。这些特征的功能非常有限：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有用的概览，展示一下我们在回答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时需要解释的模式。

并不是只有这4个特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也观察过若干其他可能的特性，包括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人口规模、科学能力和对于技术能力的更广泛的衡量尺度，但是，没有一个能像能量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这样，更好地服务于有用特性假设下开列的原则。也就是说，特性中的确有相当大的冗余，说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关联密切的任何特性组合，都可能产生非常近似的一套分数。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对于任何指数来说，最大的挑战无疑都是决定如何给特性分配分数。为了使情况简单，我决定将1 000分定为指数的顶点——公元2000年前所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然而，这个顶点与HDI中可能的最高分1.0所起的作用非常不同。在联合国的指数中，1.0代表着某种完美，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的得分都不可能高过1.0。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则相反，1 000分只是公元2000年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从指数的顶点到本书写作时，又过了十几年，西方发展的分数在继续上涨，已经超过了1 000分。假如东方和西方继续以20世纪的速度发展，到21世纪末时，两者都将达到5 000分；而如果增长率超过20世纪的速度——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两者在2100年时的得分还会更高。

设计了HDI的经济学家们创建了一个详尽的权重体系，将3个特性的分数标准化，然后计算出相加后总分的平均数。相反的是，当1956年纳罗尔发表了他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时，他给他的3个特性设置了相同的权重，他解释说，“因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某一特性比另一特性有任何更高的重要性。”

不同权重的优缺点总是有讨论的余地，我将在第七章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纳罗尔的办法在这里似乎比联合国的要中肯。即使有很好的理由确定某项特性比另一项意义更重要，也没有根据假设这一重要性能贯穿我们所考察的整个16 000年，或者它们始终同样适用于东方和西方。

因此我把我的1 000分平均分配在4个特性上。这意味着在某个特性上能获得最高值的社会，将在其达到那个水平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元2000年）获得250分，而其他社会因为达到的是较低值，相应地获得较低的分数。我将在第三章到第六章详细说明证据、定义问题和我如何计算每个特性的分数，但在此，我要简短地举一个具体例子，以说明打分系统的运行机制。我将以社会组织为例，通过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来进行间接度量，因为这也许是最简单明了的特性了。

大多数地理学家都将公元2000年时的东京，归为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我们所知的最大城市，该城有大约2 670万居民。于是，公元2000年的东京获得了划拨给社会组织这一特性的满分250分，即意味着在指数中，每106 800人得1分（2 670万人除以250分）。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是纽约，有1 670万人。按照每106 800人1分的算法，纽约的得分是156.37分。

公元1900年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但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那时候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大约有660万居民，得61.80分；而在东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东京，但那时只有175万人，得16.39分。

当我们回溯到公元1800年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将若干不同种类的证据结合起来，包括食品供应和税收记录、城市覆盖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内房屋的密度，以及逸闻故事等，不过大多数人的结论都是，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能有110万，得10.30分；西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伦敦，人口有大约86.1万人，得8.06分。

沿时间继续回溯，误差幅度将越大，但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 00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的城市经常紧随其后）。公元800~1200年，首先是长安，其次是开封，最后是杭州，人口在100万上下（分数在9分左右）。与之相反的是，西方城市始终没有超过其一半的规模（西方最大的城市通常在欧洲南部和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地区，而不是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基督教地区）。再往前几个世纪，这种情况则要颠倒过来：公元前1世纪，有100万人口的罗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而中国长安的居民人数可能只有其一半。

当我们回退到史前时代时，证据无疑越发模糊了，数字也变得小得多了。然而，将系统的考古调查结果和较小区域内详细的发掘记录结合起来，我们对于城市规模仍能产生合理的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解的艺术，不过就算是最广为人们接受的估量结果，仍可能需打10%的折扣，但误差幅度不可能更大了；而且由于我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考古遗址采用同样的估算方法，大概的趋势应该还是相当可靠的。

由于在社会组织这个特性上，需要有106 800人才能得1分，略微超过1 000人将得到0.01分，这是值得纳入指数的最低分数了。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西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500年，而东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两个时间之前，西方和东方的得分都将为0（参见第四章）。

另外3个特性的分数，也以同样的方式计算：（1）确定在这个生活维度中能得到最高分的社会（就能量获取而言，在公元2000年的美国，平均每个居民每天消耗大约228 000千卡的能量）；（2）将满分250分分配给这个社会；（3）计算能得到1分所需要的表现（就能量获取而言，228 000除以250分，等于平均每人每天消耗912千卡得1分）；（4）估算历史上不同时间每个社会在这个特性上的分值；（5）将这些估算出的分值除以分母，将它们换算成指标中的分数。在计算了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中每个特性的得分后，我只需将4个特性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到一系列每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了。

反对者的声音

根据第一章回顾的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可能存在4种主要的反对我的意见。我将针对每一种说上几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几种反对意见

都不是致命的。

1.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量化并进行对比，使人类失去了人性，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却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以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当然，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瑟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问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问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2.将社会量化并进行比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比较，对于解释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加有益。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1）在我考察的4个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特性。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特性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特性之外，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特性。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4个特性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足以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特性。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特性，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或相互重叠。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特性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3）我们关注的特性应当更少。考虑到4个特性当中存在的冗余，我们或许应减少几个特性，以增强简约性。很显然，方法也许是放弃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只专注于能量获取，因为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都只是使用能量的途径。图2.4展示了单看能量的指标会是什么样的。图2.5则不同，展示了由全部指标产生的分数，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在单有能量的图中，正如在完全的社会发展图中一样，自冰期晚期以来，西方仍在90%的时间里领先东方；东方仍然是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超越了西方；大约公元100～1100年仍然有一个硬上限阻碍了发展（稍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得分仍高于较早的时代；公元2000年仍然由西方主宰世界。

图**2.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线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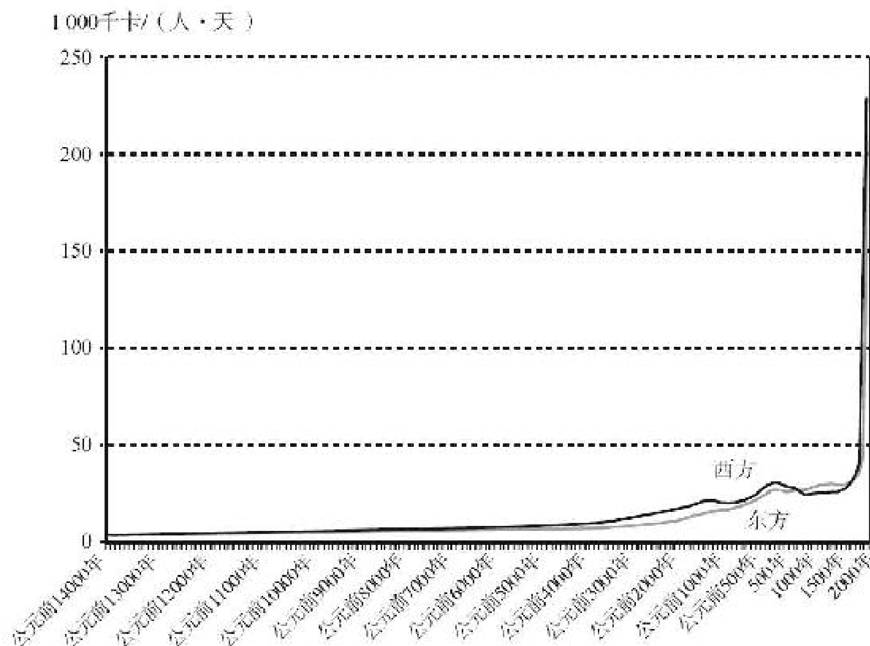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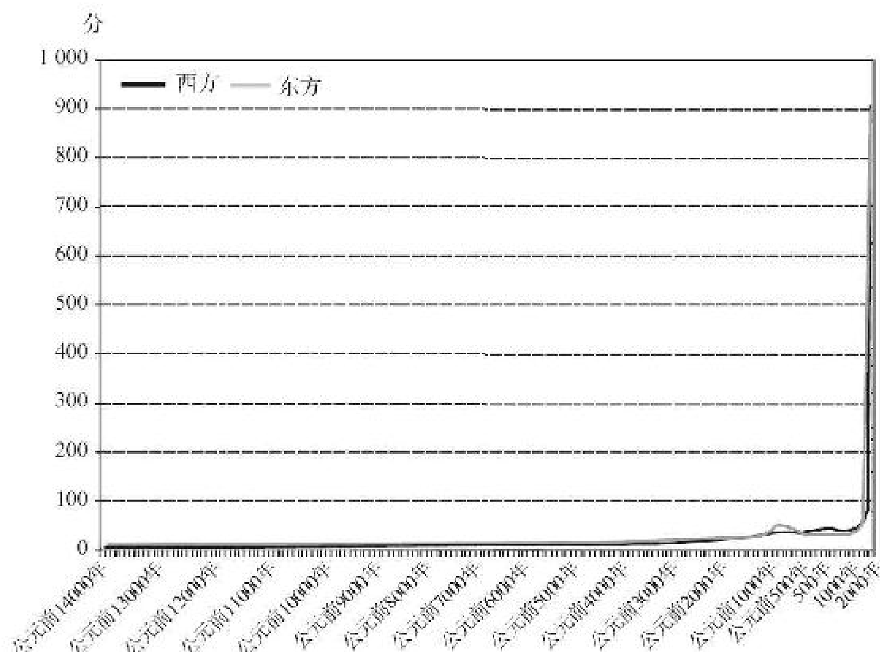


图2.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得分（线性标尺）



单是关注能量，当然有更加简约的好处，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我采用的4个特性并不完全多余，自大约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能量获取与其他特性呈现非线性关系。能量获取的余裕的增长，导致了选定领域能量使用的极其巨大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20世纪城市的规模

翻了4番，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信息技术跃进了80倍，而人均能量获取才翻了一番。如果只关注能量，就经不起爱因斯坦理论的检验，因为那样太简单了，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4.这4个特性是度量社会发展的好办法，但我犯了事实错误，得到了错误的度量结果。

正如在讨论近似和讹误时提到的，应对这个反对意见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的经验主义错误，始终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问两个问题：（1）我们需要把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上去非常不同，以致《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不再有效？（2）这样的改变是否似是而非？我将在第七章里论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

另一种辩驳这种意见的办法是，假设存在一贯但并不系统的经验主义错误，随意、出人意料且严重地夸张或低估了东方和/或西方的分数。避免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无疑就是贯彻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的意见，对照证据检查指标中的分数。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对于我创造的社会发展指数，我最想说的是，它反映了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也同样反映了社会进化论者们的贡献。从斯宾塞最初的文章发表以来，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们就辩称，社会进化论者们试图解释一切，却往往最终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

批评者们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就是没有能通吃的社会发展指数。纵观整个20世纪，指数创造者们想把各种各样的主题纳入自己的框架，却往往使得不具备可操作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经常又使情况雪上加霜。例如，卡内罗的解决办法是给他的指数增加越来越多的特性，结果，特性从1962年的8种，膨胀到1970年的618种，仍然还望不到明显的尽头。

本书中的指数并非试图解释一切，只专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大陆西端的社会，在19世纪主宰了世界，而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又在20世纪取代了它们。

这样的专注有3点好处。它使得3种情况成为可能：（1）定义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时，头脑中有这一特定问题；（2）选择能直接证明核心概念，同时又合情合理、易于操作的特性；（3）设计能在时间的推移中度量变化的指数。

这些好处也使得我避免了许多摧毁了新进化论者的指数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棘手的分化概念。这个概念是从斯宾塞那里传承下来

的，但几乎不可能付诸实践。由斯宾塞学说的分化概念发展而来的某些见解，在任何关于社会发展或社会进化的有用的定义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见解的确在我的指数中出现了，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特性的一部分，通过城市规模而进行间接度量。然而，这里提供的指数确保不会陷入麦圭尔（McGuire）在新进化论者对分化的研究中发现的那些陷阱。

同时，这个指数也避免了与任何特定的社会进化理论密切结合（相反的是，比如说，与卡内罗的量表分析倒是密切结合，而量表分析又是与直线发展的阶段理论明显相关联的）。这个指数也同样便于度量是否所有社会都的确是沿着卡内罗提出的路线发展的，或者自组织临界性是否始终符合长期、大规模的社会变迁。

本章介绍的方法对于解决分析单位问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问题曾令20世纪的社会进化论者痛苦不堪。这里介绍的办法，也使得在东方和西方各确定一个核心地带，有了很大的灵活度，由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而不是由它们的周边区域来决定。

这对于通过城市规模这个变量间接度量的社会组织特性，也非常适用，尽管它并没有完全解决能量获取、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单位定义问题。对于这些特性，仍然有可能有倾向性地确定一个核心，有意地将高分和低分的地区结合在一起，人为地制造出较低的总体分数。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将下面这个问题称为“彭慕兰问题”：历史学家彭慕兰注意到，认为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比中国发达的历史学者们，经常试图以一种不相称的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即以欧洲一小块发达的核心地带——通常包括英国和低地国家——与整个中国相比较。彭慕兰指出，更相称的比较，应当是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比较，或者将整个中国与整个欧洲相比较。

我的指数应对彭慕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要求分析必须清楚。表2.1清楚地显示了在每个时间点上，哪个地方被认为是每个地区的核心地带。该表允许批评者们挑战定义，提出另外的核心地带，并显示出他们的修改将会如何改变分数。将假设暴露于挑战和歪曲之下，给指数建设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基础，比试图制定能应对一切可能性的规矩要好。

最后，说说定量分析的问题。长达50年的关于社会进化的数值方法的辩论，其主要教训是辩论本身就跑题了。有些学者从原则上就反对定量分析的办法，另一些学者反对定性分析的办法也同样是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但两派学者都错了。有些问题只能用定量的办法来回答，而有些问题只适用于定性的办法。如果“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果真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定量分析，使用一个能向我们展示需要解释的历史轮廓的社会发展指数。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70年前，莱斯利·怀特曾说，能量获取应当是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的复合性层次要想随时间的推移而维系，除非它们能自由地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能量，人类及其社会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氧气，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的复合性层次在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瓦解：如果没有水，我们几天后就会完蛋；如果没有食物，我们至多撑上几星期，也要呜呼哀哉。如果将多个人聚在一起创造超个体，人们就必须获取更多的能量，这使得能量获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在说“能量获取”时，指的是人类全方位的能量获取，最重要的有：

> 食物。无论是直接消耗，还是喂养牲畜以让它们提供劳力，还是喂养肉畜以供随后食用。
>
> 燃料。无论是用于做饭、取暖、制冷、烧窑或烧炉，还是用于为机器提供能源。燃料既包括木头、煤炭、石油、天然气，也包括风能、水能和核能。
>
> 原材料。无论是用于建筑、金属制品、制陶、制衣，还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如此定义的能量获取与更普遍使用的生理幸福感尺度有关，但要宽泛一些。生理幸福感尺度包括诸如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NDI（国民可支配收入）等。实际工资衡量校正了通货膨胀的个人收入（无论是以现金还是其他形式获取）；GDP衡量消费、生产添加的价值和一国疆域内产生的收入；GNP衡量的是加上或减去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来的净收入的GDP；而NDI衡量的是GNP加上或减去以货币或其他形式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的净转移支付的GNP，包括税收和馈赠。GDP、GNP和NDI只需各自简单地除以研究地域的人口数量，就可转换为人均数字。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人均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和人均NDI，而不是能量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度量标准在现代经济体（即1800年后的西方、1900年后的东方和1950年后的世界其他地方）中，比种类更广泛的能量获取记录要完备得多。然而，如果在时间跨度极长、生存实践的本质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做比较，能量获取是一种更灵活的度量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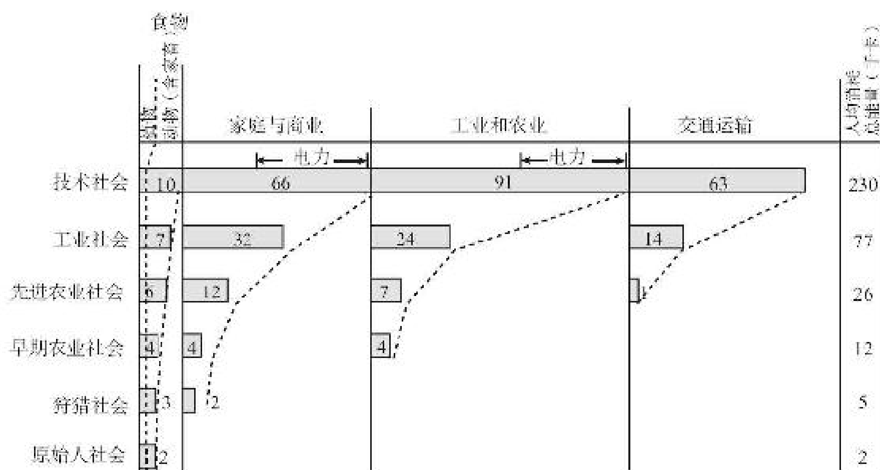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关于人类的能量使用情况，涌现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贡献者有医学

研究者、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然而，相形之下，很少有人尝试对其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而且由于不同的研究者专注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特点（比如，食物消费、净能量使用、物质生活标准、总消费等），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度量（比如，每人每天千卡消耗量、出生时预期寿命、实际工资、身高等），或者对变化进行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使得即使只是形成总体概貌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任务。因此，我首先要更严密地定义我的一些术语。

我的总体框架要从一幅广为引用的图说起（见图3.1）。这幅图最初是于1971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在该图中，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对狩猎–采集社会、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民）、先进农业社会（大约公元前1400年欧洲西北部的农民）、工业社会（1860年左右的西欧人），以及他本人身处的北美和西欧的技术社会的典型的人均能量获取，进行了粗略估计。库克给4项指标打了分：食物（包括喂养的家畜）、家庭和商业、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此图表成为研究能量获取情况的历史学家一个常用的出发点。

图**3.1** 厄尔·库克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能量消费（以每人每天计算）



资料来源：库克，《能量流》（*Flow of Energy*），137页。

库克将食物能量与非食物能量区别对待，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对食物能量的消费是具有极大的强制性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值远低于平均每人每天2　000千卡，人们就会变得虚弱而无法劳动。他们将丧失身体的机能，过早死去。然而，如果食品能量的输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4　000千卡，人们也会变得肥胖，患上极其严重的相关疾病，同样会有不少人过早死去。（营养学家通常会用“卡路里”来描述物理学家所说的营养“千卡”，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上列出的含热量实际上指的是千卡。）

食物能量的消费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部分是因为人们会在诸如谷物等“廉价”热量食物和诸如肉之类的“昂贵”热量食物之间来回摆动（大致估算，消耗10千卡的植物才能生产1千卡的肉类）。在肉类丰富的21世纪，饮食通常会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0 000千卡。然而，在非食物的表中，能量消费变化得更显著。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消耗的非食物热量都相当少：他们需要生物量用于烹饪、燃料、衣服、武器、篮子和个人饰品，但通常居住在非常简陋的栖身所里，只有极少的实用物质产品。农业社会通常有数量多得多的坚固房屋，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工产品，而现代工业社会无疑更是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非食物产品。在最简单的热带狩猎－采集社会，总能量获取量（食物＋非食物）大致会低至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而在当代美国，这个数字则会高达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全球平均数现在大约为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均非食物能量都是趋于上涨的，但人们没有多少办法将非食物热量转化为食物。结果，增加食物热量的困难成了扩大人口规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其《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应当始终牢记，食物与加工产品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可以促使它们需要多少就能生产出多少。然而对食物的需求，绝对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甚至在史前时代，非食物能量都能稍稍缓解食物供应的压力。例如，提供肥料、改善交通以使食物从充裕的地方流动到匮乏的地方，还可以提供燃料以加工食物。然而，直到19世纪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于马尔萨斯在世时——交通、加工、肥料和科学干预才对食物供应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得人类的身材、寿命和健康状况得到不断改进。

尽管马尔萨斯和库克的研究都很出色，对长期经济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们仍通常会忽略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差别，只专注于食物，他们的结论是：自一万年前农业发明到200年前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最被广为引用的最近的一次讨论中，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清楚地表明：“（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 000年时好。”但他的论断是错误的。正如马尔萨斯所认识到的，如果良好的天气状况和先进的技术或组织促使了食物产量提高，人口往往会增长，消耗掉盈余的食物，迫使人们消费更少、更廉价的食物热量，然而尽管人均食物供应有下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在整个全新世却得到了稳步的累积。

库克提出，虽然典型的狩猎－采集社会只能获取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到早期农业社会时便提高到8 000千卡，而工业革命前先进的农民所获取的达到了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我重新构建的框架认为，从长远看（暂且忽略几个暴跌期），自大约公元前12700年冰期结束后的13 000年间，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提高得较缓慢，但却很平

稳，直到罗马时代的意大利——最先进的古代农业帝国的核心地带——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这似乎是前工业社会可能达到的上限，相当于经济史学家E·A·里格利（E. A. Wrigley）所说的高级有机经济体和化石燃料经济体之间的界限。

在将近2 000年间，农业帝国不断冲击着这个上限，但却无法突破。到了十七八世纪，当全球化达到了能使植物和动物在大洲之间流动的程度时，投入到交通运输业的热量开始间接地转化为食物热量。然而，直到19世纪，企业家们学会了将煤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动能后，非食物能量获取才得到了极大增长，使之能够转化成食物热量。这便将人类从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中解救了出来——至少目前如此。

库克的估计当然只是个起点，因为他只提出了6个数据点（原始人社会、狩猎社会、早期农业社会、先进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没有尝试区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他也没有提供他估计时使用的资料来源。因此，在重新探索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时，我先将库克的数据作为出发点，为给定体制内“正常”的消费建立一个数量级，然后利用更详细的证据，估算出每个时间点上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实际上距离这些正常的数据有多远。

度量的单位

在书中，我使用下列传统的度量单位及缩写：

1卡＝将1立方厘米的水的温度提升1℃所需要的热量

1卡＝ 4.2焦耳

1焦耳＝ 0.238卡

1英制热量单位＝ 1 055焦耳

1吨小麦当量＝ 3 300 000千卡

1吨原油当量 ＝ 10 038 000千卡

1公升小麦当量＝ 0.78千克小麦当量＝2 574千卡

1兆焦＝239 999千卡

1瓦特＝ 1焦耳/秒

1马力＝ 750瓦特

成人基本生理需求所需食物热量＝2 000~2 700千卡（＝8~11兆焦≈90瓦特）/（人·天）

证据的本质

关于能量获取的可靠的统计资料，在东方的核心地带，只能部分回溯到20世纪，在西方也只能回溯到19世纪早期。即便如此，这些资料通常也都会遗漏大量的农业社会用于燃料和建筑的生物量。零星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可追溯至19世纪，在西欧可至少追溯至17世纪。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只有文本记录，偶尔才有一些计量文献，在中国可回溯至公元前12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这些资料都无法提供像现代时期那样可供了解的细节。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就越必须依赖于考古证据和比较证据。前者有时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谷物和技术的非常清晰的画面，以及关于贸易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然很重要的感觉。结合现代语境中记录良好的关于类似的谷物、技术、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能量产额的比较证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能量获取。我们偶尔也可以对照一些完全不同类别的证据，如冰蕊和泥炭沼的污染记录等，反复核查结果。

将这样形形色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个挑战，需要时常施展猜测的功夫。一方面，这使得专家们对于公元19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1700年之前的西方的精确分数，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另一方面，证据的确形成了没有专家会质疑的历史上能量获取的参数。例如，没人会认为公元1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大约在伊拉克－埃及一带）或东方的核心地带（黄河流域）的能量获取，会像1 000年后的美国或日本一样高，或者就此而言，像1900年、1800年，甚至1700年时的核心地带那样高。同样的，也不大可能会有专家提出公元1000年时西方的能量获取会和1 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一样高，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同意，那时的能量获取会比大约公元前1000年“黑暗时代”的地中海地区高。在东方，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比在公元1年左右的汉朝要高，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更是要高得多。任何违背这些看法的结论，都会招致严密的审查。

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约略的能量消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误差幅度控制到足够小，从而大概估计能量获取状况，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于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究竟是长期注定论，还是短期偶然论，抑或根本是某种其他理论。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计算不同时期的能量获取的最好方法，是从最广为人知的时期向最

不为人知的时期推算，因此我不是从公元前14000年起始，不断向前推进至公元2000年，而是让我的讨论从目前开始，回溯至公元1700年，然后向后进行两次大跳跃，再去填补三个时期之间的沟壑。第一个跳跃是跳回到约公元前500～前200年的古典地中海世界，有好几位经济史学家新近提出了一些消费水平的数据；第二个跳跃是跳回到我们故事的开端，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这个时间点上（尽管会令非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我们可以对冰期晚期狩猎－采集社会的消费，做出非常自信的估计。

表**3.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千卡/（人·天）	分数（分）	年代	千卡/（人·天）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500年	23 000	25.06
公元前13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400年	24 000	26.15
公元前12000年	4 500	4.90	公元前3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1000年	5 000	5.45	公元前2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0000年	5 000	5.45	公元前1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9000年	5 500	5.99	公元前1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8000年	6 000	6.54	公元100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7000年	6 500	7.08	公元2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6000年	7 000	7.63	公元300年	29 000	31.60
公元前5000年	8 000	8.72	公元400年	28 500	31.06
公元前4000年	10 000	10.90	公元500年	28 000	30.51
公元前3500年	11 000	11.99	公元6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3000年	12 000	13.08	公元7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500年	14 000	15.26	公元8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250年	16 000	17.44	公元9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000年	17 000	18.52	公元10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750年	19 000	20.65	公元11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5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200年	26 500	28.88
公元前14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3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300年	21 500	23.43	公元14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2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5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1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6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1000年	20 000	21.79	公元1700年	32 000	34.87
公元前9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800年	38 000	41.41
公元前8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900年	92 000	100.00
公元前700年	21 500	23.43	公元2000年	230 000	250.00
公元前600年	22 000	23.97			

图**3.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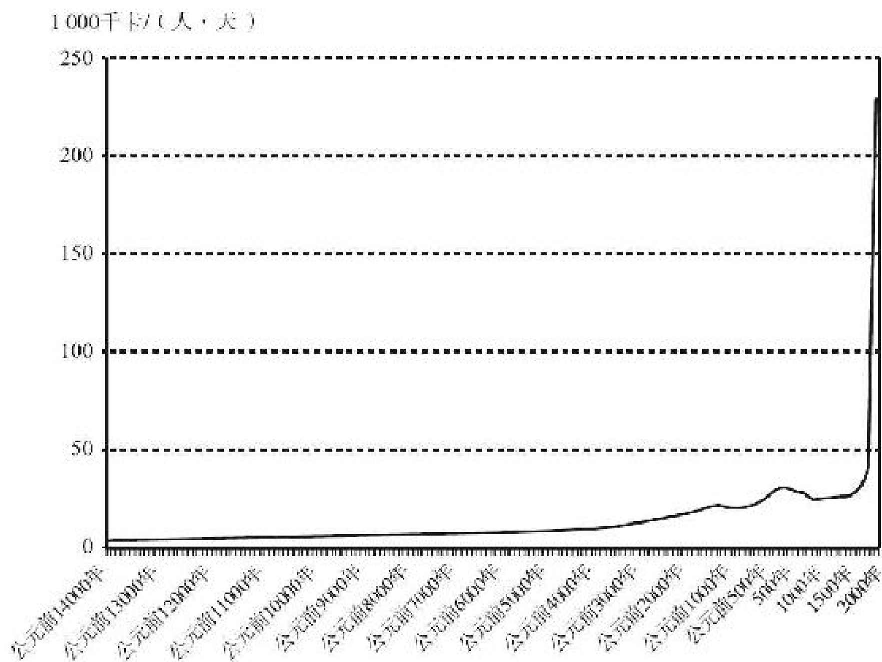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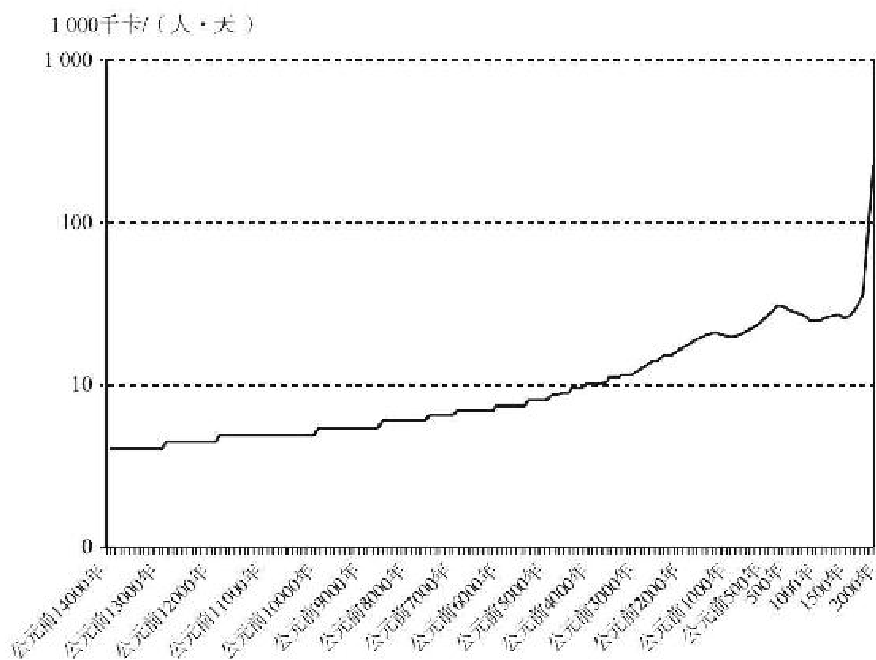


图3.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

公元2000年的统计数据质量很好，据此可以得出西方核心地带（美国）的人均获取食物＋非食物总能量为（每人每天）大约230 000千

卡。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方法，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史上最高的能量获取水平——可得到满分250分，意味着在指数中，每人每天920千卡得1分。

我们关于1900年甚至1800年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大西洋北岸一带）的资料，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完备的。有可回溯至1700年的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工业产值的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主要难题是怎样将这个信息与用作燃料、房屋和衣服等的生物量结合起来。最依赖于生物量的农民往往不会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这就迫使我们关注那些根据比较证据所做的估计，再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定性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定性证据通常极其丰富，但又必须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误差。

将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数字，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人口数据相结合，显示西方核心地带典型的能量获取数字为：1900年，每人每天约92 000千卡；1800年，每人每天约38 000千卡。据我的大致估计，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41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8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43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7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6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25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这两个数字，都与库克所估计的1860年的先进西方经济体为每人每天77 000千卡的数字完全相容，在这样的数据可等同的范围内，与遗嘱检验记录和工业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家庭用品增长的证据，看来是一致的。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比2000年的数字所容纳的误差幅度要大，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能量使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重新确定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也是相符的。

我所估计的西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在1800~1900年有242%的增长，低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的欧美核心地带工业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在估算工业产值时，生物量和肌肉力量通常完全不纳入计算，使得总体能量获取的情形被扭曲了。19世纪工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剖面是在向着取代生物量和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容许工业核心地带有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而又不至于产生环境灾难。

当我们回顾1800年之前时，不确定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但我们的估计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西方的能量获取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显然要增长得慢，但比在17世纪或16世纪则要增长得快；如果库克的推断——中世纪晚期先进的农业社会已能获取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的能量——是正确的，1700年左右早期现代化的西北欧所消费的能量，一定在每人每天30 000~35 000千卡。

1700年和14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比率大致为5：4，这一

猜测是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做出的，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房屋质量的改善，家庭用品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改善，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昂贵热量消费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等等。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欧的人均GDP在1500~1700年，从798美元（以国际元来表示，这是一种与1990年的1美元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假设单位）增长至1 032美元。有好几位经济学家都认为麦迪森的数字低估了，但其总体趋势似乎没有错误——只要我们记住几乎所有的计算结果似乎计算的只是非食物热量。成人的身高是反映儿童营养水平的强有力的指标，但在1700年与在1400年似乎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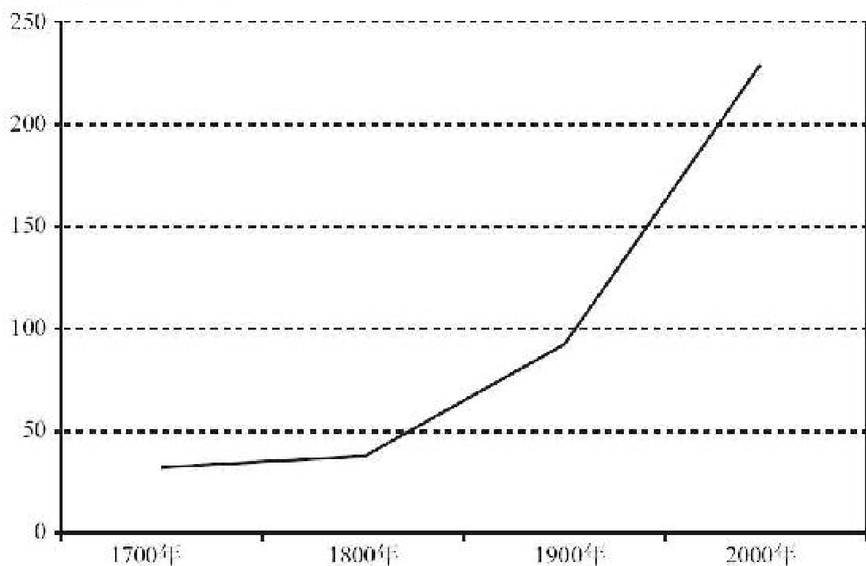
我的数字——1700年为32 000千卡——当然是个推测，但我认为误差不超过10%，原因如下：

一是，如果西北欧的消费在1700年时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但是到1800年时只增长到38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工业和运输业上消耗的所有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所展示的，实际工资在1750~1800年也许是下降了，随后也增长得很缓慢，直到1830年，因为新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大量利润，又进行了再投资）。

二是，西北欧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时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假如在1700年仍然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贸易、工业、农业和林业在15~17世纪，怎么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迅猛发展，而能量获取增长得却这样缓慢。

三是，假设西方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后迅猛上升，在1700年左右却仍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将1400年的数字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压低至每人每天20 000千卡，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或者承认，（按前现代化的标准）生产力极高的14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还不及大约3 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南地区，这似乎不大可能；或者承认，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能量获取还要低，或许在每人每天15 000千卡左右，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将更早的数字压得更低。由于我们可以为后冰期时代的能量获取设一个至少每人每天4 000千卡的下限，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压低到每人每天15 000千卡，这么一来，像公元前1500年左右乌尔这样的考古遗址有坚固的房屋，而像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以色列的恩马拉哈这样的遗址只有非常简陋的栖身所，两者之间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图3.4 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

过去几年，有几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尝试量化古典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工资和人均GDP。这些计算虽然与本书所定义的能量获取不是一回事，但是迈出了非常有益的一步。

实际工资

我们有关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工资和食物价格的信息，参差但有用，据此也能计算出部分时期和地方某类人每天能买得起的小麦的数量。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循早期现代史学家扬·范·岑登（Jan Van Zanden）之例，将古代的工资数据换算为“小麦工资”，借以表示一名工人一天收入可以买到的小麦的公升数。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以及1公升小麦（0.78千克）含2 574千卡，我们就能计算出由工资水平代表的能量获取情况了。

沙伊德尔证明，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不久，一名雅典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每天可以购买含有超过22 400千卡能量的小麦，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到相当于每天33 500~40 000千卡。这是极高的数字了，接近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了。

沙伊德尔关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的数据，变化要大得多。其中罗马城的工资居于相当于每天15 500~43 000多千卡，而庞贝的每日工资是12 000~30 000千卡。这些数字的平均值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但正如沙伊德尔所指出的，考虑到变异量，很难过多相信这

个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但在将实际工资与能量获取相关联的道路上，也有后退的两步。首先，正如沙伊德尔本人所强调的，数据点如此分散，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典型。这种情况只有一例，在古代欧亚大陆的西部，即公元前385～前61年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许多商品的真正详细的一系列价格，然而价格波动得也很剧烈。由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连几个世纪无资料的情况，只搜集到单独的价格点，我们很可能会被零星信息误导。

其次，工资水平与总体的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朗。我们只有少量行业的工资信息，许多人也许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货币化经济中从业的，他们在家庭农场或家庭商铺中谋生。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工资数据是由诸如军饷和担任公职的俸禄之类的国家雇佣主宰的。在这些部门，国家担任了独家垄断买方的角色，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与私有领域的关系变得很难琢磨了。

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人均GDP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

	千克小麦当量（人·年）	千卡（人·年）	千卡（人·天）
霍普金斯	491	1 620 000	4 438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843	2 780 000	7 616 仅算意大利：12 712
特明	614	2 030 000	5 561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经沙伊德尔、弗里森的数据调整）	620	2 050 000	5 616 仅算意大利：9 370
埃及“概况”（沙伊德尔、弗里森）	390	1 290 000	3 534
埃及“可观数字”（沙伊德尔、弗里森）	940	3 100 000	8 493
沙伊德尔、弗里森	714	2 360 000	10 710

301年，戴克里先价格法令（根据艾伦的资料）	204	670 000	1 836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特明，《估算GDP》(*Estimating GDP*)；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

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表3.3 能量密度

密度	能量	能量密度（每千克兆焦）
食品		
极低	蔬菜、水果	0.8~2.5
低	薯类、牛奶	2.5~5.0
中等	肉类	5.0~12.0
高	谷物和豆类	12.0~15.0
极高	食油、动物脂肪	25.0~35.0
燃料		
极低	泥炭、生材、草类	5.0~10.0
低	作物残茬、风干木材	12.0~15.0
中等	烟煤	18.0~25.0
高	木炭、无烟煤	28.0~32.0
极高	原油	40.0~44.0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General Energetics*）

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考古证据

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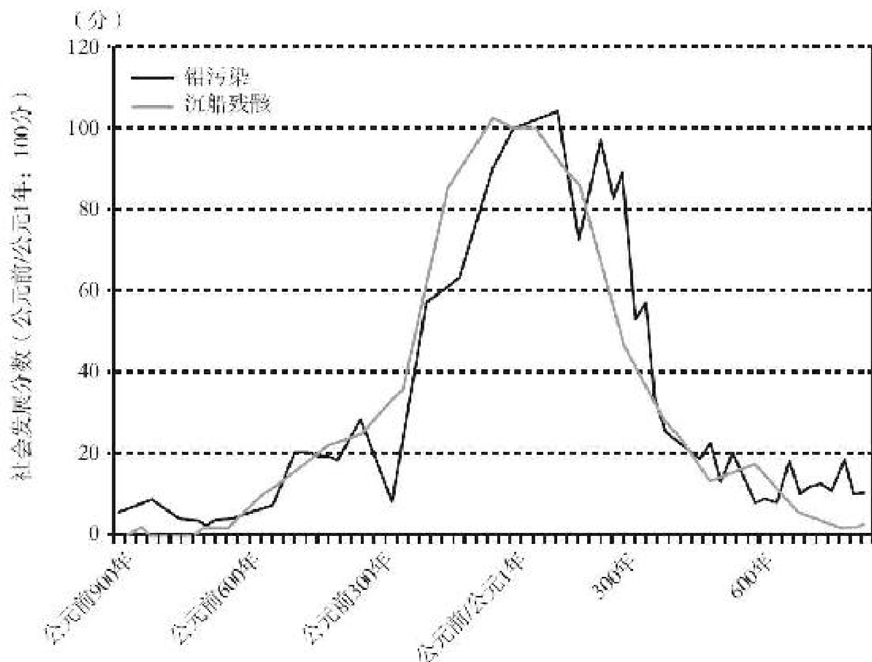
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图3.5 船只残骸和铅污染情况所显示的公元前后第一个千年经济增长和下跌情况



资料来源：帕克，《古代船只残骸》（*Ancient Shipwrecks*）；许兰德等，《精炼前工业化时代》(*Refining the Preindustrial*）

像在希腊的情况一样，房屋证据的信息量也许是最大的，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an）和杰夫·克朗目前正在搜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埃及和意大利的资料已经表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典型的罗马房屋甚至比古希腊的房屋还要大，而且（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复杂精细的水管设施、排水系统、屋顶和地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房屋。

罗马考古遗址物质产品的激增甚至更令人惊讶。轮制的、烧制得很精美的陶器，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瓶，还有贱金属的饰物和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分布图也显示，到公元200年时，贸易网络之广大和密集，远超后世，至少要到17世纪才又恢复到那时的水准。与帝国正式边界之外很远的印度的贸易规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数据表明，通过考察实际工资，尤其是人均GDP的办法来研究罗马经济，会低估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使用情况。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均GDP计算均以人类对食物热量的生理需求为出发点，对非食物消费进行了随意的“提高”，既没有考虑生物质能量的比较证据，也没有考虑非食物消费异乎寻常的激增的考古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今出现的最大的“提高”为75%，但比较证据表明，对于复杂的农业经济来说，这个数字甚至都太低了。

库克总结说，即使对于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提高”的幅度都应在300%以上。考古证据很清楚，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

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绝非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确定应当对其“提高”多少，但考古证据给我的启示是，应当比古希腊高出许多，很可能应提高400%以上。因此，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总能量获取能力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这一估计使得公元100年左右的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对罗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比人均GDP的估计更乐观的评定，但能解决对罗马经济观察方法不一致的问题。麦迪森的数字显示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与1500年的西北欧最相当，不过他随后又指出，罗马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与约1700年的西欧更接近，而不是约1500年。虽然沙伊德尔和弗里森也曾总结说，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的经济不像1580～1600年的荷兰或168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那样复杂、精细，但他们的确提到过，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表现要好得多。经济学家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只知道另外还有两个人，曾试图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计算整个罗马帝国的能量获取。第一次讨论是瓦茨拉夫·斯米尔在其《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Why America Is Not a New Rome*）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旨在彰显当代美国和古罗马之间的不同。斯米尔非常正确地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两者在能量获取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斯米尔在试图证明这个非常有效的观点时，所提供的罗马人能量使用数据是难以置信地过分低估了。他认为当代美国人使用的能量比罗马人高出30~50倍，这将使罗马人的总能量获取数值定为每人每天4 600~7 700千卡。如果我们假设其中大约2 000千卡是食物（这意味着忽略考古证据所显示的来自肉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的相当高的昂贵热量消费水平），那么就只剩下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来涵盖所有其他能量消费了。为了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斯米尔提出罗马人使用的燃料每人每年只有相当于180~200公斤的木材，或者说大致为每人每天1 750~2 000千卡的热量。

这些数字与关于罗马人的消费状况，或罗马时代沼泽、冰蕊和湖床的铅污染程度的考古证据不相符。斯米尔的数字与他在《世界历史的能量》（*Energy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使用的前现代时期生物量的数据，也不兼容。斯米尔对罗马的估计，使其能量获取能力与一些有记录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为伍。我本人的估计与洛·卡西欧（Lo Cascio）和马拉尼马的计算大致相当，我们都将巅峰时代的罗马（约公元100年）的能量获取能力与1700年的西北欧相提并论，而麦迪森和沙伊德尔、弗里森则认为其与16世纪的西北欧相近。然而，斯米尔在《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一书中提出罗马人获取的非食物能量只有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这就将罗马人的水平降至不足斯米尔本人在《世界历史的能量》一书中估计的18世纪的西北欧能量获取数字（每人每天21 700~43 400千卡）的1/8了，使罗马人更接近于狩猎－采集社会，而不是早期现代农业社会。所有其他类的证据都使之显得实在太低了。

第二个讨论是保罗·马拉尼马在他的论文《罗马世界的能量消费和能量危机》（*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risis in the Roman World*）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其在2011年罗马美国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该论文的附录之一直接回应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论点，提出罗马人获取的能量在巅峰时期为每人每天6 000~11 000千卡。这大致是斯米尔所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却不及我的数字的1/3。

我们的计算之间的某些差异是明显的。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类型的食物能量有不同的成本；通常要耗费大约10千卡的饲料才能产生1千卡的肉食，这意味着向肉类消费转变的时期，也是人均能量消费增长的时期。以面包和水为食的人，也许会像以牛排和香槟酒为食的人一样，吃掉同样千卡数量的食物能量，但食用牛排/香槟酒代表着高得多的总体能量消费水平。考古证据表明，罗马时期大多数人的饮食成本都有巨大增长。这在罗马本地最为显著。葡萄酒和橄榄油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泰斯塔西奥山，但即使在最简陋的村落遗址，也出现了向更昂贵的食物热量转化的惊人证据，覆盖的人口达数千万。虽然普通罗马人的饮食并非牛排和香槟酒，但的确他们至少有橄榄油和进口葡萄酒。

马拉尼马将用于建筑、工业和运输的材料排除在了能量内容之外。在罗马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不会对计算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工业和运输业一直非常简单。但考古证据又一次清晰地显示，罗马时代与前罗马时代最巨大的反差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

马拉尼马在定义上的判定，不断地创造着比我的分值要低的能量获取分数。而同时这种情况又不少见，那就是当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例如，对于罗马帝国役畜的数量及因此而消耗的饲料量的人均数值，或者对人均消耗的木材量的猜测），而选择了较低的估计数字时，我们的差异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些差异合起来，就会使我们每个人所估计的提高的幅度越发不同。

如果争论纯粹是定义上的，那倒不是很重要，因为马拉尼马和我都竭尽全力地做到了清楚、直白，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想了解的问题，选择使用相关指数。然而，马拉尼马还提出，我所得出的罗马帝国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了。他认为我的数字意味着罗马人获得了比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还要多的能量，而且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强度（即消费的能量与GDP的比值，或者基本上是耗费1千卡所能赚取的美元数）是1800年的西欧的两倍。

马拉尼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我对罗马帝国核心地带能量消费所做的每人每天31 000千卡估计，与他本人的欧洲人在1800年只能获取大约每人每天15 000千卡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的数字比我得出的1800年左右西欧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为每人每天38 000千卡的数字低了很多。我的数字来自库克、斯米尔和麦迪森的计算，因为纵观19世纪前的时期，马拉尼马定义的能量获取比库克的和我的都狭窄得多。结果，马拉尼马

计算的1900年前的分数，始终只有我和库克计算的一半左右，所以，将我计算的100年的能量获取数与他自己计算的1800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只能产生荒谬的结果。我们的设想当然是不同的——按照马拉尼马的计算，西方核心地带的普通人在1800年消费的能量要比100年时的多大约75%；而依据我的计算，只多25%——但是，在罗马帝国使用的能量比英国廉价的情况下，马拉尼马认为我的分数是荒谬的，纯粹是因为他坚持将术语定义不同的指数直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将定义上的分歧视为看待数据的两种不同方式，马拉尼马的定义将导致较低的结果，而我的定义则导致较高的结果。那么引人注目的是：总体的画面何其相似。马拉尼马和我都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能量使用是稳步增长的这种旧看法是错误的。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甚至到20世纪时，我们的画面仍大致是相似的。依照我的定义，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5）；而依照马拉尼马的定义，在西欧，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41 5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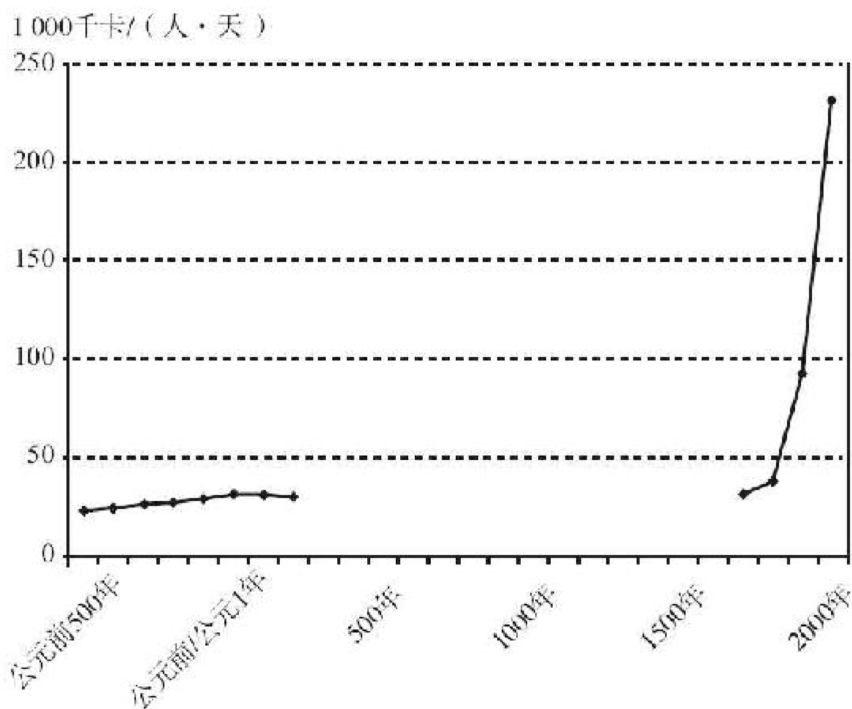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将马拉尼马的计算和我的计算相对比的方法，会忽略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当我们只观察过去2 000年时，这两种方法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观察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的历史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从拉斯科时期到泰斯塔西奥山时期，人均获取能量一定大致翻了一番（从养活能生存的人口所需的最低水平，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约8 500千卡），而我则认为应当增长了七八倍，增长至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马拉尼马倒不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离谱。正如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克拉克曾说，“（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然而，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在公元前14个千年间，能量获取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5%。而我的数字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02%，这个速度也不算快，但使前现代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一幅非常不同且更真实的面貌。

在本章较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到过，对罗马世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试图探究罗马的实际工资或人均GDP，却很少有人关心考古记录的杂乱的细节。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似乎往往对罗马世界与史前社会之间的鸿沟，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马拉尼马对度量什么和如何度量所做的设想，没有抓住罗马帝国的生活与像耶利哥那样一万年前的农业城镇的生活，以及像南非的平纳克尔角那样10万年前的定居点的生活之间的反差。观察非常长期的能量历史，需要更完备地研究考古记录，也需要采用像库克那样的先驱人物们创新的方法。能量流之类的问题对研究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至关重要，而库克等人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比马拉尼马的方法要敏锐得多。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图3.6显示了我对古代时期（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现代时期（1700～2000年）的估计。

图3.6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估计数字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下一个挑战是填补古代地中海地区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数据之间的漫长鸿沟。我把这1 500年分成了3个阶段：200～700年、700～1300年、1300～1700年。

衰退（200～700年）

图3.5显示了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工业和商业活动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味深长的衰退，说明能量获取也在下降。

原则上讲，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著名法令，应当能使我们了解4世纪初时的实际工资情况，从而为我们提供起点，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简单。根据沙伊德尔的计算，从该法令所推测的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每人每天9 376千卡，低于

1~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不过存在很大的变量，12 000千卡上下）。然而，罗伯特·艾伦的计算显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 439千卡，和18世纪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一样低，即使把工资全部用于购买食物，也维持不了太久。无疑，这个法令似乎说明从公元150~301年，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建议将其中的数字权当痴心妄想，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相距甚远，他们恐怕是对的。

最近几项对考古证据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公元200~700年间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印象，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变化的详细情况和速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殊为不同。一些新的能量获取手段，例如铧式犁和水车的使用，在公元200年后变得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罗马核心地带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的北部边缘地区，但是总体趋势是显著地在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除非罗马晚期考古的专家们能够更精确地对考古证据进行量化，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公元200~700年的概貌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高大房屋被木头和泥土建成的矮小房屋取代了；铺砌的街道被泥土道路取代了；排水沟和高架渠被废弃了；人的寿命、身高和数量都下降了，存活下来的人们从城市流向了农村；远程贸易衰落了；简陋的手制陶器取代了精致的轮制陶器；木制和骨制的工具使用增多，而金属工具减少；工厂纷纷歇业，被乡村匠人或家庭手工业者取代。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提出，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下降，是从1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图3.5显示，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了。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但是从5世纪开始的第二轮暴跌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450年，不列颠岛的极西北部便显示出物质财富的骤降。到500年时，高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600年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700年时又吞没了北非和爱琴海沿岸的拜占庭核心地带。

公元400~700年，崩溃的浪潮从西北席卷东南，通常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式，正如新近对6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西部的萨迦拉索斯遗址的公共厕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所证明的。研究显示在当地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的同时，城市结构却在瓦解，呈现出明显矛盾的画面。然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整体效应却是明显无误的。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收缩了，缩小到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地域的缩小是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是相应的。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为公元200~7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的下跌并非是灾难性的。在埃及和伊拉克，灌溉系统、城市和基本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完整无缺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许反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如意大利地区的6世纪，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7世纪），人们仍然采集木头，生火做饭，做

着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致相同的事情。然而，总体能量获取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例如，最近对英国所做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7世纪时，非常简单且千篇一律的谷物食物，代替了罗马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

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600年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但详细情况却难以说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能量获取的关注度相比同行要低。

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已收缩至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有一些证据表明，8世纪或9世纪是叙利亚，9世纪或10世纪是伊拉克，11世纪塞尔柱人入侵时是整个亚洲西南部地区，能量获取水平都下降了，但是在700~1300年这段时期，似乎埃及始终保持着能量获取的高水平，而西班牙地区有所上升。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中，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计算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拜占庭核心地带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为大约每年68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像罗马的人均GDP的计算一样，这个数字对食物热量之外考虑很少。米拉诺维奇特别对非食物收入进行了小小的提高。然而，他的确注意到了，他得出的拜占庭人均GDP数字比大多数人估计的罗马帝国早期人均GDP数字低大约20%，比扬·范·岑登计算的1086年英国人的收入和格里高利·克拉克计算的13世纪初英国建筑匠的收入高20%~25%。所有这些人均GDP研究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说明即使绝对数字低估了能量获取水平，随时间推移的相对变化仍然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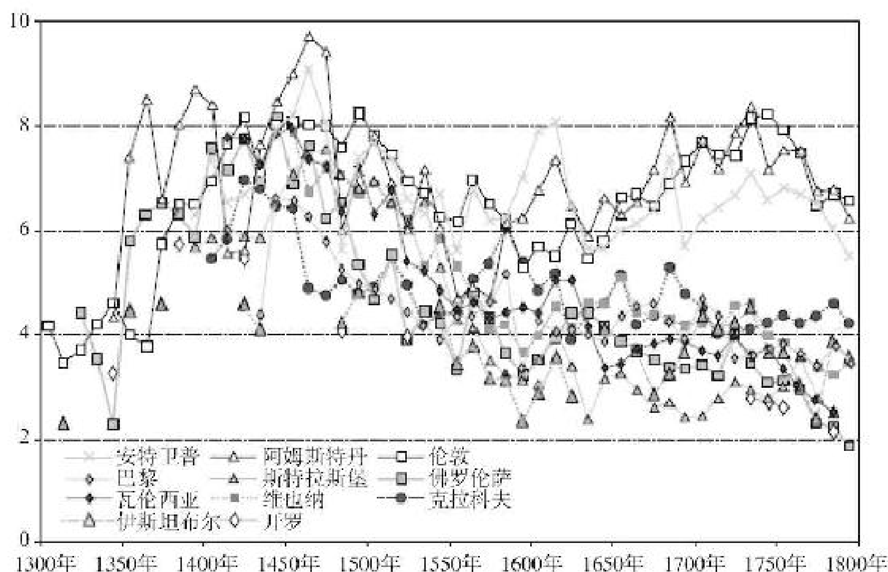
从这些对比推断，再为非食物热量做较大的提高，如果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的话，那么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约为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如果米拉诺维奇所采纳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的论断——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相当——是正确的，西方核心地带整体水平也应当达到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公元第二个千年早期，英国遥远边缘地区的能量获取水平约为21 000千卡。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么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人均GDP和实际工资的对比，也许会稍稍低估了公元100~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总体的下降情况，因为这一下降也许对非食物热量的影响比对食物热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戈德史密斯–麦迪森–米拉诺维奇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这些非食物热量。

如果这一系列推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700~1000年只有极小提高，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6 000千卡。尽管这个数字无疑与希腊的发现是相符的，但考古证据的匮乏使得这点很难得到验证。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在700~900年比较平稳地保持在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在10世纪时开始攀升，在

1000年时增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可能在13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欧洲的考古证据似乎与此相符，有家庭财产增多、坚固房屋增多、贸易加强，以及政府开支大大增多的显著迹象。甚至在遥远的波兰边缘地区，11～12世纪的饮食也比以前要丰盛得多，花样也繁复得多，但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似乎仍然是意大利。

我们不可能对13世纪的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直接的考古对比，这是令人沮丧的，但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搜集的实际工资数据显示，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的工资水平（可以推测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赶上了埃及，并领先于拜占庭；而到1400年时，意大利连埃及也超过了（见图3.7）。

图3.7 1300~1800年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帕慕克，《黑死病》（*Black Death*），第297页，图2

快速增长（1300~1700年）

如果对中世纪和近代的能量获取水平的这些估计大致是正确的，那么在1300～1700年这段时期，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增长了大约23%，从大约26 000千卡增至大约32 000千卡。这比同样时间跨度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除了公元前400～前1年这段时间，当时增长了29%——从24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古代和近代早期增长率和总体分数的近似，说明历史学家们喜欢将这些时期做类比，并非是不合时宜的。

欧洲许多城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极其详细的实际工资系列数据，如今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表明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总体减少了；1350年，黑死病加大了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后，工资得到了巨大回升；随着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人口增长，实际工资又逐

渐下降了，但是到1600年时，西北欧和南欧、东欧的工资水平拉开了距离：西北欧的工资呈回潮之势，而南欧和东欧仍在继续下跌；1700年时，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比在1350年时高出了30%，而伦敦的非熟练工人高出了80%，这两地的工资增长都高于前面提到的能量获取水平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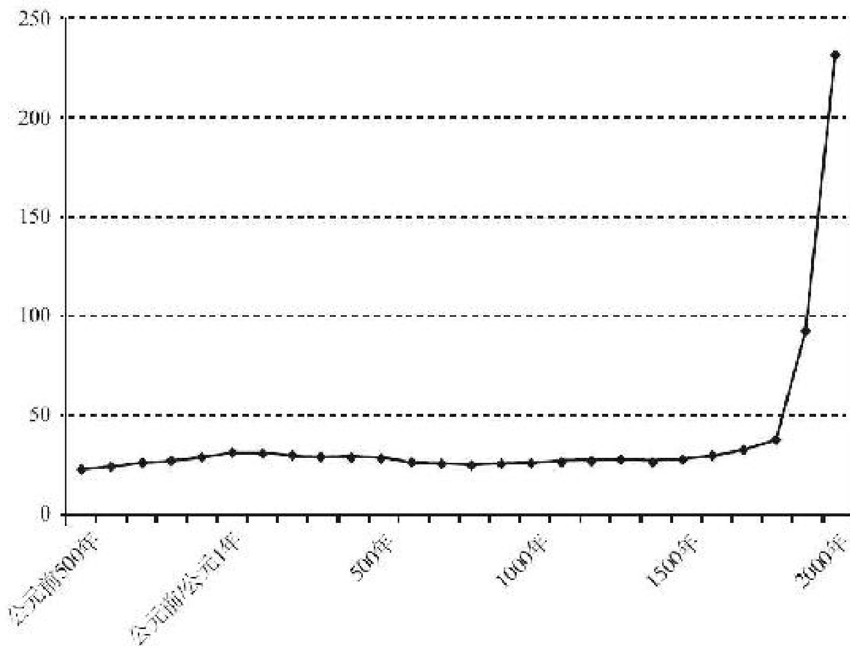
安格斯·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计使得1500～1700年这段时期呈现出极其不同的面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除了意大利，整个16世纪西欧的生产率全面持续增长。在他看来，1700年时荷兰和英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非因为它们在17世纪复苏了而其他地区却倒退了，而是因为它们比欧洲的其他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他确定在1500～1700年西欧生产率增长了29%。

像古代时一样，实际工资和人均GDP情况之所以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应解释为，度量的是非常不同的事物。西欧的领主们在黑死病肆虐后无法再任性妄为，使得资源配置大大地向穷人转移，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快得多；但随着16世纪人口回升，实力又转回贵族那一边，尽管人均GDP仍在增长，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1350年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飙升，也遮掩了14世纪的广泛大衰退的事实。衰退在很多方面损害了贸易和工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以往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严重，但14世纪的灾难和不稳定似乎仍然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但下降幅度不大。从1300年的每人每天27　000千卡降至1400年的26　000千卡，但由于缺乏关于定居点的可量化的考古证据，这只是猜测。

1300～1700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呈现上升（见图3.8），这方面的考古证据非常明显，似乎也符合我在前文中提出的23%的涨幅，尽管考古证据还没有详细到能够验证我所提出的每人每天的能量获取水平在14世纪下降了1　000千卡的看法。西北欧农业产量增长的证据非常清楚，文字资料和实物证据都表明，13～14世纪在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捕鱼量有显著增长，渔场也得到了扩张。

图3.8 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食物热量的增加仍不足以明确地影响成年人的身高，但在非食物热量中，变化要惊人得多，特别是在1500年后。遗嘱和诉讼文书中显示的细节和发掘出的遗物，全都表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1700年时西欧的房屋比1300年时的更大、更精致，物质产品也更丰富。工业生产在增长，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诸如泥炭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开始贡献巨大的能量。虽然对比肯定仍然是猜测性的，不会很精确，但17世纪时西北欧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巅峰时期（约公元100年时）。

冰期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年）

尽管也许令人吃惊，但我们在估计冰期末期的能量获取水平时，较之其后到18世纪前的任何时代，我们有更充分的立足点。尽管自农民将最后的食物采集者逐出最早的西方核心地带（侧翼丘陵区）已过去了数千年，同时，该地区的气候和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研究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能量获取的可能参数。

颇具盛誉的生物能量学和灵长类动物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我们最近的进化邻居类人猿的能量使用情况的生动画面，而经济人类学家也测出了从炎热的非洲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当代世界各地的食物采集者的能量获取情况。

已知最早的作为物种的人，180万～25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地区。他们的能量需求近似于黑猩猩，但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能人”吃

肉的次数比黑猩猩要频繁，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成为活跃的猎手，而不是拾荒者。通常需要植物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产生的大约10千卡的化学能量，才能使动物产生1千卡的动能，所以，能人已经在用昂贵热量取代廉价热量了。即便如此，能人由于身材矮小、脑容量较小、物质文化简单，可能通常也只需要大约每人每天1 500千卡的能量。

随着180万年前东非的能人进化成直立人，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得到了巨大飞跃。直立人的脑容量增长了大约40%（从610毫升增至870毫升），体重增长了75%（从35千克增至62千克），身高增长了近50%（从1.15米增至1.7米）。直立人可能已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非食物能量获取的能力，并使他们通过改造食物从中吸收了更多热量。由于大约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太少，证据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最近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地区的考古发现强而有力地证明了79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懂得使用火了。假如从木头中释放能量烹饪食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技术，那么直立人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升至大约2 000千卡。

随着原始人类北迁越过北纬40°线，他们必须摄入更多能量以应对更为寒冷的气候。英国的山毛榉坑和德国的舍宁根都发现了4万年前的人类经常使用火的确凿证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尼安德特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昂贵的肉类热量，特别是在较寒冷的地区和时间。生物能量学家估计他们通常每人每天要消费至少3　000千卡，也可能接近5 500千卡。

冰期晚期的现代人需要用于食物的热量相对较少，因此用于燃料的热量也较少，但其他类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极大地增长了。对虱子的基因分析表明，人类至少在5万年前，也可能在15万年前，就开始穿合身的衣服了。对化石脚骨所做的解剖研究也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人类也普遍穿鞋了。大约5万年前，智人也开始将少量的能量用于个人装饰，将相对较多的能量用于建设栖身场所。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发现关于原始人类盖房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至少自5万年前起，现代人开始将能量投入建筑了。从最早的时候起，修建这些建筑物就需要数千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是人们在没有山洞可以使用时，有了遮风避雨之所，就可以借助火炉取暖，使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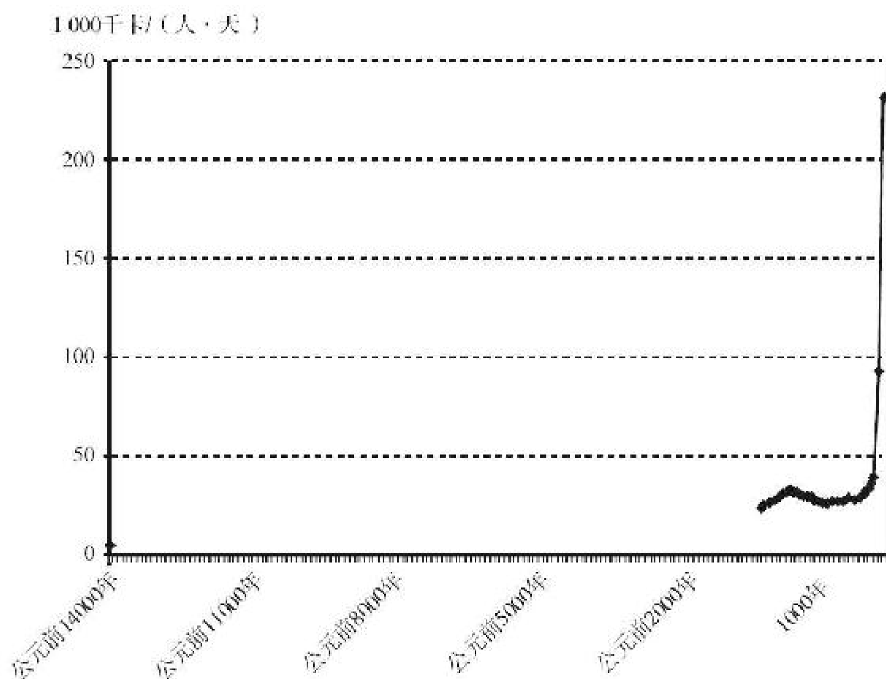
到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亚洲西南部西方核心地带，像欧哈罗这样的考古遗址，人类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食物+非食物）一定是在每人每天4　000千卡左右。我做出这样的估计，是因为食物能量不可能长期远少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低于此，纳吐夫人的物质文化就要比考古记录所显示的简陋许多；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高于此，考古记录也会比实际显得富裕许多。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14000**~前**500**年）

正如图3.9所清楚地显示的，关于冰期晚期西方核心地带狩猎－采集

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东岸城市居民，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13 5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或者是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5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10）。

图3.9 公元前14000年和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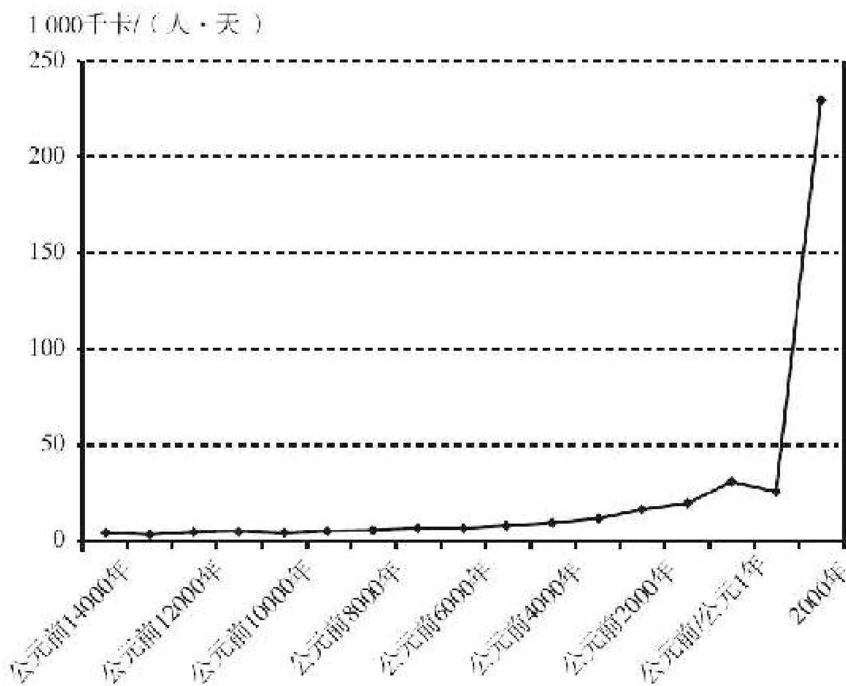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6个阶段，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于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

考古证据似乎非常清楚，亚洲西南部随着冰期末期气候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稳定、饮食越来越丰富，棚屋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了，物质文化在发展。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的考古发现表明，用于种植的黑麦在公元前11000年时，更大种子已被选出来。亚洲西南部的人仍然是采集者（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定居者），到公元前11000年时，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然更接近于冰期晚期时的每人每天4 000千卡，而不是库克所认为的早期农业社会所应达到的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3 000年至少就百分比而言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增长，即便没有按照后世的标准，认为在千卡的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的话（见图3.10），也会得出这一推论。

图3.10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每千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长达1 200年的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对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公元前10000年时，很多永久性村落似乎被遗弃了，居民回到了更具流动性的生活，在建筑和物质文化方面投入的能量也减少了；另一方面，最早的重大公共建筑出现在像柯尔梅斯德雷、杰夫–阿玛和穆赖拜特这样的考古遗址，意味着能量获取的增加。在我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至少在相关证据得到重大完善之前，先假设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与平稳的算术增长模式和几何增长模式都有了较大差异。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17%（算术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9 000千卡增至10 500千卡；几何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6 000千卡增至7 000千卡）。

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

公元前9600年后，随着天气变暖和定居生活的普遍化，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耕种恢复得相当快。在公元前9000年时的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和底格里斯河谷的多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非自然生长的小麦和大麦的大种子，到公元前8500年时就变得更普遍了，在很多考古遗址都能看到完全是人类种植的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坚硬的叶轴和外壳都还没有碾碎）。到公元前8000年时，沿着今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的边境地区延伸的侧翼丘

陵地区，将近半数的碳化的谷物种子都是人类种植的了。到公元前7500年时，几乎全部的种子是种植的了。

驯化动植物的定居生活提高了平均每公顷耕地能量获取量，并且至少在短期内，提高了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然而，多余能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养了更多婴儿，这就引发了第二个趋势。村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何级的人口增长超越了算术级的食物供给增长，使得人均食物供给跌回最低限度。这两个趋势共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显然得到了巨大提高，总体食物供应的最好情况也就是停滞不前。种植谷物的廉价热量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基于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的更为丰富的饮食。人们的骨骼记录表明，总体而言，早期的农业人口健康程度不及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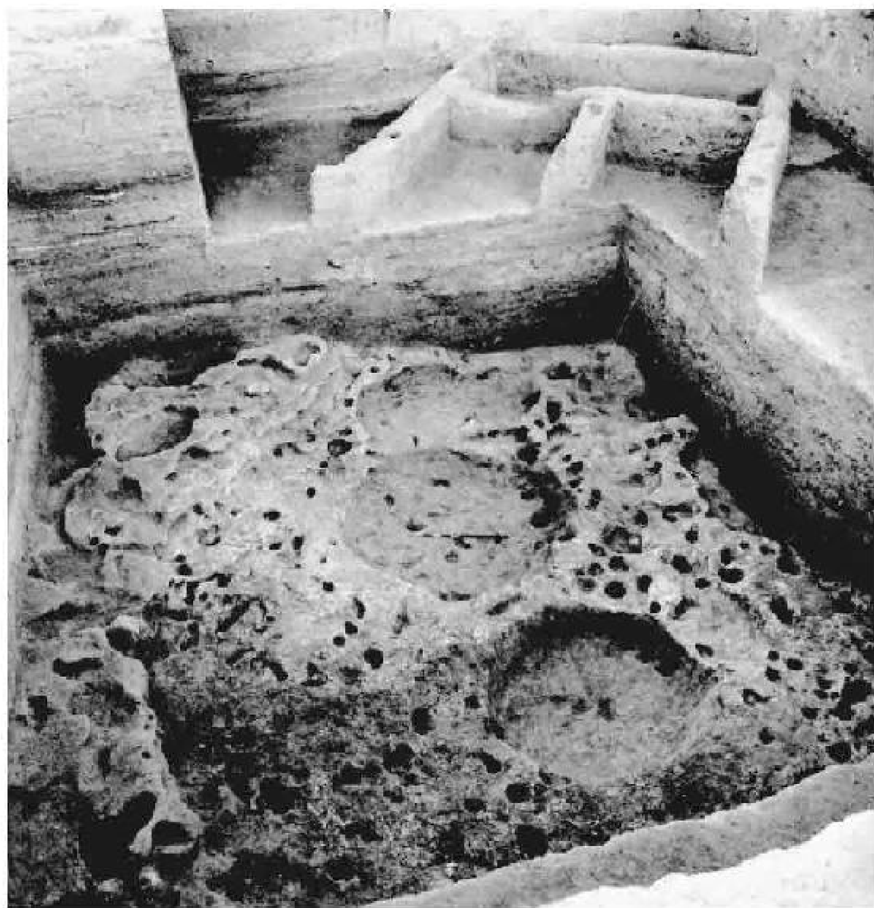
过去3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表明，自新仙女木事件后，能量获取的变化率比原先想象的要慢得多。我们不应想象发生了一场单一的农业革命，也许应当认为从用全部时间采集食物，到采集与耕种相结合，再到用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的食物逐渐替代野生食物，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最新的研究也表明，在侧翼丘陵区，这一过程大致发生于公元前9600～前7500年，经历了大约2 000年。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阶段，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转变之后，跟随而来的是时间更为漫长的食物能量的副产品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民们逐渐加强实践，发现了驯化的动植物的新用途。人们花费了很多世纪，才学会了轮换种植谷物和豆类以恢复地力；去除杂质，更有效地处理谷物；更有效地烘烤面包；约束动物用于取奶或牵拉，而不是在它们尚幼小时就把它们全部吃掉；制造更高效的犁和装有轮子的车；储藏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打井技术为溪水流不到的地方提供了水。

完整的古代干谷农业在亚洲西南部至少直到公元前4000年时才就位。到那时，除草、轮种和为庄稼施肥才全部成为常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每公顷能量获取量，即使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能量盈余都转换成了更多的人口，而不是更多的人均获取食物能量。

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依然缓慢，但已经明显得多了。就像计算后罗马时期的能量获取量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不同时期的定居点遗址。来自阿布胡赖拉的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见图3.11）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顶部是一座小而结实的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底部是一个脆弱得多的棚屋的残存，建于大约公元前12000年。如果我们将时间继续推移，我们发现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时，房屋更加牢固——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恰塔尔休于。到公元前45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欧贝德时期越发令人难忘。迈克尔·罗亚夫（Michael Roaf）曾描绘过一个相当典型并且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例证：伊拉克的玛德胡遗址，面积170平方米。那时的房屋已经用泥砖建得很坚牢了，通常会围成一个阴凉的院子，有防水的屋顶，还有很大、很好的仓储设施。

图3.11 叙利亚阿布胡赖拉的房屋遗迹。底部为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棚屋的柱坑；顶部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泥砖房屋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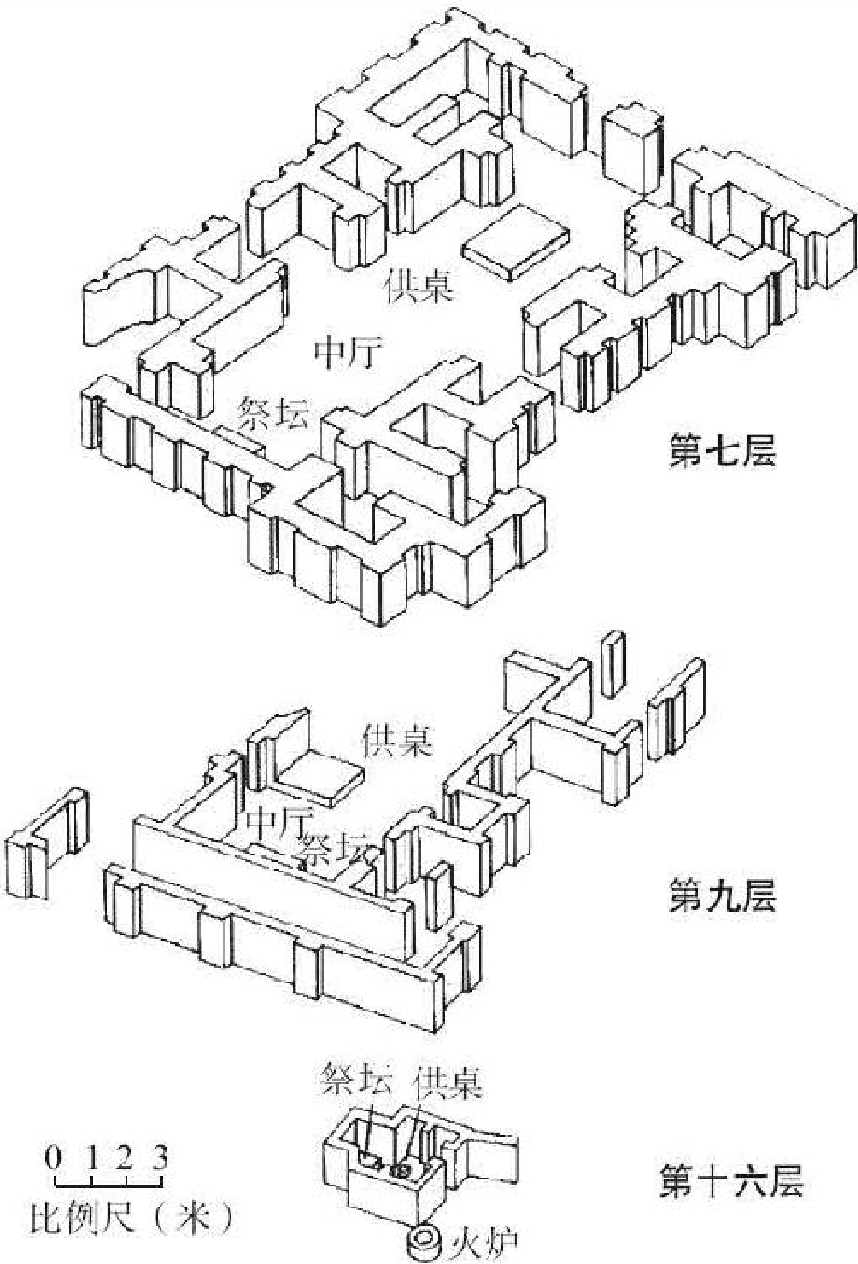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摩尔（A.M.T. Moore）、莱格（A. J. Legge）和希尔曼（G. C. Hillman），《幼发拉底河畔的村落：阿布胡赖拉，从采集到农业》（*Village on the Euphrates*：*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t Abu Hureyra*）（2000年版），第107页，图5.4

典型的家居产品也同样在增长。陶器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使用，自那以后不久就有专业的制造者开始使用陶轮了。编织似乎也在稳步发展成熟，铜质的饰品、工具和武器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使用。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考古学家对亚洲西南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居产品进行过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比较，但阿布胡赖拉（约公元前12000~前8000年）和玛德胡遗址（约公元前4500年）家居产品内容的反差，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各种各样的重大公共建筑所消耗的能量也急剧增长。耶利哥有一些早至公元前9000年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塔，但是与公元前3500年埃利都的精美神庙或者苏萨的堆积的巨大土台相比，就要逊色多了。图3.12是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埃利都神庙序列的复原图，能够像阿布胡赖拉

的房屋图片一样形象地说明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情况。

图3.12 伊拉克埃利都神庙遗迹。最底部是建于约公元前5000年的神庙；最顶部是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神庙



资料来源：迈克尔·罗亚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文化地图集》（*Cultural Atla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the Near East*），1990年，第52页

用于运输的能量也在增加。将畜力与带轮的车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

的确凿证据，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绘的牛车图。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坟墓中，出土了真实的车辆。风力和水力也得到了利用。独木舟于公元前5000年被用于打鱼；在埃利都，公元前4000年时就开始使用正经的船了。

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增长非常明显。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就公元前14000～前11000年丰富的采集社会而言，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在百分比上变化很大，但在绝对数字上，按照现代的标准却并不大。甚至到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末期，西方核心地带的人们仍然是村民，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处于图3.1中库克所谓的“早期农业社会”阶段。

古代国家（公元前3500～前1200年）

公元前3500年后，随着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创建和扩张，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增长率开始加速。但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讨论又一次无法进行，就像对旧石器时代饮食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及其他人类学分析不足一样。零散资料给人们形成的总体印象是，食物热量摄入的总体变化相对不大。

对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部分的饮食和营养，我们可以勾勒出非常简略的画面，但细致研究后会发现，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高产可能是长期趋势：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结实率上涨了（在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大麦种植可能达到了30：1），但人口似乎增长得同样快，抵消了收益。

然而，像较早的时期一样，人均非食物热量获取也有极大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属器具的普及。这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标准名称：青铜时代。据皇家官方档案记载，宫廷里有很多青铜铸造坊；考古发掘者也发现了大量的私人铸造坊；自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的石制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

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亚述和巴比伦金字形神塔，以及青铜时代的宫殿和神庙，无疑消耗了巨额的能量。约公元前2600年修建于埃及吉萨的大金字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重约100万吨。长距离贸易的规模也在迅猛扩大，尤其是在公元前1600年后，在土耳其海岸外发现的船只残骸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大量新增人口所消耗能量的增长。公元前3500～前1200年，在西方核心地带的所有部分，房屋标准和家居产品的数量和工艺都有较大的改善。

像其他时期一样，这段时期内也存在强烈的地区差异，以及突发的地方性崩溃事件。例如，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新宫殿时期（约公元前1800～前1600年）是一个十分富足的时期，有很大的房子（中等规模房屋的楼层平面都有130平方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然而，公元前1600年后，克里特岛上的非食物财富似乎下跌了，而与此同时希腊大陆却仍

在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最大的突发性崩溃事件，似乎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后的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被焚毁了，其庞大的物质文化区瓦解了；还有公元前2200～前2000年，发生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和黎凡特到埃及的整个地区（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也受到了冲击）。然而，尽管这两次崩溃都留下了清晰的考古痕迹，但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能量获取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似乎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两次崩溃实际上发生的地点都非常分散，一些遗址被毁灭并放弃了，而另一些却依然繁荣（例如在叙利亚，今塞赫那城和斯维哈特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被放弃了，而布拉克丘和莫扎却发展得更大了）。对于崩溃的根本原因，考古学家们意见不一，有些人甚至质疑使用“崩溃”这个词是否合适。

另一个原因是公元前3100年时在埃及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尼罗河谷没有受到公元前3100年崩溃的影响，尽管公元前2200年后的灾难的确给埃及造成了重大冲击，但与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作用时间不同。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古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王国都已经瓦解了，但强大的新国家乌尔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王国也崩溃了，但中王国重新统一了埃及。尽管公元前2200～前2000年这个时期留下了明显创伤，但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始终在增长。公元前1800～前1550年又一轮动乱发生时，能量获取似乎仍在增长。

还有一个原因，我界定能量获取的办法也许低估了危机对此的影响。在早期历史的这段时期，公元前2500年前，我每50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间，我每25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3500年的分数度量的是乌鲁克崩溃之前的能量获取水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也许低于公元前3100年之前（证据并不清楚），但埃及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肯定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500年时高。同样，对公元前2250年的能量获取的计算，显示的是大崩溃开始前的水平，而且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000年时仍处于混乱中，埃及的秩序已经恢复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两个分离甚远的时间点之间进行度量，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抹平现实的变化。

既然我们为城市化设置了低门槛（大约5　000人），可以说到公元前125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了，而欧亚大陆西部的大多数人已经生活在有行使职责的中央政府的古代国家中了。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库克的图表（见图3.1）中早期农业阶段的水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即使将最富裕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点，如乌加里特（毁灭于约公元前1200年），与一流的希腊定居点，如奥林索斯（毁灭于公元前348年）相比，青铜时代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仍无法与古希腊的每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相提并论。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

公元前1200～前1000年，席卷了整个西方核心地带的崩溃提供了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在受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今希腊和土耳其），城市和精美的经典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甚至在受危害最小的地区（埃及），社会上层的活动也锐减了。

至今尚无很多证据证明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但在叙利亚、以色列和爱琴海地区，住房的标准、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贸易网络的规模都急剧下降了。缺乏人体骨骼的大规模系统性对比，又一次造成了问题，但至少在爱琴海地区，成年人的死亡年龄下降了；同时，发病率增长的一些证据也肯定了成人身材呈下降趋势。

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

能量获取水平一定是急剧飙升了，才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时代后的低谷期蹿升至公元前500年的约25 000千卡。而公元前500年，正是地中海古代社会经典时期的开端。

大多数可用的资料和早期阶段所用的同属一类。像通常一样，经典建筑是最明显的证据：公元前6世纪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和巴比伦的神庙、宫殿，使此前几个世纪的所有建筑都黯然失色，就像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罗马卡皮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对扩张的核心地带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核心地带，房屋说明不了太多问题。那里有多间屋子、方方正正的房子一般面积都在50～100平方米。这种情况好几个世纪来都很普遍，但在以色列，结实的两层楼“柱屋”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变得更普遍、更大，也更豪华。再往西到地中海地区，多间屋子的方正房子逐渐取代了面积较小、曲曲弯弯、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这一过程在希腊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年时大致完成；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始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到公元前400年时告一段落；在法国南部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年时基本完成。

在希腊，关于成人身材的证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公元前1000～前500年，成年人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了，发病率也可能下降了，说明作为其基础的能量获取水平也在增长。然而，关于饮食的直接证据仍然不清楚，因为目前遗址中在食物方面的变量使得仍不可能探求现象变化。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铁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肌肉力量的效用。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早的时候，金属就已经偶尔被使用了，但公元前1100年后不久，塞浦路斯地区的锻工们开始更加系统地打造铁器。这可能是因为公元前1200年贸易道路崩溃后，获得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锡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采取对策。到公元前800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之后，铁的优势（尤其是其含量丰富和成本低廉）已经尽人

皆知了，于是铁被继续当作工具和武器的标准原料。公元前1000年，希腊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铁制的了；公元前700年，最早的铁制工具也在希腊出现了。当时铁制武器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也已得到普遍使用。

公元前800～前500年，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兼并，是西方核心地带最迅速的扩张。尽管亚洲西南部的老核心地带的经济活动无疑仍在增长，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今天突尼斯所在的地区发展得更为迅猛。最容易量化的证据是船只残骸和污染记录（见图3.5）。

对希腊以外地区的人体骨骼、住房以及其他形式的证据缺乏系统性的搜集，又一次妨碍了估算，但总体面貌似乎是清晰的：公元前1000～前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上升——也许像以前一样快。在地中海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上升得尤其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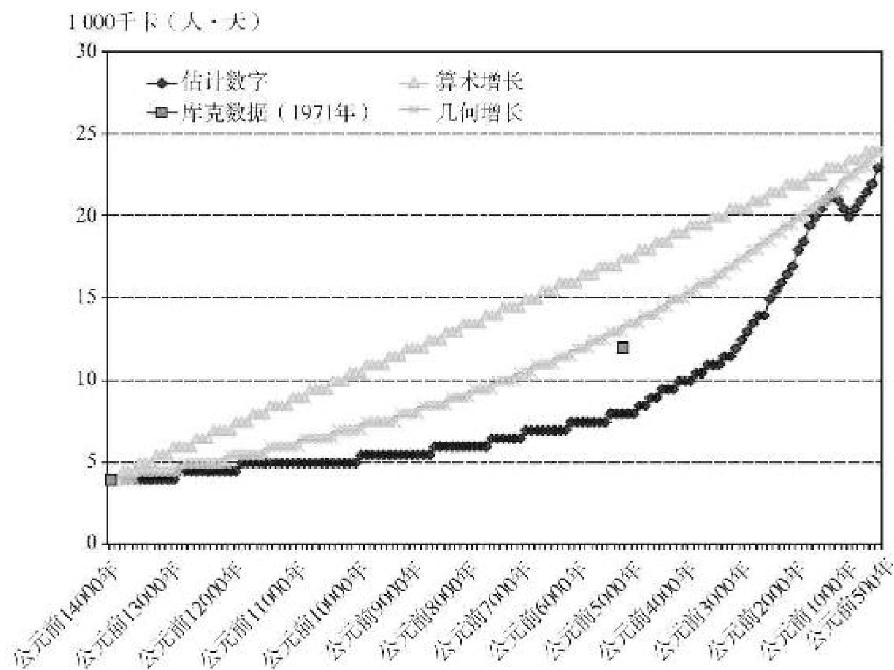
能量记分牌

要填补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到公元前500年（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13 500年的能量获取分数的鸿沟，办法之一是索性假设一个固定的增长率，无论是算术的还是几何的（见图3.13）。然而，本节讨论的证据显示，那样做将遗漏大量重要信息。

考古证据显示得非常清楚，公元前最后几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比冰期晚期和冰期刚刚结束的时期，增长得要快得多，意味着算术增长曲线肯定存在严重的误导。如果设定一个几何级的固定增长率（每年0.013%），会更大致符合实际，但即便如此，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如公元前10800～前9600年新仙女木期能量获取的中断、约公元前3500年后的显著加速，以及公元前1200年后的下跌。最好的估计曲线无疑是几何曲线和算术曲线下方的那条曲线。其增长率是指数的，但指数总体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看法，我们没有确凿的一个点，继续推进的唯一办法是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与实际的考古证据、比较证据，以及我们为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期间估计出的分数进行对比。

图**3.13** 估计公元前**14000**～前**5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能量获取水平也增长了，但极其缓慢。像新仙女木期前的阿布胡赖拉这样的定居点，相比于像欧哈罗这样的冰期晚期的考古遗址，人们获取的能量似乎更多。我猜测增长大致在每人每天1 000千卡，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5 000千卡（即3 200年间增长了25%，平均每年增长0.007%）。我这样假设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房屋面积和精致程度、食物准备的复杂程度和物质文化的扩展程度的增长，也许只代表每人每天500千卡的增长（即12.5%的增长率）；也许能代表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增长（即50%的增长率）。虽然这两个数字都过于极端了，但即使两者中有一个比我估计的每人每天1 000千卡更接近于现实，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的变化量仍然非常小，假设公元前10800年时的能量获取水平为每人每天4 500千卡，或者每人每天6 000千卡，而不是每人每天5 000千卡，对于随后的计算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新仙女木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证据有相互矛盾的迹象，所以我决定将这1 200年的能量获取情况视为没有变化。当然，这也许又是错误的。能量获取水平也许下降了（不过不可能一直跌到公元前14000年的水平），也许在继续上升（不过不会像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那样快）。不过，像较早的时期一样，所涉及的数量微乎其微，估计误差更可能是相互抵消，而不大可能相互掺和。

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似乎远大于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库克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经升

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只比上面的几何曲线所指示的每人每天13 000千卡低一点。但目前可用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似乎太高了。库克也许犯了20世纪中叶的考古学家们偶尔会犯的错误，以为农业革命只是一场单一的、极其迅速的转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耕种和驯化是一个长达大约4 000年的过程，而且这还只是在亚洲西南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不间断的革命副产品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9600~前3500年，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翻了一番，从大约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13%，几乎比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翻了一番），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到公元前5000年时就翻了一番还要多。按照库克的估计，公元前10800~前5000年的年增长率为0.017%。如果以这样的年增长率，到了公元前3500年，分数将达到每人每天15 500千卡。按照我的设想，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500~前120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能量获取水平就将达到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几乎相当于1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12世纪中国宋朝，或者大约1600年时西欧和中国核心地带的水平了。

这恐怕根本不可能。假如库克估计的公元前5000年的为每人每天12 000千卡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与后来的数字保持看似合理的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公元前5000年后能量获取的增长率急剧减缓。假如增长率降到只有每年0.015%（也就是说，比库克估计的公元前9600~前5000年的0.017%的年增长率还要低），那就将把公元前12000年的分数拉低至每人每天21 000千卡，像我估计的一样。然而，考古证据却很难与公元前5000年后增速减缓的说法相吻合。库克对大约公元前50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估计（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一定是过高了。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10800~前5000年大致增加了50%，也就是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加到大约8 000千卡（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翻了一番还要多，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至12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增长了大约1/3（从每人每天8 000千卡增至11 000千卡），那么我们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能量使用情况，及其与青铜时代的关系的图画，就合理多了。所以，公元前5000年时，能量获取水平增长至每人每天8 000千卡，然后到了公元前3500年，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

公元前3500~前1300年——大致是从乌鲁克时代到拉美西斯大帝的时代——能量获取水平大约又翻了一番，从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增长到21 5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恰好是公元前9600~前3500年增速的两倍，是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增速的4倍）。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所估计的增长曲线就在公元前13世纪赶上了几何曲线（见图3.13）。公元前1300年的数字当然有可能或高或低，但任何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低于每人每天18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都将意味着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必须假设一个奇慢或奇快的变化率。

公元前1300~前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程度是比较难以估计

的。我曾经提出，公元前13世纪的这个数字稍稍下降了一点，从每人每天21 500千卡降到21 000千卡，然后下降速度加快，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从每人每天21 000千卡降到20 000千卡（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年下降率为0.025%）。波谷的底部也许还要更深一些，那样的话，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增长一定要稍微快一些，以便在公元前500年时达到每人每天23 000千卡；波谷的底部也可能稍微浅一些，那样的话，随后的增长一定会更慢一些。然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公元前1200年后崩溃的规模实际上极小，甚至根本没有崩溃，是误入歧途了，好比提出后罗马时代也没有崩溃一样。

如果这些数字大致是正确的，那么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一定是上升了大约15%，从每人每天将近20 000千卡增至23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比公元前3500～前1200年的估计增速稍快一些）。据我的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前1年又上升了35%（从每人每天23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

在图3.5中，船只残骸和铅污染分别代表着远程贸易和金属制造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15%的增长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另外85%的增长在公元前500年之后完成。这也许意味着我对公元前1000年（其实是公元前1300年）的估计太低了；或者这也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地中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沙伊德尔估计在公元前1200～公元150年，人口大致增长了4倍），其中大部分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增加的，意味着贸易和工业的总量增长似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人均增长量却没有得到很大重视。

惊人的积累：西方能量获取

图3.2和图3.3显示了我为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所计算的分数。这样的图表就其本质而言，大量数据都是近似值。很难想象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应当问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数字是否都正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样——而是这些数字是否错误到严重歪曲了西方能量获取的历史轮廓的地步。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答案一定是：否。我计算的分数无疑都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出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过的原因，系统性误差的幅度恐怕不会超过上下20%。然而，最受关注的肯定是非系统性误差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图表的形状。

图**3.1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假设罗马的增长率较低而早期现代时期的增长率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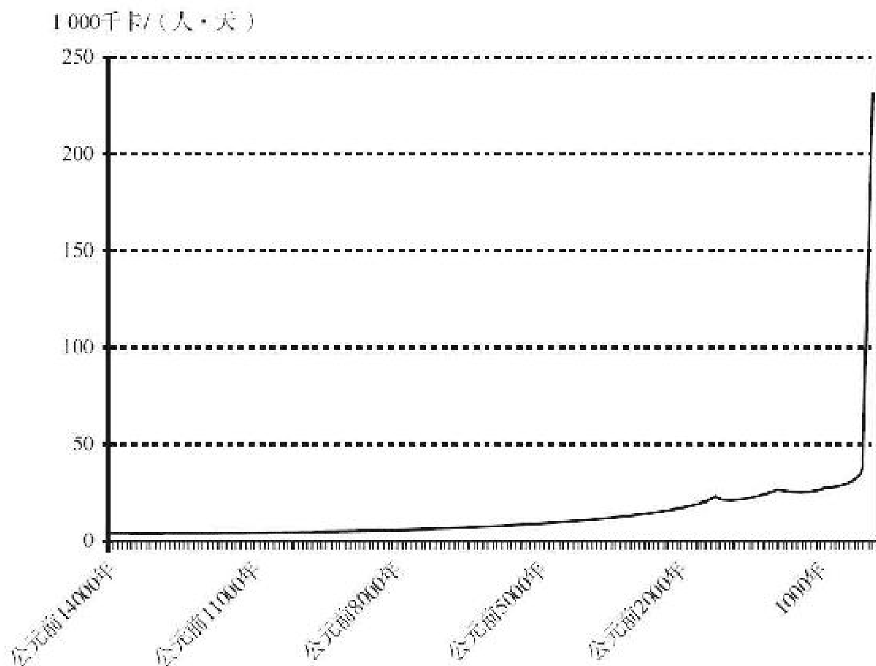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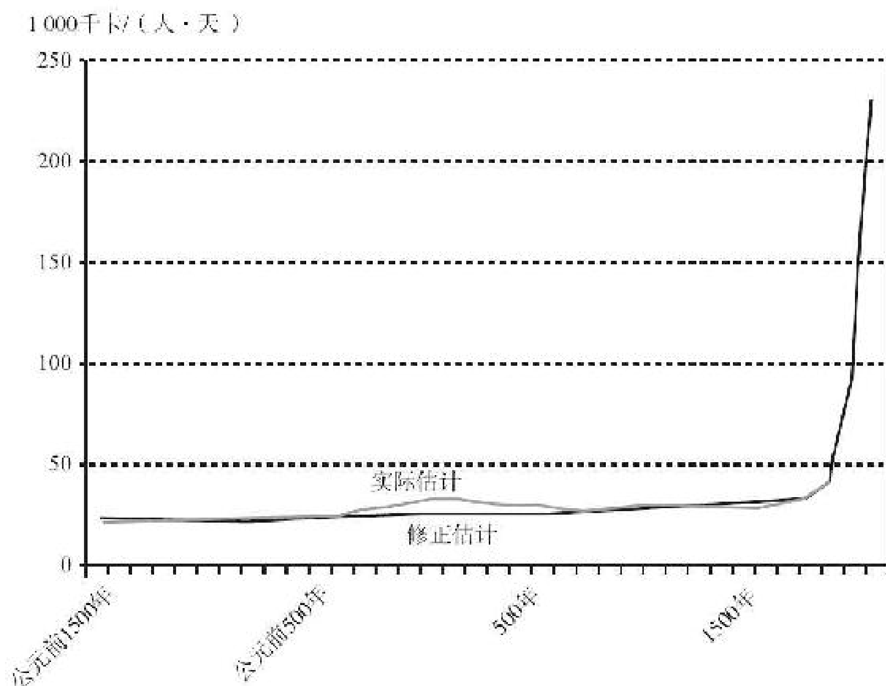


图3.14显示了能量曲线将会如何变化，例如，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实际上只是我估计的一半（即在公元前1000～前1年，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增至25 500千卡，而不是31 000千卡），而公元700～1500年的增长，则是我估计的两倍（即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9 000千卡，而不是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7 000千卡）。这些重大的修正令我非常吃惊，因为难以得到现存的考古证据的确证；然而它们对图3.14的影响却并不大。公元前1000～公元2000年的能量获取增长情况变得平稳多了（这从图3.15中更容易看出。该图既显示了实际估计，也显示了这些修正估计，而且只显示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但基本情形大致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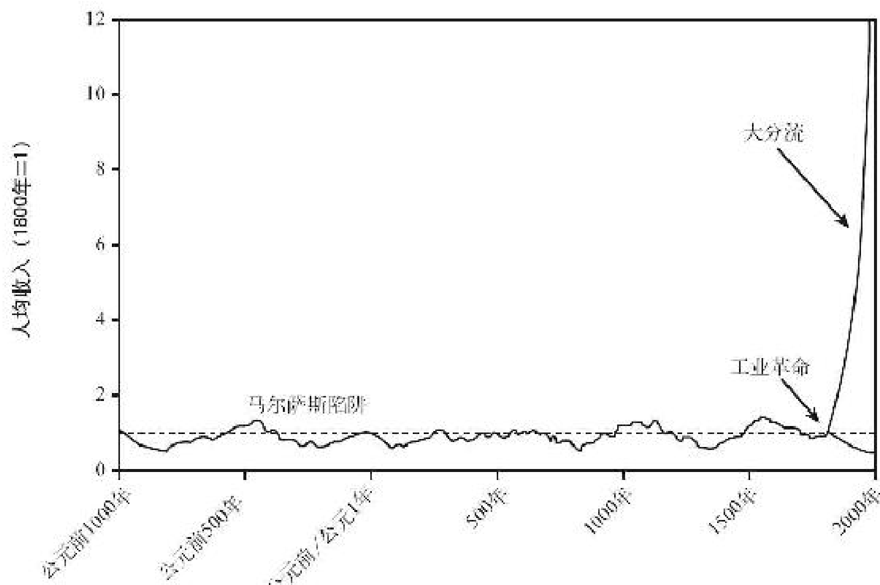
图**3.15** 对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实际估计与修正估计（假设罗马时期的分数应降低而早期现代的分数应提高）的对比



我们可以拿任何假设的修正数字来做实验，但是这样的实验的主要价值就是展现我们需要对分数进行多么剧烈的改变，才能对西方能量获取历史的基本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模式是非常清楚的——从冰期末期到国家开始出现（从约公元前14000~约前3000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发展极度缓慢的时期，在早期国家和帝国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1年）虽有所加速，但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然后波动不断冲击着农业社会的上限，使之稍稍超过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约为公元1~1600年），继而是短暂的农业社会的上限继续被推动提高的时期（1600~1800年），最后是（至今仍在持续的）爆炸式增长的短暂时期（1800年至今）。

经济学家们经常认为工业革命前没有发生任何重要变化。格里高利·克拉克曾说过（本章前面曾引用过）：“（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他配发的图表（见图3.16）将前现代时期的生活标准表现为在马尔萨斯论的上限周围盲目乱撞，其非同凡响之处只在于其直率，观点本身仍然是错误的。

图**3.16** 格里高利·克拉克对过去**3 000**年来人均收入的再现



资料来源：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A *Farewell to Alms*），第2页，图1

从冰期末期到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有巨大的增长。然而，正如马尔萨斯本人所认识到的（见第三章第一小节），能量必须区分为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当人们将能量的意外收获转换为生养更多的孩子时，每单位土地上食物热量的增长很快就被消费掉了。然而非食物能量获取却不会被抵消掉，考古记录证明，过去16 000年的积累是惊人的。图3.2和图3.3中的上升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崩溃打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1200年后、公元200年后和公元1300年后，但这样的中断每次都被证明是暂时性的，并且只能毁灭先前增长的部分成果。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对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研究，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定量估计尤其少。然而尽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主体轮廓却相当清晰。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东方那些最得天独厚的地区，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与西方是不相上下的，都在4 000千卡左右。出于地理原因（就此而言，生态差异使欧亚大陆西部可驯化的潜在动植物物种比东部要多），东方的分数起初上涨得比西方慢，耕种和驯养植物最早的清晰迹象的出现，比西方核心地带晚了2 000年。东方的分数增长到公元前3000年时开始加速。像西方一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发生了一次严重崩溃。但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迅速恢复了，到公元400年时又开始向上提升了，但直到公元1000年后，达到农业社会的上限——大约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公元1200~1400年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崩溃之后，东方的分数于1600年又恢复到农业社会的上限，然后在18~20世纪迅速增长（相对于更早的时期）。表3.4、图

3.17和图3.18显示了我对自公元前14000年起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估计。

相对而言，在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似乎比西方核心地带低，但在西方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时代，也就是大致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到第二个千年的中叶，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要高。不过，将这些比较再进行精练，要困难得多。

在本节中，我首先从最近的时期——1800年开始。接下去，像我在分析西方能量获取情况时一样，我先从广为人知的时代（先是960~1279年的宋朝，然后是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汉朝）开始，然后再填补鸿沟，最后再转入史前时代的东方。

表**3.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500年	21 000	22.88
公元前13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400年	22 000	23.97
公元前12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300年	22 500	24.52
公元前11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200年	24 000	26.15
公元前10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100年	25 500	27.79
公元前9000年	4 500	4.90	公元前/公元1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8000年	5 000	5.45	公元1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7000年	5 500	5.99	公元2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6000年	6 000	6.54	公元3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5000年	6 500	7.08	公元4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4000年	7 000	7.63	公元5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3500年	7 500	8.17	公元6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3000年	8 000	8.72	公元7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2500年	9 500	10.35	公元800年	28 000	30.51
公元前2250年	10 500	11.44	公元9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2000年	11 000	11.99	公元1000年	29 500	32.15
公元前1750年	13 000	14.17	公元11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500年	15 000	16.35	公元1200年	30 500	33.24
公元前1400年	15 500	16.89	公元13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3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4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12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5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100年	16 500	17.98	公元1600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1000年	17 000	18.52	公元1700年	33 000	35.96
公元前900年	17 500	19.07	公元1800年	36 000	39.23
公元前800年	18 000	19.61	公元1900年	49 000	53.40
公元前700年	18 500	20.16	公元2000年	104 000	113.33
公元前600年	20 000	21.79			

图**3.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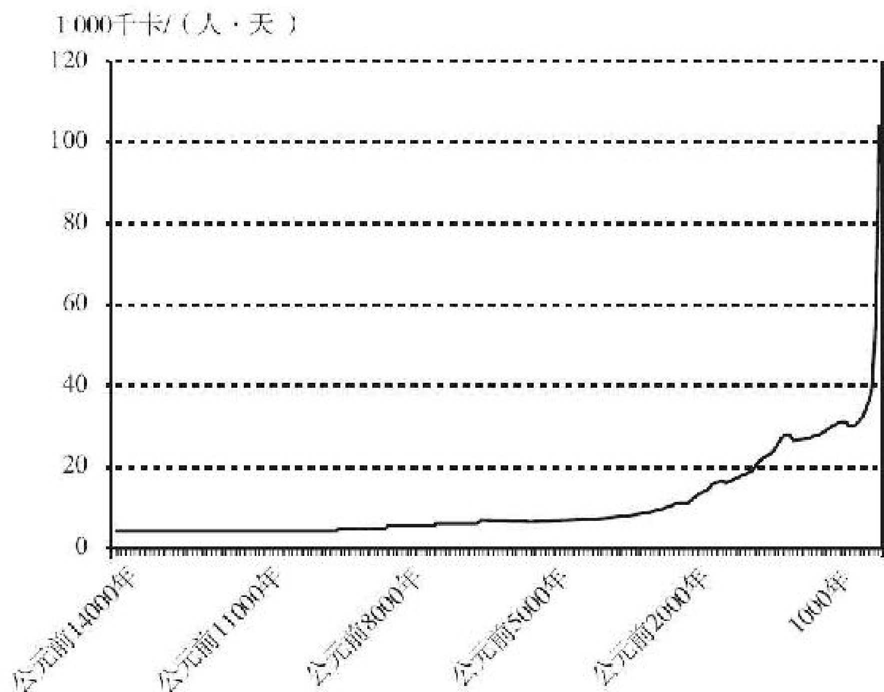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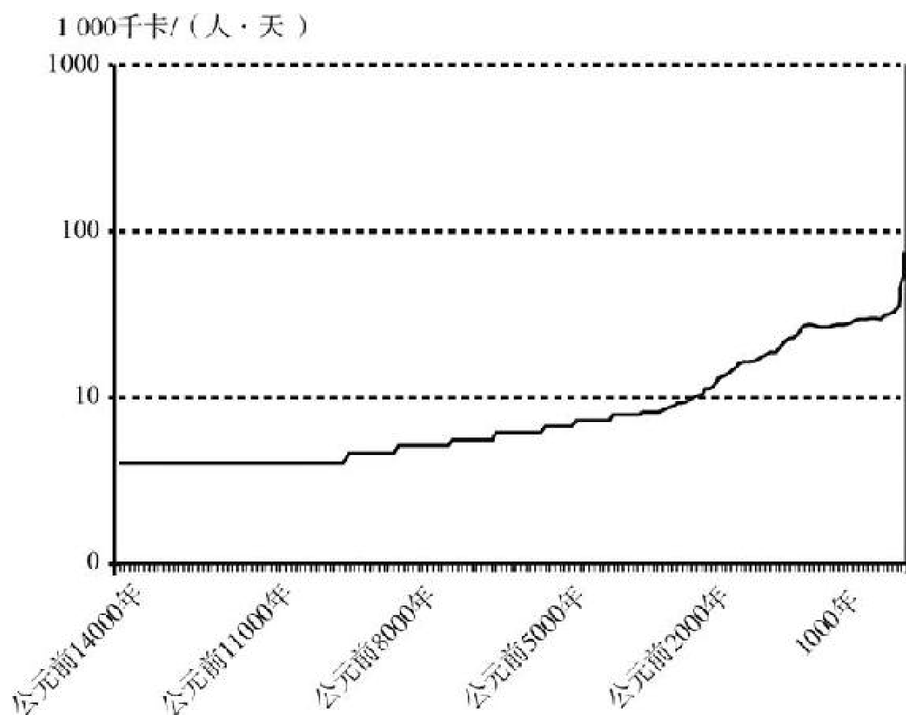


图3.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最近的过去（1800~2000年）

像西方核心地带一样，2000年时东方核心地带也有高质量的统计资料，可供计算能量获取情况时使用。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人均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为大约每人每天104 000千卡，不到美国的消费量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的一半，但比东方（或西方）历史上任何较早时期高得多。

在东方，可靠的政府统计数据不会在历史上回溯太远，而且（像西方一样）农民家庭用于燃料、房屋、衣服等的生物量缺乏量化的资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1900年，日本烧了300万吨煤（大致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500千克，或者略高于每人每天500千卡；而1903年英国的消费水平为1.81亿吨煤＝每人每天4.36吨≈每人每天40 000千卡），以及只能称之为微量的石油。然而，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压力的增大，生物燃料的使用也越来越高效和密集，而资源基础在逐渐弱化，也许堪与十八九世纪西北欧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相比。总之，各种不同的资料表明，1900年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相对记录得比较好。煤和豆渣肥料在19世纪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日本，一些地方实际上还在下降，但能量获取水平肯定高于每人每天40 000千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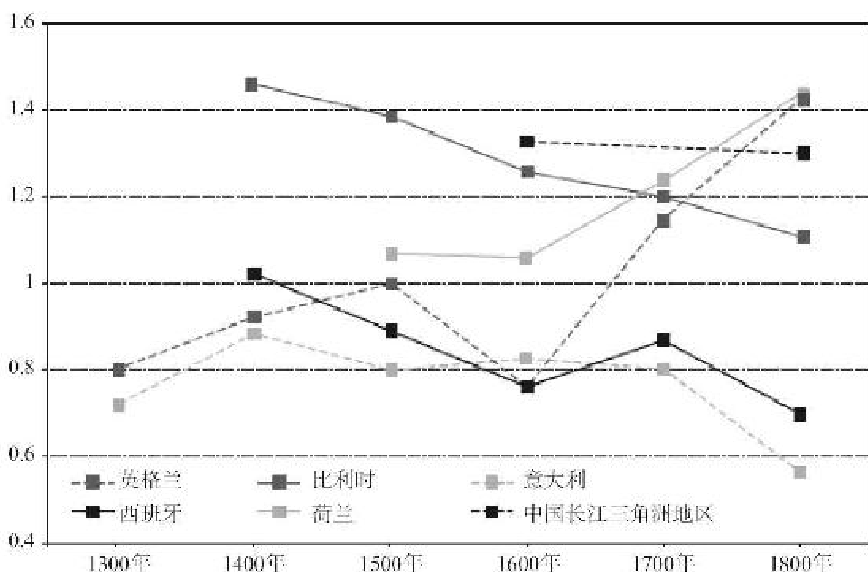
19世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议，以致成为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争执的主要战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中主导的理论是，中国经济在1400～1900年是停滞的。例如，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在1000～1500年，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表示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然后在1500～1820年，一直停留在600美元没有变化。同样，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农业在中世纪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变革后，于元朝（1271～1368年）达到了其极限，自那以后，最优的实践方法从中国南方农业核心地带传遍了全中国，但基本上没有再出现重要的新技术。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在宋朝（960～1279年）接近于工业起飞后，就陷入了一个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的依靠肌肉力量和水力的技术达到了其效率的极限，但却没有足够的诱因跃升到使用化石燃料的技术。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率，此类观点都认为东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猛烈攻击，部分是因为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向学者们开放了大量明朝档案，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证据，特别是清朝（1616～1911年）的证据。彭慕兰尤其主张，18～19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轨道，与西欧的发展轨道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差异。他认为，中国原始工业化形式与工业革命是类似的。彭慕兰还提出，清朝时期的中国即使人口迅

速增长，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中。按照他的计算，19世纪典型的中国成年男子每天消费2 386~2 651卡路里的食物，与英国的水平是大致相当的。中国人消费的食糖、烟草、蜡烛、家具和肉类的数量似乎也在上升中，棉质衣服已普及寻常百姓。

为1400~1900年的东方勾勒出的农业退化的悲观的旧画面，仍然有其捍卫者，但随着东方实际工资和农业产量的长期资料的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在两种理论中折中是最为合理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1600~180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的确是下降了（见图3.19），但仍然相当高，晚至17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可能仍然比欧洲任何地区的都要高。

图3.19 1300~1800年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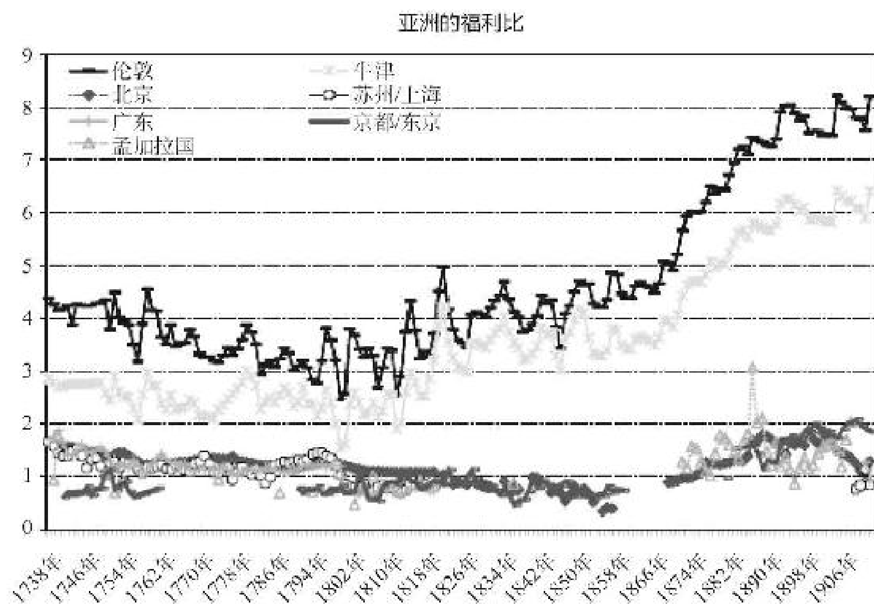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艾伦，《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收入》（*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相形之下，乐观主义者们认为，1738~1900年的北京实际工资的确是稍稍上涨了（见图3.20），但仍然非常低，与落后的欧洲南部差不多，与兴旺发达的欧洲西北部相差甚远。1738年时，北京、上海、苏州和东京实际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及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一半，但大致与欧洲南部（如米兰）或中部（如莱比锡）相当。东方的工资实际上在1918年时仍与南欧非常接近，但在1820年的时候，中欧的工资就已经与东方拉开了距离，而向英国靠近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00年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西方核心地带，但低得并不多。按照我的计算，当时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大约38 000千卡。在东方核心地带，农业产量很高，也有相当大量的煤用于取暖和做饭，但没有蒸汽动力，关于实际工资的资料也表明总体生活水平低于西北欧。所以，东方标准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其核心地带（中

国北方和沿海地区，再加上日本）大约为每人每天36 000千卡，在不超过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前提下，不会过于高于这个水平；在不降至罗马帝国水平的前提下，也不会低得太多，与罗马帝国为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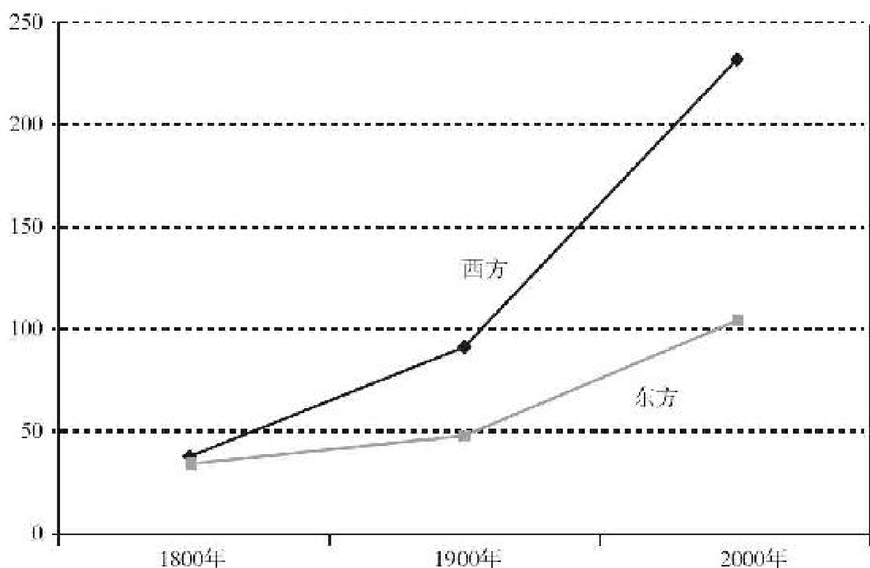
图3.20 公元1738~1918年欧洲和亚洲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艾伦，《工资、价格和生活水平》（*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这些数字表明，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进入现代时期的时间（这么看来，大约是在1800年）仅比西方稍晚一点（见图3.21）。与传统/悲观论点相左的是，19世纪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确上升了，但增幅比西方要小得多。在19世纪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中，西方占了先机，是由西方的腾飞，而不是东方的衰落决定的。同样，20世纪东方的全球地位提高，也不是因为西方的衰落，而是因为东方人学会了利用西方人率先利用的化石能量资源。

图3.21 1800~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



中国宋朝（960~1279年）

宋朝也许是中国前现代时期能量获取的巅峰时代。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从10世纪早期的大约5 000万人增至1200年的1.2亿人，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上升得更快。

最清楚的文献证据来自需要大量燃料的冶金业。50年前，经济史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重新分析了宋朝税单，提出11世纪宋朝的铁产量比历史学家们先前认为的要高出20~40倍。据他计算，1078年时中国的总征税产量为75 000~150 000吨，比850年时增长了12倍。而且，郝若贝指出，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大致比1640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出2.5倍，超出1700年整个欧洲的产量的一半，大约与中国1930~1934年每年产量持平。郝若贝对文献的分析不断受到挑战，葛平德（Peter Golas）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他所负责的那卷中，提出郝若贝的铁产量数字存在整个数量级的偏差。然而后来，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所撰写的那卷中得出结论，尽管郝若贝对不同文献的解读有缺陷，但他的数字肯定是大致正确的。中国历史学家漆侠独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朝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11世纪时农民家庭对金属的需求一定达到了每年7万吨左右；而国家对铁制钱币和武器的需求还更大。铜的生产同样非同寻常，从997~1070年产量涨了4倍，从2 420吨增长到12 982吨，比1800年时全世界的产量都要高。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金属制造业的副产品首次在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冠上留下了痕迹，就像1 000年前的罗马的银加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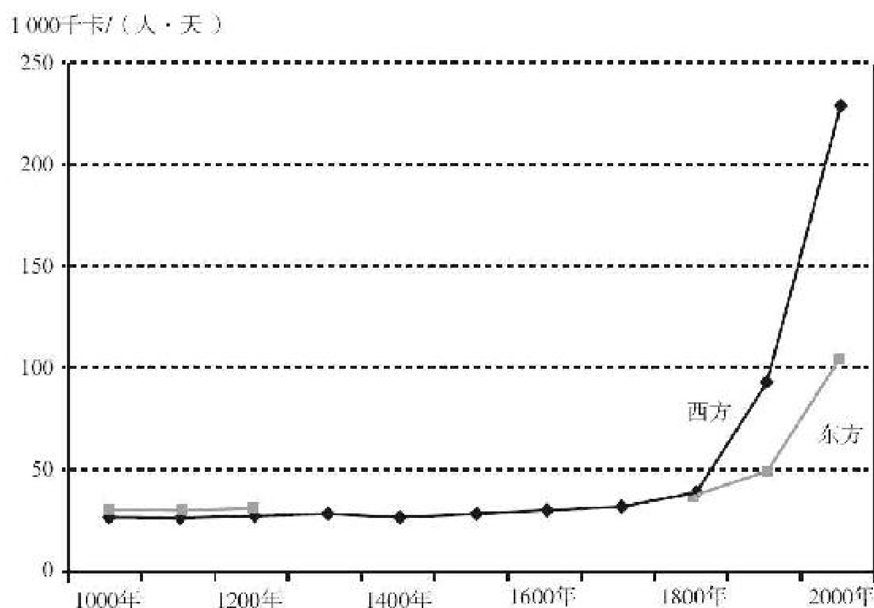
郝若贝不断地将宋朝冶金业的扩张与1540~1640年的英格兰相比

较，认为——像英国的例证一样——结果之一是炼铁极大地加快了以化石燃料代替木炭的进程。假如中国的铁器制造商们完全以木炭为燃料，那么1080年时他们就需要烧掉22 000棵成材的大树，远超过开封一带所能够供给的数量。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焦炭来炼铁，转而大规模地采煤。到1050年时，开采的煤产量之高，以致家庭做饭和取暖时烧煤比烧木柴都要便宜30%~50%。到1075年时，开封已经有了只出售煤的专门市场，1096年的官方文件也讨论了煤供应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木材作为热源的事。对于在蒙古境内曾是大宋帝国边境的地区发现的铁制品和钢制品新近所做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转变，在10~12世纪，冶金业用煤炭取代了木炭。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发掘出的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等的统计资料，无法与公元前900～公元8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相比（见图3.5），但是来自文学、艺术及其他文物的质量证据证实了贸易、商业和制造业有巨大的扩张，纺纱机和水车得到了广泛应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广东沿海遭到大肆洗劫的大量宋朝沉船残骸，显示了船体在变大，船上货物越来越丰富。2007年得到完好打捞的“南海一号”沉船证实了这一点。

那时的房屋也变得更结实了，在12世纪的杭州，两层小楼非常普遍，与古老的中国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大多数人也许仍住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木质小房子里。有一些证据表明出售陶器和其他家居用品的大众市场在增长，但对家庭集合艺术品似乎没有任何统计研究。

图3.22 宋朝时期（1000~1200年）和现代时期（18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及与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的对比



11～12世纪的能量获取水平（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无疑很高，但很难赋予其绝对值。铁制品的生产规模和中国的冰蕊污染记录显示，其能量获取水平大概和罗马帝国1 000年前曾达到的水平差不多（每人每天31 000千卡），或者达到了西欧大约公元17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2 000千卡）。然而，中国没有发生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事件，说明其能量获取不可能接近西欧18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8 000千卡）。我姑且假定宋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稍稍低于罗马，在11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也许到1200年时稍稍超过了这个数字（见图3.22）。一个稍稍高于罗马水平，或许甚至与欧洲1700年的水平（32 000千卡）相当的数字，似乎同样是说得通的，但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字——比如说达到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或者低至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似乎就不大可能了。

现代早期的中国（1300～1700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在中世纪时期经历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后，在1400～1800年，农业和工业生产均陷入了停滞状态，然后在19世纪，由于内战、政府管理不善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影响，实际上倒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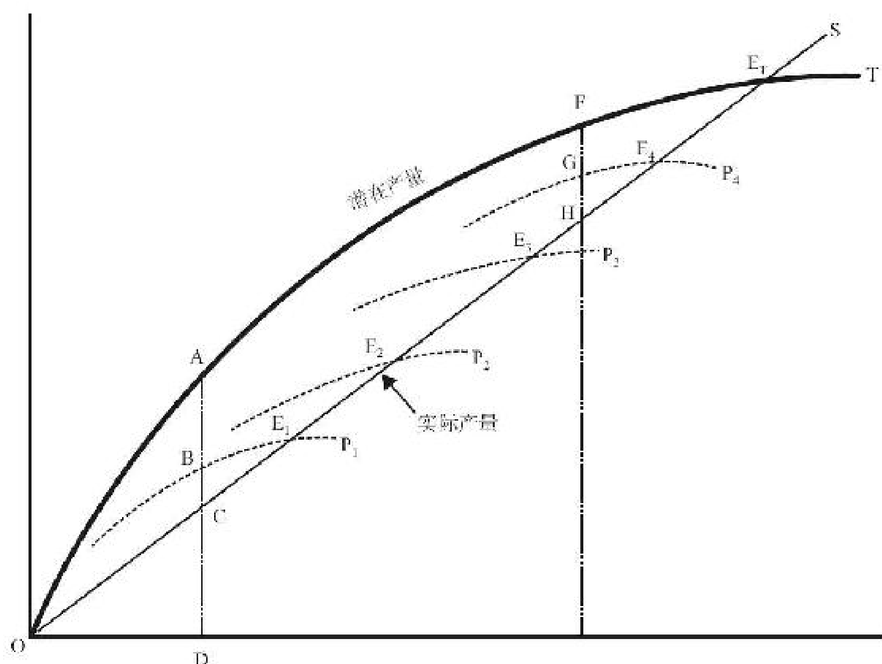
这种论点有好几个版本。德怀特·珀金斯在他对1368～1968年的农业产量的先驱性研究中，在卜凯（John Buck）对战争时期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15～19世纪，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从长江流域推广到中国北方，然后随清朝时期的移民，又推广到陕西，甚至西部更远的地方。据珀金斯的计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产量到1300年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每公顷[1]3.5吨，是1800年英国地区产量（每公顷1.7吨）的两倍还要多，尽管按照劳动者人均产量计算，只有1800年英国水平的1/3（每公顷0.3吨比每公顷0.92吨）。中国的生产力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灌溉小麦种植相比，成绩也极可观，埃及的产量可能大约为每公顷1.67吨和每人0.6吨。珀金斯认为，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于1400年后在全中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总产量，甚至人均产量也因为出现了较好的耕作方式而有所提高，但19世纪最优秀的农民仍不及14世纪最优秀的农民那么高产。

伊懋可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的能量获取水平经过唐宋时期非同凡响的提升后，于14世纪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见图3.23），农业、工业、财政和交通运输业都达到了传统手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伊懋可说，唯一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就是转向化石燃料经济，但由于传统技术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巅峰，东方没有诱因让人们进行那种能引发西方工业革命的革新。简而言之，这样的革新实际上会降低产量，因此受到人们排斥。

这两种论点都认为中国经济停滞了大约400年，这与20世纪中叶认为中国是永恒静态的传统西方理论是相符的。在同样的理念下，安格斯·麦迪森提出，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稳定地保持在600美元，

只有1700年英国水平的一半。正如上面提到的，罗伯特·艾伦认为1738～1900年中国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稳定无变化，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产量在1600～1800年略微下降了。

图3.23 高水平均衡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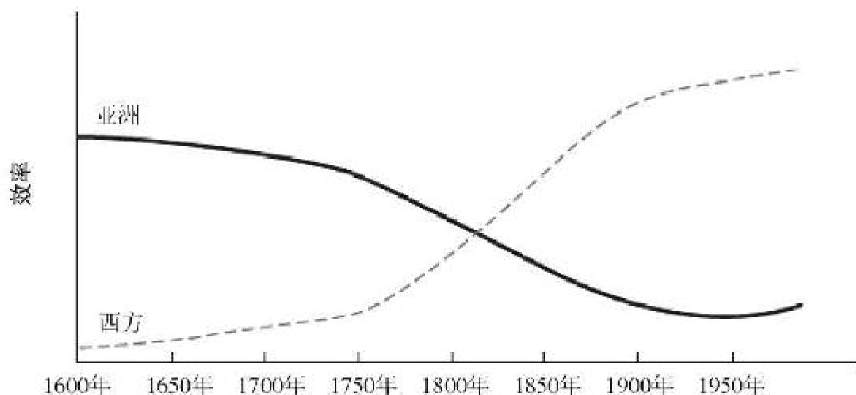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自20世纪90年代，来自彭慕兰等人的挑战重启了争论。我本人的计算结果是，1200年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与罗马帝国非常近似（刚刚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而在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只比当时的西方略低一点（每人每天36 000千卡）。这将意味着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1700年增长了15%～20%。由于极少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早期现代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说法进行过量化分析，所以很难说我的数字是更接近于珀金斯/伊懋可/麦迪森/艾伦的观点，还是彭慕兰/王的观点。

然而，如果说1200～1700年的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也不大可能。对长江三角洲一带新近的研究显示，有些地区这500年来的确很稳定，但总体而言，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也许稍好一点）都是饱受创伤的。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城市毁灭和贸易崩溃。我不了解对经济具体领域的详细研究情况，但非常粗略地推测，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勉强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之后，可能下降了5%。譬如，1300年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1400年为每人每天29 000千卡。这将导致1400～1800年是比传统模式更快的恢复时期。在3个世纪中，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将提高20%。

图**3.24** 罗兹·墨菲关于**1600~2000**年西方崛起、东方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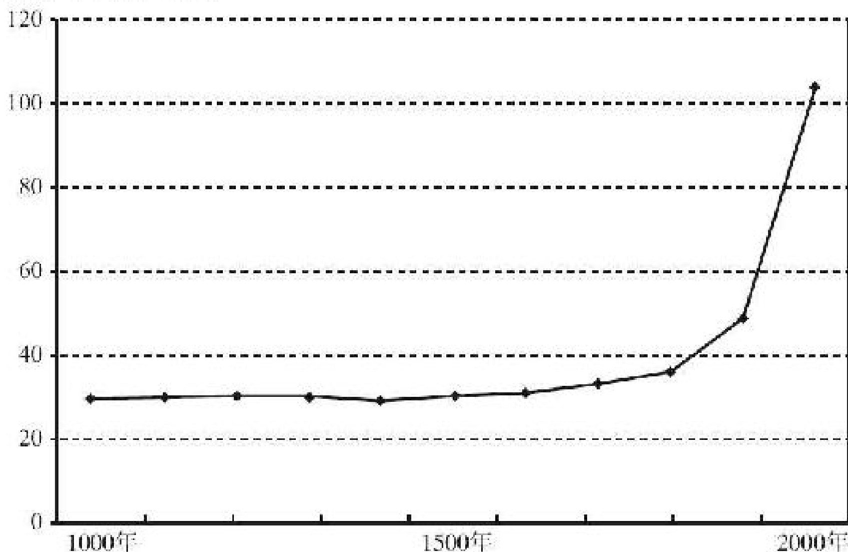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罗兹·墨菲，《外来者》（*The Outsiders*）

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得出这些瞎猜的答案，但总体画面似乎是可信的：1200~18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稳定增长——实际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应当算是迅速增长；但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快得多。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诸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等历史学家们的主张——现代早期“东方的衰退”和现代早期“西方的崛起”对于促成19世纪西方的统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必然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发现证据，能证明公元1400年前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上升到足以与19世纪的西方相匹敌，然后又下降了——实际上，这似乎正是墨菲的图（y轴上没有数字）想展示的。

图3.25展示了我对公元第二个千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的估计。

图**3.25**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古代中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通常被划分为西汉/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年）、王莽改制时期（公元9～23年，也称为“新朝”）和东汉/后汉时期（公元25～220年）[2]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堪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将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考古证据的全面比较，如能以量化的形式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供利用，否则这部分的估计必然是非常印象化的。

最普通的对汉朝经济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统计数字，但文献资料和对汉朝考古证据的定性分析，的确使尝试性的计算变得可行。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即使最成熟的铁器加工业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而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铁器只是非常缓慢地在中国农业中得到推广。公元前200年时，青铜工具、木制工具，甚至骨制工具和贝壳制工具，都比铁制工具要常见。关于犁的考古证据是有争议的，金属头的犁似乎到东汉时才得到普及。大规模使用犁牛和用砖衬井进行灌溉，似乎也是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特色。文学作品也描述了一系列汉代出现的耕作方式改进，起始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赵国的轮作法，但这些改进方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施了，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最高产的技术和机械也许只局限于东汉的精英阶层使用。

给人形成的印象是汉朝的农业生产力不及罗马帝国，尤其不及尼罗河谷的灌溉农业发达。这也许不仅是印象。生产力在公元前200～公元

100年之间肯定是增长了。贾思勰写于6世纪30年代的《齐民要术》一书，也表明农业技术（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即使在农业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不断改善。许倬云搜集的文献资料表明，汉代农业是高度成熟的，但仍不及贾思勰时代的中国农业发达，也许也不及罗马帝国的农业发达。对汉代和罗马帝国成人身材的骨骼证据和营养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将是极有助益的。

似乎没有任何全面的考古出土物目录，可供我们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定居点遗址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直接进行比较。对公元11年因黄河泛滥被淹没的一个村庄三杨庄新近的发掘记录的全面出版，将尤其富有价值。该村发现后，立刻被冠以“亚洲的庞贝”的称号。遗迹保存非常完好，考古学家们甚至发现了村民们在泥泞的田地中逃跑时留下的脚印。不大引人注目但却更具价值的是，至今可查阅的简要报告中描述的有着黏土屋顶的砖砌房屋，简直就像是稍小版本的同时代的罗马房屋。村民们的农具配备得很好，很多都是铁制的。从留存下来的黏土模型和布局证据判断，汉代城市里的房屋无疑是非常精美的，但总体的考古记录显示，中国的城市比罗马面积要小，结构也比较潦草。

文学作品中有大规模铁生产的描述。新近在朝鲜的发掘也发现了建于公元2世纪的令人惊叹的炼铁设施。沙伊德尔提出，罗马的货币供应大致是汉帝国的两倍，罗马最大财富值也是汉朝最大财富值的两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只有松散的关联，但验证了人们认为西方古代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高于东方的印象。汉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也低于宋代。至少从已公开的汉代考古证据来看，没有任何成就堪与宋代的煤铁使用、道路建设、技术革新、金融工具或者远程贸易水平相比。不过，与草原游牧部落和东南亚间的贸易在汉代的确有迅猛增长，而且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到的，到公元2世纪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接触。

依照目前的证据状况，任何关于汉朝能量获取的实际数字，都必然是猜测性的。汉朝的数字一定低于西方的巅峰罗马时代（每人每天31 000千卡）和东方的巅峰宋朝（每人每天约30　500千卡）。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也显示，汉朝在后罗马衰落的低谷期时（公元8世纪时为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能量获取水平高于西方，比西方晚期青铜时代的巅峰（公元前1300年时为每人每天21 500千卡）更是要高出许多。因此，汉朝的巅峰为公元1世纪，达到27 000千卡，到公元200年时由于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稍有下跌（跌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西汉时期的增长似乎相当显著。这一时期能量获取水平提高了10%以上，从公元前200年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增长到公元前100年的25　500千卡；在公元前/公元1年和公元100年时，达到了巅峰水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数字仍然是猜测性的，当有更好的比较考古资料可利用时，应当予以校正；然而，汉朝的巅峰水平似乎不可能低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9 000千卡。

图3.26 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古代、中古和现代时期东方能量获取状

况，及与西方能量获取状况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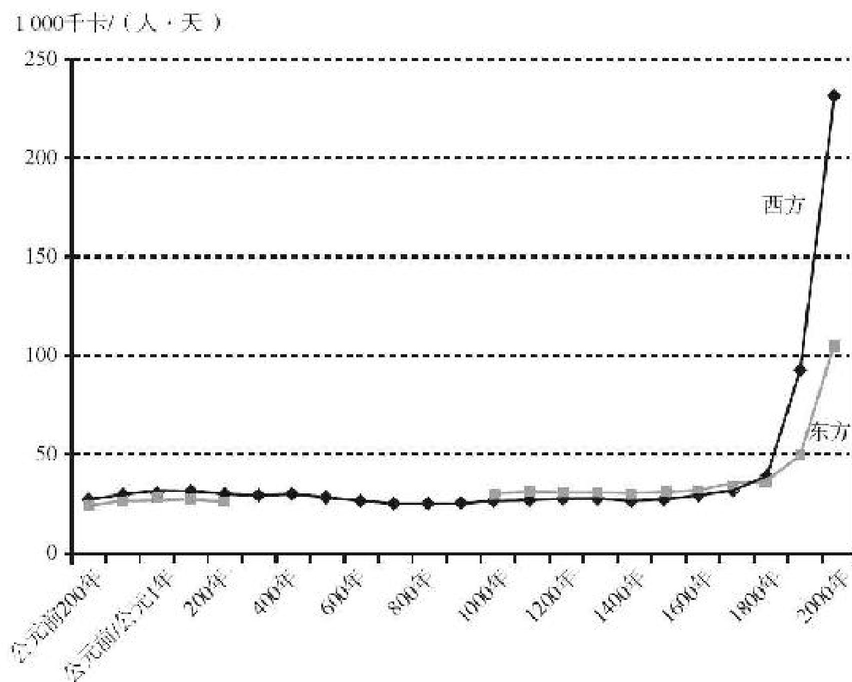


图3.26显示了对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将其与过去2 200年西方分数的弧线对比，显示出西方核心地带在古代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

证据不足的800年（公元200～1000年）

“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的能量获取历史甚至比汉朝的还要模糊。鲁威仪（Mark Lewis）新近发布了一份对这一时期的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阿尔·迪安（Al Dien）也搜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并做了同样有益的概括，但量化的研究仍然极其稀少。

像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结构在公元200年后也瓦解了，尽管农业技术也许还有所改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展示了比任何汉朝文献都要详细的干谷种植知识，也披露了中国南方所实践的高深的水稻种植知识。看来自公元3世纪起，最好的水稻种植方法在长江以南得到稳步推广，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时，水稻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随着5世纪轮船出现在长江上，原本只在佛寺使用的水车走进了许多家庭，地方特产如茶叶等得到广泛交易，经济的基础结构也在改善。国家强烈干预土地所有权，最著名的事例是“均田制”，但在4～6世纪那动荡的时代，那似乎有助于将农民拘系在土地上。在589年中国重新统

一以及7世纪开凿大运河之前，汉朝以后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南方新种植水稻的地区，北方的商业衰落到连货币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的地步；但是到公元650年时，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在复兴中了。水力灌溉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据记载，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公共市场。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政权的崩溃削弱了唐朝对经济的控制，但任何损失似乎都不及官僚干预的放松所获取的商业获益更大。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中国在公元600~1000年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依照前现代社会的标准），那段时期在经济上比西方先进。唐代上层社会的房屋至少像汉代一样显赫，佛教和宫廷艺术也很兴盛。然而，中国中古时期的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艺术史和建筑上了，我们缺乏证据来定量分析这些变化对个人层面上的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估计的能量获取数字——公元200年时为26 000千卡，公元1000年时为每人每天将近30 000千卡——大致是准确的，那么中间的7个世纪增长率就大约为15%。上面所引用的资料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公元700~900年。我因此估计，在公元200~5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大致保持在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6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到公元800年时又升至每人每天28 000千卡，公元9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9 000千卡。图3.27显示了这些估计的分数，以及假如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200~1000年在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的分数（无论是算术级增长还是几何级增长），差别极微小。

图3.27 估计公元200~1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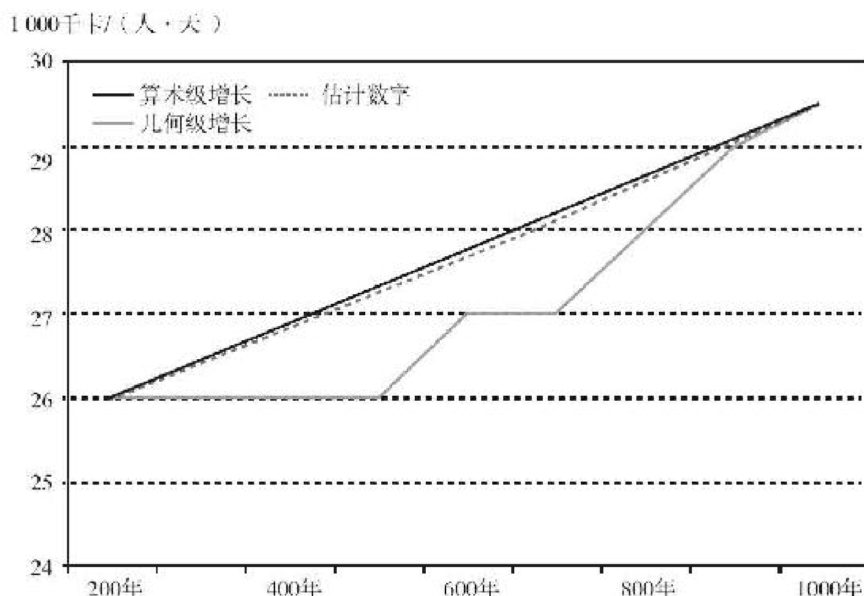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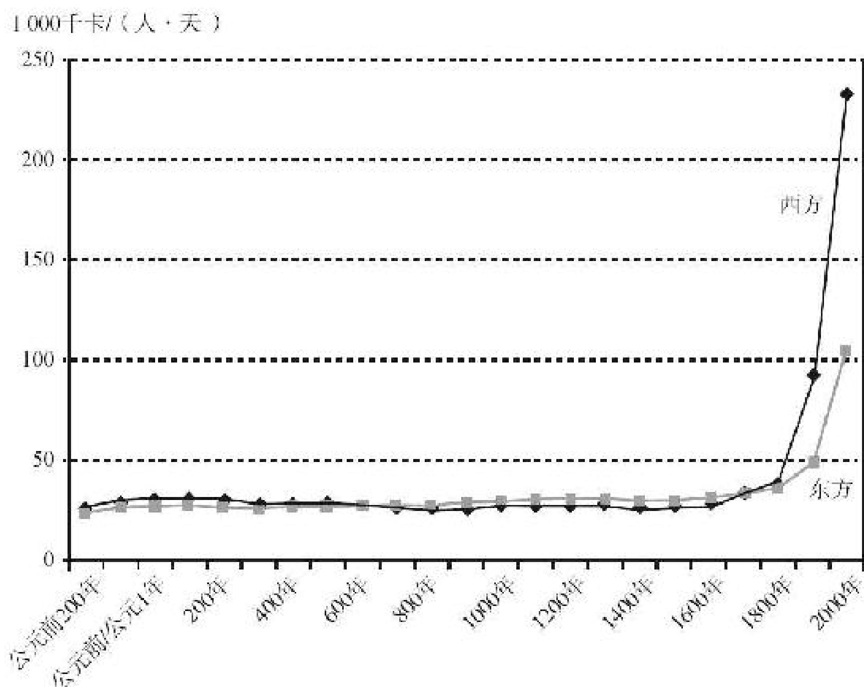


图3.28展示了我对自公元前200年以来整个时期东方和西方的估术。按照这些数字，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63年，有史以来第一

次超越了西方；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公元1800年之前的2　000年的能量获取的历史就太平淡了。无论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还是西端，庞大的帝国都在冲击着有机经济可能达到的上限，但都无法突破。这是支持近些年关于欧亚文明的一个普遍看法——历史是循环的——的事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的欧亚精英人士是正确的。

图3.28 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



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前9500年）

我对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西方时所依赖的同样的灵长类动物能量学和人类进化研究成果。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东亚的智人一定已经能够获取大约4 000千卡的能量，否则他们就会灭绝；而假如他们获取的能量比这多得多，甚至能达到5　000千卡，那么我们就能从考古记录上看出这一点，比如会有更精致的建筑、物质文化，或者昂贵的食物热量。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将近5 000年的时间里，考古记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在冰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增长了；但在东方，公元前9000年之前的考古遗址，完全没有任何建筑结构遗存。有一些证据表明，大约2.5万年前对动物尸骸的利用增多了。在中国南方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手工制作、烧制温度很低的粗糙陶器——

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年代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16000年。到公元前14000年时，中国北方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在制作陶器了。陶器的发明也许意味着人们开始食用需要煮沸的新型食物了，很可能是野生稻（在南方）和野生粟（在北方）。

然而，东方核心地带的情况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在西方核心地带，到公元前11000年时，阿布胡赖拉的黑麦种子已经变得比较饱满了。而在东方核心地带，却几乎没有公元前14000～前9500年间人均获得的食物热量有所增长的较明确的证据。在吊桶环遗址，发现在公元前12000年时，野生稻谷被采集并带回了山洞，正好是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新仙女木寒冷期之前，但野生稻谷在这个迷你冰期期间似乎又消失了，直到公元前9600年后才又重新出现。至今还没有发现在新仙女木期前有种植稻谷或其他植物的证据。这几千年当然会有其他变化，但似乎都是循环性的，而且规模极小无法度量。因此我估计公元前14000～前9400年整个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都在4 000千卡左右。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9500～前200年）

正如图3.29清楚显示的，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冰期后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估计数字（公元前200年西汉时期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9 3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2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30）。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先简要概括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图3.29 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和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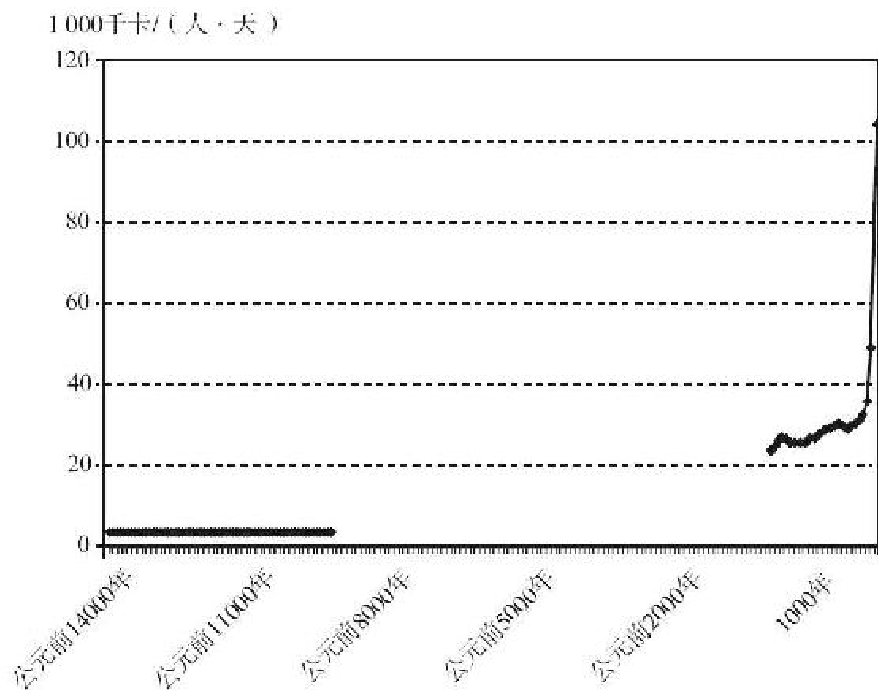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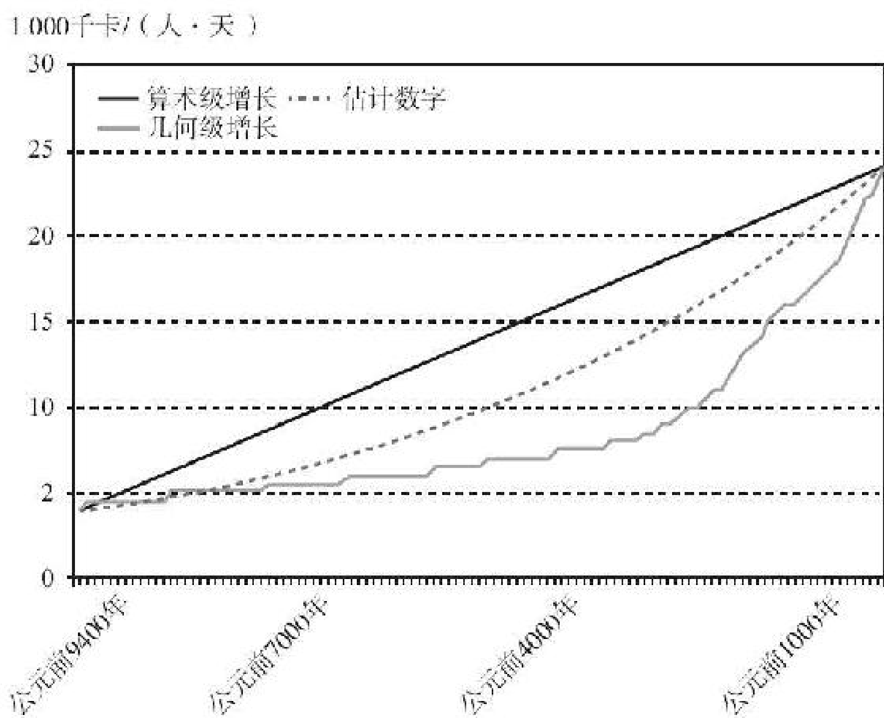


图3.30 估计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采集者和农民（公元前9500～前2500年）

在东亚工作的考古学家们经常热衷于将农业起源的时间尽可能地向前推。在中国北方的一些考古遗址，如早至公元前9000年或前8500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和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磨和石辊，有时被视为小米种植的证据。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张家富等人提出，黄河河谷的龙王辿遗址出土的25 000年前的磨制石器，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极大地前推至冰川时期。然而，对欧洲冰期磨制石器上的淀粉残渣的分析，证明其时间可回溯至公元前23000年，说明这些工具被用于将野生植物碾磨成糊状，制作前农业时代的粥或面包，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新近在东胡林出土的公元前9000年的石磨上残存的淀粉，说明这些工具也是用于碾磨野生植物的，特别是橡子。迟至公元前600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白音长汗出土的石磨器上的淀粉中，橡子依然是主要成分。在渭河河谷，种植农业开始很久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野生食物也仍然是重要的食品。

东亚驯化植物的直接物证已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长江流域的彭头山遗址，制陶的胎泥中发现了稻壳灰屑，这肯定说明稻谷已经得到了驯化种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老生常谈。最近，蒋乐平和刘莉又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和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发现的稻壳印痕和植物化石，证实了水稻被驯化种植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然而，将中国的考古证据和论点与关于亚洲西南部农业的开端的争论相比较后，富勒（Fuller）等人提出，水稻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栽培，才形成了完全驯化的品种。他们认为蒋乐平和刘莉被不成熟的小穗所误导了，这些小穗在采集的野生稻中极其常见，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都是野生稻。富勒等人的结论是，正经种植稻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许是因为橡树覆盖面积减小，此前作为重要食物的橡子出现短缺。他们提出，完全被驯化的稻子是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而成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北方驯化粟谷实际上先于南方驯化稻子，对于公元前5500年时栽种粟谷，和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驯化稻子，都有清晰的证据。

随后是激烈的交锋。情况经常是这样，似乎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如果种植和驯化稻子像富勒坚称的那样晚，那么其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点就难以解释了；然而如果种植和驯化开始得像刘莉主张的那样早，此后一直缺乏较大的、明确无误的样品，也同样难以解释。进一步的工作无疑会解决这些问题。富勒提出的长期而持久的种植模式应当会得到证实，而传统观点可能也会被证明无误，即在水涝地上的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很多稻子都是驯化的，而到公元前7000年时，贾湖、吊桶环、彭头山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种植的稻子。

我们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农业革命的想象，与西方核心地带亚洲西南部的现象越来越像了，只是大约晚开始了2 000年。正如在西方一样，似乎决定性的步骤并非发生在大河的河谷，而是在环绕着河谷的侧翼丘陵地区。农业革命的传播推广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并且与模仿和

移民相结合，还伴随着时间同样漫长的副产品革命。

这种趋势在中国可以通过农具的演变很好地看出来。例如，在6 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收割用的刀具占全部农具不到1/3，而到了5 000年前，在庙底沟遗址，收割刀具的比例就上升到1/2以上。在半坡遗址，锋利度不够的陶刀数量比石刀多，比例在2：1以上；而在庙底沟遗址，石刀数量超过了陶刀。在半坡，（刀耕火种时伐倒树木所必需的）斧子数量比（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翻土所必需的）铲子要多，比例在5：1以上；而在庙底沟，锹的数量超过了斧子，比例在4：1以上。庙底沟的锹的刃，也普遍比半坡的长50%（30厘米比20厘米），说明5 000年前的农民比6 000年前的农民翻土翻得更深，以改善土壤的通风条件。

也有其他证据支持副产品革命为时很漫长的设想，如中国北方新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粟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事情，长江流域也有证据表明驯化动物的过程也非常缓慢。

然而，东方和西方的巨大差异，是西方核心地带的耕种和驯化似乎开始得比东方核心地带早大约2 000年。即使我们忽略大约公元前11000～前10500年（显然早于新仙女木期）阿布胡赖拉种植的黑麦种子，到公元前9500年，就在新仙女木期刚刚结束时，种植的大麦和小麦已经确定无疑地出现在西方核心地带了。按照目前的证据状况，很难看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甚至比这还晚，假设富勒是正确的）之前东方有种植稻子或粟的情况。完全驯化的小麦和大麦已经被确凿地认定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出现在西方的侧翼丘陵区；驯化的粟直到公元前5500年前在东方都并不常见，稻子要到公元前4500年（或者按照富勒的说法，在公元前4000年）才被完全驯化。副产品革命在西方到公元前4000年时已基本完成，在东方到公元前3000年时还仍在进行中。例如，直到公元前2500年，我们才发现了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说明东方典型的农业性别结构：男性从事户外活动，女性则从事室内活动。

像西方一样，东方食物热量总获取量的增长，是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和缓慢而又惊人的人均非食物热量的增长的。已知最早的房屋时间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8000年，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更早的遗址只发现了灶台。房屋的面积在稳步增长，从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平均4～6平方米的圆形的半地下的棚屋，到公元前4000年大河村遗址上30～40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地面上的建筑。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最大的房屋面积为10平方米，而公元前4000年的大地湾遗址却有150平方米和290平方米的“宫殿”，而且面积还只是根据房顶算出的。房屋的体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前增长也很缓慢，但在那之后，就突飞猛进了。

古代国家（约公元前2500～前800年）

公元前2500年以后，特别是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更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大大加速了。像在西方一样，由于没有

对人体骨骼数据的大规模系统性的搜集和比较，未能直接记录下古代国家的出现对人类体格的影响，但存在其他变化的迹象。

其一是稻子种植在中国北方的推广，特别是在约公元前2300年之后；其二是动物骨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和第二个千年的定居点中的大量增加。到公元前2000年时，驯化的猪一般在家养的畜类中占到2/3以上。文献记录也提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农业组织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许反映了真正的变化。

《孟子》第三篇上部提到井田制，据说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西周王朝设立的制度，尽管孟子所言一定是对当时混乱的现实的理想化描述。历史学家们经常把这种土地占有制度称为封建制，尽管这似乎不完全适当。

总的来说，东方农业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力人均还是每单位土地）似乎一直比当时的西方要低得多。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考古遗址中出现了不少铜器（大多是装饰品），但在公元前800年之前，极少见到金属农具的实例。在公元800年前，木头、石头、骨头和贝壳始终是占绝对优势的最重要的农具材料。除非有更好的证据出现，否则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方古代国家农业产量的增长，慢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西方古代国家的灌溉农业体系所带来的。

然而，在公元前2500~前8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看来的确有强劲的增长。由于考古学家们让人出乎意料地对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定居点缺乏兴趣（不是因为缺乏实际的遗迹，而是因为考古学家们只关注贵族坟墓和重大建筑），我们的想象受到了限制。为数不多的出土物的确显示，到公元前800年时，房屋的面积和质量都有所改善。洞穴屋依然在建造，但更多人住到了地面上，有人住在结实的矩形房屋中，有挖了防护壕的地基、夯土或泥砖的墙、灰泥抹的地面，以及墙围。一些房屋中有绘画装饰，也有一些房屋是围绕着一个宽敞的院子建造的。墓穴中发现的浸满水的木器，说明细木工技术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些事物发展的年代顺序尚不清楚，但宽泛地说，我们可以相信房屋建造水平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晚期到第一个千年的早期，有了长足进步。

家居用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提高。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陶器已经普遍使用飞快旋转的轮子制作了，丝绸、漆器和玉器也更加常见了。最早的铜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了越过大草原传来的西方冶金技术的推动。金属似乎非常罕见，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二里头、郑州和安阳才出现了巨大的铸造作坊，打造武器和一些手工工具，最重要的是铸造祭祀器皿。铜陵保存完好的矿井遗址显示了早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国冶金的规模。

鲜有像样的家庭考古资料，意味着我们对金属的日常使用情况知之甚少，不过坟墓中出土的物品和财宝似乎意味着，到公元前800年时，青铜器皿已在某种程度上照社会等级自上而下流传了。在上层社会，金

属的使用量是极大的，公元前12世纪的后母戊鼎（大概是从安阳的王室陵墓中发现的），使用了将近一吨的青铜。自公元前1046年商/周更迭后，有铭刻的青铜器皿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也许证实了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出现。考古学家们也已经确定了上层社会中发生了“祭祀革命”，自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用青铜器陪葬，这似乎与青铜工艺的巨大进步，包括脱蜡法和焊接法的应用，是相适应的。

上层社会的重大建筑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也有重大发展。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最大的一些遗址（有时会占地200～300公顷）开始夯出通常会高达两米的土台。其中最宏伟的陶寺遗址有早至公元前2600年的一个占地5公顷的宫廷院落；到公元前2300年时又筑起了厚达9米的防护墙，有巨大的圆形碑，还有墙上有绘画的宫殿。

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在可能是夏朝和商朝的都城的二里头和郑州，建起了规模大得多的宫殿。而从公元前13～前11世纪，尽管曾遭受洗劫，安阳的商朝王陵无论依什么标准，仍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发掘出的西周宫殿都不及其前朝商朝的宏伟，不过其都城酆京遗存的房屋仍然极大而坚牢。公元前1046年后，富裕的墓葬骤然激增。贵族炫富的程度和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也许是持平的，但比公元前2500年时要高得多。

像西方一样，在古代国家时期，确定无疑地发现了最早的地区性崩溃的证据，最明显的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陶寺的陷落和山东复杂社会的瓦解。不过，像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西方的崩溃一样，陶寺/山东的衰落对于能量获取水平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至少对于如此粗略的度量工作来说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东方没有经历像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崩溃那样的灾难。西方的崩溃使其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连下降了好几个世纪。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相反，上升得越来越快。像古代国家时期一样，缺乏对人体骨骼资料的系统性搜集和家庭考古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但相同的是，仍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勾勒出总体的画面。

文献资料证实，土地占有制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掌握在法律上自由的农民手中，国家课税取代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在土地上为他们的主人劳作的制度。这方面最早的清楚记载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对农产品课税。到公元前3世纪时，这种向自由持有土地的制度的转变可能已经完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大概鼓励了农民自发地加大了投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更高的产量便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还伴随着农业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成熟的文献并不断发展，以公元前440年魏国的李悝为开端。

多茬复种的文献证据似乎也是与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相伴的。到公

元前200年时，两种作物轮种（中国北方是小麦和粟，南方是粟和水稻）已显然成为常态，偶尔也会种些豆类，可能两年轮种3种作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牛”字的流传说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时，役畜也变得重要起来（至少是在上层社会）。然而，在更确定的文献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国家大规模地涉入水利工程始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大力投资开凿运河，以提高农业产量，其最高峰为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的李冰在新征服的四川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金属工具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李学勤和唐纳德·瓦格纳都认为，公元前800～前5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一些考古学家仍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到公元前500年时，中国也开始使用铁器（可能像青铜技术一样，制铁工艺最初也是跨越草原由西方传来的）。中国的铁匠进步非常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炼出了真正的钢，公元前5世纪时铸出了生铁（而欧洲的铁匠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到公元前200年时，铁制武器开始取代青铜武器，铁制工具的使用显然也越来越普遍。不过，青铜业依然繁荣。公元前6世纪的铜绿山铜矿显示了异常成熟的建筑水平，有设有树木线的竖井。侯马的铸造作坊也同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时期，商业也迅猛发展。公元前625年从鲁国的臧文仲开始，大臣们在各自国内巡视以废除关卡。诸侯国都必须向商人们保证不干涉贸易，水运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中国商人在没有受到西方发展影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独立铸造和使用青铜钱币。到公元前200年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铜钱币在流通。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家那样对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碑铭和铅污染状况进行量化，但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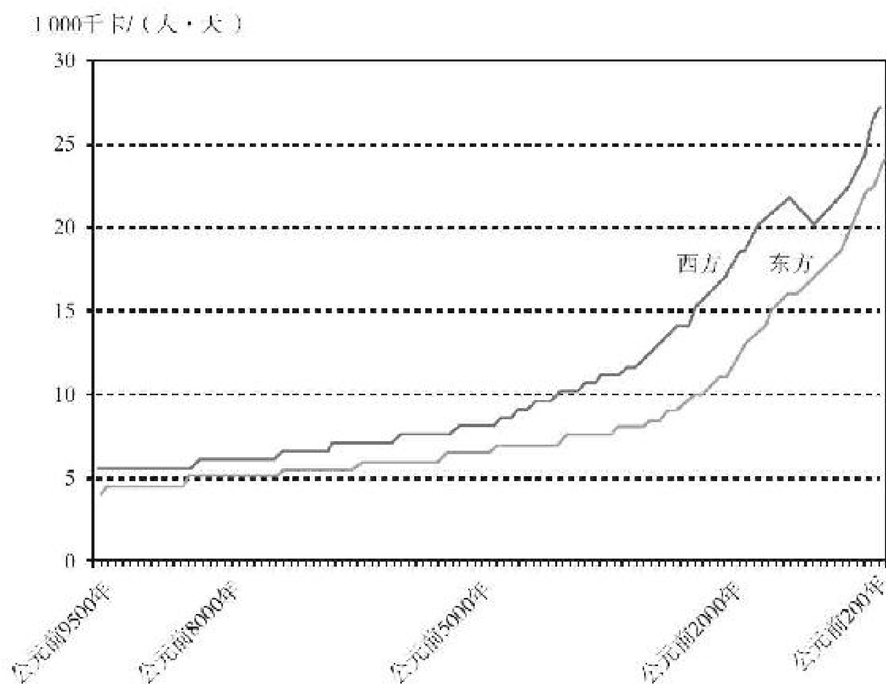
计算分数

图3.30显示了3种不同的办法，来填补公元前9500～前200年能量获取分数估计的鸿沟，或者索性假设能量获取以算术或几何的规模稳步增长，或者依据实际证据进行估计。算术级增长似乎不大可能：图3.30中上面那条线意味着，自大约公元前7000年贾湖文化建立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建立，和自大约公元前2300年陶寺文化毁灭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在四川兴修水利工程，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一样快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应当假设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几何级的，指数随时间而增长。

我们在将西方的考古数据转化为消费水平时所遇到的所有挑战，在东方进行转换时也都会遇到，但将东方的考古发现与西方相比较，显示出东方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与西方非常相似的轨道前进的。主要的不同在于，东方走上耕种和驯化的道路比西方晚了大约2 000年，其能量获取水平也相应落后于西方。在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代，最初差距似乎也停留在大约2 000年。从公元前9500～前6000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

增长了大约50%，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6 000千卡；到公元前2500年时，随着副产品革命的完成，又增长了50%，增至每人每天9　000千卡。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建设大金字塔的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还停留在约公元前45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当时西方最早的大城市，比如布拉克丘和苏萨，都已经出现了（见图3.31）。

图3.31 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和西方能量获取状况



不过，公元前2500年后，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要快得多。由于东方的数据实在太少，我们只能就总体印象而言。在我看来，到公元前2000年埃利都腾飞前夕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大致达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即苏萨时代和乌鲁克扩张的前夕（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公元前1500年，当商朝建设郑州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与公元前2400年的西方的水平大致相当了，即乌尔王陵和埃及大金字塔兴建的时期（14　000千卡）。令我惊讶的是，到公元前1000年，当周朝取代了商朝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不相上下了。当时西方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埃及的中王国取代了旧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城邦（每人每天17　000千卡）。不过，到公元前500年时，因为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崩溃，并且恢复缓慢，东西方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到公元前500年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和东西方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西方差不多了。当时亚述帝国正面临巨大危机，不得不进行上层体制改革——当时的水平是21 000千卡，当然也是西方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时达到的水平，即埃赫那吞和奈费尔提蒂开始奇特的宗教和政治实验之前半个世

纪。

这些估计当然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支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都还只是推测而已。但如果这些大致在正确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大约公元前9500～前3500年这6 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翻了一番后，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2 000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1300～前200年这1 100年间又增长了50%。

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崩溃是到公元前200年时，东西方差距缩小到只有300年的主要原因，但差距缩小的趋势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1 000年间，实际上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只增长了31%，而东方增长了5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尽管目前看来，东方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并且驯化的小麦也同样是通过跨越大草原的商人获得的。这是否是东方迎头赶上的唯一原因，塔里木盆地里那些保存完好的干尸是否就是把很多技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中亚商人，是否还有至今未知的其他原因促使东方社会在古代国家时期比西方发展得快，都还有待研究。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图2.5显示了过去16 000年间的能量获取状况，也展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主要论点。社会发展指数的其他维度——社会组织（通过城市规模来度量）、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尽管单纯度量能量获取无法涵盖社会发展的完整内涵，但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因此我讨论能量获取的证据时比另外3个特点更为详细。

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尽管能量获取是历史的脊梁，我们关于能量获取的证据却是零散和不尽准确的。总体而言，西方历史比东方历史有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西方历史的确有可供量化的证据存在。像史前考古的情况一样，致力于西方考古的学者们对于发掘结果，通常会比东方的同行们做出更多的综合整理。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做了更多的家庭考古工作，并对实际工资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随着证据基础的改善，新发现会解决这里遗留的一些问题。例如，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地断言，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罗马时代的巅峰期究竟是公元前1世纪还是公元1或2世纪，其水平是否当真比东方的巅峰期宋朝要高（以及东方的巅峰期是否真的是12世纪）。我们应当也能够证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到中期，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都真的下降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是否真的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是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和公元前2300年左右东方的危机，是否也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加强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削弱我的另

一些结论。

不过，总体情况显然是有充分坚实的基础的，即使所有具体分数都还存在争论的空间。能量获取水平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非常低，不会过分高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得也极其缓慢。食物热量有所收益，但是，正如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这些收益通常都被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消费了增加的收益，使得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费水平仍低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但是，也如马尔萨斯所看到的，非食物热量也有大量收益，而且随时间积累。因此，总体（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是几何级增长而非算术级增长的，指数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以及最重要的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古代和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精英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达到其顶峰、历史是循环性的、最好的时代在过去等感觉——正如自公元1700年以来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爆炸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8～19世纪众多欧洲思想家，以及20～21世纪的美国人抱持的乐观主义。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2] 应还包括更始帝时期（23～25年）。——编者注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特别是在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联性远非完美，但对于探索跨度为16 000年的社会发展指数这种粗线条的研究，已经足够了。

原则上讲，探究城市规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概念上比较简单。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1）确定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上每个需要计算指数值的时间点上的最大定居点的规模；（2）确定公元20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模；（3）将公元2000年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除以250（社会发展指数所能赋予“社会组织”这个特性的满分）；（4）再将过去城市的人口数除以那个数字。

由于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和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的看法不同，人口统计学中对于公元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规模，意见很不一致。为了设立一个相对无争议的基线，我索性采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社出版的《袖珍数字世界》（*Pocket World in Figures*）中的估计：东京高居榜首，其人口为2 640万；纽约则是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人口为1 670万。当然，还有大量其他估计数字可供我使用，但所有可靠的数字似乎都与上述数字相差不远。

这个起点意味着东方在公元2000年的社会组织方面得到满分250分，每106 800人得1分。纽约有1 670万居民，因而为2000年的西方挣得156.37分。值得记录的最小分值为0.01分，只需1 000人即可获得。这意味着，与能量获取分数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分数的确可能降至0分，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前7500年之前的西方，人口都太少而无法度量。

以这种方法计算组织分数，主要的障碍是经验主义。对于早期定居点，我们必须借鉴考古学和人种志/历史的类比。估算极其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的度量和根据有记录的人口密度的外推。人类学家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密度统计的差异有多大，尽管这些数字似乎都遵循了一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古希腊，估计数字可能非常可靠，误差幅度极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数字就不那么可靠了。总体而言，大多数记录良好的前现代城市，很少有人口密度超过每公顷200人的，每公顷将近100人的城市更为常见。偶尔也可能有前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公顷500人，但这样的人口密度极其异常，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然而，20世纪和21世纪的超大城市中极小的村庄和特定地区，有时人口密度却完全可能超过每公顷500人。

从古代起，就有一些文学作品提到城市规模，但这些资料往往不可靠，因为古代城市的居民通常并不知道自己周围住了多少人。这意味着在现代之前，考古和类比仍然非常重要——尽管由于同时代没有很像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巨人”罗马和长安那样的城市，使得过去3 000年的类比比史前时期的还成问题。在近代，食物进口的资料有时也会留存下来，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核实人口规模的办法。而在现代，我们可以利用相当准确的官方统计资料。

一些作家提供了有精确数字的关于城市历史的概述。特蒂斯·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所著《4 000年城市发展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是一部价值无量的参考书，可能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尽管书中提供的资料来源太少。其较早的版本，《3 000年城市发展史》（*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对资料来源注明得较好。对前现代城市规模的所有估计数字都存在争论的空间。钱德勒和福克斯（Fox）的一些估计数字从资料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估计的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的数据尤其过高，而且像许多历史学家，他们过分夸大了古希腊城市的规模。例如，他们认为公元前430年时雅典居民有15.5万人，而不是3万～4万人。然而，他们对中古和现代早期中国的估计数字，避免了历史学家们时常出现的浮夸。

只采用单一的资料来源，例如钱德勒和福克斯的《3 000年城市发展史》，然后始终依赖于这个来源，虽然会有一些好处，但似乎弊端更大。依赖于单一资料来源的最大好处是，犯的错误会比较一致，因此容易补偿。然而，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错误似乎会无序散布。所以，我决定不这样做，而是采取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专家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交叉检验它们的分数，以减少主观臆断。我总结了西方和东方城市的结果，对于每个城市都列出我的资料来源，以及估计中涉及的任何特殊问题。如果某个估计数字是我自己推测的，我还将提供选择这个数字的理由。我将我对西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1中，对东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2中。研究公元前3000年之前时期的西方考古学家，和研究公元前2000年之前时期的考古学家，以及研究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提供对城市规模的估计数字，即使他们的数字五花八门。但不幸的是，研究从公元前3000/2000～公元1000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大多不肯冒险给出具体的估计数字。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对于每段时间（公元前1400年之前，每100年；公元前1500～前2500年，每250年；公元前2500～前4000年，每500年；公元前5000年之前，每1 000年），我首先提出我确定的最大城市及对其人口的估计，然后提供我的主要资料来源和该城市在社会发展指数中所得的分数，最后简要地评述冲突的估计数字和证据的本质。

表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年代	定居点	规模（人）	分数（分）
公元前8000年	穆赖拜特	大概500	—
公元前7000年	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	1 000	0.01
公元前6000年	恰塔尔休于	3 000	0.03
公元前5000年	布拉克丘	4 000	0.04
公元前4000年	乌鲁克、布拉克丘	5 000	0.05
公元前3500年	乌鲁克、苏萨、布拉克丘	8 000	0.09
公元前3000年	乌鲁克	45 000	0.42
公元前2500年	乌鲁克	50 000	0.47
公元前2250年	阿卡德、孟菲斯	35 000	0.33
公元前2000年	孟菲斯、乌尔	60 000	0.56
公元前1750年	巴比伦	65 000	0.61
公元前1500年	乌鲁克、底比斯	75 000	0.7
公元前1400年	底比斯	80 000	0.75
公元前1300年	底比斯	80 000	0.75
公元前1200年	巴比伦、底比斯	80 000	0.75
公元前1100年	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	50 000	0.47
公元前1000年	底比斯	50 000	0.47
公元前900年	底比斯	50 000	0.47
公元前800年	尼姆鲁德/卡尔胡	75 000	0.70
公元前700年	尼尼微	100 000	0.94
公元前600年	巴比伦	125 000	1.17
公元前500年	巴比伦	150 000	1.40
公元前400年	巴比伦	150 000	1.4
公元前300年	巴比伦、亚历山大	150 000	1.4
公元前200年	亚历山大	300 000	2.81
公元前100年	亚历山大，可能还有罗马	400 000	3.75
公元前/公元1年	罗马	1 000 000	9.36
公元100年	罗马	1 000 000	9.36
公元200年	罗马	1 000 000	9.36
公元300年	罗马	800 000	7.49
公元400年	罗马	800 000	7.49
公元500年	君士坦丁堡	450 000	4.23
公元600年	君士坦丁堡	150 000	1.41
公元700年	君士坦丁堡	125 000	1.17
公元800年	巴格达	175 000	1.64
公元900年	科尔多瓦	175 000	1.64
公元1000年	科尔多瓦	200 000	1.87
公元1100年	君士坦丁堡	250 000	2.34
公元1200年	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	250 000	2.34
公元1300年	开罗	400 000	3.75
公元1400年	开罗	125 000	1.17
公元1500年	开罗	400 000	3.75
公元1600年	君士坦丁堡	400 000	3.75
公元1700年	伦敦、君士坦丁堡	600 000	5.62
公元1800年	伦敦	900 000	8.43
公元1900年	伦敦	6 600 000	61.8
公元2000年	纽约	16 700 000	156.37

公元2000年：纽约，16 700 000人，156.37分。据《经济学人》的《袖珍数字世界》估计，200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为18 100 000人，圣保罗为18 000 000人，但纽约仍然是西方核心地带（即美国、加拿大边境

地区，以及西北欧和中欧）最大的城市。

公元1900年：伦敦，6 600 000人，61.8分。钱德勒估计伦敦的人口为6 480 000人，根据多种官方统计资料，似乎城市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数字为大约6 500 000。

公元1800年：伦敦，900 000人，8.43分。关于1800年的人口比1900年的争议要多一些。一些资料来源认为伦敦的人口数要小一些，证据是将官方统计数字与见证人的评述结合在了一起。当时西方第二大城市可能是君士坦丁堡，钱德勒认为其人口为570 000人。

公元1700年：伦敦、君士坦丁堡，600 000人，5.62分。钱德勒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700 000人，而伦敦为550 000人；贝洛赫（Bairoch）认为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650 000~1 000 000人。国际中世纪后勤学项目联合主任之一约翰·霍尔顿（John Haldon）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将近700 000人。我的论点是在综合了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的面积后得出的。

公元1600年：君士坦丁堡，400 000人，3.75分。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6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700 000人；贝洛赫则说是650 000~1 000 000人。证据仍然主要是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1600年时证据质量骤然下降。

公元15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弗兰克说贝洛赫估计开罗人口为450 000人，贝洛赫还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500 000人，但约翰·霍尔顿认为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遭洗劫过去不久，人口估计只剩下100 000人左右。证据与1600年和1700年的仍是一类，但对于公元500~1500年，就如何解释这些证据，争议要大得多。欧洲历史学家和中东历史学家有时也采用非常不同的方法，经常导致对伊斯兰城市不切实际的高估，他们认为人口密度会达到每公顷500~1 000人。伊斯兰城市的历史学家对于把握不大的估计往往比欧洲的历史学家谨慎。对开罗的估计似乎尤其成问题。证据主要来自军人登记册、当时人们的印象，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在对证据所做的解释中存在很多疑问。

公元1400年：开罗，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本人的估计，是在比较了欧洲城市在黑死病期间极高的死亡率的基础上做出的。钱德勒认为开罗在1400年仍然有360 000居民，但那将意味着人口只从瘟疫前巅峰时期的450 000人下降了20%。这似乎与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多斯（Dols）所述不符。关于证据的本质，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3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关于资料来源和问题，

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200年：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关于这些城市的人口，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一般都认为人口全都在200　000~300　000人之间。然而，也有一些估计（尤其是对巴格达），认为还要高很多（见“公元10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威克姆（Wickham）认为开罗在11世纪时，人口也达到了250 000人。

公元1000年：科尔多瓦，200　000人，1.87分。这是我的估计。也有几项估计认为科尔多瓦的人口达到了400　000~500　000人。钱德勒也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达到了300 000人，巴格达人口为125 000人。然而，这些估计似乎都太高了。霍尔顿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150　000人，而巴格达居住区的面积（550~860公顷）似乎太小了，不足以居住100　000人以上的人口。科尔多瓦的面积大致是巴格达的两倍，因此，11世纪其巅峰时的人口为200 000人。

公元900年：科尔多瓦，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钱德勒估计巴格达的人口为9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人，而科尔多瓦为200　000人。还有几位学者把巴格达的人口估得很高，不过再没有人估得像钱德勒那样高了。例如伊拉·拉比达斯（Ira　Lapidus）认为是300 000~500 000人，那样的话，人口密度就是每公顷350~900人。按照钱德勒的估计，人口密度则为每公顷1　050~1　600人。这两个数字似乎都高得出奇了。其他工业革命前的大城市甚至很少有达到每公顷200人的。

公元800年：巴格达，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巴格达自762年建城后，显然发展非常迅速，在812~813年和865年遭到围攻之前，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钱德勒估计的巴格达人口为7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为250 000人，科尔多瓦为160 000人。考虑到这些城市的实际面积，以及黑死病肆虐了好几个世纪后西方核心地带普遍人口较少的情况，这些数字似乎又都过高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仅仅为40 000~50 000人。

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从霍尔顿关于公元500年和750年的数字推测来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50~750年肯定是陡然下降了。下降自查士丁尼大瘟疫开始，在7世纪10年代的波斯战争和40年代与埃及的谷物贸易瓦解后又加速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40　000~50　000人，但是证据不足以使我们确定公元700年之前和之后各下降了多少。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公元700年之后。人口在7世纪仅下降了15%~20%，在8世纪又下降了65%。

公元600年：君士坦丁堡，150　000人，1.41人。参见“公元700

年”一段的讨论。

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450 000人，4.23分。卡梅伦（Cameron）和威克姆认为人口应为5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400 000人。讨论非常倚重于谷物供应资料。在公元439年丢失了北非之后，罗马人口迅速下降，到公元600年左右时，可能减少到只有20 000~40 000人。威克姆称7世纪的罗马为“都市村庄”。

公元4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罗马人口在公元3世纪时可能就下降了，但很难说下降了多少。不过，很显然在4世纪时，它仍然是地中海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到439年，汪达尔人征服北非时，该城也许仍有75万居民。自那以后，人口骤降。威克姆就此提出了一个较低的数字：在5世纪早期时为500 000人。

公元3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参见公元400年一段。公元300年时，城区人口数量比400年时的要低，这也许意味着3世纪时人口的下降比我想象的要剧烈，4世纪时又上升了，但这些都无法肯定。

公元2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时有100万居民，而且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至少一直到公元200年，然后在3世纪有明显下降，5世纪时急剧下降。不过，我们恐怕已经无法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了。一些学者认为罗马要小得多，人口也许从来没有超过500 000人。然而这有些太小看罗马了，500 000人恐怕是最低的可能数字了。这个论点部分依赖于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整个意大利的人口（究竟是四五百万，还是1 200万以上），部分取决于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

公元1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这是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元头两个世纪的数字（参见“公元200年”一段）。直到大约公元200年之前，人口完全有可能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不大可能比100万人多太多。

公元前/公元1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2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也可能是罗马，400 000人，3.75分。谷物贸易记录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300 000人，2.81分。

公元前300年：巴比伦、亚历山大，150 000人，1.4分。沙伊德尔认为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1年建城后发展非常迅速，但在公元前3~前2世纪速度减缓。

公元前4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估计数字是根据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当时的人所做的评述得出的。一些人对巴比伦人口的估计数字要低一些。盖茨（Gates）认为是

80 000人，这对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巴比伦是合理的，但对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巴比伦，恐怕太低了。

公元前5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参见“公元前4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巴比伦，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根据公元前400年和公元前500年的估计数字推测的。

公元前700年：尼尼微，100 000人，0.94分。估计数字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人口密度的猜测和对诸如《圣经·约拿书》等当时文献的解读得出的。因此，各种估计数字大相径庭。例如，阿凯尔曼（Akerman）认为尼尼微的人口为300 000人，意味着人口密度为每公顷630人。

公元前800年：尼姆鲁德（也被称为“卡尔胡”），75 000人，0.7分。参见“公元前7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1100～前650年）的埃及的文字资料特别匮乏，而考古学家也基本上未对这个时期的遗址发掘予以重视，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估计主要是靠猜测。

公元前10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100年：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200年：巴比伦、底比斯，80 000人，0.75分。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的居住区如今大都已沉于地下水位之下，使得很难展开正式研究。然而，底比斯显然比中王国时期的城市大得多。中王国的城市一般只有50公顷左右，底比斯也许是公元前1500～前12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们关于巴比伦的信息非常稀少，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人早期对默克斯地区的发掘。

公元前13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4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3500年：乌鲁克、底比斯，75 000人，0.7分。还有一些估计要高得多。例如，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认为巴比伦的人口达到了200 000人。

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65 000，0.61分。这是我的估计。我们仍然不知道汉谟拉比（在“长年表”上于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时期巴比伦的面积和人口密度。那时候的巴比伦，如今不仅在地下水位之下，而且深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巴比伦之下。它也许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城市，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其他城市的遗迹显示人口密度相当高，因此推测其都城人口为65 000人左右，应当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尽管我们缺少能进行严格估计的信息。

公元前2000年：孟菲斯、乌尔，60 000人，0.56分。关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城市（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的人口密度，不同的意见实在太多了，以致大多数考古学家都不肯给出具体数字。钱德勒估计的数字相对争议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甚至是第二个千年，任何城市的人口都不可能达到100 000人，当时最大的一些城市的人口都在50 000人加上15 000人上下（可得0.33~0.61分）。根据R·M·亚当斯（R. M. Adams）的调查，乌鲁克的人口数字可能比孟菲斯和乌尔还要可靠，尤其比对阿卡德的猜测可靠。目前连阿卡德的位置都还没有确定。

公元前2250年：阿卡德、孟菲斯，35 000人，0.33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2500年：乌鲁克，50 000人，0.47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乌鲁克，45 000人，0.42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苏萨、布拉克丘，8 000人，0.09分。乌鲁克和苏萨的人口数字纯属猜测，而非严格的估计。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发展得很快。公元前3500年时，该城很显然是最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但依照目前已有的证据，我们无法非常准确地推算出其人口。苏萨的遗迹显示该城也是一座大城镇，但由于19世纪的考古发掘质量太差，我们也无法说出该城人口的准确数字。新近在布拉克丘进行的发掘表明，该城在公元前3000年时达到了10 000人，就此前2 000年的水平来说，已算非常大了——甚至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点。然而，至今没有更准确的估计数字了。

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布拉克丘，5 000人，0.05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5000年：布拉克丘，4 000人，0.04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6000年：恰塔尔休于，3 000人，0.03分。

公元前7000年：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1 000人，0.01分。耶利哥的规模也许差不多，可能还有一些大致同样规模的更早的定居点；梅塞尔斯（Maisels）认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穆赖拜特有500~1 000居民。

公元前8000年：最早到公元前7500年前，西方核心地带恐怕没有任何定居点的人数能达到500人，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我所确定的指数的最低分0.01分。

从姜寨到东京

表4.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年代	定居点	规模（人）	分数（分）
公元前4000年	姜寨、贾湖	300	0
公元前3500年	西坡	2 000	0.02
公元前3000年	大地湾	5 000	0.05
公元前2500年	陶寺、两城镇、尧王城	10 000	0.09
公元前2250年	陶寺、两城镇、尧王城	14 000	0.13
公元前2000年	鄫城南水	11 000	0.10
公元前1750年	二里头	24 000	0.22
公元前1500年	郑州	35 000	0.33
公元前1400年	郑州	35 000	0.33
公元前1300年	郑州	35 000	0.33
公元前1200年	安阳	50 000	0.47
公元前1100年	安阳	50 000	0.47
公元前1000年	洛邑、酆京	35 000	0.33
公元前900年	洛邑、酆京	40 000	0.37
公元前800年	洛邑、酆京	45 000	0.42
公元前700年	临淄、洛邑	55 000	0.51
公元前600年	临淄、洛邑	65 000	0.61
公元前500年	临淄	80 000	0.75
公元前400年	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	100 000	0.94
公元前300年	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	125 000	1.17
公元前200年	长安	250 000	2.81
公元前100年	长安	375 000	3.75
公元前/公元1年	长安	500 000	4.68
公元100年	洛阳	420 000	3.93
公元200年	长安	120 000	1.12
公元300年	平阳、长安、洛阳、许昌、邺	140 000	1.31
公元400年	平城	200 000	1.87
公元500年	洛阳	200 000	1.87
公元600年	大兴城/长安	600 000	5.63
公元700年	长安	1 000 000	9.36
公元800年	长安	1 000 000	9.36
公元900年	长安	750 000	7.00
公元1000年	开封	1 000 000	9.36
公元1100年	开封	1 000 000	9.36
公元1200年	杭州	1 000 000	9.36
公元1300年	杭州	800 000	7.50
公元1400年	南京	500 000	4.68
公元1500年	北京	678 000	6.35
公元1600年	北京	700 000	6.55
公元1700年	北京	650 000	6.09
公元1800年	北京	1 100 000	10.3
公元1900年	东京	1 750 000	16.39
公元2000年	东京	26 400 000	250.00

公元2000年：东京，26 400 000人，250分。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上海，12 900 000人，120.79分。

公元1900年：东京，1 750 000人，16.39分。一些城市历史学家做出了稍低的估计，但是对这一地区的估计数字，意见总体似乎是一致的。估计数字是根据人口普查、纳税申报、食品供应和军事人员等多种官方统计资料做出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大约有1 100 000居民（10.3分）。

公元1800年：北京，1 100 000人，10.3分。对清朝时期北京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据于调运粮食的统计资料，估计结果大相径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北京的人口为300万或200~300万。钱德勒的估计数字似乎与社会历史学家们对清代北京的描述更为相符。

公元1700年：北京，650 000人，6.09分。在遭受1644年残酷的洗劫之后，北京人口急剧下降，到1700年时可能仍未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较高的人口数字。

公元1600年：北京，700 000人，6.55分。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但却没有提供支持这些数字的证据。

公元1500年：北京，678 000人，6.35分。莫特（Mote）估计16~17世纪南京和北京的人口都在大约100万左右，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既因为这个数字太高了（北京可能直到18世纪晚期，人口才达到100万），也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自1421年北京取代南京成为国都以来，南京人口下降了大约50%，这是莫特在别处也承认了的。贝洛赫也同意较低的估计数字，他认为1600年时北京至少有600 000人。

公元1400年：南京，500 000人，4.68分。莫特说他认为南京的人口大约有100万人，但根据他本人粗略的计算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是400 000~500 000人。

公元1300年：杭州，800 000人，7.5分。贝洛赫认为1300年左右另有4个中国城市人口在200 000~500 000人，而杭州“可能要大得多”。然而，他根据稻米的消费量计算而来的数字更准确地指向了800 000人，同时，伊懋可通过稻米消费量计算出的数字为600 000~700 000人。饶济凡（Rozman）也认为12~13世纪杭州的人口在500 000人以上，甚至可能高达100万人。库恩（Kuhn）和克里斯蒂安也倾向于100万人，施坚雅（Skinner）认为是120万人。我为1200年选择较高的数字：大约100万；为1300年选择较低的数字：800 000人。到1300年时，中国整体人口都减少了。当马可·波罗于13世纪晚期访问杭州时，该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马可·波罗言语间暗示的数字（500万~700万）肯定是高得离谱了。马可·波罗恐怕根本不可能知道杭州的人口数，只需想想该城比他那个时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都大

得多即可。

公元1200年：杭州，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3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钱德勒和贝洛赫都认为开封较小（他俩分别认为开封的人口为400 000人和400 000~450 000人），但这似乎与当时文献对该城市的描述不符。不确定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来自哪些区域应算作“城市”这个问题。新城建于955年，有长27千米的城墙（962年又延长了3.3千米），在旧城46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5个行政区，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该城人口就已经在向城墙之外发展了。到1021年时，14个新的城外大行政区得到了承认。官方统计资料称，980年左右开封辖区共有890 000人定居，1103年时增加到130万人，城市某些部分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公顷500人。如果我们只计算城墙内的人口，那么钱德勒和贝洛赫的估计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计算全部人口，莫特、施坚雅和库恩选择的官方数字，看来就是合理的了。我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到资料的模糊性，我索性做一个粗略的估计：100万人。按照官方数字，1100年时，杭州可能有80万~100万人。

公元10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100年”一段。

公元900年：长安，750 000人，（我的估计）7分。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对公元900年左右的长安人口发表意见。9世纪70年代末，黄巢曾反复洗劫过这座城市，并于880年和883年将其彻底焚毁，其人口锐减也就毫不奇怪了。在9世纪70年代末之前，长安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贝恩（Benn）认为其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库恩认为“在100万人以上”，但即使已经开凿了大运河，也很难看出怎么可能运输那么多谷物到长安，来供养贝恩提出的那么多人口。施坚雅认为中唐时期长安可能有大约100万人，似乎更为可信，我认为这个数字适用于公元800年和700年。包围了30多平方英里[3]的城墙内无疑能容下100万人，但200万人恐怕不大可能，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不过，自9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是怎样骤降的，也不大清楚。原始资料称当皇帝唐僖宗于885年回到长安时，该城已被彻底毁灭，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因为该王朝又在那里维系了20年，直到904年军阀朱温下令将所有仍存在的建筑摧毁。直到那一年之前，长安仍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不过，即使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公元900年时东方的社会组织/城市规模的分数仍然很高，因为洛阳那时可能也有500 000~750 000人。武则天于7世纪晚期移居洛阳时，可能有100 000多户家庭随之迁移。贝恩认为洛阳的人口高达100万人。不过，饶济凡提出的数字是500 000人。

公元8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7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600年：大兴城（7世纪时被唐朝重新命名为“长安”），600 000人，5.63分。这是我的估计。隋朝兴建了大兴城，作为其新都，城墙包围的面积有30多平方英里，在7世纪时可容纳约100万人。不过，皇帝于583年定都于此时，该城还仍在建设中，很多行政区尚无人居住。公元600年时，该城人口可能已经很多了，因为建筑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劳工，加上他们的家眷，更不用说大量官员和工匠（及其家眷），还有上百座寺庙里数以千计的和尚和尼姑了。而且，当隋朝于589年灭亡了中国南方的陈朝后，又有大量人口从南方迁到了大兴城。

公元500年：洛阳，200 000人，1.87分。北魏的孝文帝于493年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据史书记载，他还于495年调集了150 000名士兵到洛阳，并将部分洛阳周边土地赐予他们。该城于公元6世纪扩展了许多，人口很可能像大兴城一样，达到了600 000人。

公元400年：平城，200 000人（我的估计），1.87分。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北方有好几座大城市，但平城（1048年更名为“大同”）可能是最大的。史书记载公元398年，有100 000名鲜卑人被强制迁往平城；399年时，又有100 000名河南农民和2 000户富裕的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被迁往那里。除了像邺城等极少数例外之外，公元200～400年这段时期城市的考古证据极其匮乏。

公元300年：平阳、长安、洛阳、许昌、邺城，140 000人（我的估计），1.31分。公元四五世纪时，很难定义究竟什么样才能算城市；因为那个时期的主要战争基本上都是来自奴隶的袭击，所以在中国北方，城市就像是巨大的军营。军阀聚拢了成千上万户家庭，将他们围在中央，而堡垒周围则有广袤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平阳、长安、洛阳、许昌和邺城在公元300年左右都成了大城市，可能比公元2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还要大，而比公元4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稍小一些。

公元200年：长安，120 000人（我的估计），1.12分。公元190年时，军阀董卓劫掠并摧毁了洛阳，将其人口迁移到长安；196年，曹操将皇室也迁到了长安（直到他死后，皇室才迁回洛阳）。这些城市显然比公元100年的洛阳要小得多，更不用说公元1年的长安了。

公元100年：洛阳，420 000人，3.93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汉朝一些主要城市的布局，却没有提供对人口的估计。从考古发掘报告和留存下来的城市平面图来看，似乎长安和洛阳（在公元前206～公元32年和公元32～220年两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分别为都城）的人口都有数十万。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于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强行迁移了120 000户家庭到其都城咸阳，在公元前3世纪10年代又迁移了更多家庭去照料他的墓地。这些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咸阳可能的确有200 000人以上的居民。汉朝在长

安的新都城至少也一样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长安的两个主要市场面积分别达到了50公顷和25公顷，这也说明了人口之庞大。该城面积广大，达到了44.5平方公里，但从发掘区域的人口密度，以及一向不够完备的长安粮食供应记录来看，其人口数量不及当时的罗马。我估计到西汉末年时（即公元前/公元1年左右），该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为大约500 000人，不过这种猜测的误差很可能会达到20%左右。

长安周围还有一些卫星城，使得估计其人口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围绕着皇陵发展起来的卫星城，分别散布在郑国渠两岸30千米和灞河、浐河两岸20千米的区域内。如果我们把长安及其卫星城合并在一起计算，那总人口会超过罗马，但由于这些卫星城从各方面来看都像是独立的城市，所以我没有这样做。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长安在公元前100年后发展放缓，自汉武帝于公元前87年死后，也没有再建立新的卫星城。洛阳面积比长安小一些，但人口显然比长安稠密。我因此对洛阳做稍低的估计，认为其人口在公元100年巅峰时为420 000人。当然，如有上下20%的误差也是合理的。

公元前/公元1年：长安，500 000人（我的估计），4.68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长安，375 000人（我的估计），3.75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200年：长安，250 000人（我的估计），2.81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3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25 000人（我的估计），1.17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考古资料依然很少，但这些城市的规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似乎明显稳步扩大。最大的城市的城墙[舞阳（燕国），长达27千米；新郑（郑国/韩国），16千米；临淄（齐国），15千米；曲阜（鲁国），14千米；洛邑，后更名为洛阳（周朝都城），12千米]一般都围拢了9~15平方千米的面积，说明人口应在100 000~200 000人之间。然而，一些城市显然有较大的典礼和工业用地，而且（至少在起初）可能有大片的土地被并入城墙内，只是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下面的估计是我自己做出的，误差可能会比汉朝的城市大，甚至可能高达上下50%。

古代的文献资料并无多大帮助。《史记》中记载齐国的临淄有70 000户人家，号称有210 000名成年男子。司马迁评论说，该城如此拥挤，以致人们“挥汗如雨”。他的数字暗示总人口可能达到350 000~750 000人，这将使临淄的人口比同时代的巴比伦要多得多。不过，考虑到该城的实际面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还意味着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在公元前500~前1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长，即使证据毫不含糊地表明它们的面积在这段时期至少增加了一倍，甚至可能增加了4倍。

贝洛赫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1年）有4～6座城市的人口在100 000人以上，这与我此处所做的估计非常一致。

公元前4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00 000人（我的估计），0.94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500年：临淄，80 000人（我的估计），0.75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临淄、洛邑，65 000人（我的估计），0.61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考古证据，甚至比下半叶还要缺乏（其实比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都要少）。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比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要小，但我们不能确定小多少。我猜测前者的人口大约是后者的一半，但是这全都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和人口密度的估计。

关于最大城市（西周的都城、渭河流域的丰京和镐京，东周的都城洛邑）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大多局限于贵族陵墓和青铜器皿。丰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12.5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而镐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但这些区域只有小部分当年是盖有建筑物的。对于洛邑，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偶然发现的出土物就是来自洛邑城本身，还是也有可能来自郑州。

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认为“周原（即丰京和镐京地区）上的西周都城，是由一些宗教兼居住功能的大院落非常随意的聚合而构成的。这些院落散布在可能广阔达20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院落之间有大片的农田相隔”。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不仅意味着周朝都城人口非常之少，而且意味着由于居住模式过于分散，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国根本谈不上“城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的“城市”。

即便如此，这200平方千米内的出土物显然密度不同，（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国作家们那样）认为丰京、镐京和洛邑是明显的核心地带，似乎是合理的，即使从有密集、连续的房屋建筑区域这个意义上判断它们不是严格的“城市”。我猜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洛邑和丰京有35 000人，镐京可能有它们的一半。我想公元前1000年时洛邑和丰京还不大可能有50 000人，因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期的增长量不可能超过20 000人。因此，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以相当平稳的增长率发展的，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稍多，从35 000人增长至约80 000人。

公元前700年：临淄、洛邑，55 000人（我的估计），0.51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800年：洛邑、丰京，45 000人（我的估计），0.42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洛邑、酆京，40　000人（我的估计），0.37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1000年：洛邑、酆京，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钱德勒认为洛邑人口有50 000人。

公元前11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作为商朝最后的都城，安阳自1928年以来得到了大规模发掘，尽管有城墙的城市洹北直到1997年才被定位。洹北城墙包围的面积有470公顷，判断其中有20 000～25 000人似乎是合理的，但安阳的其他遗迹蔓延了大约30平方千米。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一样（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在这样一个分散的定居系统中，很难确定一个“城市”的边界在哪里。因此我提出的50　000人就多少有些武断了。如果非常狭义地将这个城市只定义为城墙包围的区域，那么这个估计数字可以砍去50%；而如果非常广义地将其定义为包含郊区，则又可能将总人口提高到100　000人，甚至还要多。如果安阳的人口有50 000人，就与公元前1100年的孟菲斯一样大了；如果有100　000人，那它就是公元前13～前1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提出50　000这个数字，是对这座城市非常狭义的定义和非常广义的定义取中。

安阳建于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时已显然成为主要的定居点（无论怎样定义）。考虑到对公元前1100年做估计时的不确定性，为公元前1200年提出一个不同的估计数字，将更麻烦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索性为两个年代都提出50 000人这个数字。

公元前12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三星堆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也许能达到350公顷，人口也许能与安阳匹敌，但我们对三星堆仍然知之甚少。

公元前13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大约兴建于公元前1600年，通常被认为是商朝早期的一个都城。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有300公顷，但还有一堵更大的外围墙包围了总计达1300公顷的区域。像安阳（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一样，想准确估计其人口有两大难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定义“城市”；第二，如何，计算城市内的人口密度。我只好又一次在最狭义的定义（城墙之内的核心区域人口不到15　000人）和极广义的定义（多达50 000人）之间取中了。郑州似乎比公元前13～前11世纪的安阳要小得多；我估计的数字为35　000，将使其规模相当于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底比斯的一半。

公元前14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300年”一段。在缺乏详细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对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郑州提出同样的数字。

公元前15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

元前1400年”和“公元前1300年”两段。

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24 000人，0.22分。二里头比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遗址得到了好得多的探索。二里头三期的面积大致达到了300公顷。
24 000人这个估计数字——即使刘莉认为只是作为从18 000～30 000人的一系列估计数字的取中点提出的——可能仍然是东方最可靠的史前人口统计学数据了。24 000人这个数据意味着大约每公顷80人，按照巴比伦等同时代的西方城市的标准来看，人口密度算是低的，但与史前其他中国定居点比，仍相对较高。

公元前2000年：酆城南水，11 000人（我的估计），0.1分。这个定居点面积似乎达到了230公顷，但发掘得仍然非常不足。我猜测人口密度人较低，大约每公顷50人。

公元前225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4 000人（我的估计），0.13分。陶寺在其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8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为每公顷50人。刘莉也说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酋邦可能有10 000多名成员，这也许意味着对陶寺的人口密度，我们应当采用较低的数字（甚至即使以史前中国定居点的标准来看，陶寺的出土物实际上极其分散）。新近的研究表明，两城镇和尧王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期，面积甚至比陶寺还要大，分别达到了272.5公顷和367.5公顷。

公元前250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0 000人，0.09分。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显然比其后来的巅峰时期要小，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估计数字。参见“公元前225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大地湾，5 000人（我的估计），0.05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10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3500年：西坡，2 000人（我的估计），0.02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4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没有任何定居点面积大到能供养1 000人，故而得分为最低分（0.01分）。公元前4000年时，姜寨的面积为5公顷，刘莉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公顷44～63人，意味着该定居点只有220～315人。彼得森（Peterson）和谢拉赫（Shelach）为该遗址的人口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动态模型，所产生的数字要稍高一些，但也仅仅是400人左右。公元前6000年时，贾湖的面积也是大约5公顷，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从公元前第7个至公元前第5个千年，似乎再没有面积能超过2公顷的考古遗址了。

多少人才够

间接度量

自我们有文献资料起（西方始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东方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直到公元20世纪，在所有时间点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起，孟菲斯是埃及的都城，而安阳是商朝的都城；到了19世纪，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而北京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到孟菲斯和安阳之前，有一定数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乌鲁克和东方的郑州（也可能是二里头），也是更早期国家的都城。

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选择城市规模作为社会组织的间接度量手段的正确性。在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地区最大城市的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在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希腊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前现代历史。只是到了20世纪，经济力量才压倒政治力量，以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在2000年未能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前30名；而东方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只排在第24位。在此前的全部历史中，城市规模都是社会组织的非常直接的反映。

能量获取失去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总体而言，能量获取历史的图形（见图2.5）与城市规模–社会组织的图形（见图4.1），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在冰期结束后增长非常缓慢，在公元前最后几千年开始加速，然后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呈爆炸式增长。在两幅图中，在过去10 000年间，西方的分数在大部分时间都高于东方。然而，两幅图中的差异也如相同处一样引人注目。

图**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城市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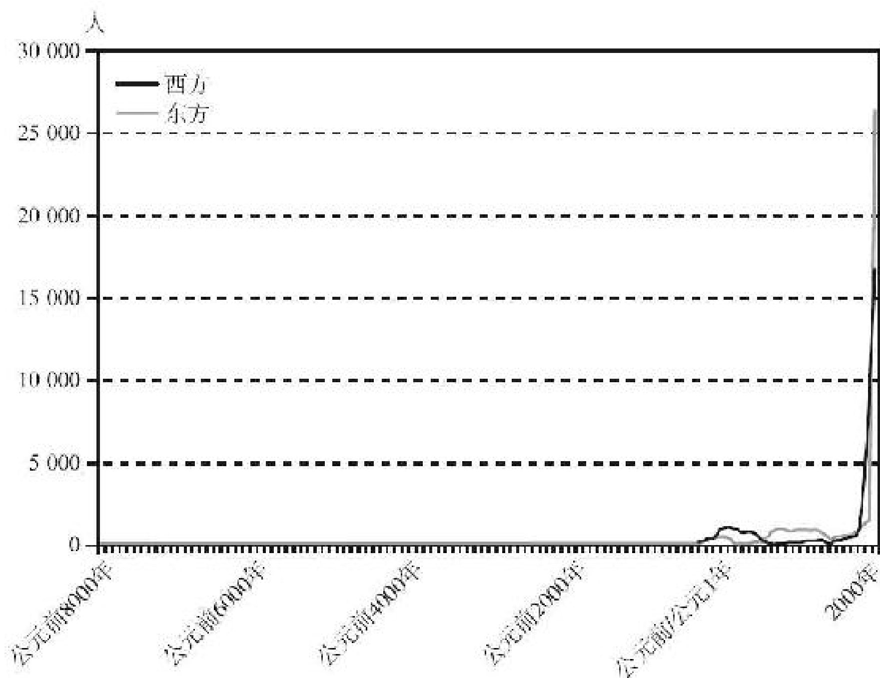


图4.2和图4.3分别标绘了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情况和城市规模（以社会发展指数上的分数的形式表示），以及两者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图4.4和图4.5则在线性－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同样的数据；可以看出同样的模式，不过对比不像对数标尺上那样鲜明）。能量获取曲线与城市规模曲线最引人注目的反差，似乎是：（1）城市规模曲线开始上升的时间比能量获取曲线要晚得多；（2）城市规模曲线比能量获取曲线不稳定得多。这两个反差很容易解释：城市规模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只有当能够达到某种水平的能量获取（每人每天7 000~8 000千卡），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才会开始显著增长；然而一旦某个社会跨过了这个门槛，能量获取预算边缘相对较小的变化，就能对可用于组织较大的社会的能量数量产生巨大影响。

图**4.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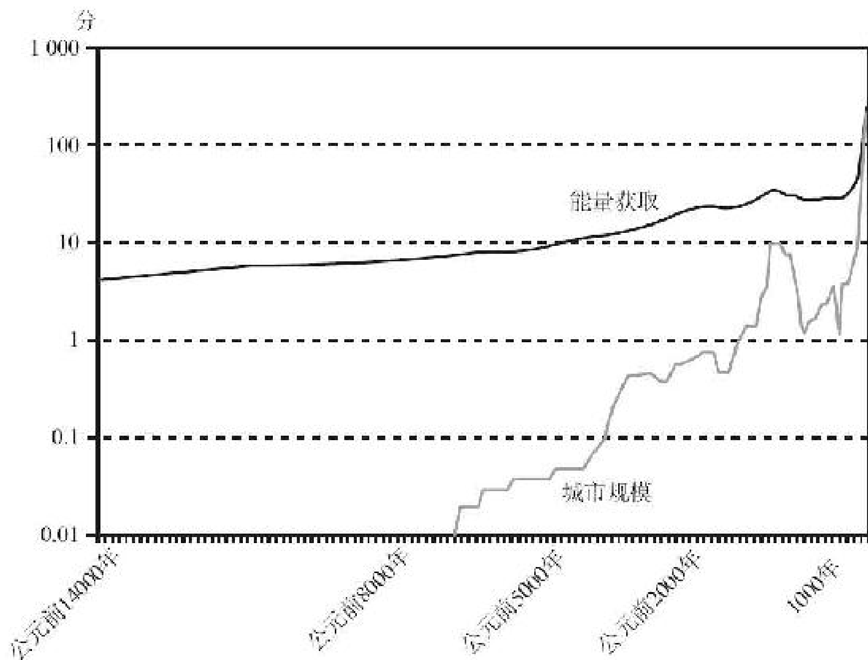


图4.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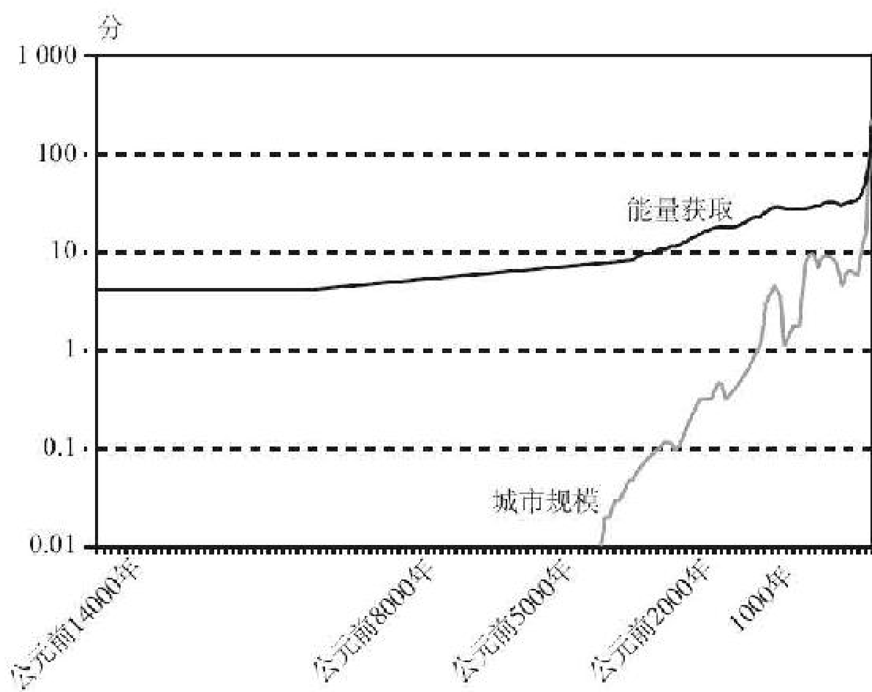


图4.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 - 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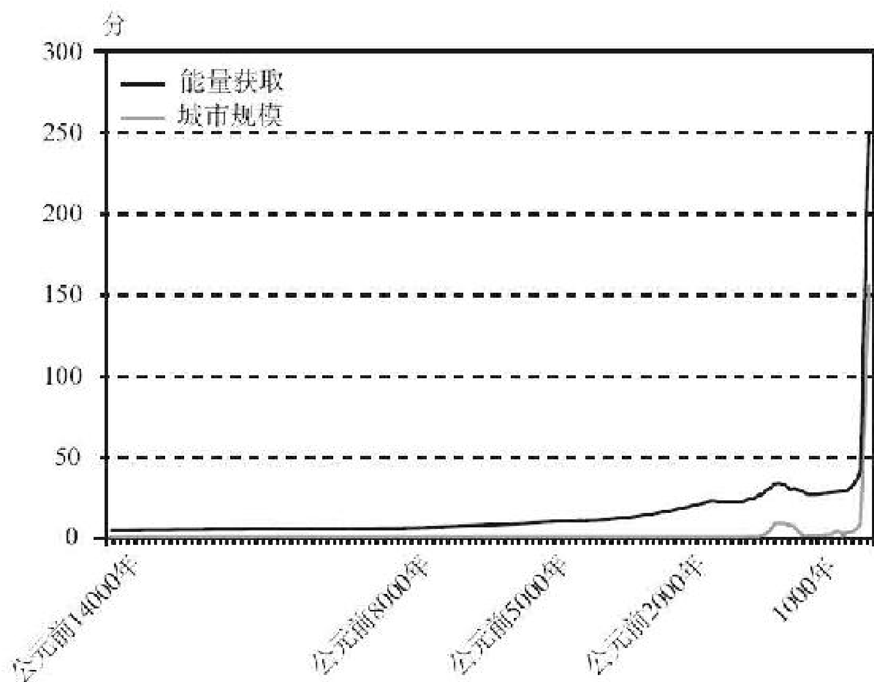


图4.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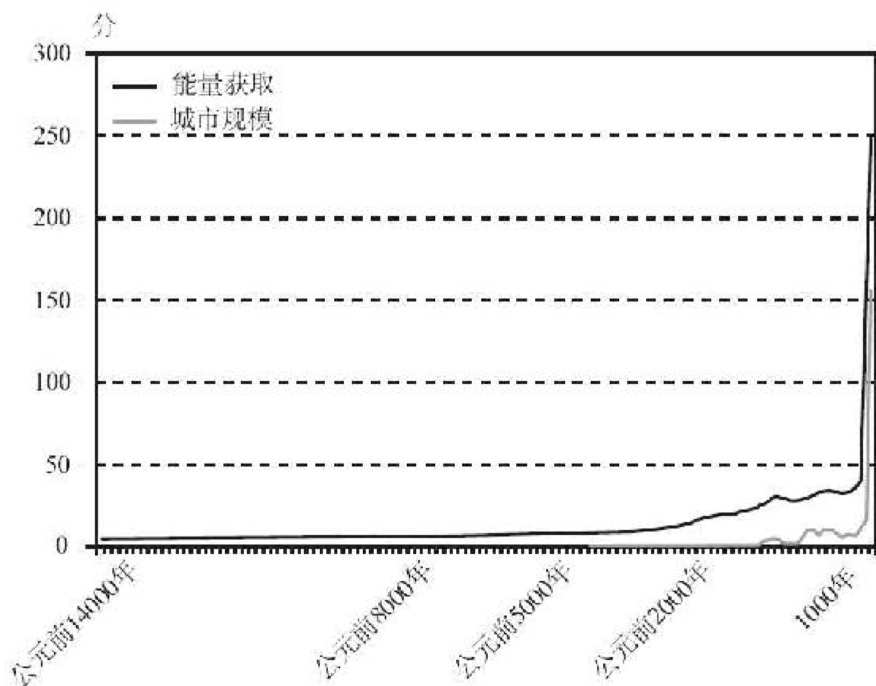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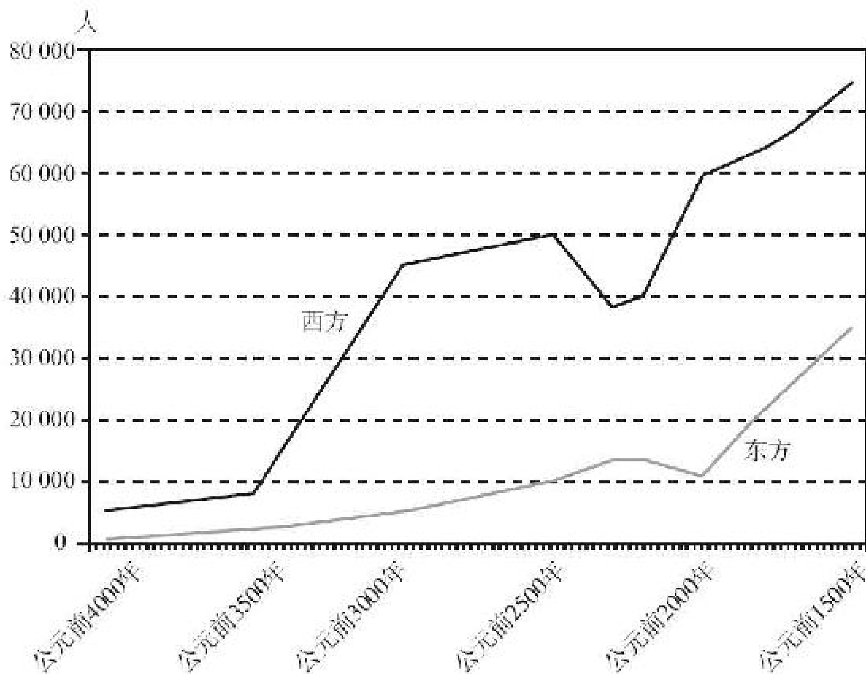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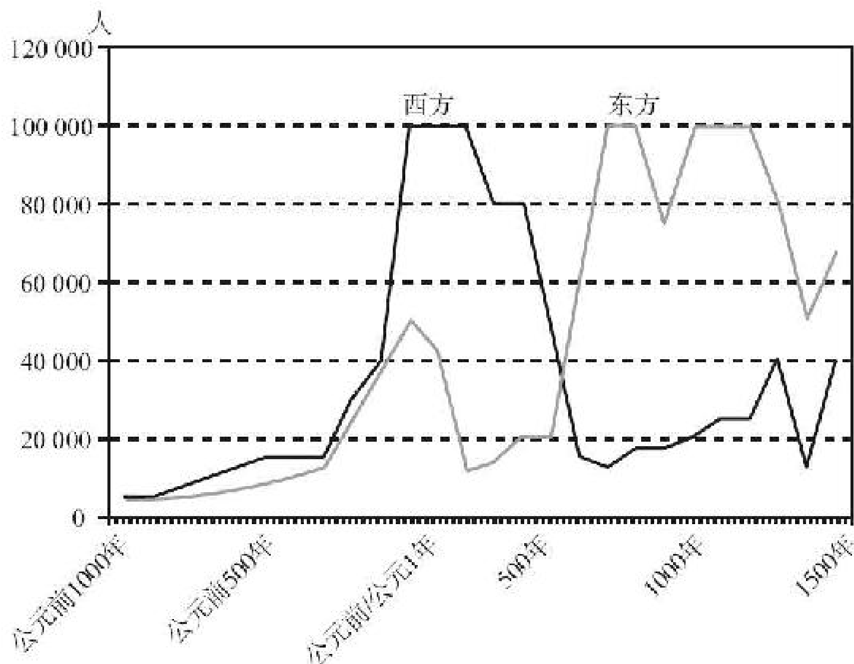
图4.6 公元前4000～前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当能量获取水平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1 000~12 000千卡时（见图4.6；西方于大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东方于公元前2000~前1500年到达此水平），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历程很相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两者的定居点规模都出现了暴跌。西方发生了阿卡德、乌尔陷落和埃及旧王国衰败等危机，东方则出现了陶寺和山东早期城市的败落，尽管这些危机对东西方的能量获取状况都只产生了极微小的影响。

最近3 000年的变化甚至更为惊人（见图4.7）。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规模的增长还要更快。能量获取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门槛，这回是略高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跨过了这道门槛的社会，就能创造出有100 000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道门槛是大约每人每天27 000千卡，跨过这道门槛，创造有50万~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大危机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获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锐减（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将近20%；在东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将近4%），但危机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缩了85%以上；公元1~200年，东方的城市萎缩了75%以上。

图4.7 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的规模



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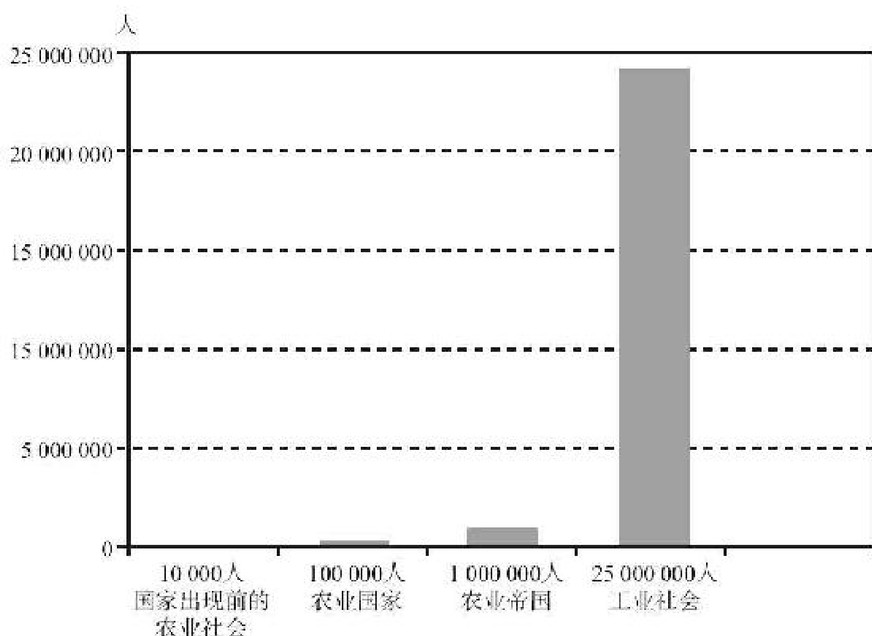
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城市规模的量级

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 000

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 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图4.8 自冰期以来已知最大定居点及群落组织水平



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

[3] 1英里≈1609米；1平方英里≈258万平方米。——编者注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呻吟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

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步枪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技术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战争游戏的研制者们（既有专业军事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要将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简化为可供比较的数值。总的来说，军事史学家菲利普·萨宾（Philip Sabin）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商业化战争游戏通常试图复制过多细节，但与社会发展指数非常相似的是，这些游戏的重大贡献是使得假设变得清楚明确了。

一些游戏发行多个版本，模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战争，为跨越时间和地点思考战争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例如，电子游戏公司GMT的系列游戏“历史上的大战役”，包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南亚的战车大战、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同时期印度的战争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争等各种战役变体。至少在战术层面上，游戏允许启人深思的比较，不过，像所有这样的规则系统一样，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也许仍是系统在似乎运转不灵时提出的问题。

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指数所需要的跨历史比较应当与实际历史背景下的比较没有差异，但实际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譬如所谓的军事革命，就经常是设计出新的作战系统，使旧系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这种装备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钢板的战舰，是英国于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于让以前所有军舰都被淘汰——只是因为海军战术的变化，才使得这种新式武器融入了旧式战舰仍然重要的系统里。

甚至对现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来说，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坏力远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们并非无可匹敌地更具破坏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吨或百万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来衡量的，这一

事实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破坏力使先前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1942~1945年3年的轰炸中，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总共才向德国扔下了70万吨炸药；而在1961年万圣节那天，苏联试验的单一一颗炸弹，即所谓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5 000万~5 700万吨炸药。到1966年时，单独一颗苏联SS-9II型导弹就可以携带相当于2 500万吨炸药的弹头，是美国“二战”期间轰炸德国的全部炸弹的破坏力30多倍；到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总共部署了255枚这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核武器的破坏力仍然可以和常规武器在同一个天平上予以衡量，正如放射性尘降物的毒害作用能以拉德来衡量，并与毒害作用较小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比一样。而且，像1906年后建造的无畏舰级军舰一样，核武器也被融入了更广泛的作战系统中，而这种作战系统依然依赖于1945年之前就在使用的武器类型（尽管以高得多的效率形式）。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衡量。

社会发展指数在衡量战争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将2000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前阶段的武装力量的关系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战争能力的飞跃实在太巨大，难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战争能力的变化也可称之为飞跃，尽管幅度不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难以衡量。

一方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计分系统内将最高分250分打给2000年的西方，那么在估计1900年的战争能力时，在百分比上就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幅度，更不用说1800年或任何更早的时期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破坏力与以往的差距实在太巨大，1800年前的分数会极低，也就意味着就社会发展指数的实际分数而言，误差也会极小。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意味着1600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作战系统能得到0.2分（也就是说，不到当代分数的千分之一）；而1500年之前，甚至很少有作战系统能得到0.1分。战争能力像城市规模/社会组织一样，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一旦能量获取水平达到了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只需在边缘处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就会刺激战争能力向上激增。衡量战争能力对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工业化的20世纪和21世纪与所有先前的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20世纪的变革

对于现代西方军事实力有很多评估，我主要依赖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该书提供国家投入、军力、素质和后勤等方面的数据。

美国自“9·11”事件后又加大了军备投入，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国的军力就已经傲视所有对手了。公元2000年，美国可以代表西方获得满分250分。有很多国家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军人人数上超过美国，俄罗斯的核武库也比美国大了几乎一倍，但美国在战争所有其他维度上都占有巨大优势，已经远远打破了平衡。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供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得多，训练和领导也强于大多数国家，机动性也很强。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主宰着全球海洋，美国空军在天上也发挥着同样作用。美国的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也更加可靠，一般认为比其对手俄罗斯威力更大。

一旦我们从2000年回溯到1900年，量化战争能力的最大困难就出现了。1900年的西欧武装力量的数据记录很好，也很容易获得，但为1900年的西方计算一个相对于2000年的西方的分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军事系统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2000年的军队比1900年要大，尽管并没有大许多。在某些方面，基本武器是相似的——1895年投入使用的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准确射程为大约5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733米，而M16步枪（1963年装备于美国陆军，但其改进版在2000年仍是常规武器）的准确射程为550~8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948米。然而，差异却超过相似性：M16步枪每分钟能发射700~950发子弹，而李–恩菲尔德步枪通常每分钟只能发射二三十发子弹（在测试条件下，其发射纪录为每分钟38发）。一把普通的M16步枪或者AK47突击步枪，比1900年的最好的重机射速都要快得多（马克沁重机枪每分钟只能发射450~600发子弹）。而最早的大致相当于M16或AK47步枪的德国MP18轻机枪，直到1918年才投入使用。

军事史学家通常将现代大炮的出现定为1897年投入使用的“法兰西75”。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膛线加农炮，配有长驻退机，意味着炮手们不需要在每次发射后都添加炮弹。这种炮的发射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分钟15发炮弹，射程达7.5千米。现代更复杂的大炮射速要慢得多。美国陆军最新式的榴弹炮——2005年投入使用的155毫米口径的M777——每分钟只能发射2~5发炮弹；然而，这种钛炮非常轻，可以装载在飞机上，射程达到24~30千米，而且，当使用“神剑导引炮弹”时，其圆径概率误差可达到24千米内只有5米（也就是说，50%的炮弹将落在距目标只有5米的范围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导武器的革命已经使每一门现代大炮的价值都超过了1900年时的数十门大炮，而运输机械化、通信手段和电子控制方面的先进同样令人惊叹。

在海上，1900年最强大的武器是新式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的战列舰（“战列舰”一词是1892年最早开始使用的），通常排水量达到15 000~17 000吨，航速达每小时30千米，可装载4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能发射400千克重的炮弹，射程将近23千米。1906年后，无畏号不仅配备了更重的装甲，还增加了6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航速还提高到了21节[4]。1911年后，各国海军又纷纷用石油代替了煤作为燃料。所有

这些改变都具有革命性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军舰与当代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100 00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56千米，可航行20年无需添加燃料，可载90架飞机，打击范围在700千米以上）之间的差距，使得20世纪早期所有连续类型军舰之间的差异都相形见绌。

20世纪战争革命最惊人的部分无疑发生在空中。飞机最早用于军事是在1911年，当时意大利在与土耳其交战时使用了轰炸机和侦察飞行。这些早期飞机与2000年最精密的军用飞机（即1989年投入使用的B-2隐形轰炸机）之间的差距，足以令人窒息。B–2隐形轰炸机的航程达到11 000千米，巡航速度为大约每小时900千米，且它实际上是无法探测的，能够穿透任何防空系统，发射精确制导的炸弹或者10兆吨以上TNT当量的核武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时期的武器火力、军队机动的速度和范围，以及武装力量的无数其他维度。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从1900～2000年，大炮的威力提高了20倍；从1918～2000年，反坦克火力提高了60倍。但是为20世纪全部变化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却要难得多。

表**5.1** 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战争能力（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年代	西方（分）	东方（分）	年代	西方（分）	东方（分）
公元前4000年	0	0	公元前/公元1年	0.12	0.08
公元前3000年	0.01	0	公元100年	0.12	0.08
公元前2500年	0.01	0	公元200年	0.11	0.07
公元前2250年	0.01	0	公元300年	0.10	0.07
公元前2000年	0.01	0	公元400年	0.09	0.07
公元前1750年	0.02	0	公元500年	0.07	0.08
公元前1500年	0.02	0.01	公元600年	0.04	0.09
公元前1400年	0.03	0.01	公元700年	0.04	0.11
公元前1300年	0.03	0.01	公元800年	0.04	0.07
公元前1200年	0.04	0.02	公元900年	0.05	0.07
公元前1100年	0.03	0.02	公元1000年	0.06	0.08
公元前1000年	0.03	0.03	公元1100年	0.07	0.09
公元前900年	0.04	0.03	公元1200年	0.08	0.09
公元前800年	0.05	0.02	公元1300年	0.09	0.11
公元前700年	0.07	0.02	公元1400年	0.11	0.12
公元前600年	0.07	0.03	公元1500年	0.13	0.10
公元前500年	0.08	0.04	公元1600年	0.18	0.12
公元前400年	0.09	0.05	公元1700年	0.35	0.15
公元前300年	0.09	0.06	公元1800年	0.50	0.12
公元前200年	0.10	0.07	公元1900年	5.00	1.00
公元前100年	0.11	0.08	公元2000年	250.00	12.50

我选择的2000年与1900年的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为50：1，这样产生的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就只有5分（与2000年的250分相比）。很显然，这个分数跟瞎猜差不多。如果选择100：1的比率，则1900年的得分为2.5分，也许同样是个说得过去的猜测。不过假如比率是25：1，1900年的得分就会是10分，就不大可能了。

这一误差幅度比整体社会发展指数的误差（见第七章）要大得多，

但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与所有较早阶段的分数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20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减半或翻倍，也不会使指数出现任何可以辨别的差异。表5.1、图5.1和图5.2运用我估计的数字，展现了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图5.3和图5.4则展现了如果我们将对2000年之前的所有估计减半之后得到的分数。

在纵轴上使用对数标尺使得差异更明显，所以图5.2在对数－线性轴上显示了我计算的分数，图5.4以同样方式显示了修订后的数字（即2000年前所有时期使用的都是减半后的分数）。修订后的数字当然使20世纪的破坏力比我的估计大了一倍，但是将2000年以前的分数减半的主要结果，并不是增加了现代/前现代的反差，而是使得公元前100～公元200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变得极小，以致无法衡量（而我的估计则相反，显示出罗马帝国的战争能力稍强于汉帝国）。结论必然是，对2000年与1900年之间战争能力的比率的任何合理的估计——无论是50：1，还是100：1，还是只有25：1——对于更大的社会发展指数都没有什么差别。

图**5.1**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线性－线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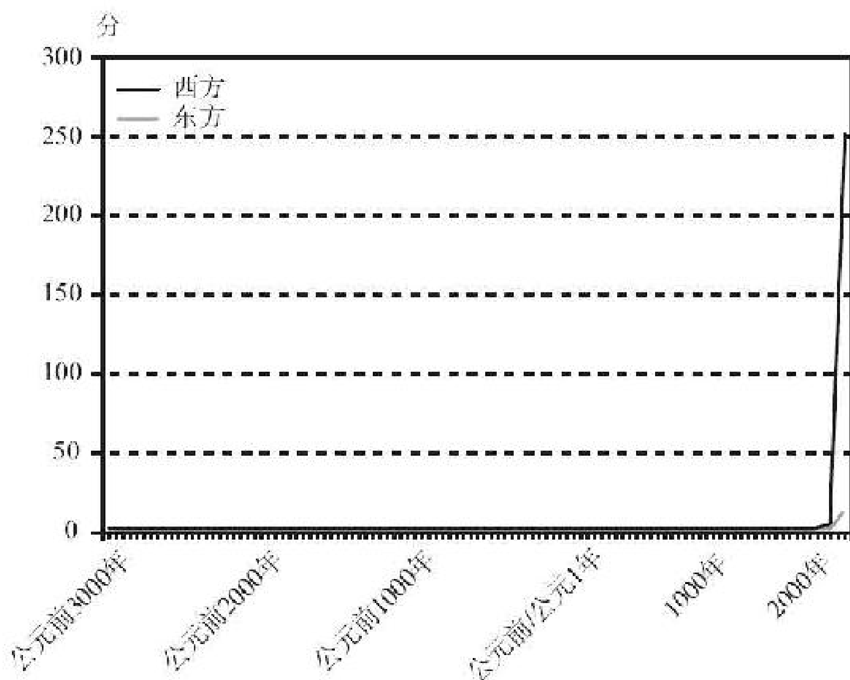


图**5.2**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对数－线性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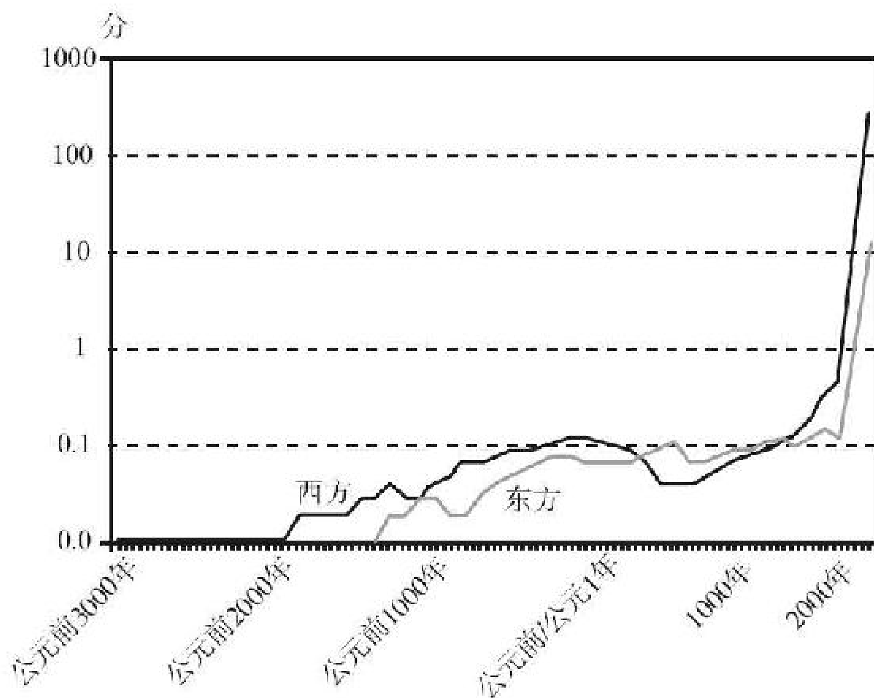


图5.3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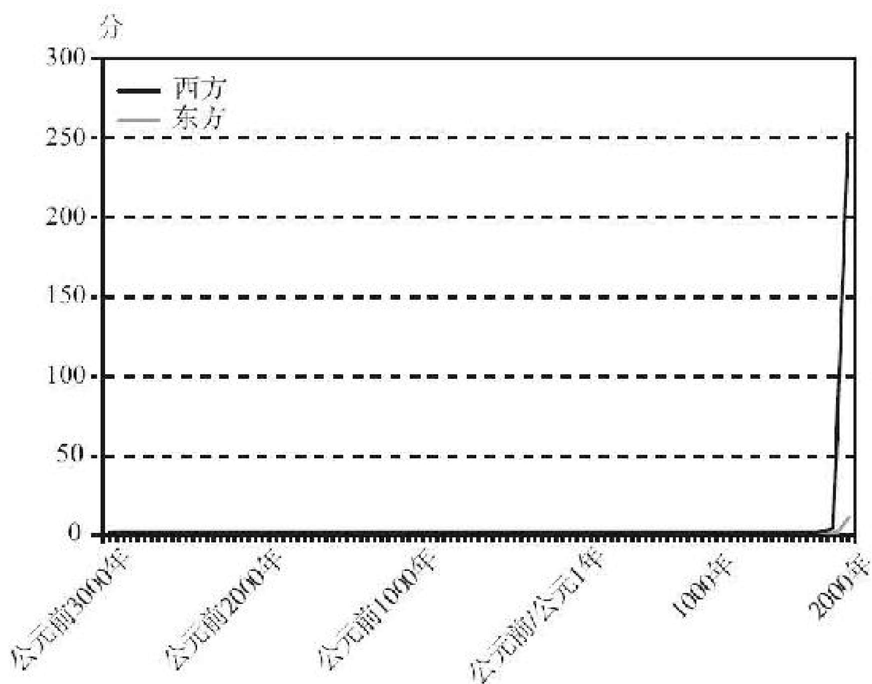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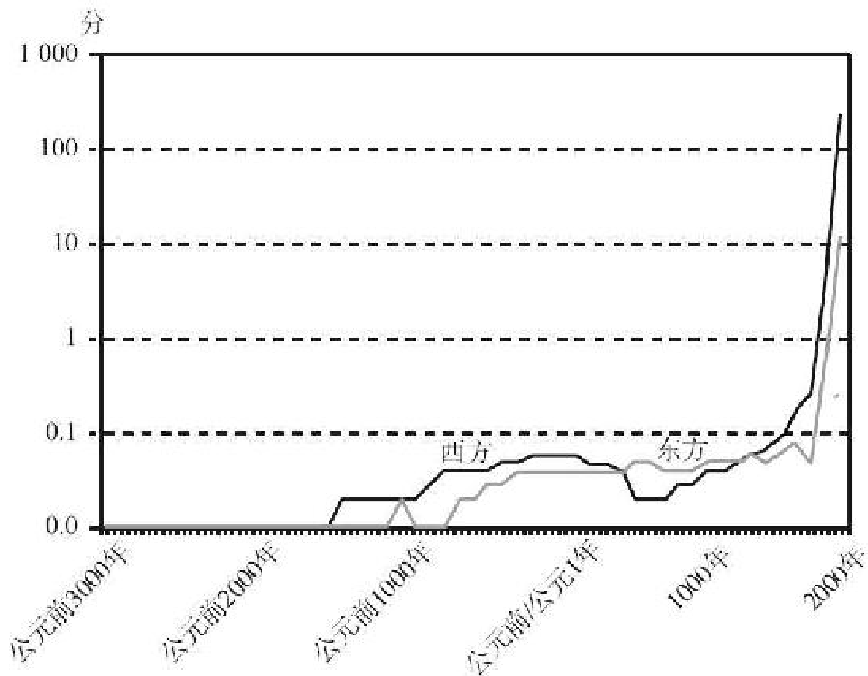


图5.4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 - 线性尺度标绘，并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1500~1800年欧洲的军事革命

1800~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飞跃与1900~2000年的飞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非常巨大。武器的射程、精度、射速，抛射的力度（因炸弹的发明而威力更大），军队的规模，运输的速度，以及后勤保障能力，在整个19世纪都普遍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然而，纯技术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其的应用。据军事分析家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计算，1800年左右时，如果一个拿破仑式的千人步兵团向另一个步兵团发起冲锋，针对每一个攻方士兵，守方大致能打两发子弹；如果一个世纪后重复同样的步兵团攻防，那么就将有200多发子弹射向每一个攻方士兵。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1815~1918年，军队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因为战术家们采用了新的作战方式，使得部队暴露在敌人直接火力下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法国人于18世纪90年代发明了“全民动员”，使得军队规模扩大到50万人——将近1900年世界最大军队的一半了——但是其主要武器滑膛步枪比1900年的步枪效率就差远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拿破仑步兵每分钟也只能打大约4发子弹。滑膛枪的子弹可以射到400米开外，但射程一超过50米（最多75米）就很不准确了，只打一个单发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在打不超过75米的目标时，也只有多人齐射才有命中把握。在18世纪的一次演习中，步枪手们射击60米外一个宽达30米的目标，只有不到一半人命中。

滑膛大炮，尤其是能发射12磅[5]重炮弹的大炮，每分钟能发射4~6

发炮弹，有效射程达到500米，于1800年开始成为战场主宰，但滑膛炮仍然远不及1900年的膛线炮更有效；平射弹道的炮弹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

1800年最好的军舰，比如英国皇家海军的胜利号（1765年下水），在顺风的情况下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17千米，但在恶劣天气下就要慢得多。胜利号载有104门炮，总共能发射大约1吨实心弹丸，射程大约为2 000米。该舰与无畏号出现之前其他拥有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炮弹和鱼雷的军舰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

又一次，将军事系统的复杂性概括为一个单一的分数，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我认为1900年和18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约为10：1，1800年的得分为0.5分。这个猜测的误差可能像我对1900年的猜测一样大（或者说与拿破仑时代的步枪单发的准度差不多），真实比率也很可能是20：1。如果相对于2000年的战争能力，我对1800年和1900年都高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不给2000年打250分，给1900年打5分，给1800年打0.5分，我们完全可以在给2000年打250分的情况下，给1900年打2.5分，给1800年打0.13分，就像图5.5（线性 - 线性图）和图5.6（对数 - 线性图）所显示的。但是即使像现在这样把1900年前的分数大大减少，对整体社会发展指数所产生的影响也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所涉及的绝对数值实在太小了。

图5.5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将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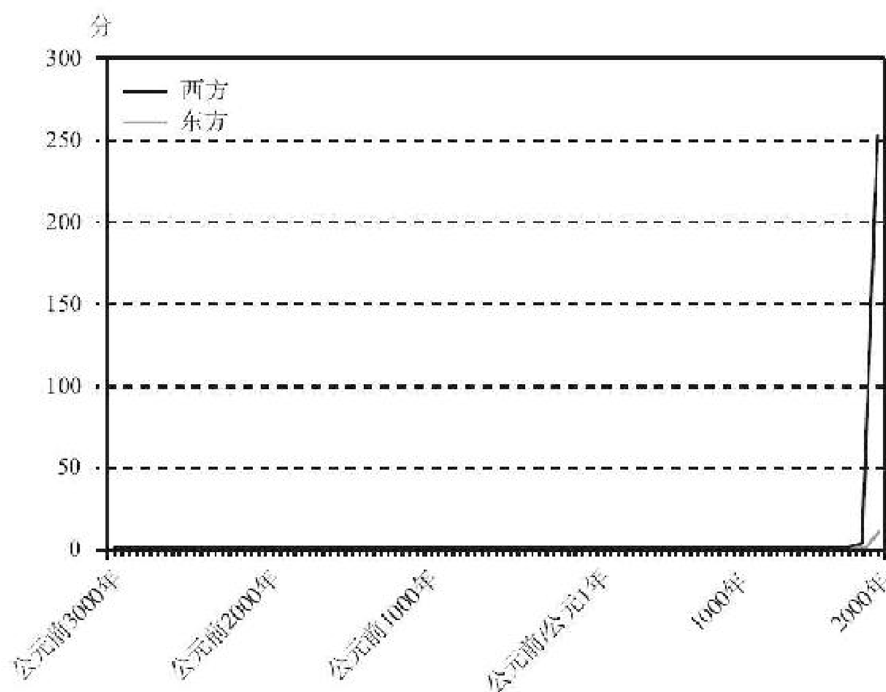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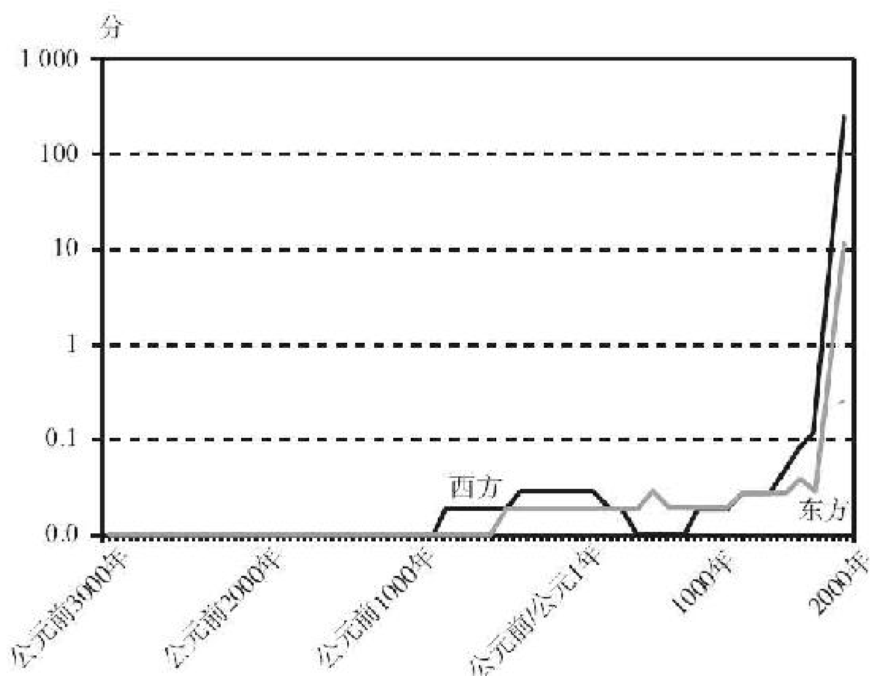


图5.6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线性尺度标绘，并将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由于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以及最重要的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先锋性工作，1500~1800年这段时期已经广为人知是“欧洲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是陆海军规模、效率、火力和到达范围的巨大增长。然而与1800~1900年的变化相比，这些军事革命实际相形见绌，不过它们仍然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军事能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火器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一些社会利用了这些变化，是促使军事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使用火药的武器在14世纪20年代就到达了欧洲，但过了100年，它们才开始在陆地和海洋的战场上变得重要起来。甚至在1500年，火枪手们的发射率还在以几分钟打一发子弹，而不是一分钟打几发子弹计算，而他们的枪只在非常短的射程内才有效。特别是在英国，长弓在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手里，每分钟能发10箭，精度可达200米，不少士兵都不相信，弓将不再是最优越的武器。而在骑兵最为重要的大草原上，直到17世纪，弓仍然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甚至早期的火绳枪也能发射比箭要重的抛弹（滑膛铅丸），因此有更强的穿透力，但火枪的主要优势是对枪手的技能要求较低，不像弓箭手那样需要学很多技巧。正如意大利的拉文那战役（1512年）、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和比科卡战役（1522年）所证明的，在适宜环境下，众多火枪是可以战胜弓箭和长矛的。早在1490年，威尼斯就决定用枪来取代十字弓，到了16世纪60年代时，英国人对长弓的喜爱已经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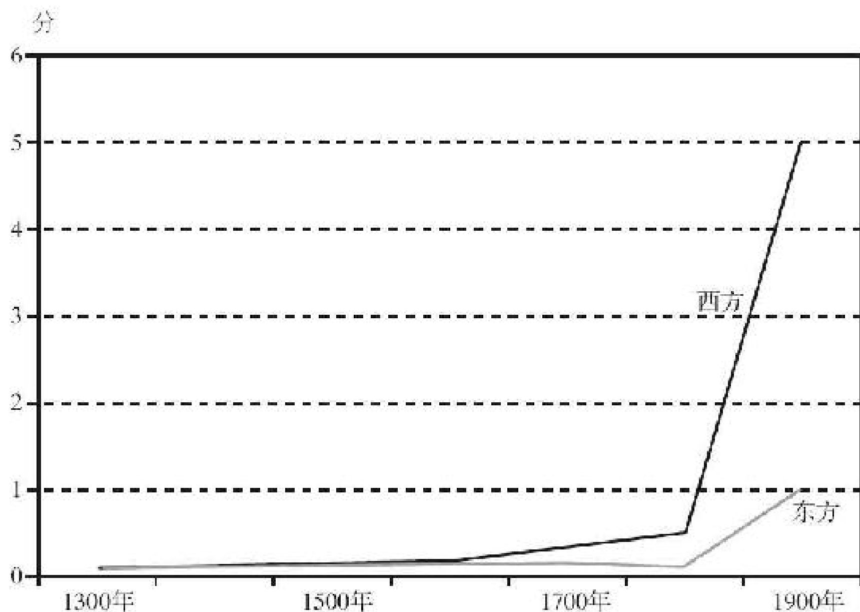
无疑地被普遍认为不合时宜了。1594年，荷兰陆军发明了队列战术和火枪齐射，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效率（尽管他们的战术需要更多训练和管理）。17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新办法的威力有多大。

17世纪，燧石发火装置极大地提高了火枪的发射率。18世纪插座式刺刀的出现又使火枪手同时能发挥长矛手的作用。大炮的进步更是迅速。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火炮已经使中世纪的石制堡垒失去了作用，但到17世纪中叶时，更复杂的土木工事又重塑了防守方的优势。

18世纪晚期组织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法国在陆上发明了纵队进攻和军队的部门结构，英国在海上进行了战术革新——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绩效，但是最大的变革还是在组织方面。当时最强大的西欧国家法国，1500年时能够组织四五万人的军队；1600年时能组织8万；1700年时为40万；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率领的是60万大军。海军的增长要缓慢一些，1700~1800年，英国（当时最强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俄国都将其现役军舰数大致涨了一倍，而法国的舰队在1689年路易十六入侵英国的计划失败后，实际上萎缩了。这段时期开始时，奥斯曼土耳其的陆海军实力都还是西方最强的；但到结束时，军事力量的天平已经决定性地倾向了西欧方面。

将如此众多而复杂的信息转化为西方战争能力的单一分数，又一次需要动用非常主观的猜测，但是1500~1800年的变化，尽管有革命的性质，却明显比1800~1900年的变革要小得多（更不用说与1900~2000年相比了）。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在整个军事革命时期实力涨了4倍（与之对比的是，我估计19世纪涨了10倍，20世纪涨了20倍）。从1800年的分数0.5分向后推，1700年的分数大致为0.35分，1600年为0.18分，1500年为0.13分（见图5.7）。

图**5.7 1300~19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从恺撒到苏莱曼（公元1~1500年）

大多数军事通史学家认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前半期，西方的战争能力总体下降了，在后半期恢复。但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伯纳德·巴克拉克（Bernard Bachrach）在其一系列研究中，提出后罗马时代的西欧军队比其他历史学家设想的规模更大，更多地由步兵主宰，更善于远程作战，更多采用围困战术而不是直接战斗。然而，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观点，我还是追随主流意见：西欧的军事力量自200年后开始下降，400年后下降得更快，600~800年时极其衰弱，然后缓慢恢复，1300年后复兴开始加速。倒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14世纪黑死病肆虐后，在军事方面出现了堪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相比的衰退。

然而，尽管战场上有重要变化，比如由于能够得到更大的马匹和马镫，使得重型骑兵兴起，伊斯兰军队中马上弓箭手的效率也在提高，但公元500~1300年战术的持续性更引人注目（实际上自公元前700年后的整个2 000年间，战术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因为普遍都在使用铁兵器和骑兵）。基本的军事要素——铁兵器、金属盔甲、步兵和骑兵结合的战术、箭术、围城机械、划桨结合风能的战船——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在后勤和组织方面。

公元前1世纪30年代，罗马共和国大约有25万武装人员。他们被编制在效率极高的军团内，得到前现代世界最出色的后勤系统的支持。他们（大部分时间）由优秀的职业尉官和士官领导，即使他们的高级军官——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有时不尽如人意。

公元3世纪的危机后，军队扩大了，在4世纪中叶时可能达到了大约

50万人。关于晚期罗马军队的素质，存在很多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任务的性质变了，从边境防御转向了纵深防御，随之引起了组织上的变化，卫戍部队和野战军的差别越来越大，后者采用了比早期帝国军队更小的单位和更多的骑兵，所有部队也都更加依赖机动兵力。

有些旧说法称卫戍部队效率低下，可能言过其实了，但从2世纪60年代的安东尼瘟疫到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罗马军事力量恐怕的确严重衰退了（尽管还不是灾难性的）。

从阿德里安堡战役到609年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入侵拜占庭帝国，由于人口下降加上行政结构破碎，西方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到7世纪时，军队萎缩到只剩下几万人。阿拉伯人之所以得以迅速征服了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部，更多地要归因于帝国结构的瓦解，而不是哈里发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

整个西方中世纪，军队始终规模很小、组织涣散、供给不力，人数基本不到罗马帝国军队的1/10，效率更不值一提。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有学者仔细地研究，但没有得到那么透彻研究的拜占庭军队，特别是伊斯兰军队，在大约630～1500年也许仍很强大，尤其是在土耳其军队配备了成千上万名强悍的马上弓箭手后。

西欧的十字军于1099年奋力攻占了耶路撒冷，拜占庭军队也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总体而言，10～15世纪，优势在土耳其人一边。1527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据称能召集75 000名骑兵（大多数是弓箭手）和28 000名持枪步兵，另外还有野战炮兵。尽管他在1529年未能攻克维也纳，土耳其军队仍然是16世纪西方最强大的军队，很可能在17世纪还继续领先。同样，土耳其海军尽管在1571年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也吃了败仗，但直到160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始终是基督教势力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强劲对手。

将所有这些历史简化为战争能力的分数，又一次需要将每支军队所面临的具体任务抽象化，但一些基本结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1500年西方最大的军队的规模仍然比罗马共和国晚期或罗马帝国早期的军队要小得多，并且远不及罗马人技艺娴熟；但是火器威力的增长（尤其在攻打堡垒时，庞大的野战军与轻骑兵相结合，如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使我怀疑苏莱曼大帝的军事实力恐怕最终赶上了恺撒的军队。

如果给15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打0.13分，那么给1年打0.12分，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认为罗马军事力量直到4世纪时仍然很强，然后骤降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可以认为300年时有0.1分，到600年阿拉伯人征服前夕时暴跌至只有0.04分，到1200年时又反弹至0.08分，然后于1500年更快地攀升至0.13分（见图5.8）。[认为罗马的分数应该稍高一些（比如说0.13或0.14分）或稍低一些（比如0.10和0.14分似乎更为合理）的历史学家们，也可相应地调整300～1200年的分数。]

这些数字与历史文学中的定性估计是相一致的。然而，其中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抽象性和主观判断，反对者也许不会接受。这就是说，图5.9展现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前现代时期战争能力的分数，包括恺撒时代和苏莱曼时代的分数，以公元2000年的视角看时都太小了，对它们进行任何可以想象的调整，都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少影响。而且这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军事力量超乎寻常而造成的人为假象。图5.10显示，即使从1900年的视点来观察，1~8世纪西方军事实力的变化都仍然小到可以不计。只有当我们从1800年的视角（如图5.11）回望时，我们才能看出早期分数间明显的高下。即使我们将600~800年的分数翻倍，或者断定罗马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而不是1500年才被超越，那也没有什么不同。

图**5.8 1~15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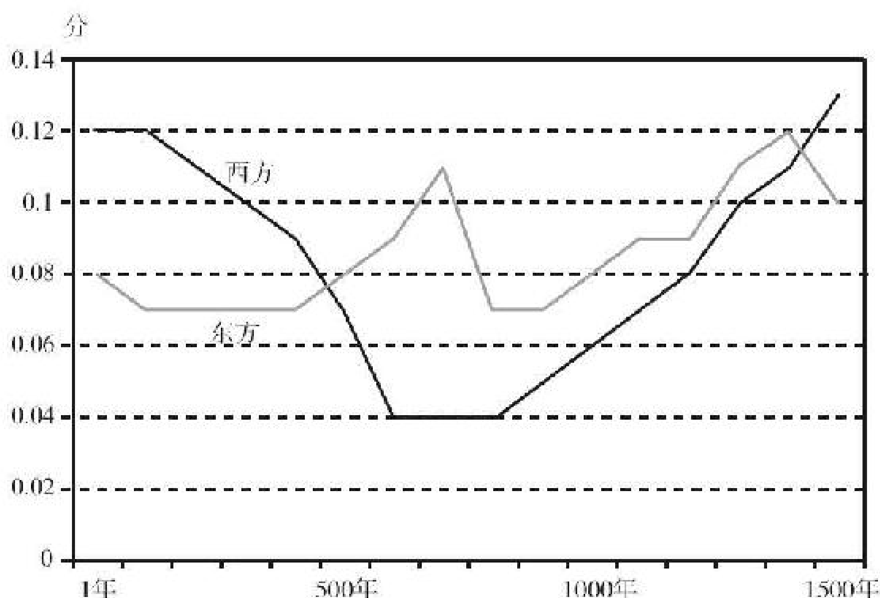


图**5.9 1~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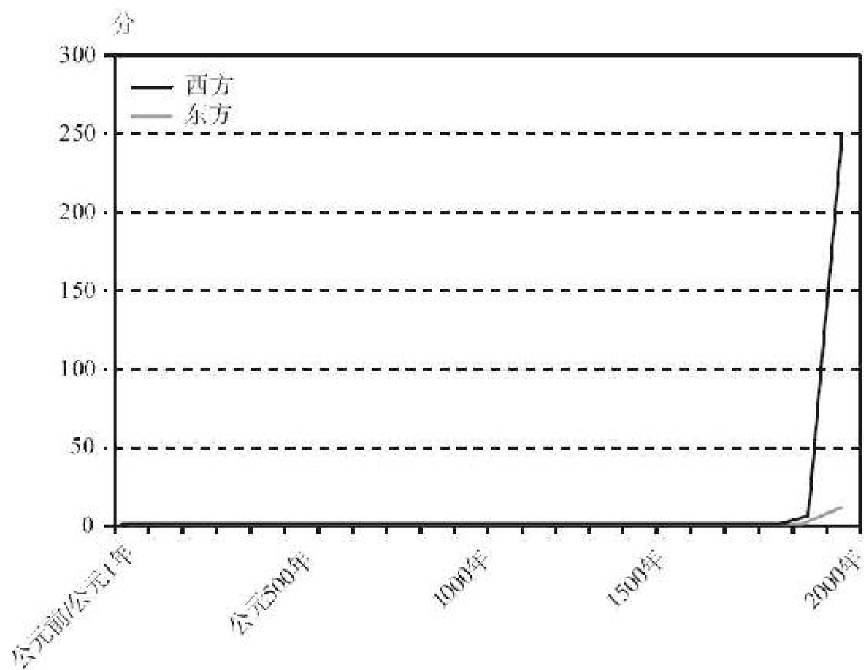


图5.10 1~19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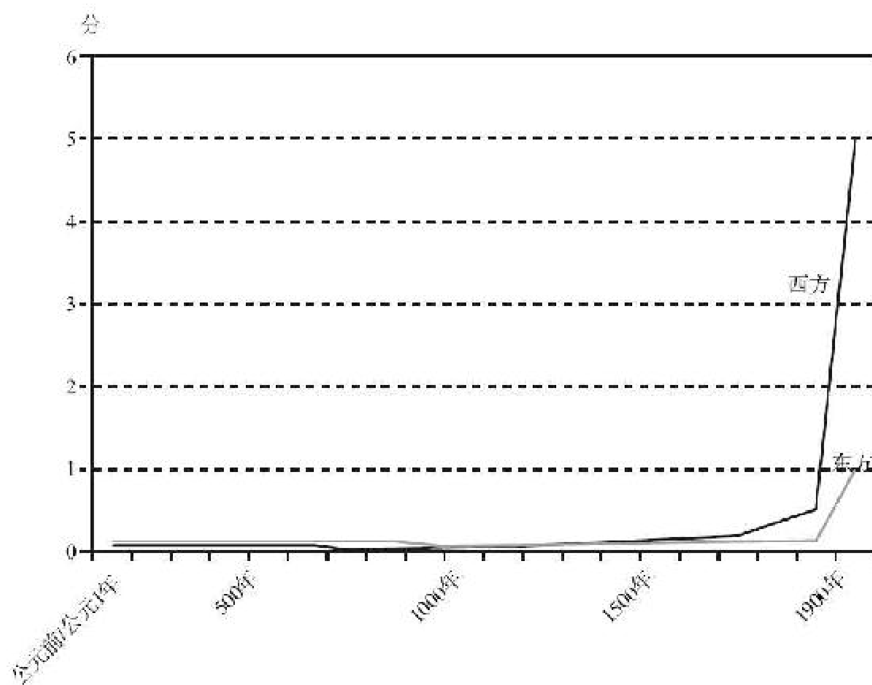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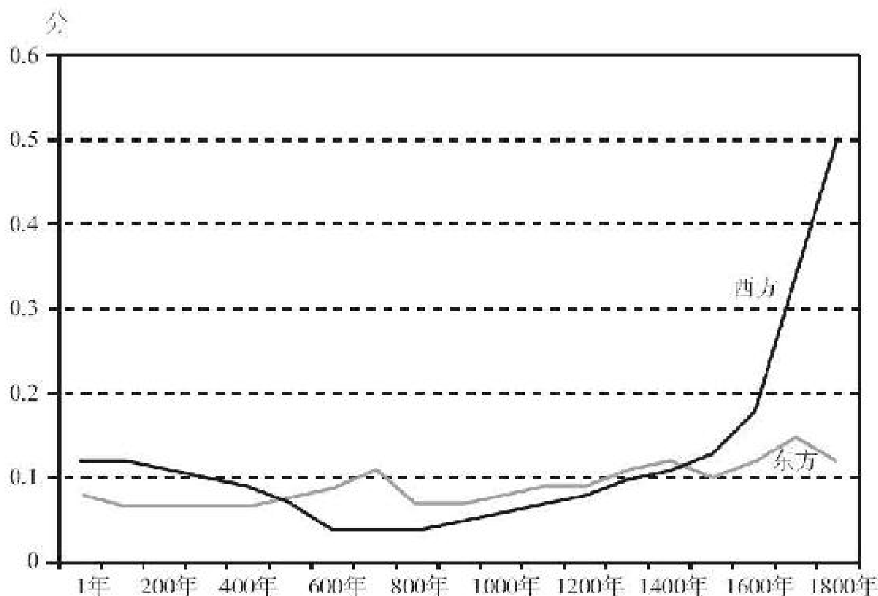


图5.11 1~18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早年的战争（公元前3000~前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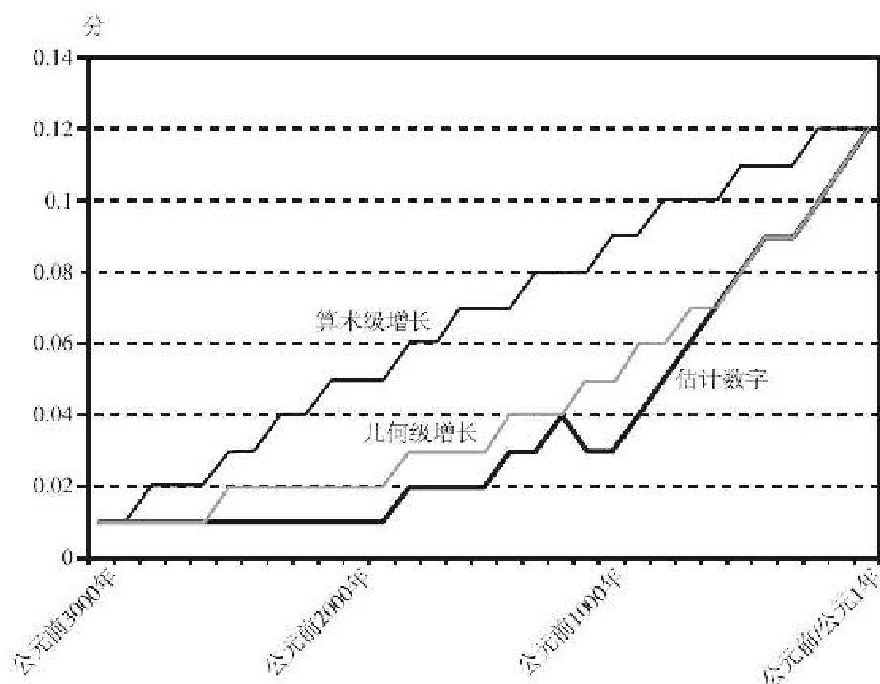
公元前最后三个千年，将我们从埃及第一位法老纳美尔的时代，带到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时代，人类的战争能力有了相当显著的增强。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战场上的主要进步也许要列上：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制武器；公元前2500年，重型步兵兴起；公元前1600年左右，马拉战车普及；大约同一时代，合成弓（反射弓）取代了单弓（整片弓）；公元前1100年后，铁制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公元前900年左右，骑兵出现；公元前700年后，三桨座战船普及；公元前600年后，方阵战术兴起，并不断得到改善；公元前400年后，扭力弹弩和更大的战船（四桨座和五桨座的大帆船）出现；公元前300年左右，堡垒得到完善；公元前200年左右，更灵活的步兵战术得到发展。

对于军队组织方面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列出同样的单子：专门的战场阵形最早的迹象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至今所知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350年，职业战车手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由税收支持的常备军出现在公元前750年之后，专职水军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后，罗马人对征兵制的改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之后。军队规模也显示出同样的上升途径：大约公元前2350年时，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号称麾下有5 400人；公元前1274年加低斯之战时，交战双方分别投入了大约30 000名步兵、5 000辆战车；公元前845年，跟随亚述国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出征的有10万人；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出动的也是10万大军（准确的数字有争议）；公元前3世纪40~60年代罗马和迦太基大战时，动用的水军兵力也以10万计。

图5.12展示了3种用数字表示公元前3000~前1年战争能力的结果。

我给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打了0分，并不表示我支持曾经一度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都是和平之地。这种理论已经被彻底否定了。0分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反映的是社会可用的破坏力太小，发动不了足以记录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战争。

图5.12 估计公元前3000~前1年西方战争能力的3种结果



我们当然可以从其他假设起步，比如说，从我们至今听说的第一支常备军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公元前24世纪开始计分，但没有明显理由重视这些假设中的某一个而忽视其他。我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计0.01分，纯粹是因为这是一个便利的整数，但是也没有其他看似合理的假设能使社会发展指数显示出任何比较明显的差异来。

图5.12中最上方的线，显示了公元前3000~前1年按简单的算术增量增长的战争能力，中间的线显示了按几何量级增长的战争能力（即以每世纪8.65%的稳定增长率增长），最下方的线显示的是我对变化率的估计。（从公元前3000年的0.01分到公元前1年的0.12分，算术曲线和几何曲线都不是平稳上升的，因为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而最低分数是0.01分，上升线都不可避免地是曲折的。）

算术增长显然不符合实际。那意味着到公元前2200年时，阿卡德国王沙尔卡里沙里和埃及法老佩皮二世的军队（大部分人有青铜武器，但也有一些士兵只有石制武器，步兵几乎没有盔甲，军中没有战车或骑兵，只会构筑非常初级的防御工事）可以得0.04分，简直与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军队（有铁制兵器、反射弓、骑兵和骆驼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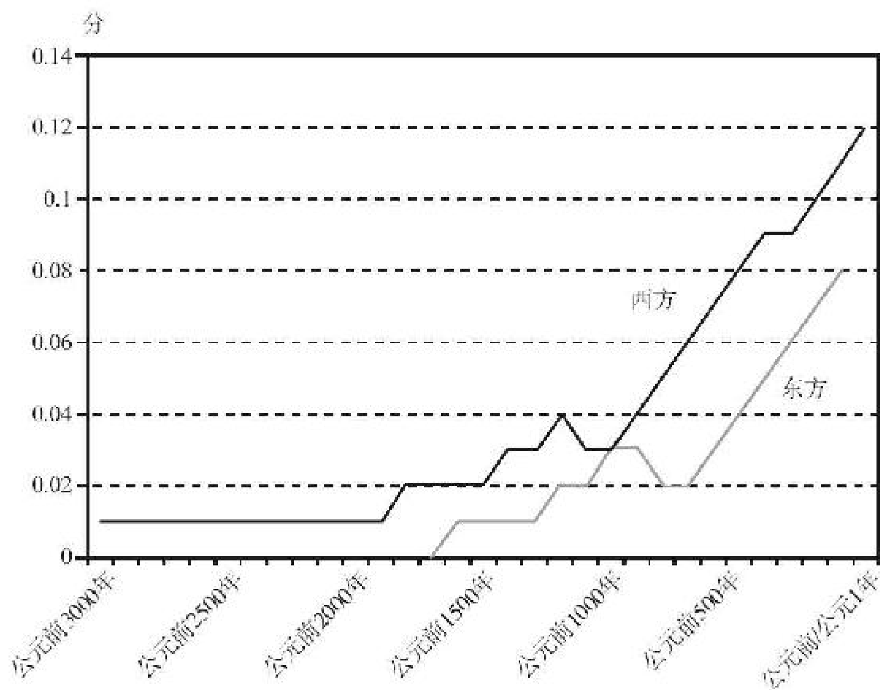
队，会构筑坚固的城堡）一样强大了。那还意味着公元前1300年时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可得0.08分），像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一样威武了。这两种结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几何曲线似乎要可信得多，尽管该曲线掩盖了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溃，肯定过于简化了事实。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崩溃也对战争能力有巨大影响，但是又一次因为那个时期的分值太低（只有0.01分），无法在图中将衰退显示出来，除非我们假设公元前2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战争能力跌回到国家产生之前、青铜利用之前的水平，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我估计的增长率走向与简单化的几何曲线相差甚远。我的曲线在公元前3000年后缓慢起步，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黑暗时代有所下降（从0.04分降至0.03分），继而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有一次快速增长。（无论在几何曲线上还是估计曲线上，公元前400～前300年的分数都是相同的0.07分，倒不是因为这段时期战争没有发展——这个世纪的军事水平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重装步兵和三桨座战船发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迦太基时期的各种武器协同的战术和五桨座战船——而是因为要把极小的数字凑成整数：公元前400年的分数恰好勉强超过0.07分，而公元前300年的分数不足以进到0.08分。）

几何曲线和估计曲线都显示，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国际时代的国王们似乎正要将东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单一大帝国的时期，当时的战争能力大致处于公元7世纪所跌回的相同水平（0.04分）。公元7世纪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都在分崩离析，阿拉伯的征服者们正企图夺回他们先前的领地。估计曲线还显示，古代的战争能力在约公元前900年时恢复到公元前13世纪的水平，当时诸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等亚述国王也建立起大帝国。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了这些看似合理的结论。最后，我的估计还表明，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罗马的战争能力与公元1300～1500年西方的水平非常接近——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应该会认同这个观点。

图**5.13** 公元前**3000**～前**1**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难以评估的东方

2000年东西方的军事平衡

2000年东方最大的军事强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尽管获得其军事力量的大体数字非常容易，给东方的战争能力打多少分却困难得多。

2000年时，美国与中国在市场交易率方面的投入比超过20：1，在购买力平价率方面超过9：1，美国核弹头数量对中国的优势超过25：1，洲际弹道导弹超过10：1，核潜艇为14：1，航空母舰编队为11：0。两军主战坦克的数量大致相当，但美国坦克的质量远比中国好得多。在从卡车到直升机在内的所有其他武器上，美国都占压倒优势。就总体技术能力而言，美国领先得甚至还要多。西方的军事主宰当然不是全面的，经常有分析家对美国海军是否敢在台湾海峡与中国众多潜艇和反舰导弹直接对抗表示怀疑；但中国在其近海之外几乎没有施展其军事力量，而美国却像个巨人一样跨坐在其他国家上。

公元20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显然比东方强很多，但究竟强多少？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单一分数。最广为人知的数字比较恐怕要数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简称CINC）了。这是国际关系方面广为应用的一个计分系

统，旨在标示每个国家的硬实力在世界上所占的百分比。其分数可回溯至1816年，但只能用于进行国家之间的共时比较，不能衡量历时性的能力变化。

不过，CINC所衡量的国家实力比我此处要查究的战争能力要广泛得多。该指标给每个国家打分，是根据其人口规模、城市化程度、钢铁产量、能量消费水平、军费开支，以及其军事人员的总数。按照CINC，2000年时，中国（16%）已经超越了美国（14%），尽管两个大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军事不平衡。

战争游戏设计者詹姆斯·唐尼根（James Dunnigan）在他的《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办法，给不同国家的“战斗力”打不同的分数。他对陆上实力和海上实力分别打分，在两个项目上都将美国定为榜首。在陆上，美国得2 488分；中国排第二，得827分。在海上，美国得302分，中国排第5，得16分。（英国排第二，得46分；俄罗斯排第三，得45分；日本排第4，得26分。）

如果我还继续沿用在社会发展指数中使用的技巧，只关心东方和西方最发达的地区，那么采用唐尼根的数字，将使公元2000年时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致为：陆上3：1，海上19：1。如果我们将陆上和海上的分数相加，那么美国就是2 790分，中国为843分（比率为3.3：1）。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对陆上和海上实力等量齐观，将美国在两个领域的分数都转换成125分，同样合计入我在此使用的250分系统内，那么中国的得分为48.17分（陆上41.55分，海上6.62分），西方和东方的比率则略高于5：1。

唐尼根没有解释他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但如果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在3：1~5：1这个范围的话，必然要设想投资收益是递减的，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中国，2000年时双方的比率为9：1~21：1。在技术的复杂精密性方面也应大大加权，因为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是复杂的技术密集型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反导弹系统、隐形轰炸机、精确制导导弹和航空母舰，而不是诸如冲锋枪和手榴弹之类的简单武器。美国在电子战方面领先多少，还须继续观察，但2010年和2012年其分别利用“Stuxnet蠕虫病毒”和恶意程序“火焰”发动的网络攻击分别获得成功，表明美国的优势相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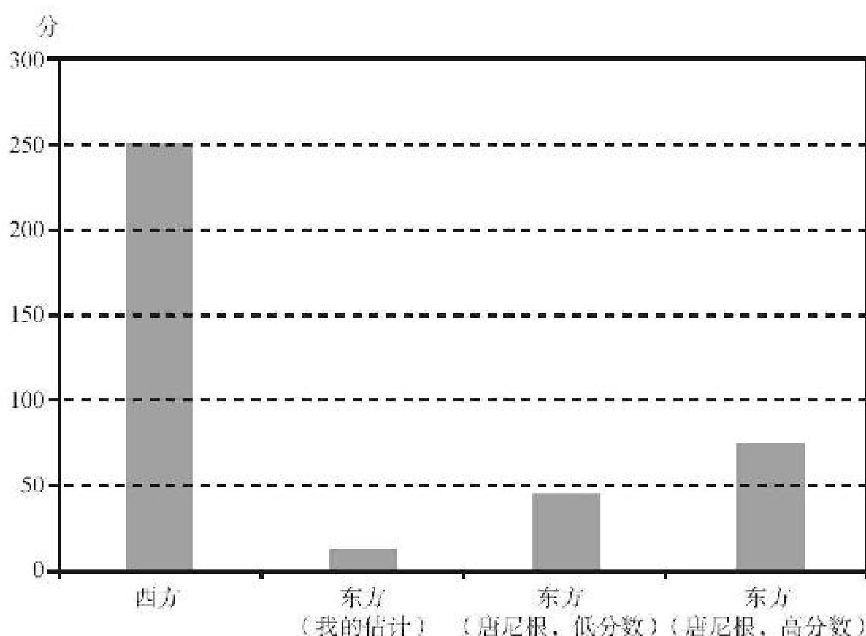
美国及其盟友在击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技术敌人时所遇到的困难，表明唐尼根的假设有其价值，但也有证据显示，这些困难既源于战略和原则的失误，也与西方战争能力固有的局限性有关。还有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投资实际上是收益递增的，在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完善和信息传输系统越发精确的驱动下，军事革命已经给作战方式带来了极大改变，程度不亚于现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革命（速度却要快得多）。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常规部队“一边倒”的战争，证明这种观点也有其价值。军事革命似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与国之间交战的方式，扩大了西方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但对于占领和安

抚战败国却没有多少影响。

公元2000年的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对比大致为20：1，比唐尼根提出的3：1~5：1要高得多。这将是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最为悬殊的比率，甚至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比率都相形见绌，但是，公元2000年时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方面巨大的技术差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我的估计是合理而准确的，在社会发展指数上，与西方的250分相比，2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只能得12.5 分。如果唐尼根的估计更准确，那么2000年东方可得48.17分（图5.14中估计的“低分数”）或75.54分（“高分数”）。

图5.14 对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同定量估计



东方的现代军事革命（1850~2000年）

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作战系统传到太平洋地区，是东方军事史上意义最深远的裂变。中国军队使用火器比西方时间更长，但没有跟上西方自15世纪使用火药武器后的前进步伐。日本则相反，使用火器相对较晚，却在16世纪成为变革的中心。然而，日本统一并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扩张政策，意味着日本军队自17世纪早期到19世纪早期没有打过大仗，于是日本火器发展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停滞了。

1840年和1850年，当西方的海军远征舰队分别来到中国和日本海岸后，中日两国均仿效起西方的军事实践来，但日本对新挑战的适应要成功得多。日本政府于1873年引进了欧洲式的征兵制度，并于19世纪

70年代末废除了武士制度，继而先后按照法国和德国的路线建立了陆军，按照英国的路线建立了海军。1880年时，日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陆军只有71 000人（只相当于德国陆军人数的1/6），海军舰船总吨数只有15 000吨（相当于英国海军的1/40）。但到1900年时，日本陆军有234 000人（几乎相当于德国陆军人数的1/2），海军舰船总吨数达到187 000吨（几乎相当于英国海军的1/5）。

日本军队的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894～1895年他们在侵略中国时，表现出了对西方军事思想、纪律、组织（和硬件）的精通。1900年，日本军队在围剿北京的使馆区的义和团时扮演了主要角色。1902年，英国认识到与日本结为海上同盟，是保证其在太平洋事务上继续发声的最好办法。1904～1905年，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尽管这场战争差点导致日本破产）。虽然日本的战争能力比欧洲所有主要强国要弱很多，但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抵御欧洲人武力的非西方国家。

日本在1914～1915年和1941～1942年战争中的惊人胜利，都是在西方列强耽于欧洲战争而无暇旁顾的情况下取得的。日本在《凡尔赛条约》中得到了它觊觎的大部分利益（尽管它在条约中加入主张种族平等条款的要求落了空），然而当它在1942～1945年不得不面对美国的认真抵抗时（即使美国只是将太平洋战场列为二级前线），东西方战争能力的持续差距就彰明较著了。

日本在1945年被几近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尽管到20世纪末时其海军又一次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地区性力量），但中国在1949年结束其内战后，重新成为东亚强国。中国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也付出了惊人代价），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在1964年成功试验了其首颗原子弹。然而，人民解放军的训练和专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在20世纪70年代，其组织、理论和装备方面的严重缺陷暴露无遗。邓小平于1979年启动了军队现代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国军费开支开始大幅增长，在10年间涨了4倍，在接下去的10年内又涨了4倍，尤其强调加强海军，并对美国及盟友潜在的压倒优势形成不对称反应。到21世纪20年代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也许会赶上美国，但在2012年时，东西方的军事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东方的战争能力在整个20世纪一直落后于西方。日本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与西方军队的战斗中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中朝军队和越南军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也占据了上风。但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东方军队都得益于一个现实，就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这些战斗都发生在争夺欧洲的大战争中的二级战场，西方的重点先是与纳粹德国的争夺，继而是与苏联的争夺。东西方战争能力的差距在1900～1940年有所缩小，但仍然很大，而在接下去的60年中又进一步拉大了。

为1900年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打一个分值，没有2000年那么难。如前面提到的，1900年时德国陆军对日本陆军的优势在2：1以上，英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近6：1，而且无论陆海军，欧洲军人的素质也要高得多。我估计1900年时西方和东方之比大致为5：1。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已被定为5分，意味着东方的得分是1分。还有更深的含义，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12.5倍，而西方增长了50倍，东方2000年的军事力量比西方1900年时高出2.5倍。然而，假如我们采用唐尼根估计的数字，也就是东方的军事能力在2000年为48.17～75.54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应接受一个更高的增长数字（即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50～75倍），这似乎太过分了。

火药时代的东方战争能力（公元1500～1850年）

新近的一系列研究使得中国2　000年帝制以来历史上关于东方战争能力的大致轮廓已经相当清楚了。主要的难题又一次是打一个精确的分数，但是在东方，涉及的数字（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误差）在大部分时期甚至比西方还小。

将1900年之前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直接进行比较，是件虽不精细但却仍然可行的事情。到1800年时，西方已经显然要强大得多了，也许在1500年时，也就是西方军事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更为强大了。明朝在必要的时候，的确有能力召集庞大的兵力（尤其是在15世纪上半期应对草原战争时），但没有像欧洲人一样有效地利用火药技术。

16世纪时，西方的大炮已经确定比东方的优越了。明朝政府也许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见识过一些西方的大炮了，但即使这样，他们到16世纪40年代仍然对这种大炮很感惊奇。那时日本的军械师已经非常高效地仿制出一些这样的炮，不过数量仍然极少。甚至在16世纪中叶扭转了抗倭战争局面的著名的戚家军，拥有的火枪手与同时代的西欧军队相比也少之又少。他们的枪通常都造得很粗糙，往往会自爆，这使得枪手们不敢离自己的武器太近，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瞄准。戚家军的人数从来没超过10　000人，对海战的影响远比对庞大的明朝陆军的影响大。戚继光实施的一些新的海战备战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明朝水师自15世纪早期以来衰退得非常严重，手忙脚乱地付出了许多仓促的努力，才建立起一支部队，于16世纪90年代与朝鲜水师联手打退了日本的进攻。陆军也同样如此。例如，北京的禁卫军到1564年才用铅制炮弹替代了泥炮弹，到1568年才（像欧洲人一样）改用了铁制炮弹；直到15世纪70年代，戚继光才采用了将轻型炮装置在由柳条栅栏围护的手推车上的办法，就像1444年匈牙利人在瓦尔纳与奥斯卡人作战时使用的那种车。

16世纪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哈布斯堡帝国要弱得多（更不用说奥斯曼帝国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小小的荷兰共和国还要弱。我提议1600年给东方打0.12分（西方为0.18分），在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与中国持平，东方1500年只能得0.1分（西方为0.13分）。这意味着中国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左右才达到罗马巅峰

时期的水平，尽管那时候人类使用火器已经有三四个世纪了。

中国的战争能力在整个17世纪是处于上升状态的。1696年，康熙与准噶尔游牧部落作战时，带了235门重型炮（每门重4～5吨）和104门轻型炮（每门重40～400千克）。但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得更快。我估计1600～1700年欧洲人的战争能力翻了一番，从0.18分增至0.35分；这段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只增长了25%，从0.12分增至0.15分——意味着康熙的军事实力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0.12分）和哈布斯堡皇帝腓力二世（0.18分）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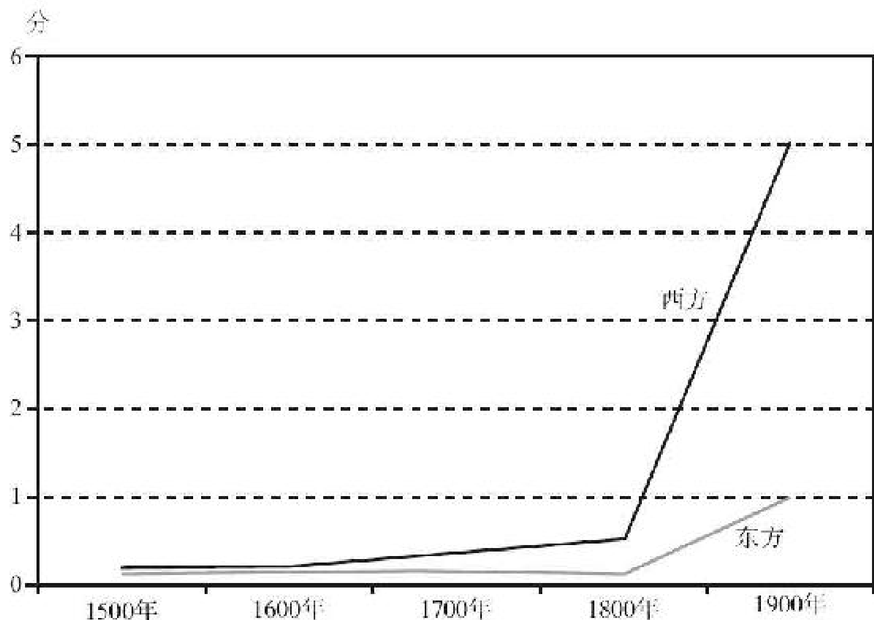
1750～1800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能力都急剧下降。1800年时，清朝拥兵85万，其中25万据说是精锐的满洲旗兵。不过，相对于其庞大数量，我们必须指出其素质、组织和后勤自康熙时代起就在全面衰退。尽管乾隆皇帝因十大军事胜利而在1792年自封了“十全老人”的光荣称号，但实际上他的军队在缅甸、越南和尼泊尔都蒙受了惨重损失。

当罗伯特·乔斯林勋爵（我们在本章开头曾引用过他的话）于1840年观看中国陆军和水师的行动时，东方和西方在武器和组织方面的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军官阿尔明·芒廷（Armine Mountain）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称中国军队就像是14世纪傅华萨（Froissart）所著《英法百年战争编年史》中的插图，“恰好是他的老版画的主题所呈现出的生活、物质和色彩，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好几个世纪，和所有现代的习俗、发明和改进一起在我眼前浮动。”

我估计西方的战争能力从1300年的0.1分增至1400年的0.11分。如果这个估计是可靠的，而且阿尔明的判断也是可靠的，那就意味着在1700～184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从0.15分降到了大约0.11分。我猜测阿尔明夸大事实的成分极小，于是在1700～1800年，在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了将近50%，从0.35分增至0.5分的同时，中国的战争能力却下降了25%，从0.15分降至只有0.12分（日本的军事实力则降得更低）。

这意味着1800年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及1600年之前不久与丰臣秀吉作战的明朝军队，不过多少比在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中厮杀的骑士和弓箭手们强一些。这也意味着东方的战争能力在19世纪增长了10倍，才使得日本在1900年得到了1分（见图5.15）。

图5.15 1500～1900年，军事革命时代的东西方战争能力



中华帝国和游牧时代（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

中国在2　000年帝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能力都强于东方（甚至世界上）的任何对手，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称为“游牧异族”的民族有关。

总体而言，我用于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4个特点的分数，都显示出存在相当大的冗余，然而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形态来抵消这一趋势。草原游牧民族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些群体通常在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方面都得分极低，在能量获取方面也乏善可陈，但在火药时代来临之前，只有最为高效的农业帝国才能在战场上胜过他们。

在东方，农业帝国显然在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年达到了这一水平。当时汉朝军队经常能击败匈奴军队，然后在7世纪，唐朝军队在与突厥对峙时甚至取得了更大的优势。然而，直到1700年后，随着火器得到了巨大改善，清朝军队才真正控制了草原。在中原王朝占优势的这些时期之前和之间——即大约公元前200年、200～500年和800～1500年——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强于任何农业国家。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最强悍的草原社会在社会发展指数的战争能力方面，也许平均能得到大约0.1分（浮动为±25%～50%）。最低分（也许是大约0.06分或0.07分）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当时罗马、波斯和汉王朝都成功地压制了新的游牧大帝国在草原上的崛起，最高分（可能为大约1.3分，大致是匈奴的两倍）则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

这意味着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武力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帝

国，甚至可能与1500年左右的奥斯曼帝国不相上下了。当然，已经无法证明这样的看法是否正确了，但帖木儿的确曾在1402年轻取了奥斯曼军队，并认为他的游牧部落的实力足以在1405年推翻明王朝。另一支蒙古军队的确于1450年俘虏了明朝皇帝，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也很可能攻陷北京城。不论有多少参考价值，“历史上的大战役”游戏也假设成吉思汗的军队在战术上优于恺撒的军队。

然而，尽人皆知的是，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在试图将其战争能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时，都极其困难。只有拥有“半游牧”背景的民族才有可能成功建立统治王朝，如6世纪时鲜卑人建立了隋唐，12世纪时女真人建立了金朝，17世纪时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完全游牧背景的征服者，如13～14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在进行统治一个农业帝国所必需的文化调整时感到太困难。因此，对于整个公元前200～公元1800年，我只给中国的战争能力打分，而不计游牧民族。

东方军事史上这段时期的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楚的，尽管精确打分又是一个主观的问题。我将从15世纪说起，回溯至公元前200年。

公元1400年，就在郑和远航和永乐大帝征伐草原前夕，明朝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皇帝号称统率着一支有3 500条船的近海船队（其中有1 750条战船、1 350条巡逻船和400条武装运输船）和一支120万人的陆军。但实际上，军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不过在1414年对草原最大的一次征伐的确投入了大约50万兵力。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要强（我给奥斯曼帝国打的分数为0.11分），但恐怕不及13世纪中期蒙古人鼎盛时期，因此，我为1400年的东方估计的分数是0.12分。

到1300年时，蒙古人在夺取了全中国后，军事实力比13世纪中期巅峰时可能有所下降，但依前现代的标准依然令人生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甚至重建了中国水师，修复了自13世纪中期就处于失修状态的战船，据说还在1274年派遣了4 500艘战船，搭载15万士兵远征日本。我为之打0.11分，稍稍低于明朝早期全盛时期，但这只是猜测；估计为0.1分或0.12分也是合理的。

尽管宋朝有不尚武的名声，但在10世纪晚期，其军队仍在迅速发展。据说997年太宗驾崩时，宋军有65万之众；1022年仁宗时，兵力接近100万。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引发了财政危机，使得领军饷的职业士兵逐渐减少而民兵开始增多，削弱了整体力量，但军队依然强大。1081年时，正规军有32万人，还有同样数量的勤杂人员，得到庞大的中央军械库的支持。甚至在12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廷仍然能向战场上投入10万～20万兵力。

12世纪的南宋统治者为了与女真族作战，大大加强了水师，制造了更大的战船，包括能抵御风浪的明轮船，还研制了许多新武器，如弩炮、火箭和喷火器等。12世纪的明轮船有可能长达60～90米，配有8个

轮子，可载700～800名水手。到12世纪30年代时，最大的船的长度超过了100米。到1200年时，一些船甚至装上了铁板，做装甲用。

1000～1200年，宋朝的军事力量显然比当时四分五裂的西方要强大得多。在西方，1000年时军事力量最强的可能是拜占庭帝国，1100～1200年是塞尔柱突厥。我给1000年的拜占庭打0.06分，给1100～1200年的塞尔柱人打0.07分和0.08分。我姑且建议给1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打0.08分，给1100～1200年的东方打0.09分。这意味着宋朝的战争能力即使在其巅峰时期，也不及罗马帝国。

然而，唐朝的战争能力更为接近罗马帝国。8世纪早期的文献显示，唐朝有大约50万军队，军队高度集权，有严格的纪律，有长期服役的专业化部队。

唐朝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将草原的重型骑兵与6世纪北魏、北周及其继承者隋朝发展起来的大规模步兵结合了起来。这一过程始于5世纪早期鲜卑征服中国北方大部，5世纪晚期，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其进程，但即使到了6世纪30年代，10万人仍被认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直到6世纪晚期，随着中国北方的巩固，才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589年，隋文帝征服南方时，曾在长江流域屯兵518 000之众，并得到有5层甲板的战船的支援。这种战船可载800人，装备有尖刺状的伸臂，可固定住敌方的战船，并供本方士兵登上敌船（令人惊讶的是，听上去很像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晚期制造的带有乌鸦吊桥的五桨木船）。

在隋朝建立了庞大的水军，于589年统一中国，于612～614年与高句丽进行了灾难性的战争后，唐朝水军逐步缩小。然而，保留的规模依然算是很大，因为没有国家能从海上对该帝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至少到755年前）中国的国内和平也不要求江河上有庞大的武装存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需要船只，当7世纪60年代与朝鲜的战争重启后，强大的唐帝国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建造或征用数以百计的船只，发动大规模战役。

755～763年的安史之乱极大地削弱了唐帝国。763年11月，一支吐蕃军队竟然攻破了长安城，而且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的军事能量都消耗在连绵不断的内战和算是部分成功地抵御吐蕃侵袭的战争中。在中央权威崩溃后，各藩镇还保持着自己的军队，但即使最大的藩镇（例如平卢军）的军队人数也不到10万。而且藩镇的军队普遍装备、补给和统领都很差。

在5世纪早期鲜卑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军队规模都相当大，但都远不及唐朝时期战斗力强。例如，公元279年，晋朝召集20万大军和支援战船征讨长江以南地区。这场战争与隋文帝于589年在同一地区为同样目标而发动的战争非常相似，但晋军的人数只是隋军的40%，且组织水

平更接近于汉朝而不及隋朝。

在接下去的200年里，骑兵主宰了中国战场。出土文物、陶俑和墓中浮雕提供了大量关于武器的信息，显示4世纪时骑兵普遍使用了马镫。很多坟墓中出土的物证都表明冲击武器和马的护甲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应用，说明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200～400年的战争能力显然有重大进步，给这段分裂时期打分却仍然不容易。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衰落到西方7～9世纪的羸弱水平，国家的基础设施始终得以保存。即使在4世纪，5万～10万人的军队也比比皆是。尽管攻城器械基本上从北方军队中消失了，但南方的堡垒依然坚固。400年后，军事实力增长得比以前更快。从我给600年的隋朝军队打0.09分回溯，我给500年打0.08分，给200～400年这段时期打0.07分。

变化极小的分数遮掩了重大的变革，但除非我们将公元600年的分数推得更高，我们就不得不或者（像我那样）设想公元200～400年的变化没有大到能在指数上显示出来，或者认为分数在公元200年后的某个时候降到了0.07分以下，然后又迅速攀升了。0.06分将相当于西方在6世纪早期或大约公元1000年时的水平，但我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在整个分裂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仍然高于那些水平。

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9年）的战争能力还要更高。公元前3世纪的大战，催生了交战双方都动辄上万人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他们娴熟地运用围城技巧和后勤保障手段，还开创了大量的军事理论。

公元前200年时水军还很弱，因为控制江河湖海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骑兵也是如此，而且许多军队都还在使用青铜武器而不是铁制武器。然而，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里，铁制武器逐步取代了青铜武器，随着主要战争从中国军队之间的内战转变为抵御匈奴游牧部落的战斗，骑兵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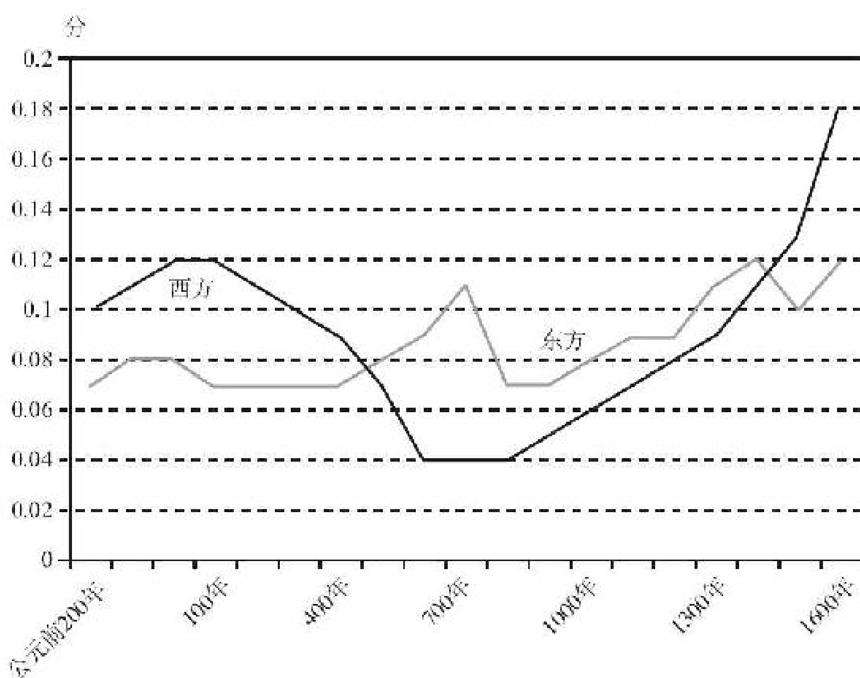
西汉军队的规模是起伏不定的，公元前200年后随着皇帝削藩，军队人数有所下降，但为了打大仗，此后又有所攀升。如公元前97年武帝出击匈奴时，就派出了14万步兵和7万骑兵。不过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于公元31年废除了普遍征兵制，并认真开始在帝国核心地带实行非军事化。到公元1世纪50年代时，汉帝国的军事制度改为将大量军队（通常都是处于帝国极松弛的控制下的盟国骑兵）驻扎在边境地区，帝国核心地带只留下一支规模极小的常备军，大约只有4万人。

汉朝军队的战斗力似乎始终没有达到罗马帝国军队的水平。我为公元前100～前/公元1年的汉军打0.08分（罗马巅峰时期为0.12分），然后公元100～200年稍降一点，为0.07分。对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估计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即使将西汉的得分提高到0.1

分，也不为过。不过，除非我们认为汉朝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与罗马势均力敌，否则不可能将东方的战争能力分数改变到足以严重影响社会发展指数的程度。

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曲线（见图5.16）的形状显示，在火药革命爆发之前，恐怕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草原联盟）都不可能使其军事力量超越0.1～0.12分。尽管进行跨越漫长时间和广袤空间的广泛对比极其困难，但铁制兵器武装下的罗马帝国军队、唐朝初期军队和明朝初期军队的战斗技能，似乎的确是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水平。较而言之改进指挥与控制、加强后勤的空间都不大了，因此也不可能比这些时段的水平再高很多了。

图5.16 公元前200～公元16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中国早期（公元前1600～前200年）

正如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的分析一样，在指数中可能出现的极小分数只能对图解产生影响（见图5.13）。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中国史前时代使用武力的证据，但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我们才看到金属武器的经常使用，以及我们可以合理地视为国家级战争的军事组织的迹象。依照我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采用的原则，我将最低的分数0.01分给公元前1600年，这与通常被认为与商朝的到来相关的一些事件是大致相符的。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的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战争中通常使用青铜武器，参战人数只有几千名，都是没有盔甲的民兵，没有骑兵或战车，也没有专门为打仗建造的船，只有非常简单的防御工事。

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时间滞差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急速缩小了。这大概与战车从中亚向这两个地区的推广（大约公元前1800年传至西方，公元前1200年传至东方）大有关系。商朝晚期的战争似乎比商朝早期规模要大得多。按照甲骨文上的标示，商朝的远征军通常大约有3 000多人，但至少有一次，商王武丁和夫人妇好召集了10 000人。到公元前1200年时，这些军队已经用上了战车，但似乎局限于主要将战车用于军官的车乘。公元前1200年时战争能力的增强足以将分数提至0.02分。我估计西方的分数是在公元前1800年时升到了0.02分，说明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缩小到了大约600年。

在西方，军事变革的步伐在公元前1500年后加快了。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王国中，战车部队成为主力，在高度集中的统领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化部队建立了起来。西方战争能力的得分在公元前1400年增至0.03分，公元前1300年增至0.04分。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东方似乎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能力加速增强的时期。到公元前1000年时，周朝也大规模地使用起战车来，就像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西方军队。据（公认是将近1 000年后编撰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在推翻商朝的战争中，统率了45 000名步兵、6 000名盟军和300辆战车。即使实际数字只有一半，这支军队按照西方公元前1500年的标准，也相当可观了（尽管不会给公元前13世纪的西方国王们留下什么印象）。因此我提议给公元前1000年的东方战争能力打0.03分。

周朝军队在公元前10世纪似乎更加壮大了，并使王权跨过了渭河，扩展至黄河流域。然而，在公元前957年周昭王在汉水流域遭遇惨败后，国家开始分裂。给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体系打分无疑是武断的，但公元前1000～前900年周朝军力的增长不足以使得分升至0.03分以上，但公元前850年后国家陷入的混乱却足以使得分降至0.02分。

军事力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和晚期迅速而稳步增长。最重要的变化在组织方面，从贵族征税征兵，并坐在战车里指挥自己的部队，转为统治者征税，征召自由的农民组成大规模的步兵部队。公元前7世纪时，10 000人的军队仍被视为庞大。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主要的军队能召集到50 000人，而一个世纪后，最大的军队的人数还会再翻上一番。

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学者以能投入战斗的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千乘之国（1 000辆战车可能只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投入城濮之战的战车数量的一半）为小国，万乘才是大国。然而，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军队的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我们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据（达到了60万）经常受到怀疑，但到公元前250年时，秦国无疑能一次性投入数十万兵力。铁制兵器直到公元前200年后才普遍使用，但公元前4世纪和

公元前3世纪，我们也看到了战车被骑兵取代，围攻战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北方许多地区都建起了泥砖长城，以抵御草原袭击者。

在图5.13中，我标绘的东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在公元前700～前100年是稳步增长的，从0.02分增至0.08分。这无疑是过分简单化了，增长率在公元前400年后很可能加速了，但鉴于涉及的分数实在太小，目前这样标绘，比插入停滞时期和骤变时期，随意性似乎要小一些。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跟社会组织一样，战争能力也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能量获取水平稍微提高一点点，通常就能引发战争能力的巨大增长（见图5.17和图5.18）。

图5.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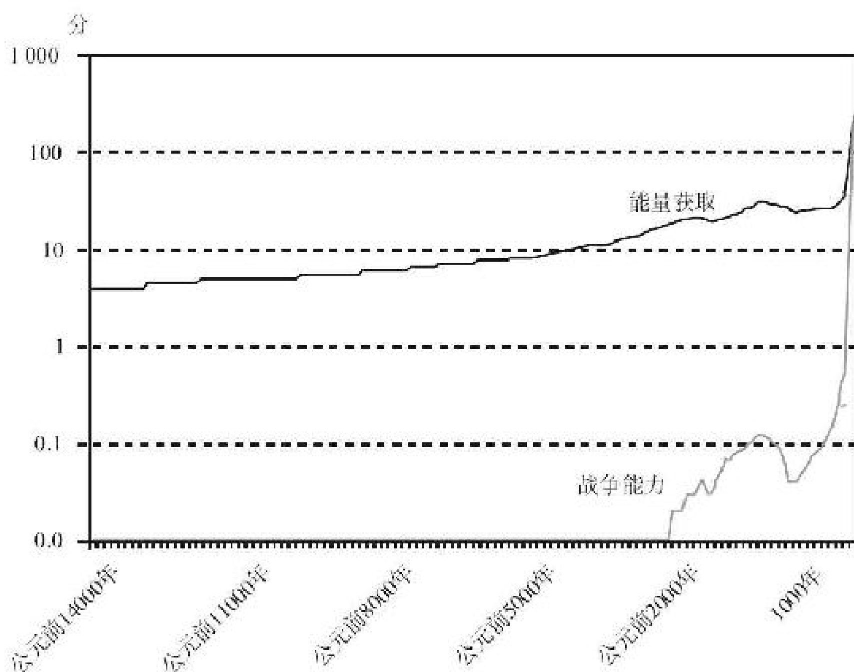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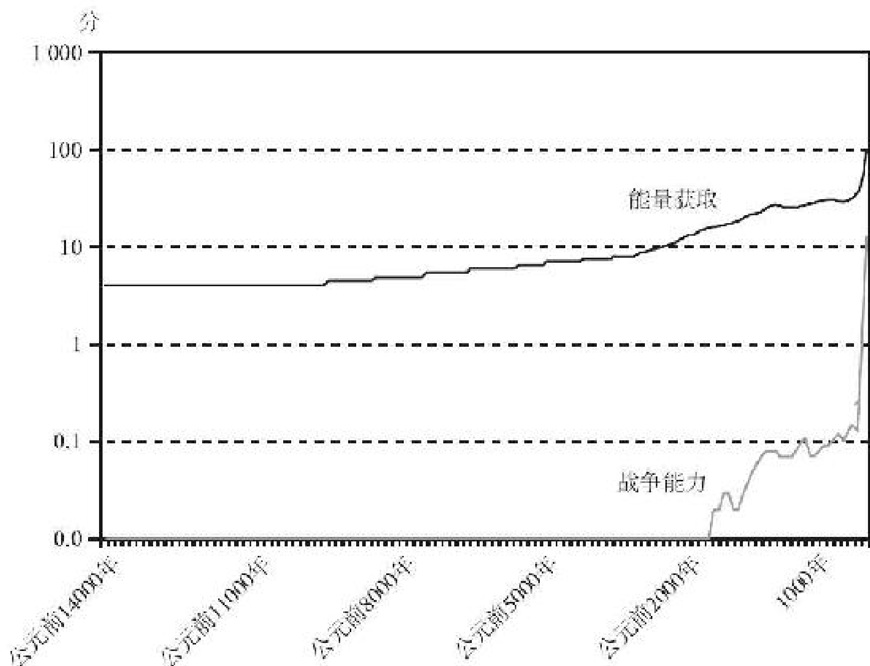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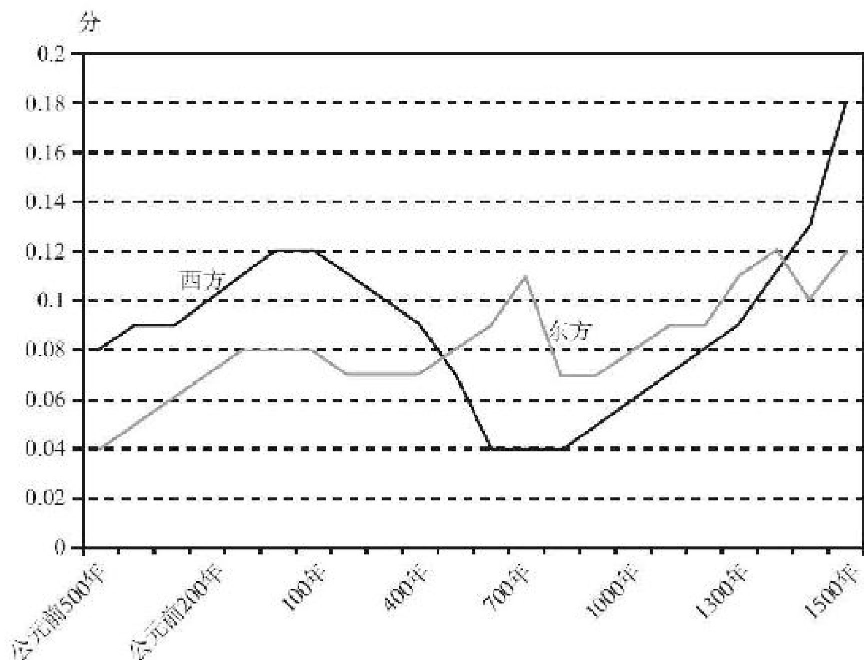
图5.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东方和西方一样，战争能力在经过了一段增长缓慢得在发展指数上难以衡量的漫长时期后，又突飞猛进了一段，在大约1 000年间（西方为公元前1800～前500年，东方为公元前1200～前100年）从0.01分跃升至0.08分。继而在接下来的将近2 000年间，东西方的战争能力又都似乎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也许可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即0.08～0.12分（见图5.19）。

在0.08～0.12分这个范围内，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经历了多少不同的道路。在东方，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波峰（公元前100～公元100年、公元700年、公元1400年）被崩溃（公元200～400年、800～900年）分开。每个波峰都比前一个要高（公元前100～公元100年为0.08分，公元700年为0.11分，公元1400年为0.12分，在大约1500年经历了一次轻微的下跌后，于1600年又恢复到这个水平）。

图5.19 公元前500～公元1600年，军事上的“硬天花板”



前现代时期的西方战争能力经历了一段更富戏剧性的历史，从公元前500～前100年（如前所述，图中公元前4世纪那段时间的线是平直的，只是为了将极小的分数凑整）相当平稳地增长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0.12分，然后又一路下跌，到公元600年时降至0.04分，公元800年又开始平稳上升，约于15世纪40年代突破了0.12分的上限——此时正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前往勃艮第、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枪手们开始实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时候。

图5.19恰好说明了早期现代欧洲军事革命理论家们的观点：枪是欧洲军事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枪使得15世纪时的欧洲军队在很多重要方面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可能，然而是战术、后勤、指挥和控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才使得新武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正如肯尼思·蔡斯（Kenneth Chase）所指出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始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伊朗或土耳其，是因为：（1）欧洲距草原较远，这使其难于维持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其战场上保留着大量运动缓慢的步兵，因此发射较慢的枪仍是有效的；（2）欧洲有大量筑有围墙的城市，使得大炮有较大的用途；（3）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战事不断，因而革新是有益的。

表5.2 约1400～1700年促成军事革命的因素

	步兵	城市	分裂程度
基督教世界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伊斯兰世界	比较重要	不重要	比较重要
东方	不重要	比较重要	不重要

表5.2粗略总结了地区差异，将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地区分为3部分，分别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东方。在伊斯兰世界（大致从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步兵经常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草原骑兵通常起主宰作用，很少采用战术，因为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印度在政治上有些四分五裂，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埃及及其他邻国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但政治争端并不像欧洲那样剧烈。东方则相反，壁垒森严的城市是首要的军事目标，但除了1592～1598年在朝鲜发生过大战外，鲜少发生国家间的战争，主要的战争是在中国的边防军与草原骑兵之间进行的。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发生军事改革的诱因要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所以是西欧人最先开发了火枪和火炮的潜能，并为进行更现代化的战争而组织社会。

这就是说，组织效率不可能将现代早期的战争能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再提高哪怕1.0分。只有工业革命和将自然科学手段运用于运输、供给和火力，才能做到这点。将图5.17和图5.18，与图4.2和图4.3对比，就可看出工业革命对战争能力的影响比对城市规模要大得多。

[4] 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编者注

[5] 1磅≈0.45千克。——编者注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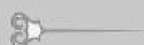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是，能够随时间推移，通过积累信息、观念和优良传统来实现文化进化。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原始人类也许就有了与现代语言相似的语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有可以发出语音的舌骨和也许能分辨出交谈语言的发音的内耳。然而，过去15万年来智人的进化，才代表着这方面的革命。

几十万年来，信息的传输和储存完全依赖于语言和记忆。最早的通过实体信息符号进行交流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要回溯至将近10万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号洞刻有符号的赭石碎片。然而，这类符号不仅极少，也非常简单，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在所有发现人类的地方突然普遍起来（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标准化）。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最早的明确表示数字和话语的符号，于5　000年前较常出现于亚洲西南部，自那以后这些技术就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相对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数字产生后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因为每一件从古代留存下来的文件，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技术完善和推广的例证。因此，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探查到存储和交流信息的系统是怎样产生的，获取信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是怎样不断完善的。

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掌握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人类写作和计算的自然痕迹有考古证据，但衡量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难的。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勇敢地尝试估计过去两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读、会写以及语言水平。计算能力尽管明显更重要，但得到的关注度不及读写能力，但还是有一些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学家中就有反对量化的声音，许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有那么多种类的语言，计算有多少人能读、会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的前半部分（欧洲有许多种类的语言，因此也就有同样多种类的计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计算有多少人具有读写能力是无意义的）并非必然。只要我们清楚读写和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在问其他问题时也许会选择不同的定义，那么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于在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反对量化之声，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要回答什么问题的质疑之声。

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特性，需要分别计算下列分

数：（1）在特定时间点上，技术在东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术的使用范围。然后将两个数字相乘，以得出东方和西方信息技术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分数。

跟考据战争能力的情况一样，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现代时期的证据稀少，而在于20世纪技术成熟度的巨大飞跃，使得公元2000年的信息技术很难与先前时期对比。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指出，摩尔定律称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成本效益自1950年以来每18个月翻一番，也许意味着公元2000年西方信息技术的分数比1950年高出10亿倍还多。公元2000年西方的分数是250分，实际上我们回溯不到1970年时，就已经跌至可衡量的最低分数0.01分了。

我们很多人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卷盘式磁带机和有大型主机的计算机，与我们这个文明时代的音乐播放器iPod和平板电脑iPad等相比，那些简直像是古代的机器；然而假如你认为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太过原始而无法衡量，那也是很荒谬的。计算信息技术的分数要求对不同种类的系统加权，并确认它们之间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或直接的。文字并没有替代语言，电话或推特也没有替代面对面的交谈。新的信息技术形式也许最终能完全替代过去几十万年来发展的形式，但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而且在计算信息技术的历史分数时，我们还必须认清复杂的重叠模式。

有多少人会读、会写、会计算，他们的技能处于什么水平，他们使用什么信息技术，其证据是零散破碎的，也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时代变迁中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变革是各有偏好的，这又增加了计算中的主观性。因此信息技术的分数比另外3项特性争议更多。

信息技术记分牌

给信息技术分类的困难，要求在计分时采用两段法。

1.技能。遵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范例，我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按照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时的能力，划分为3个技能水平：初步、中等和充分。同样遵照标准范例，我在划分每个类别时都将门槛设得较低。“初步”包括能够读和写名字，或者记录简单的数字；“中等”意味着能够读或写简单的句子，或者用加、减、乘、除来解决基本的问题；“充分”意味着能够读或写更连贯的文章，或使用更高级的数学技巧。

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提出，这样的定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在有些文化传统中，语言和数学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实证研究支持这样的主张。例如，将读写能力划分为初步、中等和充分3级水

平，是中国在1950年开展扫盲运动时独立创制的，规定充分的读写能力为认识1 000个以上的字，中等文化水平为认识500~1 000个字，而基本的读写能力为认识300~500个字。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研究成果（如有可利用的专家的定量估计则直接利用，如无则通过专家的定性讨论进行推算），我将不同时期人口中的成年男子按照充分、中等和初步3个类别进行了划分。如果人口中每1%的成年男子能够进入充分技能类，则可得0.5 ITP（信息技术分）；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中等技能类，可得0.25 ITP；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初步技能类，可得0.15 ITP。

这些数字是且只能是掌握信息技术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的武断估计。这也许对于某些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另一些则大谬不然。然而，打分时坚持一贯性似乎比虚伪而高度主观地追求更加精确更为重要。将分数相加起来，会得出每个时期唯一的男性ITP。如果认为我为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类别提出的数字不合理，批评家们当然可以用其他数字做实验，然后看看需要多少数字才能改变结果，并且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女性读写和计算能力的证据普遍比男性要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20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会读、写和进行数学计算的女性要少于男性（通常是要少得多），并且通常都处于较低水平。

史前时代的男女差异无疑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意味着我又一次只能瞎猜，唯一所受的约束是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总体印象。然而，做出清楚的猜测比留下含糊的假设更具建设性，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一系列估计数字，抛砖引玉。然后我将估计的每个时期的性别乘数运用于男性ITP分数，得出女性的ITP分数；将这两个分数相加，就能产生一个东方和西方在特定时间点上的唯一的ITP分数。

在公元20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我将100%的成年男子划入充分技能类，得到的男性ITP分数为50（即100%×0.5）；而女性的技能分数也是男性的100%，于是女性的ITP分数也是50分（即男性的50分×100%）。因此，公元2000年西方ITP得分为100。

西方核心地带的职业文字和计算从业者通常设定的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的标准比历史学家要高得多，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同意我所主张的100%男性都有充分的技能，也不会同意女性的计算技能与男性相当。然而，尽管为初步、中等和充分的读写技能和计算技能设定极高的标准对那些寻求在复杂的21世纪社会提高标准的人非常适宜，对于长期的跨文化比较却无所助益，因为那将使19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都降为零。

2. 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计算分数的第二个阶段，是再设立一个能反映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的乘数。我将处理信息的工具分为3个更广泛的类别：电子媒介（2000年时在东方和

西方广泛应用），电媒介（1900年时在西方广泛应用，但在东方没有应用），还有电之前的媒介（在西方可能使用了11 000年，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 000年）。

我为公元2000年西方使用的最先进形式的电子媒介赋予的乘数值为2.5。2000年时东方也使用类似的媒介，但不够普及。电话（既包括固定电话，也包括移动电话）和电视在东西方大致同样普及，但电脑和互联网主机在西方更为普及（美国每100人中有62.3台计算机，中国香港为38.5台计算机，日本为34.9 台计算机；美国每100人中有375.1台互联网主机，中国台湾为97.3台互联网主机，日本为72.7台互联网主机）。由于2000年西方的乘数为2.5，我为东方核心地带使用的乘数为1.89。2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信息技术得分为250分（即100 ITP×2.5）；东方的得分为189（即100 ITP×1.89）。

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电子乘数定为2.5，是因为为这一特性所设的最大分数是250分，但为电媒介和电之前的媒介设乘数值就要难多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尝试计算整个20世纪信息技术的功能的总体增长量，但根据专家文献，我的猜测是2000年可用的电子媒介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媒介，功能增长了大约50倍。这意味着19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乘数为0.05。

19世纪的信息技术也有非凡的进步，不过显然与20世纪无法相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子媒介功能比1800年时可用的电子之前的媒介增长了5倍，这样便得出1800年的乘数为0.01。我将此作为所有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基准面，包括大约公元前9000年时出现在西方，公元前6250年时出现在东方的，有记录的最早的用视觉符号所做的实验。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提出的数字，我对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的粗泛分类无疑也存在许多变量。历史学家尤其会注意到我对印刷媒介和印刷产生之前的媒介没有做类别上的区分，尽管印刷机的发明在15世纪对欧洲精英文化、17世纪后对东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印刷的主要贡献是产生更多、更便宜的物质，而不是像电报在19世纪、互联网在20世纪那样改变了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方式，这些纯粹数量上的变化已经作为因素计入了指数。然而，即使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涉及1900年前的信息技术分数的数字也实在太微小——甚至比战争能力的数字还要小——将不会使乘数有太大改变，也不会对最终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太大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区分符号形式，将字母的、章节的、表意的以及其他的文字形式均视为电产生之前的系统的变量。这样过分简化了事实，但是因为：（1）对文字系统相对效率的判断太容易陷入局限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中；（2）公元1700年前所有时间点上的微小分数意味着任何看似合理的调整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索性对于电之前的各种信息技术系统一视同仁，只关注它们的应用范围。

最后，我没有将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单分成一类，比如大约公元前2500年最早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盘，或者其简单形式大致同样古老的印加结绳话。这与我没有区别对待印刷机是同样的原因：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加快了计算速度，改善了精确性，但并没有像计算机那样改变计算过程。

图6.1以线性–线性标尺展示了我计算的分数：1900年西方的分数不过是勉强看得到，但更早时期的分数就都看不到了。图6.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现了同样的数据。不同在于，将西方1500～18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印刷机带来的重大影响，将东方1400～19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这段时期印刷术的巨大扩张，在线性–线性图（见图6.3）上造成不了可见的变化，在对数–线性图（见图6.4）上只能造成极小的变化。

图6.1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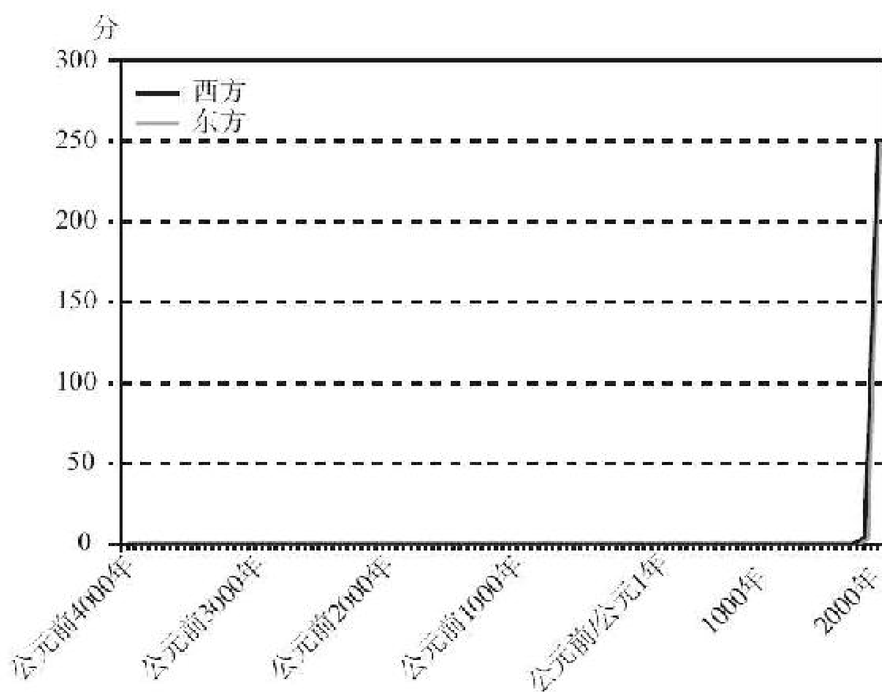


图6.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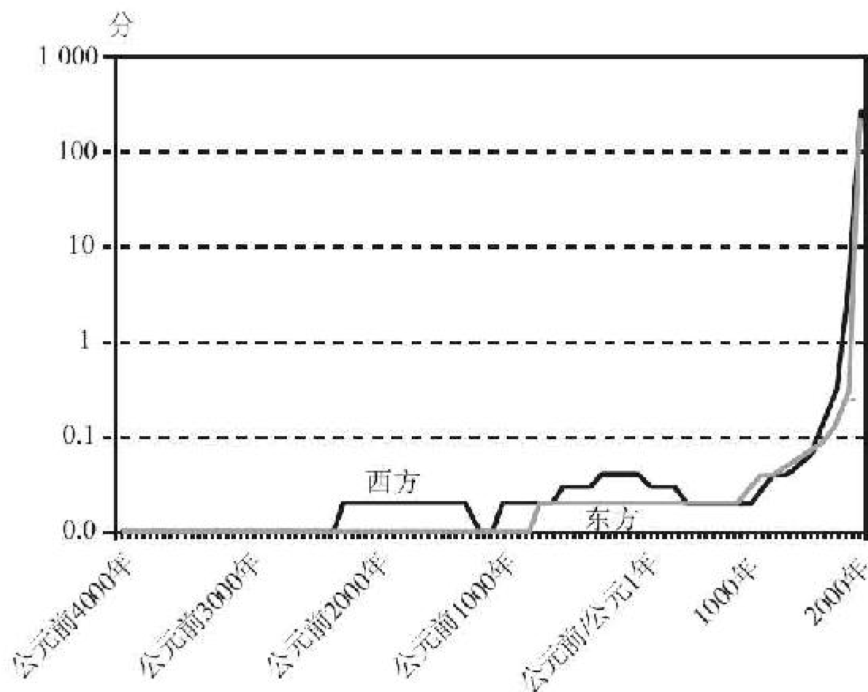


图6.3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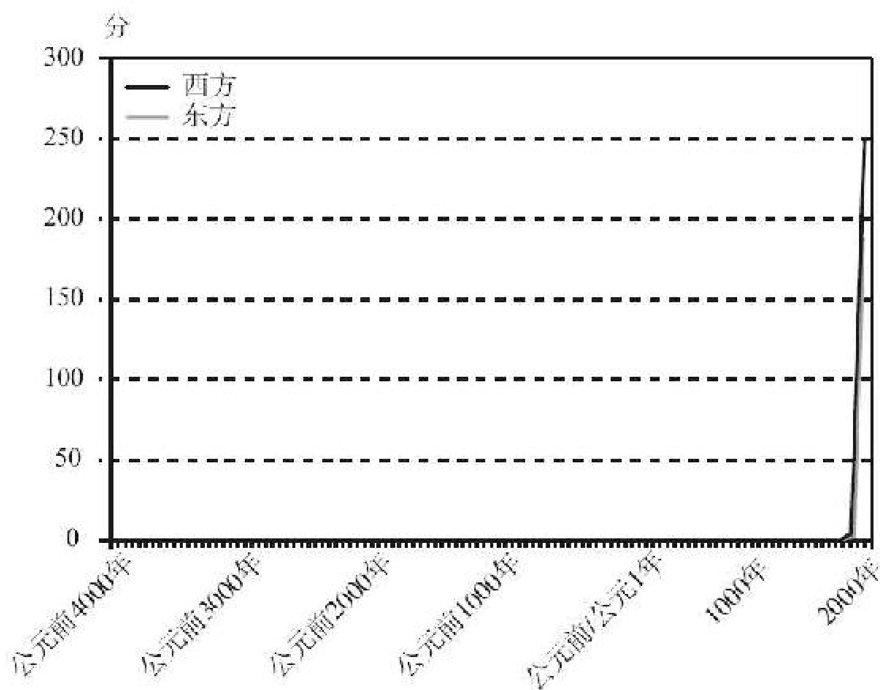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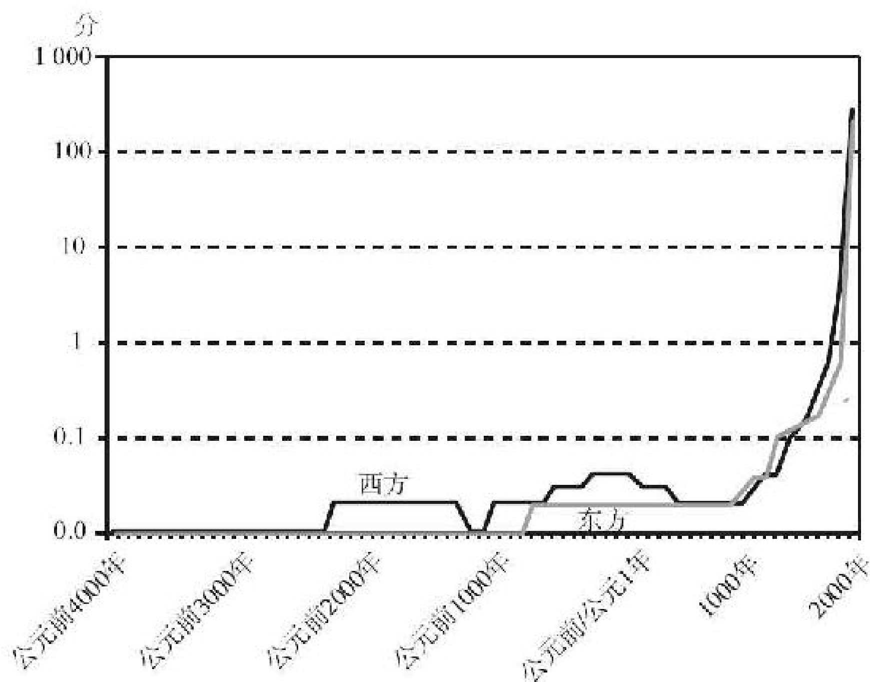


图6.4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这种计算方法依赖于一个更进一步的关键假设：采用可见符号来记录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谈和计算几万年后，才开始书写或使用数字符号，我们通过传统、仪式和艺术储存和交流了浩如烟海的信息。然而，很显然的是，所有纯粹口头系统的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指数中自然都是零分。

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

第一，出于生物学的考虑：人脑都是一样的，尽管先前曾提到有人声称文化之间有极端变量，但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不同口头文化的人群在头脑中处理和存储信息，或者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能力有什么重大不同。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出于比较的目的，文字产生以前的信息技术系统实际上都要归零。只有更成熟的文字和计算技术开发出来后，可以衡量的差异才开始出现。

第二，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使上一段所提到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衡量和比较古代没有文字的不同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假如在符号系统最早的证据在两个地区出现（西方为大约公元前9300年，东方为公元前7000年）之前的时代，东方的口头文化在处理、储存和交流信息方面是否强于西方的口头文化，我们无从得知。

第三，出于经验的考虑：使用可见符号来记录述谓性概念和数学概念的革命性的影响已经非常确定了。经常给那些强调直观记录的有效性的人贴上“进化论者”标签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大量理由要求人们当心极

端的主张，在解释文字的影响时要持灵活态度；但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后，从纯粹口头转变为口头和文字的信息技术的各种组合，究竟是加强了个人能力，产生了等级层次，还是同时促成了两者，似乎仍然不清楚，这也标志着在增强人的存储、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西方，这方面的证据得到了极其详细的研究，最早的符号可能是用来记账的，从中也逐渐产生了口头形式。在东方，证据不那么清楚，但同样的模式应当也适用。

表**6.1** 西方信息技术得分

年代	充分（0.5分）	中等（0.25分）	初步（0.15分）	男性分数（分）	女性（%男性）	读写分数（分）	乘数	总分（分）
公元2000年	100 (50)	0	0	50	100% = 50	100	2.5	250
公元1900年	40 (20)	50 (12.5)	7 (1.05)	33.6	90% = 30.2	63.8	0.05	3.19
公元1800年	20 (10)	25 (6.25)	20 (3)	19.3	50% = 9.65	28.95	0.01	0.29
公元1700年	10 (5)	15 (3.75)	25 (3.75)	12.5	10% = 1.25	13.75	0.01	0.14
公元1600年	5 (2.5)	10 (2.5)	10 (1.5)	6.5	2% = 0.13	6.63	0.01	0.071
公元1500年	4 (2)	8 (2)	6 (0.9)	4.9	2% = 0.10	5.0	0.01	0.05
公元14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3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2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100年	2 (1)	4 (1)	2 (0.3)	2.3	1% = 0.02	2.32	0.01	0.02
公元1000年	2 (1)	4 (1)	2 (0.3)	2.3	1% = 0.02	2.32	0.01	0.02
公元600~900年	2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300~500年	3 (1.5)	4 (1)	3 (0.45)	2.95	1% = 0.03	2.98	0.01	0.03
公元前100~公元200年	4 (2)	6 (1.5)	5 (0.75)	4.25	1% = 0.04	4.29	0.01	0.04
公元前500~前200年	2 (1)	3 (0.75)	2 (0.3)	2.05	1% = 0.02	2.07	0.01	0.02
公元前900~前600年	1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前1100~前1000年	1 (1)	1 (0.25)	1 (0.15)	1.4	1% = 0.01	1.41	0.01	0.01
公元前2200~前1200年	1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前	1 (1)	1 (0.25)	1 (0.25)	1.4	1% =	1.41	0.01	0.01

2700~前2300年					0.01			
公元前3300~前2800年	0 (1)	1 (0.25)	2 (0.3)	0.55	1% = 0.01	0.56	0.01	0.01
公元前6000~前3400年	0	0	1 (0.15)	0.15	1% = 0	0.15	0.01	0
公元前9000~前6100年	0	0	0	0	0	0	0.01	0
公元前9300~前9000年	0	0	1 (0.15)	0.15	1% = 0	0.15	0.01	0

表**6.2** 东方信息技术得分

年代	充分（0.5分）	中等（0.25分）	初步（0.15分）	男性分数	女性（%男性）	读写分数	乘数	总分（分）
公元2000年	100 (50)	0	0	50	100% = 50	100	1.89	189.00
公元1900年	15(7.5)	60 (15)	10 (1.5)	24	25% = 6	30	0.01	0.30
公元1800年	5 (2.5)	35 (8.75)	10 (1.5)	12.75	5% = 0.64	13.39	0.01	0.13
公元1700年	5 (2.5)	20 (5)	10 (1.5)	9	2% = 0.18	9.18	0.01	0.09
公元1600年	4 (2)	15 (3.75)	10 (1.5)	7.25	2% = 0.15	7.4	0.01	0.07
公元1500年	3 (1.5)	10 (2.5)	10 (1.5)	5.5	2% = 0.11	5.61	0.01	0.06
公元1400年	3 (1.5)	10 (2.5)	10 (1.5)	5.5	2% = 0.11	5.61	0.01	0.06
公元1300年	3 (1.5)	5 (1.25)	5 (0.75)	3.5	1% = 0.04	3.51	0.01	0.04
公元1200年	3 (1.5)	5 (1.25)	5 (0.75)	3.5	1% = 0.04	3.51	0.01	0.04
公元1100年	2 (1)	2 (0.5)	3 (0.45)	1.95	1% = 0.02	1.97	0.01	0.02
公元前600~公元1000年	2 (1)	2 (0.5)	2 (0.3)	1.8	1% = 0.02	1.82	0.01	0.02
公元前1000~前700年	2 (1)	1 (0.25)	1 (0.15)	1.4	1% = 0.01	1.14	0.01	0.01
公元前1300~前1100年	1 (0.5)	1 (0.25)	1 (0.15)	0.9	1% = 0.01	0.91	0.01	0.01
公元前7000~前1400年	0	0	1 (0.15)	1.15	1% = 0	0.15	0.01	0

西方识字率

当我们沿时间长河回溯时，证据的性质变化极大，但我们仍然能拼

出一幅非常粗略的画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对1600～1900年欧洲的识字率做了些先驱性的探索工作，讨论了不同时间男性和女性识字的不同水平。也有一些学者对美国开展了少量的同类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类统计方法遭到了批评，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有利于文化史研究图书和读者群体的量化方法。在重构现代早期识字率时，所运用的方法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研究方法的改变，似乎更多的是受背离定量分析的更广泛的史学趋势的影响，而不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结果有什么严重的错误。

从专家研究中浮现出的整体画面是，自1600年以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识字率的地区变化和广泛趋势相结合，各级水平的识字率都有所提高，并且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在我的指数上，将奇波拉（Cipolla）、斯通（Stone）及其他人提出的数字转换成分数后，表现出自1600～1800年大致每世纪翻了一番，（社会发展分数）从1600年的0.07分增长至1800年的0.29分，然后又飙升至1900年的3.19分。

公元1600年之前，证据情况不大好。中世纪史专家大张旗鼓地研究了欧洲关于读写情况的文献，但对计算情况关注不够。在伊斯兰核心地带，情况却正好相反，关于读写情况的文字资料极少，但自然科学和数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很少有人专注于研究中世纪的伊斯兰教育情况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人口的读写和计算能力。

自历史学家们有时称之为“12世纪复兴”的时代起，西欧男性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开始缓慢增强，而在公元1100年前，他们的水平非常低，对此意见似乎较一致。会读写和计算的女性的数量，可能是直到1500年后才开始稳步增长的。

研究伊斯兰教育的学者基本上无人愿意冒险去做任何量化估计，但看来公元1100年前，尽管顶级的伊斯兰学者计算能力比基督教世界顶级学者要强，读写能力至少也不相上下，但读写却局限于极少数人。我们也许可以说，中世纪伊斯兰的读写工作只是抄写员和神职人员的绝技，而在基督教的欧洲，读写却为更广大的工匠阶层普遍掌握（尽管能读的读物通常都与《圣经》相关）。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16世纪的欧洲男性踊跃阅读宗教经典并带动识字女性增多的兴旺景象。

1100年时，仅仅具备最基本的阅读水平的西方人可能还不到10%，算得上有完全读写能力的人甚至更少（可能仅有2%）。能读会写的女性数量尤其难以知晓，但有文化的女性与有文化的男性的比率恐怕要达到1：100，实在少到几乎无法对分数产生影响。我估计大约1100年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只有0.02分，到1500年时以缓慢的增量达到了0.05分，然后增长速度才得以加快。

读写和计算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似乎普及更广、更深，尤其是

在民主时期的雅典（公元前508～前322年）和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意大利。在此方面，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做出过非常过硬的量化估计，我基本上将采用他的数字。

新近对古希腊–罗马读写水平的研究，像中世纪史专家和人类学家们一样，强调读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分数来反映，但哈里斯在计算比率时，已经将读写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考虑在内了。

结合这些批评，我估计西方核心地带信息技术的社会发展分数在公元前100～公元200年这一时期达到的巅峰为大约0.04分。公元200年后开始下跌，我为公元300～500年估计的分数为0.03分，此后，由于缺乏任何更清楚的证据，也因为所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我给直到公元1100年复兴之前所打的分数，都停留在0.02分这个静止的水平上。

再回望公元前100年之前，公元前400～前200年，在爱琴海岸和东地中海的核心地带，信息技术得0.03分，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0.02分比，有所增长。分数这样微小，精确性和细微差别都谈不上了；我给公元前2200年（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等官僚国家兴起）到公元前500年（希腊的民主国家开始扩张）的信息技术打的分数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示历史学家经常称之为“抄写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我还要加上“识数文化”）的结合。

说到抄写/工匠识字文化，我指的是有一个人数极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大概只占男性人口的1%）完全掌握了文学经典，一个人数稍多一些（大概占男性人口的2%）的官僚精英阶层掌握了记录技术，还有一个较小的工匠群体（也许是1%～2%）能够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能进行他们的专业所需要的计算。这种抄写/手艺信息技术所得的社会发展分数为0.02分，除了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溃时期出现了一次中断，各种文字证据都骤然萎缩。在希腊，文字可能完全无用了，在整个东地中海一带，只有非常少的文字资料留存了下来。对那个“黑暗时代”，我打0.01分。

抄写识数文化和识字文化最早的确凿证据，大约于公元前33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我给这段时期打0.01分。信息技术在接下来的1 000年中成熟度和应用范围均有所增长，但鉴于社会发展指数中可用的最小增量是0.01分，图6.2中对这段时期只能用平直线标示，直到大约公元前2250年才向上跳跃。早在公元前9000年也有人类符号活动的细微迹象，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书写或算数，但这些痕迹实在太稀少，我仍给它们打零分。

东方识字率

在我能看懂的语言中，对东方识字文化和识数文化的定量分析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图6.2中的平直分数线和表6.2的简略便反映了这一点。我给东方打的分数必然将复杂得多的模式过分简化了，使之像西方的分数图中标绘的一样，充满了起伏。

公元2000年，我采用HDI，将日本核心地带的东方识字率视为与西方核心地带的相同，但正如我在“信息技术记分牌”一节中所解释的，我使用乘数1.89，而不是西方的2.5，来表示2000年时日本电子媒介的可用性比美国要狭窄。

1900年，日本政府开始为提高识字率付出艰辛努力。虽然标准与西方核心地带相比算是低的，但比前现代文化要高得多，可能有85%的男孩和25%的女孩至少掌握了一些技能。就日本达到的水平，存在一些争议，但由于日本的信息技术即使在1900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电之前的技术，所以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在社会发展分数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我计算的东方分数是0.3分（30 ITP ×0.01，表示仍处于电之前时期），而西方的分数是3.19分。1900年左右，中国人的识字和识数水平比日本还要低，因为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于大众教育存在矛盾心态。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按照前现代的标准算是非常高了，1900年时可能至少有50%的男孩达到了基本的识字标准，但迈向大众教育的步伐仍然相当迟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众教育才真正起飞。

1900年之前，清朝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和工匠识字文化在稳步扩大。1700年左右，可能只有5%的男人可以说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35%的男孩粗通文墨，但到1800年时，中国北方将近一半的男孩都达到了粗通文墨的水平。

女性读写和识数受到很大限制。18～19世纪西方人的识字和识数率比东方人高（尤其是女性），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小，社会发展分数的实际差别（按我的计算，西方1700年为0.14分，1800年翻番为0.29分，东方1700年为0.09分，1800年时大致增长了50%，为0.13分）并不大。

明朝时期的分数似乎更低，尽管可能比1600年开始信息繁荣之前的西方要高。在欧亚大陆两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可能没多大区别，但中国似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等识字识数文化程度的群体（男性占压倒多数）。实际分数必然是凭印象打的（我给1500年打0.06分，给1600年打0.07分，西方同期分别为0.05分和0.07分），然而由于17世纪前的分数如此之低，除非误差非常大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严重影响。当时日本的水平可能与中国非常接近。

回溯到更早的时期，打分的精确性无疑会更差。精英教育在唐朝和宋朝得到了很大改善，10～12世纪，书籍和财务记录始终处于爆炸状态，使我感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大致堪与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0.04分）媲美。打0.03分或0.05分似乎也同样合理，但低至0.02分（相当于我给

公元600～900年的西方打的分数）或高达0.06分（相当于16世纪西方的分数）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分数从1000年的0.02分迅速上升到1400年的0.06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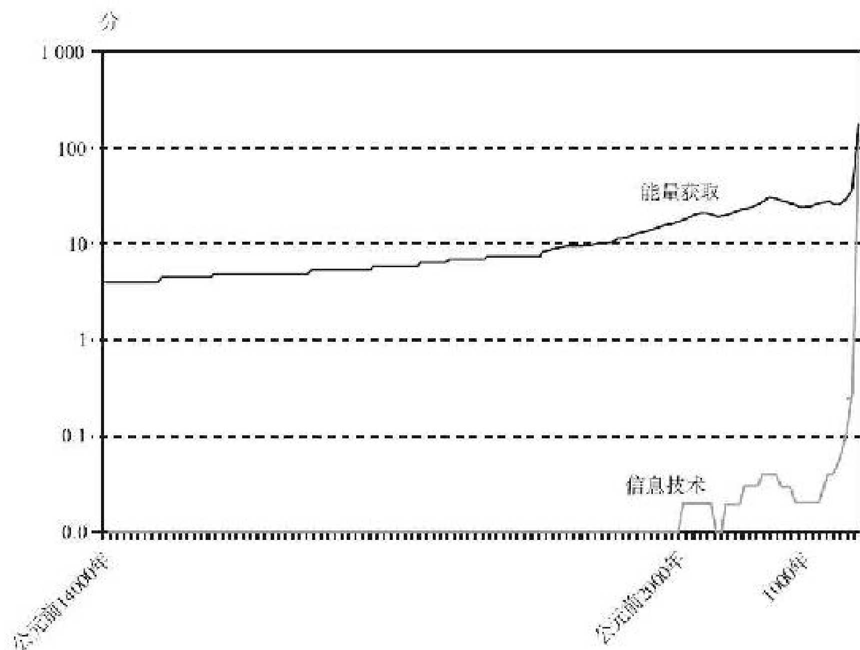
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做其他选择，我索性假设公元前600～公元1000年这段漫长的时期都是同一个分数0.02分。在这16个世纪，识字率和识数率无疑都是波动的。定性证据表明，两者可能在公元前600～公元100年都上升了，在公元100～400年都下降了，然后在公元400年后又再次上升了。越来越多的汉朝文献正在被发现，特别是在干旱的西北和湿润的南方，气候条件利于竹简留存。然而，目前看来，中国人的识字率和识数率似乎仍然低于罗马的水平。汉朝灭亡之后信息技术的衰退似乎也不像西方后罗马时代的衰退那样严重。中国在0.02分上下的变量从历史上看一定很重要，但在社会发展指数上，恐怕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中国符号表示法最早的证据来自大约公元前6250年的贾湖，也有充分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5 000年这一实践存在着连续性。然而，直到大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使用的文字符号和数学符号似乎才能够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相媲美，能够得到0.01分。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证据显示符号系统的应用不断扩张，从甲骨文到青铜器皿上的铭文，再到大规模地使用墨在竹简和丝绸上书写。然而，分数实在是太低了，这些改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只能从0.01分跳到我给大约公元前600年打的0.02分。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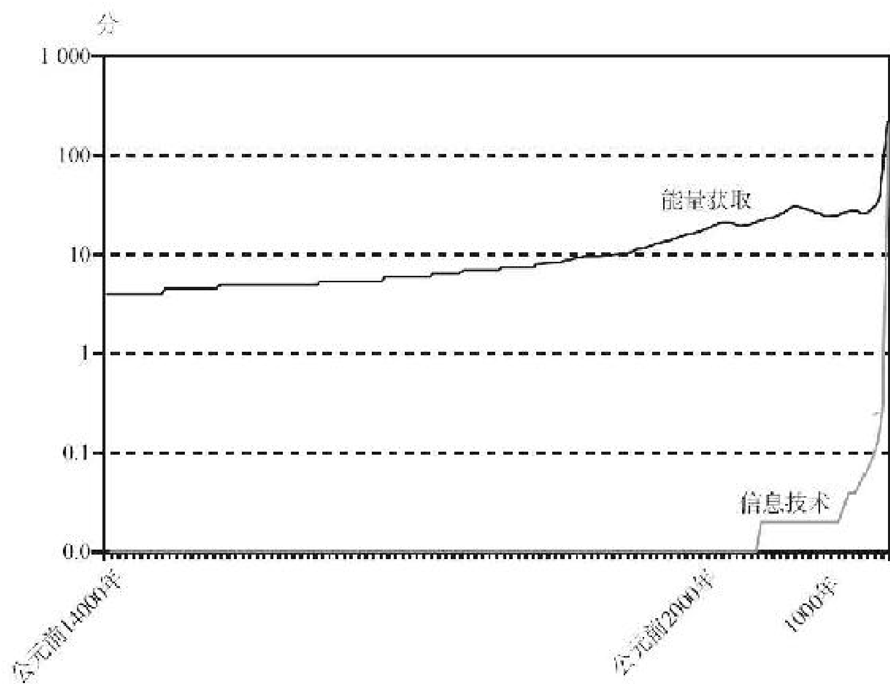
图6.5和图6.6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信息技术都对过去几个世纪广泛的变化格外敏感。

图**6.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信息技术和能量获取被卷入了一个反馈回路。如果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18世纪晚期最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而19世纪晚期使化学全面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是倚重于信息技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产力的爆炸式发展，与全新形式的信息技术的彻底腾飞，关系更是极其密切。

图6.6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新近的信息爆炸意味着1700年之前的所有信息技术得分都必须极低。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指数4个特性中最难衡量的，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的分数实在太低，即使有误差，似乎也不大可能对总体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明显差异。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七章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在本书中，我介绍了支持一种分析工具——社会发展指数——的证据和方法。因此，以一个关于这种工具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更开放的讨论，而不是一系列结论来结束本书，似乎是明智的。

我先用两节来讨论一下指数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我对误差和讹误做些评论。新进化论者的指数最大的缺陷之一是，由于指数并非真正为回答某个具体问题而设立，其设计者很难准确地说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讹误。误差项取决于所问的问题，就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能够容忍多大的误差才能保证指数不误导，可以做到相当准确。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将转向展示数据的问题。在展示统计信息时，根本没有中立的方式；各种方式都会强调指数的一个或多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我成系统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均优先选用线性–线性图，但其他方式也有其优点。

然后我将回到在第一章中曾考虑的问题上，探讨此处谈论的指数怎么会有助于统一历史上的进化理论。我对有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理论，而且社会发展指数可以成为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持乐观态度。最后，我将探讨这样一个理论能否真的使历史成为未来的指南，就像斯宾塞150多年前所声称的那样。

误差和讹误

第三章至第六章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细节都可能受到质疑，证据几乎都可以进行多种解释。有不止一种方式来定义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我也能以其他方式计算分数。在产生社会发展指数的每个阶段，都会牵扯出长长的一连串争论和推断。

因此，另一位研究者完全可能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分数。实际上，任何其他研究者是极其不可能得出与我完全一致的一套分数的。就此而言，如果我再重新计算一遍社会发展分数，我本人也很可能得出不同的数字。

所以，问指数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从来没有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是从严格的意义上理解为表7.1和表7.2中的所有530个数字都完全符合实际，还是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所有专家都将同意这些数字。我计算的分数肯定是错误的，唯一有用的问题是它们错得有多厉害。它们是错到了连图2.5中描绘的历史基本轮廓都属误导，以致整个《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都有致命缺陷呢？还是误差实际上微不足道？

想确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办法是让其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

研究我在第三章到第六章中展示的证据，并检验我的论点。不过，在此，我至少能肯定地说出指数能容忍多大的分数错误，以及什么情况能促使我改变主张。如果我计算的分数基本上和其他分析家计算的数字相差在10%以内，那么我试图解释的模式的基本轮廓就仍然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我的数字基本上和其他人差15%，那么我也许要将发展曲线的形状改变得足以修正我的观点，这取决于细节。如果相差在20%以上，那么显然我的观点需要修正了。

表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年代	能量获取	社会组织	战争能力	信息技术	总分
公元前14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3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2000年	4.90	0.00	0.00	0.00	4.90
公元前11000年	5.45	0.00	0.00	0.00	5.45
公元前10000年	5.45	0.00	0.00	0.00	5.45
公元前9000年	5.99	0.00	0.00	0.00	5.99
公元前8000年	6.54	0.00	0.00	0.00	6.54
公元前7000年	7.08	0.01	0.00	0.00	7.09
公元前6000年	7.63	0.03	0.00	0.00	7.66
公元前5000年	8.72	0.04	0.00	0.00	8.76
公元前4000年	10.90	0.05	0.00	0.00	10.95
公元前3500年	11.99	0.09	0.00	0.00	12.98
公元前3000年	13.08	0.42	0.01	0.01	13.52
公元前2500年	15.26	0.47	0.01	0.01	16.29
公元前2250年	17.44	0.33	0.01	0.01	17.79
公元前2000年	18.52	0.56	0.01	0.02	19.11
公元前1750年	20.65	0.61	0.02	0.02	21.30
公元前1500年	22.34	0.70	0.03	0.02	23.09
公元前1400年	22.88	0.75	0.03	0.02	23.68
公元前1300年	23.43	0.75	0.03	0.02	24.23
公元前1200年	22.88	0.75	0.02	0.04	23.69
公元前1100年	22.34	0.47	0.03	0.01	22.85
公元前1000年	21.79	0.47	0.03	0.01	22.30
公元前900年	22.34	0.47	0.04	0.02	22.87
公元前800年	22.88	0.70	0.05	0.02	23.65
公元前700年	23.43	0.94	0.07	0.02	24.45
公元前600年	23.97	1.17	0.07	0.02	25.23
公元前500年	25.06	1.40	0.08	0.03	26.56
公元前400年	26.15	1.40	0.09	0.03	27.67
公元前300年	28.33	1.40	0.09	0.03	29.85
公元前200年	29.42	2.81	0.10	0.03	32.36
公元前100年	31.06	3.75	0.11	0.04	35.50
公元前/公元1年	33.78	9.36	0.12	0.04	43.30
公元100年	33.78	9.36	0.12	0.04	43.30
公元200年	32.69	9.36	0.11	0.04	42.20
公元300年	31.60	7.49	0.10	0.03	39.22
公元400年	31.60	7.49	0.09	0.03	38.67

公元500年	30.51	4.23	0.07	0.03	34.84
公元600年	28.33	1.41	0.04	0.02	29.80
公元700年	27.24	1.17	0.04	0.02	28.47
公元800年	27.24	1.64	0.04	0.02	28.94
公元900年	27.24	1.64	0.05	0.02	28.95
公元1000年	28.33	1.87	0.06	0.02	30.28
公元1100年	28.33	2.34	0.07	0.02	30.76
公元1200年	28.88	2.34	0.08	0.03	31.33
公元1300年	29.42	3.75	0.09	0.04	33.31
公元1400年	28.33	1.17	0.11	0.04	29.65
公元1500年	29.42	3.75	0.13	0.05	33.35
公元1600年	31.06	3.75	0.18	0.07	35.60
公元1700年	34.87	5.62	0.35	0.14	40.98
公元1800年	41.41	8.43	0.50	0.29	50.63
公元1900年	100.25	61.80	5.00	3.19	170.24
公元2000年	250.00	156.37	250.00	250.00	906.37

按照图7.1中以对数–线性标尺展示出的指数，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公元前14000年后领先于东方。东方慢慢追赶了上来，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的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但到公元541年时，东方首次升到了西方之上。东方的分数保持领先直到1773年。自冰期结束后92.5%的时间里，西方的发展水平均高于东方。

图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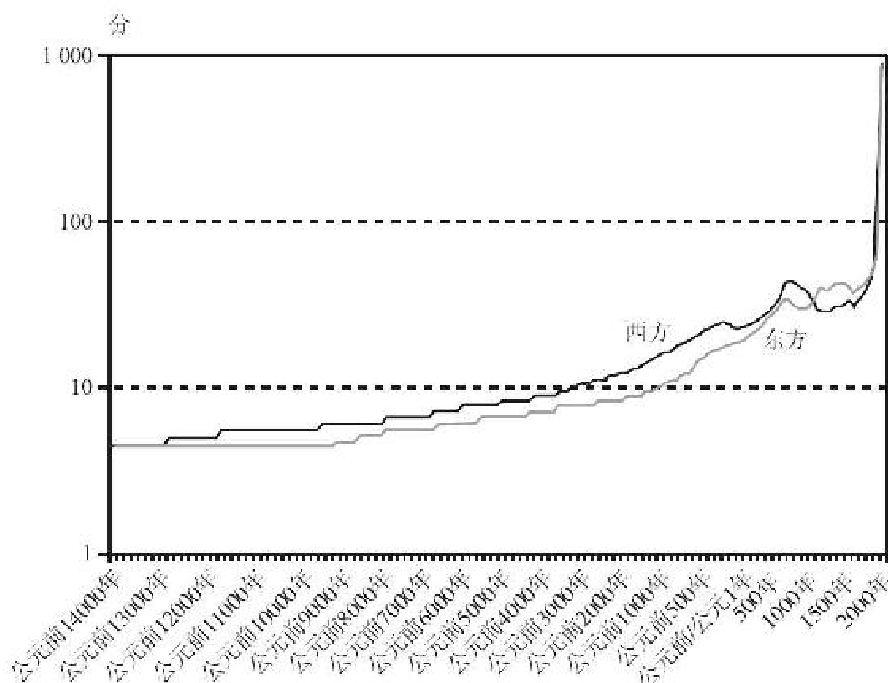


表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年代	能量获取	社会组织	战争能力	信息技术	总分
公元前14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3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2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1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10000年	4.36	0.00	0.00	0.00	4.36
公元前9000年	4.90	0.00	0.00	0.00	4.90
公元前8000年	5.45	0.00	0.00	0.00	5.45
公元前7000年	5.99	0.00	0.00	0.00	5.99
公元前6000年	6.54	0.00	0.00	0.00	6.54
公元前5000年	7.08	0.00	0.00	0.00	7.08
公元前4000年	7.63	0.00	0.00	0.00	7.63
公元前3500年	8.17	0.02	0.00	0.00	8.19
公元前3000年	8.72	0.05	0.00	0.00	8.77
公元前2500年	10.35	0.09	0.00	0.00	10.44
公元前2250年	11.44	0.13	0.00	0.00	11.57
公元前2000年	11.99	0.10	0.00	0.00	12.09
公元前1750年	14.17	0.22	0.00	0.00	14.39
公元前1500年	16.35	0.33	0.01	0.00	16.69
公元前1400年	16.89	0.33	0.01	0.00	17.23
公元前1300年	17.44	0.33	0.01	0.01	17.79
公元前1200年	17.44	0.47	0.02	0.01	17.94
公元前1100年	17.98	0.47	0.02	0.01	18.48
公元前1000年	18.52	0.33	0.03	0.01	18.89
公元前900年	19.07	0.37	0.03	0.01	19.48
公元前800年	19.61	0.42	0.02	0.01	20.06
公元前700年	20.16	0.51	0.02	0.01	20.70
公元前600年	21.79	0.61	0.03	0.02	22.45
公元前500年	22.88	0.75	0.04	0.02	23.69
公元前400年	23.97	0.94	0.05	0.02	24.98
公元前300年	24.52	1.17	0.06	0.02	26.87
公元前200年	26.15	2.81	0.07	0.02	29.05
公元前100年	27.79	3.45	0.08	0.02	31.64
公元前/公元1年	29.42	4.68	0.08	0.02	34.20
公元100年	29.42	3.93	0.08	0.02	33.44
公元200年	28.33	1.12	0.07	0.02	29.54
公元300年	28.33	1.31	0.07	0.02	29.73
公元400年	28.33	1.87	0.07	0.02	29.99
公元500年	28.33	1.87	0.08	0.02	30.30
公元600年	29.42	5.63	0.09	0.02	35.16
公元700年	29 .42	9.36	0.11	0.02	38.91
公元800年	30.51	9.36	0.07	0.02	39.96
公元900年	31.06	7.00	0.07	0.02	38.69
公元1000年	32.15	9.36	0.08	0.02	41.61
公元1100年	32.69	9.36	0.09	0.02	42.17
公元1200年	33.23	9.36	0.09	0.03	42.71
公元1300年	32.69	7.50	0.11	0.04	40.34
公元1400年	31.06	4.68	0.12	0.05	35.91
公元1500年	32.69	6.35	0.10	0.06	39.20
公元1600年	33.78	6.55	0.12	0.07	40.52
公元1700年	35.96	6.09	0.15	0.09	45.29
公元1800年	39.23	10.30	0.12	0.13	49.78

公元1900年	53.40	16.39	1.00	0.30	71.09
公元2000年	113.33	250.00	12.50	189.00	564.83

图7.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假如我将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10%，而将东方的发展分数高估了10%，那么东方和西方正确的走势将是怎样的（即在图中将我计算的所有西方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图7.3则展示了假如我犯了相反的错误，将东方发展分数低估了10%而将西方发展分数高估了10%，将会是怎样的。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图7.2和图7.3的可信度扭曲了多少。图7.2分别将西方和东方的分数提高和降低了10%，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在公元1400年，当郑和正准备扬帆印度洋时，西方比东方要发达；这也意味着当公元前218年，汉尼拔驱赶着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水平已经比东方的郑和时代要高了。好像这些结论还不够荒唐似的，该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时，西方已经比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通商请求时的中国要发达了。所有这些结论没有一个能与众多历史证据相符。

图**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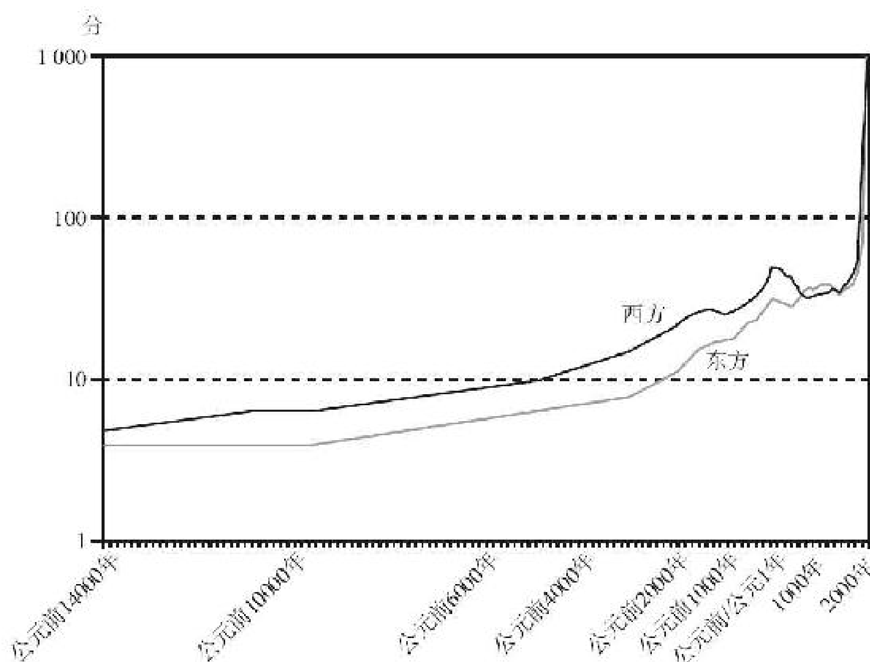


图**7.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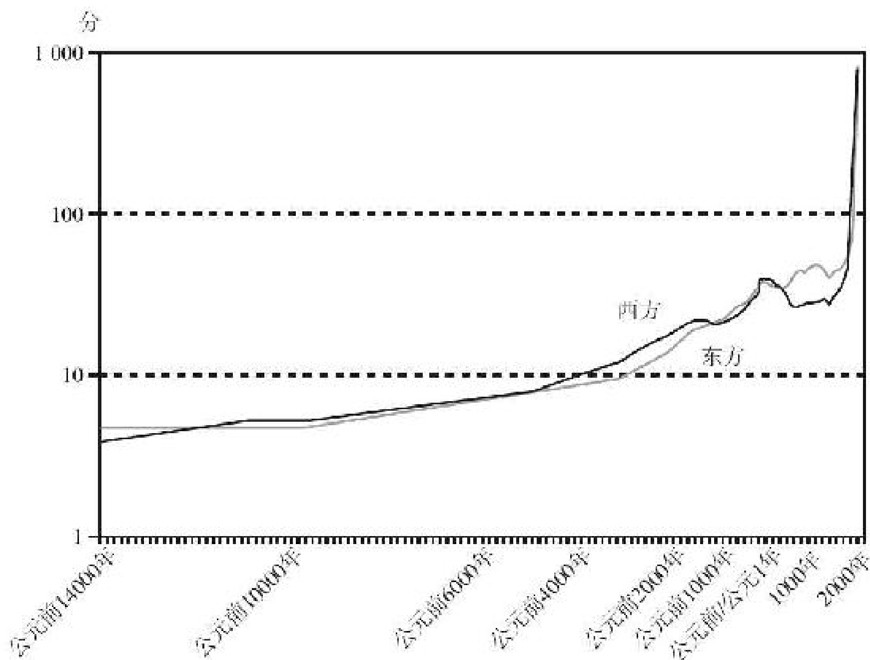


图7.3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1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10%，甚至更为荒唐。例如，700年时，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一个从今葡萄牙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大帝国，该图给当时西方打的发展分数却比孔子时代的东方还要低，这恐怕根本不可能；1800年，工业革命已经展开，英法两大帝国攫取了全球大片土地，然而该图给西方打的分数，却比东方在1000～1200年的宋朝时期还要低，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即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忍受这样奇怪的结论，图7.2和图7.3所描绘的历史的形状与图7.1所描绘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要改变基本模式的地步。短期偶然论仍然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3中，西方的分数在冰期结束后的大多数时期仍然高于东方（只不过这个“大多数”意味的是56%的时间，而不是92.5%）。长期注定论也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2中，东方也领先了7个世纪。我计算的分数所产生的模式——西方在过去15 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但中间插入了一个1 200年的“东方时代”——仍然是不变的。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估计必须是在误差达到了20%以上的情况下。图7.4展示了假如我对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20%，而对东方的分数高估了20%，那么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图7.5则展示了假如我将东方的发展分数低估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高估了20%的结果。

这回模式大不相同了。在图7.4中，西方的分数总是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论貌似非常合理，也否定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通篇的主张：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图7.5则相反，实际上颠倒了我

的实际指数得出的结论，使东方在冰期以后90%的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7.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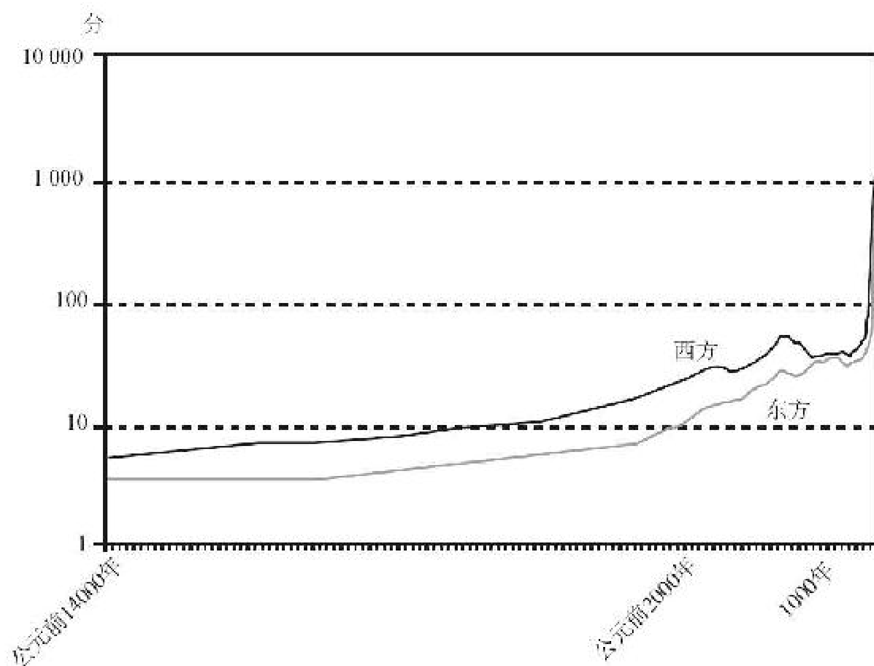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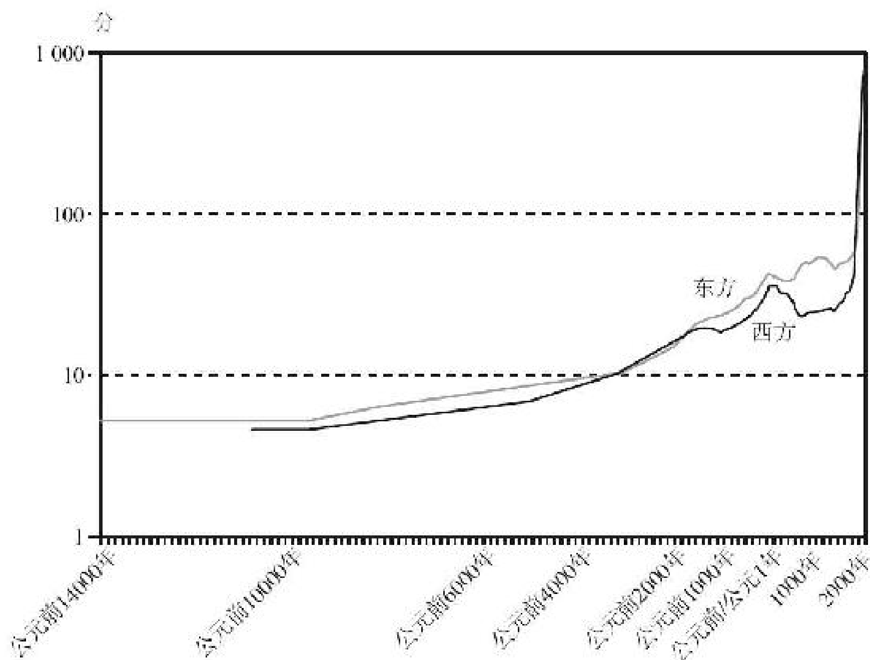


图7.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20%）



假如图7.4或图7.5是正确的，那么《西方将主宰多久》中的一切就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两张图都是错误的。图7.4将西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东方的分数降低了20%，告诉我们公元前/公元1年时罗马帝国的发展分数只比1900年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低5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图7.5则相反，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20%，意味着东方的发展在商朝之前的时代就比西方在波斯帝国时期快；而西方是直到1828年，鸦片战争前夕时才赶上东方的；并且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实际上是在2003年）。所有这些看来都是不可信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1）我估计的误差恐怕不会超过10%，并且肯定不会超过20%；（2）即使误差超过了10%，我试图解释的基本历史模式也仍然是有效的。

指数的直观显示

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是一回事，展示结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可以想象的展现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突出信息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因此，对指数本身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对其所做的解释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或许是我选择的视觉展示方式模糊了其他同样适当的对记录的解释。

感谢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艾萨克·奥珀（Isaac Opper），有一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计算分数时，给每个特性打的最高分值为250分（均为公元2000年），分数除以250，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表现可以得到1分，然后我又设定指数上值得记录的最低分值为0.01分。其结果是3项特性的分数一路跌到了0分，分别是社会组织（西方于公元前8000年，东方于公元前4000年）、战争能力（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750年）、信息技术（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400年），但能量获取没有。这是因为人们如果不能获取到最低量的能量，即每天4 000卡（得4.36分），他们就无法生存。

结果，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分数都在社会发展总分中占到了90%以上，直到公元前100年（见表7.3）；甚至自那以后又过了2 000年，直到20世纪，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全都有了爆炸式增长以后，能量获取在总分中仍然占到75%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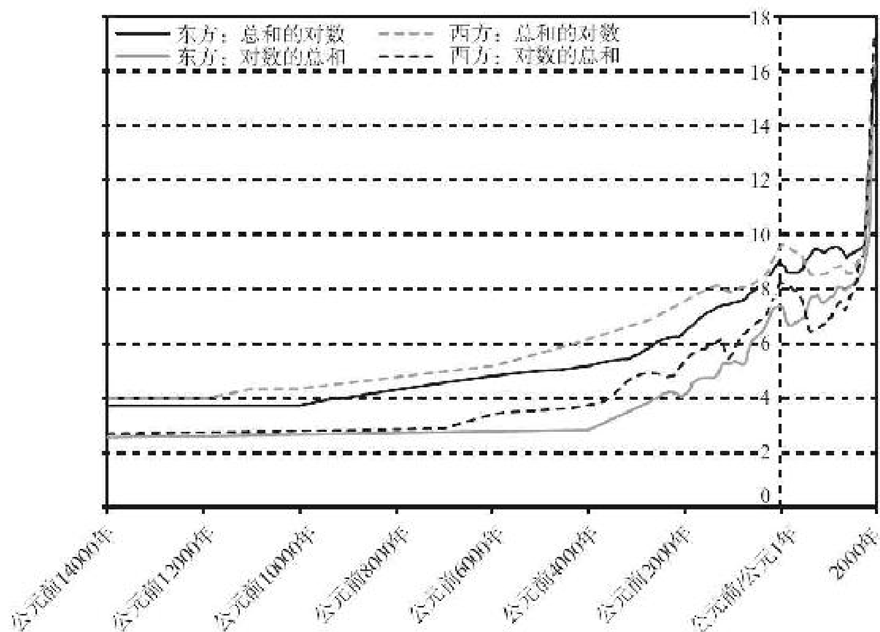
表7.3 社会发展总分中能量获取所占百分比

年代	西方（%）	东方（%）	年代	西方（%）	东方（%）
公元前14000～前4000年	100*	100	公元前100年	87	87
公元前/公元1年	78	86			
公元前3500年	92	100*	公元100年	78	88
公元前3000年	97	99	公元200年	78	96
公元前2500年	94	99	公元300年	81	95
公元前2250年	98	99	公元400年	80	94
公元前2000年	97	99	公元500年	88	93
公元前1750年	97	98	公元600年	95	84
公元前1500年	97	98	公元700年	96	76
公元前1400年	97	98	公元800年	94	76
公元前1300年	97	98	公元900年	94	80
公元前1200年	97	97	公元1000年	94	77
公元前1100年	98	97	公元1100年	92	78
公元前1000年	98	98	公元1200年	92	78
公元前900年	98	98	公元1300年	88	81
公元前800年	97	98	公元1400年	96	86
公元前700年	96	97	公元1500年	88	83
公元前600年	95	97	公元1600年	87	83
公元前500年	94	97	公元1700年	85	79
公元前400年	95	96	公元1800年	82	79
公元前300年	95	91	公元1900年	59	75
公元前200年	91	90	公元2000年	28	20

*社会组织的分数，在西方是从公元前8000年，在东方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记录的，但直到公元前3500年的西方，公元前3000年的东方时，它们的分值仍然太小，在社会发展总分中的贡献不到0.5%，意味着它们作为舍入误差消失了。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了能量获取分数是怎样淹没了其他3个特性的，但随意地为其他3个特性加权或提高分数，制造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艾萨克·奥珀指出，有更容易的办法让另3个特性更清楚明确。

图7.6 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的社会发展分数



*上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总和的对数（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对数的总和（先计算4个特性的分数的对数，然后再将4个对数相加）。对数的总和虽然直观上不够明显，但对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在前现代时期的小变化更为敏感。
资料来源：艾萨克·奥珀绘制

展现前现代时期社会发展分数的变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对数-线性图上标绘数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某些点上这样做了，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其总和的对数。这有其用处，但如果我们分别计算4个特性的对数，再把对数相加，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我们就能绘出一幅不再由能量获取的高分数主宰的图了。图7.6中上方的两条线分别展示了西方和东方特性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则分别展示了特性对数的总和。可以看到，将特性的对数相加后产生的曲线，对于20世纪前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哪怕极小的变化都更加敏感。

公元前2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埃及旧王国和阿卡德王国的崩溃，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方的陶寺的毁灭，以及公元前771年中国西周王朝的灭亡——当以其他形式绘图时，都被能量获取分数的持续性淹没了——现在却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曾被众多的学者极度轻视的西方后罗马时代的瓦解，现在也凸显了。

图7.6　中下方的线也改变了图中左手侧斜线的形状。该图不再单纯由能量获取水平（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驱动，其对于其他特性更强的敏感性，已将西方领先于东方的时间从约公元前12500年（冰期结束时）推迟到约公元前7000年，最早的人口超过千人的定居点（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等）出现时。现在看来，西方发展的速度在公元前

3500年左右最早的国家出现时加快了，然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再次加快，当时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框架之下，标志着又跨越了一个门槛。不过，在这两个时间之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现在以趋势线上突然中断的形式清晰地凸显出来，两次中断后又都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东方古代时期的曲线的变化也很有趣。这回农业的出现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发展速度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西坡成长为约1　000人的定居点后，才真正加快的。东方的曲线此后平稳上升（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800年中断，但都比西方大约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要平和得多），直到大约公元前600年，发展再次提速，直到大约公元100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应当能表明，东方曲线相对于西方的平稳性，是代表着历史的真实，还是只因为我们对西方考古和古代历史知识了解得更详细。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而不是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对公元1年后2　000年间的曲线形状影响较小，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已经足够高，无论用哪种办法都可以显示了。然而，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的确突出了偏离总体趋势线的程度。

我写《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并没有停滞这个观点。图7.6中下方东方的曲线使这一点甚至更加清楚，公元1400～1800年的分数紧紧追随着汉朝之后更长期的趋势。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也有助于使西方在公元1400～1800年的爆炸式发展显示得更为清楚，强调了现代西方的主宰并不是以“东方的衰落”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1400～1800年间表现得不错，但西方社会表现得更好。前现代时期全球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驱动，像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的地中海化对罗马社会发展的驱动一样有利。

图7.6中下方西方的线突出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论述的两个论点。第一个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的确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有共同之处，而且17～18世纪欧洲人在其社会发展方面重新获得了将近2　000年前的水平时，谈论一场“古代和现代的战争”，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个是尽管早期现代的欧洲成绩不俗，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800年之后，是随着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发并利用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而发生的。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更灵敏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然而能量获取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础。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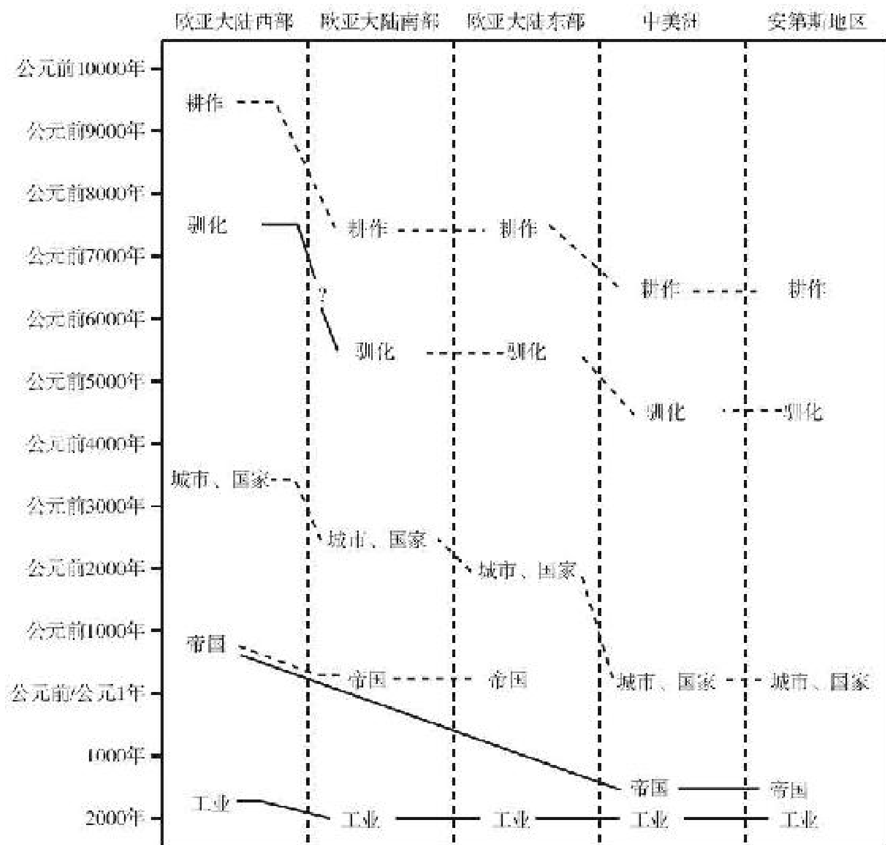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6 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公元1500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图7.7是一幅简图，展现了古代复杂社会的5个地区主要的文化转型，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旧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农业核心地带，遵循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历经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图7.7 世界5个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实线代表变革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扩散；虚线则非）



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 0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

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 500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0 000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万~20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 000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

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毫无疑问，直线发展的进化与多线发展的进化之间的争执，是文化进化论方面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罗伯特·卡内罗在结束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总结道。

不过，像许多这样的问题一样，烦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以及对适度水平的抽象的隐含假设。在一些学者看来，问社会发展是否是直线发展的，似乎意味着问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而且，相应的还要问现代化是否不止一种）；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似乎意味着问更普遍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相应的，问是否有多重道路，以致谈及发展就是个错误）。

社会发展指数认为，对第一种问题——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数显示的不仅是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工厂工人并继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进步，也表明了在每种广义的组织下的发展所能达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样的上限。在指数上，任何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可能发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农业帝国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跨越农业帝国阶段而直接实现工业化——除非受到另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些阶段的社会的影响；没有任何社会能从草原游牧阶段直接进入工业社会，除非先被一个农业帝国征服。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无休无止地争论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他们通常视为“现代”的社会，都经历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两条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化都包含能量获取激增的意

味。这种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其后果又是将能量应用于重新划分的各行各业。关于现代化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概括这些社会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如果我们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直线发展与多线发展之争问题——社会是否能向多个方向发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时序观点，以及我们将调查的终点设在哪里。如果我们从观察1 000年前的世界开始，我们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社会非常显然是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从卡拉哈里沙漠的猎手到突厥游牧者，从密西西比河畔的农夫到中国宋朝。

然而，在支持多线进化的论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释这种多样性时，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个给定的生物群落区内，众多社会倾向于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发展。农业是在幸运纬度带内生根的，也是从那里向外推广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徒步、乘车和骑马的发展阶段。狩猎和采集则主宰着不支持农业或畜牧业的环境。

又一次，我们的工作所停留的抽象层次也决定着我们能看见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尔特克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大相径庭，学者们完全可以随意选择强调这些差异而忽视其共性。然而，社会发展指数迫使我们认识到，生物群落区内的共性是真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21世纪的世界，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否”：社会并不是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内，地理推动着发展沿不同道路前进，但是随着世界上的幸运纬度带内社会发展的增长，最发达的社会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公元200年时，欧亚大陆上农业帝国的商人们将商品从旧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时，我们已掌握有个人来往于欧洲到中国全程的确凿证据；到公元1400年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已经有了能够可靠地渡过任何海洋的船只；而到公元1900年时，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几乎将整个世界聚合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全球化历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一旦有一个社会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门槛，整个世界迅速变成现代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

被拽上这条道路。

社会进化的方向

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

在进化论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正确框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像古尔德一样看到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情使得过去15 000年不断上升的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数上的数字开始攀升，是因为公元前1270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升的发展成为一种成功的适应。改变了环境背景，你也就改变了适应景观；在一种环境下兴盛，比如发展水平高的群体，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就不一定兴盛了。

这种观点的隐含之意，似乎是社会进化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无论其在了解历史方面的描述性价值如何，都没有预测能力。但这样看也许会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生命历史上其实有非常明显、非常强大的模式，很多生物学家都曾得出结论：动物进化到像人类一样聪明——也许像人类一样看待事物——是完全可能的，以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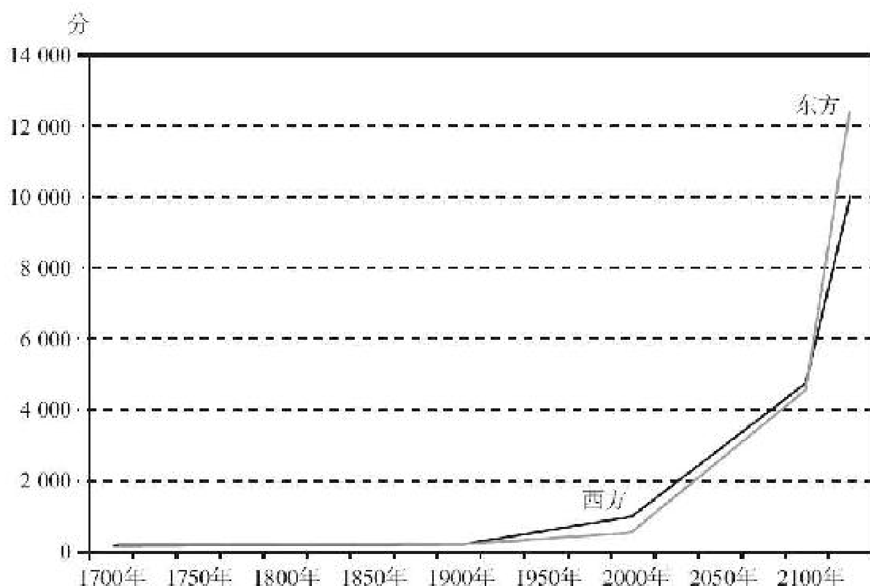
古尔德本人愿意承认，尽管他看到了生命彩票本质的随意性，但贯穿生命历史，有一种"复杂性的右倾"一直在非常稳定地运行着。社会历史尽管时常被像物种历史所受到的同样众多的冲击所打断，然而在过去15 000年中，也仍然能看到同样稳定的"右倾趋势"。整个历史明显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预期社会发展分数会不断地增加。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事实的确如此，并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社会发展指数在整个21世纪及以后的趋势，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看法的。我的预测非常粗糙，只是推断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在21世纪将以与20世纪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假如情况的确如此，东方的分数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届时两个地区在指数上都将达到大约5 000分（见图7.8）。

这个论点比本书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吸引了更广泛的关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会遵循这样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直线性预测，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预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所有预测都不能实现），更多的是在于迫使我们提问，我们需要将设想改变多少，才能产生彻底不同的结果。

预测20世纪指数趋势线到21世纪的走向时，会认为过去50年“东方的崛起”并非西方主宰的暂时中断。这是中期历史趋势的结果，是由可回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地理意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实际上变小了）驱动的。西方国家政府也许能操纵财富和实力向东方的转移，最老练的西方政策预言家们关注的恰恰是这一点。然而，阻止或逆转东方的崛起，要求有至今尚未确定的会使地理再度强烈改变其意味的发展，并且这些发展是有利于西方复兴的优势的。

图7.8 未来的趋势？对21世纪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分数的预测



不过，预测20世纪趋势线的进一步走向的最意味深长的含义，是社会发展在下一个百年将达到5 000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发展提高了900分。这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发展到互联网而获得的。不过，按照图7.8的设想，2000～2100年发展还将再提高4　000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分数可能被低估了。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发展是以指数方式增长的，而不仅是像20世纪末时那样的线性延伸。

又一次，重要的问题不是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的具体预测能否实现，而是需要发生什么情况，才能使现实远离我的预测所依托的设想，使社会发展分数在2100年时远远达不到5　000分。从过

去15 000年的社会发展曲线来判断，最有可能的答案似乎是发生一场新的社会崩溃。

5 000分的设想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限制，但对冰期后的历史显然也有另一种解释：工业化只是将这些限制向外推了推。它推动力度的确很大，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也使数十亿人脱了贫；但对指数的这种解读仍然要提出，工业社会也将面对内在的“硬天花板”，就像曾限制了农业社会发展的“硬天花板”。

罗马帝国和宋朝等农业帝国在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40分以后，便开始动摇和衰退，现代社会在1 000～5 000分的某处，也许也会遇到新的“硬天花板”。假如一个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发展停滞了，或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气候变化，或者发生了核扩散，再或者出现了机器人战争、电子战争和纳米战争等分布不平衡的发展，其后果会比农业时代的发展停滞还要恐怖。

指数暗示接下来的50年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一方面，假如19世纪和20世纪能量增长带来的好运只是一锤子买卖，那么21世纪就将注定成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方面，假如工业革命被证明只是一个更长时期的能量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当前这个世纪将肯定会使人类变得面目全非。到21世纪60年代时，也许我们将看清世界走向什么道路。

社会发展指数当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它可能是确定其中一些问题的宝贵工具。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开头推断：“假如有更高级的生物从太空造访地球，为了估量我们的文明水平，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们发现进化论了没有？’”假如这样的事情当真发生了，我想他们问的既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社会进化。

致谢

《文明的度量》与我此前所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姊妹篇，但是一本截然不同的书。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试图讲述最近15 000年来社会发展的故事；而在本书中，我想介绍我在建构那些故事背后的社会发展指数时所使用的论据和论证方法。

和许多书一样，本书也是持续多年的讨论的产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有人向我介绍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自那以后，我就不时思考并与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的人情，特别想感谢以下各位：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弗兰切斯卡·约翰·谢里（Francesca John Cherry）、埃里克·齐恩斯基（Eric Chinski）、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斯特凡·德·施皮格利埃（Stephan de Spiegeliere）、贾雷德·戴蒙德、阿尔·迪安、汤姆·加伦特（Tom Gallant）、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班宁·加特（Banning Garret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约翰·霍尔顿、保罗·霍尔斯特德（Paul Halstead）、伊恩·霍德（Ian Hodder）、徐心眉（Agnes Hsu）、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卡拉·克尔凯郭尔（Karla Kierkegaard）、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迈克尔·莱西希（Michael Lässig）、鲁威仪、安东尼·林（Anthony Ling）、刘莉、安格斯·麦迪森、阿莱西奥·马格纳瓦卡（Alessio Magnavacca）、保罗·马拉尼马、乔·曼宁（Joe Manning）、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汤姆·麦克莱伦（Tom McLellan）、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雷维尔·内茨（Reviel Netz）、道格·诺思（Doug North）、乔希·奥伯（Josh Ober）、艾萨克·奥珀、安妮·波特（Anne Porter）、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库马尔·罗摩克里希纳（Kumar Ramakrishna）、安娜·拉泽托（Anna Razeto）、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格伦·施瓦茨（Glenn Schwartz）、雨果·斯科特 - 加尔（Hugo Scott-Gall）、史蒂夫·香农（Steve Shennan）、丹·斯梅尔（Dan Smail）、瓦茨拉夫·斯米尔、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彼得·特明（Peter Temin）、尼克·托马斯（Nick Thomas）、彼得·图尔钦、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托德·怀特洛（Todd Whitelaw）、詹姆斯·惠特利（James Whitley）、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和诺姆·约菲（Norm Yoffee）。他们都曾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希望他们能同意我很

好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如果没有下面这些人，我也根本完不成这本书。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的鼓励；感谢Profile Books图书公司的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是他看出原本只被我视作一个数据库的东西可以扩展为一本书；感谢桑迪·戴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和阿拉贝拉·斯坦（Arabella Stein）的指教，是他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感谢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我父亲诺埃尔·莫里斯（Noel Morris）给我树立的榜样和早年对我的教育，事实证明，他教我的数学派上了用场。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梦游者

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

董莹 肖潇◎译

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倾力之作

坎迪尔历史奖、《纽约时报》2013年十大好书、《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游者 /（英）克拉克著；董莹，肖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 The Sleepwalkers
ISBN 978–7–5086–4699–2
I. 梦…　II. ①克…　②董… ③肖… III.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史料　IV. 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5959号
The Sleepwalkers by Christopher Clark
Copyright © 2012 by Christopher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限量尊享，不得销售

梦游者
著者：[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者：董莹 肖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梦游者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董莹 肖潇 译

中信出版社

“一战”其实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莽撞自负、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去向的“梦游者”。

献给约瑟夫和亚历山大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通往萨拉热窝事件之路

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第二章 无个性的帝国

第二部分 欧洲的分裂

第三章 由多极到两极：欧洲在1887～1907年

第四章 欧洲外交政策的多种声音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第六章 最后的机会：1912～1914年的缓和与危险

第三部分 危机

第七章 萨拉热窝谋杀案

第八章 扩张的旋涡

第九章 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第十章 最后的通牒

第十一章 枪声响起

第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结语



N
挪威
瑞典
芬兰
丹麦
北海
爱尔兰
泰晤士河
大西洋
荷兰
比利时
巴黎
法国
德国
柏林
瑞士
爱沙尼亚
立陶宛
白俄罗斯
华沙
波兰
俄国
莫斯科
基辅
奥匈帝国
乌克兰
敖德萨
塞巴斯托波尔
黑海
罗马尼亚
波斯尼亚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黑山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奥斯曼帝国
葡萄牙
西班牙
马德里
罗马
地中海
西属摩洛哥
法属摩洛哥
法属阿尔及利亚
法属突尼斯
意属利比亚
1914 年的欧



前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清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出现在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大陆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这个多事之夏爆发的冲突导致欧洲成为6 500万兵力厮杀的战场，三大帝国卷入其中，造成2 000万士兵和平民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场浩劫宣告了降临在20世纪欧洲的恐怖的开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说，它是“20世纪所有灾难的开始，此后各种灾难便接踵而至了”。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对战争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未有定论。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数量空前、内容翔实、流露出强烈道德情感的历史文学作品。此外，1914年发生的事情仍是那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政治危机，由于它们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的假设和猜想都能够自圆其说。

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总会碰到一些问题。首当其冲且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资料的过剩。每个交战国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搜集的档案资料也数量庞大，而其中有些文件是否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还有待商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布的官方文件大都带有致歉并反思的意味。长达57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Die Grosse Politik*）将15 889份文件归纳在300个主题下，但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人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曝光战前的档案来反驳《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战争罪名”。法国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长让·路易·巴尔都（Jean Louis Barthou）于1934年5月指出，战后出版的文献“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于“根据《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中维持秩序”。1926年出版的8卷合集《奥匈帝国外交政策》（*Ö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的其中一位编者路德维希·比特纳（Ludwig Bittner）在维也纳指出，他们之所以出版该合集，是未雨绸缪，及时出版官方资料，防止某些国际机构（很有可能是指国际联盟）迫使奥地利政府在情况并不乐观时出版。抱着将法国要求赔付战前贷款这一事实合法化的希望，苏联早期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证明：是独裁的沙皇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在英国，人们高调呼吁学术公

正，《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应运而生。尽管如此，之后的文件记录仍有偏颇和疏忽，这也使得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并不中肯。总而言之，尽管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但正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韦特费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其1929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欧洲的文件记录俨然在为“历史文件领域的世界大战”提供军火。

对于那些致力于洞悉通往战争之路的人来说，尽管政客、指挥官以及其他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它们同样疑点重重。对于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很多文件却保持出奇的缄默。在此举三个例子：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于1919年出版了《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实质上对他自己及其同僚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的行动只字未提；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在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丝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10卷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执政时期，但它的宣传作用却超过了其启发性——普恩加莱关于危机时期的“回忆”与他当时匆匆记下的日记（这些日记并未出版）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言辞温和的回忆录也只是隔靴搔痒地解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在1914年8月之前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在他处理危机时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历史学家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造访欧洲，并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事的政治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的作为从未感到怀疑（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格雷，他“直率地承认”，在“七月危机”发生时，在通过柏林与维也纳协商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但他提到的这个错误并不重要，同时这种口吻也折射出一种英国特有的自我贬低的官方话语方式，因此这并不是对其应负责任的认真反省）。其他人的回忆同样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踪访问了俄国前财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1914年，巴克参与了一系列会谈，会议上做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然而当施米特与他对话时，巴克却坚持说他“不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幸运的是，这位前大臣当时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信息。1937年秋，一位名叫卢西亚诺·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对每一位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系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他发现，有些人为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作证，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对他们所知的事情给出错误的解释”，还有一些人“夸大事实或是一味专注于自我辩解”。

此外，我们现有的了解仍旧匮乏。许多与关键人物的交流只是口头进行的，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它们都是通过间接的或者后来的证据来重现历史的。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塞尔维亚的组织异常警惕，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涉嫌参与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键人物——塞尔维

亚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定期焚毁他的文件。很多人对维也纳和柏林在最早关于如何应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讨论的确切内容一无所知。记录6月20～2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法首脑会议的文献对理解危机的最后阶段具有潜在的巨大重要性，然而它们却无迹可寻［俄国的会议记录可能早已丢失，而委托编辑《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团队也没能找到法方的版本］。苏联曾经的确出版过许多关键的外交文件，以此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但这些文件对时间段的划分并不规范，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编纂；此外它们还普遍存在片面聚焦某些事件的问题，比如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有些文件（其数量不明）在内战时期混乱的运输过程中丢失，苏联也从未有系统编纂成卷的可与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原版相匹敌的文档记录。时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记录仍然处于未“竣工”的状态。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战”危机内幕的繁杂精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已经足够复杂了，但它所涉及的仅有两大阵营而已（美国和苏联），无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随者”。与此相反，要研究“一战”的起因，必须要弄清楚实力居于同等地位、相互独立的5大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它们是德国、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英国，如果我们加上意大利的话，这一数字就变成了6个；此外，其他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且拥有独立主权的方面同样可以考虑在列，如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诸国——后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内政治局面高度紧张且动荡不安。

参与战争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并不透明，这是研究“一战”起源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1914年的“七月危机”表现出“国际化”特征，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联系紧密，又是独立而离散的单一实体——就像台球桌上的台球。但是危机期间负责政策制定的权力机构却并不统一。在多个执行单位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究竟谁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谓“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响政策走向的不同的主观意愿）并非必然出自国家的高层系统，它们或许出自外交组织的外围机构、军事指挥官、部门的官员，抑或来自职权范围常常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们。

由此看来，现存的资料中，关于承诺、威胁、计划和预言的内容相互交错，毫无头绪，如此具有迷惑性的卷帙浩繁的解读使得战争爆发的原因变得捉摸不定。实际上，任何观点都能够在现有的资料中找到证据支持。正是因为关于“一战”起源的解读囊括了太多的维度，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一位能够驾驭多国语言的出色学者）历尽一生都无法阅尽它们——根据20年前的统计，当时就已经有2.5万份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了。其中一些将战争责任归罪于某个充当“害群之马”的国家（公认的是德国，但实际上其他国家都难辞其咎），另一些将原因聚焦于“体制”的缺陷。总之，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终止人们的讨论。历史学家试图解开战争罪责或是独立机构和体制约束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辩论又延伸到对国际关系全局把握的宏观视野上，其中包括关系中的威慑、缓

和与疏忽，或是诸如平衡多方、协商和顺应时局的普适机制。尽管这些辩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能找到突破口。

尽管人们对这些辩论已不陌生，但这一主题却历久弥新。实际上，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它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时代和世界的改变让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1914年。20世纪60～80年代，人们越发普遍认为1914年爆发的战事散发着神奇的魅力，并很容易将欧洲“最后的夏天”那场灾难想象成爱德华时期的一场古装剧。在现代人的头脑中，那个仍然以世袭皇权为统治的世界，那个追求奢华的年代中苍白的礼节和华而不实的服饰已经离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来自另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些设想在潜意识中坚信，如果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着俗丽的鸵鸟毛，那么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的。

然而对于一位了解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始末、身处21世纪的读者来说，他会对危机中展现出的原始的现代性感到震惊。事件以车队和自杀式袭击开场。在萨拉热窝事件背后，分明是一个崇尚献身、死亡和复仇的恐怖组织，但是这一恐怖组织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没有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归属，它只是分散在政治边界的小股势力，人们无法对其做出界定，因为它只是间接与其他政权相联系，想要从组织外围觉察出其隐秘的存在是相当困难的。诚然，人们还是完全有理由认为1914年7月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它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两极化的体系日益明显，各种力量前途未卜，帝国走向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1914年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重新反思战争是如何在1914年降临到欧洲的。接受这项挑战并不意味着对流于俗套的现代主义的默许（这种现代主义将历史的解读建立在满足现代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利用现代的优势去认可过去以及历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战争的开端，即巴尔干地区的背景。塞尔维亚是关于“七月危机”的史籍中的盲点之一。很多人将萨拉热窝事件仅仅当作一个托词，与最终发起战争的真正列强相比，它实际上无足轻重。近期对于1914年战争爆发的一个精彩的解释提到：“（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让这些国家走向战争的是人们对这次事件的利用。”“七月危机”中，从宏观的巴尔干地区的维度来看，对塞尔维亚的边缘化引燃了事件，成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导火线，并一发不可收拾，进入地缘政治阶段；随着事态的发展，塞尔维亚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淡化。

其次，我们的道德罗盘同样发生了偏转。以战胜国姿态出现的塞尔维亚族居于主体的南斯拉夫，似乎隐晦地为1914年6月28日那位打响第一枪的人做出了合理辩解——这是南斯拉夫当局的观点。为了纪念“象征迈向南斯拉夫之自由的第一步”的刺杀事件，在事发地点，他们用铜质记号和徽章作为标记。在那个国家概念方兴未艾而颇受欢迎的时代，人们普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抱有感性的怜悯，而对多元化联邦形态的哈布斯堡帝国却表现出刻板的冷淡。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杀伤力。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和塞尔维亚人包围萨拉热窝引爆战争的事实，很难让人将塞尔维亚想象成受大型政治集团摆布的棋子或受害者，从而证实了这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自身就是一股历史的推动力。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对于业已消失的混合帝国——哈布斯堡帝国，我们现在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或至少不再那么蔑视它。

最后，如今以下这种观点或许越发得不到支持——我们应当对萨拉热窝事件更宽容，它只不过是并不具有真实因果重要性的小事故而已。2001年的“9·11”事件就很好地印证了单一的、象征性的事件（不管它陷入历史洪流的程度有多深），确实能以该种方式不可逆转地改变时局，它能以始料不及的紧迫感摒弃旧的观点，催生新的观点。将萨拉热窝以及巴尔干地区重置于事件的中心并不是要将塞尔维亚人及其政治家妖魔化，也不是让我们摆脱解读其他力量的责任，只是在各种力量之中，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官员及激进主义分子的行为和决定奠定了萨拉热窝事件的结果。

因此，本书致力于以现代视角来解读1914年的“七月危机”——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现代事件。重点不在于战争为何爆发，而是其以何种方式呈现。在逻辑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战争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按照一定顺序深入研究产生既定结果的列强之间的互动。与此相反，“战争为何爆发”这一问题则需要研究那些细微而绝对的原因：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财政问题、对待国家荣誉的看法以及动员机制。尽管后者能够通过分析具备一定的明确性，但其中仍有曲解之处，因为人们会产生一种基于逐渐建立的因果思维的假象；各种因素相互推挤，重重地压在事实上；政客们成为某种力量的执行者——这种推动力早已成形并超出了人们的可控范围。

与此相反，本书的内容更关注各种机构。关键的决策者（国王、外交官、大使、军事指挥官以及众低等官员）以小心翼翼、精明算计的步履逐渐逼近危险。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决策不断积累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正是政治家有意而为的。在掌握了最佳信息之后，他们通过自我思考和反省，明确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继而形成最佳的判断决策。诚然，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以及财政问题的确是事件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只有被嵌入促使战争爆发的决策中，才具有实际的解释价值。

保加利亚一位研究巴尔干战争的历史学家最近发现：“只要我们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便不自主地聚焦到罪责的问题上。”在战争打响之前，关于战争爆发的罪行和责任的问题就已然出现了。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充斥着对罪行的归咎和谴责（侵略性的意图在这里总是被理解为敌意的，而抵御性的意图才是合理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奠定了“战争罪”问题持久而突出的显赫地位。相反，对战争“如何发生”的探讨却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纵观事件始末，并非旨在完成一个针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档案记录，而是为了定义引爆战争的决策，理解其背后的

理性及情感支撑。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开责任的问题，相反，它是在对“如何发生”的理解的基础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因此，本书重在讨论战争是如何在欧洲大陆点燃的。通过多角度的叙述来追踪、还原这条战争之路，包括对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决策中心的分析，此外还简单地囊括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和索非亚。本书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关注两大死对头——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它们之间的争端是战争的导火线，因此我们需要追溯二者直至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互动和交往。第二部分仍以叙事的手法，回答以下4个问题：欧洲的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相互对立的联盟阵营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处于欧洲权力和财富中心外围的巴尔干地区是如何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危机爆发源头的，以及表面上做出绥靖姿态的国际体系最终如何倒向了战争。第三部分聚焦萨拉热窝事件和“七月危机”，探究主要决策中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将危机不断向前推动的考量、误解以及决策。

因此，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只有准确追踪和阐明关键决策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观点的，1914年7月所发生的事情才有意义。要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仅需要简单地回顾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危机”，还需要了解它们的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人们的观点、激励人们的行动的。那些将欧洲送上战争之路的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人们可以从许多资料中体会出当事人的恐惧和对灾难的预测，但这些情感又是如何在同样的人身上与傲慢、狂妄相互交织的？战前，为何那些看似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会如此举足轻重——正如“阿尔巴尼亚问题”和“保加利亚借贷问题”，它们与大国列强又有何干系？当决策者们谈及国际环境以及外部威胁时，他们是否洞见了真相，还是为了向其对手展现自己的忧惧和愿景，还是两者兼有？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生动地还原战前以及战时关键当事人所经历的高度动态化的“决策环境”。

大部分最近出版的关于战争的有趣作品认为，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未必会发生的”——至少在它真正爆发之前。由此可知，冲突并非是长期恶化的局面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是短时期发生的，对国际体系具有一定震撼力。不管我们对这种观点接受与否，至少它开始了对战争的偶然性因素的关注。当然，我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似乎确实在1914年发生了，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发展矢量，将事情引向不同的、未曾出现的结局。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致力于展现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到一起并引发了战争的，但我并不会将结局绝对化。我试着提醒自己，书中出现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推动力本身都可能改写历史与未来——或许它们不是那么糟糕。

[1]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于1995年7月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的一场大屠杀。屠杀持续11天，大约8 000名当地穆斯林男性被塞尔维亚族军官枪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译者注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第一部分

通往萨拉热窝事件之路

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贝尔格莱德谋杀

1903年6月11日，时间刚刚过了凌晨两点，28名塞尔维亚军官集结在贝尔格莱德皇宫的入口处。一阵交火后，在这栋建筑前站岗放哨的卫兵被逮捕并缴械。谋反者从值班的卫兵队长那里获得了钥匙，之后闯入了接待大厅，迅速登上楼梯、穿过走廊，直奔王寝。最终，他们发现了国王的卧室。卧室被两扇厚重的橡木门保卫着，谋反者用一箱炸药进行了爆破。爆破的冲击力使得大门从墙体脱落，撞向室内的前厅，藏在后面的王家副官无一幸免。爆炸同样让皇宫的供电系统瘫痪，因此整栋大楼陷入了一片漆黑。但入侵者们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从附近的房间找到了一些蜡烛，闯进了国王的卧室，却发现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和德拉加王后（Queen Draga）早已不见踪影。但王后阅读过的法国小说还在床旁边的桌子上倒扣着，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摸了一下床单，感受到床单上还有余温——他们两人似乎刚刚离开。在卧室进行了一番徒劳的搜索后，入侵者们手持蜡烛和左轮手枪，对皇宫里的房间进行了逐一排查。

一间，两间……军官们不断向储藏柜、挂毯、沙发和其他可能的藏身之处开火。而此时，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正在楼上与卧室相连的狭小的侧楼里瑟瑟发抖，平时，王后的仆人常在这栋侧楼给她熨烫、缝制衣服。搜查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国王趁机悄悄地穿上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他可不想赤身裸体地被敌人发现。王后也穿上了一条白色丝绸质地的裙子以蔽体，还套上了一只黄色的长袜。

在贝尔格莱德，其他受害者也遭到搜查和杀害：王后的两个被人普遍怀疑觊觎、图谋继承塞尔维亚王位的兄弟被引诱出王后的住所，然后“被带到皇宫附近的一个警卫室，在经过一番羞辱后被残忍地刺死”。杀手同样闯进了总理迪米特里捷·辛卡尔–马尔科维奇（Dimitrije Cincar-Marković）和军政大臣米洛万·帕夫洛维奇（Milovan Pavlović）的住所，两人皆遇难。当时帕夫洛维奇藏身于一个木柜中，遭到25轮射击。内政大臣贝利米尔·西奥多洛维奇（Belimir Theodorović）也遭到了枪击，但侥幸活了下来。其他大臣均被逮捕。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皇宫。王家第一副官拉扎尔·彼得罗维奇

（Lazar Petrović）已缴械投降，在一阵交火后被抓，并由谋反者们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厅，被迫对着每扇门呼叫，以找到国王的藏身之处。进行第二轮搜查时，谋反者们终于在帐帘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入口。当他们中的一位准备用斧子将墙砸穿时，彼得罗维奇感到已回天无力，便答应劝国王出来。在与外面一墙之隔的距离，国王询问来者姓名，他的副官答道："是我，您的拉扎尔，请为您的军官们打开门吧！"国王说："我还能相信我的军官们的誓言吗？"谋反者们佯装顺从。于是，这位戴眼镜的胖国王穿着不协调的红色丝绸衬衫出现了，他的臂弯里搂着王后。之后，这对夫妻被冰雹般的、毫无方向的子弹射杀了。彼得罗维奇抽出藏着的手枪，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反抗，以保护他的陛下（之后人们才得知这一细节），却也被乱枪打死。这种暴行越发肆无忌惮，甚至演变成一场狂欢。事后，国王的意大利理发师（他被命令对尸体进行处理，给它们穿上衣服，以便举行葬礼）证实，尸体被利剑刺穿，被刺刀撕裂，部分已经被剖开，遭到斧子的砍击，直到它们四分五裂、无法辨认。这位理发师因此也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刺激。他们将王后的尸体顺着卧室的窗台扔了下去，这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直接落到了花园里。据说，当谋反者们也对亚历山大国王做出上述举动时，他的一只手在一瞬间死死地扒住了窗台。一位军官操起军刀向这只手砍去，几根手指被砍下来，国王的身体坠落到了地上。当谋反者聚集在花园里抽烟并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检验时，天空开始飘雨。



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一世

1903年6月11日发生的事件掀开了塞尔维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塞尔维亚的历史十分短暂，而统治权几乎占据这个年轻的国家大部分历史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现在荡然无存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刺杀行动后，谋反者们敲响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丧钟，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Petar Karadjordjević）作为继任者，登上了塞尔维亚的王位（当时，此人正流亡瑞士）。

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究竟是如何引来如此残忍的杀身之祸的呢？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从未形成稳定的局面。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与王朝分庭抗礼的家族的存在。在使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的魔爪中解放的斗争中，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和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渐行渐远。那位皮肤黝黑的领袖——“黑乔治”（Black George）彼得罗维奇（Petrović）是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诞生的第一位风云人物。1804年，正是他率领部队起义，成功将奥斯曼人驱逐出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在若干年内都没有遭到侵略；但到了1813年，当奥斯曼部队蓄势发动一次反攻并获胜时，这位英雄却被迫流亡奥地利。两年后，在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的带领下，塞尔维亚爆发了第二次起义。但米洛什是一位

易妥协、顺从的政治家，他与奥斯曼政权达成共识，承认了塞尔维亚的公国性质。当彼得罗维奇重返塞尔维亚时，米洛什下令对其行刺，帮凶就是奥斯曼帝国。在了结了政敌之后，米洛什被授予塞尔维亚王子的头衔。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成员在塞尔维亚以公国身份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实施统治（1817～1878年）。

同时存在的两大对立阵营，地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小农经济为主体形成的争强好胜的政治氛围，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国家形成了火药味浓重的君主体制。让人感到震惊的是，19世纪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没有几人因为自然死亡而结束统治。公国的元勋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王子是位残酷的独裁者，他执政期间频频出现反叛事件。1839年夏，米洛什出于对长子继承王位的考虑而退位；长子米兰（Milan）当时因患麻疹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继位13天后便离开人世，直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父王让自己继承王位的意图。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的统治也因为1842年的一场谋反戛然而止，这就为另一位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的后人——“黑乔治”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夺权留下了余地。然而在1858年，亚历山大也被迫退位，米哈伊洛在1860年重新问鼎王座。但在他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受欢迎了；8年后，他和一位女性表亲一同遇害，据说，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正是这起阴谋的支持者。

米哈伊洛的继任者——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四世的漫长的执政期（1868～1889年）终于保持了政局的连续性。1882年，即柏林会议授予塞尔维亚以独立国家地位4年后，米兰宣称塞尔维亚王国成立，自己当仁不让地成为国王。但政局的极度动荡仍然困扰着这个新成立的国家。1883年，政府尝试解除塞尔维亚东北部民兵使用武器的权力，这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方起义——蒂莫克叛乱。米兰对起义者采取了残忍的镇压手段；在贝尔格莱德，那些被怀疑与起义有牵连的高层政治人士都遭到了迫害。

19世纪80年代早期，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现代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同步诞生的还有体现现代政治特征的报刊、政党会议、宣言、竞选策略和本地委员会等）。这些新生事物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不可抗力，但国王对此却采取独裁的手段加以钳制。1883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塞尔维亚议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现存体制持反对态度。国王拒绝从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激进党中委任政府幕僚，而是选择成立一个官僚内阁。法令允许设立议会，却又在10分钟之后将其取消。关于1885年那场与保加利亚的血战，王室做出的执行决策既没有咨询部长的意见，也没有询问议会，米兰与纳塔莉王后（Queen Nathalie）的唇枪舌剑和离婚丑闻也进一步侵蚀着君主专制统治。当米兰在1889年退位时（当时他只希望能够迎娶他的私人秘书——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的离开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管理塞尔维亚事务的摄政时期（此时米兰的儿子亚历山大王子尚幼）持续了4年。1893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以一场

奇怪的“政变”结束了该家族的摄政阶段：内阁大臣都被邀请参加晚宴，当大家热情地举杯时，国王亲切地告知所有人，他们都被捕了；年轻的国王宣布了当政的意图，声称自己拥有“完整的王权”；关键的部级大楼和通信部门已被军队占领。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通知众人亚历山大已经获得了实权。

实际上，上任国王米兰仍然在幕后处理政事。米兰批准了摄政时期，而代表儿子发动“政变”的也是他。在当代欧洲很难找到如此怪诞的家族伎俩——退位的父亲成为继位的儿子的首席幕僚。1897~1900年，这种“米兰—亚历山大”共政的局面一直持续着，米兰被委任为塞尔维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成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公民。

亚历山大的统治成为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末路。在他父亲的协助下，亚历山大很快将在登基典礼上人们赋予他的希冀挥霍一空。他将塞尔维亚宪法中相对自由开放的条款统统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专制主义的内容：民主选举被取消，媒介自由被废止，并停办了报纸。当人民激进党首领们提出抗议时，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亚历山大以手握生死大权的独裁者的姿态，恣意对宪法进行废除、篡改和中止。他从不尊重司法公正，甚至密谋对高层幕僚的暗杀活动。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米兰两人一同鲁莽地操纵着这个国家，更别提亚历山大的母亲纳塔莉了（尽管与米兰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她仍然是幕后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这些都对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亚历山大决定迎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的遗孀，这样的结合当然并没有改善局面。1897年，他第一次遇到了德拉加·马欣（Draga Mašin），当时她是国王母亲的一位女仆。德拉加比国王年长10岁，在贝尔格莱德声名狼藉——人们都知道她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而且据说她的私生活十分不检点。在王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言辞激烈的会议上，部长们纷纷劝阻国王不要与德拉加结婚；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Djordje Genčić）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陛下，您不能和她结婚。她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情妇——当然也包括我。”这种耿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根契奇之后也成为谋反行刺的军官之一。其他的高级军官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一次群情激昂的内阁会议上，代理总理甚至提议在皇宫中逮捕国王，或是将其五花大绑，强行驱逐出国境。幕僚上下反对德拉加的呼声过于强烈，以至于国王发现一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提拔合适的高级官职候选人。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订婚的消息本身就足以导致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国王不得不勉强集合了一帮乌合之众，组成婚礼上的“内阁”。



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
（约1900年摄）

对这段婚姻的争议同样使国王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米兰因德拉加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而勃然大怒，辞去了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职位。在一封于1900年6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他称亚历山大“正将塞尔维亚推向深渊”，并在结尾处警示他：“在你做了这般蠢事之后，如果有哪个政府把你驱逐出境，那我将是第一个拍手称快的人。”但亚历山大非但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和德拉加于1900年6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完婚），还利用他父亲辞职之机，加强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之后，米兰的同党和德拉加的敌人被逐渐从军事高层和行政部门中清除，国王的父亲处于被持续监视的状态，接着他被勒令离开塞尔维亚，之后又被下令永远不得返回境内。米兰定居奥地利，并于1901年去世——这对于那对夫妻来说莫不是一种解脱。

1900年年底，这段君主专制统治也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受欢迎时期——王室宣称王后怀孕了，这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但1901年4月，有人称王室宣称德拉加有身孕只是安抚舆论的诡计，这又使得民愤四起（首都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王室以“假婴儿”的把戏来稳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权，但最终还是暴露了）。但亚历山大对这些糟糕的征兆并不在意，仍大肆宣传，鼓吹对王后的盲目崇拜——斥巨资举办公共活动来庆祝她的生日，将军团、学校，甚至村庄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同时，他对宪法的践踏更加猖獗。1903年3月，国王借机在深夜中止宪法，对新式媒体和组织进行压迫的法律条文也在匆忙的草拟中，45分钟之后，宪法内容被更换。

直至1903年春，塞尔维亚举国上下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统治。在1901年7月的选举中，人民激进党获得了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议会席位，他们对国王的独裁控制愤恨不已。在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银行业家族中（特别是那些业务涉及牲畜和食物出口的家族），很多人都看清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亲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将塞尔维亚的经济禁锢在奥匈帝国的垄断之下，剥夺和封锁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者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和途径。1903年4月6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抗议者谴责国王恣意篡改宪法，但这次示威活动被警察和宪兵残酷地镇压了，18人殒命，50人受伤。尽管被捕者几天之后就被释放了，但还是有百余人（其中不乏军官）被逮捕并监禁。

在不断加剧的对立中，塞尔维亚军队也成了反对者的中坚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军队是塞尔维亚社会中最活跃的组织机构。在这样一种仍旧以极不景气的乡村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中，想升职可谓步履维艰，但成为一名军官正是能够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不二之选。这种优越性在米兰国王那里得到了强化——他慷慨地拨款给军队，扩大军官队伍，其代价就是削减了本来就短缺的国家高等教育资金。但自从1900年，米兰突然被驱逐之后，军官这一美差就迎来了它的末日：亚历山大国王削减了军事预算，军官的薪水逐月减少，甚至还出现了拖欠。此外，还通过了一项任人唯亲的政策：国王及其妻子的朋友和亲戚能够被晋升到关键职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事实（尽管官方出面否认），那就是国王没有一位血缘上的继承人，他计划将塞尔维亚王位传给德拉加王后的兄弟尼科迪耶·伦耶维卡（Nikodije Lunjevica），这激化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1901年夏，塞尔维亚军队中一位相当有天赋的年轻中尉酝酿了一场军事谋反行动（该中尉在1914年发生的事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因为他拥有强健的体格，令他的崇拜者联想到肩膀宽阔的古埃及公牛神“阿匹斯”，他也因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在塞尔维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就在参谋部谋得了一个职位。由此可见，他的上级相当器重这个年轻人。迪米特里维奇天生就是政治阴谋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行动极其诡秘，他能够绝对地投入军事和政治工作；他的手段非常毒辣，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迪米特里维奇不是能够统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然而他却具备十足的能力，能在小群体和私人交际圈中令对方信服，向他的信徒传达一种使命感，并消除质疑、煽动极端行动。他的一位合作者对其如下描述："他是一种神秘力量，我在他的命令面前完全顺从，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并不合理。"另外一位谋反者同谋甚至对"阿匹斯"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感到困惑：他并不聪颖过人，又不具有雄辩能力和口才，他的想法似乎也不能自圆其说；"然而，他的确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位仅仅依靠他的出现就能将我的思路带到他的方向上的人；他只用最普通的方式道出寥寥数语，我就会完全臣服，成为他的意志的忠诚执行者"。迪米特里维奇从小生长在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他上述高人一等的能力的根源。在他成年后，妇女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他对她们从来没有性欲。他的居所杂乱无章，他所有策划阴谋的地点都是烟雾缭绕、全体成员皆为男性的世界——贝尔格莱德的咖啡厅。曾经这是些非常私密的场所，但现在，人们在这里的对话并不需要确切被对方听见，人出现即可。在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上，这位谋反者魁梧、强壮，留着髭须；他身旁还有两个同谋，摆出一副明显心怀不轨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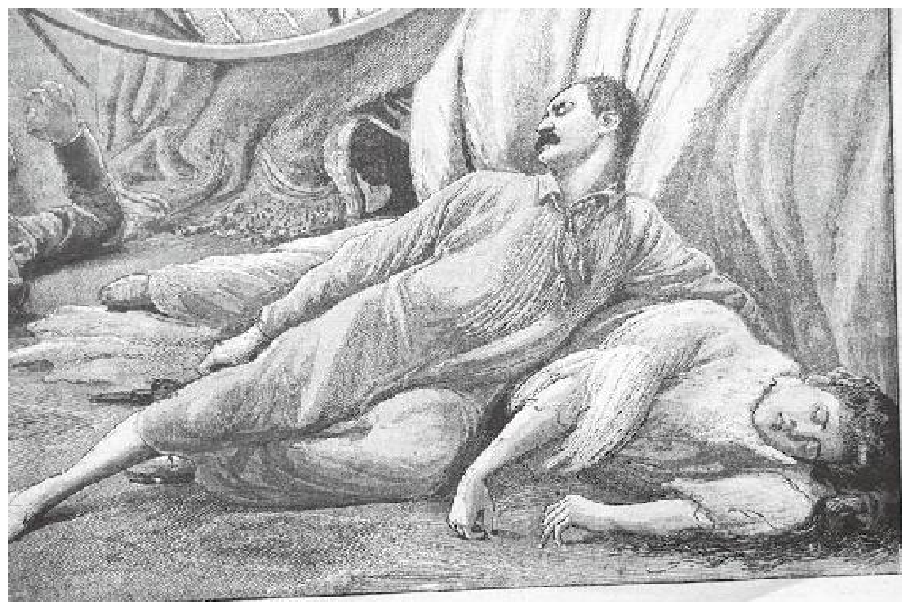
迪米特里维奇原本计划在1901年9月11日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次舞会上谋杀这对王室夫妻（当天是王后的生日）。这项计划似乎出自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2]的小说——两位军官被委派袭击多瑙河发电站（该发电站为贝尔格莱德提供电力），而还有一位的任务是摧毁为舞会场地提供电力的稍微小一点儿的公电站。一旦陷入黑暗，4名出席舞会的刺客就趁乱点燃窗帘，敲响警报，然后逼迫国王和他的妻子服毒自尽，了结两人的性命（这一方案巧妙地避免了混乱之中寻找武器的可能）。他们在一只猫身上成功检验了毒药的毒性，但这缜密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发电站由重兵把守，无法进入，并且王后最终并未出席舞会。

他的其他计划也都失败了，但他并不气馁。这些谋反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兢兢业业"，试图扩展政变的范围。他们"招募"了百余名军官，其中不乏年轻人。1901年年底，有些公民政治领袖也加入进来，当中的一位便是前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在反对国王的婚姻一事上直言不讳的那位。1902年秋，谋反组织正式有了自己的秘密誓约。其构思者便是迪米特里维奇，他将组织的目标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预感国之将陷……罪魁祸首便是国王和他的情人德拉加·马欣；我们立誓要将他们除掉，以践行我们的宗旨。"

1903年春，谋反组织的成员扩大到120～150人，计划在皇宫内刺杀这对王室夫妻的方案已经完备。如要执行计划，则需要周密的准备；然而，国王和他的妻子深知自己不得人心而草木皆兵，因此对于安保措施近乎偏执，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卫。如果没有一帮侍从跟随，国王从不单独出现在城里；德拉加王后因为过于担心发生意外，曾将自己禁足在皇宫长达6周。皇宫内和周边区域的安保力量增加了一倍。一时间，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谋反暴动的谣言风行，1903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还援引了贝尔格莱德的"匿名信息来源"，称"针对王室的一个军事谋

反组织发展得如此壮大，以至于国王和政府都不敢采取措施与之对抗”。

对线人的征募（包括皇宫护卫队的军官和国王的随从副官）确保了刺客们能够顺利在哨兵把守的地方杀出一条路，进入皇宫内部。谋反的日子在行动的前三天才确定——当得知所有的关键谋反者能够各就各位时。这项计划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之后立刻被广而告之，以防止警方或是国王政权的残余势力的介入和破坏。谋反者在大功告成的一瞬间急于宣扬自己的行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国王和王后的尸体被从卧室窗户扔出。“阿匹斯”本人也在突围进入皇宫的刺杀小分队中，但他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在皇宫主入口处与卫兵的交火中，他中弹了，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差一点儿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



贝尔格莱德行刺

（法国*Petit Journal*画报，1903年6月28日）

“不负责任的因素”

“城市悄无声息，人们也普遍无动于衷。”1903年6月11日晚，英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乔治·博纳姆爵士（Sir George Bonham）向伦敦发出了言简意赅的消息。消息称，塞尔维亚的“革命”使得首都居民“欢欣鼓舞”，凶手们将第二天（1903年6月12日）“改为节假日，街道上到处装饰着国旗”。人们“完全没有流露出该有的后悔之情”。根据博纳姆在维也纳的同事弗兰西斯·普伦基特爵士（Sir Francis Plunkett）所称，塞尔维亚悲剧中“最让人震撼的特点”是“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谋杀案面前，人

们表现得出奇的平静”。

对此感到反感的观察者洞悉到了这种稳定情绪背后的原因：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暴力和弑君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冷酷似乎并不奇怪。实际上，贝尔格莱德的公民有十足的理由为谋反者喝彩——谋反者立即将统治权转移到一个超越党派的临时政府。议会也被迅速重建。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结束了在瑞士的流亡，重返塞尔维亚，并被议会推选为国王。带有强烈民主色彩的“1888年宪法”（现更名为“1903年宪法”）在被稍微调整之后恢复权威。两大敌对的塞尔维亚王朝之间历时已久的纷纷扰扰瞬间成为过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追随者，他年轻时甚至将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翻译成塞尔维亚文，这激励了那些具有自由意识的人。

更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佩塔尔在他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不久向公众声明：他准备成为一位“真正以宪法为准则的塞尔维亚国王”。塞尔维亚自此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议会制国家，徒有君主之名，国王并不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在对冷酷无情的总理辛卡尔–马尔科维奇（他是亚历山大的追随者）实施谋杀的行动中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从今往后，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大众以及各党派手中，而不是集中于国王手中。政党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展工作，不必担心受到打压。媒介也最终摆脱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严酷的审查制度。这些转变昭示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更重视大众的需求，更契合舆论。塞尔维亚的政治形态正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一个新纪元。

但是如果说1903年的政变革除了积弊，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1914年显得尤为突出。总而言之，谋反组织并没有在成功除掉这对王室夫妇之后解体，而是继续强势存在于塞尔维亚的政治和公众生活中。行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就有4名谋反者（4人中有军政大臣、公共事务大臣以及经济大臣）和6名政客。仍然处于康复阶段的“阿匹斯”受到了来自议会的正式表彰，成为民族英雄。事实上，这个建立在血腥谋反和夺权基础上的政权，以及对于仍然阴魂不散的暗杀组织的恐惧，使得公开批判步履维艰。政变发生10天后，新政府的一名部长向一名报纸记者坦言，他认为刺杀行动“很可悲”，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无法公开地表达意见，因为军队中可能没有人会认同，而王权和政府都是以军队为支撑的”。

纵观整个宫廷，刺杀组织的影响力格外巨大。英国使者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在1905年11月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消息中称，“截至目前，谋反的军官已经成为国王举足轻重、独一无二的支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国王“将会陷入孤立，届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忠心甚至友情是国王可以信赖的”。因此，当佩塔尔国王在1905年冬为他的儿子乔尔杰王子寻找一位陪同他一起游览欧洲的人时，“阿匹斯”成了不二人选。这时“阿匹斯”刚刚从一段漫长的康复期中走出，但他的体内仍然存留着三颗子弹——行刺当晚击中他的那三颗。这位弑君行动的

首席策划师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照料下一任卡拉乔尔杰维奇的国王，直至他受教育阶段的结束。然而乔尔杰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国王：1909年，因为将贴身男仆活活打死，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认为，尽管国王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将其送上王位的那些人的“囚徒”——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夸张。1905年11月底，奥匈帝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总结道：“国王就是傀儡。”谋反者只是利用国王作为政治杠杆，谋求和确保他们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新委任的副官全部来自谋反者团队，管理军火的军官以及军务处邮政部门的官员同样如此。这些曾经的谋反者同样有能力影响军事方面的人事变动，包括控制高层指挥的职务。利用他们在君主那里的便利，他们还影响着关乎国家大事的政治问题。

谋反者的阴谋并非到此为止。新任政府承受着从与他国伙伴关系中撤出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与英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英国已经撤回了军事全权大使，公使馆被交到了临时代办塞西杰手中）。直到1905年秋，欧洲大国的代表们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示谴责，尤其受到谴责的是其司法系统。在军队内部，以米兰·诺瓦科维奇（Milan Novaković）上尉为首的“反叛国”军事组织在要塞城市逐渐壮大队伍，米兰还草拟宣言，呼吁取消68名“杰出”叛军的领导权。诺瓦科维奇迅速遭到逮捕，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自我辩护之后，他和他的同伴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并被判处监禁。两年后他离开监狱，却“重操旧业”，继续他公开反对这些谋反者的事业，因此又重返牢房。1907年9月，传言称他和一位男性亲属试图逃跑，于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杀害，这一传闻激起了议会和自由媒介的愤慨。因此，军队和民间权威之间的糟糕关系在1903年暗杀行动之后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也解释了塞尔维亚在1914年的举动。

在不断发起挑战的诸多民间组织中，挑大梁的当属人民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帕希奇在瑞士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是暗杀事件后国王的得力助手和幕僚。1904~1918年，他位居十任内阁之首长达9年。作为处于塞尔维亚权力顶峰的人，在最终引发“一战的”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包括发生前后），帕希奇都是其幕后主要的决策者之一。

毫无疑问，帕希奇是现代欧洲历史上一位显赫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从政的时间长（他在塞尔维亚政坛上活跃了40年）还因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获得胜利。尽管他名义上是工程师，但他兢兢业业为之奉献的还是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他直到45岁依旧单身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塞尔维亚的独立事业。1875年爆发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统治的民族起义，作为《民族自由报》（*Narodno Oslobodjenje*）的记者，年轻的帕希奇前往前线，冒着危险报道战况。19世纪80年代初，他便对人民激进党的现代性问题予以关注——这也使得该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力量，直到“一战”爆发。

人民激进党由选举产生，它融合了自由宪政的理念，呼吁塞尔维亚扩张以及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族区的领土统一。政党最坚实的基础（同样也是保持其选举成功的关键）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主导的小农经济。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人民激进党主张平民主义的多元化，并与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专业化的军队建构表示怀疑，不仅因为他们对维持军队所产生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还因为他们认为民兵组织是最佳且最纯粹的军队组织。1883年蒂莫克叛乱爆发时，人民激进党与拿起武器的农民并肩战斗，反抗当局。政府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们。帕希奇是嫌犯之一，为了逃避抓捕，他及时出逃，但在本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被宣判死刑。在流亡岁月里，他与俄国一直保持联系，他本人也成为泛斯拉夫圈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因此，他的政策总是与俄国的政策亦步亦趋。1889年，米兰退位后，对帕希奇的宣判被取消，而他也在流亡期间成长为一名激进运动的英雄。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在一片赞许声中被选举为部长主席，之后又成为首都的市长。但是他第一次的总理任期（1891年2月至1892年8月）的结束，是由于对米兰和摄政者持续操控宪法感到不满而辞职。

1893年，因反抗摄政者，帕希奇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被亚历山大派往圣彼得堡。这一举动目的在于消除帕希奇的政治野心，同时让其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希奇致力于建立深入的俄国—塞尔维亚关系，并且对于一点毫不怀疑，即塞尔维亚未来的民族解放事业最终还将仰仗俄国盟友的支持。但米兰重返贝尔格莱德政坛阻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人民激进党受到侵扰，并被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帕希奇本人也被召回。在米兰—亚历山大联合执政期间，帕希奇遭到了严密监视，与权力失之交臂。1898年，当局借口他在公开场合侮辱米兰，对其实施了9个月的监禁。1899年，当举国为谋杀米兰的笨拙阴谋感到震惊时，他还在服刑期间。人民激进党再度被怀疑是谋反者的同谋，尽管他们与波斯尼亚青年之间的关系之前并不明朗，现在也尚未明朗。亚历山大国王要求将帕希奇判决为刺杀计划的同党，但由于奥匈帝国政府紧急出面，这位人民激进党领袖的性命最终才得以保全（如果从后来事情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足够讽刺）。亚历山大的统治一向以阴谋论著称，帕希奇也被告知他与其他几位人民激进党同僚将被国王处决，除非他承认自己对刺杀事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由于不知道奥匈帝国的干预足以挽救他的性命，他屈从并承认了。文件得以公开，他也免于牢狱之灾，但公众普遍怀疑他为了苟活于世而出卖了自己的政党。虽然帕希奇还活着，但至少在同一时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亚历山大政权的风烛残年，他完全在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王权的更迭成为帕希奇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东山再起，进入政治鼎盛时期。他和他的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的中流砥柱。这位对权力向往已久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他是如此适合成为一名掌权者，因此他迅速适应并扮演起国父的角色。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在农民群众中却享有盛誉。他浓重的乡下口音被许多人讥笑。他的谈吐并不流畅，多带有旁白性质的嘀咕和感叹词，这也成为人

们在他身上挖掘到的趣闻。当被告知著名的讽刺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Branislav Nušić）1908年在镇上发动了一场示威游行以抗议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并骑马闯入外交部时，据说帕希奇当时做出了如下回应："呃……你们瞧……我知道他写的书很棒，但是，嗯……他的骑术也这么棒，这是我没想到的……"帕希奇并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极其善于与人沟通，特别善于与占塞尔维亚大多数选民人数的农民进行沟通。在他们的眼中，帕希奇的言论低调内敛、朴实无华，却让人回味无穷；更别提他那浓密而充满阳刚之气的胡子，好像它们是近乎出神入化的谨慎、前瞻性和智慧的象征。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称呼他为"Baja"，这个词意为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气质，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人所爱慕。

曾被判处死刑、多年流亡国外，以及长期处于被监视情况下而形成的偏执症状——所有经历都在这位政客的举手投足和气质形象上留下了烙印。帕希奇谨小慎微、行为诡密、秘而不宣。多年后，他曾经的秘书回忆道，在传达想法和做出决策时，他并不想将这些信息付诸纸笔，甚至不想口头表达出来。他习惯定期焚烧文件，不管是公文还是私密文件。在暗含潜在冲突的情境中，帕希奇习惯于被动处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摊牌。他务实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对手眼中，他全然缺乏原则性。所有这些特征又与其他个性相互交织：他对舆论极其敏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让塞尔维亚这一民族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在谋反行动开展之前，帕希奇就已被告知；虽然他保守了秘密，但拒绝加入该行动。当皇宫血案的具体执行计划送到他面前时，他最特别的反应是携家带口乘火车来到亚得里亚海岸，等待最后的结局。

帕希奇的成功仰仗确保他自身以及政府的独立性，而同时又能与军队及其内部的谋反者联盟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对此他心知肚明。这并非单纯关乎那100名临时参与阴谋行动的人的问题；在谋反者看来，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的人数在持续增长）身上承载着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意志。然而事实上，帕希奇最为强劲的政敌，独立激进党（他们于1901年从帕希奇领导的政党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派系）试图与谋反者联手，前提条件是后者要对帕希奇政府进行破坏行动。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

在这种微妙的情境中，帕希奇处理起事情来却精明而游刃有余。他与谋反者们单独会面，向他们提出意见，目的是为了阻止反政府联盟的形成。尽管受到了来自人民激进党同僚的反对，他还是为成立军队提供了慷慨的一揽子资助，用以弥补米兰退位后军队丧失的福利和好处；他公开承认1903年政变（这对于谋反者来说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和重要性），并反对将谋反者绳之以法的企图。然而，他同时也在持续向他们施加压力，削减他们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频率。当谋反者们计划在政变事件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庆祝舞会时，由于帕希奇（以及外交大臣）出面干预，这一庆祝日期被推迟到1904年6月15日，即新国王选举登基纪念日。1905年，谋反者们的政治势力已经得到加强，媒体和议会对此表示

关注。帕希奇警示议会，在宪法权威框架以外进行操控的那些“并不可靠的人”已经对民主秩序造成威胁。这很好地契合了激进民众和普通士兵的想法，他们憎恶军官团充满政治野心的、“罗马禁卫军”式的特点。1906年，帕希奇巧妙地借助与大英帝国重修旧好的契机，以退休的名义解除了几位谋反者的军官职务。

这些精明的举动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谋反者中最为杰出的人被革除了职务，因此在短期内，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帕希奇并没能成功抑制谋反者组织在军队内部的发展势头，也阻止不了民众对其的认同感；谋反行动赢得了这些民众的认可，他们甚至持有比最初的同谋者更极端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多数谋反者高官从公众视线中淡出的举措让勤勉的“阿匹斯”趁机成为群龙之首。“阿匹斯”一直是政变周年庆典上的重量级人物。在这样的庆典上，谋反者军官们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国家剧院附近一个小公园里的餐馆里欢聚一堂，举杯相庆。在下面这件事情上，“阿匹斯”比任何一位谋反者都要用心：招募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全力支持以实现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使之形成统一体为目标的事业。

意念蓝图

对“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这一观念的强化，是塞尔维亚人的精神构想，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地图并无干系。对此，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表达见于1844年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为亚历山大国王起草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即为1906年出版的“草案”，其中记载了加拉沙宁对“塞尔维亚国家及外交政策规划”的设想。该文件对几代塞尔维亚政治家产生的影响毋庸赘述——它最终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大宪章”。加拉沙宁开篇明义，认为塞尔维亚“虽然是小国，但必须走出当下的局面”。他指出，塞尔维亚政策的首要戒律必须是“国家统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塞尔维亚国家地域范围内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只要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方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家地位的扩张主义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那便是中世纪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广袤的疆域囊括了现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此外还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马其顿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中部和北部地区；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包括波斯尼亚。

在科索沃地区与土耳其人一战败北后，塞尔维亚于1389年6月28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分崩离析。但加拉沙宁认为，这次败北并没有削弱塞尔维亚作为国家的正统性，它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断点。因此，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而是对既定现实的“修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意识和历史权力。“他们不能指责我们是在毫无头绪地另辟蹊径，也不能诬陷我们是在谋划一场革命或

是动乱。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认同，我们这样做有政治需求和合理性，这种观念在前辈的时代已经被树立，它深深扎根于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并被传承下来。”由此可见，加拉沙宁的观点将一段历史时期戏剧性地拉近，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关于融合性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此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即统治者杜尚在中世纪制定的格局迥异、种族多元的综合性政策，能够与文化和语言上都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融会贯通。塞尔维亚的爱国者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本质上都是塞尔维亚人。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缔造者、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塞族人无处不在》（1836年）的作者］就谈及了一个拥有500万使用“塞尔维亚语”的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它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延伸至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当时位于匈牙利东部地区，今在罗马尼亚西部）、巴奇卡地区（该地区范围从塞尔维亚北部到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到北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岸。然而，这些地区当然有许多人“很难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但似乎很有可能他们会逐渐习惯这一身份”——卡拉季奇做出了如此让步。

对统一的规划和渴望使得塞尔维亚的国家组织不得不与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做长期抗衡——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它们的存在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现的拦路虎。1844年，奥斯曼帝国仍然控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以逐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之后再将独立的部分整合，利用固有的塞尔维亚帝国的良好根基和积淀，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塞尔维亚国家”，奥匈帝国同样注定成为其敌人。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人（更不用提那些并不承认塞尔维亚血统的克罗地亚人）恐怕都期待着从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获得解放，并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实现统一。

直到1918年，这些目标都业已实现，加拉沙宁的备忘录仍旧是塞尔维亚统治者制定关键政策的蓝图。这些目标已经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手段，逐渐渗透到了广大普通民众中。发起宣传的人有的来自贝尔格莱德，有的来自媒介内部的爱国组织。由此看来，大塞尔维亚的设想已经不仅限于政府的政策中，也成为宣传的内容。这种思想融入了塞尔维亚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中。杜尚关于宏大帝国的回忆尤其能够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史诗歌曲中得到体现，这也是这个民族鲜活而独特的传统。这些歌谣由单弦民族乐器古斯勒琴演奏出的忧郁曲调为伴奏，歌者和听者能够同时陷入对塞尔维亚历史的回忆和沉思。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村庄和市场，这些歌谣能够将诗歌、历史和民族认同非凡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民族气质。一位对此早有洞悉的观察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在182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塞尔维亚史的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历史由诗歌来体现，这也转化成它独特的民族资本，并深深镌刻在它子民的回忆中。”

镌刻在人们回忆中最深刻的当属塞尔维亚人民奋勇抗击外来统治者

的传统和记忆。人们铭记在心的是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场上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的屈辱。经过几个世纪的润色，这场中世纪发生的原本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塞尔维亚反抗异端外敌的象征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出现了一些鲜活的人物。他们有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实现塞尔维亚大一统的风采无限的大英雄，也有摒弃了共同事业或是向敌人出卖国家的背信弃义的叛徒。诸多的虚构人物包括英雄刺客米洛什·奥比里克（Miloš Obilić），歌谣中记载了他在战斗打响的那天潜入奥斯曼帝国的指挥部，割开了苏丹的喉咙，之后他被逮捕，奥斯曼帝国卫兵砍掉了他的头颅。行刺、殉道、牺牲以及以死者的名义进行复仇，这些成为这个民族的核心主题。

理想中的塞尔维亚承载着神话般的过去，在它的歌谣文化中这个国家富有无穷生机。1875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打响了。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观看了这段时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史诗歌表演。他感到极其震撼，感慨这些歌曲“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光荣的传奇中忘却了他们国王的狭隘传统”、让他们认为与所有塞尔维亚“同胞”拥有共同经历的力量，这种力量“颠覆了地理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一切虚伪言辞”。诚然，这种口传史诗文化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衰落——它们逐渐被印刷品所取代，但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于1897年来到塞尔维亚，听取了德里纳河山谷的市场上游吟歌手演唱的史诗后，不禁感慨：“歌手们以单调的吟唱，在单弦吉他的伴奏下道出这些溢美之词，但它们是如此真实的表达，因此整体效果非常有感染力。”在很多情况下，武克·卡拉季奇编纂和出版的有关塞尔维亚史的诗集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在文学出版物种类越发繁多的时期，也能够保持很好的销量。此外，史诗集的数量也在增加。1847年，黑山王子主教佩塔尔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Petrović-Njegos）出版的经典之作《高山花环》（*The Mountain Wreath*），向推翻暴政的谋反者以及民族烈士米洛什·奥比里克表达了崇敬之情；此外，该书还呼吁将反抗外部势力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高山花环》成为塞尔维亚民族经典诗歌，并流传至今。

面对收复“失去的”塞尔维亚国土的承诺，以及面对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在夹缝中求存的窘境中，塞尔维亚的国家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是地理边界的不确定性。大塞尔维亚的原则和承诺没有问题，但这项收复国土的工作从哪里开展？从匈牙利王国的伏伊伏丁那开始，还是从人们熟知的“旧塞尔维亚”——当时为奥斯曼帝国所辖的科索沃开始？从波斯尼亚开始（该地从未被纳入杜尚的帝国范围，但居住着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从马其顿向南拓展（这片区域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下）？关于“大一统”的理想遭遇了现实中塞尔维亚国家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匮乏，显得格外苍白。这意味着贝尔格莱德的决策者毫无选择，只能对巴尔干半岛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因此，1844~1914年，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目标如罗盘针一般飘忽不定，这种踌躇的逻辑还时常伴随着无动于衷。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抗议匈牙利革命政府提出的匈牙利化政策，加拉沙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必需品和志愿军。1875

年，黑塞哥维那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因为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发起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在第一时间赶往战场浴血奋战的人中，就有帕希奇、军事指挥官以及未来的国王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他使用化名加入部队）。1903年后，在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失败后，人们对解放奥斯曼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的愿望更加强烈。1908年，当奥地利人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自从1878年，奥地利人便开始对该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一地区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然而到了1912年和1913年，马其顿又成了人们优先讨论的话题。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在一种矛盾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渗透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巴尔干地区复杂的种族问题。科索沃处于塞尔维亚神话体系的中心位置，但从种族关系方面来看，它却并非确凿地归属于塞尔维亚的领土。至少回溯到18世纪，该地的绝大部分人是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武克·卡拉季奇口中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塞尔维亚人实际上很多都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并没有加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意愿。历史从未记载波斯尼亚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虽然该地居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1878年，这些人占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3%的人口，当时这两个地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居民，除此以外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20%）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约占33%）。（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成为该地的独特之处，而在塞尔维亚，在经历了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后，大部分穆斯林被迫移民、被驱逐出境或是惨遭杀害。）

而马其顿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巴尔干政治版图中，我们所称为马其顿的地理区域不仅包括之前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还包括沿塞尔维亚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东部地区边界地带、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大片区域，以及希腊北部的大片领土。至今，关于马其顿确切的历史边界仍具争议（单从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对“马其顿”的名称使用的争端便可看出[3]），同时，这片地区是否拥有或在什么程度上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或民族认同也值得商榷（时至今日，世界上除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1897年，当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旅行至塞尔维亚，他讶异地发现他的塞尔维亚陪同者“不允许马其顿出现保加利亚人”，而是“坚持认为那个国家的所有斯拉夫居民皆为塞尔维亚人”。16年后，当卡耐基基金会派遣委员会到该地，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这里所发生的暴行时，该委员会成员发现住在马其顿的人们无法在种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这些问题被谈及时，人们的观点十分极端，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委员会当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及该地区拥有两种种族观点而非一种，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各自持有的。一方面，马其顿的西部和北部充斥着渴望与祖国实现统一的塞尔维亚人；而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似乎是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带。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在马其顿境内设置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机构，目的是使本地的斯拉夫人皈依于他们各自的民族大业。

理想中的民族建构以及种族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塞尔维亚国家目标的实现注定是个充斥着暴力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其他大小势力虎视眈眈的地区层面，还体现在属于争议领土的城镇和村庄中。一些政治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试图以一个更为慷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政治视域（即多元种族合作的观点）将塞尔维亚的国家目标纳入其中。其中一人便是尼古拉·帕希奇，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以长篇大论指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应当联合起来，因为这是时代的需求，小国的出路就是要团结起来。然而这种浮夸的言辞背后，首先是基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本质上是同胞的假设，其次是塞尔维亚人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为相比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是更为纯正的斯拉夫民族，前者长期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

作为地处两大陆上帝国之间、资源匮乏的小国，塞尔维亚无力在全世界面前追寻它的目标。因此，仍旧是相邻国家或帝国国民的塞尔维亚人关于“解放”的渴求便掺杂了一些隐秘性。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起义爆发期间，加拉沙宁道出了这项义务。“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他写道，“正期待所有的同胞施以援手，以战胜他们的传统宿敌，取得胜利……但由于一些政治因素，我们不能公开帮助他们，我们只能在私下对他们进行秘密援助。”这种对于隐秘行动的青睐同样出现在马其顿。1903年8月，在一场针对土耳其人的马其顿人暴动失败后，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政权便开始在该地区实行积极的政策。他们建立了委员会，协助在马其顿开展行动的塞尔维亚游击队队员，此外他们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招募人马并为战士们供给必需品。当在贝尔格莱德面对奥斯曼帝国大臣时，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否认政府对此进行干涉，并反对那些无论如何都是非法召开的会议，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共同体的形成起作用，而是单纯为了敛财，以及向边界以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表达同情”。

谋反者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跨国界活动。谋反者军官和他们在军中的同僚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民族委员会，他们还为运动提供帮助，并指挥了许多志愿军军队。严格来说，这些军队并非塞尔维亚的正规军，但志愿者军官立刻被要求听从军队调遣的事实，证明了官方在很大程度上对此给予支持。民兵组织开展的活动也在规模上稳步扩大，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和保加利亚志愿军军团之间也爆发了数次暴力冲突。1907年2月，英国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停止这种行为，这似乎也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战事一触即发。塞尔维亚再次推卸责任，否认开展游击队活动，宣称这样“不会阻止人民抵御外侮”。但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支持破坏了这种姿态的正确性，1906年11月，议会已经筹集了30万第纳尔来援助旧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进行抗争的塞尔维亚人，之后又“为极其昂贵的开支和保家卫国的民族利益”提供了“秘密贷款”。

如此一来，领土收复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将游击队送往战场并不困难，难的是一旦派出人马，便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到1907年冬，在马其顿的一干塞尔维亚勇士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发起了行动，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特使费尽周折才对其重新施加控制。因此，“马其

顿纠纷”也传递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教训，这对1914年的事件有着关键的影响。一方面，控制权向激进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谋反组织）的偏移也带来了这样的危险：对塞尔维亚国家政策的控制权可能正在从政治中心转移到外围并不可靠的成员手中。另一方面，1906~1907年的外交行动显示，塞尔维亚政府和其他那些被委任传播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组织之间模糊而非正式的关系，可能会使政治责任从贝尔格莱德分离，并且使政府操控的空间和机会最大化。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习惯于一种矛盾思想（这种矛盾思想来源于时不时出现的借口）：塞尔维亚的官方外交政策与国境外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两码事。

分裂

加拉沙宁曾在1844年写道："对塞尔维亚来说，与奥匈帝国达成一致并和谐相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直到1903年，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仍很小。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它在这两个国家共享的那条漫长的国境线上并无防御能力。塞尔维亚的首都气派地坐落于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处，距离奥匈帝国的国境线只有很短的车程。塞尔维亚的出口物资大多数运往奥匈帝国，大多数进口物资也来自那里。该地区地理上的规则在俄国的政策里得到了加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俄国向保加利亚伸出援手，帮助其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形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体——其目的还是想让保加利亚依附于自己。由于已经预见到有朝一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将会在马其顿的领土问题上产生分歧，当时的米兰王子（也就是之后的国王）面对这一威胁，积极寻求与维也纳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正是俄国对索非亚的帮助，将塞尔维亚推向维也纳的怀抱。只要俄国继续用保加利亚作为筹码推行其巴尔干政策，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似乎就会和睦。

1881年6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3周后，双方又追加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由米兰王子亲自协商并签署，其中规定了奥匈帝国不仅要承认塞尔维亚王国的地位，还要支持塞尔维亚兼并马其顿领土的事业。塞尔维亚方面则同意不会破坏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位。该项协议中称，塞尔维亚"绝不允许任何发端于自身领土的政治的、宗教的抑或其他的针对奥匈帝国的阴谋，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新帕扎尔的桑扎克"。米兰更是力图加强这种联盟关系：在咨询奥匈帝国之前，塞尔维亚不会与任何第三方签署"任何形式的条款"。

毫无疑问，这些共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良好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并没有涉及塞尔维亚公众敏感的生活层面——他们从骨子里是反奥匈帝国的，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越发让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此外，缔结关系的是一位古怪的、越发不受人欢迎的塞尔维亚君主。但是只要米兰·奥布雷诺维

奇在位一天，他们就至少能够保证塞尔维亚绝对不会与俄国联手共同对付奥匈帝国，且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也将一直直指马其顿，以抗衡有朝一日与保加利亚的冲突，而不是指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92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协议。1889年，秘密协议又续签了10年，尽管它继续成为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政策的有效纲领，但之后它还是被废止了。

1903年王权的更迭重置了这一关系。奥匈帝国很快便承认了卡拉乔尔杰维奇的政变，部分原因是佩塔尔曾向奥地利人保证，他会继续保持塞尔维亚亲奥的姿态。但不久后，塞尔维亚的新任领导人却表现出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推向独立的意图。1905~1906年，贸易政策、军备订单、复杂的财政情况以及地缘政治相互错杂，使得双方出现了危机。奥匈帝国试图实现三重目标：确保与塞尔维亚的商业协议，确保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继续流向奥匈帝国的工厂，以及向塞尔维亚提供巨额贷款。但三项目标中没有一项达成，这使得两位邻居之间的关系疾速冷却，这件事的结果对奥匈帝国来说也是个十足的灾难。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被法国的施耐德–克勒索公司接收，而这家公司正是奥匈帝国公司——波西米亚的斯柯达的竞争对手。奥地利人迅速做出反应，中止了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猪肉贸易，消费者为此抗议，引发所谓的“猪肉战争”（1906~1909年）。但这项举措却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发现了其他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开始建造大规模的屠宰场，借机从长期依赖奥匈帝国的加工过程中解放出来。最终，塞尔维亚完成了一项大额借贷，而且贷款方不是奥匈帝国，而是法国（这也算是对塞尔维亚军火订单寻求法国卖主的“礼尚往来”）。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停下来，思考法国提供贷款背后的故事。正如所有新兴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常常举借外债，完全依赖于此，大部分借款是为军事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米兰国王统治时期，奥地利人情愿作为贝尔格莱德的债主。但自从这些贷款超过了贷款方的资金，它们不得不借助多种多样的抵押：一定的税收或是铁路特权。来自铁路、印花税和酒水的被抵押的收益应当由塞尔维亚政府以及债券持有人代表联合控制下的特殊国债来支付。这一举措使得塞尔维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陷入动荡，并且丝毫没有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财政挥霍起到限制作用，这导致直到1895年，债务额累积超过了3.5亿法郎。破产的脚步逐渐逼近，贝尔格莱德又谈成了一笔新贷款，通过这一举措，所有的旧债被合并，并按较低的利息来计算。抵押的收益被置于分管之下（其中一部分管理者是债权人代表）。

换言之，诸如塞尔维亚这样脆弱的借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同意财政控制特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理想数额的贷款。这种财政特许意味着主权国家职能的部分担保契约。主要出于这一原因，该地区的国际贷款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外交手段和强权政治。法国的国际借贷高度政治化。有些国家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违背法国国家利益的，法国从不会让贷款流入这些政府，只有在获得经济或政治特许的情况下，贷款才得以进

行。有时，它也会勉强为一些并不可靠但在策略上十分重要的客户提供贷款，以防他们另寻其他出路。它在寻求潜在客户的过程中表现出攻击性和强硬的态度。以塞尔维亚为例，塞政府于1905年夏被告知，如果他们在贷款方面不给予法国优先权，法国面向塞尔维亚的资本市场将全部关闭。在意识到策略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之后，法国外交部于1907年将商务部门和政治部门合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塞尔维亚1906年的贷款事件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借用一位研究战前金融情况的美国分析家的话，法国与塞尔维亚的财政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重要”。塞尔维亚3/4的债务来自于法国，这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是一笔巨额的义务——偿还计划已经规划到1967年（实际上，1918年以后，塞尔维亚就一直没有对债务的大部分进行偿还）。这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军火（尤其是大炮），而这些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这不仅让奥匈帝国感到恼火，英国的外交官和军火供应商同样十分头疼。1906年的贷款使得塞尔维亚不惧怕奥匈帝国的商业压力，并且帮助它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1906年，驻塞尔维亚的英国使节报道：“帕希奇先生抵制奥匈帝国要求的事件无疑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塞尔维亚经济整体呈现出不景气局面的事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下滑态势与其说与奥匈帝国的关税政策脱不了干系，不如说它深深根植于其历史背景和土地结构。塞尔维亚的成立和后续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剧烈的逆城镇化过程，大部分穆斯林城镇已经饱受数十年的骚扰和驱逐，人口锐减。取代奥斯曼帝国周边地区相对城镇化甚至世界性大城市的帝国结构，是一个完全由信奉基督教的小农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塞尔维亚本地贵族阶层的缺失。此外，王朝阻止大庄园进行合并，以防止出现新兴的统治阶级。城市不断缩水，而人口增长率却狂飙突进；年轻的家庭对成百上千公顷的边缘土地进行开拓，社会对于婚姻和生育并无限制。自19世纪中叶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这种人口恣意的增长丝毫没有改进和逆转塞尔维亚经济的颓势和衰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10~1912年，农业的人均产值下降了27.5%，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大规模滥伐森林。因此，养猪业赖以发展的牧场数量锐减，而养猪业是塞尔维亚传统农业中利润最大、最高效的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舒马迪亚地区美丽的野生森林景观（同时也是适宜养猪业发展的不二之选）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单从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来看，事态发展会不会更乐观一些？这些领域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塞尔维亚的企业很少产生于对国内生产制造商品的需求。农村人口很难接触市场，基础工业十分落后。与此相比，塞尔维亚的邻居保加利亚靠纺织厂为工业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对内投资，布达佩斯一家食品加工公司最先让塞尔维亚的梅子果酱得以包装、出口；19世纪对丝绸和葡萄酒的高需求同样也是国外企业家带动的。但是这种对内投资十分缓慢，当外国公司试图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时，排外主义、官僚腐

败和低劣的商业伦理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它们放慢了脚步。有些地方的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投资，但即便如此，当地豪强对外国公司的阻挠仍旧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对塞尔维亚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欠缺：1900年，塞尔维亚国内只有4家师范学校，小学老师中有一半并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的训练，大多数学校班级并不是在专门的教学楼上课，并且只有大概1/3的孩子是真正来上课的。所有的弊端暴露了这个国家农村人口教育意识的薄弱，在他们眼里，学校只是政府设立的陌生机构。1905年，为了批准一项新的收益来源，议会决定向教科书征税（议会大多数是由农民构成的），而家庭蒸馏工艺甚至都不在税收范围内。这一结果导致文盲的比例大幅攀升：该国北部地区的识字率为27%，而东南部地区仅有12%。

这种糟糕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它意味着塞尔维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同质性。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口述文化传统（如那些非凡的神话故事）之间的纽带从未切断，甚至连贝尔格莱德（1900年，其识字率仅有21%）也仍然只是一个农村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这个“农民城市者”的世界深深地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与血缘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现代化意识的发展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开创性认识，而更像是以一种与现代思维相互抵牾的方式，仍然沉迷于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

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特殊联系的现实解释了战前塞尔维亚表现出的几大明显特征。在如此缺乏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的经济体中，军队难免成为主角。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面对来自军事指挥机构的挑战时，民政系统为何不堪一击——这也是影响1914年夏天席卷塞尔维亚那场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对正规军队保持警惕的农民文化，使得非正规的民兵组织以及游击队系统的党派冲突成为家常便饭，这也是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来所面临的中心主题。对于一个军国文化不断扩张且缺少与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加强了19世纪其他国家的议会系统）的政府来说，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最有力的政治工具和文化传统。这个国家几乎普遍对兼并土地抱有热情（这些土地至今都未成为塞尔维亚的国土），这种热情根植于流行文化中对神话的崇拜，同时也来源于对土地极度渴求的农民——他们自己的土地已在不断缩水，变得越来越低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塞尔维亚的经济困境是奥匈帝国惩罚性的关税制度造成的，或是由于来自奥匈帝国的束缚，那么这种论点虽然可疑，但或许也会得到最热烈的赞同。商业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使得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为了寻求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需要为军队筹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1905年之后塞尔维亚与法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从金融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这是塞尔维亚迫切的需要。

升级

1903年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将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三国在马其顿的争端问题上。1908年，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时，事情发生了转机。由于这两个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已经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长达30年，因此人们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多大异议——从占领到直接吞并，这种名义上的改变似乎无伤大雅。但塞尔维亚人并不这么认为。声明“使得人们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憎恶，群情激昂”。人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会上，发言人“吵嚷着要对奥匈帝国宣战”。超过两万名群众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剧场举行的集会，独立激进党领袖柳巴·达维多维奇（Ljuba Davidovi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声称塞尔维亚人民必须誓死与吞并行为斗争。“我们要坚持抗争，直到胜利，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在捍卫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尊严，我们也在捍卫整个斯拉夫种族的尊严。”几天后，冲动的王太子乔尔杰在首都一万名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表明他正计划率领一支武装起来的塞尔维亚革命军收复被吞并的行省：“我是一名军人，我为此感到极度的自豪；我将因成为你们的领袖感到骄傲，塞尔维亚同胞们。这场绝望的抗争关乎生死，关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荣耀。”连塞尔维亚人民激进党首领尼古拉·帕希奇（当时他还没有任部长委员会主席一职，因此发表言论时更自由一些）都认为，如果吞并行为得不到纠正，塞尔维亚必须为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俄国自由主义者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1908年拜访塞尔维亚时，为该国公众的激烈情绪和冲动意向大为震惊。他回忆道，参加与奥匈帝国的战争成为“人们的意愿，胜利似乎是容易而肯定的”。这种观点很普遍，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与他们对此进行争论毫无用处”。

塞尔维亚的政策和意图背后的思维方式又一次趋于明显。1909年4月27日，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臣在一篇报道中称，塞尔维亚人由于吞并而激起的情感只能通过下面的事实来理解：

> 对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或身体力行的爱国者来说，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国王佩塔尔意志的体现，还包括所有其他在种族和语言上一致的同胞们的意志。因此，人们期待大塞尔维亚的最终实现，它能够囊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不同部分，而这些部分现在尚处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基于这一观点，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民族论上看，波斯尼亚都是大塞尔维亚的核心部分。

在一本同时代的关于危机的小册子上，尼古拉·帕希奇在国家问题上最为得力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著名的民族志学家约万·斯维伊奇（Jovan Cvijic）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塞尔维亚问题的关键，其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种族的民族志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大塞尔维亚便无从谈起。”在泛塞尔维亚政治家的观念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领土”，其构成人口“在种族和语言上完全属于塞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当然，还包括少数民族的“暂住

居民”以及奥匈帝国在过去30年中安插的“剥削者”。

在这股愤怒的推波助澜下，为了追求民族目标，一个新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它招募了来自分布在塞尔维亚城市和农村的220多个委员会，以及作为援军、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数千名成员。在马其顿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的视线突然转向了被兼并的行省：民族自卫组织组织游击队成员招募志愿者，建立在波斯尼亚的间谍系统，并说服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民族政策。在马其顿战场上厮杀过的老兵，如“阿匹斯”的亲密盟友沃亚·坦科西奇（Voja Tankosić），就在波斯尼亚的前线严阵以待。在那里，他们训练了数千名新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一时间，塞尔维亚似乎马上就要向它的邻居发动一场自杀式攻击。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一开始是鼓励这种激进行为的，但他们在不久后发现，塞尔维亚根本不可能阻止兼并行动。这种清醒态度的关键来自俄国，它并没有鼓励塞尔维亚进行抵抗。这不足为奇，因为兼并发起人正是俄国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这么说，他向他的奥匈帝国同行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提出了这样的计划。伊兹沃尔斯基甚至就兼并事宜，提前向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Milovan Milovanović）发出警告。在马林巴德的一次会议上，伊兹沃尔斯基有所退却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告知他的塞尔维亚同行，尽管圣彼得堡将巴尔干诸国当作“俄国的孩子们”，视如己出，但无论是俄国自己，还是其他列强，面对兼并行动都无能为力。（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向他的塞尔维亚听众提及他自己向奥地利人提议兼并两个行省的事实，而这项提议的目的在于确保俄国的战船能够在土耳其海峡更自由地出入。）在圣彼得堡期间，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之后还被警告说，塞尔维亚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奥匈帝国进军，“因为一旦行动，必然会孤立无援，因为整个世界都向往和平”。

外交大臣米洛瓦诺维奇是一位温和的政治家，他曾对帕希奇处理1905~1906年奥塞危机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但在1908年，他惊奇地发现，他本人也在支持战争。现在，他正身处一种微妙的境地。在直接和伊兹沃尔斯基商谈过后，他发现联合欧洲列强反对兼并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他不得不限制塞尔维亚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狂躁，同时，他还需要以一种温和的“国家”政策，将议会与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两项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塞尔维亚公众能以任何理由指责他是站在奥匈帝国立场上的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的两难境地还包括人民激进党和其之前的党派同僚独立激进党之间的矛盾和敌对。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如帕希奇派和围绕在米洛瓦诺维奇身边的官僚激进分子，又将事情复杂化、不确定化。在这种情况下，米洛瓦诺维奇兢兢业业地追寻一种温和政策，该政策主要聚焦确保有限的领土补偿，以及忍耐处理来自泛塞尔维亚媒体的诽谤和中伤。然而在公共场合，他采取强硬的措辞，决不妥协，激化国内人民的情绪，并激怒奥匈帝国的媒体。在近乎疯狂的掌声中，他于1908年10月在议会做了演讲：“塞尔维亚的

民族进程需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解放！”他声称，由于对实现这一目标进行阻挠，奥匈帝国已经使得“整个塞尔维亚准备与其展开生死较量”势在必行了。

米洛瓦诺维奇的窘境正是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决策者们面临诸多压力的真实写照，这位聪明而谨慎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塞尔维亚地理位置和目前状况的局限性。1908～1909年的冬天，所有列强都在敦促塞尔维亚做出妥协、接受现实。但米洛瓦诺维奇同样知道，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绝对不可能公开否认塞尔维亚统一的民族进程。无论如何，米洛瓦诺维奇本人就是对这一进程的狂热和忠诚的拥护人。他曾说过，塞尔维亚永远不能停止实现统一的事业。“从塞尔维亚的立场来看，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又能投射出政治和种族义务背后的思维方式。关键的一点在于，如米洛瓦诺维奇这样温和的人（甚至还包括帕希奇，他最终动摇了呼吁战争的立场）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仅在于如何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他们并没有也不希望去否认民族主义进程。从国内方面来看，极端主义者总是占据言论上风，因为发起争论的正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和派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接受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他们也采用极端主义者的语言和口吻表达观点。由此，外部观察者若想分辨政治精英们的态度变化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动态的政治文化非常危险，1914年6月和7月，它同样影响了贝尔格莱德。

最终，奥匈帝国还是得手了，贝尔格莱德被迫于1909年3月31日公开放弃了自己的声明。历尽千辛万苦，政府终于扼制住这种狂热。贝尔格莱德答应维也纳解除武装，并与“志愿军及其他组织”脱离干系。民族自卫组织被剥夺了其发动反抗的权利和战争补助，该组织转变为（至少是从外部发生转变）一个和平的泛塞尔维亚宣传和信息机构，其运营与一系列其他民族主义联盟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Soko体育社团，及一些旨在通过文学作品、公共教育和青年工作加强塞尔维亚文化的组织。

塞尔维亚或许并没有改变兼并结局，也没有获得米洛瓦诺维奇要求赔偿的领土，但这件事同样带来了两大变化。首先，这次危机促成了贝尔格莱德和两大列强之间的关系进入蜜月期。一位新俄国公使的上任加强了其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他就是尼古拉·哈特维希男爵（Baron Nikolai Hartwig）。他热情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持亲塞立场。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暴毙，他的影响力一直居于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除此以外，与法国的金融和政治关系也得以加强，这表现为法国贷出的一笔巨额贷款，目的是要实现塞尔维亚军队的扩张，并提高其战斗力。

其次，1908～1909年的愤怒和失望使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在兼并的问题上，尽管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野心。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也由此出现了裂痕。身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在该地仍与保加利亚处于冲突状态）的一位民族激进主义者波格丹·拉登科维奇（Bogdan Radenković）会见了马

其顿前线的军官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1903年的谋反者），共同商讨成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商谈的结果便是1911年3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一间公寓内成立的“不统一毋宁死”组织，也就是人们所知的“黑手社”。在当天出席成立会议的7个人中，“阿匹斯”（现在是军事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便是一员，他得到了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带领着一群年轻的谋反者队伍及其同僚。毫无疑问，“不统一毋宁死”组织的规章宣称了其目标为“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其他条款同样规定了所有成员要对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塞尔维亚是所有塞尔维亚人，当然还是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核心”这一观点。为了宣传组织的职责和意志，他们还创立了刊物。这一新的举动假设了无所不包、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塞尔维亚概念。为了时刻准备着为大塞尔维亚的实现进行暴力抗争，整个社会需要在所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内开展革命性的工作。在塞尔维亚国境线以外的地区，人们同样需要采取一切手段与明显的敌人斗争。

在完成“国家事业”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发现，自己越发成为塞尔维亚民主议会体制的敌人，尤其是人民激进党——他们将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称为“国家的叛徒”。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内部，塞尔维亚军方对人民激进党一直以来的憎恶仍在持续。其中可以发现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要更迭国家主权所有者（1903年，他们达成了这一目标，但对塞尔维亚来说并没有带来值得称赞的好处），还要彻底对塞尔维亚的政治和社会进行洗牌（“使这个堕落退化的种族获得生机”）。

他们同样对神秘仪式表现出狂热的态度。成员在加入时必须举行仪式，该仪式是由一位名叫约万诺维奇–丘帕（Jovanović-čupa）的内部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成员）设计的。新加入的人要在一间漆黑的屋内，在一个蒙面的塑像前发誓，表明自己完全服从组织，无论痛苦或死亡的决心。

> 我（名字），即将加入“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在普照我的阳光下，在滋养我的土地上，在上帝面前，在祖先的鲜血前，我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从这一刻起，直到死亡，我都将忠实于这个组织的纪律，我将时刻准备着为此做出牺牲。
>
>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执行所有命令，义无反顾，毫无疑义。
>
>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终生保守组织的秘密，直至将秘密带入我的坟墓。
>
> 如果我对誓言有所背叛，愿上帝和我同组织的战友们成为我的审判者。

但该组织并没有书面纪录，其成员没有正式的登记名单，管理机构松散，每个成员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因此对组织的规模以及活动并没有

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因此，该组织究竟发展到何等规模，仍然无人知晓。截至1911年，成员数量增长至2 000~2 500人；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成员数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根据一位曾当过逃兵的人提供的数据，这一人数达到10万~15万人，但这种依靠回忆的估量显然夸大了事实。无论确切的人数究竟是多少，黑手社的确很快融入了塞尔维亚的官方机构：从它在军队的机构开始，逐步渗透到边境部队的官员和海关军官中，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地区。在波斯尼亚，仍然有大批间谍机构招募的新成员为民族自卫组织工作，尽管该组织曾在1909年表面上解散。他们开展的活动中，有一项是维持恐怖主义训练营的存在。在那里，成员们接受射击术、投掷炸弹、炸毁桥梁和间谍活动训练。

老练的阴谋家“阿匹斯”为组织设立了标准，对神秘主义的狂热与他的性格相吻合。组织的官方标志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圆形的图案中，具备了头盖骨、交叉的腿骨、一把匕首、一个装满毒药的玻璃瓶和一颗炸弹的元素。之后，当被问及为何他和他的同僚们采用这些标志物时，“阿匹斯”回答道，对他来说，“这些象征看起来并不骇人、并不消极”。毕竟，这是所有抱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塞尔维亚人的任务——“用炸弹、匕首和枪支保卫国家”。他还回忆道：“当我在马其顿时，人们就已经使用毒药了。所有游击队员都要随身携带，其目的不仅仅是攻击敌人，还在于解救落入敌手的战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标志出现在组织的徽章中，这是大家视死如归气概的象征。”

但在公众眼中，黑手社的神秘性却充满矛盾。流言蜚语接踵而至，称政府和媒体已经觉察到了它的存在，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接替放弃权力的哥哥乔尔杰位子的亚历山大王子被提前告知了这个新组织的存在，并对其活动予以支持。（王子本人是一小撮资助方中的一员，在这些人的资金帮助下，该组织创立了自己的刊物。）其招募新成员的过程并不正规，通常是半公开性的；成员对于组织的爱国工作很少参与，许多官员加入组织之后便相安无事了。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里却经常举办晚餐和宴会，届时，“阿匹斯”也会与会并主持，他坐在长桌边，挤在一群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中。当贝尔格莱德的指挥官米洛什·博扎诺维奇（Miloš Bozanović）向他的部下科斯蒂奇少校（Major Kostić）询问关于黑手社的信息时，科斯蒂奇充满疑惑地回答：“您真的不知道吗？这人尽皆知啊。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时都会谈及这个组织。”或许对于一个像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里，人们相互认识，在咖啡馆而不是家里进行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黑手社这种引人注意的秘密状态或许同时也在满足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如果无人知晓你是一个秘密组织，那么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特征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人们目睹在桌前和其他共谋者举杯同饮、共进晚餐会让他们意识该组织的重要性；对那些名义上不在组织内但知情的人来说，这样会让他们形成震撼人心的共谋之感。对于一个声称代表了塞尔维亚国家沉默的大多数的组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该组织的存在是人尽皆知的，那么对于组织的目的则出现了

五花八门的解读。帕希奇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民激进党领导人的想法，他们认为黑手社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从内部推翻塞尔维亚国家——似乎将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仅仅当作颠覆国家的幌子。这种误解也被写入了许多外交报告中。例如，消息一向很灵通的驻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其1911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黑手社作为爱国团体的主张和在塞尔维亚国外开展行动以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的行动，“仅仅是种伪装，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国内事务”。在1914年危机爆发时，奥匈帝国当局始终被这种误解所蒙蔽着。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不统一毋宁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的行动与当地本土泛塞尔维亚激进者组织相互交织，后者中最重要的当属波斯尼亚青年党。波斯尼亚青年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更像是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革命青年团体和个人的集合（约从1904年开始），其聚焦的塞尔维亚地区与黑手社和民族自卫组织相比，范围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行动正是在奥匈帝国警方的眼皮底下开展的，因此这些波斯尼亚青年采取了一种以小圈子为基础的隐藏的、灵活的组织形态，这些圈子仅通过指派的中间人相互联系。1910年，波斯尼亚青年党的活动进入鼎盛期，其中一位成员向在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总督发起了自杀式袭击。1910年6月3日，趁波斯尼亚议会成立的契机，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学生波格丹·热拉伊奇（Bogdan Žerajić）向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Marijan Varešanin）开了5枪。这几颗子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热拉伊奇打出了第6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朝着自己的脑袋。他以无名者的身份埋葬在专门为罪犯和自杀者而设的萨拉热窝公墓，但他的坟墓不久后变成了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圣地，他的行为也受到贝尔格莱德民族主义媒体的吹捧。

没有人对热拉伊奇荣誉的赞扬能比得上他在波斯尼亚青年党的同伴弗拉迪米尔·加契诺维奇（Vladimir Gačinović）。加契诺维奇曾离开波斯尼亚，到贝尔格莱德读高中，之后在那里读大学；刚读了一个学期，他便赢得了去维也纳大学就读的政府奖学金。1911年，他同时参加了“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和民族自卫组织。在他回到萨拉热窝之后，他在这座城市成立了一个激进者组织。但加契诺维奇这个名字被人们熟知则是由于他写的一本歌颂热拉伊奇的生与死的小册子。《英雄之死》（*The Death of a Hero*）对这个饮弹自尽的杀手的描述是“行动果敢、充满力量、满载生之荣耀的人，他是新纪元的开拓者”，并在书的结尾提出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年轻的塞尔维亚小伙，你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加契诺维奇的小册子作为违禁作品在波斯尼亚广泛流传，并成为泛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之流最热衷的作品，它也将行刺和牺牲的主题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索沃史诗。热拉伊奇的行动标志着系统使用政治恐怖主义打击哈布斯堡皇朝政治家的开端：从热拉伊奇的死一直到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决定命运的枪击案发生，在王朝辖区的南斯拉夫行省内，类似事件发生了7起，并有十几起阴谋被扼杀在摇篮中。

三次土耳其战争

1911年9月末，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成立仅6个月时，意大利对利比亚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场对奥斯曼帝国所辖范围内地区平白无故的袭击使机会主义者抓住良机，因此引发了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控制地区内的一连串袭击。巴尔干国家之间也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向奥斯曼帝国辖区同时发动了攻击，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始于1912年10月，1913年5月结束）。战争的结局是巴尔干同盟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逐出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1913年6~7月），交战国又为第一次战争赢得的战果而反目：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战争中最明显的受益者正是塞尔维亚：它获得了瓦尔达尔中部地区，包括奥赫里德、比托拉、科索沃、什蒂普和科查尼，此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行政区新帕扎尔的桑扎克东边的部分（西部被黑山占有）。塞尔维亚的领土从1.86万平方英里[4]扩张到3.39万平方英里，人口数也至少增加了150万。举国上下皆大欢喜，因为他们获得了科索沃地区——这片塞尔维亚民族史诗中的神秘土地。由于扩张后的塞尔维亚在西面与黑山接壤，通过与其邻居结成政治联盟，塞尔维亚被认为获得了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永久权。此外，塞尔维亚的参战似乎表明这几年法国用于塞尔维亚军事投资的贷款并没有白白付出（1913年9月，法国银行的财团又为其提供了一笔大额资金贷款）。在第一次动员令下达之后，3周内便有30万兵力在国内集结。一位国外观察家记录道，当时，塞尔维亚的军力已经“成为不得不被重视的力量”，且这个国家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角色。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Dayrell Crackanthorpe）记录了人民高涨的情绪：“可以这样说，塞尔维亚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大部分，并且能够遵循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政策了。”举国上下的政治精英都在“经历一个极端自我满足的阶段”，媒体和舆论铺天盖地地谈论着塞尔维亚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时刻将这种胜利与奥匈帝国外交的失败做对比。

对于有些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新征服的领土的人来说，强加在他们之上的塞尔维亚法规带来的却是烦恼和压迫。1903年塞尔维亚宪法规定并保证的组织、集会和媒介自由（分别为第24、25和22项条款）并没有被带到这些新扩张的领土上，同样，第13项条款（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也不适用于这些地方。此外，这些居民没有投票权。换言之，一时间，新征服的土地带有一种殖民地的色彩和特征。对此，政府对这些决定做出了以下的解释：新扩张领土的居民的文化水平过低，赋予他们自由会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考量是，将一个以非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地区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诸如Radičke Novine和Pravda这样的反对派媒体很快便讽刺道，实际上，这些“新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统治下享受的政治权利远不如土耳其人统治的时期。

对塞尔维亚来说，这场战争带有二元性，它不仅包括正规军集团的作战，还有（和过去发生的战争一样）游击队组织及其他自由作战的勇士。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官方和非正规集团的联手作战导致了惊人的后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例如学校、澡堂和清真寺，进行恣意的损毁。英国领事绞尽脑汁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他劝说当地的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称某些建筑物可以追溯到斯特凡·杜尚的年代，因此这些建筑是塞尔维亚的国家遗产。这种策略成功了，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座美丽的16世纪土耳其式古桥。

1913年10月和11月，英国在斯科普里和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们报道了塞尔维亚在所吞并领土上的行为：一贯地胁迫、恣意地扣押、殴打、强奸、焚烧村庄以及大屠杀。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格雷格（Greig）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对其统治下的穆斯林进行定期的大屠杀和驱逐。"11天后，他又发了另一篇报道，警告"在塞尔维亚军队异乎频繁、野蛮至极的大屠杀和烧杀抢夺下，保加利亚几个地区内的人口，特别是穆斯林人口，濒临灭绝的危险"。到月底，"塞尔维亚军队伙同那些狼狈为奸的人以另外的形式进行的抢掠、谋杀和凌辱"，已经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根据副领事在12月的报道，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其人以及犹太人非常担心自己将被一个"不名一文的国家"所统治，这个国家"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将每个团体榨干，直至回归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日子，而这种黑暗程度还无人知晓"。这位英国副领事从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比托拉进行报道称，原来的地方官员已经被一伙腐败的"塞尔维亚前宣传人员"组成的新队伍取代，这个罪恶团伙的头目们"曾经做过理发师，或是塞尔维亚的特工和间谍；从事过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的当地塞尔维亚人"。格雷格总结道："对于塞尔维亚的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帮人建立的恐怖组织更能令他们欢欣鼓舞的了。"

这些报道的耐人寻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令人不安的内容，还在于那位明显带有亲塞情绪的英国公使克莱肯色普对此持有的怀疑态度。克莱肯色普关于那些被吞并地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仅是"一位熟知的塞尔维亚军官"；他仅从字面意思上就接受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官方否认，并试图通过说服外交部消弭格雷格发自莫纳斯提尔的报道的影响力——这位副领事上了那些歇斯底里的难民以及他们荒谬言语的当。当然也有人会说，联盟体系中的国家会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塞尔维亚因此成为在一场与其可怕的邻居奥匈帝国之间的蔚为壮观的抗争中以友好姿态奋斗的国家。只有那些来自被吞并地区（以及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官方报道才会越来越激烈地向英国外交部力陈马其顿暴行不应当被视为奥匈帝国的宣传手段。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丝毫没有兴趣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暴行，也没有兴趣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当英国警告帕希奇发生在比托拉的事件时，他只是简单地回复称，他私下里并不认识那里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不做评论。他关于派遣一位专员到南方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提议从未得以实施。在君士坦丁堡，当有塞尔维亚公使告知他穆斯林显贵

们的不满时，他声称，这些来自移民的故事将他们的遭遇夸大其词，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新同胞更容易接受自己。当卡耐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公正无私的国际专家组成）来到巴尔干地区，执行他们的任务，即调查发生在争议地区的暴行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任何帮助。

一时间，战争似乎缓和了贝尔格莱德执行机构之间的紧张情绪。在这段时间里，地下组织、正规军、各个党派以及内阁部长都在国家问题上统一了战线。在塞尔维亚1912年发动入侵之前，“阿匹斯”被委派到马其顿，负责执行军队的秘密行动。1913年与阿尔巴尼亚酋长们的协商中，黑手社实际上在贝尔格莱德扮演了外交部的武装力量的角色。在对南部新征服地区的平定中，不仅牵扯到正规军，还涉及志愿者队伍，后者由沃亚·坦科西奇等黑手社人员领导，而这位坦科西奇正是杀害德拉加王后两个兄弟的谋反活动的监督者。1913年1月，“阿匹斯”被提拔为陆军中校，并在8月被委任为总参谋部情报机构的头目（这一角色使他控制了在奥匈帝国内部广泛开展的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黑手社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巴尔干战争一结束，原来的统一体便呈现分裂的态势——关于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得军民关系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一方是塞尔维亚军方以及来自独立激进党反对派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占据内阁大部分剩余席位的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争端集中在新土地的管理模式问题上：帕希奇内阁意图依法建立一个临时的人民管理体系；与此相反，军方仍坚持军事化统治。仰仗着最近取得的胜利，军事领导人拒绝出让被吞并地区的统治权。这已经不仅仅是控制权的问题，而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些强硬派分子坚信，只有靠一种稳固和狭隘的管理方式，塞尔维亚才能够在多元种族兼存的地区施加控制。当激进派内政大臣斯托扬·普罗蒂奇（Stojan Protić）在1914年4月正式将军队归属行政当局时，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新领土的官员们拒绝遵守法律条例，军事派使军队团结议会中的独立激进反对派，正如1903年的谋反者们所为。甚至还有传言称，一支由“阿匹斯”率领的贝尔格莱德独立军团会开赴皇宫，逼迫佩塔尔国王退位，并对人民激进党内阁成员实行暗杀。

直到1914年5月，贝尔格莱德的形势不得不依靠外国势力进行干预，才能阻止帕希奇政府的倒台。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出人意料地公开宣称俄国的巴尔干政策需要保留帕希奇的执政才得以开展。法国政府也对他表示支持，暗示如若帕希奇政府倒台，而由独立派和军事集团成员继任的话，那么法国将中止自1905年便开始的对塞尔维亚慷慨的国家金融投资。这种情况似1899年事件的拙劣重现，当时老谋深算的人民激进党领导在奥匈帝国公使的干涉下得以自保。而此时，“阿匹斯”选择从争吵中抽身而退——显然这是高人一等的做法。面对威胁，帕希奇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1914年6月大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这场并不透明的政治斗争中，丝毫没有什么能够让身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事务观察员感到宽慰。正如戴雷尔·克莱肯色普在1914年3月指

出的，激进派内阁提出的“更为节制和谨慎的观点”以及受到黑手社影响的“军事政党”的意见，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奥匈帝国不久后会分崩离析，塞尔维亚将成为这片广大国土的继任者，大家都在等待着大塞尔维亚的实现。分歧在于采取的方式不同：军事政党坚信“当这一时刻到来，应当采取侵略战争，国家已经蓄势待发”，而更为温和的人们则认为“奥匈帝国的瓦解终归会实现，但这并不是外力使然，而是源于帝国内部”，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此外，从制度上看，塞尔维亚官方的温和派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方的高层及其情报机构（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报系统）、海关总署、内政部门以及其他政府组织皆为网状系统，这个网状系统又深深地渗透于国家当中。

阴谋

若要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案的细节进行重构，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刺客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使贝尔格莱德摆脱干系：幸存的参与者拒绝透露内幕，其他人或夸大其词、轻描淡写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导致了证据的混乱和相互矛盾。对于这场阴谋，并没有现存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都习惯于保守秘密。塞尔维亚究竟有没有蓄意和刺杀行动的组织相勾结？这一鬼祟的勾当并没有真实的文件记载。因此，关于这次阴谋的编史工作只能靠一些战前的回忆录、证词和口供等拼凑在一起来开展，而这些证据都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些还建立在已销毁的或是零星残存的文件来源所声称的内容的基础上，它们大多数甚至与阴谋的计划和执行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关于这次刺杀行动背景的资料仍然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尽而充满分歧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冗杂、失真和充满偏见的材料和二手文献中披沙拣金，总结出一个具有“最大合理性”的结果，拨云见日。

在这场行动背后，“阿匹斯”是其总设计师，但这个行动创意本身或许真正来自他的助手拉德·马洛巴比奇（Rade Malobabić）——一位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马洛巴比奇是一位间谍，为民族自卫组织效力多年，搜集关于奥匈帝国防御工事和军队动向的情报，并把它们交给塞尔维亚的边防军官（这些军官同样是黑手社的成员），通过他们再递交给塞尔维亚的军事情报机构。马洛巴比奇身为特工，具有超凡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他对边界地带了如指掌，数次从奥匈帝国当局的逮捕中成功脱身。据说，为了将情报报告给塞尔维亚的接头军官，有一次他横渡了近乎冰点温度的德里纳河，他出现时身上挂满了冰碴。马洛巴比奇很可能是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位明显的奥匈帝国继任者）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的消息告知“阿匹斯”的第一人。

我们很难了解“阿匹斯”为何迫切敦促刺杀大公行动的开展，因为并

没有关于他的动机的直截了当的解释。1914年年初，波斯尼亚当地的激进分子主要将其敌意聚焦在管辖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地方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身上，他同时也是瓦雷沙宁（1910年6月，热拉伊奇对其行刺未遂）的继任者。随着仇恨的目标被转移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上，“阿匹斯”挥舞起手中的政治指挥棒。对于一位地方官员的行刺当然会闹得满城风雨，但这件事很容易被定性为由地区统治导致的区域性事件。与此不同，在哈布斯堡皇朝现任皇帝已经83岁高龄时，对该王朝继任者的刺杀则注定被视为动摇其生存根基的毁灭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成为目标，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其对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采取敌对措施。恰恰相反，如果借用杀手普林西普的话说，“作为未来政坛的首领，他将通过一定的改革手段阻止我们实现统一。”普林西普暗示着斐迪南大公对君主政治改革方案表示支持，而这将赋予斯拉夫民族更强的自治性。许多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者认为此举对于统一大业来说将是潜在的威胁。如果哈布斯堡皇朝按照联邦制原则实现成功转型，将整体一分为三，使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萨格勒布（一个与布达佩斯处于同一地位的首都城市）共同统治，那么这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危险的——它将会丧失其作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将斐迪南大公作为打击对象成为恐怖行动的典型逻辑，即温和的改良者比激进的敌人和强硬派更值得担忧。

那些被挑选执行行刺斐迪南大公任务的人都来自民族统一主义组织。三名将要作为刺杀核心力量被送往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皆由沃亚·坦科西奇招募而来。当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Ž）、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坦科西奇这位伯乐选中时，他们都只有19岁。他们彼此是好友，经常相互来往，尤其是在各自的公司里。格拉贝日是帕莱地区一位正统神父的儿子，他的家乡位于距离萨拉热窝东部12英里[5]的地方，他来到贝尔格莱德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查布里诺维奇在他14岁时就辍学了，之后就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专门出版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的公司当印刷员。像格拉贝日一样，普林西普也是为了求学才来到贝尔格莱德的。他们三人都出身贫寒，且家庭并不幸福。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中，都饱受父亲独裁一样的压制。在审讯过程中，查布里诺维奇告诉法官，当他还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虐待他，原因是他在萨拉热窝的学校读书时的表现平平，这个男孩最后因为打了他的一位老师的耳光而被学校开除。来自家庭的压力逐渐恶化，查布里诺维奇之后甚至成为一名为奥地利人服务的警察卧底——这也是这位男孩希望抹杀的污点，因此他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格拉贝日同样被图兹拉的文法学校开除，因为他给了他的教授一拳。当时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普林西普有定期收入，这来源于他的父母微薄的收入，但这些钱通常用于与朋友们一起挥霍，或是借给贫穷的熟人。查布里诺维奇之后回忆道，初来贝尔格莱德时，他曾有几天都拖着行李箱（这是他所有的家当）流落街头，大概是因为无处栖身。因此，这些男孩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这并不奇怪。他那时或许是得了痨病，疾病迫使他早早地离开了萨拉热窝的学校。根据审讯的备忘录，他被描述为“一个个头很小、

很脆弱的年轻人”。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年轻时）



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

这些男孩并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们在阴郁的环境中长大，却又年轻气盛；他们颇有些理想主义，却又缺乏经验。这些品质正是现代恐怖活动滋生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对饮酒没有嗜好。尽管他们也向往浪漫的恋情，但他们并没有沉迷于异性交往。他们阅读民族主义的诗歌、报纸和小册子。这些男孩充分地了解塞尔维亚国家的苦难遭遇，他们谴责所有人，除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同胞所遭到的蔑视和侮辱。一个不断被提到的话题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经济萧条（这种抱怨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上，与大多数塞尔维亚中心城市相比，波斯尼亚在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他们一再强调的，甚至成为一种偏执的思维。普林西普甚至还抽时间全文背诵《高山花环》——彼得罗维奇–涅戈什的一部情绪昂

扬的史诗，它赞美了一位自私的谋反者米洛什·奥比里克。普林西普在审判中向法官陈述，在行刺前的几日，他照例去了自杀式袭击者波格丹·热拉伊奇之墓——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通常日夜守候在那里，思考我们民族的境遇、我们糟糕的处境，和他本人（热拉伊奇），之后我决心执行这项刺杀任务。”同样，查布里诺维奇也声称自己在抵达萨拉热窝之后不久就去凭吊了热拉伊奇的墓。当发现这座墓已经被遗忘之后，他还献上了花（奥地利人关于该审讯内容做出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注脚：这些鲜花被附近墓地的扫墓人偷走了）。查布里诺维奇称，就是在拜谒热拉伊奇安息之地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这样的念头：像热拉伊奇那样死去，并且付诸行动。“无论如何我都清楚，我不会苟活。自杀的念头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

竟然有人徘徊在一位自杀者的墓前，这是十分有意思且意味深远的。这位自杀的刺客非常符合科索沃英雄的特征和举止，并且象征着狂热的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意识觉醒——他们的期刊、日记和通信中无不充斥着自我牺牲的字眼。就连袭击事件本身似乎都是热拉伊奇行为的翻版，因为普林西普原本计划将地点准确地定在热拉伊奇当时的行动地点——国王大桥，他说：“我想与已故的热拉伊奇一样，从同一个方位射出子弹。”

对于所有刺客来说，贝尔格莱德就像一个温床，将他们的政治观点激进化，并把这些观点同塞尔维亚的统一大业紧密相连。审判纪录中，查布里诺维奇口述他是如何在1912年病得无法继续在塞尔维亚工作，并且决定返回家乡时，来到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办公室，被告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经常能够得到回萨拉热窝的旅费。瓦西奇（Vasić）上校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他是当地民族自卫组织的秘书。瓦西奇给了查布里诺维奇钱和爱国文献，还没收了他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并告诉他这些被没收的东西并不值得牵扯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爱国者的精力，瓦西奇鼓励他，要时刻做“一个优秀的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些饱受男性权力煎熬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以类似的会见对他们进行重塑是十分关键的。在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前辈们不仅准备在金钱上帮助这些迄今为止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建议，同时还表现出真情实感和尊重，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属于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是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参与者。

对于民族运动来说，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怀，并介绍他们加入组织，是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萨拉热窝时，查布里诺维奇发现自己与以前接触的社会主义观念环境格格不入了；当意识到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同志们谴责他为塞尔维亚的煽动者和间谍，并将他驱逐出该政党。1913年重返贝尔格莱德时，查布里诺维奇已经不再是一名“左翼”的革命派，而是“混入民族主义成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普林西普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在1912年5月离开萨拉热窝之后，为了完成中学教育，他来到贝尔格莱德，同样遇到了孜孜不倦的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瓦西奇上校。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瓦西奇协助普林西普前往奥斯曼帝国边境，签署成为志愿兵的协

议，但当地的司令员（无独有偶，这位司令员正是沃亚·坦科西奇）拒绝了他，理由是他“个头太矮，体型瘦弱”。

与瓦西奇这样的激进分子和民族自卫组织的宣传的接触同样重要的是咖啡屋里的社交环境，它为漂在贝尔格莱德年轻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提供了一种归属感。查布里诺维奇经常去的咖啡屋有“榛子花环”、“绿色花环”和“小金鱼”，根据他之后的回忆，他在这些地方听到了“各种方式的谈吐”，那里还混杂着“学生和排版工人”，但最多的还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用餐，他们吸着烟，谈论着政治，争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正是在“榛子花环”和“绿色花环”咖啡馆，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第一次思考了刺杀奥匈帝国继承者的可能性。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勃朗宁手枪和子弹的黑手社高层人员成为“贝尔格莱德咖啡馆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普遍的政治立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奥匈帝国情绪。审判纪录中的公开纪录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官询问普林西普，格拉贝日究竟是如何树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普林西普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格拉贝日）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也接受了相同的原则。”在获悉了他的言外之意后，法官继续发问：“也就是说，只要来到贝尔格莱德，你们就能够成功向别人灌输这样的观点了？”当发现自己被看透之后，普林西普拒绝做任何评论。



米兰·齐加诺维奇

在这场刺杀计划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策划者们就力图确保自身与贝尔格莱德当局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关系。管理这伙刺客的是一名叫米兰·齐加诺维奇（Milan Ciganović）的人，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曾在坦科西奇麾下的游击队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当时，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铁路的员工。他向坦科西奇汇报情况，后者则直接与“阿匹斯”接头。所有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

刺客的训练活动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开展。在游击队学校时，普林西普便已经掌握了射击技巧，他是三个人中枪法最准的。1914年5月27日，他们拿到了武器——来自位于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军工厂的4支手枪和6枚手榴弹（每枚都不足2.5磅[6]）。此外，他们每人随身携带一只用棉布包裹的小瓶，里面是氰化物毒药。在行刺成功实施或者失败之后，他们必须吞食氰化物自杀。这是在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疏忽的举动或是严刑逼供使得塞尔维亚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更何况对这些年轻气盛、迫切地想为国捐躯并将这种行为视为殉道的年轻人来说，这样做再符合不过他们的意愿了。

在黑手社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这三名刺客成功潜入波斯尼亚。5月30日，查布里诺维奇在黑手社地下铁路特工（这些特工中有几名中学教师、一名边防警察、一位市长秘书等）的协助下，成功通过了玛利沃尼科的边境检查站，并由此踏上了去往图兹拉的路。在那里，他将与他的朋友们汇合。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则在塞尔维亚边境官员的指引下来到莱捷斯尼卡，并于5月31日出现在德里纳河上位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领土交界的一座植被葱郁的小岛上。这个藏身之处经常出现走私者，它很好地保护了他们，躲过了奥匈帝国边防警察的巡查。当次日夜幕降临时，在一位为地下铁路组织工作的业余走私者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奥匈帝国的领土。

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躲过奥匈帝国边防警察或者军官，但这三位刺客以及帮手们却在与他们的塞尔维亚同胞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极度的轻率。比如，在将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带到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农民米塔尔·凯罗维奇（Mitar Kerović）家后，那位身为地下铁路特工的教师喝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他对那位农民大吹特吹："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是谁吗！他们将要去萨拉热窝，向马上到来的斐迪南大公投掷手榴弹把他炸死。"出于一种鲁莽的逞强劲头，普林西普也加入进来，炫耀起他的手枪，并讲解藏在裤子里的手榴弹是如何操作的。因为他们的愚蠢，凯罗维奇家族（这些大字不识一个、丝毫不关心政治，并且对这些男孩的行为仅一知半解的人）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内乔·凯罗维奇（Nedjo Kerović）因为驾驶他的马车将这些男孩运送到图兹拉，之后被判通敌罪，因为成为杀人犯的同伙而被判处死刑（之后改为20年监禁）；他的父亲米塔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14年10月对刺客的庭审现场，他们的供词为整个严肃的审讯过程带来一丝罕见的幽默。当主审法官问到其年龄时，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的内乔·凯罗维奇回答，他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这得问他的老父亲。而当米塔尔被问到男孩们抵达他家的那晚，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时，他回答："在我喝酒的时候，我并不会统计自己喝了多少，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到达波斯尼亚后，这些男孩身边又多了一个四人集团，这一集团是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ć）招募而来的。伊利奇23岁，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他曾获得奥匈帝国政府奖学金，被培养成一名中学教师，但在大病一场后，他抽身而退。他是波斯尼亚青年党成员，私下与加契诺维奇是朋友——也就是那位对热拉伊奇高歌赞扬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伊利奇在1913年来到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经常光顾咖啡馆，被招募进入黑手社，并在1914年3月重返萨拉热窝之前（之前他在萨拉热窝一家当地的报社当审校员和编辑）赢得了"阿匹斯"的信任。

第一个被伊利奇招募进刺杀队伍的是"左派"革命者——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uhamed Mehmedbašić）的黑塞哥维那穆斯林木匠。1914年1月，他们在法国与沃亚·坦科维奇会面，计划行刺波蒂奥雷克，但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在火车上，穆罕默德巴希奇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惊恐万分，将那装着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连行刺

的匕首也被他扔出了窗外）。另外两名被招募进来的萨拉热窝人是波波维奇（Cvijetko Popović），他是一名优秀的18岁的在校生，以及瓦利可·丘布里洛维奇（Veljko Čubrilović），那位带领他们来到凯罗维奇家的中学教师是他的哥哥。丘布里洛维奇只有17岁，是这里面最小的男孩。在所有人被整合成一支队伍之前，他从未见过伊利奇；这两位当地的男孩同样只有在行刺行动中，才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穆罕默德巴希奇、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

乍一看来，伊利奇选拔的行刺者队伍十分奇怪，其中一人在执行高度危险的任务时已经暴露出他的笨拙和胆小，而另外两人完全还是毫无经验的中学生，但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却有它的策略。萨拉热窝当地的第二组人马的任务实际上是对行刺活动进行掩护和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巴希奇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能力欠佳，但他干劲儿十足，而且不是塞尔维亚人，因此可以为贝尔格莱德小组提供有效的支持。作为黑手社成员，伊利奇和普林西普可以轻易选择自杀，或至少在事件之后保持沉默。萨拉热窝男孩无法对此作证，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其背后更大的阴谋一无所知。因此，该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定性为一个地区性事件，而与贝尔格莱德毫无干系。

尼古拉·帕希奇的反应

尼古拉·帕希奇对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阴谋究竟了解多少？他会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事情的发生？实际上，帕希奇对该计划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这种判断有若干证据支持，但大多数有说服力的证据都来自柳巴·约万诺维奇（Ljuba Jovanović）——帕希奇政府的教育大臣。根据约万诺维奇的回忆（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残篇，但也可能写于更早的时期），帕希奇告知塞尔维亚内阁，“在5月底或是6月初”，“有人计划来到萨拉热窝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认为，总理应当向德里纳边界的军官下达指令，防止有人穿越边境。其他文件和零星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1918年帕希奇自己整理的，他整理这些文件的原因很奇怪且不详）。但是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根据间接证据猜想，给他提供消息的人最有可能是塞尔维亚铁路雇员、黑手社特工米兰·齐加诺维奇。他很可能是总理本人的私人特工，他的任务就是时刻关注社会活动的动向。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帕希奇便掌握了所有细节和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不仅是行动计划本身，还有参与者及其背后的组织。

塞尔维亚官方当然没有留下关于三位刺客的任何纪录。他们在5月底进入波斯尼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是1914年夏非法携带武器跨越边境的唯一一批人。6月的前半个月，来自塞尔维亚边防的报告证实，被隐瞒的越境活动还有很多。6月4日，波德里涅区区长警示内政大臣普罗蒂奇称，有军官正伙同边防人员预谋“利用我们在波斯尼亚的人，转移

一批数量可观的炸弹和武器”。这名区长考虑将武器查封，但因为装着它们的箱子已经到达波斯尼亚境内，他担心追回箱子可能牵连并暴露边防军队的行动。更多的调查显示，在波斯尼亚一方负责接洽这批武器的人正是拉德·马洛巴比奇。

据一位当地的官员所说，这些行动耸人听闻的是，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相关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开展的。再加上犯罪者正是“政府官员”，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欢迎这样的行动。”帕希奇和内政大臣普罗蒂奇深谙这个道理。如果帕希奇在计划尚未出炉就已经知晓，我们将期待他尽一切可能撇清它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关系。6月10日，边境地区当局确实得到风声，要求“制止所有类似的活动”。

而这些相关地区的公务人员是否当机立断地禁止这些行动则是另一码事儿了。赖科·斯特潘诺维奇（Raiko Stepanović）是边防警卫的一名警官，他走私了一只装满枪支和炸弹的箱子越境，但当他被传讯向区长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却直接拒绝露面。在6月中旬的一次会议后，民政当局收到官方命令，要求严查向波斯尼亚非法运送武器和人员的事例；4名边防警卫的领导收到一封简短的告示，“建议”他“停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输送武器、军火以及其他爆炸物”。但这些信息都被当作耳边风，无人回应。后来的事情显示，边界军事人员从他们上级那接受了严格的指示：不理会民政方面的有关问题。

换言之，塞尔维亚边界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受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控制。当军政大臣上书总参谋部，质疑并要求告知关于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暗中行动时，这一请求先是被呈上至行动指挥部，该方称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清楚；之后，军事情报处的头目便知悉了此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匹斯”本人。在向行动部门递交的一篇冗长的、毫无诚意且言语并不坦率的反馈中，“阿匹斯”为马洛巴比奇的纪录和此人的声誉辩护，坚称任何经他手的枪支纯粹是为了支持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开展的特工行动。关于那些炸弹，他声称一无所知（3年后，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私下委托马洛巴比奇，为他的刺杀计划提供装备和支持）。他说，如果边境地区出现了安全风险，则不能归咎于谨慎而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是那些政府官员和特工的问题——他们傲慢地要求对边界进行巡查和监督。简而言之，错就错在那些人试图干预敏感的军事行动，而这又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和理解力。这一回复被呈到了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接着在6月23日由总参谋部部长整理、签署，递交到了军务部。民政当局和军事领导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从德里纳河岸到贝尔格莱德当局无不如此。

“阿匹斯”以及总参谋部语气强硬的反馈使得帕希奇十分恼火和紧张。6月24日，他采取行动，下令对边防警卫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在一封写给军务部的顶级机密信件中，他写道，根据“多方”了解，“军官们”从事着一些不但很危险，而且具有叛国性质的活动，“因为其妄图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制造冲突”。

> 如果塞尔维亚所有的盟友和伙伴知道我们的军官和警官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仅会弃我们而去，还会站在奥匈帝国那边，允许它惩罚那个浮躁的、靠不住的邻居。因为它唯恐天下不乱，并要在邻国的领土内开展行刺活动。从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任何挑唆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的事情都应当终止，因为我们需要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信末还附加了一道命令，要开展一项“严肃的调查”，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军官牵扯到这种荒唐而鲁莽的行为中，希望能够对反抗的势力进行“清除和镇压”。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悬崖勒马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年轻人已经在5月底成功穿越了边境——这距离帕希奇采取行动关闭边界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很难想象，在行刺这件事上，为何这位总理的反应如此迟缓。他肯定已经认识到，下达给边防警卫的命令一定会被当作耳边风，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黑手社的成员。或许是因为他担心激怒这位强大的对手——“阿匹斯”，招致可怕的后果。尽管他下达了“严肃调查”边境人员的命令，但“阿匹斯”仍然不为所动，自始至终都稳坐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第一把交椅。他并没有因此被革职，甚至当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他竟成功逃脱了责任。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14年5月那场给塞尔维亚带来沉痛打击的政治危机。帕希奇成功地在那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也只是凭借运气罢了，何况还有对塞尔维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列强的大使助他一臂之力。因此，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对“阿匹斯”开展的活动进行干预。或许帕希奇担忧一场公开的对峙可能会招致黑手社的憎恶，引来杀身之祸，尽管这并不太可能，因为他在5月的危机中毫发无损。另外，我们不能忘记，无论如何，这位塞尔维亚总理仍然是整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位拥有出色能力的政客，也是党魁——他的党派成员仍然占据着国家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帕希奇又才重拾自己的老作风——这是他在久经塞尔维亚混乱政局的考验之后形成的，即始终保持低调，不要硬碰硬，让矛盾自行消除，以无为的姿态等风暴过去。

然而，帕希奇手中仍然有一张王牌：他大可以私下警示维也纳这场刺杀行动，同时明哲保身。人们热议的问题是，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找到证据，没有人愿意承认提供或者收到过事前的警示。1914年7月接受一家匈牙利报纸的采访时，帕希奇自己也否认了这一点。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承认提前告知，那么他和他的同僚们相当于刺杀事件的从犯。战前为塞尔维亚辩护的人也是同样的理由，他们认为战争爆发前塞尔维亚当局是无辜的，他们的理论是：塞尔维亚政府完全没有参与任何阴谋策划。同样，奥匈帝国当局也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警示，因为如果被告知存在这样的阴谋，为何他们没有采取更好的措施保护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呢。7月2日，维也纳一家半官方报纸《异闻报》（*Fremdenblatt*）发表评论，否认了这些流言，称关于这即将到来

的危险，奥匈帝国外交部没有收到任何告知。

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类似的警示是存在的。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源是法国外务部副秘书阿贝尔·费里（Abel Ferry）7月1日的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老朋友，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来访。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韦斯尼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政府“提醒奥匈帝国政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刺杀计划的风声”。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军事专员在1915年对意大利历史学家马格里尼说，帕希奇曾向塞尔维亚在维也纳的公使馆发电报，称“有信息泄露出来，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掌握消息，在大公访问波斯尼亚期间，有人策划要置他于死地”，奥匈帝国政府最好将到访的日期推迟。

大量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重现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约万诺维奇（Jovan Jovanović）是如何采取行动的。6月21日中午（也就是帕希奇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之后的第三天），他会见了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Leon Biliński），试图转达这一信息，告知对方如果大公出访波斯尼亚将会出现的后果。但他在表达时却拐弯抹角：大公如果选择在科索沃战争周年纪念日到访，那么肯定会被对方视为挑衅行为。在那些为奥匈帝国服役的塞尔维亚青年当中，“可能就会有人把他们的步枪或手枪上膛……”比林斯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谈话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回复对方：“就让我们期待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吧。”在之后的几年里，比林斯基拒绝向记者或是历史学家谈及这一情节。显然，他当时并没有把这种警告当真。对方的表达如此含糊，因此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恫吓，仿佛是这位塞尔维亚公使在做一次毫无理由的尝试，试图通过向奥匈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模棱两可的威胁，来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比林斯基认为不需要将这些信息上报给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

也就是说，确实有类似的警告被传达给对方，但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真正起了作用。回顾这个过程，所有人似乎都在遮遮掩掩。约万诺维奇应当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向对方提出警告，告知对方准确的信息。同样，帕希奇也应当直接告诉奥地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迂回地通过约万诺维奇来传达。他大可开展一次针对刺杀行动的调查，这会危及他的政权，但会确保他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可事实总是更为复杂、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约万诺维奇不仅是塞尔维亚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泛塞尔维亚激进分子，他的职业生涯无不带着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约万诺维奇之前是“科米塔吉”的成员，在1908年兼并之后，他在波斯尼亚参与制造骚乱，甚至还亲自坐镇指挥游击队。1914年夏，如果帕希奇政府倒台，他还差点儿以黑手社成员的身份成为外交大臣的候选人。确实，就连奥匈帝国也曾因为这位塞尔维亚大使的泛塞尔维亚情结向塞尔维亚提议，如果这一职位由一名更温和的人来担任，他们会非常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约万诺维奇选择比林斯基，而不是直接会晤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十分不待见他。

同样，帕希奇的行为也是出于诸多考量。一方面，作为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他担心黑手社一干组织会将这种通风报信的行为视为赤裸裸的叛国，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只能希望萨拉热窝行动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权自始至终与民族主义组织纠缠不清。这不仅仅事关塞尔维亚的国家团结，这种团结是通过国家机构和各种能够渗透到邻国的志愿组织缔结而成的；同样，这还关乎国家的未来。塞尔维亚在过去需要这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刻，这个国家同样需要它们。

这个老道而有趣的政客深刻地了解，如果塞尔维亚试图在巴尔干战争的血的教训之后重振雄威，和平发展是首要前提。新兼并地区的统一（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暴力和痛苦的）方兴未艾，强迫选举迫在眉睫，但是最聪明的政治家的特质不正是在于他能够同时应对不同程度的制约和挑战吗？帕希奇渴望和平，但他同时相信——他从不掩盖这一点，塞尔维亚扩张的攻坚阶段必须通过战争来赢取。只有一场诸列强都参与其中的欧洲大冲突，才能够扫清横亘在塞尔维亚“大一统”道路上的强大障碍。

或许帕希奇还记得1908~1909年兼并危机期间，伦敦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对驻伦敦的塞尔维亚公使格鲁伊奇（Grujić）的警告。哈丁在1909年1月对这位公使说，只有塞尔维亚受到来自奥匈帝国的攻击，俄国和协约国家才会向它伸出援手；如果塞尔维亚先发制人，那么任何的援助都免谈。帕希奇之所以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是因为1914年初春，他和俄国沙皇进行会晤，他向沙皇请求如果遭到奥匈帝国攻击，请俄国提供支持。如果刺杀行动成功，那么塞尔维亚就成为挑衅的一方，这一请求必然被回绝，但是帕希奇相信奥地利人不会把刺杀行动（如果行动成功的话）和塞尔维亚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联系并不存在。奥匈帝国如果反击，那么俄国和它的同盟必然会相助，塞尔维亚便有了靠山。在帕希奇看来，这并不是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有多么紧密，而是俄国在巴尔干政策中符合逻辑的体现。帕希奇对这种补偿机制十分有把握，这种执着甚至遭到了嘲笑。6月中旬，他收到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公使的报告，为了可能出现的“对西面国家的侵犯”，俄国重新调整了东部防线，以部署更多军事力量。这些消息使得帕希奇对这位盟友的支援更加深信不疑。

这并不是说帕希奇在刻意寻求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是说挑唆奥匈帝国进攻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他的行为。事实上，或许他在考虑，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一场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独立来说是很必要的，所以在为时已晚之前，他暧昧的举动丧失了阻止刺杀行动的机会。在面对如何处理萨拉热窝阴谋的时候，这些想法肯定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得他放缓了行动的步伐。

历史的遗留以及1903年以来塞尔维亚王国的发展，都在1914年夏使贝尔格莱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国家的民主是如此原始和脆弱，它的政治决策者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在军队和各个密谋组织之间夹

缝求生，控制议会的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毫无决断力。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机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界线以外的）相互渗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政府的监督管理寸步难行。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其领导人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上，这些特点也不断造成压力。常驻柏林的塞尔维亚公使米洛什·波奇舍维奇（Miloš Bogičević）说："对于那些非塞尔维亚人而言，在众多以实现大塞尔维亚理想的国家组织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是非常困难的。"各种行动背后各国家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瓜葛，使得人们要想分清楚究竟它的性质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无异于无稽之谈，就连那些老道的外国观察家都云里雾里。

如果站在尼古拉·帕希奇的角度来看，1914年夏所积攒的各种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在两次艰苦的战争后，财政和军事都呈现出疲态，新兼并的地区军事暴动此起彼伏。此外，针对那位强大却很不宽容的邻居发动的刺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但帕希奇，这位势必要力挽狂澜应对1914年6月28日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的人，自身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行事遮遮掩掩，小心翼翼地几近怠惰。这些都是将近30年的政治生涯对他的塑造。这些特质帮助他在狭隘而混乱的塞尔维亚政界生存下来。但如果要应付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制造的危机，这些特质恐怕还远远不够。

[2] 伊安·弗莱明（1908—1964），英国小说家，最广为人知的"007"——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就出自他的笔下。——译者注

[3] 斯科普里：马其顿共和国首都。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的名称之争缘自："马其顿"是古希腊时期希腊北部国家的名称。由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马其顿帝国曾征服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等地，把希腊文明传播到中东各地，至今，希腊仍将其北部地区称为马其顿。希腊认为，由斯拉夫民族（马其顿斯拉夫族）建立的国家无权使用属于希腊的名称作为国名，因此提出抗议。由于以上原因，马其顿独立初期，希腊雅典等地曾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一名。——译者注

[4]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5]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6] 1磅≈0.453千克。——编者注

第二章 无个性的帝国



冲突与制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皇朝的生存轨迹可以由两场军事灾难来定义。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的10万大军，这也吹响了意大利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号角。1866年，普鲁士人在克尼格雷茨摧毁了奥地利的24万军队，将奥地利驱逐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德国。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改变了奥地利的命运。

在军事打击的重创下，新专制主义的奥匈帝国逐渐演化成奥匈帝国。根据1867年的协议，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国家（即西边的德国人和东边的匈牙利人）之间实现权力共享。旋即出现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就像一只双黄的鸡蛋：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领土中称为“内莱塔尼亚”（意为“利斯河一侧的地方”）的部分在哈布斯堡双君主制的外壳下融为一体。两大实体都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它们没有共同的首相和共同的内阁。只有在外交事务、国防和国防相关的财政事宜上，两者才通过对帝国直接负责的“共同部长”统一处理。帝国共同利益不能通过议会会议来决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暗示匈牙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更大帝国实体的附庸。相反，两者之间经常派“代表”相互切磋（代表团由30人组成，分别来自双方），他们定期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碰头。

这种双边协议达成后，便招致了许多批评，也树敌不少。一方面，那些强硬的匈牙利马札尔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否认匈牙利应有的国家独立性的自我出卖。有些人还称，奥地利仍然在利用匈牙利王国，让它变成自己的农业殖民地。引起争议的是，维也纳拒绝出让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拒绝创建一支独立、平等的匈牙利军队——关于这一问题的宪法危机在1905年扰乱了帝国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人认为，匈牙利人会蚕食更为发达的奥地利经济，他们应当为此承担更高份额的经费。这种体制势必导致分歧，因为协议要求“合二为一”的两大帝国每隔10年就关税同盟进行重新协商（收益和征税是二者共同享有的）。每次协商之后，匈牙利人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大胆。协议中同样没有说明，这两大“优等民族”中究竟是谁对其他少数民族拥有政治监管权。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任匈牙利总理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向他的奥地利同事建议：“您看护好您那边的斯拉夫人，我们管好我们这里的。”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帝国的11大官方民族之间关于民族权利的抗争逐渐成为主旋律，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

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

两大帝国之间分别有自己的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匈牙利人主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冷处理。王国的选举权仅仅覆盖人口的6%，且最富裕的阶层马札尔人拥有最有利的财产资格。这样就导致尽管马札尔代表仅占人口的48.1%，却控制了90%的议会席位。300万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是整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的15.4%，但在400余个匈牙利议会席位中，他们仅占5个。此外，从19世纪70年代起，匈牙利政府便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马札尔化”运动。教育法强行规定各个州和不同信仰的学校都使用马札尔语，甚至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也要服从这一规定。同时要求教师能够熟练掌握马札尔语，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匈牙利国家抱有敌意”，则会被解雇。针对少数民族激进分子的严格措施助长了语言权的退化。来自南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来自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常常联起手来，为少数民族的权利抗争，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小了。

与此相反，在奥地利的内莱塔尼亚，政治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以符合少数派的需求。1882年和1907年的选举改革（男性普选权被正式确立）旨在创造公平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民主措施却增加了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在公共机构（如学校、法庭和行政机关）语言应用的敏感问题上。

没有哪个地方的民族主义政治摩擦比内莱塔尼亚议会更严重。内莱塔尼亚议会坐落于维也纳环路一栋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这个拥有516个席位的立法机关（也是全欧洲最大的）除了会出现人们熟悉的政党间的思想分歧，还有民族势力掺和其中，各种矛盾交织成一幅分裂重重的景象。比如，在1907年选举产生的具有合法权的30余个政党中，有28名捷克平均地权论者、18名捷克激进民族主义者、17名捷克保守人士、7名捷克温和派、2名捷克改革分子、1名独立身份的捷克人和9名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波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斯洛文尼亚人和罗塞尼亚人也同样被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阵线。

由于内莱塔尼亚没有官方语言（与匈牙利王国截然相反），那么议会召开的过程便不存在统一的语言。人们可以随便使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罗塞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议会并不提供翻译，除非演讲的代表自行提供演讲稿的译稿，否则即便演讲者使用的并非德语，也不会记录或者显示演讲内容。就连那些来自最微不足道的派系的代表因此也能够通过用很少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夸夸其谈，来防止别人说三道四。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谈论当下的话题，还是在用地方话吟诵诗歌，别人无法判断。尤为著名的是捷克人，他们最喜欢用夸张而过分的冗长演说对议事进行阻挠。内莱塔尼亚议会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在冬季，维也纳那些总想找点儿乐子的人便会蜂拥而至，旁听议会。一位细心的柏林记

者发现，与这座城市的电影院和歌剧院不同，旁听议会会议是免费的。

民族冲突已经非常紧张，以至于在1912～1914年，各种各样的议会危机重创了君主政体的立法机构：1913年，由于波西米亚人存心作对、不服管束，奥匈帝国首相卡尔·施蒂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解散了他们，由一个帝国委员会接手管理该省。1914年3月，捷克人对此事的抗议又掀起了波澜，而3月16日，施蒂尔克把捷克人的组织也解散了。当奥匈帝国在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它仍然处于解散状态，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内莱塔尼亚实际上在遵循一种专制统治。匈牙利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12年，继萨格勒布和其他几个南斯拉夫城市共同抵制一位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后，克罗地亚的宪法被暂停；仅在布达佩斯一地，战前的几年变成了针对少数民族反抗和选举权改革要求、保护马札尔霸权的议会专制时期。

这种惊人的失调现象显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奥匈帝国政体已经奄奄一息，它在政治版图上的消失仅仅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些敌对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帝国近年来（战争爆发前）对于统一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奥匈帝国政治骚乱的程度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比如，1908年在卢布尔雅那也陆续出现民族冲突，布拉格也时不时会上演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斗殴的场面，但不同于当时的俄国或是20世纪的贝尔法斯特，这些冲突都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至于内莱塔尼亚议会出现的骚乱，则更像一场慢性疾病，而非不治之症。政府常常行使1867年宪法第14条规定下的紧急命令权。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政治冲突会相互抵消。对于奥匈帝国的君主政权来说，发生在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权保守主义者以及1907年后出现的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恩惠，因为它可以制衡各个民族阵营，民族主义的毒素因此也被冲淡了。想要在众多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持多数派的统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求技巧、灵活性和对策略的想象力，但从1914年以前的三任奥匈帝国首相贝克（Beck）、比纳特（Bienerth）和施蒂尔克的表现来看，尽管政体总是遭遇间歇性的创伤，但他们还是能够力挽狂澜的。

战争打响前的几十年里，也是哈布斯堡皇朝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呈现一派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另外一个日薄西山的政体，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相比，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显得与众不同。奥匈帝国广大的关税同盟里，自由市场和竞争制度刺激了技术的革新和新产品的引进。二元君主制的多样性在于，新型的工厂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工业合作中受益，而有效的运输体制、高品质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又加强了这种合作。这种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匈牙利王国尤为显著。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还是奥匈帝国的“大粮仓”——出口奥地利的货物中有90%是农业产品。但在1909～1913年，匈牙利的工业出口上升了44个百分点，而奥地利—波西米亚工业地区对于廉价食品持续走高的需求同时拯救了匈牙利的农业部门，哈布斯堡共同市场抵御住了来自罗马尼亚、俄国和美国的竞争。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1887～1913年，帝国整体内部见证了一场“工业革命”，或者说

是自力更生的扩张增长阶段：1881～1911年，生铁消费增加了4倍；1870～1900年，铁路覆盖面积也翻了两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年平均增长率为4.8%）。

就连长期居住在维也纳的《泰晤士报》记者、挑剔的观察家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都在1913年发出感慨，“奥匈帝国出现的‘种族斗争’”在本质上是现有体制内对于保护权和恩惠的争取：

> 争取语言权的本质是对官僚影响力的争取。同样，捷克人、罗塞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提出的建立新的大学或中学的要求（同时遭到日耳曼人、波兰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反对），实际是要求建立能够造就潜在官员的新机构，而这些未来的官员能够将议会党派的政治影响力官僚化。

此外，使保障民族权益的政策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努力也在缓慢却卓有成效地推进（至少在内莱塔尼亚如此）。1867年的基本法正式对内莱塔尼亚统治下的民族的地位和语言平等做出说明，一大批判例法供法律起草者参考，为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例如德属波西米亚地区的捷克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规定。在帝国最后的和平年代里，内莱塔尼亚当局一直在根据少数民族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系统。比如1914年1月28日在伦贝格通过的《加利西亚协议》，它确保了之前遭到排挤的罗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能够在扩大的地区立法权中获得固定比例的选举权，并向他们承诺不久之后建立一所乌克兰大学。连匈牙利当局也在1914年年初国际环境恶化时期做出了表态。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得到承诺不再受过度强权的困扰，并保证他们获得媒介自由；特兰西瓦尼亚也收到消息，称布达佩斯政府打算满足当地罗马尼亚人的诸多要求。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警觉地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巩固哈布斯堡皇朝在罗马尼亚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在1914年1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向在俄国西部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也做出类似的让步。

这些针对不同需求做出的调整说明该体制最终会在一定的框架内，实现一系列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有迹象表明，在响应这些地区的物质需求后，管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国家，而不是哈布斯堡困难重重的议会。与各个政党或是立法会议不同，通过一种更加直接和连续的方式，即通过教育委员会、城市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长选举等范围的扩大，国家与公民被紧密联系起来。国家（或者说其主要职能）不再是实施镇压手段的暴力机器，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黏合的、充满活力的实体，一个多元社会、经济体和文化利益之间的中间人。1890～1911年，哈布斯堡官僚体制的国内行政花销增加了366%，因此而付出了巨额经费。但哈布斯堡皇朝的居民们都因有序的政府而获益匪浅：公共教育、福利、卫生、法制以及精巧的公共设施

等。哈布斯堡政体的特点在它灭亡后仍然闪烁着余晖。20世纪20年代末，当作家（同时也是机械领域专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回顾奥匈帝国尚存的最后几年和平时光时，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洁白、宽阔、繁华的街道……如河流般有序地延伸，就像军装上的绶带，用白色的臂膀拥抱着这片土地”。

最后，大多数少数民族激进主义者认可了哈布斯堡联邦，承认它是一个共同的防卫体系。少数民族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例如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或是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杂居着不同民族的地区，这些状况似乎都在说明，成立新的、离散的民族实体只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会缓解现状。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果失去了一个帝国的护卫，又怎能继续生存下去？1848年，捷克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就警告称，哈布斯堡皇朝的解体只会为“俄国君主制的入侵”制造条件，而不是换来捷克的独立和解放。他说：“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且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维也纳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民族，使之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中心。”1891年，查尔斯·施瓦岑贝格王子（Pince Charles Schwarzenberg）询问年轻的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格雷格尔（Edward Grégr）：“如果您憎恶这个帝国……那么您的国家那么小，它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吗？您是把它再拱手让给德国还是俄国呢？如果您抛弃了奥地利同盟，您将孤立无援。”1914年以前，那些寻求与帝国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很多地区，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已经融入联盟，如老兵俱乐部、宗教和慈善团体、狙击手联盟，哈布斯堡的爱国精神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滋养。

沉着冷静、拥有着美髯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很好地诠释了为何人们因此敬重君主国，且它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但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却写满了悲剧：皇帝的儿子鲁道夫和情人在家族狩猎场双双自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人们熟悉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河畔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叛乱者在克雷塔罗处决；他最喜欢的侄女被活活烧死，而这场悲剧是由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她的衣服引起的。皇帝将这一连串的打击进行了淡化处理。在每个正式的庆典仪式上，他的标志性语言总是“很好，我们很满意”，这句话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当处理复杂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不同力量以达到各方面都不会呈现抱怨时，他总能表现得很周到；他积极投身于宪法改革的每一阶段。然而在1914年，他却显得怠惰了许多。在战斗打响前的两年里，他维护独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伊斯特万（István Tisza），共同抵制少数民族对于选举权的要求。只要匈牙利王国向维也纳提供它所需的资金和选票，弗兰茨·约瑟夫就能接受马札尔的领导权，虽然它罔顾王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他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奥匈帝国日耳曼政治家约瑟夫·马里亚·伯恩莱特（Joseph Maria Baernreither）在1913年（此时弗兰茨·约瑟夫已经83岁高龄）写道：“我们的时代气势如虹、排山倒海而来，而对于我们年迈的皇帝来说，它却仍如同在远方飒飒作响。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实

质性参与。他不再理解这个时代，而时间却不会因此停下它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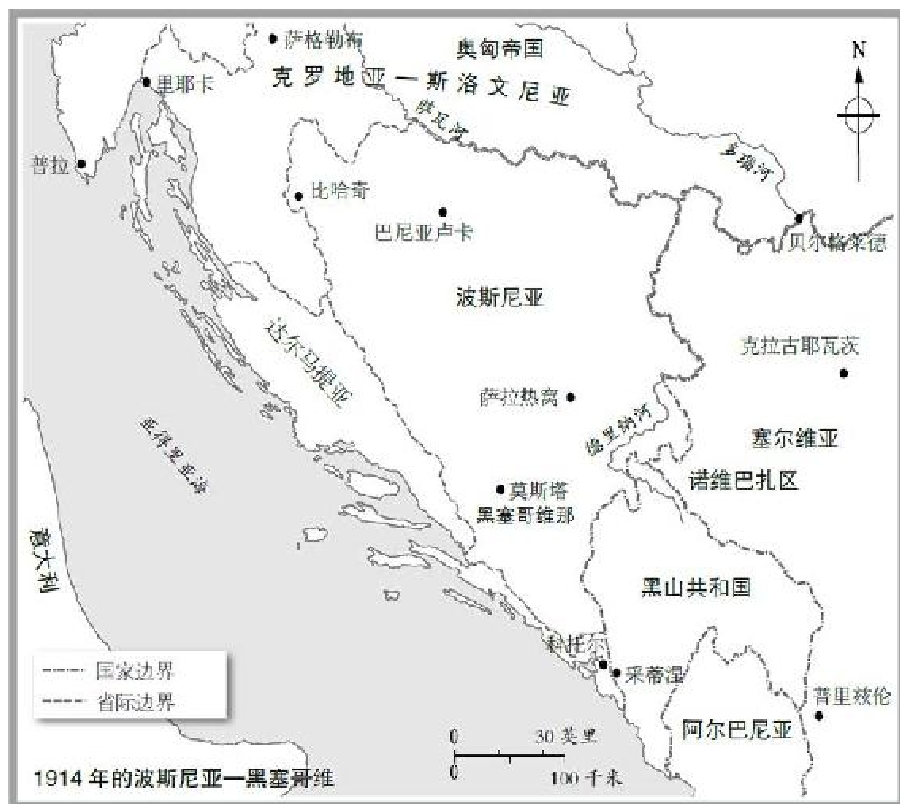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对这位皇帝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有着强大的依恋。众所周知，他受欢迎之处并不在于他体制内的角色，而是体现在普罗大众对他的情感。到1914年，他的在位时间甚至比他的臣民们的寿命还要长。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作品《特罗塔家族》（*The Radetzky March*）里的话来说，他似乎“潜藏在冷若冰霜的高龄背后，就像一块铠甲覆盖下催人振奋的水晶”。他常常出现在子民的梦中。在数以万计的肖像画中，他湛蓝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在客栈、学校、办公室和火车候车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双眼睛；日报仍然用惊叹的口吻报道，他是如何在国事场合迈着稳健而灵活的步伐从他的马车上走下。正如它旧时的风采，这个帝国依旧繁荣、井然有序，于乱象中向世人展现罕见的稳定局面。危机此消彼长，但从未危及它的存亡。正如维也纳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的俏皮话，这种局面“让人绝望，却无伤大雅”。

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是个特例。1878年的柏林条约授予奥地利人管辖权，使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中易手；30年后，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它。19世纪末，波斯尼亚还是一个植被郁郁葱葱、山地层峦叠嶂，南部是海拔2 000多米的高山、北部是萨沃河溪谷的国家。黑塞哥维那则主要是由湍急的水流作用劈就的荒凉而高耸的喀斯特高原，周围由群山环绕——严酷的地形条件使得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基础建设。哈布斯堡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状况一直充满争议。那些在1914年夏天潜入萨拉热窝、杀害奥匈帝国继承人的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恐怖分子，辩称这一行为的动因是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胞们遭到压迫，历史学家们也认为应当归咎于奥地利人自己，因为是他们的压迫和恶政，将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拱手让给贝尔格莱德。

真的是这样吗？在刚刚占领该地的前几年里，确实出现了广泛的抗争，特别是人们对征兵制度的不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省份也经历了类似的骚乱；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14年，这些地区实际上经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1878年之后，农民的生存状况成为统治该地区的一个瓶颈。奥地利人并没有选择废除奥斯曼的领主体系（直到1914年，还有约9万波斯尼亚塞族农奴在这样的体系下劳作），有些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讨好住在城市里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而压制主要是由塞尔维亚人构成的农民。但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基于过去的想法。正是根植于文化的由来已久的保守性，而非一种殖民统治哲学，才使得奥匈帝国在这些新省中的统治得以巩固。“渐进性和连续性”是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统治的特点，这正迎合了这些地区的传统性。只要有可能，那么在奥斯曼时代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能继续沿革、发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它们。但哈布斯堡的统治确实也通过一次性清算解放了所辖范围的农民们，超过4万波斯尼亚农奴在占领后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获得了人身自由。无论如何，从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的农民境遇标准来看，“一战”前夕，旧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农奴的生

活确实不能算糟糕，他们或许比达尔马提亚或是南意大利的农奴活得更滋润一些。

在增加农业产量和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工业状况上，奥匈帝国当局也付出了很多。他们建立了模范农场，包括葡萄园和鱼塘；培训中学老师，让他们了解初级农艺学；建立了一所农业高等院校，而在邻国塞尔维亚，这种教学机构还从来没出现过。如果说引进新方法的过程仍然相对缓慢，那么农民对创新的抵触情绪是主要原因，而非奥匈帝国的责任。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投资资本涌入这些地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网络，其中有一些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山地铁路。诚然，这些基础设施工程部分被用于军事目的，但其他一系列部门（如采矿业、冶金、林业和化学产品制造业）同样也吸引了大批投资。在本杰明·卡洛伊伯爵（Count Benjamin Kállay）统治时期（1882~1903年），工业化的步伐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就是巴尔干地区实现史无前例的工业产值（1881~1913年年均增长率达12.4%）。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将这些新省份当作施展其施政才能的平台，其目的是“展现哈布斯堡统治的人性和效率”。到1914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发展到可与帝国内其他地域媲美的水平。



1914 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治纪录中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低得耸人听闻的识字率和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比塞尔维亚还要

低）。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奥匈帝国的政策使然。奥地利人兴建了大约200座小学、3所中学、1所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1个科研所。虽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被忽略。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直到1909年（在这些省被正式兼并之后），小学义务教育才被引进。

诚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境况并非可人而光明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竭尽全力，应对所有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行为，有时也会果断地重拳出击。1913年，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事管理者奥斯卡·波蒂奥雷克终止了1910年波斯尼亚宪法，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禁止发行塞尔维亚报刊，并关闭了许多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文化组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它们都是出于对膨胀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遏制。另一个让人恼火的事实是，对边境西部和北部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以及东部的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管理是失败的，这些地区都处于匈牙利严格的统治之下。总而言之，对这些省不同民族群体的多元传统的尊重，使得这种管辖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和有效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两位奥匈帝国高级政客造访白宫时表示，哈布斯堡君主国“知道如何以公平的姿态对待这个国家存在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因此也会懂得如何获取巨大的成功”；他还不开心地添了一句，他相信美国在菲律宾事务的管理上能够从奥匈帝国身上学习很多。此外，游客们也被哈布斯堡政权的公正性所震撼：1902年，一位美国记者观察到，在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中，处处体现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的精神；法院在“明智和真诚的管理下”，“公正对待每一位公民，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在“一战”爆发前夕，我们对奥匈帝国状况和前景的评判或许会遇到一些问题。从战争期间一直到1918年战败，这个帝国的溃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预示着它迫在眉睫而不可避免的衰落，这掩盖了它之前的光辉，也导致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矛盾。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战”期间，贝内什成为捷克秘密独立运动的组织者；1918年，他是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他1908年发表的“奥匈帝国的问题和捷克的质疑”的研究论文中，他也曾对哈布斯堡联邦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有人提到奥匈帝国会瓦解，我根本不相信。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沿革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泰晤士报》记者（之后是该报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1954年，斯蒂德在一封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信中称，当他在1913年离开奥匈帝国时，“我感觉我正在逃离一座将倾的大厦”。当时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当他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13年的奥匈帝国，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尽管他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诸多特征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但那一年他还是写道，在10年的“持续观察和体验”中，他无法获得“任何充足的理由”，认为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不应当在欧洲大陆维持其合法地位”。他总结称：“它的内部危机通常是发展导致的危机，而不是衰落引起的危机。”只有在“一战”期间，斯蒂德才是一

名真正呼吁奥匈帝国解体的人。在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什·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回忆录《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Making of a State*）1927年的英译本中，斯蒂德为其作序，在序中他写道，“奥匈帝国”这个名字是以下这些特征的同义词：“能够抹杀一个民族的灵魂，用少得可怜的物质利益来腐蚀它，剥夺它的自由、它的良知和它的思想，摧毁它的意志，消解它的毅力，让它放弃追求理想的道路”。

这样极端的反转也有相反的版本。研究哈布斯堡皇朝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匈牙利学者奥斯卡·亚西（Oszkár Jászi）对这种二元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29年，他在一份研究君主制解体的宏大研究中总结道：“‘一战’并不是原因，深深积累的仇恨的最终爆发以及各民族的不信任态度才是导致帝国瓦解的原因。”然而在1949年“二战”结束后，亚西的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时刻，独裁和种族灭绝的噩梦挥之不去。这一次，自1919年就流亡美国的亚西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他写道，在旧的哈布斯堡时期，“法制还算健全，个人的自由越发受到重视，政治权利也不断扩大，民族主权的原则逐渐被尊重。自由流动的人口和商品让君主国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享受着利益”。那些曾经忠于哈布斯堡、对民族独立欢欣鼓舞的公民，之后却指摘旧有的二元君主制；那些在1914年怨声载道的人，之后却陷入对往事的怀恋。1939年，在写到君主制的瓦解时，匈牙利作家米哈伊·鲍比契（Mihály Babits）是这样形容的：“现如今，我们对这一损失追悔莫及，急切想要寻回曾经我们所厌恶的事物。我们现在独立了，但我们没有欢愉之感，我们感到的只是焦虑。”

棋逢对手

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战争中战败后，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和德国，从此，巴尔干地区便成为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幸的是，他们在缩小地缘政治范围之时，恰逢巴尔干半岛的动荡越演越烈的时期。此外还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奥斯曼政权已经日薄西山，在东南欧苟延残喘，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对该区域的利益虎视眈眈，而这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历史渊源上看，俄国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应当在奥斯曼帝国撤出的地区行使主权。哈布斯堡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东部抵御土耳其人的大门。而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认为，巴尔干地区新兴的斯拉夫人民族（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圣彼得堡的老东家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奥斯曼帝国的退出引发了争议，即土耳其海峡未来的控制权究竟归谁。对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许多雄心勃勃的新巴尔干国家诞生，它们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还有利益冲突。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位博弈的棋手，它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每一步，希望能够消除或削弱对手的优势。

直到1908年，合作、妥协和对非正规的势力范围进行界定让事态中

潜藏的危险得到抑制。1881年，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对之前达成的三皇同盟进行了调整，俄国承诺“尊重”《柏林条约》的规定，即奥匈帝国187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正式统治，三个当事国还同意“相互为对方考虑”彼此“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俄奥之间在1879年和1903年的另外几项协议，重申了对巴尔干地区现状的共识。

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与敌对的势力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并不足以保证安定。半岛上那些次要的难缠分子同样需要安抚和驯服。从维也纳的立场上看，最重要的关系当属塞尔维亚王国。在亲奥匈帝国的米兰·奥布雷诺维奇的漫长统治期里，塞尔维亚十分归顺维也纳，默许了帝国的区域领导权。同样，维也纳支持贝尔格莱德1882年以王国的身份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并答应如果塞尔维亚意欲扩张到南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奥匈帝国会提供外交上的帮助。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Count Gustav Kálnoky）在1883年夏告知他的俄国同行，与塞尔维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帝国在巴尔干政策的关键。

尽管米兰国王同样很友好，但他绝不是一个省心的伙伴。1885年，通过提出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奥地利上学，并允许帝国吞并他的王国，这位国王在维也纳制造了一场骚乱。奥地利人当即拒绝了这种胡闹的行为。在维也纳的一场会晤上，人们提醒这位狼狈的君主他作为国王应尽的责任，并把他送回了贝尔格莱德。古斯塔夫向奥匈帝国首相解释道：“比起一个信马由缰的省份，一个繁荣和独立的塞尔维亚更符合我们的意图。”然而就在米兰国王似乎要放弃统治权的4个月之后的11月14日，他出其不意地进攻了自己的邻国保加利亚——俄国的附属国。这场冲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保加利亚人的抵抗下，塞尔维亚军队很快就被打败了，然而事情的善后还需要外交行动，以防止得到缓和的俄奥关系再起波澜。

新国王表现出比他的父王更加奇怪的举止：亚历山大国王狂妄地吹嘘奥匈帝国给他的王国提供的帮助；1899年，他公开宣称“塞尔维亚的敌人就是奥匈帝国的敌人”，这样失言举动震惊了圣彼得堡，同样也使得维也纳感到尴尬万分。但是他也对亲俄政策心动不已：1902年，在他的父亲米兰国王死后，亚历山大国王不遗余力地寻求俄国的支持，他甚至对圣彼得堡的记者宣称，哈布斯堡皇朝“是塞尔维亚的头号敌人”。可以想象，在听到亚历山大早年便遇害的消息后，维也纳并不感到惋惜，尽管那里的政客们像其他人一样，对这样的根除行动感到震撼。

奥地利人慢慢地意识到，1903年6月的弑君行动标志着新的突破。维也纳的外交部迅速与篡权者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乐观地把他视为亲近奥匈帝国的人。奥匈帝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新塞尔维亚政权的外部势力。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两个邻国之间和睦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事务的管理权已经由一些公开反对二元君主制的人接手，维也纳的政策制定者们越发担心贝尔格莱德媒体的民族主义恶言（它们现在已经摆脱了政府的管控）。1903年9

月，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康斯坦丁·邓巴（Konstantin Dumba）在报道中称，这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极点”。维也纳重新认识了这场违反道德的弑君暴行，并与英国一道对卡拉乔尔杰维奇进行制裁。俄国人试图从松动的奥塞关系中趁火打劫、分一杯羹，他们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保证，塞尔维亚的未来在西方，在亚得里亚海岸，并教唆他们不要恢复与维也纳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

1905年年底，这种紧张态势终于演变成公开冲突——维也纳发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私下”成立了关税同盟。1906年年初，维也纳要求保加利亚拒不履行这一协议，但适得其反；除此之外，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一夜之间被塞尔维亚国人奉若神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的）。而在过去，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大概讲述了1906年的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维也纳的政客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与保加利亚缔结的具有微不足道的商业重要性的同盟，不如说是这背后暗含的政治逻辑。如果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呢？巴尔干国家“联盟”会不会携起手来反对奥匈帝国，并投入圣彼得堡的怀抱？

这很容易被当作奥地利人偏执的想法，实际上，维也纳政客们的担忧并不是天方夜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共同关税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三个协议，前两个协议已经明确表态，其出发点是针对奥匈帝国的。两国之间的《友谊条约》和《同盟条约》已经于1904年在贝尔格莱德签署。邓巴已经竭尽全力解读到访的保加利亚代表和他们的塞尔维亚对话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他还是没能明确地探明这些协商的机密之处。这就表明，维也纳担心俄国的介入是有其原因的。尽管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且俄国正忙于与日本进行一场恶战，但圣彼得堡的确意图建立一个巴尔干联盟。这些协商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保加利亚外交官迪米特尔·里佐夫（Dimitar Rizov），他曾是为俄国亚洲部门工作的特工。1904年9月15日上午11点，俄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使们同时（且秘密地）收到由两国外交大臣分别呈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联盟协议复印件。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国外和国内事务彼此之间的高度融合。原因很明显：因为这片国土存在许多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国境线以外，还有他们真正的“家乡”，因此，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很容易混淆。哈布斯堡境内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境外没有独立主权的“母国”，但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则不然。由于二元体系过于复杂，维也纳无法阻止匈牙利与邻国罗马尼亚相分离的不公正的文化政策——毕竟后者是该地区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伙伴。然而至少到1910年，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不受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的，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奥匈帝国和德国同盟国的罗马尼亚并没有挑唆或利用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事端。

然而，在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王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特别是在

1903年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仅有4成人口是塞尔维亚人，南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有很大一片地区都是塞尔维亚人定居点，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也有小部分塞尔维亚人。1903年弑君事件之后，贝尔格莱德加快步伐，在奥匈帝国内发起民族主义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6年2月，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专员波米亚诺夫斯基（Pomiankowski）在一封致总参谋部长官的信中对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如果未来发生军事冲突，塞尔维亚一定会拉拢奥匈帝国的敌人助阵。问题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总体上有着极端民族主义血统的政治文化。波米亚诺夫斯基警告称，就算掌舵的是一个“明智而通情达理”的好政府，也不可能阻止“所有强大的激进沙文主义者”采取“冒险行为”。然而比塞尔维亚“公开的敌意和它糟糕的军队”更危险的是“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在和平年代的间谍活动，它们会系统地对我们的南斯拉夫人民进行毒害，且试想最坏的结果，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队面对的严重困难”。

塞尔维亚整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沙文民族主义，成为维也纳评估与贝尔格莱德关系的焦点。1907年夏，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伯爵在对新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的官方指示中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从弑君行动之后每况愈下的。埃伦塔尔回忆，在米兰国王执政期间，塞尔维亚王室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波斯尼亚的公然煽动行为”，但自从1903年6月弑君事件发生后，事情便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因为佩塔尔国王在政治上的弱势，无法对沙文民族主义进行打压，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开始利用这些民族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任奥匈帝国公使的“当务之急”之一是，对塞尔维亚民族活动进行严密的观察和分析。当机会来临时，公使便会告知国王佩塔尔和总理帕希奇，他已经充分掌握了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活动开展的规模和特征。毫无疑问，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们应该意识到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是“不可更改的”。最重要的是，对方不能用那种习以为常的官方的否认来敷衍公使：

> 估计他们还会对你的警告一如既往地用一些陈词滥调做出回应，在被占领的省份的问题上，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往往会因为鬼祟的密谋备受指摘，他们也常为自己做出毫无实质内容的辩解：“塞尔维亚政府致力于维持正确而清白的关系，但我们无法左右国家的意见，这需要实际行动。”

埃伦塔尔的官方指示体现了维也纳对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们相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原始力量，但深深质疑对方的领导人，对波斯尼亚的未来，他们也表现出万分的焦虑，虽然奥地利人表面上做出了傲慢而自信的姿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08年还是被奥匈帝国吞并了。奥匈帝国和其他列强都认为，1878年的占领就意味着永久的拥有。1881年修订

后的三皇同盟相关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奥匈帝国明确表态“无论何时，吞并这些省份都是恰如其分的”，这项声明隔三岔五就会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协议上出现。俄国也没有对此进行辩驳，尽管在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时刻（从占领到吞并）来临时，圣彼得堡持保留意见。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正式的吞并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关于这些省份未来发展的未知都烟消云散，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占领的期限正是1908年，因此这是在最后的期限内仓促实现的。通过诸如成立省级议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更充分地融入了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这也有利于为对内投资创造稳定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吞并的行为是对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发出的信号，宣称了奥匈帝国对这些地区的永久占有权，这也至少在理论上消除了骚乱发生的一大隐患。

在1906年10月被晋升为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他是这种二元君主制的忠实拥趸。但在1905年，当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精英因为共同军队管理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对之前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产生了质疑。到1907年，他开始支持在君主制问题上引入第三方的意见，两大主流的权力中心应当由包括南斯拉夫（最主要的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第三方进行调解。这个想法得到了南斯拉夫上层集团的强烈支持，尤其是布达佩斯管控下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不愿意被分成内莱塔尼亚、匈牙利王国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省三个支离的部分。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帝国完全吞并，它才最终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这样一来，正如埃伦塔尔热切希望的那样，才能在内部实现对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制衡。届时，塞尔维亚将不再是巴尔干南斯拉夫的一片山麓地带，而是从帝国内广袤的、以克罗地亚为主导的南斯拉夫实体中被割裂出去。

1908年夏在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爆发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成为吞并计划的导火线。青年土耳其组织逼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颁布宪法、成立议会，他们计划对奥斯曼帝国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时间谣言四起，称土耳其的领导人不久之后将会在奥斯曼帝国内，同时包括一些奥匈帝国占领的地区（但它们暂时还没有奥匈帝国的代表机构），举行普选。土耳其的新政权通过革命匡正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时提高了士气。如果这个新政权意欲夺回它们丢失的西部军事重地，并承诺进行宪法改革以赢取当地人的民心，那该怎么办？一个趁火打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民族联盟想利用这些不确定性，从土耳其领主地位那里宣布自身的独立。这就变得很危险，因为这些省的民族联盟可能会与土耳其人联手，将奥地利人驱逐出去。

为了在一片混沌中先发制人，埃伦塔尔当机立断，准备兼并事宜。在得到一笔慷慨的赔偿后，奥斯曼人放弃了他们名义上的主权。更重要的是要摆平俄国人，他们的默许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埃伦塔尔坚信，与俄国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1899~1906年，作为驻圣彼得堡的奥匈帝国大使，埃伦塔尔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

献。让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对之前的协议进行担保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合法化统治的问题上，俄国人没有提出异议——前提是圣彼得堡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事实确实如此，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正是伊兹沃尔斯基本人，提出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兼并，那么俄国要从奥匈帝国那里得到进入土耳其海峡的许可。1908年9月16日，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在布赫劳城签署协议。因此，1908年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产物。此外，这次交易中双方寻求到了一种平衡，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所追求的实际上是相同的：通过秘密协议确保自己的利益，但违反了《柏林条约》，牺牲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尽管做了准备，埃伦塔尔于1908年10月5日宣布兼并的事实还是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危机。伊兹沃尔斯基出尔反尔，否认曾与埃伦塔尔达成共识，他之后甚至否认他之前就了解埃伦塔尔的动机，并要求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危机由此爆发，并持续数月。塞尔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甚至进行战争动员，摩拳擦掌。埃伦塔尔始终没有理会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召开会议的要求——这项要求并没有在《布赫劳协议》中出现过。直到1909年3月，德国致信俄国，要求俄国承认兼并的合法性，并要求塞尔维亚也这样做。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首相警告称，如果他们不干，那么“就让该发生的发生吧”。这样的口吻不仅暗含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德国可能会拿出证据，证明伊兹沃尔斯基在地区兼并事宜中的所作所为。伊兹沃尔斯基立刻败下阵来。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在这次兼并危机中，埃伦塔尔负主要责任。而这样说公平吗？诚然，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行为缺乏外交透明性。他没有尝试通过召开国际会议，邀请签署《柏林条约》的多方共同解决兼并危机，而是选择运用老套的外交手段：秘密会议、相互许诺，以及私下的双边协议。而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及其成果很容易让伊兹沃尔斯基抓到把柄，声称自己，甚至整个俄国，都被这位“老奸巨猾”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了。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伊兹沃尔斯基为了不丢掉饭碗并保全个人名誉，以一种过分的方式撒了谎。这位俄国外交大臣的判断出现了两点失误。首先，关于土耳其海峡向俄国战舰开放的问题，他误认为伦敦会赞同这一点。其次，他彻底低估了兼并对于俄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据说，当1908年10月8日，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听到兼并的消息后，他还表现得相当镇定。直到他几天后来到伦敦，发现英国摆出不配合的姿态，并且还听到来自圣彼得堡媒介的风声，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开始尽力将自己的角色塑造成受害者。

不管埃伦塔尔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波斯尼亚的兼并危机还是成为巴尔干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它将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实现合作的最后可能和意愿摧毁殆尽，从这一刻起，遏制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消极影响变得更加困难。它同样影响了奥匈帝国的邻居和盟友

——意大利王国。双方之间的关系早就有紧张的趋势，意大利少数民族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权利问题和他们与亚得里亚的强权政治之间的对抗是两大争论的焦点，然而兼并危机要求意大利进行赔偿，这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双方陷入新一轮的紧张关系。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关于巴尔干亚得里亚海岸的利益分歧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起初，德国人对兼并问题并没有表态，但他们很快便积极地对奥匈帝国表示支持，这种姿态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它阻止了俄国政府从兼并危机中捞取更多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使得圣彼得堡和伦敦更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奥匈帝国是柏林的左膀右臂。对于1914年的危机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后果。

危机对俄国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败局，使得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前景破灭。伊兹沃尔斯基和英国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于1907年8月31日签署的《英俄公约》限制了俄国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影响力。当下，只有巴尔干地区还是俄国能够继续施加影响的地区。舆论认为，俄国是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守护者，这些声音灌输给关键决策者，因此所有人都在土耳其海峡的问题上产生了偏见。在伊兹沃尔斯基的误导和普遍的沙文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俄国政府和人民将兼并视为对彼此之间的共识的无情背叛，是对自己的不可原谅的侵犯，是在关键问题上让人无法接受的挑衅。在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俄国人计划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俄国同样表现出要更深层次地介入塞尔维亚政治的姿态。1909年秋，俄国外交部委派尼古拉·哈特维希为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他是一个“狂热地遵循亲斯拉夫人传统的人”。走马上任之初，这位精力充沛、头脑聪敏的外交官便不遗余力地迫使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实际上，他有些发力过猛，以至于僭越了圣彼得堡管理者们下达的指令。

谎言与伪造

兼并危及使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二元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数年来，奥匈帝国当局一直在观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1905年在匈牙利辖内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首都萨格勒布成立的政治宗派）的动向。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该联盟攫取了对萨格勒布的控制权，提出了“南斯拉夫议程”，旨在寻求帝国境内所有南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并在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上与匈牙利当局长期斗争，如对方要求所有国有铁路的军官必须讲马札尔语。不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况，真正让奥地利人感到担忧的是，联盟的一些（或是所有）代表都有可能成为贝尔格莱德的间谍。

在1908～1909年的危机中，这些担忧上升为一种偏执的心态。1909年3月，当俄国在与波斯尼亚的对峙中妥协退让时，哈布斯堡当局

出其不意地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司法攻击，主要的53名塞尔维亚激进分子被判处叛国罪，原因是密谋将南斯拉夫地区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归入塞尔维亚。就在同一时间，维也纳作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博士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发表文章，谴责联盟的3名主要政治家收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补助金，然后替塞尔维亚王国卖命，开展叛国行动；他号称政府机密文件已经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对于叛国行为的审讯从1909年3月3日一直持续到11月5日，很快，它便给政府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彻底的灾难。法院听取了276名证人的证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告人提到的。在阿格拉姆（即现在的萨格勒布）宣布的所有31项罪名之后却在维也纳的上诉中被撤销。与此同时，弗里德永以及《帝国报》（*Reichspost*）一位编辑也遭到了一系列诽谤指控。这位博士作为证据的“秘密文件”变成了伪造物，由塞尔维亚的一名双重间谍传给了奥匈帝国使馆，奥匈帝国外交部之后又将它交回弗里德永。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位不幸的弗里德永博士的名誉被可耻地滥用，他做出道歉并撤回了指控。但是，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同时也是被告的辩护者托马什·马萨里克仍然穷追不舍地对这次事件刨根问底，通过广泛的调查搜集新的证据，并在多次公共讨论中声明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以埃伦塔尔伯爵的名义刻意伪造了文件。

维也纳当局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晓这些文件并非真实的，他们的偏执可能会轻信这些言论——奥地利人一直都对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深信不疑。但阿格拉姆和对弗里德永的审判还是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糟糕的是，这场丑闻曝光不久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代表约翰·福尔加奇（Johann Forgách）伯爵成为众矢之的。1910~1911年，马萨里克仍然在努力“揭发”令人尴尬的奥匈帝国的不义行为（他的发现并非都是真的）。塞尔维亚媒体欢欣鼓舞，将福尔加奇逐出贝尔格莱德的呼声此起彼伏。福尔加奇——这位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处境倍感不快的代表，发起了猛烈还击，否认所有的指摘（或许他是正确的）；同样身为攻击对象的埃伦塔尔，发现无法让这位跟敌人唇枪舌剑、交锋正酣的公使离开，因为这样就暗示着维也纳默认了奥匈帝国当局在故意欺骗公众。1910年11月，福尔加奇私下致信维也纳的外交部门称：“情况对我来说很不乐观，但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主持公道，那么我一定会从贝尔格莱德媒体发起的风暴式打击中挺过来，因为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愉快。”

尤其让福尔加奇感到愤怒的是，塞尔维亚高级军官总是不断地介入这件事，以达到让他身败名裂的目的。在这些人当中要属外交部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ković）最过分。斯帕拉伊科维奇向马萨里克提供证据以攻击奥匈帝国政府；在对弗里德永进行审判的日子里，他甚至成了代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专家证人。在竭力质疑伪造文件的可信度之后，他又继续采取行动，断言福尔加奇为了捏造针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指控，故意肯定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1910~1911年冬天，荷兰驻贝尔格莱德使节弗雷登比赫

（Vredenburch）称，斯帕拉伊科维奇一直在外交圈内散布针对奥匈帝国代表的流言。更糟糕的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斯帕拉伊科维奇和他的妻子身边出现哈特维希的身影，也就是那位新任俄国公使。福尔加奇愤怒地将他称为“我们的死对头”，两人之间互通信件，恶语相向。1911年4月，福尔加奇下令奥匈帝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所有外交人员都不许和斯帕拉伊科维奇有任何往来。他告知埃伦塔尔：“在某些方面，这个过度焦虑的人神志并不健全。自兼并以来，他对奥匈帝国的憎恶已经让他精神出问题了。”

很明显，福尔加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已经无法继续下去，1911年夏，他被召回。但阿格拉姆和弗里德永的丑闻还在审讯中，这件事在塞尔维亚首都造成的余波尚未散去，因为很多关键人物都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里悉数登场了。作为外交部高级官员，斯帕拉伊科维奇很看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利益——他的妻子是波斯尼亚人；1879年，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既然这两个省是奥斯曼封建统治下独立的合法实体，那么奥匈帝国对它们的兼并就永远不是合法的。之后，斯帕拉伊科维奇成了塞尔维亚驻保加利亚的公使。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串通俄国，在巴尔干同盟中建立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在保加利亚任职期间，他是哈特维希最亲密的朋友，以“每月20次”的频率拜访他。很快，他便被调到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去了。在那里，适逢1914年“七月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他的工作是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意图传达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1912年，埃伦塔尔突患白血病逝世，继他之后奥匈帝国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者中，福尔加奇（这位被调离原岗位的强硬的反塞主义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名重量级成员。他不大可能忘记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之间的私人过节，波斯尼亚危机过后，维也纳的报刊恰当地将其看作阻碍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改善的绊脚石。1914年“七月危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其中许多主要人物早就是老熟人了。在关键事务背后，埋藏的是纷纷扰扰的私人恩怨和挥之不去的伤害。

单凭奥地利人的力量，塞尔维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其背后牵扯许多交互错杂的关系。首要的是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兼并危机之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加深。维也纳对俄国公使哈特维希十分提防，因为他是个持反奥立场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位在索非亚的法国公使这样描述哈特维希：“一个典型的农民”，顽固地坚守“旧俄国政策”，并时刻准备“牺牲远东，赢得巴尔干地区”。哈特维希与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之间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友谊，这两个人每天都要见面。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官员们也跟着向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示好：“我们是唇齿相依的伙伴。”一位俄国记者曾做出如此评价：“没有人相信，俄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存在任何秘密。”贝尔格莱德的大街小巷都欢迎这位俄国公使，他就像一个征服了这里的英雄一样风光：“只要有人看到他很有特色的脑袋，他就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理论上，维也纳可以通过寻求与保加利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来转移

塞尔维亚的敌意，但这种选择同样会带来问题。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依旧存在领土争，讨好索非亚就不得不冒着与布加勒斯特分道扬镳的危险。得罪布加勒斯特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生活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如果罗马尼亚脱离维也纳，转而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扰乱该地区的安全。匈牙利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尤其警告称，“大罗马尼亚”对二元君主制的威胁不亚于“大塞尔维亚”。

亚得里亚海岸的小公国黑山也是问题之一。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ár）的轻歌剧《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就是取景于这个风景如画却颇为贫穷的王国。黑山共和国是巴尔干地区面积最小的国家，仅有25万人口，散居在虽然美丽但环境很恶劣的山峰和溪谷中。这个国家的国王身着镶满金银、颜色鲜艳的华丽制服，人们在黄昏时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宫殿前吞云吐雾，等候路人过来搭话。布拉格记者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在1913年夏徒步从采蒂涅出发，途径黑山首都，最后到达美丽的港口城市里耶卡（现在克罗地亚境内）。旅行中，他听到山谷里传来枪声，这使他大惊失色。一开始他还以为巴尔干爆发了战争，但他的防卫人员向他保证，这只不过是黑山青年用他们的俄式步枪朝湍急的山溪里的鱼开枪的声音。

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且面积狭小，但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洛夫琴山上架起枪支，能俯瞰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卡塔罗建造的港口设施，而后者丝毫没有防御能力。1861年之后掌握政权的王子尼古拉（Nikola）是继维多利亚女王和弗兰茨·约瑟夫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君主，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土扩张了一倍；1908年吞并危机时，黑山的领土再一次得到扩张；之后，他又开始盘算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小块地盘。1910年，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王。他以超凡的技巧，嫁出自己的女儿们。塞尔维亚的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是他的女婿（尽管他的黑山妻子在他刚获得王权时就离世了）；尼古拉的其中一个女儿埃莱娜嫁给了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另外两个女儿则嫁给圣彼得堡的俄国大公，他们都是俄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尼古拉充分利用他的国家敏感的战略地位，以吸引强大的外部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中最重要的当属俄国。1904年，他为了表现对大斯拉夫同盟的支持，悍然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俄国给他提供军事补助，并派出军事代表团帮助“黑山军队的重新改组”。

与黑山联姻的意大利的处境同样复杂。1882年5月起，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成三国同盟，并在1891年、1902年和1912年三次恢复自己的成员国地位。但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问题上，意大利国内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一般来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与奥地利人对抗，尤其是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巩固意大利影响力的最佳地点，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教权主义者和保守人士则相反，支持与维也纳修好并与之合作。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罗马方面推行了一种精细化、多元化但常常自相

矛盾的外交政策。1900年和1902年，意大利政府与法国签署秘密协议，解除了大多数与维也纳和柏林的条约义务。此外，从1904年起，意大利人渐渐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视为对该地区利益的侵犯。黑山是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商业和文化影响的不二之选，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aso　Tittoni）与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于1908年的兼并，意大利的反响非常强烈，并非仅仅因为抵制奥匈帝国的行为，更是因为埃伦塔尔拒绝为罗马提供财政支持——在哈布斯堡主要讲意大利语的港口城市伊斯特里亚建立一所意大利语授课的学校。1909年10月，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打破三国同盟的约定，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秘密协议，即之后的《拉冈尼基协定》。协定规定，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意大利和俄国都不能在“欧洲东部”的问题上与其他方面缔结合约。此外，双方都承诺，“要支持彼此的利益，即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利益，以及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利益。”而这项协定并非表面上那么重要，因为意大利很快就和塞维利亚签署共识，推翻了之前的《拉冈尼基协定》中的许多承诺，但这也表明罗马下决心寻求一种更加肯定和独立的政策。

最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出现分歧的是阿尔巴尼亚问题，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大。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奥匈帝国就通过其在斯库塔里的副领事，为这个国家北部的天主教徒提供宗教保护。但意大利也对阿尔巴尼亚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虎视眈眈。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罗马和维也纳都认为，一旦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权垮台，它们应当为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提供支持。而在双方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还有待商榷。

佯装的平静

1909年3月，塞尔维亚正式宣告停止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内的秘密行动，并意欲与邻居奥匈帝国修好。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口角之后，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甚至同意以一份贸易协议来结束双方之间的贸易冲突。同年，塞尔维亚进口量增加了24%，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来自奥匈帝国的商品重新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商店的货架上；到了1912年，奥匈帝国再一次成为塞尔维亚的主要买家和供应商。帕希奇与奥匈帝国代表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双方都做出了信誉担保。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尴尬似乎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抹杀。尽管佩塔尔国王正式出访维也纳的计划已被提出，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最初，塞尔维亚政府以国王抱恙为由，将出访地点从维也纳改到了布达佩斯，但之后又推迟了时间；1911年4月，这个日子被一推再推，仿佛遥遥无期。然而就在奥地利人气愤不已时，1911年冬，塞尔维亚却对巴黎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皇家访问。这

次拜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就连塞尔维亚驻法国的公使都回到贝尔格莱德，准备诸项事宜。更早之前，他们计划将维也纳和罗马作为这次法国之旅的额外访问地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佩塔尔于11月6日到达巴黎，被安顿在法国外交部。在那里，他得了共和国总理的迎接，还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在这样的场合，这枚奖章的意义十分特殊：它用来纪念和表彰这位国王，即作为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流亡者和志愿者，他在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表现非凡。让奥地利人更为恼火的是，当日的晚宴上，法国总理致辞的开场白中赞扬佩塔尔是“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国王”（很明显，也包括了在奥匈帝国生活的塞尔维亚人），并且会“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向自由”。佩塔尔兴高采烈地回应，他和他的塞尔维亚同胞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此外，种种现状背后，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耿耿于怀。民族自卫组织虽然在表面上已经转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机构，但它很快便重操旧业，它的分支机构在1909年之后迅速扩张，且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地利人也铆足了劲儿，监视塞尔维亚特工在边境外的间谍活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塞尔维亚军队中的一名候补中尉德拉戈米尔·乔尔杰维奇（Dragomir Djordjević），他将自己的文化工作（即在波斯尼亚当一名“演员”）与管理塞尔维亚线人的秘密组织相结合。1910年10月，有人发现他重返塞尔维亚参与武装训练。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的代表们很早就觉察到黑手社的存在，尽管他们当初并不确定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个充满秘密的新生集团。1911年11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新任驻塞尔维亚公使（也就是福尔加奇的继任者）斯特凡·冯·乌格龙（Stephan von Ugron）告知维也纳，“一个存在于上层圈子中的组织”目前是塞尔维亚媒体热议的话题。关于这个组织，外人没有“深入的了解”，只知道他们自称黑手社，其主要目的是重新获得奥布雷诺维奇时代军队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影响力。

乌格龙和奥匈帝国陆军武官奥托·格利内克（Otto Gellinek）之后提供的消息显然更为充分。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中，“阿匹斯”是最重要的人物。对于该组织的目标，人们也有了更准确的了解：“行动计划包括清除这个国家里所有阻碍大塞尔维亚理想实现的人”，并且扶植一位“立志领导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民族统一”的人上台。报纸上谣言四起，称黑手社已经草拟了一份黑名单，上面是他们准备行刺的官员——如果需要发动一场针对人民激进党政府的政变的话，但这些谣言之后被证明并不可信。1911年11月22日，格利内克在报道中称，显然，谋反者们计划通过合法的途径消除“塞尔维亚国内的敌人”，以便之后“通过联合所有的力量，清除外部敌对势力”。

起初，奥地利人以出奇的冷静对待这些组织。但格利内克发现，根本不可能放任这些秘密组织在塞尔维亚长时间存在，因为“每5个反叛者中，就有一个线人”。反叛活动在塞尔维亚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不用大惊小怪。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黑手社在国家机关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之后，奥匈帝国观察家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11年12月，格利内克称，塞尔维亚军政大臣取消了一项针对组织行动的调查，“因为将会招致大麻

烦”。1912年2月初，他发现黑手社的性质已经变成半官方的了，很明显，政府“对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斯特潘诺维奇却是这一组织的保护人，这足以见得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

奥匈帝国在1914年夏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黑手社的确是一个针对塞尔维亚当局的颠覆性组织，后者也十分畏惧它；另一方面，大塞尔维亚的雄心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容忍——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亦如此。更重要的是，黑手社和当局似乎在行动上联起手来。1912年2月，乌格龙警告称塞尔维亚当局可能会支持“一次狂热的军事爱国主义行动”——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让双方一致对外且不会再企图颠覆国内政权的话。民族主义组织Pijemont曾打着民族事业的幌子公开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极端目标，而黑手社的存在又使得塞尔维亚当局无法采取行动进行打压。简而言之，奥地利人深谙黑手社的势力，以及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复杂形势：帕希奇政府受到了重重限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地利人目睹了黑手社组织的成长和扩张。1914年1月，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对谋反军官韦米奇的审判上。1903年刺杀行动后，韦米奇随身携带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他从德拉加王后乳房上割下来的一块已经脱水的肉，这算是6月11日晚行动成功的战利品。1913年10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韦米奇射杀了一名塞尔维亚新兵，原因是他执行命令的动作太慢，而他也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担任司法人员的全部是高级军官，他被宣判无罪，这在贝尔格莱德的部分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韦米奇不得不接受塞尔维亚高级法院的复审，但宣判结果仅为判处10个月监禁，并且1913年12月底的一项由国王下达的赦免令又将刑期缩短。格利内克在1914年5月写道，军事警察“已经成为今天塞尔维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塞尔维亚公共生活的“趋军事化”特征构成并加深了对奥匈帝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军事警察同时也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排头兵，是号召反奥匈帝国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当属“塞尔维亚的无冕之王”——尼古拉·帕希奇。1913～1914年的政治风暴中，帕希奇按兵不动，生怕自己和军事警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1914年5月21日，格利内克写道，“带着他一贯的机敏”，这位总理巧妙地回避了来自议会的质询和催促，坚称塞尔维亚政府和军事警察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达成了高度一致”。在6月21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星期）的文件中，格利内克将当前的形势总结为4点：国家的大权已经落入反叛者之手，塞尔维亚当局有心无力，军队继续执行着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仍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但这些都不能说明帕希奇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正相反，存在长达30载的“亲俄”的人民激进党奠基人和领导人仍然处于“全权地位”。

然而，想与帕希奇进行直接对话是相当困难的。1913年秋发生的一

段奇怪的插曲证明了这一点。10月3日，经过预先安排，帕希奇访问了维也纳。这次到访是一场及时雨，因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0月1日，贝尔格莱德收到一封信，警告塞尔维亚人必须放弃阿尔巴尼亚，但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反馈。在大使的陪同下，帕希奇与诸位奥匈帝国大臣举行了会晤，还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匈牙利首相蒂萨、福尔加奇、比林斯基等人共进晚餐。然而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有对双方面对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联合财政大臣并兼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比林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帕希奇的谈话闪烁其词。他的话语“热情洋溢，辞藻华丽”，但刻意回避奥匈帝国方面提出的问题，东拉西扯，并保证“一切都会好的”。比林斯基还批评贝希托尔德没有给这位塞尔维亚政治家施加更多的压力。“外表精悍，有一把很有代表性的胡子，热情的目光，举止得当”，帕希奇用他彬彬有礼而激情四射的举止、刻意让人迷惑的话语，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弄得云里雾里。在午饭前他们的第一场会谈中，贝希托尔德被帕希奇友好的姿态和热情所感染，以至于当谈及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竟然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态度强硬地表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表示反对。会谈过后，贝希托尔德在下午突然意识到他“忘记”告知帕希奇维也纳的态度。双方答应在当天晚上一起去看戏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位外交大臣稍微迟到了一些，来到了他的皇家包厢之后，却发现帕希奇已经回酒店休息，现在他应该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这位塞尔维亚总理在第二天早些时候匆匆离开了，双方再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会谈和交流。贝希托尔德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信，并将它转交给酒店的信使，信使会在帕希奇离开这座城市时把信交给他。但因为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更不用提贝希托尔德“天书”一样的字迹），帕希奇看不懂。即便这封信在贝尔格莱德被翻译过来，帕希奇或许也很难明白贝希托尔德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同样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因为贝希托尔德没有留下信件的副本。假设比林斯基在十几年后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充满喜剧特质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奥地利人混乱的头脑造成的，或者说，是贝希托尔德近乎恼人的谦虚、羞怯和保守造成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帕希奇真的是一个聪明狡猾的人。

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数年、数月和数周里，奥匈帝国一直对塞尔维亚实施监控，他们发现这个邻国中的确存在一股企图颠覆政府的力量，而这一解释与事实有细微的差别。因此，这只能说是存有偏见的一家之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活动的观察深深根植于一种对塞尔维亚政治文化以及主要人物的消极的情感态度——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经验，部分来自长久以来存在的刻板印象。奸诈、阴险、不可靠、闪烁其词、暴力、急脾气……这些都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报道中常见的描述。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彻底的分析，即分析塞尔维亚的反奥匈帝国团体与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格拉姆—弗里德永事件有可能使奥匈帝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在1909年之后受阻，正如20世纪80年代“伊朗门”让里根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大大削弱一样。奥地利人知道，民族自卫组织的目标是颠覆哈布斯堡在波斯尼亚的统治，并在哈布

斯堡境内开展破坏活动。他们认为，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动机根源是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的爱国主义组织的泛塞尔维亚宣传。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和黑手社之间的关系都无从确认。尽管如此，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想法和行动，早已经在1914年春之前就见端倪了。

鹰与和平鸽

巴尔干战争动摇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坚固地位，同时它也壮大了塞尔维亚，后者的国土在战争中扩张了80%。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坐镇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体现的纪律性和主动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威胁时，哈布斯堡政府往往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埃伦塔尔就曾用生动的比喻将塞尔维亚形容成在奥匈帝国果园里搞破坏的“无赖男孩”。然而1912年11月9日，总参谋部发文，称惊讶于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崛起。该年年初便开始的铁路系统建设、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前线兵力的增强（法国人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已经让塞尔维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此外，塞尔维亚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会继续增强，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新征服的土地有着160万人口。在1913年的报道中，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陆军武官格利内克称，尽管眼下并没有直接的危机，但所有人都不能低估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奥匈帝国的国防必须向塞尔维亚看齐。

在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衰退的地位的问题上，维也纳的关键决策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奥匈帝国应该与塞尔维亚寻求和解，或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维也纳需要和圣彼得堡重修于好？或者问题的解决需要付诸一场军事冲突？奥匈帝国多元的政治立场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清晰的共识。外交政策也并非来自这一体系最高级别的一小撮人，而是产生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磋商，而这些团体的关系有些并非是正式的，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总参谋部就是众多团体之一。外交部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尽管它的内部也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平台。二元制度宪法要求，帝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咨询匈牙利总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大臣和高级官员同样宣称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比如负责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甚至还有理论上是他下属的波斯尼亚地区长官波蒂奥雷克——一个意见总是和别人相左的人。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如此开放，以至于连中等级别的人（例如外交官，或是外交部的部门领导）都可能通过提交来路不明的备忘录左右帝国政策的形成，而决策者们经常谨慎对待这些人的意见。负责总管事务的是皇帝，他的权力没有改变——赞同或是否决他的大臣们和谏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他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于松散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给出的意见，他只知道顺从或是对它们进行调解。

在这种混乱的政治背景下，有三个人凭借巨大的影响力脱颖而出：奥匈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哈布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20世纪欧洲掌管军事大权的著名人物之一。1906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已经54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支持通过战争扫清帝国的敌人。在帝国的外交关系上，康拉德始终表现出野心勃勃的姿态。然而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却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并常常考虑退休的问题。他在公共场合非常拘谨，喜欢独自一人登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他还用忧伤的笔触完成了一幅描绘被黑暗的针叶林覆盖的陡坡的素描。间歇性的严重忧郁症让他趋向于自我怀疑，尤其是1905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为了逃离这场沉痛的打击，他从与维也纳一位实业家的妻子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的关系中寻求慰藉。



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这段不光彩的私情给康拉德的人生仿佛投射进一缕阳光。1907年，两人相识在维也纳的一场晚宴上，当时他们的座位挨着。大概一周之后，康拉德出现在赖宁豪斯的别墅并对她说：“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您了，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您应当成为我的妻子。”大吃一惊的吉娜赶忙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她已经身处“七人联盟”中无法抽身——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无所谓。”康拉德坚定地认为，“我不会退缩，这个愿望是我的动力。”一天之后，一位副官出现了，告知赖宁豪斯总参谋长处于脆弱的精神状态中，劝说她应当在毁灭他所有希望之前三思。8天后，康拉德本人又亲自拜访，宣称如果她明确地拒绝了她，他将辞去在总参谋部的职位，就此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赖宁豪斯继续和丈夫、孩子生活，但应当时不时地和她的丈夫分开。这位总参谋长无畏的计划（大胆而狂热，甚至有些冒犯的求偶艺术）大获成功。

就这样，吉娜和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8年，期间她和康拉德是否还保持着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吉娜的丈夫汉斯·冯·赖宁豪斯（Hans von

Reininghaus）虽然戴上了绿帽子，却仍然自鸣得意，这位富有的商人总归还有别的女人来慰藉自己，何况与康拉德攀上关系意味着能够轻易地获得利润颇丰的军需物品合同。只要有机会，康拉德就会来拜访他的情人。此外，他还写情书给她，有时一天会写好几封。但因为将它们寄给情人等于冒着丑闻曝光的危险，他只能将它们收集成一个集子，并命名为“记我的苦楚”。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这些信的主题一直没有变过：她使他的灵魂得到欢愉，只有她的想法才能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的命运掌握在她手中，云云。1907～1915年，他一共攒了3 000多封信，直到他死后，吉娜才得知这个信集的存在。

我们很难将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再夸大，因为从1907年到战争爆发，它就一直是康拉德生活的重心，虽然他也在不停思考其他一些事情，包括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段关系中他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解释康拉德职业生涯的特质，比如他不顾身份铤而走险的坚强意志，以及对破坏名誉的毫不畏惧。他甚至将发动战争当作赢得吉娜芳心的手段。康拉德认为，只有成为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战争英雄，他才能消除一切社会压力和障碍，让吉娜永远地离开她的丈夫和自己结婚。在一封信中，他幻想着从一场“巴尔干战争”中凯旋，将所有蹑手蹑脚的行为都抛弃在空中，大大方方地迎娶她。在那些年，他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阳刚之气、衣冠楚楚而年轻的形象，这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私人文件里（现在它们被陈列在维也纳的各大档案馆中），可以发现从日报上剪下的抗皱霜广告。总而言之，康拉德代表了欧洲男子的典型性格——脆弱且过度紧张，因此在某些方面具有忧郁的特质。

在面对哈布斯堡皇朝地缘政治上的困境时，康拉德表现出了他对梦中情人的那种偏执。1914年以前的欧洲军事指挥官中，他以出奇的好武独树一帜。每次遭遇外交上的挑战，他的回答都是“战争”；在这一点上，1906年的他和1914年的他没什么两样。康拉德一再重申要对塞尔维亚、黑山、俄国，甚至还有奥匈帝国不忠实的盟友、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意大利，采取防御性战争。他从不掩盖他的意图，而是将它们公之于众，比如通过总参谋部控制下的媒体《军事快报》（*Militärische Rundschau*）广而告之。他对他坚定的信念非常自豪，并将这种果敢和大胆视为男人应有的品质。在他写给部长和同事的信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再地重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与人沟通的语气常常是粗鄙、吹毛求疵而自我欣赏的，这使得他的同僚和上司们很不快。1912年，当他的桃色新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吉娜建议康拉德，如果他能够更和气地和皇帝说话，并避免犀利的言辞，那么他一定能够和这位长辈更好地相处。

康拉德的眼中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塞尔维亚是其中一个主要对手。在1907年写的备忘录中，他呼吁侵略并吞并塞尔维亚，他将这个国家描述成“滋生那些将南斯拉夫从帝国中分裂出去的意愿的温床”。1908～1909年，当兼并危机还处在风口浪尖时，他多次提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防御性战争。1909年春，他对吉娜说：“这是一场危机，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能够挽救帝国。几年之后我们就会为自

己的不作为而感到痛苦，那时我将选择负全责到底。”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又呼吁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在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发动战争的次数超过25次。这种固执的坚持背后体现着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两国的政治关系的主旋律且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是竞争和对抗。与其说康拉德是个种族主义者（尽管一些稍微年轻的哈布斯堡军官都在憧憬着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爆发冲突），不如说他的思维更倾向于冷漠的霍布斯主义，认为两个国家为了追求各自的安全，诉诸永无止境的对抗。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直到巴尔干战争打响，康拉德的呼声才变得姿态高于影响力。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1908年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样，埃伦塔尔对他的论点也变得无动于衷，并且对这位总参谋长不懈地阻碍政策制定过程表现得越发没有耐心。1911年10月，当康拉德敦促与意大利开战时，埃伦塔尔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埃伦塔尔写道，康拉德在总参谋部形成了一个“战争派”。如果不对他们的发展势头进行遏

制，那么“帝国的政治行动将会被其削弱”。11月15日，在会见皇帝时，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已经无法再忍耐这位聒噪而固执的参谋长，他将他召到美泉宫，狠狠地训斥了他。“我禁止您再向埃伦塔尔发动无休止的人身攻击。”他对康拉德说，“您那些关于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直接是针对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是我！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所有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总参谋长之间的这次冲突值得一提，因为在康拉德的前任中，还没有谁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会闹到这种程度。它象征着哈布斯堡指挥体系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与大部队分道扬镳，试图实现自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使得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康拉德对皇帝的指摘毫不畏惧，赶忙起草一份尖锐的回复。但弗兰茨·约瑟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他呈上这份回复之前就将他免职了。1911年12月2日，他被正式免职。

在反对康拉德和他的战争政策的人中，最执着且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而他的死也加速了1914年“七月危机”的发酵。在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中，弗朗茨·斐迪南的地位既复杂又关键。在宫廷中，他是个被孤立的角色。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之所以被提名为帝国的继承者，完全是因为皇帝的亲生儿子鲁道夫在1889年1月自杀了。对逝去的这位才华横溢却充满忧郁气质的皇太子的怀恋，无疑让皇帝和这位代替皇太子继承皇位、脾气古怪的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在他的儿子死后不到5年，皇帝准备指定弗朗茨·斐迪南为继承者，两年后，即1896年，这位大公正式继承了皇太子之位。但即便是这样，皇帝和他的侄子之间的会面气氛依旧很尴尬。据说这位大公在去参加帝国会议的路上吓得瑟瑟发抖，就像一个要去校长办公室的学生。

1900年7月，斐迪南与捷克贵族索菲的婚姻进一步影响了他与皇帝的关系。这段通过自由恋爱而达成的婚姻违背了皇帝和哈布斯堡皇室的初衷。尽管有着高贵的波西米亚血统，但这位女伯爵还是没有达到哈布斯堡对皇室血缘关系的要求。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积极赢得大主教们、大臣们，最后还有德皇威廉二世和罗马教皇的支持，以确保这个联盟的稳定性。弗朗茨·约瑟夫最终还是放弃了坚持，但对于这样一段婚姻，他仍不甘心，直到这对夫妻在1914年遇袭身亡。他的皇位继承人必须发誓，自己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哈布斯堡皇室的血统。婚礼之后，这对夫妻继续忍受着哈布斯堡宫廷几乎包含了所有公众生活礼仪的规章制度（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定无疑带有冷落和歧视的味道）：索菲从来都不被允许使用大公妃的头衔，而是被称为第一公主，之后是霍恩贝格女公爵。在看戏的时候，她不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坐在皇家包厢，在用晚宴的时候也不允许和他坐在一起，在他乘坐华丽的金轮马车时，她也不能陪伴他。最让她感到受折磨的是皇帝的管家——蒙特诺福，他自己是拿破仑众多妻子中的一位的私生子，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监督她落实每一条规矩，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1906年后，当皇帝任命他的侄子为军队的总监察长时，弗朗茨·斐迪

南开始打翻身仗，弥补多年来在宫廷受到的冷落。他在二元君主制摇摇欲坠的执行机构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力量集团。除了任命一波关键人物（比如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之外，这位大公还扩大了他的军事总理府的活动范围，他将它们设立在自己的下宫旁边。在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总管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伦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少校的监督下，军事总理府按照军事化方针和原则进行了重新改组。表面上看，它作为军事信息渠道，为政治情报搜集和一批记者提供掩护——这帮记者专门宣传大公的观念，打压政敌，并试图形成舆论和公开的讨论。该总理府以每年一万件的速度审理信件，它已经升华为帝国的智囊团和这个政治系统的权力中心，有些人将其视为“影子政府”。正如所有的智囊团一样，它也有行动的方向。一项内部调查表明，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消灭任何能够加速哈布斯堡皇朝“国家—联邦之间的分裂”的“可能性意外”。

他们对政治分裂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控制奥匈帝国东半部分的匈牙利上层集团由来已久的敌意的担忧。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形成的这种二元政治体系，成为大公和他的谋士们公开的批评对象。在弗朗茨·斐迪南眼中，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权力被集中在傲慢自大且并不属于忠实的政治伙伴的马札尔领导者手中，这就导致哈布斯堡其余9大官方民族被边缘化和排斥。当布罗施·冯·阿伦瑙被任命之后，他集结了一批愤愤不平的非马札尔学者和专家；军事总理府成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信息交流所，专门针对匈牙利王国欺压性的少数民族政策。

这位大公开诚布公地表明了他试图在继承王位之后重新规划帝国内部系统的意愿。他的主要目标是毁掉或是削弱匈牙利在帝国东部的领导权。弗朗茨·斐迪南还一度支持强化斯拉夫人的影响力，如在帝国内成立了一个以克罗地亚人（因此天主教成为主要宗教形态）主导的“南斯拉夫国”。正是这样一个念头，点燃了他的对手的敌意——信奉正统的塞尔维亚人。然而到了1914年，他似乎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帝国变成一个包括15个成员国（大多数“成员国”内都有斯拉夫民族）的“大奥地利合众国”。

通过削弱匈牙利人的地位，大公和他的智囊团希望能够强化哈布斯堡皇朝的权威，与此同时，恢复少数民族对帝国的信心和忠心。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当然匈牙利人对此并不乐意，我们确实能够由此看出大公的激进目的，他的继承将摆脱1914年之前十几年浑浑噩噩的政治局面。同时，大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众矢之的。皇帝拒绝支持任何对1867年二元协议的篡改，因为在他眼中，这项协议是他本人早年执政到现在经久不衰的典范。

弗朗茨·斐迪南的国内改革计划同样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深远影响。他相信，目前帝国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对激进的国内改革的需求，决定了坚决不能实施冲突对抗的外交政策。因此，弗朗茨·斐迪南坚决反对激进冒险主义的康拉德。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弗朗茨·斐迪南本人（当他还是监察长时）将康拉德提拔到总参谋长的位子上的，让他从许

多看似更合适的人选中脱颖而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普遍错误地认为，奥匈帝国背后的战争贩子是这位大公。这两个人的确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例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对高龄军官的退休金计划。私下里，弗朗茨·斐迪南也非常喜欢康拉德，部分原因是后者对他的妻子十分尊敬，抱有同情（这位皇位继承人一般喜欢通过人们对他不被看好的婚姻的反应和态度评判对方），而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或许是同病相怜），康拉德欣赏大公的非正统婚恋。但在国土安全和外交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

在康拉德的眼中，军队是专门的现代战事工具，必须要完全达到现代化，要有实战能力，为下一场大战未雨绸缪；而对弗朗茨·斐迪南而言，军队主要是用来维持国内稳定的。通过成立无畏舰舰队，作为海军主义者的弗朗茨·斐迪南决心加强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统领地位，而康拉德却认为组建海军是在浪费资源，资源应当用于军队建设。他曾对大公说：“一次最漂亮的海上打击不会弥补陆上作战的失败。”与康拉德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反对兼并波斯尼亚。1908年8月，他对埃伦塔尔说：“从我们不尽如人意的国内形势来看，我坚决反对所有类似的权力闹剧。”10月中旬，当塞尔维亚对兼并事件做出激烈的反应时，他告诫埃伦塔尔，不要让危机升级成一场战争：“如果战火燃起，我们绝不是受益方；然而在英国（或许还有意大利）居心叵测的撺掇下，那些巴尔干的讨厌鬼们似乎正将我们拉入军事冲突的泥潭。”他向阿伦瑙坦言，如果能给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一些颜色，那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它们会让帝国卷入一场欧陆大战，或是一场拥有“两三条阵线”的、旷日持久而让人弹尽粮绝的冲突，那么这些“小打小闹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他警告称，康拉德必须克制。1911年12月，康拉德要求奥匈帝国趁利比亚战争攻击意大利，导致了冲突的激化。康拉德被皇帝免去官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茨·斐迪南对他失望透顶。

弗朗茨·斐迪南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哈布斯堡新任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贝希托尔德是个相当富有的贵族，他拥有独到的品位，是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当时仍然在奥匈帝国的上层管理集团中拥有显赫地位。他的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因此他天生并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真正的爱好是艺术、文学和马术。他之所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是因为对私权和声誉的渴望，而更像是在对皇帝和外交大臣埃伦塔尔表达自己的忠心。每当被提拔到需要更高资历和承担更多责任的职位时，贝希托尔德都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而这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

从行政机关调到外交部后，贝希托尔德在驻巴黎和伦敦的使馆供职，1903年又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成为埃伦塔尔的亲密盟友，而埃伦塔尔自1899年以来便担任驻俄大使。圣彼得堡的工作正巧顺遂了贝希托尔德的意愿，因为他积极支持俄奥同盟。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于，在诸如巴尔干地区等存在潜在分歧的地区问题上保持合作。贝希托尔德认为，这种关系对帝国的安全和欧陆的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埃伦塔尔在圣彼得堡的同僚，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

确实在两国巩固良好关系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埃伦塔尔要离开前往维也纳担任外交大臣时，贝希托尔德欣然接受了大使的职位，并坚信他的观点和维也纳那位新任大臣完全吻合。

然而1908年，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在贝希托尔德任职的前18个月里，两国关系还算和睦，尽管有事实表明，伊兹沃尔斯基正与奥匈帝国分道扬镳，转而采取一项新的大陆策略（这项新策略的基础是1907年俄国与英国之间新签订的协议）。然而兼并波斯尼亚引发的危机，摧毁了进一步与俄国外交大臣合作的所有契机，同时破坏了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而贝希托尔德正是因这项政策才答应任职的）。埃伦塔尔曾试图冒着与俄国翻脸的危险，维护奥匈帝国的威望，贝希托尔德对此深表遗憾。1908年11月19日，在一封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贝希托尔德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鉴于“俄国不断膨胀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心理”，如若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巴尔干政策”，那么这必然会“对奥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变得“步履维艰”。其他人或许能够通过个人魅力或诚挚态度来修复双方的关系，但对于“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人来说，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最后，他附上了一个请求：等局势恢复平静之后，他不再担任此职。

按理说，贝希托尔德应该在圣彼得堡待到1911年4月，但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的负担。象征着20世纪初显赫政治人物社交生活的奢靡财富对他来说已经开始变味。1910年1月，他在特克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夫人（Countess Thekla Orlov-Davidov）的住处参加了她举办的一场巨大的豪华舞会。那栋建筑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模仿凡尔赛宫建造的，所有的舞厅和走廊都被成千上万朵鲜花点缀，它们来自法国里维耶尔的花房，是斥巨资用一辆特殊的火车装载，一路穿过寒冷的北方运送而来的。对这位富有的艺术鉴赏家和狂热爱好者来说，这等无度的挥霍反而让人无法忍受。当贝希托尔德离开圣彼得堡返回他在布赫劳的住所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然而这种放松状态仅持续了10个月。1912年2月19日，皇帝召他到维也纳，指派他接任埃伦塔尔，担任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

上任之后，贝希托尔德仍希望修复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诚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这也是皇帝指派他成为外交大臣的动机。新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杜格拉斯·图尔恩伯爵（Count Duglas Thurn）是这项政策的支持者。不久后贝希托尔德发现，他已然成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坚实盟友，后者很快便向这位新任外交大臣靠拢，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赞扬他比“他恼人的前任们（戈武霍夫斯基和埃伦塔尔）”优秀得多，并支持在巴尔干的缓和政策。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俄国重修于好：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鼓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在哈布斯堡皇朝内煽动民族情绪；最重要的是，俄国特工已经背着奥地利人，苦心建立了针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巴尔干联盟。尽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鲜血液还是愿意着手进行意见交流。1912年4月30日，在对匈牙利代表团的讲演中，贝希托尔德宣称，他的政策“是倡导稳定与

和平的政策，提倡对现有问题进行对话，避免干涉和打击”。

巴尔干战争正是对这些承诺的有力检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人恪守成立独立阿尔巴尼亚的诺言，因为他们希望后者能够成为奥匈帝国的卫星省。然而对塞尔维亚政府来说，他们也想力保这块连通中心国土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土地。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冲突时期，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进行了多次进犯，引发了国际危机。事情的结果同样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奥匈帝国也曾想满足塞尔维亚的需求（或仅仅对要求予以重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塞尔维亚由于在南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新的领土而士气大增，逐渐成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存在。

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胜利表现出愤怒情绪。1913年秋，被塞尔维亚用武力征服的地区传来坏消息时，这种敌对状态再一次加强：奥匈帝国总领事杰里茨卡（Jehlitschka）从斯科普里发来报道，称那里发生了针对当地居民的暴行。其中一份报道还提到，10个小村庄被摧毁，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惨遭屠杀。那些人被赶出村庄，被排成一排并扫射；房屋火光连天，但凡有妇孺从火光中逃出，便会被刺刀刺死。这位总领事称，总而言之，参与射杀平民的是军官，而对妇女儿童的杀戮则由士兵执行。另外的消息来源描述了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戈斯蒂瓦尔（阿尔巴尼亚奋起反抗塞尔维亚侵略者的地区之一）之后的行为。有大约300名戈斯蒂瓦尔穆斯林被捕，并在夜间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离城区；之后，他们有人被枪托猛击而死，有的被刺刀刺死（因为如果开枪，附近的居民会被惊醒），然后统统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巨大墓坑中。这些人与起义并无干系。杰里茨卡认为，这并不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场血腥而有组织的种族屠杀或灭绝行动，这些人背后应该有发号施令的人”。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报道与该地区的英国外交人员的报道如出一辙，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对奥匈帝国领导层的情绪和态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14年5月，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称，就连法国大使都向他抱怨塞尔维亚人在新兼并地区的不当行为；希腊、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僚也纷纷表示不满。塞尔维亚名声的败坏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摇唇鼓舌，对此进行了否认，而这种行为反而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政府要么是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要么无意对这些行径进行阻止或是展开调查。让人感到可笑的是，维也纳的报纸上刊登的领导人文章建议塞尔维亚政府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通过安抚政策使他们归顺。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呈给贝希托尔德的一封信中说，这样的建议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或许还有些作用，但塞尔维亚是“犯罪和杀戮已经被制度化的国家”。关于暴行的报道对奥匈帝国政治的影响很难预测，维也纳的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行径与他们眼中典型的塞尔维亚作风并不矛盾。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还一再强调塞尔维亚领土扩张的非合法性。

尽管如此，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1914年春夏之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年春天，贝尔格莱德的情绪尚且稳定，这反映了巴尔干战争之后该国家还未完全从战争的疲态中恢复过来。5月，面对新征

服地区的不稳定和军民之间的冲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在1914年5月24日的报道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Baron Giesl）认为尽管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布置了重兵，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心未来会发生侵略战争。而3周后的6月16日，贝尔格莱德的陆军武官格利内克派遣的部队打破了宁静。一时间，在外度假的军官被悉数召回，居民被禁止离开他们的住所，军队蓄势待发，形势一触即发。但这并不足以表明针对奥匈帝国或是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意图。因此，南线还是和平的。

从奥地利人那里同样无法察觉要发动战争的迹象。早在6月，贝希托尔德命令一位外交部高级首领弗朗茨·马特申科男爵（Baron Franz Matscheko）起草一份声明，阐述帝国对巴尔干问题的关切所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份在咨询福尔加奇和贝希托尔德的基础上完成的“马特申科备忘录”于6月24日被呈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桌上，也成为我们了解1914年夏维也纳主张的最清晰的材料。这并不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文件。关于巴尔干问题，马特申科仅指出了两点积极因素：奥匈帝国与“最终从俄国的催眠下苏醒”的保加利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但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完全遵循成功的建国模式，其国内骚乱程度以及目无章法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此外，阿尔巴尼亚人普遍认为，无外部势力的干预，良好秩序的建立便是空谈。其余所有问题几乎都是消极的。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走向强盛和扩张的塞尔维亚成为空前的威胁，罗马尼亚的舆论正中俄国的下怀：罗马尼亚何时能够正式与三国同盟决裂从而投入俄国的怀抱，成为人们应当警觉的问题。奥匈帝国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俄国政策的压力。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势力已经被摧毁，俄国暗中资助巴尔干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最后的奥匈帝国进行肢解，而俄国早已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妄图其成为自己的卫星省。

那么奥地利人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备忘录集中回答了4个外交问题。第一，必须让德国站在自己的一边，支持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柏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维也纳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他们的态度必须有所转变。第二，罗马尼亚应当明确表态自己站在哪一方。俄国人已经在向布加勒斯特示好，希望能够拉拢一位新的同盟对付奥匈帝国。如果罗马尼亚人倾向于自己一方，则需要尽快告知维也纳，以便后者做出部署以加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东部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第三，奥匈帝国必须尽力与保加利亚之间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和贝尔格拉德之间关系的深化。第四，必须通过使用经济特许权等手段，把塞尔维亚从对抗政策中拉拢过来，尽管马特申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能否平息贝尔格莱德的敌对情绪。

“马特申科备忘录”体现出一种偏执的妄想，这种妄想奇怪地将强硬的姿态和宿命论融合在一起。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发现，这是20世纪早期维也纳盛行的一种情绪和文化产物。但并不等同于维也纳承认战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能说明他们渴望战争。正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外交手段和目标，这与维也纳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吻合的——“通过对话实现

和平的政策”的倡导者。

另外，1912年12月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康拉德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战争政策，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薄西山。1913年5月，反情报军事部门前长官、布拉格第八军团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Colonel Alfred Redl）被发现向圣彼得堡定期汇报奥匈帝国军方的高级别机密，包括所有的动员计划。这次丑闻直接影响了外界对康拉德作为军事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的质疑，因为这一级别人员的所有任命都是他的职责。雷德尔为人浮夸、轻率，是个同性恋者，他的联系人名单上都是重量级人物，这很容易让他成为俄国情报人员胁迫的对象。有人或许会问，这一行径是如何逃过康拉德的注意的？因为他从1906年就开始负责监督雷德尔的工作了。众所周知，康拉德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他与绝大多数高级军事人员只是泛泛之交。为了弥补他的失误，他将这位上校召至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递给他一把手枪，向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自裁。雷德尔将手枪瞄准自己，扣动了扳机。这一不光彩的结局让总参谋部永远丧失了从雷德尔那里获悉他究竟向圣彼得堡泄露了什么信息，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的机会。

这或许是康拉德的本意。据说泄露奥匈帝国军事秘密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切多米尔·扬德里奇（Čedomil Jandrić）的南斯拉夫裔男子，他任职于总参谋部，这个人恰好是康拉德儿子库尔特的亲密友人。切多米尔和库尔特是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经常外出饮酒，寻欢作乐。不断有证据表明，扬德里奇伙同赫岑多夫的意大利情人以及其他若干名圈中朋友，卷入向意大利人出卖军事情报的事件中，这些情报之后不久便被意大利泄露给了圣彼得堡。库尔特本人也可能直接参与了为俄国人效劳的间谍活动，如果圣彼得堡军事区的军情首领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钦上校（Colonel Mikhail Alekseevich Svechin）的声明可以信赖的话。斯韦钦之后回忆称，奥匈帝国特工为俄国提供了高端的军事情报，包括总参谋长的儿子，据说他潜入了他父亲的书房，搜出了总参谋部的战事规划文件。康拉德家族与这种事情有染，可见能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当时，库尔特的罪责并没有被全部揭发（如果他自己确实是个特工的话），但在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由康拉德主持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那位年轻人宣称拒绝向自己人透露重要信息，因此备受谴责。在敦促会议给予当事人最严重的处罚之后，康拉德感到头晕目眩，从椅子上起身，暂时离开了房间。出于自负，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被雷德尔丑闻搞得元气大伤，颜面尽失，以至于在191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异常沉默。

弗朗茨·斐迪南仍然是最强硬的反对战争政策的人，这位皇位继承人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地在冲淡康拉德在主要决策意见上的作用。1913年2月初，差不多在康拉德重返岗位的6个星期以后，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泉宫的一次会议上提醒他“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和平”，康拉德则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但明显不是以任何代价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弗朗茨·斐迪南多次提醒贝希托尔德不要在意这位总参谋长的观点，并派遣他的副官卡尔·巴尔多夫上校（Colonel Carl Bardolff）到康拉德那里，严肃地告知对方，不要“逼迫”外交部“采取行动”。康拉德却认为，这位大公“无论如

何也不会支持与俄国开战”，他“并不想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一草一木，抑或是一只羊，他的思想太单纯”。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越来越浓的火药味。1913年秋，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然公开。在一次高层首脑会晤之前，弗朗茨·斐迪南猛烈抨击总参谋长，因为他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恣意修改了军事演习的安排。只有前任总参谋长布罗施·冯·阿伦瑙从中调停，才成功阻止了康拉德的辞职。康拉德被迫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公的一位副官回忆道：“自从雷德尔案之后，总参谋长就心如死灰……是时候该考虑考虑他的葬礼安排了。”在关于波斯尼亚1914年夏的演习问题上经过激烈交锋后，弗朗茨·斐迪南下决心除掉这位让人头疼的总参谋长。如果这位大公能够毫发无伤地从萨拉热窝回来，康拉德可能就会卷铺盖走人了。鹰派群体到时候恐怕就会失去他们最为坚决和专注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呈现良好的态势（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奥匈帝国政府拥有东方铁路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是之前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领土运作的一家国际化公司。既然大部分控制权已经转移到塞尔维亚手中，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必须就铁路权达成共识（同时还包括谁应当对战争损失赔款负责和如何、是否继续这项工作的问题）。因为贝尔格莱德坚持认为塞尔维亚应全权掌握，1914年春双方不得不进行协商，就价格和运输条件等达成一致。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困难重重，局面不时出现敌对态势，尤其是当帕希奇就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霸道地插嘴、打断协商流程时，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在大公前往萨拉热窝时，协商仍在继续。双方关系的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改善，是经过了数月的官方争论后，1914年5月底达成的共识：交换双方被指控为间谍罪的一小部分嫌疑犯。这件事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但仍暗示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彼此之间迟早会友好相处的希望。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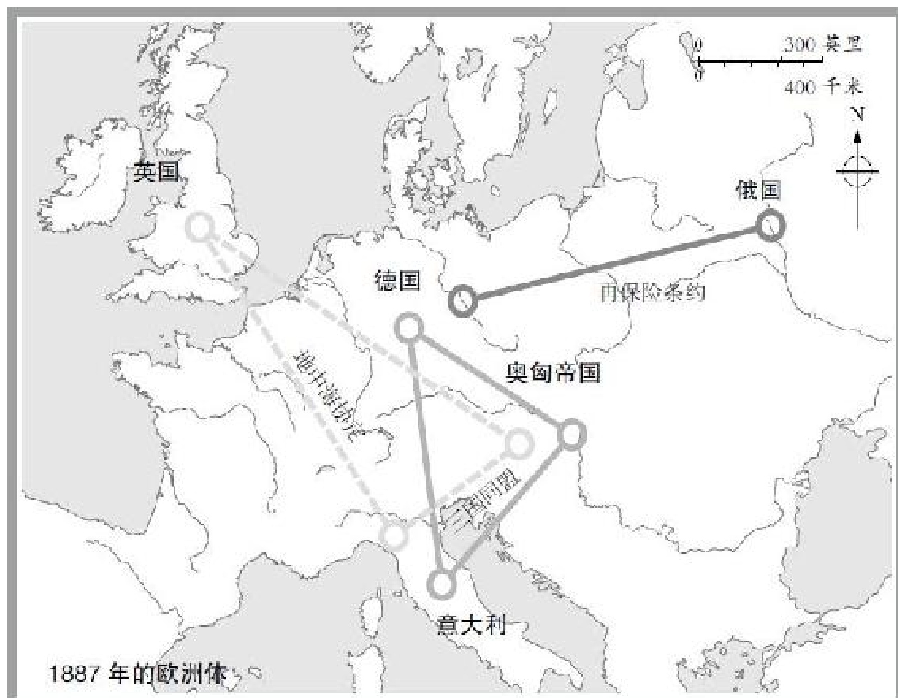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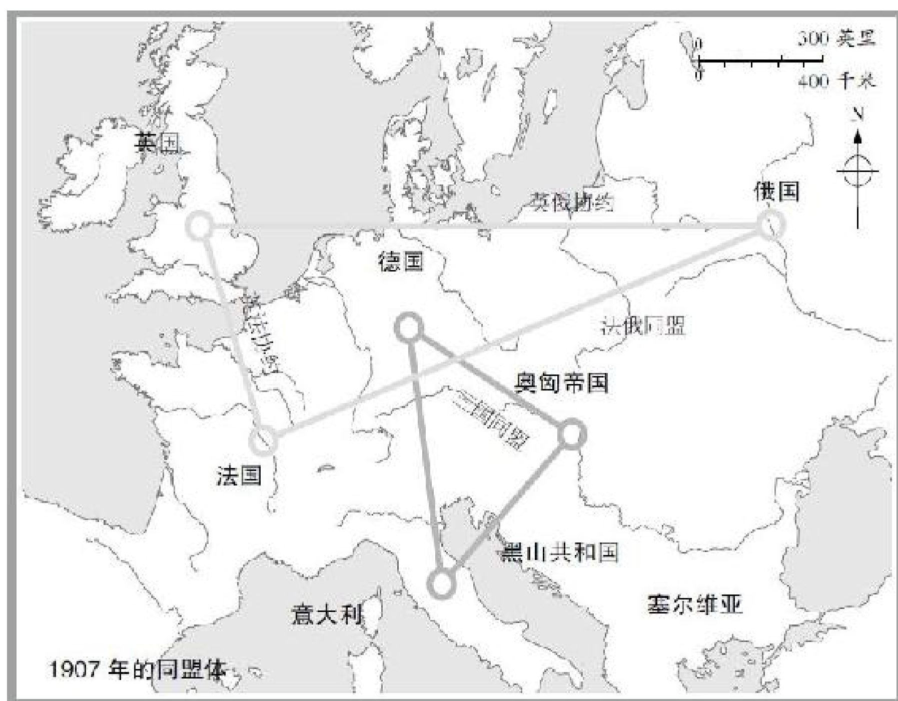
欧洲的分裂

第三章 由多极到两极：欧洲在1887~1907年



如果将1887年与1907年这两个时间内的欧洲的大国势力分布做个对比，便能清晰地洞悉其中的端倪。1887年的欧洲所呈现的是一个多极化的势力分布，在这其中，多个国家或利益团体努力维持着彼此间微妙的平衡，使各个势力都得到制衡：英国与法国在非洲与南亚维持着竞争关系，英国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亦与俄国针锋相对；而法国也费尽心机企图一雪1870年普法战争的前耻；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使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争端由来已久，而法意两国在法国对北非的政策上亦存在分歧。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在1887年潜存着，德奥意三国同盟（其条约于1882年5月20日签订）使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不至于撕破脸，而带有防御性质的俄德《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18日签订）则有效限制了两国对于他国领土可能造成的侵略行为，并使俄德关系不至于因为奥俄关系而发生冲突。同时俄国与德国的紧密关系也使法国无法联手俄国构建反德联盟，而英国借由1887年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签署的《地中海协定》（其目的在于遏制法国在地中海地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及土耳其海峡的势力）也与欧洲的各个势力体关联到了一起。





然而1907年的欧洲局势与20年前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法俄与德奥意两大联盟之下，呈现的是一个两极化的欧洲。德奥意三国同盟依然存在（虽然意大利此时与德奥两国已是同床异梦），法国与俄

国组建了法俄同盟（其盟约于1892年起草，于1894年通过），规定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一经得知，无须任何事先协议”，需立即调遣全部兵力，以“使德国立即陷入东西方向腹背受敌的局面”的速度来御敌。而随着1904年英法协约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英国也加入法俄同盟之中。至此，距离这些国家真正与彼此组成同盟并打响“一战”虽然还为时过早，两大军事阵营的轮廓已然清晰可见了。

对于1914年爆发的“一战”来说，欧洲地缘政治体系的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当时绝对没有人能想到这会成为欧洲大陆迈入战争深渊的最后一步。欧洲两极分化的状态并没有引发战争，实际上相对于战前持续升级的两极对立局势，它也对平息分歧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然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两大阵营的对立，“一战”也不会就这样打响。很多至关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欧洲两极化的大环境中产生的，而要想知道这种两极化的形势是如何产生的，就有必要先回答4个相关问题：为何俄国与法国要在19世纪90年代组成同盟对抗德国？为何英国也选择加入这个同盟？在促成这个同盟的过程中，德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个同盟发生了哪种程度的结构转型，才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

法俄同盟：危险的关系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日后法俄同盟在欧洲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几个世纪来，德国所处的欧洲中部都处于一个多方势力各自为战而又不堪一击的状态，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以新的强势姿态联合起来，屹立于欧洲。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一落千丈，德国出乎意料地大胜法国，不仅让法国的精英阶层大跌眼镜，也引发了法国文化界的深层次危机感，而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及军方所极力坚持的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成了法德关系中永远无法弥补的一道深深的裂痕。阿尔萨斯—洛林俨然成为法国报仇雪恨的终极符号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沙文主义的不断发酵。虽然丢失的领土绝非法国新政策的唯一推动力，但其对舆论不断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政府高层产生的隐性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即便没有割让领土，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也将改变其自身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毕竟在此之前法国的安全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政策。1871年后，法国不得不在东边寻求与新的稳固势力联合的机会，法国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也因此深深地融入了欧洲的国际化体系。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但欧洲各国却因此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时期。

鉴于德意志帝国的国土面积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法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反德同盟来遏制德国的发展。俄国虽然与法国的

政治体制大相径庭，但依然是同盟成员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前驻法国大使尤斯蒂斯（J. B. Eustis）在1897年就注意到，在法国“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是孤军奋战，以其一己之力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要么寻求与俄国这个唯一能倚靠的大国的同盟关系”。如果法俄组建同盟，德国将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潜在威胁。

德国只有与俄国联盟，才能阻止这种被两面夹击的情况发生。为此，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于1873年缔结了三皇同盟。但由于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有利益之争，任何与这两国相关的联盟体系都注定无法长久。这也让德国必须在这些潜在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德国选择亲奥，法俄同盟的发展之路就将畅行无阻。作为德国首相、帝国的构建者，同时掌握着外交决策权的俾斯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于1890年3月离任前相应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如他在1877年夏所宣布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除了法国之外，所有大国都依靠于我们，且要让它们因彼此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形成反德联盟的政治总形势”。为此，俾斯麦推行了一项双面政策：一方面，避免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为德国尽量创造更多的优势。

俾斯麦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停止了对非洲及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大规模掠夺，使英国不至于与其翻脸；他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权益摆出了毫不在意的姿态，并于1876年12月在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表示巴尔干问题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的士兵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引发国际震动时，俾斯麦通过德国国会的力量使各国相信德国有能力成为欧洲大陆的守护者。这位德国首相还通过义务调解战后的领土纠纷，向世人证明，对于德国来说，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德国自身的稳定同等重要。1887年，俾斯麦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达到顶峰，德国通过各种各样的协约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保持紧密的联系。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确保了法国始终处于孤立的位置并且无法组建反德同盟，而由俾斯麦促成的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甚至使德国与英国（经由三国同盟关系）变为了间接的同盟关系。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勉强维系的三皇同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也让俾斯麦的同盟濒临崩溃。1885年，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东鲁米利亚爆发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对此，俄国政府极力反对，因为保加利亚领土的扩大将使其更加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地区均是俄国的战略要地。素来与俄国在中亚地区有利益争端的英国则承认东鲁米利亚为保加利亚的新领土。随后，塞尔维亚于1885年11月入侵保加利亚，使原本紧张的事态进一步升温。然而塞尔维亚人非但没有胜利，反而被保加利亚军队逼回塞尔维亚境内，最终在奥匈帝国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才不至于被保加利亚占领。在各方的妥协之下，俄国成功阻止了保加利亚的国土扩张，却不得不接受保加利亚北部与奥斯曼帝国南部土地

合并的事实。之后，俄国为了让保加利亚服从自己，甚至采取了包括绑架、恐吓和废黜保加利亚大公在内的一系列举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887年春，俄国都完全有可能不顾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反对，入侵保加利亚并扶植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而就在俄国政府因为巨大的风险打算放弃发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时，一股巨大的反德舆论风波突然自俄国媒体和社会各界席卷而来，因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媒体眼中，此时的德国俨然与奥匈帝国一起成为巴尔干地区的最大获益者，也使俄国丧失了对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群体在政治方面的统辖优势。

对德国来说，这一切也是一个教训，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依然存在。保加利亚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潜藏在该地区的巨大矛盾，即发生在一个不算重要的国家身上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因此走向战争。那么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对此，俾斯麦的答案是再次寻求与俄国的友好关系，避免那些能触及共同利益的矛盾，阻挠俄法的交往，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俾斯麦于1887年与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格尔斯（Nikolai Giers）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以稳固与俄国的关系。该条约规定，德国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主权提供支持，同时需在俄国与另一国家（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保持中立，由此，德国也能通过双重的条约在与俄国以及奥匈帝国的联盟上进行适当的利益权衡。

但俾斯麦的政策在国内没有得到完全认可。面对俄国强势的姿态以及德俄之间日益浓重的火药味，很多人开始对《再保险条约》提出质疑，甚至连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大臣的俾斯麦之子赫伯特也对这个条约有所顾虑。“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赫伯特曾这样向他的哥哥透露，《再保险条约》或许能“给我们6～8周的喘息之机用以抵御俄国”。另外，激进的情绪也开始在军方酝酿，很多人提议积极备战，应对可能来自俄国的威胁。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消极情绪、对俾斯麦政策的争论以及舆论的多重影响，一个包括部分政府高层在内的反对派开始形成。很多人质疑，德国为何要同时承担帮助奥匈帝国抵御俄国以及帮助俄国抵御奥匈帝国的责任？没有任何国家会这样做，为何德国永远要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为何唯独德国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完全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策？在反对派看来，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制衡各个国家的协约体系，其运作效果还不如一台老旧的破烂机器，是一个让德国陷入越来越危险境地的用“破铜烂铁”勉强维系的体系。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此后接替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的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于1890年春宣布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失效。

随着德俄《再保险条约》的终结，法俄关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依然存在许多障碍。以独裁政治闻名于世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统治阶层显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俄国也对与法国结盟后的利益评估有所质疑。毕竟无论俄法关系如何，俄国应该都能随时获得法国的支持，既然这样，又何必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而束缚自己的行动呢？一旦俄国与德国真的爆发战争，法国政府是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的。至少德国当时必须在德法边境增加驻军，从而使

俄国的边境压力得以减弱——这可是不需要签订任何条约就能拿到的实际好处。虽然法国和俄国在抵制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有着相同利益，但俄法两国相隔甚远，难以在对抗英国上有实质性的紧密合作。以法国所处的位置，即便它有意维护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也是鞭长莫及，就更别说维护俄国在北非的利益了。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俄法之间的利益矛盾可谓针锋相对。例如，法国的政策倾向于阻断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通航，以防止其最终削弱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地中海地区也使法国和英国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俄国似乎也没什么理由继续以让步的姿态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频繁出现，主要表现在德国针对俄国的粮食进口关税方面，却很少涉及直接利益的问题。俄国与德国的主要争论源于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帝国的对抗，德国的实力成了消除俄奥争端的关键，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问题上，俄德两国联手抑制奥匈帝国可算是众望所归。而这也是三皇同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表现。德国的相对中立性使其相比于法国来说，在俄国人眼里是更有利的盟友。俄国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才选择将其大陆安全政策的第一步放在与德国的结盟上。这也是为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便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感情，但依然对各方的压力视若无睹，坚持于1887年签订《再保险条约》。

那么，俄国为何又在法国向其示好时，于19世纪90年代初向对方张开了双臂呢？即便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提出过改善条约的方案，德国拒绝恢复协议内容的行为还是改变了俄国政策的初衷。此外，1890年6月德国军事法案中规定增加预备役军力18 574人，加之德国宣布废除《再保险条约》等举动，都使俄国感受到了接踵而来的威胁。随着俾斯麦的离任，生性冲动鲁莽的德皇威廉二世大权在握，这个被沙皇亚历山大形容为“无赖的花花公子”的皇帝增加了德国未来外交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时，法国提出的大额国债也吸引了俄国沙皇的目光。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让俄国真正动摇的原因是其对于英国将加入三国同盟的担忧。

19世纪90年代初，英德关系迎来战前的最好时期。借由1890年7月1日签订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英国与德国之间交换或割让了位于非洲的部分领土主权，德国因此得到了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1891年夏，三国同盟修订；此外，德皇出访英国期间被亲德媒体大肆宣扬，俄国的危机感急剧增强。特别是英国的《晨报》还提到“加入三国同盟，或者说是成为四国同盟的一员”。此外，1891年7月11日的*Standard*杂志称，英国与德国“自古以来就是朋友，更是盟友”，未来“英国海军将与德国军队联手”，一同捍卫欧洲的和平。随着类似报道的出现，法国与俄国的驻英大使之间也展开了多次交流。对于俄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作为其远东和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将要与强大的德国结为同盟，并进而与威胁着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奥匈帝国沆瀣一气。正如法国驻俄大使警告过的，这样一来所造成的局面将是“英国与德国政府在大陆均势政策上达成共识”，并给俄国带来潜在的

灾难性后果。

英国与德国日渐亲密的关系，加之俄英之间在阿富汗、波斯、中国、土耳其海峡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都使俄国不得不更加慎重地考虑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了缓解这种威胁，俄国放下姿态，公开与法国签订合约。曾经与德国修订《再保险条约》的格尔斯在1891年8月19日写给俄国驻法大使的信中，提出了与法国签订合约的想法：三国同盟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出于政治目的也或多或少地涉入其中”，这让俄国和法国不得不“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就如何看待对方国家这件事上重新交换意见”。鉴于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格尔斯于1891年夏正式宣布增进俄法两国的互利交往。1892年8月18日，法俄签署军事协定，两年之后，两国最终形成了全面同盟关系。

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法俄联盟的形成动机十分复杂。虽然遏制德国是法国的最大目标，但俄国更看中的是阻挡奥匈帝国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法俄两个国家也都不得不防范，日渐发展的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其政策依然带有一定的亲德倾向，毕竟比起与德国为敌，与英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俄国的高层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亲德派人士——格尔斯就是其中之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表示，如果俄奥之间爆发战争，法俄同盟就将“摧毁”德国目前形成的主权国家，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弱小的城邦”。这话让格尔斯大惊失色。但总的来说，俄国对于德国的敌意主要还是源于德奥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德英之间的密切交往。直到1900年，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条款增加到法俄合约当中，规定如果英俄之间爆发战争，法国必须出动10万兵力到英吉利海峡协助俄国作战；如果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俄国军队必须经由法国出资修建的铁路线直抵印度前线，以压制英军。

其次，1894年形成的这个法俄同盟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价值。与之前欧洲大陆的两国、三国同盟或者三皇同盟相比，这个同盟主要表现在军事协定方面，规定两国要合并各自的力量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一规定于1912年被写入海军法）。同盟的作用不再是“制衡”同盟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并化解来自对立同盟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俄同盟标志着“促成‘一战’拉开序幕的转折点”。

法俄同盟丝毫没有加重与德国之间的矛盾。通过官方及民间的节日互访、宣传政策、文化及贸易合作等方面的交流，法俄两国之间达成了文化上的某种共识。但法俄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依然阻碍着两国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外交部长都坚持认为，既然俄国不愿意在帮助法国讨回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一事上采取实际行动，法国也就不必在与俄国的同盟中尽太多义务。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并不想因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而疏远德国，相反，他们恰恰认为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是上策。在俄国外交大臣的首席助理弗拉基米尔·拉姆兹多夫（Vladimir Lamzdorf）看来，同盟的目的是保证俄国一切行动的独立性，并在保障法国安全的同时抑制其打击德国的气焰。在同盟刚刚成立

的前10年里，以沙皇为首的俄国政府首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如何以经济和政治手段渗透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太过关注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利益纷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促成了法俄联盟的英国也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阻止欧洲大陆的各势力朝着一致反德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了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也使得与英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与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巴黎的反应

随着英国与德国的交好，如何权衡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成为摆在法国面前的难题。在法俄同盟建立之后的前4年里，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所推行的是坚决反英的政策。在法国殖民主义媒体的舆论影响下，阿诺托向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直接提出质疑，这种敌对状态最终酿成了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的一支远征军为了征收殖民地的款项而向尼罗河上游方向行进，同时一支英军部队也由占领地向南行进，两支部队在苏丹沼泽地的一个名为法绍达的废弃前哨站相遇了。由该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使两个国家在1898年夏向着战争的深渊迈进了一步。直到法国做出让步，危机才得以化解。

法国对德政策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于与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纠纷。阿诺托在1892年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提到，根据法国当时的政策，法国允许与德国在极其有限的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是增强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同时也加速了法俄同盟的形成与发展。而在阿诺托看来，阻止英德之间相互勾结的一个方法或许应是寻求法、德、俄三国在更广泛的事务方面的理解；这也将确保德国在法英的殖民地竞争中支持法方，进而摧毁“德国与英国之间存在了很久的和谐景象”，尤其是在这一切都只是英德在所谓的同为“日耳曼国家”的概念之下所形成的和平假象。法国与德国的这种联系当然是暂时有所裨益的：阿诺托曾写道，如果德国愿意永久归还其于1870年占领的法国领土，那么法德之间长久的友好关系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

于1898年继任外交部长的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如大多数表现突出的法国政客一样，德尔卡塞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无时无刻不表露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法国曾经割让的土地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他的家人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词。“我们当时甚至有一种错觉，这两个词是绝不能逾越的禁区。”他的女儿后来回忆道。但作为在各个领域争取影响力的大国，法国难免会在一些事务上面临与德国狭路相逢的尴尬局面。作为殖民部的副秘书长，德尔卡塞决定加大法国与英国竞争尼罗河上游殖民地的力度。其实他上任之时正值法绍达事件发展到顶峰，他当机立断决定做出让步，以避免法属南苏丹地区受到英国的威胁。但当英国拒绝和解之后，德尔卡塞转而变成反英姿态，并尝试（正

如同阿诺托所做的一样）染指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有朝一日能将摩洛哥纳入法国的版图。

为了向英国施加更多压力，德尔卡塞尝试着将阿诺托的构想付诸实践——将德国拉入法俄同盟。从1899年秋到1900年春，这个同盟的政治环境变得空前良好：在与法国驻德大使的一次会谈中，新任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暗示愿意德法之间共同分享欧洲大陆之外的利益。法国人都知道，德国媒体（同法国媒体一样）对于英国在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持反对态度，德国皇帝在这件事上，对英国行径的怒斥更是增加了法国人的乐观情绪。1900年1月，德尔卡塞操纵之下的主要媒体都鼓励德国加入法国与英国争夺埃及殖民地的斗争，并指出如果苏伊士运河恢复中立状态，德国也将从中获利，同时德法两国的强大海军联盟也将在欧洲重大问题上拥有与英国分庭抗礼的实力。在外交界，人们都知道这些文章皆是出自法国外交部之手，只不过是借媒体传递出他们的外交政策而已。

在德尔卡塞等待德国回应的同时，他与同僚们也在紧张地为可能与英国爆发的全球性战争做准备。“有人提出可以直接空降到英国本土实施打击。”他在1900年2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说道，“有人则提议先出征埃及，也有人提出应该配合俄国在印度的军事行动，让印度支那的部队向缅甸发起进攻。”大家都认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应该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以商讨法国究竟应该从何地发动对英国的武装突袭。德尔卡塞宣称，英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还在190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是时候“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采取实际行动了。同时他声称，英国为了离间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些国家都对摩洛哥的领土图谋不轨（后来，德尔卡塞甚至也与美国人共同探讨抢占摩洛哥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对于德国往昔的不信任都转移到了英国身上。

然而法国的这些计划最终化成泡影，因为德国拒绝按照德尔卡塞的规划组成反英同盟。德国方面甚至指出，任何向英国提出的要求都应事先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由此看来，德皇嘴上坚持说要反英，但在外交政策上却犹豫不决，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确实说过‘我讨厌英国人’……”德尔卡塞抱怨道，“但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真正把法德关系扼杀在恢复期的是德国为此提出的要求：1900年3月15日，来自法国驻德大使的一份报告称，德国只有在法、俄、德三国“保证欧洲政治版图的现状不再变更”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继续发展反英同盟。实际上，这相当于变相要求法国承认德国对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

德国的此番要求永远地改变了德尔卡塞的想法，从这一刻起，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彻底放弃了构建法德同盟的想法，联手向埃及殖民地进军的想法也永久地搁置了。相反，德尔卡塞开始认为，同英国结盟，并加强在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法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如果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能在法国的帮助下得到巩固，作为交换，英国便会将摩洛哥交到法国的手里。这种安排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防止出现（虽然实际

上几乎不可能）英国和德国就摩洛哥问题达成一致——这对法国将是巨大的损失。到1903年，法国外交部长已经把摩洛哥和埃及之间的主权交换作为法英联盟的基础。

法国外交上的这种重新定位对法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亲英政策发展的同时，反德情绪也随之滋长。德尔卡塞在获取摩洛哥主权的方法的变化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德尔卡塞早期曾设想以武力威慑埃及，从而让英国顾此失彼，放弃对摩洛哥的掌控，之后法国会收买其他与摩洛哥利益相关的国家：西班牙将获得摩洛哥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将在利比亚事务上得到法国的支持，德国则将得到法属中非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20世纪后，法国对摩洛哥的政策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国要与英国合作；更重要的是，德尔卡塞现在计划在不给德国任何补偿甚至不征得其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控制独立主权受到国际公约保护的摩洛哥。德尔卡塞对于这个充满挑衅性质的计划一意孤行，以至于在北非埋下了最终发生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的导火线。

英国结束中立

德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三个月后，1871年2月9日，英国保守党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在下议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普法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告诉议员们，与普奥战争、法意战争或克里米亚战争相比，普法战争绝非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一次革命，甚至比18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影响还大”。同时他强调，很多外交传统在这次战争后都已荡然无存。“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制衡关系已被彻底破坏，而这其中遭受损失最大、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当属英国。”

迪斯雷利的这席话后来经常被看作对未来与德国的冲突的预言，但我们不能在“一战”爆发的事实基础上解读他的演讲，从而觉得他很高明。实际上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普法战争之后崛起的德国并非其最大的威胁；俄国作为英国的宿敌，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又开始对英国图谋不轨。而依照英法于1856年参与签订的《巴黎和约》所规定的内容，黑海已经“正式永久地禁止”包括俄国所属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该海域内驻军。该条款的目的在于削弱俄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威胁，并防止俄国干扰英国通往印度的海陆线路。而随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该条约的政治基础也土崩瓦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承认《巴黎和约》，对于俄国的黑海海域武装化行为也不再加以制止。俄国深知仅凭英国无法继续维护禁止黑海驻军的协约，于是开始了包括组建黑海舰队在内的一系列新动作。1870年12月12日，俄国正式宣布废除1856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并开始建设“新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传至英国。俄国营建的波蒂港位于黑海东岸，这个“全副武装”的备战用港口距离奥斯曼帝国边境仅几英里。

至此看来，俄国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已经开始，而这一点迪斯雷利在1871年2月9日的演讲中也有所提及。在迪斯雷利看来，200年来，俄国一直是以一种“合法”的政策手段一步步扩张，直到“将国境线延伸到了海岸线”。但目前俄国在黑海地区的驻军则似乎预示着其扩张进入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阶段，即开始将主要力量用在吞并君士坦丁堡、控制土耳其海峡。鉴于俄国“未曾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任何声明”且“没有任何染指那一地区的政治必要”，迪斯雷利宣称，俄国目前奉行的是一种“不合法且给别国带来祸患的外交政策”。在迪斯雷利看来，俄国并非唯一的威胁，他同时也非常关注美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野心。值得注意的是，当迪斯雷利提到“德国的变革”时，他并没有以此喻示德国带来的威胁，而是更多地关注这场给“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直到1914年，迪斯雷利演讲中所阐述的主题都被视作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1894～1905年，给英国利益带来“最显著和最长期威胁”的不是德国，而是俄国。而对于英国领导者来说，中国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和巴尔干地区一样，都是由一个没落的帝国所引发的变革。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一连串的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达到顶峰。日本获胜后，开始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同时，中国的战败也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欧洲各国在中国加紧瓜分步伐的同时，欧洲本土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

对英国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与非洲相比，中国对于英国来说有着无可复加的贸易潜力，然而俄国的存在却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威胁。在国际社会对八国联军（1898~1901年）施压之后，俄国却一家独大地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更大的优势，故此，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来说变得更加严重。然而，鉴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其地面部队的先天优势，俄国进一步向东亚进行渗透的步伐根本无法阻挡。在这场新的“竞争游戏”中，俄国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印度是英国的另一个脆弱的前线：英国领导人警觉地注意到，随着俄国的铁路逐渐稳步地向中亚地区延伸，俄国在次大陆享有比英国更好的“军事主导权”。

鉴于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坚决实行的反英政策，并且法国也在非洲与英国进行竞争，法俄联盟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为了向南非派遣充足的部队，导致了印度北部的兵力真空。1901年8月，一份来自国防部情报局的关于“英国针对法国及俄国的战争所需的军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俄国发动攻击，印度军队完全没有实力抵抗。更糟的是，（在英国人看来）俄国外交官们不只是好战、野蛮的，更是阴险狡诈、毫无诚信的。“俄国的外交发展史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于1901年3月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这样写道；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也曾在1903年向身为海军要员的塞尔伯恩伯爵表示：“如你所知，俄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谎言”。

对于俄国的威胁，英国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双面政策，一方面与日本和法国发展积极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寻求与俄国的利益共享，以减小来自俄国的威胁。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和日本都希望抑制俄国的扩张。在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于1895年5月写给英国驻日大使的一封信中，他将日本比作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天然盟友”。20万日军于1895年年底驻扎于中国东北境内，由此给俄国造成的军事威胁与英国在印度北部带给俄国的军事优势相互抵消。同时，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也增加了“与俄国抗衡的筹码”，并因此让早已不堪重负的英国海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1901年，在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之后，英日之间终于展开了官方的正式合作；从一开始的海上联合防务协约，再到后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署的内容更为全面的协约。1905~1911年，合作不断升级（协约条款也逐渐增多），英日同盟也成为“一战”之前国际社会的另一个特色。

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也决定开始寻求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早在1896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就曾提出，英国就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处的湄公河地区向法国做出让步，这有利于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而暂时瓦解法俄同盟。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英法于1904年签订的《友好协议》（至少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也主要是旨在缓解与法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并同时对俄国产生负面影响，而非旨在反德。为了对该协议表示支持，德尔卡塞也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成为协约国，法国将对俄国加以抑制，而且如果俄国与英国开战，法国将不会向前者提供帮助。正如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所说，人们有理由相信英法联盟比英俄联盟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借力日本平衡俄国的同时，也与俄国签订利益分享协议，用以应对俄国的威胁。而这之间并无矛盾。正如时任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Sir Thomas Sanderson）于1902年5月写给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封信中所说，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们更希望（俄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将“更有利于（英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英国国防部一直都在设想中亚地区可能产生的最坏情况，并于1901年12月向英国内阁发出警告：俄国有能力向特兰斯卡斯皮亚和赫拉特地区调配20万大军。而为了抵御这一可能到来的军事威胁，英国将被迫在印度增设5万~10万的兵力，这对当时正需大幅削减开支的英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俄国向着阿富汗方向修建铁路的“疯狂步伐”也预示着英国在这场竞争中将迎来更多的挑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英国的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俄国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没能占据日本的上风，而这也加剧了英国的担忧。基钦纳子爵就曾担忧：俄国会不会通过进军印度，为其挫败于日本的耻辱找回一些安慰？这样看来，印度需要大规模增兵：到1905年2月，据印度政府粗略统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预计需达到211 824人。这种增长带来的支出是巨大的，根据基钦纳的测算，为了阻挡“来势汹汹的俄国军队”，英国需要花费“2 150万英镑的军费”。对于在1905年上台

时刚刚承诺过要削减军费、扩大内需的自由党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然而如果英国无法再用武力保卫印度北部的边境线，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抵抗俄国进攻的非军事手段，以保证印度的安全。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给出了一种两全的方法。随着俄国的战败及其国内发生的动荡，在印度增兵以防范俄国的想法也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1905年上台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出："俄国在欧洲重新恢复元气的过程中，希望对于咱们的态度能够优于从前。"到1906年，格雷已成功地将在印度增兵的方案废止了。

英国这种多变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无论是与法国的《友好协议》还是与俄国的双边对话，都没有被英国领导人视作反德的筹码。在英国的考量中，德国带来的威胁只是伴随着法国和俄国而产生的，德国政府的动作都是协同俄国和法国一同反对自己的。例如在1895年春，德国与法俄一起将日本逼退回甲午战争中其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内；又如在1897年，德国出乎意料地占领了山东胶州——当时伦敦（官方）认为这是出于俄国的默许与指示。在这些事例当中，德国都与法俄默契配合，进行反英的动作。不仅是在中国战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德国对于英国来说，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外交上的压力而非切实的利益掠夺。换句话说，"英德之间的对抗"并非英国政策中主要关注的内容；实际上，直到1904～1905年，英国还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内容。

德国：后来居上的帝国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重心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大国组成反德联盟。各国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也使他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法国与英国的竞争让法国有些无暇顾及德国；俄国对英国的敌意也使其目光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开来，从而避免了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作为欧洲大陆的强国之一，只要德国本身不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它完全可以保全自己不至于陷入非洲、中亚和中国的区域争斗的泥潭。而只要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多保持一天竞争的关系，德国就能多一天在其中渔翁得利。这种现状维护了德国的和平稳定，却也让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了。

但俾斯麦的政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一政策需要德国在面对其他大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展开争斗时始终视若无睹，而且在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其他地区的战果时，也只能做个局外人。这都需要德国在各个国家之间巧妙地周旋。而这很容易由于某些失误导致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执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毕竟对于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来说，建立殖民地能带来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能具备移民条件及贸易上的优势，是让人梦寐以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德国对于压在其身上的权力与政治的束缚稍作反抗，都会受到其他大国的强烈抵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当再次审视德国这一“姗姗来迟的帝国”与其他大国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但是重要的特质。借助本国的广阔土地、富饶物产和与尚在扩张中的德国相比更为雄厚的军力等优势，英、法、俄三国都掌握着为国家赢得巨大利益的资本，并在国际社会中独占鳌头。英国可以通过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权益让步与法国搞好关系，俄国可以通过与英国划分在波斯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赢得话语权，法国则可以通过将北非的领土划拨给意大利而赢得更多的盟友。至于德国，则没有这么“财大气粗”，作为后起之秀，它已经很难在这个早已被瓜分殆尽的利益市场占据有利位置了。即便它只想从中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也往往遭遇来自其他大国的巨大阻力。

例如在1884～1885年，当德国希望通过购买殖民地来满足帝国主义的胃口时，却遭到英国不屑一顾的回应。1883年，不来梅商人海因里希·福格尔桑（Heinrich Vogelsang）曾购买了一片今属纳米比亚的安哥拉海岸地区，在此后的那年中，俾斯麦曾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承认德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而英国的答复一直很简单：英国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葡属安哥拉地区和英属开普敦地区之间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随即也以两个问题针锋相对：英国凭什么证明自己的殖民地所属权？如果不承认此地属于德国，那么英国政府能否承诺保护该地区的德国公民？几个月之后，英国政府才迫不得已给出回应，对此，俾斯麦显然大为不满，其实他完全不用将此事放在心上：1895～1896年，英国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边境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也是以这种傲慢粗鲁的态度给美国泼了一盆冷水。之后，当德国以雷厉风行的态度正式宣布其对于该殖民地的掌控时，英国政府立刻表示抗议，英德之间的关系由此日趋紧张。最令俾斯麦气愤的是，英国这种举动无疑是在推行“非洲版的门罗主义”。随着大臣们的接连施压，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被派往英国展开谈判。而英国由于面临其他更严重的危机（俄国对阿富汗的觊觎，加之在非洲地区与法国关系的僵化等），无暇再与德国纠缠，终于决定做出让步。这次的危机虽然安全度过，但欧洲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却也可见一斑了。

或许是出于希望挣脱俾斯麦政府给德国造成的自我束缚的原因，德国于1890年废除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年德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俾斯麦卸任首相一职，由列奥·冯·卡普里维接任，德皇威廉二世执掌政权，这一切都给德国的外交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但19世纪90年代初的“新政”最初可谓摇摆不定，加之俾斯麦突然卸任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状况，实权实际上落在了当时在外交部机要部门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身上。霍尔斯泰因坚持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加紧巩固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与英国方面的一系列协约尽可能地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与英国建立全面联盟的关系。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英国结盟很有可能意味着成为英国的“替罪羊”，就像在“七年战争”期间，身为英国盟友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最终发现自己被几

个强大的敌国四面环伺。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斯泰因的亲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在1890年3月曾表示，德国“不应该依靠其他国家”。与英国达成合作协定的代价将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而这恰恰是卡普里维愿意付出的代价。

自由政策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它的风险巨大。1891年夏，德国发现自己的盟友意大利正在与法国秘密会谈，以图在未来争夺北非殖民地的过程中得到法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接到消息称法国外交人员从海路抵达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港，并受到俄国媒体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1892年建立的法俄军事协定则表明，即便英国与这两个国家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也将极大地增加德国落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更值得德国警惕的是，虽然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但也并未因此带给英国“必须与德国结盟”的压力；非但如此，英国政府甚至开始对法国和俄国先后采取绥靖政策。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俄后回国的路上顺便象征性地造访朴次茅斯，为德国政府增添了更多的忧虑。

德国到底是否有能力在不借助其他盟国的力量下突破重围呢？卡普里维给出的答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军事防御能力。1893年的军事法案使军队扩充到552　000人，比10年前增加了15万人，同时军费开支已是1886年的两倍。但这些增长并不是某种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单纯地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德国高层之间在对于扩军所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问题上也争论不休。鉴于与法国改善关系已是痴人说梦，那么德国是否应该寻求英国的支持，或者从与俄国的联盟中找到发展之路？然而，这两种可能性的结果都令人失望。被德国高层寄予厚望的俄德贸易条约在1894年春宣告订立。迫于德国农业界的强烈抗议，德国政府通过此条约，这对两国的贸易增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并没能削弱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关系，相反，俄国将这个条约视为受众的政治筹码，打算借此在德国处在外交劣势时进一步从中牟利。

与英国的外交往来也丝毫不轻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卡普里维在德国外交上推广的“自由政策”让英国变得更自由了，相比之下德国反而显得被束缚了手脚。法俄两国之间的同盟局面让英国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国间更有效地周旋，也降低了其与德国结成稳定同盟的必要性。英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主动与德国寻求合作，但这与德国所给予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支持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例如1901年，英军在南非无法抽身，俄国借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急于寻求德国的援助，赶忙在内阁中发布了一份密约，所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俄国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与德国结盟，以便联合英德两军的力量共同对抗俄国。此类密约被送至德国进行试探，但德国不愿意卷入任何反俄的事务当中，因为怕就此成为欧洲大陆各国的众矢之的，而如果真的面临那种情况，英国海军对他们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令当时德国首相比洛最忧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抵消英德结盟后带给法俄同盟的威胁感。这正是阻挠英德之间构建

同盟的根本性问题。

另一个更长远且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德国致力于扩张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地盘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英国的抵触。当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 Hamid）委托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建设一条从安纳托利亚到孔亚的铁路（巴格达方向）时，英国政府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个融资项目“未经允许就侵犯了英国的权益”，因为新铁路将会重创英国投资建设的士麦那铁路的收益。因此，在众多纠纷中，英国的决策者得出结论，尽管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和“最为核心”的，但德国总是“更奢侈”一些，后者劲头十足的行为背后一定是其他势力在挑唆。关于1894年5月12日签订的英刚（刚果）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获得了连接乌干达和罗得西亚的25千米宽的走廊地带）的纠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条约原本打算消除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企图，不料英国划分领土的警戒线却紧逼德国在东南非洲的地盘。德国只好通过协商向对方施加压力，英国最终退避三舍。这样的结果对于渴求民族自我主张的德国媒体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同样，它也坚定了德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勇敢地反抗英国才是维护德国利益的不二法则。

1894~1895年发生的德兰士瓦危机是英德关系紧张局面达到顶峰的象征。在英国控制下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相邻的南非布尔共和国（即德兰士瓦）之间，积累着由来已久的矛盾。尽管德兰士瓦的独立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包括英国），然而好望角殖民地的统治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因觊觎19世纪80年代在那里发现的巨大的黄金储量而试图兼并北面的邻居。由于德国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的经济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并且德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占据所有国外投资的1/5，因此柏林政府能够在该独立共和国维持自身的利益。1894年，柏林计划投资修建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被内陆包围的德兰士瓦和葡属莫桑比克的德拉瓜湾连接起来，引发了来自伦敦的抗议。当英国政府考虑通过兼并德拉加湾攫取这条并不受欢迎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稀释他们在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安排时，德国则坚决支持德兰士瓦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另一次摩擦发生在1895年。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马来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在谈到德兰士瓦时，将其定义为英德关系的瓶颈，并且隐晦地指出：如果德国拒绝让步，则不排除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最终，英国在1895年12月向德兰士瓦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进攻，从而引发了一次全球性危机，德国政府也因此被激怒。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发动袭击，尽管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前获悉了此事。英国发动的袭击以失败告终：詹姆森的手下很快就被击垮，成为德兰士瓦士兵的俘虏。正如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情形，柏林人普遍相信英国是这次来犯的幕后主使——尽管白厅官方否认了这一点。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德国政府以德皇的名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去了一封私人电报。后来人们知道，这封“克鲁格电报”向总统致以新年的祝福，并祝贺他“在没有呼

吁友方支援的情况下”抵御外侮，保卫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

这个言辞温和的电报激起了英国媒体的愤慨，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却欢呼雀跃，它被当作一种象征——人们终于能够为德国在海外的利益做点儿什么了。但“克鲁格电报”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罢了，很快，德国就从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冲突中抽身而退。对于自己的意愿，德国缺乏执行手段。最终，柏林选择了妥协，其在非洲南部的政治未来也就此断送，只为换取英国对某些问题虚假的让步。最让德国民族主义媒体感到愤怒的是，德国政府在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拒绝代表德兰士瓦进行干预，这导致德兰士瓦一败涂地，并被作为殖民地收入英国囊中。

因此，德国的孤立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英国的承诺如空中楼阁，法俄同盟似乎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在欧洲发展自身的活动。然而德国慢热的政客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主要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无法保证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与其选择以睦邻友好的政策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德国的决策者们宁愿另辟蹊径，选择以加强自身实力为指导方针的道路。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和相对的衰微后，海军建设和策略重新成为德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中心。舆论在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在英国，大型舰艇向来是德国的严肃报刊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们心向往之的。由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风靡一时的“海军至上主义”便是例证。马汉在《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预言，全球列强之间的抗衡将由大批重型战舰和巡洋舰决定。德皇威廉二世也积极支持海军建设，他本人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同时也是马汉的忠实读者。在他年轻时的一本画册中，我们会发现战舰的影子，他用热情饱满的铅笔素描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漂浮的要塞上架设的巨大枪炮如同发怒一般地工作着。这项工作背后的国际影响也是很关键的：毕竟正是与英国之间无足轻重的矛盾，坚定了德国加强海上军事实力的信念。在德兰士瓦事件之后，德皇开始疯狂地满足自己对舰艇的渴望，他开始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世界性危机都需要通过海军实力来解决。

德皇个人对海军事业如此地热衷，但在德国海军管理部门的高层人员中却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海军内阁首领、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Baron Gustav von Senden Bibran）和他雄心勃勃的下属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敦促进行大规模的大型战舰建设。与其对立的是行事谨慎的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他是海军的国务秘书，并且负责为帝国国会草拟海军立法议案。霍尔曼仍希望组建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海上力量。当蒂尔皮茨将德国海军发展战略视为未来与大英帝国在本土水域附近相抗衡的力量时，霍尔曼的设想则是开发更为灵活和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武器，以

保护德国的海外利益。1893～1896年，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不断向霍尔曼发起攻势，公开质询他的能力，并不断向德皇进行轰炸式的“进谏”，力申他们的战略规划。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许久之后，德皇威廉二世于1897年不再支持霍尔曼，蒂尔皮茨取得了他的位置。1898年3月26日，在一轮密集的宣传攻势之后，帝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一改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规划的折中性和零散性，蒂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规划了一项大规模的、长期的建设项目，其主导德国国防经费直到1912年。其最终目标是使德国海军能够与英国海军相抗衡。

在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作品中，德国开展雄心勃勃的海军项目的决定成为关键。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它或许确实预示甚至解释了1914年冲突爆发的原因。难道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不是一种多余的挑衅行为吗？它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让欧洲的格局走向极端化。

人们大可以对德国海军战略进行批判，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诞生于一种广泛的政治概念，且超越了自身的需求。但这项新的海军项目不但不离谱，还有其根据。德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除非他们拥有令人侧目的海上实力，否则会一直被别人小觑。众所周知，英国在与德国的沟通中，其口吻一直是居高临下的。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弗朗西斯·伯蒂爵士（Sir Francis Bertie）——因其火爆的行为而被送外号“公牛”，和德国驻英国的临时大使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Baron Hermann von Eckardstein）之间举行了一场会晤。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作为人尽皆知的亲英派人士的埃卡德施泰因（他的穿着打扮刻意模仿爱德华七世，并流连于伦敦的俱乐部）提及了德国在非洲南部利益的问题。伯蒂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声称，只要德国敢动德兰士瓦一根手指头，英国政府就会“不顾一切地”死磕到底（很显然这是指一场战争），以“反抗德国的干涉”。“如果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他继续补充，“整个大英帝国都会团结起来，届时，对于英国的舰队来说，封锁汉堡和不来梅，断绝德国的海上贸易将易如反掌。”

基于此，德国的海军政策不得不被视为阻力和威胁。诚然，新力量的宗旨无疑是反英的，蒂尔皮茨自己也做出了充分的说明：1897年6月，呈给德皇的舰队计划直抒胸臆，即“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就是英国”，之后几年的各种草拟提案和备忘录中，同样的假设也多次出现。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军事力量的建设通常就是针对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而制定的。直到1904年英法协议签订，法国海军的计划文件仍这样预测：一旦爆发战争，全副武装的巡洋舰就要全速前进，攻击英国商船，使英国本岛陷入饥荒和屈服。1898年，这一景象已经实际发生，英国海军因为需要更多的巡洋舰、克服本国食品供应问题而惊慌失措。

总而言之，德国在1898年之后建立自己的舰队的事实并非是让英国转向与法国和俄国结好的原因。英国决定与法国签订协约并寻求与俄国合作的安排，其压力源于帝国本身。英国的决策者对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在意或警觉。英国的海军战略并非仅仅针对德国，

而是在于维持自己在世界海上列强中的霸主地位，其竞争对手包括法国、俄国和美国。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吸引英国战略家的注意。1905年，英国海军情报指挥官自信满满地说，对德国来说，英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1906年10月，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认为，德国并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直接威胁。次年，英国海军上将A·K·威尔逊爵士（Sir A. K. Wilson）在一篇报道中谈到，英德之间不可能爆发冲突，因为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样乐观：根据他在1907年11月的观察，“德国人还没有无畏舰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7艘了。”“1910年，他们将建成4艘来对抗我们的7艘，如果这几年间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那些新鲜出炉的军舰。”就连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于1907年写给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都在自吹自擂，夸耀英国对德国的巨大优势：“英国有7艘无畏舰，其中3艘是所向披靡的，而德国至今还没有着手建造第一艘！”这样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德国占下风是理所当然的事：1898～1905年，当德国的战舰从13艘增加到16艘时，英国的舰船数量则从29艘增加到44艘。蒂尔皮茨曾将目标设定为1艘德国战舰对1.5艘英国战舰，但这目标距实现遥远无期。1913年，德国海军军部单方面下令正式开始英德军备竞赛，蒂尔皮茨对德国与英国的军舰对比比例感到满意，而到1914年，英国的领先地位再一次巩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媒体舆论和政界带来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因为重视海军军力的人士推动为资金紧张的海军募集资金。

因此，在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开展的海军开支合法化的巧言令色的工作，与其收到的微弱效果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德国海军建设旨在为1900年提出的“世界政策”提供支持。这一术语代表着一项聚焦扩张德国影响力（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外交政策，以使德国能够以大国身份同其他列强对话。1897年，历史学家和时政评论员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一篇重要的时评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人将会被爱国主义唤醒，那些徒有一副空壳的国家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其他优秀的种族（那些定义了人类精神轮廓的种族）所排斥。”在1897年12月6日的一次颇受欢迎且颇具影响力的演讲中，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传达了一种激昂奔放的信号：“德国将世界拱手让与邻邦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海上实力落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再也不会停留在纯粹哲学统治下的温床里，我们不想置任何人于不快，但我们同样需要在太阳下宣告我们的存在。”

“世界政策”一词似乎一度吸引了德国中产阶级和国家重要媒体的眼球。它之所以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它浓缩了人们当时最为强烈的愿景。世界政策意味着扩大国外出口市场的需求（当时出口增长势头正颓），意味着摆脱欧洲联盟系统的限制，以更广阔的世界作为展现自己的竞技场。它体现了膨胀的民族性，将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的地区团结在一起，并传达了几乎是被普遍认同的信仰：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若想在帝国盛宴上分一杯羹，想要得到其他列强的尊重，就必须奋起直追。然而，尽管世界政策含义深远，却从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就连使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指导性方针的比洛本人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说明。他的表述

充满矛盾，这说明世界政策与旧的自由政策（同样支持海军扩建）并无二致。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General Alfred von Waldersee）在其1900年1月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打算支持世界政策，如果我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的。"

1897年后，世界政策的具体实践成就相对微小，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其与美国在同时期的帝国扩张相比：当德国确定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中国北部沿海的胶州湾时，美国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交战正酣，在此过程中，美国于1898年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收入囊中，并于同年宣告了对夏威夷的拥有权；1899~1902年，美国又与菲律宾发生了惨烈的殖民地战争，菲律宾的人口损失介于50万~75万；1899年，美国获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在当地支持下顺势建立了横亘中美地峡的运河，并握有控制权；最后，正如其国务卿的观点，美国对南美洲拥有"实际主权"。比洛兴奋地致信德皇威廉二世，称"对人民和海军来说，这次胜利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将继续跟随陛下，向成为列强的征程、向伟大和永恒的荣耀进发"，而他所谓的"胜利"，指的却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对德国来说都一文不值的加罗林群岛！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对德国的世界政策做了如下总结：它的初衷是面向国内舆论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以及用长期的预算投入对国家议会造成压力的手段，使持不同政见者闭上嘴（如社会民主党），借此巩固现有的主导型工业和政治局面。

或许德国在1900年前后制定的政策中最显著的短板是没有看到风起云涌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一步步置德国于不利的。柏林的决策者们在20世纪初仍然自信满满，他们认为，大英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紧张将继续为德国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短时间内，他们保持与圣彼得堡的良好关系；从长期看来，他们则相信英国由于与俄国相抗衡，且面临德国舰队的不断发展，将被迫与柏林寻求更好的关系。

惊天逆转？

1904年2月8~9日的晚上，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Togo Heiachiro）的舰队袭击并击沉了俄国在中国旅顺港停泊的战舰，日俄战争就此爆发。虽然冲突是由日本制造的，挑唆者却是俄国人。在过去10年中，沙皇和他最为得势的同僚们被这样一个愿景所诱惑——攫取东亚帝国广袤的领土。俄国人在中国北方、辽东半岛和朝鲜北部稳步推进，逐渐蚕食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权益。他们以1898~1901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作为借口，向满洲里派兵17.7万，声称要保护那里的铁路。起义被镇压后，俄国将其他列强敦促撤兵的要求当作耳旁风。直到1903年年初，人人皆知俄国意欲永久占领满洲里。日本多次要求俄国对其与日本在满洲里以及朝鲜的势力范围进行正式的边界划分，但并没有引起圣彼得堡的

注意。

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因此信心大增，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处理事务了。于是，接下来的战争对俄国造成的打击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的三支舰队中有两支全军覆没（更为讽刺的是，第三支幸存的黑海舰队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一条禁止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限令）。俄国的军队在1904年满洲里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人同时又包围了旅顺港，前去支援的俄方部队不得不从满洲里撤出。1905年1月，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日本占领了旅顺港。两个月后，一支27万人的日本军队在满洲里的奉天城附近击垮了人数略占优势的俄国军队。外部打击接踵而至的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一波接一波的民族暴动、大规模罢工、政治反抗以及人民起义，横扫整个帝国，它们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脆弱性。这导致一支将近30万人的队伍（比在满洲里战场迎战日本军队的人数还多）曾一度被迫驻扎在波兰整顿秩序。

日俄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既意义深远又充满矛盾。短期来看，这场战争似乎为德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机会，去打破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国施加的限制。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加强了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所有人的目光从周边地区重新聚焦欧洲大陆，极大降低了德国行动的自由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对1914年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对两者进行简要的分析。

直到1904年夏，德国的外交地位实际上比1890年俾斯麦卸任时还要糟糕。德国的政治领导者目空一切，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永远为良好的英德关系敞开大门。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英法结盟的消息对德国来说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在1904年4月写给比洛的信中，德皇威廉二世告知这位大臣，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无限深思”，因为英国和法国不再相互畏惧和排斥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越发没有必要重视我们的实力”。

而德国要如何让自己摆脱低落的情绪呢？对他们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转而寻求与俄国交好，以削弱或抑制法俄同盟；第二种是通过某些途径破坏英法关系。日俄战争为检验两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机会。德皇曾一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人打交道，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很快发现从俄国的窘境中获得甜头的机会。1904年2月，他致信沙皇，称法国正为日本提供原材料，这种行为可不是一个可靠盟友应当有的。6月，他对尼古拉二世说，他相信法国与英国（日本的伙伴）的缔结，是在“阻挠法国向您提供帮助”。其他的信则都是表达了对俄国军队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他对俄国未来胜利的信心。此外，德国人还提供了更实际的帮助，诸如在德国境内的补给站（这是东行的必经之地）为俄国战舰填装燃煤。在这些主动示好行为的推动下，双方形成了两个正式结盟的提议。第一个诞生于1904年10月30日，其中规定，缔约方无论哪一方谁在欧洲或其他地方遭受攻击，另一方就要为其提供帮助。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征求他另外一个盟友法国的意见之前，并不情愿达成正式共识。而法国显然是不会同意的，这相当于俄方拒绝了这项提

议。

然而直到1905年夏，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地位急转直下。当德皇再次与沙皇商讨这些提议时，他发现沙皇开始动摇了。1905年夏，德国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驶向芬兰海湾的一个小渔村，与沙皇的“极地之星”号汇合。7月23日，两艘船并排停泊，沙皇亲自登船用餐。之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期间德皇极尽所能地撩拨沙皇的忧虑，收效颇丰，使他担心英国的威胁以及法国的不可信赖，而此时的法国显然已经投入英国的怀抱了。在重重压力之下，尼古拉二世泪如泉涌，拥抱了他的德国表兄，并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但条约草案却夭折在圣彼得堡的官员手中，他们指出，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这种同盟关系仍然是俄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与德国结好的。法国也传来消息，确认自己永远不会容忍任何更改条约的行为，指的正是俄国与德国的合作。沙皇仍然支持与德国之间达成类似于共识的成果，但迫于来自政治和经济同僚的压力，他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德国向东寻求突破孤立局面的道路就此封上，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如此。

与此同时，面对英法协约的压力，德国也曾从中寻找突破。在突出的殖民地问题上，英法协约在磋商后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英国承认将摩洛哥划分到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回报，法国也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控制权。在英国刚刚做出承诺之后，法国决定继续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此法国政府于1905年1月派出一位外交使节到摩洛哥城市非斯，商议巩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权。

鉴于协约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法国在摩洛哥宣誓主权的努力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在1905年，法国外交部长选择给这项政策赋予明显的反德意味。通过交换领土，法国与西班牙的潜在分歧被消除，与意大利在1902年达成的北非共识既给了意大利一个交代，也体现了英国的立场。但德国人却在此方面毫无斩获，柏林甚至未被提前告知法国的意图。这与德尔卡塞个人的早期政策相悖，他预测，要获得德国的支持，必须做出领土上的补偿，即“他们可能觊觎的非洲的其他地方”。为了排挤德国，德尔卡塞在他的北非决策中加入了完全不必要的挑衅成分，这招致了他的法国同僚们的批判，就连保罗·雷瓦尔（Paul Revoil）——德尔卡塞在摩洛哥问题上最亲近的合作者都在为部长的不妥协感到遗憾，他反驳道，“最大的不幸”就是德尔卡塞认为“与德国进行磋商是让人厌恶的事情”。“德国人是骗子。”他表示，“但是天哪，我又不是在与他交换浪漫爱语或是象征爱情的戒指，而是要和他进行商业谈判！”就连法国殖民支持派领袖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都将德尔卡塞拒绝与德国协商摩洛哥问题视为“高度的轻率”。

德国方面，其外交部早就开始以怀疑的姿态观察法国在摩洛哥的动向，且其并不打算允许法国政府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德国的观点被制定成了法律条款，即“1881年国际协议”。这项协议正式提出，摩洛哥地区任何的改变都应当在法德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然而，德国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按国际法办事，而是试图考

验英法同盟关系的牢靠度。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给了德国这样的信号：英国政府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干涉法国和第三方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议。德国希望这样的表态能够提醒法国——用德皇精巧的表达就是“海军是没有轮子的”，以此减少对方对于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敌意。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摩洛哥事件可以说是对俄国在1904~1905年所采取的措施的西方版本。

1905年1月初，一支法国代表团来到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宣示对摩洛哥军队及警察的控制权，但被苏丹拒绝。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其不意地造访丹吉尔。在人民极其兴奋的欢呼声中（他们认为德国的主权是能够与法国抗衡的力量，因此颇为欢迎），威廉二世骑马来到德国使领馆，让法国使领馆的三等秘书碰了一鼻子灰（这位秘书还“以德尔卡塞先生的名义”向德皇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德国使领馆，德皇发表演讲，声称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与摩洛哥的独立和统一息息相关，因此应当被接受。在这里短暂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便回船返航了。

就短期而言，这次声势浩大的姿态性政治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功。德皇的造访在法国激起了愤怒，但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干涉的兴趣。在一系列相互威胁和外交冒险政策之后，法国政府选择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了，他的挑衅政策也暂时宣告破产。他的职责落到了接任的并没有多少经验的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身上，这位新人支持就摩洛哥问题进行双边协商。德国人却一味试图巩固自己的优势，愚蠢地拒绝了鲁维埃的提议，并坚持根据1881年的条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最后，德国的提议被通过，但德国的胜利也就此终结。会议于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举办，摩洛哥的拟独立通过一般条款被确定下来，但是就其他提议，包括摩洛哥警力和经济机构的国际化，德国的谈判者并没有从其他列强那里获得任何支持（除了奥匈帝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被法国的领土补偿所收买，而俄国则因为法国向其提供贷款而支持自己的东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法国一方。俄国代表在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时就明确表态自己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的所有提议。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所谓的三皇同盟的脆弱性在现实中暴露无遗。事实证明，通过多方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其实当初法国的态度已经表明事情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解决。德国的决策者完全失误了。1906年4月5日，德国对摩洛哥政策的总策划师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讲，宣布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就在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便脸色苍白，栽倒在地。直到10月，他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德国政府在东西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彻底破产，而这些努力背后的目的是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法协约不仅没有因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战而被削弱，反而得以巩固。在东方，日俄战争为德国创造的条件就此看来也是虚无缥缈的。当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签署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所有纷争时，德国在东方的选择机会也一起丧失了。

1907年的条约并非针对德国或是出于对德国的畏惧，事实正相反：由于俄国在英国的一系列弱势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他们必须舍弃德国而保住与俄国的关系。这是世纪之交以前英国的主导思路，在协约签订之后这种思路仍然奏效。1909年3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对此做了扼要总结。“我们与德国之间并没有悬而未决的争议，除了海军建设问题。”他对他的继任者阿瑟·尼科尔森说，“但是我们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取决于我们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与俄国之间的协约，即使是为了一个简化了的海军计划。”俄国的决策者同样支持协议，并抱有和英国一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项政策并不是针对德国的，而是一个颇为划算的举动，旨在为国内的动荡赢得喘息的机会，为自身的对外行为赢得更大的自由。这些利益具体表现为波斯问题的和解以及英国支持俄国拥有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权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他在伦敦的大使贝肯多夫伯爵（Count Beckendorff）而言，土耳其海峡问题是“协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甚至能确保在将来某一“合适的时间”，俄国能够对通行权做出修改。

换言之，面对1907年形成的国际新格局对德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不应当简单做如下假设：该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事人的目的性。只有在法国的例子中，我们才可以说其决策一贯优先考虑的是对德国的制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协议是世界历史出现转折后影响欧洲的结果——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和中日战争，非洲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的角逐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奥斯曼帝国残余势力在非洲和西南欧制造的威胁，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纠纷（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包含列强在中国的相互争夺，还有列强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德国的“焦虑”及傲慢和强硬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但它们应当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德国的孤立状态是咎由自取（他们举止奇怪，在国际上的口碑很差），但该结论并不是根据时代带来的地区重组过程得出的。

实际上，对德国的敌视与新的联盟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系上的逆转：并非是他者对德国的敌对才导致了德国的孤立，而是这一新体系本身为他者对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创造了可能性并不断被强化。例如俄国，日本在东方的胜利以及与英国在中亚问题上分歧的暂时平息，都不可避免地使其外交政策重新聚焦剩余的阻碍其实现帝国大业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即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分歧，更进一步来说，德国也脱不了干系。俄国外交政策团体分为“亚洲派”和“欧洲派”两大派系，双方的分歧也因此以后者的胜利告终。以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为首的欧洲派（他们试图对德国采取不信任的姿态，借此与英国和法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关键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英法协约的诞生消除了1904年协约缔结以前的反英情绪，断断续续地淡化了法国政治家对德国的畏惧心理。

言过其实

尤为显著的是英国的例子。让人惊讶的是，对德国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势力的问题上，许多英国的关键决策者的反应十分激烈。1905年4月2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告知在巴黎的英国大使，他相信德国人会试图获得非洲西部海岸的港口，作为法国得到摩洛哥的补偿，且英国会站在法国一方，“强烈谴责这项提议”。而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正是这位：“公牛”脾气的弗朗西斯·伯蒂爵士，泰姆子爵，曾就德兰士瓦问题以发动战争来威胁德国代理埃卡德施泰因的前议会副大臣。在将兰斯多恩的支持态度转达给德尔卡塞（他还没有听说德国觊觎西非港口的事）的过程中，伯蒂的语气十分坚定，坚决表示为法国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这位法国外交部长是这样被告知的：“考虑到德尔卡塞先生的立场，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举措是极其不理智的，英国政府愿意倾其所有的能力为您提供帮助。”在与德尔卡塞的私人谈话中，伯蒂用掷地有声的言谈肯定了对对方的支持。一天之后，这位外交大臣对一位亲密的同僚称（他的言辞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伯蒂早些时候威胁埃卡德施泰因的话语），法国的地位现在已经坚不可摧：

> 德国很清楚，英国可能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我在此重申，英国将会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没有我们，任何和平协议都无法达成。你会认为德皇能够平静地设想他的舰队被击垮，他的海上贸易被摧毁，他的港口被英国的舰队夷为平地吗？

英国决策部门的其他人也同样发出了这种激奋的声音。格里尔森将军（General Grierson）是军事行动部门的首领，他和他的副手一道，以私人名义于1905年3月到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带考察，目的是评估英国远征部队降落地点的具体情况。4月，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甚至建议，将英国海军部署到基尔运河，并派遣远征军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港。这些颇为偏激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没有对德国面对法国渗透摩洛哥所采取的立场进行是非评价，它们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德国正在试探新协约关系的稳固性，毕竟，协约的基础是建立在主权交换之上的（以英国在埃及的权力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

1905年12月继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外交部出现的反德情绪。格雷的同僚和下属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各种备忘录，提醒他柏林方面的威胁。外交部那些反对德国的声音反而被边缘化了。被派到德国的外交使节并不赞同这种主流观点，如拉塞尔斯（Lascelles）、索尔兹伯里和戈申（Goschen）。当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贴上了不入流人物的怀疑标签。相反，在慕尼黑（之后是维也纳）的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Sir Fairfax Cartwright）却从来都没有忘记最大限度地贬低德国和奥匈帝国，他发回的报道格外受到赞扬：“从所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优秀的、颇具价值的报道”、“最有趣且最值得一读”、“有趣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卡特赖特先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最有能力的人做的报道”、“对时局做出的深度评论”等。

在英国外交决策的“官方意见”中，英德关系的历史写满了德国作为挑衅方的不良记录。外交部初级文员G·S·斯派塞（G. S. Spicer）逐渐相信，从俾斯麦上台的那一刻起，德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求一条非常不友好地侵蚀英国利益的道路。回顾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格雷认为，从1884年到他就任的这段时间（大概20年），英国一直被它的宿敌误导而做出让步。“日耳曼人含混不清的扩张规划”被归咎于德国的领导人。德国人被指责为妄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刻意地将目标设定为统治世界”，正如伯蒂用他的伊顿口吻所说的那样：“将我们拉下水，然后偷走我们的衣服。”1909年11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将德国形容为“欧洲唯一一个有豺狼野心的势力”。这样的措辞不停被重复，人们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这样的表达（书信或是备忘录），这种情况逐渐成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在言辞中获得了它的意义。

为何这些人如此敌视德国？难道德国的行为真的比其他列强更“糟糕”，难道真的因为德国的愚蠢和傲慢，才使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其他列强则承担着调解者的角色吗？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中，确认某些具体的行为和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挑衅”，并非易事，因为人们的主观印象独占鳌头，对得当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总是不断变化。难道“克鲁格电报”就比措辞拙劣的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消息（即大概在同时间从华盛顿发出的阻碍英国入侵委内瑞拉的抗议）更“有挑衅性”？难道获得胶州湾就比美国攫取巴拿马运河或是俄国将蒙古划为自己的保护地区更“有挑衅性”？难道德国在阿加迪尔用笨拙的方式寻求外交上的胜利就比法国在1911年单方面破坏法德摩洛哥协议（见第四章）更“有挑衅性”？或许这个问题的假设出了问题。那些反对德国的人并没有就一个具体的问题发起攻击，他们只是泛泛地指摘德国自负的野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德皇的变幻莫测以及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列强之间平衡的破坏，却对德国破坏良好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定义一直讳莫如深。

对英国满腹牢骚的原因的最佳解释莫过于艾尔·克劳（Eyre Crowe）完成于1907年1月的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当下英国与法德的关系。艾尔·克劳是英国外交部西方部门的高级文员，也是驰骋英国外交圈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就职于英国领事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国人。就连克劳本人都是在莱比锡出生的，直到17岁来英国参加外交部的资格考试时，他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正如他的同僚们所形容的那样，他这一辈子都带着“喉音很重”的口音，有位下属回忆道，他在批评自己的时候说“你写……写的报……报道简直一……一塌糊涂”（德国人的“r”发为小舌音，所以克劳将英语里“write”或是“report”当中的“r”音发得很重）。尽管他在处理部门事务时表现出让人钦佩的效率和勤奋，但人们对克劳的印象仍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德国式”风格的烙印，这也说明他永远不可能爬上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尽管有着这样的个人背景，克劳仍然是白厅最为坚定地反对与德国结好的人之一。

1907年1月1日的备忘录以对最近发生的摩洛哥危机的简要回顾展

开。克劳采用了一种故事叙述的手法。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是建立在将英法“年轻的友谊”“扼杀在摇篮里”的基础之上的，但这样的恐吓低估了法国对英国盟友的忠诚和果断。此类恐吓是无力和懦弱的，武装起来的英法同盟的大好前景足以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但在他们退出之前，这些恫吓者却恬不知耻地讨好英国，“规划出一幅与德国合作所带来的具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再次暴露出他们无耻的嘴脸。而英国应当怎样回应这种不讨喜的作态呢？克劳认为，作为世界老牌强国，英国受困于一种“自然律”，因此无法抗拒任何试图通过结盟来最终推翻英国霸权的国家。而这正是德国的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德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先称霸欧洲，再占领世界”。英国的统治地位因其政治民主和商业自由而颇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德皇和泛日耳曼主义媒体的大声聒噪意味着德国的霸权代表着“政治独裁”，很可能“摧毁欧洲的自由传统”。

当然，克劳原则上不能反对德国崛起。但问题在于，德国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令人厌恶，具有挑衅意味。然而德国的挑衅行为究竟是什么？这些罪恶包括在桑给巴尔“模棱两可的行为”，包括获得喀麦隆（当时英国已经宣布将该国的居民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或许对克劳来说，但凡英国的举目之处都在与德国纠缠不清。继续列举这些行为，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德国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供了财政支持，德国对英国在南非战争中的行为感到不满，厌恶其插手中国长江流域的事务（“那里实际上是英国的地盘”）。更糟糕的是，德国对国际媒体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在这些地方，“德国使馆与一大批拥有广大读者的媒体有着秘密的、大部分没有被察觉的关系”，这“或多或少的是一种让人厌恶的行为”。

格雷称，这份有巨大吸引力的报告值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和其他高层官员一读，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克劳近乎滑稽地将大英帝国发起的战争以及对其保护国、占领地和兼并地区的行为视为自然而然的、颇受欢迎的，而德国在这方面徒劳的努力则被当作对和平粗暴离谱、必然失败的破坏。当英国打算在德兰士瓦问题上“诉诸战争来解决”时，德国怎么可能在萨摩亚问题上再与之纠缠！然而，德国的政策进一步被视为暗中破坏和扩大了诸帝国之间的分歧，因此，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问题”是由德国挑起的，德国还“小心地煽动”欧洲的反动势力，向英国占领埃及发起诘难。无论英国及其帝国对手在哪里发生摩擦，德国总要在背后推波助澜。对于德国操控了从开罗到伦敦的媒体一事，克劳的处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其极强的偏执狂倾向：与那些规模更大、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来自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行动相比，德国的媒介工作简直微不足道。

或许这些无礼冒犯的重要性只能排在第二位，最核心的问题是克劳对于德国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充满恐惧的心理分析：德国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人，密谋着用“具有攻击性的恐吓和挑拨”、“专业的勒索”、“威胁和冒犯”从中获益，“丝毫不顾及其他民族”。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打算，或者这“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让人疑惑的、不切实际的政治家的

表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都是相同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规范才能让德国人老实。克劳称，法国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曾一度让人烦心，处处与英国作对，无理取闹。但英国强硬地坚守埃及和苏丹的每一寸土地（最后还以发动法绍达战争为威胁），给这一切挑衅画上了句号。英国和法国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从中可以看出，只有用最“不屈不挠的精神”来维护“英国在这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权利和利益”，才能赢得“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并没有给欧洲新兴势力留下余地。

尽管在克劳的文字中没有明确地表达，但在其陈述和理解背后，证明了德国经济大幅增长这一奇迹。1862年，当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时，德国各个州的制造业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4.9%，名列第5，而英国则占到了19.9%，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1880~1900年，德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列第3；而到了1913年，它又前进了一步，超越了英国。换言之，1860~1913年，德国所占世界工业产值的比重增长了4倍，而英国下降了1/3。更让人惊讶的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突出的成就。1880年，英国控制着22.4%的世界贸易；虽然处在第二位，但德国所占的份额只有10.3%。然而在1913年，德国以12.3%的比率几乎可以与英国的14.2%相媲美。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经济奇迹：1895~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50%，金属制造增长了300%，煤炭产量则增长了200%。1913年，德国的经济所产生和消耗的电量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高出20%。在英国，“德国制造”的字眼传递出了强烈的威胁感，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商业或是工业实践比其他国家更野心勃勃或更具扩张性，而是因为它们使英国认识到自己处于霸主位置上的局限性。

德国的经济实力解释了其他列强在政治上的焦虑和担心，正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引发的恐慌一样。然而这对于英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的反德态度却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这种意见并不是人人都认可的，就算是外交部内部高层人员亦如此，甚至在其他政治家中也不受欢迎。只有在幕后开展艰难的工作，才能将伯蒂、尼科尔森和哈丁推到更高的职位，以便能以他们的声音指引英国政策的方向。从低级别的职位到国王爱德华七世私人秘书，花费了伯蒂数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参与竞选，之后他便一路飞黄腾达。哈丁也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他将伯蒂推选为1905年驻法国大使职位的候选人。哈丁动用了他在高层的关系，“肃清”了“来自外交部高层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伯蒂和哈丁之后又合伙将阿瑟·尼科尔森推举到高级使节的职位，尽管有人说他的妻子不擅社交且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女佣。英国的政策原本可以遵循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格雷和他的同僚没有在如此多的重要职位上有所安排，诸如来自戈申和拉塞尔斯以及议会副大臣埃德蒙·菲茨莫里斯（Edmond Fitzmaurice）——他感叹道，“反德的病毒”已经感染他的同僚们——等人的温和言论会被更广泛传播。正相反，格雷的集团逐渐握紧了英国的政策，与德国关系的大方向也因此确定下来。

正如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所说，将德国所谓的“干涉”视作

英国最大的威胁，反映并强化了更广泛的体制变化。多极化的世界在对非洲、中国、波斯和阿富汗等问题上“角逐”，使得其中的决策者时常觉得他们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颠簸，庸人自扰般地设想那些遥不可及的挑战和威胁，而不是坐下来达成共识，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假想敌的目的是要统治世界。这并不是英国与俄国和法国结盟的原因，反而更像是它的结果。因为这种联盟关系的重构加剧了（实际上使其成为必要）英国的焦虑和偏执（这些表现在布尔战争期间达到顶峰）。英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在20世纪的外交政策一样，时常将威胁和入侵的手段作为假想的依据。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入侵对政客们形成了周期性的刺激。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接替法国，成为英国政治和公共问题的焦点——哥萨克骑兵们不久后就会入侵印度和埃塞克斯了。现在又轮到了德国。正是：“铁打的思维，流水的目标”。

回顾往事，在1904～1907年的风起云涌中诞生的三国同盟似乎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诱因。这正是法国外交官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观点，他在30年后将其在这些年的日记整理出版，取名为“惊天逆转”（*A Great Turning Point*）。经过事后的杜撰，帕莱奥洛格的“日记”赋予法国决策者（尤其是他本人）几乎能够预测战争的超自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后出现的关于战前政治家们的“回忆录”的观点的扭曲，这些“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1914年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似乎能够推断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现实却是，这只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而已，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1907年新同盟的缔结仍然无法显示欧洲大陆要爆发战争的端倪。在1905年遭受重创后，圣彼得堡的政客们被迫寻求与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在此非常时刻，俄国国内的脆弱性不允许它采取任何国际冒险主义的政策。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法国会为了俄国自愿涉足巴尔干问题。更难想象的是，俄国会为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出兵柏林。1909年，法国与俄国就摩洛哥问题签署协议，成为在联盟体中“僭越原则的惊天案例”。1910年11月，俄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和柏林见面，商讨德国和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地区的利益问题。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无疑使得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但它们是朝着缓和局势的方向做出的重要姿态。至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的协约，它或许能够缓解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没有改变关系的本质，直到1914年，英国外交部甚至还在警惕俄国对英国辽阔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简而言之，此后的前景并不清晰。1914年，三国同盟仍然超出大多数政客的理解范围。1904～1907年发生的大逆转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格局如何出现（正是它们，一场欧洲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却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政策结果是如何通过决策过程诞生的，以及欧陆联盟松散的关系是如何在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催化下成为连环的。

第四章 欧洲外交政策的多种声音



在一幅19世纪90年代末的漫画中，一位法国艺术家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所发生的危机。在英国和俄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德国努力让自己在这个叫“中国”的蛋糕上分一杯羹，而其所得到的地方正是“胶州”。法国为它的俄国盟友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日本则袖手旁观。这一切的背后，是陷入了绝望境地的中国清政府和他们无力扭转的局面。正如其他类似的作品，诸列强被赋予了各自的特征：漫画里的英国、德国和俄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主权区域体现的，法国被人格化为“玛丽安”（法兰西共和国的绰号），而日本和中国则被刻画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将国家人格化是欧洲政治漫画的惯用手法，但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将国家概念化为复杂的个人意图——国家被当作是个体的复合，这些个体由条约的执行机构统领，而其背后则由一个不可分割的意愿支撑。

然而即便是浮皮潦草地对20世纪早期的欧洲政府进行研究，我们依然能发现，产生政策的管理机构远远没有达到内部的统一。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些个人统治者的特权。在国家政策的选择上，人们的考量事实上来自于政治结构中非常边缘的地带。政府内部的派系划分和职能冲突、经济和财政限制，以及舆论的摇摆不定……这些都为决策过程添入了源源不断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列强从管理机构的观点出发，摇摆不定，因此政策的论调和方向都是不确定的。不同论调所造成的混乱是理解欧洲体系在战争爆发前几年的间歇性动荡的关键因素。同样，它也解释了1914年的“七月危机”为何能够成为当代最为复杂和令人费解的危机。

君主政体下的决策者



瓜分中国

（亨利·迈尔，法国Le Petit Journal画报，1898年）

20世纪初的欧洲盛行君主制。6大列强之中，有5个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君主政体，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是个例外。巴尔干半岛新型的民族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全部都是君主政体。诞生了快速巡逻艇、无线电报机和电动雪茄打火机的欧洲却在本质上仍然沿袭着那种古老而辉煌的体制，它将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与人类生物学出乎意料的想法和变化结合在了一起。欧洲的管理者们仍然将王权和王室视为焦点问题。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的大臣们都是由皇帝钦点的。三大帝国的皇帝都有无限制干涉国家媒体的权力。同样，对于他们各自的军队，他们都有正式的统治权。国家之间的沟通通过皇朝的体制来实现。使节要亲自向君主递交国书，君主国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会议在战争爆发前仍然存在。诚然，这种体制有很强的重要性，为交流创造了另一种渠道，尤其是在双方关系无法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来确定的时候。

君主是国家和政治的象征，是获得和维系集体情感的纽带、桥梁。当巴黎民众看到爱德华七世慵懒地蜷在宾馆外面的椅子上抽雪茄时，他们脑海中的英国此刻也变成这样一个肥胖、时髦而自信的形象。1903年，爱德华七世在巴黎市民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这也为来年与法国签订条约铺平了道路。就连那位温良恭谨的“独裁者”尼古拉二世都颇受法国人的欢迎，当他1896年来到巴黎时，人们就像欢迎一位凯旋的英雄，尽管他不算十分有魅力，甚至信奉独裁统治的政治哲学，这些呼声纯粹是因为他被视为法俄同盟的代言人。这样看来，有谁能比狂热、粗鲁、容易焦虑且专横的德皇威廉二世，这个敢于向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挪威著名作曲家）提出建议，指导对方如何指挥《培尔·金特》（*Peer Gynt*）的人，更能代表德国让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毫无重点却踌躇满志）呢？不管德国的政策是不是德皇本人制定的，对于德国的死对头们来说，他已经成为它们的代言人。

战前欧洲的君主体系核心代表是三位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20世纪初，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系谱复杂得几乎能够融为一体：德皇威廉二世和国王乔治五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来自黑森州的亚历山德拉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母亲是来自丹麦同一个家族的姐妹。德皇和沙皇都是沙皇保罗一世的曾曾孙。德皇的姨奶，普鲁士的夏洛特是沙皇的祖母。从这样的情形来看，1914年爆发的战争更像是达到顶峰的家庭矛盾。


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他们身着各自国家的军服）

对各位君主在其管理范围内外的影响力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英国、德国和俄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君主制。俄国的君主制本质上是独裁的，其议会和宪法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十分微弱。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代表的是立宪和议会君主制，他们没有直接操控国家的权力。而德皇威廉二世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德国，立宪和议会体制被嫁接到旧有的普鲁士军事君主制中，后者由于历经了国家的统一过程而被保留下来。但是正式的统治架构并非君主施加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君主本人的决策能力和洞察力，大臣们对异议的控制能力以及君主及其政府之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威廉二世



爱德华七世（身着其服役的澳大利亚第12轻骑兵上校军服）

在君主们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中，最为显著的有一点是其对外交政策的构想随时间而变动。负责1904~1907年外交改组的爱德华七世对外交政策十分有限，并且对于自己能充分了解信息感到十分自豪。他的态度是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代表，例如，他十分恼火自由党反对1878~1879年的阿富汗战争，于是对殖民地行政负责人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Henry Bartle Frere）说：“在我们没有完全拥有阿富汗之前，我是不会满意的。”对于1895年突袭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他十分欣赏和支持塞西尔·罗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却十分恼怒。在他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反德人士。造成这种情绪的根源或许部分来源于他对自己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反抗，他认为母亲对普鲁士过分友好，此外还部分来源于他对那位不苟言笑的德国教师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的畏惧和憎恨，这位教师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安排的，目的是让年轻的爱德华能够热爱学习并终身学习。1864年爆发的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使他在

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那场战争，爱德华完全同情自己刚迎娶的新娘的丹麦亲人们。在他继任后，爱德华成为以弗朗西斯·伯蒂为中心的反德决策团体的重要拥护者。

1903年，当他正式出访巴黎时，这位国王的影响力到达顶峰，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来访”，它为两大敌对帝国间建立协约关系创造了可能。由于法国并不支持布尔战争，两大西方帝国之间的关系在当时仍不乐观。这次来访则是爱德华本人的主意，并取得了公共关系上的胜利，缓和了双方之间紧张的气氛。在签署条约之后，爱德华继续开展了与俄国达成共识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厌恶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并且对俄国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虑。1906年，当他听说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人在巴黎时，便从苏格兰一路向南，只为和他进行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对此也做出了友善的回应，动身来到伦敦；根据查尔斯·哈丁的描述，两人的谈话“在实质上为英国与俄国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上面两个例子中，国王并没有动用过多的管理权，更像一位“编制外”的大使。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优先权与白厅的那些自由帝国主义派系紧密相关、高度符合，而这些主导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员也是他自己不遗余力支持的人。

而乔治五世则是与之相反的例子。在他1910年继任前，他对外交事务并不感兴趣，对于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他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大使门思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对这位新国王十分满意；与他的父王相反，这位新国王对任何支持或是反对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强烈的偏见。如果门思多夫希望王室的换血能够降低英国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么恐怕不久之后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君主看似中立的立场仅仅意味着决策权紧紧握在以格雷为中心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手中。乔治五世从未组建过与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来自背后势力的限制，尽量避免在没有明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前独自对政策做出解释。他或多或少地与爱德华·格雷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在与外国代表进行政治会谈时，他小心地寻求格雷的意见，尤其当对方是德国人时。因此，乔治五世的继任使得王室对一般外交政策路线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尽管宪法规定两位君主有相同的权力。

尽管俄国的独裁统治呈现出高度集权化，但沙皇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受限于一些微小的限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不一。正如乔治五世，新的沙皇在1894年继任时还是白纸一张，没有任何经验。在成为沙皇之前，他没有拉拢自己的政治党羽，对父王的顺从也使他在表达对政策的意见时受到重重阻碍。作为尚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他并没有展现出在国家事务学习上的天赋。保守派法学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选中作为指导小尼古拉如何处理俄国内部工作的教师，他之后回忆道：“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在全神贯注地挖鼻孔。”即使在他加冕后，他的极端腼腆和对真正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恐惧，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相应的执行支持来持续地形成他的政策路线，例如他没有个人秘书处和个人秘书。虽然他甚至获得非常细节的部门决策信息，但在像俄国这样一个

幅员辽阔的国度，这仅仅意味着君主已被琐事包围，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被丢在一边。

即便如此，沙皇还是能够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动向，尤其是在19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奔忙于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但管理层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项远东政策，有些人对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投入表示不满。还有一些人，例如陆军大臣阿列克谢·A·库罗帕特金（Aleksei A. Kuropatkin），则认为远东分散了人们对西方主要地区的注意力，尤其分散了对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精力。但同时，尼古拉二世仍然坚定地认为，俄国的未来不仅在于塞尔维亚，还有远东地区，但支持东方政策的人还是超过了其反对者。尽管最初还有些担心，但他还是对1898年攫取中国辽东半岛旅顺港的政策予以支持。在朝鲜问题上，尼古拉二世支持俄国对该地区进行渗透，而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圣彼得堡和东京的利益冲突。

尼古拉二世的干涉政策以非正式联盟的形式展开，而非执行决策。比如，他与贵族企业主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拥有在朝鲜鸭绿江的林场特许权。鸭绿江林场的大资本家A·M·别佐布拉佐夫（A. M. Bezobrazov）之前是一名骑士，他利用与沙皇的私人关系，以鸭绿江为平台，用非正式手段扩展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1901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称，别佐布拉佐夫与沙皇“一周至少要见两次面，见一次就要在一起4个小时以上”，为后者提供远东政策上的建议。大臣们对这些出现在朝堂上的毫无影响力的局外人的参与感到十分愤怒，但是对于他们越发膨胀的势力却束手无措。在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影响下，沙皇在决策时变得越发偏激。“我并不想要朝鲜，”1901年尼古拉二世对王子亨利说，“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日本长期待在那里。这会成为开战的理由。”

之后，通过任命在远东的总督，尼古拉二世加紧了控制。总督不仅要对远东地区的民事和军事事务负责，还要展开与日本的斡旋。该机构的总负责人是E·I·阿列克谢耶夫（E. I. Alekseev），他直接受沙皇的控制，因此避开了大臣们的意见。这项任命是以别佐布拉佐夫为首的小团体策划的，他将其视为绕开审慎的外交部的一种手段。最终，俄国的帝国政策是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两条平行轨道上开展的，双方之间相互竞争，尼古拉二世便可从中选择。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丝毫没有外交经验，对此也并不了解，因此他不友善的、固执的做派必然会与日本疏远，甚至激怒对方。尼古拉二世是否明确地要对日本发动战争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的确对1904年战争的爆发及其后续灾难负有重大责任。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可以说沙皇的影响力十分强大，而大臣们却一直遭到打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战争政策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让他无法再主揽一切。失败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社会动荡不安，以谢尔盖·维特为首的大臣们提出合并政府的举措，并推进了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权力转移到大臣会议的手中，第一次朝着诞生一位主席或是总统的方向前进。在维特和他的继任者P·A·斯托雷平（P. A.

Stolypin，1906～1911年）的努力下，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与沙皇的初衷背道而驰，反对进行侵略性的干涉。斯托雷平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有智慧和魅力且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他用个人能力打动了大部分大臣，达到了一个政府所具有的高度，但在1905年之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斯托雷平主导的这些年中，尼古拉二世好像“很奇怪地从各种政治活动中消失了”。

面对这种情况，沙皇并没有选择沉默。就连斯托雷平当政时期，尼古拉二世都在寻找出路，通过在背后私下与大臣们勾结来削弱他的控制权。其中一位便是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伊兹沃尔斯基在与奥匈帝国的谈判上出现失误，引发了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吞并危机。为了回报奥地利在外交上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上的支持，伊兹沃尔斯基也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表示了支持。但是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他的同僚们都没被提前告知这一鲁莽行为，但沙皇本人却早已对此了如指掌。1911年秋，当斯托雷平被恐怖分子行刺后，尼古拉二世很自然地转而支持他的政敌，以消灭他的影响力。但大臣集团却威胁称要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因此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开始结党营私，与自己提拔的人相互勾结。维特成为1906年独裁行动的受害者，如果斯托雷平没有被杀，他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他的继任者、性情温顺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于1914年2月被革职，因为他同样承认自己是联合政府理念的支持者。在此，我不想对试图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密谋做过多解释，当下关键的是，1911～1914年，联合政府以及对独裁权力的重申都在经历下坡的阶段。

然而，独裁统治并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实施，而是通过一种负面的手段来保护君主的权力：对任何具有主动权的政治组织一律打压。然而，独裁干涉的结果并没有强迫人们接受沙皇的意愿，而是在谁拥有权力的这个问题上增添了持续的不确定性。这种状态滋长了党派勾结，严重损害了俄国决策的连续性。

在三位重要的君主中，威廉二世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一位，他在德国管理层中的权力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德皇即位时确实有意让自己成为外交政策的一把手：“外交部？为什么，我就是外交部！”“我是德国政策的唯一决定者，”他在一封写给威尔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信中如是说，“我走到哪里，我的王国就追随我到哪里”。威廉二世对大使的任命十分感兴趣，且常常无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一意孤行。与其他两位君主相比，他更将君主之间的会晤和通信视为帝国之间沟通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外交手段对国家利益有好处。就像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尤其是在他早年执政时期）经常用自己的“偏好”绕开相关部门大臣的建议，助长派系之争以破坏统一政府的形成，且经常在没有告知相关部长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主张，有时这些主张还与现行的政策相矛盾。

就是在这些方面——以并不权威的身份提出未被认可的观点，德皇招致了众人和历史学者的痛斥。不难想象，德皇对国内外政治话题的私

人探讨（电报、信件、提议、对话、采访和演讲）当中不乏一些古怪的论调和内容。这些独特的想法十分引人注目，在他执政的30年中，可以说一直在演讲、写信、发电报、写文章和进行批评，当中大部分内容为后世子孙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些是乏善可陈的或是不合时宜的。这里举两个例子，它们都与美国有关。1906年4月4日，威廉二世作为客人应邀来到柏林的美国大使馆。在与他的美国东道主愉快地交谈的过程中，德皇提到了为德国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的必要性。他对对方说，在他就职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4 000万，现在应该已经增长到大约6 000万。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认为粮食问题是接下来20年里比较棘手的问题。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人口不足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发展人口，或许应当询问一下法国政府是否介意将他们的领土向西边缩小一点，来接纳德国这边过剩的人口。这些愚蠢的言谈（我们只能将其视为笑话）都被其中一位参与谈话的人认真地记录下来，并被装入一封外交信件中，寄到了华盛顿。另一个例子是在1908年11月，当时外界传闻美国和日本可能要开战，德皇获悉后激动万分，他正想讨好一下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人，于是十万火急地致信罗斯福总统——这次是十分严肃的，称要为他提供一支普鲁士军队，驻扎在加利福尼亚海岸。

但这样的表达究竟与真正的政策结果有什么联系呢？对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或大使来说，如果用这样不合时宜的语言与其他人沟通，会被当场革职。但为何一国之君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表现得如此失态？德皇的观点中出现的严重矛盾使得后人对其影响力的评估变得很困难。如果威廉二世的政治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那么我们能够轻易地将其意图与结果进行对比，但他的动机却常常模棱两可，他所关注的问题也变来变去。19世纪90年代末，德皇十分热衷一个在巴西建设“新日耳曼”的计划，“迫切地要求”并鼓励人们移民到该地区去。毫无悬念，这样的热情并没换来什么结果。1899年，他对塞西尔·罗兹说，他想将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德国的殖民地。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时，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德国人应当派遣一个军团到中国，并对这个国家进行瓜分。1903年，他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拉丁美洲”，且敦促海军着手准备入侵古巴、波多黎各和纽约的计划，但制定这样的入侵计划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总参谋部从未答应为其提供必要的作战部队。

德皇的想法层出不穷，他先是对这些想法有三分钟的热度，厌恶或是受挫之后，又弃之如敝屣。也许这个星期，他还对俄国的沙皇气愤不已，但一个星期后，这种态度可能又会发生180度大转弯。对他来说，联盟的计划是无穷无尽的：与俄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和英国；与俄国、英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与中国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以及德奥意三帝国；或是与日本和美国结盟对抗英法协约国……1896年秋，当英德关系在德兰士瓦问题出现后降至冰点时，德皇提议与法国和俄国达成同盟以实现共同防御。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又突发奇想，试图简单地废除东非之外德国所有的殖民地，以消解与英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到了1897年春，威廉二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认为德国应当与法国寻求亲密关系。

威廉二世并不满足于将他的思想成果展示给大臣们，他还将它们直接传达给外国代表。有时候他的干涉与官方政策相悖，有时又成为他们的支持者。1890年，当外交部与法国的关系恶化时，威廉二世又活跃起来。他的举动与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如出一辙，当外交部向巴黎不断施压时，威廉二世却向几位将军和记者（包括一位法国前部长）保证，德国会与法国和睦相处，在摩洛哥问题上，德国无意发动战争。3月，就在他启程去丹吉尔前，德皇在不来梅发表演讲，声称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他知道，“永远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无意义的权力”。此外他还说，德意志帝国应当“作为一个冷静、诚实和爱好和平的邻居，赢得别人的完全信赖”。一些高级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鹰派的军事指挥）则相信，这样的言论完全是在给摩洛哥的官方政策添乱。

1904年1月，威廉二世正好坐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的旁边（这位国王专程赶到柏林庆祝威廉二世的生日），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利奥波德说，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他希望比利时能够站在德国这边。威廉二世承诺，如果比利时国王支持德国，那么比利时人将会获得法国北部疆土，他也会授予比利时国王“旧勃艮第之王”的称号。利奥波德在大吃一惊之后对他说，他的大臣和比利时议会很难接受如此的空想和大胆的提议。威廉二世则反唇相讥，声称比起耶和华，他更无法尊重一个对大臣和副手们负责的王室。如果不是比利时国王十分乐于助人，德皇将会“纯粹根据战略原则”采取行动，换言之，入侵并占领比利时。据说利奥波德对这一席话感到胆战心惊，用餐结束，他站起身来时，把头盔都戴错了。

正是因为这些轶事，威廉二世的大臣们试图让他与真正的决策过程保持距离。很不寻常的是，威廉二世没有参与其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外交决定（即1890年决定不变更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甚至都没被提前告知。1905年夏，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授权威廉二世，于芬兰海岸的比约克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一项联盟建议，但他回来时却发现威廉二世对条约草案私自做了更改。首相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正式提出辞呈。由于害怕被他最得力的助手抛弃，威廉二世立刻打了退堂鼓。比洛最后答应继续留任，这份修改的条约也被撤回。

德皇不停地抱怨自己不知情，抱怨自己无法获悉重要的外交文件。当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坚持审查他与外国政要的私人通信时，他异常惶恐。1908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冯·施坦伯格（Speck von Sternburg）拒绝将威廉二世的信传达给罗斯福（德皇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无限钦佩和尊重）。这引起了施坦伯格的紧张不安。让外交官们担忧的并不是信中传达的政治意图，而是过分抒情且很不成熟的语气。一位官员认为，德国君主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就像一个头脑发热的中学生给一个面容姣好的女裁缝写信一样”，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诚然，这些表达方式让人十分不安，存在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各个政府不断揣度彼此的心思和意图。然而，有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首先，在这种情况下，德皇的身份是领导者和控制

者，而他却不能真正改变些什么；其次，他言辞虚浮的恐吓时常伴随着德国是受攻击一方的假想。不能将威廉二世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不合适的提议理解为具有进攻型的冒险行为，而应当看作德国面对法国攻势的一种回应。奇怪的是，在未来发生的冲突中，他对比利时中立立场的破坏并非出于单纯的破坏动机——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长同样也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们应当在一个更大的环境背景下根据双方的地位特征来看待这个问题。德皇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他从来都无法让他的行为合乎别人对他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德皇并没有像一个君王那样发表讲话，而更像是一个过分热衷于表达自己现有成见的未成年人。他是典型的爱德华统治时代宫廷的代表，即便是对旁边的陌生人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生活琐事，或是一直在对自己的同桌讲述自己最得意的计划。难怪对许多欧洲的政要来说，如果在午餐或者晚餐时被德皇揪住不放又难以逃脱，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威廉二世的行为确实对德国外交部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且并与真正的决策脱节，威廉二世才不停地表达自己的空想和幻想。比如未来发生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入侵波多黎各、全球针对大英帝国的战争风暴、将中国划为自己的保护国，这些都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按照自己的地缘政治思维勾画的蓝图，并不是政策。如果一场真正的冲突迫在眉睫，威廉二世则会立刻偃旗息鼓，然后为德国寻求理解，解释不发动战争的原因。当1905年年底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威廉二世惊慌失措，告诉比洛国内的社会主义波澜比国外的战争行为更值得关注；次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不期而来，拜见卸任的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这又让威廉二世坐不住了，他告诫首相，德国的枪炮和海军还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只是嘴上逞强，但当麻烦真正来临时，他却试图逃避。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5月，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Jules Cambon）在一封写给法国外交部高官的信中说：“很奇怪这个人是如何做到出言如此鲁莽冲动，而在行为上却突然表现出谨慎和耐心的。”

通过对20世纪早期的君主们的具体观察表明，他们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呈波动状态，且其最终的决定权也是相对有限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读了大量的文件，且定期与他的大臣们会面，然而作为帝国的“第一官僚”，弗兰茨·约瑟夫与尼古拉二世一样，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无法完全掌握办公桌上的海量信息。他并没有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安排自己的时间。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通过皇帝的果断决策形成的，而是在外交部内部、周边派系和游说集团的相互沟通中产生的。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没有弗兰茨·约瑟夫那么勤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山里或是他在卡萨尔帕洛措的住宅中。尽管他也在努力读完外交报道，他一天总要花3个小时读报，且会把自己发现的错误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位意大利皇帝与他的外交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全力支持1911年占领利比亚的决定，却很少进行直接干预。尼古拉二世能够在不同的政治派系中按自己意愿做出选择，由此破坏政府的统一性，却无法制定议程，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惨败之后。威廉二世比尼古拉二世更为积

极，但比起俄国大臣们，威廉二世的大臣更能很好地保护决策过程不受上述干扰。威廉二世的想法总是过于奇特，无法作为任何形式的行动选择而被采纳。

无论欧洲的君主们是否对政治进行了积极干预，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是造成国际关系不稳定的因素。只有部分实行民主的君主体制的存在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这些君主是被他们各自的执行机构所认可的，他们能够直接干涉国家的媒体和人力，并且对每个决策都有最终责任。纯粹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君主们会参与重要的国家问题——无果的比约克会晤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外交官和政客们（尤其是君主自己）一直将君主视为总舵手以及国家政策的拟人化，他们的存在使得决策过程的核心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国王和皇帝是国际关系混乱的根源。这种明确性的缺失敦促各国之间应努力建立明确和透明的关系。

君主体制同样也使各国内部的关系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在意大利，军队的统领权究竟在国王、军务大臣还是总参谋部长，还未被清晰界定。意大利参谋长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同人进行商讨时，总是试图避免文官介入。同样，文官也将军官们排斥在自己的政治圈外。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意大利总参谋部长官甚至对意大利在哪种情况下，按三国协议规定，必须出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所有地区的君主制度中发现相似的情况），国王或者皇帝成为分散的控制链条的唯一汇合点。如果他无法行使综合职能、无法弥补宪法缺失的机能，那么国家体系的问题则不会得到解决，国家也不会团结。而这些君主往往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或者说是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与各种关键的执行职能，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保留，并显现出其卓越性。这样的想法破坏了决策过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相关的大臣所做的决策很容易被其同僚或对手推翻或破坏，这些大臣们经常觉得很难决定“他们的行为如何与大环境相融”。在这种疑虑的笼罩下，大臣们、官员们、军事指挥以及政策专家都认为自己有权力将各自的案例纳入讨论范围，而不是在个体意义上对政策结果负责。与此同时，人们感到必须要与君主的步调一致，于是出现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拍马屁的局面，这破坏了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恰能够为决策提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这样的结果造就了党派主义和夸张虚浮的十分危险的文化氛围，比如酿成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一切。

谁在统治圣彼得堡

如果君主无法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那么由谁来决定呢？答案显然是外交首脑。这些人对国内外的外交官员进行监督，阅读并回复大部分

的重要外交信件，并对议会和公众做出政策的解读和论证。然而实际上，与君主一样，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同样处在波动状态，且国与国之间也有不同。其影响力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他部门领导者（尤其是政府首脑）的意见和干预，君主的态度和行为，外交部高级工作人员对遵从部门领导者的意愿，以及体系内派系不稳定性的程度。

在俄国，外交大臣和他的家庭住在外交部内的公寓里——大广场上的一座巨大的、深红色的建筑，面对着冬宫。这样，他和他妻子、儿女的社会生活就会与外交部的工作交织在一起。被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改革重塑了的政治体系动态走向决定了他出台政策的能力。一些有影响力的大臣继而着手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决策体系，这使得执行者能够平衡国内外的当务之急，并规范最高级别官员的行为。但这些努力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效果还是有争议的。改革者中最为积极、最有才能的是谢尔盖·维特，他是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1903年，他因反对对朝鲜的政策，向政府递交了辞呈。维特试图成立一个由“总统”领导的“内阁”，这个内阁不仅有规范大臣、同僚行为的权力，还能够控制他们与沙皇的关系。更为保守的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则将这些提议视为对沙皇专制原则的破坏，他认为只有政府形式才最符合俄国的国情。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大臣会议的形式成立一个类似内阁的组织，其主席或是总统被赋予解除不合作的官员职务的权力。尽管如此，“个人进谏的权利”还是被保留了。换言之，大臣们可以独立于首相（官方名称为“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向沙皇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切都取决于继任的首相、大臣们以及沙皇的意见能否实现一种平衡。如果主席十分强硬，那么他会希望将他的意愿强加于大臣。但如果一个非常自负的大臣设法支持沙皇的意见，那么他会与其同僚分道扬镳，另辟蹊径。1906年夏，彼得·斯托雷平被任命为首相，这一新体系获得了一位魅力十足且地位举足轻重的领袖。当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看起来是那种能够配合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支持者，且很快成立了外交部联络组织，搞好与杜马之间的关系。伊兹沃尔斯基以十分尊敬的语气与沙皇打交道，但不如他的前任那般讨好和恭顺。他致力于改革和政治部门现代化，同时，他是联合政府的积极的代言人。最重要的是，伊兹沃尔斯基与大臣会议的大多数同僚一致，同意与英国达成和解。



彼得·斯托雷平

然而，伊兹沃尔斯基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很快与他的同僚产生了分歧。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将《英俄条约》视为日俄战争以前告别多年来冒险主义的一次机会，它会让人们将的精力聚焦到国内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来。然而对伊兹沃尔斯基而言，与英国的协议却为追求一种更为独断的政策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的问题上——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对俄国的意愿进行阻挠。伊兹沃尔斯基认为，协约带来的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让伦敦接受俄国战舰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许可权。这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举动让伊兹沃尔斯基更受鼓舞。1907年3月，格雷与俄国大使在伦敦签署条约，称“如果双方要建立永久的良好关系，那么英国将不再在其政策中坚持反对海峡通行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兹沃尔斯基与埃伦塔尔进行了注定会失败的协商。在协商中，他许诺俄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奥匈帝国则要同意修改海峡协议。与埃伦塔尔的共识是迈向全方位协议修改的第一步。这次行动得到了沙皇的支持，实际上，很有可

能是尼古拉二世在背后敦促伊兹沃尔斯基与奥地利人谈判的。1904年以前，作为对远东扩张政策的狂热追随者，沙皇现在则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海峡问题上。一位俄国政客回忆道：“攫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想法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避免来自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及其他大臣的阻挠，伊兹沃尔斯基利用了所谓的“个人进谏的权利”。这是政治家独立性的最高体现——这种独立性是通过游离在体制内不同权力中心的边缘获得的。但是他的胜利十分短暂，由于与英国之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海峡政策破产了。俄国的舆论为伊兹沃尔斯基增添了不光彩的一笔，他也同时受到了来自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的指责。

短期来看，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瓦解（正如日俄战争的失败一样）重申了大臣会议的集体权威。沙皇失去了主动性，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做出让步，服从了联合政府的规则。而斯托雷平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专制政体的保守派支持者开始将其视为篡夺了帝国主人应有权力的“大人”或是“大宰相”。1910年9月，谢尔盖·萨佐诺夫取代了伊兹沃尔斯基的职位，这样的选择似乎强化了斯托雷平的统治地位。萨佐诺夫是个级别相对低一些的外交官，在外交部的高级职位上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贵族和皇室的人脉。他更没有多少参与圣彼得堡决策的经验，对政府圈几乎没有个人影响力。外界评论人士认为，他唯一的参政资格是因其“平庸和顺从”方面有很好的名声，以及其斯托雷平妹夫的身份。

就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政策破产以及他本人离开外交部之后，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开始脱离外交部，落到了首相彼得·斯托雷平手中。斯托雷平认为，俄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因此要寻求一种调和主义的政策。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进入一段与柏林结好的时期，尽管波斯尼亚的局势紧张。1910年11月，尼古拉二世和萨佐诺夫来到波茨坦并开展了一系列会谈，这标志着俄德的和睦关系达到了顶峰。

一开始，斯托雷平的遇刺并没有改变萨佐诺夫的政策路线。在突然失去庇护者之后，萨佐诺夫立刻转而依靠自己制造影响力。但他自己本身处于弱势，加上斯托雷平的死亡，导致了体制内潜在不稳定性因素增多。那些身在国外的甚为老练和自信的俄国代理商则变得更加独立而不受牵绊。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N·V·恰雷科夫（N. V. Charykov）与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这两位大臣，他们感到圣彼得堡的控制力正在逐渐削弱，便开始着手进行冒进而独立的行动，以充分利用巴尔干地区恶化的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俄国驻法国大使正是前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他控制决策的意图（尤其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在其重新回到外交系统后仍然没有减弱。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秘密策划，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对萨佐诺夫进行恐吓”。

萨佐诺夫黯然失色的日子并不久。日复一日，他开始充分利用科科夫佐夫（接替斯托雷平成为首相的继任者）的政治弱点，在巴尔干政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俄国各方在决策的影响力方面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君主、外交大臣、总统和大使的不同势力间游走。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为“权力水力学”：当一方满溢时，另一方呈现出亏损，且体系内动态性的对抗在不同政治选择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俄国自由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采取进取式政策，以寻求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的团结。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则强烈感受到俄国国内的政治和财政弱势，以及如科科夫佐夫所指出的，“以牺牲农民的口粮换来的激进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的外交政策。

比如，1909年春，当议员们在杜马当中讨论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重要性时，代表联合贵族委员会的保守派们认为，波斯尼亚的兼并无论如何都不会损害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俄国应当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政策，与柏林建立和睦关系。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英国，英国正在将俄国拖入与德作战之中，只为了强化他们在世界市场的控制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立宪民主党内的亲法和亲英的自由主义者呼吁将三方协议发展成为三方同盟，以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影响，挽救自己越发不景元的大国地位。这是所有外交政策执行者以及在今天试图解读政策的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权益”并非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诸在俄国政府之上的客观命令，而只是政治精英自己内部具体利益的投射罢了。

谁在统治巴黎

法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点。与俄国相比，法国的外交部（即根据其地址而命名的“奥赛码头”）享有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权。法国的外交部是一个高度社会化且相对稳定的组织，有着自己的使命。其团队精神通过密切的家族血缘关系得到加强：朱尔和保罗·康邦分别是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1914年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是朱尔和保罗的妹夫，其他主要的家族还有埃尔贝特家族、德马尔热里家族以及德库塞尔家族等。外交部的保密传统保护了其独立性，敏感的消息只能透露给内阁部长。对高层官员来说，拒绝将消息告知位高权重的政治家（甚至共和国总统本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1895年1月（尚在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任期内），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在任职6个月后递交了辞呈，以抗议外交部没有告知他外交事务的最新进展，甚至是最重要的信息。政策文件皆秘而不宣。只有在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于1912年成为总理兼外交部长之后，他才获悉关于法俄同盟的重要细节。



约瑟夫·卡约

但外交部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必然地授予其部长权力和自主性。法国外交部长的权力非常小，甚至小于部里的人员。其中一个原因是部长人选的频繁更迭，这是战前法国政治的高度混乱造成的结果。比如在1913年1月1日到战争爆发期间，外交部就换了6任部长。在法国，政客在外交部的任期短暂，相较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对其政治生命来说显得没那么重要。由于内阁的团结缺少制度约束，部长们的能力和抱负在严酷的党派斗争中消耗殆尽，而这正是法兰西第三帝国政府每天所经历的。

当然，也会有例外出现。如果部长能够在位足够长的时间且拥有巨大的决心和辛勤的努力，那么他必定会在工作中注入他个人的影响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位长达7年（1898年6月~1905年6月），这巩固了自己在外交部的统领地位。这不仅得益于他的勤奋，还在于他不在乎巴黎的那些重量级官员，他在整个组织内建立起由志同道合的大使及官员组成的关系网。正如欧洲其他地方，法国的

政治体系内部的派系也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对权力的分配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德尔卡塞的强硬做派下，高级行政官员（即“中央”）的权力份额逐渐缩小，而摆脱了中央限制的大使们则逐渐活跃起来——正如伊兹沃尔斯基和哈特维希在萨佐诺夫早期执政时的所作所为。德尔卡塞冗长的在位时间催生了一个小内阁，以在伦敦和柏林的康邦兄弟以及在罗马的卡米耶·巴雷尔（Camille Barrère）为核心人物。这些大使们定期在巴黎会晤，商讨政策，并在关键的官员之间游说。他们完全绕开了中央的那些官员，通过私人信件与部长交流。

高级大使们对自己的重要性有格外深刻的感触，尤其当我们将其与现在的大使们的气质和想法作对比，更能发现这一点。保罗·康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01年，他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整个法国的外交历史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记载着身在国外的大使们在来自巴黎的反对之下想要有所突破的各种尝试。当他对来自首都的官方指示感到不满时，常常将它们付之一炬。在与朱斯坦·德赛尔福斯（Justin de Selves，1911年6月～1912年1月任外交部长）的谈话中，康邦毫无城府地告诉对方，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与部长一样重要。如果我们还记得从1898年他成为法国驻伦敦大使到1914年夏之间，康邦见证了9位外交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来了又走（其中两位还经历过复职），也许对此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康邦并不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下属或雇员，而是因为其专业知识而被授权参与决策过程并担任重要角色的法兰西公仆。



保罗·康邦

康邦崇高的自尊感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也是众多高级大使的信念）：他们不仅是法兰西的代表，还是一个国家人格化的象征。虽然他在1898～1920年任驻伦敦大使，但康邦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当他与爱德华·格雷（他也不会说法语）见面时，他坚持将对方的每句话都翻译成法语，就算是很容易理解的词，比如“yes（是）”。和许多法国政治精英一样，他坚信法语是唯一一种能够表达理性思维的语言。他拒绝在英国建立法语学校，理由很奇怪：他认为在英国长大的法国人的智力发育都很迟缓。康邦和德尔卡塞通力合作，才有了1904年《英法协约》的诞生。康邦本人从1901年开始便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劝服他的英国同人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和解，同时敦促德尔卡塞撤回法国在埃及问题上不切实际的声明。

在德尔卡塞辞职后（当时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达到顶峰），事情发生

了转机。他的继任者们没有那么强势和有权威。莫里斯·鲁维埃和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在位的时间分别只有10个月和7个月；斯蒂芬·皮琼（Stephen Pichon）稍微长一些，从1906年10月到1911年3月，但他厌恶工作，经常不来上班。这样就导致中央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到1911年，两大派系合并，共同掌管法国外交事务。一方是老使节们及其行政同僚，他们支持与德国缔约，寻求务实的、开放的法国对外关系；另一方是朱尔·康邦称为“激进分子”的中央官员。

大使们在资历和经验上具有权威，但“中央”的人却拥有强大的制度和机构优势，他们能够干预媒体报道，控制官方文件的传输，此外，还能够干涉部长级职务的“黑色内阁”——一个规模很小但很重要的部门，他们对公开信负责，拦截并破解外交信件。就像俄国一样，这些机构性的、带有对抗性的部门与对外关系上的分歧是一致的。内部对于获得影响力的斗争因此也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定位。

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政策就是一个案例。1905年，当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发生分歧，德国次年又在阿尔赫西拉斯败下阵来之后，巴黎和柏林都在寻找一种解决方式，化解摩洛哥冲突。对法国来说，如何对待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声明出现了分歧。巴黎应当调解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还是视而不见？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一个代表就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保罗的兄弟。对于与德国消除积怨，康邦的理由如下：德国人有权为其海外的实业家和投资者说话；德国的最高层政治决策者，从德皇和他的亲密友人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Count Philipp zu Eulenburg）到伯恩哈德·冯·比洛、德国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及其继任者威廉·冯·舍恩（Wilhelm von Schoen），都由衷地希望与法国结好。他指出，法国的派系政治和兴致勃勃的民族主义媒体要对两个邻国之间产生的误解负主要责任。康邦的努力带来的成果便是1909年2月9日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协议，德国在摩洛哥的政治主动性被排除，法国与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价值也得到了肯定。

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方面是拒绝任何让步的“中央”集团。在幕后，疯狂的反德主义者莫里斯·埃尔贝特（1907~1911年在“奥赛码头”任通信部总管）等重要官员，利用他与媒体的密切关系，暗中向法国媒体泄露有争议的缓和提案（德国人并不知晓这些提案），甚至针对康邦本人煽动侵略主义的媒体斗争，进行蓄意破坏。埃尔贝特是那些成功向法国决策施加个人影响力的杰出案例。类似于几年前艾尔·克劳著名的英国外交部备忘录（除了一点不同：克劳的文件是被打印出来的，共25页，而埃尔贝特却以潦草的手稿形式洋洋洒洒地写了300页），在其1908年的备忘录中，埃尔贝特故意抹黑法德近期的关系，还采取了恶意中伤、含沙射影以及恐吓的诡计。他写道：德国人是不真诚的、多疑的、不忠的、奸诈的两面派，他们试图和解的努力只是狡猾的阴谋，目的在于戏弄和孤立法国；他们更看重自己在国外的利益；他们的外交政策徘徊在“恐吓和承诺”之间。他还总结道，对于两国之间糟糕的关系，法国几乎不负任何责任，毫无疑问，法国在与德国打交道时一直是以“和颜悦色且高贵的

姿态”。“如果公正地查阅一下文献便会发现，法国及其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应对这种现状负责。”正如几年前克劳的备忘录，埃尔贝特的备忘录的重点只是抨击对方备受指责的动机和“病态”行为，却没有明确指出对方的罪名。没有迹象表明，埃尔贝特曾经改变过他对德国的态度。他和中央其他固执的官员都是与柏林缔约的最大障碍。

1911年3月初，政府的垮台以及皮琼的离任为中央机构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提供了机会。外交部长皮琼的继任者是谨慎自觉但完全没有经验的让·克鲁皮（Jean Cruppi），他之前是一名地方官员，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外交部的职位，是因为许多比他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都拒绝任职——这也能够看出部长职位并不受人重视。在克鲁皮短暂任职期间（1911年3月2日上任，任期到6月27日），中央机关有效地控制了政策。由于承受外交部政治和商业部门主管的压力，克鲁皮同意中止所有与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经济联系，这是在变相否认1909年的和解协议。之后，一系列的举措逐步开展，不知不觉中，法国和德国之间关于从非斯到丹吉尔的铁路管理问题磋商被终止，在法国起草的关于摩洛哥的新财政协议根本就没有提到德国的参与。康邦大惊失色，他警示道，法国将自己与德国的关系引上了一条“困难重重之路”。

最终，在没有咨询其他利益相关国的前提下，法国作为宗主国，以镇压当地暴乱、保护法国殖民地人民为借口，决定于1911年春向摩洛哥城市非斯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巴黎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和1909年的《法德和解协议》。声称保护非斯的欧洲人团体而派遣军队的口实是虚伪的，摩洛哥内政所引发的叛乱以及其对欧洲人的危害也非常遥远。苏丹呼吁得到巴黎的援助——这其实是法国领事一手捏造的。当它被呈送到苏丹那里签字的时候，巴黎早就已经决定好要进行干预了。在这些事件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上，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并不是法国政府制定了对摩洛哥的激进政策，而是外交部的那些鹰派分子（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在1911年春和初夏达到无可匹敌的高度）。同俄国一样，权力从一个管理部门向另一个的倾斜，使得政策的论调和方向发生巨大的转变。

谁在统治柏林

德国亦是如此——外交政策的形成来自于政治体系内不同权力核心的交锋。但在体制上，德国与其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871年建立的囊括了德意志帝国这个复杂的联邦体制下，外交大臣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帝国首相来承担的。因此，这一关键的职位实际上复合了诸多职能，与许多不同的部门有着联系。德意志帝国的首相通常还兼任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联邦州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鲁士的领土居住着3/5的德国人口，此外还包括新征服帝国的领土。帝国没有外交大臣，只有一位外务秘书，他是首相的直接下属。首相与外交政

策的密切联系通过这样一个事实便可表明：他的私人公寓就坐落在威廉大街76号那座小小的、拥挤的宫殿里——那里便是德国的外交部。

依赖于这样的政治体系，奥托·冯·俾斯麦才能在这一特殊的机构中获得统治地位，并一手包揽外交事务，而这样的政治体制正是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成果上建立起来的。1890年早春，俾斯麦离职，留下了一个谁也无法弥补的权力真空。继俾斯麦后第一位首相及普鲁士外交大臣列奥·冯·卡普里维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并没有经验。卡普里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坚持不修改《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是在德国外交部一个小派系的帮助下做出的决定。该派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暗地里反对俾斯麦的观点，其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他同时也是外交部政治部门的首脑；他是个极其聪明、表达能力强，私下却居心不良、不善社交的人。人们佩服他，却不喜欢他。他领导的派系很轻易地赢得了首相的支持。换言之，如同法国一样，外交部长（在德国是首相）一旦居于弱势方，便意味着主动权逐渐偏向威廉大街的那些高官手中——也就是柏林的“中央机关”。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卡普里维的继任者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Hohenlohe-Schillingsfüerst）的任期内（1894～1899年）。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德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不是通过首相或是帝国外务秘书，而是霍尔斯泰因。

霍尔斯泰因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不仅与相关政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很好地处理了与德皇威廉二世身边智囊团的关系。那些年中，威廉二世积极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决定成为“他自己的俾斯麦”，并试图建立他对德国臃肿的政治体系的“个人统治”。他最终没能达成这个目标，但他那让人发笑的举动却歪打正着地产生了一种对权力的聚焦效果，即大多数高层政客和官员共同协作，以避免皇帝对决策过程的统一性造成威胁。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和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德皇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甚至包括毫无作为的霍恩洛厄，都深谙“对德皇进行管理”之道，通过忽略德皇的重要性来做到这一点。在1897年2月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中，霍尔斯泰因认为，他已经在三个月内看到他们的君主完成了“第三项政策方案”。奥伊伦堡回复他，让他不要担心，他敢肯定德皇的计划并非“方案。”而是异想天开的“无关紧要的笔记”，对政策的执行几乎没什么贡献。首相也没有被他说服：“看起来陛下又在推荐他的另一个新方案了”。霍恩洛厄如实写道，“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具有策略性的，他的方案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将外交官伯恩哈德·冯·比洛推上首相位置的正是奥伊伦堡和霍尔斯泰因。作为首相霍恩洛厄之下的帝国外务秘书（1897～1900年），比洛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控制德国的政策。1900年后，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德皇采纳了奥伊伦堡的建议，任命比洛为首相。与其他任何一任首相相比，比洛在极尽能事给威廉二世拍马屁的本领上更胜一筹，这也使得威廉二世信心倍增。尽管有许多政敌和存疑者，比洛–霍尔斯泰因–奥伊伦堡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当稳固地掌握决策权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它就可以良好地运转：一是，三个

人对他们最终的目的达成一致；二是，他们的政策是成功的；三是，德皇没有从中掺和。

而1905～1906年摩洛哥危机期间，这三个条件都未满足。首先，在摩洛哥问题上，就德国的目标而言，霍尔斯泰因和比洛之间产生了分歧（比洛想要的是赔款，而霍尔斯泰因却不切实际地希望摧毁《英法协约》）。其次，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当德国代表团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法国人技高一筹时，便宣告摩洛哥政策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误。这次惨败导致的结果是德皇与其首相分道扬镳（他一直对摩洛哥问题的行动方针抱有疑虑），进而继续成为决策过程的一个障碍。

在同一时间，俄国却上演着完全不同的场景：沙皇的东亚政策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内阁的责任则得到加强。而在德国，高层军官的失败暂时让德皇的行动更自由。1906年1月，外务秘书的职位突然空缺（之前的在职者因为过度操劳而去世了），威廉二世对比洛的意见置之不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继任者。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德皇的一位亲密友人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他俩经常结伴旅游）会是对抗比洛–霍尔斯泰因集团的人。1907年初，有传言称“比洛阵营”和“契尔什基的圈子”之间产生了不和。

在他最后担任首相的几年中（一直到1909年），比洛为东山再起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正如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所作所为，他试图建立新的效忠于自己的议会联盟，希望借此在政治上避开德皇的影响。他帮助策划了震惊世人的“《每日电讯报》丑闻”（1908年11月）：一家英国报纸刊登了对德皇的采访，其中德皇浅薄的言论激起了德国公众的抗议。比洛甚至间接地参与了1907～1908年的宣传运动，揭发了德皇亲密朋友圈内的同性恋行为，包括这位首相之前的盟友奥伊伦堡（他本人有可能确实是同性恋），而在德皇的支持下，他成了潜在的对手。尽管采取了大量的行动，比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一直没有达到他早先的状态。1909年7月14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被任命为首相，事态才趋于稳定。霍尔维格缺少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但他非常沉稳、谦和且出类拔萃，很快，他在大臣和帝国秘书之间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也说明了德皇为何在经过了《每日电讯报》以及奥伊伦堡的丑闻之后，仍然没有像之前那么坚定地公开挑战他的大臣们的理由。

爱德华·格雷爵士：高处不胜寒

英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像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或是其德国同人比洛和贝特曼·霍尔维格那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没有理由担心来自王室的不受欢迎的干预。在国际问题上，乔治五世非常由乐意他的外交大臣操持一切，格雷也同样非常享受来自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慷慨支持。不像他的法国同人，他并不需要与外

交部其他位高权重的同僚进行对抗。比起他的法国同人们，单凭格雷持续的在位时间，就足以让他对外交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1905年12月到1916年12月，爱德华·格雷一直大权在握，而在法国的同一时间段里，法国外交部却换了15个部长。此外，格雷在外交部的就职也加强了这样一部分影响，即那些支持他对英国外交政策观点的高层官员。毫无疑问，格雷是战前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



爱德华·格雷爵士

正如他19世纪的先驱们，爱德华·格雷爵士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他有着辉格党贵族后人的尊贵血统——他的曾伯祖父参与了1832年英国议会法案改革。在1914年之前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政治家中，格雷是极其让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的疏离感和傲慢使他区别于自由党党内的其他人。他很久以前就加入了自由党，但是他却认为外交政策十分重要，以

至于备受议会争议。他身为外交大臣，却对英国以外的世界茫然不知，从来没有对旅游表现出兴趣，不会说外语，并且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局促。他是自由党政治家，可他的政策观点却遭到大部分党内人士的反对，与此同时，却得到了大部分保守党员的支持。他成为“自由帝国主义者”派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然而他却对大英帝国漠不关心——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土安全的观点主要聚焦于欧洲大陆。

格雷的内在想法以及办事方法有着令人奇怪的不协调——无论是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聪颖、好奇、对政治的野心和驱动力。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虚度了光阴，在以不理想的成绩取得法理学学位之前（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听人说该专业很容易），他成为学校室内网球代表队的冠军得主。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通过辉格党家族的关系获得的。成年以后的格雷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对他来讲，参与政治与其说是在度假，不如说是在承担一种让人感到厌倦的责任。1895年，自由党在一次关键选举中败下阵来，导致议会解体，格雷当时作为自由党议员和外交部的议会副大臣，却声称自己并不感到遗憾，他说：“我再也不会上班了，我离开下议院的时间也指日可待。我们（这里指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终于感到些许安慰。”格雷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的人，喜欢观察鸟类和钓鱼。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一篇关于用假蝇钓鱼的文章名噪一时。就连在任外交大臣时，他也经常抓住时机离开办公室到郊外去游玩，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会十分厌恶把自己召回伦敦的指令。那些和格雷共事的人，包括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都认为格雷对郊游活动的热衷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希望有人向这位外交大臣提议：“少花一些时间在他的鸭子上，多抽时间学学法语。”他的同僚们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任何政治动机，他们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个“丝毫没有个人抱负，冷漠而不易接近的人”。

实际上，格雷对于权力的胃口是很大的，他也准备为了获得并维持手中的权力而使用一些阴谋诡计。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外交大臣，还要得益于他所信任的朋友们、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的精心策划——赫伯特·阿斯奎斯以及R·B·霍尔丹（R. B. Haldane）。在格雷钓鱼的小草房（位于苏格兰一个叫“维吕加”的小村庄）里诞生的“维吕加合谋”，旨在排挤自由党领导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并建立他们自己在内阁的关键地位。作为外交大臣，隐秘地办事、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在幕后交易是他的行事风格。在他看似温文尔雅的羞怯背后，隐藏了对反对性政策的手段和策略的直觉。

格雷很快就控制了决策过程，他的权力无人匹敌，这也让英国的外交政策直接聚焦在“德国威胁论”上。当然，如果将英国政策的重新定位仅仅看作爱德华·格雷一人的功劳，那就太有失偏颇了。幕后的人并非格雷，新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伯蒂、哈丁、尼科尔森、马利特（Mallet）、蒂雷尔（Tyrell）等人（这些拥有相同观点的人组成了松散的小同盟），与其说他们受到格雷的控制和操纵，不如说是与他同心同德。诚然，格雷是十分依赖这些协同者的，比如他的许多决策和备忘录都是模

仿哈丁的风格。格雷集团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来自针对外交部的新机构改革的冲击，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加强外交大臣的权威，而是对一批更大范围内的高官的影响范围做出界定。然而，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格雷所做出的努力和他的警觉性让人刮目相看。当然，他之前的共谋者、1908~1916年任职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为他提供的坚定支持也帮了不少忙。来自于下议院保守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也对他有所帮助，这证明格雷具有跨党派的影响力。

然而格雷的大权在握以及观点的一致性并没有完全让英国免受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政策波动。格雷集团的反德立场并没有在外交部之外产生共鸣，甚至连大部分内阁成员都不支持这种观点。在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之间的矛盾的催化作用下，自由党政府（更广泛地说是自由党的行为）变得极端化。许多激进党领导人（其中不乏党内备受尊重的人士）强烈反对外交大臣的政策，认为这是在与俄国结盟。他们指摘格雷和他的同僚对德国采取一种完全不必要的挑衅姿态。他们质疑，安抚俄国所得到的好处是否大于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谊的潜在利益。他们担心，三国协约的诞生并不会迫使德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他们敦促缓和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英国的舆论，它们来自文化和政治精英。尽管英国和德国之间隔三岔五就会有“媒体之间的交锋”，但英国的舆论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已经逐渐偏向于亲德的态度。英国精英阶层中除了反德的声音，同时还存在友好的声音。后者认为两国之间有着多层次的文化关联，这些人对德国的文化、经济和科学成就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面对这些挑战，格雷通过躲开敌对的监视来保护自己的决策过程。从他的办公桌上发出的文件经常标着“仅在有限范围内传阅”的字样。他的私人秘书也经常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只让这些人过目就足够了。”对重要决策的咨询，尤其是关于与法国的深层缔约问题，仅限于管理层中那些可信赖的人了解。比如，1905年12月和1906年5月，内阁并没有告知法国和英国之间举行的商讨事宜，而在探讨中，两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在原则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要爆发战争，英国就可以给予法国军事上的支持。这样的行动符合格雷对政策的精英主义理解，以及他对于缔结协约的公开表态：事情应当符合“一种忠实和慷慨的精神”，以此确保任何不测的发生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双方的协议”，此外，循序渐进而达到深入承诺的过程应当始终避免“党派论辩”的干扰。换言之，格雷在实行一种二元政策。在公开场合，他多次否认英国有义务为法国提供援助。在反对者的敦促下，他常解释说，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方案也仅仅是应急计划。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格雷成功地维持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内部连贯性。

然而随着权力的平衡在英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派系之间不停地游走，我们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状态是如何变得复杂的。对那些直接与外交大臣和他的同僚们打交道的法国人来说，格雷爵士（这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他的很古典的称谓）将在爆发战争时站在法国这边，尽管官方坚持协约的无约束性。而对于没有参加过秘密谈判的德国人来

说，英国会抽身于欧陆的盟国之外，尤其是当法俄同盟采取措施针对德国而不是相反情况时。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决策机构内不同利益方面的权力所形成的动荡，增加了欧洲国际体系内沟通交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在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刻：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的政府在高度紧张和威胁的氛围中相互打交道。这种情况在1911年夏发生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争执上充分地体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法国外交部的一系列举措下（高潮是1911年4月向苏丹国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法国军队），1909年的《德法协议》破产了。1911年6月5日，因为对法国单边攫取摩洛哥统治权力有所警觉，西班牙政府派遣军队占领了摩洛哥北部和西北部的拉腊什和凯比尔堡两地。现在来看，德国的干预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黑豹”号炮舰于1911年7月1日及时地在摩洛哥海岸抛锚泊船。这艘炮舰的实力并没有给人留下印象，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服役期达两年之久。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有许多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事态发展到西欧国家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但是当时反对党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最后也成为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但为何事态还是会恶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外交部的不妥协。在危机爆发之初，掌握和控制主动权的是政府首脑机关，外交部长让·克鲁皮于6月27日离职的事实（就在“黑豹”号到达的几天前）巩固了高层官员们的地位。他的继任者朱斯坦·德赛尔福斯（像克鲁皮一样，他同样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很快便沦为法国外交部“内阁长官”莫里斯·埃尔贝特的傀儡。作为1907～1911年信息部的总管，埃尔贝特与媒介之间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他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竭尽所能地抨击与德国进行谈判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埃尔贝特以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高层官员的不妥协，才导致直到1911年7月底，法国驻柏林大使才接到通知，与德国进行商务研讨，探讨如何就法国在摩洛哥的独裁给予德国赔偿。

之所以有这样的缓和举动，全部仰仗于朱尔·康邦以驻柏林大使的身份，他越过外交部长直接向精力旺盛且直率坦诚的总统约瑟夫·卡约进行呼吁的努力（卡约于6月27日，即危机爆发前上台）。卡约是财政部长的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尤金·卡约（Eugène Caillaux），尤金曾在1870年之后迅速向德国提供了赔偿金。约瑟夫·卡约是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实现财政现代化，他用商人的实用主义眼光看待外交事务。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按照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对待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并且他对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标签性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内阁由此一分为二，一方是支持在摩洛哥问题上采取缓和政策的卡约，另一方是朱斯坦·德赛尔福斯，他是法国外交部鹰派的喉舌。在他的部长的敦促下，德赛尔福斯向阿加迪尔派遣了巡洋舰，这一举动很可能

引发严重的后果而使事件升级。在卡约否决了这种选择后，鹰派开始组织力量对他和朱尔·康邦进行攻击。他们充分利用媒体报道，对缓和派人士进行贬损。卡约被莫里斯·埃尔贝特暗中破坏自己政策的行为激怒，叫他来办公室，用实际行动对他进行了警告："我会像折断这根铅笔一样折断你。"卡约最终能够与德国达成和解，但只能通过与柏林进行秘密的和非官方的谈判（通过德国在巴黎的使节，通过在柏林的朱尔·康邦，或是通过一位从中斡旋的商人）来进行，以躲开部长和他的官员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8月初，卡约秘密地接受了柏林的意向赔偿措施，而外交部长朱斯坦·德赛尔福斯曾经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

这种暗箱操作的外交手段使总统成功地绕开了外交部那些反德的鹰派，但这种行为极具冒险性。1911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谈判突然破裂，使得事态出现了不必要的升级，包括法国派遣部队以及德国战舰驶向阿加迪尔的威胁——尽管卡约和他的德国对手实际上是很愿意选择妥协的。卡约责怪那位名叫丰德尔的调停商人，因为他在沟通中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但是如果外交部官员没有谋划将他免职或是破坏与德国的协商的话，则根本不需要丰德尔这个牵线人或是卡约的幕后操作。也就是说，卡约是没有办法才被迫绕圈子以达成自己的承诺，因为他的部长同僚们拒绝接受他向柏林做出的保证。这种复杂局面增加了柏林对如何解读法国的行动的不确定性：正如一位德国外交官所言，这需要在两种完全矛盾的趋势中进行甄别，"尽管法国媒体以及军队的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但卡约的政策似乎更占优势"。

德国在危机期间的政策并不是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所控制，当然也不是由德皇控制（他对摩洛哥问题丝毫提不起兴趣），而是在于士瓦本的帝国外交事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基德伦参与了1909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协约的过程，因此很自然地，他应当在德国如何对法国派遣军队的反馈中起关键作用。正如德国高级官员的典型做派，这位外务秘书将其个人影响力施加到摩洛哥外交政策制定的始末，并与巴黎进行沟通。基德伦并没有兴趣让德国在摩洛哥分一杯羹，但他同样决定不会允许法国单方面控制该地区。通过模仿法国的行为（做出一系列越演越烈的反对姿态），他希望能够保障德国的利益，并在法属刚果问题上获得土地补偿。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目标不用发生冲突就可以实现，因为在1911年5月，约瑟夫·卡约以其财政部长身份向在巴黎的德国外交官保证："如果你们意识到自身在摩洛哥的重要利益，那么法国就准备在别处做出妥协。"因此，在卡约6月就任总统后，基德伦便认为这会成为法国的外交政策。他拒绝将两艘舰船派到阿加迪尔，他相信装备水平甚至不足以成功登陆的"黑豹"号作为象征性的表态已经足够。

危机的进一步演变证明了基德伦对法国的反应判断失误。他在评估德国国内环境时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基德伦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且正如1905年那样，皇帝对1911年的北非政策同样表示怀疑。为了规避潜在的反对声音，基德伦寻求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公共人物的支持。但只要有媒介运动的介入，他还是无法控制舆论

的方向和内容。结果，在民族主义媒体雷鸣般的煽动下（这让巴黎和伦敦都有所警觉），旨在持久地将危机控制在武装冲突的边界之内的德国政策得到巩固。极端民族主义报刊的大标题聒噪地呼吁“将摩洛哥西部还给德国”，而这反而成为巴黎鹰派们的把柄。让他们同样感到担心的是德皇，他对外务秘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至于基德伦在7月17日正式递交了辞呈。好在首相霍尔维格从中斡旋，才挽救了这一政策，并留住了基德伦。

1911年11月4日，一项法德条约最终将双方的共识清晰地定义出来：摩洛哥成为法国专属的保护国，德国的商业利益通过条约得到保障，且部分法属刚果地区被让给德国。但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也暴露出法国外交政策上危险的不连贯性特征。1911年11月18日成立的整顿性委员会调查了莫里斯·埃尔贝特的行为，这揭露了巴黎高层官员们的精心策划的阴谋。卡约的名誉也同样被败坏了。在公众眼中，他和他的内阁沆瀣一气，通过一项条约而割让给德国过多的领土（在那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则更为恶劣），因为与德尔卡塞在19世纪90年代末所设想的换取摩洛哥的条件相比，德方承担得过少。总统与德国人暗中谈判的举动昭然若揭（黑色内阁破译了电文，并战略性地透露给了中央控制的媒体），他的命运也由此被决定：在仅仅就职了7个月之后，卡约于1912年1月21日下台。

德国方面对于1911年11月的条约同样不满，他们认为德国得到的太少。部分原因是基德伦引起的，在德国期望通过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得到的与实际微小的收效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比如“摩洛哥西部的利益”），极端民族主义媒体将此作为噱头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这位外务秘书深化了政府以及那些声称自己是其“天然支持者”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分歧。然而民族主义媒体所认为的做出牺牲的条约却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基德伦没有其他办法避免君主控制政策的决策过程。

或许德国在危机期间政策出现摇摆所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巴黎更深地误解其行为，认为对方的政策是出于恐吓的目的。当新任总理兼外交部长雷蒙·普恩加莱阅读1912年前几个月的外交文件时，被德国摇摆于强硬和妥协的政策立场所震撼了：“当我们对德国采取缓和的态度时，德国不领情；而我们在任意场合下表现出强硬态度时，德国人又打退堂鼓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只有“威胁性的语言”才对德国人有效果。

同样，英国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暴露了其管理机构内部的严重分化。伦敦自由党内阁的反应十分谨慎，因为他们认为法国要对危机的爆发负主要责任，因此要规劝他们让步。7月19日，内阁甚至授权格雷告知巴黎，英国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承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法国政府气愤地反馈道，英国在这方面的首肯可能会破坏1904年的《英法协约》。而与此同时，以格雷为首的反德集团却采取了坚定的亲法立场。尼科尔森、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哈丁以及格雷本人侃侃而谈德国的威胁，此外还老调重弹，强调当务之急是要维护《英法协议》。7

月19日，理查德·哈丁要求军事行动指挥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延迟他的欧陆之行，以便能够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评估其军队实力，以防德法边境爆发冲突。当贾斯丁·德赛尔福斯对德国在刚果索要赔款的夸张程度表现出惊讶时，弗兰西斯·伯蒂爵士从巴黎致信格雷，告知他德国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旨在让法国同意德国在摩洛哥海岸的控制权，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然而这却是对德国立场的误读，并且这种误读进一步在英国海军主义者中造成恐慌，因为对他们来说，德国在大西洋建立要塞的行动是难以接受的。

德国获得大西洋港口的愿景使得格雷成功说服内阁，于7月21日向德国大使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人在阿加迪尔登陆，那么英国也会采取措施确保自己在该地的利益，即格雷也要派出英国的战舰。就在同一天，格雷集团进一步让事态升温：1911年7月21日傍晚，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府邸发表演讲，向柏林提出严正警告。劳合·乔治称，英国不可避免地要“保护它的地盘和它在世界列强中的领先地位”。英国的权力不止一次地“拯救”其他国家于“巨大灾难，甚至种族灭绝之危险中”。如果英国被迫在和平与妥协于其他势力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在此强调，以此为代价的和平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耻辱”。次日，格雷成功鼓动了海军人士的不安，他警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英国的舰队不久后可能会遭到袭击，此外他还通知第一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德国的舰队已经被动员，整装待发，然而事实上，公海舰队还处于分散状态，德国人并没有打算将它们集中起来。

府邸演讲并非临时起意，它是由格雷、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精心策划的棋局。就像卡约绕过了外交部，实施他与柏林进行谈判的鸽派政策，以格雷为中心的反德阵营同样绕开了自由党内阁，向德国传递出强硬和暗中挑衅的信息。劳合·乔治敏感的发言词并没有经过内阁的同意，而仅仅被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认可。这次演讲标志着劳合·乔治正式与鸽派激进分子阵营和自由帝国主义者分道扬镳。他的言辞在柏林造成了恐慌，德国方面一直认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破坏《法德协约》的进路。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质询驻柏林的英国大使：“劳合·乔治是何方神圣？他怎么能够对德国耳提面命，并组织法国和德国的和解？”

劳合·乔治的演讲同样震惊了英国内阁中那些并不认同格雷的大臣们。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子爵（Viscount Morley）公开指责这次演讲（以及格雷之后与德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为“未被授权且并未成功的对德国的挑衅”。大法官劳尔伯恩大人（Lord Loreburn）认为英国过于积极地在这场争议中支持法国，而无论如何，巴黎明显是不占理的一方。他恳请格雷否认这次演讲，并澄清英国并无干涉法国和德国之间谈判的意图。

格雷集团最终还是胜利了。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如果法国和德国开战，那么英国会迅速进行干

涉，包括派遣英国远征军。阿斯奎斯、格雷和劳合·乔治等人均出席，但关键的激进人士，如莫利、克鲁（Crewe）、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以及伊舍（Esher）等人，却既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被邀请。接下来的一周充斥着激情洋溢的战争规划（这对激进人士来说是十分恐怖的事情）。就连阿斯奎斯都从密集的"军事谈话"中抽身而退了，这些军事谈话旨在于1911年9月同法国进行调度合作计划以及战略合作，但格雷却拒绝中止它们。英国十分乐于幻想事态极速升级的可能。就连在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法国方面都没有做任何的战争准备，而霍尔维格在一封给伦敦的德国大使的信中却感慨："看起来英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开战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8月3日，英国以摩洛哥争议为借口，将德国视为其对手。与俄国的相对保守和绥靖姿态相比，英国的积极性尤为明显。正是因为英国做出这样的反应，维也纳也决定放弃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中立政策。

尽管如此，鹰派和鸽派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正如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对卡约和倒霉的贾斯丁·德赛尔福斯进行报复，迫使他们于1912年1月下台，之后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又展开了对格雷政策的新一轮攻击。在这些大臣中有许多人从未对格雷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前向法国的承诺表示过满意。1911年12月，后座议员对格雷提出了质询。这些非议部分是因为对他策略的隐匿性表示失望：为何政府的那些可能代表英国人民的行动却并没有被公之于众？杰出的自由主义活动家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以及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激烈地反对格雷，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改善英德关系。事实上，对这位外交大臣的抨击已经遍布整个自由主义媒体。巴黎的那些强硬派成功地使卡约和他的缓和措施声名扫地，英国的"亲德"游说同样也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格雷和他的政策扫地出门。

三个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首先，由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中强大的党派建构，英国的大臣们本身并不容易被这类质疑所击垮；其次，如果格雷的政策被全盘否定，那么他便会辞职，一并带走的还有劳合·乔治、霍尔丹，或许还有丘吉尔，在那些理性的非干预自由主义者眼中，这将昭示着政府中自由党人的末路；最后，重要的一点在于来自议会保守派对格雷与法国进行军事结盟政策的支持。帮助外交大臣预测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动向的一个方面便是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1911年11月前，他担任保守党领袖）私下提供的支持。1914年夏，一场笼罩在爱尔兰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也引发了对保守党持续提供帮助的质疑。

但如果格雷的协约政策的本质是恰当并且合理的，那么面对来自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反对者的叫嚣，他对自己的辩解则阻止他尽可能明确地阐释他本来的承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格雷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问题：满足法国的要求（他已经对对方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以及说服内阁中仍占据大多数的非干涉主义者他并没有这样做。1911年11月出台的两份内阁决议表明，他的内阁大臣同僚中有15人对格雷提出过警告，要求他停止支持那些与法国高层的军事会晤。当然，这些会晤并没有被提前告知他们或是提前征得他们的同意。1912年1月，劳尔伯恩带

领下的非干涉主义者召开会议，达成了一项内阁声明，称英国“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暗示的义务，来支持法国针对俄国采取的武力行动”。只有当劳尔伯恩告病辞职之后，格雷一众才从这些压力中松一口气。

对于采取以协约形式作为安全策略的政策平衡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的需要，使得英国发出的外交信号一直让人感到困惑和犹豫不决。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通常在与法国同人的交往中自主决定并与之达成协议，这些来自英方的军事保证（一旦与德国爆发冲突）巩固了法国的地位。这些主动性行为并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更不用提英国议会了。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亨利·威尔逊被派往巴黎，与法国总参谋部人员进行商讨，目的是达成一项针对德国的英法联合动员计划，这便是1911年7月21日的“威尔逊–迪巴伊备忘录”——当时奥古斯特·迪巴伊（Auguste Dubail）将军是法国的总参谋长。这项备忘录规定，在动员的15天内，英国的6个步兵师、1支装甲部队以及2支骑兵部队（总共包括15万名士兵和6.7万匹马）将会被调往法国左翼。1912年前几个月，双方为了挫败德国的海军扩张，决定达成英法海军的合作，而这项决定进一步肯定了这样一种假设：一个防御联盟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1912年11月22~23日的格雷—康邦信件（正如莫利所言，这些信件是格雷那些非干涉主义政敌从他那里“敲诈”出来的）证明，《英法协约》只不过是一个联盟的象征，因为这些信中宣称双方具有独立行动的自由，甚至在第三方对其中一方进行打击时亦如此。英国究竟有没有支持法国的义务呢？格雷会在公共场合宣称，这些承诺只不过是没有约束力的权宜之策。而私下，这位外交大臣则将英法军事对话视为“与法国进行合作的义务”，只要“其行为并不具有挑衅性且是合理的”。当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于1914年8月初力挺格雷，称“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康邦保证，如果德国先发制人，您将站在法国这边”，格雷只是回了一句：“是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面的回复。”

因此，在英国方面，英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一种双重考虑而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知道，格雷的公开声明需要字斟句酌，就连他的官方沟通都要满足内阁的非干涉主义者以及公众的要求。然而，保罗·康邦从那些伦敦的反德朋友以及驻巴黎的伯蒂口中听到的正是他所盼望听到的。潦草敷衍和不谨慎都是法国人所不能接受的。1914年“七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巴黎的决策者们、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当然还有格雷自己都曾经一度感到高度焦虑。更重要的是，英方承诺的不确定性迫使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弥补手段，他们甚至更加强烈地希望与俄国建立军事联盟。法国政府、卢森堡驻巴黎的大臣纪尧姆伯爵（Baron Guillaume）在1913年春都表示，自己有义务“不断地加强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因为众所周知，与英国的友谊正变得越来越不牢靠和无效”。对德国来说，英国政策的模棱两可也使其产生了疑惑和苦恼。为了安抚非干涉主义者，格雷不得不对柏林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同时他又多次对德国人进行警告，以免他们得出结论，法国被彻底抛弃并且担心英国不会及时伸出援手。这种信息混乱的局面以及欧陆列强之间权力关系的动态

性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意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七月危机”中一直困扰着德国的决策者们。

军事与民事

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在1914年5月旅欧归来后，如实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汇报：“欧洲的情形十分离奇，那里的军国主义氛围几近疯狂。”豪斯的观点部分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是典型的美国式“政治上校”。作为政治服务的回报，他在得克萨斯自卫队中获得了此等军衔。当豪斯上校拜访柏林时，德国人却将他当作军方人士来对待，常常在就餐时安排他和将军们坐在一起。他关于欧陆军国主义氛围的看法或许与这种不幸的误解有所关联。正是如此，来自大西洋彼端的人才感觉到战前的欧洲呈现出古怪的现象。高层政要、皇帝和国王们在出席公开场合时都会穿着军装，精心炮制的军事评论是公共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丽的海军军力展览吸引着大批的人，占据了画报的大部分内容。部队招募的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几乎榨干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丁资源。疯狂的军事实力展览涌入大街小巷，甚至连最小的社区组织也不放过。这样的“军国主义”是如何影响1914年欧陆战争的决策的？是否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七月危机”的根源是民事责任的消退，还是将军们手中的军事权力的异军突起？

在战前的管理集团中，军事与民事的冲突和分歧无可厚非，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国防开支成为政府开销的主力，部队长官们热衷于改良装备、培训士兵以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不得不与民事政治家们斡旋，渴望更多的政府资源。与此相反，财政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治同僚则以财政紧张和维护国内稳定为由，力争限制军事力量的扩张。要想在这些较量中占上风，则必须依靠制度环境以及当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格局。

直到1908年，俄国军事指挥结构的混乱一直阻碍着将军们有效说服政府。但1908年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军事管理改革之后，诞生了一个更集中的执行机构，设立了军政大臣的职务，他有向沙皇直接汇报军事动向的专权。从1909年开始，新任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1914年7月时他仍在位）和意志强硬的保守派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在强大的总统斯托雷平的支持下，科科夫佐夫（财政职责和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把手）一直阻挠或是剥夺苏霍姆利诺夫的预算制定。工作上的摩擦迅速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私仇。苏霍姆利诺夫认为科科夫佐夫是一个“狭隘、啰嗦、自私的人”，而科科夫佐夫指责这位军政大臣无能、不负责任且贪污腐败（看起来他的指责好像更有道理）。

科科夫佐夫的德国同行是1909~1911年任职的财政大臣阿道夫·韦

穆特（Adolf Wermuth）。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下，韦穆特努力调整帝国的预算，削减公债。韦穆特指责蒂尔皮茨过度开支，经常抱怨这位海军大臣的失职，与科科夫佐夫抱怨苏霍姆利诺夫在处理军务基金时的挥霍态度如出一辙。这位财政大臣的格言是：“无税收，不开支。”在参谋长和军政大臣之间同样反复出现矛盾，因为前者要求增加资金供应，而后者常常拒绝或反对。近期的一份研究甚至表明，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规划大举西进行动的著名的“1905年备忘录”在一定意义上看并非“战争计划”，而更像是向政府要钱的恳求。除此之外，施里芬设想派遣81个师，这超过了德国当时实际拥有的动员总人数。由于联邦宪法向其成员分配直接税收的收益，而不是面向帝国政府，因此德国的军事财政问题更为复杂。德意志帝国的结构转移限制了帝国国防开支，而这种限制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财政资源的争夺在德国却很缄默，因为军事预算每隔5年才向议会提交一次，这种系统叫作“五年计划”。因为军事高层人员将这种“五年计划”视为保护军队免遭议会持续干预的手段，他们则十分不情愿通过请求大量的额外预算来破坏这种体系。这样的体系成为自我限制的有力保障。正如普鲁士军政大臣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在1906年6月所观察到的那样，“五年计划”虽然是一项麻烦的安排，但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改为按年度提交，每一次军事扩张后针对军队存在意义的粗鲁而固执的挑唆将会更为危险”。甚至在1911年，当人们进行“五年计划”的改革，且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7]以及军政大臣约西亚·冯·黑林根（Josias von Heeringen）协力谋取军队的实质性扩张时，其对手（财政部的韦穆特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则保证，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增加非常有限（约1万人）。

在每个欧洲国家中，我们都能洞悉这种类似的紧张状态。在英国，自由党人于1906年要求承诺削减用于布尔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口号是“和平、节约与改革”。在寻求与法国和俄国相互理解的决策中，预算限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当英国海军预算水涨船高时（1904年英国海军花销是德国的3倍。到1913年，其仍是德国的2倍还要多），陆军的花销却在战前的几年中基本不变，这迫使军政大臣霍尔丹不得不考虑有效节约和机构重组，而并非扩张规模。在奥匈帝国，双轨制政体的喧嚣舆论实际上严重阻碍了君主在世纪之交发展军事的步伐，因为匈牙利议会中主张自治主义的集团通过减少匈牙利的税收和招募，使得联合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增加军事拨款的提议在无尽的立法斗争中消磨殆尽，正如奥匈帝国参谋长所言，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在“持续停滞”的状态下裹足不前。这就是为何在1912年，奥匈帝国仅仅花费了其国民净产值的2.6%来进行防御的一个原因。这一百分比要低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当然也远远低于其自身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俄国、法国和德国当年的比例数据分别为4.5%、4.0%以及3.8%）。

在法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德雷福斯案”摧毁了第三帝国的军事

力量与民事力量之间达成的共识，并将军队中的高层人物置于公开怀疑的风口浪尖上（这被视为教士与保守派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共和主义者和反教会干预政治的左派人士。紧随这些言论之后的是，连任3届的激进派政府寻求积极的“共和化”军事改革，尤其是在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1903~1905年）和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906~1909年）担任总理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越发严密，民事主义至上的部门壮大起来。尽管军事专家提出了意见，但兵役的年限还是从1905年3月开始由三年降到两年，目的在于将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几年中在政治上十分可疑的“禁卫军式的护卫队”转变成由后备军人组成“人民军队”，以担当战争时期的国家防御任务。

仅在战争打响前的几年，事情才开始向着军方的意愿发生转变。比俄国提前一些，法国的军队领袖于1911年被合法化，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正式走上和平时期承担军事计划的官方责任以及战争期间指挥主要作战部队的职位。为了筹措资金而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还在继续，但在1912~1914年，普恩加莱政府以及后来普恩加莱个人支持军方的态度，因为法国政策和舆论主导的复杂重组而得到加强，这为重整军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13年，在政策上恢复三年服兵役制已经可行，虽然遭到了财政部长路易–吕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的反对。克洛茨认为，对边防要塞的巩固会更划算且更有效。同样，在德国，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沮丧情绪使得军政大臣黑林根以及总参谋长毛奇痛下决心发展军队。利用他在帝国财政部的职位，阿道夫·韦穆特对昂贵的军费开支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但他却不得不在1912年3月辞职，因为他的政策已经无法获得政府的青睐了。韦穆特的财政紧缩时代宣告结束，而军事开支的倡导者逐渐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其海军对手。经过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状态之后，1913年7月3日的军费法案将德国的军费开支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我们将视线转回俄国。仍旧担任财政大臣并在彼得·斯托雷平被谋杀后接替其首相职位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发现，对苏霍姆利诺夫无休止的游说和遏制军务部的秘密谋划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913年春的一次重要的大臣级会晤中，两人之间的敌意达到极限：苏霍姆利诺夫以一份主要预算提案将科科夫佐夫打了个措手不及，与会的所有人都被提前告知了提案内容，除了科科夫佐夫本人。按照俄国的惯例，君主的支持对权力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在您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争执中，您总是正确的，”尼古拉二世于1912年10月对科科夫佐夫说，“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会支持苏霍姆利诺夫，不是因为我对您没信心，而是因为我不得不批准军事开支。”

资源的大规模转移是否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或至少是政治影响力的转移？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毫无疑问，政体中的民事控制最稳固的当属法国。1911年12月，当霞飞阐述他的新战略计划时，他将其聚焦在跨越德法边境的大规模攻势调度上，激进党总统约瑟夫·卡约简略地告知总参谋部，决策最终的责任在于民事组织。卡约多次指出，他们的职责仅仅在于在专业范围内为其政治主人出

谋划策。增加军事开支的变化以及对霞飞进攻调度的支持不是来自军方，而是那些政客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具有鹰派作风但本质上却强调民用主义的雷蒙·普恩加莱。

俄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沙皇在专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大臣以个人名义实行相对自治成为可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1909年上台时，圣彼得堡正爆发一场针对议会控制军队的争执。一组颇具影响力的代表坚决维护杜马对国防政策的监督作用。苏霍姆利诺夫则介入进来，破坏杜马的权利，以阻止“民用思想”渗入军事决策中，并保护沙皇的特权。也正是这一特权招致了公众的愤怒，但确保他能够保住自己的皇位。对皇室的支持使得这位军政大臣敢于起草一份安全政策，而这项政策与俄国对法国的官方承诺格格不入。

与满足法国的要求不同（即在动员的第一阶段采取对德国的迅速攻势），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重组将俄国的兵力调遣从与波兰的西部边界转移到俄国国内，其意义在于在单元作战力量和密集兵力之间应寻求更好的平衡，并打造一支能够被调遣至东部作战的军队。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西部边界可以欲擒故纵地拱手让与敌人，但俄国的军队可以进行大规模反击进攻。这项创新似乎并没有刻意迎合外务部门。法国军事专家起初对这项新计划表示十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法俄同盟中先发抑制德国的军事措施成为泡影。俄国人确实引起了法国的焦虑，但苏霍姆利诺夫拥有足够的独立权来设想和实施一项与法国之间的同盟（这也是俄国外交政策重心）格格不入的政策。

在沙皇的庇护下，苏霍姆利诺夫同样能够对科科夫佐夫的权威进行暗中破坏，不仅通过以军事预算的形式对其进行挑战，还包括在大臣会议中组建一个敌对分子集团。因此，这些举动为他提供了一个阐释他本人对俄国的安全形势的意见的舞台。1912年11月的第4周，即在一系列重要的会议结束后，苏霍姆利诺夫表态道，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越早发动战争，我们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认为，一场战争“对俄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奇怪且颇具蒙骗性的言论让谨慎的科科夫佐夫大为震惊。但苏霍姆利诺夫之所以如此狂言，是因为他取得了其他民事大臣的支持，比如鲁赫洛夫（Rukhlov）、尼古拉马克拉科夫（Nikolai Maklakov）、谢格洛维托夫（Shchglovit ov）以及最为重要、最有权势的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克里沃舍因担任农业大臣一职，同时也是沙皇的心腹。191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大臣会议中出现了“战争党派”，而这一部分人的头领便是苏霍姆利诺夫和克里沃舍因。

同样，在德国，体制内的“禁卫军”性质使得军队拥有一定自由。诸如总参谋长这样的关键角色自然能够时不时地对决策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候。遵从军事指挥官的命令是足够容易的，但明确他们在政府决策咨询中的地位则要相对隐晦一些，尤其在这样的情境下，例如俄国的大臣会议这样的决策组织一旦缺席，军事和民事官员们之间公开化的冲突则会变得没有必要。

理解军事与民事政策制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考察大使、大臣以及大使秘书的官方外交手段，及其与处于总参谋部和海军部监管下的军事和海军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对时事的观点时常与官方外交部门相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11年10月，德国驻伦敦的海军随员威廉·魏登曼（Wilhelm Widenmann）向柏林发出了一份报告。魏登曼在其中写道，英国的海军官员如今公开承认，英国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的几个月中“动员了其所有的舰队”。英国看起来“仅仅在等法国一声令下，便会向德国发动攻击”。更糟糕的是，新任第一海军大臣是“不讲道德、野心勃勃且不可信赖的煽动者”丘吉尔。因此，德国也必须武装到牙齿，以避免遭到无端的打击，这种防范心理和做派正如英国1807年将丹麦悉数驱逐一样。海军的军备重整十分必要，因为“英国人给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树立一个坚定的目标，并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去达成它”。这些报道传到了威廉二世那里，他高兴地进行了批注——“好”、“好的”、“太棒了”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这种行为背后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奇怪的，魏登曼确实汇报了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但他更隐晦的建议是要阻止柏林的总参谋部利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破坏海军的财政优势。

魏登曼报告的意义不只在于其内容或是德皇的反应，更在于它们引发的首相以及外务秘书的反响。贝特曼·霍尔维格对这种超越外交规范的恐吓行为感到震怒，他要求德国驻伦敦的大使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写一份报道反驳魏登曼的言论。梅特涅对魏登曼的言论做了相应的改动。1911年夏，“整个英国”确实“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这并不表示英国有先发制人的动机。准确地说，对许多年轻的海军军官来说，战争“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但这种态度是其他国家的军事官员所共有的。梅特涅认为，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由陆军或海军军官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军政大臣决定的，同时也不是由第一海军大臣决定的，而是一个由相关大臣组成的内阁决定的。梅特涅称：“正是在这里，舰队和部队才是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才是终结一切的手段，而不是政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如何，英国都想将夏天出现的危机局势置于脑后。因此，与其将所有的一切都置于军备的篮子中，德国政府不如寻求与伦敦关系的改善。

而这次德皇显然不高兴了：“不对”、“胡言”、“不可理喻的废话”、“胆小鬼”，这些潦草写就的不快被写到了文件的边缘。“我不同意大使的观点！海军随员才是对的！”两份内容冲突的报道中很奇怪的一点是，双方都对政策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德皇以魏登曼的报道作为借口，要求一部新的海军法，而霍尔维维格则接受梅特涅的意见，继续采取缓和的措施。正如一位高级军官之后所言，在德国，“德皇制定一种政策，首相则有他自己的另一套想法，而总参谋部却一直在提出自己的意见”。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主议会制的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民事决策者发号施令）以及体制更为专制的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中，尽管有不同程度的议会形式，但军方总能够借助与君主的关系，以一种平等甚至更高的姿态与其民事对手抗衡）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但真实情况比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复杂

得多。在法国，1911年之后的军事重组使得总参谋长霞飞的权力大为集中，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他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甚至超过了他德国的贵族军事主义者同人赫尔穆特·冯·毛奇，甚至法国军队的新规定几乎使军队实现了完全的自治，尽管与德国的军队不同，这种自治仍然需要建立在相关民事部长的合作和支持的基础上。

同样，在英国，与法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协约关系是军方促成的，而不是通过民事协商和共识实现的。我们已经目睹在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英国军方的关键人物是如何急切地想为法国提供帮助。我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军事指挥者是否将自己真正视为顺从的政治仆人。威尔逊并不是在简单地循章办事，关于未来的欧陆大战中英国军方要扮演的角色，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断呼吁一场军事冲突。正如他的其他同人，威尔逊轻视民事政治家，认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爱德华·格雷爵士是一个“愚昧、自负而无力的人，他无法在一个比葡萄牙面积还要大的国家中胜任外交大臣”。至于自由党内阁中其余的人，不过是“肮脏、愚蠢的卑鄙小人”。军方对政府的整体印象是“理论上的胜者，实践中的矮子”。出于政治上的保守性，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所轻视的自由党政治领导人，他通过亲密的伙伴尼科尔森爵士从外交部获得信息，然后将其传达给保守党的同僚们。在亨利·威尔逊将军眼中，奥匈帝国的康拉德和塞尔维亚的“阿匹斯”在英国都有“翻版”。与法国之间的军事对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施加于民事领导人的压力，还在于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法国并肩同德国作战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协约国的军事化揭示了英国军事计划以及官方外交立场之间不断深化的矛盾——后者总体来说仍然排斥一切与“结盟”有关的字眼。

在法国与俄国的盟友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法国军方指挥官们破坏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派遣计划所做的努力，导致双方之间的军事规划产生了进一步的相互依赖性，即该过程由军事部门所控制，但受到民事领导人的制裁。但是就算得到民事领导人的批准，他们也无法改变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当法国在法俄年度联合参谋会议上指出，俄国挥霍了太多借贷用于其在西部的铁路修建时，其结果却导致圣彼得堡的权力从科科夫佐夫转移到了他在俄国军方的对手那里。或许当科科夫佐夫指摘军方利用联盟关系加强他们在俄国政治体系中的分量时，他的想法是对的。

相应地，俄国对法国盟友的要求对法国国内政策也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1914年，当俄国人发出警告，称任何减少国家兵役年限的做法都将破坏法国作为盟友的价值时，他们迫使国家领导人支持一项措施（即新近采取的“三年法令”），该措施与法国的选民产生了分歧。就连这项行动计划中最为技术性的细节都为政治矛盾爆发增加了火药味。法国的一小部分关键决策者费尽千辛万苦，向那些在政治背景下可能会进行抵制的人（主要是激进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隐瞒这些策略性的联盟承诺的程度和本质。当普恩加莱与军方于1914年年初共同向致力于防御措施的内阁隐瞒法国战略的攻击性本质时，对自由裁量权的需要变得尤

其强烈。普恩加莱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过于保密，以至于他和霞飞甚至向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都隐瞒了新计划的细节。直到1914年春，建立法俄军事战略合作的承诺成为潜在的分歧，因为它使得法国不得不坚持一项连公共合法性都没有保障的军事计划。普恩加莱的斡旋行动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1914年夏爆发的战争让这件事无疾而终了。

因此，我们可见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方面，积极地采取宽容手段的想法不得不退让于本质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军事领导；另一方面，禁卫军式的军队在享受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政客们的遏制、操纵。毛奇要求进行防范性战争的建议被德皇以及民事政治领导人阻挠，正如康拉德同样被皇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干预一样。科科夫佐夫也曾一度成功地遏制了军政大臣更激进的想法。1913年年底，当苏霍姆利诺夫试图将作为总统和财政大臣的科科夫佐夫完全排除在军事开支的商讨之外时，大臣会议意识到这位专横的军政大臣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英国和法国，军事战略最终还是从属于民事政治家领导人的政治和政策的。

虽然如此，军事和民事之间的摩擦和实力均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各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的影响继续成为列强之间不明朗关系的原因。欧洲所有的列强都做出这样的假定：在各自政府中都存在鹰派军事团体，并且它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评估这些组织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在1913年2月（当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与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的谈话中，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认为从对方在圣彼得堡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充满着和平的愿景。但他是否能够强硬到抵抗来自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他尚武的规划在俄国军事情报部人尽皆知）的压力呢？即便贝希托尔德在当下仍然受到控制，那么权力会不会在二元君主制失效的情况下滑入军方之手，使得他们寻求更激进的解决方式？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苏霍姆利诺夫和科科夫佐夫之间的权力之争的萨佐诺夫发现，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让俄国处于与奥匈帝国开战的边缘，他最清楚军事和民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何等诡谲。在一篇关于1914年3月圣彼得堡氛围的精妙分析中，普塔莱斯觉察到主战派和和平派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正如缺乏既有意愿又有影响力的人，且能将俄国拖入一场战争冒险的人一样，同样缺乏的还有其地位和影响力都足够强劲地唤起人们的自信，从而让俄国在若干年内走上和平之路的人。"科科夫佐夫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则不甚乐观。对于他来说，沙皇似乎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军事圈子"中，而该圈子的人的"简单化观点"正"汇集着越来越多的力量"。

民事政治家并不乐意利用战争派的存在来强调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利用外部优势阐释这种关系的本质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1912年霍尔丹主政时期，德国人希望英国能够相信，柏林政府分裂出了鹰派和鸽派两大阵营，且英国的让步能够强化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地位，从而与柏林的主战派抗衡。1914年5月，他们又故技重演，通过一系列"具

有鼓舞性”的媒体文章声称，英国和俄国海军对话的持续只会加强军方的势力，而打击温和的政治领导人。正如政府间沟通的其他领域，其各自体系中军事和民事关系的变易性被认知错误虚假陈述扩大了。

媒体与舆论

1909年3月，时任德国首相比洛在德国议会上宣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冲突并不是都由王室倾轧或大臣们的阴谋，而是舆论激扬的煽动，这种情绪横扫媒体和议会。”比洛的断言是否正确？形成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否超越了首相们和大臣们，而掌握在游说集团和政治刊物手中？

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更广泛的关于国际关系事务的公开讨论迅速地扩大着范围。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主义媒体，它们致力于成为公众情感和游说政府的渠道。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政治批判实质上和风格上的转变，这些批判变得更加蛊惑人心，追求一种传播更广、更极端的目的，因此政府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指控中，即他们在追求民族目标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肯定。同样，在意大利，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更果断和苛求的政治舆论已经形成：在极端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以及煽动者乔瓦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的影响下，意大利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民族者联盟于1910年成立。通过其议会代表和报纸，该政党要求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岸所管辖的意大利人居住地区，并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的情况下诉诸战争。到1911年，就连都灵和罗马相对温和的媒体都在雇用信奉民族主义的记者。在这里，甚至出现了比德国还严重的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俄国也是如此，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出现了一大批刊物，到1913年，莫斯科最畅销的日报日销量达到了80万份。尽管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但统治者还是在外事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舆论自由（只要它们没有直接批评沙皇及其大臣即可），并且大部分重要报刊要求退休的外交官讲述其外交政策。此外，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的舆论变得逐渐独断（尤其在巴尔干问题上）、逐渐与政府背道而驰。同样，在英国，迅速发展的报刊呈献给读者大量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安全危机和战争狂热。在布尔战争期间，《每日邮报》日销售量达百万份；1907年，其平均销售量仍在85万~90万份。

因此，君主、部长级高级官员有足够的理由对媒体严加管控。在议会体系中，积极的宣传可以被转化为得票，而消极的报道则可能酝酿的是反对的声音。在更为专制的体制中，公众支持成为民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替代品。有些君主和政客积极地关注媒体，每天花费数小时研读报道。威廉二世就是一个例子，但他对公众批评的敏感本质上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对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说：“如果我们在

外交政策上失去了对公众舆论的信心，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任何政体都会承认媒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确实因此而受到钳制了吗？

在处理公众意见时会出现矛盾，大臣、军官和君主相信（甚至有时候还会惧怕）媒体是公众情绪和态度的镜子和发泄渠道。所有的外交大臣都清楚当自己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国内敌对媒体时会发生什么。1911年，格雷就是自由党媒体的把柄；基德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媒体的攻击；德皇因为多个原因而遭到嘲笑，这些原因包括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胆怯和优柔寡断。那些被认为向德国示好的法国政治家会被群起而攻之，正如约瑟夫·卡约所经历的。1914年1月，萨佐诺夫和他的外交部因“怯懦而没有主意”而被俄国民族主义媒体斥责。对敌对媒体和公众的畏惧成为许多外交大臣秘密采取行动的一个原因。正如查尔斯·哈丁写给尼科尔森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爱德华·格雷与俄国结好的政策很难被英国公众接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隐瞒真相并寻找托词，来讨好充满反对声音的公众舆论……”在圣彼得堡，战前的几年中，人们一直记得公众风波是如何摧毁伊兹沃尔斯基的。

对于媒体，许多政治家进行了充满智慧和不尽相同的观察。他们认为很多风波都是爆炸性的——这些短期的煽动和狂暴不久后就会绝尘而去。他们明白，公众情感由相反的刺激产生，对政府的要求也很少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舆论通常是“放肆的言论和畏缩的行动”的结合体。公众意见是狂躁而容易引起恐慌的，但十分不稳定。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媒体建立起的仇英心理是如何在爱德华七世于1903年访问巴黎时得到消除的：当国王和他的随同共同驾车离开火车站驶向爱丽舍宫时，街上的人都在呼喊着不和谐的话语，更不用提那些充满敌意的横幅和侮辱性的漫画了。然而就在几天后，国王通过讨喜的演讲和颇具魅力的评论赢得了东道主的赞赏，媒体的口吻也随之改变。在塞尔维亚，因为奥匈帝国于1906年封锁了一起与保加利亚的海关联盟而煽动起的一波民族冲突，因为塞尔维亚公民意识到奥匈帝国现行的商业条约实际上比塞尔维亚与索非亚所结成的联盟更有利于本国的消费者而得到化解。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的公众情绪出现了强烈的波动；9月初，柏林的和平示威吸引了10万民众，然而就在几周之后，气氛得到缓解，正如社会民主党的耶拿议会决定所反映的，人们又拒绝在发生战争时举行一场大罢工。1914年的春夏之际，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记录了出现在塞尔维亚媒体报道中的关于与奥匈帝国关系的前后矛盾之处：3月和4月，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开展活动抵制维也纳，但到了6月的第一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双方的情绪却突然想不到地克制住了。

至于那些全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能够听到的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声音，大多数都仅得到了小范围的极端主义者的支持。那些最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游说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其领导被持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所破坏——泛日耳曼联盟因为派系摩擦最终解体，就连规模稍大且稍微温和的海军联盟也在1905~1908年遭受着支持政府的派别和反

对政府的派别进行的“内战”。俄国人民同盟——一个于1906年8月建立的沙文主义、反闪族人、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全国拥有900多家分支，却于1908～1909年土崩瓦解，原因是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讧，以至于分裂为一批更小的、相互敌视的团体。

与媒体有直接关系的精英所制造的舆论究竟是如何与大众的主流态度相关联的，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认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沙文主义运动使得报纸销量走高，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深？1912年12月，德国在莫斯科的总领事警告称，俄国“主战派”的敌意和恐德心态完全是巨大的误解，误解了俄国的还有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斯拉夫主义媒体，因为它们“仅与俄国现实生活的趋势有着最为松散的联系”。德国的媒体报道的问题在于，其报道都是由那些缺乏在俄国生活的经验且与精英阶层鲜有接触的记者完成的。1913年5月，驻巴黎的比利时大臣纪尧姆认为法国有着“某种沙文主义”的倾向。它不仅存在于民族主义刊物，还充斥于剧院、评论和咖啡馆的演出中，各种各样的表演都表现出这种“呈现出亢奋情绪”的沙文主义。但他还加了一句：“真正居住在法国的人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症状……”

除了英国，其他的各国政府都设置了新闻部，其目的不仅在于监督，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布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似乎觉得并没有必要对公众说明其政策的是非曲直，因此并没有成立官方机构来保障媒介的影响力；许多主流媒体都享受着丰厚的薪酬，但这些资金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更多地来自私人或是党派资源。当然，这并不阻碍白厅官员和著名记者之间关系的发展。意大利的情况却相反。1911～1914年在位的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定期支付给至少30位记者报酬，以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政策的文章。俄国外交部于1906年成立了新闻部，自1910年起，萨佐诺夫定期组织在外交部以茶会友，对方是最为重要的编辑和杜马领导人。俄国外交官与其支持派报刊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位记者在1911年称，圣彼得堡的外交部“似乎都成了《新时代》（*Novoye Vremya*）报纸的分支机构了”。经常有人见到报刊编辑叶戈罗夫（Jegorov）在外交大臣的新闻办公室里出现，该办公室的负责人涅利多夫（Nelidov）自己也曾当过记者，他也频频拜访报刊的编辑部门。在法国，外交官和记者的关系尤其亲密：第三共和国将近一半的外交部长都曾经当过作家或记者，并且外交部长们和媒体之间“沟通的渠道一直保持通畅”。1912年12月，当普恩加莱任职法国总理时，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刊物，以此在法国政治精英群体中宣传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国内半官方性质的报纸以及“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来检测舆论情况，是欧洲外交常见的手段。这些文章在独立报刊的自由言论的乔装下诞生，但其效果却首先取决于读者的怀疑程度，即它们是否出于权力的要求。例如，塞尔维亚人普遍认为，Samoprava这家报纸代表的是政府的观点；《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被认为是德国外交部在俄国的官方机构；在俄国，政府通过其半官方性质的杂志Rossiya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同样也时不时地在更为受欢迎的诸如《新

时代》的刊物中进行鼓舞人心的宣传。像德国一样，法国外交部从一个秘密基金向记者支付现金报酬，并与一些报刊保持密切关系，此外还利用一些并不是特别严肃的刊物来设置自己的“政治风向标”。

像这样的干预有可能会出现失误。一旦某个特别的刊物经常刊登具有某种导向性的文章，该刊物就会被认为是轻浮的、具有偏见的、充满谬误的，其被认为表达的是政府的意向。比如，在1913年2月，当一家法国报刊刊登了一篇匿名的且非授权的信息来源、揭露了政府最近关于军备重组的商讨细节时，许多官员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澄清。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于1908年致力于“让舆论和媒体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个新闻：俄国已经允许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他完全低估了公众的反应程度。1914年，尽管《新时代》之前与外交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反而倒戈萨佐诺夫，指控他在维护俄国利益时过于畏首畏尾，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媒体受到了来自军务部的压力。1909年弗里德永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在背后支持一次媒体宣传，这次宣传以针对一些著名的塞尔维亚政客叛国的虚假言论为基础，但他虚假的胜利却在之后一系列媒体和议会的批判风暴中折戟，这些批判针对的是1912年冬的普洛哈斯卡事件，具体内容是一位奥匈帝国领事遭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虐待，而该消息最后被证明是虚假的。

官方对媒介的控制同样也会越出国界。早在1905年，俄国人向巴黎的媒体支付了8 000英镑，希望能够在法国提供贷款一事上得到公众的支持。法国政府也提供给意大利的挺法派媒体津贴（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对西班牙媒体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人也斥巨资贿赂法国的记者；德国人会给予圣彼得堡那些友好的记者们一定奖励，同时用金钱买通伦敦的报刊编辑（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为的是让他们多写一些有利于德国的东西。

那些具有导向性的文章也可以是以国外政府的视角来写的。1905年摩洛哥危机期间，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利用稍作伪装的媒体文章，泄露英国军事计划的细节，以此恐吓德国人。这样，这些媒体成为可予以否认的、次于外交的国际沟通方式，它能在不会让任何人束缚在特定承诺的前提下，取得一种威吓或激励的效果。1912年2月，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路易（Georges Louis）翻译报道了一篇《新时代》上的文章，在附信中他表示，这篇文章“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俄国军事圈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导向性文章使得体制内分散的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军务部）在不正式牵涉政府的情况下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部门要求媒体按照不同的方向行事，例如1914年3月，当《证券交易报》（*Birzheviia edomosti*）发表文章（该文章被认为是受到苏霍姆利诺夫“指使”）宣称俄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并且已经“抛弃”了纯粹防御战略的观点。萨佐诺夫当即在半官方的Rossiya媒体上发表了调停文章进行反击。这是一个二元控制的经典案例：苏霍姆利诺夫旨在向法国示意，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且决定履行协约职责，而萨佐诺夫的回应则意在针对德国（或许还有英国）外交部。

在同一时间发表在《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的一篇文章几乎是由德国的外交部一手策划的，该文章根据俄国军事开支的高涨推测圣彼得堡具有侵略意图，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俄方做出明确的表态。在欧洲各国争取影响力的地方，用贿赂媒体来交朋友或是揭发对方的阴谋已经是老生常谈的手段了。德国人担心英国在俄国媒介的贿赂效果过于明显，且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时常抱怨法语媒体的话语权过于强势，收受贿赂的主编“极尽能事地煽动针对我们的言论”。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成了外交政策可利用的工具，而非其决定性因素。但这并没有阻止政策制定者将媒体真心地视为舆论的风向标。1912年春，朱尔·康邦担心法国媒体中的沙文主义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危险：“我希望这些以制造和传播舆论为职业的法国人能够克制自己，不要因为制造效果而玩火，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6个月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部分媒体的泛斯拉夫主义高涨，俄国驻柏林大使表示了担忧（至少表明了这种担忧）：“这个国家民众的心智状况可能会左右其政府的行动。”

那些认为本国政府能够抵御国内舆论对政策制定影响的大臣和外交官，却在担心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德国军事领导人担心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复兴的呼声可能会逼迫其温顺的政府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相反，在法国的政策商讨中，他们同样时刻担心本质上提倡和平的德国领导人将会因为国内沙文主义舆论的影响，对其邻居采取打击。特别是俄国政府，他们被普遍认为最容易受到来自公共领域压力，尤其是当涉及巴尔干问题时，而“七月危机”时俄国人的表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但俄国人认为议会制的西方政府同样容易受公众压力的左右，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化体制，比如英国就承认（正如格雷一如既往的行为）“危机时刻，英国政府的行动取决于英国舆论的方向”。政客们经常赞同这种说法：他们的行为受到国内舆论的限制。比如，1908～1909年，法国警告俄国人不要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战争，原因是法国的公众对该地区并不感兴趣；1911年，伊兹沃尔斯基进行了还击，他敦促巴黎与德国磋商，原因是“俄国国内舆论无法接受在摩洛哥问题上发动战争”。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于1912年11月声称，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别无选择，只能以国家的名义寻求一种民族统一政策。如果他试图调和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那么贝尔格莱德的“主战派”将会把他扫地出门，并让另外一个自己人接替他的职位；萨佐诺夫则认为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好战的公众姿态是因为塞尔维亚国内“有一些过头”的舆论作祟。

1912年11月，萨佐诺夫对德国大使普塔莱斯说，因为考虑到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抵御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权利的侵犯。他运用同样的借口说服罗马尼亚人，不要在1913年1月与保加利亚发生冲突：“要谨慎！如果你们与保加利亚开战，我将无法抵御铺天盖地的舆论。”实际上，萨佐诺夫并没有太拿记者和编辑们当回事儿，并且他相信他比那些媒体更加了解俄国的舆论。在必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潮水般的媒体评论，并始终利用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来说服其他国家的政客，他处

在压力之下，并需要采取措施。而读者们通常能够看穿这种伎俩：当德皇在1908～1909年读到这样的报告，称支持泛斯拉夫主义的舆论可能迫使俄国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行动时，他当即在边上写下“恐吓”的字样。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普遍假设国外的政府因压力而不得不与其舆论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媒体的报道是外交内容所必需的。成捆的剪报和翻译文件出现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

因此，所有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舆论的努力强化了媒体监督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是舆论的关键，媒体至少也会成为政府的观点和意图表达的关键。因此，格雷将1911年9月阿加迪尔的反英媒体运动视为德国政府的策略性操控，目的在于在即将到来的帝国选举中动员更多的人支持海军法案；奥匈帝国大使则指责俄国外交大臣在波斯尼亚危机后鼓励媒体，对俄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报道。外交官们经常认真研读报刊，寻找那些具有导向性的、可能表达出各部门主要观点的报道。但自从大多数政府和一系列部门牵扯上关系之后，人们就很难从一篇具体文章中辨别其是否被官方操控。比如1910年5月，一家法国报纸发表文章，激烈抨击最近俄国的一项部队派遣计划，俄国外交部则怀疑该文章是官方授权而为之（在该案例中，这一假设却很不幸是误会），并向巴黎提出抗议。德国驻巴黎大使在一封信中写道，坚持认为法国媒体的观点与外交部或是政府的观点如出一辙的想法是一个误会，该报纸的编辑安德烈·塔迪厄（Andre　Tardieu）经常因为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非主流言论而与当局发生纠纷。1914年1月，比利时驻巴黎的大使警告其政府，塔迪厄是该报纸的政治领导核心，而这一集团经常受到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的指使。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疑虑不仅意味着使馆官员在搜罗媒体信息时不得不提高警惕，同时，针对外国政府的敌对言论可能会在一定场合下造成分歧，导致双方的外交官员通过自己幕后的媒体相互攻讦，而这一过程则可能会点燃公众情绪，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和德国的外交部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之间不断夸大对方政府控制舆论的程度。

媒体的矛盾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不牵扯政府的参与。各个政府都很清楚，沙文主义报刊的编辑们的不和将会升级，以至于威胁到国际关系氛围。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偕查尔斯·哈丁）在雷瓦尔举行了一次会谈，沙皇对哈丁说，俄国媒体的“自由”已经为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制造了“巨大的尴尬”，因为“俄国每一个遥远的省城所发生的每件事，诸如地震或是雷击，都在第一时间被归咎于德国，因为俄国媒体所发出的不友好声音，人们对此产生很大的不满，抱怨我和我的政府”。但是沙皇也承认，他无力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与媒体进行官方沟通，但“这种影响虽然普遍却收效甚微”。他十分希望“媒体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事务，而不是一味地关注国外的动态”。

1896～1911年（1896年，英国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表现出愤怒的情绪；1911年，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又谈崩），英国和德国之间曾出现多次媒体战争。1906～1907年，两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高级记者代表团的交流进行一场“媒体裁军”，但都失败了。媒体战争之所以爆

发，是因为各国的报刊时常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支持其他国家报刊的态度和立场，整篇文章被原封不动地采用或是进行稍微修改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俄国在柏林的全权军事代表塔季谢夫（Tatishchev）于1913年2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称，《新时代》的泛斯拉夫主义文章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对方的媒体保持高度警惕并监视——这个问题对1914年的“七月危机”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欧洲的媒体是否在1914年之前越发充斥尚武情绪仍然值得商榷。最近关于德国报刊的研究认为，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在一系列战前重大危机期间（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巴尔干地区的危机等）对德国媒体报道的研究显示，在外交途径中出现了对国际关系越发极端化的理解以及自信心的丧失。但期间也出现了一段缄默期，如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媒体战争在1912年戛然而止，战争爆发的前两年中，呈现出了“出奇的和谐与和平”。就连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1911年出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常被当作德国舆论中膨胀的主战氛围的案例而被引用，都在他的那本极端激进好战的书中开篇便大费笔墨地为其同胞的“和平主义”表示惋惜。此外，沙文主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英国，反俄情绪仍然是战前最后几年中呼声最高的舆论，虽然双方在1907年便签订了协约。1911～1912年的冬天，当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在善后时，自由党成员指控格雷以牺牲与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代价，寻求与俄国之间过度的友好关系。1912年1月召开的公开会议要求英国和德国达成共识，而这些会议的召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俄国的敌视，这种敌对观点认为俄国的诡计会在帝国周边地区的诸多事务上威胁英国的利益。

政治家们经常提及（抑或抱怨）政府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无论是公共观点还是出版物所持有的观点都存在于政府之外，就像是压迫在部长办公室窗户玻璃外的迷雾，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将它们排除在自己的行动领域之外。提到“观点”，它们大多数意味着对于决策者及政策的公开支持或反对。但比观点更深入的是一种被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称为“心态”的东西，它是“无法言说的假设”的产物，形成着政治家、立法者、公众人物等人的态度和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整个欧洲都在深化对战争的心理准备。这并不是出于对其他国家采取血腥暴力的动机，而是面对战争可能性的“防御性爱国主义”，它并不一定是欢迎战争的。这种观点被这样的信仰不断加深：冲突是国际政治的“自然”特征。1910年，英法协约关系的推崇者、爱德华七世的挚友和顾问伊舍子爵写道：“持久的和平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两年后，他对剑桥的大学生听众说，不要低估“武装冲突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并警示他们，轻视冲突将会“展现出无力的精神和枯竭的想象力”。牛津大学军事历史学院的教授亨利·斯宾塞·威尔金森（Henry Spenser Wilkinsen）在他的就职演讲中称，战争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模式”。这种对战争必然性的宿命论式的接受可见于一系列分散的论点和态度中：有些人根据达尔文或是赫胥黎的理论认为，就英国和德国的能力

和野心来看，它们注定会发生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种族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战争是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自然特征，肇始于其精密而发达的武器装备；还有一些人则鼓吹战争具有治疗性，是“对社会有益的，且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英国和德国对于类似观念接受度的强化是一种“具有牺牲性质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被报纸和书籍（尤其是那些面向男中学生的读物）大肆渲染，战争和冲突都被描述为积极的事物。新西兰一位崇尚武力的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并由国民兵役联盟出版，该册子让男孩们有这样的感触：他们“身处所有他们遇到的女性（母亲、姐妹、女友）和一场不可思议的外来入侵的恶行之间，他们需抗击后者，保卫前者”。就连1908年开始的童子军运动都在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军事特征，这些意识在战前的一段时间就被强化给孩子们了”。在俄国，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对军事改革的渴望催生了一股“军事复兴”的潮流：1910年，572本关于军事主题的作品被出版。其中大部分并非主战的，而是关于俄国的军事改革应当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性改变过程发生联系的讨论，而这里的“社会性改变”是将社会引向一场大战所需要的牺牲的进路。

这些现象出现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它们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立法机构为何愿意接受战前阶段由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在剧烈的争执之后，法国下议院支持的新三年兵役法反映了公共领域中“战争威望”的重塑，这种观念在“德雷福斯案”（即提倡强烈的反军事民族精神）之后迅速被提倡，尽管我们同时不能忘记，激进党领袖之所以支持这项法案，部分原因是他们第一次可以享受到累进财产税的财政政策。同样，在德国，霍尔维格在1913年通过的大规模军事法案上得到了中右派的支持，而在资助手段的其他议案上，则取得了和中左翼人士一样的意见，尽管其原因只是他想通过向有产阶级征收一项新税来筹措部分资金。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高度作战准备的观点与其他的社会—政治诱因相互掺杂，而后者的目的是确保通过议会为巨额账单赢得支持。与之相反，在俄国，政治精英对装备的热衷在1908年高涨，以至于杜马的拨款速度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考量如何进行处理的速度还快。需要注意的是，是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集团而非大臣推动了俄国的军事扩张运动。同样，柏林的立法也体现了防御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普遍性：1902年，只有3名国会议员支持国家兵役联盟，而191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80人。

媒体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决策者提供需要考量的因素。前者从不能控制后者，而后者也从未控制得了前者。我们更应该谈到的是公众舆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其中，决策者时不时地寻求引导舆论，使之走向同一种声音，但他们也只不过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自治性、保护决策过程的同一性而已。另外，政治家不仅将国外媒体视为舆论的风向标，而且把它们当作官方观点和意图的指南，这意味着对言论发起者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将国家之间的交流复杂化了。更基础且更难以衡量的是“心态”的转变：它并非在沙文主义者的强硬和对抗中诞生，而是根植于一种广为接受的对战争的心理准

备，人们设想它是国际关系本质中不容置疑的一点。这种情绪的积累可见于1914年“七月危机”，它不是以激进的纲领性声明来体现的，而是在民事领导者们意味深长的缄默中显现的。这些民事领导者或许希望自己能够指出，列强之间的战争将会是所有事情中最糟糕的。

权力的风水轮流转

如果我们假设战前欧洲各大权力集团处在一个紧密的执行机构的安排和管理下，以团结和合作为目的，那么重建它们之间的秩序仍然是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因为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能被充分认识，除非考虑到所有其他国家。但1903~1914年，整个欧洲的现实情况甚至比这种“国际”模式还要复杂得多。君主的混乱干涉、军事与民事之间含混不清的关系、关键政治家之间对抗性的较量、政治体系中内阁的不团结，加之大众媒体对间歇性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安全问题的煽动和批判，使得这段时间里的国际关系变得空前不确定。决策的摇摆和多元的意图不仅给历史学家制造了难题，还为战前几年政治家对国际环境的分析造成障碍。

但我们也不能对此进行过分的观察。所有复杂的政治集团（甚至包括独裁主义者）都容易遭到内部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困扰。关于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的文学作品花费大量篇幅描述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在关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一项杰出的研究中，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认为当约翰逊以及肯尼迪两位总统对发动战争犹豫不决且国务院的大部分人都反对干预时，规模更小却更为机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强烈倡导发动战争，他们越过国会的监督，限制了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选择范围，直到战争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欧洲在“一战”发生之前的情形在一方面与之具有天壤之别。从牵扯在内的所有紧张关系来看，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责任明确、高度集中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权最终毫无疑问地落在了总统手中。而战前的欧洲则不然，人们反复质疑格雷是否有权力在不咨询内阁或是议会的前提下自作主张。诚然，这些质疑施加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格雷无法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法国来说，这个问题则更加模糊，外交部、内阁以及总统之间仍然没有达到观点上的平衡，甚至连老道而果敢的普恩加莱都在1914年春面临着别人要将他排挤出决策过程的压力。在奥匈帝国（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在不同政治精英团体组成的蜂巢结构上来回游走，它的停留取决于谁能够形成更有效和果断的联盟。在这些例子中（包括德国），“至高无上”的皇权并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被体制内的权力关系搞得模糊不清。

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这并不是两大相互较量的超级大国伸张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不同势力之间在相对不了解彼此意图的情况下展开持

续而急切交往的过程，这一过程缺乏自信和信任（甚至在联盟中也是如此），相反，充满过多的敌对和偏执。各个国家内部权力的流动性及其外化在不同国家之间，加剧了群雄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许外交部门中的异议和雄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它们的质疑和反对或许会被一个更有秩序的政策环境所压制。但风险也的确是大于益处的：在充满潜在冲突关系的环境中，当双方的鹰派都占据了命令过程的主导方面时（正如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及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切），快速而出其不意的事态升级将会是唯一结果。

[7] 赫尔穆特·冯·毛奇：本书中所提及的毛奇史称“小毛奇”。不再特别标注。——编者注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一战”在开战之前，其实就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为什么这样说呢？与奥斯曼帝国毗邻的东南欧的冲突和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的体系时常进行自我调适，以维持整个大陆的和平，但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这一原则发生了转变。1911年秋，意大利发动战争，试图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非洲的一个省，引发了一系列在巴尔干地区针对奥斯曼领土的投机取巧的侵袭。地缘政治达到平衡的体系遏制了地区间的冲突，但这种平衡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经历过1912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匈帝国在东南欧地区面临一个更具有威胁性的新局面，而奥斯曼帝国的后撤则对俄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战略性要求，并且这些问题是他们无法忽视的。两大洲际联盟体在这一动荡地区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在这个过程中，巴尔干舞台上上演的矛盾冲突与欧洲体系的地缘政治紧密相连，并不断使得事态升级，最终在5周之后，也就是1914年夏，扰乱了整个大陆。

空袭利比亚

1912年1月5日一大早，住在利比亚沙漠一处帐篷里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阿博特（George Frederick Abbott）就被喊叫声和枪声惊醒，他赶忙跑到阳光明媚的帐篷外，发现营地旁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士兵正在盯着空中的什么东西——那是一架飞在约600米高空的意大利单翼机，阳光照射在机翼上，熠熠生辉。那架飞机完全不顾来自营地的射击，优雅地继续驶向西南部——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已经有四个月之久。作为英国观察员，阿博特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目的是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他写道，阿拉伯人“除了开枪之外”，对飞机丝毫不热衷，“他们认为新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对此感到奇怪”。这架飞机在一天后又飞了回来，向营地空投了大量的宣传单，这些纸单在空中飘然而下，就像“许多人造的雪花片”。阿博特回忆，那些阿拉伯人“停止射击，弯下腰，迫不及待地捡起传单，希望这些纸片会是钞票”。

阿博特的那些土耳其兄弟十分幸运，因为这些从天而降的只是意大利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投下来的宣传单而已。意大利军队和奥斯曼方面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利比亚战争的主要行动开展之前，意大利的飞机就做足了侦查工作，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和实力，因此意大利人能够通过野战炮兵连或者海上装甲力量对对手予以打击。

同时这也是第一场进行空中轰炸的战争。1912年2月，在赞祖尔绿洲和加加莱仕之间的黎波里东南部撤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了意大利P3飞艇的轰炸，溃不成军。该飞艇能够携带250枚烈性炸药制成的炸弹。飞艇扔下的炸弹数量很少，尽管机上的人已经尽全力了，飞行员不仅要驾驶飞机，而且还要拿起放在膝盖间的炸弹，并在瞄准地面敌军之前腾出手来插入导火线。

尽管不是什么最新的科技，但军事探照灯（皇家海军早在1882年就使用探照灯来对付亚历山大港的埃及军队）的出现也可以算作当时另一项高科技武器，且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杰出的运用。比起飞机和飞艇，它甚至具有更强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探照灯的使用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发动夜袭，或至少让对方在夜袭时付出更惨重的伤亡代价。一位英国观察家欧内斯特·贝内特（Ernest Bennett）回忆道，他和一小撮阿拉伯士兵沿着海岸的一条小径摸黑回到营地时，他们突然被意大利巡逻兵的探照灯发现了："这些可怜的阿拉伯人在灯光照耀下的轮廓让我感到黯然神伤。探照灯、大炮、战舰、飞机，这些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破坏的一系列战争开始于非洲，而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掀开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势力进行打击的序幕。不同于埃及（当时属于英国）或摩洛哥（在法国的有效控制下），利比亚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中的三大综合省。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对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而言，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最后领地的毫无缘由的进犯成为一次"破冰之举"。多年以前，人们曾就形成联盟、为逐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势力举行过会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直没有突破。只有在意大利的侵犯行为之后，巴尔干国家才有胆量举起武器。当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前政治首领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ovic）192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认为意大利进攻的黎波里成为后续战争的肇始："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第一次进犯的演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意大利就一直强调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权益。1902年夏，根据《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的条款，罗马和巴黎私下达成共识，在领土重新分配的问题上，法国的目的是摩洛哥，而意大利则要控制利比亚。这项共识确保了与曾是北非问题上的劲敌的意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1902年3月，英国方面传来消息称，英国承认"利比亚局势的任何变动都与意大利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保证作为绥靖政策，旨在从意大利入手撼动三方联盟——其最不可靠的一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国王于1909年制定的《拉冈尼基协定》。在该协定中，俄国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特殊权利，以此换取意大利支持俄国自由通行于土耳其海峡的权益。

向那些持激进政治观点的意大利民众宣扬侵略和吞并的政策并不困难。与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正在高歌猛进，在他们的记忆中，"罗马非洲"时期的利比亚就是罗马帝国的粮仓，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处于殖民地的中心位置。1908年，位于罗马的殖民办公室扩大了面积，同时升级为殖民地事务中央机构，这标志着政府内部对非洲殖民地问题

越发重视。自1909年以后，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在民族主义机构L’IDEA Nazionale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号召对利比亚采取行动；1911年春，他公开要求入侵并吞并对方。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也普遍认为，意大利需要找到一片物产丰富的土地，来安置涌出的移民。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尽管他们倾向于用“经济需求”这种措辞对此进行掩饰。

然而直到1911年夏，意大利领导人仍然严格地恪守着这个古老国家的传统——意大利不能挑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1911年夏，首相乔瓦尼·乔利蒂仍然坚定地拒绝针对君士坦丁堡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和呼声（如在一系列关于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地区利益的问题上），而法国人对摩洛哥问题的干涉则改变了这种局面。意大利外交部相信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从利比亚那里得到补偿。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高级官员指出，法国在地中海局势中表现出的“激进的改良”姿态打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赶在舆论之前”将继续无作为的政策“合理化”。

刺激罗马采取行动的不是意大利所在的三国同盟，而是由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1911年7月初，意大利人向英国政府抱怨，称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统治成为意大利的一块“心病”（这是欧洲列强的惯常手段，即宣称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在不公正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将掠夺行为合法化）。7月28日，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马奎斯·吉里诺·因佩里亚利（Marquis Guiglielmo Imperiali）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采取实际干涉行动的问题时，格雷的反应是格外支持对方。格雷对大使说，他“与意大利十分有共鸣，鉴于两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在的黎波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遭到了强迫”，格雷将会“让土耳其人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不会从英国这边得到任何好处”。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将这些含混的表述视为攻击利比亚的通行证。但格雷一直表现得言而有信：9月19日，他告知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最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和法国都不要阻止意大利的计划。在俄国人那里，意大利甚至得到了更令人愉快的答复。派到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大使被告知，如果意大利得到了利比亚，俄国将不会做任何干涉；圣彼得堡甚至还敦促意大利的行动要“迅速而果敢”。

因此，意大利首先与协约国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商讨，却将自己三国同盟的盟友罔顾一旁。9月14日，乔利蒂和马奎斯在罗马达成共识，要尽早行动，以免“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政府觉察”。这种隐而不显的含蓄，德国人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意大利盟友与他们的奥斯曼兄弟之间爆发战争，并且已经采取行动，希望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德国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甚至警告其意大利同人，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可能会瓦解青年土耳其组织的统治并引发一系列的动乱，这些动乱会让东方问题卷土重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再三要求限制意大利人的行为，并警告他们，鲁莽地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在巴尔干半岛导致不乐观的后果；他还提醒对方，他们自己也曾多次强调，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和统一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

桑·朱利亚诺（San　Giuliano）深刻地认识到意大利政策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以及奥地利人所担心的“不乐观的后果”。1911年7月28日向皇帝和首相所做的一次冗长的报告中，他权衡了入侵的利与弊。他认为，对奥斯曼帝国地位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会“引起巴尔干人民的反抗，并加速一场被迫让奥匈帝国卷入其中的危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意见背后的考量并不是真正为奥匈帝国的安全担忧，而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系列军事行动可能会以牺牲意大利为代价巩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在许多方面，该地区已经被视为意大利未来的另一块殖民地）。朱利亚诺的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危险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拖延意大利进攻北非的时间。

> 如果政治原因不足以削弱或瓦解奥斯曼帝国，那么在两三年内，奥斯曼帝国将会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并且使得针对的黎波里的计划无从谈起……

该观点最惊人的一点是其完全缺乏依据。诚然，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努力让已经淘汰的舰队实现更新换代，打造一艘现代化战舰的订单已经在英国人手中，并且政府还准备从巴西购买另外一艘。但与意大利的海军建设计划相比，这些努力相形见绌，更不用提意大利舰队当时的实力。假设奥斯曼帝国撼动意大利在东部地中海的海军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朱利亚诺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列强在海军实力上的平衡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根源于一种时代的恐惧症：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它，那是一种觉得时间将被耗尽的紧迫感，人们认为自己的财产正在耗散，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任何的拖延都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惩罚。

因此，在一系列小规模的海军冲突之后，1911年10月3日，停泊在的黎波里港湾前的一群意大利战舰响起了出发的号角。其中一艘战舰上的意大利指挥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枪手冲向前取枪，搬运工冲向军火库，信号员也都各就各位。”炮弹被搬运到排炮前，白色的弹壳，尖端是红色的，被整齐地码成一堆。在下午3点13分，“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首先在红堡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一片枪林弹雨，“沿着海岸，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在敷衍地进行了抵抗之后，的黎波里沦陷了，1　70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仅用了48小时便占领了它。接下来的几周，图卜鲁格、德尔纳、班加西以及胡姆斯也相继沦陷。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士兵人数从2万增至10万，之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微弱的防御下又有所损失。

朱利亚诺所期待的“速战速决”并没有实现。意大利人越发觉得打入这个国家内部困难重重，并且在战争的前6个月中，他们的胜利仅仅被局限在海岸的桥头堡地区。11月5日的一项意大利法令正式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一举动不是军事情况的如实反映，而是做出旨在让其他国家进行草率调停的姿态。在1912年1月和2月针对黎

巴嫩海岸的一系列行动后，意大利人摧毁了奥斯曼海军在贝鲁特的实力，清除了南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仅有的海军优势威胁。与此相比，陆上作战却停滞不前，甚至有许多报道称意大利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施以耸人听闻的暴行。尽管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奥斯曼抵抗者和他们的战友们仍进行着殊死搏斗。以土阿士兵为核心的部队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向的黎波里周边发动强攻，实现了多点突破，大大挫伤了对方，造成对方大量的人员伤亡，而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内的武装"叛徒"则从后部对反抗的士兵进行攻击。在整个冲突中，小规模的战斗、埋伏战和游击战妨碍了从主要海岸要塞向内部深入的行动，因此意大利人想要打入利比亚内部，恐怕要花20年的时间。

此外，朱利亚诺还认为，进攻并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有利。如果主动进攻有效，那么意大利一定会试图通过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海上作战打破该地区的已有局面。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的炮艇轰炸了保卫土耳其海峡入口的两座堡垒。船上的炮手在离岸边约6海里的地方发射了346枚炮弹，造成一名士兵和一匹马死亡，损坏了一座营房。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而不是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真实打击。土耳其人也不出所料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停止了进出海峡的所有中立国的商业活动。

10天后，爱琴海南端的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也遭到了袭击。从1912年4月28日到5月21日，意大利人一共占领了13座岛屿，岛上的希腊人将入侵者视为英雄和解放者。在消停了一阵后，意大利人在7月重整旗鼓，向土耳其海峡派出了8艘潜艇。土耳其人试图再次关闭海峡，尽管这一次君士坦丁堡在俄国的压力下同意只是通过放置鱼雷，缩小海峡通行的范围。1912年10月，意大利政府威胁道，如果奥斯曼政府不妥协，就要向爱琴海派出海军主力。在其他列强的施压下，尤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他们的考虑分别是防止海运贸易的中断以及巴尔干地区不断升级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方面最终还是认输了，并于10月15日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和平协议，承认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自治。当天，一项帝国法令宣布奥斯曼撤出其在这些省的直接统治。3天后，这项安排被公开写在了《洛桑条约》中。

今天，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体系。利比亚反抗意大利占领的斗争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的关键的早期催化事件。鼓励意大利毫无缘由地掠夺的幕后国家正是协约国，而三国同盟方面则勉强保持沉默。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诸列强的干预暴露了三国同盟的弱点和松散性。奥匈帝国和德国一再警告意大利，其行为会危及巴尔干半岛或者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但这些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这样看来，意大利这个盟友好像只是徒有其名了。

到此为止，意大利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反对协约国的迹象。意大利复杂而模糊的外交政策仍然在充满矛盾的保证中寻求着并不牢靠的平衡。在北非问题上，他们与法国仍然是宿敌，并且这种敌对状态在表面风平

浪静之下暗流涌动。双方在海上也发生过敏感事件，如意大利海军扣押法国船只，因为怀疑对方私下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这些事件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也激起了相互的怨恨和偏执。尽管如此，战争同时还向巴黎和伦敦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于协约国来说，当下意大利作为三国同盟成员，非常具有价值。1912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致信保罗·康邦，称对于三国同盟来说，意大利“这个盟友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累赘”：

> 它（意大利）对奥匈帝国有着潜在的、无可救药的敌对心理。至于法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爆发冲突，它将保持中立或更有可能在采取行动之前就静候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必跟它走得太近……

发现三国同盟内部出现的混乱状况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在进犯利比亚的行动中，意大利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它揭示了欧洲内部亲奥斯曼的联盟是如何全面瓦解的。19世纪50年代，诸列强达成一致，纵容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行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后，这一团体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组合，并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完成了重组。但20世纪初，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意大利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寻求与英国达成联盟，但因为不想破坏与意大利的关系，伦敦对此不置可否。而接下来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打破了这个绥靖集团。

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发生了：英国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统一，逐渐改变了其长达一个世纪的承诺——帮助俄国进入黑海。诚然，英国对俄国的戒心还是让其无法彻底在海峡地区放松戒备。1908年，格雷拒绝伊兹沃尔斯基的要求，即放松对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尽管《英俄协约》已经对此进行了规定。一直到1914年，奥斯曼在博斯普鲁斯的舰队仍然由一个英国人指挥——海军上将阿瑟·亨利·林普斯爵士（Sir Arthur Henry Limpus）。但由于地缘政治真空的逐渐形成（这使得德国同时也乘虚而入），使得英国也逐渐放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承诺。1887年，俾斯麦在柏林向俄国使者保证，德国并不反对俄国人成为“海峡的主人，进入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的拥有者”。但在1890年俾斯麦卸任之后，与俄国结成的传统友谊关系开始松懈，德国的领导人转而与君士坦丁堡走得更近一些。德皇威廉二世于1889年10月和1898年10月冠冕堂皇地出访了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就为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慷慨地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安纳托利亚铁路，其次是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这条1903年开始修建的铁路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直达奥斯曼占领下的伊拉克。

体制上的连续性成为从英国到德国盟友变动的基础。海峡问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即允许俄国势力进入东部地中海的问题）是长期困扰

欧洲国家的诸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抛开1915~1917年的小插曲，即法国和英国为了寻求圣彼得堡在战时与其达成同盟，向俄国许诺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权利的话）。1945年，当土耳其在盟友美国的庇护下、以避免遭到来自苏联的潜在进犯可能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承诺意味着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已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了——尽管它一直被欧盟拒之门外。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海峡的守护者。这一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同时伴随着欧洲向两大同盟阵营分化的过程。曾经一度有助于欧洲内部统一意见的土耳其海峡问题，当时却成为两极分化体系中敌对状态的深刻表现。

忙乱的巴尔干

当1912年秋，土耳其人向意大利人寻求和解时，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场主要的冲突却正在酝酿。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向君士坦丁堡下了最后通牒，而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却提出警示，如果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巴尔干地区。就在意大利1911年10月公开宣战的同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府间的代表人也坐到一起，商讨共同的军事行动。1911年11月，塞尔维亚第一份与保加利亚结盟的条约草案明确指出，要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战争。在1912年3月达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防御同盟之后，双方又在5月签署了共同进攻的条约，正如意大利攫取佐泽卡尼索斯群岛那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条约主要集中在针对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南欧的军事目的，但他们同样也在酝酿针对奥匈帝国的联合行动。以这两个国家为核心，一个秘密的巴尔干联盟正在形成，其目的是要将奥斯曼帝国赶出巴尔干半岛。当这些联盟国家开始行动起来，展开一场大范围的巴尔干战争时，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和平协商仍然裹足不前。1912年10月8日，黑山首先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打击，揭开了战争的序幕。1912年10月18日，就在签署《洛桑条约》之时，彼得一世在皇家声明中指出他“以伟大的上帝的名义，命令我勇敢的军队加入圣战，让我们的兄弟得到解放，并许诺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1912年10月，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足为奇了。真正让当时的观察者感到惊讶的是，巴尔干联盟国家的胜利如此迅速、范围如此之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奥斯曼的要塞开赴，同时，巴尔干半岛的海面上也闪过诸国的舰队。受地形影响，战争的主要地点将是色雷斯东部，那里波浪状的广阔平原在地峡处变窄，而那里就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地方。30万保加利亚士兵涌入该地——该数量大约为这个国家男性数量的15%（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的男性共有30%加入了作战部队）。在罗森格勒，一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战线绵延36英里，向东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在埃迪尔内的要塞。在骁勇善战的迪米特里耶夫（Dimitriev）的带领下，保加利亚士兵的作战果敢而凶残；迪米特里耶夫绰号“拿破仑”，不仅因为

他与拿破仑一样都十分矮小，还因为他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当土耳其人四散溃逃时，保加利亚士兵穷追不舍，不顾道路泥泞和倾盆大雨，直到他们追击至缺乏地图或已不在勘察的范围内——他们的司令却从没命令他们追到这么远的地方。保加利亚的猛攻最后爆发于仅离首都君士坦丁堡20英里的查塔尔贾防线。1912年11月17日，靠着首都提供的支持，土耳其人守住了最后的防线，运用精准火炮便将对方的先行部队造成了惨痛的伤亡，并抵御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这是保加利亚人离君士坦丁堡最近的一次作战了。

当保加利亚人大举开进色雷斯时，塞尔维亚第一军团的13.2万士兵则从南部向马其顿北部挺近。10月22日，他们出其不意地遭遇了一支驻扎在库马诺沃附近的奥斯曼军队。第二天，双方在一场冰冷的大雨中展开了战线长达10英里的战斗。两天后，塞尔维亚人一举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胜者并没有立刻进行追剿，而是继续向南行进，三天内就遇到零星的但火力十分猛烈的敌军，在普里莱普附近，又是伴随着冰冷的秋雨，塞尔维亚人再一次将当地的土耳其人赶了出去。应保加利亚同盟的请求（他们急于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拿下萨洛尼卡，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塞尔维亚军官命令第一军于11月8日向比托拉前进——马其顿西南部濒临德拉格河的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城。而这里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则巩固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将大炮拉到奥布拉科夫高地上，俯瞰着敌人的进犯。枪林弹雨从高地上倾泻而下，塞尔维亚人节节败退。11月17日，在攻击并占领奥布拉科夫大桥之后，形势才得以扭转，塞尔维亚人反败为胜。塞尔维亚人也占据制高点，以让人刮目相看的技术向对方发射炮弹，捣毁了守卫城市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为步兵团进一步向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推进扫清了障碍。这是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最后据点。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第三军已经从西面进入北阿尔巴尼亚，在那里，他们协助黑山军队围剿了守城斯库台。

战斗一开始，希腊人就一心一意地集中火力攻打萨洛尼卡——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该地区的战略重地。左翼的马其顿守军交给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军队，在色萨利的希腊军队则向东北方进攻，分别于10月22日和11月2日攻下了奥斯曼帝国在萨兰塔波罗斯和雅尼察的据点——通向萨洛尼卡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这期间也有有趣的插曲出现。在11月的第一周，希腊军队开始围城，而在意识到希腊人将要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战利品之后，保加利亚人却命令他们的第七师挥师向南，赶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捷足先登。当他们快赶到时，就派出信使提前通风，敦促奥斯曼指挥官向保加利亚人投降，并准备了相当优厚的诱降条款。但他们从指挥官那里却得到了近乎绝望的消息：“我只有一座塞萨洛尼基城呀，而且它已经屈服于人了。”显然，希腊人还是赶在了他们前面。先发制人地将保加利亚人拒之门外之后，希腊指挥官最终还是同意让1.5万保加利亚人与2.5万希腊士兵共同占领该城。在伊庇鲁斯王国（即阿尔巴尼亚南部）同时进行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土耳其人在亚尼纳周围的要塞十分牢固，因此希腊人陷入了对方的包围中。战斗在几个地区陆续打响，但联盟所取得的胜利却十分可观：仅6周，他们就征服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近一半地盘。到1912年12月3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时，奥斯曼帝

国在查塔尔贾防线西面进行继续抵抗的据点仅剩下阿德里安堡、亚妮纳和斯库台，并且所有的据点还都处于包围中。

正如萨洛尼卡纷争所体现的那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为第二次冲突（针对已经获得的领土）埋下了伏笔。1912年3月联盟形成时订立的协约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同意事先实施瓜分计划：保加利亚人的目的是马其顿南部，包括奥赫里德、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科索沃、新帕托尔的桑扎克被分给了塞尔维亚。包括诸如斯科普里这样的马其顿北部重镇则尚处于“争议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都要接受俄国的裁决。保加利亚人欣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法，因为俄方的决定总是对他们有利的。

与此相反，塞尔维亚人则高兴不起来。许多政治精英都认为，由温和的总理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参与的同盟协商使得塞尔维亚牺牲了许多利益。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以及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的影子。帕希奇之后发表评论称：“以我的观点，我们进行了太多的妥协。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放弃了我们从来都不敢放弃的属于我们的塞尔维亚地盘，纵使我们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几个月后，在1912年7月，米洛瓦诺维奇突然离奇死亡，他的死亡也使得持温和外交政策的官员中损失了一员大将。他死后6周，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帕希奇成为总理和外交大臣。



1912年的巴尔干半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设立停火线后的巴尔干半岛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的巴尔干半岛

塞尔维亚政府摧毁与保加利亚的协约条款的明确意图甚至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前就有所体现。1912年9月15日，帕希奇向塞尔维亚代表团暗中发去了通告，通告中他提到了“旧塞尔维亚”，并将普里莱普、基切沃和奥赫里德包括在内，而这些地区却在条约中被划给了保加利亚。在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意图因为被阿尔巴尼亚的战事所搁

置，当时的领导人一心着迷于获得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这个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统一”中老生常谈的：其扩张潜在包括了若干个不同的方向，这迫使决策者在不同的意见中做出选择。然而一旦事情变得明确，即奥匈帝国并不打算允许塞尔维亚获得阿尔巴尼亚的一块地区，并且获得亚得里亚港口的愿景也消失之后，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便开始公开违反与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条款。塞尔维亚对莫纳斯提尔的兴趣尤为强烈，这片土地也是用数次的军事努力和惨重伤亡换来的。保加利亚人警觉了起来，他们要求对方做出澄清，但帕希奇却用他一贯的搪塞回应，“所有的分歧都将化解”，他向保加利亚人保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背后讨论兼并保加利亚辖区内的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甚至还在觊觎备受争议的斯科普里。此外，还有消息称，塞尔维亚虐待“解放区”居住的保加利亚人，这使得事情进一步升级。亚历山大王子曾经来到被征服的数个马其顿城镇（那些城镇里住着许多当地的保加利亚人），并与当地人进行了形式上的对话，可对话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 “你们是谁？”
>
> “保加利亚人。”
>
> “你们才不是保加利亚人。去你们的吧。”

数月以来，双方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都于1913年4月底同意将马其顿争议交给俄国进行仲裁。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索非亚派出迪米特尔·里佐夫（这位保加利亚外交官曾在1904年协助双方达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来到贝尔格莱德，为协商提前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里佐夫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双边合作的竭力推动者，因此如果事态发展得很糟糕的话，他也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与塞尔维亚政府的谈话中，他明显感觉对方完全没有放弃任何地区和军事要塞（它们都处于“保加利亚辖区”）的意愿。尤其让里佐夫感到惊讶的是俄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向保加利亚首相汇报称，哈特维希在塞尔维亚事务中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对方的外交同人私下称他为‘摄政王’，因为实际上他在代替疾病缠身的塞尔维亚国王行使权力”。5月28日，就在里佐夫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帕希奇旋即公开了他的兼并政策，并赶在联盟议会之前宣称，塞尔维亚将保卫所有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

而接下来的关于马其顿的冲突则变得毫无调和的余地了。1913年5月的最后一周，大批塞尔维亚军队被调往沿保加利亚防线的各个据点，铁路也都停止了民用功能。6月30日，帕希奇再一次抢先联邦议会一步，重申他的马其顿政策，以免遭到极端民族主义代表的破坏（这些代表认为塞尔维亚应当直接并彻底地占领那些土地）。就在争论升级之时，信使赶来通报总理，称凌晨两点的时候，保加利亚的军队攻击了塞尔维亚在争议地区的据点。因此，双方再也不需要考虑如何宣战了。联邦议会顿时炸开了锅，帕希奇结束了会议联合政府一起准备组织反击。

接下来，曾经的联盟之间爆发了战争。塞尔维亚、希腊、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联军分别从保加利亚的侧翼地区进行攻击。7月初，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的军队在布雷加尔尼察河一带遭到了塞军的阻挠。7月1~18日，在马其顿东北部的卡里曼奇，成功挺进的保加利亚军队击败了对方的反击，阻止塞尔维亚人进犯西保加利亚。当塞尔维亚防线部分出现僵局时，希腊人从南部攻入，与对方发生了一场血腥却无果的战斗。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从东边进攻，直逼索非亚，离保加利亚首都只有7英里不到了，这迫使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要求停火。1913年8月10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元气大伤的保加利亚丧失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收获的大部分领土。

摇摆不定的人

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政策在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阴影下得到了强化。俄国人忘记了（或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伊兹沃尔斯基在提议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筹码与奥匈帝国外交官进行交换（以换取土耳其海峡的通行权）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宏观的国际背景，比如英国拒绝支持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为了迎合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波斯尼亚兼并被认为是奥匈帝国背信弃义的一段历史，而德国在1909年3月为保护其盟友而进行的干涉则使事情的性质进一步恶化，这使俄国无法再经历第二次的“耻辱”。但是波斯尼亚混乱同样说明了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孤立立场，因为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帮助俄国摆脱伊兹沃尔斯基制造的问题。因此，俄国在将来不得不寻求在该地获得发言权的途径——在不得罪其西方伙伴的前提下。

俄国在1911~1912年的巴尔干政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征是微弱的中央权力和合作。1911年9月18日斯托雷平被刺杀，搅乱了当时的体制。首相的死亡就在意大利政府向奥斯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新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还没有站稳脚跟。萨佐诺夫在1911年3~12月都在国外养病。在他的缺席下，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Neratov）竭尽全力力挽狂澜。行政控制权被大大地削弱，其结果就是俄国的政策被分裂成若干并行的、相互矛盾的集团。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恰雷科夫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来与之协商俄国船只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条件。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恰雷科夫向奥斯曼帝国提议，俄国会确保奥斯曼帝国不丢掉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内陆的防御地带。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则要授予俄国船只进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行权。

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却在寻求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哈特维希曾在外交部的亚洲部门受过训练，而该部门的文化则以武断的立场和无情的手段著称。自从他1909年秋到塞尔维

亚首都任职后，他就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积极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掩盖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厌恶和自己的泛斯拉夫观点。当保加利亚驻塞尔维亚首都的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Andrey Toshev）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哈特维希一步一步地将塞尔维亚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毫无疑问，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涯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代办沮丧地认为，哈特维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的得宠以及圣彼得堡方面松懈的控制和监督，意味着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权来炮制自己的极端观点，就算它们与官方的表态大相径庭。他“明确地提出，他将随时为塞尔维亚提供俄国下一步的动态解读”。

当恰雷科夫正在做出与君士坦丁堡达成长久和平关系的努力时，哈特维希却敦促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合伙，达成一个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防御联盟。后者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将各方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旧友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审判弗里德永丑闻期间，他几乎成为俄国代表团的一员）接受了作为塞尔维亚驻索非亚大使的职位，这将帮助他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约的缔造铺平道路。为了让他的观点被塞尔维亚政府接受，哈特维希致信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坚持称针对土耳其人（间接指向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是确保俄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唯一方式。他在1911年10月6日（就在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开枪后的第三天）向涅拉托夫表示：“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双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应当形成伟大的抵御力量，保卫俄国和斯拉夫族——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踌躇。”

因此，当萨佐诺夫于1911年年底结束疗养回国后，他不得不在两种矛盾的建议中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抛弃恰雷科夫的立场。奥斯曼帝国被告知，应该忽视该大使的提议，恰雷科夫也在几个月后被召回。萨佐诺夫称，他惩罚了这位大使，因为他不顾他的旨意，越过圣彼得堡的“所有障碍”，“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这只是烟幕弹而已：恰雷科夫已经得到来自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的支持，他也绝不仅仅是在非常时期制定政策的俄国公使。从这方面来说，哈特维希行为的性质是更恶劣的。萨佐诺夫否决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真正意图，是因为获得土耳其海峡主动权的时机尚未成熟。1911年12月，在他从瑞士疗养地归返的途中，萨佐诺夫从伊兹沃尔斯基和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那里得到消息，直接敦促解决海峡问题可能会导致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紧张。尤其应当被考虑的是英国的态度，因为1911～1912年冬，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解决上再度陷入紧张局面。局势越严峻，英国就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对俄国的目的网开一面。与此同时，俄国在1911年春夏出现的摩洛哥问题上一直对法国表现得不温不火，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东地中海达成心愿，因为他们也将此地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最重要的是，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投资让巴黎深切怀疑俄国的任何动机，认为这将危害自己的金融投资。一时间，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相对削弱，在对像土耳其海峡这样的战略重地的问题上，如果成员之间有潜在的分歧，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萨佐诺夫不得不将协约国的团结放在第一

位，俄国在海峡的权力暂且搁置。



谢尔盖·萨佐诺夫

就在他放弃恰雷科夫观点的同时，萨佐诺夫选择支持哈特维希的亲塞、结盟政策，这样不仅会破坏奥匈帝国的意图，而且能够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直接的压力。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却谨慎地避免以一种可能会让自己与西方协约国盟友分道扬镳的方式挑战奥斯曼帝国。利用机会获得海峡权力的苛求必须与独自行动所承担的风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鼓励意大利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然后立刻撤退，这样可能会让奥斯曼帝国关闭水路，从而严重阻碍俄国的商业运输。萨佐诺夫同时告知英法，他的目的在于将意大利拉入伙；他对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称，他认为意大利的价值在于“抗衡奥地利”；实际上，他则希

望意大利的突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国提供一个借口，来要求只有他们自己的商船才能通行海峡。1912年10月初，萨佐诺夫对伊兹沃尔斯基表示，俄国“不要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角力且破坏其统一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萨佐诺夫还支持并资助了巴尔干同盟的成立。在重新回到岗位之后，他成为联盟政策的倡导者，并声称自己被这样一种愿景所鼓舞：几十万的刺刀共同形成一座坚固堡垒，横亘在中央权力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他之所以选择资助1912年3月形成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是为了借刀杀人，针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条约称，一旦“有任何的列强试图兼并、占领或暂时入侵”任何土耳其占领下的巴尔干领土——当然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签署国要“倾其全力，相互协助”。

萨佐诺夫心知肚明，巴尔干半岛在利比亚战争之后将有可能变得极其动荡。因此他相信，俄国在随即发生的任何冲突中都有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议就相应地赋予俄国在任何后续冲突中起调停和仲裁的作用。一项秘密协议确保了签署方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提前征询俄国的意见；如果两国在是否对奥斯曼帝国出兵、何时对奥斯曼帝国出兵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俄国的否决权将会生效。如果在被征服地区的领土划分上有矛盾，那么该事务就要被提交给俄国进行仲裁，即俄国的决定与协约双方的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个联盟对于俄国的利益诉求相当有利。然而却仍然有几点存疑。过去的经验表明，俄国帮助下成立的巴尔干联盟可能并不会对圣彼得堡言听计从。1911年10月和11月，由于这一点产生的分歧已经引发哈特维希和A·V·涅克柳多夫（A. V. Nekliudov）之间的敌意，前者支持激进的巴尔干同盟政策，而在索非亚的后者则担心联盟会脱离俄国的控制。涅克柳多夫也有自己的论据：如果两大签约国确实在攻击的可能性和时间表上达成一致，俄国的否决权就毫无意义了（事实确实如此）；此外，如果两大签约国家又邀请其他邻国加入（例如希腊和黑山）他们的联盟而并没有征询圣彼得堡的意见呢？他的质疑再一次成为现实：联盟只是告知俄国附加在联盟之外的秘密军事条款，但并没有征得它们的同意；圣彼得堡反对让黑山和希腊加入的提议被忽略了。在该联盟完全存在之前，它们就已经脱离了俄国的控制。

当巴尔干猛虎在1912年10月脱笼而出时，萨佐诺夫公开对此表示限制（但这也只是示意性的）。另外，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被告知他不会同意任何牵扯俄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合作的提议。与此同时，联盟国家也得到警告，它们不会得到来自俄国的帮助。这些警告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很是不寻常，因为俄国曾经鼓励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向奥斯曼帝国开战。驻法国的塞尔维亚大使米伦科·韦斯尼奇于1912年10月被萨佐诺夫在巴黎召去开会，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当着一群法国外交部官员的面，萨佐诺夫对韦斯尼奇说，他认为塞尔维亚的动员存在“计划不周”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对这场战争进行遏制，使其尽快结束。韦斯尼奇十分恼怒，他直言不讳地提醒萨佐诺夫，俄国外交部“完全了解塞尔维亚和保

加利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萨佐诺夫当即感到很尴尬——法国官员可都在场啊！——他回应说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只对于第一个“仅有防卫性质”的协议有效。萨佐诺夫告知索非亚，他并不是针对巴尔干战争，而是对时间表示担心：巴尔干战争或许会波及更大的范围，而俄国并没有为一场全面冲突做好军事准备。萨佐诺夫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质疑，再加上好战的哈特维希以及俄国在索非亚的军事随员，他们都鼓励各自的对话者，让他们相信如果事情变得糟糕，俄国不会让巴尔干“小兄弟们”自己收拾残局。据称，当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动员宣布开始时，涅克柳多夫一度喜极而泣。

但如果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不仅没有让俄国得到任何的海峡权益，还让其处于危险境地呢？圣彼得堡的政治领导人承认，海峡权应当留到合适的时机，即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相对放松的时候，但其他列强如果也乘虚而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阻碍他们的话，那就完全不能接受了。1912年10月，保加利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攻色雷斯东部的查塔尔贾——奥斯曼首都最后的壁垒，这给萨佐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敲响了警钟。保加利亚任性的国王一直觊觎着古老的拜占庭，如果保加利亚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么俄国将如何应对？萨佐诺夫对布坎南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将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警告”。他很不由衷地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尽管俄国并没有打君士坦丁堡的主意，但我们也同样不允许其他国家占领它。”在一封写给涅克柳多夫的信中（该信件同时被抄送给在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和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萨佐诺夫再一次重申，保加利亚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会使得俄国的舆论矛头指向索非亚。圣彼得堡向保加利亚大使发去了不友好的警告：“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入君士坦丁堡，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将要面临更复杂的后果。”当保加利亚对查塔尔贾的血腥进攻被打败之后，萨佐诺夫才从一场可能的干预中脱身。

这项策略的背后，是俄国媒体的挑唆。俄国报刊编辑们受到巴尔干国家和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宿仇（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的激励。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激起俄国城市媒体如此强烈的兴奋、团结和愤怒的情绪。“如果斯拉夫人和希腊人能够胜利，那么还有哪个强者能够抢走他们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利品呢？”评价萨佐诺夫在这些事务上施加的影响并不容易。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媒体想要了解他政策细节的兴趣非常反感，并且做出一幅轻视记者及其观点的姿态。然而，他对媒体批判又非常敏感。他曾经召集一次媒体会议，抱怨他感受到的来自记者的敌意。在10月31日致所有俄国大使的通知中，萨佐诺夫称，他无意让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俄国媒体中传播，以至于影响他对政策的控制。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公使们应当考虑利用媒体的煽动性文章来“使他国的内阁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时刻考虑我们目前遭遇的困难”。换言之，当他否认媒体影响他的决策的同时，他还看到敌对的媒体文章能够在国外被充分利用，以确保为控制外交协商留出空间。这些文件可能是最能揭示决策者和媒体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了。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的政策充满了即兴和游移不定的特质。10月底，他坚定地宣称，他支持奥匈帝国维持在巴尔干半岛领

土现状的政策。然而在11月8日，萨佐诺夫却告知意大利政府，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权益必须被保障，他还自负地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然而仅在三天之后，他就告诉哈特维希，在亚得里亚海岸成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是"无法逃避的必然之举"，这次他又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哈特维希接到命令，警告帕希奇如果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过于激进，俄国可能会被迫抽身而退，让他们自行处理问题。这是这位俄国部长十分不乐意看到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条消息同时也被发往伦敦和巴黎。然而到11月17日，他却又在为塞尔维亚辩护了。伦敦和巴黎又收到消息，称如果他们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的话，俄国可能有义务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两个政府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萨佐诺夫总是在改变他的立场。"1912年11月，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称："他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总是轮番登场，让人捉摸不定。""我曾不止一次责备萨佐诺夫变化多端的观点。"但是他继续指出，平心而论，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并不是其自由意志的履行者"，他需要考虑沙皇的意见，而后者当时受到圣彼得堡军方意见的左右。驻巴黎和德黑兰的前第三任秘书、就职于伦敦的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对这个问题做了简单的总结："萨佐诺夫先生是个悲哀的摇摆不定的人。"

巴尔干冬日危机

萨佐诺夫还在犹豫不决时，俄国统治阶层对巴尔干的态度渐显强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动员其军事力量时，俄国决定在1912年9月30日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俄国打算通过对巴尔干采取军事行动向维也纳示好。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约五六万俄国预备役军人被纠集到波兰战线的华沙地区（紧邻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预计后续还要召集17万人，用来在奥匈帝国边境建立一个大型的俄国军营。当被问及这些军事行动时，萨佐诺夫宣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与之相反，苏霍姆利诺夫坚称外交部完全知晓此事。无论萨佐诺夫是否参与了这个决定（两种可能都是可信的），军事演习（以及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后继续沿用这个策略的决定）标志着俄国与之前的保守政策告别。俄国开始拥护"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在一封1912年10月10日写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中，萨佐诺夫评论道："我们可能需要英法的实质支持，只要这两个国家明白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只有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且利用"和平压力"，才能使俄国实现目标。这是与他的政策自相矛盾的地方。

俄国对巴尔干转向更加坚定的政策，也标志了科科夫佐夫与苏霍姆利诺夫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1912年10~11月，在讨论1913年的军事预算期间，沙皇明显不再愿意支持科科夫佐夫的限制军事开支的号召。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召开一系列会议后，内阁同意增补军事贷款6680万卢布。这个提议的发起者不是苏霍姆利诺夫，而是萨佐诺

夫，他在10月23日给科科夫佐夫写信称，他想提高军备实力以对抗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科科夫佐夫别无选择，只能将该信传达给苏霍姆利诺夫，由他正式申请提高贷款。这是削弱科科夫佐夫地位的关键步骤：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11月5日之后，沙皇批准了一条法令，推迟俄军高龄入伍者返乡时间，因此，服役期延长之后的预备役人数增长到40万人。根据从圣彼得堡传到法国的信息，前线部队力量仅比战时水平低一点点。这些策略还有其他措施辅助：派遣一些队伍前进至邻近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界、优化武装设备、保证足够储备。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参谋长告诉法国军官，所以这一切的目的是保证“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

使冲突扩大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912年11月的第4周，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其他司令积极说服沙皇颁布动用部分武力针对奥匈帝国的命令。科科夫佐夫回忆道，有人在11月22日告诉他，沙皇要在第二天早晨召见他和萨佐诺夫。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惊愕地发现军事会议已经决定，在紧邻奥匈帝国的基辅和华沙军事区进行武装召集。看来苏霍姆利诺夫前一天就想进行武装召集了，但是沙皇因为要先征求相关大臣的意见，因此推迟颁布命令。科科夫佐夫被军方这些蛮不讲理的小动作激怒，他指出该提议是愚蠢的：对奥匈帝国的小范围动武毫无意义，因为德国有义务在奥匈帝国受到攻击时协助他们。那法国这边呢？由于当下还没有和法国商量，突然动武很可能迫使俄国独自面对这愚蠢的结果。此外，该行为还违反了宪法：科科夫佐夫认为，苏霍姆利诺夫没有权力在未征求外交大臣的意见前，向沙皇提出这样的建议。尼古拉二世支持了科科夫佐夫观点，并同意撤销陆军大臣的命令。在这次事件中，萨佐诺夫选择站在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一边，支持撤销该提议，因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毫无意义；从战略角度看，它极不可行，而且还存在危险。这也是俄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次发力。

但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时，萨佐诺夫事实上是支持对奥匈帝国动武的。也是这个政策使得俄奥边境成为“外交风暴中心”。在11月23日，平民和军官之间就动武问题发生对峙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圣彼得堡总归还是支持战争的。12月中旬，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向内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基辅和华沙军事区的边境骑兵团军力、召集预备役进行训练、增强边境部队战斗能力、运输马匹到边境区域、强化军事防卫以及禁止出口马匹。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直接把冬季危机推至战争——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战争在所难免，因为法国政府当时正敦促俄国加快对奥匈帝国进行制裁，并承诺在德国参与军事冲突时对俄提供帮助。但是这对于萨佐诺夫来说有些过头了，他再一次与科科夫佐夫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苏霍姆利诺夫的提议。这次，和平支持者仅获得了部分胜利：召集步兵预备役以及马匹出口禁令因为过分具有煽动性而被拒绝，但是其他措施仍然得以继续实施，此举自然会令维也纳的奥政府不安。

从历史上来看，1912年12月的最后一周，萨佐诺夫提出将加利西亚

边境的部分俄军撤离（但是是在奥军先撤退的前提下）看起来更像是在进一步威胁恫吓，而不是真正努力缓和危机、避免战争。如果奥匈帝国不顺从，俄政府会再一次加速恫吓的步伐，并指出有可能进一步公开放宽征兵年龄上限，这将引起战争恐慌。萨佐诺夫甚至在1913年1月初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他有个“召集军事力量到奥匈帝国边境的计划”并计划征集更多军队。关于在基辅军事区征兵及俄对奥下最后通牒的讨论（这次是萨佐诺夫，而不是苏霍姆利诺夫）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俄奥武装僵局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在维也纳，边界冲突给原本财力薄弱的皇室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捷克、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预备役士兵的忠诚度也受到质疑。如果时局持续高度紧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失去原有的工作。俄方同样也有质疑边境军队的可靠度的问题，那些被召集来扩充和平时期加利西亚边境的军力逐渐产生反叛心理，他们要求要么即刻开战，要么撤退兵力。财政部及科科夫佐夫也抱怨维持预备役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尽管一般说来财政问题对于俄方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维也纳则不然，他们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其财政控制会彻底崩溃。科科夫佐夫成功地缓和了冲突，并说服沙皇不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在这次事件中，奥匈帝国首先做出了让步，从1月底开始逐渐减少边防部队的军力。2月及3月，贝希托尔德又对贝尔格莱德进一步做出妥协。2月21日，弗兰茨·约瑟夫提议大规模减少加利西亚的兵力，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允许被召集的年长士兵返乡。3月的第二周，边境双方的驻军大规模减少，并告知公众冲突正式得以缓和。

1912~1913年的巴尔干冬日危机结束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一般看来，这次危机改变了维也纳政府和圣彼得堡政府的政策。奥匈帝国的决策者开始习惯于一种更为军事化的外交风格。在圣彼得堡则出现了战争派，该派别中最核心的成员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ievich）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Pyotr Nikolaievich），他们都是高级军事将领，都迎娶了黑山公主。驻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年初写道：“帝国的和平主义者不能（在庭上）劝服那些宣称不可能早于奥匈帝国撤退的人。”主战的观点获得支持，不仅是因为沙皇（间接）、高级陆海军将领站在这一边，还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事大臣同样鼓励这种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

克里沃舍因是俄国政坛最活跃、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对扩展政界网络得心应手的人：睿智、世故、敏锐，并且拥有一种能够恰当结交朋友的过人天赋。年轻时，他就因善于结交能帮助他登上较高职位的高官子弟而闻名。1905年，他混入了沙皇的秘书D·特列波夫（D. Trepov）的社交圈（1905年秋是沙皇启用私人秘书的唯一时期）。至1906年，尽管克里沃舍因还是没有任何固定官职，但他依然被皇家所接受。他也因此变得非常富有，还娶了纺织帝国后代莫罗佐夫家族的成员。通过这段联姻，他可以与莫斯科工业经营层保持密切的联系。

克里沃舍因的政治天赋源于他作为俄国人在波兰生活的幼年时光，他是在华沙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壤是孕育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温床。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原话来说，在波兰西部省份的俄国官僚“就像个封闭起来的营队，他们的想法总是会向国家权威靠拢”。1905年之后，西部地区成了杜马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落脚点。掌握对外政策一开始并非克里沃舍因的拿手好戏，他是斯托雷平式的农业与管理革新者。他觉得跟外国人交流有困难，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和他同阶层的俄国人那样能够流利地说德语或法语。但是，当他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旋即拥有了控制外交的野心——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政府事务。此外，1908年5月，他被任命为土地使用管理以及农业大臣，他的地缘政治权利范围比他的头衔所体现出的还要多。克里沃舍因的部门参与扩展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因此他特别关注俄国远东和中国满洲的边境安全问题。就像很多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家一样，克里沃舍因偏向于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不赞成伊兹沃尔斯基将波黑归为奥匈帝国属国的观点，也拒绝外交大臣所呼吁的对三国同盟进行“报复”的看法。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

但是，在1914年夏季来到的几年以前，克里沃舍因经历了一次转变。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导师斯托雷平突然被害身亡，联合政府变得毫无头绪。克里沃舍因开始更加努力地扩大杜马以及公众中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冬季危机期间，他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巴尔干地区的激进政策，并把“停止对德国人唯唯诺诺”、让大家信任俄国人民以及他们对祖国长久的爱作为依据。1913年春，他领导了一场获得高票数的竞选，以修改当时俄德税费协议条款。谢尔盖·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于1904年与德国签订的该协议；1913年，在俄国政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该协议允许“狡猾、冷漠的德国企业家”从“头脑简单的俄国农业工作者”身上剥削“贡品”。这次明显是反对科科夫佐夫农业政策的竞选激起了德俄媒体间的争执。克里沃舍因的儿子在日后回忆，当时，那场争执越演越烈，俄国同德国的关系也越发恶化，但与此同时，克里沃舍因却成为法国使馆的宠儿，在那里，人们能经常看到他和他法国朋友圈的新朋友在一起。

克里沃舍因追求强硬外交政策的热情也反映了他对寻求能够将社会和政府联结起来的时机的渴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而言，这同样重要）。克里沃舍因以及他的部门能够在政府和官方机构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与区域地方选举议会以及很多民事社会组织紧密合作。1913年7月，他在基辅举办了一场农业展并做了一个简短的且在日后变得非常知名的讲话。在该讲话中，他宣称，俄国只有在“我们”（即政府）和“他们”（即社会）之间没有不利分歧时，才能实现富裕、和谐。简言之，克里沃舍因代表了一种在对外事物上可怕的技术治国的现代主义、民粹主义、耕地区域主义、议会普及化以及渐强的鹰派观点的结合。至1913年，他毫无疑问是最擅长社交以及最有权力的民政大臣。难怪科科夫佐夫绝望地在大臣会议上谈及他的“孤立感”与“彻底无助”，很明显大臣会议是要逼他下台。

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

萨佐诺夫以及他的同僚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抉择：俄国应该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中，保加利亚显然在战略上更加重要，它位于黑海，而且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得它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在1877～1978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失败为建立保加利亚紧急自治州创造了条件，该州名义上隶属奥斯曼帝国，实质上受俄国监管。因此，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直是俄国的属国。但是保加利亚从来没有像俄国期待的那样，做个听话的属国。保加利亚的亲俄派和亲欧派不停争夺外交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统治阶层利用该国具有战略敏感性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向不同的势力表达自己的衷心。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科哈里家族的费迪南德即位统治保加利亚后，

这种混乱局面更加显著。1885~1918年，费迪南德首先作为王子君临，后来成为国王。他在亲俄和亲德的内阁派系间掌控着大局。保加利亚君主“一直定下规矩，自己不准确定地倾向于任何事情的一边，”乔治爵士日后回忆道，“一个投机者只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先谄媚地与一个国家搞好关系，然后是另一个……”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令保加利亚与俄国的关系急速恶化，因为费迪南德决定暂时与维也纳联盟，利用这个契机弃置《柏林条约》（该条约将保加利亚定义为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公国），宣布保加利亚的统一与独立，并且在保加利亚古都特尔诺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还自立为沙皇。伊兹沃尔斯基对保加利亚的不忠表示吃惊，并警告保加利亚，他们不久将为自己对朋友的背叛付出代价。这场胜利十分短暂，而后果也十分恼人：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关于独立问题的谈判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兵力，保加利亚向俄国求助后，一切才得以平息。通过俄国的调停，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独立协议，维持一段时间忠诚的协约伙伴关系。

但是，即使是最亲近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客也认识到，跟保加利亚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考虑到塞尔维亚的利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之后——该危机在俄国公众中激发了支持塞尔维亚的情绪。1909年12月，由于急于在巴尔干半岛重建据点，俄国战争部起草了一份秘密协定，开展俄国–保加利亚联合行动，以共同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罗马尼亚或是奥斯曼帝国，并向保加利亚保证马其顿和多布罗加（罗马尼亚边境有争议区域）的领土完整。但是，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指示下，该条约被搁置，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塞尔维亚的利益。驻贝尔格莱德的哈特维希鼓励塞尔维亚人对抗奥匈帝国，并且代表塞尔维亚人去挑衅俄国，因此，对塞尔维亚还是保加利亚的选择问题上，矛盾越发显著。

1910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两周的高层对话。保加利亚要求俄方放弃塞尔维亚，坚决维护保加利亚，即只有在此前提下，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保加利亚首相马利诺夫告诉伊兹沃尔斯基，俄国不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和大塞尔维亚国：

> 一旦你决定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很容易和塞尔维亚解决马其顿问题。只要塞尔维亚政府认识到这点，你们最好摆明立场让他们认识到这点，如此一来塞尔维亚就容易妥协多了。

保加利亚人刚刚离开、塞尔维亚人的彼得国王后脚就跟着来了。彼得在沙皇的宫廷上要比狡猾的、因塞尔维亚事件对俄施压的费迪南德受欢迎得多。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俄国不再授予保加利亚优先权。俄国在马其顿问题上对保加利亚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名义上依旧存在，但实质上，伊兹沃尔斯基承诺他也会找到“保障塞尔维亚利益和权利”的

方法。首先就是（这是个令塞尔维亚外交部振奋的消息）俄国现在承认部分马其顿领土归属塞尔维亚。

在俄国看来，巴尔干联盟政策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能够结合两种选择之间的矛盾——至少当下可以。一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在1912年3月缔结的联盟找到双方看似都可以接受的马其顿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成为俄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长久手段。俄国仲裁争议区的条款看似是在保护俄国在半岛上的特殊地位，并创造出一套能够管理、化解双方冲突的机制。

保加利亚军队对君士坦丁堡毫无前兆的突袭引起了圣彼得堡的恐慌。萨佐诺夫强烈要求保加利亚要足够“理智”、谨慎，并且“在对的时机停手”；由于怀疑法国要求保加利亚占领奥斯曼首都，他的警告显得更加重要了。这种情绪在保加利亚进攻失败后得以缓解。战后，俄国专注于在两个胜利国之间调停，在符合1912年3月条约条款的情况下，使两国停战和解。但是塞尔维亚拒绝撤离已经获得的领地，而保加利亚又不同意放弃对该区域的所有权，调停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保加利亚声称调停的依据必须是1912年3月的条约，而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令该条约无效。巴尔干半岛诸国正如尼古拉二世说的，就像“表现良好的孩子”却“长大变成了烦人的小混混”。

萨佐诺夫起初倾向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不撤出占领地进行谴责。但是，在1913年3月底，俄外交大臣改为支持塞尔维亚且强迫保加利亚做出让步。当他得知保加利亚即将召回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时，萨佐诺夫感到无比愤怒，并且谴责保加利亚是在维也纳的指示下行事，由于他们“对俄国以及斯拉夫民族的无理”，保加利亚正自己走向“毁灭”。最后，保加利亚同意不召回列普切夫，争执才得以平息，但是俄国却在进一步考虑疏远保加利亚。在萨佐诺夫重复警告任何挑起下一场战争的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保加利亚在6月29日发动的战争为俄疏远保加利亚推波助澜。（但是俄国其实也参与其中，哈特维希让尼古拉·帕希奇无论如何不能主动带头，要等保加利亚先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曾向罗马尼亚请愿，确保罗马尼亚不会对保加利亚的任何领土进行突袭，他指的是多布罗加——两个国家的争议边界区域。与此相反的是，1913年夏初，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关于马其顿区域协议破裂后，萨佐诺夫则告知罗马尼亚，如果罗马尼亚干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中侵略的一方，俄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这是至此为止最明确的反对保加利亚的行动，这令俄国立场空前明确。

圣彼得堡财政上的起色强化了其站在支持塞尔维亚一方的立场。根据卡耐基基金会对巴尔干战争的起因及经过的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参战国就像“寻求借钱用于还债、重建军事和恢复生产力的乞丐”一样。保加利亚的状况最糟糕，刚与四国交战，其人力、财力都损失惨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死亡人数达9.3万——比4个帝国

死亡人数总和都多）。在1913年7月17日新任职的自由党首相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的统领下，保加利亚政府寻求一笔巨额贷款。维也纳第一个做出反应，10月底预付3 000万法郎，但是这些数额都不够保加利亚政府继续偿还自己的债务。尽管保加利亚承诺把达达尼尔海峡转让给俄国作为其管辖地，俄政府依旧不愿伸出援手。萨佐诺夫认为，只要是对俄有敌意的拉多斯拉沃夫执政，俄国就不能给予保加利亚经济援助。俄国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予保加利亚所需要的贷款额度，尽管它希望如此。此外，也是更重要的，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持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法国施压，令其跟俄国站在统一战线，不给予保加利亚支援。

法国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他们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猪肉战争”之后，就出于政治动机给塞尔维亚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放贷是法国的一种成熟且高效的外交手段。驻索非亚的法国大臣安德烈·德帕纳菲厄（André de Panafieu）在1914年1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观察到，只要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和平相处，想出拒绝保加利亚贷款的理由很容易，他也因此明白了金钱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如果萨佐诺夫过度运用这个政策，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新任俄国大臣亚历山大·萨温斯基（Alexander Savinsky）于1914年1月被派去索非亚，他的任务是防止保加利亚投靠日耳曼一方。从在索非亚的俄国外交大臣那边得到警告称，如果拒绝贷款，保加利亚就会向德国人借钱购买奥匈帝国的武器。在争议的压力之下，伊兹沃尔斯基求助于法国，使得法国外交部从2月开始便考虑给保加利亚提供贷款，但是条件却极其苛刻，比如要求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法国的军备和军需用品。

可想而知，是德国救了保加利亚。3月中旬，德国政府同意以政府的名义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这并不代表德国打算把保加利亚拉入长期的三国同盟，夏季，德国同样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塞尔维亚。当塞尔维亚拥有很高的信用额度，并不需要接受任何令协约国对其忠诚起疑的任何贷款时，保加利亚陷入绝望。当俄国和法国政府得知柏林与索非亚之间接洽后，最后一搏试图阻止贷款继续进行。萨温斯基在保加利亚亲俄媒介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文章，并不断督促萨佐诺夫对保加利亚进一步施压。在最后一刻，法国一家专门给拉丁美洲和亚洲提供贷款的银行Périer & Cie银行为其提供了贷款：5亿法郎、5%的利息。基本是俄方通过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斡旋获得的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银行规定俄国作担保方，即如果违约，俄国需要承担保加利亚的债务。其目的是将巨额贷款和政治依赖性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巴尔干协约国的影响：计划劝服保加利亚接受贷款，日后再给他们施压以更换政府。但是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资金到位过晚（1914年6月16日），并未成功改变局面，最终还是经过几轮交涉、确保条件改善之后，德国提供的贷款获得了胜利。在这场喧嚣和混乱中，德国的“一揽子”财政（如果用词得当的话）于7月16日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上得到通过。事实上，该法案既未被宣读，也未被讨论，更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在会议结束时，政府只是宣布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反对党指责政府出卖国家，并将“书本、墨水瓶扔向大臣们”。大家看见首相拉多斯拉沃夫维护秩序并挥动左轮手枪。贷款成

了联盟的一个危险的工具。通过国际借贷武装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新鲜手段，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加利亚被迫和三国同盟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像塞尔维亚融入了协约国政治体制一样。巴尔干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对“忠诚”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逆转。过去，俄国支持保加利亚，而奥匈帝国管辖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到1914年，这样的安排彻底调转。罗马尼亚也参与其中，1913年夏初，萨佐诺夫还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中邀请罗马尼亚政府加入保加利亚一方。当时时机已经成熟，因为罗马尼亚正因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而感到愤怒，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也因为奥匈帝国反对签署作为他个人外交政绩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而感到愤怒。俄国和罗马尼亚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恢复邦交，当时沙皇在罗马尼亚黑海岸康斯坦察拜访国王卡罗尔。这是个象征性的仪式。到场的从沙皇手中接过奖章的唯一一位外国代表是法国驻罗马尼亚大臣卡米耶·布隆代尔（Camille Blondel）——他前不久刚从塞尔维亚国王彼得那里获得一枚高级奖章。奥匈帝国驻布加勒斯特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也参加了庆典，他把这一天形容成罗马尼亚“向三国同盟”的完美转型。

事情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被削弱。罗马尼亚的民族统一主义逐渐偏离比萨拉比亚地区（因为它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然后趋向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这种趋势阻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体化。当然，对罗马尼亚一些意愿的限制也成了俄国的目标。当萨佐诺夫询问罗马尼亚首相及外交大臣伊恩·布勒亚努（Ion Brătianu），“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爆发武装冲突，俄国必须发起战争时”，罗马尼亚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布勒亚努“面露惊色”，并给出了个“搪塞的回答”。但是，当被进一步施压时，布勒亚努还是承认罗马尼亚和俄国在防止“任何削弱塞尔维亚的行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对于萨佐诺夫来说，这就足够了。因此，俄国与罗马尼亚恢复邦交造就了（援引自法国内阁一份报告）一种俄国给奥匈帝国施压的新手段。但是巴尔干地缘政治重组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成形之快。这不是需要数年才能消失的长期现象，而是针对地缘政治环境更改的短期调整。1913年11月，萨佐诺夫告诉在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保加利亚现阶段倾向奥匈帝国很可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是一个由狡诈的费迪南德国王支持的特殊国会小集团的杰作，“对于他，我们完全没有敬重”。等时机到了，新的巴尔干联盟很可能很快又有进一步的调整或者形成新的体系。重要的是，在1914年夏，这种特殊结盟模式还在运作。

塞尔维亚现在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傀儡了，这种形式既不必要也不自然。1909年，埃伦塔尔指责俄国即使在塞尔维亚不牵涉各国利益时期，依旧做塞尔维亚保护者的“疯狂主张”。他是有道理的。俄国声称做它在巴尔干的东正教“孩子”代表的行为，无异于一个民粹主义者为弱化奥匈帝国的政策辩护，它想要获得更多本国人的支持，以及确保自己在邻土耳其海峡的巴尔干内陆的霸权。泛斯拉夫主义学说可能在俄国民族主义媒介那边很受欢迎，但它也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概念一样，不能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依据。此外，这个政策也没有保持其一致性，因为保加利亚人也是东正教派的斯拉夫人，而罗马尼亚人虽然信仰东正教，但

不是斯拉夫人。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承诺是出于霸权政治，而非泛斯拉夫主义。它令巴尔干两大势力变得极其不平衡，因为奥匈帝国在那里没有可以与俄国盟国相比的盟国。

虽然很难量化，但是不可否认俄国结盟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刺激效应。1914年2月，当帕希奇访俄回国后，由于沙皇对他的偏爱，呈现出一种“完全如痴如醉、触及灵魂”的状态：

> 从沙皇的每一个字（帕希奇告诉哈特维希），我都能感受到陛下对塞尔维亚的仁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俄国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给予的无价的奖赏，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都毫无二心地跟随着俄国。沙皇的友好在我们看来也是对塞尔维亚光明的未来的保障，如果没有俄国强有力的援手，塞尔维亚不可能克服由充满敌意的毗邻国家制造的困难。

圣彼得堡收到的从斯帕拉伊科维奇那里发出的急件也显示出对方因为获得了俄国的支持而充满自信。沙皇“公开表示对塞尔维亚的偏爱”，斯帕拉伊科维奇在1914年1月21日与俄国统治者会面后报告：“并向我保证全俄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有决定权的区域。”“全俄媒体都支持塞尔维亚！”他于3月27日宣布。保加利亚媒体对塞尔维亚的批评受到了俄国媒体的强烈敌视。“曾经是保加利亚人对俄国媒体有影响，现在轮到我们了。”他宣称，“只有一家*Rech*报不那么友善，近几个月，它发表了一些批判塞尔维亚政府在新占领的马其顿地区的行为的报告。”但是这些负面报道对俄国官方关于新占领省份的看法没有影响，这很令人欣慰。斯帕拉伊科维奇与萨佐诺夫的代表涅拉托夫谈过，斯帕拉伊科维奇认为俄国外交部对塞尔维亚在兼并区域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他们愉快地谈及塞尔维亚如何修好公路，重建楼宇，“时间之短，令人都无法认出它们”——此处完全没有提及驱逐及屠杀。

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M·德斯克斯（M. Descos）记录了塞尔维亚王国的这种新的自信。在报告帕希奇在国会的演讲时，他注明，政府现阶段“和平政策”的关键是确保塞尔维亚有机会“强化军队、扩展盟友以及力求在新发生的事件中表现最好”。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一个通常表现得谦逊的人，却想将自己归于巴尔干事件中的权威人物——可能他认为塞尔维亚统治的时机已经到了”。德斯克斯还补充说，塞尔维亚领导者“跟俄国大臣关系如此亲近，很难区分究竟是俄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想法在控制着局面”。确认了塞尔维亚的身份和俄国的利益之后，塞尔维亚执政者纷纷转而准备接受俄国的激励。例如，1912年年底，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向圣彼得堡抱怨塞尔维亚大臣与奥匈帝国过度交涉。结果就是俄国外交部给帕希奇发函，要求塞尔维亚避免与奥匈帝国“所有过度公开的讨论”，以免引起“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签署特殊协议的流言蜚语”。帕希奇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给他的代表发出一封仅有“小心”二字的电报，并且是当着俄国公使哈特维希的面写的。哈特维希在1914年1月的贺年信中

向萨佐诺夫保证道，“他们当然会听我们的指示。”

奥匈帝国的麻烦

《时代周刊》的驻地记者威克姆·斯蒂德1912年10月17日在维也纳报道称：“巴尔干大战真正开始，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严肃气氛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无论战争进程如何，情况必定发生巨变。”因为巴尔干发生的冲突比任何国家都要紧急、严重。联盟国家让人猝不及防的胜利令奥匈帝国面对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首先，事实证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现在已经彻底破灭、无法挽回。维也纳的行动准则即永远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整顿该区域的核心问题，至此也变得无关紧要。现在需要的就是迅速的随机应变。1912年夏，“保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得不被摒弃，当前情况下催生了一个新计划，主要用来控制巴尔干的局势变化、以将其对奥匈帝国的损害降到最低。他们允许塞尔维亚侵占土地，但是他们必须保证今后好好表现，像有组织的经济合作就会比较受欢迎（奥匈帝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旧的关税联盟要慷慨得多，同时他们还派遣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提出条款）。另外，塞尔维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扩展其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边界获得许可。原因是塞尔维亚港可能很快就在外国势力（俄国）的控制下了。这样的理解听起来牵强附会，但是它获得了极度亲奥的贝尔格莱德“无冕之王”哈特维希的信任。

维也纳坚持：为了维持现有政策，阿尔巴尼亚必须成立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巴尔干国家为巴尔干人民”的宣传口号下，这个政策成了阻止塞尔维亚侵略亚得里亚海域的后备方案，因为所有塞尔维亚想侵占的港口都不可避免地处于阿尔巴尼亚境内。这项政策的宣布激起了帝国范围内支持塞尔维亚派系的反对声音，1912年11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波斯尼亚会议上，塞尔维亚代表做出了一项决议，认为塞尔维亚军队的“牺牲与胜利”证明了“令阿尔巴尼亚重归塞尔维亚”是合理合法的，并抱怨奥匈帝国不断挑衅南斯拉夫的“自主权”之苦，同时把原因归于“未开化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欧洲政权，贝希托尔德计划看起来像是对巴尔干发生的剧烈变化的一个温和回应，甚至萨佐诺夫都站到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一方了。

手中握有王牌的是塞尔维亚。到1912年10月底，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挺进至海岸，一路上惩戒性地杀死野蛮的阿尔巴尼亚反抗者。一系列的小型挑衅进一步僵化了双方的关系：塞尔维亚阻断奥匈帝国领事的信件，干扰其他领事间的交流，也有报告称有领事被逮捕或者绑架。比如，奥匈帝国驻米特罗维察的领事就被塞尔维亚军队关禁闭关了4天，这究竟是如塞尔维亚当局宣称的那样保护对方的人身安全，还是说像领事自己要求的那样——“这样他不用见证本地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在恐慌中，奥匈帝国外交部试图做另一番尝试，让情况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当证实无法与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奥斯卡·普罗哈斯卡

（Oskar Prochaska）取得联系后，维也纳流传他被塞尔维亚人绑架并阉割。外交部调查并发现，虽然他确实被捕（有人伪造称他煽动土耳其人进行反抗），但是被阉割的流言是假的。外交部没有抑制谣言传播，反而允许其流传一两周，以最大化首都人民的愤怒。普罗哈斯卡几周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计谋事与愿违，产生了很多攻击性言论。普罗哈斯卡事件是个不大也不聪明的舆论控制实践，它也成为宣称奥匈帝国总是用假造文件和伪造指控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把柄。

阿尔巴尼亚问题曾经一度看起来会激起欧洲边界的争端。至1912年11月中旬，黑山和塞尔维亚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包括阿莱西奥以及海港城圣乔瓦尼–迪梅杜亚和都拉斯。一大批黑山军队包围斯库塔里城，有3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于此。事实上，这种侵略已经威胁到维也纳的政策。贝希托尔德继续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并且驱逐所有占领军。但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交出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维也纳决定，如有必要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但是俄国在与奥匈帝国交界的边界处召集军队演习也表示俄国可能愿意武力支持其委托人。11月22日，黑山共和国国王尼古拉通知奥匈帝国驻采蒂涅大使："如果帝国试图武力驱逐我，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炮。"

整个1912～1913年的冬季至春季，阿尔巴尼亚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政治。1912年12月17日，该问题由在伦敦举办的、由爱德华·格雷任主席的强国大使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以寻求解决巴尔干战争问题的办法。大使们一致同意在各国共同担保下，建立一个中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萨佐诺夫（在经历了稍许动摇之后）同意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但是划定这个新国家的国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俄国要求普里兹伦、佩奇、迪勃拉、达科维卡和斯库台应该归属塞尔维亚和黑山，而奥匈帝国希望这些地方属于新阿尔巴尼亚。为了平息与俄国的争议，奥匈帝国最终做出让步，同意把大部分争议地区划归给塞尔维亚，这个提议一开始并不是由贝希托尔德提出，而是由他派去伦敦的大使门思多夫伯爵提出的，门思多夫伯爵和俄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在会上做了很多消除双方对立观点的工作。至1913年3月，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界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基本解决了。

但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因为还有10万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直到4月11日，塞尔维亚政府才宣布撤军。国际焦点继而转向黑山，其军队依旧包围着斯库台并拒绝撤离。尼古拉国王宣称，只有强国们直接攻击黑山领土，让它"光荣战退"，它才会愿意撤军。很难说他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取笑国际共同体。4月22～23日晚，于阿尔巴尼亚出生的斯库台总指挥埃萨德·帕夏·拓普塔尼（Essad Pasha Toptani）投降并撤离。黑山的旗帜飘扬在城市及要塞上空，黑山和塞尔维亚都欣喜若狂。荷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称，斯库台的投降令塞尔维亚首都陷入"难以言表的欢乐"，全城挂满旗帜，所以商店都关门，两万狂欢者在俄国使馆外庆祝。

当从伦敦寄来的要求黑山撤离的联合信函被忽视之后，国际共同体一致同意在大使会议的下一次会议（计划于5月5日）上讨论联合政权的应对之道。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开始准备在外交手段失败后针对黑山侵略者采取单方面行动。俄国会对奥匈帝国军事行动做出何种反应还不清楚。至1913年1月末，俄国及其外交部对鲁莽的黑山国王失去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因此会获得俄国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俄国外交部把他看作一个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的行事目的仅仅是让自己在国内享有盛誉。1913年4月，俄国外交部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公开声明否定尼古拉以及他对斯库台的处理方法。在这份声明中，萨佐诺夫（虽未提及，但众所周知他就是作者）指责媒体对该问题愚蠢的处理方法，并指出尼古拉对斯库台没有控制权，该市“完全属于阿尔巴尼亚”。因此，俄国准备好接受几个国家的联合提议。但是当斯库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萨佐诺夫也警告说公众舆论可能强迫他在奥匈帝国单独行动时采取武力干涉。布坎南在圣彼得堡报道：“政治前景空前黑暗。”

问题存在数月之后，突然消失了。5月4日，在伦敦大使会议举办的前一天，尼古拉国王宣布他把“斯库台的命运交给强国联合体”。随后，该城就分给了阿尔巴尼亚。1913年5月30日，各方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宣布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7月29日，在会议的第54场中，大使们确认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近一半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尤其是科索沃）是在伦敦达成一致、确定的国界之外。

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巴尔干地区却再一次爆发战争。这次是由瓜分战利品之事引起。1913年8月10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把马其顿东南的一些新的区域分给了塞尔维亚，因此扩大了其王国的领土：与1912年前相比扩大了近100%，并且使其增加了64%的人口。维也纳陷入混乱，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新局面。1913年夏，关于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境再次动荡的报告送至维也纳，贝希托尔德此时依旧试图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重获政治控制。尽管被不断谴责和警告，塞尔维亚依旧拒绝从阿尔巴尼亚部分边境地区撤军，而该地区在伦敦会议上一致同意归属阿尔巴尼亚。这种做法的表面意图是保护塞尔维亚不受阿尔巴尼亚暴徒侵袭，事实上，塞尔维亚军队才是边境麻烦的制造者。7月，维也纳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毫无成效。然后，在爱德华·格雷的协调下，强国联合起来一致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依旧毫无成效。法国和俄国阻止了一场9月初的联合抗议；当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单方面抗议时，得到的是时任外交大臣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的回应，他否认在争议地区有任何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几天后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军队已经撤到德林河岸线之后。尽管如此，塞尔维亚军队依旧在伦敦会议划出的国界之内。9月17日的报告称塞尔维亚打算在几个入侵的区域设立海关办事处，这加剧了维也纳的不安。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猫鼠游戏解释了为什么奥匈帝国政策决策者逐渐丧失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间利益冲突问题的信心。当阿尔巴尼亚人在边境通过游击战等方式对塞尔维亚的挑衅（例如，否认违

背伦敦协议、否认侵占地处塞尔维亚边境的属于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做出反应时，塞尔维亚军队则使他们节节败退，甚至比他们更加深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在9月26日接受一家维也纳报纸的采访时声称，由于很难在阿尔巴尼亚找到解决边境问题的机构，所以塞尔维亚“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该言论敲了警钟。帕希奇9月30日宣布塞尔维亚打算“为了保护自己”占领阿尔巴尼亚疆域内的“有战略意义的位置”，这进一步将局势复杂化。10月1日，奥匈帝国向帕希奇政府发出要求其澄清言论的信函，却得到了一个敷衍的答复。

10月3日，帕希奇对维也纳进行短期访问，但这也没有改善局势。贝希托尔德，这个被塞尔维亚领导人以热情及友善的方式“缴械投降”的人，错过了向帕希奇转达奥匈帝国的态度的机会。帕希奇向维也纳媒体代表保证，“他对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未来的关系很看好”，但是他也提及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的“边界更改”。贝尔格莱德发出的声明称，塞尔维亚不属于“违抗欧洲”、抢占阿尔巴尼亚领土，这着实令人欣慰。一位接待奥匈帝国领事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的塞尔维亚高级外交官“热情地好像帕希奇在奥匈帝国签署了一份防御联盟协约似的”。但是当被问及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具体政策时，他很官方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继续挺进。10月9日，奥匈帝国领事坚持要与帕希奇会面谈这事件，总理虽然依旧心情愉悦，但还是坚称塞尔维亚只是“临时”占领阿尔巴尼亚领土。10月15日，在半官方报纸上，塞尔维亚声明其确实计划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奥匈帝国的警告再次得到挑衅式的回复之后，10月17日，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下了最后通牒。塞尔维亚要在8天内撤出阿尔巴尼亚，如果塞尔维亚没有这么做，奥匈帝国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要求得到满足”。

最后通牒奏效了。1913年秋，列强们与塞尔维亚达成一致，认为塞尔维亚侵占阿尔巴尼亚领土是违法的。在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甚至也改了口，承认“塞尔维亚在该事件中应当受到更严重的谴责，这也是导致它近期收到最后通牒的原因”，并要求塞尔维亚赶紧做出让步。在收到最后通牒两天后，帕希奇宣布塞尔维亚撤军。至10月26日，塞尔维亚军队撤离有争议的区域。

1913年10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僵局为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为处理破坏两国关系的危机提供了经验。首先，最显著的是要强调最后通牒的效果。奥匈帝国于10月17日发出的信函都得到媒体的广泛支持，塞尔维亚最终撤出其军队的消息也令维也纳欣喜。贝希托尔德因为在斯库台事件中的胆怯曾被斥责，当时他却在尽享荣耀。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的沟通也留下了麻烦的印象：他们狡诈而不失礼貌，看似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充满了挑衅和不安分。不仅是利益冲突，执政形式也有矛盾。看起来，贝尔格莱德只有在维也纳的威逼下才会撤退，泰然接受任何因此带来的羞辱；一旦奥匈帝国有所松口，塞尔维亚则又开始尝试挑衅。塞尔维亚的行事准则就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更大。

对奥匈帝国来说，巴尔干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争表明了奥政府的孤立状态，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是如何无法理解其观点的。俄政府对奥匈帝国的敌意使得它理所应当完全不顾奥政府在该区域的利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强国对此事的冷漠。国际共同体不愿看到奥匈帝国在其南部面对真正的安全威胁并有权抵抗它，这反映了其态度上的大转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奥匈帝国是维持中西欧稳定的支点，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护好。但是到1913年，这样的准则不再那么吸引人。另一种趋势取而代之，1907年后，这种趋势在合约国中很快获得支持，即认为欧洲是一个联盟集团，每个国家都扮演重要角色，和地缘政治没有太大关系。许多英法出版的战前几年反奥匈帝国的政治报告也通过传播奥匈帝国不符合时代、必将消亡的观点，强化了这种趋势。更有甚者，像塞尔维亚报纸报道的那样，把奥匈帝国称为“欧洲的第二个病人”（在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帝国常被如此形容）。

特别令人警觉的是，来自德国的支持不温不火。1913年10月，德国政府很肯定地支持对抗塞尔维亚的政策——这正是危机有扩大的风险、可以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德国的行为与它的承诺有所背离。1913年2月，双方在加利西亚边境纠集的军队如此之多，令人觉得战争一触即发，甚至连军方都急需警惕。毛奇跟他的同僚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写信保证德国会在俄国袭击奥匈帝国时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是奥匈帝国挑起战争，德国就很难进行合法干预，因为德国人民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

奥匈帝国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态度。不仅不要求德国政府与奥匈帝国团结一致，威廉二世还禁止在柏林的外交办公处参与任何“有可能妨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军队胜利进程”的活动。他认为，巴尔干战争是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可将伊斯兰教徒赶出欧洲。如果巴尔干国家可以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稳固自己，这就可以成为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一种联邦盟国（“巴尔干共和国”）的基础。太平盛世、奥俄紧张关系的平息、新区域市场的形成，这都给德国出口创造了最佳的条件。威廉继续奉行这种路线。1912年，塞尔维亚入侵亚得里亚海的危机时期，威廉二世明确拒绝德国应该帮助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的想法。当然，巴尔干半岛局势当时的改变对维也纳来说“并不舒服”，但是威廉二世“绝对不会考虑为了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的利益，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11月9日，他甚至向外务部提议，要求维也纳同意塞尔维亚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宗主国。

这种疯狂的想法中还是有可以安抚已经很烦恼的奥匈帝国政府的部分。1912年11月22日，在一次与他的朋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秘密会谈中，威廉二世表示在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件事上，他愿意支持奥匈帝国的立场，尽管这意味着要冒向俄国宣战的风险，但是前提是英法不参与；一个孤立的俄国，他补充道，是不太可能冒风险挑起冲突的。但是就连这如此微弱的宽慰的信号都在三天后消失了，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基德伦发出官方消息称，德国会寻求多边解决方案。1913年2月，巴尔干危机达到顶峰，威廉二世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要求他与俄

国商谈，找到减缓危机的解决方法，因为面临的问题没有严重到要持续陷入武装僵局。10月18日，阿尔巴尼亚危机白热化，威廉二世在与康拉德的一次谈话中承认，情况可能“终于”达到“一个强国不再能控制，必须用武装来解决的地步”。但是10天后，他告诉在柏林的奥匈帝国大使，维也纳应该通过贿赂塞尔维亚领导人，以大量现金（“从国王开始，从上到下，他们都很需要钱”）、军事交换计划以及优化贸易条件来安抚这个国家。1913年12月，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保证，“几百万”就够收买贝尔格莱德了。

在1914年4月25日发出的报告中，外交部高官、奥德关系专家、时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康特·绍帕里（Fritz Count Szapáry）描述了一副毫无前景的德国对巴尔干政策的分析图。1909年3月，协助结束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强有力的德国后援已经成为过去，绍帕里称。绍帕里援引德国决策者委婉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一场为了保障经济文化活动实现无冲突的对话”。所有德国直接反对俄国的立场完全被摒弃，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德国都会事先询问一下俄国的意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放弃奥匈帝国、选择其他利益集团、给奥匈帝国施压接受塞尔维亚的胜利和挑衅，总的来说就是在“牺牲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这个观点更加戏剧化，奥匈帝国对俄国加强对塞尔维亚支持的理解经绍帕里添油加醋了一番，但是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家对德国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采取任何举措的失望。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柏林急于促成《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使奥匈帝国失去了与保加利亚结好的机会，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把它视为制衡塞尔维亚的潜在力量。

孤立感，以及1912～1913年不断遭到的挑衅，都令维也纳决心采取单方面行动。奥匈帝国主要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再那么抗拒使用武力解决。最显著的象征就是在俄国召集军队进行威胁时，奥匈帝国决定召回康拉德。“你必须再次担任总参谋长。”国王在1912年12月7日召见这位将军时疲惫地对他说。复职后，康拉德当然为战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不过都是些老生常谈。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他们对极端措施的抵抗逐渐弱化。1912年秋，几乎所有人（包括匈牙利首相蒂萨）都倾向于采取对抗军事威胁的政策。值得一提的例外就是弗朗茨·斐迪南，他在10月12日写给贝希托尔德的极有说服力的一封信中警告他不能允许帝国陷进康拉德的“魔法战争厨房”。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德国，这些国家很有可能避免各类高风险的手段。至于贝尔格莱德，弗朗茨·斐迪南补充道，想要挑起冲突的人是弑君的主战派（孰知，在8个月后，正是这些人将其暗杀）。总的来说，他不认为有任何发起战争的“必要”。发动战争的压力仅仅来自奥匈帝国皇室的仆人们，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侵害着帝国”。但是到了1912年12月11日，在美泉宫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连弗朗茨·斐迪南一反主张和平的常态，支持不惜任何代价与塞尔维亚进行武装对抗。

但是这个改变转瞬即逝，他刚一听到贝希托尔德和民政大臣的对立观点，这个法定继承人立即转变了他的观点，并表示支持贝希托尔德的外交方案。4个月后，轮到贝希托尔德反悔了。在1913年5月2日的联合

内阁会议上，由于被黑山再次攻击斯库台所激怒，贝希托尔德也第一次同意召集兵力对抗黑山共和国。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发起全欧或者局部战争，因为黑山共和国这次是完全孤立的，甚至连塞尔维亚都撤回了其兵力。贝希托尔德希望仅靠召集兵力就可以将侵略者驱逐出阿尔巴尼亚，并且深信俄国不会干涉。等真正开始行事之后，却发现召集兵力是没有必要的，尼古拉自己在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就撤退了。但是，该会议的基调预示着维也纳更加倾向战争的态度。1913年9~10月，在塞尔维亚第二次侵略阿尔巴尼亚北部之后，康拉德一如既往要求开战，贝希托尔德也再一次基本同意应战，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弗兰茨·约瑟夫也同意了。就在此时，只有弗朗茨·斐迪南和蒂萨（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还在做高级官员中的“和平鸽”。而最后通牒成功驱退了塞尔维亚军队，这本身也证明了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

这种喜战态度也表明，财政的限制增强了奥匈帝国战略决策的意识。针对巴尔干战争危机的局部兵力召集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帝国的经济。1912~1913年的额外支出总共3.9亿克朗，相当于奥匈帝国全年的军事支出预算，在奥匈帝国经济萎靡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奥匈帝国在军事上的支出却极少：在强国中，意大利的军事支出更少。奥匈帝国每年的征兵人数（占总人口的0.27%）比法国（占总人口的0.63%）和德国（占总人口的0.46%）都少。1906~1912年虽然是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资金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拨给了军事预算。尽管人口增长了两倍，但是帝国在1912年的步兵营士兵数量甚至低于1866年，当时，帝国军队须在克尼格雷茨和库斯托扎迎战普鲁士和意大利军队。双轨制政体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匈牙利一直遏制军事增长，建造昂贵的基础设施的压力是另一个原因。令情况恶化的还有夏季或早秋征兵对农业经济的极大破坏力，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农业劳动力无法从事收割工作。1912~1913年，批评政府者指出，和平时期征兵成本高昂，破坏了帝国经济，并且没有加强帝国防御水平。看起来，帝国负担不起战略征兵策略了。如果真的是如此，政府控制巴尔干地区危机的灵活度就大大降低。没有战略征兵的中间选择，决策就没有那么多细微差别。只有和平或战争的区别。

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

1912年夏，法国是否在一场纯粹的巴尔干冲突中支持俄国还是个未知数。法俄于1893~189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模糊的特征。其中的第二条条款规定，如果三国同盟中有任何一方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和俄国将同时、即刻调动起所有兵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兵到前线而不需要事先商议。这似乎在暗示一场巴尔干危机已经足以诱发奥匈帝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与此同时也自动带来了法国和俄国的反动员，二者的动态又会引发德国的反动员。因为1879年的德奥双边同盟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签署双方将在任一方遭受来自俄国或其

他俄国支持下的势力攻击时相互帮助。因此，这种机制表面上看起来会使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一场欧陆大战，更重要的是，无论奥匈帝国的动员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结果都会如此。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法俄军事条约中的第一条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形，才有干预的义务：a）德国进攻法国时；b）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时。该条款设置了比第二条更高的军事干涉门槛儿。文本中出现的矛盾反映了双方一开始就不同的需求。对法国来说，该同盟以及附属的军事条款只是反抗和遏制德国的手段；对俄国来说，其核心考虑则是奥匈帝国，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法国谈判代表还是不能说服他们的俄国伙伴放弃其在第二条中规定的随奥匈帝国的动员而开展的法国全面动员的内容。相应地，这有效地使得俄国手中握着随时挑唆起一场为了其在巴尔干野心的欧陆大战的遥控器（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

然而联盟（就像宪法一样），对政治现实充其量只起到大概的引导作用。巴黎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第二条中暗含的风险，并迅速对法国的义务做出限制性阐述。比如1897年爆发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30天战争”期间，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就告知圣彼得堡，法国不会将奥匈帝国的干涉视为条款上所规定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看出，法国十分不情愿被卷入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法国人拒绝承认它会给法国或俄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威胁。1911年，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修改了军事干预的条款。双方立刻为对方提供帮助的义务不变，但条件变为德国的全体动员。然而，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全面或部分动员，法国和俄国之间则也会同意采取合适的行动对策。

1912年，这种趋势却突然发生扭转，这种变化成为战前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的原因之一。多年以来，法国政府都试图让法国游离于巴尔干动荡的影响范围之外，但现在，他们扩大了法国的承诺，宣布了法国对纯粹的巴尔干危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更改的幕后人是普恩加莱，1912年1月14日到1913年1月21日他任外交部长，之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普恩加莱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巴黎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普恩加莱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与奥匈帝国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1912年11月，他又告知伊兹沃尔斯基，法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自己会孤立无援”。

追寻这种思想的演变历程并不简单。普恩加莱本能地对德国方面造成的威胁十分重视，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德国在1870年攻占他的家乡洛林时，他只有10岁，被迫举家逃亡。他所住的地方被德国占领了三年之久，直到法国对此进行了赔偿。这并不是说普恩加莱是一位布朗热式的收复失地主义者，但他仍然深深地质疑德国人，他们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共识的努力在他眼里则是陷阱和妄想。普恩加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法国和俄国之间达成联盟关系，这也是确保法国

安全的关键之举。当不同的政治思路让人充满疑惑时，他同样也想防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混乱再度上演。在这里，性格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倾向于清晰的立场，并一贯坚定地追寻他的目标。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于清晰定义的目标的坚定追求立场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保罗·康邦认为，普恩加莱的“死板”反映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不老道，这是法律界人士的显著特征”。保罗的兄弟朱尔也认为“在普恩加莱的头脑中，一切都是量化的、分门别类且被有序记录的，就像文件夹一样”。

然而普恩加莱并不是旨在将法国的安全政策赋予更激进目的的唯一一人。他的晋升有着这样的背景：当时，法国的政治基调正在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所遵循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主义复兴”的思路中发生转变。共和派政治家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后，倾向于对法国的安全政策采取一种防御性措施，其标志就是对领土边界安全以及全国性武装的强调。与此相反，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几年，法国又回归到另外一种政策，它考虑到军队的职业利益，同意延长训练时间，讲求指挥机构的集权化和效率化，并且设想，在下一场战争中明确地采取进攻作战。与此同时，1905年的和平主义和反军事主义的普遍情绪被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所压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浪潮——拥有这种激进好战性格的正是普遍年轻的、头脑聪明的巴黎人，但对军事力量的重建却成为共和国政策的信条之一。

或许是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势力在欧洲开始走下坡路，才使得普恩加莱将巴尔干半岛纳入他的战略考虑范围。早在1912年3月，他就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巴尔干本土危机和具有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之间的长期存在的差别，“已经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了”。在欧洲现阶段的联盟体系面前，设想“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陆”是不切实际的。“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事务上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触发奥德联盟的行动；与此同时，法俄同盟也会联手予以抗衡。”

普恩加莱究竟有没有意识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呢？在法国总理于8月到访圣彼得堡期间，他与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阐明了这一点。普恩加莱知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签订协议，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在4月已经告知他此事，但他并不知道该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当法国外交部长询问圣彼得堡其确切内容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萨佐诺夫之后称，他推迟了向普恩加莱发送信息的时间，因为他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被泄露给法国媒体）。8月，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大臣会谈期间，普恩加莱又提出了这一问题。萨佐诺夫将文本翻译成法语，呈现给对方。这些细节震惊了法国人，尤其是涉及针对奥斯曼帝国（如果有必要，还有奥匈帝国）的自发动员，更不用说现在仍然划分在奥斯曼控制下的马其顿领土，并且俄国将作为未来发生的任何争议的仲裁者。普恩加莱认为，该权限的规定“隐晦地出现在字里行间”。在会谈后他写了如下文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该条约似乎埋下了不仅针对奥斯曼帝国，还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的种子，而且它建立了俄国对诸斯拉夫王国的霸权，因为俄国成为所有问题的裁判。我对萨佐诺夫先生称，该条约完全没有符合之前我所被告知的内容，就让我开诚布公一些，这纯粹是战争条款，它不仅揭露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动机，同时让人有理由担心他们的企图是被俄国所激发的……

对于俄国在巴尔干政治上的影响，普恩加莱并不是唯一感到担心的人。法国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参赞让·杜尔塞（Jean Doulcet）几乎同时认为，巴尔干共识实际上是“瓜分计划的条款”。俄国对此的支持也说明：“俄国人准备绕开关于奥匈帝国的杂事，在不考虑奥匈帝国利益的前提下直接与土耳其人进行清算。”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可能会期待普恩加莱开始质疑在巴尔干问题上支持圣彼得堡是不是明智的，但他的发现（俄国已经如此深入地将自己卷入半岛事务）却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或许这只是单纯让他认识到，根据俄国政策的整体情况，巴尔干冲突不是可能，而是几乎注定要发生。因此，该问题要被纳入联盟的讨论范围内。另外一个更长远的因素是，普恩加莱认为（一部分法国军方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巴尔干战争是最可能将俄国彻底拉入伙，共同对抗德国人的方式。普恩加莱的军事顾问对他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开战的话，将会削弱奥匈帝国军队中1/2~2/3的力量，俄国也会派遣大量部队针对德国，因此会迫使德国分配更多的兵力到东线，这样会大大缓解法国在西线的作战压力。

无论他改变思路的原因是什么，1912年秋，普恩加莱坚定地支持俄国对巴尔干的武装干涉。9月的第二周（当第一次巴尔干危机迫在眉睫但还没有正式爆发时），他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会谈，这位法国总理对俄国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的破坏，或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都可能“迫使俄国放弃其被动的角色”。无论俄国是否有必要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是否会将德国卷入其中（根据德奥双边联盟，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国政府都将提前将此断定为合乎条约规范的，且不会耽误一分钟，去履行自己对俄国承诺的义务”。6周之后，战争还在进行，伊兹沃尔斯基向萨佐诺夫汇报称，普恩加莱对“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加入战争”“丝毫不担心”，并且他认为三方协约国将会取得胜利。伊兹沃尔斯基补充道，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最近才被呈上总理办公桌的法国总参谋部的细节性分析上的。

的确，普恩加莱如此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至于有时候他冒着赶在俄国前面的危险。1912年11月4日，他致信萨佐诺夫，提议俄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先发制人，抵抗奥匈帝国的干预。该提议着实让伊兹沃尔斯基大吃一惊，他写信告知了萨佐诺夫。直到最近，这位大使才指出，法国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参与一场看似纯粹的巴尔干事端。但最近，该观点发生了转变。巴黎现在承认，“奥匈帝国的任何领土入侵都会

打破欧洲的平衡状态，并且会触犯法国的根本利益”（与之前法国关于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并没有涉及自己利益的辩解相反，这次他们转变了口径）。伊兹沃尔斯基总结道，普恩加莱对巴尔干事务的前瞻性措施，标志着法国外交部的“新思路”。他建议圣彼得堡的外交部立即把握这种优势，以确保在未来取得法国和英国的支持。

直到11月中旬，萨佐诺夫仍然还在预测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的可能性（或至少进攻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并且希望知晓伦敦和巴黎对俄国的武装干涉有何反应。格雷的回答明显是一种敷衍，他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对于并没有发生的假设情况，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与此相反，普恩加莱的反应是要求萨佐诺夫进行更清晰的表述，他询问俄国政府具体的意图是什么？这必须明确地说明，否则“法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将会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没有达到其盟友的目标，或者又做得过火了”。俄国人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法国在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不会提供帮助：“如果俄国参加战争，法国也会效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必定会站在奥匈帝国的背后。”在几天后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的谈话中，普恩加莱坚定地表示：“如果奥塞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俄国完全可以依赖法国的武装援助”。

在其回忆录中，普恩加莱强烈否认自己做过这些保证，而伊兹沃尔斯基也很明显不是一个完全公正的证人。正是他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毁掉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生涯。在质疑声中，他从高位上下马，却仍然对埃伦塔尔和奥匈帝国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他是否为了坚定其同僚萨佐诺夫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决心而撒谎？还是正如普恩加莱自己之后承认的，他并没有夸大法国总理的言论，以此扩大他在巩固联盟中发挥的作用？

这只是可能的臆断，但事实证明它们都是假的。比如，伊兹沃尔斯基在9月12日的报道中称，普恩加莱宣称法国军队对在一场肇始于巴尔干危机的欧陆军事冲突有着必胜的决心，9月2日的总参谋部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而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独立的权限阅览该文件，这说明备受质疑的谈话确实发生过。11月17日，伊兹沃尔斯基记录了普恩加莱关于忽略俄国而感到不安，这也是真实的。在普恩加莱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的日记中，他同样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疑虑。此外，还有许多证人可以作证，诸如前总理和外交部长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他是一位聪明的法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他在1912年秋与普恩加莱多次会面。在里博1912年10月31日的私人笔记中，他写道：“普恩加莱认为，塞尔维亚不会撤退出于斯屈布；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干涉的话，俄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德国和法国也将根据条约履行他们的义务，加入进来。内阁特意做此决定，并认为法国应当坚守承诺。”

普恩加莱的转变在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他对德国的不信任和对契约的死守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巴黎政治学院的积极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对斯拉夫民族的同情和对德国的敌对是不证自明的。军方高层对此也表示普遍支持。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办公室的维尼亚

尔上校（Colonel Vignal）在其1912年9月2日的回忆录（普恩加莱在与俄国大使的交谈中还引用了他的话）中认为总理应当意识到，巴尔干地区开始的战争将会为协约国的胜利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奥地利人将会在与南斯拉夫的战斗中元气大伤，德国人必定会倾其全力，从西线的进攻中抽调部队，到东边抗衡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三方协约国将面临最好的获胜机会，这种胜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尽管奥匈帝国可能会在巴尔干取得地区性的小胜利”。

而其他人对此则并没有表现出支持。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就对普恩加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几个星期里针对奥匈帝国采取的对抗性立场感到惊慌。1912年11月5日，在回到巴黎期间，他写信给其兄弟朱尔，抱怨媒体的一篇文章（明显其背后的怂恿者是普恩加莱）直接对奥匈帝国进行挑衅，以一种“毫不巧妙、毫无耐心、毫不谨慎”的姿态责备维也纳。保罗进一步采取措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晚上与普恩加莱进行对话。康邦冒着风险向对方建议，法国应当考虑允许奥匈帝国拥有新帕札尔区（该区只是“一堆石头”，毫无价值可言），这样他们就对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兴趣了。而总理的回答着实让他一惊：“根本不可能让奥匈帝国这样一个没有交战、没有权利的国家得到任何好处，这将让法国产生非议，并破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普恩加莱继续指出，“法国在战争开始就没有太大作为”（此时，康邦在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惊叹词），“而我们同样有义务分一杯羹，比如爱琴海的一座岛屿……”次日早晨（11月3日星期天），康邦经过一夜对此谈话的担忧，再一次前去会见普恩加莱，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为了区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区，不值得发起战争。”他对总理说。比起带来的好处，一座爱琴海小岛将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康邦同时对普恩加莱所言的按照“舆论”压力行事表示质疑。与普恩加莱的主张不同，法国公共舆论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姿态，康邦警告称，政府不去煽动起“让问题不可能解决的舆论”是非常重要的。普恩加莱无法接受对方的意见，谈话终止了：

> “我已经在内阁议会上跟政府摆明了我的立场，”普恩加莱冷冷地回答，“他们已经认可了我的观点，现在这是内阁的决定了，我们没法违背。”
>
> “我们没法违背？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除了只有两三个部长知道，其他的内阁成员根本就一无所知，且此类会谈一直对此问题有所保留。”
>
> “这是政府的决定，”他继续敷衍道，“对此施加压力是无效的。”

这种交锋中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上述内容，因为这并不是要求一个行省的问题，奥匈帝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了军队，将其交给邻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来管理。这件事早就成为历史，被人们淡忘了。更关键的是普恩加莱对法国深入、直接地卷入巴尔干问题的意见所传达出的内涵，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让人匪夷所思的笔记中所记录的：如果将一个行省让给奥匈帝国，那么巴黎将寻求以“爱琴海岛屿”的形式的赔偿。更悲观的信息不仅从康邦的信中，还能从里博的言论中感受到：法国的巴尔干政策不再是根据新情况随机应变的了，而是陷入坚决而果断的承诺中，陷入“根本没有回头路”的“决定”中了。

争取主动权的法国

1912年12月19日，俄国驻巴黎的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上校（Colonel Ignatiev）在一封信中记述了与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一段冗长的对话。米勒兰提出了一个关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防线增加兵力的问题：

> 米勒兰：您认为奥匈帝国进行动员的动机是什么？
>
> 伊格纳季耶夫：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猜测是很困难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奥匈帝国针对俄国的准备动作，其意义远非防卫性的。
>
> 米勒兰：好的，但您不认为占领塞尔维亚是让您采取行动的直接信号吗？
>
> 伊格纳季耶夫：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并不期待欧洲爆发战争，或是采取某些手段激化欧洲的冲突。
>
> 米勒兰：所以，您要让塞尔维亚自由行动了？这当然是您自己的决定。但我们也要理解，这不能归咎于我们。我们准备好了。

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米勒兰似乎对他含混不清的回答“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有些恼怒”。这位法国部长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是都拉斯的问题，而事关“奥匈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霸权”。对此，俄国政府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法国部长的言谈之中有些地方十分值得注意。这位部长是位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处理外交事务不是很娴熟，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关注养老保险、教育以及劳动环境，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然而到1912年，从在校期间就是普恩加莱挚友的米勒兰，却成为法国民族复兴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坚韧、勤勉和强烈的爱国情感等优秀品质，他为人们所敬畏。他的目标不仅在于重振士气，加强军事领导权威，还在于为法国人民灌输一种尚武的精神。他与伊格纳季耶夫的交谈反映了1912～1913年巴尔干冬日危机时期，法国领导人普遍的一种态度。伊格纳季耶夫写道：“卡斯泰尔诺将军（General Castelnau）曾两次对我说，他本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甚至十分喜欢作战。”的确，整个法国政府“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支持我们，共同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如果需要的

话，不仅在外交方面，还有军事方面”。伊格纳季耶夫认为，这种主动性的原因在于，巴尔干战争为法国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扩大冲突的范围，因此德国也就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俄国上，“将法国抛诸脑后”。诚然，1912年11月和12月，来自巴黎的信息言辞过于激动，以至于萨佐诺夫本人不得不敦促法国冷静下来。

该政策背后的协调者正是普恩加莱。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外交部长和总理在这两个岗位上来来去去，并没有给法国的外交政策留下什么谈资。但普恩加莱却是个例外，他将总理的职权和外交部长的职位结合起来，排斥不受欢迎的意见。他经常早早地就来工作，这种行为明确地体现了以往非常闲适的法国外交部在这些天内出现的严肃氛围。他坚持阅读并标注档案文件，定期查阅邮箱；还有人称他时不时地自己撰写文章。他并没有耐心应付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使，1914年1月他怒气冲冲地称，这些部长过于轻易地就接受他们赞同的政府观点。为了确保外交部不会失去控制，普恩加莱成立了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顾问组成的内阁，正如德尔卡塞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所作所为一样。

1913年1月，普恩加莱当选共和国总统，他是直接通过总理职位成为法国总统的第一人。奇怪的是，这在理论上削弱了他的外交决策能力，因为根据传统和经验，尽管拥有让人敬畏的特权，但总统的职位在权力中并不处于重要位置。在议会两院的选举中，人们期待他能够作为“向前滚动的弹球”，在内阁陷落时能够力挽狂澜。但是这位前总理并不甘心从此大权旁落，在选举开始之前，普恩加莱就明确表示，他想要充分利用总统一职所赋予的宪政手段——他的头脑和对宪法的深刻理解确保他能够放开手脚施展抱负。1912年，他甚至出版了政治科学教科书，书中他认为，总统的权力（比如解决议会问题）是关键的稳定因素，总统能够恰当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出色的角色。

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之后，普恩加莱立刻对候选人选举施加间接影响，以确保他在外交部的继承者是一个实力孱弱、毫无经验或是对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观点唯命是从，抑或是结合所有以上特征的人。查尔斯·若纳尔（Charles Jonnart）于1913年3月接替普恩加莱的职位，他正是其前辈理想的人选：他曾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对外关系一概不知，且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需要完全依靠普恩加莱的手下、政治部首领莫里斯。普恩加莱于1913年1月26日在其日记中坦言：“我仍然控制着若纳尔，我每天都要去外交部。”

当法国的领导人在扩大与俄国的联盟职责时，与法俄军事条约紧密相关的条款中出现了重要变故。法国军事指挥官为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调度计划感到担忧（该计划将俄国地区的焦点从波兰转到了往东几百英里的地方），因此不得不拖延西线的动员时间，这破坏了条约文本所规定的同时动员的设想。1911年法俄总参谋部年度会谈中，法国代表团以此问题向其俄国同人施压。俄军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的回答并不是特别能给予对方信心。他承诺，俄国的武装力量将倾其全力在动员的15天之后尽快实施行动。但他还承认，必须到1913年和1914年，才能

够完成给部队配备野炮和机关枪的工作。

在条款的约束下，俄国究竟能多快地调兵、调动多少人以及调遣到哪个方向，这些问题成为1912年和1913年法俄内部磋商的首要问题。在1912年7月的会谈上，法国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请求俄国将其所有通往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防线的铁路都改成双轨铁路。有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甚至可以将运送兵力的速度提升4倍。1912年7月的法俄海军条约为双方海军达成密切合作和协调提供了契机，这是双方合作的另一大收获。此外，俄国的保证逐渐提高。1912年，日林斯基承诺在动员第15日以80万大军进攻德国；次年，承诺得到了升级，他认为自己能够再提前两天达成上述目标。动员的方向是双方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内部磋商的记录记载，法国军官不遗余力地将俄国的视线集中到德国身上，而不是将奥匈帝国作为实质对手。尽管法国人愿意承认以巴尔干事端为战争借口的合法性，但如果俄国纠集大量军队对付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不得不在西线孤军奋战，抵御大量来犯的德国人，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联盟的军事目的就不复存在了。1912年的一次会晤中，这个问题被提出，日林斯基并不认为俄国还需要考虑其他威胁：奥地利人同样也在改善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由于对民族士气来说，这个地带是敏感的，因此俄国选择冒着在巴尔干失败的危险则是不可能的。瑞典人是另外的潜在威胁，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但霞飞坚信，“摧毁德国的军队”实际上将能够解决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这一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总参谋部之后的记录中总结道，会谈的结果是恰如其分的——“俄国的指挥官承认德国是最根本的敌人”。

普恩加莱也尽其所能说服俄国方面。在1912年8月起身前往圣彼得堡之前，当他询问霞飞他应当和友方谈什么问题时，这位法国总参谋部长“指出了改善铁路的问题，其他的就没有多说了”。抵达俄国首都之后，法国总统认真地不停向对方询问铁路问题：“我想让他（沙皇尼古拉二世）意识到我们的总参谋部提出的完善铁路的问题，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向他（萨佐诺夫）解释了将道路扩充2倍、4倍的必要性”，等等。普恩加莱的记录甚至还让我们了解了俄国管理层内的权力之争：它发生在科科夫佐夫和军事指挥之间。俄国首相对在巴尔干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作为金融界人士，他并不热衷于将大把大把的贷款都用到修建铁路这一目的可疑的商业行为上。面对普恩加莱的观点，他回复道，俄国近期正在“研究”改善铁路的问题。普恩加莱则坚持称：“考虑到时间很紧张，因为很有可能德国在俄国防线地带取得的战果将决定一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平淡无奇的设想给科科夫佐夫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普恩加莱认为，只有对方由此“感到不快”，俄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够在不直接咨询财政大臣（即科科夫佐夫）的前提下赢得法国政府的支持，以保证军事拨款。普恩加莱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给俄国施加压力，使其加强自己的武装。

法国人自己也在按照说服俄国的那一套行事。1911年7月，约瑟夫·霞飞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这一任命使法国的战略握在一个信奉“进攻理论”的人手中。法国的军事

家倾向于在将来与德国的对抗中采取防御性手段：1903年的第15号作战计划以及1909年的第16号作战计划都设想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采取防御性的调度，之后则在了解敌军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反攻，这种思路与1910年苏霍姆利诺夫的调度计划截然相反。但是霞飞却修改了第16号作战计划，允许部队先发制人，从阿尔萨斯打入德国的领土，因为他认为“仅凭进攻就足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同时，他比他的前辈更积极地与法国的盟友和协约国伙伴搞好关系。作为法国方面，他推动了1911年、1912年和1913年召开的联盟内部会议，他与其俄国同僚日林斯基的友谊是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也与英国军事指挥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与亨利·威尔逊。霞飞是第一位将英国远征军纳入自己的部署的法国军事战略家，他对第16号作战计划的修改就包括对集中在比利时边境的英国军队做出的细节性规定。

普恩加莱在霞飞那里发现了一个十分适合他自己的战略观的军事伙伴。诚然，两人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比利时的中立的问题。根据德国方面泄露的文件以及其他军事情报，如果爆发战争，德国人将通过中立的比利时对法国发动进攻。1912年2月21日普恩加莱新任总理时，当他在外交部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商讨法国的防御部署时，霞飞提出了一项先发制人的策略——当然也是通过比利时来达成，霞飞认为，这是抵消法国在人数上不敌德国的唯一方法。英国当然会理解这项措施的需要，并且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当时十分冷淡，这意味着甚至有可能提前与比利时达成共识。然而普恩加莱却断然拒绝考虑霞飞的意见，因为进攻比利时将会顶着冒犯英国舆论的危险，并且格雷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恪守他对巴黎的诺言。在法兰西共和国，民政权力是大大高于军事权威的，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而普恩加莱的远见和智慧则在于，他将与东方国家的协议中高度带有攻击性的因素，与法国前线需要采取的策略性的防御姿态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法国如何解决1914年几个交战国所面临的一大棘手难题的方式。

在普恩加莱胜任共和国总统之后，他继续对承诺进行强化。1913年春，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德尔卡塞的任职期却很短，从一开始他就只打算在圣彼得堡待到1914年的法国选举。然而，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离职的杰出（在位时间很长的）前辈的决定对法国的政策动向一点儿都不担心。在圣彼得堡的德尔卡塞和在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即联盟的双方大使都对德国有着强烈的主观上的憎恶。德尔卡塞的这种情感在近几年甚至变得更加强烈，当他东行的路上途径柏林时遇见朱尔·康邦时，据说他拒绝下火车，防止自己鞋子的灵魂被德国的土壤玷污。这位新任大使以其对铁路战略的专业性知识著称（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甚至向俄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修建铁路以对抗大英帝国）。不难想象，俄国媒体热烈欢迎他的上任，称“他好战的性格”将成为协约国的一笔资本。普恩加莱在给沙皇的介绍信中称，这位新任大使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法俄联盟之间的关系”，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向对方灌输向帝国西部防线修建军事铁路的重要性。伊格纳季耶夫称，德尔卡塞已经被法国政府授权，“让我们提出用于此事的任何数额的贷款”。

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从1913年3月23日到1914年1月）中，德尔卡塞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过于忙碌，以至于人们很少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场合见到他。在他第一次会见沙皇时（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他强调了“完成铁路工作、实现总参谋部的意志”的重要性，并出奇招：直接请求科科夫佐夫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在圣彼得堡工作生活期间，除了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德尔卡塞几乎不与任何人会面，就连英国大使都觉得和他约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向其俄国同人夸口说：“我了解俄国所有的外交政策，我身边的人对此却知之甚少。”德尔卡塞监督着诞生了法国巨额贷款成果的谈判：法国资本市场为俄国的私人铁路公司提供25亿法郎，有效期为5年，每年分期付款额度为5亿法郎；作为条件，西部的军用铁路要按照1913年共同商讨所设想的进行优化。1914年1月开始，莫里斯走上了德尔卡塞的位置，他和他的前辈并无二致，同样计划将战略性强化和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强硬作风结合起来。

普恩加莱的压力

在普恩加莱前18个月的总统任期里（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他都在逐步提高法国军事计划的进攻性。他支持由法国内阁和参议院于1913年夏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法国军队的兵力提升至约70万人，使得与德国仅差5万兵力，并向俄国展示出法国真的要为了对抗“主要的敌人”而贡献自己切实的力量了。通过选任副总理、掌握国防部高层权力等措施，普恩加莱成为法兰西第三帝国成立以来最强势的总统。

而这一切行动都有着一层公众的意义。普恩加莱—米勒兰—德尔卡塞三人之间所形成的联盟关系引发了比利时驻法国大使纪尧姆男爵的注意。纪尧姆对普恩加莱一派所坚持拥护的《三年法案》表示震惊，虽然这帮助普恩加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他也同时“忽视了其中不断滋生的不稳定因素”。纪尧姆在1914年1月写道，“正是普恩加莱、德尔卡塞和米勒兰三位先生”在现在的法国社会中“发起并推行民族主义、强硬外交政策和沙文主义政治”。他将此视为“当今欧洲最大的一次咎由自取”。普恩加莱不只是一个巴黎的贵族，纪尧姆在1914年5月写道，他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极端手段在全国赚取了人们对自己的支持。他是一个叱咤法国各地的优秀的演说家，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赞誉与支持。

尽管得到了全国这么多地区的支持，法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波动性仍使普恩加莱当时的位置变得并不是那么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高层也频繁出现变动，就连普恩加莱的亲信查尔斯·若纳尔也在短短两个月里离开了外交部长之位。接替他位置的外交部长皮琼则表现出一副与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姿态，甚至开始在与德国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加温和（或者说不再那么强硬）的姿态。当普恩加莱1913年归来时，他找了另

一个傀儡替代皮琼。新任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就职之前就已经承诺将继续遵循《三年法案》和普恩加莱的既有外交政策。总统希望缺少经验的杜梅格能彻底听命于自己。但他并没能如愿，因为杜梅格作为亲俄派的同时，暗地里也跟普恩加莱对着干，甚至任命了普恩加莱的死敌约瑟夫·卡约为财政部长，并逐步开始剥夺总统在外交政策讨论中的话语权。

普恩加莱始终在面对着一群强大且不择手段的政敌。1913年5月，当总统与天主教会高层的一次秘密谈话所达成的内部交涉遭到曝光并在内阁引起轩然大波时，他的政治图谋遭到重创。1913年春，普恩加莱和皮琼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这种谈话，目的是选举一名能够支持法国的教皇继任者。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碍，因为这能巩固法国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地位。但在1914年之前的法国，一名政界的高层领导和天主教廷之间的此类协议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政治文化本身就在抵制宗教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次讨论本来是绝对保密的，就是为了防止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从中作梗。但在1913年4~5月，意大利驻法国使馆收到的三封电报披露了普恩加莱、皮琼和梵蒂冈之间的交涉。5月6日，内政部长让-路易–吕西安–克洛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在随后爆发的舆论风暴中，皮琼威胁称如果此类电报继续被泄露，他将辞职。电报的泄露停止了，但覆水难收，因为这些敏感的材料日后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作为证明普恩加莱失职的证据。

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个人方面的问题：普恩加莱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一个私下的过场就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亨丽埃特。但1913年5月，在人们知道了亨丽埃特的前两任丈夫都去世了的消息后，他才迫于其妻子的压力，并遵循其不久前刚去世的老母亲的遗愿，正式通过宗教仪式迎娶了她。后来的这次仪式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普恩加莱一直担心泄露出去的话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出于对此的担忧，他也费尽心思收买那些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以防被抓住把柄。他甚至邀请亲英的激进派领袖和反普恩加莱一派的乔治·克里孟梭（后来拒绝了他的提议）共坐一叙。对于各种阴谋的担忧，直到“一战”爆发，一直伴随在这位总统左右。

换句话说，普恩加莱已经很脆弱了，甚至某些时候他可能将面临必须放弃自己现有政策的局面。民族主义的锐气于1914年年初便开始消退，形成了另一股复杂的力量。普恩加莱在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的眼中“逐渐成为遭人厌恶的对象”，他的政敌克里孟梭和卡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他发起口诛笔伐。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之下产生的新的对立局势可能迫使《三年法案》被废除，并由此让法俄同盟变得不那么稳固。1914年4月26日和1914年5月10日的大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很难准确定位了，但这意味着《三年法案》的根基开始动摇。随着1914年6月2日杜梅格政府的垮台，普恩加莱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可以拯救这项法案的政治伙伴。经过几次碰壁之后，普恩加莱和前社会主义者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搭上了线，后者在6月1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内阁，在17个内阁成员中，有10个人都支持《三年法案》。当新的政府于6月16

日再次赢得大多数支持时，内部的危机似乎平息了。《三年法案》安全了，至少暂时是如此，但这种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

国际问题的发展引发了更多的关注。1913～1914年，巴黎的政策决策者们对俄国势力的增强变得尤为关注。法国军方观察员报告称，俄国的军队自对日战争的挫败后已经取得巨大的发展；俄军士兵是“一流的，坚韧的，训练有素的，有着强烈的纪律性和对国家的巨大忠诚”，俄军也在为了战胜其“最终的敌人”而时刻准备着。法国金融专家证实了俄国的这些情况。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资深经纪人M·德韦纳伊（M·de Verneuil）长期研究俄国的经济。德维纳伊曾长期参与俄法之间的商贸活动，在此期间，他也曾前往圣彼得堡，探讨科科夫佐夫政策下法国新贷款的事宜。在1913年7月7日的一封信里，他向外交部长皮琼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德维纳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但从他最近到访俄国的经历来看，真实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

>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将目睹俄国在经济方面一个空前的成长，这将相当于（如果保守地说，不会超过）美国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革。

不仅德维纳伊有这种感觉：在1914年，法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俄国“巨人”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着“一流的”士兵和“无尽的权力”。在参加了那年春季的演习后，该外交官更是激动地表示：“我看的越多，就越觉得惊叹，俄国人真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种。我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都感觉不到这种源源不竭的力量与能量。”媒体的一些报道则加剧了这种感觉。1913年11月，法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驻俄国通讯员在文中宣称：

> 我们不能过于夸赞俄国军队的强劲，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自身的问题，在法国，军费开支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俄国人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俄国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取胜。俄国的人口随着其财富的发展而增长，也让军队的扩大成为可能。他们也完全没必要抑制这种增长。

而将此看得最严重的正是普恩加莱自己。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来看都对法俄同盟是好事。但在巴黎，也给人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疑惑。如果俄国变得足够富有、强大，以至于不再需要依靠法国的援助，那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最起码，俄国的这种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局势变得不利于法国政府，因为正如一名外交官在1914年2月表示的：“俄国每多获得一分自立的力量，就将多挣脱一分来自我们的控制。”而法国这种忐忑的心情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这完全是建立在对于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过度的评估之上的。但这些错误的判断已经

足够让法国人乱了阵脚，在结合了其他情况之后，法国政府认为目前针对德国的手段也难以为继了。

在1914年6月底，令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他还在保持镇定。他的政策是安全的，至少在目前政府垮台之前是这样的。勒内·维维亚尼在与议会的周旋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但在外交事务上则完全是个新手。万一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作为总统应该是可以轻松控制住局面的。积极的军事政策和对巴尔干地区的战略保持不变。但从中长期来看，普恩加莱一派的未来显得就不那么明朗了。这种奇怪的政治组合也将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后影响法国的政策。就像其他很多因这件事而陷入困境的决策者们一样，普恩加莱也将面临分秒必争的压力。

第六章 最后的机会：1912~1914年的缓和与危险



时间是1914年年初。“自从我进入外交部任职，就没遇上风平浪静的时候。”阿瑟·尼科尔森写道。尼科尔森的这段话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那令人好奇的特征上，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各国武器储备迅速增加，一些军方高层及公众领袖表现得越来越好战，欧洲国际体系却在整体上展现了危机处理和缓和外交方面的惊人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半里，其发生的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呢？难道外交上的缓和只不过是在掩盖不断深化的联盟内部的敌对关系？若果真如此，缓和局势下所隐含的事实与导致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缓和政策的局限性

1912年夏，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在一众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在波罗的港（即帕尔迪斯基）——俄国海军在柏格里半岛（今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海军驻地，进行了非正式对话。这次会面被认为是对沙皇在1910年到访波茨坦的回访。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位君主一起漫步、共同用餐、检阅士兵，而官员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气氛融洽。时任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和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首次在波罗的港会面，两人惺惺相惜。他们都很拘谨且保守，属于温和派。他们之间的对话冷静且坦率，详细讨论了两国在武力装备方面的有关政策。他们互向对方保证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采取守势，都认为当下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局势动荡不安的印象。霍尔维格说，大家都希望，“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多的相同利益，以至于他们只会把军备竞赛当作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打算动真格的”。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

霍尔维格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谈及各种话题，但他们都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谈到关于巴尔干半岛日渐动荡的局势时，萨佐诺夫向贝特曼保证，俄国针对基督教斯拉夫国家的“任务”早已是过去式。萨佐诺夫重申，俄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从中谋利。霍尔维格表示，尽管有时德国被认为有意干涉三国协约之间的内务，但他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反过来说，他也觉得德国并无必要与英、法、俄三国培养过于深厚的友谊。在会面结束之际，当萨佐诺夫问起“你觉得如果把奥匈帝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会怎么样”时，霍尔维格向他保证，德国不会在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萨佐诺夫问道：“所以（德国）不会鼓励奥匈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吗？”霍尔维格回答，柏林方面并无兴趣支持维也纳这些“冒险”政策。会面结束前，双方都表示，将这样的会面变成每两年一次的“例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德皇威廉二世在这次会面上已尽力表现得最好。沙皇一直害怕与这位德国同辈会晤：他总是很勉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据科科夫佐夫的观察，这是因为“沙皇只是害怕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而这并非他的本

意”。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尔塔勒斯伯爵在会面前曾在备忘录里写道，威廉二世被告知在会面中要避免谈论有倾向性的话题，尽可能地采取聆听的态度，只有这样，沙皇才有机会发言。在大部分时间里，威廉二世都控制得非常好，但仍免不了有些小纰漏：在沙皇的“斯坦达特”号上的第一顿午宴后，威廉二世支开萨佐诺夫，直接与沙皇谈了一个多小时（“针对沙皇”可能是更合适的说法），说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称父母从未给予他关爱。萨佐诺夫觉得威廉二世的表现“明显过了头，没有表现出他这样地位崇高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尊严”。会面的第二天，一行人在酷热中参观了一些废弃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彼得大帝建造的港口周围。威廉二世又将之前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强留科科夫佐夫听他反复唠叨建立泛欧石油信托基金的重要性，要以此抗衡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科科夫佐夫回想起这次对话时说：“他的表达过于生动，完全将正式场合下的礼仪抛诸脑后。”

> 阳光十分灼热。沙皇并不想打断我们的对话，但他站在威廉二世的身后，向我示意他已经不耐烦。不过，威廉二世的热情越发高涨，不停回应我的主张。最后，沙皇的耐心消耗殆尽，向我们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于是，威廉二世转向他，用法语说道：“你们的首相并不是很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极力说服他，不想让他心存犹疑。我希望您让我用我们在柏林搜集到的资料来证明我的观点。等一切准备妥当，我希望您允许我继续和他讨论这一话题。”

这场景十分值得描绘：猛烈的阳光灼烧着要塞废墟里的乱石，科科夫佐夫穿着夹克，热得几近昏厥；威廉二世面部赤红，他的胡须颤抖着，对他的话题越来越投入，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完全不在意身边人是否难堪；而沙皇站在他身后，极力想要从这种折磨中逃脱，躲到阴凉处。没人知道威廉二世最后是否将“在柏林搜集到的关于石油财团的资料”发给科科夫佐夫，因为这说不准——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德皇在皇室中被认为是“难应付的人”，也不足为奇。

关于威廉二世的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对双方的融洽气氛造成什么损害，这次会谈在非常好的氛围中结束。7月6日，一份官方联合公报发表，声称“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这不仅成为两位君主之间‘友谊关系’的又一例证，也证明了两国想要维持‘双方之间长久以来可敬的传统’的‘坚定的决心’”。

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几年的缓和局势中，波罗的港的会面成为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最高点。但实际上，这次会面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两国之间的对话虽然友好，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定。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概述，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会面既没有达成“新的共识”，也没有“在团结各个势力上有所进展”。而这种团结早已被证明对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是非常有价值的。霍尔维格和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局势问题上做出的种种保证的背后，暗藏着十分危险的矛

盾：德国的确在加紧对奥匈帝国的限制，维也纳对“柏林已对同盟国许下坚定承诺”表示怀疑，而俄国人正在并将继续和巴尔干地区对着干。萨佐诺夫对霍尔维格保证，俄国并无意趟奥斯曼帝国这摊浑水，而且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任务”早已结束。这样的保证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实际情况要糟得多。如果这些保证就是俄德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那么这基础的确非常不牢靠。哪怕是波罗的港会面的联合公报里那些谨慎的套话，都足以在伦敦和巴黎引发一阵猜想。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在波罗的港会面前后都曾向伦敦及巴黎方面保证，自己对三国协约的承诺比以往更加坚定。与之相反的是，俄国在波罗的港进行的试探性和解显示出多方参与的缓和政策是多么难以捉摸。

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缓和政策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与政治上的约束。1912年2月的霍尔丹任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和英国没有就海军武力限制达成共识，而霍尔丹任务的始作俑者是霍尔维格。他的目标是和英国达成这样的共识：要让国际问题（尤其是殖民问题）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而不是走上竞争和对峙这条路。但是在首相眼里，蒂尔皮茨将军在海军建设上的野心会成为达成这一共识的主要障碍。然而德皇个人对海军建设项目表示出的支持态度，以及德国决策层中混乱而脱节的架构，都说明需要用间接手段来瓦解当前的海军策略。为了削弱蒂尔皮茨将军的势力，霍尔维格站到了海军部这一边，成为海军部长期对抗帝国海军办公室斗争中的一分子（海军部对蒂尔皮茨将军更注重船舰数量而忽略对海军人力的教育及培养这一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陆军长期以来面临资金短缺，而海军的预算却不断增加。霍尔维格就怂恿陆军坚持要求重新整装及扩军。当然，霍尔维格也和德国驻英国大使梅特涅沟通过，为的是他之后试图让德皇相信这种观念时能握有更多的胜算：“相对于当下采取的关于军事力量及挑战的政策，控制海军扩张或许对英国更有用。”总而言之，霍尔维格费尽心思地采取各种手段，想把帝国的国防政策重心从发展海军上移开。

正如约瑟夫·卡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所作所为，霍尔维格也动用了一位非政府官员身份的中间人：立足于汉堡的运输界大亨阿尔伯特·巴林。他为拓展沟通的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许多商界及银行业的大人物一样，巴林深信文明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认为欧洲战争会是一项愚蠢的犯罪。通过银行业的关系，他接触到了英国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并通过他向柏林传达英国在原则上有意寻求在海军武力和殖民等问题上的相互理解。1912年2月，陆军大臣霍尔丹动身前往柏林，试探达成这一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为什么霍尔丹任务最终失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及步伐上不予妥协——霍尔维格和极不情愿的威廉二世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的。真正的绊脚石是柏林方面坚持要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换句话说，柏林方面希望与英国约定，如果德国与欧洲另一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英国必须保持中立性。而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愿做出这一承诺？有观点认为英国被其与法国之间的义务所束缚，但这一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霍尔维格想要将这一“保持中立”的约定限定于德国并非侵

略方的情况下，同时也明确表示，若与现有的由高层缔约方制定的协议无法协调，任何新达成的共识都将作废。英国对这一约定有所保留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有所付出却毫无收获：英国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海军竞争中摘得桂冠，享受毫无争议的优越感。霍尔维格和威廉二世想要以中立协议换取德国永久认同英国在海军实力上略胜一筹，但英国有何必要以这样的交易来换取它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呢？总的来说，并不是船只什么的阻碍了双方达成共识，而是因为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无法调解。

霍尔丹从柏林返回英国，对他在德国所看到的混乱连连摇头。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出来，霍尔维格根本没有说服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办公室站在他这一边。但同样在英国，认为这次任务失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一开始，英国只把这次任务当作纯粹的试探。霍尔丹不得不以学术的名义远赴柏林（他当时担任伦敦大学皇家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份英国起草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描述道，他“既无权力和德国立下协议，也无法对其他同僚进行约束”。霍尔丹曾向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保证，这趟德国之行是为了缓和政策，而不是为了立下友好协约。在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努力想要破坏协议，他暗中警告普恩加莱，并唆使外交部向英国施压。此外，据说，在对话期间为霍尔丹提供资料和建议的那个人正是阿瑟·尼科尔森。他一直相信，任何对德国的让步都会增加与俄国成为敌人的风险，而俄国的支持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从不掩饰他对霍尔丹冒险行为的反对。1912年2月，他与伯蒂说起此事：“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一直占据的有利地位，放下身段，努力把自己陷于所谓‘相互理解’的泥沼中，这样会毫无疑问地损害我们与法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伯蒂也认同霍尔丹之行是“非常愚蠢的一步棋”，它只不过是为了让“驱赶格雷的激进分子们”闭上嘴而已。带着这样的出发点，这项任务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让尼科尔森和伯蒂感到欣慰的是，格雷不接受“中立公约”，霍尔丹任务宣布失败。英国驻德国大使戈申从柏林写信给尼科尔森表示祝贺：“有这样的好结果，你功不可没。”

正如尼科尔森的笔记所描述的，缓和政策的发展（至少在英国）受到了集团式思维的局限，而这一思维方式仍被认为是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根基。缓和政策或许可以成为集团式策略的一个补充方案，却永远无法代替它。1911年11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爱德华·格雷爵士非常利落地描述道：“一个人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代价来争取新的友谊。我们当然要接触新朋友，但绝不能以我们现有的友谊为代价。”

也正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为霍尔丹任务投入太多，它的失败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的英德缓和局势得以持续。只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双方未能就海军问题达成协议，而那些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非凡意义。1912年秋，巴尔干危机爆发，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向英国大使戈申提议，两国应该统一认识，防止双方变成敌对关系。在格雷这方面，他让霍尔维格知道他急切盼望着和英国有“紧密的政治合作”。英国和德国共同资助了1912年12月至191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针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引发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两国

帮助起草了妥协方案，并极力主张对它们各自的盟友（俄国及奥匈帝国）做出限制。

当然，这里面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外交大臣基德伦在1912年突然去世，继任者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合作，希望能让英国看清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激进政策，从而摆脱对三国协约的依赖。格雷则希望德国能继续对奥匈帝国施加控制，以免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对欧洲和平造成威胁。但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准备好在各自的联盟政策上进行实质性改变。英德之间的“巴尔干缓和政策”大体上还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双方虽都十分专注于这一地区，但实际上它们在巴尔干半岛并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利益。另一个原因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无意发动战争。这一缓和策略没有实质内容，也只在欧洲和平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缓和政策的发展潜力受到了联盟内部集团反弹的约束。这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联盟是国际体系内非常稳定及坚固的组织。许多主要决策者已经察觉到联盟内部有多么脆弱和不稳定，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奥匈帝国时常担心德国会马上将自己与俄国区别对待，置哈布斯堡的盟友于不顾。不过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有证据显示德国在1910～1913年对奥匈帝国的限制鼓励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却并没有为奥匈帝国带来任何安全利益作为弥补。在波罗的港的会面中，普恩加莱察觉到一些不祥的迹象，预示着俄国和德国在巴尔干及海峡地区问题上会达成合作关系。1913年春，法国渐渐传出对英德两国相互示好的不满，乔治五世则被指想与德国发展良好关系。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则认为，若有蛛丝马迹能证明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和趋势，前景将不容乐观：俄国会背弃协约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伍，重演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皇同盟的局面。

回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这一强大的盟友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在战争爆发前三年，俄国和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又恢复如前。从中国到突厥斯坦及阿富汗，中国及中亚阵线上隐患重重，其中以波斯地区最为严重。1912年夏，俄军武装进入波斯北部，人们开始怀疑英俄条约是否能够继续维持。早在1911年11月，格雷就曾警告过俄国驻英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很快就会有人命令他公开否认俄国在波斯地区的行动，因这会对英俄条约的前景造成威胁。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内阁、国会及新闻界都十分关注。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和格雷在巴尔莫勒尔堡会面探讨波斯地区问题时，就有公众游行示威抵制这位外交大臣。对于大英帝国发展前景的忧虑，加上长久以来自由运动及英国新闻界对俄国的恐惧，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这些忧虑在1913～1914年早期一直存在，且越发严重。在1914年2～3月，格雷与布坎南大使多次通信，表示英国对于俄国出于战略目的计划在波斯地区建造铁路十分不满，因为这些铁路横跨波斯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俄国已经开始排挤英国在波斯地区的贸易利益，甚至对于在协议中规定的英国控制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国边境的局势更加不容乐观：1912～1913年，英国收到线报，俄国正在煽动蒙古族人与中国西藏相互发动“非常规

的军事活动”；俄国的来复枪穿过乌兰巴托被运抵拉萨这一举动也被侦查出；俄国布里亚特“僧侣”正在训练中国西藏的军队，同时俄国还在不断逼近中国其他地区及土耳其斯坦地区，在距离英军斯利那加驻地240公里处建造防御工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俄国正在伺机而动，准备入侵印度。

英国察觉到的这些潜在威胁导致其外交政策出现裂痕。在格雷看来，俄国这些令人恼怒的举动加强了英德在巴尔干半岛的缓和政策的重要性。就在人们惊讶于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官竟然轻而易举地开始合作时，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地区充满投机意味地蜿蜒前行激怒了他的英国盟友们。格雷的举动得到了他的长期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的支持，他与格雷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同僚。他倾向于“反德政策”，之后却变成了“坚定的英德共识的拥护者”。英国方面发现，自从发现自己在海军实力的竞争中不敌英国，德国就像是被“拔掉了刺”，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威胁，所以英国对与德国的合作也更感兴趣。重新采用这样较为灵活的政策，一方面是不想让激进的反对党在恐俄这一议题上再出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止“驱赶格雷”的倡议者，他们把外交大臣对柏林的敌意看作对英国独立和欧洲和平的威胁。

不过，亲近德国所得到的好处太少，远远无法弥补失去俄国的支持所导致的风险，这样的选择近乎空想。在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而这并没有发生在1913～1914年，亲俄抵德的论调仍然占据主流。在1913年，俄国的角色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像其法国同僚们一样，十分坚定地相信俄国的庞大力量。在他们看来，这时的俄国比1900年时更加危险。在日俄战争及1914年“七月危机”这几年以来，英国大使馆的军官及一些专家确信俄国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尽管许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这种确信在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1909年9月，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Sir Ian Hamilton）——他也曾是大使馆军官中的一员，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驻地见识过俄军的行动——呈交了一份十分有代表性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表示俄军在过渡时期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多亏了“突进”战术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优势”，俄国军队现在已经可以被描述为“比德军更加骁勇善战”。由于汉密尔顿也曾参与过德军调遣，他的观点非常有分量。

在伦敦，一些重要的决策者认为，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和德国相较之下仍显逊色。1912年12月初，当第一次阿尔巴尼亚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候，一位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承认：“我们的人民所害怕的是，德国向俄国提出，如果俄国放弃三国协约，德国将会协助其控制奥匈帝国。这才是最危急的状态，而不是各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俄国会在三国联盟这边引发骚乱。”在尼科尔森的眼里，英国的安全问题和帝国的发展仍然要依靠“英俄条约”，他希望这份精心打造的条约能够带着法国盟友一起，组成一个完全成形的联盟。“相比于与德国为敌，失去法国和俄国这两个盟友更加不利。”他在1914年写道，“显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条件都留给俄国，如果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不再友好，甚至变得再不往来，那么我们将会在一些地区面临困境——一

些我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地区。”即使是些微与德国和解的举动，都是在拿英国为人称道的可靠性来冒险。一旦别人认为英国不再可靠，俄国就很有可能摒弃英国，与之为敌。尼科尔森的观点来源于战前时期在伦敦很流行的一种论调：经济水平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会让俄国变得越来越独立，而到那时，英国对俄国来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以这一论调看来，无论是付出多大的代价，英国都需要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尼科尔森很惊讶萨佐诺夫在俄国资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对抗奥斯曼帝国时的表现，以及俄国在整体上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怂恿。不过考虑到俄国与英国一旦相互对立所造成的灾难，这些就都只是小事罢了。在某些方面，英国的外交人员觉得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日子更好过，相比处于奥匈帝国与俄国共同管辖时期的巴尔干，那时的巴尔干局势更容易控制。这种共同管辖的关系会回过头来促使局面回到1907年年初，当时英俄两国正处于公开的全球性竞争关系。1913年的英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毫无胜算，获胜概率还不如在布尔战争时期的。1912年夏，尼科尔森甚至宣扬，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应该反对俄国的举动。他告诉身处维也纳的英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既然此时的俄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军队也整装待发，此时俄国的表态就是要再次强调并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

缓和政策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并不稳定的联盟内部起着作用。它能掩盖主要政治人物对危机的警觉，从而使局面更加危险。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格雷认为会晤能成功举行，大部分的功劳属于自己）让格雷对自己处理危机及“拯救和平”的能力非常自信，而正是这一自信成为他的障碍，他在面对1914年7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时就没能及时回应。格雷从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缓和政策中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事，德国都会继续抑制自己的奥匈帝国盟友。贾高和霍尔维格也同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至少曾经认识到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真面目，一旦俄国在该地区制造冲突，英国很可能会保持中立。此外，缓和政策对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某一方起到的作用，也会同时僵化其与另外一方的关系。比如说，由于英德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英国的态度变得不明朗，这就导致法国与俄国的关系受到影响。比利时首相在1913年4月致信法国：“法国政府想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们意识到自己与英国的友谊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效果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这一切仿佛暗示着在战前时期，欧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而战争是打破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纵观局势，可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使是缓和政策，也对和平造成了威胁。但我们不该忘记，整个欧洲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或者说它的发展前景仍然有无限的潜力。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英国一些最高层的决策者逐渐明白，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协议可能无法持续到原本计划的1915年续订时。1913年春，蒂雷尔认为英国应该要容忍俄国的冒进行为，直到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平复，然后在1914年或1915年，再对俄国在波斯、蒙古及中国附近的行动采取强硬态度。1914年，随着尼科尔森逐渐被孤立，他与格雷之间出现了裂痕。尼科尔森对《英俄条约》的无条件的支持态

度，使许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其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蒂雷尔和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其他高级官员，非常反感俄国没有遵守1907年所签协议中的条款，而且开始觉得与德国进行一些往来能够修正俄国的这种态度。到了1914年春，连尼科尔森都察觉到了外交部的这种想法。1914年3月27日，他警告一位同事，不要以为当下的这种势力分布能够持续很久："我相信，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政治布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组合。"

生死存亡之际

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着眼于战争前的两年国际形势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一方面，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局势缓和，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有迹象表明欧洲内部的各个阵营仿佛正失去它们的功能性和凝聚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缓和政策不仅仅是想要暂时缓解敌对关系，更是真的有可能成为欧洲国际系统的常态。由此看来，一场全面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阿加迪尔和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加快了各国军事准备的速度，同时，在巴黎的支持下，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主张变得更为激进。对三国协约瓦解的担忧，加上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的好战情绪，的确在短期内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德国的政策就显得既无条理又模糊不清。我们先要记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及活力所震惊。霍尔维格在1912年夏到访俄国之后，对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9个月之后，韦纳伊也对皮琼做出了类似的阐述）：

> 首相感到十分钦佩及惊喜，以至于这些感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策。这个国家气势雄伟，幅员辽阔，农业发展强劲，人口涨势迅猛。但他觉得仍然缺少的是对知识及智慧的追求。他把俄国和美国两地的年轻人互相比较，在他看来，俄国青年的未来一片光明，而美国青年之后不过就是普通人而已。

从德国军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指挥官的立场上来看，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似乎使德国迅速处于下风。赫尔穆特·冯·毛奇从1906年起接任总参谋长，接手施里芬计划。他认为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十分不乐观，更倾向于发动战争。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两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第一，从长远来看，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德国无法控制的。无论是德国可预见的敌人，还是经济飞速增长、人力资源充沛的俄国，它们的军力日益壮大，直到它们强大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开战的时机——他们很享受这种绝对的优越感。

值得关注的是，两种假设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一种假设不过是毛奇偏执又悲观的心理映射，无法得到客观证实。与之相反，虽然也有些许偏执的意味，第二种假设已经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各国相对军力来证实。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平衡持续加剧，德国在之后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不容乐观，这些都引发了毛奇的担忧。1910年之后，俄国着手进行第一轮武器及军力重整，他的担忧加深也是情有可原的。



1914年的赫尔穆特·冯·毛奇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把欧洲向战争又推进了一步，也掀起又一轮购买武器的热潮。1912年11月，俄国加紧充实军备以抗衡奥匈帝国，法国政府在一旁拍手称快，德国却显得束手束脚：它们没有召集后备役军人，没有保留征兵制，也没有尝试进行征兵动员。但从11月中旬开始，鉴于俄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逐渐为人所知，德国的指挥官们越

来越坐不住了。最引起他们警觉的是，俄国保留了高等级征兵制，大大增强了波兰战线的军队实力。来自不同消息源和地区的情报显示，俄国军方高层普遍认为和奥匈帝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好的开战时机就是现在”。这些都使得德国方面的忧虑持续加深。

因为接踵而至的种种征兆以及加利西亚边境两侧的军队行动而慌了阵脚，又急于打破“德国对于保护奥匈帝国在地区内的安全早已失去兴趣”这样的流言，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2年12月2日在国会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演说，这算得上是对劳合·乔治前一年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演说的修订版，形式更加简洁，态度更加谦虚。他一开始就指出，“为了使战争地域化，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且这一目的“已经达成”。此论调赢得了场内一片喝彩。紧随其后的则是用词十分小心、严谨的警告声明：

> 如果（当然我并不希望这样）困难无法解决，所有陷入其中的国家就应该将它们之前声称的一切付诸实践。我们的盟友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盟友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第三方攻击，国家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一位忠实的盟友，应该坚决且鲜明地表态，和我们的伙伴站在一边（右翼及德国国家自由党欢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在欧洲的地位而战，也为保护我们的未来和国家安全而战（右翼人士欢呼）。我确信，只要遵循这样的方针，全体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全场欢呼）。

《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就刊发了演说全文，认为首相的言辞“没什么新意，或者说算不上轰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写道：“很显然，德国希望和平，同时也在努力保证（追求）和平。”格雷却不这么认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召见了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Count Lichnowsky），告诉他一旦德国与法俄联盟之间爆发战争，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敌人。伯爵将这一对话呈报给柏林，引发了一片恐慌，更确切地说是让德皇慌了神。他对来自英国的信号向来敏感，他表示他了解了格雷这一“精神上的宣战”。在深深的震惊中，威廉二世召集毛奇、蒂尔皮茨、海军部战时参谋长黑林根（Heeringen）及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Mueller），于12月8日上午11点在皇宫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威廉二世就将自己的好战情绪倾泻而出：他提出奥匈帝国必须对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军队当时正在阿尔巴尼亚），如果俄国攻打奥匈帝国，德国将对后者提供援助。威廉二世吼着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陆军就要直指法国，海军则要派出潜艇，用鱼雷对付英国的舰队。在之后的讨论结束前，他敦促海军加快U型潜艇的生产，要求“必须在传媒界有更多动作，以劝说公众接受这场打击俄国的战争”。他还认可了总参谋长毛奇的观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越早开始对我们越有利。”

在历史学家眼里，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名

字不过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霍尔维格出于讽刺所起的绰号罢了。一方面，有人认为，1912年12月的这次会议不仅揭示了德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关键地位，也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战争蓝图：以战争为立足点，将海军和陆军、德国经济及公众观点全部包括在准备这场早有预谋的战争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德国对国际危机的响应，否认德国军方及政界领导层将开始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欧洲大战倒计时这样的论调。谁是对的？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上提及的军事策略是充满好战情绪的，而且很明显，威廉二世暂时是想站在他手下那些最激进的指挥官这边的。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让这场保卫战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拥有的唯一一份来自与会者的会议报告是穆勒上将的日记，他将会议的观察总结为“几乎毫无成果”。在会议结束之后，既没有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投入为战争做准备。12月8日的那次会议的主角并不是威廉二世，而是霍尔维格。他随后就让德皇“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废除了”德皇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各项决定。战争会议的惯性还持续了一阵子；终于，在1月初，笼罩在柏林上空的危机感渐渐消散，威廉二世也终于冷静下来。霍尔维格说服他放弃海军的扩充计划，他在会议上要求的潜艇增产最终也未实现。1913年4～5月，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占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塔里，引发新一轮的巴尔干危机，此时的威廉二世仍然反对任何增加战争风险的行动。

和12月在新宫举行的这次会议相比，另一件事的意义更加深远。11月，军方决定要想方设法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增加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俄国在处理巴尔干危机问题上的态度为德国敲响了警钟。德国对于安全问题恶化的担忧则全部反映在1913年德国军费预算法案上。在12月的一份详细备忘录里，毛奇极力促成一项野心勃勃的军队扩充及改进计划。他据理力争，强调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很有可能将面对法国及俄国的两面夹击，那时奥匈帝国的帮助作用甚微，而意大利则完全帮不上忙。根据格雷在12月3日发出的警告，英国非常有可能加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派出的步兵将比英国、法国及比利时三国联军少192个营。来自俄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它的兵力正在逐年增强。1913年4月，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将军们表现出对德国前景的担忧。他们认为德国目前的处境很难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且获胜的概率不大。到1916年，俄国的军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战胜的地步。法国在战略铁路、军队流动性及部署上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直至1913年，法国已经拥有16条双轨铁路，与支线环形道、车站、交叉道相连；而那时的德国仅拥有13条直通边境的铁路。

在争论了许多细节及讨价还价之后，新的预算法案在1913年7月通过。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已达到89万人，增加了13.6万人。但这仍然没有满足德国的安保需求。法国和俄国见此纷纷增加了自己的军队开支，抵消了德国增加的军力。在欧洲第一轮扩军潮中，俄国发展速度成为其他国家标榜的对象；而现在，这个位置让给了德国。1913年的德国军队法案对1913年8月法国通过三年制兵役法起了关键作用。这一切都促成了俄国名为“大计划”的军事扩张及装备更新项目。1913年3月，沙皇批准了数额惊人的预算，这些预算将用于炮兵及计划中的其他武器装备。

俄国的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将在1917年前为冬季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80万人。与1910年的调遣方案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驻扎在俄国属于欧洲版图的地区。结果就是，1914年，俄国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规模达到约150万人，这一数字是德国的两倍，甚至比德国与奥匈帝国两国军队相加还多了30万。到1916～191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万。俄国在1914年的军队规模也要归功于由法国资助的俄国战略铁路计划。1905年起，德国就以施里芬计划作为对俄国军队扩张的回应。施里芬计划是为了应对德国被法俄两面夹击的状况，首先集中军力对抗法国，而在东边按兵不动；在解决西部战线的问题之后，再转向东边对付俄国。但如果法俄联盟的力量分配变化使得施里芬计划变为废纸，德国应该怎么办？

有消息指出，与它的两个敌人相比，德国能够更快地做出改进，而这一点也在1914年那段时间为德国军方带来了短期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俄国军方的经济基础似乎仍然薄弱：在1900～1913年，俄国的生产力与德国相比其实是下降的。但是柏林方面依然觉得形势十分严峻。1904年，法俄军队比德奥军队多260 982人；到1914年，这一差距的估值已经达到约100万人，且还在继续快速扩大。在1914年5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位于圣彼得堡的德军随行官员指出最新的增长情况（从45.5万人增加至58.5万人），并且预估了接下来三四年间和平时期军队的增长，并总结道："俄国的军队将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毛奇把法俄之间的借贷关系看作"1870～1871年的战争以来，法国用来对付德国所做出的最敏感且最充满战略意味的一击"，并且预测它将带来"让德国转为劣势的决定性转折点"。直到1916～1917年，德国的战略家们确信，俄国的战斗力已经足以让施里芬计划失效。

出于对东线及西线暗涌的危机和时间紧迫的担忧，毛奇成为"保卫战"的极力拥护者。他认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即将来临的危机。在他眼里，过往所有的战前危机都是在尝试弥补德国在策略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调，且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这种失调将很快置德国于不可挽回的劣势。保卫战这一想法很快就在军方指挥层内传播开来。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曾出现过许多情况使得指挥层中的高级人员迫切要求开战，"越快越好"，即使这样意味着德国将主动开战，还要背负侵略者的骂名。当然，并非只有德国是这样看待局势的。早在1914年早期，普恩加莱就对《晨报》（*Le Matin*）的编辑说，德国害怕俄国的发展壮大，"他们知道这个巨人每天都在成长，他们想要在它的力量强大之前攻击它、摧毁它"。1914年3月，英国陆军行动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收到了一份新闻简报，上面列出了1913年以来俄国军队所做的各项改进。威尔逊做出了以下评论：

> 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新闻。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未来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生死存亡之际"。

在德国军方的好战倾向背后，暗藏着一丝宿命论的意味。提起战争时，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战败和被消灭的双重威胁”，而不是胜利。这种想法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指挥官批准将最激进的主动性作战视为基本防卫。不过，军方坚持的保卫战这一论点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呢？就算在诸如普鲁士—德国这样的带有禁卫军性质的系统中，也必须依靠大多数高层指挥官的能力才能说服其民政机关的同僚，接受他们的战略计划。因此，并不是特别成功的。毛奇于1912年12月在新宫敦促道，“战争越早开展越好”，但是尽管德皇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位总参谋长的意见，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很矛盾的是，在柏林并没有一个像圣彼得堡的大臣会议那样的共同决策机构，这就导致军方很难在政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支持他们的提案，并使用军事征税来打破财政上的限制。在巴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政及军方官员紧密合作以筹措资金，来支撑由于采取进攻策略而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在德国，由于体制和法制上的重重障碍，民政和军方之间这样的紧密协调很难实现。德国没有克里沃舍因这样的人，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与俄国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相比，更加强势且更难对付。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霍尔维格持续奉行与英国及俄国保持不引人注目且务实的合作政策。他在1911年12月发言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与英国妥协。”1913年3月，他写道：“我们必须控制法国，并且对俄国和英国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然，这种政策既没有让我们的爱国主义者高兴，也不受欢迎。”1914年之前，保卫战这一论点从来没有被德国摆上政策层面，而是一直被平民领袖们反对，就像康拉德在维也纳提出的那些吵吵嚷嚷的要求一样。无论是在1905年或1908～1909年，还是1911年（当情况变得比在1914年夏对德国更加有利），德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要挑起这一场保卫性战争。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正是英国把危机推到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地步，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中，是法国而非德国的政策越来越向（虽然是断断续续地）保卫性战争这种论调靠拢。与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相比，德国更多地被约束在给盟友维也纳的忠告中。

至于德皇，虽然好战的论调在他嘴边就要脱口而出，但他还是害怕了，并警告陷入无尽的挫败感的将军们，无论什么时候，若一场真正的冲突正在逼近，一定要保持戒备。威廉二世仍然对与英国的长期和解抱有希望。他在1913年表示，他仍然认为英德战争不可能爆发。他还对德国军力自信满满，足以阻止俄国以武力介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纷争。在这种自满的情绪下，作风强硬的法金汉（Falkenhayn，之后他成为德军总参谋长）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察觉到，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政治领导层，对长久和平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虚幻的信任，而这使得毛奇在与德皇要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斗争”中“孤立无援”。德皇对保卫性战争这一想法的抗拒态度成为不断壮大的“反对军事派”的令人厌恶的一个特点。和以前一样，民事的优先地位仍然高过军方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在反对主动权的论调与德国或其他决策者的行为之间划清界限。相反，保卫性战争的逻辑对主要决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机中的思考影响深远，而这一切不为人知。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德国人

德国的决策者（撇开那些执着于在两条战线上武装德国以应对未来战争的人）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德国既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能避开战争的风险。一群较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包括殖民地事务大臣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驻英大使保罗·梅特涅以及他的同事，之后成为外交大臣的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ehlmann），继续推进对英国的缓和及妥协政策。这一路线在一本名为“没有战争的德国世界政策！”（*A German World Policy Without War!*）的政治宣传册中有了更加正式的表达。这本册子在1913年于柏林匿名出版，撰写者为理查德·普莱恩（Richard Plehn），他和库尔曼在伦敦曾经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内也有潜在的支持这一政策的伙伴，尤其是反对格雷的自由党成员，比如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考特。

尽管霍尔丹任务以失败告终，探寻对英缓和政策的努力却并非颗粒无收。1912年夏，关于殖民问题的新一轮谈判展开。两国签署了关于非洲领土的协议，这些领土当时隶属葡萄牙帝国管辖，而葡萄牙帝国的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柏林和伦敦两方对何时及如何公开这份协议意见相左，最终导致协议没有生效。但它仍然显示了两国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划清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共同合作防止第三方介入。

纵观世界，在全球帝国竞争的舞台上，以及欧洲这个因为联盟集团而变得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德国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个地方尤其吸引那些奉行“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的官员们：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德国都被束缚在这个帝国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环境中，但在19世纪80年代，柏林变得更活跃了。这一举动受到了正被英治埃及（1882年）疏远的奥斯曼帝国的鼓励，君士坦丁堡方面非常积极地讨好在柏林的伙伴。德国的银行、建筑公司及铁路公司开始进驻这些苏丹帝国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建立租界，划分利益范围。1881年，安纳托利亚铁路动工。这一铁路连接君士坦丁堡和安卡拉与孔亚，由德国出资并建造，两条铁路都在1896年前完成。政府对这些投机事业的支持一开始虽然断断续续，但逐渐变得明确，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到了1911年，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已经可以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德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范围”。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德国人希望能够稳定面临其他帝国力量（尤其是俄国）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破裂，就仿佛是向世界各个帝国敞开了瓜分领土的大门，它们一定会想确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

安纳托利亚铁路被寄予了厚望。奥斯曼当局试图安抚并联合安纳托利亚“未开化的东部”——那里当时仍在遭受切尔克斯土匪的破坏，并让奥斯曼土地上最不开化的地方走向文明。他们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审视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把它看作急需开垦的殖民地。他们向已经通了铁路的地区引进新的粮食作物，比如甜菜和土豆，后来发现在这个地区早有

这些植物的种植历史。他们还尝试引进一些经济作物，比如可以用于造纸的细茎针草。许多尝试都止步于试验阶段，要么是因为气候与土壤条件不适合作物生长，要么是因为当地人拒绝采用新的农耕技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乡下的一些人会把大量稻草带到火车站喂食牵拉火车的马匹。对他们来说，蒸汽机车的出现无疑是一次难忘的冲击。

在德国，开拓安纳托利亚的想法也同样煽动了殖民计划的火焰。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认为（虽然不太可能），今后可以把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展为德国大量人口的居住地；其他人更感兴趣的是开拓当地市场、贸易路线及原材料开发。就像19世纪30～50年代的水电大坝或60年代的太空旅行，铁路在20世纪初始占据了帝国幻想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在英国及其开普殖民地，建造开普至开罗的铁路计划正在准备中；几乎在同时，法国也加入竞争，筹划建造一条横跨非洲的超级铁路，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吉布提。伟大的全球电报网络历史已经开始：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在英国的某些地方，电报站同时也是皇家权威与律法的小型前哨站。

因此，1903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一个非常大的铁路建设项目交给一家隶属于德国银行的公司时，引发了一阵惊恐。这条铁路将把安纳托利亚铁路在安卡拉的终点进行延伸，经由阿达纳和阿勒波，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巴格达，并最终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可以在某天实现乘火车由柏林直达巴格达，却遭到了来自其他帝国力量的质疑及阻挠。由于英国海军当时正计划将以煤炭为动力的船只更新为以汽油为动力的型号，油田对于英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英国担心铁路建设项目将使德国优先获得奥斯曼伊拉克的油田。英国还担心，这些从英国称霸世界的海军带来的束缚中挣脱、由陆路来到东方的德国人，会威胁到英国在殖民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虽然铁路的路线已经确定（这给工程师和投资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并会尽量远离俄国有意向的地区，圣彼得堡方面还是担心德国因此会威胁到俄国对高加索地区及波斯北部的控制。

回想起来，这些战略上的担忧很牵强，但它们在那时对决策者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些决策者倾向于认为，资金上的投入将必然导致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威廉二世在支持奥斯曼和支持伊斯兰之间飘忽不定时，就完全没有打消这种担忧。1898年，威廉二世第二次访问中东，他在大马士革市政厅即兴说出了一段祝酒词：“愿苏丹陛下，以及将他看作‘哈里发’的全世界3亿穆斯林，坚定地相信德国皇帝会是你们的朋友。”这段话很快为世界各报纸引用。这样的表述源于阿拉伯人民的欢呼所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因德国与泛伊斯兰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为伍，而唤醒了对德国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在英国和俄国势头渐长。

实际上，德国的经济投入符合国际惯例。德国在电子设备、农业、矿业及城市交通上的投入非常多，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也正在增长。但在1913年，德国依然在从奥斯曼帝国进口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在出口奥斯曼方面落后于英国和奥匈帝国。法国在这上面的投资比德国多了约50%。所以和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竞争相比，德国也

说不上在这方面特别上心。为了确定能够战略性地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一场竞争悄然而起。比如，英国的银行和投资者在伦敦方面的支持下，通过强硬杀价，加上毫不留情的金融外交，轻而易举地就将德国推向了不利局面。即使是在铁路建设领域，德国将多于一半的投资花在这上面（3.4亿金法郎），法国也不甘示弱，投资金额达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水平（约3.2亿金法郎）。奥斯曼帝国公债由一家国际代理机构作为帝国债权人的代表进行管理，公债中的62.9%为法国所持有，德国和英国差不多平等瓜分剩下的份额。君士坦丁堡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除了负责控制有利可图的烟草垄断及为数众多的企业，还拥有在奥斯曼帝国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这样大的机构并非德资银行，而是一家法英合资企业。同时，它也是法国政策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信用及财政管理全部由巴黎掌控。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的确对缓和巴格达铁路沿线的紧张局势有所帮助。1914年2月15日，法国与德国签订协议，划定了两国主要投资者的利益范围（法国的资本投入对于这个项目的资金筹备来说非常关键）。6月15日，通过让步妥协，德国终于能够不再理会英国的反对声。这些让步中包括了认可英国对至关重要的未来铁路中的巴士拉—波斯湾区段的控制权，这一举动也牺牲了这个项目应给德国带来的地缘战略价值。协议、让步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合作，各国已将政治问题摆在一边，而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有实际效益方面。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或许真的可以提供一个舞台，让“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得以施展，从而及时建立与英国合作的某种基础。

比中立巴格达铁路权所产生的矛盾更加严峻的是，1913年12月德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引发的一场危机。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活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迫切渴望外国的协助，通过彻底的改革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奥斯曼军方指挥官曾经短暂考虑过邀请法国军事代表团前来，但显然德国更像是伙伴。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德国军方顾问就已经是君士坦丁堡的常客，当时戈尔茨·帕夏（Goltz Pasha）将军已经在训练奥斯曼帝国基层军官。但是与以前的尝试不同，这次的行动目的是扩大规模。代表团首领被任命为指挥官（拒绝停止这种放权行为被看作导致之前尝试失败的原因），而且将负责整个奥斯曼军队的训练活动，总参谋部也包括在内。指挥官同时拥有无限的军队视察权力，他也会有一队由40位现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组跟随。最重要的是，作为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将军，他同样也肩负着保卫海峡地区及君士坦丁堡的重任。被选中作为领头人物执行这次任务的是，驻扎在卡塞尔的第22师指挥官中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无论是德皇还是首相霍尔维格，都不认为这次的任务相较之前的实例有任何基本偏差。也由于这项任务的细节由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军方指挥官内部起草，没有人把它和与俄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谈判联系起来。反而是德皇于1913年5月参加普鲁士的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欧

内斯特·奥古斯特王子的婚礼时，以非正式的口吻，向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提出了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人对这项计划好的行动表示反对。霍尔维格在1913年11月与萨佐诺夫短暂会晤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还以为沙皇已一五一十地告诉萨佐诺夫了。当利曼任命的细节渐渐泄露出来时，俄国报业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公众的愤怒离不开俄国外交部门的煽动，但真正原因是民众担心这项行动不仅将使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形成战略瓶颈），同时将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新生机，而当时在俄国对中短期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分裂已经成为既定元素。在一封寄给沙皇的信中，俄国军方驻柏林全权大使将利曼描述为一个“充满活力、喜欢自我吹捧”的人。德皇在一次与代表团成员秘密会晤时，催促他们为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并成为“对俄国激进谋略中的一个砝码”。这些话经由俄军驻柏林随行官员巴扎洛夫传回圣彼得堡。由此，萨佐诺夫认为这次德军的行动“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义”。此时在圣彼得堡则是一片恐慌，“我从未见过他们这么激动”，爱德华·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吐露了心声。

为什么俄国人对利曼的任务反应如此强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1912~1913年的危机时期，俄国的战略思考仍是以海峡地区为中心。当时萨佐诺夫的政策倾向于着重应付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不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而海峡地区对俄国经济生产的重要性从未如此显而易见。在1903~1912年，俄国37%的出口需途经达达尼尔海峡；对于小麦和黑麦的出口来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5%~80%，而这一出口对俄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转型以及现金匮乏的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显露出这些关联的紧迫。自冲突开始，萨佐诺夫多次向好战的各国以及结盟的势力表示，关闭海峡地区中立性的商务运输将会使俄国的出口商遭受“巨大的损失”，必须避免这种导致损失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一切发生，战争将导致达达尼尔海峡经历两次暂时关闭，严重损害俄国的贸易活动。

造成损害是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有着关键性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区永远失势是另一方面的担忧，且后者更为严重。1911年夏，苏霍姆利诺夫十分担心德国在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据点，“在奥斯曼帝国的背后，”他警告道，“正是德国。”1912年11月，保加利亚似乎即将拿下君士坦丁堡。在那时，萨佐诺夫命令伊兹沃尔斯基前去警告普恩加莱，一旦君士坦丁堡沦陷，俄国将不得不立即将整个黑海舰队部署在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及海军讨论俄军的登陆计划，以保护君士坦丁堡并彰显俄国的利益。英国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的资产国际化，但遭到了萨佐诺夫的反对，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弱化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以军事行动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整个海峡地区，新的计划应运而生。在一份于11月12日为科科夫佐夫和后勤主任准备的文件里，萨佐诺夫阐述了俄方占领君士坦丁堡所带来的优势：这将确保又一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这是“打开地中海大门的钥匙”，这是“在为俄国实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打下基础”。他表示，俄国将建立“一种国际身份，或者说是一顶本就属于俄国的皇冠，以彰显在两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努力和付出”。在暗暗透露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时，萨佐诺夫总结出，如此巨

大的成就将在“毋庸置疑的超越民族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联合政府及社会”，并由此“重塑我们国家的生活”。

在最近海峡地区的混乱局势中，俄国在贸易上遭遇了上百万卢布的损失。1912年11月23日，萨佐诺夫向尼古拉斯二世指出：“想象一下，如果海峡地区不是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而是在另外一个有能力反对俄国要求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导致1913年夏天至秋天，俄国黑海海军指挥官都集中精力，使即将到来的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成为可能。海军总参谋部的A·V·聂梅兹（A.V.Nemitz）上校声称俄国“必须准备好在近期实现（占领海峡地区）的目的”。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不断壮大的担忧也反过来使得这些提议更为迫切。土耳其人已经订下了一艘无畏战舰，当时仍在英国建造。1912～1914年又加订了两艘，不过这些战舰都没有在战争爆发前交货。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当地高级官员对俄国海军军力的看法，让圣彼得堡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们有这样一种预感，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帝国计划被倒置了。

俄国人(尤其是萨佐诺夫，他与所有相关的策略讨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变得对利曼·代表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的海峡地区控制问题极其敏感。令外交大臣特别不快的是德国指挥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错，因为此前没能任命真正的权威人士担任军队顾问（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这被当作没有进行真正改革的核心原因。经验告诉我们，若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改革完成，只有下命令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萨佐诺夫并没有被打动，还尝试通过争取另外两个协约国的支持来向柏林施压。他向伦敦和巴黎发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以最强硬的言辞反对这项活动，并在结尾给出暗示性威胁：“如果德国这么想要在君士坦丁堡占据首位，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得不遵从这样的做法，尽管它们在意的是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这种倡议并未成功，主要是因为俄国把利曼的任务当作对自身性命攸关的利益的威胁，而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它自己。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随军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利曼到来的特别通知。他们认为，德国在之前几次任务的失败后加强控制以获得某些长远价值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格雷也对此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爱尔兰危机及“国家内部的困境”已经比对这件事的介入来得迫切得多。同样，相比法国资本越来越壮大的统治地位，英国人也不那么关心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得势这件事了。1913年3月，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告诉爱德华·格雷：“在法国金融家的逼迫下，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是不会存在的。”3月18日，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次有力的演说中，奥斯曼及中东地区问题专家、保守党下议院议员马克·塞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警告称，法国金融在奥斯曼叙利亚的绝对统治将最终“为合并而铺路”。

事实上，英国海军已经派代表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1912年，海军上将阿瑟·林帕斯（Arthur Limpus）到达该地区之后曾将领地扩大——他的雇佣合同上写着他的职位是“舰队指挥官”。除了监督奥斯曼军队训

练和补给品的改进，林帕斯还协调鱼雷舰艇及地雷在土耳其海峡地区的分布部署，这是防止外国战船进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林帕斯能从一个较为广阔的政治层面理解自己的任务：他与奥斯曼海军部门的联络并不只包括技术现代化、采购及训练，还有更多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比如“让俄国军队穿越黑海时更危险”而需要的海军军力水平。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想要达到的目的和利曼的很相似。林帕斯以自己的睿智与泰然来看待英国和德国对奥斯曼海军及陆军的共同管制。他在1912年6月对奥斯曼海军说道：“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海岸建设方面无人能及。”

> 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这支军队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我很确定，让德军顾问参与陆军的方方面面是最明智的。我也相信，在海军事务上采纳英国顾问的建议同样是最明智的选择。

由此，萨佐诺夫发现，想要把协约的伙伴国也拉进俄国对于德国代表团抵达奥斯曼这件事的愤怒情绪中是很困难的。格雷拒绝了萨佐诺夫发来的带有威胁语气的联合备忘录，并建议在德军代表团范围内对君士坦丁堡开展无伤害性的调查。尽管在圣彼得堡，德尔卡塞很积极地表示赞同，但法国外交部已经变得甚至比英国外交部更不上心。因为在萨佐诺夫充满威胁的联合备忘录中，法国看到了一幅完整的“亚洲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的画面，而这将有可能给法国金融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法国更倾向于支持格雷较为缓和的提议。也就是说，已经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吸引了太多不同类型的帝国的野心和狂想，使得三国协约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同一个可能的威胁。

无论如何，利曼的这一篇文章使得俄国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情绪有了一次危险的升级。英国和法国对于俄国的抗议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使得萨佐诺夫大为恼火。在1913年12月12日发给俄国驻英国大使的一份电报中，他咬牙切齿地阐述了自己越来越不信任英国支持的效力，还说“身为三国协约中的两个国家却缺乏团结，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在12月23日呈交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他的态度则是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好战性格。他促请立即准备好“联合军事措施”，并与法国和英国协调。三国协约应该“在小亚细亚地区掠夺并占有些什么，并声明在达成自己的目标前不会离开该地区”。当然，如此戏剧化的主动行动是冒着触发“欧洲大混乱”的风险进行的。但一方面，摆出这种“坚定的决心”很有可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迫使德国改变心意；另一方面，屈服“可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为了讨论由利曼事件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召开一场峰会很有必要。

1913年1月13日召开的峰会，由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主持。萨佐诺夫、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总参谋长日林斯基及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悉数出席。会议的开始就是讨论向君士坦丁堡施压，迫使其放弃对德国军队代表团的需求所应采取的“强制措施”。有

一种意见是可以用经济制裁来向奥斯曼政府施压，不过被摒弃了，因为这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法国在奥斯曼的金融利益，也会使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条路则是动用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以武装占领奥斯曼的要塞。萨佐诺夫指出，最关键的前提是法国的支持。和往常一样，科科夫佐夫反对任何战争的论调，认为战争所冒的风险太大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努力想要使会议进程的基调变得温和且理性。他认为，建立明确的限制很重要，要列明哪些是俄国能够容忍的举动，哪些不可以，而不是表现得因为一时的报复心态而满腔怒火。在科科夫佐夫的观察中，德国是在寻找一种逃离“由俄国的要求所造成的局面”的方法，并已准备好做出妥协。所以，避免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明确声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会迫使德国巩固自己地位。但当时，这位首相遭受了苏霍姆利诺夫、萨佐诺夫、格里戈洛维奇和日林斯基的轮番挑战，他们争论说德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已达到最小，但万一情况坏到极点，即使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局面，战争是可以接受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总参谋长日林斯基都断然宣称：“俄国已经完全准备好与德国进行一对一的战争，更不要说和奥匈帝国对战了。”

这些激烈的场面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德国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危机得以解除。鉴于俄国的强烈反应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催促调停，柏林政府同意将利曼调任至苏丹陆军：他仍然是督察长，但是“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这一晋级实则让他丧失了第一军团的指挥权，却不有损于他的面子。

利曼事件并没有升级成为欧陆战争，但现在回顾来看，它确实揭露了其中的一些端倪。首先，它揭示了一些俄国决策者已经变得多么好战。尤其是萨佐诺夫，由早期从事文职时的优柔寡断转到了一种更加坚定且更加反德的思维方式。他开始撰写描述德国和俄国之间关系的文章，完全不考虑柏林的立场：俄国永远是温顺的、热爱和平的邻国，而德国则是虚伪的掠夺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欺凌、羞辱俄国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坚定地站起来了！这种文章在政策广度上带来的缩紧不容低估。巴黎反复的保证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萨佐诺夫表示，虽然并不清楚英国对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会有何反应，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将会提供“积极的援助，甚至是最终极的力量”。萨佐诺夫说，法国大使德尔卡塞已于近期向他保证，“法国将与俄国同进退”。至于英国，虽然一开始伦敦方面仍有犹豫，但“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冲突的结果对法国和俄国不利，英国将会介入。

沙皇也同样开始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在1914年4月初和大使布坎南的一次对话中，他说：“人们普遍以为没什么能把德国和俄国分开，可不是那么回事：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有点儿问题。”沙皇害怕德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努力把俄国限制在黑海范围内。若德国尝试这么做，那么协约国就要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让柏林更清楚“三国协约将共同对抗德国的侵略”。在德国，俄国对利曼代表团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德国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投降所带来的痛苦，让德国人觉得柏林和圣彼得堡已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开。“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成为历史！”威廉二世

哀叹道，“我们已经变成敌人了！”

对作风稳健的科科夫佐夫来说，利曼事件终于显露了他地位的卑微。当危机爆发时，他一直在法国就新铁路贷款的事进行谈判。萨佐诺夫指派他前往柏林与德国谈判。科科夫佐夫写的关于那些会谈的报告显示出他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坐在冷板凳上了。他向萨佐诺夫抱怨——他不怎么掩饰这种抱怨，让他在德国的对话人明白俄国体系的“特色”，即身为首相却在“权力与特权”上受限颇多，是非常困难的。科科夫佐夫在1月13日出任首相一职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样的职务。1914年1月底，作为首相及财政大臣的他被沙皇免职了。

科科夫佐夫的免职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政策，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他所代表的谨慎且保守的俄国政治倾向的失败。新的首相是戈列梅金（Goremykin），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个傀儡领袖，如萨佐诺夫日后回忆所描述的，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关心的能力，只在意个人的宁静和舒适。同样失去的还有考虑他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的能力”。新大臣会议的真正权力源泉其实是社会关系广泛的克里沃舍因，他自1913年起就一直在协调反抗科科夫佐夫的活动。在财政部门，科科夫佐夫的继任者巴克能力很强，但是个平凡的角色，同时还是克里沃舍因的手下。克里沃舍因是强硬派的积极支持者，而强硬路线正是苏霍姆利诺夫和萨佐诺夫一直追求的。没有了科科夫佐夫在旁不停倡议谨慎，大臣会议的天平偏向了好战那一边。



伊万·戈列梅金

最终，利曼事件显现出俄国对海峡地区变得多么热衷。同时，麻烦的问题不断涌现，三国协约的伙伴国对俄国努力争取在海峡地区畅通无阻表示支持，但这种支持能保持多久？萨佐诺夫在这一点上的怀疑反映在并不怎么重要的1月13日的会议总结里。总结在一方面同意俄国应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施展一系列强制的手段对付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如果协约国继续抱持支持的态度，俄国要限制自己的强制手段，不可以涉及军事。俄国在协约国支持上的怀疑是对的。即使危机过去，英国仍然担心俄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提出（关于土耳其海峡）的问题”。

换句话说，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项直接并公开地瞄准海峡地区安全控制问题的政策得到俄国的保证，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1911年11月，当恰雷科夫在探寻与奥斯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时，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萨佐诺夫选择不承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因为他

相信直接争取海峡地区的时机仍未成熟。他转而投向哈特维希，因为他那好战的泛斯拉夫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并特别关注塞尔维亚。萨佐诺夫的选择说明，重新将目光投向巴尔干战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峡政策上遭受的失败或挫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默认的或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前进政策并不要求放弃俄国在海峡地区的终极利益。相反，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更长久、更曲折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俄国的战略思考在1912～1914年逐渐倾向于把巴尔干看作海峡地区的腹地，同时也是确保自己对奥斯曼控制住“咽喉”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在这种决心的背后是一种信任：相信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宣言只有在欧洲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信任在战前最后几年内渐渐变为萨佐诺夫的中心思想。而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战斗即确保自己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控制。

这些都在1914年2月8日的国家特别会议议定书里呈现了出来。会议由萨佐诺夫召集并主持。在科科夫佐夫下台之后，会议的基调及大致氛围很明显并未延续他的风格。会议重新确定了俄国控制海峡地区的重要性。但连萨佐诺夫都承认，现在仍然很难描绘拿下海峡地区却不触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的画面。由此展开了关于俄国应该如何考虑这两项不同任务的优先性的讨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动用所有可用的力量赢得欧洲战争。作为对萨佐诺夫观点的回应，总参谋长日林斯基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将没有多余的力量攻占海峡地区，因为军力要集中在俄国西端战线。但是（这也是概念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俄国在西线战争中占据优势，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许多其他地区的问题就算是其他更严重冲突的一部分，也能得以解决。这一点也得到了总军需官达尼洛夫（Danilov）的赞同。他反对军方任何专门为保障海峡地区而采取的行动：

> 西线战争需要的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分配任何一个军团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保证在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场的成功。在这个战场的胜利需要我们在其他次要问题上做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决定。

这并不是会议上被采纳的唯一一种看法。身为俄国海军行动部门领导的聂梅兹上校曾经警告说，萨佐诺夫、日林斯基和达尼洛夫所描绘的愿景只有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威胁君士坦丁堡安全的敌人，和俄国在西部战线的敌人是同一个国家（比如德国和/或奥匈帝国）。在那种情况下，再加上如果那时海峡地区能够及时被俄国掌控，俄国才能够真正地只关注主要冲突。但在争夺海峡地区的努力中，聂梅兹描述道，俄国也曾遇到过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敌人。这说起来仿佛也合理，即当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前线浴血奋战时，有可能有“外国舰队和军队”来占领海峡地区，在这里他暗中影射了英国。聂梅兹说出了他的道理：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来，任何单方面改变海峡地区政治体制的尝试，

都有可能遭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抵抗。

这些反映都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利曼事件成为俄国对英国政策的关键节点。萨佐诺夫立即开始施压，采取能使三国协约变成完全成熟联盟的措施，他同时也是与伦敦进行的海军对话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对话开始于1914年6月7日。在他的传记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德国派遣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事代表团，它“迫使”俄国在“意识到柏林引发的共同危险”的基础上寻求与英国之间“实质上的一致”——这也同样符合我们回顾走向1914年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但正当萨佐诺夫梦想着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正面对抗德国并抑制它的势头时，很明显（虽然这并不是外交大臣能够马上实现的），一份与英国的海军协议履行了约束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诺言，并使其退出了海峡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行动。俄国于1914年5月正式递交给伦敦的抗议强化了这一论断，这一抗议针对的是英国官员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俄国眼里（对英国人来说亦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潜在的敌人不止一个。在联盟的架构下隐藏的是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

启动巴尔干计划

在一封于1913年5月寄给哈特维希的信中，萨佐诺夫概述了近期巴尔干半岛的事件以及它们对于英国的意义。他写道，“塞尔维亚”仅仅完成了“它历史路径的第一阶段”：

>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还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斗争，其存在性甚至会受到质疑。塞尔维亚的期许之地在今天奥匈帝国的领土，而不在它现在努力争取却被保加利亚人阻碍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将来不可避免的抗争而坚定、耐心地努力，对于塞尔维亚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正在对塞尔维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敌人已显露出明显的解体征兆。

这封信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萨佐诺夫如此坦率地将塞尔维亚人的敌意从保加利亚转移到奥匈帝国身上，而且在于他声称历史已经决定了哈布斯堡政权已经时日无多，他自己仅仅是默认了历史的裁决。我们经常在协约国政治家的虚华辞藻中见到类似的奥匈帝国必将衰落的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多么有所助益。它们使塞尔维亚的武装斗争得以合法化，像现代化的先驱一样注定要扫除过时的双君主制度。同时，它们掩盖了过多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奥匈帝国确实是欧洲文化、管理和工业现代化的中心之一，然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却仍然深陷经济倒退和生产力下滑的旋涡之中。不过，这些精妙的论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让决策者得以掩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未来已经被描绘出来，那么政治就不再意味着在指向不同将

来的选项中做选择，其任务变为去迎合与个人无关的磅礴历史潮流。

到1914年春为止，法俄同盟已经在奥匈帝国及塞尔维亚的边境构筑起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诱因。他们把三大强国的防御策略与欧洲最暴力、最不稳定地区的不确定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对法国来说，投身于塞尔维亚突出阵线是其对法俄同盟忠诚的合理结果，而这本身也出于法国决策者眼中不可动摇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上的限制之一来自人口。即便三年制兵役法给军队带来巨大扩张，法国的指挥官们仍然认为其兵力不足以独力对抗德国方面的威胁。所以要战胜德国需要两个条件：英国远征军参加协约国在西线的战斗；快速穿越比利时，使得法国部队可以包围被重兵把守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幸的是这两个选择是互相排斥的，因为突破比利时中立地区就意味着丧失来自英国人的支持。然而英国人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人心生怀疑，即使放弃入侵比利时带来的战略优势，也无法保证英国会在战争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就介入。

因此，法国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帮助，以补偿其在西方不足的安全感。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说过，与英国人的友谊看起来越不“可靠和有效”，就会有越多法国战略家认为需要“加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法国政府从1911年开始着重发展俄国的进攻实力；在1912~1913年致力于确保俄国的兵力部署计划针对德国，而非它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敌人奥匈帝国。强有力的经济动力渐渐加固了双方密切的军事联系。实施这一策略意味着付出一定的战略代价，因为将重注如此压在依靠俄国上以占据对德国的主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国的自主权。法国决策者愿意专门在巴尔干半岛事务方面扩展与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这种将主动权交到俄国人手中的让步表明了法国人心甘情愿接受接踵而来的限制。究其原因，在于法国人最担心的并不是俄国会贸然采取行动，而是俄国人会完全不采取措施，因其占有过大优势而不再关注同盟的安全价值，或是将其精力集中在进攻奥匈帝国而非“主要对手”德国身上。

准确地说，启动巴尔干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是在联合行动中获取俄方支持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历来就对巴尔干半岛地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可以依赖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激起俄国的民族情感，如此一来俄国的领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给俄国的巨额借款（当时算得上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贷款之一）加上能让俄军主力进攻德国的战略铁路建设项目，可以迫使德国（如法国期待的那样）分散兵力，减轻对西线的进攻压力，给法国留下获胜所需的喘息时间。

俄国对塞尔维亚阵线的投入源于不同的考量。长久以来，俄国一直谋求和有能力抵御奥匈帝国的一众巴尔干半岛国家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俄国在意大利对利比亚战争期间重新启用了这一策略，出面促成了将俄国定义为半岛上仲裁者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因瓜分领土问题产生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俄国意识到原先的同盟策略已被淘汰，在一番推诿之后，它选择了塞尔维亚作为主要委托人。保加利亚的利益

受到损害，很快被纳入同盟国的势力范围。正如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事件所展现的，与塞尔维亚越走越近的俄国的立场已转变为与奥匈帝国直接对峙。

然而，俄国并没有很快接受法国总参谋部反复提出的战略设想。在苏霍姆利诺夫的重新部署计划中，俄国兵力不再集中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这使得法国人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人将能把庞大军队送入敌人腹地的铁路干线数量翻了两番，并借此成功迫使俄国接受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将最大打击力量输送到西部边境的策略。

如果说俄国和法国的战略思想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法国人对俄国承诺的巨额借款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合作。由于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不可能不涉及德国，那就显而易见，只有当俄国能够战胜德国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才有可能被颠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利曼·冯·桑德斯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不仅引起俄国的战备升级和对德国真实目的的怀疑，也澄清了巴尔干战略与俄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更基本的需求之间的联系。在2月8日的特别会议上，萨佐诺夫、苏霍姆利诺夫和日林斯基认识到，确保能够通行或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标，尽管被一致认为对俄国的经济和战略未来有深远意义，但也必须为在欧洲斗争中战胜同盟国的任务让路。这不仅仅，或者说并不是主要由于害怕德国在土耳其海峡取得控制权，而是由于协约国同盟当时还未准备好支持俄国人去争取这一关键战略资产。确实，三个协约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观点如此迥异，使得俄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以爆发全面战争为背景，俄国的行动才能得到其西方盟友的支持。

我们需要明确区别一点：法俄战略家们从未计划发动一场针对同盟国的侵略性战争。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设想中的情况，而非计划。尽管如此，决策者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德国会有所影响，这一事实仍十分引人注目。法国决策者了解到军事威胁的天平已经不再倾向德国。1914年6月一份法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满意地指出“军事形势已转变为对德国不利”，几乎一样的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的军事评估报告中。但由于主要决策者将其行动视为防御性行为，将侵略的意图完全归咎于敌人，他们不曾认真考虑过他们制定的措施可能让柏林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个国家为了加强自身防卫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迫使其他国家做最坏打算”的情形，被国际关系学家称为“安全困境”，而这正是“安全困境”的一个显著例子。

那么英国人意识到了巴尔干化的协约国安全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吗？英国决策者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地理政治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触发这一机制，它将使巴尔干半岛上的争执变为一场欧洲战争。他们看待这一可能性的态度，正如他们看待欧洲局势的几乎所有方面那样，十分矛盾。即使最亲俄的英国决策者也对圣彼得堡的巴尔干政策不无批判。1912年3月，当尼利尔森得知俄国人促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的签订时，他强烈谴责了俄国人的这一新举措：“这说明俄国政府无意在巴尔干事务上与奥匈帝国政府携手合作，对

此，我非常遗憾。”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在伦敦和巴尔莫勒尔与英国主要政治家会面时，英国在巴尔干事务上“过度的谨慎”以及他们怀疑俄国蓄意对奥斯曼政府施压一事，给萨索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尔维亚部队于1912年11月突破阿尔巴尼亚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警告法国外交部长，英国不会因为贝尔格莱德要在亚得里亚海夺取一座海港而参战。

然而在仅仅数日之后的12月4日，爱德华·格雷给了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一个强硬的警告：

> 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以及在舆论驱使下的俄国军队开赴加利西亚（而不是再一次忍受诸如1909年那样的屈辱）共同导致了一场欧陆大战，并且德国不得不对奥匈帝国施以援手，那么法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因此再没有人能预知其后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流是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对德国议会发表的一次10分钟的演说为借口。在那次演说中，霍尔维格提醒众人，如果奥匈帝国出乎意料地遭到另一大国（此处明显指的是俄国，其在加利西亚边境的军事措施已经引起战争恐慌）进攻，德国会出面干预以保护盟友。利赫诺夫斯基将格雷的话理解为一次“不可能被误解的暗示”，它说明保护法国不被德国击败对英国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几天之后，看过利赫诺夫斯基总结报告的威廉二世大为恐慌，认为这是对德国“道德上的宣战”。正是这次警告引发了1912年12月8日的波茨坦战争会议。法国的文件中明确地记录，就在格雷发出警告当天，他将自己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对话内容传达给了大使保罗·康邦，康邦随后将细节告知了普恩加莱。

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雷的警告中，启动巴尔干计划能够引发的一系列因果联系得到了有力证明，其中包含众多假设。格雷首先赞同了萨佐诺夫与伊兹沃尔斯基对1909年遭到“羞辱”的观点，似乎忘了正是英国拒绝与伊兹沃尔斯基在海峡问题上合作，才促使这位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声称自己被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而引发危机。至少可以说，认为俄国多次遭到同盟国羞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俄国幸运而轻易地逃过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危险。接着，“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煽动了俄国国内舆论，俄国决策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攻奥匈帝国”，这一想法也大有问题。事实上俄国国内的意见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轻率行事。虽然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理所当然地表示支持，但其他人持不同意见，例如米谢尔斯基亲王的保守派刊物《公民》（*Gćazhdanin*）就谴责斯拉夫派“无力的浪漫主义”，并抨击了所谓俄国必然要在奥塞冲突中支持塞尔维亚的观点。在1913年2月，巴尔干冬季危机正值高峰时，前俄国首相谢尔盖·维特估计只有大约10%的俄国人赞成战争，而剩余90%的人则反对战争。格雷还假定，俄国的介入一定会侵犯一个并未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国家，还会“不可避免地”将法国

卷入其中。这一观点实质上赞同了——或者说至少含蓄地承认了，普恩加莱考虑俄国进攻另一欧洲大国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条约承诺的行为。格雷暗示，在某种情况下，这会迫使英国干预援助法国。格雷也许对“为塞尔维亚而战”的可能性感到窘迫，他无疑陆陆续续地表达了这一点，不过他已理解和合法化了巴尔干的计划，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记得，这一情景并不是国际体系的中立特征。它体现的并不是客观的必要性，而是交织着倾向性思维、承诺和威胁。这表明格雷十分倾向于将协约国同盟安全最大化，而舍弃了纯粹的大国之间的策略平衡。为利赫诺夫斯基描绘情景时，格雷不是在预言已注定的未来，而是在清晰表述让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系列认识的一部分。

这些谋划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拒绝（无论是明确地或含蓄地）奥匈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方式保卫其邻近区域利益。英法决策者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会因何爆发冲突的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奥匈帝国虽然还未进犯塞尔维亚，但普恩加莱从未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试图清晰定义这一标准，包括在与伊兹沃尔斯基的谈话中，以及在1912～1913年冬季与法国战争部队、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谈话中，而后者已敦促采取进攻性措施。格雷的态度则更矛盾，他试图将其区分开来。1912年12月4日，即他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告的同一天，格雷在给身在巴黎的伯蒂的便笺中写道，英国对巴尔干冲突的反应将取决于“战争如何爆发”：

> 如果是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使其产生有合理理由的怨恨，那么情况会和奥匈帝国主动进犯大不相同。

可是怎么算是“有合理理由的怨恨”呢？在1912～1914年分化对立如此严重的欧洲，我们很难界定哪种程度的挑衅会导致武装报复。不愿意把奥匈帝国的安全要务加入考虑也进一步证明了，大国们对将来“二元君主制”的完整性是多么的无动于衷。这或是由于它们将其视为德国身边缺乏自治性地缘政治认同的宠物狗，或是由于怀疑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有激进的谋划，又或是由于它们认为已不能再给君主制国家时间，其必将很快让位于更年轻、更好的后继国家。这个局面的一个讽刺之处是，无论哈布斯堡的外交大臣是雄辩——如艾伦塔尔，还是仁和——如贝希托尔德，都没有区别：前者被怀疑有侵略性，后者则被认为对柏林阿谀奉承。

让已被判处死刑的哈布斯堡雪上加霜的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拥有许多自由斗士的塞尔维亚已被赐予了未来。在我们意料之中，从哈特维希发自贝尔格莱德的充满热情的报告，以及法国驻塞尔维亚首都公使德斯克斯发出的热烈支持的快件中，我们都能看清这个趋势。法国继续提供存在已久的经济援助。1914年1月，贝尔格莱德又得到了一大笔法国借款（金额达到1912年整个塞尔维亚国家预算的两倍）以支持其庞大的军事支出，帕希奇与圣彼得堡协商，同样得到了一笔军事援助，包括12万支步枪、24门榴弹炮、36门“拥有最新系统”的加农炮以及适量军需

品，他声称（后被证实确实发生）保加利亚从奥匈帝国也得到了类似的货物。

格雷在1913年伦敦和会的谈判中隐蔽地采取了亲塞尔维亚策略，赞同贝尔格莱德索要新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土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塞尔维亚的概念表示支持，而是因为在他眼中，安抚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同盟长久维持下去的关键。最后的领土划分将超过一半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关在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门外，被划归塞尔维亚统治的很多人遭到迫害、放逐、虐待及残杀。然而在塞尔维亚政坛交友甚广的英国代理部长克莱肯色普却先是压制，而后淡化处理了被征服区域发生暴行的新闻。当这些罪行的证据不断增加，尽管也有人陆陆续续地对此表示厌恶，但还是不足以改变国家倾向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

两个更深层的因素使得巴尔干半岛问题的触发变得更为敏感。一个是奥匈帝国日益增长的抑制塞尔维亚领土野心的决心。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维也纳的决策者们逐渐倾向于鹰派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情绪随着危机的起伏波动，但是始终有积累效应存在：每次都有更多的决策者选择采用激进的姿态。经济上和国内士气方面的因素增强了政客的易变。随着金钱因和平时期调动而流出，随之而来的是对少数民族征募的忧虑，奥匈帝国的选择范围渐渐缩小，其政治前景渐渐失去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6月贝希托尔德得到的最后一次战前区域战略总结中，对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奥匈帝国在半岛上面临的众多问题只字未提。

另一个是德国人对“实力政策”的倚仗日益加深。从俾斯麦到比洛，再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实力最大化寻求自主权和国家安全一直是德国政策的一大特征。历任决策者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力量的追求可能引起德国邻国的敌意以及疏远潜在盟友。不过，只要这个政策继续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以杜绝敌对阵营联合进攻德国的可能性，其带来的孤立的威胁即便很危险，也未到达势不可当的程度。直至1912年，协约国同盟大规模增强军事防备，使得这一途径在更长时期内的可行性被逐渐破坏。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两个问题困扰着德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第一个问题在上文中提及过：如果战争爆发，德国能够击退其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能保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则与俄国人的意图相关：俄国领导人是否在积极准备一场针对德国的预防性战争？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紧密联系，因为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俄国确实在寻求与德国开战，那么用政治上代价高昂的让步来避免战争的方案就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没有避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只可能推迟它的发生，那么明智的选择是现在就与敌人开战，而不是等到相同的情景重现，环境却已不再对德国如此有利的时候。

男性主义的危机？

如果在1914年的春天和初夏对欧洲的大臣们做一次调查，我们必定不惊讶于那不幸的性格结构。从卡斯泰尔诺和霞飞到日林斯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威尔逊和毛奇，这些高级军官全部是策略性进攻计划的拥趸，他们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们施加着具有波动性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1913～1914年，德尔卡塞和帕莱奥洛格两位强硬派先后任法国驻俄国大使，而仍旧决心为1909年的“羞辱”报仇的伊兹沃尔斯基正驻巴黎工作。法国驻索非亚大使安德烈·德帕纳菲厄在1912年12月观察到，伊兹沃尔斯基是“最好的驻法国大使”，因为他“在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问题上拥有个人利益”。而他的俄国同僚注意到，当他谈及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政策时，他总是呈现出“从吞并时期就不曾离开他的明显的苦涩语调”。脾气暴躁且厌恶奥匈帝国的米罗斯拉夫时任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他的老对手福尔加奇伯爵正在维也纳协助制定战略。这不禁让人想起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登场人物之间知根知底却又互相厌恶。

这是一幕只有男性人物的戏，那么这一点有多重要呢？男子气概一向包含了多种行为形式；这些男性的男子气概受到他们的阶级特性、民族性和职业影响。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关键人物经常刻意地诉诸男性的行为模式，这与他们对战略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我衷心地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挺直腰杆。”尼科尔森在给他的朋友查尔斯·哈丁的信中写道，并建议伦敦拒绝任何来自柏林的重新修好的恳求。至关重要的是，德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冯·舍恩在1912年3月写道，柏林政府在与法国的关系上保持着“完全冷静沉着”的姿态并“冷血地”尝试解决国际局势带来的国防问题。当伯蒂谈到德国会“把我们推入水中，并偷走我们的衣裳”的危险时，他把国际体系比作了一个挤满了男青年的乡间操场。萨佐诺夫赞扬了普恩加莱“正直诚实”的品格和他“意志的坚定不移”；保罗·康邦欣赏他具有专业法学家的“刚正”，尽管内敛自主的“户外活动者”的魅力是格雷最重视的公众人物特质。霍尔维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14年的危机期间畏畏缩缩而不支持奥匈帝国，体现的是一种“自我阉割”的行为。

对颓废的男子气概的祈求在那些年的书信和备忘录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其影响很难被囿于局部。然而这确实反映出欧洲男子主义的历史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性别历史学家提出，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数十年中，一种主要与满足欲望（食物、性、商品）有关的相对豁达的父系特征正被某种更加敏感、更加严苛、更加有节制的特征所取代。同时，来自低级别及边缘雄性的竞争，例如无产者和非白种人，更加强了在精英人群中对“真正男子气概”的演绎。特别是在军事领袖群体中，毅力、韧性、责任和毫无保留的服务逐渐代替了过去注重、现在却被视为“娘娘腔”的上层社会出身。“尽可能地表现男子气概在（男人的）眼中是真正优秀的品质。”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Rosa Mayreder）于1905年写道，“他们全然不顾失败的无情和只为符合传统男子气概标准而行动的纯粹谬误。”

但是，这些逐渐过度膨胀的男性气质却在压力下存在着，因为服从、谦恭、有教养和慈悲的理想特质仍被看作“绅士”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将在许多关键决策者身上观察到的角色压力和疲惫的迹象，譬如情绪起伏、强迫症、神经紧张、优柔寡断、心理疾病和逃避现实，归咎于已经开始给一些人带来无法承受的对性别角色的强调。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既有好战的严格执行纪律者的冷漠形象，也有对女性的支持的渴望。在女性的陪伴下，不可动摇的指挥者的面具摘下，显露出一个迫切需要安慰和心理支持的难以满足的人。他的母亲芭芭拉在去世前都与康拉德同住，或住在他附近。康拉德为填补逝去母亲的空缺，最后与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此女子当时已婚，后离异）结婚并让她随军生活在切申的奥匈帝国总部，这一举动让他的同僚和维也纳社会大吃一惊。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德斯克斯。一位对德斯克斯很了解的俄国同僚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深深的道德打击”已经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开始变得更孤僻，还不时会重复哼唱他最喜爱的关于和平不可侵犯的小曲”。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贝希托尔德时常在日记中抱怨噩梦连连、不眠之夜和头痛。当新任法国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前往圣彼得堡参加1914年7月的峰会时，这位生性安静的人几乎彻底崩溃。哈特维希也处于压力之下。俄国驻索非亚大使亚历山大·萨温斯基相信哈特维希已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失去了心理平衡”；萨温斯基观察到，哈特维希“到处都能看见他自己树立的敌人”。直至1914年初夏，哈特维希都在抱怨自己的心脏不好以及憧憬在巴特瑙海姆的暑假和治疗。可是他并没有活过“七月危机”。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04年所说的，被许多人视为这个时代标志的这种神经质不仅以这些有权势的男人身上的焦虑表现出来，也在他们的强迫性欲望上得以体现，这一强迫性欲望驱使他们为成为一个“勇敢之人”而非“懦弱之人”而战胜个人意志“弱点”。然而，当把这些人物与这个故事在性别史的更大范围内联系起来时，我们似乎能发现一种基于崇尚坚强不屈，而非上一代政治家（俾斯麦、卡武尔、索尔兹伯里）身上可见的能屈能伸、战术灵活和诡计多端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漫漫长路

奥匈帝国公设律师格奥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在其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法权利体系》（*System of Subjective Public Laws*）中分析了他所谓的“事实的规范性力量”概念。其意为人类根据现有事件状态确定规范权力的倾向。他提出，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事态对人的影响塑造了人对事态的认知。陷于这个解释的循环当中，人们往往很容易放弃对现有事物的观察，而设想事态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包含某种道德的必

要性。

当我们在思忖历史事件，尤其是像“一战”这样灾难性事件时，某种大致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会把一种必要感加于（或是有可能加于）我们身上。这是一个会在许多层面上显露出来的过程。它可见于信件、演说以及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很快强调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回避战争的爆发。这样对必然性的记叙有许多种形式：他们可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或参与者，也可能归咎于体制本身具有引发战争的倾向，不受个别参与者意愿的控制，或是归结于人类不可控的历史或命运的力量。

在相关文献中占首要地位近一个世纪的对战争起因的探求，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欧洲的战前数十年中找出的各种原因像砝码一样被放上天平，直到人们的意见从可能性倾向必然性。意外性、选择和成因被从视野中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和视角相关的问题。当我们从遥远的21世纪早期回头看1914年前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起伏时，我们的观点不能不透过后续事件的镜片。这些事件汇集成类似于狄德罗所描述的一张构图优秀的图片：“事物整体都被囊括于单个视角内。”当然，尝试去纠正这个问题，盲目追求意外性和无意为之都是不合常理的。此外，这只不过是将一个“多元决定”的问题替换成了一个“不完全决定”的问题——关于一场没有起因的战争。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发生的重要性的可能性及其原因，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与分析战争为何以及如何确实发生的重要性相当。

欧洲领导层之间互动的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对盟友和潜在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意图的长期不确定性。权力在派系和要员之间的不断变化，以及对公众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个问题。格雷能在内阁和议会中战胜他的对手吗？普恩加莱能保持对法国各部门的掌控吗？军方的意见向来都为维也纳的战略讨论定下了基调，但在雷德尔事件曝光后，康拉德的权力似乎开始缩小，其已大有可能被免职。同时，鹰派在圣彼得堡正占据上风。外国政治领导人在解读权力关系时遇到的困难更加重了这些在国内诱发的不确定性。英国观察者（根据我们的回溯，错误地）相信像科科夫佐夫（尽管他刚刚被撤职）和杜尔诺沃（Durnovo）这样的鸽派保守党人士已增强了对沙皇的影响，并准备卷土重来。巴黎曾忧心忡忡地讨论过以前首相谢尔盖·维特为代表的亲德派即将获得的胜利。对关键决策者易受公众意见风向影响的紧张也一直存在。在一份于1914年2月最后一天从柏林发出的报告中，德国皇帝的朋友利奥多维奇·塔季谢耶夫（Leonidovich Tatishchev）少将承认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出版物中对俄国的高度敌意，他还是无法判断这对威廉二世会有何影响：“我相信大体上，陛下对和平的热爱是不可动摇的，但这种倾向可能正在他的幕僚之中减弱。”不过，两周后他宣布警报解除，指出最近俄德媒体的结怨似乎没有给德国统治者留下丝毫印象。在所有的猜疑和侵犯的表面之下，是一种对如何解读他国官员情绪和意图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如何预判他们对仍未发生的不测之事的反应了。

未来仍然广阔。两个强硬的欧洲武装阵营中都出现了“大规模冲突发生的时机正在流逝”的征兆。英俄同盟正面临窘境，看起来它无法维持到定于1915年的续期。正在品尝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德国关系缓和的胜利果实的英国决策者，甚至开始显露出要改变看法的迹象。普恩加莱能否在更长时间内支持他的安全策略，这一前景并不明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谋求和成功达成了有关交换政治犯的协议，以及东部铁路问题的解决，都说明双方的关系正渐渐好转。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正在考虑对其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战争。他们都对这样的主动行动心存恐惧，随着协约国的军事准备升级，维也纳与柏林军方曾经讨论过抢先发动一场战争以打破僵局，但是他们并未确定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维也纳也没有决定要在未被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塞尔维亚——这将会发展为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自杀式行为。整个体系仍旧需要从外部点燃，即通过俄国人和法国人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边境建立起的契机。如果帕希奇的塞尔维亚政府能谋求国内整顿，进而将威胁国家政权乃至欧洲和平的民族统一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男孩们也许就不会跨越德里纳河，维也纳也许就会在良好的时机得到更加明确的警告，枪声也就不会响起。造成1914年灾难性结果的相互交错的诸多承诺并不是欧洲体系的一个长期性特征，而是无数短期性调整的结果，这些调整本身就是大国间关系瞬息万变的佐证。

假如枪声并未响起，1914年已成的历史将让路于一个不同的将来，可以想象，在其中，三国协约将不会在巴尔干危机被解决之后继续存在，英德之间的缓和也可能会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矛盾的是，第二种未来的合理性增强了第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恰恰是为了避免被俄国放弃和确保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才使得法国加强了对圣彼得堡的压力。如果同盟关系能更可靠和持久，关键决策者们或许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采取他们倾向的行动。与此相反，战前最后数年特有的缓和时期有着矛盾的影响：让发动一场欧陆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渺小，但是也使得关键决策者们低估了参与战争的风险。这是大国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正如正在进行的最终将欧洲卷入战争的一连串事件那般）的危险正在降低的一个原因。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第三部分

危机

第七章 萨拉热窝谋杀案



刺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早上，身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乘坐火车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改乘汽车经由阿佩尔码头前往市区。其车队共由6辆车组成，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着身着黑衣的萨拉热窝市市长费希姆·埃芬迪·丘尔契奇（Fehim Effendi Čurčić）和警察专员埃德蒙·热尔德（Edmund Gerde）。他们身后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经典的双门跑车，车的顶篷收卷了起来，这样能让车上的斐迪南大公夫妇清楚地看到一路上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着的是波斯尼亚州长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是弗朗茨·冯·哈拉赫（Franz von Harrach）中校。更靠后的三辆车上则载着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公和州长的随员。

如画的景象呈现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面前，沿着河的两岸是林荫大道，直通萨拉热窝市中心，再往远处则是高达1 500多米的山峦，在半山腰上还星罗棋布着村舍民居。山的顶端有薄薄的积雪，只有一些杉树与巨石点缀其间。在街道两旁偶尔可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则向人们述说着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奥斯曼文明。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错落的小巷组成了这个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迷宫”，地毯商、菜贩、马贩、铜匠……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叫卖着。在集市的中心，一个由奥斯曼慈善教会组织经营的小屋里，正在向穷人免费发放咖啡。尽管前一天刚下了阴冷的小雨，但6月28日的这个早上，整座城市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与索菲在萨拉热窝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个出访的日期并不吉利。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贵族的军队，结束了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为日后奥斯曼帝国吞并塞尔维亚打下了基础，这一天也被当地人称为“圣维特日”。1914年的这一天，整个塞尔维亚地区的相关纪念活动尤其热烈而激进，因为这是科索沃地区在经历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赢得“自由”以来的第一个圣维特日。“激励着（塞尔维亚）一代又一代的科索沃圣火，现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黑手社在1914年6月28日的一份记录中写道，“科索沃自由了！科索沃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对于这个由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组织来说，斐迪南一行在这个时间来到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波斯尼亚地区的挑衅。

在斐迪南一行到来之前，已有7名恐怖分子隐匿在城市中的两个据点。在斐迪南大公抵达的当天早晨，他们已沿着河岸就位。他们的腰间都绑着跟小蛋糕差不多大的炸弹以及12秒引爆装置，口袋里则揣着上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才准备了如此充足的人力与武器，以便在其中有人被发现、被捕或刺杀失败时立刻能有其他人继续完成刺杀行动。他们每个人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物粉，这样一来，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可以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了断。

与此相对的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完全不到位的安保措施。尽管曾被警告可能会出现恐怖袭击，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依然乘坐着敞篷车沿着拥挤的、人尽皆知的既定路线行进。本应站在两侧人群与车队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警戒人员一个也没有就位，这让车队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甚至连贴身警卫团也不在身边，警卫团长错误地与另外几个当地官员一起乘上了车队中的一辆车，而将自己的下属留在了火车站。

大公夫妇对自己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在三天前，弗朗茨·斐迪南与夫人索菲还在附近的一座名为伊利兹的小镇上，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环境所麻木，斐迪南夫妇甚至当时曾一时兴起步行到大集市里参观。而他们不知道，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这个当时也藏匿在集市中的塞尔维亚青

年将在三天之后开枪打死他们。在搭乘火车去萨拉热窝的前一晚，索菲在晚宴上遇到了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约瑟普·苏纳里奇（Josip Sunarić），他曾告诫当地政府，在这个民族情绪严重激化的时候让斐迪南大公夫妇进入市里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亲爱的苏纳里奇，”当时索菲告诉他，“您还是错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友好的氛围，即便是在塞族地区，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对此也觉得非常欣喜！”弗朗茨·斐迪南在当地一直以来是以难以交流和充满警惕的状态示人，而在他波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也想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检视了波斯尼亚山地驻军的情况，而此刻他想的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接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6月28日是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的结婚纪念日。尽管有着哈布斯堡王朝繁文缛节的宫廷礼仪作祟，但大公和夫人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弗朗茨·斐迪南在1904年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我的小索菲”喜结连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她是他的“所有幸福的来源”，他们的孩子则是最令他“喜悦和骄傲”的，“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的身影，可以就那样待一整天，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们”。即便当时政治婚姻充斥在皇室之间，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期间感情也是非常浓烈。索菲执意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留在弗朗茨·斐迪南身边，而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海外附属国，他们也能拥有与在维也纳相比完全不同的感受。

车队驶向市中心的楚穆尔亚桥，街道两旁的民居和店铺墙面上都挂着代表哈布斯堡的黑黄相间的旗帜，以及代表波西尼亚的红黄相间的旗帜。随周围的欢呼声渐强，人群中的一个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已手握炸弹蓄势待发，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一旦炸弹的引信被开启，将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此时就将没有退路，必须扔出炸弹。第一名刺客刚想拉开炸弹的引信，却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了什么人（或许是一个警察）站在了他身后，这让他惊得愣住了，就像他1914年想在火车上刺杀奥斯卡·波蒂奥雷克时一样，这次的刺杀也失败了。人群中的另一个刺客，也是第一个发起刺杀行动的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查布里诺维奇，当时他藏在靠近河岸的一侧道路边。他扔出了炸弹，听到引信被拉响的声音，大公的保镖哈拉赫还以为是车胎爆了，但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猛踩油门。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是斐迪南大公挥手挡开了炸弹，还是它打到了车的篷子上自己弹开了。无论如何，炸弹没有落到预期的位置，而是在车的后方爆炸了，在地上炸出一个大洞，碎片也波及了周围的一些人。

斐迪南大公对这个突发状况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转过头来一看，第四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空气中由于爆炸的冲击波而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和烟雾。除了索菲的脸颊被爆炸的碎片擦伤之外，他们二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第四辆车上的乘客虽也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些人还正想下车。受伤最严重的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官埃里克·冯·梅里齐（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虽然神志尚清，但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周围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次爆炸的波及。

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之后，就吞下了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并纵身跳入河中，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痛快的“了断”。毒药过于劣质，以至于直接溶解在了他的嗓子和消化道，非但没能致命，甚至可以说是让他毫无异样的感觉，而夏季的河水水位太低，不仅没能淹没他，就连推动他流走的水流程度都达不到。相反，他只是滚落到了7米之下的河床上，并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一个店主、一个拿着手枪的理发师和两名警察制伏。

斐迪南大公非但没有要求车队立刻离开现场，还耐心地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命令车队继续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厅，并在回来的时候改道去医院探望伤者。“这没什么的，”当时他说道，“这个人明显是疯了而已，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进行。”随后，后面几辆车绕过冒着烟的第四辆车，再次组成了一连串的车队向目的地进发。剩余的刺客们仍然潜伏在自己的袭击位置上，继续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且缺乏经验，其中三个人在车队靠近自己时都惊慌失措。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刺客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因为出乎意料地看到大公的夫人也一起在车上，在最后关头像第一个刺客一样僵在原地。“我没有掏枪，因为我看到大公夫人也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忍心伤害到她。”刺客波波维奇也由于恐惧而没有出手，他一直在指定地点准备行动。但由于他“在最后一刻被斐迪南大公的视线扫过时吓破了胆”，所以并未实施刺杀。当他得知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他惊慌失措地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塞族俱乐部里，并把自己携带的那个炸弹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后面。

刺客普林西普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听到爆炸声后，他以为刺杀行动已经成功，随即跑向查布里诺维奇所在的位置，却看到他弯着腰一边忍受着喉咙里氰化物的灼烧，一边被双手绑缚着押走了。“我立刻发现他并没有成功，同时也没有饮毒自尽，当时我打算赶紧开枪打死他，而就在这一分神的工夫，车队开了过去。”于是普林西普放弃了干掉同党的念头，而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车队上，但当他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他是通过其头盔上点缀的绿色鸵鸟羽毛准确地认出他的），车已经加速了，使他难以瞄准。普林西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冷静，在得知大公夫妇不久将返回后，他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右侧找到了一个新的刺杀位置，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车队离开城市的必经之路。另一个刺客特里夫科·格拉贝日为了找普林西普也离开了隐藏的位置，却在第一声爆炸后被抓。当车队经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或许是由于恐惧，他完全乱了阵脚，而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他表示当时周围的人太多了，拥挤到他连掏出炸弹的空隙都没有。

起初一切行动看起来还都在按照日程计划进行，直到车队到达萨拉热窝市政厅，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轮到市长丘尔契奇致欢迎辞时，他自己明知道刚刚在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意外，他之前准备的那些欢迎的套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但他当时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修改自己的措辞。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他满头大汗地走上演讲台开始致欢迎辞，其中就包

含如下内容："萨拉热窝首都的民众们今天都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阁下您的到来的巨大期待与欢迎……"他的发言并没有进行多久，就被斐迪南大公一阵不满的咳嗽声打断了。斐迪南大公之前一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身为客人出访你们的国土，却被你们的民众用炸弹来欢迎！"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索菲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随后弗朗茨·斐迪南恢复了冷静："就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说了。"在市长终于费劲地念完自己的欢迎辞之后，又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因为斐迪南自己准备的那份致辞已经被第三辆车上受伤官员的血浸掉了字迹。但随后斐迪南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了致辞，并委婉地提到了早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市长先生，在此我衷心地谢谢你，你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市民们对我的欢迎！在刺客行刺失败时，周围人爆发出的欢呼声是那么热烈。"在讲话的最后，斐迪南大公还特别用克罗地亚语叮嘱市长，要代表他向市民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讲话结束后，大公夫妇也要暂时分开了。按照日程安排，索菲将在市政厅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穆斯林妇女代表团，男性不能进入该房间，这样参会的妇女们就可以揭开面纱。房间并不宽敞却很温暖，大公夫人在看到其中一个妇女代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时，似乎也勾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想念，面露忧色，她说道："你们看，这个小女孩跟我家的小索菲差不多高呢。"后来她再次提到，她和丈夫都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尽快团聚，并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扔下孩子这么久不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奥匈帝国皇帝，表示他们二人都很好，此时正在市政厅里。但早上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吓这时似乎开始在他身上造成影响，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称，斐迪南大公"说话的声音显得滑稽而尖锐"，"他站立的姿势也很怪异，就像踢正步一样交替抬起双腿。我想他可能借此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早上的意外而害怕"。当然，他的表情也流露出对波蒂奥雷克的安保工作的严重失误非常不满。

访问活动接下来怎么进行？原先的计划是车队在行驶过大集市时右转，开上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之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斐迪南大公询问波蒂奥雷克是否还有遭到袭击的隐患，根据波蒂奥雷克后来讲述的，当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复，他"希望没有，但即便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防护，也无法完全防止近距离的袭击"。出于安全起见，波蒂奥雷克建议取消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直接开车出城回到伊利兹镇，或者去州长的官邸，并从那里沿着河的左岸一路前往火车站。但斐迪南大公一心想去探望正在西郊的驻军医院里疗伤的波蒂奥雷克的那名受伤的副官。当然，博物馆之行必然取消了，车队将原路返回，不再经过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以防遭遇更多的袭击。此外，按照原计划，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市政厅的活动结束后也将分开，大公前往博物馆，他的夫人则前往州长的官邸。但索菲在所有人面前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出于安全考虑，哈拉赫决定站在车左侧的踏板上（朝着河的那一侧），防止遭遇其他袭击。

伴着烈日，车队离开市政厅一路向西行驶，但大家都忘了将行程的

变动告知司机，当车队经过大集市后，前导车右拐驶入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后面载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车也随即跟上。波蒂奥雷克责备司机：“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原路返回！”汽车停了下来，（由于没有倒车挡）缓慢地返回主干道。

普林西普的机会来了，他早已埋伏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右侧的一家商店门前，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追上这辆几乎停在原地的车。由于来不及解开腰间的炸弹，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子弹直接朝着目标射去，而此时站在车左侧的哈拉赫只能眼睁睁看着右侧飞来的子弹。据普林西普后来的供述，当他从店铺门前遮阳棚的阴影里冲出来瞄准的时候，时间似乎都静止了，而索菲的眼神一度让他迟疑不决：“当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他的身边，我曾犹豫是否要开枪。而同时，我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在波蒂奥雷克后来的讲述中，也对当时的那一幕有着特别的感受：我坐在车上，注视着杀手的脸，他开枪了，但似乎并没有烟尘和火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仿佛子弹来自遥远的方向。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第一颗子弹穿过了车门，击中大公夫人的腹部并瞬间切断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穿过颈静脉。当车向着目的地酒店开去的时候，索菲的身子倒了下来，面贴到了她丈夫的双膝上，波蒂奥雷克起初以为她只是吓得休克了。直到他看到鲜血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涌出，他才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的严重。而站在踏板上的哈拉赫则探身进到车内，拽着大公的领子使他的身体保持坐着的姿势，这时他听到弗朗茨·斐迪南气若游丝的声音：“索菲，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头盔从他头上滑落，当哈拉赫询问他的伤是否严重时，斐迪南大公一遍遍重复着：“这算不了什么！”之后陷入昏迷。

在车队的后面，普林西普被人群包围了。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了，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并将他带走，他很可能当场就被围上来的愤怒群众乱棍打死。

在到达州长官邸的时候，索菲已经气绝身亡，他们两个人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施以急救。弗朗茨·斐迪南昏迷不醒，他的贴身男仆莫赛从事发现场一路跑到这里，此时正想剪开大公的制服前襟以便他呼吸。鲜血染红了这名男仆的黄色袖口，随后他跪在床边，询问斐迪南是否有遗言给孩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大公的嘴唇早已僵硬。几分钟后，这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宣布已经死亡。凌晨两点，消息迅速从那里传播出去，钟声响彻萨拉热窝。

亦真亦幻

萨拉热窝的枪响也打乱了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思绪。6月28日下午，他正在巴登度假，这是一个离维也纳很近的温泉小镇。这里远离喧嚣的人群，也让他有机会耐心阅读俄国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的一篇论文。他很快沉浸在文字当中。

> 而林间的风声、小鸟的阵阵啼叫和公园里悠扬的音乐声在我看书的同时似乎也萦绕在耳边。我可以清楚地辨别那旋律，因为我的耳朵此时已经屏蔽了吵闹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所带来的噪声；只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停顿让我竖起了耳朵。……突然音乐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演奏的是哪个乐章，我只是感觉到音乐突然停了。我本能地抬起头，远处的人群似乎也乱了阵脚，突然静止了动作。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在1963年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当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人们都在回忆当时自己在哪、和谁在一起。来自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当时正在与她患有抑郁症的丈夫卡尔在德国旅行，他们在德累斯顿所下榻的旅馆对面的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上看到了相关消息被贴出。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半个世纪之后，阿尔方斯·克拉里–阿尔德林根（Alfons Clary-Aldrigen）王子想起他当时正在与金斯基的亲戚在波西米亚的森林里打猎，当他们在黄昏时分在森林边缘的路边露营时，来自金斯基的一个厨师骑着车将这个从当地邮政局局长那里得知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国会议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则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的，随后的整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和合作伙伴，告知他们这一消息。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就在 4 个星期之前还梦到耶稣会指派他去刺杀大公，在那之后他就被人打电话告知大公遇刺身亡了。

更有甚者，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预感。6月28日，由于要等到11点才去做弥撒，他就一早在维也纳的家中看报，他被上面的一篇关于斐迪南大公出访波斯尼亚的详细行程的文章吸引了。

> 直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在读到这篇描述（出访萨拉热窝）行程细节的文章时身体上的不适感。但鉴于只是一些疼痛的感觉而无大碍，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为看到斐迪南大公出席这样的活动而感到难受。然而片刻之后，（向我通知他遇刺的消息的）电话响了。



利昂·比林斯基

当时的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称，这个消息太过骇人，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直到当天晚上一些相关细节报道见诸报端、表示哀悼的旗帜在政府建筑上升起，才算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首都的居民聚集在街道上，为了这件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整夜。”在24小时内，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甚至传到了《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里。那个傻气十足的捷克士兵帅克在布拉格家中的客房里，一边给自己患有关节炎的膝盖上药，一边谈论此事。萨拉热窝事件甚至融入当时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这部小说《好兵帅克》中，就以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事件作为重要情节的铺垫，当时帅克从负责清扫公寓的米勒太太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借助帅克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讽刺了奥匈帝国政治上的丑恶。

> 米勒太太：他们在萨拉热窝把他刺杀了，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当时大公正与他的夫人一起坐着车。

帅克：哦，你知道得还挺清楚，米勒太太，原来他们是在车里遇刺的啊。这也难怪了，如果是平时，他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就遇刺了，但当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脚下时就不一定了，况且是在萨拉热窝！那是波斯尼亚地区啊，米勒太太，我希望是土耳其人干的，毕竟我们当时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就是个错误。

直到奥匈帝国覆灭多年之后，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描述依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来自萨拉热窝的消息与多年来文学上关于消失的帝国的想象紧密呼应：从卡尔· 克劳斯的《人类的末日》（*Last Days of Mankind*）中不祥的电话铃声，到约瑟夫·罗特的《特罗塔·冯·斯普尔杰少尉》（*Lieutenant Trotta von Sipolje*），在书中，特罗塔中尉接到“令其终日幻想成为现实”的噩耗。

我们很难具体评估萨拉热窝事件在当时对奥匈帝国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一个专家曾如此写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为公众人物“最杰出”的一点“就是他在各个阶层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绝非万人迷，他没什么人格魅力，并且易怒。透过他平时给人的那种矮胖、迟钝的形象，普通大众很难想象当他和至亲在一起时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会变得充满活力，碧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不能容忍有犯上由头的行为，同时他又对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在他的政治友人奥托卡尔·切尔宁看来，他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他暴躁的脾气也让那些大臣和高官们经常“在还没面对他的时候就已经胆战心惊”。他只有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在与其他人交流时，他更多时候是保持着戒心。“在每次与别人初次见面时，我都认定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曾经这样说，“只有深入交往后，我才慢慢消除自己的这种成见。”他对于打猎的极端痴迷也不时引起负面评论，尤其是在布吕恩巴赫堡所在的山谷，这里是他的主要狩猎场，为了保证当地能有足够的健康的猎物，弗朗茨·斐迪南封锁了城堡周边所有的土地。当地人不能再走那些熟悉的路了，也不能再到山上去放羊了，这都引起了当地的民怨。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就曾在记录萨拉热窝事件的一份笔录中注意到，当时的“第一波袭击”很快退却，但因为斐迪南大公“极其不受欢迎”，民众中的戾气一时间并没有消散。

也正因此，刺杀案的消息公之于众时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哀痛情绪，这也是为什么这场刺杀案一直以来都以发生地命名，而不是受害者的名字（相较之下，没人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称为“达拉斯事件”）。也正因为斐迪南大公并非一个饱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能作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线。当然，这么想是错误的。首先，不管他是否受欢迎，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和对于改革的热忱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匈帝国大使曾告诉他的塞尔维亚同事，弗朗茨·斐迪南有着“罕见的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将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献给国家，并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有识之士，并且“都深知只有实施一个彻底的改革政策”才能确保帝国的持续

生存。此外，这不仅关乎弗朗茨·斐迪南个人的存亡，更在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走向——王朝的未来以及“哈布斯堡国家理想”的实现。

弗朗茨·斐迪南的声望在纸媒的报道炒作之下不断提升，24小时之内萨拉热窝事件的诸多主要细节（从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到跳河寻死、从大公对伤者所表示出的关切到他在市长致辞时对情绪的克制、从那个致命的通往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弯道到大公弥留之际对妻子说的话）已是人尽皆知。报纸以大篇幅持续报道此事。代表哀悼的黑色条纹最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随即街上开始出现哀悼的黑旗，直到最后就连电车上都被盖上黑布以示哀悼。舆论领袖们也开始从大公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能力竟然英年早逝、一段完满的婚姻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摧毁了、大公夫妇的三个孩子一夜间变成了可怜的孤儿、老皇帝承受丧子之痛等多个方面突显这一事件是如此让人悲痛。

此外，这也是第一次将大公的私人生活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当中。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援引了大公对自己家庭的一段描述：“每当我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里，看到爱妻在那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我就感到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家门外，而围绕着我的只剩下幸福。”这些被大公的亲信们整理口述出来的片段，完全改变了大公曾经的那种并不太受欢迎的形象，但事实上报道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而非事实。在卡尔·克劳斯将这些内容引入自己的作品后，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也显得倍加悲壮了。

然而，萨拉热窝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冲动所为。舆论领袖们也迅速将此事件包装得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代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用“命中注定的打击”来形容这个事件，“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撰稿者如此写道，“就仿佛是暴风撼动了帝国的权威，似乎历史注定要用血在这个新时代开启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茵斯布鲁克消息报》（*Innslbrucker Nachrichten*）则用“奥匈帝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来形容此事。斐迪南大公遇刺后，有媒体报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更使民众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他们所依靠的、能够为他们构建美好未来的伟人”。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奥匈帝国的声音。在布达佩斯，更多的声音则是一个灾星终于陨落了。但即便在这里，资产阶级报刊也将这个事件渲染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在舆论的普遍影响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传遍了奥匈帝国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人能坚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但也有例外，当时身在布拉格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对此事充耳不闻，他那天的日记里只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出门走错了路、坐错了车，然后又错过了电话。当然，他只是为数不多的特例。

调查开始

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相关司法调查自普林西普开枪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事件发生的几小时之后，忍受着氰化物残渣的灼烧和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上群众“私刑”后带来的伤痛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带到了身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法官莱奥·普费弗（Leo　Pfeffer）面前。普费弗后来回忆道：“这个年轻的刺客身材矮小且面黄肌瘦。很难想象看起来如此文弱的一个人能犯下如此深重的罪行。”一开始普林西普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当普费弗直呼其名的时候，普林西普“以一个清晰而平缓的声音”回应了他。在之后的几天里，普林西普以坚韧的毅力百般阻挠官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在6月28日下午对他进行首次审讯时，他表示自己完全是独自行动的，跟查布里诺维奇没有任何瓜葛。“当我听到（查布里诺维奇所投出的炸弹产生的）爆炸声时，”普林西普解释道，“我告诉自己：看来有人有跟我一样的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甚至为自己的虚假供述增加了很多细节描述，以加强其所谓的真实性：他当时被查布里诺维奇的举动震惊了，以至于忘记在大公经过自己身边时举枪射击，之后只好迫不得已找了另一个地方实施他自己的刺杀行动。查布里诺维奇起初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他也声称自己是独自策划的此事，他使用的炸弹是从贝尔格莱德一个不记得名字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的。



刺杀者在法庭上

而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星期一，查布里诺维奇的供词却突然改变了，他承认与普林西普是同伙，并且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一起策划了此次犯罪行动，武器是由一个曾参加了巴尔干战争的“前游击队员”在复员后保留下来并提供给他们的。后来查布里诺维奇指认了齐加诺维奇就是那个“前游击队员”，当普林西普在周一早上面对以上供述时，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同伙。

至此，两个年轻人都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且一致的供述，调查此时似乎已经到头了。普费弗并不是一个善于审讯罪犯的人，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采用刑讯逼供或任何其他司法威胁的审讯方法。普费弗似乎非常反感采用这种威逼的手段得到不同犯罪分子之间的一致口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面对独立的罪犯并通过非胁迫的方式得到的供述才是值得

信赖的真相。实际上，想得到独立的供词并非易事，因为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即便被各自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却可以通过敲击之间的隔板，以他们之前在一本俄国小说里学到的暗语及时交换信息。

在这之后推动调查取得更多进展的并非这两个人的供词，而是来自于当地警方对相关嫌疑人员大范围的搜捕，因为他们都怀疑此事必有其他同党尚未落网。达尼洛·伊利奇就是因此落入警方手里的。实际上警方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他们之所以逮捕伊利奇，是因为知道他与普林西普交往密切，并且他经常与塞尔维亚种族主义者们沆瀣一气。而伊利奇此时也不知道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同时他开始怀疑是普林西普或查布里诺维奇供出了自己。当他在7月1日星期三被警方带到普费弗法官面前时，他彻底慌了，并要求“坦白从宽”，他表示，如果法官能保证他不被判处死刑，他就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普费弗没有这个权利，但他提醒伊利奇，在奥匈帝国的法律中，提供相应证据帮助破案确实有助于在最终判决中减刑。



逮捕嫌疑人

对于伊利奇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供词揭穿了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之前编造的故事，并让调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参与此次刺杀活动的远不止两个人，而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组织，其中三个人来自贝尔格莱德，这三个人是由伊利奇亲自招入组织的。之后他提供了该组织的详细名单，并推测了他们目前的大致行踪。在得到这些信息后，普费弗立刻从审讯室冲到外面，并电话通知各处去逮捕名单上的那些人。

第一个落网的是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即第三个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组织成员。当时在普林西普开枪后。格拉贝日也给自己精心规划了一个摆脱嫌疑的办法，他从事发现场小心地离开，躲到了他在萨拉热窝的一个叔叔家，并把随身携带的炸弹和手枪也藏在那里。之后他绕过城镇闹市

区，来到另一个在当地开餐馆的叔叔那里，在那里吃了饭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乘火车回到在帕莱的家中，并打算从那里逃往塞尔维亚。最后他在临近塞尔维亚边境的一座小镇上被逮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9天内，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也先后落网，只有穆罕默德巴希奇尚未被抓。当时他已经逃到了黑山，并躲过了奥匈帝国警方的追捕。即便如此，萨拉热窝的警方也已经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伊利奇的供词又使得更多的相关人员进入警方的视线当中，从学校教师到街头地痞无所不包，甚至连当时给几名刺客提供过夜住所或帮助他们藏匿、运送武器的当地农民也被牵连。

想查出塞尔维亚与这件事有关的方面则是更为困难的一件事。武器是塞尔维亚产的：左轮手枪是在塞尔维亚手工制造的，炸弹经查也出自塞尔维亚的军事重镇克拉古耶瓦茨。6月29日，查布里诺维奇供出在贝尔格莱德时是丘布里洛维奇给他们提供了武器装备。但以当时丘布里洛维奇身为波西尼亚流亡者的身份，他在当地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通过高层搞到这些东西，这也表明塞尔维亚官方并未参与此事。而根据后来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结论，如果齐加诺维奇是作为尼古拉·帕希奇的助手在黑手社做相关的情报工作，那么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抓到。对于沃亚·坦科西奇这名曾经参加游击战的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坦科西奇不仅为刺客们提供了武器，还在贝尔格莱德训练他们的枪法，而且也是他告诉他们，即便自杀也不能落入警方手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这几名刺客一开始表示完全没听说过有坦科西奇这么一个人，直到他们一个个被带到伊利奇面前当面对质之后（一个比较少见的方式，可通过嫌犯之间的当面口角来从中辨别真相），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才承认坦科西奇确实也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

但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直到此时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该事件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还是一头雾水。或许确实如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雷马克（Joachim Remak）所说，普林西普、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面对审讯时通过“从最初的闭口不谈到扭捏作态，再到最后的假意逢迎”而精心布下了一个迷局，同时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之下也让伊利奇的供词丧失了很大效用，也让贝尔格莱德官方未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他们都没有提到黑手社，而是一直在暗示关于齐加诺维奇和民族自卫组织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让奥地利人的调查走向错误的方向。加之普费弗法官消极的诉讼态度，也给了刺客们更多的时间完善他们谎话的各个细节。

即便警方的调查进展缓慢，依然让奥匈帝国政府上层将此事与贝尔格莱德有关的边境问题产生了联系，而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所发出的电报就已经提到了该事件与塞尔维亚有关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电报中称“投掷炸弹的人”查布里诺维奇实际上参与了一个“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操纵的”塞尔维亚社会团体；普林西普也曾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就读，而且警方也曾在普林西普哥哥的住处找到“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

的书籍”。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截获了一份加密的电报，上面显示查布里诺维奇就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前还曾受雇于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出版社。而在6月29日发出的另一份比较长的报告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发现这些刺客曾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政治教育”，并将谋杀冠以塞尔维亚种族文化的高尚名义，其中最著名的教材范例当属中世纪的自杀式袭击者米洛什·奥比里克，他被称为“塞尔维亚人的英雄”：

> 我还不敢直接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之下的宣传部，他们多年以来安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

波蒂奥雷克也并未就此收手。在一份发给陆军大臣的加密电报中，他发现刺客曾提到从贝尔格莱德获得武器装备的支持。但即便刺客并未亲口承认这一点，波蒂奥雷克也“完全相信”幕后的黑手来自于塞尔维亚。尽管他无权为此采取什么官方措施，但在他看来，只有“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手段，才能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的长治久安”。萨拉热窝事件的余波在最初的报道中持续存在，“我们依然没能从昨天的灾难性事件中缓过神来，”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大使表示，“为此我也始终很难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评估萨拉热窝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仅仅通过司法方面的调查，奥匈帝国方面立刻就对塞尔维亚政府充满了复仇的愤怒，并将其作为“假想敌”来看待了。

塞尔维亚的回应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反应引起了塞尔维亚的极大重视，贝尔格莱德政府极力示好，但其官方的吊唁与塞尔维亚民间丝毫没有悲痛之感的氛围让奥匈帝国政府感到巨大反差。根据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报告，本来计划在事件第二天举行的纪念同样身为刺客的米洛什·奥比里克的活动被临时取消了，但他的报告中同样指出，民间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表现出的情绪似乎很高涨。其中，在科索沃地区更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圣维特日庆典，据奥匈帝国领事报告，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传到当地时，当地人“极其夸张”地热烈庆祝，那种表现“我只能用‘兽性’来形容”。此外，塞尔维亚官方此前表示的将对此事件进行7周的官方哀悼活动也被改成了只持续8天，但这好在对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中所充斥的对哈布斯堡家族此次深重打击所带来的喜悦有所掩饰。

伴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持续的谩骂之声，奥匈帝国方面的质疑也进一步加强。6月29日，印有关于揭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塞尔维亚人的所谓“种族灭绝”阴谋的小册子开始在贝尔格莱德被分

发，里面提到哈布斯堡王朝当时对屠杀坐视不管，这让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颇为不满。情况后来愈演愈烈，第二天就有当地一份重要报纸指出并谴责维也纳政府试图与塞尔维亚结盟完全是个“谎言”；其他媒体则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刺客称为“身怀荣誉感的优秀青年”，带有如上内容的这篇文章（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文章）被定期翻译、刊发在奥匈帝国国内的报刊上，不断激起民怨。带来更恶性的影响是（因为内容里充满了真实的描述），这些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向维也纳方面提出过官方警告。一篇在贝尔格莱德《新闻报》（*Stampa*）上刊登的名为“一个被忽略的警告“的文章指出，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曾将刺杀的各项安排提前告知了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对于大使的此番话语“感激不尽”，并将这一警告及时地转达给了皇帝和皇储。以上内容可以被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方面揭示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个警告的忽视，另一方面透露出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就对此次刺杀行动了如指掌了。

当然，面对指责之声，塞尔维亚官方几乎束手无策。贝尔格莱德政府既不能禁止在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庆祝活动，也无法控制科索沃地区的激进活动。媒体成为灰色地带，在维也纳，约万诺维奇意识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媒体刊发的内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敦促帕希奇对其中最恶劣的几家媒体采取措施，杀鸡儆猴，防止更多极端言论的涌现。奥匈帝国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提出警告。但对于帕希奇政府来说，对限制塞尔维亚媒体的言论自由，他们缺少足够的宪法依据。实际上政府还指示塞尔维亚新闻出版署署长要谨慎处理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有关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在7月7日官方辟谣后，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官方警告维也纳关于刺杀的这一传言也烟消云散了。帕希奇是否动用强制措施管住了媒体的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很有可能考虑到如果此时对媒体强硬，会导致内阁中激进派作祟，因此没有动用强制手段。此外，毕竟8月14日的大选日益临近，面对选举阵营中普遍的对奥匈帝国的愤慨情绪，帕希奇也不敢在此时对种族主义者们大动干戈。

还有更多失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6月29日，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向俄媒体表明了关于波斯尼亚反对维也纳政府的各项论据，谴责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收复失地的组织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多年以来斯帕拉伊科维奇都在向媒体表示，身在维也纳的一些政治领袖正在谋划反奥匈帝国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新兴的被称作‘黑手社’的组织”。他坚持认为，在塞尔维亚国内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日后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他还否认刺客的武器是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提供的，并指责耶稣会挑起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地区的宿怨，并警告称如果有塞尔维亚领袖在波斯尼亚被逮捕，很可能由此引发塞尔维亚人对政府的反抗。斯帕拉伊科维奇历来以善于与奥匈帝国外交官针锋相对并在唇枪舌剑中占据上风而出名，就连与他交往密切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都形容他“不甘平静”。但当这些公开言论快速地被传到维也纳的官方时，也加剧了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阴云。

帕希奇也因为其不合时宜的虚张声势使这摊浑水越搅越浑。在6月29日于新塞尔维亚进行的一场有几名内阁大臣、多名奥匈帝国辖区的塞尔维亚代表出席的演讲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奥匈帝国方面尝试以“刺杀案这一让人遗憾的事件”作为政治筹码抵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民则“必将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当时刺杀案发生没过多久的那个时刻看来，这一姿态显得甚为扎眼。在7月1日发送给所有塞尔维亚使馆的通函中，帕希奇也以类似的态度，对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事件的平息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奥匈帝国媒体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与揭露，并提出塞尔维亚及其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抵抗维也纳政府任何“印有欧洲整体舆论导向”的尝试。在后来就此通函的进一步补充中，帕希奇指责了维也纳媒体对塞尔维亚报刊的错误翻译与舆论导向，并指出这一行为阻碍了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正面措施控制舆论发展。简而言之，帕希奇有些时候更像是在扮演一个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火上浇油而非是釜底抽薪的角色。

帕希奇与奥匈帝国大使和外交官们的往来一直困难重重，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他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尴尬。例如7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一次对大公的官方悼念仪式上，帕希奇对奥匈帝国大使表示对此可以尽管放心，贝尔格莱德政府将“像是本国的领袖去世一样”处理这件事。他这么说固然是出于好意，但在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弑君行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的国土上，这番话就显得毫无分量了。

与帕希奇的话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能否在奥匈帝国政府调查皇储夫妇遇刺案的根源动机时提供可靠的协助，而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质疑。6月30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会见了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Slavko Gruić），询问塞尔维亚警方目前在调查众所周知的刺杀阴谋上已经有了怎样的进展，格鲁伊奇对此报以了一种极端的（很可能是装傻充愣）天真的态度，表示因为不确定奥匈帝国政府是否希望就此事展开调查，警方还未有任何动作。施托克听后勃然大怒，表示不论维也纳方面是否要求进行调查，这都应该是贝尔格莱德警方最起码的职责。

然而，尽管塞尔维亚做出过官方的承诺，但其当局从未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过切实有效的犯罪动机调查，或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实质性的评估。格鲁伊奇表示，内政大臣确实任命了贝尔格莱德警察局局长瓦西尔·拉扎列维奇（Vasil Lazarević）调查该事件，一周后拉扎列维奇就结束了他的“调查”并欣喜地宣布，萨拉热窝事件与贝尔格莱德方面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他补充，在贝尔格莱德从来没有过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当施托克提出希望得到塞尔维亚警方及外交部的帮助，调查一个可能有计划更多刺杀行动的当地一个学生团体时，却得到了对方敷衍了事的合作，这使他相信，尽管尼古拉·帕希奇一直担保塞尔维亚的调查效果，但实际上塞尔维亚外交部在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中并不能胜任一个合格的协作伙伴。对于黑手社，塞尔维亚当局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措施，警方大多按兵不动，而帕希奇关于非法入境者的调查效果也并不尽

如人意。

帕希奇（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奥匈帝国方面建立最终的协助关系，而是采取了自我辩解的态度：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始终都是受害者，而这都是奥地利人带给他们的；如果有必要，塞尔维亚人有通过言论或军队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帕希奇看来，萨拉热窝事件与“塞尔维亚官方”没有丝毫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参与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独立措施，在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都是可以允许的。塞尔维亚也指出，奥匈帝国此前一直都对自己的政府进行无端的言论攻击。这一切在塞尔维亚方面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激怒了奥匈帝国政府，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塞尔维亚的傲慢无礼和假意逢迎，而塞尔维亚曾经信誓旦旦做出的关于遇到灾害性事件时的所谓合作，在此刻只能产生更负面的作用。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的言论中，完全看不到塞尔维亚政府能对此次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虽说对于已经在与塞尔维亚合作道路上踌躇不前的奥匈帝国来说，这些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这些后续事件的发生使两国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曾经正常的轨道上了。

还需要做什么

事件给奥匈帝国决策层带来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6月28日之后没几天，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就达成共识：只有靠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鹰派更是对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施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迅速采取行动。“去年我还在写给你的信中表示我们将学着宽容对待塞尔维亚的戏谑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战争。”里特尔·冯·施托克在6月30日给贝希托尔德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 在回答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错误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战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他们毁灭性的打击。

被任命为接替瑟杰尼（Szögyényi）出任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王子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会见了贝希托尔德。霍恩洛厄威胁道，如果现在还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即便是冒着犯上的大罪也不愿去继任驻柏林大使一职。在贝希托尔德经历了一天的类似对话之后，当天晚上，康拉德到了。这名总参谋长借助萨拉热窝事件终于得以毫无顾虑地开始再次说起他的那套理论，即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立刻开始总动员，不要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了。“打蛇打七寸，否则你只会面对毒蛇坐以待毙。”后来贝希托尔德回忆道，总参谋长的建议其实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开战！开战！开战！”而刚从南蒂罗尔

视察归来的国防大臣克罗巴廷（Krobatin）在6月30日（星期二）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会见时也持类似的态度。克罗巴廷声明，军队已经准备就绪，面对如此灾难性的事件，战争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联合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也被卷入了此次事件。作为奥匈帝国政府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三大高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对这次危机的走向至关重要。比林斯基并不仇视塞尔维亚人，作为负责波斯尼亚的行政大臣，他在处理该地区少数民族事务时从未采取过强硬措施，始终以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他通过自学学会了阅读并能听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平时与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交流也是用俄语而非德语，这也让属下们备感亲切，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全力营造和谐的氛围。直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比林斯基仍在持续致力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与少数民族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也极力反对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

在巴尔干局势动荡的时期，比林斯基对于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是战还是和的态度曾来回摇摆。在1913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对峙和10月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即便他知道皇帝和皇储对于全面战争都不会支持，并且会因此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依然是主战派的一员。另外，他也与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诺维奇交往甚密，并通过这层关系和平解决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纷争。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反对帮助保加利亚打击贝尔格莱德政府，并以此帮助塞尔维亚开拓了疆土。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康拉德针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建议，认为这将使奥匈帝国变成一个暴虐无理的国家，失去在大国之中的权威。

但萨拉热窝事件让比林斯基的态度急转直下，从6月28日下午开始，他就大力倡导对塞尔维亚加以制裁。即便他与弗朗茨·斐迪南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但他依然认为在萨拉热窝事件上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失职责任，当然，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完全不必为此自责。他之前也并不清楚波蒂奥雷克将大公夫妇带进城里的种种安排，因此他在后来读到相关报道时更是感到莫大的震惊。虽然在大公夫妇此次出行的安全事务上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萨拉热窝事件后的会议上，他并没有像贝希托尔德那样急于通过各种证据摆脱各方的责难。

鹰派中最激进的当属比林斯基的下属波蒂奥雷克了，与比林斯基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萨拉热窝事件感到自责。波蒂奥雷克也提出要首先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演习行动。在斐迪南夫妇出访当天，一切安排都是由他全权负责的，也是他在大公从市政厅出发之后的这段行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处理。实际上，波蒂奥雷克只是在借这种深切的自责掩盖自己好战的本性。在从萨拉热窝传到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能看出，波蒂奥雷克期望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快速打击。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波斯尼亚地区即将面临被塞尔维亚势力控制的局面，一旦如此，该地区将无法再进行大型兵力部署。只有打击散布在各地的塞尔维亚组织、根除贝尔格莱德的问题，奥匈帝国才能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波蒂奥雷克虽然并不能扮演决策者的角色，但他的相关报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弗朗茨·斐迪南始终认为奥匈帝国只会因为与别国的战争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波蒂奥雷克则推翻了这种论断，指出战争将解决帝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种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国内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论帮助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在与鸽派的论战中占据上风。

外交部的官员们也开始接受这一主战的政策。早在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就表示大多数驻外使节都希望看到一个“与塞尔维亚一了百了的做法”。主战的事态也逐渐扩大开来：出席了几次相关会议后便自称是“塞尔维亚问题专家”的亚历山大·冯·穆苏林（Alexander von Musulim）男爵作为一名克罗地亚人，生怕塞尔维亚的发展会给克罗地亚带来威胁；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绍帕里因为回国探望生病的妻子故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正巧在维也纳，在他看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则值得忧虑；自1913年10月开始担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一职的福尔加奇伯爵也因为曾经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的不堪经历而颇有成见。主战派占到了决定性的比例。掩盖对对抗政策的偏好是积极外交政策的一贯作风——这被视为是顺从的极端反面，以及可能困扰奥地利政策的得过且过的心态。埃伦塔尔在1908年到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期间，曾就这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先发制人的观点与其前任们的“宿命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尔加奇、亚历山大·奥约斯伯爵（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绍帕里、阿尔伯特·内梅斯伯爵（Count Albert Nemes）和穆苏林男爵都是埃伦塔尔的忠实信徒。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期间，这些人多次向贝希托尔德施压，要求他不要放任俄国的恐吓行为，也不要纵容塞尔维亚“越发的无礼举动”；他们私下还为他实施的过度安抚政策感到悲哀。更有一部分政界人士在1912～1913年持续劝诫贝希托尔德不要向俄国或塞尔维亚“日益蔓延的侵略”屈服。

萨拉热窝事件不只鼓动了鹰派走向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和平的希望。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在1914年波斯尼亚之行中幸免于难，他必将继续坚持他一贯以来反对战争的态度。在他此次出访结束后，他可能就会将康拉德调离目前的岗位，如果果真是这样，也就绝不会有这个好战的总参谋长的今天了。“大公一直以来反对战争，这完全不合情理，”一个奥匈帝国高级外交官曾在7月底这样对约瑟夫·雷德利希说，“是他的死让我们找到了一种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带来的力量！”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奥匈帝国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的压力是最大的，他被萨拉热窝的消息极大地震惊了。他和弗朗茨·斐迪南自儿时起就是要好的伙伴，与这个英姿勃发、自信满满、富有主见的大公相比，他则显得思维缜密、心思细腻，他们二人彼此间充满了敬意。贝希托尔德深知这名曾带给外界古怪形象的大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怎样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此外他们二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贝希托尔德的夫人南迪纳和索菲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贝希托尔德得知刺杀消息时正身在他位于布赫劳的城堡，他震惊得哑口无言，之后立即乘坐火车赶往维也纳，并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一个逝去的人，一个逝去的伟人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谈话，”贝希托尔德后来回忆道，“我内心的

伤痛无以复加。他被残忍地杀害的场景一遍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散发着光彩……”

贝希托尔德除与塞尔维亚开战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吗？这当然离不开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第二天就有鹰派开始对他教唆身为外交大臣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即便贝希托尔德也曾在一些事务上采取过强硬措施（例如针对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但他始终还是主要以怀柔政策而出名的。1914年5月，曾有一名大使宣称贝希托尔德就是个“外行”，他那“缺乏主见的做事方法和不足的信念”让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为了催促这位外交大臣对萨拉热窝采取强制措施，鹰派开始费尽心思进行各种努力。康拉德也扮演了鹰派中的急先锋，他在6月30日对贝希托尔德宣称，奥匈帝国目前陷入了和在巴尔干战争时相同的窘迫境地。

事实上，贝希托尔德似乎自己提早做出了一个或许是完全出自个人意向的导向直接措施的政策，这个别人眼中“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铁腕的领袖。在6月30日下午1点就萨拉热窝事件举行发布会并在美泉宫接受皇帝会见时，他第一次有机会阐述自己针对这次危机的观点。这次会见至关重要，在一份未曾出版的贝希托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关于此次会见的细节。引起他高度关注的是，尽管皇帝与大公和他出身低微的夫人索菲的关系并不大好，但对于萨拉热窝事件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这位83岁高龄的统治者破例拉住贝希托尔德的手并要求他坐下，在谈到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他的眼眶湿润了。贝希托尔德与皇帝达成了共识——奥匈帝国的“忍耐政策”已经到达了极限，同时贝希托尔德警告，如果帝国在这样一个极端恶劣的事件后表露出自己的软弱，那么“东边和西边的邻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自己的利益行动”。帝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据贝希托尔德回忆，皇帝看起来明确了目前所处的状况并完全同意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但皇帝也坚持要求贝希托尔德与当时身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的步调保持一致。

这里蕴含着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蒂萨强烈反对立即采取冲突行为的政策。蒂萨曾于1903~1905年出任匈牙利首相，并于1913年再次接任，是匈牙利政坛的一把手。这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同时也是俾斯麦的狂热崇拜者，他通过贿选、对内铁腕统治、倡导经济改革而为马札尔中产阶级带来利益与支持率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蒂萨于1867年建立了妥协系统。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信赖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他认为这是匈牙利未来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坚持执行马札尔精英统治的方针，并因此使非马札尔人不能进入政坛。

对蒂萨来说，皇储遇刺事件带来的不是悲痛，而是极大的解脱。弗朗茨·斐迪南曾倡导的改革或将撼动蒂萨所建立的权力体系，大公与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尤其让人感到不安。因此，这位匈牙利首相并没有像他的奥匈帝国盟友那样表现出愤怒与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的急不可耐。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一次会见以及之后几天与皇帝的书信交流中，蒂萨认为不能以此作为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主要的

限制因素还在于目前巴尔干地区并不稳定的局势。1914年与俄国以及协约国调解之后所产生的罗马尼亚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鉴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巨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和与罗马尼亚冗长的边境线，布加勒斯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蒂萨认为，在这种罗马尼亚随时可能翻脸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为此蒂萨设想了两种选择：要么在德国的帮助下说服罗马尼亚再次加入三国同盟，要么通过建立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敌人保加利亚的关系，达到限制罗马尼亚的目的。

> 罗马尼亚政府的心腹之患只有保加利亚。一旦他们觉得不能阻止我们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他们或许就将尝试加入三国同盟并借此保护自己免遭保加利亚的侵略。

在匈牙利人眼中，这其实是巴尔干关系的再次体现。身为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家庭的后裔，蒂萨很愿意看到罗马尼亚受制于马札尔精英集团的控制。蒂萨和他的幕僚们都觉得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是匈牙利安全的巨大保障，当时这种理念在马札尔领导集团中也颇为盛行。这名匈牙利首相指出战争并非是绝对的。蒂萨曾在1913年10月第二次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支持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同时他也很乐意看到在将来某个更合适的时机展开与塞尔维亚的另一场战争。但他坚决反对大多数奥匈帝国决策者所支持的直接采取行动的政策。

即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奥匈帝国领导层一直被激烈的情绪冲击着，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不可能为此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首先说服蒂萨同意这一观点就很难，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宪法上都不可能在这个二元制的统治系统下忽略匈牙利首相的意见。此外塞尔维亚官方对开展萨拉热窝刺杀行动的介入问题也并未完全得到证实。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见中，蒂萨曾指出应该给塞尔维亚政府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展示出良好的意愿”。贝希托尔德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同意等到塞尔维亚政府的罪责被进一步确认之后再采取军事行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康拉德反复要求鸽派们“立即行动”（即无须等待更多的调查结果），但他也曾在6月30日上午告知贝希托尔德，总参谋部需要16天筹备针对塞尔维亚的打击行动——后来证实远不止需要这么几天。因此即便领导层同意立刻展开行动，也免不了被一拖再拖。

最后，最重要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会同意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峙吗？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的支持也已经形同虚设。绍帕里大使8周前才刚刚从圣彼得堡写信过来抱怨德国为了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利益而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各种信息从柏林接踵而来。7月1日，德国著名记者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将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阿列克·霍约斯（Alek Hogos）称为“内阁之首”，用以抨击他相信德国将乐于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开战并准

备好与俄国开战的可能的一厢情愿。瑙曼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但他与德国外交部政策司司长威廉·冯·施图姆（Wilhelm von Stumm）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话也带有一定分量。同时，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则催促奥比利人小心观察。每当奥地利人向他感叹采取强硬的措施是多么有必要的时候，契尔什基在6月30日写道："我就会劝诫他们要冷静地分析形势，不要冲动。"在一次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谈话中，德国外交副秘书阿瑟·齐默尔曼表示了他对维亚纳政府所处困境的同情，但同时也警示他们不要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提出"羞辱性的要求"。

德国皇帝的看法也值得关注。1913年秋冬之际，威廉二世就多次建议奥地利人通过礼尚往来建立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友好关系。而在他于1914年6月与弗朗茨·斐迪南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德皇则是含糊其辞。在被问及奥匈帝国"能否在未来继续依赖德国的力量"时，威廉二世"避重就轻地做出了回复，并且完全没有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在7月1日提交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蒂萨警告称德皇是"亲塞尔维亚"的，并且如果想让他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巴尔干政策，就需要给予德皇更有力的说服。在威廉二世即将来维也纳出席大公葬礼的时候，奥匈帝国的领导层本来希望两国的皇帝可以借此机会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但德皇的此次行动随即因为"塞尔维亚刺客组织还将对德皇展开刺杀行动"这一传言而被迫取消了，故而只能通过其他手段争取与德国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起码在一件事上贝希托尔德、蒂萨和其他奥匈帝国决策者们达成了共识：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开展之前，都必须先充分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负责监督对德国的外交动作，两份文件都被发往德国盟友处。第一份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虽由皇帝签名，但实际上是由贝希托尔德的首席顾问阿列克·霍约斯所起草的；第二份则是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备忘录，其中还包括暗杀事件后的一些内容。

如今这两份文件产生的效果让人震惊。备忘录传递出来的实际上与巴尔干协约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更强调罗马尼亚的潜在危害。法俄同盟的侵略性被夸大了，并被误导地称为不仅对奥匈帝国是威胁，对德国也是威胁。在文件的最后有这样一个附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上述备忘录刚刚被写完。"这份文件完全是为了宣扬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危险和紧迫性"，并指出此时对塞尔维亚采取怀柔政策毫无意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要挑起战争，但也暗示着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近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份文件还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结尾：奥匈帝国之鹰"现在必须亲手撕裂它的敌人们笼罩在它头上的罗网"。

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则更加开门见山，它也对罗马尼亚和俄国可能采取的动作做了暗示，但结尾处则明示了需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措施。文件中指出，刺杀行动绝非偶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牵涉贝尔格莱德政府"。只有当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中立力量"时，奥匈帝国才会安全。

你也将明白最近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进一步说明塞尔维亚与我们同床异梦，欧洲大国所倡导的和平实际上纵容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狂妄，让他们逍遥法外。

现今的读者们对这些文件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没有做到有理有据，也并没能以情动人，没有要求德国的援助，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协议，没有讲威胁为何最大化，也没有将巴尔干的局势阐述清楚，而只是将外交途径解决的关键放在了塞尔维亚上，而这就让读者明白了该文件的起草者心中是渴望战争的。

贝希托尔德最开始打算将这两份文件以政府定期快递送到柏林，但在7月4日的这个周六，他给驻柏林大使瑟杰尼发电报表示他的“内阁之首”霍约斯伯爵将亲手将两份文件送至柏林。瑟杰尼被要求安排一场与德皇以及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会见。霍约斯虽然只有36岁，但他已经是外交部中鹰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与柏林政府的关系也很好，1908年瑟杰尼大使就曾赞许他促成了与德国“亲密的且值得信赖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期间，霍约斯结识了阿瑟·齐默尔曼。在霍约斯看来，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是奥匈帝国安全保障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身为强硬派的霍约斯一开始就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争取蒂萨的支持时，他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派霍约斯执行前往柏林的任务，贝希托尔德确保了借助这两份文件将好战的思想有效地传达过去。毫无疑问，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也很重要。虽然表面上同意蒂萨所建议的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中断了传统的匈牙利决策进程，并保证政策方向朝着对萨拉热窝事件予以制裁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正如德国大使在7月3日向贝希托尔德尖锐地指出的，奥地利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天赋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影响政策的走向。

部队武装进程、政治纷争、萨拉热窝警方的调查、等待德国的支持，这些都拖延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日程，康拉德对此也束手无策。而随着危机的发酵，奥地利人开始越来越认为即便草草准备之下就对塞尔维亚发动武装突袭也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经历了如此的举国哀悼之后。在危机就这样愈演愈烈的时刻，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在7月4日曾质疑为何奥匈帝国不直接攻击塞尔维亚。“之后（你）将得到整个欧洲的同情。”危机将如何发展，人们争论不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自载着阿列克·霍约斯的火车在夜色中抵达柏林的那一刻，通向和平的那道大门就关闭了。

第八章 扩张的旋涡



别国的反应

6月28日周二的下午，德皇正在北海海岸准备在基尔帆船赛中驾着他的快艇一展身手。在发动机马达开始轰鸣的时候，帝国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在岸边告知了他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经过了快艇上的短暂会面，威廉二世必须立刻回到柏林去“掌控局势并确保欧洲的和平”。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也被发至正在隆尚马场与其他外交官观看比赛的雷蒙·普恩加莱总统手里。除了奥匈帝国大使塞琴（Szécsen）立即离开了，包括总统在内的其他外交官仍旧留下来观看下午的比赛。

上述这些小插曲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暗示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那场危机中各方势力的分布。据英国驻柏林大使表示，萨拉热窝事件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德皇不久前才刚刚在大公位于波西米亚的府邸会见了他，而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德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之后迎来的是对奥匈帝国老皇帝的同情。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感同身受，事件在无数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那样，当他在办公室看到报纸头条登出的这个消息时，他一度差点儿昏了过去。

在罗马尼亚同样充满悲痛的情绪，即便最近布加勒斯特政府与维也纳政府并不是非常亲密。罗马尼亚新闻界一致将斐迪南大公赞扬为“少数民族的保护者以及民族权益的支持者”。根据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特使发来的一份报道显示，罗马尼亚人一致认为弗朗茨·斐迪南有效地调和了马札尔精英阶级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政客”希望大公的努力可以打开罗马尼亚与维也纳政府的友谊之门。塞尔维亚驻布加勒斯特特使也表示，罗马尼亚对于刺客的反应表现出“这个事件给塞尔维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损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其他地方则是另一番景象。最鲜明的对比是塞尔维亚国内的反应，英国大使称之为在大众中“充斥着麻木的感觉而非哀悼”。而在邻国黑山，据奥匈帝国使领馆秘书洛塔尔·埃格·里特尔·冯·摩沃德（Lothar Egger Ritter von Möllwald）报告，虽然也有对于大公之死的哀悼情绪，但他们认为这都是奥地利人自作自受的恶果。在黑山境内临近奥匈帝国边境的小镇梅塔卡，节日用的旗子在7月2日依然飘扬着；根据奥地

利人的了解，那种旗子只应该在6月30日科索沃纪念日那天才挂出来，也就是说当地人是为了挑衅附近的奥匈帝国部队才有这种举动的。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则表示，弗朗茨·斐迪南的死让人“为之一振”。

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和对手，意大利面对大公夫妇死讯时则表现得百感交集。由于大公是马札尔人，身在奥匈帝国的意大利人都对他心怀愤恨。英国驻罗马大使伦内尔·罗德（Rennell Rodd）表示，即便官方表现出一片哀悼之情，但“人们实际上普遍对大公之死表现得幸灾乐祸”，奥匈帝国大使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外交官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俄国大使的报告，周日下午人们聚集在罗马的剧院里庆祝这一消息，欢呼雀跃并让乐团演奏国歌，之后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刺客的罪行令人发指，”桑·朱利亚诺对苏贝耶夫（Sverbeyev）大使这样说道，“但好在世界和平的现状不会因此受到更多撼动了。”而当塞尔维亚大使在罗马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一名意大利记者以“感谢塞尔维亚”总结了他的感想。

在法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所占的版面实际上还不如一些政治丑闻靠前。1914年3月16日，前总理约瑟夫·卡约的夫人走进《费加罗报》（*Figaro*）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的办公室，并朝他开了6枪。这场谋杀是因为在约瑟夫·卡约竞选期间，卡尔梅特在报纸上刊登了卡约在尚未与前妻离婚的情况下写给现任卡约夫人的情书。审判在7月20日公开进行，由于此案涉及性丑闻和在法国公众眼中的知名女性，媒体对此高度关注。7月29日，法国当地主流媒体以比萨拉热窝事件两倍之多的篇幅报道了卡约夫人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巴黎的很多记者也报道了萨拉热窝事件，而主要的态度是维也纳方面无权因此指责萨拉热窝政府参与此次刺杀阴谋，恰恰相反的是，法国媒体普遍指责维也纳媒体恶意煽动反塞尔维亚情绪。

相比之下，塞尔维亚驻伦敦大使在报告中表示，伦敦的媒体表现出“支持奥匈帝国舆论”的态度，并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指责塞尔维亚：“他们说这是塞尔维亚革命性的举动，而且与贝尔格莱德政府有关。这对塞尔维亚可不妙。”《泰晤士报》的一名高层于7月16日指出，奥匈帝国政府完全有权利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展开一切必要的调查，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也应该极力支持相关活动。

以上各国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反映出各国之间的亲疏离合，其中罗马尼亚算是个有趣的例子。由于大公一直以亲罗马尼亚的形象示人，他在舆论中也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但作为罗马尼亚新的大权在握者的卡罗尔国王，则持有亲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相信塞尔维亚政府将针对罪行开展有效的调查，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无权强求贝尔格莱德方面做任何事。

更加值得人们警惕的发展是此事逐渐成为战争的隐患，首先是有流言在大国外交事务当中兴起，将斐迪南大公视作奥匈帝国鹰派的领袖人物——这显然是子虚乌有。强调受害者的侵略性可以削弱奥匈帝国方面

的势力，同时也让塞尔维亚的行为看起来理所应当。之后出现了更加超前的假设，甚至没经过深度的调查，即塞尔维亚官方完全没有参与策划萨拉热窝事件。根据1914年7月13日塞尔维亚驻柏林大使的表述，俄国外交大臣当时告知俄国驻柏林大使“塞尔维亚政府并没有策划萨拉热窝事件”——即便当时奥匈帝国方面的调查已经表明并非如此。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圣彼得堡肯定地表示，即便奥匈帝国政府向俄国媒体提供了很多相关证据，圣彼得堡的媒体依然遵从俄国政府的口径，并将萨拉热窝事件称为“单纯的奥匈帝国外交事故”。

如果从俄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看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如何否定维也纳对刺杀案调查的权利，并通过这种假象描绘凶手的无辜，而其实际目的必然是另有所图的。根据舍别科（Shebeko）大使从维也纳发来的报告，这些年来弗朗茨·斐迪南只不过充当了皇帝的傀儡。由于奥匈帝国的“德意志血统”，才使得在刺杀案后产生了反塞尔维亚情绪。舍别科在7月1日报告称，特别是德国大使契尔什基尽可能地“利用这一让人伤心的事件”营造舆论抵制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情绪。

哈特维希从贝尔格莱德向圣彼得堡发去报告，称奥匈帝国所有的质疑都是毫无道理的：塞尔维亚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相反，那里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萨拉热窝事件所造成的悲痛情绪之中；那个所谓的谋划刺杀行动的贝尔格莱德恐怖组织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查布里诺维奇也并非是从克拉古耶瓦茨军械库拿到的炸弹和武器。这些声称奥匈帝国政府在假造证据的言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因为它再次唤起了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那些丑闻（参见第二章），也不仅因为它们完全是假的（这些当然是假的），更是因为这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实际上是想借此事件煽动情绪以实施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侵略行动。在这一阴谋的背后，据俄国的特使所称，实际上是德国人想借此向东进军，从而削弱法俄同盟。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周里，一系列协议在各国之间被订立下来，也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在俄国决策者眼中，奥匈帝国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方式与塞尔维亚敌对。在俄国看来，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义务对一位国民在外国所做的私人事情负责，尤其是当这位国民还是一个冲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时。在这里俄国没有特别指向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的那些可能参与刺杀行动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一个个体的行为就让整个民族饱受责难，是不对的。舍别科7月5日在维也纳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说道，奥匈帝国政府指责塞尔维亚“对大公之死幸灾乐祸”是“不公平”的。7月8日，萨佐诺夫和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临时代办奥托卡尔·切尔宁之间的一席谈话就足以看出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对于维也纳是多么的遏制。切尔宁提到奥匈帝国“有可能”“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相应的调查”。萨佐诺夫的回复则是警告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官，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将“给俄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奥地利人应该放弃他们现有的念头，“免得陷入危险的境地”。在6月18日与刚刚回维也纳参加完夫人葬礼回到圣彼得堡的绍帕里大使的一次谈话中，萨佐诺夫以更决绝的态度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将容忍此类阴

谋事件的产生。”

这一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俄国决定如何针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做出回应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俄国看来，这一切都是奥匈帝国蓄意制造的假象，并想以此对贝尔格莱德不利，毕竟在历史上塞尔维亚“小兄弟”的英勇抗争就被俄国所肯定。而既然俄国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冲突的对错与否已做出判断，其他大国的态度相比之下也不那么强硬而肯定了。法国政府已经全权委托圣彼得堡方面处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普恩加莱未经任何亲自调查就断定贝尔格莱德政府绝对与萨拉热窝事件无关。在1914年7月4日与奥匈帝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的一次颇有意思的谈话中，这位法国总统将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与1894年暗杀时任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相提并论。这看似是一个同病相怜的态度，实际上是暗示萨拉热窝作为一个非主权地区，没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罪责。为此奥匈帝国方面徒劳地回应总统，刺杀卡诺的凶手“与在意大利的任何反法组织都没有关系，而现在萨拉热窝的情况是这些刺客已经为颠覆君主制谋划多年”。



爱德华·格雷曾至少表现得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争上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而已，因为他认为英国不应支持由三国同盟或塞尔维亚这两者间任意一方所挑起的战争行为。而他也一直没有表明态度，同时，在萨拉热窝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并没有对俄国的言行予以反对。7月8日，俄国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告诉爱德华·格雷他“并不觉得针对塞尔维亚的反对行为有什么依据可循”，格雷对此的回答也是非常精明的：

> 我说过我不知道目前都有什么设想。我只能认为或许审讯中的一些发现指向了萨拉热窝事件中的炸弹是在贝尔格莱德生产的，而这被奥匈帝国政府用作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一个借口，但这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而已。
>
> 贝肯多夫伯爵说他希望德国遏制奥匈帝国的动作。但他也应该想想，德国并不希望争吵持续下去。

格雷对此没有做出（或记录下）更多的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德国的这种做法让“争吵”不在他们这里变得更加严重，也防止了大国之间因此直接兵戎相见。但持续的争论也随着维也纳发给格雷的电报而展开，这份电报描述了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与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俄国外交官表示他无法相信奥匈帝国会愚蠢到让自己“冲进战争的深渊”：

> 一切只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俄国必将保卫塞尔维亚。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如果不得不面对战争，那么意味着整个欧洲都将燃起战火。

10天之内，俄国就推出了一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局面分析图，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很明显。正如一名奥匈帝国外交官所指出的，一方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抗争着，另一方面反对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激怒了克罗地亚人，这些都不合情理。从俄国来看，塞尔维亚无非就是渴望和平的生活，并如同萨佐诺夫此前向帕希奇所保证的那样，很快将在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得到南斯拉夫的土地。斯帕拉伊科维奇的一份广泛传播的报告也刊登在圣彼得堡的媒体上，其中指出贝尔格莱德政府曾警告维也纳方面可能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而这也是被俄国所忽视的。首先，俄国在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行为也被忽略。另一个很明显在示意图中隐含的信息就是，俄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地下网络。就在“一战”结束后，驻扎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指挥官阿尔塔莫诺夫（Artamonol）上校承认他们在战前即已有密切联系。他甚至承认他给黑手社提供资金用以运作在波斯尼亚的阴

谋，即便他否认参与了刺杀大公的阴谋。

不管怎么说，可以确定的是，英国和法国都不打算质疑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上的态度。奥匈帝国在人们看来是想利用一个人的死去向他们和平的斯拉夫邻居挑衅，这让俄国的军事力量开始有可能参与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中，巴尔干局势也变得愈发紧张了。

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

在阿列克·霍约斯乘着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7月5日星期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前，当地就已经对奥匈帝国即将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的制裁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而关键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德皇。当威廉二世读到契尔什基在6月30日的报告中关于他正努力让奥匈帝国方面冷静下来的内容时，他也几近震怒了：

> 谁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这简直愚蠢透顶！这是奥地利人自己的事，跟他毫无关系。以后如果事情变得更坏了，就会变成：这也并非是德国的意愿！契尔什基能不能别再做这些无稽之举了！是时候一网打尽塞尔维亚人了。

而这一言论肯定也传到了契尔什基的耳朵里，因为就在7月3日，他向贝希托尔德确认了柏林政府将给予奥匈帝国外交方面的积极支持。因此霍约斯才在德国将给予支持这件事上有着十分的把握。他首先提出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进行短暂会晤，就他所携带的备忘录文件及奥匈帝国皇帝写给德皇的私人信件做一个接洽。之后瑟杰尼就带着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奔赴波茨坦面见德皇并共进午餐，同时霍约斯则与柏林政府外交办公室副秘书长阿瑟·齐默尔曼会面。

威廉二世与瑟杰尼大使在波茨坦皇宫花园最西边的新官会面了，这是一座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德皇一边听着瑟杰尼的介绍，一边浏览了一下两份文件，之后明确表示他已经“对于共同向塞尔维亚做出制裁有所准备”，但同时他必须考虑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的复杂局势”，因此他“在与首相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后德皇就离开了餐桌。瑟杰尼这样写道：

> 饭后，当我再次强调此次情况的严重性时，陛下让我告知我们的最高统帅（弗兰茨·约瑟夫），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依靠德国的全力支持。正如他所说，他必须听听首相的意见，但他认为贝特曼·霍尔维格不会有与他完全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在我们对塞尔维亚采取制裁方面。但是，在他（德皇威廉二世）看来，这一行动刻不容

缓。俄国不管在任何事务上都与我们持敌对的态度，但他对此已有多年的准备，而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将一如既往地站在我们一边。更不要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绝无开战的意图，而且必然会在任何武力行动之前做足考量。但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制裁的必要性，如果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他（德皇）不像我们一样采取行动，就一定会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

就在大使与德皇在波茨坦会面的同时，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位于柏林的外交办公室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由于还在度蜜月，未能出席此次会见。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德国将对奥匈帝国制裁塞尔维亚一事上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齐默尔曼看了两份文件，表示他无权提供代表官方的观点，而根据霍约斯后来的回忆，齐默尔曼在向大使表示德国将向奥匈帝国提供支援之前，又强调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将“有90%的可能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战争”。不管怎么说，齐默尔曼曾在7月4日于维也纳表现出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当天下午5点，一伙人在新宫举行会谈讨论当天的事件，并达成一致意见。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德皇、他的副官普勒森将军、国防大臣林克将军，以及战争部长法金汉，齐默尔曼和首相也出席了。普勒森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此次会谈的细节。德皇当众读出了弗兰茨·约瑟夫写给他的信，从中众人得出一致的观点：奥匈帝国已经“准备好向塞尔维亚开战”，而又想“先确认德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奥匈帝国越早向塞尔维亚开战越好，至于俄国，其虽然与塞尔维亚很亲近，但也不会掺和到这场战争当中”。

第二天，7月6日，霍尔维格与齐默尔曼会见了霍约斯伯爵和瑟杰尼大使，并正式告知德国将给予奥匈帝国支持（德皇威廉二世此时已离开柏林去观看每年在斯堪的纳维亚举行的快艇比赛）。霍尔维格先阐述了一些针对巴尔干地区的总体局势的看法：保加利亚应该加强与三国同盟的紧密关系，布加勒斯特应该减少其在特兰西瓦尼亚对罗马尼亚的支持，等等。之后他才转入拟议的军事行动话题：

在我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当中，（根据瑟杰尼后来的报告）他指出德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理顺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不管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相信德国作为我们的盟友和奥匈帝国王权的支持者，将站在我们一边。我在之后的谈话中总结出来，德皇和首相都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将成为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良好途径之一。从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他将当前的这个局势看得非常重要。

与其他内容相比，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显得少得可怜，瑟杰尼只用了54行文字表述了将针对塞尔维亚采取的具体措施，且其中并未提到俄

国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德国政府内部也达成了一致，德皇和首相（他也曾是外交大臣）达成一致，外交部副秘书长也与秘书长贾高的意见相同。国防大臣告知并建议德皇，德军已经对所有情况做好了准备。其结果就是德国给予的支持许诺变成了“空头支票”。

鉴于这种对于同盟关系的支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德国方面的以上形容并不为过。德皇和首相相信奥地利人完全有理由对塞尔维亚展开武力行动，且不必忧虑俄国方面的威慑。更大的麻烦是，德国人对奥匈帝国的信息领会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于做出了驱使奥匈帝国迈向战争的支持性行为。虽然弗兰茨·约瑟夫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但从字里行间中读者都能领悟到维也纳政府正在准备采取最激进的行动，不然人们还能怎么理解两国之间“冲突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而且只有在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一支争霸势力被消灭”才能解决问题等此类字眼？霍约斯伯爵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相信维也纳政府确实是这么考虑的，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期间，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行为；后来他向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表示，是他，而非大使，把瑟杰尼总结的霍尔维格的话做出那种解读的。

德国领导层如何评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可能带来的俄国威胁，以至于让德国卷入同盟之中并激怒法俄同盟，进而引发欧陆战争这种风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贝特曼和他们的军方参谋们将萨拉热窝事件视为与其他大国挑起冲突并从中为德国带来利益的机会。几年来，由于三国同盟逐渐失去军事上的优势，德国军方都在尽力避免战争，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在若要打一仗，还是有可能胜利的，但5年来的军事装备发展上的差距让协约国的获胜概率也增大了。

像这样的权衡在德国领导层中究竟又做了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关键决策者不相信俄国可能对此做出干预，同时也不想挑起俄国的参战。根据7月2日撒克逊驻柏林特使萨尔扎·利希特瑙（Salza Lichtenau）的报告，虽然某些高层军官强调“现在立刻开战”是非常可取的，俄国也毫无准备，但似乎德皇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之后由撒克逊军队代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与那些迫不及待想要开战的人相比，“德皇表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7月5日下午在波茨坦与威廉二世举行会谈的人都认为俄国虽然与塞尔维亚关系亲密，“但并不会加入这场战争”。因此，当法金汉在会上向德皇问及他是否希望针对大国之间的冲突“进行某种形式的准备”时，威廉二世表示了否定。德国没有进行军事准备，并维持这种姿态直到7月底，这一方面显示出德军对于已有的准备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德国领导层希望将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即便目前的备战情况非常冒险。

德皇自己也坚信冲突只会发生在巴尔干地区内。7月6日早上，在他离开柏林之前，他告诉海军将领阿德米拉尔·冯·卡佩勒（Admiral von Capelle），鉴于“沙皇不会与出现弑君行为的国家站在一起，并且俄国和法国都没做好准备”，“他相信不会出现更多军事问题了”。对其他军方

高层人士，他也是这样说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德皇一直以来都认为虽然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在推进，但距离冒险开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巴尔干危机之后的1913年10月底，他就曾劝慰瑟杰尼大使，“这一刻俄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威胁感，接下来6年里也完全不必为之感到畏惧”。

这种推论并不是反对战争，相反，这也同主战思想交织在一起。主战思想由两个独立分开的要素组成：首先是人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德国在欧洲军事上的能力已经减退；其次是德国看起来必须在为时不晚之前通过战争解决这一问题。德皇所考虑到的主要是第一点要素。毕竟鉴于德国本身的实力不及当年，俄国干涉进来的可能性更小了。如果与1914年相比，俄国在战争中胜利的可能性真的在这三年中远远超过了德国，那圣彼得堡又何必冒险在还未做万全准备的时候就挑起欧陆冲突呢？

基于这样的考量，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情况。第一种是，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不进行干预，放任其攻打塞尔维亚，或许会在之后召开外交发布会，向其他国家阐述其这样做的原因，而这也是霍尔维格等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第二种看起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俄国会质疑奥匈帝国，并不顾自身备战尚未完成的状况，参与到战争当中。正因为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的假设，让预防战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如果不管怎么说都要爆发战争，那倒不如现在立刻开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认为俄国不会干预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过度错误考量的原因并不难找。俄国在1913年10月接受的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引发了当时德国的种种想法，再有就是当时对俄国强权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柏林政府看来，萨拉热窝事件是对君主制的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种观点在一些英国媒体上也能看到）。而如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样，德皇认为沙皇不会“与谋反者”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当时我们必须记上一些关于俄国的意图问题。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法俄同盟所关注的问题，他们也难以想到，对俄国和法国来说，谁挑起战争并不重要。

此外，德国人也没能意识到科科夫佐夫离开俄国内阁之后在俄国国内产生的新的重大政治变化。在这一点上，不只是他们犯了糊涂，英国人也误以为科科夫佐夫为首的反战派已然占据上风。而在法国，谢尔盖·维特所领导的“亲德派”也受到侧目。从前的成见加上现在的种种谣传，让局势变得越发危险。与此同时，鉴于此前曾与伦敦政府合作处理巴尔干问题，德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即便自己与英国人之间在海上存在利益纷争，但在这件事上，英国会支持德国的理念，并对俄国施压。这种缓和风险无异于“温水煮青蛙”：德国的决策者们为此低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此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需要对风险的正确评估，但在当时的德国人那里正少了这一环。那就是，俄国将借此机会向中欧大国宣战，借奥匈帝国的力来发力，达到打破三国同盟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

看，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危机倒不像是战争，而是俄国建立其帝国的一步。而如果俄国也是渴望战争的（从其当时的一系列动作中，在德国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那么与其退缩逃避，倒不如面对俄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毕竟，如果德国选择逃避，那么就将面临输掉盟友、丧失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的局面。

因此，严格地说，这就不是一个以危险为中心的评估，而是面对俄国所带来的危机进行的一次应对。换句话说，如果俄国选择对德国发动欧陆战争，那么并不是因为德国，而是俄国为了重新平衡欧洲大国关系所采取的一个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并不是在冒险，而是在验证威胁。这也是霍尔维格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坚持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内容，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1914年春夏之交世界各国政客和媒体对此事的评论。1914年1月2日，巴黎《晨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名为“庞大的俄国”的文章，撰写该文的是总编辑斯特凡娜·洛桑（Stéphane Lauzanne），他刚刚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归来，透过他细腻的文笔，柏林的读者们形象地感受到了俄国对于战争的挑衅意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幅名为“俄国的备战情况”的图，在这张图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密密麻麻的部队被铁路线连起来。图的附注中表示这些是“俄国截至1913年12月31日的确切部队部署情况”，并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些武装力量对俄国和普鲁士边境地区产生的特别影响”。夸张地描述了俄国的军事力量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抵制俄国的贷款寻找的借口，但在德国读者眼中，这篇文章却起到了不同的警戒作用。这些原本源自官方的信息被错误地放大了，《晨报》代表的是普恩加莱的口舌，而洛桑也曾在其赴俄期间与萨佐诺夫以及俄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会面。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虚张声势的内容被写入报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看作总参谋部官方刊物的军事杂志也为与德国的战争表达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

> 不仅是部队，俄国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清楚，我们要为了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全副武装，即便为此我们将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德意志帝国也必须被消灭。

这种半官方的恐怖舆论一致持续到夏季。尤其令人不安的是6月13日《商业日报》（*Birzheviia Vedomosti*）上刊登的头条：“我们准备好了。法国也必须准备好了。”这篇文章也在法国和德国被广泛传播。而真正引起柏林政府领导层警惕的是来自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的（准确）建议，而他的灵感则完全来自俄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他描绘出一个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将面临庞大战争机器的情景：俄国军队人数很快将达到232万（相比之下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有约180万的兵力）；而借助目前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调兵也更加方便了。

苏霍姆利诺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吓唬德国人，而是想告诉法国俄国

已经尽了两国协约中应尽的义务，同时提醒法国人也做出一些应有的“表示”。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信息给德国人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忧。德皇更是写下了这样的随笔：“哈！俄国佬终于摊牌了！这时候如果还有德国人觉得俄国和高卢人并没有和我们开战的想法，那真算是脑子有毛病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也获知了来自苏霍姆利诺夫的信息。在6月16日写给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中，首相指出，俄国“军国主义党徒”的战争欲望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过。同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泛德意志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对俄国为侵略德国备战一事有所认同。而现在，“就连那些淡定的政客们”（在这里霍尔维格应该也把自己算在内）也“开始相信俄国对德国的侵略性了”。戈特利布·冯·贾高也认为，即便俄国现在似乎还没有准备开战，但很快它就将以其庞大的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以及战略铁路网等多方军事优势“淹没”德国。在1913年11月27日和1914年7月7日德军总参谋部报告中提供的针对俄国战略铁路设施的最新分析中，深入俄国腹地并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边境接壤的一些关键铁路线路用粗笔重点标示了出来。

1914年6月英俄海军的会谈让协约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入，也让德国的担忧进一步加剧。1914年5月，为了应对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压力，英国内阁决定加入与俄国的海军高层对话。尽管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但德国依然通过潜伏在俄国驻伦敦使馆的间谍本诺·冯·西伯特（Benno von Siebert）详尽了解了会谈的相关内容。柏林政府从中了解到，英国和俄国正在密谋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军舰将载着俄国的先遣部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这一消息引发了柏林政府的高度警戒。1913~1914年，俄国在海军方面的军费支出首次超过了德国，德方开始担心俄国更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与协约国之间的稳固关系将很快使德国陷于束手束脚的不利境地。爱德华·格雷给利赫诺夫斯基提供的闪烁其词的回复与西伯特所阐述的细节大相径庭，这让人不得不警惕英国的刻意隐瞒，让德国与英国间一度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毕竟在他过去制定政策时，一直认定即便英国与协约国之间有瓜葛，也绝不会支持一场由协约国发起的侵略德国的战争。

作为霍尔维格最亲密的顾问和知己，外交官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位首相当时是如何做出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决定的。在结束了与瑟杰尼和霍约斯于7月6日的会见之后，里茨勒陪同霍尔维格回到了位于霍恩芬诺的府邸。里茨勒回忆起当晚他与霍尔维格的一段对话：

> 夜色之下，谈话就发生在阳台上。他透露给我的那些秘密信息（德国间谍偷听到的关于英俄海军谈话的相关内容）令人无比震惊。他认为英俄海军关于波美拉尼亚合作行动一事非常严重，事关重大。一方面，俄国的军事实力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稳固德国在波兰的阵地已经于事无补。此外，奥匈帝国的实力也在逐步减弱。

随着对俄国方面的担忧，对于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的可靠性和长久性也受到了挑战。

> 首相谈到了一些重要决定：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凶手，塞尔维亚官员的涉入，奥匈帝国想要重整旗鼓，以及弗兰茨·约瑟夫的信件里提到的关于联军的战斗。
>
>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动作一直以来都让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我们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说是我们逼迫他们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反对他们，他们就会说我们视他们于困境而不顾，之后他们就将投入早已伸开双臂迎接他们的西边其他大国的怀抱，而我们也将失去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在7月7日与里茨勒的一次谈话中，霍尔维格更是表示，奥匈帝国不可能“作为我们的盟友参与任何一场因德国的原因而爆发的战争”。相比之下，一场源于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且事关奥匈帝国利益的“来自东部的战争”则将让维也纳政府倾其全力：“如果战火从东边烧来，随后我们加入战争，为奥匈帝国而战，而不是奥匈帝国为我们而战，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功的希望的。”德国的这种想法恰恰与法国领导层的想法如出一辙，即一场源于巴尔干的战争将让俄国全力加入欧洲大国对抗德国的战争之中。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不相信其盟友会在只涉及法国或德国利益的战争中全力以赴。

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

一个决策在参考了多方形势后被确定下来：奥地利人，或者说至少是贝希托尔德一派，力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但在其他各项事务上，维也纳政府内部却始终没能达成一致。直到霍约斯出发前往柏林时，还没有形成各方面的一致意见，例如，如果奥匈帝国在战争中胜利，该如何处置塞尔维亚等问题。当齐默尔曼询问关于奥匈帝国战后的打算时，霍约斯给予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回复，他宣称，塞尔维亚的领土将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瓜分。而实际上霍约斯并无权限向齐默尔曼阐述此类国策，同时期奥匈帝国的同僚们也绝无此意。在后来回忆自己为何会提出这种瓜分政策时，霍约斯表示，因为他当时怕德国会因为感觉到“我们（奥匈帝国）没有针对塞尔维亚设置具体的政策且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失去对奥匈帝国的信任；有着怎样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系重大的是让自己的盟友感觉到自己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胸有成竹的计划。蒂萨在得知霍约斯的言论后勃然大怒，因为相比维亚纳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匈牙利人更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对哈布斯堡家族带来的威慑。维也纳政府随后表示，并没有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意图。但霍约斯失态的言论已经显现出奥匈帝国在危机之下的政策有失考

量。

时机是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坚持认为，如果要对塞尔维亚采取反制行动，必须尽快进行，最好赶在人们对萨拉热窝事件的愤怒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字典中“雷厉风行”这个词并不多见，很明显，如果想要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在霍约斯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举行的部长级联合会议上，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高层决策者中还存在分歧。贝希托尔德表示，如果想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就必须首先解决塞尔维亚的问题。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奥匈帝国对于俄国发起的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抵抗运动也将丧失主动权。他的这一言论也是在刻意迎合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而蒂萨无动于衷，他回复贝希托尔德，他非常关注塞尔维亚媒体对此形势的报道以及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结果对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的影响，但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必须先向贝尔格莱德政府发出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其展示的要求也必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也并非不能完成的”。同时要对特兰西瓦尼亚增兵，防止罗马尼亚借机发动侵略。之后维亚纳政府必须寻求在巴尔干霸权的争端国之间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维也纳应该寻求与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用以制衡塞尔维亚的力量，同时“迫使罗马尼亚回到三国同盟”。

他的这种言论并非出乎意料的，将特兰西瓦尼亚放在头等位置是匈牙利一贯的政治理念。但蒂萨眼前的这些政府人士则更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拒绝奥匈帝国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相关条件。国防大臣克罗巴廷警告，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取得成功，会给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圣彼得堡政府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一个维也纳政府已经变得软弱的印象，因此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已经日趋衰弱。霍约斯的会议记录中也反映出这一紧迫的形势。所有人都认为“不管是通过军事还是和平手段”，首先要解决与塞尔维亚的争端。此外，大臣们接受了蒂萨的提议，即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依然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才施以军事打击。最后，除了匈牙利首相蒂萨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即便纯粹的外交手段能给予塞尔维亚“深重的羞辱”，依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后通牒必须规定得足够苛刻，以使得贝尔格莱德政府难以接受，“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军事手段了”。

午餐后，康拉德和海军参谋部代表卡尔·凯勒（Karl Kailer）参加了大臣们共同出席的军事行动会议。在国防大臣克罗巴廷的质疑之下，康拉德解释说，虽然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部署［被称作“B计划”，“B”代表“Balkan”（巴尔干）］需要大量部队前往南部，但与俄国的冲突也将迫使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向东北部转移。至于这种转移是否有必要，并且何时做出部署，尚需时日加以确认，但康拉德希望在行军之后的第5天能知道是否需要将俄国视为威胁，而这一迟疑甚至就可能冒着将加利西亚北部拱手让给俄国的危险。至于如何在这两场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战争

中转换，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与会的大臣们也并没有提出疑问。

这次会谈起着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会议结束的时候，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但依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迹象，不宣而战的做法遭到了否定。在决定中有着巨大发言权的蒂萨始终认为应当先通过外交手段对塞尔维亚进行鞭策。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也是因为他开始担忧如果塞尔维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对于立刻采取行动，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障碍。在哈布斯堡家族统辖的农村地区，正值收获时节，青壮年劳动力并不是那么愿意立刻放下手里赖以生存的农活走上战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匈帝国总参谋部针对农忙时节做出了调整，允许这些士兵抽时间回家打理农活，之后再回到部队参加夏季的军事演练活动。在7月6日，也就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康拉德就已经获悉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格拉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科夫、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因斯布鲁克和布达佩斯的部队因农忙而7月25日才能回归服役。

因此康拉德别无选择：他可以禁止再出现新的离队行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他如果召回各地的兵源，就必须面临干扰农作物收割、扰乱铁路网秩序并因为一系列大动静导致欧洲各国都知道奥匈帝国在策划一次突袭等弊端。而出乎意料的是，作为这一军队新政的创造者的康拉德并没有看到这一问题，而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就吩咐贝希托尔德，要像1904年日军突袭俄国舰队时那样不宣而战。

与此同时，维也纳方面也对下一步行动达成了一致。在7月14日召开的一次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将于7月19日周日逼迫内阁大臣检查并获得通过。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在7月23日才能见到这份最后通牒，这是为了防止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和他的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于7月20～23日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见到这份文件。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一致认为："如果这份最后通牒暴露在圣彼得堡，将被视为对大国的一种挑衅行为，进而增加俄国和法国对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外交方面，保密都是最重要的。康拉德于7月10日告诉贝希托尔德，绝不能让塞尔维亚得到任何风声，从而扰乱了奥匈帝国的进军计划。从奥匈帝国近期对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评估来看，一旦开战，塞尔维亚将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当1914年冬塞尔维亚军队打败奥匈帝国军队时，这一评估也被验证了。）保密行动的成功与否也能决定维也纳政府能否在其他欧洲大国没做出防备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因此刻意避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贝希托尔德也下令媒体禁止谈到关于塞尔维亚的内容。这步棋显然是有效的：在危机酝酿期间的几周里，关于塞尔维亚的消息并不再那样频繁见诸报端，这让舆论产生了片刻的镇静，而在此之下实际埋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在面对俄国的关系上，维也纳政府尽其所能地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摩擦，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绍帕里使出浑身解数与俄国外交部周旋，让他们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精心掩藏的政治意图却出乎意料地在柏林露出了马脚。7月11日，德国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告知德国驻罗马大使关于奥匈帝国的种种意图，弗洛托（Flotow）将这个消息又转达给了意大利外交大臣桑·朱利亚诺，同时将这一信息加密之后向意大利驻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的使领馆发了电报。奥匈帝国方面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维也纳和罗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破译了该电文，并立刻了解到意大利已得知奥匈帝国向德国寻求支援的计划，甚至已经将此计划告知了两个不太友好的国家——俄国和罗马尼亚将为此做出“威胁式的举动”。奥地利人也有理由相信，掌握着先进解码技术的俄国人也已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文，并知道了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事实上俄国并非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报才能知道这些，他们早已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相关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最后通牒的信息。7月16日，在与德国前任外交官（原驻罗马大使）吕措（Lützow）伯爵的谈话中，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得知了奥地利人正在起草一份“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极其不堪入目的条款”。令人吃惊的是，吕措是在维也纳与贝希托尔德和福尔加奇谈话的时候知道这些事的。舍别科将这一惊人的消息直接通过俄国外交部告知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对此的评论值得我们牢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别的国家提出要求，除非它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抵制奥匈帝国的态度。

奥匈帝国保密工作上的漏洞产生了两个巨大影响。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大约在7月20日前后，俄国和其大国盟友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奥匈帝国在策划什么。而通过7月17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克莱肯色普的报告，塞尔维亚对此也已经一清二楚。在圣彼得堡和贝尔格莱德，对这一情况的提前掌握有助于他们在最后通牒被真正呈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就采取相应的应对工作，也正如此，7月19日的圆桌会议上，帕希奇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接受这些任何其他独立主权国家都不会接受的要求。”除此之外，这也让法国领导人和其总理在7月20日到达圣彼得堡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对最后通牒有所准备。萨佐诺夫所声称的俄国和法国在7月23日得知关于最后通牒被呈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的消息之后无比震惊，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关于维也纳对其德国盟友的处理上。贝希托尔德指责德国人将他的秘密战略曝光了，为了不让漏洞进一步扩大，他干脆中断了与柏林政府的联络，这也使得德国甚至不如其他大国更了解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具体内容。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次危机的非常奇怪的处理方法还包括，直到7月22日晚才将最后通牒的副本发送给德国。而这更让其他大国认为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让危机进一步升级。

我们应该对奥匈帝国的决策过程再做一次分析。贝希托尔德虽然在很多鹰派眼中是软弱的，但他终归在6月28日控制了政治走向。但他只有通过艰巨的磨砺和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人们的共识。

或许奥匈帝国决策过程中最大的弊端是个人和团体的狭隘视野。奥地利人经常像井底之蛙一般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出兵和欧洲大陆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就此讨论过多次，但他们从没有真正客观审视过当时的情况，更没有评估过奥匈帝国与其他一个欧洲大国或多个欧洲大国爆发战争之后的具体后果。这其中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奥匈帝国对德国军力的巨大信任，他们相信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将很快击败俄国；奥匈帝国政界的组织架构也不利于一项决策在经过全面的考量之后得到确认。决策者们往往只关注当时舆论的走向而不是维也纳的实际国情。奥匈帝国决策的唯我主义也反映出地缘隔离政治的弊端。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从没有"对于欧洲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即使塞尔维亚大军侵略我们，俄国和法国的舆论也将永远认定我们是有罪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奥匈帝国政府始终觉得他们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理所应当的，就连蒂萨也在后来认同了贝尔格莱德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无所作为只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气数已尽。从另一方面来说，鹰派的举动将让奥匈帝国找回自信，就如同"我思故我在"。

总而言之，奥地利人在决策过程中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选择性决定"的过程，这充满了非客观之下的奉献，并且会受个人情绪的左右。这种决策因为其表面看起来遵从民意而具备一定的市场。但这也并不是说奥匈帝国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毕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在综合考量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尼古拉·哈特维希的离奇死亡

就在奥匈帝国酝酿其政策期间，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突然暴毙而亡。哈特维希长期以来一直受心绞痛的折磨，由于本身肥胖的体格和易怒的性格，加之工作压力带来的高血压，导致了这一结果。以往他每年都会到巴特瑙海姆修养，同时进行减肥。在他的下属巴西尔·斯坦德曼（Basil Strandmann）听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之后，立刻结束了他在威尼斯的假期，回到贝尔格莱德，恰巧发现哈特维希的健康状况欠佳。哈特维希告诉斯坦德曼，"鉴于秋天之前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已经提交了一份7月13日开始休假的申请。

而7月10日，就在距离他休假开始的三天前，哈特维希得知奥匈帝国的吉斯尔男爵刚刚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随即致电奥匈帝国使领馆，并安排了一次到访，想对此前的种种误会做一个释疑。7月3日，贝尔格莱德的媒体曾广泛报道称，俄国使领馆是城里唯一一个没有对大公之死

降半旗表示默哀的单位，意大利和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此外，还有知情人士称，就在大公遇刺的当晚，哈特维希还在自己的府邸举办了一场宴会，欢声笑语响彻周围的街道。因此，俄国公使也着急了，他不想让这些消息传到奥地利人的耳朵里。事实上，这次会见还是非常和谐的，吉斯尔耐心听取了哈特维希的解释，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他促膝长谈。

在谈过了自己欠佳的健康状况和假期计划之后，哈特维希将话题引入了重点——为塞尔维亚政府辩护。但就在他刚刚开口还没说出一句话时，大概晚上9点20分，他失去了知觉，从沙发上瘫软下来，手里的香烟甚至还燃着。随后哈特维希的马车接来了他的女儿柳德米拉（Ludmilla）和一名塞尔维亚当地的医生，哈特维希的私人医生也立刻赶到了，但无论什么方法，都无法再次唤醒他了。吉斯尔男爵的夫人想安慰哈特维希的女儿，但被决然地以“没心情听奥地利人说话”回绝了。柳德米拉·冯·哈特维希刚刚在晚上同塞尔维亚王储亚历山大会面，此时她在父亲死去的房间里焦急地四处查看，并问旁人此前是否有给他喝过什么水或吃过什么食物。吉斯尔表示，哈特维希只是抽了几根自带的俄国香烟。柳德米拉随即找到了残留的烟头，并自己收了起来。哈特维希之死引发了巨大的猜想，更有一家报纸将吉斯尔和他的妻子称为“当代波吉亚”——毒死自己不欢迎的客人。几天后吉斯尔自己也无意中听到理发店里两个客人之间的谈话：

> 奥匈帝国派来的大使都非常奇怪。一开始是个低能儿（指前任福尔加奇大使），现在倒好，来了个杀手。吉斯尔从维也纳带来了电椅，谁坐上去都会立即死亡，并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幸运的是，这两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认出邻座的吉斯尔。在哈特维希家人和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要求下，萨佐诺夫同意破例将哈特维希安葬在塞尔维亚。葬礼当天，前来哀悼的市民夹道相送，足以见得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巨大影响力。不管怎么说，从哈特维希在巴尔干地区造成的影响来看，这位俄国公使在吉斯尔的沙发上昏死一刻之前，已经充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法国公使德斯克斯的话来说，在哈特维希“不屈的意志”已经成功“影响了塞尔维亚意识形态，并让欧洲的塞尔维亚问题进一步升级”的情势之下，他死去了。

第九章 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德罗宾伯爵换了火车

1914年7月6日，26岁的法国外交官路易·德罗宾（Louis de Robien）离开法国前往圣彼得堡，就任法国大使馆参赞一职。为了在当地就普恩加莱总统即将于7月20日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筹备工作，他提前出发了。为了争取时间，德罗宾没有搭乘并非每天都发车的北方快车，而是乘坐一趟普通的卧铺长途车前往科隆赶快轨，路上也有机会在路过鲁尔工业区时一睹莱茵河畔那座哥特式大教堂“永远令人印象深刻且美丽异常”的芳容。火车从那里取道东边，直到抵达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维尔巴伦。在这里，德罗宾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德国车厢，换乘其他列车，因为俄国和欧洲的普通铁轨是不一样的。他与边界之外的人的第一次接触令人印象深刻：火车一停，一群穿着大靴子的“大胡子部落成员”就闯进车厢拿走了他的行李。德罗宾和其他乘客还经过一个旁边站满了“持巨大军刀的士兵”的检查站，在这里，他们的护照被逐一检查，这一过程让德罗宾颇为震惊，因为“在那个自由无阻的年代，人们只有去俄国旅行时才需要携带护照”。在提交了他的旅行相关文件后，德罗宾被安排在一间装潢颇为奇怪的大等候室里。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列车再次出发，穿过一片“带着可怕的悲伤感”的乡村，村中最显眼的是一些洋葱状尖顶的教堂。他曾尝试与一些看起来像是工程师的人交流，但这些人只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感觉，”他这样回忆道，“我们好像是在中国一样。”

他抵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他将度过战争年代并见证两次革命带来的灾难般的后果）并没能消减自己的陌生感，相反，这几乎算是“加剧了我们的失望”。这座俄国的首都处处是“可怕的小马车、又长又破的街道和长得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大胡子车夫”。他最初下榻在法国大酒店，那里的房间虽大，但家具丑陋破旧，“与我们在欧洲所习惯的全然不同”，所以后来他决定退订房间，并改为住进位于“著名的内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上的欧洲大酒店。但即便是欧洲大酒店，也并不是那么“欧洲”，河岸两遍的店铺都非常让人失望。这位来自巴黎的贵族写道：即便是里面最好的店，也只能跟法国的乡镇店铺相比。

想融入当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路人几乎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这让德罗宾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巴黎时他的同事都肯定地告诉他，当地人人都会法语。当地的饮食也让这名挑剔的伯爵感到不堪忍受：在他的报

告中，他记录称俄国的食物都非常糟糕，尤其是鱼汤，简直是“令人深恶痛绝”，只有罗宋汤是“值得保留在菜单里的菜品”。至于“他们的伏特加”，则太容易让人醉了，“完全不能与我们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慢慢品味的红酒相提并论”。

在对城市有了一个大体的熟悉之后，德罗宾开始着手他的工作。法国大使馆坐落在美丽的涅瓦河畔，是在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府邸旧址上扩建的，这一点起码还能让人感到些许的欣慰，令德罗宾最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使馆驻守部队那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和短款马裤。大使办公室位于一层，正对着河岸，办公室里挂有范德尔·莫伊伦（Van der Meulen）的画作。隔壁是一间放着电话的小房间，使馆的工作人员每次都齐聚于此喝下午茶。再隔壁是法律顾问M·杜尔塞（M. Doulcet）的办公室，这里挂满了历任法国驻俄国司法人员的画像。在使馆的后部，在堆着各种文件的后面是使馆的保险库，这里存放的是机密文件和密码函。而使馆里装饰得最奢华的地方，还要数一楼的接待处了。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大使自1月起就到任了，并将工作三年，德罗宾也认识他，从1914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使中等身材，头发整齐地打理过，且“深邃的眼眶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外交官”。他任何时候都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审视事物。“每当他看到什么事情或遇到一个事件，他会凭想象再次塑造它们的特征，让这些事物变得更为理想化，而非真实。”帕莱奥洛格还特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自豪，他曾（特别）强调这有可能是从拜占庭时期的一个皇帝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同时他也认为他骨子里就带着细腻的文艺和思想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的政治难民，他的母亲是一个比利时音乐家）。

由于此前从未任职过这么高阶的职务，帕莱奥洛格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德罗宾注意到，这位大使以自己的习惯充分诠释了一个“更小的”国家的形象：每当秘书宣布比利时特使或荷兰大使来访时，帕莱奥洛格都会从后门出去先溜达一会儿，之后才回到接待室，一边张开双臂迎上去，一边说“有失远迎，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即便在面对高级外交官的场合，他也竭尽所能地显示自己奢华的排场。就连使馆晚宴所准备的食材都是帕莱奥洛格从巴黎带来的，这在圣彼得堡前所未见。而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的“东方”血统造就了这样的他，同很多暴发户一样，他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俄国任职期间，帕莱奥洛格总喜欢以自己的叙述替代外交活动中客观的报道。德罗宾回忆起大使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被沙皇召见前去洽谈关于重要的军事工作方面的事宜。帕莱奥洛格希望相关报道在他回到使馆的时候就发出去，这样消息就能在“起到最大影响的时候”到达巴黎。为了实现这一效果，他提前结束了使馆的会议，前往沙皇那里，德罗宾和他的同事则随便编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会议记录。在这些虚假的报道里，德罗宾回忆起一个最能代表帕莱奥洛格风格的句子：“会见的谈话内容进入了转折点，而皇帝在此时递给我一支香烟。”

德罗宾对于这位大使的评价虽然并不甚好，但或许是客观的。帕莱奥洛格是法国外交界最“传奇”的官员之一。起初他年复一年地在巴黎进行枯燥的基础工作，后来被调去管理秘密档案，其中主要包括关于法俄同盟和军队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对此他干得乐此不疲。常年的工作让他对军事方面的内容深有了解，例如关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等方面。他的笔记中展现出以一个伟人的姿态对历史性决策所做出的那些浪漫的描述：

> （在他所写的卡武尔伯爵传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智者往往留下很多机会，并避免自己超越理智，每每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像是一种天赋。这不是谁教给他们的，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让他们这样做。

帕莱奥洛格对德国的厌恶之感充斥着夸张的情绪，这也被他的很多同事认为是危险的信号。在他前往圣彼得堡任职之前，曾于1907~1912年在索非亚工作，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指出，帕莱奥洛格的报告和谈话中充满了诸如“地平线、云彩和狂风暴雨”等狂野的意向。实际上后来也很难找到任何关于他的正面评论了。一位高级外交官也在1914年5月注意到，关于这个新大使，有太多的负面报道。伊兹沃尔斯基将他评价为“故事制造者，一个狡猾的幻想家”。帕莱奥洛格过去在索非亚认识的同事甚至也于1912年谈到他的时候将他形容为“偏执”、“传播谣言”的人。

而帕莱奥洛格被委派至驻圣彼得堡大使这样一个对法国外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的位置上，也就值得关注。他是通过拉拢普遍的政治群体，而非通过特别的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德尔卡塞发现了帕莱奥洛格并大力提拔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德尔卡塞从帕莱奥洛格那里找到了共鸣。帕莱奥洛格的仕途随着德尔卡塞在1905年的下台也走入低谷。而普恩加莱拯救了他，他们二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好友。德罗宾曾不客气地评价道，帕莱奥洛格中学时代作为普恩加莱和米勒兰的同窗，真的是他“巨大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事业，完全是因为这些朋友人脉从中疏通的缘故”。普恩加莱任总理期间，于1912年将帕莱奥洛格从索非亚召回，并将其升迁至外交部负责全权工作。这样一个缺少资历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突然得到如此的待遇，让很多老资格的大使颇为震惊。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帕莱奥洛格“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法国驻日本大使也将这形容为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外交界，这些评价已经非常严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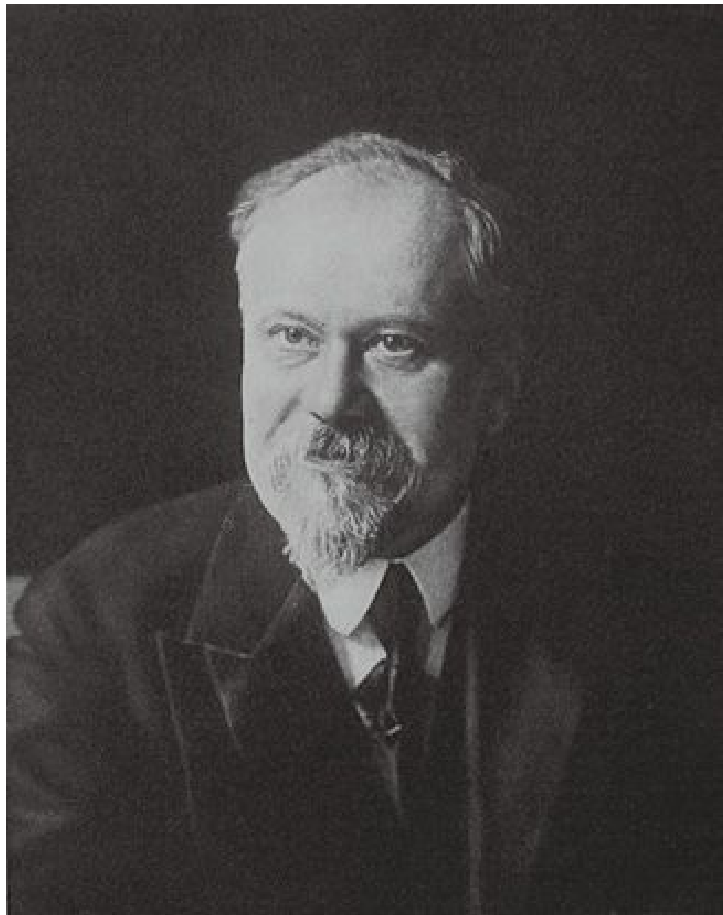
普恩加莱其实也深知帕莱奥洛格的声誉和所作所为，但由于他们二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都出奇的一致，他也不忍制止帕莱奥洛格的过激行为，甚至变成听取其建议。事实上，正是帕莱奥洛格让普恩加莱在巴尔干地区也掺一脚。帕莱奥洛格不相信奥匈帝国和俄国能就地区利益问题达成和解，而他个人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憎恶也让其对俄国的居心叵

测视而不见。他将两次巴尔干战争视为俄国为了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而发起的。出于与普恩加莱的亲密关系，萨佐诺夫也对帕莱奥洛格就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事没有表示异议。德尔卡塞离任之后，帕莱奥洛格于1914年1月接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职。在出发前往俄国就职之前，帕莱奥洛格曾向一位恰巧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官表示，他将结束法国一直以来对外软弱的政策，并且“他将为建立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而不懈奋斗”。“这一切已经持续得够久了，现在我们应该让德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位新大使就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态度走马上任了。

普恩加莱乘船前往俄国

7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30分，总统专列离开巴黎北站，前往敦刻尔克。车上坐着的有雷蒙·普恩加莱、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和外交部新任长官皮埃尔·德马尔热里（Pierre De Margerie）。第二天一早，三人又搭乘法国号战舰穿过波罗的海前往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维维亚尼出任总理只有死咒，还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对于普恩加莱来说，他的主要作用在于协助相关法令的制定，并维护自己的防守策略。随着对俄访问的展开，他的水平也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则是在51岁时被普恩加莱亲自提拔的。普恩加莱将德马尔热里视作看门狗，让他注意帕莱奥洛格的一举一动，监督其可能做出的出格举动。而这在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帕莱奥洛格深得普恩加莱的赏识，于是在其升迁到圣彼得堡后，德马尔热里接替了他原有的职位。在这个新职位上，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忠诚，后面一点是尤其被所有最高领导者所看重的。而维维亚尼和德马尔热里在政治上终归还是难有作为。

普恩加莱在7月16日早上5点登陆法国的敦刻尔克时，思绪万千。首先是关于查尔斯·安贝尔（Charles Humbert）对法国军方管理层震惊四座的控诉。7月13日，在参议院的一次递交军需用品特殊预算选举报告的演讲中，作为默兹河议员（该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界），安贝尔对法国军方管理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法国的要塞质量低下，工事配备的枪支缺少弹药，要塞与要塞间的无线通信装备常常出现差池。他说，但凡德国在梅斯的无线装置处于传输中，凡尔登的接收站就会出故障。法国的大炮数量大大逊色于德国，尤其是重型机枪。有一个细节最能够吸引法国民众，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母亲们的注意力，即军队急需供应靴子；安贝尔称，一旦开战，法国士兵只能带一双靴子上战场，顶多再在他们的军用背包里带上一只存放了30年之久的旧靴子。这场演讲触动了政治神经。在陆军大臣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的回应中他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的内容，但坚持认为所有的前线情况都在迅速地改善。到1917年，大炮的不足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雷蒙·普恩加莱



勒内·维维亚尼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样一个现实：身处议会风波的风口浪尖上的人正是普恩加莱的宿敌乔治·克里孟梭，他声称报道中揭露的现象说明应当对新的军事财政政策加以阻止。只有解决问题，并及时通过新的军事预算，才能够避免推迟总统的离任。在他们赶往敦刻尔克的那天，维维亚尼似乎有些紧张，满脑子都是阴谋论的阴影——尽管普恩加莱竭尽全力地安慰他。

如果这些还不够，对卡约夫人的审讯工作将于7月20日开展；我们有理由担心法庭上的检举和曝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丑闻，这些丑闻足以撼动政府的安全。当谣言四起时，丑闻的规模便开始膨胀：人们传言被杀害的报刊编辑卡尔梅特掌握了线索，破译了德国人的电报，电报中清楚地揭露了卡约与德国方面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的谈判事宜。在沟通中，至少根据电报内容是如此的，卡约向柏林方面提及了双方结好的希求。同时，卡约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普恩加莱已经在进行精心策划，以针对他本人。7月11日，就在总统离开俄国之后的第三天，卡约威胁道，如果普恩加莱不释放他的夫人，那么他就将一切公之于

众。巴黎政治阴谋的隐秘机制仍然开足马力地运行着。尽管有这些顾虑，普恩加莱还是以出奇的冷静和果断的神态踏上了横跨波罗的海的旅程。这必定是在非常时刻逃离巴黎进行喘息的机会——对卡约的审判已经逐渐引发了媒体的狂乱。前三天他几乎都在甲板上度过，并给维维亚尼写信，告知在圣彼得堡的任务；后者对外交政策的冷漠态度曾让他觉得“十分惊讶”。他对这些事物的总结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普恩加莱在离开巴黎时的所思所想，包括“联盟问题的细节”、对“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的回顾、“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军事条款”、俄国在海军条约上与英国的处理方法以及“和德国的关系的处理”。普恩加莱宣称：“我从未在德国的问题上犯难，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

“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包括加强战略性铁路的建设、波兰地区进行大规模防御性攻击的重要性，以及将德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必要性。提到英国的内容暗示了普恩加莱不仅考虑了与俄国的联盟，而且高瞻远瞩，酝酿着三国协约的雏形。如若将普恩加莱的信念一言以蔽之，即联盟是我们的牢固基础、是我们的军事防御力量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它的维系只能通过在敌对势力的需求面前不妥协来达成。这是表达他对于巴尔干危机的认识的基本公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判断，普恩加莱在海上的数日感到格外轻松。当维维亚尼因为巴黎丑闻以及从巴黎发出的无线电报所揭示出的密谋片段而感到焦虑不安时，普恩加莱却在甲板上享受着温暖的气候，在“细浪”冲刷着的湛蓝海面上与阳光嬉戏。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困扰他：在7月20日靠近法属喀琅施塔得港时，船只以15节的速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进，却撞上了一艘牵拉着护卫舰驶向泊港的俄国拖船。这起事故惊醒了船舱里的普恩加莱。接海军舰队的指令在公海上行驶的一艘法国战舰竟然撞上并损毁了盟国的拖船，这是何等令人懊恼的事情。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是一个“缺乏技巧和庄重的姿态”。在船只驶入喀琅施塔得港后，总统的情绪因人们的热情而缓解。海军船只、装点得如同过节一样的邮船以及欢快的小渔船从四面八方倾巢驶出，欢迎来客和被拉到一边的皇家汽艇——该艇用来将普恩加莱运送到沙皇的“亚历山德拉”号游艇上。普恩加莱记录道：“带着时常困扰我的情绪，我离开了法国，在加农炮的聒噪中，我离开了我们的一艘战舰。”在对面的亚历山德拉桥上（在该桥上能够饱览周围所有的景色），沙皇身边的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或许已经在脑海中为他的回忆录打好了腹稿：

> 场景是何等的蔚为壮观。在晃动的银白闪光中，法国人缓缓地乘着青绿和翡翠色的浪头朝我们驶来，船身后面泛起了一道长长的白色皱波。然后船优雅庄重地停住了。载着法国最高领导人的雄伟战舰名副其实。法国人终于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小鹿撞胸。

之后三天进行的峰会备忘录全数丢失。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外交档案》（*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的编辑们进行了搜寻工作，却徒劳无功。或许人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俄国在会上的记录也丢失了；在战争和内战的年代，档案工作出现了中断。然而，通过阅读普恩加莱日记里的描述、帕莱奥洛格的回忆录以及外交官在关键的日子保留下来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基本清晰的了解。

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中欧地区日益升级的危机状况。作为一次早有计划的国事访问，这一内容应当作为主要议题，同时也必须着重讨论关于塞尔维亚的问题。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就在普恩加莱还没从“法国”号军舰上走下来的时候，沙皇就已经向帕莱奥洛格大使表示了自己对此次会议的强烈期待：“我们将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将在各项事务上达成共识……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与英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让英国加入我们的同盟。”

在相关手续完成之后，沙皇和他的法国客人就来到“亚历山德拉”号的船舱里开始对话。“或者我应该将之称为讨论，”帕莱奥洛格这样写道，“很明显，他们在像谈生意一样互相交换问题并争论着。”在他看来，普恩加莱主导着此次会谈，很快就只有他“侃侃而谈，而沙皇只是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现出他由衷的赞同”。根据普恩加莱的日记记载，在游艇上的此次谈话首先涉及的便是同盟关系问题，对此沙皇表现得“尤为强硬”。沙皇询问他关于安贝尔丑闻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给俄国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并敦促普恩加莱尽一切可能阻止《三年法案》的失效。普恩加莱对此做出了回应，向对方保证，新的法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继续保留法律表现出其真正的决心，且维维亚尼也会对此予以坚定的支持。之后沙皇又谈到关于谢尔盖·维特和约瑟夫·卡约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事关俄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对于地缘政治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总之，尽管之后他们并没有搭乘同一艘舰艇回到岸上，但普恩加莱和沙皇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盟的团结性，这不仅意味着外交方面的支持，更有军事行动方面的内容。次日（7月21日），沙皇前往普恩加莱下榻的夏宫府邸看望他，二人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这次，会谈首次集中在关于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紧张关系上。普恩加莱做出调解的姿态，表示这些小矛盾不应影响英俄关系的友好发展。两人也均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伦敦政府或圣彼得堡政府，而在于一些含糊不清的“地区利益”。沙皇带着些许轻松的情绪称，爱德华·格雷没有允许柏林因为觉察到海军谈判而破坏协议的达成。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也被涉及，即阿尔巴尼亚问题、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地区的争端以及意大利的有关政策，但根据普恩加莱的笔记，沙皇的“心头之患”还要数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的动向。在普恩加莱看来，沙皇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一次

次跟我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法俄之间完整的同盟关系对他来说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后不久沙皇就离开了。

可见这次谈话的主题再次锁定在面对奥匈帝国的挑衅行为，法俄同盟所应表现的无可动摇的团结。但在实际行动中，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法俄同盟将在必要的时刻发动一场欧洲大陆范围的战争？在当天（7月21日）下午，普恩加莱在与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一同接见多名大使的时候，用加密的信息回答了这一问题。大使中排在第二个的就是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绍帕里，他刚处理完夫人的丧事从维也纳归来。在对斐迪南大公遇刺表示了几句慰问之后，普恩加莱向他询问塞尔维亚方面是否有新的消息。“相关的司法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绍帕里回答道。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普恩加莱是这样回应的：

> 我当然对此非常关注。我记得近期的两个事件也并没能促进你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你不记得了吗？弗里德永事件和普罗哈斯卡事件？

一个国家元首在他国期间所做出如此表态，在此前并不多见。且不说其中的讥讽意味，这实际上是提前否认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的权威性。这表明法国没有也不会承认塞尔维亚政府将对萨拉热窝事件负任何责任，同时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任何要求都将是非法的。弗里德永和普罗哈斯卡事件完全只是法国为了让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反对变得更加合理的借口。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普恩加莱进而做出了如下举动：

> 我以强硬的态度提醒奥匈帝国大使，塞尔维亚在欧洲的朋友们不会让其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

帕莱奥洛格还记录了下了一些普恩加莱的言论：

> 塞尔维亚跟俄国人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俄国和法国是同盟。这里面的复杂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劝君不可轻举妄动！

绍帕里也向奥匈帝国领导人汇报了这些关于奥匈帝国的行动将导致“危害和平局势”的言论。不论萨佐诺夫具体说了什么，产生的效果也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不仅是对绍帕里来说，就连作为其同盟的德罗宾也在笔记中表示：“并没表现出俄国对奥匈帝国众所周知的反感。”在会见的最后，绍帕里记录道（他的判断一向非常准确）法国总统作为一名“处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官员”，其“过激的言论”与“萨佐诺夫先生尚且克制

的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切都表明，普恩加莱的圣彼得堡之行对目前的事件“只会引发更激烈的争端”。

绍帕里在将萨佐诺夫和普恩加莱的言辞加以对比之后，发现了法俄关系当中某些貌合神离的方面。在当晚于使馆举行的晚宴上，普恩加莱坐在萨佐诺夫旁边。在闷热的房间里（房间的通风很差），他们讨论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局势。令普恩加莱颇感失望的是，萨佐诺夫显得心事重重，并没有给出什么确定的观点。“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利，”萨佐诺夫说道，“我们国内的农民都还在忙于农活。”与此同时，在其他客人所在的隔壁的小厅里则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情绪氛围。在这里，普恩加莱的一名随行上校则听到了“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必胜”等诸如此类的祝酒词。萨佐诺夫优柔寡断的态度让普恩加莱感到不安。“我们必须，”他叮嘱帕莱奥洛格，“向萨佐诺夫警告关于奥匈帝国的邪恶意图，并激励他保持强硬的态度、履行对我们所做出的支持承诺。”当天晚上，普恩加莱与维维亚尼以及刚刚从巴黎回来的伊兹沃尔斯基一起在沙皇的游艇上见了面。维维亚尼表现得“非常悲伤”。游艇沿着河岸静静地行驶着，普恩加莱仰望着夜空并思考着：“奥匈帝国到底在针对我们策划着什么？”

第二天，7月22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维维亚尼几近崩溃，尤其到了下午更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坐在沙皇左侧的法国总理对于俄国提出的问题哑口无言。午后，他的行为变得愈加古怪起来。当沙皇和普恩加莱坐在一起欣赏军乐演奏时，维维亚尼却独自在附近自言自语，甚至一度嘀咕咒骂的词语，似乎是在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帕莱奥洛格也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普恩加莱的日记里对此也略有记录：“维维亚尼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天的晚饭还是非常完美的。”事后，维维亚尼被诊断出有“肝脏方面的严重问题”并需要尽早退休。

我们尚不可知到底是什么让这名总理当时陷入如此糟糕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有历史学家指出他之所以精神崩溃，是由法国国内的危机事件导致的。但作为鸽派来说，维维亚尼似乎更像是被当时法俄双方在会谈期间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刺激到了。德罗宾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在德罗宾的记录里他谈到，7月22日双方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内容其实完全是关于战争方面的，“人们能感觉到，气氛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发生了转变”。有“法国”号的船员开玩笑称可能在回国的路上就遭到攻击，但这显然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了。7月23日，事态发展到了最高潮，这也是普恩加莱此行在俄国停留的最后一天，这位法国元首在俄国人特别为其准备的法语进行曲中检阅了7万人的俄国军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检阅的军队所穿的并非传统的礼仪用军装，而是平时训练时的卡其色军装，德罗宾将这视为渴望战争的另一种表现。

7月22日晚，身为俄国帝国卫队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evich）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风景如画的豪华宫殿里设宴款待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这让他们仿佛感受到了同盟关系最为亲

密的时刻。在晚宴上迎接两位法国客人的是尼古拉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和妹妹米丽提娅，这两姐妹是黑山国王尼古拉的女儿。“你意识到了吗，”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时刻！”

>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父王的加密电文，他说我们在月底之前将面临一场战争……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看看这个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盒子，这里面装着来自洛林的泥土，这是两年前我和我丈夫一起从法国边境带回来的。你看那边的桌子上摆的都是洛林奶蓟草，我不想养其他的花，这些荆棘是我特意将种子带回来种植的……米丽提娅，继续跟咱们的大使讲讲，讲讲今天的这一切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得去迎接沙皇了……”

在当天晚上于“法国”号上举行晚宴时，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就对媒体公布怎样的政策决议产生了很大分歧，最后帕莱奥洛格就塞尔维亚问题写下了这样的话：

米丽提娅的话并不是象征性的。在一封1912年11月来自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军事随员的信中，拉吉什（Laguiche）将军证实，1912年夏，公爵夫人在她的丈夫参加法国南锡附近的演习时，曾派了一个人跨越边境，来到德国控制下的洛林地区，并命令该人带回了一朵蓟草花和些许土壤。她将蓟草花带回了俄国，悉心培育它发芽，然后把种子种到洛林的泥土里，浇水灌溉直到新的花朵长出来。之后，她将洛林的土壤和俄国的土壤混合起来，象征法国和俄国组成联盟，并将其转交给园丁继续培育，还警告他如果花死掉的话，他将被赶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她采摘了后来在1914年7月向普恩加莱展示的花卉样本。这种过度热情的姿态的确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且是沙皇隔代的大表兄）就是那些在向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以塞尔维亚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奥匈帝国逼迫贝尔格莱德接受“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的人之一。

当阿纳斯塔西娅在晚宴时招待她的邻居并预言“‘那里’将要发生战争……奥匈帝国将荡然无存……你们将重新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和我们的敌人在柏林见吧……德国将遭到毁灭云云”时，餐厅里一直播放着黑山狂想曲。普恩加莱也目睹了夫人们的行动。他在一场舞会的幕间休息时刻坐在萨佐诺夫旁边，这时阿纳斯塔西娅和米丽提娅走了过来，开始责备这位外交大臣在支持塞尔维亚的问题上缺乏激情。这位外交大臣的软弱举止让人浮想联翩，但普恩加莱还是十分满足地写道：“沙皇这边虽然没有两位公爵夫人那般热情，但似乎在保卫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上比萨佐诺夫坚定得多”。

这种不和谐并没有妨碍双方盟友在行动方针上达成一致。在7月23日晚6点，法国人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维维亚尼似乎从他的肝病中恢复了一些，并与萨佐诺夫在发往俄国和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指示上达成共

识。这一友好的合作行动方针旨在对奥匈帝国采取温和的行动，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奥匈帝国不会损害塞尔维亚的荣誉和独立。诚然，这些言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提前打破这样的印象：双方早就知道奥匈帝国的问题会出现。乔治·布坎南同意他的政府也发出类似的信息。

> 法俄两国政府此次在维护欧洲的和平局势，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平衡方面，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维维亚尼对此表示不满，他说：“我认为这涉及太多关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了。”他之后做了如下修改：

> 共和国总统造访俄国沙皇的举动，给予双方之间友好且相互结盟的政府一个良机，使双方意识到，他们在关乎和平的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且欧洲各国势力的平衡在于诸国的努力，尤其是巴尔干国家。

这是一篇言辞非常委婉的公报，但依然被自由派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媒体加以扭曲报道，成为推动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催化剂。

普恩加莱对于这顿晚宴不是非常满意。他在笔记中写道，午后就开始下起大雨，厨师并没有对此做出充足的准备，菜都上迟了，而且“没人觉得菜做得好吃”。但对于本次出访，他总体上还是满意的。他此行就是希望俄国能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显然对方也很认同。这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当奥匈帝国政府表现出任何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时所应做出的。他已经到处宣扬要摆出强硬姿态的理念，他的言辞被有意的人听到了。这里所说的强硬是针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采取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反抗。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恩加莱或是他的俄国对话者或多或少地考虑过奥匈帝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行事。人们已经不需要即兴创作或新的政策声明——普恩加莱只是坚持他自1912年夏所做的计划。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与他周围的人不同，在造访期间明显地保持冷静。这是许多法俄对话中设想的巴尔干局面。如果俄国同样保持强硬态度，那么事情就会按照政策预期进行。普恩加莱将此称为和平政策，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德国和奥匈帝国会在如此坚定不移的团结中一败涂地。但是如果其他一切都落空，那么强大的俄国以及作为军事、海上、商业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将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德罗宾作为一个全程的近距离的见证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觉得普恩加莱已经剥夺了维维亚尼的权利。正如总统和外交大臣，他也是身负职权的公务员，向尼古拉二世施压，使其做出保证和承诺。就在他们离开前，普恩加莱还再次提醒沙皇：“这一次，我们必须保持强

硬。”

> （据德罗宾回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自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被发到了贝尔格莱德政府手中。看来我们的对手也决定“保持强硬”。双方都觉得用虚张声势的手段就能让对方认输。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要做得太过火。悲哀的博弈开始了。

帕莱奥洛格日后可能会这样写：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敢于玩这么命运攸关的游戏。他眼中的“实干家”此刻已然成为“一个赌徒，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未来的走向，更决定了重大事件的转折”。

第十章 最后的通牒



奥匈帝国的要求

就在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乘船驶向喀琅施塔得港口时，奥地利人也开始对最后通牒进行最后的修订，并准备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7月19日周日，为避开关注，部长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乘坐着一辆无牌照的车，秘密前往贝希托尔德的私人公馆讨论“即将对塞尔维亚展开的抵制行动”。众人对即将发往贝尔格莱德的文件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并得出了最终的确定方案。众人一致决定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下午5点发布（后来又被推迟到了6点，以确保在普恩加莱离开后才发布）。贝希托尔德想当然地称他相信“我们的相关言论不会在普恩加莱离开圣彼得堡前就被外界所了解”，但由于他注意到维也纳的计划已经传到了罗马，现在有必要加快速度了。塞尔维亚政府将有48小时进行回应，而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最后通牒将于7月25日周六晚到期。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此次非正式讨论其余的内容也涉及了最后通牒发布之后的事宜。康拉德向蒂萨保证，他们将有足够的兵力保护特兰西瓦尼亚应对可能遭受的来自罗马尼亚的攻击。蒂萨坚持要求奥匈帝国一开始就宣布“对抵制塞尔维亚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并且无意吞并任何国家的领土。这位匈牙利首相之所以如此反对，是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会议上他都感觉到，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行为都将导致南斯拉夫人对奥匈帝国的反抗情绪加剧；同时他也担心俄国不会对奥匈帝国政府的侵吞行为坐视不管。他的这一要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贝希托尔德坚持认为在冲突发生之后，也许塞尔维亚领土的减少是减少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威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蒂萨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在会上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维也纳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奥匈帝国并非企图侵占塞尔维亚的领土。但这也会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产生借机侵占塞尔维亚领土的念头。

奥匈帝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没有涉及在整个事件中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塞尔维亚所处的地区一直不太平：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局势始终不稳定，保加利亚也有可能在出现战乱之后回归亲俄的政策，而保加利亚政局的变化与罗马尼亚领土的变化之间又该如何得到平衡？亲奥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能否稳坐江山，如果不能，谁将替代它？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果奥匈帝国被迫与德国断绝关系，又该由谁来接管其位于贝尔格莱德和采蒂涅的使领馆？所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而直到7月7

日会议结束，对于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始终没有得出应有的准确评估。康拉德对于军事情况的评估完全集中在奥地利的B计划而非R计划，前者是一个纯粹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战略，然而后者则是对于俄国可能对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做出了防御预案。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层官员提醒康拉德：俄国一旦发难，奥匈帝国该如何应对，包括相应的战略转变会有哪些困难。奥匈帝国的高层一直在聚焦贝尔格莱德的边境问题。即便普恩加莱曾向绍帕里发出特别警告称塞尔维亚也是有“朋友”的——法国和俄国将对奥匈帝国的侵犯行为做出反击，贝希托尔德在知道这些消息后，依然没有改变既定的策略。

相关文件和最后通牒是由男爵穆苏林·冯·戈米（Musulin von Gomirj）起草的，他并不是一位高级官员，只是自1910年开始担任宗教和东亚政策的相关顾问。穆苏林之所以被任命为最后通牒的起草者，是因为他出色的文笔。正如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后来所说，他是“引发欧洲那段灾难般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诚实的、善良的却因噩运被选为这场‘游戏’兵前卒的人”。穆苏林像一名珠宝商对待价值连城的钻石一样精雕细琢这个文件。在文件的最开始提到，塞尔维亚曾承诺将在结束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与奥匈帝国做“友好的邻居”。文件进而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包庇其境内源自“恐怖主义行为、一系列暴动与谋杀”的“颠覆运动”——这实际上将此前的多起南斯拉夫恐怖分子暴行与萨拉热窝事件联系起来。同时文件指出，塞尔维亚政府还“包庇多种社团形式的犯罪活动”，并“包庇某些塞尔维亚舆论向青少年所灌输的对奥匈帝国皇室的仇恨情绪”。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初步调查显示，刺杀者是在贝尔格莱德计划的此次行动并受到相关支持，而其通向波斯尼亚的道路则是在买通了塞尔维亚边检官员之后才打通的。因此，奥匈帝国“放任”塞尔维亚种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牒文件最后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必须将这份文件所提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并抵制泛塞尔维亚的领土收复主义。

或许这份文件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在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宣战5天之后就立刻被其他国家在原文件中抓到了口实的部分，即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塞尔维亚官方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相反，它只是用极其隐晦的语句谴责塞尔维亚政府的“包庇”导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这些谨慎的用词只简单地体现出什么是奥匈帝国政府所知的和不知的。维也纳的外交部已经派出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Friedrich von Wiesner）参赞前往萨拉热窝，整理并分析整个事件的相关背景。7月13日，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维斯纳在结论中指出并没有证据指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联或需负任何直接责任。鉴于这份调查报告，后世很多人认为萨拉热窝事件纯粹只是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当时的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正如维斯纳后来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所解释的，他的报告内容被“广泛地误解了”。

据（维斯纳）回忆，当时他所找到的证据很明显能从道德层面上指向萨拉热窝政府应对刺杀事件负责，但鉴于此类证据并不能被法庭接受，他也就没将这些内容用于对塞尔维亚的质疑上。他说他在回维也纳

的路上搞清了这一切。

既然奥匈帝国一向以最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对其来说就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受过训练的凶手及入境塞尔维亚等方面的相关证据已经掌握得够多了，只差确认具体是塞尔维亚的哪些组织与之相关。在追踪关于民族自卫组织的相关线索时，奥匈帝国政府却漏掉了更重要的黑手社，后者实际上在塞尔维亚国内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不仅没能追踪到“阿匹斯”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塞尔维亚政府与这次阴谋的关联，或许是因为比林斯基与塞尔维亚大使的对话内容让贝希托尔德觉得很尴尬，相关的调查遇到瓶颈。如果他们对全局有更多的了解，奥匈帝国方面无疑将更准确地判断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时间，弗里德永案（该案成为俄国和法国扬扬得意地拒绝接受维也纳声明的理由）所带来的耻辱使得最后通牒的起草人不得不修饰他们的言辞，试图以萨拉热窝调查中收集到的贫乏的信息为基础，证明事实、消除疑窦。

随之而来的是最后通牒中的10大要求。前三条关注于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对领土收复主义进行打压，并叫停任何反奥匈帝国的国策。第4、6和8条提到关于镇压萨拉热窝可能出现的涉及军界及边境官员的暴乱。第7条更为具体：要求“立即”逮捕沃亚·坦科西奇和米兰·齐加诺维奇将军。奥匈帝国所不知道的是，坦科西奇是黑手社的骨干成员，是“阿匹斯”的亲信，也正是他招募了刺杀小组的三名核心成员。齐加诺维奇在奥匈帝国看来是“刺杀事件初步调查之后显示为和事件有所牵连的政府人员”，但实际上根据后来柳巴·约万诺维奇的证词，他也是黑手社混在帕希奇麾下的间谍。第9条要求贝尔格莱德向维也纳对“身在塞尔维亚国内和国外的塞尔维亚高官的不正当表达方式做出解释。这些人虽然有着官方身份，但仍然在6月28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在采访中表达了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敌意”。这一点最主要涉及来自圣彼得堡的斯帕拉伊科维奇的采访；此外它还提醒我们，奥匈帝国的态度已经深深受到塞尔维亚对战争反应的影响。第10条则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应“毫不迟疑”地贯彻如上各条内容。

最具争议的当属第5条和第6条的内容。第5条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与奥匈帝国合作，共同镇压对帝国皇室有害的活动”，第6条要求奥匈帝国的“有关部门”也要“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调查”。与往常一样，这份文件的条款是由各方共同提议设立的，但是贝希托尔德坚持将奥匈帝国方面对相关调查的参与权加到要求当中。原因很明显：维也纳政府不相信塞尔维亚当局能在没有奥匈帝国当局的监督和核查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调查。必须指出的是，从6月28日到最后通牒的发布期间，塞尔维亚政府也没采取什么有效的举动让奥匈帝国改变这一固有想法。

而这些要求对于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本身在其主权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国家当然可以依据法律来规定其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可以做的事。但在塞尔维亚主权不可侵犯的形势之下，这显得有些走样了。首先是对等问题。塞尔维亚（或者说至少是国

家领导人）接受塞尔维亚以及其在奥匈帝国生活的民族同胞的最终的“统一”。这意味着帝国的领土与未被界定的“塞尔维亚化”的领土之间存在模糊的界限。而帕希奇领导之下的塞尔维亚很难地争取到收复这些领土。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夹杂着的民族及领土问题时常让二者出现摩擦，而且当时对于此类问题的相关国际仲裁机构也尚未建立。

当爱德华·格雷看到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全文后，他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给另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最强硬的文件”。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也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此类文件中最为猖狂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格雷和丘吉尔是在和什么相比较的情况下才产生这种想法的，而且由于萨拉热窝事件，也让这个文件本身变得难以被完全客观地评判。但这些评价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简直和蛮荒时代野蛮人的行径无异，是对他国主权的践踏。而实际上奥匈帝国的这份文件所要求的并不过分，例如，它与1999年3月北约发给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最后通牒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份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 北约的人员需享有在搭乘车辆、飞机、轮船并携带任何设备时自由进出南斯拉夫共和国国境并在国境内开展相关事务的权力。这些事务应包括但不限于驻扎营地、工业生产、军队训练等活动。

亨利·基辛格将朗布依埃描述为“一个挑衅和开始轰炸的借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这些条款即使对于最为温和的塞尔维亚也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中所要求的内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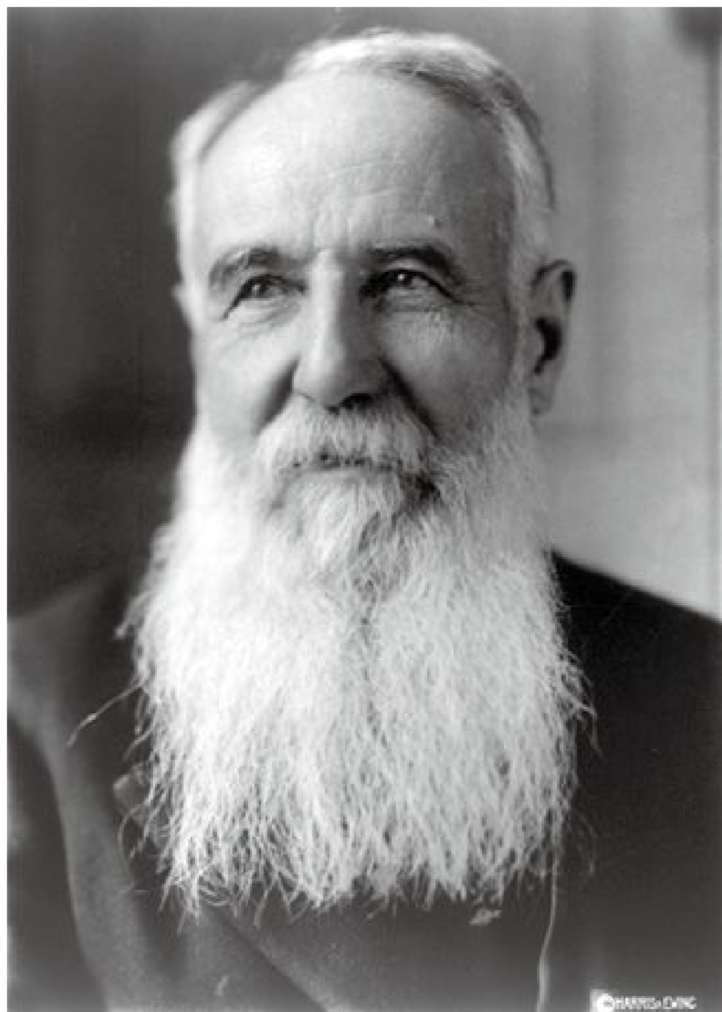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政府的最后通牒就是从塞尔维亚可能不会接受为假设而制定的。这并不是一次挽救两国之间和平的最后尝试，而是奥匈帝国用来表示出自己毫不让步的立场的工具。另外，不像朗布依埃所想象的那样，通牒的内容并非是想完全击垮塞尔维亚而提出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和抵制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息息相关，第5条和第6条甚至直接就反映出这些问题，条款的起草者也很看重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月16日，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才将这份文件交给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并指出塞尔维亚此时应当针对刺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格鲁伊奇则坚持“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准确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采取任何其他应对奥匈帝国的措施”。格鲁伊奇表示，一旦调查结果公布，塞尔维亚政府将遵从“不惜任何代价按国际惯例协助调查”的规定。格鲁伊奇还称，即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塞尔维亚也不会孤军奋战。至少俄国不会在塞尔维亚遭受大规模攻击之时坐视不管”。这种模糊的表述表明拒绝屈从敌邻邦的威胁的确是不太可能的。在1912年巴尔干国家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政府正是以强制和顺从问题为由，向其他国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进行改革的尝试多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拒绝“外国势力”参与到这样的改革中来，并且“整个世界”对于他们“独立地进行严肃的改革”的承

诺充满着“深切的不信任感”。贝尔格莱德是否有人在1914年7月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仍然值得验证。

塞尔维亚的回应

7月23日早上，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致电塞尔维亚外交部，告知他们维也纳政府将与塞尔维亚总理于当晚进行一次“重要的沟通”。帕希奇当时因参加选举而离开了贝尔格莱德，财政大臣拉扎尔·帕丘（Lazar Paču）在此期间代理他的职务。在提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信息后，帕丘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帕希奇，让他尽快回来。但帕希奇并不想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并指示帕丘“在我的住处接待吉斯尔”。当吉斯尔于下午6点抵达时（最后的期限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帕丘和作为翻译的格鲁伊奇接见了他，因为财政大臣本人并不会说法语。

吉斯尔交给帕丘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两页附录以及一份写给代理总理帕丘的说明，并告知他需要在48小时内做出答复。如果在给定期限内塞尔维亚没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或根本没有答复，吉斯尔将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带着所有使馆的外交人员回到维也纳。在浏览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前，帕丘就直接表示目前国内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层官员都不在贝尔格莱德，客观条件上来说就很难让这些决策者们及时聚在一起做出决定。对此吉斯尔表示：“在这样一个铁路和电报高度发展的年代，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召集这些官员应该只需几小时就足够了。”同时他表示：“这是塞尔维亚的内政问题，对此他自己无须发表看法。”在吉斯尔发给维也纳的电报中，结尾处表示“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但在战后与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的谈话中，吉斯尔回忆称，帕丘当时迟疑了一下，说他无法接受这些条款。在当时的情况下，吉斯尔说他将文件放在了桌上，“帕丘想怎么处置它都可以”。



尼古拉·帕希奇（1919年）

吉斯尔一走，帕丘就召集了仍在首都的大臣们，并一起浏览最后通牒的全文。帕丘大为震惊，因为他曾认为德国最终将冒着“将自己也拖入战争”的风险来支持奥匈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场的人读完文件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没人敢第一个说出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开口的是教育大臣柳巴·约万诺维奇，他先是在屋里来回踱步，之后表示：“除了开战，我们别无选择。”

后来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鉴于这份文件的极端重要性，在场的人都清楚帕希奇必须立刻返回贝尔格莱德。为准备将于8月14日进行的选举，帕希奇已经在塞尔维亚南部的尼什城准备了一上午。在进行了一个演讲之后，这位总理似乎突然对竞选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能稍微休息一下，应该是件好事，”他告诉同行的外交部政策大臣沙伊诺维奇（Sajinović），“你觉得去萨诺尼卡（即塞萨洛尼基，据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该地被希腊吞并）待两三天怎么样？那边也没什么

人认识我。”而就当帕希奇和沙伊诺维奇在车站等着乘坐开往塞萨洛尼基的总统专列的时候，有列车员告知帕希奇，他们接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紧急电话。电话正是拉扎尔·帕丘打来的，恳请帕希奇回到首都。然而帕希奇并无意立刻就赶着回去。“我告诉拉扎尔，等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自然会给出答复。但拉扎尔告诉我这并非一个普通的文件。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之后，他就和沙伊诺维奇登上了开往塞萨洛尼基的列车。当火车抵达尼什南部50公里外的莱斯科瓦时，这位总理才被摄政王子亚历山大的电报劝了回来。

这确实奇怪，但并非不合常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1903年夏，当帕希奇提前得知谋反者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时，他就带着全家坐火车前往了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坐等结果。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他在7月23日下午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阿尔贝蒂尼看来，他可能只是希望能远离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所带来的沉重的责任。有趣的是，贝希托尔德已经从秘密渠道获悉，帕希奇打算在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就立刻辞职。他可能只是乱了阵脚，或者他觉得无法理清头绪了。全国大选加上塞尔维亚所遇到的最为紧迫的外部危机，已经让他陷入极大的压力。无论如何，最终总理和随行的沙伊诺维奇于7月24日早上5点抵达了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花了一段时间对最后通牒做出具体的回应。7月23日晚上，在帕希奇返回首都的路上，帕丘向塞尔维亚使馆发去了一份密函，表示奥匈帝国政府列出的这些要求“过于苛刻，塞尔维亚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帕丘在会见临时代办斯坦德曼（他在哈特维希去世后接任了驻俄国大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帕丘走后，亚历山大王子又来与斯坦德曼讨论了这次危机事件。他也坚持表示，接受这样一份最后通牒，“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莫大的侮辱”，并称他将希望寄托于沙皇，相信“他强大的话语权可以解救塞尔维亚于危难之中”。第二天一早，帕希奇又去面见了斯坦德曼。这位总理认为，塞尔维亚既不应该立刻接受这些条款，也不应该反对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而应该立刻想办法推迟回应最后通牒的期限。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申诉支援，对塞尔维亚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帕希奇补充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我们也将战斗。”

从这些内容来看，似乎塞尔维亚领导层都立刻一致认为，塞尔维亚如果必要的话对此必须反抗并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言论都是从斯坦德曼的报告中转述得知的。看起来贝尔格莱德政府急于寻求俄国的支持。从其他报告中还能看出，塞尔维亚的决策者们都对奥匈帝国可能发起的攻击深感畏惧，同时又觉得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而1913年10月萨佐诺夫曾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在面对阿尔巴尼亚利益方面的问题时应向奥匈帝国妥协，这不禁让人担忧俄国这次能否支持塞尔维亚度过此次危机。至于法国的态度，也难以了解，因为法国的领导人正在从俄国返回的路上，而法国特使德斯克斯由于国内问题被召回巴黎之后，还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7月23日晚上由帕丘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这一情况也一直持续到帕希奇归来的那个早上。帕希奇只是表示，在俄国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之前，不应轻举妄动。除了与斯坦德曼的会谈被报告给了圣彼得堡政府之外，还有两个官方的要求需声明。帕希奇致电斯帕拉伊科维奇，要求他搞清楚俄国政府的观点。同一天，摄政王子亚历山大向沙皇发电报表示，塞尔维亚“无法孤军战斗”，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将接受“陛下（沙皇）所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中的任何条款。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马格里尼通过对当时的塞尔维亚决策者们以及其他相关的见证人的了解，认为当时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的内容。带着将辞职的情绪，帕希奇最终于7月25日向塞尔维亚当局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当“同意各项条款”并让维也纳政府“完全满意”。这与他前两天颇为坚定的言辞相比明显是退让了。而在一份于7月25日午后克莱肯色普发出的电报显示，此时的塞尔维亚政府甚至愿意接受条款中最为过分的第5条和第6条，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并宣称该组织符合国际惯例”。

还是俄国人的支持让塞尔维亚吃了颗定心丸。7月23日，大约早上8点半，一封斯帕拉伊科维奇前一天晚上发出的电报到达了塞尔维亚，报告了他与普恩加莱在出访期间的谈话。普恩加莱向这位塞尔维亚特使询问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最新消息，当斯帕拉伊科维奇告知情况非常糟糕时，普恩加莱表示：“我们会帮你们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可喜的，但并不代表着特别的改观。在7月24日午夜前后，又有一封电报发到贝尔格莱德，称“一个大胆的决定”迫在眉睫。

一封发于7月24~25日，来自斯帕拉伊科维奇最为轰动和重要的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和萨佐诺夫于7月24日晚上7点前所进行的对话的内容，在此期间，这名俄国外交大臣将下午3点进行的俄国大臣会议的内容转告给了塞尔维亚特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在报告中称，俄国外交大臣“厌恶地谴责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并宣称任何国家若接受这样一份文件的要求，还不如“自杀”。萨佐诺夫向斯帕拉伊科维奇承诺，塞尔维亚可以“非正式地依赖俄国的支持”。但他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帮助形式，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由沙皇决定，并征询法国的意见”。在此期间，塞尔维亚应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如果遭受攻击又无力自保，塞尔维亚应当立刻将部队由东南部调进俄国领土。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任由奥匈帝国占领国土，而是保存塞尔维亚部队实力，以备日后的反攻行动。

7月25日晚上8点，斯帕拉伊科维奇又发来一份电报称他与刚从沙皇官邸归来的塞尔维亚国防部官员进行了会见。这名官员此前与俄国总参谋长有过会谈，他告诉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防部已经表现出“充分的备战状态”，并准备好“最大限度地保护塞尔维亚”。沙皇对此的决心更是让所有人震惊。此外，俄国已经下令，下午6点整，也就是塞尔维亚被要求回应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所有俄国军校的应届学员都将被提升为军官级别，这也是即将开始做全军动员的清晰信号。“在各个方面，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欢欣鼓舞。”在发至贝尔格莱德的其他电报中则报告

了各项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准备措施，“荣誉感和（可以做出任何程度的）牺牲的精神”充斥在俄国国内，而关于英国的舰队也开始备战的消息则让人更为振奋。

俄国提供军事支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消除了弥漫在贝尔格莱德的悲观情绪，也打消了一些大臣试图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以防止战争爆发的念头。斯帕拉伊科维奇于7月24日发出的关于萨佐诺夫承诺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电报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于凌晨4点17分到达，第二部分于7月25日上午10点到达。关于报告斯帕拉伊科维奇与国防部官员于7月25日下午的会谈内容的电报，于7月26日某个时间被送达了贝尔格莱德。这封电报是前一天晚上8点发出的，所以这应该是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奥匈帝国做出最终回应之前被送达的。

即便呈现这样的形势，塞尔维亚的大臣们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好言缓和与维也纳政府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塞尔维亚的主权受到侵害。帕希奇、柳巴·约万诺维奇以及当时大多数身在贝尔格莱德的高官共同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后来向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描述了当局是如何忙于应对奥匈帝国进行答复的。7月25日周六下午，众多官员在上面进行着反复的修改，以至于到最后连最初的字迹都难以辨认了。

最后到了下午4点，文件似乎终于顺利完成，人们试图将其打印出来。但是打字员缺乏经验，打字机也出现了故障，因此该回复不得不用誊写墨水手抄而成，文件用胶版批量印刷出来……最后半小时的工作最为慌乱。回复文件上到处是钢笔修改的痕迹。插入的句子又被墨水勾掉，面目全非。到下午5点45分，格鲁伊奇将文件放在信封里，呈给了帕希奇。

帕希奇曾希望格鲁伊奇或其他下属能将这份回函交给吉斯尔男爵，但没人愿意去，他说道：“好吧，我自己去拿给他。”之后他走下楼梯并加入了与吉斯尔的会议，与此同时高官们都慌忙地乘火车赶往尼什，塞尔维亚政府已经迁到该地，以应对可能遭受的冲击。

塞尔维亚的回复可能看起来一团糟，但它可算是外交事务中含糊其辞做法的“杰出体现”。曾负责起草最后通牒初稿的穆苏林男爵将其形容为他所遇到过的“最精明的外交技巧示范”。有人指出塞尔维亚政府曾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等多个场合表现出其温和、顺从的态度。事实上，“塞尔维亚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这份回函的起草者们也相信，他们的回复将消除两国间所有的误解。由于政府无法追究每个个体的行为责任，也无法对媒体或是“社会的和平工作”直接施加控制，因此它为来自维也纳的指责感到讶异和痛苦。

在这份回函中，起草者们将对于条件的接受、逃避与拒绝等微妙地混合交织在一起。第一，他们同意官方谴责一切针对奥匈帝国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内容的宣传（而他们在此处用了动词的情态形式，以避免表

明曾经其实有过类似的宣传）。第二，在关于抑制领土收复主义方面，回复中称，塞尔维亚政府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能证明民族自卫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社会组织”犯有“此类罪行”，不过他们愿意解散民族自卫组织及其他“可能有此类反奥匈帝国意识的”组织。第三，政府很愿意“在帝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消除任何反奥匈帝国的教育宣传。第四，同意撤销军方可疑人员的职务，但也只能在奥匈帝国能提供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具体罪责”的情况下。在关于成立奥匈帝国—塞尔维亚联合委员会的事情上（最后通牒中的第5条），回函中表示塞尔维亚政府“没有充分了解这一要求的明确意思”，但他们将同意此类规划，前提是这符合“国际法、刑事诉讼法，并能维护良好的邻国关系”。第6条要求（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相关违法人员的协同检查）被回绝了，因为这与塞尔维亚的宪法相违背。这事关塞尔维亚主权问题，为此萨佐诺夫也强烈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守住底线。关于第7条里所要求的逮捕坦科西奇和齐加诺维奇，塞尔维亚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份回函发出的当晚”逮捕了坦科西奇，而“还无法抓住齐加诺维奇”。奥匈帝国政府也被再次要求提交“推断犯罪的证据以及证物，以便后续的调查”。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回应：一旦在萨拉热窝城里发现有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警察就会把他遣送出去，同时官方则会表示城里找不到名为齐加诺维奇的人。关于第8条和第10条里谈到的对反对奥匈帝国的行为做出查办并通报帝国，被无条件地接受了。但第9条关于对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官员不当言论做出惩戒，则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如果奥匈帝国政府“具体指出哪些段落有这类内容，并能证实确实是塞尔维亚官员所说的”，那么塞尔维亚政府将“很乐意给出”相应的解释。

也难怪穆苏林大加赞赏这篇回函的用词。其实这篇回复并非完全屈从于奥匈帝国的要求。该文件是为塞尔维亚的朋友塑造的，而非敌人。它给奥地利人所提供的便利非常小。首先，它将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责任推到了维也纳政府身上，同时又没有明确表示这样合作的调查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看来，这实际上延续了塞尔维亚当局自6月28日以来的政策：避免被卷入事件当中，同时概不承认任何与之有关的言行。回函中所提到的“国际法”其实只是障眼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相关的国际法可以对此类联合机构的行为加以裁决判定。但不管怎么说，文中已经完美地展示出一种不明就里却仍要尽一切便利条件来接受最后通牒的表象。

因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掩饰的拒绝。既然帕希奇的拒绝先发制人，对民族主义集团势力进行打压，使得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导致总理在6月28日之后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被动性的多种原因，这种被动性体现在最近与军事派和黑手社集团的交锋中一直处于下风；在塞尔维亚政局处于危险的巅峰时，他30多年的政治生涯深深地将含蓄寡言和行事隐匿的作风烙在了他的性格中；此外，帕希奇和他的同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基本思想中还是对此抱有同情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设想。帕希奇必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担心对这个案件的任何彻底调查，因为这可能

牵涉塞尔维亚政坛一系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核心当事人。说得好听一点儿，对“阿匹斯”集团的任何调查都会损害贝尔格莱德的政治事业。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双重间谍齐加诺维奇（他已被奥匈帝国方面列为嫌疑人）的追踪和调查可能会暴露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提前知晓真相的事实；在7月7日接受晚报采访时，帕希奇曾激烈地否认自己提前知道内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人确实在缘木求鱼，即要求符合政治版图的塞尔维亚官方对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势力进行打压。问题在于，这两方实际上是相互勾连、自成一体的，它们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在贝尔格莱德的战争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官方部门的话），在主接待大厅前面挂着一张塞尔维亚的地图；地图前竖立着一个颇有讽刺意味、全副武装的女性形象，在她所持的盾牌上罗列着“仍需要被解放的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

就在接到塞尔维亚的回函之前，吉斯尔就已经料到他们不会无条件接受这些要求。当天下午3点开始，塞尔维亚的军事总动员令就已经生效了，部队已经大张旗鼓地出发并占领了城市周围的高地，国家银行及重要档案都已经撤出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已经做好准备遵循政府的指令，途径尼什，来到其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临时地点。对参与起草这份回函的高官们也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在最后期限到来的最后5分钟，也就是7月25日（周六）下午5点55分，帕希奇出现在奥匈帝国使馆并移交了回函文件，并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他没说法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提出的部分要求……至于其他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能表现出一名奥匈帝国大将应有的骑士精神。”然后他就离开了。吉斯尔瞥了一眼文件，随后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交给总理的关于他将与部下于当晚一同离开贝尔格莱德的信件。身在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交给了德国大使馆，使馆里相关的密件都已被焚毁，而已经打包好的行李被装到了等候在门口的车上。下午6点30分，吉斯尔偕妻子及部下搭上了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10分钟后，奥匈帝国封锁了国境线。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开始了？在7月24日发给身在伦敦的门思多夫的一封电报里，贝希托尔德要求这位大使转告爱德华·格雷，奥匈帝国的文件并非正式的最后通牒，而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行动方针”，如果在到期之后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破裂以及可能开始的相关军事准备。但战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之后塞尔维亚退缩了，“在我们的大军压境之下”，贝希托尔德说道，他们将偿还奥匈帝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第二天，就在贝希托尔德前往巴特伊施尔会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在途经莱姆巴赫时，收到了一封身在维也纳的第一分队长官马基奥（Macchio）发来的电报。马基奥报告称，维亚纳的俄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库坦舍耶夫（Kudashchev）已经官方提请延长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期限。贝希托尔德回复表示，延长最后期限的截止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他补充说，即便超过了最后期限，塞尔维亚也可以通过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来避免战争。在历史学家阿尔贝蒂尼看来，或许这些话表现出贝希托尔德一时的糊涂，也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只是逢场作戏——谁都能看出奥匈帝国已经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最后的辩解并没有什么好处。7月26和27日，斯帕拉伊科维奇带来了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俄国正在动员170万人的部队，并计划“一旦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就立刻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斯帕拉伊科维奇在7月26日报告称，沙皇称塞尔维亚人将“像雄狮一样战斗”，甚至有可能摧毁奥匈帝国的铜墙铁壁。虽然德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如果德国人没有加入战斗，沙皇认为这将是一个“让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绝佳机会；如果德国参战，俄国将“执行与法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这样战胜德国也完全不在话下”。

斯帕拉伊科维奇作为前任塞尔维亚外交部政策大臣，对这些消息无比激动，以至于他也开始建议相应的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善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可能促成塞尔维亚真正的统一。因此，奥匈帝国对我们的攻击也将是一个契机，我们应以上帝的名义回击！”这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激进情绪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奥匈帝国也不会再对开战有所迟疑了。帕希奇一直以来就坚信，塞尔维亚及其盟国不会得到安宁，而将借助强国的力量展开伟大的战争。这并非从来未曾经过谋划，而是一个即刻就会爆发的局面。虽说两周之前或许还有办法避免严重争端的发生，但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对塞尔维亚来说，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局部战争”开始

1914年7月28日早晨，弗兰茨·约瑟夫在他位于巴特伊施尔的皇家别墅的书房写字台前，用一支鸵鸟毛做成的羽毛笔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声明。在他面前的是他已故妻子的大理石半身像。在他的右手肘边，是一支造型十分具有艺术感的电动雪茄点火机，它是铜质的，十分笨重，带有深色木质底座，线路引向桌子后面的壁式插座。声明文件的格式参考了奥匈帝国在1866年宣告对普鲁士开战时的模板。

> 承蒙上帝保佑，我的强烈的愿望依然如是——将这虽已被判决的几年时光神圣化，继续开展和平的工作，继续保护我的人民免遭战争的牺牲和重负。然而事与愿违，一个恶毒的敌手却在威逼我，让我不得不为了维护我人民的权力和财产，在度过了长久和平的时期之后再次拔出我的利剑。

但这次，贝尔格莱德已经接近于无人区了。所有适龄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许多家庭已经逃往国内的其他地区找亲戚避难，大多数外籍人员也已经离开。7月28日下午2点，关于大战一触即发的传言像野火一样蔓延在整座城市当中。街道上零售的报纸都被立刻抢购一空。当天更有两艘塞尔维亚籍的船只携带弹药和地雷在多瑙河上被奥匈帝国的侦察兵截停。第二天凌晨1点刚过，塞尔维亚部队就炸毁了连接塞姆林和贝尔

格莱德之间的大桥。奥匈帝国炮艇向岸边开火，在经历了短暂的交锋之后，塞尔维亚部队撤退了。

时年58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也了解到了开战的消息，他对此非常欣喜："30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奥地利人，并觉得应该给这个垂暮的帝国一个机会。我对奥匈帝国又充满了自豪。"

第十一章 枪声响起



毫不让步

在经历了充斥着招待会、军事评论、演讲、晚宴祝酒词的忙碌的4天后，莫里斯·帕莱奥洛格需要休息。在7月23日晚上于“法国”号舰船上见过了普恩加莱之后，他告诉仆人第二天早上不要打扰他。但事与愿违，早上7点就有紧急电话，通报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消息。对于这位当时还躺在床上、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的大使来说，这些内容就好像一个似真似幻的梦进入了他的脑海：

> 这些内容在我听来是那么的不真实，却又是客观存在的。我又感觉自己仿佛还在继续着昨天和沙皇的对话，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同时我又强烈地感觉我只是在一场噩梦之中。

帕莱奥洛格当即取消了他的午餐安排，改为与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和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会面，此次会面在法国大使馆举行。根据他的回忆，帕莱奥洛格向两位来客回顾了前一天晚上法国总统和沙皇的谈话内容，并重申三个大国必须保持“毫不让步”的政策。萨佐诺夫回应道：“但如果这样的政策将导致战争呢？”帕莱奥洛格对此表示，只有在“德意志势力”已经“打定主意靠武力手段来维护其在欧洲东部的利益”时，毫不让步的姿态才可能引发战争。（这位法国大使在此极佳地演绎了7月的第二个星期里，霍尔维格向里茨勒所表达的观点。）

萨佐诺夫似乎也并不像帕莱奥洛格所形容的那样畏首畏尾：在与乔治·布坎南的一次会谈中，正是萨佐诺夫宣称“俄国将不惜一切动用武力”。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三个人此时都从奥匈帝国呈献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中看出了形势的危急。萨佐诺夫和帕莱奥洛格一同开导布坎南，让他去劝说英国政府放弃“无异于自杀式行为的”中立政策。布坎南表示同意并承诺将“严词”劝告格雷，让他实行“抵抗德国”的政策。曾与大使在那天午后有过交流的德罗宾伯爵为此震惊，他回忆道：“在这个气氛紧张的午餐时间里，他们都彼此刺激、怂恿。帕莱奥洛格更是夸大了他与普恩加莱的谈话内容……”

事实上，萨佐诺夫并不需要帕莱奥洛格或其他任何人的怂恿。就在

他前往法国使馆共进午餐之前，他就已经向奥匈帝国驻俄大使写信阐述了他如何看待目前的情况，以及他将如何对此进行反馈。在绍帕里大声读出了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后，萨佐诺夫愤怒地咆哮道：“我懂了。你们就是想与塞尔维亚开战！德国的舆论也在怂恿你们这么做。你们这是要让欧洲陷入战争。你们这样做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很快你们就将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应了。”绍帕里表示愿意提供证明维也纳政府这样做的合理性的证据，但萨佐诺夫大手一挥，表示自己没兴趣知道：“是你们自己想要战争的，而且只是你们自己。”当绍帕里表示奥匈帝国有维护自身利益，而且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时，萨佐诺夫讽刺地回应道：“像你们现在这样在欧洲燃起战火，人们确实能看出你们有多么爱好和平。”就这样，绍帕里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他立刻回到了奥匈帝国使馆，并将如上信息加密回报给了奥匈帝国。

这位奥匈帝国大使刚走，萨佐诺夫就叫来了俄国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Yanushkevich）将军。他宣称，俄政府将很快发布一份新闻公告，将告知外界，如果“塞尔维亚同胞的尊严和主权受到威胁”，俄国将不会再保持“坐视不管”的状态（第二天又针对此内容发布了进一步的说明）。之后，他和亚努什科维奇讨论了关于“针对奥匈帝国展开局部战争”的计划。在最后通牒发布的那天，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坚持自己毫不动摇的政策，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并做出了让危机进一步升级的一系列决定。

那天下午3点，召开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大臣会议。萨佐诺夫在刚刚结束与帕莱奥洛格和布坎南的午餐会面后，在理事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以描述目前所处的危机四伏的欧洲形势作为开场。他指出，德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系统的准备工作”，其目的不仅在于扩大其在中欧的影响力，更在于铲平“包括三国同盟所带来的影响在内的所有国际问题”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在过去10年中，俄国在面对其挑衅时一直都保持着克制，而这恰恰“鼓励”德国产生了更多“侵略性的企图”，到了该摆明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正是“在德国的纵容之下”写就的，如果贝尔格莱德政府接受这些条约，实际上就意味着臣服于德国。如果俄国此时放弃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不维护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那么俄国自己也将丧失“所有的权威”，进而“在巴尔干地区陷入被动”，并且“只能屈居于第二大国”之位了。为此他也警示道，一个坚定的立场可能引发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战争，而更让人不安的是，目前还不知道英国将站在哪一边。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他是一名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的观点的大臣。当时他是沙皇面前的红人，同时也与杜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为农业大臣，他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也非常紧密，这些人的势力遍布俄国。他曾经为《新时报》工作多年，这是一家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他曾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1912年11月提出的针对奥匈帝国出兵的提议。他也和黑山的米利察（Militsa）过往甚密。在科科夫佐夫离开后，克里沃舍因是大臣会议中最有权势的人。这名鹰派成员在外交问题上也显得

越来越反德意志。

7月24日，在这次大臣会议的发言中，克里沃舍因首先大段阐述了关于军事行动的利与弊，但最终表示应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击。他强调，俄国在经历了1904～1905年的变故之后，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空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发展的时期。但重整军备的进程尚未完成，这也让人担忧俄国目前的军事力量能否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现代高效的科技”武装相抗衡。但反过来说，“总体条件”在近几年里已经有所改善（或许他指的是法俄关系的巩固），这样看来，帝国自己也很难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在如此好的情况下还表现得“畏首畏尾”。接着出现了争论的核心问题。过去，俄国“过于审慎的态度”没能“稳定”中欧的动荡局势。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开战，俄国也将冒很大的风险，日俄战争就是前车之鉴。但永无止境的“调解”并不能为俄国换来其想要的和平。“纵使我们再怎样调解，战争也在所难免。”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的政策应该是“以一个更为坚定、充满活力的态度面对中欧地区的动荡局势”。

克里沃舍因的发言在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后面发言的人也没有对他的结论表示异议。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承认，重整军备的进程确实没有完成，但二人“都表示不能再这样犹豫着任人宰割了”，而且在他们看来，“毫不让步的姿态没什么不好”。财政大臣彼得·巴克表达了自己对于俄国发动欧陆战争后所需承担的经济财政冲击的担忧，即便如此，他也承认，一再让步并不能保障和平，而且“既然俄国的荣誉、尊严和权威受到挑衅”，他认为没有理由不坚持目前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决策。戈列梅金在最后总结道：“立刻帮助塞尔维亚，是俄国的责任。”毫不让步的姿态比调解更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即便不能顺利走向和平，“俄国也应该准备好为和平做出牺牲”。最后，大会达成了以下五点共识：（1）将要求奥匈帝国延长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2）将建议塞尔维亚不要在边境地区交火，而是将军队撤到国家内部备战；（3）将要求沙皇“原则上”同意随时准备动员基辅、敖德萨、喀山和莫斯科军区的部队；（4）将责成国防大臣加紧军事物资的储备；（5）将紧急撤回目前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的一切投资资金。

“这次战争真的开始了”

第二天（7月25日），又举行了一次更为隆重的大臣会议，由沙皇亲自主持，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和尼古拉斯公爵都参加了会议，后者作为圣彼得堡行政区的执行长官，也曾在普恩加莱到访期间在其面前直言不讳地交换观点。此次会议不仅确认了此前所做的决定，还制定了更具体的军事行动措施。最重要的是，理事会决定授权一系列所谓的“战争筹备阶段”的准备工作。这些包含着复杂的军事准备措施的工作，不仅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地带生效，而且是为了俄国在欧洲所有领土准备的。

7月24日及25日的会议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性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着大臣会议在斯托雷平去世之后再次恢复了其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这在外交方面是相当不寻常的。为了让其他政客将德国视为灾祸的始作俑者，萨佐诺夫后来表示他甚至修改了法俄同盟的一些核心内容，即德国才是“主要敌人”，而非奥匈帝国。至于这是一场奥匈帝国还是德国引发的危机，其实没有差别，因为奥匈帝国一直被认为与德国是一丘之貉，且其除了“称霸近东地区”之外的终极目标尚不为人知。至于俄国对于战争的准备相对不足的问题，大臣们以含糊其辞的借口表示，即便俄国采取“调解”的姿态，不攻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但战争“终归”还是会爆发。这种论点很像是霍尔维格在7月初所持的一系列观点：萨拉热窝危机实际上是在试探俄国的意图，如果俄国为此不顾一切地挑起欧陆战争，那就说明他们只是以此为借口。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霍尔维格的想法中，这是用来辨别俄国是否有意发动战争的，而并非用以辨别德国的军事企图。相反，在圣彼得堡所判断的标准并非出于被动，不是在俄国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而且也似乎（还不能确定）正使危机进一步升级。

两次会议所确定下来的军事措施也尤为让人感到费解。首先，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被萨佐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所认可的开始着手进行局部备战动员的方案，实际上非常不切实际，而且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即便是局部动员，如果向奥匈帝国展示了威胁性，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带动整个奥德同盟做出反应。而让德国也开始反击，这就好比德国针对俄国进行局部动员，即便没有在西侧动兵，也一样会引起法国的警戒与还击。如果这些反击的动作出现，在南部军区向奥匈帝国发起攻击的右翼部队将在前线迎战来自两个国家的敌军。因动员的局部性所带来的大部分战略空间也因此成为泡影。更令人担忧的是，俄国原本的计划中是不包含局部动员的，并没有计划直接针对奥匈帝国一国发兵。目前这个被称为19号命令的军事动员计划是同时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整体计划”，“不成功便成仁”。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变化意味着绝大多数军队都吸收了来自其他动员区的后备役士兵。此外，在全面出兵的同时，有一部分毗邻奥匈帝国的军队被预留作为防备波兰地区德军势力的力量。因为如果所有一切都不算足够糟糕的话，限定在某些地区的动员则只会使那些进入或穿越中心区的铁路运输调度陷入巨大灾难（这些调度十分复杂）。因此，奥匈帝国的动员不仅对其自身来说是冒险之举，也会让俄国在随后必要之时向全体动员的转变中受阻。

鉴于这些弊端，局部的动员计划恐怕还缺少周密的考虑，但为什么萨佐诺夫还对此坚定不移呢？显然，全面出兵很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萨佐诺夫无疑也记得1912~1913年的那场危机，那正是由一次针对奥匈帝国的紧急出兵而引起的。军事人员受到格外关照，而军事和民政人员之间的沟通又不甚充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身为文官且对军事事务十分反感的萨佐诺夫不会掌握更多消息。当时萨佐诺夫就从亚努什科维奇那里得到了极其糟糕的建议。亚努什科维奇作为一个文臣而非武将，在战略方面并不突出，他之所以受到重用，更多的是因为沙皇个人的喜爱，而非其真正的能力。但此时，就连亚努什科维奇本人及其下属

都认为局部的军事动员是非常不可取的。萨佐诺夫还是坚持己见，或许他觉得需要给沙皇提供一个替代全军出动的方案，或许他寄希望于仅以局部的军事力量就让奥匈帝国和德国屈服，或许另一方面来看，他希望通过局部动员让沙皇的决策也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不确定因素中最起码有一点是确定的：俄国高层中出现了脱节。沙皇被允许将波罗的海舰队增加到萨佐诺夫的局部动员计划中，这更印证了这一事实，即尽管对外交大臣来说，这在他避免与德国对抗的打算中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但不管怎么说，从目前来看，局部军事动员的政策只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工具，起码在7月28日政府正式宣布这一政策之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大臣会议也达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决议，即重新启动“关于在1913年3月2日备战期间的规定”。这种战前动员方案适用于舆论、铁路等多个方面，加之还有其他的多项相关措施：在基地之外进行训练的部队被即刻招了回来；大约有3 000名军校候补生被提升为军官，以在军官数量上满足战时需要；港口严阵以待，马匹和马车随时备战，华沙、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地区的所有堡垒都被转至战时状态，以便在任何时候听从当局调遣，即时进行战略部署。而且，这些措施不仅生效于临近奥匈帝国的边境地区，而是整个俄国在欧洲的国土。

当然，这些措施是充满了风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又怎么判断俄国到底是在进行战前动员，还是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呢？3月2日的一份用于行动规范的相关文本传达出了军事动作的指向。根据这份文件的规定，部队被召回并“被指示按照对敌状态的情况穿好制服严阵以待。马匹被聚集起来，从士兵到军官都结束了休假。一些被怀疑有间谍倾向的人相继被捕。马、牛和农作物的出口活动也受到了限制。钱财和有价证券被从靠近边境的银行转移到了远离边境的银行。海军舰艇都已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好出击”。

为防止可能产生的误会，亚努什科维奇告知各地区的指挥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打破3月2日行动规范的规定。

之后，很显然，很多其他势力也将这次战前动员理解为了局部动员。比利时驻圣彼得堡的外交武官在7月26日的报告中就指出，沙皇已经下令调动“位于基辅和敖德萨的10个军团”，并称这一命令已经受到俄国军界的普遍支持，并指出之后媒体关于“军事动员”的报道恐怕都将被封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也开始发回带有警示性的报告。奥匈帝国驻哥本哈根大使塞切尼（Széchényi）伯爵在7月26日的报告中称，丹麦外交大臣埃里克·史卡维尼斯（Eric Scavenius）已经从圣彼得堡得到消息，称俄国开始了军事动员——尽管塞切尼认为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动，英国和法国不会出来助长俄国的气焰。第二天，奥匈帝国驻基辅领事海因（Hein）报告称，目击大批军官进行集结，且有庞大的炮兵部队从基辅军事基地向西边行进，其目的地不明。同一天晚些时候（7月27日），他报告称有16列运载着大炮和哥萨克骑兵的火车离开基辅，且有26列运载着大炮和工兵的火车已经从敖德萨出发，这些列车的

目的地都是俄奥边境。占地广阔的基辅军营此刻空空如也：部队要么已经被调往其他战区，要么就已经上船。从波兰的彻卡科瓦发来的一份加密报告显示，该地区的演习被中断，所有部队回到了城里集结；“大批的”大炮已经被装上了列车的车厢，并在开往维也纳方向的车站待命；而在几天前，7列满载工兵的列车已经离站。从莫斯科发来的报告称，规模仅次于法国空军的沙俄帝国空军已经开始向西进发，而骑兵团已经来到距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即今日的第涅伯佩特罗斯克）南部约600英里的地方进行集结。奥匈帝国驻加利西亚的外交官报告称有包括大炮和哥萨克骑兵在内的“巨大规模的”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从黑海东岸的巴统传来消息称，哥萨克骑兵团已经在前往华沙的路上了。俄国向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馆发出的领事文件报道了各种部队准备迎战的信号，包括河流采矿、扣押车辆、一整支从基辅向西挺进的俄国炮兵部队、被莫斯科电报厅阻截的德国加密电报、结束演习的军队、开赴卢布利林和科韦利的步兵和骑兵、成群的马匹、大批护送军用机车，以及部队准备应战的其他准备信号。早在7月25日傍晚，当帕莱奥洛格前往圣彼得堡的华沙车站和“非常热切地想要”回到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告别时，二人就被周围接连不断的骚动所震惊了：

> 站台上传来巨大的喧嚣声。火车上挤满了官兵，这看起来像是军事动员。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并在同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次战争真的开始了。”

俄国人的情理

在实施了以上的种种措施后，萨佐诺夫和其幕僚们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大大增加了爆发欧陆战争的可能性。一方面，俄国的战前动员改变了塞尔维亚的政治氛围，贝尔格莱德政府原本是想考虑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的，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这也加剧了俄国国内的压力，舆论纷纷表示俄国不会在面对塞尔维亚所受到的压迫面前“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给奥匈帝国敲响了警钟。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让德国也感到了威胁，虽然此前德国一直坚持寄希望于这次危机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迸发。

为什么萨佐诺夫要这么做？他不是一个坦诚的人，也从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明确表明自己的动因，但他得到最后通牒的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似乎暴露了他的想法，当时他就激动地表示：“这将是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俄国必须对别国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做出回击。他对于最后通牒所给出的回应与他此前的言论完全一致。萨佐诺夫从不承认奥匈帝国有权对塞尔维亚进行领土收复主义的制裁。相反，他赞同巴尔干领土收复主义，并认为塞尔维亚才是继承奥匈帝国君主制的正确人选，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才应当成为

正统。他似乎并没有看到俄国专制下的民族压迫其实正与他自己的理论相悖。

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这一点是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他将对针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做出军事上的反击。早在7月18日，那时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还未揭示，萨佐诺夫就已经告诉乔治·布坎南，“对于任何奥匈帝国针对贝尔格莱德提出的类似最后通牒等形式的要求，俄国都不会坐视不管，可能将会被迫采取适当的军事措施加以回击”。萨佐诺夫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面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因为在1912年11月巴尔干危机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也同科科夫佐夫一样反对所谓的局部动员，正如科科夫佐夫所说的：“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动员就是一次动员，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而准备的。”

当然，1914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风险变得更大，而且随着科科夫佐夫的退休，政界的情绪也变得难以控制。但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区别：1912年11月，萨佐诺夫曾给自己的支持加上了一个前提，即“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战，我们也应该首先争得我们的同盟国家的理解”。至于这个理解，至少是对法国来说，在1914年夏的此时此刻是毫无疑问的。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非只是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费尽心思所阐述的，目前的这一危机也是自巴尔干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情况。俄国驻巴黎的一名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就曾在7月30日满怀喜悦地报告，在与法国国防部高层有过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在法国看来，此次俄法两国的战略合作将有很好的前景”。比利时驻法国的大使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法国高层普遍看好战争。”他在7月30日这样写道：“他们渴望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机非常合适，而且也是时候让一切做个了结了。”

帕莱奥洛格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曲解了法国的意图，并且未经巴黎政府的授权就对圣彼得堡方面做出种种承诺；他也并没有误导巴黎政府对俄国的动员行动展开错误的反应，以至于最终无法抑制俄国的动作。相反，他在俄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期间，一直在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警示。一封发于7月24日晚上6点30分的电报里确认了关于“通过军事手段争取和平”以稳固联盟关系的必要性，当晚11点的另一份电报提到了俄国“将在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毫无疑问地有责任”采取的种种措施。之后，次日凌晨4点45分的一份被标明了“紧急”和“机密”的电报中指出，大臣会议在那天已经“原则上”同意了针对“13支对奥匈帝国展开反击的部队”的军事动员。最后有这么几句关键的话：

> 只有在奥匈帝国尝试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军事动员才立刻公开执行。但是，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秘密的准备。

维维亚尼事后才知道这一切，并强烈谴责了帕莱奥洛格的越级行为，但即便维维亚尼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普恩加莱也正希望如此），如果帕莱奥洛格的笔记还不足以描述，那么来自法国军事大使随员拉齐什（Laguiche）将军的类似的大量报道则可以进行弥补。比如，他于7月26日称，“秘密的军事部署”已经在华沙、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展开，所有地区都与德国毗邻。然而法国外交部则没有表态。尽管普恩加莱之后篡改了他参与这场危机的关键细节，他同样也没有呼吁对此进行遏制，甚至向帕莱奥洛格抵赖，不承认他曾在圣彼得堡极力鼓吹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萨佐诺夫曾几何时也相信危机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奥地利人的动作曾在7月25日收到最后通牒的回复之后有过片刻的停滞，他们是希望或许能在最后一刻收到贝尔格莱德反悔的决定。萨佐诺夫将此误以为是维也纳政府在寻求一种冷处理以及谈判的方式。“直到最后一刻，”他在7月26日告诉法国大使，“我将为谈判一直做好准备。”当他召来绍帕里并听取其“坦诚和忠实的解释”时，他的这些想法也展露无遗。在读过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后，萨佐诺夫坚持认为这篇文件充满了“让人难以接受的、荒谬的、带有侮辱性的”词句，并表示：“收回你们的最后通牒，修改你们的措辞，我保证你们将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此“谈判”之下，很难有进一步的进展。不管怎么说，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短暂的迟疑，并非是对自己的要求的合理性有所疑虑，而是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能就此屈服。俄国战前动员的消息让这些希望烟消云散了。没有人比斯帕拉伊科维奇看到登上火车的哥萨克骑兵部队而更激动了，他见证了塞尔维亚民族在最后时刻为了统一与自由所做的斗争。加之沙皇敦促塞尔维亚人要“像狮子一样”去战斗，贝尔格莱德政府似乎不会对最后通牒有所屈服了。而且，在此期间，萨佐诺夫曾特别指示贝尔格莱德政府不要接受英国在其中的调解。

即便他们就这样放任危机不断升级，俄国人也必须保有必要的谨慎。不管俄国的行动是否有必要，法国都从始至终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做出的任何干预行为。但安抚法国与英国的舆论并且尽量不激怒德国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自1912年11月开始，对于俄国的军事动员一直存在一种设想，即即便军队都已集结完毕，“如果没有受到敌方的攻击，依然是能避免战争爆发的”。在军事动员的初期，“巧妙的外交周旋”将使“敌人放松对于威胁的警惕性”。就在俄国的军事动员令发出后，帕莱奥洛格于7月25日与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向巴黎政府报告称，俄国将只针对奥匈帝国开战，并将避免其他挑衅行为，“以此让德国不至于加入战争”。对于俄国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和英国的舆论把奥匈帝国而非俄国视为战争的发起者。萨佐诺夫在7月24日这样告诉帕莱奥洛格：“我们必须让奥匈帝国完全陷入不义之战的境地。”这种必须让对手被视为战争发起者的想法，将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天里在各种关键决定中产生影响。

这些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塞尔维亚吗？俄国真的为了保护其远方的友好国家的主权而不惜冒战争的风险？我们不难看出，塞尔维亚当时在俄国眼里变得越发重要，部分原因是索非亚地区的异化，部分原因是与

保加利亚相比，塞尔维亚更能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产生影响。对塞尔维亚的同情情绪在俄国的泛斯拉夫人群和民族主义者中非常强烈，这也让政府借此与国内的中产阶级达成了良好的沟通。同时，奥匈帝国要求塞尔维亚人从阿尔巴尼亚北部撤军，这与俄国曾经于1913年10月将这一地区交给贝尔格莱德政府控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与俄国的邻国、拥有部分黑海沿岸地区控制权的保加利亚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本身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没有任何威胁。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俄国领导层对土耳其海峡未来发展日渐强烈的焦虑情绪，或许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俄国对此的回应是如此强硬了。俄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海军司令部）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在追求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同样，我们也看到保加利亚是如何浩浩荡荡逼近君士坦丁堡，巴尔干战争期间粮食出口的中断，以及利曼事件是如何让这一事件列入1912～1914年的重要议事日程的。1914年夏，俄国进一步深化了对土耳其海峡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之间后来针对爱琴海群岛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开展了海军军备竞赛，为了保持领先优势，奥斯曼海军从英国购买了两艘无畏级战舰，第一艘将于1914年7月抵达。

这一地区性的争端特别让俄国人为之担忧。首先，如果地区矛盾进一步升级，海峡的不平静将使俄国在此地区的商船活动受到巨大影响。其次，一些小国（希腊或保加利亚）可能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里夺走俄国也想夺取的部分。再次，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使英国海军也掺和进来，而俄国人一直极力压制英国海军的规模。最后，其中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奥斯曼帝国将有无畏级战舰进入黑海，而俄国并没有这种级别的战舰。俄国海军司令在1914年1月时警告，奥斯曼帝国无畏舰的到来将制造出一种“毁灭性的，近乎是6倍强于”俄国黑海舰队的军事力量。“对黑海控制权的丧失，将给我们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显而易见。”萨佐诺夫于1914年5月告诉俄国驻伦敦大使，“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坐视奥斯曼海军力量持续快速地扩张。”直到1914年7月底，萨佐诺夫仍在向英国提请收回向奥斯曼帝国出售的无畏级战舰。

以上这些问题在“七月危机”中对俄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于正式文件都侧重于对奥塞冲突的关注，俄国之所以做出这些决定，有可能主要还是为了团结斯拉夫的“小伙伴们”，并借此在巴尔干地区获得合法的控制权。萨佐诺夫已经有了足够的前车之鉴，他深知不可能与其盟友共同管理海峡。然而，由于让海军尤为着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有为军队参谋长共享，事件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另外，海峡问题对克里沃舍因来说也非常重要。作为农业大臣，他很清楚这一地区在俄国农作物出口方面的巨大商业效益。巴尔干近期的不稳定局面正通过海峡问题点燃巴尔干战场的导火线，因此，人们逐渐将巴尔干半岛视为海峡的关键战略后方。同时，俄国如果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控制权，也将防止博斯普鲁斯地区受到更多的侵扰。对于海峡地区的利益谋划因此也在俄国针对塞尔维亚的问题上产生了影响。

不管这些因素孰轻孰重，俄国已经走上发起战争的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其他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1914年8月前几日爆发的战争变得几乎（虽然并非不能）不可避免了。这也正是为什么1914年7月24～25日结束了圣彼得堡的会谈之后，负责军事动员的俄军长官多波罗斯基（Dobrorolsky）将军在1921年回忆称：“战争已经在所难免，俄国与德国之间频繁往来的电报都在促成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7月的决定性的第四个星期里，俄国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友还在继续探讨和平的政策。用沙皇的话来说，普恩加莱、萨佐诺夫、帕莱奥洛格等人所坚持的“毫不让步”的政策是“以武力的手段确保和平”。

这种婉转的说法对俄国和法国乃至英国的侵略性都有所掩盖，我们在一些内部文件和私人信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说法。很有意思的是，在德国的一些文件里，反倒经常性地将战争视为一种必要的手段。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所说的维护和平的手段，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质上和德国所说的并无不同。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在表述上会有所区别，但或许我们从中就能看出德国当时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望。这可能正反映出克劳塞维茨对德国的政治语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始终认为战争是必要手段，而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也将最终服务于政治；相比之下，俄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言语中所反映的则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可以选择的手段。不管怎样，两者的想法都没能阻止他们于1914年7月将欧洲卷入战火。

第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笼罩在欧洲的奇怪光影

在1914年7月的危机酝酿期间，英国决策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9个县上。1914年5月21日，一项关于爱尔兰自治的规定被下议院在第三次审议时通过，但遭到上议院的反对。为了争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决定利用议会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开上议院直接通过该项决议。爱尔兰地区风雨欲来。或许有解决的办法能让双方——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工会——都满意，但他们还是开始了争斗。同年春天，爱尔兰地区即将爆发内战。这一问题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初期北爱尔兰地区政局最为不稳定的因素。

阿尔斯特地区的问题对英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一问题触及了英国政治体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方面面。保守党激烈地反对自治。英国军队则深受工会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实际上，如果地方自治被强制要求执行，这些军队恐怕都难保忠诚。在1914年3月20日的卡拉事件中，57名驻扎在基尔代尔郡的卡拉营地的英国军官宁愿辞职，也不愿加入自治的行列与工会势力相抗衡。



赫伯特·阿斯奎斯

在领导层中暗中支持工会的抵抗行动的是指挥官亨利·威尔逊，他曾为英国的领土政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威尔逊越来越明显地对“醉鬼”（他是这样称呼阿斯奎斯的）和其“肮脏的内阁”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以地方自治问题来要挟这位首相满足工会的相关需求。1914年6月29日，威尔逊和他的同僚在内阁会议上提交给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他们指出，如果要想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应当把英国远征部队整个安置在爱尔兰。换句话来说，如果英国政府希望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那就意味着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在欧洲大陆部署军力的打算；相反，如果对欧洲大陆部署兵力，就意味着放纵地方自治势力的滋长。或许在整个欧洲，除了奥匈帝国之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英国这样，由军官势力影响政治决策。

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英国还在为阿尔斯特地区的争端而苦恼。首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他与年轻貌美的社交名媛维尼夏·斯坦利无话不谈，包括其日常事务。从他们的某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奥匈帝国皇

族”于6月28日惨死令首相极为震惊，让他不再只是一门心思放在“阿尔斯特所发生的那些琐事”上。直到7月24日，阿斯奎斯都没有再提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一直汇报从阿尔斯特地区传来的种种负面消息。直到首相经历了漫长的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讨论研究之后，才注意到奥匈帝国刚刚“向塞尔维亚送去了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最后通牒”：

> 我们确定距离一场真正的末世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且这场战争真正的规模足以震惊阿尔斯特和那些民族主义的拥趸。庆幸的是，我们似乎可以不被牵涉其中。

这封信是以“光明陷落”这样让人诧异的字眼开始的，但阿斯奎斯指的是维尼夏是在早上离开伦敦回到她的家乡安格尔西郡，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危在旦夕。

对爱德华·格雷来说，这些天也是很难熬的：他的视力在下降，在球场上他已经难以准确接到飞来的壁球，也难以用肉眼直接辨认出天上的星星。他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乡下，更有传闻说他准备去找一名很有名气的德国眼科医生治疗。但不管怎么说，与阿斯奎斯不同的是，格雷立刻就察觉到了在欧洲东南部酝酿着的危机。

7月，在他与一些大国的驻英大使会谈时，格雷像往常一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7月8日，他警示保罗·康邦，如果奥匈帝国皇帝不顾国内的舆论，一意孤行要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那么法国和英国就需要尽其所能地防止俄国也加入战争。对此，康邦表示“强烈支持”。当天，格雷还提醒俄国大使，德国对于近期的英俄海军会谈非常警惕，而且俄国能否让德国不怀疑自己面临一场政变，将是至关重要的。7月9日，格雷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法、俄之间绝没有达成任何秘密协定或结成固定的盟友关系。但他也补充说，英国现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已经度过了“蜜月期”，而利赫诺夫斯基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没有挑衅的态度”，自1906年开始，这些国家的陆军、海军元帅就已经开始了某种“谈话”。

这位外交大臣很礼貌地与奥匈帝国大使会谈，但对事情的定性不置可否。当门思多夫伯爵在7月17日向他抱怨贝尔格莱德媒体的不当言论时，格雷回应称，这些塞尔维亚的报纸似乎从来就没有言论得体过。门思多夫承认或许是这样的，但继续表示，奥匈帝国不会再允许出现如此不负责任和挑衅的言行。“爱德华·格雷爵士承认这一点。”门思多夫在报告中指出，“但对此事再无进一步的讨论进展。”在当晚9点收到了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后，格雷于7月24日再次会见了门思多夫，也是在那个时刻，他将最后通牒形容为他所见过的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文件。而也是在当时，这位外交大臣表示，奥匈帝国提出的一些关于塞尔维亚部门改革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就在同一天，在经过内阁的批准后，他建议4个不在事件中心的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

德国——应该干预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

以上这一切信息都没有表现出格雷有想要掺和进冲突之中的想法。他经常强调民意（在这里，他更多的是指公开的舆论意见）是英国政府做出决定的最高参考，而且在此方面不会有其他干预。几乎所有的大型媒体都对英国加入欧洲战争不看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文表示，基于“联盟条约”的保护，英国不用担心被卷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并宣称，曼彻斯特一点儿也不在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就如同贝尔格莱德毫不在乎曼彻斯特一样。7月29日，对英国可能将“为了实现俄国在斯拉夫地区的霸权统治”而做出牺牲，《每日新闻》（*Daily News*）表示了极大的抵制。8月1日，一个名为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的自由撰稿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一定不能开战”的文章。文章主要有两个中心思想：一是英国与德国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二是如果英国遏止了德国，将从侧面让俄国建立“从欧洲到亚洲”的霸权。除了代表自由党人的媒体之外，保守党的大部分媒体也纷纷表示应当冷处理。例如《约克夏邮报》（*Yorkshire Post*）就刊文指出，不论是奥德同盟胜利还是法俄同盟胜利，对英国来说都毫无区别，因此“英国完全没有理由加入这一争端”。《剑桥每日新闻》（*Cambridge Daily News*）于7月28日认为，英国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兴趣寡淡。《牛津编年史》（*Oxford Chronicle*）也于7月31日称，政府的责任是将争端局部化，并明哲保身。只有《泰晤士报》一直以来都在主张英国应该出兵干预：尽管威克姆·斯蒂德于7月17日对奥匈帝国表示强烈的同情，但该报从7月22日起就卷入了这场大陆冲突，并于7月27日、29日和31日公然支持英国的介入。其中尤以喜好自我炒作的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为首，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英国佬》的7月第1期上这样写道：“我们一直视塞尔维亚为邪恶势力滋生的温床，”并要求“必须消灭塞尔维亚”，但相反的，英国民众也应该要求英国政府“利用这一危机为契机”去“消除”德国舰队对英国的威胁。塞尔维亚驻英国大使博斯科维奇在看到《英国佬》的文章后大为震惊，他甚至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正式文件，要求起诉这种对塞尔维亚的“恶意中伤”。

至少直到8月初，还没有公众舆论要求英国政府对此次危机进行干预。而且内阁似乎也并不打算这么做，大部分高官也都赞成不干预政策。正是同一拨人煽动内阁，使得后者于1911年11月将矛头对准了格雷的政策。这是格雷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的外交政策连他自己政党里的一大部分人都反对。一直以来他都能对保守党在国会上的支持抱以期望，但在1914年夏天，随着反对地区自治制度情绪的高涨，这一支持也显得岌岌可危。面对种种压力，此刻他只能依赖于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三位同僚了。

直到7月24日的内阁会议后，在经过了对阿尔斯特边界问题的长时间讨论之后，他才将欧洲正在酝酿的危机提上讨论日程，并指出4个位于事件边缘的大国应该出面协调两个当事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英国内阁第一次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讨论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后来，丘吉尔用一段颇有文艺气息的话引起了内阁对于格雷的观点的关注：“弗马纳

和蒂龙的土地消失在薄雾之中，来自爱尔兰的狂风和奇怪的光影开始肆虐并笼罩在欧洲的版图上。”内阁在那个周末终于做出决定，通过了格雷所提出的4个国家对俄国和奥匈帝国关系进行调解的方案。

7月第4个星期的周末，格雷开始进一步向政府施压，要求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将出手调解。7月27日（周一），他询问内阁，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攻击，英国政府是否会出面进行调解。格雷的老对手莫利、西蒙、伯恩斯、比彻姆和哈考特纷纷威胁表示，如果政府进行调解，自己将立刻辞职。在7月29~30日进行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在经过了长久的讨论之后依然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格雷要求政府承诺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法国提供支援。对此只有4位内阁成员表示支持（其中包括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一提议，其他人全都表示反对。

甚至就连在比利时的问题上也不太容易让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将会违背1839年规定比利时为中立国的国际公约，穿过比利时入侵法国。但英国内阁对此的看法是，即便英国也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但维护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凭什么单独要求英国要为此而出力呢？同时英国表示，即便问题真的出现，英国回应的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事实上，英国的军事高官和政界领袖们普遍不相信德国会跨过中立的比利时直捣法国。在1911年英法对话的基础上，亨利·威尔逊所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会选择经由阿登山区穿过比利时南部这一路线，范围在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以南。这一结论也被呈递到了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第114次会议上。针对相同的情况，内阁在7月29日也做了讨论，劳合·乔治在讨论中通过地图展示了之所以德国军队“只会选择比利时最南端的角落通过”的原因。英军的战略要点主要集中在安特卫普和斯海尔德河，这两个地方都被视为是事关英国安全的门户要道。“我不明白。”丘吉尔表示：“如果德国真的只是擦边经过比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掺和进去。”劳合·乔治后来声称，如果德国只是经过阿登山区而进入比利时，他将拒绝加入战争。英国的决策者们认为，比利时人不管怎样都不会以南部地区作为最后的防线，而是会在进行一定的抵抗之后退守北部，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从中调解争端的可能了。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就推断格雷和他的同僚们将放弃对协约国的长期承诺。相反，格雷几乎完全是从协约国的身上看到了欧洲正在逐渐酝酿的危机。在法国面临危难时，英国政府可能袖手旁观，这让格雷感到格外焦虑。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他的同僚们对贝尔格莱德实行的冒险主义政策，并且对新征服地区人民所遭受的屠杀和痛苦感同身受。毫无疑问，他也充分了解到了此次塞尔维亚对于奥匈帝国皇储延续方面所产生的威胁。他认为任何大国都不应“被拖入一场由塞尔维亚发起的战争当中”，然而他也无意对奥匈帝国所提出的最后通牒事件进行调解。7月24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四国调解机制夭折了。这里面所涉及的四国当中（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只有一个国家可能会去捍卫奥匈帝国的权益。最终，最直接地对塞尔维亚民族统一进行资助的列强，并没有卷入或受限于达成一致的决定。虽然自1913年在伦敦成功举办大使会议

后，格雷对自己调和国际局势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与当时各国间针对阿尔巴尼亚边境问题的争端相比，这次的大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完全不同的事了。

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格雷经常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作整个协约国需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应了俄国的政策。格雷确实曾在发言中表达过“安抚”俄国的重要性，他也确实要求圣彼得堡政府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但他表现得对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公布之后，在俄国究竟引起了怎样的风波，完全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毫不在意。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他的错，因为俄国一直以来都在故意向乔治·布坎南隐瞒其“秘密准备”的进度，而是于7月26日告诉他，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已经开展的“防卫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应对国内罢工的浪潮。布坎南并没有完全相信：在他于7月26日写给格雷的一份简报中，他报告称，鉴于罢工已经“基本结束了”，他所看到的种种行为一定“毫无疑问”与“军事动员的企图”密切相关。但格雷对此不以为意，而布坎南方面也并没有跟进这些线索，伦敦政府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7月26日，也就是在布坎南递交了报告之后，格雷已经面见了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伯爵也带来一份紧急电报，报告称俄国似乎正在准备“一定程度上的储备工作”，也就意味着俄国开始了军事动员。格雷回应称，英国政府“没有得到关于总动员的消息”。但之后他补充道：

> 不管怎么说，在奥匈帝国也开始在军事上有所动作时，我们很难劝说俄国停止军事动员；我们不该这么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主要所应该做的是防止军事行动的真正实施。

这是对于当时情况的一种奇特的反应，至少可以说，它忽略了奥匈帝国与俄国军事动员的差别，即奥匈帝国的举措完全是针对塞尔维亚的，而俄国则是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由于1913年3月2日的规章适用于几乎所有俄国西部的军事地区，并且动员的范围已经扩展至波罗的海舰队。在那个军事攻击的速度是胜败关键的时代，格雷的此番回应也暴露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无知。最后，如果格雷曾经把心思放在解决本国国内的民族纠纷上，或许他也能花更多心思去审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深层矛盾，并防止俄国从中作梗，引起边境冲突。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在7月8日他与贝肯多夫的会见上，格雷最终还是默许了俄国的观点，即“塞尔维亚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

格雷大概了解法国领导人访问俄国时发生了些什么。在7月24日的一份报告中，布坎南指出，法俄之间的会晤透露出在“欧洲总体的和平与局势均衡”方面，俄国和法国所达成的“完美的共识”，为此这两个国家已经能够做出“出于它们联盟关系义务之下的庄严承诺”；萨佐诺夫也曾要求布坎南转告格雷，俄国希望英国也能“宣布和法国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在艾尔·克劳对该报道的评论中，他的言辞较格雷的更为犀利，但

是其内在逻辑却与这位外交大臣的如出一辙：

>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法国和俄国都会认为这些只是托词，三国同盟针对三国协约的动机已经很明显了。我认为英国试图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任何场合驳斥或是掩盖这一观点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更不用提这样做的危险性……我们在这场争端中的利益与法国和俄国息息相关，这场争端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而是在欧洲进行独裁的德国和那些争取个人自由的国家之间的较量。

格雷向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国没有任何义务与那些协约国合作。但他在7月29日也告诫这位德国大使（未经内阁正式授权），如果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可能会采取必要的冒险举措。当贝特曼·霍尔维格7月30日联络伦敦政府称，只要英国同意保持中立，德国就将放弃此前吞并的法国领土，格雷发电报给戈申表示，这个提议“暂时难以接受”。

格雷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协约国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于此次危机的看法。实际上，这是最开始巴尔干局面的新循环，它成为法俄联盟的生动逻辑，同时也体现在格雷于1912年12月初向德国大使提出的警告中（见第五章）。在巴尔干地区将会出现争端（这无关于谁先挑起的），俄国将加入，并让德国也卷进来，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站到其盟友一边，英国则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法国被德国消灭。这正是格雷在1914年所执行的政策思路，尽管有着暂时的质疑和推诿。他没有权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实际上他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并非是因为他觉得塞尔维亚是无辜的，而是因为他和法国、俄国一样，认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成为再次激活这个同盟的“借口”。

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接受，或者起码不反对俄国通过进攻奥匈帝国来解决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以及在此过程中法国不可必要的对俄国进行支援的行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争端的具体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一旦俄国（和法国）加入，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这样来看，德国也在其中占有巨大的分量，因为其对奥匈帝国的支援必将导致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进而引发欧陆战争。

普恩加莱回到巴黎

就在格雷在7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他的四国调解机制时，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正在俄国鱼雷舰的护送下，乘坐“法国”号舰船穿过芬兰湾。当他们于次日到达瑞典后，普恩加莱通过加密线路使用电报，以确保只有他和（名义上）维维亚尼对政策改变有所掌握。他指示总理向法

国媒体发表声明，通告称维维亚尼已经与各方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恢复了各项事务的正常运转。普恩加莱的笔记中曾写道：“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安弗尼–马坦（Bienvenu-Martin）（缺乏经验的法国代理外长）已经没有了实权。”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一直通过“法国”号上的无线电台接收关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危机发展的各种细微的进展。随着对局势更为全面的掌控和了解，普恩加莱也更加坚持他在圣彼得堡期间所陈述的观点：奥匈帝国的所作所为是不合法的，维也纳政府的要求“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确实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维护和平的责任不再由俄国担负了，其军事准备行动已经在法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全面开始，现在关键要看德国的了，它必须让奥匈帝国盟友们冷静下来。如果德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普恩加莱在7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将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错误的境地，并将为奥匈帝国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



尼古拉二世和普恩加莱

普恩加莱对他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的看法十分积极，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他面对新闻时的反应。萨佐诺夫要求塞尔维亚面对奥匈帝国的边境进犯勿做抵抗，而是向国境内转移兵力，他会向国际社会抗议入侵行为，并呼吁多方制裁，这一消息传到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普恩加莱耳中时，他也颇为关注。萨佐诺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样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塞尔维亚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让奥匈帝国军队尽可能地进入到俄国B计划的包围圈，并减少俄国在加利西亚地区可能遭到的抵抗。普恩加莱误会了这一目的，他以为萨佐诺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并打算把俄国所应尽的职责全权交给巴尔干地区。“我们确实不能做到比俄国更‘勇敢’了。”他这样写道，“塞尔维亚已经为此受尽了一切羞辱”。这简直是，或者说看起来像一切都回到了1912~1913年冬天，当时法国决策者们要求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奥匈帝国。同时，在巴黎的俄国军事随员对法国军方的好战言论十分费解。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俄国的相关政策已经得到了通过，普恩加莱没有理由担心萨佐诺夫会再次迟疑。

鉴于当时中欧危机持续升级，普恩加莱却依然没有取消在回国路上

顺道访问瑞典的行程，这让人觉得很诧异。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短暂停留有时也被视作法国领导人对危机局面被动处理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普恩加莱有意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他又为什么和维维亚尼在回国的途中在瑞典逗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瑞典的访问绝非简单的游览，而是考虑到瑞典在圣彼得堡所陈述的联盟战略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普恩加莱曾和沙皇讨论了关于在战争来临时，确保瑞典保持中立的必要性。瑞典与俄国的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在斯德哥尔摩开展的间谍行动以及可能对两国边界或波罗的海地区所做出的挑衅行为。在他们于圣彼得堡会面的最后一天，尼古拉斯二世要求普恩加莱亲自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转达他对俄国与瑞典间和平的意愿。普恩加莱将告诉瑞典国王，沙皇对波罗的海的邻国绝对没有冒犯的意图，并且至今对间谍活动毫不知情，并会严令禁止一切此类行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瑞典决不能与德国成为伙伴，组成战略合作关系。7月25日，在与古斯塔夫五世进行了一下午的会见后，普恩加莱成功地转达了这些内容，并得到了瑞典国王欣然接受了沙皇所希望的瑞典保持中立局面的回报。

当然，在欧洲危机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不得不待在瑞典的酒桌旁，确实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尤其是对焦急的维维亚尼来说。但法国的公众舆论依然很冷静——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卡约一案的审判上，直到7月28日卡约夫人出人意料地被无罪释放才结束。普恩加莱自己也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打乱行程提前回国，反倒会引起法国乃至欧洲的不安。此外他可能会“给人以法国可能也被卷入了争端的印象”。但当法国政府在7月27日得知德皇已经提前结束了波罗的海的行程返回柏林的消息时，普恩加莱也被国内一封接一封的紧急电文召回巴黎，再没有时间继续原本安排的丹麦与挪威的行程，毕竟这两国的行程安排从战略上考虑也没那么急迫。就此，“法国”号舰船直接返回敦刻尔克。

它们几乎没有改变航线，但“法国”号和其护送舰艇在穿越基尔外围的梅克伦堡湾时，与一艘德国的战列巡洋舰相遇了。德国战舰为此给予特别礼遇，甲板上所有士兵鸣枪致礼，法国的护送舰艇也给予了回礼，法国号作为一艘搭载国家领导人的舰艇，没有回应此礼节。几分钟后，法国号的电报接收台截获了一份从德国舰艇上发出的加密电文，大概内容是警示柏林方面，法国总统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发现他们在国际形势上有着越来越巨大的分歧。普恩加莱注意到，这位总理看起来“越来越忧虑且困惑”，而且忙于通过一些“极其矛盾的设想”。7月27日的一封电报表示爱德华·格雷已确定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普恩加莱“将这种坚定不移的例子展示给维维亚尼”，想借此让他振作起来。当天，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就像当初在圣彼得堡的时候那样，向维维亚尼阐释“软弱就意味着迟早要崩溃”，而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坚持一如既往的毫不让步的态度”。但维维亚尼依然“紧张、激动，不断地自言自语，表达自己对当前外交政策前景的忧虑”。皮埃尔·德马尔热里也对维维亚尼所表现出的“神智不稳定的状况”而感到不安。让普恩加莱感到惊愕的是，总理似乎对任

何事的观点都无法保持一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政党大会和政治联盟。

其实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受到了压力。尤其令人苦恼的是7月27日爱德华·格雷发来的令人迷茫或者说是不知所云的电文。在警告了奥匈帝国大使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之后，格雷又警告法国大使保罗·康邦，英国的公众舆论不会支持英国加入针对塞尔维亚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当中。但总的来说，维维亚尼惧怕的是走向战争的局面，普恩加莱惧怕的是在交战时不能战胜奥匈帝国。

> 如果奥匈帝国试图进一步扩大其胜利（普恩加莱的“胜利”指的是贝尔格莱德可能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如果它向其宣战或是进入贝尔格莱德，那么整个欧洲会允许它这样做吗？欧洲仅仅会干预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态以防止其升级吗？这意味着站在奥匈帝国的一边，公然针对塞尔维亚。我向维维亚尼阐述了所有这些反抗的声音。

7月28日，当他们进入北海并靠近法国海岸时，普恩加莱提前通知敦刻尔克取消接待：总理专列已经准备就绪，一行人将直接从港口前往巴黎。北海上空乌云密布、遮天蔽日，海面波涛汹涌，并伴着细雨。从最新收到的电报消息来看，英国支持大国之间的“集体行动方针”，以化解危机，这对法国总统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奥匈帝国退缩的情况下，俄国才会退缩了。最后，从巴黎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在对德国大使冯·舍恩（他坚称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问题是仅限于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做出回应时，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宣布，除非德国制止奥匈帝国，否则法国也不会对俄国做出干预。普恩加莱对此大为赞赏，并指示德马尔热里让普恩加莱向巴黎发电报，表扬代理外长的这一回应。这件事其实也映射出1914年7月底法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关系链。

就在他回到法国时，普恩加莱已经打定了主意——虽然德国还没有表现出要采取军事反击措施的迹象——一场欧陆战争已经无法再避免了。他欣慰地看到部长们的情绪依然镇定而坚决，而且他们的态度也比怯懦的维维亚尼更加坚定。普恩加莱已经发电报给比安弗尼·马坦，指使他与在国防部、海军署、内政部和财政部的同僚们取得联系，以确保在关键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令他感到欣喜的是，所有有关部门的相关活动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交部副秘书长艾贝尔·法瑞（Abel　Ferry）和此前前往敦刻尔克参加总统欢迎仪式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勒内·雷努尔（René　Renoult）告知普恩加莱，休假中的士兵都已经被召回，在外训练的军队也已返回自己驻扎的营地，各处均已进入警戒状态，各地相关公务员也已经被命令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各项支援物资的就位；“总之，目前已经做到的就是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以立即出兵。”在从敦刻尔克返回巴黎的火车上，雷诺特问普恩加莱是否还有可

能通过政治手段缓解各国之间的矛盾，普恩加莱回答道：“不，不可能和平解决了。我也不可能再做出类似的安排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有普恩加莱在日记中所描述的当天欢迎他回归巴黎的那些人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放在了战争上：

> 我们立刻发现，人们的士气非常高涨，特别是码头的那些装卸工人和水手们。大量群众聚集在这里，他们高呼，‘法国万岁！’“普恩加莱万岁！’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并与市长和议员们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告诉我，在这种时刻，国家上下必将团结一心，同仇敌忾。

俄国政府也早已实施了影响巨大的战前动员措施。巴黎方面也从帕莱奥洛格7月25日发来的简报和之后不久驻圣彼得堡的参赞拉齐什将军的报告里得知了这些消息。7月29日早上伊兹沃斯基大使又带来消息，称俄国打算在同一天对奥匈帝国展开局部动员。我们现在很难再找到当时普恩加莱是如何回应此事的了，因为他后来（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时）删掉了7月29日信件的一半内容，而这几页正是与对俄政策有关的。此外，当天的部长级理事会所讨论的内容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根据约瑟夫·卡约的一份记录所表示，部长级理事会明确对俄国的措施表示认同。26～27日以及29日，巴黎政府也没有做出遏制同盟国所作所为的举动。

所有这一切都与各国在巴尔干战争之后达成的协定相符，也符合法国的战略设想，这也让俄国的军事动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但在这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英国的干预。7月底，英国政府对于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机下加入即将到来的欧陆战争仍然悬而未决。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法国与俄国显露出是侵略战争的姿态，英国作为历来“不打不义之仗”的国家，不会对它们提供支援。然而，法国在与德国西部地区接壤的防线上又需要俄国尽快做出军事上的行动。这听起来就像这样一个熟悉的悖论：一场在西部的防卫战需要从东部的侵略战开始打起。这种矛盾给巴黎的领导人也带来了很大压力。7月29日晚上，当德国宣布如果俄国不停止军事动员，德国也将开始出兵时，这种压力变得尤其巨大。

7月30日凌晨时分，伊兹沃斯基在俄国驻巴黎大使馆收到了一封来自萨佐诺夫的电报，警告他关于德国的这一通告。既然俄国不会退缩，萨佐诺夫写道，看来他们有意“加速我们防御措施的执行，并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出准备”。萨佐诺夫指示伊兹沃斯基感谢法国政府曾说过的“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国视为可靠的盟友”的这种承诺。既然俄国已经建议法国像此前计划的那样开始一个局部动员（仅针对奥匈帝国），由此也可看出萨佐诺夫的“加速进程”实际意味着俄国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而这一举措事实上将导致几乎不可避免的欧陆战争。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在巴黎引发骚动。伊兹沃斯基派秘书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前往外交部，同时

自己与维维亚尼会面，向他展示萨佐诺夫的电报。之后不久，7月30日早上4点，维维亚尼与陆军部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和普恩加莱在爱丽舍宫就电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他们拟定了一个措辞谨慎的回应，并在当天一早发出。

> 法国决心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但是，考虑到维护和平方面的问题以及尚没有做出站队的那些小国，我相信最可取的一种形式是，在俄国做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和防卫工作的同时，也不至于惊动德国，使它全面或局部出兵。

这一回复后来也常常被视为法国政府当时愿意为了和平而可以无视法俄同盟的表现。当然在维维亚尼看来就是如此：在当天晚上与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一次会谈中，他抱怨俄国对法国完全是“先斩后奏”。但这一回复的目的其实比它看上去的更为复杂。它实际上是要告诉英国，法国正在努力遏制俄国的动作——也正因为此，该回复的内容也同时被抄送发往了身在伦敦的保罗·康邦。之所以说这份文件与英法关系也紧密相连，是因为在普恩加莱的日记里记载着，发往圣彼得堡的消息是“考虑到英国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撰写的。然而与此同时，德马尔热里和梅西米奉普恩加莱之命——显然维维亚尼对此不知情——向伊兹沃斯基表明法国政府真正的意愿。在伊兹沃斯基后来的报告中，法国的真实态度与此前所发出的回复消息大相径庭：

> 刚刚我与德马尔热里聊了聊，他告诉我法国并没有打算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做出干预，但他相信考虑到和平问题，这些军备行动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于公开或带有挑衅意味。法国国防部长也向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俄国驻巴黎外交官）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我们可以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愿意为了和平起见而暂时放缓我们的军事动员措施，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真的放缓我们的军备行动，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大军事动员的力度。

这两封电报都发自7月30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在法俄同盟和英法同盟的框架下，在三国的微妙关系当中是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的。口口声声表示自己“考虑到要维护和平问题”，实际上是让对手放慢脚步——虽然看来并不会达到这种效果。与此同时，俄国的战备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阿贝尔·费瑞在7月30日早上于外交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期间，在笔记中这样总结了法国的政策：“不制止俄国的军事动员。进行军事动员，但并不花太大精力在这上面。”在普恩加莱记载发给圣彼得堡回复内容的同一天，他这样写道：“与此同时，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组织起我们在东部的武装力量。”

俄国的军事动员

7月29日傍晚，俄军总参谋长将全面军事动员的会签文件发给塞尔盖·多波罗斯基将军。作为动员的指挥官，多波罗斯基的任务是得到高官们的会签，否则命令就不能被视作生效。将军后来回忆起他与国防部部长、海军上将和内政大臣会见并索要他们的签字时的情形。当时的气氛非常沉闷，就连曾以脾气暴躁著称的苏霍姆利诺夫最近也变得格外安静了。或许，多波罗斯基为自己烧掉了几个月前所写的关于俄国《准备好开战了》的文章感到后悔。海军上将格里戈洛维奇在看到总参谋部部长的会签文件后很震惊："什么？与德国开战？我们的舰队恐怕难以与德国的舰队相抗衡啊。"之后他给苏霍姆利诺夫打电话，对此消息进行了证实，然后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签字了。多波罗斯基在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办公室里则感受到了"教堂里一样的气氛"：在柔和的灯光下，狭窄的桌子上摆满了巨大的神像。"在俄国，"部长说道，"国内的广大民众永远不会支持战争。比起战胜德国，革命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但人终归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马克拉科夫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然后也在会签文件上签了字。

大约晚上9点，在得到了所有会签之后，多波罗斯基辗转来到圣彼得堡的中央电报局，而电报局局长早已接到命令，准备为他发出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文件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打出多份副本，这样一来就能从圣彼得堡同时发往俄国的各个主要电报中转站，之后就将传送到各个区的所有乡镇里。为了确保这份文件能被送达，电报局甚至暂时关闭了所有其他电报的流量通道。晚上9点半，就在电报要开始发送时，电话响了：是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命令多波罗斯基暂时不要发出电报，而是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之后一个信使带着参谋官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的命令来了。沙皇改变了主意。局部动员的命令将取代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以顺应7月24～25日的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新的命令已经起草完成，并在29日当晚午夜时分发出，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和喀山地区就此进入了军事动员状态。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法国驻俄使馆感到哗然。法国外交官拉齐什将军在10点过后就被告知了军事动员的消息，但俄国人让他不得向帕莱奥洛格大使透露此事，以免后者不慎走漏了风声。但帕莱奥洛格在一个小时之后就从其他人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并立即派遣他的一等秘书尚布伦前往俄国外交部，发送紧急电报给驻巴黎的俄国使馆，告诉他们俄国已经开始秘密的军事动员（之所以选择去俄国外交部发电报，是因为他担心法国使馆的电报系统已经遭到监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向外交部发送了一封加密的电报："请从俄国使馆接收一封紧急的电报，勿通过我们的电报系统。"）就在查姆布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遇到了拉圭彻，而后者刚刚得知沙皇又取消了军事动员的命令。拉圭彻命令查姆布伦删掉电文中提到的"开始秘密军事动员"的内容。而这样一来，这封发往俄国驻巴黎使馆的电报里就基本上没有俄国针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动员的内容了，因此维维亚尼和他的幕僚们也依然不知圣彼得堡政府对于

军事总动员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第二天的早晨，帕莱奥洛格对军事随员以及他的一等秘书所做出的阻挠他与巴黎进行沟通的努力表现出强烈不满。

不管怎么说，7月29日所宣告的局部动员并没有继续开展。局部动员对于俄国参谋部也阻碍重重，因为这相当于打乱了其后的全面军事动员的安排。除非该命令被撤销，或总动员的命令在24小时之内再次提上日程，否则俄国西线将难免受到重创。7月30日早上，萨佐诺夫和克里沃舍因通话——他们都“对全军总动员的取消感到极大的震惊”。萨佐诺夫告诉克里沃舍因，有必要安排说客去向沙皇告知全军总动员的迫切性了。上午11点，萨佐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在后者的办公室里会面，这名总参谋长再次陈述了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的必要性。萨佐诺夫在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直接打电话到夏宫联系沙皇，在焦急地等待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的声音起初让人难以辨认，“似乎很久没有打过电话了，并想知道自己是在和谁通话”。沙皇同意于当天下午3点面见萨佐诺夫（他拒绝同时面见克里沃舍因，因为他不喜欢同时面对多名高官时，对方所带来的压迫感）。

在夏宫，萨佐诺夫被直接召唤到沙皇的书房，在那里，他发现这位俄国的最高统治者看起来“劳累而心事重重”。在沙皇的要求下，即将返回俄国驻德国使馆的外交官塔季谢夫将军也见证旁听了此次会见。萨佐诺夫说了50分钟，讲到了关于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提醒尼古拉斯二世，德国人已经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和解条件，这对于一个有着完整主权的大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能容忍的范围”，同时他对此总结道：“已经没有维持和平的希望了。”在会见的最后，沙皇说道：“你是对的，现在我们只能专心备战了。传我的命令给总参谋长，开始军事动员。”

终于，亚努什科维奇接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电话，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发出你的命令吧，将军。”萨佐诺夫在电话中这样告诉他，“然后——剩下的时间暂时回避一下。”但萨佐诺夫还是担心又会出现另一个无理由撤回命令的要求。多波罗斯基将军再一次前往中央电报局，发送出全军总动员的指令。这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当多波罗斯基在大概下午6点时走进电报局的大楼时，“电报局里的工作人员都神情严肃”。每个人都端坐在自己的电报机前，等待着输入这份电报的副本。沙皇没有发来其他消息。6点过了几分，虽然人们都保持着沉默，但电报机键盘敲打的声音已经响彻整个大厅。

俄国的军事总动员是“七月危机”中里程碑一样的重要事件，俄国是首个发动总动员的国家。在当时那个阶段，德国政府甚至还没正式宣布国家进入备战状态，俄国的战争准备从7月26日开始发挥作用，而奥匈帝国则仍然专注于为击败塞尔维亚而进行的局部军事动员。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政客之间的一个尴尬的话题。在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橙皮书中，作者还将奥匈帝国下令军事总动员的时间提前了三天，这样看上去俄国只是对此做出对应的总动员行为。在维也纳的舍别科大使所发的一封日期为7月29日的电报中表明，全军总动员的命令“预计”在第

二天发出，但这被篡改为是7月28日所发出的，电报的内容也被改为“全军总动员令已经签署”。事实上，奥匈帝国的全军总动员令最早是在7月31日才下达，真正执行则是在第二天。法国的黄皮书在对待文件记录上十分冒险：其中插入了一段虚构的公报，公报于7月31日出自帕莱奥洛格，称俄国的命令是“奥匈帝国进行全面动员的结果”，同时“也是德国在过去6天内暗中持续进行的动员措施的结果……”实际上，从军事方面来看，德国在危机期间发生始终都表现得相对冷静。

俄国人为何要走这一步？对于萨佐诺夫而言，导致这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无非是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对此他曾立即向俄国驻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和罗马的大使馆发电报，通知它们俄国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布在临近奥匈帝国的地区进行（局部的）军事动员。（这也正是7月29日法国部长级理事会上所讨论过的那封电报。）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萨佐诺夫而言，让德国人明白“俄国没有进犯德国领土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此，他强调局部的军事动员。那么为什么他又如此迅速地从局部动员转变成了全军总动员呢？这里面有4个原因。其中一个我们已经谈过了，即局部动员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转变为全军总动员（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合适的计划）。

另一个原因是萨佐诺夫自己的定论——从危机萌芽阶段便开始接手，一路走过深有体会——奥匈帝国的强硬态度其实是有德国做靠山情况下的狐假虎威。这也是深深地根植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之中的想法，曾经一度抑制奥匈帝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　1912年夏天在波罗的港，萨佐诺夫向霍尔维格下达了警告不要鼓励奥匈帝国的冒险行为。而根据相关报告显示，德国仍在持续支持奥匈帝国，而不是压制。在他的回忆录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在7月28日，也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当天，他收到驻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发来的电报，报告称从他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谈话中，“证实了他的定论”，即德国“还在‘支持奥匈帝国摆出强势的姿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它让德国成为俄国发起这场战争的理由，也让德国成为有责任维护和平的一方。正如贝肯多夫简洁地总结的那样：“柏林才是一切的关键之所在。”

在一份7月28日发往巴黎和伦敦的电报中，萨佐诺夫表示自己从德国驻俄大使普塔莱斯伯爵那里得知，“是德国助长了奥匈帝国的嚣张气焰”。第二天，当普塔莱斯给俄国外长看过一份关于德国首相的通告后，外长姿态也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份通告指出，如果俄国执意进行军事动员，那么德国也将被迫开始出兵。萨佐诺夫将此视为德国首相的最后通牒，并简略地回应道：“现在我对于奥匈帝国没有妥协的原因已经心知肚明了。”这让波达尔斯惊得险些从椅子上蹦起来，并表示：“我强烈抗议这种恶意诋毁的造谣！”会见在一片冷漠的氛围当中结束了。对于俄国来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德国正是奥匈帝国政策的背后支持者，那么进行局部动员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而会让德奥联盟变得更加巩固——那么何不正视威胁，并调动一切力量与这两国抗衡呢？最后，萨佐诺夫对于全军总动员的提议，还在7月28日得到了帕莱奥洛格的支持，“法国政府做出指示”，俄国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寻求来自已经做

出完全准备的法国的支持，法国必将履行同盟的义务”。俄国甚至还有信心获得英国的支援。“今天他们都在圣彼得堡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甚至直接做出了承诺。”比利时外交官伯纳德·德艾斯卡勒（Bernard del'Escaille）在7月30日这样写道：“英国将支持法国。这份支援力量的意义重大，并让主战派进一步占了上风。”他所说的这种支持指什么，何时将揭晓，人们还不太清楚，但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关于俄国领导人仍然对英国的干预抱有信心的看法几乎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虽然全军总动员的命令立刻就得到了确认并被沙皇所通过，但与针对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相比，它还是夭折了。根本原因是沙皇恐惧并厌恶战争，而现在他正面临着真正发起战争的局面。事实上所有了解沙皇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方面，他担心战争将对自己的国家造成深重的破坏与伤害；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极其感性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浓烈的爱国使命感。7月29日，就在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准备从中央电报局发出时，一封于晚上9点20分从德皇威廉二世那里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沙皇的注意。电报中，这位沙皇的德国表亲表示，德国政府仍然希望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政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理解”，并在电文最后这样写道：

> 当然，俄国所进行的军事动员可能被奥匈帝国视为威胁，而我们都希望战争得以避免，而我作为调解人，也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意见。

就这样，沙皇一边说着“我才不会成为一个刽子手”，一边执意取消全军总动员令。亚努什科维奇通过电话让多波罗斯基脱不开身，与此同时，信使赶赴电报局，告知局部军事动员将取而代之的消息。

作为沙皇的表亲，德皇的一封简单的电报竟然就让全军总动员的命令推迟了将近24小时，这确实令人震惊。1917年2月的革命后，有人发现了沙皇的私人信件，其中就包含当时沙皇与德皇的书信，书信的署名均为“威利”和“尼基”。这两位皇帝曾一直在用英语互通书信，并且一度极其亲密。这一发现曾引起极大轰动。1917年9月，曾经在革命活动期间进行报道的记者赫尔曼·伯恩斯坦（Hermann Bernstein），将其报道内容发表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4个月之后，这些内容被重新收录成书（西奥多·罗斯福为该书作序）。

这些被后世习惯性地称为“威利–尼基电报”的书信内容，曾一度对学者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战前的欧洲两个皇帝之间的对话；另一部分原因是，从这些信件中也能深刻体会到，当时的世界命运仍然掌控在几个极权国家的手中。实际上，这两种原因都是误解，至少从1914年的那些著名电报来看是这样的。那些在“七月危机”期间交换的内容既不是密码（因为这些内容早已被广为人知）也不是隐私，它们实际上是以私人信件式的措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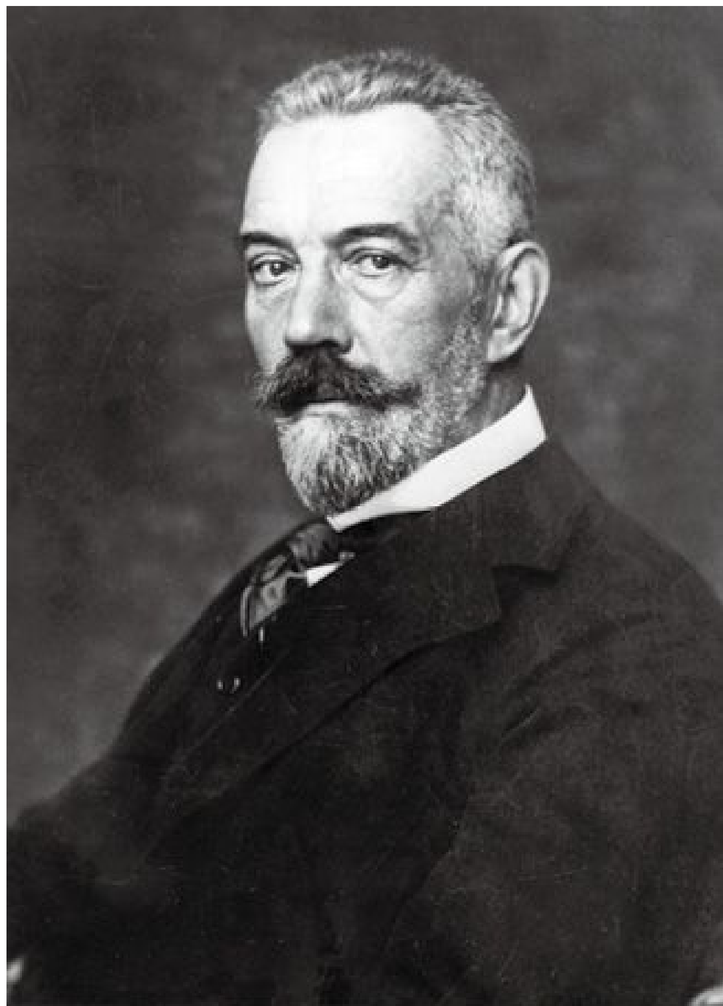
所写成的外交电文。所有相关内容都是经过外交部的相关人员仔细审查之后才被发出的。这表现出的是，在“一战”爆发前，君主之间直接书信往来的形式依旧在欧洲的政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君主制早已徒有虚名。它们的存在反映出欧洲政治体制中君主立宪的结构，而绝非君主制本身对政策的影响力。7月29日德皇发给沙皇的那封电报则是个例外：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在那个时刻，沙皇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而这并非因为他是政策决定中的关键人物，而是因为他的许可（和签字）是下达全军总动员令的一个必要步骤。这表现出的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君主专制制度遗留的问题。当时沙皇本来就觉得很难对总动员做出首肯（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性，这是值得理解的），而“威利”的电报则正好让他“借刀杀人”。但这效果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毕竟德国和俄国的政策还是对立的。7月30日早上，当沙皇收到威廉二世发来的电报，文中重申了普塔莱斯大使前一天的警告时，尼古拉斯二世放弃了和自己的表亲之间商议和平事宜的想法，转而选择了全军总动员。

关于俄国军事动员，还有一点：在萨佐诺夫于7月30日下午面见沙皇时，他发现沙皇对于奥匈帝国军事动员对俄国所表现出的威胁非常担忧。“它（德国）不想承认奥匈帝国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出兵了。现在它又要求我们停止军事动员，而绝口不提奥匈帝国方面的事。现在，如果我接受了德国的建议，那就相当于我们将赤手空拳对抗奥匈帝国的枪炮。”而我们知道，虽然来自俄国的威胁日益严峻，奥匈帝国的备战行动到目前为止仍然完全聚焦在针对塞尔维亚的战斗上。沙皇的焦虑并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倒更能从中体现出当时俄国对别国军事威胁性分析的普遍警觉。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一直以来都对奥匈帝国的军事实力有所高估，更重要的是，奥匈帝国曾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不宣而战，突然加强加利西亚地区的兵力，这也给俄国留下了前车之鉴。而矛盾的是，由于现在俄国详尽掌握了奥匈帝国的军事部署计划，俄方的戒备心更强了。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10年，新出任国防部部长的苏霍姆利诺夫就曾夸口说，他见证了奥匈帝国军队的严整军容和其海军舰队的“征服马其顿”计划。他声称这些都表现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展对俄国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使所有的外交保证都变成了一纸空话。而这些奥匈帝国的陈旧设想实际上根本没有被付诸行动，其实只是当时苏霍姆利诺夫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军费预算的借口罢了。对于此类政策的过度解读，直到1914年都对俄国的安全政策制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正是因为对于奥匈帝国的军事动员计划太了如指掌了，俄国一方面将奥匈帝国目前的局部动员视为其将来整体动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将一些奥匈帝国计划的内容都视为已经存在的潜在威胁。

例如，1913年，俄国情报部门得知，奥匈帝国已经部署了7个兵团执行对塞尔维亚的作战任务。但在1914年7月，俄国舍别科大使和武官温内肯（Vineken）的报告（准确度尚存怀疑）指出，兵团数目可能达到8个或者9个。以这些情报作为参考，俄国情报部门认为康拉德可能已经从他的针对塞尔维亚的B计划转为针对俄国的R计划，换句话说，已经开始“秘密布署全军或接近全军的总动员”。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知道奥

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军力水平评估确实在上升，这也让塞尔维亚提高了自己所需动用的军力水平。而从“一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情况来看，即便奥匈帝国提升了预期的军力，但还是不足以战胜这个真的如沙皇所激励的一样在“像狮子一样战斗”的塞尔维亚。从这个例子也足以看出，错误的情报分析对于时局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在当时充满了偏执心态的氛围中，想对所面临的威胁做出客观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每天都看总参谋部的情报调查结果的沙皇，也对这些对奥匈帝国的错误评估信以为真，这就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俄国人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的全军动员是在奥匈帝国的全军动员之后才进行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像所有被卷入这场危机中的人一样，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背水一战了。

跃入黑暗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1914年7月中旬，德国人都固执地坚持着他们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最初几天里，危机看似很容易得到解决。威廉二世在7月6日告诉弗兰茨·约瑟夫，“情势会因为塞尔维亚的屈服而在一周之内得到缓解……”当时他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曾对战争部长法金汉表示，“紧张时期”或许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那么长。但即使到了7月的第三个星期，当危机得到轻易解决的希望已经渺茫时，德国的领导人依然坚持固有的政策。7月17日，柏林撒克逊使馆的临时代办得知“可能只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英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法国和俄国也同样不想被卷入战争”。在7月21日于驻罗马、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进行的圆桌会议上，霍尔维格表示：“我们迫切希望冲突仅限于局部地区，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不顾同盟的协约强行介入此次冲突，都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如果想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德国人自身就要先采取一切手段避

免战备的升级行为。一方面是出于这个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让德皇在霍尔维格的建议下对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巡视期间不至于被打扰。出于同样的考虑，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也被建议与德皇同行，或去休假。总参谋部部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海军大臣冯·蒂尔皮茨和海军上将雨果·冯·波尔都已经休假了，军需官瓦德西将军则在其梅克伦堡的岳父家里休假，战争部长法金汉正外出进行例行的巡视，此后也将开始休假。

让这么多关键将领离岗，实际是一个错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已经对危机有所警觉，但对德国的军力很有信心。在他们看来，除非奥匈帝国直接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行动，否则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另外，德国人绝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是在佯装涣散，实则暗自四处备战。当时的内部备忘录和书信都表明，德国的领导人和军方都认为是可以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德国高级军官并没有召开会谈，而且赫尔穆特·冯·毛奇直到7月25日才从波西米亚休假归来。7月13日，他曾写信给德国驻奥匈帝国外交官，表示奥匈帝国将被默许“击败塞尔维亚并立刻让局势回归稳定，并与其形成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同盟，就像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匈帝国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仍然相信奥匈帝国有能力在不引起俄国干预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情报网的涣散。负责情报和反间工作的总参谋部IIIb部门的主管沃尔特·尼古拉上校，当时正在哈尔茨山区与家人度假，且并未被军方召回。在波茨坦会议后，东部边境情报搜集工作负责人的职位依然没有落实，且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在7月16日才有相关部门的人意识到，或许“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政治局面之下，很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俄国的动作”，但即便如此，德国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举动”。在一些与俄国领土毗邻的地区，当地的情报官员被允许继续休假到7月25日，例如毛奇。

为了不干扰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贝特曼和德国外交部反复多次敦促奥地利人有所行动，但维也纳的政客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遵从德国人的意思。腐朽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这个烦琐的政治机器已经很难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了。早在7月11日，霍尔维格就已经开始担心奥匈帝国的举棋不定会让情势有变。他在一份日记中记载库尔特·里茨勒这样总结问题：“显然（奥地利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军事动员。康拉德曾说需要16天。这是很危险的。立刻做出反应并向协约国示好——只有这样，紧张局势才能被及时止住。”等到7月17日，德国驻维也纳使馆的秘书施托尔贝格告知霍尔维格，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之间仍在进行“磋商”。为了尽量加快速度，同时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情绪，贝希托尔德才把最后通牒的回复期限设为在48小时之内。出于同样的原因，贾高也要求奥地利人将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日期从29日提前到28日。

如果奥地利人的这些相应的政策日程改变不利于将局势控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那为什么德国人又要这么坚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相信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例如俄国军备计划的不完整性，抑

制了武装干预的扩大。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难捉摸，更何况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政治部门长官在7月第4个星期的时候都在俄国或在海上。但从安贝尔针对法国军备工作的报告中，德国政府更深信协约国不会掺和到战争当中。

德国高层略带怀疑地看了安贝尔的报告，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更多的是通过其中的激烈言辞对陆军部部长梅西米和其部下进行政治攻击。德国的军事专家很快就指出，法国的小口径火炮实际上比德国的武器杀伤力更大。鉴于法军将战术从防守变成了更多的积极进攻，其看似荒废的边境守备线实际上成为转移视线的把戏。不管怎么说，在毛奇受到安贝尔的启发所写下的秘密备忘录里，他指出法军在东部边境的军事准备确实不足，特别是在重炮、迫击炮和防爆弹药储存方面。最起码，安贝尔的报告指出法国政府，特别是法国的军事指挥，不会让法俄同盟为了塞尔维亚而卷入战争；俄国也一样不会轻举妄动。

对德国来说，另一个必须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原因是缺少其他选择。德国不可能放弃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结盟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声誉和政治权利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德国的政策决策者们打心眼里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裁决。如果目前军事实力的均衡转变成了对德国不利的局势，德国为此失去奥匈帝国这个唯一的大国盟友，情况就太糟糕了。由于意大利太不可靠，德国领导者已经不再将它视作可以信赖的盟友。由于意大利的摇摆不定，格雷所青睐的通过4个外围大国调解争端的计划也变得不太可行了：如果意大利由于其反奥地利巴尔干政策，而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协约国站在一起，那么对奥匈帝国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德国愿意向维也纳政府转达英国的建议，但在霍尔维格看来，德国只应该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而非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进行多边干预。

对霍尔维格来说，比局部冲突的策略或其他选择更好的发展方向是，俄国决定不顾一切地为了塞尔维亚而悍然发动战争，让局势超出德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让俄国和协约国同盟被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为整个欧洲的敌人。从外交部秘书长贾高于7月12日写给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路：

> 我们需要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能否达成这一目的，首先要看俄国和协约国的各国有何动作。我们不会有计划地发起战争，但如果战争最终还是开始了，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再一次可以从危机中诸多“主角”的推论中洞悉事情的发展趋向：认为自己受到外部的不可抗拒力，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将决定战与和的责任坚定地放在对手肩膀上。

通过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和他们对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信

心，德国领导人的种种决策实际上也让危机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而从他们对1914年夏天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并不能表现出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将这场危机作为将邻国卷入一场有预谋的战争的机会。相反，齐默尔曼、贾高和霍尔维格均在努力放慢灾难发展的步伐。直到7月13日，齐默尔曼仍然相信不会出现“整个欧洲范围的冲突”。到了7月26日，外交部的高官们还认为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卷入任何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当中。德国的领导人显然完全没有成为局面的主导者，倒是在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在危机发展过程中占到决定性意义的几天里，贾高给其他人的印象是“焦虑、犹豫不决、胆怯”以及“无法胜任他的职责”，霍尔维格则向提尔皮茨提到了“溺水之人”的典故。

在炎热的7月里，德皇乘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巡游。在波罗的海进行这样一趟固定的行程，早已成为威廉二世在夏天的固定安排。这让他有机会从烦琐而让人焦虑的政府工作当中获得短暂的休憩与解脱。在这艘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上，围绕在人们的赞颂声当中，德皇总能感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在基尔赛艇会期间度过了几天时光之后，威廉二世一行前往挪威的沿海小镇巴尔霍姆，并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25日。在7月14日，他正是从这个地方对弗兰茨·约瑟夫向德国的求助做出回复的。信中重申了他曾做出的支持奥匈帝国的承诺，并谴责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但并没有提到因此就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表示，虽然他必须“继续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但在他看来，对抗反君主制制度主义者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并值得为此“使用大国的一切必要的手段”。而信的其他内容则完全关注于巴尔干地区局势以及如何遏制“在俄国驱策之下的巴尔干同盟”的出现。信的最后，德皇还对奥匈帝国皇帝的丧子之痛致以深切的慰问。

从德皇对于这些国务文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就像柏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不想听维也纳政府的唠叨。他主要关心的在于，如果这样拖延下去，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给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国际上一致认可的正义性将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也可能最终失去追责的决心。在7月15日左右，他欣喜地得知一个“积极的决策”正在酝酿当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奥地利的要求被送到贝尔格莱德之前，还会耽搁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说，在7月19日，威廉二世被外交部秘书长贾高发往霍亨索伦号上的一封电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文中提醒道，一份最后通牒被计划于7月23日执行，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关措施，以保障“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皇帝“可以及时做出（军事动员）的决定”，这让威廉二世感受到了隐藏的危机。他立即下令当时正在公海航行的舰队取消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行程，随时准备返航。他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海军此刻也在对军事动员进行评估，而且处在高级的备战状态当中。但霍尔维格和贾高也正确地评估到了，如果干涉英国的军事动员，情况将变得更糟，因此，在7月22日，他们没有接受威廉二世的想法，并要求驻扎在挪威的舰队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外交仍然比战略占有更为重

要的地位。

尽管局势已变得日趋紧张，但威廉二世仍相信危机的波及范围不会进一步扩散了。在看过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的副本后，他这样评价：“事情恐怕没有看起来这么严峻吧，这毕竟只是一份言辞激烈的文件罢了。”威廉二世显然已经和他的随行人员一样，认为奥匈帝国最终还是会对塞尔维亚妥协。当海军上将穆勒指出最后通牒意味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德皇甚至决绝地反驳了他。他坚称，塞尔维亚人绝不会冒险与奥匈帝国开战。穆勒这样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德皇在心理上对战争毫无准备，一旦他意识到真的可能开战，他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愿意承认现实。

威廉二世于7月27日下午回到了波茨坦。第二天一早，他就看到了塞尔维亚5天前回复给维也纳政府的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他的回答至少可算是出人意料的，他这样写道：“48小时（截止时间）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结果。这比我们所预期的情况都要复杂得多！但这确实让战争成为不可能。”而在了解到奥匈帝国已经发布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后，威廉二世表示十分震惊：“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决策的。”当天上午10点，德皇匆匆地给贾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完全放下了姿态，委曲求全”，“没有任何理由再为这个问题发动战争了”。他还写道，奥地利人此时不应该直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应该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市区，以确保塞尔维亚确实能够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贾高通知奥匈帝国政府，德皇希望“战争不要爆发”，而且准备“就维护和平的问题与奥地利进行磋商”。“我将尽一己之力促成此事，同时也将照顾奥匈帝国朋友的民族荣誉感。”此外，他还写信给毛奇，表示如果塞尔维亚按照对奥匈帝国的承诺履行了各项措施，那么就不存在开战的必要了。据国防大臣的回忆，在那一天里，德皇还进行了一场“让人迷惑不解的演讲，从中人们感到他不想让战争爆发，并且下决心即便可能让奥匈帝国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德皇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谨慎，恰恰表现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开始不受控制。早在德皇于7月6日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基尔会见时，他曾再三告诉这位企业家：“这一次，我不会退缩。”而在克虏伯看来，德皇这样说只是在故作强势。正如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所说的：“当距离危险的情况很远的时候，威廉二世充满着满腔的愤怒与士气；但一旦他发现战争的威胁近在眼前，他反而变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而到了7月28日，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利赫诺夫斯基最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他报告称爱德华·格雷表示塞尔维亚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姿态“远远超出他的设想”，并提醒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奥匈帝国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威廉二世一直以来很看重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他也一定认真听取了这些提醒。但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在7月28日的笔记倒是与以往他的失态表现大相径庭：与维也纳和柏林政府的那些将最后通牒单纯视为一个开战借口的人不同，德皇将之视为在危急关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外交文件，为此他还在坚持以政治手段解决目

前在巴尔干地区的问题。

德国的决策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高领导人在主权问题方面存在分歧，但这分歧很快又消失了。德皇于7月28日写给贾高的信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威廉二世曾经关注过自己命令的落实情况以及大国政策的发展状况，那么他的这封信则可能改变危机发展的轨道，甚至是世界历史。但他对维也纳政府的所想所为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维也纳政府已经急切地准备向塞尔维亚发起攻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危机发展的最关键的几周里他一直在外，他已经对柏林政府的政策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了解。他写给贾高的信件完全没有改变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霍尔维格也没有及时将威廉二世的意见转达给奥匈帝国，也就导致奥匈帝国并没有推迟的7月28日宣传日期。而在德皇给写信贾高仅15分钟后，霍尔维格也给契尔什基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提到了威廉二世的一些观点与诉求，但省略了关于对战争的抵制态度等重要内容。相反，霍尔维格还在电文的一开始写道，德国必须“避免给奥匈帝国留下德国想劝阻他们的印象”。

我们很难搞清楚霍尔维格为什么要这样做。该文件并没有体现出对这种观点的支持——他的外交思想已经演变成防御战的政策了。很可能是他只是已经承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与维也纳政府合作，防止俄国对奥匈帝国的种种举动做出过激的反应。7月28日晚上，霍尔维格说服德皇给尼古拉斯二世发出一封电报，向他保证德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成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就在24小时之前，他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欠考虑的。后来所发生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写给“尼基”的信了，告诉他不要把“威利”只当做调解人。霍尔维格所期望的是在局部地区爆发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而他也在致力于化解上层对他在政策制定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7月25日开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现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军事部署了。柯尼斯堡的情报官员报告称，截获了一批在法俄之间传输的“超乎寻常的冗长的”加密情报。7月26日（周日）早上，驻俄皇官邸的德国军事代表彻留斯（Chelius）中将报告称，俄国当局似乎已经开始运作“针对奥匈帝国的一切反制措施”。为了获得俄国的更多相关军事情报，情报局IIIb部门的尼古拉上将提前结束了休假返回柏林，同时发布命令称“特别的旅行者”将被调动起来。这些人其实是以游客或商人的身份进入俄国和法国境内，进行秘密间谍行动，并如同尼古拉上将所说的，“不论法国还是俄国在备战”，都要由他们进行密切监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经常往返于较近的国家与德国之间，传递情报，例如赫诺蒙特先生就曾在三天内两次前往华沙，并且一度因为国界的关闭而被困在俄属波兰境内。另一部分人则被派往更远的地方，将情报通过加密的电文传输回德国。当时的局面看起来还无须太过着急——情报部的官员于7月25日告知这些“旅行者”，紧张的局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局势得到缓和，这些“旅行者”也将真的被安排回家休假。

“特别的旅行者”和在东部边境驻扎的其他情报人员很快开始对俄国

的军事准备情况进行侦查。从柯尼斯堡发来报告称，有空的货运列车向东部行驶，科夫诺地区的俄军兵力集结也值得警惕。7月26日晚上10点，德军间谍温特斯基从德维纳伊发来电报称，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备战。在整个27～28日，持续不断的情报由“特别的旅行者”和情报人员发送给德军总参谋部新成立的“情报评估委员会”。7月28日下午，委员会将所取得的所有最新消息总结如下：

> 俄国显然已经开始了局部军事动员，但准确规模尚不能确定。已经可以确定敖德萨和基辅两个军区已经被调动起来；莫斯科军区的动作还未确认；华沙军区尚待单独的评估报告结果；在德维纳伊等其他军区，动员令尚未下达。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俄国在德国边境地区驻扎的一些边防军队一定也在备战。或许关于其“站前准备期”的声明，是面向整个帝国的。随处可见的前线士兵都已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了。

在情况如此恶化之下，德国的外交又因为7月29日更多关于局部动员的确认消息而陷入恐慌：出于对伦敦的意见和俄国军备情况的担忧，霍尔维格突然改变了他的策略。在7月28日辜负了威廉二世的和平期望之后，他现在又希望向契尔什基转达德皇曾经劝奥匈帝国和谈的意愿。但由于俄国的军事准备工作进行得过于迅速，德国几乎被打乱了阵脚，也无法再顾及这些和谈的事宜了。

在7月30日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对此做出军事上的回击，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两天前，战争部长法金汉在经过与霍尔维格的一番理论之后，已经成功地将在外参加训练的部队调回了他们的驻地。这个时候，早起的准备工作——在西部地区储备粮草，在铁路沿线加强驻军力量——还在秘密进行当中，因此也就能与德国表面上的外交手段共同应对紧张局势的发展。但这些内容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时，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德国是否要采取军事动员、何时采取军事动员，成为柏林政府在战前最后几天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7月29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局部军事动员的那天进行的一场会议上，德军高层之间仍对此存在分歧：法金汉认为应当宣布，当前已经进入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而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目前种种措施只是为了确保交通运输网的安全。德皇则似乎始终在这两种意见之间举棋不定。柏林政府就如同圣彼得堡政府一样，君主仍然在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威廉二世当天早上收到沙皇发来的电报，其中关于威胁“（俄国的）极端措施将把局势引向战争”的观点，一度让他同意国防大臣的意见。但在霍尔维格施压之下，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到来。法尔肯海对这种结论表示失望，但在日记中他写道，他能理解德皇这么说的动机，“因为人们对维护和平的信念，或者至少是期望，能驱散所谓‘战争的威胁’的影响”。

7月31日，在经过了又一段时间的踌躇之后，驻莫斯科的波达尔斯大使发来消息称俄国已经下令从前一天晚上的午夜开始进行全军总动员。德皇这次在电话中宣布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法金汉在7月31日下午1点向军队转达了德皇的口谕。现在俄国是主动出兵的一方了，这对德国的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历来很担心被国内舆论抨击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占有超过1/3的席位。霍尔维格于7月28日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阿尔伯特·休特古姆（Albert Südekum）举行了会谈，后者承诺社会民主党将不会就政府对俄国进行的还击做出批评（社会民主党内本身也有着很强的反俄情绪）。7月30日，首相告诉他的幕僚们无须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国家内部不会出现政党的内讧。

鉴于目前俄方的动作，威廉二世也无法再拒不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有趣的是，根据巴伐利亚军事代表冯·魏宁格的记录，这些即将开战的论调是法金汉“从他嘴里硬生生掏出来的”。到了下午，德皇又恢复了平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告诉自己，自己是在外界情形逼迫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些决定的。对于几乎所有的“七月危机”的参与者而言，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法金汉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将当前的紧张局势全部归结为是俄国的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他的神情和语言，”法金汉在日记中写道：“不愧为一名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愧为普鲁士的国王。”这是身在前线的鹰派士兵的让人惊愕的言论：他们声讨君主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观念。就这样，当俄国拒绝停止军事动员令时，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向俄国正式宣战。

“这过程中一定有些误会”

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德皇的注意力也一直放在英国政府身上。部分是因为，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也把英国视作欧洲大陆局势的重要支点之一，同时认为英国有能力阻止一场欧陆战争。威廉二世一方面高估了英国在大陆政策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和平政策对英国领导层（特别是格雷）所产生的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观原因有很大影响——威廉二世一直以来都在费尽心思寻求与英国的共识，但只在某些时候能得到认同。对于他来说，英国代表着一切贵族式的生活状态——最好的武器装备、充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海军部队、财富与成熟的特质。他欣赏这种世俗的、些许贵族式的（至少与他的来访中所遇到的人相比是这样的）、泰然自若的举止，却很难进行效仿。那里也是他已故的祖母的故乡，威廉二世后来回忆道，她老人家绝不会允许尼基和乔治这样联合起来欺负他。他所嫉妒而憎恶的哥哥——爱德华七世——成功提升了英国的国际水平（而威廉二世并没能在德国身上做到这一点）。而且英国也是他那已去世了30年的母亲的出生地，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每当威廉二世试图去理解英国的政策时，以上种种复杂的情绪总会萦绕于他的脑海，影响他的思绪。

德皇于7月28日收到来自身为普鲁士皇储的弟弟的来信，告知他乔治五世不希望英国被卷入战争当中。在7月26日早上，亨利就从考斯赶回白金汉宫，去向英国国王道别，之后返回德国。两人也有简短的交谈，亨利后来表示，乔治五世对他这样说道：“我们要尽可能地置身事外，并保持中立。”皇储于7月28日在基尔港刚一登陆，这些内容就通过电报发给了德皇。威廉二世将这个内容视为是英国对中立的官方正式表态。而当提尔皮茨对于他的这些理解表示质疑时，威廉二世以一种想当然的口气说道：“我得到了一位国王的承诺，对我来说这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英国国王究竟有没有说过那些话。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载，那上面只是这样简单地写道：“普鲁士的亨利今天早上来见我；之后他就返回了德国。”但另一个可能出自爱德华·格雷的对此次会见的相关记录，提供了更多细节内容。根据那上面的记载，当亨利寻味乔治五世，英国将在欧洲爆发战争之后做出何种举动时，这位英国国王是这样回答的：

>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冲突，我希望我们能保持中立。但如果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法国加入俄国一方，那么恐怕我们也将被卷入其中。但你放心，我个人和英国政府都将尽我们所能地去避免一场欧洲的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亨利的报告中或许偷换了概念，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份记录的准确性，也可能乔治五世的真实意思是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的。但不管怎么说，亨利的电报足够让德皇确信英国不会参战了，而德皇自己也因为英国政府，特别是格雷的退缩，而感到宽慰。



利赫诺夫斯基伯爵

也正因此，7月30日早上格雷和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之间的谈话让威廉二世感到震惊，在这次谈话中，格雷警告称英国只有冲突被限制在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俄国之间时，才会保持中立，而如果德国和法国也参与了进来，英国就将加入协约国的一方。大使的报告随即让德皇愤然写下了如下的手记：英国人就像“无赖”和“奸商”一样，想让德国置奥匈帝国“于生死攸关的境地而不顾”，谁也不能以自己的靠山来威胁德国。当第二天俄国全军总动员的消息传来时，威廉二世的思绪再次转向了英国政府。将俄国的军事动作与格雷此前的警告结合在一起之后，俄国的军事总动员向威廉二世“证明”了英国打算以不断升级的冲突规模作为“借口”，从而“让所有的欧洲国家按照英国的意思，与我们为敌”！

之后，8月1日（星期六）下午5点刚过一会儿，一个更为轰动的新闻来了。就在德国政府签署了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之后不久，利赫诺夫斯

基从伦敦发来电报，报告了当天上午与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会议内容。似乎格雷表示，如果德国不进攻法国，英国不仅会保持中立，还能担保让法国也在这场大战之中按兵不动。电文内容如下：

> 爱德华·格雷爵士刚才让蒂雷尔爵士传话给说，说他希望在今天的部长级理事会结束后，向我做出一份声明（利赫诺夫斯基于早11点14分发出），从而有助于避免这场战争灾难的发生。蒂雷尔爵士认为，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攻击法国的话，英国就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按兵不动。今天下午我应该就能得到更多有关的细节。爱德华·格雷爵士刚刚又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保证，如果法国在德国与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我们就不会攻击法国。我想他承诺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而他也表示将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谈到这些问题。附注：蒂雷尔爵士恳求我通过我的权力来阻止我们的部队攻击法国边境。一切都靠这个了。他说，有一次，德国的部队已经穿越了前线，而法国的部队则撤退了。

德国的决策者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条件感到意外，并赶忙开始着手就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但当天晚上8点左右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打断了这一切："承接我上一封电报，蒂雷尔爵士刚刚跟我见了面，并告诉我爱德华·格雷爵士希望今天下午就提议英国保持中立，即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交战也无所谓。我将在3点30分见到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后还将即时汇报进一步的情况。"

从伦敦发来的消息引发了德皇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激烈争辩。德国的军事动员已经箭在弦上，这也意味着施里芬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在接到了利赫诺夫斯基的第一封电报后，威廉二世打算，即便军事动员令无法立刻终止，他也愿意停止对法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以换来英国和法国的中立。在霍尔维格、提尔皮茨和贾高的支持下，他命令在从伦敦发来进一步能说明英国的真实意向的消息之前，停止一切的部队行进进程。而在威廉二世和霍尔维格希望抓住机会避免来自西面的战火的同时，毛奇则认为全军总动员一旦下令了，就不能停下。"这引发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争辩，"一个当时也在场的人回忆道："毛奇当时非常激动，他的嘴唇在颤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德皇和首相以及所有其他人对他的劝说都显得徒劳无功。"毛奇认为，将德国的后方毫无戒备地暴露在法国的军事威慑范围之内，无异于自杀；况且第一巡逻队已经进入了卢森堡地区，同时第16师也从特里尔出发紧跟其后。威廉二世对此不为所动。他已向特里尔发布了命令，要求第16师在卢森堡边境外停止进军。当毛奇恳求皇帝不要停止对卢森堡的占领，因为这关系到德国对其铁路的控制权时，威廉二世反驳道："那就用其他的铁路线！"争辩陷入了僵局。在这个过程中，毛奇变得几近歇斯底里。这名总参谋长私下里曾几乎带着哭腔对法金汉表示："他已经完全崩溃了，因为德皇的这个决定表现出他还对和平抱有幻想。"

即便在后面一封电报发来后，毛奇仍在继续坚持动员计划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法国的立场而临时改变，但威廉二世不听了：“如果是你那有着优秀军事才能的叔叔，他一定不会有这样与我相抗衡的态度。只要我做出了命令，那就必须是合理的。”之后威廉二世下令拿瓶香槟来，毛奇彻底震怒了，后来他告诉妻子，他完全做好了准备去与敌人作战，但不能是在有着“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情况下。毛奇的妻子甚至表示，这次争辩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这位总参谋部部长患上了轻度中风。

就在威廉二世开始拿着香槟把酒言欢时，霍尔维格和贾高仍在起草针对从伦敦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所做的回复。他们写道：“如果英国能全权担保法国确实能在德国与俄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德国就会接受英国的提议。德国的进军仍会继续，但部队将等到8月3日下午7点才会穿过法国国境，为的就是等待最终的协定落实。德皇又在自己单独发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电报里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表示他很乐意接受“在大不列颠保障之下的法国的中立”，并且表示不会让法国感到“紧张”。“即将穿过法国国境的前线德国部队已经接到了电报和电话传去的命令，停下了进军的步伐。”贾高也发了一封电报给利赫诺夫斯基，请他代为向格雷的提议致谢。

不久之后，一封来自利赫诺夫斯基的新报告发来了。期待已久的与格雷于下午3点半进行的会见如期召开，但让德国大使惊讶的是，格雷没有提出关于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而且他似乎也从未在内阁会议上提过这类事情。相反，他暗示德国和法国可能只是在“一场俄国所发动的战争当中，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攻击对方”，而德国的所作所为则可能引发英国的干预。格雷特别警告称：“想让英国对于（法国或德国）任意一方对中立国比利时所做的暴力行为做出容忍，都是不可能的。”利赫诺夫斯基对此问了一个问题，引起在座的外交部官员一片哗然：如果德国同意其军队不进入比利时的境内，格雷是否也能承诺英国继续维持中立的态度？奇怪的是，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格雷显得有些失措：他表示，由于英国有做出任何选择的自由，他也不能给出这样的承诺。换句话说，格雷看来是在背离他此前的提议。同时他透露——或许是在不经意间的——他在做出自己的提议之前，并没有征询过法国政府的意见。在报告这次混乱的谈话时，利赫诺夫斯基表示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打算做出任何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承诺，而格雷还将对法国和德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他的这封电报在当晚早些时候到达了柏林，引发了巨大骚动，让德国政府无言以对。

然而与此同时，德皇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关于他很乐意接受英国提出的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的电报也到达了英国，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没人比格雷显得更加惊慌失措，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即刻就被召至白金汉宫，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同时起草一份回复。晚上9点左右，他用铅笔写下了这封后来成为乔治五世写给威廉二世的回复电报的文字：

在利赫诺夫斯基皇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今天下午讨论关于如何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达成和解，进而防止德国与法国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情时，这过程中一定有些误会。爱德华·格雷爵士将于明天一早安排一次与利赫诺夫斯基皇储的会见，并阐明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对他所说的话的误解。

而任何其他尚存的歧义都被利赫诺夫斯基后来的电报所消除了，他在乔治国王收到德皇的电报的几乎同一时间收到了贾高发来的关于"接受"英国政府的"提议"的电报。利赫诺夫斯基这次的电报中清楚地写道："由于英国政府没有过任何提议，您的电报没有起到作用。因此他们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但这时候柏林已经过了晚上11点。身在总参谋部的毛奇已经差不多可以安心了，虽然他还在为德皇下令停止第16师的进军而伤心。临近午夜时，毛奇被命令回到皇宫去听取最新的调遣。等他到达之后，威廉二世向他展示了后来收到的修正了（真正的）英国的立场的电报，并说道："现在你想怎样都随你了。"

格雷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在8月1日与利赫诺夫斯基、康邦以及众多同僚的会面并不能被视作促成了战争的爆发。7月29日，格雷曾警告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都参与战争，那么英国也将被迫立刻采取行动——正是这个警告激怒了德皇，使他将英国政府称为"无赖"和"奸商"。然而在7月31日，他又告诫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英国的公众不希望英国参与到一场与自身利益几乎毫不相关的争端当中。或许格雷确实是在利赫诺夫斯基面前表现出了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利赫诺夫斯基自始至终就没有误会他的本意。这样看来，"误会"变成了格雷开脱自己欠妥当行为的借口。又或者他只是因为英国内阁对法国态度的摇摆不定而做出意见的修正。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中立的提议至少会给英国提供一种手段，使德国做出各种保证（比如保证不会先发制人对法国进行攻击）。也可能格雷根本就没有过保持中立的想法，而是鉴于他的自由帝国主义同盟霍尔丹大臣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法来尽量延迟法国和德国开战的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英国远征部队的训练做准备。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在7月最后一周里的低迷走势也成了他曾一度迟疑不定的原因之一。

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之间也对此事尚存争论），很显然，格雷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事态处于危机爆发的边缘。在一场包括法国参与在内的欧陆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提议英国中立，足以让这位外交部秘书长的态度产生巨大的逆转，以至于转向他本来不想发展的那个方向。同时，关于法国和德国应当保持武装对峙的内容也被明确地记载在相关的档案中。在8月1日下午5点25分发给伯蒂的一封电报中，格雷表示他已经让德国大使"停止德国军队的进军，除非法国出兵国境，否则德军也不能越界。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让法国人放心地开始履行自己在联盟中应尽的责任"。但即便是这样的建议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它是建

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法国可能会情愿抛弃其与俄国的联盟，而该联盟是普恩加莱及其同僚多年来煞费苦心维护的。这顶多意味着人们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之现实的把握能力非常小。而不久，格雷就被命令成为伯蒂的下属，后者曾激动向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发泄自己的不满：

> 我无法想象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开战，并遭到德国攻击时，法国会保持沉默。如果法国真的这样做了，德国将首先进攻俄国，之后如果他们打败了俄国，就将转向法国。法国在法俄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岂不是不言自明？

正如我们所知，格雷的这种政策夭折了；格雷甚至在伯蒂的话传到自己耳朵里之前就自我否定了这一政策。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日子里，格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常常失眠。他无从了解内阁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会支持他的倾向于加入战争的政策，同时他也受到来自同僚们的种种压力，包括内阁里的大量鸽派人士的反对，以及保守党里倾向于加入战争的人。

还有一方面的巨大压力来自俄国于7月30日所发出的军事动员令。31日深夜，德国使馆告知英国政府，针对俄国的命令，德国政府已经宣布战争已经一触即发，并通告如果俄国不立刻收回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德国也将不得不出兵，而这就将“意味着战争”。这一表态给英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凌晨1点30分，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和格雷的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爵士乘坐出租车赶到白金汉宫告知了国王这一消息，这样英国国王就可以给沙皇发电报，要求他停止俄国的军事动员。阿斯奎斯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可怜的国王被从自己的床上拽了起来，当时发生的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再奇特不过了（你们也知道我经历了足够多奇特的事了）——他穿着棕色的睡袍，脸上的痕迹显现出他刚才正在睡“美容觉”——而我当时就这样在一旁说着刚刚得到的消息。他当时的建议是，应该直接以私人的形式处理此事——例如以‘我亲爱的尼基’这种方式为开头来写信，然后在信的最后署名“乔治”。

外交活动从那天黎明开始就变得愈加活跃起来。

我们或许应该考虑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在“七月危机”最终爆发前的几天中，对于英国外交部的深刻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和蒂雷尔已经一度开始重新考虑与俄国的关系。随着俄国对波斯和其他帝国外围领土的压力，英国方面曾考虑过抛弃英俄协约，改为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外交姿态，接纳与德国之间的可能的合作。这从未成为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但关于俄国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反制措施的消息，至少加重了俄国

加剧此次危机的罪责。英国的领导人对塞尔维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或同情。这是一场东部的战争，与白厅里的政客们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即便是这样，是否也加剧了格雷对巴尔干局势的忧虑呢？

7月29日上午，格雷提醒康邦，法国正放任自己被“卷入一场不属于它自己，而是属于其盟友的战争；法国之所以会加入，完全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相反，英国则“不受这种束缚，而将不得不决定政府出于何种利益做出何种应对措施”。“我们所希望的，”格雷补充道：“一直以来都是避免被卷入源于巴尔干问题的战争当中。”两天后，在德国政府宣布战争进入迫在眉睫的阶段之后，格雷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康邦的观点相反——现在这种状况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完全不同，当时英国和法国都加入了战争，而“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法国正被卷入一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康邦对此表示了巨大的失望，并询问如果德国攻击法国，英国政府是否将帮助法国。格雷对此的回应更加尖锐：“最新的消息是俄国已经下令所有的舰队和陆军部队进行总动员。在我看来，这将酝酿一场危机，而且将使德国的军事动员看起来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发起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而发生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峙，而同时，俄国也将孤军面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攻击。“如果法国没能利用这个机会，”格雷在8月1日下午告诉康邦，“那是因为这个联盟是仅限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在写下这些内容时，格雷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通过收回支持态度或为军事准备而拖延时间，来为事件降温；他正在与三国协约无意识的一项特殊共识斗争。格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对三国协约的内容也有着特别的理解。一个东南欧的争端能引起一场欧陆战争，即便三国同盟的成员里没有任何一个遭受直接的攻击或威胁，但这也把他吓到了。格雷最终还是忠实于他自1912年所遵从的三国同盟政策，但在这段时间里，三国之间发生的种种变故也让我们必须注意“七月危机”所带来的变化，即一个接一个的痛苦抉择不仅让党派之间产生了分歧，也让关键的决策者之间产生了异议。

保罗·康邦的磨难

这些都是保罗·康邦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当他看到奥匈帝国政府写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文件之后，他就明白一场横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了。虽然他有时候也不能认同普恩加莱在俄国巴尔干政策上的支持态度，但他现在认为法俄同盟在面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矛盾之时，必须共同面对可能出现的威胁。事实上，他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伦敦，以便去向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阐明当前的事态。或许正是因为康邦的影响，代理外长才告诉德国驻法国大使，普恩加莱于7月28日了解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是极其高兴的。

对于康邦来说，同时也是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

英国政府的态度了。“如果英国政府今天真的开始全权参与此次危机事件，或许还有可能挽救和平。”他于7月24日对记者安德烈·热罗这样说道。在7月28日与格雷的一次会议上，康邦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真的就这样对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趋势坐视不管，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其实这也是又一次地将维护和平的责任转嫁给了别人。在康邦看来，法国与俄国共同举兵征讨奥匈帝国并不是下一步所应做的，但这也将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动武之后自然会出现的状况。这样看来，英国现在确实对维护和平有责任，只有它的强大海军和贸易优势可以防止德国政府及其盟友的介入。多年以来，康邦也一直在告诉英国首相，法国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

他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里。毕竟，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场自卫战争，而是一次法国被迫加入的，与俄国共同发起的针对巴尔干地区争端的干预——这也是他自己此前就有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不惹来更多麻烦，法国也在竭尽所能地不去招惹德国：7月30日早上，在巴黎召开的部长级理事会决定，法国的掩护部队将在孚日山脉到卢森堡一带部署，而不接近距离前线1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是为了避免任何与德国巡逻队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向英国政府展示法国政策的和平本质。人们都认为，限制区内的道德效果和宣传价值要优先于军事风险。英国方面立刻通过康邦了解到了这一新的政策。然而事实上，英国政府继续如格雷反复强调的那样，既不表现是法国盟友，也对三国同盟的内容不管不顾。俄国和法国都没有被攻击或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原本康邦打算向格雷申辩，称法国是“在俄国遭受攻击时不得不进行了援助”，但当时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攻击俄国的意向。同样不可能的是，英国企图进行干预的声明会使诸列强在不征求英国意见的前提下，放弃它们已经采取的政策。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深深扎根在英法协约关系里的历史分歧。康邦一直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和法国一样，将协约视为平衡和限制德国的一种工具。他并不知道，对英国的领导人来说，协约有着更为复杂的目的。除了一般规定的内容之外，协约还是转移大英帝国领土威胁的手段，而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将可能的威胁都转向俄国。康邦之所以失算的一个原因是，他太相信常务副部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建议，爵士对于维护俄法同盟有着极大的意愿。但尼科尔森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英国政府里就没什么发言权了，而且他的观点已经和格雷一派的观点完全脱节了，后者对俄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并日益热衷于亲德（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反德）的政策。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那些掌握最佳信息的人们若想猜透其同伴和敌人的动机，是多么困难。

因为英国政府里对约束性协议的反感增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大了，尤其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政客中，更多人开始对俄国抱有敌意。因此英法友好协议对于双方来说也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在整个联盟存在的年月里，法国外交部“寻求着友好协议的存在感，并艰难地践行着其中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问题也正是由爱德华·格雷和保罗·康邦的不同政见所引起的。前者对待法国和欧洲时十分小心谨慎、闪烁其词，

且彻底忽略了它们，而后者则过度追捧法国，对协约国倾其所能。让康邦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而是他一生的爱国行为。

格雷的所作所为也受着限制。他没能在7月27日就干预战争的问题争取到内阁的支持。当他两天之后征求对法国的正式支持的承诺时，再次失败了，只有他的4个幕僚支持他（阿斯奎斯、霍尔丹、丘吉尔和克劳）。在该次会议上，内阁拒绝了这样的观点：英国作为1839年《伦敦条约》（承认比利时为中立国）的签署方，有义务反对德国使用军事力量对该条约进行破坏。内阁里的激进分子们认为，同盟协约不能只由英国执行，而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内阁决议认为，如果问题扩大，该决定的也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而法国和俄国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政府清楚地表态将坚定地维护英俄同盟时，才能让德国和奥匈帝国“知难而退”。格雷也受到了来自其同僚的压力：尼科尔森和艾尔·克劳都强烈建议他宣布对同盟的坚定维护。在7月3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克劳为格雷提供了在内阁中与反对者们据理力争的论据。可能英国确实没有义务去帮助法国，他写道：“但英国对于自己在海峡彼岸的‘朋友’所应有的那份‘良知’是不可否定的。”

> 确实，我们与法国从未有过书面约定的内容。我们没有协约规定之下的双方义务。但我们之间协约国的关系是存在的，是经过一定发展的，并用来检验我们的处世之良知。如果英国不能在一场争端发生的时候维护它的伙伴，那协约国的名号也就毫无意义了。此事关系荣辱。要想名声不堕，就应奋勇出战。

相反，尼科尔森则更关注比利时以及英国维护比利时中立性的责任。但格雷一派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决策的关键所在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内阁，完全抛弃了格雷一派。

8月1日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后，格雷失望地向康邦转告，内阁反对对此次欧洲危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康邦对此表示不满，并表示不会将这个消息转告法国政府；他只会告知他们，英国政府并没有达成任何决定。但格雷反驳道，目前这个就是决定。内阁已决定，英国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利益问题而派远征军前往欧洲大陆。在失望中，法国大使改变了他的提议。他提醒格雷，根据1912年海军协议，法国已经从北部港口撤军，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了英国皇家海军。虽然英法两国并没有因为该协议而正式结盟，他也恳求道：“既然当时是你们建议我们从港口撤军，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至少提供舰队的支援？”格雷对此表示震惊，他承认，如果德国对法国的海岸地区发起进攻，或德国对比利时的中立性视而不见，那么英国的公众舆论或将改变。最重要的是他承诺将向内阁提出关于向法国海岸地区增援的问题。康邦悲伤地结束了这次会见。回到格雷办公室隔壁的大使办公室后，他坐到了尼科尔森旁边，喃喃自语道：“他们打算放弃我们。他们会放弃我

们了。”

英国介入

事实上，情况并没有康邦想象得那么糟。在1914年8月初危机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公众情绪就已经高涨了。康邦对于被英国政府抛弃的恐惧和格雷关于在政府中失势的担忧，都可能让我们错误地领会当时的真实情况：英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倾向于对欧洲大陆形势采取干预的态度。7月29日，内阁任命丘吉尔为海军大臣，着手准备舰队的动员。而当天晚上，阿斯奎斯通过与丘吉尔的眼神交流传达给了他对于将舰队转入战时状态的默许态度。8月1日，在没有确认得到内阁同意之前（但已经有了首相的默许），丘吉尔就开始对舰队进行军事动员。

与此同时，保守党也开始对干预行动进行游说。代表保守党利益的媒体也刊文阐述英国干预欧洲大陆危机所带来的好处。当《曼彻斯特卫报》、《每日新闻》等报刊都坚持对中立政策的维护时，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保守党报刊则强烈要求对抗奥匈帝国和德国，并参与到即将爆发的欧陆战争当中。而在幕后，坚定地支持英国干预的军事行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由于他连日以来频繁来往于法国使馆与外交部，也让保守党的领导层感到英国政府的态度可能是要放弃法国。

8月1日，在康邦与格雷会见不久之后，保守党领袖劳埃德勋爵给法国大使打了电话。康邦仍然处于愤怒之中：他问道，英法军事协议对于英国总参谋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多年以来所承诺的支援又表现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有共同之处，”大使强调，“我们的总参谋部已经寻求过意见。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全部计划和预期的指令安排。”康邦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灵活地应对着劳埃德。他表示，法国外交部认为英国保守党并不能坚持自己所希望的对战争采取干预措施的设想。劳埃德坚决地否定了这一点，在结束了会见之后，他决定发起一次保守党内的对干预政策的演说。当天晚上，在张伯伦的家里举行了一场会议，等到第二天（8月2日）上午10点，已有包括议会领袖人物兰斯多恩和博纳·劳（Bonar Law）在内的多名保守党人士对积极的干预政策表示支持。在一封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表明，反对派们将支持干预的政策，并警告他，如果英国政府依然决定保持中立的观望态度，不仅将损害国家的声誉，更可能危及自身的安全。

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争取内阁对此的首肯。在内阁，主流意见还是不对欧洲的战争进行干预。多数人仍然对与法国的协约关系持质疑的态度，并且对与俄国的公约有着敌视的态度。“每个人都希望在一旁观望，”阿斯奎斯于7月31日这样告诉维尼夏。丘吉尔后来回忆称，至少有3/4的内阁成员都不希望被卷入一场“欧洲大陆的争端”，除非英国自身也受到攻击，“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反干预主义者们也可以得到伦

敦的银行和商业机构的财政支持：在7月31日，阿斯奎斯会见了一个由城市金融家们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警告他不要让英国被卷入欧洲的战争当中。

8月1日早上的内阁会议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意见。以莫利和西蒙为首的反干预主义者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英国政府“从现在开始”，“不论出现何种状况”都绝不会出手。相比之下，丘吉尔则“非常好战”并要求“立刻进行军事动员”；而如果内阁依旧保持中立的姿态，格雷则可能辞职；“霍尔丹困惑不解。”内阁否决了立刻部署英国远征部队前往欧洲大陆的提议——格雷和自由党也反对这个决定。（正是这个决定让保罗·康邦陷入了绝望之中。）约翰·莫利则在丘吉尔面前得意地宣布了“和平主义者”的胜利，他说道：“最终我们还是打败了你们。”

然而，到了第二天——8月2日（星期日）——快要结束时，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进行干预的关键步骤。内阁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格雷被授权告知法国大使，如果德国舰队穿过北海或进入英吉利海峡，阻断了法国的航道或对法国的海岸线展开攻击，那么英国的舰队将对法国提供全面的保护。农业和渔业委员会委员长沃尔特·朗西曼爵士后来将此事形容为“内阁还是认为，与德国的战争在所难免”。在于晚上6点半到8点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又达成一致，表示如果比利时的中立性遭到“实质性的破坏”，“我们也将被迫采取行动”。而后来的这个情况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德国曾经明确对英国表示，他们将穿过比利时朝法国进军。在意识到局势已经开始朝着干预政策的方向发展时，伯恩斯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宣布辞职；第二次会议之后，莫利也立刻提请辞职。这在“和平主义者”里掀起了巨大波澜。

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是怎样做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关注主张干预的人士在这个过程中的辩论能力。内阁大臣赫伯特·塞缪尔提前制定了两次会议的议程，首先讨论关于德国的轰炸对法国海岸的威胁，其次是将比利时的中立性的“实质性的侵害”转换为引发英国出兵的原因。这两项提案还有一个重要之处是，都为了确保成为“德国的行动而非我们的”，所以“罪责在于德国”。在8月2日上午的会议上，格雷满怀深情地提出，英国政府对于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支援法国，有着道德良心上的义务，并表示，“我们告诉法国，可以依靠我们，而如果我们现在又不能在法国身陷危险时提供帮助，那我也没有脸面继续待在外交部了……”而在倾向干预政策的人们与格雷和首相持相同意见的同时，“和平主义者”没能争取到其他各党和议会的更多支持，无力再在面对目前众望所归的形势之时逆流而上了。

自由主义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到底有多么重要？由于英国是在德国进入比利时境内后，于8月4日对德宣战的，而且由于协约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同盟，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比利时和法国是让英国的内阁、国会与民众选择加入战争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确实没错。于8月3日在下议院进行的一次精彩的演讲中，格雷将英法同盟也纳入了支持战争一派的内容中。他表示，英国经常在“一遇到战争中需要提供支援时”就放弃

对法国的援助。但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更多表现出的是道义上的内容：

> 法国的舰队目前部署在地中海地区，而法国北部和西部的海岸则完全处在海军兵力真空的状态。法国的舰队在地中海集结，这跟之前相比意味着更多的差别，因为英法两国之间长久以来增进的友谊让法国觉得无须害怕英国。法国朝向英国的海岸线是完全不设防的。法国的舰队长年以来一直都只在地中海集结，因为信任与友谊一直在英法两国之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鉴于此，格雷向康邦和普恩加莱建议法国撤回其在东地中海的舰队，因为意大利也可能在合适的时机到来之后加入到战争中来，而英国则可能在不久之后为了保护地中海的“如同国家命脉一般的”商路，而加入战斗。这是格雷政治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演说——人们在读过了这篇讲稿之后，都会从中领略到格雷那巧妙的措辞中为帝国主义给出的道义上的借口。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来自反对干预战争局势的自由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艾迪所说的话：“格雷的演讲让内阁里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满意，除了可能有3～4个反对意见。”而一旦决定被做出，英国就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按部就班地部署，创造了包括各个工会党派甚至是爱尔兰种族主义者在内的不列颠神圣联盟。随后，康邦也丧失了在英国外交办公室的威信。这确实让人感到痛苦，但这位法国大使才是真正正确的，虽然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几天的时间。

然而，鉴于比利时和法国的因素并没有在内阁7月底的决定中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需要再仔细审视一下英国做出这个最终决定的过程。一定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内阁的态度从中立到干预的转变，尤其是在部委中的那些“骑墙派”对内阁最终决议的确定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着这个复杂的环境，自由党在承受了格雷和阿斯奎斯的辞职之痛后，将如何在党派政治斗争中存活下去，成了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而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爱尔兰问题的态度，如果出兵干预，那么地方自治政策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随着格雷的政策被采用，自由党的内阁也显然将面临垮台的境地。对于那些坚持比利时中立及英法海防协议的人，这是一个避免因干预与否的辩论而让政府崩溃的有力论据。

在这些考虑的背后，是对于逐渐浮现出来的争端对英国可能造成的威胁的忧虑。自1900年左右开始，抵御俄国的威胁就一直是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所考虑的中心主题。1902年，英国就曾利用英日同盟以制衡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实力；1904年组建的英法协约关系又进一步地打压了俄国的气焰，至少作为英国的竞争对手来说是这样的；1907年，在英国无法继续有效驻防的帝国外围所发生的冲突为与俄国的公约提供了——至少是在理论上提供了——管理的手段。但来自俄国的威胁直到1914年都从未消失，事实上它甚至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更大了。当时，俄国在

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极端霸道和挑衅的举动让英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英俄协约关系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也有一部分人要求在与俄国联盟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正如布坎南于1914年4月在给尼科尔森的信中所写的："俄国正在迅速崛起，所以我们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与它的友好关系。如果它认为我们不可靠，或者没有利用价值，它就可能转而与德国亲善，谋取奥斯曼帝国地区的利益。"尼科尔森在1912年也曾更具体地谈道：

> ……如果不能与法国和俄国搞好关系，那情况会比与德国搞不好关系更加糟糕。德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但它无法威胁到我们真正重要的利益，而俄国则能在这方面让我们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确切地说就是在中东和印度地区对我们造成威胁，有可能让局面退回到1904年和1907年以前的状态。

而英国之所以在1914年参战，也是为了抑制德国，而非俄国。对于两种大相径庭的安全保障思路，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此前的一些研究（以及部分最新研究）强调英国以大陆均势政策作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最近的研究则把英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方面放到了更为全球化的视野，指出英国当时作为一个在世界强国中并不靠前的国家，将俄国视为最为根本的基本威胁。大陆均势政策确实在1905和1911年的危机之后对英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混杂地存在于英国政府高层当中的。从艾尔·克劳对7月25日布坎南大使从圣彼得堡发来的电报所做的笔记中就可见一斑。克劳始终是一名奉行大陆均势政策的人，并将抑制德国放在首要的位置。但他也做出了其他针对英国安全性的呼吁：

> 如果在战争到来之时，英国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么以下两种可能性中必然会发生一种：1. 德国或奥匈帝国赢得战争，占领法国，击溃俄军。英国在那种孤立的状况之下又将被置于怎样的位置？2. 法国和俄国赢得战争。他们对英国的态度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印度和地中海地区是否又将易主？

总之，英国关键的政策决策者们并非在1914年被迫从大陆政策主义和帝国政策之间做出选择。不论是将俄国或德国作为首要的威胁，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英国对协约国的援助将意味着既对俄国抱持绥靖和包容的态度，又对德国产生抵制和遏止的效果。在1914年的情景下，英国政府的决策出于对全球和大陆安全形势的考虑，决定支持协约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

聚焦比利时

法国的政策是对敌国威胁的主动出击以及对自身的安全进行被动防御相结合的；对德国来说，则正好相反。由于腹背受敌，德国政府必须决定先攻破哪一边。西线的攻势更为重要，因为德军认为在这一侧会受到更为强烈的抵抗；而在东线，只保持了能够拖住俄军前进步伐的力量。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鉴于毛奇费尽心思地阐述了俄军在军事装备和工业发展方面的进步，在东、西战线之间对平衡的把握有所改变，但战略计划的基本思路依然不变：在向东与俄军开战之前，德国将先集中大量兵力消灭西边法国的军事力量。而自1905年起，德国的领导层就认为只有取道中立的卢森堡和比利时，才能在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上获得成功。该攻击会通过阿登森林旁的两条道路进行，一条穿过卢森堡国境，另一条则包围着被称为荷兰的咽喉要道的马斯特里赫特阵地的凸出部分。穿过比利时南部地区。德军的各路部队将从法国北部绕过凡尔登、南锡、埃皮纳勒和鲍尔弗等重要防御据点，从东北部直取巴黎，从而立刻结束西线的威胁。

毛奇与其他总参谋部的军官都将这个计划视为对法军事行动中当之无愧的制胜计划，所以他们也没有设定其他方案。唯一的一个备选方案，即只对俄国进行军事行动的东征计划于1913年被搁置。很显然，德国的军事领导层完全不关心对比利时中立性的破坏可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政治影响。史学家们也曾对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死板表示过质疑，认为这完全是军队为了实现“绝对的毁灭效果”所做出的违反政治与舆论规则的行为。但之所以将计划的方案设置得如此有局限性，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鉴于法俄同盟之间日益增进的共同防务合作关系，只针对一边的战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东征计划被废止。此外，德国军方并没有对英国的干预问题做出很多考虑，因为在大多数德军高层人士看来，英军是不可能参战的，这成了德军战略和政策上的另一个失误。

随着德国8月1日军事动员日期的临近，德国领导层又做出了两个空前巨大的错误决策。西线的进攻计划需要立即迅速向比利时出兵。毛奇表示，进军绝不能有任何延迟，因为如果等到比利时在列日要塞的防御工事完成了，就将阻挡德军前进的道路，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而这种立即行动的决策在政治上出现了程序问题，导致了在德国正式开始向比利时进军、穿过比利时国境之前，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将有更多的时间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另外，格雷和他的幕僚们要想做出干预战争的决策，原本应该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格雷的政敌可能已经指出，俄国和法国才是此次战争的挑起者，而非德国；而英国如果出兵干预，则将让俄国和法国陷入更为不利的舆论旋涡中。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就曾愤怒地质疑：“为什么我们没有再等等？”

8月2日发给比利时政府的最后通牒，是德国犯下的另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既然决定了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性并且加快进军的速度，或许更好的处理方法（对德国来说）是直接入侵并穿过比利时国境，并在事后对此进行相应的赔偿措施。这正是英国政府期待德国人做的。而阿斯奎斯内阁中的部长们——包括丘吉尔——一直以来都在重复一个观点，那就是英国不能将德国借道比利时作为干预战争的理由，前提是德军只驻

扎在桑布尔—马斯一线，不进入安特卫普及斯海尔德河口等战略敏感地区。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领导层则认为除了最后通牒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开始对比利时的进军，并让英国袖手旁观。最后通牒由毛奇于7月26日起草，并由德国外交部修订：鉴于参战部队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以呼吁在比利时问题上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周密考量。最后通牒的开篇表示，德国认为法国即将穿过比利时国境，对德国发起攻击，而“如果德国这种出于自保才出兵进入比利时境内迎战法国的行为，被比利时政府视为敌对行为，那对德国政府来说将是巨大的遗憾”。之后是几点内容：第一，德国将保障比利时所有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第二，一旦对法战争结束，就立刻撤出比利时；第三，全额赔付在比利时境内所造成的任何伤害；第四，如果比利时抵抗德国部队，“德国将遗憾地将比利时视为敌国”，但如果比利时没有抵抗德军，“两个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将“更加深厚而持久”。

后来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又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在毛奇的要求下，留给比利时政府的回复时间从24小时缩短到12小时，因为他急于快速开展军事行动。此外，关于指出比利时在保持“友好态度”的情况下，将可以“从法国的领地”获得割让领土的条款被删除了，因为德国外交部突然觉得这可能会让英国政府也蠢蠢欲动。霍尔维格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能解释他在危机的白热化阶段所做出的政治判断。

从德国外交官贝洛·萨雷斯克（Below Saleske）把最后通牒交给比利时外长达维南的那一刻开始，对德国来说一切都开始变得糟糕了。如果毛奇直接从比利时南部穿过，或许直接就能形成军事上的突破口。但最后通牒让比利时政府对此有所防备。这个任务现在落到了比利时国王和政府首脑布罗克维尔伯爵的头上。布罗克维尔在晚上8点前往皇宫面见国王时，带上了最后通牒的法文翻译版。这两个人将如何回应，是毫无悬念的。比利时国王一向以正直的为人和坚定的信念而闻名，布罗克维尔则是一个老牌的爱国者。他们将最后通牒视为对比利时荣誉的一种侮辱——除了这个他们还能怎样看呢？一小时后，晚上9点，比利时的部长级理事会和议院都对德国最后通牒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异议：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确认为，比利时将奋起抗争。在当晚几个小时之后，比利时外交部给德国写就了一个维护自身尊严的掷地有声的回复：“如果比利时政府接受了这些条款，那么将成为国家的耻辱，并背叛比利时在欧洲的责任。”

8月3日上午，法国驻布鲁塞尔外交官M·克罗布科斯基（M. Klobukowski）看到了最后通牒的原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哈瓦斯通讯社。随后一场舆论风暴横扫比利时和所有协约国，引得群情激奋。在比利时，爱国情绪被点燃了。在布鲁塞尔和其他大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挂上了国旗；所有的党派都表示要同仇敌忾，捍卫祖国和荣誉，与入侵者做抗争。国王于8月5日在众议院做了关于维护国家团结、保卫祖国的演讲，并询问在座的议员：“你们是否将不惜一切代价

守护我们祖先延续下来的神圣领土？”欢呼声如雷鸣般响彻大厅。就这样，德国的最后通牒变成了一次“可怕的情绪感染”。它在战时宣传的过程中让人们产生了共鸣，甚至掩盖了战争的合理性和后果，让协约国的战争被赋予了一种坚不可摧的道德正义感。

很多德国人都对比利时誓死抵抗的决定表示震惊。“唉，可怜的傻瓜们，”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使馆惊呼，“唉，可怜的傻瓜们！他们为什么不知难而退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如果他们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那他们必将被消灭。唉，可怜的傻瓜们！”也许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人在6天之后，才在8月8日再次对比利时发起呼吁。被毛奇视为眼中钉的列日要塞与此同时也完成了进一步的加固措施。在一份给美国驻比利时外交官布兰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的笔记中，德国政府表示了对“将要遭受血洗的列日要塞”的遗憾之情，并附注：

> 现在，鉴于比利时的军队将为了维护军队的荣誉感而对抗与自己过于悬殊的力量，德国政府恳请比利时国王和比利时政府及时收手，挽救比利时于未来的战争之灾。德国再次在此给出庄严的承诺，绝不会借此机会对比利时的主权有任何侵犯。德国随时都准备着将在战争情况发展到合适阶段时撤出比利时。

这份提议，也被拒绝了。

迈入战争

随着全军动员、最后通牒和宣战的一步步实施，本书的内容也进入了尾声。在于8月1日（星期六）在圣彼得堡与萨佐诺夫举行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波达尔斯大使嘀咕着“不可理喻的话”，泪流满面，之后费力地说了句“这就是我任务的结果了”就跑出了屋。当利赫诺夫斯基伯爵在8月2日给阿斯奎斯打电话时，他发现首相“几近崩溃”，泪水“从他的脸颊滑落”。在布鲁塞尔，即将离开的德国外交官们坐在一堆已经打包的盒子和文件当中，摸着额头，抽着烟，努力缓解着心理压力。

外交斡旋的阶段已经进入尾声，下面该通过士兵和舰队来“交流”了。德国的军事动员令发出后，巴伐利亚的军事全权代表前往柏林与外交大臣长举行了会见，他发现“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面庞，人们在走廊上碰面时会激动地握手，大家都在庆祝成功克服障碍”。7月30日，在巴黎的伊格纳季耶夫上校报告了法国人“对于有机会获得战略优势的”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悦”。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期待。“一切都走向灾难、趋于崩溃。”他于7月28日写给自己妻子的信里这样描述道：“对此我异常兴奋而愉悦。”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克里沃

舍因向由杜马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承诺，德国的军队将很快被粉碎，而战争对俄国来说是一个“福音”：“我们将造就这场战争的一切胜利。”

曼塞尔·梅里，一名来自牛津圣米歇尔镇的牧师，在7月中旬前往圣彼得堡，准备在那个夏季担任当地英国教会的神父。当军事动员令发布后，他曾尝试乘船逃往斯德哥尔摩。但他的船——“多贝尔恩”号被限制在港口不得出海。芬兰湾的所有灯塔都被摧毁了，喀琅施塔得的所有堡垒也接到命令，向所有穿过雷区的船只开火。7月31日，圣彼得堡的天空灰暗而多风，梅里与其他旅客都被限制在船上，看着预备役的士兵成群结队地走过。几个人迈着“轻盈的步伐”走着，但大多数人都“拖着沉重的步伐，身旁跟着的女人则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送她们的丈夫、孩子或爱人奔赴战场”。

在8月1～2日的这天晚上，巴黎市中心的大道上也弥漫着这种哭喊声，成群结队的士兵向火车站集结。现场没有音乐、歌唱或欢呼声，只有靴子摩擦的声音、马蹄走过的声音、卡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和搭载着火炮的车厢驶过楼下与鹅卵石摩擦所发出的噪声，而窗内，很多人睡眼惺忪地望着前往前线的部队。

公众对开战消息的反应因为虚假的报道而受到扭曲，所以政府发言人们总是宣称，政府是被公众舆论逼着加入战争行列的。可以确定的是，人们也都没有对檄文产生太多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或多或少自愿地前往集结地点。造成这种准备为国家奉献的状况的并不是出于对战争的渴望，而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由于冲突的内在原因十分复杂，让士兵和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出于自卫才加入了战争，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敌人的攻击和挑衅，认为他们自己是为了维护和平才这样做的。就在协约国的同盟部队备战的同时，事件本身的导火线却很快地被人们忽略了。“看来没人记得，”美国驻布鲁塞尔的一名外交官在8月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几天前塞尔维亚还在这次的事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现在看来，它已经退出了这个舞台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也出现了一些沙文主义的热情，但这都是偶然现象。关于欧洲的英雄人物欣然抓住机会打败仇敌的神话早已化为泡影。在大多数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军事动员的消息让人震惊，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惊雷”。城里的富人纷纷撤离，并没有觉得动员令所引领人们进入的战争将让士兵们失去亲人、致残，甚至死亡。在俄国的农村，经历了片刻“死一般的寂静后”，得知军事动员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痛哭起来”。在法国东南部的小镇瓦蒂利厄，钟声将工人和农民们召集到镇上的广场。有些刚刚从田里回来的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干草叉。

>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面临什么？”妇女们问道。妻子们、孩子们、丈夫们，所有人都被激动的情绪所淹没：妻子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只有

惊慌与不安包围着我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啊。

一名英国游客回忆在阿尔泰（塞米巴拉金斯克）哥萨克地区住宿时，旗手扛着“蓝色的旗帜”，伴着军号，带来了军事动员的消息。哥萨克士兵传达了沙皇的命令，“拼尽全力击败敌人”。但谁是敌人？没人知道。发来军事动员令的电报里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流言四起，起初大家觉得这场战争一定是针对中国的：“俄国在蒙古的进军太深入了，中国为此宣战。”后来又有流言称：“是跟英国打仗，跟英国。”这种观点也曾盛行了一段时间。

直到4天之后，一些进一步的真实消息才传到我们这里，然而没人相信。



结语

“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站在萨拉热窝市政厅的阳台上对她的丈夫这样说道。她表示，这不是因为相关的史实太少，而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摆在那里。1914年那场危机的复杂性也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出于当时的复杂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行为，在当今的政治现象中同样存在。在写本书最后一部分时，正值欧洲2011～2012年经济危机的最高峰——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像1914年那些国家一样，也都注意到了有可能出现的普遍的灾难性结果——欧元崩溃。所有的大国都不希望产生这种结果，但除了这个共同的利益，他们也各自有着特殊且矛盾的、属于各自的利益关注点。基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他国进一步的反应，而由于政策决定的不透明，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很难被预估。与此同时，身陷于欧债危机的各国领袖们还在尝试利用普遍性危机作为杠杆，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4年的那些人跟我们是同一代人。但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和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显著。至少负责解决欧债危机的各国领导们对问题的关键有着相同的认识。与此相反的是，1914年关于道德与政治的争端磨灭了各国间的共识和信任。况且1914年也还没有如此强大而成熟的国家体系，可以准确制定应对策略、调解冲突、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此外，1914年危机的复杂性并非源于各国之间单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交流，而是源于各国之间频繁出现的军事动作和面对高风险、低信任所做出的对威胁的反应。



普林西普的足迹

（萨拉热窝，摄于1955年）

国际关系体系中发生的飞速变革，对形成1914年复杂的事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异军突起，黑海地区进行的奥斯曼帝国与俄国间的军备竞赛，俄国对从索非亚到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重新定位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不是长期的历史变革，而是短期内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而扩散：例如格雷与自由党之间的斗争、普恩加莱和其同僚们推行的政策或是苏霍姆利诺夫对科科夫佐夫发动的战役。根据一份未出版的回忆录所记载的，科科夫佐夫在1914年1月卸任后，沙皇尼古拉二世首先想到将他的职位交给行事风格非常保守的彼得·N·杜尔诺沃，这是一个强势而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巴尔干纠纷。但杜尔诺沃并没能胜任，后来位置又让给了戈列梅金，由于他的软弱，克里沃舍因和一些高级军官们于1914年7月掌握了议会的实际权力。过于关注这个细节可能有失偏颇，但这也确实是引发1914年危机的原因之一。

这反过来让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透明且难以预测，以至于使同盟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感，这对和平都是非常不利的。在1914年，俄国和英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但这并没

有让英国外交部拒绝加入这场俄国发起的欧洲战争；相反，它还加强了增援。这同样也适用于法俄同盟：对于未来发展的疑虑让两国的心气更加高涨，而不以避让的姿态对待危机。各国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外部条件的多变导致了政策上的变革和信息的复杂交错，这成为战前危机阶段的显著特点。而鉴于1914年前后类似的文件或承诺过于多变，用“政策”这个词似乎也确实不合适。俄国或德国在1912～1914年是否有过一个巴尔干政策，是值得推敲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多样的措施、方案和表态，难以下一个总体的定论。对于各国领导人来说，大国关系的变动也意味着制定政策者将承受巨大的国内压力，这不仅来自于媒体舆论、工业和金融团体，也来自于他们各自的政党内部。而这也加剧了各国决策者们在1914年夏天焦虑的情绪。

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以及他们对本国及他国所说的关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本书中所涉及的关键国家领导人的内心都曾经充满了恐惧、不安以及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在维也纳上演的是一个关于年轻暴徒弑君之后，政府教唆邻国共同抵制贝尔格莱德的故事；在塞尔维亚，被受害妄想症所困扰的贪婪而强大的哈布斯堡皇朝也做过同样的应对举动；而德国则是因对未来被入侵、分割的恐惧导致了1914年夏天的决策。俄国多次在轴心国那里蒙受羞辱同样产生了影响，对过去的认知不复存在，人们更加认清了现在的局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匈帝国出于历史发展角度必然会出现衰败趋势（这十分有利于奥匈帝国的敌人），这也逐渐改变了此前人们对奥匈帝国扮演中欧和东欧霸主的看法。它破坏了这样一种观念：正如其他列强，奥匈帝国为保护现有利益而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

巴尔干地区是战争爆发的中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巴尔干地区也正是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发生之地。但还是有两个特别之处值得关注。首先，巴尔干战争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在奥匈帝国和俄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对巴尔干半岛的归属权加以干预，将带来新的威胁，特别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期间。后果之一就是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法国和俄国以不同的步伐、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区设置了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巴尔干问题并不是由逐渐成形的政策或阴谋引发的，1912年和1913年的遗留问题也和此后的“一战”爆发没有必然的或线性的联系。这并不能说巴尔干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塞尔维亚问题导致的，并将整个欧洲卷入了1914年的战争，正相反，一旦战争爆发，它便可以提供能够对危机做出解释的概念框架。世界上两个差异巨大的大国俄国和法国也为了这一地区的稳定联合起来。

对于地区安全已经被巴尔干战争破坏了的奥匈帝国来说，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们也不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是带有变革意义的事件，带着实实在在而又无从捕捉的威胁。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来评判，维也纳政府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寻找和平的处理方式的，但在1914年就不可能了。同样，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提倡的“四国调解”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实施，因为他所代表的党派自身就

对奥匈帝国局势的发展走向漠不关心。并非塞尔维亚当局不愿意或者不能抑制由盛行起来的领土收复主义者策划的萨拉热窝事件，而是塞尔维亚的盟友们并没承认维也纳政府对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监控和疏导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拒绝维也纳政府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塞尔维亚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这与2011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提案的争议有相似之处，该提案是北约国家支持的，即应加强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制裁，以防止其对该国公民中持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屠戮。俄罗斯代表当时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表现出一种不太恰当的“对抗方式”，是典型的西方做法；中国的代表则认为强加制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对叙利亚“主权”的干预。

那么罪责又该在谁那儿呢？鉴于断言德国及其盟友对战争的爆发有着道义上的责任，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战争的罪责在于战争起源。类似的对德国的指责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费舍尔论文”，这份由弗里茨·费舍尔、伊曼努尔·盖斯和几名年轻的德国同事共同撰写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件里，他们将德国视为引发战争的主要责任国。根据他们的观点（抛开费舍尔一派内部的诸多变化不谈），德国并非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而是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更糟的情况，即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借助战争的爆发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并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对费舍尔论文的近期研究强调了，德国学者之所以认为德国对“一战”负有罪责是源于他们对纳粹时期的反思；费舍尔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遭人诟病。但即便如此，“费舍尔论文”的简化版仍然被当作学习德国“一战”时期心态的重要文献。

我们真的有必要将战争的罪责怪到某个国家头上吗，或者我们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参战国的责任程度列出他们应该为战争的爆发所承担的罪责？在一份根据当时的文件所做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指出通过指责全部的国家或不指责任何的交战国，来解决相关的战争缘由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肯尼迪暗示，强硬的做法不应该回避问题。人们如果只是为了责备而责备，并不能最终达到责备错误一方的目的。围绕责备而进行的解释则更能够构成假设。人们普遍倾向于首先假设在冲突中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错误的。塞尔维亚人寻求民族的统一是错误的吗？奥地利人坚持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性是错误的吗？这两个国家哪个错误更大？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错误是，它将问题局限在了某个特定的政府或者国家，而非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因此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批判对象的探索使得人们容易将决策者的举动看作有计划而为之，并有着连贯的意图。而实际上你需要证明，确实有人渴望战争并引发了战争。在极端情况下，这样的过程中就诞生了阴谋论式的叙述：一小撮掌权的人（比如那些穿着天鹅绒夹克的恶棍们）依照一个恶毒的计划，从幕后操纵着事情。无可否认，这样的解释确实传递出一种道德满足感，而且从逻辑上看，1914年夏天所爆发的大战也是由这种方式开始的，但是本书认为以上论点并不能由切实的史实证据支撑。

1914年战争的爆发过程绝非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那样：最后，我们发现罪魁祸首站在温室里的尸体旁，手里拿着一支冒着烟的手枪。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冒着烟的手枪，或者应该说每个主要角色的手里都拿着枪。从这一点来看，战争的爆发是一场悲剧，而非罪行。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我们要为奥匈帝国和德国领导人穷兵黩武的姿态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开脱。关于这一点，费舍尔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是对的。而同时，德国也绝非唯一的帝国主义者，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帝国主义思想控制的国家。引发“一战”的那场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也正因此，“一战”的危机成为当代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同时也让“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刺客普林西普射出那两颗致命的子弹之后成为悬而未决的谜题。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与后来“一战”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比，1914年危机期间政客们尔虞我诈所得到的任何所谓权益都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国领袖们知道他们在冒着怎样的风险吗？有种说法是，欧洲人普遍毫无根据地相信下一次的大陆冲突将是类似18世纪那样的短暂而尖锐的内阁之争，就如俗语中所说，人们将“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最近，这种“对于短期战争的幻想”的说法也遭到质疑。德国的施里芬计划是以大规模的闪电突击对法国进攻，但就连施里芬的下属都认为，接下来的战争无法取得快速的胜利，而恐怕会演变为“步履艰难的充满血腥的道路”。赫尔穆特·冯·毛奇也希望，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能迅速结束战斗。但他也承认这场战斗有可能旷日持久，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1914年7月底也曾将此形容为“世界末日”临近了。一些法国和俄国的将领则将其称为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以及“文明的湮灭”。

他们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他们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吗？这或许也是1914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最大的区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和舆论都深刻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广岛和长崎升起的两朵蘑菇云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永远的噩梦。也正因如此，后来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再也没有发展到核战争的程度，但在1914年则完全不同。在许多政治家看来，对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期望和对长期战争的恐惧相互抵消，让人们不怯于冒险。1913年3月，《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军医界领军人物的报道。其中包括雅克–安布鲁瓦兹·蒙波菲特（Jacques-Ambroise Monprofit）教授，他刚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军事医院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归来，在那里，他协助当地的军医建立了更高水平的手术标准。蒙波菲特注意到“被法国大炮（这些炮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被卖到了巴尔干地区国家）炸伤的情况不只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同时也会导致最恐怖的死亡方式——骨头被震碎、肌肉组织被撕裂、胸部和头部被炸开了花”。由于这种武器的杀伤效果过于残忍，军医中的另一名杰出的专家安托万·德佩（Antoine Depage）教授甚至提出对这种武器实施国际禁运，防止其出现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我们理解他的用心良苦，”记者评论道，“但只要我们有一天还可能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我们就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有如此厉害的武器保卫自

己，让敌人恐惧……”这篇文章在结尾表示，法国应该为同时拥有让人感到恐怖的武装力量以及“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医疗组织”而感到高兴。在“一战”前的欧洲，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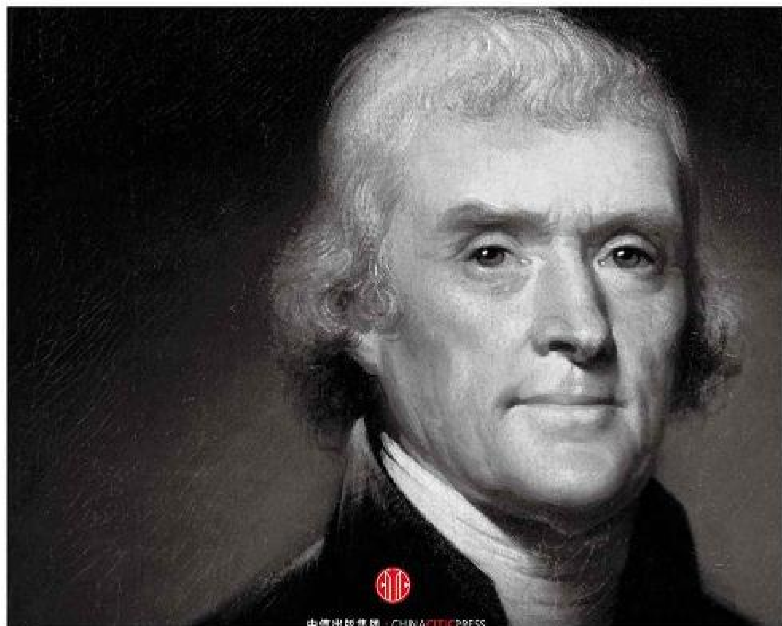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西雅图时报》
《彭博商业周刊》年度最佳图书
荣登亚马逊畅销书总榜第1名

权力的艺术

托马斯·杰斐逊传

[美] 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著
贾冬妮 徐宁 启辉◎译

一部权力使用指南
对权力的深刻领悟 对美国崛起的另一种理解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美）米查姆著；贾冬妮，徐宁，唐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ISBN 978–7–5086–5085–2
I. 权… II. ①米… ②贾… ③徐… ④唐… III.杰斐逊，T.（1743~1826） - 传记IV. 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9228号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Copyright © 2012 by Jon Meacham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著者：[美]乔恩·米查姆
译者：贾冬妮 徐宁 唐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权力的艺术

——托马斯·杰斐逊传

[美] 乔恩·米查姆 著
贾冬妮 徐宁 唐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世界之希望

第一部分 继位

第一章 幸运之子

第二章 什么决定了我的命运

第三章 革命的根源

第四章 诱惑和考验

第五章 充满欲望和否定的世界

第二部分 革命

第六章 惊心动魄

第七章 和平遥遥无期

第八章 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

第九章 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第十章 责任的吸引力

第三部分 改革者和州长

第十一章 自由的议程

第十二章 棘手的州长职务

第十三章 蒙蒂塞洛的英军

第十四章 超越死亡的炽热感情

第四部分 失意的议员

第十五章 重返政治舞台

第十六章 一场为了赢得尊重的战斗

第十七章 消失的城市和终生的劝告

第五部分 世界是他的舞台

第十八章 浮华的欧陆

第十九章 知识的世界

第二十章 头脑和心灵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第二十二章 巴黎的条约

第六部分 首任国务卿

第二十三章 纽约的新职位

第二十四章 杰斐逊先生太讲民主了

第二十五章 两只斗鸡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风暴

第七部分 反对党领袖

第二十七章 蛰居蒙蒂塞洛

第二十八章 就任副总统

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第三十章 亚当斯对阵杰斐逊：第二回合

第三十一章 危急之秋

第八部分 美国总统

第三十二章 新秩序开始

第三十三章 踌躇满志的总统

第三十四章 胜利、丑闻与隐疾

第三十五章 有如神助

第三十六章 举国欢腾

第三十七章 黑暗大阴谋

第三十八章 这该死的禁运

第三十九章 告别终极权力

第九部分 蒙蒂塞洛之主

第四十章 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

第四十一章 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

第四十二章 联邦的丧钟

第四十三章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

后记 所有荣耀归于杰斐逊

作者摘记及致谢

Th: Jefferson



描绘早期的美国总统时，你大可以泼墨写意，只要寥寥数笔，他们的形象便尽现眼前，唯独他除外……杰斐逊得用铅笔精描细绘，逼真与否，全看是否绘出了那些若隐若现、闪烁跳跃的光影。

——亨利· 亚当斯

《托马斯· 杰斐逊时期的美国历史》

在我看来，这是白宫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一次聚会，汇聚了众多英才和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少了已离开我们独自用餐的托马斯·杰斐逊。

——约翰·F· 肯尼迪

于1962年在为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庆祝晚宴上的致辞

献给赫伯特·温茨

一如往常，也献给玛丽、玛吉、萨姆和基思

世界之希望

华盛顿特区，1801年冬

他天明即醒。在国会山康拉德–麦克蒙公寓房间里，体形瘦长的托马斯·杰斐逊掀开被单，伸出长腿，将双脚浸入一盆冰水中。他认为这样做有益健康，于是早起冰脚便成了其保持终生的习惯。在他位于弗吉尼亚蓝岭附近西南群山中的蒙蒂塞洛庄园，每天清晨放在杰斐逊卧榻旁边的铁桶把地板磨出了一圈凹痕。

1800～1801年冬，华盛顿，杰斐逊即将58岁。他身高6.25英尺[1]，头发已逐渐转灰，不再是年轻时的红棕色；因日晒而遍布雀斑的脸上开始显出皱纹；目光锐利但难以捉摸，时而呈蓝色，时而呈棕红或褐色；牙齿十分健康。

1801年2月初，首都四处道路泥泞，建筑稀稀落落。混乱无序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总统宝座归属尚不明朗，宪法地位岌岌可危。杰斐逊避居在新泽西大街康拉德–麦克蒙公寓里，默默沉浸在无言的痛苦中。这栋新建公寓的马厩可容纳60匹马，距离尚未竣工的国会大楼仅200步之遥。

他一边足浴，一边整理思绪。经过一轮轮激烈竞选，他成功挑战现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并在预选中将其击败。然而，这位高个儿弗吉尼亚人却获得了与纽约人阿伦·伯尔相同的选举人票，后者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灵活善变，本作为他的副总统参加竞选。根据1800年生效的选举规则，总统和副总统的选票无法分出胜负，这就使得原本从亚当斯到杰斐逊的和平的权力交接演变成了一场宪政危机。

焦虑不堪、郁郁寡欢的杰斐逊在给长女的信中写道："在这里参加各种活动，无欢娱却精疲力竭。敌手、间谍环伺，蓄意曲解我的字字句句，一旦与事实不符，便口诛笔伐。"他的命运掌握在其他人手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憎恶无尽等待，憎恶流言蜚语，憎恶懵然无知。然而，他却无能为力。托马斯·杰斐逊能做的只有等。

杰斐逊说，选举成了"所有谈话的主题"。杰斐逊与伯尔选票相同，亚当斯紧随其后，选举成了众议院代表的竞赛，无人知晓前路几何。突然间，一轮全新的选举在众议院展开，16个州的代表每人要投出一票，赢得9票者当选总统。"危机影响空前深远……"2月第二个星期的《华盛顿联邦党报》[2]如此宣告。可能是伯尔当选吗？他承认视政治为"玩物与名利"，他会被心怀鬼胎的联邦党人选为总统，从他的民主共和党[3]同伴杰斐逊手中夺走总统宝座吗？又或者杰斐逊的政敌们会选出一位临时总统，拒绝将最高权力拱手让给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人？

在华盛顿沉重压抑的氛围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杰斐逊乐于散发一种不囿于政治的哲学家风度，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奋力稳固选举地位，他要将美国从据称有君主制倾向的联邦党手中拯救出来。1776年，还是青年的他为了美国的自由而不顾一切，如今，25年过去，杰斐逊认为他所熟知和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可能要走到尽头了。1800年选举期间，爱国医生本杰明·拉什告诉杰斐逊：“听说某位国会议员哀叹我们脱离大英帝国，并诚挚希望我们重新回到它的治下。”

这样的想法令杰斐逊胆战心惊。他坦承自己有责任维护1776年《独立宣言》所申明的原则。身为绝大多数选民的选择，如果他在总统选举中败北，那么这些年来美国人民一直是为了什么而抗争？危机四伏。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老革命友人埃尔布里奇·格里说，杰斐逊的反对者们已经开始从“分化思想转化为分化人民的行动了……这是他们煽动、酝酿内战的开端”。

有流言称，刚获任首席大法官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有可能击败杰斐逊，被任命为总统。当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被告知宾夕法尼亚州有22　000人已“随时待命，准备在极端时期拿起武器”时，他说：“倘若联邦分裂了，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混乱是杰斐逊所深恶痛绝的，威胁着他热爱的和谐。

最终，一场暴风雪袭击华盛顿之后，杰斐逊在众议院第36轮投票中险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总统。自此，造就美国独一无二的政治丰功伟绩的杰斐逊时代开始了。与这位蒙蒂塞洛的哲学大师相较，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时被形容为更英明、更务实。然而，若以大权在握的时间为粗略的判断标准，杰斐逊当属美国共和体制前50年里最成功的政坛人物。1800～1840年的40年间的36年里，居美国总统要职的不是杰斐逊本人，就是自称“杰斐逊的拥护者”的人：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以及马丁·范布伦。（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一届总统，属唯一例外。）这个未引起关注且未公开过的“杰斐逊家族”，在美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杰斐逊构想清晰，目标宏大——期盼民众政府在美国得以存续。他相信，民众受过良好教育，民智已开，他们的愿望定会实现。他的对手们对人民则缺乏信心，他们担心大部分美国公众可能无法担当自治的重任。而杰斐逊认为正是这批美国公众才是自由的救星，民族的灵魂，共和的希望。

为实现目标，杰斐逊追求权力，一旦在手即施加影响，令现实屈从于其个人意志，按其心中蓝图重新加以塑造。最伟大的领袖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独裁者。他们如杰斐逊一样，既畅言国家宏图伟业，又深谙权力之道，懂得达权知变。杰斐逊在整顿思想、打动人心方面的能力超群，激情澎湃的同时又不失踏实务实。为实现构想，他妥协退让，也相机变通。杰斐逊在特定时期，心甘情愿应时而动，使得他成为一个可遇

不可求的历史人物。然而，在现实世界，身处那个时代，当杰斐逊被赋予国家安全的重任时，他大胆创新，灵活机变，堪称锐意改革的领导人。

选择理想还是现实、高尚的目标还是无奈的妥协，美国一直都在挣扎。杰斐逊也是如此。和美国一样，在杰斐逊的内心和头脑中，是追求完美还是得过且过，是理智行事还是随心所欲，这种交战一直在上演。于他同于美国，这种矛盾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杰斐逊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共鸣，主要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永恒的戏剧情节：在复杂的乱世当中，通过争夺国家的领导权实现伟大的变革。

杰斐逊比任何一位早期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都更加深信人性的可能性。他志存高远，但也明白，要让梦想成为现实，其捍卫者要足够强大和狡猾，能让历史为其所用。大体来说，就是哲学家的思考、政治家的操控。杰斐逊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而且常常能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这就是权力的艺术。

他爱妻子，爱藏书、农场、美酒、建筑、荷马作品、马术和历史，爱法国和弗吉尼亚联邦，爱花钱，爱最新的理念和观点。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深信不疑。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他曾说过，这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希望”。他认为只要用心，美国人几乎无所不能。杰斐逊曾在1814年这样形容他的美国同胞：“他们能做到的就一定会做到。”

艾萨克·格兰格·杰斐逊是蒙蒂塞洛的一位奴隶，他眼中的杰斐逊令人敬畏：“杰斐逊先生个子很高，身板笔直，肩膀宽阔。他身形挺拔，长脸形，高鼻梁。”埃德蒙·培根，蒙蒂塞洛的一位监工，形容杰斐逊“像一匹骏马，没有一丝赘肉……脸上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

高个子和令人敬畏也许会赢得一时的尊敬，但很难被喜爱；过于平易近人也许会赢得一时的喜爱，但很难被尊敬。杰斐逊就是那种极为罕见的领导人，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却又不会让人有压迫。他的气质赋予他独特的机会，让他能努力落实头脑中的想法，让周围的世界朝着他的理想转变。

杰斐逊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是自然主义者，也是历史学家。他是启蒙思想家，总是向前看，对知识有着执着的追求；他酷爱细节，每天都会关心天气，随身携带一个印着乳白色树叶图案的小本，把每天的花销记录下来；他是骑马高手，认为阳光“治百病”。杰斐逊还有步行的习惯，这让他身体匀称强健。他不喝烈酒，但喜爱葡萄酒，每天要喝上三杯左右；他不吸烟，收到仰慕者送的哈瓦那雪茄，他都会转送给朋友。

杰斐逊对于发明和探索孜孜不倦，他设计过餐桌旁的上菜架，还有蒙蒂塞洛房间门上的隐蔽式开门装置。他喜欢考古学、古生物学、天文

学、植物学和气象学，还曾经把《新约》中他认为超自然的、不可信的段落删除，把剩余的诗章按他心目中的正确顺序排列，创作了自己的“福音书”。音乐让他提神，园艺使他快乐。他喜欢买漂亮东西，也喜欢自己动手建造。在蒙蒂塞洛，他曾创作过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草图，还设计过罗马风格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其灵感源自法国南部城市尼姆的一座古庙宇。他是意大利面爱好者，曾费力地抄下法文的冰激凌食谱，还乐此不疲地寻找完美的沙拉配菜。他养牧羊犬（他最爱的两条分别是贝热尔和格雷佐）。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杰斐逊喜欢研究人性，热衷于观察使人前进的动力，关心他人生活的细节。他爱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她的信件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风貌；还有斯达尔夫人的作品《科琳娜或意大利》，一本浪漫主义的流浪汉小说。蒙蒂塞洛的藏书室中有一系列的藏书，一位访客将其内容总结为“君王丑闻”，杰斐逊把它们放在一起，标题为“列王纪”。它包括“Bareith公主的回忆”（由普鲁士的Bareith长公主、腓特烈大帝的姐姐著），“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回忆录”（作者是卷入玛丽·安托瓦内特钻石项链丑闻的关键人物之一），有关审判约克公爵的记述，以及因纵容其情人向军官出售军衔而被迫辞职的英军统帅的故事。据杰斐逊的访客回忆，他在讲到这些故事时“有一种满足感，但他又声称这类事情通常并不重要，这好像有点儿自相矛盾”。

据说，一位乡村旅店的客人曾经和一位“衣着朴素、低调的旅客”聊过天，这位客人根本认不出这位陌生旅客是谁。二人聊了一个又一个话题，这位不起眼的旅客“对每个话题都很精通”。聊到法律，“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律师”；聊到医学，“他就确信自己算得上医生”；聊到神学，“他又笃定自己能当个牧师”。后来，旅馆的客人“十分讶异”，于是就问店主这位奇人是谁。

店主的回答很简单：“哦，我怎么觉得你应该认识他。”

杰斐逊有众多挚友，对于他们来说，杰斐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可敬但不傲慢，耀眼但不张扬，力争胜利但不让人厌烦。

然而，他同样有众多对手，而且层出不穷，对于这些人，杰斐逊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蛊惑者、一个空想家、一个像女人一样的亲法人士，不值得被一个伟大国家的政府所信任。而杰斐逊只能竭尽所能扭转这些看法。他渴望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可。

他善于操控情感和政治，对批评敏感，执着于名誉，献身于美国。他走出蒙蒂塞洛的庄园，夜以继日地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看到人类的思想被君主、牧师和贵族禁锢在封臣制度下长达多个世纪之后，理性的标准最终得以建立”。作为庄园主、律师、议会议员、州长、大使、国务卿、副总统、总统，杰斐逊大半生都在寻求自控和影响他人生活及命运的能力。对杰斐逊而言，政治不是令人沮丧的烦心事，而是

让一切成为可能的伟大事业。

有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他很早就立志要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并且乐于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他是个人自由主义理想的先行者，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决策人，是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的派遣者，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先驱。为了制衡权力和联邦军队的影响，他领导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而至关重要的或许是他赋予这个国家“美国人不断进步”的理念——一种明天会比今天和昨天更加美好的精神。自此以后，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都会因为构筑了“美好前程指日可待”这一杰斐逊式的愿景而飞黄腾达。

杰斐逊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引人入胜，某种程度上还在于，在面对极端的政党偏见、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外来威胁时，他总有办法坚持下来，而且多半还能占据上风。杰斐逊的政治领导力颇具启发性，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总统，他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运筹帷幄：一方面，营造未来会更好的希望；另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灵活性和技巧，最大限度地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他通常被视为美国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一位能清晰描述国家未来的人，但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虽然杰斐逊曾写过不少振奋人心的经典语录，他的诸多理念也广为流传，然而，杰斐逊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他是一位建造者，一名斗士。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曾说过，“现实性优先于纯理论”，而且，“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统治者的习惯决定的”。

杰斐逊为了最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然而他却很少关注被迫害者和被奴役者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对所有的争论、分歧、学术研究以及研讨会而言，关于杰斐逊大概也只有一件事是毫无争议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于1743～1826年的人同绝大多数凡人一样，会被激情、偏见、骄傲、爱情、抱负、希望和恐惧所左右。在接下来的几章，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杰斐逊——那个谋求公职、为新时代定义了人权、探索不断拓展的科学和哲学前沿领域的人，那个爱女人、养奴隶、参与缔造了一个国家的人——也是一个凡人。

他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是18～19世纪的背景下所塑造出的人物。因此，必须将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待。诚然，他所关注的诸多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具有深远影响。

全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深知，杰斐逊是一位魅力非凡、卓越高雅的人。无论是谁，哪怕你是碰巧出现在他面前，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片刻时光展现他的魅力。无论男女，他都会调侃打趣，让你对他产生好感。“被喜爱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他对他的孙辈讲，“获得人们喜爱的方法就是：不要同人争吵，也不要发脾气。”他厌恶面对面的争辩，更喜欢圆融地化解言谈中的冲突与不快，这让一些人

以为杰斐逊同他们的观点一致，但事实上，他只是在竭力避免冲突而已。正是由于他对一团和气如此痴迷，一些人将他的有所保留误解为表里不一，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然而，女士们却对他青睐有加。受华盛顿民主共和党《国民通讯员报》的发行人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邀请，杰斐逊造访了史密斯家。在会客厅，他同女主人、史密斯的妻子、作家玛格丽特仅仅独处了几分钟。起初，这位出身于联邦党人家庭的史密斯太太并不了解杰斐逊为何方神圣，但她发觉自己“有些被这位访客高贵稳重的气质所震慑”。然而，这种“战栗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体验。就座后，这位陌生的造访者“举手投足安然自若，还漫不经心地把胳膊搁在他座位旁的桌子上，他转过来对着我，神情流露出关爱，声音柔和，举止优雅，宛若女性一般”。他还有“唤醒别人”的天赋，“开始会聊点儿日常生活的话题，”史密斯太太说道，“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开始在观察这个人了，相当有趣。”

杰斐逊的非凡魅力让她不由自主讲了一些她原本不打算讲的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言行、神情都散发出一种气质，瞬间就能让我敞开心扉。”这位到访者有些许的控制欲。“我发觉自己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他，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史密斯太太说，“我并不了解他，但他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些家长里短，让我感到安然自在；他神情举止温和友善、抚慰人心，甚至让我忘了他不是我的朋友。”

就在这时，客厅的门开了，史密斯先生走了进来。一听到这位到访者就是“杰斐逊先生”时，史密斯太太立刻变得异常兴奋，同时也觉得颇为尴尬。“我感到脸颊一阵灼热，心跳急剧加速, 在他离开之前，我没敢再多说一句话。”她被杰斐逊的公众形象和他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迷惑。“难道这就是我平日里听到的、被联邦党人大肆抨击的那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个粗鄙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那个狂妄的无神论者？那个生活放荡的男人？”她不禁问道，“眼前的这个男人优雅谦恭，举手投足透露着高贵，声音柔和谦卑，面容和善而不乏智慧，难道他就是那个胆识过人的一党之首？那个和平生活的破坏者？那个所有阶层的公敌？”在起身离开的时候，杰斐逊“真诚地跟我们握手道别……以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方式说道：‘我是您二位的朋友。’”

杰斐逊敏锐的感官不仅局限于欣赏艺术的优美、音乐的力量和自然的瑰丽。他曾追求过两个女人，而后他的妻子带给了他十多年的幸福生活，而妻子的亡故让他一蹶不振，他变得冷漠麻木，悲恸地徘徊在蒙蒂塞洛的树林中，甚至想到了自杀。

妻子临终前，杰斐逊曾许下诺言，有生之年绝不再娶。而他也信守诺言，不过他确曾与一个女人——美丽（但已婚）的玛丽亚·科斯韦——有过一段情。最终，杰斐逊还是同帮他打理蒙蒂塞洛庄园的萨莉·海明斯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关系，而萨莉·海明斯是他亡妻的黑人奴仆，更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其中两个夭折），而这引发了

长达两个世纪的猜想：这段风流韵事的实质是爱情，是权力，还是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到底有几分真情，又有几分不得已？杰斐逊跟萨莉·海明斯的关系大约始于1787年，一直持续到1826年杰斐逊去世，前后将近40年。

美国的建国堪称传奇——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拆解为17世纪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的故事和18世纪的革命故事，这种传奇的力量之大，让人难以预测后来在这片国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历史看作一系列必然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结局。然而，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将其视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行动，让英国人的邪恶帝国和高贵的美国人对抗，那这种看法对英美双方都不公平，因为它不但以漫画的方式挖苦了英国人，而且也低估了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在选择妥协还是背叛时面临的复杂局势。

毕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此独立革命前数十年的美国文化都对君主政体恭敬有余，甚至达到拥护的程度。杰斐逊的美国先祖及其同辈们生活的环境使民众习惯于身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憎恨标志着革命进入活跃期，但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特例。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他知道，也能感觉到，美国的敌人无处不在。最强大的敌人是英国，不仅在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我并不想以传统的方式回顾独立战争，比如从1775年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武装斗争开始，到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败北结束，我想做的是谈一谈杰斐逊的看法，这样也许更有启发性。在杰斐逊看来，与大英帝国的抗争及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从1764年就开始了，直到“1812年战争”中美军的新奥尔良大捷、1815年签订《根特条约》，抗争方才结束。

通过讲述杰斐逊怎样看待这场斗争——至少是他不为人知的经历——不难看出，杰斐逊生活和担任总统的年代属于“50年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时而紧迫、时而缓和，但一直在推进，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1775~1783年和1812~1815年，对抗发生在传统战场上，也有以支持者代理人与英国和印第安人结盟的形式进行的对抗，还有商业打击和反击。需要担心的是加拿大新斯科舍或英国西部顽固势力（独立战争后，拒绝投降的顽固势力）借助英国军事运动对美国进行政治入侵。还有对新英格兰和纽约分离主义情绪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政府与社会中君主政治复苏的恐惧。

与英国的持续冲突犹如一面三棱镜，可以透过它解读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即使与英国有潜在的盟友关系，那也是为了与法国对抗，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出自对英国人的喜爱。杰斐逊不信任曾经的宗主国，以及那些幻想维护，甚至依赖君主政体及其外在光环的美国人，这些外在光环包括贵族出身、世袭爵位、永久的立法机关、常备

军、庞大的海军机构及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等。一旦觉察到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时，他会立刻本能而迅捷地做出反应，以免革命工作和制宪会议陷于险境。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如此强大，而其官员和军队又近在咫尺，这一切都使他忧心忡忡。

从杰斐逊当选总统至1809年卸任，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尤其是1783年在签署标志着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和约》期间，面对诸多可能性，难道他都表现得过分偏执，像个妄想狂吗？或许吧。难道他在不遗余力地散播阴谋论么？是的！妄想狂有时会臆造出假想敌，而阴谋也只有在实施的过程中流产才变得荒唐可笑。杰斐逊对“君主复辟”怀着深深的不安与焦虑，因为在他看来，“君主复辟”只不过是恢复大英帝国影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而且“君主复辟”也是对美国人谋求与众不同的自治事业的终结。幸运的是，杰斐逊的这种不安和焦虑被极少数人消除了，其中就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一个间谍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发的革命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会遭受多舛的命运，正如其他共和国所遭遇的那样。由此来看，杰斐逊凭借敏锐直觉将英国视为宿敌不足为奇，但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杰斐逊认为自己已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他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在杰斐逊看来，美国没有安全可言，独立革命的胜利仅仅标志着这场浩大、长达半世纪的战争中一次战役的结束。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到约翰·亚当斯的亲英立场，这些新英格兰的敌意明显对他的总统任期构成了威胁，他认为英国会威胁民主共和主义，他对政治生活正是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考量的。回顾历史，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杰斐逊似乎是多虑了——对于经历过那些岁月且承受过同样压力的人来说——但这些焦虑对他而言是不容回避的。

杰斐逊渴望伟大，那个时代的这幕大戏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而他也从未真正离开过。1803年，在他给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校友、革命同僚约翰·佩吉（佩吉是杰斐逊总统任期时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的信中写道：“时代剥夺了我们选择自由的权利，从而抽空了我们对学习的激情和宁静，然而时代为我们撒播下了一颗种子，孕育一个公平政府、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将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放弃自己的追求，肩负起这个时代的重任。”

他退休后归隐蒙蒂塞洛，回首以往的岁月、战争的阴霾、艰难险阻以及不屈的抗争，他自认尽职尽责。他向一位来访者谈起：“当我将步入人生的大道时，面对国家当时的处境，每一个忠诚的人都会竭尽全力。”杰斐逊曾说过，独立革命不过是一场“大胆和未能确定的选举……对我们国家而言，要么投降，要么战争”，他别无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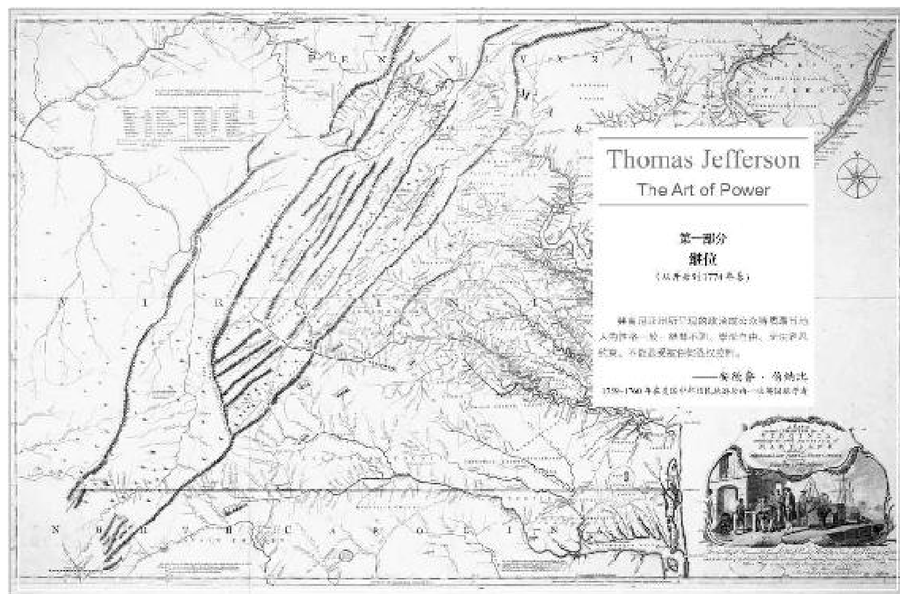
理解杰斐逊的起点不在康拉德–麦克蒙，不在总统府邸，甚至不在位于山丘上的他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在蒙蒂塞洛庄园之前，杰斐逊拥有另一座位于弗吉尼亚西南树林中的庄园。寻找托马斯·杰斐逊应该从那

里开始，它位于詹姆斯河支流里瓦纳河两岸，是一座已经销声匿迹，被称为沙德维尔的庄园。

[1]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2] 联邦党：美国共和党的前身。——译者注

[3] 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的前身，由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于18世纪70年代创立。——译者注



1752年，托马斯·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公布了和测量员约书亚·弗莱合作的成果：为弗吉尼亚州划定边界，并绘制了一张该殖民地的地图。

第一章
幸运之子

强健的身体让他拥有坚强的意志、自由的思想。

——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之父

彼得·杰斐逊是那种引人注目的人。一位仪表堂堂、富裕阔绰、受人尊敬的农场主。他力大无比、耐力惊人，远近闻名。在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境内及其周边地区，他拥有广袤的土地，蓄养着众多奴隶。在那里，他沿着里瓦纳河修建了沙德维尔庄园——以他妻子珍受洗礼的伦敦教区命名。

18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令年轻人、白人、男人、富人和弗吉尼亚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一个聚敛财富、保护私有财产、种植并出售烟草的时代。众多雄心勃勃的人——一群大胆的冒险家怀揣着对家园的渴望，受开垦农场、扩张土地和蓄养奴隶等财富欲望的驱使，纷纷涌向大西洋中部的广袤荒野。

在当地，彼得·杰斐逊是成功的测量师和富足的种植园主。托马斯·杰斐逊于1743年4月13日出生，身为长子，他深知自己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人。

彼得·杰斐逊勇气过人，精于马术，擅长打猎。托马斯·杰斐逊回忆，他的父亲曾一个人推倒了一间木棚，而三个奉命将其拆毁的奴隶都没能撼动分毫。据说还有一次，他父亲独自一人竖立起两个单体重量1 000磅[4]的烟草大桶，简直是神奇非凡、不可思议！

父亲的声望对儿子影响巨大，他对父亲怀有一种崇敬的眷恋之情。杰斐逊曾写道：据父系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威尔士的斯诺登山一带，那里是英国海拔最高的地方。其他有关这个家族起源的一切都已消逝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同斯诺登山的联系是关于杰斐逊这个颇具声望的古老家族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的唯一记述。那里即便不是家族的诞生之地，也是其力量的源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托马斯·杰斐逊一步步获得了权力。有父亲作为榜样，杰斐逊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很明确：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还要注意的是，要能够逐渐适应权力，有责任、有担当。杰斐逊学习能力过人，求知欲很强，他既务实，又肯钻研；既足智多谋，又善于分析。

杰斐逊很早就通过行动而不是理论，懂得并领悟了忍耐和随机应变

的重要性，正如他父亲所希冀的那样。杰斐逊10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了他一把枪，让他独自一人在沙德维尔的树林里生活。杰斐逊要证明自己能够独自在野外生存才能回家。

起初，考验并不顺利，他一无所获，没能猎到任何东西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片树林是禁入区，周围的一切（树木、灌木丛、岩石和河流）都让他感到恐惧和沮丧。

但他拒绝放弃或认输，像一名坚守的战士等待着好运降临。他的家人是这样记述的：“终于，他把一只野火鸡关进了围栏，用吊袜带把火鸡捆在树上，给了它一枪，然后扛起火鸡凯旋。”

这次丛林考验倒是预示了杰斐逊一生的命运：碰到阻挠时，他能够勇往直前；遭遇意外时，他可以转危为安；取得胜利时，他享受成功的喜悦。

杰斐逊先后得到父母和教师的悉心教导：作为一名绅士，他应当尽责于家庭、帮助邻里、尽职于自己的郡县、服务于自己的群体，尽忠于国王。在弗吉尼亚，家族的长子在成人后要肩负起家族的重任，使众人遵从于他。杰斐逊逐渐长大，他深信，掌控他人的命运是这个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生而为领袖，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1612年，杰斐逊家族从英国移民到弗吉尼亚。在这个新世界，这个家族很快变得兴旺显赫、声名鹊起。1619年，詹姆斯敦召开议会，杰斐逊家族一名成员当选议员。未来总统的曾祖父是一名种植园主，娶了查尔斯城县一位法官的女儿，并在约克镇从事买卖地皮的生意。他于1698年去世，留下了包括土地、奴隶、家具和牲畜在内的诸多遗产。他的儿子，未来总统的祖父，也名为托马斯，在殖民社区里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加显赫，拥有一匹赛马，担任亨利科县的治安官与和平法官。他把财产同样也传给了儿子彼得·杰斐逊：一栋豪宅、银质的餐具和大量昂贵、坚实的家具。作为民兵队队长，托马斯·杰斐逊的祖父曾用烤牛肉和珀西科酒款待上校威廉·伯德二世——弗吉尼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彼得·杰斐逊于1708年出生于切斯特菲尔德县，他在其父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彼得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数学教授约书亚·弗莱一同绘制了第一幅弗吉尼亚的权威地图，并穿越了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这个显著的成就要归功于他深厚的知识积累。托马斯·杰斐逊写道：“父亲的学识被忽略了，其实他意志坚强、判断敏锐、渴求知识，他阅读很多书籍提升自己。”通过自学，彼得·杰斐逊成为民兵队长、教区代表和弗吉尼亚州下议院议员。

在界定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边界线的远征中，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开拓英雄。家族史记录者是这样记录的：穿越蓝岭时，彼得·杰斐逊和他的同伴日间击退了野兽的袭击；夜晚，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树上轮流休息。

食物匮乏、筋疲力尽、晕倒昏厥，这支队伍蹒跚前进。靠生食动物的肉，彼得·杰斐逊才得以生存了下来，直到工作结束（也许正如家族史里所记载的，吃掉能找到的所有可维持生存的东西）。

托马斯·杰斐逊在父亲的光环下成长，彼得·杰斐逊去世时，托马斯·杰斐逊只有14岁。父亲很强大，能做到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他通过自己的意志、体魄的力量，改变了周遭的世界。勘探者定义新的世界，探险者征服未知世界，绘图者勾画这个世界。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心目中，父亲彼得·杰斐逊三者兼备，是一位神一般的人物。托马斯·杰斐逊崇拜父亲的力量，并且一生都在追述这位英勇的长者的故事。托马斯·杰斐逊的曾孙女讲述道："我的曾祖父对自己父亲性格中高贵的品质充满了子孙对先祖的由衷的崇敬与钦佩。"父亲深深地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而托马斯·杰斐逊也竭尽全力扮演同父亲一样的角色。

彼得·杰斐逊婚姻美满，娶了弗吉尼亚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子。1739年，他同1721年出生于伦敦的珍·伦道夫喜结连理，她的父亲艾夏姆·伦道夫是一名庄园主和海军上尉。珍同父亲居住在古奇兰县的丹吉内斯带有私家花园的府邸里，拥有巨大的产业。

伦道夫家族的殖民起源可以追溯至1642年从英国移民而来的亨利·伦道夫，他与一名下议院议员的女儿结为夫妻。亨利·伦道夫发迹于弗吉尼亚，在亨利科县担任官员，同时还是下议院的一名职员。1669年，他返回英国，据说，他很轻易地说服了年轻的侄子威廉与他一同前往弗吉尼亚。

威廉·伦道夫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外祖父就这样各自于1669年和1674年来到了新世界，具体年份说法不一。后来，威廉同样也在弗吉尼亚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就接替了叔叔在亨利科县的职务，并不断获得大量土地。作为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伯克利勋爵的助手，威廉·伦道夫很快在航运业、烟草种植业和奴隶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威廉之所以家喻户晓，源于他位于詹姆斯河土耳其岛的辉煌华丽的府邸。威廉同他的妻子玛丽·艾夏姆·伦道夫（詹姆斯河百慕大种植园园主的女儿）生育了10个儿女，有9个存活了下来。一位1779~1780年前往弗吉尼亚游览的英国旅客，托马斯·安布雷这样记录道："伦道夫家族人口众多，像苏格兰氏族那样，他们因众多的府邸而声名显赫。"正如伦道夫历史学家乔纳森·丹尼尔所记载，其中包括查茨沃斯庄园的威廉、特可侯庄园的托马斯、威廉斯堡塔兹韦尔庄园的约翰先生、克勒斯耐克的理查德、朗菲尔德的亨利、布雷默的爱德华。还有丹吉内斯的艾夏姆，杰斐逊的外祖父。

身为上尉和商人，托马斯的外祖父往返于新旧世界。大约在1717年，他迎娶了一位极为标致的英国女人：珍·罗杰斯。他们居住在伦敦和弗吉尼亚古奇兰县的府邸里。

1737年，一位商人形容托马斯·杰斐逊外祖父这个家族“是一群温和有礼、穿着考究的人”。杰斐逊的母亲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颇以自己拥有高贵的英国血统而骄傲。她继承了“祖上苏格兰莫里伯爵的爵位，这个家族与许多英国和苏格兰显赫皇亲贵胄有着血缘或联姻的关系”。

这个家族的威廉·伯德二世（据说他修建了一座佐治亚种植园府邸威斯多佛，位于里士满南部的詹姆斯河上）拥有的财产较杰斐逊家族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段关于伯德二世1711年2月寻常一天的描述让人们感受到托马斯·杰斐逊出生之前的数十年间弗吉尼亚的精英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 早上6点起床后，阅读了两章希伯来文和一些琉善著的希腊文书籍。祈祷后，早餐喝了些热牛奶。餐后，练了会儿舞蹈，就去砖房查看奴仆堆积木板的劳动情况，发现他们懒散懈怠，厉声威吓了一顿，并没有鞭打他们。天气很冷，外面刮着东北风。给英国的亲友写了封信。之后阅读英文书籍到12点，这时邓恩夫妇来了。午餐吃的是煮牛肉。下午我和邓恩先生玩了会儿桌球，然后我们在种植园里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之后查看了所有生意……晚餐吃了些面包和乳酪。

无论是靠近大西洋的东海岸地区，还是森林覆盖的蓝岭山丘，杰斐逊的诞生地弗吉尼亚给予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位游览过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英国游客注意到，“较之于其北方的邻居，这些更加宽容的殖民地区……给予年轻人更多柔和、安逸的娇宠”。孩子们从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包括小步舞和名为“乡村舞”的舞蹈。卡特家族庄园位于阿尔伯马尔以东大约100英里[5]，一名家庭教师这样描述在庄园诺米尼大厅所上的课程，也就是年轻的弗吉尼亚年轻人跳舞的场面，他说：“实在是美得令人赞叹。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绽放出最美的一面，和着优美音乐的节拍，轻盈起舞。”

托马斯·杰斐逊出生在殖民地的上流社会，成长于一个富裕、有教养、交游广泛的家庭。他们用银器进餐，优雅跳舞，时常大宴宾客。

彼得·杰斐逊的书房在房子的一楼（一楼共有4个房间），他在一张樱木桌上办公。他的藏书包括莎士比亚、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瑟夫·艾迪生的著作和波·德·索尔亚斯·拉平的《英格兰史》。托马斯·杰斐逊写道：“我年轻的时候，着迷于历史书籍和游记。”尤其是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和约翰·奥格尔比的《美洲》，这两本书为年轻的杰斐逊提供了一条通往更加广阔的世界的文学走廊。彼得·杰斐逊的孙辈回忆起祖父时说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祖父就对游戏等消遣不感兴趣，而是非常喜爱阅读，他从没有闲坐、无所事事的时候。”

对于富裕的弗吉尼亚白人而言，生活是悠闲惬意的。“父亲时常拜访

一位挚友，二人一同进餐、共度夜晚，第二天又一起进餐，晚上才会返回沙德维尔。”托马斯·杰斐逊回忆道，“这位挚友也以同样的方式回访父亲。每周都如此，这样一来，你瞧，一周之内他们就会共度4天。”食物精致丰盛，美酒香醇甘洌，朋友愉悦惬意。

杰斐逊认为自己最初的记忆始于马背上。一名骑马的奴隶用手托抱着他，小杰斐逊的身下还有一个枕头，就这样赶了很长时间的路：一个白人幼主被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照看着。那时杰斐逊不过两三岁。他们举家赶往特可侯——沙德维尔西南方60英里的伦道夫府邸。特可侯的主人，珍·伦道夫·杰斐逊的堂兄威廉·伦道夫刚刚过世。弥留之际，鳏夫威廉·伦道夫请求彼得·杰斐逊这位“敬爱的、忠实的朋友”，赶到特可侯处理自己的后事，并收养自己的3个孩子，彼得·杰斐逊均一一做到了。（威廉·伦道夫和彼得·杰斐逊关系极为亲密：彼得·杰斐逊曾经从伦道夫手中购买了400英亩[6]的土地——沙德维尔所在之地，花费仅仅是饮下亨利·韦泽布诺恩最大号的碗所盛放的朗姆潘趣酒！）

托马斯·杰斐逊在伦道夫的府邸生活了7年，自威廉·伦道夫过世后，年仅两三岁的托马斯就生活在那里，一直到他年满9岁或者10岁。

彼得·杰斐逊可以从伦道夫庄园（他将此处管理经营得很好）很轻松地赚到自己和家人吃穿用度所需的费用，那些年他在特可侯为离世的朋友履行职责，而对自己位于阿尔伯马尔县的土地却疏于管理。在此期间，彼得·杰斐逊曾多次外出考察，这意味着他长时间远离家园，远离身处特可侯的妻子以及伦道夫和杰斐逊家族的亲人。

成年后的托马斯·杰斐逊不喜冲突的性格应该根源于在特可侯与伦道夫家族一起居住的日子。尽管托马斯·杰斐逊是父母彼得和珍·杰斐逊的长子，但在别人家寄居多年对他的性格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可侯财产的继承人、年长两岁的托马斯·伦道夫与他年龄最相仿，是否因此造成了年幼的孩子们之间的差别无从考证，但杰斐逊从小就不愿与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在特可侯生活的日子让杰斐逊养成了在与人面对面交往时谦和礼让的性格。

当杰斐逊还在特可侯生活，而且仍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蓄奴的弗吉尼亚地区生活的复杂性。数十年后，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写道：“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整个交易是一场充斥着狂暴激情的永久运动，是奴隶主对奴隶经年累月的专制，是奴隶对奴隶主屈辱的服从。”作为孩子，看到这些就会去模仿，因为人是一种善于模仿的动物……在一旁的孩子看到双亲对奴隶的暴虐，便会模仿这种暴虐，并将其施加给身边卑微的奴隶。在这种纵容暴虐性格的环境下成长、受教育、每天施虐，怎能不养成令人憎恶的品性？

特可侯是杰斐逊与众不同的短暂童年时光的场景所在。他盼着课程早点结束，逃课溜走并躲藏起来，心里不断祷告着快点放学，可祷告并没有奏效。他更愿意相信：正统的基督教名不副实，根本就不像教徒们

所宣扬的那般。

1752年，杰斐逊举家搬回到沙德维尔，这个种植园由母亲珍·伦道夫·杰斐逊掌管。母亲同传奇的父亲彼得·杰斐逊一样对小杰斐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深深影响着他。

显然，珍喜欢按自己的判断行事。她有学识、善交际、偏好雅致的事物，从精致的盘子餐具到制作精良的桌子和考究的服饰。她默默地忍受着亡夫之悲，勇敢地面对丧子之痛，坚强地克制情感，隐忍不发直到终老，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她所喜爱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热爱的生活之中。

她的长子托马斯·杰斐逊，长大后成为一位果敢、适应力极强的贵族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杰斐逊面对家庭悲剧时的果敢，以及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管理领地和人民的决心，都要归功于母亲。从母亲身上他懂得了怎样坚强面对生活的风暴。

丈夫去世后，珍·杰斐逊不仅是沙德维尔的女主人，而且是真正的管理者。她时年37岁，是8个存活下来的孩子的母亲——长女珍，17岁；长子托马斯，14岁；最小的是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她的玄孙女后来讲述了一个家族传说：杰斐逊太太是“一名有极其透彻和深刻领悟力的女人”。她必须管教孩子、管理沙德维尔等千头万绪的事，还有66名奴隶和至少2 750英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蒙蒂塞洛的1 000英亩土地）。从沙德维尔存留下的家谱得知，珍·杰斐逊是一个细致的记录者（托马斯·杰斐逊也继承了她的这个习惯）。

死亡、火灾和家人的不幸遭遇接踵而来。珍的8个孩子中，托马斯的姐姐伊丽莎白是残疾人。“我们生命旅程中最大的财富就是时常遭受的灾难和困苦，尽管我们深受其折磨。”杰斐逊曾写道，“但正因如此，才锤炼出我们坚强的意志抵御这些悲剧。战胜灾难和困苦应该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课程和修炼。”托马斯的母亲顽强地经受住了多重磨难的考验。同母亲一样，托马斯也坚强地面对着生活的磨炼。

作为女族长，杰斐逊夫人发明了一套与雇工、奴隶相处的好方法。“她是个令人愉悦、充满智慧的女人，同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其他弗吉尼亚女性一样，身份高贵……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女管家。”她的一位曾孙女评价道，“她和蔼可亲，温柔体贴，充满活力，性情令人愉悦，还非常有幽默感。她喜爱写作，尤其是写信，写得既轻松又意趣盎然。”

珍·杰斐逊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她丈夫在世时经常外出，而在其外出期间，特可侯和沙德维尔都交由她一人管理。1770年沙德维尔被烧毁后，珍·杰斐逊并没有举家搬迁、一走了之，而是努力重建家园，她的坚毅可见一斑。蒙蒂塞洛之所以能够成为儿子托马斯·杰斐逊的庄园，在某种意义上应当归功于她，因为这位伟大的女性总是能够按照期望将现实

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

77岁时，托马斯·杰斐逊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传记，只在描述父亲时提及母亲。有关父亲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是这样描述的："父亲出生于1708年2月29日，1739年与艾夏姆·伦道夫的女儿、19岁的珍·伦道夫通婚。伦道夫家族定居在古奇兰县的丹吉内斯，艾夏姆·伦道夫是伦道夫家族7个儿子中的一个。"然后，他描述了作为测量员和绘图员的父亲。托马斯写道："父亲于1757年8月17日去世。我的母亲寡居至1776年离世。他们养育了6个女儿和2个儿子，我是长子。"

在母亲离世数月后，杰斐逊在写给英国伦道夫亲戚的一封信件里简短地谈到母亲，并记录了他付款请牧师操办母亲的葬礼。除此之外，现存的托马斯的其他记述中，再也没有谈及自己的母亲。

1770年沙德维尔遭受的大火让母子二人来往的信件都化为灰烬，而两人后来的信件显然都被杰斐逊自己销毁了。一代又一代的传记作家猜测杰斐逊和母亲之间存在嫌隙。但杰斐逊母亲寡居的19年中，杰斐逊大部分时间住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因为那时候他已长大成人。杰斐逊夫人一直活到1776年，那一年托马斯·杰斐逊33岁，正在起草《独立宣言》。杰斐逊在沙德维尔居住期间曾离家求学,进行初期的法律实践。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大学毕业后，已是年轻律师的托马斯称他所居住的房子为"我母亲的家"，这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疏离，甚至没有嫌隙。直到1770年11月，托马斯才搬到了他建筑在小山丘上的蒙蒂塞洛庄园，因为那时在遭受火灾的沙德维尔庄园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重建后的沙德维尔庄园比最初的小了很多。

杰斐逊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有女性的陪伴。在兄弟姐妹中，和他关系最亲密的是大姐，名字也叫珍。珍出生于1740年，是彼得和珍的第一个孩子。据说，小珍是弟弟"家里亲密的忠实伙伴，是知晓他所有年轻的心事的心腹好友"。

他们喜爱在树林中消磨时光，同样也都热爱音乐。珍为他演唱赞美诗，他们还一起合唱圣歌。"多少个夜晚，在家里的火炉旁；多少个轻柔的夏夜，在里瓦纳河畔，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伴着他的提琴独奏，歌声缓缓飘向远方。"他给予姐姐最高的评价是："我将永远视她为知己。"

托马斯9岁时被送去跟随威廉·道格拉斯牧师学习古典文化和法语。威廉·道格拉斯是古奇兰县特可侯附近圣·詹姆斯·诺瑟姆教区的教区长。在5年的时光里，托马斯都和道格拉斯在一起，只有夏季除外。早熟的托马斯后来回忆道格拉斯"是个肤浅的拉丁语学家，对希腊文没有什么造诣。除了教我关于这些语言的浅显入门知识外，道格拉斯还教我学习法语"。

之后，杰斐逊在牧师詹姆斯·毛瑞的寄宿学校里求学。他把毛瑞描述为"一位得体的传统学者"。毛瑞教得极为出色，由浅入深地教授托马斯

古典文学。杰斐逊热情地回忆起他和毛瑞在一起的日子，不论是关于学习还是一起做游戏。很久之后，在一份写给毛瑞儿子的信中，杰斐逊希望他们能够再见一面，这样就“能够唤醒我们曾经沉浸于其中的青春记忆，回想起年轻时的风采、一起打猎的时光以及那时的所思所感。至少可以通过回忆，去捕捉那些青春闪光的瞬间”。

寄宿在毛瑞学校的快乐源泉之一是达布尼·卡尔，这位男同学成为杰斐逊年少时代最重要的朋友。卡尔出生于1743年（与杰斐逊同岁），来自路易莎县。这两个年轻人同样痴迷文学、热爱知识、陶醉于弗吉尼亚优美的风景。在沙德维尔，他们带着正在阅读的书籍，穿越遍布山丘的树林（杰斐逊后来称之为蒙蒂塞洛的地方），一起交谈，一同思考，然后到山顶附近的橡树下小憩。在那里，杰斐逊和卡尔结伴阅读，无所不谈。对杰斐逊而言，达布尼·卡尔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们可以互相启发彼此的心智。杰斐逊晚年回忆道，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人“拥有那么纯真的善良天性，谈吐和举止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轻柔和令人愉悦”。两个年轻人间相处的方式既强烈又严肃，仿佛他们的生命已交融在一起，为他们交往的时光蒙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他们相互约定：无论谁先离世，另一个人都要将逝者的尸骨埋葬在他们彼此钟爱的橡树之下。

在学校，詹姆斯·毛瑞培养杰斐逊接触文学、历史和古代哲学。在写于1762年的《论教育》一书中，毛瑞阐述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学习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观点，但像杰斐逊这样的年轻人是适合的。毛瑞写道：“如果有人想要在神学界、医学界或法律界成为知名人物，那么掌握几种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绝对必要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对那些想要谋求上流社会职位的人也至关重要，尤其对“那些生而为权贵、要代表国家发出声音、要封王拜侯的人”。

杰斐逊珍视他所受的教育，一般而言，教育是最为珍贵的，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会接受父亲给他安排的古典式的培养模式，这是除了物质财富外，父亲留给他的精神财富。

1759～1760年在查茨沃斯庄园度假时，托马斯·杰斐逊就快17岁了。他母亲的表弟彼得·伦道夫在詹姆斯河的府邸距祖传土耳其岛庄园并不遥远。在杰斐逊拜访期间，彼得·伦道夫建议杰斐逊前往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求学，这是除在牧师毛瑞监护下接受经典教育外最明智的一步。“去大学深造，”杰斐逊写道，“会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对我今后会更有帮助……并且像在这里一样，在那里也可以继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还可以学习数学等科目。”

威廉与玛丽学院录取标准并不复杂。根据学院规定，对投考学生的测试要求为“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愚笨和懒惰的考生不予录取。

杰斐逊既不愚笨又不懒惰，于是1760年，他离开阿尔伯马尔县前往

威廉斯堡。威廉斯堡是弗吉尼亚的首府、下议院的所在地，此外，这里还有剧场和客栈，以及一群可以永远改变杰斐逊生活的人。

[4]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5]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6]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第二章
什么决定了我的命运

>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启蒙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自由……并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即能够在一切事务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
>
> ——伊曼努尔·康德，《何谓启蒙》

> 我能告诉你最好的消息是，威廉斯堡因众多才俊云集而绽放光芒。
>
> ——佩顿·伦道夫

威廉斯堡是殖民地首府，这里非常适合杰斐逊。各种最新的理性思潮、弗吉尼亚的名媛绅士都汇集于此，包括教授威廉·史莫、律师乔治·威勒、州长弗朗西斯·福基尔和政治家佩顿·伦道夫。这些人对杰斐逊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还有充满趣味的消遣娱乐：杰斐逊赌马、猎狐、闲谈、求爱、跳舞。最重要的是，威廉斯堡有一种精神气质吸引着杰斐逊：政治的刺激和魅力。

对杰斐逊来说，这里是个美妙的世界，学院是弗吉尼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乔治·华盛顿从威廉与玛丽学院获得了勘测证书，其他校友还包括未来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未来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及17名弗吉尼亚的地方长官。

17～19岁时，杰斐逊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继续深造。之后又进出威廉斯堡学习了5年的法律。威廉斯堡同沙德维尔一样，对杰斐逊形成了永久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那些危机和平静的时刻，他的意念都会重回威廉斯堡，在所学的政治课堂上寻找方向，为探索的理念寻找指导。

学院生活围绕着雷恩教学楼展开。这座大楼建于1760年，是一座三层半的建筑，圆顶、砖墙结构，30年前又增盖了小教堂和地窖。东面围墙外是布鲁顿教区教堂，位于格洛斯特公爵街左侧，紧挨着通向总督府的宫殿草坪区。再往前一点儿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格洛斯特公爵在此任职，下议院和普通法院也在其中。后边不足半平方英里的地方，就是杰斐逊所在的弗吉尼亚的整个公共权力组织的所在地，到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没有路标，你也可以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观赏一下威廉斯堡一派公务繁忙的不凡景象。没有人比杰斐逊更喜欢这里。

对于杰斐逊来说，威廉与玛丽学院基本具备了大学生活的所有应有元素：阅读、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品位的教师，他们好像是从其他更富裕、更光明的世界来的使者。杰斐逊认为威廉斯堡是“美国有史以来礼仪和道德最好的学校”。

把他引入广袤森林又给予他前方指引的人是威廉·史莫，一位苏格兰平信徒及教授，给威廉斯堡带来了具有启发性的世界观。杰斐逊遇到史莫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史莫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只任职了6年（1758~1764年），正好与杰斐逊就读学院的时间一致。杰斐逊很崇敬这位史莫教授，他评价道：“遇到史莫教授是我今生的殊荣，或许是他决定了我的人生。威廉·史莫是苏格兰人，一名数学教授，对众多实用科学分支都很有造诣。他还具有与人顺利沟通的天分，正直、举止绅士，思维开阔、思想自由。”

史莫先生1734年出生于苏格兰，他比杰斐逊年长不到10岁，是学院外聘的数学教授，还临时担任道德哲学教授。一个同时代的弗吉尼亚人描述史莫是“一位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史莫住在学院的两间房间里。据说居住条件“一点儿也不雅致”，但史莫和他的同事“对陈设的朴素十分满意，尽管开始的时候嗤之以鼻”。史莫的房间里有6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座壁炉、一张床和一个床架。

相比起内部的装饰陈设，他们似乎对衣着更关注些。学院期望全体教员注重仪表，穿着俊美的丝绸外衣，仿佛去皇宫参加国王的生辰宴会，而这场宴会是所有英国绅士都想要出席致敬的。

史莫教授道德伦理、修辞学、纯文学和自然哲学（我们心目中的科学），还有数学。上午用于教学，下午则举行类似研讨会的环节，教授和学生就一些材料开展讨论，需要精通培根、洛克、牛顿、亚当·斯密的思想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史莫将新知识时代这一关键性的洞见灌输给了杰斐逊：在人类事务中，是理性值得我们骄傲，而非启示或毋庸置疑的传统和迷信。

在史莫的影响下，杰斐逊开始分享伊曼努尔·康德1784年对时代精神所下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康德写道：“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史莫就是这样将思想中的要旨精华传授给他的学生的，杰斐逊对此深深着迷。在之后的岁月里，当他回忆起史莫先生时，给予他最崇高的褒奖：“对我来说，他就像父亲一样……”

据说杰斐逊每天学习15个小时，每日天明即起，一直阅读到凌晨两点。在威廉斯堡时，黄昏时分，杰斐逊会跑到距城市一英里外的一块岩石处，以此锻炼身体；在沙德维尔时，他会划着自己的独木舟穿越里瓦

纳河，并攀上他称之为蒙蒂塞洛的山岭。对于杰斐逊来说，懒惰是一种罪恶。他曾告诉他的一个女儿："所有人类幸福的腐败中，它的腐蚀是最寂静无声的，然而却如此致命，好比一颗因懒惰而彻底腐坏的牙齿。"用于学习的时间是不容浪费的。"知识，"杰斐逊说道，"就是一种令人渴望和愉快的财富。"

同父亲一样，杰斐逊相信骑马和散步是美好的品德，认为精力充沛的身体有助于创造充满活力的头脑。杰斐逊曾说过："每天锻炼身体不得少于两小时，不要考虑天气。"事实上，杰斐逊认为下点儿雨、天冷点儿更好。"没有谁会因为受点儿潮就生病或受伤的，"他说，"不过就是洗了个冷水澡，不会让人感冒的。"凶猛的动物是最健康的，它们暴露在一切天气中，对人来说也是一样，那些最健康的适应能力最强。

他说一名有抱负的律师，早上应该专注地研究法律，但要善于变化和调整："首先进行适当时间的锻炼，将剩余的时间（我是说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分成3个部分：首先分给历史一部分，其余两部分应该稍短，分给哲学和诗歌。"

杰斐逊善于提问。在他的观念里，"技工也是一位懂科学的人，"一位后代回忆，杰斐逊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不管是车轮的结构还是对一种灭绝物种的尸体进行解剖"，然后回到家记录下所听所闻。很快，他就被称作"活动的百科全书"。

杰斐逊既热爱学习又热衷消遣。令人担忧的是，在学院的第一个学年，杰斐逊的花费巨大。19世纪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称之为"过于张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花费在好马匹身上的费用"，杰斐逊为此写信给一位监护人索要自己那份遗产份额，以偿还所有的账单。感到好笑而非恐慌，监护人拒绝了杰斐逊的请求。后来，杰斐逊写道："我经常混迹于赛马、玩牌、猎狐各种活动，还与科学、专业人士经常往来……在狐狸死去的狂热时刻，在钟爱的马匹获胜的时刻，在酒馆就某个问题雄辩的时刻……我常常问自己，我更应该追求哪一种名誉？驯马师？猎狐人？演说家？或是正直的国家权力的拥护者？"

事实上，这些事物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杰斐逊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在威廉斯堡多年的生活方式让他明白追求知识和追求快乐是可以共存的。威廉斯堡受欢迎的雷利酒馆有一则座右铭说得好："欢乐，是智慧和良好生活的产物。"

在总督府（而不是在雷利），杰斐逊深入细致地领会到了优质生活的艺术，其衡量标准是优雅的举止和交谈，这是他所珍视的两件事物。

弗朗西斯·福基尔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皇家官员，经常和威廉·史莫和乔治·威勒（弗吉尼亚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一起聚会。托马斯·杰斐逊是参与聚会的第4人，杰斐逊称之为福基尔的"固定搭档"。他们共进晚餐，交流思想，欣赏音乐。这些长辈培养了杰斐逊对小提琴的热情，杰斐逊会

应邀在福基尔的总督府音乐晚会上演奏小提琴。

福基尔出生于1703年，仅比杰斐逊的父亲大5岁，如果彼得·杰斐逊没有去世，也大致是这个年纪。这位总督喜爱科学、美食、音乐，而且热衷于玩牌。

福基尔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哲学家，他的行为世俗化，甚至有些放荡。有关福基尔到新英格兰上任，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他能上任是拜英国海军勋爵安森所赐。福基尔曾一夜之间就在牌桌上把全部家当都输给了安森勋爵，之后这位勋爵就环游世界去了。然而，无论怎么渲染这个故事，现今的情况是：处在敏感年纪的杰斐逊所遇到的这个男人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了他的博学。

福基尔的父亲是一名胡格诺派医生，在英国皇家铸币厂与艾萨克·牛顿先生一起工作，并在英格兰银行担任主任。福基尔也对科学兴趣浓厚，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英国南海公司的经理——由此证明福基尔具备了新旧英格兰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能力，这一点杰斐逊应该留意到了。

福基尔精力旺盛。1758年，在他刚到达弗吉尼亚的几周内，突然下了一场7月罕见的冰雹，冰雹砸碎了总督府北面的窗户。福基尔对此深感兴趣，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现象的科学论文，并火速发信给自己的哥哥，并让他呈递给了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

律师乔治·威勒出生于1726年伊丽莎白城县，同时还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在杰斐逊的眼里，他“鹰钩鼻子，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身材匀称”，精明博学，善于求知。史莫对杰斐逊思想的影响仅通过理论方式，相较之下，威勒的影响方式则更加直接。威勒教了杰斐逊5年法律及其他科目，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位长辈居住在布鲁顿教区教堂附近的一栋房子里，位于威廉斯堡的中心。杰斐逊回忆道：“威勒先生是我年轻时代忠诚和敬爱的导师，是我一生最真挚的朋友。”

在威勒家里，他们共度了1765～1772年的大部分时光。威勒使他懂得了自由和奢华。这位长辈品位奢华，派人去伦敦为夫人购买斗篷、天鹅绒马裤，为自己购买丝质长袜，还为他们共同购买了“一套雅致的桌子和茶具、不同尺寸的相同图案的碗具、雕花玻璃酒瓶和酒杯、一套玻璃的甜点餐具、4个中号和6个小号的盘具，以及……一辆漂亮的四轮轻便马车”。威勒一家还喜欢大宴宾客。杰斐逊曾满怀欣赏地记录过：“威勒夫人会将1/10非常昂贵的马德拉甜葡萄酒兑入马德拉白葡萄酒调制出一款美味的葡萄酒。”

在他的文学备忘录里，他曾摘录下碰撞出心灵火花的段落，杰斐逊引用诗人欧里庇得斯的诗句来描述与威勒在一起的日子：“没有什么比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更可贵的，无论是财富或皇权，拿这些令世人艳羡的东西与一位高尚的朋友相比是毫无意义的。”

1767年，威勒介绍杰斐逊到法院担任实习律师，开启了杰斐逊的法律生涯——1767~1774年杰斐逊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后因独立战争的需要，他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政治和外交。

当这些事耗费了杰斐逊主要精力时，审视他的生活和事业，不难发现杰斐逊的政治、外交才能源于总督府和那些穿梭于雅致、高天花板房间的人们的影响。亨利·兰德尔写道："在福基尔总督府，与优雅的上流社会人士频繁交往中，不仅让杰斐逊提高了才智，据说，还让他养成了优雅的行为举止，这一点让他一生都卓尔不凡。"

在之后的岁月里，杰斐逊不断从威廉姆斯堡那些长夜汲取精神和物质营养。当他在蒙蒂塞洛的圆餐桌旁、在巴黎的沙龙里、在公寓的房间里、在费城和纽约的酒店里以及最后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府邸里，杰斐逊渴望谈论最新的科学和艺术，热衷与漂亮的女人、政治家和推动新旧世界运行的国务人士交谈。

在杰斐逊的精英阶层里，还包括他的表兄佩顿·伦道夫。他是弗吉尼亚司法部部长、弗吉尼亚下议院发言人及大陆会议第一任主席。伦道夫出生于1721年，性格友好、令人印象深刻。康涅狄格州的塞拉斯·迪恩这样描写了初遇佩顿·伦道夫时的感觉："他友好，开放，举止从容，个子很高，但比例匀称……因形象出众获得了尊重和敬意，还拥有独立自主的高贵品格。"

史莫、威勒、福基尔和佩顿·伦道夫建立了杰斐逊判断他人的标准。他们代表着对风度翩翩朋友的喜爱、对精神生活的奉献和为了更高利益对政治职责负责执行的承诺。"每当遭遇困难和考验，"杰斐逊告诉他的孙子，"我都会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史莫教授、威勒先生和佩顿·伦道夫会怎么做？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确保获得他们的认可？"

以往的经验和心中的榜样总能给予杰斐逊以指导，他会思索这些阅历丰富的人——他尊敬和爱戴的人——在相同的境遇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杰斐逊认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起点，因此要不停地奋斗和超越。

为了追求这个高起点，杰斐逊从未切断自己和当代社会、文化潮流趋势的联系。在学院放假期间，杰斐逊便显露出弗吉尼亚人好客的天性，经常在沙德维尔庄园款待宾客或拜访朋友的庄园。

某个冬天，杰斐逊去拜访汉诺威县的纳撒尼尔·丹德里奇上校，在上校的家里遇到了帕特里克·亨利，一个居住在路易莎县的年轻人。杰斐逊回忆他们在邻里的季节性狂欢节上共度了两周。亨利经常会流露出些许不太优雅的举止，他的爱好很琐碎，喜欢跳舞、爱开玩笑，但他有种独特的气质，每个人最终都会被他吸引。

杰斐逊会从社会角度来看待生活，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与身边的人密切相关。生活中少不了奴仆、家人和邻里，访客也会时常出现在身边。

在一封给孙女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深信要与这个世界不断融合并与之俱进，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杰斐逊是个纯粹的政治人物。与身旁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为社区的各种事务而奔忙，他享受这种处在事务中心、掌控一切的状态，却并不在乎身边的事物到底是些什么。他曾是威廉与玛丽学院神秘社团扁帽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但这个社团正如杰斐逊所说的："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与威廉斯堡的魅力相比，庄园的喧闹都已变得苍白。当杰斐逊不在威廉斯堡时，他渴望了解所有发生在那里的情况。杰斐逊在给大学同学约翰·佩吉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城里有任何新闻，比如哪些熟人谁去世了、谁恋爱了、谁跟谁结婚了，都一定要告诉我。"

18世纪60年代早期，杰斐逊与一名叫作丽贝卡·路易斯·伯韦尔的年轻女子恋爱了，她是杰斐逊在英国格罗斯特县的同学小路易斯·伯韦尔的姐姐。这场恋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是炽热的。一个不足20岁的年轻人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无非是些言过其实、令人心跳加速、浮华自夸的东西。与丽贝卡所有的通信中，他的幽默和自嘲大多单调无味，但这段经历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反映了杰斐逊对拒绝、混乱和批判的敏感。

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甚至连老鼠和雨水都在跟杰斐逊作对。1762年平安夜，杰斐逊像往常一样回卧室睡觉，他把笔记本、吊袜带和手表放在了一边。手表底下压着一张丽贝卡·伯韦尔的画像，这是杰斐逊唯一可以寄托情思的信物。

圣诞节早上醒来后，杰斐逊发现老鼠溜进自己的卧室，啃坏了笔记本和吊袜带，老鼠在圣诞夜离杰斐逊头部仅有几英寸[7]，更糟糕的是，雨水漏进了屋子，弄坏了他的手表和他珍爱的画像。苦恋中的杰斐逊认为这件事是可怕的预兆。

深陷苦恼的杰斐逊拿自己与乔布相比，思考着："这世上是否真的有幸福？"他的回答是："没有。"一个月后，1763年1月，来自沙德维尔的信中可以得知：杰斐逊仍旧很低迷。他在给约翰·佩吉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日复一日，让我感到苦闷压抑：早上起来吃早餐，之后是中餐、晚餐，然后上床睡觉。日复一日，昨天和今天没有一丁点儿不同。"

杰斐逊有很强的控制欲，同时也喜爱分享秘密："我们必须制订个计划，互相交流想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能告诉别人。"他写信给佩吉，彼此分享一些求爱、舞会的八卦和恋人用的小把戏。

在过去的一年里，杰斐逊对丽贝卡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强烈。9个月后，1763年10月6日，星期四，杰斐逊决定对丽贝卡表白。那晚，威廉斯堡雷利酒馆阿波罗大厅正举办一场舞会，大厅里灯火辉煌。

在这种优雅的环境下，杰斐逊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杰斐逊第二天写道："我做了很多准备：我先把要说的想好，然后组织成流畅的语言，还要用一种对方完全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与丽贝卡跳舞时，杰斐逊和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切都按计划在进行。

然而，当他设法表白时，思维却一片混乱。"我的天呐！"杰斐逊继续写道，"终于盼到一个表白的机会，但我根本连不成句，完全词不达意，呼吸急促，语无伦次，大脑彻底停摆！"

令他难堪的场面终于快要结束了。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又尝试了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与丽贝卡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计划（并没有成行）去英国旅游，但他的心还系在丽贝卡身上，只要丽贝卡需要的话，哪怕只有丁点儿需要。

1764年1月，他把表白的事情告诉了朋友约翰·佩吉。他彻底坦白自己对丽贝卡的心意，但略去了那段混乱尴尬的表白，好给自己留几分颜面："我没有逼问她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明确地表示还会问她相同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杰斐逊没有再问相同的问题——事实上，他和丽贝卡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失败的打击让他退却了。在遭受丽贝卡的拒绝后，他患上了头痛病，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压力一大就会持续头痛。

3月的一个夜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杰斐逊批评自己"太消极"，说他想娶丽贝卡的"计划"现在已完全泡汤，因为丽贝卡就要嫁给约克富有的杰奎林·安布勒，婚礼定在1764年3月。

之后，他未遮掩地暗示自己与女奴或女仆发生了关系，虽然尚不确定，但很有可能。杰斐逊写道："单身可以有很多快乐的抚慰。并不是因为出于本能的需要，而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也可以随时同威廉斯堡的女人或年轻女子作乐一番。信徒圣保罗说过，婚姻是扑灭心中欲火最好的方式。现在我认为，如果他确切地知道，上帝在末日审判时对任何人都非常友善——不管此人是以婚姻中夫妻关系方式扑灭欲火，还是以其他方式——那么，圣保罗应该真诚地建议人们按自己的需要行事。"

写下这段话时已经接近午夜了。他忍受着头痛的煎熬，将要燃尽的蜡烛照在朱庇特身上，这位杰斐逊的私人奴仆已经坠入了梦乡。也许是此时的亲密让他敞开了心扉，也许他只是在夸夸其谈，但说"上帝"给了他这样的人满足性欲的方式，一定是有缘由的，看来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方式。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杰斐逊希望自己能从失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幸运的是，他的教师和导师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这有助于他摆脱相思之苦。

[7] 1英寸≈0.025米。——编者注

第三章
革命的根源

服从宗主国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由来已久的信念局限了我们的思维，使它变得狭隘。

——托马斯·杰斐逊

对于杰斐逊来说，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就好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杰斐逊曾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日记：“我们要比敌人活得更长久。”在备忘录的同一页上，记录着他派人去伦敦为奴仆朱庇特购买夏装，还有给自己做背心的鲜红布料，此外还有一句警句：“不自由，毋宁死。”

让我们跟随杰斐逊回到18世纪60～70年代初，去看看美国独立战争的形成及其原因。自由的定义及代议制政府的性质——基本的人权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像杰斐逊这样年轻人的注意。在那几十年里，伦敦掌控着美国的殖民地。英国《航海条例》控制着贸易运输；费城的商人或阿尔伯马尔县的农夫都受制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没有政治发言权；英国总督可以召集如弗吉尼亚下议院这样的殖民地议会，也可以否决任何立法，并有权随意解散会议；北美直接选出的英国代表没有资格参加英国议会。

在杰斐逊成长的年代，这些争端的范围和重要性逐渐扩大。1754年，杰斐逊还不满12岁，纽约举行了奥尔巴尼会议。在会议上，北美殖民地居民制订了一个提案，即大众熟知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联邦皇家总督管理下的庞大自治省。计划的起草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特别指出：因为北美殖民地居民认为计划太专制，而英国方面又认为它太民主，计划最后流产了。

当杰斐逊14岁时，他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波·德·索尔亚斯·拉平的《英格兰史》，一本揭示了美国革命根源的书，因为美国18～19世纪的历史与英国17世纪的历史密不可分。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来自英国各地,他们大多也熟悉英国历史，这些人明白政治生活就是与统治阶级不断做抗争以维护个人的自由。

受到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影响，杰斐逊认为历史是“哲学教学的实例”。因此，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一代重新上演。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

拉平的历史书于1723年首次出版，这本书里讲述了英国的历史故事

（英国人民对暴政进行的反抗，如今在美国再度重演），其中包括君主政权与（相对来说）人民主权之间的抗争：辉格党倾向于议会及人民，托利党则倾向于国王。杰斐逊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他得出结论：任何社会都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

英国内战、王朝复辟及光荣革命影响了美国人对生活和政治的看法。在拉平、博林布鲁克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历史被描写成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博弈。在17世纪的英国，民众起来反抗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专治暴政，其中不乏贵族，引起了骚乱。奥利佛·克伦威尔为首的当权的共和国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之后复辟（这引起了更多政治和宗教的斗争），最后于1688年爆发了光荣革命，迎立玛丽和其夫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坐上王位的一个条件是：威廉和玛丽支持通过《权利法案》，限制君主滥用个人和议会的权力。通过1689～1701年出台的宪法条款，英格兰建立了新秩序并限定君权，从而保护自由。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美国人被笼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7世纪宗主国因暴政曾引起了民众及贵族的抗争。安全只存在于混合政府，行政机构对英国来说就是君主，应该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制衡（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人想要的是一种互相制衡的体制，他们开战要反抗的是缺乏公平和民主的政府。

由于自己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杰斐逊支持美国进行抗争。彼得·杰斐逊图书馆收藏了拉平所著的多卷《英格兰史》，体现了祖辈们的世界观，而托马斯·杰斐逊将把这种世界观推向大西洋世界的中心。早期杰斐逊传记的作者亨利·兰德尔在书中描述杰斐逊是“坚定的辉格派，他遵循某种民主的（取‘民主’一词广为人知的含义）概念和准则，并将其传给子孙”。

更为稀奇的是，托马斯·杰斐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阅读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并成为该书理论的追随者。该书阐述了英格兰起初是由热爱自由的撒克逊人迁移建立的，这群热爱自由的人不甘于“征服者”威廉的君主制封建势力的压迫。根据这一观点，美国人是撒克逊个人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是这个传统长期受到压制。

杰斐逊和他的革命同僚站在相同立场，他们1775年领导了独立战争，1776年发表了《独立宣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身为英国后裔却享受不到与英国居民相同的权利。在1764～1774年的10年间，也就是在抗税运动和革命前夕，杰斐逊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保卫个人自由不受侵害，并反抗将光荣革命成果据为己有的英国代表。每一项来自伦敦的提案、每一项税收、每一个帝国权威的标志，都唤起美国人对暴政的恐惧，因为这些17世纪的提案、税收和皇权表现已经引发了内战和复辟时期的宗主国国内的暴政。

随着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也被称为“七年战争”或“帝国伟大战争”）的结束，英国有关税收和代表权的争论获得了新的力量，当然，这其实是有关自由和管理权的争论。

战争争端于1759年在亚伯拉罕平原结束，然而结盟的法国与印第安一方和英国与美国的另一方在新旧世界又展开了一场有关金钱和权利的冷战。

帝国的花销是巨大的，“七年战争”结束后，伦敦统治的帝国疆土庞大得惊人。简言之，伦敦需要大量资金，所以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承担更多英国领土的维护费用。有约一万英军驻守在北美，这就意味着普遍的威胁，军队既可以解放和保护，也可以攻占和征服。

英国殖民当局如今更加深入美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命运。美国人谨慎地观察到这一切,担心专制近在咫尺。英国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之前，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战后，俄亥俄山谷地区印第安部落起义反抗英国驻军，这之后，英国议会赋予国王随意处置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土地的权力，此举尤其损害了弗吉尼亚土地投机家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战前，英国议会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航海条例》管制贸易；战后，为了减少发生在美洲殖民地的走私活动,英国议会制定了“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允许政府登上并搜查殖民地船只，此举尤其激怒了波士顿民众。

美国南部和西部民众因土地和印第安人感到愤怒，东北部民众因“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而感到担忧。1764年颁布的《食糖法》激怒了整个殖民地民众，其中包含了严格执行此法案的相关机构。尽管该法案实际上降低了糖浆的税收，但在其他物品上增收了关税（包括马德拉白葡萄酒，年轻的杰斐逊最钟爱的一种酒）。《食糖法》还试图在“七年战争”后建立一个原则和开创一个先例，用法律语言来描述的话，即“在大英帝国下辖的美洲地区提高税收是正当且必要的”。

1764年3月9日星期五，殖民当局下议院，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一位在1763～1765年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辉格党派政治家，继宣布《食糖法》后，又提出了在殖民地实行《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执照及新闻纸类甚至毕业证书都要缴纳印花税）。格伦维尔告诉下议院，他期望国会对辖地领土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控制力，提高或征收任何税收，不希望遭到争议。

然而，争议是存在的，而且必然存在。美国民众都在争先恐后地阅读马萨诸塞州詹姆斯·奥蒂斯律师撰写的《英格兰殖民地宣称的和证实的权利》一书，这本1776年的小册子与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类似，为美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1764年秋，奥蒂斯的观点在殖民地广为流传。这时，在威廉斯堡，乔治·威勒向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抗议税收的请愿书。有些议员认为该请愿

书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不忠之嫌，所以向威勒这个杰斐逊最亲近、最崇拜的人暗示，这一断然的看法可能会导致战争。

1764年弗吉尼亚决议总结了反英立场的精髓，并将其呈送给了英王及议会："不经殖民地同意，不得擅自征税；非合法选定代表不得擅自征税。"弗吉尼亚决议在伦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英议会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决议。《印花税法案》于1765年3月22日星期五通过。

遭遇戏剧性尴尬结局的弗吉尼亚决议风波是杰斐逊第一次亲历的政治争端。弗吉尼亚关于如何应对《印花税法案》的争论包罗万象：情绪化的言辞、帝国的压力、代际划分以及立法手段。

在这个利害攸关的时刻，将这些原则和想法改善并应用于现实世界，这其中就包含了最初的政治和人类的谋略。对于这场斗争来说，这正是一个完美的试验场所，而这场斗争又与杰斐逊息息相关。

弗吉尼亚下议院大多数成员想采取反对议会权力主张的立场。但美洲人究竟能将殖民地及个人的辉格党解释权利推行多远？1765年3月30日星期三，帕特里克·亨利在下议院慷慨陈词地抨击英国暴政的演说，引起了杰斐逊的关注。在1765年的关头，甚至对于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激进人士来说，想向大英帝国宣传也是不切实际的。

下议院春季会议已进入晚期。许多议员已经离开威廉斯堡回家了。杰斐逊后来回忆道："我那时还是个学生。"而当时，杰斐逊则在一旁观察他们的举动。共有7个人进行了反《印花税法案》决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帕特里克·亨利，这名自学成为律师的人正在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大胆的举措。而杰斐逊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纳撒尼尔·丹德里奇的府邸。

杰斐逊站在下议院门旁，惊奇地聆听亨利的演讲：实在是振聋发聩！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根据留存下来唯一一份当时的会议记录，亨利激昂地讲道："有塔克文和恺撒就有布鲁图，有查理一世就有克伦威尔，有乔治三世就有亨利！毫无疑问，一定会有可敬的美国人为祖国的荣誉而肝脑涂地！"杰斐逊听得热血沸腾，这样评价亨利："他的讲演如荷马史诗般具有感染力，雄浑有力。"

一位和杰斐逊一同在场的法国旅游者记录道，当下议院议长听到亨利援引布鲁图和克伦威尔时，冲着亨利叫喊着"大逆不道"！

亨利让步了。根据这位法国旁观者的记述，亨利说道："那么我请求各位的原谅，我会效忠英王乔治三世陛下，直至最后一滴血，但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为的是保护祖国奄奄一息的自由精神。"

对于亨利的决议，下议院分裂成两派，彼此的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杰斐逊形容现场"十分血腥"。有关审议的记录十分有限，但亨利的演说大致如此。显然，"第五号决议"的框架是亨利提出的：

弗吉尼亚议会表决通过，只有议会拥有对该地区征税的权利和权限，试图将此权利和权限授予上述议会外的其他人员的行为将被视为破坏英国及美国的自由。

然而，佩顿·伦道夫等人想暂时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但亨利激进的“第五号决议”竟以十分微弱的20票对19票通过了！伦道夫得知结果后说道：“我的上帝，我宁愿花500基尼买一张选票。”如果再有一张反对票就会成平局，而议会发言人约翰·罗宾逊应该会投反对票，让“第五号决议”搁浅。

然而，激进派赢得了胜利。针对伦敦的相关会议记录并没有烦扰到温和派，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帕特里克·亨利已经建立起了成功的基石。

夜幕降临威廉斯堡，亨利离开了首府。他获胜了，或许他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早晨——1765年5月31日星期五，杰斐逊迫不及待地返回下议院。昨天的激战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早早抵达了会议厅。然而他发现了更早到来的另一位伦道夫表兄——彼得·伦道夫，他已经开始工作了。伦道夫正在查阅下议院的记录，想找到在议会会议期间如果议员发生分歧时应该如何处理的先例：他想要以此为借口废除“第五号决议”，击败亨利，重新夺回下议院的控制权。

于是，杰斐逊无意中成了有人要推翻前一日决议结果的见证人。约一个小时后，下议院又重议了该项决议，并撤销了前一日的决定。亨利的离开留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虽然有关下议院5月31日《印花税法案》的重议结果静静地躺在记录本里，但这场内讧的惊心动魄却让人心有余悸。总督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在写给商务部的信中将它形容为“下议院一个小小的修改”——想必是因为亨利的离开——“有人想要攻击他人的决议……‘第五号决议’是最具冒犯性的，因此予以撤销。”

这件事引发了杰斐逊的思考：亨利究竟该被视为伟大民主的自由捍卫者，还是精英管理阶层的瘟疫？杰斐逊认为应该永不放弃政治斗争，也不回避使用任何手段获得胜利。仅仅22岁生日的6个星期后，杰斐逊就进入弗吉尼亚下议院这个权力错综复杂的地方开始了实习工作。这个星期四，亨利荷马史诗风格般的演讲振聋发聩，唤起他内心对辉煌自由的渴望，并让他断定交予国会任何控制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区的权力都无异于“摧毁美国的自由”。

于是星期五，他就亲眼看到了前一天落败的温和派抓住机遇，灵活机变地反败为胜。决不放弃，亨利的政敌既警觉又足智多谋，趁亨利离开之机，查阅记录寻找先例，为扳回败局找到了堂皇却确凿的理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也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立法程序），这样才能具备充足的能力获得期望的结果。在此后的岁月里，杰斐逊无论何时

都能抓住意外的政治机遇而扭转乾坤，全是拜这次经历所赐。在威廉斯堡的5月末，他亲身经历了整个内讧夺权事件。

福基尔也感觉到局势在发生着变化。在随后的星期二，1765年6月4日，福基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诞辰晚宴，借此向乔治三世致敬，这是威廉斯堡一大壮观场景。然而今年却盛况不再。“去那里本想能看到不少显贵，”一个无名的法国旅行者写道，“但让我失望的是那里总共就没多少人。在晚餐前我便索然离去了。”

因《印花税法案》下议院展开的内讧夺权事件，是杰斐逊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公共事件，他十分珍惜这次经历，从中懂得了精心的谋划可以反转乾坤、转败为胜。他知道精心的谋划不仅需要头脑，还需要安定从容的说服力。

里瓦纳河段不可通航，船只无法将满载的粮食从阿尔伯马尔县运到集市上。登上一条小舟，杰斐逊开始寻找可以运输的航线。

杰斐逊和朋友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沿着河岸划行，河边的景色“自然又美妙”。杰斐逊发现移除弥尔顿瀑布下的岩石可以改变里瓦纳河的流向，这样满载粮食的船只就可以通行到集市。除了个人出资，杰斐逊还成功地募集到散户资金实行这个计划。1765年10月，殖民议会赞扬杰斐逊做了一项“值得称赞的、有益的”工作，并授权其“清理詹姆士河段的瀑布、奇克哈默尼河段及詹姆士北部支流”。

杰斐逊兴奋不已。他效仿父亲留下的传统，在杂乱中创造了秩序。他所做的不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小事，还因此受到了肯定和嘉奖。

对于杰斐逊来说，威廉斯堡《印花税法案》斗争的11年间，里瓦纳河段通航工作及1776年费城《独立宣言》，是他走向稳定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在智力、政治还是情感上。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曾经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从忠诚的拥护者转变为革命者，这揭示了杰斐逊不仅是个实用主义者，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他明白，利用哲学和历史创造情感诉求影响公众情绪是很重要的。

杰斐逊已具备非凡的领导能力，这意味着他懂得了怎样把复杂的事物提炼成易于理解的信息，从而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深入人心。1776年，杰斐逊帮助一个马里兰出版商，威廉·林德在威廉斯堡创办《弗吉尼亚州公报》，来制衡约瑟夫·罗伊尔、约翰·迪克逊和亚历山大·珀迪把控的报业。“直到革命斗争的初期，”杰斐逊回忆道，“我们都没有一家自己的报刊，所有的报刊都是政府控制的。如果我们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制衡政府的言论。”

杰斐逊着迷于御人之术，他不仅从书本上学习政治艺术，还在威廉斯堡和阿尔伯马尔县的具体工作中进行实践。他不善于公众演讲，但崇拜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天才演说家。沙德维尔对于来往威廉斯堡的各色行者来说，是个便利的落脚点。这些行者当中就包括切罗基族首领奥

塔斯特，他1762年横渡大西洋是为参见乔治三世而来。“那是个月圆之夜，”杰斐逊回忆道，“渡轮上的奥塔斯特似乎在为此番航行进行祈祷，同时也祝福远在故乡的家人一切安好。他声音洪亮清晰，行动活跃，围坐在炉火旁的随从沉默不语。尽管我听不懂他的言语，但感受得到空气中弥漫着敬慕的气息。”

说到语言表达能力，杰斐逊知道他绝不可能与这样的人相媲美。正因为洞见了这一事实，他着重培养自己感化他人的能力。他深入研究了审议机构的套路，学习如何快速写出得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信件，这在革命期间尤为重要。

杰斐逊专注于与他人愉悦沟通的微妙技巧，首要的是善于赞美他人，还要仔细聆听他人的愿景和观点。政治家经常说得太多，听得太少，这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太多例子证明：赢得朋友不是靠说服他们你的观点多正确，而是凭借你是否关心他们所想。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的言语令人着迷、富于启发性，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好的政客能够营造一种印象，就像阿比盖尔·亚当斯所形容的杰斐逊那样：让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到自己很独特。

杰斐逊的孙子这样描述祖父的人际交流策略：“他掌控谈话的能力超群，总是不动声色地将话题转向对方最擅长的领域，无论对方是劳动者、机修工或是其他职业人员。”

这样的习惯获取的不仅仅是信息。亨利·兰德尔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受老式教育、既智慧又高贵的弗吉尼亚女士”经常在家款待杰斐逊。兰德尔记录道：“这位女士四处夸耀杰斐逊对自己的拿手菜很感兴趣，总是询问菜肴的具体做法。”尽管她怀疑杰斐逊的赞美甚至吹捧是出于礼貌，但她仍旧享受杰斐逊诚恳聆听她讲解的态度。“我知道这多半是想讨好我，”她承认道，“但他对菜肴真的很有鉴别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会放弃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不仅对这位女士，还有许多其他人，杰斐逊都可以从容应对。

1765年秋是一段令杰斐极其陶醉的日子。这年7月，他的妹妹玛莎和他的朋友达布尼·卡尔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结合让杰斐逊喜出望外。卡尔在古奇兰县一个名为春天森林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客栈，是杰斐逊往返威廉斯堡的必经之地。

年轻、聪明的杰斐逊不仅在威廉斯堡很受老师的青睐，还在弗吉尼亚贵族社交圈备受欢迎。杰斐逊已渐渐走出丽贝卡·伯韦尔留给他失恋的阴影，发现这世界幸福远多于悲伤。

1765年10月1日星期二，他的大姐珍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离世及伯韦尔带给他失恋的阴影又淹没了他的心。他痛苦地领悟到生命的脆弱。

珍是杰斐逊挚爱的姐姐。1765年这个灰暗、悲伤的秋天，他沉浸在痛苦里无法自拔。新年的悄悄临近，也没能给杰斐逊带来一丝喜悦，他

仍陷在失去至亲的悲恸之中。他的玄孙这样写道：“失去这样一位知己姐姐，杰斐逊的心底留下了一道永不可弥合的伤口。”引用英国诗人威廉·申斯通作品中的诗句：一个作家通常具有悲悯、忧伤的天性和离群索居的品性。杰斐逊用拉丁文写了一段墓志铭悼念亡姐，将其翻译出来是：

啊，珍，你是最美好的姑娘。

啊，在青春绽放的最美时刻你悄然离去。

与你偶然邂逅，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记忆。

别了，永远别离。

1766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珍离世约6个月后，杰斐逊开始了园艺记录，零零散散地记录了花朵和蔬菜的生长和凋落。他内心渴望着春天。1766年3月30日星期日，他这样记录道：“紫色的风信子开始吐蕊了。”4月6日，他又写下：“水仙和紫草也开始绽放了。”紫草又名血根草，存活期很短。一星期后，在他生日那天，“紫草凋谢了。”

杰斐逊仍旧沉浸在缅怀珍的悲伤里，对于留在家中还是远游难以抉择。数星期后，他计划去北方短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去弗吉尼亚之外的地方旅行，这次旅行预示着他今后的命运：他能用冷静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以及渴望融入世界政治舞台。杰斐逊于1766年春启程，他总是不忘防治和控制疾病，于是途中在费城逗留数日，前去看望威廉·希彭医生，并接种了天花疫苗。杰斐逊继续前往纽约，拜访了一位美国的精英朋友，食宿安排在朋友家里。在这位朋友家，他结识了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未来的革命战友和同盟伙伴。

这是一次危险之旅。行程的第一天，杰斐逊就被突然发足狂奔的马甩下去两次，“我的脖子都差点摔断了”。第二天又遭遇到了暴雨，可路上一个躲雨的地方也找不到。第三天，他涉渡一条溪流，差点被出乎意料的大水淹没。有生之年第一次，他的周围全都是陌生人，“连一张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

杰斐逊在安纳波利斯逗留了几日，那里的景色极其优美，房屋也比威廉斯堡的优质很多。杰斐逊不自觉地被吸引到了马里兰殖民议会。他这样描述道：不知为何，这里的议会厅十分窄小；立法委员工作能力有限，多在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无论这里的设施或是委员的工作态度都没给杰斐逊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对马里兰议会的同事嗤之以鼻，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里说道：“当我靠近时，惊奇地发现会议现场一片嘈杂，就好像弗吉尼亚庄园主在开公开会议一样。”他注意到那里的发言人都戴着黄色的假发，这在年轻的弗吉尼亚人看来“一点儿发言人的架势都没有”。对议会的详细分析说明杰斐逊强烈的领导欲望。这对杰斐逊来说是很自然的，如今他是

作为威廉斯堡的一名成员讲述邻近殖民地议员留给他的印象。相比之下，这里会场内精神高涨，声势浩大：“我要给你描述一下这里废除《印花税法案》后的欣喜气氛，不过你应该会在接到我的信之前就得知这个消息了。”

英国国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然而也意有所指地在1766年的《宣示法案》中声明，国会对殖民地拥有合法权力，“无论是何种事务”。对于杰斐逊来说，《印花税法案》的故事始于下议院的会议厅，终结于他第一次亲身体验这场以反对印花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旅程中，这时殖民抗议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威廉斯堡和弗吉尼亚。在马里兰海岸人们为胜利举办的庆典及人群迸发出的欢快笑声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开始在杰斐逊的心中萌发。

杰斐逊师从乔治·威勒学习法律。1767年，杰斐逊获取了律师资格，在弗吉尼亚常设法院当了一名律师。他与母亲同住在沙德维尔，但经常外出。接手的案件使他经常穿梭在斯汤顿和温彻斯特法院之间。7月上旬，他收到了姐姐玛莎写给他的花园记录，告诉他：在栽种71天后，家里的康乃馨开花了。他对实用性的农场和观赏性的花园同样感兴趣。1767年11月下旬，他算计着需要储存多少干草才能让他的马群度过冬夜。

杰斐逊给同龄人的印象是一位聪明、热情，求知欲强的律师，代理各种不同的案件。一件案子是一个小偷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件衬衫；还有一件是诽谤案：一名叫作戴维·弗雷姆的已婚男人起诉有人诽谤他，说他和伊丽莎白·布尔金等女人通奸。

杰斐逊的朋友热爱他，委托人感激他，长辈欣赏他。他是那么优秀，让人不自觉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但他的一个朋友发现，杰斐逊的生活中多了一名已婚的美丽妇人。

第四章
诱惑和考验

你会认为我犯了他们指控我的其中一种罪，当我年轻单身的时候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妇人。

——杰斐逊，于1805年承认自己迷恋伊丽莎白·穆尔·沃克

人生来自由，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意志。

——杰斐逊谈论770年“豪厄尔奴隶制案例”

这无疑是通奸行为，但杰斐逊陷得太深（或者他自认为如此）而无法顾及。杰斐逊有魅力、有阳刚之气，是一个有权势、有领导能力的男人，对于他所渴望的不会轻易放弃。

伊丽莎白·沃克正是他渴望的。伊丽莎白是他朋友约翰·沃克的新婚妻子，而杰斐逊与沃克从小就相识。这两个男人的交情深厚：彼得·杰斐逊指定沃克的父亲为遗嘱执行者之一，也就是说，城堡山的托马斯·沃克是小杰斐逊的监护人之一。这两个男孩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在就读威廉与玛丽学院之前都寄读在詹姆斯·毛瑞的学校里。“在那所私立学校里，我们一起长大，交情日益深厚，”约翰·沃克回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友情，“我们珍爱（至少我是真诚的）彼此。”

伊丽莎白·沃克，人们平时都称她贝琪，是一位皇家总督的孙女、伯纳德·穆尔的女儿。伯纳德·穆尔是威廉国王县滨海地区切尔西庄园的主人。她的两个哥哥、杰斐逊和未来的丈夫沃克全曾一起就读于威廉与玛丽学院。1764年1月，杰斐逊向其他朋友通告了沃克的喜讯，而那时杰斐逊还沉浸在丽贝卡带给他的愁闷之中。“杰克·沃克和贝琪·穆尔订婚了，”杰斐逊在威廉斯堡写信给约翰·佩吉，“希望他所有的兄弟们都分享这份快乐。”

这种反语甚至是出于嫉妒。丽贝卡的拒绝仍旧啃噬着他的心，杰斐逊哪里有心情去庆贺朋友的浪漫好运。他的马匹被送回庄园不在身边，这更加重了他的苦闷。没有它们，他更加感到孤苦无依，他说，现在“我不能够随时乘兴骑马狂奔了”。写给约翰·佩吉的信注明着“魔鬼城堡”，将威廉斯堡渲染成黑暗的“魔鬼城堡”，因为在这里他失去了心爱的新娘。世界如此荒凉暗淡。杰斐逊想：“‘可怜的’约翰·沃克，你不会这么心急就把美丽的新娘娶进门吧，听说应该不会一两年之内就结婚的。”

然而杰斐逊错了。不到5个月，1764年6月第一个星期，贝琪·穆尔和约翰·沃克就在贝琪的家切尔西庄园结婚了。杰斐逊也出席了婚礼。约

翰·沃克回忆，“杰斐逊是我的挚友”，在婚礼上担任了伴郎。婚后直到1768年，包括新生的小女儿在内，沃克一家都居住在人们熟知的贝尔沃府邸，距离沙德维尔大约5英里。同杰斐逊一样，沃克也是弗吉尼亚政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久，沃克参加了代表团，并要前往纽约斯坦尼克斯堡同印第安人进行谈判。约翰·沃克在临走前，依着自己的心意，嘱托“杰斐逊先生……我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主要负责照顾我的家人”。沃克的代表团将在初夏前往纽约。

这时，杰斐逊刚满25岁，贝琪·沃克也只有22岁。1768年夏，在拜访贝尔沃府邸的过程中，杰斐逊发现自己是贝琪唯一的陪伴，他感觉到自己似乎爱上了老朋友的新婚妻子。

鉴于自己所冒的风险，杰斐逊觉得要巧妙地展开爱情攻势。年轻的妇人开始反抗，但杰斐逊并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出于多方考虑，贝琪保守了杰斐逊求爱的秘密，但她直接向丈夫暗示了自己的焦虑。据约翰·沃克的回忆，他的妻子开始抱怨他为何让杰斐逊来照顾她们母女：“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信任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斐逊一直悄悄地展开着追求。有一次，趁沃克一家拜访沙德维尔的时候，杰斐逊变换了对贝琪的追求方式，将一张藏在袖子里的纸条塞进了她的长裙。约翰·沃克后来回忆道，这封信是“一张想要蛊惑贝琪相信这段淫乱的情感是多么纯真的纸条”。

或许从阿波罗大厅被丽贝卡拒绝蒙受屈辱的那一刻开始，杰斐逊就意识到他的文笔比口才好。写给沃克夫人的信是要试图给贝琪洗脑，劝说她接受自己的爱并无任何不妥。他的花招失败了。沃克夫人说她“看了一眼，当场就把信撕碎了”。

之后，在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著名猎人约翰·科尔斯）的庄园举行了持续数日的宴会。杰斐逊看到有机可乘便试图接近贝琪。一天晚上，所有女士都回房就寝了，杰斐逊认为时机已到。约翰·沃克回忆道：“他假装生病，说头疼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我也在场。”

悄悄地溜走后，杰斐逊找到贝琪的房间，在那里，据约翰·沃克说：“我的妻子已经脱衣睡下了。”杰斐逊再次失败。“贝琪愤怒地驱赶他并威胁说要喊人，杰斐逊这才仓皇逃走。”

数十年后，杰斐逊承认沃克所言非虚，这才让杰斐逊和沃克之间的党派分裂有所缓和。沃克早已得知杰斐逊数年间一直对自己的妻子图谋不轨，杰斐逊也承认那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1768年夏，杰斐逊再次受挫于沃克夫人。不过这年金秋在威廉斯堡，杰斐逊倒是从戏剧和政治上得到了些抚慰。多年前，尊敬的长老会牧师塞缪尔·戴维斯在弗吉尼亚举办了多场民众喜爱的戏剧，目的是为了净化人们的心灵。他说：“戏剧和爱情小说比耶稣基督的史书更有可读性。”于是那年在威廉斯堡春季上演了约瑟夫·艾迪生的《鼓手》、莎士

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托马斯·奥特维的《得救的威尼斯》和《孤儿》等剧目。当时上演的剧目由威廉·维林的弗吉尼亚公司承办，其中包括喜剧：约翰·霍姆的《道格拉斯》和亨利·凯里的滑稽剧《诚实的约克郡人》。杰斐逊不仅观看剧目，还给予了资助：邀请意大利音乐家弗朗西斯·阿尔贝蒂从威廉斯堡到阿尔伯马尔县进行指导。阿尔贝蒂还指点了杰斐逊的小提琴琴艺。

1768年，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逝世于总督府邸。威勒–杰斐逊这个圈子中最有权力的人走了。在费尔法克斯的遗嘱中，他遗憾地表示死后会变卖所有奴隶。他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允许12名成年奴仆选择自己的新主人，并规定女奴和孩子不得分开。一位思想开明的绅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还建议捐出自己的尸体用于解剖找出死亡的原因。他在遗嘱里交代，希望能为同胞比生前做点儿更有用的事情。

费尔法克斯的葬礼于5天后在布鲁顿教区教堂北侧通道举行，距离威勒的府邸不远。费尔法克斯的离去标志着杰斐逊、威勒及费尔法克斯密友时代的结束（这些费尔法克斯家宴上的座上宾，在明亮会客厅欣赏杰斐逊小提琴表演的密友们），也标志着当地温和治理时期的结束。晚年，杰斐逊评价费尔法克斯是“威廉斯堡历届总督中最具才华的人”。

诺伯恩·伯克利是第4代博特托尔特男爵，他接替了费尔法克斯的总督职位。他被大家称为博特托尔特大人，是一个善于享乐的人。有一次，杰斐逊的朋友一家正在自家威廉斯堡府邸的台阶上举行歌唱晚会，这时他们听到一个行人喊道：“唱得好！唱得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继续，不然我就回家啦。”这个行人就是博特托尔特，随后，他愉快地加入了晚会。

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同一天《弗吉尼亚州公报》以标题加黑边框的形式报道了费尔法克斯的逝世，悼念费尔法克斯的文章连载了9期，是一位宾夕法尼亚的名叫约翰·迪金森的农夫所写的信件。在文章中，他主张宗主国不应该忽视与美国的利害关系：“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阻止大英帝国从我们身上夺取各种利益……让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

费尔法克斯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同一时期，杰斐逊在贝尔沃距离母亲的府邸两英里的地方（骑马至少半个小时）开始建造自己的新家，这引起了周围居民的纷纷关注。这期间，他经常返回大都会威廉斯堡逗留小住。新府邸被命名为蒙蒂塞洛，意大利语的“小山”。这片小山曾种过樱桃，1767年8月3日星期一，杰斐逊注意到樱桃树可嫁接的属性；还曾种过庄稼，1768年5月15日星期日，达成一项协议：“把山顶东北方向250平方英尺平坦区域种上小麦和玉米，到圣诞节时”可收获180蒲式耳[8]的小麦和24蒲式耳的玉米（可能有12蒲式耳的误差，以收割后称量为准）。杰斐逊在园艺记录本上记

录道，如果想把坚硬的岩石挖走，则需要“冷静的人来处理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冷静”根据上下文应该就是公正的意思。但令杰斐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句话就像是一句谶语：只是这里的“坚硬的岩石”不是真实的岩石物体，而是他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他决定在那里建造蒙蒂塞洛，按着自己的设想建造。

1768年12月15日星期四，《弗吉尼亚州公报》报道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阿尔伯马尔县下议院议员，年仅25岁。

他将为托马斯·沃克医生工作，也就是约翰·沃克的父亲、贝琪·沃克的公公。竞选活动主要包括给有选举权的地主购买酒水和蛋糕。在接下来的41年里，杰斐逊基本没有离开过政坛。即便是没有正式职务的时候，他也没远离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旋涡的中心。

自从《印花税法案》引起广泛不满并被废除后，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以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名字而命名的《唐森德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颜料、茶叶等商品征收很重的进口税，并在波士顿设立海关税务司总署。13个殖民地中，马萨诸塞州率先起来反抗。1768年2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发出了一封抗议法案的通告信，并号召其他殖民地也起来进行反抗。这就是杰斐逊于1769年5月8日星期一首次当选议员时所面临的政治气氛。

威廉斯堡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英国当局已经下令：若弗吉尼亚州议会加入马萨诸塞州反抗《唐森德税法》的行动，博特托尔特将就地解散议会。不出几日，这里就上演了一幕解散议会的大戏。

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支持马萨诸塞州的决议。因此，1769年5月17日星期三中午，博特托尔特召集议员们在议会大厅开会。“我听说了刚通过的决议，但这个决议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博特托尔特对议员们说道，“你们逼着我行使权力解散议会，那么我现在宣布议会解散。”

杰斐逊当选议员还不足10天。在他选任生涯刚刚开启的时候，就面临着纷争、危机，面临着为美洲殖民民众探索出一条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实行自治的创新之路。

他随着同僚离开了议会厅，走进了雷利酒馆的阿波罗大厅，杰斐逊就是在这里首次遭受了失恋的打击。酒馆正门上方的二楼悬挂着领袖沃尔特·雷利爵士半身像，议员们依次从正门进入。正如《议院期刊》上所说的，他们决定“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保护殖民地真正的、基本的利益”。第二天，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们制订出了计划：他们决定不进口或购买任何大英帝国的货品。

随后，就职会议结束后，杰斐逊就离开了威廉斯堡回到蒙蒂塞洛。此刻，他完全沉浸在权力和对抗中。

1770年2月1日星期四，习惯了当一家之主的杰斐逊和母亲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邻居，这时传来了灾难的消息：沙德维尔失火了。

杰斐逊大惊失色。不过他询问送信奴隶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图书馆是否还在。所有书都被烧毁了，这位奴隶答复道："不过啊，我们保住了您的小提琴。"

杰斐逊是注重实物的人，他有收集物品的癖好，这种癖好其实就是他好奇心的一个具体表现。物品被烧毁或损毁令他极其烦恼和沮丧，但火灾同时也提醒人们，有很多事物并非人力可控。杰斐逊耗费了近10年学习法律和从事法律工作。法律这项事业基于一个前提：尽管人是有局限性的，但还是可以构造出一种秩序，让他们可以对世界事务行使权力。沙德维尔的烧毁就是一例：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无所不能的。

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杰斐逊猜测被毁掉的图书应该价值200英镑。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困扰他很久。他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中感慨道："如果烧毁的只是200英镑的钱币……还真没什么可惜的！"

真正的痛楚源于失去了书籍和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为开庭期精心准备好的工作笔记。没有这些笔记，他就不能掌握手头的工作。杰斐逊陷入了绝望，甚至有些躁狂，四处告知亲友沙德维尔失火的消息获取建议和安慰。他在考虑是否需要重新选址修建家园——这对故土观念很强的人来说真是个非凡的想法。

火灾焚毁笔记带给杰斐逊的伤痛让他想起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普洛斯彼洛，莎翁笔下一位里程碑式的悲剧人物。杰斐逊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也就是现在被烧毁的这座。他凄凉地影射自己遭受了与剧中人相同的命运：

>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我们的这些演员，
>
>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
> 他们都已经化为轻烟消散了。
>
>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境，
>
> 入云的阁楼，恢宏的宫殿，
>
>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
>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
> 如同这一场幻境，连一点儿烟云的影子都不会留下。
>
> 构成我们的材料也就是构成梦幻的材料，我们短暂的一生，
>
> 前后都被沉睡包围。

对于杰斐逊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和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段饱受考验的时间。在温暖的壁炉旁手持红酒，阅读悲剧作品、挖掘其中的哲理、体味精神内核及探索事物的本质并非难事，难的是有能力将脑中的想法转化成内在的感受。托马斯·杰斐逊就具有这种能力：他的头脑、心灵和开放的个性仿佛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很多哲学人士生活在抽象地带，总是在争论象征和幻象，能看到全局的读者和思想者很少。站在沙德维尔灰烬上的杰斐逊就在设法放眼全局。

杰斐逊摆脱了火灾所带来的痛楚，准备着手建造蒙蒂塞洛。阳光倾洒在小山山顶。在小山东南坡，杰斐逊打算建一座果园：里面种上梨子、苹果、油桃、石榴和无花果。“生活的不幸没有击倒你，”乔治·威勒在给学生的信中写道，“因此我确信，今后你一定能克服所面临的困难。这次磨难反而让你得到了多方面的锤炼。”威勒还附上了一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格言：“忍辱求生，寄望将来。”

1769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公报》刊登了一则告示寻找一名逃跑的奴隶，全文如下：

该奴隶从阿尔伯马尔县的主人家中逃跑，

名叫桑迪，是一名黑白混血儿。

约35岁，身材矮小，有点儿肥胖，肤色较浅。

桑迪是鞋匠，

左撇子，可以做点粗浅的木匠活儿，

还懂点儿驯马和骑术。

有酗酒嗜好，喝酒时举止无礼、语言粗鲁；

行为狡猾、无赖。逃跑时骑着一匹伤痕累累的白马，希望他获得应有的处罚。

他还随身带着修鞋的工具，因此可能会重操旧业。

若有发现者请与我联系。

发现者若在本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0先令的报酬；

在弗吉尼亚州其他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镑的报酬；

在其他州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10镑的报酬。

托马斯·杰斐逊

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杰斐逊逝世，历史学家卢西亚·斯坦顿搜集的相关资料证明：托马斯·杰斐逊拥有600多名奴隶，150名是从父亲和岳父那里继承的，20名是自己购买的，其余大多数都是自家庄园家奴的后

代。1774～1826年的这段时间，杰斐逊拥有约200名奴隶（最少时165名，最多时225名）。当他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身为一名外交家、乔治·华盛顿内阁成员、副总统、总统，赋闲在蒙蒂塞洛、成为美国圣贤时，杰斐逊一直体现着蓄奴者的利益。

比起后来的数十年，在杰斐逊刚刚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时，他是努力改革奴隶制的。在1769年的下议院，杰斐逊回忆："我那时提出了一项有关奴隶解放运动的决议，并努力使之通过，但最终遭到了否决。"杰斐逊所说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他正努力使解放运动"获得通过"，这种运动不是广泛的解放运动，并不像90年后亚伯拉罕·林肯那样废除了奴隶制。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在1769年第一次议会会议上，他起草了一份议案：将解放运动的控制权从普通法院转移到奴隶主身上，法律将赋予弗吉尼亚奴隶主个人单方解放奴隶的权力。

在杰斐逊的脑海中浮现出，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再受总督和议会的控制；在现有的法律下，由他们来裁决解放运动的请求，这些请求基于他们如何（不是庄园主，而是法官）选择定义"功劳"。杰斐逊请他的表亲，理查德·布兰德带头提议这项立法。议会对此的反应是迅速又坚定的。杰斐逊回忆："布兰德受到了最无礼的对待。"

此后不久，杰斐逊接手了塞缪尔·豪厄尔诉韦德·尼德兰的案件。整个案件的关键是长期受到关注的种植园阶级问题：混血儿（父母一方为白人、一方为黑人）是否仍被视作奴隶？杰斐逊为自己的代理人塞缪尔·豪厄尔（其母为白人、父亲为黑人）争辩：法律应归还豪厄尔自由，但弗吉尼亚法令规定，豪厄尔应劳役至31岁才可获得自由。

杰斐逊就此进行了一场自然法的辩论，根据相关记录，"人生来自由，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意志"。杰斐逊辩论道，"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这对他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杰斐逊输掉了这场官司。

在他参与立法和公共生活的不同时刻，杰斐逊谈论和推行的做法最后都不言而喻地归结到奴隶制。豪厄尔案件最终失败了。但法庭上，杰斐逊的无私坦白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杰斐逊来说，废除相关的法令是下几代人的事情了，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了。议会对布兰德的提案及法院对豪厄尔案件的反应不可能不给这样一位如此渴望成功的年轻律师和立法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奴隶制改革尝试的失败带给杰斐逊的打击让他最终退回更加保守的立场。

为了逃避沙德维尔火灾带来的焦虑、审判工作的失败和奴隶逃跑所增添的烦恼，杰斐逊用一种惯常的方式来排解：调情。"我经常愉快地回顾最后几次拜访罗斯维尔府邸所度过的充满哲思的夜晚，"这是他写给好友及同学约翰·佩吉的夫人信中的一段，"我喜欢从事物中寻找哲理，形

式乏味的事物也一样。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亲吻戴着红宝石戒指的纤纤玉指时，那感觉实在销魂。”提到另一位正在恋爱中的朋友，杰斐逊说道：“亲爱的女士，我并不是建议他放弃这段感情。相反，我很支持他，因为我太震惊。”

杰斐逊似乎也陷入了一场恋爱。

[8] 1蒲式耳≈35.238升。——编者注

第五章
充满欲望和否定的世界

婚姻中，和谐的状态是首要目标。

——托马斯·杰斐逊

我们谈到的这个女人是位富有的遗孀，颇有才华和智慧，而且其家族成员都“柔韧而又优雅”，玛莎·斯凯尔顿于1748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查尔斯城县一座名为森林的庄园。她比杰斐逊小5岁半。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帕蒂，她美丽动人、通晓音律、博览群书，杰斐逊为她着迷。据说，帕蒂的美让人一见倾心，终生难忘。“她的肤色明亮；深褐色的眼睛大大的，仿佛会说话一般；浓密的秀发呈现赤褐色。”亨利·兰德尔在访问过帕蒂的晚辈后记述了以上文字。一个与帕蒂同时代的人评价她是判断力强、性情温和的女人。帕蒂和托马斯都爱好文学，所谈论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一位男性亲属觉得“杰斐逊夫妇……真是一对知己，彼此交流知识、分享欢乐”。帕蒂教授自己的孩子和侄子、侄女什么是传统所谓的“知识的开端”，这与杰斐逊家族注重教育的传统不谋而合。

杰斐逊终于找到了最志趣相投的伴侣，这个女人与他心意相通。他们共度的夜晚充满音乐、美酒和谈话——他们无所不谈。他们充分地分享着彼此的生活。他甚至彻底敞开心扉，对她吐露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孙女回忆帕蒂“十分依恋杰斐逊并很尊重他的看法”。就杰斐逊本人而言，“从大局上讲，他是位可敬的丈夫；从细节上说，他又充满魅力”。

帕蒂曾用抱怨的口气讲述了几件杰斐逊慷慨解囊，结果接受者并不领情的事。“但他总是这样，”杰斐逊夫人这样评论道，“他心地善良，根本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坏人。”

聪慧、坚强，帕蒂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同时又很有原则。杰斐逊曾温和地指责她不要老是批评他们的大女儿帕茜惹是生非。杰斐逊对帕蒂说：“亲爱的，这么小的孩子犯了错，一次受罚就不会再犯。”（帕茜回忆当时的感觉：觉得有股暖流涌上心头，她非常感谢父亲的体谅。）

帕蒂不是一个谦让或顺从的女人。她有自己的主见，甚至有些武断和尖刻。埃伦·伦道夫·库里奇，杰斐逊的一个孙女这样说道：“我的祖母杰斐逊夫人性格活泼，有时甚至有些尖刻，但在她与丈夫相处的过程中，却完全服从丈夫，这出于她对丈夫深深的爱。”

然而，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有一次，杰斐逊同女儿讲到婚姻经验，建议女儿："这会更好……如果就某件事，爱人的意见同我们的不太一样，那应该让对方保有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干吗非要纠正对方呢；如果这件事很重要，那么先顺其自然，等到一个更轻松的时刻、和缓的场合，再一起沟通商讨这件事情。"

但当杰斐逊焦躁不安时，帕蒂又能够安抚丈夫。减轻托马斯·杰斐逊的紧张情绪绝非易事，杰斐逊非常敏感。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一个人投身政治是很矛盾的，政治界总是充满着批评，鲜有赞扬之声。无论如何，杰斐逊内心与身外事务的关联遵循着与历代政治家相似的模式：雄心让他们渴望行动和喝彩，渴求赞扬的他们对批评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杰斐逊夫人是少数几个能抚慰杰斐逊心灵的人。

帕蒂·杰斐逊的父亲并非发迹于弗吉尼亚。他出生在英格兰兰卡斯特市一个贫寒、普通的家庭。约翰·威乐士在做律师时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还从事收债、奴隶贩卖的交易，并拥有一座庄园。约翰·威乐士的第一任妻子玛莎·埃普斯是百慕大庄园主弗朗西斯·埃普斯的女儿。他们于1746年成婚。1748年秋，一个名叫玛莎，昵称帕蒂的女婴降生了，但帕蒂的母亲却因难产离开了人世。此后，约翰·威乐士又再婚过两次，又生下了4个女儿，其中3个存活了下来。

帕蒂在一个没有安定感的家庭环境中渐渐长大。她从来不知道生母是谁，两位继母也是来了又走。这段悲惨的童年经历在她心上烙下深深的伤痕，帕蒂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也面临这种境况。在她的病榻前，帕蒂让杰斐逊当面发誓此生绝不续弦，她才撒手人寰。因为没有母亲可依靠，帕蒂很早就担当起了掌管森林庄园家务的重任，并懂得了世事的险恶和多变。

帕蒂父亲的生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生活是否陷入窘迫。他是英国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里一名所谓的"代理人"，实际上，约翰·威乐士就是名收债人——这个细节，杰斐逊在自传里描写岳父的相关段落中并没有提及。"威乐士先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他因勤奋、守时、老练敏捷的品性广为人知，反而他出色的职业经历较少被人知晓。"杰斐逊这样描述他的岳父，"他是个最令人愉快的伙伴，性情幽默诙谐，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杰斐逊对岳父的这段描写，既带有屈尊俯就的意味，又含有忐忑不安的心绪。有关威尔士律师职业的评价也仅简单地以"经验丰富"寥寥几笔带过。更为有趣的是"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句话——为何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加上这一句呢，反倒暗示出约翰·威乐士在社会上的尴尬境地，引发出威尔士在殖民社会的身份问题。

岳父的身份对于杰斐逊想跻身其中的上流社会是一个威胁，因为威乐士体现了所有庄园主最深切的一两个担忧：如果奴隶暴动排第一位的话，那么还债（通常是巨额的）则排在第二位。威乐士的出现引发了庄

园主的焦虑，很多庄园主好像在刻意躲避威乐士举办的宴会。

1767年1月1日星期四《弗吉尼亚州公报》上刊登了一首嘲讽诗，讽刺约翰·威乐士“没有教养”。这句话出自在威廉斯堡开庭的一场有争议谋杀案的审判现场。作为辩方律师，威乐士被指控做了伪证。“帕蒂的父亲不被这里所接受。”一位伦道夫家族成员这样说道，这说明杰斐逊决心冒险娶帕蒂为妻，更多的是出于爱而不是利益的考量。

1768年，杰斐逊开始为威乐士先生工作，担任他的法律助手。在此两年前，1766年11月，刚满18岁的帕蒂嫁给了巴瑟斯特·斯凯尔顿。次年，帕蒂生下一子，名为约翰；1768年9月，帕蒂的丈夫去世；1771年夏，他们的儿子约翰也不幸夭折。

丧失亲人的斯凯尔顿夫人回到了父亲的森林庄园，在那里，像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遗孀是绝不缺乏追求者的。求婚者们伺机而动，希望自己能最终抱得美人归。

帕蒂·威乐士·斯凯尔顿夫人周身散发出的魅力，很容易俘获一个像杰斐逊这样的男人。杰斐逊比她年长，可是她见多识广，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成熟。帕蒂的举止端庄，丝毫不卖弄风情，她更像贝琪·沃克而非丽贝卡·伯韦尔。帕蒂是一个经历了丧母、丧夫、丧子的女人，生活带给她的磨砺让她懂得怎么操持一个庞大复杂的家庭。

不言而喻，弗吉尼亚庄园家庭生活主要复杂事务之一（帕蒂深深懂得这一复杂的事务）是处理与白人主人和黑人奴隶有关的血统、情欲和权力问题。

森林庄园充满了这样的问题。1735年前后，一个名叫海明斯的英国白人男子，一艘贸易轮船的船长，与一个纯血统的非洲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的孩子名叫伊丽莎白，人们通常叫她贝蒂。（这个细节出自麦迪逊·海明斯的相关记述，他是海明斯船长和非洲女人的曾孙。）在百慕大庄园埃普斯家族里，这位母亲和女儿最终也没能逃脱奴隶的命运——约翰·威乐士迎娶的第一位新娘，死于难产的玛莎，就来自这个家族。1746年——威乐士迎娶玛莎·埃普斯的那一年——作为陪嫁的伊丽莎白·海明斯约11岁，成了威乐士的财产，一同搬到了森林庄园。在那里，从18岁开始，她给威乐士陆续生下了好几个孩子。

这期间，威乐士后娶的两任妻子也都离开了人世。1761年2月，第三任妻子去世，这一年伊丽莎白·海明斯26岁，“鳏夫威乐士一直与其姘居在一起。”麦迪逊·海明斯记述道。到1762年时，伊丽莎白·海明斯共给托马斯·杰斐逊的岳父生了5个孩子：罗伯特、詹姆斯、帕西尼娅、科瑞塔和彼得。1773年，又生下了第6个孩子：莎拉，大家昵称她为萨莉。

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蓄奴时代司空见惯。19世纪时，南卡罗来纳州的玛丽·博伊金·切斯纳特记录了那个年代一些关于白人女人的真实情况：任何一位夫人都能说出别家黑白混血儿的父亲是谁，唯独搞不清自

己家的，因为与她偷过情的男奴仆为数实在众多。这些孩子就好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否定的世界。跨越种族的性爱——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性爱——是不可直接言说的。血统、情感和沉默的怪异混合弥漫于整个森林庄园。杰斐逊知晓这座庄园是在1770年，那一年他作为帕蒂的一名追求者出现在这里。这种怪异的混合也将在日后的某个时候弥散于整个蒙蒂塞洛……

是否能赢得斯凯尔顿遗孀的芳心还不得知，这使杰斐逊的追求难以施展。在1771年的头几个月里，杰斐逊开展了全面的追求。他给威廉斯堡一位年长的德拉蒙德夫人——这位夫人与乔治·威勒交好——写了一封“浪漫的、充满了诗意的”信，在信中描绘了他心爱的帕蒂。“没有谁的笔下再能流动出如此动人的语句”，德拉蒙德夫人称赞杰斐逊（这封信已遗失）颇有密尔顿的诗风，并询问帕蒂“是否已心有所属”。

怎样俘虏帕蒂的芳心？音乐是个不错的方法，书籍也是。根据家族传统，杰斐逊和帕蒂确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曾有两个帕蒂的追求者来到了森林庄园，听到杰斐逊优美的音乐伴奏声及他俩动听的歌声，相互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自己绝无胜算，便悄然离开了。

一如往常，音乐是杰斐逊最好的同盟者。对他来说，歌唱和演奏小提琴或钢琴的方式胜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手忙脚乱地款待对方。音乐反而能让一个男人敞开心灵之窗，对于女人亦是如此。在杰斐逊的文学备忘录里转录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一段文字：

> 灵魂里没有音乐，
>
> 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
>
> 都是善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
>
> 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
>
> 他们的感情像鬼蜮一样幽暗。
>
> 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杰斐逊的头脑主要思考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本性这样的主题，他总是能够回归政治的中心问题：一个男人该怎样——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动物——在充满激情和冲突的世界里与近邻相对和平、仁爱地活着？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仅通过持久的努力将冲突的元素化为和谐？或许在这场终生的斗争中，一个不断拼搏的男人能做出最有效的决定是究竟要娶谁为妻。杰斐逊需要一个女人共同分享他对音乐的热情和音乐所体现的东西——复杂巧妙、超然存在、对生活的幻想及心灵的吟唱，就如同分享彼此的血肉那样。帕蒂·威乐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女

人。

杰斐逊下定决心娶帕蒂为妻，并想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他甚至一度对家族流传下来的旧英格兰贵族遗物产生了兴趣。“我有一些纹章，家人告诉我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是它们代表着何种权威就不好说了，”结婚前一夜，杰斐逊在写给自己的英国代理人托马斯·亚当斯的信中说道，“或许很有权威，或许只是些普通的而已。要是这样，你倒是可以帮我买些纹章，用劳伦斯·斯特恩的话来说：带有纹章的衣服其实跟其他衣服没什么两样，只是上面的纹章让人神往。”杰斐逊对母亲高贵的出身总是摆出一副冷漠的面孔，可能是受到了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影响，斯特恩对代表权威的族徽不屑一顾，对自己曾追捧纹章的行为尽情自嘲了一番。假若探究追捧出于何种心理，不是出于虚荣，便是出自好奇。

杰斐逊越来越有兴趣给新娘购买大件物品。他订购了一架古钢琴（从德国汉堡订购的，他说“因为那里的古钢琴不仅制作优良，价格还便宜”），但不久他又喜欢上了钢琴，觉得必须要购买一架。他对自己的英国代理人说，钢琴真是令“我”着迷，先前订购的古钢琴就取消了吧。钢琴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杰斐逊希望马上拥有它。这架钢琴要用结实的上等红木制作，不要镶嵌饰片；中高音区的G～F调的琴键制作双份，以为备用；一定要精工细作才配得上“我”心仪的女人。他还购买了半打白色真丝棉袜和一把别致的伞——“伞要大……配以包裹着绿色丝绸的黄铜伞骨，要整洁精致”——“当然乐器是首要的”，他说。他已迫不及待地要在10月前见到钢琴。如果制作没有延期的话，正好可以赶上结婚典礼。

1772年元旦，托马斯·杰斐逊和玛莎·威乐士喜结连理。杰斐逊28岁，玛莎23岁。

这是冬日的一个星期三。在玛莎父亲的家中，牧师威廉·库茨为他们主持了一场英国国教式的婚礼。婚礼持续了数天。（杰斐逊付给牧师5英镑作为报酬，还打赏了伊丽莎白·海明斯——萨莉的母亲第一次出现在杰斐逊的记录本里。）1月2日，《弗吉尼亚州公报》刊登了他们结婚的喜讯：阿尔伯马尔县议员托马斯·杰斐逊先生和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遗孀玛莎·斯凯尔顿喜结连理。

帕蒂是否曾是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妻子，杰斐逊并不在意。杰斐逊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沉浸在对新婚生活的无限憧憬里，他毫不在意帕蒂曾有过丈夫，因为他的眼中只有她。1771年12月30日，他们领取了结婚证书，杰斐逊竟错误地将帕蒂婚姻状况一栏填写为“未婚”，这时另外一只手将其划掉并改写为“遗孀”。

帕蒂的遗孀经历并不是附带的细节。帕蒂虽年轻，但比杰斐逊更加懂得婚姻所能带给人的慰藉和伤害。在帕蒂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时候，这段经历给了她更多的信心。

1772年飘雪隆冬的头几个星期，杰斐逊该是这世上最满足的男人了。从随后几年帕蒂接连受孕来看，他们之间绝不缺乏床笫之欢。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莎，昵称帕茜，于1772年9月27日星期日凌晨1点降生——他们婚后居住在森林庄园的8个半月后。

婚后，杰斐逊夫妇在森林庄园逗留了一阵，之后他们决定动身去蒙蒂塞洛，在那里度过日益寒冷的大雪隆冬。当他们临近沙德维尔和蒙蒂塞洛时，因为积雪过深，马车已无法前行。卸下马车，他们骑马继续穿越树林。呼啸的寒风漫卷着雪花，地上已结起了厚厚的冰。天色渐渐灰暗，地上的影子越拉越长。

日暮时分，他们开始爬坡，缓慢而又艰难地向这座海拔867英尺的小山山顶行进。蒙蒂塞洛沿路树木的枝条几乎要被冰雪压断。杰斐逊夫妇不得不低头穿越低垂着冰冻枝条的灌木丛小路。

当他们到达山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山顶是如此荒凉！地上还残留着火灾的痕迹，奴隶们已四处逃散。女儿帕茜说：“一派凄凉、破败的景象。谁也意想不到一场艰辛跋涉后，竟落入如此境地。我经常会听他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回忆。”

杰斐逊夫妇找到了残留的半瓶酒，像以往的夜晚一样，“喝得酩酊大醉、纵声歌唱、大声欢笑”。约一个星期后，他们搬到了麋鹿山的庄园里。这座庄园位于古奇兰县詹姆士河与伯德溪流的沿岸。麋鹿山属于帕蒂——她和她第一任丈夫居住在这里——杰斐逊夫妇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房屋和土地（麋鹿山山顶面积约669英亩）。

在闲暇时光里，他们喜欢阅读詹姆斯·麦克佛森翻译的莪相诗集，此书据说是3世纪凯尔特的吟游诗人莪相所作。（事实上，这些作品虽有部分是根据凯尔特语民谣写成的，但大部分为麦克佛森自己所作。）“没有哪颗心灵能充满如此温柔、崇高的情感，没有谁的笔端会流淌出如此激昂的文字。”1773年杰斐逊记录道，“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认为这位粗鲁的吟游诗人是北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蒙蒂塞洛是杰斐逊心灵的避风港湾，他自己也这样说过。位于山丘的这栋建筑还是一个富有创新的防御之地，主人不仅可以在这座堡垒里寻觅藏身之所，而且可以集中火力展开一场攻坚战。这种灵感应该源自莪相的史诗般的诗文，杰斐逊据此建造了自己的世界。在他的记录本里，他摘录了一段讲述地位、权力、名望和冒险的段落：

> 汇集于高高岩石上两条深色的溪流在平原上混合、咆哮，
>
> 在喧闹、粗野、昏暗的较量中汇合于罗克林与因尼斯费尔。
>
> 宛如一场殊死的战争：
>
> 两方首领要置对方于死地，人群也早已厮杀在一起，

利器碰撞出铿锵之声，头盔碎裂满地，

鲜血喷涌，烟火四起。

抛光的紫杉木制乐器的弦子在低沉吟唱，

标枪在空中飞驰发出厉响。

暴风雨的夜晚电闪雷鸣，光亮中长矛散落一地。

波涛翻滚的海洋发出不安的声响，

宛如雷霆天国的最后鸣响，这就是战争的嘈杂之声。

这众多死难的英雄，勇士的鲜血喷洒满地。

帕蒂是名细心的主妇，采取行动确保丈夫个人方面一切安好。她会注意家里的肉类、鸡蛋、黄油、水果这些食物是否新鲜，监督奴仆制作黄油和肥皂。她还亲自指导怎样制作更复杂、精致的食物。“杰斐逊夫人走进厨房，手里拿一本菜谱，告诉我的母亲怎么制作蛋糕、果馅饼之类的东西。”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道：这名奴隶写下了一本有关蒙蒂塞洛生活的回忆录，并保留在了杰斐逊家族里。

曾有一名德国军官拜访蒙蒂塞洛，杰斐逊夫妇留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杰斐逊充满魅力，夫人楚楚动人。他羡慕杰斐逊的图书馆书籍丰富且经典，衷心地赞美杰斐逊亲自设计的蒙蒂塞洛府邸充满着“建筑的崇高精神”，他还注意到杰斐逊为客厅天花板设计了一个罗盘以测量风的强度和方向。

杰斐逊夫妇在一起的情形留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弗吉尼亚人喜爱音乐，杰斐逊先生尤其如此，”这位来访者说道，“他的家里摆放着一架精致的钢琴和一些小提琴。杰斐逊先生擅长演奏小提琴，夫人则弹奏得一手好钢琴。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出色，令人愉快、通晓事理、有教养的夫人。”

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面，小山丘上如此和谐、快乐的一家人。他们的生活充满构思、创意和动人的音乐。这正是杰斐逊渴望的生活——是他父亲构建、母亲保持的生活；在自己筑建的爱巢里，他所给予家庭的这种生活。

1773年5月16日星期日，是一个令杰斐逊悲痛万分的日子。他的挚友兼妹夫达布尼·卡尔因“胆汁热”离开了人世，留给杰斐逊的妹妹玛莎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杰斐逊本能地担当起了父亲的责任。他竭尽所能地为妹妹一家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而把自己那份痛失年轻时代挚友的悲伤深深埋在心底。挚友的逝去将他抛入痛苦的深渊，似乎姐姐珍的离去也没让他如此痛不欲生。他不能把卡尔亲手埋葬在蒙蒂塞洛，他

不能。起初，他只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在一张纸上草拟了朋友的墓碑碑文：

致朋友达布尼·卡尔的墓碑碑文

令人怀念的幽魂啊，天堂赐给每个人的礼物，
祝福像山泉一样涝涝涌出，愿你永得安宁。
这既非怜悯更柔情，也非真理更明亮。
他只遵循内心的声音行事，既不逢迎讨好也不躲避喝彩。
自然中绽放自己美丽的情怀。
轻拭密布着悲伤的眼中的泪水，
给予爱人恬静的温暖，消除她内心的悲伤，让她的心重新欢笑。

马利的远行

杰斐逊把碑文刻在一枚铜币上，将铜币钉在了卡尔墓碑脚下的树上：

那坟墓是否依然被绽放着花朵的枝条缠绕，
地上的青草轻敷在你的胸膛；
梦中涌出思念的泪水让她惊醒于又一个拂晓，
你离去后又一年的玫瑰花是否就要绽放，
白色天使挥动着银色羽翼，
布满贡品的土地如今已神圣庄严。

在墓碑上部雕刻着如下文字：

已亡人达布尼·卡尔，
路易莎县约翰与珍·卡尔夫妇之子，
生于1743年，
1765年和彼得与珍·杰斐逊夫妇之女，玛莎·杰斐逊结为夫妻
1773年5月16日逝世于夏洛茨维尔，
留下6个待抚养的后代，

卡尔品德高尚、判断力强、爱好学习，愿我们的友情长存

托马斯·杰斐逊献上此碑致我最热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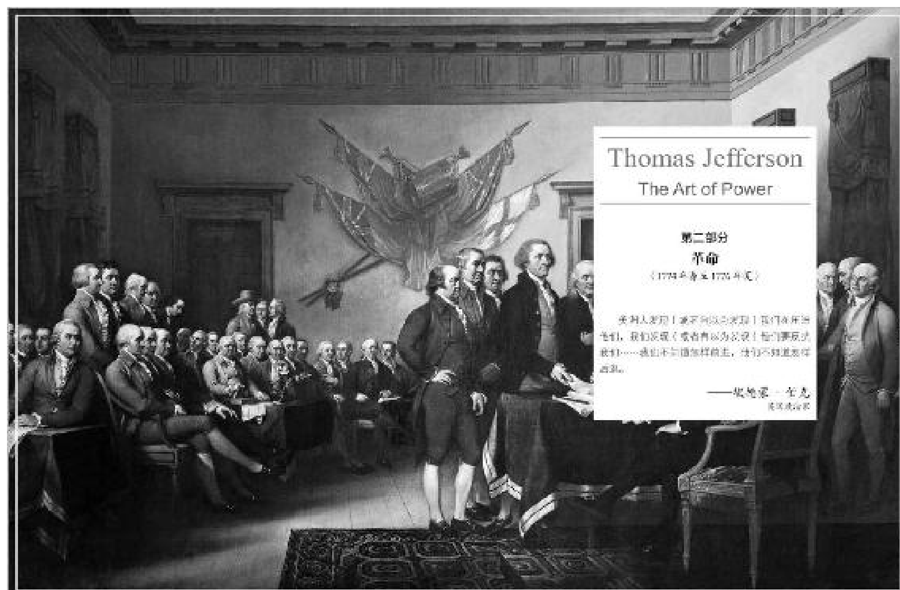
哀伤之事接踵而来。就在杰斐逊努力平复失去挚友的伤痛时，帕蒂的父亲又去世了。1773年5月28日星期五，约翰·威乐士离开了人世，身后留下大笔负债。杰斐逊夫人毫不犹豫地把伊丽莎白· 海明斯及她与父亲的孩子——帕蒂的异母兄弟姐妹——从森林庄园接到了蒙蒂塞洛。

我们无法了解帕蒂对父亲和伊丽莎白之间的关系及对他们孩子的真实感受。鉴于她生活年代的限制，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了解帕蒂为何会在父亲死之后，选择把海明斯一家接到蒙蒂塞洛自己的家里。

海明斯家族的命运将永远与杰斐逊夫妇及蒙蒂塞洛交织在一起。伊丽莎白·海明斯的儿子罗伯特，杰斐逊叫他鲍勃，代替朱庇特成为杰斐逊的贴身男仆，直到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动身去法国。伊丽莎白的儿子詹姆斯·海明斯随同杰斐逊前往巴黎担任厨师。伊丽莎白的另一个儿子，约翰·海明斯，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工匠和木匠，可以制作精巧的家具和室内用具，还制作了一架杰斐逊自己设计的活顶四轮马车。

杰斐逊现在掌管着与自己和妻子相关的三个家族分支。他自己的家庭：妻子帕蒂和他们幼小的女儿；他的妹妹和他的外甥、外甥女；当然，还有一支不被众人承认的隐秘分支：他妻子父亲的情妇，伊丽莎白·海明斯及他妻子的异母兄弟姐妹，其中包括萨莉·海明斯。

杰斐逊是这样一个男人，有着开放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品格。他是蒙蒂塞洛的主人、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一名著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将成为一名中央领袖，带领一个民族使用武装力量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约翰·特朗布尔对1776年夏提交《独立宣言》草案情景的再现。

第六章
惊心动魄

局势似乎马上就要演变成一场令人惊恐的危机，所有持共同目标的人们需要快速、团结地组建起自己的委员会。

——1774年3月31日弗吉尼亚议会上的一封信

蒙蒂塞洛遭遇了一个极为离奇的季节。1774年2月21日星期一午后不久，弗吉尼亚史上首次记载的地震猛烈地袭击了阿尔伯马尔县。在沙德维尔一片惊恐慌乱之中，伊丽莎白·杰斐逊——托马斯智力不健全的妹妹失踪了。三天后，当人们找到她时，她已溺死在里瓦纳河里。

5月第一个星期刚过了一半，一场春雪侵袭了蓝岭，蓝岭霎时白茫茫一片。第二天，一场可怕的霜冻肃杀了万物。杰斐逊在自己的园艺记录本上写道："树叶、葡萄藤、小麦、黑麦、玉米和大量的棉花全部凋零。这场霜冻范围广、毁灭性强，整个县和临近的殖民区都遭了灾。"蒙蒂塞洛只有一半的水果幸免于难。

然而蒙蒂塞洛也有喜事降临：帕蒂·杰斐逊在1774年4月3日星期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这个女儿名叫珍·杰斐逊，与杰斐逊的母亲和早逝的姐姐同名。这是帕蒂·杰斐逊婚后19个月内的第二次生产。在婚后的前27个月里，帕蒂有18个月处在孕期。即使在贵族精英家庭，生产也是极危险的，母亲和婴儿很容易丧生。杰斐逊深知这一情况：帕蒂和杰斐逊的6个孩子就有两个夭折了。

不言而喻，杰斐逊是位炽热的情人，但他也是位细心的丈夫和父亲。在他的记录本里曾记着购买"乳管"，一种协助哺乳的玻璃器具。

然而还有大量的政党事务需要处理。1774年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有许多事务需要商榷处理，杰斐逊必须出席。

将妻儿留在家中——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珍和蹒跚学步的帕茜——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冲突升级的前夕，杰斐逊回到了威廉斯堡。

这场危机已经持续数年了，而且还将继续。当选下议院议员后，1769年5月，杰斐逊首次出席了下议院该年的第一届会议。杰斐逊身陷在与英国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对抗之中。大英帝国通过征税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压榨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英国议会又强加了新的税种以增加收入，殖民地有众多的殖民州首府（波士顿、安纳波利斯、费城、威廉斯堡等）因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北美各地殖民当局和英国机构

对这批顽抗、无理、忘恩负义者挑动的叛乱局面已忍无可忍。

从反抗《唐森德税法》到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当局试图施加控制。北美殖民地居民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制定了停止对英贸易和抵制英货的法案，并抗议将倾茶事件的案犯引渡到英国受审。殖民地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以使各殖民地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调抗英斗争。

在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心中淤积着一种悲痛：独立并非没有可能，只是道路曲折又漫长。直到1772年5月，如乔治·威勒这类人士仍坚持维持或至少表面维持现状。威勒给英国当局写信，要求“赐发新的制服长袍，就像下议院成员现在穿着的那种，只是比我现在的好些……这件真是耻辱”。从他信中不难看出，尽管言辞嘲讽，威勒绝不会预料到殖民地会团结起来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联合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杰斐逊岳父当时的一番话鼓舞了许多殖民地开拓者的民族士气，因为他已经敏感地嗅到了反抗运动潜在的强大力量。1772年10月威廉斯堡的记录中记载，约翰·威乐士曾说道：“如果‘反对派政党’公开反叛大英帝国，局势会一片混乱，奴隶会加入反叛，我们贩卖奴隶的交易将很难再维持下去，我会在混乱前离开这里。”“反对派政党”当时还未形成，他随口暗指的还只是反抗运动。

反抗是一回事，反叛又是另一回事。与杰斐逊同一阶层的部分弗吉尼亚人选择了忠于大英帝国，而非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表亲，塔兹韦尔庄园的约翰·伦道夫，后被人称为“保守党”约翰·伦道夫，因为他极为效忠大英帝国——当殖民地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时，他的忠心促使他选择了返回英国。总的来说，约有1/5，即20%的北美殖民地白种人居民选择了支持大英帝国。

然而，杰斐逊备忘录里的一则注释表明他的想法在不断膨胀。这则注释为：“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对精英阶层来说，革命是最敏锐的经济选择。英国殖民当局已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通过限制他们的资金（或限制他们贷款）达到自己的目的。弗吉尼亚州公共财政已陷入困境，州内无法继续通用“七年战争”期间发行的纸币，这使纸币的持有者迅速赤贫化。无疑还有个人资金方面的问题：庄园主亏欠英国债权人巨额资金。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些债务从父到子已拖欠了数辈，因此庄园主实则是一些伦敦商贸公司的附属财产”。弗吉尼亚庄园主欠债至少230万英镑，几乎占到北美殖民地亏欠英国商贸公司总额的一半。1774年5月，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建议暂停偿还这类债务。

仅数个星期之前，在个人财务方面，杰斐逊刚做出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决定。1773年约翰·威乐士去世时，留下了价值3万英镑的财产，但单他亏欠布里斯托的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他最大的债权

人）就高达1.1万英镑。1774年1月，杰斐逊和威乐士的其他两个女婿决定自行分配岳父的遗产，其结果是：如果杰斐逊偿还不了所承担的那部分威乐士的债务，就要用自己的财产抵押或偿还。

对殖民者来说，决意反叛绝不仅仅因为经济问题，但无疑与金钱密切相关。在弗吉尼亚，反叛的动力来自有产阶级，中产和无产阶级只是迟缓地跟从像杰斐逊这样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富人的革命，杰斐逊正是一名富人；这是一场开明的革命，而杰斐逊正是一个开明的人。

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力量产生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教导弗吉尼亚人如果脱离大英帝国的控制，就能看到一个更清新、更引人注目、更有吸引力的未来。

在杰斐逊的政治想象中，任何被视为侵犯自由的行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读。征税、驻军、制定贸易条例、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屠杀印第安人及其他事件，都是宗主国英国强势掌控北美殖民地权力的表现。这些权力在杰斐逊和其他人眼里是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或者至少应由他们主导制定相关的宪法条例）。离专制主义仅一步之遥，大英帝国的镇压近在咫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想法并没有错，从历史及他们的政治经历中可以看到，权力一贯倾向于统治者及其追随者，而并非定义更广泛的人民。

作为一名弗吉尼亚人及议员，杰斐逊敏锐地觉察到英殖民当局在不断地加大对权力的控制。1729年之前，英殖民当局未曾废除过弗吉尼亚殖民地宪法中的任何法案。在随后的35年间（即至1764年），殖民当局干涉多于60次，每年不少于2次。之后，1764～1773年的9年间，有35项法案被废除，呈稳定的令人激愤的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令议会议员等弗吉尼亚当地的权力阶层极为愤怒。

1774年5月19日星期四，弗吉尼亚报纸通告了英国议会制定的《波士顿港口法案》。该法案宣布：封锁波士顿海港，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直到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赔偿。

立法关闭波士顿港口意在报复波士顿人民为了抵抗茶叶人口税而发动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举动激怒了杰斐逊所在的贵族权力阶层（这是人们熟知的1774年“无可容忍法案”中的一则法案）。据杰斐逊记录：包括他在内的几名弗吉尼亚议员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要与马萨诸塞州一样，大胆地采取明确的立场”。

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及其他四五名议员加入了杰斐逊的州议会大厦会议厅行动。他们以图书馆为家，泡在里面查阅大量的议会及立法先例，其中包括约翰·拉什沃思所编纂的文件，他是一名参加过英国内战的反君主制的历史学家。杰斐逊回忆道：“我们坚信，有必要唤醒麻木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如果规定某一天为禁食和祷告日，这将最有可能唤起民众的注意力，并让他们警醒。”

1774年5月24日星期二，杰斐逊提出了一项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从1774年反常的寒冷的5月，到6月，再到7月，通过这一决议和其他政治事件，杰斐逊抓住了一切机会调整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在针对《印花税法案》开展的辩论期间，他看到诸多经验丰富的立法者想尽各种办法将他们的想法强加到帕特里克·亨利身上，这让他见识了实用主义的艺术。于是，他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威廉斯堡议会转移到了广阔的农村地区，从立法机制转移到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在提出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后，他不遗余力地促使议会采纳并推广该决议，这表明他日益认识到调动其追随者的情绪的重要性。

对杰斐逊来说，基于宗教理由呼吁革命是一种权宜手段，这表明他对政治的一种理解，而非说明他真的认为上帝会帮助英属北美殖民地。虽然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但他十分推崇精神感染力的作用。以宗教的方式提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理由，实际上是以一种不易被打败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只是在上帝面前表现出谦卑，呼吁广大笃信宗教的民众禁食、祷告，不要对抗权威。

在该决议的制定过程中，杰斐逊亲自斟酌措辞，同时，他的同僚们翻遍了拉什沃思关于英国清教徒采取的革命先例和形式的相关记载。用杰斐逊的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于1774年5月23日星期一“编造”了这一项决议，规定弗吉尼亚州的民众要虔诚地祈祷，以求从内战的罪恶中得到拯救。

与此同时，城镇自治议会商定要全面抵制各种英国货物，并号召成立大陆议会。了解了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项决策，并感受到当前局势的紧迫之后，位于威廉斯堡的殖民地领导层开始意识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并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要为其在北美进行的殖民统治付出代价。

5月，杰斐逊从他的家乡阿尔伯马尔县出发，前往威廉斯堡。待到7月他回到家乡时，蒙蒂塞洛的樱桃已经成熟了。回家后，他便开始埋头工作。在一封写给当地选民的信中，他和约翰·沃克宣布了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他们认为：由于受到恶意侵略，英属北美殖民地即将面临危险，而这一提案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他们的提案口吻严肃，措辞严谨。与自治议会一样，他们也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有发生“内战”的不祥之兆。

为了让民众更好地接受这一提案，杰斐逊向他的朋友查尔斯·克莱牧师寻求帮助。当年早些时候，杰斐逊的妹妹伊丽莎白溺水身亡后，正是克莱帮忙下葬的。克莱计划在哈德维尔河畔的圣安妮教区里的“新教堂”里布道。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位于最中心，便于大多数教民前来，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的注意。

在不同地方，举行礼拜仪式的日期不尽相同。1774年7月23日星期六，杰斐逊参加了圣安妮教区的礼拜仪式，这一活动散发出来的人文气

息深深地震撼了他。他写道："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带忧虑和恐慌的神色。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犹如电击一般，唤醒了每一个人，让他们挺直了脊梁，坚守自己的信念。"

三天后，阿尔伯马尔县的选民们聚集在夏洛特维尔县政府，选举杰斐逊和沃克为代表，参加8月在威廉斯堡召开的特别会议。此外，选民们还通过了《阿尔伯马尔县地产所有人提案》，谴责了《波士顿港口法案》。该提案由杰斐逊起草，提出了"人类应共同拥有的权利"。他指出："我们时刻准备着，和我们的同胞们一起，行使上帝赋予我们的所有正当权利。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旦有人侵犯这些宪法权利，我们必须重新确立这些权利并保障它们的行使。"此外，该提案还呼吁立即禁止进口英国商品，并提出将于15个月后，即1775年10月1日起，禁止向英国出口商品，除非美国人民所受的冤屈得以平反。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一边吃着新鲜的黄瓜和生菜，一边忙碌地工作着。一次大规模大陆会议将于1774年9月5日在费城召开，杰斐逊忙着为出席此次会议的弗吉尼亚州代表们撰写与会细则。

以此为契机，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作品：《英属美洲民权概观》。这本手册大概有六七百字，其中探讨了诸多关于美洲发展的普遍话题，将英属美洲这一新世界里的各项权利与英国这一旧世界里辉格党人为自由而战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他说，他写这些是为了提醒乔治三世：

> 在移民到美洲之前，我们的祖先是英联邦自治领的自由居民。他们拥有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的一项权利——如果有机会，人们有权利离开故土寻求更好的生活……同样也是遵循这条普遍规律，他们的祖先撒克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故乡——欧洲北部的荒野和森林，占领了不列颠岛，在那里定居，并制定了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不仅为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令英国人引以为豪。

在手册的最后，杰斐逊总结出政治和执政的本质：

> 去奉承那些害怕的人吧，这并不是美国特色。一味地恭维讨好，对那些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可能很受用，但是对那些坚持主张人权的人而言，却完全不起作用……请您张开双臂，拥抱自由、包容的思想吧！别让乔治三世这个名字成为历史长卷上的一个污点……执政的唯一技巧就是诚实。只要你一心一意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即使你失败了，人们也会信任你。不要妄想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满足另一部分人无节制的欲望，而是要赋予所有人平等和公正的权利……对于一个伟大的、蓄势待发的帝国，如何均衡其中各方的利益，这是命运给予你的一项重要任务。

杰斐逊还探讨了关于最大限度的忠诚这一话题，虽然这样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我们既不愿意，也没兴趣脱离大不列颠的统治。"然而，却有许多人希望这样做。"更何况，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的财产却要向别人纳税，被别人管制，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武力也许能摧毁我们的自由，却无法剥夺它。"

杰斐逊原本打算亲自把这一草案送到威廉斯堡。但他在途中感染痢疾。于是，他将草案复印了两份，派他的私人奴仆朱庇特送往威廉斯堡，一份交给佩顿·伦道夫，另一份交给帕特里克·亨利。之后，他返回了蒙蒂塞洛。

朱庇特将杰斐逊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送达威廉斯堡。在克莱门蒂娜·林德（北英格兰大街上的出版商威廉·林德的遗孀）的帮助下，这一手册得以出版，并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伦敦引起了大量民众的注意。

在佩顿·伦道夫家，城镇自治议会的议员们聚集在一起，传阅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阅读之后，大家纷纷鼓掌称赞。为了扩大这一手册的影响力，林德太太用她的手动印刷机在威廉斯堡的路德维尔–派尔代斯印刷所印刷出版了《英属美洲民权概观》。在手册的出版序言中，林德太太这样写道："在没有征询作者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冒昧地将他的观点与公众分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本手册里，一位最优秀、最具智慧的人表达了他对于公众深感兴趣的话题的看法，而广大公众毫无疑问有权利了解这一切。"此外，林德太太（也可能是其他编者）还选取了西塞罗的一则箴言，附在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对最高法官而言，为全社会服务是其应尽的职责。他有义务维持社会的尊严，并公平地为人民分配各项权利，只有这样，他才能忠实于人民给予的重大责任。"

1774年8月6日星期六，乔治·华盛顿花费3先令9便士购买了多本《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他将这本小册子称为"杰斐逊版的权利法案"。同时，托马斯·沃克（在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的遗嘱里，托马斯·沃克被指定为杰斐逊的监护人之一）也将他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书借给了自治议会的议员、民兵上校威廉·普雷斯顿，敦促他仔细阅读这本册子，并嘱咐道："我也只有一本，你一定要细心呵护它。"

在《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书中，杰斐逊明白了当地探讨了英属北美殖民地所暴露出的矛盾。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这样的揭露甚至可以说过于赤裸。但不论在思想上如何大肆地宣扬独立和战争，在现实当中，如何提出合理、正当的理由拿起武器进行革命，却又另当别论。正如杰斐逊所说："目前，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是我们的首选，这是明智的做法。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我所提出的做法仍然过于激进。"他认为，在当时的弗吉尼亚州，民众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步调"并不一致"，因此，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将思想进步的民众和思想比较落后的民众

团结在一起”。

这一手册的发行促使杰斐逊走上了引领美国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成为先锋战士之一。甚至有传言称，当时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根据该法案，杰斐逊有可能被宣告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

倘若说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将阿尔伯马尔县的民众唤醒了，那么在《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中，杰斐逊不仅有力地唤起民众的正义感，以促使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冤屈提出控诉，还不遗余力地调动他们的使命感。在行文布局方面，他合理地兼顾了细节和整体。一方面，他对英国殖民者的劣行提出了最详细的指控（其中一些措辞甚至对当代读者来说都较为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他还勾勒出一个辉煌的历史愿景，那就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漫长故事中无法磨灭的壮丽篇章。如此一来，通过关心民众所需，了解他们内心固有的渴望——投身于追求自由这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当中，为平淡的日常生活注入神话般的色彩，杰斐逊熟谙笔杆子里的政治领导之道。

不断积累知识，开阔眼界，思考关于自由、法律，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杰斐逊的精神生活。在威廉·史莫和乔治·威勒的指导下，杰斐逊和他的朋友达布尼·卡尔、约翰·佩吉都逐渐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处理各项事务所依靠的应该是理性，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利。专制统治，不论是由君主还是牧师实行，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充实自己精神生活之余，杰斐逊也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使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陷入各种危险。在他的日常记事本中，他摘录下了几行由蒲伯翻译的《荷马史诗》：

> 死亡是最可怕的命运，但任何人终究都要面对。
> 为国捐躯，是极其幸福之事，
> 在战斗中，勇士也许会被杀害，
> 但是，他的牺牲却能为祖国带来安宁，为孩子们带来自由，
> 所有国民也将对他的壮举感激不尽，
> 他的勇敢的朋友们将为他感到骄傲，
> 他的妻子将以他为荣，
> 整个民族将取得成功，
> 子孙后代也将受益于他的英雄事迹。

托马斯·杰斐逊为大西洋畔的世界带来《英属美洲民权概观》时，距离美国宣布独立仍有23个月。随着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杰斐逊逐渐

声名远播。约翰·亚当斯称这本册子为“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作品”，“恰如其分的措辞体现了作者老练的写作才能”。

1774年夏秋，随着杰斐逊的政治思想和信念逐渐被公众接受，他仿佛成了一位预言者，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瞰世界，洞察事物的本质，并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同胞们。凭借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勇气，他撰写了《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为处于茫然中的民众带去信念。

随着1774年渐渐接近尾声，身为一个丈夫、一位父亲、一名律师、一个种植爱好者、一位立法者和一个思想家，31岁的杰斐逊娴熟地掌握了新颖、高超的政治写作技巧。凭借《英属美洲民权概观》和他的其他作品，杰斐逊展示了他表达民意、调动公众情绪的非凡才能，既为民众勾勒出对未来的憧憬，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如何让遥远的未来变得触手可及，如何让梦想走进现实。

第七章
和平遥遥无期

是服从还是反抗，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

——英王乔治三世针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如是说

1775年3月初，蒙蒂塞洛的桃花开得正旺。杰斐逊正准备离开家乡前往里士满，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弗吉尼亚州会议。此次会议将在圣公会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届时将有诸多革命领袖与会。这座木制教堂位于山顶，是里士满最大的建筑物。据会议主办方预期，尽管初春时节的道路将略显泥泞，仍将有约100名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为了召开此次会议，教堂的每一块空间都被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圣坛围栏的后面设置了大会主席的席位，与会代表们坐在教堂长椅上，长椅的空余位置则预留给热切关注此次会议的民众们。教堂的窗户敞开着，这样一来，那些因为教堂里容不下而只能站到院子里的人们便可以聆听会议。

此次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杰斐逊的任务也很繁重。预计战争有可能爆发，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导人们不得不就军事准备措施、税收和贸易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决策。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则对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采取了更坚决的反对态度。

当时，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是邓莫尔伯爵四世约翰·默里。他出生于苏格兰，继博特托尔特男爵之后出任弗吉尼亚殖民总督，以作风强硬而著称。在任期间，他曾禁止弗吉尼亚人从英国进口武器和火药。英国当局也下令没收任何运往美国的弹药，明确规定英国王室驻北美殖民地的官员们须阻止一切关于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选举的活动。双方均未表现出任何让步的倾向。

在圣约翰教堂，杰斐逊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中。他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他深信，当时的局势所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

1775年3月23日星期四，在这个温暖的春日，教堂的窗户都敞开着。站在教堂中殿东面过道处的47号长椅上，帕特里克·亨利呼吁弗吉尼亚州民兵队进入战略防御状态。他的演讲鞭辟入里：“诸位可能希望呼吁和平！和平！但是，目前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了！”讲到高潮处，他情不自禁地呼喊道，“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但我的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对于杰斐逊而言，亨利仿佛拥有魔力。“在我看来，如果‘雄辩’一词

足以形容能言善辩的话，他的雄辩能力超乎想象，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叹为观止。”杰斐逊补充道，“在他演讲完之后再复述他的话不是一件易事，他发表演讲时说的话往往都切中要害。”

随后，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委员会，针对殖民地的防御工作制订各项具体计划。委员会决议：

> 每个骑兵队除长官外，由30人组成。每个骑兵配给良驹一匹、马勒一副、马鞍一套、手枪及枪套若干、卡宾枪或其他短火铳一把，并配有水桶一个、刀或战斧一把、火药一磅以及弹药至少四磅。所有士兵务必尽全力熟悉各项骑兵军事操练，并严格训练战马，以使它们适应枪支开火。

当然，各殖民地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分歧。例如，纽约殖民地议会投票拒绝派代表参加将于5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针对这一事件，杰斐逊问道，这一决议是否意味着纽约州已经“脱离了联盟”呢？

武器、民兵队、团结——在里士满，杰斐逊忙着从这些方面开展防御工作。在履行身为委员会成员和弗吉尼亚州议员的职责之余，杰斐逊也努力地让自己在里士满的日子过得愉快。他有时在荣赫鹏太太的小酒馆小酌两口，有时在荣赫鹏太太酒馆的竞争对手——古恩的小酒馆那里用餐，有时则逛逛奥格尔维太太的书店，丰富自己的藏书。就在这舒适的日子中，他政治生涯中的下一个事件悄然而至。1775年3月27日星期一，杰斐逊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弗吉尼亚州代表。

第一届大陆会议是在《波士顿港口法案》以及其他所谓的强制法案颁布之后举行的。在1774年9~10月，也就是从杰斐逊完成《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之后不久到他感染痢疾这一期间，与会代表们针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申诉，呼吁北美殖民地坚决抵制英货（制定了抵制英货的详细措施），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若有必要，将召开下一届大陆会议。

这一必要性在1774年秋确实凸显了出来。这个秋天，战争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在新英格兰，英国驻军控制了火药库和大炮，以防止殖民地民兵使用这些军火；此外，他们还要求英国当局增派更多的驻军，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血腥的杀戮即将上演。为了回应这一增派驻军的要求，也为了回应各殖民地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提出的申诉，英国殖民政府明确指示英国驻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用武力解决”。“对待武力反抗，就应血债血偿。”英国当局如是说。

谈判毫无可能，战争一触即发。因此，与第一届大陆会议相比，第二届大陆会议所承担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管理这个业已开始反英武装革命，雄心勃勃地渴求独立的国家。

在里士满，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民兵如何做好战斗准备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一旦弗吉尼亚州遭受侵略或者爆发叛乱……整个州无疑会陷入危险的境地”。1775年4月的第3个星期过后，遭受入侵和爆发叛乱这两种可能性均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1775年4月19日星期三，英国驻军与殖民地民众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武装冲突。经过一天的激战，战火绵延了长达16英里，最终导致273名英国驻军和95名美国民兵伤亡。这场战斗的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完全明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显而易见。正如杰斐逊在了解了这次战役的相关报道后所说的那样，“和解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疯狂的报复情绪似乎已经占据了所有人的心”。

画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在写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信中道：“战火已经在美国燃烧起来了，我敢肯定，它将迅速蔓延，其猛烈程度将不亚于在任何时代、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过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州，各种状况也层出不穷，一方面，殖民地奴隶的反抗时有发生（尽管这些反抗有些是谣传，有些则真实发生了）；另一方面，总督邓莫尔伯爵下令管制威廉斯堡的火药供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袖们忙着想各种对策。到了4月中旬，切斯特菲尔德县（距阿尔伯马尔县不远）的白人革命者们十分担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而在诺森伯兰县，两个奴隶将一捆稻草绑在一根棍子上点燃，放火烧了一个民兵军官的房子。在这种形势下，邓莫尔伯爵决定拉拢殖民地奴隶。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些白人革命者所忌惮的奴隶们恰恰是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天然盟友。

1775年4月20日星期四到4月21日星期五，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成功地将15桶半桶装的火药从威廉斯堡的弹药库转移到了皇家海军舰艇“莫德林”号上，解除了弗吉尼亚州民众的革命武装。满腔愤怒的民众聚集在总督府外面，时刻准备为争取独立而战。

为了平息众怒，邓莫尔伯爵于总督府中发表声明，称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障火药的安全，以防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但是，这位总督几乎无法掩盖他对于聚众人群的愤怒和蔑视，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对英国政府权威的莫大侮辱”。邓莫尔总督对威廉斯堡的民兵组织尤其感到愤怒，他说：“这些民兵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火枪全副武装着和我谈判，而制造这些武器的工厂竟然就在距离我家仅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两天后，他逮捕了该工厂的两名负责人，这标志着他向殖民地民众发起了真正的进攻。

1775年4月22日星期六，邓莫尔总督宣称，“永恒的上帝作证”，倘若再有任何对英国王室政权的“损害或侮辱”，“我将宣布给予奴隶自由，并将威廉斯堡化为灰烬”。

不出预料，这则公告的发表迅速在白人当中引起了反响。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白人在写给他的海外朋友的信中称：“邓莫尔总督打算解放我们的奴隶，这一想法简直比地狱还要黑暗、还要可怕。”于是，赞成蓄奴制的殖民地民众纷纷开始或加紧备战，杰斐逊便在他们的行列中。

北美大陆的这场危机充斥着各种明争暗斗，令杰斐逊有些困扰。1775年5月7日星期日，在写给他远在英国的恩师威廉·史莫的信中，杰斐逊说着说着突然笔锋一转，叹道：“天呐，我到底该怎么做？一直沉浸在我的祖国所遭受的苦难当中，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解决这些政治纷争。”

然而，他无法自行解决这些困扰。在写给史莫的信中，他说：“这个星期，不幸的消息已经传来，英国驻军和我们在波士顿的同胞们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杰斐逊看来，在这种局势下，流血冲突的发生似乎注定了和平解决纷争变得毫无可能。（杰斐逊的信寄到英国之前，史莫逝世于英国伯明翰。）

邓莫尔扣押火药的行动以及他关于废除蓄奴制的言论使弗吉尼亚州的局势更加紧张，群情更加激愤。阿尔伯马尔县的民兵宣称：“邓莫尔应当停止扣押火药，别再危言耸听，唆使黑人奴隶叛乱。”

在杰斐逊看来，邓莫尔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了一个普遍真理：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顽固，丝毫没有表现出对美国人民的尊重，似乎美国民众表现得越无畏，英政府采取的政策越粗暴。杰斐逊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这些蔑视，也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玄妙，这其中有尊重，有钩心斗角，也有顺从，它们以不同的比例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变化着。这些关系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杰斐逊可以敏锐地察觉出这些不同关系之间的较量和细微变化。

他精辟地分析了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注意一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以北美殖民地民众现在的精神状态，英国政府傲慢自大的作为更容易让他们恼羞成怒，而不是吓坏。”

1775年6月，弗吉尼亚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会议，议员们热烈地探讨了当前的局势，这些讨论促使杰斐逊掌握了更多政治技巧。当时，议会正在考虑英国政府的和解建议，就在此时，弗吉尼亚州的三名殖民地居民因试图闯入火药库而被打伤，因为火药库里安置了散弹猎枪，一旦有人擅闯，便会开火。这一事件让邓莫尔深感时局动荡，为了安全起见，他和他的家人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佛威尔”号离开了威廉斯堡。

大约在1775年6月10日星期六，杰斐逊代表弗吉尼亚州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和解建议做出了回复。当时，皇家总督逃离；为了争夺火药，各种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奴隶叛乱使整个弗吉尼亚州人心惶惶。在这样群情鼎沸的局势下，杰斐逊丝毫没有自乱阵脚，他用慎重的语气说

道："我们仔细了解了和解提议，并尽我们所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考虑。但是，令我们痛苦和失望的是，我们最终不得不声明，这项提议只是改变了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方式，丝毫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

和杰斐逊相比，弗吉尼亚州的另一些人则没有采取这么坚定的态度。据杰斐逊回忆，与自己相比，甚至与主张弗吉尼亚应采取更强硬的革命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相比，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和来自斯塔福德县的律师詹姆斯·默瑟曾更加公开地谈论支持与英政府和解。

因为伦道夫"担心尚未认清时局的尼古拉斯先生答应英政府的和解提议"，他便委托与他持相同立场的杰斐逊起草弗吉尼亚议会对该提议的回复。杰斐逊所做出的回复开了个好头，接下来，伦道夫便可以在弗吉尼亚议会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指派尼古拉斯负责此事，显然收不到这样的效果。

在如何实现民族独立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即使在波士顿发生了倾茶事件，在莱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威廉斯堡发生了火药事件，后来又谣传着奴隶们将发动武装叛乱，杰斐逊和他的同胞们仍然激烈地争论着是否要与宗主国英国彻底决裂。

在杰斐逊这些年的政治生涯中，众人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冲突中，杰斐逊不断成长、蜕变。对他而言，处理政治事务往往意味着在那些热切地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之间的博弈。他曾经梦想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问题，顺利地达成彼此都满意的共识，但现实截然相反，而恰恰也是这些现实对他的影响最大。

在伦道夫的引领下，杰斐逊所提的草案最终通过了议会的表决。杰斐逊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草案受到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默瑟的种种质疑，就像被泼了许多冷水，它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最终它还是通过了表决。对杰斐逊和伦道夫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各殖民地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样的团结，为了最终引领弗吉尼亚议会走向国会，杰斐逊不停地操劳奔波。1775年6月11日星期日，他从威廉斯堡出发，前往费城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召唤他。

第八章
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

在敌人面前，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像人一样理性地思考，现在，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可以像人一样英勇地战斗。

——托马斯·杰斐逊，于1775年7月5日

时局充斥着各种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大家的观点五花八门。

——托马斯·杰斐逊，1775年于费城

第二届大陆会议在位于费城第三大道和第四大道之间的栗树街上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后来被称为独立厅）召开，杰斐逊参加会议时便寄宿在栗树街，在那里，他记录了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将军事形势的变化记录下来寄回弗吉尼亚议会，仔细阅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起草的《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还做了北美大陆独立战争财务及军事预算。

在某种程度上说，为了这一时刻、这项工作，杰斐逊一直在准备着。自从10年前，他第一次站在威廉斯堡的城镇自治议会的大厅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了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说之后，他便一直在准备。在一个个星光闪烁的夜晚，他在福基尔总督的府邸里，听着音乐，不断汲取知识；在乔治·威勒家，他沉浸在法律和历史的世界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宝贵的几年；在雷利酒馆，他在佩顿·伦道夫的指导下，不断地观察和学习参政之道。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风格——以朋友的姿态赢得比他年长的人的支持，亲切和蔼地对待同龄人，凭借他的笔杆子和智慧在政治争论里锁定胜局，凭借这种杰斐逊式的政治风格，他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他而言，那里不再是威廉斯堡，不再是里士满，而是家，他感到游刃有余，丝毫不感到无所适从。

在弗吉尼亚州，杰斐逊熟悉那里的一切人和事。在费城，他参加了两届大陆会议。在那里，他有过闲暇时的徜徉，碰撞出了新的思想火花，结交了新的朋友，结识了新的政治势力。

圣公会牧师威廉·史密斯说：“费城人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民族，这些人在语言、习俗、思想等方面都有差异。”另一位牧师雅各布说：“即使是特拉华湾畔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认为自己有权和绅士或学者一样，自由地表达对于宗教和政治事务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期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和他富有的邻居享有同等的地位。”

在费城，杰斐逊陷入了一场猛烈的战争和纷飞的战争传言中。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提议任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1775年6月15日星期四，会议最终通过了这一决案。两天后，大陆军与英军在波士顿打响了邦克山战役。

事实证明，帕特里克·亨利3月在费城以南250英里处的圣约翰教堂的预言现在应验了：和平手段无法解决问题。

在费城，杰斐逊的到来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罗得岛州的代表塞缪尔·沃德记录了他看到“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时的感受：“这个弗吉尼亚人看上去睿智十足、意气风发，而他去年夏天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也确实证明了他的卓尔不群。”之后，约翰·亚当斯也转述了另一位与会代表对杰斐逊的看法：“杰斐逊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吸尘器’——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各种知识，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还想学习德语。”

从表面来看，很难想象亚当斯和杰斐逊会有交集。年龄上，亚当斯比杰斐逊年长8岁；身高上，亚当斯比杰斐逊矮5英寸；亚当斯是个十足的新英格兰人，而杰斐逊则是地道的弗吉尼亚人；亚当斯很难保持缄默或者忍住脾气，而杰斐逊则擅长管理自己情绪。然而，多亏了亚当斯了不起的妻子——阿比盖尔在两人间的及时沟通，他们后来携手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错综复杂的联盟之一。

约翰·亚当斯于173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他的父亲是农民，同时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彼得·杰斐逊一样，老约翰·亚当斯对他的儿子有重大影响。约翰·亚当斯年轻时就读于哈佛大学，他曾考虑成为公理会牧师，但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选择成为律师。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动荡岁月里，他在波士顿律师界崭露头角。

从1775年到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组建政府之前，亚当斯和杰斐逊经常共事，且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是在他们代表美国出使欧洲期间。但在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的前10年，他们在美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两人退休后，便恢复了他们年轻时在费城建立的友谊。他们共同的革命伙伴本杰明·拉什在1812年2月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在我心中，你和杰斐逊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北极和南极”，“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有些人奔走呼号，有些人诉诸笔端，有些人毅然从戎，而你和杰斐逊先生则在思想上引领我们”。

通过对时局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和美国北方殖民地的代表们（尤其是亚当斯）的接触，杰斐逊逐渐对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革命志士钦佩不已。一方面，杰斐逊了解了诸多他们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密切关注着家乡发生的流血冲突，并将自己的荣辱和家乡的生死紧密联系在一起。和他们相处，杰斐逊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殖民地人民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他感到革命的气息在四周弥漫。

杰斐逊抵达费城的一周后，会议通过了入侵加拿大的决议。这一惊人之举牢牢锁定了加拿大在杰斐逊的政治和军事设想中的地位。自从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已占领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那里曾一度被称为新法兰西。1775年，美军入侵加拿大，蒙特利尔沦陷，但魁北克仍顽强抵抗，美军未能完全占领加拿大。这导致加拿大最终还是落入英国手中，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的安身之处。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人心中，加拿大成为一个可能重振英国势力的集结地，会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产生影响。

1775年，在费城，杰斐逊可以感觉到，广大殖民地群众深受革命情绪感染。他于7月写道："现在，只要我们愿意竭尽全力，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没有能力反抗大英帝国的压迫，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尽管通过革命实现独立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但杰斐逊仍保持着高尚的想法，希望美国民众以磅礴的气势和高尚的美德赢得独立。

围绕美国独立这一问题，杰斐逊和约翰·迪金森（《宾夕法尼亚农人来信》的作者），在后者坐落于费城边缘日耳曼敦道的斐尔丘庄园里探讨了几个星期。作为讨论的结果，他们起草了《武力革命的原因和必要性声明》。1775年7月6日星期四，大陆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一声明。

第二天，杰斐逊悄然离开了大陆会议，乘渡船前往植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位于司库河畔的伍德兰兹庄园。在那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起醉心于他们酷爱的园林园艺。徜徉在夏日的伍德兰兹庄园，杰斐逊任凭他的想象力恣意驰骋，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思想的火花，思考着如何把自然界与人类融为一体。之后，他前往司库河瀑布游玩，还在那里享用了晚餐。

通过这样的短途旅行，杰斐逊将自己从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氛围中解脱出来，让身心得到了尽管很短暂但愉悦的放松。基于迪金森和杰斐逊起草的声明，大陆会议列出了武装抵抗英国统治的一系列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会议还寄希望于与英王和解，并于1775年7月8日星期六向英国政府呈递了和平请愿书。

没有任何结果。

杰斐逊很少在大型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更喜欢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博得大家的喝彩。由于熟谙政治学和历史学，约翰·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的保持缄默使他在辩论中获益良多。根据所有他曾经读过的书籍和他的亲身经历，亚当斯发现，"一个人要想成名或升迁，在公众面前能言善辩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除非他极其谨慎、有节制、矜持地展现出其雄辩的口才"。亚当斯将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划归为与杰斐逊一样的一类人，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滔滔不绝。亚当斯说："一个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人无疑会和诸多公众事务打交道，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也可能是受人敦促。他日复一日不辞辛苦地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措施的正确性，反驳政见不同的人提出的异议，如此一来，公众就会对他过于熟

悉，并不可避免地使他树敌过多。”

如果一个政治家能够默默无闻地起草公共文件或商议公共事务，而不是费尽心思地进入议会或某个较大的委员会，他往往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对公众施加影响，而且他树敌的风险会小很多。亚当斯说：“人们在争论的时候，往往会不甘示弱地推理、慷慨陈词、机智应答、讥笑挖苦、诙谐巧辩或者讽刺，而所有这些技巧都很容易在辩论中得到锻炼。”他补充道：“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活跃在公开辩论里，几年下来，他便会在全国树立众多敌人，至少那些在某次争论中觉得难堪的人会与他为敌，他们会幸灾乐祸地挫他的锐气，让他蒙羞。”

在1775年的革命洪流里，杰斐逊勤于思考而又不忘联系实际，自信而又不失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我们无法预测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但是，我们现在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至少应该防范我们所预见的可能发生的灾难。”也许“一些天资聪颖、精神顽强的人士”应该交由华盛顿将军进行训练，以了解“必要的战争技巧”。

尽管诸多事情都无法预知，但战争中所使用的政治语言则必须颂扬已取得的胜利，为黑暗的时刻带去希望。杰斐逊就十分精通这一门复杂的语言，他清楚地认识到，弗吉尼亚面临着“缺乏”军事技能的局面——在劫掠肆虐的当下，它是唯一可以用来保障公众安全的技能。杰斐逊在这里使用“劫掠”一词，是他的律师身份使然。这个词是一个古老的法律术语，表示暴力占有财产，它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强调任何财产所有者都与斗争息息相关。

1775年8月1日星期二，杰斐逊来到第三大道，逛了逛罗伯特·贝尔的小店，买了一本詹姆斯·伯格的《政治专题论文集》。之后，他便离开费城，前往弗吉尼亚州。途中，他在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市的克莱夫人旅馆短暂停留。之后，他继续前行，到达安纳波利斯市的切斯特顿，最后经由皇家港口回到蒙蒂塞洛。

由于已找不到任何杰斐逊和他的妻子帕蒂之间的信件，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在分离时彼此表达思念的语气。尽管如此，鉴于杰斐逊一生中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写过许多信，我们可以推测，杰斐逊给妻子写信的方式有可能和与他同时代的小西奥多里克·布兰德给自己妻子写信的方式大致相同。布兰德也是弗吉尼亚人，他是一个医生、政治家，也是革命家。他在1777年在新泽西州的前线写给他的妻子玛莎的信中说：“天呐，亲爱的，在你给我写信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你的情况就好。无论如何，我期望你可以在聊别的话题之前，多谈些那个我喜欢的、永远喜欢的主题——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早餐，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外出，告诉我你的一切，别让我担心你的健康……不要害怕……是的，你又可以感觉到你丈夫满溢着爱和深情的亲吻。天堂不会无情地让两个如此深爱的人分开的，如果它硬生生地要使我们阴阳相隔，我们乘什么交通工具在天堂相会呢？”

和帕蒂一起，杰斐逊经营着他曾经幻想拥有的那种婚姻和生活。音乐和舞蹈在他们生活里是必不可少的，杰斐逊总是哼着小曲，他还订购了一架伊奥利亚竖琴，又花5英镑买了一把新小提琴。在记忆里，他记得他的姐姐珍唱歌的声音。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坐下来听帕蒂弹钢琴或竖琴。

据杰斐逊家的奴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说：“夫人比较娇小，但是十分漂亮。”帕蒂总是很忙碌，一边忙着养育孩子，一边忙着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照看种植园。她的账本上记录着她的日常工作，包括监督宰杀鸭、火鸡、猪和羊等。她还得管理家里的奴隶。

杰斐逊的住所蒙蒂塞洛一共经历了三次修建。尽管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在18世纪90年代被杰斐逊拆毁并进行了重建，而且它比第二次以及最后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要小很多，但它仍然是一座宏伟的深宅大院。一位曾去过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的客人这样写道：“这里是新建成的，有最新的意大利风格。”整个建筑的四周围着一圈柱廊，中楣上装饰着各式各样取材于神话的雕塑，非常迷人。在那里，杰斐逊收藏了一个象棋棋盘以及配套的棋子、一个西洋双陆棋的棋盘、一架折射式天文望远镜、8个百叶窗，以及苏格兰地毯。他总是注意搜集可爱的小玩意儿，当然，也总是热心于收藏各种书籍。即使是在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里，据说也有一个书房，里面有丰富的、精心挑选的藏书。

据这位客人回忆，蒙蒂塞洛本身就是一座典雅的建筑。它恰恰是杰斐逊涉猎广泛、博闻强记的最生动体现。从书籍到音乐，到闲暇娱乐，到艺术，再到建筑，杰斐逊在不断地学习、体验、尝试、品味和生活着。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沙德维尔和位于威廉斯堡的总督府里，他曾经聆听教导——人可以领略并创造一个广阔的世界。

杰斐逊的建筑造诣得益于多本建筑学著作，其中包括詹姆斯·吉布斯的《建筑设计规则》以及《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建筑风格》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在装潢蒙蒂塞洛的时候，他琢磨着餐厅应采用什么样的粉刷方案，订购了一本汉娜·格拉斯所著的《烹饪艺术——简单的美味》，还买了一个衣橱。

除了建筑设计，杰斐逊在哲学方面也造诣颇深。他加入了“推广有益知识”哲学协会，该协会是由弗吉尼亚州的哲学爱好者（包括他的朋友约翰·佩吉）以美国哲学学会为模型而创建的。后来在1780年他又加入了美国哲学学会。此外，他还对医学感兴趣。1772年，詹姆斯·麦克鲁格（独立战争时期任弗吉尼亚州所有医院的总负责人）出版了《人类胆汁研究》一书，杰斐逊便买了一本。

受约翰·伦道夫的熏陶，杰斐逊还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伦道夫是杰斐逊的表亲，他是保皇党，也是一位检察长，住在位于威廉斯堡南英格兰大街的塔兹韦尔庄园，那是一座占地99英亩的漂亮宅邸。伦道夫拥有当时在弗吉尼亚州大概是最好的一把小提琴，对此杰斐逊一直十分

羡慕。伦道夫在园艺方面也颇具造诣，他还撰写了《一个弗吉尼亚公民的园艺论文》一书，在他的熏陶下，杰斐逊迷上了园艺。此外，菲利普·米勒、伯纳德·麦克马洪和托马斯·沃特利的著作也深刻地影响了杰斐逊对园艺和园林艺术的理解。在园艺方面，杰斐逊的核心思想是营造和控制对野性和自然产生的错觉。

1775年夏，伦道夫又一次成为杰斐逊一心惦念的表亲，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园艺，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当年8月，杰斐逊给伦道夫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亲切友好地与伦道夫寒暄，对于伦道夫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一事深表遗憾，并再一次地提及自己对他的小提琴的无限欣赏之意。

寒暄过后，杰斐逊便进入了正题：将伦道夫争取到美国独立事业的队伍当中，并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杰斐逊认为，英国当局对美国人民的立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在美国，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仅仅集中在“一小拨人”当中，并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杰斐逊对当时的局势有如下分析：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并不限于革命精英，而是在汲取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

第二个误解令杰斐逊更加义愤填膺。他说：“英国当局一直认为，我们是懦夫，在他们的武力镇压下就会投降。”接着，他矜持、自豪地补充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采取过的和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一定会让他们的幻想破灭。”总而言之，杰斐逊希望伦道夫向英国政府证明，北美殖民地人民是广泛、团结、勇敢的革命力量，理应得到英国当局更多的尊重。

杰斐逊是从纯政治的角度思考。如果北美殖民地民众被认定为既不团结又懦弱，那就无法促使英国当局考虑通过谈判解决矛盾。美国这个新世界的软弱只会引起英国这个旧世界的蔑视。

在信中，杰斐逊原本打算威胁一下伦道夫，但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做法。他的威胁十分有趣，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如果英国当局打算武力统治沿海殖民地，弗吉尼亚人民会采取另一种办法——也许我们当中最顽强的人会“翻越群山”，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表明杰斐逊一直在参与探讨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那就是，致力于美国独立事业的殖民地民众可能会深入北美大陆腹地以脱离英国殖民统治。

这是有关杰斐逊这一构想的最初表达，在他后来的诸多文章中，他都将美国西部构想为自由的源泉和重振美国的地方。在1775年的这场危机中，杰斐逊提出的这一具体建议表明，他一直在竭力思索着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可能会造成哪些实际影响，以及一旦局势恶化，可能会发生哪些最可怕的突发情况。

杰斐逊并不想在信中对伦道夫放狠话，那样的话就达不到他写信的目的。他给伦道夫写这封信是为了通过他这位前往英国的表亲接触英国

当局中有权势的人物。在信的结尾处，杰斐逊热情地与伦道夫道别：“我收藏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关于政治学的书籍并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全。既然你已前往有‘文学的殿堂’和‘书籍的国度’之称的英国，你可能会愿意处理掉你在美国的一些书，以便在英国买更好的版本。对此，我十分愿意效劳，不论你心中有怎样合适的人选，我都愿意与他竞争。”

杰斐逊在这封信里的潜台词是：或许我们是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们都热衷于文化，有着共同的爱好。他在信开头处提到了小提琴，在结尾时又提到了书籍，这使得他那些干预性的政治言论和主张看起来像是一段很自然的对话中的一部分，这体现了杰斐逊的精明之处。

伦道夫读出了杰斐逊的言外之意。1775年8月31日，在给杰斐逊的回信中，他写道：“虽然我们可能在政治上持不同的观点，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证明我们私下不可以惺惺相惜，我从前就坚信我们会彼此欣赏和尊重。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得冷淡，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率先造成这种局面的人。我们俩似乎致力于截然相反的事业，而我们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成功。”

杰斐逊的这封信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信件经由伦道夫之手转到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二世威廉·理雅各的手中。如此一来，杰斐逊完成了他的预期任务：向英国殖民当局的当权人士表达自己的观点。

1775年9月，杰斐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蒙蒂塞洛陪他的家人。这期间发生了一幕悲剧：他年仅一岁半的女儿珍夭折了。自从珍去世以后，在每次离家外出的家信中，杰斐逊总不忘惦念他的妻子帕蒂和女儿帕茜，后者是他当时唯一活着的孩子。

然而，杰斐逊具有极大的公共责任感。于是，1775年9月25日星期一，他离开了蒙蒂塞洛，前往费城。

再次寄宿在栗树街，杰斐逊重新投入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工作当中，但他心里仍然牵挂着帕蒂和蒙蒂塞洛。他很依赖他的妻子，总是十分信赖地向她倾吐一些政治问题，也在写给她的信中提及军事事务。然而，在费城的这个秋天，他却没有收到妻子的任何音信，因为她生病了。

到了1775年10月31日星期二，他更加担心帕蒂。他告诉他的朋友约翰·佩吉：“自从来到这里，我每星期都留出将近一天的时间写信。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音信，哪怕是她写的只言片语。”

8天之后，他更加绝望了。他在写给他内兄的信中说：“自从我离开弗吉尼亚，就没有收到任何那里的人写给我的只言片语，更别说向别人打听下我家人的消息了。这让我心生挂虑，焦虑不断折磨着我，快无法忍受了。天呐，如果家里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知道吧。”

杰斐逊对家人的忧虑逐渐蔓延到了政治领域。有诸多报道称英国当

局在集结兵力——经由伦敦塔运送大炮，从爱尔兰调集2　000人的部队，多艘护卫舰开往美国中部殖民地。这一切行动都是针对一个目标：弗吉尼亚。

更确切地说，都是针对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杰斐逊说：“应邓莫尔伯爵明确、坚决的指令，英国当局采取了这次行动，计划将我们沿河的种植园变成一片荒芜。”

似乎一切都不尽如人意。1775年10月22日星期日，杰斐逊应邀到费城葡萄酒商人亨利·希尔在罗克斯伯勒的乡间别墅用餐，这或许为杰斐逊提供了些许庇护，使他得以躲避这一系列风暴带来的冲击。在那里，以杰斐逊所崇拜的佩顿·伦道夫为首，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聚集在了一起。

不幸的是，4点左右，佩顿·伦道夫突患中风——杰斐逊称之为“卒中”，在奄奄一息地撑了大约5个小时后，当天晚上9点卒于希尔的别墅。

对于杰斐逊而言，佩顿·伦道夫是一个世界的象征，这个世界杰斐逊十分熟悉，并立志要在这里奋斗。因此，佩顿·伦道夫的逝世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个风云暗涌的时刻倒下了。佩顿·伦道夫在弗吉尼亚政治界叱咤风云，曾活跃在城镇自治议会、雷利酒馆、圣约翰教堂和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等重要政治场所。杰斐逊始终将伦道夫视为自己的榜样，十分钦佩伦道夫能兼具坚定的信仰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也正是凭借这种品质，伦道夫（杰斐逊称其为“最值得我们尊敬的演讲家”）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

佩顿·伦道夫去世，帕蒂生病，女儿夭折，这一切的发生似乎让杰斐逊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困扰。之后，在1775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中间几天，英国殖民者试图让英国舰艇上全副武装的英军登陆位于诺福克港口附近的弗吉尼亚汉普顿市。当时，诺福克港口在邓莫尔的控制下，这为英军在进入美国的关键要道上提供了一个战略基地。在北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理查德·蒙哥马利领导下的大陆军在远征加拿大。而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会（城镇自治议会被邓莫尔解散之后成立的执政机构）则创建了一个安全委员会——一个用以监督该州军队的民间机构。

杰斐逊所珍爱的一切都处在危险当中。在《独立宣言》发布前的11个月里，争论永无休止。就家人而言，杰斐逊无法确定他们生活得怎样，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帕蒂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就政治局势而言，似乎一切都扑朔迷离，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呈压倒性数量的英军与北美殖民地人民冲突不断。

在费城，杰斐逊不断地收到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写给他的信，里面记录了占绝对优势的英军对弗吉尼亚的劫掠蹂躏。约翰·佩吉给他写信：“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城镇遭受掠夺，即使我们的房子被毁坏，我们也

不会叹息。”这无意中重复了杰斐逊5年前对他说过的话。那时，杰斐逊家位于沙德维尔的宅第为大火烧毁，他给约翰·佩吉写信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约翰·佩吉信中还说：“我早已放弃拯救我的房屋。”

与此同时，杰斐逊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政治伙伴们也同样正在他们的家乡为类似的事情担忧着。杰斐逊在第二届大陆会议工作期间，人们有时会减少对他的个人因素的关注，而更多地去了解他撰写的那些引起大家共鸣的政治文件。然而，个人和外界是密切联系的：1775年的紧张局势和各种势力的角逐对1776年夏的杰斐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诸多报道，他了解到，在弗吉尼亚，革命群众与邓莫尔的关系逐渐恶化，流血冲突不断爆发，民众的恐惧逐渐蔓延。这使得他坚强起来，准备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争。

1775年11月7日在大众关于美国革命的记忆中是一个被遗忘的日子，但是这个秋日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最终推动了第二年《独立宣言》在费城得以通过。

邓莫尔率舰队驻守诺福克，他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并下令任何愿意拿起武器反对美国革命者的黑奴或契约仆人可以重获自由，这直接向弗吉尼亚白人革命群众发起了挑战。随着邓莫尔这一公告的发布，受惊的弗吉尼亚白人民众以及对他们深表同情的其他殖民地白人们突然目睹了那些他们激动不安地想象出来的可怕情景变成了现实——黑奴们群起反抗他们的主人。如此一来，诸多原本对独立保持淡漠态度的白人纷纷投入了革命的阵营。

在这样的局势下，杰斐逊立即想到了他家人的安危。如果邓莫尔能成功地鼓动黑奴和契约仆人加入英军的队伍，那么蒙蒂塞洛就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杰斐逊为帕蒂和他的家人制订了多个逃离计划。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暴力事件，他们就可以逃到可能较为安全的地方，然后杰斐逊会与他们在那里会合。11月的时候，杰斐逊给他内兄写信：“我已经写信给帕蒂，告诉了她一个确保安全的方案，这样你们就可以远离邓莫尔伯爵警报的惊扰。”

就在杰斐逊为他的家人制定这些紧急措施时，邓莫尔这则鼓动奴隶罢工的公告迅速席卷了美洲东海岸。11月下旬，约翰·佩吉从弗吉尼亚写信给杰斐逊，他信中的语气既有蔑视又有一丝恳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尽量让我们弄到些军火和弹药吧！”佩吉既害怕英军，又害怕黑人奴隶发动叛乱。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弗吉尼亚州的革命精英们意识到他们的财产会落入英国人之手。1775年年底，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有些无赖，都是些外国人，已经在搜寻那些大房子和漂亮的宅第了。”1775年11月25日，尼古拉斯又给杰斐逊写信：“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现在更需要发挥聪明才智，这是刻

不容缓的。”

随着第二届大陆会议接近尾声，为了查明此次会议未解决的事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一项任务，杰斐逊被提名为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他一共发现了27件需要处理的事项，包括货币、印度事务和制盐等。此外，杰斐逊还有另外一项任务：按与会代表们的建议，会议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负责在大陆会议休会期间管辖各项事务。为了规划这一委员会的工作职权，又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杰斐逊便任职于该工作组。

这些对杰斐逊来说是有益的工作，因为他需要对大陆会议所一直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弄清它的哪些功能是必不可少的。1775年12月15日，他拟订了一份草案，其中列出了19项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职能，包括“通过海陆两种方式为大陆军提供供给”、“搜集有关当前局势的情报，了解敌人的计划”、“确保军事要塞和军队驻地的防御以及保护，并防止敌人获得新的货船”等。这些职能着重强调了诸多实际的军事问题，也正是长期以来萦绕在杰斐逊心中的主要问题。

尽管自己的家人也陷入了可能发生的危险当中，杰斐逊还是清楚地表示：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坚持以眼还眼了。有报道称，美国军官伊森·艾伦在加拿大战役中被抓获，将被戴上镣铐遣送至英国，并将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受到处罚。为了回应这一事件，杰斐逊在他为大陆会议拟写的一项宣言草案中提出，英国囚犯应对发生在艾伦身上的一切事情负责。他说：“我们强烈谴责这起事件，它迫使我们血债血偿，为了制止血腥无谓的杀戮继续蔓延，我们唯有诉诸报复手段。”美国人民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尽管最后大陆会议暂缓向乔治·华盛顿发布任何指示，但杰斐逊撰写的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草案表明，他认清了当时局势的本来面目，而没有以自己原本抱有的美好期望看待它。

1775年12月28日星期四，杰斐逊离开费城踏上了回家的路，并于1月中旬抵达蒙蒂塞洛。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各种蓬勃的生命迹象如往常一样随处可见。杰斐逊打开了一桶1770年的马德拉白葡萄酒，和家人一同畅饮。他还计划带妻子一起到费城，注射天花预防针。然而，危机还是无法遏制地逐渐蔓延开了。1776年2月4日星期日，杰斐逊收到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它的作者托马斯·潘恩这样写道：“美国的独立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全人类的事业。”杰斐逊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第九章
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立刻宣布各殖民地独立，把我们从废墟中拯救出来吧！

——约翰·佩吉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于1776年春

钟声响了一整天，又几乎响了一整晚。连基督堂的教堂钟也响了。

——约翰·亚当斯，描述1776年《独立宣言》在费城通过时人们的反应

1776年3月31日星期日早晨7点左右，杰斐逊的母亲珍·伦道夫·杰斐逊突然中风，一个小时后逝世，享年55岁。

杰斐逊请查尔斯·克莱牧师主持他母亲的葬礼。珍被安葬在蒙蒂塞洛。看着她的遗体葬入他视为神圣的土地中，和其他已经去世的、他挚爱的人在一起，杰斐逊十分确信，母亲会永远和他的家人同在，永远和他同在。

珍的逝世让她的儿子变得更加茫然不知所措。他原本埋首于一个最困难也最可怕的政治事业（革命并建立一个新型政府）中，却突然赤裸裸地面对了人生终会经历的一种最严重的伤痛。人的一生中，在理想的情况下，孩子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呵护、安慰和爱。但是，父母有时也会让孩子恼怒、恐惧和焦虑。因此，父母的死亡对孩子来说既意味着损失，也意味着解脱。

在不同的时刻或者不同的年月，这两种感情混合的比例可能会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意味着孩子自己将被迫承担起生活的重任，无论他几岁。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生活的重任也会越来越多。尽管杰斐逊的生活丰富多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

当他转身离开墓地时，并没有忘记母亲。在强烈的悲痛情绪席卷他的内心时，他总会头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周期性头痛发作”。他的这种偏头痛非常严重，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他甚至说“疼得无法读书，写作，甚至无法思考”。1776年以前，杰斐逊最后一次为人所知的头痛发作是在丽贝卡·伯韦尔给他带来极大的悲伤之后。而这次，因为母亲的去世，他大脑中的血液和神经又一次激烈地运动起来，让他陷入

了极度痛苦。母亲的死亡带给杰斐逊的冲击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疼痛仍然在继续。

对杰斐逊来说，这一时期是不同寻常的，他的生活伴随着头痛、哀恸，以及对美国下一步行动的不确定。他试着让自己沉浸在种植园的生活中，花钱聘请助产师为伊丽莎白·海明斯接生她的儿子约翰。在家庭生活之外，他还试着解决一些政治事务，如筹集资金为弗吉尼亚购买火药，并救济波士顿的穷人。

1776年5月7日星期二，杰斐逊离开蒙蒂塞洛，7天后抵达费城。而帕蒂则留在了弗吉尼亚。杰斐逊对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政治伙伴小托马斯·纳尔逊说："在这里，我整个人处于一种不安的焦虑中，一如去年秋天我的状态，当时我妻子也无法跟我一同前来。"5月23日，杰斐逊寄宿在砖匠小雅各布·格拉夫的一幢三层房子里，位于费城第七大道和市场街的西南角。

刚开始，他感到自己与其他与会代表们的思维不同步。他们所探讨的事情他并不了解，因为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蒙蒂塞洛，沉浸在母亲逝世的哀伤当中。

但是，他很快便参与一切事务当中。

1776年6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提议"各殖民地联合起来，不再效忠于英国王室。殖民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均将也应该被彻底解除"。

做出决断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第二天，关于民族独立的争论便开始了。

大陆会议所主要关心的不是人的权利或美国政体的形式。历史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它仅仅在远方响起。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则充斥着议员们嘈杂的讨论声，探讨着他们认为最实际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一些代表认为，草率地宣布独立可能会促使一些，甚至是所有中部殖民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和纽约州）脱离美国独立事业的阵营。杰斐逊认为，如果殖民地内部产生这样的分裂，"其他强国可能会拒绝与我们联合帮助我们完成独立事业，也可能会牢牢地控制我们……它们提出来的条件就会相应地更加严苛，更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局势下，约翰·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威勒以及其他几个代表便着手整理赞成宣布独立的证据。他们首先指出："针对脱离英国统治这一计划或者殖民地有权利脱离英国统治这一点，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有可能会和英国重新建立关系，持反对意见的人只是不赞成现在宣布独立。"

因此，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鉴于纽约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与英国这个母本脱离的时机尚未成熟”，“它们在一段时间后再宣布独立是最审慎的做法”。

但不会太久。关于宣布独立的表决被推迟了3个星期，定在7月初。杰斐逊表示，在此期间，“应尽量减少对独立事业造成延误”。委员会的成员们奉命起草独立声明，为新政府制订计划，并为与外国结盟的谈判制定准则。

但是，距离独立声明的审议和表决已经不足3个星期，谁是起草该声明的最佳人选呢？

约翰·亚当斯认为这个任务非杰斐逊莫属。亚当斯的这一决定根源于前两年的一次秘密会谈。那是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前夕，本杰明·拉什和其他几个与会代表在费城郊区遇见了马萨诸塞州代表团。他们来到位于费城法兰克福地区的一个旅馆，距离市区6英里。在一个清静的房间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期间，拉什和他的同事们为亚当斯和其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实际的政治建议。很久以后，亚当斯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独立持有怀疑态度。”但马萨诸塞州当时在思想上比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要先进。亚当斯继续回忆道：

> 拉什他们说道，现在，不论在大陆会议上，抑或在任何私人谈话中，你们绝对不能说出“独立”这个词，也不能有关于这一想法的丝毫暗示或影射。若做不到，你们的前途就毁了。因为在宾夕法尼亚，独立这一想法如同《印花税法案》一样并不得人心，在北美中部和南部亦是如此。在这些地区，没有人敢提独立。更何况你们还是陷入这种不幸境地的马萨诸塞的代表。波士顿和整个马萨诸塞都处于高压统治下。你们正遭受英国舰队和军队暴虐的欺压，你们本身就令英军以及英国政府的所有盟友厌恶。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迫害你们，你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你们的情绪被激了起来。如此一来，一旦你们提出独立，人们就会认为你们的这一想法过于强烈、过于狂热、过于乐观。因此，你们务必要非常谨慎。你们绝不能提出任何大胆的措施，也绝不可以声称要为独立打头阵。你们都知道，弗吉尼亚是整个殖民地联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州。弗吉尼亚人对于他们长久以来的统治感到非常自豪，并认为他们有权利获得独立事业的领导权。而且，南部和中部各地区也非常愿意将这一领导权让予他们。

亚当斯很欣赏这次坦率的交谈。他回忆说：“这些话非常率直……我必须承认，其中蕴含着诸多智慧和明智的判断，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同事们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两年后，在1776年初夏，亚当斯会见了杰斐逊，提出了他所谓的“法兰克福建议”。一位记者对由杰斐逊执笔起草宣言一事感到好奇，

在写给这位记者的信中，亚当斯说道：

> 你问为什么让杰斐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负责《独立宣言》的起草？我的回答是：根据“法兰克福建议”，弗吉尼亚州将在独立事业中充当先锋……同时任命三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草拟《独立宣言》，一个负责拟定邦联章程，另一个负责起草将与法国签署的条约。理查德·亨利·李先生被选为邦联委员会的负责人，鉴于由同一个人负责两个委员会的事务会造成诸多不便，李先生便不宜再负责《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杰斐逊先生是在1775年6月加入大陆会议的，他以高超的文学和科学素养，以及令人称道的写作才能而声名远播。他的著作被广为传阅，以措辞得体著称。尽管他比较沉默寡言，但在与各个委员会探讨以及与人交谈时，他反应敏捷，言语坦诚，表述清晰明确，态度果断，甚至连塞缪尔·亚当斯都甘拜下风。因此，他很快就抓住了我的心。当此之际，我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他，并尽我所能帮他拉票，如此一来，任何竞选者和他相比都少了一票，这使他当选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负责人。我的选票数仅次于他，位居第二。该委员会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由杰斐逊先生和我执笔，起草《独立宣言》，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俩的选票数位居前两名。

据亚当斯回忆，在他随后和杰斐逊的谈话中，杰斐逊建议由亚当斯一个人草拟《独立宣言》。

> “我不会那样做。”亚当斯说。
>
> “应该由你来起草。”杰斐逊答道。
>
> “哦！不行。”
>
> “为什么呢？就应该由你来起草啊。”
>
> “我不会那样做。”
>
> “为什么？”
>
> “我有充分的理由。”
>
> “你有什么理由？”
>
> “第一，你是弗吉尼亚人，这件事就应该由弗吉尼亚人负责；第二，许多人厌恶我、怀疑我，我不太受欢迎，而你则恰恰相反；第三，你的写作能力比我强10倍。”
>
> “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会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
>
> “很好。你起草好后，我们开会讨论。”

在《独立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杰斐逊的措辞需要既诗意又平淡，既要言之凿凿地谴责英国殖民政府，又要唤起人们对这项宏大的独立事业的同情。他说，他的目的“不是寻找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新的准则或新的论据……而是让公众了解一些有关美国独立的常识，用直率且坚定的语言赢得他们的赞同，进而证明我们被迫采取的独立立场是正确的”。

在小雅各布·格拉夫的房子里起草声明的那些日子里，杰斐逊睡觉是在一个房间，而起草声明则在位于楼梯对面的另一个私人会客室。他非常清楚他要做的是什么，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做。关于独立的目的和手段，他曾进行过诸多思考。文字在他的笔下自然地流淌，彰显着他的个性及信念。他没有时间也不愿意采用那些新鲜的观点。他后来写道：“这份宣言既不是旨在体现其准则或观点的独创性，也没有照搬任何特定的和以前的作品，而是为了表达出美国人民的心声，并赋予这样的表达以当前局势所要求的恰当的基调和风格。”

在这一对战争充满忧虑的时期，随着立法工作忙碌的步调，杰斐逊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措辞更有力，而不是更无力地开了一扇窗，直抵他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他提炼出一种启蒙时期关于个体的神圣和核心地位的看法，认为自治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

>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之造物主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公布。
>
>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私下里，杰斐逊有着最好的编辑：“不言而喻”这个词便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手。总之，杰斐逊所撰写的宣言草案是一个有哲学框架的政治承诺。它是一个政治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满足其受众的特别关注。而这群极其复杂的受众包括还在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民、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全球的潜在盟友。

1776年夏，杰斐逊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既要在他的住处草拟宣言，又要执行大陆会议的职责。宣言起草好后，会议决定将它分发至“各个集会、政党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大陆军队的众指挥官；宣言还需在美国的各个州，以及军队的领导层予以宣布”。对该宣言有投票权的选民包括所有殖民地的宣言读者（特别是在民意仍倾向于反对独

立的地区）和为了美国独立事业在军队服役的士兵们。针对不同类型的选民，杰斐逊对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一长串指控，其中有些非常晦涩难懂，甚至他的同代人都很难理解。

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洛克、孟德斯鸠、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哲学家们的思想，詹姆斯·威尔逊撰写的小册子《从性质和程度思考英国议会的法律依据》，乔治·梅森为弗吉尼亚州起草的一项宪法法案《弗吉尼亚权利法案》。

在《独立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杰斐逊也曾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探讨。（在写给富兰克林的一个便条中，杰斐逊说道："宣言已经委员会阅读完毕，并进行了几处小的改动。"当时，富兰克林因患痛风和疮疡不便出行。"富兰克林博士，能劳烦您仔细研读这份宣言，并以您更为宽广的眼界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吗？"）

杰斐逊毫不吝惜对英国以及英王乔治三世的抨击，包括采用严厉的措辞谴责奴隶贸易。他曾在弗吉尼亚州提出反对奴隶制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法院和城镇自治议会上均已惨遭否决，在起草宣言时，他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尝试，使大陆会议在奴隶制这一问题上采取较为先进的立场。

然而，他又一次失败了。亚当斯对杰斐逊所写的内容一直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 宣言起草好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仔细研读了宣言的内容。我极其欣喜地看到，宣言的措辞具有高尚的格调，到处迸发出雄辩的才华，尤其是在抨击黑人奴隶制的问题上。虽然我知道，南方诸州的代表们绝对无法容忍大陆会议通过这一项内容，但我一定不会反对……
>
> 我们将草案向委员会汇报……我们都十分匆忙。大陆会议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正式的宣言。如我所料，正式的宣言仍保留了杰斐逊的风格，正如他第一次起草的那样。会议代表们删减了他的草案中约1/4的内容，他们抹杀了一些最好的想法，并删除了任何可能会引起非议的内容。

草案于1776年6月28日星期五提交大陆会议，相关辩论于7月1日星期一展开。据亚当斯回忆，当时，草案的内容被大段大段地删除，这让杰斐逊十分恼怒。他说："一种懦弱的想法仍然萦绕在许多人心中，他们认为在英国还有许多值得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对英国人予以谴责的段落才被剔除了，以免引起英国人的反感。"

此外，草案中对奴隶制的谴责也被删除了。杰斐逊说："为了讨好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代表，草案中指责英国奴役非洲人的段落也被

剔除了。这两个州从没有试图禁止输入奴隶，与此相反，它们仍希望继续实行奴隶制。……在我看来，对于谴责奴隶制的段落，北方诸州的代表们也感到有点儿敏感，因为尽管那里的人民本身很少有奴隶，但他们一直是相当重要的输入奴隶的媒介。”他废除奴隶制的又一次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于是，杰斐逊更加坚定了一个政治直觉，那就是只打自己绝对能赢的仗。

杰斐逊十分厌恶自己所撰写的草案被这么一大群人改来改去。当他坐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里，听着一个又一个代表表达他们的想法——改掉这一处，删掉那一处，他的内心极其痛苦。会议召开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遏制住了他的痛风，并出席了会议。对于杰斐逊明显表现出来的痛苦，富兰克林深表同情，他试图安抚这位年轻的同事。对杰斐逊而言，议员席上的代表们每提出一项建议和要求，都会让他深受煎熬，仿佛提出来的这些异议都不是针对草案，而是针对杰斐逊本人。富兰克林对杰斐逊说：“我给自己定了这样一条规矩，无论何时，我都会尽我所能避免起草将交由一个公共机构进行审查的文件。”然而，对于这些一时的不适，杰斐逊采取了一项特别措施，以行使自己的起草职责：不论他的草案被修改了多少，他的意见和看法仍然在独立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文件起草人将其言词视为神圣的。日后，在描述起草宣言使用的那张书桌时，杰斐逊说道：“政治和宗教一样都有一种迷信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与日俱增，终有一天它会赋予这个纪念物虚拟的价值，因其与《独立宣言》的诞生密切相关。”

1776年7月2日星期二，与会代表们表决通过了独立的决议。两天后的星期四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夏日，当天正午温度为华氏76度（约24.5摄氏度），代表们正式批准了《独立宣言》。当晚，《独立宣言》便交由费城印刷商约翰·当列普制成了第一套单面印刷本。7月6日，《宾夕法尼亚州晚邮报》的发行人本杰明·汤在他报纸的头版上刊登了《独立宣言》。

7月8日星期一，《独立宣言》通过表决这一消息在费城的州议会大厦前予以宣布。聚集在大厦外的人群欢呼起来：“上帝保佑北美各州的自由！”

对宣言进行表决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代表们知道，他们已经投入了一项反叛英国的事业当中。当感到浮躁时，他们总会尽力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附近有一个马厩，那里的马蝇飞进议会大厦里，不停地嗡嗡叫，让被詹姆斯·帕顿称为“穿着高贵的尊贵的代表们”大为困扰。几年之后，杰斐逊说起当时的情景，引用了帕顿的话：“他们拿着手帕，大力地驱赶着苍蝇……但是，这样的烦恼变得越来越沉重，最终导致他们没耐心延迟《独立宣言》的表决。于是，他们匆忙结束了这一项重大的议题。”

杰斐逊很喜欢关于弗吉尼亚州胖胖的本杰明·哈里森和马萨诸塞州纤瘦的埃尔布里奇·格里之间的一次争论的故事。哈里森说道：“格里，一

旦独立事业失败，我们同时被处以绞刑，我肯定比你有优势。我都被绞死半小时了，你还在空中蹬脚挣扎呢！”

《独立宣言》公布后的几年里，有许多对宣言本身和它的意义的质疑声。约翰·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获得了很大名气，这让亚当斯着实忌妒，他抱怨说《独立宣言》是“戏剧表演”，而不是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文件。亚当斯在1811年说：“杰斐逊轻而易举便获得了这场表演所有的舞台效果，他赢得了所有的荣耀。”

尽管如此，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措辞的革命性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凭借笔杆子的力量，他清楚地阐述了一个治理人民的新前提：人人生而平等。他所说的“人”主要是指所有白人，尤其是有产阶级的白人。但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却指出了这份在费城通过的文件所蕴含的言外之意。边沁抨击《独立宣言》，对其中人人都拥有天生的、上帝赋予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想法嗤之以鼻。他表示，这种说法是“荒谬而不切实际的”。他还将这一美国的政治思想比作新英格兰地区受巫术的蛊惑而产生的愤怒。

边沁写道：“美国人告诉我们，‘人人生而平等’，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发现。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拥有和他父母等量的能力，以及和法官等量的政治权力。”

虽然这从根本上而言是美国人的基本观点，但边沁正确地理解了杰斐逊的言外之意。《独立宣言》通过后，杰斐逊也在第一时间明确地表示出他对于自己是《独立宣言》的作者的自豪感。他将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始版本复印，向朋友们分发。他给一个同事写信：“这个原始版本比修改后的版本好还是坏，你会向那些批评者们做出你的判断。”他的朋友约翰·佩吉在阅读了原始版本后，先是对他表示了赞美，让他对自己恢复了信心。之后，佩吉温和地表示，与民族独立这件大事相比，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里那些满腹牢骚地修改《独立宣言》的人们根本不值一提。他对杰斐逊说：“我非常满意你所起草的《独立宣言》。愿上帝保佑美国。我们都知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你不觉得有一个天使乘风而来，指挥着这场风波吗？”

第十章
责任的吸引力

我恳求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因为我承担着神圣的责任——回家照看我的家人。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理查德·亨利·李，于1776年

反抗暴君，即是服从上帝的旨意。

——美国的座右铭，由杰斐逊提议

1776年，杰斐逊在费城为民族独立事业忙碌地工作着，而与此同时，帕蒂流产了。在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日子里，他没有一天能安心地休息，总是担心他的妻子，留意她的来信。1776年7月，在写给内兄的信中，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更加确信帕蒂的身体已经康复”，“我之前写给她的两封信她都没有回，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收到任何一封她写给我的信”。

杰斐逊无法得知妻子的任何消息，他很厌恶这一点，他也非常担心最糟糕的状况发生。他与帕蒂·杰斐逊于1772年结婚，他们的婚姻十分令人羡慕。帕蒂是体贴的贤妻。她的外孙女曾这样评价她：“她丈夫的姐妹们都非常喜欢她（众所周知，姑嫂之间关系十分微妙，也不易相处），她丈夫的家人也很喜欢她，邻居亦是如此……她很明智，有着良好的家庭美德，这让她赢得了丈夫的尊重。她机智风趣，活泼开朗，个性和举止让人十分愉悦，这使她深得丈夫的赞赏和爱慕。”

杰斐逊知道自己有责任继续留在费城，他也感到自己无法避免地被政治生活所吸引。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回家，渴望与他的妻子和家人团聚。

提到1776年夏在费城的杰斐逊，我们会想到他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哲学家：他手握羽毛笔，才思敏捷，脑海里满是关于人的权利的启蒙思想。然而，在那关键的几个月中，杰斐逊做了很多事，他周围也发生了很多事，《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只是这诸多事情中的一件。在军事报告、战时供应问题以及有关内部颠覆的情报和传闻的猛烈冲击下，杰斐逊认识到，国家安全应居于核心地位。阴谋活动可能会造成诸多危害，对舆论进行管理永远是有必要的。

这些工作让他筋疲力尽。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对各种阴谋的担忧，国内的保皇党密谋破坏独立事业，而印第安人则蓄谋袭击边境地区。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

这是一个充满各种计划和机密的时期。6月下旬，有消息称在纽约的大陆军内部有保皇党，密谋杀死乔治·华盛顿，叛离美国独立事业。据说这个阴谋策划者还包括纽约市市长。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华盛顿的贴身保镖队的一名成员被判处死刑。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英国政府正忙着集结兵力。

没有一个好消息，杰斐逊感到极其沮丧和苦恼。7月，他对理查德·亨利·李说："我们的军队征募新兵的速度很慢，出人意料的缓慢，天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独立宣言》起草时，美国背叛了英国殖民统治，并采取了诸多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并不是特别成功，整个美国的气氛非常紧张。在大陆会议代表改选时，杰斐逊所得的票数在所有现任弗吉尼亚代表中位列最后。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意识到国内已经有诸多批评他的声音，自己的声誉也在逐渐削弱。他说："远离自己的故乡300英里，随时可能遭受秘密暗杀，且丝毫无法自卫，这是一个痛苦的处境。"

杰斐逊坚信，他手中的工作将有助于澄清自己所遭受的责难。"如果有任何关于我的怀疑，我最近正在起草的'《独立宣言》等'将让民众了解我的政治信条。"

在弗吉尼亚州，一场与切罗基人的战争让弗吉尼亚人极其沮丧。杰斐逊对美国原住民的看法，与同时代的白人政治伙伴们相比，有些许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也只有一点点儿。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深深地着迷，他经常寻求文物以及相关资料，以满足自己对美国原住民真切的好奇心。他认为印第安人是一个高贵的种族。虽然如此，他的核心观点与白人有产者的普遍看法仍一致：印第安人的土地注定属于白人，他们应该被反复灌输白人的思想。

与英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列强）结盟的印第安人部落对美国革命事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776年8月，切罗基人袭击南方地区，杰斐逊发自内心地回应了这一消息。他写道，"没有什么能更迅速地削弱这些家伙，唯有把战争推进到他们家乡的核心地区"，"但是，我不会止步于那里。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仍留在密西西比河的这一边，我就永远不会停止驱逐他们"。这是一个有力的回应，为一个种族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776年夏，杰斐逊把时间都花在了为政府管理中的难点工作做准备。例如，他提议并起草了一部弗吉尼亚州宪法。他也密切关注着大陆会议上关于国家政府的辩论，以及他称之为邦联条款的内容。

此外，他还帮助起草大陆会议的议事程序规则。他提出的建议体现了对秩序的渴望以及对文明礼貌的要求。例如，"未经会议许可，任何议员不得在开会期间在议院阅读任何文件"；"任何议员若要进入议院，或从议席离开，均不得从会议主席和正在发言的议员之间经过"；"当议院开会的时候，任何议员均不得与他人说话（或低语），以免打断正在辩

论中的人”。

杰斐逊宣扬文明礼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美德，他身体力行。有一次，他和约翰·亚当斯在一个关于祈祷日的提案上产生了分歧。尽管他已经在弗吉尼亚州领略过宗教在感召公众方面的绝妙用途，但他却越来越抵触频繁地诉诸公众的信仰解决政治问题。多年以后，本杰明·拉什向亚当斯回忆：“你提出这一议案并为它辩护。在回应杰斐逊先生对基督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时，你说，听到杰斐逊这样一位你一直极其敬重，并在诸多问题上志同道合的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你感到非常失望。这也是你唯一一次发现一个有着明智判断力和真正才干的人却是基督教的敌人。……你对我说，你认为你得罪了他。但是，你很快便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他并没有与你交恶，而是穿过房间，走到你旁边的一个座位坐下。”

杰斐逊明白一个永恒的真理：政治犹如万花筒，有千变万化，早上还是敌人，下午就有可能成为朋友。

由于他仍然十分担心妻子的健康状况，杰斐逊试图离开费城，回到留在弗吉尼亚的帕蒂身边。他给理查德·亨利·李写信：“我透过每一封信了解杰斐逊太太的健康状况，我已经向她承诺了回去看她的时间，我无法辜负她的期望，这意味着下个月11日我要离开这里。”他在信末又补充了附笔，恳求李来接替他的工作。

但是，杰斐逊不得不留下来，以保持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法定人数。他很厌恶这一点。他在8月对约翰·佩吉说：“尽管杰斐逊太太的健康状况不尽如人意，我还是必须推迟我的归期，这让我十分痛苦。”

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十分清楚美国独立斗争的规模之宏大。杰斐逊在费城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新成立的美国设计国家纹章（国徽），这项任务由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共同完成。

富兰克林提议纹章的设计可以援引《出埃及记》当中穿越红海的故事，杰斐逊赞成这一提议，并建议纹章的图案可以设计为：“法老坐在一辆敞篷的双轮战车上，头戴一顶王冠，手握一把利剑，穿过摩西用手杖在红海中劈开的道路，追捕已经过了河的以色列人。云中的火柱发射出道道光芒，昭示上帝的存在。在上帝的授意下，站在对岸边的摩西再向大海伸出手，于是海水淹没了法老。这些画面的外围则环绕着以下一则箴言：反抗暴君，即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在这一设计当中，摩西代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法老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摆脱了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则代表广大美国民众。

事实上，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要求并没有高得吓人。要知道，首先，捍卫一国边界的费用相当巨大；其次，英国统治下的美国拥有非常可观的财富。此外，埃德蒙·伯克曾在伦敦建议殖民地有权享受“虚拟代表”，并为此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英国国王和议会是整

个帝国的管家，有权决定个别殖民地民众能否投票支持英国下议院的议员。

既然如此，为什么殖民地民众还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真枪实弹，并将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呢？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英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思想以及政治遗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既有指引作用，又有警示作用。首先，约翰·洛克和其他人清楚地阐明了后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传统——搜集了关于强调个体在市民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的自由的各种见解和信念。其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极力地保存古代共和国，经由那里，古典共和主义精神的核心，即德行、和谐、均衡、畏惧腐败，传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再次，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的宗教复兴对美国而言也尤为关键，因为18世纪中叶的布道往往专注于个人灵魂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次大觉醒运动是一场新教运动，新教教义主要强调所有信徒的重要性，而不是神父、主教和基督教体系重要性。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对这一制度的不满也对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民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无尽的经济能量，但许多美国人，包括杰斐逊在内，都发现自己永远欠他们英国债主的钱。

学者们经常想将上述这些现象中的某一个单独列为美国革命的起源。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法似乎是：洛克式自由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共和主义、大觉醒运动、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对债务（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等债主们）的憎恨仿佛一条条支流，最终汇聚成了美国革命湍急的大河。

宣布独立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原因就是与英国政府的永久决裂并不是注定的。多年来，北美殖民地民众都选择相信君主制是由那些恶毒的反美大臣们掌控的。18世纪50年代到1776年，他们都怀揣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英王会设法纠正这一错误。例如，杰斐逊对这种可能性的相信程度便体现在他1774年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中。在那本小册子里，他始终对乔治三世保持着一种尊重和顺从的口吻。但是，从他在《独立宣言》中流露出的对英王的敌意和反对，便可见他深感被背叛和失望。

在1776年大陆会议的任期内，杰斐逊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政治方法和手段。这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使用的措辞恰如其分地将原则转化为政策。此外，他还认识到了一个现实状况，那就是既要运筹一场战争，又要管理一个新生的政府。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让现实和政策最大可能地符合理想和原则。33岁的杰斐逊发现，他很喜欢这个任务。他还发现了一些自己很擅长的东西。

1776年初秋，树叶刚刚开始泛黄，杰斐逊骑马从费城返回蒙蒂塞洛。在位于山顶的家中，与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帕茜团聚，他感到非常轻松。帕茜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刚庆祝了她的第4个生日。

但是，在其他地方——费城和威廉斯堡，政治家们仍然在忙碌地工作着。在威廉斯堡，议会代表们正忙着建立一个新的弗吉尼亚州政府。杰斐逊很早以前就欢欣鼓舞地期望为弗吉尼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州政府曾由佩顿·伦道夫领导，威勒管理，杰斐逊渴望能参与新政府的组建。

一边是与家人对他的需要和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另一边是治理国家的需要和这带给他的兴奋，杰斐逊要在两者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我必须回家，我必须参与政治事务，我必须回家，我必须参与政治事务。他在这两种决定之间翻来覆去，摇摆不定。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仍然不稳定，而她频繁受孕使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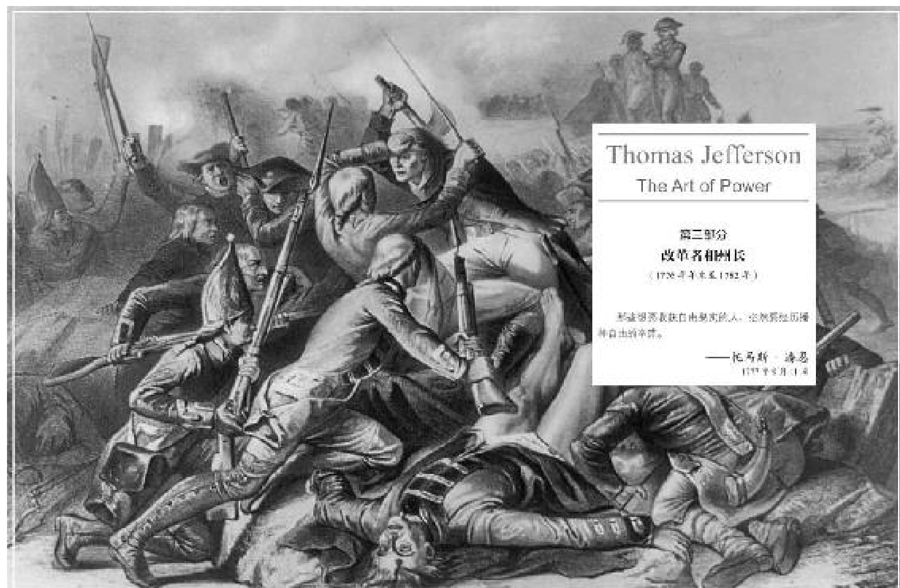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威廉斯堡，弗吉尼亚政府正在重建；在费城，一个新生的国家正在建立；此外，到处都是战争。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弗吉尼亚州的律师埃德蒙·彭德尔顿便期望在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开始时，杰斐逊能回到威廉斯堡。彭德尔顿给杰斐逊写信："我希望你能打消这么早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的愿望，发挥你的才能支持我们新宪法的制定。因为新宪法就像一株植物，需要它的朋友给予所有的关注，修剪它扶疏的枝叶，并对它呵护备至。"弗吉尼亚需要杰斐逊。

杰斐逊认为自己可以在威廉斯堡任职的同时照顾他的家人，他和帕蒂接受了乔治·威勒和伊丽莎白·威勒的提议，决定住在威勒在威廉斯堡的房子里。这意味着杰斐逊可以带着他的家人一同前往威廉斯堡，这样的安排在遥远的费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家庭在威勒家漂亮的砖房里安顿下来，这让杰斐逊得以享受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让他能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实现平衡。不工作的时候，他便陪伴帕蒂和帕茜。一家人在楼上睡觉，在楼下招待客人，在两个对称的花园里享受家庭时光。

这很完美。

但是，这样的完美只持续了片刻。



在弗吉尼亚，约克镇战役标志着独立战争的结束，但就在度过了英国入侵的艰难岁月后不久，杰斐逊作为州长却无法有效应对局面。

第十一章
自由的议程

谬误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存活，而真理则可以自己站得住脚。

——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宗教自由如是说

杰斐逊到威廉斯堡后不久，就面临一个新的抉择。大陆会议需要一些可靠的人代表美国的利益出使法国，于是，会议选举产生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促使法国和美国结盟。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的议员席上，与会代表们决定将这一项任务委托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康涅狄格州的赛拉斯·迪恩和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无法成功地与法国联盟，美国将有可能输掉与英国的这场战争，因为英国实在太强大了。此外，美国人民还担心俄国可能派兵帮助英国，击溃美国的爱国人士。作为大陆会议的主席，约翰·汉考克承担着说服杰斐逊同意出使法国的任务，他给杰斐逊写信："你认为什么时间和地点最合适开始这项工作……请回复我的这封快件，告诉我你的决定。"这封快件送到了杰斐逊手中，当时，他与他的家人在威廉斯堡，他在那里为弗吉尼亚州的新政府工作。

他让送信员等待他的答复。

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他一直在痛苦抉择。待在威廉斯堡的好处之一是帕蒂可以和他在一起。鉴于她的健康状况，她不能去法国。如果他决定去巴黎，就意味着要再次分开。他怎么能丢下她乘船驶向大西洋的彼岸呢？那样的话他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他又怎么能拒绝时代赋予他的这项伟大的任务和荣誉呢？权力、激情、旅行的魅力都近在咫尺，只要他投身于这项重要的公共服务事业当中，便可以品味这一切。长久以来，他一直想象着自己到世界各地旅游，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这么做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

送信员等待着他的答复。这项任务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会议选中他完成这项使命，这蕴含着对他的器重，对此杰斐逊欣慰又欣喜。他想给汉考克写信说："贵机构对我下达这项如此机密的任命，如果我对此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便是极度麻木与冷漠。我的感谢不足以回报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厚爱。"在两个决定之间，他踌躇不定。他不能离开他的家人，那他到底要不要带着她们一起去法国呢？

因为帕蒂的身体状况，他决定不去法国。他极其痛苦地做出了抉择。

杰斐逊爱他的家人，爱弗吉尼亚，也爱他新生的祖国。他从小在亲密和睦的亲友圈中长大，习惯了在一楼他父亲的书房里花几个小时读书，习惯了和他的姐姐珍一起在里瓦纳河岸边唱歌，也习惯了在他母亲的身边学习监督管理他的土地，他十分珍爱家乡的这一切。但与此同时，他也深深为政治所吸引。

在1776年秋，如果前往法国，他无法兼顾这两者，但留在弗吉尼亚，则可以。

于是，他叫来送信员，写了一张便条给汉考克："我丝毫没有因为对我个人私事的顾虑而犹豫过是否接受这项任务，但是我家人现在的状况非常特殊，这种特殊的状况不允许我离开她们，而她们也无法和我一同前往法国，因此，我不得不恳请您准许我谢绝这项光荣的、对美国的独立事业极其重要的使命。"

在撰写完《独立宣言》后的那段时间，杰斐逊一直在学习如何将关于人性的想法转化成政治行动。正如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提出的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一样，《独立宣言》让他又一次认识到语言在领导艺术中的力量。向人们展示一个未来的愿景，并鼓舞人们一同分享，这是政治家才能的基本要素之一，以前是，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政治家可以在立法舞台上发挥他个人意志的影响力，赢得其他政治家的支持也是政治家才能的一个基本要素。

1776年10月，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了一系列为实现自由而进行的了不起的立法事项。他致力于将《独立宣言》中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在新组建的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一系列法案。帕蒂在威廉斯堡陪伴着他。

对于杰斐逊而言，理念可以让人了解政治，但只有把理念转化为行动，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获得权力。杰斐逊小心谨慎地在威廉斯堡推进着他的工作，先提出一系列法案，以检测"大家改革的决心"有多大。当发现议员们对建立一个新秩序确实很感兴趣时，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便加紧推进他的改革工作。（其实，他刚一明确了实施改革的理由，便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

在威廉斯堡的州议会担任代表期间，杰斐逊不停地劝诱，并努力说服他的弗吉尼亚同胞们，以引起真正的改变——让世界变得和以往不同。

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1776年秋在威廉斯堡举行的反对限定继承和长子继承制度的罢工。根据这两项古老的制度，大地主不得不将其财产传给一个继承人，用杰斐逊的话说，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法律赋予一些家族以特权，可以永久地拥有他们的财富，于是，这些与众不同的

家族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贵族的秩序，区分这些特权家族和普通家庭的标志就是他们房屋的壮观和奢华。”杰斐逊本身就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但是，他认为改革这一制度将带来更大的益处。

在杰斐逊的锐意改革下，弗吉尼亚州法律法规的每一部分都被仔细地审查。他起草了诸多法案，包括改革刑事司法，废除最严酷的刑罚（包括限定只有谋杀罪和叛国罪可适用死刑）；创建普通公共教育体制，为许多弗吉尼亚白人提供了更多受教育机会；加快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居民加入美国籍的速度（对此，杰斐逊赞成限定一项必要条件：在美国居住至少满两年）。

工作过程中，杰斐逊注意到了一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人。这位男士很年轻，身材矮小，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位于夏洛茨维尔东北方约30公里处）附近长大。他25岁，而杰斐逊33岁；他身材矮小，而杰斐逊身材高大；他总是致力于轻描淡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杰斐逊则习惯于发表隆重的声明。

这个新人就是詹姆斯·麦迪逊，后来成为托马斯·杰斐逊最值得信赖和极其珍贵的顾问。1751年，麦迪逊出生于一个种植烟草的绅士家庭，后来他曾北上就读于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麦迪逊寡言少语，情感浓烈，精力充沛。据杰斐逊回忆，麦迪逊“养成了一个沉着冷静的习惯，这让他可以随时调动他清晰而敏锐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并使他在之后参加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中都能第一个当选”。

35年后，当麦迪逊当选美国总统，成为杰斐逊的继任者时，作家华盛顿·欧文形容他“只是一个干瘪的小苹果”。就麦迪逊而言，人不可貌相。他尽管身材矮小，他的政治个性却非常强大。杰斐逊曾经对他做出如下评论：“探讨问题时，他从来不会离题进行徒劳的慷慨陈词，而是会紧扣主题，用纯粹、朴实、严谨又丰富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常常会借助礼貌的客套和温和的表述舒缓对手的情绪。”对全国人民而言，麦迪逊是一位伟人；对杰斐逊而言，麦迪逊为他提出了诸多忠实、高明的建议，为他的职业生涯做出了宝贵贡献，是一位功臣。

他们俩一同发起的第一场战斗是在弗吉尼亚争取宗教自由。杰斐逊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求学时师从威廉·史莫，他阅读了诸多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传统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著作。（杰斐逊坚信有必要实现信仰自由，麦迪逊也赞同这一观点。）杰斐逊认为使徒信仰是迷信的，故而是不合理的——这是杰斐逊谴责基督教的理由当中最令基督教徒难以忍受的一条。

杰斐逊在州议会任职期间大力改革州内法律，几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弗吉尼亚笔记”。在这本书中，杰斐逊如实记录了弗吉尼亚在信仰自由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在弗吉尼亚，不为婴儿施洗礼属于犯罪；非国教教徒不得担任民事及军方公职；如果父母未能信奉规定的信条，他们的孩子将被带离他们身边。据说詹姆斯·麦迪逊在这些年曾听说

浸礼会牧师在监狱传道。基督教教会显然也与其他机构一样，易受腐败侵蚀。1767年，杰斐逊曾接手一起案件：阿尔伯马尔县圣安妮地区的居民（具体来说是蒙蒂塞洛教区）试图免除牧师约翰·雷姆赛的职务，因为他喝醉并企图勾引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女人。教区居民们提出的一项指控是：雷姆赛“喝圣餐酒而醉倒”。

尽管杰斐逊长期以来一直在宗教观方面持怀疑态度，但他在州议会所做的有关宗教的事都是因为自由，而不是因为缺乏信仰。从政治角度来看，杰斐逊认为，使用公共资金供养一个国教教会，并将公民权利和信奉宗教联系在一起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做法。他说，这样的政教制度会造成“宗教性专制”。从神学角度来看，根据杰斐逊对约翰·洛克学说所做的笔记，可以发现他非常赞同一个基督教传统：宗教不应被迫依存于政府。他总结洛克的观点时这样写道，“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没有选择通过世俗的处罚或剥夺民事行为能力传播他的宗教信仰”，因为那样“就是在用他万能的权力”强迫他人信教。与此相反，“他选择……通过他的信仰对理性的影响来展示这一信仰，从而告诉他人该如何继续前行”。这儿也可以引用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笔记：

> 反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将衰落。
>
> 反对的理由：地狱之门必定无法战胜宗教。

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还需要依靠一个人类建立的政府，那么上帝的力量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1776年秋，弗吉尼亚州各地的非国教教徒们向州议会请愿，要求解除对圣公会的法定效忠。杰斐逊回忆道，宗教自由的呼声“引起了我所参与过的最激烈的争论”。埃德蒙·彭德尔顿和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支持国教——杰斐逊称这两人为“诚实的人、狂热的国教徒”。因此，宗教自由需要渐进的立法和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最终在1786年，杰斐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得以通过。杰斐逊说，这部法规“旨在在它可以保护的职责范围内，去理解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以及任何宗教派别的信徒。”

在弗吉尼亚，奴隶制也许是唯一一个比宗教更能引起群情激愤和政治紧张的问题。早年间，杰斐逊在城镇自治议会任职时，曾主张反对奴隶制，但最终失败了。他在州议会任职期间，又提案解放州内奴隶，但又一次失败了，这证明了在奴隶制这一问题上人们的可悲之处。后来，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抨击奴隶贸易，但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修改《独立宣言》时将这些言论删除了，这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对奴隶制的可悲态度。

在州议会任职时，作为修订州内法律工作的一部分，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们起草了一项修正案，规定“在某一天之后出生的（奴隶）恢复自

由，并应在达到适当年龄时离开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杰斐逊认为自由的白人和自由的黑人无法在一起和睦地生活。

后来，杰斐逊卸任总统后回到蒙蒂塞洛过着退休生活，当他回顾自己制定这项修正案的经历时，他认为这项提案前景黯淡，他写道：“当时，公众心目中尚未认可（解放和驱逐）黑奴这一主张，即使在今天，他们也不会认同……。然而，终有一天，他们一定会认同并采纳这一主张，即使退一步来说，他们也会遵循它，那一天并不遥远。……黑奴们一定会获得自由，这是天意；当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种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时，他们一定无法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下共存，这也是天意。因为他们在本性、习惯和思维方面的差异已经在他们之间划分了一条条无法磨灭的界线。”

杰斐逊没有成功地改变公众舆论对奴隶制的看法。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令他失望，也令美国失望了。

到了1776年年底，美国究竟能否实现独立，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曾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年结束时的局势和年初时一样，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危险。一位来自特拉华河河畔美国营地的记者对杰斐逊说：“敌军就像蝗虫一样。”

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军队已竭尽全力，但军事形势仍很严峻。1776年年底，华盛顿说：“从来没有人……面临比我更多的困难，也从没有人拥有比我更少的摆脱困境的办法。”美国的独立事业似乎不太可能熬得过这一年的冬天。

美国民众依旧在担心英军对美国的破坏。理查德·亨利·李向杰斐逊转达了一些军事报告，内容是德国正试图支持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保守党，计划以“10　000人，其中主要是德国人”支持英国军官约翰·伯戈因进攻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后，南部和中部各殖民地将处于军事管制政府的统治下”。

当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的州议会的任期满后，他带着家人（当时帕蒂又怀孕了）回到了蒙蒂塞洛。1777年5月28日星期三，帕蒂诞下一子。

遗憾的是，这个小男孩只活了17天便夭折了。即使杰斐逊夫妇给他取了名字，这个名字现在也无人知晓。孩子的去世使杰斐逊夫妇非常悲伤，他们相互慰藉。不久，帕蒂再次怀孕。1778年8月1日凌晨1点半，帕蒂在家中产下一女，受洗礼时被命名为玛丽，昵称波莉。除了她的姐姐帕茜，她是托马斯·杰斐逊夫妇唯一一个活到成年的孩子。

尽管帕蒂·杰斐逊不断患病和怀孕，她总能迅速振作起来。她用账本记录在蒙蒂塞洛的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她的书写力道十足，且一目了然。当然，账本上也有她的信笔涂鸦，表现了她的梦幻和活跃的想象力。对待丈夫，她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特点。据她的外孙女说，帕蒂·杰斐逊抄写了一本音乐书，上面“没有任何污渍和瑕疵”。这本书，连同她对

家庭生活的诸多记载，一起“表现了她的整洁、秩序、出色的家政能力和女性教养”。她的外孙女这样描述她：“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和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还是一位大方得体、高雅贤淑且颇具才情的女性，她有着极强的沟通能力，掌握一些音乐技能，了解所有良好的社交习惯，并拥有完美迎合她丈夫朋友的技巧。”

此外，帕蒂还努力参与备战工作。玛莎·华盛顿曾写信请求她帮忙缝制衣服以供应军队，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帕蒂还找来了詹姆斯·麦迪逊的母亲埃利诺·康韦·麦迪逊一起帮忙。她写道：“华盛顿夫人来信告诉我宾夕法尼亚的姐妹们所做的事，并告诉我同样的感激情绪在马里兰州也显露了出来，她肯让我知道这一切，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她的信件的许可下，我认为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一计划。我欣然承担这份责任，那就是，为女同胞们提供一个机会，证明她们也拥有能孕育这一计划的高尚情操。”

美军士兵们需要一切他们能得到的军需物资，因为革命战争即将猛烈地在南部爆发。在巴尔的摩，托马斯·纳尔逊试图表现得更加乐观，但他失败了。1777年1月，他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只要有一支良好的正规军，就能很快将这些该死的侵略者清除出北美大陆。……他们就像魔鬼，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性欲，不停地玩弄女性，甚至是老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找不到一个处女。”

一种威胁感一直笼罩着美国民众。1779年5月，一名记者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得到了非常确定的情报，一大批援军将立即被派遣到美国（据5月1日纽约的报纸报道，有8 000人），如此一来，毫无疑问一场激烈的战役即将打响。大家普遍认为这场战役的目标将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因为那里是我们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此外，如果敌人有必要撤军，从那里可以更容易撤到西印度群岛。”

英国当局企图击败美国人民的反叛，并恢复帝国的秩序，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入侵并征服弗吉尼亚州，这让弗吉尼亚人越来越担忧。在这一局势下，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接替帕特里克·亨利担任州最高行政长官。

在接受这一职位时，杰斐逊就很清楚博得公众好感的重要性。他写道：“在弗吉尼亚州这样一个高尚又自由的地方，要想取悦这里明智的人们，没有什么比认可这里的同胞们更有效的了。”杰斐逊说他的“巨大痛苦”是担心“我所做的努力不够，无法满足祖国对我的期望”。

在竞选州长时，根据投票表决，约翰·佩吉与杰斐逊须进行最后的较量。在第一轮投票中，杰斐逊以55票比38票领先，此外，托马斯·纳尔逊获得32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即在杰斐逊和佩吉之间展开的决胜局投票中，杰斐逊以67票比61票获胜。

杰斐逊和约翰·佩吉的友谊已经超过20年，但这次他们不得不相互解

释，承诺任何一方不得对州长选举怀有佩吉所说的“低级肮脏的感情”。投票结束后，佩吉按照原定的日程安排短暂离开了威廉斯堡，因此他无法与杰斐逊见面。但是，他希望杰斐逊这个新州长明白自己并不是回避他。1779年6月2日星期三，他给杰斐逊写信：“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我的行为做出了错误的解释，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向你道这个歉。”

杰斐逊回信说：“我们各自的朋友们十分热衷于将你和我置于竞争对手的处境，这让我极其痛苦。但是，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认识到这是他们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我们俩之间的竞争。我们之间选票数的差异微乎其微，根本不会让你感到丝毫痛苦，也不会让我感到丝毫快乐。由于我们彼此的性情使然，我们不会有那样的感受。”

杰斐逊还指出两人之间的票数差距非常小，以试图抚慰佩吉的情绪。但他知道，没有人喜欢在比赛中以微弱差距落败。此外，在提起佩吉所说的别人对他的误解时，杰斐逊努力地表达了自己与佩吉之间的一种牢不可破的情谊：“我非常了解你，也希望你能永远确信。你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和我道歉。至于别人对你行为的那些解释，只会让我更加确信，让它们都见鬼去吧。”

不论两人对对方是多么友好，但是，竞争终究是竞争，总会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杰斐逊了解如果结果相反，自己会是怎样的感受，他也极其厌恶两人的关系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于是，他努力缓和佩吉的情绪。他给佩吉写信：“这是第一次，我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之间拘于礼节。”他还补充说，佩吉太太在威廉斯堡对帕蒂的陪伴是后者来到首府后唯一的慰藉。

杰斐逊上任后，他希望自己身边都是他熟悉的、可以信任的人。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后来回忆，他当时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赶到了威廉斯堡。此外，詹姆斯· 海明斯、罗伯特·海明斯和马丁·海明斯也到了威廉斯堡。

杰斐逊州长的任期为两年，即从1779年6月至1781年6月。在这段时期，他所关心的一切事情的未来都不确定，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将肩负起他深爱的弗吉尼亚州的命运。

第十二章
棘手的州长职务

他们一定打算发起另一场战役，以做最后的努力。目前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边境和海岸地区。

——理查德·亨利·李，于1779年针对英国的军事计划如是说

人民对我们所从事的独立事业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大不列颠的仇恨仍丝毫没有动摇，这让我极其满意。

——托马斯·杰斐逊，当来自英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大时如是说

他们敲着战鼓，列队行进至州政府，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仿佛最后的审判日到来了。

——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于1781年1月如此描述英军进攻里士满

在威廉斯堡有一座巨大的宅邸，有着青葱的草地和精致的花园，在托马斯·杰斐逊年轻时这里曾经是皇家总督府，现在这里即将成为杰斐逊的官邸。20年前，杰斐逊曾幸运地成为弗朗西斯·福基尔总督的座上宾，和他一起进餐、交谈、听音乐、演奏音乐，向诸多更杰出、更博学、更强大的人学习。20年过去了，杰斐逊现在36岁，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弗吉尼亚州州长，同时也是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家。

杰斐逊担任州长的两年任期内充斥着各种威胁，他还将面临英军的入侵。但是到目前为止，弗吉尼亚州在军事方面的忧虑主要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包括印第安人、奴隶）造成的威胁，并没有受到英国军队全部军力的直接危险。战争确实真实地发生在弗吉尼亚州，但从邓莫尔总督时期到1779~1781年，这里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抽象的、理论上的，而不是有形的。

这样的局面在杰斐逊上任之前不久便改变了。英军袭击萨凡纳之后，佐治亚州便沦陷了。南卡罗来纳州成为英军的下一个目标。

杰斐逊喜欢控制，欣赏秩序与和谐，但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最无序、最混乱的危机：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东面，与英军正规军作战；西面，不得不与驻守在底特律的英军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军抗衡。

在官邸里，当他走过一个个厅堂，观望着官邸的花园，听着妻子的话语和孩子们的声音，他的脑海中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响起自己曾在这些房间里、这些桌子旁听到的谈话，那些谈话让他受益颇深。不论用什么

标准衡量，杰斐逊在仕途上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这个在1779年初夏接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一职的男人雄心勃勃，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权力对他而言很重要，但他用勤学好问和贵族的自信风采掩盖了自己的野心。

和许多立法者一样，杰斐逊对行政权力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直到他承担行政责任后也是如此。与刚开始接任州长一职时相比，他在战时担任州长期间，对权力有了不同的认识，对控制权的风险和可利用价值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他还比先前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担任公职所付出的代价。他提前预见到，自己担任州长的几年将伴随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巨大的个人损失”，他所说的“损失”比金钱损失更为重要。人们对他的认可和推崇曾促使他当选，但这很难持久。他知道，很少有人在卸任时仍能享有和刚上任时一样的地位。

一名记者从费城给杰斐逊写信表示问候，但他的问候是有所保留的。他写道：“故乡的人民选举你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但我不会向你表示祝贺。这一任命将打乱你原本的计划，你也会发现，战争期间的州长职务将十分棘手。”杰斐逊确实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从俘虏问题到军事防御，从边境安全到压制保守党的异议，通过诸多问题的解决，杰斐逊州长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做出困难的，甚至是严酷的决策。

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捕获驻守底特律的亨利·汉密尔顿，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军指挥官。据说他曾向印第安人提供奖金，悬赏白人的带发头皮，故而得一绰号：“买头发的将军”。在杰斐逊指示下，汉密尔顿被捕后被戴上了镣铐，尽管英国当局对此提出了异议。

杰斐逊早已公开表示，为了国家安全，他愿意做任何事情。早在1778年5月，一个名叫约西亚·菲利普的男子“犯有谋杀、烧毁房屋、浪费农田和其他敌对行为等罪行”，针对这一案例，杰斐逊起草了一项关于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根据法令自动对个人定罪。根据该法案，在一定的时间内，菲利普可以投降以接受审判；但如果他没有自首，则被宣判有罪。

杰斐逊的这项法案非同寻常地表达了权力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的作品。从本质上讲，它否认了菲利普享有美国人民所说的那些他们正在争取的权利。然而，对杰斐逊而言，终结菲利普的叛乱这一实际需要远比理想地运用《独立宣言》所倡导的原则更加重要。

1778年6月，杰斐逊注意到军队招募不到足够的步兵志愿军，于是，他建议大陆会议：“从我们中指定精锐部分为步兵人选，再配以相同数量的马匹，形成骑兵部队。这一军种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大批新的年轻人，他们还不曾迈步向前参与战斗，这里我指的是那些由于懒惰或自身能力不适合当步兵的人。”作为州长，杰斐逊还对弗吉尼亚海军的状态深

感痛惜。他注意到，弗吉尼亚海军尝试造船的努力“非常失败，这让我担心不已。但是，我认为，尽管失望，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用其他方法防御”。杰斐逊还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以东选取了一个地点，以视察弗吉尼亚军队的枪炮操作与射击技术。

除此之外，他还坚持努力确保西部地区的安全。他和乔治·罗杰斯·克拉克计划远征英军驻守的底特律。克拉克比杰斐逊小10岁，是一个身材高大、喜欢冒险的弗吉尼亚人，他年轻时曾学过土地勘测。克拉克在肯塔基州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在捍卫西部领土免受英国所支持的印第安人的攻击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顶住了来自“买头发的将军”汉密尔顿的压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畔的卡斯卡斯基亚以及温森斯（大约位于圣路易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中间）。1778年严冬至1779年，他在西北地区的英勇战功确保了美军在伊利诺伊州的势力。此外，克拉克还是一个硬汉。多年以后，他的一条腿在一场事故中严重烧灼，需要截肢。他躺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正在阅兵的肯塔基州民兵，等待手术。据说他听着军乐，挺过了残酷的截肢手术。手术结束后，他才把头转向医生问道：“嗯，结束了吗？”克拉克正是杰斐逊需要的那一种人：他是一个无畏的指挥官，执行着杰斐逊构想出的并为之奋斗的政治愿景。

但是，杰斐逊最终还是认为克拉克远征底特律的计划过于危险。他对华盛顿说，“兵力不足，资金匮乏，以及食品采购困难”使得这一任务目前尚不可能完成。于是，他遗憾地公布了这一决定。（将近25年后，杰斐逊委任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弟弟威廉·克拉克和梅里韦瑟·刘易斯带队，进行横越美国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远征考察活动。）

不久之后，杰斐逊便需要克拉克实施另一项计划：镇压保皇党的暴动。1780年3月，他给克拉克写信：“我们有理由逮捕在西南部边境地区发起暴动的那些不满的居民（保守党们）。我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那些人警告……如果不将这种状况扼杀在摇篮里，如此危险的事端必将分散我们的兵力。”杰斐逊没有心思大发慈悲。

通过约西亚·菲利普和亨利·汉密尔顿事件，杰斐逊直接打击了敌军。外交手段、施以恩惠和宽容以待这些方法有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同样，武器、复仇和军队也有它们的用武之处。事实证明，托马斯·杰斐逊完全有能力有效地利用任何他认为最好的武器保护他的人民。

1779年与1780年之交，那是一个任何人都记忆犹新的寒冷的冬天。河流结了冰，冻得非常硬实，马和货车都能从詹姆斯河和波托马克河上驶过。

随着春天的来临，冰雪融化。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从威廉斯堡迁往里士满。因为他们认为越往内陆地区会越安全。随后，杰斐逊将他的家人安顿在里士满夏柯山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是他向一个姻亲的叔叔借的。安顿好家人后，他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其紧急的气氛当中。

1780年5月10日星期三，查尔斯顿被英军攻陷。杰斐逊意识到，他处于包围之中。他于1780年6月表示：“极其可怕的攻击正威胁着我们，北面是俄亥俄州殖民地的英军，南面则是极易到达我们边境地区的印第安人，而东部地区则受到驻守在卡罗来纳州的英军的入侵。”

除此之外，当年夏天，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蒙哥马利县的新河上又爆发了一场保守党起义，更多的印第安人暴力事件也频繁发生。1780年6月2日星期五，杰斐逊再次当选为州长，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为期一年的任期。然而，这些坏消息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宽慰。

在8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康沃利斯勋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彻底击溃了霍雷肖·盖茨率领的美军和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民兵。

这让杰斐逊非常沮丧，他引用了“近来降临在我军当中的灾难”这样的字眼形容这一事件。他召集议会开会，以协助他做出“及时、极大的努力遏制敌军逼近”。他知道自己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他说：“选出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措施实属不易，而且这些措施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最沉重的打击最终还是到来了。1780年12月29日星期五，美军将军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变节投靠英国，率领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州。1781年新年的早晨，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海角的消息传到了里士满。

在一个充斥着言过其实的表述和漏洞百出的谣传的时代里生活了这么久，杰斐逊没有轻易相信这则情报。自1777年以来，一系列关于入侵的传闻已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人们对于拿起武器准备战斗这样的号召也已出现矛盾的态度。杰斐逊于1779年12月表示：紧急召集民兵却“发现没有敌人”，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因此，在1781年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海角的消息传来后的两天内，杰斐逊拒绝召集弗吉尼亚的民兵队伍。一个报信者在杰斐逊位于里士满山上的住所里找到了他，他镇定如常，泰然自若——甚至过于镇定和泰然。

日子一天天过去，情形逐渐变得明朗，英军入侵的消息属实。于是，杰斐逊立即发布了命令，但为时已晚，无法成功解决两军之间严峻的敌对危机。

1781年1月5日星期五，随着英军向里士满行进，罗伯特·海明斯和詹姆斯·海明斯将帕蒂和杰斐逊的其余家人转移到杰斐逊在里士满以西的凡恩溪市的一处房产内，以确保她们的安全。

当天下午1点左右，英军抵达里士满，他们列队行进，并向城内发射火炮。一枚火炮射到杰斐逊在夏柯山的住处附近，将一个屠夫的房子的房顶炸了下来。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所说，“10分钟后，整个里士

满看不到一个白人，因为他们拼命地奔跑”，逃向驻扎在里士满北部贝肯河畔的一个美军营地。

一片混乱。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道，“英军身穿红色衣服”，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市里行进”。为了防止被英军俘获，托马斯·杰斐逊早已撤离州长官邸。在英军入侵里士满的数小时里，他在市内不停绕行，努力确保美军的物资供应，并与美军军官会合。

杰斐逊的这项离开战事中心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英军已经带来了手铐，以期逮捕《独立宣言》的作者。

英军找到了杰斐逊在夏柯山的住所，一名英国军官问起他的去向。艾萨克的父亲乔治·格兰杰为了保护他的主人杰斐逊，答道：“他到山上去了。”

据艾萨克回忆，那名军官紧接着问道：“房子的钥匙在哪里？”艾萨克的父亲便把钥匙交给了他。

“家里的银器在哪里？”军官继续问道。

“也都带到山上去了。”乔治·格兰杰回答道。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据艾萨克回忆，他的父亲已经把家里所有银器放到了一个床套里面，又将床套藏在了厨房的一张床底下，从而挽救了这些银器。

不久之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便将军队撤回到了海岸地区。与此同时，英军抓走了大量杰斐逊的奴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随英军离开里士满时，听到了战争的声音——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爆炸的气浪袭来，“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如果更早发出调集民兵的号令，里士满防御战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英军入侵事件一个月后，杰斐逊在里士满写道，他认为“如果阿诺德向这里进军或撤离”，“勇气十足和信念坚定的民兵们”就可以俘获他。那样的话，被调动起来的民兵很可能会发挥其军事价值。杰斐逊的思想非常强大，但这一次，他对时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在推迟下令召集民兵一事上，杰斐逊犯了一个常见的政治错误，那就是一味顺从公众意愿，而不是对他们进行引导。许多参与了真正民兵战斗的弗吉尼亚人都对杰斐逊所体现和代表的精英领导者们表示不满和质疑。弗吉尼亚州的本土文化原本就不利于抓住最好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军事部署，如今在战争时期，民兵们就更加难以召集。1781年3月，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抵达弗吉尼亚，担任大陆军的指挥。杰斐逊对他说：“法律法规不够严厉，民众不适应战争局势，也不习惯及时地表示服从，战争所需食物匮乏，又找不到采办这些物资的办法，这一切导致了我们下达的命令往往不起作用，因而迫使我们拖延了民兵的召集。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无法实现目标时，就要尝试想别的办法。”

杰斐逊可能并不是因为惧怕英军才在那两天内阻止自己发布号令。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在自己无法确认来自英军的威胁是否真实的情况下，如果动员公众战斗，他将冒惹怒大众之险。由于他的犹豫，里士满没能守住。

然而，几年后，当杰斐逊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时，他在弗吉尼亚州汲取到的这一痛苦教训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无畏和果断有时是一位领导者应具备的美德。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其间，杰斐逊没有表现出无畏和果断，这让他为拖延付出了代价，但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有一天他将把自己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一部分功劳归于1781年的这次失败。

第十三章
蒙蒂塞洛的英军

这种恐怖和混乱是你无法想象的。州长、州议会，所有人都匆忙地跑来跑去。

——丽贝卡·伯韦尔的女儿帕蒂·安布勒

面对英军的进攻，杰斐逊领导下的弗吉尼亚州岌岌可危。1781年春末，康沃利斯勋爵和以手段残忍著称的陆军中校伯纳斯特·塔尔顿的注意力集中在弗吉尼亚州。迫于英军的步步紧逼，州长杰斐逊和弗吉尼亚州议会从里士满撤退到了夏洛茨维尔。但是，即使在那里，州议会也只能勉强召集齐议会的法定人数。

就在这一困难时期，一个曾经在杰斐逊家上演过的悲剧又发生了：一个孩子夭折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失去了三个孩子。这次去世的孩子是露西·伊丽莎白，亡于1781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当时她还不到6个月。第二天，杰斐逊没有出席州议会的会议，而是留在家里陪帕蒂。当天的天气非常不好，他给同事们写信："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杰斐逊夫人的状况让我不放心留她独自在家，今天的会议我就不出席了。"

他留在家中陪伴帕蒂，一起为孩子的去世感到痛心，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一次罕有的能和家人情感交融的机会。迫于工作的压力，他当时很少有时间休息。1781年5月28日星期一，杰斐逊意识到，他预料中的那一天即将来临。英军正朝着夏洛茨维尔向弗吉尼亚州内陆地区推进。因此，州议会拟定了一项召集弗吉尼亚州民兵的草案，但引发了暴动。杰斐逊不得不向乔治·华盛顿将军寻求个人援助。

在这样的局势下，杰斐逊给华盛顿写信，因为民兵人数不足，无法抵御英军，"民众普遍认为……没有人能阻止"英军的必然胜利。"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将军"来到他们中间，才能让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可以得救，也才能让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杰斐逊是在5月28日给华盛顿写的信，他打算在几天后，他的州长任期期满时引退。他对华盛顿说："长久以来，我一直都表明了自己将（州长一职）让给更有能力的人的决心，我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过自己的个人生活。"

然而，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杰斐逊所提到的卸下重任（他称之为"我职务内的工作"）并回归个人生活这一举动并无法美化他的形象。

州议会忙于处理各项事务，整个州都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的局势下，谁都希望杰斐逊能化身为一位骑马而来的英勇的救世主，将弗吉尼亚人团结在一起，阻止英军的侵略。

但杰斐逊并不是救世主。1781年春，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州这一事件的可悲之处在于，全程没有出现一个爱国领袖，领导人们成功地应对这一紧张局势以击退阿诺德、康沃利斯或塔尔顿。战争过于分散，局势又非常不稳定，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包括杰斐逊，尽管他前两年一直忙于弗吉尼亚州边界地区的军事防御工作。

1781年6月2日星期六，杰斐逊在蒙蒂塞洛陪伴家人及几位客人，包括弗吉尼亚州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发言人们。议员们享受他的殷勤款待，并等待将于6月4日星期一在夏洛茨维尔召开的立法会议。杰斐逊的继任者将在本次会议上选举产生。

杰斐逊经过仔细考虑后，建议他的政府同僚们选举政治和军事经验丰富的小托马斯·纳尔逊为下一任州长。杰斐逊说，“是时候该将民事和军事权力统一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了”——前两年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这一举措“将极大地为军事措施的实施提供便利”。

虽然对于在蒙蒂塞洛召开的这一会议完全不知情，康沃利斯早已命令塔尔顿前往夏洛茨维尔追捕州政府官员。1781年6月3日星期日，英军骑兵策马飞奔，路过位于路易莎县的布谷鸟酒馆。英军经过酒馆的时候天色已晚，大概晚上九十点。当时，一个名为杰克·朱厄特的弗吉尼亚大个子民兵（据说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20磅）正好在路易莎县。当他意识到敌军正要去抓杰斐逊，便立即上马，冒险夜行40英里赶往夏洛茨维尔。

据说朱厄特骑着“方圆7个县中最好的且脚程最快的马”在旷野里狂奔。为了避开敌军，他没有走那些广为人知的大道，而是穿过林地，沿着山脊疾驰。据一个报道说，“在他策马前行的过程中，沿途低矮的树枝狠狠抽打着他的脸，划出许多伤口，最终变成了一道道疤痕，据说这些疤痕伴随着他的余生”。大约晚上11点左右，英军暂停行进，在一个种植园休息了大约3个小时，这为朱厄特争取了一点儿时间。深夜时分，塔尔顿再次下令暂停行进，纵火焚烧了一辆为美军运送物资的火车。

天亮时分，朱厄特抵达蒙蒂塞洛，他通知杰斐逊英军即将来袭。杰斐逊冷静地下令招待所有住在他家的人吃早餐，之后为家人召唤了一辆马车，然后与议员们道别。议员们下山返回了夏洛茨维尔，而帕蒂和他的两个孩子以及一些奴隶则动身前往周边的种植园避难。

杰斐逊留在了蒙蒂塞洛，非常孤独。不过，至少还有两个奴隶陪着他，其中一个便是马丁·海明斯。预料到英军的袭击，他们正忙着将家中的银器藏起来。而杰斐逊则试图抢救他的文件，他说：“在为离开蒙蒂塞洛做准备时，我把文件塞到任何可以塞的地方。”

之后，他做了一些完全符合他性格的事情：他决定亲眼看看英军是否来袭。他的控制和行动本能促使他骑马从蒙蒂塞洛前往附近的一个名为蒙塔尔托山或卡特山的山顶。他随身带着他的小望远镜。透过望远镜观察夏洛茨维尔，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他转身准备返回。就在这时，他的剑杖滑落到了地上。捡起剑杖时，他突然好奇心起。于是，他再次拿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

这次，他看到了英军。

他当即返回蒙蒂塞洛，骑上了他最好的卡拉克塔克斯，出发追赶他的家人。他刚离开5分钟，英军便抵达蒙蒂塞洛。一个英军掏出一把手枪，扣动扳机，瞄准马丁·海明斯的胸膛，要求他说出杰斐逊的下落，否则就开枪。海明斯回答："那你就开枪吧。"

不过，在英军短暂占领蒙蒂塞洛期间，这里没有任何枪声，也没有任何掠夺。（唯一的例外是英军喝掉了一些杰斐逊的藏酒。据说，他们喝酒是为了庆祝乔治三世的生日。）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对待杰斐逊的其他几处种植园则远远没有这么小心谨慎，尤其是对麋鹿山，英军驱散了杰斐逊在那里的奴隶，并放火烧了农作物。在塔尔顿–康沃利斯入侵事件期间，共有23名奴隶逃离了杰斐逊的种植园，其中至少有15人在约克镇或朴茨茅斯的英军营地中死于疾病。

离开蒙蒂塞洛后，杰斐逊骑马赶上了帕蒂和孩子们。最终，他们到达了杨树林庄园避难，这是他们在贝德福德县拥有的一处地产。他的家人安全了，他也安全了。

然而，他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

1781年6月12日星期二，弗吉尼亚州议会在斯汤顿市的三一教堂召开会议，会议表达了对朱厄特的感谢，授予他一对手枪和一把剑作为纪念，以表彰他勇敢的夜间骑行。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正是这项决议伤透了杰斐逊的心：

> 决议如下：于下届会议上调查本州行政首长在过去12个月当中的行为。

杰斐逊想象不到比这更糟糕的状况了，他的勇气和能力都受到了指控。在自己执政期间遭遇这样的灾难，真是糟糕透了。当他回想最近发生的一切时，也许不会承认这样的指控，但他一定能认识到，英军两次入侵弗吉尼亚州，并将州政府从夏洛茨维尔赶到斯汤顿市，这样的惨败会让人们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所质疑。这些他大概能应付。与他相比，乔治·华盛顿的声誉则得以维持。杰斐逊所需要的是时间——给他时间平静下来，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尽职于他如此坚信的独立事业。

然而事与愿违，他现在被迫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斗争。对此，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愤怒。在一张纸条上，他以尖酸的语调写道，在议案当中，“既然你们并不是仅打算以普遍提出的一项建议损害我的名声，而是期望以后能找到事实依据以支撑这一建议，那么，劳驾向我详细地说明你们所引证的对我的糟糕的行为指控，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这一要求有所不妥”。

在三一教堂召开的议会会议上，议员们投票决定对杰斐逊进行调查。然而，在这次会议上，议员们还讨论了另一项议案。这项议案含蓄地表示，英军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并不是政府官员的过错，而是政府本身的过错。有议员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应有权随时支配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而不必服从他人”。

帕特里克·亨利也表示赞成这一“独裁者”措施，他说，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无论怎么称呼他）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这对于遏制放荡敌军的肆意而为是很有必要的”。这一议案以及与之相关的讨论趋向于为杰斐逊开脱，这表明，那些最真切地经历了英军入侵事件的议员们认为权力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出在州长这一职务上面，而不在州长个人身上。（该议案最后惜败。）

但是，关于杰斐逊担任州长时的糟糕表现却无法调和两次表决在本质上的矛盾。第一次表决是关于调查杰斐逊，这相当于对杰斐逊行为的控诉；而第二次表决则是关于杰斐逊的继任者们新享有的权力，这相当于默认了杰斐逊执政期间并不享有与时代挑战相称的权力。如此一来，在谴责杰斐逊执政失败的同时又试图改革他曾担任的职务，这本身在逻辑上就将责任从个人转移到了政府机构上。

然而，逻辑鲜能成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杰斐逊的敌人看到了这样一个让他难堪的机会。虽然议会只对杰斐逊进行了短暂的调查——会议最终以赞扬而非谴责杰斐逊结束——但这一段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杰斐逊的脑海中，也留在了他的政治对手的记忆里。他在被指控失职期间的辛酸是显而易见的。杰斐逊说，那些官方诽谤都“没有根据”。

9月，杰斐逊又一次迎来了出任驻法国特使的机会——这进一步表明，他担任州长的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美好的时刻（仅有的两个例外可能是朱厄特和马丁·海明斯），而他的表现并没有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然而，杰斐逊谢绝了这项外交任命。他表示：“我已经决定向这一类事情做最后的告别，然后退休，回到我的农场，享受家人和书籍的陪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将我与他们分离。”

但尽管杰斐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坚称自己想过田园般的退休生活，他仍决定留在弗吉尼亚政界，直到证明自己的清白。1781年9月，杰斐逊表示：“我希望自己在卸任时能得到应得的声誉，而不是让它被损害得更严重。出于这样的渴望，我将参加下一届的议会选举，并可能接受其中的一个席位。但是，鉴于我此次任职的目的只有这一个，因此这

一目标达成后我就会离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当中，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在这段时间内，到处充斥着关于他州长一职的谣言，这让他遭受了极大痛苦。他永远无法完全退出政界，因为政界舆论对他而言仍然很重要。

1781年10月，美军在约克镇大败英军，结束了战争。和其他几个杰斐逊的奴隶一样，当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仍然被囚禁，他目睹了这场战役。据他回忆：“子弹不停地扫射，到处弥漫着枪炮造成的巨大烟雾，仿佛天堂和人间混在了一起。”他记得听到了伤员的哭声。“当烟雾散去，你就会看到倒在地上的死人。”

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显然，托马斯·杰斐逊也获得了胜利，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成功。1782年，法国的沙斯泰吕叙尔侯爵造访蒙蒂塞洛，离开后，他对这里的主人赞不绝口。

>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杰斐逊，他不到40岁，身材高大，面容温和且令人愉悦，他的思想和见解比他的外在魅力更加突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祖国的独立事业。与此同时，他还熟练地掌握了绘图技术，并且是一个音乐家、几何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立法者以及政治家。他曾当选为著名的大陆会议的议员，并任职两年，正是大陆会议发起了美国革命……他还曾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在阿诺德、菲利普斯、康沃利斯入侵该州期间坚守这一困难的岗位。他生性豁达，出于对政界的热爱，他表示自愿退休，远离政界和公共事务，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认为自己为人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任何一个目标，似乎从青年时期起，他就早已将自己的思想置于一个崇高的境界，正如他将自己的房子建在山上一样，从那里他可以审视整个世界。

以上这些描述是杰斐逊所乐见的别人对他的认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甚至连美国革命的胜利都无法让他完全忘记担任州长时那一段饱受争议的最后时期。他对詹姆斯·门罗说，议会调查对他的最坏影响之一是，公众可能会认为“他被控告是因为内心的背叛，而不仅仅因为思想的软弱”。对于他出任州长期间的工作的攻击，他说：“已经使我的精神受创，只有能够化解一切的死亡才会治愈这一创伤。”

他最后补充道：“杰斐逊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取名为露西·伊丽莎白，是以她刚出生没多久便去世的姐姐的名字命名的。帕蒂没有更多的体力了。她自身体力不支，也找不到恢复健康的办法。杰斐逊说：“从那时起，她一直病得很严重，而且病情现在仍在恶化。”

第十四章
超越死亡的炽热感情

杰斐逊夫人向折磨她的疼痛屈服了，她终于摆脱了疼痛，却使我们的朋友伤心欲绝。

——杰斐逊的朋友埃德蒙·伦道夫对詹姆斯·麦迪逊如是说

杰斐逊的妻子生命垂危。帕蒂·杰斐逊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第二个取名为露西·伊丽莎白的孩子是她在10年当中诞下的第6个孩子。她年仅33岁，但已精疲力竭。由于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所有家庭成员不得不撤离蒙蒂塞洛，这使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可能患上了结核病。1782年初夏，她已病得卧床不起。

她的丈夫不肯离开她。很久以后，女儿帕茜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杰斐逊“一直待在她的身边”。他竭力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顾好妻子，帮助她吃药，帮她把杯子放到嘴边。

夜里他也一直守护在她的床前或者守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帕蒂也很渴望杰斐逊的陪伴。“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总是追随着他”，她在家一直是这样。“他说话的时候，其他声音都无法进入她的耳朵，或引起她的注意。当她从沉睡中醒来，如果找不到平日俯着身陪在她旁边的那个身影，看不到平日注视着她的那道目光，她会立即表现出担心和痛苦，甚至惊恐。”蒙蒂塞洛和他们彼此成了他们夫妇眼中俩唯一的真实生活。

渐渐地，她有了些力气，便开始在一小张纸上抄写斯特恩《项狄传》中的一些段落。

时间挥霍起来真快：我写下的每一个字母

都在向我诉说

人生如何在我笔下迅速地流逝。构成人生的那些日子，那些时刻

正飞过我们的头顶，就像起风时

天上的云朵一样一去不复返——

所有的一切都在继续——

她的字迹在这儿渐渐淡了下去，杰斐逊接着为她抄完了这一段话：

每一次

我亲吻你的手与你告别

那之后的每一次分离，都是永久离别的前奏曲

我们马上就会永远地分离了！

在这一段文字中，斯特恩传达且不间断地传达着悲哀的讯息，因为在他看来，甚至连在情感交融和相爱的瞬间，人们感受到的都不是满足，而是生命的短暂：这是一种阴郁但又现实的人生态度。

詹姆斯·门罗感觉到帕蒂生命垂危，也感觉到他的同僚深切的悲痛。他说："说起杰斐逊夫人，我感到非常难过……每一次收到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天的消息后，我就很害怕她将离去。"他还向上帝祷告，希望帕蒂能康复："祷告也许可以取悦上帝，让我们可亲的朋友恢复健康，从而重新拥有一个朋友，如果失去她你会感到极其悲痛。你的孩子们也可以重新拥有母亲，这是任何经济状况的改变都永远无法取代的。"

然而，祈祷并没有起到作用。1782年9月6日星期五近中午时分，帕蒂去世了。根据蒙蒂塞洛的传统，"家中的仆人"，包括伊丽莎白·海明斯，都在帕蒂·杰斐逊弥留之际陪伴她。据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管理蒙蒂塞洛的埃德蒙·培根说，蒙蒂塞洛的奴隶们"经常对我的妻子讲起，杰斐逊夫人去世时，他们都围绕在她的床边。杰斐逊先生坐在她身旁，听她讲着她想要完成的很多事情"。

像杰斐逊已故的母亲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帕蒂都在安顿家中的各项事宜。"当说到孩子时，她簌簌泪下，一时泣不成声。最后，她举起了她的手……对杰斐逊说，一想到她的孩子们将来会由一个继母照看，她就无法放心地离开。"杰斐逊只有39岁，他精力充沛，性欲旺盛，要求这样的一个男人承诺永远忠贞看起来是一个自私的临终请求。然而，帕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请求最有可能是考虑到她的孩子们的幸福。她可能认为，孩子的姑妈们，以及她认识很久、关系非常亲密的伊丽莎白·海明斯都可以给予孩子们母亲般的关爱，这就足够了，不必冒险找一个陌生女人成为蒙蒂塞洛的女主人。帕茜当时将近10岁，波莉4岁，露西还是个婴儿。而杰斐逊年轻富有，声名远扬，有着迷人的魅力。但他还是做出了承诺。他向奄奄一息的帕蒂保证，他不会再婚。

当时，许多人见证了杰斐逊的这一誓言。萨莉·海明斯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帕蒂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还不满10岁。

在那个星期五差15分钟12点的时候，帕蒂·杰斐逊去世了。杰斐逊悲痛欲绝，他的妹妹玛莎·卡尔不得不搀扶着他离开他妻子的床边。据杰斐

逊的女儿回忆，他当时“毫无知觉”，“卡尔夫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带到了书房，在那里他晕倒了”，而且并非短暂的昏厥。他“昏迷了很久，大家都非常担心，怕他永远醒不过来”。

当他苏醒过来时，悲伤得语无伦次，并且陷入了狂怒之中。一切都表明，帕蒂的去世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让他失去了所有控制力。据他的女儿帕茜说，“我没有目睹那个情景”——大概是指杰斐逊在书房苏醒过来的“情景”——“但是，晚上当我悄悄地进入他的房间时，他的情绪非常激动，直到现在我自己都不敢描述那种激烈程度。”（帕茜在半个世纪后这样写道。）

为了让他更舒适一些，人们在他的小书房里铺了一个床垫。然而，在悲痛的驱使下，他疯狂地冲出门外。帕茜抓住她的父亲，仿佛紧紧地抱住一个一直在她生命中的亲人。对她来说，兄弟姐妹们在她生命中来了又去，现在，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战争时期，他忙于领导大局，那时的他对于帕茜而言似乎是一个慈爱但又有些生分的父亲。但是，他深爱着他的家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对待深陷丧妻之痛的父亲，帕茜表现得很坚强，也彰显出成熟，从她身上，杰斐逊看到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珍的影子，当然，还有帕蒂的影子。杰斐逊与帕茜紧紧相拥。在这段绝望的黑暗日子里，父亲和女儿相互慰藉，这种温暖而亲密的相处模式一直持续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

帕茜说：“他在房间里待了三个星期，期间我从未离开他的身边。他几乎昼夜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有在精疲力竭时，才会偶尔躺在那个床垫上，床垫是在他漫长的昏厥期间被放置到他房间里的。我的姑妈们也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了几个星期，我记不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了。”

他没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终于从房间里出来，又骑着马出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总是骑着马去山间漫步，有时会到人迹罕至的小路，也常常会在林间穿梭。每一次忧郁的漫步，我永远陪在他身边，唯有我见证了他许多次悲伤情绪的爆发，这些记忆总能唤起那些时间无法抹去的失去亲人的记忆。”他不停地骑着马出去漫步，仿佛只有活动起来才能缓解痛苦。在1782年9月6日的那场灾难后，他首次给朋友们写的信中，他说：“我考虑过暂时离开弗吉尼亚州，去费城或者北方某地待一段时间。”

谣言几近将杰斐逊逼疯。埃德蒙·伦道夫对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一直都知道他把家庭幸福放在首位，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的悲伤会如此强烈，真的像坊间流传的那样，他一看到他的孩子就会晕过去。”

他为帕蒂写的墓志铭摘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核心部分。他将这些诗句用希腊文刻在墓碑上，这样，只有有教养的人才能够分享他对妻子的追思。亚历山大·蒲柏将杰斐逊选取的诗行翻译如下：

如果说在死亡的忧郁中，

友情和爱情的烈焰会不再炽热，

但是，我的感情的烈焰定会持续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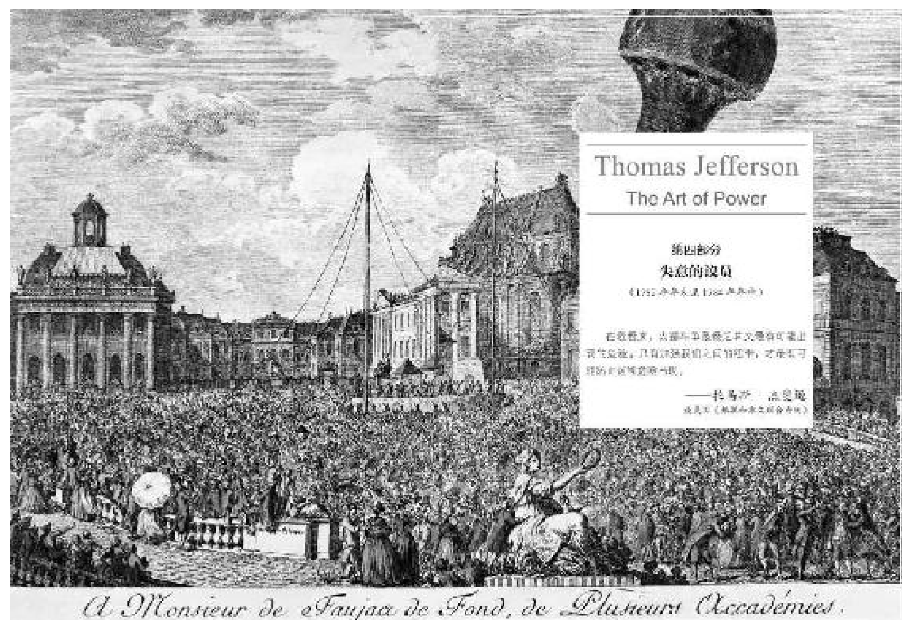
它将超越死亡，永不衰竭，给我的灵魂赋予生命。

在他心里，他与帕蒂的感情是永恒的，甚至能抵御死神的召唤。然而，墓碑上的文字却道出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玛莎·杰斐逊……于1772年1月1日嫁给托马斯·杰斐逊，于1782年9月6日去世，永远离开了他。”

一个月后，他曾暗指自己有可能自杀。他写道：“这样痛苦地活着对我而言实在是太沉重的负担，我快无法承受了。如果不是为了忠实地履行照管孩子们的神圣职责，我一刻都不想继续这样痛苦地活着。”随着帕蒂的去世，他的世界似乎也崩塌了。他给帕蒂的表妹伊丽莎白·埃普斯写信：“我的一切幸福计划皆因她的去世被打乱了，对于未来的日子，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一片愁云惨雾，即使还有一个指望能让我高兴一些，它也无法将这忧愁抹去。”

为了那唯一的指望——帕茜、波莉和露西，他会活下去。他知道自己对于他的孩子和其他亲朋好友的责任。他对埃普斯夫人说：“……和你们沟通时，我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你们感到沮丧。我答应过你们要去艾平顿庄园，但现在我还不会去，当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情，不在别人开心的时候苦着脸让别人扫兴时，我就会去。”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他能做到的只有和帕茜一起到林间漫步或骑马出行。



飞行的未知和刺激使杰斐逊着迷，他详细了解了载人热气球表演的进展，图中展示的是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杜伊勒里举办的热气球表演。

第十五章
重返政治舞台

各州之间将无视大陆议会而开战：一个要向法国请求援助，另一个则要让英国帮忙。如此一来，我们将把欧洲的所有战争引到我们的门前。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软弱的国家政府的担忧

杰斐逊现在年近四十，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失败过。他小时候是一个受宠爱的儿子、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25岁时在弗吉尼亚州城镇自治议会中执法，31岁时写下《英属美洲民权概观》，33岁时起草《独立宣言》，36岁时出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已经习惯于成功和大众对他的赞誉，习惯于不断取得进步，成就一次又一次辉煌。

然而，现在的他不再辉煌。他挚爱的妻子已经去世。面对本尼迪克特· 阿诺德和查尔斯·康沃利斯对弗吉尼亚的进攻，他对州政府的领导被普遍认为几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事情的细枝末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实情况是公众认为杰斐逊的领导力不足。尽管他很厌恶这一点，但它仍然是一个事实。

诗人但丁在和杰斐逊大致相同的年龄时，感觉自己仿佛“在黑暗的树林里徘徊”，杰斐逊现在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必须强迫自己从最近的悲痛经历中走出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完美的著名人士。除非他认识到，伟大的人生总会有种种不幸和过失，否则他将无法重返政治舞台。

在他准备重返政坛，想到自己的名声会遭遇到的危险时，他给在独立战争期间赢得了诸多著名的胜利，现在却饱受非难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写信：“当你认识到自己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时，你必须确信，一定会有人与你为敌。”

如果不考虑到这句话与写下它的人以及收到它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根本无法理解它。在写给克拉克的信中，杰斐逊还说：“如果你想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就只能把自己局限在那些让人厌烦的常规职责的范围内。一旦你超出这一范围，并勇敢地做出了一些会让你的名声流芳百世的举动，你就会成为一个招致敌意的标记、一个他人忌妒攻击的对象。不论在你当政期间，还是卸任以后，这些敌意和忌妒都会伴随着你。”

精神的痛苦是一个公众人物需要为他人的奉承所付出的代价。自从

杰斐逊担任州长后，他便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以前从未付出过那样的代价。他也认识到，坚定地继续前行是将过去抛在脑后的唯一办法。除非他选择永远退休，但这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由于逆境本身就是杰斐逊所选择的政治生活的内在要素之一，他就要接受这样的生活对他的考验，并且在经历过逆境后，对于要走哪条路做出选择。

杰斐逊在1781年和1782年所遭受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政治苦难——英军的入侵、对他名声的中伤，以及他妻子的去世——如果发生在那些不如他的政治家们身上，他们很可能会伤心地、愤怒地回到他们的种植园，感慨这一切的不公。

但杰斐逊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前进，而不是退缩。

当帕蒂·杰斐逊去世的消息传到费城时，杰斐逊在大陆会议的同僚们请他出使法国，担任巴黎和平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战后秩序。

杰斐逊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后来回忆道：“在我去法国的两个月前，我失去了生命中珍爱的伴侣。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未消退，这10年我过得一直很幸福。失去她之后，我的精神状况很差，国家的召唤让我得以更换生活环境。”

1782年11月26日星期二是杰斐逊一生的转折点。当天，他来到安普希尔庄园，该庄园位于詹姆斯河河畔，福林克里克河附近。它的主人是阿奇博尔德·加里，与杰斐逊一样是个革命者。在那里，杰斐逊给家中写信，吩咐孩子们注射预防天花的疫苗。从那时开始，他恢复了与外界的通信，走出了过去三个月的悲伤，开始重新接触世界。

在他拟写的接受驻法大使这一任命的草稿中，杰斐逊表示：“我会诚实正直地完成我的任务，并公正地兼顾两国的利益。”他可能希望通过强调自己更广阔的视野和全局策略，将他的政治生涯里那个不如意的前一章翻过去。不管怎样，他渴望尽快走马上任。他表示：“我要抓紧每一刻为出发做准备。”

在他写给沙斯泰吕叙尔侯爵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发生在那个秋天的痛苦事情。他写道，之所以没有回复沙斯泰吕叙尔侯爵之前的来信，是因为“妻子的去世让我的世界也变得死气沉沉，我现在刚刚从那种麻木状态中稍稍缓过来”。

杰斐逊将两个较年幼的孩子（波莉和露西）交由帕蒂的妹夫弗朗西斯·埃普斯和表妹伊丽莎白·埃普斯照顾，而年龄最大的孩子帕茜则同她的父亲一起前往巴黎赴职。1782年12月15日星期日，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在《弗吉尼亚公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宣布他已将“自己的个人事务”委托给两个人照料，一个是帕蒂的妹夫——切斯特菲尔德县的弗朗西斯·埃普斯，另一个是他的朋友——阿尔伯马尔县的尼古拉斯·刘易斯。4天后，杰斐逊和帕茜动身前往巴黎。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急切地想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但是，英国政府对他此行百般阻挠，而且天气状况不好。他和帕茜原本预计将与法国公使一起乘坐“罗穆卢斯”号护卫舰从巴尔的摩前往法国，岂料船在距离巴尔的摩还有几英里的地方便冻住了。因此，杰斐逊只好留在费城，开始重新了解自己在6年前离开的那个国家政治舞台。他和他的女儿住在玛丽·豪斯夫人位于第五大街和市场街交界处的公寓里。

在豪斯夫人家，杰斐逊享受政治伙伴们（包括麦迪逊）的愉快陪伴，同时，沉浸在悲痛中的他还感受到了房东女儿伊丽莎·豪斯·特里斯特的同情。这种与富有同情心的女性朋友的友谊对他而言是必要的，自从他和他的姐姐珍建立起这种友谊后，他的生活中便一直有这样的朋友。伊丽莎·特里斯特便继续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他十分欣赏这位朋友。

在豪斯夫人家，纽约州国会议员威廉·弗洛伊德的美丽女儿——15岁的凯瑟琳·基蒂·弗洛伊德向32岁的麦迪逊表达了爱意。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中，杰斐逊扮演了配角。最终，基蒂赢得了外表严肃的麦迪逊的心。杰斐逊也参与了其中，他称之为所有住在豪斯夫人家的人的“善意的玩笑”，因为它记录了这段浪漫的爱情。

除了花时间和新老同事相处，杰斐逊还认真阅读了大陆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保管的“外交事务机密日志”，并做了详细的记录。他还研究了大陆会议与驻法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驻西班牙的约翰·杰伊，以及驻荷兰的约翰·亚当斯的外交信件，并回顾了会议对派往国外的专员的指示，以及驻维也纳、俄罗斯、普鲁士和托斯卡纳的外交大使的任命。此外，他还研读了麦迪逊的文章《大陆会议政治事务观察报告——有关佛蒙特州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影响》，并仔细研究了西班牙–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纠纷的有关文件。

渐渐地，杰斐逊熟悉了人看待周围一切的方式，他认识到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于是，他便向他未来的同事约翰·杰伊示好，杰伊当时是驻欧洲的一名外交官。杰斐逊表示：“如果我在更早一些时候见到你，我确信我就不会接受这项任务。因为我在最后时刻才参与其中，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不给你们添麻烦。”这是一个化敌为友的暗示，旨在减轻对方对于一个新外交官的任何忌妒或厌烦。杰斐逊在努力与他周围的人成为朋友。

此外，他还努力结交那些地位比他更高的人。例如，他曾写信讨好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在整个国家中的崇高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独立战争期间，杰斐逊便与他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随着和平可能来临的大好形势出现，杰斐逊希望亲切友好地对待华盛顿，并帮他做些有用的事。他向华盛顿表示：“我对阁下为我们所吃的所有苦头和所做的一切表示我的敬意。”

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杰伊和当时在职的美国驻法代表们已经完

成了将与英国签署的《巴黎条约》草案，这项文件将正式结束独立战争。该条约的文本正在送往美国，经大陆会议签署后将正式生效。如此一来，杰斐逊的任务还没开始执行便结束了。

于是，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又一次不情愿地成为一个平民。但是，他向詹姆斯·麦迪逊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想再次行动起来。他写道，“有时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只要国家需要”，他就会满腔热情地重返政治舞台。

这一愿望在不久之后便实现了。1783年6月6日星期五，杰斐逊当选为邦联议会弗吉尼亚州代表。埃德蒙·伦道夫向麦迪逊简练地叙述了这一消息：“杰斐逊先生同意担任代表团团长。”

在这之前，杰斐逊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了。

杰斐逊所入选的邦联议会是当时唯一的国家政府机构，根据《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设立，但它本身就有内在缺陷：既没有独立的行政机关，也没有司法部门，只有邦联议会。每个州在邦联议会中至少要有两名代表。大部分较大问题的决议需征得大多数州（9个州）的同意，这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即使议会具备了法定人数，并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议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它不能征税、规范国家贸易或创建军队（尽管它有权宣战）。它也没有执法手段，各州实质上是主权国家，这导致邦联议会这个国家政府机构无力制定一致的外交和商业政策，然而，只有这些政策才可能让这个年轻的国家变强大。

1783年与1774年有着诸多共同点：一段曙色朦胧的时期，一段重大问题的答案尚未揭晓的时期。1774年的重大问题是战争；而1783年的重大问题则是和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人民能否化解矛盾现状，进而将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治理。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75年提议制定《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起，杰斐逊就一直在思考在全国层面上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为了探讨富兰克林的提案，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杰斐逊便在该委员会任职。1783年，他又被委派到另一个专门小组，以“组建一个邦联议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在他的提议下，美利坚合众国委员会成立。杰斐逊始终执着地倡导增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权。

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杰斐逊后来回忆道：“当时，人们将这一失败归咎于两三个人的坏脾气，但那些明智的人都认为它是人的本性所造成的。”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杰斐逊从战时治理弗吉尼亚的经历和18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机构的瓦解中吸取了经验，支持设立一个单一的（但负责任的）行政首长职位。这样的选择是顺应历史规律的。针对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杰斐逊表示：“提供建议的人可以有许多，但有最终决定权的裁定者只能有一个。我相信，这样的政权组织形

式定能对智慧和实用性进行最佳结合。”

纵观1783年邦联议会的状况，杰斐逊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独立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怎样才能避免州与州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相互攻击呢？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全部控制力的、有约束力的国家政权。现在的任务非常明确：杰斐逊和他的同代人必须“肩负起责任，加强我们邦联的凝聚力，并避免因目前的羸弱而造成残酷灾难”。

这些问题在18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持续存在。1786年，约翰·杰伊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建立邦联政府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这一点我思考了很久，而且我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赋予同一群人，而且构成这一群人的成员每天还在变化，绝对不是明智的做法。”同年，杰斐逊对詹姆斯·门罗说：“如果我们的邦联不显示它的威力，国库里就永远不会有钱。各州必须看到它的铁腕，或者说一些州必须感受到它的铁腕。”

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邦联，国家将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问题不仅存在于政治和法律方面，还存在于民族性上。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生存前景完全掌握在它的国民自己手中。1782年，有人简洁有力地提出了美国的民族性这一问题。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他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问道：“那么美国人一这个新生的种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这个疑问，杰斐逊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答，虽然他的重点局限于一个区域，而不是整个国家。1780年，法国驻美使馆总领事巴贝–马霸侯爵曾向杰斐逊询问了一系列关于弗吉尼亚的问题。杰斐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终集结成了一本书——《弗吉尼亚笔记》，这成为他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创作，该书几年后在巴黎出版。这部作品是对马霸提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回答，从“能否对弗吉尼亚州的范围和界限进行一个准确的描述”到“该州有哪些特别的风俗习惯”。这本书的内容既具体精确，又兼收并蓄，风格既正式又口语化。

这本书明显地表现出杰斐逊对于家乡的自豪，书中充满了对弗吉尼亚州美丽的自然风光的狂热赞美。但他也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在革命时期执政所遇到的困难。对弗吉尼亚州的治理需要对诸多因素进行独特整合。“治理该州既需要英国宪法中最自由的原则，也需要那些源于自然权利和自然理性的原则。这些与绝对君主制准则是截然相反的。”

杰斐逊后来发现，弗吉尼亚州的状况在美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同样存在。美国人民还远远没有找到他们生活中那些相互竞争的因素（中央政府和各州、州和人民）之间的制衡点。

在一个雨夜，詹姆斯·麦迪逊在返回奥兰治的途中与他的弗吉尼亚同胞乔治·梅森交谈，他就当下的诸多问题试探了梅森的意见，发现梅森对这些问题持有“非正统的观点”。麦迪逊对杰斐逊说，梅森“对维护邦联的必要性或正当手段几乎没有什么认识”。

在这一时期，麦迪逊在《宾夕法尼亚邮报》（又名“广告周刊”）上匿名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在文章中，麦迪逊热切地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出了有利论据。但是，正如梅森的观点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论据未能引起广泛共鸣。

与此同时，麦迪逊的个人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基蒂·弗洛伊德解除了婚约，这让他倍感羞辱。杰斐逊非常担心麦迪逊，便立即给他写信，表示了自己的关怀和同情：“不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不幸，我由衷地感到悲痛……这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尽管我的预期是基于我对生活的充分了解。但是，在所有事物中，我们的感情却是最复杂、最神秘莫测的。”

这些安慰的话语出自杰斐逊这样一个好友，一个经历过悲伤，并很早就试图以一种达观态度看待生活挫折的人。他曾经体验过悲伤和孤寂，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使自己的情感正常工作，让他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继续前行。他相信麦迪逊也会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杰斐逊对有关政局的信息知之甚少。在他当选为邦联议会代表的10天后，他请求在里士满的一个弗吉尼亚州议会代表随时告诉他有关该州政治局势的消息。1783年6月17日星期二，他给该代表写信：“我对有关州议会的消息很感兴趣，但了解却很少，近乎没有。诸如，你做了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的领导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他们是谁？两院的人员是怎样部署的……”

一如以往，信息就是力量。

第十六章
一场为了赢得尊重的战斗

对外民事部署和外交条约，国内民事部署，在国内和平地建立军火库和军事要塞，西部领土，印第安人事务，钱。

——托马斯·杰斐逊，列出战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邦联议会变得无家可归，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1783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400名大陆军士兵哗变，攻占了位于费城的邦联议会，要求政府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议会代表们不得不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并预计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将议会迁往安纳波利斯。哗变发生的时候，管辖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官员没有进行调停，导致议会代表们不得不撤离费城，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换句话说，中央政府被本国人民逼得出逃了。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政府的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据詹姆斯·麦迪逊汇报，当时邦联议会的代表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意愿，那就是，冒着他们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风险，离开普林斯顿返回费城，以“防止任何有关这个如此重要的州的民众对革命或邦联政府不满的推论流传开来”。

尽管如此，邦联议会仍然留在了普林斯顿，直到1783年11月才迁往安纳波利斯。虽然在秋季自己的任期开始时，杰斐逊并不确定政府会定都哪里，但他早已让麦迪逊请豪斯夫人为他准备一间房间——无论大小。如果定都费城的话，他还就帕茜的就学问题向特里斯特夫人征求了意见，因为不论议会最终决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帕茜不久后便会到费城。

1783年10月16日星期四，杰斐逊离开了蒙蒂塞洛。他途经费城，最后于11月4日抵达普林斯顿到议会就职。然而，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是最短暂的。他到达普林斯顿的当晚，议会便迁往了安纳波利斯，因为普林斯顿无法为议会代表们提供“足够的住宿”。麦迪逊并不赞成在普林斯顿召开议会会议，他认为这里是“一个村庄，既不能方便地完成公共事务，也无法体面地满足议会代表们的生活所需，更根本不能供养那些与议会有联系的人”。

秩序的实现需要权力，这样的权力是各州所缺少的，也是议会所需要的。杰斐逊既不是一个自反性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也不是一个州权力纯粹主义者——这两种思想已经成形——他一直在努力思索如何在一个充斥着多种利益的国家分配权力。

对于邦联议会在1783～1784年的作用，杰斐逊的认识与他卸任州长后的想法是一致的：不论是谁当政，都必须拥有确定无疑的控制权。杰斐逊写道：“合众国各州聚集在邦联议会，共同代表整个联盟的最高统治权。在任何场合，不论是议会之于集体层面，还是议会主席之于个人层面，都应比其他机构和个人享有优先权。”即使杰斐逊在这里仅仅是指正式场合，但他的中心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邦联议会要想发挥它的效力，就必须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安纳波利斯是一个宁静的地方。杰斐逊认为，这里太过宁静，并不适合成为一个战胜国的政府所在地。1783年12月，他给麦迪逊写信：“现在距离预定的开会日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却只来了6个州的代表。”按照规定，只有具备9个州的法定人数，会议才可以召开。“罗得岛州的代表有望今天能来，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两个州，这就和地震什么时候发生一样无法预测。”他还表示，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这些驻外专员们写道，“发生在费城的骚乱，以及邦联议会从那里撤离的事件给欧洲各国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对于我们邦联的稳定性，以及我们的收场方式，它们也表示极大的怀疑”。

然而，邦联议会即将面临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有限的时间内签署并正式批准《巴黎条约》，以结束独立战争，并获得英国对美国独立的认可。1783年12月13日星期六，杰斐逊被委派至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审查该条约内容。

该条约共有10项主要条款，其中英国政府承认美国领土，并承诺返还被其没收的财产（包括奴隶）。第10条也非常关键，规定了该条约的签署程序：本条约于1783年9月3日星期三在巴黎签署，务必于签署后6个月内正式生效。

虽然杰斐逊所在的委员会提议正式批准该条约，但邦联议会仍然不具备开会所需的法定人数。不具备法定人数，就不能采取行动。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杰斐逊深感厌恶。

这一年的平安夜令人十分不安。杰斐逊感觉不太舒服，他很担忧。就在这一天，也就是1783年12月24日星期三，他给一个弗吉尼亚州记者写信：“我无法克制自己对目前严峻形势的极度焦虑。”现在只剩下“两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正式批准该条约，并将其送回巴黎。“目前只能说该条约有望得到批准”，希望议会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如果该条约没有及时得到正式批准，英国将企图对条约进行新的改动。

1784年元旦，杰斐逊情绪很低落，身体也不舒服。他对麦迪逊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欠佳。现在，我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了。”

如果邦联议会不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将因未能及时批准和交付条约而在国外受辱。但是，如果议会在未具备9个州的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采

取了行动，中央政府则会面临权力被篡夺的危险。

杰斐逊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可以维护——实际上是建立——美国的国际声誉，并避免议会遭受僭越权力的指控。以律师般的精确性，杰斐逊起草了一份议案，利用先前的一次投票表决，通过扩展其权限使其适用于《巴黎条约》，确保了该条约的正式生效期限得以延长。（最终，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代表终于赶到，经9个州的代表批准后，该条约正式生效。）

目前，议会已成功地使《巴黎条约》正式生效，反过来说，该条约也正式结束了独立革命。为了宣布这一消息，杰斐逊起草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号召“各州的所有优秀公民们”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诚意”尊重并履行和平条款的内容，“这些维护他们利益的条款的制定得益于邦联政府的权威，他们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并被世界各国所了解和认可，与邦联政府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斐逊认为，“在贸易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采取行动”，这样英国“将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照以前的情况看，“英国并不害怕采取报复行动”。

尽管如此，几个月来让杰斐逊备感紧张和不安定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这让他振作了起来，也可能让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曾对帕茜说：“我仅仅能在议会大厦里工作，无法到外面出席其他任何场合。”但是，《巴黎条约》正式生效后的第二天，他便表示他感觉“好多了”。这位《独立宣言》的作者宣布了和平的到来，再一次肯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的身份。

注意到战争期间许多要塞被攻占，该条约还提出了诸多关于美国西部未来的议题，长期以来这是杰斐逊的兴趣之一。萦绕在他心头的西部地区具有浪漫性、科学性以及实用性。他喜爱那里无尽的森林——在那样的景象中，他就像一个古老的撒克逊人，在原始的自由里生活着；他也深深地被那里他所谓的“不同种类的骨骼、牙齿和长毛象的象牙”，以及其他自然标本所吸引。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曾认为，新世界（美洲）的动植物是低等的，这一评论杰斐逊一直记在心里。他后来于1784年在费城买了一张“极其大的美洲狮狮皮”给布丰看。

杰斐逊还是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同战时的担忧一样，战争结束后，他担心超出美国控制的边境地区会对美国造成威胁。1783年12月，他从安纳波利斯给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写信：“我发现他们已经在英国捐了一笔非常大的款项，用于考察密西西比河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地区……他们声称这次考察只是为了传播知识，但是，我担心他们想要在那一地区建立殖民地。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谈到要尝试对那一区域进行探索，但这一提议的影响力很微弱。”不过，对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这一探索，杰斐逊很发愁。他写道：“但我怀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筹集资金。你想要如何带领这样一个考察队呢？”

杰斐逊在“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目睹了美国的故事，他很清楚自己所参与的这一事业的规模有多大。178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杰斐逊多方打听，想通过塞缪尔·豪斯（伊丽莎·豪斯·特里斯特的哥哥，一个费城商人）购买一台机械复制设备。他想确保，到了讲述故事和编写历史的时候，他在独立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长篇故事中的一部分。从开始分发他的《独立宣言》的原始版本时起，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他正在采取措施，保存关于每一天，甚至是每个小时自己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的活动的记录。

第十七章
消失的城市和终生的劝告

州长是一个最纯真的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知识渊博，在各个方面都极其优秀。

——耶鲁大学校长以斯拉·斯蒂尔斯对杰斐逊的评价

在费城，到处都是关于气球的谣言。1784年3月，杰斐逊的朋友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给他写信：“据邦联议会的议员们的想象，当他们板着脸离开这里前往安纳波利斯时，我们都应该感到深深的悲痛。每看到一副板着脸的面孔，我们都应该回应一声叹息。然而，实际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议会的名字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如果说有一个人会说起这个值得尊敬的机构，那么就有100个人会谈论气球。”

此时正值巴黎盛大的乘气球飞行试验季，关于此类飞行，包括一次1783年11月的载人飞行的消息迅速传开。杰斐逊感觉到，人类对天空的控制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他回信道：“对于这些气球，你有什么看法？议员们确实开始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有报道说有人乘气球在3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了20分钟，飞行距离总长6英里。对此，杰斐逊以戏谑的语气予以评论，但他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一发现似乎预示着那些在四周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建筑也会被破坏，除非它们的上空也设防，舰队也会被摧毁等。法国人现在可能会将他们的蕾丝、葡萄酒等向英国免税出口。建立在货物经由港口运输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整个英国法律体系将进行修改。内陆国家现在也可能成为海上国家，除非你宁愿称它们为空中国家，因为它们将来的贸易将通过天空这一媒介进行。不过，说正经的，我觉得这一发明可能会带来些益处。”10年后，杰斐逊在费城见证了美国第一次成功的载人气球飞行。

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同时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杰斐逊的朋友霍普金森机智幽默地表达出政治和科学之间的一种联系。霍普金森写道：“在我看来，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恰恰就像一个气球——极其易燃，每一阵风都能将它刮起，那些愿意忍受乘坐它飞上天的人们都冒着它可能会爆破的极大风险，并使他们从自己轻易上升到的高度跌落。”

杰斐逊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减弱。有一天，詹姆斯·麦迪逊给他写信，提到了从国外传来的一则不同寻常的消息：“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座地下城市，那里似乎曾经人口稠密，宏伟壮丽。许多罕见的珍品被发掘出来，其中有一座骑士雕像，它的脖子上绕着一条长达200英尺的金链。布丰根据俄国女皇曾送给他的一条6英尺的金链样品推

断，这条金链的锻造极其精致，在巴黎没有一位大师能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

詹姆斯·麦迪逊牧师（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校长，同时也是杰斐逊的政治盟友詹姆斯·麦迪逊的表亲）和杰斐逊通信聊气候（“英军抢了我的温度计和晴雨表”，对此他很恼火），聊新的科学书籍，还聊彗星。“你一定能观察到那颗彗星，它上个星期五晚上第一次在这里出现……我将尽力追踪它的运行轨迹，并将结果寄给你。”

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也通过信件和杰斐逊联系，好奇地向杰斐逊询问一个科学问题：在法国有传闻说，“在弗吉尼亚州或卡罗来纳州的一些最偏僻的村落里，人们用蒸馏法从土豆中制取白兰地”，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他表示，他之所以向杰斐逊询问，是因为“我曾经听人很尊敬地提及您的名字，而且，您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

杰斐逊相信反复试验法的正确性，他用这种方法探究布丰的热理论，并在植物学领域寻求突破性发现。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引进或传播新的植物品种的试验中，在100个品种中只要能找到一个有用的品种，并取得试验的成功，那么其他99次失败都是值得的。”

杰斐逊还给巴贝–马霸侯爵写信，以感谢他在费城为帕茜找了一位法语家教，并就帕茜的读物问题向他寻求建议。杰斐逊表示，他已经给帕茜找了一本阿兰–列内·勒萨日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还有一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我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来看，它们是所有同种类作品中最好的。”他的选择表明了他酷爱冒险思维，并希望他的女儿也能够与他分享这一乐趣。

他是一个慷慨的父亲，但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写给他的女儿帕茜的信中，他说：“我希望你能在我给你找的教师的指导下学有所成，这些学识会使你更值得我去爱你。即使它们不能增加我对你的爱，也会避免这种爱减少。”他还雇了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的母亲托马斯·霍普金森夫人照看帕茜，并将他心爱的已故妻子的权力赋予霍普金森夫人。

> 你要体谅这位让你住在她家的好心的夫人，她已经答应会监督你完成所有作业，并在你因不谙世事而迷惘于是非对错时告诫你。将她视为你的母亲，视为唯一一个……你现在要尊敬的人。不论何时，如果你任何轻率的行为导致了她的不悦或非难，都将是极不幸的。届时你要做出一切让步，以重获她的青睐。

在杰斐逊心中，他将帕茜放在了她母亲的位置上。但是，他不是一味地，而是视情况而定地疼爱她。他希望，他的女儿能拿出与他做所有事情时相同的干劲和努力，专心致志地完成他规定的任务。

对于你的时间表，我的建议如下：

上午8 ～10点：练习乐器。

10点～下午1点：跳舞，第二天画画，交替进行。

1～2点：画画（与跳舞同天），第二天写信，交替进行。

3～4点：读法语。

4～5点：听着音乐运动。

5点至就寝时间：读英语、写字等。

除了帕茜外，杰斐逊还教导其他孩子。1783年12月，在写给他的外甥彼得·卡尔（他的妹妹玛莎和达布尼的儿子）的信中，他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认识到如何利用现在的时间对你未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浪费现在的每一刻。"他委托他之前的老师詹姆斯·毛瑞照看卡尔。

杰斐逊对卡尔寄予了厚望——这种厚望反映出了他自己的志向。他希望卡尔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影响力的人"，并期望他为登上"公共舞台"做好准备。（他还建议卡尔学习西班牙语。他对卡尔说："鉴于未来我们与西班牙的关系，西班牙语成为继法语之后现代语种中最有必要掌握的语言。……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时，有可能会用到它。因此，如果你掌握了这门语言，可能会比其他候选人更有优势。"）

后来，他又对卡尔说，宗教需要的是审慎的思考，而不是反射式的接受。"宗教坚定地秉持理性，并以此对每一个事实、每一种看法做出裁断。甚至连上帝的存在都能勇敢地提出质疑，因为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更尊崇理性，而不是盲目的畏惧。"

杰斐逊极其渴望秩序、控制和爱。1784年2月，他从安纳波利斯给麦迪逊写信："门罗正在几乎毗连我家的地方购买土地，威廉·肖特也将要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搬到这个圈子里来……你考虑一下。只要你想，这是可行的。人生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带给我们许多乐趣。其中最宝贵的乐趣之一就是理性的陪伴，它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性情变得温和，振奋精神，促进健康。"

杰斐逊也一直是一位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朋友。例如，有一次他给乔治·威勒写信："虽然我们从事不同行业使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我很挂念你，我向每一个从你那儿来的人打听你的健康状况……我会永远将那些和你一起度过的愉快、有益的日子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并将那些你让我受益终生的极大恩情谨记于心。"又如，1787年年底，杰斐逊在里士满的朋友亚历山大·唐纳德正在家中招待沃纳·刘易斯时，收到了一封杰斐逊的来信。唐纳德对杰斐逊说，这封信"非常亲切友好，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以至于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不住将信给他看。而他所说的

话则让我的自尊心更受鼓舞，他说……在他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你对于友谊的表达是最真诚的……似你这样高声望的人会很容易忘记他们的老朋友，但是你没有。而我必须公正地说，我自己从未有过你的这一想法”。

邦联议会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这种混乱似乎超出了杰斐逊的控制，它甚至很难召集到法定人数。1784年2月，杰斐逊对麦迪逊说：“议会向各州发出了一次又一次警告，但起不到任何效果。……我担心，我们的状况现在非常危急。”

报销议会代表们的个人费用也成了一个问题。杰斐逊表示：“在其他立法选题中，我们的经济窘迫应该受到关注。……我已经离开家4个月了，花费了1 200美元，现在才收到1/4便士。”而对于杰斐逊的一些同事而言，钱发的太晚了。“在此期间，由于缺钱，一些人的马从付费马房被赶了出来，我们感到很难堪。这实在让我们无法忍受。”

紧接着，关于英王或者英国重申影响力的唠叨便时常出现，暗示局势更加严峻。这让杰斐逊开始思考这几十年来的政治局势。1784年1月下旬，他针对一位波士顿记者的来信起草了一份答复，这位记者在信中告诉他：“……新斯科舍省政府的大不列颠的子民们侵占了马萨诸塞州的领土。”

几个星期后，当杰斐逊看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相关报告后，他提醒乔治·华盛顿：

> 他的信描述了英国针对我们的部署。他注意到，虽然英国已经与我们和解，但其实并没有和我们重归于好，也并不甘心失去我们这个殖民地。他呼吁我们注意众多的英国王室后代，注意他们中一些人所受的军事教育，以及那些会分散我们注意力的英国思想。他还希望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民已经对他们的新政府感到疲劳。欧洲大陆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可能会纵容英国重新占领我国的意图，我们也因此会得到一个有益的教训，即加强我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友谊。

1784年3月，当杰斐逊在克服他的“又一次发作的周期性头痛”时，他给华盛顿写信：“我想，你很清楚邦联议会已经被严重削弱……这所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正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工作都是徒劳。”

英国人正在催讨美国人的战前债款。而在《巴黎条约》所规定的内容里，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一是英国承诺舍弃其在西部地区的堡垒，二是英国保证向美国归还其俘获的奴隶以及那些逃脱的奴隶。显然，这两个问题都备受弗吉尼亚民众的关注，并且多年来在英美两国之间引起了骚动。

针对西部地区，杰斐逊构建了宏大的梦想。他提出了一条贸易路线，将俄亥俄州和波托马克河流域连接起来。他说：“……如果我们打算拥有它，现在正是占领它的时机。”“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商业化”，他正在促使弗吉尼亚州批准针对这一内河项目的一项特别税，但正如他对乔治·华盛顿所说的那样：“这类主张往往会引起最强烈的反对，理由是公共事业会管理不慎，投资巨大但成效甚微。”

杰斐逊克服这些障碍的计划是，招募退役的华盛顿负责这一项目。尽管几十年来华盛顿也一直有实施同一项目一样的想法，但这位将军的答复却是务实的。虽然他认可该计划的可取之处，但他表示：“我对公众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不抱任何希望，一是因为忌妒行为普遍存在；二是因为均衡地分配那些为了实现你所提到的目标而拨给的资金，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难题（如果不是我对我的同胞们的看法太糟糕的话）：一是无法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措施的绝妙和明智之处，二是很难从他们那儿筹集到钱。而且在我看来，这两个困难更加难以克服。”尽管如此，杰斐逊的信重新引起了华盛顿的兴趣。他们希望在波托马克河上开辟航道，并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使该河经由一条陆运通道与俄亥俄州相连接。华盛顿担任一家私营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监督波托马克河的河道改善。（在几十年之后，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浚成。）

4月，华盛顿给杰斐逊写信，含蓄地称赞了他关于“辛辛那提协会的意见”。这个组织由华盛顿领导下的军官构成，但有人担心这样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可能会腐化合众国。

杰斐逊很高兴华盛顿向他询问这一议题。他说，辛辛那提问题“非常有趣，并和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也是我一直挂虑的事情……我希望你不必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作为我们的革命领袖，你的名声将流芳后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那些不重要的争吵而受到损害”。

杰斐逊非常了解他的这位朋友，要想赢得华盛顿的关注，没有什么比指出他的声誉受到了威胁更管用的了。杰斐逊说，他确信华盛顿并无恶意。凭借“个人的克制和美德”，华盛顿“有可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避免失败，而没有像其他大多数革命事业一样，因为其建立起来的自由被颠覆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即使是他也“终究会死去，到那时，这个机构的继任负责人或者以后的继任者中的某一位可能会通过糟糕的途径争取荣誉”。杰斐逊还表示，邦联议会也同意他的看法。

杰斐逊反对这一新兴阶层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出于人的政治本性，一群定期会晤的人是极不可能一直保持和睦的。杰斐逊说：“让朋友之间发生争吵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公众视线下陷入争论。”第二，一个世袭的阶层与建立在杰斐逊称为“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平等”的基础上的合众国是不协调的。

华盛顿似乎认真地听取了杰斐逊的劝告，他敦促辛辛那提协会停止授予荣誉会员资格。在杰斐逊看来，这一种会员资格“可能会让所有有才

干、有官职、有财富的人加入这一阶层中，并进而介入政府”。

杰斐逊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事业进行了广泛又大胆的思考。他对麦迪逊说：“我认为将我们的年轻政治家们召集到这里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这里，他们能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看待各项邦联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并在返回各州后友好地对待邦联的各项措施。”

1784年3月1日星期一，邦联议会接受了弗吉尼亚州对俄亥俄河西北部领土的割让，结束了几年来的谈判和利益冲突。这一割让使美国西北部领土的所有权从弗吉尼亚州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土地已经割让了，但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在这样的形势下，杰斐逊经过思量，已开始制订一项建立新州的计划。他甚至给各个新州想好了名字：西凡尼亚、克罗尼瑟斯、阿瑟尼斯比亚、米索不达米亚、伊利诺伊亚、密歇根尼亚、华盛顿、萨拉托加、波利波特米亚和宾利斯比亚。《1784年法令》意义重大，因为它将未来新州的组织方面的诸多细节问题交由它们自行决定。但是，这些新州也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邦联的一部分”，且“它们各自的政府也必须以共和为体”。

最重要的是，杰斐逊版的《1784年法令》中规定，禁止将奴隶制扩张至新的领土。但是，这一法令最终在邦联议会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代表因病重无法出席投票，注定了这一法令的失败）。想到当时的情景，杰斐逊写道：“我们目睹了数百万未出生的人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人要说的话，在那一可怕的时刻，上帝也沉默了。”

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里，杰斐逊试图通过法律和立法的手段废除奴隶制；现在，他已人到中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再冒着失去自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有用性”的危险坚持废除奴隶制。（但是后来，废奴事业取得了一次局部性胜利：《1787年西北领地条例》规定，俄亥俄河以北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领土内禁止奴隶制。）然而，总的来说，公共生活对杰斐逊而言就是妥协和无休止地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追求废除奴隶制，甚至按照杰斐逊的想法，在废除这一制度的同时将黑奴驱逐出境，这会对一个人的政治生涯造成致命性影响。杰斐逊不会再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追求一项他认为时机未到的事业。

1784年5月7日星期五，对杰斐逊而言是漫长且意义深远的一天。从早上到下午，他一共写了十几封信和文章，所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纸币、西部地区的商业决议、辛辛那提协会、麦迪逊曾提到的消失的西伯利亚城，还有和波莉、埃普斯家族以及卡尔家族聊到的家庭问题。

下午5点，每天按时传送信件的人离开了安纳波利斯。邦联议会任命杰斐逊为美国驻欧洲代表团的一员，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起，负责在新生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联盟。他急急忙忙给威廉·肖特（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杰斐逊的姻亲）写信，希望肖特能担任他的私人秘

书，一同前往巴黎。他还写信叫詹姆斯·海明斯前来，希望将他训练成一个法国菜厨师。

在这一任命正式生效后的第二天，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现在，我将远离各州的纷争，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里的分歧更少，但一旦有分歧，规模会更大。"他表示，他将以那些他在公共生活中一直遵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那里，我将继续遵循我在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我相信，做不公正的事情，或提出不平等的要求，绝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利。"

与此同时，他还请麦迪逊及时告诉他国内的消息："每一届议会会议结束后的各项整体措施和部署，以及各个党派或个人的政治活动对我而言都是非常有趣且大有助益的信息。"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消息，它们就是他每天的食粮。

他对麦迪逊的友爱和信任早已加深，因此，他将他所谓的"一项须悉心完成的遗留事宜"交由他的这位朋友：彼得·卡尔的教育问题。彼得的父亲是已故的达布尼·卡尔，杰斐逊在1784年仍然真切地记得他，就像他们小时候一样。在给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写道："我不会说这一遗留事宜是关于我妹妹的儿子，虽然她的重要性会让我理应那么做，我会说它是关于我朋友的儿子。如果不是上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的这位最亲爱的朋友本应成为我的孩子们的一个父亲。"14岁的彼得"几乎掌握了拉丁语，读过一些希腊语……我希望他在16岁之前能充分利用时间学好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古英语。我打算让他满16岁时到威廉与玛丽学院上学"。

1784年5月11日星期二，杰斐逊给弗吉尼亚州议院写了一封告别信。在信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他最主要的政治担忧：极其不稳固的邦联。他表示："我一切的政治行为的首要目标是，为我的祖国谋求正当权力，并加强与它的幸福和安全紧密相关的联盟。"就这样，他结束了自己为期6个月的作为邦联议会弗吉尼亚州代表的任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目睹了邦联的松散和国家政府的无力所付出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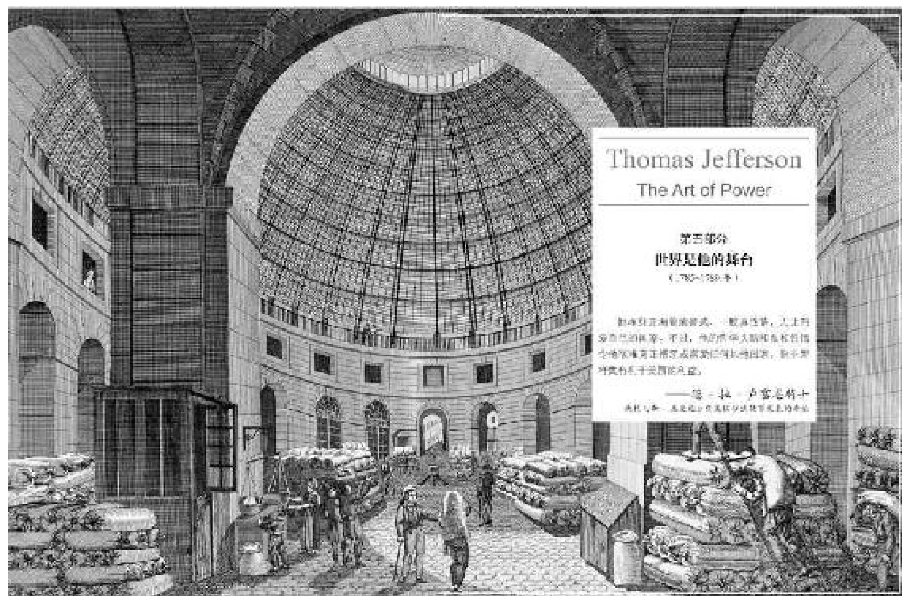
前往巴黎工作的前景既诱人，又有些令人恐惧。在为杰斐逊记录巴黎的政治生活时，威廉·肖特注意到，外表和各种微小的细节在那里非常重要。"巴黎这个地方愚蠢得很……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你必须服从它。"

在等候从波士顿通行期间，杰斐逊搜集了关于北部各州的商业情报，并做了大量的记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学习，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完成这项使命的要求"。

1784年7月4日星期日晚上，杰斐逊完成了他的所有议会事务。这距离他起草《独立宣言》已经过去8年了，而美国这个在1776年夏宣布独立的国家面临着诸多对其可行性的严重质疑。

1784年7月5日星期一早上4点，杰斐逊与帕茜以及詹姆斯·海明斯一

同乘坐“谷物女神”号巡洋舰离开了波士顿港。一个新世界的人将前往旧世界。



杰斐逊非常欣赏巴黎谷物交易所的穹顶这一建筑艺术上的创新设计。就是在一次来交易所参观时，他邂逅了玛丽亚·科斯韦。

第十八章
浮华的欧陆

比起斗士，懦夫总是更易陷于争执。

——托马斯·杰斐逊

横渡大西洋的船开得很快，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很愉快；帕茜一直对“谷物女神”号上的“好友良伴和……精致的餐桌”念念不忘。杰斐逊回忆道：“整趟航程一直风遂人愿，除了偶尔要闪避浅滩之类，船从未偏离过航向。”

他还未抵达巴黎就已经爱上了法国。从大陆会议时期起，杰斐逊就一直在为美国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而战，现在，赴任欧洲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常有意见认为，客居法国的这段时间是他的革命狂热期。在此期间，他与君主制的仇敌相见恨晚，对法国大革命及其种种过激行为有褒无贬，对其赞赏甚至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他的一些流传最为持久的激进语录就出自这一时期，这些名言往往没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人们总是把这些话单独拿出来考量，而没有将其放在杰斐逊数十年政治、外交和哲学生涯的大背景之下。

不过，应该客观地看待杰斐逊和法国、法国人的关系：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先的政治活动。他下决心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权力平衡，在这一均势下，法国能够帮助美国抵御英国人的贸易威胁和可能的军事威胁。从路易十六和玛丽 - 安托瓦内特旧政权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杰斐逊看待法国的视角一直都是它如何能在世界舞台上帮助美国。

杰斐逊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两个方面：为美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促成商业条约的签订，为美国的贸易和财富铺平并拓展道路。他任由自己的思想漫游、驰骋、翱翔，可在自己肩负的主要职责——增进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他始终心思专注、头脑清醒。国家只有表现出强大、团结的姿态才能赢得尊敬，为此，他竭力向世人展现美国的力量和团结，这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需要。他一心致力于在巴黎引导美国展现国家实力，正如他在安纳波利斯所做的一样。

在穿越大西洋途中，杰斐逊安排“谷物女神”号的船长将欧洲的野猫、兔子和鹧鸪运给在弗吉尼亚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饲养和育种”。他还订购了斯蒂尔顿奶酪和波特啤酒，送给他的连襟。

经过19天的航程，“谷物女神”号在临近法国海岸时遇上了杰斐逊所

谓的“浓重阴霾天气”。船程的最后几天里，帕茜突然发起了高烧。杰斐逊陪着她在怀特岛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才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杰斐逊一行于1784年7月31日星期六抵达勒阿弗尔。从这个港口到首都的行程令人沉醉。杰斐逊写道，他们一路骑行，“穿行乡间，再没有比这里更肥沃、更精耕细作的土地”。等到他于8月6日星期五到达巴黎时，他与这个被他称为“世界上最可亲的国家”的恋情已经在心里生根萌芽，而且持续终生。

在法国期间，杰斐逊就鲸油和烟草贸易达成了协议，为美国的生产者争取权益。他对法国在南太平洋的一次远征充满警惕，担心这是法国试图在太平洋沿岸建立影响力的举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曾希望这场动乱能够促使法国购买更多美国的出口商品，尤其是食品；他还希望法国能够为美国的商船开放法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圣多明戈。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和巴黎维持一种对伦敦的制约关系。眼前看不尽的是华裙美服，耳边听不尽的是夸夸其谈，杰斐逊却始终不曾忘记，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各帝国列强激烈相争的世界上，保护和促进共和制的美国。

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曾建议杰斐逊拜访那些重要人物。“一定记得请富兰克林先生把你介绍给拉·罗什富科公爵。他是所有公爵中的明珠，为人侠义，还是个出类拔萃的化学家。他的家宅是能人异士经常聚会的场所。”意大利博学家菲利普·马泽伊就法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向杰斐逊提供了不乏详情细节的描述。（举例来说：“美国人欠德·拉·沃居庸公爵一个大恩情，让他了解到美国人都对他感恩戴德是大有好处的。”）杰斐逊结交的朋友之一是德·孔多塞侯爵，这位侯爵相信美法两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其中的观点和潘恩的一样，对眼前的可能性充满了憧憬。“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正临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启蒙运动的现状确保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杰斐逊先是在黎塞留街落脚，后来又搬到了小奥古斯丁街的奥尔良府。帕茜寄宿于她在潘塞梦皇家修道院的新学校，杰斐逊特地为她定做了在巴黎人看来时髦得体的新衣服。到了10月中旬，杰斐逊再一次搬家，这次是搬到泰特布路一栋叫作朗德龙府的宅邸，租金要4 000里弗尔一年。美酒、家具、音乐、骏马，还有细麻织品，这一切花光了杰斐逊的收入。“为了家具、衣服和马车……我不得不提前支用我的薪水，而且可能永远都还不上。”杰斐逊在给门罗的信中写道，“希望你能够尽可能谨慎地帮我处理此事，因为我知道国会对此十分敏感。我宁可破产，也不愿失去他们的尊敬。”

在巴黎，他与同样身为美国外交官的约翰·亚当斯会合了。这个时候，阿比盖尔·亚当斯已经来到巴黎和她的丈夫同住，他们在奥特伊区有一栋漂亮的房子。阿比盖尔觉得杰斐逊魅力十足。她写道：“我丈夫的同事杰斐逊先生是个出众的男人。”亚当斯夫妇的女儿纳比认为杰斐逊是“最亲切的人”，而杰斐逊和他们的儿子约翰·昆西更建立起非常亲密的

友谊。约翰·亚当斯后来评论道，那段时间，这位年轻人更像是“你的儿子，而不是我的”。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期间的巴黎正在飞速发展当中。他写道，巴黎“每天都在扩张，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美丽”。住宅、剧院纷纷拔地而起，包税人城墙（确保对所有进入巴黎的货物征收税款的壁垒）修好了，同时兴建的还有近50栋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关税大楼。一个类似于城市购物中心的建筑群皇家宫殿在1784年开幕。这里饭店、赌坊、投注站应有尽有，而且（到了晚上）还有数量可观的娼妓。1784年正是杰斐逊到达巴黎的这一年，皇家宫殿欢乐喧嚣的气氛令他深受感染。他认为它是“这座城市主要的亮点”之一，还说里士满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市集。

流连于法国首都，以及后来徜徉于风景醉人的法国南部，杰斐逊学到了他所能学到的一切，关于建筑、艺术、戏剧、音乐、文学、佳肴、美酒，还有这个“伟大、善良”的国度的人民。杰斐逊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问起任何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愿意居住在世界上哪个国度？”他说第一个答案，会是自己的祖国。但是第二个答案？法国，理所当然，一定是法国。

就在杰斐逊致力于向世人明白无误地展示，美国的力量已经足以在外交和贸易政策方面与欧洲列强相抗衡的时候，他在地中海遭遇了一场危机。为此他竭力主张美国采取行动，甚至不惜动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

当时的巴巴里诸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威胁到了美国的贸易安全。巴巴里诸国被视为完全不讲信誉的国家，要求西方各国进贡以免受海盗的侵袭。（当时有一本书《地理：或对世界的描述》，书中写道：“这些国家以对基督教的敌视和主要集中于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行径闻名于世。基督教列强中只要有不向它们屈辱进贡的，都会遭到其海盗船的劫掠。”）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这一危险真实存在，它们不得不每年向巴巴里诸国进贡，以确保本国船只的安全。

杰斐逊一直在暗中调查，其他国家到底付了多少贡金，才“买来了它们的平安”。他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写道，没人愿意告诉他，“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知数目不菲”——每年10万～30万美元。“我们国家决不付这笔钱，”他继续写道，“向它们提议签订平等条约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如果它们拒绝，为什么不跟它们开战呢……如果要发展自己的贸易，我们必须建立起海上霸权。以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缘由，选择这样一个相对孱弱的对手，不正是我们开创这一事业的大好时机吗？”

就在这时，摩洛哥皇帝俘获了一艘美国船只。杰斐逊再次疾呼以战争回应，他对门罗说：“眼下欧洲各国对我们毫无敬意，这势必会带来羞辱，而我们只能以开战回应。”他还认为，在巴巴里诸国对美利坚的敌意背后，是英国人在耍弄诡计：“这些行动是在伦敦密谋策划的，好以此为借口向我们的船只索取高昂的海险保费。”

众所周知，杰斐逊认为英国是永恒的威胁。“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福祉着想，必须远离英国。”卢塞恩写道，“正因此，在这一体系下，与法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至关重要。”

杰斐逊还担心英国人正巧妙地利用报章舆论损害美国在欧洲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他亲自执笔投稿。在给荷兰一家报纸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杰斐逊杜撰出了一个法国军官，借这个军官之口发表亲美的观点，以抵御英国人的政治宣传。杰斐逊以这个军官的口吻写道：“我（为美国）打过仗、流过血，因为我认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可是，回到法国之后，这个“法国人”却发现朋友们“纷纷表示惋惜……如此顺应天意的一场战争如今结出的都是苦果”。杰斐逊笔下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这些善良的民众为什么会有如此错误的认识？

杰斐逊接着就把预设的答案摆了出来。他写道，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英国人的报纸。“自从承认美国的独立以来，欧洲对大洋彼岸的境况一无所知，唯一的渠道只能是英国人的报纸。”他说，“但是这些报纸的报道都受到两个主导动机的支配：其一，阻止独立未遂而引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其二，害怕他们的人民都移居美国而使国家变成空岛。”

这篇文章于1784年12月分两期登载在了《莱顿公报》上。杰斐逊懂得他那个时代的媒体的运作法则，他发表这封信是精心算计过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得心应手的方式攻击敌人，改变公众的看法。

杰斐逊写信告诉弗朗西斯·埃普斯，他给埃普斯和自己的另一位连襟亨利·斯基普威思送去了成桶的白兰地（亨利娶了他已故妻子的一个姊妹），并且还计划从波尔多地区为埃普斯订购红葡萄酒。他也有自己惦念的美食：“如果有船从詹姆斯河开来勒阿弗尔的话，别忘了给我捎上一两打蒙蒂塞洛的火腿啊。”

1785年1月，从埃平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杰斐逊年仅两岁的女儿露西因为罹患百日咳过世了。这种病“发作起来剧咳不止，像是要窒息一般……而且咳嗽是一阵一阵的，最后通常都要咳到呕吐为止。此外，它还会传染给其他人”。埃普斯夫妇也失去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埃普斯在信中写道：“蒙此不幸，言语无法描述我内心的痛苦。一场可怕的百日咳夺走了我们两家的两个女儿，两个可爱的露西，她们的病故前后相隔还不到7天。我家的露西先走……她不停地剧烈咳嗽，咳得全身都抽搐起来，撑了一个星期便去了。你的可爱天使卧床了一个星期，尽管也受了很多苦，好在没有剧烈发作。她的意识一直都很清楚，临去前还清楚地叫我，说她想要喝水……得了这样的重病，无法想象如何忍受。”

还是她的丈夫弗朗西斯·埃普斯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了杰斐逊。他说，两个露西“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从没见过还有哪个与她们同龄的孩子遭这样的罪……医药根本无能为力”。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可以从他问候二女儿波莉的话中看得出来：“代我向埃普斯夫人转达深切的慰问。请她为我吻一下我最最亲爱的女儿波莉。噢！我多想自己能够吻

一下她呀！”

露西的死对处在困难关头的杰斐逊来说是雪上加霜。“杰斐逊先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女儿纳比·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孩子（露西）出生的时候，他的妻子过世了，他为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度离群索居。现在这个消息对他的打击相当大。”

冬天到了，杰斐逊开始厌恶起巴黎的潮湿。“看看我吧，终于来到了浮华的欧陆！”他在1785年写道，“在这里，我发现人类的命运只能说是可悲可叹。伏尔泰话中的真理永不过时，这里的每个人不为刀俎，便为鱼肉。”尽管杰斐逊深深地喜爱法国，但旅居国外让他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写信给门罗说：“上帝啊！我的同胞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承认我之前也跟他们一样。”这是拥护共和的杰斐逊——一位政治哲学家——发出的肺腑之言。他拒绝相信，也许有一天美国会和旧世界的众多国家一样，走上君主专制、神权至上和贪污腐败的道路。

一直等到来年春天，杰斐逊的情绪才有所好转。5月初，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个人决定：要想办法让一家人团聚。他每天都要散步6~8英里，好让自己不去触及心中的哀痛。露西已经不在了，他这时迫切地希望波莉能够到巴黎来，跟他和帕茜在一起。他在1785年5月给弗朗西斯·埃普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必须让波莉也到巴黎来。4月1日到9月不宜航行，这让我们有时间考虑周详——能在弗吉尼亚雇个妇人陪同她一起过来吗？”

美英两国本就不睦，现在关系更是每况愈下。约翰·亚当斯获任驻英大使，他和阿比盖尔·亚当斯从巴黎移居伦敦。在伦敦，阿比盖尔十分想念杰斐逊。她于1785年6月写信给杰斐逊：“我想我好像在哪儿听人说过，不管是谁离开巴黎，或多或少都要感到愁闷。我承认，我极不情愿扔下我在巴黎的花园，它无可取代。更糟糕的是，我不得不中断与一位可敬的朋友日益深厚的友谊，只有在这位朋友面前我才能兴之所至，无话不谈。他不必担心自己的位置在这里被别人取代。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来到英国。”

杰斐逊成为唯一的美国驻法使节。他在给一位英国记者的信中谈道：“我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怨愤情绪正在发酵，或者倒不如说，这种情绪正是受到你们国家的感染。只有上帝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不是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正如两个热恋的情人不会懂得什么叫适可而止。”

杰斐逊认识到，如同情人或密友关系一样，敌对和疏远也没有中间地带。处在热恋之中，或者热恋过，再想成为普通朋友根本不可能。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各奔东西，因为感情一旦冷却，让它保持余温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性往往倾向于再度全力燃起激情的火焰，或是干脆放弃这段感情，把它永远冰冻起来。总有一天，美国和英国必

须做出抉择：是做永远的敌人，还是永远的爱人。

对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内活动的担忧从未消散过。约翰·杰伊在1785年7月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有情报显示（尽管情报的来源不是百分百可靠，但很多人都相信确有其事），英国人正通过提供免费的粮食、农具等，诱使我们的人民在我们的疆界内定居，但接受他们政府的保护。”

拉尔夫·伊泽德是一位参加过大陆会议的前外交官，他从南卡罗来纳州给杰斐逊写来的信使杰斐逊更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对美国命运感到的忧虑。“据说英国人在背后怂恿海盗国家攻击我们的船只。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我赞同和英国开战，而不是去打阿尔及利亚。”伊泽德写道，“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使我国没办法跟任何一国打仗……在现任政府下，美国的收入尚不足以抵偿国债。我们拿什么钱支持战争呢？”

伊泽德纵览大局，其中也包括他认识到了美国的政客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我们的国家一味追求民主。一个手艺人都知道，想要学到手艺，得从学徒做起。可是我们那些偏远乡下的同胞却认为，政治家和诗人一样都是天生的。”

和写诗一样，从事政治确有一部分要靠灵感，但它同时也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技艺。这一点伊泽德说得很清楚，杰斐逊心里也很明白。这个他在威廉斯堡时期就已经学到的经验教训，现在在一洋之隔的欧洲大陆同样令他大受裨益。

第十九章
知识的世界

能否劳烦您为我觅得一副鹿角，越大越好？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阿奇博尔德·卡里的信

杰斐逊发现，在法国购物真是太棒了。他不断购买银器、瓷器和佳酿。他对新发明磷光火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买了3打送给在美国的朋友。他还自掏腰包观看歌剧、意大利式喜剧，偶尔还参加在杜伊勒里宫的大剧院举行的圣灵音乐会（杰斐逊初次参加这一音乐会时有幸聆听过韩德尔作曲的一支歌）。他在巴黎居住的5年内，总共购入了60多幅画作，其中很多是肖像，或者以宗教为主题。值得一提的有：一幅《浪子》、一幅《德谟克利特与赫拉克利特》、一幅《圣彼得的哭泣》、一幅《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忏悔》，以及一幅《希罗底手持施洗约翰的头颅》。

杰斐逊曾经两次参加过在巴黎歌剧院举办的化装舞会。舞会晚上11点开始，要到次日早晨6点才结束。（有一次，他和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史密斯成为一位放浪的男爵夫人追逐的目标。史密斯叙述道："杰斐逊落荒而逃之后，这位夫人就把她的利爪伸向了我。"）每星期二是大使日，杰斐逊照例要到凡尔赛宫觐见。他也常到帕茜寄读的潘塞梦皇家修道院看望女儿。这个修道院由西多教团的修女主持。他在写给一个身在弗吉尼亚的妹妹的信中说："这所学校提供的教育可以说是法国最好的，这里的教师也是最优秀的。"

他曾试过和巴黎人下棋，结果发现他们的棋艺远在他之上。他初到巴黎时，曾受邀加入过皇家宫殿的象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上层人士。他的一个外孙女回忆道："我曾听他说过，他刚到巴黎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象棋俱乐部，结果马上就被打败了，而且是转瞬就一败涂地，结果他彻底放弃了与人对弈。"他这个人不喜欢输的滋味。

杰斐逊一心想要结交巴黎这座城市的知识圈子的成员。1785年6月，他前往萨努瓦拜访德·乌德托伯爵夫人，寄望这趟行程"为我打开大门，与围绕在伯爵夫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交上朋友"。杰斐逊在那里听到了一只夜莺的鸣啭，并就此评论道："尽管它的歌声几近完美，但我仍要毫不犹豫地宣称，若是放在美国，夜莺只能屈居季军。毋庸置疑，我们国家的嘲鸫和狐色鸫的歌声要比它动听得多。"

对于欧洲文化和政治正反两面的矛盾，杰斐逊始终态度暧昧。旅居国外时，他不知疲倦地倡导美国的事物；回到美国国内，他又不遗余力

地宣扬欧洲的事物。他就这样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向新世界传达旧世界的精粹，又向旧世界介绍新世界的裨益，他自觉扮演起中间人和公断者的角色。从政治理念到伦巴第杨树，从建筑风格到意大利面食，杰斐逊把自己置于这场跨大西洋对话的中心——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祖国效力。

他到处寻访最优秀的艺术家。弗吉尼亚的官员交给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项神圣的使命：委托创作一尊华盛顿雕像，陈列在弗吉尼亚新州府里士满。杰斐逊为此找到了最佳的人选——乌东。杰斐逊视他为同时代最伟大的雕塑家。他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说，乌东想要前来美国“面见您，以便创作这座半身像”。

杰斐逊能对获得的任何一点儿知识都加以利用。1785年8月，他写信给约翰·杰伊：“国会想必有兴趣知道，这里的火枪制造技术出现了新的进展。每个零件都按照完全一样的规格生产，从而使得属于某支火枪的部件，可以用在军械库中其他任何一支火枪上面。”他还要求乔治·华盛顿“讲讲布什内尔在战争期间的潜水艇航行试验，不管记得多少都行。还有，你认为他的方法能够成功摧毁战船吗？”他给约翰·杰伊寄去了有关法国海军的文件资料，因为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想要”建立一支海军部队。

布丰伯爵认为相较欧洲来说，美洲的动物都是次等的，杰斐逊花了大力气想要说服他情况并非如此。他托阿奇博尔德·卡里为他觅得一对雄鹿的鹿角：他打算拿着这个本土实例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杰斐逊到访过一所盲人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他自己还有一本有关教授聋哑人的书）。他和杰出的法国政治家和植物学家马勒塞布也有往来：他用美国的坚果和浆果跟马勒塞布交换法国的葡萄藤植物。他还对美国探险家约翰·莱迪亚德的计划表示大力支持。莱迪亚德当时人在巴黎，他称杰斐逊为“我的兄弟”。莱迪亚德正计划一次远征，从西伯利亚出发，到堪察加半岛，再从那里到北美洲，到大西洋。

杰斐逊所处的位置得天独厚。1785年4月，詹姆斯·麦迪逊牧师从威廉斯堡给他写信：“了解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不过，您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祖国人民对信息的渴望可见一斑。麦迪逊在这封信的附笔中还说：“罗尚神父就他在光学方面的新发现有无再发表过文章？其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水晶的比重具体是多少？它和其他水晶石有什么不同？”杰斐逊十分高兴地一一解答了他的问题。

为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购物也是杰斐逊的一大乐趣。他买了一件罗马神话中战神玛尔斯的瓷器小摆设，并且和之前买的智慧女神密涅瓦、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太阳和音乐之神阿波罗凑成一套，要送给阿比盖尔：“我想，这些摆设放在美国大使驻伦敦宅邸的桌上再合适不过了。英国人都不免要瞧一瞧，并且领会到，尽管智慧是我们的向导，音乐和狩猎带给我们至上的欢乐，但我们同样崇拜战神。这个守护神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诞生，接受了我们的献祭，捍卫公义，打抱不平。”（遗憾

的是，这些小瓷器在运往伦敦的途中打碎了。）有一次，他还受托给亚当斯夫妇的女儿阿比盖尔·史密斯寄去紧身褡。“他希望衣服合身，”杰斐逊在信中以“他”自称，“史密斯夫人未能将她的尺码相告……如果衣服太小了，不妨摆上一段时间。要知道世事仿如潮汐，有起也会有落。”为了报答杰斐逊的好意，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请人在英国为杰斐逊裁衣做鞋。

1785年9月，他写信告诉阿比盖尔·亚当斯：“我终于找到了一处房子，比起眼下住的地方，要合意得多。”这栋房子是朗雅克府，就在香榭丽舍大道和贝里街的拐角。他在1787年给尼古拉斯·刘易斯的信中提道：“我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玉米，这样可以供应自家的餐点，吃上自家的蔬菜。”

园艺维系着他与遥远祖国的感情纽带。“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不再能够轻易适应新的礼仪和新的生活方式了：我仍怀有原始的性情，喜欢森林，喜欢荒野，喜欢蒙蒂塞洛自给自足的生活，更胜过这个花花之都五光十色的欢愉享乐。”

不过，他实在称不上是一个野蛮人。1788年，一位在伦敦研读法律的年轻的美国学生托马斯·希彭前来巴黎拜会杰斐逊，他后来写道：“我发现，尽管在满屋子的人当中，杰斐逊先生衣着最为朴素，身上挂的绶带和勋章最少，但他总是所有外交使节当中最获追捧、最受殷勤招待的，即使是那些朝臣也不例外。”

他的公务活动开展得游刃有余。1785年，拉法耶特从巴黎写信给马里兰州医生和政治家詹姆斯·麦克亨利，信中这样说：“他简直就是公正诚实、开明睿智的化身。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尊敬他、喜爱他。”在1787年发表的一篇随笔中，意大利路易吉·卡斯蒂格利奥尼伯爵写道：“杰斐逊先生年约五十，身材瘦削，看上去严肃谦逊。初见之下，他杰出的才华并不显目。但是，只要和他聊起他自认有所涉猎的各类话题，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见识高卓，心思敏锐。”

杰斐逊总是能够对他周围的世界迅速地做出判断和评估，对政治、科学、社交都是如此。他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描述他在法国的那些年里巴黎人的生活，从这些描述中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上述能力。他生动地勾勒出“巴黎空虚的熙攘喧闹”背后日常的琐碎：

> 上午11点，一位巴黎贵妇的一天开始了。窗帘拉开，她把头发捋得略像点儿样子，便半倚在靠垫和枕头上，读读信件便笺，了解一下亲朋好友的安康。接下来，她给一些相识之人写写信，然后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客人不多，她还可以出去走走，在皇家宫殿的花园和店铺间闲逛。不过她得抓紧时间，因为该做头发了，这时间可就长了！能赶得上吃饭已经是谢天谢地！饭后犯懒消食一阵，她便忙不迭地穿街走巷，访亲拜友，这大概要花上半个钟头。

之后是去剧院看戏，看完之后又再花上半个钟头的时间进出密友的家，便可以吃晚餐了。吃完晚餐便是打牌，打完牌便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中午起身，像拉磨的马一样，再把头一天的路线跑上一遍。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消磨，除了眼前的事物之外看不到任何目标：永远都在想办法躲避无聊……永远都在追求快乐，都总差一步。如果死亡或者破产打破了这个轮回，那也不过是晚上多了一个闲聊的话题，到了第二天早晨便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杰斐逊对法国人日常文化的看法。他在政治上也存在担忧，忧虑法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的。他在1786年2月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欧洲的政治现实要求我们，在一切对外事务上，都务必作为一个国家主权，坚定地保持一致。还必须牢记：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赢得尊重，便会招来羞辱，引发战争。"（他还向麦迪逊索要"一两百个美洲山核桃果。这样我便能够满足这里一些重要人物的愿望，而我也不胜乐意这样做"。）

在国内，麦迪逊在中央政府的权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他和杰斐逊两人共同忧虑的问题。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贸易相关问题。大会结束时，召开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呼吁被提了出来。尽管进展缓慢，但实有成效。首先，各州必须同意派代表参加会议；其次，这些代表须拟订一个方案；最后，这个方案务必在各州批准通过。麦迪逊说："我几乎对成功感到害怕。"

在法国期间，杰斐逊开始思考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个能够擦出思想火花的同伴讨论这些问题：1787年仲夏，托马斯·潘恩来到巴黎拜访杰斐逊。

潘恩是个紧身褡裁缝的儿子，1737年出生在英格兰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镇。潘恩从小在宗教思想冲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贵格会信徒，母亲却是一个英国国教会律师的女儿。潘恩幼时受洗于英国国教会，但有时也参加贵格会的集会。

1776年，潘恩撰写的小册子《常识》销售超过50万册，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随后，他又分别于1791年发表抨击君主制的《人的权利》，于1794～1795年发表反对有组织宗教的《理性时代》。他言辞激昂，笔调铿锵，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潘恩和杰斐逊成为朋友，并且长期保持通信往来。他们对未来怀有共同的愿景：一个开明的新世界。不过杰斐逊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点：为了纯粹的理想而牺牲实在的进步，不愿做出任何妥协，是有勇无谋的莽夫所为。

约翰·亚当斯希望杰斐逊能够来伦敦。他当时和来自的黎波里的大使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气氛友好，双方头上裹着穆斯林头巾，抽着烟斗，喝着热咖啡。会谈之后，亚当斯相信，有可能和这个地中海强国达成一项协议。他担心，如果协议无法达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多年经营

将受到威胁。他对杰斐逊说，“之前所做的努力、花费的金钱将会全部付诸东流”，并且认为，该地区可能发生一场战事，“战事将持续多年，除非立即采取更多的行动制止”。1786年2月21日星期二，他写信给杰斐逊，要求他前往英格兰一趟。

杰斐逊答应赴约。他对帕茜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甚至不用等她的信寄到伦敦。“给你请一位绘画老师的事等我回来再说，”他告诉她，“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你的琴艺已经大有精进。不用说你也知道，你在任何合宜、有益的方面取得进步都会让我万分高兴。”

就这样，杰斐逊到了伦敦。在一次约翰·辛克莱爵士做东、许多内阁大臣就席的宴会上，他被安排坐在一位克拉克将军旁边，这位将军是个苏格兰人。“他先挑起了美国事务的话头，并且在谈话中告诉我说，如果现在美国向英国议会提出请求，希望重新承认英国为宗主国，将被绝大多数票否决。”

杰斐逊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他说这番话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我认为，席上的宾客同样是这种态度，甚至英国举国上下都可能是这种态度。”在杰斐逊看来，“（伦敦）本届内阁的目标就是大力鼓吹眼下国内的繁荣景象，让国民欢欣雀跃，相信没有了美洲殖民地，英国只有得，没有失。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一点。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表面上，他既没流露出愤怒，也没表现出困惑，其实他是把自己的愤怒掩藏了起来。弗吉尼亚及其后多年的生活历练赋予他一种能力：无论内心多么波涛汹涌，表面都可以表现得波澜不惊。他通常能够娴熟地掌控自己的情绪。杰斐逊的一个朋友曾这样评论道：“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遭遇人生的种种不快时，再没有人比杰斐逊先生更不以为意了。他知道世事不遂意者十之八九，因此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把这一点估算在内。碰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只要在心里默默数到10，便能够一如平常地谈论任何话题。”

在伦敦期间，他和亚当斯觐见了英王，结果却发现，“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对亚当斯先生和我本人的接见无礼至极”。不管人们对杰斐逊做何评价，没有人会说他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因此英王和王后极不友好的态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两位觐见者给汉诺威王朝带来了极大的羞辱——更验证了杰斐逊对世袭权力一贯以来的看法。

他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对美国的恶意攻击令他深感震惊。杰斐逊对阿比盖尔·亚当斯这样评论道：“根据这些报纸的报道，美国到处充斥着种种人类最可怕的罪行：暗杀、自杀、偷盗、抢劫。而比暗杀、自杀、偷盗和抢劫更糟的，是最恶毒的污蔑！”他向阿比盖尔交心地讲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职位我恐怕难以胜任。我不喜欢困难，我喜欢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尽我自己的职责。污蔑和诽谤会扰乱我的心绪，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位。这些是我的弱点。而亚当斯先生依靠理智的头脑

和您的协助能够幸运地克服它们。”

在杰斐逊返回法国之前，他和亚当斯决定花上几天的时间参观英国的园林。于是两个人便一起旅行，一边热烈亲密地交谈，一边赞叹不已地欣赏园艺大师的鬼斧神工，这些大师凭借极具创造性的想象力，将工匠的巧思与天然的谐趣浑然融为一体。

回到巴黎之后，杰斐逊开始操心起把波莉从弗吉尼亚带来法国留在自己身边的种种事宜。他写信给弗朗西斯·埃普斯：“我在这件事上焦虑不安，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细节。幸好你和埃普斯夫人办事稳妥周到，免去了我不少烦扰。请埃普斯夫人代我亲吻我亲爱的女儿波莉，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她。”

结果他收到了一封简短的来信，信里面只有一句话：“亲爱的爸爸，我想要见你和帕茜姐姐，但你得到埃普斯姨父家来。”

杰斐逊不得不和一个7岁的小孩子讲道理；他写信给波莉说：“我非常想见你，因此希望姨父和姨妈能够把你送到我身边来。我亲爱的波莉，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姨父、姨妈，还有你的表兄、表姐，可是你姐姐和我不能没有你……你到了法国之后，会有老师教你弹琴、绘画、跳舞和法文，还能学会许多其他的东西，你的朋友一定会更加爱你，并且为你骄傲。最重要的是，只有来到我们的身边，受到我们的关爱，你才会更加爱我们；如果你和我们远隔重洋，你对我们的爱便不会那么深切。”

在黑暗的时期，查尔斯·汤姆森给他写来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的乐观情绪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信里写道：“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全世界再没有哪一国的人民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更加快乐，更加迅速地取得进步。人口在增长，新的房子建造起来，新的土地开拓出来，新的定居点和工厂不断涌现，其速度之快，简直超乎想象。”

这正是杰斐逊所希望看到的。

第二十章
头脑和心灵

我的朋友，我们并非永生不死，又怎能要求快乐永驻？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

——托马斯·杰斐逊

一位与她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她“身上流着英意两种血统，一头金发，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体态婀娜……多才多艺，尤其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玛丽亚·科斯韦，本名玛丽亚·路易莎·凯瑟琳·塞西莉亚·哈德菲尔德，1759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她比杰斐逊年轻16岁。她的父亲是个旅居海外的英国商人，在意大利经营一家很受欢迎的旅馆。历史学家海伦·杜普雷·布洛克曾详细记叙了玛丽亚·科斯韦的生平。据她所述，这个年轻的女孩从小家境富裕，深受艺术和宗教的影响。她年幼时差点命丧乳母之手，这个乳母在此之前已经杀死了哈德菲尔德家的4个孩子，因为她深信，自己是把这些孩子仁慈地送回上帝的怀抱。幸好有人听到她对玛丽亚说，“小可爱，我已经把4个孩子送往天国，我也要把你送去”，于是及时制止，才避免了又一出悲剧的发生。在此之后，玛丽亚被送到修道院接受教育，一面深造视觉艺术（她于1778年获准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一面为教会服务（她是圣母往见修道院的管风琴手）。

年轻漂亮的玛丽亚后来前往伦敦，进入了流光溢彩的伦敦社交圈。当时活跃在这个圈子里的，有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画家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和安杰莉卡·考夫曼，以及收藏家查尔斯·汤利。她遇到了理查德·科斯韦，一个行为古怪但富有魅力且非常成功的微型图画画家。后来两人结了婚。有人这样形容科斯韦：他是个“身材匀称的小个子”，只可惜“脸长得像只猴子”。科斯韦个性张扬，雄心勃勃，受到威尔士亲王的赏识，而他在蓓尔美尔街的住所也成为伦敦的时髦沙龙。古董收藏家约翰·托马斯·史密斯描述道：“他把自己的新宅装潢得如画卷一般，而且奢华堪比王侯。没让画家把每个房间都描画下来真是太可惜了。这里的许多房间不像是居住场所，倒像是诗人幻想着施了魔法所勾勒出来的。”家具镂花镀金，上面覆着“最昂贵的热那亚丝绒”；象牙雕的橱柜；镶嵌的桌子，四足都刻成雄狮或老鹰的形态；玳瑁壳和金色铜制成的巨大音乐钟滴答作响；“古代……日本”的屏风下铺着波斯地毯。

对科斯韦夫妇的影响力，学者威廉·霍华德·亚当斯详细搜集过当时人们的评价。其中英国文人威廉·黑兹利特曾这样写道：科斯韦夫妇“有点儿像是一对搭档，他们持家的做派如此特立独行，令他们的新邻居都感到惊奇……于是成为城中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有一次，在科斯韦

夫妇举行的一个派对上，作家兼政治家贺拉斯·沃波尔曾看到德·埃翁骑士当场教宾客击剑。这位骑士平时着女装，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异装癖者、外交家和间谍。皮埃尔–弗朗索瓦·于格，杰斐逊通过科斯韦夫妇结交的一位友人，曾为两部情色作品《十二位恺撒私人生活纪》和《罗马贵妇私密仪式纪》绘制插图。

1786年夏末，于格和科斯韦夫妇在巴黎结识了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其后又经由他介绍，认识了美国驻法大使。

杰斐逊当时的心情好极了。他正在做自己最热衷的事情：一趟悠闲自得、目的崇高，而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巴黎寻访之旅。他在巴黎穿街走巷，探索建筑艺术，希望能够将欧洲最卓绝的建筑创新用于美国的建设。

杰斐逊同特朗布尔一道前往拜访建筑师雅克–纪尧姆·勒格朗和雅克·莫利诺斯，这两位建筑师设计了巴黎谷物交易所的穹顶。穹顶采用木制排骨架结构，排骨架间镶嵌玻璃，阳光透过玻璃，产生令人惊叹的采光效果。杰斐逊认为它是“地球上最精美的事物”，并且急着想要了解更多，于是便有了到圣弗洛伦廷街6号的这次拜会。在这里，杰斐逊和特朗布尔遇见了科斯韦夫妇。

玛丽亚当时27岁，她的美貌令时年43岁的杰斐逊一见倾心。她娇艳丰厚的双唇、熠熠生辉的紫罗兰色眼睛、梳着时髦发型的一头金发，这一切似乎即刻就点燃了杰斐逊对她的热恋。可以说，他陷入了那双迷人眼睛的深潭里，几乎一个月都没有浮上水面呼吸。

他一心只想着和玛丽亚做伴，其他的一切都顾不上了。那天杰斐逊本来已经有了应酬，答应要到罗什富科公爵夫人府上做客。现在他只好编造借口——不过编得并不太高明——派人向公爵夫人传话，有外交公文送到，“需要立即处理”。他的同伴也都加入这场“阴谋”中来。杰斐逊写道：“每个人当天都有约在身，可是为了能够一起进餐，大家都牺牲了自己的应酬。”

这一天过得近乎完美。玛丽亚虽然会说多种语言，可她的英语并不太流利，这或许倒为杰斐逊和她的交谈更增添了异国情调和迷人魅力。杰斐逊、科斯韦夫妇和特朗布尔一起在圣克卢用餐，观赏了一场焰火表演，又前往拜会了作曲家兼竖琴演奏家约翰·巴普蒂斯特·克伦普霍尔茨。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不过，对杰斐逊和玛丽亚来说，他们虽然短暂但炽烈的恋曲才刚刚开场而已。在这段时间里，杰斐逊举手投足间都表现得像个坠入爱河的人。理查德·科斯韦可能察觉到了，也可能没有；即便他察觉到了，也很难说他真的在意。在科斯韦夫妇的圈子中，调情甚至更有过之的，都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杰斐逊自己的圈子中，这种事也算不上什么新闻。追求得不到的人，这样的事在他来说并不是头一遭，贝琪·沃克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1786年初秋的这段时间，是他第一次能够大胆展开一段恋情，而几乎不必担心受到周围人的指摘。杰斐逊面临的唯一危险在于：如果詹姆斯·博斯韦尔所言属实，那么玛丽亚“对待男人就像对待狗一样”。

他愿意冒这个险。日子一天天从指间溜走，不知不觉中，8月过去，9月来临，巴黎完全成了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从圣日耳曼到讷伊大桥，从塞纳河两岸的山丘到许多僻静的精巧园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杰斐逊觉得“每一刻都令人感到愉悦”。两人都很喜欢到处游览。巴加泰勒堡是一栋新古典主义穹顶建筑，由国王的弟弟德·阿图瓦公爵修建。黑兹花园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园林，园中有一栋建在古典石柱之上的4层花房，由弗朗索瓦·拉辛·德·蒙维尔建造，（“石柱的主意是多么了不起啊！”杰斐逊感叹道，“螺旋楼梯也美极了。”）杰斐逊和玛丽亚身处无人打扰的世界。“时光之轮转动的速度是马车的车轮无法想象的，”他说，“可是，到了晚上，回想起一天的光景，我们有多少快乐啊！”

这期间有一次，杰斐逊的右手手腕脱臼了。他神神秘秘地不愿吐露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伤。（1786年10月，他写信给威廉·史密斯说：“完全是一个低级的愚蠢错误。”）这个小插曲——可能是充好汉翻越围栏导致的——发生在9月18日当天或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在1786年9月11日美国国内各州的代表召开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几天。

在他休养期间，玛丽亚给他写来了信：“出于私心我希望……能够在席间为您服务，给您帮忙，并在餐后演奏音乐，分散您的注意力，使您不致感到过分疼痛。”

杰斐逊对自己手伤的疼痛程度毫不掩饰。“手腕的疼痛让我一夜没能合眼，”杰斐逊给玛丽亚写信道，“因此我感到万分遗憾，不得不推却您迷人的陪伴。我已经派人去请一位医生来，看看伤情变化是什么原因。希望只是昨天乘坐马车时路面颠簸所致。如果您今天不打算动身，那我还有机会再见到您；如果您今天便要离开，不管您去哪里，愿上帝保佑您……告诉我您今天不打算动身吧。”

玛丽亚即将离开巴黎，她立即给杰斐逊写了回信：

> 对造成了您（夜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抱歉……您当时再三坚称说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因为希望有您陪伴，也就没有坚持反对……我会从英格兰给您写信。我无法想象失去您这样一个遂意的朋友在身边的生活。我不想对您多加溢美之词，因为再多的赞美对您来说也是不够的。您的好意我铭记于心，想起我们一起共度的快乐时光，我便满心欢悦。期望来年春天我们能再相聚。

1786年10月9日，约翰·特朗布尔从安特卫普递来一张便笺：“科斯韦夫妇冒雨赶了一夜的路，已于今天凌晨3点抵达。”

他后来在信中告诉她，道别是他“最后一件悲伤的职责”。他于1786年10月12日写了一封剖白心迹的长信。这篇4　000多字的散文（比起一封常规的信，这更像是一篇散文）是这样开头的：“我独自一人坐在炉火边，深感悲伤。我的头脑和心灵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在这篇杰斐逊用左手写下的文章中，他对人性，尤其是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头脑：啊，老友，你这副模样可真妙极了。

心灵：我实在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儿。悲伤浸透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处毛孔，叫我无法承受。我情愿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愿受这情感和恐惧的折磨。

头脑：这便是你的激情和轻率带来的必然后果。你一再引领我们陷入这般困境。的确，你也承认自己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可你仍义无反顾地拥抱它们，珍视它们。你若不知悔改，便无法重生。

心灵：噢，老友！现在不是指摘我缺点的时候。我已被悲伤撕得粉碎！如果你有治伤的良药，请将它敷在我的伤口上；如果没有，也请不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在我如此痛苦的时刻，就放我一马吧！换作其他任何时候，你的批评我都悉心接受。

头脑：恰恰相反。你情场得意的时候从不听从我的劝告；在你遭受痛苦的时候，或许能够认清自己的愚蠢，但一旦不再发作，你便好了伤疤忘了疼。因此良药虽然苦口，劝你服药是我的职责所在……

心灵：老天啊，我绝不相信他们就这样一去不返了！

头脑：希望你能够看清自己是多么鲁莽，将感情毫无保留地投放到很快就会失去的人儿身上，而且失去他们将带给你极大的痛苦。记得最后一个晚上，你得知你的朋友就要离开巴黎。光这一点便足以让你陷入苦恼的深渊。你整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你一再招惹这些痛苦。为了避免我们永受折磨，下次搅扰安宁前，你必得三思而后行。世上的一切事物均经过计算，因此行动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掂量再三。天平的一端放上任何一件事物带来的欢愉，另一端便要放上随之而来的痛苦，看看究竟孰轻孰重。结交新友不可等闲视之，交友的机会出现时，需要全盘考虑。究竟是裨益大，还是烦恼多？不要一口咬上欢愉的鱼饵，除非知道鱼饵后没有锋利的钓钩。生活的艺术是避免痛苦的艺术：谁能成功避过围堵的暗礁浅滩，谁才是出色的领航员。欢愉总是在前方向我们招手，灾祸亦如影随形：在追逐前者的时候，后者往往已将我们绊倒。抵御痛苦最有效的方法是从自身寻找快乐……朋友不幸早逝，或是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觉得像是断了一条臂膀；朋友卧病在床，我们得要照看他，分担他的痛苦；朋友的财富毁于一旦，我们必得解囊相助；朋友痛失儿女、父母或伴侣，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心灵：世上哪有比这更神圣的欢乐：为上帝夺去的好友留下悲痛的眼泪；照看病榻上的好友，为他减轻乏味和痛苦；和倾家荡产的好友一起分享面包！这个世界确实苦难无边，我们必须相互分担沉重的包袱……造化让我们共居一人之身，又让我们统辖不同的领地。头脑啊，你分得科学之地，我则分得道德之壤。倘若需要求取圆的面积，或是绘制彗星的轨道，倘若需要探知哪个拱顶支承最大，哪种固体电阻最小，都得交给你来处理，造化没有赋予我认知科学的能力。同样的，你不会懂得同情、仁慈、感激、正义、爱情和友谊，因为造化没有教会你认知情感，它们都在你的掌控之外，只得交给我来处理。道德对人的快乐至关重要，不能冒险让捉摸不定的头脑担此重任。因此，造化将道德的基础立于情感，而非科学。她将科学赋予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需要；情感则只赋予少数人，因为少数人拥有已足够。我知道你装作掌握了至高权力，能够操控我们的一切行为，有时你庄重的格言和警句令我肃然起敬，我想要做正确的事，因此听从你的劝告……可是如果刺刀威逼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做出不义之举，这时主宰的是头脑而不是心灵，那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高高挂在哈曼的绞架上[9]。你忙着计算财富、比较数字，我们则不惜抛洒温热的鲜血。我们倚靠一腔热情抵抗物质，顾不得自身的性命安危，拯救国家于存亡之际。这同时也是顺应天命，因为上天的旨意是永远要做正确的事，剩下的都交给她来裁夺。长话短说，我的朋友，记忆所及，你的建议从来只会让我作恶，而非行善。因此，我郑重禁止你插手我的一切事务。随你在白纸上画多少三角形和正方形，随你如何摆弄它们……我的朋友，我们并非永生不死，又怎能要求快乐永驻？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这是我们生存的法则，我们必须遵从。

那么，最后到底哪一方取得了胜利呢？头脑还是心灵？杰斐逊将最后的话语权和最高的赞美——美国革命的胜利——都赋予心灵，因此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收到信时，这封信的直接收信人倒不知道该怎样应答才好。玛丽亚写信给杰斐逊道：“您的来信得容我细细思虑一番，每个字都要体味一个小时，每一句都可以写成一本鸿篇巨制。”由于她英文不佳，信里接下来的内容都是些文辞不通的话。他们的友好通信往来断断续续保持了终生。

杰斐逊的信是他就相互冲突的人性问题最丰富的文学阐释。他将这些人性的冲动归类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虽有用但太过简单化了。比如，心灵既可以为情感所驱使，也可以为欲望所驱动，或是两者的结合。他对玛丽亚的情感是出自他的灵魂，还是激素，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出自两者的结合？即使对杰斐逊本人来说，答案也并非清晰可见。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杰斐逊有深刻的自我认识，知道生活中存在

无法调和的矛盾，他心怀希望对待生活的危机，同时也认识到，心碎、失败、失望和死亡永远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他笔下的这句话出自他的心灵，而非头脑。“这是我们生存的法则，我们必须遵从。”杰斐逊相信未来会比过去更加美好。他深知最有意义的生活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也懂得痛苦是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而必付出的代价。

[9] 哈曼：《圣经》故事人物，企图灭绝波斯帝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阴谋败露后被悬于75英尺高的木架上绞死。——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因此，应该珍视吾国人民的精神，悉心培育他们关切国事之心。不要太过苛责他们的错误，应该教导他们改正。

——托马斯·杰斐逊

法兰西债台高筑，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其在美国革命中的军费支出，路易十六的波旁政府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再加上饥荒肆虐，财富又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民众的怒火越发不可抑制。杰斐逊对普通法国人的贫困状况深感震惊；帕茜一直都忘不了他们初到巴黎的时候，乞丐把马车团团围住的情景。

君主制和法兰西迎来了空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税赋分摊不均，征收随意。王室的奢靡开支和战争的高昂军费成为两项最沉重的负担。然而，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身上却负担较少，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免税的，相反，平民阶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税赋。因此，社会关系极度紧张，阶级对立持续发酵。在1786年8月给路易十六的一份备忘录中，财政大臣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这样写道："眼下的形势，增税已经没有可能，借贷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削减开支只是杯水车薪。"在卡洛讷的敦促下，国王召开权贵会议——这是150多年来的首次——商讨改革方案。"此事当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1787年1月杰斐逊在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说。不过，杰斐逊并非鲁莽之辈，他在信中提到，解决如此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灵活的对策。

杰斐逊1787年3月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如果他们的提议超出了国民习惯上能够承受的水平，那么就可能遭遇失败，而且这将无限期地阻碍最终目标的达成。"

权贵会议失败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高涨起来——呼吁者包括拉法耶特侯爵。三级会议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在中世纪设立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辅佐君主。此前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召开于1614年。

希望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脚步加快了。一位民主派人士在三级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我们谈论着要为国家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就好像）这是一件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继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狂喜的人们只看到希望，只知道庆祝，几乎不去考虑，在自由的第一根地桩打下之前，在遭到封建君主、特权教士、大行会和旧习俗反对的原则确立之前，我们还有无数的障碍需要克服。"

正当法国人民处于君主专制的水深火热之中时，美国民众却面临完全相反的问题。“我国政府的碌碌无为一天比一天更有甚之，”约翰·杰伊1786年10月给杰斐逊写信说，“国家债务累累，国库空虚，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智慧或是激情带来变革。”

问题在于到底是依靠智慧还是依靠激情。在新英格兰，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个独立战争老兵丹尼尔·谢司领导的团体发动了起义。杰伊告诉杰斐逊：“马萨诸塞眼下法纪败坏。”

1786年11月间，约翰·亚当斯写信给杰斐逊，期望消解他对谢司起义的忧虑。“对最近发生在新英格兰的动荡不必过分担忧，”亚当斯写道，“事情的起因是马萨诸塞州议会过分心急地想要摆脱债务。他们征收了一项新税，结果超出了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不过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经过这场暴乱，政府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杰斐逊松了一口气，他对亚当斯说：“只要大家都理性地处理问题，那就不必担心局势会失去控制。”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人会利用这一时机给美国制造麻烦吗？杰伊写信给杰斐逊说，美国领土上可能有加拿大人的阴谋活动，通过“马萨诸塞的叛乱者和一些加拿大领导人物之间存在的某种默契”。杰伊还担心，英国人可能会利用一种“趁机捣乱的观点”：“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和西部各州的利益是相悖的”，以及“后者的发展将损害前者的利益”。

杰斐逊给在美国的一位记者写了封信，希望能将自己的观点传达到国内。这时的杰斐逊已经不是1783～1784年那个毫无实权的议员了，他采取了一种更温和、更乐观的调子。毫无疑问，比起离美赴法之前，驻法这几年的经历让杰斐逊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加民主。他写道：

> 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来自人民，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自然应该是让人民满意。如果由我来决定，是只要政府不要报纸，还是只要报纸不要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然，前提是每一个国民都能读到这些报纸，而且能够理解其中的内容……不要太过苛责（人民的）错误，应该教导他们改正。如果有一天民众对国是漠不关心，那么你和我、国会、州议会、法官和州长就会变成豺狼虎豹。这似乎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是唯一同类相残的动物。

在1787年1月30日星期二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显示出他对政治的领悟，以及他对施政者与受政者两者性质的深刻理解。

他说，社会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就像印第安人那样”），第二种是“每个人的意愿都有公平影响力”的社会，第三种

则是“强权社会，所有的君主制国家和大多数的共和国都是如此”。杰斐逊接着说，当然可以认为第一种是理想社会，但是在“任何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的存在形式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摒弃了那种人人自由、共同生活在“没有政府”的社会的伊甸园式图景。人类应该致力于建设第二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快乐。当然，它也有其弊端，最主要的是它容易经受动荡。但与君主制的压迫相比，这一点就算不上什么了。”

他说，自由需要耐心、宽容和坚忍。实现共和国的理想非懦弱怕事者所能为。他写信给麦迪逊道：“我倒觉得时不时地来场叛乱不是什么坏事，它之于政治世界就像风暴之于自然世界一样必不可少。”

1787年2月底，杰斐逊离开巴黎，独自一人展开了一趟游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旅程。他写信告诉威廉·肖特：“建筑、绘画、雕塑、古迹、农业，还有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时刻都在我的心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乡村美景和美食佳酿令他心醉神迷。“我现在身处谷物、美酒、橄榄油和阳光之地，”他的信上说，“就算天堂也不过如此吧。如果我不幸死在巴黎，请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让我沐浴在阳光之下。我敢肯定，它能够让我死而复生。”他热爱古罗马统治时期的遗迹，热爱古老的石桥和高架的水渠。他还爱上了尼姆的卡利神殿，一座1世纪时建立的古罗马寺庙。这座神庙后来激发他设计了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1787年6月10日星期日，杰斐逊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的他发现，世界一片光明。在美国，制宪会议5月开始召开。他密切关注会议的进程，并对其中一项提案提出质疑。该提案规定，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涉及国家事务的法案，联邦国会均拥有否决权。杰斐逊深知人性，也深知国会，他认为国会不过就是人性的放大而已，因此，他相信，国会将无法抑制自己对权力的滥用，并会认定一切事务都涉及国家利益。

1787年6月26日星期二，8岁的波莉·杰斐逊抵达伦敦。按照计划，波莉将托付在伦敦的阿比盖尔·亚当斯临时照管，但她不愿意和同来的船长，一个叫拉姆齐的男人分开，而拉姆齐船长也不愿意和萨莉·赫明斯分离。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你原本安排照顾波莉的老乳娘病了，这次没能和她一道来。她随身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是你身边那个仆人的妹妹。”

萨莉·赫明斯没有肖像留存于世。从有限的资料可以得知，14岁的萨莉陪着波莉·杰斐逊来到亚当斯夫妇伦敦的宅邸时，从外貌上看几乎完全是白种人，而且“非常漂亮，一头直发垂在后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样貌多多少少地显露出韦尔斯家族的特征，也就是说，相貌很可能跟已故的托马斯·杰斐逊夫人，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一些相像之处。也可能大约14岁的萨莉发育得很好：阿比盖尔·亚当斯所猜测的她的年龄比实际要大一两岁。

此外，我们知道拉姆齐船长想要带着赫明斯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不难想见，他的兴趣所在并不只是多一个谈话的对象。因此，有理由相信，萨莉·赫明斯在1787年夏到达欧洲的时候，已经出落成窈窕的少女。

亚当斯夫人立刻就发现，波莉是个童言无忌的聪慧的孩子。到了伦敦之后，她被从拉姆齐身边带走，就开始抽泣起来，大概是因为她在航程中与拉姆齐变得很亲近，而且可能很喜欢他。亚当斯夫人为了安慰她，就提起了她的姐姐帕茜。“我告诉她说，我一次都没见她姐姐哭过，”亚当斯夫人事后写信给杰斐逊：“结果她回答我说，姐姐年纪比她大，比她懂事是应该的，而且姐姐有爸爸陪在身边。”她又告诉杰斐逊：“我给她看了你的画像。她说她不认识画像上的人，她说她连你都不认识，怎么会认得画像上的人呢？”

亚当斯夫人在信中说，杰斐逊应该来伦敦接他的小女儿，最好把帕茜也一起带来，这样或许能“让她的妹妹不再排斥启程前往法国”。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比盖尔报告说：“小波莉……抹干了眼泪，上床睡觉了。”

一夜的休息在这个小女孩身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阿比盖尔写信说，到了27日星期三，她“已经完全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昨天的气恼、难过一扫而光。真是个好孩子”。

亚当斯夫人对萨莉倒是不知道该如何作想，她有点儿搞不懂她：“陪同（波莉）的那个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拉姆齐船长认为，她在巴黎派不上什么用场，他想把她带回美国去。当然了，这事该由你来决定。她看上去很喜欢波莉，脾气也挺好。”

1787年7月1日星期日，杰斐逊派他的法国管家阿德里安·帕蒂去接波莉和萨莉，同时向亚当斯夫人衷心地表示感谢。他宣称繁忙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四个月以来拖下的事务都堆到一起了”——令他无法亲自前来。

得知父亲没有亲自来接自己，只是派了个人来，波莉大发脾气。她紧紧抓住阿比盖尔不肯放手，只顾着大声啼哭，“又记起了之前的种种伤心事”。阿比盖尔写信给杰斐逊说：“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抛下了弗吉尼亚所有的朋友，横渡大洋跑来见你，你至少应该抽空亲自接她，而不是派一个语言不通的人来。”为避免杰斐逊以为自己是在责怪他，她又加了一句：“我只是转述她的原话。”

波莉·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于1787年7月15日星期日到达巴黎。杰斐逊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她已经完全不记得姐姐了，对我倒还是有点儿印象”——看来，她之前在伦敦对阿比盖尔·亚当斯说不记得杰斐逊的那些话，并非当真如此。

波莉平安抵达之后，杰斐逊坐下来给妻妹写信，感谢她和她的丈夫

长久以来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他在给伊丽莎白·埃普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她的读写、礼仪举止都无可挑剔，姨父、姨妈对她的悉心照顾让我们感激不尽。你们现在虽然不在她的身边，但她对你们的感情丝毫未减。请将她的这份敬爱视作对你们的微薄回报吧。"

想到费城制宪会议，杰斐逊给约翰·亚当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这真是一次半神英雄的大会。"

其中一位半神英雄——詹姆斯·麦迪逊，此时却满腹忧虑，他写信给杰斐逊道："再没有比此次大会的召开更引发普遍焦虑的了。"弗吉尼亚局势非常动荡，"在民众中……据传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情况虽然还没有糟到像马萨诸塞那样的地步，然而一场干旱导致粮食作物歉收，"征税也是造成不满的原因之一"。一些监狱、法院和政府办公室遭到了"蓄意焚烧"。

杰斐逊的其中一个担忧是，美国可能会改弦易辙，倒退回世袭权力制，甚至可能确立一位君主。他近距离接触路易十六宫廷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忧就越强烈。

这样的谣言从来没有平息过。西德尼勋爵1787年9月14日星期五从伦敦写信给多切斯特勋爵称："这里有传言说，美国正寻求推立一位汉诺威王室成员为君主。如果他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怎样处理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据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信，与英国重新联合的"最有可能的形式"是"立在位英国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君主……签署一项家族协定"。

多切斯特于1788年发回伦敦的一份报告中说，这样的计划全都失败了。据称，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君主国，将王冠戴在一位外国王子的头上……但是提议被否决了，尽管它在大会上获得了一些强有力的支持"。

在制宪会议召开的这一年，一位英国间谍——很可能是乔治·贝克威思——给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寄去密信，称美国的君主主义有萌芽之势。"眼下，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各州，没有一位绅士不对现任政府嗤之以鼻。他们深信这样的政府低能无效，无一不盼望一个君主国的出现。"这封信接着写道：

> 这些人现在分为三个阵营：
>
> 第一阵营提议建立一个类似纽约州政体的联邦政府，下设一年一届的行政院、参议院和众议院。
>
> 第二阵营希望推立一位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并设三年选举一次的两院制议会。
>
> 第三阵营意欲确立一个世袭制君主国，政府形式与英国的极为

相似。

其中，第一阵营中的许多人以华盛顿将军马首是瞻，第二和第三阵营则将眼光投向汉诺威王室，希望推立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国家元首。

第三阵营的势力最为强大，当中不乏一些美国国内能人志士。

……

通过其他消息来源了解到，美国国内才干卓著的人士普遍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他们认为当前的政府既没有效率，也不配获得尊重。不过，他们在确立何人为君主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个美国人，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位英国或法国王室成员。

杰斐逊担忧封建君主控制美国国政，但他同时也相信，一个国家必须国力强盛，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1787年，他看到了在尼德兰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危机，认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美国警惕。当时，尼德兰总督（得到英国支持）和爱国派（得到法国支持）之间爆发了冲突。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军事干预下，爱国派遭到镇压，尼德兰总督取得了胜利，而法国则未能履行自己当初对爱国派的承诺。杰斐逊在1787年11月给杰伊的信中写道："这件事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无论结盟的原因是出于道德、荣誉、利益还是战争，一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可以依赖的盟国是不存在的。"

在杰斐逊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告诉杰伊："因此，我们只有全副武装起来，才会是安全的。"

制宪会议在费城结束的第二天，乔治·华盛顿就派人给身在巴黎的杰斐逊送去一份宪法草案的副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派人送了一份，与此同时，谈论宪法的信件雪片般涌至杰斐逊的朗雅克府。在看过草案的副本之后，约翰·亚当斯对杰斐逊说，他觉得这份草案"经过精心的考量，达到了维护邦联完整、增进各方感情、统一思想模式的目的，其成果值得赞许"。

亚当斯问杰斐逊："你怎么看《权利法案》？难道不应该在通过宪法之前先行通过这一法案吗？"

杰斐逊秉持同样的观点。第一次读到这份草案时，他就表达了强烈的异议。"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他写信给亚当斯道，"我承认，里面的部分内容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大会提出的这一草案。"

有关总统任期的具体条款让他感到不安。"总统四年届满后可以一再连任，直至终身。"杰斐逊说，"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位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可以不受限制，那他一定会终身任职。经过一两代终身任

职的行政长官后，世人便会认为这个职位是终身职位。从此往后，每一代的继任都将充满阴谋、贿赂、武力，甚至是外国干涉。”

他把自己不认同的内容之起因都归咎于英国，由于英国报界长期以来都在夸大美国局势的动荡，以致“最后全世界都相信了这些话。英国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开始相信这些话，更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我们自己都信以为真”。杰斐逊继续说道：

> 我们的13个州已经独立了11年。这期间只（在马萨诸塞）发生过一次叛乱。也就是说，每个州每150年才会有一次叛乱。在此之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150年间未曾发生过叛乱？如果不给统治者时不时地敲敲警钟，提醒他人民仍留存反抗精神，哪一个国家还能存续人民的自由？让人民拿起武器吧。方法是通过事实来纠正他们，并且宽恕、安抚他们。如果一两个世纪之内只是丧失几条人命，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需要不时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因为这对它而言是自然的养分。我们的制宪会议对发生在马萨诸塞的暴乱过于担忧了。

杰斐逊承认自己有些夸大其词：“由于眼下缺少可以转达你的具体信息，因此我任由自己的论点抒发了一番。既然我们无法提供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于逗乐解闷吧。”

1787年12月20日星期四，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就宪法的具体条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欢迎将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分支；他赞赏联邦政府确保了足够支撑良好运作自由和权力，而“无须屡屡诉诸州立法机构”；同样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联邦立法机构被赋予了征税的权力，仅凭这一原因，我支持设立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众议院”。

杰斐逊不同意将权利宣言（或法案）排除在外，这样不能保证“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自由不受常备军侵害的权利、反垄断的权利、人身保护法令的永久性和始终如一性，以及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他表示可以容许这些事项在未来通过修正案或召开新的会议解决。最后，他同意由批准程序决定宪法的最终命运。“毕竟，我的原则归根到底是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他对麦迪逊说，“如果他们批准了整部宪法草案，那么我衷心地表示赞同，并希望他们能在日后发现问题时随时修正。”

可他越想这件事，就越希望有关权利的问题能够在新政府组建之前得到解决。杰斐逊建议，前9个州批准宪法，剩余的4个州则否决它，直到将有关个人权利的宣言补充进去。

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宪法草案的现状。他于1788年5月写道：“确实存在一些缺陷，让我一开始无法接受。不过，完美不是一蹴

而就的，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

这是一个理解杰斐逊观点的要义：他下笔力求完美，但他会发现并汲取好的事物，而不会让两者拼得鱼死网破。

杰斐逊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宪法的批准进程。他从各方获知了各州会议的投票结果，并记录下来。1788年5月，他相信宪法的通过已是定数。当月15日，他说：“总统和新的国会很可能于9月在纽约就任。”

从一开始，杰斐逊就认识到了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詹姆斯·门罗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谈到，华盛顿“再度投身公职之际，他所选择的道路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值得关注：人的本性存在缺陷，如果他放纵这些特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与人类脆弱的本性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对美国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1788年4月，杰斐逊结束了一趟欧洲旅行回到巴黎。在一堆信件中，他一眼便认出了玛丽亚·科斯韦的笔迹，于是迫不及待拆开她的信笺，顾不上读其他信件便坐下来给她写了回信。

他说自己在旅途中梦到了她。“身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真希望您就在我的身边……事实上，我牵着您的手游遍了整个花园。”他写道，“您一定要……再给我写封信来，信里如同我对您的情感一样饱含深情。”他给她讲了个有关鼻子和阳具之间关系的笑话，是他从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中学来的，这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调情暗示。

不过，在这趟旅途中，他的心里可能同时有了萨莉·赫明斯的影子。在杜塞尔多夫，他被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德·韦夫1699年创作的一幅画深深吸引，画中描绘的是亚伯拉罕与年轻的女仆夏甲圆房的情景。杰斐逊形容这幅画“非常甜美。若不是他已作古五六千年，我真愿意身为亚伯拉罕”。

1788年5月，他在朗雅克府写信给一位朋友：“巴黎俨然成为政治的熔炉。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政治疯狂地运转。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童，他们没有任何别的话题。”

第二十二章
巴黎的条约

他希望带我母亲一起回弗吉尼亚，可她犹豫不决。

——麦迪逊·赫明斯

1788～1789年，无论是在杰斐逊的公职生涯还是在其私人生活中，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在尼德兰，借款谈判艰苦而漫长；在法国，革命洪流滚滚而来；在朗雅克府的围墙之内，萨莉·赫明斯的身影无处不在。

法国人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不但立法反对奴隶制，而且揭竿反抗路易十六——在这两年对杰斐逊而言，都是极大的考验，触及他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领域，迫使他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哲学信条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

在这个急剧动荡的时期，杰斐逊似乎和他已故妻子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开始了一段性关系，而且这个妹妹还是他的女奴。从赫明斯1787年夏陪同波莉来到巴黎之后，她一直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每个月12里弗尔，一共领了10个月。杰斐逊为她置办了衣装，还给她接种了天花疫苗。她的哥哥詹姆斯正在接受厨师的训练。关于萨莉日常的工作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她在巴黎的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修道院女校担任杰斐逊两个女儿的贴身女仆度过的。

杰斐逊的生活不可能更复杂了。他的公务紧急而繁忙；他在巴黎的知识界和社交界里穿梭往来；他要抚养两个女儿；他为年轻、脆弱的共和国日夜担忧；他还要跟一个已婚妇人言语传情，在林荫遮蔽的巴黎市郊偷偷跳下马车，在浪漫迷人的森林公园惬意漫步。从凡尔赛宫到剧场和歌剧院，他既生气勃发，却又忧心忡忡，随时都有可能从美国传来不幸的消息——祖国的安全、稳定和地位危如累卵。

一片疾风骤雨之中，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随时听候他的吩咐。这个女子可能让他想起了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杰斐逊的妻子。杰斐逊和赫明斯两人之间到底有多少感情，这已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他可能爱过她，她也可能爱过他。也有可能，如同一些人指出的，这是带有胁迫性、体制性色彩的强奸。或许，她仅仅是为了在一个罪恶的制度下求得生存，把性关系当作一种责任，当作自己受奴役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以此为手段，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又或许，以上种种情形在不同的时期都是真实存在的。

杰斐逊自己有一次评论道，性爱是“人类最强烈的欲望”，如果是他想要得到的，他不会勉强克制自己。而据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回忆，萨莉·赫明斯“肤色白皙，非常漂亮”。此后多年间，她生下了几个孩子。从资料记载的孩子的出生时间来推算，她怀孕的时间可能都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期间。

尽管资料有限，我们极有理由相信，萨莉·赫明斯是一个聪慧、勇敢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却竭尽所能改善自身的境况。她凭借着坚忍性格和生存本能开始了她人生中的这一新篇章，并且在今后的日子中保持了下去。

这个新的开始给她带来了希望。因为过去一直禁锢、奴役她的两大因素——地理和文化——现在站到了她这边：在法国，奴隶可申请获得自由，而他们的主人没有权力阻止。

杰斐逊很清楚这一点。作为美国驻法大使，他曾就这一制度向一个在法居留的美国奴隶主提供建议。萨莉·赫明斯也不是一个无依无靠、孤身一人流落异国的奴隶女孩，她的哥哥詹姆斯当时也在朗雅克府干活，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获得自由。

据他们的儿子麦迪逊·赫明斯后来回忆，萨莉当时已经成为“杰斐逊先生的妾室”，杰斐逊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她正怀有身孕。麦迪逊·赫明斯说：“他希望带我母亲一起回弗吉尼亚，可她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即意味着拒绝。对杰斐逊来说，他完全不能接受有人违抗他的绝对意志，更何况这人还是个奴隶。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尽可能地掌控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变数。如今，一个跟他的大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居然拒绝服从自己，拒绝接受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白人奴隶主对女奴的性支配。

“她才刚刚开始听得懂法语，而且在法国，她是自由的。如果回到弗吉尼亚，她会重新沦为奴隶。”麦迪逊·赫明斯说，“所以她拒绝跟他一起回去。”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杰斐逊刚刚同欧洲的银行家就一项债务达成协议，把法国从全盘崩塌的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眼下，他不得不和一个怀了身孕的未成年女奴谈条件。这个女奴现在有机会获得自由，而且这样的机会很可能仅此一遭，错过就再也没有了。

掌握主动权的人是她，而不是他。这样的情形看起来一定是超乎现实、无法想象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或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一件让他紧张的事情上，杰斐逊真正地处于劣势。于是他开始让步，希望说服萨莉跟自己一起回弗吉尼亚。麦迪逊·赫明斯说：“为了劝诱她回美国，他向她允诺了很多特权，并且郑重发誓，会在她的孩子年满21岁时给予他们自由。”

萨莉·赫明斯同意了。“她决定完全相信他的许诺，同他一起回到弗吉尼亚。”麦迪逊·赫明斯说，“他们到达美国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孩子，托马斯·杰斐逊是孩子的生父。这个孩子没过多久便夭折了。她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父亲都是杰斐逊。他们的名字是贝弗利、哈丽雅特、麦迪逊（我自己）和埃斯顿——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们的父亲最终兑现了他在巴黎对萨莉许下的承诺。麦迪逊·赫明斯说：“根据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达成的协议，我们全都获得了自由。”这是杰斐逊一生中最重要的契约之一。

在巴黎，权贵会议不得不让位于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杰斐逊在1788年7月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我想你一定听说了关于这个国家内部动荡的可怕传闻。谣言总是愈传愈烈。……迄今为止，据我所能搜集到的最为可靠的证词，在骚乱中尚无一人丧生。”

法国王室深陷财政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美国无力偿还欠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债务。这个问题给在外交前线的杰斐逊和亚当斯带来了麻烦。1788年年初，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碰面，准备与尼德兰银行家展开协商。杰斐逊此行的主要目标包括：找到足够的资金，既可偿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服役的法国军官的军饷，又可支撑美国在欧洲各国的外交驻地。1788年，他和亚当斯顺利达成了这两个目标。

随着人们对美国稳定的信心逐渐增强，美国的信用等级在欧洲市场上开始提升。由于杰斐逊本人欠下了大额的个人债务，因此他强烈反对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认为这会使国家受制于人。1788年5月，他写信给华盛顿：“对任何可能会影响我国信用的风吹草动，我都感到焦虑不安。我的设想是，尽可能提升我们的信用，但审慎使用。”

杰斐逊凭借巧妙的外交手腕商定了一项条约，这将是在新的宪法下首项获得通过的条约——一项界定美法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领事级协议。这项协议最初由富兰克林在1784年主持商定，但在当时被认为对法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因而遭到国会否决。杰斐逊重开谈判，他的主导原则是：“改变做法……不再拒绝任何一项对我们无益的条款，而是接受任何一项对我们无害的。”

这是处理微妙事务的实际办法。协议获得通过后，美国被世人视为一股更强大、更成熟、更受尊敬的力量。杰斐逊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他对宪政下的美国政治充满好奇。麦迪逊告诉他，华盛顿将成为总统。约翰·汉考克和约翰·亚当斯是“被提及最多”的副总统人选。麦迪逊还说：“我认为杰伊先生或诺克斯将军是更好的人选，不过他们两人很可能都宁愿维持现状。现在还说不准前两人中究竟谁会出任，或者是否还会出现其他人选。”

大家都禁不住要猜测一番。“副总统的人选仍然悬而未定。”杰斐逊

在1788年写给一位记者的信中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富兰克林博士的年龄以及他很可能不会接受，博士倒是个十拿九稳的人选。……亚当斯、汉考克、杰伊、麦迪逊和拉特利奇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10月过去后，幕后的权力角逐愈发激烈。麦迪逊报告说，考虑到华盛顿出身弗吉尼亚州，副总统的人选将在汉考克和亚当斯两人之间产生。在麦迪逊看来，这两个人都不理想：“汉考克软弱无能却野心勃勃，为了赢得支持不惜玩弄低级的花招……亚当斯在著述中公开宣称的政治原则让他遭到许多人的憎恶，在南方各州尤甚。”

杰斐逊热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在1788年11月说：“亚当斯先生和汉考克先生之间存在不公开的敌意，两人都被提名为副总统人选。”

私底下，有关君主制的议论一直没有消失。华盛顿的助理戴维·汉弗莱斯告诉杰斐逊，支持建立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人原本“对王权深恶痛绝，现在却开始认为，也许只有一位国王才能消灭邪恶。这样的议论真是令人震惊，不幸的是，连我都已有所耳闻”。

杰斐逊想要回国，至少是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而且他特别希望能与华盛顿建立起私人关系。眼下回到国内，在政治上是有裨益的，因为他极为反感别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的朋友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于1788年12月从费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了这件令人恼火的事：“顺便提一句，不断有人在我面前说，你是个强硬的反联邦主义者，这几乎等于在战时说某人是亲英分子一样。”

杰斐逊借此话题对派系斗争进行了抨击。“我不是个联邦主义者，因为无论在宗教、哲学、政治，还是其他方面，我的全部信仰不会只听由某一党派或派别的信条的摆布。我自己能够独立思考。”他在1789年3月给霍普金森的回信中说，“沉溺于派系之争是一个自由和有道德的人的终极堕落。如果不加入某个党派，我就不能进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因此我向你郑重声明，我不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但我更不是一个反联邦主义者。”

他一再重申自己的立场：“我最大的愿望是不受打扰地恪守自己的职责：避免受到瞩目，避免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因为在我看来，即便是毫无根据的小小指责，它所带来的痛苦也远远大过溢美之词带来的欢愉。”

麦迪逊从美国来信，向杰斐逊戏谑地报告了一条新闻：约翰·亚当斯想要为总统杜撰一个堂皇的头衔，结果以失败告终。“亚当斯竭力主张头衔的重要性。……拟议的头衔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殿下、各州自由的保护者。如果这个提议得到通过，无疑将令总统陷入两难的困局，在我们新生的政府中造成裂痕。”

杰斐逊称亚当斯的提议是“我听到过的最为荒谬的事情，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证明了富兰克林博士对我这位朋友的评价确实恰如其

分：‘无论何时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常常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有时是个彻底的疯子’。”

这一年，法国迎来了一个严酷的冬天，然而杰斐逊的心情却好极了。他在1789年1月写道：“我们的新宪法……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期望。”

法国人能否也推出一部这样的宪法，成为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爆炸性问题。1788年年末至1789年年初的寒冬，法国国内食物匮乏、政治动荡，局势一触即发。随着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召开，巴黎街头发生了造成约百人丧生的暴乱。杰斐逊对此表现出了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一贯的态度：他对暴力流血坚持轻描淡写，认为这一事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命运问题毫无联系。

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杰斐逊为法国人起草了一份权利宪章，并送到拉法耶特侯爵手中。杰斐逊的草案完全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没有对人类自由的大声疾呼，没有对言论自由等各种人权的激情罗列，这份草案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权力分配的记录性文件。[比如：“法律只能由（三级会议）制定，并须得到国王的批准”，“军队必须听命于国民政府”。]这份草案是他受时代精神的感召，为无数的可能性所激励而匆匆写就的。

1789年6月17日星期三，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的三级会议平民代表自行设立国民议会，从事实上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数百年来，受尽王权专制的欺压，法国人民终于奋起反抗。在此后的1/4个世纪里，从数次试图创立共和政府，到将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再到产生恐怖统治，最后到建立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帝国，法国一直在迈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上挣扎前行。这场斗争的实质影响不仅横扫法国，而且遍及世界，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法国曾帮助建立起来的国家——及其领导人，住在朗雅克府的美国驻法大使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巴黎的动乱也波及杰斐逊。他的宅邸曾三次遭受劫掠，他还目睹了一场在路易十五广场（今协和广场）发生的巴黎市民与德国雇佣骑兵的街头战斗。开始时，还只是民众投掷石块，最后发展成雇佣军动用“强大火力”。

1789年7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在朋友德·科尔尼夫人府上做客时，杰斐逊获知了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他在两天后这样记叙道，“内阁更迭，在进攻巴士底狱的过程中，民众遭到屠戮，典狱长、副典狱长和商会会长被斩首，这些事件在巴黎引发的骚乱把国王吓坏了”，他向三级会议允诺遣散部队，并发誓进行改革，“将和平与幸福还给人民”。

局势的发展尚未明朗。“市内的气氛仍然极为紧张，遣散军队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且他们仍在继续武装和组织资产阶级。”到了第二天，也就

是17日，杰斐逊告诉托马斯·潘恩：“巴黎过去这5天里的局势比我在美国见过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更危险。”

杰斐逊表现得临危不惧。在写给玛丽亚·科斯韦的信中，他说，“触目所及都是骚乱和暴动”，“人头落地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早上醒来，倒要回想一下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

1789年8月25日星期二，拉法耶特请杰斐逊“推掉所有约会，在星期三做东设宴。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国民议会的成员。我希望我们能够（联合起来），这是制止议会解散和内战爆发的唯一途径”。第二天，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拉法耶特撰写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份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受到《独立宣言》的影响，并且在起草过程中，拉法耶特也不断征求杰斐逊的意见。

就在这个星期三，宴会从下午4点在朗雅克府开始，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杰斐逊回忆说，在整整6个小时中，他“作为一个沉默的见证人，目睹了一场不同政见之间冷静而坦率的交锋。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对话、一次逻辑的推理，丝毫没有受到华丽辞藻和肤浅誓言的污染，足以与色诺芬、柏拉图、西塞罗等古人的著名论辩相媲美”。在杰斐逊的餐桌旁，这个8人团体就新共和国的政府架构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决定了（法国）宪法的命运”。

对革命成功的期望空前高涨。拉法耶特将巴士底狱的钥匙作为礼物送给了乔治·华盛顿。他本人当时负责保证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安全，以期在推进革命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据帕茜·杰斐逊回忆，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站在窗口围观国王和王后的马车通过，随行保护的正是她父亲的这位同僚兼好友。最先过来的是王家马车，一位内侍向她鞠躬致意。接下来，几个小姑娘听到像“数千头公牛的吼叫声”，这是人群在呼喊拉法耶特的名字。“拉法耶特！拉法耶特！”民众欢呼道。这位年轻的法国绅士注意到帕茜正在窗口观看，于是向她鞠了一躬。他的这一致意令帕茜终生难忘。她将一个三色帽结——大革命早期的象征——留作永远的纪念。

尽管不时发生暴力事件，一直存在各种威胁，杰斐逊本人始终持乐观态度。他曾对拉法耶特说：“眼下看来，你们的革命正在稳步进行当中：期间当然少不了艰难险阻，然而，从专政到自由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羽毛床上。”

1789年9月初，杰斐逊在病中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他沉浸在法国大革命狂热的激情中写就的，据他自己说，他的思想受到了欧洲近期事件的影响。“我的出发点想来是不证自明的，‘世界的用益权属于生者’——死者既无权威，亦无权利。”他稍后又补充道，“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世代。他们在自己的用益期内可以随心耕耘和收获。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因此可以随心地支配自己。……既然如此，每部宪法、每条法律，自然而然地会在19年的期限（19年是杰斐逊自己对一个

世代的定义）过后终结。”

若仅从字面来看，这些想法简直就是灾难的配方。如果先例失去了权威，法律不能保护财产，榜样也不能引导我们，那么社会就会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状态，强权在无序中得到巩固。

关键在于，杰斐逊的意思是要让后代子孙原封不动地照搬他的想法，还是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只是分享自己在时代巨变中那种急切的心情。在这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高举今日的大旗，而不是强调回顾和存续往昔，他并不真正主张在世代的更迭中抛弃一切旧有的法律。单从1789年来看，他是着眼于过去5年间的种种事件看待当前世界的：在法国，个人和制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世袭地位决定。“这一原则——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适用广泛，影响深远，无一国例外，尤其是在法国。”

1790年，在即将返美的数月前，在写给查尔斯·克莱牧师的信中，杰斐逊又完全换了一副务实的态度。克莱当时正谋求一个众议院席位。杰斐逊信中写道：“你在政治方面见多识广，在人情方面世故通达，不可能不知道自由的土壤是靠着一分一寸的争取而来的。我们应该满足于眼前唾手可得的果实，同时永不放弃尚未开花结果的理想。”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杰斐逊——宣扬摒弃一切法律的哲学家，还是相信“我们应该满足于眼前唾手可得的果实”的政治家？

这两个貌似矛盾的杰斐逊很可能都是真实的。他在一个时期抱有这样的想法，又在其他时期秉持那样的观点。有时，他脑海里同时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性吗？更何况是不断求索、智识活跃的思想家？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站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思考问题。不过，他总是会从空中楼阁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挑起治理一个不完美世界的重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永不放弃尚未开花结果的理想。（在法国，他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火枪制造问题上——这表明他始终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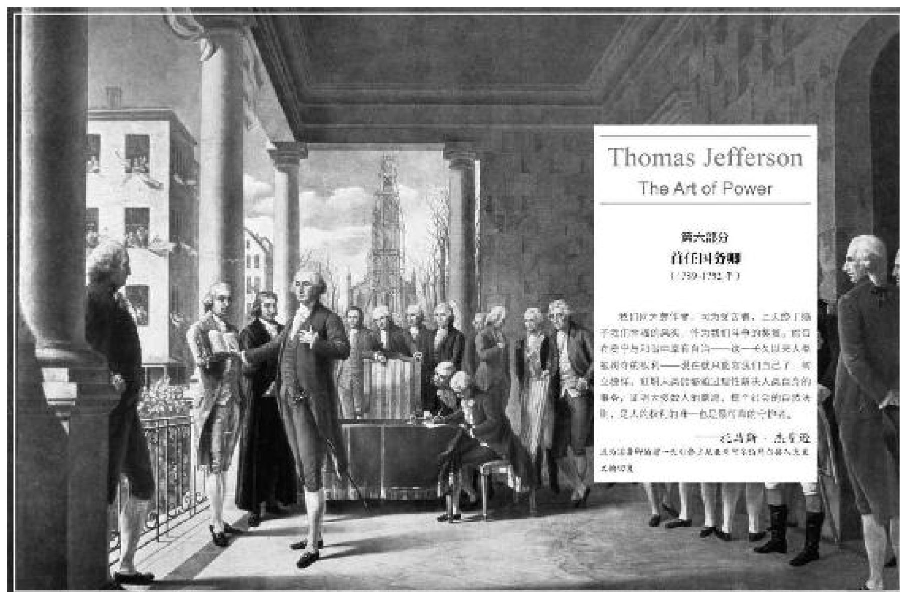
麦迪逊就杰斐逊满是狂想的来信认真给予回复，他总是担负着消化吸收杰斐逊的原始思想的责任。麦迪逊对共和国的诸多贡献之一，便是常常充当杰斐逊生活中的调停人角色，保护杰斐逊免受自身激进思想的伤害。

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时刻。虽然麦迪逊言辞温和，但是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哲学立法的精神从未散播到合众国的部分地区，不论国会内外，都远不能称为潮流。”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此外……在我们这个半球，透过哲学这一介质看到的许多至高真理还不为一般政客的凡胎肉眼所察觉。在此之前，民众仍需启蒙教化。”

麦迪逊提到“哲学这一介质”，这是在告诉杰斐逊，对发生在欧洲的关于人的权利的革命，他的热情是脱离美国治国现实的。麦迪逊的话很有道理，从两人的这番信件往来也可以看出麦迪逊确实是一位诚挚、可敬、审慎的友人，在杰斐逊间或沉浸于哲学狂想时，他能够良言规劝，拉住脱缰的野马。麦迪逊一直在杰斐逊身边支持他、帮助他，同时巧妙地提醒他要牢记自己的核心理念：政治有其局限，政府有其缺憾，人性亦有其现实的一面。

1789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托马斯·杰斐逊带着两个女儿、萨莉和詹姆斯·赫明斯两兄妹一起离开了巴黎，启程返美。在勒阿弗尔和考斯停留之际，他教其他人如何丈量河流的宽度，还教导波莉西班牙语。据他记叙，他还“在当地漫游，想要寻得两只牧羊犬”。“为了找牧羊犬，我们走了10英里路，攀上了悬崖峭壁，而且还是冒着我这辈子所经受过的最狂暴的风雨。”结果牧羊犬没找到，倒是在路上见到了一桩触目惊心的事。“在我们回来的路上，”他写道，“看见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这个人刚刚举枪自杀。手枪落在他的脚边，身子后仰，一动不动。子弹从前额到下巴射穿了整张脸，血肉模糊得辨认不出面目。头顶的脑壳也不见了。”就在经受暴雨又发现尸体的隔天，杰斐逊碰上有人卖狗，于是买到了“一只即将产崽的法国牧羊犬”，而他认为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警觉聪明的狗”。

他们的船很快扬帆起航。在旅途中，萨莉·赫明斯是服侍杰斐逊一家人的佣人之一。一直到37年后杰斐逊逝世，萨莉仍然是杰斐逊家族的女奴。



乔治·华盛顿1789年春在纽约市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杰斐逊不久也来到纽约，出任华盛顿内阁的国务卿一职。

第二十三章
纽约的新职位

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中，给予和索取同样重要。

——托马斯·杰斐逊

在正式提名的信函送达的时候，杰斐逊正在埃平屯庄园。这座埃普斯家族的庄园位于里士满西南方的切斯特菲尔德县，就坐落在阿波马托克斯河畔。1789年11月23日星期一中午12点45分，杰斐逊搭乘的“克莱蒙”号于“天清气朗的秋日”横渡大西洋，抵达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同行的有他的两个女儿波莉和帕茜，以及萨莉和詹姆斯·赫明斯。一行人慢慢悠悠返回蒙蒂塞洛，途中在埃普斯府上稍作停留，主要是为了能让波莉与她挚爱的姨父母团聚。

1789年12月11日星期五，杰斐逊收到了总统提名的信函。杰斐逊从巴黎到达弗吉尼亚期间，有关此提名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内容是：杰斐逊愿意出任国务卿吗？

杰斐逊并未给华盛顿一个明确的答复。国务院的职责不仅涵盖所有外交事务，而且包括不少国内事务。杰斐逊对此重担感到畏惧，而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这一点：他担心“公众的批评和指责，即便他们的意图是公正的，亦难免有时会收到错误的信息或被人误导，而他们的意见又总是举足轻重且不可忽视的”。

杰斐逊身陷一个熟悉的困局：他渴望舞台，期盼掌声，同时又害怕失败和非难。在饱受舆论攻击的艰难时刻，他可以雄辩滔滔地声称自己一直希望从政坛退隐。但是，公职生涯让他感到厌恶的一面，同时也正是深深吸引他的一面。他渴望铸就伟业，也认为自己足以成就一番事业。他为国家服务和牺牲的意愿之强烈，丝毫不亚于他因为其服务和牺牲的对象认为他欠缺才能时所感到的痛苦。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当真如此憎恶“批评和指责”，就早该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以免受流言蜚语和政治攻击的伤害。然而，这样的退隐对杰斐逊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对他本质性格的否定，因为他既是一个凡人，也是一位英雄。他既是一个在政治上永不退缩的斗士，又有一个容易受伤的灵魂。而他永远都如此。

华盛顿把说服杰斐逊的技术性工作交给了詹姆斯·麦迪逊。1789年年末，麦迪逊来到蒙蒂塞洛与杰斐逊详谈此事，并且希望纠正杰斐逊对国

务卿职责的错误看法。国务卿并不主管所有的国内事务，他的身份是担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总顾问。“在这件事上，但凡与我交谈过的人，都热切盼望（杰斐逊）能够接受任命。”麦迪逊写信给华盛顿说，“我有信心不负所托，此事的最终结果定不会令他们失望。”

普遍的赞同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杰斐逊，也让华盛顿打消疑虑，他认为杰斐逊是合适的人选，即使要与他展开拉锯战也是值得的。1月中旬在纽约与麦迪逊交换了意见后，华盛顿给杰斐逊写了封信，有力地陈明理由，邀请杰斐逊加入内阁，卸任驻法国大使。

华盛顿对杰斐逊说，“为了让你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最终的决定，我想有必要告知你”，就是“关于你的任命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和欢迎”。

华盛顿希望得到答复。杰斐逊可以选择赴任纽约，也可以选择回到法国，但是他必须做出决定。

何去何从？杰斐逊热爱巴黎，而且外交职位既赋予他高度的自主权，又使他免于无休止的批评。可话说回来，他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美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他必须下定决心，自己在哪里才能为这更崇高的事业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内阁，还是法国？

他接受了华盛顿的邀约。他从实际的政治考量向一位友人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华盛顿在来信中“说我可以自由选择，接受任命或者返回法国。但我很明白地看出，他更希望我选择前者。我从多个消息来源获知”——主要是从麦迪逊那里——“接受任命才是让人满意的做法。因此，我若选择返回法国，难免会招来恶感。这一点是任何职位都弥补不了的”。

杰斐逊出任国务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既动荡不安又激动人心的年月。通过这一经历磨炼出的，是杰斐逊坚强的信念和灵活的策略。在他后来出任副总统，直至最终当上美国总统的过程中，这些信念和策略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届内阁经历的风风雨雨对托马斯·杰斐逊产生的影响，乃至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华盛顿政府的任期。

杰斐逊和家人回到弗吉尼亚之后，已经17岁的帕茜很快便决定嫁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小托马斯21岁，是杰斐逊童年玩伴的儿子，也是帕茜的第三代堂亲。他们小时候见过两回，都是在杰斐逊一家拜访茯苓庄园的时候：一次是在1781年英军入侵期间，另一次是在1783年。年轻的伦道夫一头黑发，胸怀宏图壮志，受过良好教育。杰斐逊一家于1789年抵达诺福克之后，他便立刻展开了追求攻势。在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中，杰斐逊写道：“无论从才能、性情、关系，还是家世来看，他都是我的佳婿首选……我还是不敢擅作主张，因为这都得看我女儿自己的心意。”在女儿订婚之后，由于他希望将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因此推迟

了离开茯苓庄园的时间，以便与伦道夫一家商量婚事安排。最后，婚礼于1790年2月举行。

帕茜一回到美国就结了婚，而且对象还是一个她不太熟悉的男人，这件事似乎有些蹊跷。有历史学家推断，这可能是她对父亲和萨莉·赫明斯的私情做出的反应：女儿可能感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了。

也有可能，事情正如表面上看来的一样。帕茜到了适婚的年龄，年轻的伦道夫又是一个合适的对象，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伦道夫与她挚爱的父亲十分相像：他对农耕、科学、法律和政治都很感兴趣。这位男子得到了父亲的首肯，而且和父亲有着共同的爱好，因此在这门婚事提出之后，帕茜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准备开始人生必经的第二篇章。

此后，杰斐逊前往纽约赴任，萨莉·赫明斯则留在了蒙蒂塞洛。在这些年间，她的主要职责是照管杰斐逊的私人房间和衣物，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物件都交由她保管。赫明斯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住处已无法得知，有可能是位于一排18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的原木奴隶营房中的一座。这排木屋沿着庄园的主要道路桑径修建，研究蒙蒂塞洛的学者指出，桑径两边曾有过二十来座房屋、作坊和牲口棚，当时的几十名奴隶和自由白人工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劳动。学者认为在杰斐逊任职总统期间及之后的岁月里，萨莉·赫明斯住在建于1802～1809年的主宅南翼的露台区。

杰斐逊北上纽约的旅程缓慢，途中还不时遇到雪。然而，这似乎是一个政治上的春天。在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大典举行之际，理查德·普莱斯从伦敦给杰斐逊寄来一封信。这位老者在当时的英国是一位激进的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美国革命。他在信中表达了许多人的心声：“我想，新宪法下的国会现已在美国诞生，急盼听到国会顺利运作的消息。我已近风烛残年，如今竟有幸见到人类取得进步，宗教迫害几乎绝迹，底层民众睁眼发现自身的权利，世界各国渴望争取失落的自由，老怀安慰，别无他求。”

到了纽约之后，杰斐逊在百老汇大道上找不到住处，于是只得租下了下曼哈顿仕女街57号的一栋房子。（他告诉帕茜，这栋房子“马马虎虎”。）亚当斯夫妇等老朋友十分欢迎他的到来。阿比盖尔·亚当斯在1790年4月间的一封信中写道：“杰斐逊先生现在身在纽约，他的到来为我们的社交圈子增色不少。”副总统亚当斯和夫人的住处——一所叫作里士满丘的宅邸——当时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居住区，此处即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格林尼治村。

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发生在国外的战争和冲突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内的形势和政局——18世纪90年代已被证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791年夏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他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共同发表了《皮尔尼茨宣

言》，宣称要捍卫法国王室。这直接引发了1792年春法国革命党人向奥地利宣战，开始了长达13年的一系列战争，都发生在革命的（及后来拿破仑的）法国与君主制的欧洲列强之间。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流血（包括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决，以及1794年的革命恐怖时期）也将英国和西班牙卷入了对法战争。

发生在旧世界的冲突同样给新世界造成了难题。在这10年间，由于英法之间的战争，美国亦曾数度濒临战争边缘，敌人既曾是英国，也曾是法国。不仅如此，战争的威胁还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形势（如在90年代末的最后几年，由于害怕爆发对法战争，政府对公民自由出台了强硬的限制政策）。在这重重考验期间，杰斐逊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曾是国务卿，又是先后反对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政策的反对派领袖，最后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

杰斐逊在这10年风暴中的种种行动，主要受到他对自由和权力的双重信念的驱使。也许可以说，他对法国过于宽容了，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是与他对英国君主主义的厌恶和恐惧密不可分的。

尽管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杰斐逊与开始时并无两样：他仍然是美国试验的保护者和美国利益的捍卫者。

1790年3月21日星期日，美国历史上的首任国务卿第一次正式拜会首任总统，标志着两人之间长达4年“每日见面、挚诚交心”（杰斐逊原话）的友好关系开始了。这两人有太多的事情要谈，一次会面根本就谈不完，于是两人在星期一（画家约翰·特朗布尔给华盛顿画完肖像之后）和星期二再度会面。

华盛顿和杰斐逊相识已近25年，这可以追溯到他们在威廉斯堡出任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的时期，当时两人时常在这个旧殖民地首府的议会厅和雷利酒馆之间流连忘返。

在3月明媚的春光中，华盛顿有充足理由相信，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是值得另眼相看的：许多人都向他大力夸赞杰斐逊。拉法耶特曾在1788年对华盛顿说：“杰斐逊先生集出众的才能、高尚的品德、讨人喜欢的脾气及其他众多优点于一身，在这些方面，无人能与他相匹敌。因此他既是杰出的政治家、热心的公民，也是可亲的朋友。”美国商人纳撒尼尔·卡廷在法国与杰斐逊来往过一段时间后写道：“在我眼里，杰斐逊先生学识广博、见解高卓。他的风度肃穆得体、讨人喜欢。他的众多才能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引以为荣。”几年前，约翰·亚当斯还在巴黎的时候，也曾对战争部部长亨利·诺克斯说：“不论是从能力还是品德来看，都很难找到像我的朋友兼同事杰斐逊先生这样的人才。”

对杰斐逊来说，华盛顿是高高在上、有距离感的，他优雅得体、超然孤高，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神话。“他无所畏惧，有种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泰然。”杰斐逊在很久之后写道，“他性格中最大的优点或许

就是审慎，行事之前必先对任一条件、因素深思熟虑、再三权衡。如果心存疑虑，绝不会贸然行动。可一旦做出决定，便不顾任何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杰斐逊对华盛顿才智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他思维清晰、头脑灵活，不过算不上绝顶聪明。他的洞见深刻，可是不及牛顿、培根、洛克般敏锐，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判断总是最明智的。他处理起问题来慢条斯理，鲜有创新或想象，但决断有力。”

在表象之下华盛顿还有隐藏的一面。“他天生急躁易怒、自视甚高，不过时刻的反省和坚定的意志让他牢牢地、习惯性地掌控自己的缺点。”杰斐逊继续写道，“然而，一旦失去控制，他的怒火是可怕的。”换句话说，就是与华盛顿打交道需要小心谨慎，不可冒犯他。

杰斐逊抵达纽约不久，他的间歇性头痛又一次发作了。这或许表明，在内心深处，他对未来的职责以及公众的审视感到惶恐。

在过去5年中，他不必每一天，甚至是每小时都处身刀光剑影的美国政坛。作为一个驻外大使，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演员。然而，现在他是新政府中的内阁高官，完全暴露在虎视眈眈的纽约政治阶层眼前。

他需要花上一段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在此期间，他对麦迪逊友情的倚重不但明显，而且真诚感人。有一次，就政府与联邦参众两院沟通形式的问题，杰斐逊写信征询麦迪逊的意见，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妨直抒你的意见。我在新的岗位上尚未熟悉情况，恐怕有许多地方要烦扰你。”

有一件事他心里非常清楚：国务卿这个行政职位位高责重。他在1790年4月写道：“与各国交往的事务完全是行政事务，因此除去需要特别呈交参议院决定的部分外，均属于国务院行政首长的职责。例外情况还需严肃解释。”

来到纽约没几个星期，杰斐逊就迎来了自己的47岁生日。他是全世界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可是因为他过去5年都在巴黎，所以许多在此期间跃上国内政坛的人物对他并不熟悉。威廉·麦克莱，一位不满现政府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对杰斐逊的风度不但感到吃惊，而且相当失望：“他仪表随便、心不在焉，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一位国务卿或部长那种气定神闲的仪态。我想在他身上找到庄重肃穆，却只发现漫不经心。他说话几乎不停顿，可即便是他的谈吐也带有几分他个人仪表的特质，即随随便便、漫无章法。不过，他的言谈总是能带来有用的信息，有时甚至是卓越的见解。”

多年来，人们眼中看到的杰斐逊是在不断变化的。据报人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评述，杰斐逊“身材高大挺拔，举止灵巧潇洒。虽然称不上风姿绝尘，却也风度翩翩。他给人的印象便是这般英武矫健”。

一位英国旅行家约翰·伯纳德则写道：“他的见识既高雅，又深刻。他的谈吐高妙，从甚为严肃的道德议题，到轻松愉悦的幽默和畅想，都掌控得游刃有余。他的思路清晰明了，他的描述栩栩如生、一针见血。在所有抽象的话题上，他都直截了当——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贵格会教徒；可当他谈论起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时，则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其巧舌如簧不逊色于一位朝臣。”

杰斐逊深谙私人关系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在1791年7月写给亨利·诺克斯的一封信中说：“倘若快到用餐钟点时，天下起了雨，或是天太热了你不想走远路，或是公务繁忙，你想在办公室多待片刻或用完餐后再回来办公，这时在城里用餐便是更好的选择。不管哪一天，如果遇到了上述情况，你都不必拘礼，尽可来与我共进午餐。只要我当日在家，必定欢迎之至。我的午餐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45分，你的大驾光临一定会受到真挚的招待。”

杰斐逊视自己为政治动物。一位记者对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流露出的反英论调提出质疑，他于是写信回应。他指出，书中的言论都出自战时，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并未努力构建它与其前殖民地的建设性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战时以来，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并不如其预期的那样能够博得我们的好感。”杰斐逊在1790年11月说，“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对他们绝不会表示强烈的支持或反对。不论何时，当他们出于对贸易的贪婪，愿意对我们做出让步时，我也将很乐意对他们做出让步，因为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不过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现阶段我对此不抱希望。”

杰斐逊竭力想博得他人的好感，然而他发现，自己对纽约的政治气候水土不服。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政府圈子里盛行的联邦主义风气让他感到“惊诧和苦恼”。

在晚间聚会上，他觉得自己“几乎成了民主共和派观点的唯一代言人”。总统的准国王待遇——觐见和鞠躬礼仪、众多马匹牵拉的庞大总统马车——也让杰斐逊感到不安，因为他相信，实质的变化总是紧随在做派的改变之后。他担心，形式上向君主制的倾斜，将是事实上迈向专制政体的一步。

约翰·芬诺在纽约发行的《美国时事报》为杰斐逊的结论提供了更多证据。约翰·亚当斯以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论达维拉”的文章，论辩纯粹的民主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平等的法律真正能够实现并得到施行吗？因为它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政府下才能够出现，并且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差别与等级。”亚当斯继续道，“听人说，我们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朋友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差别。别相信这些话，吾辈国民。不可能发生的事是没法办到的。难道他们均分了所有财产和土地吗？难道他们将所有男人和女人造就得同样聪慧、优雅和美丽了吗？”

杰斐逊担心亚当斯的论点背后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含意：差别是天生的，而且很可能是继承而来的。这一观点在旧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新世界也将如法炮制。基于这种忧虑，他安排芬诺发表了一篇国民议会对民众讲话的译稿："国家，法律，国王。国家就是你们自己；法律也是你们自己，是你们的意志；国王是法律的守护者。"

杰斐逊还敦促芬诺在报上刊登翻译成英文的《莱顿公报》文摘，《莱顿公报》是一份以法语出版的亲共和派尼德兰报纸。这样一来，杰斐逊便能够在一向宣传联邦派政策的《美国时事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到1790年8月初，芬诺完全成为联邦派的喉舌，不过有那么一段短暂时间，杰斐逊还是在《美国时事报》上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

他不仅是从战术上打击敌人，而且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对于人类和国家来说，我只有一个道德体系，"他在1790年4月写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即对任一约定都心存感激，并信守承诺。在任何情形下都开诚布公、慷慨大度。只有这样，才能长远地促进双方的利益，并且我确信，这也将增进双方的福祉。"

1790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纽约下了一场晚雪。这之后没过多久，华盛顿总统突然病重，很多人都以为他挺不过来了。可是到了6月初，总统的身体居然已经恢复得已如平常，还带上了杰斐逊前往桑迪胡克钓鱼。杰斐逊不论到哪里都保持着他的务实和乐天精神：他希望晕船能够"让我剩余的头痛一扫而光"。

这趟钓鱼之旅回来后，一天晚上，杰斐逊在华盛顿的宅邸附近遇见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1755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的英属尼维斯岛，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度过。他的母亲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父亲是苏格兰领主，他本人则是一个私生子。母亲在他13岁时就过世了，他下定决心要摆脱卑微的出身，出人头地，于是自学成才。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小职员之后，一些当地居民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出资送他到纽约深造学习。他最终被国王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由于他下笔成章（他是一个多产的散文作家）在美国革命期间，他成为华盛顿将军的首席副官，后与纽约名门斯凯勒家族结了亲，并被选为制宪会议的代表。据说，他的岳父、参议员菲利普·斯凯勒对君主制旧习"情有独钟"。

汉密尔顿赞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仿效英国金融和贸易制度的基本模式。他对公共事务的构想基于理性、思路清晰，而且他相信，他的构想是美国最佳的道路。正如任何一个研究过历史和人性的人，他对基于普选权和定期选举的共和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心存疑虑——当时的世界上还从没有出现过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相较杰斐逊而言，他对依照旧世界的模式改造美国政府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而且，汉密尔顿也愿意将总统或参议院世袭制（或至

少是终身制）的可行性纳入考量。

在制宪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汉密尔顿提到了诞生一位美国君主的可能性，这位君主必须“能够抵御民意的洪流”。眼下，他则大力倡导与英国建立牢固的关系，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英国的附庸国。

汉密尔顿的许多（但并非全部）观点与杰斐逊大相径庭，而且他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不留余地、言辞激烈。如此一来，杰斐逊逐渐开始把自己树立为这位财政部部长坚定的反对者。比方说，杰斐逊长期以来一直坚信，国家需要一个备受尊重和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斗争。然而，由于他目睹了法国的旧王政权，同时担心英国对美国图谋不轨，他对华盛顿总统周围的准君主制气氛感到不安。杰斐逊相信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共和政府。

随着华盛顿政府逐渐成形，杰斐逊开始把汉密尔顿视作共和派最深恐惧的化身：一个有可能愿意牺牲美国的自由事业换取专制独裁的人。而在汉密尔顿的眼中，杰斐逊是一个为了乘上法国革命的东风，不惜把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抛弃的人。汉密尔顿的观点（和杰斐逊的一样）是极端的、反应过度的。然而，当时的政治现实是极端、过激的观点盛行，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身为政治家，都无法置身时代之外。

多年之后，随着强烈的情感终于冷却，杰斐逊觅得了一尊汉密尔顿的半身像，并把它放置在蒙蒂塞洛的门厅里，正对着一尊自己的半身像。据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所述：“走进大门，人们的眼光立刻落在两个面对面置于巨型底座的半身像上，这就是由切拉基创作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像。汉密尔顿过世之后，杰斐逊看到人们为雕像所吸引的样子，有时不禁会带着沉思的微笑评论道：‘死后和生前一样势不两立。’”

在上述这个1790年纽约的夜晚，杰斐逊看到眼前这位财政部部长“面色沉重、形容憔悴，情绪之低落无法用言语形容”。杰斐逊写道：“甚至他的衣着都邋遢不整。”

汉密尔顿如此失仪是有原因的。他于1790年年初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共信用报告》，第二份报告在当年年末发表。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应该建立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由中央政府为国债提供资金，并且承担各州的债务；同时还应成立一家国家银行；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是来自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二是对烈酒课税。

为国债提供资金这一举措存在广泛的争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向联邦证券持有人支付名义（票面）价值，而投机商一早就在证券的原持有人手中进行收购，他们收购的价格比汉密尔顿建议支付的现价要低得多。这既是一个政治难题，在情感上也掀起了波澜。原因在于，这些证券的原持有人中，有许多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他们没能预料到自己

手中的纸券价值会水涨船高（他们过去习惯了接受大陆币作为报酬，而这些纸币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往往变得一文不值）。麦迪逊告诉杰斐逊说，更加精明的投机者正在“合众国的内陆和偏远地区撒网，利用证券持有人的信息缺乏谋取利益”。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汉密尔顿仍然顺利推动了联邦政府对证券的购买，并成功地将联邦政府置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中心。

汉密尔顿方案的第二部分——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的债务——将进一步巩固政府的地位。如果债务都整合到了联邦政府这一层面，那么就需要政府通过征税偿还这些债务。在所有政府权力当中，征税的权力从来都是最根本和最具影响力的（也许可以说，开战的权力不在征税的权力之下，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也离不开征税，因为战争耗资巨靡）。

然而，由政府来承担债务的提议立刻就在国内产生了分歧。有4个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马里兰）早已担负起自己的财政责任，偿还了革命战争时期欠下的大部分债务。其他州（主要是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则没能还清债务，因此它们很乐意把自己的账单寄给人在纽约的汉密尔顿。财政上更有担当的各州认为，为帮助拖后腿的邻居摆脱债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向联邦缴纳税款的冤大头。

1790年4月12日星期一，就在杰斐逊抵达纽约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由麦迪逊领导的政治力量在众议院以三票的优势，否决了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的提案。这对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来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杰斐逊在总统宅邸附近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仪容不整的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急需盟友，于是他提议与自己的这位内阁同僚交谈两句。两个人就这样在华盛顿家门口附近的街上谈起话来。杰斐逊是否愿意在债务担负问题上向汉密尔顿伸出援手呢？汉密尔顿相信，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合众国的延续”就将受到威胁。

杰斐逊知道事态紧急，因为国会似乎陷入了瘫痪。“情况确凿无疑”，“东部和南部各州……之间嫌隙至深”，造成了当时“局势一触即发、双方水火不容”的紧张气氛。

杰斐逊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联合行动。和他的许多弗吉尼亚同乡不一样，这位国务卿并未条件反射式地全盘否定政府承担债务。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样做实际上赋予北方更强大的财政权，因为如果希望它们改弦易辙，就要用其他条件交换。

首都的选址问题为达成交易带来了些许希望。纽约当时已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中部和南部各州期望看到政治中心能够设立在其他地方。费城、巴尔的摩和波托马克河边的乔治敦都是候选城市，还有人提到了新

泽西的托伦顿或是萨斯奎汉纳河沿岸的某个地点。麦迪逊在1790年6月给门罗的信中写道："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边的可能性很小，不过，政治交易瞬息万变，最后定在其附近的某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听到汉密尔顿的请求，加上读到南方各州的来信，并对眼前的各项事务进行了一番梳理之后，杰斐逊意识到，可能，仅仅是可能，仍存有达成妥协的余地。

杰斐逊认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一开始悄悄躲开公众的视线，于是，他设宴把关键人物都召集到一起。杰斐逊相信，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他说："只要有机会说明主张，且相互理解，头脑清醒、观点坦诚的人士就能够找到某些交集，携手合作。"

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就意味着灾难。杰斐逊写道，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每个人都固执己见，拒不妥协，为公共债务提供资金的议案就无法获得通过……没有了资金，将导致政府的覆亡"。

席间，麦迪逊答应缓和自己在债务负担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国会"以决定其命运"——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胜利。据杰斐逊所述，不知道是麦迪逊还是汉密尔顿随后说，"鉴于这对南方各州来说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应该在某些方面进行补偿，以示安抚"：首都理应设在波托马克河沿岸。

杰斐逊认为，这一最终结果是"所有可能的糟糕结果中最好的一种"。他心里清楚，汉密尔顿规划中的商业体制会引发各种金融投机行为，而他对此是深感厌恶的。"应该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没有资金就进行交易的人。"杰斐逊说，"这些商业投机者的行为最终都得由消费者来埋单，这会导致负债、破产，国家债务激增，并为此蒙受耻辱。"

不过，杰斐逊同样也相信妥协。他给女儿帕茜提出忠告：对任何人、任何事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亲爱的女儿，看待每一个人都要从他的优点出发，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确实，一个也没有——是完美的。假若有缺点的人都不值得我们去爱，这个世界就会成为爱的荒漠。"杰斐逊在1790年7月写道，"我们所能做的，是要尽可能善用我们的友情：热爱和珍惜朋友的优点，避免沾染他们的缺点；千万不能抛弃他们，就如同不能因为一两段乐章平淡无奇，就将整本乐谱丢弃。"这些话不论是对蒙蒂塞洛还是纽约的生活来说无疑是至理名言。

1790年12月，一位弗吉尼亚人写信告诉杰斐逊说，弗吉尼亚州议会对政府接管债务提出了正式抗议。信中称："其中一党指控国会的行为是违宪的；两党都指控说，这是不公正的。"

就让他们说去吧。杰斐逊尽力达成了他能够达成的协议，就眼下来看，美国会因为这项协议变得更加强大。

第二十四章
杰斐逊先生太讲民主了

> 我承认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当前的政府形式无法满足社会终极目标的需要……也许引入英国政体才是权宜之计。
>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据杰斐逊的记述）

杰斐逊就任国务卿的日期是1790年3月22日星期一。112天后，就美洲爆发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他向华盛顿总统呈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咨文——这绝非一个和平时期。难怪他的头痛病自他上任以来就一直对他苦苦纠缠。

一场世界大战似乎近在眼前。1789年7月，在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偏远小港努特卡湾，长期雄霸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西班牙俘获了两艘英国船。这一地区的毛皮交易利润丰厚，而且关系到与亚洲的贸易航线，因此不仅对西班牙，而且对俄国和英国来说都利益攸关。

1778年，英国探险家、海军上校詹姆斯·库克在努特卡登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英王乔治湾。西班牙人则主张，15世纪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份敕令赋予他们对该地的所有权，因此他们决心击退任何国家对其属地的侵占。西班牙探险家埃斯特万·何塞·马丁内斯于1789年春抵达此湾，夺取了英国船只“皇家公主”号和“伊阿宋”号，俘虏了两船的船长和船员。

西班牙人夺船的消息传来，英国举国震惊，与西班牙开战的言论喧嚣至上。1790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和一些英国议员共进晚餐之后，南卡罗来纳州律师和政治家约翰·拉特利奇提笔从伦敦给杰斐逊写信；信中说，他从没见过像这帮英国议员一样“傲慢的恶霸”。“他们一边倒地主张开战，张口闭口都是老英格兰和英国雄狮；他们轻蔑地笑称要让西班牙人吃尽苦头，（而且）开始迫不及待地计算起（西班牙）不得不为羞辱世界第一强国所要支付的数百万赔款。”

英国人的快乐意味着美国人的焦虑。杰斐逊担忧战争蔓延开来。英国人有可能派遣驻扎在加拿大的英军南下，夺取西班牙的领地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法国是西班牙的盟友，必定会卷入冲突。到时，全球各大洋都会爆发战事。刚刚通过新宪法一年多的美国，则身处旋涡的中心。按杰斐逊的说法，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他最大的担心恐怕是，英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包围之势。副总统亚当斯赞同杰斐逊的观点；战争部部长诺克斯相信，一旦英国人控制了佛

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将招来“塌天之祸、长久之殃”。

局势日趋恶化，美国深陷其中，必须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军队借其领土通行。杰斐逊主张采取一条他所谓的“中间道路”，即在英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拖延答复。然而，如果最终不得不给出答复，他赞成允许英军通行，因为拒绝就可能引发英美战争。尽管并不惧怕战争，但杰斐逊同时指出“战争充满了变数”。他认为，手中握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是从务实出发的立场。

努特卡湾事件正赶上美国计划发起一次对印第安部族肖尼人和迈阿密人的战役，由西北领地的总督阿瑟·圣克莱尔领军。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应不应该把这次行动告诉英国人呢？如果告诉的话，英国人可能会向印第安人通风报信。这些部族一直是英国人的盟友，长期以来不断骚扰着美国的边疆地区。

杰斐逊向华盛顿建议，这次对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应该要保密。可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卿都没想到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通过英国使节乔治·贝克威思将这件事透露给了英国人。此人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策反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出过力。

通过汉密尔顿与贝克威思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位财政部部长的根本立场和行事风格。1789年，汉密尔顿曾私下里让贝克威思给英国当局传话，说华盛顿政府愿意和伦敦做生意。“比起任何其他国家，我一直更希望与贵国建立贸易关系。”汉密尔顿对贝克威思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英国式的，双方好恶也相似。”这明显是想要成为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一员，而不是法国的盟友——后者正是杰斐逊支持的路线。

汉密尔顿告诉贝克威思，倘若英法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海军力量将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成为贵国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助力”。这样的看法，在汉密尔顿看来，“可以说是我国最精英人士的观点”。

可这些并非杰斐逊的观点，汉密尔顿一派也深知如此。来自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威廉·塞缪尔·约翰逊对贝克威思说：“杰斐逊先生……眼下对我们来说太讲民主了。”

美国的亲英势力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势，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空想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杰斐逊先生……的确有些才干……可他关于政府的观点不过是些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全是些源于洛克、锡德尼之辈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奇思妙想。”正如新泽西州参议员威廉·佩特森对乔治·贝克威思所说。

最后是西班牙人服软了。（征讨印第安部族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不过原因与汉密尔顿的泄密无关。）对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努特卡湾事件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波及面、突发性，以及发生的时点——美国政府刚刚诞生不久，这些都促进塑造成形了一种持续多年的习惯性思维：世界危机四伏，任何特定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普世的灾祸，

旧世界——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仍然是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790年，美国首都从纽约暂移到了费城（以等待10年之后哥伦比亚特区建设完成）。在11月初迁往费城的路上，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华盛顿的弗农山庄留宿了一晚。杰斐逊对总统的农艺颇为赞叹，他收下了一些麦种作为礼物，派人送给帕茜的丈夫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让他们在蒙蒂塞洛栽种。杰斐逊给女婿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说，“最好是种在花园中最肥沃的土地上”，种子应该“分洞埋种，小洞之间需间隔适当的距离”。

到了费城之后，杰斐逊租下了高街274号托马斯·利珀的一栋4层砖楼。他又给自己和华盛顿订购了佳酿，接着便投入火热的事业中。

杰斐逊的目标是要在最大限度上建立一个受到尊重、繁荣富强、在不过分依赖任何一个盟友的情况下仍保有和平的美国。他首先面临的是三个既独立又相关的议题：与英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就英国政府强征美国水手休·珀迪事件与其进行交涉，在地中海地区投入兵力打击海盗。在这些议题上，杰斐逊追求的是自由贸易、相互尊重和正义。

可就在此时，建立国家银行、对杰斐逊所谓的烈性酒征收消费税这两个议题占据了更优先的位置，这些都属于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一部分。

税法的通过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为偿债提供资金和承担责任的问题敲定之后，政府需要收入来源才能履行自己新的义务。

然而，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激起了一场广泛的辩论，各方就联邦政府的作用争执不下，也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各自在总统圈子里的影响力意见不一。汉密尔顿希望银行由联邦储蓄提供资金，但在运营的过程中部分地考虑到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杰斐逊和麦迪逊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汉密尔顿方案会让金融投机者从政府所资助的商业交易中获益。

华盛顿私下里就银行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征询过杰斐逊的意见。杰斐逊回答说，应该做出严格的界定：宪法中任何没有明确提及的权力应归于各州，而非联邦政府。他在1791年2月写道：“国会的权力已经明确划定，跨出界线仅仅一步，也会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此任何界定都失去了效力。”

历史后来证明，作为一个临场应变型选手和民族主义者，杰斐逊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把他的以上观点置于历史环境中考察（这在当时是对抗汉密尔顿构想的唯一手段），并且认识到，杰斐逊对汉密尔顿构想持有怎样的态度（它将营造出更有利于专制、而非共和民主的气氛），这才能够深刻地了解杰斐逊的整体思想观。即便在1791年的这个时候，杰斐逊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他在信尾给华盛顿提

出了务实的建议："如果利弊难以取舍，（总统）无法决定，不妨相信立法院的智慧，它自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汉密尔顿给予了绝妙的回击，提出"如果仅从字面遵从（宪法赋予的）权力，政府的运作将会立刻停摆"。汉密尔顿获得了胜利，不过也是一次险胜。华盛顿让麦迪逊起草了一份否决书（虽然最后并未发布），而且一直拖到宪法容许的最后期限才签署法案。当然，他最终还是签署了，汉密尔顿打了一个漂亮仗。

"国会成员可以解散回家了。"威廉·麦克莱写道，"汉密尔顿先生无所不能，只要他想做，没有不成功的。"

费城的春天来了。杰斐逊在给波莉的信中记录下了五颜六色的鲜花绽放的盛景：

4月5日：杏花盛开。樱花树抽芽。

9日：桃花盛开。苹果树抽芽。

4月11日：樱花盛开。

不过，他并没有忘了汉密尔顿这桩事。杰斐逊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先生，如果我们不能推翻'欠债越多，致富越快'、'公债为实业锦上添花'等诸如此类的原则，我们就完了。"就在同一天写给帕茜的信里，他提到的是女帽和费城出现的一种新的帽子样式："特里斯特夫人说，这里最近出现的一种面纱很受欢迎。它固定在帽檐上，可以围系住脖子，也可以不系。"

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杰斐逊的一张便笺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暴。便笺上只有短短4句话，其中两句还是套话，但可以说，在杰斐逊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信件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力。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麦迪逊借到了托马斯·潘恩刚刚在英格兰出版的《人的权利》的第一部分，他看完后又给了杰斐逊。小册子的主人约翰·贝克利是众议院执事，他请杰斐逊读过之后再递送给乔纳森·B·史密斯，一位费城商人。乔纳森的兄弟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打算在美国出版这本小册子。1791年4月26日，在随书夹递的便笺中，杰斐逊简短地使用第三人称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杰斐逊说，他"对于（潘恩的著作）将在这里重印感到非常高兴，终于有人对在我们中间跳出来的政治异端公开直言了。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公民将再次高举起'常识'的大旗"。他这里指的当然是潘恩于1776年撰写的小册子《常识》。

没过几天，杰斐逊翻开新近出版的小册子后发现，他便笺里的话也被一并印刷了。这几句话的意思显而易见：杰斐逊不但是潘恩的支持者，而且他相信，"在我们中间"有"政治异端"在散播。似乎这位国务卿

是在向副总统和财政部部长宣战。

“确实，我当时想到的是，《论达维拉》在芬诺的报纸上连载了12个月都没有人站出来提出相反的意见。”杰斐逊在此事发生之后对总统说，“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公众面前站出来，成为那个反对者。”他告诉麦迪逊，之所以写下那几句话，“是为了不让便笺显得干巴巴的”。

杰斐逊相信，汉密尔顿正紧紧抓住便笺事件不放，把它当作杰斐逊“反对政府”的证据。杰斐逊不能苟同，他告诉麦迪逊，自己的话是“针对政府的敌人说的，就是那些想要改政府为君主制的人”。他还说，他相信汉密尔顿正在猛烈地攻击他：“我有理由认为，（汉密尔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表达这些观点。”而杰斐逊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躲在暗处诋毁他的名声。

把美国建国之初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概括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貌似很有几分道理。对两人各自的拥护者来说，在当时（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讽刺夸大对方的形象是便利的做法：汉密尔顿是个一心建立君主制、诡计多端的标准英国佬，杰斐逊则是个沉醉于过度民主、头脑简单的典型法国佬。当然，这样的简化不可避免是片面的。

18世纪90年代初期，杰斐逊有时会发现自己赞同汉密尔顿（以及华盛顿和亚当斯）的观点，这种情况在随后10年中也偶有发生。因为杰斐逊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相信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中央政府——他在弗吉尼亚任州长以及13州邦联时期的经历使他确信这一点——而且常常主张在必要时展示力量。

然而，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杰斐逊从来没有妥协过。这一信念贯穿了他从1790年直到逝世的大半政治生涯。他忧惧的是君主专制和独裁，这有别于忧惧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尽管常有人认为，在杰斐逊眼中，这两者是一回事。他用来称呼自己对手的一个词——“独统派”——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独统”的意思是“一个人实行的统治”。

杰斐逊感到焦虑，因为他担心王权可能以某种形式复辟，这种形式可能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不受1787年宪法制约的总统，也有可能是一个角色更明确的君主或独裁者。他不反对施用威权，且一直致力于怎样和平、公正地以最佳方式积累和使用威权。出于浪漫的想法，他梦想着一个品德高尚的自由和谐共处的未来；回到现实，他怀疑自己帮助建造的美国不过是以多凌少的暴政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篇章。杰斐逊有一次写信给麦迪逊说：“我们受的是君主主义教育，这就难怪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奉君王为偶像。”

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杰斐逊曾说过：“王室对人民的爱永不改变，就像野狼对羊群的爱。”就连约翰·亚当斯似乎也存在这种担心。他1787年10月写信给杰斐逊说：

> 如果安古莱姆公爵，或者勃艮第公爵，甚至是法国王储本人向您漂亮、可爱的女儿求婚，那么全美国，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都会感到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所有至理名言都被抛诸脑后，甚至我们头脑清醒的新英格兰共和派都会在心里把这一天当作感恩节庆祝。如果华盛顿将军有一个女儿，我毫不怀疑法国或英国王室的某个成员一定会向她求婚，或许两国都会提出婚约；如果他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一定会被邀请到欧洲挑选一位妻子。

亚当斯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贵族家庭之间联姻只会带来麻烦，美国会因此重蹈旧世界的覆辙，延续旧世界的陋习。“简言之，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不屈不挠、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到了下一代就会毁于一旦，仅仅是因为某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名字的人的虚荣和纨绔念头在作怪。”

威胁国家安全的传闻不时从美国西部和英国王宫传来。前者诸如“西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正迅速滑向危机边缘，必须即刻寻求西班牙或英国的保护”，自称“一位肯塔基绅士”的詹姆斯·威尔金斯在1789年写道。后者诸如“一种对我国根深蒂固的厌恶正在宫廷中不断滋长。如果无须全面开战或惊动内阁就可以惩治我们，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早就重新展开了，即便这样做只是为了平息国王的怒气”，美国律师约翰·布朗·卡廷1788年8月从伦敦写信对杰斐逊说。

1793年6月，一位美国军事副官皮尔斯·达菲，在尼亚加拉与英国陆军军官、上加拿大省督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进行了会谈。皮尔斯在他的报告中回忆说，西姆科曾问他，“美国人民还像从前一样支持华盛顿将军吗？还是像我了解的那样，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英国政府的管辖”？

要理解作为内阁成员、副总统及后来成为总统的杰斐逊，有一点需要牢记：他不但对人民一腔热情、对共和推崇至极，而且在他心里，深信各种势力正蠢蠢欲动——可见的和无形的势力、国内的和国外的势力——企图通过重新建立神职人员、贵族和君王的统治破坏人的权利。他之所以反对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英国人和金融投机家，都是出自这一根本性的关切。

与任何一位卓著的政治家一样，杰斐逊一面致力于追求远大的理想，一面则在主政时擅于应变。他认为，只要自己坚守根本的共和信条，并且得到政坛上下和社会各界盟友的支持（这些人相信他会坚定不移地倡导法治下的民主自由），那么面对具体问题时，一切都可以灵活处理。

一些人认为这是虚伪，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政治智慧。一位政治领导人只要具有核心的战略信仰，那么战术上的灵活多变是颇有裨益的，而杰斐逊对共和制的捍卫正显示了他是一位这样的领导人。即便亚历山

大·汉密尔顿也承认杰斐逊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方式上天差地别。汉密尔顿在1801年曾说：“在我看来，若要真正对杰斐逊先生做出评估，需要一个中和的、而不是极端的价值体系。”

遗憾的是，产生这样成熟的想法不是始于两人冲突之初，而是到了尾声。杰斐逊和他所谓的独统派（独统派则视杰斐逊为美国的雅各宾，认为他恨不得在费城竖起一座巴黎的断头台）之间的较量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兴趣，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却能够（而且确实）不时地合作。即便是在双方水火不容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同一个内阁供职，在同一张餐桌用餐，同样在美国政坛这个紧密的圈子里活动。手足之间时常爆发战争，正如杰斐逊与联邦党人长达十来年的斗争所表现的那样，家庭内部的战斗是最为残酷，也是最令人眼花缭乱的。

1790~1791年，在圣多曼格岛（今海地），奴隶和他们的自由民盟友起义反抗法国奴隶主。这场血腥的战事后来持续了10年以上。法国大革命让岛上的黑人奴隶看到了希望，他们要通过斗争赢得《人权宣言》中宣称的自由权利。

对美国的奴隶主来说，圣多曼格岛的战争似乎让他们瞥见了美国黑奴大规模反抗的未来。许多白人逃离了该岛，这引起了杰斐逊的关注。“圣多曼格岛逃难者（尽管他们都是贵族）的境况值得我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他写道，“人类历史上还未见过如此惨痛的悲剧。……我更加确信，整个西印度群岛都会落入有色人种的掌控之中，早晚所有白人（会）被赶走。”对杰斐逊来说，对待这场起义最可取的方法，是把它当作一次警告。他说：“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血腥的场面未来肯定（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甚至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我们应该竭力避免这一灾难。”整个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奴隶主都在担心，以圣多曼格岛为引火线，国内会爆发一场蓄势已久的奴隶战争，黑奴很有可能得到圣多曼格岛黑人的直接帮助。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于1802年向伦敦报告说，人们的担忧日益加深，“每当出现岛上黑人首领获得胜利的报道，都会引发美国的黑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

随着时间推移，杰斐逊开始感到，圣多曼格岛有可能成为他为美国的奴隶寻找的庇护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当他站在国务卿的战略制高点观察圣多曼格起义的时候，他没有料到图桑–卢韦蒂尔领导下的黑人的胜利，将给法国在新世界的势力以致命一击，而巴黎有一天会重新评估其在美国边界上的战略抱负。

1791年的部分时间里，华盛顿巡视了南方各州。“我今天写这封信就如同守夜人打更一样，不过是为了证明他还醒着，并且诸事安好。上个星期几乎没有任何国外或国内消息值得您关注。”杰斐逊1791年5月1日写信向华盛顿报告说。

杰斐逊和麦迪逊也打算出一趟门，前往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部分地

区。这一地区是联邦党人的地盘，两人的政治对手都紧盯着他们的行动。杰斐逊和麦迪逊声称，他们此行是为了考察植物，杰斐逊还对小麦瘿蚊特别感兴趣。

这次旅行既有科学目的，也有政治目的。两个弗吉尼亚人在纽约市短暂逗留期间——杰斐逊住在比克曼街——会晤了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和参议员阿伦·伯尔。他们还与菲利普·弗雷诺见了面，弗雷诺是一位作家，麦迪逊早在普林斯顿时就已经认识他了。两人想请他创办一份报纸，用来对抗亲汉密尔顿的《美国时事报》。起初，弗雷诺拒绝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邀约，并于1791年10月31日出版了第一期《国家时事报》。杰斐逊后来聘用他为国务院的一名翻译员，让他得到了国务院的资助。

聘请弗雷诺是新生的民主共和党迈出的关键一步。通过创办报纸，杰斐逊扮演起了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在随后的几年中，众议院执事约翰·贝克利逐渐成为民主共和党最出色的战略家，帮助组织策划了多个政治行动，在反对联邦党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杰斐逊有一次曾说，那些“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将“同胞高涨的热情”汇聚起来，并导向“团结与成效”。这正是民意领袖的任务。

杰斐逊于6月中旬踏上了南归的旅程，麦迪逊则留了下来。1791年7月，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生动地捕捉到了当时纽约的城市氛围：“这里没有新鲜的话题。实际上，所有人嘴里谈的都只有股票投机，咖啡馆里成日里聚满了赌徒。”

杰斐逊在费城仍没有完全安顿下来。这并非易事：他的行李散落四处，从法国到费城，再到蒙蒂塞洛。“你之前提到说，有两个抽屉送到了蒙蒂塞洛。”他写信给波莉，“我的两副象牙象棋在抽屉里吗？我在费城的行李里遍寻不着。”

1791年8月13日星期六，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私下里就亚当斯和由《论达维拉》而生的政治风暴交换了意见。据杰斐逊所述，汉密尔顿表示说，尽管他个人相信一个英式政府会更加稳固，但“既然我们走上了试验的道路，那么不论我的期望如何，都需要给这条道路一个公平的机会”。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是出于政治考量。他在提到汉密尔顿方案时曾说：“不管这些措施在理论上的对错与否，都必须更多地关注广大民意。”在纽约时他曾询问利文斯顿：“选区的选民对我们政府的种种举措，是否真像他们的代表所称的那样满意呢？”杰斐逊还指出：“在南方，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扩散、加深，天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我对此感到忧虑。”

他还担心着立法机构的腐败——立法者在经济上和汉密尔顿的证券与银行股票体系牵扯不清。杰斐逊认为，这样的金钱关系虽然算不上是

公开的贿赂，但确实营造出一种国会和财政部相互关照的有害氛围。这种微妙的“腐败”形式让杰斐逊感到不安，他把这看作汉密尔顿及其盟友操控政府大方向的手段。而杰斐逊从来都不愿看到的，就是操控大权落入他人之手。

第二十五章
两只斗鸡

何其不幸……此刻宿敌和损友环伺，内讧却在攻击、撕扯我们的要害。

——乔治·华盛顿

宴会结束，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围坐在一起品尝佳酿。华盛顿总统此刻人在弗农山庄，他请杰斐逊代为召集副总统亚当斯和几位内阁成员，商讨待决事务。

国事处理完毕之后，谈话转移到了更为宽泛的话题上。杰斐逊的客人个个来头不小——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战争部部长亨利·诺克斯、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而这场国务卿家中饭后闲谈的主戏，便是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的“意见冲突”。

当晚的话题是英国体制的政府。在烛光下，亚当斯表示，在他看来，“如果一些缺陷和弊病能够得到纠正，那它将是人类发明的最完美的政府架构”。

可以想象，坐在那里听亚当斯对一个始终维护世袭权力的国家高唱赞歌，杰斐逊是何等震惊。

接下来，汉密尔顿比亚当斯更进一步，声称“这已经是最完美的政府模式，任何纠正其弊端的做法都等同于建立一个空中楼阁的政府”。在杰斐逊听来，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同时，亚当斯在较小的程度上）更加相信英国体制的政府，而非美国体制。

汉密尔顿席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更加深了杰斐逊的这一印象。杰斐逊在自己居所的墙上挂了启蒙时代大师的肖像，其中有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爵士。汉密尔顿问杰斐逊，这些都是什么人。杰斐逊回忆道：“我告诉他这些人的名字，并且告诉他，他们是我的三位一体，古往今来世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物。”

听了这话，汉密尔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打破了沉默。

“古往今来世上最伟大的人物，”汉密尔顿说，“是尤利乌斯·恺撒。”

这个晚上就这样结束了，杰斐逊不禁思忖起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两人之间的差别：“亚当斯先生做人、为政都诚实正直；汉密尔顿做人亦是如此，却相信为政时，需要借助武力或腐败。”

两人在华盛顿任总统的风云年代里都不是杰斐逊的盟友，分别代表了杰斐逊认为让人担忧、令人不安，甚至危险的势力和倾向。

1792年2月28日星期二的午后，杰斐逊眼看要迟到了。他原本希望能在3点总统对外接见访客之前拜会华盛顿。这次面谈对杰斐逊来说事关重大——他提出改进邮政服务，建议“将驿骑的速度翻一番”，从现在的每天50英里提高到100英里——却因为种种其他事务而耽搁了。

终于见到华盛顿之后，杰斐逊急急忙忙道出自己的提议。他解释说，邮政局应该归属他的国务院管辖，而非汉密尔顿的财政部，因为“财政部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足以把一切行政权力吞入腹中”。

这件事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杰斐逊说，因为他打算在华盛顿任期结束时就辞去国务卿的职务。他对总统说，他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寻求“建立稳固的秩序”。

华盛顿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叫去接见下午的访客了。临走前他问杰斐逊明天早上能否与他共进早餐。

杰斐逊回答说可以，而且第二天准时赴约。早餐过后，两人复议了邮政问题。接下来，总统又将话题转回到杰斐逊前一天提起的更宽泛的话题上来。华盛顿说，他打算在四年任期届满后卸任，既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年纪大了”），也是因为免得让人以为他贪恋权位（“如果他继续留任，可能会招来话柄，说他尝到了总统职位的甜头之后便舍不得引退”）。不过，总统企望内阁成员不要仿效他的做法，他担心“这可能会在国民中引发震荡，造成危险的后果”。

杰斐逊含蓄地提到了击退敌人后随即辞官务农的古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归因于时代的机缘巧合。“我对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不情愿担任公职：当年形势危急，战争迫在眉睫，人民的一切辛苦经营可能付诸流水，凡我国民莫不应该为国鞠躬尽瘁，所以我才出任弗吉尼亚州长”，而且自那之后，他两度谢绝外交任命，直到“丧亲之痛……令我想到，离开一段时间，换个环境，对我来说可能是合宜的”，这才接受了驻法使命。

这个深冬的上午，望着眼前的总统，杰斐逊可能感到了一种无须多言的同志情谊。在与联邦党人的斗争中，他尽心尽力，也已感到疲倦。总统鼓励他在这个高位上继续干下去，无疑是对他个人的一种肯定。

这两个弗吉尼亚人既有着相仿的家世背景，又经受了相同的革命洗礼，在抵达人生顶峰的时刻，他们停下脚步，回顾来时的道路。不论多么短暂，在这一刻，两人是相互坦诚的。他们向对方倾吐的这些关于壮志、义务和权力的话，也是他们想对自己说的。两人都希望自己留给世人的印象是超脱党争、远离政治的钩心斗角的。

在这个充满了真挚友情的时刻，华盛顿向杰斐逊吐露了自己的忧

虑，杰斐逊则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华盛顿说，政府“在初始之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可是……不满的情绪近来正不断加重，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如果政府发生剧变，这种不满情绪会发展到何等程度，实在难以预估”。

杰斐逊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直言不讳且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依他之见，“这些不满情绪只有一个源头”：汉密尔顿的财政部。

杰斐逊说，汉密尔顿“没有金银打底就大量印发纸钞的行为正在压垮这个国家”，这样做只会鼓动投机，阻碍“其他有利的行业”的发展。杰斐逊还对华盛顿说，他相信汉密尔顿派的议员“用纸币给自己造起了安乐窝”。

还不止这些。杰斐逊说，他的敌人“现在发起了一项提案，比以往任何提案都更进一步，也必将牵动许多人的视线，因为它最终决定我们的政府拥有的权力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说完这些话之后不久，杰斐逊就起身告辞了。

据杰斐逊回忆，他和汉密尔顿如今“天天在内阁争执不休，就像两只斗鸡”。杰斐逊意识到汉密尔顿是个聪慧的政治家，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赞赏其政治技巧。举例来说，汉密尔顿苦心经营同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的关系。杰斐逊发现，汉密尔顿似乎总是对哈蒙德的想法了若指掌。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一点“证明了两人之间过从甚密。我据此相信，他把我们的所有观点和意见都转达给了哈蒙德，同时也从哈蒙德那里了解到英国宫廷的观点和意见”。

杰斐逊时刻都在担忧，会有人背弃对共和制的承诺。即便华盛顿本人也无法幸免于杰斐逊这些灰暗的想法。一次，谈到众议院能否投票通过为条约规定的款项提供经费时，华盛顿变得不耐烦起来。杰斐逊在1792年4月写道：“他说，他不愿看到事事都交给民主表决，如果（众议院议员）不愿遵照宪法规定的义务行事，那么政府就会终结，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

对杰斐逊来说，君主制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美国革命的豪言壮语——杰斐逊的豪言壮语，他笔端结出的果实——在首都的政治喧嚣声中日益式微。这里不像是共和国的中心，倒像是国王的宫廷。

公债、纸钞、消费税和国会的腐败嫌疑，随着1792年慢慢过去，杰斐逊相信所有这些将有可能导致终极的背叛。杰斐逊对华盛顿说：“这一切的最终目标都是在为政府形式的更迭铺路，从现在的共和制政府变更为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不点名地指出，早在1787年，汉密尔顿便提议建立更接近君主制政体的体制。“制宪大会期间已然议及此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其支持者也毫不隐讳自己的意图。”杰斐逊说，“当时想要付诸现实显然不切实际，可这些人并未放弃目标，正预先为其最终的

实现做好一切准备。”

杰斐逊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在汉密尔顿式金融体系中都有既得利益。它“会在日后成为一件任人利用的工具，用来产生国王、贵族、平民，操控者选择产生何物，就能产生何物”。他对华盛顿说，“拥护君主政体的联邦党人”的目标，是把“新政府仅仅当作一块通向君主制的垫脚石”。

他担心，南方各州为了抗议联邦党人的主导地位，可能会脱离联邦，而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杰斐逊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合众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更无法估量的灾祸了。”一旦北方各州的利益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事态的发展将难以预料。

在这件事上，杰斐逊相信华盛顿能够发挥作用。“整个联邦的信心系于您一人身上。……如果可以依靠您，北方和南方就能够团结在一起。”

再给我们几年时间，杰斐逊说，也许形势就会大为改观。“接下来的一两届总统任期将决定这场危机的结果。您已经把这么多年的时间奉献给了人类的福祉，我禁不住希望，您能够下决心再出任总统1～2个任期。”

1792年6月7日星期四，杰斐逊在华盛顿的宅邸就餐。据杰斐逊回忆，他与同席的约翰·杰伊“临近傍晚时分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世袭还是选举，哪种制度更有可能产生睿智和诚实的公职人员”？杰斐逊拥护民主，杰伊则崇尚贵族统治。

华盛顿在一旁听着两人的争论。“我很高兴总统先生认真听取了这场谈话。这正可进一步证明我在先前信中提到的该党的图谋。”

杰斐逊向拉法耶特吐露了自己的忧惧：“太多证券投机商和国王投机商进入了我们的立法院，或者不如这样说，我们有太多的立法者成为证券投机商和国王投机商。”

对君主制的威胁，杰斐逊忧虑日深，华盛顿则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安抚他。“他承认，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但他不相信，存在以君主制替代当前政府形式的切实图谋。”杰斐逊回忆起华盛顿1792年7月曾对他讲过的话。这实在不是个让人安心的保证。

据杰斐逊所述，到了8月，华盛顿又重新提起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分歧。华盛顿在信中写道：

> 何其不幸，何其令人遗憾啊！此刻宿敌和损友环伺，内讧却在攻击、撕扯我们的要害。……我相信，要牢牢驾驭政府的缰绳，或维系政府使之不致分崩离析，即便不是空中楼阁，亦甚艰难：若衣料量好了尺寸，却不摆上机器缝制，一人扯住左袖，一人扯住右

袖，这件衣服不等试穿，便已撕裂了——在我看来，人类幸福和繁盛的最大期望便将丧失，也许是永远丧失了！

杰斐逊情绪激动地回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言辞激烈地为自己辩白。他对华盛顿的语气变得尖锐——虽然依旧讲究策略，但已露出了锋芒——这是他针对总统8月那封信中含蓄的批评做出的回应。被人指说自己错了，这是杰斐逊的一大忌，因此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在私下场合，我曾断然否定财政部部长提议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坦率承认，并且不怕再次重申。我们的分歧不仅仅是人们的猜测。"

他这是在直接挑战华盛顿。总统在信中表示，应通过实践活动解决意见分歧，杰斐逊则明确回答：不，他和汉密尔顿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触及根本的。他说，汉密尔顿的制度"源自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原则，且经过精心谋算，是要利用他的财政部对立法院议员施加影响，从而达到破坏和摧毁共和国的目的"。

政治斗争前所未有的激烈。杰斐逊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忠诚的斗士，受到野心勃勃、恃强凌弱的财政部部长的迫害。"他擅作主张与（法国和英国的）使节举行会谈，并且……每到议事时，（他）便透露出……这类谈话的只言片语，改头换面，断章取义，为自己的政见服务。"

最后，杰斐逊还告诉华盛顿，一旦自己卸下公职，若有需要，他将保留在"报章笔战"中阐明自己立场的权利："我隐退之后，决不容许自己的声名因某人中伤诽谤而沾染上污点。此人从历史容其登上舞台之时起，便极尽阴谋操弄之能事，不惜颠覆收留他、培养他，而且施予他无限荣耀的国家的自由。"

1792年10月1日一大早，杰斐逊再次与总统会面，这一回是在波托马克河边的弗农山庄。华盛顿仍然希望杰斐逊能够留任。据杰斐逊说，总统"认为我的观点可在内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有利于诸事遵循正确的轨道，不致走得太远"。

在君主制的威胁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上，总统和国务卿再度产生了分歧。华盛顿说，他"认为在美国，其意见稍有分量的人物当中，支持君主制的不超过10个"。杰斐逊的回答是，"人数远比他想象的要多。……我告诉他，尽管人民头脑清醒，可是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派系心中以君主制为念。财政部部长就是其中一员。我曾亲耳听他说，当前宪制像兑了水的牛奶一般寡淡无味，是个不能长久为继的草台班子，唯一的用处就是当作一块垫脚石"。不久，早餐端了上来，谈话到此为止。

对自己左膀右臂之间的斗争，华盛顿采取了理智的态度。他在1792年10月18日星期四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我郑重坦言，两位秉承的观点，我坚信皆出自无私、善意。唯实践能够证明争议诸事的政策的健益。"身为总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处理这件事，华盛顿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既如此，”华盛顿继续写道，“这些美利坚合众国国民中见识卓绝的精英，坚持理想、久经考验的爱国者，内无私心恶念，外守纯良品行，他们何至于各守阵营，搅得风波不息？两位又何至于如此执着己念，竟不容对方一分半点？”

就在华盛顿斡旋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同时，他还在为另一件事头疼不已：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因消费税而起的暴乱。他告诉杰斐逊，该地区的对抗局势现在已经发展得“过于公开、过于暴力、过于危急，政府若再轻描淡写，等同于将权威拱手相让，对可能发生的暴行袖手旁观”。抵制烈性酒税的声浪尤其让汉密尔顿感到不安，他因此起草了一份由总统发布、措辞强硬的公告。在这件事上，华盛顿特意将杰斐逊纳入意见征询程序中，并最终为公告赢得了国务卿的签字支持。总统希望自己的政府对外展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即使这个政府内部仍在你征我伐。

杰斐逊或许确实夸大了君主制的威胁，不过这个威胁绝不是他生造出来的。上加拿大省督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在1792年8月写道：“倘若国会迎纳布伦瑞克王朝的一位亲王即位为总统或国王，则两国福祉从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切妒意烟消云散，两国的持久情谊必成为独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此时正逢华盛顿为消费税公告争取杰斐逊的支持之际。“大不列颠深切关注此一目标，亦为美利坚合众国众多和平人士所希冀。一旦计划系统地付诸实施，各项事宜必将加速促成目标的完满达成。”从友人处听来的消息加深了杰斐逊的忧惧。有人向他报告说，在一次与汉密尔顿的宴后闲谈中，这位财政部部长说：“除了君主制，再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能够获得稳定和保障。”

而汉密尔顿也有其他烦心事。1792年年底，他和一位有夫之妇的私情遭人揭露。这个名叫玛丽亚·雷诺兹的妇人与自己的丈夫詹姆斯·雷诺兹合谋，引诱财政部部长上了钩。据汉密尔顿自己承认，他在玛丽亚的诱惑面前没有多少招架之力。这对夫妇不断敲诈汉密尔顿。最终，不但私情传了出来，而且有谣言说，汉密尔顿在经济上有不正当行为。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小组专门就此事展开了调查。结果认定汉密尔顿确实犯有通奸，但并不存在经济上的不法行为。

1793年年初，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提出决议案，旨在迫使汉密尔顿就某些问题做出解释，而这些问题与他的私生活并无关系。贾尔斯的意图是想更深入了解财政部的财政政策。

联邦党人把这一行动视作对汉密尔顿的党派攻击，他们指称，决议案是由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弗吉尼亚民主共和派系一手炮制的。虽然这份决议案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却很快就不了了之。一份据称是杰斐逊所拟的草案以如下惊人之语作结：“会议经过表决认定，财政部部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渎职舞弊，以国会之见，应请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解除其职务。”贾尔斯最终提交众议院的议案中，并未出现吁请总统将汉密尔顿解职的语句。即使是这样一份措辞相对温和的决议案，最后也未能获得通过。

杰斐逊只在私下里表露出他对此事的失望情绪。1793年3月，谈到贾尔斯的决议案时，他在纪事中写道，只有贾尔斯“和其他一两个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认为决议案事实分明，众议院绝无可能不予通过”。但凡像他一样熟悉众议院的人，杰斐逊说，则对这样的结果毫不吃惊，因为他相信，眼下的众议院是由这样一帮人组成的：“（1） ……银行董事，（2）银行股东，（3）证券投机商，（4）盲信的追随者，（5）不了解（决议案）的无知之辈，（6）懒骨头和老好人，他们了解决议案的内容，也认可决议案的主张，可要不就是懒得审议，要不就是不愿出声当恶人。”

尽管在立法院遭到了挫败，杰斐逊仍然认为，或许就长远来说，这一行动对民主共和党人是有利的。用他的话来说，“通过此事，公众会明白他们面临的巨大危险”。或者不如说，这是杰斐逊一厢情愿的期望。

华盛顿最终同意续任总统，杰斐逊也答应了再留任国务卿一段时间。鉴于当时他在报纸上屡遭攻击，杰斐逊不愿让外界认为，自己是被赶下台的。他的自尊心太强，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他会在国务卿这个位子上一直留任到“之前兴风作浪的人”歇手为止。“等到这些人自己经受风雨之苦，不得不偃旗息鼓，”杰斐逊说，“我的船便会入港靠岸。”

自1792年秋以来，法国的暴力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在1793年9月达到了历史性的顶点：革命党人宣布实行“恐怖统治”，大肆处决那些被视为革命敌人的人。看似没有止境的流血事件为美国的亲英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美国政坛，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一度是众口一词的。“我们全都对法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能胜过我本人的更是寥寥无几。”约翰·马歇尔回忆道，“我真心相信，人类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大革命的成败。”尽管一些联邦党人从一开始就有所异议，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法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美国革命同属一体。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自1792年秋开始变得愈加血腥，美国舆论逐渐分化。特别是在极端分子举起屠刀发动暴乱和清洗，迫使拉法耶特流亡国外，并于1793年1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之后，两派的立场更是泾渭分明。

杰斐逊本人对在巴黎发生的事件抱有复杂的态度，他的许多友人命丧断头台。拉法耶特逃离法国之后，落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保皇军队手中，在欧陆度过了5年的囹圄生涯。然而，杰斐逊把法国的动乱看作共和与专制之间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他相信，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时代的命运。“在这场必要的斗争中，许多有罪的人未经审判便遭处决，更有一些人无辜丧命。”他在1793年1月3日写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中说。接下来，他又写道：

> 我对无辜者的殒命深感痛惜，并且至死都会将他们中的一些人铭记在心。然而，我哀悼他们正如我哀悼战死沙场的将士。……全

> 世界的自由均系于这场斗争的胜负。自古以来，如此崇高的目标，岂是这么一点儿无辜者的鲜血就能够换来的？我为因这一事业牺牲的烈士悲恸不已，可是，与其事业失败，我宁可半个地球化为焦土。每个国家即便只剩下亚当和夏娃，只要他们是自由的，也好过眼下的光景。我向你倾吐内心的观点，是因为我真切知道，我们的公民中，100个里有99个和我一般看法。

杰斐逊表达这番夸张言辞的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依旧在美国政坛上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对杰斐逊来说，支持法国大革命等同于表明自己是民主共和党人，是自由的朋友；反对它，或是对它持保留态度，则意味着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是自由的叛徒。

不过，他对当时政治气氛的描述倒也并不是不着边际的。就在1793年1月29日星期二，波士顿的亲法国团体宣布将举行集会，声援法国的革命者，公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法国盟友在当前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光荣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许多市民迫不及待想要庆祝……为此，他们愿意宰杀一头公牛，并且供应美酒。"

1793年2月，华盛顿向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是否愿意考虑返回巴黎担任大使1～2年，为美国在法国的利益代言。杰斐逊拒绝了总统的提议。

华盛顿在回复中对杰斐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统说，杰斐逊"再三敦促"华盛顿"续任公职"，（现在）轮到自己身上，"却拒绝做出相同的承诺"。

杰斐逊见招拆招。他写给华盛顿的信言辞恭维、谦逊，但不难看出，他决心已定："我对他说，两件事截然不同。他一身维系全美人民之信任，除他之外，再无旁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续任与否至关重要。我的情况则不然：我如果外放，不会牵动人们的视线，除我之外，随手拈来，皆有良选。因此，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可以任意而为。"

华盛顿只好让步，冷淡地要求杰斐逊"慎重考虑此事应如何安排"。这件事于是到此为止了。

在这个全美国最得人心、最有权势的人面前，杰斐逊如愿以偿。他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既彬彬有礼又讲究实际的态度：一方面赞扬了华盛顿；一方面又指出，比起在法国，自己在美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当前的事务。他的论点是强有力的。

违拗乔治·华盛顿不是件轻易能够办到的事。但杰斐逊巧妙地运用了策略，在明确表达自己意愿的同时，由于他话语恭谦，反而让华盛顿无从反击。这件事突显了杰斐逊的政治形象：他能够在不动声色间不容反驳地达成目的。他不会咆哮怒吼，也不会浮华虚夸，他的言辞如和风细雨，可他的意志毫不动摇。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风暴

我同情你的处境，可你必须挺过去。于公于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要求你再做出一段时间的牺牲，推迟退隐蒙蒂塞洛的打算。

——詹姆斯·麦迪逊对托马斯·杰斐逊的劝解

在弗吉尼亚州坎伯兰县的阿波马托克斯河畔，有一座叫作比怪的种植园，园主名叫理查德·伦道夫。看姓氏也知道，此人是杰斐逊的一位远房表亲。1792～1793年，发生在这里的一起事件引发了诸多的揣测和漫天的流言蜚语。这件事性质之残忍、恶劣，即便是杰斐逊本人，也难以泰然自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一个妹妹（也就是杰斐逊的女儿帕茜的小姑子）安·卡里·伦道夫，与自己的姐夫理查德·伦道夫私通，并且怀了孕。在和姐姐、姐夫到邻近的一座种植园做客期间，安（大家都叫她南希）生下了死婴（不过也有可能是她流产了）。死婴当时被拿到野外处理了，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这件事迷雾重重，引人遐想，因此很快就传扬开来。理查德·伦道夫被控弑婴而出庭受审，不得不聘请包括约翰·马歇尔、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律师为自己辩护。

发生在弗吉尼亚的这一恶性事件打破了当地和谐安宁的生活，这不禁让杰斐逊想到，自己身在首都，和谐安宁是多么鲜见。他写信给女儿帕茜，竭力劝她对四面楚歌的亲友要宽容体谅："在他人最需要深情厚谊的时候，切不可吝啬相与，也不可为了明哲保身，不愿对溺水之人伸出援手。"杰斐逊笃信个人修养，并且认为，越是遇到急难关头，个人修养的作用越是重要。他在费城欲求和谐安宁而不得，时时刻刻都受到考验。

华盛顿第二届任期的就职典礼日益临近，可国家的改革依然不见迈出关键步子的迹象。在一次商讨总统宣誓仪式的小型会议上，亨利·诺克斯的焦虑情绪终于爆发了。"在讨论的过程中，诺克斯一直坚持要举行游行仪式。他突然变得非常激动，大声宣称，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能完全改造，那么不出10年，必定分崩离析。"杰斐逊写道，"他说，当前的这个政府在他眼里一文不值。维系这个政府的，不是明文的宪法，而是华盛顿总统的个人魅力。"

在一封并未寄出的信中，纽约州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 利文斯顿写道，他希望杰斐逊不要因为1792～1793年遭到的攻击而辞职。利文斯顿

说，杰斐逊不应“表现得像个被革除出部队的军官。因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将军的职位出现空缺，你将被擢升为大军的统帅”。他还把杰斐逊在华盛顿内阁中任职称作“打入了敌方的阵营”。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792年9月，汉密尔顿在《美国时事报》上刊文称：“杰斐逊先生……在世人眼里是温和、谦逊、与世无争的哲学家，朴实无华、无欲无求的民主共和党人。他当然不会贸然自毁形象，让人视自己为耍弄阴谋诡计的煽动家、野心勃勃的捣乱分子。”

1792年年末，杰斐逊搬出了费城市区，迁居至斯库尔基尔河畔。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家里的消息。“你一定得把蒙蒂塞洛的点滴新闻都写进信里告诉我，我在世上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些了。”他在信中对家人说，“我栽下的小栗子树长成什么样了？你的花园现在是何种景况？果树都开花了吗……

对每天绷紧神经的杰斐逊来说，蒙蒂塞洛的回忆是生活中的一个慰藉。他和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常常在思想上无法达成一致。这里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例子：杰斐逊有时会为总统拟好信件，再由总统签名。他在信中用到了“我们的共和国”这样的说法（比如，“贵国派驻我们的共和国的全权公使”）。

据杰斐逊说，华盛顿有一次告诉他，“我们的政府无疑是一个共和政府，不过这个称谓不应如此使用。他确信，想要建立君主国的只是极个别人，全美国没人比他更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一种改变。不过他不担心这个，他的忧虑来自另一方面：国家面临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一更大的威胁”。

不管怎样，可以说华盛顿那时的心情很糟。“诺克斯转述了几个小小的传闻，惹得总统大动肝火。”杰斐逊回忆道，“其中一件事是金先生告诉他的，金先生本人是听一位女士说起的，而这位女士又是听一位先生说的：总统先生和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没有本质区别，很快就会被人民赶出费城。”

杰斐逊相信，正是汉密尔顿一派在背后捣鬼。他们假冒民主共和党人，撰写文章大肆批评总统，其目的就是要使总统陷入孤立，“让总统相信，民主共和党是他真正的敌人，如此一来，他的天平便会完全倒向独统派一边”。

在杰斐逊面前，华盛顿提到了弗雷诺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此事让他深感不快。“他显然心烦气躁。”杰斐逊记述道，“我猜想，他是希望我向弗雷诺施加压力，或许解除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的译员职务。而我决不会这样做：在我们的政府向君主制飞奔而去的时候，正是靠了他的报纸才挽救了宪制。”

杰斐逊不愿退让。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这位国务卿一如既往地拒

绝妥协。

1793年上半年，旧世界的战争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2月1日，就在路易十六遭处决11天后，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宣战。华盛顿决心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杰斐逊对声明草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声明中流露出汉密尔顿式的亲英论调。

中立声明同时还引起了一些民主共和党人质疑行政权力是否过度扩张。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说：“还有人提出疑问：宪法是否允许行政机构在美国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表明倾向？……决定战或和的权力……归于立法机构。”

华盛顿表现得太像一个国王了吗？詹姆斯·门罗认为，这份中立声明“是违宪的、不恰当的”。

总统对外界质疑中立声明的声音十分敏感。在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华盛顿特意提到，他在一份草稿中就用到了“中立”这个词，“当时我们并未对这一措辞提出反对”。即使是在用餐之后，华盛顿仍然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杰斐逊回忆说：“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总统动辄发怒，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华盛顿对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各种争吵深感厌倦。1793年11月，内阁讨论是否该由总统提议创办一所军事学院。华盛顿断然拒绝，因为“尽管可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也不愿引发任何争论和批评”。

然而，争论和批评不以华盛顿的意志为转移：法国使节埃德蒙－夏尔·热内的即将到访在国内又掀起了一阵波澜。汉密尔顿认为，此时不宜以官方礼仪接待这位法国人，由此引发了“疑虑重重、麻烦不断的漫长商讨”（杰斐逊语）。

杰斐逊希望能够热情地公开欢迎热内，以此显示美国民众对法国的广泛支持。结果没想到，热内的到访简直是一场灾难：他不但侮辱了华盛顿，而且其言行举止引发了普遍的反感。不过，这里面不仅是个性冲撞的问题：这位使节试图组建一支私掠船队，这就公然违反了华盛顿的中立声明。据杰斐逊说，热内“头脑冲动、脾气火爆，凭空妄想，毫无见识，笔端和口头不但对总统大不敬，甚至出言粗鄙……他让我的处境极其难堪”。热内的确陷杰斐逊于两难，因为他向杰斐逊吐露了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煽动叛乱。杰斐逊决定保守秘密，因为热内这番话是对“杰夫（杰斐逊昵称）先生，而不是对国务卿”说的。

在汉密尔顿的推动下，1793年8月，内阁决定促请法国政府召回热内。杰斐逊视这一结果为必然，汉密尔顿也就赢得了这一仗的胜利。杰斐逊写信对麦迪逊说：“如果不把他赶下台，他一定会凿沉共和国这艘船。”

麦迪逊能够感觉到，杰斐逊在国务卿这个位子上越来越坐不住了，但他劝说杰斐逊坚持下去。杰斐逊不同意自己这位老朋友的看法。他在1793年6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尽忠尽职地为国民服务，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经过了25年的公职生涯，并经历了革命、战争和内忧外患的脆弱和平，杰斐逊感到疲倦。他说：“我体内血液的流动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翻涌的节奏。”

在灰心丧气之中，他把自己的烦恼和无力感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劳心劳力。心里明知道这些努力不但折磨自己，而且无益他人，仍然单枪匹马与一支大军进行绝望、永恒的斗争，这支军队正在系统地破坏公众的自由和富足。”他接着又说，他“献出自己热爱的所有，换来自己憎恶的一切。眼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表示一丝一毫的感激；眼前既得不到快乐，将来也见不到希望”。

斗争无止无尽，胜利遥不可及。詹姆斯·门罗写信来说，他担心美国“正被一群心怀歹意的君主制拥护者撕成碎片”，这更加深了杰斐逊的忧虑。

就在此时，杰斐逊听到一个传言，说如果出现杰斐逊一派主导政府的情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联邦党人鲁弗斯·金、威廉·史密斯“已经为自己在英格兰铺好了一条后路”。消息的来源“没有说明，这条路是他们主动铺好的，还是英国人告知他们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可大胆行事，阴谋策划政府改弦易张；如果失败了，不得不撤退，那么像阿诺德……一样，英国有一份酬金在等着他们”。

在纽约，民众中出现了对联邦党政府不满的迹象，起因是出现了许多被称作“民主–共和社团”的团体，并且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团体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领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新移民。然而，民主－共和社团宣扬共和主义和贵族威胁的言论激怒了华盛顿。一次内阁会议上，当亨利·诺克斯提到民众对总统的批评时，总统终于发了脾气。据杰斐逊回忆：“总统大发雷霆，无法自控……他不怕与天底下任何一个人当面对质，其任职以来所做的哪一件事不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以上帝之名，他宁愿进坟墓也不愿当总统，宁愿农耕度日也不愿君临天下。可竟然还有人指责他想当国王！”

会议不欢而散。

杰斐逊决心退隐。是时候做出战略性撤退了。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能否赢得更大的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华盛顿不愿看到杰斐逊递交辞呈，他于8月拜访了杰斐逊在斯库尔基尔河河畔的宅邸。

总统心事重重。而汉密尔顿也想辞职，这让华盛顿感到，他正失去对政府的掌控。他提议杰斐逊留任到下一期国会结束。杰斐逊拒绝了，他委婉地表示：“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上，浑身都不自在。社交礼仪迫使我不得不在一成不变的圈子里活动，而我心里知道，这个圈子里的人，这

些有钱有势的贵族、与英格兰唇齿相依的商人、（还有）靠证券投机起家的暴发户，都对我深恶痛绝。”

总统回答说，“我们所拥有的宪法是极好的，当前的要务是维护它。可能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党派，他们试图改变我们的政府，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是，他全心全意地发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比他更加坚决地站出来反对”。

杰斐逊对华盛顿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他还头脑清醒，就不会怀疑您对共和国的忠诚。然而，我们三天两头听到拥护君主制的党派在叫嚣，宣称我们的政府不过是兑了水的牛奶，是无力自给的草台班子，必须将它彻底推倒，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府。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居然拿不出实据来反驳。”

杰斐逊提出任命一位临时国务卿，过段时间再转而委任此人为财政部部长。华盛顿表示反对，他认为，“人往高处走，一旦坐上国务卿的位子，再想让他担任级别稍低的财政部部长，就没那么容易了”。

1793年夏末，费城爆发了黄热病疫情。“疾病已经传播到城里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传染性很强。”杰斐逊写道，“起初，4个病患里面就有3个丧命，现在，死亡率降到了1/3。患者先是头痛、肚痛，接着轻微发寒，再下来转为发热，呕吐物和粪便呈黑色，2~8天内可能死亡。”（一位求职者甚至试图借着疫情为自己捞到好处：“眼见此次疫情夺去各阶层、各行业众多无辜者的性命，不禁忧心如焚，深感悲伤。在下猜想，必定有一些公职空缺。因此缘故，特向阁下自荐。若得一官半职，必在此位上尽职尽忠。”）

杰斐逊不忘嘲讽汉密尔顿。“据说汉密尔顿染上了黄热病。”杰斐逊写信告诉麦迪逊，“前天晚上，他把两个大夫请到自己家里。他的家人担心他有性命之虞。照我看来，不过是他过于惜命，小题大做罢了。……此人乘船、骑马、患病，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他军中英勇的名声若是货真价实，倒真是天下一大奇闻。”

杰斐逊如此在意公众舆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甘冒染病的风险：“我想过暂时离开此地，因为我认为危险确实存在，但……我不想表现出恐慌。”

1793年12月31日，杰斐逊正式向华盛顿请辞，华盛顿则在新年的第一天接受了他的辞呈。总统表示，他对杰斐逊的决定“深感遗憾”。两人都极为看重名声，因此华盛顿对杰斐逊任期内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值君离任之际，一定容我表达钦佩之情。你的忠诚和才能……尽显于本职岗位，完全不负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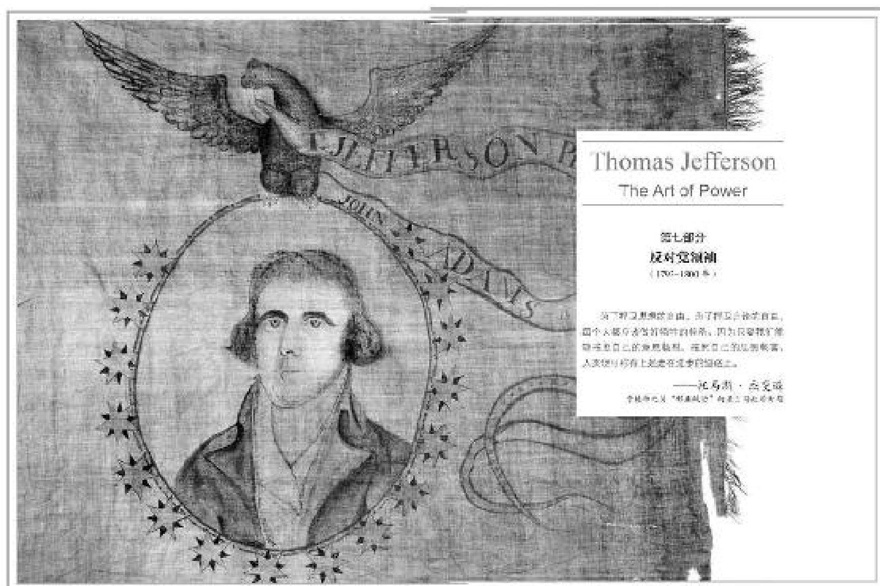
华盛顿的临别祝福是热切的：“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祈愿，祝君在退隐生活中找到幸福之源。”

杰斐逊开始打点行装，他告知自己的知交和信友："里士满是距我最近的港口，往后的信件和包裹最好都寄到那里。"

人们纷纷猜测，他这次退隐会持续多长时间，没几个人相信他会永久隐居。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霍拉肖·盖茨听闻这个消息后就认为，杰斐逊的退隐很可能不会长久。他从纽约玫瑰丘给杰斐逊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杰斐逊此次离任"荣耀载身。民众深怀感激之情，某一天或将迫使你不能不放弃闲适生活，再度为国效力。因此，切不要匆忙许诺，以免落得跟其他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最终自悔食言"。约翰·亚当斯则言简意赅，仅仅感叹道，政治植物在不见阳光的地方长得多么茁壮啊！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友谊始于近二十年前，却未能经受住时代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了政治角力的牺牲品。1794年1月6日星期一，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杰斐逊昨天离开了。就像丢弃一只缺了口的碗，这不失为一件好事。我知道他才能出众，也相信他正直不阿，但是狂热、偏见和宗派观念已经毒害了他的思想。"

杰斐逊提到这次退隐的口气，给人的感觉像是要一去不返了。"再没有任何私人事务能够把我从这片土地上召唤走。政治更是绝无可能，我对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深恶痛绝。"他在1794年2月3日星期一写给霍拉肖·盖茨的回信中说，"庄园的生活带给我莫大的欢愉。我先前放弃这份快乐，是因为国家危难，凡天下事，'人皆有责'。"最后这句引自维吉尔。他接下来回到航海的比喻："遇上这样的风暴，所有船员都必须到甲板上待命。如今海面恢复平静，我欢天喜地将航船交给热爱大海的水手。归根结底，我是陆地上的人，不过机缘巧合离开了自己的天然环境。现在我回来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除却航程中结下的友谊，我宁愿把此行的一切见闻都彻底忘记。"

然而，既然杰斐逊把自己在国家舞台上的责任归因于风云变迁，那么，当风暴再度来临的时候，他便没有拒绝复出的理由。不用说，风暴总是会再次来临的。



1800年大选混战中的一幅宣传画。

第二十七章
蛰居蒙蒂塞洛

从清早离开早餐桌后，到黄昏坐到晚餐桌前，我一整天都在马背上度过，甚至常常用过晚餐还会再骑一阵，直到天黑为止。

——托马斯·杰斐逊

“记得好像是蒙田曾经说过：无知是最柔软的睡枕。”1794年2月，杰斐逊在一封从蒙蒂塞洛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拿关乎政治的一切事务来说，我想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因此，我竭力避免与任何政治事务沾边。”从费城回到蒙蒂塞洛的家中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杰斐逊就惊异地发现，不论首都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对普罗大众来说，都是远在天边、与已无干的事。“身在费城的时候，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民众对首都正在发生的事情会如此孤陋寡闻……就如同这里的情况一样。”他对詹姆斯·麦迪逊说，“由此看来……在对他们的政府表示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上，显然人民并无任何能力做出判断，更不用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了。”

从杰斐逊退出华盛顿内阁，到1796年重返国家政坛，与约翰·亚当斯角逐总统，他在蒙蒂塞洛蛰居了仅约两年时间。这段时期是深深契合杰斐逊性格的。在这两年里，发生在英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以及各民主 - 共和社团之间的种种事件，加深了公众眼中联邦党人拥护君主政体的印象，令其形象大受影响，而杰斐逊安居远方的家中悄无声息地发挥政治作用，让自己成为象征共和派希望的一面旗帜。杰斐逊深知，避世的英雄通常都会受到召唤，再度出山。毕竟，不久之前的华盛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美国人民曾经有过一次向一位伟岸的弗吉尼亚隐士求援的经历，他们很可能会再度这样做。

约翰·亚当斯此时仍然担任副总统一职，他于1794年4月送了一本书到蒙蒂塞洛，并且随书附上了友好的问候：“我要恭喜你，能够在种植园享受明媚的春光，远离政治的喧嚣和战争的传言。真希望我这里的春天能和彼处的一样啊！”杰斐逊回信向亚当斯表示感谢：“从前的我每天要习惯性地写上10～12封信，现在的我就像个农夫，把回信的事都推到了下雨天。倘若再遇上其他紧要的事务，回信更是遥遥无期。”可他还是忍不住要就外交政策略表评论：“我的同胞正因饱受英国人的羞辱而煎熬。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既可捍卫我们的信念和荣誉，又可维系和平。我承认，目睹过一场战争已经足够，这辈子再也不想见第二回了。”

这几句话耐人寻味，因为身在纽约和费城的时候，杰斐逊极少提到革命时期的战事。不过，现在回到了阿尔伯马尔县，他大概很难不会回

想起英军的劫掠和暴行。眼前的景物不断提醒着杰斐逊战争的恐怖，他因此对当下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新的认识，这是他整天忙碌于外交事务的时候无暇思考的。阿诺德、康沃利斯、塔尔顿，美国民众并没有忘记这些残暴的英军将领。

亚当斯同样不愿看到战争，他附和杰斐逊的想法，希望能与英国和平相处。在回函的最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很快有一天能和杰斐逊一样，“从‘罗马的浓烟、金钱和喧嚣’[10]中抽身”。

然而，两人都希望看到的和平正面临新的威胁：英国海军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试图摧毁美国与法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航线。英法两国眼下正处于交战状态，英王秘密颁布枢密令，要求封锁这些岛屿，切断（对法国人来说的）利润丰厚的贸易链——而这些贸易绝大部分是由美国船只承运的。美国人同时还担心，英国人强迫施行不平等的贸易条约，鼓动地中海的巴巴里海盗，并且暗地里支持美国边境上敌对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报复策略，以撼动他们整个王国的根本。”一家民主共和派报纸宣称。

乔治·华盛顿为了抵挡国内对英宣战的压力，派遣约翰·杰伊作为特使前往伦敦。曾担任过邦联外交国务秘书的约翰·杰伊现在是美国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斐逊希望，杰伊此行的外交使命“能够在确保我们的信念和权利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帮助我们避免战争”。这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我们当地的好战情绪愈发滋长了起来。”杰斐逊1794年4月写信对门罗说。

杰斐逊在山顶的庄园安居下来之后，想要开始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世界。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决定把房子的大部分都拆了重建，以建造一所更为恢宏的宅邸。由此，最初的蒙蒂塞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后世所熟悉的蒙蒂塞洛。这座庄园总是处在不断的建造和翻修中。蒙蒂塞洛初建的时候，杰斐逊曾写信对乔治·威思这样说：“以房子现在的状况来说，我们眼下和住在砖窑里没什么两样。”没想到多年之后，浩大的土木工程又开始了。

他理想中的房子真正竣工，要等到1809年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不过他看起来再没有比他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更快活的时候了。一位访客曾经评论说：“他花了很长时间完善他的工程。”其实无须赘言，谁都看得出来：毕竟杰斐逊从1768年起就在山顶动工，而过了40年，仍然没有完工。杰斐逊自己也承认：“建筑是我的爱好，建了拆、拆了造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

在蒙蒂塞洛大兴土木的这么多年中，为了满足杰斐逊的需要，沿着主宅东南侧延伸的桑径两边也在不断扩建。根据蒙蒂塞洛史学家的研究，杰斐逊新建了更多奴隶营房，一间熏制鱼、肉等的烟熏室，还有制酪场、铁匠铺、木工坊、洗衣房、锯木坑等。1794年4月，他还在桑径创办了一项新的制造事业：一家制钉厂。在这家厂里，庄园的男童奴每

天最多可以生产10 000枚铁钉。

一位法国友人1796年拜访蒙蒂塞洛时，不禁为杰斐逊对庄园事务巨细必究的娴熟掌控所惊叹。“他觉得指望不上临近的两个小镇，因此每一件物品都是在他自己的农庄里制造出来的。他的黑奴中有木匠、石匠、砖瓦匠、铁匠等。”这位访客写道，“童奴在制钉厂里干活……女奴则负责纺纱，以满足庄园的用布所需。”到了翻修工程于1809年完工之际，主宅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并且新增了两个L形的露天平台。这两个平台是杰斐逊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构想的，它们将平台底下大部分的劳动和生活场所都巧妙地掩藏起来。制酪场、烟熏室和洗衣房都搬到了这里，此外还有厨房、冰窖、贮藏室、马车房和几个奴隶营房。

在这段造房务农的时期，杰斐逊的风湿症频繁发作，令他“被无休无止地折磨”，不过，家人的陪伴为他带来了慰藉和快乐。他在1795年年初的一封信中充满慈爱地提到帕茜的儿子、自己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小杰斐逊好动极了。他的一双小手摸着永远都是冰凉的，像冰块一样，可他就是不愿意穿戴暖和。一整个冬天，他穿着鞋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这边刚给他穿上，一转身他就踢掉了，还把坚果等小玩意儿塞进一只鞋里拎着。这两天我们终于给他和安妮都穿上了印第安‘莫卡辛’鞋。这种鞋是用软皮做的，穿上去不但合脚，而且绑着鞋带。两个小孩子再也没办法把鞋子脱下来了。”

杰斐逊喜欢枪支和马匹，爱好狩猎和钓鱼。他往往给自己的坐骑起些高贵的名字，比方说，我们所知的杰斐逊的第一匹马，名字叫艾丽·克罗克[11]。还有古斯塔夫斯、库库林、大将军、阿尔弗雷德、卡拉克塔克斯、埃塞琳达、银尾、奥拉·穆尔、佩姬·华芬顿[12]、赞加、波莉·皮彻姆。他的两匹拉车的马分别叫罗慕路斯和雷穆斯[13]。此外，还有雷利、塔尔坎、卡斯托、迪奥梅德、布雷莫、威灵顿、特库姆塞和维和士。他的最后一匹马于1820年购得，取名神鹰。

无论留居庄园还是出门在外，杰斐逊都不会放过钓鱼的机会。在弗吉尼亚，他钟爱里瓦纳河上“老河坝下游不远处”的一块垂钓宝地；在费城，他享受斯库尔基尔河畔的钓鱼时光。1791年，他与詹姆斯·麦迪逊在北方的阿第伦达克山区旅行时，特地抽出一天时间在乔治湖上落竿。他在给帕茜的信中说：“湖中水产丰饶，溪红点鳟、湖红点鳟、鲈鱼等，不一而足，令我们在尽兴游玩之际更享受到了垂钓的乐趣。”杰斐逊对尚普兰湖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在他看来，尚普兰湖虽然面积更大，但是“远不及乔治湖令人愉悦。此湖水质污浊，水流暗涌，鲜有猎获”——污浊、暗涌、鲜有猎获，这些不仅是杰斐逊在垂钓时最不喜的，也是他在生活中最不希望见到的。

杰斐逊家中不但收藏有枪支，旅行时也随身携带（有一次，他途经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城时，不慎把一支锁在箱子里的枪遗忘在了旅馆里，不得不写信给旅馆老板）。对杰斐逊来说，狩猎是最佳的锻炼方式。尽管到了晚年时，骑马成为他最大的慰藉和消遣，只要提到狩猎，

他还是常常竭力推荐。据他的黑奴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杰斐逊主要猎杀“松鼠和山鹑”，“老主人不会射杀孵蛋的山鹑”。他是个讲求公平的猎手，在射猎前总是要将山鹑或野兔“从藏身处赶出来”，给它们一个逃跑的机会。他还会赶跑闯进蒙蒂塞洛鹿苑的偷猎者。

杰斐逊的枪支收藏中，包括一支双管猎枪和一整套土耳其手枪，这些手枪的“枪管制作极其精良，长20英寸，我用它们在30码[14]开外射猎松鼠时从未失过手”。在个人是否应该持有枪支的问题上，杰斐逊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1822年写道：“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希望保护自己的农庄免受四条腿的野兽的蹂躏，保护自己的国家免遭两条腿的侵略者的践踏”，都应该“拥有枪支”，并且说：“提到狩猎这项男人的运动和有益健康的锻炼方式，我是大力提倡的。”

通过与（以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友人的书信往来，杰斐逊时刻关注着当前的政治和外交动向。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嫌隙是永恒的主题。美国经济学家坦奇·考克斯当时在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担任助理部长，他从费城写信时提道：“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台面上，两党之间相互攻讦，人身攻击令社交乐趣或是大受折损，或是难以获得。”这封信送达不过一个星期，另一封詹姆斯·门罗的信也寄到了，信中向杰斐逊详述了近期的消息：在杰斐逊贸易报告的相关决议问题上，两派激烈交锋；在国会要求审查古韦纳尔·莫里斯通信内容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参院投票罢免了阿尔伯特·加勒廷——一位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共和党人——的议员资格，理由是他当选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尚未满9年，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份印第安条约得到了签订；当然了，还有埃德蒙–夏尔·热内灾难性的到访。杰斐逊生活的环境虽然相对闭塞，但是各地的新闻却从来没有断绝往来过。

1794年3月，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众议员西奥多·塞奇威克在国会试图推动一项立法，要求新建一支15 000人的军队，并且赋予总统控制海上通行的特别权力。据门罗对杰斐逊说，塞奇威克的理由是，“这项法案将为我们防范外敌的侵略提供支持。考虑到英国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我国的不友好行为，这样的侵略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尽管民主共和党人确实对英国心存忧虑，但他们同时也对联邦党人的图谋怀有疑虑。他们担心，这只不过是联邦党人计划的第一步：这样一支军队日后如果壮大起来，虽说可能起到保卫美国的作用，但也很可能在危急关头成为颠覆宪法的工具。共和国往往因军事独裁而灭亡，而军事独裁者必然需要一支军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定是基于更为深远的目标。”门罗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这支部队的兵力来源不限于任一地区。尽管除去战时之外，这些士兵的地位差不多仅相当于临时民兵，但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他们都算得上是正规兵。……军队的指挥权将归于辛辛那提。”

民主共和党人竭力寻找任何突破口发动攻击。作为入籍法案的一部分，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提出修正条款，要求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声明放弃其原所在国的任何世袭头衔。通过这一做法，杰斐逊派希望能够大大降低移民贵族把旧世界的价值取向带到美国的概率。

作为反击，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众议员塞缪尔·德克斯特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条款，要求蓄奴的移民申报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德克斯特称：“你们要向公众展示我们是世袭贵族，那么我以牙还牙，要向同一批公众展示你们是奴隶贩子。”贾尔斯的修正条款获得了通过，德克斯特则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从这两项动议中，我们对左右当时美国政治的情感因素可以窥见一斑——民主共和党人担心世袭权力日益壮大，联邦党人则忧惧蓄奴主的力量不断增强。

杰斐逊和他的战友一直以来都在忧虑，联邦党人手中掌握的权力会越来越大。1794年秋末，国会召开。在向各位议员发表年度咨文演讲时，华盛顿不仅提到了威士忌暴乱，而且对民主－共和社团毫不留情地进行了鞭挞。

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威士忌暴乱源起汉密尔顿的消费税在农民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抗议活动逐步升级，直至1794年达到高潮，发生了围攻联邦税务官约翰·内维尔将军的宅邸凉亭山这一事件。暴乱者的一个首领詹姆斯·麦克法兰中弹身亡。联邦政府征召了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派往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由汉密尔顿和绰号“轻骑哈里”的亨利·李三世统帅。华盛顿本人还曾一度随军亲征。暴乱分子很快就溃散了，但是华盛顿却在心里认定，这一暴力事件与民主－共和社团的政治煽动脱不了干系。因此，他在1794年对威士忌暴乱和这些社团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到了12月中旬，杰斐逊写信给威廉·布兰奇·贾尔斯，表明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早有预见：“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动作，企图限制本国公民集会的自由、就关切的议题交换观点的自由，以及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表达这些观点的自由，这比我预料的时间提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杰斐逊认为，政府不仅是在试图镇压宾夕法尼亚州的叛乱，同时也是在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自由。他直言不讳地对麦迪逊道：“独统派胆大妄为的举动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此次对民主–共和社团的指责便是一例。”威士忌暴乱造成了什么真正的危害吗？对杰斐逊来说，几乎是不值一提的。他在1794年12月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抗议者确实举行了一次集会，就是否脱离联邦征询意见。但是，就某一议题征询意见并不等于确定地表示赞同，更不等于切实地转化为行动。”

杰斐逊深知，民众的吵吵嚷嚷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杰斐逊坐镇家中时，他对事事都要严格掌控的性格显露无遗。他对自己的马匹有着一丝不苟的苛刻要求。他年轻的时候，但凡仆人把坐骑牵到他的面前，他都会用一条细纺白手绢擦拭马肩。如果手绢上沾染了灰尘，那么，他一定会要求仆人把马牵回马厩。只有一切做到最好才合乎他的心意。

他养的马匹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不过，他不喜欢动物有自己的意志。有几次碰上不听话的马，他平常的镇定自若都被丢到了一边。“他

唯一按捺不住脾气发作的时候，是碰上他的马不听命令。每当这种时候，只要马稍有违忤，他都会用鞭子一顿猛抽，直到马乖乖驯服为止。”他的一个外孙后来回忆说。

家里人还流传下来另外两件他大动肝火的逸事，这两次发火都是因为他公然遭到了忤逆。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杰斐逊吩咐家里的一个奴隶去马厩要一匹拉车的马出门办事，可掌管马匹的黑奴朱庇特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拒绝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居然有人违抗自己的命令，杰斐逊勃然大怒：“马上把朱庇特给我叫来。”据家里人叙述，朱庇特受到的这番叱责可不比寻常，简直是一场疾风暴雨，杰斐逊“说话的口气和脸上的神色，无论对是朱庇特还是被吓坏了的旁观者，都永生难忘”。杰斐逊的命令是不容挑战、不可置疑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个渡口。有一次，杰斐逊和他的女儿帕茜乘船渡河。船上的两个渡工之前一直在争吵，开船后不久，两人就要动起手来。据说，杰斐逊“两眼冒出火光”，立刻“抄起一支桨来，挥过两个渡工的头顶，然后厉声呵斥，将这两个人的争吵声压了下去”。杰斐逊手里拿着武器，发出明白无误的命令：“赶紧给我好好划船，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们两个都丢进河里！”

当时在河中央，因为这两个渡工的争吵，他和女儿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杰斐逊掌控住局势，强力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他们真的就赶紧好好划船了。那个高个子怪人在他们头顶上挥舞着一支沉甸甸的木桨，眼里怒火熊熊、脸上杀气腾腾的样子，我想这两个渡工恐怕是不会轻易忘掉的。”杰斐逊的外孙女记叙道。当他的挚爱受到威胁的时候——在这件事中，是他的女儿帕茜——他的真实情感便会流露出来。

美国也是他心中的挚爱，而且他越来越相信，国家的前途正处在危险之中。

“如果你以农夫的身份来探望我，那么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我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内心既迫不及待，但又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年纪已大，很难学会一门新的手艺。”杰斐逊对威廉·布兰奇·贾尔斯道。他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在一封写给老友的信中，他说：“来吧……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喝汤饮酒，追忆青春岁月、过往传奇。”

麦迪逊对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以为然。他在1795年3月写信对杰斐逊说：“你必须做好准备……接受你再固执己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对麦迪逊来说，这个事实的核心是：托马斯· 杰斐逊是注定要谋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的人。

杰斐逊承认自己曾考虑过这件事。他告诉麦迪逊，他的敌人“在报纸上无休止地含沙射影”，说他企图继华盛顿之后成为总统，这迫使他感到，“为了自己的安宁，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这一问题”。他的结论——他在1795年4月写道——是否定的，他不会竞选总统。“我早几年的那点

儿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比起身后的评价，我更看重眼前的名声。”严格来说，这并非他的真实想法，不过是拿来劝慰自己的话罢了。政治人物不能够表现得贪恋权位，因此尽管杰斐逊渴望推动时代进程的意愿甚为明显，他在嘴上也总是要予以否认。

不过，在1795年的这个春天，他嘴上这老一套的抗议倒是比往常更多了几分可信的理由。一方面，他的风湿屡屡发作，长期忽视的庄园和账目事项也让他无暇分身；另一方面，外孙、外孙女承欢膝下，而且很可能在经过了4年之后，第一次能够长时间地维系与萨莉·赫明斯的私情。

当他写信给麦迪逊和其他朋友，告诉他们自己打算永久隐退的时候，他并非是在说谎。他在蒙蒂塞洛找到了安宁和慰藉。只不过，他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与政治仍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从他初次当选弗吉尼亚州自治议会议员到现在，已近1/4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早已和科学、音乐、蒙蒂塞洛一样，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无法选择不对科学或书籍发生兴趣一样，他同样无法选择从共和国的事务中抽身而出。

他需要政治舞台，需要一个能够施展宏伟抱负的天地。这不仅关系到他的身体健康，而且关系到他的自我意识和心灵安乐。“我坚信，要想获得自身的幸福，必须不断地接触世界，跟随世界的脚步前进。任何人倘若失去了与世界畅通无阻的交流，必将因头脑的衰退而饱尝苦果。唯有满足我们好交际的天性，才能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杰斐逊在成为总统之后写给波莉的信中说：“关于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1793~1797年，我赋闲在家的时候，除了访客便再见不到其他人。终于，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对我的头脑产生了危害，其直接的、不可阻挡的结果是造成了社交的障碍。当不得不参与社交活动时，我会感到浑身都不自在。我强烈地感受到与周围世界脱节所带来的影响，并由此认识到，这种影响会产生不合群的、遁世的情绪。如果任由这种情绪滋长，必将饱尝苦果。这个教训让我永生难忘。”

阐发信念，履行公职，为支持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摇旗呐喊：政治不仅仅是托马斯·杰斐逊所选择的事业，而且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尽管有时候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795年6月，他请费城的报社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把你们1794年出版的报纸为我发一份过来”。麦迪逊寄来一份他自己称是“即兴写就的报文”：一本题为“政治评论”的小册子。威廉·布兰奇·贾尔斯表示，“在我前往参加（国会的）冬季会期之前”，要来探望杰斐逊一趟。当年秋天，纽约州的阿伦·伯尔造访蒙蒂塞洛，联邦党人听到消息后，指责这两个人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国会“部署和核准”民主共和党议程。

伯尔的这次造访是短暂的，他只在杰斐逊的山顶庄园逗留了一天。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尽管这年秋天两人的会面只持续了短短数小时，在

随后的12年中，两个人的名字却将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为盟友，后为仇敌。

阿伦·伯尔1756年出生在新泽西的纽瓦克。他的外祖父乔纳森·爱德华兹是著名的神学家、传教士，也是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的院长。伯尔的父亲阿伦·伯尔牧师娶了爱德华兹的女儿伊丽莎白，后来也成为该学院的院长，而伯尔正是在新泽西学院接受了教育。

阿伦·伯尔岁数比杰斐逊小，他面容英俊，谈吐迷人，敢做敢当，雄心勃勃。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当过大陆军军官，后来做了律师，最后成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政治家之一。他娶了西奥多西娅·普雷沃斯特，一位英国军官的遗孀，两人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也取名叫西奥多西娅。

伯尔是纽约州民主共和政治的奠基人。他一步一步攀上政治高峰，先是当选为州议会议员，接着出任纽约州总检察长，又在1791年进入参议院。深谙选举之道的伯尔为杰斐逊的政治事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直到180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杰斐逊认为两人的目标产生了冲突。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下，不论何门何派的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甚至举国上下，都在担心美国可能与英国开战。

约翰·杰伊的伦敦之行不但未能达成杰斐逊期望的结果，而且事实上与他的期望相距甚远：1795年3月7日交到华盛顿总统手里的条约，被认为对英方做出了过多的让步。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试图加强英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这个条约让他如愿以偿，从实质上把两国的经济牢牢拴在一起，并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一场政治风暴迅即刮起，华盛顿遭到了无情的抨击。愤怒的民众当街焚烧杰伊的纸人像，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华盛顿。杰斐逊对这一条约嗤之以鼻，认为它是汉密尔顿派一手炮制出来的，他的立场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1795年8月，杰斐逊在写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信中说："从北到南，人们无不对这一条约口诛笔伐，谴责它不是极端愚蠢，就是极端肮脏。"

甚至8月中旬发生的洪灾也未能转移公众对杰伊条约的注意力。"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任何一份协议能引发如此普遍的不满情绪。"杰斐逊说。

他敦促麦迪逊在报章上撰文，对条约进行鞭挞，因为他担心，汉密尔顿可能会设法扭转公众舆论，赢得支持（他称汉密尔顿是"反共和派毫无疑问的支柱"），并且"在最初的哗然过后，民众的声音会自然而然地归于沉寂"。

杰斐逊在这个条约中看到的，是汉密尔顿通过杰伊的外交活动成功地把自己的主张转化成了法律条文。他对麦迪逊说："还没有哪个党派使

出过如此大胆的伎俩。噢，不用怀疑，这绝对是某党派的花招。他们在众议院未能赢得多数席位，因此便想出偷梁换柱之计，借助参议院和行政权力的力量，把自己的图谋伪装成条约，使之成为法律确立下来。这样一来，原先反对他们的众议院便被缚住了手脚，再也不能对宗主国的贸易设限了。”

尽管如此，条约还是以微弱优势获得了通过。不论是华盛顿本人，还是参议院勉强够上2/3的多数议员都相信，签订这样一份协议总好过与英国开战。

但是条约还面临另外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条约部分内容所需的资金必须得到众议院的批准。1795年12月，在一片批评声中（如“目空一切的暴君”、“践踏法律和宪法的统治者”），华盛顿前往众议院发表他的年度咨文。

这一次，他受到的欢迎大不如前。以彼得·箭猪为笔名的小册子作家威廉·科贝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直到本次会期开始的几个月前，即便最恶毒的派系诽谤也不敢公开攻击他的人格。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踏入国会的时候，未能得到在座每一位的衷心欢迎。”如今他放眼向台下望去，瞧见的一张张面孔都“跃跃欲试，想要阻挠他的政策，为他呈上已经溢到杯口的羞辱之酒”。

即便如此，众议院仍然和参议院一样，不情愿地投票通过了对条约的支持。最终，华盛顿于1796年5月6日星期五签署了该条约。就在华盛顿签字三天之后，麦迪逊写信对杰斐逊说：“（如果众议院胆敢否决条约，）新英格兰各州的大批民众已经准备起来暴动，推翻众议院了。这是贵族主义、亲英主义和唯利主义长期在这一地区施加影响的结果，共和主义如今溃不成军。”毫无疑问，这一回合是联邦党人赢得了胜利。

然而，这一外交和政治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联邦党人推动杰伊条约获得批准的举动反而赋予新生的民主共和党人一个明确的目标，激励他们向这一目标迈进。

他们清楚地知道，应该向何处、何人寻求帮助。

杰斐逊已经在以务实的态度分析现时的政治形势，并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他于1795年10月中旬之后的某次所做的笔记中，概括性地勾勒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杰斐逊写道：

> 在美国，确实已形成了两个政党。它们分别由以下各类人构成。
>
> 组成反共和党人的是：

1.老一代的流亡者和亲英分子。

2.居住在我们当中的英国商人，这些人是我国商人群体的主体。

3.依靠英国资本的美国商人，这些人在商人群体中为数不少。

4.投机商以及银行和公债证券持有人。

5.联邦政府官员，不过也有一些是例外。

6.为了往上爬不惜放弃原则的求官者，这些人为数众多，而且折腾的动静很大。

7.整日里惶恐不安的人，这些人生性软弱惰怠，宁可逆来顺受，也不愿积极进取。

组成合众国民主共和党的是：

1.全美国所有的土地所有者。

2.没有土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工。

后者的总人数与前者相比大概是500：1，尽管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没有如此悬殊，但前者的财富仍然远超后者，而事实上后者还是前者财富来源的基础。尽管反共和党的人数少得可怜，可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了他们势力强大、人数众多的假象。他们全都聚居在城市里，因此随时随地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报社供职，因此把持了大部分报纸。与之相反，务农的人口散布在全国各地，彼此之间少有交流信息的手段。但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并且相信，只要依靠力量和意志，随时都可以一记重拳击垮颠覆政府的阴谋。

杰斐逊对敌人的评估混合着恐惧和骄傲两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对联邦党人心存忧惧；另一方面，他也相信，只要民主共和党人行动起来，便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前者促成了他的危机感，后者则赋予他力量，使他能够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刻坚持奋斗下去。

1795年圣诞节过后的这一天，杰斐逊写信给贝奇，要求订阅他的《曙光报》；与此同时，他还给费城和里士满的其他许多报社主编写了信，提出同样的请求。尽管他从未真正远离政坛，但是这一次毫无疑问，他重新登场了。

杰斐逊从未怀疑过总统权力的分量。他在法国第一次读到宪法草案时，就意识到总统这一职务将是整个政府运作的中心。此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证明了他当时的直觉是正确的。谈到华盛顿在杰伊条约这一议题上取得的胜利时，杰斐逊写信对门罗说：“你已经看到……一个人的影响力远远胜过了所有人。人民一心支持总统，既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相

信自己选出的代表的判断。共和主义不得不放下船桨，将航船完全交托给领航员，依靠领航员为他们选择他认为最佳的航线。”

杰斐逊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1796年6月中旬，大约6个月后，总统选举团便将召开会议，推举华盛顿的继任者。因此不难想象，杰斐逊很可能是在考虑，如果美国这艘航船的领航员是一位民主共和党人，国家的前景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更进一步来说，他自己是否应该担任这个领航员。当时得体的做法是要在是否参选总统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是杰斐逊不久就将做出抉择：他会允许自己的名字被提名，参选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吗？这将是自他在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期间选择“国家高于国王”以来，公职生涯中最重大的决定。

不过首先，他想要亲自向华盛顿本人澄清一些疑虑。事情的起因是杰斐逊在1796年6月9日的《曙光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报道宣称消息来源是中立辩论期间华盛顿分发给内阁成员的一份机密文件。杰斐逊一向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且特别看重华盛顿的评价，因此他决意要说服华盛顿相信，至少他本人没有辜负总统的信任。在他6月19日的信中，杰斐逊凭“一切神圣的事物和所有的荣誉”起誓，向华盛顿保证自己一直将文件“妥善锁藏，绝无泄露”。

1796年初夏的这几个星期中，杰斐逊一直在担心华盛顿可能对自己有意见，因为他知道，不断有流言传入总统的耳中，说杰斐逊私下里对他的这位旧上司不仅有诸多批评，而且极不尊重。为了消除华盛顿对自己可能产生的负面印象，杰斐逊在信中提醒华盛顿，有些人可能“试图在你我之间挑拨离间”，造谣杰斐逊“仍在政治圈子里营营碌碌，暗中挑起事端、策划阴谋反对政府”。

1796年7月，华盛顿写来了回信，表示相信杰斐逊在《曙光报》一事上是毫无责任的。不过他也借机谈到了杰斐逊对本届政府的看法：“既然你已先挑起话题，那么故意遮遮掩掩岂不是显得我不够直言坦荡，甚或枉称朋友：人们告诉我，你言行之间对我多有贬损，与我所认为的你对我的看法相距甚远。”

联邦党人为了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忙着排兵布阵。他们采取的其中一个策略是向杰斐逊的死敌帕特里克·亨利主动示好，支持他竞选总统。亨利表示他不感兴趣。不过，如果亨利接受这一提议，势必在弗吉尼亚州造成分裂，这进一步显示，联邦党人坚信杰斐逊将是他们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

1796年8月，西部地区的议员威廉·科克在信中清楚地表明对杰斐逊的支持。科克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现在则是田纳西州的政治领袖之一。他在信中写道，他本人荣幸之至地“告知您，本州人民一致，衷心期望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下届总统，伯尔先生担任副总统”。

杰斐逊的回答既清楚又含糊：“你向我提到的那个荣誉职位，我是断

不敢据傲拒绝的。然而说实话，人们认为我配当此任，对我来说便已足够，并非定要当真坐上那个位子。”他写信对科克说，因为“我深知，总统一职于任何人的名声都只能招来损害，而绝无增益”。

[10]　此诗出自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著名诗人、批评家贺拉斯的《歌集》。——译者注

[11]　艾丽·克罗克：取自流行于18世纪的一首爱尔兰民歌，内容是关于一位绅士向名叫艾丽西亚·克罗克的女士求爱却遭到拒绝。——译者注

[12]　佩姬·沃芬顿：在乔治王朝时期，英国伦敦有一位著名的爱尔兰女伶名叫佩姬·沃芬顿。——译者注

[13]　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一对双生子，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译者注

[14]　1码≈0.9米。——编者注

第二十八章 就任副总统

每个人都负有为国效力的义务，这一义务与他所获自然与命运的馈赠相当。

——托马斯·杰斐逊

你我都曾见过激烈的争论与政治上的互不相让。然而，激辩过后，纵使政见不同，双方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交谈……然而，今非昔比了。现如今，曾经的至交好友若在大街上遇到，为了避免见面寒暄，都要穿过马路；为了避免触帽致意，都要扭过头去。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爱德华·拉特利奇的信

1796年9月19日星期一，华盛顿公开发表卸任演说，揭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选战的序幕。照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费希尔·埃姆斯的说法，华盛顿的声明是“一个信号，就像帽子往地上一扔，各党各派的参选者听令起跑”。

共和国建国的最初数十年间，总统选举的许多做法在今天看来古怪得很：候选人不会发起竞选活动，他们通过知交或盟友间接放出消息说，已同意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候选名单。政见相同的联盟于是提名自己中意的总统和副总统两位候选人。在大多数州，总统选举人公开表明自己所支持的两个职位候选人，选民投票给总统选举人，就意味着投票给这两个候选人。在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对总统和副总统并未分开投票选举，得票数第二的候选人当选为副总统。

不论现今的总统选战与当时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一个特征是从一开始就保留下来的恒久未变的，那就是候选人之间肆意的相互揭短。

华盛顿的卸任演说发表仅仅10天之后，杰斐逊的政敌便对杰斐逊发起了攻击，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1796年9月29日星期四，《哥伦比亚县镜报及亚历山德里亚县时事报》上发布了查尔斯·西姆斯的一份声明。此人是个联邦党人，也是一位律师，并且还是总统华盛顿的故旧。西姆斯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王子县、斯塔福德县和费尔法克斯县发起竞选活动，希望成为三县的总统选举人，并承诺支持约翰·亚当斯。在9月末的这份声明中，他公然挑战杰斐逊，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西姆斯宣称，杰斐逊不能胜任政府要职，因为他在战时主政弗吉尼亚期间，“逢敌军入侵”而自顾逃离，“公文案册毁于一旦，致弗吉尼亚州州政府混乱，损失惨重，处境艰难”。这样一个怯懦的人是绝不该成为总统的，西

姆斯说，“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料风暴会自何时、从何处来袭”。换句话说，杰斐逊不过是个贪慕虚荣的懦夫，而约翰·亚当斯则是值得信赖、能够坚持在乔治·华盛顿确立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堂堂政治家。

杰斐逊一派立刻给予猛烈还击。加罗林县的约翰·泰勒，一位支持杰斐逊的弗吉尼亚人，公开撰文对西姆斯进行批驳。泰勒在文中重述了1781年英军入侵事件的经过，表明时任州长杰斐逊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更重要的是，泰勒辩驳说，选战必须立眼当下，而不是纠缠过去。这一政治策略此后屡为民主共和党人所用，起到了上佳的效果。他们提出，选战的实质是美国政府今后所走道路之争，是要走向民主共和，还是走向君主专制。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泰勒提到了1794年时任副总统亚当斯和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兰登之间的一场对话。据泰勒称，亚当斯当时说，“若无一位世袭的国家元首、一个世袭制或终身制的参议院，政府难以久立，人民难得福祉”。当年的竞选宣传册上是这样写的：“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共和党人，约翰·亚当斯是一个死忠的君主主义者。”

签订杰伊条约之后，下一届美国总统面临的其中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与法国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风险为原本就如火如荼的选战更增添了几分紧迫感。

秋末的蒙蒂塞洛遭遇了一股寒潮——气温降到了12华氏度（约零下11摄氏度），书桌上墨瓶里的墨水都冻住了——这时的杰斐逊仍在等待着179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鉴于下一届总统将要挑起的重担，杰斐逊说，他倒觉得赢得总统之位还不如当个副总统呢。“在这件事上，没几个人会相信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杰斐逊写道，“就算如此，也不能代表我说的不是事实。我真心希望自己在投票中位居第二。”

汉密尔顿是此次选举中的一个不定因素，因为他既反对亚当斯，也反对杰斐逊。为了不让他的两个政敌当上总统，汉密尔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鼓动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党选举人不要把总统选票投给亚当斯，而是投给亚当斯的副总统人选、南卡罗来纳人托马斯·平克尼。汉密尔顿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麦迪逊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汉密尔顿认为亚当斯“太刚愎自用，当不了这些幕后阴谋家的听话傀儡”。

尽管杰斐逊口头上不断客套地声言自己无心于总统之位，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这场关系个人荣辱的胜负还是很在意的。其中一个证据是1796年12月10日星期六麦迪逊写给他的一封便函。“如果运气使然，最终屈居人下，敬陪次席，你也应当欣然接受。”麦迪逊对杰斐逊如是说。关键就在这“应当”两个字：麦迪逊是杰斐逊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顾问，他一定是知道这位总统候选人对国家最高职位跃跃欲试才提出这样的建议。另一方面，麦迪逊也是在给自己的朋友打预防针：由于汉密尔顿一派在幕后耍弄政治花招，可能会出现亚当斯和杰斐逊票数相同的情况。

这样的话，将由联邦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决断选举结果。

杰斐逊知道，之后在众议院也可能出现票数相同的僵局。他在信中对麦迪逊说：“这是一个宪法未能提供解决方案的难题。”假若他和亚当斯真的面临这种情况，他授权麦迪逊“代表我，衷心表达推举亚当斯先生的愿望。自我们从政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前辈。既然公众的意愿在我二人之间不分伯仲，理应敬他为先”。

随着各州的投票结果陆续报送到费城，平克尼落到了第三位。麦迪逊开始担心，杰斐逊一心希望当选总统，因此可能拒绝副总统之职。他知道杰斐逊看重名声，于是希望借此说服杰斐逊。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既然你已下定决心服从国家的召唤，那么，就交由国家来决定哪个岗位需要你吧。”并且，在总统身边若有一个人能发挥民主共和党的影响力，将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亦有理由相信，你与亚当斯共事可能为他的议事桌带来宝贵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的外交事务方面。”麦迪逊写道。

1797年2月8日星期三，选举人票清点完毕：亚当斯以71票险胜杰斐逊的68票，平克尼得到59票。联邦党人为杰斐逊当选副总统而心有怨言。据称，一位反对杰斐逊的牧师曾祈祷：“噢，主啊！求您赐双倍的恩典给我们的副总统吧，您深知他需要您的点化。”

亚当斯对当选总统喜不自胜。他在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说，他深信“这个国家的使命、精神和蕴藏的力量，世上没有几人比我对它更加了解，也没有几人与它一起久经试炼，心志犹坚”。尽管陪坐次席，杰斐逊也对选举结果感到满意，认为是公众对他个人的肯定。他说：“此次投票的结果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不过这意义仅在于，它是衡量我在同辈国民心目中位置的一把标尺。”

在选举过后的那几周中，天气依旧寒冷，杰斐逊把时间都用来思考当前的政治形势。“我一早知道，在特拉华以北各州，亚当斯先生绝无可能丢掉任何一张选举人票，加上他在自由和公正的南方也有一定的支持者，这便足够了。”他写道，“考虑到公众寄予的信任，我若当选便不会推辞（总统一职），可我在上帝面前发誓，免担此责，我内心充满欢喜。”

他颇具预见性地冷嘲道：“蜜月期总是转眼即过，这放在哪里都适用，出任总统也不会例外。一时半刻的狂喜终将换来经年累月的烦恼和怨恨。”眼前来说，当个副总统无疑是更佳的选择。“此刻绝非觊觎舵轮之时。”杰斐逊说。

1796年11~12月的《康涅狄格新闻报》上，隐约出现了北方各州可能脱离合众国而自组邦联的言论。这些流言蜚语的背后显然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就出在“五分之三条款[15]”，这条宪法条文规定，各州人口数按照自由人总数加上奴隶实际人数的3/5确定，并由此对各州的

众议员人数和选举人票数进行分配。北方各州认为，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南方人借助“五分之三条款”在全国选举中占了不正当的优势。4年之后，当杰斐逊成功赢得总统选举之时，抨击他的联邦党人蔑称他为“黑鬼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杰斐逊正是靠了“五分之三条款”才在大选中胜出的。因此，双方围绕奴隶制的斗争不仅关乎废奴道德问题，而且关乎现实的政治角力：具有讽刺意味，亦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每增加一个奴隶州，这些州的白人就在谋求权位时更添几分胜算。

与政敌在赤裸裸的权力谋算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并非杰斐逊所愿，亦非他所长，他更愿意站在宏观的角度强调国家团结的重要性。他对埃尔布里奇·格里说道：“我们永远都不应背弃我们的联邦，它是泊固定我们希望的最后一把铁锚，也唯有它才能阻止这天佑之国沦为角斗士相互厮杀的竞技场。”

在1796年大选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杰斐逊拟了一封写给亚当斯的信，信中言辞友善恳切。在一通照例的谦逊之词（“我并没有统辖天下人的雄心”）之后，杰斐逊写道，总统一职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倘若亚当斯能够“使我们免于这场会给我国的农业、商业和信誉以毁灭性打击的战争”，那么“荣耀必将归于您一身。彼此相交多年，虽然多有磕磕碰碰，或无意为之，或有意使然，可在我心中，对您那份深厚的敬重之情，一如我们并肩为国家独立而奋斗之时。因此衷心期望您在任期中铸就辉煌，收获喜悦，亦惠及吾辈国民”。

1797年元旦当日，杰斐逊将这封信的草稿寄给了麦迪逊。“我对给亚当斯先生当副手没有一丝一毫的厌恶情绪。”杰斐逊写道，“论及年纪，我是他的晚辈；论及在国会和外交部门的资历，我亦是他的晚辈；即便之前同在华盛顿政府供职期间，我仍是他的晚辈。”尽管如此，他仍想听听麦迪逊的意见：他该不该寄这封信给亚当斯呢？

麦迪逊立刻回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信中洋洋洒洒列出了六大理由，主要是：第一，既然两人之间眼下气氛融洽，“那么就需要掂量，有没有必要为了更进一步地改善关系而冒将事情变糟的风险”。第二，“并非所有人都不情愿在此刻的危机之下受命掌舵，信中所提及的‘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至高愉悦’之类言语，是否会被误解为是对这些人的非议？当然啦，你比我更清楚亚当斯先生的脾气，不过在我看来，他是颇易动怒的。”第三，“必须考虑到在选举中你的那些热情、积极的支持者的微妙处境。此时的任何举动，即便有一分暗示说他们的渴望和努力不合情理，都会被视作一种贬低，是不妥当的。我就知道有些人因为全心全意地投入你的选举事业中，可能已经招来政治上的敌意，或至少是当选总统的不满，他们在此事上甚感不平。”第四，“考虑到亚当斯先生的政策很可能迫使民主共和党形成反对阵线……你此时给予赞美，表示信赖，虽出自私人的关切和情谊，日后若成了握在他手中的书面证供，岂非大失颜面？”

杰斐逊对朋友的相劝深表感激。他决定不把这封信寄出去。

1797年3月2日星期四，杰斐逊到达费城。他一刻都未耽搁，立即拜访了当时住在第四大街弗朗西斯旅店的当选总统亚当斯。亚当斯第二天上午便回访了杰斐逊下榻的临时住处。关上门之后，当选总统随即表示说，他很高兴只有杰斐逊一个人在，两人有很多事情要谈。

亚当斯提到了法国，他对杰斐逊说，他曾考虑过派遣这位新任副总统到巴黎执行一项外交使命，“不过他料想，现在此事已不可行了。因为一旦他本人发生意外，副总统必须代为履行总统职务，这时把人送走，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此外，把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竞争对手调离，等于是为自己清除障碍，这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那么，如果派遣麦迪逊出使巴黎，杰斐逊觉得如何呢？

杰斐逊同意自己此时不应该离开国内，他也表示，他认为麦迪逊不会接受这样一项任命。不过，亚当斯看起来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说即便麦迪逊先生拒绝，他也仍然要任命他。接受与否，全由麦迪逊来担此责任。”

1797年3月4日星期六，在国会厅举行了正式仪式，仪式虽简短，却令人难忘。其时，国会召开短会，宣布进行两项事宜，一是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二是新当选参众议员的宣誓就任仪式。杰斐逊的宣誓仪式在二楼的参议院举行，由参议院临时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宾厄姆主持。

美国的第一位国务卿现在成了第二位副总统。接下来，轮到杰斐逊主持8位新当选参议员的宣誓就任仪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概括性地提及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言辞得体但明白无误地谈到了总统可能的生死问题：“尽管宪法规定，在出现某些意外的情况下，总统职权由副总统代为履行，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衷心地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我不至受召担负更高、更重要的职责。”

但是，在当时两党之间不共戴天的政治氛围之下，杰斐逊的一些支持者认为他的演说是曲意讨好。一位纽约的民主共和党人据说曾这样评论道：“他在参议院做的头一件事是发表一篇趋炎附势、避重就轻的该死演说，公开宣称能够在约翰·亚当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爱国者领导下为国效力，是千载难逢的无上荣幸。这就等于是在对他的朋友说：我已经上位，你们都可以见鬼去了。”

在杰斐逊主持的新参议员宣誓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又重新回到国会厅一楼的众议院，参加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典礼。据亚当斯本人回忆，乔治·华盛顿看上去心情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我想我都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话：‘哈哈！我终于脱身了，你终于登场了！看看我们两个谁最快活。’”杰斐逊认为华盛顿是幸运的，他写信给麦迪逊说：“总统真是好运气，在泡沫要破灭的时候及时抽身，留给其他人背这个黑锅。”私下里，杰斐逊再次声明，他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担任政府的二把手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又不必花费多少气力。”杰斐逊

说，“相比之下，当一把手就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就职典礼两天之后，亚当斯和杰斐逊与华盛顿一起用餐。餐后，新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一同起身告辞。两个人走到街上的时候，杰斐逊告诉亚当斯，麦迪逊不会接受出使法国的任命。

这倒正合了亚当斯的意。这位新总统当天已经同他的阁僚商议过，他派遣麦迪逊的想法遭到了内阁中联邦党人的反对。“他即刻说，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一些人对这项提名表示了异议，他先前确实考虑欠周。”杰斐逊回忆说，“接下来，他开始以诸多借口搪塞，说到最后，显然连他自己都难为情了。我们到了第五大街就分手了：他往市场街去，我沿着第五大街继续往前走。自此之后，他再未就这件事跟我提过一个字，也未就政府的任何政策征询过我的意见。”

约翰·亚当斯治下的美国内忧外患。在此期间，美法两国爆发了一连串的海战，导致美国损失惨重。（亚当斯称之为“与法国的半战争状态”。）作为总统，亚当斯竭力在后世称为“美法准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维持和平，或至少是维持表面的和平。为了能够顺利履行总统职权，他全盘保留了华盛顿的内阁班底，其中包括出任国务卿的联邦党人蒂莫西·皮克林。这一决定后来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内阁官员往往自把自为，不断拖总统的后腿，陷政府于困境。副总统杰斐逊此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同时（悄悄地）构筑和扶持反对亚当斯联邦党政府的民主共和阵线。

回想起1797年3月6日星期一这天晚上与亚当斯的谈话，以及白天的事件，杰斐逊写道：“在这件事上，我当时的看法是，亚当斯先生逢此场合（他的就职典礼），一时激动，忘记了党派之争。他这个人行事一向没有章法，单凭眼前好恶，因此心思一动，决意要不偏不倚地把两党端平。结果到了3月6号星期一，他第一次与内阁碰头，才刚把自己的这些念头抛出来，就立刻被挡了回来，他本人也马上恢复了原先的党派之见。”

亚当斯任总统的这几年，杰斐逊家里的事也是接连不断。1796~1801年，帕茜·伦道夫接连生了三个孩子。1796年，罗什富科公爵造访蒙蒂塞洛，看到帕茜漂亮的妹妹波莉“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不过她芳龄十七，又出落得花容月貌，不消说，很快便会发现，人生在世除了要尽女儿的义务之外，还有更甜美的义务在等着她呢”。波莉来年就嫁给了自己的一个表哥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他们后来有两个孩子。杰斐逊自己于1797年7月11日星期二回蒙蒂塞洛小住。8个月又3个星期后，萨莉·赫明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取名叫威廉·贝弗利，大家都叫他贝弗利。

在当副总统的几年中，杰斐逊对待批评的态度变得达观了。他把批评看作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若想在公共舞台上大展拳脚，必然要忍受批评，就像忍受暴雨或烈火的洗礼。“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

大小报纸演出的道具，供任意人等中伤的靶子。”他写道，“有些人仅仅通过这些动机不纯、言论不公的渠道对我有所认识，便也加入其中，乐此不疲。我一生竭力为公，换来的却是部分同胞的肆意谩骂，可以说罪名古怪、惩罚严苛至极。然而，这些以怨报德都是要承受的，就像身体需经受风暴、烈火等的折磨。”比起在法国或是初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此时成熟、克制了许多，这表明，杰斐逊是能够不断成长、学习的。他可以不喜欢，可他知道自己必须容忍。

同样，他也开始把党派行为看作难免之恶。到90年代末期时，他甚至瞧不起那些自认高于党争的政界人士。在1797年6月写给伯尔的一封信中，杰斐逊这样说：“有些人全然缺乏固定的信仰体系，一时怯懦，一时无畏，就像风吹墙头草，今天倒向共和派，明天倒向贵族派，支持谁全凭临时起意。”

不过，杰斐逊的政治风格仍然是和风细雨的，不是疾风骤雨的；是彬彬有礼的，不是公然对抗的。对自己坚信的事业，他是一位斗士，可他并不亲自上阵厮杀。若在社会辩论中有至关重要的信息需向公众传达，他会发动知交和盟友撰文、发稿、宣扬理念。他几乎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待人，部分原因是弗吉尼亚崇尚优雅礼仪、殷勤待客的文化使然，部分原因则是特意为之，是基于他对人和政治的了解：正面冲突往往徒劳无益。

他曾给自己的外孙写过一封经缜密思考的长信，信中阐明了他对政治的这一理解，以及如何处理与冲突各方的关系。在这封给帕茜的儿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是非对错问题上绝不苟且、行事审慎、待人和善，只有做到这三样，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他接着说，待人和善“就是要在与人交往中，不惜牺牲自己的小小方便或喜好，这点儿损失对我们来说不值一提，却可解他人一时之需；待人和善就是要在与人交谈时，面露愉快、恭维的表情，这样能够取悦他人，他们因此对自己感觉良好，也对我们感到满意。仅仅付出极小的代价就能博得他人的好感，这岂不是太划算了！”他继续写道：

> 遇上别人言语无礼的时候，倘若我们仍然和善待之，他就会恢复理性，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竭力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场的人见了，也只会责怪他的不是，称赞你的大度。不过，谈到在社交场合为人处事的审慎原则，有一条至关重要，千万别忘记：绝不要与人公开争执或辩论。我还从没见过在这种情形下，辩论的一方能够说服另一方。相反，双方越辩越激烈，最后因为出言不逊要拔枪决斗，这种情形我倒见得多了。我们的信念源于自身冷静客观的推论，这或需要我们独处深思，或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辩论中抽离出来，认真听取他人的看法，然后在自己心里不偏不倚地权衡斟酌。就是这一条最重要的原则，让富兰克林博士成为社交界最和蔼可亲的人：“从不顶撞任何人。”

亲英的杰伊条约引发了法国灾难性的反应。本来因为法国的缘故，期望维系与英国的和平，现在却因为英国的原因，可能导致与法国的战争，这就是18世纪最后10年的政治现实。

法国舰船开始虏获美国船只。杰斐逊写道："我想不久就会焚烧我们的海港，劫掠我们的边疆，煽动暴民的叛乱，诸如此类一长串的灾难，任何人这辈子见过一次就绝不会想见第二次。"

美国政坛总是浸淫在一种持续的危机感之中：冲突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不是与这个，就是与那个欧洲强国。不论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会因某一刻爆发的冲突随时改变。社会舆论也深受影响：各党派的编辑发行本党派的报纸，驱动公众抛弃中间立场，只剩下偏激的意见，以及对极端结果的预料。

就在这样一种壁垒分明、剑拔弩张的气氛下，一封杰斐逊于1796年所写的信见诸报端，信中言辞似乎是在抨击华盛顿总统甘当维护英国利益的工具。

1797年5月间由菲利普·马泽伊发表在报纸上的这封信，是杰斐逊前一年写给他的。"我要是说出改奉异端的变节者的名字来，你一定会以为自己的脑子烧坏了。某些人过去在战场是参孙，在议院是所罗门，现在却让英格兰这个娼妇剃去了头发。[16]"杰斐逊在谈及围绕杰伊条约的争议时写道，"简言之，为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很可能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这封信被视作杰斐逊对华盛顿本人及其所谓亲英倾向的攻击，这就等于把弹药给联邦派报纸送上了门。"眼下敌意之盛，我们有生之年都恐难见其平息。"杰斐逊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

至少在这一点上，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达成了共识。在他们看来，对方极端过激、不可理喻的例子俯拾皆是。

联邦党人有杰斐逊写给马泽伊的信为证，民主共和党人耳朵里听到的敌方消息也有一大箩。1797年圣诞节，麦迪逊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亚当斯正利用新一波黄热病疫情为借口，试图推迟国会会议的召开，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力。

与此同时，杰斐逊听到一件关于1792年副总统选举的传闻：当时与亚当斯竞争的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克林顿获得了可观的票数，亚当斯为此大动肝火，曾对人说："这些该死的，这些该死的！现在你们瞧见了吧，一个民选政府是行不通的。"据称，亚当斯最近还说过："先生，绝不能让共和主义出头。"

杰斐逊也听到类似不少关于汉密尔顿的传闻。1797年年末，坦奇·考克斯声称，汉密尔顿曾对他说："'就我来说……我坦承自己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我不反对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来做试验，但是……'云云。"杰斐逊本已对他的联邦党同僚忧心忡忡，这些传闻在此时更是火上浇油。

[15]　五分之三条款：又称“五分之三妥协”，即将美国每州奴隶实际人数乘以3/5，算在该州总人数内。此为1787年美国南北方达成的妥协方案。这一条款在美国南北战争和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后，被废止。——编者注

[16]　据《圣经》所载，参孙为以色列士师，被上帝赐予神力。他不听劝告，娶非利士妓女大利拉为妻，结果受其蒙骗而泄露了自己力气来自头发的秘密，被剪去长发，力量全失。——译者注

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 不，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若要维护自由，政党是必不可少的：真正品德高尚者应当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组建一个政党，倘若敌人企图侵害平等的信条和人的权利，这个政党能够随时随地挫败他们的阴险图谋。
>
> ——杰斐逊的友人约翰·佩吉

新年里，与杰斐逊同住在弗朗西斯旅店的两位众议员——佐治亚州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和马萨诸塞州的汤姆森·J·斯金纳——给杰斐逊讲了一件事，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1787年。据两人描述，“在纽约和东部各州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联盟……其成员或是坚守部分君主制信条，或是受了谢司起义和旧国会无能的惊吓”。他们告诉杰斐逊，联盟的代表“甚至开会商议要武装夺权，建立新的政府。他们互通信件，还派了一位代表去见华盛顿将军，寻求他的支持”。

华盛顿没有参与这项阴谋，与此同时，由弗吉尼亚州倡议的制宪会议召开了。然而，（这一事件中的）君主主义者曾经一直——并且现在仍然——在等着新政府的垮台，君主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

1797～1801年杰斐逊担任副总统期间，政治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一次，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众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羞辱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共和党众议员马修·莱昂，说他怯懦无能，于是莱昂一口唾沫啐在格里斯沃尔德的脸上。莱昂是个以激烈言辞攻讦敌党著称的报人，联邦党人趁机提出动议，要将他从众议院除名。然而，动议未能通过，格里斯沃尔德在懊恼之下，挥舞手杖攻击莱昂，莱昂则抓起壁炉旁的煤钳反击，两个人就这样在众议院大打出手。

举国上下都在担忧，杰伊条约签订之后，可能与法国爆发战争。1798年3月，亚当斯透露，一项旨在与法国修好的外交使命失败了，因为三个法国官员——政府文件中称他们为X、Y和Z——不仅伸手索要贿赂和巨额贷款，而且还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如此才肯恢复条约风波之后中断的两国贸易。这一政治事件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人觉得受了法国人的侮辱，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要与法国开战。据杰斐逊说，法国官员勒索未遂的消息“对共和派心理上造成的冲击之强烈，自我国独立以来还未曾见过”。

约翰·亚当斯发表咨文，号召美国人民备战。他下令全国“迅速、果决、团结一致地采取”措施，维护“我国以航海和贸易为业的公民的权

利，保护任何易遭攻击的领土不受侵犯，贮存武器弹药，建立铸造厂和兵工厂，并扩充国库，以备支付非常开支和弥补贸易损失引发赤字的不时之需”。美法两国由此进入“准战争”状态：尽管双方都未正式宣战，美利坚合众国与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海战。

这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时期，接二连三的战事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忧虑，担心法国势力和法国密探的渗透。亚当斯借机发动攻势，意图压制国内的不同政见（这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国家安全为名，行限制民权之实）。值此之际，杰斐逊扮演起他最能胜任的角色：一位滔滔雄辩、捍卫个人权利的斗士。

亚当斯政府引发最大抗议声浪的举动，是广为人知、合称“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四项法案。这些议案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获得通过，赋予总统特别权力。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些权力是以国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敌对外侨法》规定，总统有权将他认为有危害性的侨民驱逐出境。《惩治叛乱法》则判定言论自由是违法行为，禁止任何人“撰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错误、丑化和恶意的言论，倘若这些言论蓄意中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美利坚合众国国会两院之任一院……或导致它们……遭轻视或羞辱，或煽动美利坚合众国善良人民仇视它们，不论针对以上所有机构，抑或其中任一”。

此后一段时期内，国家严重分裂，两个阵营之间剑拔弩张、言辞激烈。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同僚认为，美国人自由的终结不再是一个预言，而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约翰·泰勒写道。他接下去说，政府如今“生生造出一条法律，若要依照它，即便向上帝祈祷好光景都是非法的了”。

一些民主共和党人觉察到，这是君主独裁思想在作祟。杰斐逊昔日大陆会议的同袍约翰·狄金森以英国内战的历史为鉴，感慨亚当斯总统已经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当时固然不可置信，眼下同样令人震惊：我们的先祖为了逃避斯图尔特王朝的癫狂和暴政，不惜来到美洲这片千里之外、危险四伏的荒野大地。如今他们的后代子孙居然把愚蠢、自私的斯图尔特们的每一个手段、每一条借口都拿来据为己用。”

《惩治叛乱法》一旦获得通过，并由亚当斯签署实行，直抒己见这项基本的自由权利就有可能导致最高2 000美元的罚款和最长两年的监禁。“就我个人而言，我看这帮人仅仅是把这些法律当作一次试验，要试试美国人民对公然违犯宪法的行为究竟能够容忍到何种程度。”杰斐逊说，“如果获得通过，我们马上便会看到国会试图通过另一项法案，宣布总统终身任职，死后职位由他的子嗣继承，参议院也要改弦更张为终身制。”换言之，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杰斐逊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将化为乌有。

亚当斯和联邦党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限制过度的自由正是

为了保护自由。战争威胁真实存在，而战争时期便需要施行非常手段（况且《惩治叛乱法》的有效期限仅到1801年）。亚当斯和他的盟友认为，大量涌入美国的外侨和毫不留情地质疑政府合法性的报界，这两股力量倘若合流，很可能是致命的。

麦迪逊在1798年5月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情："在赋予一国政府的所有权力当中，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权力看起来最易遭到滥用，因为处理的过程可以隐蔽，也可以公开，或者为了达到营造特定舆论的目的，挑选公开的内容和时机……或许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为了对抗来自国外的危险——这危险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必得以牺牲国内的自由为代价。"极端的时期似乎理应采取极端的措施。

1798年2月15日星期四，杰斐逊与亚当斯一起用餐。"在场的人很多"，杰斐逊写道，不过两人还是在餐后找机会聊了两句。他们谈到了上涨的物价（当然了，这都要怪汉密尔顿的"银行纸钞"）。"我们接下来谈到了宪法……他说，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必须有一个根基深厚的参议院，如此才可以抵挡一切民众风暴和怒潮。没有了它，共和国绝不会长久。……他还说，将保护国民自由的使命交托给一个平民议会……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在费城向一群示威者发表讲话时，亚当斯谈到了自己的长期观点："我不打算浇灭好奇的热情，也不愿左右探索的自由，只是大胆做一预测：在经过最孜孜不倦、最不偏不倚的研究之后，你们之中活得最长久的那一个会发现，就教育的原则、机构和制度总体而言，再没有比先祖留下来的更适合传给子孙后代的了。"亚当斯如此倒退的教育观就像一粒老鼠屎，让杰斐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耿耿于怀。

在杰斐逊看来，就像生活有残缺遗憾、政治有力所不逮是活生生的现实一样，人类头脑的惊人奇迹和无限可能同样如此。"若从总体上评价人性，我属于那种抱有期待的人。"他在成为总统的21个月之前写道，"一个人只要检视一下已知的领域，就没有可能看不到任一科学分支都是浩瀚无际，正等待我们去发掘的。"

天文学、植物学、化学、自然历史和解剖学，这些"科学分支……值得每一个人关注"，杰斐逊说。他又补充道："尽管伟大的学科仍未得到探索，我们无法划定它们的边界，但是我们的才智能够担当起认知的责任。"认为"人类的大脑无法再取得进步"是一种"怯懦的"想法。

杰斐逊为美利坚合众国描绘的蓝图是波澜壮阔的。不论某一代人取得多大的成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永续。"这一代人即将离开历史舞台，他们为人类的斗争做出了贡献，迎头痛击了统治世界数千年的专制暴政，因此理当得到嘉许。"杰斐逊说。然而，迎头痛击并不等于灭绝根除。

1798年5月在费城，大约1　200人上街游行，支持通过《敌对外侨法》。这些人向亚当斯呈递了一份声明，为政府的违法政策摇旗呐喊。

亚当斯宣布5月9日为斋戒日——根据独立战争时期在弗吉尼亚州的经验，杰斐逊知道这样的政治招数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结果，亲亚当斯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共和党人纳撒尼尔·埃姆斯在日记中冷嘲道，“亚当斯的斋戒”意在“祈求上天的帮助来对抗法国人”。）据杰斐逊记述，“双方发生了打斗，轻骑兵被召到了现场。我是一大早写这封信的，因此还不知道详情细节。不过，看起来斋戒的意图就是要引发暴力。局势正迅速向骚乱演变。”这样的场景让杰斐逊回想起他在巴黎最黑暗的时光。

杰斐逊脑子里开始冒出阴谋论的念头。“不论是在住处还是任何其他地方，我知道我在费城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监视，并被记录了下来。”他还担心有人拦截拆读自己的邮件。当时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1798年7月，弗吉尼亚参议员亨利·塔兹韦尔写信说起，恐怕《惩治叛乱法》会“迅猛无情地施行”。与此同时，杰斐逊料想一位宿敌即将到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能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汉密尔顿最后婉言谢绝进入参议院。）

眼前的疯狂让杰斐逊想到了一种自然元素：火。“政治倾轧和党派仇恨抹去了这里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他在写给帕茜的信中说，“他们就像是以火为生的火蜥蜴。”

杰斐逊手头拮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此刻在这世界上，我能够支配的钱不超过50美元，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钱将是我仅有的积蓄。”他在1978年4月写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自己姐姐婚姻不幸的内情。他姐姐玛丽的丈夫约翰·博林据说不但酗酒贪杯，而且虐打妻子。“博林先生的酗酒恶习会毁了他自己，毁了他的财产和家庭。”杰斐逊写信对波莉说，“酗酒可以说是万恶之首。”不过，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讲求实际的，甚至是冷漠无情的。“希望我的姐姐能够对他多一点儿耐心，容忍他的劣行。这样做可能减轻他对酒瓶的留恋，或者至少能够让她自己的处境好过一些。倘若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的磨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坚强面对，凡事都顺应现实。”

1798年1月22日，帕茜写信告诉杰斐逊，只有两岁的哈丽雅特·赫明斯夭折了。哈丽雅特是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的女儿，不过帕茜在信中对孩子的身世只字不提。

1799年8月，多利·麦迪逊造访蒙蒂塞洛。杰斐逊写了一封信，请她带给她的丈夫。信中提到了好几件事：蒙蒂塞洛制钉厂依照订单生产了一批铁钉、工匠抹灰泥的技艺，还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为了保密，信里未提及家中任何重要的消息：萨莉·赫明斯此时又怀了身孕。1799年12月初，萨莉生下一个女孩，但是还没来得及取名，这个孩子就死了。

政治斗争依然残酷激烈。“别人告诉我，全国范围内由XYZ事件引发的狂热情绪已经极大消退，而‘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则在四处寻求支

持。”杰斐逊在1798年10月说：“我猜想，一些州议会在此事上绝不会轻易让步。……至少这可能是克伦威尔派的目标，至于蒙克和保王党人（其势力或许最为强大），他们正在耍弄花招，企图复辟仁慈的国王陛下乔治三世。”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提及英国内战和其保王党获胜结局的字眼。杰斐逊直接拿17世纪的这段历史类比：克伦威尔派就是民主共和党人，蒙克是一位支持查理二世复辟的贵族，保王党人就更不用说了。杰斐逊想要说的话很清楚：他担心当今的君主主义者正寻求让一位英国国王掌控美国大权，也就是所谓的乔治三世。

“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实施之后，政府针对性检控的行径令人震惊。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主编遭到逮捕、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发表了被亚当斯政府视为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城《曙光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案和里士满《观察家报》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案。

报纸主编不是唯一的目标。佛蒙特众议员马修·莱昂——一位出自联邦党根据地新英格兰的难得的民主共和党人——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罪状是他曾写信给《佛蒙特日报》，抗议《惩治叛乱法》（这封信是在法案签署施行数周之前就写好的）。莱昂在信中严词谴责了亚当斯总统所谓“不断攫取权力的野心……对荒唐的浮华、愚蠢的吹捧和自私的贪婪有着无穷无尽的胃口”。然而，这封信尽管言辞激烈，却绝对称不上有什么叛国的言论。莱昂是爱尔兰裔，联邦党人因此攻击他是“一个煽动叛乱的外国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危害远胜过战场上1 000个法国人”。莱昂因此遭到起诉、审判，并被定罪。主持审理此案的是联邦党人威廉·佩特森，华盛顿任命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佩特森判处莱昂4个月监禁，并处1 000美元罚款，并在判词中说：“马修·莱昂，身为联邦立法院的一员，你一定很清楚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造成的种种祸害。”

杰斐逊忧心如焚。“我不知道哪一点让我感到更加心痛：是我写信时需要提心吊胆，还是我们国家沦落到如此光景。”杰斐逊写道，“审判莱昂的法官们……成了全体国民恐惧的对象。”尽管被判有罪，莱昂本人倒是勇气倍增，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去监狱报到，在牢里谋求竞选连任众议员，而且最终获选。

对杰斐逊来说，“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不仅令他极度灰心，而且让他难以置信。“但凡记得我们所见证过的时代、所经历过的风雨，任谁能够相信，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依着流行新词‘机密’和‘责任’之名，不但贯穿每一次革命行动、来之不易的自由精神被四处围捕，就连英国的辉格主义普遍原则[17]也未能幸免，反倒是亲英的屈从恭顺信条大获全胜？”杰斐逊写信对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

杰斐逊绝不是个置身事外的人：私下里，他动员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1799年年初，他恳请约翰·佩吉谋求一个众议院席位：“敬爱

的先生，请您务必全力以赴……因为每一票都可能决定哪派（在众议院）取得多数。”

还有更激进的举措：杰斐逊秘密为肯塔基州的州议会起草决议案，抗议“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麦迪逊为弗吉尼亚州起草了同样的决议案。）这件事于是演变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为美国的一个州服务，拟就了一份斥责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官方议案，并呈递到总统手中。《肯塔基决议案》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民主共和党文件，然而，杰斐逊在文件中一些过激的言辞威胁到了他热爱的合众国。在这份决议案中，他表示支持“联邦法令废止权”——如果一州认定联邦法律违宪，那么它有权拒绝执行。杰斐逊一向都倡导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中央政府，而他在此提议的机制却只能引发混乱，几乎注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主义的杰斐逊和主张联邦法令废止权的杰斐逊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然而，如果从性格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杰斐逊这样做便合情合理了。对任何能够服务于他眼前目标的手段，他都是大力赞成的。担任邦联议会代表期间，他希望提升邦联议会的地位；当选弗吉尼亚州长之后，他希望强化州长的权力；现在，他与联邦政府意见不合（尽管他是该政府的一名官员），因此他希望各州能够掌握控制权，以达成他支持的结果。他的思想理念未必会坚守不变，然而他从政和治国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会动用情理许可范围之内的一切手段，把世界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

肯塔基民主共和党人兼该州众议院议长约翰·布雷肯里奇报告说，肯塔基州参议院对草案提到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部分犹豫不决。布雷肯里奇写道：“在参议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对这一句：‘由各州废止这些法令，将是正确的补救办法’。”杰斐逊经过一番考虑后，向麦迪逊承认，一条中间道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我想，我们应当……将此事预留在这样一条轨道上，既不必一力推进至极端，但若情况许可，亦能够尽可能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在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问题上，杰斐逊的确是言辞过激了，那么对于党派问题的性质，他的观点倒是日渐成熟。“在任何一个自由和公民议事的社会，人的天性决定了必然会出现对抗的党派，出现激烈的歧见和冲突。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一方总是会在整体上压倒另一方。”他在1798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说，“也许党派分歧是必要的，能够促使一方监督对方的行动，并向人民阐述各自的政见。……只需要一点儿耐心，我们将看到邪巫的统治很快就会过去，他们的咒语失去效力，人民恢复视力，看见真相。”

对杰斐逊来说，18世纪的最后10年不尽如人意，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绝望过。他知道搞政治需要贴身近攻，因此他尽可能消除自己对手的戒备。审理过莱昂叛乱案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佩特森曾这样评价杰斐逊：“只要真正认识了杰斐逊先生，就不可能与他结下私人仇怨。在政治

上，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激烈地反对他。直到不久之前，不论他的为人还是政见，都让我打心底里感到厌恶。”结果，这两个人碰巧一块儿旅行，途中交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的言谈很讨我喜欢。”佩特森说，“尽管我们两个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他的态度不偏不倚，没有偏见。”

1799年1月，杰斐逊给埃尔布里奇·格里写了一封信，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 我赞成宗教自由，反对任何促成某一教派合法凌驾于另一教派之上的图谋。我赞成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压制言论的违宪行为。国民针对其代理人的抱怨或批评，不论公正与否，都应该通过理性说服，而不是武力镇压。我赞成促进一切科学领域的进步，而不是借着神圣的哲学之名大声抗议……为了改善现状，应当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相信最黑暗蒙昧的时代才拥有政府、宗教、道德及任何其他科学最完美的形式，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先辈所创立的更加完美。……我心中最挚爱的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庭、财富和我自身的存在全系于它一身。对其他任何国家，我没有点滴兴趣、丝毫依恋，也没有一星半点儿偏爱的动机。我只关心它们对我的祖国是否友好，友好到何种程度。

当然，杰斐逊也不是一味沉浸在空想之中。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其中包括发动友人撰写抨击文章，还和麦迪逊讨论影响公众舆论的策略。杰斐逊说，公众对民主共和党的立场是愿意听取的，他由此“相信，这个夏天是系统发动攻势、不计牺牲的最好时机。新闻报纸就是我们的引擎”。他把民主共和党的宣传册寄送给门罗，请他代为散发：“希望你能将这些小册子递到我们的同胞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手上……在此事上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他还请弗吉尼亚州民主共和党的主席分发一些传单：“小册子从我处得来这件事，我相信你会严守秘密。”

在副总统任上，杰斐逊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一位坚定果断的政府领导人，能够在影响民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泰勒1799年2月写信对杰斐逊说。泰勒信中谈到的是州长一职，不过他和杰斐逊都知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总统之位。

[17] 辉格主义普遍原则：英国辉格党建立于1678年，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种种变化，遵循有限君主制和议会重要性等原则。——译者注

第三十章
亚当斯对阵杰斐逊：第二回合

吾辈国民中的共和人士视我为他们权益的坚定维护者。我必须承认，这对我来说是全人类所能给予的最高奖赏。

——托马斯·杰斐逊

联邦党的策略看似儿戏，却行之有效。1799年2月25日星期一，众议院的民主共和党人计划发起申诉，反对“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联邦党人在众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优势，他们召开了秘密预备会议，会上决定——据杰斐逊对麦迪逊言——“无论对方发表何种言论，他们这一方只以缄默回应”。

当天在议院，瑞士出生的宾夕法尼亚州州众议员、众议院民主共和党领袖艾伯特·加勒廷首先发言，反对《敌对外侨法》；弗吉尼亚州州众议员约翰·尼古拉斯紧随其后，发言反对《惩治叛乱法》。众议院多数党则通过最原始的方式破坏申诉程序：淹没发言者的声音。联邦党人“开始大声谈笑、咳嗽等”。

发生在众议院的这番喧嚷让民主共和党人不知所措、灰心丧气，他们甚至感到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杰斐逊说。

蒙蒂塞洛和阿尔伯马尔县正当春光明媚，杰斐逊却在担心，亚当斯打算征召一支“总统部队，或总统国民军”，这支军队的组建“令我确信，它的意图旨在强行改宪”。他还相信，汉密尔顿会是新的兵团背后真正的指挥者。杰斐逊在1799年4月写道：“一旦汉密尔顿组建了这样一支军队，想要解散它谈何容易？”关于军队的辩论引发了暴力事件，罗阿诺克县的约翰·伦道夫——杰斐逊的一位表亲兼众议院议员——在议院抨击维持一支常备军的想法。他把正规军士兵称作“唯利是图的佣军”、“一群流氓暴徒”。第二天晚上，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新剧院”门口截下了他。据杰斐逊说，伦道夫遭到了“推搡”，连“外套也被人扒走了”。

18世纪接近尾声，美国政坛又一次迎来总统选举，这是思想理念和人格魅力的战争中的一场终极战役。杰斐逊决心再度竞选总统。发生在他称之为“邪巫统治”时期的种种事件令他确信，共和主义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一场胜负关系重大。一位记者报道说，在纽约圣安德鲁斯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汉密尔顿领头向乔治三世祝酒的欢呼声浪，盖过了对约翰·亚当斯的祝词。“没有凡人能够预料，哪一个政党会在选举中胜

出。”杰斐逊在1800年3月如是说。

夸大事实是当时的风气。在民主共和党人眼中，亚当斯一心想要称王。一位民主共和党人写道，美国人民“绝不会允许联邦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总统摇身变作一位君王”。在联邦党人眼中，杰斐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危险分子。《美国时事报》告诫选民，要选择“上帝——和一位虔诚的总统。如果投票给杰斐逊，就是亵渎的行为，是背弃上帝”。

然而，杰斐逊支持宗教自由的立场，赢得了许多温和派选民的支持。新泽西州的民主共和党人指责杰斐逊的敌人把宗教作为攻击武器，“因为杰斐逊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不愿看到贵格会信徒、浸礼会信徒、循道宗信徒，或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向其他教派的牧师纳税；他也不认为，仅仅因为天主教徒相信圣餐变体[18]，或犹太教徒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19]，就要驱赶他们”。

尽管如此，杰斐逊不同寻常的信仰仍然一再遭到攻击。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蔡斯，一个死硬的联邦党人，曾向一个大陪审团“慷慨陈词”，据门罗报告称，这篇讲话“处处含沙射影，充斥着东部各州（对杰斐逊）的构陷之词”，“他一本正经地宣称，绝不会容许一个无神论者在法庭上陈词做证”——这个“无神论者”显然是影射杰斐逊。

蔡斯还推动起诉、审判苏格兰出生的报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罪名是煽动叛乱。卡伦德是一位言辞犀利、刻毒的民主共和党人，并在经济上得到杰斐逊的资助。这些指控的直接起因是一本名字看来高瞻远瞩的小册子：《我们的前景》，书的文风却极尽尖锐。“迄今，在亚当斯先生治下，邪风恶气不绝。”卡伦德写道，“身为总统，他一张口，一动笔，便语带威胁，厉声责骂。亚当斯政府一直以来的宏伟目标，是要激起反对党派的怒火，恶意中伤任何敢于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直至将他们置于死地。亚当斯先生煞费苦心——他的这番苦心不幸亦取得了成功——要破坏同志情谊，任信任和友谊毁于一旦，掐灭人生这场黑暗、可鄙的闹剧中最后一丝欢乐的火光。”

杰斐逊对卡伦德说，他的小册子“定会收到良效”。

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读到此册子之后，不禁怒火中烧。

1799年12月，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辞世。尽管杰斐逊私下里一直记挂着这位老总统，但两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杰斐逊觉得，此时最明智的做法还是留在蒙蒂塞洛，避免出席任何纪念华盛顿的活动。他仰慕华盛顿的领导才能，可是心里禁不住认为，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最终成为联邦党的象征，而在杰斐逊看来，这个政党正把国家引上歧途。

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的。杰斐逊没有对华盛顿说实话：他确实在暗中支持菲利普·弗雷诺和《国家时事报》，以这份报纸作为民主共和党人的阵地，抨击首任总统。他宁可拿假话蒙

骗华盛顿，也不愿与华盛顿正面冲突。最终在政治上成为华盛顿继承人的，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举国上下，也许没有人比我更为他的辞世感到哀痛。”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去世后说，“将军对我的恩情我铭记于心，他是支撑我的最坚实的支柱。”

在全国各地一片歌功颂德的悼念声中，弗雷诺不忘借几行短诗给民意大潮注入一针清醒剂：

不烂舌，生花笔，
尔辈轻狂难尽数；
肆意吹捧寻常事，
反污逝者身后名。
曲意谄媚妄尊神，
君临四海未有之；
千般颂词都罢了，
只留清白在人间。
清白原是他根本，
何需荣耀落满身；
顶天立地大丈夫，
救国危亡只靠他。

詹姆斯·麦迪逊对联邦党人的活动也做出了阴暗的预言。他在1800年4月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很显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他们感到惊恐万分。在此之前，他们必定会拼死挣扎。”在给妹妹玛莎·卡尔的信中，杰斐逊把《惩治叛乱法》与1800年大选联系起来：“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选战已经拉开序幕，造谣诽谤的大炮火力全开。另外那个党首先对报纸出版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战场的主导权，迫使对方无法还击。”他在给帕茜的信中说：“我们的对手觉察到自身的力量正在衰退，可是他们仍不死心，试图通过立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杰斐逊真心期望人民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对民主的信奉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信念：他相信，只要开启民智，大部分民众便能够发现真理。

现在已经是1800年了，杰斐逊确信，联邦党人的“疯狂和奢靡”昭然若揭，蒙蔽不了选民雪亮的眼睛。“全国各州的人民，”杰斐逊说，“都拥护共和体制、共和原则，拥护简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拥护宗教和民权

自由。”

5月初，亚当斯对内阁进行调整，提名约翰·马歇尔为替代蒂莫西·皮克林的国务卿人选，任命塞缪尔·德克斯特接替战争部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当初，亚当斯决定原封不动地保留华盛顿内阁，结果在他任内，他对政府的掌控一直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现在他企图挽回失地，可惜为时已晚了。亚当斯同时还解散了杰斐逊所谓的“总统国民军”。杰斐逊写信对他的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说：“临近大选，（联邦党人）企图博取一些民心，只等换来4年执掌大权之后，便可继续违逆民意。”

1800年7月4日国庆的前一天，巴尔的摩的《美国人报》刊载了一则传闻，说杰斐逊“偶染微恙48小时”后在蒙蒂塞洛去世了。由于提到了时间、病情方面的细节，报道显得很可信。几家报纸随即转载；《美国时事报》称，报道“貌似有几分可信性”。直到7月6日谣言才完全平息，所有人都得知杰斐逊平安无恙，身体好得很。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专门就此事从纽约写来一封信。“我以为自己失去了这个大陆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开明见识对新旧两个世界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他写道，“一连好几天，我都深陷难以言喻的绝望之中。”

在康涅狄格州的沙伦，一个联邦党人主导的地区，科顿·马瑟·史密斯牧师有一次宴请几位客人，当时尤赖亚·麦格雷戈里也在座，他是一位杰斐逊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一个立场强硬的联邦党政客。”麦格雷戈里说。席间，史密斯问麦格雷戈里，他是不是真的希望见到“杰斐逊坐上总统这个位子”。

麦格雷戈里对此给出肯定的答案，史密斯听了之后，“说了许多恶意中伤的话”，抨击杰斐逊存在所谓的经济问题和违法行为。史密斯声称，杰斐逊“采用欺诈和强占的手段获得……产业——（他说）您有一次身为遗嘱执行人，从孤儿寡母的手中又骗又抢，得到了一块地产。这块地价值1万英镑，您不但只付给他们纸钞，而且票面价值还不到实际价值的1/40”。麦格雷戈里并不相信，并且当面质疑史密斯。史密斯执意不肯收回说过的话；他说，这件事千真万确，“是可以证明的”。

在1800年7月写给杰斐逊的信中，麦格雷戈里指出，在宴席间如此这般抨击杰斐逊，是前所未有的。“先生，我知道在这个州，您常常遭受辱骂毁谤——据我从可靠人士处打听得来的消息，这些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恶意中伤——然而，即便最恶毒的诽谤者也从未怀疑过您在钱财方面的清白。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应该告知杰斐逊指控他的这些罪名是何，并且希望杰斐逊能够对此予以还击。“先生，我冀望有能力在报纸上登载一篇事实分明、不容置疑的驳斥文章，与那个恶毒的谎言一起，摆在读者面前。”

杰斐逊完全否认这些指控——这些指称都是毫无根据的——并且为出现这样的谣言感到痛心。在这件事上，杰斐逊只能说，他指望“有一天，说谎的证人会遇上一位公正严明的法官，这位法官对他的造谣污蔑

一清二楚”。

1800年秋，弗吉尼亚州亨赖科县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奴隶密谋暴动，结果在举事的当晚败露。这次起义组织散漫，领导者计划吸纳广大奴隶加入队伍，占领里士满、诺福克和彼得斯堡的部分地区。白人当局立即无情地展开镇压，对26名暴动参与者处以绞刑。

詹姆斯·卡伦德从里士满狱中写信告诉杰斐逊：“他们的计划是杀光所有白人，不分老幼，不论男女；还要杀光所有不肯加入他们的黑人；然后他们打算带着从城里劫掠来的财物逃进山区。妻子如果不愿追随自己的丈夫，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命丧在屠刀之下——真是只有非洲人才想得出来啊！”

如同圣多曼格岛的武装冲突一样，加布里埃尔的暴动密谋使杰斐逊更加确信：黑人和白人自由地比邻而居，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加布里埃尔事件，以及弗吉尼亚州对奴隶发动暴力叛乱的恐慌，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咨询杰斐逊，国外是否有地方愿意接收美国黑人。当局随后向塞拉利昂公司[20]表达了意向，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谈判没有进行下去。

在纽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政情的发展感到不安：由于阿伦·伯尔领导有方，民主共和党人在他的大本营步步进逼。1800年春，纽约州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共和党人一举夺下“他们的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杰斐逊语），实际上已经把赢得该年冬天总统选举人票所需的票数牢牢攥在手里。（在纽约州和其他10个州，总统选举人由州议会选出；联邦的16个州中，只有5个州的选举人是由全民选出的。）爱德华·利文斯顿从纽约来信报告：“每一个亲英分子的脸上都笼罩着愁云惨雾，实在是大喜之兆。”

汉密尔顿和他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向时任纽约州州长约翰·杰伊陈情，希望在新当选的民主共和党多数成员就职之前，更改该州的选举法，从而在事实上推翻选举结果。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密尔顿式花招。“身处我们眼下的时代，”他吁请杰伊，“容不得半点儿谨小慎微。”汉密尔顿声称，他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一个宗教上的无神论者和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掌控国家的舵轮”。

杰伊不为所动。他在汉密尔顿这封信的末尾提笔写道：“出于党派私利提议这样一项举措，恕我不能为之。”民主共和党得以保全纽约州的胜利果实，为汉密尔顿的死敌走向总统之位铺平了道路。

纽约州选举结果传来的当天，人在费城的杰斐逊恰巧因为其他事务要和亚当斯碰面。据杰斐逊说，听到民主共和党在纽约州获胜的消息，总统“显然大受震动”，主动与自己的副总统“攀谈起来”。

“如此一来，我猜想这次选战我会是你的手下败将了。”亚当斯对杰斐逊言道，“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我会做一个最忠实的国民。”

“亚当斯先生，这并非你我之间的私人竞赛。”杰斐逊回忆自己当时这样回答。他接下来又说：

> 在政府制度的问题上，由于秉持两种原则体系，我们的同胞分裂为两个党派。您和其中一党观点一致，我呢，与另一党志同道合。如今在世的这一辈人当中，我们两个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时间，比大多数人的都要长，我们两个的名字也因此为更多人所熟知。为了这个缘故，其中一党以您为马首，另一党则把我推到台前。倘若我们两人今天不幸离世，明天立刻有另外两个名字补上，机器的运转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它运转的动力来自原则体系，不是因为你我个体。

“我想你说得对，我们不过是被动的工具。”亚当斯说，“我们两个的私交不应该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然而，在杰斐逊看来，亚当斯“没过多久就抛弃了在此事上的公正观点。联邦党人因为心里痛恨我，又因为落败而感到颜面尽失，因此每天编造出数以千计的不实之词诽谤我。我一直认为，跳梁小丑肯定把话都传到了总统的耳朵里，在他心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杰斐逊说中了一点：联邦党人绝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退出舞台。有传闻说，他们打算再次从南卡罗来纳州推举一位平克尼出来，以期给选举制造混乱。1796年是托马斯·平克尼，1800年轮到他的哥哥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上场了：他将是联邦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亚当斯的竞选搭档。这一招完全是1796年联邦党竞选把戏的重演。根据法律规定，每一个选举人投票给两位候选人，但是无法指定哪一位是总统，哪一位是副总统。像汉密尔顿这样反对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期望，南卡罗来纳的选举人会投票给杰斐逊和土生土长的平克尼。这样，就能一举把平克尼推上总统宝座（平克尼稳获支持亚当斯各州的票数，再加上南卡罗来纳的选票，赢得整个大选的胜算很高）。

“给予亚当斯和平克尼同等的支持，很可能是拯救我们免遭杰斐逊的尖牙利齿荼毒的唯一办法。”汉密尔顿在1800年5月给一位联邦党同僚的信中写道。尽管杰斐逊指责联邦党人的战术是“装神弄鬼的伎俩”，但如果一切真按照汉密尔顿所预计的方向发展，杰斐逊有可能难以招架。

亚当斯四面楚歌。1800年10月，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刊文，大肆抨击第二任总统。这篇文章题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封信：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的公共行为与人品”。汉密尔顿在文中称，亚当斯“不具备管理政府的才能”，同时，“他在性格上天生有诸多明显的缺陷，不适合担任国家元首”。纽约州联邦党人罗伯特·特鲁普在写给驻英使节鲁弗斯·金的信中说，他认为汉密尔顿与亚当斯的党内分歧将使联邦党的愿景化为泡影：“我们的敌人团结一致，正在取得胜利。”

然而，汉密尔顿不认为会造成什么损失。“倘若注定要由一个敌人执掌政府，”他说，“我宁可要一个可以大声反对的，可以不必为其负责的，一个不会因其愚蠢、糟糕的举措令我党蒙羞的。”

1800年的秋天是杰斐逊有生以来最关键的一个秋天，每一天都怀着揪心的焦虑和欢跃的希望。他即将登上权力的巅峰，获得举国的支持，迎来胜利的荣光。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感汹涌澎湃。

在蒙蒂塞洛，他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的祖国是否真的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而变得更加美好。”他在私人札记中写道，“我不能肯定确实是这样。的确，我是促成以下几件事的关键因素，可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实现，最多不过是稍晚些发生罢了。”在他列下的几件事中，包括了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期间，改善里瓦纳河的通航条件；参与制定《独立宣言》；修订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把橄榄树引入美国。

各州选举的结果开始慢慢地陆续传抵蒙蒂塞洛。在需要获胜的州，民主共和党都取得了胜利：不但守住了南方的基本地盘，而且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两州的选情也宣布告捷。前任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闷闷不乐地说：“民主原则的影响力似乎在明显扩大。”

此时传来消息，联邦党人企图利用南卡罗来纳州选举人票将平克尼推上总统宝座的计策失败了，杰斐逊很有可能成为总统。听闻此事，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写道：“还从来没有什么坏消息能让我如此震惊。”

到了1800年12月12日星期五，杰斐逊感到已经胜券在握。他私下里说，自己很有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一任总统。在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信中，他写道：“我想现在可以说，大选的结果已见分晓。”特拉华州民主共和党人西泽·A·罗德尼为选举结果欢欣雀跃，他相信，杰斐逊当选总统标志着亚当斯执政年代的“狂风暴雨”终于要结束了。

尽管如此，杰斐逊仍然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心里时刻都在警惕联邦党人的陷阱。在写给阿伦·伯尔的信中，他说，有几个“野心勃勃的联邦党人表示，他们希望见到两位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所获的票数相等。倘若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决意阻止众议院选出总统（他们确有能力这样做），将主持内阁之责转移到参议院议长身上”。

12月间，杰斐逊告诉麦迪逊，出现平票的可能性“让这里的每一位民主共和党议员面色沮丧，神情阴郁；相反，联邦党议员则喜不自禁，公开宣称他们会阻止选举，任命参议院议长为临时总统——照他们的说法，这只是对宪法的规定稍加扩展而已。……因此，到了2月，我们将迎来新的政治风暴”。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一些激进分子（民主共和党人）担心，杰斐逊先生不会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式主持政府。”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在1800年12月28日星期日写信对鲁弗斯·金说，“另一些人则认

为，站在一旁指责挑错是很容易、很轻松的，真要治理国家、树立权威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不愿这个重担落到自己或友人的肩上，还有一部分人担心伯尔会成为总统。”

一些人把当前的戏剧性事件看作更宏大斗争——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的一部分。“亲英分子已经开始跳出来，公开表示说希望出现同票的情形。”罗阿诺克县的约翰·伦道夫1800年12月16日星期二写信给马里兰州众议员约瑟夫·尼科尔森，“我担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给我们制造麻烦。不过我也相信，反对君主制的人一定会谴责该党的所作所为。”

尽管一些联邦党人提出，愿意支持伯尔以作为政治和政策上的交换条件，这位纽约人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反对杰斐逊的迹象。“我不……担心会有任何尴尬，即便出现你我票数相等的情形——我的私交好友都很清楚我在此事上的愿望，绝不会想要从您那里分走任何一张选票。”伯尔对杰斐逊说，“恰恰相反，他们会是您最忠实的追随者。”没有证据表明，伯尔打算背叛杰斐逊，可是没过多久杰斐逊就开始相信，自己的这个竞选搭档是靠不住的、有妨害的盟友。在18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出炉后，杰斐逊对自己的女婿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全盘托出了这些想法。

“我听人说，总统情绪极度低落。我们都要庆幸没有处在他的境况。”蒂莫西·皮克林于1801年1月5日星期一写道，“现在举国上下都茫然失措、灰心丧气，这都是他鲁莽的（用个好听点儿的字眼）举措种下的恶果。许多有见识的联邦党人即便嘴上不说，至少心里都在怀疑，到底哪一种情形更不可取：是他再次当选，还是杰斐逊先生坐上总统的位子。”

民主共和党人担心，联邦党人会想方设法违逆民意。“现在大家都在担忧，”一位记者于1800年12月底写信对民主共和党人约翰·布雷肯里奇说，“杰斐逊和伯尔获得相等票数的选举人票，如此一来，东部各州会投票给伯尔，并非因为他们真心认为他更有能力，而是因为杰斐逊是人民的选择……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若真这样做，称他们的行为恶毒阴险、违背常情也不为过。不过，他们又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不敢尝试的呢？”

1800年就这样在迷雾重重中走到了终点。“联邦党人似乎决意要阻止选举，然后通过议案，将政府大权交给杰伊先生（他会被任命为首席法官）或国务卿马歇尔。”杰斐逊在圣诞节后一天写信给麦迪逊，“不过我倒认为，马里兰和新泽西两州会与7个民主共和党占多数的州站在一起。”到了1800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投票结果全部出炉，并且递送到时任参议院议长杰斐逊手中。

杰斐逊和伯尔同票。

1801年1月2日，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詹姆斯·麦克亨利提出了关

键性的问题。

麦克亨利问道："最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18] 圣餐变体：天主教认为无酵饼和葡萄酒在弥撒中经神父祝圣后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译者注

[19]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即耶和华。——译者注

[20] 塞拉利昂公司：1792年建立，是英国在非洲第二个殖民地的法人团体。当时的移民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加入英军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战后曾定居于英国在北美的新斯科舍殖民地。——译者注

第三十一章
危急之秋

流言四起，诡计横行。

——古韦纳尔·莫里斯

总统宝座会落入谁的囊中，现在根本无法预料。

——约翰·马歇尔

1800~1801年的华盛顿特区是个草草拼凑起来的首都。七八家旅店一起争抢生意（杰斐逊本人暂住在其中的康麦旅馆）；一位费城来的制靴匠刚刚在国会大厦附近开设了一家店铺，新开张的还有一家书店；莫氏杂货店的货架上摆放着马德拉白葡萄酒、白兰地和其他烈酒，此外还有肥皂、灯油和发粉；国会山的山坡上依旧林木丛生，野兽出没。

杰斐逊每天在参议院——他仍然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处康麦旅馆之间往返，同时试图保持心情的平静。这并不容易做到，没人知道明天会传来什么消息。他在写给一个女婿的信中说："选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曾经的盟友阿伦·伯尔现在可能成为威胁。1801年1月5日星期一，《费城时事报》刊文称，"有人听到（伯尔）暗示说，他觉得自己和杰斐逊先生一样能够胜任总统的职责"。同一天，本杰明·希克伯恩（一位杰斐逊的支持者）报告说："一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人，愿意加入另外那个党派，以便到时联合起来，支持伯尔中校。"

杰斐逊的敌人确实在到处活动，任何能够不让杰斐逊掌权的方案都在考虑之列。"如果政府落入杰斐逊先生手中，我们有切实的理由担心，他的道德和政治试验会把政府拖垮。"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众议员詹姆斯·贝亚德称。

艾伯特·加勒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联邦党人会耍弄什么诡计呢？他们会篡夺总统权力吗？……选举的前景存在风险。"

罗杰·格里斯沃尔德哀叹事情竟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作为一个政治家，杰斐逊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合格的——或许他当真为人正派，但是了解他私生活的人都非常怀疑这一点。"

1801年1月11日星期日，杰斐逊在国会大厦参加了早晨的礼拜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托马斯·克拉格特主教大师，他是马里兰州圣公会主教

兼参议院牧师。罗杰·格里斯沃尔德当时也在场，因此能够在主教布道期间观察杰斐逊。据格里斯沃尔德称，克拉格特“学识多过智慧”，试图将某个《圣经》预言与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他写道，主教这样做，“势必要长篇累牍地谈到法兰西哲人不切实际的空想引发的种种祸端……接下来又讲到（他们）不信奉正教的行为，最后对他们的图谋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危害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

在格里斯沃尔德的眼中看来，杰斐逊“以为主教一字一句都是在说自己，是在严词抨击他的理论和愿望”。杰斐逊“脸臊得像个15岁的小女孩，我毫不怀疑，他心里一定暗骂，让主教和他的预言都见鬼去吧”。

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的杰斐逊支持者计划武装起来，向首都进军。杰斐逊私下说，违逆民意“等于是在我们面前劈开了一道深渊，每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往下张望时都不禁战栗”。“政府高层”中有人对埃尔布里奇·格里表示，杰斐逊的当选“是对宪法的一次考验”。

日子一天天过去，谣言开始四处传播。“值此危急之秋，有关联邦党人的图谋，我们这里听到一些不寻常的流言。”门罗1801年1月6日星期二从里士满写信对杰斐逊说，“据称，他们铁了心要阻挠众议院指定的总统人选。他们打算通过立法将权力移交给约翰·马歇尔、塞缪尔·A·奥蒂斯或其他什么人，直到举行下次大选。”

门罗还说，里士满的州议员正在争论要不要延长议会的会期，“以便随时采取必要行动，挫败”任何企图阻止杰斐逊当上总统的举措。

对任何人都不能放松警惕。“对不怀好意的外国使节应该严密监视。”坦奇·考克斯在1801年1月10日星期日写道，“对联邦党人的表白也不能轻易相信。……鉴于眼前的形势，我们应当意志坚定、头脑冷静，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选举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联邦党人先下手为强，于同年2月通过了《司法条例》（1801年）。如果杰斐逊或者伯尔当选，天晓得联邦党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能力采取行动。

因此，国会利用当前的时机通过了这项法案，并由亚当斯总统签署生效。该条例新增了联邦司法官员的人数，扩大了巡回法庭，并给予了法庭更大的权力，而且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从6人减为5人，这样一来，不管哪个民主共和党总统上台，都少了一个任命的名额。“（1801年）《司法条例》完全是强塞给我们的，一个字都不容许更改。”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参议员史蒂文斯·汤姆森·梅森写道。

杰斐逊认为，亚当斯临到主政结束才通过的这条法律，是“趁着国会最后一次会期嫁接到司法体系上的寄生植物”，新获任命的联邦党人“撤退到司法机关这座堡垒……要从那里的炮台摧毁和抹杀共和制的所有成果”。这批新任命的法官在民间被称为亚当斯的“午夜法官”。此外，“午夜任命”的现象也出现在一些级别较低的职位上。

在这几个月中，亚当斯做出的最重大决定是任命他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美利坚合众国首席大法官，这就等于给了杰斐逊的死敌一个终身职位，而且这个职位还是联邦政府分立的三大权力机构之一的最高首长。联邦党人认为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极其危险，就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联邦党人极其危险一样。

亚当斯和马歇尔在1801年1月碰了面，此时的马歇尔仍为国务卿，前来与总统讨论即将退休的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思的继任人选问题。亚当斯此前曾希望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重新回到最高法院，但是杰伊选择了继续担任纽约州州长。

“现在我应当提名什么人呢？”亚当斯问马歇尔。

据马歇尔回忆，他告诉总统，他也想不出有什么建议。

“我想我必须提名你。”亚当斯说。

马歇尔回忆自己“既吃惊又高兴，默默地鞠了一躬”。

美国参议院在1801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批准了总统的这项提名。

马歇尔的提名获得通过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民主共和党人相互打气，认为总统大选一定会获得预想的结果。“毫无疑问，杰斐逊先生是我们的磐石，只有他才能拯救我们摆脱眼前的政治困境。不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绝不会背弃他。”特拉华州的西泽·A·罗德尼在1801年2月17日星期二写信对约瑟夫·尼科尔森说，“戈耳狄俄斯之结[21]把我们不可分离地牢牢拴住一起，任何阴谋都无法把它解开，任何刀剑都无法把它劈开。”

杰斐逊听到传闻说，联邦党人打算让参议院临时议长代理总统一职。他心里十分忧虑，于是前往拜访亚当斯，这次拜访只有一个目的：“请求他动用总统的否决权，阻止这项不顾一切的举措”。

听明白杰斐逊的来意之后，亚当斯勃然大怒。“他立刻大发雷霆，”杰斐逊回忆说，“（他答复我的话）言辞之激烈，以前当着我的面从未用过。”

“先生，”亚当斯对杰斐逊说，“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完全操控在您的手中。”他表示，杰斐逊只需要承诺施行联邦党的某些政策，就可以揭开悬念，当选总统。用亚当斯的话来说，政府会“立刻被收入您的囊中”。

“亚当斯先生，”杰斐逊回答，“我尽职尽忠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于公于私，我相信自己的行为没有可指摘之处。我必须说，我绝不会通过暗中交易入主政府。只有在完全自由地遵从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我才会接受领导政府的职责。”

“那么，就只能顺其自然了。”谈话到此结束了。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苦涩、难受的时刻——“自我们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告别的时候彼此心里愤愤不平。”杰斐逊回忆说。这是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双方的政治利害关系所决定的。

在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基恩看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民利益、道德品格、个人责任和对国家的热爱联合一致，都要求确保（杰斐逊当选）。然而我听人说，嫉妒、怨恨、绝望和以制造混乱为乐的祸心，促使亲英的联邦党人将所有其他顾虑都抛诸脑后。他们意图使出一切手段，在各州之间保持等势的分裂，这样国会就有可能以法律的形式为我们直接任命一位总统，直到下次大选。”他说，尽管他个人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同时也相信，应当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就算诸位议员有可能不顾一切，通过一个支持无政府和内战的党派提出的议案”，麦基恩质疑，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任命除杰斐逊或伯尔之外的任何人选都是违宪的，是篡夺政权的行为。

麦基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恶徒胆敢图谋叛乱，破坏我们的联邦政府和合众国，或令其蒙羞，我即使不顾性命，倾家荡产，也要尽一己之责反对他们。因为依我之见，屈从于国内暴政比屈服于外国暴君还要来得更加可耻。”麦基恩说，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到时候会动员和武装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人”，武器包括“铜制野战炮等”；州长同时打算下达政令，“逮捕和审判在宾夕法尼亚州州界之内的所有国会议员，或任何参与叛乱活动之人”。

华盛顿的一些政府大楼接连发生火灾也引发了疑虑。“上个月战争部刚遭火灾，这个月又轮到财政部，这虽然很有可能纯属巧合，不过，费城早前有人预言会发生这种事，而且去年7月间就听到了相关议论，因此很多人怀疑，这其中或有阴谋。”麦基恩说。罗杰·格里斯沃尔德也谈到了财政部和战争部的火灾，他评论道：“似乎上天对这座荒野之城中的政府设施降下了诅咒。”

紧张的时局让杰斐逊感到精疲力竭。“我渴望回到外孙、外孙女的身边，他们傻乎乎的小小错误能带给我比贤者的智慧更大的欢乐。”他写信对帕茜说，“在这里，到处人心险恶，我禁不住感到自己身处敌国。”

众议院计划在1801年2月11日星期三召开会议，选出总统。小托马斯·曼·伦道夫从阿尔伯马尔县写信来说：“2月11日的临近让本县民众屏息以待，焦虑的心情难以自制。”

随着国会议员会聚华盛顿，迷局反而加深了。据杰斐逊于2月12日星期四所做的笔记，他从与爱德华·利文斯顿的一次谈话中得知，有人在暗中进行见不得人的交易。“爱德华·利文斯顿告诉我，（联邦党人詹姆斯·）贝亚德于今天或昨晚拜会了塞缪尔·史密斯将军。他对将军表示，倘若将军改变阵营，转投伯尔的票，那么所有职位任他挑选，他特别提到

了海军部部长一职。史密斯问他，他是不是能够做主，他说自己可以。……贝亚德还以同样的方式试探了利文斯顿……对新泽西州的（民主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林博士，他们许诺让他主政新泽西州。”

贝亚德很快转变了战术。他前往拜见马里兰州民主共和党众议员塞缪尔·史密斯，通过史密斯向杰斐逊转达他的提议。贝亚德后来声称，他向史密斯说明，要化解目前的僵局，让杰斐逊当上总统，需要做些什么。如果杰斐逊承诺不会解除所有联邦党官员的职务，并且保留海军和公债，一切就都可以顺利解决。据贝亚德说，史密斯去拜会杰斐逊，得到了杰斐逊的默许，然后回复了贝亚德。

“这完全是谎言。”杰斐逊后来写道，“史密斯将军在来访过程中，没有向我转达任何提议，我也没有授权任何答复。”史密斯同意杰斐逊对此事的说法，他说，他与杰斐逊泛泛地讨论了政策问题，但是没有告诉杰斐逊自己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史密斯向贝亚德做出的保证，是他自己对杰斐逊意图的揣测，并非杰斐逊的授意。

杰斐逊真的为了当上总统而暗中进行了交易吗？他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不过，当时选举在一触即发的政治气氛下进行，大家开口闭口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贝亚德有可能相信自己得到了足够的保证：杰斐逊不会把联邦党此前12年的辛苦经营全部推翻。听了史密斯的话之后——尽管这些话具体、明白到何种程度有待商榷——贝亚德行动起来，准备结束对峙，把总统之位送到杰斐逊手上。

据贝亚德自己的说法，杰斐逊非常清楚联邦党开出的条件。至少有两次——其中一次由亚当斯总统亲自出面——联邦党人请他表明态度，为打消他们的疑虑，以免他们把事情往最糟的方面想。纽约州参议员古韦纳尔·莫里斯有一天在参议院外面遇上了杰斐逊。“他把我拦了下来，开始谈到当前非同寻常、预示不祥的形势。他接着又说起，为什么占少数的几个州一心反对我当选总统，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强行免去所有联邦党人的公职，解散海军，撤销公债。所以只要我主动声明，或是授权友人声明，不会采取上述步骤，那么，选举一事即刻就能得到解决。”

站在参议院外的台阶上，认真考虑了莫里斯的这番话后，杰斐逊回答了对方：“我对他说，我迄今为止所走的道路，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这一点我留给世人评判。此时此刻，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做回应，保持沉默。我绝不应该答应什么条件，绝不应该通过暗中交易坐上总统的位子，也绝不应该让任何前提缚住手脚，妨碍我为了公众的利益施行自己认为适当的举措。”

杰斐逊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据他回忆，“大家心里都清楚，古韦纳尔·莫里斯”有能力说动“一张选票改变立场，从而决定选举的结果”。

杰斐逊在宾州大道上遇见亚当斯时，两人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随后，联邦党人德怀特·福斯特到康麦旅馆拜访杰斐逊，希望杰斐逊能够做

出保证，等于又把此事重提了一遍。然而，杰斐逊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这是他的底线。“我不记得与塞缪尔·史密斯将军特别谈到过这件事。”杰斐逊写道，“很可能我们谈到过。当时私下里和朋友密谈，没有不聊起这个话题的，不是泛泛评论两句，就是具体提及某个方面。不过我可以肯定，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民主共和党人，都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要我屈从某些条件，或向任何人做任何保证。我更加可以肯定，从来没有向他或任何其他人授意，说我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

汉密尔顿清楚这一点。“选杰斐逊要好过”伯尔，他说，“他远没有那么危险，而且还有几分自命清高。”汉密尔顿表示，杰斐逊“懂得见风使舵，会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精打细算。这样一种品性的人，多半选择维护现有的体系：尽管起初反对，可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他心里便明白，要想推倒重来，难免伤及自身”。其他一些联邦党人也同意他的看法。“杰斐逊先生品德高尚、头脑精明，对当前的制度不会试图做实质性的改变。这一制度由我们已故的敬爱的华盛顿总统所建立，并由亚当斯先生坚持奉行。过去12年间，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掀起了腥风血雨，只有我们国家在这一制度下维系了和平安宁，创造了繁荣富足。”威廉·菲茨休，一位曾是华盛顿密友的弗吉尼亚州联邦党人在1801年1月这样写道。

选举过程缓慢冗长，在国会大厦里，投票反复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议员们睡在草垫上，天气非常糟糕。身体不适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约瑟夫·尼科尔森躺在担架上被抬过雪地，在众议院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安置下来，他的妻子引导着他的手写下选票上的名字。

终于，1801年2月17日星期二下午1点，历时36轮投票，杰斐逊获得了胜利。

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联邦党人是“阴谋家”。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杰斐逊派的报纸主编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妻子）所述，联邦党人马不停蹄地“匆忙躲回自己的住处，生怕同胞正义的怒火”惩罚他们试图破坏选举。

詹姆斯·贝亚德在选举过后声称，新英格兰已经准备好“丢弃宪法，甚至不惜为此冒内战的风险”。杰斐逊对麦基恩说：“倘若发生政变，我会坚决地和所有反对它、制止它的人站在一起。否则一旦开启这样的先例，此后必然不断有人仿效，直至暴君上台当政。”

杰斐逊公开展现出的冷静与力量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激励民主共和党人坚持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回想上次大选时的情景，我对可能的后果不禁感到战栗。”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县的一名律师阿奇博尔德·斯图尔特写道，“民众最初的极度惶恐逐渐让位于坚定的决心，誓要与任何将非民选总统强加我们身上的图谋抗争。……见到民众的这种精神，我心里很是欢喜，因为它表明，我们绝不会不斗争就放弃自由。”

欢腾的礼炮宣布了杰斐逊当选的消息。在亚历山德里亚，礼炮轰鸣32响（在县城广场上放了16响，在波托马克河上又放了16响）；在里士满，人们放起了烟花；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共和党人敲响钟声，从午前一直持续到日落。“我们的国民兴奋得几乎要发了狂，称他是人民的总统、国家的救星。”一位纽约州的联邦党人如此描述，“人人醉酒嬉闹，献祭给这位新神祇的牛羊比从前犹太祭司敬献给上帝的还要多。”一位新教牧师威廉·斯凯尔斯的看法则乐观得多。“许多人说您是个无神论者，”斯凯尔斯写信对杰斐逊说，“即便如此，我宁可要一个开明的无神论者治理国家，也不愿要一个偏执的圣徒，这样的人并不真正知晓上帝的旨意。”

约翰·马歇尔的国务卿一职要等到杰斐逊就任总统之后才会卸下，因此他现在身兼国务卿和联邦首席大法官两大要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既感到惊讶，又心怀焦虑。至于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公众舆论发生如此天翻地覆、异乎寻常的变化”，以至于杰斐逊取亚当斯而代之，他都拒绝置评。“接下来应该选择哪条道路……才是更紧要的问题。如果不是当选总统圈子里的人，这一点便很难得知。”马歇尔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写道。在外交政策上，马歇尔的担忧也是联邦党人一贯的忧虑：杰斐逊会“煽动人民对英国的憎恶和仇恨”，但是“并不打算挑起任何实质性的对抗”。

尽管近些年来关系一直紧张，杰斐逊和亚当斯夫妇还是保持了点到为止的礼貌关系。1801年1月初，总统和第一夫人请副总统杰斐逊来家里吃饭。“杰斐逊先生和我们一起用了餐。他在答复邀请的回帖中，恳请总统一定要相信，他对总统极为尊敬推崇。”在1801年1月3日给自己一个儿子的信中，阿比盖尔这么写道。她将于2月13日星期五离开华盛顿，动身之前，她在家里接待了杰斐逊，请他喝下午茶。据阿比盖尔说，杰斐逊“来拜访了我……一则同我告别，二则祝我一路顺风。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客气”。

这些重感情的点滴小事很能说明亚当斯夫妇和杰斐逊的品格。在过去的大约1/4个世纪中，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们对彼此的人生了解之深入、透彻，在世的人当中，没有几个能够做到。当初是政治促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现在也是政治促使他们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他们对彼此仍表现出了善意的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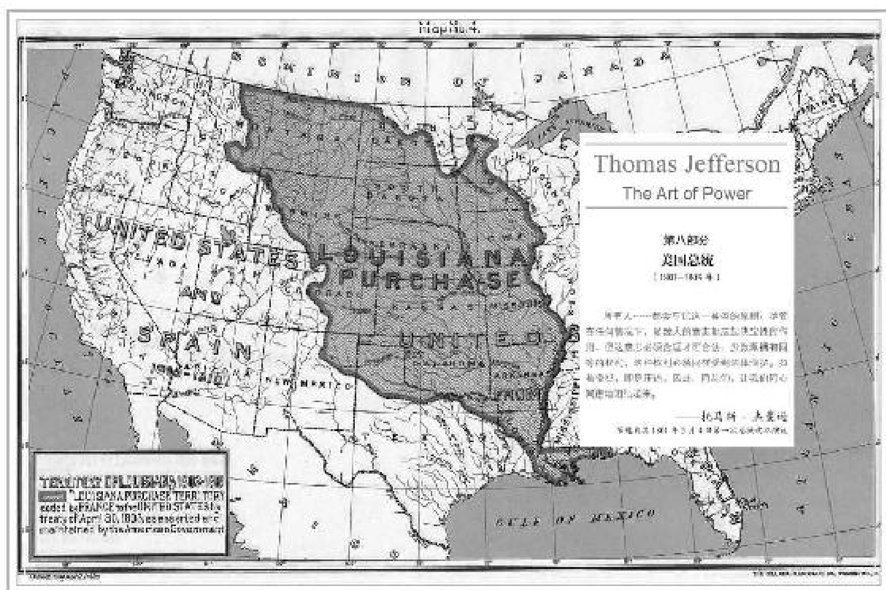
杰斐逊心中为选举的结果暗自雀跃。“无法在蒙蒂塞罗与你（和波莉）团聚，我虽说有些失望，但也并非全然遗憾。因为重任在肩，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应是欢喜的。”他写信给帕茜，说明自己当选总统之后，需要继续留在华盛顿。

他欣喜地看到，人们从全球的视角出发评价他的胜利。“谈到未来，您将是舞台上的主角。”他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同袍约翰·迪金森写道，“或许地球上芸芸众生之中，我们是少数挑选出来的英才，人类中的一大部分会从我们身上学到：自由绝对是超然的恩赐。通过启发心智，它的力

量既能够波澜不惊地驱散内心的敌人，也能够锣鼓喧天地击退外来的仇寇。”另一位仰慕者写信对杰斐逊说：“先生，全天下苦苦挣扎的共和人士都以您马首是瞻，从您身上获得希望。”

杰斐逊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沾沾自喜。“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假设之中，”他说，“就浪费了成就一番真正事业的宝贵时间。”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国家元首的责任”，杰斐逊有一次说，是要“集全体人民的信任于己身”，“把人民的力量全部联合起来，引导它们向唯一的方向前进，就如同全国上下为一体一心”。他也知道，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绝非易事。“对你的祝贺，我衷心表示感谢。不过，现在开篇才只写下几行而已，”他写信对友人约翰·佩吉说，“最后结局如何，没有人能够预料。”

[21] 戈耳狄俄斯之结：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戈耳狄俄斯所系的难解之结，神谕能入主亚细亚者才能解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挥利剑把它劈开。——译者注



用杰斐逊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买下路易斯安那，这宗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土地购买交易，整个事件简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第三十二章
新秩序开始

您一直深得民众的拥护，如今又取得政府的支持，前景不会比预期更有利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您要面临诸多麻烦与困境。

——詹姆斯·门罗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中有君主主义者。

——托马斯·杰斐逊

双方的对话交流缺乏热情洋溢的气氛。为了给就职典礼做安排，杰斐逊不得不给他的亲戚，约翰·亚当斯任命的首席大法官、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写信。仅仅几天前他还是杰斐逊竞争总统宝座的潜在对手。杰斐逊写道："既然两院已收到举行时间的通知，我猜想您会理解我希望务必严格守时。"马歇尔复信说他会"特别注意守时"。

两人都很准时。1801年3月4日星期三近午时分，当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准备从康拉德–麦克蒙公寓步行前往不远处的国会大楼。约翰·亚当斯并不在场。这位美国第二任总统早已计划搭乘凌晨4点的马车离开华盛顿，启程北上返家（据说他途经纽约时"风驰电掣"）。《马萨诸塞侦查报》撰文称："假使他能够逗留到继任者正式就职后再走，两党中理智的温和派人士会较为满意，也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1800年11月亚当斯之子查尔斯亡故，亚当斯仍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加上阿比盖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期待他早日归来，他已迫不及待离开首都。尽管亚当斯后来度过了1/4个世纪的春秋，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华盛顿。

国会山上炮声在杰斐逊寄居的公寓外回响：哥伦比亚特区炮兵部队鸣响了礼炮。上午时分，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造访，来取一个小包：杰斐逊用工整的小字抄写的就职演说的副本。副本将拿去排版，并在《国民通讯员报》上发表。

10点，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一连步兵抵达，组成了一小支游行队伍。将近午时，杰斐逊走到室外，与护送他参加就职典礼的一批军官会面。国会议员代表们加入了护送队伍，他们跟随着这群军官前往国会大楼。军人们分成两列，抽出宝剑，请杰斐逊通过。他步行经过时，军人们立正、敬礼。炮声再次震响，声音回荡在山顶村庄的上空时，杰斐逊走进了国会大楼。

约有1 000人在参议院会议厅等候着他。一位立法者在给妻子的家

书中这样描述会议厅："大厅雄伟壮观，装设富丽堂皇。"房间长86英尺，宽48英尺，顶高41英尺。每位参议员都有一张桌子和一把红色皮椅。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写道，会议厅"太拥挤，我相信什么东西都进不来了"。当杰斐逊向大厅中部走去的时候，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起立以示敬意。

马歇尔主持就职宣誓仪式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用微弱的声音——在如此拥挤的房间里很少有人能听清——宣读了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国家文件之一：一份争取自由与克己自制的声明。

> 所有人……都会牢记这一神圣的原则：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志都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意志必须合理才可合法；少数派拥有同等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若侵犯，即是压迫。因此，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恢复和睦与友爱，如果没有这些，自由，甚至生活本身都会索然无味……各种意见分歧并不都是原则性分歧。我们以不同的名称呼唤同一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这个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那就让他们不受干扰地去做吧，将他们视作象征安全的纪念碑，有了安全的保障，错误的意见就可得到宽容，理性就得以自由地与之抗争。诚然，我知道，有些正直之士担心共和制政府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政府，担心我们这个政府不够坚强，但是，在试验取得成功的高潮阶段，一个诚实的爱国者难道会因为一种理论上和幻想中的担心，就放弃这个迄今带给我们自由和坚定的政府吗？就以为这个被世界寄予最大希望的政府可能需要别的力量才得以自存吗？我相信不会。相反，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我相信唯有在这种政府的治理下，每个人才会响应法律的召唤，投奔至法律的麾下，像对待切身利益那样，迎击侵犯公共秩序的举动。有时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么，能让他去管理别人吗？或者，我们在统治人民的君王中发现过天使？让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
> 各位同胞，我即将担当起你们委派给我的职务。根据我担任较低职务的充足经验，我已经意识到这是最艰巨的职务，因此，我能够预期，当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人从这个职位卸任时，很少能像就任时那样深孚众望。……由于判断有误，我会常常犯错。即使我是正确的，那些不是站在统筹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人，也会常常认为我是错误的，我请求你们宽容我自己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决不是故意犯的；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反对别人的错误，这些人如果能全盘考虑，也决不会犯了。

这篇演说堪称政治杰作。"今天，新的政治纪元开启了——新秩序开始了。"约翰·马歇尔在就职典礼开始前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写的信

中说，“民主党人分成了投机理论分子和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我不倾向于把杰斐逊先生归为后者。”然而，“如果他与他们达成一致，我们不难预见，我们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如果他没有如此，他们不久就会与他为敌，造谣中伤之事在所难免。”下午4点再提笔写信时，马歇尔的情绪稍微好转了些。他写道：“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就会看到他的就职演说了。总体而言，观点阐述且表达了和解的意愿。”

詹姆斯·贝亚德认为这篇就职演说“政治意义比我们期望得要好，而且也没有迎合另一党派拥护者的各种愿望”。汉密尔顿承认演说“可谓坦率地厘清了过往种种误解，同时向民众郑重保证，新任总统不会沉溺于危险的改革措施，而会在关键问题上继续循着前任的脚步前进”。对医生本杰明·拉什，这位杰斐逊的崇拜者而言，这是感恩祈祷的时刻。“老朋友们由于所属党派不同，因所谓假定的政治原则上的分歧而隔阂多年，听完演说，立即握手言欢，因为他们头一次发现，对于实现国家的利益，他们仅仅在最佳实现方式上意见不同而已。”

政治失意又蒙受丧子之痛的约翰·亚当斯从马萨诸塞州昆西镇致信杰斐逊，信中提到他亡故的儿子。“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我衷心希望你永远也不会遭受任何类似的惨痛经历。”亚当斯又添了一条亲切的政治意见，“这一带联邦和睦平静，你期待执政期内的平安繁荣料想应无所滞碍，对此我谨向你表达诚挚的祝福。”

杰斐逊绝不会仅仅代理执政。他行事果决，雷厉风行，渴望拥有长久以来追求的权力。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致信杰斐逊，“我们思索……魁伟强壮之士肩负重担乃自然之选择。我们深知您的心里定会为实现宏大的目标，在广阔领域纵横捭阖、殚精竭虑而欢欣雀跃，这亦是天性使然。”

杰斐逊对建设国家的雄心壮志不可估量。他说，在任期内，他要“坚定不移地追求这样的目标，要证明生活在如本国这样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的人民，是有能力在政府的领导下明智行事的，政府基于人的理性成立，而非出于恐惧和愚行。……这是目前最接近我心愿的目标”。

杰斐逊私下里承认他所面临的重担。“我感受到民众极大的善意和殷殷期许，”就职典礼翌日他写道，“现在我的信心要大于自身的能力，我害怕会令朋友们失望。”

无论是追求父母、教师、同龄人还是人民的认可，杰斐逊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以旺盛的精力，尽心竭力地担当着一家之长的重责。一直以来，其所受的教导都是为他人的生活与幸福负责，除此以外，他别无所求。他对人的本性和人为管理思考良多，他相信，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自己就职演说中所宣称的“和睦与友爱”，便是他的责任。

从发动战争到干预经济、购买土地，应对联邦开支、法庭传唤，与国会和法庭共享信息，杰斐逊或维护或扩大了总统内阁的权力。杰斐逊

很幸运，身为在国会占大多数的共和党党主席，参议院两党人数差距日益拉大：1801～1803年还是17位共和党党员对15位联邦党党员的微弱优势，到了杰斐逊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8：6。共和党关于限制与最简管理的辞令的确语出赤诚，但几乎未加控制。杰斐逊在高谈理想却做事务实这方面已是登峰造极。举例来说，为表抗议“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他本可以辞去副总统职务，然而，他却继续留任，等待着可能攀登到政治顶峰的那一刻。身为总统，他确实打算沿用一路走来的方法进行统治。

杰斐逊坐镇总统府后，在其两届任期中发生的故事，把他这样一个热衷于控制与权力的人的一切美德与缺点，统统呈现在了最大的舞台上。看来，期待他精简行政权，开启新篇章的联邦党人大错特错了。

杰斐逊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关于一个中央政府权力弱化的农业国家的构想，把自己摆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他们说，汉密尔顿才是那个正确地预见了未来的人，未来需要金融体系和举国之力创造国家的辉煌。

这类关于杰斐逊的评论属老生常谈，但失之全面。杰斐逊向制造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发出了安抚的信号，它们本早对这位重农轻商主义的捍卫者心存恐惧。1801年2月18日星期三，杰斐逊写了一篇通讯：“有一项对我的指责一再被重复，以至似乎有些人已经对它信以为真：我是商业的敌人。他们确信我是农业之友，却揣测我与处理农产品的唯一方式为敌。”

直至1809年杰斐逊离任，其任职期间声势浩大、坚决果断，且往往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说杰斐逊利用汉密尔顿主义的方式追求杰斐逊式的理想也不为过，他巧妙而又坚定地把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打政治战并不适合他，他更愿意不事张扬，拒绝哗众取宠，低调地在事件进程中烙下自己的印记。他太过平静的表现，让他在主流历史上留下了无所建树的总统形象。

他懂得，这个国家欢迎，甚至渴望一个不像华盛顿和亚当斯时代那样侵犯隐私又傲慢专横的政府。在杰斐逊执政的8年里，国债由8 300万美元减少到5 700万美元。他削减税赋，控制开支，在新和平时期——美法准战争在其就职前6个月已经结束——杰斐逊把军费开支缩减到了战前水平，海军规模也减少到13艘护卫舰。那个时期，他认为美国是无法与欧洲诸海军强国对抗的。他的海上战略重在防御，但对巴巴里海盗，则继续追击开战。

杰斐逊长久以来只关心两件事：美国自由和美国力量。8年来，为了美国能朝着自己心中所设想的国家前进，他召集了一切可兹驱使的力量。18世纪90年代党派纷争中，他的很多政敌曲解了他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汉密尔顿式集权主义的倾向，认为这是他不切实际的表现，也是他

的弱点。他们很快就会明确无误地知道，他们错了。

联邦制美国改革在表面上始于就职典礼的早晨，杰斐逊谢绝佩带仪式佩剑参加宣誓仪式，打破了由华盛顿和亚当斯沿袭下来的传统。典礼结束后，杰斐逊像往常一样在康拉德–麦克蒙公寓就餐。不久，他卖掉了原属于亚当斯总统的马车和银质轭具，这是对联邦党人威仪的又一次象征性打击。

亚当斯一家人于1800年11月1日入住总统官邸时，阿比盖尔·亚当斯把东厅——这位亚当斯夫人之前称之为“尚未竣工的豪华会客室”——用作晾衣室。现在杰斐逊安排他的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在那儿工作。总统自己的办公室则选在了一楼西南角的一个房间。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房间里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里面放着杰斐逊的工具和各类小摆饰，窗户上养着天竺葵，几只嘲鸫近在手边。

他性喜安静，却受不了寂静无声。他通常哼着曲子，或者轻声吟唱。从70年代初开始，杰斐逊就开始饲养嘲鸫作宠物，他喜欢它们的啼鸣。有时在长达数小时的沉思默想时，他会打开鸟笼，让鸟儿们在蒙蒂塞洛私宅或者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飞来飞去。

1772年的11月，杰斐逊在查尔斯城郡他的岳父约翰·威利斯家的一个奴隶处买了第一只嘲鸫。又过了20年，嘲鸫才在蒙蒂塞洛自然繁殖起来。当杰斐逊得知嘲鸫在山顶筑巢，他给家里写信说道：“告诉孩子们，要把它当作化身鸟类的灵物给予尊重，如果伤害了它或者伤了它的蛋，它的鬼魂将对他们纠缠不休。”

任总统期间，杰斐逊养了一只鸟，取名迪克。鸟笼挂在办公室的窗户处，窗户周围环绕着天竺葵和蔷薇。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说，迪克“在杰斐逊独自用功时一直陪伴在身旁”，有时停在杰斐逊的肩上，有时“从他衔着食物的嘴上啄食吃。杰斐逊回卧室休息，它经常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后上楼；他午后小憩时，迪克就待在沙发上，唱出一串串婉转的旋律”。

杰斐逊接管总统官邸之后，他下令拆除草坪上一处木质厕所，派人把建造“构造精良的……盥洗室”所需的材料从费城送来。在蒙蒂塞洛已经习惯当一家之长，杰斐逊在总统官邸力求建立起同样的家风。他决定哪些家具保留，哪些家具处理掉。原来亚当斯家人用作正式会客的房间（今美国国家宴会厅）被他选作办公室，一楼椭圆形的房间（今美国白宫蓝厅）被改成了画室。他下令在官邸里安装唤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召唤佣人。这个便利装置亚当斯一家考虑了很久，而杰斐逊在入住最初的几个月就完成了。管家拉潘向他随时汇报装修和改建的进展。不久艾蒂安·勒迈尔成了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管。

杰斐逊内阁成员代表着国家的几大主要地区：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被任命为国务卿，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伯特·加勒廷就任财政部

部长，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亨利·迪尔伯恩成为战争部部长，利瓦伊·林肯即将获任司法部部长，来自马里兰州的罗伯特·史密斯成为海军部部长。

任命加勒廷实为精明睿智之举。加勒廷1761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780年来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过军，在哈佛教授过法语，精通金融，曾担任一系列竞选职位（其中包括十分短暂的参议员席位，由于不符合美国公民身份的要求于1794年被解职）。在施行“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日子里，1798～1800年美法准战争的动荡岁月中，加勒廷是众议院共和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和他第二任妻子汉娜与杰斐逊交情甚笃，后者信任他在财政及政治方面提出的建议。他于1801～1814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一职。

列出共和党在国会和各州的获胜情况后，法国外交官路易–安德烈·皮雄向巴黎报告，杰斐逊处于巅峰状态。美法冲突正盛期间，看似不可战胜的联邦党走向衰落，令人震惊。皮雄说：“衰落之迅速实在令人瞠目。”甚至新英格兰地区也受到了共和党的崛起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言，杰斐逊先生仅会面临微弱的挑战”，皮雄写道，西部人口的扩张只会扩大杰斐逊的权力，因为这些人会“无一例外地反对沿海城市”。

兴致勃勃的新任总统用他偏爱的航海作喻。“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雨曾横行四野，”就职典礼两天后杰斐逊给约翰·迪金森写信，“我们的‘阿戈斯’号的坚固程度受到了最严苛的考验。她的力量经受住了风浪，即使她被驶向那个方向的目的就是希望她沉没。我们要把她调转到共和党的风向上，让她以优美的动作展示其建造者们的能力。”

英国科学家、神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则尽情发挥了自己的历史想象力：“我们不能再说普天之下没有新事物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章是崭新的，共和国版图之广是崭新的，人口之稀少是崭新的，席卷这片土地舆论浪潮是崭新的。”

杰斐逊就是如此理想化，但他也是现实的。“即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正确的事，我也能觉察到，基于理性思考和经验证明的改革，多多少少总有无法诉诸施行的，”他写道，“然而，当我们思索驱动或改变这架社会大机器操作之难，骤然将全体人民的观念转变到理想境界之不可为，我们就会发现梭伦[22]的智慧之处，他说，行事即使合乎情理，也不可超出国家可承受的限度。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浪费公帑的行为，赶走那些靠此敛财的贪婪人士，这可视为对墨守成规上的稍作改动。”

杰斐逊还生动又直言不讳地形容联邦党人是一群疯子：“他们的领导人是一群重症不治的患者，和其他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享有受保护和受照顾的权利。”然而，希望仍然存在——对于杰斐逊而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希望。“这段时期令人不快，”他说，“但是他们证明了一条有价值的真理：正直善良的公民永远不会对民主共和国感到绝望。”

普里斯特利也希望，“政治不会让你忘记什么对于科学才是真正合宜

的”。杰斐逊实际上把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才会产生调查自由的感觉。从君主制或者世袭制度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的人，生活在公民之间和睦友爱的环境中，他的思想才更有可能无拘无束地发展、成长、创造、革新。这是杰斐逊理想的共和国，他将矢志不移地让它实现。

关于如何按照参众两院狭隘的决议管理政府，杰斐逊收到了不少忠告。“许多朋友会因为失望而渐渐疏远，”詹姆斯·门罗写信说，“那些迫不及待的暴力狂热分子会因为没有如愿以偿而觉得遭到羞辱；另外，……还有那些失意的亲英殖民者，过去主要由于分裂和种种愚行而狼狈落败，也会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我们……他们会与国外势力勾结，因此我们必须加以关注。”坦奇·考克斯发出了警告，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体所面临的危险，无论国内外，仍然存在。”

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看来，“失势的一党被普遍认为由英国操控，旨在破坏全体人民手中的自由。”

每天，杰斐逊在总统官邸一楼他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事件和问题。官员的任命、新英格兰的政治、巴巴里海岸、农业政策、西印度群岛、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文件如潮水般在杰斐逊面前来去。

帕茜和波莉都没有来华盛顿和他一起生活，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萨莉·赫明斯曾经离开阿尔伯马尔县来总统官邸拜访。尽管杰斐逊喜欢社交，他在华盛顿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有梅里韦瑟·刘易斯和他同住在尚未竣工的宅邸里。杰斐逊说，他们生活得就像“教堂里的两只老鼠”。

他任职初期备感孤独。他的同伴迟迟未能聚集到他身边。在总统府安顿下来时，他说：“我还感觉不知所措。”詹姆斯·麦迪逊和艾伯特·加勒廷尚未定居首都。加勒廷一家抵达时，他们收到了一份杰斐逊发来的全员邀请函，他请他们每天在一起用餐。他说，那将是“真正的承情”。不过，杰斐逊失望了，因为加勒廷夫妇决定搬到离总统府更远的地方。8月，加勒廷写信告诉杰斐逊，“这座城市有碍健康，我的家人也有同感，因此他们十分急切地想搬到国会山居住。”不过财政部部长很快让杰斐逊宽了心，因为他会住在附近，“以前骑马20分钟的距离要被10分钟的替代了”。

与他许多官员和议员们不同，杰斐逊喜欢这座首都新城。“我们觉得这里是一处宜人的乡间居所，”他写道，“上流社会，且交往适度，没有噪声、暑热、恶臭的困扰，也不受附近新建镇子忙乱熙攘生活的影响。”

创建美国崭新的未来必须纠正过去联邦党执政时期的过激行动。杰斐逊签署赦免令，释放了一些因《惩治叛乱法》而获罪的出版商人。其中，他的老盟友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被定罪、罚款并入狱，他的案子是杰斐逊本人最关切的。卡伦德的赦免令签署于1801年3月16日星期一。

卡伦德有三个孩子要抚养，想让政府归还当初200美元的罚款。但罚款迟迟未还，1801年4月12日星期日，卡伦德因仍不见动静的罚款问题“大失所望”，感情“受到伤害”。他说：“我现在开始明白什么是忘恩负义了。”

杰斐逊希望他的人民时刻意识到如今是共和党当政时期。1801年3月20日星期五，他让艾伯特·加勒廷对联邦党人罗伯特·古德洛·哈珀写的一封对华盛顿——亚当斯当政时期歌功颂德的通函予以回应。杰斐逊说，通函中描述“虚假浮夸”，因此“有必要展示一下奖章的另一面”。出于极度谨慎，杰斐逊没有在附函上署名。

居于幕后指挥共和党发表文章对于杰斐逊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件事同时也暴露出，从执政开始，他转而向加勒廷寻求协助。自1800年起，杰斐逊过去几年一直器重倚赖的卡伦德已经不再受青睐了。

为什么杰斐逊抛弃了卡伦德呢？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中频频出现的一个特点：总统功成名就时，那些帮助他取得胜利的不太正派的人或不够光明的手段，总让他有所介怀。新上任总统通常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野心家，孜孜以求胜利，而是一名政治家，实际争取选票时遭遇的肮脏与付出的辛劳与他全无干系。正如出身卑微的人不喜欢被人提醒马厩的气味，达官显贵厌恶回忆积垢累累的旧事。那位巧舌如簧的辩才在选举征程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但如今普选已决，他的阴谋诡计在审判时也大白于天下，很显然他的尖刻抨击已无用武之地了。对卡伦德，杰斐逊为追求权力做了一笔魔鬼交易：他支持并与卡伦德——这个精通党争中黑暗手段的人——为伍，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人有朝一日可能与他变友为敌。

在罚款仍未退还时，卡伦德告诉麦迪逊：“杰斐逊先生没有归还我一分一毫的罚款……我不是那种可以白白压迫或抢劫的人。”卡伦德考虑再三决定，认为拿回罚款固然很重要，但获得里士满邮政局局长这个美差或许更好。他赶到华盛顿与麦迪逊会面。“归还罚款的要求被冷淡地拒绝了，就如同当面侮慢，令人恼火，”卡伦德写道，“小麦迪逊……滔滔不绝，辩称在华盛顿还钱是不恰当的。”

许多因素都在作祟。“你知道吗？他除了其他嗜好，现在还臣服于所谓爱情的专制之下？”麦迪逊问门罗。“他的爱情之火住在里士满。我没问她的姓名，但猜想她年轻漂亮，至少在他眼里如此，而且她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自吹自擂，坚信一份邮局的薪金和名声会为他赢得美人归。不过，就算有这些推荐，他还是要失望地打道回府了。”

麦迪逊也对总统说明了情况。杰斐逊派梅里韦瑟·刘易斯给卡伦德送去50美元，以度过罚款全额赔付之前的困难时期。卡伦德对待刘易斯的态度表明，杰斐逊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他所想的要严重。“他对刘易斯上尉的言语十分傲慢，”杰斐逊给门罗的信中说，“他暗示自己手中握有把柄，遇到某种情况时他就会使用。他收到的50美元不是施舍，而是应得

之物，更明白地说，是封口费。他说，我知道他的要求，即欲求获得某个职位，另外还说了一些类似这个意思的话。”

感觉自己受到伤害，愤怒的卡伦德等待着复仇的时刻。

总统府内，杰斐逊渴望控制一切。1801年11月，他给内阁成员发了一封便函，以通知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运作方式。这是一份和往常一样存在流程问题的权力文件。

杰斐逊想掌握一切细节，他循华盛顿总统的先例，制定了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几乎所有公函华盛顿都要经手。“以这种方式”，杰斐逊告诉他自己的内阁，华盛顿总统“总是能准确地掌握联邦各处所有的事情和进程，无论这些事情和进程事关哪个部门”。

这也是杰斐逊所期望的事情。他说，他感到“公众的意愿强加给了我一种责任感，我本人要尽力完成他们委托我的任务”。正如斯言，他期待获悉各种情报信息，他告诉加勒廷：“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或者讲述事态信息，这样的文件……比较合我心意。”

他想知晓一切。他必须知晓一切。

[22] 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古希腊七哲之一，他修改了德拉古所制定的法律条文，使之不过于严酷，他以财产取代出身把公民分为四等，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译者注

第三十三章
踌躇满志的总统

总统推行的种种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欢迎。

——约翰·昆西·亚当斯

人们满怀激情与热忱，提出如此多的诉求和期望，而各自利益和目标却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满足一方诉求，就会有损他方的利益。

——托马斯·杰斐逊，谈华盛顿特区政治文化

时至1801年11月中旬，总统任期进入杰斐逊称之为“稳定常规阶段”。他每天伏案工作10～13个小时，从清早到正午，处理文件，接待来访者。他计算过，“有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骑马、吃饭和少量余暇”。他中午时尽量离开总统府，骑马或者散步，然后再回来“会见客人，处理事务直到掌灯时分”。仅仅在晚上的时候——这样的夜晚极其罕有——他才有时间沉浸在喜欢的“机械、数学、哲学等学科中”。

杰斐逊极其注重隐私。他很高兴解雇了总统府某位男佣，“我有理由相信，我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会偷看碰巧放在桌上的文件，我又不能每次出去的时候把文件都锁起来”。

杰斐逊自己的时间也很难保证。有一次，他必须快速反应，以缓和与一位支持者之间的紧张态势。杰斐逊给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共和党两院发言人纳撒尼尔·梅肯写信说：“某个敌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正种下毒草。”杰斐逊说，事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要好好谈谈，“今晚我的客人可能会待到很晚，但是明晚或者后晚，我可以一人独处。”

每次国会会议前夕，他会与朋友们相约见面，因为他知道下次再见面时，这些立法者们就要离开华盛顿了。“因为国会本周开会，我们现在就开始忙忙碌碌筹备了。这个星期，我都要和朋友们吃饭，为国会竞选做准备。”他给外孙女埃伦·韦利斯·伦道夫·库利奇的信中说，“这些事一开始，我要处理公务，还要招待朋友，就不能准时回信了。”

其中一位这样的朋友是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她与丈夫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这些年来与杰斐逊、多利·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结下了深厚友谊。麦迪逊一家人安顿好住宿之前，曾在杰斐逊的总统府邸住过一阵。他们起初住在离乔治敦4条街以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最后在F街1333号定居。多利在她家三层楼的砖结构房子里大办沙龙，她的餐厅和客厅里总有政治讨论和她所谓的“时尚话题”（偶尔也会有牌局，她是位

嗜赌人士）。

1801年5月，内阁成员纷纷到来，史密斯夫人说，首都“和冬天时一样热闹了。各位部长的到来似乎给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家人为准备居所也给一些工匠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总统官邸举行的小型晚宴上，麦迪逊一家也在座，史密斯夫人坐在杰斐逊旁边，再一次为他“从容、坦率而又温柔的风度”所倾倒。后来在客厅看到总统和詹姆斯·麦迪逊相处的情景，史密斯夫人觉得这两人“如此亲密而不拘礼，表现得全无克制”。

加勒廷一家也是总统圈子里的熟面孔。他们决定住在靠近32号的M街。加勒廷夫人虽称不上漂亮，但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女性。“她的头脑与心灵远比她本人更具吸引力，然而，我并不希望她再拥有除此以外的其他特质。”艾伯特·加勒廷在他们婚姻期间曾这样直率地描述他的妻子，“她善解人意；与众多年轻女士们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为人单纯，不做作；爱我，并且是一位不错的民主人士。”

杰斐逊执政事必躬亲，他不知道有其他办法。他观察过佩顿·伦道夫领导1619年弗吉尼亚州议会在威廉斯堡市尼科尔森和北英格兰街伦道夫安有楔形护墙板的深红色房子里举行会议，他有时也会列席。就他在邦联议会度过的岁月，以及以副总统身份主持参议院的4年中，杰斐逊完全了解如何对待议员，因为他长久以来就是其中一员。即便在当时，得到总统的关注对于政客们来说，和对普通老百姓一样，意义非凡。他一直低调处理身为民主共和党象征的身份，杰斐逊明白，与总统本人见面，治国之道就可能大相径庭。因此，他宴请议员，也十分愿意接待来访者。

杰斐逊的策略是奏效的。在杰斐逊主政的那些年，据闻共和党人承认，每当他们计划投票反对杰斐逊时，“总统的宴请让他们噤了声”。

杰斐逊相信总统和议员之间需要不断地对话沟通。他认为，“如果议员们不了解什么样的信息传达给公众才是重要的……这样的政府是投机冒险的政府，而不是计划周详的政府”。总统必须对立法者心存信任，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可能不会再宣之于众，要与他们建立一种亲密感，让他们了解双方的目的是共通的。向政客们发表演说，或者看上去像是在对他们发表演说，既不会令他们衷心拥护、鼎力相助，也不是管理妙方。

杰斐逊喜欢不着痕迹地行使权力。“美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拿破仑有一次问一位刚回法国的游历者，他与杰斐逊总统有过接触。游历者说：“陛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恰是杰斐逊希望世人所想的。

另一位总统官邸的来访者，欧洲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在杰斐逊的私人房间拜访了他。洪堡特男爵看到民主共和党权力中心放着一份极其负面的联邦党人的报纸，他问杰斐逊：“为何允许这些诽谤言论存在？为何这份造谣中伤的报纸未被封杀？或者，至少报纸的编辑应该被

课以罚款并关入监牢吧？”

这些问题给杰斐逊提供了绝佳的反驳机会。“把报纸装进口袋吧，男爵。如果您听到任何人质疑我们享有民主自由、质疑我们出版自由，就把报纸拿出来，告诉他们您是在哪里找到它的。”

华盛顿总统刻意保持一种循规蹈矩的形象；杰斐逊总统早晨和中下午接待访客时却好像刚从外边骑马回来，有时情况确实如此。“杰斐逊先生毫不做作。他迎接客人时不修边幅，全无繁文缛节。”1802年路易–安德烈·皮雄在巴黎写道，“他每天骑马或步行离开，以骑马为主，身边甚至没有佣人跟随。”

杰斐逊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无须通过光鲜的衣着证明什么。与此相反，往往是那些出身优越或者社会地位尊崇的人才能避免世俗的约束——对条条框框的忽视或疏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杰斐逊的衣着搭配多为旧双排扣长礼服、棉绒及膝短裤、纱线长袜、老式便鞋。

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与杰斐逊会见时，他发现总统“表现得大体上客气有礼”。在总统官邸，“门突然开了”，杰斐逊站在那儿。“他径直朝我伸出手，和其他人也是如此，然后请我坐下。”福斯特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幸好我在土耳其待过，对这种简陋的待客之道已相当习惯了。”

杰斐逊的外表令福斯特大为吃惊。福斯特的家书中写道：“他穿得看上去极像个普通农夫，便鞋还趿拉在脚后跟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斯托里与福斯特见解不同。他是一名律师兼议员，1811年进入最高法院。他理解杰斐逊的举止所为何意，一个极度关注欧洲对美国品味和文化评价的人不会是个乡下懒汉，他不过是本性如此。“弗吉尼亚人惯以衣着简单朴素自矜，”斯托里写道，“他们情愿以出色的头脑和温文尔雅的态度赢得关注。”

另一位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与斯托里有同样的感受。桑顿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杰斐逊可能受到了共和主义“平均精神”理念的吸引，但是在总统官邸却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迹象。官邸“陈设比亚当斯先生时期要好得多；就家庭用度和生活水准来看，也比任何一位前任总统（当政）时期的开销要高得多。不过，却没有当年华盛顿将军表现得那么讲究形式和排场”。

杰斐逊对个人及领导力的自信显而易见。他认为1800年选举的结果就是一道要求改变的执行令。通常他将权力运用得不动声色，但是他的的确确在行使，确保自己掌管行政部门，同时将意愿传达给国会中的同盟者。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杰斐逊“通过施加个人或官方影响，令各项议案得以通过，他整套行政机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一如杰斐逊长久以来的做法，他倾向于尽其所能巧妙而坚决地让一切事务都按

他的意愿来办。

与其说他是传统斗士，不如说他更像一名象棋棋手：考虑周详每步走法，巧妙迂回下每一步棋，而非不经思考，大张旗鼓地应对。事实上，在华盛顿时，他发现需要一本留在蒙蒂塞洛的书：由象棋大师弗朗索瓦–安德烈·达尼康·菲利多尔撰写的一部棋谱。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精确地记得书籍的位置。“你可以在书房进门左手边第二个书柜里找到。”他写信告诉小托马斯·曼·伦道夫。

在1801年5月中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杰斐逊与顾问们就巴巴里地区问题展开了争论。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派出一支中队前往地中海，由海军准将理查德·戴尔带领，震慑针对美国商船的海盗，以阻止其继续进行海上掠夺。“全体一致同意巡航便于行事。”杰斐逊如此记录。

他还想确定全体一致同意另一件事，那就是海军“搜寻敌人的舰队，一旦发现，即予以摧毁”是由行政机关授权，而非立法机关授权。如果戴尔发现巴巴里地区任一国家向美国宣战，他就要“调集船队对他们予以严惩”。如果他发现巴巴里地区所有国家都向美国宣战，他被告知要分布军力“以便保护我方商船，并在发现敌方船只及舰队时，通过凿沉、放火或摧毁的方式严惩其傲慢”。

1801年8月1日星期六，戴尔下辖的“进取”号在船长安德鲁·斯特雷特的带领下，在马耳他附近击败了的黎波里人的“的黎波里”号。“长久以来，这些野蛮人遭受着煎熬，全因对协议的神圣信念以及对人性的权利和本能进行践踏，”杰斐逊告诉斯特雷特，“你向同胞们表明，敌人在勇气和智慧合而为一时不堪一击。”斯特雷特先牵行了这艘巴巴里船只，后又予以放行，继续其航程。继该事件之后，杰斐逊描述了美国此次的胜利，并请求国会授权在地中海地区对进犯者实施主动进攻。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早在春天，他就未经国会许可授权如此行事了。斯特雷特自那时起就一直在奉命采取行动。杰斐逊表面上尊重国会的意见，实际已十分有效地控制了军事及外交政策。这是杰斐逊的典型做法：在不引发冲突对抗或横生枝节的情况下达到个人的目的。

国会落入了杰斐逊的掌控，不但在实质上追溯批准了向戴尔发布的命令，而且在斯特雷特事件之后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国会宣布，行政长官“在战时状态，或者在其认为必要时，可下令采取战备或战争所涉及的一切行动”。

根据此法令，杰斐逊精心策划了一项行动，企图推翻的黎波里当时的帕夏[23]（此人暗杀了自己的亲父和亲兄），让已逃亡突尼斯且更易摆布的弟弟哈米特登上王位。其后几年，美国人尝试帮助哈米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的黎波里政权，但未获成功。这一行动脱胎于杰斐逊最初对该地区势力的单方面规划。他担任国务卿时，就成立美国银行一事据理力争，反对对宪法进行宽泛的解释。事到如今，他发现身为总统，自身

的种种权力恰恰得益于对宪法最宽泛的解释。

梅里韦瑟·刘易斯从总统官邸出发，策马奔上国会山。时值1801年12月8日星期二，总统私人秘书刘易斯受命向国会递交杰斐逊的第一份年度报告。

杰斐逊说，除巴巴里国家外，世界大体处于和平时期。他谨慎而又坚定地强调，他相信斯特雷特取得胜利的消息，“向世界证明，我们谋求和平并非缺乏勇气，而是衷心希望把举国之力用于人类繁衍，而非造成毁灭”。

杰斐逊削减联邦赋税及支出，阻止建立新法庭，允许各州自主决定内部事务的流程，这些举措标志着华盛顿和亚当斯领导下的国家基本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总统年度报告引发的反响十分热烈。“没有什么比总统的报告更加令人欢欣鼓舞，”约翰·泰勒说，“……也没有什么能令君主主义者们更愁闷不堪了。”

联邦党人对于事情的发展不甚喜欢。“弗吉尼亚简直控制了一切，”1802年4月罗伯特·特鲁普写信给鲁弗斯·金，“杰斐逊是一切举措的最高统领：他不举办招待会，不遵守礼仪，经常身着便装会客，有时甚至穿便鞋；随时可以找他，而且他与要人们的关系十分熟稔。”

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抓住了杰斐逊式象征主义的精髓。年度报告抵达国会山之后，格里斯沃尔德写道：

> 在现政府领导下，不会因循旧制。事无巨细均要改变。亚当斯先生任总统时，总统官邸的大门敞向东方；杰斐逊先生关上了这扇门，新开启的门朝向西方。华盛顿将军和亚当斯先生在每次国会开会时都发表演说；杰斐逊先生则不发表演说，而是通过书面的报告沟通交流。我担心，你们这些新英格兰的贵族们会认为这些重要的变化无关紧要，还要说这些变化仅为表面功夫，但是你们要记得，你们既不是学者，对民主党政策的谜团也不甚了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纽约晚邮报》[24]上撰文，指出杰斐逊的报告应使“那些忧心政府安全、思虑国家责任和福利的人士警醒”。他所描绘的杰斐逊，意图不轨、心胸狭隘、性格暴戾。几个月间，汉密尔顿给古韦纳尔·莫里斯写信：“大概美国没有人比我为现行宪法付出更多了，我现在仍尽心竭力支撑着它脆弱而又无用的体系……除了退出，我还能做什么呢？日复一日的现实向我证明，这不是我所期待置身其中的美国。”

1801年走向尾声时，那时的美国的确更偏向杰斐逊式而非汉密尔顿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杰斐逊先生的敌人们苦心编造以诋毁他的子虚

乌有的事逐渐消失。”皮雄在给巴黎的上级写信时说。

一天，一个巨大的奶酪送到了总统面前，它来自马萨诸塞州柴郡的人们。在平民百姓中，这件奇物成为向共和主义致敬的象征。“它不是巴士底狱里最后一块石头，也不像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份自觉自愿赠送的礼物，我们希望它能被收下。”柴郡人民如是说。

1802年元旦，杰斐逊把上帝和政治都放在了心上。1801年10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科尔布鲁克，丹伯里浸礼会赞扬了杰斐逊关于宗教自由的观点。

作为回应，他发表一份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声明作为鉴证，使得他联邦党的宿敌们大为震动。“要相信，宗教只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务，任何人对他的信仰或敬神都无权干预，政府的立法权力仅涉及人的行为，而非观点。我怀着至高无上的敬意看到，全体美国人民宣告，他们的立法机构‘不应立法限制宗教成立，或禁止其自由行使宗教权利’，由此在教会和政府之间竖起一道分离之墙。”

1800年，本杰明·拉什帮助杰斐逊明确了政教分离的观点。“你希望宗教和政府保持相互独立，这我也同意，”拉什告诉杰斐逊，“如果在此关键时刻，圣保罗死而复生，他会对那些正忙着处理政治事务的牧师们说：‘停下你们的政治工作，你们的王国并不在此。细读我的使徒书。其中任何一处你们都不会看到我意图罢黜一名异教徒皇帝，或者扶植一名基督徒登上王座。基督教鄙视受到人类政府的支持。’”

联邦党人中，蔑视杰斐逊的情绪十分高涨。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乔治·卡伯特惧怕他所称的“民主的可怕弊端”，但是认为杰斐逊无法阻挡。1801～1802年冬春之交的种种事实表明，卡伯特对杰斐逊权力的评价是正确的。

在这几个月里，杰斐逊说服国会废除所有国内税收，向的黎波里宣战，在西点建立美国军事学院，放宽归化制度，也许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废止了1801年的《司法条例》。该法令扩大了联邦司法权限，新增了法庭和法官席位，在亚当斯离任前，这些席位全由联邦党人把持。

在听说总统在重新设计一套勋章作为给印第安部落的赠礼后，前战争部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语含讽刺：“如果他能只把他革命性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更没意义的事情上，那我们现在对宪法和国家命运就能更少些担忧了。”

从在议院争夺总统之位开始，阿伦·伯尔似乎就成为杰斐逊的共和党内一个不可控的政治因素。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认为，1800～1801年，联邦党人企图利用伯尔否定杰斐逊的胜利时，伯尔并没有主动拒绝；另一部分原因是，纽约州政治的复杂性——伯尔仅代表党内一个派系——杰斐逊决心一旦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就挫败伯尔的勃勃野心。一

个名为伯里特·马修·L·戴维斯的人想为自己求得一个联邦职位，前来拜见总统。听戴维斯诉说原委时，杰斐逊看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飞过，他眼疾手快从空中一把抓住了它。这个动作让来访者很难释怀：如此迅捷巧妙抓住苍蝇的总统，除非自己愿意，否则是不大可能为人所动的，最后戴维斯没有得到那份工作。而加勒廷说，那份怠慢被视为对伯尔的怠慢。加勒廷告诉杰斐逊："在纽约政坛混迹的人，几乎没有谁不相信，戴维斯遭拒是因为其是由伯尔举荐的。"

汉密尔顿十分犀利地评价了杰斐逊总统与伯尔副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1802年6月，汉密尔顿给金的信中说："能确定的是，这位领袖和他最可能的继任者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裂痕。这种裂痕是绝对无法弥补的，因为两人都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地彼此竞争。""伯尔先生一定会问鼎总统宝座，"路易–安德烈·皮雄写道，"玩政治阴谋没人及得上他。"

1802年，在首都一次纪念乔治·华盛顿诞辰的联邦党人庆祝晚宴上，伯尔不请自到，巧妙地"询问他是否擅自闯入——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并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据特鲁普向金报告的。伯尔颇为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寻了个恰当的时机问是否可以祝酒。请他发言时，伯尔举杯说道："向所有联合起来的正直之士致敬。"对与会者而言，其言下之意显而易见。特鲁普说："联邦党人普遍把祝酒词看作他主动提出合作的表示。"

1802年7月1日星期四，共和党人庆祝杰斐逊废止国内税收。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理查德·弗曼牧师将美国革命与杰斐逊执政联系起来，强调两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全国各地都在7月1日和7月4日举行特别庆祝活动，这足以证明全体民主共和党人对此都很满意。"

皮雄私下对杰斐逊执政颇多批评。"其执政原则显而易见：一股政党豪情，一颗希望迎合大多数人而保住权力的雄心，对标新立异异常的执着，以及质朴外表下隐藏着的幼稚的虚荣心。"皮雄还对杰斐逊颇有抱怨：他邀请法国使节及拜访使节的客人，却未邀请皮雄及其夫人。"一国之都极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皮雄说，"这是荒蛮之地明显的失礼行为。"

然而，联邦党人却看清了政治现实。特鲁普在1802年4月给金的信中写道："杰斐逊才是民主共和党人效忠的对象。只要在下次总统选举时不会危及杰斐逊的利益，伯尔毫无疑问是会被抛弃的。"

尽管杰斐逊从未去过弗吉尼亚州温泉村以西的地方，但他热爱西部。20年前，他曾提议由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带领探险队远征。10年后，即1793年，杰斐逊在美国哲学学会提议，计划由法国植物学家安德烈·米肖组织一场探险之旅。但是克拉克和米肖都未能实际成行，最后来自英国的威胁迫使杰斐逊（和美国）采取了行动。这种担心现在看来已完全过时了：英国（以及西班牙、法国及其他印第安部族）会根据情况，在新大陆建立或扩大持有的土地，将美国包围以限制其扩张，同时创造随时进犯的机会。

毛皮商人亚历山大·麦肯齐出版的新书《蒙特利尔启程游记》提供了新的契机。书中记叙了1793年麦肯齐穿越加拿大抵达太平洋的旅程。1802年夏，杰斐逊读到这本书时受到了极大震动。

麦肯齐激情满怀地写到英国在北美更广大地区的美好前景，称“仅需要英国政府的支持”以“确保国家对臣服者的贸易”。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政治原因”——大概包括大英帝国有可能再度统治失去的殖民地——“每一个熟悉英国土地及商业扩张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些政治问题”，麦肯齐暗示。所述种种都契合杰斐逊原有的恐惧，1783年他对乔治·罗杰斯·克拉克清楚地提过。“我担心，”杰斐逊写到英国和西部时说，“他们会考虑对那一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杰斐逊长久考虑的探险远征之旅适逢其时。他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太平洋的路线，并勾画出西部地区轮廓，那里很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之地。

杰斐逊没有四处寻找合适人选，而是选择自己的私人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领导这次远征。刘易斯1774年出生在距离蒙蒂塞洛10英里远的洛克斯特山，一个被杰斐逊称之为自己家“附近”的地方。年轻的刘易斯有一双蓝眼睛，为人勇猛果敢，1801年在美国陆军担任詹姆斯·威尔金森的副官时，被杰斐逊邀请去华盛顿总统官邸任职。刘易斯对“西部、军队及其现状的了解”给杰斐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评价约翰·亚当斯所移交的军队时，很显然激发了刘易斯身为军官的壮志。

杰斐逊信任刘易斯，欣赏他坚韧不拔的作风。在国会秘密同意资助远征队寻找通向太平洋的最佳路线后，杰斐逊请他领导远征队。（总统申请并收到2 500美元经费，而实际最后开销是这个数字的15倍。）杰斐逊告诉本杰明·拉什：“刘易斯上尉勇敢、谨慎，惯于在林中活动，熟悉印第安人的风俗和特点。”刘易斯请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弟弟威廉·克拉克加入远征队，共同组建了众所周知的西北探索军团。

杰斐逊认为美洲是“自由之帝国”。如今，他即将对这块大陆上国家现存边界以外的地区有更清晰、更细致全面的了解，占领这片广阔的西部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23] 帕夏：巴巴里地区统治者的称号。原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由此可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译者注

[24] 《纽约晚邮报》：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801年创办。1934年，更名为《纽约邮报》。——编者注

第三十四章
胜利、丑闻与隐疾

我们的总统和这位名叫萨莉的女子，生了几个孩子。夏洛茨维尔镇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在少数。

——詹姆斯·卡伦德，里士满《记事报》，1802年9月

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久之前，杰斐逊相信，自己即便不能结束党派分歧，也能超越党派偏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理想：那时人们带着恐惧和疑虑看待“政党”的理念。伟大的乔治·华盛顿在发表告别演说时还一度警告党派观念。

警告未起作用，杰斐逊所希望的稳固的政治统一体也从未得以实现。1801年年初，甚至在杰斐逊发表就职演说，宣布美国人既是联邦党人，又是民主共和党人之前，艾伯特·加勒廷就如实地汇报了首都的现状：“您可能以为被强行聚在一起，同住几间公寓，见不到其他人，我们就不太可能是温和的政客，抑或除了政治就什么都不考虑了。”联邦党人西米恩·鲍德温也有同感，他写道：“不同党派的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另有观察者说：“同一家酒馆或寄宿公寓的屋檐下不会有持异见的人存在。”

杰斐逊的确努力过了。“若可以不废弃原则，我会不遗余力消弭党派痕迹，巩固我们的国家。”1801年3月他这样说。34个月之后，经历了他第一个任期内的党派斗争，他接受了现实，定下的调子也务实了一些。他说：“我们一两年来光明磊落地追求和解的行动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

杰斐逊心里很清楚，他所能希望的最佳现实情况，不是实现永久的和平，而是与对手休战。政治分歧必然存在，最关键的是身为总统如何处理这些分歧。

杰斐逊采取的策略十分得当。他高瞻远瞩，并相信民主共和制度的前景，也自信自己作为变革领导者的能力：“当一个国家将全部力量与热忱都交托在这些人手中，让他们指引国家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国家前途无可限量。”

杰斐逊提出了一份协议：让我们共同面对国家政治挑战，勉力约束过激情绪，避免走入极端，重演18世纪90年代的灾难——他称为“恐怖主义阴霾笼罩的日子”。由此，政治可以成为取得进步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冲突的来源。

联邦党人中盛行的观点是，这样的协议说起来好听，但是不可能付诸实际。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政治斗争不会是偶发事件，它在美国即将成为司空见惯的情况。他是正确的。亚当斯在杰斐逊第一任总统任内写道："国人已彻底受党派精神的奴役，不盲目追随一党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政治自由且利益多元化的环境里，建国者所梦想创建的没有党派争斗的国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无论是民主共和党人，还是联邦党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杰斐逊在首都的行动毫无神秘可言。"杰斐逊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上届政府奉行反共和主义的原则。"法国使节路易–安德烈·皮雄向巴黎报告，新任总统决意纠正此"不平等和谬误"。

凡是威胁到杰斐逊共和制国家远景的，他在追剿并加以清除方面毫不留情。无论是联邦党人法官或其他公职官员，包括美国首席大法官在内，或是敌对的报社记者，杰斐逊的敌人们都面临着来自总统府的无休无止的挑战。由于共和党人在1800年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均取得胜利，杰斐逊已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已经宣告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参众两院的议员也明确地对他和他的理念表示拥护支持。大多数选民希望不再走90年代联邦制的老路，杰斐逊已做好当领路人的准备。联邦党人虽然意见多多，但是他们的意见无法与总统手中之物抗衡：选票。

1802年颁布的新《司法条例》对杰斐逊的权力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联邦党人企图通过1801年《司法条例》，使本党人士实现终身任期合法化，从而使政党免遭非议。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人起草并通过了1802年《司法条例》，力图打破联邦党人垄断司法部门的局面。一边是联邦党人，宣称所有法庭——包括仅在数月前成立的法庭——神圣不可侵犯；另一边是杰斐逊及其追随者，强调政府的任何机构都没有理由不进行改革。

提出的原则十分清晰，但政治现实也同样明朗。尽管杰斐逊行动谨慎，并未向司法制度宣战，然而他的确采取行动了。1802年，杰斐逊发布年度报告之后，参议院就根据总统的"建议"开始了废止条例的行动。罗杰·格里斯沃尔德说："司法法案只字未改就直接戳进了我们的喉咙。"

1801年《司法条例》的废止于1802年3月8日星期一获得通过。议院的投票反映出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更多优势。在参议院，法案仅以一票胜出予以通过，但终究是通过了。这对杰斐逊来说是巨大的胜利，联邦党人为此惊骇不已。

杰斐逊从心底里厌恶他的远房侄子约翰·马歇尔，不喜总归是不喜。（杰斐逊曾写道："这位法官冥顽不灵、食古不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折磨牺牲品的机会，以满足他恶毒阴暗的心理。"）1803年2月，这位首

席大法官就最高法庭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表了判决意见。案件交锋一方是威廉·马伯里，约翰·亚当斯任命的午夜法官之一；另一方是杰斐逊政府。判决裁定，麦迪逊扣留委任状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裁定与总统的意愿相背，但马歇尔巧妙地避免了一场终极较量，同时为司法审查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1803年冬，议院弹劾新罕布什尔州法官约翰·皮克林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蔡斯案也在进行。皮克林的精神不稳定，长期酗酒的他可能早已精神失常。议院对他的弹劾及判决不像对蔡斯那样，要进行到最后一刻。蔡斯以前一直公开反对杰斐逊及其政党。他挑衅巴尔的摩大陪审团，为共和党人提供了机会。1803年5月，蔡斯说："当法律制定不明、徇私不公、随意专断，当司法审判不能对所有人公正、公平，当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身受到攻击和暴力伤害却得不到法律的匡正，无论政府形式如何，他们的人民都是不自由的。"他抨击废止1801年《司法条例》的做法。他对巴尔的摩大陪审团放言："我们的共和宪法将沦为群氓统治——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恶劣的一种。"

如此攻击性言论竟出自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口，杰斐逊勃然大怒，他给马里兰州国会议员约瑟夫·H·尼克尔森写了一封信。尼克尔森在不久前控告了法官皮克林。"对我们的宪法原则和国务院做法蓄意挑衅，公然抨击，难道不应受到惩罚吗？若采取必要的措施，除了像您这样直言不讳之人，公众还会求助于谁呢？"信末，杰斐逊补充了一句，"我提出这些问题谨供考虑。就我本身而言，还是不介入为好。"

只不过，他恰恰介入了。这是典型的杰斐逊式做法——远程指挥行动开展。最终，参议院判决约翰·皮克林罪名成立；众议院弹劾塞缪尔·蔡斯，而参议院判决蔡斯无罪。无罪判决于星期五公布，时值1805年杰斐逊发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之前。蔡斯最终未被免职，这一失败长久以来被看作杰斐逊的败绩。但总统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用约翰·伦道夫的话说，任何"为政党竞选拉过选票"的法官，都不会逃脱某种形式的严正谴责。联邦党人的法官们已明白了这一点。

杰斐逊一系列的成功让他的敌人们发了疯。一名记者给总统写信："阁下在一年内或遭斩首。"一封寄自纽约的匿名信告诉杰斐逊，笔者——在信中署名"一名联邦民主党人"——受邀"前往华盛顿暗杀您"。12天后，又有一封署名A–X的发自纽约的匿名信，信中说："您正身处险境，一场针对您的可怕阴谋正在酝酿……尤利乌斯·恺撒收到警告，谨防3月15日[25]；我警告您当心4月的最后一天。"

尽管取得了胜利，就联邦政府官员任命这一危险重重的政治任务，杰斐逊仍谨慎行事。政府人员的组建是刚宣誓就职的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是新任总统领导一个非分裂国家的希望所在。应撤换多少联邦党公职官员，改由共和党人任职？杰斐逊的共和党盟友们督促他采取激进的做法。1801年就职典礼过去8天后，门罗给杰斐逊写信："对君主主义领导人采取强硬的态度，有助于民主共和党人与新加入我党的人士

的团结，并日益巩固您的领导。”

杰斐逊回信说，他希望90年代末的那段狂热期已经过去，希望联邦党人操纵的XYZ事件以及其他可能对国家造成威胁的事件，业已认定是蓄意而为。“事隔这么久，诸如粮桶阴谋之类的拙劣把戏又再度上演，那个党的意图惹人怀疑。”粮桶阴谋这一典故出自1679年英国国内战争时期，是为了阻止身为天主教徒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继承王位而策划的一场阴谋。由于伪造的证据是在一个粮桶中找到的，故得此名。杰斐逊对90年代的事件有此联想，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他仍参照17世纪的战乱纷争看待历史、剖析过往——那段时期，君主制主义者与共和党人之间充满阴谋诡计，钩心斗角，气氛紧张。

杰斐逊认为，美国人民通情达理，对联邦党人种种过分行为也有认识，他更愿意采取温和的态度。（他提到联邦党人时说：“我们必须与他们和睦相处。”）但是，采取行动时他却不乏坚决果断。

据学者统计，杰斐逊撤换职位的比例相当高：1801年，他撤换了46%的在职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联邦党人。这样的撤职比例在历史上，仅有30年后的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可相提并论，后者的官员大撤换震惊了整个政坛。对亚当斯最后一刻发布的委任状，杰斐逊格外不留情面。亚当斯其中一项午夜任命，就是任命伊莱泽·古德里奇担任纽黑文港收税官。但是，那个职位到1801年2月才会空出。为照顾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的情绪，杰斐逊罢免了古德里奇，改任纽黑文市市长塞缪尔·毕晓普。

纽黑文的一群商人发表抗议书，反对罢免古德里奇。这促使杰斐逊阐明他在联邦官员任命方面的考量。“本人发表声明，支持在政治上容忍，在社会交往中和睦友爱，尊重少数派的平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声明被引用，并曲解成任职期内官位无虞的承诺。”杰斐逊继续道，“但是，主张在公共事务中占有一定比例的份额是不是在政治上就不能容忍呢？除非全部掌握在手，否则就不能在社会中保持和睦吗？”

他讲求实际，并能纵观全局。他明白纽黑文官员任免会引发政治上的不和睦，但干事业免不了如此。

同样的手段也用在对付猛烈抨击政府的报纸上。托马斯·麦基恩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公开明确支持杰斐逊。他认为州内的党派报纸正在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遂考虑采取法律手段。“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煽动性的诽谤言论，十分恶劣，越来越无法让人忍受，”1803年2月麦基恩给杰斐逊写信，“即使不能全部禁止……几场诉讼也能狠狠遏制一下。”

杰斐逊的回复很谨慎，但意思明确。“有关诉讼的问题，我说的话必须严格保密，你也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多么容易招致攻讦。”2月19日星期六，杰斐逊致信麦基恩，“我一直在想，起诉几个最知名的闹事者，就

能达到重整报界、端正风气的良好效果。不要大范围诉讼，那样看起来就会像是搞迫害，只挑几个就好。”

然而，杰斐逊对大部分报纸都鞭长莫及，詹姆斯·卡伦德的报纸也不例外。1802年9月1日，卡伦德终于在里士满《记事报》上伺机报复，发表了一篇讲述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之间的绯闻的文章。

> 这位人人心怀敬仰的人士，将他的一个奴隶据为情妇，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周围人尽皆知。她名叫萨莉。萨莉的长子名叫汤姆。据说，汤姆虽是黑皮肤，他长得却与总统本人惊人地相似。这个男孩现年10～12岁。孩子的母亲当时与杰斐逊先生及其两位千金乘船一同前往法国。该安排之微妙，稍谙人情世故之士都会震惊不已。堂堂美国大使在两位年轻女士面前做出了多么光辉的榜样啊！……
>
> 我们的总统和这位叫萨莉的女子，生下了几个孩子。夏洛茨维尔镇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在少数……
>
> 瞧瞧这位共和党的第一个宠儿！景行行止的表率！他不加掩饰的所作所为却要颠覆党的政策，破坏人民幸福，甚至危及国家的存亡！
>
> 我们不妨推测，当杰斐逊先生言辞激烈地笔伐奴隶制度的时候，当他兢兢业业“轻慢”非洲种族的时候，他绝不会料到有朝一日，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席大法官竟会悍然出面，指出他的观点存在谬误；或者，他也绝不会料到他会选择一位具有非洲血统的女子繁衍自己的后代……
>
> 可以断言，我们坚信以上所述事实无可辩驳。据说，这位“非洲维纳斯”在蒙蒂塞洛任管家之职。杰斐逊先生读到本文时，会抽空掂量一下，对J·T·卡伦德诸多莫须有的攻讦，究竟是得是失。

卡伦德所述大部分属实，之后，他又更正了疏谬之处。（例如，他后来写道，赫明斯并未与杰斐逊、帕茜一道走，而是同波莉一起单独旅行。）皮雄向巴黎报告：“由于和一名奴隶私通的陈年旧事遭到揭发，一向呼风唤雨的总统现已偃旗息鼓。”

杰斐逊从未对此直接回应。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认为他在1805年的一封信中含蓄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他在信中说，“唯有”他追求有夫之妇贝琪·沃克的指控是事实。然而，也有可能，杰斐逊在那封信中根本没提有关赫明斯的指控。信中原来包含一份附件现已遗失，那份附件很可能是一张联邦党人申斥杰斐逊品行的简报或复印件。没有附件，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他是不是否认了有关赫明斯的事。我们只能确认，附件中提及了沃克丑闻和其他一些有违道德规范的事情。不管实情究竟如何，这些指控在他生前身后传播甚广，直至今日。“卡伦德和萨莉会作为杰斐逊

人格上的污点，永远被人们牢记，”约翰·亚当斯在私信中写道，“黑奴制引发人性低劣的一面，萨莉事件自然会发生，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结果。”不久之后的一天，卡伦德被人在水深三英尺的詹姆斯河中发现溺毙身亡，有目击者看到他曾在里士满大街上醉酒踉跄。死因调查未发现任何可疑证据，一条不幸生命竟走到了如此可悲的结局。

1806年，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发表的诗篇中提到有关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的流言：

疲倦的政治家只想小憩，

逃出议会厅，钻进奴隶的蓬荜，

天幸求得黑娇娘几许柔情，

奴隶的温柔乡里梦自由大计！

帕茜和杰斐逊的前秘书威廉·A·伯韦尔把这段“可憎至极的文字”拿给杰斐逊看，杰斐逊只是一笑置之，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尚未开始的讨论。

就我们所知，除了指责报纸议论此事，表达谴责之意外，无论杰斐逊的家人，还是政治圈的朋友，再也没有人向杰斐逊提起萨莉·赫明斯的事。就杰斐逊而言，在这件跨种族的情事上，他似乎只是沉默。

1801年12月，杰斐逊吞吞吐吐地向本杰明·拉什透露了另外一件事：他的健康状况。“我的身体一向强健，这些年来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怕自己活得太长，”杰斐逊写道，“不过，我觉得现在出了个问题，已经不用想活得太长的事情了。”

他再没细说，只是要求关于这事一定要保密。“我跟别人都没有说过，”杰斐逊补充道，“我还指望自己的好身体能让朋友和敌人都保持平静呢。”

直到拉什追问具体情况，杰斐逊才和盘托出。他染上了痢疾，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疾病。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25年后照看过病危的杰斐逊，在他的著作《医学词典》中，他这样描述痢疾：“通常由肠黏膜发炎或受刺激引起，以频繁液体状……排泄物为表现的疾病。”该疾病可能为“急性或慢性”，有些情况下可致命，“因为与痨病热类似，该病习惯性侵占躯体组织，几乎不间断地发作，通常最强效的药也对其不起作用”。这种病痛一直折磨了杰斐逊后半生。

1802年，杰斐逊的家人来华盛顿过圣诞节。帕茜和波莉一道前来，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与她俩相聚时间颇多。“埃普斯夫人长得漂亮，有生人时腼腆羞怯，但是只和熟人在一起时，滔滔不绝，能言善辩。”她写道，“伦（道夫）夫人长相普通，略微有些像她的父亲，不过比埃普斯夫人有意思得多。她真是我见过的女性中极可爱的一位。她的面容散发

着聪敏与仁慈，她的话语也无不透露出智慧与善良。她的态度是如此直爽热情，任何人只要一和她接触，就会和她一见如故，相处十分舒服。”

史密斯夫人接着写道，帕茜“把她的孩子、丈夫的性格和许多家庭轶事都告诉了我。她那种自我中心虽然罕见，但是非常迷人，她讲的事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那段时间十分忙碌。“我最亲爱的丈夫，我只能匆匆写下只言片语，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我连换装接待的时间都不够了，”波莉给她丈夫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写道，“这会儿我一边写信，一边等着裙子熨烫好，可客厅里女士们都坐满了。”

看到杰斐逊独居府邸的情况，弗吉尼亚的拜访者大为吃惊。1803年1月，波莉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又要道别了，我亲爱的爸爸，我多么想念我们与您独处的那些时光，一想到您睡在楼上，既不安全又孤单，我的心又是那么难受。”（杰斐逊开始购置合适的家具装修卧室，以便未来更多家人来访。）

他喜欢家人都在身边的感觉。一次，一位访客看见总统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被孙辈团团围住，“全神贯注，嬉耍喧闹地玩着游戏”，甚至连访客来了都没察觉。杰斐逊兴致勃勃地在外孙女来拜访之前给她写信说：“星期日或星期一我会在你的床上捉到你。”

在蒙蒂塞洛，帕茜给她父亲写信，讲述如何管理庄园大小事务。管理中流露出的强硬态度一定能让她的父亲备感欣喜。“我对……家务进行了全面改革，”她告诉杰斐逊，“没有我的许可，任何物品都不能随意进出，而且，我相信浪费极少。天气允许的时候，我会去厨房熏制室，还去看看家禽，按您的心意，看着切肉块。”

杰斐逊在华盛顿拥有个小家族的陪伴还是有希望的：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和小托马斯·曼·伦道夫都在谋求国会席位。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位入选，他们都会来华盛顿，和杰斐逊一起住在总统官邸。（两位后来均入选。）

卡伦德的攻讦、管理政府的辛劳、独居官邸的寂寞，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利，杰斐逊仍喜欢担任总统。他为使命驱使，要确保共和国不落入国内外敌人之手。大多数领导人只能冀望对国家保持短暂时间的影响，但1803年年中，一份来自巴黎的报告将赋予杰斐逊永久全面变革国家的力量。

[25]　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日。此前他曾收到警告，要其小心这一天。——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有如神助

转让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事件必会使杰斐逊执政时期流芳千古。

——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

您的政治智慧如今已永久确立，任何对此失望的党派也无力消减您半分威望。

——霍雷肖·盖茨获悉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时说

总统上任未满一月，杰斐逊收到报告，伦敦有消息称西班牙已和法国签订条约，将北美超过半数的殖民地交给法国。这个名为“圣伊尔丰索第三条约”的协议，在马德里以北一座18世纪建造的宫殿里达成。宫殿富丽堂皇，是西班牙王室夏日避暑之处。双方于1800年年末开始协商，最后决定，法国拥有西班牙在新大陆路易斯安那土地的所有权，即路易斯安那土地转让。杰斐逊1802年4月写道：“这对美国的影响极恶劣，完全颠覆了美国与他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将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开启一个新时期。”

拿破仑对美洲大陆（及其利益）十分关注。杰斐逊说，“我情愿希望，其他人也和我同样希望”报告是错误的。

报告所言非虚。杰斐逊明白，他需要采取行动，但一定要慎之又慎。他致信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时说：“我相信这些地区的未来全系于此。”

对杰斐逊而言，事关生死存亡。“整个地球上唯有一处土地，它的所有者是我们无法化解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土地上出产的3/8的农产品都要通过那里进入市场。不久以后，新奥尔良丰饶的土地上出产的农作物会超过我们全国产量的一半，那里的居住者数量也会超过我国人口的一半。”在一次与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的“长谈”中，杰斐逊说：“法国对这一地区的占领，使得美法各方面的关系都呈现出了全新的特点。”杰斐逊并不乐观。“这样的邻国在侧，”桑顿引用杰斐逊的原话，“由妒生恨，最后发展到军事冲突的结果不可避免。”

尽管时局令人忐忑，杰斐逊仍信心十足地应对。他当政第一年取得的胜利令他在与拿破仑的对抗中斗志昂扬。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体现了国家实力以及杰斐逊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抵抗法国、保卫

国家领土的决心。通过这次购地，美国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使合众国成为陆上大国。换作行动犹豫、勇气欠缺的政治人物，这宗购地案就可能化为乌有；而过于理想化，囿于宪法条条框框的人物也可能丢了这桩生意。杰斐逊则不然，他既不优柔寡断，也不墨守成规。

他吸取从政以来种种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应对这场路易斯安那危机事件。他知道，他需要尽可能掌握决定的各个细节，这是他在威廉斯堡《印花税法》辩论中学到的教训（这次，他派出自己的使节詹姆斯·门罗前往巴黎）。他知道，他需要把公众召集起来，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是他1774年撰写禁食和祈祷日决议，以及1776年撰写《独立宣言》时学到的一课。他知道，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抓住机会，果断出击，这是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州长时的亲身体会。

拿破仑对情况了若指掌，杰斐逊明白要采取何种行动。“法国取得新奥尔良的那一天……我们必须与英国及其舰队结成友好关系。”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之时，杰斐逊甘愿由支持巴黎转而声援伦敦，至少在外界看来如此，以便增加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

杰斐逊对局势洞若观火。西班牙帝国日益衰落是一种情形，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法国近来的态度对我们是公然的示威，”杰斐逊说，“如果西班牙保留土地，可能还会静默几年……一旦到了法国手中就绝不会没有动作。处在与我们摩擦不断的位置，……一旦在如此敏感的情况下相遇，以法国冲动躁进、实力充沛、不安于室的性格，法国与美国之间不可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1802年2月，后续条约文件《阿兰胡埃斯条约》由美国驻英公使鲁弗斯·金发往华盛顿，直到那时，有关路易斯安那转让的消息才最终得以证实。）

从美国启程前往法国之前，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对世界局势现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绝不能冒犯或威胁拿破仑。在众多问题中，欧洲各国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对西属墨西哥意有所图。现在问题来了：“您打算怎样以友好的方式取得路易斯安那，如何说服法国拱手交出所有权呢？唉，总统先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希望不受条约的束缚，也都想获得财富（贫困对一切强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只有二流国家才不受贫困的影响）。您无地可供交换，除了用金钱来购买之外，别无他法。”

杰斐逊本人不能前往法国，因此他派出了可靠的朋友。对于多利·麦迪逊所称的“一笔极其重要的政治交易”，总统和詹姆斯·麦迪逊多番考量权衡，决定请他们的同乡弗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担任总统使节前往法国。杰斐逊给门罗写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请您暂时牺牲小我，在我们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阻止这场滔天的阴谋。”门罗接受了委派。

不料一场暴风雪及连日的大风耽搁了门罗启程。他利用这段时间致信杰斐逊，谈到这次的政治使命。“我希望法国政府能明智地看到，我们绝不会容忍法国或其他任何列强染指我们的内务。如果法国意不在此，

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提出的和解方案。”

与此同时，时任驻法大使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在巴黎一次聚会中收获颇多。这次聚会在客厅举行，由约瑟夫·波拿巴主持。按照习惯，波拿巴夫人先入场，拿破仑随后进来，先与身边的女士交流，然后再与男士攀谈。利文斯顿告诉杰斐逊：“当第一执政在房间里走过一圈，他来到我面前，问了一些这种场合里惯常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拿破仑走到英国公使惠特沃思勋爵面前，按利文斯顿的话说，“与惠特沃思勋爵亲切攀谈，告诉他可能会有一场风暴来临”。这是一次公开声明，而在此两日前，惠特沃思勋私下里被告知：“不撤出马耳他就开战。”

之后，与外交官们一番别具意味的交谈后，拿破仑突然离开了客厅。“您不难想象客厅内引起的骚动，”利文斯顿说，“当天夜里两份特快信件发往伦敦，我敢说，第二天欧洲各个宫廷也都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利文斯顿对这件事的看法与众人一致：这是拿破仑意欲同英国开战的信号。这样，法国有可能将北美问题简单化处理，将路易斯安那交到美国手中的概率增加了。

对法国而言，持有并防卫远离欧洲本土的土地，耗费甚巨，且麻烦诸多。在圣多明各与奴隶军队交锋遭到的挫败令拿破仑大为光火，他认为，需要节约军事资源，用于靠近本土的作战中。

拿破仑正浸在散发着古龙水香味的水中洗浴，他的兄弟们闯进来，抗议出售路易斯安那的决定。“你们没必要带头提出反对，”拿破仑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再重申一遍，不会（就此事）举行辩论，因为这个方案……是我构想的，由我去谈判，也会由我一人正式批准并予以执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803年4月11日星期一早晨，拿破仑向法国财政部部长巴贝–马霸宣布：“我声明放弃路易斯安那。”几小时后，法国外交部部长夏尔·莫里斯·塔列朗询问美国是否有意购买整个地区。“我要割让的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将整个殖民地全部出让。我清楚放弃……的代价。声明放弃我无比遗憾。然而，一味固执地保留该地区是愚蠢的行为。”

利文斯顿清楚他要做什么。“我们可购买的土地比指示中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得多，”利文斯顿告诉麦迪逊，“机不可失。”当时门罗已抵达巴黎，他和门罗共同谈判，签订协议，美国以约1　500万美元，每英亩地约合3美分的价格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这片土地太过辽阔，连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边界究竟在哪里。

1803年7月3日星期日的晚上，消息传到杰斐逊处。鲁弗斯·金到达巴黎之后给华盛顿发出一封快件，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利文斯顿与门罗的一封信。信中宣布，他们已于4月30日同法国签署协议，“法国将新奥尔良以及原属西班牙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割让给美国。”7月5日星期二，杰斐逊在华盛顿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价格没有提及。”

消息震惊了杰斐逊，尽管是喜讯，但他仍然受到极大震动。在总统官邸读着信件，他慢慢领会到这个消息的重大意义。他一边消化这个消息，一边把所思所想写了下来。“这片土地比整个美国还大，美国现有领土4.34亿英亩，它大概有5亿英亩。购买下这个地区，无疑是除去了对我们和平的最大威胁。”

太令人惊叹了。“每一位真正支持美国自由的朋友，都会被这个消息震撼，这是自《独立宣言》发表以来发生的最伟大而有益的事件。”7月7日星期四，霍雷肖·盖茨写道，“看到做成一桩如此美妙的生意，我十分震惊。几个月之前，我们还只是私下里悄悄讨论而已。真像是有如神助一般！”

安德鲁·杰克逊从西部给杰斐逊发来信件，“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笑容，每一颗心都欢腾雀跃。”有人给杰斐逊写信，“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现在更重要的是借此事为人类造福。”

杰斐逊沉浸在喜讯中的同时，致信指示梅里韦瑟·刘易斯启程远征。刘易斯于1803年7月5日星期二离开华盛顿，开始了杰斐逊称为“承担发现密西西比河源头与河道、找到从密西西比河至太平洋最便捷水路的重任之旅”。

总统写这封信时满怀乐观，同时也注重实际。他希望刘易斯一行能抵达太平洋，并配备一切所需的给养装备返回。无论此行结果如何，他授权刘易斯必要时可动用合众国的资源。

刘易斯、克拉克带领的约40人的队伍，即将北上密苏里河，在冬季进入今北达科他州，沿哥伦比亚河抵达太平洋。对于这件变数极多、前途未卜的使命，杰斐逊已经尽其所能地进行安排规划。他撰写了详细的指示，提供咨询建议，可谓事无巨细、殚精竭虑。最终，事情到了探险者的手中，杰斐逊热切地期待着，从他心中畅游过的地方传来的消息。

7月4日是星期一。总统府里挤满了节日拜访者。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觉得访客比平时要多。人群中到处都在谈论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史密斯写道：“40多位女士盛装出席，人人身着华衣美服，无限量供应的蛋糕、潘趣酒、葡萄酒等，也使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受到突如其来的喜讯鼓舞，杰斐逊对所有事情都抱持乐观态度，甚至连联邦的命运也不例外。他致信约翰·布雷肯里奇：“大西洋和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将来的定居者会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留给他们的土地彼此接壤。咱们认为联合起来才会走上康庄大道，也乐见其成。不过，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如果他们觉得分裂才符合各自的利益，我们又何必厚此薄彼，支持大西洋沿岸子孙而反对密西西比河岸的孩子们呢？他们只有长幼之别而已。愿上帝保佑他们，若联合有益，保佑他们紧密团结；若分开更佳，则保佑他们速速分离。”

杰斐逊在信中向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夸赞自己外交方面的敏锐洞察

力："我很早就预见到，路易斯安那在我们的版图上虽然是遥远的一点，但必会引发一场飓风，而我们的公众却对灾难的临近一无所知。正是由于事态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迅速发展，同时拿破仑明智地看出一切无法避免，世界面貌会随之改变，我们才免于这场风暴的袭击。"信末他问了个学究式的问题："你读了马尔萨斯论人口的新作吗？那是我读过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这是多么典型的杰斐逊啊——身处可能影响到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事件中，他还能研读马尔萨斯的学术作品。

协定必须在1803年10月30日星期日之前签署完毕。杰斐逊与内阁进行了商讨，并召集国会于10月17日星期一开会，以考虑他称为"重大且重要的事件"。

杰斐逊最初认为，购买路易斯安那并进行管辖需要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他在给约翰·布雷肯里奇的信中写道："这份协定理所当然要摆在两院议员面前，对于遵守该协定，他们负有重要职责。我推测，他们会忠于职守，为确保国家利益批准协定，并为此买单。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在他们有生之年很可能再也遇不到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会提出一份宪法修正案，让国家赞成并通过以前未曾批准的授权法案。"

在杰斐逊当时看来，迄今为止，他批准诸代表与法国谈判并签署协定的做法，超出了他权力许可的范围。"极大促进国家发展的事件发生时，行政机关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良机，采取了超出宪法许可的行动。立法机构抛却缜密的推理论证，为国家如忠仆一般挺身冒险，批准协定并为其埋单。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以前遇到这样的状况，即使同样并未获得授权，他们也会这样行事。"他以律师身份做类比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钱投资购买毗连土地的案件。被监护人成年时，监护人向其说明：本人此举是出于为您的利益考虑，本人并未自赋权力约束您。您可以对我的处理拒不承担责任，而我必定尽可能摆脱这种窘境。彼时彼刻，我认定为您冒险是我的职责。"

1803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当时的杰斐逊认为，尽管议会讨论的进展缓慢又艰难，但对于批准购买案而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至关重要。但是，给布雷肯里奇去信6天后，杰斐逊又匆忙致函，主要表达撤回之前观点的意愿。"我本月12日给你写信，信中谈及有关路易斯安那之种种，以及为达成购买可能必须通过宪法条款一事。昨日收到一封信函，情况显示对这个话题我们还是保持缄默为妙，以免传入他人耳中，故意借必须通过宪法条款为由取消购买案。故请务必对我信中内容保密。会议首日希望每一位赞成购买协定的朋友在场，来信使这样做的理由更充分了。"

8月17日星期三收到的这封不利信函寄自巴黎。身在法国首都的利文斯顿和门罗报告，法国方面对这笔交易渐有悔意。杰斐逊担心夜长梦多，改变了先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想法，果断采取行动，敦促国会于10月

迅速投票表决。“对于最近与我方的交易，法国政府有可能反悔。他们会很高兴以修正案为借口宣布交易无效。”1803年8月23日星期二，杰斐逊给加勒廷的信中说，“因此，事不宜迟，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关键是要速战速决。9月7日星期三，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给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写信：“无论国会认为做何事实属必要，都要尽可能减少分歧，达成一致意见，在涉及宪法的难题上尤须如此。”

司法部部长利瓦伊·林肯则担心会有人对购买案提出反对意见，这使得杰斐逊更有理由相信要单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协定中直接涉及一州事务，不免让人想到政府某个部门中南部各州的比重会变得更大。现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嫉妒与恐慌，即便不算纽约和再往南的其他州，包括罗得岛和佛蒙特州在内的东部各州会反对批准这个协定。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存在吗？……再论述其何其必要、其商业价值几何、其之于国家安全之意义，在群情激昂的一方面前都毫无影响力，也无法与不乏敌意的举措和强烈抗议的反对声相抗衡。”

1803年9月23日星期五，托马斯·潘恩向杰斐逊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如果拿破仑大败英国，令其俯首称臣了呢？“英国政府现在已是岌岌可危。一旦波拿巴赢了，英政府就会垮台，”潘恩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假若是那样的话，我们得到加拿大也并非无稽之谈。而且我认为，百慕大也应属于美利坚合众国。”

潘恩也思索了波拿巴对英的作战计划。潘恩说，这位第一执政仅需择一“风平浪静的月黑之夜”于北海海岸登陆即成。潘恩的言外之意是：值此风起云涌之时，为宪法那点繁文缛节忧心实在愚不可及。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能说得更好了。

崇尚理论的杰斐逊认为修正案是必要条件。然而，身为一名政治家，杰斐逊可不打算让理论阻碍了现实。“我承认……在目前形势下，请求人民赋予新的权力，通过树立这样一个先例，用来反对对《宪法》宽泛的解释十分重要，”他致信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然而，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另作他想，我当然也会欣然默许。我相信一旦解释造成不良后果，我们明智的国民会对错误解释进行纠正的。”

因此，他为自己留下了转圜余地。这种政治手段与他在成立美国银行问题上辩解时的手法如出一辙。当时，他反对汉密尔顿对宪法宽泛的解释，然而却（精明地）预留了华盛顿为此埋单的这种可能性。

假设总统另有其人，这种不通过宪法修正案就扩大行政者权力的做法，必定会让杰斐逊倍感愤怒。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中的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并巧妙地使用权力。为了维护共和制，为了国家的发展，他只得做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凡事完美无瑕只可能在理论上存在。尽管他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也爱惜自己的形象，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行动果决的实干者。

印第安部落深谙这点。杰斐逊在世时看不到19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踏上的“血泪之路”，但他是推动印第安人西迁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急切地从全国印第安人部落手中获取土地，全国土地面积达到20万平方英里。和在购买路易斯安那时一样，他想方设法鼓励白人进一步西进和南下，以占有更多土地。1803年，杰斐逊给时任准印第安纳州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写信。他说，他认为印第安人“最终不是与我们融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就是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他威胁要对负隅顽抗的部落实施报复，“抓住部落所有男女老少……赶过密西西比河，否则和平遥遥无期”。

杰斐逊四处凯歌高奏，无往不利。“现在要做的就是向着占领了我们28年的国家前进，前进，再不踟蹰犹疑。”1803年元旦前夜，杰斐逊致信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在父辈的土地上用聪明睿智与正直的爱国心建立起亘古未有的伟大杰作。唯此，在临终时刻我们才会欣慰满怀。”

在对手的眼中，杰斐逊的成功更似无法超越，令人无法忍受。1803年11月，古韦纳尔·莫里斯在写给罗杰·格里斯沃尔德的信中说，“如我所料，（民主共和党人）在加强行政权力方面做的事，即便在华盛顿当政时代，联邦党人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1804年1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提议脱离共和国，成立一个北方联邦政权。“要我说，在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制度正在瓦解，片刻都不可耽搁，不然，制度一旦土崩瓦解，自救就来不及了。”格里斯沃尔德婉称为“北部各州联盟”的计划若想成功，纽约州的加入至关重要。“东部人的生活习惯、观点看法和自身利益同南部和西部人都无法调和，”皮克林说，“而对后者就要施行铁鞭统治了。”杰斐逊的反对者们相当绝望。1804年1月10日格里斯沃尔德写道：“此刻许多人已准备好宣告杰斐逊为终身总统了。”

这是联邦党人最畏惧的。

第三十六章
举国欢腾

如果我们能保持国家之舰航向不变，平稳航行4年，我的目标就会达成。

——托马斯·杰斐逊

我觉得你该好好挨顿踢，你这个红毛杂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好”家伙，你个下流坯。

——匿名者

在华盛顿时，杰斐逊通常于下午3点半或4点左右在总统府接待晚宴客人。他频频慷慨宴请，用意明确。他敞开大门，款待来宾，这种习惯是在弗吉尼亚传统习惯下成长习得的。

杰斐逊也认为，交际是共和主义的要素。人们彼此喜欢，相互尊重且乐于相处，会更有可能养成良好的习惯，促使国民们去“追求幸福”。与邻居和睦共处、热情友好的人，会更有可能理解杰斐逊所述的共同牺牲的意义，并做出这样的牺牲。

当然，立法者、外交官和内阁成员频频会聚在总统的餐桌前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当你与这个人分食过面包，也曾推杯换盏，在想反对他，或者至少中伤他时，就会变得比较困难。随着一道道菜摆上餐桌，讽刺文章不攻自破；享用甜点之际，那些想象出的可怕阴谋也就烟消云散。

杰斐逊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执政期间异常珍惜有限的时间。如果想创造出脱离党派之见的友好氛围，杰斐逊得把意见相左的政治家们聚到一起。然而，杰斐逊太反感正面冲突了，他禁止邀请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同时与他吃饭。他只有4年或者8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印记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餐桌前，听两派争论不休，即使是温和有礼的争论也不行。为促进互谅互让而设局，这期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

因此，杰斐逊选择用在总统府设宴的方式，逐步增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这是他的舞台，上演他的剧本。他不再遵循华盛顿和亚当斯总统举行正式会见的惯常做法，即按照身份高低安排座位，而是颇有民主风格地采取“混坐”，或者请宾客随意挑选座位的方式；他也取消了那一套冗长的祝愿身体健康的祝酒礼仪，代之以更轻松随意、毫不拘束的对话。他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穿衣习惯，好似人在家乡蒙蒂塞洛而非首都华盛顿，许多客人都对他穿着旧拖鞋的形象记忆深刻。晚宴上略微的无

序混乱恰恰凸显了杰斐逊无比健谈的特点。

建筑师本杰明·H·拉特罗布对初次到总统府参加晚宴深感愉快。拉特罗布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食物美味极了，（烤鹿肉）按法国菜做法，甜点种类丰富，制作极其精美，还有各式小吃，遮布撤去后，琳琅满目，不计其数。酒的品种也很多，雪利酒、香槟一应俱全，一些广口瓶中还盛着稀有的西班牙酒。"晚宴之初，杰斐逊仅尽地主之谊，相对保守，之后就与宾客愉快地攀谈起来。

拉特罗布对一切都喜欢极了。"好久没有享受过如此美妙的精神盛宴了，"他说，"谈文学、讨论各种农作物和建筑，捎带一点儿工作，每时每刻谈话都很风趣幽默。和杰斐逊先生一起相当轻松自在，大家似乎都感觉到了，也十分享受和他交谈。"

杰斐逊提倡保护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一次，谈到国会山沿路以及波托马克河、阿纳卡斯蒂亚河两岸迅速减少的树木，他若有所思。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回忆，他说："这些生长在公共土地上的树木本应该被保留下来。但是，我们这样的政府，人民至尊无上，就不能这么做。这里的'人民'，这些穷困的居民，有的砍倒这些漂亮的大树烧火取暖，有的则为了伐木卖钱。"

"我真希望自己有暴君的权力，"一天，杰斐逊说道，客人们吓了一跳。"真的，"他继续说道，"我希望自己是个暴君，那样我就可以拯救那些漂亮的大树，不用每天为了人类的贪婪或者穷人的生存做出牺牲。"

一位客人问道："难道您无权拯救公共土地上的那些树吗？"

"没有，"杰斐逊答道，"只有武装警卫能救它们。对我来说，毫无必要地砍伐那些可能生长了几个世纪的树，简直与谋杀无异。看到这样的罪行，我的痛苦无法言表。"

杰斐逊的社交亲和力缓和了党派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党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刚到华盛顿履职时，对杰斐逊的看法自然十分尖刻。19世纪初头两三年，普卢默评价总统是一个"孱弱无力的政府的"领导人。之后，他补充说："我的确认为他才智一流，具有部分善良有益的道德品质。但是，他的观点与真正的超卓之间，如同奸诈狡猾与聪明睿智有天渊之别，吝啬与节俭一样相去甚远。"

随着岁月流逝，普卢默对杰斐逊的看法，在做客总统府、与之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由充满敌意逐渐转为略怀敬意。1806年普卢默写道："越是客观细致地考察杰斐逊先生的人品与德行，我越发认为他为人端直。"这位参议员仍然强烈反对总统先生的政策，但是杰斐逊的优雅风度与热情好客打动了他。普卢默写道："我的好奇心在和他见面并攀谈之后得到了满足。我深入地了解了他的性格、他的观点以及他党内的那些人——他天生善于与人沟通。"

在总统府时，杰斐逊送给普卢默一些山核桃种子种植。接着，两位男士开始了一番彬彬有礼的交流。“过20年它们就会结果。”杰斐逊说。

“到那时我可吃不动了。”普卢默说。

“您的孩子会满怀喜悦地享用您辛勤劳动的成果。”杰斐逊说。

“我会教导他们牢记对谁心存感激，因为谁，他们才有了后来长成果树的山核桃种子。”普卢默答道。

杰斐逊悉心照顾每位客人。乔治敦市长的夫人搜肠刮肚想和总统先生讲讲话，但她只想得起听说过卡特斯山——据说这个地方是1781年杰斐逊从英国人手中逃出的藏身地点。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提到这个地方会引起多么不好的回忆和尴尬，便询问杰斐逊是不是住在卡特斯山附近。

“很近，”他说，“它和蒙蒂塞洛毗连。”

“我猜这地方交通既方便，环境又宜人吧？”毫不知情的夫人继续说着，她丈夫尴尬地坐在一旁，不知如何阻止她说下去。

杰斐逊泰然自若，简洁地答道：“哦，是啊，我觉得在战时的确如此。”话题在此结束了。

另一回，几个人在晚宴席间高谈阔论。史密斯夫人当时也在场，形容这几个人是“尊贵的人物”，谈话进行得“真挚而又热烈”，但是有一位旅居欧洲一段时间的客人，“一言不发地”坐着，“无人注意”，显然位高权重的同席人令他不知所措。他不禁觉得自己是“身在祖国的异乡人，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他”。

这时美国总统注意到了这位归国同胞。“C先生，我们对您感激不尽……唯有您当得起祖国的敬意。”

聊天戛然而止。席上的大人物们听到总统的赞语大吃一惊，注意力突然全都集中到这位无人搭理的客人身上。“是的，先生，”杰斐逊继续说道，“您从阿尔及尔送来的高地稻米目前已种植成功，等种植园园主大面积播种时，将证明它给南部各州带来的好处无可限量。”

杰斐逊优雅巧妙地把一位无人问津的客人变成史密斯夫人所称的“重要人物”。总统先生履行了身为主人的最基本职责：他对来宾们展示了敬意，令他们惬意自在，并受到关怀照顾。

对杰斐逊而言，每一位来到他屋檐下的客人都很尊贵。他很少，实际上，他全无耐心对待官场的繁文缛节。他官民混杂的做法、民主共和党简朴的做派以及美酒佳肴并未受到所有人欢迎。英国新任大臣安东尼·梅里发现，在对待英王乔治三世代表应有的尊重方面，他与杰斐逊很难达成一致。总统迎接这位使节的招待会可谓波澜不惊，然而邀请梅里夫

妇出席总统府的晚宴却掀起轩然大波。麦迪逊夫人担任当晚的女主人，因此杰斐逊携她入席。梅里夫妇最后被安排在他们自己认为是次席的位置上。

由此，华盛顿总统府的客厅与宴会厅就上演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异常激烈的社交兼外交战。梅里阵营包括西班牙部长一家，后者也讲究仪式与繁文缛节。杰斐逊说，梅里夫人实属“悍妇一个，短短几周时间就遭到所有人厌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被人讨厌到这种程度，我本来以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呢”。

这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对抗。在杰斐逊的关照下，新世界即将获胜。1804年1月，杰斐逊写道：“我们要对他们说，不。我们的社会准则以及我们的政治制度之准则，乃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应当盛行的场合，一定是旨在追求友好、欢乐气氛的交际圈。”

风波起因还包含一个特定的政治因素。杰斐逊说，英国代表们认为“我们现在对大不列颠不如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那样友好了”。杰斐逊对此予以否认：“这种说法完全毫无根据。我们对英国的友谊诚恳真挚，对法国也一样……我们认为两个国家相互遏制，十分必要，能避免对他国实施专制统治。”

安东尼·梅里从未对杰斐逊示好，而任何对美国的不满，英国外交人员都予以支持。然而，杰斐逊受到拥戴，1804年2月共和党党团成员大会上，他再度被提名竞选总统。联邦党人由担忧渐渐转为绝望。

1804年2月11日星期六，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在华盛顿哀叹杰斐逊当政的这段时间情况是多么糟糕，联邦法官和其他在职官员正遭受抨击，以杰斐逊为领袖的那帮乌合之众统治着国家。“难道我们要向这些邪恶势力屈服吗？”皮克林致信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西奥多·莱曼，“就没有解决之道吗？”

皮克林认为，脱离联邦是一条抵御杰斐逊政府“滚滚洪流”的可行之路。马萨诸塞州最有可能带头。如果该州脱离，康涅狄格州就会跟上，而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和佛蒙特州必定紧随其后。如果能说服纽约州成为新国家的中心，纽约州一定会加盟。皮克林说，那么，纽约州又会带动新泽西州以及萨斯奎哈纳河以东的宾夕法尼亚州加入。

还有英国。英国很有可能同意其在北美的部分属地与北方联盟联合在一起。从理论上看，所有设想似乎都合情合理。皮克林说：“两人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那就分开来，单独处理各自的利益，朋友之间这样做并不罕见，双方的友谊也由此得以维系。如果不分道扬镳，两人的友谊毫无疑问会尽毁于此。”

皮克林的构想多半意味着内战。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怎么会同意北方各州脱离出去呢？另一位与皮克林有书信往来的是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他认为脱离合众国的时机尚未到来，不过现在可以开始

寻找合适的时机了。卡伯特写信给皮克林：“总而言之，我们是提倡民主的。我坚信政府到了最坏的时候，民主自会发挥切实的作用。”

皮克林态度执拗。他在杰斐逊就职三周年时写道：“我讨厌统治我们的人，也讨厌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皮克林寄希望于伯尔，有消息称伯尔可能有意担任纽约州州长。他希望，这样可与弗吉尼亚形成制衡。皮克林说：“那么，杰斐逊在耍他那些手段时就得被迫谨慎、克制一些了。”

根据鲁弗斯·金一封信上的说法，联邦党人认为：“在民主的道路上，专制独裁困难重重，必不长久。”

金并不主张脱离联邦，但他说皮克林的信“应当把联邦中真正支持自由的朋友吸引过来，目前事态似乎正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此时更要取得应有的支持”。好几年，脱离联邦的流言甚嚣尘上。安东尼·梅里收到消息，向伦敦做了汇报；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也向他的母亲写信谈及此事，1805年6月，他的信中写道：“大众报刊上甚至公开讨论分裂的可能性，东部和南部各州之间也不断相互攻讦。”

除此之外，还有阿伦·伯尔，这股捉摸不定又颇具威胁的政治势力。1804年1月26日星期四，伯尔登门总统府，拜访杰斐逊。自从1800～1801年选举打成平手之后，两人在任职期间几乎没有联系。杰斐逊打定主意不让他参加1804年的选举。

伯尔讲到自己时，总是真诚暖人。他说，自己是最谦逊、最诚实的。

伯尔知道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都备受批评。据杰斐逊称，伯尔说过“很多流言蜚语都传到了他耳中，他觉得我这边一定也一样听到了不少，他对此深感厌恶。但是，感情是相互作用的，或者当时那段感情已经烟消云散也未可知。所以，他选择与我当面交谈，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来问我，我对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伯尔说，他愿意放弃选举席位，但是他需要杰斐逊协助，给他安排“某个职位”。

杰斐逊的答复令人恼火。总统先生否认在竞选活动中会有任何小动作。他说，他对伯尔爱莫能助。

与此同时，宪法第十二修正案的草案正在各州讨论通过。该修正案旨在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选举危机，建议将选举总统与副总统的选票分开，这意味着同一份候选人名单上的两个候选人不会再出现同票数的结果。“联邦党人一定会强烈反对这个修正案，”1804年1月杰斐逊写给托马斯·麦基恩的信中说，“他们明白，如果修正案最后通过，总统或副总统的人选都只能通过公平选举产生，获得多数票才能担任，而他们得不到多数票。”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杰斐逊捐出200美元“以

帮助不幸的受灾群众”，但他要求匿名。）1804年2月15日星期三，家住埃奇山的波莉生了一个女儿。“我亲爱的玛丽亚，祝贺家中迎来新成员，祝你欢欣快乐！”2月26日星期日，杰斐逊给爱女写信，信中用1789年11月波莉给自己取的名字称呼她。

但并非事事顺意。波莉身体未见好转，她的丈夫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从华盛顿赶回家中。一路上寒风肆虐、道路结冰，旅途颇为艰难。“她生产时身体极度虚弱，我十分担心她会得重病。”埃普斯写信告知杰斐逊。

1803年10月里的最后一天，美国护卫舰“费城”号在地中海被的黎波里海军截获。三个半月之后，即1804年2月中旬，海军准将斯蒂芬·迪凯特率领一支骁勇之师击沉了“费城”号，以防舰船被利用反过来攻打美国。在英国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的眼中，迪凯特的这次行动是“当代史上最勇猛无畏的事件”。杰斐逊评论该事件时也持同样的看法。“失去‘费城’号时，大多数驻国外政府人员表现出的惊慌失措令我感到耻辱，”1804年4月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说，“好像他们觉得，丢了一艘舰船，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欧洲各国因此必定会小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的黎波里施以同样的报复，欧洲两大强国已给世人做出无数示范了。”

1804年4月1日，杰斐逊离开华盛顿，前往蒙蒂塞洛。三天后抵家，他发现波莉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立刻全权负责照看她的起居饮食。

在极少数情况下，杰斐逊稍微告诉麦迪逊事情并不顺利。“这个春天格外阴沉。”4月13日星期五，杰斐逊61岁寿辰当天，他写信给麦迪逊。波莉的情况不断恶化，为了稍微分分神，以求片刻喘息，杰斐逊与迪尔伯恩、加勒廷和麦迪逊通信讨论政务。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起作用。在讨论有关西班牙在莫比尔的关税问题时，杰斐逊告诉迪尔伯恩，波莉“情况糟糕……我根本无力对这个问题予以置评”。4月17日，波莉离世。“我不知道总统先生会怎样撑过这个打击，”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给西泽· A·罗德尼，“昨天他整晚拭泪，手帕不离手。再见。我觉得自己也需要手帕了。”

多利·麦迪逊从杰斐逊本人处获悉了这个消息。“总统先生来信告诉我们可怜的波莉去世的消息，他们全家人都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这和许多其他事一样……告诉我们生命多么无常啊！”麦迪逊夫人给她姐姐的信中说，“这么年轻、这么可爱的一个姑娘，她父亲、朋友和医生的努力都白费了。”

杰斐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和满心的伤痛回到了华盛顿。5月14日，杰斐逊在华盛顿写信给帕茜：“我昨晚就到了，这是我多年来感觉最累的一次旅程。”帕茜是他与已故妻子最后一个还在世的孩子。

6月2日星期六，一封寄自马萨诸塞州昆西镇的信不期而至总统

府。“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辈子没有什么事能激起我的同情心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写道，“但是我懂得，父母在心中对子女的牵绊是多么紧，一旦突然分离，那种切肤之痛又是多么痛彻心扉。”

杰斐逊礼貌地回了信，信中简洁地提到了导致亚当斯一家同杰斐逊关系破裂的事件——卡伦德发表的恶意文章《我们的前景》以及午夜任命事件。

7月1日星期日，阿比盖尔再次致信杰斐逊，解释了她为何对他如此恼怒。

> 阁下，我从未对您当选美国总统而心怀仇恨。但是，我极端厌恶和鄙视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的做法。我已见过太多担忧、关切、欣羡、嫉妒与抨击加诸这个职位，也清楚它须担负的巨大责任，因此满心希望见到职位交出的那一天……
>
> 阁下，我现在坦率地和您讲明，是什么割断了我们的友谊，是什么使我大大改变了原来对您的看法。
>
> 您在任期间释放了一名正在接受法律公正惩罚的犯人。这个无耻之徒编造并发表最下流无耻的谎言，恶意造谣、诋毁污蔑您前任的人格和名誉。您与前总统交情甚笃，对他极为敬重。您一定也清楚，他做不出那些卑鄙龌龊之事。您豁免了卡伦德的罚款，这是公开认可了他的行为。如果堕落狂徒不为人痛恨厌恶，那么对无德之人的最后约束不就没有作用了吗？那些人不就连一点儿羞耻感都没有了吗？……你养的蛇，给它爱，给它温暖，它却咬了喂养人的手，还告诉你什么才是聪明，怎样才算感激，何谓公平正义，它才是真理。
>
> 这封信私下写成，别人都没看过。忠诚乃朋友之伤痛。我常常希望您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心无恶意，也未怀仇恨。即便可以，我也不会实施报复。不仅如此，以基督徒宽容慈爱的精神，我会原谅您，也希望获得原谅。

7月22日星期日，杰斐逊回信称，他支持卡伦德是基于对《惩治叛乱法》的反对，同时，他也同意当时作者的政治观点。“我给他的一点儿资助并不是对他污言秽语、粗鄙下流的肯定，这就如同我给门前的乞丐施舍一点儿钱，也不是对他不良生活的奖赏一样。”

对上一个10年里发生的事件，杰斐逊和阿比盖尔的观点大相径庭。1804年5~10月，尽管双方往来通信达到7次，但再说下去也毫无意义。就这样，通信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了。约翰·亚当斯到1804年秋天信件交流接近尾声时才得知这件事。

1804年7月11日星期三，在哈得孙河上游、新泽西州威霍肯高地

上，美国副总统在决斗中开枪打死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据称，这场决斗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阿伦·伯尔的毁谤性言论而起。

杰斐逊仅对汉密尔顿的死提过只言片语，而且语焉不详。他没有赞颂的纪念文章，也没有致意友人的作品登载在报纸上。当时，即1804年年中，他的沉默显得奇怪，甚至有些不通人情。那时的政治状况或许可以解释杰斐逊为什么对这件事三缄其口，也不写任何文字。其时，公众对汉密尔顿的死亡反应激烈，群情激昂。他一手创建的《纽约晚邮报》对他歌功颂德，称他为“最伟大、最具才德之士”。在纽约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最后在曼哈顿下城区、百老汇与华尔街的三一教堂举行了安葬仪式，十分令人瞩目。

秋季总统大选在即，杰斐逊很有可能认为保持庄重的缄默——他希望这种缄默至少会被视为庄重而非冷酷无情——是最佳方式。1804年盛夏，对汉密尔顿的赞颂没有被解读为对他英年早逝的震惊与惋惜，而是被理解为对他计划的支持以及对其对手的谴责。约翰·亚当斯看到了这一切，后来给杰斐逊写信说，汉密尔顿所在党党人“抓住公众的同情心，随后在葬礼上演讲，又印制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什么这么做呢？只是为了羞辱老辉格党人，同时安抚那些基金会和银行家而已”。

对杰斐逊而言，汉密尔顿代表着最危险的趋势。然而，身为总统，杰斐逊并没有对汉密尔顿建立起的金融体系加以摧毁。“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个人恩怨，”杰斐逊在后来提到汉密尔顿时说，“也许，就个人而言，我们都认为对方不错；但是，作为政治家，我们两人的政见是完全对立的。”

关于伯尔的事情更加紧迫。他被纽约州验尸官陪审团和新泽西州大陪审团同时以谋杀罪起诉。副总统先生在7月末逃脱了两个州的起诉。但是，对于杰斐逊来说，阿伦·伯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804年8月6日星期一，距离汉密尔顿离世还不满一个月，安东尼·梅里向伦敦汇报，伯尔意图“起事，将美国西部各州和大西洋与山脉之间的各州彻底分裂”。

杰斐逊总统发现，了解反对派们的言论和行事用处颇多。在幕后，他是消费报纸和政治情报的精明行家。通过阅读敌人的报刊，杰斐逊找到了可能得以连任的灵感，也发现了阻碍连任的危险。“我衷心地感到遗憾，联邦党人孜孜不倦的污蔑诽谤迫使我全心投入对国家审判的裁决上。原本我最大的愿望是本任期结束后，回归平静的生活，这是我当初就职时就决定的，”1804年他给埃尔布里奇·格里的信中说，“是他们逼迫我竞选连任。”

1804年选举中，乔治·克林顿代替伯尔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是纽约人，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在政坛的崛起预示了美国政治的情况。约翰·杰伊曾经这样写道：“克林顿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并未赋予他如此杰出的成就。”这是典型联邦党人的观点。杰斐逊式的观点则不同，后者允许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白人间自由流动。

联邦党人派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上场。他在4年前是约翰·亚当斯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任何对现任总统的挑战都注定是一场令人尊敬但败局已定的战斗。杰斐逊凭借他超高的人气、低税收政策、国家的繁荣以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保持着稳固的地位。总统以162票对平克尼14票的压倒性优势成功连任。曾经雄踞一时的联邦党阵营开始日渐衰落。

1804年12月，一个署名为“宪法之友”的人从费城发来一封信。信中告诉杰斐逊：“有人阴谋杀害您……一伙儿暴徒已参与此事。事成之后，他们会得到1万美元。他们计划携带匕首和手枪。我曾被邀请加入，但我宁愿去死。我建议您多加小心，出行时请务必谨慎，因为其中一些杀手已经到华盛顿了。”

此类恶意威胁事件与当时国家大背景是相悖的。“现任政府的权力依托于全联邦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自宪法创立以来，往届任何政府都没有达到的。”杰斐逊大选胜利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说。亚当斯本人的父亲的政治信仰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延续下来并占有统治地位的全然是杰斐逊的理念，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反映出这位获胜总统复杂的性格。杰斐逊领导下的美国既不全是联邦党式，也不全是民主共和党式。它更像是两者大理石般斑驳的混合物，经由一位务实者调配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在形成国家未来格局、显示杰斐逊政治领导力方面，意义深远、无可超越。例如，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但当他认为权力更广才能最好地服务国家时，则应不在此列。那是回味胜利与成功的时刻。

首都到处静悄悄的。“城里只有几个陌生人。”1805年1月7日星期一，杰斐逊给帕茜写信。

手中握着第二份就职演说，杰斐逊的思绪回到了过去40年中他和他的同胞们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参加第一次革命时，我们还年轻，革命结果皆大欢喜。”杰斐逊给新罕布什尔州政治家约翰·兰登写信说，“我们老了，还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更危险的革命，因为我们的人分成了两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然而，即使取得胜利，杰斐逊仍能感受到期望带来的压力。他明白政治上一时的风平浪静绝不会持久。1804年12月，联邦党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应邀与杰斐逊共进晚餐。总统先生衣着得体（“一套崭新的黑西服、长筒丝袜、新鞋、干净的亚麻衣料，头发还上了很多粉”），来宾们乐享美食（“他的晚宴食物精美、种类丰富”）。然而，在普卢默眼中，杰斐逊并不像一个正处于政治巅峰的人。普卢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今天比较沉默，显得有些郁郁寡欢，很少说话。”

总统心事重重。当时正处于拿破仑与纳尔逊争雄的时代，两个大国之间争斗不休，似乎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和平。而美国一直是敌人们觊觎

的目标，意图霸占美国全境或部分领土。杰斐逊担任公职的最后4年如同以往的几十年一样，他仍然在奋力保卫国家的安全。

英国最先开始，但不是最后结束的那位。英国仍然对美国的综合实力持怀疑态度。1805年，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我们驱使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可时机并不合适，他们也不适合，比我们流放到博坦尼湾的罪犯好不到哪里。"

1805年3月2日星期六，副总统伯尔献给参议院一篇赞歌后离开了首都。他在赞歌中将参议院称为"一座圣地，一座法律、秩序与自由的堡垒，并矗立在这里。只有这里提供尊崇的庇护；只有这里，会抵御民众狂暴的狂风骤雨；只有这里，会抵御政治腐败的汹涌暗流；如若宪法在蛊惑民心或篡权者手中遭到亵渎，愿上帝阻止，只有这里，会见证他们最后垂死的挣扎"。

威廉·普卢默认为伯尔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后来，他又做了一番思考。"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普卢默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确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从不循规蹈矩的另类。"普卢默当时还不知道他的话是多么的一语中的。

"现在全是公务，紧急，还总有干扰。"杰斐逊在第二次就职前一晚说道。

他处理政务时主导一切的态度好似与生俱来。在一封私信中，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讽刺他，称他为"蒙特祖玛的继承人"。虽然这是把杰斐逊比作了16世纪阿兹特克神王，这种挖苦还是表达了对他权力的敬意。

杰斐逊第二次宣誓就职日是一个星期一。他身穿黑服，骑马离开了总统府。在参议院，杰斐逊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这次的声音仍然过小，听清楚的人不多。"在上届政府期间，那些旨在干扰政府工作的新闻界，把炮口对准我们狂轰滥炸，其放肆和大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攻击一种对自由和科学如此重要的制度，这实在让人深感遗憾，因为这些攻击意在削弱这种制度的功用并损害其安全性。"然而，应当由市场决定。审查监督应交到人民的手中。

之后，杰斐逊大开总统府，迎接拜访者。这次也是遵循"混排"的原则。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好不容易来到总统府参加庆祝会的福斯特报告说，"凡是登门的他全都接待，甚至连那些几乎与黑人无异的，包括肮脏不堪的搬运工都接待。那些人就在我们面前，喝着他的葡萄酒，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一段器乐声响起，宣告接待日接近尾声。用福斯特的话说，"几声笛响，伴着一阵鼓声"，所谓的庆祝活动就结束了。

杰斐逊如今是第二位连任两届的美国总统。他返回总统府，向民众（包括福斯特所表述的"几乎与黑人无异的肮脏不堪的搬运工"）致意时，一心想以华盛顿为榜样，履职4年后退出政坛。仅有一种意外情况可能促使他再战第三届。1805年年初，他曾向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泰勒提

到过这种意外情况。“我原来的想法是美国总统应连任7年，然后永远再无参选资格。”现在他不太确定了：

> 后来我意识到，连任7年不能撤换，这时间实在太长。对于行事错谬的人，应当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在中途将他换下。8年任期中，在第4年时有权使他卸任，这种经过经验修正的方式与我的原则大体接近。危险在于人民对领袖的纵容与依恋，会让人在即使变成昏聩不堪的老糊涂时仍执掌大权。然后不断连任变成一种惯例，最后演变成终身制。华盛顿将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连任8年后主动离职。我也会仿效他的做法。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将来有人意图延长任期时，就会成为不良惯性的有力阻碍。或许，最终还能列入议事日程，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这样的制度……然而，有一种情况我会默许再参加一届选举，那就是和继任者之间存在实行君主制度这样的严重分歧。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君主制度在未来的可能性仍让他忧心忡忡。

1805年春，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远征队首批成果源源不断地运抵东部。4月，威廉·克拉克给杰斐逊写信：“承刘易斯上尉所愿，我不揣冒昧将本人行程中所写日记原封不动寄给您，仅供您本人审阅。”梅里韦瑟·刘易斯给杰斐逊的简报中写道：“我看不出任何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实质性或者潜在的障碍，因此，我对此行圆满成功抱有极其乐观的预期。”

两位队长从北达科他州密苏里河上的远征队冬季据点曼丹堡，给杰斐逊寄来了一大批手工艺品。一个箱子中装了羚羊皮、水貂皮、狼皮以及骨架，还有各种麋鹿角、大量植物，另外还有4只活喜鹊。对杰斐逊而言，这次收到的物品让他大喜过望了。

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游记令公众大开眼界。“刘易斯上尉的发现之旅吸引了好奇者的注意，也引起了许多对美国心怀偏见者的关注。”1805年8月，威廉·尤斯蒂斯在马萨诸塞州写道，“这个国度从未像此刻一样受到外国的尊重，人民也从未像此刻一样举国欢腾。”

1805年年末，经过3 000多英里的长途跋涉，在一棵能俯瞰太平洋的大树的树干上，克拉克钉下了杰斐逊长久以来梦想的宣言：

> 威廉·克拉克上尉
>
> 1805年12月3日
>
> 陆路至此
>
> 1804～1805年美国领土

波托马克河上构想的使命最终在太平洋得以完成。取得这项成就的过程如此波折，正是杰斐逊权力的映射：通过找到一条穿过西大荒的路，进而控制整个大陆。

杰斐逊很高兴收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物品。他向伦敦订购了一套巴克斯特所著的八卷本《英国史》，大量有关酿酒、地质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地图。他还想要一架望远镜和一对“包括1800年最新发现的”英国地球仪。

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杰斐逊在职的这些年里，他不但将总统职位变得完全不同，他还把总统官邸也改头换面。这里变成了新奇有趣物品陈列及咨询中心、一个生机勃勃的机构，从自然科学到文学艺术，在国家广泛生活方面扮演着非正式但重要的角色。

杰斐逊在官邸单独辟出一个房间陈列化石，有头盖骨、下颌骨、牙齿的碎片、野兽的獠牙，还有一条动物前腿。“一头巨兽的角”以及200块威廉·克拉克搜集的小型骨头，“骨头全部陈列在一个大房间里。有空时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从早到晚，无人打扰，还可与我们一起用餐。”他致信费城外科医生小卡斯帕·维斯塔，医生后来出版了一部《系统解剖学》。

探险者泽布伦·派克在沿格兰德河行进途中从一个印第安人那里买了两头小熊幼崽。他的手下用牛奶饲养这两头小熊，并将它们在1808年安全运抵总统府。“如果条件许可，我会建议把两头小熊关在一起（不要拴链子），定期供给食物和水。我几乎可以确信，它们会和平相处，性情也要比拴上链子，关在两处温驯许多。”派克告诉总统。

总统采纳了派克的建议。“我把它们一起关在10平方英尺的地方，”杰斐逊写给博物学家兼画家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第一天玩的时候，它们彼此还充满戒心，但那之后不时玩闹，在一起是极高兴的。”事情发展并不意外，但把两头熊养在总统府里还是不切实际，因此，杰斐逊把它们送到了皮尔在费城的动物园。

有人提出请求，希望得到专家意见，以确定一块石头是不是陨石。杰斐逊说：“任何我们确认不了的，我们自然也不能否认。”他并不总是保持本应持有的怀疑态度，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也会大错特错。蒂莫西·皮克林暗指麦迪逊和门罗两人操纵总统连任一事。他说，正当共和党人为1808年总统选举备战时，“总统本人却在路易斯安那的荒野中‘徜徉’，考察一片片盐地是岩盐还是矿物盐，探索它广袤的草原，他在那里发现了人间‘乐土’——数不清的印第安人部落及遗迹，他们会说那么多种语言。部落附近有滚烫的温泉和温暖的泥洼，还有各种奇妙的发现：一种小小的，或者‘极小的贝类’，形状像贻贝，但长着四条腿；一种‘半英寸长的蠕虫，爬起来像蛇那样蜿蜒蠕动呢’”。

杰斐逊对自己多方面的兴趣爱好颇感骄傲。“杰斐逊先生性格特点中

最引人注目的包括对赞赏和谴责的戒备感。他对前者有多感激，就对后者有多厌憎。”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写道。他说，杰斐逊“被认定为能力卓著的政治家恰如其分。但是，有人认为他‘兼具处理公众事务的才干及追求科学所必需的抽象能力’时，他就更感自豪”。

英国人甚至认为杰斐逊长久以来对伦敦持有敌意，部分原因是他在法国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我真的认为，早年间他的文学才能未在英国有所发挥，当其他事件引起他对英国的不满时，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桑顿写道，“而法国人，至少在君主制时期，似乎对他的这一面了解更多。通过在文学圈里的交流往来，赢得了他的青睐。”

杰斐逊总是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您明天能来与我们共进一顿印第安式晚餐吗？”1806年3月，杰斐逊给约翰·布雷肯里奇写信，“有一个酋长真的很少见，他会用手语沟通。我们经常听说，但以前从没亲眼见过。时间和往常一样，还是3点半。”在华盛顿，他和剧作家兼画家威廉·邓拉普聊青蛙的蛙鸣声。“早春的蛙鸣是在评价法式和英式园艺风格。蛙鸣表示更喜欢后者，赞赏他们在园艺布局方面很有品位。”在总统官邸与塞缪尔和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夫妇喝茶时，杰斐逊谈到“种植、园艺及二者在不同国家的区别，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出产哪些不同的作物”。他还把马耳他的香瓜种子寄到史密斯夫人的家中。

谈什么话题无关紧要，杰斐逊一直在努力解决政治和哲学问题。“以这种方式建立一支新奥尔良防御军队，你们怎么看？”1806年2月他写信给麦迪逊、加勒廷和迪尔伯恩，“给每个壮丁补贴50英亩土地，直接送出土地的条件是：即刻在该片土地上定居，并承诺，如果在定居的头7年里被征召，必须服两年兵役（期间军饷照发）。”

他总是乐于给年轻人提出建议。“我会……建议他今年夏天读李维、塔西佗和贺拉斯，”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这个朋友有个儿子，“前两个人的著作会让他充分了解罗马史，而且，这三人的作品能使他在语言上受教。他也可以读读法语版的阿纳卡西斯的作品，在强化法语的同时了解希腊史。我还建议他读读巴克斯特所著的《英国史》。他已经读过休谟的作品，巴克斯特可以作为一个修正，他可算是共和主义式的休谟。”

1805年，国家主要的政治关注点放在了处理与西班牙的紧张关系上：确定路易斯安那确切边界；因马德里拒绝移交，佛罗里达前途未卜；债务索偿。西班牙仍在北美洲盘踞，并与法国结盟。门罗前往西班牙首都的使命失败，这引发了杰斐逊内阁的一场争论：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武力进攻西班牙的据点。

美国是否应该冒着与西法两国开战的危险而坚守立场呢？如果开战，美国是否应该考虑与英国建立攻守同盟？英国需要盟友对抗拿破仑，结盟能否把英国这个潜在的敌人，至少暂时地转变成美国的朋友呢？

杰斐逊最终的回答是，不。与英国签订一个临时协议，万一与西班牙或法国打仗时能有一个盟友，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杰斐逊认定，保持中立仍然是国家的上上之策。“我们的《宪法》是为和平创立的，并不是为了战争而设。”杰斐逊说，“战争会危及它的存在。”杰斐逊读过的史书中，战争意味着陆军、海军、债务和荣誉，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的衰落和帝国的兴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为了自由，偶尔还是不得不抗争。杰斐逊对此非常明白，而且他也承认，打仗虽然是最后一招，也毕竟是一个手段。在最后祭出美国军队之前，这位曾经被塔尔顿追捕的人会把能想到的武器统统使用一遍。各种不牵涉传统战争模式的措施——用大炮加强港口防御、建炮舰进行沿海防御、组建民兵队伍以备未来军事部署——即将被大派用场。杰斐逊在1805年年底给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呼吁采取以上所有措施。

这一年走向尾声时，杰斐逊只觉得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英国不断骚扰美国船只；法国也是如此，只是略少于英国；拿破仑在奥斯特立兹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纳尔逊赢得特拉法尔加一役却光荣战死；近在身边，前副总统伯尔据称正策划阴谋推翻美国。

在这个内外交困、麻烦不断的时刻，杰斐逊试图充分利用时机，以对付法英两国。“此时此刻，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可怕的景象，”1806年1月，杰斐逊写道，“我们本应希望，陆军军力强大者拥有不了制海权，而海上霸主没有陆军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享有安宁，至少在国内如此。”杰斐逊无法回避，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种安宁会持续多久？又能持续多久呢？

第三十七章 黑暗大阴谋

我们这位喀提林[26]的计策貌似真切，但设计得过于理想。

——托马斯·杰斐逊评价阿伦·伯尔在西部的动作

杰斐逊的冬天随着帕茜一家在总统官邸长住而变得明朗起来。这个他和妻子唯一的尚在世的女儿在官邸诞下了他的外孙。外孙取名詹姆斯·麦迪逊·伦道夫，以表达对外祖父的国务卿的敬意。多利·麦迪逊在此之前已帮助帕茜准备好了新年用品，从巴尔的摩购置了“一顶时髦的假发……一套打理头发用的梳子，一个系带女帽，披巾和白色的蕾丝面纱”，另外还买了两块带花边的手帕。

总统也抽空去了趟他在华盛顿的酒窖，查看一下是否有足够的波尔多酒（量是足够的）。但是，他仍然派人再去买一些汽酒，他觉得他目前的存货“都是烈酒，没有不含酒精的”。

然而，在国会山，他的一个亲戚破坏了杰斐逊正在享受的宁静时光。洛亚诺克的约翰·伦道夫，一个秉性怪异的人，杰斐逊曾经的盟友，1806年3月和杰斐逊分道扬镳。一年前，伦道夫终止了一项杰斐逊主导的让步方案，协商解决由来已久的事关亚祖土地公司的争议案（腐败的佐治亚州立法机构为进行土地期货投机，把原属于克里克人的合法土地进行售卖）。这个事件是伦道夫最终走向反对杰斐逊的前奏。

为报复英国军舰劫掠美国商船，决定限制甚至禁止从英国进口货物的辩论成了新的导火线。在众议院，伦道夫向杰斐逊政府宣战了。

那天，威廉·普卢默离开参议院会议厅，前往众议院听他发言。“他认为，大不列颠眼下正为了自身生存，同时也在为文明世界，与妄图篡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波拿巴努力奋战。”普卢默是这么记录伦道夫的演讲的。伦道夫特别点名批评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普卢默写道：“那是我听过的最激烈、最严厉、最巧舌如簧的抨击。”第二天，伦道夫再度放言。普卢默说：“对总统出奇地严厉……伦道夫先生已经渡过了卢比孔河[27]，此后无论总统还是国务卿都不可能与他为善了。他已公然反对二人和他们制定的措施。”

伦道夫说话尖酸刻薄，谁也不放过。一位同僚起身想发言，被他挥手制止。“坐下，先生，我说坐下。先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伦道夫说。提到总统本人，伦道夫“对他执政行为谴责用词之粗鲁狂妄，令所有听者骇然”，马里兰州参议员塞缪尔·史密斯写道。

伦道夫小集团后来人称为“奎兹”（源自tertium quid，拉丁语意为“第三方”），也有人称之为“老民主共和党人”，代表着更绝对、更单一的民主共和党原则。伦道夫的追随者们认为，杰斐逊朝联邦党方向走得太远，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信徒，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党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分裂标志着杰斐逊超越了后1798时期单纯从语言上进行区分的做法。人在谋求权力的时候，从理论上谈论理想化的政治是很容易。然而，一旦大权在握，行使权力的要求是如此复杂多变，原本在思想上十分确定的事往往在真正执政时被最先牺牲掉。杰斐逊取得的成就，在他的联邦党政敌看来，是不可企及的。对某些人来说，他已经不再像个民主共和党人了。换句话讲，杰斐逊令当时的极端分子极其不悦，这标志着他做事没有死搬教条，而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

总统确实在考虑扩大权力，扩展政府公共部门的职权范围，超出一些赞成严格限制政府权限的人的规定范围。杰斐逊是第一位支持开展全国性公共工程项目的总统，他呼吁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批准资金以支持“教育、道路、河流、运河”及其他项目的权力。

“通过这些举措，”他在第六次国情咨文报告中说，“各州之间新的联络渠道会被打开，分隔的界线会消失，各州的利益会趋于一致，它们会因坚不可摧的新纽带变得更加团结。”之后，1808年春，财政部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建议斥资2 000万美元进行道路和运河方面的基础设施修缮。由于禁运期间资金吃紧，与英国关系日趋紧张，而且杰斐逊本人认为，未经宪法授权，他无法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但是，加勒廷计划的每个项目最终几乎都全部完成。项目中第一个完成的是联邦政府出资修建的坎伯兰公路（又称国家公路），从马里兰州向西直达伊利诺伊州。

在伦道夫看来，杰斐逊大多数时采取中庸态度的政治主张，必然走向灾难。1806年，伦道夫写道：“我认为，自由政府的事业没有比现在更让人担心的了。”忠诚于总统的民主共和党人已经变成了共和事业“暗藏的敌人或者温和派，对曾经宣誓坚守的原则‘虚褒实贬’”。伦道夫煽情地发问：“现在的行政机关难道无懈可击吗？那个部门里形形色色的人就从来没有犯过错？他们就不会犯错？”

对伦道夫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杰斐逊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过于妥协让步。伦道夫说，中庸之道，是千百年来“野心戴着的面具”。等到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伦道夫告诉詹姆斯·门罗：“老民主共和党早已朽坏，无可救药了。”

对国会里发生的种种事，杰斐逊表现得镇定自若，但是，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足以说明民主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局势的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可能爆发的美国内战——都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在他心头。

1806年4月末，为查找英国船员，英国军舰“利安德”号在纽约州搜查美国船只。开炮预警时，“利安德”号误杀了一名美国船员。当时，另外两艘英国军舰，“驾驶者”号和“威尔士”号也在附近。杰斐逊命令三艘船离开美国海域，下令以谋杀罪逮捕“利安德”号的船长。

他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厉害。“我现在病痛难忍，白天一整天既不能做事也不能交谈。”杰斐逊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参议员乔治·洛根说。杰斐逊只能在晚上与人面谈，那时头痛似乎减弱些。他的腿也疼（他称之为“膝部麻木”），他还担心着钱的问题。“我在华盛顿欠下太多债了，现在不但不能开新账单，而且所有非必需的开支也通通取消。我现在必须这么做，不然，等我离开这地方时还有债在身，如果不幸要动用我的私人财产归还，我注定晚景凄凉了。”1806年5月杰斐逊在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说。

夏初，他最年长的导师去世了。1806年5月25日，乔治·威思像往常一样起床，在家里吃早饭。早晨大约9点左右，他开始胃痛，他的家人也都生了病，其中一个叫迈克尔·布朗的混血青年在几天后死去。地方治安官威廉·杜瓦尔怀疑死因，下令进行尸检，有4名医生参加，杜瓦尔告诉杰斐逊，“从胃肠部的肿胀情况来看，他们说是由某种毒药引起的”。嫌疑犯锁定乔治·斯威尼，他是威思的孙侄。如果是他干的，他的动机可能与嫉妒及金钱有关。

1806年5月25日，威思曾说：“我是被谋杀的。”但是，杜瓦尔报告，威思“没有提及姓名”。病情恶化时，他说：“让我体面地死去吧。”

故事耸人听闻，有人对乔治·威思的私生活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威思结过两次婚，目前鳏居，和年轻人迈克尔·布朗及身为自由人的黑人女管家莉迪亚·布罗德纳克斯住在威廉斯堡。按照威思的遗嘱，除继承其他财产外，布罗德纳克斯还继承威思的房子。威思在条款中注明，如果自己身故，请杰斐逊监管迈克尔·布朗的教育问题。

这些安排隐含的意思虽未经证实，但十分明确：布朗是威思和布罗德纳克斯的孩子。“不论被形容为‘黄’皮肤的布朗是不是威思的亲生儿子，威思对他的教育问题上似乎不遗余力，”历史学家安妮特·戈登–里德写道，“当然，请自己最得意也最有名的学生——现任美国总统来做迈克尔的监护人，足以表明他对这个男孩的钟爱。”

威思遗赠给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杰斐逊书籍、银质酒杯和金头手杖。这起罪案令总统不安又沮丧。他告诉杜瓦尔，他原本十分乐意负责迈克尔·布朗的教育。他说，这一嘱托原本“能让我在实现朋友的遗愿时，常忆亡师，给我带来无尽的安慰”。杰斐逊相信迈克尔·布朗是他老师的孩子吗？如果相信，这起据称由他导师所在的白人家族内部心怀怨愤的一员犯下的谋杀罪会在杰斐逊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呢？杰斐逊对这样的生活可再熟悉不过了。杰斐逊的所思所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趣的是，他认为这个事件十分离奇异常，在一般生活中不会发生。“这样的邪

恶事件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只出现在诗人的寓言故事里。”1806年6月，杰斐逊写信给杜瓦尔说。杰斐逊想象自己与威思的命运，相差得越远越好。

夏天出现了新情况：弗吉尼亚的旱情日趋严重。到秋天这些事已经不再新鲜了：不断有报告称阿伦·伯尔在制造事端。

与汉密尔顿决斗之后，伯尔开始四处游历。他到了西部，有流言称，他正密谋说服某些州脱离联邦，在西部建立一个帝国；也有传闻说，他在策划一场进攻墨西哥的战争。

另有一种猜测引起最大骚动，将事态描绘得更加严重。伯尔正考虑组织军队直捣华盛顿，企图接管美国。“毫无疑问，伯尔正积极参与筹划西部各州脱离联邦。”1806年11月杰斐逊写道。据称，这位前副总统正在招募士兵，囤积军火，建造船只。

杰斐逊收到的所有消息都无法令他的担忧之情略减分毫。“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比黑暗的巨大阴谋，”11月，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给杰斐逊写信说，“对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民主共和党人还是联邦党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争取国家独立的老爱国者还是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富人还是穷人，居高位者还是平民百姓，通通加以笼络，我担心新奥尔良会大力支持。”

威尔金森本人就是个麻烦。他一直从西班牙那里收受贿赂，在高层军官中臭名昭著，还与伯尔就提及的阴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事情进展到某个阶段时，威尔金森认定，向杰斐逊告发伯尔可能出现的叛国行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此又可逃过一劫。

1806年11月27日，忧心忡忡的杰斐逊发表了一份公告，警告说“形形色色的人”，包括“美国公民”在内，正“密谋联合起来”占领西班牙的属地。

伯尔究竟在做什么呢？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确定。起初，他似乎有意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得克萨斯及其他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这样的行动被称作挟持议会——自行对外国发动战争。伯尔和他的各色同盟者似乎在为某次军事远征做准备。目标并不清楚，但是杰斐逊认为，这一军事行动必定涉及伯尔欲夺取西部的权力与土地，他可能在南至墨西哥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

1806年12月27日星期六，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和杰斐逊一起吃饭。喝咖啡时，杰斐逊说他相信所有事情都会顺利解决。普卢默说：“（杰斐逊）毫不怀疑，阴谋事件尽管波及范围极广，但一定会被粉碎，而且美国几乎不用费吹灰之力。”很快指控伯尔的文件出现了，1807年1月，杰斐逊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了国会。

与此同时，杰斐逊也在谋取处理国内危机的权力。在他与普卢默聊

天的8天以前，杰斐逊起草了一份议案：“在叛乱事件发生时，可授权征用美国土地及海军。”他把起草的立法文件发给弗吉尼亚议员约翰·道森，并附上一张直白的便条：“杰斐逊向道森先生致敬，在此请求他抄写一份副本后，将原件焚毁。他本人极不希望与立法议程细节有任何牵扯。”

纯粹作为政治家的杰斐逊就是这样：为奋起保卫国家，请求被授予权力，然而在获得那份权力的过程中却竭力隐藏自己。他的对手会认为这种手段虚伪下作、不光明磊落，但是就杰斐逊看来，他在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堂而皇之地掌权会威胁这个国家的民主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至关重要。他认为，宁可通过在国会的盟友从中运作，也比冒着成为他人眼中的独裁君主的风险要好，即使换作联邦党人当总统，可能也想这样做。讲求实际的人就用这种方法做事。

杰斐逊攻击伯尔时毫不留情。他这样做倒不是出自个人野心或者嫉妒心——自从汉密尔顿被杀，伯尔在传统政治体制内对杰斐逊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关心。如同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样，保持联邦的统一比杰斐逊所称的“严格的法律条文”要重要得多。1807年1月22日星期四，杰斐逊向国会递交的有关伯尔的报告中迈出了少见的一步：他宣称他的前副总统“犯罪事实确凿”。这个结果与很久以前他对约书亚·菲利普斯案以及逮捕“买头发的将军”所做的决定不无相似。如果这些决定令包括伯尔在内的嫌疑人的自由受到了侵犯，那就侵犯吧。

1807年3月末，伯尔被逮捕。杰斐逊对案件审理过程密切关注。“没有谁的过往更能说明诚实的价值了，”杰斐逊写道，“真能如实以告，有什么事他没做过呢！”不幸的是，他说，他的头痛“害得他每天早晨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能处理事情”。

伯尔被带到里士满受审，审理在雄鹰酒馆临时搭建的法庭里进行，由约翰·马歇尔主持。杰斐逊对案件关注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搜集情报，并向公诉律师建言献策。他认为事态严重，千钧一发，又以一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姿态投入这件事中，但是，他仍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尽管伯尔以叛国罪受到指控，但随着案件的进展，控告漏洞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由同案犯转为污点证人的詹姆斯·威尔金森控告称，伯尔意图攻占新奥尔良（这一指控已致使杰斐逊对新奥尔良宣布戒严令），并意图进攻西班牙殖民地。（威尔金森的控告有问题，因为自行对外国发动战争并不违法。）

里士满的信差在黑夜里骑马上山来找杰斐逊。度假中的总统还没入睡，他仔细地研读着来信以及信中的附件。这并不是普通的邮件：伯尔案的公诉人、美国联邦检察官乔治·海给总统发出传票，要求他本人出庭做证。其时麦迪逊正在蒙蒂塞洛作客，与麦迪逊商讨过之后，杰斐逊决定拒绝把自己及行政部门交由他人掌控。第二天，他给海写信：“我认为

地方法院没有权力命令执政府放弃高一级的职责，听从指派，无论距离远近，我不愿意凭一纸传票就创下一个先例，认可一个如此荒谬的程序。”

杰斐逊决定保留自己是否遵从法庭传令前往做证的决定权，他为行政机关树立的这个榜样具有深远意义：杰斐逊称，与应付法律系统的胡搅蛮缠相比，总统对广大公民具有更高的责任和义务。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给海寄去相关文件，这是非常聪明的折中办法：既避免了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又保留了应有的处事能力，在地处偏远的地方法庭征召时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虞。他又把海发给他的传票原封不动地随信寄了回去。

马歇尔作为审判法官的决定和态度令审判进一步恶化，杰斐逊把起诉过程中受到的种种不利全都归咎于这位首席大法官的政治伎俩在作祟。马伯里案之后，弗吉尼亚州的司法程序废除了1801年颁布的《司法条例》。弹劾塞缪尔·蔡斯是杰斐逊与司法系统长期斗争的首战，一年年过去，他越来越不喜欢，也越来越不信任司法系统了。

伯尔最终被无罪释放，总统勃然大怒。实际上，指控被告犯有叛国罪的证据并不确凿。然而，杰斐逊希望，国民会同他一样，明白起诉失败是因为马歇尔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全国人民会审判两名违法者，并且是为自己审判，”杰斐逊写给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的信中说，“如果行政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有人犯错，人民把他赶下台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杰斐逊认为，由伯尔判决激起的愤慨之情或可引导另一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让法官们对公众更加负责。

他已忍受病痛达一个星期之久。“今天是我犯周期性头痛的第7天，我早晨趁头痛发作之前写的这封信。”1807年3月他给帕茜写信，“这些天发作没有前几次那么严重，但是发作起来时间很长，从早晨九十点开始，直到天黑才停。到现在服用氯化亚汞和树皮都没有任何作用。”

杰斐逊还有惯常的抱怨和精神压力。“我厌倦了在政府部门工作，这里其他人并不逊色于我，而且他们还乐意在政府任职。”1807年年初，他写信给他的老革命战友约翰·迪金森，“对我个人来说，这工作就是没完没了的苦差，每天都在化友为敌。”

在此期间，一份与英国的协定提议抵达了华盛顿，提议几乎没有考虑美国的利益。“英国的达官贵人们极尽扭曲之能事，每项条款占尽一切，寸步不让。”1807年3月杰斐逊提到协议时说。简而言之，外交手段并未解决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尤其在阻止英国强征美国海员这一侮辱性事件上毫无用处。杰斐逊拒绝将提议交给参议院审议。

1807年2月，杰斐逊碰见两位女婿，在交谈中邀请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和他一起去某个场合（详情不得而知），却没有叫上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这种出自无心的轻慢立刻激怒了伦道夫，他很不高兴地给杰斐逊写

了一封情绪激烈的信，抱怨总统偏向埃普斯。伦道夫对埃普斯心生妒恨，视他为敌，认为他占尽了岳父的宠爱和关注。

杰斐逊读到信吃了一惊。他说，他注意到这两位都娶了他女儿的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是他决定不去询问紧张的因由（这是杰斐逊典型的做法）：避免正面冲突是杰斐逊的专长。杰斐逊写信安抚伦道夫："我想不出，我做过什么事令你觉得我更喜欢或者表现出对（埃普斯）的喜爱。"

心中既怒又痛的伦道夫在此之前已搬出了总统府。"你如能搬回家住，对我将是莫大的安慰，"心里放不下这件事的杰斐逊写道，"我对你视如己出，爱你如子（我的确不知两者能有什么区别），我太过想当然，以为你与我想法一样。"他在1807年2月19日第二封短信里这么说。

已决定不再参加竞选连任议员的伦道夫在新居中得了病，杰斐逊派家仆去照看他的病况。

杰斐逊对伦道夫慈父般的感情出自挚诚。"我定不会催逼你做任何令你十分反感的事，不过，我希望，亲爱的先生，你能同意搬回你原来住在这里时的房间。"2月28日杰斐逊给伦道夫写信。

伦道夫的确搬了回来，但是他病得很重，又很抑郁。他甚至想自杀。杰斐逊记录着病情好转的伦道夫在总统府二楼圆形房间里每天能走多少步（第一天走了大约五六百步，第二天走了1 200步），还给帕茜频繁去信，汇报好消息。对他而言，家庭和睦与政治和谐同等重要。

[26] 喀提林：罗马的阴谋叛变者。——译者注

[27] 渡过卢比孔河：卢比孔河为意大利北部河流，为当时高卢与罗马共和国的界河。根据当时罗马法律，任何将领率军越过此河，既视为叛变。故而至今，西方仍以其表示人们断然将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危险境地。——译者注

第三十八章
这该死的禁运

> 自莱克星顿一役以来，我还从未见过国内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慨情绪，且即便是在当时，全国上下也从未如此同仇敌忾。
>
> ——托马斯·杰斐逊，评论英国攻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

在华盛顿，杰斐逊进入了战备状态。1807年7月，他写给财政部部长艾伯特·加勒廷的信中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事发生，而就这些事最好听取几位部长的意见。内阁成员们大可随意在自觉方便的时候随时来找我。”

1807年6月22日星期一，一场危机突然爆发：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在弗吉尼亚州海岸亨利角附近海域遭到英国军舰“猎豹”号攻击。这艘英国船命令美国船只允许其登船搜查逃跑的船员。“切萨皮克”号指挥官詹姆斯·巴伦拒绝了这一要求，而“猎豹”号则向这艘美国护卫舰开火。22发炮弹击中“切萨皮克”号，此时美国人才设法发射出一发炮弹给予回击。巴伦和另外17名船员受伤，另有3人死亡。

这种战争行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侮辱，也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袭击。公众反应十分迅速。“我读到有关‘切萨皮克’号遇袭这一无耻的消息时，我的感受和每一位真正的美国人一样：对英国人无比愤慨和憎恨。”6月29日星期一，一位记者从费城致信杰斐逊。

杰斐逊立刻召集内阁。加勒廷当时身在马里兰州。“我很抱歉，被迫催你快些返程，”杰斐逊给他的信中说，“我祈祷旅途顺利，没有片刻延误。”加勒廷身体抱恙，但不久即能好转。“我身体太过疲惫，无法搭邮车夤夜兼程。不过，我会在星期三下午两三点与你见面。”一分一秒都不可浪费。

7月4日，联邦党人现身杰斐逊一年一度的招待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报纸称，总统的宿敌们“与他们的民主共和党兄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斯特尔举行的宴会上，响起爱国宣言般的祝酒词。有的说：“美国人民，时刻做好准备，面临危机时，维护自身的权利，并为祖国受到的不公复仇。”另一位客人起身说道：“美国总统，起草《独立宣言》之手，会维护它认可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不受侵犯。”

杰斐逊领会了此刻的重要性，他发布公告，宣布禁止英国武装船只驻留美国领海。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决定号召各州州长召集总数达10万人的民兵待命，并下令购买武器、弹药和补给。这均是总统单方面下

发的命令，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

他认为，他最能判断出在此危机时刻什么是当务之急。“当我们的和平受到威胁，我认为保证我们弹药库里目前储备的一般的军用物资库存更加充足这十分重要。”事后杰斐逊告诉国会，“我相信，立法机关同样为国家安全感到担忧，通过这样的预防措施提前做好物资准备，即便是事后再召开会议，还是会批准立法者们必定认为非做不可的这件大事。”

国会同意了。总统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杰斐逊对权力的观点受到了肯定。“严格遵守成文法律无疑是良好公民的责任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责任，”杰斐逊在离任后写道，“在危急关头迫不得已、自我保护以及挽救国家所行的法律才是更大的职责。因一味墨守成规而失去我们的国家，就失去了法律本身的意义，失去生命、自由、财产以及那些与我们共享所有这一切的人们。为维护手段而牺牲目的，实在是本末倒置、愚不可及。”

美国“复仇者”号舰艇被派往英国向英国政府就“猎豹”号攻击事件讨要说法。令人愤慨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一艘美国缉私船也遭到了炮轰，船上有一位极为尊贵的乘客——副总统乔治·克林顿。他后来告诉杰斐逊，英国的掠夺行为激起的激昂情绪，即便是最极端的联邦党人也难以平息。“对于托利党人和亲英的联邦党人来说，”克林顿说，“这种情况十分尴尬，因为他们认识到，万一开战，他们就会被竞选伙伴抛弃，只能自生自灭了。”

反英情绪十分高涨。“美国人的精神与毅力特别适合进取型事业。”7月8日星期三，记者威廉·杜安给杰斐逊写信。他提出了进攻建议，作为“切萨皮克”号事件后对英的进攻行动。杜安的建议是：突袭加拿大，攻占哈利法克斯，入侵纽芬兰和牙买加。

杰斐逊计划在1807年10月召开国会。“理性与文明国家的惯例要求我们，应该给他们否认为此事负责以及进行赔偿的机会。”7月12日星期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我们自身的利益、开战的条件，也要求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商人时间以召回他们的商船以及出海的船员。”

杰斐逊对战争的支持从危机伊始就很明显。“‘补偿过去损失，确保未来安全’是我们的座右铭，但是英国人能否就此屈服让步，施行互不往来策略，还是诉诸战争，尚未可知。”他说，“我们为后者做好准备。”

1807年7月最后一天，他宣布召集国会于10月举行特别会议。担心在蒙蒂塞洛逗留期间无法获取全部信息，他增加了从华盛顿到蒙蒂塞洛的邮递班次，夏天的后半段时间他要在蒙蒂塞洛度过。

尽管在“切萨皮克”号危机事件初期，战争呼声甚嚣尘上，杰斐逊早已猜到立法者们更愿意实施贸易禁运，而并非即刻开战。他并没有迷失在和平主义的哲学经验里，他愿意开战，但他认为，国会更愿意首先实

施禁运。

杰斐逊自己的不同的想法相互交战。当时，他最担忧的是庞大的军事力量会对共和制造成威胁。然而，他也非常实际。他知道美国不可能很快建成一支能与英国抗衡的海军，在迫在眉睫的战争中与英国一较高下。过去20年中积累的外交经验也教会他，时间往往能解决问题。

从努特卡湾到圣多明各，国外战略焦点一直在变化：伦敦一届政府的垮台、巴黎一位帝王的决定、远方一场战事的结果，都可能解决（或者复杂化）美国此时面临的问题。

1807年11月一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上，新任英国大臣戴维·蒙塔古·厄斯金与杰斐逊、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诗人兼外交家乔尔·巴洛、路易莎·凯瑟琳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同席而坐。有消息称，伦敦方面可能将海事问题移交华盛顿谈判。如果消息属实，杰斐逊对厄斯金说："我们整个冬天都会为此忙碌，同时贵国调停和解，我们就再无争议——那是我所希望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记录这段插曲时写道："如果这些话中包含任何诚意，那也只能说，拖延概括了杰斐逊先生方针的全部核心，我认为这是他实际的意图。"

11月30日星期一，杰斐逊告诉小托马斯·曼·伦道夫，此刻的问题是"究竟走哪条路，是开战、禁运还是什么都不做。折中的提议最有可能"。但是，那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回应。"与此同时，"杰斐逊说，"做如下安排：（1）征募足量炮舰；（2）准备充足资金（75万美元）用于修建防御工事；（3）整编国民军；（4）建立一支海上国民军；（5）在河西岸奥尔良地区以土地为奖励，建立牢固的美国民兵定居点。"

禁运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就我判断，议员们极希望和平解决：毫无疑问英国会宣布不对'猎豹'号的行动负责，我倾向于认为，议员们更希望通过一条非进口法律以对抗英国强制征用船员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10月26日星期一，杰斐逊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说。

1807年12月，从巴黎和伦敦传来的消息把早已不平静的美国首都搅得更加波涛汹涌。拿破仑宣布，他要将禁止进口英国商品的柏林敕令扩展到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而乔治三世非但没有在强征问题上让步，反而命令英国军舰从往来商船和战舰上抓捕英籍人士。

杰斐逊告知国会，世界两大强国正不断向美国利益施压，他建议，下令美国船只待在本国港口内，同时"做好万全准备以防危机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接下来是什么？从政治角度看，此刻开战似乎是不可能的。夏天"切萨皮克"号事件引发的沸腾民怨已经消退。"战争狂热已经过去了。"11月杰斐逊给帕茜写信时说。

目前，答案是实施禁运。禁运远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艾伯特·加勒廷为其固有缺陷做出了最好的概括。“物资匮乏、百姓受苦、税收锐减、对敌人的影响、国内政治等，从各个方面考虑，我都宁愿打仗，而不是永久性禁运。”12月18日星期五，加勒廷对杰斐逊说，“而且，政府禁令带来的坏处总是比当初预计的要多。政治家犹豫再三，妄图化解民众的思虑，好像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似的。”

理论上，杰斐逊表示同意；而实践中，他又左右为难了。“这件事的好处得不到，”他致信加勒廷，“因此，我们只能考虑最不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杰斐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和主义的指引：结束战争、理性治国是那个时代的梦想。战争催生君主和贵族，会赋予少数人特权而破坏多数人的自由。然而，杰斐逊并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在地中海发动过战争，他愿意与英国，甚至与法国开战。

但是，时机尚未成熟。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时机是美国的盟友，这点也得到了国会的认同。“实施禁运，我们的船只、货物和海员都在国内，不会被征占，因而不会成为双方立刻开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船只去英国，法国就会一意抢夺；如果去其他地方，英国又会抢夺。”杰斐逊致信约翰·泰勒，“禁运提供了时间。时间有可能在欧洲创造出和平。欧洲和平会消解一切不和谐的因素，直到下一场欧洲战争来临。而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债务可能已经还清，税收已无负担，我们的国力也已增强了。”

法令迅速获得通过，1807年12月22日星期二，杰斐逊签署了禁运令。这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法案，反映出政府权力超越了令人反感的“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法令签署后，杰斐逊“牙痛……脸上大面积肿胀，发烧，昨晚才退烧”，12月29日星期二，他给帕茜的信中讲。他感到从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下颌的疼痛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无论目的或意图如何，他正把联邦权力扩展到每个美国人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禁止与外国贸易。什么也不许进来，什么也不许出去。后来的强制执行法案又赋予杰斐逊控制航运的权力。

他习惯于挥舞经济战争的武器。比如，针对目标国家实施非进口行动，从威廉斯堡以来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相信并且长期实践着商业外交。民主共和党人梦想的没有战争、市场自由开放的世界经证实是不切实际的，杰斐逊就修改他的原则，以适应美国面对的现实。在外交政策中，经济胁迫是一项广为认可的外交手段。

禁运总体与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它被视为确保备战时间，或者应对战争威胁的一种有限手段。美国人的经历会证明，禁运从长期看是不可行的。杰斐逊懂得这个民族既重农又重商，他的责任覆盖整个国

家。“我们的人民对航海和经商都颇感兴趣，”他说，“他们从祖国那里继承了这个品味，他们的公仆就有责任以此为前提慎重考虑种种措施。”

一开始，这个国家愿意信任杰斐逊的道路。1808年1月18日星期一，蒂莫西·皮克林写道：“杰斐逊先生现在似乎信心满满，他的建议人们都会遵从，其效果就如同拿破仑手下的士兵服从指挥一样。”选择禁运的道路，他说，是公众对总统“绝对的盲目信任”的结果。

“我们的禁运是非常折磨人的措施，但产生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长效影响，”杰斐逊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从事国内生产，我确实相信，未来对英国货物的需求会减少一半。”

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长达一年的禁运的确在英国产生了效果。商人和制造商们抗议反美政策导致了杰斐逊的报复性行动。1808年4月，英国感到美国市场的重要，基本上鼓励船只突破禁运。走私成了大问题，在北方地区尤其严重，在加拿大地区与英国人进行非法贸易一时间欣欣向荣。对那些“意图挑战美国法律权威、在尚普兰湖及其周边区域勾结串联妄图造反者”，杰斐逊发出了警告，执行机关被授予特别权力实施禁运。

禁运把美国政治搅得天翻地覆。杰斐逊开始明确提倡强力中央集权。支持政府较少干预的民主共和党人变成了事事干涉的管理者。康涅狄格州则成为州权的堡垒，宣称“在事处如此危急关头，州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不协助、不配合能使禁运制度更加有效实施的法令的执行，不但是正当的，也是当局的责任”。

尽管无论禁运还是其他政策最终都没有避免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但禁运推迟了美国与英国开战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禁运是成功的。外交官威廉·平克尼的想法当时可能是对的，1809年，他告诉麦迪逊：“禁运以外的任何其他措施要么是疯狂之举，要么是懦夫行为。因为没有人和我们一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不是与两个侵略者开战，就是向两个侵略者屈服。而且十分确定的是，随着事态发展，屈服要么向着战争方向发展，要么倒退到更恶劣的境况。”

禁运并没有脱离杰斐逊的风格。从最广义的范围来看，禁运仍让他掌控着事态，只不过没那么直接，还避免了与欧洲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像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样，禁运说明了杰斐逊的灵活以及为适应当前现实而修正此前理念的能力，当然，购地案更加成功。1808年1月，杰斐逊给本杰明·拉什写信：“它延迟了战争，争取了时间，可能带来种种益处，特别是维护了欧洲的和平，而和平又能推迟导致下一场战争产生的缘由。”

历史对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却恶评如潮。普遍认为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它虽推迟，但并没有阻止战争的发生，而且美国国力也因这项政策而被削弱。对此持批评意见的大有人在，但是在杰斐逊当时可做的几个

选择中，用他本人的话来说，禁运可能不是个好办法，但是即使不好，也是选择中较为理想的一个了。当时美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做好与英国（或者法国）开战的准备，当时的政治方针也不利于加强陆军和海军力量。主流观点认为常备军不是一个好主意，创建海军不是在对战争进行防御，而是在吸引战争，何况创建海军费用极其高昂。概括地讲，这些也是杰斐逊的观点，但是他已显示出修正自身观念的灵活性。他确实请求国会采取一些措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国会要么否决，要么行动缓慢，然后事情就到此为止。19世纪约头10年，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军备问题上都没有取得满意的进展。美国还会再次遭遇战争一触即发时仍无法充分防御的困境。

杰斐逊试图说服自己，禁运是起作用的。“一路回到本地的旅途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一致同意禁运，反对战争。感到施行禁运的必要性，他们做出的牺牲也笼罩在了欢乐的气氛中。”1808年5月，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写道。

他的私人邮件显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你这个该死的恶棍，”8月，一个叫作约翰·莱恩·琼斯的人从波士顿来信说，“你还打算让该死的禁运持续多久，这要把我们穷人都饿死。我的一个孩子已经饿死了，我太羞愧，对外宣称说孩子死于中风。我还有三个孩子，如果禁运还让他们没吃的，我想他们很快也会饿死的。”

“你是上帝创造的最该死的蠢货。”1808年年中，一位匿名信作者对杰斐逊说，“见鬼去吧。”

另一位匿名信作者对字母大写的运用格外青睐，他在一封6月的信中写道：“THy DEStruction is nEAr At HAND THOMAS. THE, REtriBUTive, Sword is SuspENDED OVEr Thy HEAD, BY A S1ENDER THREAD. ——BEWARE. （你毁灭的时间已临近，托马斯。那么，报应之剑正被一丝细线悬在你的头顶。——小心。）”

在新英格兰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波士顿，关于攻击“切萨皮克”号的激烈反应已经平息。约翰·昆西·亚当斯同情遭遇危机事件的杰斐逊，他只好说服波士顿的联邦党人举行一次城镇会议，“将党派之情放在一边，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支持国家政府”。他的成功付出了代价：他被告知，他“对联邦党人的背叛行为，活该让人把他的头砍下来”。

脱离联邦的讨论死灰复燃。蒂莫西·皮克林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禁运措施和总统本人。1808年7月4日，在纽约州，村民们焚烧了杰斐逊的肖像。

马萨诸塞州州长、民主共和党人詹姆斯·沙利文确信，禁运加强了亲英势力的力量。1808年4月，他从波士顿给杰斐逊写信：“意图……分裂国家，在英国的保护下，在北部本地区成立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您可能会认为此事可笑，国会中的南部各州议员也会这样想。但是他们的破

坏力会像旋风一般席卷而至……即便蒙蒂塞洛的围墙也抵挡不住民众的叛乱或英王的贪婪。”

联邦党人有更传统的手段向世人证明：他们——而不是杰斐逊之流——才代表着美国的主流。这一手段就是1808年的总统选举。

1808年年初，党团会议提名詹姆斯·麦迪逊为总统人选。杰斐逊一直希望麦迪逊能继任总统，但他担心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之间的竞争，后者在党团会议上也获得了选票。

“我无比痛心地看到你和你的另一位挚友之间产生竞争，对于你们两位我都一样珍视。”1808年2月，杰斐逊从华盛顿给门罗写信，“我真诚地祈祷两位的关系不会受此影响……经验告诉我政治上的争议发展下去会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度，也不再担心彼此是否能继续相互尊重。一句话激怒对方，接着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彼此越来越会恶语相向，直到说话全无顾忌。你会发现想摆脱你的朋友们努力为你编织的罗网很困难，想避免像他们一样情绪激烈也很难。”

他对政治家的情绪以及环境的描述来自自己毕生的经历。社会和谐与政治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杰斐逊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矛盾。矛盾只能被想方设法处理。

1808年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对杰斐逊的一次全民投票。有麦迪逊，他最亲密的伙伴作为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总统非他莫属。联邦党人再次推举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对麦迪逊的反对意见是反对杰斐逊时的老生常谈：麦迪逊喜欢法国，讨厌英国；在弗吉尼亚州把持大权的时间久；共和党人的信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民统治。

但这些统统都没用。麦迪逊以122票对平克尼的47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与公众生活开始时一样，杰斐逊任期结束时也带着对君主制复辟的担心。1809年1月初，国会里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终止禁运，而且当再出现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行为时，签发向敌方追偿海事损失的命令书。这意味着私人船只可充当战舰，用于攻击并俘获敌方船只。杰斐逊在1月写道：“北方的君主主义者（一段时间以来抱着分裂国家的希望）已与……东部5州结为同盟……并已危及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即将于本月月中开会，据悉将召开大会考虑脱离联邦的问题，并向北河以东的地区发出倡议。它们已确保得到英国的保护。”

一切都笼罩在被英国蚕食的恐惧之中。“现在似乎正在勾勒出一条界线，”杰斐逊说，“区分出支持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以及全身心支持英国和君主制的亲英党。”在杰斐逊的世界里，有些事从未改变过。

第三十九章
告别终极权力

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安全上。

——托马斯·杰斐逊对国会的最后致辞

差不多该是离去的时候了。“下颌有问题的那颗牙齿脱落了，一个星期前被取了出来，伤口愈合了，肿也差不多消了。只要等好天气来临，我就又能骑马出去了。”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冬天，杰斐逊写信给帕茜。

1808年圣诞节，他写信给老同僚查尔斯·汤姆森：“我已经感觉到走路比从前吃力，记忆力也变差了。部分原因可能是总有新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的记忆，但我觉得也有上了年纪的关系。”

他已经为他的离去准备了很久。当他清点总统府的家具陈设，考虑如何还清债务时（据杰斐逊自己估算，他任总统期间债务又增加了8 000～10　000美元），他知道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40多年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国内与国外的风云变幻，走过整个大西洋世界，从威廉斯堡和里士满，到费城、纽约和安纳波利斯，再到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最后到达波多马克河畔这座新生的一国之都。杰斐逊渐渐觉得过去这几十年的岁月就像一场神话，他和他的战友们——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拉什、佩吉，还有许多已经离世的人——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

他相信自己已经尽忠职守。“我生性热爱科学，本该以宁静的科学研究为业。”他在1809年3月2日给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的信中写道，“但身处动荡凶险的年代，我不得不努力遏制我对科学的热爱，转而投身于政治活动的汪洋大海……现在，我把一切交到一群非常有能力的继任者手中，因此假如未来真的遭遇不幸，那也是因为局面已严重到人类智慧所不能扭转的程度。”

他的引退同其8年前的当选一样，激起不少争议。“过不了多少年，当人们——即使就是身处这一时代的人们——回首这个时代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观点的冲突，我们曾陷入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争论，身边似乎弥漫着一种不明所以的不信任感。”马里兰州阿勒格尼县的居民们在1809年2月20日给杰斐逊中的信中写道。

然而，这种不信任感的确存在。民众的感情也不足以减少杰斐逊政敌对他最后的攻击。“你们这些摸不准的人！”一个纽约人在1809年2月

写道。

“你把政府推向了虎口，”费城一个自称“卡珊德拉[28]”的人2月28日写道，“但我说不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因循守旧、胆怯软弱，还是过分热情，我不想妄加推测。”

杰斐逊本人则乐于思考这其中的问题，而且直言不讳。有人请他推荐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列了包括爱德华·吉本在内的一份长长的书单，并谈起作为一个不仅阅读历史，而且创造历史的人的感受。“在公共生活中，我想只要一个人有还算明确的政治观点，并具备足够的力量使这些观点产生效力，那么肯定会遭到持相反观点的人的对抗。”杰斐逊写道，“而我进入政府时，见到的更是一派剑拔弩张之势。每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个政治小团体，想把自己的地盘最终转变为他们所看好的英国政府的模式。”

杰斐逊说，1800年民主共和党的胜利“打破了这些人的图谋，他们自己，还有守护他们权力和利益的堡垒转眼间落入了另一群人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剩下哀叹和谩骂”。

谩骂的对象？当然是杰斐逊本人。“自然而然，所有的争论、奚落、恶意和谎言都把矛头指向了我。”

尽管如此，也时常有人对杰斐逊表示赞美。美国驻巴黎领事寄给杰斐逊一本关于马可·奥勒留的书。“我认为马可·奥勒留的人格只有一点缺陷：他没有采用确定的手段使他统治期间人民的安乐延续下去。”领事写道，“他似乎一直在担心随着他的死去，他所建立的太平盛世必将毁于一旦。在这一点上，和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美国的公民比罗马人要幸运。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政府开明的治理带来的好处一定会延续后世。”

挑战也一直存在。杰斐逊时常在战争和贸易禁令间权衡。“这一切都关乎政治。”1808年9月，他给外孙女安·卡里·伦道夫的丈夫查尔斯·L·班克黑德写信道。“国会的行动刚刚开始。”1808年11月，杰斐逊在写给利瓦伊·林肯的信中说，“目前只有三个选择。第一，禁止贸易；第二，打仗；第三，投降和臣服。而且有意思的是，第三种选择肯定不缺支持者。”

没有好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一切都不确定。”12月，杰斐逊从华盛顿写信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说。

詹姆斯·麦迪逊的就职典礼在一个星期六。前一天，也就是1809年3月3日，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在《国民通讯员报》上表达了对杰斐逊的赞美：“只要人类仍珍爱自由这项事业，就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天——托马斯·杰斐逊在数百万人的祝福和惋惜中，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引退。”

就职典礼当天早上，杰斐逊从总统府乘马车到国会山，看着他的挚友兼国务卿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任美国总统。（他和他的一个外孙在无

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总统府出发，麦迪逊则由卫队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路护送。）他们是最亲密的政治伙伴，而麦迪逊的继任也是对杰斐逊的一种肯定：说明国家认可他的基本愿景和治国方略。

众议院会议厅里的仪式结束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仪式的场景“非常壮观”，此时已成为前总统的杰斐逊到F街的麦迪逊家拜访了新总统——杰斐逊一个星期后才会搬出总统府。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说：麦迪逊夫人“看上去美极了……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麻纱裙，裙裾很长……浑身上下散发着尊贵、优雅和亲切”。

麦迪逊夫妇站在客厅门口迎接如潮的拜访者时——街上挤满了马车，光是等着进门就花了半小时，杰斐逊看到了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向她伸出了手。

“记得你向我保证过的，明年夏天来看我们，别忘了。”他对史密斯夫人说，“我们一定会翘首企盼。”

史密斯夫人当然要他放心，她和她丈夫一定会去蒙蒂塞洛。她接着提到了这一天的大事件。

“你现在卸下重任了。”她对杰斐逊说。

“的确，”他说，“而且此时我比我的朋友还要开心。”

在眼花缭乱的庆典中，很快有人告诉杰斐逊“夫人们”想跟随他到总统府去。杰斐逊的眼睛愉快地闪烁着光芒，他说：“没问题，因为我太老了，也没法追着她们到处跑了。我记得在法国，富兰克林博士的朋友们跟他告别时，夫人们一个劲儿地拥抱他。当他把我作为他的继任者介绍给大家时，我说我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这种特权，但他回答：‘你太年轻了。’”

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出席庆典的民主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就职舞会。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舞会的记忆并不愉快：“人太多了——热得令人窒息，娱乐活动也糟糕。”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热切地计划着重归农场和花园。“我回到这里，心里满是打算做的事情。”他写信给查尔斯·汤姆森，而且“这些事情主要对保持身体机能有好处，头脑方面的健康，我主要通过娱乐活动来保持。唯一的女儿和众多的外孙、外孙女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

他曾经提议或许可以让他的妹妹安妮·斯科特·马克斯担当蒙蒂塞洛的女主人。帕茜很不喜欢这个想法。她——只有她——才应该成为他世界的中心。“让马克斯姑姑来管家不太好，”1809年3月2日，帕茜写道，“去年夏天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仆人们不尊敬她，在她面前姿妄为。她人很好，能很有条理地管理一些小事，但她没有那个头脑，也没有那个魄力管理您将来那么大的产业。我

将亲自管理您的产业，充满热情地去维护它，我对自己的事情都不可能这么有热情。我们也将带着温柔的爱意服侍您、珍惜您，我亲爱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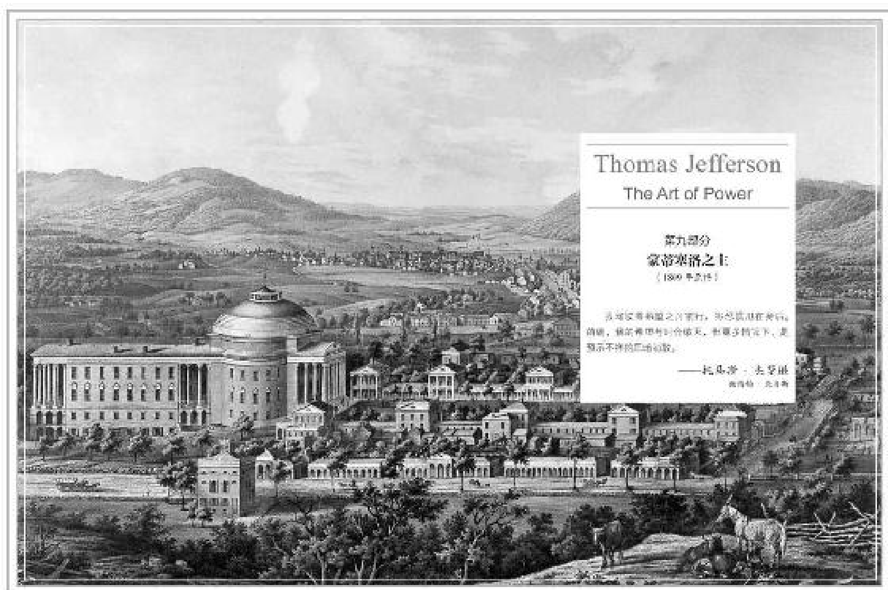
随着在华盛顿日子的结束，他订购了约翰·贝尔的《外科手术原理》的节略本，把一盆他自己培育的、一直养在总统府的天竺葵送给了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又安排从里士满购买了36把温莎椅，准备放在贝德福德县的隐居所杨树林。

埃德蒙·培根来到华盛顿帮忙收拾东西、陪杰斐逊回家。令这位蒙蒂塞洛的总管感到震惊的是，首都的人们对他的主人杰斐逊总是有所求。培根写道：“他有一间很长的餐厅，在我待在那里的16天里，每一天桌前都坐满了人。”在培根的监督下，箱子和灌木整整装了三辆车。

1809年3月9日星期四，培根带着这些东西从华盛顿启程，杰斐逊则在3月11日乘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离开了首都。路上遭遇了强劲的暴风雪，培根在本杰明·沙克尔福德开在库尔佩帕法院的小客栈安排了住处，请老板点起温暖的炉火，并拦下了一个前来向杰斐逊表达祝愿、口口声声叫他“老汤姆”的追随者。杰斐逊到达时，培根想把人群从他身边挡开，但没有成功，杰斐逊便向人们简短地讲了几句。他仍是一个公众人物。

1809年3月15日星期三，托马斯·杰斐逊到达蒙蒂塞洛。他把他的整个世界都带了回来。他的厨师朱利安前来掌管蒙蒂塞洛的厨房，为他做他喜欢的法国菜。他和很多人大量通信，大量阅读各领域的书籍。这里是他的家，他再没有远离过这座山顶。他的头脑则不然，从来没有休息过。

[28] 卡珊德拉：古希腊神话中拥有预言能力的特洛伊公主。因为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遭其诅咒，无人相信她的预言而都视她为疯子。——译者注



从刘易斯山远眺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和蒙蒂塞洛的景色（19世纪中期）。

第四十章
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

在战争的喧嚣里，在国与国的争斗间，他一直用智慧守护着我们的和平。他的赫赫功勋已铭刻在他的儿女们的心上。

——致托马斯·杰斐逊的祝酒词（华盛顿坦慕尼协会，1809年5月12日）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的套间里，睡床嵌在书房（也常被称作他的“内阁”）和一间带壁炉的卧室之间的凹室内，休憩时脚朝东。床周围挂着红色的帷幔。尽管房间里很安静，可每当杰斐逊把头倚在枕头上时，他的眼睛和耳朵总是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凹室内的木隔板上摆放着两块方尖碑，中间架着一只1790年的钟，每逢整点和半点就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报时。钟下面悬着一把剑，据说是一个“被遗忘已久的阿拉伯王子”的礼物。房间里还可以听到杰斐逊养的许多知更鸟的叫声。

夜里，卧室的寂静也会被放在书房西墙的落地钟打破。这只高大的钟发出的滴答声分分秒秒不绝于耳，黑夜里整座房子安静下来，这声音便更加明显。杰斐逊的套间有三扇门与房子的其余部分连通，这三扇门一关上，就在主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隔出了安静的小天地。杰斐逊入睡时，右边是有四扇高大窗户的书房，左边是只有一扇窗户的带壁炉的卧室，在那里，他保存着妻子的胡桃木梳妆台。

距离睡床几步远的地方就是杰斐逊自己的洗手间（整座房子里共有三个洗手间）。杰斐逊总是用废纸上厕所。（杰斐逊去世那天，一个家庭成员搜集了一些这种废纸，现在保存在国会图书馆。）

杰斐逊夜里一般睡5~8小时，睡前总要戴着眼镜看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书。上了年纪后，他听几个人同时说话有点儿吃力，不过身体还是很健康，极偶尔会发一次烧。卸任后一身轻松、不再操劳，之前压力一大就头疼的毛病也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杰斐逊的几个房间都有阳光直射。每天早上，他对光线的最早感知主要来自右边书房里第一扇朝东的窗户。如果像他本人所言的那样，每天在天亮时分醒来，这时方尖碑钟的指针正慢慢变得清晰，可以感觉到光不断地涌入房间，最初只是一小束，但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

这时，杰斐逊会从床上坐起身来，面向左边，把脚浸在每天早上使用的冷水盆里。他会这样待一小会儿，眼睛望着壁炉，通过卧室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多少以推断太阳的高度。

其实，他和他的蒙蒂塞洛跟太阳有点儿像：处在宇宙的中心。

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这座占地1.1万平方英尺、有33个房间（几座凉亭里和南露台下面还有10个房间）的房子，正是杰斐逊的快乐所在。而直到从总统任上退下来，这座房子才真正变成了他想要的模样。

从蒙蒂塞洛朝东的玻璃正门进入门厅，杰斐逊及他的家人朋友立刻被象征他毕生功绩的物件所包围。宽敞的大厅里挂满手工艺品、美国的自然风物以及杰斐逊政治生涯的纪念品。地板是绿色的（这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建议），墙壁刷得雪白，腰线以下则是橘黄色的墙裙。可以看到驼鹿和麋鹿的角、乳齿象的上颌骨，还有40件印第安物品——石头雕像、工具、一件曼丹人的水牛皮袍子、一位年轻索克酋长的小画像等。还可以看到一些地图，有很久以前杰斐逊父亲绘制的“弗莱–杰斐逊”弗吉尼亚地图，还有后来的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地图。还有一座胡夫金字塔的微缩模型。

门厅里还有一座雕像，杰斐逊一直以为是克娄巴特拉，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女性阿里阿德涅。还有两幅画：《沉思中的耶柔米》和《耶稣在衙门院内》。杰斐逊对后一幅有详细的描述：“耶稣……被脱了紫袍，还未穿上自己的衣服，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坐在那里……在场的人似乎有一个辱骂他的兵丁、他的一个门徒，还有监督行刑的人。这是《马可福音》第15章16～20节的事情。”另外有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约翰·亚当斯以及杰斐逊本人的肖像（作者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两幅《独立宣言》的版画——一幅是约翰·特朗布尔描绘的宣言签署场景，另一幅则是宣言本身，还有汉密尔顿、伏尔泰以及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的胸像。

蒙蒂塞洛的装饰很讲究。对杰斐逊而言，房子里的肖像、胸像、雕塑和手工艺品不是随意拼凑起来的，而是为了“纪念那些杰出的人物”，并且“为之感到骄傲和欣慰”。在蒙蒂塞洛展示的任何物件、任何人，对杰斐逊来说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特别意义。

因此，只消往房子里走几步，杰斐逊高瞻远瞩的头脑、开阔的胸襟、广博的兴趣和对历史更迭的关注就展现在每个人眼前。化石、鹿角、印第安手工艺品和地图呈现了早期美国的面貌，以及白人征服这片土地的最初努力。金字塔模型和阿里阿德涅雕像是古代世界的遗物。耶柔米和被钉十字架前的耶稣的画像展示了宗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不容置疑的重大作用。韦斯普奇以及隔壁客厅里哥伦布的画像，则将视角从大西洋彼岸转向新大陆。伏尔泰和杜尔哥代表着启蒙运动中哲学家的功绩。亚当斯、汉密尔顿、杰斐逊本人以及大陆会议成员宣告美国独立的场景则把视角拉回不远的过去，讲述着房子主人毕生的丰功伟绩。

就这样，一个个房间、一样样物品、一幅幅版画、一幅幅肖像、一枚枚奖章，构成了蒙蒂塞洛的世界。

门厅高高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石膏浮雕，图案是被星星簇拥着的鹰，还悬着一盏阿尔冈式的圆筒芯铜吊灯。客人们穿过门厅，从二层的楼廊下走过，就踏上了客厅美丽的镶木地板——樱桃木和山毛榉木镶嵌组成的图案由杰斐逊亲自设计而成。

和门厅一样，客厅的高度也是18英尺2英寸，装饰着朱庇特神庙中的那种科林斯式雕带。根据杰斐逊的精心设计，层层叠叠的艺术品散落在牌桌、椅子、沙发、一副国际象棋、一架羽管键琴和一架钢琴之间。在这个房间里，一家人的生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被象征着房子主人丰功伟绩和整个国家历史的种种物件簇拥着。“肖像：24幅，其他画作：17幅，奖章：10枚，胸像：2座，其他：4件。”杰斐逊写道，他正清点着客厅里的装饰品。

这里的画像和雕塑，有造就这个时代的伟人，也有造就各个时代的伟人：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麦哲伦、拿破仑、拉法耶特、哥伦布、韦斯普奇、亚历山大一世、戴维·里滕豪斯、沃尔特·雷利爵士、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詹姆斯·门罗、路易十六、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爵士、弗朗西斯·培根、詹姆斯·亚当斯，还有特朗布尔和马瑟·布朗分别给杰斐逊本人画的肖像。还有一幅出色的肖像，是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给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画的。另外还有1804年在的黎波里打了大胜仗的爱德华·普雷布尔的圆形大奖章。和门厅里一样，这里也有宗教主题的画作：《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忏悔》、《下十字架》和《希罗底手持施洗约翰的头颅》。还有两尊塞夫尔产的小雕塑：《维纳斯和丘比特》、《希望女神和丘比特》，召唤出那个古老的世界。

客厅右边是明黄色墙壁的餐厅。在餐厅尽头，两道滑动折叠门隔出一间八角形的茶室。这里被杰斐逊称为“最荣耀的套房”，他和他的家人会在这里用餐、交谈，一抬头就能看到华盛顿、富兰克林、拉法耶特和约翰·保罗·琼斯的胸像——都是让–安托万·乌东作品的石膏复制品。

在杰斐逊的套间旁边，有一间属于帕茜的蓝色起居室，被称作南方形房。北面则有一间八角房，配有凹室床，麦迪逊夫妇来访时常常睡在这里。

楼上（包括最顶部的穹顶房间）都是一间间的小卧室。房子的中心、生活的中心，还是在楼下，在杰斐逊的掌握之中。

“假如这座房子不叫蒙蒂塞洛，”一位来访者于1816年写道，“那我会叫它奥林匹斯，它的主人就是朱庇特。”杰斐逊的家人同意这种看法。“他的乐观和慈爱，”一个外孙女回忆道，“就像温暖的阳光，照耀、鼓舞着全家人。”

杰斐逊在写给玛丽亚·科斯韦的一封信里说，自己就像“古时候的一个族长”。“我们的妈妈教导所有孩子要像她自己一样仰视她的父亲——是真正意义上的仰视，仰视着一个站在荣耀和美德高峰上的人。”一个外

孙女埃伦·库利奇写道，“而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们也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我们印象中的伟大的外祖父的确很伟大。”

杰斐逊的外孙、外孙女都爱他、崇敬他。他们跟着他在花园散步（不过从来没有踩过园中的苗圃，因为这“不合他定下的规矩”。）他从来都不必大声说话：他们太清楚他的威严了。“外祖父不用对我们任何人说狠话、提高嗓门或者使用威胁，”一个外孙女回忆道，“他只是说‘去做’或‘不要去做’。”他的话一定会被遵从。

他会帮孩子们摘果子——通常是无花果和樱桃，工具是一根顶端有钩子和网兜的长棍子。他还会组织孩子们赛跑，并亲自当裁判。赛道往往设在露台上，或是绕着草坪。他按孩子们的年龄规定好各自起跑线的位置，当他把白手绢从伸出的右手中抛下时，选手们就开始跑。第一名的奖品是三颗无花果或李子，冬天就是枣子；第二名两颗，第三名一颗。夏天的夜晚，他会把自己设计的国际象棋桌——制造者是约翰·赫明斯——支到外面来，和某个外孙女下一局。

到了冬天，白昼较短，杰斐逊会在傍晚和家人围炉小坐。用一个外孙女的话说，这个时间“天已经暗得看不了书了”，因此“在蜡烛点起来之前的半小时里，我们都围坐在炉火前，他会教我们一些小孩子的游戏，还陪我们一起玩”。这些游戏中有“横问竖答”，还有“我爱她，是因为她……”，后者要求参加游戏的几个人按字母表的顺序依次说出以某一字母开头的一种品格。

蜡烛的到来宣告游戏的结束，大家继续开始读书。随着杰斐逊“拿起他的书来读”，四周都变得安静下来。“我们说话都用耳语，生怕打扰到他。通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拿起一本书——我看到过他从自己的书中抬起头来，环视这一小圈读书人，然后笑着朝妈妈评论上几句。”

为了保持自己套间的私密性，杰斐逊建造了威尼斯式的带百叶窗的门廊，这样从房子外面就看不进他的房间了。不过，他并不喜欢长时间一个人待着。有一次他被大雪困在杨树林回不来，写信给帕茜道：“我就像个犯了重罪的人，看守每天按时给我送来点儿吃的，然后就走了。”

他的命令不由分说，他的爱也无以复加。全家人去贝德福德游玩时，他会让所有人穿上披风，需要时甚至是毛皮大衣。他一路都唱歌、说话，中午还给大家提供野餐——冷盘肉和兑水的葡萄酒。

一次，他无意中听到一个年幼的外孙女感叹自己没有一条丝绸裙子。第二天，她就有了一条从夏洛茨维尔送来的丝绸裙子。还有一次，一个外孙女心爱的棉布裙在门廊和门厅之间的玻璃门上扯坏了。她回忆道：“外公正好站在旁边，目睹了这场惨剧。”过了几天，这位美国前总统走进帕茜的起居室，“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他对外孙女说：“我帮你补好了裙子。”那是一条新裙子。

要是听到哪个孩子想要一块表，想要一套马鞍和笼头，或是一把吉

他，他都会悄悄地买给他们（用借来的钱）。他确保外孙、外孙女们都有圣经和莎士比亚可读，都有写字桌可用。“外祖父好像能看穿我们的心思似的，知道我们隐匿的愿望，他是我们的守护精灵。他挥一挥魔杖，用慈爱和礼物点亮我们的童年。”

可感知他人需要是杰斐逊的一种天性。用一个外孙女的话说，他骨子里“充满了对他人的关爱，对于他爱的人，他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猜出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想法，用爱将他们包围”。族长的爱和政治家的韬略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要感知他人的需要，并努力以合理的方式满足这些需要。这就是杰斐逊政治生涯的全部，而退休后又成了他私人生活的全部。

在麦迪逊的就职典礼上，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注意到杰斐逊显得十分快活，这种快活在他回弗吉尼亚的头几个月里一直很明显。“杰斐逊先生上周过来了，昨天还在这里吃了饭。”1809年4月，伊丽莎白·特里斯特从法明顿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未见他的状态这么好过，也没见他这么快乐过。”

1809年年中，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如约到访蒙蒂塞洛，发现杰斐逊身心状态都非常好。“他总是太阳一出就起床，脑子里总在策划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多到早起晚睡都干不完。”她写道，“他身上有一种宁静的气质，只有内心平和的人才会有的气质。”

从退休开始，杰斐逊喜欢听公众谈起对他的信任、对他所开创的道路的信任。1809年的总统就职日，一群大学生这样写道：“远方在打仗，我们却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大胆地用知识另辟蹊径，不受战争喧嚣的侵扰，不用经受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经受的颠沛流离之苦。”一位不知姓名的作者把杰斐逊誉为最伟大的人：“你对国家的贡献如此之大，对我来说你是一位父亲、一位守护者。因为你的贡献，我将永远以感激之心颂扬你。”一位法国的老朋友也给予他最高的评价，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在1809年6月给杰斐逊的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确信你的朋友和学生麦迪逊先生能够按照和你一样的原则治理国家，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遗憾，你不愿再做4年总统。”

世界仍把杰斐逊和美国看作希望的象征。费城的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写道：“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做好人有多难：人是很邪恶的，他们脑中充满了各种愚蠢的想法，很容易传染给别人，一旦染上就很难清除。就连最伟大的、最泰然的化学家杰斐逊也无法把这些愚蠢的想法变成气体，让它们从人类头脑中蒸发掉。”

“假如贵国的共和制政府没有存续，人类将走向何处？”一位法国朋友在信中写道，“我真的不敢想象！”

在书房里，杰斐逊坐在一张种植园风格的写字桌前写东西，腿搭在桌下一条红色的皮革长凳上。现在他是全职的农场主，每天还要花几小

时读信、回信，确实有点儿勉强。“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阅读。”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写信给本杰明· 拉什，“从吃过早饭，或者最晚从中午开始，直到晚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处理农场或者别的什么事情，我发现这样对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都很有好处。”他给农场订购英国桑树、桃树和杏树的种苗，还有雁和一只公羊。“现在无论什么天气，我都很早吃早饭，然后一直骑在马上穿梭在农场之间，很晚才回家吃晚饭。”1811年1月，他这样告诉拉法耶特，“我发现这样对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都很有好处。”

杰斐逊乐得少过问政事。“我对两三千年前发生的事情比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得多。”他在1819年写道，“因此，我读的书都是关于特洛伊英雄的，还有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

然而，他从来无法做到全然不关心当下的世界。他对拉法耶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欧洲的动荡最终能够结束。“假如真的有上帝，而他又是公正的，那么一定会有他施行公义的那一天。他绝不会丢下全人类不管，任由他们被洪水猛兽吞噬。”他也订阅报纸，并告诉麦迪逊，自己“每天只读一点点儿报纸，不过神奇的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两句真言打动我的心，像《圣经》中落在财主舌尖上的水一样”。随着他回到山间享受安逸的生活，有一个事实变得毋庸置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做自己时间的主人，这感觉妙不可言”。

利用这些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杰斐逊和科学界、教育界、哲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威廉·克拉克继续往总统府送标本，麦迪逊便在1809年美国独立日把一张来自落基山脉的大角羊羊皮转赠杰斐逊。（“包裹太大了，没法邮寄，我找机会用其他方式转交给您。”）杰斐逊还监督了一项翻译工作，将一部关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法语评论作品译成英文。他和一位朋友在信中讨论马铃薯的起源；写信向别人要葡萄树的插条，因为他自己想种葡萄酿酒；思索图书馆的作用。“我常常想，如果每个县都能花点儿小钱设立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在保证按时归还的前提下，把精挑细选的好书借给居民们阅读，一定能带来巨大的益处。”

那年（1809年）秋，杰斐逊以前的朋友约翰·沃克病了，说很想见见老朋友。詹姆斯·门罗写信给杰斐逊，告诉他“如果你这时候能去见见沃克上校，对他来说将是莫大的善举，他一定会很感动”。约翰·沃克的妻子（杰斐逊曾经追求过的贝琪·沃克）也在生病。显然，杰斐逊怕见面尴尬，决定不去贝尔沃拜访沃克夫妇。尽管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还是单身的杰斐逊曾多次走过这一小段路去见贝琪。他给夫妇俩送了一篮熟透的无花果作为礼物。沃克的女婿休·纳尔逊对杰斐逊表示了感谢，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沃克夫妇俩仍然“都很虚弱，提不起精神来”。

杰斐逊也随时准备着像担任州长时那样继续维护弗吉尼亚。一位历史学家写信问他关于革命时期的事情，他在回信中写道，弗吉尼亚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一直是“相当大”的。他说：“我们一直立足于把全州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全国共同的事业贡献人力、财力、物力，满足

一切需要。”

杰斐逊从前的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在田纳西旅行时惨死的消息传到了杰斐逊耳中。他听说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刘易斯住在一家小酒馆，酒馆老板娘那天正在熟睡，突然听到两声枪响。之前被认为“精神错乱”的刘易斯“躺在血泊之中”，头上和心口各有一处伤口。看来第一枪没死成，他又朝自己补了第二枪。但这一枪似乎也没有致命，最后这个可怜人用匕首刺死了自己。

从佛蒙特州前去拜访的伊莱贾·弗莱彻对杰斐逊的描述非常不留情面。“杰斐逊先生又高又瘦，腰板很直。”弗莱彻于1811年写道，“他的长相并不英俊，而是有些粗野——我得知邻居们也不怎么尊敬他……女黑奴萨莉的事情并非传言——他和她同居，她还生了好几个孩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最可怕的是，他仍让这些孩子做他的奴隶——这简直是毫无人性的犯罪，可在这一带却很常见——考虑到这种行为在这里如此普遍，算不上丢人，所以杰斐逊这件事似乎也没那么过分了。”

在农场日志里，杰斐逊不动声色地记载了赫明斯的几个孩子的出生，同他记录奴隶们的生活、庄稼的收成没什么两样。显然，他在心里把赫明斯为他生的这几个孩子看作另一个世界的人，尽管他们就在他身边长大。麦迪逊·赫明斯说：“他不习惯对我们小孩子表现出关心或父爱。”但据他所言，杰斐逊对自己的几个白人外孙、外孙女“倒是非常疼爱”。

这种生活方式怎么说都有几分奇怪。但杰斐逊毕竟处在那样的文化之中。“和黑人或者黑白混血女子同居是很平常的事情，人们说起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不用遮掩或觉得羞耻。”马萨诸塞州的小乔赛亚·昆西从南北卡罗来纳州回来后这样写道，“餐桌旁服侍的黑奴有可能正是桌上主人的子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蒙蒂塞洛每天也上演着这种情形。在给另一位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的信中，亨利·兰德尔提到了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的一些观察。谈到萨莉·赫明斯几个子女和杰斐逊长相的相似之处，“伦道夫说有一个黑奴和杰斐逊太像了，如果穿着差不多的衣服，离远点儿或者在天黑的时候那个黑奴很可能被误认作杰斐逊本人”。有一次，伦道夫说：“和杰斐逊一同进餐的一位绅士抬头看到杰斐逊身后的仆人，吓了一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有多像。”（伦道夫对别人讲起这些回忆，是为了证明杰斐逊的外甥彼得·卡尔是萨莉·赫明斯几个子女的父亲，但这种说法最终被基因研究推翻了。）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些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我问R上校（指伦道夫），杰斐逊为什么不把这些长得像他的黑奴送到贝德福德的庄园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去，让他们消失在公众视线中。”兰德尔在给帕顿的信中写道，“他说杰斐逊先生表现得他压根儿就没有发觉到这种相似——尽管他（R上校）很清楚他母亲会很乐意让这

些人消失，但他和他母亲，他们所有人都太敬重杰斐逊了，不敢跟他提起这一话题。只要他觉得合适，他们都没意见。”

这种缄默和否认正是当时各蓄奴州的潜规则，于杰斐逊而言很合适。这是他的种植园，他的世界，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弗吉尼亚的一座古老庄园可以蕴藏许多秘密，”亨利·兰德尔写道，“就像古代的诺曼城堡一样。”而人们对于这些秘密总是尽量闭口不谈。

杰斐逊有时能感觉到老之将至。“我都不怎么能走路了，”他在1811年7月写给菲利普·马泽伊的信中说道，“大部分活动都是靠骑马，生活能力也明显退化了。”他深知自己的极限。他在1811年8月写给本杰明· 拉什的信中说道：“我很惊讶老年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头脑会和身体一同退化。”他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洞察力感到骄傲，微微而又毫无疑问地庆幸自己能认识到人类能力的有限：“无限期地占据权力宝座会让我们的共和政体陷入危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感觉自己有责任退下来。再说，我也害怕变成一个老糊涂，自己还浑然不觉，光这一点顾虑就足以帮我拒绝所有要我连任的请求。”

但他的好奇心仍未消减。“你好吗？”他在给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前司法部部长利瓦伊·林肯的信中问道，“你在忙什么？是经营农场还是搞研究，还是两者交替？你读法律还是神学？两门学问中，哪一门研究起来比较有趣、引人入胜，哪一门比较枯燥乏味？将救世主送上十字架的是律法，还是神的旨意呢？”

1811年元旦次日，本杰明· 拉什开始了一场悄悄的游说，试图让杰斐逊和亚当斯恢复通信联系。“你们如果能恢复交往，对于知识分子和爱国者而言将是一种荣耀，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和事业也将大有裨益。”拉什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两位曾经对立的前总统重修旧好，子孙后代都会为之肃然起敬。这也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拉什称，如果杰斐逊能迈出第一步，一切就都好办了。亚当斯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时间也不多了。“亚当斯已经在坟墓边缘挣扎，”拉什说，“全靠旧日的战友拉他一把了。”

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友谊是在18世纪90年代的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破裂的。杰斐逊写信给拉什：“你还记得那时候那些联邦主义者使出的各种手段吧。”他回忆起“外侨和惩治叛乱法”，对于他而言，这意味着“打压那些支持我国宪法原则的朋友，用威慑制止任何对他们的友好表示，让我们与法国为敌、与英国为盟，最终将我们的宪法同质化为英国的宪法”。

拉什则不屈不挠而又小心翼翼地继续他的努力。拉什在回信中写道：“政治生涯的糟糕之处有很多，而最可怕的就是友谊的破碎，还有往往随之而来的难解的仇恨。”

在位于昆西的家中，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和来访的杰斐逊的两位邻居度过了两天时间。他们聊了许多。“亚当斯先生谈论人和事都毫无顾

忌，为我们讲述了国家历史上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尤其是他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以及与180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一些事。”其中一位访客爱德华·科尔斯写道。亚当斯也表达了对杰斐逊的“不满”。“我告诉亚当斯先生，他所听说的杰斐逊先生针对他的一些言行，其实与杰斐逊本人一贯所言大相径庭，而且对自己的朋友——亚当斯先生的政敌，杰斐逊也从没说过那样的话。”科尔斯写道，“我复述了杰斐逊先生对亚当斯的一些赞美之辞，亚当斯先生看上去很高兴，也在话语中表达出了这种喜悦。”

听到来访的两位弗吉尼亚人的热情描述，亚当斯感到既吃惊又欣慰。据科尔斯所说，他改变了对杰斐逊的态度，“对他的人格大加称赞，还感激了他在独立革命中及之后的日子里对国家的贡献”。亚当斯又批评了报界对杰斐逊的苛刻态度，还说：“我一直很喜爱杰斐逊，现在依然如此。”

这句简单的话语对于杰斐逊来说足以宽慰。“这样就够了，”他给拉什写信说，“他只要这样承认了，我就能重拾我们关系最亲密时我对他的深切感情。”拉什把杰斐逊的想法转告了亚当斯，亚当斯便在1812年新年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并给他寄去一本约翰·昆西· 亚当斯初次在哈佛教授修辞和演讲时的讲稿集。

杰斐逊的回信直击亚当斯的心弦。“你的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宝贵的记忆，”1812年1月21日，他从蒙蒂塞洛写信给亚当斯，“它让我回到那个举步维艰、危险重重的年代，我们为同一项事业共同奋斗，争取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治权。我们一直努力划着同一支船桨，迎接面前的风浪，每一次风浪都似乎要掀翻我们，但我们的小船总能化险为夷。我们一心一意与风暴搏斗，最后终于抵达了幸福的港湾。”

就这样，一段被政治摧毁的旧日友谊重新建立了起来。1812年2月10日星期一，亚当斯从昆西给杰斐逊回信时，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似乎已成了过眼云烟。亚当斯向杰斐逊要一本在弗吉尼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说1812年7月是世界末日。亚当斯觉得这种预言能够流传开来真是很神奇，因为“时间和经验都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些预测不可信”。

两位已步入老年的革命家分享着他们的想法和回忆，谈论着精神上和现实中的问题。“你问我，美国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该由谁来书写。”杰斐逊在1815年写给亚当斯的一封信中说，“谁有这个能力？谁最终能够下笔？没有人。能写下来的只有外在的史实。而那些在国会里关起门来进行的探讨和谋划，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记录过。这些才是历史的精髓，注定永远无人知晓。”

两人当中亚当斯的信写得更勤些。“太多的话题涌上心头，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告诉杰斐逊。这位第二任美国总统非常看重这段失而复得的友谊。“在你和我把彼此所有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之前，谁也不能死。”

杰斐逊很喜欢这些信。“亚当斯先生和我现在定期通信。”1813年3月，杰斐逊告诉本杰明· 拉什，“我正欠着他一封信，一想好说什么我就马上给他写。不过我们从来不瞎讨论看似稀松平常的政治问题。我们在那么多方面所见略同，为何专挑这个唯一有分歧的话题呢？”

关于政治的变幻无常，亚当斯写道：“50年来，我的名声一直是大众茶余饭后咀嚼的话题，将来也会如此。因此，名声对我而言就像一团泡沫，一张飘荡在夏日多变的微风中的蜘蛛网。”杰斐逊的态度也是如此。1813年6月，他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终极追求就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身体舒服，内心宁静。我希望就这样度过余生。”

> 自社会形成之初，人们就持有不同的意见，并就此形成不同的派别。在所有允许人们自由思想、自由发声的政府中，都会产生不同的派别。现在美国所经历的政治派别之争古已有之。究竟是人民的意愿占上风，还是贵族精英的意愿占上风，古希腊和古罗马政坛一直为之争论不休……由于我们的政界资历较别人更久，同胞们对我们的名字更熟悉些，所以认为和你意见一致的那一派会把你看作他们的领袖，另一派把我看作领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杰斐逊认为，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纷争早该结束了。“我和你，我亲爱的先生，就像老迈的普里阿摩斯，怎能穿上儿子赫克托耳的铠甲呢？我们这把年纪了，怎能代表各自的派别在报纸这一角斗场上针锋相对地比拼呢？我绝不会这样做。我早已下定决心顺从于世人的评判，他们将按照我的行为评判我，我绝不会为自己解释一句。”

谈到两人的意见分歧，亚当斯表现得很有风度，但也决不让步。“我深信二人的正直崇高，就像对华盛顿那样深信不疑。”提到杰斐逊和麦迪逊，亚当斯写道，“我对你和麦迪逊先生的执政方式从来不敢苟同。我和你们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判。”亚当斯承认“整个国家都站在你们那边。但你们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都不足以让我信服，也不足以让后人信服——我敢这样断言”。

亚当斯和杰斐逊对民主本质和国家未来的探讨十分精彩。通信迫使两人澄清想法，进行理性思考。派别争斗中大呼小叫的指责已成为过去。“就对社会的教化和治理而言，我认为天生的贵族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杰斐逊写道，“的确，既然造物主让人类形成社会，就不可能不赋予我们足够的美德和智慧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甚至不妨说，让这些天生的贵族成为政府管理者，或许是最好、最有效的政府组成形式。”他又继续写道：

> 以上是我就我们的分歧之处所表达的自己的意见。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和你争论，因为我们都年事已高，一辈子习惯了质疑与

反思，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是受到你之前一封信的启发，你说在我们把彼此所有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之前，谁也不能死。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漫长、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融洽。我们建立起一个政体，尽管我们俩都承认它并不完美，但我们也都觉得它足以使我们的同胞享受天底下最幸福、最有保障的生活。对于我们政体的欠缺之处，我们就算想法不同，对国家也无大碍，因为经过一辈子无私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把国家交给了下一代，他们能够好好治理国家，也好好对待自己。

截至1826年两人相继去世之时，杰斐逊和亚当斯一共互通过329封信，其中很大一部分（158封）是1812年之后写的。

“这个冬天对农场主来说日子不太好过。”杰斐逊在1811年3月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对于政治家们而言，这个冬天也没好到哪里去。“上一会期激烈的派系冲突又在国会重演了。”杰斐逊的女婿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也在3月给他写信，“哪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可恶的少数派，他们没有固定的原则或宗旨，也缺乏美国情感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全部政治信条可以用‘反对’一个词概括——他们无原则地反对，全然不顾个人名誉和国家利益。”

身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眼睁睁地看着他几十年来的担忧（英国对美国的控制）成为现实。1812年起，随着美国又一次和英国开战，杰斐逊多次警告过人们的情形出现了。杰斐逊从总统职位退下来时，还相信可以不通过武力冲突解决英国问题。然而，他建议麦迪逊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战争固然无益，但任人蹂躏更可怕。”

1811年9月，杰斐逊写信告诉约翰·韦尔斯·埃普斯，总统夫妇和战争部部长、海军部部长将携家人做客蒙蒂塞洛。然而，可能是英国军船“停泊在特拉华拒绝离开”的消息让内阁成员们无暇如约到访。

本杰明· 拉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们的国家两次宣布独立于大不列颠——1776年一次，1800年一次……是不是如今我们要第三次宣布独立，而且不是用笔，不是用普选，而是用大炮？”

随着战争临近，杰斐逊从杨树林回到家中。雨水和冰雹摧毁着小麦的收成——5月里仅10天的降雨量就达10英寸，弗吉尼亚的人们也在等待着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在杰斐逊看来，与英国的冲突也是与亲英派美国人的冲突。1812年5月，杰斐逊告诉麦迪逊：“大家都镇定地等待你宣战。假如那些北方人意图控制少数派，这也是教训他们的一个好机会。”

1811年11月5日星期二，麦迪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备战演说。他认为来自边境和海上的威胁之大已无法让人容忍。检验美国能否实现永久独立的时刻到了。

“这么说我们是要打仗了？我看是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杰斐逊写

信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我们曾经凭着耐心和对和平的爱等待着，但希望已经破灭，我们只剩下斗争和夹着尾巴投降两个选择。”

1811年的最后一天，杰斐逊给麦迪逊寄去了鼓舞的话语。“你的演说可谓坚定、理性、庄重，可以说是十全十美……天佑你渡过难关。”

第四十一章
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

在一个共和国，如果其公民不是被强权征服，而是为理性与信仰所引领，那思辨的艺术就至关重要。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对这种形势并不陌生：国王的军队虎视眈眈，美国危机四伏。对杰斐逊那一代人来说，这种冲突已持续良久，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到达高潮之后就已经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印花税法案到强制征募船员事件，英国从未完全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也知道这一点。甚至到1810年，一名美国议员仍觉得有必要声明："我们的人民不会向殖民统治妥协，不会放弃自主独立。"在杰斐逊生命中，他将要再次面对英美之间的战争。

对美国人来说，1812年的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灾难性的。1814年8月，英国军队火烧首都华盛顿，挽救文件和一幅乔治·华盛顿画像的任务落在了多利·麦迪逊的身上，她在敌人到达之前逃离了总统官邸。当有报告说一些美国人对英国人表示了欢迎时，杰斐逊非常气愤，他在1814年写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说："一个政府如果不令人心怀敬畏，不具责任感则难以维持。良民遵从责任的指引，而恶徒只能靠威严震慑。"

直到在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取得胜利后，美国才扭转形势。《根特条约》的签署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近半个世纪来美国与英国的冲突也由此终止。另一场斗争——支持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和顽固的新英格兰联邦党的斗争——也宣告结束。联邦党人于1814～1815年在康涅狄格州召开了会议，即哈特福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联邦党人以受侵害者的姿态提出了决议，其中包含了一些关于脱离联邦政府的言论。然而，这次会议的内容一经传开，人们认为联邦党在向英国妥协求安，这暴露了联邦党急功近利的形象，使他们失去了民心。杰斐逊指出："对国家统一性的期盼流淌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我相信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不是建立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的。"

1815年年中，在杰斐逊一直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美国大部分地区，终于结束了与外敌的战争，重新获得了安宁。

181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圣公会主教西奥多·德霍恩来到蒙蒂塞洛。虽然是不期而至，但他对蒙蒂塞洛及其主人印象颇佳，在那儿他感受到了友好的气氛。这位主教惊叹于杰斐逊的体态。他在自传中写道："只有

杰斐逊先生这样的大体格才能容纳下他宽广的心胸和丰富的头脑。他家的花纹红木地板打好了蜡，他走在上面步态自若，相比其他不熟悉那里的人，步履要快上不少。”

与杰斐逊的谈话也令这位主教赞叹：“他几乎能立即谈起任何当下的话题，说话时很理性，观点似乎脱口而出。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思想大师。”在杰斐逊家住了一晚，吃完早餐后，主教一行人前往蒙彼利埃。

杰斐逊在家时，常常要接待访客。帕茜说至少有一次杰斐逊要求她为50人准备过夜的床铺。

破碎的玻璃让杰斐逊的家人得知来了一位访客，这位女士太想看看这位伟人了，她用自己的太阳伞将窗户敲破，以便能更好地看清楚。众所周知，他的书房和房子主厅之间的过道被那些想一睹他真容的陌生人挤得满满的。“他们看好时间，等着他晚饭时间从书房走到主厅，这样他们就能抓紧机会看他一眼。”还有人在家里有聚会的晚上，在门廊等着。“他们就像在小动物园里看狮子一样，离他只有十几码远，近距离地盯着他看，一直看到满意为止。”

杰斐逊辞世后，19世纪的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曾经在沃姆利·休斯的陪同下游览蒙蒂塞洛，沃姆利曾是杰斐逊家的奴隶。农庄北边排房下有三处马车库，每个库里都能放下一辆四轮马车，兰德尔指着那些马车库问：“沃姆利，杰斐逊先生在世时，多长时间这些马车库就会停满马车？”

“先生，在夏天，每天晚上都是满的。通常在那棵树下还会停两三辆。”休斯指着另一处地方说。

“你们所有人都得招待访客吧？”

“是的，先生。整个农庄的人都得管他们吃喝。”

一位弗吉尼亚绅士早年与杰斐逊发生过争执，他到蒙彼利埃拜访麦迪逊。恰巧麦迪逊的一位朋友要去蒙蒂塞洛，麦迪逊鼓励他与那位朋友同行。这位绅士决定前往。在到达位于山上的房子前，他对自己的冒昧来访有些担心。

看到他时，杰斐逊有“片刻”的惊讶，然后“迅速上前向这位绅士表示欢迎，那种急切的热情就好像一直盼望着他来”。晚餐时，杰斐逊坐在这位不速之客旁边，吩咐上马德拉白葡萄酒，不知怎的，杰斐逊记得这位绅士喜欢这种酒。这位客人拒绝了，他说他喝杰斐逊喝的葡萄酒就行。

餐后，杰斐逊有事离开，这位客人问那位同行的蒙彼利埃朋友：“你觉得我能找到一杯上等的白兰地吗？杰斐逊是那么的热情风趣，我一直小口喝他的……又酸又冷的法国葡萄酒，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死掉……如果我不喝下‘解毒药’的话。”杰斐逊不会知道，这位客人不愿扫兴。

第二天，这位客人回到麦迪逊家，他“将杰斐逊捧上了天”。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那么有品味的人会喝又冷又酸的法国葡萄酒！’他对麦迪逊先生说，这种酒肯定会损害杰斐逊的健康。他在这个话题上滔滔不绝，宣称这种酒会害死杰斐逊，会在某天晚上夺走他的性命。最终，他坚持让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督促其换一种葡萄酒。他那种警告的口气以及热切的关心被原原本本转述，麦迪逊和杰斐逊从中获得不少乐子。从此，他们三人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杰斐逊的听力逐渐变差，他也越来越需要眼镜了。1818年年初，他生病后又痊愈，但是他的同龄人却纷纷倒下了。

1818年下半年，他听说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饱含深情地致信约翰·亚当斯。在信中，他说“在人生经历过的伤痛中”，他已经领悟到，任何言语在这样悲痛的时刻都软弱无力，但是“你们痛哭时，我也悲痛到不能自已”。他写道：“对我们而言能聊以自慰的是，这种分别不是遥遥无期的，我们也将同样长眠于墓穴，我们的悲伤和苦难的身体将升华，快活地与我们曾深爱和失去的朋友们重聚，那时我们仍彼此深爱，并将永不分离。”

杰斐逊享受家庭生活，但同时亲友也给他带来了烦恼。他的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长期陷于经济困境，而且酗酒。据说他嫉妒杰斐逊在家族里的中心地位。伦道夫曾三度出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但直到老年他都没能平静度日。埃奇山种植园使他债台高筑，他和他父亲为如何处理种植园而闹翻。他有时很暴躁，他的儿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评价他“比狼更凶狠，比鬣狗更残暴”，这与这个家族温和的性格特征可谓大相径庭。（伦道夫于1828年去世。）

另一个麻烦人物是杰斐逊挚爱的外孙女安·卡里·伦道夫的丈夫查尔斯·L·班克黑德。他酗酒成性，有暴力倾向，甚至对妻子动粗，这些情况愈演愈烈。班克黑德尝试过法律工作和农产经营，但都一事无成。杰斐逊曾经送给安一本《现代女性格丽塞尔达的故事》，这是玛丽亚·埃奇沃思所著的有关失败婚姻的小说。

虽然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经常情绪不稳，但杰斐逊和谐有序观念的最大挑战来自班克黑德。监工埃德蒙·培根描述班克黑德道：“他相貌堂堂，却是个可怕的酒鬼。”班克黑德在夏洛茨维尔和蒙蒂塞洛都是不安定因素。“我曾看到他骑马进入夏洛茨维尔的酒吧饮酒。”培根说,“我曾看到他喝醉后，他的妻子为了躲避危险，逃到一个土豆窖里。”

为了让班克黑德一家搬到贝德福德县（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让班克黑德远离酒吧），刚退休不久，杰斐逊带着班克黑德来到杨树林。然而最后，班克黑德一家在临近蒙蒂塞洛的一个农场安了家。

到1815年，杰斐逊觉得有必要在状况不可收拾之前，让查尔斯的父亲亲自管教儿子。他父亲是名医生。然而，改头换面的保证根本没用。

班克黑德仍会在夏洛茨维尔喝得酩酊大醉后回家，杰斐逊觉得这个人“像个疯子”。

班克黑德对妻子安施加暴力。杰斐逊描述道：他“对妻子进行暴力殴打”，随后他“把她赶出房间，又强迫她回去，为了躲避他，安不得不在母亲的房间过夜。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一天晚上，班克黑德找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要酒窖的钥匙遭到拒绝，他大发雷霆。据培根叙述，管家“是不会再给他一滴白兰地的”。帕茜想让班克黑德冷静下来，但她根本制止不了他，于是她叫来培根。（培根说：“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会叫伦道夫先生的，他太容易激动。”）然而伦道夫听到了争斗。培根写道：“我到房间时，伦道夫也来了。班克黑德误以为他是管家，便开始咒骂他。”伦道夫从壁炉里拿出一根发烫的拨火棒，砸向他女婿的头部，这下子班克黑德被烧掉了一块肉，差点没命。

1819年2月1日星期一，在夏洛茨维尔的政府大楼外广场上,班克黑德和他的小舅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打了起来，后者是杰斐逊最疼爱的外孙。这次冲突的原因不明，然而结果却血淋淋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伦道夫用马鞭抽伤了班克黑德的头部，而他自己则被班克黑德刺了两刀，刺成重伤。

杰斐逊结束了自己的日常骑马活动，刚回到蒙蒂塞洛就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前往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到达广场上的利奇商店时，看到外孙躺在地上，他跪倒在地哭起来。年轻的伦道夫活了下来，但是这次流血事件使杰斐逊更担心安的处境。

杰斐逊写道：“提到班克黑德，有太多让我担心的地方，大部分是我对他妻子的担心。我一度认为安会死在他手里。”1826年，安死于难产。

尽管生活中有各种不如意，杰斐逊仍积极地保持乐观。他在1816年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我认为整个世界还是美好的，仁慈宽厚是它的准则，它给予我们的快乐多于痛苦。与君共勉。”杰斐逊心胸开阔，“我驾驶着希望之舟前行，将恐惧甩在身后。的确，我的希望有时会破灭，但更多情况下，是预示不祥的黑暗消散。”

亚当斯则没有那么乐观。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我对未来毫无信心。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国家宪法和州宪法，甚至我们的艺术和科技，都成为酝酿分裂、派系之争、暴乱和反叛的温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竞选活动的工具。”

杰斐逊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他一生的经历见证着政治进步和智慧发展的可能。他认为，过去不应对现在妄下断言。1816年，他曾写道：“有些人对《宪法》抱有一种伪善的敬畏，将《宪法》看作约柜，不敢逾越半分。”

他们将前人看作神知，而非人类，认为那个时代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不可更改。我很了解那个时代：我属于那个时代，曾奋斗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功于这个国家。它和现在这个时代很像，但是它缺少现在这个时代的经历。如果那个时代的人起死回生，他们会说：一个政府40年的历史，是值得用百年品读的。当然，我肯定不希望频繁地贸然修改法律和宪法……但同时我也认定法律和宪法需要与时俱进……让文明社会一直遵循着他们未开化的祖先的准则，就如同让一个成年人穿上他儿时合体的衣服那般不切实际。

杰斐逊推崇创新。“一个新理念会引出另一个新理念的产生，然后产生第三个，一段时间内，新理念层出不穷，但这些理念都未被称之为创新，直到终有一人将这些理念相互结合，恰逢其时，最终产生一种新的发明。”未来充满了无数的可能。“在我生活的年代，科技发展迅猛，艺术创新不断，每当思忖至此，我便充满信心。我相信当代人定会如前辈般进步前行。无疑他们终归要比我们更有智慧，就像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更聪明，父辈们比那些烧死巫师的人更高明一样。”他在卸任时如是写道。

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是时候该进行建设了。英国军队攻入华盛顿时，烧毁了国会约3　000册藏书，之后不久，杰斐逊提出将个人藏书卖给国家。杰斐逊手中有6　487册藏书，援引《国民通讯员报》的话说，这些藏书“无论从选本，还是从珍藏价值以及内容价值来看，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成为新国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岁月流转，杰斐逊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夏洛茨维尔的一项事业上。他认定这个事业若能成功，将造福后人，且新一代会使之不断发展。

这项事业是建立一所大学。杰斐逊事无巨细地张罗这所大学的创立事宜，因而这所大学后来被称为是“杰斐逊的”。山顶酒馆位于蓝岭山脉纳尔逊和奥古斯塔两县之间的石鱼口，距离蒙蒂塞洛25公里。1818年，杰斐逊来到了这里。正是在这里，杰斐逊等人一致同意在夏洛茨维尔建立一所大学。这是一次重量级的聚会。除杰斐逊、麦迪逊以及马歇尔以外，还有弗吉尼亚其他知名政治家。显而易见，杰斐逊处于主导地位，他也乐在其中。

杰斐逊指出，这项任务是为了“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个体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人来获得”。在这项事业的所有投资中，杰斐逊的资助最多。他说：“我认为最安全的社会权力保管人，莫过于人类自身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够明智，无法以审慎的判断力掌控他们的权力，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通过教育提升他们的判断力。这是对滥用宪法权力的最好的矫正方法。”

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是杰斐逊最后一次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领导才

能。这项事业让他的政治才能、过人智慧以及建筑天分都得以发挥。在杰斐逊的一生中，有各种妥协和问题（他花费甚巨），但他身后留给世人更多的是不朽的功绩：《独立宣言》，因路易斯安那的并入而扩充发展的美利坚合众国，加强总统权力种种可能性的理念，还有这所大学。

杰斐逊一直对教育事业满怀热情。他在18世纪80年代写给乔治·威思的信中说过："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整部法典中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是公民获取知识的权利。这是公民享受幸福与自由的可靠根基，无可取代。"

杰斐逊一直为美国社会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努力奋斗，他将这所大学的创建看作其中重要的一环。"无限的思想自由是这所大学的根基所在。"他如是说。他还引用了自己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观点："我们不惧追寻真理，无论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我们也不畏犯错，因为只要能自由独立思考，我们便能战胜谬误。"

地域因素也是他热衷于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的立法机构不真心地推动弗吉尼亚大学的建立，我们就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到肯塔基州或者剑桥市去受教育。"杰斐逊于1820年曾这么说。他话里话外对肯塔基州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以及剑桥市的哈佛大学颇有微词，"从哈佛大学回来，他们会成为盲从者和保守派；而肯塔基则不会让他们回来，因为他们需要增加人口。"

他想要建立一所伟大的新学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参与。1819年，伊丽莎白·特里斯特曾看到杰斐逊骑马冒着"飓风……去学校"。据说杰斐逊为了能看到学校的施工情况，在蒙蒂塞洛的一个平台上架起了一架望远镜。

由于宗教教派的抗争，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所做的第一次人事任命以失败而告终。1820年，他邀请一神论者托马斯·库珀担任教授。这一举措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强烈抗议，杰斐逊称之为"神圣指控"，最终宗教狂热分子赢了。杰斐逊不得不撤销任命。

无论如何，这位老人一直善于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杰斐逊仍遭人诟病，批评者认为这所州立大学对宗教抱有敌意。针对批评者提出这所大学不对学生进行宗教信仰引导的指责，杰斐逊提出了一项绝妙的计划。引起宗教观察家不满的直接导火线是杰斐逊拒绝一位神学教授的加入。1822年，杰斐逊作为校长做了年度报告，在报告中，他巧妙地、准确无误地将这个难题踢回给宗教人士。他提出每个教派都可以自己出资，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学院。学校的图书馆将向所有人开放，学校也允许学生们同时学习宗教知识和普通课程。"但必须明确的是，"杰斐逊写道，"这些学院必须独立于弗吉尼亚大学，并各自独立。"

又一次，杰斐逊在公平和开放的名义下，非暴力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确实是公平和开放的：他提出的折中方案，

在调和各方利益方面，可谓是合情合理。然而，各个教派一想到要自己建学院，便纷纷退缩了。学校里仍然没有神学教授，也没有独立的神学院。杰斐逊虽然失去了库珀，但他赢得了更大的胜利。

同年，杰斐逊认为理性强大的坚定信念，发展到了夸张的地步。“我很高兴在这个质询和信仰皆自由的天佑国度里，其宗教和信仰已经脱离任何国王或者神父，”他1822年曾写道，“只有一位上帝的正确观念再次复苏，我相信现在的每一个年轻人最终都会成为一神论者。”（这个预言虽然没有实现，可杰斐逊在这个预言中提到有关咖啡兴起的预见变为了现实。他写道，咖啡豆“正在成为文明世界最受欢迎的饮品”。）

虽然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传播已久，而且依然拥有众多支持者，但杰斐逊在思考非传统的精神信仰传播时，却有独到见解。“如果我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我会将其称作‘蜜蜂教’，鼓励教众以蜜蜂为榜样，汲取各种宗教的精华。”杰斐逊说道，“我的基本教义是……我们的救赎来自自身能力范围内的工作成就，而不是来自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信仰。”

杰斐逊相信造物主以及来生的存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维护生活中的道德伦理，支持耶稣的教诲，但他不认同耶稣的神性，却赞同耶稣的训言和品行。在任总统期间，他完成了一篇46页的文章《来自拿撒勒的耶稣的哲学——摘自马太、马可、路加以及约翰对耶稣生活和教义的叙述》。在卸任后，他又重拾这个课题，私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创作，他将这个作品命名为《来自拿撒勒的耶稣的生活与品行——引自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福音书＞》。1820年，杰斐逊在给一神论者贾里德·斯帕克斯的信中写道：“耶稣的宗教是以上帝的统一性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是其战胜纷乱的异教众神而为人认可的主要原因。想象一下，所有国家的民众都自愿地信奉只有一个上帝的信条，遵从耶稣有关纯净道德的谆谆教诲。”

作为教区代表，杰斐逊定期去教堂，手中拿着翻烂的祈祷书参加礼拜。他还在自己的公共演讲中引用神明之语。正如杰斐逊自己所说，“就我而言，我自成一派”。虽然他反对创立宗教，但他理解并支持信仰在美国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作为政治家和共和政体的拥趸，杰斐逊希望宗教情感向自由探究的倾斜，能将信仰从争论转为向善的动力，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宗教都是一种常态。所以，最明智的方法不是苛责宗教，而是鼓励利用理性解决信仰问题。杰斐逊相信，人们对宗教的态度越是理性，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从而整个国家会朝着越来越稳定和良性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持久战，尤其是在传统基督教还有着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杰斐逊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有些人称自己是耶稣教义的诠释者。事实上，耶稣教义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将耶稣的教义歪曲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虚幻体系，而这个体系并没有以耶稣真正的圣言为根基。终有一天，耶稣诞生的神秘主义说法——耶稣是上帝之子，被投生于处女的子宫中——将与女神密涅瓦（雅典娜）从朱庇

特（宙斯）的脑中诞生的说法一样，被视为寓言。耶稣本是最令人尊敬的人类所犯错误的改革者。我们可以期待美国的理性和自由之光将驱赶所有那些虚伪的传说，还我们本真的耶稣教义。”

失去自己挚爱的亲友让杰斐逊感到当下的痛苦，他期望来生能与他们跨越时空而重逢，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安慰，让杰斐逊对来生有着非常具体的展望。关于天堂，杰斐逊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希望我们能在天堂再相遇，在那里的国会，让我们与我们的老同僚重逢，一同接受赞许和褒扬。”

在杰斐逊内心，他相信“耶稣的教条简单明了，希望人人幸福”，他解释道：

1.只有一个上帝，他是完美的。

2.人死后将会受奖赏，抑或受惩戒。

3.宗教的核心是：全心爱上帝，爱人如爱己。

谈到自己的信仰，他告诉亚当斯：“只有我的上帝和我自己知道，在我的生命中这种信仰有迹可循。如果这种宗教造就了我对社会的忠诚与责任，那它就是好的。”杰斐逊回顾自己年轻的时候很是骄傲，他说自己“无畏地追求真知，从不畏惧追随真相和理性,无论它们指向何方；对真相与理性的拦路虎，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威，都勇于与之对抗”。

他将勇敢进行到底。“时至今日，诚实的人不应该还不合时宜地假装相信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教义，三位一体，一体为三……但这些正是神父们赖以生存的技艺、权力以及利益的来源。如果将他们宗教中的虚伪教义剥丝抽茧，这些神父绝不会有一个信徒。因而，我们应该像贵格会教徒那样，摆脱神父的束缚，进行自我的道德培养，遵从内心良知的指引，不说人们难以理解和难以笃信的虚妄之语。因为在我看来，信仰是要将内心所信传达为他人可懂的主张。”虽然如此，杰斐逊仍捐款给美国圣经协会，他赞同“没有任何其他形式，能比四福音书向人们传播的道德伦理更纯粹、更崇高”。

1819年10月，杰斐逊因为回肠狭窄而病倒，他的医生认为这种肠危象很可能是致命的。与以往一样，杰斐逊挺过来了。由于对1820年以及之后美国命运的深深忧虑，他并没有好好休养。1820年，他在给记者的文章中写道：“自由的喧闹之海永远不会没有波浪。”此刻，一波巨浪正从西部汹涌袭来。

第四十二章
联邦的丧钟

从邦克山战役到《巴黎条约》的签订，我们从未有过如此不祥之兆。

——托马斯·杰斐逊，于密苏里州加入联邦时

杰斐逊一向对未来十分乐观，这符合他的主要性格特点。他也知道，民众希望得到的承诺是进步而非倒退，是看见光明而非陷入黑暗。“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世世代代顺利前进。”他在1817年写给巴贝–马霸侯爵的信中说，“我对其持久性的信心是建立在不断丰富的生活资源和不断扩大的领土上上的。”

1819年12月10日星期五，杰斐逊记录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国会辩论：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的条件。众议院只有在该州签署反奴条约的条件下才赞成其加入，而受蓄奴州左右的参议院则拒绝支持这一要求。

从制宪会议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东北各州一直担心不断扩张的南方和西部蓄奴州会使奴隶制利益集团获得对国家的永久控制权。同时，南方和西部各州也在为奴隶制的未来担忧。

对杰斐逊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刻。他知道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也相信其最终会被废除。然而，他无法使自己致力于奴隶解放事业。作为政治家，他明白地区冲突是联邦最大的威胁。在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东北地区针对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后来实施禁运的地区冲突已经对联邦产生了威胁。

目前奴隶制是最显著的问题，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杰斐逊说：“密苏里就像夜里响起的火警……是联邦的丧钟。”他又说：“这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一旦画出并在愤愤不平的人们中提起，就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每次新的刺激都会使它更深入人心。”

杰斐逊自己承认，他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过于复杂，无法实施。“如果这种所谓的‘财产’转让能够实现奴隶的大解放和‘大遣返’，对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同意。而且我认为，在做出必要牺牲的情况下，这有可能实现。”他写道，“然而，事实是，我们捉住了一只狼的耳朵，但我们既无法控制它，也不能安全地放了它。天平的一端是正义，而另一端是自保。”

杰斐逊向约翰·亚当斯和盘托出了他的忧虑。同年12月，他写道："银行、破产法案、制造业、与西班牙的条约，这些都不算什么。这些事件就像暴风雨中的海浪，只会在船下涌动。而密苏里问题就像一股巨浪，我们会在反抗下丧失密苏里地区。还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最后的决议做出了妥协：北纬36度以南的地区允许蓄奴，而除密苏里外的以北其他地区都禁止蓄奴；逃亡到自由地区的奴隶将被归还奴隶主。

杰斐逊视此争端为权力问题。由于监管会最终导致废奴运动，一旦联邦政府开始对各州的奴隶制进行监管，就会开创一个先例。

他同时相信，北方正试图打造新的自由州，以巩固反奴利益集团的全国影响力，这样自由州也许能在总统选举团问题上吃颗定心丸。"这不是道德问题，仅仅是权力问题。"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道，"其目的是为总统选举提出一项地理上的原则，在这一目标达成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对密苏里事件的思考和措辞体现出他深切的感受。杰斐逊视此问题与君主制的威胁相关，而这是他毕生的忧虑。他说："联邦主义的领袖们在通过团结君主制支持者夺取权力的计划失败后，改变了方针。"他们目前正试图诉诸反奴思想以获得政治支持。

最后，杰斐逊看到了奴隶制的悲剧。他曾认为奴隶制是"丑陋的污点"，正如他于1823年9月所写的，但他不认为这个污点能被抹去。杰斐逊对能够获取并运用各种权力（政治权力、智慧权力和家庭权力）深信不疑；他也相信自己无论是对现代社会人类自由的基本定义，还是对他所藏的酒和所种的花的细枝末节，都能够了如指掌。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在奴隶制这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事实面前无能为力。

一位记者请求杰斐逊设法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他在回信中表示反对。"尊敬的先生，"杰斐逊说，"这就像是叫年迈的普里阿摩斯攻击赫克托耳的铠甲……这项事业是年轻人的……我会尽全力为其祈祷，这是一位老人唯一的武器。"

很少有话题能像奴隶制这样使杰斐逊认清现实，妨碍他在为改革事业服务时尽显乐观精神。他于1814年写道："只要有一个能根除这一道德和政治恶习的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会为此在所不惜。"然而，这不是事实。即使他提出可行性这一客观标准，用这一典型做法在措辞上给自己留了后路，也并不愿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杰斐逊认为，没有比将黑人从已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领土上迁出更合适的办法了，这一迁出甚至会使印第安人的迁移相形见绌。在杰斐逊和其众多同时代的人看来，美国是属于白人的。印第安人被不公平地赶到密西西比河对岸，黑人则会被遣散到大洋对岸，而不是河流对岸。"这

些人会获得自由，这一点在命运之书中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另外一点也同样清楚，同等自由的两个种族是无法在同一统治下共同生活的。”

多种族群体超乎他的想象，但存在于他的经历中，因为他曾恰好在蒙蒂塞洛组建了这样一个群体。他在家中每天都能见到他和萨莉·赫明斯的孩子与其他白人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在他看来，混血儿童与他的这些孩子一样忍受着天生的“屈辱感”，而这是由白人和黑人的“种族融合”造成的。

怎样解释他对“种族融合”的强硬观点和他身为混血孩子父亲之间这令人困惑的矛盾呢？也许杰斐逊始终认为，只要他能管理好他的特殊家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就能掌控局面。他对其债务持同样观点，在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对国家也显然如此。用他的话说，“种族融合”的产物被认为是造成外部世界混乱的源泉。然而，在他的世界中，他说服自己相信，他的中心作用使蒙蒂塞洛免于遵循其他领域的法则。

在回溯历史时行使道德评判是无益的，用当今的标准衡量往事并不公平。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同时代面临同样现实的其他人的所思所为，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观点。拿罗伯特·卡特为例，这位种植园园主于1791年解放了他的奴隶，一些与杰斐逊同阶层的弗吉尼亚人认识到了消灭奴隶制这一罪魁祸首的必要性，并尽其所能地解放了他们的奴隶。

从大局来讲，北方的政治家们正努力为反奴言论和观点营造生根发芽的土壤。关于密苏里的争论表明反奴力量正逐渐壮大并准备开始行动。对杰斐逊这样久经世故的人来说，法国对这一制度的观点同样重要。他曾在那个国度生活过，也可能担心过赫明斯一家，尤其是萨莉·赫明斯本人会在法国期间获得自由。

在杰斐逊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废除奴隶制度的设想并不是遥不可及或异想天开的。人们不仅考虑过废奴，在杰斐逊熟悉的土地上，废奴还曾在他生前变为现实。杰斐逊对奴隶制的看法是错误的，尽管他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致力于改革。

我们又一次看出，杰斐逊作为一位实干政治家明显比作为道德理论家更有影响力。他的驱动力来自他在1795年给麦迪逊的信中所称的“南方利益”，因为南方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他的政治根据地。他无法为这个难题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是他效仿别的政治家：他建议待时机成熟再去处理这一问题——反正不是现在。他认为全面殖民化并不可行。他于1824年写道：“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永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没有持这种观点，我也不希望如此。只是这一目标无法用此方式实现。”

可以用其他方式吗？杰斐逊并不知道。他于1815年写道：“病入膏肓之处往往是治愈得最慢的。”这一观点体现出争取选票的人在寻求公众对其行动路线的支持时的敏感和悟性。

“这一重任未能在留给我的有限时间内宣布完成，我将把完成它的工作交给下一代。”杰斐逊在1825年写给改革家弗朗西丝·赖特的信中说，“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罪恶的消除并非不可能，我们再也不用为此绝望。我们采纳每项计划，进行各种试验，这样也许会达成最终目标。”

只是他无法亲自进行这些试验。富有创新精神、好奇心和创造才能的杰斐逊拒绝参与一项他认为必要的工作，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于是，他做了一件他几乎从未做过的事：他放弃了。

杰斐逊的一生中，其个人债务是另外一件长期存在，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那个时代的当地种植园园主们通常拥有大片土地，却缺乏现金。因此为支付农田、奴隶和预期中的作物，他们往往债台高筑。受现金需求的驱使，杰斐逊、他的父亲以及当时的许多人都种植烟草。这种作物会消耗土地资源，但其市场价格高于小麦和其他谷物。因此，当烟草价格高时，弗吉尼亚人就能够赚钱；反之，他们就会收益平平甚至亏本。无论挣钱多少，这样都会将土地资源耗尽。1794年回到弗吉尼亚后，托马斯·杰斐逊放弃在蒙蒂塞洛种植烟草，但他在偏远的种植园仍种植这种作物。

杰斐逊负债有诸多原因，包括当时的绅士文化，还有给朋友和家人签署的期票。最重要的是他继承的债务。为了还清债务，他卖掉了继承的价值4 000英镑的地产。但独立战争时期剧增的通货膨胀使他名下的土地田产价值变得“不名一文”，而债务仍然存在，还有不断累积的利息。

为什么杰斐逊这样一个对人和事都谋求掌控权的人，会放弃对债务的掌控，并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仍继续借债呢？也许部分是因为他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将事情“简单化”，以避免进行艰难的个人抉择。签署一张新的欠条留待日后支付，比面对捉襟见肘的财务清算看上去总是更容易。同样奇怪的是，他与生俱来的控制意识和地域意识使他将债务视作一个抽象问题而非具体问题。在他的家庭和阶层中，借债和抵押土地就像待客和打猎一样，是文化的一部分。破产的危险虽然真实存在，但在杰斐逊心中还很遥远，至少遥远到使他觉得社会地位的基本安全感要高于财务自律性。讽刺的是，杰斐逊的普遍权力意识却导致他在特定方面牺牲了部分权力和家庭的未来。就像在奴隶制问题上一样，杰斐逊对矛盾的忍受度是十分惊人的。

密苏里问题使杰斐逊更急于着手建立弗吉尼亚大学。他相信新兴一代领袖应当在当地接受教育，而不是在北方，因为在这里更易于接受他的世界观。

他度过了一个相当安逸的晚年，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在他接近80岁时，有个朋友说他看上去“和10年前一样”。

19世纪2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他1786年在巴黎受伤的手腕开始恶化。20年代头几年里，他的心情很阴郁。1822年6月的第一天，怀着对密苏里的担忧，忍受着手腕的伤痛，他给亚当斯写信：“报纸上说斯塔克将军去世了，享年93岁。查尔斯·汤姆森在这个年纪还活着，乐呵呵的，瘦得像蚂蚱一样。但他严重失忆，几乎连一个家人都认不出来。一个好友不久前拜访他，他好不容易才想起对方是谁。而且才坐了一小时，他就把同一个故事讲了4遍。这难道是生活？……这顶多活得像一颗卷心菜，而且绝对不值得祝福。”

1822年年底的一天，在蒙蒂塞洛，他不小心在下台阶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摔断了左臂。虽然痊愈情况良好，但他的双手都严重受伤了。“我很享受夏天的温度，”杰斐逊说，“但一想到冬天要来了我就害怕。我希望能和冬眠鼠一起睡上整个冬天，春天来临时再一起醒来，要能那样就好了。”

杰斐逊对于他这代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毫不怀疑。他在信中向约翰·亚当斯介绍了他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杰斐逊说：“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期待在晚年的某个冬夜，向围着他的人讲述他出生前的那段英雄岁月，以及他曾有幸见过的那些阿尔戈英雄们。”

但是，他曾担心过历史会如何看待他所生活和引领的时代。他在1823年给南卡罗来纳州高等法院法官威廉·约翰逊的信中这样说：“我们过于漠视身后之名，而保守派会不惜一切加罪于我们。”杰斐逊对约翰·马歇尔所著的五卷本乔治·华盛顿传记很是不以为然，认为是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宣传。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担心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的作品。

> 这部五卷本诽谤我们争权夺利，而且对我们的政府走向君主政体未加丝毫制止。此外，汉密尔顿的生平掌握在一个会将极端狂热的联邦主义加进去的人之手，他措辞尖锐，且对我们心存成见。而且无疑还会有其他我们未知之事正在酝酿中。对我们来说，我们寄希望于真相能不言自明，但历史正走向相反的方向，也许会积重难返。

随着年岁渐长，他开始拒绝放弃独立性。1823年5月，杰斐逊每天都独自骑马。一天在穿越里瓦那河时，他的马“陷在了河里”，他的孙女这样写道。杰斐逊的腿被缠住，跌落河中。他的家人惊惧万分，担心“如果不是水流湍急将他冲到浅水处，使他的手触到河底，支撑着自己站起来，不然他一定会溺水而死”。他全身湿透，最后手臂也缠上了绷带，但他拒绝家人让他放弃每日骑马的要求。当时他刚年满八十。

1823年10月，门罗总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美国正犹豫是否要同英国一起反对西班牙保留西班牙正处于叛乱中的南美洲殖民地。杰斐逊回信说，真正的问题并不特殊，而是具有普遍性。那就是，美国应如

何看待欧洲在西半球的冒险主义行径。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问题是独立以来引发我思考的问题中最严重的。”杰斐逊给门罗的信中说，“我们的首要准则应当是，不要把自己卷入欧洲的混乱中。其次，不要任凭欧洲干涉大西洋对岸的事务。美洲，无论是北美洲还是南美洲，都有不同于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其自身利益。”

门罗主义，即美国反对欧洲对西半球事务的一切干预，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其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至少也部分地受到杰斐逊的启发。对杰斐逊来说，一个终生致力于追求掌控的人自然会尽可能地延长为其国家服务的时间，因此他留下了一份最终的独立宣言。这次关于政策，而非革命。这是一份永久性宣言。

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杰斐逊再次看到，建国者们结束党派之争的梦想仍然只是个梦想。这一梦想也许会在未来实现，但显然不是现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杰斐逊说：“你不会相信这两个党派会联合起来，就像狮子和小羊会躺在一起。联邦主义之名败在哈特福德会议、奥尔良胜利和根特和平手下。其支持者怀着屈辱抛弃了它，如今称自己为共和党人。但只有名称改变，其理念依旧。”

1824年的总统竞选人异常之多。有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佐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和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这次竞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旧一代的更迭。杰克逊出生于杰斐逊开始律师生涯的那年，1781年14岁时曾当过战俘，而那一年杰斐逊在蒙蒂塞洛从塔尔顿手中逃脱。

杰斐逊看好克劳福德， 一名曾任职于麦迪逊和门罗内阁的老将。然而，这位佐治亚人在1823年患了一次中风。选举最终定于1825年2月在众议院举行。虽然杰克逊得票数最高，但在克莱表示支持亚当斯后，亚当斯在众议院当选，而克莱成为亚当斯的国务卿。（杰克逊指控竞选中存在“腐败交易”，激起了他为落选复仇的野心。1828年，他再次参加总统竞选。）

1824年11月一个美好的秋日，拉法耶特在旗帜林立的行进队伍与号角声的陪伴下抵达蒙蒂塞洛。他停在大宅东门走出马车。时年67岁的拉法耶特来到美国进行最后的胜利告别之旅（像亚当斯和杰斐逊一样），他是一座象征着无上光荣而遥远的岁月的活纪念碑。

81岁且驼背的杰斐逊向他的贵客走去。这两位曾见证那个时代和各自国家最美好和最糟糕时刻的革命者，毫不拘束地拥抱在一起。

“亲爱的杰斐逊！”这位贵客说。

“亲爱的拉法耶特!”主人回应道。

他们已经有30多年未曾谋面，而杰斐逊也颇有风度地决定设宴招待拉法耶特，以感谢这位法国人为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杰斐逊居于法国期间为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在夏洛茨维尔为拉法耶特举办的晚宴上，杰斐逊起草了一份祝酒词：

> 你们曾听说或读过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事迹。这些事迹你们了解并铭刻在心，也记载在真实的历史篇章中。他在战后和平时期的事迹，你们也许并不了解，但我可以做证。我在他的国家派驻期间……他将我们的事业视如己出……他在那儿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阔的人脉。一切部门的大门随时都向他敞开；而对我，只是在指定时间形式上的敞开而已。事实上，我只是在打下手，他才是主要功臣。让我们向他致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都是我们的恩人。

杰斐逊的祝酒词中还有祝愿的含义，为其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们传递更广泛的信息，因为他知道他的话会变成铅字四处传阅。

> 我和你们的父辈一起出生长大，蒙他们偏爱，我能走上公共事务的道路。我同他们一起艰苦奋斗，努力将我们从外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治的权利。这些权利保佑着我们，也会逐一保佑地球上的每个国家。

特定的地点，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晚年的杰斐逊仍像青年时期一样，尊崇政治的作用、战友情谊以及能使并不完美的人为高于自身的事业而奋斗的理念。

上了年纪的杰斐逊仍保留着谈论对方最感兴趣话题的沟通技巧。当那些话题枯竭时，他会泛泛而谈过去和未来。他总是很和蔼。丹尼尔·韦伯斯特如此写他1824年在蒙蒂塞洛逗留期间的感受：“在交谈中，杰斐逊先生随和自然，一点儿也不做作。他的声音不大，不像是在吸引大家的注意，而往往是在和身边的人交谈。”杰斐逊会谈论“科学和文学，尤其是弗吉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完全是在他的努力下才成立的……我们和他在一起时，他最喜欢的话题是希腊和盎格鲁–撒克逊，回忆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他在1783（或1784）~1789年在法国居住时的事情。”

作为新英格兰人，韦伯斯特对安德鲁·杰克逊在西部的崛起感到不快。显然杰斐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韦伯斯特有同样的担忧。“想到杰克逊将军成为总统，我感到很焦虑。”据韦伯斯特称，杰斐逊曾这样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不适合这个位置的人。他对法律和宪法没有任何敬

意，他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领袖。他的野心非常可怕。”

在读韦伯斯特的文章时，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怀疑其准确性，并向杰斐逊的孙子提出这一问题。后者回复如下：

> 我不能假装知道我祖父对韦伯斯特先生说了什么，我也无法相信韦伯斯特先生会做出误述。但我仍然认为这段描写是不准确的，有些扬贬抑褒。我曾听祖父说起过对杰克逊将军军事才能的无比钦佩。如果他称之为“不适合这一位置的危险人物”，乃至全国上下都这样称呼他，我认为这一定是基于他的一个大体观点：军事领袖不适合担任当时我们国家这种和平共和国的领袖……他不希望看到人们轻易受军事荣耀所左右。

一直以来，杰斐逊都债台高筑。而在1819年，他仍以朋友相助之名与弗吉尼亚州州长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联合签署了一张20　000美元的期票。此乃绅士之举，也出于亲戚情谊：尼古拉斯的女儿嫁给了杰斐逊的外孙。

后来，尼古拉斯被迫违约，使这位前总统不得不背负起这笔债务。灾难般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外孙媳首次拜访蒙蒂塞洛，杰斐逊特意将她找来。她为此事感到羞愧恐慌，不知应如何面对杰斐逊。杰斐逊一从房间里走出，立刻就招呼她。“她听到杰斐逊的声音就马上奔过去见他。”兰德尔写道，“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切地握手亲吻，而是拥抱了她。他笑得很灿烂。”晚餐时他风度十足地同她交谈，这个年轻女子的羞愧感逐渐消失了。“当时以及接下来的任何场合，他都没有用一个字或一个表情使她觉得他对她父亲带来的厄运耿耿于怀。”

尼古拉斯州长的住处就在杰斐逊前往杨树林的途中，杰斐逊知道他不能不去拜访他。他们拐弯去尼古拉斯住处的时候，杰斐逊对他的家人这样说：“我不应该停留，我时间不够，但不去见他未免太无情了。”见到老朋友，杰斐逊表现得无可挑剔。“他没有展现出愁容，也没有假装格外高兴。”在尼古拉斯的余生中，杰斐逊始终一如往常地待他。在蒙蒂塞洛，一个爱管闲事的女人曾当着杰斐逊的面诋毁尼古拉斯。这位前总统礼貌但坚决地打断了她。他告诉她，他对尼古拉斯“评价很高，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这就是他的个人品格，而他公开的敌人却指责他自私、口是心非、野心勃勃且冷酷无情。

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迫使杰斐逊不得不去做这世上他最不喜欢的事：将命运交给他人。市场不景气，因此传统的融资渠道（寻找土地买主）已不可行。随后他灵机一动，帕茜说他“整夜不眠痛苦地思索”，而后想到发行彩票的办法。在向弗吉尼亚州议会的一次申请中，为偿还债务，他征求允许售卖有机会赢得他的土地、磨坊甚至蒙蒂塞洛的彩票，虽然一想到失去蒙蒂塞洛他就心惊胆战。这样做对他的尊严是极大的打击，但他别无选择。他的孙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负责处理此事。

这位前总统已有告退之意。在应邀给一位同名的年轻人提供忠告时，他写了一封比通常此类情况下长得多的信。信的主题不仅包括他自己，还包括如何高尚地度过一生。他写道："崇拜上帝，尊敬并珍惜父母。爱邻如己，无私爱国。要正直，要真诚。不要怨天尤人。如此你的人生才会开启通往永恒无尽福祉的大门。"

信中还有对《圣经·诗篇》第15篇的改写：

最伟大诗人笔下之善人，供效仿

耶和华啊，谁能有幸前往你的福地？
非作为生客到访，而是居住于此？
是所思所为皆遵循美德的人，
从不心口不一的人。
他从不造谣中伤，诋毁邻里声誉，
从不恶意传播谣言。
他身陷荣华富贵，却弃之如敝屣，
衣衫褴褛，却笃信虔诚。
他始终捍卫其誓言与信用，
宁愿吃亏，也不愿背信。
他的灵魂鄙视放债取利，
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始终如此之人，幸福必会眷顾他，
虽天动地摇，上帝将佑其永生。

信中还包括：

日常行为的10条准则

1.今天能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2.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他人。
3.决不花还没到手的钱。
4.决不贪图便宜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这其实会很贵。
5.骄傲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
6.我们绝不会因吃得过少而后悔。

7.只有心甘情愿才能把事做好。

8.对于不会发生的事切勿庸人自扰。

9.凡事讲究方式方法。

10.生气时，数到10再说话；极其生气的话，则数到100。

他晚年生活中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有关历史的小插曲，差点儿让他一命归西。一位纽约艺术家来到蒙蒂塞洛，想做一个杰斐逊的面部石膏模型，即活人脸模。然而，过程中出了岔子，石膏差点让他窒息。杰斐逊拼命敲打躺着的沙发旁边的椅子，终于让他的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发现了他处于危险中。一个奴隶救了他的命，正如此前也是奴隶改变了他的生活。

晚春的某天，杰斐逊想到了废奴，也许还有奴隶遣返问题，他写道："这项事业所需要的公众观念革命，是无法在一天甚至一个时代内发生的，但时间能够战胜一切，也终会战胜这项罪恶。"

1826年伊始，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出现恶化。"我的恶疾（一次严重痢疾）将我困在屋里、困在沙发上已经三个星期了。"1826年1月1日，杰斐逊给里士满的一位朋友写信这样说，"由于被要求卧床，我写得很慢、很吃力……身体因疾病而虚弱，精神因岁数而不济，我对83岁这个年纪有了深切体会。刚读完一页报纸，我马上就会忘了刚才读了什么。"但他仍坚持骑马，即使他在跨上他的爱马雄鹰时，必须让它站在台阶下，然后他才能坐上马鞍。

1826年夏，在《独立宣言》发表15周年纪念时，华盛顿庆祝活动的组织者非常希望当天能将杰斐逊请到首都。当时他已病重，无法同意这一请求，但他在沐浴着阳光的小屋里为庆祝此事写了封信。"所有人都已经或正在睁开眼睛关注着人权。科学之光已投向每个角落，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那就是，多数人并不是生来就背负着鞍具，少数人也不是生来就穿着带马刺的靴子，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下合法地凌驾于前者之上。对他人来说，这是希望的根本。对我们来说，就让每年的这一天始终提醒我们回忆起这些权利，以及对其永不消减的热爱。"

这是他对这个他协助建立并带领发展的国家的最后寄语。他与深交半个世纪的好友麦迪逊的告别则更私人化，但同样诚挚。在2月写给老友的信中，杰斐逊这样请求："死后，请照看我。"

然而，杰斐逊不认为死亡近在咫尺。在寄出给华盛顿7月4日纪念活动的关于自由的信后，他写了一封涉及个人爱好的信。信的内容关于红酒，他在信中为即将到港的物品向巴尔的摩海关安排交税事宜。

他活不到品尝这些红酒的时候了。不久，杰斐逊就卧床不起。他坚持阅读浏览《圣经》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作

品，陷入对这些伟大悲剧的思考。直到6月末，时间和疾病终于将他拽入深渊。

终点就在不远处。

第四十三章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

杰斐逊先生离世，举世皆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人为之添砖加瓦，传道授业，杰斐逊曾是其中一员。他离世后的世界将大为不同，他的离去触动着文明社会的芸芸众生。

——小丹尼·卡尔（托马斯·杰斐逊的外甥）

1826年6月24日星期六，杰斐逊忍着病痛给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写了便条，请他到家中看诊。收到便条后，邓格利森立即从夏洛茨维尔出发。当他赶到时，发现杰斐逊竟然拖着病体从卧室来到了客厅，似乎还想维持他们以往惯常的会面方式。

邓格利森将他扶回床上。这位医生说自己“非常担心这次的病是致命的。杰斐逊先生也这样认为。从这时起，他越来越虚弱，不得不卧床”。

此时，杰斐逊满心希望能实现最后一个愿望：他想活到7月4日。

在杰斐逊弥留之际，他的女儿白天陪着他，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和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晚上守着他。而那个从巴黎回来，做了他30多年女婿的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却避而不见。“他头脑很清楚——从不迷糊。”他的孙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说道，“他口齿也很清楚，对自己的身后事一一交代。”

杰斐逊告诉孙子自己对灵柩和葬礼的要求：禁止铺张，一切从简。杰斐逊希望举行一个简单的圣公会仪式，然后将他的墓地安置在蒙蒂塞洛的西坡。几十年前，他曾在那里安葬了达布尼·卡尔，后来他的母亲和妻子皆长眠在那儿。

6月末的最后几天，“轻骑哈里”亨利·李的儿子前来拜会杰斐逊。他此行的目的源于：他正在重新编撰其父的《战争回忆录》，这本书对战争期间作为州长的杰斐逊颇有微词。虽然已病入膏肓，杰斐逊仍不希望错过修正那段历史的机会。他邀请李于1826年6月29日到他休养的内室见面。

李到了蒙蒂塞洛，便被帕茜在主厅拦下，她说父亲病太重了，无法见他。李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了。他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哲学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人皆从他那里获益良多”。

得知李已经来了，卧病在床的杰斐逊仍然让人将他请进来。“我无法描述我看着‘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杰斐逊’时的感受，”李写道，“你会记得他躺在凹室里的样子：虚弱、痛楚，但你也不会忘记他脸上清朗、透彻的神情。”杰斐逊认出了李，他热情地从床上伸出手来。“他那一握的力量、他谈话中的精气神儿，都让我心生希望，觉得他仍能康复。他身上那种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的气质，让我觉得他能活得更久些。”

杰斐逊想帮助李，但已无能为力。他病得太严重，无法找出他曾承诺要给李的文件，那些文件里记录了他有关阿诺德、塔尔顿及康沃利斯的叙述。杰斐逊用充满哲学意味的大白话谈及死亡。“他举重若轻地谈到死亡的可能性——就好像一个人可能遭遇一场大雨——这种事情并非人心所愿，但也没什么可惧怕的。”

李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凹室里有飞来飞去的苍蝇，杰斐逊却自己挥手驱赶，不让围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帮忙。

杰斐逊尽可能地要自力更生。“伦道夫夫人后来告诉我，这是他的习惯——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无能为力这一概念，他要与岁月抗争。”李写道。在离开内室来到大厅后，李再也没有见过杰斐逊。

杰斐逊的房间在以前是那么的私密，在他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这里反而变得人来人往。他跟家人一一道别。面对8岁的小外孙时，他微笑着说：“乔治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向一个重孙女引用了《路加福音》里的话：“主啊，现在就让你的仆人安心离去。”

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认为他看上去好些了，但杰斐逊不以为然。“千万不要认为我对最终的归宿没有丝毫准备。”杰斐逊说，“我就如同一枚老化的机械表，不是这儿的齿锈了，就是那儿的轮坏了，直到最后走不动。”他已经接近自己曾经描述过的“永恒的睡眠状态——不管有没有梦，它都在我们死后等着”。

他被一阵声响吵醒，好像听到了弗雷德里克·哈奇牧师的名字。他问是不是这位教区牧师来了。他被告知对方并未到来。杰斐逊翻了个身，说道：“把他看作一位友善的好邻居，我可以见见他。”

杰斐逊为女儿帕茜作了一首诗，在诗中他婉转地提到自己将与帕蒂和波莉重聚。他将这首诗放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中，直到他去世，帕茜才开启。

生命之光将熄，梦想即逝；

我的至爱亲朋，何须泪流心伤？

我将至先祖所在，坦然去向彼岸

我心之所愿将实现，我心之牵挂将安放。

亲爱的，再见了，我的爱女，永别了！

与你分离是我生命最后的哀伤！

两位六翼天使，已守候良久；

我会带着你的爱，与之同归彼方。

躺在凹室的床上，杰斐逊回味着独立战争，喃喃地讲述着波澜壮阔的故事。最小的细节都能令他回忆起最轰轰烈烈的斗争。他提到，他的床帐是1782年战后的第一批进口货。

杰斐逊的部分意识也许已经快速回到了过去，再次听到了城镇自治议会的声音、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声音、总统官邸的声音。然而，他的另一部分意识牢牢地留在了当下。他在暗暗计算着时间，即使希望渺茫，仍然盼着自己能挺到7月4日，看到《独立宣言》发表的第50个纪念日。

“再多几个小时，医生，然后一切就可以结束了。”他曾强打着精神这么说。

7月2日5点45分，他喝下掺了鸦片酊的烈酒。3个小时后，他喝了兑了药的茶，过了4个小时又喝了掺了药的白兰地。钟表的嘀嗒嘀嗒声让他半睡半醒。

到了3号晚上约7点的时候，他问邓格利森：“医生，你还在那儿吗？”其实，杰斐逊最关心的是时间：“是4号了吗？”

“马上到了。”邓格利森回答道。

杰斐逊服下他最后能承受的鸦片酊剂量，喃喃道：“哦，上帝！”

又过了两小时，夜里9点了，邓格利森让他再服用一点儿药物。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杰斐逊说道。

午夜前的那三个小时格外煎熬。杰斐逊于3号夜里醒来，询问道：“现在是4号吗？”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沉默着，因为还不到。杰斐逊又问道：“现在是4号吗？”他得不到答案不罢休。特里斯特不想让这个老人失望，他点了点头，撒谎道，是的，现在的确是4号。“嗯，”杰斐逊说，“正如我所愿。”

也许杰斐逊知道那不是真的。出于某种原因，他知道实际上还不到他的《独立宣言》的纪念日，起码那一刻还没真正来临。所以他继续坚持着，一息尚存。

终于，杰斐逊卧室的钟表响了12下，标志着7月4日的到来。

意识游离中，杰斐逊似乎又回到了往昔峥嵘的岁月，他嘴里念叨着安全革命委员会，手里比画着，好像在写字。“让委员会提高警惕。”他念念不忘的是危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然在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战，只不过这次是在他飘忽的臆想中。

凌晨4点，杰斐逊给了照顾他的奴隶们最后的指示。他最早的记忆，是自己被放在枕头上交给了一名奴隶，而他生命最后的言语也是对奴隶说的。他的一生为了变革而奋斗，见证了无数变革，而有些东西在他的人生终点却依然如初。

10点，杰斐逊有些动静，他盯着一个孙子看，想示意些什么，但对方没能明白他的意图。最终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弄清楚了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把头抬高。伯韦尔按照杰斐逊的意愿给他安顿好姿势。一个小时后，他干涩的嘴唇动了动，但已经无法说话。他显然非常痛苦，他的一个孙子用一块湿海绵给他润了润嘴唇。

结束了。1826年7月4日星期二，12点50分，托马斯·杰斐逊逝于自家的床上。他逝世的地方离他的出生地沙德维尔3公里，当时那里还是大英帝国的附属地。

他走的时候，眼睛睁着，盯着他心爱的凹室。虽然他在外面的世界战斗，获得了不少胜利，他也爱着那样的世界，但每每遇到风浪，这里才是他的避风港。

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抚摸着他外祖父冰冷的肌肤，轻轻地合上了这个巨人的眼睛。他的头发依然是褐色的，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静静地剪下一缕，为家人留作纪念。约翰·赫明斯制作的木棺已经准备好。他的遗体被搬入木棺，然后被庄严地抬到客厅。

“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父辈，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戴他，尊敬他。”小丹尼·卡尔在一个星期后给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的信中写道。悲痛的詹姆斯·麦迪逊致信特里斯特：“作为出色的科学家、自由的信仰者、爱国主义的模范以及为人类文明的贡献者，他活在并将永远活在有识之士和正直之人的记忆和感激之中。”一名弗吉尼亚大学古代语言学教授说：“他值得每一个因在他的大学里接受教育而获益的人的尊敬。作为生于弗吉尼亚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应该被永远铭记。他伟大的事迹写入了他为自己所作的碑文中。”

园丁沃姆利·休斯在山的西边挖了坟地。葬礼举行时，天色阴沉，人们聚集在蒙蒂塞洛送他最后一程。送葬的人很少，杰斐逊不希望举办隆重的葬礼。夏洛茨维尔那所大学的一名代表来晚了，错过了最后的仪式。

一小队他的家人、朋友和奴隶将他的木棺从房间护送到墓地。哈奇牧师在那里宣读了祷告词。

仪式按照《圣公会祈祷书》举行。“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哈奇读道，“‘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巴黎的承诺得到了兑现。杰斐逊在世时以及在遗嘱中都遵守了对萨莉·赫明斯的许诺。杰斐逊和萨莉的孩子中有4个活到了成年。19世纪20年代早期，杰斐逊允许贝弗利和哈丽雅特离开蒙蒂塞洛，据说这两个孩子后来过着和白人一样的生活。他们的儿子麦迪逊·赫明斯曾说：“哈丽雅特嫁给了华盛顿一个有身份的白人，并生儿育女，据我所知，在她生活过和现在生活的社区，没有人怀疑她的孩子有丝毫非洲血统。”在杰斐逊的遗嘱中，予以麦迪逊和埃斯顿自由之身。麦迪逊最终移居俄亥俄州；埃斯顿则定居在威斯康星州，并改名为埃斯顿·杰斐逊，宣称自己是白人。杰斐逊的遗嘱中还给了赫明斯家中另外三个人自由：伯韦尔·科尔伯特、约翰·赫明斯以及乔·福西特。除了赫明斯一家，他没有给其他奴隶自由。

萨莉·赫明斯在杰斐逊去世的时候已经52岁，很快她就搬到了夏洛茨维尔，过上了安宁、自由的生活。杰斐逊的遗嘱中没有提到她，但是很显然，相关遗愿在暗地里清楚地传达给了帕茜以及其他子嗣：对萨莉·赫明斯要以礼相待。1834年，帕茜给了赫明斯“自由”——非官方的解放，实际上萨莉在杰斐逊去世后就已经是自由身了。此后不久，萨莉于1835年去世，她遗赠给子女一些杰斐逊的纪念品：一副眼镜、一个墨水盒以及一个鞋扣。

杰斐逊一生中最没有把握的事情只有一件：他想用彩票保住负债累累的种植园，但他去世时这些彩票并没能帮他解决债务问题。那时，他的彩票在100万～200万美元（按照21世纪前期的货币值计算）。负债如此庞大，蒙蒂塞洛和他的奴隶们都被卖掉抵债。杰斐逊的思想和公共事业流传于世，而他的私人世界却未能得以留存。

在杰斐逊去世的同一天，600英里外的约翰·亚当斯也去世了。他同样也是在家中的床上逝世。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将这个巧合称作“冥冥之中的天意，可见可感。因此我对世界的主宰心存感激，暗暗敬仰，他面前的我卑微渺小”。丹尼尔·韦伯斯特要在波士顿的法纳尔厅致悼词，他在某天早餐前写完了悼词。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眼泪浸湿了纸张。”致辞当天，波士顿阳光明媚，总统亚当斯也亲自出席。韦伯斯特的致辞令杰斐逊和亚当斯与美国先贤们比肩，他们伟人的形象，永远保持欢心雀跃：“在我们的第50个纪念日，在50年大庆的日子里，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欢呼雀跃，感恩节的致谢辞又再次响起，他们的名字在人们口中传颂，就在那时，他们携手飞向了天堂。”

在病榻上，约翰·亚当斯最后的遗言提到了他的老对手兼老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不会死。”

是的，杰斐逊永垂不朽。

后记

所有荣耀归于杰斐逊

> 杰斐逊遵循的信条是光明之源，因为它们并非构建于纯粹的理性之上，而是源于灵感、冲劲、视野和同情心。它们在心灵的激情中得以燃烧。
>
> ——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

他的一生是艰难存活的一生——在很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他刚离世，就和亚当斯一起因为1776年美国大革命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在美国人看来，这场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无可争议。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爱德华· 埃弗里特曾于1826年在一篇颂文中写道："通过一次简短而果断的行动，表达了各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家庭的集体意志和决心；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宣言中，展现了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运动的崇高目标、动力和缘由，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的荣耀。"

杰斐逊完成的杰作在于为人类的思想和心灵创造出了一套不完美但能够持续的民主惯例。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经写道："杰斐逊先生认为美国体系应该是一个民主制度，他宁愿看到整个世界消亡，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对于他而言，值得全人类拥有的原则无法实现。汉密尔顿先生则认为民主是主要祸根，希望能阻止它的进程。"

当外祖父的死讯传到纽约时，埃伦·库利奇正在从波士顿前往夏洛茨维尔的路上。葬礼结束很久以后，她才来到了蒙蒂塞洛。对于她来说，这个曾经的家园现在无比陌生。"他走了，"多年后，她在写给亨利·兰德尔的信中，回忆起这次归乡的痛苦，"他的房间空了。我去了他的墓前，但蒙蒂塞洛的整座房子，它那高耸的屋顶和宽敞的房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巨大的墓碑。"

这就是杰斐逊的力量。埃伦依然期望他随时能出现在她的面前，能听到他的声音，望着他的眼睛，再次感受他的爱抚。"我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游荡，像在寻找他一样。"

> 在我生命的最好年华中，难道未曾在那里见过他吗？我在他的卧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好像只是离开了那个房间。那里还摆放着他睡了好多年的床，还有那把椅子——每次我走进房间，他都在上面坐着。还有仍放在原处的几件衣物，他的钟伴随他度过了多少个充实的日夜。旁边的橱柜放着他的书，是他闲暇时挚爱的伴侣，还有他的书桌，我从上面拿走了几件小遗物、一些信笺和碎纸片，如今仍然保留着。目睹这一切，感觉他似乎只是不再在这里居

住了而已，某些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等待他的归来。

当时的她处于一种奇妙的梦境般的状态。

> 刚开始的很多天，我似乎都在注意听他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在餐厅里，我们曾经一起度过很多时光，冬天时他总是会坐在火炉旁的那把矮扶手椅上，旁边还摆放着那张小圆桌，上面会放着他的书或者蜡烛……茶室里还放着那张沙发，夏天的时候我经常陪他一起坐在那里。客厅宽敞的木地板上还矗立着那把紫苏木椅，我经常看到他坐在那里，在暮色的阴影中休息。大厅里有大大的玻璃门，天气不好时，他喜欢在那里散步。我曾经多么喜欢和他一起散步啊！睹物思人，似乎每个角落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无形的存在。

最终她离开了那幢房子，也离开了那座庄园，再也没有回去。对于她来说，她的外祖父永存于她的心中和脑海里。

同样忘不了他的还有埃伦所在的这个国家。1826年的这个夏天，美国民众和他悲痛不已的外孙女一样，都在缅怀他。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在1874年写道："如果杰斐逊错了，美国就错了；如果美国对了，杰斐逊就是对的。"

对于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来说，这都是难以承受的重任。但这一结论赢得广泛认同，因为去世后的杰斐逊和他生前一样，依然是一个生动鲜活、魅力非凡的人物，他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伟大不朽的同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如果你很难想象和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同饮一杯葡萄酒的情形，但你会觉得和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这样做却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起饮着酒，四周尽是法国画作、来自费城的半身像和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带回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工艺品。

杰斐逊的声音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因为他生前的声音是如此有力，又如此发人深省。他当时身处的环境的确特别，但他劳神苦思的事情却总是离不开自由和权力、权利与义务、维护和平和发动战争这些主题。他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身处一个政治与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且依旧是中心的国家。正如杰斐逊他本人写的："人……应该能感受到自己是政府事务的参与者，而并非只是参加了一场选举。每年不应该只有这么一天，而是每天都应如此。"

如果他只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影响力不会那么持久；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立法委员，或者一个外交官、发明家、教育家，或者单单只是一位总统，他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难以忘怀。

他之所以与世长存，是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所能经历的各种各样让人惊叹的可能性——渴求知识、创造的能力和亲友的爱；渴

望取得成就，获得世界的赞赏、对权力的控制和让他人服从于一个人的远见。他的才能体现于他的全知全能，而他更伟大的政治遗产则在于他对思想和人类的领导力。

出于他的才华横溢、卓越功勋和声望，他得以万古流芳；但由于他存在缺陷，会遭遇失败，才让我们意识到他也终有一死——虽然他成就卓越，却和我等凡人一样，也会受到诱惑，也会面临妥协。他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一位政治家，也没有哪个人是万能的。

我们意识到了他的伟大，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不可能无可挑剔，但杰斐逊通过了领导力的基本考验——虽然他也有弱点，也不可避免地会让民众失望，会犯错误，会推迟梦想的实现，但他让美国和整个世界比他初涉公共事务之时都有所改善。

杰斐逊是最令人着迷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会让人心生敬畏，约翰·亚当斯会让人肃然起敬，而杰斐逊的风度和好客，他的品味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于银器、艺术、建筑、园艺、食物和美酒的热爱，都让他本人更加丰富鲜活，更加欢快友好。

19世纪的主张脱离联邦者和20世纪的州权纯化论者都认为他是个英雄，进步的领袖们——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都相信他体现了美国传统中受民众欢迎的政府的最佳动力。

那么他到底是谁？用最简单平实的方式描述，唯一一个真正的杰斐逊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爱过、领导过，于1826年一个潮湿的夏日，在一个木制灵柩中被抬进了他的坟墓的人。真正的杰斐逊和我们当中很多普通人一样，身上充满了矛盾、互相冲突的情感、缺点、罪恶和美德，这些永远无法共存的因素。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的是他对于权力和控制的渴望。他一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这些渴望，就连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最机敏的观察者都难以察觉。亨利·亚当斯写过：“他追求的领导力是基于同情和爱的领导力，而非发号施令的领导力。”但这并不属实。对于他来说，同情和爱是他的政治圈成员们要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这个目的就是控制权力。如果他发现感情不足以得到他想拥有的权力，他便会利用其他途径达到统治的目的。

而其他诸多版本的杰斐逊——有象征性的杰斐逊，有各种寓意的杰斐逊，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党派阐释和创造出的杰斐逊，他们试图从他的榜样形象中获得鼓舞，以他的名义获得认可——所有这些杰斐逊更多地体现出了真实的我们，而非真实的他。他可以被许多人引用，而且永远都会如此。

最伟大的人皆如此。人们会谈论和想起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发人深省，他们领导的战役让人难忘，他最重要的继承者们已从他在自由和联合方面的远见定义了他。当然，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在他身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肯塔基决议案》的作者这两个身份之间进行选择，就

意味着要大力宣扬他认为主张脱离联邦对于美国是致命这一观点，而不是强调他曾经书写过拥护州权的文字。

杰斐逊的最杰出的继任者们做了这些选择和决定，创造出了一个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代表着美国精神的精髓和最佳政治可能性的杰斐逊。

1859年4月初，身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亚伯拉罕·林肯谢绝了波士顿一个团体让他在杰斐逊诞辰庆祝活动上发言的邀请，但写了一封致辞。这给了林肯一次机会，让他能在联邦的危难时刻，将杰斐逊和自由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信中写道：“杰斐逊的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但遭到了否定和回避，连一丝成功的迹象都没有……那些否定他人自由的人，自己也不配拥有自由，而且在公平的上帝面前，也无法长久拥有自由。”

一位曾经的奴隶主就在这封信中成为自由的象征，不仅象征着白人的自由，还象征着黑人的自由。以林肯的观点，这就是杰斐逊的远见的核心思想。他还为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大唱颂歌，称赞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将理想变成了现实。“所有荣耀都归于杰斐逊，”林肯说，“归于这个伟大的人，在一场单一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压力下，他能冷静沉着，有预见，也有能力将一个抽象的真理写成一份革命性的文书。这份文书适用于整个人类，适用于所有时代。这让它得以流芳百世，在今天，乃至日后的将来，都能成为再次出现暴政和压迫时，对其进行谴责的依据和阻碍。”

70年后的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效仿1859年的林肯：他也披上了杰斐逊神圣的外衣。在明尼罗达州圣保罗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伟大的金融才能或者早期联邦主义者这一思想流派，仅仅因为他们向来坦率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认为国家的某些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的某些个人比其他人更适合领导政府。杰斐逊的目的是要教导整个国家，联邦主义的团结是不完整的团结，只能代表少数人。要想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度，每个部分中所有团体的利益都应该得到重视，而只有实现了大范围内的全国团结，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罗斯福本人作为政治高手，自然欣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他认为杰斐逊“被称为政治家，是因为他多年致力于建立一个政党。但这种努力本身是为了将国内的不同派别统一起来，以支持共同的原则而做出的确切和实际的行为。当人们或草率或势利地嘲笑政党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政府的政党制度是实现统一，并教导人们以文明之共同方式进行思考的最伟大的方式之一”。

杰斐逊的话语是美国语言的最基本组成部分。1948年9月，在得克萨斯州博纳姆的博纳姆中学橄榄球场，也是时任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家乡，哈里·杜鲁门在演讲中也借助了杰斐逊的力量：

> 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充满无限信心。我相信他们的常识，他们热爱自由，而且对于自由和公平的爱并没有消亡。我们的人民就像杰斐逊一样，相信当今人类并非生来就背负着鞍具，供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驾驭。
>
> 就像杰斐逊一样，我们相信“给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样给了我们自由”。我们保护我们自身的自由，不被国外威胁剥夺我们自由的人的侵犯，也不会向国内威胁剥夺我们自由的人妥协。我们不会放弃民主，让位给左翼的独裁政权，也不会让它被享有特权的专制主义夺去。

1988年12月，罗纳德·里根在自己总统任内的没落时期，来到了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的草坪上对学生发表演讲。对于里根来说，杰斐逊纯粹的共和主义政治和有关联邦政府的局限性的论断长久以来都被视为金科玉律。

里根先是向杰斐逊“变革性的才能”致敬：“对于科学的追求，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对于自由发问的珍视，简而言之，重视精神生活这一思想——是的，这些影响深远、恒久不变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原则，最初从一位高大、浅色头发、为人友善的男士那里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和最伟大的体现。他目睹这所大学从他居住的山腰间成形，这所大学的成立被他称为漫长而有意义的人生中至高无上的成就。”

并非只有这所大学的人（以前只有男性，现在又有了女性）能感受到这位伟人鲜活的灵魂。“各届总统也能感受到。”里根说。杰斐逊是他的继任者们永恒的守卫者，因为“从草坪径直下行，穿过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就能看到杰斐逊纪念堂里四面整齐排列的经典语句。里面那座高19英尺的塑像的双眼直视着白宫。这所房子里曾经居住过的那些雄韬伟略且宽宏大量的人，现在却越发罕见。对于任何一个会入主其中的人而言，它的存在都是一个提醒”。

具有远见卓识的里根本人骨子里带有几分务实，作为一位政治理想的机敏沟通者和改革性的领导者，凭直觉就能理解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他知道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里根说，“的确，作为领导武装斗争出身的领导人，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他的话，他本身可以说就是秩序的缔造者。但他也相信，上帝赠予人类启蒙之厚礼，赋予人类理性，使人类有能力从生活的混乱中汲取意义、真理和秩序。”恐怕杰斐逊本人都无法将这一点阐释得如此清晰。

从罗斯福到里根，即便他们对于政府和文化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杰斐逊都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改变的不是杰斐逊，而是他的国家，一会儿向这个方向前进，一会儿又往那条道路前行。而对于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议程、一种又一种远见而言，杰斐逊一直是指路的北极星，就像真正的杰斐逊执政时会做的任何事一样，引领着美国在他所处时代的暴风雨中前进。

但有一点很明确地贯穿始终，那就是他的继任者们都这样理解杰斐逊的：他们都像他一样，相信言语在公众生活中的力量，在塑造大众舆论以及在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在最艰难的时期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强大。

杰斐逊要求在自己墓碑上刻下的三项个人成就分别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的执笔者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这体现了他对于思想和心灵的自由的热爱，以及他对于未来的信念。它们体现了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所受争议最少的成就，体现了理性的至高地位、自由的诸多可能性和对于智慧的永恒追求。它们也体现了他对于事物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他曾为其中每一项事业而奋斗，让世界上足够多的人信服，他的远见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留下一直存在的纪念碑。而杰斐逊留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国家——无论多么漫长、多么痛苦，它都一直致力于在一个由野心和私欲驱使的政治界里实现着理想。

因为杰斐逊从未放弃过美国——这个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他参与创立，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度过重重危机的国家。他曾在1824年写道：“我目睹着这个文明从海边前进，像一团光明的云朵一样越过我们头顶，增长我们的知识，改善我们的境遇……而且无人知晓这一进程将在哪里停滞。”

杰斐逊按照他希望的样子安排着这个世界，直至他生命的终结，甚至持续到身后。他于1826年仲夏离世后，他的遗体被抬着经过蔓延的西草坪，经过柳树，越过山丘，到达墓地。这块公墓自然是他亲自设计的，这里埋葬着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们和最好的朋友。他也要将自己埋葬在这里。

小小的坟墓坐落在山峰西侧。到了黄昏时分，夜幕似乎降临得十分缓慢。东侧的阴影在里瓦那河和沙德维尔上空拉长，降落在蒙蒂塞洛和马尔伯里罗上空，笼罩着他的亭阁和花园，最后才停落在托马斯·杰斐逊——这个永远热爱光明的人的身上。

作者摘记及致谢

1803年年底，法国驻华盛顿的代理大使路易·安德烈·皮雄起草了一份关于杰斐逊总统的特殊信函，寄给了巴黎的外交部。皮雄在信的开头写道："部长先生，要针对杰斐逊先生的品格进行一个明确的判定是很困难的。同样，也很难评估他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

的确如此，但也并非不可能。我希望，这本书既不会神化杰斐逊，也不会控诉他，而是将他还原为他所扮演的那个全面而丰富的角色——不会被轻易划分为某个类别的美国政治家。

近些年来，对于杰斐逊的评判从未停息。1998年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和后来进行的学术评估表明，他和他的奴隶萨莉·赫明斯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性关系——这种通奸关系长久以来被主流白人历史学家否认，而这一发现也让杰斐逊作为一个伪善者的面目变得更加鲜活。几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备受赞誉的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的传记都理所当然地强调了其主人公的美德，但经常是以诋毁杰斐逊为代价（引发这一趋势的是我的朋友约瑟夫·J·埃利斯，始于他20年前出版的《激情智者——约翰·亚当斯的品格和遗产》一书）。但即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杰斐逊也曾面临貌似互相矛盾的指控，他曾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哲学家，同时却还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政治人物。

杰斐逊本人的真面目（正如许多人一样）是很复杂的。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伟大的人物，也是为人铭记的总统，但只有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冷静而又理智的他无法抵抗政治斗争的热潮，他将自己阐述得精妙绝伦的理论原则付诸选举和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治理国家这些现实之中。许多美国人视他为偶像，但其他人则和曾给他写过匿名信的人同仇敌忾："你是上帝创造的最该死的蠢货，见鬼去吧！"

我的观点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托马斯·杰斐逊从本质上来说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谋求官职，一旦即位，就会尽力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就会在自己所能影响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为未来设定一个发展路线。他能极有技巧又很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人生中值得赞誉之处，我认为这也是他留给人类的遗产的实质。倘若当时没有一位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依靠自己坚信的原则和惯例反对联邦主义者的利益——杰斐逊自然就是一位这样的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美国的生活和政治可能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当时的杰斐逊作为一位政治家，是一个站在历史城墙上的人物，为了某种思维习惯和政府而战，这个政府

最终能让多数人而非少数人都有自己可扮演的角色。

我并没有试图将杰斐逊完整的人生轨迹记录下来——仅用一本书记录下诸多发生在他身上和周围的事件，对于那些致力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众多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本书更像是描述他作为一个人在其所生活的世界，所希望追寻的目标。我通过阅读和研究发现的杰斐逊是一个有着文艺复兴情怀的公众人物，但也有长久以来最为困扰他的忧虑——民主共和主义制度在美国的命运。

最引人注意的事会发生在最不寻常的政治家们身上——他们是那些在时间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竭尽自己所能的人，他们的错误是个人的错误，同时也是人类普遍会犯的错误。但成就斐然的总统们大多都能超越这些局限，克服那些错误，以使这个国家与之前相比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国度。对于他们的考验不应该以完美或是否能进英烈祠为标准，因为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也不能。

但他尽了全力。他的付出虽然并没有实现持久的人类自由，但至少给它下了一个定义，也指出了美国登上全球霸主的途径。

我相信，如果不能理解他有多么严肃认真地对待美国式的尝试会时刻走上穷途末路，以及对君主政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懂他。从乔治·华盛顿本人说起，同时期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将杰斐逊对于君主政体的恐惧归因于他富于幻想、偏执多疑，至多是夸大其词到不负责任的地步。但是，基于我对杰斐逊的论著以及美国、英国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我认为英国权力会在美国复苏这一威胁对于杰斐逊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其重要程度不亚于与苏联的冷战对于从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的影响。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准确，毕竟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在敌友之间不断转换。但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比喻则是杰斐逊对于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意义相当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的意义——一位改革了政府的现有路线，但从本质上是认可了的总统。

如果不能体谅和理解，英国内战的事件和影响长久以来在杰斐逊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想象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理解这位历史人物。辉格党传统中的个人自由的重要地位闻名已久。并未受到较多关注的是在杰斐逊的信函中诸多战役和斗争事件发生的频率——这一迹象显示战争和英联邦（当时是君主政体复辟后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命运一直存在于杰斐逊的意识里。一般来说，政治家们都会记住值得借鉴学习的榜样和希望能避免的教训。对于美国，杰斐逊既不想让它受克伦威尔式的专制统治，也避免查理二世1660年的复辟在这儿上演，更不会发生威廉和玛丽1688年的“光荣革命”——两个君主分享了特权，但依然都是最高统治者。杰斐逊认为，这些结局都过于似是而非。

我的研究项目始于在普林斯顿与芭芭拉·奥伯格一次愉快的共进午餐。她是杰斐逊论文项目的编辑，该论文项目是美国一项最为艰巨又最

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芭芭拉和她的同事们热情慷慨，给我提供了很多信函的电子文件，用以讲述1803年年初以后杰斐逊任期内发生的事件。任何要研究杰斐逊或早期美国的人都受惠于始于1950年出版的第一册的论文中富有启发性的评注。芭芭拉和她的团队在继承朱利安·P·博伊德开始的这项传统工作中表现出色。我尤其要感谢玛莎·金和伊莱恩·帕斯库，她们都协助芭芭拉查阅了我的书稿。

从1809～1826年杰斐逊辞世期间的论文属于“退休系列”的论文，正在夏洛茨维尔进行编辑。在一个美妙的星期六下午，主编J·杰斐逊·卢尼抽空回答了我的疑问，并和我一起讨论了和杰斐逊有关的事情，对于我之后所提出的疑问也总是很有耐心地解答。我十分感谢他和他在弗吉尼亚的同事们。

在本书写作期间，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主席莱斯莉·格林·鲍曼一直非常热情且孜孜不倦地帮助我。我很感谢她的善意、热情和深刻见解。同样还要感谢她的丈夫科特兰·诺伊霍夫能够忍受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还要借他的衣服穿。莱斯莉的诸多善举中还包括带我一起骑马，走过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必经之路。据我所知，对于我糟糕的骑术，她费了很大劲儿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我得到蒙蒂塞洛太多人的慷慨相助。苏珊·斯坦花费了不少时间，为我提供了很多专业知识。安德鲁·杰克逊·奥肖内西和梅拉妮·鲍耶也是如此。我还要感谢蒙蒂塞洛参考文献管理员安娜·伯克斯和考古学主管弗雷泽·奈曼。

写作期间的最大乐趣之一便是于2011年11月获准在夜间和清晨时分入住蒙蒂塞洛，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恩赐，让我尽可能地近距离体验和观察这座杰斐逊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物质文化遗产。我非常感激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在批准我进入房屋的请求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博物馆工作人员协助安排了这次活动，并带领我细致地参观了杰斐逊在此居住期间的房屋，因此我要感谢苏珊·斯坦以及博物馆项目的高级馆长兼副总裁理查德·吉尔德，感谢馆长伊丽莎白·V·丘和馆长助理约迪·弗雷德里克森，同样感谢安保部门主管巴里·克莱特，以及弗雷德·奥布赖恩，布赖恩·格洛弗和特雷尔·汤普森。

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很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帮助。我要尤其感谢参考书管理员德尔·穆尔、殖民地威廉斯堡图书馆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戴维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凯瑟琳·A·路德维格。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是我主要的资料查阅地。我要尤其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艾尔玛和保罗·米尔斯坦美国历史、当地历史和宗谱的部门。斯蒂芬·施瓦茨曼大厦的私有财产（他们收藏的缩微胶卷），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其他部门也为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还有南方大学的杰西·鲍尔·杜邦图书馆的员工。还要感谢戴维美国革命图书馆、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安大略档案馆、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反独立者收藏以及英国德文郡埃克塞特的德文记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在法国外交档案馆工作的梅利莎·洛和汤姆·斯坦默斯，为我翻译了手稿。梅利莎还在英国和路易莎·托马斯一起开展档案工作。我也很感激杰米·约翰斯顿、斯蒂芬妮·戈顿、科尔比·亚内尔、马修·普赖斯、凯特琳·沃森、张宝宝（音）、杰西卡·加拉格尔，感谢他们抄写手稿资料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参议院历史办公室的历史学家唐纳德·A·里奇和他的同事贝蒂·科伊德。

编写和杰斐逊有关的书，永远都不会有止境，这是件好事。想要了解针对杰斐逊奖学金现状的有见解的、易得到的、细致调查的读者，可以在编辑弗兰西斯·D·科利亚诺搜集编著而成的《托马斯·杰斐逊指南》一书中找到答案。该书作为“美国历史布莱克韦尔指南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出版。弗兰克·科利亚诺十分热情，给了我慷慨的帮助，他所编辑的这本书极有价值。其中所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安妮特·戈登–里德、迈克尔·A·麦克唐奈、克里斯托弗·雷、罗伯特·G·帕金森、彼得·汤普森、约翰·A·拉戈斯塔、约翰·N·尼姆、伊恩·麦克莱恩、托德·埃斯蒂斯、乔安妮·B·弗里曼、罗伯特·M·S·麦克唐纳、杰里米·D·贝利、伦纳德·J·佐土、安德鲁·伯斯坦、安德鲁·凯顿、露西娅·司坦登、卡桑德拉·派伯斯、凯瑟琳·克里森、比利·L·韦森、理查德·塞缪尔森、凯文·J·海斯、戴维·托马斯·寇尼格、汉娜·施潘、卡罗琳·温特若、彼得·S·奥诺夫、R·B·伯恩斯坦、麦克斯·M·埃德林、卡梅伦·阿迪斯、马修·E·克罗、芭芭拉·B·奥伯格、詹姆斯·P·麦克卢尔、布赖恩·斯蒂尔和杰克·N·拉科韦。

我十分感谢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为我提供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友情，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在不同方面为我提供建议。埃文·托马斯和迈克尔·贝施洛思永远都是那么慷慨无私，欧斯茨·托马斯和艾菲·贝施洛思也是一样。

安妮特·戈登–里德所著的有关杰斐逊和赫明斯家族的著作为美国历史做出了里程碑一样的重大贡献。对于我来说，她是位令人称赞的好友和珍贵的读者。苏珊·克恩曾写过一本讲述杰斐逊出身的杰作——《沙德维尔的杰斐逊家族》。她大方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和我一起待在沙德维尔的遗址，并阅读了我的部分书稿。露西娅·辛德·司坦登帮我们安排了那次活动以及其他很多事务。我长久以来视为偶像的戈登·S·伍德也很慷慨地抽时间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供了珍贵的见解。

在蒙蒂塞洛时，辛德·司坦登和苏珊·斯坦都阅读和评论了我的书稿，大大改了书稿质量。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彼得·奥诺夫，被研究杰斐逊和美国历史的一代甚至两代学者都视为导师。他仔细阅读了我的书稿，做出了有用的评论，就像我的其他读者一样，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奥诺夫教授还在本书成稿时给予了祝福，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2012年，我有幸受邀出席由美国革命之子联合会和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在夏洛茨维尔举办的会议，会议名称为“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历史缔造者的传记”。此次聚会非常适合向奥诺夫致敬。对

于组织和协调此次会议的人，我很感谢安德鲁·奥肖内西，他是国际研究中心的桑德斯主管及相识多年的好友；感谢西点军校的罗伯特·麦克唐纳；感谢联合会的约瑟夫·W·杜利。关于杰斐逊的论文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我从其中以及芭芭拉·奥伯格主持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中受益匪浅。麦克唐纳教授也和克里斯蒂娜·科威尔·麦克唐纳合著了一篇论文，他正在为新一册的论文集做准备。做出贡献的人还包括杰斐逊·卢尼、安德鲁·伯斯坦、南希·伊森伯格、扬内·B·弗里曼、简·艾伦·刘易斯、理查德·A·塞缪尔森、布莱恩·斯蒂尔、赫伯特·斯隆、安妮特·戈登–里德、弗兰克·科利亚诺、R·B·伯恩斯坦以及戈登·S·伍德。

这一路走来，还有沃尔特·艾萨克森、亨利·温塞科、保利娜·梅尔、罗恩·切尔诺夫、约瑟夫·J·埃利斯、丹尼尔·乔丹、肖恩·威伦茨、戴维·麦卡洛、安德鲁·伯恩斯坦、南希·伊森伯格、斯泰西·希夫、罗伯特·A·卡罗、多里斯·克恩斯·古德温、加里·E·莫尔顿、迈克尔·克兰尼施以及后来的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都是无私的读者、顾问、讨论者和编辑。当然，为本书内容负责的自然是我。

以下诸位无论给予过我多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感谢理查德和丽莎·普莱普勒、乔纳森·卡普、约翰·休伊、茱莉亚·里德、玛丽·斯迈思、马克·米勒、克拉拉·宾厄姆、安娜·昆德伦、汤姆·布罗考、佩里·佩尔茨、艾瑞克·鲁滕伯格、格雷顿·卡特、约翰·丹福思、加德纳和尼古拉斯·拉帕姆、米卡·布增金斯基、乔·斯卡伯勒、威利·盖斯特、迈克·巴尼克尔、安·埃德尔伯格、艾利克斯·考森、凯特·切塔、萨莉·奎因和本·布拉德利、琳达和莫特·詹克洛、艾丽斯·梅休、理查德·施滕格尔、南希·吉布斯、珍和布莱恩·威廉姆斯、杰弗里·利兹、克莱尔和约翰·瑞施曼、莱斯莉和戴尔·理查德森、哈德威克·考德威尔、塔米·哈达德、克洛艾·杜普利、芭芭拉·迪维托里奥、比尔·欧文斯、杰弗里·法格、丽贝卡·普拉特、乔治·吉列姆、塞缪尔·R·威廉森、姬蒂·布恩、贝齐·费希尔、戴维·格雷戈里、尼尔·夏皮罗、艾利森·斯图尔特、韦恩·菲尔茨、莱诺拉·费希尔、理查德·科恩、罗布利·胡德、鲁比·沃克、莎玛·艾丽、马德琳·马吉、罗杰·赫托格、诺拉·弗朗西丝、沃恩·麦克雷、查利·罗斯、吉姆·凯利、迪娜和里克·鲍威尔、凯文·施开、贾斯廷·雷诺兹、特雷莎·史密斯、唐娜·帕梅耶以及她在大学图书用品店的同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麦克·希尔如往昔向我提供珍贵慷慨的帮助。路易莎·托马斯无可取代，我很期待她所写的有关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的书问世（我确定书中有关杰斐逊的内容一定会充满善意）。杰克·贝尔斯再次在参考书领域创造了奇迹。我还要感谢克里斯蒂娜·梅佳的帮助和辛勤工作，感谢罗布·克劳福德在检阅书稿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露西·沙克尔福德也通读了最后一个校次的稿件。

这是我在兰登书屋出版的第5本书，我会继续称赞和感激吉娜·桑垂洛。吉娜是最优秀的出版人，也是最慷慨无私的朋友。她的睿智、友情和帮助无人可比。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有着一流的专业水准，以对于书稿近乎完美的高标准严要求鼓舞着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足够幸运能

从她的智慧中受益。也要感谢安娜·皮托尼亚克和林赛·斯克乌瑞一直以来的帮助和优秀的工作。威尔·墨菲是一位慷慨耐心的读者。苏珊·卡米尔和汤姆·佩里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领导了非常杰出的出版发行团队。同样，我还要感谢非同寻常却富有魅力的萨莉·马尔温，以及芭芭拉·菲永。还要感谢本杰明·斯坦伯格、乔纳森·赵、安迪·沃德、艾利森·多布森、比尔·泰克斯、波莎·伯克、塞尔比·麦克雷、萨拉·维拉奎兹、桑俞·狄龙、阿维戴·巴什拉德、埃丽卡·格雷贝尔、卡萝尔·洛温斯坦、保罗·佩佩和卡罗尔·波提科尼。米歇尔·丹尼尔是出色的文字编辑。在我看来，无与伦比的本杰明·德雷尔和丹尼斯·安布罗斯足以负责诺曼底登陆计划，联军一定会以无畏的精神面对风雨，坚持按照既定计划于6月5日发起进攻。的确，我非常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还完成得那么出色。同样，我也同意克里斯托弗·巴克利的看法：如果我落到了某些恐怖分子的手里，第一通电话一定要打给阿曼达·厄本。

这本书献给我的良师益友赫伯特·温茨。对于他和他的妻子索菲亚对我的恩情，我无以为报。

我的妻子基思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我因调查研究历史的频繁外出。她给予我爱、支持和（最初并不总是很让人愉快的）劝告和建议。她让所有一切成为可能，我们的孩子，玛丽、玛吉和萨姆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物。

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战 争

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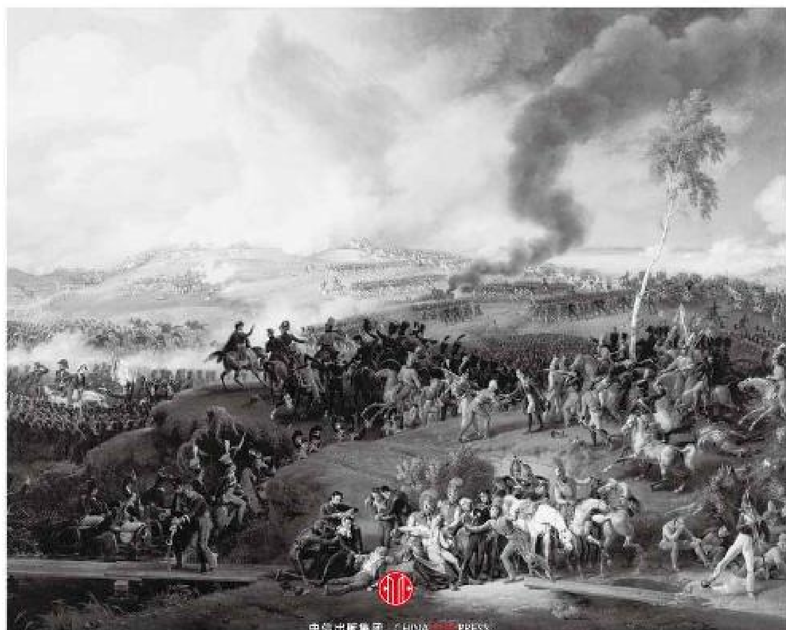
［美］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
栾力夫◎译

战争，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

穿越人性荒漠 挑战人类历史的最大悖论／《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潜心力作，横跨15 000年战争史

《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科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盛赞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 倾力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美）莫里斯著；栾力夫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War! What Is It Good For?:Confl 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ISBN 978–7–5086–5200–9
I. 战… II. ①莫… ②栾… III. 世界史 - 研究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640号
War!What Is It Good For?:Confl 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4 by Ian Morris
Simplifi 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著者：[美] 伊恩· 莫里斯
译者：栾力夫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战争

——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栾力夫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

前言 送葬人之友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将怪兽放入囚笼：建设性的战争

第三章 蛮族的反击：反建设性的战争（1~1415年）

第四章 500年战争：欧洲（几乎）征服世界（1415~1914年）

第五章 钢铁风暴：争夺欧洲的战争（1914年至20世纪80年代）

第六章 赤牙血爪：贡贝黑猩猩为何走向战争

第七章 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坚帝国（1989年~？）

致谢

出版说明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

我很高兴伊恩·莫里斯的又一本简体中文译著《战争》出版，在此之前他已有《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1]在中国出版，且都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如既往，这本书也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材料和激发我们思想的观点，而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观点，也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作者认为，从长程的观点看，战争是好的，常常是建设性的，他并力图展示为什么说战争是好的理由和数据。

这一“长程”的观点是很“长”的，莫里斯强调他看战争不只是从近代500年的观点，也不是从人类有文字史以来5 000年的观点，而是他在前两本书中也采取了的、人类近15 000年来的历史观点，而且主要是从客观结果来看。他认为，人类经过1万多年的进化，终于摆脱了部落与个人之间频繁的互相残杀，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即便在激烈动荡的20世纪，也比在石器时代下降了90%。而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可以从史料清晰得知，人类几千年来的战争，虽然有建设性的和反建设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建设性的。

而战争之所以在总体上起了这种好的作用，莫里斯认为，是因为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了更庞大、组织更完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政府的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和平，虽然不一定出于心中的善意，但即便在不经意间，这样的举措也达成了创造更大、更和平的社会这一目标。战争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社会，这一社会由更强有力的政府统治，而这样的政府用强制力确保了和平，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战争塑造国家，国家缔造和平”。战争创造出强大的国家——利维坦[2]，而利维坦让人们更安全、更富有。战争虽然在有些条件下可以走向建设性的反面，让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会倒退回更小、更穷困、更暴力的社会，但从长期的总体趋势来看，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

我们不难看到，作者还是在肯定生命和反对暴力的基础上赞扬战争的。他说战争是好的，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战争从长远来说可能比和平还更有效地保障了生命。战争促进了大的政治社会的建构，而一种大的政治社会往往能够更有效地维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换言之，少数大战代替了频繁的小战，一次短暂的剧痛代替了持久的小痛，“坐寇”代替了“流寇”，而前者比后者反而更能保护人们。作者并不美化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善意”，但十分强调国家的“善果”，强调国家相对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甚至也强调大国相对小国的优越性。

的确，在莫里斯那里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他对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极其担心。他引爱比克泰德的话赞扬“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说罗马“为我

们带来了伟大的和平，不再有战争、打斗、巨寇或是海盗；从日出到日落，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意出行”。同此，他也赞扬曾经的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在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方面的作用。他最后的一个观点是：战争正在自我终结。他将21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进行比较，认为未来的40年将是最危险的40年，正像德国曾经挑战英国的霸权，而事实上却是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霸权一样，现在也有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而有些奇特，甚至有点儿反现实主义的是，莫里斯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一种硅基生物的技术发展上，说传统的人的碳基智能和电子技术的硅基智能将合并为一个全球意识，其思维能力将让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相形见绌。他认为这种“技术统治的世界”如果及时地取代“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世界就会有希望。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进程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有可能在“世界警察”衰微而引发新的钢铁风暴之前实现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的转变。但是，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技术成就上，期望政治的问题通过目前看来还相当渺茫的科技奇点得到解决，这是否也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乐观期望？

莫里斯为战争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战争造就了强大的国家，创造了大规模的、组织完善的政治社会。但我们或许可以质疑说：第一，国家，包括强大的国家是不是只是由战争造就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原因？第二，即便我们承认国家，尤其是强大国家主要是战争推动造成的，那是不是也并非是战争直接造成的，而是经过了人们对战争的反省，接受战争的教训而采取了防范战争的措施和建设维护持久和平的制度，包括推广反战的意识与观念，如此才造就了强大且长治久安的国家？这也就引出了第三点质疑，即国家，包括强大的国家也有多种形态，而我们究竟要哪种强大的国家？是要短期强大的国家，还是要可持续的强大国家？而可持续的强大国家是不是恰恰要优先考虑全民的安全与福祉，而不是把战争放到首位？而现代意义上可持续的强大国家是否恰恰要通过反战、维权、法治和宪政建设？人类是否应当主要是通过“数人头”而非“杀人头”取得进步和发展？第四，在今天的核武器时代，战争是否还能推动造就强大的国家？大国、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更有可能造成其同归于尽甚至人类的灭亡？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难赞同一种在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单因论和直接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上万年来人类社会暴力事件的减少，但即便这一减少的趋势的确存在，它也不是直线型的，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而在战争因素对这一趋势的影响方面，看来也更多的是因为反省和吸取战争的教训而出现的制度与观念的努力起了作用，而不是战争直接起了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在事后谈论一场战争或一系列战争所带来的客观上的好结果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将这作为日后事先选择战争的理由（自然只能是一种结果论的理由）？事后评价和事先选择是有区别的，而莫里斯似乎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区别。比如他谈到战争是地狱，但又说从长期来看，其他选择可能更糟糕。他甚至直接批评丘吉尔的话“吵吵总比打打好”说，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很难找到一个

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人们自愿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而不是被实际或潜在的暴力迫使就范。那么，这种对战争的事后评价会不会变成一种对战争的直接诉求？对只是某一些战争所带来的建设性后果的分析，会不会变成对一般的战争的普遍肯定？而如果变成这种普遍肯定的话，这种普遍肯定显然就容易变成一种选择战争的支持理由，或至少是催化这种态度：发生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许还更好。因而不畏惧激化走向战争的因素，甚至不畏惧发动战争，从而真的带来了大难。

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判断战争，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是战争本身作为行为与活动的性质，即战争的本性；第二是发动战争者乃至介入战争的各方的意图和动机，即所要达到的目标；第三是战争实际上促成的结果，这一结果可能会接近某一方的目标，但由于合力的作用，它绝不会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愿望，而且，由于战争其暴力相搏的本性，它一定要带来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即便有长期的好的结果，也还是一定有战争中所付出的生命财产的代价。而且正如作者所承认的，还有一种完全是反建设性、纯粹破坏性的战争，不仅造成社会停滞，而且造成社会倒退很多年。

战争有哪里好？除了作者所说到的，其实还可以补充一些。当然，这还是只能主要是指战争的客观结果。除了一场大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连年的、相持不下的混战，终于带来了强大的国家与它统治下的地区和平，甚至推进了世界和平。战争还可能推动科技的发展。由于双方在战争中集中了人力物力，极力想战胜对方，从而带来了技术的突破，这种突破的成果常常可以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我们实际看到的许多科技发明最初都是在战时出现的。近代以来，战争还可能推动了社会平等，包括阶级、阶层和两性的平等，缓解了阶级冲突，或者松动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有时富人和穷人、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乃至男人和女人来到了同一战壕，站到了同一战线。战争甚至还引发了一些不无好处的革命，一些和平时期不易解决的沉疴终于得到了解决。战争还可能刺激了经济，长远来说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像核武器的威慑遏制了核大国之间的战争等。战争对精神和道德也不无起到锤炼作用，面对生死和平时很难战胜的困难，战时却通过极大地调动人的精神和道德潜力而战胜了这些困难。但我想，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重申：这只是战争一个方面的结果，还有另一方面的、更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家破人亡，对经济的直接摧残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多少年都很难恢复过来，还有广泛和持久的心灵创伤和道德伤害，为下一场战争酝酿的持久的敌意和复仇心等。而问题还在于，前述的种种战争好处，在核武器时代一旦战争爆发，可能都要化为青烟。

以上是从战争的结果方面分析，如果从战争的意图方面观察呢？一场战争必定涉及不只一方，而且，发动战争一方的意图是主导性的，这种意图是否有好的呢？对此可能要有极严格的限制，有人甚至否认今天有任何“发动正义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莫里斯看来也没有从这方为战争辩护，相反，他充分认识到人们发动战争的自利乃至邪恶意图。

最后从战争的属性来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战争的第一本性就是人类的相搏，就是成建制的、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厮杀。战争不仅本身就是残酷，还助长残酷，它容易把残忍的习惯从战场带到非战场，从战时带到战后。战争无论如何都不是人之为人的骄傲。而且，我们不仅要持一种人类的观点，还要持一种个人的观点，因为生命实际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那里真实存在的，我们因此也就不仅要持一种长期的观点，还要持一种短期的观点。这是由战争的本性决定的。某一场战争可能会带来长远的好的结果，但我们是否还要念及和哀悼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呢？他们死去就是死去了，那就是他们全部生命的结束。而没有这场战争，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世界上也没有谁能够活15 000年，大多数人的寿命也就是50～100年。所以，我们总是要优先考虑尽量减少战争，包括减少战争中的伤亡；我们还要尽量优先考虑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

我与莫里斯教授曾在2014年11月中旬中信书院举办的前沿论坛中见过面。当时对这本书的观点，我当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莫里斯教授解释说，他的意思其实是：战争并不是全无是处，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好处。如果是这样，他的立论应当是建立在比较不易受批评和攻击的立场上，但细看全书，似乎在有些地方又表达得过于强势。我希望我的批评没有太误解他的意思，或者可视作一种对赞许战争的一般观点的批评。我推荐人们读这本书，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我们澄清自己的反战理由的机会，或者看清自己隐蔽的好战“理由”的“缘故”。战争总是引人注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战争中有各种偶然因素、剧烈冲突、戏剧性变化、胜者与败者、英雄与枭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战争是攸关千百万人生死的事情。研究战争的文献卷帙浩繁，但这本《战争》将以其独特的观点与方法，成为其中一部新颖的杰作。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 《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分别于2014年5月和6月出版。——编者注

[2] 利维坦：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中象征君主专政政体的国家。——编者注



前言

送葬人之友

23岁那年，我差点死于战火。

那是1983年9月26日的夜晚，大约9点半。我当时正在英格兰剑桥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俯身在一台手动打字机后面，敲着我考古学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此前，我刚刚在希腊群岛上实地考察了4个月。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正在恋爱中。生活很不赖。

我根本不知道，远在2 000英里[1]之外，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正在做一个抉择：是否杀掉我。

彼得罗夫是苏联谢尔普霍夫–15预警指挥中心作战运算方面的副负责人。他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一名工程师，还会编写计算机代码。对我而言，十分幸运的一点是，他不是一个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但当警报在莫斯科时间刚过午夜的时候响起，就连彼得罗夫这样的人也不禁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那张占据了控制室一整面墙的北半球巨型地图被红色的灯泡点亮了。地图上显示，一枚导弹刚刚从美国蒙大拿州发射了出来。

在那张地图的上方，一些红色的字母跳出来，拼成彼得罗夫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词语：“发射！”

计算机检查了一遍数据，紧接着又检查了一遍数据。红灯再次闪烁，这次的“语气”更加肯定：“发射——高度可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彼得罗夫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早在6个月前，罗纳德·里根指责“祖国母亲”是一个邪恶帝国。他威胁说，美国人将建造基于太空的反导弹防御体系，打破维持了近40年和平的恐怖平衡。他还宣称，要加速部署新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在5分钟之内打击莫斯科。接着，仿佛像是要嘲弄苏联的脆弱似的，一架韩国客机飞到了西伯利亚上空，看上去“迷了路”。苏联空军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架客机。随后，就在这架客机终于开始向中立空域返航时，一架苏联战斗机将其击落，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议员。现在，这块屏幕告诉彼得罗夫，帝国主义者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可彼得罗夫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美国人要先发制人地发动打击，此刻就应该有1 000枚“民兵”导弹呼啸着掠过北极，带来火焰与辐射的地狱。它们应当疯狂地倾巢而出，把苏联导弹摧毁在发射井内，让莫斯科方面无力反抗。仅仅发射一枚导弹？那简直是疯了。

彼得罗夫的职责是按照规定进行所有必要检测，以排除错误的可能，但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了。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否终结这个世界。

他拿起了电话。“我向您报告，”他对电话另一头的值班军官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这是个假警报。”

值班军官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彼得罗夫的下属放松了下来。技术人员开始按照既定的方案，系统地检查线路错误。但随后——

“发射。”

红色的字样又出现了。地图上又亮起了一个红灯：又一枚导弹飞了出来。

接着，又一个灯泡亮了起来。又一个，又一个，直到整张地图都好像烧红了一样。彼得罗夫曾经参与编写的算法发挥作用了。有那么一会儿，地图上方的屏幕暗了下去。它随即又亮了起来，带来了新的警报。它宣布了“世界末日”。

“导弹打击。”

苏联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开始自动将这条信息在指挥体系中传递，每过一秒钟，这条信息都会更接近整个体系的顶端。年老体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即将需要做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你或许对战争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很感兴趣。就像今天一样，那时的剑桥也是一座安静的大学城，远离权力的宝座。不过，在1983年，剑桥的周围环绕着空军基地，它们可都在莫斯科的打击目标名单之上。一旦苏联总参谋部相信了彼得罗夫编写的算法的运算结果，那么在15分钟之内，我就会沐浴在比太阳表面还要炽热的火球中，被彻底蒸发掉。国王学院和它的唱诗班，吃着草的奶牛，漂过的平底船，穿着长袍在高桌宴会上递着甜酒的学者，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化为放射性尘埃。

如果苏联人仅仅发射那些针对军事目标的导弹（核战略专家将其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并且美国人以同样的方式予以还击，那么包括我在内的大约100万人会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被炸死、烧死或是毒死。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就在彼得罗夫迎来生死攸关的抉择前的3个月，美国战略理念发展中心刚刚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试图探寻核战争的开始阶段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没有哪个演习参与者能够坚守军事力量打击的底线。每一次，他们都会将核打击等级升级到民间目标打击，不仅会摧毁导弹发射井，也会向城市发难。如果情况演变成这样，那么战争前几天的死亡人数将上升到大约5亿；而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核爆炸留下的放射尘、饥荒和后续战斗将再导致5亿人

死亡。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彼得罗夫止步了。他后来承认说，当时已经吓得腿都软了，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他的计算。他鼓起勇气，告诉值班军官，这次仍然是一个假警报。导弹打击的信息在抵达最高统帅层之前被截了下来。12 000枚苏联核弹头仍然留在它们的发射井内。地球上的10亿人得以活到了下一天。

彼得罗夫拯救了世界，但他没有得到挂满胸前的勋章。他得到的“奖励”是一份正式的批评，因为他递交的文书不符合规范，而且没有按照规章办事（决定是否毁灭这个星球是总书记的职责，不是彼得罗夫的事）。他被调到了一个没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后来提前退休。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失常，随后在苏联解体之后陷入贫困，因为再也没人付给他养老金了[2]。

就这样，拙劣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机程序员的瞬间判断就能决定末日之战是否会打响，这样的世界显然是疯了。当时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一方，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禁止核武器，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或是投票给那些承诺实行单方面裁军的政客；在苏联的这一方，人们并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自由，因此只有比平时稍微多一些的持不同政见者站出来表明立场，随后便被出卖给了秘密警察。

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带来太多改变。西方的领导人带着更高的支持率重掌权力，却买回更先进的武器；苏联的领导人则制造出更多的导弹。1986年，全球核弹头的库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总数超过70 000枚；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事件，让这个世界略微领教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人们怒吼着，想要寻求解决危机的答案。铁幕两侧的年轻人都抛弃了那些年老昏聩的政客，转而聆听更嘹亮的声音。作为“婴儿潮”后新一代的代言人，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选取了越南战争时期最伟大的反战歌曲——埃德温·斯塔尔（Edwin Starr）在摩城唱片公司推出的经典之作《战争》（War），并推出了一个封面充满能量的版本，使这首歌再度打入榜单前十：

战争！

哈，上帝啊。

它有什么好处？

它一无是处。

说啊，说啊，说啊……

哦，战争！我唾弃你

因为你只能毁灭
那些无辜的生灵
战争意味着眼泪
闪动在无数母亲的眼中
当她们的孩子走向战场
当她们的孩子丢掉性命……
战争！
它一无是处，只能让人心碎。
战争！
它只是送葬人之友……

为我们时代的和平[3]

在这本书中，我要提出些不同意见——在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战争并非送葬人之友。战争确实是大屠杀，但战争是殡仪工作者最大的敌人——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了。与那首歌里唱的不同，战争是有好处的：从长期来看，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战争是地狱，但从长期来看，其他的选择可能更糟糕。

我知道这个观点颇具争议，所以请容我解释一下。

我的观点包括四点。第一点是，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更庞大、组织更完善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

这一观点的建立基于20世纪一项重大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石器时代的社会规模通常很小。由于找到食物很困难，人们通常生活在几十人的团体里，或是几百人的村庄中，或者（很少见地）生活在几千人的小镇内。这样的社区并不需要太多的内部组织，而且通常对外来人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有敌意。

通常来说，人们会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但一旦有人决定诉诸武力，他（或者偶尔是她）所面对的束缚要比现代人少得多。虽然偶尔会有一整个小团体或是村庄的人死于暴力及其带来的疾病和饥荒，但是大多数杀戮都是小规模的，比如家族仇杀或是持续不断地劫掠袭击。不过，由于总人口数量也很少，持续不断的低水平暴力也会导致惊人的伤亡。据估算，在石器时代的社会中，至多有10%~20%的人死于其他人类之手。

而20世纪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的种族灭绝以及多次政府行为引发的大饥荒。这些惨剧难以置信地导致了1亿~2亿人的死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5万，这一数量比公元前5万年的人类总数还要多。但在1945年，地球上共计有25亿人口；而在整个20世纪，地球上生活过大约100亿人。这就意味着，20世纪与战争有关的那1亿~2亿的死亡人数，仅占整个地球人口的1%~2%。如果你十分幸运地出生于工业化的20世纪，那么平均而言，你死于暴力（或暴力间接导致的死亡）的可能性仅为石器时代的人的1/10。

这一数据如果让你吃惊，那么对这一数据的解释就会让你更加吃惊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的东西，正是战争。我将在第一至五章详细解释这一观点。在大约10 000年以前，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从而组成更大的社会。这一现象从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随后遍及整个星球。而唯一能让这些较大的社会运转起来的方法，就是发展出更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如果想要持续掌权，那么它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社会内部的暴力。

政府的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和平，并非出于心中的善意。他们镇压杀戮行为，是因为那些“表现好”的臣民比那些愤怒的、杀气腾腾的人更易于统治和征税。而不经意间，这样的举措使得暴力死亡率在石器时代和20世纪之间下降了90%。

这一过程并不美好。无论是在不列颠的罗马人，还是在印度的英国人，那些“维持和平的人”可能跟他们想要消灭掉的那些“野蛮人”一样残暴。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在一些地方，短期内的暴力死亡率可以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例如，在1914~1918年，几乎有1/6的塞尔维亚人死于暴力、疾病或饥饿。此外，很显然，并非所有政府都擅长缔造和平。民主制度或许是一团乱麻，但民主制度极少吞噬自己的子民；独裁体制办事高效，但经常枪毙、饿死或是用毒气杀死大量人。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变数、政府的能力不同和例外事件，从10 000年这样一个长期跨度来看，战争缔造了政府，而政府实现了和平。

我的第二点是，要达到创造更大的、更和平的社会这一目的，战争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最糟糕的方式，但也几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方式。“上帝知道，一定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埃德温·斯塔尔在歌曲中这样唱道。但显然，并没有那么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罗马帝国的崛起不需要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高卢人和希腊人的死亡，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不建立在数以千万计的美洲原住民的尸骸之上，如果人类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选择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而是靠商讨解决问题，那么人类的确可以在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的情况下享有大社会的益处。但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这令人沮丧，但是证据确凿。除非被强迫，人们总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其中也包括互相杀戮和剥削的权利。事实上，唯一可以让人们放弃这些权利的，就是在战争中失败，或是对迫在眉睫的失败的恐惧。

我认为，政府的存在让我们更加安全，而战争几乎是已知的唯一塑造政府的方式。如果这一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战争确实是有好处的。不过，我的第三点还要更进一步。我认为，由战争创造出的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从长期来看，它也让人们更富有。和平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这一过程同样混乱不堪，充满波折。战胜者经常奸淫掳掠，把数以千计的幸存者贩卖为奴，并且霸占他们的土地。战败者或许要世代遭受盘剥。这一切既可怕，又丑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更大的社会往往会使所有人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其中，既包括战胜者的后代，也包括被征服者的子孙。这一长期趋势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更安全的环境，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富庶。

如果我们把我的这三个观点整合在一起，就只会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这一社会由更强有力的政府统治，而这样的政府用强制力确保了和平，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10 000年前，地球上仅有约600万人口。平均而言，他们只能活到大约30岁，每天供养自己的物质的价值，折算成今天的美元，仅不到2美元。而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是那时的1 000倍（实际上有70亿），寿命比那时的人长1倍还要多（全球平均寿命为67岁），每天赚的钱是那时的12倍多（全球平均水平为每天25美元）。

因此，战争是有其好处的。实际上，我的第四点是，战争正在自我终结。千载以来，战争（在长期内）缔造了和平，破坏创造了财富。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太过擅长战争了——我们的武器变得如此具有破坏力，我们的组织机构变得如此高效。正因如此，战争正使得自身在未来越来越不可能发生。在1983年的那个夜晚，如果事情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轨道——如果彼得罗夫发了慌，如果总书记按下那个按钮，如果10亿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丧命——那么20世纪的暴力死亡率会迅速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如果那些核弹头的长期危害真的像一些科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可怕，或许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存在了。

好消息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永远不太可能发生。我将在第六章具体解释这一点。基本的一点是，人类已经证明了，自己十分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历史上，我们打了难以计数的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好处。可是到了20世纪，随着暴力带来的收益减少，我们学会了在避免末日决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没人能保证末日决战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就像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将阐明的那样，我们仍然有避免其发生的希望。21世纪将目睹太多的剧变，其中就包括暴力的角色转换。长久以来的消灭战争的梦想或许终将实现——尽管那时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这么直白地提出这些观点，或许已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你也许会奇怪，我说的“战争”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又怎么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争？我到底把什么样的东西视为“社会”，我又怎么知道一个社

会何时开始变得更庞大？还有，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政府”，我们又怎样衡量一个政府究竟有多么强大？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也将在本书中努力回答这些疑问。

不过，我的核心观点，即“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大概会引发最多的质疑。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恰好是“一战”爆发（1914年）100周年，也是“二战”爆发（1939年）75周年。这两次世界大战共导致1亿人死亡。在这样的时机抛出一本书，告诉人们战争让世界变得更安全，看起来像是一个病态的玩笑。但同时，2014年也是冷战结束（1989年）25周年[4]。冷战的结束让世界不再需要面对彼得罗夫式的梦魇。在这本书中，我将讲述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至今10 000年来的战争史，并最终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个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而富庶的过程之中，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一观点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那是因为战争中的一切其实都是反常的。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绝妙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无矛盾的线性逻辑会发生作用，其本质仅是尝试。但在战略的领域……发挥效果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逻辑经常性地违反常规的线性逻辑”；战争“通常会青睐那些充满矛盾的行径，而挫败那些符合逻辑的行为，从而导致充满讽刺意味的结果”。

矛盾贯穿战争始终。20世纪坦克战术的奠基人之一巴塞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说，根本的一点是“战争一直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做下坏事，并寄希望从中会收获好的结果”。从战争之中收获和平，在损失中得到收获。战争引领我们透过一个窥镜看去，看到一个是非颠倒、似是而非的世界。本书中提出的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而这就是一种经典的矛盾形式。要列出战争的坏处是很简单的，首先就是杀戮。但战争仍然是“次要的恶”，因为历史表明，战争之外的那种选择更加糟糕——持续不断的、石器时代式的、充斥在每天生活之中的暴力，这样的暴力会夺去生命，并让我们陷入穷困。

对“次要的恶”的思想最显而易见的反驳是，这一思想无疑有着良莠不齐的记录。狂热的理论家喜欢“次要的恶”的思想：一个又一个极端主义者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只要他们烧死那些女巫、毒死那些犹太人或是肢解那些图西人，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纯净而完美。这些邪恶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如果你能够回到过去，把阿道夫·希特勒扼死在摇篮中，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选择了“次要的恶”，那么你犯下的微不足道的杀人罪行或许可以阻止未来大规模的杀戮。“次要的恶”的思想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做出艰难的抉择。

伦理学家对“次要的恶”观点的复杂性格外感兴趣。我想起曾经听到，我所在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同事曾经向一整间讲堂的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抓住了一个恐怖分子，他安放了炸弹，而且不肯说出究竟放在了哪儿。如果你折磨他，他或许会说出来，因而拯救许多人的生

命，那么，你会不会拔掉他的手指甲呢？如果学生们面露踟蹰之色，这位哲学家就会提高筹码。他说，你们的家人也在可能遇害者之列。现在你会不会拿起钳子？如果他仍然不肯开口，你会不会去折磨他的家人？

这些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实世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做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就在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进退两难的局面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个实验者把你绑起来，放进一台核磁共振成像仪中，再问你一些在道德上让人感到纠结的问题，你的大脑将表现出惊人的反应：当你想象自己折磨一个恐怖分子时，仪器上你的额眶部皮质部分会亮起来，因为血液正流向大脑中掌管不愉快想法的部分；而当你计算你能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时，你的背外侧皮质部分则会亮起来，因为大脑中另外一部分被激活了。这些充满矛盾的情感和智力刺激会表现为激烈的内心挣扎，此时你的前扣带皮质也会亮起来。

由于“次要的恶”这一观点让我们感到如此不舒服，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让人困扰。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大规模屠杀。什么样的人才会说这样的事情会有好处？我现在要说，我，作为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对我自己的这一研究发现也感到震惊。倘若有人在10年前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或她）的。但我懂得，历史的证据（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是确实的。虽然这种说法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从长期着眼，战争确实使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富庶。

我并非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大约75年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写就了两卷高度理论化的专著《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他在书中指出，从他所生活的时代回溯历史，在过去的5个世纪中，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和平。他认为，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上层社会（曾经是野蛮暴力的主要来源）逐渐放弃了使用武力，而欧洲整体的暴力程度也降低了。

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事实，其实早就应当是有目共睹的。像很多人一样，我在中学时代最先体会到了这一点。那还是在1974年，中学时代的英语课要求我研读莎士比亚的某一部戏剧。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并非这位诗人美妙绝伦的词句，而是他笔下人物极易动怒的性格。他们动辄就陷入暴怒，然后互相捅刀子。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自然也有这样的人，不过他们很可能会锒铛入狱，或是接受治疗，或是在狱中接受治疗。而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暴徒们则不会受到谴责，往往还会因为他们“先打再谈”的勇气而受到赞扬。

不过，埃利亚斯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比以往更安全，这一结论真的是正确的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这也是一个问题。埃利亚斯的回答是，在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16世纪90年代，他笔下那些嗜杀成性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的人们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

这样的理论本应成为大新闻，可就像出版商经常告诉作者的那样，合适的时机是最重要的。埃利亚斯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问世，就在同一年，欧洲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了6年的惨烈战争，导致5 000万欧洲人丧生（其中还包括埃利亚斯的母亲，她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了1945年，已经没有人有心情听什么“欧洲人在变得更文明、更和平”的鬼话了。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已经退休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社会历史学家在经过几十年辛勤的工作，翻遍了琐碎的法庭记录之后，开始承认埃利亚斯的观点原来一直是正确的。他们发现，在1250年前后，每100个西欧人中就会有一个死于他人之手。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一比率下降到了1/300。而到了1950年，这一比率则是1/3 000。而且，就像埃利亚斯坚持的那样，上层社会在引领这一潮流[5]。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出版了一本与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同样引人注目的书：《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在书中，基利用数据告诉我们，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有着令人惊讶的暴力程度。仇杀和劫掠通常会杀死1/10的人口，有时甚至是1/5。如果基利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石器时代的社会比纷乱的中世纪欧洲还要暴力10~20倍，比20世纪中叶的欧洲则要暴力300~600倍。

要测算史前的石器时代社会中的暴力死亡率显然更加困难。但基利找到了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凶杀、屠杀和大骚乱的证据，足以证明欧洲人的祖先就像人类学家研究过的其他同时代人群一样嗜杀。我们看到了沉默的证词：肋骨间的石质箭头、被钝器击碎的颅骨、墓葬中堆放的武器。这些都告诉我们，通向文明的进程要比埃利亚斯想象的更漫长、更缓慢、更波折。

基利意识到，即便是世界大战也没有让现代社会变得像石器时代社会那样危险。另外，又有第三种学术力量支持了他的观点。这一流派于1960年发轫。那一年，一本引人注目（但也有些枯燥乏味）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其作者是离经叛道的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后来他意识到气象学有力地帮助了空军，于是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易斯·弗莱·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理查德森一直在试图寻找杀戮的混乱表象背后的统计学模型。例如，在1820~1949年，发生了大约300次伤亡惨重的战事，其中包括美国南北战争、欧洲人的殖民征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理查德森惊讶地发现：“在这一时期，从谋杀到世界大战，不同规模的致命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约1.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凶杀之中丧生的人数相加，我们会发现，在1820~1949年，大约每62.5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死于暴力，这

一比例仅是依靠采集狩猎生存的石器时代人类暴力死亡率的1/10。

还不只如此。理查德森发现，“在1820~1949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并没有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而出现相同比例的增长，这说明战争的频繁程度下降了”。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

在理查德森的著作出版50年之后，为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新的数据库要比理查德森的数据库更精细，胃口也更大，其时间范围已经上溯到1500年，下行则到了2000年之后。像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这一领域也充满了争议。即便在有史以来记录最为完全的战争——在从2001年开始的、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中，对于死亡人数的统计也有多种方法。不过，即便如此，理查德森的核心发现仍然成立：被杀死的人类总数并没有能跟上全世界总人口的增长步伐。其结果是，我们当中的任意一员死于暴力的概率已经呈数量级降低了。

这一学术领域在2006年达到了其顶峰。那一年，阿扎尔·盖特（Azar Gat）出版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人类文明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这本书令人惊讶地横跨多个学术领域（这应当与盖特本人在以色列国防军担任少校军官的经历也有关系），把新的观点整合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人类如何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驯服了自身的暴力。盖特的思想已经成了当今思考战争问题时不能绕开的一部分。如果你曾读过他的书，你会发现我的这本书也深受其影响。

人们对战争的思考经历过巨大的转变。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类的暴力水平在下降这一假说，还仅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学家的狂想，甚至不值得对那些苦读莎士比亚的学生们一提。不过，今天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例如，在2010年，克里斯托弗·瑞安（Christopher Ryan）和加西尔达·伊塔（Cacilda Jethá）出版了《人类性的起源》（*Sex at Dawn*），这本畅销书极力否认早期人类社会充满暴力；2012年，约翰·霍根（John Horgan）整理了其几年中在《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出版了《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2013年，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将31名学者的论文结集成册，出版了《战争、和平和人类本性》（*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对暴力死亡率在长期内的下降提出了质疑。上面提到的这些书都很有趣，信息量丰富，也很值得一读。但在我看来（在本书中我也将详细阐释），这些书都有选择地搜集了证据，并且被那些支持埃利亚斯、基利、理查德森和盖特的研究所压倒。就在我写这一前言的第一稿时，在一个月内就有两篇阐释暴力水平下降的著作问世：政治学家约书亚·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的《用战争赢得战争》（*Winning the War on War*）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年之后，普利策奖得主、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6]中，用最长的一章表达了相同观点。不断有新的观点涌现出来，但在基本的那一

点，即暴力死亡率确实下降了这一方面，正在汇聚越来越多的共识。

不过，我们如果问，为什么暴力水平下降了，就没有那么多共识了。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实现和平

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有着深层分歧，争论激烈，由来已久。实际上，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暴力水平在下降。在那10年之中，欧洲和亚洲都充斥着血雨腥风。也正是因此，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才把这一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当霍布斯发现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正在陷入内战时，他就逃离了那里，来到巴黎。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在内战中丧生，这一事实让霍布斯相信，如果任由人们肆意妄为，那么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包括使用暴力。

霍布斯看到，英格兰中央政府的崩溃导致了那么多人的死亡，他不禁自问，在人们尚未创建政府的史前时代，情况会有多糟糕呢？他在其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霍布斯解释说，在政府出现之前，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在这种状况下，”他做出了著名的推断，“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气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一生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在霍布斯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人类社会将充斥着凶杀、贫困和无知。霍布斯认为，政府应当像利维坦一样令人敬畏。利维坦是《圣经》里记载的如同哥斯拉一般的怪物，它曾经使约伯感到惶恐不安。（“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约伯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组成这样的政府的，可以是一个独自统治的国王，也可以是一个决策者的集合体。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利维坦都必须彻底威服它的子民，使他们甘愿臣服于它的律法，而不敢相互杀戮、劫掠。

但不守规矩的人类如何建立起一个利维坦式的政府，从而摆脱了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呢？在17世纪4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学，更遑论考古学知识可以用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霍布斯抛出强有力的观点。霍布斯宣称，“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人”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例证。不过，比起寻找证据，霍布斯总是更热衷于抽象的推断。“取得这种主权的方式有两种，”他解释说，“一种方式是通过自然之力获得的，例如一

个人使其子孙服从统治就是这样，子孙要是拒绝的话，他就可以予以处死；这一方式下还有一种情形是通过战争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为条件赦免敌人的死罪。另一种方式则是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地服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用暴力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作“以力取得的国家”；而用和平手段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为“按约建立的国家”。不过，霍布斯总结说，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政府让我们获得安全和富足。

这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庇护霍布斯的巴黎人十分厌恶《利维坦》一书，这使得霍布斯不得不逃回英格兰。可他刚到英格兰，又要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到了17世纪60年代，如果有什么思想被称作是“霍布斯式的”，那么一个体面的人就应当敬而远之。1666年，要不是刚刚复辟的国王出面干预，霍布斯险些被当作异端接受审判。

巴黎人并不满足于赶走霍布斯，那里的知识分子很快开始着手反驳他那令人沮丧的观点。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法国思想家宣称，这个英国佬把事情完完全全地本末倒置了。在霍布斯去世75年之后，瑞士裔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整合了这些批评意见。卢梭总结道，政府并非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人“对战争和任何社会联系都没有认知，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利维坦并没有驯服我们好战的一面，相反，它腐蚀了我们的质朴。

但事实证明，卢梭比霍布斯还不受欢迎。他不得不逃离了瑞士的法语区，躲到了德语区。他刚到德语区，又遭到一群暴徒朝他的住所扔石头。紧接着，他逃到了英格兰，发现自己不喜欢那儿，于是又不顾已经被法国正式驱逐的事实，溜回了巴黎。尽管如此，卢梭仍然是霍布斯强有力的对手。在18世纪晚期，卢梭对人类内在善良的乐观信念征服了诸多读者，他们都认为霍布斯的思想是反动的。到了19世纪晚期，霍布斯又卷土重来，因为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映衬下，霍布斯所描绘的互相残杀的世界看起来更符合自然本质。可到了20世纪，霍布斯又输了一阵。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章中探讨这个问题），埃德温·斯塔尔的《战争》中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大获全胜。到了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那“强有力的政府是积极的力量”的思想全线溃败。

批评霍布斯的人遍及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罗纳德·里根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美国人说：“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里根最大的担忧——膨胀的政府会剥夺个人的自由——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代关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辩论，已经从霍布斯所担心的那种恐惧中走出去了多远。对于我们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今天的争论都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说，要么只有一个极小的政府，要么干脆就没有政府。极小的政府意味着会至少有一些法律和秩序，而没有政府则意味着没有这些东西。

里根曾经开玩笑说：“英语里最可怕的10个词是，‘嗨，我是政府派

来帮忙的’（Hi，I’m from the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help）。”但实际上，最可怕的10个词应该是“没有政府，我是来杀你的（There is no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kill you）”。我猜想里根可能会同意这一点。还有一次，里根说：“有一个立法者指责说，我对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停留在19世纪。这根本就是荒谬的指控。我的观念停留在18世纪……我们的开国之父说得很清楚，保障守法公民的安全应当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1975年，就在里根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前几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说，如果抛开欧洲历史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日期和细节，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核心，即“战争缔造国家，国家招致战争”。他注意到，战争催生了强有力的政府，而政府则利用它们的力量打更多的仗。我非常喜欢蒂利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遗漏了真正的主题。事实就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10 000年中，战争缔造了国家，而国家实现了和平。

在里根发表演说30多年之后，学术观点又回到了霍布斯的一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超越了里根，拥抱了17世纪的法律和秩序观念。大部分最近出版的、认为暴力水平在下降的书籍都用赞成的态度引用了霍布斯的话。盖特在《人类文明战争》中说道：“比起卢梭式的伊甸园，霍布斯距离真相更近。”

不过，对于霍布斯“政府的力量使我们获得安全和繁荣”的直白观点，霍布斯的新拥趸们似乎无法完全接受。人类学家基利显然更喜欢霍布斯，而不是卢梭，但他认为“如果说卢梭那原始的黄金时代是想象中的，那么霍布斯的永恒混战则是不可能发生的”。基利总结道，石器时代的人们并不会真的展开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而政府的崛起不仅带来和平，也带来痛苦。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并未真的提到霍布斯，尽管他在书中分享了霍布斯的观点：政府在抑制暴力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与霍布斯把吓倒所有子民的利维坦当作主动的因素不同，埃利亚斯把主动权交给了被统治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对暴力失去了兴趣，是因为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华贵的皇家殿堂，而接受了更文明的方式。霍布斯猜测，普遍的和解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而埃利亚斯认为这一切从16世纪起才开始发生。

心理学家平克在他2002年出版的《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说得很直白：“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稍微后退了一点，削弱了利维坦的主题。平克认为，暴力的衰减并非是由于利维坦，而是“包含6种趋势、5个内心的魔鬼和5种历史的力量”。平克说，要想好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将其分解为几个阶段：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及新的和平。我们还要认识到，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其使命，有的已经持续了千年，有的则从1945年（甚至1989年）才开始。

政治学家戈德斯坦走得更远。他认为，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二战”后），而要想理解这些，我们必须比霍布斯更“霍布斯”。戈德斯坦认为，对暴力最猛烈的一击并非像霍布斯说的那样来自政府的崛起，而是来自超政府的崛起，即联合国这样的形式。

很显然，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过程中，战争和政府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专家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分歧通常意味着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有误，因此只能找到部分的、有争议的答案。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

战争猪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最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视角的。除了我跟彼得罗夫的那点儿“小摩擦”之外，我从未参加过战争，甚至都没看到过大屠杀的场景。我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是在2001年的特拉维夫，当时一个自杀式爆炸者引爆了距离我几百码[7]之外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炸死了21名青少年。我觉得我听到了爆炸声，但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正坐在酒店的吧台旁，那里正在举行一场中学毕业派对，挤满了运气更好的一些学生，他们玩得正开心呢。不过，所有人都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我也并非出身于显赫的军人家庭。我的双亲均于1929年在英格兰出生。“二战”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还太小。朝鲜战争爆发时，我父亲在矿井里工作，因此没有参战。我的祖父在“二战”爆发前死在了煤矿里，而我的外祖父是炼钢工人，因此也没有被征召入伍。（而且，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这点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没那么重要了。）我母亲的叔叔弗雷德倒是曾经去过北非，在蒙蒂[8]手下为国效命。但他没开过一枪，甚至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据他讲，战争的内容对他而言就是跳上卡车在沙漠里追击看不见的敌人，再跳上另一辆卡车被赶回出发地。他经常说，他本人距离危险最近的一回，是在一场沙尘暴中丢掉了假牙。

我也没有为国服役，而是在摇滚乐团里虚度了青春。20世纪70年代，我或许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追寻“和平与爱”，但是在内心深处，拙于表达的我大概也是赞同《战争》那首歌的。实际上，我学会的第一段吉他乐曲，就是黑色安息日乐队的经典歌曲《战争猪》中的那段非凡的吉他连复段，及其不朽而压抑的开场唱词：

将军们召集了他们的部众，

如同安魂弥撒上的女巫。

我在乐团度过了快乐但谈不上收入丰厚的几年，鼓捣出一些听起来特别像《战争猪》一样的歌曲。我最终意识到，比起做一个重金属吉他手，还是做一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更加适合我。

历史写作的鼻祖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及中国古代的司马迁——都把战争当作他们的写作主题。如果只看历史频道上播放的纪录片，或是机场书店所销售的书目，你很有可能认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追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但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中，专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基本上忽视了战争（我会在第一章里讲述具体原因）。

在入行的前20年里（我在1986年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基本上遵循了前辈的做法。直到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也是有好处的。我的妻子平时更爱看当代小说，而不是历史书，不过在我写作那本书时，她逐章进行了阅读。但当我把特别长的一段文字递给她看时，她终于承认："好吧……我挺喜欢你写的东西的……但是讲了太多的战争。"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本书里写了很多战争。要说起来，我一直以为我把战争故事当作书中的背景。但当凯茜指出这一点时，我意识到她是对的。我确实写了很多战争。

我为此感到苦恼。我是否应该删掉这些战争？我是否应该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说明一下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战争？或者是，我根本就写错了方向？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本书中必然会出现这么多的战争，因为战争确实就是历史的中心。在我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我又意识到，战争不仅是曾经的中心，还将是未来的中心。我非但没有写得过多，反而是写得太少。

就在此时，我明白我的下一本书必将是与战争有关的。

但我马上就感到害怕了。当莎士比亚要写到战争时，他这么祈祷道："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啊。"我很快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就连他在写这样一个伟大的题目时都感到绝望，我又有什么希望呢？

部分原因是，已经有太多关于战争的思考和著作了。尽管专业历史学家对这一话题敬而远之，但是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论文、诗歌、戏剧、歌曲是关于战争的。据基利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超过50 000种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了。没人能读完这么大量的东西。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海量的著作其实可以归纳为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第一种，也是近年来最为普遍的，我称之为个人经历。它讲述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在战场上的感受，强暴或者被强暴，折磨或是被折磨，为死者而悲伤，与伤者一同生活，或者是忍受火线后方的贫苦生活。不论采取何种体裁，是新闻、诗歌、歌曲也好，是日记、小说、电

影也罢，或者只是喝上一杯时讲的故事，这种题材的优点在于发自内心，而且很直接。它经常能同时让人感到震惊、兴奋、伤心或是受到启迪。

个人经历试图告诉我们在战争中的感受。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真正经历过暴力的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个人层面的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战争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最终只能对这个问题——战争有什么好处——做出部分回答。除了战争中的感受之外，战争还有其他的内涵。而我总结的第二种思考角度——我姑且称之为军事历史——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个人经历和军事历史之间的界限有时未必那么分明。至少，从约翰·基根（John Keegan）于1976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战斗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一书之后，士兵们在以往的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就成了军事历史中令人饶有兴味的一部分。但军事历史学家也会讲述更宏大的战争场景，描绘整场战斗、战役甚至整个纷争。战争的迷雾总是浓厚的，没有哪个人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或理解事件的全部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在战士和平民的个人经历之外，还会使用官方数据、军官的战地报告、对战场的实地考察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资料来源，以求能获得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的全貌。

军事历史的角度经常会渗入第三种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研究。几千年来，职业军人、外交官、战略家们经常会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对历史的了解，从实践中抽象出战争的原则，并试图解释何时应当采用武力解决争端以及怎样运用武力最为有效。技术性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站在了个人经历的对立面：个人经历自下而上地看到暴力，通常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而技术性研究自上而下地看待暴力，经常能看出它有很多作用。

然而，第四种视角会把我们更远地带离个人视角，它把战争视作更广阔的演化图景中的一部分。生物学家早已认识到，暴力是生物争夺资源和繁殖机会的一种有效工具。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总结，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暴力的进化功能时，我们才能解释人类暴力行为。通过对比人类行为和其他物种行为的特点，他们希望可以找到战争背后的逻辑。

从未有人能掌握全部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或许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在长年的阅读和与专业人士的交流之后，我痛苦地意识到自身背景的欠缺。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凭着我在落满尘土的图书馆里的多年苦读，以及我在尘土弥漫的考古学发掘现场的工作经历，我应当可以尝试把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融为一体，解释战争有什么好处。至于我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先从全球的、长期的角度看待战争，再聚焦某些关键点以仔细观察细节，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对我而言，看待战争就像看待其他庞大的事物一样，如果你站得太近，你就只能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树林；

如果你站得太远，你又看不清楚树木。我认为，大多数个人经历和许多从军事历史角度的观察，都站得太近而看不到全盘的图景；而大部分演化论视角和许多技术性研究的作品，都站得太远而错过了暴力的细节。

如此往复可以让我们看到，长期的后果与那些导致它们发生的短期行动之间可能有多大的不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而在短期，也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时期，战争只能加速我们的死亡。但在过去的10 000年中战争的累积效果却让人们活得更长久。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矛盾贯穿战争始终。

凯恩斯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用经济手段帮助英国参加世界大战，而他仍然在1917年写道："我为我唾弃的一个政府工作，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犯罪的目标。"他或许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很多政府都是在犯罪。但矛盾在这里仍然生效：10 000年来的这些利维坦带来的累积效果创造了更和平、更繁荣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希特勒（或是伊迪·阿明……随你挑）反例"这样的反例呢？纳粹政权是一个怪物，既热衷于保护它的子民，又热衷于屠戮它的子民。看到这样的例子，你怎么能说政府的总体作用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裕？你可能会很高兴地总结说，希特勒的例子驳倒了霍布斯。

但这个"希特勒反例"本身也有问题。希特勒的例子不仅可以驳倒霍布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例子似乎也驳倒了埃利亚斯，但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1933~1945年，纳粹利维坦吞噬了在它统治下的年轻人，把暴力死亡率推高到令人惊骇的程度。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眼光稍微放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在1945年夏，这头怪兽就被其他利维坦打败了，暴力死亡率也因此而恢复了其下行趋势。

我会在第五章里更详细地讨论"希特勒反例"。现在，我要说的是，挑出一个暴政或是德政的极端例子，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战争有什么好处"这样更加宏大的理论。因此，希特勒的例子并没有驳倒霍布斯。事实是，没有哪两个政府是完全相同的（实际上，考虑到那些不体面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弯的历史，同一个政府甚至都无法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原样），因此，我们只有从尽可能长期的角度观察政府和战争，才能真正得出有关利维坦的作用的结论。

表前1是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设计的，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弗格森解释说："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菜单，而不是一个网格。"每个社会都从一列中选择了一个或多个选项，然后拼凑在一起。这里有超过10 000种可能的组合。比如说，希特勒的德国实际上采用了独裁制。它的目标包括安全、原材料、财富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即著名的"生存空间"）；它提供的公共福利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应当包括健康；它的统治主要通过军事手段；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得很糟糕），主要的受益者是统治层精英；至于社会特征，

则无疑是种族灭绝。

表前1 多种多样的方式：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设计的政府形式“菜单”

宗主体系	目标	公共福利	统治手段	经济制度	谁受益	社会特征
君主独裁	安全	和平	军事	种植园经济	统治层精英	种族灭绝
贵族政治	交流	贸易	官僚体系	封建领地经济	宗主国人民	等级制度
寡头政治	土地	投资	社区	重商主义经济	殖民者	转化
民主制	原材料 财富 人力 租金 税收	法律 治理 教育 兑换 健康	NGO（非政府组织） 公司 当地精英代表	市场经济 混合经济 计划经济	地方精英 全体居民	同化

资料来源：摘自《巨人》，作者尼尔·弗格森，版权所有©2000年尼尔·弗格森。企鹅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美国）下属企鹅出版社授权使用。

没有两个社会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在希特勒之前的2 000年，罗马共和国是贵族政治统治形式，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攫取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罗马共和国主要的公共福利是贸易和法律，大体上通过当地精英的代表机构来统治，造福于其大部分居民，其社会特征在漫长的岁月里由等级制度演变为同化。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从弗格森的菜单里随机抽出不同类型的社会是件很有趣的事，但我们从这个表格中还能得出更重要的东西。在有文字记载的5 000年历史中，有些政府的作为更接近霍布斯的利维坦，有些则更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其总体趋势是向霍布斯的方向前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死亡率下降了这么多。

唯一能看到这一趋势的方法，也是我将在本书中追求的方法，就是从细节上后退一步，从长期角度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听那些理论家或是自封的伟人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或是应该发生什么）。总体来看，政府会追求那些它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东西（具体原因我将在第六章讲述），而不是遵循哲学家为它们准备的蓝图。希特勒向欧洲开战，并且清除他所谓的“亚人类”，并非是因为有伪科学家告诉他这么做。事实上，他先决定要开战，再去找伪科学家为他的行为提供佐证。当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签署了协议，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结成了“友谊”时，欧洲的舆论界震惊了。“所有的主义都过时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讥讽道。但他们不应该感到震惊。事情的真相是，主义一直都是过时的。充满矛盾的战略逻辑一直胜过其他东西。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工人、士兵、经理，而讲述思想家或意识形态理论家的篇幅则要少得多。我们将看到，那些使得男人、女人为之付出生命或是为之屠杀无辜者的伟大理念，都像是波涛表面的泡沫，由更深层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看到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它将如何发生改变。

进攻计划

本书的前五章将讲述战争的故事，从史前打猎、采集的人群所处的充满暴力和贫困的世界，写到彼得罗夫的时代。这个故事千头万绪，因为当我们埋首于细节中时，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但这个故事展示出一种强大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就像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观察的那样，战争可以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它创造出利维坦，而利维坦让人们更安全、更富有。在其他情况下，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观察到的，战争可以走向建设性的反面，让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会倒退回更小、更穷困、更暴力的社会。但在其他情况下，就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观察到的那样，战争可以变得比以往更具建设性，它不仅创造出利维坦，还打造出“世界警察”。它们像巨人一样称雄世界，用一种在过去会被视为魔法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而它们也握有极具毁灭性的武器，有可能会把所有的生命一扫而尽。

在第六章，我将从故事中跳出来，把这个故事置身于更宏大的进化论环境之中，以让它变得更具意义。随后，在第七章中，这个故事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21世纪将走向何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让人警惕，又让人感到轻松。说它让人警惕，是因为接下来的40年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说它让人感到轻松，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不仅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内幸存，还可能在这一时期内取得辉煌的成就。关于战争的漫长故事正接近其非同寻常的终点。但要想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入观察我们充满暴力的过去。我们现在就开始。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 2004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世界公民总会授予彼得罗夫红杉木徽章，以表彰他拯救世界，并给了他1 000美元的支票。2013年，彼得罗夫获得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奖以及25 000欧元奖金。还可通过下面的网址捐助:www.brightstarsound.com。

[3] 这个细节可能只有教授才会留意：1938年，当尼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英国时，他的原话是“为我们时代的和平”（Peace for our time），而非“在我们时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

[4] 原文如此，与冷战实际开始和结束时间（1947~1991年）不符，疑为东西方核定标准不同。保留原文时间。——编者注

[5] 犯罪学家常用的表述暴力死亡率的方式是“每年每10万人死亡数”。我个人认为，用这样的方式表述不太直观。因此，我通常用死于暴力的人口百分比的方式表述［用死亡率乘以30（一代人的时间），再除以1 000，以获得一个百分比］，或是表述为一个人有多大的概率死于暴力事件。

[6] 此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编者注

[7] 1码≈0.91米。——编者注

[8] 蒙蒂：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世界边缘的战斗

在人们的记忆中，各个部落间首次实现了和平——瓦科马吉人和泰扎里人、德坎泰人和卢基人、凯雷尼人和卡诺纳凯人——所有能拿得起武器的男人都赶往格劳庇乌山。酋长们认为，那将是罗马人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在这个能俯瞰冰冷的北海的高地，喀里多尼亚[1]人将进行一场在歌谣中被永久传唱的战斗。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些长发飘飘的凯尔特诗人为那天参战的英雄们究竟谱写了怎样的赞美诗篇。他们的所有史诗都早已被遗忘了。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唯一流传到今天的，是由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塔西陀做的。塔西陀并没有跟随军队来到格劳庇乌山，不过他娶了那天参战的将军的女儿。如果将塔西陀对战斗的描述与考古发现及其他罗马人的记录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两件事：我们不仅可以好好了解一下近2 000年前两军交战时的场景[2]，还可以发现本书试图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北方的子民们！”

卡加库斯用尽全力喊道，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中能被听到：战士们的喊叫、铜质号角的响声以及下面的谷地中双轮马车的响动声。在他的前方，30 000人挤挤攘攘，毫无纪律可言，从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北方野蛮人聚集在一起。他扬起手臂，希望人们能安静下来，但没有如愿。

“兄弟们，听我说！”有那么一会儿，喧哗声变得更大了，因为人们开始呼喊卡加库斯的名字。接着，喧哗声低了下去，显示出人们对他的尊敬。卡加库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也是喀里多尼亚几十位酋长中最为勇武的一位。

“北方的子民们！这是不列颠的自由之黎明！我们所有人都将并肩作战。这是属于英雄的一天，哪怕你是一个懦夫，今天也只有战斗这一条路可走！”霎时，苍白的阳光穿透了铅灰色的北国天空，人们的欢呼声再度打断了卡加库斯。他仰起头，高声怒吼。

“听我说！我们生活在世界的尽头，我们是大地上最后的自由人。我们身后再也没有人了，只剩下岩石和波涛；而就算是在岩石之上、波涛之中，也到处是罗马人。没人能躲开罗马人。他们已经劫掠了这个世界。现在，他们已经窃取了陆地上的一切，因此又开始劫掠海洋。如果他们认为你有钱，他们会出于贪念攻击你；如果他们认为你一无所有，他们会傲慢自大地攻击你。他们已经抢夺了西方和东方的一切，但是仍然不知满足。在大地之上，只有他们会不分贫富地一概抢夺。他们打着

那诓骗成性的政府的旗号，去偷盗、杀戮、奸淫！他们把大地变为不毛之地，然后称之为和平！”

声嘶力竭的喊叫声、跺脚声、刀剑击打盾牌声共同组成的浪潮淹没了卡加库斯后面的话。不等任何人下达命令，人群就开始向前涌动。有的是上百人跟在一名酋长的身后前进，其他一些人则自顾自地向前冲锋，兴奋地手舞足蹈。卡加库斯披上了一件铠甲，跑着追赶他的部下。战斗打响了。

半英里之外，罗马人在等待。他们的将军阿古利可拉为这场战斗已经等候了6年。每个夏天，他都不断率军向北推进，烧毁不列颠人的房屋和作物，迫使他们迎战。现在，当83年的秋天临近时，他终于得偿所愿：一场战斗。尽管他的部队以寡敌众，远离自己的堡垒，补给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但这毕竟是一场战斗。这令他很满意。

阿古利可拉命令他的士兵排成两行。尽管地面坑坑洼洼，但是他们的队伍如尺子一般笔直。在阵列的第一行是辅助兵，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得到金钱（这是好东西）和劫掠的机会（这个更好），并且在服役满25年之后，他们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参加这场战斗的大部分辅助兵是在莱茵河沿岸招募的日耳曼人。他们有些是掩护阵线两翼的骑兵，更多的则是步兵。他们可不是挥舞着大砍刀的部落勇士；他们几乎肩并肩地站着，手持标枪和锋利的刀剑，装备着30磅[3]重的铠甲、铁制头盔和盾牌（见图1–1）。



图1–1 为帝国而战：1世纪，一名效忠于罗马的日耳曼辅助兵

资料来源：德国美因茨，美因茨州立博物馆。

阵列的第二行由精锐的军团士兵组成，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成员全都是罗马公民，是世界上最棒的士兵。掌旗官们站在他们的前方。阿

古利可拉差人把他的坐骑牵走后，站在掌旗官们中间。

正如阿古利可拉预料的那样，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很久。喀里多尼亚人冲进谷地，尽可能地靠近罗马人，然后投掷他们的长矛，再挤回安全的位置。阿古利可拉的一些士兵倒下了，有的是没有防护的大腿受伤，有的则当场送命。但是将军仍然在等待。很快，众多敌人涌进了谷地，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机动的能力。直到这时，将军才命令辅助兵们前进。

有一些喀里多尼亚人转身逃走了；有的则没有逃走，而是试图找到可以双手大弧度挥舞大砍刀的位置，这些大砍刀可以穿透盔甲、皮肉、骨头，把人剁成两半。但披着金属重甲的辅助兵们稳步向前，一排又一排地向前推进，靠近分散的高地人，使得他们无法使用笨重的武器。当靠得足够近时，罗马士兵就用镶着铁边的盾牌击碎了敌人的鼻子和牙齿，用短剑刺穿敌人的肋部和咽喉，再从倒在湿润的草丛中的敌人身上践踏而过。喷溅而出的血液在他们的铠甲和头盔上凝结了厚厚的一层，但他们仍然向前推进，把昏厥和受伤的敌人留给后面的战友解决。

人们常说，没有任何作战计划能在与敌人相遇后还有效的。当罗马辅助兵向山上推进时，他们一直以来不可阻挡的整齐阵列开始瓦解了。辅助兵们累坏了，身上浸透了汗水和血水。他们先是放慢了速度，接着停了下来。三三两两的喀里多尼亚战士转过身来，在巨石和树丛间站定。在那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们对着罗马士兵叫骂着，并朝他们投掷石块和剩余的长矛。接着，随着他们的阵线越发坚实，胆子大的人就开始靠近入侵者了。越来越多的人转身跑下山坡，鼓起勇气，开始骚扰罗马士兵的侧翼。辅助兵的进攻停了下来。喀里多尼亚人认为形势已经逆转，他们的骑手骑着满身泥点的小马开始冲击日耳曼人的后方，用长矛刺敌人的腿，严严实实地将敌人包围起来，使敌人无力反击。

在谷地的另一边，阿古利可拉仍然没有动，但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随即军号发布了一个新的命令。他的辅助兵骑手们开始叮当作响地前进了。就像在进行阅兵似的，他们的纵队整齐地展开为一条横线。军号再度吹响，骑手们放低了他们的长矛。军号第三次吹响了，骑手们开始让他们的战马飞奔起来。他们用膝盖紧紧夹着马肚子（5个世纪之后马镫才被发明出来），俯身飞驰，马蹄踏过地上的鲜血，奔驰声响如雷霆炸响；骑手们发出了怒吼。

当发觉罗马骑手们出现在身后时，喀里多尼亚人立刻转过身来与他们作战。罗马骑手们冲过阵前，一时间刀光剑影，长矛对刺。有的地方，马匹直接撞在了一起，骑手和马匹都叫喊着砸在了地上，摔断了腿和脊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北方人开始逃跑，令人丧失理智的恐惧让他们打消了其他念头，只知道逃跑。仅有的一些坚持战斗的人发现身边的人逐渐消失，他们胸中的怒火也开始消退，最终也丢下武器，开始逃跑。

转瞬间，军队化为乌合之众。剩下的喀里多尼亚人仍然多得足以淹没罗马人，但是一旦丧失了秩序，希望也就化为了泡影。罗马骑兵穿过野花和溪流，纵横在格劳庇乌山的山坡上，他们用长矛刺杀一切在奔跑的东西，用马蹄践踏不再移动的物体。在有树丛遮掩的地方，喀里多尼亚人聚集在树荫下，希望能避其锋芒。但罗马骑兵在一片混乱中依然有条不紊地翻身下马，将敌人驱赶回空地之中，再继续他们的追逐。

罗马人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他们估计，约有10 000名喀里多尼亚人被杀。卡加库斯很有可能也在阵亡者之中，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过他的名字。与之相反，阿古利可拉毫发无损。在罗马方面，只有360名辅助兵丧生，连一个军团士兵都没有损失。

历史学家塔西陀告诉我们，在黑暗中，“不列颠人分崩离析，男人女人一同号哭着搬运伤者，或是呼喊着幸存者。有些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甚至在慌乱中放火焚毁了自己的家园。其他人则背井离乡，找地方躲了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制订复仇计划，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他们的会议中断了。有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不禁悲从中来；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怒火中烧。我们曾经发现的证据表明，有些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怜悯”。

塔西陀接着写道，当太阳再度升起时，“四处一片可怕的沉寂。山野之中空无一人，房屋冒出的浓烟在远处就能看得到，我们的侦察兵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卡加库斯是对的：罗马人把大地变为不毛之地，然后称之为和平。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冬季即将来临。阿古利可拉的敌人已经崩溃，而他的士兵们也已经非常疲惫。因此，阿古利可拉率领他的部队返回基地，任由喀里多尼亚人自生自灭。

他们越向南深入罗马已经控制了几十载的领土，所经之处就越不像是不毛之地。这里没有被焚毁的废墟，没有饥肠辘辘的逃难者。相反，罗马人看到的是精心打理的田地或者熙熙攘攘的城镇，以及热情地向他们兜售商品的商人。富裕的农民端着精致的进口杯子喝着意大利葡萄酒，曾经野蛮的不列颠军阀们也不再栖身于山丘堡垒之中，而是住进了奢华的别墅。他们炫耀着身上遮盖了文身的托加[4]。他们还把儿子送去学拉丁文。

如果卡加库斯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或许会为这种矛盾的现象感到困惑。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境的人民来说，罗马帝国为什么并非不毛之地，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前，演说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经在给弟弟昆图斯的一封信中完

美地表述过这一点。当时，昆图斯在希腊人居住的富庶的亚细亚行省（大体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担任总督。这是一个甚为理想的职位，但昆图斯性情暴躁，因此他统治下的民众怨声载道。

西塞罗先是给了昆图斯几页大哥式的严肃建议，随后口气一转，表示并非都是昆图斯的错。希腊人需要面对现实。西塞罗指出：“让亚细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如果不是在我们的政府统治之下，这个地区难免会遭遇内忧外患。只要有政府，就必然要有税收。所以亚细亚应当乐于献上一点物产，换得永久的和平。”

在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西塞罗对于战争的产物明确地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战争究竟会带来不毛之地，还是人间仙境？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将贯穿本书始终。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解决这场辩论。如果罗马人的征服带来了暴力死亡率的下降和繁荣程度的上升，我们就可以说西塞罗是正确的，战争确有其好处；如果一切相反，那么显然卡加库斯对当时情况的理解更为准确，战争只会带来不毛之地。而在本书的第二至五章，我们也可以重复这样的测试，考察后来的历史时期，并最终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战争到底有没有好处，又有什么好处。

但现实世界很少能这样遂人愿。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过，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但是如果时间前移到1500年，我们基本找不到什么可靠的数据，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只有一种证据，有可能覆盖各个时期，并且能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起源——那就是人类的遗骸，上面通常会留下暴力致命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从这一源头上获得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学者对这种情况复杂，在技术层面上充满挑战的材料上做过大规模的研究。即便以后会有人完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会太明确。

例如，在对特拉维夫大学搜集的颅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结果于2012年公布）中，人们发现在过去6 000年中，暴力的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2013年对来自秘鲁的骨骼分析却发现，当更大型的国家处于形成过程中时（大体上为公元前400～公元100年，以及1000～1400年），暴力程度会达到一个高峰，这与本书的观点大体一致。除非我们能发现比现在多得多的证据，我们对于1500年以前的时期（在有些地方，连21世纪的数据都很缺乏）的情况，只能在偶尔出现的一些真实数字之外，再混杂以考古学发现、文学记载和人类学比较研究进行考察。

这本来就是一项繁杂的工作，而罗马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其变得更加繁杂。在卡加库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面积相当于今天美国本土的一半，在那里生活着6 000万人。其中，约有4 000万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及人）生活在帝国东半部复杂的城市社会之中，

而剩下的2 000万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西部较简单的乡村和部落社会之中。

对于希腊人生活的亚细亚地区在被罗马征服前的暴力情况，我们已经听到了西塞罗的观点。而在其他一些作家的笔下，那些西方的蛮族（Barbarian，罗马人就是这样轻蔑地称呼他们的）[5]听上去更糟糕。罗马人说，打架、劫掠、战斗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每个村子都有防御工事。对一个罗马绅士来说，如果没穿托加，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穿得太单薄；而对一个日耳曼人来说，如果他没带着他的盾牌和长矛，他会觉得仿佛赤身裸体。罗马人坚称，那些蛮族崇拜砍下来的人头。他们喜欢把人头挂在正门外，涂上柏油以防止发臭。他们为他们愤怒的诸神献上活人当祭品，有时甚至把人放到枝条编成的神像里活活烧死。塔西陀说得很直白："日耳曼人对和平不感兴趣。"

因此，难怪西塞罗和他的同侪们会认为，罗马征服它的邻邦，其实是在帮它们一个大忙。我们也无须奇怪一些历史学家会说，当现代古典学术在18世纪形成时，大多数顶尖的智者都认同罗马人的看法。欧洲人也乐意认为，他们征服世界是在帮这个世界一个大忙。因此，罗马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再合理不过了。

但在欧洲帝国于20世纪后期衰退之后，古典主义者们开始质疑罗马人对于被征服者的血淋淋的描绘。有的学者认为，也许古代的帝国主义者就像现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热衷于把他们手下的受害者描绘得未开化而腐朽，需要被征服。西塞罗想要为压榨希腊人找到借口，恺撒要让对高卢（大体上是现代的法国）的进攻看起来有必要，而塔西陀想要赞美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如果你完全相信恺撒说的"高卢人需要被征服"，那么这可能就像完全相信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那句著名的"统治刚被抓到、闷闷不乐的人是白人的负担"（我将在第四章再谈这个问题）一样不明智。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并非必须相信罗马人的话，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声音流传到了今天。

在地中海东岸，有文化的上层希腊人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有时会对罗马征服者百般阿谀，有时候则变成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不过，奇怪的是，他们也会把未被征服的世界描绘成一幅满是失败的国家、邪恶的海盗和土匪、没完没了的战争、充满暴动和叛乱的灰暗图景。

比如，有一段碑文刻在一尊雕像的底座上。这尊竖立于公元前58年的雕像使得帕加马的菲利普为世人所知。（帕加马位于亚细亚行省境内，而公元前58年刚好是昆图斯·西塞罗结束其亚细亚行省总督任期后一年，因此，昆图斯和菲利普应该彼此认识。）在菲利普各类善举之中，碑文告诉我们，他曾经写过一部历史，试图"讲述最近发生的事件——在我们时代的亚洲、欧洲、利比亚的部落之中和岛民的城市之中发生的苦

难和相互屠杀”。显然，菲利普认同西塞罗兄弟关于“没有罗马，亚细亚将变得一团糟”的说法。

在西部，被征服者中能够写字的人不多，也确实没有他们的任何想法流传到今天。不过，考古学发现表明，罗马人并没有乱讲。在罗马人征服他们之前，这里的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确实居住在有围墙和壕沟的堡垒中。尽管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无法证明他们都是习惯性地持有武器，但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经常在埋葬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时把武器一同埋掉（有时候埋盾牌、铠甲甚至整驾马车）。他们希望人们记住，自己曾是一名战士。

最令人惊讶的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神灵确实喜欢人类祭品。数以百万计的游览过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游客都看到过那个最著名的例子，一具有着2 000年历史、于1984年从英国柴郡的沼泽里捞出来的保存完好的尸体（他很快就被起了“皮特·沼泽”的绰号）。在3月或4月的一天，大约在罗马人抵达不列颠10～20年之前，这个不幸的人头上挨了两下，胸部被捅，又被绞喉，最后被沉入沼泽以确保他死掉。在他被水浸泡的内脏里发现了槲寄生，由此我们得知他大约在什么月份丧命（不过年份就比较难以确定了）。槲寄生是德鲁伊教的神圣植物。据塔西陀和恺撒说，德鲁伊教徒专门从事人祭。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皮特·沼泽是某种杀人仪式的牺牲品。

一共有几十具看起来像是祭品的沼泽沉尸被发掘出来，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人们崇拜颅骨的遗迹。2009年，考古学家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在丹麦阿尔肯恩格的一处沼泽地里发现了200具尸体。很多尸体被砍成数段，他们的骨骸中夹杂着斧头、长矛、刀剑和盾牌。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杀的，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当作祭品杀死的。

当然，也许我们对这些发现的解读也有误。武器与死者同葬和在沼泽中进行人祭并不一定意味着四处战火不断。这些被发掘出的遗骸或许意味着，暴力已经只会出现在仪式当中了。而那些围墙和壕沟可能也并非出于防御目的，也许它们只是一种表示地位的方式，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人士喜欢在他们的乡间庄园仿制一些可怕的城堡似的。

但这些说法都不十分令人信服。人们花费几千个小时的时间挖掘壕沟、修筑城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挖掘出来的最完好的堡垒在英格兰南部的丹伯里。那里的木质大门和村庄的一部分被烧毁过两次。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生的第二次大火之后，大约100具带着金属武器留下的伤痕的尸体被丢进了坑里。

在丹伯里发生的事情并非孤例，人们不断有可怕的新发现。2011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德比郡的芬科发现了一处屠杀现场，他们在一小段壕沟里找到了9具尸体（其中还有一个孕妇）。这些尸体都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被同时埋葬的，上面还压着芬科堡倒塌的围墙。发掘者猜

测，大概还有几十甚至上百具遇害者的遗体没有被发现。

西塞罗显然是对的，罗马人到来前的世界是可怕的。卡加库斯大概也不会反驳这一点，因为他的观点是，被罗马人征服后的世界更糟糕了。

没人知道在罗马的扩张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这场扩张从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在公元前3世纪扩散至西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来到东地中海，又在公元前1世纪影响西北欧。罗马人并没有记录这一数字（见图1–2），但是死亡总数大概超过500万人。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卡加库斯的观点。



图**1–2** 数人头：**110~120**年左右，为罗马而战的蛮族辅助兵向皇帝展示在达契亚战役（现代的罗马尼亚）中斩获的敌人首级

资料来源：Scala授权/艺术资源，纽约。

根据罗马的内部政治情况和遇到的抵抗激烈程度不同，暴力的水平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罗马军队会彻底破坏敌人的领土，导致其后几十年内都没有人能在该地生存，就像公元前283年在一个叫作赛诺尼斯的意大利部落发生的那样。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本人就曾在战败后被作为战俘押往罗马。据他说，当公元前3世纪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结束时，人们对这样的场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他们会杀掉他们遇到的一切生命，人畜不留……因此，在罗马人

攻占一座城市之后，你或许不仅会看到人类的尸体，还能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的零散肢体。”

那些未做太多抵抗就投降的人的待遇会好得多，但罗马人最痛恨那些投降之后又出尔反尔的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恺撒在公元前58～前56年，未遇到太多抵抗就征服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但又不得不再花6年时间镇压他们的叛乱。古代的作家们声称，恺撒最后杀掉了300万高卢青壮男子中的100万，并且将另外100万人贩卖为奴。

在罗马人眼中，最可恶的冒犯者是犹太人。约瑟夫斯曾是一名犹太将军，他在66～73年发生的犹太人大起义的早期投降了罗马。据他记载，罗马人不仅烧毁了耶路撒冷的神庙，窃取了神圣的宝物，还杀死了超过100万犹太人，并奴役了几十万犹太人。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132年，当犹太人再度起义时，罗马人就真的变得恶狠狠了。一份犹太人的记载称，罗马人“不停地杀人，直到鲜血没过了他们胯下战马的鼻子才住手”。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张的，但是确实又有50万人死于非命。犹太行省被更名为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来自古代居住在这里的非利士人。幸存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耶路撒冷，每年仅有一天被允许回去。流亡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和中东地区。

西塞罗与卡加库斯观点相左的地方，在于征服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罗马统治阶层，西塞罗可以看到，在罗马军团离开、反叛之火被血水浇灭之后，和平降临了，战士的坟墓和嗜血的众神消失了。古代城市那些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围墙日渐破败，终于倒塌。新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却完全没有防御工事。

西塞罗可能会接受卡加库斯的这个观点：罗马时常会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尽管他对罗马的文明化使命十分热衷，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明白，无论是对征服者来说，还是对被征服者来说，征服的过程都并不美好。战争的胜利者可以进行空前的劫掠。在公元前80～前30年左右，罗马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因为争夺战利品的内战而崩溃。有些时候，头脑正常的商人都不会在没有武装保卫的情况下在意大利的大路上旅行。曾经接连几个月，暴徒们控制了罗马的街头，吓得连人们选举出的执政官都躲在他们（布置了防御工事的）宅邸里瑟瑟发抖，不敢到室外去。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也十分易怒，动辄就想用暴力去报复任何轻慢行为（不过倒也并非像莎士比亚那些以罗马为背景的戏剧中那样没来由地动粗）。在被一位将军[6]的手下杀害而英年早逝之前，西塞罗因为指控一群恶棍而声名远播。被害之后，西塞罗的头和双手都被砍了下来，钉在集会广场之上，用来警示那些胆敢对实权人物发表反对意见的人。

据说，在那一时期前后，西塞罗众多的敌人之一——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养不起自己的军队，他就算不上什么富人。”在公元前30年左右，一个人出现了，他

告诉我们这个逻辑会走向何方。这个人就是恺撒的甥孙——屋大维。通过战争，屋大维摆脱了那些令人厌烦的贵族，使自己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他十分明智地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以此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反对。不过，他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普通人，而且还恰好完全掌控着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屋大维接受的唯一荣誉是一个新的名字——奥古斯都，意为“最受尊崇的人”。不过，大多数贵族立刻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塔西陀说：“人们发现，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了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贵族们不再像克拉苏那样说话。他们意识到，既然现在只有奥古斯都才能使用致命的暴力，他们只得找到更安静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利维坦拔掉了贵族的尖牙。

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中说，欧洲的暴力程度在大约1500年之后下降了，因为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逐渐不再把杀戮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埃利亚斯在他的论述过程中几次提及了罗马，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罗马人早在1500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后的前两个世纪之中，富有的罗马人为自己重新塑造出和平的形象，并将这一时期称作“罗马和平”。

整个帝国似乎都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欣喜地写道：“公牛徜徉在平安的田野，刻瑞斯（农业女神）和繁荣滋养着大地；水手飞驰在平静的海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们对这个时代的奇妙罕见地表现出一致态度。曾经做过奴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称赞罗马“为我们带来了伟大的和平，不再有战争、打斗、巨寇或是海盗；从日出到日落，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意出行”。

要堆砌类似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太容易了。18世纪70年代，当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着手写作后世首部关于罗马的历史书时说道：“如果有人被要求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一个人类最幸福、最繁荣的时期，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在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7]继位之间的这段时间（即96~180年）。”

吉本虽这样说，但他也知道生活在罗马帝国并不容易。公元头两个世纪是角斗士们的黄金岁月，潮水般的人群聚集起来观看人们互相残杀（单是罗马斗兽场就能容纳50 000人）。暴力也并非局限在竞技场里。例如，59年，庞贝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角斗士表演，相距不远的纽塞利亚人也来看热闹。“像往常一样，这些粗鲁的乡村小镇人就开始互相辱骂，”温文尔雅的塔西陀写道，“辱骂随后演变成丢掷石块，然后刀剑就拔了出来。”对于野蛮的喀里多尼亚来说，这或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感到惊讶。纽塞利亚人并没有直接进行报复，而是选择向皇帝申诉。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并提交了报告。庞贝城的节日主办者遭到了放逐，而该城在10年内不准再举办角斗士表演（事

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因为在20年之后，庞贝就在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中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事情到此结束。

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而一个克罗地亚人早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就洞见到了这一点："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因为每隔100米就有一个警察，他的作用是确保我们相亲相爱。"而在1世纪的庞贝并没有这样的警察力量维持和平；实际上，在伦敦于1828年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之前，这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那么，为什么杀戮就到此为止了呢？

原因或许是，罗马的统治者成功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政府有权力使用暴力。如果在59年，庞贝人继续杀害纽塞利亚人的话，皇帝将收到更多报告，而他拥有30个军团，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未经许可就诉诸暴力、杀害可能的纳税人的惹是生非之徒。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暴力那充满矛盾的逻辑：由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能够（而且在被逼无奈时会）出动军团，所以他几乎从未真正有必要这样做。

在前言部分，我曾经提到，霍布斯将国家分成"以力取得的国家"，即用武力迫使人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和"按约建立的国家"，即利用信任让人们遵从规矩的国家。不过，在现实中，这两种方式并行不悖。在59年，庞贝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已经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人们相信这个利维坦可以威服其子民。吉本指出，罗马帝国用法律取代了战争。在公元头两个世纪，用武力解决分歧的方式，就算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至少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当然，政府和法律也有它们的问题。塔西陀笔下的一个人物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苦。"帝国的臣民们意识到，如果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消除犯罪，那么它自身也可以犯下更大的罪。

一些罗马官员将这点利用到了极致。当然，像罗马历史上常见的那样，最坏的犯罪也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适逢中央政府最弱小之时。盖乌斯·维尔列斯（Gaius　Verres）在公元前73～前71年曾统治西西里。他曾开玩笑说，他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干三年：第一年非法敛财让自己变成富人，第二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请得起好的律师，第三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能贿赂法官和陪审团。维尔列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对那些不愿意给他钱财的人进行殴打、监禁，甚至将他们钉上十字架。

但这一切终归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塞罗在对维尔列斯的指控中出名。维尔列斯最终流亡海外，才逃脱了审判。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指控腐败官员成了年轻律师迅速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虽然经常有一些门路较硬的恶棍能够逃脱处罚，但新的法律逐渐让暴力敲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罗马的战争创造出来的帝国并非乌托邦，但很多流传至今的书面资

料（罗马人和行省人民的记载兼有）确实表明，罗马使得它的臣民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而且很显然，罗马也让他们变得更富裕。随着海盗和土匪纷纷被镇压，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为了能够调动军队和舰队，政府修建了最高水准的道路和港口，而商人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反过来，罗马向这些商人征税，并把征到的大部分钱花在武装力量上。

军队集中布置在边境行省，这些行省大多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军人总数大约为35万）。因此，军队在购买粮饷上花费巨大。商人将这些食物从生产能力强大的地中海沿岸省份运送到这些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边疆省份。这一运输过程为贸易商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政府可以对此征税，从而获得更多金钱充作军费，再由此产生更多商业利润，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税收和贸易的滚动前所未有地将地中海经济捆绑成一个整体。每个地区都可以生产对它来说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再把产品销往卖得上高价的地方。市场和货币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

由于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船只变得有利可图；由于有了更大的船只，运输费用得以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前往大城市。在那里，政府投入了扣除军费之外的大部分钱财。在公元头两个世纪，有100万人生活在罗马城，这一数字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各生活着50万人。

这些城市是世界的奇迹，它们热闹非凡，散发着异味，沸反盈天，但也充满了盛大的场面与仪式，以及发光的大理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食物，更多的砖头、铁钉、盆盆罐罐和葡萄酒，而这些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更多的贸易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一点一点地，热闹的活动增加了流通中商品的数量。据估算，在公元头两个世纪中，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地区，其人均消费量通常会增加约50%。这一过程给富人带来的好处更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包括房屋的规模、宴会吃剩下的动物骨头、钱币、人类骨架的高度——证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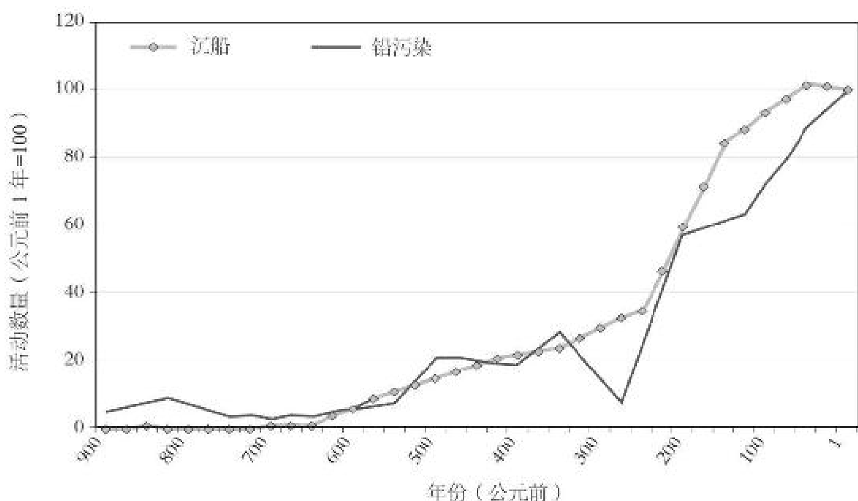


图**1–3** 富足的时代：印证贸易水平的地中海沉船数量和印证工业活动水平的西班牙佩尼多维洛沼泽的铅污染状况出现了同步的增长。沉船数量和铅污染情况都经过标准化处理，使其可以呈现在同一纵轴上。我们假设其在公元前1年的数量为**100**

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8]（他最出名的事就是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靠得太近而身故）曾在格劳庇乌山之战爆发前4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还有谁不知道，托罗马帝国皇帝之福，世界的各个角落才得以彼此沟通？人们的生活水平才得以实现巨大的进步？人们依靠着贸易才普遍享受着和平之福？"罗马帝国，并非不毛之地。

坐寇

在吉本看来，帝国幸福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罗马有幸拥有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过当的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来的无边赞颂；还有他们为自己的善德真诚地感到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喜悦"。

这种"依靠几个好人"的理论自然是有其吸引力的，首先就是它把事情简单化了。如果罗马成功的因素真的就是一系列伟大的领导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得出"在古代，战争是有好处的"这一令人不快的结论了。这种理论似乎是在说，一个组织只要有足够好的领导者，那么它就可以渡过任何难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古代世界是因为战争才变得更安全、更富庶，而应该说尽管有战争的纷扰，古代世界依然变得更安全、更富庶了。

但吉本的观点也是有弱点的。首先，古代皇帝的真正影响力是有限的。罗马确实曾经出现过一些精力旺盛的统治者，他们夙夜不懈地工作，答复信件、听取案件情况、做出决策。但如果想把事情做成，他们必须与一层又一层的官僚、律师、学者们一同发挥作用，而这些人是各

有打算的。即便是精力最为充沛的皇帝——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也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有所作为。

其次，罗马帝国不仅有奥古斯都这样的明君，也有卡里古拉和尼禄这样的暴君。他们取乐的方式与常人不同，要在罗马城燃起大火时奏乐、与自己的姐妹乱伦或是任命马做执政官才行。据那些写下这些历史的人（官僚、律师和学者们）说，在1世纪，罗马在暴君统治下的时间要比在贤君统治下的时间更长——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和图密善都留下了恶名，而他们一共统治了罗马56年。但就在这几百年中，人们却看到和平与繁荣事业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

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并不能把大批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富裕这件事归功于“贤明的牧羊人”。在大多数时候，罗马的统治精英们所追求的无外乎他们自身的利益。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他们却也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这个世界的奥古斯都们靠打败对手获得统治权，并且凭借手中握有比其他人都重的兵权维持统治。但要获得这样的武力，是要花钱的。统治者可以掠夺他的臣民养活他的军队（不毛之地的模式），但如此一来终将有一天会再无东西可以掠夺。而且，就像罗马最糟糕的那些统治者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们会一直反叛下去，直到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被掠夺一空。

从长期来看，只有当统治者懂得在何时停止劫掠，甚至学会有所回馈时，政府才能够维持下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巧妙地将统治者与土匪做了比较。奥尔森说，通常的匪徒都是流寇，他们会闯进一个社区，尽可能地偷盗他们能拿走的东西，然后再逃走。他们不在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偷盗，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奥尔森意识到，统治者也从他们的臣民身上偷盗。但利维坦与烧杀掳掠的匪徒有着巨大的区别，那就是统治者们是坐寇。他们并不会疯狂地偷盗然后再逃之夭夭，而是留在一地。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要避免犯下竭泽而渔的错误，还要尽他们所能地让臣民变得更富裕，从而使统治者可以在未来有更大收获。

通常来说，统治者有必要花上一些时间和金钱清除其他流寇，因为流寇的偷盗所得就是统治者的税收损失。如此，在社区之内镇压暴力也就变得有意义，因为被杀害的臣民就没法再在军队中服役或是纳税了，而在村庄冲突中荒废的田地也无法出产作物。统治者甚至会把皇家或贵族的收入花在道路、港口和其他福利之上，只要这些投资能在可以接受的时间之内回馈以更高的收益。

利维坦也是一个犯罪集团，但可能是所有犯罪集团里面最不坏的那个。统治者使用武力保障和平，再为此向其臣民收取费用。统治者的效

率越高，他们能取得的利润就越多。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竞争压力推动罗马政府变得越来越高效。包税人横征暴敛，导致那些受害者第二年无力再继续纳税，这样就损害了罗马的利益，因此罗马把这一制度取消了。让有生产潜力的城市居民饿死对罗马更有害，因此罗马建设了港口，甚至免费发放食物。自私自利带来了良好的副作用，使得整个帝国的臣民都更安全、更富裕。战争的矛盾性充分发挥了作用。长于暴力的人可以打造出王国，但要经营好这些王国，他们必须变成经理人。

尤里乌斯·恺撒再次成了经典的例子。他曾经写道，“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不过，如果他说的是“Veni，vidi，vici，administravi”（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我管理了）就更好了，因为他确实在来了、见了、征服了之后，又进行了出色的管理。他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就包括2 000年后仍在使用的儒略历。七月（July）也以恺撒的名字（Julius）命名。

古代皇帝并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会坐在那里算计着每在维持和平上投入一个塞斯特提乌斯[9]就能在税收上获得两个塞斯特提乌斯的回报。不过，很多古代帝王都是冷峻而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利维坦与其臣民之间的处事原则，还懂得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们是理解人民的感受的。公元前2360年左右留下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段文字是目前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政治性文告之一。拉格什（今伊拉克南部）的国王乌鲁卡基那（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2380～前2360年）在文告中宣称，他已经“将拉格什的居民从高利贷、严苛的控制、饥饿、盗窃、凶杀和掠夺中解救了出来。他实现了自由。孤儿寡妇不再需要强者的垂怜：乌鲁卡基那正是为了他们而与宁吉尔苏女神订立了誓约”。就算是奥古斯都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乌鲁卡基那的形象几乎在时间缥缈的迷雾中消失了，但根据这份文告，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清楚投入的价值。政府统治之道非凡的一部分就是信任。如果人民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发了狂、腐败或者是个白痴，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违抗统治者的命令；而如果政府的管理看起来技术娴熟、公正，甚至受到众神的青睐，那么人们密谋反对这一统治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不过，根据事物的平均规律，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一定也有疯狂、腐败或无能的统治者。故事的真正主角，也就是那些让利维坦发挥作用的人，是官僚、律师和他们的随从们。那些文书办公人员和精于算计的人经常掣肘奥古斯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经常掣肘卡里古拉。

在流传至今的材料中满是这样的故事：罗马皇帝因那些专门妨碍议案通过的元老和操纵法庭事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生气。大体来看，在这样的事件中，那些臣僚都不会有好结果。但在这些留下鲜明印记的案例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没那么出彩的人。从不列颠到叙利亚，在到处可见的墓碑上，人们骄傲地铭刻着自己的官职，以及他们在委员会供职、征税、在底层官场攀爬中所取得的荣誉。“我，就连我这样的

人，”一个早年务农的北非人吹嘘道，“也成了城市议员，又被他们推选坐在了厅堂之上……多年以来，我以我在工作中的成绩而变得非同寻常，也从未有任何的指控中伤我……因此，当我死去时，我就像活着时一样光明磊落。”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者们可以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自私自利。他们塞满了自己的腰包，不失时机地提拔自己的亲属。但同样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更多的中层管理者充满热忱、刻苦而勤奋。他们确保了引水渠的修建、道路的维护以及信函的送达。他们推动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继续前行。

毁灭性的大错也可能发生，罗马也曾度过那些危机接二连三出现的危险阶段。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面对的压力是不变的。战士们征服了更小的国家，从而不得不变成管理者。良好的管理可以让国家更高效、更安全、更富有，这样的国家可以让管理者有能力与敌对的国家竞争。而在这样的竞争中，管理者又不得不变回战士，用暴力消灭掉他们的敌人。

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

1992年4月的一天，在洛杉矶城外的西米谷，一个陪审团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他们先是看了一盘录像带，上面显示，一个叫罗德尼·金的人在因超速驾驶被截停后，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警察一共用警棍打了他56下，还踢了他6脚。随后，医生告诉陪审团，金的面部和脚踝都受了伤。然后，有护士做证说，当警察把金送到医院时，他们还拿金挨打一事开玩笑。但陪审团最后宣布三名被告无罪，而对第四名被告没能达成判决意见。

当天晚上，洛杉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美国。在暴乱中，共有53人丧生，2 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在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三天，金出现在电视上，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大伙儿，我只想说，你们知道，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别、别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

这是一个好问题。古时候的人们肯定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能否不选择那条充满暴力、化一切为不毛之地的战争之路，而是一起坐下来，协商建立一个更大的组织，制定出规则，再自觉地纳税，然后安然相处？

显然不能。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吵吵总比打打好。”但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人们自愿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而不是被实际或潜在的暴力迫使就范。

就拿帕加马的菲利普的例子来说吧。我在前文曾提到过他关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世界是如何被战争、海盗和匪徒毁掉的看法。“靠着我勤勉的双手，我将这部历史传递给希腊人，”他解释道，“如此……通过观察他人的痛苦，希腊人或许会选择以正确的方式生活。”但希腊人不为所动，继续互相杀伐。他们最终停了下来，但不是因为菲利普的“吵吵”，而是因为罗马人的“打打”。

公元前67年，罗马元老院派格奈乌斯·庞培（出于某些原因，他被称为“伟大的”庞培）消灭侵扰希腊水域的海盗。像通常一样，他们这么做并非大发善心，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时，海盗活动十分猖獗，以至于在公元前77年，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都被绑架了。（他当时对绑架者说，等他被赎回去，他会再回来把绑架者全部钉上十字架。当然，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前70年之后，一些海盗甚至开始袭击意大利的海港。

希腊人完全无力镇压海盗活动，但庞培带去了罗马式的组织方式和具有令人惊异的现代特征的策略。2006年，深受伊拉克武装袭击之苦的美军采取了一种新策略，他们将这种策略称作“清剿、坚守、建设”。美军不再把歼灭或擒获袭击者作为首要目标，而变为在某一个地区赶走袭击者，固守这个地区，再重建这个地区。随后，再有条不紊地前进到下一个地区。到2009年，死于暴力袭击的人数下降了超过80%。而在2 000多年前，庞培想出了同样的策略。庞培将地中海划分为13个区域，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时间里逐一清理这些区域，同样遵循“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见图1–4）。在围捕了20 000名海盗之后，庞培并没有钉死他们，而是赐予他们和平的生活。在关于庞培的传记中写道：“野兽，通常在臣服于更高贵优雅的存在时，就会丧失其凶狠和野蛮。因此，庞培决定把这些海盗从海洋迁移到陆地，让他们习惯在城市里居住，习惯在田间耕作，从而让他们品尝到文明生活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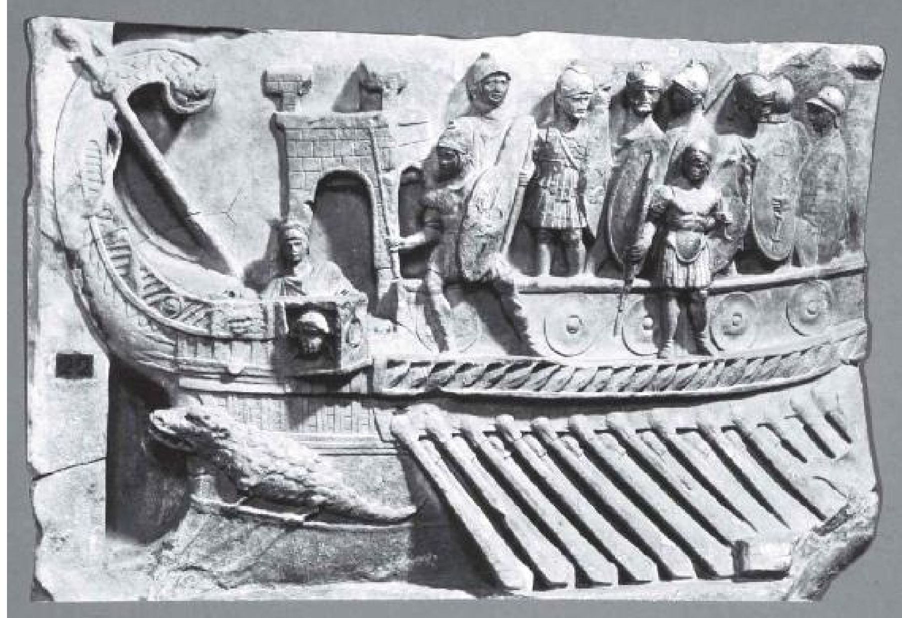


图**1–4** 肃清海洋：在公元前1世纪的一块浮雕上，罗马水兵正准备登上敌舰

资料来源：Scala授权/艺术资源，纽约。

在海洋平静之后，庞培的目光转向了陆地。他率领罗马军队，打了5次漂亮的战役，穿过叙利亚的城市、高加索的要塞和埃及的边界，一路上击溃了异邦的国王、反叛的将军和放肆的犹太人。他又一次采取了“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制定法律，安置罗马守备队，整顿财政。在清除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同时，庞培下调了税率，提高了罗马人的收入。和平降临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几个希腊城市称颂庞培是下凡的神明。

庞培之所以诉诸武力，并不是因为罗马人缺乏“吵吵”的技巧——这座城市里挤满了西塞罗这样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像许多罗马人一样，清楚“吵吵”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是在“打打”之后。比如，塔西陀记载道，阿古利可拉把他在不列颠的第一个夏天（77年）花在了恫吓当地原住民人上——塔西陀称他们为“孤陋寡闻、无知蒙昧，因此才热衷于打架的人”。随后，阿古利可拉在冬天“为当地人提供生活便利设施，让他们能够适应和平而静谧的生活。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阿古利可拉都鼓励并支持当地人兴建神庙、广场和设施良好的住房”。

不列颠人很高兴。塔西陀说道：“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厌恶拉丁语，反而变得希望可以说好拉丁语。同样，我们的民族服装也成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穿着托加。”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把这种方式称作“软实力”[10]，即“利用制度、思想、价值观、文化和政策的合法性等无形的因素”赢得人心，与之相对的是战争和经济等具有强迫性的硬实力。

塔西陀明白软实力的诱惑："人们逐渐开始倾心于那些消磨意志的诱惑——游乐、洗浴、奢侈的宴会，这些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把这些新奇的事物视作'文明'，但其实这些只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不过，他也知道，软实力必须在硬实力发挥作用后才能奏效。在19个世纪之后，在越南的美国人则这样形容："先抓住他们的要害，然后就能赢得他们的心和头脑了。"罗马人在不列颠的成就要远大于美国人在越南的作为。罗马人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和头脑，因为他们已经剥夺了不列颠人反击的自由。当阿古利可拉还要对付卡加库斯这种还能反击的不列颠人时，还没轮到托加出场呢。

考古学发现大体印证了这点。罗马的产品，特别是葡萄酒（放在与众不同的包装里运来的），即便在罗马边境以外很远的地方都很抢手。有传闻说，高卢人的酋长为了换取一大罐葡萄酒，甘愿把一个人当作奴隶卖掉。而罗马的作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习惯于罗马生活方式、靠近边境地区的蛮族人，打起仗来都不如那些远离罗马、依旧野蛮的蛮族人凶猛。

最具诱惑力的软实力是知识。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罗马人完善了一系列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二者在起源时都并非罗马帝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两种信仰的创始人都对世界的现状持批评态度。一个是身无分文的希腊哲学家，一个是犹太人木匠，两个人都依靠真理从社会的边缘和帝国地理的边缘发迹。经过许多代人之后，当时帝国的冷峻而聪明的统治者做了他们这样的人经常会做的事：他们颠覆了这些反主流文化。他们并没有抗拒这些文化，而是把其中表现得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年轻人吸收进统治阶层中。他们在这些思想中挑挑拣拣。在曾经的极端分子中，他们奖励那些懂得讨好统治阶层的人，无视那些不谙此道的人。逐渐地，他们把对帝国的批评转变成了对帝国的辩解。耶稣对虔诚的基督徒们说："恺撒的归给恺撒。"而圣保罗补充道："因为所有权力都是来自上帝的，掌权者都是上帝所立的。"

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使帝国的臣民们确信，未经授权的暴力是罪恶的。这对利维坦来说是件好事。于是，帝国开始大力向其邻邦输送这些价值观。不过，尽管这些新的思想十分具有感染力，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劝诱任何人加入帝国。只有战争或是对战争的恐惧能做到这一点。在那之后，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时机来了，它把被征服者融为一体，让帝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统一。

像很多事情一样，对于战争先行原则来说，那些看上去的例外反而可以证明这一原则。例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们有很多理由摒弃它们之间的分歧，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体。在城邦内部，希腊人大体上可以很好地维持和平：到了公元前500年，人们每天出门就不需要携带武器了；而到了公元前430年，雅典有一位上层人士甚至抱怨说，他再也不能在街上殴打奴隶了（事实上，这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当城邦之间也处于和平时，希腊的暴力死亡率必然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低点。然

而，对大多数城邦来说，三年之中往往就有两年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据柏拉图说：“大多数人口中说的‘和平’只是一种想象，实际上，每个城邦都在与其他所有城邦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随后，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公元前477年，几十个吵吵嚷嚷的希腊城邦同意把大部分主权让渡给雅典。他们此举并非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或是对雅典的推崇，而完全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依然各自为政，就很有可能会被波斯[11]帝国逐一吞并。波斯帝国在公元前480年曾试图征服希腊。到了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左右，在波斯人的威胁衰减之后，几个城邦就不再愿意向雅典臣服，转而决定各行其是，但很快被雅典人用武力制止了。

到了公元前3～前2世纪，新的一轮城邦合并潮流席卷了希腊。这一次，城邦们纷纷联合起来，组成了同盟（字面的意思是“社群”，但通常翻译为“同盟”）。它们建立起代表同盟的政府，将安全防御和财政管理统一起来。但它们的主要动机依然是担心自己无法独立赢得战争——起初是对抗亚历山大大帝那些强大的马其顿继任者，随后是对抗入侵的罗马人。

最特别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胖家伙”）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身上。托勒密八世先是在公元前163年被他的兄长（另一个托勒密）赶出了埃及。公元前155年，被驱逐的托勒密立下遗嘱，一旦他死后无嗣，他的新王国昔兰尼加就将交给罗马人。阿塔罗斯三世则更为过分。他在公元前133年死去时无嗣，随后他的臣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被赠送给了罗马帝国。

我们不知道罗马人对托勒密八世的遗嘱有何看法，因为这位体重超重的君主实际上又活了40年，并且在勾引了自己的继女之后，生下了一大堆继承人。不过，我们知道，对于阿塔罗斯三世的馈赠，罗马人与帕加马人一样感到惊讶。而出于私心，元老院中的各派系对阿塔罗斯三世是否有权馈赠他的城市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罗马的热爱，而是因为比起罗马，他们更害怕战争[12]。在没有后嗣的情况下，两人都十分惧怕内战的爆发。早在“胖家伙”设立遗嘱之前，托勒密兄弟就曾相残过。阿塔罗斯三世的情况更糟糕。一个自称是他同父异母弟弟的人觊觎王位，煽动穷人造反（差点在阿塔罗斯死前就酿成内战），而另外4个邻国的国王则等待时机瓜分帕加马。因此，对于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来说，他们把国家和平地移交给罗马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世界对罗德尼·金的经典回答：不，我们没办法安然相处。唯一能说服人们放弃杀戮和掠夺的力量就是暴力，或者对即将来临的暴力的恐惧。

要想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放眼世界的另一端。

我们就是怪兽

在南海的一座岛屿上，一个名叫西蒙的男孩站在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他正跟插在棍子上的一颗死猪头争论。

“你可别以为你们能猎杀那头怪兽！”猪头说。

西蒙没有回答。他口干舌燥，脑袋里一跳一跳的。他的癫痫要发作了。

在海滩上，他的同伴们载歌载舞。当这些男孩刚发觉自己流落到这座岛屿时，一切都很有趣，仿佛是游戏一样：他们游泳，吹海螺，在星空下入眠。但在不知不觉间，他们和谐的小社会就分崩离析了。一个阴影潜藏在他们之间，像一个邪恶的怪兽一样让森林变得可怕。

直到今天。今天，一群十几岁的猎人刺中了一头正在哺育幼崽的母猪。男孩们兴奋地大喊大叫，互相涂抹着鲜血，准备享用一顿大餐。但他们的“首领”认为，需要先做一件事：他把那面露微笑的猪头砍了下来，并把它插在那根刺死母猪的尖木棍上。“这颗猪头是献给怪兽的，”他对着森林喊道，“这是一个礼物。”

随后，男孩们开始跑着把肉带到海滩上去。只有西蒙没有去，他一个人蹲在空地那斑斑驳驳、看起来不真实的光影之中。

猪头说：“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儿！事情办不成是我的责任吗？为什么事情搞成这副样子呢？”

西蒙知道了。他的身体僵硬地弯了下去。他的癫痫发作了。他先是跌倒，再向前，向前，朝着那头猪咧开的大嘴。牙齿之间的血液已经发黑了，周围环绕着苍蝇。那里面是漆黑的，黑暗还在逐渐扩大。西蒙知道了：怪兽是杀不掉的。我们就是怪兽。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他令人难忘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这样写道。流落在太平洋上、远离学校和规矩的一群男孩懂得了黑暗的事实：人类杀戮成癖，我们的心灵准备好了使用暴力。我们就是怪兽，只有一层脆弱的文明加以控制。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儿机会，怪兽就会逃脱。戈尔丁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办不成。这就是为什么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没法商谈，只能开战。

不过，是这样吗？在南海的另一座岛屿，或许就在距离戈尔丁的岛屿不远的地方，似乎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就像小说家戈尔丁一样，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怀疑，在这个暖风吹拂、棕榈叶亲吻着海浪的纯朴环境里，她可能会看到人性这根曲木[13]被剥去文明的粉饰。但与从来没去过太平洋的戈尔丁不同（不过在“二战”结束时，他原本要负责指挥登陆艇参加太平洋战事

的），米德在1925年逃离了纽约城，来到了萨摩亚。

“当拂晓来临时，”米德在她的人类学经典《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中写道，“恋人们就离开幽会地点——棕榈树下或是停放在岸上的独木舟旁——溜回家中。天亮时分，他们都会在自己应当睡着的位置出现了。”

猪头在萨摩亚可没什么可怕的。“太阳越升越高，茅草屋顶投下的影子也越来越浓……今天要烹饪的家庭都在辛勤劳作；人们从内陆带回来了芋头、白薯和香蕉；孩子们四处跑来跑去，弄来海水，或是弄来树叶喂猪。”晚上，一家人会在平静和满足中分享食物。“有时，直到午夜过后许久人们才会入睡。最后，就只剩下了海浪轻打礁石的柔和声响和恋人们的低语，整个村庄都休息了，直到破晓……”

“萨摩亚，”米德总结道，“在这里，没人会下大的赌注，没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没人会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苦，也没人为特殊的目的而进行决斗。”在萨摩亚，怪兽不知所踪。

戈尔丁和米德都把暴力视作一种病态，却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在戈尔丁看来，暴力是存在于基因之中的，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文明是唯一的解药，但即便是文明也只能控制其症状，而不能除去病根。而米德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她看来，“南海的例子”证明暴力是传染来的，而文明正是它的源头，而非它的解药。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相互厮杀，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好战的文化使然。而在20世纪还在继续厮杀的人们，也是因为好战的文化让他们如此行事。

1940年，当法国沦陷于希特勒的铁蹄，伦敦被雨点般洒落的炸弹袭击，波兰犹太人的尸体堆满壕沟时，米德发现了一个新的比喻：“战争不过是一种发明。”当然，她承认，战争是“一种大多数人类社会都知晓的发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为战争似乎是大多数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感到绝望，我们也应当从中得到些许慰藉：糟糕的发明总会被更好的发明所取代”。

米德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过她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1969年，当米德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退休时，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令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们感到满意的是，她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个又一个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之后报告说，他们的人民也是和平的（人类学家喜欢把自己考察的人群称为“我的人民”）。那是一个属于歌曲《战争》、谈情说爱的集会和宣称要颠覆五角大楼的反战示威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只可能看到卢梭终于赢得了他与霍布斯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辩论。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就曾是这么想的。1964年，他暂停了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涯，转而去了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雨林地区。他打算研究那里的亚诺玛米人的

婚姻状况[14]。他满心期望亚诺玛米人过着一种他称之为“单纯的人类的生活”。他说：“这种生活图景早在我进行实地考察前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种‘卢梭式’的想法。”但对此，亚诺玛米人却持有不同的想法。

“当我像鸭子一样蹒跚地走过低矮的通道（边界地带出于防御目的的通道），走进村落中央的空地，第一次见到亚诺玛米人时，我简直兴奋得难以自持。”沙尼翁写道。沙尼翁浑身是黏糊糊的汗，手上和脸上更是因为虫子叮咬而肿了起来。

> （我）向上看去，结果倒抽了一口气。我看到一打健壮、赤裸、满身是汗的可怕男子正挽弓搭箭，瞄准我们！……他们的鼻孔滴着暗绿色的黏液，那黏液甚至挂到了他们的胸肌上，或是沿着下巴向下淌。我们抵达村落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些人往鼻子里吹一种迷幻药剂……我的下一个发现是，有差不多一打饥肠辘辘的猛犬包围了我，对着我的腿把牙咬得咯咯直响，仿佛我将是它们的下一顿大餐。我站在那儿，无助而可悲地拿着我的笔记本。接着，一股腐烂的蔬菜和秽物的臭气袭来，我差点吐了……
>
> 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前一天，有7个女人被邻近的村落劫走了。就在那天早上，这个村落的男人和他们请来的帮手与劫掠者经历了一场野蛮的棍棒大战，救回5个被劫的女人……我承认，如果有什么外交渠道能让我逃走的话，我当时就会终止我的实地考察，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但他留了下来，并且在其后的30年里又来访了至少25次。他发现，亚诺玛米人的世界与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并不一样。他观察说：“有很多事件，既体现了个人的恶毒，又展现了集体的好斗……这些事件包括最普通的打老婆、打胸膛，以及决斗[15]（见图1–5）。”

凭借几十年来的数据，沙尼翁发现大约有1/4的亚诺玛米男子会死于暴力，而2/5的男子曾经参与过至少一次杀人事件。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使用暴力是有“报偿”的。平均而言，杀过人的男子比没杀过人的男子生下的孩子多两倍。怪兽就在奥里诺科河的上游活蹦乱跳着。

与霍布斯和卢梭不同，沙尼翁从来没有被驱逐过（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圣巴巴拉教书，对于一个教授来说，那可是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不过，他在学术上的对头们对他的质疑也是不遗余力的。首先，他们质疑他是如何搜集收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沙尼翁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愿意坦承在实地考察中遭遇的困难。沙尼翁承认，他一抵达比萨西特里村就遇到了麻烦：他发现，亚诺玛米人认为，大声说出别人的名字是非常无礼的（无礼到可以动粗的程度）。这样一来，他原本计划的族谱研究就变得特别困难。沙尼翁不屈不挠地继续着他的努力。亚诺玛米人被他的粗鲁冒犯了，于是为了报复，他们就开始编造出一些名字，而且越傻越好。而这个愚蠢的外乡人居然把这些名字都记录了下

来，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有趣。



图**1–5** 并非高贵的野蛮人：亚诺玛米人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进行的棍棒大战，照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注意图中间偏左位置的男子，在他胸部和腹部上的暗色的线，是从他头上流下来的血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拿破仑·沙尼翁，《亚诺玛米人》，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97年，187页。

沙尼翁一直到5个月之后才得知真相。当时，他走访了另一个村落，说出了一个比萨西特里村人告诉他的名字。“霎时间一片寂静，紧接着整个村落都陷入了一片无法抑制的狂笑声、笑得喘不上气声、抽气声和喊叫声。在他们看来，我认为比萨西特里村的头人名叫‘长屌’，而他的弟弟名叫‘鹰屎’；头人的儿子名叫‘混蛋’，女儿名叫‘放屁’。”

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最好有个后备方案。现在，既然沙尼翁的计划已经告吹，他就拿出了他的后备方案。亚诺玛米人或许不愿意说出他们亲属的名字，但是他们很愿意说出他们敌人的亲属的名字。沙尼翁发现，用一点儿小恩小惠或者小敲诈手段，总能帮他弄到需要的信息。

后备方案奏效了。不过，这个方案可不是一个教人与其他文化互动的好例子。实际上，美国人类学会的执行委员会在2002年正式通过了对沙尼翁的实地考察方法的谴责，这在学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直到2005年，在一次全体投票之后才撤销了这一谴责，而这在学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人们群情激愤。有些人类学家问道，如果沙尼翁能如此不诚实地对待“他的人民”，那么学者们还能相信他说的话吗？一些曾经在亚诺玛米人居住地工作过的人干脆拒绝相信他，坚称亚诺玛米人一点儿也不热衷于暴力。他们说，沙尼翁伪造数据，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接下来，事情就真的变得很难堪了。一些批评人士指责沙尼翁参与了巴西人的密谋，将亚诺玛米人居住地分割成小块的保留地，使淘金者可以恐吓各个部落，从而更方便地攫取资源。2012年，委内瑞拉活动家指责淘金者杀害了80名亚诺玛米人，但政府派去的调查团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一名批评人士甚至宣称，沙尼翁助长了麻疹的传播，导致数百名亚诺玛米人的死亡。

这在学术史上算不得光彩的一笔。但世界总是平衡的。就在针对沙尼翁和他的蝇王式的研究结论的批评日渐高涨时，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也开始“享受”同样的待遇。1983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萨摩亚工作的新西兰人类学家德雷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了一本书，指责米德完全误读了这个地方。

弗里曼从米德未发表的记录中发现，米德远没有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讲着他们的语言，吃着他们的食物，光着脚、盘着腿坐在满是卵石的地上”。实际上，米德对当地人的语言仅仅略知皮毛，她仅在萨摩亚待了几个月，她在身份问题上也没有说实话。她和一名美国药剂师及其家人住在一间小别墅里，还曾经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共进晚餐。弗里曼总结道，由于米德在萨摩亚过着殖民者一般的生活，她没有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萨摩亚警察记录上就清清楚楚记载着的事实：萨摩亚岛上的暴力死亡率要高于美国（在阿尔·卡彭[16]的时代，那可不是个小数字）。

更糟糕的是，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法阿普阿·法阿木（当时她已经是一位曾祖母，但在1926年时，她是米德的一位重要线人）承认，她和她的朋友福福阿都觉得米德十分可笑，就像亚诺玛米人对沙尼翁的看法一样。不过，其中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米德始终没有意识到当地人在跟她开玩笑。米德对于性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让法阿木感到十分难堪。法阿木说：“我们就撒些小谎来骗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着那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性方面的荒诞故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类学家们彼此之间的指责、揭短行为愈演愈烈，实在让人有种人类学在霍布斯和卢梭之后就再无进步的感觉。有些人类学家甚至开始庆祝，声称他们所从事的这一领域根本没有什么结论可得出。新一代的学者声称，实地考察根本就不是一种搜集数据的方法，而更像是一种编故事似的艺术表演。那些寄希望于实地考察能得出什么“事实”的人根本就是大错特错了。

幸运的是，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在恶意中伤和口水战的背后，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家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有条不紊地做着真正的工作。他们慢慢地将小规模社群的暴力情况搜集起来，建立起一个信息量惊人的数据库。从非洲到北极，人们在世界各地耐心进行的研究最终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发现：在小规模社群中的暴力死亡率通常高得惊人。

在20世纪，工业化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种族灭绝事件。自理查德森的《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之后（我曾在前言部分中提及过），人们整理出丰富的数据库，从而使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在这100年中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大约100亿人中，大约有1亿~2亿人死于战争、世代仇杀和凶杀等暴力事件，这一死亡人数大体是总人口的1%~2%。而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进行研究的小规模社群中，平均的暴力死亡率则要达到10%~20%，是前者的10倍。

这并不意味着亚诺玛米人和萨摩亚人像19世纪典型的野蛮人那样整日随意杀人、伤人。人类学家还发现，即便是最凶狠的族群，也懂得通过亲属圈子、交换礼物和饮宴等渠道和方式为大部分冲突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选择用血说话的概率高得惊人。2008年，生物学家、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的高原进行实地考察。那个被戴蒙德描述为“欢快、热情、善于交际的”司机在闲谈中对他说，自己曾经参与过一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仇杀，该仇杀共夺去了30条性命。戴蒙德对此感到十分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由于他在书中讲了这个故事，这名司机起诉了他，要求索赔1 000万美元。这个案件最终没有被受理。）

人类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他们的人民”的行为方式经常如《蝇王》中的人物一般。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用于观察的时间往往不够长。例如，在她十几岁到20岁之前，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与她的人类学家双亲一道，在喀拉哈里沙漠与桑族[17]的打猎采集部落生活在一起［如今她以其著作《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闻名］。她用敏感的笔触描写了那些被她称为“无害的人”的桑族人的生活。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桑族人相互残杀的频率甚至高于高纯度可卡因流行高峰期的底特律市中心的凶杀频率。

托马斯之所以为她的书取名《无害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并不是因为她不善于观察。如果在某一个打猎采集的社群中暴力死亡率为10%，那么在由大约一打人组成的小团体中，大约每25年才有一个人被杀害。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有足够的资金和毅力在某一个地点考察25个月，更不要说25年了。要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将遭遇不幸的劫数，人类学家需要经常回访，并且最好能兼顾多个社群（就像沙尼翁在亚诺玛米人中间做的那样）。

现在，暴力频繁的证据很确凿了，但想要解读它就是件更复杂的事

情了。如果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提出的那样，战争是由文明传染而来的话，那么桑族人频繁的暴力行径就是从西方人那里传染而来的。这一想法给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喜剧《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带来了灵感。而一些批评沙尼翁的人说得更过分，他们指责说，沙尼翁通过用钢制斧头换取信息的方式把战争的恶习（以及麻疹）传染给了亚诺玛米人。

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回顾历史。那些小规模的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是否就早已经战争频发（《蝇王》中提出的观点）？还是直到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后，它们才知道战争为何物（《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出的观点）？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困境：大多数小规模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完全没有文字记载。

玛格丽特·米德的最爱之地——萨摩亚，就是个好例子。关于这个群岛的最早的详细记载，来自英国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他在1830年抵达此地，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着火的阿纳村。威廉姆斯写道：“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怒火燃烧了将近9个月。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一天都会出现死者和伤者。”这场战争制造了一片不毛之地：“阿纳的所有区域都没有人居住了。沿着美丽的海岸线行驶上10英里或12英里，你也看不到一个居民。”

就算阿纳村发生的事情不能说服威廉姆斯，让他相信萨摩亚人不是好惹的，后来发生的事也能达到这个效果。萨摩亚人的酋长们向他展示了经过防腐处理的人头，这些人头都是他们的祖先的战利品。酋长们还给威廉姆斯讲了过去的战争和屠杀故事。有一个村子，每打一次仗就会在一个篮子里放一块石头。威廉姆斯数了数，有197块。

但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威廉姆斯是第一个详细记载萨摩亚的欧洲人，但他并非第一个抵达萨摩亚的欧洲人。1722年，荷兰探险家雅可布·罗赫芬（Jakob Roggeveen）就曾来到萨摩亚。在随后的100年中，又不断有人追随他的足迹而来。我们可以认为，威廉姆斯看到的每一颗人头、石头，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1722年之后积累下来的，都是文明传染的产物。

不过，考古学发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在萨摩亚的内陆，满是史前时代留下的山中堡垒。有一些是1722年之后修建的，但碳–14定年法显示，其中的一些堡垒有着600～1 000年的历史。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萨摩亚人就曾经建筑堡垒，而且很可能是出于战争目的。萨摩亚的传统文化中描绘了大约800年前对抗汤加入侵者的大战，而这样的故事为堡垒的修建提供了说得通的解释。当欧洲人来到萨摩亚时，当地人使用的木质棍棒和作战用的独木舟的样式，正是源自那个时代汤加人使用的样式。这说明，萨摩亚人一直保留着使用致命武力的传统。

看来，即便在萨摩亚，《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出的理论也不是很

站得住脚。但对于考古学的发现，总是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考古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也还没有太多的考古学项目培训未来的考古学教授们。那些挖掘历史的人，往往是从其他领域转到这个行当来的，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军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他们发掘的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战争和破坏。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新一代来到了这个领域，这些在大学的人类学系和考古学系接受教育的男男女女，往往对史前时代抱有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中一样的观点。因此，同样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往往在任何地点都看不到战争和破坏的影子。

要让一个中年人回首年轻时做下的蠢事，是很痛苦的。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差不多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那种理论的极盛时期），我在考考纳里斯做了几个夏天的挖掘工作。那是一处非凡的希腊史前遗迹，坐落于如童话般美丽的帕罗斯岛。我们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约在公元前1125年的一次暴力袭击中被摧毁了：防御工事被铲平，房屋被烧毁；守军在墙上堆了些石弹；在卫城的窄巷里还发现了几头驴的骸骨——它们没能逃脱最后的劫难。但我（我必须强调，我的同学们也跟我一样）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东西是战争的证据。一旦我们认定没有战争，那么剩下来的任何一种解释方式，不管它有多么不现实，都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那么多的考古学家，即便在面对非常明显的证据时，还要坚持说本章前面提到过的那些西欧的前罗马时代的山中堡垒是举行仪式的地方，是一种标识地位的方式或者任何别的东西，唯独不会是军事基地。但就像人类学家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那些证据没法再被硬塞进《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及的那种理论模式中去了。

新的科学方法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作用。1991年，登山者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发现了著名的“冰人”——一具来自公元前3300年的被冰封的尸体。起初，考古学家推断他死于一场暴风雪。2001年，通过扫描发现，他的左侧腋窝处有一枚箭头。但即便如此，一些考古学家仍然猜测这是一种葬礼仪式，人们把他的遗体运到山中安葬。不过，在2008年，新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显示，“冰人”至少被袭击了两次：第一次袭击重伤了他的右手；在几天之后的第二次袭击中，他被钝器击打了后背，又被箭射中，伤及了动脉。2012年，纳米扫描原子力显微镜发现了完整的红细胞，这证明，他是在中箭后的几个小时内失血过多身亡的。

如果不是“冰人”保存得这么完好，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不过，对大量骨骼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同样能得出骇人听闻的结果。例如，大约在1325年，至少有486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乌鸦溪被杀，并被抛进沟中。超过90%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受害者都被剥了头皮，他们的眼睛被挖了出来，舌头被切了下来，牙齿都打掉了，还被割了喉；有一些人被砍掉了头。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剥头皮

或是被射中了：他们的骨头上留下了部分痊愈的旧伤。

乌鸦溪的挖掘开始于1978年。从那以后，关于美洲原住民遭受大屠杀的证据就层出不穷。最近的一次发现是在科罗拉多州圣脊。大约在800年，那儿的一个村庄被烧毁了，至少有35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虐杀。他们的敌人用钝器（棍棒或者就是石头）砸烂了他们的脚和脸。凶手剥了每个人的头皮，割掉了耳朵，又把一些尸体剁成了几十块。就如同波利比乌斯笔下1 000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他们甚至杀掉了村里的狗。

实际上，在乌鸦溪、圣脊或萨摩亚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让罗马人感到惊奇。西塞罗和塔西陀，就像霍布斯和戈尔丁一样，清楚地知道怪兽很近，很近，很近，而只有利维坦这个更可怕的怪兽才能制服它。

怎样才能变成罗马

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敏锐的问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通往丹麦？

福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买一张去丹麦的机票。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丹麦是一个（用福山的话说）“传说中的地方，它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稳定、民主、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程度极低。每个人都会想，怎样才能把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变成‘丹麦’呢？”

如果在2 000年前有政治学家的话，他们会问，怎样才能成为罗马。罗马帝国虽不是很民主，但无疑是和平的。按照今天的标准，罗马也很稳定、繁荣和包容（腐败程度比较难以判断）。而与罗马帝国不同的生活方式，则不仅与今天的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生活有很多相似点，而且还要危险得多。

在这一章中，我提出要解释罗马人如何塑造了罗马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利维坦镇压了暴力，因此罗马人（今天的丹麦人）压制了暴力；而在另一方面，暴力又是锻造利维坦的先决条件。总而言之，战争看起来还是有好处的。但并非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战争被证明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但是在很多地方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家在波罗的海沿岸、澳大利亚的沙漠中、中非的森林中都曾发现过无休止的战争的痕迹，但是这些地区都没有产生属于它们的罗马帝国。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怪兽不能在所有地方都变成坐寇？看起来，战争只是在有些时候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知道，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

是什么。

[1] 古罗马时期的喀里多尼亚大体在今天的苏格兰一带。——译者注

[2] 对历史学家来说，要使得古代对战斗的描述说得通，是一桩臭名昭著的麻烦事。

[3]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4] 托加：罗马式的长袍。——译者注

[5] 希腊人声称，其他语言在他们听来就像是在说“bar bar bar”。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这种傲慢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外国人一概统称的做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希腊人把罗马人也视为蛮族。

[6] 一位将军：罗马“后三头同盟”成员之一的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 Marci Filius Marci Nepos）。——译者注

[7] 图密善和康茂德：二人都是罗马时期的暴君。——译者注

[8] 普林尼：在罗马历史上，共有两个著名的普林尼，两人为舅甥关系，同时也是养父子关系。此处所指的是老普林尼。——译者注

[9] 塞斯特提乌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译者注

[10] 约瑟夫·奈所著《软实力》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5月出版。——编者注

[11] 波斯：伊朗旧称，自1935年更名伊朗。——编者注

[12] 据我们所知，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最为热爱的事物是女人。在托勒密八世娶了自己的姐姐（这意味着他的继女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女）之后，又勾引了自己的继女。而阿塔罗斯三世与其母亲的关系连世俗的希腊人都感到反常。（阿塔罗斯三世的另一个爱好是种植有毒植物，他在这一方面也确有天赋。）

[13] 人性这根曲木：语出康德，“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编者注

[14] 对于术语，人类学家再重视不过了。一项对沙尼翁的观点的研究认为，“Yanomam（亚诺玛）是沙尼翁对整个族群的称呼，而那些将这一族群称为Yanomam的人往往是沙尼翁的观点的支持者。而那些更愿意使用Yanomami（亚诺玛米）或Yanomamo这些名词的人则通常持中立，或是反对沙尼翁的观点”。我一直觉得采取中立的态度比较好，所以我使用了Yanomami这一用法。

[15] 打胸膛的意思是，两个愤怒的人轮番击打对方的左胸，直到有一方难以承受为止；而决斗，则是两个更加愤怒的人用（有时候是削尖了的）木棍击打对方的头部，直到一个人被击倒。

[16] 阿尔·卡彭：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黑帮头目。——译者注

[17] 再一次，词语的使用可能会带来问题。1996年，使用桑族语的人们在一次会议上决定，以后使用“桑族”（San）作为他们的整体称呼，而不再使用以前的“布须曼人”（Bushmen）这一称呼。但有些人认为“桑”这个称呼带有贬义，因为在纳马语中，“桑”的意思是“外来者”。

War

What Is It Good For?

第二章

将怪兽放入囚笼：建设性的战争

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希腊人有个词是这么说的”，人们常这样说道，在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词汇当中，有一个词是“混沌世界”。在希腊神话当中，混沌世界是在众神创造宇宙之前就存在的无序的虚空。而在希腊的战争当中，混沌世界是波斯将军马铎尼斯在公元前479年8月的一个早晨看到的场景。当时，太阳正在普拉提亚城的上空升起。众多全副武装的希腊步兵已经在俯瞰马铎尼斯营地的山坡上驻扎了一个星期。就在前一天夜里，希腊人开始撤退，但场面一片混乱。有些人拒绝后撤，坚称撤退是懦夫的行为；有些人听从了命令，但走错了方向；有些人则干脆消失不见了。

这是马铎尼斯的机会。一条险峻的山脊将斯巴达人与其他希腊部队分隔了开来。因此，马铎尼斯带领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直冲斯巴达人的队伍。很快，其他的波斯部队也冲散了斯巴达人，向前冲锋，淹没了与之数量悬殊的斯巴达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波斯人跟希腊人一样勇敢、强壮，但他们没有盔甲，没受过训练，也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有作战技巧。他们时而一个一个，时而十几个人一起冲进斯巴达人的队伍。但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是少，这些冲进去的人都被砍倒了。”

“马铎尼斯骑着白色战马，由上千人的精锐部队簇拥着。他出现在哪里，波斯人就会猛烈地进攻哪里。马铎尼斯活着的时候，波斯人奋勇作战，杀死了许多斯巴达人；而在马铎尼斯阵亡，他的护卫亲兵也被消灭了之后，剩余的波斯人很快就被击溃了。他们转过身去开始逃命。”希罗多德总结说，残酷的现实就是“波斯人……他们有很多人，但没有多少真正的士兵”（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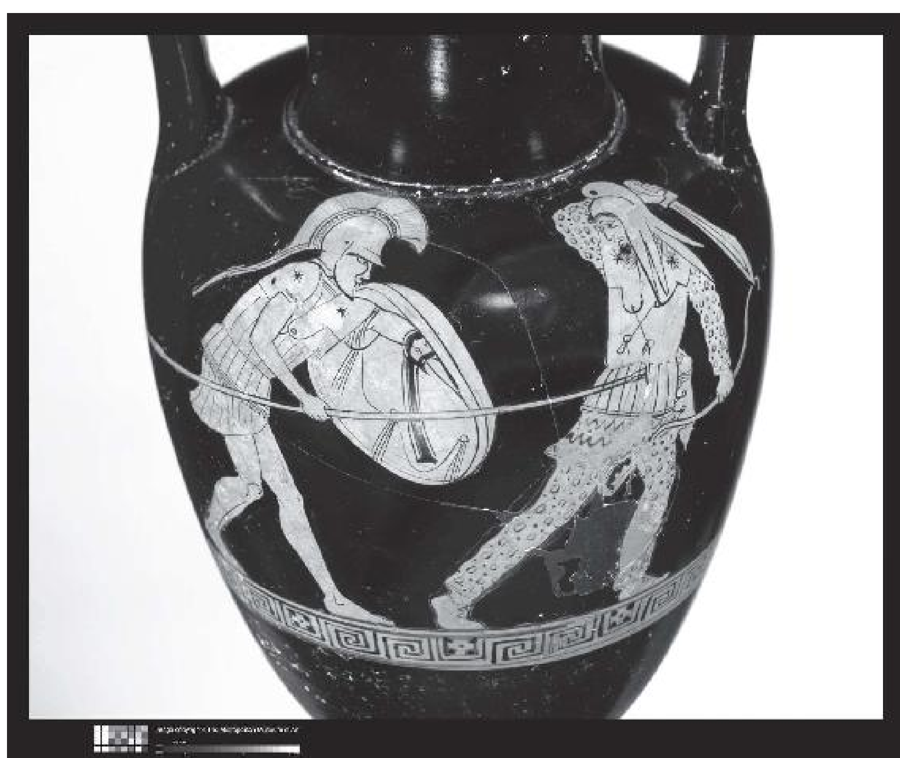


图**2–1** 真正的士兵：在一个大约制作于公元前**470**年的雅典红绘花瓶上，一名希腊重装步兵刺穿了一名没有铠甲的波斯士兵

资料来源：Scala授权/艺术资源，纽约。

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认为，这说明作战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其后历史的走向。汉森认为："在过去的2 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方式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

汉森将这称作西方式的战争。汉森说，这种方式由希腊人发明出来，他们从公元前700~前500年左右开始把穿戴全副铠甲的长矛手方阵的正面冲撞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汉森总结道："正是西方人这种对步兵大规模交锋、自由民在战场上用开刃的武器相互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 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

已故的约翰·基根是20世纪军事史学泰斗，他让这种观点更进一步。基根认为，自希罗多德的时代以降，就有"一条分界线，将（西方的）作战传统和大草原[1]及近东、中东地区以间接、躲避、僵持为特征的作战方式区分开来，在大草原的东侧和黑海的东南侧，战士们延续了与敌人保持距离的习惯；而在大草原的西侧和黑海的西南侧，战士们不再谨慎从事，而选择近身搏斗"，马铎尼斯来自这条分界线的另一侧。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缔造了罗

马式的国家，而古代的许多其他民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汉森和基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作答：罗马人之所以能缔造罗马式的国家，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西方式的战争，而只有这种直接的、血腥的战斗才能缔造利维坦。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当我说到战争是有好处的时候，我的意思其实是，西方式的战争是有好处的。

要想验证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的作战方式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形式是否也是西方独有的。

在本章里，我将尝试说明两点：首先，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次，这一事实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有趣。当我们把视野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时，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人能创造出罗马式国家的真正原因，由此，我们也能发现用来解释“战争为什么是有好处的”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

为什么一些帝国比另一些更幸运

首先，我将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形式是西方独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普拉提亚之战结束后的2~3个世纪里，一些十分相似的帝国崛起于亚欧大陆，西起地中海，东抵中国。而在大洋彼岸，一些稍小但同样令人敬畏的国家也统治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一部分。

在这些帝国的极盛期，它们中的翘楚——西方的罗马帝国、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孔雀王朝——各自占据着150万~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统治着3 000万~6 000万人口，并且将其（大部分）军事力量转化为了生产力量。在每一个帝国中，暴力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创造了相对和平富足的盛世。

总的来说，我们对汉朝和孔雀王朝的了解要少于罗马，而对美洲大陆的国家的了解就更少了。在美洲，留下的证据十分匮乏，以至于专家们甚至无法在何地最先出现利维坦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和秘鲁的查文德万塔尔文明率先形成了利维坦。不过，主流观点认为，直到1 000年之后，当莫切文明出现在秘鲁、阿尔班山和特奥蒂瓦坎城邦出现在墨西哥时，美洲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有效的政府。它们统治着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上百万的人口。它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迹，监管着复杂的贸易网络，主导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们仍然没有文字。

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就算考古学的发现再多，它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利维坦的事情也还是有限的。或许，在特奥蒂瓦坎发掘出的人祭遗迹表明，这一文明要比亚欧大陆的古代帝国更加暴力，可是，罗马人同样也会蜂拥着去观赏角斗士把对手大卸八块（有很多被肢解的角斗士遗骸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个结论也未必成立。在位于安第斯山地区的瓦里帝国的皇家墓穴中，人们发现了60具尸体。这一墓穴大约修建于800年，而那时亚欧大陆上的帝国们早就抛弃了这种行为。因此，这或许说明美洲的暴力程度要高于亚欧大陆。但如果我们要深究的话，这样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进行系统性的比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中美洲的塔西陀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这个人。通常来说，一个利维坦越是强大，那么它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留下的证据往往就越多，因为强大的政府需要建设很多东西，并且进行大量文字记载。缺乏文字记载这一点本身，可能就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的统治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让文字记载变得不可或缺。这或许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从未像罗马那样接近丹麦的水准。

帕提亚帝国的中心位于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其发展程度似乎处于罗马和美洲国家两者之间。帕提亚人继承了西亚绵延千年的文字传统，也拥有能读会写的统治者和官僚，但只有少量的文字流传至今。其中有一部分技术因素。帕提亚的官员们曾经在用黏土烧制的碑上写字，这种材质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然而，他们后来开始使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而这些材料不一定能保存很久。并且，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们的阻挠下，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被严重延缓了。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帕提亚的政府也比较弱小。罗马的作家们惊讶地发现，帕提亚的贵族们无法无天（埃利亚斯不会同意这一点），有时甚至掌控着独立的小王国的实权。他们经常彼此征伐，无视国王的存在。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经历了公元前4～前3世纪愈演愈烈的战争之后，汉朝创造了可以媲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中国盛世”，在辽阔的国土上实现了和平。战士式的墓葬在公元前3世纪还很常见，但在公元前2世纪就消失了。旅行者们出行时不再携带武器，用土垒成的城墙逐渐荒废。律法取代了战争。

像罗马一样，汉朝政府也会镇压匪徒和海盗，官员的过激行为也会受到惩处。公元前1世纪的地方官尹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因在都城长安肃清暴力团伙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是在那之后，他在今天的河北[2]省某地担任地方官时，因为在保障社会安全时使用了过当的武力而遭撤职。

就像罗马一样，汉朝时的中国也并非天堂。比起今天任何一个局势稳定的现代国家，汉朝的暴力程度都更高。官员们经常抱怨百姓们经常恣意妄为，甚至雇用匪徒杀害自己的敌人。那些官员自己也并非无可指

摘。在这里，你无权保持沉默：按照官方的指导办法，调查杀人案件需要找到多个证人进行反复盘问，还要寻找物证。但在这一指导办法的最后，还会不经意地加上这么一句："如果案件没有进展……可以对那些身份适合受刑的人进行杖责。"

不过，比起更早的时期，汉朝无疑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在汉朝之前，法律规定可以对使用轻微暴力的人进行割鼻、割耳、割脚和割手的刑罚；而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在犯罪者的头上钻洞、切除数量不等的肋骨、砍头、活埋或是腰斩。这些可不仅仅是说来吓唬人的。在墓葬中发现的庭审记录表明，这些刑罚真的会被采用。

埃利亚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曾经说道，和平的关键是让那些富人们头脑冷静下来。在这一点上，"中国盛世"做得要比"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更好。由于帝国们可以让其内部的地区变得更和平，因此往往将部队派往边疆地区。不过，罗马人仍然从帝国的各地招募士兵，诸如地理学家普林尼和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的可敬的人也会在律师、作家、指挥官等角色中进行切换。而中国则更进一步。汉朝用犯人充军，或是从帝国之外招募士兵。如此一来，汉朝的士大夫们就仅仅需要做文职工作。罗马人拥抱了斯多葛主义，这教会他们忍耐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而不是勃然大怒去杀人；汉朝的精英们则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儒家学说，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的地位。在中国，教育和文化对于人生成功的意义甚至要远大于罗马。

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南亚。不过，要想摸清印度盛世的轮廓，要比在中国和罗马困难一些。人们常说，蹩脚的工匠抱怨他们的工具，而蹩脚的历史学家经常抱怨他们的史料。但事实是，我们对印度的孔雀王朝的了解确实要少于对罗马和汉朝的了解。古代印度流传至今的文件十分罕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事论》（*Arthashastra*），一部800页的关于治国之道的论文[3]。但这本书消失了多个世纪，一直到1904年才重新浮出水面。当时，一位地方学者（没有一位官员记载了他的名字）把用棕榈叶写成的、幸存的最后一部手抄本夹在腋下，走进了位于印度西南部的迈索尔东方图书馆。

《政事论》记载了各种东西，包括怎样建设一座堡垒和国王应当拥有多少名理发师。除此之外，它还记载了复杂的司法体系，其中罗列了地方治安官在调查杀人案和殴打事件时必须遵从的规则；被怀疑过失造成病人死亡的医生必须提交报告；被人看到虐待动物的村里头人也要提交报告。法律为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暴力犯罪设置了处罚方式，并且有着十分细致的区别。比如，在殴打事件中，向对方吐口水和对着对方呕吐的处罚方式是不同的。不仅如此，根据吐出的液体接触到受害人的位置（腹部以下、腹部以上或是头部）的不同，相应的处罚也是不同的。

无疑，《政事论》让人们感到孔雀王朝对于镇压暴力一事是很认真的。该书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在书中也不是信口雌黄。公元前

320年，他领导了最终缔造了孔雀王朝的起义，并且担任了孔雀王朝开国之君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首席顾问。

考底利耶的地位使他十分适合描述孔雀王朝的制度，但是这也是问题所在。考底利耶究竟描写的是现实，还是理想中的国王应该做的事，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有人还质疑《政事论》一书究竟是否为考底利耶所写。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东西（比如中国的丝绸）显然是在成书多年之后才传到印度，而且通过对该书的用语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考底利耶死后多年由跨越几个世纪的各种资料堆叠而成的。

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可以用来与《政事论》做比对，但这些材料也有它们自身的问题。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曾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抵达孔雀王朝的首都巴连弗邑，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应该见过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记载说，印度人极为遵守律法，以至于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作战时，他的士兵不会蹂躏乡间，更不会杀戮农民。不过，麦加斯梯尼也曾记载说，印度人的脚前后长反了；还说印度的狗咬人时过于凶狠，眼珠子都会突出来。有鉴于此，对他的记载应当存疑。

除《政事论》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是后来的国王阿育王立下的39根石柱上的碑文。这些碑文是他于公元前260年左右[4]征服了羯陵伽之后刻下的。与皇家敕令中常见的歌功颂德截然不同，阿育王宣称“在征服羯陵伽的过程中，受众神爱戴者（指阿育王自己）感到自责，盖因征服之中的杀戮、死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让受众神爱戴者感到极为悲伤”。

阿育王“在长达1 500英里的边界上赢得了全面胜利”，但现在他宣布将追随佛法。佛法究竟是一个明确的佛教概念，还是阿育王自创的理念，在这一问题上印度学家们尚有争论。但阿育王告诉我们说，佛法是“善行……是顺从……是慷慨……是弃绝杀戮。父亲、儿子、兄弟、主人、朋友、故旧、亲属和邻人都应当说，‘这是好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阿育王在城市和乡间设立了“佛法官”，他们负责施行新法。阿育王还派出视察员监督这些佛法官的工作，后来还亲自检查。就像罗马的情形一样，霍布斯所说的“以力取得的国家”和“按约建立的国家”后来显然结合成了一体。阿育王认识到，“立法的效果不如劝谕”。而他总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自从设立了佛法，人们的恶就减弱了。在那些受苦的人中，恶消失了，整个世界满是喜悦与平和”。

我们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古代印度暴力死亡率的准确数据，以此来与这些史料对比。但仍然没有这样的数据。甚至在印度的研究中，考古学的作用都不显著。我们几乎没找到任何类型的墓葬，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人们是否还把武器视作男性时尚的正常组成部分。在公元前6世纪，防御工事沿着恒河河谷分布，表明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在罗马帝国

境内，随着最初的征服战争的结束，大多数城市的城墙就被弃之不理了，而印度的城垒在孔雀王朝的整个存续时期都维持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状态。其原因仍不为人知。或许，孔雀王朝没有罗马帝国稳定；也可能是因为孔雀王朝的寿命太短（约于公元前320年建立，在公元前185年的一次政变后覆灭），因而变得无用的城墙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败。但在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没法确定。

通过考察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和阿育王的记载中相吻合的部分，以及印度和中国在法律方面的相似性，我认为孔雀王朝可能就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让它的子民生活得更加安全了。不过，尽管这个疑问暂时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但是这三个帝国都让它们的子民过得更富庶，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值得辩论的余地。

在中国，文字记录和考古学发现证明，经济活动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频繁。运河、灌溉渠、水井、肥料和耕牛在田间随处可见。铁制工具的数量在增加。货币从一个城市流通到另一个城市，商人将小麦、水稻和奢侈品运往可以卖上好价钱的地方。政府减少了关税，投资建设道路和港口。从拥有50万人口的都城长安到最简陋的乡村，汉代的集市上挤满了富人和穷人，出售他们可以低成本生产出的产品，购买他们无法生产的东西。哲学家们对商人如此轻而易举地致富感到担忧。

中国的考古学家尚未搜集到足够的数据画出类似图1–3这样表现出生活水平提高的图表。不过，从2003年开始，在三杨庄的发掘提供了仅次于此的证据。

11年的一天，黄河决口了。倾盆暴雨下了好几天，从上游也传来了洪水泛滥的消息，但三杨庄的农民仍然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着，希望不会发生坏事。在2 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知晓灾难最初的征兆是什么。或许，他们看到了堤坝崩溃，听到数十亿加仑[5]的褐色河水奔涌而过时产生的低沉的怒吼声。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大雨淋在屋瓦上的噪声淹没了这样的声音。我想，只有当泥水开始从他们的屋门下涌入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雨。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农民扔下了一切东西开始逃命。他们的村庄在这里存在了长达1 000年，然而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突然消失了。

考古真是个残忍的行当，它让11年发生的灾难变成了一场科学的胜利。这座汉代的村庄完美地保存了下来，甚至被记者称作“中国的庞贝”。发掘者精准地将洪水带来的泥土和村庄本身的泥土分离开来，发现了赤脚的村民和钉着铁马掌的马匹跑过犁好的耕地时留下的印记。

尽管这十分引人注目，但比起这戏剧化的场面，考古学家对农民留下来的平淡无奇的一些东西更感兴趣。这些汉代的农民生活在用泥土砖建造的坚固的房子里，这些房屋与向西4 000英里之外的罗马帝国的房屋惊人的相似。这两个帝国的屋瓦十分相似，两个帝国也都拥有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铁制工具和精致的陶器。

当然也有区别。在三杨庄，考古学家通过细致地挖掘发现了桑叶在泥土中留下的印记，而桑叶是用来喂养蚕的。罗马人一定很想拥有蚕。在70年，博学但性情乖戾的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抱怨说，罗马的时髦女性们正在挥霍数以百万计的塞斯特提乌斯购买轻薄的中国丝绸，借此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风姿。但总体来看，在三杨庄发现的东西与罗马村庄，甚至庞贝城中的东西十分相似。

印度的证据依然不足，但可以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度量衡，大规模地铸造钱币，制定了商业法律，修建了道路，并且帮助村民开垦新的土地。帝国还鼓励创立商业公会，这些公会在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考古学家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在这块次大陆上没有发现类似庞贝或三杨庄这样的地方。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孔雀王朝时期的房屋位于塔克西拉和比塔，而这些仍是英属印度时期的成就。在这两个地方的发掘工作很糟糕，即便按照当时的时代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那里的发掘工作仍然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它们表明公元前3世纪的房屋比先前的更大、更舒适，里面的家具也更好。像汉朝和罗马帝国的房屋一样，这里的房屋也有砖墙和瓦顶，几间房屋围成一座院落。多数院落有水井、排水系统、带炉灶的厨房及贮藏室。

对考古学家来说，坏消息是这里没有发生惨剧，因此居民在离开时有足够的时间清空他们的房屋。好消息是，孔雀王朝的臣民是一群邋遢的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的碎片、厨房用具、铁制工具，甚至一些珠宝，这足以证明他们的生活比先前的印度人过得更好。

来到印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异的事物（会说话的鹦鹉！眼镜王蛇！当然，还有大象），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元前200年之后在地中海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蓬勃而起的大规模贸易。普林尼写道："没有哪一年印度人从我们的帝国攫取的财富会少于5.5亿塞斯特提乌斯（足够养活100万人一年），当印度的货物在罗马出售时，价格是其成本的整整100倍！"

普林尼的计算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的话，就会有数以千计的商人获得550亿塞斯特提乌斯的利润，而这一数字是整个罗马帝国年产出的3倍。因此，有很多古典学者怀疑此处抄写有错误，普林尼最初写的应该是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而不是5.5亿塞斯特提乌斯。近期的发现表明，尽管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也会令人瞠目结舌，但它可能是准确的。1980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得到了一卷从埃及的罗马人居住点劫掠走的纸莎草纸，其年代大约为150年。研究表明，这卷纸莎草纸记载着一艘货船从印度的穆吉里斯[6]驶回埃及时的财务情况。船上运载的象牙、细布和香料价值800万塞斯特提乌斯（古罗马的市价），这笔钱足以养活15 000人一年。罗马对这些进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如果来500艘这样的货船，就足以支付整个帝国一年的军费预算。

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在印度这一方的书面记录。不过，考古学家从2007年开始在穆吉里斯进行发掘。在前4年的发掘中所发现的罗马葡萄酒酒器数量超过了罗马帝国版图之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现。显然，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

看起来，在公元前时代的后期，在罗马、中国和印度，大帝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富裕了；在帕提亚，帝国很大，但是没有那么安全；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国家更小，或许也更不安全。而在这些国家所在的纬度带（北纬20度～35度之间的亚欧大陆和北纬15度～20度的美洲大陆）之外，那些小型的社会或许仍然维持着10%～20%的暴力死亡率。

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只有在这些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开始走上通往丹麦的道路？为什么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前行得更快？

囚笼

下面我们解答这个新的问题。在农业文明的中心，人类于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率先学会了种植作物。种植业的开始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三个真正的转折点之一，我曾在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详细描述过这一点。现在我又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种植业开始的地方与几千年后古代帝国兴起的地方是重合的。战争之所以在这些幸运纬度带塑造出了利维坦，而其他地区的人类却仍然生活在贫穷、艰险和野蛮之中，正是因为种植业让战争变得富有建设性。

在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战前约9 000年，世界结束了上一个冰河期[7]，气候开始转暖。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开始疯狂繁殖。在冰河时期最寒冷的时候（20 000年前），地球上只有不到50万人；10 000年之后，人口总数达到了1 000万。

然后，就像今天一样，全球变暖开始影响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不过对一些地方的影响更为剧烈。让幸运纬度带变得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更适宜那些大籽粒植物和体型大而多肉的哺乳动物的进化。在这些地区打猎和采集的收获要比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多得多。公元前8000年，在地球上的1 000万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这些幸运纬度带。

在冰河时期，人类生活在人数稀少的觅食团体中。但就在冰河时期尚未彻底结束时，在幸运纬度带的一些地方，采集的收获已经非常可观（尤其是在约旦河河谷），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永久定居，一年到头都有丰富的食物来源——这可是一种新现象。与此同时，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通过栽种作物、培育动物，人类不自觉地制造了一种选择压

力，从而改变了这些食物来源的基因结构。这一过程——驯化[8]——首先在幸运纬度带发生。因为到此时为止，这些地区中有被驯化的潜力的动植物集中度是最高的。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经典的研究成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戴蒙德认为，全世界大约有20万种植物，人类只能吃其中约2 000种，而又只有大约200种有被驯化的潜力。其中56种植物的可食用的种子重量在10毫克以上，它们中有50种是原本生长在幸运纬度带的野生植物，仅有6种生长在其他地区。在人类于20世纪前驯养的14种体重超过100磅[9]哺乳动物中，有9种源自幸运纬度带。

因此，驯化首先出现在幸运纬度带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样的道理，在幸运纬度带内，驯化首先出现在西亚，因为那里潜在的可驯化物种的密度最大。驯化的标志是出现大得不自然的种子和动物，考古学家称之为培育的结果。公元前9500～前9000年，这样的迹象最先出现在侧翼丘陵[10]，彻底被驯化的证据则出现在公元前7500年。

中国也有密集的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但其密度仍不及侧翼丘陵。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人们自公元前7500年开始种植水稻，并在公元前5500年完成了对水稻的驯化。粟米和猪在下一个千年里被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的种植，绵羊、山羊的饲养，以及被驯化的时间也大体在这一时间段里。公元前6500年，在墨西哥出现了笋瓜、花生和类蜀黍（玉米的祖先）的种植，这些作物在公元前3250年被驯化。在秘鲁，藜麦的种植，大羊驼和羊驼的饲养出现在公元前6500年，对其驯化则完成于公元前2750年（见表2–1，59页）。可驯化物种的密度和驯化开始的时间几乎是完全吻合的。

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年，都有更多的野生物种作物被栽种下去，人们逐渐扩大开垦土地面积，播种，锄草，犁地，浇水，施肥。从事种植业也是有代价的：通常来说，农民的工作强度要超过采集者，食物也更加单调，并且不那么健康。但耕种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获取比采集多得多的食物。随着食物供给的增加，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跟动物一样，他们选择把更多的热量转变成更多的人口。如此，幸运纬度带就越发显得独特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者稀疏地分布在大地之上，每平方英里中的人口密度通常低于一人。

人口爆炸导致了一连串始料未及的结果。首先是种植业的拓展。在最初的农业中心里最好的土地都已经被作物占据了之后，农民们开始大胆地探索新的区域，寻找肥沃的土地。在4 000年的时间里，史前的拓荒者们从最西边的核心驯化带——侧翼丘陵——一直拓展到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从最东边的核心驯化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拓展到了婆罗洲。

另一个不经意间产生的后果是，随着农业发展提升了人口密度，人们找到了更多打仗的理由。不过，并非是种植业本身直接导致了更多战争。从争夺海伦的特洛伊战争到詹金斯的耳朵战争[11]，人类几乎会为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相互杀戮，不过最常引发战争的是财产、威望和女人。而把更多的人放进同一块地盘上（就像把更多的实验室小白鼠放进同一个笼子里一样），只会导致人们有更多机会发生纠纷，并将有更多的人干掉。

考虑到本书想要讨论的话题，在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影响之中，最为深远的是那些战败的参战农民的命运。经过千年的演变，这一事实逐渐变得清晰：在一个定居的、拥挤的农业世界打一场败仗与在一个流动着的、人口相对稀疏的采集者世界打一场败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喀拉哈里沙漠中一名名叫≠高[12]的桑族猎人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与一名叫作戴贝的猎人因为一些食物而发生了纠纷。鲁莽的≠高用长矛刺死了戴贝。随后，戴贝愤怒的家人袭击了≠高。但是在这场冲突中，≠高用毒箭射中了另一个人的背部，致其死亡。≠高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于是“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这个地区”（据另一个桑族人在20世纪50年代讲述这个故事时说）。一伙人开始追杀≠高，但在一场导致三人丧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高和他的人逃走了”。在猎人和采集者的社会之中，总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还有允许其逃窜的空间，就没人能让≠高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不过，≠高最终也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团伙中的一个年轻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

而如果农民打了败仗，他们的命运将迥然不同。尤里乌斯·恺撒记载说，在公元前58年，一个叫作赫尔维蒂的农耕部落为了找到更好的土地，抛弃了他们位于今天瑞士的家园，迁徙到高卢地区。他们知道，高卢地区住满了人，所有的好田地都早已有人定居了。但赫尔维蒂人满不在乎，他们会强抢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埃杜维人的土地。

埃杜维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以选择坐等“风暴”结束，祈求会有好运，不过看起来他们的运气并不好。恺撒写道，赫尔维蒂人一来，“他们就烧毁了埃杜维人的土地，把他们的孩子掳为奴隶，攻打他们的城镇”。束手就擒的结果就是死亡、毁灭和奴役。

第二个选项是反击。但（恺撒说）鉴于“赫尔维蒂人远比其他高卢人凶猛得多，因为他们时常与日耳曼人争斗”，很多埃杜维人认为反击不会有好的结果。埃杜维人认为，他们没有作战所必备的经验和组织，而这些也不会凭空出现。不过，埃杜维人中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战斗。有一个名叫杜诺列克斯的人（恺撒评价他“十分鲁莽，极有影响力……有着革命的野心”，听起来就像是高卢人中的≠高）募集了一支骑兵私人武装。他打算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推翻无能的埃杜维贵族，并自封为王，把埃杜维变成一个地方政权。

第三种可能，也是埃杜维人最终选择的道路，是置他们自己于强大的朋友的保护之中。但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对大多数埃杜维人来说，眼前最适合的朋友就是恺撒，因为他刚刚被任命为邻近的罗马行省的总督。但杜诺列克斯另有打算。他的本意并非领导埃杜维人对抗赫尔维蒂人，而是希望置埃杜维人于赫尔维蒂人的保护伞之下。然后，赫尔维蒂人将帮助他成为埃杜维人的国王。随后两个部落将联手统治高卢，把罗马的势力驱逐出去。

不过，喀拉哈里沙漠中的≠高和他的团伙可以逃走，再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埃杜维人却没有类似的选项。≠高和他的团伙在迁徙过程中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埃杜维人会在这一过程中损失掉一切：他们将失去农舍、田园和储藏的食物，几代人挖沟、打井、修梯田、清理灌木丛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而且，即便要走，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的周围都是其他的农耕部落——波伊人、阿维尔尼人、阿洛布罗基人。如果埃杜维人开始迁徙，他们就会变得像赫尔维蒂人一样，只能攻击其他部落，去抢夺土地。

在幸运纬度带，种植业造就的拥挤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两位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这个想法是他们最先提出的。1970年，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将这一现象称作“界限”。而在1986年，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则将其称为“囚笼”。

卡内罗和曼认为，关于界限或囚笼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被它困在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被迫建立起更大、更有组织的社会，不论他们如何看待这一事实。由于无法逃离敌人，他们要么建立起更有效率的组织，从而能够进行反击；要么就被敌人更有效率的组织吸纳进去。

埃杜维人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们由于无处可藏，在公元前58年就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他们可能会被赫尔维蒂人控制；埃杜维人可能与赫尔维蒂人走到一起，组建一个可以控制高卢地区的社群；埃杜维人、赫尔维蒂人和高卢地区的所有人都被罗马人控制（这也是真实发生的结果）。从埃杜维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结果的吸引力各异；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它们导致的结果大致相同。有人——不论是杜诺列克斯、赫尔维蒂贵族[13]，还是恺撒——将成为高卢的坐寇。一个单一的、更大的社会将形成，由一位国王、一群战士或是一位罗马总督掌控一个比以往的部落贵族政体更为强大的政府。最后，利维坦为了能拥有一群和平顺从的征税对象，将清除高卢地区动荡不安的祸根——部落间的仇杀。

我认为，曼用“囚笼”形容这一过程是最好的。自从我们进化为人类，我们就一直在争斗中相互杀戮。从短期来看，≠高这样的人可能会从打斗中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暴力是没有建设性的，只是《蝇王》这类故事的喧闹的背景罢了。只有当气候变化造就了

种植业，并使得幸运纬度带中的人们开始朝着囚笼的方向发展时，战争才开始变得具有建设性，因为胜利者可以把失败者融入更大的社会当中去。

本书中的很多措辞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而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建设性的战争”，又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反建设性的战争”，可能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标签有悖我们的道德判断。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好的战争，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坏的战争，从很多角度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胡话。比如说，从战争造成的绝对的死亡人数来看，建设性的战争要远远超过反建设性的战争。历史上的一些最具建设性的战争——我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意为最能加速利维坦的成长的战争——也是历史上最为卑劣的战争。无论我们怎么样看待亚诺玛米人，他们至少不像罗马人那样经常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尽管在道德层面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事实似乎就是如此。将我们内在的怪兽装进囚笼中的这一漫长、缓慢、仍在进行中的过程，正是由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建设性的战争促进的。

利维坦遇到红桃皇后

1991年2月27日午夜，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在中东停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花了100个小时就消灭了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80万名联军官兵仅仅牺牲了240人，而伊拉克守军损失了2万人左右。这是现代战争史中最一边倒的胜利之一。

在随后纷至沓来的脱口秀和专栏文章中，政策专家们将越来越倾向于将这场胜利归结为一场军事革命。著名分析家安德鲁·克雷宾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说：“当新的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系统，并与足以改变战争的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新型行动理念和组织结构上的相应转变相结合时，就会造就这样的军事革命。”这样的军事革命“包括四个部分：技术上的变革、体系上的发展、行动上的革新以及组织上的改变”。它们会“对战斗潜能和武装部队的效用带来戏剧性的提高——通常是呈数量级的，甚至更加迅速的提高”。

克雷宾涅维奇指出，在过去700年中，西方出现过10次这样的革命。而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告诉我们，“岂有一件事能让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军事革命也是如此。在那10 000年中，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中的暴力、贫困的农民逐渐变成了罗马帝国、汉朝和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的臣民，这基本就是一系列的军事革命。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各种各样的革命仅仅视作一次长期的军事演进中的迅速变化的一瞬。

在生物学界，持续最久的一场辩论发生在渐进学派及其批评者之间。渐进学派认为，进化是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过程，其批评者则认为进化包含无事发生的漫长时期和发生较快变化的较短时期。无疑，这场辩论将持续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后一种看法可以很好地描绘冰河时期结束以来的军事演进。一方面，在这10 000年中，微小的变化在逐渐地积累；另一方面，一些戏剧性的革命打乱了故事的节奏。不同的考古学家可能会选取不同的细节，但我选择强调防御工事的形成、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出现、军事纪律的产生、双轮战车的问世和令人震撼的部队（通常持有铁制武器）组成的大型编队。

如同20世纪末期发生的军事革命一样，以上这些变革的突然出现也得益于技术、组织和后勤的相互作用。但终极的原因是囚笼。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了适应新近变得拥挤的版图；所有这些革命，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都以相同的顺序出现（我将在第三章里解释，为什么在美洲发生的情形与此不同）。这就回答了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希腊人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人的方式不是西方特有的，庞大而安全的社会的出现也不是西方特有的，并没有什么西方式的战争这一说。

公元前9500年左右，在西亚的侧翼丘陵带种植大麦和小麦的人们显然是低技术含量、无组织的战士。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坟墓和居所发掘出的东西证明，他们作战的方式就跟人类学家在20世纪观察到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手中最致命的武器是有缺口的石刃。他们或战或逃全看心情，并且打不了几天仗就会发现没有食物了。

因此，当人类学家第一次遭遇当代的石器时代社群时，他们通常会得出跟玛格丽特·米德一样的结论：这些人不是战士。人类学家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雨林中看到的仅有的那么几场战斗，参战者看起来都漫不经心。几十个人会组成散漫的战线，然后站在弓箭射程之外嘲笑对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两个人冲上前去，他们射上一两箭，再跑回来。

这样的战斗可能会持续一整天，然后暂停吃晚饭。或许第二天早上战斗还会再次进行。如果有人受伤，战斗可能会立刻结束。有时，下场大雨就能让双方停战。这一切看起来都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写的那样：所谓的战斗不过是展现男子气概的一些仪式，给那些年轻人机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而（按米德的说法）不需要付出太高的代价。

但由于人类学家通常不会进行太久的实地考察，因此他们很少能看到那些夹在战斗中间的真正的石器时代的厮杀。不管怎么说，战斗都是危险的。不用说那些拿着石质斧头冲向敌人的人，就是那些在敌人放箭时站在原地的人都有可能受伤。人类学家发现，20世纪的石器时代战士们喜欢做的事情是躲起来，然后在趁人不备的时候袭击别人——这样做要安全得多。一小群勇敢的人会溜进敌人的领地。如果他们能碰到一两个落单的来自敌对部落的人，他们就会杀掉这些人；如果碰到的是女人，他们就会强奸她们，再把她们拖回家；如果他们遭遇的是足以反击

他们的人群，他们就躲起来。

比伏击效果更好的是拂晓突袭。这种袭击经常出现在人类学的文章之中，常读这类文章的人对这种袭击带来的恐怖都已经感到麻木了。通常，十几名袭击者在前往敌人村庄的路上都会十分小心谨慎。要完成这样的袭击是非常费神的，大多数时候，袭击者在尚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放弃行动。但如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袭击者会趁着夜色接近他们的目标，然后在拂晓时分发动袭击。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通常也仅能杀死一两名敌人（通常是晨起之后去小便的男人），随后就惊慌地逃走。但有时他们也会走好运，就像霍皮人所记载的一次袭击。1700年，在位于今天的亚利桑那州，一个名叫阿瓦托维的村庄遭到了袭击。

> 就在天空现出拂晓时分的黄色时，在密室[14]屋顶的塔帕罗站起身来，挥舞着他的毯子。于是，袭击者爬上了台地的顶部，开始了袭击……他们点燃了密室屋顶上的木柴垛，再把着火的木柴顺着窗口丢进去。随后，他们开始向下方的男人射箭……只要遇到男人，不管是老是小，一概杀掉。有时候，他们直接把人抓起来，丢到密室里面去。不管是男人还是男孩，他们一个活口都没留。
>
> 成捆的干辣椒挂在墙上……袭击者把这些干辣椒弄碎……再把粉末撒到密室中燃起的火焰之上。随后，他们就关上了密室的窗子……辣椒着火了，混在浓烟之中。密室里一片哭声、喊声和咳嗽声。过了一会儿，屋顶的梁木也起火了，随后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塌了下去。终于，喊叫声消失了，化作一片寂静。最终，屋顶坍塌在死者之上，将他们埋葬，只剩下一片寂静。

这样的突袭很适合石器时代的社会。他们较为平等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没有人能确保执行严格的纪律，而只有这样的纪律才能让斯巴达人在波斯人朝他们射箭时坚守不动。而在这样的突袭之中，没人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之中。在行动开始之前，一旦被人发现，袭击者随时可以逃走。这样的袭击几乎没有风险。只是，除非袭击者杀掉了所有人，不然被袭击的村庄几乎肯定会用同样的袭击进行报复。

以牙还牙的突袭和反突袭是造成现代石器时代社会惊人的暴力死亡率的元凶，而史前社会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在20世纪亚诺玛米人生活的地区和新几内亚的高原上，突袭最终导致数英里宽的地带变成了危险的缓冲带，没有人会住在那些地方。我们仍然可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恺撒和塔西陀分别记载说，在罗马人统治前的高卢和日耳曼，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考古学家也证明，此类事情曾发生在史前的北美洲和欧洲。

缓冲带策略显然是有效的，但是很浪费。很早之前，人们肯定就知道，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与其放弃大好的土地，不如修建一道足够高大的城墙，把袭击者隔绝在村庄之外。但这种选择本身也有问题，因为

修建防御工事需要有纪律和后勤保障，而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两样。更糟糕的是，如果村庄A能很好地组织起人手修建起城墙，那么此时的村庄B的纪律和后勤保障水平可能就足够发动一次认真的围攻战了。

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一书中，有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场景：红桃皇后和爱丽丝突然开始没缘由地在乡间疯跑。她们跑啊，跑啊，“快得仿佛在滑翔”，但爱丽丝随后发现，她们仍然在出发时的那棵树下。爱丽丝不太高兴地对红桃皇后说：“在我住的地方，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红桃皇后感到很惊讶，她对爱丽丝解释：“你瞧，在我们这儿，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学家将这种红桃皇后效应升华为一种进化论原理。他们发现，如果狐狸进化得可以跑得更快，从而可以捉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就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有繁育后代的机会，从而使新一代的小兔子们跑得更快。同样地，也只有跑得最快的狐狸才能捉到足够多的兔子使自己生存，并且使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所以，这两个物种都得拼命地奔跑，才能使它们留在原地。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们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时，红桃皇后效应经常被用以描述战争的疯狂。军备竞赛的批评者们说道，没有哪一方有什么收获，只是大家都变得更穷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讲述。现在，我要说的是，在史前时代发现红桃皇后效应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尽管对于防御工事首次出现的时间还有争论，但这一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公元前9300年，生活在约旦河谷杰里科的人们就曾建起一座令人生畏的塔。但很多考古学家怀疑这座塔究竟是否具有军事功能。即便具有军事功能，这座塔的功效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其后的5 000年内都没有什么防御工事发现，一直到一道在公元前4300年建立于今土耳其梅尔辛的墙的发现。

在梅尔辛的墙之后，西亚的防御工事就出现得比较频繁了。到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城有了一道6英里长的城墙。尽管这道墙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修建这道城墙的居民的定居点却被摧毁了。这说明，就在人们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修建这样的城墙时，人们同时也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攻克这样的防御工事。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苏美尔人就像红桃皇后一样，拼命地跑着，才让自己留在了原地。

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幸运纬度带核心区域的农耕社会在拼命地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军事演化史中，产生于公元前倒数第四个千年的防御工事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第一次革命性飞跃。当时的社群已经有能力建设这样的城墙，并且攻克敌人修建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变得富有建设性。利维坦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创造出更大的、更有组织的，并且可能（除非我们获得更多的可供研究的骸骨，否则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更和平的社会，有能力达成那些以前力有不逮的目标。战争不再是以牙还牙式的突袭。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创造出更大的社会。

但这一过程也并不美好。在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文字已经发展到可以流传诗歌的程度。其中一首诗可以让我们隐约听到那些在野蛮的压迫下沉寂的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呜呼！”它悲歌道，“属于我的那一天，我被毁灭的那一天！”

敌人的铁蹄踏进我的厅堂！

敌人把肮脏的双手向我伸来！

……敌人剥去了我的袍子，披在他的妻子身上，

敌人夺去我的珠宝，挂在他的孩子身上，

我只得徘徊在他居所外的步道上。

不过，这样的野蛮行径带来的结果，是更少的城市统治着更多的人民。到了公元前3100年，就在乌鲁克修建其6英里长的城墙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苏美尔的大部分地区。乌鲁克进行征服或殖民的脚步，似乎一直向北延伸到了今天的叙利亚，涵盖了布拉克丘（公元前3800年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和哈布巴卡比拉。

规模更大的乌鲁克社会发展出了更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拥有真正的城市，城内居民数量达到万人以上；国王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最终，坐寇们制定出法律，统治着做记录、征税收的官员。用他们喜欢的措辞说，他们对待自己的子民，仿佛牧羊人对羊一样。

最初的统治多个社群的利维坦，虽然没有以前的社会平等，但更富有，也很可能更安全。由于缺乏数据支持，所以我们自然只能大体靠猜测。但在人口高度稠密的尼罗河谷地，这似乎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尼罗河谷地中的农民被沙漠限制在狭窄的一条土地上。在几个世纪的争斗之后，公元前3300年，有三个小国家出现在了尼罗河谷地的上游。到了公元前3100年，这里就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其国王那尔迈（Narmer）成了第一位统治整个埃及的法老。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500英里长的国境上消除了战争，把坐寇统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当同属一个千年的国王们还热衷于称自己像神一般时，法老们干脆说自己就是神；当其他国王还在修建神庙时，法老们兴建了金字塔（吉萨的大金字塔重达100万吨，时至今日仍是地球上最重的建筑）。

在今天看来，神君的说法显得甚是狂妄自大，但是在集权方面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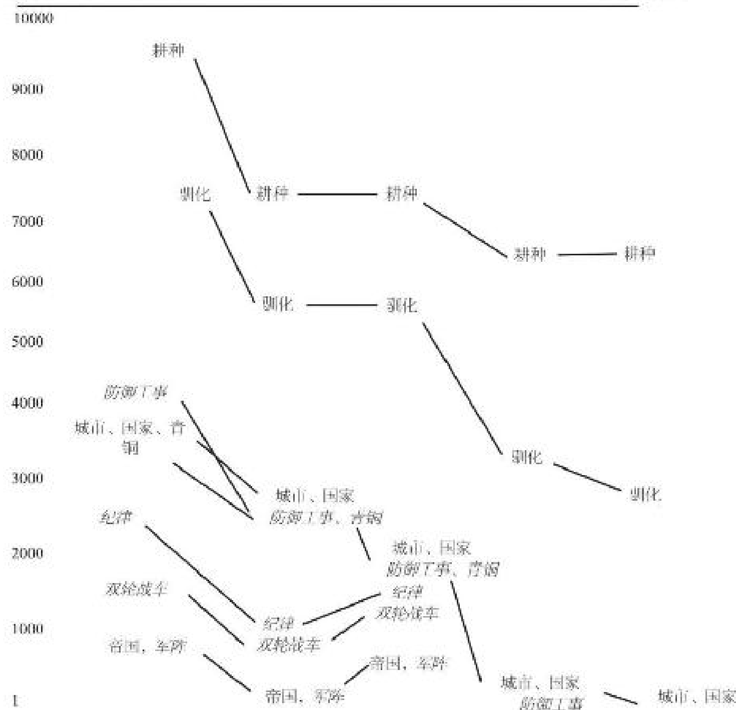
良好的效果。据我们所知，埃及的贵族们开始全神贯注于赢得皇室的青睐，因而基本放弃了彼此之间的武力竞争。这样的现象就像埃利亚斯于45个世纪之后在欧洲观察到的基本一样。从那个时期流传至今的艺术和文学只能为我们塑造出一个非常笼统的印象，但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按照古代的标准，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方。利维坦战胜了红桃皇后。

同一个充满矛盾的假设

在产生利维坦的道路上，西亚和埃及（考古学家通常将它们统称为“新月沃土”）领先了。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幸运纬度带的其他农耕社会也走上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就像我们可以设想的那样，农耕开始的时间与城市、利维坦、防御工事出现的时间大体吻合。一个地区在冰河时代的末期拥有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密度越大，那里的人们就会越快地学会农耕，进而使得囚笼效应让那里的战争更早地变得富有建设性。

要想说明这一切，没有比画一张图表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我看来，表2–1可以很好地展示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一切。在耕种出现之后，通常要花上2 000～3 000年才会出现对动植物的驯化。在驯化出现后的3 000～4 000年内，会开始出现修筑城墙的城市、神一样的君主、金字塔形的纪念物、书写和官僚政治（巴基斯坦：约公元前2800年；中国：约公元前1900年；秘鲁和墨西哥：约公元前200年）。

表**2–1** 公元前**10000**年～前**1**年的囚笼效应与军事演化



注：军事发展用斜体字表示，社会发展用正常字体表示。连线的存在只为了让各个阶段看起来更清晰，并不代表各个区域之间有某种联系。

从表2–1还能看出，进步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在亚欧大陆，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发明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发明作为宏大的军事演化史中的第二个革命性的变革，通常与防御工事、城市和政府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早在公元前7000年（驯化阶段后的500年），西亚的工匠们就已经开始用铜制作漂亮的装饰品了。但直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他们才学会将铜与锡或砷混合在一起制作青铜，这种金属的强度足以制造武器和盔甲。恰在利维坦于乌鲁克出现时，青铜工艺才在新月沃土一带腾飞。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有关联的：在南亚和东亚，青铜也是与城市和国家一同出现的（不过，美洲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将在第三章里讨论这一问题）。

在战场上使用金属武器似乎直接导致了第三场革命，这场革命再一次最先发生在新月沃土。手里拿着青铜尖的长矛是一回事，而要有勇气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用长矛刺死他，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当这个人和他成百上千的战友们也准备用长矛刺死你的时候。要想真正用好金属武器，就必须有军事纪律这种让士兵们坚守阵地、服从命令的艺术。

可以说，这是古代军事革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与一群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之间的差距，就像“马尼拉的震颤”[15]与酒

吧里两个醉鬼互殴一样大。那些在接到命令之后，敢于冲上前去杀敌或是冒着滚油、落石、箭矢的危险攻城的士兵，往往会击败那些缺乏纪律的士兵。较为可靠的指挥和控制、能够按照命令进行调整的阵型以及遵守命令的士兵，这些进步将会改变一切。

不幸的是，考古学家没办法发掘出“纪律”来。目前发现的证据，只能证明在几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有纪律的部队，但是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军队的纪律是与集权政府几乎同时出现的。也正是在此时（公元前3300年的新月沃土、公元前2800年的印度河河谷、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两军对垒的场面开始变得和突袭与围攻战一样常见了。说服年轻人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服从命令，这是利维坦最初的伟大成就之一。不过，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史前时期的酋长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仍然是考古学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

最早的有形证据出自艺术。石器时代的洞窟绘画，有的有着上万年的历史。它们经常描绘成群的人相互射箭和投掷长矛的场景（见图2–2）。不过，有一块雕刻于公元前2450年的苏美尔浮雕展现了不同的内容。这块被称作“秃鹫石碑”的雕塑（见图2–3）描绘了在拉格什国王恩纳图姆（Eannatum）率领下的部队，这些步兵戴着头盔，手持长矛和大盾，排成密集而有纪律的阵列。拉格什士兵们正迈过死去的敌人。一旁的一块碑文记载说，乌玛占领了拉格什的一些田园，而恩纳图姆在与乌玛人进行的对阵之中取得了胜利。恩纳图姆随后将乌玛和苏美尔余下的大部分地方都并入了他的王国。



图**2–2** 屠杀的号令：史前时期的洞窟壁画上描绘的混乱的战斗。这幅壁画绘于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的西班牙

资料来源：让·吉莱纳和让·萨米特，《战争的起源：史前暴力》，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1年，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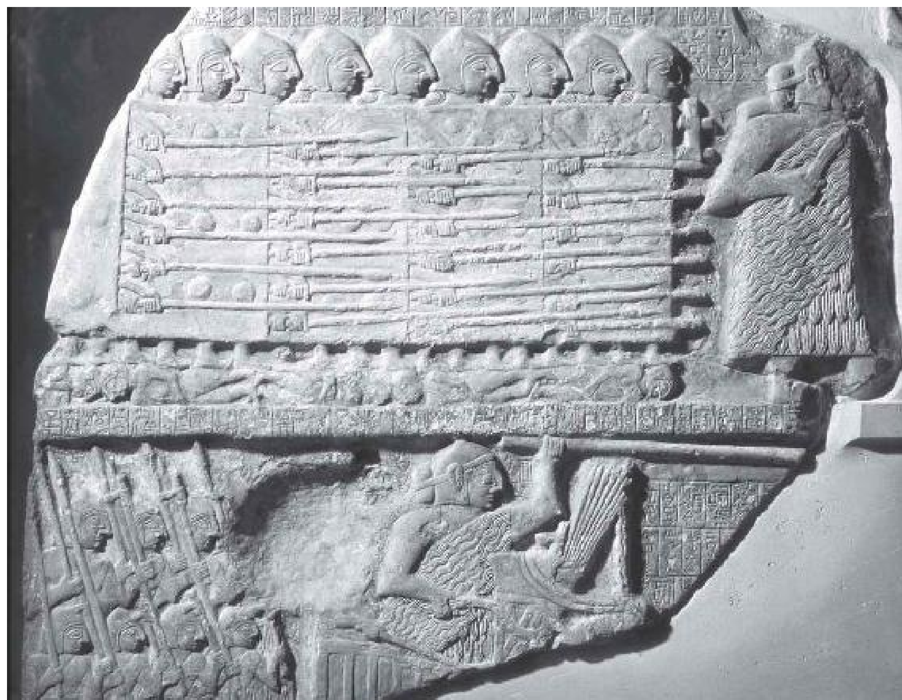


图2–3 纪律的诞生：这幅浮雕被称作“秃鹫石碑”，创作于公元前2450年的拉格什（今伊拉克），是已知的最早的描绘士兵组成阵列的作品

资料来源：吉亚尼·达利·奥尔蒂/艺术资源档案，纽约。

显然，苏美尔士兵有着足够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使他们可以通过决战决定战争的结局。苏美尔士兵抛弃了由来已久的打了就跑的传统，不顾危险地靠近敌人。在公元前2330年左右，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King Sargon）甚至夸耀：“有5 400人每天在我面前吃饭。”他显然指的是一支常备军。他的臣民为他的军队提供食物、羊毛制品和武器，因而他的军队可以一直操练。

野蛮的战士正被转化为有纪律的士兵。现代的职业军人除去了平民生活中的自私，将忠诚、荣誉和职责上升为基本美德。虽然萨尔贡大帝的士兵们的纪律性或许不会打动恺撒的百夫长们，但在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和阿卡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宁愿战死也不愿有辱其所在部队的士兵。

结果很清楚。阿卡德征服了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击败了拉格什、乌尔和乌玛，推倒了它们的城墙。萨尔贡大帝任命了总督，在叙利亚修建了防御工事，一直打到高加索山区和地中海。他的孙子甚至来到了波斯湾的另一侧。在那里，有一块碑文写道：“有32个来自海的那一边的国家加入了这场战斗。但他还是胜利了，征服了它们的城市，杀掉了它们的王子。”

就像2 000年后的罗马一样，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城接下来在与印

度的贸易中变得富有。印度河谷如果在公元前2300年还没有见识过富有纪律性的军队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算是见识到了。但要想找到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南亚拥有这样的军队的证据，那实在是太难了。实际上，表2–1的底部表现出了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在公元前的倒数第三个千年，印度河河谷是第二个形成城市和政府、出现防御工事和青铜武器的地方，比新月沃土地区要晚上几个世纪，但要比东亚地区早上几个世纪。然而，到了公元前最终的那个千年，南亚却掉到了第三位，远远落后于东亚。

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度河河谷的文明约在公元前1900年崩溃了。城市被废弃，人民抛弃了利维坦，打破了表2–1中的进程。南亚地区下一次看到城市和政府的出现，已经要等到近1 000年以后了。而且，那时的城市和政府没有出现在印度河平原，而是出现在恒河平原。而与此同时，未曾经历过类似崩溃的中国早已走在了前面。

我们不知道的是，印度河文明为什么会崩溃。我们仍无法解读目前发现的少量文献。鉴于在巴基斯坦的挖掘工作依旧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拥有的证据仍然很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曾有过从军经历的人占据着考古学界的主流时，人们通常认为是后来印度史诗中描绘的雅利安人摧毁了印度河沿岸的城市。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思潮处于高峰期时，人们又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元凶另有其因——气候变化、内部叛乱和经济崩溃。而到了21世纪10年代，我们只能承认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何。

在本书中，我还会讲述更多关于利维坦缘何崩塌的事情，不过关于印度河文明的崩溃这一问题，我还想再做一些思考。假如，我不是在2013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写作这本书，而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南亚的话，我可能会总结说，战争毫无益处。在我周围，我所能看到的是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城市化作了泥土堆，里面只有鬼魂和牧羊人。我可能会说，或许战争可以让我们暂时变得更安全、更富有，但它随后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了。

不过，我如果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南亚写这本书，并且我也了解失落的印度河文明，那么我可能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公元前500年，崛起于恒河河谷的国家就像1 500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一样引人注目，也别具特色。而这样的现象可能说明，富有建设性的战争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周期性的。利维坦在混乱中带来秩序，但它带来的反作用会让这个世界归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这样的情形会再次产生利维坦。就这样循环往复，在秩序和混乱之间不停地摆动。

但如果我在公元前250年左右，也就是阿育王的鼎盛时期写这本书，而且我依然熟知以往的历史的话，我会得出一个更深刻的结论。是的，我会承认250年前的我所说的话，即建设性的战争是周期性的。但我会认为，建设性的战争是波浪式的，每一个浪头都比前一个浪头要高一些。我也会承认，印度河河谷的文明是非凡的，而其在公元前1900年

之后覆灭是糟糕的。但孔雀王朝比那时的文明还要非凡，这是建设性的战争的成果。

有了这样的认识，如果我在250年之后最后一次重生的话，我就不会感到绝望。此时，孔雀王朝已经覆亡，就像印度河文明一样，而它广阔的疆土现在属于一群争斗不休的王子。但我仍然会对未来有信心。利维坦退后了一步。但就像孔雀王朝追随了失落的印度河文明的脚步时一样，利维坦还会很快再向前迈出两步。

从这场思想的实验中，我们能得到什么？一个吸引人的解读方式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建设性的战争究竟是否存在，它究竟是不是周期性的，或者究竟是否在持续向前，这都取决于我们观察它的角度。但我认为，这个结论言之过早。南亚地区在公元前最后几个千年里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建设性的战争的魔力让人类社会更安全、更富裕，但这种魔力只能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体现出来。在时间上跨千年之久的战争上升到理论上加以肯定，这种做法看起来对那些在古代南亚的战争中杀人或被杀的人们而言十分残酷。在长期的战争历史中，这种道德层面的解读总会让人感到困扰。但证据一直在指向同一个充满矛盾的假设：战争让人类社会更安全、更富裕。

烈火战车

文明的崩溃中止了建设性的战争，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南亚。实际上，早在公元前3100年，类似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了苏美尔。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乌鲁克城建立起来的控制权此时崩溃了，乌鲁克城被焚毁。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亚被分割为征战不休的若干个城邦国家。约在公元前2200年，一场规模更大的剧变发生了，它摧毁了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帝国和埃及的古王国，甚至把灾难扩散了地中海的另一边。与此同时，在中国可能发生了相似（但是规模较小）的崩塌。人们对这些崩溃的真正原因争论不休。但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事情逐渐变得清晰了。从这时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军事革命本身就可以是巨大的不稳定性的根源。

第四次重大的军事革命没有发生在辉煌灿烂的新月沃土或是印度河谷地城市，而是发生在今乌克兰的荒芜的草原。这里的猎人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服了野马。就像幸运纬度带上驯化牛、羊和猪的那些人一样，这里的牧人最初也只是想获得更多的肉类供给。不过，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他们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草原上，是否能迅速地从一个水源地移动到下一个水源地，这经常是一件关乎生死的事情。牧人们给他们的小马套上车，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移动能力和生存能力。

改进在一点点地积累。到了公元前2100年，在今哈萨克斯坦的牧人

们培育出了体型更大、腿更长的马匹，并且训练它们拉更轻便的马车。这些马要比大多数现代马种体型小得多，但是它们拉的轻马车（双轮战车）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商人和移民（很可能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族群：胡里特人）把这些战车带过了高加索山脉，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带到了新月沃土。一开始，这些战车用作运输。但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它们被改造成了军事用具，并立刻给建设性的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双轮战车使用起来并不像古装战争片里经常描述的那样，仿佛坦克一般冲进敌人的战阵。双轮战车很难操纵，也十分脆弱（在公元前14世纪，双轮战车的重量可能还不到100磅）。如果要冲击坚守阵地的有纪律的步兵，战马也会感到惊慌。双轮战车的优势不在于重量，而在于速度（见图2–4）。轻型的双轮战车上可以搭载两三个身披铠甲的士兵，通常有一名驭手、一名弓箭手，有时还会有一名盾牌手。这样的双轮战车可以把移动缓慢的步兵变成箭靶子。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曾描述说，从双轮战车上射出来的箭雨如此密集，“以至于遮蔽了太阳”。



图**2–4** 速度之王：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史上规模最大的双轮战车大战——卡迭石之战（公元前**1274**年）——中追击敌人

资料来源：吉亚尼·达利·奥尔蒂/艺术资源档案，纽约。

在南非洞穴中发现的斑驳的石质箭头表明，人们使用弓的历史至少有60 000年。不过，据我们所知，直到接近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们才开始使用现代专家所说的单弓，这种弓是用单条窄木制成的，用动物的

肠做弓弦。由于很少有木质的弓保留下来并被考古学家发掘到，因此对这种弓的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后来的弓手们开始把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木材砌合在一起以增强武器的威力，这一潮流可能是从中亚的草原上开始的。新的发明出现得越来越快。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新月沃土上的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弓——复合弓。工匠们不再使用单条窄木，而是让弓梢向前弯曲，使其射出的箭更有威力。大多数单弓的有效射程不到100码，而复合弓的射程是单弓的4倍，其射出的箭可以穿透除金属铠甲之外的任何东西。

复合弓可能也是在大草原上被发明出来的，甚至可能是与双轮战车一起被引入幸运纬度带的。但不论其中细节如何，双轮战车和复合弓的组合改变了战场上的情势。起初，双轮战车的作用可能是次要的，战车手要做的事情是向敌军步兵射箭，以打乱他们的阵型，便于长矛手发动进攻。后来，统治者们发现双轮战车效果奇佳，于是逐渐不再部署大量步兵。从此，战争的胜负几乎完全取决于“那些围着彼此绕圈、如降雨一般迅捷放箭的战车手”（仍然引自《摩诃婆罗多》）。

在公元前17世纪之前，战场就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步兵推推搡搡，手持青铜长矛，从敌人盾牌的上方刺向他们的咽喉和脸，或是从盾牌的下方刺向他们的胯部和大腿。大战之后，战场上往往会留下几百具尸体，以及更多躺在地上慢慢死去的伤者，就像莎士比亚后来描写的战场一样：“有的在咒天骂地，有的在喊叫军医，有的在哭他抛下了苦命的妻，有的高喊他欠了人家的债还没还，也有的一声声呼唤他甩手不管的孩子——我只怕死在战场上的人很少有死得像个样儿的！”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战场上的恐怖程度又提高了一分。通常来说，马是比人大的目标，而且不会披铠甲。因此阻止双轮战车最快的方法，就是朝拉车的战马放箭，或是让勇敢的人坚守战阵，待战车从他们身边掠过时砍断马的腿筋或是让它开膛破肚（站在战阵外的散兵会手持可怕的镰刀状的刀，专为此用）。在接下来的3 500年里，一直到20世纪，亚欧大陆的战场上都不仅会满是惨叫着流血的人类，还会同样遍布着静悄悄地流着血的马匹[16]。

几个世纪之后，双轮战车从哈萨克的草原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它于公元前1200年传播到了中国，又在公元前600年传到了尚在印度河文明崩溃后的恢复期中的印度。从地中海沿岸到中国的海滨，双轮战车的设计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这说明它们来自相同的源头。正是来自中亚的移民和商人将双轮战车带到了新月沃土和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其他地方。在每一个地方，双轮战车都满足了人们相同的对机动性和火力的需求，也带来了相似的混乱后果。

如果某一个组织有着自己擅长的行事方式，那么它就会不太情愿去接受一种新的方式，这或许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类似的事情在双轮战车的身上也发生了。在新月沃土带上，最先开始使用双轮战车的不是埃及或巴比伦这样的大国，而是一些更小的、更边缘化的国家，诸如加喜特、赫梯和喜克索斯。从大约公元前1700年起，它们开始击败、劫掠，

有时候甚至推翻更富裕的国家的统治者。与之相类似，公元前1046年，更乐于接受双轮战车的周部族推翻了中国的商朝。但只有当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国家最终接受了双轮战车时（新月沃土带在公元前1600年，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印度在公元前400年），双轮战车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因为只有富有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实力恰当地应用双轮战车。

双轮战车很是昂贵。据《圣经》记载，以色列的所罗门王要为每辆双轮战车支付600个谢克尔银币，为每匹马还要额外付出150个谢克尔。要知道，那时一个奴隶才值30个谢克尔。公元前14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字资料显示了双轮战车为什么这么昂贵。它逐日记载了双轮战车战马长达7个月的训练项目。

双轮战车进行集群作战的效果最好。数百辆战车一起涌向敌人不受保护的侧翼，然后射出遮天蔽日的箭矢。敌人拥有的双轮战车越多，就意味着你也需要更多双轮战车。这样一来，双轮战车的数量就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在公元前1625年左右，赫梯人进攻阿勒颇时只动用了100辆双轮战车；而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之战中，赫梯人投入的双轮战车有3 500辆之多，并伴随10倍于此的步兵。而他们的埃及对手也派出了数量相近的军队。

要建立、训练、供养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就要求官僚机构和军需部门在规模和能力方面都实现巨大飞跃。而在人山人海、尘土飞扬的战场上控制这么多的战车，则需要更多的军官。在公元前倒数第三个千年的新月沃土，如何让步兵有着足够的纪律性进行面对面地厮杀，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挑战；而到了下一个千年，这个挑战就变成了如果让双轮战车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答案是：更森严的等级制度、更多的军官、更大的开销。

双轮战车时代的坐寇们狠下心来，向他们的臣民征收更沉重的赋税，建立起更强大的军队，才能与其邻国相匹敌。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只能看着自己的双轮战车在战场上被击垮，自己的步兵被追上、杀掉，并且寄希望于他们的城墙足够坚固。因此，城墙和塔楼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实现了飞跃，而这促使敌人建造更好的攻城槌，或是把地道挖掘得更深。我们又看到了红桃皇后效应［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完成于公元前750年的希腊，其中或许保留了一些关于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十年围攻战的略显失真的片段］。

在双轮战车的时代，利维坦必须变得更大、更可怕，管理更严格，军队和内政服务更专业。结果，又会出现你现在已经很熟悉的那个矛盾——暴力减少了。每当一个国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相互之间能够开战的国家数量就减少了。而一旦再有战争爆发，也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战斗。至少，在我们看来，公元前13世纪新月沃土上的国王们的想法会与18世纪的欧洲统治者们的想法大致相同：既然这些骄傲的职业军人花费甚巨，而在战争中他们的损耗速度又是那么快，所以除非被逼无奈，思维正常的统治者都不会把他们派去与敌人正面交锋。在我们目前所知的

最大规模的双轮战车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368年的米吉多战役和发生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之战[17]，战争中的一方甚至双方，都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袭击。

仍然，我们并没有关于暴力死亡率的官方数据。但旁证表明，在幸运纬度带上双轮战车的黄金时代（新月沃土带：公元前1600～前1200年，中国：公元前1000～前600年，印度：公元前400～前100年）中，暴力死亡的总体风险在下降。在这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这一趋势自然是不甚平衡的。但战士式的墓葬变得不那么常见了，精英艺术更热衷于突出和平的艺术；而在军事前沿之外的地方，防御工事也变得罕见了。

贸易始终在发展，财富增加了。这一趋势也是不平衡的，但那些在商业方面最活跃的地区（例如叙利亚沿岸的乌加里特或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满是宽敞舒适的房屋，表明繁荣的中产阶层的存在。从地中海沉船的发现中，我们可以一瞥金属、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的贸易已经遍及多么广阔的地域。而根据皇室和贸易官员的文件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木材、食物和纺织品曾在大国内部和大国之间往来。战争比以往更具建设性了。

但情况突然就变了。双轮战车的时代从边缘地区的变革开始，也以相同的方式结束。这一次，相对边缘的地区换到了欧洲，而不是中亚。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农耕从新月沃土带发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3 000年中，欧洲的人口开始增长，稳步接近触发囚笼效应的水平。然而在这3 000年里，欧洲人还在使用弓和匕首进行那种打完就跑的战斗。但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在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一带，锻工们为当地的战士提供了新的选择。在那之前1 000年，当新月沃土带的战士们开始将战斗的方式从突袭转变为军队对垒时，青铜合金的技术还很粗糙。当时的工匠所能制造出的最好的武器也就是沉重的、用来刺杀的长矛。这种较软的青铜可以用来制作匕首和奇怪的镰刀形的短剑（只能用来砍）。但还没有任何锻工能制造出性能可靠、够长、够坚硬、可以用来砍和刺的真正的剑[18]。

然而，到了公元前1450年，工匠们铸造出了硬度更强的青铜，用它可以打造长而直的剑。剑刃和剑柄均用同一块青铜制成，无论使用者多么用力地砍在敌人的铠甲上，剑柄也不会脱落，这种剑还可以用来刺。大多数剑的剑刃上都有两道浅槽，考古学家们称之为血槽。多么可怕的名字，但很准确。

在两个世纪之内，这种新的剑就传遍了北欧和西欧。考古学家经常在密窖和墓穴中发现这样的剑，一同埋藏着的还有成捆的小矛头（其中有些是标枪上用的，用来投掷而非刺击），有时候还有胸甲和盾牌。如果只是进行拂晓突袭、杀戮熟睡的村民的话，是不需要这样的装备的。无疑，这意味着两军对垒的战斗。一小群身披铠甲的人会从50步甚至更近的距离投掷标枪，以杀伤敌人或是破坏敌人的盾牌；随后，他们冲到敌人的身前，用闪着寒光的青铜剑进行屠戮。

欧洲的战士们有了致命的新武器，而新月沃土那些老练的士兵似乎并不急于向未开化的北方人学习。他们肯定会问，既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战车手可以射出遮天蔽日的箭雨，为什么还需要拿着标枪和剑涌上前去呢？

大约公元前1200年，他们得到了答案。从那时开始，剑士们开始前往地中海东部。一些是独来独往的亡命之徒，一些是小型的匪徒团伙，还有一些人在法老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兵，有些人则随着整个部落的人乘着船或马车迁徙。其中可能有气候变化的因素，因为巴尔干、意大利和利比亚的气候变得更加干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不管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带来的后果是很显著的。

起初，职业军队一定很难认真对待这些乌合之众，而直到此时，这些自负的战车兵都是对的。公元前1208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Merneptah）拦截了来自利比亚沙漠的一支军队，将他们全部消灭，杀掉了9 274名战士（计数的方法是清点从尸体上割下来的阳具）。埃及人缴获了9 111支剑，但只缴获了12辆双轮战车。这说明，入侵者很可能在采用新的战术。为了安全起见，埃及随后也增加了部队中剑士的数量（有可能是从入侵者中招募的），并且在公元前1176年取得了一次更富有戏剧性的胜利。因此，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因为事实证明，入侵者们学会了不按规则出牌。据我们所知，他们避免进行直接对垒，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着不对称的战争。无形的威胁无处不在，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前一天，战马精疲力竭地拖着双轮战车去参战；第二天，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突然被包围了，廉价的标枪刺倒了昂贵的马匹，接着蛮族的剑士冲过来大开杀戒。

一个错误就足以招致灾难。当乌加里特的军队远在异地帮助赫梯帝国对付一群劫掠者时，另一群劫掠者就烧毁了这座贸易城市。在公元前1220~前1180年，迁徙者们从希腊开始，一直打到以色列，面对着一个接一个的国王，迁徙者拖垮了他们的军队，洗劫了他们的宫殿。埃及人在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避免了这样的命运，但无法阻止迁徙者更缓慢地渗透。到公元前1100年，迁徙者们实际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

在整个新月沃土带，官僚机构土崩瓦解，文明程度降低了。没人再缴税，断了财源的政府也就没钱供养军队，劫掠行径肆无忌惮。贫穷开始蔓延，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人口锐减。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来临了。

推动一切的囚笼效应

接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没有了利维坦的庇护，长距离的贸易枯竭了；没有了贸易，锻工们找不到制造青铜所需的锡。本来利维坦能招募到的人就已经变得十分有限，现在又无法武装他们，由此利维坦的灾

难更加深重了。中央政府进一步崩解。

但到了公元前1050年，塞浦路斯的天才金属工匠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青铜短缺的办法。不过，这件事最初起到的效果是给利维坦带来了更多的麻烦。铁，这种缺乏吸引力，但是数量很充足的矿物，塞浦路斯的工匠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知道怎样冶炼它了。只不过，他们一直不愿意去冶炼铁，因为青铜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胜过这种丑陋脆弱的金属。只有在商路断绝、锡的供应消失的情况下，工匠们才不得已又把目光投向了铁，并且学会在其中加入碳。很快，他们就成功冶炼出可以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这些器具虽然不如青铜那么好，但成本要低廉得多。铁制品的造价十分低廉，几乎任何人都能负担得起。铁剑就好像是古代的AK–47，使得每个愤怒的年轻人都能像法律与秩序的代言人一样拥有杀戮的能力。

无政府状态在公元前1050～前1000年愈演愈烈，在新月沃土上几乎看不到新的纪念物或是文字记载。但随后情况开始好转。由于已经没有什么富裕的王国可供劫掠，也就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那些劫掠者穿过沙漠、跨过海洋发动进攻。随着安全环境逐渐稳定，酋长们开始重建破碎的国家。到公元前950年，所罗门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公元前930年一分为二，但同时亚述在今伊拉克北部又建立起一个帝国。公元前918年，将近三个世纪中第一次有埃及法老率领大军在其国境外作战，一直把战火烧到了接近黎巴嫩的地方。再一次，双轮战车的车轮把尘土卷到了叙利亚平原战场的上空。

但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开端并非倒数第二个千年中叶的重演。双轮战车再也没能夺回其在战场上的支配地位。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草原上的养马人并没有无所事事。1　000年来，大草原上的牧者赶着成群结队的马匹，拉着沉重的马车从一个水源地走到另一个水源地。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移动性对于那些分散居住在草原上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能够迅速地在时荣时枯的草场间移动是事关生死的大事。因此，人们总是需要高大强壮的马匹。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在大草原最西端（今乌克兰）的养马人培育出了可供人们整日骑乘的高头大马。随后，骑手们发明出缰绳和嚼子，以便更好地控制马匹。马镫此时还远未出现，但骑手们可以用膝盖夹紧坐骑，并且坐在精心制作的有角的木质马鞍上。他们学会了骑在全速奔跑的马匹上放箭，甚至骑在马上用长矛猛刺。

一次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待到这次革命真正深远的影响波及那些农业帝国时，时间已经又过去了1　000年——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介绍这部分内容。而在大草原上，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是立竿见影的。可以骑乘的马匹使得人们在繁盛的草场之间的迁徙时间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天。只要一个社群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都学会骑马、射箭，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在平原上疾驰，并在必要时进行战斗了。古希腊的故事中，曾描述过来自中亚的亚马逊女战士，或许其原型就是这些在长途跋涉过程中作战的女性。考古学家发现，在某些时期的草原墓穴中，

足有1/5的有武器陪葬的墓穴里埋葬的是女性。

西亚地区新的利维坦的统治者很快发现，骑兵要比双轮战车更便宜、更快捷、更可靠。到公元前850年，亚述人开始招募游牧民族为他们作战，并购进可以骑乘的马匹。公元前400年，在中国，那些扩张中的诸侯国也开始做差不多相同的事情。到了公元前100年，就连与大草原远隔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印度国王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了。

双轮战车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里基本消失的另一个原因，也更重要的原因是：铁制武器的真正优势开始显现出来。铁制的矛头、剑和铠甲造价低廉，可以大量购置。骑兵的成本比双轮战车低，而步兵用铁制武装的造价要比用青铜器武装低得多。据皇家记载，公元前870年，亚述率先招募了50 000名步兵，而后又在公元前845年拥有了超过100 000名步兵。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亚述国王们投入战场的骑兵数量通常会高于之前一个千年里法老们投入战场的双轮战车数量。而亚述国王拥有的步兵数量之多，使得此时的骑兵无法像以往的双轮战车那样在战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唯一能阻挡这些步兵的密集阵列的，就是与之同样密集的步兵阵列。

公元前744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 Pileser III）推翻了之前的国王，成为亚述国王。他真正洞察了此次军备竞赛的奥秘。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他只有选择另辟蹊径。很快，他发现，建立起比他的前任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继续维持统治的关键。以前的国王们，由于无力构建起有效的官僚机构、征税并且降服那些不听话的贵族，只能同那些好战的贵族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如果地方领主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征募军队，那么最常见的情况是，国王将他们的军队召集到一起参加战争，并且在战胜后将战利品的很大一部分都分给他们。要想征召大量部队，这是一种廉价的做法。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并不确定这些亚述领主们会支持他。不过，他还有另一种办法：绕开那些贵族，直接与农民达成协议。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匮乏，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具体是怎样做的。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确实设法让农民成了他们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而不再是大领主的佃农。作为回报，农民要向国王纳税，并且在他的军队中服役。有了源源不断的税收收入之后，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可以雇用官僚进行管理，并为他的臣僚支付俸禄。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让人们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还可以独自占有战利品，而不需要与那些过于强大的领主们分享。

这样的做法为利维坦带来了奇迹。在公元前8~前7世纪，很多人在战争中被钉在木桩上（亚述人的一种习俗）。但与这种暴行同样有名的，是那些蓬勃发展中的城市里的花园和图书馆。正是这些城市支撑着开销巨大的亚述政府。亚述社会中的精英们，就像此前埃及的贵族和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廷臣们一样，发现取悦国王比在首都尼尼微的街头决斗更有利可图。

作为古代历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仍然没有留下关于杀人率或是精英们相互仇杀的数据，但旁证仍然强大。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找到了一种驯服贵族的新方式。就像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到的，这条道路正是2 000多年之后早期现代欧洲获得和平的道路。同时，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在扩张亚述的领土，他们吞并小国，从而防止了它们之间的战争。亚述帝国急剧扩张，迫使其邻国要么降服，要么采取类似的集权政策。

这一过程一旦启动，就再无回头路可走。由于亚述的崛起，其周边的民族必须组织起政府来征税，训练军队，进行反抗，从而使得亚述的周边兴起了数十个新的国家。公元前612年，亚述人的统治被这些敌人所组成的联盟推翻。随后，在亚述帝国的残骸上，他们持续了60年的争斗，一直持续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崛起。这个新的帝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不过，据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领土都几乎无人居住，其人口总数还不到后世的罗马帝国或汉朝的一半）。

随着波斯的壮大，在它的周围，又有一些国家开始形成。约在公元前330年左右，波斯帝国遭遇了与亚述相同的命运。来自波斯西北方向的一个落后王国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仅用了4年时间就推翻了这个大帝国。但即便在那时，新兴的国家仍然在涌现。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和迦太基进行了古代历史中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战争。到迦太基于公元前202年投降时，罗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吞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在随后的1 000年中，新月沃土和地中海地区一直处在几个少数大帝国的统治下，这些大帝国支配着数千万人口的生活，并在他们之中推行和平（见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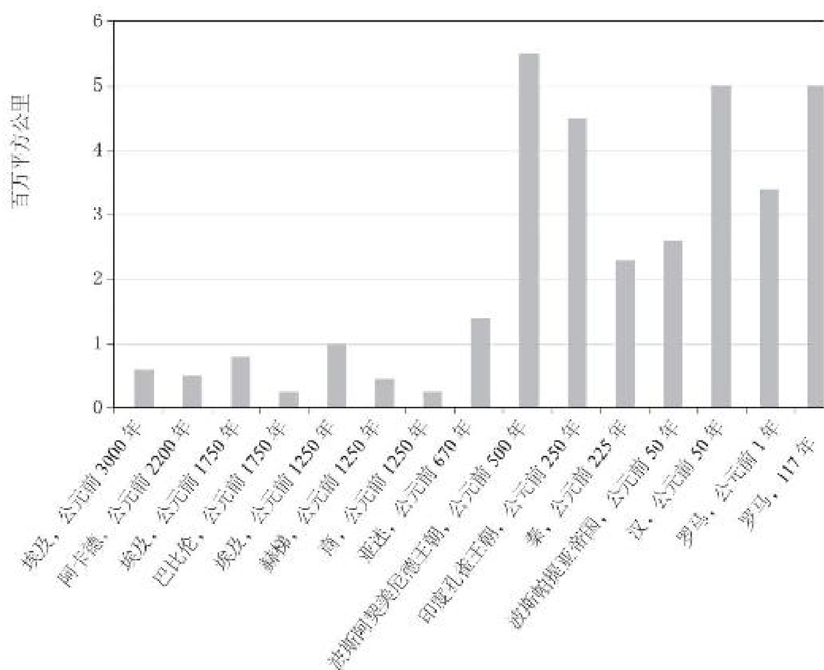


图**2–5** 面积很重要：亚欧大陆上的帝国比较：公元前**3000**～公元**117**年

汉森和基根认为，这就是西方式的战争诞生的时代。但如果放眼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亚欧大陆上幸运纬度带的其他地区，我们会看到十分相似的情形。冰河时期结束后，在中国和印度，农耕与囚笼效应都比地中海世界来得晚，因此这两地的发展进程也要比地中海晚上几个世纪。但中国和印度都独立地发现了亚述、希腊和罗马成功的奥秘，它们组建了强大的政府，征募规模庞大的军队，并采用令人惊异的战术在正面冲突的大战中取得胜利。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在新月沃土之后采用了双轮战车，双轮战车随即成了战场上的主宰，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632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轮战车大战——城濮之战）。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诸侯们也想到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采用的那种战略：他们不再让贵族参与战争，而是直接把土地授予农民，再向农民征税、征兵役。

公元前400年，来自大草原的高头大马到达了中国。此时，中国战场上的主角是大量的装备了铁剑、铁矛和弩（古代中国对军事技术的一项重大贡献）的步兵。相比于复合弓，为弩装填箭矢更花时间，其射程也更短。但弩使用起来更简单，其发射的铁箭能够穿透更厚的铠甲。这样的特点使得其非常适合大军在近距离作战时使用。

冶铁技术在公元前800年传到中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工匠们可以锻造出钢，这比新月沃土上制造出的任何金属都更坚硬。铁制武器

传播得很缓慢，直到公元前250年之后才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但此时，在亚欧大陆的两端，人们作战的方式已经十分相似了。

像在新月沃土和地中海地区一样，利维坦摆脱了红桃皇后效应。互相攻伐的小国家被并入更大的、更和平的国家之中。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在公元前771年时，黄河流域一共有148个诸侯国。这些国家彼此征战不休，到公元前450年时就只剩下了14个，其中只有4个是真正的大国。而就在它们相互争斗之时，新的国家在南面和西面崛起。到公元前3世纪，来自西面的秦吞并了其他所有国家。

在亚欧大陆的西侧，暴力的高峰始于罗马与迦太基开战的公元前260年左右。而在亚欧大陆的东侧，时间点也大致相同。发生于公元前262～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可能是古代最大的一场战役，交战的秦赵两国共计投入了50万人以上。白天，军队会在敌人的营垒下挖掘地道；夜晚，他们会发动突袭，攻击战略要地。

最终，秦国的间谍让赵王相信，他委任的将军不仅年迈，而且过于谨慎，不适合指挥作战。形势因此急剧逆转。赵国派了一个更年轻、更狂热的将军取代老将军指挥战斗。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说，这位新的将军根本不适合担当这一重任，甚至连他的父母都向赵王谏阻。就像秦国期望的那样，他迅速发动了正面进攻。30 000名秦国骑兵设下圈套，从两翼将赵军合围。有的考古学家会把三杨庄称作“中国的庞贝”，而有的军事史学家经常把长平之战称作“中国的坎尼会战”。在那场发生在公元前216年的战役中，汉尼拔也同样充满戏剧性地包围了罗马军队。被切断后路的赵军在小山上扎下营寨，等待援军，但援军迟迟不到。46天之后，在年轻鲁莽的将军阵亡、军队缺食少水的情况下，赵军投降了。但这又是一个不明智之举：秦军将投降的赵军全部坑杀，仅留下年纪尚幼的240名士兵，让他们把这灾难性的消息带回国去。

秦国发明了以杀死敌人人数记功的方法。秦国不靠技巧，不靠谋略，相信只要杀掉够多的人，敌人就无法再进行抵抗，从而也就可以赢得战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斩首、肢解或是活活烧死，但是其总数应有数百万之多。在接下来的40年里，秦国让它的敌国都流尽了鲜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接受了他最后一个敌人的投降，把自己的称呼改为“始皇帝”。如今，这位始皇帝因为他陪葬的8 000个兵马俑而举世闻名，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要证明卡加库斯的不毛之地理论是正确的。他没有解散他的军队，让他的臣民享受和平的果实，反而迫使他们投入大型的建设工程之中。在修建道路、运河和长城的过程中，数十万人死于辛苦的劳作。秦国像罗马一样，用律法取代了战争。但与罗马不同的是，秦制定出来的律法比战争还要可怕。司马迁记载说，在秦统一10年之后，人民感到很满意，山林中没有匪寇，男人在军中奋力作战，乡村和城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实际上，其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始皇帝于公元前210年驾崩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的统治在12个月之内

就被推翻了[19]。在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内战之后，汉朝取得了政权，并且吸取了秦朝过度使用暴力的教训。在一个世纪之内，定都于熙熙攘攘的长安的汉朝就迎来了其盛世，这在本章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尽管印度的资料依然很混乱，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线索。在公元前5世纪，铁制兵器大体上取代了青铜兵器，骑兵则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不过，双轮战车又继续存在了300年）。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印度的国王们的军队人数开始以十万计。不过，也有些不同的情况。《政事论》中的一段文字曾把披铠甲的步兵视为战争中最好的兵种。然而，大部分的印度步兵都是不穿铠甲的弓箭手，而不像亚述、希腊、罗马和中国的步兵那样使用沉重的长矛和剑。印度最好的步兵是世袭的常备军，他们训练有素，其纪律性和战斗决心可以与任何军队媲美。但大兵们处于印度军队4个级别中的最下层。不过，这可能是因为，印度军队中最高级别的部队比任何形式的步兵都更巨大，也可能更有战斗力：它们就是大象。[20]

《政事论》中很直白地说："国王要取得胜利，主要依靠大象。"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大象有时候非常不可靠。即便在经受了多年的训练之后，大象仍然很容易受惊，从而在战场上四处践踏。如果一头大象冲向了错误的方向，要想避免它踩踏友方部队的话，就只能依靠其驾驭者用木棒猛敲它的颅底。结果是，即便是战胜的那一方，往往也要损失掉大部分昂贵的、受过训练的大象。尽管如此，一旦大象冲向了正确的方向，就没有人能坚守阵地。《政事论》很平静地解释道，"大象应当这样使用：消灭敌人的各个兵种，不论是聚合在一起的，还是分散开来的；践踏敌人的中军、侧翼和两翼"。

在古代战争中，大象冲锋可能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每一头大象都有3~5吨重，很多大象还披有至少1吨重的铠甲。成百上千头大象会冲过平原，其声响简直震耳欲聋。防守的一方会试图割断它们的腿筋，用长矛刺它们的睾丸或是用弓箭射瞎它们。攻击者会投掷标枪和长矛，驾驭着坐骑把敌人踩在脚下，踩碎他们的骨头和脏器。战马，这种敏感的动物，不会愿意靠近大象。

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不得不承认，身披铠甲的大象是令人敬畏的。在仅用了8年时间就推翻了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来到了今巴基斯坦的希达斯皮斯河。在那里，国王波鲁斯（Porus）拦住了他的去路。波鲁斯的几百辆双轮战车在马其顿方阵面前毫无用处，但是操作大象就另当别论了。为了对付大象，亚历山大展现了他一生中最卓越的指挥才能。但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发现波鲁斯只是个二流国王，统治着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孔雀王朝的前身）有着多得多的大象。亚历山大至此只好决定班师回朝。

亚历山大死后，曾效命于他手下的将军塞琉古（Seleucus）于公元前305年重返印度河，在印度河河畔与孔雀王朝的创始者旃陀罗笈多（希腊文中将他称作"Sandrokottos"）拉开了阵势。这一次，马其顿人

没能取胜。塞琉古比亚历山大更惊讶于大象的威力，同意用今天属于巴基斯坦和伊朗东部的富裕省份与旃陀罗笈多交换500头大象。这笔交易看起来很不划算，但塞琉古的判断是正确的。4年后，塞琉古的手下将这些皮糙肉厚的动物带到了2 500英里之外的地中海沿岸。正是这些动物打破了伊普苏斯战役中的平衡，保住了他在西亚的王国。这些“新型武器”震撼了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君主们，他们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大象，别管是买来的、乞求来的还是借来的。在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甚至还带着几十头大象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那些在南亚进行的战争就像在东亚和亚欧大陆西部的战争一样具有建设性。在公元前6世纪，几十个小国家出现在恒河平原，彼此征战不休。到了公元前500年，4个大国——摩揭陀、憍萨罗、迦尸和弗栗恃——吞并了其他国家。印度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将这一过程称作“鱼的法则”。诗人说，在干旱的季节，大鱼就会吃掉小鱼。

在恒河流域的国家扩张的同时，新兴的小国还出现在它们周围的印度河流域和德干高原。不过，到了公元前450年，恒河流域就只剩下了一条大鱼——摩揭陀。在它的首都巴连弗邑的高墙之内，连续3个王朝不断地扩大它们在印度的势力范围，直到孔雀王朝超越了它们。摩揭陀拥有由数百头大象、数千名骑兵、上万名步兵组成的部队，进行精心计划过的大型战斗，并且实施复杂的攻城战。

在公元前260年左右，阿育王在战争中打败了羯陵伽，孔雀王朝达到了军事上的顶峰，这与罗马和秦国的时间大体一致。阿育王记述道：“15万人被驱逐了，10万人被杀，更多的人也丢掉了性命。”在胜利者的悔恨中，佛法的统治开始了。

放眼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世界，我们很难找到独特的西方式的战争的痕迹，即所谓欧洲人喜欢近身肉搏，而亚洲人喜欢保持与敌人的距离这样的区别。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从中国到地中海，都有比以往更大的利维坦在崛起，更直接地控制着更多的人口，并对他们征税。这些利维坦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杀戮。他们征募了数以十万计的军队，用严酷的纪律约束他们，派遣他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是通过面对面的血腥战斗取得的。在亚述、希腊、罗马和中国，决定性的攻击通常是由重步兵完成的；在波斯和马其顿，骑兵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印度，则换成了大象。但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幸运纬度带上，发生的事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西方，罗马人拥有了罗马；在东方，中国人拥有了长安，印度人拥有了巴连弗邑。这些地方各具特色，但其实都是相似的：并不十分民主，但是和平、稳定、繁荣。缔造这一切的推动力量是囚笼效应，而不是某种文化；创造出建设性的战争的也不是什么西方式的战争，而是囚笼效应。

扩张，再扩张[21]

罗马、长安和巴连弗邑要想达到丹麦的水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罗马人会把犯人钉上十字架，还会让角斗士相互杀戮，以此取乐；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公开场合对犯人用刑，甚至砍头。在各个地方，都有合法的折磨行为，奴隶也四处可见。这些地方都充满了暴力。

尽管如此，前面两章中我们看到的证据表明，古代的帝国已经比萨摩亚进步多了。人类学和考古学数据表明，石器时代的社会中，大约有10%~20%的人会死于暴力；而历史学和统计学数据表明，在20世纪，只有1%~2%的人口会死于暴力。在孔雀王朝、汉朝和罗马帝国，暴力死亡率可能介于现代的1%~2%和史前的10%~20%之间。据我猜测（由于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信息，我们只能猜测），这一数字可能更接近低部。

我在我之前的两本书《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中曾经做过一些数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我粗略计算出一个社会发展指数，用来衡量社会的组织能力和达成目标的能力。社会发展指数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利维坦的实力，但可以得出比较接近的结果。

这一指数的数据表明，在发生格劳庇乌山之战的83年，罗马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于西欧在18世纪早期的水平；汉朝的发展水平略低一些，大约相当于西欧在16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开始出名时的水平；孔雀王朝的发展水平要更低一些，大约相当于欧洲15世纪的水平。

这意味着，尽管古代帝国没有达到丹麦的水平，但是它们达到了1450~1750年的西欧的发展水平。我的假设如果是对的，那么罗马帝国、汉朝和孔雀王朝时的暴力死亡率可能相当于15~18世纪西欧的暴力死亡率，即大约在2%~5%（见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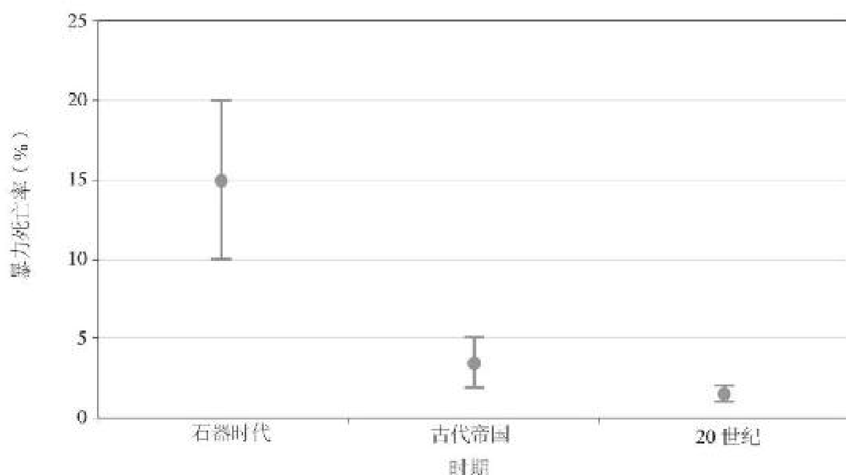


图**2–6** 距离丹麦有多远？我对暴力死亡率的估算：各个时期暴力死亡率的区间（石器时代社会：**10%~20%**，古代帝国：**2%~5%**，**20**世纪的世界：**1%~2%**）及其中点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至少，不论是在一个帝国内部，还是在帝国与帝国之间，数值都会有巨大的差别。当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与迦太基进行大战的时候，暴力死亡率有可能更接近于5%这一端；而到了纷乱的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暴力死亡率可能会再次逼近5%；而在被吉本视为罗马的黄金时代的2世纪，暴力死亡率更可能会接近2%~5%这一区间的底部。

汉朝和孔雀王朝的暴力死亡率可能都不曾这么低过，而相对缺乏资料记载的帕提亚帝国的暴力死亡率可能一直在5%以上。但从总体来看，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末叶，所有的古代帝国都走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自从囚笼效应出现在幸运纬度带，其暴力死亡率可能较之前下降了75%。

无疑，这一下降十分显著，但这个过程花费了近10 000年。这本身可能就能解释为什么西塞罗和卡加库斯在罗马战争的后果上分歧如此之大。作为一个尚未出现文字的社会中的战士，卡加库斯只能看得到最近发生的历史，因此他只会看到死亡、毁灭和不毛之地。而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帝国中的知识分子，西塞罗可以看到过去7个世纪中的扩张的历史，并且意识到这些扩张造就了建设性的战争，让每一个人——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

83年底，当阿古利可拉率军返回营地时，他确信自己在进行一场具有建设性的战争。当格劳庇乌山之战结束之时，他或许留下了一片不毛之地。但他还会回来，带着农民、建设者和商人回来。他们会开垦土地，铺设道路，从意大利进口葡萄酒，帝国的疆域会越来越广阔，和平与繁荣会被播撒得越来越远。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1] 指的是亚欧大陆上西起东欧的广阔草原带。

[2] 原文如此。但据《汉书·尹赏传》应为湖北，尹赏于此以“残贼”免官。——编者注

[3] 现在也有一部非常戏剧化的时长30个小时的印地语电视剧，有英文字幕（http://intellectualhinduism.blogspot.com /search /label /Chanakya）。

[4] 原文为公元前260~前250年，但资料显示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2~前261年。——译者注

[5] 1加仑≈3.785升。——编者注

[6] 穆吉里斯：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帕特南。——译者注

[7] 从技术角度，古生物气象学家将冰河期的结束确定在约公元前12700年，不过通常将持续了1 200年的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作为冰河时期的最终阶段。

[8] 从技术上讲，驯化的意思是，某个物种进行的基因改变，以适应另一物种对其的持续影响，例如人类将狼驯化成狗，将野牛驯化成牛，将野生的稻子和麦子驯化成需要人类收获和播种的品种。

[9]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10] 侧翼丘陵指西亚地区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谷的一片弧形地带，是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的所在地。——译者注

[11] 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名称堪称历史上最特别的战争名称。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1731年一名西班牙海岸警卫割掉了英国商人罗伯特·詹金斯的左耳。在这件事发生后的8年之内，英国政府都毫无反应，却突然在1739年决定只有战争这一条路可走。

[12] 桑族语言中满是英语中没有的声音，例如吸气音、声门塞音等。因此，人类学家的记载之中满是以“≠”、“！”、“/”，甚至“//”开头的名字。

[13] 当赫尔维蒂人刚刚动了入侵的念头时，一个名叫奥尔吉托利克斯的人就像杜诺列克斯一样动了当国王的念头。就在内战几乎一触即发的时候，奥尔吉托利克斯突然（很可疑地）死掉了。

[14] 一种从屋顶上的活板门进出的房屋。

[15] 用这个比喻，我又暴露了我的年龄。1975年，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与乔·弗雷泽（Joe Frazier）在这场拳王争霸战中表现出了最好的纪律性。在一回合接着一回合的激烈较量之后，两个人都已经头昏眼花，却还是坚持战斗在拳台之上。阿里把这次经历形容为“濒死的”经历。

[16] 2004年，在屠杀战马38个世纪之后，在伦敦的公园径（Park Lane）揭幕了一块纪念碑，纪念所有在战争中被杀死的动物。上面的碑文很简单：“它们无从选择。”

[17] 原文如此。但一般认为米吉多战役发生于公元前1457年，卡迭石战役发生于公元前1285年。——编者注

[18] 从技术角度讲，刃部短于14英寸（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的被称作匕首，长度在14～20英寸的称作短刀，长度在20～28英寸的称作短剑。真正的剑的长度要超过28英寸。（著名的罗马短剑的剑刃长度通常在24～27英寸。）

[19] 原文如此。实际上，秦二世的统治持续了3年。——编者注

[20] 第二级别和第三级别分别是双轮战车和骑兵。

[21] 此为英国爱国歌曲《希望与光荣的土地》中（Land of Hope and Glory）一句著名的歌词。这首歌曲的词于1902年完成，表现了当时英国人继续开拓大英帝国疆土的梦想。——译者注



第三章



蛮族的反击：反建设性的战争（1~1415年）

帝国的极限

这个计划没能成功。阿古利可拉再也没有回到喀里多尼亚，而是在意大利的阳光之下度过了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被派遣到巴尔干地区，其余的退回到英格兰北部一连串的堡垒中。他们的征服结束了。

从1973年起，考古学家们开始在罗马人留下的堡垒之一——文德兰达的有毒的垃圾填埋场里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在一个浸满了排泄物，连氧气都无法渗入的坑中，他们发现了几百封士兵的信件。这些信用墨水写在木板上。最早的一封写于90年，也就是阿古利可拉的战役结束后不久。其中一些信的内容很有趣，包括一个生日派对的邀请函，但大多数都很无聊。1世纪，在不列颠服役的罗马士兵脑子里想的事情跟21世纪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大兵们差不多：家里的消息、糟糕的天气，以及对啤酒、暖和的袜子和美味的食物的无尽渴望。守备军的生活在过去的2 000年中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阿古利可拉的余部在这些堡垒里继续留守了近40年。他们给家里写信，冒死与喀里多尼亚人进行小规模战斗（文德兰达另一封被小便浸过的记录中写道，“他们有好多骑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在等待。他们一直等到2世纪20年代才离开这里。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取得新的胜利，而是被哈德良（Hadrian）皇帝派去修建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横断不列颠的长城。罗马放弃了征服北方的计划。

在塔西陀看来，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图密善皇帝嫉妒阿古利可拉的战功。也许他是对的。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他应当看到大局，而在80年，局势突然变得不妙了。甚至在格劳庇乌山战役之前，图密善就已经开始从阿古利可拉的军团中抽调部队，返回欧洲大陆加强莱茵河防线。85年，皇帝又把最精锐的部队撤出不列颠，为的是重固摇摇欲坠的多瑙河前线。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奏效了，罗马守住了多瑙河边境。但图密善从中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从建设性的战争之中，罗马已经不能再得到多少好处了。

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正逐渐滑向这种观点。在公元前11～公元9年，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场战争。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场战争将是罗马有史以来进行得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奥古斯都将可以把罗马的东北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将今荷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纳入罗马的版图之中。但这场战争收获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在通往黑森林的蜿蜒的小路上，罗马人的队伍前后绵延了10英里之长，士兵的弓弦和铠甲都浸泡在瓢泼大雨之中。就在这时，罗马人的向导背叛了他们。罗马人遭遇了伏击。在持续了3天之久

的战斗中，约有20 000名罗马人被杀；更让罗马的战士阶层感到惶恐的是，居然有3面军团旗帜落入敌手。在接下来的10年，罗马军队烧杀劫掠，进行报复。但这场灾难最终让罗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国的大战略。征服看起来得不偿失。当奥古斯都于14年驾崩时，他的遗嘱中只有一条战略建议：“帝国应当维持其现有的疆界。”

他的继任者们大多遵循了他的遗愿。只有克劳狄乌斯（Claudius）破坏了这一规矩，他于43年入侵不列颠；而随后，图密善就在1世纪80年代结束了不列颠战役。在101年之后，图拉真（Trajan）进一步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他发兵占领了今罗马尼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当哈德良在117年继承他的帝位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新占领的地盘。

罗马的皇帝们逐渐达成了一种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17个世纪后被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视为战争的基本准则之一：“胜利也有其顶点，超过这一顶点，就会发生剧变，遭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要大得多。”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他亲身观察到的（他目睹了拿破仑在1812年超过顶点后的灾难性的经历。当时，克劳塞维茨在为俄国效力，因为当时他的祖国普鲁士已经退出了战争），也可能来自他对罗马的战争的深入研究。无独有偶，现代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也对顶点那充满矛盾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且写出了迄今为止关于罗马大战略的最好的一本书。“在战略的领域中，”鲁特瓦克写道，“一个行动不可能永久地进行下去，它很可能会变成自身的反面。”

几个世纪以来，征服战争在长期来看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它创造出使人们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的、更大的帝国。但当古代的帝国主义接近其顶点时，充满矛盾的战争逻辑就把所有事情都转向了反面。战争非但不再具有建设性，反而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战争开始让大的社会崩解，让人们变得贫穷，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危险。

征服带来的回报开始减少，这是古代帝国接近其顶点的第一个征兆。只要罗马人还留在地中海附近，国土面积的扩张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水运相对便宜，也更快捷。然而，在这个军队的行军速度跟牛车相近的世界里，把疆域扩张到德国、罗马尼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内陆地区就会导致成本上升。通过陆运将1吨谷物运送10英里所产生的成本，与通过水运将1吨谷物从埃及运送到意大利的成本相当。即便罗马拥有举世闻名的道路网，但是到了1世纪，无论是以金钱还是以荣誉衡量，罗马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几乎远不及损失。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公元前130～前100年，汉朝的军队狂飙猛进，把今甘肃、福建、浙江、云南、广东，以及中亚的一大片土地，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和越南的一部分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更不要说深入蒙古的惩罚性打击了）。但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长安的朝廷开始觉得，在战争中投入那么多人力、财力

实在是得不偿失。军队离黄河和长江越远，其耗费就会越高，而带来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汉朝军队再度向中亚和缅甸推进，随后又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23～25年的内战之后，汉朝的扩张基本上停止了。

在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已经征服了面积相近的领土（分别约200万平方英里），统治着数量相近的人口（分别为5 000万～6 000万人口）。它们的皇帝们面临的问题也是相似的，也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召回了雄心勃勃的将领们，在越来越固定的边界上修建城墙，并且把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们安置在类似文德兰达这样的要塞中。事实上，在中国荒芜的西北边疆中发现的一些遗迹甚至超过了文德兰达的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悬泉置这个汉代的军事驿站中，发掘者们发现了23 000封没有寄出的信件。这些写在竹简上的信大约写于公元前111～公元107年（其中很多信都在抱怨驿站太不靠谱）。

1世纪的皇帝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收获了，但他们看不到，正是建设性的战争的巨大成功改变了整个大环境。公允地说，人们总是很难看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克劳塞维茨曾说：“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因素在影响着力量的平衡，我们就会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要判断哪一方正占据着上风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谁占据着上风就变成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帝国跨上战马

古代帝国达到了它们的顶点，并且超过了它们的顶点，因为到1世纪，建设性的战争使它们与大草原上的骑手们发生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缓慢的过程，使得皇帝们更难看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在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与骑手的联系最早开始于公元前850年，当时亚述帝国开始购买草原上的牧者成功培育出的高头大马，这些马匹强壮到可以供人骑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帝国持续扩张。帝国的农民开垦草原边缘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帝国的商人们进一步深入中亚，购买牲畜。与此同时，生活在荒芜的草原和经过开垦的农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有了新的选择。他们通常会意识到，与其奔波在绿洲之间，为了几口猪食不惜与其他骑手们开战，还不如把马匹卖给帝国的中间商们。他们还发现，如果帝国无力应付他们的要价，他们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弓马直入帝国，从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这看起来是种更好的选择。

最早有关草原游牧民族侵扰帝国的资料，来自公元前700年之前的亚述帝国。亚述人一直扩张到了高加索山脉，那里是大草原的边缘。当斯基泰劫掠者开始给边境地区带来恐慌时，亚述的国王们选择雇用另外的一些游牧民族对付他们。但他们很快发现，斯基泰人的机动性和凶猛

的秉性不仅使他们成为合适的雇佣兵，也让他们变得难以驾驭。灾祸的种子就此种下。

在公元前7世纪，成群的斯基泰人开始自行其是，抢劫他们所遇到的任何人，实际控制了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地区。“他们的野心和暴力把一切都化作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因为他们四处奔突，抢走了所有的东西。”在公元前7世纪最初的10年里，反对亚述的叛军也雇用了斯基泰人，而在公元前610年之前，整个帝国就化为了废墟。这样一来，如何对付斯基泰人就成了那些获胜的叛军的问题。在公元前6世纪90年代，他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麻烦（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在宴会上灌醉，然后杀掉了他们）。

亚欧大陆上的帝国成长得越大，就越要面对一个特别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在中亚的边缘地带进行不对称的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正在进行他最早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时，美国人发现，如果他们想要把拉登消灭在他阿富汗的老巢里，他们就不得不把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用在打击恐怖分子价值10美元的帐篷上。古代帝国的步兵部队庞大而笨重，要想在荒野中追击那些骑手，其难度一样很大。

这并非西方的战争方式对抗非西方的战争方式，而是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从欧洲到中国，富裕的帝国的统治者们差不多面对着相同的挑战，即对付来自草原的骑手。到了阿古利可拉的时代，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进行非对称性战争。就像今天一样，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先发制人。波斯国王们曾派遣一系列部队进入草原，想要消灭斯基泰人。但波斯人发现，进入游牧民族的藏身之所追击他们，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要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想交战，步兵就没法迫使他们交战。有的时候，先发制人的战争能迅速取得战果，就像波斯人在公元前519年击败了他们所称的“戴尖帽的”斯基泰人的联盟。但通常这种战争没有什么好结果。公元前530年，游牧民族杀死了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居鲁士国王，并且歼灭了他的军队。公元前514年，波斯的大流士国王绕着草原追击了斯基泰人几个月，不但未能得手，还险些遭遇了与居鲁士国王相同的命运，仅仅因为趁着夜色渡过了多瑙河才得以幸免。

亚述和波斯是各个帝国之中最先与大草原产生联系的，而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为了将游牧的匈奴人赶出国境，他还吞并了一大片草原。但这没能为中原王朝带来太多好处。公元前200年，匈奴人把一支秦朝军队引入草原深处，并将其全歼。

从公元前134年开始，汉武帝再次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在15年中发兵6次，派遣了数十万大军进入草原。他的军队损失惨重，军费开支将前几代皇帝积攒的财富消耗殆尽，汉朝债台高筑。尽管耗资巨大，汉武帝却像大流士一样，并没有与游牧民族进行决定性的大战。

从雅典到长安，知识阶层都认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根据今天的经验，从长期来看，很难说清楚究竟谁赢得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难以确定这些战事究竟在何时结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和物资损失，斯基泰人在公元前513年之后就再未威胁过波斯，匈奴人的侵扰从公元前100年之后也急剧减少了。

皇帝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更好地发挥耗资巨大的草原远征的效果，应该在同时配合以更柔性，但同样花费不菲的措施。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将游牧民族隔绝开来，这通常意味着修建城墙，把他们拦在外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长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左右。本章前面提及过的哈德良长城修建于2世纪20年代，算是长城的远亲。城墙并不能完全隔绝游牧民族，但是至少可以限制骑手们往来的路径。

最成功（也可能是最不成功）的策略就是贿赂。游牧民族的劫掠会造成大量死亡，这意味着帝国税收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不花点儿钱让游牧民族不再来侵扰呢？只要贿赂的成本低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这种交保护费的方式就能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皇帝省下了一些钱，边境地区的农民可以保住性命，游牧民族免去了很多麻烦。2 000年之后，贿赂仍然在非对称战争中存在：200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阿富汗的军阀们7 000万美元的现金，此举也节约了不少金钱，挽救了不少性命，省去了不少麻烦。

在芝加哥有这么一种说法：诚实的政客就是，你在他身上花钱，他就给你办事。但在非对称战争中，你的期望值要更低一些。阿富汗的指挥官在2001年12月收了10 000美元，负责守卫托拉博拉山区的退路。结果，当“基地”组织的人给他更多的钱时，他就放那些人过去了。像他这样的人，也适合生活在古代的草原地带。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经常收受帝国的贿赂，但还是会回来继续劫掠。事实证明，贿赂是对付游牧民族最糟糕的方式，但其他方式还要更糟糕。波斯和中国的战略家们发现，贿赂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一部分时，是最有效的。不停地给一些好处，再偶尔发动大规模的、十分暴力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的组合可以或多或少地维持和平。

靠着这一系列技巧，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们设法保住了他们的疆土。他们把帝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变得像糟糕的婚姻关系一样：双方有没有对方都能活下去。当帝国强盛时，就会在草原的部分地区设置定居点，把暴力限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当帝国衰弱时，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苦。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这1 000年之中，各大帝国逐渐意识到，要想保持主动，就要在游牧民族擅长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就意味着，皇帝们要在他们庞大的步兵之中加入更多骑兵。那些认为存在一种植根于希腊文化的西方式的战争方式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在马背上作战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人躲避肉搏的方式，而步兵作战是西方价值的标志。

但实际上，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真正促成了向骑兵作战的重大转型的并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那些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在公元前500年之后较早地过渡到了骑兵，而那些有着山丘森林作为屏障的帝国则过渡得较晚，其兵种转型也更不彻底。但无论情愿与否，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帝国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了。

很自然地，这一转型最先在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的波斯开始了。当大流士在公元前514年于今乌克兰一带追逐斯基泰人时，他的部众几乎都是步兵。而到了公元前479年，当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锋时，他们对骑兵的倚重程度几乎与步兵一样。在公元前334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时，波斯帝国则几乎完全仰仗其骑兵了。中国仅次于波斯，也是第二个开始向骑兵转型的帝国。汉武帝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之前，征募了大量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拥有18万名骑兵，占其军队总数的1/3，而骑兵每年消耗的财物是帝国每年税收的两倍。印度躲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背后，在公元前5～前2世纪，印度的国王们都仍在因循旧制。印度人依然可以依靠身披铠甲的大象的冲锋赢得战斗的胜利，骑兵的作用仅限于掩护大象的侧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了一切为止。

1954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对着大量要求美国干预东南亚共产主义传播的呼吁请求时，警告美国人要当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解释道：“（假如）你立起来一列多米诺骨牌，当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一块骨牌也会很快倒掉。因此，最初的一点儿崩溃也可以导致最显著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这一对20世纪50年代中南半岛地区形势的分析，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用它来形容公元前1世纪的草原再合适不过了。随着汉朝强大的骑兵部队胜过了匈奴的骑兵，很多游牧民族就开始向西迁移到月氏人一直以来放牧的地方。惊慌失措的月氏人也向西方迁徙，进入了斯基泰人的地盘。随着下一块骨牌的倒下，斯基泰人（在印度被称作塞人）向南经过今天的阿富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50年，塞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一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了草原上更多次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骑兵大战之后，月氏人跟在塞人的后面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脉。月氏人迫使塞人进一步深入印度腹地，而他们自己则征服了从今土库曼斯坦到恒河中部的广阔地域，建成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繁荣强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之一。到2世纪，贵霜帝国恐怖的骑射手们控制了连接罗马和中国的丝绸之路。关于他们的雕塑可以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找到。贵霜帝国也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还与远征到今天的阿富汗的汉朝军队打了一仗。

印度的经历表明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军事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当多米诺骨牌倒下，农业帝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时，这些帝国要么像波斯和中国一样让自己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要么就像印度一样被拥有强大骑兵

的游牧民族打垮。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入侵者也会让被征服的地区最终拥有骑兵。统治者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但是最终战争那充满矛盾的逻辑总会取胜。

与此同时，中国的汉朝（正是汉朝在草原的另一侧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改变了印度的命运）发现了一个更严酷的事实：各个帝国与草原的联系此时也达到了其顶点。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中国就一直在北部边境抗击匈奴部落的侵袭，而其西面的边境，由于受到足有100英里宽的山地和森林的保护，一直很安静。但当匈奴人开始在公元前50年前后进行迁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匈奴人的一部向西，导致月氏人和塞人涌入印度；而匈奴人的另一部则向南迁徙，劫掠汉朝西部边疆的羌人农民。

几十年来，羌人一直作为中国的屏障，使中国人免于与打了就跑的游牧民族进行艰苦的边界战争。然而，在1世纪，被囚笼效应困在游牧民族和汉朝之间的羌人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权。规模更大、组织更良好的羌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奴役，进入了汉朝的疆土。他们又不时与匈奴贵族通谋，联合反对汉朝。羌人的角色从屏障变成了利剑，刺向了帝国的要害。

汉朝边境的官员们看清了事情的走向。有人在公元前33年写道："最近，西羌守卫着我们的边境，与汉人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但他接着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羌人进入汉朝的疆界，"小吏和刁民开始抢夺羌人的牛、女人和小孩。这引起了羌人的愤怒，他们开始起兵造反"。

在1世纪，汉朝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受到了挑战。在94年、108年和110年[1]，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叛和入侵（这两者很难区分），边疆地区陷于战乱之中。"就连女人也持戟舞枪，手里拿着弓，背后背着箭。"一名官员悲叹道。

在亚欧大陆遥远的西端，类似的情形即将终结阿古利可拉的有建设性的战争，将罗马也带到相同的顶点。长久以来，在罗马帝国与大草原之间，一直隔着日耳曼农牧民居住的区域，这一区域比中国西部边疆羌族人居住的区域还要广阔。但在这里，草原移民同样把帝国的屏障变成了插入帝国心脏的利剑。

迁徙的驱动者可能是沿着顿河居住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他们于1世纪开始向西迁移。萨尔马提亚人是非常凶猛的：据希罗多德记载，萨尔马提亚人是亚马逊人的后裔，他们中的女性除非曾在战场上杀过一个男人，否则不准结婚。在萨尔马提亚人的部队中，轻重骑兵相结合。战斗时，先用骑射手扰乱敌人的阵线，再派持有长矛、披着铠甲的骑兵冲击敌军。这样的战斗方式极具毁灭性。1世纪80年代早期，萨尔马提亚的支族埃阿热格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正是他们的出现促使图密善把阿古利可拉的部队从不列颠召回。而出现在东欧各地的其他部落则给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混乱。

在1～2世纪，温暖的气候导致了欧洲人口增长，加剧了日耳曼农民之间的囚笼效应。结果，那些试图躲避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立刻就与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地的邻居们大打出手。那些最靠近大草原的日耳曼人从给他们带来灾祸的人身上学会了骑马作战，而就连那些住的离大草原最远的日耳曼人也采用了更好的武器和战术。在战争的压力下，酋长摇身一变成为集权的国王，他们开始征税，并且组建真正的军队。

大约在150年，一支被称为哥特人的日耳曼人离开了他们靠近波罗的海的田园，一路向南朝黑海而去。在他们的征程上，他们一路驱赶着出现在面前的其他部落。到了2世纪60年代，一个被罗马人称作马克曼尼人（字面意思是“边界上的人”）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渡过多瑙河。日耳曼人已经在罗马的边境上来来回回达几个世纪之久。情况通常都是一小群年轻人跑来找些事情做，或是想偷盗点儿什么东西，然后再跑回家乡去。但这次不同。这一次，他们是几千户人一起出动，而且打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面对他们的，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见图3–1）。他是161～180年的罗马皇帝。在吉本将2世纪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位博学、有文化素养又仁爱的奥勒留——他可能是终极的“坐寇”。如果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话，奥勒留可能会更愿意与留着胡子的希腊教授们探讨斯多葛主义哲学问题。但草原上的风暴迫使他一路征伐到多瑙河另一边的森林之中。即便如此，在战争的间隙，他还是废寝忘食地写作了斯多葛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沉思录》（如果有任何一位古代帝王可以称得上是“伟人”，那么非奥勒留莫属）。



图**3–1** 工作日战士：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的骑马雕像

资料来源：华盖图像。

像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继任者们一样，为了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奥勒留被拖入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战争，并且用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打了这场战争。美国陆军上校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在1975年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了河内。当时，就像艾森豪威尔预言的一样，南越（越南共和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刚刚倒下。一名会讲英语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上校在机场迎接他。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两国之间刚刚发生的不快。

“你看，”萨默斯告诉北越军官，“你们从未在战场上击败过我们。”

北越军官想了想。“可能是这样吧，”他最后说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美国人在越南一样，2世纪60年代的罗马军队也总能在战斗中直截了当地击败他们的敌人[2]。而就像北越人一样，日耳曼人因此尽量避免这样的战斗。结果，骄傲的罗马军团不得不采取了那些在越南再熟悉不过的战术。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后，他的坟墓上用来装饰的柱子十分忠实地表现了这些场面：罗马人烧毁村庄、盗取牲畜、屠杀俘虏（见图3–2）。



图3–2 为了拯救村庄而毁灭它[3]： **2**世纪**80**年代，纪念马可·奥勒留的雕塑——罗马士兵烧毁茅屋，拖走妇孺

资料来源：阿里纳利档案馆–安德森档案馆，佛罗伦萨。

更糟糕的是，当罗马人真的遇到两军对垒的战斗时，战斗进行的方式也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当罗马军队第一次遭遇埃阿热格骑兵

时，他们就吃了一惊。埃阿热格人采用了游牧民族常用的策略：先是假装逃跑，把一个罗马军团吸引出来，一直到冰冻的多瑙河之上；当罗马人在冰面上站不住脚之时，游牧民族的骑兵们又返身回来，包围了罗马人，意欲将他们歼灭。但罗马人的纪律性拯救了他们。“罗马人冷静依旧。”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写道：

> 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面对着进攻者。大多数人把盾牌放在冰面上，一只脚踩在盾牌上，使自己不至于滑倒。当敌人进攻时，他们会抓住骑兵的缰绳、盾牌或是长矛，再猛地向后一拉，把敌人连人带马都拽倒。如果罗马士兵向后跌倒，他就会把敌人拉到他身上来，再像摔跤手一样用腿夹住对方，翻滚一下，使自己转而压在敌人身上。如果罗马士兵向前摔倒，他就会去咬萨尔马提亚人……这些穿着轻铠甲的蛮族没领教过这样的作战方式，丧失了斗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脱了。

罗马步兵在那一天击败了骑兵。但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跨上了马背，越来越多的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开始侵扰边境。更糟糕的是，在224年夺取了波斯政权的萨珊王朝开始把成千上万的铁甲骑兵投入战场。这些重装骑兵连人带马都由铠甲和钢板包裹起来。4世纪的一个亲眼见过铁甲骑兵的罗马人写道：“他们全都由金属覆盖起来，铁甲非常合身，其关节与骑手的关节完全匹配。面罩也精巧地嵌在头盔之中，使得整个人完全覆盖在铠甲之下。仅有的可能被箭矢射穿的位置是留给眼睛和鼻孔的小洞，只有通过这些小洞，骑手们才能得到一点儿光线和空气。”

罗马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更多的骑兵，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尚有争议。不过，在200～400年，罗马走上了与波斯、中国和印度相同的道路。罗马军队中骑兵的比例从1/10上升到1/3甚至1/2。到了500年，这次军事变革彻底完成了。从地中海到黄海，战马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过，每个帝国运用骑兵的方式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各异：汉朝和贵霜帝国仰仗轻骑兵，他们可以在开阔的草原上快速进击；波斯的萨珊王朝依靠配备长矛铠甲的骑士的正面攻击；罗马人则采用多兵种联合作战战术，驰骋深入蛮族藏身的森林，焚毁村庄，伏击敌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每个帝国采用的方式都能很好地对付他们当下的敌人。因此，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古代帝国并没有露出已经越过建设性的战争的顶点的明显迹象。

揭露这一事实的，是一个完全未曾预料过的敌人。

建设性与反建设性的血腥循环

古代帝国的贵族们十分厌恶游牧民族。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的剥皮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斯基泰人第一次杀人之后，他会喝掉死者的一些血，之后再把人头带回去给国王看，然后，他会绕着人头的两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来的口，把皮甩松。之后，他会用牛的肋骨把皮剥下来，再用手把皮弄柔软，最后把人皮当作餐巾使用。”1 000年之后，罗马作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匈人[4]（古代游牧民族中最可怕的一支）的描写更直白。“他们身材矮胖，四肢强壮，脖子很粗，”他坚称，“相貌丑陋畸形，简直就是两条腿的野兽。”但是，这些绅士们真正应当感到惊恐的，并非这些骑在马背上而来的肮脏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坐在”游牧民族身上而来的更加肮脏的微生物。

一直到20世纪，战争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军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给他们吃比较差劲的食物，任由他们待在他们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来，军队有如微生物培养皿一般，使得微生物疯狂滋生。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军营里，外来的病毒即便在杀死它们的人类宿主之后仍然可以存活，因为总会有其他宿主可供它们迁移。痢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这些都是军营中常见的疾病。

但就在161年，也就是马可·奥勒留在罗马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东西开始酝酿。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是在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在那里，一支大军正一如既往地与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作战。人们的报告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新疾病，这种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去了军营里1/3的人的性命。4年后，同样可怕的传染病发生在罗马在叙利亚的各个军事基地。这种疾病在167年传染到了罗马城，导致众多罗马人丧生，以至于奥勒留推迟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而留下来举行保护这座城市的仪式。当他的军队终于开拔往前线时，他们也把这种疾病一同带去了。

按照目击者的说法，这场瘟疫听起来像是天花。遗传学者迄今还未能从古代遗留下来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上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导致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爆发疫病的源头也是来自草原的多米诺骨牌。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一系列疾病种类。致命的病原体和起保护作用的抗体也表现出了红桃皇后效应，它们你追我赶，越跑越快，但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健康的均势。大约有1/4 ～1/3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以内会死掉；能活过50岁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误认为处于最佳健康状态的人，他们的身上也滋生着病菌。

距离曾经将这些疾病彼此隔绝，但建设性的战争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帝国的壮大，人们开始在帝国之间迁徙，经常会经过草原。伴随着这样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绝开的疾病之间产生了联系，酝酿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混合体，这样的疾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幸运地天生具有抵抗这种疾病的抗体。在这些幸存者的抗体基因遍

布人类社会之前（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瘟疫就会经常发生。

埃及的数据最为完整。在165～200年，埃及的人口减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进行猜测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埃及的情况并非特例。由于人口减少，帝国募集士兵、征收赋税的难度就更大了。这样一来，帝国要想在草原边缘阻止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就变得越发艰难。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统治者们惊恐地看到，他们的疆界土崩瓦解[5]，而大量的移民导致疾病传播得更加迅速。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年中，气候变化变得更为迅速。从南极洲的冰芯到波兰的泥炭沼泽，气候学家都发现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寒冷、更干燥的证据。全球变冷导致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变短，进而引起粮食减产，并在整个亚欧大陆造就了更多的气候移民。

在游牧民族迁徙、疾病和粮食减产的连续打击下，通过几个世纪的建设性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税收和贸易体系开始瓦解。在中国，鉴于税收的减少和边防开支的增长，2世纪的一些官员建议道，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停止为军队发放军饷。他们认为，既然西部边疆已经在羌人叛乱和入侵之下被破坏得千疮百孔，那么再让军队在那里自筹粮饷又能让情况坏到哪里去呢？反正那些地方距离都城洛阳还远得很。

答案是：情况可以变得很糟糕。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为匪徒，开始抢劫那些他们本应该保护的农民；将领们变成了军阀，只接受合乎他们心意的命令。有官员记载道："平民百姓惧怕国家里最强大、最勇敢的人。"168年，瘟疫横行，军队四分五裂，宫里的宦官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反对年仅12岁的皇帝和掌管朝政的外戚。这场政变酿成了一场灾难。数以千计的官员在相互倾轧和清洗中被杀，政权崩溃。法律和秩序也开始瓦解，在2世纪70～80年代的起义造成了无数人丧生。189年，西部边境地区军阀中最可怕的一个挥师进入洛阳，烧毁了这座城市，并劫持了又一个小皇帝[6]（仅8岁）。

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个接一个强人横行无忌，宣称要让天下重归一统，一直到220年，汉朝最终分裂为三个相互征伐的国家[7]。边界消融了，数以十万计的羌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迁徙到了中国北方，数百万汉朝人则从北方逃到了南方。官员们甚至不再尝试去统计死亡人数。

罗马的情况同样糟糕。人口、农业和贸易都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手头拮据的皇帝们只得减少士兵们的军饷，或是降低铸币品质，以使得有限的白银储量能撑得更久一点儿。可以预料到的结果自然是不值钱的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愤怒的士兵们决定自己解决问题。193年和218年，罗马禁卫军先后两次把皇帝宝座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而在218～222年，"疯狂的少年"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统治着（如果那也能算是统治的话）罗马帝国。即便在罗马皇帝之中，埃拉伽巴路斯的腐朽、残暴和无能也是

登峰造极的。在235～284年，根据判断标准不同，我们可认为罗马有过最多43位皇帝。这些皇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除了一人死于瘟疫，全部死于非命。在被杀掉的42位皇帝中，其中一人被哥特入侵者在战场上杀掉；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抓住了一个，并且把他丢进一个笼子里，嘲笑他，折磨他，一直到波斯人玩够了才把他杀掉；其余的40位皇帝都是被他们的罗马同胞杀死的。

被迫面对多重军事威胁的罗马皇帝不得不把大军交给他手下的将军们，尽管这些将军们经常用政变报答统治者的信任（政变后“黄袍加身”登基成为皇帝的人往往活不过几个月，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每当有将军反叛，他麾下的部队通常就会抛弃他们在前线的驻防地，赶回去参加内战，使得帝国的边界门户大开。

哥特人建造了船只，驶过黑海，劫掠了希腊。法兰克人（他们当时的根据地在今德国）在高卢横行，并且杀进了西班牙。其他的日耳曼人袭击了意大利，摩尔人占领了北非，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则焚毁了叙利亚繁荣的城市。东西方的各个行省意识到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保护它们，只得自行成立政府。在260年，罗马帝国就像汉朝一样，分裂成了三个小国家。

大帝国的血腥分裂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印度的贵霜帝国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大军和斯基泰劫掠者击败，在3世纪30年代一分为二。248年，在最后一次战败后，西部的那个王国被波斯吞并；而在3世纪70年代，东部的那个王国失去了对恒河流域城市的控制，只能苟延残喘。再往南，2世纪时强盛的贸易王国百乘王朝也不堪斯基泰人的袭扰，最终于236年土崩瓦解。

我曾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过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发明的“坐寇”一词。他将那些相对良性的盗贼与彻头彻尾恶性的流寇明确区分开来。坐寇们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我管理；而流寇们则只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偷了，我又走了。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的帝国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那里的坐寇通常有足够的实力拒流寇于国门之外。可是，这种情形在3世纪发生了变化。在亚欧大陆的几乎每个地方，战争开始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把巨大的、和平的、繁荣的古代帝国撕成碎片。

这发生在几乎每个地方，但并非是每个地方。在3世纪，帝国崩溃潮流中的一个重要例外是波斯。波斯新兴的萨珊王朝在224年推翻了帕提亚帝国，随后变得越来越强盛。萨珊王朝击败了贵霜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军队，赶走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伟大的征服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270年驾崩之时，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萨珊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并非仅仅是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在大约200～1400

年的这1 200年间，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在进行着循环。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200年之前的1 000年是利维坦扩张、繁荣程度提高、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时代；而我们即将在第四至七章看到，从1400年开始，这样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但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漫长的中古时代里，却满是复杂、混乱、暴力的插曲。

这是一个曲折混乱的时代。在3世纪晚期，萨珊王朝的复兴看起来似乎要引领一个帝国复苏的新时代。在半个世纪的无秩序之后，罗马在274年再度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280年，中国的西晋王朝再度把中国建设为大一统的帝国。4世纪20年代，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开始完成相同的功业。但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复苏已经开始进入了尾声。匈奴人焚毁了中国古老的城市，杀死了西晋的皇帝，屠杀了数百万的难民。随后是60年的战乱。到383年，似乎即将有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中国。然而，这个王朝的军队却在遭遇了一场不重要的败仗[8]之后，莫名其妙地在惶恐之中土崩瓦解。新的一轮战乱又席卷了东亚。

罗马也在4世纪晚期重新陷入混乱。哥特人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战部队，帝国的疆界开始崩解。匈人向西迁徙，推倒了更多多米诺骨牌。在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涌过了结冰的莱茵河。西欧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之中。476年，也就是莱茵河边界被突破70年之后，一位日耳曼国王宣布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484年，另一支匈人消灭了萨珊王朝的军队，杀死了国王。看上去，萨珊王朝即将重蹈西罗马的覆辙。但萨珊王朝坚持住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归一统。5世纪，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了黄河流域；589年，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

在经历了令人目眩的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地中海地区看起来也要重归一统。6世纪20年代，拜占庭帝国（古罗马帝国残存的东半部）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在550年，扩张停止了。在6世纪后期，新兴的入侵者让拜占庭帝国再度衰落。印度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467年之后，笈多王朝开始在另外一支匈人的打击下面临崩溃。尽管这个帝国在528年曾经大败游牧民族，但是到550年，这个帝国就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混乱，周而复始。

我知道，以上的叙述看起来很混乱，我想图3–3可以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片混乱。这张图将幸运纬度带分为4个区域（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并且描绘出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每个区域中最大的帝国的疆域面积。我承认，用面积来表现利维坦集权政府的实力并不严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650～850年，中东的曲线出现了飙升，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这两个伊斯兰王朝。理论上讲，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进行统治的哈里发控制着430万平方英里土地，使得这一帝国成为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但实际上，哈里发的

势力仅仅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贵霜帝国使得印度的曲线在15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高峰，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贵霜帝国当时统治着2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大部分地区都渺无人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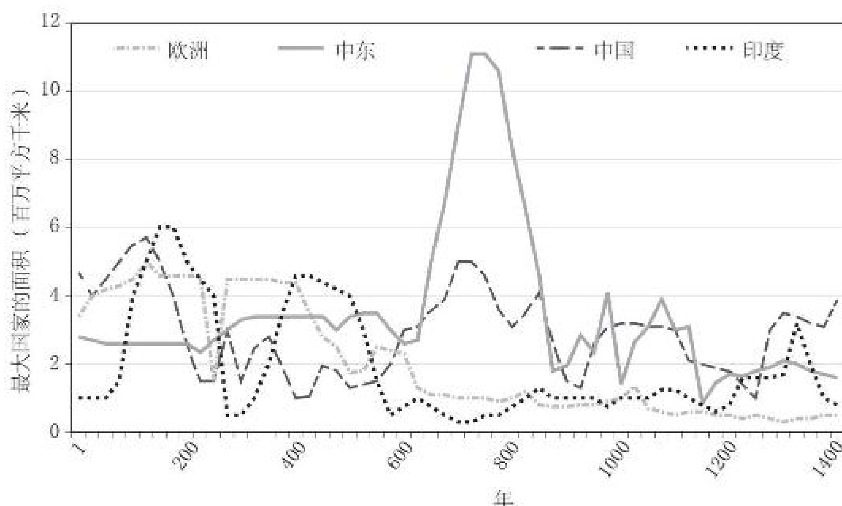


图3–3 事情一个接着一个？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利维坦的兴与衰（再兴、再衰），用每个地区最大国家的面积作为衡量标准

尽管有上述这些问题，这张杂乱的图还是表现出一个要点。在2~14世纪，幸运纬度带上的所有区域很少有什么时候展现出相同的趋势。当有的帝国崛起时，别的帝国就在衰落。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就是另一个社会的黑暗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博学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解读最显而易见，也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法用（科学）规律解释的一片混乱；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毫无意义地发生着。这种情形，用一位20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的话说，就是Odtaa，即‘事情一个接着一个’（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从表面上看，图3–3简直就是Odtaa现象的典型。帝国时兴时衰，战争或胜或败，但这一切都没带来太多变化。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但汤因比提出Odtaa现象，只是为了驳倒它。在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几十载的研究之后，汤因比很清楚，在Odtaa的表象之外，还有更大的图景。我想，他会从这张图中看出来好几个图景。首先，就像我在图3–4中画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14个世纪的喧嚣之下，帝国的面积在稳步下降，幸运纬度带成了帝国的坟墓。

其次，汤因比肯定能看出来，国家面积的剧烈变化绝不仅仅是Odtaa。国家的面积一直进行着膨胀——破裂的循环。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帝国面积减少，之后会发生建设性的战争，又使得帝国面积重新增加，随后反建设性的战争又将利维坦瓦解掉，周而复始。与其说是遇到

了Odtaa现象，不如说，幸运纬度带更像是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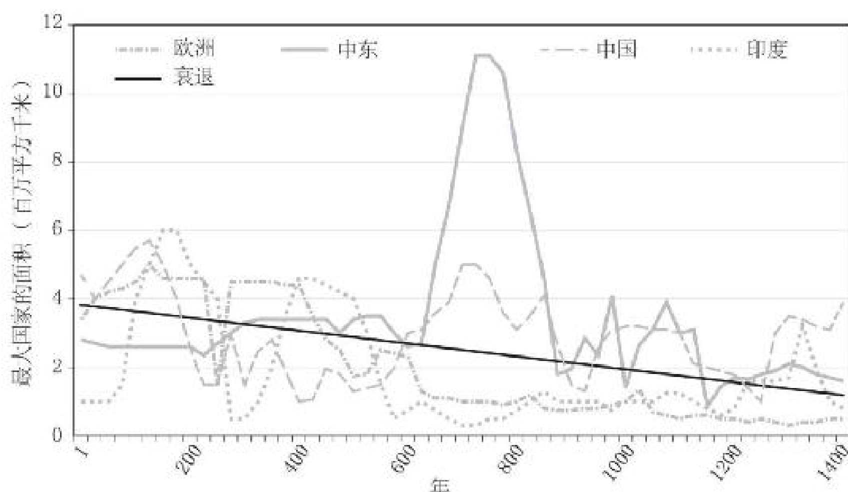


图3–4 混乱中的秩序：黑线表示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帝国平均面积的衰减（使用图凯检验法； ＝ 3.83 - 0.047x）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由于建设性的战争已经越过其顶点，草原和农业帝国被联结在了一次。从此之后，每一个活动都会带来力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某个时候，瘟疫、叛乱、外敌入侵会导致帝国在反建设性的战争中瓦解，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会在这一过程中丧生；而接下来，当地的军阀或是外来的入侵者会发动新的建设性战争，利用此前产生的空间缔造又一个利维坦。隆重登场的新国王会竭力恢复法制，从臣民身上榨取税收。而这个新国家的财富又会吸引更多掠夺者，带来更多叛乱，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建设性的战争。如是反复。

幸运纬度带上的每个地区都在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之间反复，但时间点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王国成功地赶走了劫掠者时，往往就使其邻国面对的压力变得更大。有些来自草原的部族太过强大，看起来似乎同时在四处出击。例如，在5世纪，从印度到意大利，都能见到匈人劫掠的身影；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在从日本到德国的各地发动进攻。即便如此，战场上意外的胜败让事情的结果不尽相同，造成了我们在图3–3中看到的那种混乱。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反建设性的战争，但即便是那些最糟糕的反建设性的战争，也只是建设性的战争大潮中的插曲而已。有时候，这样的崩溃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但尽管阿卡德帝国和埃及的古王国在公元前2200年覆灭，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公元前1900年衰败，东地中海的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崩溃，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一直在朝着通往罗马、长安和巴连弗邑的方向前进。他们每后退一步，总会又前进两三步。

可是，在200~1400年，情况变了。来自草原的骑手们太过强大。偶尔有一两个国王能反击这股混乱的力量，但没有人能永久地阻挡草原迁徙的步伐。或迟或早，流寇们总会再次回来。直到有人学会阻止草原

游牧民族为止，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无法打破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血腥循环。

帝国的坟墓

反建设性的战争使得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过的发展进程发生倒退。陷入重围之中的政府已经无法承担它们的基本职责：保障安全。商人躲在家里，这给要征税的国王和要购物的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统治者无力支付军饷，军队就依靠抢劫农民弥补亏空，农民则只好向大地主们寻求保护。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对大地主卑躬屈膝，地主也将他们组织起来，靠这些农民武装赶走入侵者和征税官。地主们普遍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再为遥远的君主支付任何东西了。

公元前的5 000年中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将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富有纪律、装备精良的军团。然而，现在反建设性战争则引发了军事领域的反革命。已经发明的东西毕竟不能被简单地遗忘，国王、将领和士兵们也没有遗忘大集群作战、纪律性和良好补给的优点。但当亚欧大陆的这些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时，政府就不再有能力去提供这些东西了。

陆军萎缩，海军朽烂，补给线崩溃，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控制能力都瓦解了。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把贵族排除在了战争之外，招募、供养效只忠于他一个人的军队。1 000年之后，国王们开始做截然相反的事情；既然没法从肆意妄为的贵族身上榨取供养军队的钱财，他们只好向贵族们妥协。

以前，国王和地主都要从农民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国王把他们的那杯羹称作赋税，地主把他们的那杯羹叫作地租。现在，国王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征税，只好放弃了他们的税收，而把好听的头衔和特权交给那些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家伙们，任由贵族们像小王国一样经营自己的产业。作为回报，国王们从这些侯爵、伯爵、男爵那里得到承诺，当国王需要进行战争时，这些贵族们会从他们的封地上招募一支军队参加战争。

贵族们要想招募军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仿效国王们的做法，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级的骑士。作为回报，这些骑士也将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而这些骑士们也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等级的人。如是多次，就形成了一张权利与义务的大网，将上至高坐城堡之内的国王，下至实际付出辛劳的贫农在内的所有人都联结在一起。

对那些滑入了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国王来说，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他们不再需要供养作战的士兵或是征税的官吏。然而，以这种方式组织管理军队也有缺点。首先，国王对其追随者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力，这些人通常更在意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荣誉，而不是什么更宏大的计划，他们经常会一时兴起杀入战场，也可能会一时胆怯而逃之夭夭。在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战役—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正在攻击哈罗德国王（King Harold）盎格鲁–撒克逊军右翼的诺曼人突然调头就逃，哈罗德的弟弟利奥弗温和吉尔斯此时忘记了秩序、原则和常识，追着敌人冲下了山坡，他们的部下也欢呼着紧随其后。而就在山坡底部，诺曼人集合起来，转过身砍倒了那些追击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阵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随即崩溃，最终丢掉了他们的王国。

据传说，哈罗德国王被诺曼人射来的一支箭射穿了一只眼睛。但即便哈罗德幸免于难，他也将面临这个时代战争的第二个大问题：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王，也就没办法去劫掠敌人。不论有多少誓言和关于职责的说教，如果一个国王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分配给属下，那么他也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忠诚。

而在另一边，诺曼人的领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则用英格兰广阔的土地打赏他的追随者们。但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新的安排造成了第三个问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这张联结了国王和骑士的职责和义务的大网变得越来越混乱。聪明或是幸运的领主们通过继承、联姻、购买等手段扩张了他们的领地，而每块新的领地都带来了新的义务。很快，就有人发现自己要效忠于不只一个主人。

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二世（Count Robert II of Flanders）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101年，罗伯特伯爵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宣誓效忠。按照惯例，他发誓说将帮助主人“对抗任何敌人，不论他们是生是死”。但罗伯特还补充道，其中不包括亨利国王真正的心腹之患——法国国王菲利普（Philip），因为他此时已经是菲利普的封臣。罗伯特向亨利国王保证说，如果菲利普国王决定进攻英格兰，他本人（罗伯特）将努力劝说菲利普放弃这个计划。但如果会谈失败，菲利普仍然决定发动入侵的话，罗伯特承认他将在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不过他也坚称，他只会派出一部分军队，只要不让菲利普怀疑他不忠心就可以了。

如果英格兰国王亨利要求罗伯特伯爵参加一场并非对抗法国的战争，罗伯特将愿意提供援助，除非（1）罗伯特身体抱恙；（2）法国国王要求罗伯特参加另外一场战争；或是（3）日耳曼皇帝（他是罗伯特的另外一个主人）也征召了罗伯特。好像是觉得这还不够麻烦似的，罗伯特还许诺说，如果法国入侵诺曼底——这几乎必然会导致法国和英格兰开战——他只会派出20名骑士为法国作战，而会派出另外980名骑士为英格兰而战。

长达几个世纪的衰退造成了如此混乱的效忠关系。我在前文提到过，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曾试图重新统一地中海沿岸。

在他失败之后，利维坦开始真正瓦解。从7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一种来自沙漠的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竭尽全力供养的孱弱的军队。7世纪50年代，阿拉伯人推翻了波斯的萨珊王朝。而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拜占庭帝国看上去也似乎随时要步萨珊王朝的后尘。

到750年，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军队四处告捷。他们深入法国，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哈里发们的利维坦却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从伊斯兰教发迹之初，哈里发就一直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位置，介于穆罕默德的神权继承者和普通国王之间的位置。哈里发们都仅仅能在其庞大帝国中的一小块区域里将自己的神权成功转化为世俗权力。到9世纪，很多地方上的苏丹实际上成了独立的统治者，他们相互征伐，甚至进攻哈里发，以及任何敢于挡路的敌人。

在遥远的西北方，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成了一些新的王国。当这些王国拥有强势的国王时，它们就会进行建设性战争；而当它们没有这样的君主时，它们就进行反建设性战争。其中，最具建设性的统治者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他在771～814年征服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首都亚琛，查理曼手下的官僚在木制的厅堂里威吓地方领主，从他们身上征税，倡导教人识字，并不顾一切地让国王的臣民们遵守命令。800年，彻底被他威服的教皇甚至把皇冠戴到了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复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很快破灭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查理曼的儿子和孙子们正忙于彼此攻伐，没空去理睬那些不听话的贵族。“这导致了大战，”当时一位编年史家悲叹道，“并非由于法兰克人缺乏足够高贵、强壮、聪明得可以统治王国的王子，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慷慨、同样有尊严、同样有权势，而导致他们越来越不和。没有哪个人远远胜过其他人，足以使其他人向他臣服。”

但即便在查理曼去世之前，新的劫掠者已经开始掠夺查理曼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的财富。维京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北方而来，马扎尔人则坐在马背上从东方赶来。亚琛距离边境太远，没办法对这种打了就跑的攻击做出反应。于是，当地的领主们就站出来填补了安全问题上的空白，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来就很熟悉了。即便是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物也无法阻止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力量。到885年，当厄德伯爵（Count Odo）在巴黎对抗维京人的围攻时，远比查理曼差劲得多的“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却未能出现在巴黎。这标志着帝国已经形同虚设。

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人们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第一个效忠于多个主人的人出现在厄德保卫巴黎的战斗后仅仅10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到14世纪80年代，也就是厄德之后的500年，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一位法国的牧师提出了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那些效忠于多个主人的战士，应当为他最先效忠的那位领主而战，再通过雇人代替自己作战的方式来履行其对第二个（以及第三个、第四个，等等）领

主的义务。

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流行过，可能是因为雇人替自己作战是要花钱的。更常见的是库西勋爵昂盖朗（Enguerrand de Coucy）做出的那种选择。1369年，库西勋爵昂盖朗的主人（英格兰国王）召集他去参加对抗其另一个主人（法国国王）的战争。库西勋爵并没有在两位国王中做出选择，而是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和约。随后，他为自己找到了第三个主人：加入教皇的军队中去意大利作战。在教皇的战事在1374年告吹之后，库西勋爵又带了10 000人私自在瑞士开战。

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正在安全而开化的爱丁堡写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把自己身处的富有秩序的世界与库西勋爵、罗伯特伯爵、亨利国王和菲利普国王所生活的纷乱的时代进行了对比。亚当·斯密遗憾地总结说，那就是一个“封建的无政府”的时代，“大的领主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几乎永不停歇地相互征伐，甚至经常对国王开战，原野上仍然上演着暴力、劫掠和动乱”（见图3–5）。



图3–5 封建的无政府：1218年，在埃及的达米埃塔，基督徒和穆斯林最精锐的骑兵们相互砍杀（出自一本约成于1255年的书籍）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难以找出封建的无政府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正是在读到了中世纪的混乱之后才确信，欧洲一定随后经历了一个文明化的进程，才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这个结论只能说对了一半。由于埃利亚斯并没有从一个长期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古代帝国崩溃后长达1 000年的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的结果。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说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他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和平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应当用“封建的无政府”描述库西勋爵的世界。毕竟，每有一个砍人脑袋的“征服者”威廉，也会相应地有一个帮助他人的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而且大多数时候欧洲人都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20世纪的亚诺玛米人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当中仍有大约1/4会死于暴力。“封建的无政府”这一说法之所以适合14世纪的欧洲，是因为那时的很多人（就像亚诺玛米人一样）会十分轻易地选择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其轻易的程度让人震惊。

在流传至今的数以千计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下面这个：

> 一位骑士造访一位邻居的城堡，跟他一起用晚餐。
>
> “大人，”他闲聊道，“这上好的葡萄酒，花了您多少钱？”
>
> “啊，”那位和蔼的主人回答说，“没有哪个活人为这酒要过一分钱。”

在我看来，实际上，“封建的无政府”这一说法不仅可以很好地形容900～1400年的西欧，而且适用于同时期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从英格兰到日本，随着利维坦的自我解体，社会都蹒跚走向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在3～4世纪的中国北方，资料上记载了“部曲”的崛起。所谓“部曲”，就是追随地主投入战斗的佃客。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一部分战利品。在6世纪的印度，衰落中的笈多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那些在帝国的官僚体系崩溃后为国家派遣士兵的地方领主，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独立。在9世纪的中东，哈里发把土地封给地方上的苏丹，苏丹则会（也可能不会）召集军队作为回报。哈里发分配的这些土地，已经成了唯一联结着阿拉伯世界的东西。到了1000年，拜占庭帝国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皇帝们也把土地分封出去，换取军事支持。在世界各地，古代帝国们都走进了它们的坟墓。

僵尸帝国

但各帝国并没有待在坟墓里。就像好莱坞大片中的僵尸一样，帝国一次次地死而复生。

就拿中国来说吧。547年，居士杨炫之来到了故都洛阳，那里的残破景象令他感到震惊。他写道，城墙倒塌了，宫殿和房屋化为废墟。就在13年之前，一场战乱席卷了这座城市，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并将曾短暂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两个相互征伐的国家。从那时起，杨炫之说，“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

耕老，艺黍于双阙”[9]。

但就在杨炫之造访洛阳30年之后，中国北方重归一统；又过了12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了。中国重新爬上了图3–3中的坡顶。

就像建设性的战争一样，反建设性的战争也有其顶点，一旦超过了其顶点，那些暴力卓群的人们（就像古时候一样）会开始减少杀戮的时间，增加治理国家的时间。一位波斯亲王约在1080年左右告诉他的儿子：“你要了解这一真理，军队保护国家，金钱供养军队。农业的发展可以带来金钱，而公正与公平带来农业的发展。因此，你要既公正，又公平。”

拒绝接受这一真理的征服者难以持久。于589年统一了中国之后，隋朝开始征召越来越多的军队，然后把它们投入到征伐朝鲜的灾难性的战争中。7世纪10年代，隋朝的臣民感到忍无可忍，中国一度似乎又要滑向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的深渊。盗贼四起，纳税的户口减少了75%，军阀们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其中还包括数以千计的好斗的和尚，他们显然没有听从佛教反对暴力的教导）。但内战的赢家建立了唐朝，他们很懂得建设性的战争的真谛。唐太宗曾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朝的君主不仅说得好，他们也确实做到大赦天下，不计前嫌地提拔有才能的官员，重建起内政体系。唐太宗以身作则，命人把奏章挂在寝宫墙上，这样晚上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批阅这些奏章。他甚至还请来曾经反叛的佛教教徒，在大战的废墟上修建新的寺庙，让那些投降的僧人为内战双方的战死者祈福。

唐朝的统治者做的还不仅这些。作为外来的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了解草原政治，知道怎样利用那些长城外面的突厥部落之间的关系。630年，在铁山之战中，唐朝的10 000名骑兵趁着浓厚的晨雾出击，荡平了东突厥人的营地，使得中国的边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都很安宁。

不过，真正让唐朝的统治者超越了封建制国王的成就是重新建立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唐朝的统治者十分务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会向强大的贵族妥协，但他们拒绝用土地换取武装。所有军队都是唐朝政府的军队，甚至废除前朝的土地分封。他们让将领们在全国范围内轮调，避免他们形成过强的地方势力。官员擅自调动10名士兵可能要坐一年的大牢，擅自调动一支部队的可能会被绞死。

唐朝几乎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因此7世纪成了中国的黄金时代。和平再度降临，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诗歌达到了完美的顶峰。唐朝的军队征服了朝鲜和中亚的绿洲，中国的文化永久地影响了日本和东南亚。唐朝虽然有这些成就，但也无法打破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

争的循环。

8世纪中叶，中国的富庶使得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再度联合起来进行劫掠。为了自卫，唐朝只好在边境布置了前所未有的大军。755年，唐朝的一位将领[10]（一个加入唐朝一方的突厥人）造反了。唐朝平定了这次叛乱。但为此，唐朝赋予了其他将领巨大的权力，并请更多的突厥部落进入帝国的领土，帮助唐朝对付那些入侵的突厥人。这样的做法导致了更可怕的灾难。曾经有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国家又重新有了希望，但总体上，唐朝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在一路衰落。治安完全崩溃，犯罪团伙强大到可以在正面冲突中击败唐朝军队。883年，起义者中最强大的一个[11]（被他的朋友们称作“冲天大将军”，被他的敌人称作“狂贼”）甚至攻陷了长安。在“狂贼”出现之前，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住着100万人口。而在他来过之后，当时在那里的诗人韦庄写道：

长安寂寂今何有，

废市荒街麦苗秀。

……

含元殿上狐兔行

……

天街踏尽公卿骨。

有的故事记载说，在883年，因为人们太过饥饿，每天都有1 000名农民被吃掉。“狂贼”的手下会把人的尸体腌渍起来，留到以后食用。到907年，当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中国正式分裂为10个国家[12]。此时，看起来确实永远不会有人能打破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了。

没有出路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为幸运纬度带带去骑兵作战的这次军事革命与以往的大多数军事革命都不同。以往的历次军事革命——从公元前4300年出现防御工事和围城战，到公元前3300年之后出现青铜武器和铠甲，在公元前2450年之前出现的军事纪律，再到大约公元前900年出现的铁兵器步兵——大体上都在增强幸运纬度带上文明的实力，使得利维坦可以镇压内部的纷争与叛乱，并且征服外部的邻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即便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于草原的双轮战争，最终也在帝国军队的手中发挥出了更大的威力，因为只有帝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建造那么多车辆，并且训练数以千计的马匹。

但随着骑兵的出现，幸运纬度带上的帝国无法再把自己在财富、组织性和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对游牧民族的胜利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游牧民族占据的土地最适合养马。大多数部落蓄养的马匹比他们的人口还要多，而且游牧民终日在马背上生活。即便是最富有、最有智慧的农业帝国（其中的顶峰是唐朝），也仅仅能获得暂时的优势，而这样的优势最终会因为一点儿不走运的、错误的判断或是特别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崛起而丢掉。幸运纬度带需要的是另一场可以让天平重新倾向于它们一侧的军事革命，但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每当有一些技术改进增强了幸运纬度带的优势（比如更好的船只、城堡和基础设施），总会有一些其他技术改进让游牧民族变得更加强大（比如马镫和更强壮的马种）。

最终打破了这一等式的是火药。但在1400年之前，除非你有着非常灵验的水晶球，不然你是预见不到这一点的。关于火药最早的记载出现在9世纪，当时中国寻求长生不老药的道士点燃了硫黄和硝石的混合物，结果发现这种混合物会以一种特别有趣的方式燃烧，发出嘶嘶的声响。他们很快发现了这种粉末的两种用途：第一种，用来做烟火，这种用法显然没法帮人延年益寿；第二种，做成火药武器，也只能让人活得更短。

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火药配方出现于1044年。这一配方中硝石的含量不高，所以这种火药不会爆炸。在火枪中，火药会从一根管子里把弹珠或是子弹喷射出来。不过，中国的工匠设计出了不同的武器。它们或是从竹管中喷射燃烧的火药，或是用抛射装置发射装满火药的纸袋子。总体来看，火药对敌人的威胁可能还不大，火药的使用者面临的危险似乎更大。

一直到14世纪，军事的天平似乎还倾向于蛮族一方，因为蛮族非常善于向他们的对手学习。378年，当哥特人如洪水般涌入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自己虽然可以打赢野战，却无法攻克城市。他们的首领指导说："离那些城墙远点。"但仅仅在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当阿提拉（Attila）率领匈人入侵同一片区域时，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同的场景。442年，阿提拉发现纳伊苏斯（今塞尔维亚的尼什）的堡垒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命令匈人砍倒大树，建造了几十个攻城槌。"守军从城墙上丢下马车大小的巨石，"罗马外交官普利斯库斯（Priscus）记载说，"有些攻城槌被摧毁了，操作它们的人也被砸死了，但它们的数量太多了，罗马人没法全部摧毁它们。随后，敌人拿来了云梯……城市被攻陷了。"

阿提拉用战利品雇用罗马最好的工程师，作为回报，这些工程师帮助匈人利用那些防御设施的弱点——而那些防御设施有的就是这些工程师自己建造的。结果，按照5世纪一位作家的说法，匈人"占据了100多座城市，甚至几乎置君士坦丁堡于险境，以致大多数人都逃离了这座都市。连神职人员都从耶路撒冷逃走了"。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被攻陷的城市（位于今保加利亚的尼科波利斯）。匈人进行破坏的彻底性是惊人的，这座城市的建筑再也未被修复过。

几个世纪以来，游牧民族变得越来越善于对付幸运纬度带的国家。1219年，成吉思汗入侵了位于今伊朗东部的花剌子模帝国。这个国家曾经非常强大，但今天已经几乎被人遗忘。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中有一支由中国工匠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指挥战俘挖掘沟渠，引来河水，建造投石车、攻城槌和塔楼，并且将点燃的火药如雨一般向守城者投射。据第一个生活在蒙古大汗帐下的欧洲人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记载，工匠们会经常改进他们的手段。“他们甚至会使用被杀掉的人身上的脂肪，”柏郎嘉宾声称，“他们把人的脂肪融化掉，再投掷到房屋上面。一旦这些脂肪燃烧起来，基本上没有办法将火扑灭。”

1258年，在蒙古人的投石机集中轰击一座塔楼，并在3天内使其坍塌之后，伊斯兰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巴格达投降了。蒙古人先是嘲弄巴格达的统治者，因为他宁愿囤积财富也不愿意把财富花在防御之上。随后，蒙古人用毛毯把他卷起来，然后把他踩踏死，正式终结了哈里发的统治。

1267年，蒙古人又发动了对襄阳的围攻。襄阳城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战略要地。宋朝人在襄阳抵抗了6年。攻城槌、火药武器、云梯，这些东西都没能奏效。但一向善于学习的游牧民族又学习了更多的东西——弃马乘舟。蒙古人在汉水之上消灭了宋朝舰队，随后使用新型的投石车攻击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守卫江岸的樊城，在它的城墙上砸出大洞。樊城陷落后，襄阳陷入了绝境；而襄阳陷落后，宋朝也陷入了绝境。1279年，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忽必烈的追击下跳海，而忽必烈坐上了天子的宝座。

游牧民族的军队在野战方面同样善于学习。例如，1191年，来自草原的古尔帝国骑兵在第一次遭遇印度战象时落荒而逃，他们的指挥官幸以身免。但当他们在第二年卷土重来时，相同的指挥官在塔拉奥里这同一个战场上面对着相同的对手——恒河流域的王国联盟。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战术。四支人数分别在10 000人以上的骑射手队伍轮番骚扰印度军队而避免与可怕的战象直接对抗。随后，当夜幕降临之时，古尔帝国的12 000名身披铠甲、手持长枪的预备队发动了总攻，将士气低落的印度军队击溃。

在古尔帝国这支拥有超过50 000名骑兵的大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的力量增长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游牧民族不仅学会了怎样对付城墙、船只和大象，他们还学会了安排后勤。到13世纪，游牧民族经常会征召并供给古尔帝国的军队同等规模的大军，每名骑手通常会带着三四匹备用的马。当来自草原的军队相互杀伐以争夺幸运纬度带时（就像1221年成吉思汗在印度河河畔消灭花剌子模人以及60年后突厥人的马木留克骑兵在霍姆斯打退了蒙古人对叙利亚的入侵时），在尘土飞扬、箭矢乱飞的狭小空间里，可能有50万匹战马纵横驰骋，而它们可能消耗了周围几百平方英里内的草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组织保障，为此，伟大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们召集了大量的参谋人员（通常是在被攻克的城市中抓到的人）完成这些任务。

大战中，人和动物的死亡数量之大是令人震惊的，但与随后对平民的屠杀比起来，它们就黯然失色了。但有些幸存者的记载肯定不是真的，比如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蒙古人在内沙布尔屠杀了174.7万人，外加当地所有的狗和猫；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说，在赫拉特，有240万人被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死亡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城市的总人口数量。不过，即便我们减去那些夸张的说法，每次草原上的骑手涌入幸运纬度带时，总会造成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成吉思汗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千万的级别；而当帖木儿在1400年左右发动第二波蒙古征伐，攻破德里、大马士革和几十座其他城市时，他刀下的人命可能也接近这一数字了。若不是他在1405年在进军的路上死于热病，他所夺去的性命或许还能超过这个数字。

这些大屠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但别忘了，军队带给亚欧大陆的强奸、劫掠、杀戮和饥荒还仅仅是那个时代暴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偶发的小规模杀戮——凶杀、仇杀、私斗、家庭纠纷，仍在继续。当王国崩塌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时，这些偶发的小规模杀戮就会增多；而当建设性的战争暂时发挥作用时，它们就会减少。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手头有了关于一种流血事件的让人半信半疑的数据，这就是西欧的凶杀案件记录。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3世纪。尽管这些记录难以解读，充满缺漏，而且由于事关重大，所以充满了扭曲事实的谎言，但是它们几乎就像成吉思汗的故事一样耸人听闻。从英格兰到低地国家[13]、德国乃至意大利，在1200~1400年，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个死于谋杀。英格兰是最安全的，那里每140个人里会有1个人死于谋杀；意大利则是最危险的，差不多每60个人里就有1个人会被人谋杀（与之相对比，20世纪西欧的数据是每2 388人里有1人死于谋杀）。

西欧只是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一小部分，凶杀只是致命暴力的一种形式，13世纪和14世纪也只是我们要审视的漫长时期中的一部分。这些意味着，要想得出一个200~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暴力死亡率的数字，可能得全凭运气。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凶杀、仇杀、私斗、家庭纠纷以及国家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相对比例。但如果我们假设这5种形式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相同，那么西欧的总体暴力死亡率大概是5%（英格兰3.5%，意大利8.5%）。

这个数字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也可能根本不靠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偏低）。而且，西欧的情况也未必适用于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不过，这个数字毕竟能让我们体会一下暴力死亡率大概在什么数量级上。这一数字也与定性的证据指出的方向一致，即在200~1400年这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循环的1 200年中，古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和汉朝曾经取得过的许多成就都开了倒车。

从200~1400年最成功的一些帝国（比如中国的唐朝）流传至今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暴力死亡率有可能被重新降低到

2%～5%，即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古代帝国曾达到的水平。而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又会明显使这个数字升高。但除非那些关于游牧民族大屠杀的最极端的数字是真实的，否则当时的暴力死亡率不可能重新回到人类学家在石器时代社会中观察到的10%～20%的水平。如果这一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暴力死亡率就高于古代帝国，但低于石器时代社会，大约在5%～10%。

我们很难从中世纪的手稿中看出这一数字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一数字的感受，大体上来自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侦探故事。伊迪丝·帕杰特（Edith　Pargeter）用埃利斯·彼得斯（Ellis　Peters）这一笔名创作了12本小说和1本短篇故事集，讲述一位卡德法尔神父变成了一位侦探［在电视剧中由德雷克·雅可比（Derek　Jacobi）扮演］的故事。卡德法尔神父过着平静的生活，平日里在英格兰市镇什鲁斯伯里郊外的本笃会修道院里打理草药园。但在小说故事覆盖的8年中（1137～1145年），据我的计算，卡德法尔神父一共经手了33件凶杀案，有94个人在对什鲁斯伯里的围攻战后被绞死，而另外一场围攻战和两场战斗也造成了不明人数的死亡（更不要提一次意外溺水和各种各样的袭击、鞭打和强奸未遂事件了）。

帕杰特笔下的人物很是谨慎小心。他们清楚，犯错误很容易导致丧命：对身份更高的人顶嘴会挨打，独自在树林中行走可能有被抢劫和杀害的危险，老朋友可能会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杀手。不过，尽管暴力死亡率肯定至少达到了5%，帕杰特笔下的人物也并未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致命的威胁下瑟瑟发抖。毕竟，对每个人来说，被杀死的概率只有1/20。更重要的是，暴力不过是这个野蛮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连他们的娱乐活动都很危险。一位编年史作者曾记录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普拉托小城的一些同伴们的故事。他们会把一只活猫钉在柱子上，把自己的头顶剃干净，把双手绑在背后，然后比赛用头把猫撞死，“就为了听到别人的吹捧”。当比利时蒙斯这个地方的人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的城镇里没有罪犯，他们就会从邻近的镇子里买来一个抢劫犯，把他的两个手腕和两个脚踝各绑在一匹马上，再把他五马分尸。据记载，“人们欢呼雀跃，就好像从死人身体里又长出来一个新的神圣的躯体一样”。记述者说，唯一让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是，蒙斯人为了买这个罪犯花了太多的钱。

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就连卡德法尔神父这样的人也没法把怪兽关到笼子里。

把世界装入“囚笼”

尽管12世纪的西欧充满了危险，但它也要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更安全。但情况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就在草原民族和亚欧大

陆上的帝国陷于血腥的循环之中的同时，囚笼效应开始影响地球上其他的地区，并在那里降低暴力死亡率。

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地方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发展农耕。但由于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太不均衡，只有幸运纬度带在冰河时期结束后的5 000年内出现了农业。不过，到了卡德法尔神父的时代，有三种力量开始发挥作用，把农耕的范围远远扩大到最初的幸运纬度带之外；而紧随其后的，是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将利维坦带到了几乎每一块大陆之上。

第一种力量是迁徙。农业导致人口增长。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相应地开始向外迁徙，寻求更多土地。只要还有未被占据的疆域存在，早期的农民就可以基本躲避开囚笼效应。但一旦最好的土地被分割殆尽，囚笼效应就开始让人们走上了通往建设性的战争的道路。

广阔的太平洋可以很好地展现这一点。石器时代的农民从现在的中国出发，到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迁徙到了菲律宾。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他们的后人进行了史诗般的独木舟远航。他们驶向海天之间，发现了数百个土地肥沃却无人居住的岛屿，并在那里定居。这些岛屿共同组成了密克罗尼西亚。他们种植芋头（这种富含纤维的根茎最早出现在东南亚），养育大家庭，进行战斗。当他们的岛屿新家也住满了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再乘坐独木舟出海。

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这些太平洋上的冒险家远达波利尼西亚，并在1200年到达了遥远的新西兰。一些英雄一路划桨到了美国的西海岸，又折返回来（尽管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点，但是不然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美洲的甘薯会在那个时候传播到波利尼西亚）。不过，从夏威夷到加利福尼亚有3 000英里之遥，对于迁徙而言实在太过遥远。这就意味着，到1200年，太平洋地区即将出现囚笼效应。

我们对夏威夷的故事了解最多（我怀疑很可能是因为人类学家一直都很喜欢在那里工作）。人类在800~1000年来到夏威夷，在1200~1400年出现了人口剧增。根据19世纪记载的口述故事和后来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从那时起人们之间的战斗开始增多。到15世纪，强大的战士们将各个岛屿都合并为王国。

第一个完成这一壮举的是麦里库卡西（Ma’ilikukahi），他杀掉了瓦胡岛上所有的对手（大约在15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坐寇。他兴建了灌溉渠和神庙，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据民间故事传说，他的族群繁荣壮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他夏威夷岛屿开始要求拥有更强大的国王。据传说，茂宜岛的统治者基哈皮拉尼（Kihaa–Pi’ilani，大约统治于1590年左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勇猛的战士、技艺高超的冲浪者，并且长得特别英俊；他还是一位农业改革家——他清理了森林，大量种植甘薯，而且还能公正地为人民主持公道，化解矛盾。

但就像在亚欧大陆一样，夏威夷的建设性的战争也并不平静。英俊的基哈王之所以能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与他的兄长反目（据传说，这位兄长把一整碗鱼和章鱼丢在了基哈的脸上），在内战中使国家分裂。不过，国家在衰落之后，实现了进一步成长。基哈之所以能赢得战争，是因为“夏威夷大岛的国王乌米（他也以种植甘薯闻名）想把他的势力拓展到茂宜岛，因此乐于出兵援助这位篡位者”。

从很多角度看来，夏威夷的统一战争都与亚欧大陆在200年之前的1 000年中进行的战争惊人地相似，而又与亚欧大陆在200～1400年的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往复极为不同。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在夏威夷没有大草原，也没有马匹。因此，每当有茂宜内战这样的退步的时候，夏威夷的建设性的战争总又会前进两步。到了17世纪10年代，统治者们经常试图控制多个岛屿。威基基海滩是入侵瓦胡岛的首选登陆点；在游客们开始舒服地躺在这块完美的沙滩上几个世纪之前，有很多人在这里流血而亡，其中包括茂宜岛的一位国王、瓦胡岛的一位高级祭司以及几千名士兵。

18世纪，战争将8个岛屿合并成了3个王国。这些王国可以征召超过15 000人的军队，甚至有一次召集了拥有1 200只独木舟的舰队。帕特里克·基尔希（Patrick Kirch）是研究夏威夷的人类学家中的翘楚，他认为，“如果夏威夷再晚一个世纪接触到西方世界，这些国家中一个将胜出，并且占领整个群岛”。这显然是建设性的战争。

不过，大部分离开幸运纬度带寻找新的土地的农民，并没能来到太平洋这样充满土地肥沃却无人居住的地方。更常见的情况是，移民到达的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有时候，当地靠采集业为生的人们会在农民到来后躲到其他地方去。但他们只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这个地方，砍伐森林，辟为田地，最终使得原住民无处可去。一旦囚笼的大门关闭，这些以采集渔猎为生的人们就面临艰难的选择了。

其中一个选项是战斗，通过残酷的、绵延几代人的游击战争焚毁那些边远地区的农庄。在美国的西南部，纳瓦霍人就时有时无地进行着这样的战争。他们先是从1595年开始对抗西班牙人，接着是对抗墨西哥政府；最后，在1864年，美国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蹂躏了纳瓦霍人的土地，并且将幸存者驱逐出去。纳瓦霍人的抗争只是成千上万的抗争中的一个。大多数抗争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所有抗争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坚持斗争的采集部落最终都被消灭了，奴役了，或是被驱赶到了保留地里。除了被毁灭之外，唯一的出路就是同化。采集部落开始学习那些后来者，然后也变成了农民。同化成为第二种将农耕、囚笼效应、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传播到整个星球的强大力量。

关于同化，最有趣的例子可能就是日本。起初，迁徙的作用更为突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朝鲜人把大米和粟米带到了日本最南方的岛屿——九州。九州是一个采集渔猎业的天堂，那里的野生食物足以养活成千上万的人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农耕在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没

有什么太大发展。一直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当来自朝鲜的新移民带来了金属武器时，农耕的界线才一直拓展到日本最大的主岛——本州。

日本列岛比夏威夷群岛大得多，因此囚笼效应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发挥作用。不过，在400～600年的三波朝鲜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新移民以带来了文字和佛教而闻名，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弩、骑手和铁剑。农耕文明的界线向北遍及了本州，但与此同时，同化作用将移民的界线又推了回去。日本的酋长们把握住了由朝鲜移民带来的现成的军事革命的成果，建立起本土的利维坦——大和国家。到800年，大和征服了本州和九州的大部分地区。

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建设性的战争统一了整个日本列岛。就像夏威夷的情况一样，这也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但在每次利维坦崩解之后，它总会以更大更强的姿态再度出现。大和在9世纪和10世纪陷入分裂。到了1100年，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由被称作武士的雇佣兵群体组成的私人军队。一直到12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战争才再次变为建设性的战争。当时，一位军阀击败了其他军阀，完全控制了武士，自称将军。

理论上讲，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把先祖追溯到神的天皇，但真正掌权的其实是幕府将军，这些强硬的人通常是崛起于行伍，白手起家。这个体系看上去很混乱，但效果很好。在征服了今天日本的几乎全部地区之后，幕府将军们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和人口都迅速增长。在1274年和1281年，日本甚至击退了蒙古人的入侵。

随后，就像幸运纬度带上许多统治者一样，幕府将军们发现，一旦遭遇游牧民族，建设性的战争就会很容易变成反建设性的战争。为了动员足够的资源抵挡蒙古人，幕府将军们不得不对武士和地方领主做出很多让步，这导致这些过于强大的臣僚不再惧怕利维坦。在接下来的300年中，日本也陷入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到16世纪［即黑泽明（Akira Kurosawa）著名的影片《七武士》（*Seven Samurai*）所处的时代］，村庄、城市社区，乃至佛寺都开始雇佣自己的武士。军阀们到处兴建城堡，暴力水平上升到连卡德法尔神父都从未见过的程度。

一直到16世纪80年代，钟摆才终于向回移动。就在基哈征服茂宜岛、乌米打算统一夏威夷的时代，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日本军阀攻克了敌人的城堡，废黜了幕府将军。他的继承人丰臣秀吉甚至进行了历史上最有趣的一次非武装化行动。丰臣秀吉宣称，他希望“不仅造福人民于今生，还要造福人民于来世”。他迫使他的臣民交出武器，以便将这些武器都融化，重新打造成铁钉和螺钉，用来建造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高一倍的佛陀的雕像。政府军四处收缴武器，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丰臣秀吉带来的福祉。

不过，丰臣秀吉也不是那么诚实。在收缴了臣民的武器之后，他发动了一次入侵朝鲜的建设性的战争，意欲一举吞并朝鲜和中国，组建一个大东亚帝国。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死伤。当丰臣秀吉于1598年去世

时，他的计划宣告破产，他手下的将领们开始陷入内战。即便如此，他在本土推行的和平政策持续了下去。政府甚至拆毁了日本大部分的城堡：在备前国这个地方，在1500年有着200座城堡；而到了1615年，就只剩下了1座。在接下来的250年中，日本是暴力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就连描述武器的书籍都被禁止了。

到1500年，迁徙和同化将农耕、囚笼效应、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从它们发源的幸运纬度带远播到其他地方。但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第三种力量：独立的演化。在幸运纬度带之外的一些地方，有着一些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于是那里的采集部落最终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农业革命和军事革命。尽管滞后了几千年之久，但他们也开始走上了幸运纬度带上人们走过的道路。

非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把农业带到这个大陆的过程中，迁徙和同化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非洲最初的农民是从侧翼丘陵迁徙来的定居者，他们约在公元前5500年将小麦、大麦和山羊带到了尼罗河流域。当埃及农民开始进入今苏丹时，努比亚的采集部落开始模仿他们，自行转向了农业生产。最终，当埃及军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向南推进时，努比亚人已经通过建设性的战争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王国。到了公元前7世纪，一位努比亚国王——纳帕塔的塔哈尔卡（Taharqa of Napata）——甚至征服了埃及。

在这里，建设性的战争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充满了混乱，甚至经常变成反建设性的战争，并且带来国家的崩溃，随后又反过来创造出更加强大的利维坦。公元前300年，纳帕塔处于衰落之中，一个新的伟大的城市开始在麦罗埃崛起。到50年，麦罗埃的光辉岁月也宣告结束，一座更伟大的城市——阿克苏姆——崛起了。其统治者建立起100英尺[14]高的石柱，并派遣军队渡过红海，抵达了今也门。

假以时日，迁徙和同化作用可能会把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一直传播到非洲的东海岸。但土生土长的囚笼效应却胜过了它们。到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萨赫勒（北至撒哈拉沙漠、南至雨林地区的横贯非洲的草原带）的人们驯化了高粱、山药和油棕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尚有争议：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东部和南部的非洲人也独立发明了农业；而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说班图语、使用铁制武器的农民从非洲西部和中部迁徙到了东部和南部，把放牧、农耕和囚笼效应传播到了那些地方（不过，班图人究竟是从地中海世界学会了制造铁器，还是独立发明了制造铁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不论细节如何，到了卡德法尔神父的时代，建设性的战争已经让利维坦从刚果河河口一直蔓延到赞比西河畔，并且引发了当地的军事革命。例如，考古学家发现，在13世纪，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了刚果盆地：更多的军队、更有力的指挥和控制、更大规模的战斗用独木舟以及适用于正面肉搏的新的铁制长矛。

通往更大、更安全的社会的路径总是不平坦而充满血腥味的。在非洲东南部，随着人口的激增，一个名叫马蓬古布韦的王国在12世纪出现。但到1250年，马蓬古布韦王国倾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城市——大津巴布韦。到1400年，大津巴布韦降服了周围讲绍纳语的部落，城市人口增加到15 000人，拥有强大的城墙和塔楼。当第一批欧洲人看到这些城墙和塔楼的遗迹时，他们甚至不相信是非洲人建造了这些东西。

15世纪的夏威夷、日本和非洲（以及它们之间的其他地方）当然是各不相同的，且各自受到了迁徙、同化和独立演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远离细节，观察更大的图景，我们就会发现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利维坦正在占领这个星球。但凡我们可以找到证据的地方，我们都发现战争在制造压低暴力死亡率和提升繁荣程度的更大的政府。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幸运纬度带晚了几千年踏上通往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的道路，并且在1400年时仍然落后于亚欧大陆的这些核心地带。但由于从200年开始，从草原的边缘产生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地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自然试验

我把最有趣的例子留到了最后，那就是美洲。与受到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强烈影响的日本、太平洋岛屿和非洲不同，美洲在15 000年前接受了来自西伯利亚的最初移民之后，就基本上与亚欧大陆失去了联系。有些冒失鬼倒是曾经突破过边界，比如曾在1000年定居于文兰的维京人，以及在其后不久抵达过美洲西海岸的波利尼西亚人。但除了一个例外之外（我随后会回来讲述这个例外），这些冒失鬼都没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视为两个独立的自然试验。对比这两块大陆的历史，可以真正地验证一下我们的理论，即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的出现是人类对囚笼效应的普遍反应，而并非某种独特的西方式的（或者亚欧大陆式的）战争的产物。

当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于1519年出现在墨西哥时，中美洲已经处于农耕文明阶段6 000年之久了。如果从亚欧大陆的侧翼丘陵上产生农耕的公元前7500年算起，那么经过6 000年就到了公元前1500年。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们已经拥有数以千计的双轮马车了，上面还乘着身穿青铜铠甲、手持复合弓的弓箭手。可是，那些对抗科尔特斯、保卫特诺奇提特兰的阿兹特克人却既没有双轮战车，也没有青铜制品。他们全靠步战，穿着有衬里的棉质衣服，戴着木质头盔。他们的弓制作得很粗糙，手里最可怕的武器是镶嵌了尖锐的黑曜石（一种火山岩）碎片的橡木棍。很显然，在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军事的发展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对本书的观点——建设性的战争是人类面对囚笼效应的普遍选择——可不是一个有利的现象。

不过，有些区别很容易解释。阿兹特克人没有发明出双轮战车，因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野马在美洲灭绝了（刚好在人类到来之后不久），既然没有可以拉车的马匹，自然也就不会有双轮战车。那么，青铜矛头和铠甲怎样解释呢？在亚欧大陆，这些事物与最早的一批城市和政府一同出现（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以及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而在美洲，却并非如此。目前所知的美洲人最早使用金属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而到了1 000年之后，当最早的利维坦出现时，莫切文明的金属工匠们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黄金饰品，用来给所谓的西潘王陪葬。但美洲的原住民从未想过将铜与其他金属一起制造出青铜武器。或者说，即便曾有哪位富于进取心的匠人确实有过这个想法，这种做法也没能流行开来。

在弓箭这个问题上，美洲的情况就更加奇怪了。我在第二章里提到过，非洲人使用箭头已经有60 000年的历史了。可是，那些在15 000年前借助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美洲的人却并没有带着弓，他们到了美洲之后却没有能再发明出弓。美洲最早的箭头被发现于阿拉斯加育空河的岸边，大约来自公元前2300年。考古学家将制作这些箭头的方式称作“北极小工具风格”，表明其是由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一波移民带来的。随后，弓箭极其缓慢地在北美传播，花了3 500年才传播到墨西哥。当科尔特斯抵达美洲时，中美洲人才刚刚使用弓箭4个世纪。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单弓，即便在埃及法老看来，都简直原始得足以令人发笑。

由此来看，这似乎指向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文化差异决定了一切。这证明，要么是亚欧大陆上的人们比美洲原住民更有理性（因此，或许更优秀），要么是亚欧大陆上的人更热衷于暴力（因此，或许更糟糕）。至于持哪种观点，完全看你自己的政治倾向。但这些观点本身也有问题。中美洲人拥有高超的技巧，可以创造出惊人的历法、垛田和灌溉法。把这样的人称作不理性的人，或者说他们的理性水平不如欧洲人，并不太令人信服。

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暴力程度低于欧洲人的说法也不靠谱。很多年以来，考古学家都把古代玛雅人当作热爱和平的典范，认为既然我们没有在他们的城市周围找到太多的防御工事，因此他们一定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但玛雅人的文献甫一被成功解读，这种理论立刻就崩塌了。在玛雅人的文献中，其主题就是战争。玛雅人的国王就像欧洲的国王一样经常打仗。

有些历史学家则举了荣冠战争[15]的例子，这些战争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伤亡人数。他们认为，这表明美洲原住民将战斗视作某种表演，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注重进行决战。但这也是一种误读：荣冠战争与其说是一种仪式性的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有限的战争。荣冠战争以一种代价比较小的方式让敌人明白，抵抗是徒劳的。“如果没能达到这一目的，”研究阿兹特克战争的顶级专家罗斯·哈西克（Ross Hassig）说，“荣冠战争就会升级……从一种英勇的展示变成消耗战。”就像欧洲

人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试图以低廉的代价赢得战争；而一旦未能如愿，他们也会不择手段。

那么，为什么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在军事方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实话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历史学家们在这样宏大的比较课题上只花费了很少的时间。就现阶段的成果来说，最令人瞩目的解释是由生物学家转行为地理学家的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出的看似简单的观点。

戴蒙德指出，美洲大陆大体上是南北走向的，而亚欧大陆是东西走向的（见图3–6）。在亚欧大陆，人们可以沿着幸运纬度带来回移动，相互交流思想和制度，而不需要离开这片大体上条件相近的生态带（地理学家称之为生物区系）。与此相反，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没法沿东西向移动得太远，从而使自己可以不离开一个生物区系。沿着美洲大陆的长轴，人们只能沿南北向移动，穿越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和茂密的丛林。



图**3–6** 地理决定命运：南北走向的美洲大陆和东西走向的亚欧大陆

戴蒙德认为，这造成了两种结果。首先，由于沿南北方向跨越不同的生物区系的移动要比沿东西方向在同一个生物区系中的移动要困难得多，所以在美洲大陆，能够彼此交换思想和制度的人类族群要比亚欧大陆小。如果亚欧大陆的金属匠人族群要比美洲更大，他们拥有的市场也更大，那么亚欧大陆的人们比美洲人更早地想出青铜制造等有用的想法，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其次，戴蒙德认为，一旦认为产生了这些有用的想法，它们在同一生物区系中的亚欧大陆要比跨越不同生物区系的美洲传播的范围更大，速度也更快。

这些观点看起来与事实很相符。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公元前4000年发明了青铜武器时，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远播到印度和地中海沿岸，这一交通网络所能连接的人数比印加帝国产生（15世纪）前的美洲的任何交通网络都更多。一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青铜武器，这项技术就可以沿着幸运纬度带迅速地进行传播。在不到1 500年的时间里，在今

中国的人们和英国的人们就都拥有了青铜武器。

至于为什么美洲原住民没有发明出青铜武器，还没有形成定论。但戴蒙德的理论看起来是最有力的观点，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美洲奇怪的弓箭使用情况。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史前的猎人们在向北穿越非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各个生物区系、再向南穿越美洲时，抛弃了他们的弓。一直过了上万年的时间，弓箭才传播到西伯利亚的东端。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弓箭跨越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终于来到了美洲。随后，弓箭又花费了漫长的时间才穿越了阿拉斯加和墨西哥之间的各个生物区系——这段时间十分漫长，因为亚欧大陆的青铜武器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英格兰（差不多相同的距离）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因为并不需要跨越太多的生物区系）。

如果戴蒙德的观点是对的，即地理因素比文化因素更显著地造成了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特点。我们会看到，尽管美洲发生变革的步伐要比亚欧大陆小，但是其变革的大体方向——从农耕到囚笼效应，再到建设性的战争，再到利维坦——是相同的。

大体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发现。在我们今天称为墨西哥和秘鲁的地方，人们约在公元前4500年驯化了动植物。起初，变化发生得就像在亚欧大陆一样快。在中东，从农民的出现到利维坦的诞生花费了大约4 000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和苏萨）；而在美洲大陆，特奥蒂瓦坎文明和莫切文明的产生花费了大约4 500年（出现于公元前100年）。

东西半球都经历了相似的前进两步、退后一步的曲折过程，在军事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在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创造出了最早的整齐而有纪律的阵型，其军队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到150年，没有头盔、盾牌和铠甲的小型作战群体被数以万计的大型军队代替了。至少，有些人开始戴上棉质的头盔，尽管听起来不是很安全，但这种头盔可以有效抵御石斧的打击。

到450年，军队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精锐部队在戴上头盔的同时，还穿上了棉质的铠甲。比起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的亚欧大陆，美洲的军事革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不过，特奥蒂瓦坎人也在沿着亚欧大陆利维坦相同的道路前进着。而且，就像亚欧大陆的帝国一样，特奥蒂瓦坎最终也衰落了，其城市中心在650年可能被来自墨西哥西部的入侵者劫掠并焚毁。与东半球的情况相似，中美洲的军事组织随后也崩溃了。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壁画上再也没出现过铠甲；山顶堡垒的大量出现可能意味着，法律和秩序已经瓦解。

到了10世纪，中美洲的战争再度变得具有建设性。托尔特克人以托兰城为中心，统治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托尔特克战士比特奥蒂瓦坎穿着更多的棉质铠甲，并且发明了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作曲棒的武器（镶嵌了尖锐的黑曜石碎片的橡木棍）。托尔特克帝国大概从未达到过特奥蒂瓦

坎的规模，并且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12世纪，来自更遥远的北方的移民征服了托尔特克，约在1179年焚毁了托兰（入侵者中的一支——奇奇梅克人，可能在这一时期将弓箭带到了墨西哥）。中美洲再次陷入小城邦频繁混战的状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5世纪。当时，又一群北方来客进行了建设性的战争——他们就是阿兹特克人。

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了解要胜过对其之前的美洲社会的了解。除了战争之外，他们的成功也仰仗外交和明智的联姻。不过，当阿兹特克人进行战斗时，他们的表现确实也比特奥蒂瓦坎人和托尔特克人更出色。阿兹特克军队分成数个师，每个师有超过8 000人。他们就像拿破仑的军团一样，既可以分散作战，也可以迅速集结。后勤方面的进步更加明显，因为他们可以要求被击败的敌人提供给养。职业军官群体逐渐成形，而就连普通的士兵也会接受基本的训练。

当战斗开始时，他们先从侧翼用弹弓和弓箭进行射击，随后再派突击队正面接近，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他们的士兵穿着厚重的棉质铠甲，手持大盾牌，头戴覆盖有羽毛的木质头盔。突击队在进攻时采用松散的队形，以方便他们挥舞宽剑—4英尺长的橡木棍，上面镶嵌有成排的黑曜石齿。他们排成两行推进，第一行是精英的贵族战士，第二行则是平民老兵。指挥官会让这两排部队轮番上阵，一来可以避免部队过于疲劳，二来可以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在决定性的时刻对敌人进行侧翼包抄。

阿兹特克军队铸就了中美洲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人口迅速膨胀，或许曾达到400万之众，其中20万人居住在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农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贸易网络延伸到了前所未见的领域，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我们无法知道阿兹特克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但流传至今的一些诗歌片段表明，阿兹特克人感到自己很安全。一首诗歌写道："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为自己而骄傲，在这里没人会担心死于战火。这是我们的荣耀！"

在亚欧大陆，迁徙、同化和独立的演化进程将农耕文明和囚笼效应从其位于幸运纬度带的源头传播开来。如果戴蒙德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应当发生在美洲大陆，只不过会因为要跨越多个生物区系而在进程上迟缓一些。证据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在500年之前，玉米、笋瓜和豆类就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到了河谷地区，那里的河流穿越了美国西南部炽热的沙漠。当时，这一地区更加湿润，但是降雨量仍然很不稳定。因此，唯一能使农耕在这个炎热的地区变为可能的做法就是挖掘灌溉渠。没有什么比水资源的匮乏更能激发囚笼效应了。到700年，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水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发生激烈的战斗。在8世纪和9世纪的一些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到处都是被石斧击碎的颅骨、插着箭头的肋骨和被彻底焚毁的村庄。

不过，在900年之后，战斗似乎停止了，考古学家经常称之为"查科现象"，因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有着惊人的考古发现。不过，

也许称之为“查科统治下的和平”更加合适。人们开始生活在更大的群落（在查科峡谷可能有10 000人）中，建造拥有更多储藏室的更大的房屋，并且到更远的地方去进行贸易。

查科统治下的和平一直持续到大约1150年，然后也宣告结束。可能由于气候恶化，人们离开了查科峡谷和位于亚利桑那州希拉河畔的蛇镇这样的大社群。人们之间发生打斗的频率增加了，也不再能维护他们的灌溉渠，并且放弃了长途商旅。这个进程持续了下去。在13世纪的希拉河畔，更多更大的城镇兴起了。这些城镇通常建有用于仪式的庭院，其造型与中美洲的那些庭院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些被称为霍霍坎的文明也在1450年衰败了。

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的例子，比如美洲原住民在密西西比河畔建立起来的了不起的城市卡霍基亚。不过，我相信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表达我的观点。地理上的差异可以塑造某一个特定地区的独特情况，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农业能够立足的地方，囚笼效应都在200～1400年发挥了效果，创造出建设性的战争。

唯一重大的例外，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在这里，地理因素使得各农业帝国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里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纠葛，结果使得这一地带陷入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以此看来，幸运纬度带此时倒是变成了不幸的纬度带。

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上的“马＋草原＋农业帝国”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假以时日，这一组合以及它带来的灾难性循环也会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被复制出来。18世纪，在欧洲的马匹传播到了类似亚欧大陆大草原的北美大平原之后，科曼奇印第安人创造出了一个游牧民族帝国。尽管美洲原住民在文化上与蒙古人有诸多差异，但很多历史学家仍然把科曼奇帝国比作微缩版的成吉思汗帝国。或许，在阿根廷和南非的草原上也会最终崛起类似的游牧民族帝国。

但事实是，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陷入了循环之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则在进行着建设性的战争。亚欧大陆上的人们在此前10 000年里创造出的巨大的发展优势正在逐渐消减。比如说，在15世纪，中国明朝和印加帝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但如果200～1400年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了。假设其他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在21世纪的世界，我们就有可能会看到大津巴布韦的继承人统一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在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在尼罗河流域进行激烈的骑兵大战。或者，装备了铁制兵器的墨西哥军队将征服北美地区所有的农民，并且打造舰队以对抗波利尼西亚帝国驰名寰宇的水兵们。而且，在这个世界，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各帝国会时兴时衰，但始终无法在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上风。

如此，再经过五六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可能就会追赶

上亚欧大陆，但亚欧大陆并没有给它们这么多时间。

幸运的少数人

1415年，一小群欧洲人告诉世界，时间快到了。

那年10月，一支被寒冷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英国军队挤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附近两片潮湿的森林之间。他们已经在泥地里拖着他们的马车跋涉了两个星期，试图躲避一支人数是自己4倍的法国大军。但现在英国人陷入了包围。

按照惯例，英国国王会在大战前鼓舞士气。“今天是克里斯宾节。”莎士比亚笔下的英王说道。在这一天，亨利五世说，他们将赢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这一场胜利将是如此之伟大：

> 谁只要度过今天这一天，将来到了老年，
> 每年过克里斯宾节的前夜，将会摆酒请他的乡邻，
> 说是：“明天是圣克里斯宾节啦！”
> 然后，他就翻卷起衣袖，露出伤疤给人看，
> 说：“这些伤疤，都是在克里斯宾节得来的。”
> ……
> 那个故事，那位好老人家会细细讲给他儿子听；
> 而克里斯宾节，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
> 永远不会随便过去，
> 而战斗在这个节日里的我们也永不会被人们忘记。
> 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

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午饭时间，英国人已经杀死了10 000名法国人，而自己仅损失了29个人。编年史作者记载说，法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人们甚至没法从上面爬过去；许多那天早晨才刚刚获封的骑士就在堆积的死人下面，被流出的鲜血溺死。

作为一个成长在英格兰的人，我很不情愿地承认，如果有人应该给他的儿子讲述1415年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应当属于另外一支兄弟的队伍；他们作战的场合也并非下着蒙蒙细雨的法国，而是烈日当空的

地中海沿岸。在那个夏天，一支小舰队离开了里斯本，穿越摩洛哥狭窄的水域，袭击了休达城。这场战斗比阿金库尔之战还要更一边倒，非洲人阵亡数千，而葡萄牙人只死了8个。但让这场战斗不同寻常的并非这点。休达之战的重要性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这是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人的建设性的战争第一次波及其他大陆。

在此之前，欧洲军队也曾跨越过海洋：维京人去过美洲，十字军去过圣地。但他们出征的目的不过是远离他们的主人，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更大的利维坦之外的小王国。与此相反，在休达，葡萄牙的若昂国王（King John）则把非洲也置于里斯本的统治之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但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欧洲人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将整个地球的3/4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欧洲人即将成为那幸运的少数人。

[1] 东汉时，羌人的起义多达50余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分别发生于77～101年、107～118年、140～145年、159～169年、184～189年。——编者注

[2] 在2000年公映的影片《角斗士》中，开篇场景重现了发生在180年的马克曼尼战争中最后一次大战的激烈场面。

[3] 这是越南战争时期新闻报道中的一句名言。—译者注

[4] 匈人：在本书中匈人（Hun）与匈奴人（Xiongnu）为两个概念。关于匈人和中国古代的匈奴人是否为同一民族目前尚无定论。——编者注

[5] 实际上，游牧民族逐渐不受控制地涌入中原发生在东汉刚刚灭亡后的魏晋时期；特别是在311年，匈奴人攻灭了汉之后的统一政权西晋，此时距离东汉灭亡约90年。——译者注

[6] 12岁的皇帝：汉灵帝。最可怕的一个：董卓。又一个小皇帝：汉献帝。——译者注

[7] 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222年，孙权称帝，建立吴。——编者注

[8] 不重要的败仗：前秦军队被东晋击败的淝水之战。——译者注

[9] 此句出于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意即洛阳衰败，断壁残垣，鸟兽出没，牧童和野老徘徊。——编者注

[10] 将领：安禄山。——译者注

[11] 最强大的一个：黄巢。——译者注

[12] 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行称帝，中国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编者注

[13] 低地国家：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狭义上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其海拔均低于海平面。——编者注

[14]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15] 此处原文为Flower Wars，实际应为Garland Wars，疑为原文错误。——编者注



第四章



500 年战争：欧洲（几乎）征服世界（1415~1914 年）

将成为国王的人

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有着6月夜晚常有的沉闷，”讲故事的人写道——两个英国人，丹尼尔·德拉沃特（Daniel Dravot）和皮奇·卡纳汉（Peachey Carnehan）阔步走进印度北部一家报社的办公室。“关于我们的身份，说得越少越好。”他们声称。他们今晚唯一在乎的事情是怎样能到卡菲尔斯坦去。

“据我估算，”德拉沃特说，“那个地方就在阿富汗的右上角，距离白沙瓦不超过300英里。在那儿有32个异教偶像，而我们两个将成为第33个和第34个……我们就知道这些。另外，还没有人去过那里。他们一直在打仗，而在他们打仗的地方，谁懂得怎样训练人们作战，谁就能当上国王。”

德拉沃特和卡纳汉伪装成疯狂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其仆人，在两头骆驼的背上藏了20杆马提尼–亨利步枪，一路走过沙暴和暴风雪，最终来到一个广阔而平坦的积雪山谷。在那里，他们看到两伙人在用弓箭相互射击。“‘咱们的生意就从这儿开始啦。’德拉沃特一边说着，一边用两支步枪朝那20个人射击。其中一个人离他坐着的那块石头有200码之远，却被一枪放倒。其他人开始四散逃跑，但德拉沃特和卡纳汉就坐在弹药箱上，把山谷上上下下的人都给干掉了。”

幸存下来的人躲在他们能找到的掩体后面瑟瑟发抖，而德拉沃特“走过去踢他们，然后把他们拉起来，再跟他们握手，表现出友好的样子。他把他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去搬运箱子，随后开始对所有人挥手，仿佛他已经是一位国王了”。

德拉沃特现在开始着手做一名坐寇。首先，“他和卡纳汉拉着各个村子头人的胳膊，把他们带到山谷中，教给他们怎样用长矛在山谷底部划出一条线，再从那条线的两侧各取了一点土分给他们”。其次，他们召集了村民，“德拉沃特说：‘去地里面挖掘吧，我希望你们能取得丰厚的收获。’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接着，“德拉沃特把各个村子的祭司带到他们崇拜的偶像面前，告诉他们要坐在这里为人们主持公道，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射杀”。最后，“他和卡纳汉挑选了20个好汉，教他们怎样使用步枪，怎样组成四人一排的队伍，怎样齐步前进。这些人很乐于做这些事情”。德拉沃特和卡纳汉每到一个村子，“他们的军队就会告诉当地人，除非他们想被杀掉，不然就不要再使用他们的小破火绳钩枪”。很快，他们给卡菲尔斯坦带来了和平，德拉沃特还准备把这块土地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1888年出版的短篇故事《将成为国王的人》中编造出了德拉沃特、卡纳汉这样的人物和卡菲尔斯坦这样一个地方，以

及当地的32个异教偶像，以此满足读者对彰显帝国勇气的奇闻异事的好奇心。不过，这个故事之所以受到追捧，甚至直到今天还值得一读，是因为19世纪的现实情况与吉卜林的小说相去不远。

例如，有一个狂野的年轻人名叫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16岁就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部队。他曾经在缅甸受过重伤。后来，他买了一艘船，在上面装上火炮，并在1838年驾船来到了婆罗洲。刚一到那儿，他就帮助文莱苏丹镇压了一场叛乱。文莱苏丹满怀感激，任命布鲁克为沙捞越总督。1841年，布鲁克把沙捞越变成了属于他的王国。他的后代——被人们称作白人拉者——在这里统治了三代，最后在1946年将沙捞越交给了英国政府，并且换取了（非常）丰厚的补偿金。直到今天，沙捞越最有名的酒店还是以布鲁克的舰船名命名的——“皇家”号。

吉卜林笔下的人物说，他们之所以来到卡菲尔斯坦，就是为了效法布鲁克的功业。“现在，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靠两个强壮的男人就能‘捞一把’的地方了。”不过，他们并非第一批试图在中亚“捞一把”的人。1838年，也就是布鲁克抵达文莱的那一年，一个名叫乔塞亚·哈伦（Josiah Harlan）的美国探险家就已经尝试了一次。失恋的哈伦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且作为一位外科医生与布鲁克参加了同一场英缅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在印度四处漂泊，最后说服了拉合尔的王公，将两个邦给他治理。从那里，哈伦带着自己的军队去了阿富汗，废黜了以奴隶贸易闻名的古尔亲王。被哈伦富有纪律性的军队推翻的古尔亲王与哈伦谈了一个条件：只要哈伦允许他做大臣，他就可以把宝座让给哈伦。

哈伦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中亚的山岭中升起了美国的星条旗。不过，他做君主的日子就像卡菲尔斯坦的德拉沃特一样短暂。在他荣登王位的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就占领了阿富汗，废黜了这位新进亲王。回到美国之后，哈伦试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战争部部长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把他送回阿富汗，并为他的军队购买骆驼。哈伦寄希望回到阿富汗后可以接着做他的古尔亲王，他几乎成功了。计划失败后，他先是试图从阿富汗进口葡萄到美国；后来又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为北军组建了一个团，但一场难堪的军事法庭审判让他的这个职务也没能干太久。1871年，哈伦在旧金山去世。

在19世纪之前，布鲁克、哈伦、德拉沃特和卡纳汉这样的人物是超乎想象的，但到了19世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葡萄牙人占领休达的1415年，到这个属于“将成为国王的人”的时代，欧洲人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展开了一场历时500年的战争。

这场500年的战争与其他战争一样丑陋，满是泪痕和疮痍。在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上，都有当代的卡加库斯们在谴责这场战争，但同样也有西塞罗们赞美它：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到1914年，欧洲人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控制了84%的陆地和100%的海洋。在环绕北大西洋沿岸的帝国中心地带，暴力死亡率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生活水

平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当然，一如既往地，被征服者的日子往往过得没有征服者那么好，而且在很多地方，殖民征服都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但当我们再一次远离细节去观察宏大的图景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大的特点：在整体上，征服者们压制了局部战争、匪徒劫掠以及私人对致命武力的使用，并且开始让其臣民过上更安全、更富裕的生活。建设性的战争继续发挥着其有悖常理的魔力，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

为什么欧洲人的火器最优良

将欧洲人从占领休达的时代带到占领卡菲尔斯坦的，是一项崭新的军事革命，而这一军事革命又是由两项伟大的发明推动的。不过，这两项发明都并非产生于欧洲。

第一项发明是火器。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到过，中国的化学家们从9世纪起就一直在试验一些杀伤力小的火药，主要用来制作烟火以及燃烧物。在12世纪或13世纪，一位姓名已经佚失的工匠发现了添加硝石制造真正的火药的方法。真正的火药在被点燃时不仅会燃烧，还会发生爆炸。如果把这样的火药放进足够结实的弹膛里，它的爆炸力就可以把弹珠或是箭矢以足以致命的速度发射出来。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火器的形象，出现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一处佛教圣地。这一佛教圣地位于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重庆附近。大约在1150年，佛教信徒们为了装饰这一圣地，决定在岩壁上进行雕刻。雕刻的内容很符合常规，展现出一些魔鬼站在云端，还展现了几种魔鬼使用的兵器：一个魔鬼使用弓，另一个拿着斧头，还有一个手持长戟，另外还有四个拿着剑。不过，还有一个魔鬼拿着的武器看起来像是一种粗糙的火枪，在爆炸产生的硝烟和火焰中射出了一颗小弹丸。

这一雕刻充满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雕刻证明，12世纪的中国军队就已经使用火器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一雕刻证明火器虽然存在，但很罕见，至少那位雕刻师就从未真正见过火器（他们指出，如果你像那个魔鬼那样手持着金属制成的火器，就会把手上的皮烫掉）；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个魔鬼拿着的实际上是一件乐器，而当时的人们尚未发明火器。不过，不管我们对这一雕刻如何解读，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辩的：在那之后大约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人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了，因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当时的火器——那是一件一英尺长的造型简单的青铜管，出土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处古战场附近，其使用时间应该不晚于1288年（见图4–1）。



图**4–1** 一件伟大事物的发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火器，它于**1288**年被遗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场上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雅尼克·特罗提尔。

这件火器的使用效果可能难以预料，它不仅装填弹药极其缓慢，而且射击精度也很差。但更大、更好的火器很快就投入使用了。这些火器在中国南方非常流行。在14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公然对抗蒙古统治者。因而，这一时期人们对火器的革新十分迅速。在大约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起义军就掌握了将这种新型武器的效果运用到最好的方法了。第一个要点是，这些火器要大规模使用（到14世纪50年代，起义军建立的吴政权[1]就已经拥有数百门铸铁火炮，其中有几十门流传至今）；第二个要点是，要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1363年，起义军领袖朱元璋与蒙古人在鄱阳湖上进行了决战[2]。在战斗进行的前夜，朱元璋将正确的战术传达给了他的部将们。“靠近敌舰之后，”他命令道，“先发射火器，再使用弓弩；待到靠上敌舰，再使用近身兵器发动进攻。”朱元璋的部将们依计行事。5年后，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被攻击的一方通常会很快地学习并制造对方使用的那些新型武器，这一规律在火器方面也同样适用。到1356年，朝鲜人的防御工事中已经开始配备火器；又过了一个世纪，火器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传到了印度，并且在1456年曼达尔加尔围攻战中投入使用；到1500年，缅甸和暹罗开始制造青铜火炮；在稍晚的1542年（或许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阻挠才导致了这一延迟），日本人也拥有了火器。

最令人惊奇的是，火器在遥远的欧洲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在1326年，也就是距离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火器仅仅不到40年（而且早于朝鲜拥有火器30年），在中国以西5　000英里的佛罗伦萨，就已经有两名

官员受命购买火器和弹药。第二年，牛津的一位插图画家就在一幅手稿中描绘了小型火炮。在古代，从未有哪种发明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在这一迅速传播的过程中，供给一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3世纪进行的野蛮征服之后，蒙古大汗们在草原上确立了某种意义上的“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在这个环境里，商人们可以将货物从亚欧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外一端，马可·波罗不过是这些商人中最出名的罢了。商人们运输着货物（最主要的货物是丝绸），传播着思想（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将东西方联结在一起。同时，他们也在传播着微生物（比如黑死病），把灾难带给所有人。但不论他们传播的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没有一样东西像火器那么重要。

与此同时，需求方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火器，欧洲人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有热情，他们很快发现了它们的使用方法，并投身到对火器的改进工作当中去。1331年，也就是佛罗伦萨人第一次提到火器的短短5年之后，另外一些意大利人就在围城战中使用火炮了。到了1372年，正是火器轰倒了法国各地的城墙。

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大约在1350年之后，东亚地区对火器的改进进程就放缓了；而在欧洲，对火器的改进正在加速进行。随着需求的增长，欧洲人发明了开采硝石的各种新方法。到了15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硝石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一半。与之相呼应的，金属工人开始制造规模更大、造价更低廉的熟铁火器，这些火器可以装填更多的火药，发射更重的炮弹。就在阿金库尔战役发生的7年之后，英国的炮手们就展示了重炮的价值——他们把诺曼底的石头城堡炸成了碎块。

不过，英国人的经历也展现了大型火器的弱点。大型火器过于沉重，移动不便，而且发射速度太慢。这些缺点在攻城战中无关紧要，但是在野战的战场上就使得大型火器变得基本无用武之地了。就算一支军队能把火炮拖到合适的位置，再开上一炮，但在他们完成装填之前，敌人的骑兵早就冲上来了。因此，虽然亨利五世本人就曾在1415年利用大型火器迫使哈夫勒尔的敌人投降，但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却没有携带任何火器。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不懈思索的炮手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Jan Hus）[3]的追随者们制造了几十门小火炮，并把它们绑在马车上。随后，他们驾着马车开赴战场，再把这些马车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型的可以移动的堡垒（这通常使用一个荷兰语词laager来形容它，即马车堡垒）。火器的发射一如既往地缓慢，但藏在马车阵后方、手持长矛或剑的士兵可以抵挡冲锋的骑兵，为火器赢得再次发射的时间。

1444年，马车堡垒战术差点给敌人以重挫。在众多于中世纪从草原迁徙到幸运纬度带的突厥人中，有一支被称作奥斯曼人的突厥人从他们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大本营出发，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扩张。在征服

了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奥斯曼骑射手们现在开始威胁匈牙利。教皇召集了一次十字军东征，随后便有一支基督教联军［其中包括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由“穿刺公”弗拉德·德拉库尔（Vald 'The Impaler'Dracul）[4]的兄弟率领］在今天属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挡住了土耳其人的去路。

在当时的欧洲，土耳其人是最好的战士，而且此次战役的人数要比对手多出一倍。因此，土耳其人本可以轻松赢得这场战斗，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奥斯曼骑兵在冲击基督教军队的马车堡垒时被射倒，土耳其人的士气开始涣散。有一段时间，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奥斯曼人的进攻本可以就此被挡住，但是年轻的匈牙利国王决定直击土耳其人阵线的腹地，结果导致他本人和500名骑士阵亡，最终使得基督教军队输掉了战斗。

奥斯曼人不仅就此吞并了匈牙利，还从这次难分高下的战斗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开始雇佣基督教徒作为炮手；到1448年，他们就已经开始能用马车堡垒战术反过来对付匈牙利人了。又过了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下服务的一名匈牙利炮术专家布置了几十门中型火炮，这些火炮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炸出大洞，终结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

改进仍然在继续。欧洲人学会了先将火药弄潮，再让它自然干燥成小颗粒（俗称“小米粒”），这样的小颗粒的爆炸威力更大。起初，没有哪种火炮结实到足以承受小颗粒火药的爆炸强度，但到了15世纪70年代，法国在和勃艮第之间的军备竞赛中产生了一种体形更短、炮管更厚的火炮。这种火炮可以使用小颗粒火药，发射的炮弹也不再是石头弹丸，而是铁弹丸。匈牙利人则为这种更强大的火药找到了另外一种用法：他们把少量的火药填入一种手持的枪中，这种枪被称为“火绳钩枪”，因为其上有用来减少后坐力的钩子。

1494年，这种新武器进行了令人瞩目的试演。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一心想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夺回圣地，并且认为入侵意大利是理所应当的第一步。从宏观角度来看，他发动的战争都是一场灾难，但是至少证明了这种新的火炮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凭借几十门新式的、重量较轻的火炮，查理八世轰平了挡路的一切东西。多少个世纪以来，战场上的失败者总是可以选择躲进城堡之中，祈求能坚持到围城战的结束。但意大利人此时意识到（就像经历了这场战争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现存的城墙无论有多厚，都可以在几天内被火炮摧毁”。

这种武器造成的第一个影响是战役数量的激增。因为任何在野战中失败、并且退回防御工事内部的军队，现在注定要遭遇失败。在1495~1525年，西欧人一共打了十几场大决战，这样的高频率是前无古人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进攻方的进步也引发了防御方的进步。现在，欧洲人放弃了自史前的杰里科就开始采用的修筑高耸的石墙阻拦敌人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倾斜

的土堆，用来使炮弹发生偏转，或是吸收炮弹的力量。步兵可以更轻易地爬过这种新墙，但是对此也有解决方案。“第一个要点，”马基雅维利约在1520年写道，“是要让我们的城墙呈弯曲状……这样一来，敌人如果试图靠近，那么他们在侧面和正面就都会受到袭击。”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开始到处出现造价不菲的新型城墙。这些城墙的形状好像海星，四周满是向外探出的半月堡、棱堡和角堡。这样一来，战败的军队又可以退回坚不可摧的堡垒里，这导致交战突然失去了吸引力。在1534~1631年，西欧人几乎总是避免进行正面冲突；即便当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时，也通常是因为其中一方试图解除围城状态。“我们打起仗来更像狐狸，而不像狮子，”一位英国士兵说，“每打一次直接交战的战斗，你总要相应地打上20次围城战。”

这听上去像是又一个红桃皇后的故事，欧洲人仿佛越跑越快，却依然停留在原地，在越来越可怕但却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挥霍着鲜血和金钱。但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关于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铠甲以及所有的古代军事革命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事实。西欧人确实没有办法超过彼此，但是他们超过了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地方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处于防御姿态，他们应对着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入侵者。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的震动；1528年，土耳其军队甚至打到了维也纳城下。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欧洲的前景看上去更暗淡了。“我们难道能奢望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在君士坦丁堡领衔谈判的欧洲代表忧郁地自问。一边是基督教国家“空荡荡的国库、挥金如土的习惯、耗竭的资源和涣散的士气”，另一边是土耳其人“未受削弱的资源、使用武器的丰富经验、身经百战的老兵以及连续不断的胜利”。

而令大多数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竟然是肯定的。就在这位大使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军事力量的天平正在倒向欧洲的一侧。1600年，在匈牙利的土耳其指挥官忧郁地报告说：“那些被诅咒的人（即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步兵，手持火绳钩枪。大部分的伊斯兰部队都是骑兵，不仅只有很少的步兵，也缺乏善于使用火绳钩枪的专家。因此，我们在战斗和围城战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在一个世纪当中，欧洲人一直在稳步增加军队中使用火器的士兵的数量。这一趋势在16世纪50年代之后提速。当时，西班牙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手持火器——火枪。这种火枪可以发射2盎司[5]重的铅弹，其威力足以穿透100步之外的板甲。在16世纪20年代，持有开刃兵器（长矛、剑、斧枪）的步兵的数量通常是持火绳钩枪的士兵数量的2~3倍。但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比例就发生了逆转。骑兵失去了其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转而承担侦察、前哨和保卫侧翼的任务。在17世纪的军队中，骑兵的比例很少超过1/10。

于是，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矛盾。大约在1415年，蒙古人和明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亨利五世和其他欧洲君主则落在后面。到了1615年，甚至早在1515年，这一趋势就发生了逆转，这个世界上已经少有什么军队能够抵挡欧洲人的火力了。欧洲人拥有了最优良的火器，而发明了火器的亚洲人则没有。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保持住它在火器上的早期优势，并进而对这个世界展开500年的战争呢？这或许是整个军事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却难以达成共识。

最流行的一个理论，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谈过的理论，欧洲人受益于独特的西方式的战争。他们自古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这种战争方式，而这种战争方式也造就了他们的火药革命。“火器和爆炸物的真正关键点，并非是它们突然赋予了西方军队绝对的霸权，”军事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认为，“而是因为西方以高质量和大批量地将这些武器生产出来，而这没有发生在欧洲之外的地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倾向于理性主义、自由探究和对知识的传播，而这些都植根于古典时代的传统。”他总结说，“鉴于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欧洲的腾飞是“合乎逻辑的”。

这样的观点不能令我信服。你读到这里，我相信你不会惊讶于我的态度。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并没有所谓古代的西方式的战争这种东西，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并非西方独有的。他们的作战方式，仅仅是遍及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一种大的趋势中的地方（地中海地区）版本罢了，而我将这个大的趋势称作建设性的战争方式。接着，在第三章中，我指出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里，面对着骑兵的崛起，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这种古代建设性的战争开始瓦解。我的这些观点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汉森这种继续用所谓西方式的战争解释欧洲的火药进步的方式就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如果仔细观察16世纪欧洲的现实，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法用西方式的战争理论解释的。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深入探讨过这些细节，所以我在这里只想集中说明两个问题。如果真如汉森所说，“正是西方人这种对步兵大规模交锋和自由民在战场上用开刃的武器相互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　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新的作战方式却是站在远处开火，而非近身使用开刃武器？如果西方式的战争总是关注“在战场上给予敌人的力量以彻底摧毁”，“发动致命的打击，然后绝不后退地坚持下去”，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在1534～1631年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打了那么少的战役？如果“在过去的2　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方式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那么为什么欧洲在整整一个千年的时间里（大约500～1500年），一直在来自亚洲和北非的劫掠者和入侵者面前退却？

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十分务实的答案解答所有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欧洲的火器革命与文化传统无关，欧洲人火器用得好，只是因为他们仗打得多。这是由于欧洲分裂成了众多的小国家，彼此争斗不休。而与之相反，中国在1368~1911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中国人很少打仗，也没有理由在改进火器方面太下功夫。而对于征战不休的欧洲人来说，改进火器的效果却事关生死。因此，欧洲人使得火器趋于完美，而中国人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种说法回避了关键的问题。中国尽管在1368~1911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但是也经历了很多战争，而且其战争规模往往会让欧洲人之间的小打小闹相形见绌。在1411年和1449年，明朝皇帝两次派遣超过50万人的大军对抗蒙古人；16世纪，明朝一直在抗击海盗；16世纪90年代，明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惨烈的大战；1600年，中央政府又征调25万人镇压四川的叛乱。那么，为什么这些战争都没能引发欧洲式的对火器的改进呢？

由历史学家转行做了律师的肯尼思·切斯（Kenneth Chase）在他杰出的著作《火器：1700年前的全球历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中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欧洲和亚洲人打了多少次仗，而在于他们进行的战争的类型。最初的火器笨重、缓慢，射速不能以一分钟几发计算，而要以几分钟一发计算。它们只能适用于打击同样笨重、缓慢的目标，比如城墙。这也是为什么火器最初的重要改进出现在攻城火炮上。

火器最早的革新温床在中国南方。因为在14世纪中叶长江流域对抗蒙古统治者的战争中，取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通常是攻克城池，以及在行动受限的河段上击沉对方的大船。早期的火器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但在长江流域的战争于1368年结束后，主要的战场就转到了中国北方的草原。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供轰击的城池，而射速缓慢的火器在移动迅速的骑兵面前毫无用处。中国的将领们也都是些理性的人，他们因此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增加骑兵的数量和兴建长城方面，而不是用于火器的进一步改进。

而欧洲，至少其在刚接触到火器时，与中国南方的情况有更多的相似点。欧洲到处都是堡垒，有着大量的地形阻隔可以限制军队的行动。而且，由于欧洲远离草原（这导致骑兵十分昂贵），欧洲的军队中总是包括大量的移动缓慢的步兵。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火器加以微小的改进就可以取得显著的功效。到了1600年，长久以来日积月累的改进，使得欧洲军队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如果明朝皇帝有一颗水晶球，能预见到在17世纪火器可以有效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话，他们肯定也会从长期着眼，对火器的改进进行投资，最终研制出小颗粒火药、火枪和铸铁火炮。但在现实世界，没人能预见未来（尽管有些人很努力地想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的只是对当下面临的挑战做出反应。欧洲人潜心于火器的改进，是因为在当时这是

有意义的行为；中国人没有潜心于火器的改进，是因为在当时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行为。而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欧洲人（几乎）征服了世界。

回报

14世纪，由于旅行者、商人和军队将火器沿亚欧大陆向西传播，欧洲人学会了使用火器。到了16世纪，由于旅行者、商人和军队将火器沿亚欧大陆向东传播，亚洲人也学会了使用欧洲人改良过的火器。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一种回报。

横跨欧亚两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率先了解到了欧洲的火器。土耳其人的火器水平通常落后于欧洲人，但是也要比其东方和南方的国家领先几十年。在1514年的查尔迪兰战役和其后两年进行的达比克草场之战中，正是置于马车上的火炮屠杀了波斯和埃及最优秀的骑兵，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中东。

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另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莫斯科大公国，同样学会了使用西方的火器。从13世纪开始，俄国人就一直靠着每年向蒙古人进贡而苟且偷生。但到了16世纪，伊凡雷帝（Tsar Ivan the Terrible）对他们进行了报复。在与瑞典和波兰的血腥战争中，俄国人学到了使用火器的基本方法。伊凡扫荡了伏尔加河，用火炮摧毁了挡在路上的蒙古人防御工事。到他于1584年去世时，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帝国疆域已经扩大了一倍，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1598年，装备着新型火枪的俄国毛皮猎人翻越了乌拉尔山脉；到1639年，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太平洋之滨。

如果这一切继续下去，商队一定会一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前进，把先进的欧洲火器带到中国去。但商队的步伐却被这个时代另外一项伟大的发明超越了，那就是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船舶。

就像火器一样，远洋船只的基本技术也出现于亚洲，但在欧洲臻于完美。比如，在1119年，只有中国的船长们在使用磁罗盘。这项技术随后传到了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商人手中，继而在1180年传播到了地中海海域的意大利人那里。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东亚地区的造船工人在索具、船舵和船体制造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到1403年，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干船坞，其中可以容下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船只。这些船只拥有大量的水密舱，用防水涂料密封，还配备有储存淡水的船只辅助航行。因此，中国的水手们可以驾驶这些船只前往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在1405～1433年，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着上万名水手，乘坐着上百艘船只，抵达了东非、麦加和爪哇。

与之相比，西方的船只就显得很简陋了。但就像火器一样，欧洲人

可以把亚洲人的灵感用在迥异的方向。这一次的驱动因素仍然来自一个根本点：欧洲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人面临着与亚洲人不同的挑战，而欧洲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付出的努力，最终使得相对劣势的环境反而变成了他们的优势。

在15世纪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西欧的位置看起来再糟糕不过了。一位经济学家曾把西欧称作“一个遥远而边缘的半岛”，远离位于南亚和东亚的中心区域。欧洲商人深知中国和印度的富庶，几个世纪来一直试图找到通往东方蓬勃发展的市场的快捷途径。但情况在1400年之后开始变得糟糕了。蒙古人建立的各个汗国开始分崩离析，这导致穿越草原的丝绸之路变得更加危险；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另一条路线（经由叙利亚抵达波斯湾）上征收关税，使得这条道路的通行成本更加高昂。此时，最佳的方案似乎就是通过海路，绕过非洲的南端抵达亚洲，从而可以避开那些在陆上插手的国家。但是没人知道这条道路是否真的可行。

在想要一探究竟的欧洲人当中，葡萄牙人所处的位置是最有利的。在占领休达多年之后，葡萄牙船只逐渐向南探索着非洲的西海岸。在地中海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船只是以桨为主要动力的船只，但这样的船只并不适应大西洋的长途航行以及那里的风浪。这一问题的解决十分紧迫，因此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休达的征服者之一，葡萄牙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决定亲自推动建造更好的船只。

他的努力很快获得了成效，葡萄牙人建造了卡拉维尔帆船。这些小船通常只有50～100英尺长，排水量几乎不到50吨，如果郑和看到这些船，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它们足以完成使命。它们的浅底可以通过充满淤泥的非洲河口水域，方形的横帆可以让它们行驶得更快，而大三角帆则让它们更灵活。1420年，葡萄牙人的船队发现了马德拉；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几年的工夫，这些岛屿上就已经遍布欣欣向荣的种植园；1444年，水手们抵达了塞内加尔河，借由塞内加尔河，他们可以把非洲金矿中的黄金运送出来。1473年，葡萄牙人穿越了赤道；1482年，他们驶抵了波澜壮阔的刚果河河口。

一切都很顺利。但一旦过了刚果，卡拉维尔帆船（以及后来更新型的克拉克帆船）就遇到了强烈的逆风。航行就此止步，直到无所畏惧的欧洲水手们找到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在1487年的奇思妙想：“从海上回来”（volta do mar）。这个方案的意思是，驾船驶向未知的大西洋远处，寄希望于会遇到可以将帆船带到非洲南端的风。迪亚士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不过，迪亚士当时把这个地方称作风暴角（我曾经有一次坐船经过此处，狂风巨浪使我难以入睡；这一经历让我觉得迪亚士取的名字是正确的）。不论我们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当时的葡萄牙水手发动了哗变，拒绝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继续航行。继续前进的任务留给了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98年，他第二次绕过了非洲的南端，驶入了印度洋。

第二个方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方案，它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像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哥伦布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么，从理论上说，如果从葡萄牙向西一直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也知道，绕世界一周大约要24 000英里。因此，通过这条路径前往印度群岛实在太过遥远，无利可图。但哥伦布不相信这一点，坚持认为只需要航行3 000英里就能达到日本。1492年，他终于获得了足够的资金验证自己的观点。

一直到他去世，哥伦布都相信他到达的地方是亚洲。但人们渐渐意识到，他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而这一成就更令人兴奋。一些欧洲人发了大财：他们先是把美洲的财富——黄金、白银、烟草，甚至还有巧克力——运回欧洲，再把非洲人运到美洲生产这些东西。欧洲水手们把大西洋从一个天然屏障变成了一条高速公路。

不过，这是一条危险的高速公路。就像被罗马人征服前的地中海地区和被蒙古人统治前的草原一样，大西洋上也基本不受利维坦们的法律约束。一旦船只驶离加的斯或里斯本，一切约束就不复存在了。任何有一艘小船、两门火炮的无所顾忌的人都可以让他自己（偶尔是她自己）享用美洲大陆的财富。海盗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16世纪，从加勒比海到台湾海峡，全世界都在进行着对抗海盗的战争。这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如果利维坦们想赢得这场战争，它们总是可以赢的，但伟大的庞培曾经在公元前1世纪采用过的那套占领、坚守、建设的策略需要花钱。政府经过计算，发现放任海盗造成的损失要小于对海盗开战的成本，那么还何必对付这些海盗呢？聪明的官员甚至把海盗变为己用，收取贿赂后就放任他们恣意妄为，或是干脆承认这些亡命之徒的“私掠船”的合法地位，使其可以合法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一些粗心的航海者可能会倒霉，但是这似乎只是很微小的代价。

不过，对于航海者而言，这个代价却是高昂的。因此，他们做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武装起来。卡拉维尔帆船和克拉克帆船都能搭载一些火炮。到了1530年，葡萄牙的造船工人们开始制作一种新的船只——加利恩帆船，这种船基本上就是一艘漂在海上的火力平台（见图4–2）。加利恩帆船的船身更长、更窄，其上拥有四根桅杆，船首楼和船尾楼都较小，因此可以航行得更快。不过，这种船最大的特点是其船侧布满了火炮。在刚刚超过水线的地方留出了炮门，火炮可以在这里发射8磅重的铁质炮弹，射程可达500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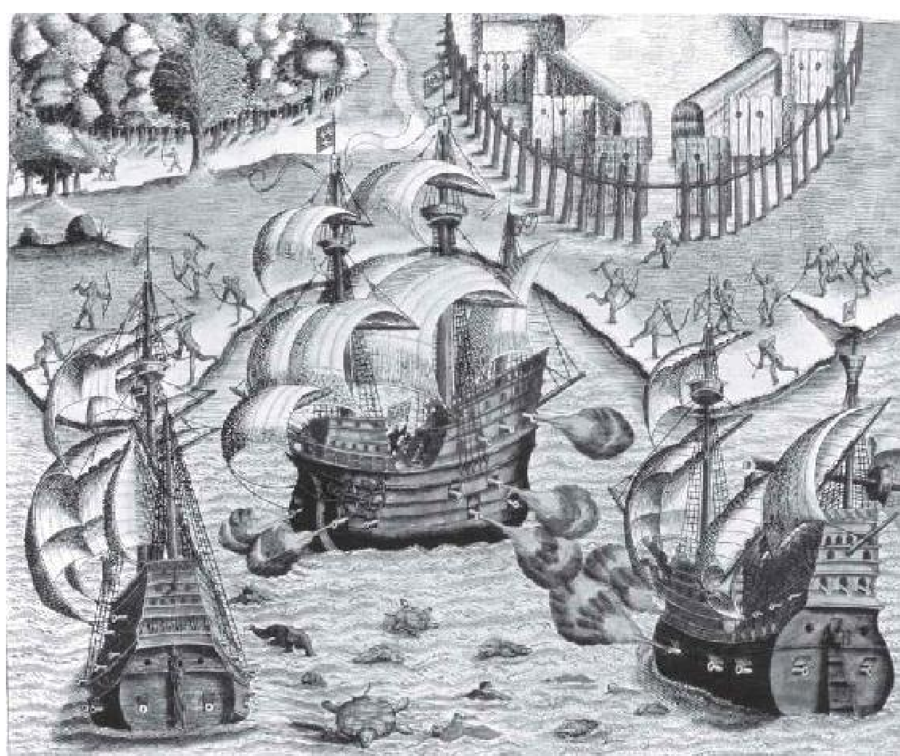


图**4–2** 漂浮着的火力平台：大约在**1562**年，法国和葡萄牙的加利恩帆船在巴西海岸交火

资料来源：吉亚尼·达利·奥尔蒂/艺术资源档案，纽约。

2 000年以来，海战的方式都一直是靠近敌舰、冲撞敌舰，再接舷登舰作战。但现在，船长们学会了用船侧面对敌舰，再在刺鼻的硝烟中向敌人倾泻炮弹的做法。弯刀和匕首依然派得上用场，不过如今最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的，是炮弹击穿船体时朝四面八方迸溅而出的木头碎片。这些碎片参差不齐，有的长度在一英尺以上，可以把人的头和四肢削掉。一位目击者称，甲板“被鲜血染红，桅杆和索具上沾满了脑浆、头发和颅骨的碎片”。

火炮不仅可以用来抵挡海盗，它们本身也可以作为商品换取利润，因为亚洲人愿意为这些可怕的武器支付大价钱。达·伽马的一些手下离开了他的船队，转而为卡利卡特的苏丹做火炮制造商，一年之内卖给他400门火炮。1521年，第一批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也开始铸造火炮供应当地市场。到了1524年，明朝的工匠已经开始自己铸造火炮，并且制作小颗粒火药了。

日本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542年，一场风暴把3名葡萄牙人送上了日本海岸，他们有可能将他们最先进的火枪出售给了当地领主，并且教会领主手下的工匠制作更多火枪。到了16世纪60年代，日本的火枪就像欧洲的一样精良，并且同样让传统的防御工事变成了过时的事物。不过，与欧洲不同，日本在防御方面的进步远远落在了其进攻能力的后面，这或许是因为先进的火枪是突然出现在那里的，而不像在欧洲那样

经历了至少两个世纪的演进。不过，不管究竟是何原因，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统一的政府在16世纪80年代控制了整个日本列岛。

欧式火器大受欢迎，亚洲的军人们很快开始把所有的现代火器都统称为“法兰克的”（在波斯被称作farangi，在印度被称作firingi，在中国则被称作佛郎机）。他们也采用了欧洲的战术，懂得装备了现代火枪和火炮的马车可以有效抵御草原骑兵的进攻。

札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布尔（Prince Zahir al–Din Muhammad Babur）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在1501～1511年，他手下那些装备着弓和长矛的阿富汗人没能抵挡住乌兹别克骑兵对撒马尔罕和喀布尔的进攻，他不得不逃到了印度。巴布尔一到达印度，就雇用了奥斯曼顾问，这些顾问要求他购买火器和马车。1526年，他在帕尼帕特大破敌军，夺回了他失去的一切。他创立的莫卧儿帝国后来成了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中国的士兵们则似乎独立发明了马车火炮战术。16世纪70年代，指挥北京防务的将领指出：“马车可以作为野外的城墙使用，也可以替代铠甲的作用。就算敌人的骑兵涌上前来，他们也无法突破马车。这些马车就像是有脚的城墙，或是不用吃草料的战马。不过，这一切还要依靠火器。如果火器部队失败了，这些马车又怎能独自坚守呢？”

有的时候，火器部队确实也会战败，马车也因而无法坚守。即便到了1739年，阿富汗骑兵还曾经淹没了莫卧儿帝国的火枪手，洗劫了德里，并且掳走了莫卧儿帝国镶嵌着蓝宝石的孔雀宝座。不过，总的来看，大约在1550～1750年，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拥有了新型火器的幸运纬度带上的各帝国终于控制了草原，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皇帝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派步兵深入不毛之地追击骑兵（这种做法的成本依旧高昂），而是靠农民一点一点地蚕食草原的边缘地区。农民们挖掘壕沟，修建栅栏，甚至用火枪开火，逐渐限制了游牧民族的行动路线，把骑手挡在了外面。最终，游牧民族再也无处可藏。直到这时，皇帝们才亮出他们的新型火炮，这些火炮的重量已经轻到可以被长途跋涉地运往草原了。

> 他们的右边是火炮，
>
> 他们的左边是火炮，
>
> 他们的前面是火炮，
>
> 万炮齐鸣，响彻云霄。

诗人丁尼生这样描绘巴拉克拉瓦战役——这场发生在骑兵和火炮之间的最著名的战役。不过，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轻骑兵所遭遇的灾难在

17、18世纪的草原上上演了无数次。游牧民族就这样冲向了敌人的枪口和防御工事，也就冲进了地狱的大门，罕有人幸存。

在1500～1650年，俄国人和奥斯曼人挤占了草原的西端；在中亚地区，莫卧儿帝国和波斯人于1600～1700年击退了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而在东方，中国人在1650～1750年吞并了新疆无尽的荒地。1727年，俄国和清朝的官员在恰克图会面，签署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蒙古北部地区的边界。至此，使用火药的帝国实际上封锁了草原这条高速公路。

没有了游牧民族的制衡，建设性的战争很快就恢复了。从土耳其到中国，随着草原被封锁，安全的环境孕育出非凡的大帝国。在确保了中亚一线的安全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北非，并且推进到多瑙河；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萨非王朝则建立起在过去1 000年的波斯历史中最强大的帝国；莫卧儿帝国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清王朝的疆域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地的情况各异，尽管有太多君主沉湎于酒精和毒品，生活十分堕落，但他们仍然像古时候一样变成了坐寇。他们聘任官员，为军队支付薪饷而非放纵劫掠。而且，鉴于置办攻守武器都要花钱（更不用提后宫和鸦片的开销），皇帝们必须想方设法促进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因为这两者是税收的主要源泉。“善待商人吧，”一位典型的奥斯曼帝国官员对他的苏丹说，“关心他们，不要允许他们被骚扰，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的贸易，这块土地才变得繁荣。”

大多数官员继续收受贿赂，欺压穷人，但也有一些开始试图厘清产权，设置合理的税率，鼓励投资。他们鼓励种植一些来自美洲的了不起的新作物：土豆、甘薯、花生、笋瓜和玉米，这些作物产量极高。政府修桥筑路、抓捕强盗、颁布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让农民可以放心地种植诸如棉花、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并且去纺丝。到16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农民，而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地区的农民们可能也不会逊色太多。

苏丹和波斯国王很喜欢新的统治方式，因为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财力兴建泰姬陵和清真寺了。不过，这样的统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普通亚洲人的生活，我们还不清楚。有迹象表明，当利维坦扩张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而当政府崩溃时，人们的收入会减少。不过，要想完全确认这一趋势，我们还需要对那些分散在晦涩难懂的史料中的信息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加确定的一点是，政府能够减少暴力的发生。在情况最为糟糕的波斯，在16世纪前，部落间的争斗已经使这个国家陷入瘫痪。“多年以来，”波斯国王塔赫玛斯普（Tahmasp）在1524年悲叹道，“我一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部落间的流血冲突，我也试图从中发现神的旨意究竟为何。”而在70年之后，阿拔斯大帝（Abbas）则采取了更

强硬的态度。“他刚一登上王位，”他的传记中写道，“就要求各个省份找出主要的劫匪，他决心要消灭这种人。”阿拔斯对安全问题的躬亲努力（1593年，他本人亲自斩首了一名罪犯）收到了成效。在17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旅行者曾惊奇地写道：“亚洲的道路都很安全，尤其是在波斯。”

事实上，在中国，我们有一些数据作为依据。在1368~1506年，处于统治前半段的明朝建立起了一个利维坦。在这段时间中，仅仅记载了108起匪徒犯罪事件和叛乱事件。然而，到了1507~1644年，明朝的官员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各种事件的总数也上升到了522起。在1506年之前，匪徒们通常做的事情是抢劫、强奸、杀人，然后在政府出面前逃之夭夭；而到了1506年之后，匪徒们经常对抗明朝军队，而且还屡屡取胜。

终于，到了1644年，明朝的统治崩溃了。尽管在接下来的明清之际的大灾难中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人死于非命，此时的情况也与以往的王朝崩溃时的情况不尽相同了。这一次，王朝的崩溃并没有引来一波又一波趁火打劫的草原骑兵，中国没有再次滑入血腥的危机之中。新兴的清王朝巩固了边境，镇压了叛乱，建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利维坦。

对于一个生活在1650年甚至1700年的人来说，似乎很容易认为亚洲是火器发明后最大的受益者。亚洲人把火器和远洋船舶带给了欧洲人，欧洲人则连本带利地用经过改进的船只把同样经过改良的火器又带给了亚洲人。使用着欧式火器的亚洲人重新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封锁了草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帝国。而在欧洲，即便是奥斯曼帝国也没办法在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中领先其他对手太多，因此这片大陆仍然是分裂的，国王、王子、沙皇，再加上一些共和国彼此争斗不休。不少欧洲人充满敬畏地看着光辉灿烂的东方，认为欧洲人正越来越落后。

训练啊，宝贝儿，训练

他们错了。欧洲人非但没有落后，反而越来越领先。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上。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欧洲人学会了让士兵和水手排列成阵，并且坚守自己的位置，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火力。到1650年，欧洲人已经发现了前机械化时代热兵器作战的基本原则，并且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将这些原则不断优化。亚洲帝国重新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而欧洲人则在重新发明建设性的战争，彻彻底底地重新发明它。

一直到1590年，欧洲军队和舰队最大的弱点仍然是他们使用的火枪和火炮射速太慢、精度太低。因此，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加上几

分运气，骑兵或海盗的突然袭击可能会在火器完成重新装填前就将其消灭。据传说，拿骚伯爵威廉·路易（Count William Louis of Nassau）在1594年想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当时，荷兰正在与西班牙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以争取国家的独立，而威廉·路易是荷兰军队的统帅之一。

威廉·路易在阅读古罗马人一份记述如何更好地使用标枪的文件时受到了启发。他赶忙给他的堂弟毛里茨写了一封信（见图4–3）。威廉·路易在信中说，合格的火枪手可以在大约30秒的时间里完成一次齐射。但如果他们不一齐进行射击，而是像罗马的标枪手一样排成6排，每一排一齐射击，效果是不是会有不同呢？第一排先开火，然后向后转，穿过其他几排人走到队伍后面去；就在他们向后走的时候，第二排可以开火；而在第二排向后走时，第三排再开火；依此类推，等到第六排也完成了开火并向后走时，第一排就已经准备好再次开火了。因此，火枪手们不再是每30秒进行一次大齐射，而是每隔5秒钟进行一次小型的齐射。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近乎不停地发射弹丸，阻挡住那些冲上来的骑兵或是海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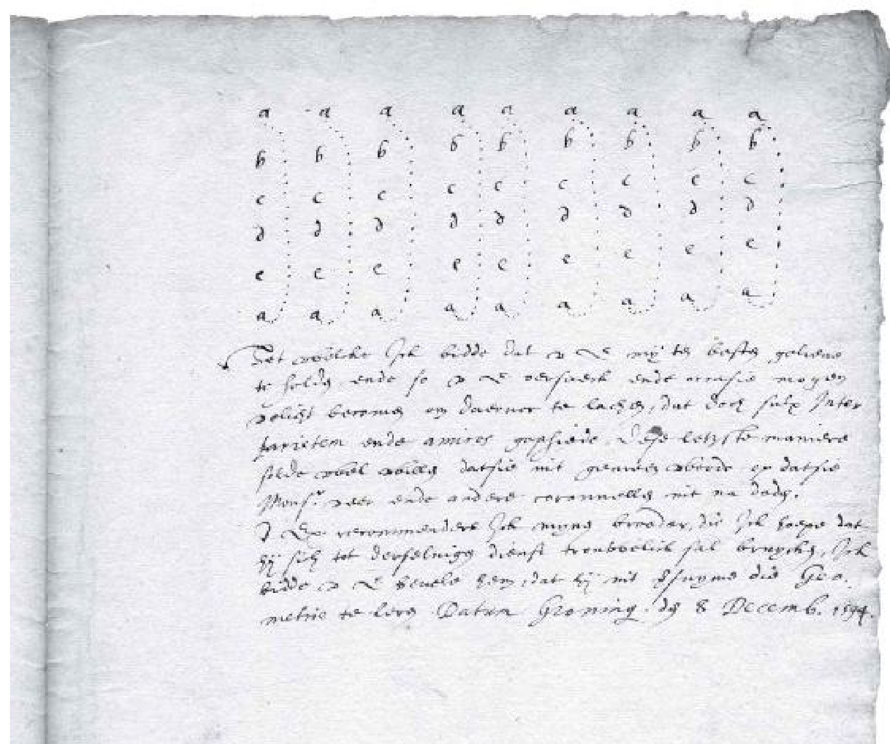


图**4–3** 欧洲成功的秘诀：拿骚伯爵威廉·路易于**1594**年写给堂弟毛里茨的那封著名的信，其中解释了齐射的原则

资料来源：荷兰皇家档案馆，荷兰海牙。

不过，事实证明，在现实中实践这一做法，尤其是对垒那些会用火枪还击的敌人，要比理论上听起来困难得多。但到了17世纪20年代，瑞典军队把威廉·路易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Gustavus　Adolphus）改变了“射击–后退”的做法，而是让士兵前进10步射击，随后停留在原地装填弹药。用古斯塔夫军中的一位苏格兰军官的话说，其他“几排人向前超过第一排，随后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射击，直到所有人都开过一轮火，再继续循环……士兵们只向前进，决不后退，要么战死，要么取胜”。

同时，古斯塔夫发现，要想让步兵齐射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其他兵种也需要重新部署。野战火炮需要集中部署，从而可以用这些可移动的炮位加强步兵的火力，而骑兵则要放弃使用火器。在16世纪，骑兵通常双手各持一把手枪，冲向敌人的步兵，并在近距离开火，随后逃开。但这样的作战方式在连排发射的火枪面前等于自杀。古斯塔夫让骑兵们回到了冷兵器时代。他通常让骑兵远离敌军步兵，直到敌人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侧翼，或是敌人的步兵团士气溃散，开始逃跑时，他才会派遣骑兵手持马刀发动冲锋。

古斯塔夫意识到，要顺利地达到这些目标，军队的规模也要更大。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军可能投入了大约30 000人；而当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席卷全欧洲时，军队人数激增。在17世纪40年代，大国一般都拥有15万人的军队（这大约相当于阿古利可拉时代罗马军队总数的一半）。法国军队的数量在17世纪70年代达到了20万人，到1691年和1696年则分别达到27.3万人和39.5万人。在1701～1713年，又有65万法国人参军入伍，最终使得法国的军人数量超过了牧师的数量。

就在欧洲的陆军将军们想方设法最大化陆上火力的同时，欧洲的海军将领们也攻克了海上同样的课题。在海上，目标是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船舷一侧的火力。在16世纪，舰队通常会直接驶向敌舰。但由于加利恩帆船上的火炮几乎都位于船侧，因此直到双方非常接近之前，都没有什么机会向对方开火。双方舰只贴近之后，战斗就变成了一场混乱的厮杀。在弥漫的硝烟当中，火炮很容易击中己方的船只。

在17世纪30～50年代，荷兰的海军将领们创造出了纵队阵形：一种进行海上齐射的方式。舰队不再直接冲向敌人，而是组成首尾相接的队形，与敌舰平行行驶，从而可以充分发挥舷炮的威力。很自然地，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很快都学会了这种战术。两支舰队可能会平行着行驶上几个小时之久，相互开火，直到夜幕降临，或是一方的指挥官决定脱离战斗。一旦在敌军的队列中打出一个缺口，舰队就会穿越这个缺口，从而可以用自己的舷炮肆意攻击敌舰脆弱的船头和船尾。

围绕着这一原理，海军将领们重新设计了他们的舰队。风帆战列舰（可以用来组成纵队的强大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一些较小的舰只则用来保护纵队、进行侦查，或是（至少在1700年以前）被用作“火船”，即故意将这些船只点燃，再冲进敌阵制造混乱。

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线性战术的关键都是标准化。早在1599年，荷兰的军需官们就开始给士兵们配备同样的火枪，这样一来他们装

填弹药的时间就可以是相同的。古斯塔夫将16世纪五花八门的火炮种类削减到了3种，分别使用3磅、12磅和24磅的炮弹。法国人则发明了一种排列军队火炮的方法，即在两层或三层甲板上一共布置74门火炮。如此，当风向突然发生变化时，纵队里的军舰会保持同样的运动轨迹，从而维持了纵队的完整。

可想而知，在战争这部机器中，最难标准化的部分就是人。按照1607年荷兰的士兵手册规定，齐射一共包括43个步骤，每一个火枪手都必须牢记这些步骤，并且在战火中严格执行这些步骤。火炮有着其复杂的使用流程，而要让军舰保持在纵队之中则是最难的一个任务。几千名训练有素的水手必须爬上索具，在同一时间里完成收帆、卷帆、变换航向、转舵等动作，而且这些动作都是在硝烟弥漫、弹片四溅的环境中完成的。人们必须被改造成可以互换的零件。

在这场军事革命发生的4个世纪后，参加2008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代表们想出了一句很易上口的口号，用来总结他们对汽油价格陡增的应对策略。“钻啊，宝贝儿，钻。”他们呼吁美国在本土开采更多的石油。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同时代的人获得标准化的军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6]。训练可以让人变成“可互换零件”式的军人。毫不留情的严苛教官们［此词源自法国一位以严苛著称的军官的名字：让·马蒂内（Jean　Martinet）］训练士兵们研磨火药，填塞火药，再把弹丸装进前膛枪中。他们不停地训练，直到士兵们可以闭着眼睛完成这些动作；水手们则不停练习打结，一直练到手指都红肿了。人类还从未被彻底改造成机器上的零件过，但17世纪的教官们做得已经很接近这一点了。

最难以标准化的人是军官。新的军事体系需要很多军官（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军队一个连的组成人员从250名士兵和11名军官变成了120名士兵和12名军官，而且这种10：1的比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是那些显而易见可以做军官的人（上流阶层）首先把自己视为贵族，其次（其实是非常次要的位置）才把自己视作机器上的零件。一位法国军官写道：“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属于国王，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我们的荣誉属于我们自己。”下级军官在对上司表达不同意见时，经常就逾越了礼节中难以把握的界限；而对大多数贵族来说，穿上制服，把自己的个性埋没于标准化的等级之中，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到了18世纪，军官们在战场上的衣着就如同他们在参加舞会时的一样。他们戴着涂了粉的假发，穿着扣紧了搭扣的鞋子和绸缎的裤子，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阵香水的气息。“哦，天哪，”18世纪一出喜剧里的主人公说道，“想想看吧，这些香喷喷的伙计们是怎么睡在地上的，他们还要穿着丝质长袜和蕾丝褶边厮杀。”（在1745年的丰特努瓦战役中，一位法国军官带了7双备用的丝质长袜——以防万一嘛。）到了1747年，才有一群在咖啡馆里秘密聚会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们提出：“对于现役军官来说，统一的制服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

抛开穿着上的散漫不说，新创建的军官学校开始在1600年以后塑造

出一个职业军官阶层。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是一位日记作家、花花公子，同时也是一位管理天才。1677年，他负责整顿英格兰[7]海军的训练，提出了清晰的训练目标：培养出“头脑清醒、做事勤勉、服从命令、热衷于航海术理论与实践”的军官。除了有时候不太清醒，塞缪尔·佩皮斯完美地做到了其他各项，他还要求每一位军官——不论私交有多么好——都要通过天文、炮术、航海和信号等科目的考试。

到1700年，欧洲人陆上和海上阵列的火力之强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前有未见的。佩皮斯认为，他们的一项弱点是，“由于缺乏资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军，都乱了套”。在士兵和火炮全都标准化的时代，进行军备竞赛的代价高昂得令人瞠目，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无力应付全部开支。在财政上取得收支平衡很快成了各国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

最粗陋的解决方案就是做假账。政府满不在乎地让债务违约，放任通货膨胀；而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时，干脆停发薪饷。但这种做法的结果通常都很糟糕。得不到薪水的英格兰水手发明了“罢工”这个概念，他们把船帆扯下来，使得舰队无法航行，直到政府付钱才罢手。1667年，英格兰的舰队正在罢工之中，佩皮斯也无法履职（“贫困的水手因为没钱而躺在大街上挨饿，发出阵阵呻吟”）。利用这一时机，一支荷兰舰队沿着泰晤士河上溯，将英格兰最好的船只要么焚毁，要么拖走。水手的妻子在伦敦街头揪住议员们尖叫道：“这就是不给我丈夫付薪水的后果！”

除了降低战争成本之外，另一种办法就是增加收入。政府在这一方面也确实做了更多的努力。其中一种手段叫专制主义，即把贵族、城镇、神职人员在过去1 000年中积累下来的各种权利全部抹杀，使得君主可以对其统治下的任何事物进行征收。自然地，这种手段对国王们颇具吸引力，但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就会感到不满意。此举经常导致的结果就是内战。

当事情的进展不大顺利时，国王最终可能就会丢掉自己的脑袋，就像1649年的英格兰和1793年的法国那样。但即便一切顺利，国王仍然无法弄到足够的钱。即便是最伟大的专制主义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也没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打败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王国。当他于1715年驾崩时，法国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第三种选择，是更高效地调动资金。在这方面，荷兰人走在了前面。荷兰人创造了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购买一部分国债，再连本带息卖给其他的投资者，就像今天的银行销售按揭贷款。荷兰政府还出台了法律，降低投资者对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如此，荷兰政府就有能力动用更多的资金，其调集资金的速度要快于其对手，且成本也更低。在17世纪，荷兰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其债务也由1632年的5 000万荷兰盾增长到1752年的2.5亿荷兰盾。不过，由于投资者对荷兰国债的信心，荷兰政府所需要支付的利率在稳步下降，到1747年已经降到了2.5%以下。

1694年，英格兰更进一步，开办了国家银行，用以管理公共债务，并分配特定税款用来偿付债券利息。强有力的财政措施带来了巨额财富。对于那些信用较差的国家来说，一场大败仗可能就会迫使它屈服，而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政府看上去几乎可以随意地组建、训练、派遣新的舰队和陆军。用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话说，“有了信贷，我们似乎可以不发薪饷、不准备补给就让士兵和军队去打仗”。

对政府来说，有了这样的方法，简直可以说是别无他求了。但大部分人对这些新的体系持有矛盾的情感。就像今天一样，那些在银行家们看来美妙绝伦的金融工具，在其他人眼中可能就很值得警惕；就像今天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人——就连银行家自己也算在内——真正理解这些新的工具究竟是怎样运行的。1720年，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和法国发生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导致银行倒闭、投资者破产。这导致了一场“茶党”式的反击。虽然在18世纪并没有出现类似“华尔街对商业街”这样的情形，但出现了“针线街（英格兰银行所在地）对庄园”的情况。世代垄断政坛的贵族们怀疑（且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商业的政府可能会让贵族们的生活越过越差；国王们也发现，要想放弃以往用惯了的搜刮式的政策也很困难。

要解决战争中的资金问题，最具建设性的方案既不是通过做假账，也不是通过增加收入，更不是通过提高资金流动的效率。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利用战争的矛盾性。国王们开始削减他们越来越具破坏力的武装力量，转而寻求组建联盟体系，从而可以分担战争的成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力量的制衡。这使得过于激进的代价变得更高（如果一国政府打破了平衡，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恢复这种平衡），也使得国家生存的代价降低（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毁灭的威胁，其他国家可能会为了维持平衡而援助它）。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军队的杀伤力变得如此之强，他们实际上造成的死亡人数反而减少了。为了避免引发各国群起反对自己，统治者们对战争的规模开始加以限制，只制定有限的目标，并且谨慎地使用武力。战场上的残酷程度不减当年（1665年，英格兰的约克公爵曾被伯林顿伯爵次子的人头绊了一个跟头），但是战争正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欧洲的作家们已经开始将战争称作“内阁的战争”。“战争再也不是国家相互之间的全面厮杀了，”一位法国政治家在18世纪80年代写道，“而仅仅是军队和职业军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就像是要靠运气取胜的游戏，谁都不会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上面。以前的那种疯狂的大战，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愚蠢的行径。”

一个经典的例子发生在1701年。当时，7个欧洲国家组成了一个同盟，力图阻止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冠落在同一个人的头上——将巴黎和马德里联合在一起将制造出一个打破平衡的超级强国。因此，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从布伦海姆到巴巴多斯，该同盟在陆地和海洋都发起了战争，以阻止这成为现实。到1710年，同盟一方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但就在此时，同盟内部的一些成员开始担心，一旦击溃了法国和西班

牙，那么实力的天平就将倒向英国一边。因此，这些国家转换了阵营以恢复平衡。战争最终在1713～1714年之间慢慢结束。

如果只观察发生在西欧的事情，那么火器的出现和草原的被封锁并没有带来什么太具建设性的结果。虽然欧洲人获得了可以打败草原骑兵的武器，从而使欧洲也摆脱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漫长循环，但是欧洲却没有能够像亚洲那样重新回到建设性的战争之中。在亚洲，从1500年开始又出现了新的雄踞大陆的大帝国。而西欧人则似乎陷入了一种反建设性的战争之中。在这种战争中，国王和他们的内阁不停地争夺着堡垒和边境省份，但他们既无法建设性地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也无法反建设性地将更大的社会打碎成小的社会。

对世界开战

1415～1715年这300年的战争，并没有能给西欧的版图带来太多变化，但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的冲突波及各个大洋；而欧洲人也逐渐开始对整个世界开战。从葡萄牙到荷兰，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的统治者们都对海外活动十分热衷，因为这些活动可以为他们带来税收，用来支持在本土的战争。欧洲的军事革命主要靠来自海外的金钱支撑，而军事革命反过来也给了欧洲人先进的武器，使得海外扩张变为可能。

由于有了火炮，15世纪的水手们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拥有海面上的优势。此外，火炮还能帮助他们神奇地说服那些不太情愿进行贸易的贸易伙伴。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先是试图说服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商人卖给他补给品。在讨价还价失败之后，他发现开火能完成这一任务。两年后，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到达了印度（他在试图绕过非洲时航行得过远，结果发现了巴西）。他向卡利卡特开炮，造成了500人死亡，结果使得卡利卡特迅速开放了它的市场。

到1506年，葡萄牙人制订了一项惊人的极具野心的计划，把海盗行径上升成了一种伟大的战略。由于每艘运送香料的船只都必须要使用几处重要的港口，因此，葡萄牙水手们认为，如果他们可以占领霍尔木兹、亚丁、果阿和马六甲，他们就可以把印度洋变成葡萄牙的内湖，并且对印度洋上的所有船只征税。这样一来，葡萄牙就将富有到连最贪得无厌的人都想象不到的程度。

这一计划终究未能成为现实。部分原因是军事方面的，由于葡萄牙人一直未能占领亚丁，因此阿拉伯商人依旧可以我行我素地驶入印度洋之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只靠打仗是实现不了海外扩张的目标的。除了极具毁灭性的火力之外，海外扩张还要考虑另外4个因素：距离、疾病、人口和外交。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欧洲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扩

张的效果。

在美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十分有利于欧洲人，因此也就出现了最为极端的结果。距离和人口这两项因素对欧洲入侵者是不利的。距离限制了能够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的数量，而这一数量与美洲原住民庞大的数量是无法比拟的。但欧洲人一到达美洲，原住民就发现他们的石剑、棍棒和棉质铠甲完全不是欧洲人的铁剑、战马和枪炮的对手。在哥伦布抵达美洲的40年之后，区区168名西班牙人就打垮了数以万计的印加人，并且在卡哈马卡擒获了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在16世纪的墓葬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被子弹击穿的颅骨。这生动地说明，欧洲人在火力上的优势克服了距离和人口方面的不利因素。

但就像印度洋上的葡萄牙人一样，抵达美洲的西班牙人也发现，只有武力往往是远远不够的。1520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手下的西班牙征服者们差点就无法从一次阿兹特克人的起义中脱身；第二年，他们攻陷了特诺奇提特兰，而在这一行动中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与武力同样重要。科尔特斯在外交方面是有问题的，以至于还曾经与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打起了内战，但他们之间的内斗比起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巨大分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中美洲，饱受阿兹特克帝国欺凌的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一些部族很高兴西班牙人的到来，因此无意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而在秘鲁，皮萨罗（Pizarro）面对的印加帝国则已经在不久前的内战中变得四分五裂。那些围攻特诺奇提特兰和库斯科的大军实际上都是由美洲人组成的。

不过，对西班牙人的成功贡献最大的是疾病。几千年来，欧洲和亚洲的农民们一直与被驯养的动物一起生活，演化出了一套微生物谱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过）。而美洲人很少驯养动物，因此也就对这些微生物没有任何抵抗力。美洲人的确也将一些特有的疾病（包括梅毒）传染给了西班牙人，但是在这场疾病的大交换中，美洲人的损失要惨重得多。

“脸上、胸部、腹部，我们浑身疼痛。”阿兹特克目击者说道，“患病的人无助地躺在床上……他们没法起身觅食，人们都病得无力照料其他人。不久，病人就饿死在自己的床上。”人们对疾病造成的美洲原住民死亡人数仍有争议，但近期的DNA研究表明，在16～17世纪，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

这场人口灾难使得入侵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洗劫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安第斯山地区的波托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白银矿藏，这里的白银也被欧洲人挖走；欧洲人还从非洲运来奴隶，来填补原住民劳动力的损失。美洲原住民与欧洲入侵者之间的野蛮争斗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但西班牙人面对的最大威胁并非美洲本土的抵抗，而是来自其他欧洲人。1600年，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开始试图挤进西班牙人的生意。

对这些后来者（主要是英格兰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来说，他们面

对的困难更多。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在美洲还有更多的类似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被洗劫，结果在寻求黄金国的征途上丢掉了性命。大多数人则认为，西班牙人已经窃取了一切值得窃取的财富。（一份报告总结说，新墨西哥一无所有，除了“不穿衣服的人、假的珊瑚和4块水晶”。）因此，如果他们也想发财，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尝试发现新的贵金属矿脉（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世界上中奖率最低的彩票”），要么抢劫那些把白银运回西班牙的船只。

英格兰人显然就是这么想的。1585年，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洛亚诺克岛上设了一个海盗老巢，但是那里的殖民者却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在1607年建设了詹姆斯镇的绅士们寄希望于找到黄金和宝石，但很快他们就大失所望，并且开始饿肚子了。后来，人们在一处垃圾站的遗迹中发掘出一具14岁女孩的骸骨，上面的痕迹表明，在1609~1610年的那个冬天，殖民者们已经不得不开始吃尸体了。但到了1612年，憔悴的幸存者们却有了一项重大发现：在他们沼泽密布、疟疾盛行的新家园里，茂盛地生长着烟草。这里的烟草虽然不像西班牙人在古巴种植的那么好，但是价格低廉，英格兰人也很愿意购买这种烟草。

与此同时，魁北克的法国殖民者和曼哈顿的荷兰殖民者发现，欧洲人十分乐于购买美洲的毛皮。于17世纪20年代从英格兰逃到马萨诸塞的一群虔诚的避难者们此时则欣然地向那些曾经追捕他们的人出售用于制作船只桅杆的木材。到了17世纪50年代，清教徒们开始向加勒比地区出口食物，因为加勒比一带的种植园庄园主已经把那里的每寸土地都用来种植糖料作物了——这种神奇的东西卖得比烟草还要好。货物从大西洋的西岸被运送到东岸，而人口——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白色瘟疫”——则沿着相反的方向流动。

不过，在美洲以外的地方，欧洲对全世界的战争起初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距离、疾病、人口、外交和武力这几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欧洲人没有那么有利。非洲西部是美洲矿场和种植园中奴隶的主要来源，欧洲人在这里也获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在这里，欧洲人却经常在微生物领域的战争中吃败仗——这主要归咎于黄热病和疟疾。只有在类似开普敦附近这种不那么适合疾病流行的地方，欧洲人才能真正掌控一切。荷兰殖民者于1652年在开普敦一带登陆，随后将当地的科伊科伊农民向内陆驱赶了50英里；1713年，一场天花大爆发彻底终结了当地人的抵抗。

不过，这只是个例外。通常来说，欧洲人除非能幸运地取得外交方面的突破，否则他们很难取得什么进展。例如，在非洲西南，葡萄牙商人从1531年就开始沿赞比西河向上游发展，但穆塔帕王国（15世纪40年代大津巴布韦衰落后，继承其部分领土的一个国家）却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一直到了1600年左右，穆塔帕的国王被一场叛乱弄得身心俱疲，才对葡萄牙人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了保住自己的宝座，国王邀请葡萄牙士兵和传教士进入王国内部。到这位国王于1627年驾崩之时，他请来的这些顾问们已经拥有了可以挑选其继任者的权势。

一直到1700年，欧洲人只要能在海岸上取得一小块立足之地，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意了。在这些地方，商人们建造起城堡，并且尽量与当地人达成一些协议。“你们有三样我们需要的东西，”一位非洲酋长告诉一位欧洲商人，“火药、火枪和枪手。而我们有三样你们想要的东西：男人、女人和小孩。”因此，在1500～1800年，欧洲人从相互交战的非洲酋长手中买到了大约1 200万人，并把他们用船运到了大西洋彼岸。

欧洲人在亚洲最初的地位，要更加岌岌可危。疾病这一因素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任何优势，因为从14世纪黑死病的爆发开始，亚欧大陆上的各种疾病已经基本上在整块大陆都交流过了。因此，在疾病因素上就形成了一种平衡，欧洲人甚至还处于略微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仍然无法抵御热带地区的疟疾。

另一个难以逾越的因素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遥远距离：里斯本到卡利卡特有8 000英里之遥，到马六甲还要再走2 000英里，接着要再走2 000英里才能到达广州。荷兰水手在1611年找到了一条近路（荷兰人在好望角附近乘着西风行驶到接近澳大利亚的位置，接着再向北抵达东南亚，这一航线比葡萄牙人沿着海岸行驶的航线要短2 000英里），但即便到了1620年，在亚洲的欧洲人仍然只有20 000人左右，而他们面对的印度洋沿岸的亚洲人就有2亿之多，更不要提在中国还有1亿人。

亚洲人无法阻止欧洲船只的到来，但实际上，一直到17世纪，他们也并未真的想阻止欧洲人的到来。古吉拉特的苏丹认为，“海上的战争是商人的事情，无关国王的威严”。他说的并不算太错。葡萄牙人的克拉克帆船或许会对马六甲这样的小城邦形成实际威胁，但是对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和日本来说，他们顶多算得上恼人，而谈不上威胁。在他们看来，欧洲人与海盗是一类人，他们都会杀死沿岸城镇的居民，从而导致帝国收入减少，但是只要他们的活动在一定限度之内，放任他们所产生的成本要比征伐他们所产生的成本低得多。甚至，与欧洲人保持良好关系还能带来好处，特别是当皇帝想要购买枪炮的时候。

在印度洋沿岸，开始形成了一种双轨经济。大帝国继续支配着它们庞大的内部市场，但欧洲人开始插足边缘地带。只要帝国还懒得理睬他们，欧洲人就可以继续相互争斗，争夺国际贸易这块肥肉。

在欧洲人之间的争斗中，葡萄牙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从达·伽马的时代开始，葡萄牙王室就一直严密控制着商人，在里斯本也并未出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卡特尔，而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却分别于1600年、1602年和1674年设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在理论上（实际上通常也是如此），这些私人性质的东印度公司要自己负担在印度洋经营的全部成本。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曾在1614年给董事会的信中写道：“亚洲贸易的开展和持续，仰仗着你们自己的武力保护和支持；而要支撑这些武力，也必须要靠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因此，没有战争，我们无法维持贸易；没有贸易，我们也无法支撑战争。”

负担过重的葡萄牙政府无力与这样的商业模式竞争。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就将葡萄牙人从他们位于马六甲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根据地里赶了出去。在驱赶了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又把目标对准了英格兰人。“世界上的贸易不够我们两国分享，”一位英格兰水手解释说，“因此，两国之中必有一个被赶出局。”在1652~1674年，荷兰和英格兰进行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两国的舰队将新兴的纵队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得益于佩皮斯在海军部的努力工作，英格兰最终在战争中取胜。但随即又有一个新的对手出现了——法国。

对于欧洲人之间的激战，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德里和北京的苏丹、国王和皇帝们完全不以为意。一群欧洲人或许会取代另一群欧洲人，但是更大层面上的力量平衡却没有发生改变。一直到1690年，如果莫卧儿帝国觉得这些外来者在孟加拉一带要求的太多，它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教训英属东印度公司。那一年，入侵的英军有一半死于疾病，东印度公司也只好接受充满“耻辱”的和平。

欧洲人得到的教训看起来很明显：欧洲人在战场上拥有优势，但疾病让这一优势收效甚微。距离、疾病和人口因素都让亚洲帝国变得不可战胜。欧洲人最多只能寄希望于争夺亚洲人的残羹冷炙。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每一个帝国，早晚都会遭遇坏运气、大洪水或是错误的决策。1707年，厄运找上了莫卧儿帝国。伟大的奥朗则布（Aurangzeb）在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之后撒手尘寰。这位坐在孔雀宝座上的君主在执政末期与国内各色人等交恶：先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是做实际工作、帮助他统治国家的拉者[8]、纳瓦卜[9]和苏丹们。在奥朗则布驾崩后，他以前的部下们抓住时机摆脱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法律和秩序崩溃了，人们开始大肆使用暴力，整个国家开始变得四分五裂。

到1720年，地方上的王公们开始互相算计，彼此征伐，同时既把矛头向上对准他们远在德里的名义上的君主，也把矛头向下指向那些不满意的臣僚下属。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参加角逐的各方为了支持自己的行动，不惜让自己债台高筑。“我拜倒在（债主）脚下，把额头都磕破了。”有人在18世纪30年代抱怨说。毫无疑问，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都非常乐于利用这一外交机遇，借钱给那些可能成为纳瓦卜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直接再把借来的钱交回到公司手上，以雇佣欧洲军队的时候。

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令人焦躁不安的。在积极方面，如果公司支持的人最终取胜，那么公司就会有拥戴之功，或许还能因此而赢得在他们的海岸据点附近进行管理和征税的权力；而在消极方面，战争会中断公司赖以为生的贸易，从而导致公司破产。在这个充满密谋、不停变换的政治世界中，头戴三角帽、沉默寡言的人们来往于欧洲人的城堡与拉者的宫殿之间，时而背叛别人，时而被别人背叛。

“王公们获得了独立，”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道，“而独立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在东印度公司里，并没有多少人想毁掉这些王公，但是这样的事情恰恰就在印度南部的卡那提克地区发生了。这一地区的情况比其他地方更加混乱，因为心怀鬼胎的纳瓦卜和苏丹们不但可以与英国人（他们的大本营在马德拉斯）打交道，也可以选择与法国人（他们的大本营在本地治里）合作，甚至可以让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互相发生冲突。1744年，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听说英国和法国又一次在欧洲开战之后，它们不约而同地决定派兵介入卡那提克地区的事务，这很快引发了一场多方参与的冲突。

英法之间的冲突使得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军事革命在莫卧儿帝国的崩溃过程中有了用武之地。如果印度在17世纪40年代四分五裂，那时的欧洲人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利用这一机会，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欧洲人的职业军队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欧洲军队的人数很少，通常不会超过3 000人，而且大部分军人并非欧洲人，而是招募来的当地人。但一旦开启战端，隶属于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极富纪律性的士兵经常能够击溃人数十倍于己的当地军队（即便印度人派出战象，也依然如此）。用一场战役中的幸存者的话说，欧洲军队就像“一堵喷火的墙”。

卡那提克战争提高了两家东印度公司的赌注。在这场英法之间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不仅可以控制沿海一带的贸易，还可以占有整个卡那提克地区。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两家公司面对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两家公司来到印度的目的都是赚钱，而商业逻辑要求双方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1754年，法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寻求退出战争的策略，但英国人没有这么做。

在过去的150年中，欧洲大国一直在争夺贸易和殖民地，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在本土的战争。在这方面，英国人做得最好。用一位作家在1718年的话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应当受到重视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贸易开展得如此广泛”。不过，一些英国人开始发问：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观念是错误的？英国在印度的贸易不应该是赢得欧洲战争的手段，恰恰相反，或许欧洲的战争才应当是手段，而在印度获得更多贸易权利才是目的？

通常，重大的战略层面的转变要花费一到两个世纪才能够完成，但是这次战略转变在伦敦进行着。经过激烈的辩论，由贸易利益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开始逐渐将英国引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欧洲战争的目的仅仅是分散法国的精力，从而使英国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和贸易权利。

英国政府开始向法国在欧洲的其他敌人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卡那提克依然延续过去的做法，把自己选中的纳瓦卜扶植上宝座。随后，公司就开始大肆勒索他，从他的手中夺走税收，并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左右经济的运行，从而为公司攫取了巨额利润。1756年，在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地区，一位新立的、亲法的纳瓦卜

开始制造事端。东印度公司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重复其在卡那提克的策略。

但这个纳瓦卜却先发制人，突袭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并且在6月20~21日的那个漆黑而令人窒息的夜里，将超过100名俘虏塞进了应当容纳8个人的监牢。到了清晨，其中半数人已经死于窒息或中暑。这一事件被称作“加尔各答黑洞”。为了报仇，英属东印度公司派出了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他不讨人喜欢，但是卡那提克战争中无可争议的“英雄”。

克莱武并没有选择直接把这位纳瓦卜赶出加尔各答，而是率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加入了孟加拉一支反对这位纳瓦卜的叛军。就这样，他控制的军队人数达到了他原本手下人数的20倍。随后发生的普拉西战役，其过程甚至有些可笑。纳瓦卜的炮手们无意中炸坏了己方的大炮，惊吓了拖炮的大象。接着，纳瓦卜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英国人属意的下一任纳瓦卜人选率众临阵倒戈，纳瓦卜的其余部队随即土崩瓦解。英属东印度公司因而又取得了孟加拉的征税权，而克莱武本人则从纳瓦卜的国库里分到了16万英镑的红利（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亿美元）。

孟加拉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两年中，英国和它的盟友一起设法让法国的精力耗费在德国身上，而英国自己则夺取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加勒比岛屿和整个加拿大。一支英国军队在印度再次击败了法国人，而英国皇家海军则两次击溃了法国舰队。从没有什么战略如此成功。1783年，伯克曾经对英国下议院的议长说：“在我出生的时候（1729年），或是你出生的时候（1735年），如果有人说，今天，我们会在下议院里，讨论那些将莫卧儿帝国皇帝的权力乃至其本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英国子民，恐怕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吧。”

“看不见的拳”

从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到1783年伯克进行演讲之间的这段时间，西欧人占领了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他们不仅再一次开始了建设性的战争，而且为之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把建设性的战争的规模扩大到了全球，创造出拥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当他们越过大洋，在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战争之时，西欧本土的暴力死亡率却在以空前的速度下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

自从罗马帝国在1 000年前覆灭以来，15世纪或许是欧洲人见过的最为血腥的一个世纪。在15世纪，没有雇主的雇佣兵们在法国和意大利肆虐，英格兰则因为内战而分崩离析。“啊！这凄惨的景象！啊！这血腥的时代！”莎士比亚笔下的“疯王”亨利六世（Henry VI）在1461年呼喊

道。其时，5万人正在暴风雪中相互厮杀，以决定英格兰王位的归属。从考古学家在陶顿战役遗址的发现来看，他也许真的如此呼喊过。一名士兵（现在他被称为陶顿25号）的头骨被人连砸了8次：前5次击中了面部，但无一致命；紧接着的一下重击击碎了他的颅骨后部，碎裂的骨头穿过了他的脑子。他朝前倒下，但接下来的一下把他打得仰面朝上，最后还补上一剑，把他的脸切成了两半——剑穿过了他的一个眼窝，然后一直切到他的咽喉（见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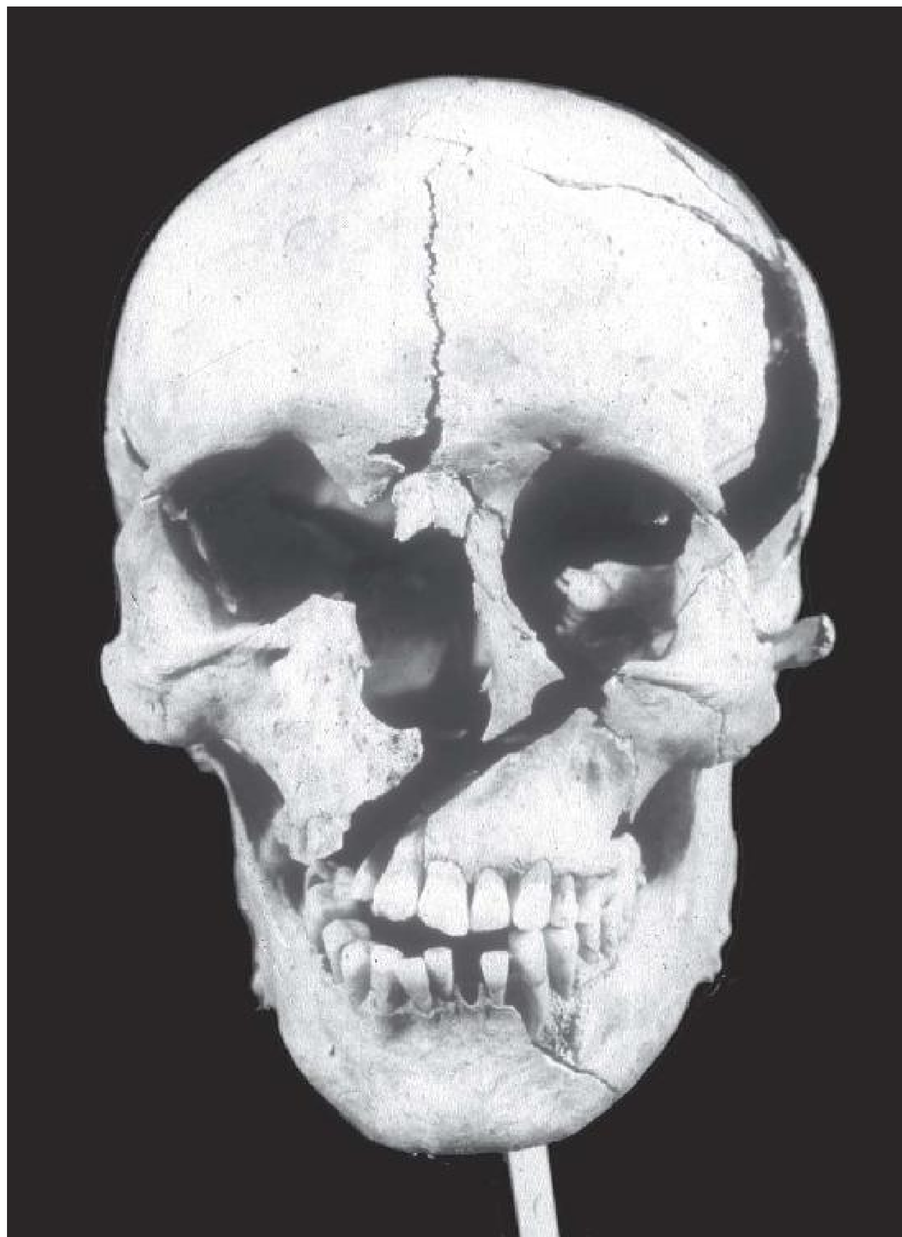


图4–4 血腥的时代：陶顿25号碎裂的颅骨，于1461年被敌人连击8次

资料来源：摘自《生物人类学》，布拉德福德大学生物人类学研究中心，陶顿墓群项目。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陶顿32号头上受了13处创伤，其中一处有意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王位争夺者本人也不能幸免。1485年，在内战的最后一战中，理查德三世（由于有DNA佐证和脊柱侧弯的特征，他的遗骨在2013年被辨识出来）被绑了起来，有人用剑刺入了他的头部，然后又用斧头劈砍。在他死去之后，他的遗体又被从臀部刺穿，最后丢到了一个坑里。

在伯克于1783年发表演讲的时候，没人会设想这样的暴力行径会再度发生在西欧。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它们竭力想要弄到金钱以供养庞大的陆海军，打造威力巨大的新式船舰火炮，培养职业军官和士兵。这就是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的进程”，一个充满理性、秩序和繁荣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会让亨利们和理查们瞠目结舌。

但这一过程也并非举世皆然。在17世纪，同样有一批国家倾覆了，因此刺激霍布斯写作了《利维坦》。但到了1783年，海盗和拦路抢劫的强盗逐渐成为历史［1718年，大海盗黑胡子身中5枪毙命；1739年，大盗迪克·特平（Dick　Turpin）被绞死］，凶杀率在下降。在15世纪80年代，差不多每100个西欧人里就有一个会被杀；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一概率下降到了1‰。伯克所在的英格兰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西欧在重演古代历史。就像罗马人、孔雀王朝和汉朝一样，西欧人也在创造更大的利维坦。就像古时候一样，这一过程也充满了暴行和剥削，但从长期看，它将带来暴力死亡率的降低和繁荣。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写了大量雄辩的文章和充满学识的论著探讨“古代和现代的战争”，辩论现代的战争是否或是在何时超过了古代的成就（不管怎么说，我在之前写作的《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这两本书中描述的社会发展指数或许可以帮助他们解答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时间在1720年左右）。不过，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像他们对建设性的战争所做的那样，欧洲人不仅再一次开始建设利维坦，而且为之赋予新的意义。

西欧人的帝国并非像传统的大陆帝国那样建立在自己所在的大陆，而是跨越了海洋。因此，西欧人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并且创造出规模空前的财富。单单是英国的出口额就从1700年的200万英镑急剧增长到那个世纪末的4 000万英镑。

正是大西洋让这一种新经济模式不同以往的任何模式。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后，北大西洋就变成了大小适中的一个海域：它既足够大，可以在其沿岸拥有各色各样的生态圈和社会；它也足够小，可以允许船只在其中穿梭，在各个地点进行贸易，并且取得稳定的利润。

历史学家通常将这种贸易称为“三角贸易”。商人可以从利物浦出

发，满载着纺织品或火器驶往塞内加尔，赚取一笔利润，并且换得奴隶。随后，商人可以将奴隶运到牙买加，再赚取一笔利润，并换得糖。之后，他可以将糖运回英格兰，再大赚上一笔。随后，他再次装载上制成品，出发前往非洲。另一种三角贸易的路线则是，波士顿人可以将朗姆酒带到非洲去，换得奴隶，再把奴隶运到加勒比地区，换取糖浆，再把糖浆运回新英格兰，然后再买进更多的朗姆酒。

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带来了完全始料未及的结果——它带来了一体化的跨大陆的市场，在地理上完成了劳动力分工，并且让每一个海岸的人都变得富有。它让毗邻北大西洋的每一块陆地都获得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并且鼓励企业家们在某一领域有所专长：不管是在非洲抓捕奴隶、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开辟种植园，还是在欧洲和美洲北部从事制造业。

这种新的经济模式要能够顺利运行，就需要能够推动专业化发展的新型政府。因此，在非洲西部产生了强势的国王；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出现了种植园寡头；在西北欧和美洲西北部，商业精英们开始挑战集权君主。每一次政府变革都会产生冲突。非洲人为了获取奴隶，就去袭击他们的邻居；美洲的移民者夺去了原住民的土地；欧洲人则为了争夺商路攻击对方的船队。

凡是被这种新的大西洋经济影响到的地方，所有的固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在西欧，廉价的航运使得普通人也能接触到一些小奢侈品。在18世纪，对一个兜里稍微有点钱儿的男子来说，可供选择的商品远不只是更多的面包，他可以买到那些来自遥远大陆的神奇东西——茶、咖啡、烟草和糖，或是本国出产的物件——烟斗、雨伞和报纸。与此同时，大西洋经济还造就了让人们获得所需的金钱的机会。贸易商们愿意购买所有他们可以运到非洲或美洲的东西，不管是帽子、火枪还是毯子，所以，生产商们也就愿意花钱雇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一旦进入城镇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人们就不再自觉跟着父辈进入农田干活了。有些人全家上阵纺纱织布赚钱；有些人则离开了农田，进入了工场。虽然各地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在17～18世纪，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向自己的雇主出卖劳动力，而且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可以购买越多的糖、茶和报纸。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奴隶会被运到大西洋彼岸，更多的土地会被开辟为种植园，更多的工厂和商店会投入运营。

1776年，哲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总结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既非掠夺，亦非征服，更非垄断。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劳动分工。他在书中说，劳动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为了追求利润，人们开始专注于那些他们擅长的或是可以低成本从事的领域，随后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换取其他人擅长或是可以低成本生产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些产品和服务获得了市场之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会降低，质量就会提高，从而提

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我们获得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非依靠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亚当·斯密写道，“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由于一个人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亚当·斯密解释说，“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显而易见地，政府对人们的干预越少、越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越好地发挥效果，人们也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政府会愿意这样做吗？在过去的5 000年里，统治者最重要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掠夺富有的子民，即便是最为勤勉的坐寇有时候也禁不住这种诱惑。而亚当·斯密设想中的世界则要求统治者赌上一把。他告诉统治者，掠夺你的子民确实会让你占有的国家财富的比例更大；而如果统治者愿意少分享一些利益，他们在长期会获得更大好处，因为国家财富这一整块蛋糕会变得越来越大。在国王独享大权的部分西欧国家——尤其是西班牙——这种说法似乎没什么吸引力。但在英格兰这样的君主权力较弱的国家，或是荷兰这样干脆没有国王的国家[10]，政府更愿意给予新富的商人们更多自由，开拓新兴的大西洋经济。（而最先产生新兴暴发户的法国，则介于这两种国家之间。）

让那些出身名门的情感脆弱的贵族们稍感安慰的是，这些在贸易中发财的新贵经常也会买下乡间的田庄，并且一有机会也迫不及待地戴上抹了粉的假发。不过，大西洋经济带来的资本化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与这些出身寒微的人做一些交换，它还意味着要邀请他们进入权力核心。经济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要求。那些试图抗拒这一潮流的国王可能会丢掉他们的宝座［例如1688年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甚至丢掉他们的脑袋［例如1649年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和1793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但对于富有的商人们来说，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美酒和玫瑰。按照传统的统治方式，国王会把征税、解决纠纷和管理市场垄断行为等职权下放给地方名流。这些人通常会中饱私囊，但是同时也降低了政府的开销。允许人们进行自由贸易意味着打破这种过时的运行机制，把控制权递到“看不见的手”里。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有新的机制去确保法律的执行和秩序的维系。唯一可以做到这点的就是中央政府。让市场良好运转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单纯让政府远离市场是不够的，甚至，政府还需要介入市场，创造出一整套由更公正的官员、法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体系。非此，“开放的秩序”［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在他们的合著《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中如此称呼这种新的体系］就无

法发挥作用。

我们不能夸大变革的规模和速度。按照21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的政府仍然很小。贵族们依然期待获得他人的尊敬，他们大多数时候也确实能够如愿；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民主”都还是一个惹人生厌的词汇。但不管怎样，统治者开始更加在意普通人的利益。而要获得代表权，其代价就是向政府纳税；有了更多的钱，政府也就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逐渐将利维坦的触角深入到民权社会之中。在率先走向开放的英格兰，政府办公人员的数量在1690~1782年增加了2倍，税收则增长了6倍。“看看我们桌上的法令汇编吧，”1743年，巴斯伯爵不屑地说，“简直可怕。单是看看索引就让人感到恐怖，连着好几列，你都看不到别的东西，只有税、税、税。”

尽管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那些选择了开放政策的政府的表现显然要比其他政府更好。从马德里到君士坦丁堡，许多统治者仍然捍卫着皇室、贵族和教权在商人面前的特权。他们限制贸易准入，制造垄断，继续掠夺臣民的财物。结果，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些国家开始面临饥饿、困苦和贫穷。与此相反，在欧洲的西北部，统治者更愿意尝试新的方式。他们强忍着与商人们达成协议，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得比人口增加的更快（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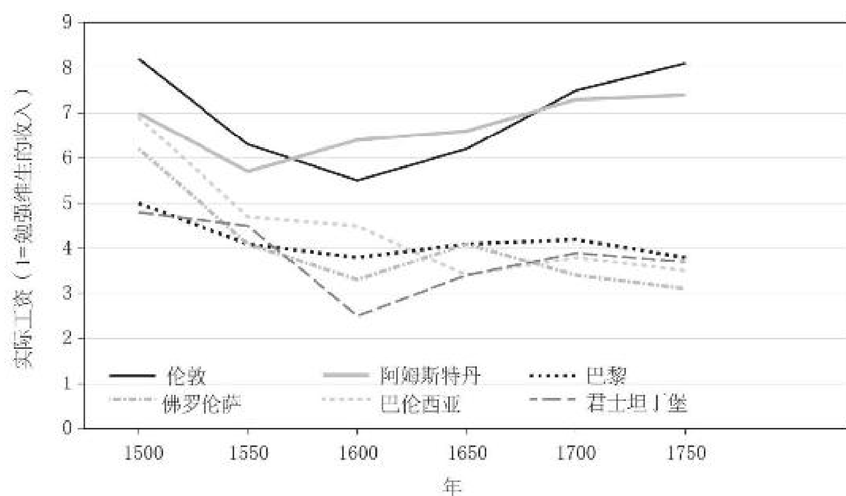


图 **4–5**为工资而劳动的人取得的工资：**1500~1750**年，在欧洲西北部和南部，非熟练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

亚当·斯密认识到，在国家内部的关系调整只是一个开始，统治者还需要重新调整国家间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在迫使亚洲、非洲和美洲进入一个急剧扩大了的市场之后，欧洲各国极大地增加了世界上的财富。但他指出，由于市场已经变得如此之大，欧洲“应当主动放弃其在殖民地的管辖权，让殖民地选举自己的管理者，制定自己的法律，并且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战争或和平”。如果亚述人、罗马人或其他的古代帝国想要放弃其行省、依靠贸易致富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疯了。但亚当·斯

密认为，现在如果允许殖民地各行其是地进行贸易，会给统治者带来净收益。

“这种做法，”亚当·斯密也承认，“以前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过，将来也不会有。”但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们让他们的宗主国无须再考虑是否要听从亚当·斯密的建议——他们反叛了英国。思想陈旧的政治家们认为，失去北美殖民地将毁掉英国的大西洋贸易，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亚当·斯密是对的。到了1789年，英美之间的贸易就恢复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水平，并且继续增长。

在18世纪晚期，解释这一现象成了一个在很多领域都十分重要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是我要在本书中进行回答的那个问题。我一直在说，在农耕出现后的10 000年里，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利维坦，利维坦则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并维持其内部的和平，从而使得经济得以增长。因此，建设性的战争推动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富庶。然而，美国独立战争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将大英帝国的一大块领土分裂了出去，因此它显然应当是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按照我此前使用的定义）。但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导致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过的种种灾难，而是英国和新生的美国都比以往更加富裕了。或许，美国独立战争告诉我们，本书的核心论点根本就是错的。或许，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真正秘诀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追寻个人利益的自由，而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来制定规则，并用暴力确保规则的实施。

在18世纪晚期，许多学者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恰是卢梭挑战霍布斯的时代。卢梭指出，在产生政府之前，人们生活在和平而快乐的自然状态之中。那也是属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他畅销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告诉美国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最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美国的一些革命家，尤其是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民主共和党[11]人试图将这种新的理论付诸实践。另一些人则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首，被称作联邦党人，他们反对“政府将变得无用，摆脱了政府束缚的社会也能存续，并且将蓬勃发展”的观点。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对杰斐逊说，事实是，人是其自身暴力冲动的奴隶，“只有武力、权力和力量能够制约之”。

亚当·斯密则站在两条道路之间。他说，就看看英格兰在1651年通过的《航海法案》吧。这一法案的主要设立动机是在英格兰殖民地的贸易中排除荷兰人的竞争，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个法案是灾难性的。将荷兰人排除在外，导致英格兰的市场变得更小，也让所有人都变得更穷。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法案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崛起中的荷兰已经威胁到了英格兰的生存。亚当·斯密指出：“安全要比繁荣重要得多。因此，《航海法案》或许是英格兰所有的商业法规中最为明智的一个。”

《航海法案》解释了大西洋经济的那个基本问题，也是开放秩序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共同面对的问题。政府如果不离开市场，那么市场就无法良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如果不参与市场，市场则根本不能运转，因为市场需要政府出面赶走怪兽，确保世界的和平。暴力和商业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看不见的手”需要“看不见的拳”为其铺平道路。

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逐渐告诉人们要怎样解决这个谜题——解决方案并非是消除利维坦，而是要建立一个跨越整个世界的利维坦。这个利维坦将是一种全新型的坐寇，它高高在上，不偏不倚地维护国际的开放秩序，并且阻止那些更小的利维坦干预“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欧洲西北部那些新兴的、对商业表现出友好态度的政府在本国内做到的事情，也是这一新兴的、对商业表现出友好态度的利维坦要在各国之间做到的事情。利维坦将扮演公正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从而让人们在经济上的自利因素的驱动下加入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放弃了掠夺和垄断权的“世界警察”将是这个巨大的市场中享有最多特权的参与者，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世界警察”的富裕程度将是此前的那些利维坦闻所未闻的。

战争再一次接近了它的顶点。自从在15世纪重新发明了建设性的战争之后，欧洲人已经对这个星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征服，创造出了空前规模的市场，但是那些曾经带领他们走向成功的策略如今却在引领他们走向灾难。为了在这个由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的全球贸易的崭新世界中生存，各国必须接受开放的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预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准备好去全心全意地采取这样的措施。即便是在北美遭遇了失败之后，英国仍然积极地加强其对印度的控制。不过，英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要想获取更大的社会带来的好处，并不一定非要控制北美，而只要控制海洋就可以了（因此，《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这首歌在1740年问世也就没什么好感到奇怪的了）。英国正一点点儿地接近于成为“世界警察”，用它那“看不见的拳”管理海路，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铺平道路。

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并没有过时，它们反而演进出了更新、更具威力的形式。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要再经过一代人的杀戮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个新的力量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

在亲历了这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才是18世纪末的真正遗产。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

非是随意为之的：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是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并且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

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应想到。许多欧洲观察家们坚持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认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仅仅是一盘散沙：如果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及冯·施托伊本——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军官，他将大陆军训练得更接近于职业军队——参与进来，美国人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在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人进行了一场新颖的人民战争之后，他们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军队简直微不足道。一直到1791年，以寡敌众的迈阿密印第安人还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歼灭了一支美国军队。印第安人杀死了600名白人士兵，并且把土塞进他们的嘴里，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很多欧洲人认为，如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结果，那么不要也罢。

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给欧洲人留下印象的，并非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而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发布的关于超越战争的声明。就连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称得上知兵的乔治·华盛顿也对法国记者说“是让骑士精神和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终结的时代了”，因为“商业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将取代战争和征服……就像《圣经》中所说，‘列国再也不学习战事’”。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的文学沙龙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提议，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启迪。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要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康德或许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广受争论的专著而闻名［就连其他的哲学家起初也觉得他长达800页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涩难懂］，也以其严谨的生活方式而著称（他餐后都会大笑：并非因为他喜欢笑，而是这样有助于消化）。不过，《永久和平论》既不庞杂，也不严厉，康德甚至在其开篇还开了个小玩笑：他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取自“荷兰一家旅店标识上的讽刺文字，那标识上画了一处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德指出永久的和平在当前就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原因在于开放的共和国比封闭的君主国更善于经营商业。“如果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国里那样，那么“公民们很可能会对进行这样不高明的赌博持谨慎态度”。而一旦共和国弃绝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也应当为其自身的安全考虑而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公民组织的组织之中，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如此就形成了国家联盟”。这样一来，就

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论》仍然颇具影响力，经常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要求阅读（有时候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问世的179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就已经很显然是错误的。共和主义非但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欧洲推入了战争之中。

事情的诱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削弱英国，而给予美国革命者异常慷慨的军事援助，这简直是整个18世纪最具讽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为此大量举债，到了1789年，他已经无法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了。他试图增税，结果引发了纳税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革命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并在不久后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前前后后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国人还有16 592人。

惶恐的欧洲大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图恢复局势。1793年，法国革命者们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发动了一场威力超乎克劳塞维茨想象的人民战争。“整个国家都投入其中，”克劳塞维茨说道，“只要是有用的资源，都被投入战争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00万法国人就此加入了战争。

康德认为，共和国的公民们对进行战争这种不高明的赌博会持谨慎态度。在这点上他可能说得不错，但一旦公民们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在职业军人身上鲜见的暴力的狂热参加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罗来纳两州进行的大战之外，罕有什么激烈的大战。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人们却带着一种狂热的正义感投入其中，并把矛头直指战争中的敌人。一位法国军官在1794年写给他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愿兵亲手杀死了3名妇女。这无疑是暴行，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那一年，革命军把25万乡下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他们嫌枪决和断头台处决的效率太低，干脆把平民绑在一起丢进河里。“卢瓦尔河变成了一条革命的河流，”指挥官揶揄道，“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将这些恶魔从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过，当革命者面对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在美国革命者最初面对英军和效忠英国的黑森雇佣军的时候，他们也曾遭遇同样的窘境。法国的人民军队人数众多，纪律涣散，指挥乏力，特别是在他们将那些反动军官都斩首或驱逐出境之后。拯救法军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队，因为炮兵部队保留了那些非贵族出身、在革命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的军官们。1796年，这些炮兵军官中的一个——个头矮小、喜欢争吵、来自外省的拿破仑·波拿巴——找到了将人民军队变为胜利之师的方法。

革命者们声称：“我们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战术，只需要火、铁和爱国精神。”而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口号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部队

抛弃了经常拖住职业军队后腿的补给线，转而在所经之处购买或是抢夺他们需要的资源。17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了，因为军队的规模已经太大，无法在行军沿途经过的农场中弄到足够的物资。但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分解成兵团和建制更小的师，让他们分别沿一条路线独自行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个兵团或师也可以独立作战，但拿破仑的胜利秘诀是，各支部队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敌人的地点，从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战。

在战场上，拿破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无法像传统的职业军人那样完美地运用复杂的线性战术，因此他也不要求他们做到这点。相反，成群的散兵会狙击敌人整齐的队列，而大群的法国步兵则在密集枪炮的掩护下排着参差的队列前进。一旦接近敌军，法军阵列就会分散为混乱的战线，对敌军进行齐射，用人数的优势弥补准确度的不足；法军也可能会继续前进，举着固定好的刺刀冲入敌阵。敌人的职业军队也经常会在法军的冲锋下丢下火枪逃走。

就在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时期，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的目标正在不经意地由保卫革命果实演变成了扩大革命成果。1796年，拿破仑席卷了意大利北部；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1800年12月，法军打到了距离维也纳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德去世后三年，拿破仑占领了康德的家乡柯尼斯堡。

欧洲的人民战争的方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在英国人于1781年于约克镇投降后，美国人便铸剑为犁。将军们都回到了自家的农场，而杰斐逊和他的同道中人则顽固地抗拒着中央集权、税收、国债、常备军以及利维坦常用的其他工具[12]。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腐朽的欧洲人截然不同。而实际上，美国在遇到危险时（比如在18世纪末，当美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入侵时）也回到了利维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国与欧洲的真正区别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区别。在1781年之后，美国的存在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威胁。因此，美国人可以只维持很弱小的军事力量，甚至开始讨论他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利维坦。与此相反，欧洲国家的周遭都是虎视眈眈的邻国。一点点儿的劣势可能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为了生存，共和国也必须像君主国一样拼命战斗。

在美洲和欧洲，爱国热忱的勃发都是开放秩序兴起的一部分。不过，拿破仑发现，人民战争并非必须伴随着共和制度，从而使欧洲的人民战争与美国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分道扬镳。1799年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让拿破仑成了法国实际上的君主。1804年，拿破仑公开加冕称帝。自此，法国大军的战争目标就变成了旧式的帝国扩张。乔治·华盛顿相信，商业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而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从1806年开始，拿破仑开始试图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利用战争控制商业。他要求被打败的敌人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即对英国展开贸易禁运，将其逐出欧洲市场，从而让英国破产。

经过了将近1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欧洲历史上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1813年有60万人参战的莱比锡战役），事实证明拿破仑是错的。如果要想靠战争制约商业，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用法国的舰队取得制海权，从而终结英国的贸易。但由于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比起法国人，英国总是能造出更多更好的船只，训练出更多更好的水手。拿破仑在海上的努力徒劳无功。由于英国的全球贸易依然可以进行，欧洲人很快发现，他们对英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要高于英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始想方设法绕开“大陆封锁体系”，继续在英格兰的市场中进行贸易。

拿破仑为了推行“大陆封锁体系”而进行的战争很快超越了人民战争的顶点。从1799年开始，他证明了他可以利用人民战争将自己送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现在，欧洲那些立国更久的君主们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将他赶下皇位。1808年，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以使西班牙留在“大陆封锁体系”之中。随后，他就陷入了全民起义的泥潭之中（见图4–6）。英国正规军支援着西班牙起义军在接下来的6年中拖住了数十万法军。



图**4–6** 人民战争：**1808**年**5**月**2**日，西班牙起义者在马德里对法军展开了游击战

资料来源：PhotoAISA，巴塞罗那。

拿破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依旧是为了维护“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又入侵了俄国（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正是这一事件让克劳塞维茨提出了顶点理论。在他的祖国普鲁士向法国屈服之后，克劳塞维茨于1812年作为志愿者加入俄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反法情绪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反应，正是拿破仑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拿破仑走得太远了）。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在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短短两年之后，俄国人就进入了巴黎，放逐了拿破仑。但随后，形势再次发生了逆转。1815年，在戏剧性的100天之内，拿破仑先是突然回到法国，再次召集

起一支军队，随后险些在滑铁卢击败了英国人。再次失败之后，拿破仑被放逐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

面对拿破仑那旧式的军国主义和时髦的人民战争的结合体的挑战，英国这个新式的、开放的贸易帝国取得了胜利。到拿破仑于1821年去世时（有人说英国人下毒加速了他的死亡），英国已经如同一个巨人俯瞰着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世界警察”的身份开始给英国带来好处：用英国战舰监管航道确实要产生成本，但这笔钱花的值得，因为从1781～1821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英国的工人也成了这个星球上产出最高的工人。

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国度，同时也解决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

日不落

亚当·斯密认为，更大的市场会带来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从而逐次提高生产率、利润和工资，形成良性循环。但一旦劳动分工的细分程度达到了极致、劳动效率已经无法再继续提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亚当·斯密没有杞人忧天地担心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未出现过。但到拿破仑去世的时候，亚当·斯密的后辈们却非常忧心这一问题。此时，英国工人的工资已经太高，导致一些英国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已经实在太过昂贵。英国公司要想维持经营，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降低工人工资。在19世纪初，伦敦人的平均工资比他们的祖辈低了15%。在战争中取胜的英国人似乎要在和平时期落败了。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猜测有一条工资的铁律。劳动分工、帝国扩张和英国成为“世界警察”这样的事件都会暂时提升工资水平，但最终工资总会下降到让人挨饿的边缘。有些人预测，19世纪将是一个悲惨的时代。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用新的方式一同发挥了功效。

故事得从衣服开始。由于每个人都需要衣服，因此纺织品是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因为潮湿多草的国家适合绵羊的生长，所以不列颠人有着许多个世纪穿羊毛服装的历史。不过，随着东印度公司深入亚洲，它开始从亚洲把成卷的色彩艳丽、价格低廉的棉布运回本土。这些棉布大受欢迎。

羊毛商人对棉布带来的竞争深感不满，于是采取了亚当·斯密最为反感的一种方式进行反击：他们游说议会，要求禁止进口印度的棉花，以此干预市场。由于棉花无法在英国生产，因此布商们只好从加勒比地区

的英属殖民地进口棉花（这是合法的），并且在英国本土纺纱织布。但英国工人纺纱织布的成本更高，做得也没有印度工人好。到18世纪60年代，每销售30件羊毛服装，才能销售出一件棉布服装。

棉布生产的瓶颈环节是纺纱。这一环节要求工人不断重复地将棉花纤维纺在一起变得更紧实，因为需要大量的劳动。据传说，在1764年，这个瓶颈被打破了。当时，一个名叫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看到他的一台手纺车在翻倒了之后，仍然继续转了几秒钟。哈格里夫斯说，他突然意识到，他可以制造出一种纺车，让纱锭不停地从垂直变成水平，再从水平变成垂直，就可以代替人的手指将纤维纺在一起。实际上，他制造出来的机器可以拥有几十个纱锭，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人工。

哈格里夫斯找到了一种遏制高工资下降趋势的方法。他用机器的力量提高了人力劳动的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大受欢迎（或许太受欢迎了，他都没办法保证他的专利权）。1779年，一种更先进的设备进入了市场——这就是克隆普顿（Crompton）发明的“骡机”，它纺出来的棉布不仅比印度的产品更便宜，而且也更精细。

这些看上去与战争史的关系不大。要想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还需要先讨论一个偏离战争主题更远的领域——深入底下的矿脉。在18世纪，煤矿主们则面临着高工资（按照当时的标准）的问题。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英国人开始生更多的孩子，而人口的增多使得人们开始砍伐森林，开辟出更多的农田。随着树木的减少，煤开始取代木柴成为取暖和烹饪的燃料。这对矿工来说是好消息，他们为了开采出更多的煤而在矿井里越挖越深。但到了1700年，煤矿透水事故开始接连发生。为了能够继续开采煤矿，煤矿主只能花大价钱请人排水；而为了喂养拉斗链的马匹，他们也只好在昂贵的土地上种植燕麦。这些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成本压力。使矿主摆脱这一困境的，是最早于1712年应用于煤矿的一项工程奇迹。这种机器用廉价的煤代替了昂贵的人力。它通过燃煤产生水蒸气推动活塞，从而将水抽出矿井；将水抽出之后，人们又可以从矿井中挖掘出更多可供使用的煤。

1785年，一位棉纺厂厂主将他的“骡机”、珍妮纺织机和画眉鸟纺织机与蒸汽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得煤与服装这两个产业发生了联系。生产效率获得了爆炸式的提高。棉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下降到了1807年的每磅7先令。销售量增长得更快。1760年，英国进口了250万磅原棉；到1787年，进口量增长到了2　200万磅；到1837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3.66亿磅。工程师们开始为蒸汽找到了各种新用途，于是蒸汽动力也就进入了一个又一个行业。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一直下滑的英国工资水平逐渐止跌，并且在1830年之后开始上升。工业革命来临了。

蒸汽动力摧毁了欧洲商业最后的壁垒。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与东亚

的遥远距离使得西方的贸易规模一直很小，商人根本无法触及非洲和亚洲腹地的市场。蒸汽改变了这一切。工程师们很快发现，蒸汽机可以装载在轮子上，它们既可以推动海洋中行驶的轮船，也可以推动铁轨上奔驰的火车。蒸汽不仅可以替代生产过程中的人力，也可以取代运输过程中的风力和洋流。蒸汽缩小了空间。

英国人走在了前面。“这个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才出现的，”查尔斯·狄更斯在他那本关于傲慢、偏见和全球贸易的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如是说，“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照明而创造的；河流与海洋是为了供他们航行而形成的；彩虹向他们预示良好的天气；刮风对他们的企业有利或不利；星星和行星沿着轨道运行，是为了确保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系……A.D.与Anno Domini（公元）无关，而只是代表Anno Dombei–and Son（董贝父子纪元）。”

狄更斯于1846年（是公元，不是董贝父子纪元）写下了这段话。1838年，一艘英国蒸汽船不顾逆风或是不利的洋流，以闻所未闻的10英里平均时速航行了15天，横跨了大西洋。次年[13]，一艘更了不起的船从英格兰驶往了中国：装备有火炮和火箭弹的全铁壳蒸汽船——“复仇女神”号。它从外表看上去是如此奇怪，连其舰长都承认：“木头是可以漂浮在水上的，所以我们认为用木材来造船再自然不过了；而铁是会沉入水中的，因此用铁来造船，乍一看上去实在太不合适了。”

“复仇女神”号此次前往东亚，是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争端。清朝政府对西方商人十分不信任，因此多年以来只许他们在狭小的澳门和广州活动，并且对他们买卖的物品种类加以限制。但商人们发现，不论清朝政府的态度如何，清朝的消费者却很愿意购买西方的商品，特别是鸦片。世界上最好的鸦片产自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因此鸦片生意十分兴隆。1839年，清朝决定对毒品宣战。

清朝官员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查抄了价值不菲的鸦片。鸦片商人们进行了一番倾向性鲜明的游说工作，最终说服英国政府向清朝索要赔偿，并且要求在香港得到一块落脚点，还要求商人们（包括鸦片商人）获得进入其他港口的权利。很自然，清朝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们相信遥远的距离能够保护他们。但“复仇女神”号和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很快证明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鸦片战争的交战双方存在着惊人的技术差距。一名英国军官记载道，清朝的平底帆船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的）图画突然实实在在、色彩饱满地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之中。它在我的面前游弋，完全不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进步和一切现代的发明和改进”。入侵者的火炮摧毁了要塞。1842年，清朝接受了英国人的要求。

蒸汽船开始将西方货物堆满中国的沿海城市。1853年，美国的一支小舰队为了寻找装煤站，公然驶入了东京湾。未待美国人放上一枪一

炮，日本政府就屈服了。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无视了舰队司令关于吞并台湾的建议，但形势已经很清楚：任何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都不再能免于西方人的侵袭。

甚至，没有海岸线的国家也是如此。蒸汽船可以在海上航行，或是溯流而上；铁路则可以让西方人深入内陆。不过，在对内陆地区的征服方面，急先锋并不是欧洲人，而是他们在海外的殖民者。欧洲政府此前就发现，那些与宗主国远隔数千英里的殖民地居民认为自己无须听从宗主国的命令。从16世纪开始，里斯本、马德里、伦敦和巴黎都曾经颁布过大量的有关贸易、茶叶、奴隶和印花税的规定，但是巴西、墨西哥、马萨诸塞和魁北克的居民无视了这些规定。即便对于那些比较合理的命令（比如殖民地应当自行负担防务费用），殖民者们也经常拒绝执行，并且对强制推行这些命令的举动进行反抗。在失去了美国之后，为了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在版图之内，英国只好赋予它们美国曾要求过的大部分权利。1803年，法国卖掉了它在北美洲最后一块领地；1825年，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只剩下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葡萄牙则已经失去了其全部美洲领地。

出于对征服成本，甚至有时是对当地居民权利的考虑，欧洲政府在深入内陆方面犹豫不决。而白人殖民者们则没那么多顾虑。《独立宣言》的墨迹未干，美国人就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切诺基战争（1776～1794年）则拉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美洲原住民的进攻之序幕。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人也如法炮制，征服了塔斯马尼亚，并且深入澳洲大陆内陆地区。19世纪30年代，南非的布尔人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并且在血河战役中以3人受伤的代价射杀了3 000名祖鲁人。到19世纪40年代，新西兰人对毛利人开战，美国的疆土则终于推进到了太平洋之滨，从一个海洋扩展到了另一个光辉之海。

原住民的领地开始缩小，而铁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铺设的铁路是欧洲人所铺设的铁路的两倍；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人铺设的铁路长度又分别增加了一倍和两倍。火车这匹“铁马”向西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并且在美国军队将美洲原住民赶往遥远的保留地时为军队提供了所需的给养。到了19世纪80年代，铁路也开始把开普敦的矿工运送到德兰士瓦开采黄金和钻石，或是把俄国殖民者和军人运送到撒马尔罕。1896年，当一支英国军队进入苏丹镇压一次伊斯兰起义时，他们甚至一边走，一边修筑铁路。

阻挡西方扩张的最后一道屏障——疾病，在1880～1920年之间轰然倒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医生们就隔绝并征服了霍乱、伤寒、疟疾、昏睡病和黑死病。只有黄热病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每死亡14个士兵，就有13个是死于这种疾病）。

这一成就带来的后果影响了整个热带地区，但是对非洲的影响最为显著。一直到1870年，还没有多少欧洲人能深入离海岸一到两天步行距离的非洲内陆。但到了1890年，蒸汽船和铁路却将数以千计的欧洲人运

入非洲内陆，药品则保障了这些人的生存。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要想获得象牙、黄金、奴隶和其他想要的东西，只能与一大串的非洲酋长讨价还价，每个酋长都会在利润中分一杯羹。而如今，欧洲人完全可以靠自己。

像往常一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不论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还是在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身上，奎宁和疫苗都同样有效。因此，那些勇闯沙漠、丛林和充满敌意的原住民等道道难关的商人们经常会发现，已经有其他欧洲人捷足先登了。就像几个世纪前在美洲和印度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些人总想说服他们的政府在非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并且把其他西方人赶出去。

吞并一块领土通常只需要几百名西方士兵。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非洲人和亚洲人就一直在努力学习欧洲的火器技术（特别是在1803年印度发生的一次艰苦的战斗之后，当时的英国指挥官承认，“我这一生中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再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西方的火器一直在进步。到了19世纪50年代，来复枪（这种枪的枪管内有膛线，可以让子弹旋转起来，从而增强其射程和精度）的大规模采用，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采用了蒸汽动力的工厂将数以万计的来复枪制造出来，每一支枪的做工都很完美，失灵的可能性比前工业化时期使用的火枪低得多。美国人尤其善于大规模生产。1854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一名工人随机挑选了该厂在此前10年内生产的10支火枪，将它们拆散，再把零件都扔进一个箱子里，随后又重新组装出10支功能完好的枪支。在场的英国人看了大为吃惊，他们立刻购买了美国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恩菲尔德兵工厂。

“没有什么东西是机器造不出来的。”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告诉他们。

一旦像美国内战那样，战争双方都拥有来复枪，而且都知道怎样使用来复枪，数以千计的士兵就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被击倒。1862年9月17日，至今仍然是美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在那一天进行的安提坦战役（美国南方军队习惯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中，伤亡总数将近23 000人。不过，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很少遇到来自来复枪的反击。1857年，亨利·哈弗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率领的一小支英军遭到印度大军伏击，结果印度军队反而被消灭。事后，亨利·哈弗洛克将军评说道：“10分钟之内，胜负已决。”他的这句评语可以用来评述19世纪中叶从塞内加尔到暹罗发生的许多场屠杀。盖特林机枪（1861年取得专利）、卡纳汉和德拉沃特最青睐的马提尼–亨利步枪（1871年问世）和全自动的马克沁机枪（1884年取得专利）使得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火力差距（见图4–7）拉得更大，只有最无能的欧洲军队才会帮敌人缩小这种差距（就像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对阵祖鲁人的英国军队和1896年在阿杜瓦对阵埃塞俄比亚人的意大利军队）。



图4–7　小心差距：这张照片拍摄于1879年。此时，西方和非西方军队的火力差距十分巨大。祖鲁王子达布拉曼齐·卡潘德（中立者）和他的手下展现着他们手中式样杂乱的鸟枪、猎枪和过时的火枪。达布拉曼齐在罗克渡口战役中被击败，尽管他的部队数量是防守一方的10倍。只有当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极端无能时，非西方的军队才可能会取胜

资料来源：南威尔士边境团博物馆，英国布雷肯。

到19世纪末，西方陆军几乎可以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而他们的海军则拥有更多的自由。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舰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对手了；而到了19世纪，随着铁甲蒸汽船和爆破弹的出现，敌人的抵抗就更显得徒劳无功了。在美国内战中，“莫尼特”号和“莫瑞麦克”号[14]之间的近距离炮战是历史上首次发生在铁甲舰之间的海战；到了19世纪90年代，战列舰的排水量已经达到15 000~17 000吨，航速达到16节[15]，舰上加载4门12英寸[16]口径舰炮，并且可以在相隔5英里的距离上进行炮战。欧洲国家在这些战舰上花费甚巨。结果，到了1906年，英国建造出了“无畏”号战舰，使得此前建造的战舰立刻就都过时了。“无畏”舰装备有涡轮发动机、11英寸厚的装甲以及10门12英寸口径舰炮。5年后，英国的战列舰使用的燃料由煤变为油。此时，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军差距已经变得不可逾越——其中只有一个例外，我将在第五章中再探讨这个问题。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祖母有一台破旧的地球仪，就是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它的纸质表面已经起泡、剥落了，但是仍然让我着迷。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报纸上满是关于国耻和帝国的萎缩的文章，但是在这台小小的时间胶囊上，一切都是不同的。地球上2/5的陆地都涂上了代表大英帝国的粉色。“在大英帝国的领地上，太阳永不落下，”早在1821年，苏格兰最早的报章就曾如此庆贺道，“当太阳西沉于苏必利尔湖的湖面之上时，它又在恒河的河口升起。”

欧洲人和他们的殖民者共计统治着这个世界的5/6。不过，就连我祖母的地球仪也无法完整地展现欧洲在这场500年的战争中的胜利程

度。由于欧洲人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历史学家们经常会觉得“帝国”这个词语并不够精确。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将19世纪的世界看作一个“世界体系”，它是一个将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而欧洲人统治的帝国只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而且未必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这个世界并非完全像亚当·斯密设想的那样靠着人们的自利联结在一起，但是这个世界比古时候的那些帝国都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想法。到1850年，“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已经在用全新的方式进行合作了。英国皇家海军保持着海路的自由，并且教训那些触犯开放秩序的人（在1807～1860年，英国皇家海军有效阻断了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共计抓获了1 600艘贩奴船，并将船上的15万名奴隶送回了非洲西部）。不过，由于这个体系过于庞大，英国根本不可能直接统治整个体系。英伦诸岛无疑是整个体系的中心，但是伦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其他人的协作，还取决于其能给予那些正式独立的地区多少激励，以使它们能按照有助于保持系统的整体运作的方式行事。

英国试图推动这个世界体系达到一个简单的目标。“政府在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目标，”英国首相在1839年对英国议会表示，“就是拓展本国的商业。”但要做到这点却并不容易。英国的领导者们必须将4种截然不同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一目标。第一种工具就是联合王国本身。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的母国，它将迅速增长的人口转化为更多的移民，送到其他国家去。英国皇家海军雄踞海上，比世界上第二强、第三强（有时甚至包括第四强）的海军加在一起还要强大，从而可以保障开放的海路，以供移民、进口和出口使用——而英国不仅仅出口棉布、钢铁和机器，也出口诱人的软实力：职业装、三明治、足球、狄更斯、达尔文和吉卜林。

第二种工具在世界的另一端，那就是印度。印度对英国保持着巨额的贸易赤字，且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供养着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英国的战略预备队。当英国人在1799年需要将拿破仑赶出埃及，在1839年需要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1856年需要威吓波斯国王，或是在1879年需要将俄国人逐出阿富汗（甚至还包括在1942年的阿拉曼拦住隆美尔前进的脚步）时，完成这些任务的主力军就是印度人。

总数达到2 000万的英国移民创造了第三种工具——位于其他大陆的、资源丰富的、由白人殖民的殖民地。在19世纪，这些殖民地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到了20世纪，殖民地里的年轻人则与印度人一样是保卫这一世界体系的重要力量。

最后，还有第四种工具：不断蔓延的由资本、专家、航运、电报、金融服务和投资组成的网络。这个巨大的无形帝国的版图远远超出了地球仪上那些粉色的区域。一些国家——阿根廷、智利、波斯——高度依赖于英国的市场和资金，以至于有的历史学家经常称它们为大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这些国家不会接受英国政客的直接命令，但很少敢违背英

国金融家的意愿。到19世纪90年代，航运和服务业为英国带来的收入相当于商品出口收入的3/4。

要让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维持运转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不断平衡。这个体系需要亚洲帝国保持弱势，欧洲保持和平（至少不能再面对一个拿破仑式的发动人民战争的敌对帝国），美国保持强大但又乐于合作。由于英国几乎不能强迫各国扮演它们的角色，所以这一切都要一系列因素——炮舰外交、市场压力和利益驱使——的巧妙的共同作用实现。

这个体系经常会遭遇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印度，1857年的那场大叛乱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指挥，或许就真的会把英国人彻底赶出印度。在欧洲，英国于1854~1856年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打了一场丑陋的战争，以阻止俄国人打破势力平衡。而在美洲，战争威胁也经常出现。1844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争端升温，“要么（北纬）54度40分，要么开战”甚至成了美国总统竞选的口号。1859年，就因为一头属于英国的猪闯进了美国人的土豆地，军队和炮艇都开进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到了1861年，美国自己陷入了内战，由于北军的水手登上了一艘英国船只，战争的阴影再度浮现。

但战争始终没有爆发。1858年，英国的水手曾经登上了美国的船只。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了平息这次危机，曾提醒国会：“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曾经如此互惠互利，或是曾经如此相互伤害。”美国国会同意了他的看法。大多数亚洲和欧洲的政府在根据当地情况给予合理的补偿之后，也通常会选择这样的做法。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他们从英国的体系中进行贸易得到的好处，都会大于试图破坏这一体系所能带来的收获。

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

“我想，在大英帝国的所作所为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骄傲。”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3年说道。“当然，”他补充道，“有好事，也有坏事。”

他发表讲话的地点是阿姆利则。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军队在这里朝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印度示威者开枪，造成了379人死亡。很快，卡梅伦的讲话遭到了各方面的抨击。有些人认为，卡梅伦的话里流露出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谴责的态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卡梅伦的话表明他的麻木不仁，而且对帝国主义还有留恋。当然，首相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人们批判。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对欧洲这500年战争的遗产做出评价，几乎一定会被指责有某种政治倾向。因此，我做好了被抨击的准备，而且不妨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观点：这500年的战争是历史上具有空前

建设性的战争（这个词的含义仍然是我在本书中一直使用的那个含义），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安全的、繁荣的社会（或者说世界体系）。在1415年，世界还是支离破碎的，每块大陆都由一些地区强国控制着。而到了1914年，这种古代的马赛克格局不见了，世界转为由4个势力遍及全球的强国主宰（法国、德国、美国，当然还有英国），而这些国家则在一个由英国掌控的体系中被紧密联系起来。欧洲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的结合使得现代世界体系与此前的任何帝国都大为不同。但创造出现代世界体系的500年战争却与以往的战争大致相似。首先是征服阶段，在这一阶段暴力死亡率会升高；其次，在很多地方，会进入一个反叛的时期，流血事件会进一步增加；最后，会进入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此时暴力水平开始下降，经济则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重建。

每一个阶段的发生时间因地区而异。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征服阶段发生于16世纪。随后，征服阶段在17～19世纪的北美、18～19世纪的印度、19世纪中叶的中国和19世纪晚期的非洲发生。主要的反抗活动则通常在征服阶段结束后爆发。

征服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在美洲，入侵者给原住民带来了无可名状的恐怖（原住民也在可能的时候回馈给入侵者以同样的恐怖）。不过，就像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样，在美洲杀人最多的是疾病。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战争期间死亡人数中死于瘟疫和饥荒的人数，这个数字会很惊人。在1500～1650年，新大陆的原住民人口减少了一半。那些把征服美洲的过程称作“美洲大屠杀”的历史学家绝非信口雌黄。

在南亚，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的征服活动肯定也造成了几十万原住民的死亡，而欧洲人通常只遭受了很轻微的损失。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南亚地区的人口约有1.75亿，并且在稳定增长。而欧洲人的杀戮只把死亡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有一位历史学家声称，在1857年的大叛乱发生后，英国人屠杀了大约1 000万人，即印度人口的1/25。尽管这次叛乱的暴烈程度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震惊，但是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真实的死亡人数应当比这一数字低一个数量级。诚然，几十万的死亡人数也令人惊诧；而在最坏的假设之下，被英国人杀死的印度人比例应该也在1/250以下。

与美洲的情况类似，造成最多印度人死亡的原因也不是欧洲人的直接暴力，而是欧洲人入侵的间接影响——在印度，这个杀手更多的时候是饥荒。在1769～1770年发生的孟加拉大饥荒和1899～1900年发生的全印度大饥荒中，饿死的印度人总数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3 000万～5 000万。在这130年里，大约有10亿人曾在印度生活过，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20～1/30的印度人死于由战争引起的饥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人应当为此负责。大多数时候，造成这些灾难的直接原因是糟糕的天气，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征服战争带来

的破坏和征服者的麻木不仁和（或愚蠢）将不可避免的天灾转变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人祸。关于罪责的丑陋争吵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就连最反欧洲的批评家们也会承认，对印度的征服过程之致命程度要远低于对美洲的征服。

在中国，情况又有不同。在19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入侵（主要是欧洲人，也有日本人）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在这半个世纪中，大约有7.5亿人曾生活在中国，这就意味着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1　000。不过，在中国，死亡人数的高峰发生在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叛乱四起的时期，这些内战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在1840～1870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0%，主要是由于暴力及其导致的饥荒和疾病。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非洲不同地区遇到的截然不同的情况。在有的地方，欧洲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此对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造成的影响也很小。例如，法国在非洲西部占领的大片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虚拟的帝国。在撒哈拉沙漠的空旷荒野上，既没有居民，也没有官员。但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比较可怕了。最极端的例子是于1884年被比利时占领的刚果盆地。在这里，殖民者对无法上交足够的橡胶的原住民采取了严酷的惩罚措施，导致这里的人口到1908年就减少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死于饥饿和疾病。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被征服的人们而言，这500年的战争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凶险了。就像古罗马人一样，欧洲人也经常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但就像古罗马人一样，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和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硝烟散尽，且被打破的体系得以重建、新的抗体也演化出来，被征服者就会发现，现在统治他们的是力量更强大的新利维坦，它们会积极地镇压暴力——就像德拉沃特和卡纳汉在卡菲尔斯坦所做的那样。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这种文明化的使命使得帝国主义有了一份道德色彩。“挑起白人的负担。”吉卜林在1899年号召美国人说，

> 把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送出去
> 把你们的孩子捆起来放逐出去
>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 ……
> 挑起白人的负担，
> 保持着耐心，
> 掩饰起恐惧，
> 隐藏起骄傲，
> 用公开而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地去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他人争利益。

这首诗发表后几天，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模仿（“堆起棕种人的负担”，有一首这样模仿道，“满足你的贪欲；去吧，清除掉那些‘黑鬼’，那些阻碍进步的渣滓”）。今天，你很难光明正大地去朗读吉卜林写下的这些词句。但他远非唯一一个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从毛里塔尼亚到马来亚，在积满尘土或是潮湿不堪的办公室里，堆积着数以千计的官员备忘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级官员投身于这需要掩饰恐惧、隐藏骄傲的事业时的那份热情。“这些不足挂齿的小邦充分享受着英国的保护和平静的生活，”1824年，有一位穆雷中尉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回顾着尼泊尔在过去10年中的平静，“凶杀案十分罕见，抢劫更是闻所未闻。那几位拉者感到十分满意，他们的子民则享受着温和而令人愉快的统治。耕种的作物增加了4倍，整座山都是翠绿的。”

可是，穆雷和吉卜林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还是他们都在说谎，试图以此掩盖帝国在榨取臣民的血汗的事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中一个原因是，在19世纪的世界体系里，各地的情况太不相同了。在欧洲人几乎消灭了原住民的澳大利亚，或是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都没有脊椎动物生存的阿森松岛，维持和平这项任务的意义与几千名法国人面对着3 000万原住民的中南半岛截然不同。

即便在一个地区的内部，也很难说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像许多事情一样，印度在这一方面是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例子。在这里，致力于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东印度公司投身于维持和平的事业。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40年代的崩溃给了东印度公司可乘之机，但也使得这块次大陆上遍布着彼此攻伐的王公。虽然我们仍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是所有证据都表明，随着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暴力死亡率出现了增长。争斗不休的纳瓦卜和苏丹们征募了数以千计的非正规军的骑兵相互杀伐，而众多失去雇主的军队则会变成匪徒，威胁着农民的安全。在18世纪的印度，道路上到处都是劫匪（也有些人据称是奉迦利女神之名勒死旅行者的邪教暴徒），乡村里则枪支泛滥。

作为称职的坐寇，东印度公司镇压了这些流寇。但像其他坐寇一样，东印度公司的行动过于暴力（而且从中有利可图），以至于旁观者经常会想，这剂“解药”是不是比“疾病”本身还要坏。“印度人受尽折磨，不得不交出所有的财富：成堆的卢比、成袋的钻石，”伦敦的一位评论家悲叹道，“城镇和村庄都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地方的长官被革职杀掉。信仰什么都不如信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他们的仆人。”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才开始试图约束东印度公司，以使其变成一个更好的坐寇。议会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不得收受或直接索取……

印度王公、地方势力、大臣或代理人（以及任何亚洲当地人）的任何礼物、馈赠、捐献、提供的机会或奖励”。但远在印度的人们并没有把这规定当回事。一直到1786年，议会决定亲自镇压这些行为。议会指控东印度公司的首脑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犯有重罪和种种不法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把印度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埃德蒙·伯克领衔进行这次检控，就仿佛当代的西塞罗检控现代版的贪腐的罗马总督维尔列斯一样。“我以英国的名义指控他，”他怒喝道，“因为这个人，玷污了英国自古以来的名誉；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指控他，因为这个人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并把他们的国土变成了一片荒漠；最后，我要以人性之名，代表所有男女老幼、所有阶层的人，指控这个全民公敌。”

这还仅仅是伯克的开场白。审判持续了可耻的7年，在这7年中，可怕的罪行一项一项地被揭发出来。然而，到最后，上议院却不顾堆积如山的证据，宣布黑斯廷斯无罪。但这并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胜利。英国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和平。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印度的法案，收回了东印度公司指派总督的权力，为以清廉而闻名的英属印度文官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像各个时代的利维坦一样，伦敦的议会对降低管理成本更感兴趣，而非为其子民创造开放的秩序。在开始于1808年的一个著名案例中，一位格外邪恶的英国殖民者殴打一名印度仆人，并让其挨饿，最终导致其死亡。法官指控被告人的行径“妨害了……当地臣民的和平和幸福”，但他更在意的是这位被告人“冒犯了我的权威，并对法庭极为无礼”。

不过，不论动机如何，从英国派来的法官逐渐停止了东印度公司采用的那套粗糙的军事管理，降低了印度人生活中的暴力程度。最显而易见的成果是他们彻底禁止了印度教的殉夫仪式（寡妇投进亡夫的火葬堆里自焚而死）。曾有过几位莫卧儿帝国的皇帝立法禁止殉夫（奥朗则布曾在1663年规定：“在莫卧儿帝国的版图之内，官员不得允许妇女被烧死。”），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种做法一直到1829年随着英国人的禁令才算基本上被废除。

在18~19世纪的有文化的印度人的笔下，很难找到有关暴力死亡率的记载。但其中很多人似乎认为大英帝国的统治从总体来看不是一件坏事。例如，加尔各答的非凡学者拉姆莫汉·罗伊（Rammohun Roy）就十分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和法律，并且赞同英国人对殉夫的禁令。但罗伊并不吝于批评欧洲人。1823年，罗伊抨击英国人，因为他们在教授孟加拉人“有用的科学”方面行动太过迟缓。他还曾经巧妙地反驳了一位误以为他从印度教转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加尔各答主教（“我的主啊，”罗伊说道，“我放弃了一种迷信，可不是为了接纳另一种迷信。”）。即便如此，罗伊仍然认为印度的理想出路就是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并且取得类似于加拿大的地位。“如果印度能够取得加拿大的地位，”他在1832年写道，“就不会有脱离与英格兰之间的联系的想法了，

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保持在一个互惠互利的程度。”

其他一些印度人在更进一步，他们推崇一切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东西。例如，“青年孟加拉运动”的成员，就曾在19世纪30年代将托马斯·潘恩置于比印度教经典更崇高的地位，让他们的前辈们大惊失色。不过，他们的观点就像罗伊和中尉的观点一样，都只是观点而已。除非社会历史学家能做一些令人痛苦的档案工作（像支撑埃利亚斯关于欧洲人变得越来越不暴力的观点的那些资料那样），或是人类学家能找出更多的颅骨并统计它们是否经历过暴力创伤，不然的话我们依然只能依靠一些定性的证据，就像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做的那样。即便如此，这些文献的体量也实在太大了。尽管吉卜林和穆雷的话语里颇有些洋洋自得，但他们确实也说明了一些事情：一旦征服过程结束、反抗者也被镇压下去，欧洲帝国就能在大体上压低暴力死亡率了。

不过，殖民地和边境的情况总是比欧洲帝国腹地的情况更严峻一些。到1900年，每1 600个西欧人中只有一个人会被杀害，而同期每200个美洲人中就会有一个死于暴力。即便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内，核心城区和乡村地区中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凶杀像英格兰本土一样少见，但是美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危险程度就要提高9倍。（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北方人问一个南方人这是怎么回事，“南方人说，他觉得南方就是有更多的人需要杀个人”。）

死于战争的可能性也以几乎同样的速度下降。把死于各种战事中的人数加在一起，在1415年左右，大约每20个西欧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暴力。而到了1815~1914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段时间内，欧洲人之间很少进行大战。1853~1856年在泥泞的战场上进行的血腥的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30万人死亡，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造成了至少40万人死亡，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则造成了50万人丧生。但即便我们把每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都加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死于战争的概率也低于1/50（而且很可能更接近于1/100）。

在白人殖民地内部或之间的战争（相对于白人对非白人的战争来说）也很少见。在美洲，1864~1870年发生的可怕的三国同盟战争（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联手阻止了巴拉圭的扩张）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而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则导致了近75万人丧生。在非洲，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至少造成6万人死亡。总体来看，殖民海外的欧洲人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比留在欧洲的人更高，但是也不会高出太多。

这500年战争的规模要远大于造就了古代帝国的那些战争。凭借装备了铁制武器的大军，罗马帝国、汉朝、帕提亚帝国和孔雀王朝可以支配次大陆级别的土地；而远洋船只、火器和蒸汽动力则将欧洲人的势力范围遍及全球。古代战争造就了总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国家，其内部的暴力死亡率（据我估算）大约在2%~5%；500年战争则造就了总人口上亿级别的国家，而欧洲核心区域的暴力死亡率则在1%~3%。这一概率

在美洲和澳洲的白人殖民地中要会稍微高一点，而在被直接统治的殖民地里会更高一些。

数据杂乱无章、缺乏学术研究以及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从刚果这样的人间地狱，到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再到尼泊尔沉睡中的遥远村庄），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估算出19世纪帝国的暴力死亡率。这就意味着，在图4–8中我给出的数字（2.5%~7.5%）可能是本书中最缺乏根据的数据。我想说明的只是，在19世纪那些非洲、亚洲、大洋洲直接被统治的殖民地的平均暴力水平要高于古代帝国的水平，但又要低于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的暴力水平。或许有一天，对文献和人类遗骸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做出更精确的估算，但显然不是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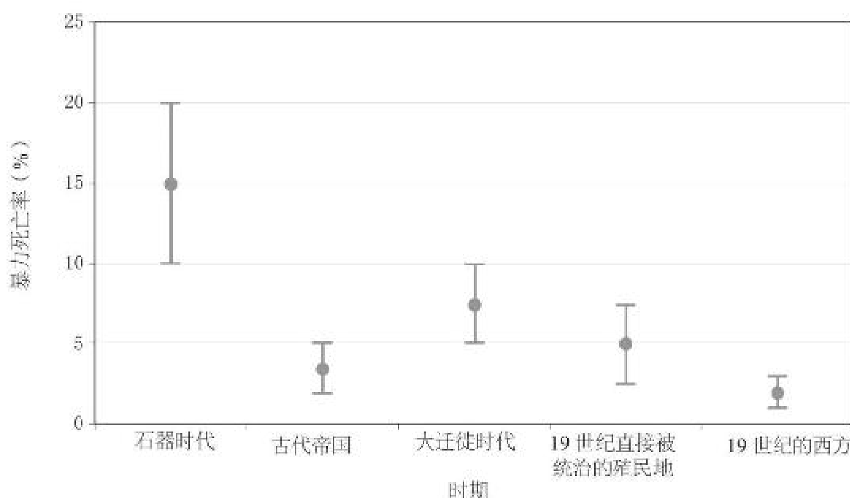


图**4–8**多数时间在向好（之一）：暴力死亡率的估算，每个时代暴力死亡率的区间（石器时代社会：**10%~20%**，古代帝国：**2%~5%**，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5%~10%**，**19**世纪的西方：**1%~3%**，欧洲直接统治的殖民地：**2.5%~7.5%**）及中点

卡加库斯对罗马的征服战争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欧洲的征服战争：二者都会造成不毛之地。但西塞罗对罗马的征服战争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欧洲的征服战争：二者最终都会将其治下的人民置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里，而这一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让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极具影响力的书籍《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s*）中说道："欧洲殖民帝国的利益往往建立于独立的国家和本土经济的毁灭之上。"对于这一说法，几乎无可辩驳。但就像图4–9中所显示的那样，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创造性毁灭。随着新的经济体系在1870年之后于全球范围内取代了旧的经济体系，全球的收入和生产力水平也上升了。当然，其中也会有例外（我的脑海中又跳出了刚果这个名字），而且大部分收益也的确落入了这个新世界体系的统治者手中。但随着19世纪步入尾声，500年战争的大潮使得全世界的经济水涨船高，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空前的富庶和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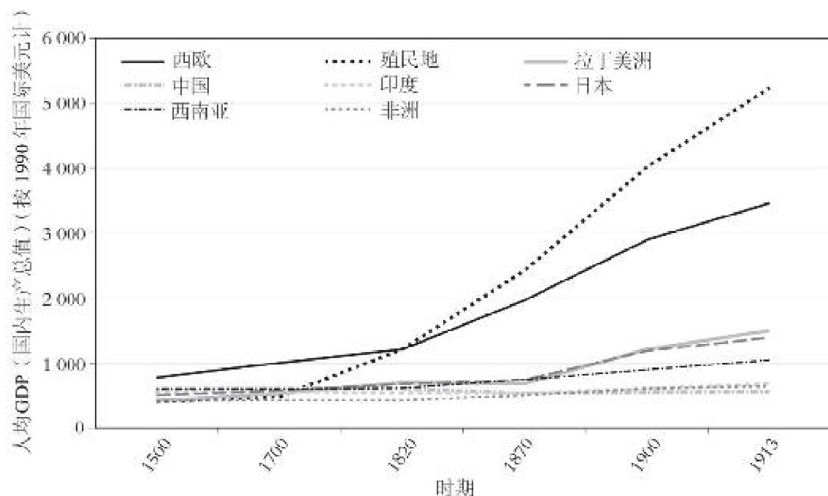


图4–9 多数时间在向好（之二）：由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计算的**1500~1913**年的年人均生产力，以**1990**年国际美元的购买力计价（这种人造的单位通常用来解决无法计算的漫长时期内货币转换率的问题）

因此，在1898年8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得出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命令他的外交大臣对那些向他大献殷勤的达官贵人们发表了一次前有未有的声明。“维护世界的基本和平和尽可能减少过剩的军备已经成了每个国家的责任，”声明中说，“也是每一个政府都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想。”因此，尼古拉二世提出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开一个好头”——探讨如何终止战争，并进行大规模裁军。

举世欢欣。著名的《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一书（托尔斯泰最喜欢的书之一）的作者、历史上首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尔塔·冯·苏特纳男爵夫人（Baroness Bertha von Suttner）称赞尼古拉二世是“文明世界的一颗新星”。1899年，在沙皇本人的生日当天，130位外交官齐聚海牙（恪守中立的荷兰的一座城市）附近的一座乡间城堡，试图促成人类的和平。

在两个月的饮宴、舞会和命令往来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就算不能终结战争，至少也可以限制战争的野蛮程度。与会者充满热情地一致同意应当再举行一次会议。1907年，在这个令人愉悦的地点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同意要在下一次会议上制订出切实的方案——下一次会议的举行时间，定在了1914年。

[1] 实际上，无论此处指的是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称吴王的张士诚，还是同样曾称吴王的朱元璋，他们称吴王的时间都是在14世纪60年代。——译者注

[2] 实际上，在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对手是由另一支起义军政权的领袖陈友谅，而并非元朝军队。——译者注

[3] 扬·胡斯：胡斯因投身宗教改革事业和捷克民族主义而遭罗马天主教会处以火刑，他的死引发了地方贵族和信众的反叛，即胡斯战争。——译者注

[4] 弗拉德·德拉库尔：吸血鬼德拉库尔伯爵的原型。——译者注

[5] 1盎司≈0.028千克。——编者注

[6] 原文中使用的Drill一词在英文中既有钻的意思，又有训练的意思。——译者注

[7] 在习惯上，历史学家将1707年合并法案生效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视为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时点之后则视为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于1801年加入）。

[8] 拉者：印度土邦首领的称呼。——译者注

[9] 纳瓦卜：印度土邦穆斯林首领的称呼。——译者注

[10] 这一时期的荷兰政权体制为共和体制。——编者注

[11] 民主共和党：今美国民主党的前身。——译者注

[12] 关于杰斐逊的故事，可参见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的《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编者注

[13] 应为1840年，疑为原文错误。——编者注

[14] “莫尼特”号和“莫瑞麦克”号最初都是北方军队的军舰；后来，“莫瑞麦克”号沉没，南方军队将其残骸打捞起来，并将其改造为铁甲舰，更名为“弗吉尼亚”号。

[15] 1节≈1.852千米/小时。——编者注

[1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第五章



钢铁风暴：争夺欧洲的战争（1914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有序世界重归混沌

在英国热衷于评论时事的知识阶层看来，《每日邮报》（*Daily Mail*）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大约在1900年，一位英国首相曾讥讽这份报纸是“勤杂工写给勤杂工看的”）。不过，在100年前，《每日邮报》还是英国最畅销的大报，该报在巴黎的编辑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也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会那么受欢迎。

安吉尔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在17岁那年，他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一所费用昂贵的瑞士寄宿学校，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养猪、挖沟、放牛、送信，在那里他什么都干过，随后，他又回到了欧洲。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中年，变成了一个比康德本人还要康德的人。他结合20世纪的现实发展了《永久和平论》中的思想，提出了“怎样才能真的保证一个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做出良好的举动”这一问题。他自己的答案是：“只有当国家之间建立起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各个层面上）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非法侵犯才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他总结道，战争就会自我终结。“靠武力去取得进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宣称，从今以后，“将是靠思想进步的时代”。

安吉尔也成了为数众多的背时的预言家中的一员。1914年，那些赞扬过他的著作、参加过海牙和平会议的政治家们引发了“一战”。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们造成了1 500万人的死亡。在其后4年中各地进行的内战里，又有2 000万人丧生。1939~1945年发生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战则杀死了大约5 000万到1亿人。安吉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预言家。

不过……如果安吉尔能来到100年后的世界，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预言家。在2010年，这个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平、更繁荣，暴力死亡的风险已经下降到了1%以下（在西欧则低于1/3 000）。人们的寿命增加了一倍，饮食水平提高，使得人们的平均身高提高了4英寸；他们的收入也是1910年他们曾祖辈收入的4倍。

20世纪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它被伟大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极端的时代”，因为它既目睹了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也经历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在出版了《大幻想》之后，安吉尔又写作了40年，但是一直未能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摆脱这一难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安吉尔本人有时候也确实会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坚持世界上在大趋势上是按照安吉尔（和康德）所说的方向发展的，只不过这一趋势有时会被坏运气干扰。看看“一战”爆发的方

式，这种说法会显得特别站得住脚。“一战”的爆发就纯粹是一次坏运气的大雪崩。如果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没有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他就不会被刺杀，奥地利就不会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就不会彼此开战；或者，如果奥地利安保人员的首领没有在那天把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行动路线公布出去，或是没有让大公坐在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敞篷车里，或是没有仅仅因为担心他们的制服不干净就不允许在附近演习的7万奥匈帝国军队参加安保，恐怖分子的阴谋肯定就不会得逞；如果安保负责人没有忘了告诉车队前两辆车的司机路线已经发生了变更，或是没有叫停那两辆开错路的车而因此让整个车队后退，那么车队就不会以那么缓慢的速度经过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如果安保负责人让大公车旁的保安面朝人群，而不是面朝空空如也的街道；如果另一个塞尔维亚袭击者没有袭击那个在普林西普拔枪时抓住他的手的警察……上面说到的这些细节只要有一个发生了变化，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七月危机”，八月的炮火也不会打响。到了12月，那100万年轻人还会活在世上。这些意外引发了太多的后果。

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把人们卷进战争的政客们十分热衷于这种说法，他们争先恐后地向读者们保证这场灾难的发生不是他们的错。“1914年，当这些国家滑向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时，没有表现出一丝忧虑和沮丧。”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1914年时他担任英国海军大臣）则更进一步，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中。他在1922年写道：

> 如果有人要审视那段时间里的国家间交往，就应当将这些国家视为蕴含着或活跃着或蛰伏着的力量的巨大组织。它们就像星体一样，当它们在空间靠近彼此时，必然会引发强烈的相互作用。如果它们靠得太近，就会擦出火花；一旦超过了某一个点，它们可能就会相互吸引着脱离原本的轨道……从而使得有序的世界变成一片混沌。

但政客们在1914年那个在劫难逃的夏天留下来的书信、日记和内阁会议备忘录中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欧洲的领导者们并非不小心滑下了那场战争，或是被引力拉向那场战争。实际上，他们充分计算过战争的风险，纷纷冷酷而冷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即便在人们已经看清战争的代价之后，仍然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土耳其在1914年晚些时候参战，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在1915年参战，罗马尼亚在1916年参战，美国在1917年参战。而到了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的1939年，政客们仍然把数以千万的人送上了死亡的道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认为，所有这些政客们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之后，却仍然只是被非理性的恐惧和

憎恨支配的傻瓜，完全看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呢？很多历史学家们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不信就看看有多少本书起了类似《愚蠢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这样的名字吧。但这种看法很浅薄，因为20世纪的领导者既不比其他时代的领袖们更聪明，也不比他们更愚笨，也不比我们在第一到四章中看到的那些人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20世纪之所以那样夹杂着暴力、和平与繁荣，是因为此前500年的战争留给我们的遗产，要远比安吉尔和他以后的很多人所意识到的更复杂。

未知的未知

“警区里派来任务啦，”吉尔伯特（Gilbert）与沙利文（Sullivan）合作的喜剧《潘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中的合唱部分有这么一句，“警察的活儿可不轻松呐。”当这部喜剧于1879年第一次登台时，观众发出阵阵哄笑，但世界体系的主宰者们或许就没那么开心了。

在过去的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人（通常）乐于，也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因为直到1860年，英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英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好、更便宜。只要自由贸易的海路还畅通，英国商品就总能够找到买主。随后，英国人可以用赚得的利润购买最好、最便宜的食物，而出售这些东西的农民又可以用赚到的钱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使得英国人又能购买更多的食物……如是往复。英国人有足够的财力充当“世界警察”；而要继续赚钱，他们也需要继续充当“世界警察”。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获得了利益，而英国人的收获最多。英国的GDP在1820～1870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也从5%上升到了9%（当今是3%）。用来维护海路通畅的船只和基地确实要耗费成本，但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因此这种成本并不算高——英国每创造出一英镑的财富，只需要花费6便士的成本——也就是不到GDP的3%。

不过，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现“警察”的工作不那么好干了。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干得不好，而是因为英国人干得好过头儿了。随着英国的利润的积累，让英国变得繁荣的自由贸易也使得英国的资本家们可以将自己的富余财富投资到能带来最高回报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投资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在1870年之后，一连串的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它们都高度依赖英国的贷款，通常用英国的钱购买英国的机器，再生产出产品与英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英国的老对手法国走上了这条道路，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奇。不过，美国（1861～1865年）和日本（1864～1868年）通过内战，德国通过统一战争（1864～1871年），也都形成了积极追求工业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见图5–1）。1880年，英

国还贡献了全世界23%的生产和贸易，而这一比例到1913年已经下降到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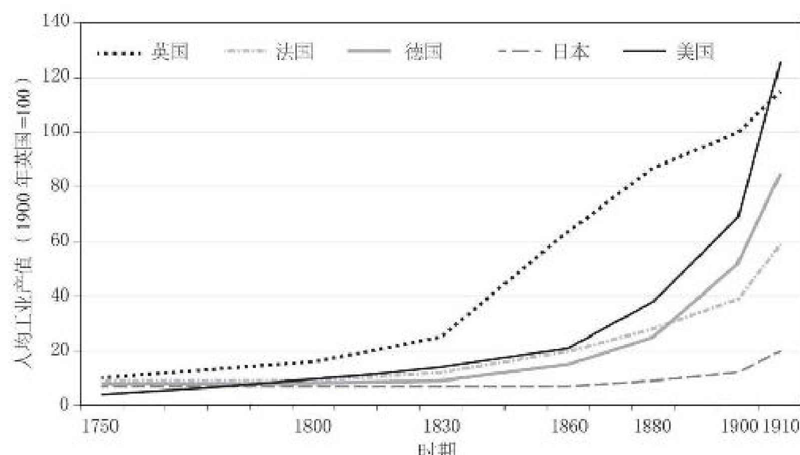


图5–1撒旦的磨坊：1750年~1913年，5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工业产值（1900年英国的产值假定为100）

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有利于英国的，因为伴随着全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整个蛋糕都被做大了。1913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14%要远大于1870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23%。不仅如此，英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从农业经济转型成为利润更丰厚的工业经济；而到了19世纪70年，英国又一次进行了转型：从投资于工业转为投资于回报更丰厚的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业、航运业、保险业和对外贷款）。在1870~1913年，英国GDP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一倍。有了更多的财富，英国（以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就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发展。德国率先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工人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到了1913年，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学习了德国的做法。免费的小学教育、男性普选权以及女性最终争取到的选举权都成了工业化国家常见的事物。

但对英国来说，经济上的胜利在战略上却是灾难性的。这是因为，英国的战略，就像17个世纪之前那些古代帝国的战略一样，越过了它的拐点。1872年，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英国；1901年，德国也超越了英国（见图5–2）。每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都开始打造一支彰显自身实力和威望的现代化舰队。在1880~1914年，英国的海军实力依然领先，其舰队规模和火力增加了三倍还多，但英国在全球海军中所占的比重却下降了（见图5–3）。英国这位“世界警察”仍然可以对付任意一种敌对的联盟，但是它已经不再具备同时对抗所有国家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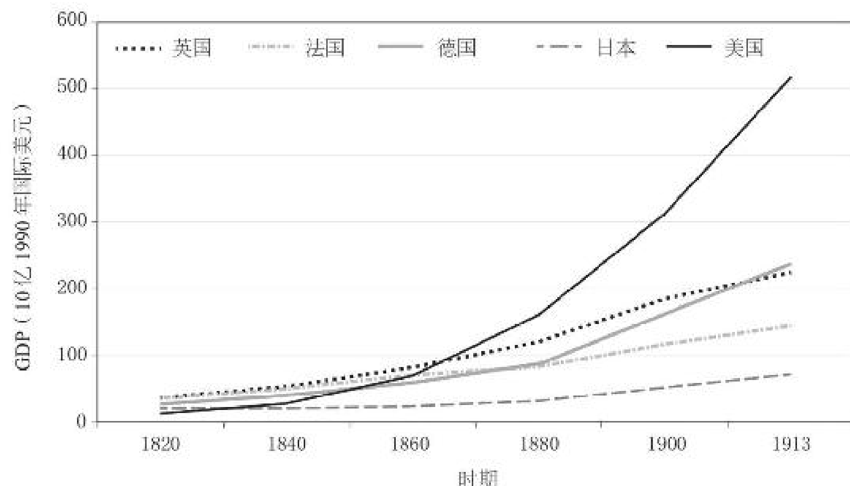


图5–2 其他国家的崛起：**1820~1913**年，五大主要工业经济体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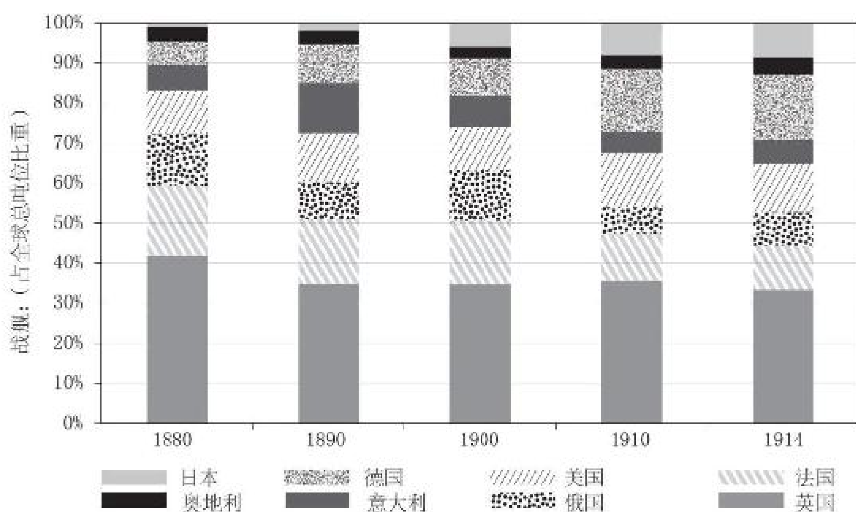


图5–3 不开心的家伙们：**1880~1914**年，“世界警察”英国的海军实力相对德国、日本和美国下降

我们如果把英国比作世界上的警察，那么我们就不妨把新兴的工业强国比作城里的帮派成员。就像警察一样，“世界警察”也要考虑，究竟是直接对抗这些对手，还是与它们和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英国可以选择向这些对手发动贸易战争，也可以选择发动真的战争，也可以选择对它们做出让步。前两个选项可能会危及英国赖以致富的自由贸易，而第三个选项可能会让英国的对手变得更加强大，最终使得英国再也没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英国先是与美国产生了矛盾。美国于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在理论上禁止了欧洲人插手美洲事务。但即便到了19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林肯最担心的事情仍然是英国皇家海军干涉美国内战。不过，到了19世纪

90年代，有一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英国已经不再有能力在保证履行其他义务的同时再去插手大西洋事务了。面对现实的英国人与美国达成了“伟大的和解”。这相当于英国这位“世界警察”自己找了一个副手，并且划给属于这位副手的势力范围。

在东方，英国收缩得更加厉害。在非西方的世界，日本是唯一一个成功地通过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应对欧洲人的进犯的国家。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无疑已是东北亚地区最强的国家。然而，当时日本的舰队尚且还排不进全世界海军排行榜的前六名；而在1902年，考虑到英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遥远距离，英国政府认为唯一能让自己在这个遥远的地区保持一定影响力的方法就是与其他国家达成一个正式的海军协议。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签订此类协议，而签约的对象就是日本。

整整100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对记者说道：“有一种东西，叫作已知的未知，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同时，还有一种东西叫作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位稳固的“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各国在战略上通常就会面对一个已知的未知。当俄国人于1853年威胁君士坦丁堡时，或是印度人于1857年发动叛乱时，或是南方在1861年朝萨姆特堡开火挑起美国南北战争，它们都不知道英国这位致力于保护世界体系的“世界警察”会做何反应，但是它们知道英国一定会做出某种反应。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未知的未知就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难以预知英国这位“世界警察”是不是干脆不会就某件事做出任何反应。不确定性增加了，各个国家无法预知其自身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英国的战略家们清楚这一点，但由于英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只能让更多的国家获得“世界警察”的身份。1904年，英国人又达成了一个合约：他们与法国人签订了协约，将地中海事务交由法国人管理，从而使得英国人可以专心应对未知的未知中最具不确定性的德国。

使德国成为最难预知的国家的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在英法签署协约的同一年，地理学家、探险家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发表了一次非凡的公开演讲。他宣称，20世纪的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将是三块大区域之间的力量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区域被他称为“心脏地带”——“世界政治的核心区域，就是亚欧大陆上不通水路，但是在古代任由骑马的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带”。

麦金德解释说，在15世纪之前，来自草原心脏地带的袭击者们曾经控制了内新月地带富庶的文明——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在内新月地带之外，还有外新月地带，这一区域曾经无关紧要，直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船只将这个广阔的区域连接在一起为止。到18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强国开始进入内新月地带，与心脏地带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到19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力量更加强大，最终渗入了心脏地带本身（就在麦金德发表这一演进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在向中国西藏进军）。一旦控制了外新月地带的海洋，就意味着可以控制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从而

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英国的政治家们并不情愿与美国、日本和法国分享外新月地带，但他们只能去赌一把试试，寄希望于这些与英国一样同属外新月地带的国家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思维方式。至于德国，则是另外一回事。德国属于内新月地带，这就使得德国可以直接进入心脏地带。在英国人看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德国，有可能会把心脏地带的资源用来对抗外新月地带。“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麦金德十分担忧，“它们就可以利用广袤大陆上的资源建造舰队，那样一来，帝国征服世界的前景就在眼前。”

但在圣彼得堡看来，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个更紧迫的麻烦——如果德国在与英法的对抗中占了上风，德国就可以动用外新月地带的资源来对付心脏地带。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德国与俄国结盟，而是德国征服俄国。拿破仑曾经试图征服俄国，但是从外新月地带一直打到莫斯科实在是项太过艰巨的任务。然而，从内新月地带出征的德国可能会更有把握。

柏林的政治家们则看到了第三个维度。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危险并非德国征服外新月地带或是德国征服心脏地带，而是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夹击德国——这种情形自18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数次。德国的领导者们认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这个很简单的战略态势造成了德国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

这三种关于德国的不同的前景将引发欧洲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的走向。不过，最初，德国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着。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或许是19世纪最不严谨，但最精明的外交家。俾斯麦认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60年代诉诸武力。经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短促而激烈的战争，杂乱而脆弱的德意志邦国组成了内新月地带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然而，在赢得了这些战争之后，俾斯麦又意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70年代放弃武力。要避免被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双面夹击的厄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国家都处于两面摇摆的状态，即在东欧和中欧不断组建或打破联盟，安抚英国，孤立法国。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还能把这种杂耍式的外交玩得很好。但随着英国地位的下降，未知的未知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因而杂耍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890年，年轻的新君抛弃了这位年迈的帝国宰相，并且开始像世界各国的首脑一样开始思考，武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他的将军们制订先发制人的战争方案，而德国的政治家们则用战争的风险来分散选民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至于太过关注快速工业化导致的国内阶层矛盾。老板和工人或许会相互憎恨，但只要他们都更憎恨外国人，一切就都还好。

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做一些在俾斯麦时代会被视为疯狂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和打造战列舰的行为必然会激怒英国，但如果不这么做，德国似乎注定会被敌人孤立。在最好的情况下，德国的敌人可能会将德国隔绝于海外市场之外；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德国必须不择手段地打破这个包围，但德国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又让它的敌人们彼此走得更近了。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人们开始普遍担心战争的到来，因此，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开始购置更多的武器，征召更多的年轻人入伍，并且延长服役时间——而这一切又让对战争的担心更可能变成事实。

到1912年，德国皇帝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极端手段已经是唯一的选项了。有时候，他们会探讨组建一个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自然是德国；另外一些时候，就像1913年圣诞节那天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说的那样，他们设想建立“一个中欧关税同盟，西方国家不管对这个同盟喜欢与否，最终都会参与其中。这样一来，欧洲就将形成一个可以比肩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的经济同盟”。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这听起来就像是宣战声明。

这些都没有让1914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弗朗茨·斐迪南本可以躲过6月28日的厄运，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冷静的头脑本也可以占据上风。实际上，大部分人认为，冷静的头脑已经占据了上风：一直到7月底之前，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都没表现出什么紧张情绪，政治家和将军们也都去度暑假了。如果运气稍微再好一点儿，人们对1914年的记忆可能就会停留在那年美妙的天气，而不是残酷的沙场。

但在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即便在1914年避免了战争，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也无法复原。英国的成功使得工业革命继续向全世界蔓延，而这反过来让英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固。未知的未知因素会进一步增多。在1914年的危机之后，新的危机还会接踵而至。在1914年巴尔干危机之前，还曾经发生过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另外一场巴尔干危机。如果20世纪的每一位欧洲外交家都是重生的俾斯麦，那么他们可能能够不停地化解紧急状况。但这不是现实，这一时期的欧洲外交家的平均水平既不比以前的外交家们更优秀，也不比他们更差。每发生一次危机都好像扔一次骰子，早晚有一天（如果不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也肯定会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会有某一位国王或首相认定战争是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普林西普刺杀弗朗茨·斐迪南一个月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在此之前，德国皇帝向奥匈帝国许诺，德国已经“考虑过俄国干涉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不管怎么说，德国宰相曾开玩笑说，其他的选项“形同自宫”。一个星期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它们并非不经意地滑向了战争的边缘，也并非仿佛脱离轨道的行星，它们只是生存于一个“世界警察”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的世界之中。

风暴来临

“战争的总体目标，”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德国宰相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是在西线和东线永久保证德意志帝国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削弱法国，使其永远不可能再恢复为一个强国；与此同时，要将俄国尽可能远地推离德国的东部边境，并且解除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奴役”。德国随后要吞并比利时和法国，并且将俄国的省份变为德国的卫星国。英国的商品将从法国市场中被逐出。德国的目标是进行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将环绕德国的巨大联盟拆散，并且给予“世界警察”猛烈甚至是致命的一击。

我们并不知道，德国究竟是在战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还是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个星期惨重的伤亡之后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德国人都冒了巨大的风险。俾斯麦所设想的最坏的情境在1914年变成了现实，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的全力夹击。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是利用其位于两敌之间的位置和强大的工业化组织能力，在俄国完成动员之前就击败法国。

德国的官员们完成了一次管理层面的壮举，他们征用了8 000辆火车，将160万人和50万匹马运送到了西线。德国人在西线席卷了中立的比利时，并且不停歇地行军作战。到9月7日，德军的前锋已经跨越了马恩河，距离巴黎仅有20英里。从地图上看，法军已经被包围，并被阻隔在其首都之外，德国似乎即将赢得战争。然而，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很快就会发现现代战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祖国，这个20世纪的利维坦纠集了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分布在100英里的战线上，但毛奇却只能用19世纪的通信手段联系他的军队。无线电的配备很少，而且很不可靠；电话更糟；完全没有侦察飞机可用。

在1914年的9月，毛奇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报告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送到他的手上。一份报告可能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崩溃；而下一份报告可能又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进行反击。别无他法的毛奇派了一位参谋乘车前往前线。一位德国军官后来悲叹道，“如果这位悲观的亨奇中校在他9月8日的旅途中撞了树，或是被掉队的法国士兵干掉，我们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能停火讲和，并且能够让我们随意地开出任何条件”。然而，亨奇最终抵达了前线，他被前线部队面临的风险吓坏了，并且说服部队开始撤退。

即便在一个世纪之后，今天的我们也不比1914年的毛奇更清楚亨奇究竟是把一场即将到手的胜利变成了失败，还是将德国人从灾难中挽救了出来。但对那些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撤退的命令让人感到非常沮丧。这个命令“就像是晴天霹雳”，133预备役步兵团的指挥官说道：“我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其他人则感到很惊讶。”毛奇精神崩溃了。

德国的豪赌失败了，而且它也没有准备后备方案。不过，德国的对手也好不到哪儿去。协约国的第一方案就像德国人预计的那样，是法国和俄国从两边同时进攻德国，将其击溃。然而，到10月，俄国人已经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而法国人却全凭运气才没有彻底战败。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倒是有一个后备方案，即用英国强大的舰队将德国的战列舰封锁在港口之中，对德国形成海上封锁，然后吞并德国的海外殖民地。除了东非之外（在那儿，有一位出色的德国上校将游击战争坚持到了欧洲战事结束），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很不幸，这个后备方案只能一点点儿地让德国人和德国工业“饿死”，因此要取得最终胜利会耗时很久。

负责海军的丘吉尔力主将海上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海军将领们拒绝了风险过大的入侵德国北部的计划，但丘吉尔坚持认为两栖作战可以在中欧国家柔软的腹部撕开一个口子。英国人无视希腊的中立地位，在萨洛尼卡登陆，但行动一无所获；在伊拉克登陆的部队最终充满耻辱地举手投降了；而在加里波利的第三次登陆更是一次灾难，丘吉尔的职业生涯险些就此终结。到1915年，就连最奉行海军至上主义的人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将取决于陆战。

但要如何赢得陆战呢？有一种说法是，将军们总是会重演上一次战争。但在战争初期，欧洲的军人们要更落后于时代。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已经证明，军队无法在开阔地上承受现代火力的打击；而在更早的时候—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末期的战事就已经表明，挖掘堑壕的部队几乎是不可撼动的。然而，到了1914年，军队开始像拿破仑时期那样挥舞着旗帜，一拥而上地进行冲锋。他们的格言是“全力进攻”。

战争刚刚开始了三个星期，比利时前线就有一位名叫夏尔·戴高乐的法军中尉在率领一次冲锋时被击中。“敌人的火力精准而集中，”他后来写道，“子弹越来越密，炮声越来越响。还活着的人趴在地上，周遭都是尖叫着的伤员和倒下的尸体。故作镇静的军官们站直了身子，结果是自寻死路……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只需要一瞬间就能看清楚这个事实：全世界的勇气加在一块儿也冲不过这样的炮火。”在德军中服役的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展现了与戴高乐一样奋不顾身的勇气。他后来把戴高乐经历过的这种炮火完美地形容为“钢铁风暴”，并以此作为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标题（在我看来，这是迄今最好的战争回忆录）。

战争结束后，人们经常形容戴高乐和荣格这样的人是“被驴指挥的狮子”——那些狂喝香槟酒、对前线的恐怖既毫无了解也毫不关心的蠢货们却派英雄们步入坟冢。但实际上，领导者们像历代的领导者一样迅速地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马上进行调整。在法国，到1914年10月，已经有上百万人挤在300英里宽的前线上，因此修筑从瑞士延伸到北海的堑壕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当战争双方都完成了堑壕的修筑时，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突破这些堑壕。

最初，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要突破敌人的防线，主要依靠高爆弹药的使用，”1915年1月，一名英军指挥官总结道，“只要使用了

足够的弹药，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炸出一道口子。如果没能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火炮，或者提高每门火炮所配备的弹药数量。”

这样一来，战争的关键点就在大后方了。哪一方能够更有效地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更多的枪炮弹药，似乎哪一方就能赢得战争。政府开始接管一切，不管是军备、交通，还是食物和工资。每个国家的生产量都在迅速增长。男人被征召入伍，政府只好劝女人走出家门，到农田和工厂中接替男人；政府对食物采取了配给制度；生产也被调整，以使得军队能够获得所需的一切。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更多的税收和更多的规定。利维坦迅速膨胀。

但在做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仍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红桃皇后效应似乎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军队的进攻能力迅速增强。各国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炮弹；为了把这些炮弹运送到前线，各国又征调了上千万匹马（单是德国就在一战期间损失了100万匹马，其中死于劳累过度和饥饿的马匹远多于死于炮火的马匹）；炮兵们越来越有技巧，他们交替着进行短暂而猛烈的炮击和旷日持久的长时间炮击，还会使用徐进弹幕射击，即让炮火一直覆盖在己方向前推进的步兵前方不远处。然而，攻击方每做出一点儿改进，防御方总能找到相应对策。他们挖掘出纵深达4～5英里的多道堑壕，在前沿阵地只部署少量的部队，并且不断地让部队在前线轮换以保持战斗力。大部分部队躲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外，坐等敌人占领前沿阵地，然后在敌人超出了火力掩护射程之外后再发动反击。

在1915年，就有些将军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毛奇曾经遇到过的那种困难。一旦战斗打响，指挥官们就失去了对手下军队的控制。当己方的部队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时，总部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得知这一消息，结果错过了派遣增援和利用这一突破口的时机。“将军们就仿佛一群既没有眼睛和耳朵，也说不出话的人。”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说道。

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双方都试图寻找新的技术击败红桃皇后。德国人在这一方面走在前列。1915年1月，德国人在波兰使用了催泪瓦斯。不过，这次行动并不成功：由于天气太冷，气体凝结了。然而，他们于3个月后在西线使用了氯气，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一阵轻风将一阵有毒的绿色云雾吹向了敌人的阵地，那里挤满了毫无防备的法国士兵和非洲士兵。氯气杀人的方式十分可怕：它会灼伤人的肺部，刺激肺部产生过多的液体，最终让中毒的人窒息而死。这种气体仅仅杀死了大约200人（按照“一战”的血腥标准，这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正如一位德军军官看到的那样，它让数以千计的敌人“像一群羊一样逃走了”。这场溃败留下了一个宽度近5英里的缺口。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也没有预料到这种气体会如此有效，因此错失了突破这一缺口的机会。到了第二天，这种武器就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由于氯气是可溶于水的，填补了这段阵地的加拿大士兵只需要在脸上围一条湿布就能化解氯气的危害。

毒气成了人们对“一战”记忆的一部分。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曾描述道：“听啊，随着每一次颤抖，鲜血/从满是泡沫的肺中涌出/像癌症一样可憎，像呕吐一样痛苦/在舌头上留下无法消弭的痛楚。”但对于有所准备的军队来说，毒气只能算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却远远不能改变战局。死于毒气的人数还不到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1/80，每100个领取战争津贴的人里才有一个受了毒气的伤害。

英国尝试了另外一种技术改进：坦克。早在1903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就写过一篇名为“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的短篇故事。到了1914年12月，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探讨制造一种带有装甲和履带的车辆了。当时，内燃机还在起步阶段，要让几吨重的钢铁翻越堑壕和弹坑还是艰巨的技术挑战。不过，到了1916年9月，已经有将近50辆坦克可以投入实战了。在战斗打响前，就有13辆坦克坏掉了，但德国人一看到那些尚能使用的坦克，就立刻逃走了——虽然这些坦克在出故障前也仅仅推进了2英里。到了1917年末，英军在康布雷5英里的前线上部署了324辆坦克，它们向前推进了4英里（按照“一战”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壮举）之后才出故障。英国的教堂钟声为了庆贺这一胜利而敲响，但德国人的战线仍然没有被突破。

其他一些进步更不起眼，但或许更加重要。在战争开始时，炮兵们对那些试图引入太多科学元素的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耐心。“小子，这是打仗，是动真格的！”一位中尉曾经被人这么告诫，“忘了你在别处学到的那些废话吧！天气冷的时候，把炮管升高一点！”不过，到了1917年，射击控制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这主要得感谢另一项伟大的技术进步——航空。直到1903年，飞机才被发明出来；到1911年，才有飞机被应用于军事上；到了1918年，已经有2　000架飞机出现在西线的上空。它们既校正炮火，也向敌人的步兵开火，甚至开始相互射击。

不过，在战场上仍然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1916年，绝望的将军们开始把杀人本身当成战争的目标。当德国人在2月发动对凡尔登的进攻时，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是让法国人在这里把血流尽。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有70万人死在了这片不过几平方英里的泥泞中。同年7月，英国人在索姆河发动进攻时，也没有指望能够真的突破敌军防线，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把德国人从凡尔登引开。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上午，就有2万名英国士兵丧生；在随后的4个月中，又有30万英国人阵亡。

德国人在这场消耗战中的表现更好。比起自己损失的人数，他们杀死的敌人更多，而且他们作战的性价比也更高。英国、法国、俄国和（后来参战的）美国每花费36　485.48美元才能杀死一名敌军士兵，而德国及其盟友只需要花费11　344.77美元。然而，德国人在战略方面却没有什么效率可言。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人没有准备好后备方案，但他们很快就有了太多的后备方案。一些将军认为，德国应当集中力量，先击败俄国。他们指出，东线的问题不是如何取得突破，因为那里有足够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突破防线是常事，东线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缺

少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保持攻势。他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比在法国的堑壕中杀出一条血路要容易得多。然而，另外一些将领则认为，俄国前线是次要的，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打败英国人和法国人，到时候俄国也会跟着屈服。

这两种观点各自占了一段时间的上风，结果分散了德国的精力。更糟的是，另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主张在欧洲之外的地方赢得战争。“我国在土耳其和印度的公使，”德国皇帝在1914年写道，“必须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起来反抗英国这个可憎的、满口谎言的、毫无原则的，由小店主组成的国家。”这场伊斯兰圣战并没有能够实现。不过，在1915年，德国海军又开始推行另一项全球战略。德国的海军将领们认为，既然英国比德国更依赖进口，那么为什么不使用潜艇封锁英国的贸易路线呢？

在策略几经摇摆之后，1917年2月，德国人决定击沉一切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究竟挂的是哪个国家的旗帜。德国的领导者们知道，这很可能让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在他们看来，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了。在“一战”爆发前，英国依靠资本输出和工业制品输出控制着整个世界体系；而现在，英国每个月要从美国进口价值2.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更糟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英国从纽约市场上借来的。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德国能切断这条大西洋生命线，那么英国只能再坚持战斗七八个月。他们指出，虽然激怒美国可能会导致德国输掉战争，但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等同于坐以待毙。不过，为了对冲风险，德国人想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资助墨西哥进攻美国。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在消耗战和对东线的侧重开始让天平向德国人倾斜时，美国人站在了英国和法国一边。到1917年初，已经有300万俄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1/3是平民），俄国军队也正在土崩瓦解。3月，一场叛乱推翻了沙皇（由于事发于俄历二月，因此被称为“二月革命”），而在其后发生的“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历11月）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俄国人随即开始投身于内战，而德国则迫使新生的苏俄放弃了非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

此时的苏俄边界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边界十分相像。只不过，在1918年，独立了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接纳了各色各样的德国贵族为统治者。“德国的尊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德军总指挥官，当时相当于实际上的独裁者——说道，“要求德国不仅要用强有力的手保护德国公民，更要保护所有的德意志人。”他所说的德意志人，也包括奥匈帝国中的德意志人，而此时的奥匈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德国的卫星国。如果鲁登道夫赢得战争，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疆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顿河盆地的大德意志国家，而这肯定会终结英国“世界警察”的身份。

俄国的崩溃使得德国可以抽出50万人赶在美军抵达前投身西线战

场。更重要的是，在俄国的战斗让他们看到了怎样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指挥和控制。

我已经几次提及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关于西方的战争方式的理论。他认为这种战争方式从古希腊一直绵延到现代的欧洲和美国，通过“简单的、大规模的步兵碰撞”赢得战争。不过，在1917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被战略家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称作“现代战争体系”的作战方式。在这种作战方式中，士兵们做出的选择与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正好相反，他们不会大规模地交锋，而是“减少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机会”；他们不追求部队的集中行动和惊吓敌人，而是追求“掩护、隐蔽和分散”。

这种现代战争方式再一次使军事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现在，士官和普通士兵（德国人称之为突击队）都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性，从而调动起人民战争的能量。经过适当的训练，士官和士兵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不需要军官跟在身边驱使他们向前。战斗小组可以偷偷穿越无人带，然后利用弹坑、树桩和一切尚存的掩护物冲过火线（见图5–4）。



图5–4 冲向前方的绿野：1918年5月27日的法国，德军突击队渗透进被破坏的蓬塔尔西村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55010）。

突击队可以携带轻便而威力巨大的武器——最早期型号的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不过，现代的战争方式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出其不意。进攻方不再使用猛烈的炮击泄露自己的进攻意图，转而在进攻开始时先短暂释放足以制造混乱、让防守方忙于佩戴防毒面具的毒气（“毒气！毒气！快，小伙子们！一阵手忙脚乱，总算及时理顺了面具和笨重的钢盔”），而这段时间的长度却不足以让敌人做好进行防御的准备。突

击队接着会潜入堑壕，穿过那些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守军，直插指挥部和炮兵所在地，猛烈地袭击他们。这样一来，敌人就变得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对于大多数守军来说，他们直到从自己身后射来子弹，才意识到有了麻烦。

到这时，第二波德军已经开始攻击那些被第一波德军留在身后的据点。不过，如果一切顺利，连这样的攻击都是不必要的。在被包围之后，得不到命令、不知道主要战斗究竟在哪儿打响的军队通常会逃跑或是投降。一位曾经领教过德国人新战术的英国军官称之为“战略瘫痪”：“摧毁一支军队的神经，并由此摧毁其指挥官的意志，比把他们的肉体炸成碎片更有成效。”

1917年9月，德国人在里加第一次尝试了突击队战术，导致对面的俄军阵线完全崩溃。6个星期之后，在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意大利人经历了更大的恐慌［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永远记录了下来］。一名德军中尉——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只带了5个人就抓获了1 500名意大利战俘。最终，一共有25万意大利人投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向前推进了60英里。

但这些还只能算是演练。到1917年底，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太多的美国军人抵达前突破西线。鲁登道夫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地试图突破英军的防线，从而使“世界警察”的部队退回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进而迫使法国人走向谈判桌。1918年3月，鲁登道夫最后赌了一次。

进攻刚刚开始了两天，英国第五军就被击败了。上千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在他们的身后，丢下了上千具的尸体，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见图5–5）。为了庆贺这一胜利，德国皇帝给德国的学生放了假。但与里加和卡波雷托的情形不同，防守方的指挥部仍在，并且把预备队迅速投进缺口。在德军的突进被遏止了之后，鲁登道夫又挑了一段防线展开进攻。到5月初，英国人的形势再度岌岌可危。“我们陷入了绝境，”英军的命令中说道，“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个人都要奋战到最后一刻……绝无退路可言。”



图5–5 那异域的一个角落，永远属于英格兰：1918年3月，在隆格瓦勒[1]阵亡的英国人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42245）。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找到了退路，但英国人又一次迟滞了德军的攻势。鲁登道夫再一次发动了进攻，法国人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让刚刚漂洋过海而来的美国人投入战斗。撤退的法军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跟他们一起后撤，结果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撤退？去你的吧，我们才刚到这儿。”美国人守住了阵地。鲁登道夫失败了。

现在，轮到德国人承受消耗战的压力了。在1918年春，战争双方都损失了约50万人，而一种可怕的新敌人——西班牙流感——则在双方军中肆虐（这种H1N1病毒可能在1917~1918年的军营中演化，最终在1919年底之前夺取了5 000万至1亿人的生命）。但已经有70万美国人抵达了法国，还有两倍于此的美国人在前往法国的途中，因此协约国一方可以补充他们的兵员。德国则做不到这点。英法美联军计划在1919年发动宏大攻势，包括动用伞兵空投到德军战线的大后方，并且使用上千辆坦克进行突破（不过，1919年的飞机和坦克究竟能否承担此重任，还要画上一个问号）。不过，协约国最终选择了英国人的老后备方案——让敌人因饥饿而屈服，而不是这些浮夸的计划。1918年秋，德国发生了饥荒。士兵和水兵们哗变了。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城市。内战开始了。

在前线，德军士兵们开始大批大批地投降。美军曾在一天里接纳了13 251名战俘。1918年4~10月间，德军人数减少了100万。9月底，鲁登道夫垮台了。在被德国皇帝撤职之后，鲁登道夫流亡国外。最终，在11月11日，西线停火。“在今天上午11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对议会说，“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上午，所有的战争都就此告终。”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为什么劳合·乔治错得这么离谱？有人责怪说，是《凡尔赛和约》太过严苛，使得德国人寻求复仇。也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太过仁慈，让德国保持完整，而没有让它倒退回1871年统一之前的状态。也有人责怪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和约，或是责备英法图谋利用和约。但事实比这些都要简单得多。真正的和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警察”。

德国没有能完成它想要的那种反建设性的战争——打破欧洲反德联盟，并且破除英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而英国也没能完成它想要的建设性的战争，因此未能重塑它在1870年以前的突出地位。英国本土在战争中确实没中一枪、一弹、一炮，在经济上仅次于美国，仍然保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而且，在夺取了德国形形色色的殖民地之后，大英帝国统治着整个地球的约1/4。但胜利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佩皮斯说出“由于缺乏资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军，都乱了套”，已经是至少1/3个千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这句话在1919年仍然是真理，甚至比1661年的时候还贴近现实。英国的债务已经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这一债务水平确实比拿破仑战争时的水平低，但是1815年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而1919年的英国不是。19世纪，英国的GDP在迅速增长，因此它可以稳步地还清债务；而到了20世纪，再想要依靠减少开支、增加税收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只会导致经济衰退。

到1921年，英国的失业率超过了11%，通货膨胀率则突破了21%，罢工导致英国损失了8　600万个工作日，经济水平则自战争结束以来萎缩了近1/4（见图5–6），已经低于1906年的水平。开支的大幅度削减让英国参谋总长绝望地说，“我们在所有的地区都兵力不足——不论是爱尔兰、英格兰、莱茵地区、君士坦丁堡、巴统、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还是印度”。由于缺乏供养舰队的财力，英国在1922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海军军备条约》，与美国保持同等的海军实力。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主动报废一批军舰，而其主动报废的军舰数量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损失掉的军舰数量。保守党领袖承认道：“我们无法独自充当‘世界警察’。”



图5–6未知的未知之形状：**1913～193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疯狂之旅（**1928**年以前的苏联数据不甚可靠）

而美国在国防开支上只投入了其GDP的1%，就足以供养其庞大的舰队。这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当其他经济体都挣扎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之中时，美国的产值却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92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几乎可以与英国在1913年时的峰值媲美，而美国的全球贸易额则比英国的峰值还高出至少50%。192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金融编辑曾写道："自1914年以来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或许是经济史上最为剧烈的一次变革。"

美国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取代英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并不关心。有些美国人坚持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即"与各国均保持和平、发展贸易和诚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有些美国人则担心这样的地位会导致更多的开销；还有包括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内的一些人怀有截然不同的梦想。

1917年1月，威尔逊对参议院表示，战争的目标必须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因为"有人取胜，就意味着失败者将被迫接受和平，而胜利者就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战败者"。在威尔逊看来，"只有势均力敌的两方之间的和平可以持久"，这就意味着"各国不能在条约中规定或暗示哪些是大国、哪些是小国，哪些是强国、哪些是弱国"。与一个由单一强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世界相反，威尔逊提议建立一个国家联盟，"由各国组成的单一而强大的集体，只有它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

从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康德就曾提到过与之相类似的事物。而在威尔逊发表这一通讲话的前几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曾建议用某种群体的"世界警察"来取代旧式的"世界警察"。他认为，"那些高效的文明国家——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很高效——应当加入一个世界联盟保障正义的和平……将它们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国家"。甚至有人曾设想，应

当组建一支国际空军，把那些侵略者轰炸到谈判桌旁。

然而，当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时，它却并非如之前的设想一般。国际联盟没有强制力。国际联盟可以安排难民返回家园，稳定货币，搜集数据，但没有能力弥补英国留下的“世界警察”的真空。很多批评家怀疑，国际联盟真正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要与英国竞争。他们指出，劳合·乔治曾经说过，“我赞同成立国际联盟”，他接着补充道，“实际上……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章程基本按照英国的意思起草，而这个机构成立之初的动作之一就是授权英国和法国“托管”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将其变成殖民地。

美国国会认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又一个纠缠不清的盟约，因此拒绝加入其中。未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则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写道：“国际联盟……不过是想让那些大国永远地控制超出它们帝国疆域的世界”；列宁则斥责国际联盟为“一具发臭的尸体”和“全世界匪帮的联盟”。苏联人在1919年宣称，唯一能够真正取代“世界警察”的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将“摧毁资本的统治，终结战争，废除国界，并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协作的整体”。

在1919年3月，也就是列宁将国际联盟称作发臭的尸体的时候，在新生的苏联，超过500万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异常恐怖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死亡的苏联人的数量超过了被德国人杀死的数量（如果算上因饥荒和疾病而死的人数，大约有800万苏联人丧生）。早在1918年5月，英国和法国就认定它们需要对此进行干涉，并且在11月11日正式投入战斗——而这也恰恰是西线停战的那天。在1919年，一共有25万外国军队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捷克人、日本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波兰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爱沙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

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世界警察”来统领行动，对苏联内战的干涉行动在混乱中失败了。到1920年年中，除了日军之外的外国军队都已经撤退，而苏军正在迫近华沙。苏俄计划在吞并波兰之后，再到刚刚镇压了本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德国去。在1920年夏的几个星期里，列宁用红旗抹去国界的设想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但红军随后耗尽了补给，波兰人借此机会发动反击，将红军赶了回去。到8月底，波兰骑兵甚至在卡莫罗赢得了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战。25 000名骑兵挥舞着战刀争相冲锋，就像此前2 000年的骑手们做的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周围是横飞的机枪子弹和飞溅的炮弹弹片。

在随后的几年里，苏俄逐渐不再提起他们的世界革命了。虽然为了争夺“一战”中覆亡的帝国的领土，不时还会有一些战争发生，但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这个没有了“世界警察”的世界似乎也能良好地运转。国际贸易复苏了。到1924年，大部分国家的收入水平都恢复到了它们1914年的水平。世界终于开始遗忘战争的恐怖了。在1921～1927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在1927～1929年，该指数几乎又上涨

了一倍，在1929年9月3日达到了381.17点的高点。

而就在整整10年之后，英国和法国再一次对德国宣战。

“世界警察”之死

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终于瓦解了。

在经过85年的争论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1929年的危机真的非常让人好奇，”金融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说道，“因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的后果（‘大萧条’，甚至“二战”），但是我们找不到其发生的明确原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10月23日，这个星期三，华尔街的交易员们都慌了神。价值4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30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到了星期四中午，又有90亿美元消失了。接着，银行家们联合起来，开始购买那些没人要的股票，这让市场出现了反弹。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一，又是一泻千里。到星期二的下午，道琼斯指数已经下跌了1/4。如果你在1929年9月3日的高点买了1美元的股票，那么到1932年夏，它只值11美分了。

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的这10年，全球金融崩溃，而这彻底扫光了那些还让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经常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相当于它认同“世界警察”的一部分职责就是维护世界信贷联盟。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世界警察”了，每一个政府都各自为政。各国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保护自己的经济，筑起壁垒防范外来竞争和金融传染。单是美国就新设了21 000项关税排斥进口。到了1932年年底，国际贸易水平萎缩到了1929年水平的1/3。

英国也不再扮演自负的“世界警察”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伦敦也躲在关税的高墙之内。国防开支下降得更加厉害。到1932年，参谋部认为，英国海军已经不再有能力保卫大英帝国苏伊士以东的领土了。他们承认，战争“将在不可估量的时期内让英国的领地和属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置于毁灭的危险之中”。很自然地，这些暴露在危险之中的领地和属地对此不会做出良好的反应。那些由白人定居的领地清楚地告诉英国，如果再有战争爆发，英国政府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领地会支援英国。而长期作为英国的世界体系的支柱的印度，也开始自行其是。1930年，英国开始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展开谈判；1935年，英国向印度的政党做出了巨大让步。

20世纪30年代的衰败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统治阶层。1913年，剑桥大学的一位导师曾经写道：“英国人从不怀疑，这是英国人的美德。”可是，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种美德迅速地消失了。即便在英国

的统治者看来，“世界警察”的地位似乎也开始变得没有意义。最雄辩的质疑者无疑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毕业于伊顿公学的奥威尔在缅甸当了5年的皇家警察，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成了对英国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印度各地，”他写道，“都有英国人私下里对这个体系感到厌恶，尽管他们自己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有一次坐晚上的火车，他与一位在印度教育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在一个隔间里。“天气太热了，根本睡不着，”他写道，“于是我们就聊了一晚上。我们先是小心翼翼地相互问了半个小时的问题，才确信可以放心大胆地跟对方说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列车穿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我们则手握着啤酒，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同咒骂大英帝国——我们都是大英帝国内部的人，既有学识，也对大英帝国非常熟悉，大英帝国待我们都不薄。但是……当火车缓缓驶入曼德勒之时，我们就像两个偷情的人一样满怀羞愧地彼此告别了。”

当然，大英帝国也仍然有其热情拥趸。“有些英国人，因为英国治理印度治理得不好而感到自责。”一位大英帝国的支持者写道，“为什么？因为印度人没有表现出对英国统治的热情爱戴。要我说，英国人在印度治理得不错，英国人的问题是不应该指望那些被统治者能表现出什么热情爱戴。”

大英帝国的这位拥趸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认为，要消除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靠的不是自我怀疑，而是武力。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政府在经济增长迟缓、党派斗争、高失业率和社会动乱的泥潭中举步维艰，这使得希特勒的观点看上去不错。在欧洲、东亚和拉丁美洲，热衷于暴力的强人（有些是左派，但更多是右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这个没有“世界警察”的世界，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在很多方面，苏联都是这些强权国家的典范。苏联的领导人好像发现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后世界的成功之道：越暴力越好。斯大林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把100万人关进了古拉格劳改营，强迫数百万人进行迁徙，并且强征了大量的粮食，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与此同时，封闭、内向、中央统一计划的苏联经济却在1929~1939年增长了80%。这一成绩远远超过了开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10年中，英国经济实现了20%的可观增长，而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仅为3%和2%。

斯大林对国内统治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1939年，他不顾自己已经将红军中最优秀的军官全部处死的事实，转而将暴力的矛头对准了国外。他派兵进入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苏军击败了同样野心勃勃的日本。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但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各国贸易壁垒的严重打击。“我们的国家陷入了绝路，”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中佐认识到，“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人口和食物的问题。”石原莞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被日本采纳了：“开发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那里的自然资源将能拯

救日本摆脱危机。”

石原莞尔和一群年轻军官我行我素，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在1931年入侵了中国东北地区。石原莞尔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然而，东京那些在未知的未知中挣扎的政客们发现，入侵行动十分顺利，而且也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拳”要为此惩罚日本。因此，他们也就此选择了武力。国际联盟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地区撤军，日本则干脆退出了国际联盟。

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日本提出了强烈谴责，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行动。1932年，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袭击，这使得英国放弃了其自1919年以来制定预算时的一个假设：在未来10年中不会发生大的战争。但英国人在是否重新增强军备方面也显得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害怕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5年之后，日本再次发动进攻，占领了中国华北地区。暴力再一次换来了收获。新征服的地方为日本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为军队提供补给的源泉。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超过了70%。“我们变得特别忙碌，”一名军火工人回忆道，“到1937年底，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劳动。我能有钱养活我父亲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想，打仗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见图5–7）

日本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超过了苏联。1937年12月，在攻下了南京之后，日本军人烧杀抢掠，造成的死亡人数达30多万。“我们轮番强奸她们，”一名士兵坦白道，“如果只是强奸她们的话可能也没什么。我不应该说没什么。只是，我们总会在事后用刺刀捅死她们。”一位来自东京的记者看到一些中国人舌头上穿着钩子被吊在那里，吓得哆嗦了一下。一位军官告诉他：“你和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你可能把他们视作人，但我把他们看成猪。对猪，我们做什么都行。”



图5–7　**1937**年，被炸毁的上海火车站中被烧伤的孩子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 Corbis图库。

早在1904年，当哈尔福德·麦金德预计内新月地带、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冲突将成为20世纪的主旋律时，他就已经担心日本可能会走上石原莞尔设想的那条道路。“如果日本人，”他指出，“意欲组织起中国人推翻俄国的统治，征服其领土，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构成一场‘黄祸’，威胁这个世界的自由。因为他们将可以把海洋资源和大陆资源结合到一起，而这种优势将使他们可以将俄国人从这个重要的地区赶出去。”

就在麦金德于1904年发表这一著名演讲时，日本正在为了取得进入中国东北的权利而与俄国作战——从外新月地带向内新月地带推进。而到了1935年之后，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完全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不过，日本并不会立刻威胁心脏地带，而且在1939年夏发生在诺门罕的那场未经宣战的战斗中，苏军的坦克给予日军重创。但此时的日本已经在征服中国的沿海地区了。在麦金德看来，这就是征服心脏地带的前奏。日本似乎是在按照麦金德的设想行动：石原莞尔宣称，在征服中国之后，“日本人就将成为亚洲的统治者，并可以向各个白人种族发动最终的决定性战争”。

这的确让人警觉——非常让人警觉——但对于那些力图维护世界现状的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德国。凡尔赛体系在东欧设置了一系列新国家充当缓冲带。不过，德国的战略难题（也是战略机遇）并没有变化。德国仍然夹在地处心脏地带的俄国人和位于外新月地带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而在20世纪30年代，其使用武力似乎就像在20世纪10年代时一样有效。

在1917年，德国皇帝曾经将当时的欧洲与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做比较。他注意到，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胜利并没有能真正解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矛盾，因此才会在20年之后又爆发了更残酷但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他预计，德国也将要打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德国需要的，只是它的汉尼拔。1933年，德国得到了它的汉尼拔。

暴风骤雨

“德国的问题，”希特勒在1937年对他的顾问们说，“只能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早在1925年，他就在他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重新打一次“一战”，并且打赢它。

希特勒认为，德国在1914年的战略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德军仍然应当在稳住东线的同时在西线出击。在击败了外新月地带的法国和英国之后，德国再回过头对付苏联。但希特勒的思路突破了20世纪10年代的水平。1917年，鲁登道夫坚持认为，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凡是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就应当属于“大德意志”。而在希特勒的脑海中是一个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作“可能的最大的德国”的构想，即让那些地方只有日耳曼人居住。这样就能为日耳曼民族赢得所谓的生存空间。如此，强壮的条顿农民就可以在不受劣等民族干扰的情况下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

希特勒认为，胜利的关键是要从“一战”中借鉴两个重要的经验。第一个想法源自英国军官。在1918年，英国人意识到，如果将德国人的突击战术和英国人的大规模坦克进攻战术相结合（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再配合以空中支援，就能让堑壕战术失效。别具一格的军事理论家巴塞尔·李德·哈特上尉解释说，这种战术的思路旨在让战斗变得更加灵活，成功的关键在于“先取得突破……再用深入的战略突进利用突破口；让装甲部队充当主力部队的先锋，并且独立行动”。

由于缺乏资金，再加上一些思想保守者的阻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都未能大力发展这一大胆的设想。但苏联的将军们注意到了这个想法。苏军将坦克编入庞大的装甲军中，装甲军可以独立行动，从而可以进行“纵深作战”，即按照李德·哈特所说的方式深入敌后。但在1937年，斯大林将这些军官中的大多数人都枪决了，而他们的继任者们自然选择避开这些极端的想法，以免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只有在德国，这种设想才真正成为现实。碍于《凡尔赛和约》的严格规定，德国军队在数量上受到限制，因此只有不断改进自身。这种多兵种配合的突破战术后来被记者们称作“闪电战”。到20世纪30年代中

期，希特勒开始大幅增加对军队的投入，军队的领袖们拥抱了闪电战战术，德国的工程师们也开始建造能够适应运动战要求的坦克、飞机和无线电（而1918年的武器装备就做不到这点）。由于暂时只有德国采用了新的战术，因此希特勒就获得了出其不意夺取胜利的机会。

闪电战意味着要接受风险和混乱，将钢铁风暴变成一场真正的暴风骤雨。轰炸机和伞兵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制造混乱，不仅袭击军人，也同时袭击平民，从而让道路上挤满了难民。在前线，一个个步兵班在密集的炮火和呼啸而过的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在敌人的防线上寻找缺口，试探战略要点和没有保护的侧翼。坦克和卡车随后就会从这些缺口突进，从而打响真正的战斗。装甲部队会突击进入敌军防线之后，在敌军的预备队得以集中、截断、消灭渗透部队之前，就迅速消灭掉其指挥中枢。突破后的部队最终会耗尽补给，但到那时，早已有第二梯队的装甲部队发动突击了。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有第三梯队，总之要让防守方手足无措。或迟或早，混乱和迷惑就会摧垮敌人的战斗意志。

闪电战的实战效果就像设想的一样好。在英国和法国开始进行动员之前，波兰军队就土崩瓦解了。随后，1 000辆德国坦克突破了法军松懈的防线。曾经在“一战”中坚持苦战的法国，在1940年5月就彻底失败了。3个星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他坚称，“我们将坚持到最后”。但当丘吉尔的陆军大臣在一间宾馆客房里秘密召集高级军官，询问他们英军“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作战”时，他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答案。“没人能说得准。”一位军官回忆。

当然，英国确实坚持了下去。但在12个月之后，德国似乎更接近赢得战争的胜利了。德军超过4 000辆坦克挥师东进，苏军像法军一样迅速崩溃了。“苏联人在战争开始的前8天就输掉了战争。”德军参谋长宣称。斯大林有点儿被击垮了，躲到了他在乡间的别墅。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找他了。“我们看到他坐在一间小餐厅的扶手椅里，”其中一个人写道，“他抬起头来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他脸上的神情特别奇怪，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奇怪。”他的手下们意识到，斯大林以为他们是要来处死他，然后向德国人投降。

不过，苏联人也坚持了下去，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场所并非只有战场——这也是希特勒从“一战”中学到的第二点。尽管（或者说因为）希特勒曾经于1918年在堑壕中服役，看到了军队的崩溃，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认为，德国并未在战场上失败。他相信，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有叛徒在德国的背后刺了一刀。因此，他认为，德国必须在战争爆发前就消灭掉那些潜在的叛徒。他先拿共产主义者开刀，在1933年抓捕了数千人。接下来要对付那些极右翼的对头，他在1934年将他们全部杀掉。随后，矛头又对准了那些不配做德国人的群体。

“主要的一点，”1938年，希特勒曾在私下里说，“就是必须将犹太人赶出去。”2 000年前，罗马帝国将犹太人从他们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从那以后，欧洲人就时不时地迫害犹太人。但像他们做很多事情的

方式一样，纳粹更进了一步。希特勒认为，由于犹太人自己无家可归，因此他们完全站在德国人的对立面，因为德国人与德国的土地有着神圣的联系。犹太人没有归属感，又十分贪婪，因此他们会腐蚀千秋万代的德意志帝国，所以他们必须被彻底根除。1939年，德国刚一开始入侵波兰，德军就开始枪毙犹太人。他们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既慢又贵。于是，他们把卡车改造成移动的毒气室。大概在1941年7月，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决定将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抓起来杀掉。希特勒的亲信们也认同他们的领袖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其他次等人类也必须被消灭掉。他们提出要切断苏联城市的食品供应，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将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

人民战争的力量走到了极端，这也正是“二战”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一战”之中，在亚美尼亚、塞尔维亚、比利时和非洲都曾经发生过有计划的大屠杀。但希特勒所采取的如此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暴行，用丘吉尔的话说，是“黑暗而可悲的人类罪行史上无可逾越的丑陋暴政”。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纳粹还是杀害了至少2 000万平民。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本书的前言部分中提出了那个“希特勒反例”。我一直宣称，战争是具有建设性的，可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可以维护其内部的和平，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解释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呢？如果希特勒能够建成他设想中的“可能的最大的德国”，那么这个国家将是自罗马帝国之后亚欧大陆上最庞大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只会让其大部分子民生活在贫困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这与建设性的战争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

在前言部分中，我提出应对“希特勒反例”的方法就是从长期角度审视历史。自从囚笼效应从10 000年前出现以来，征服者总是会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但他们或他们的继承者们随后就将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要么变成坐寇，要么被新的征服者取代，而新的征服者也将面临同样的选择。丘吉尔认为，如果希特勒击败了英国，“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一切的整个世界，都将坠入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伴随着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这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更加危险，更加漫长”。不过，所有证据都表明，希特勒的政权也将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变成坐寇，要么像历史上的所有政权一样灭亡。

希特勒一直清楚地知道，赢得欧洲的战争并不意味着他的奋斗的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约是一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他预测说，东欧将能够为日耳曼民族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但在这段时间之后，德国人就需要再次扩张，很有可能是要漂洋过海。到那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30年代之间），希特勒的继承者们将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次大战中，德国将摧毁大英帝国的残余部分，并且在全球占据领地。

绝大多数纳粹领袖们都深信，导致德国在1918年战败的原因是叛徒

的背后一刀，而非美国的参战。因此，他们中少有人能意识到，对他们的长期计划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几天，希特勒就向美国人宣战了，而没有选择让太平洋战事分散美国在欧洲的注意力。“美国人又能如何呢？”德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如是说。丘吉尔却看到了美国人能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参战，完全投入其中，并且将奋战到底，”他谈到自己听闻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反应，“终于，我们赢了！”

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就在制订进攻美国的粗略方案，并且时不时地命令德国的工厂开始建造可以袭击纽约的远程轰炸机，以及能在大西洋一决雌雄的水面舰队。但随着更要紧的问题不断出现，希特勒只好放弃了这些计划。如果希特勒在1940～1941年击败了英国和苏联的话，他会不会更认真地考虑进攻美国的计划呢？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不过这一猜测不无意义。因为，当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纳粹德国像建设性的战争产生以来的所有统治者一样，必须迅速做出那个抉择：是变成坐寇，还是被击败。

如果希特勒认真生产轰炸机、建造舰队，并且试图进行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战争的话，他会很快陷入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遇到的困境。一旦美国明白了怎样抵御闪电战，战争就会变成漫长的后勤能力比拼。即便希特勒能从被奴役的欧洲调集所有资源，他也打不赢这样的战争。

在某些意义上，希特勒的处境更像135年前拿破仑的处境。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用现代的人民战争的力量去实现旧的帝国式的理念，用武力统一内新月地带的欧洲，再使之隔绝于依赖商业的开放的外新月地带。如同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的那样，当拿破仑在1805年左右使用这一策略时，就已经证明这一策略注定会失败了。这是因为，大西洋经济圈产生的巨额财富已经证明，真正的实力来自于“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的协作。由于英国能实现这种协作，而拿破仑不能，因此法国皇帝并没有可以击败这个由小店主组成的国家的太大可能。到了1940年左右，希特勒用更加极端、血腥的方法实践了同样的策略，而他得逞的概率就更低了。希特勒和拿破仑一样，在英吉利海峡、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和埃及的沙漠中遭遇了失败，这或许并非巧合。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厄运，是因为他们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就算希特勒击败了英国，他也只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活力的开放的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独裁者们是被历史抛弃的一群人，就好像那些在史前时期对抗农耕民族的渔猎采集部落，或是试图抗拒古代帝国的部落族群一样。

如果纳粹德国在欧洲取胜，它也不会成为希特勒一直谈及的千年帝国，世界的局势反而会更像是1945年冷战格局形成后的样子。一边是极权主义的欧洲帝国，一边是采用开放秩序的美国，双方都会躲在核导弹的屏障后向对方怒目而视，并且试图在拉丁美洲以及英国和法国曾经的

版图上施加影响。它们会支持政变，发动代理人战争，并且拉拢对方的盟友（那样的话，1972年，尼克松可能就不会飞到北京去拉拢中国反对苏联，而是飞到东京去拉拢日本反对德国）。他们甚至还会经历类似于彼得罗夫所经历过的那种情况。

当然，也会有区别。如果希特勒赢了，那么欧洲帝国的统治中心就不会是莫斯科，而是柏林；其帝国的版图也不会止步于“铁幕”，而是会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希特勒和他的继任者们或许会比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更有胆量冒险发动核战争。而失去了西欧的美国也将更难以取胜。但到最后，像后来的共产党一样，纳粹德国也会遇到那个核心问题：怎样与富有活力的、开放的外新月地带竞争；纳粹德国也仍会面临同样的选择。

关于冷战的话题，我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我先就此打住，因为至此已经足以证明“希特勒反例”其实并非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是对我在本书中所要阐述的理论而言的，对于那些要生活在他的恐怖统治之中的人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大问题）。希特勒的政权在人类暴行史上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纳粹德国取得胜利，那将是一场灾难，欧洲人将在数十载中生活在盖世太保和死亡集中营的阴影之下，暴力死亡率可能会攀升到多少个世纪以来都不曾达到过的高度。但即便如此，纳粹德国也必然要像历史上的其他政府一样遵从铁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几十年的跨度增加到几代人的跨度），由于需要与奉行开放秩序的国家进行商业和军事上的比拼，希特勒的继承者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被打败，要么转变为坐寇。在这个假设的情景之中，或许到了21世纪10年代，欧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秘密警察们还会在午夜时分时不时地破门而入。但此时的暴力死亡率一定又开始下滑了。希特勒可能会延缓文明化的进程，但他不可能终结它。

当然，事实是希特勒输了。如果他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2]战役中的表现能更好一些，他本来是可以取胜的。即便到了1943年夏，当他在库尔斯克发动史上最大的坦克会战时，他也还有机会。不过，在那个时候，他的对手不仅学会怎样抵御闪电战，还学会了怎样使用闪电战。同盟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投入到总体战之中，最终击败了德国和日本（见图5–8）。上千架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空袭轴心国的本土，使它们的经济瘫痪，还造成了大约100万平民的死亡（东京曾经在一个晚上就有10万人丧生）。当德国人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德军需要动用60万匹马运输火炮和补给，极大地延缓了进军的速度。而到了1944年，盟军已经完全机动化了。在诺曼底登陆后实施的“眼镜蛇行动”之中，突破一方变成了美国坦克，而土崩瓦解的一方则成了那些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在东线也是如此，苏联装甲部队一路杀入德国境内，在巴格拉基昂行动中消灭了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群。当本国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时，希特勒自杀了，而日本天皇则对他的臣民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讲话。“战局并未好转，”天皇承认道，“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随着这次讲话，暴风骤雨总算停息了。



图5–8 被击败：绝望的德国炮兵。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彻底打破了希特勒击败苏联的希望

资料来源：华盖图库。

学着爱上原子弹[3]

“二战”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如果我们算上那些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人们，再加上在德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的集中营和战俘营中被杀害的人们，“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在5 000万至1亿，而“一战”和其后接踵而至的各种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1 500万和2 000万。“二战”将欧洲和东亚的大片地区都化为废墟，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大概相当于2013年的15万亿美元，即美国或欧盟一年的全部产值）。但充满矛盾的一点是，“二战”同时也是最具建设性的战争之一。

这是因为，“二战”开启了一个进程：清理英国这个“世界警察”下台后留下的混乱。无须赘言，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丘吉尔要求英国人民贡献出自己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4]时所设想的结果。早在美国尚未参战的1941年8月，丘吉尔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后对内阁说，他有一种“清晰而大胆的预感，在战争结束后，美国会同英国一同治理这个世界，直到建立起更好的秩序”。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二战”期间，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打败希特勒，英国负责拖时间，苏联负责出人，美国负责出钱。到了1943年11月，当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时间已经变得有利于同盟国一方了。此

时，只有出人、出钱更重要。因此，丘吉尔发现自己只能靠边站了。

当英国人从战胜德国和日本的狂喜中清醒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非但没能与美国一道分享世界，反而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后遗症之中。英国的债务情况比1918年时严重得多。英国的经济被战时生产彻底扭曲了，其本土的食品供给都要依赖于美国贷款。“这太不真实了，简直荒谬绝伦，可怜透顶。”1945年12月，一位左翼记者在日记中写道。他刚刚看了两天的议会辩论，讨论的内容是美国对英国紧急援助的条款。“议长接受了他们的条款。但事实是，他们都有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恐惧——他们害怕，如果再也不能从美国得到香烟、电影和火腿，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这一切或许荒谬绝伦，可怜透顶，但并非不真实。英国已经在抗击德国人的过程中破产了。要偿还债务，英国必须把出口放在优先于消费的位置上，而食品定量配给甚至在1945年之后变得更加严格了。1950年，当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鸡蛋之时，英国人甚至感到十分欢欣。“此事对我们的意义，只有英国的家庭主妇们才懂，”一篇日记里写道，“我们终于可以打两个鸡蛋放进蛋糕里了……我们已经10年没这样做了。”

英国一面面临着债务违约风险，一面又面临转变成高福利国家的要求。很快，英国发现维持原有的帝国疆域实在是难以承受的奢侈要求了。早在1916年，一名指挥土耳其军队保卫伊拉克的德国将军（他的对手是主要由印度人组成的英军）在家信中写道：“20世纪最鲜明的印记，必将是有色种族对抗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革命。”不过，在经历了另外一场世界大战之后，他的预言才成了真。

在殖民地被日本占领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统治。1941年12月发生在槟城的一幕就非常典型：当日军开始渗透进英军的防御工事时，英国守军未发一弹就逃走了，抛下了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任凭入侵者宰割。在几十名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亚洲公务员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疏散的消息；而为了给英军指挥官的轿车腾出空间，他又被赶下船来。一名亲历了这一切的年轻的英国女性说道：“我敢肯定，这种所作所为永远不会被遗忘，也永远不会被原谅。”

在“二战”中，有250万印度人志愿加入英军，而只有几千人加入了日军（他们这样做通常只是为了离开战俘营）。但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也不敢幻想还能继续保持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1947年，英国人非常不体面地匆忙撤出了印度；到1971年，英国人在苏伊士以东已经没有什么控制权了（或者可以说在多佛以东）。

“大不列颠丢掉了一个帝国，却没有找到新的角色。”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评论道。但这不完全对。作为曾经的“世界警察”，英国实际上已经顺利地转变成了取代其地位的新强权的主要支持者。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余地。希特勒自杀后不到一年，丘吉尔就已经看到“铁幕在欧洲大陆降下”。“二

战”的建设性还不足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警察，但创造出两个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警察”。

在500年战争之中，欧洲几乎征服了世界。而现在，苏联和美国征服了欧洲，它们把欧洲从中间分开。夹在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之间的强大的德国一直担心会被两面夹击，因而曾经引发了重大的战略问题。现在，这一问题也被解决了，因为德国被分成了两个国家。单独来看，“一战”大体上是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因为它动摇了英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但从1945年的角度看过去，“一战”似乎又更像是一次更长期的建设性的战争的开端，而这次建设性的战争将用一个更加强大的20世纪的“世界警察”取代19世纪的“世界警察”。很多颇有思想的观察家们认为，未来还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建设性的战争——两个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警察”将一决雌雄，最终只留下一个“世界警察”。

但有一样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子弹。

原子裂变改变了一切。在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炮击持续了数天，在敌军的阵地上倾泻了15 000～20 000吨爆炸物。然而，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原子弹只用了一次爆炸就释放出这样的威力，而且还会用致命的中子和伽马射线杀伤爆炸幸存者。美国用这两枚原子弹就杀死了至少15万人。如果在两个均具有庞大的核武库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在最高峰的1986年，美国和苏联共拥有7万枚核弹头），后果将不可想象。这样的战争将完全是反建设性的，被这样的战争破坏的土地，将在未来上千年中都始终是不毛之地。就连斯大林也觉得这样的事情难以接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办。一种可能是，这个世界会被吓住。在意识到可怕的前景之后，人们可能会终于实现铸剑为犁的梦想。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就为《纽约时报》撰文称，这是唯一的选择。芝加哥大学一个热心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组建一个世界政府的大纲。人们甚至希望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能够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

但所有这些答案又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如果核大国之间发生冲突，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该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管理所有的核武器，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拒绝了相关的调查协议。到了1947年，人们也不再相信沟通的作用。苏联人认为，联合国“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组织，还不如说是一个美国人的组织”；而美国官员在看到一些代表的可笑举动之后，干脆把联合国称作“猴舍”。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个世界将因为恐惧而滥用暴力。一些美国人将“次要的恶”的逻辑发挥到了恐怖的极致。他们认为，既然美国拥有原子弹和能把原子弹运送到敌方城市的轰炸机，而苏联人没有这两样东西，那么美国就应该选择在现在发动一场一边倒的核战争，而不是等到以后去进行更加可怕的、双方互相袭击的核战争。丘吉尔甚至也想出了

一个计划（非常恰当地命名为“不可思议行动”），要在发动核打击之后动用不久前投降的德军再次入侵苏联。

在4年的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上面的方案依然有瑕疵：美国没有足够的原子弹击败苏联。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的计算，如果美国把其拥有的全部133枚原子弹都投到苏联的城市，那么大约将有30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很可怕，但是并不足以动摇苏联这个在“二战”中死亡2 500万人的国家。美国并没有能力杀死上千万的苏联人，直到他们的物理学家在1952年引爆了爆炸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700倍的氢弹。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由于苏联间谍和苏联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见图5–9）。



图5–9 打破平衡：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资料来源：戴维·霍拉维私人收藏。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1953年，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敌人有了原子弹就瑟瑟发抖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正视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一次性地把所有原子弹都投入对敌打击之中”。他委托的一次研究认为，“苏联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化为一片冒着滚滚浓烟、充满辐射的废墟”。而另一次研究却指出，如果苏联轰炸机进行自杀式地有去无回的袭

击（如果机组成员的家园已经成了充满辐射的废墟，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也很合理），他们将能够在美国城市中投掷100枚原子弹，造成大约1100万人死亡。

在北极上空将会发生激烈的空战，很多苏联轰炸机，甚至是大部分苏联轰炸机都会被击落。但即便如此，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风险还是太大了。随着苏联人在1954年拥有了真正的远程轰炸机，又在1955年拥有了氢弹，美国人面对的形势就更坏了。一枚标准水平的氢弹有着相当于100万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爆炸力，足以在3英里的范围内杀死所有人，夷平所有建筑物；在6英里的范围内，衣物都将化为火焰，人们则会以足以致命的速度被抛到空中；在11英里之外，任何身处开阔空间的人都会遭受二级烧伤和辐射伤害。到20世纪50年代末，像这样的核弹，苏联拥有数百枚，而美国人拥有上千枚。

美国人既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因为恐惧而滥用武力，他们在1947年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即所谓遏制政策。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外新月地带的强国。美国比19世纪的英国更深入地采纳了开放秩序，废除了直接统治（除了它在北美征服的近380万平方英里土地上的统治之外）。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以自由之名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尽管如此，如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著作《巨人》（*Colossus*）与《帝国》（*Empine*）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战略处境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惊人地相似。

像英国一样，美国统治了海洋（现在还要加上天空），在全世界都拥有军事基地，并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并没有控制着众多的行省或是附属国，而是一群盟国的首领。因此，美国更多地要依赖政变和与当地武装力量的合作，确保它的追随者们与它协同一致，而非直接派出炮舰达到这个目的。不过，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追随者们通常会有一定的自由采取美国不喜欢的政策。但在重大事务上反对美国的代价之高（就像英国和法国于1956年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入侵埃及之后所发现的那样），使得美国的盟友通常不会冒险。凡事都可以讨论，但总体来看，美国的盟国通常都会按照美国的意思做。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美国的友邦还是美国的敌人，都将“二战”后的世界称作美利坚帝国。

有了这样的盟友，美国就能很快地实现和平。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很少允许其盟友相互开战（由于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在美利坚帝国的阵营中，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主和平论”）。与此同时，在各国内部也实现了和平。“二战”使得人们普遍尊重政府，反感政治暴力活动。“二战”后的几十年是法律和秩序的黄金时代：在1950～1974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的暴力死亡率仅为1/5　000和1/4　000。美国的比率（1/700）仍然高于欧洲，但已经比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下降了50%。20世纪50年代或许是乏味的时期，但绝对是非常安全的时期。

这同时也是非常繁荣的时期。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

中的一次会议上，美国人奠定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以取代在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崩溃的旧秩序。美国也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注入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战时的盟国，但由于美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原则，也有大量资金流入了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到1951年，美国已经对外投放了260亿美元的资金，大致相当于其当年GDP的10%。

战略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这既是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而美国使用的是完美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就像亚当·斯密笔下的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一样，美利坚帝国也并非出于善心才做这些事，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随着大量资本涌入欧洲，反过来也刺激了对美国食物和商品的需求。美国经济在从战时经济转型为和平时期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短暂而剧烈的下滑，但随后就实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受益者最多的经济增长（见图5–10）。在英国，1950年人们还会为可以自由购买鸡蛋而欢呼雀跃，而到了1960年，已经有超过1/4的家庭拥有一部汽车；到了1965年，这一比例则超过了1/3。美国的家庭汽车拥有量一直是欧洲的两倍，但并没有欧洲人为此而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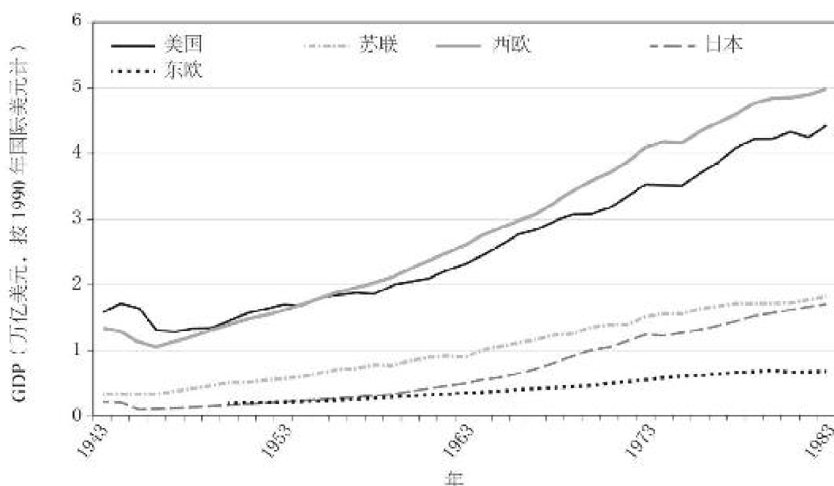


图5–10 让好时光摇摆起来：**1943~1983**年，史上最繁荣的经济增长开始了（**1950**年前的东欧数据不大可靠）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利维坦都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公民社会之中，以获得赢得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并开始负责管理从军火生产到医疗事业再到抚育子女的所有事情。在1918年之后，大部分选民都将此看作对自由的侵犯，因此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都忙不迭地抛弃了高税率和管理公民生活这样的负担。然而，到了1945年，许多欧洲人（也有一些美国人，不过不像欧洲人那么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大政府。他们不再将大政府视作一种压迫，而视作一种自由的工具。大政府曾为他们赢得了对抗希特勒的战争，那么，现在或许大政府可以帮助他们赢得对抗贫穷和不公的战争。让诸多保守主义者感到恐惧的是，选民们开始把票投给许

诺建立国家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国立大学教育、国有工业，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以及立法保护边缘人群的政府。

随着帝国的发展，美利坚帝国麾下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一切都还不坏。

一路走向彼得罗夫的时刻

美利坚帝国不需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但是它的确需要保护并发展内新月地带的自由市场，尤其是在西欧。美国的遏制策略意味着允许苏联人在他们自己的心脏地带中为所欲为，但必须阻止共产主义者任何进犯内新月地带的举动。就算美国做不成“世界警察”，它至少要一做个“世界门卫”。

可以预料到，在心脏地带看来，遏制政策就像是个包围圈。在苏联政治局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日本，美国的盟友都将其包围。美国的财富和自由将内新月地带的国家吸引到美国一边，威胁着共产主义的未来。莫斯科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尽他们所能想要打赢这场思想之战，而各种各样的五年计划也带来了放在以前会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但从苏联人征服东欧开始，他们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武力，就像以前的沙皇曾经做的那样。

衰退也在威胁心脏地带。苏联人远离海洋贸易的大潮，也无法像外新月地带的国家那样创造巨大的繁荣，苏联人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难靠更高的生活质量赢得人们的忠诚。

不过，苏联似乎把暴力犯罪率降到了极低的程度。然而，它也同时让子民们生活在悲惨的境地之中。维持庞大的镇压机器意味着巨额开支，而这也扭曲了经济的运行。在1946～1960年，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但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增加了两倍。

除此之外，苏联人为了统治东欧，必须维持上百万的大军，并在其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在“铁幕”另一侧的美国人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怀疑对方的意图（通常都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那么就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在内新月地带发生利益冲突。在因此产生的美苏争斗之中，间谍、警察、叛乱者和军队都会卷入其中。美国和苏联都发现，尽管它们都制定了自己的战略，但是它们通常无法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两个超级大国都必须与盟友紧密协作，但局势却似乎经常被这些盟友们所左右，不是“狗摇尾巴”，而是“尾巴摇狗”。苏联人曾经抱怨说，他们的民主德国代理人就曾经把他们拖进了一场他们不想要的危机之中；而北约（于1949年在挪威的倡议下形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则开玩笑说，这个组织根本就是西欧的一个阴谋，其目的是“把苏联人赶出去，把美国人弄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盟友关系更是错综复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历时3年才宣告结束，造成了300万人丧生，美国甚至还曾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美国在内新月地带保持了自己的存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54年，艾森豪威尔出台了一个全新的“零容忍”的遏制政策——“新面貌”（这个名字十分奇怪，取自克里斯汀·迪奥1947年的长裙系列）。官方的解释故意弄得很模糊，不过似乎这个政策将用核打击报复在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攻击。地面部队的数量将缩减到最小，其功能将仅限于作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而触发美国的核打击。北约在欧洲的指挥官说得很直接。“我们所有防御计划的基本点都是使用原子弹和热核武器。”他写道，“在我们的计划中，核武器不再是‘可能使用’。我们说得很明确：‘核武器将被使用。’”

只要让苏联人认识到，战争对苏联来说将是自杀性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是近乎自杀性的，那么新面貌政策就或多或少地让美国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至少在面对莫斯科和北京（中国在1964年也拥有了核武器）的时候掌握主动权。但在核僵持的局势下，反而会出现奇怪的“尾巴摇狗”现象，更弱小的一些国家反而发现自己可以冒更多的险，因为它们知道，美国宁愿在它们身上违背一些既定原则，也不愿意被视为对“小鱼”都要使用核威胁的邪恶霸权。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他不会在中南半岛对胡志明（Ho Chi Minh）使用核武器。

军事上核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几乎不可能维持稳定的战略。1945年，美国和苏联都尽可能地招揽希特勒的火箭科学家，让他们设计洲际弹道导弹。1957年，苏联人在这场竞争中险胜［在电影《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中，赫鲁晓夫吹嘘道：“我们的德国人比他们的德国人更棒。”］。苏联人用他们第一批火箭中的一枚将重达184磅的钢球“史泼尼克”发射进了轨道。在“史泼尼克”内部是一架无线电发射机，除了发出哔哔声之外别无其他功能。但这已经足以让美国人陷入绝望。“听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警告说，“这声音就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割线。”

但就像这个崭新世界里的几乎所有事物一样，苏联的优势也很短命。两年之后，美国人也拥有了可以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到1960年，美苏双方都掌握了从潜艇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这样一来，先发制人摧毁对方的导弹、使敌人无力还击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仍然对苏联保持着9：1的核优势（见图5–11）。美国国防部预计，如果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将能够杀死1亿人，基本上摧垮苏联。然而，这篇报告接着说道，苏联人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城市发动的反击将杀死7 500万美国人和1.15亿欧洲人，从而摧毁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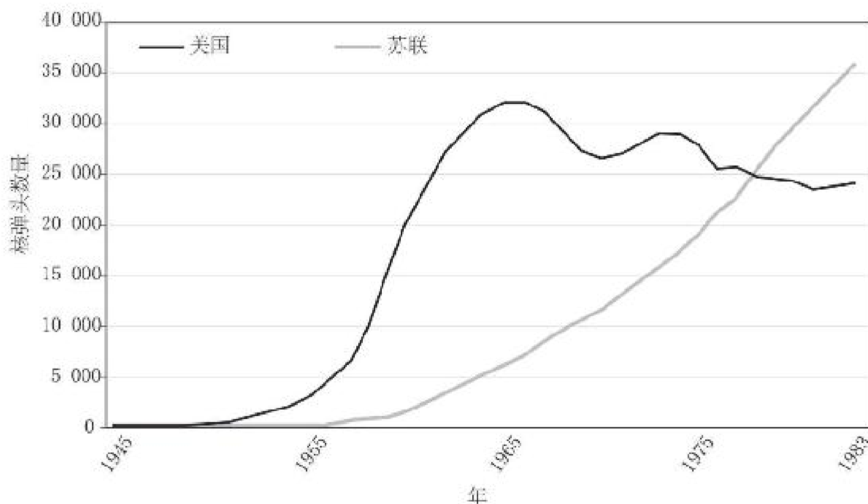


图5–11 过度的杀伤力：**1945~1983**年，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

“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正如它的缩写“MAD”（疯狂）一样，是疯狂的。大规模的核报复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向对方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这样一来，新面貌战略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未知的未知又回到了这个世界。1961年，苏联人不知道美国新上任的总统肯尼迪是否会冒着失去纽约的风险拯救美国在柏林的利益。因此，在对柏林这座分裂的城市的争夺中，苏联人比往常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政治家们摆开架势，相互威胁，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最终，苏联退缩了，在柏林的中央修建起了一道墙。到了第二年，形势却更糟了。“为什么不往美国人的裤子里放上一只刺猬？”赫鲁晓夫问道。于是，他把苏联的导弹运送到了古巴。在令人心脏骤停的13天里，最坏的情况似乎就要发生了。世界仿佛再一次回到了20世纪10年代，而且这一次人们有了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整个世界都惊醒了。在美国一方的自由民主国家里，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销毁核武器，唱着抗议的歌谣，并且排队观看《奇爱博士》。《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益处——占据了绝对上风。

但这些都解决不了这个星球所面临的问题。就像以前的时代一样，只要有人相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不坏的选择的话（或是只要有人相信有其他人是这样想的），就没有人敢放弃武器。而就像自第一把石斧发明以来产生的所有邪恶的武器一样，原子弹一经发明，也就没有办法再被“反发明”（艾森豪威尔使用的词）。即便世界上所有的核弹头都被销毁了，它们也能在几个月内被再次生产出来。这就意味着，禁绝核弹可能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危险的举动，因为背信弃义的敌人可能会偷偷地重建其核武库，并且在遵守条约的一方重新生产出足够的核武器之前就先发制人地发动毁灭性的打击。

在20世纪60年代末，《战争》和几十首略逊一筹的抗议歌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大部分人显然赞同这种逻辑。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从来都不会有宣传核裁军的党派赢得选举。英国的工党曾经许诺将禁止核武器，结果该党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该党的一位议员将该宣言称作“史上最长的绝命书”）。

那些真正操控核战争的冷静的人们在寻找更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有的方案很简单，比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设置一个直线电话（经过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中继）。还有一些方案则没那么容易，比如削减已然十分庞大的核弹头数量。1966年，美国停止了对其核武库的扩充，但苏联人又将其核军备扩充了20年。（美国的一位国防部长说道：“我们造的时候，他们也造；我们不造了，他们还造。”）

最为困难的一步，是怎样在不招致世界末日的前提下争夺内新月地带。美国的方法是采取灵活应对的新政策。美国不再动辄威胁要杀掉上亿的人，而是根据威胁的严重程度做出适当的反应。但美国要怎样确定何种反应是适当的呢？在欧洲帝国从东南亚撤退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美国人认为，如果只是为了在世界遥远的角落保住一小块内新月地带的落脚点，其重要程度不足以让美国投入一场核战争。但其重要程度足以让美国人在那里牺牲士兵吗？肯尼迪曾经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抱怨：“军队会开进去，人们会为此欢呼雀跃……然后，就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要派进去更多的部队。就像喝酒一样，一杯接一杯。”尽管如此，他还是派了8 000名顾问去了越南。两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4年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到了1968年，已经有50万美国人在越南作战（见图5–12）。



图**5–12** 搜索与歼灭：美国第一陆军师在越南南部平定省的沿岸低地四处搜索着反叛军（**1968**年**1**月或**2**月）

资料来源：赫尔顿档案馆/华盖图库。

派遣地面部队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抉择接踵而至。拘押平民被证明是切断叛军支援的有效方法，那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合适吗？白宫认为，合适。那么，轰炸北越呢？白宫认为，有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入侵北越呢？白宫认为，不行，因为此举可能会引发苏联的进一步介入。在尼克松总统看来，对柬埔寨中部的疑似共产党据点进行轰炸和袭击是合适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持不同观点。这引发了骚乱，结果国民警卫队在俄亥俄州开枪打死了4个人。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在老挝建设一条封锁线，以截断越共的补给。这在军事上是很自然的选择，南越的将军们认为此举将“从后方截断北越军队”。可到了此时，没有哪个总统会同意这种更大胆的方案。

战争继续了下去，最终导致了至少300万人丧生。尽管这一开端令人不甚满意，但北约在欧洲延续了灵活应对的政策。如果在欧洲爆发战争，那么这里就将见证最大规模的闪电战。在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袭和炮火的掩护之下，可能会有7 000辆苏联坦克冲破联邦德国边境单薄的防线，随后训练有素的部队将通过空降或乘坐直升机的方式在后方100英里的纵深里引发混乱。随着战斗正式打响，在最初的空袭中幸存的北约战机将袭击最远可至波兰的地区，将苏联装甲部队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梯队在抵达战场前消灭掉，而步兵则会固守，试图在第一梯队的苏联坦克冲破富尔达缺口或北德平原之前迟滞其攻势。

北约的将军们寄希望于借鉴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攻击以色列军队的经验。当时，指挥和训练水平都很差的阿拉伯步兵凭借着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将指挥得当、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阻拦了数日。以色列人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适应了对方的战术，并且发动反击并消灭了阿拉伯部队。但北约只能赌它们的部队可以坚持更长时间，长到可以让美军渡过大西洋，操起预先安置好的重型装备，再把苏联人赶回去。

在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将军——他曾在联邦德国负责指挥那里的英军—1978年出版的畅销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The Third World War*）中，战争大体上就会这样进行。在他的笔下，灵活应对策略的效果很完美。在17天的常规战后，苏军的攻势将被阻滞，而美军的到来将增强西方的防御力量，甚至还实现了反攻。此时，苏联将战争升级了。它发射了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SS–17导弹，摧毁了英格兰的伯明翰，造成30万人死亡。北约做出相应反应，对明斯克发动了核打击。此时，并不稳固的苏联政权垮台了。

1978年时，我刚好就住在伯明翰（距离哈克特设想的着弹点——温森格林大约2英里的地方），因此我可不太喜欢他的预言。但这位将军清楚得很，现实情况会比小说中糟糕得多。北约可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动用“战术”核武器（通常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5]一半）阻止敌人的突破，并且向敌方示意攻击必须停止。如果莫斯科拒不理睬，那么北约就会使用更大威力的核武器（通常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6倍）。如果此时已经深入联邦德国境内60英里的苏军坦克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北约将不再有所保留。

不幸的是，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核弹视作什么重要的讯号。苏联的计划要求坦克部队在两个星期内抵达莱茵河，并在随后的4个星期内抵达英吉利海峡和比利牛斯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将在第一波攻势中动用28~75枚核武器在北约的防线上撕开口子，接着在第二波攻势中再使用34~100枚核武器，配合装甲部队的突进。苏联人预计到北约将进行报复，因此苏军将配备可以在充满化学武器攻击和辐射的环境下作战的装备。因此，苏军将可以在遭遇核打击之后很快集中精力发动攻击，并将敌人击溃。联邦德国将遭遇几百次广岛惨剧，那里的居民大部分都会死去。此时，洲际弹道导弹也将呼啸着掠过北极。在莫斯科方面看来，持续多天的全面战争将摧毁双方的家园，但是一旦核武器用尽，常规战争还将持续下去，直到一方屈服。

苏联官方对于赢得战争持乐观态度（考虑到苏联糟透了的基础设施水准和组织水平，他们或许过于乐观了），但没有人会真的向往这样的战争。因此，尽管灵活反应战略不足以威慑对方，但两个超级大国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达成了共识（说得好听点，叫关系缓和），使双方可以勉强应付危机。1969年，双方开始了限制核武器的会谈。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也开始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人开始向苏联人出售粮食，借给他们美元，以帮助苏联应对集体农庄和计划经济的失败带来的损失。美苏双方的宇航员开始在太空中携手并肩。

这些看起来都不错，但并不能改变现实。这两个有能力毁灭人类文明的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帝国仍然在争夺着内新月地带。而美苏双方那些不稳定、不可靠的代理人仍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着内新月地带。美苏双方都输不起。

这场战略层面的拔河有来有往。1972年，曾经支持莫斯科的毛泽东认为，他对美国人的憎恨并不比对苏联人的憎恨更多。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的周边局势变得更紧张了。但仅仅一年之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又一次战争让美国损失惨重。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国将油价提高了三倍，在让美国的盟国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又让出口石油的苏联大赚了一笔。经济增长放缓。随着苏联在核实力上与美国持平，人们开始担心如何处理这一局势。美苏两国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也争吵不休。这一切加在一起，打碎了25年以来美国人对遏制政策的战略共识。保守派人士开始主张，只有靠削减福利支出和相应的管理机构才能重振经济，而重振经济又是实现遏制政策的必要条件。而“水门事件”的爆发又让许多自由派人士相信，比起苏联，他们更厌恶尼克松。政治上的僵局使美国的军事战略也陷入了瘫痪，最终令美国坐视北越消灭了南越。

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全面战略收缩。共产主义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赢得内战（甚至还赢得了一场大选），同时也在欧洲赢得了很多人的心。有一年的圣诞节——我记得是1976年——我的一位叔叔，一个失业的钢铁工人，竟然给了我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1979年，伊朗的非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也进来搅局，在内新月地带又放出来一个大“魔鬼”。

到了那年年底，出现了压垮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苏联入侵阿富汗。像一个世纪前俄国人和英国人为之展开争夺时一样，阿富汗仍然是在南亚连接心脏地带和内新月地带的战略桥梁。

缓和局势结束了。美国开始急剧地扩充军备，在欧洲部署了可怕的新型巡航导弹，并且开始探讨开发可以如砍瓜切菜般瓦解苏军防线的新科技。1982年，以色列人用美国制造的计算机控制的武器系统摧毁了叙利亚19座苏制地对空导弹发射台中的17座，并且在仅损失3架飞机（叙利亚人说是6架）情况下击落了92架苏制战机。原本疑神疑鬼的苏联人现在陷入了恐慌。尽管任何有理智的科学家都会告诉苏联人，要实现所谓“星球大战”计划（美国人提出用激光击落洲际弹道导弹）或攻击破坏者方案（使用远程火箭发射大量计算机制导的小炸弹，用以在装甲师尚未抵达前线时就将其摧毁）至少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莫斯科，人们总是习惯于假设最坏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做出是否相信其计算机运算结果的抉择仅仅6个星期之后的1983年11月，事情到了紧要关头。神经焦虑、罹患糖尿病，并且由于肾衰竭而不得不卧病在床的苏联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相信北约正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于是要求克格勃证实这一消息。一向尽职尽责的间谍们汇报说，很多美国和英国的公务人员似乎都在办公室里加班。只有一种可能：美国一定在谋划用在西欧即将开始的一次军事演习掩护这次攻击。在民主德国的苏军战机装备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假期都被取消了。就连军事天气预报都取消了，以免他们走漏什么消息。

幸运的是，在冷战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谁也保守不住什么秘密。一位克格勃官员后来对采访者回忆：“当我告诉英国人这个情况时，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苏联的领导人居然会这么蠢，这么偏执，竟然会相信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安德罗波夫到底蠢不蠢、偏执不偏执，各有各的说法，但美国人十分害怕苏联人恐慌后的结果，因此里根认为有必要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后来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往莫斯科，说服安德罗波夫不要走向危险的边缘。

再一次，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禁止核武器。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发布了他翻唱的《战争》。任何对世界末日感到担忧的人都关注着形势的发展。

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之安全和富裕，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尽管我们得以幸存的机会并不可观，而且也不符合过去10 000年来的趋势，但是结束战争和人类文明自身的战争并没有发生。与1983年彼得罗夫抓起电话的那一刻相比，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弹头数量已经减少到了1/20（截至2013年年中）。在未来几年中爆发可能造成10亿人丧生的大战的可能性似乎接近于零。

我们是怎么挺过那些危险的日子的？我们的运气还会撑多久？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能问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在一个我们很少留意到的地方。

[1] 原文为Songueval，但据查无此地，只有隆格瓦勒（Longueval），英军确实曾经在此地战斗过，故疑为原文错误。——译者注

[2] 1961年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3] 学着爱上原子弹：取自库布里克于20世纪60年代执导的一部讽刺冷战局势的黑色幽默电影：《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译者注

[4] 此处指的是1940年5月，丘吉尔发表就职演说时的名句。——译者注

[5] 当量：物质相互作用时的质量比值。核弹当量指产生同样能量所需TNT炸药的重量。——编者注



第六章



赤牙血爪：贡贝黑猩猩为何走向战争

杀手人猿与嬉皮黑猩猩

1974年1月7日

刚过午后，卡萨凯拉族群的一群好斗分子就悄悄地越过了边界，进入了卡哈马族群的领地。袭击者一共有8个。它们静悄悄地行动，充满目的性——它们此行的目标就是杀戮。当卡哈马族群中的戈地看到它们时，一切都太晚了。

戈地从它采食果子的树上跳开，打算逃走，却被袭击者们逮住了。一个袭击者把它脸朝下按在泥地里，其他袭击者则一边发出狂怒的尖叫，一边殴打他，并且用尖牙撕咬他。暴行持续了整整10分钟。最后，袭击者们用石块砸向他的躯体，然后就走进了林子深处。

戈地并没有死，但是它的脸上、胸口、胳膊和腿上散布着几十处伤口，并且伤口一直在流血。它躺在地上，痛苦地低声呻吟。过了几分钟，它起身躲进了树林。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族群的黑猩猩会故意寻找其他族群的黑猩猩，并对其发动攻击，再任由它留在那里等死。1960年，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在野外研究黑猩猩的项目。在10年中，《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读者和电视观众们一直对她和“灰胡子”戴维、狡猾的菲洛、淘气的麦克以及其他黑猩猩伙伴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是，现在人们却发现，黑猩猩也会痛下杀手。

更糟的还在后面。就在接下来的3年里，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打死了卡哈马族群中全部的6只雄性黑猩猩以及1只雌性黑猩猩；另外还有两只雌性卡哈马黑猩猩失踪了，很有可能也已经死亡；有3只雌性卡哈马黑猩猩在遭到殴打和强奸后，加入了卡萨凯拉族群。最终，卡萨凯拉族群占领了卡哈马族群的领地。戈地的死实际上为这场族群灭绝战拉开了序幕（见图6–1）。



图**6–1** 杀手人猿？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的灵长类园中，**4**头黑猩猩（左侧）在欺凌、威胁并攻击另一头黑猩猩（图右）。照片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弗朗斯·德·瓦尔，摘自《黑猩猩的政治》，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2年。

“贡贝战争”的消息震动了灵长类动物学界。这一事件似乎意义非凡。我们人类与黑猩猩有98%的DNA是相同的。如果两种关系很近的物种做出某种相同的行为，那么这两个物种就很有可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物种身上继承了这种行为方式。黑猩猩与人类的分道扬镳仅仅发生在750万年前（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这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天生就爱使用暴力。

20世纪70年代，那还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因此，很自然地，这一发现并不受人欢迎。有些学者把责任推在“带来坏消息的人”身上。他们坚称，是古道尔导致了这场战争。为了让黑猩猩乐于接近人类，古道尔曾经喂它们吃香蕉。批评者们指出，黑猩猩正是为了争夺这丰美的食物，才使它们原本和平的社会环境遭到腐蚀，使其变得充满暴力。

批评很快就变得非常尖刻，就如同拿破仑·沙尼翁在好斗的亚诺玛米人事件中面临的抨击一样（我在第一章中描述过此事）。不过，古道尔不需要像沙尼翁那样等待那么久才为自己洗刷清白。在20世纪70~80年代，几十位科学家投身非洲雨林之中，与猩猩生活在一起［本章中的许多内容，包括贡贝战争的内容，都来自这些科学家中的一员、曾在古道尔手下攻读研究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及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合著的《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一书］。这些科学家采用了更复杂、更少介入黑猩猩生活的观察方式。他们很快发现，不论人类喂食与否，黑猩猩都会进行战争。

就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从科特迪瓦到乌干达，成队的雄性黑猩猩正在它们的领地边境上巡逻着，系统地搜寻着外来的黑猩猩，并对外来者发动袭击。它们安静而有目的性地行进着，甚至没时间进食。在

乌干达进行的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装置追踪黑猩猩。他们发现，在1998~2008年，一个叫作恩戈戈的黑猩猩族群一共发动了几十次突袭，杀死了21只其他族群的黑猩猩，最终兼并了邻近的地盘（见图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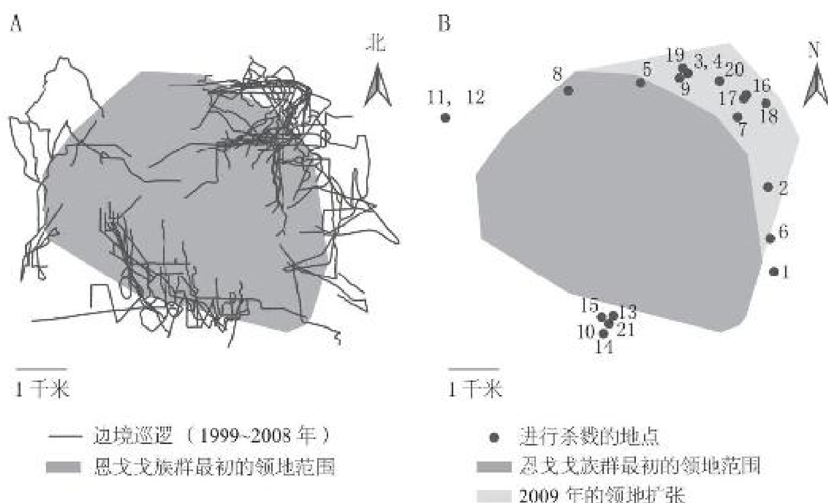


图6–2 恩戈戈战争，**1998~2009**年。恩戈戈黑猩猩对邻近的地盘发动了数十次突袭（左图中的黑线），杀死了**21**只黑猩猩，最终将战事最频繁的地区据为己有（右图中阴影部分）

黑猩猩的武器只有拳头和牙齿，偶尔也会使用石头和树枝。不过，即便是一头上了年纪的黑猩猩，其击打的力量也会超过重量级拳手；而他们剃刀型的犬齿可达4英寸之长。当黑猩猩遭遇敌人时，它们会设法置对方于死地。它们会咬对方的手指和脚趾，打断对方的骨头，撕扯对方的面孔。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观察到一次非常恐怖的场景：一群袭击者撕开了一个受害者的喉咙，把它的气管扯了出来。

似乎《蝇王》中的观点是正确的：怪兽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但就像在新的科学领域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很快发现情况要更加复杂。在第一章里，我提到《蝇王》的故事之后，马上就把叙事的地点从南海转移到了另一个岛屿——萨摩亚，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叙事。在萨摩亚岛，玛格丽特·米德发现的证据使她相信自己来到了太平洋的天堂，因为这里鲜见可鄙的暴力。在本章中，同样地，我也要把视角从贡贝拉开，沿着磅礴的刚果河行进600英里，来到非洲雨林带的另一个地区：万巴。在这里，我们仿佛跟随爱丽丝穿过了镜子，来到了仙境。

1986年12月21日，灵长类动物学家伊谷原一（Gen’ichi Idani）正在一处林间空地的边缘。他正等待着一个族群的猩猩从这里经过。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有两个不同族群的猩猩同时出现了。如果伊谷原一观察的地点是贡贝，那么他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见到可怕的场景：双方可能会先发出威胁的叫声，然后开始挥舞树枝，佯装冲锋；稍有不

慎，就可能会发生打斗和死亡。

然而，在万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两个族群的猩猩相隔几码，坐下来盯着对方。过了半个小时，一个来自P族群的雌性猩猩站了起来，从容地通过空地，朝E族群的一头雌性猩猩走去。很快，两头雌性猩猩就面对面地躺下来。两头猩猩都分开了自己的双腿，把自己的生殖器跟对方贴在了一起。她们左右摆动着臀部，动作越来越快，一边摩擦着阴蒂，一边发出哼哼声。不出几分钟，两只猩猩就都开始喘息、尖叫，紧紧地抱住对方，随后陷入痉挛。有那么一个瞬间，两只猩猩都寂静无声，盯着对方的眼睛，随后便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上。

到了这个时候，两个族群之间的距离消融了。几乎所有的猩猩都参与进来，分享食物，为彼此做清洁，或是发生性行为——雄性与雌性、雌性与雌性、雄性与雄性、年轻的与年老的，全都肆意地用手、嘴和生殖器官摩擦着对方。它们确实做到了要做爱，不要作战[1]（见图6–3）。



图**6–3** 嬉皮黑猩猩：刚果河盆地，两只雌性倭黑猩猩在进行被科学家称之为生殖器摩擦的行为

资料来源：华盖图库。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伊谷原一和他的同事们观察到，P族群和E族群的猩猩重复这种行为达30多次。他们从未看到过贡贝黑猩猩之间的那种暴力行为。不过，这是因为，万巴的猩猩并不是黑猩猩，至少不是同一种黑猩猩。具体来说，万巴的猩猩是倭黑猩猩，而贡贝的猩猩则是普通的黑猩猩。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这两个物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倭黑猩猩的体型要稍微小一些，胳膊和腿略长而细，嘴巴和牙齿略小，面孔略微黑一些，头发在中间分开（直到1928年，灵长类动物学家才把倭黑猩猩视为一个单独的物种）。不过，这两个物种间的差别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最关

键的问题：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究竟将如何。

倭黑猩猩（为了避免混淆，科学家们通常称它们为bonobo，记者们则经常叫他们嬉皮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通常就称作黑猩猩，不加任何限定性形容词）的DNA基本相同，仅仅在130万年前才分成两个不同的物种（见图6–4）。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物种的基因与人类基因的差别是相同的。如果黑猩猩之间的战争暗示人类或许是天生的杀手，那么倭黑猩猩的狂欢活动则暗示人类是天生的情种。照这么说来，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库斯就不应该在格劳庇乌山大动干戈，而是应该扯掉自己的托加，抱在一起大秀恩爱。

如果我们能解释清为什么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库斯在83年选择兵戎相见而不是友好相见，我们也就能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历经了10 000年“宁愿动手，不愿动口”的暴力史之后，人类却没有更进一步地在20世纪后期把地球炸成碎片。我们还将能看到，或许我们可以在21世纪延续这一纪录。不过，这个事情说来话长——长达38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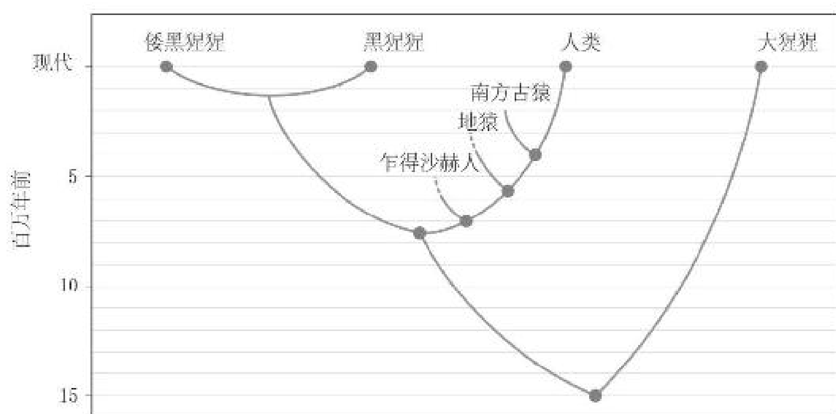


图6–4 家族谱系：人科动物自1 500万年前的演化进程

死亡博弈

起初，世间都是滴状体。

至少，生物学家经常这样称呼它们：由粗膜联结的碳基分子短链。通过蛋白质和核酸之间的简单反应，这些滴状体大约在38亿年前开始形成。它们吸收化学物质，越长越大，直到体积超过了膜所能容纳的范围，它们就会分裂成多个滴状体。当滴状体分裂的时候，组成滴状体的化学成分会按照RNA（核糖核酸）中编码的方式来组合成新的滴状体，RNA负责指导蛋白质的工作。听起来很枯燥，但这就是生命的开始。

达尔文将生物演化定义为“经过改变的传承”。RNA（在人类这样的复杂生命体中扮演这一角色的则是DNA）将基因编码近乎完满而又并非完美地复制下来，随机地引发一些基因突变。多数的突变并不会对滴状体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一些突变则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滴状体解体（或者可以说，杀死了它们）；另一些突变则使得滴状体可以更好地进行复制。经过漫长的岁月，复制效率更高的滴状体就在数量上压倒了复制效率较低的滴状体。

生物演化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比战争还要充满矛盾的事物。自然选择是一场竞赛，但合作却是赢得这场竞赛的最大秘诀。如果我们把这场持续了38亿年的竞赛简短地归纳起来，那么它就是越来越复杂的碳基生命体以各种非凡的方式进行合作和竞争的演化史。

经过3亿年的随机基因突变，产生了能够相互巧妙合作、从而组成细胞（围绕着DNA聚集的更加复杂的碳基分子簇）的滴状体。由于可以从地球的原始海洋中汲取能力，细胞在竞争中胜过了滴状体。到距今15亿年前，细胞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之前的20亿年之中，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依靠复制进行繁殖的，而基因复制中的错误则是发生改变的唯一机会。而新的细胞可以通过有性繁殖进行合作，分享自身DNA中所携带的信息。有性繁殖极大地丰富了基因池中的种类，从而把演化推上了快车道。距今6亿年前，一些细胞已经可以十分彻底地分享自身的基因信息，这些细胞以至少百万级的数量共同组成了多细胞有机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包含着大约1 000亿个细胞）。

动物体中的细胞通过发挥不同的功能实现合作。一些变成了鳃和胃，使得机体可以用新的方式处理能量；一些变成了血液，从而可以在机体内运送能量；另外一些则变成了甲壳、软骨和骨头。到了距今4亿年的时候，一些鱼类的鳃部变成了肺，它们的鳍则变成了脚，从而使它们登上了陆地。

生成鱼鳍或脚的细胞并不与生成胃或骨头的细胞竞争，而是与它们合作，共同组成一个生物体，从而可以更好地与其他细胞群进行竞争，获取动物体所需的能量。结果就是带来了一场演化军备竞赛。这场竞赛耗时数亿年之久，一些细胞进行分化，对光线、声音、触觉、味道、气味变得格外敏感，从而形成了眼睛、耳朵、皮肤、舌头和鼻子，使得动物体可以获得信息决定要去哪儿和要做些什么。神经将这些信息送往一个点，这个点通常位于动物体的前端。在这里，神经聚集起来，组成了小小的脑。

那些能够感知到自身，即知道自己的皮肤在哪儿、它们自己与世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的动物通常会比其他动物更容易赢得竞争，而那些对自身感知得更好的动物则更具竞争优势。脑开始将它所栖身的动物体视作一个个体，它开始产生希望、恐惧和梦想。动物体变成了自我，从而产生了意识。

这一盲目而无方向的经过改变的传承持续了30亿年，将碳滴状体演变了诗人、政治家和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这看起来确实像是某种奇迹。因此，在达尔文的时代之前，几乎每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类都把生命的奇迹归功于上帝（或众神）之手，我们对此也无须感到讶异。然而，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大约在4亿年前，某种鱼的嘴部长出了软骨质的牙齿。这些牙齿长在足够结实的颚部，也足够锋利，因此可以咬下其他动物身上的肉。这些早期的鲨鱼在争夺能量的竞争中找到了一条捷径——它们可以通过吃掉其他动物取得其身体中储存的能量。如果这些早期的鲨鱼遭遇了与自己争夺食物或是配偶的其他同类，它们也可以进行搏斗。牙齿将竞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回应，其他动物要么长得大到足以自卫，要么变得快到可以逃脱，要么自己也长出牙来（或是刺、毒液囊，陆地上的动物则长出爪子和獠牙）进行反击。暴力出现了。

世界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各种动物随意相互搏杀的地方。当一个动物遭遇了另一个可以进行反击的动物时，它在发起攻击之前就会思量再三。长了爪牙的动物会咆哮，露出牙齿，竖起羽毛或毛发威吓对方，而非直接相互攻击。如果虚张声势未能起到作用，对方没有退缩、逃跑、游走或是飞走，那么双方就会开始角力或是顶头，直到一方意识到自己即将落败从而求饶。但这样的打斗是有风险的，经常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每个物种都演化出了表示屈服的复杂信号，从而避免打斗真的发生。这些信号包括匍匐在地、露出肚皮或是臀部，甚至吓尿。

如果我们能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就能解释在本书的前五章中看到的大部分人类行为。不过，要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就要从生物学领域转移到数学领域。数学家们会告诉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两只动物同时遇到一块美味的食物，或是一名合适的异性，那么它们是否为此而展开搏斗呢？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会发挥作用，因此没有哪两只动物会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就拿我养的两条狗来说吧。毛毛认为每条狗都是它的朋友，所以它遇到任何狗的时候，都会疯狂地摇着尾巴，东闻闻西嗅嗅，还会去舔对方。而另外一条狗米洛，则认为其他的狗（除了毛毛之外）都充满敌意。因此，它就会冲其他狗狂吠，甚至扑上去，把拴它的绳子拉得紧绷绷的。如果有机会，它会先去咬对方，然后再说什么嗅一嗅的事情。

不过，数学家们发现，在近乎无穷种个性和相遇情形的背后，暗藏规律。搏斗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对参与者的基因能否延续下去产生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是直接的。例如，胜利者可能会获得生育的权利，从而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失败者可能会在搏斗中受伤、死亡，从而无法延续其基因。不过，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胜利者可能会得到食物，从而为以后的生育储存更多的能量；它也可能会赢得威望，使其在异性看来更具吸引力，而在对手看来更令人生畏。失败者则可能要忍饥挨饿，或是颜面扫地。

动物（包括人类）很少能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如此冷静地计算。我们的行为通常受到激素的驱使，而这些激素正是演化出来让我们做出迅速的决断的。化学物质充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也可能会摇着尾巴、寻求协商的办法，或是勃然大怒、热血沸腾，狂怒着冲上前去。每个动物做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它将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概率。而伴随着不懈的自然选择，那些有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会逐渐取代那些不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

数学家会告诉我们，不妨把这些冲突都视作游戏。我们为某个动物可能采取的各种行为打分，记在分数表上。博弈论（科学家就是这样称呼这种方式）极大地简化了现实，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自身，是怎样在搏斗、惊吓和逃跑之间取得平衡的。

在这里，我要借用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s*）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假设一只动物赢得了一场冲突，那么它就可以得到50分；而输家只得到0分；在冲突中受伤的动物扣100分；参与旷日持久的长时间冲突（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其他地方寻找食物或配偶）扣10分。

如果遭遇双方是鸽派（不是鸽子，而是代表那些永远不会选择搏斗的动物个体），那么它们就不会发生搏斗。双方都想要配偶和食物，于是就出现了僵局。双方只会瞪着眼睛，试图威吓对方，直到一方失去了耐心而离开。此时，胜利者可以获得50分，但是因为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还要再扣掉10分，因此其净得分是40分。而退缩的一方则只得到–10分。在成千上万年中发生了千百万次这样的冲突之后，每方的平均得分是15分（胜者的40分加上败者的–10分，再除以2）。

但其中的一个如果不是鸽派，而是鹰派（当然，也不是真的鹰，用来指代那些总是选择搏斗的动物）呢？鹰派既不会选择虚张声势，也不会选择干瞪眼，而是会发动攻击。于是，鸽派就逃走了。如果鹰派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遭遇的都是鸽派，那么鹰派动物总是能赢得50分（因为它没有浪费时间，所以不会扣分）。这一得分可比鸽派策略的平均得分（15分）高多了。结果就是：鹰派的基因会传播得更广。

然而，演化的矛盾性此时就会出现。随着鹰派动物的增加，鹰派动物遭遇另一只鹰派动物的概率也会增加，于是双方就都会发动攻击。其中一只鹰派动物会获胜（得50分。为了简化运算，我们假设它没有受伤），而另外一只鹰派动物会负伤，从而失去100分。因此，双方的平均得分就是–25分（50–100，再除以2）。

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剩下来的鸽派动物就占据优势了。因为鸽派动物永远都选择逃走，所以它们的分数永远都是0分，这个分数要比鹰派动物的–25分好得多。根据道金斯设置的评分体系，基因库最终会趋向一个最佳平衡位置——这被生物学家称作进化稳定策略——每12只动物

中，会有5只鸽派、7只鹰派。

由于存在随机的突变、运气因素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真实的数字经常会偏离这个平衡点，但随后这场死亡博弈又会把数字拉回来。每一个物种中，包括我们人类自身，都会有一些极端者，就像毛毛和米洛一样，但是大部分成员都会处于两端之间的某处，再被这场死亡博弈用其特有的手段——暴力——推向进化稳定策略。

这场抽象的死亡游戏揭示了每种动物使用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则。这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暴力，就像其他物种一样，一定是在演化过程中进行适应调整的结果，是我们千百万年前的祖先的习惯性行为经历了各种变化传承下来的。不过，与此同时，博弈理论也揭示了人类暴力的独特性。我们通常不仅仅会赶跑对手，而且还要杀掉对手。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胜利者往往比那些接受对手降服的胜利者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嗜杀者在死亡博弈中得到的平均分数理应低于其他人。而那些在搏斗中逃走的人可以活到第二天，可以再次参与搏斗；而那些在看到对手屈服的信号之后就任由失败者逃走的胜利者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当戈地在1974年的贡贝从树上跳下来想要逃命时，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们却要追上它，按倒它，再把它打死呢？为什么它们要继续杀死卡哈马族群中其余的雄性成员呢？为什么在黑猩猩的进化稳定策略中，它们一定要向对手使用致命的暴力呢？为什么人类也要这样做呢？

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2]

部分原因显而易见。杀死戈地的袭击与博弈理论的抽象实验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它们是8个对1个。来自卡哈马族群的黑猩猩并没有取胜的机会，而袭击者走开时身上顶多会有一两处抓伤而已。在卡萨凯拉族群中，有一只黑猩猩老得连牙齿都快磨光了，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连它也愿意加入这场屠杀。

8个对1个的袭击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暴力，只有能够相互协作、组成团体的动物才能做到这一点。实现这样的合作与竞争的混合关系，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演化。35亿年前，一些滴状体很好地进行了合作，从而组成了细胞，因此它们可以比原始的滴状体更好地取得能量。大约15亿年前，一些细胞很好地进行了合作，从而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从而比无性的细胞产生了更多的变异和后代。6亿年前，一些复杂的细胞很好地进行了合作，组成了多细胞的动物，从而在延续基因的竞争中取得了更大的优势。但直到1亿年前，这些动物中的一些才把合作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组成了由多个动物构成的社会。

生物学家把它们称为社会动物。所有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都多多少

少有一些社会化的习性，母亲和幼崽可以形成有力的联系。不过，只有几十个物种的社会化习性能超越这一水平。它们组成永久性的社群，社群成员的数量少至几十个，多到数十亿，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劳动大分工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只有社会动物才能组成团体，共同从事同一项活动，比如杀死戈地。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是高度社会化的。与人类相似的还有海豚、虎鲸和人类以外的猿类。这些物种在智力方面也很突出。不过，在我们得出智力决定社会化习性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蚂蚁既是最为社会化的动物之一，也是最愚蠢的动物之一。蚂蚁之间的协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生物学家甚至将蚁群称作超个体。在这些超个体中，上百万只昆虫协作起来，仿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只巨大的动物。不过，研究蚂蚁的专家将这些超个体称作本能文明，因为蚂蚁个体在智力层面十分低下，蚂蚁头部的神经节甚至算不上是脑。

目前，已知的蚂蚁种类大约有1万多种，而且还有更多的种类有待归类。有些种类的蚂蚁十分和平，有些则经常进行打斗。在动物的身体里，有的细胞会变成血液，有的细胞会演化成牙齿。与之相类似地，每个蚁群中都会有一些雌蚁变成可以繁殖后代的蚁后，其他的雌蚁则变成没有生育能力的工蚁。而在好战的种类中，还会有一些蚂蚁成长为兵蚁。它们不会真的思考自己在做些什么，仅仅靠着气味的驱使就会进行野蛮的战争。

由于蚂蚁的种类如此繁多，它们的行为方式也各有不同。不过，最为常见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兵蚁会用它们的触角（其功能类似于我们的鼻子）去触碰蚁群中的工蚁。如果有些从事采集工作的工蚁在上午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兵蚁就会察觉到这些工蚁的气味的消失。作为反应，兵蚁就会离开蚁穴，去对付耽误工蚁返回的任何事物。如果已经有大约1/5的兵蚁出动，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就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点。此时，剩下的4/5的工蚁就会作为预备队留在蚁穴中，以防其他的蚁群察觉到这个蚁穴防御松懈，进而乘虚而入。

如果远征军发现敌对的蚂蚁正在屠杀走失的工蚁，它们也不会立刻对敌人发动攻击。兵蚁们会先继续进行触碰和嗅气味。如果发现己方的数量多于对手，它们就会发动攻击，用自己的颚部夹住敌人的腹部，把它们咬成两半（见图6–5）；如果势均力敌，它们会与敌人对峙，并且舞动它们的触须；如果发现己方寡不敌众，它们就会逃回蚁穴；如果数量对比非常悬殊，那么实力强大的一方可能会攻击弱小一方的巢穴，屠杀它们的蚁后和兵蚁，再把卵劫走，作为奴隶养大。



图**6–5** 六腿战士：坦桑尼亚，两只蚂蚁在进行死斗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穆罕默德·马赫迪·卡里姆。

生物学家从中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不论是低智力的蚂蚁，还是高智力的猿类，其中的一些种类都会进行致命的群体作战，而另外一些种类则不会。这就说明，聪明的大脑既不是一个物种进行此类行为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第二，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性是进行致命的群体作战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才能组成群体进行合作，以悬殊的比例以众暴寡，如此一来，它们可以安全地进行死斗。第三，社会性并非致命暴力的充分条件，因为有些具有社会性的猿类和蚂蚁并不会组成凶杀团伙。

在动物将杀戮作为其进化稳定策略中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一定有别的因素提高了进行致命暴力行为的回报。从蚂蚁和猿类的自然历史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因素就是领地。如果动物们需要争夺珍贵的领地，那么杀死敌人带来的回报就会增加。在贡贝战争中，每当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进入卡哈马族群的领地中进行袭击时，卡哈马族群的黑猩猩都会进行报复，进入卡萨凯拉族群的领地中发动袭击。如果在1974年1月7日，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未能杀死戈地的话，那么戈地肯定会加入下一次的反击。但如果它们杀死了戈地，它们就可以确保他没有机会这样做了。如果它们能够杀掉卡哈马族群所有的雄性，它们就可以夺取卡哈马族群的领地和残存的雌性黑猩猩。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战争最大的矛盾性之一。对那些社会化程度高到可以安全地进行杀戮的蚂蚁和猿类来说，领地观念增加了杀戮带来的回报。然而，到了冰河时期的末期，人口的增长和农耕的发展使得幸运纬度带上的人类社会遭遇了囚笼效应——领地观念的极端形态。囚笼效应使我们的祖先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而在建设性的战争中，选择不

杀掉被击败的敌人所带来的回报却增加了。那些懂得接受敌人的臣服，并将败者吸纳进自身之中的社会开始变得更安全、更富庶，并且可以在竞争中胜过其对手。最终，这些社会中的某一个会变成“世界警察”。

在本章的末尾，我会再来论述这个吊诡的结果。现在，我要把重点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尽管有区别，但都是社会化的动物，都有领地观念，而且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变而来的（这个共同的祖先通常被称作祖猿）。很显然，这个先祖物种可以演化出截然不同的进化稳定策略。在距今700万～80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黑猩猩和人类走上了通往暴力的道路。随后，大约在距今13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倭黑猩猩不再对同类使用暴力（不过，它们仍然会为了肉食而捕猎猴子。此外，在一个让人颇为不安的例子中，几头成年的倭黑猩猩分食了一只死去的倭黑猩猩幼崽，而幼崽的母亲更是一马当先）。最后，在过去的10 000年中，人类又出于某种原因，选择减少暴力的使用，以应对囚笼效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人猿星球

首先，我想看一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扬镳。根据对这两种猩猩的DNA研究，这一过程大约开始于130万年前，这比人类和祖猿分手的时间（750万年前）要近得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扬镳知之甚少，因为在这一过程的发生地——热带雨林之中，化石很难保存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间接的证据。

DNA分析表明，仅仅在200万年之前（“仅仅”是在生物演化这个意义上说的），今天已经灭绝了的祖猿还在非洲中部的雨林中活动，这个雨林带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本土面积。但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50万年中，随着气候几度变迁，东非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决堤了。湖水朝着西方和北方奔向大西洋，于是就成了今天雄伟磅礴、河面宽度超过一英里的刚果河。对于猿类来说，这条大河是无法逾越的。因此，河流就把祖猿的王国一分为二了。到了距今130万年前，刚果河北岸的猿类就演化成了黑猩猩，而南岸的则演化成了倭黑猩猩。

河两岸的森林大体相同，两边的猩猩们都主要靠吃水果、种子和猴子（如果抓得到的话）为生。不过，在刚果河以南，最终演化成了倭黑猩猩的猿类丰富了它们的食谱，开始食用嫩叶和树根。为了适应这样的食物，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长出了用来咬碎叶子的带有长刃口的牙齿。叶子和树根没有水果、种子和猴子肉好吃，但是数量更充足。因此，在饕餮大餐之间，树叶和树根可以让倭黑猩猩们免于挨饿。用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的话说，树叶和树根是倭黑猩猩的“零食”。

为什么倭黑猩猩开始食用这些零食，而黑猩猩则没有这样做？关于

这一问题的答案，还存在争议。不过，兰厄姆和戴尔·彼得森在他们合著的《雄性暴力》一书中提出，这是因为同样食用树根和树叶的大猩猩在刚果河以南灭绝了，但仍然生活在刚果河以北。因此，刚果河以南的这支祖猿在采食树根和树叶方面就没有竞争者，从而使得任何能让该物种更善于进食这些食物的基因变异都更容易流传开来。这些变异充满了基因池，最终使得这些祖猿演变成了倭黑猩猩。而在刚果河以北，祖猿们仍然与大猩猩生活在同一区域。如果有哪只体重仅在100磅左右的祖猿敢为了一点儿树叶去挑战重达400磅的大猩猩，那么它的基因就很难延续下来。因此，黑猩猩就不会去吃这些食物。

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刚果河两岸的气候略有差异，或是好的食物的分布密度有所不同。因此，对倭黑猩猩来说，长出新的类型的牙齿来适应新的食物是有意义的，而对黑猩猩来说则是没有意义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增加，科学家们最终肯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食谱上的差别，而是这种差别造成的后果。因为，食用“零食”让倭黑猩猩走上了和平与爱的“阳关道”（虽然听起来很荒唐），而黑猩猩则走上了暴力的“独木桥”。

当倭黑猩猩找不到水果和其他它们更喜欢的食物时，它们可以靠树叶和树根填饱肚子。因此，倭黑猩猩通常在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群体中生活（通常包括16只倭黑猩猩）。而黑猩猩则通常在小群体里生活，群体里一般只包括2～8只黑猩猩，因为它们没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供养更庞大的群体。在1974年，戈地独自行动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独自行动的行为对黑猩猩来说是很常见的。而在倭黑猩猩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很反常的。因此，倭黑猩猩几乎永远不会处于以一敌八的窘境之中。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黑猩猩团体在采集食物时会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分散开。雄性的行动速度比雌性快（尤其是当雌性怀孕的时候），因此雄性通常组成单一性别的团队出行。而雌性则经常单独采集食物，因为它们的移动速度太慢，没办法在一天之内采集到足够供养更多黑猩猩的食物。这种情形与有着吃不完的“零食”的倭黑猩猩形成了鲜明对比。倭黑猩猩的团队不仅庞大而稳定，而且通常由同等数量的雄性和雌性组成。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零食，黑猩猩的土地上就会上演丑陋的一幕。由6只雄性黑猩猩组成的团队经常会遇到单独行动的雌性黑猩猩。雄性并不一定总会强奸雌性，但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还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并没有击退袭击者的机会。打斗往往发生在那些雄性之间，它们会为谁来接触雌性黑猩猩发生争执。

在过去的100多万年里，由于黑猩猩无法靠零食存活下去，雄性黑猩猩演化出了两种十分特别的特性：十分好斗和巨大的睾丸。由于经常会发生强奸，所以好斗的雄性更有可能传播其基因；由于雌性黑猩猩经常要在一天之内与多名雄性黑猩猩发生性关系，所以拥有大睾丸的雄性

黑猩猩就会具有生殖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排出更多的精子，增加其精子使卵子受精的概率）。

在猿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生物学家甚至为其创造一个全新的学术分类，叫作精子竞争理论。平均而言，黑猩猩的睾丸十分巨大，重达1/4磅；而体型是黑猩猩4倍的大猩猩，其睾丸重量仅为1盎司。这是因为，最有权势的雄性大猩猩可以独自享有多个雌性，因此几乎不会面对来自其他大猩猩精子的竞争。

由于雌性倭黑猩猩也会有多个性伴侣，雄性倭黑猩猩像雄性的黑猩猩一样，在让雌性受孕方面要面临竞争。因此，倭黑猩猩也拥有巨大的睾丸。然而，与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的精子竞争几乎完全不存在暴力因素。雄性倭黑猩猩的数量很少会超过雌性的数量。如果一只雄性倭黑猩猩的求偶行为过激，那么其他的雌性倭黑猩猩就会联合起来把它赶跑。（雌性黑猩猩有时候也会联合起来对抗强奸者，但是有效程度远逊于倭黑猩猩。）

雄性倭黑猩猩并不依靠相互之间的角逐赢得精子竞争，而是通过让雌性喜欢自己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当一个好儿子。倭黑猩猩母亲会在雌性倭黑猩猩之中大打友谊牌，以确保它们的儿子能找到女朋友。在倭黑猩猩的国度里，“妈妈的乖儿子”总是最先大功告成。

经过100万年左右的时间，作为鸽派的收益在倭黑猩猩之中迅速增加。性格温和的倭黑猩猩继承了这片雨林。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倭黑猩猩都演化得更小、更纤弱，也比黑猩猩更友善。“以我的经验来看，”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灵长类动物学的创始人——曾这样谈到第一只被抓到的倭黑猩猩——猩王子，“我从未遇到过哪个动物能在身体的完美性、机敏性、适应性和温和的性情方面能达到接近猩王子的程度。”至于猩王子是不是也这样看待耶基斯——这个把它锁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并且训练它坐在一张小桌旁用叉子进食的人，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裸猿

大约750万年前，猩王子和耶基斯的祖先在进化之路上分道扬镳。大约在那个时候，生活在非洲中部大雨林地带边缘的猿类开始演化得越来越不像祖猿，而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人类——唯一有能力控制体内的怪兽的动物。

又一次，食物似乎成了事情的中心要素。在雨林的边缘地带，气候比较干燥，雨林先是过渡为草木丛生的地带，接着又变成了开阔的稀树草原。在这里，果树比较稀疏。因此，如果猿类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

找到新的食物。逆境是进化之母，随着猿类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基因突变涌现了出来。人类学家们给了这些生物绝妙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名称：他们把生活在雨林以北的称作乍得沙赫人，把生活在雨林以东的称作地猿，并把生活在雨林其他边缘地带的称作南方古猿。不过，在这里，我将把它们统称为原人。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原人的骨骼看起来很像其他猿类的骨骼，但重大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在几百万年之中，它们的臼齿变得更大、更平，并且包裹上了厚厚的珐琅质。如此，它们的臼齿就非常适合咀嚼又硬又干的食物。化学分析显示，这些食物包括植物的块茎和草根，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的良好来源，而且即便在干燥的时期里也能采集到，而此时植物在地表上的部分都已经枯萎了。猿类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再进行咀嚼。这样一来，如果某种突变能让原人的手更加灵活，那么也就意味着原人就变得更胖、更强壮，而且很可能更加擅长搏斗。将这些优势加在一起，这样的原人也就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对踝关节的解剖学研究和原人的足印研究（它们走过柔软的灰泥时会留下足印，然后硬化成石）表明，这一转变早在4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原人开始用它们的后腿走路，解放出来的前肢最终演化成了胳膊。不过，这些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依然很大。它们只有4英尺高，很可能浑身都是毛，而且很多时候在树上生活；即便会的话，它们也极少制造石质工具；它们肯定不会说话；雄性原人的睾丸大小很可能还跟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的一样大。

不过，不论原人有多么像猿类，它们演化出了越来越大的脑，而这弥补了它们诸多接近于猿类的特性。距今4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灰质部分为22立方英寸（少于现代的黑猩猩，现代黑猩猩的灰质不妨通常为25立方英寸）；距今3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灰质部分增加到了28立方英寸；又过了100万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8立方英寸。（今天，我们人类的平均脑灰质体积为86立方英寸。）

大的脑比小的脑更好，这似乎是无须多言的。不过，演化的逻辑要比这复杂得多。脑是个颇为耗费能量的器官。通常来说，我们的脑只占身体总重量的2%，但是其消耗的能量比例达到了20%。只有当增加的脑组织能够为生物带来其所需的更多食物时，这种变异才可能传播下去。这在雨林的中心几乎从来不会发生，因为那里的猿类不需要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就能找到树叶和果子。然而，在干燥的林地和稀树草原，脑力和食物获取量一同增长，形成了良性循环。聪明的林地猿类懂得如何挖出树根和块茎，而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可以供养更大的脑；因此而变得更加聪明的猿类找到了更好的捕猎方式，而捕猎获得的肉类又可以为高耗能的灰质细胞提供能量。

凭借着更强的脑力，原人们开始发明武器。现代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懂得用木棍和石头捕猎或互相殴打，但是在240万年前，原人们就已

经意识到，它们可以通过卵石的相互击打来磨制出锋利的刃。一些痕迹表明，原人们使用这些石斧把动物的肉从骨头上剥离下来；不过，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它们使用这种武器相互砍杀的证据。

通常来说，生物学家将超过38立方英寸的脑容量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作为一个分水岭，达到这两项指标的猿类就会被视为“人属”（Homo即拉丁文中“人”）。我们人类（Homo sapiens即拉丁文中的“聪明的人”）就属于这一属。在接下来的50万年中，人属动物的外观和行为变得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人类。大约在距今180万年前，在1 000多代“人”的一段岁月中（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人属动物的成年个体平均身高突破了5英尺。它们的骨头变得更轻，下巴向内收缩，鼻子则更加突出。两性差异——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差距——减小到了今天人类的水平。原人从树上下来，完全在地上生活了。

生物学家们将这些新的动物称作匠人（Homo ergaster即拉丁文中的“工作的人”），以此体现它们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技能。有些工具和武器十分精美，是用精挑细选的石头经过木质和骨质“锤子”精细加工后制成的。这样的劳动需要制作者拥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和计划能力，自然，也就需要更大的脑（距今170万年前，它们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53立方英寸）。

匠人获得了更大的头，却做了特别的一项交换：它们的肠子变得更小了。早期的原人，其胸腔会在下端向外展开，就像今天的猿类一样，如此才能容纳体积巨大的肠子。而匠人的肋骨则更接近于今天人类的肋骨（见图6–6）。这样一来，留给肠子的空间就变少了。这可给人类学家出了一个难题。猿类拥有体积巨大的肠子，因此它们可以消化赖以为生的多纤维植物。而更小的肠子意味着，匠人从这些食物中所能获取的能量会减少，而匠人更大的大脑却需要更多的能量。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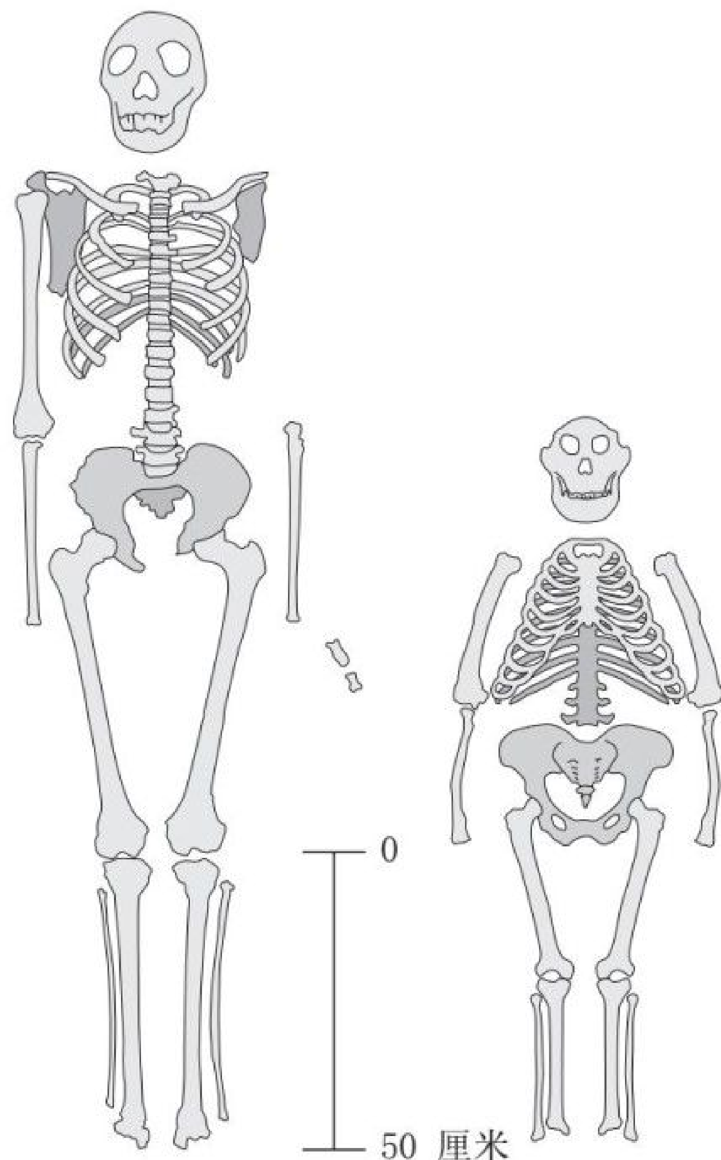


图6–6 美丽身段：图左，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匠人骨骼（它被称作图尔卡纳男孩），属于一名死于150万年前的、大约10岁的男孩；图右，是著名的露西，它是生活在320万年前的成年雌性阿法南方古猿

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匠人是最早可以随意生火的原人，并且懂得利用这项技能烹饪食物。经过烹饪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因此它们就不需要体积巨大的肠子、又大又平的牙齿和强有力的下颌。而这些都是之前的原人所必需的，否则它们无法咀嚼生的块茎、根和草。这些特征现在都消失了。

理查德·兰厄姆在他非凡的著作《生火》（*Catching Fire*）一书中指

出，这可以算作人类暴力演化史中的转折点，就好比零食对于倭黑猩猩的意义。经过多年在雨林的观察，兰厄姆发现，每当一头黑猩猩抓到一只猴子，或是找到了特别好吃的面包果时，雄性黑猩猩就会从周围突然出现，并经常招致打斗。即便是性格温和的倭黑猩猩，在享用猴脑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推推搡搡的乞食者打搅。兰厄姆认为，很难想象这两种动物要怎样才能烹饪，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食物早就被偷光了。这样一来，烹饪技能对这两个物种来说就得不偿失，因此也不会传播开来。兰厄姆指出，这说明，烹饪行为的流行必然伴随着另一项重大的变化：原人不再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生活在一个个体数量众多、性关系混乱的群体中，而是开始一雌一雄成对生活。

当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外出觅食时，雌性和雄性都兼任着猎手和采集者的职务，因此它们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在现代人类的捕猎采集社会中，男性通常负责几乎全部的狩猎工作，而女性则负责几乎全部的采集工作，随后再把他们的各自所得拿出来，供彼此和子女分享。世界各地的人们行为方式略有差异，但几乎在每一个捕猎采集的社会之中，烹饪都是女性的职责，而男性则负责威胁乃至攻击胆敢窃取这对夫妇的食物的人。这样一来，偷窃食物的代价就提高了，从而改变了进化稳定策略。家庭取代了群落，成为社会的基础。人们演化出了复杂的有关资源分享和礼数的规则，以照顾长者、孤儿和其他失去了家庭照顾的人。

这些变化也给原人的性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祖先不再像猿类一样过着混乱的性生活，而改为成对生活。因此，男性传递基因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争先恐后地拼命把自己的精子尽可能多地注入女性体内，而是开始学着去献殷勤和给予。对于匠人来说，重达1/4磅的睾丸就像体积巨大的肠子一样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对于男性匠人来说，他们仍然面临着来自勾引女性者和强奸者的精子竞争，因此他们的性腺不能像独享权势的雄性大猩猩那么小。不过，到了现代，人类的睾丸还是缩小到了只有1.5盎司重。

除了失去了巨大的阴囊之外，男性原人还失去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阴茎上一个令人厌恶的特征：侧面的一个小刺。这个小刺用来把以往的精液残留从女性的阴道内刮出去。鉴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都长有这种刺，那么我们共同的祖先可能也有这种刺。原人不再生有这种刺，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它。不过，原人长了体积巨大的阴茎。人类勃起后的阴茎平均长度约为6英寸，而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长度只有3英寸，大猩猩甚至只有1.25英寸。女性原人则长出了巨大的乳房。比起其他猿类胸前的“小土丘”，女性原人的乳房简直就是山峰。

鉴于这些解剖学上的特征，曾经在伦敦动物园担任过灵长类动物馆管理员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名作《裸猿》（*The Naked Ape*）一书中总结道，人类是“现存最性感的灵长类动物”（这是50年前的论断，当时灵长类动物学家们尚未发现倭黑猩猩的狂野行为）。不过，动物学家却无法就为什么人类的乳房和阴茎长得如此之大达成共识。（贾雷德·戴蒙德曾说：“20世纪的科学竟然无法得出一个拿

得出手的‘阴茎长度理论’，真是令人发指的败笔。”）不过，比较浅显的一种猜想是，既然人类不再通过搏斗获取配偶，而改用向异性献殷勤来赢得配偶，那么展示自己在性方面的健康程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论这种信号是传递给异性看的，还是传递给同性的竞争对手看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有什么比炫耀硕大无朋的器官更好的手段呢？

距今130万年前，也就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开始分道扬镳的时期，原人已经演化得与其他猿类有了巨大的差异。不过，此时原人的暴力程度究竟如何，仍然存在争议，因为我们迄今所发现的化石骨骼远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原人死于同类之手。目前，只有一具拥有100万年以上历史的遗骸上留有致命创伤的痕迹，而就连这个案例，我们也不能肯定地说死者一定是死于蓄意的杀害。我们发现了比较多的距今50万年以内的骸骨，而在这些骸骨上我们才发现了确切无疑的致命伤的痕迹。

不过，鉴于黑猩猩和现代人类搏斗方式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合理的推断。在这两个物种之中，使用暴力的通常都是年轻的雄性，因为它们通常比雌性或年老的雄性拥有更大的体型、更强健的躯体和更易怒的脾气。谚语说，如果你手里有个锤子，那么什么问题在你看来就都像是钉子。对于满身肌肉、睾酮水平很高的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和人类看来，很多问题看起来都可以靠武力解决。灵长类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在黑猩猩的袭击活动中，有超过90%的袭击行为是由雄性完成的；警察则告诉我们，人类的统计数据与黑猩猩的非常相似。年轻的雄性（不论是人类还是黑猩猩）可以为任何事情打起来。排在前两名的理由是性和声誉，物质则落在第三位。如果这些年轻雄性成群行动，而且处于以众暴寡的态势，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命案。

人类和黑猩猩是从祖猿身上继承的雄性团伙致命暴力行为吗？进化论者无法证明这一点，但这确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成立，我们也就可以总结说，大约从180万年前开始，匠人的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关系使得献殷勤取代搏斗成了更好的求偶策略。但打斗在对付敌对的原人社群时，仍然保留了其价值。与之相反，倭黑猩猩从130万年前开始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进行演化。这是因为，雌性的团结协作降低了雄性暴力的回报率。（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关系或许减小了女性原人间形成的倭黑猩猩式的团结协作的规模。）

随着考古学家发掘出更多的骨骼，细节会变得更清晰。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那就是原人的新的进化稳定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人属动物一路前行、繁衍，做到了猿类从未做过的事情。在1 000个世纪之中，我们的祖先遍布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又过了1 000个世纪，他们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最远已经达到了今天的英格兰和印度尼西亚（实际上，最早的带有暴力痕迹的骨骼来自于爪哇）。它们来到了与东非稀树草原环境截然不同的区域，并且十分自然地涌现出了新的变异。现在，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考古学家或是遗传学家宣布在亚洲或欧洲发现了又一种新的原人种类。

到了50万年前，这些原人中的一种（由于最早发现于德国海德堡，因此被命名为“海德堡人”）已经演化出了几乎与我们现代人同样大小的脑。在接下来的几十万年中，尼安德特人（同样以其位于德国的发现地命名）的脑体积已经超过现代人的，只不过更平滑，因此有些区域的开发程度不够。这两种原人或许已经能够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新的杀戮方式：他们使用树脂和从其他动物身上取下的肌腱把石质的矛头装在了木柄上。

考古学家发现了足够多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可以确信他们非常非常暴力。至少在两块颅骨上发现了非致命伤痊愈后的痕迹。在尼安德特人的发掘现场，石质的矛头十分常见，头部和颈部的伤痕则更加常见。与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损伤情况最接近的是现代的牛仔竞技骑手。可是，在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时代，可没有什么烈马需要他们驯服，因此，他们很可能是在打斗中受的伤。尼安德特人可能只会与猎物进行搏斗，但是尼安德特人的猎物有时也包括其他的尼安德特人（很多证据表明，他们偶尔也吃人）。因此，我们很难不去怀疑，这些脑体积很大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所有大猿[3]中最为暴力的。他们聪明、有武器，而且异常强壮（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描述尼安德特人说，“尼安德特人就好像是摔跤手的体型结合了马拉松选手的耐力”）。到公元前10万年，尼安德特人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从中亚到大西洋沿岸的广袤地区。

但接着就有了我们。

2.7磅的魔法

在你的脑袋里的，是一小块魔法。在自然界，没有什么能与这2.7磅在你的颅骨内跳动的水、脂肪、血液和蛋白质相比。它们吞噬着能量，带着电流。经过了4亿年的演化，这样的脑使我们区别于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动物，并且彻底改变了武力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这一自然的奇迹大约在距今20万～50万年前的非洲某处完全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在这一时刻，在众生之树的原人枝干上长出了充满特殊活力的新的枝条。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或许是极端不稳定的气候不断地改变着生死博弈中的回报率。

这是一段疯狂的历程。20万年前的气温要比今天冷得多（或许平均要低3华氏度[4]），随后，在几经起伏之后，地球又进入了真正的冰河时期。距今15万年前，气温比今天要低14华氏度。厚度超过一英里的冰川遍布亚洲北部、欧洲和美洲，冻结了大量的水分，以至于海平面比今天要低300英尺。没人能生活在冰川之上，而在冰川边缘的广袤荒原上，寒风呼啸，沙暴肆虐，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便在靠近赤道的位置，夏天也十分短暂，水源也很缺乏，大气中较低的二氧化碳含量抑制了植

物的生长。

就在那一时期，长得很像我们的人类出现在了地球上，他们有着长长的、半球形的头颅，扁平的面孔和小小的牙齿。发掘出的遗骸和DNA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约在距今20万～15万年前的东非演化了出来。不过，这些发现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这些大猿开始削制石头工具、打猎、采集、战斗、繁衍，但是我们在他们的生活地点并没有发现与尼安德特人或是其他原人有显著区别的东西。这一点的原因还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不过，一直到世界变暖了几千年，随即又进入另一个冰河时期之后，这些长相类似我们的人类的行为方式才开始变得像我们。

大约在距今10万～7万年前的考古现场，人们开始发现奇怪的东西了。这些人类开始装扮自己，这可是此前的原人们不会做的事情。他们收集蛋壳，花上许多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打磨成圆形，再使用尖尖的骨头在每个圆形蛋壳的中心钻孔，再把几百个这样的蛋壳串起来，做成项链。他们相互交换这些装饰物，有时被交换的装饰物会流传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

原人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于人类。他们会收集赭石（铁矿石的一种），用它们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上粗犷的红色线条，很可能还会画在彼此的身上。在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窟，有人甚至在75 000年前在赭石上画下了简单的几何图形。这不仅是已知最早的艺术作品，而且是用来创作其他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

人们灵活地使用他们的手指，开始制造小工具，比以往的工具都更轻便、更精巧。接着，他们开始把一些工具当作武器使用。在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用骨头雕成的工具中，包括鱼钩；最早的石叶工具（考古学家这样称呼那些小工具）则包括箭头和标枪头。非洲南部海岸洞穴中发现的鸟骨和鱼骨表明，人们可以用这些工具捕杀那些他们曾经鞭长莫及的猎物（尼安德特人的肩部和肘部关节的遗骸证明，尽管他们十分凶猛，但是他们投掷的能力并不强，更不要说射箭了）。

像尼安德特人一样，早期的智人[5]偶尔也会吃掉同类。他们用石刃把肉从长骨上剥下来，再用石锤砸碎骨头，取食骨髓，而最美味的当属神奇的人脑。考古学家时不时发现的被砸碎的颅骨表明，人类很可能在自相残杀。但我们只有在距今30 000年前的遗迹中才能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这次我们发现的并不是损坏的颅骨，而是智人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洞穴墙壁上留下的著名绘画。这些画都有着一种细腻的美感。“我们没人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据说毕加索第一次看到这些画时曾这样说道，“在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之后，人类越画越差。”不过，有些画则展示了阴暗的一面——它们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人类用弓箭相互射击的场景。

考古学家在发掘距今10万～5万年前的遗址时，偶尔会发现看上去

有着与众不同的现代气息的事物，比如珠宝或艺术品；而在历史短于5万年的遗址中，他们几乎每次都会发现这样的手工艺品。那时的人们在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并且找到了新的方式去做以前做过的事情，甚至为做每一件事情都发明了多种手段。从开普敦到开罗，历史早于5万年的遗址看起来都很相似，从中发现的东西基本相同，这些东西的用途也基本相同。而在历史短于5万年的遗址中发现的东西则大相径庭。到了公元前3万年，仅在尼罗河流域就发现了6种截然不同的石器制造的地方风格。

人类发明了文化。凭借巨大而敏捷的脑，人类不仅可以编织出用来交流复杂思维的符号网络（尼安德特人，甚至匠人也可以做到这点），并且还能将这些复杂思维保存下来。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不同，现代人类可以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并且不断地积累他们的想法，由一个想法进而产生另一个想法，并跨越许多代人，将其传递下去。

我们脑的生物进化造就了文化，而文化本身也在演化之中。生物进化由基因突变推动，在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跨度中，效果最佳的突变会取代其他突变。而文化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多。这是因为，与生物演化不同，文化演化是有方向性的。当人们面对问题时，他们脑中的灰质细胞就开始发挥作用，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基因突变一样，大部分想法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改变，有些想法则干脆对世界有害。但旷日经年，最有效的想法还是会从其他想法之中脱颖而出。

比如，设想你是生活在3万年前尼罗河流域的一名年轻猎手。在前文中的死亡博弈里，我用鸽子代表那些永远不会进行搏斗的动物，而用鹰代表那些总是进行搏斗的动物。那么，在这里，我将用绵羊代表那些随大流的人，而用山羊代表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我们的年轻猎手就是一名山羊，他确信自己懂的最多，并且想出了一种新的箭头设计。假设这种新的箭头有着更长的柄脚，因此可以比以往的箭头更好地留在被射中的羚羊身上。但让这位年轻猎手感到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绵羊性格的伙伴们不赞同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既然他们的祖先不需要长柄脚的箭头，他们也不需要。

就像鸽派与鹰派游戏中选择搏斗还是逃走一样，革新和保守的选择也都既有代价，也有好处。革新者需要付出代价：要学会制作新的箭头和有效地使用这种箭头需要花费时间（假设要花掉10分），而且，一个或许更严重的后果是，反对传统可能会导致他们在人群中的威望下降（减20分）。其他人也许不愿意与这么古怪的人合作狩猎。这样一来，尽管山羊发明家拥有更好的技术，但可能只能获得更少的肉食（再减10分）。最后，他可能不得不放弃。

除非，他的所得能大于他的损失。如果他的箭头确实有助于捕获更多猎物，那么他就不仅可以因为获得了更多食物而增加自己的体重（假设加20分），他还可以通过慷慨分享羚羊肉提高自己的威望（加25分）。这样的成功人士可能还会获得更多求偶的机会（再加10分）。如

此一来，他最终获得了大量的盈利（最终分数为15分）。或许，他可以将他天才的山羊派的基因在这个小小的捕猎采集群落中传播几代人。但文化变革的速度会远远快过这样的生物学变革，因为捕猎小组里的其他人只需要仿制他的箭头就可以了。此时，新箭头发明者的分数和受女性欢迎程度都会下降，但他获得的盈利或许不会很快下降回零点。因为随着每个人获得的食物都变得更多、更好（除非这项新技术太过有效，导致所有羚羊都被杀光了），新一轮连锁反应会就此开始……

就像鸽派与鹰派的游戏一样，这个游戏也很有趣。我们可以让事情朝各种方向发展，因为回报中的一点儿变化就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的改变。但就像之前的那个游戏一样，关键点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绵羊与山羊游戏也会不断地进行，每次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发明家对抗传统的代价过大，那么这种新的箭头就不会流传下来。但如果这种新的箭头确实性能更加优秀，那么其他群落中的人们也会想出这种设计，并且很快在其他地方传播开来。此时，山羊派的群落可能就会在狩猎活动中胜过绵羊派的群落，迫使后者要么最终接受这种新箭头，要么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要么与革新者作战——或者，在尚未发生囚笼效应的地方，他们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的文化战争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其他一些动物也能算是有文化（尤其是黑猩猩，每个黑猩猩族群做事的方式都与其邻居略有不同），但是它们的文化变革似乎都无法积累下去。文化给演化过程带来的变化很像15亿年前有性繁殖的崛起所带来的变化：有性繁殖加速了基因突变，文化则加速了革新。两种机制都极大增加了结果的多样性，使得细胞和人类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与竞争。

凭借足以进行文化演化的聪明大脑，现代人类征服了世界。仅仅在10万年前，一些智人走出了非洲。当时，文化还只是一朵脆弱的花。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早期移民最远也只到达了今以色列和阿拉伯。在那里，他们与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过这种邻居关系却未必友好：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矛刺造成的死亡事件（大约在10万年前），就发生在这些先锋移民者身上。不过，在7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第二波移民则已经有了完全的现代人类的行为方式，他们在这个星球上扩散的速度，是160万年前离开非洲的原人的50倍。

文化让这些新移民较之原人有了巨大的优势。例如，距今3万年前，现代人类来到了西伯利亚。那时的西伯利亚比今天更寒冷，但人类不需要像其他动物那样花上千年的时间演化出更多的毛发取暖。人类发明了骨针，并用肠子做线，缝制出合身的衣服。也许有些保守人士更青睐传统的、不怎么合身的兽皮，但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这些保守人士要么改了主意，要么就冻死了。

这一过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的文化如此多样（地方环境的微小区别和随机产生的足够好的主意创造出了数不清的不同的进化稳定策略），也解释了为什么各种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相似性（相互竞争的文化

往往汇集到几个胜出的策略上）。文化不仅是人类适应新环境的最佳工具，同时也是改造环境的最有力的力量。文化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至于世界上所有原人都灭绝了。

这一过程的细节让人不安。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我们的祖先主动消灭了原人，DNA分析也暗示两个种族之间或许还曾经有过合作。2010年完成排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显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经常发生混血，今天每一个亚洲人或欧洲人的后裔身上都有1%～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祖先，而每个澳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人身上都有6%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一种于2010年3月才发现的原人）。另一方面，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混血有多少是由强奸造成的；或者说，当我们发现被击碎的尼安德特人颅骨时，我们也无法知道那只挥舞凶器的手究竟属于另一个尼安德特人，还是属于一个智人。不过，不论现代人类是否亲自消灭了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我们的发明能力最终使得这些与我们食谱相同但智力较低的亲戚无法存活下去。

无论因果链条究竟是怎样构成的，至少这种让人沮丧的巧合是成立的：在现代人类四处扩散的同时，其他种类的人类就都逃走了。到25 000年前，尼安德特人退到了直布罗陀和高加索山脉一些难以抵达的洞穴中，到距今20 000年前，所有尼安德特人就都消失了。其他种类的原人在孤立的岛屿上存在到了公元前18 000年。尽管今天的人们还声称看见过雪人，但所有可靠的证据都表明，从200个世纪前，也就是从上一个冰河时期最冷的时代开始，世界上的人类只剩下了我们这一种。

这还只是文化改变这个星球的第一步。在第二章中，我曾经探讨过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于公元前9600年左右结束时，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是怎样疯狂地繁衍的。对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而言，这段好时光只持续了几代的时间，很快它们的数量就超过了食物总量能够供养的限度，饥饿因而再次降临。而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则回应以文化上的演进，他们开始驯化植物和动物增加食物供给。

当我在第二章中探讨农业的肇始时，我将之称作人类历史的两三个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其部分原因在于，新出现的密集的农耕文明使得死亡博弈中的失败者更难逃走。这样一来，领地观念就变成了囚笼效应。不过，领地观念给了蚂蚁和猿类进行死斗的理由，而囚笼效应带给我们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实际上，领地观念创造了一种新的进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被我称为建设性的战争的东西。囚笼效应使得那些一直进行杀戮直到其敌手失去了抵抗意志的人享有好处，但更大的好处则属于那些接受手下败将臣服而非将他们屠戮殆尽的人。文化演进让杀手变成了统治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社会的征服者。

黑猩猩有时候也会将被击败的敌人纳入它们自身的社群之中，就像1977年贡贝战争结束时，卡萨凯拉族群黑猩猩接纳了卡哈马族群残存的雌性黑猩猩那样。但黑猩猩没有足够的脑力积累文化演进。猿猴从来不

会建立起城市，蚂蚁也从来不会建立起帝国，因为增长得过大的社群总是会分崩离析，就仿佛地球早期海洋中的碳滴状物一样。实际上，这也是卡萨凯拉族群黑猩猩和卡哈马族群黑猩猩最初出现的原因。1960年，当珍妮·古道尔在贡贝建立起她的研究站时，黑猩猩只有一个族群。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族群逐渐壮大，随后就分裂成了两个族群。

与之相对比，人类无须演化成另外一种动物，也能让自己适应更大、更复杂的社群中的生活。在后冰河时期的幸运纬度带上，随着这个陷入囚笼效应的世界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大的社群通常能够胜过那些小的社群。但要想维系大的社群，领导者们必须建立起内部合作关系，使得整个社群能够更好地与外来者竞争。

由此，利维坦成了人类进化稳定策略的一部分。又一次，我们能从黑猩猩身上看到人类行为的影子。当黑猩猩生活在雄性头领地位稳固的族群中时，它们发生打斗的次数要比它们生活在秩序未定的族群中时更少。人类的领导者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变成坐寇，而地位稳固的黑猩猩雄性头领有时会惊人地公正，甚至对弱者展示出无私的精神。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弗雷迪。弗雷迪生活在西非塔伊森林之中，是地位非常稳固的雄性黑猩猩头领。在大受欢迎的迪士尼自然纪录片《黑猩猩》（*Chimpanzee*）中，弗雷迪哺育、照料了名叫奥斯卡的黑猩猩孤儿。弗雷迪花在奥斯卡身上的时间，本可以用来与其他成年雄性一起巡逻边境。不过，影片中的结尾是皆大欢喜的，弗雷迪的族群抵挡住了邻近的一个族群的进攻。而那个族群的头领（邪恶的“刀疤”）则无力弥合它和它的手下之间愈发明显的裂痕[6]。

像很多伟大的领导者一样（或许最著名的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弗雷迪示范了合作的意义，而合作或许能帮助它各执己见的团队成员良好地团结协作。不过，弗雷迪不可能开创一个可以稳步降低塔伊森林致命暴力发生率的王朝。要想做到这一点，弗雷迪和它的族群必须在生物角度上演化成另外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要能够像人类一样实现文化上的演进。雄性黑猩猩首领无法在其前任们的基础上重组其族群，它们也无法推动军事上的革命。这些事情只有我们人类能做到。

如我们在本书第一到五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人类在过去10 000年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可以持续地完成军事革命。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铠甲、军事纪律、双轮战车、配备铁制兵器的大规模步兵、骑兵、火器、战列舰、坦克、飞机、核武器，这个名单永无止境，每一次进步都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战争。而为了在这样的冲突中取胜，更大的社会也找到了让其成员能够更好地进行协作的方式，从而将统治者变成坐寇，并最终实现内部的和平与繁荣。靠着这种独特而充满矛盾性的方式，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富足。

和平主义者的困境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可能是继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之后关于人类暴力在现代下降趋势的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斯蒂芬·平克用一个被他称作“和平主义者的困境”的博弈游戏说明他的观点：欧洲和北美从1500年开始变得愈发和平。这个游戏的基本模式与本章叙述过的“鹰派和鸽派”和“绵羊与山羊”的模式很相像。平克假设，每当有某种争端需要解决时，选择合作的各方都能获得5分；攻击毫无戒心的对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得到10分，而遭遇这样的攻击将被扣除不成比例的100分（如果你曾经被抢劫过的话，就会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我们可以预见，由于担心损失100分，每个人都会变得好战，尽管在这个规则中，双方都发动攻击的结果是各损失50分（双方都遭受损失，但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都愿意通过合作得到5分，但为了避免因遭遇突袭而损失100分，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冒着失去50分的风险发动袭击。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战争的发生频率在下降，通过合作得到5分正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平克指出，死亡博弈的逻辑意味着，对这种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各种行为的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和平带来的回报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这两者之中，至少有一个（或是两者皆然）提高了，从而使得使用武力得到良好回报的情形减少。作为应对，我们开始逐渐减少武力的使用。

对于今天的中年人来说，我们曾经亲历的变化就非常明显。几年之前，我曾在西西里指导一次考古发掘。在一次晚餐中，我们聊起了打斗的话题。参与发掘的其中一个学生是个高大魁梧的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说，他无法想象打别人是种什么感觉。我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随后我发现，在座的人中几乎没有哪个曾经在盛怒之下动过别人一个指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迷离境界》（*Twilight Zone*）。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狂野的孩子，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涯中，你总要偶尔打上一架的。诚然，这些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能在暴力的光谱中接近“非暴力”的那一极［心理学家把这样的人称作“怪人”（WEIRD），即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但他们同样体现出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友善、更温文尔雅的时代。

平克认为，有5个因素改变了暴力的回报，从而使得武力的吸引力下降。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利维坦。政府转变成了坐寇，会惩罚那些喜欢使用暴力的人。在平克的和平主义者的困境游戏中，即便加上小小15分的暴力惩罚，那么在一场搏斗中获胜所能取得的分数也会从10分变成–5分，从而使之低于和平带来的平均分（5分）。很快，这就会使得利维坦的子民们化干戈为玉帛。

不过，平克认为，政府仅仅是第一步。商业也让和平的回报提高了。平克发现，如果规定贸易可以将两个选择合作而非打斗的玩家的收益提高100分[7]，那么他们得到的总分将达到105分，而这一分数远远高于赢得战争取得的分数（10分，而且战争如果打输了，则要损失掉50分）。

平克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因素是女性化。在每一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中，男性几乎完成了所有的暴力犯罪和战争行为。在历史上，男性和男性的价值观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在近几个世纪中，女性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这一趋势从欧洲和北美开始，并且向世界各地传播。人类还没有像倭黑猩猩那样，女性可以完全制约好斗的男性。但在平克看来，女权主义减少了暴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因为大男子主义越来越不像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是看起来很荒谬。平克推测，成功的暴力行为的80%的收益都是心理上的。因此，随着女性主义价值观重要性的上升，暴力胜利带来的收益就会从10分减少到2分。这样的得分就比双方均保持和平所能得到的5分低了很多，从而很快让和平主义变成一种新的进化稳定策略。

这还不算完。平克接着写道，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精神上的共鸣开始变得越发重要。“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这样的感受不再是一种新时代的空话。将其他人类成员视为同胞，这一观念不仅可以提高帮助别人带来的心理收获，也可以增加伤害他人带来的心理负担。如果和平合作能给双方各带来5分的愉悦，那么和平合作给每一方带来的收益就将增加到10分；与此相反，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之后，人们产生的内疚心理也会减少使用暴力的收益，使其减少到10分以下。因此，和平、爱与理解将获得胜利。

最后，平克认为，科学和理性也会改变收益。自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我们学会了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了宇宙是怎样起源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以及生命是如何演化的。我们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甚至发明了博弈论。在我们明白合作比使用武力更理智之后，合作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收益就会提高，而使用武力所带来的心理收益则会降低。

平克的观点很难反驳，但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曾说长期的全球历史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现在，我要说，由于平克的关注点局限在了近500年的西欧和北美，因此他实际上只看到了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观察过去10万年中的整个地球，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既比平克认为的更复杂，同时也更简单。

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在过去的500年中欧洲和美洲暴力水平的下降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件。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看到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国的时代也曾经下降过。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末尾，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距那时10 000年前水平的1/4。从200~1400

年，在人口聚居的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暴力死亡率再次攀升（见第三章），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大和平化时期——也就是平克所关注的这次（第四章和第五章）。早在1900年之前很久，暴力死亡的风险就已经下降到了比古代帝国时代更低的水平，并且一直持续下降（见图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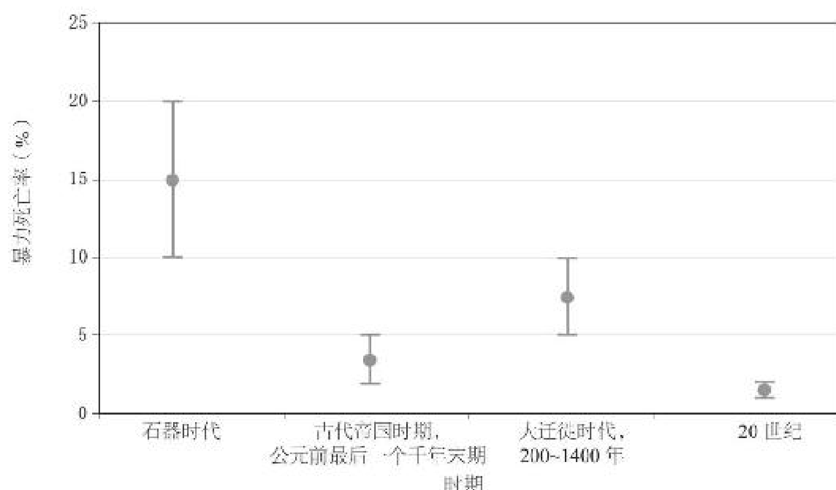


图**6–7** 大图景：从公元前**10 000**~公元**2 000**年的暴力死亡率

而让情况变得更简单的是，如果我们对比古代和现代两个暴力水平下降的时期，并拿它们与其间暴力水平上升的时期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并不需要5个因素解释为什么暴力水平会下降。我们只需要一个因素。这本书读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不会对我的答案感到惊讶：这个答案就是建设性的战争。

平克认识到："一个垄断了武力使用权，并以此来防止其子民相互危害的国家，或许是减少暴力行为最长效的选择。"不过，在我看来，事情要更简单。在过去的10 000年中，建设性的战争一直都是减少暴力的主要推动力，它创造出由利维坦统治的更大的社会，而利维坦为了在与其他利维坦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转变为专心惩处"非法"暴力的坐寇。平克提出来的另外4个因素——商业、女性化、同情和理性都只是建设性的战争带来和平后的产物，它们本身并非暴力减少的原因。

在商业方面，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在古代帝国时期和1500年以后的时期，"看不见的手"提高了商业合作带来的收益。但这只是因为"看不见的拳"提高了使用武力的成本。无论是古罗马帝国、汉朝、孔雀王朝还是近代的欧洲帝国，"看不见的拳"总是比"看不见的手"先行一步。在200年左右，亚欧大陆上的"看不见的拳"失败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从而横扫了古代帝国，而"看不见的手"也就随之失去了作用。只有在欧洲人的舰炮征服了海洋之后，全球贸易才取得腾飞，并在19世纪"世界警察"的时代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到20世纪初，当"世界警察"的地位开始动摇时，贸易也就开始萎缩，暴力活动则增加了。我们随后将在第七章中看到，在新的"世界警察"于1989年确立之后，新的商业扩张的时

代也就此开启了。

长期的图景十分清晰。利维坦提高了使用武力的成本，从而使得和平的回报要大于暴力的回报。随着局势愈加和平，商业也就愈加容易蓬勃发展，进而提高了合作所能取得的收益。

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同情心和理性主义也是建设性的战争的产物。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绅士们，经常援引古罗马时代的文献证明世界上普遍认同的同情心将带来永久的和平，这是因为曾经的罗马绅士们也持有十分相近的观点。但无论是在启蒙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同情心和理性主义都不是暴力水平下降的主要推动力。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过的一样，儒学、佛教、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反对暴力的主张，都是在缔造了汉朝、孔雀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征服战争超过其高峰时候才俘获了大量的拥趸的。与之相类似，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充满同情心和理性主义的时代也发生在500年战争最可怕的阶段结束之后。这些思想层面的运动本身并不能缔造和平，而只能用来解释利维坦所打造的更安全的世界，并为之正名。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看到，当利维坦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崩塌、暴力水平重新攀升时，并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能够阻挡这种潮流。

女性化更是暴力水平下降的产物，而非其成因，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当古代帝国的暴力水平下降时，几乎看不到任何女性赋权的痕迹；即便到了现代，也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能看到女性权利运动的身影，因为在这一时期，利维坦已经将暴力死亡率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许，只有当社会的和平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暴力死亡率低于2%），女性才能拥有足够的权利挑战男性的侵犯。在1750～1800年以前，人类社会从未使其暴力死亡率长期处于这一水平以下过。然而，一旦达到了这一水平，我们就开始在欧洲和欧洲人的一些殖民地中看到女性化的迹象。

假设维持平克设定的分数不变（合作双方各得5分，打赢战斗得10分，输掉战斗丢100分，双方均选择战斗则各丢50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游戏会有怎样的结果。在利维坦对攻击者施以扣除15分的惩罚之后，合作就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选择。因此，建设性的战争降低了暴力水平。与此同时，平克提出的其他4种因素也开始作为乘数发挥作用。首先，和平促进了商业发展（公元前200年时的几个古代帝国和1700年时的欧洲都见证了这一现象）。即便商业奖励分数也低于平克所给的100分，商业的发展依然能够显著改变局势。即便我们只给10分的商业奖励分数，那么和平的商人社会也能获得15分的回报，而次佳的选择只会带来–5分（打赢一场战斗，然后被利维坦惩罚）。平克并没有给理性分数，不过为了和平主义者的同情心给了他们5分。如果我们让理性和同情心分享这5分，那么维持和平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将增加到20分。当暴力水平像1800年的欧洲一样降得非常低时，女性化运动就会兴起，从而让武力的吸引力下降。

这一整套过程都依赖于利维坦的实力。利维坦不仅要有足以惩罚其子民的能力，也要有保护他们的能力。这是因为，利维坦与其子民进行的这场死亡博弈，同时也是利维坦与其邻近的利维坦一起进行的一场死亡博弈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利维坦总是能赢得建设性的战争，每次都获得10分，那么它最终就可以支配它的邻国，吞并以前的对手。此时，这个利维坦就会变成类似罗马帝国的存在，贸易、同情心和其他种种都会在其内部——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蓬勃发展。假以时日，或许它将最终变成一个“世界警察”。

当然，现实世界要比“和平主义者的困境”这种简单化了的游戏复杂混乱得多。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在19世纪晚期，“世界警察”陷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反馈环：“世界警察”成功地让一个全球体系保持运转，从而使得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富裕，而这将刺激新的工业革命，进而创造出足以削弱“世界警察”惩戒不轨行为能力的竞争者。到1914年，有好几个游戏参与者都认为，使用武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已经再次超过了进行和平合作的收益，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接着，情况变得更糟了。在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者的困境游戏突然变成了一场鹰派与鸽派的博弈。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征服都被“一战”的血腥吓坏了，坚持不计一切代价维持和平，从而让希特勒可以变成鹰派。希特勒在1940年几乎赢得了这场博弈，随后在1941年和1942年又有过两次机会。到那以后，英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才终于意识到这个游戏应该怎样玩。自然，事已至此，这个游戏的逻辑使其只能有一条出路：1945年，同盟国在希特勒自己的暴力游戏中击败了他。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化为了废墟，大约有1亿人丧生，美国还拥有了原子弹。

回报率完全变了，因为核武器开始把对使用武力的惩罚分数增加到了无穷大。按照这个博弈游戏的冷酷规则，即便没有了能够独自施加惩罚的“世界警察”，使用武力者要想取得正回报，也只能非常谨小慎微地使用武力——通过发动叛乱、政变和有限战争，总之不能让其武力引发暴力反击。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中的某一个做了一件威胁到对方生存的事情，双方就都会输掉游戏。因此，逻辑就要求消除武力，而苏联人和美国人也确实在几十年中设法避免了战争。但就像罗纳德·里根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世界上有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半球警察”，就好像“一家酒吧里，两个西部牛仔都拿着枪指着对方的脑袋——而且这个形势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一切都还好，只要这两个人中不要有哪一个心情特别不好。

超越彼得罗夫

博弈论在风景如画的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妮卡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意识到死亡博弈进入了令人警惕的阶段，因此委托兰德公司客观而科学地找出避免毁掉整个世界的方法。兰德公司从常

青藤盟校挖来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数学家，让他们计算这场博弈中每一个可能的举动所能带来的影响。

这些黑板前的战士是一群古怪的天才。如今知名度最高的要数约翰·纳什（John Nash），畅销书和电影《美丽心灵》（*A Beantiful Mind*）的主人公。纳什证明了，在能取得某种回报的情况下，相互仇视的敌手也能共同朝着一个双方均感满意的平衡点（数学家称之为“纳什均衡点”）努力，而无须诉诸武力。这说明，只要博弈双方保持坚毅和理性，那么核威慑确实能发挥作用。不过，纳什本人的判断能力并没有让人们能对此产生信心。他开始出现幻听，并且因为在男洗手间的不雅暴露行为而被捕，因而没能通过安全筛查。后来，他又罹患了精神分裂症。

幸运的是，那些在核战争与和平之间做抉择的人虽然不及纳什聪明，但是比他更有理智。但由于没有“世界警察”，世界上未知的未知因素越来越多，就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坚毅的人也很快开始失眠了。他靠喝牛奶缓解溃疡症状，最终因为心脏疾病进了医院。一点点儿的计算失误或是意外事件都意味着世界末日。在理论上（黑板上一遍一遍进行的博弈），核威慑是完全有效的；而在现实中，世界的命运却要仰仗于彼得罗夫这样的人的瞬间判断。核威慑缺乏稳定性，而缺乏稳定性，也就谈不上什么进化稳定策略。

纵观历史，死亡博弈唯一稳定的解决方案就是有一方赢得这场博弈。这就意味着，要想终结彼得罗夫式的生死抉择，就必须由一个“半球警察”击败另一个“半球警察”。冷战中的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间谍活动和政变都是试图改变博弈局势的尝试，这些或缓或急的权力平衡的改变可能会让另一方屈服（或是阻止另一方让本方屈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苏联战略家开始担心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终结苏联（实际上，“军事革命”这个字眼就是苏联分析家发明来形容这种新技术的）。他们是对的，苏联会被终结，只不过并非通过这种方式。

美国的计算机化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军事均势，莫斯科不得不开始寻找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进行战争的方式。不过，我们在事后来看，“星球大战”计划、“突击破坏者”技术演示项目以及其他新型武器的真正意义在于，针对它们的防范方案非常复杂而昂贵。苏联经济可以大量地生产坦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核弹头乃至洲际导弹，但不足以产出或是购买将在20世纪90年代战场上居统治地位的计算机化和智能化的军事装备。

对莫斯科来说，战争成本的这次飞跃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战争和革命造成油价飞涨，促进了苏联的石油出口，苏联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此。然而，在1980～1986年，每桶石油的价格下滑了近80%，使得苏联大部分的可支配收入化为乌有。让克里姆林宫雪上加霜的是，在1975～1985年，美国工人的生产能力增强了27%，西欧工人的生产能力增强了23%，而苏联公民的产出仅仅增加了9%，而东欧更是只增长了1%。苏联的农业效率低下，其生产能力几乎

停滞不前。结果，谷物进口量（尤其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增加了不止一倍，而这部分款项大多数要从美国盟国的银行中借来。债务危机一个接着一个。

“武力，”克劳塞维茨曾有一段名言，“是战争的手段，用来将我们的意愿强加于敌人之上。”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杀死敌人是打消其抵抗意志的最佳手段，那么就要果断地痛下杀手；如果杀戮不是最佳手段，那么就不应当在这上面浪费时间。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才采取的遏制战略的精髓就在于它体现了这一思想。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决策者都拒不接受鸽派的主张，即两个“半球警察”可以无限期地共存下去；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决策者也不会接受鹰派的主张，即只要美国更猛烈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就可以赢得最终的胜利。美国的决策者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条依靠美国实力的道路。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衣钵，成为强大的外新月地带国家，并且同时继承了英国自由的利维坦的角色，倡导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言论。美国的战略家们意识到，要想发挥自由的力量，就要发动自由的战争，将自由作为一种武器瓦解苏联人的抵抗意志。只有当“看不见的拳”为“看不见的手”做后盾时，美国才能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因此，尽管让人十分不快，华盛顿不得不继续制造氢弹，进行代理人战争，并且与一些独裁者打得火热。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领导者必须记住，核武器、战争和野蛮本身不会带来胜利，能够为美国带来胜利的只有苏联的子民——他们在商店外排起长队，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而高声咒骂，或是在黑市上购买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唱片。渐渐地，“看不见的手”就挤干了苏联的意志。

美国的计划几乎算不上是什么秘密。早在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就在其短篇故事《尼龙战争》（*The Nylon War*）中半是嘲讽，半是赞扬了这种计划。在这个故事中，五角大楼的高官们试图说服白宫进行自由的战争。他们说：“如果让苏联人能看到美国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再忍受那些只能给他们坦克和间谍，却给不了他们真空吸尘器的主子了。”总统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美国空军开始在苏联的上空投放大量的长袜和香烟。苏联政权随即垮台。

当然，现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渐渐地，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开始意识到长袜的重要性。就在理斯曼的故事出版的一年之后，苏联总理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长（据说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美国人的主要军备……就是尼龙制品、香烟和其他商品……不，美国人不知道怎么打仗。”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苏联人就已经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尼龙战争，苏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击，驳斥美国人的主张，并且突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真刀真枪的战争无异于自杀，苏联人从未认真考虑过靠进攻经济繁荣的邻国、夺取富裕的省份或商路解决经济衰落问题——在历史上，这些做法被成百上千的统治者采用过。与此相反，苏联的领导人咬牙坚持着这场拼消耗的自由战争，而苏联最终在这场战争中分崩离析。

苏联政治局之所以坐视这种情况发生，并非由于官僚们都被美国的反战歌曲所打动，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武力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入侵联邦德国或是韩国，都无助于让苏联变得像美国一样富有而高产，而只会招致末日决战。在这30年中，苏联人一直拼命地遮掩国家的裂痕，试图让苏联人民（甚至一些外人）相信苏联正在蓬勃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连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都不再奏效了。

到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西欧人来说，20世纪40年代时的鸡蛋配额和其他的屈辱都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东欧人却常常真切地觉得这些不幸即将重演。“要想弄到点儿洗衣粉这样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十分艰难，”一位波兰护士回忆道，“根本没有洗发香波，我只能用蛋黄来洗头……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也许情况会不太一样。但我们很清楚别的国家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如果此时还有什么人坚信苏联集团不会输掉这场经济战的话，那么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事件就彻底让他们绝望了。在这场惨剧中，乌克兰陷入了核辐射之中，而苏联政权的无能和虚伪暴露无遗，再也无法遮掩。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夫人坦承道。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办法。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的抵抗意志正在流失，因此他决定孤注一掷。他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开放重振经济；与此同时，还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避免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只会带来糟糕的结果。

许多美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这场死亡博弈中的一记妙招（妙到这些美国人都弄不清楚苏联人到底要干什么）。“我当时很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动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坦白道，“我担心戈尔巴乔夫会说服我们裁军，而苏联人的军事结构并不会因此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也许10年之后，我们就会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军事威胁。”

有一些时候，斯考克罗夫的判断看上去是正确的。1986年10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坐了下来，真的开始探讨禁止核武器的话题。此举让美国的防务专家们陷入了恐慌。苏联人或许害怕北约的新型高科技武器，但美国人知道那些神奇的武器鲜有几个真正投入了使用。因此，美国人也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失去了核威慑的保护，美国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就将面临规模更大的苏联大军的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想耍什么花招。逐渐地，人们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真的希望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进行这场游戏。没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在1989年1月）上台的时候，是否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呢？”后来，老布什总统在被问到这一话题时坦白说，“不，我们不知道。”即便老布什通过某种方式预见到了1989年会发生什么，并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苏联将在他的任期之内垮台、俄罗斯的疆域将退回1918年时的水平的话，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前

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发疯了。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盘算、谋划、甚至下杀手，一切都是为了动摇苏联人的意志。然而，当大结局真的上演时，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在老布什就任总统的几个月后，匈牙利的一个官方委员会宣布，1956年该国针对苏联的暴乱，是“为了对抗羞辱了整个国家的寡头权力体制而进行的人民起义”。在斯大林的时代，这样一份报告等同于集体遗言。即便是在赫鲁晓夫或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此举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枪毙任何人，他甚至默认了这个宣言。

1989年6月，受到鼓舞的匈牙利人公开为被苏联人处决的前总理举行了国葬。20万人参加了国葬，莫斯科却没有任何反应。匈牙利总理未请示任何国家，直接宣布，由于预算紧张，他没有办法翻修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而且，鉴于旧的铁丝网违反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规定，它们必须被清理掉。这样一来，铁幕上就将出现一道几百英里长的缺口。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惊慌失措，要求克里姆林宫出面干预，却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无能为力。”

戈尔巴乔夫认为，任何程度的退让，都比因为使用武力而导致整个苏维埃体系崩溃更好。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观点。1989年12月，蛮横的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命令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整个罗马尼亚群起反对他的统治，而苏联人依然无动于衷。在圣诞节的那天，轮到人们向齐奥塞斯库和他的老婆开枪了。

同样步履维艰的民主德国共产党人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开放了柏林墙。民主德国人涌向了西方，联邦德国人也来到了东方。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柏林墙上起舞，或是拿锤子开始拆毁柏林墙。仍然没有什么事发生。“德国人走过边界，去见另一边的德国人，你怎么可能朝他们开枪呢？”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说道，“这样的政策必须改变。”

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或许说明戈尔巴乔夫是正确的。然而，到了1989年夏，苏联人几乎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改变某一项政策的结果，就是人们又开始施加无法抵御的压力，要求更改下一项政策。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三个月，民主德国总理告诉戈尔巴乔夫，两个德国想要合并为一个德国。戈尔巴乔夫回答说，除非统一后的德国实行非军事化、奉行中立，否则他不能同意。美国人收到了一份提议，但老布什总统拒绝撤出身在联邦德国的25万美国人。不过，戈尔巴乔夫还是从民主德国撤出了30万苏联军队，而新生的、再度统一的德国则加入了北约。

我们从事后看来，在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脱离了苏联阵营之后，自然也就不用奇怪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车臣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和蒙古人会效法。不过，有一些现象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同凡响：俄罗斯人也决心抛弃这个帝国，并

且宣布退出苏维埃体系。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正式签署命令，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这场博弈中拒绝使用武力，结果没有得到良好的回报。然而，唯一的替代方案——使用武力压制东欧国家，抵制美国人推翻苏联的举动——只会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俄罗斯被打败了，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内新月地带，甚至丢掉了心脏地带的一大部分。但至少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人们几乎没有使用武力。1983年，当彼得罗夫做出生死抉择时，有5亿人命悬一线；而当冷战终于走到其尽头时，却只有不到300人丧生。

美国赢得了胜利（见图6–8）。世界上有了一位新的“世界警察”。



图**6–8** 一千个欢笑的理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终结了铁幕和冷战，**10**亿人免于死亡，活到了新的一天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Corbis图库。

[1] 此处借用越南战争时期的著名反战口号。——译者注

[2] 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取自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名。——译者注

[3] 大猿：人科动物，包括猩猩属、黑猩猩属、大猩猩属和人属动物。——译者注

[4] 1华氏度≈–17.2摄氏度。——编者注

[5] 智人：生物学分类中人属的一个种，指如今人类。——编者注

[6] 我之所以说这是影片中的结尾，是因为理查德·兰厄姆告诉我说，尽管弗雷迪、“刀疤”和它们迥异的行为方式都是真实的，这两头黑猩猩实际上生活在非洲的两端——弗雷迪生活在科特迪瓦，而“刀疤”生活在乌干达。影片的制作者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把这两个独立的故事拼接到了一起。不过，这种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并没有影响这个故事所要传达的寓意。

[7] 考虑到大部分历史时期的贸易规模，100分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鉴于这个游戏中的数字都是编造出来的，对此争论不休似乎也没有意义。



第七章

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坚帝国（1989年~？）

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这是奇迹般的一天。在这一整天中（实际上，是从星期日夜里10点半到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纽约市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用枪、用刀或是任何一种方式杀死。自从人们开始在1994年（当时的纽约平均每天会有14人被杀）进行综合数据统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继续向上追溯，会发现上一个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死亡的日子出现在50多年之前——当时的案件记录并不精确，纽约市的人口也比现在少50万。总的来说，在2012年，每2万个纽约人中只有1个死于暴力——这很可能是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美国不只有纽约这一个地方。2012年，芝加哥的凶杀率上升了1/6；而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蒂诺——那里半数的房主的负债额超过其房屋价值，市政府也已经破产——凶杀率飙升了50%（“门上锁，枪上膛。”该市的检察官建议道）。就在2012年临近尾声时，康涅狄格州牛顿市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开枪射杀了20名小学生、6名学校工作人员、他自己的母亲，最后饮弹自尽。但就全美国而言，纽约市要比牛顿市更具代表性：尽管有着这些噩梦般的例外，美国的凶杀率在2012年下降了。

实际上，纽约市的情况不仅在美国具有代表性，就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都具有代表性。杀人事件在总体上呈减少趋势。在2004年，大约每13 000人中会有一个人被杀害；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4 500：1。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呈现出相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冲突类型，但这样的战争几乎消失了。政权崩溃后的内战仍然存在（2012年，每400个叙利亚人中就有1个死于内战），但数据表明，内战发生的频率也在下降。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在2012年，每4 375人中有1个人死于暴力。这就意味着，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中，仅有0.7%会死于暴力。这个数字在20世纪是1%～2%，在古代帝国时期是2%～5%，在草原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是5%～10%，在石器时代则是骇人听闻的10%～20%（见图7–1）。这个世界终于开始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了，而丹麦也在不断地进步中：在2009年，每111 000名丹麦人中才会有1个人被杀害，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死于暴力的风险仅为0.027%。最棒的是，今天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是1986年（也就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重新录制《战争》一曲的同一年）时的1/20。50年前，美国空军中最为出色的人员才能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该部门负责投放核武器）；而今天，大部分美国空军军官把加入这个部门视作职业生涯上的自杀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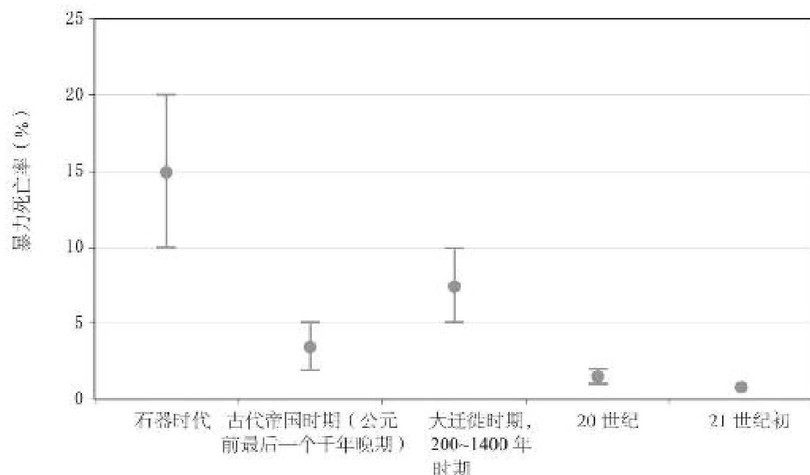


图7–1 几乎就要成功：公元前**10 000**～公元**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好消息还不限于此。如同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暴力死亡率的下降伴随着繁荣水平的提升。1989年，当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警察”时，人均财富产出刚刚超过5 000美元。[1]而在2011年（迄今最近的拥有完整数据的年份），人均财富产出已经翻了一番。亚洲获益最多，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一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们自身的工业革命。这促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向城市的大迁徙，使得至少20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世界银行将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定义为绝对贫困）。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在经历了分别由债务危机、艾滋病传播和政权更迭造成的短暂退步之后，从2000年起也都开始取得进步（见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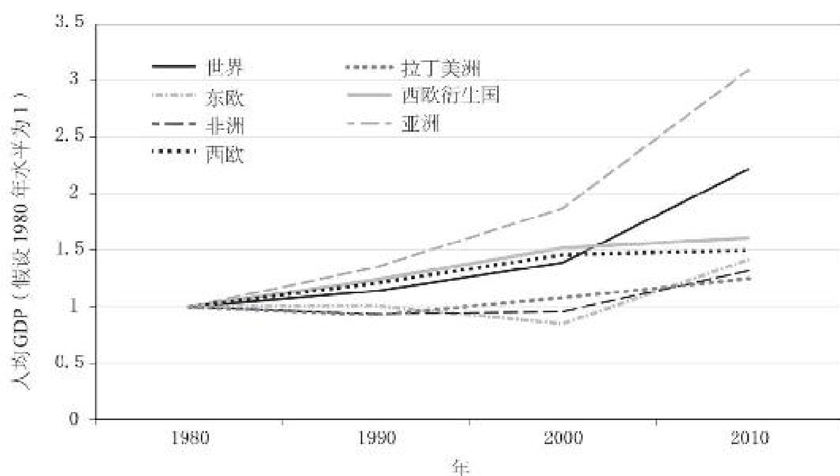


图7–2 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增收的幅度更高：**1980～2010**年，世界不同地区的财富增长速度。从全球层面来看，**2010**年的人均财富比**1980**年多出**2.2**倍；在亚洲，这一数字则是**3**倍。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穷，东欧人在**20**世纪**90**年代也面临相似情形，但他们都从**2000**年开始逐渐缩小了与西北欧国家及其殖民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之间的差距

引人注目的图7–1和7–2表明，这个世界不仅变得更安全、更富有，并且随着各个大陆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它也变得更公平。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一切好消息背后的解释，也是贯穿本书的那个观点：建设性的战争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这种说法充满矛盾，违背我们的直觉，而且令人不快（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过的那样，在我开始研究长期战争史之前，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证据看起来都是颇令人信服的。

在4亿年前，暴力作为一种赢得争端的手段出现了（最初出现在想要吃掉其他鱼类的早期鲨鱼和不想被吃掉的其他鱼类之间）。暴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几乎所有动物现在都会使用暴力。有些动物甚至演化到可以集体使用暴力；而一旦涉及领地问题，暴力就可能会变为致命的手段。战争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生物演化的大树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根短短的枝条，但也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一根枝条。人类不仅可以在基因上进行演化，还实现了文化上的演化。这样一来，我们无须坐等成千上万代人的自然选择改变我们，便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身行为方式的办法，应对死亡博弈中各种行为的回报率的改变。因此，从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末期开始，我们找到了通过使用暴力降低使用暴力的回报率（充满矛盾性的一个说法）的方法。

在公元前10 000年之后，世界开始变暖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开始迅速繁衍。对大部分物种来说，一旦等着吃食的嘴的数量超过了食物供给量，它们就再度陷入了艰难的生活中。然而，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却通过文化上的演化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变成了农民。农耕有其代价，但同时也供养了多得多的人口。拥挤的人口产生了囚笼效应。对于黑猩猩来说（或许冰河时期的人类也是如此），其领地观念使得杀死竞争对手可以在死亡博弈中获得最高的回报。而随着囚笼效应的出现，人类可以通过将被击败的敌人融入更大的社会来取得更高的回报。“融合”是个苍白的词汇，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掺杂着大量的劫掠、强奸、奴役和迁移。不过，由于那些将自己转化为坐寇的征服者最终在竞争中胜出，所有这一切暴力行径的长期结果就是带来和平和更高水平的繁荣。

到公元前3500年，坐寇开始演变成真正的利维坦。它们有能力征收税款，并且惩罚那些拒不服从的子民。这一过程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区发端，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农耕开始的地方，从而使得这里的囚笼效应最为明显，竞争也最为激烈。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幸运纬度带的大部分地区都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的每个地区都经历了顺序相似的军事革命（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由于一些原因，尤其是没有马匹，使得美洲大陆的情

况有些不同）。首先出现的是防御工事，它用来应对突袭；相应地，进攻方学会了怎样围攻无法爬越的城墙。接着，在亚欧大陆，青铜制成了进攻用的武器和防御用的铠甲。然后出现的是军事纪律，它使得生性狂野的年轻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发动进攻，面对着残暴的敌人能坚守阵地。到了公元前1900年，亚欧大陆草原上的牧民们学会了用马具把马匹套在双轮战车上，从而为战场上带来了充满速度和流动性的兵种。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地区的战士们找到了反击的方法。不过，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军事策略转为使用铁制器具装备的大规模步兵作战，这些步兵征服了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帝国。

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是一场矛与盾的竞赛。不过，就像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那样，进化论者所说的红桃皇后效应并不适用于战争。参与竞赛的人们并不会留在原地，因为这场竞赛会改变参与其中的社会。每一次军事革命都要求利维坦变得更强大，而更强大的利维坦则可以进一步地降低暴力死亡率。

所谓的独特的西方战争方式的理论也不适用。这种理论认为，希腊人在古时候发明出了一种战争方式，使得欧洲的战士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士都更善战。实际上，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民族都发明出了建设性的战争，而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了更强大、更安全、更富足的利维坦。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人们创造出了辉煌的长安、巴连弗邑、特奥蒂瓦坎和罗马城。

不过，本书中的另一个主题是，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充满矛盾的。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里，亚欧大陆的建设性的战争达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顶点”。达到“顶点”之后，那些此前带来成功的行为转而开始酿造灾难。古代帝国的扩张使得它们不断地与草原带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草原上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骑手可以征服遥远的距离，几乎随心所欲地袭击帝国。而缔造了帝国的步兵大军却难以在荒芜的草原上生存。从中国到欧洲，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在超过1 000年的时间里（大约从200～1400年），幸运纬度带和草原陷入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可怕循环之中。每一次建设性的战争都会创造出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的社会，而每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都会让这些社会再度分崩离析。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暴力死亡率开始攀升，繁荣的景象破灭。

在不久的将来，体质人类学家就将能完成足够多的骨骼研究，从而得出暴力死亡率的精确数字。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只能依靠在本书第一到三章中检视过的粗略证据。如果要研究史前时期，我们可以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与之相类比，并佐以数量很少，但在不断增加中的遗骸证据。如果要研究古代帝国和草原大迁徙时期的情况，我们就只能依赖于当时的文字记载。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些文字记载基本可以让我们确信，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国时期下降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随后又在200年左右升高了（第三章）。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暴力死亡率究竟下降或是上升了多少。

根据我的估算，古代帝国时期的暴力死亡率为2%～5%，而到了封建的无政府时代，暴力死亡率又攀升到5%～10%。当然，随着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我的估算肯定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学术进步的途径：先由一个研究者做出推测，再由别的研究者驳倒他的推测，并给出更好的推测。即便我的这次推测谬以千里，但至少我希望此举能够刺激其他研究者搜集更好的收据，采用更好的方法，然后指出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反驳我的推测。

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中叶，我们获得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此时，利维坦，尤其是欧洲的利维坦，用火器封闭了草原民族驰骋的道路，用远洋船只打通了航路，从而使利维坦获得了重生。这两项发明都源于东亚，却在西欧得到了优化，并在这里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发生这一切的原因仍然不是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方式，而是地理因素。一方面，欧洲的政治地理状况（由许多个征战不休的小王国组成）使得能造出性能更优良的火器的国家在争斗中获益；另外一方面，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距离美洲的距离仅为东亚到美洲距离的一半）使得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并从中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欧洲人之所以能展开对整个世界的500年战争，并不是因为欧洲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充满活力（或是更邪恶），而是因为地理环境使他们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这点。

500年战争迫使欧洲人重新定义了建设性的战争，因为他们的征服战争造就了太过庞大的社会，从而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他们发现，在一个洲际帝国的时代，大部分的新增国家财富并不来自于劫掠，甚至也不来自于从子民身上压榨出来的税金。借助国家的力量，使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自由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市场中进行贸易，才是带来最多财富的方法。

始于欧洲西北部的永不停息的竞争迫使这些利维坦采取了开放秩序，从而使得市场之“看不见的手”与政府之“看不见的拳”和谐地协作。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随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警察”。英国的舰队、财富和外交官们监管着全世界的秩序。然而，尽管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新低，繁荣程度攀升到了新高，但“世界警察”也有其“顶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英国带来了诸多对手，进而使得英国无力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职责。从1914年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多场战争把英国赶下了“世界警察”的宝座，一直到75年之后才由美国接替了它的位置。此时的美国，统领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秩序，创造出了更低的暴力死亡率和更多的财富。

以上是一个宏观的故事。要想看到这样的趋势，就必须如我在本书前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整个人类的历史，并且从全部4个角度去审视历史（个人、军事史、技术以及进化）。在我看来，通过这样的宏观叙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当

然也会看到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战争有什么好处”的答案，既充满矛盾，又那么骇人听闻。战争的好处是让人类更安全、更富裕，然而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却是大规模的杀戮。但既然战争确实有其好处，我们就不能说战争中的苦难和死亡都毫无意义。再看看图7–1和7–2吧，如果从贫穷、暴力的石器时代进步到和平而繁荣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选择的话，我确信很少有人会愿意选择战争作为其途径。但实现进化——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真谛——的驱动力并非我们的意愿，而是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

如果看看这套逻辑从冰河时期的结尾到今天都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那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似乎也很清楚了。我们从由采集者组成的团体，演变成了利维坦，再演变到了“世界警察”；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应该是组成一个世界政府，将暴力的回报率压制到零，所有国家都应该达到丹麦的水平。在经历了本书描述的血腥恐怖之后，人类最终将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仿佛诺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我在第五章的开头部分提及过此书）的结尾。当这本书于1910年面世时，整个世界已经有95年没有发生大国战争了。在这段时期，全球总收入翻了一番，而凶杀率至少在欧洲下降了一半。因此，安吉尔和他的拥趸们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事实并非如此，但《大幻想》仍然值得一读。这是因为，安吉尔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同样适用于今天。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过的那样，19世纪世界各国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扮演得越好，它的对手就会越多；而它的对手越多，“世界警察”就越难尽好它的职责。图7–2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正在重演。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巨人对世界的掌控要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英国更加彻底，但美国似乎在重走英国的老路。美国把全球秩序维持得越好，其潜在的对手就变得越富有、越强大。未知的未知因素在激增，赌徒们已经跃跃欲试。我们越是朝着丹麦的方向迈进，这个目标就似乎离我们越远。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时，一个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人给我讲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描述这个地区的居民有多么固执。笑话说，有一个游客（通常会说是来自纽约的游客）在神秘的马萨诸塞州（或者是缅因州）迷路了。在开车兜了一个小时的圈子之后，他决定停下来问问路。他找到了一位面容枯槁的当地人。这个当地人一会儿想出来一条可行的路线，但随后又自己否定了它，如是反复了许多遍。最后，这个当地人疲惫地摇了摇头，说：“你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这种建议无疑毫无帮助。然而，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图7–2与第五章开头的那些图表有多么相似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比起安吉尔乐观的解读，这个笑话中的说法更贴近世界的现实。或许我们没有面对着红桃皇后效应，但我们可能面对着龟兔赛跑的效应。人类跑得很快，因此确实有所进步：暴力死亡率下降了，繁荣水平提升了。然而，我们

尽管不断地在接近丹麦，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那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儿就根本到不了那儿。兔子拼命地向前跑，但乌龟却总是领先那么一点点儿，创造出新的对手、新的未知的未知因素或者甚至创造出新的钢铁风暴。根本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安吉尔的皆大欢喜，还是新英格兰人令人不悦的结尾，这两者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安吉尔的观点（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在100年前是错的，在今天仍然是错的；而新英格兰人所说的“我们从这儿到不了那儿”也是错误的。

我们似乎在走向最糟糕的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要比上一个“世界警察”衰落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武器要比20世纪40～80年代美苏以毁灭相要挟时的武器更加致命。尽管暴力死亡率在过去的40年中稳步下滑，尽管世界大战看起来在21世纪10年代的中段不可能打起来，但未来的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40年。

不过，如果我们能退后一步，远离细节，用我们在第一到六章中审视长期的暴力史的眼光去审视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就会注意到不一样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从这个更宏大的角度看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儿到那儿”，即便这个“那儿”并非是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终点。

金星与火星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会定期出版一本名叫“国防计划指导”的小册子，以此总结归纳官方的国家大战略。大部分时候，这本小册子中都是些乏味的文件。然而，就在1992年2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仅仅两个月，负责起草新的《国防计划指导》的委员会却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它讲了实话。

这本指导手册指导美国如何做好“世界警察”。文件中说，尽管美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纠正世界上的所有错误，但我们有责任有选择性地去纠正那些不仅威胁我们的自身利益，也威胁我们的盟国和友邦的利益的错误，或是可能严重危害国际关系的错误”。这意味着美国要完成一项壮举：

>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阻止可能像苏联一样带来威胁的新的对手的出现，不论这个对手是崛起于苏联的领土之上，或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阻止任何敌对势力控制重要的区域。我们所说的重要的区域，指的是某个区域的资源，在牢固的控制之

下，足以供给一个新的全球霸权的崛起。这样的区域包括西欧、东亚、苏联领土以及亚洲西南部。

这份文件一落入媒体之手，就迅速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日后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Joe Biden）批评说，这份文件“就是要创造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而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国防部在遭受抨击之后，在其最终版的文件中说得含蓄了一些。但不论美国国防部选择了怎样的措辞，美国在过去20多年中所苦苦追寻的，正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其中有一些年头里，乔·拜登本人就在白宫里服务）。

如果政治家们要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之中汲取些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也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可以持续几十年。总体来看，美国从1989年以来的经历与英国在19世纪晚期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即便偶有的例外也能证明规律的存在。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无疑是西欧，这一地区也是1992年计划制订者关注的4个潜在的问题地区中的第一个。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充当“世界警察”的两个时期，西欧地区经历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在19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在由英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随后富有而强大的德国就在19世纪90年代成了英国最致命的对手。到了20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再次在由美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而很多政治家（其中的欧洲政治家要比美国政治家更多）开始担心重新获得统一的德国会继续重走老路。（“人们说，‘如果德国的情况不好，那可真是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法国官员半开玩笑地说，“我倒是要说，这有什么糟糕的？要知道，一旦德国的情况好了，他们通常就会在6个月之后进军香榭丽舍大道了。”）

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西欧国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它们的选择不仅使得美国全球霸权和英国全球霸权之间的相似性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更对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发起了挑战。西欧国家远没有变成“世界警察”的对手，反而几乎彻底不再把武力当作一种政策工具。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大量的人口——迄今为止大约有5亿人——走到了一起，开始组成一个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社会，却没有诉诸武力，这可是历史上的头一回。

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同时也是一次静悄悄的转变。我们如果把英国算作西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地区度过了人生的前27年，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的进行。说实在的，电视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布鲁塞尔的那些官员又发表了一项什么声明（净是关于什么他们允许我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应当使用多大型号的容器来盛放）能让我更快地把电视机关上了。

但我和上百万与我一样对欧洲事务缺乏兴趣的人一样，都大错特错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在1993年更名前的名称）最大的特点就是乏

味。旧时的利维坦使用暴力造就政治上的统一，随后使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暴力）缔造经济上的统一；然而，今天的西欧却把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式颠倒了过来。这些无人歌颂的英雄们通过一次接着一次的委员会会议编织了一张规则和规章的大网，将其成员国整合进同一个经济单元中，再使用经济的力量创造一个政治单元。“我们的终极目标，”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前领导人在1994年说道，“是一个政治目标……我们要以某种形式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一个联邦也好、一个国家联合体也罢，哪怕只是联系更紧密一些的国家联盟。”这样一来，“经济上的联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既是有史以来政治家们做出的最笨的尝试，同时也是最勇敢的尝试。不过，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于1992年以来，这个体系在过去的15年中似乎一直在运转着。欧洲依然由独立的国家拼凑而成，但从爱尔兰到爱沙尼亚，大多数欧洲人共同使用着同一种货币和同一家中央银行，接受着同一家欧洲法院和议会的裁决和统治，还可以自由地通过边境而不需要出示护照。至少直到2010年，这种基于共识的乏味道路似乎正在将欧洲从这儿带到那儿。

不过，就在当下，采用欧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国家陷入了一场债务危机之中（更准确地说，是生产效率较高的北方国家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南方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并且因此暴露出这种基于条约组建的联盟的局限性。老式的利维坦可以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例如，在1850年，英国就曾经派遣炮艇逼迫希腊偿还债务。然而，在新的欧洲，德国就不可能为了重塑财政纪律而把坦克开上雅典街头。

欧盟完全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使用军事力量这“看不见的拳”保障其规则的实施。这样一来，欧盟就似乎游走在深渊的边缘了。2011年年末，瑞士的瑞银集团公开表示担忧，担心这场危机最后会沦落到用武力解决的境地。瑞银集团的分析师表示：“几乎所有现代法币货币联盟的崩溃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威权政府或军政府的出现，甚至爆发内战。”这样的前景的确令人担忧。不过，到本书写作的时候（2013年年中），尽管欧盟的政策饱受批评（它们采取的措施仅限于让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不至于崩溃，但也仅止于此），但似乎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希腊尽管经历了失业率飙升、街头暴力示威，乃至政治危机，但是这个国家仍然留在欧元区之内。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尽管都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但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垮掉。与其说这次危机会拆散欧洲，还不如说这是一次进一步推动政治集权的机遇。或许，欧洲的管理者们不需要杀死任何人，就可以完成拿破仑和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也没能完成的任务。

有鉴于此，诺贝尔委员会将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欧洲联盟。这可谓实至名归：欧盟公民之间的凶杀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欧盟各国政府都取消了死刑；欧盟完全弃绝了内部的战争，并且基本上弃绝了对外的战争。欧盟以外的欧洲人有时还能看得到使用武力带来的好处，

就像俄罗斯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发动“五日战争”时那样。然而，在欧盟内部，几乎没人再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欧盟仍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但只有英国和法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权利，并且都是为了在以前的殖民地地区进行维和活动。即便当某些军事行动有着明确的人道主义目标时（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的行动），西欧国家的政府仍然会显得小心翼翼，以至于时常让它们的美国盟友感到恼火。或许，新的欧洲式战争的常态将是发生在2012年的那离奇的一幕：一架瑞典飞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上空空投了800只泰迪熊，每只泰迪熊上都带着一个写有“实行言论自由”的标语签；而白俄罗斯的应对方式仅仅是撤掉了负责边境巡逻和空军的将军。

2003年，民意调查机构发现，只有12%的法国人和12%的德国人认为战争在有的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55%。在2006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好战的美国人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今天，在重要的战略和国际事务方面，”战略家罗伯特·卡根表示，“我们可以说，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暴力问题上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引发了诸多评论，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欧洲人来自金星，正是因为美国人来自火星。如果没有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欧洲就不可能有采取鸽派战略的空间。但反过来说，如果欧洲人不采取鸽派战略，美国也无力充当“世界警察”。如果欧盟在过去的15年里表现得更加鹰派，那么美国的地位一定会在反制欧洲的过程中遭到削弱，就像100年前，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在对抗德国的过程中遭到了削弱一样。火星和金星，就像玛尔斯和维纳斯[2]一样需要彼此。

在1945～1989年，对西欧来说，参与死亡博弈的最佳方式，就是要为了帮助美国阻止苏联而显得足够好战，但又不能太过好战而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一平衡点的位置有分歧，因而导致法国在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不过，在1989年之后，欧洲不再面临任何严重的安全威胁，而且可以依赖美国出面惩戒任何鹰派国家。因此，西欧国家变得越加鸽派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到底哪个鹰派国家应当受到惩罚也有分歧，因此造成了2003年欧洲人的反美浪潮）。结果是，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府不同，美国政府从来不需要担心其创造的财富和安全环境会让欧洲国家在发展壮大之后，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

当然，欧洲的鸽派倾向并没有彻底结束外新月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彼此之间的冲突。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大战略一直都围绕着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并且阻止任何国家主宰欧洲大陆。“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勋爵在1848年说道，“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根据这一逻辑，他应当会理解英国为什么没有加入欧元区，为什么还要在2017年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决，并且为什么有时表现得不像其邻

国那样鸽派。

东欧人对于鸽派的态度也心存疑虑。东欧国家位于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地带之间，缺乏可以用于抵御强大的德国和俄罗斯的天然屏障。因此，东欧国家也觉得它们面对了几个世纪的那个老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解决。像英国一样，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不想过于依赖由德国主导的欧洲联盟，因而更多地倒向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然而，权力本身也是个充满矛盾性的东西。美国不希望它最好的朋友们与欧盟太过疏离，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打破美国需要的平静。

西欧并没有脱离死亡博弈。与此相反，西欧国家更富有技巧性地进行着这场博弈，依靠足以惩戒鹰派国家的“世界警察”享受作为鸽派国家的好处。对于欧洲联盟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并无异议；不过，诺贝尔委员会在2009年颁发给贝拉克·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更应该颁发给1945年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正是他们的集体努力使得欧洲的实验变得可能。

美国的布尔战争

如果说，在尽量避免制造出对手的这个任务上，美国在西欧地区的表现最好的话，那么其在亚洲西南部的表现可能是最差的。自从柏林墙倒掉之后，美国已经在亚洲西南部地区进行了3场战争（如果算上2012年对利比亚的空袭，就是4场战争）；而且，美国可能需要点儿运气才能避免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在这里进行第4场战争（或者是第5场）[3]。在这一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新旧两代世界警察所面对的问题格外相似。

实际上，在过去的100年中，亚洲西南部地区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麦金德的时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对世界警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两个国家影响着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之间的联络。从高加索山脉到兴都库什山脉，英国和俄国的探险家与间谍们角逐了几十年，这甚至被吉卜林称为“大博弈”。俄罗斯军队吞并了今天中亚的“斯坦”们[4]，而英国的红衫军也吞下了阿富汗，却消化不了。

把这场大博弈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因素，当然就是石油。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开凿。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都是石油生产的中心。然而，在1871年，亚洲西南部的石油开采开始了。不久，俄国开发者就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采出了这种黑色黄金。西方的石油商紧随其后。1901年，英国的一位投机商买下了波斯2/3的石油开采权。1933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发了第一处油田。为了满足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需求，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波斯湾沿岸地区每天靠石

油可以获得超过4亿美元的收入。

西方的报纸热衷于报道阿拉伯的百万富翁们又在什么地方买下了历史性的地标。不过，从表面看来，美国在塑造其所需的石油自由市场方面的成功，使得它不太有可能在亚洲西南部创造出一个敌手。在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孱弱、教育体系不完善、地区性的腐败成风，这些因素使得哪怕最富有的产油国也不太有可能完成工业革命，或是创造出多元化的现代经济。

正因如此，靠石油赚来的财富，并没有像“二战”后美国给予欧洲的援助资金那样掌握在广大的公民群体手中，而是大部分落入了极少一部分精英的手里；而这些统治精英的压迫、谎言和无能激发了愈来愈多的不满情绪。美国急于避免苏联集团染指其石油资源，结果不得不支持一些独裁者、军政府和专制君主。因此，美国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批评：美国正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人一样，操纵着一个非正式的帝国控制中东。

石油寡头们试图把人们的不满情绪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以色列的仇视。不过，在利用人们的满腔怒火使他们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还有对以色列的仇恨）服务方面，毛拉[5]和阿亚图拉[6]们做得更好。当时，很少有什么穆斯林将美国视作头号大敌，即便在伊朗人质危机[7]期间，一些美国人还寄希望于能与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合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时代》杂志曾经将霍梅尼评选为1979年的时代年度人物）。不过，革命者们很快就发现，如果要想打击美国的这些傀儡，就必须打击美国。就在1979年这一年结束之前，伊朗给美国贴上了大魔鬼的标签。

就在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试图控制住这个新近出现的愤怒的伊斯兰国家时，始料未及的后果接踵而至。在远离波斯湾石油产区的阿富汗，美国在支持阿富汗反抗苏联侵略（20世纪80年代）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赢得太多好感，反而制造出一支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阿拉伯圣战军团。这些人随时准备着对任何敌人发动圣战，并且在阿富汗结束了对抗苏联的战争之后，他们利用了战争留下的一片混乱，将阿富汗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0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之后，美国迅速将军队开进了海湾地区以保护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与革命后的伊朗开战，残酷镇压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试图发展核武器。有鉴于此，美国的行动似乎应当赢得阿拉伯人的心。然而，穆斯林们看到的却是异教徒的军队踏上了阿拉伯的圣地，越来越多穆斯林开始怀疑美国人的动机。

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随后对伊拉克的严厉制裁阻止了伊拉克，使其不会成为《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所忧心的“亚洲西南部的敌手”。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中，美国的战略家们（乃至所有人）都将

惊讶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变化。所有能够改变穆斯林世界的力量——石油财富、对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反抗、阿富汗的圣战者、对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的憎恨、对以色列的永无止境的敌意——最终都汇聚到了一个人的手中：奥萨马·本·拉登。2002年，本·拉登给美国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

> 在你们的监督之下，那些充当你们的代理人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每天都在攻击我们……你们靠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威慑，用微不足道的价格窃取了我们的财富和石油，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盗窃……你们的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事基地布满了我们的国家；你们腐蚀了我们的土地，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安全侵犯了我们的圣洁。

此时，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已经以全体穆斯林的名义向美国宣战，并且杀害了3 000名美国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基地”组织就作为一种新型的对手出现在“世界警察”面前。从大多数角度来看，“基地”组织都比《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在1992年担心的那些国家要弱小。的确，如果“基地”组织或是其附属组织掌握了核武器，那么他们可能会杀死比“9·11”事件丧生人数多上千倍的人。然而，如果伊拉克或是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它们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些亚洲西南部国家的政府拥有税收收入，并且有足够的空间隐藏上百颗核弹头。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就可以制造出能够将死亡威胁远播到欧洲的导弹。假以时日，如果这些国家再找到合适的盟友，地球上就将不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相反，除非“基地”组织能找到某个国家作为后台，否则它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它们也永远无法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和美国威胁英国的地位那样，威胁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

不过，“基地”组织确实代表了另外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19世纪晚期由英国主宰的世界体系中也曾出现过。像现在一样，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当时也是很流行的对付“世界警察”的方式。早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都曾经享受过一段黄金时代，他们曾经用子弹和炸弹夺走过沙皇和总统的性命。被英国人称作“疯狂的马赫迪”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曾经在苏丹创立了类似“基地”组织的机构。1883年，马赫迪的追随者将一位英国指挥官率领的一支万余人的埃及军队屠戮殆尽。第二年，他们占领了喀土穆，并且杀死了另一名英国将军。英国人一直到1899年才推翻苏丹的伊斯兰统治，并且在苏丹驻军到1956年。

本·拉登与“疯狂的马赫迪”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比后者危险得多，因为他有着成熟的计划。本·拉登清楚，“基地”组织不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因此他选择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间接方案。第一步，

是要用暴力推翻任意一个在他看来不够伊斯兰化的政权（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这些政权被“基地”组织称作“近敌”），继而建成一个由虔诚的信徒组成的哈里发国家。第二步，要让美国（“远敌”）陷入其既打不起，又无法理解的战争中，直到美国精疲力竭地决定不再支持那些非伊斯兰化的政权。“到那个时候，”“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解释道，“历史就将发生一次新的转折，真主保佑，历史将抛弃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政府主宰的世界。”

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历史并没有发生这次转折。“基地”组织并没有能推翻任何一个“近敌”。相反，由于被“基地”组织杀死的阿拉伯人远远多于美国人，“基地”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恐惧和憎恨。“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或许能够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动荡局势中获益，但那些本·拉登起事前就已经建立起伊斯兰统治的国家（阿富汗、苏丹和索马里），却又抛弃了伊斯兰统治；与此同时，那些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施加以强大压力的国家（阿尔及利亚、马里、也门和巴基斯坦）仍然安然地矗立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富含石油资源的海湾之外。只有巴基斯坦，由于其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对全球秩序构成真正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这一地区事务方面的前任特别顾问经常说：“阿富汗的稳定不是必需的，但巴基斯坦的稳定是必需的。”）。

为了遏制“基地”组织对“近敌”的战争，美国采取了这样的大战略：通过推动民主化改革打消伊斯兰主义者诉求的吸引力。小布什总统曾经说：“我们要把消息传递到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的广大地区，告诉他们自由可以是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选择。”“在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他坚称，“将是全球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虽然仍有争议，但2011年以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专制统治的倒台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正确性。不过，就像布什本人意识到的那样：“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中东地区的代议制政府将会体现出它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摆脱了独裁统治的阿拉伯选民经常会把选票投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但直到本书写作时，此事带来的后果仍然不明确。埃及军队在2011年抛弃了独裁者，但又在两年之后推翻了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总统。在利比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推翻卡扎菲统治的内战中站住了脚，利用他们从卡扎菲政权夺取的武器，把圣战传播到了马里。而叙利亚，像以前的索马里和黎巴嫩一样，变成了一块军阀纷争的土地，其中一些军阀就像“基地”组织一样热衷暴力。总的来说，经历“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地区确实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迹象，但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伊斯兰化的、贫困的，统治水平低下，而且他们不相信美国人，更加不相信以色列人。对于这样的现状，布什和拉登谁会更不高兴，真的很难说。

“基地”组织的计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让美国陷入各种各样的毁灭性的战争，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广大的伊斯兰内新月地带。现在看来，这部分计划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拉登已经预料到了，由于“基地”组织在2001年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美国必然会选择入侵阿富汗将他彻底

清除掉。这样一来，美国就陷入了其有史以来参加过的最漫长的一场战争之中。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了对伊拉克的入侵，这很难算作是对“9·11”事件的直接回应，但美国进军巴格达这样的事件，恰恰是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过度反应。

不过，本·拉登认为分身乏术的美国要么走向破产，要么选择从亚洲西南部脱身。他的这一判断失误是灾难性的。美国并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而是坚持了下来，杀掉了本·拉登，并且基本完成了“分裂、瓦解、消灭‘基地’组织”（贝拉克·奥巴马对这一目标的描述）的任务。不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美国被迫要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所面对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所面对的战争局势，与布尔战争非常类似。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之间发生了布尔战争。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旨在消除未来的威胁。在1899年和2003年，批评家都将战争罪责归咎于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商人组成的卑鄙联盟，他们都是因为觊觎某种自然资源——南非的黄金和钻石、伊拉克的石油，才发动了战争。然而，将英美这两个“世界警察”带进战争的政客却经常视他们自己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保护那些被践踏的民族（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布尔战争中的非洲黑人）。但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更有理，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选择都让本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并且让昔日的盟友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战争的初始阶段。2003年，美国军队横扫了伊拉克军队，而在1899年，英国人却连战连败，他们错误地让士兵们排成密集的队列穿过开阔的地带，遭受火炮和来复枪的无情打击。然而，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参战的英军数量就已经足以将布尔人的军队击溃。然而，就像美国人在103年后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英国人发现他们的敌人逐渐分散消失，最后变成了各地的反抗军。

1900年时的英军和2003年的美军都是用来打常规战争的。起初，他们都发现对付反抗军不是件容易的事。英国军队需要在茫茫草原上追击一支支的小派遣队（布尔人将之称为“敢死队”）。“我们随时准备好听到这个命令‘上马！’”一名军官回忆道，“我们确实上了好多次马，但不论我们的动作多快，我们总是不够快。”在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心情差不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告诉新来的指挥官：“长官，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出去巡逻，直到碰到IED（简易爆炸装置，就是土制炸弹），然后我们就呼叫救伤直升机，之后我们再返回基地；第二天又是如此，如是反复。”

英军和美军都很快找到了应对之策。新的指挥官［英军的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和美军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分别找到了对付反抗军的策略，从而占据了上风。但两个“世界警察”为胜利都付出了代价，因为对付非正规军的最佳方法就是

采用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说的“黑暗的手段”，而这样的行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盟国都不会受到欢迎。

美国开始暗中监视本国公民，无限期地羁押囚犯，并且不承认他们有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权利。美国折磨了一些战俘，把另外一些俘虏送到了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在放弃这些手段之后，美国采用遥控飞机进行定点打击的做法又遭到了反对。不过，比起英国人在南非人身上使用的手段，美国人的手段完全不能算是“黑暗”了。基钦纳焚毁了上千座农场，杀死反抗者的牛，把他们的家人驱赶到集中营里去。差不多有1/4的被羁押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死于疾病和饥饿。

总体来看，尽管也有一些失误，但美国应对其“布尔战争”的方式要比英国人好得多。美国人流了更少的血，花了更少的钱，造成的创伤也更少。大约有150万美军士兵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丧生；英国人派到南非去的军队人数与美国人相仿，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22　000人（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在美军占领期间，差不多每300个伊拉克平民中有1个死于暴力，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派系斗争中死于其他伊拉克人和外国激进分子之手；而英军占领期间的暴力死亡率要高出9倍，布尔战争中每30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暴力。美国人所付出的军费，连贷款利息也算入其中的话，一共是大约2.4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2011年GDP的1/6；而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耗费了2 11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1902年GDP的1/3。

最终，英国和美国都赢得了它们的布尔战争，但为了取得所谓胜利，英美都不得不降低了胜利的意义。在英国人的逼迫下，南非战前的领袖保罗·克鲁格尔（Paul　Kruger）被迫流亡海外，但保罗·克鲁格尔在战争爆发前要求的大部分权利，战后的南非政府基本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而且这个政府的统治者仍然是战争时的反抗者们。与此相似，美国推翻了萨达姆，结果伊拉克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反而与反抗军和伊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看起来，在内新月地带资源丰富的地区，“世界警察”要想陷入一场布尔战争式的战争很容易，但要想从中脱身则既困难又昂贵，还会造成内部的分裂。如果“世界警察”决心已定，那么它几乎肯定能打赢布尔战争；而如果一个世界警察总是去打布尔战争，那么它恐怕也不会在世界警察的这个位子上坐太久了。

英国从中吸取了以上教训，因此尽量避免再发生布尔战争式的战争。至于美国是否会追随英国的脚步，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从积极方面看，“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总体上处于衰退期，美国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依赖度也在下降（由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美国本土石油产量的激增，美国在2014年的能源进口量应该是1987年之后最低的）。不过，从消息方面看，阿富汗战争的结局似乎比伊拉克战争更令人失望，“阿拉伯之春”则导致了经济崩溃和美国信誉度的下降（尤其是在2013年9月，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之后）。此外，伊朗距离

掌握核武器只有咫尺之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在伊拉克战争情况最糟的时候警告：“（伊朗获得核武器）将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梦魇。”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厉的制裁、暗杀科学家，以及发动网络攻击。这些措施迫使伊朗坐到了谈判桌前，但是伊朗人已经取得的核技术方面的进展是无法再倒退的。

如果伊朗给导弹装上了可以进行实战的核弹头，那么它将面临与以色列，甚至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过，伊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因为在全世界知道伊朗能在短时间内部署核武器之后，它大可以借此威慑它的邻国。美国和亚洲西南部的国家可能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一局面，就像美国和东北亚国家已经学会适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一样。不过，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这会促使伊朗那些富有的邻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迫不及待地要在核武器的发展上达到与伊朗相近的水平。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以色列和（或）美国可能就会觉得有必要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一场胜过所有布尔战争的战争。因为，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也比在整个中东进行一场核战争的前景要好得多。

目前，亚洲西南部消耗了美国国防预算的差不多1/6。即便美国能成功地避免在这一地区再进行一场布尔战争，鉴于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朗核计划的持续威胁，以及这一地区石油资源的重要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防开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缩减。如果亚洲西南部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军事重心，那么这种程度的开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未来10年的种种不确定性之中，这个假设的前提的不确定性或许是最高的。

不可避免的类比

“在预测我们下一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地点方面，我们有着完美的纪录，”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对西点军校的学生们说，“我们一次都没猜对过。”

但军方的努力从来都不曾停止。不管怎么说，方案还是要制订的，武器系统也还是要采购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消失和许多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消弭，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世界上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了。2001年之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似乎证实了这种判断。从现在起，美国人似乎只需要应对反抗军的战斗了。

正因如此，当我在2012年初有机会造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时[8]，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仿造的中东村庄之中，其中到处是清真寺和讲阿拉伯语的演员。我和一些人在一个尚未完工、烈风阵阵的屋顶上观看一场演习。演习中，一支部队正要将一些“阿

富汗长老”护送到一处会议现场，而假扮的恐怖分子将在街巷中发动伏击。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个垃圾桶中的炸弹爆炸了。狙击手们从窗口和小山坡上开火。一辆悍马车坏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处。整个现场十分喧嚣，尘土飞扬，一片混乱（见图7–3）。不过，这支护送队还是设法杀出了一条血路。



图7–3 真正的战争游戏：**201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一处仿造的中东村庄里，看上去一切都乱了套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图片。

坐落在莫哈韦沙漠中的欧文堡面积有罗得岛州那么大。美军士兵在被派遣到海外之前，欧文堡是他们要去的最后一处训练基地。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里的情况就能体现出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的设想。如果我在这个训练中心刚刚开办的20世纪80年代造访，我就会看到数百辆坦克远距离对射、战斗机漫天飞舞以及步兵营对中欧城镇的仿造物发动进攻。但在2005年，这一切都变了样，因为美军对应对反抗军的重视程度更高了。所有的仿造楼房都被推倒了，只留了一座仿造的小镇纪念。在那些仿造楼房曾经矗立的地方，我所看到的那些清真寺尖塔和伊斯兰学校拔地而起。

如果我以后再有机会造访，莫哈韦沙漠中的场景或许会再次发生变化。当世界警察足以压制任何敌手时，战争的形式就会是镇压反抗军。不过，美国军队正在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形还会持续多久呢？要盼望最好的情况，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训练中心正在把坦克弄回来。仿造的中东场景将变成各种各样的场景，从闪电战式的突破，到对付歹徒的枪战。新的场景可以用来演绎从叙利亚到韩国的各个地点。不争的事实是，美军又一次把大战提上了训练日程。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在亚洲西南部付出了诸多努力。然而，有一个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阻止战略性敌手崛起的能力衰减的最厉害

的地方实际上是东亚。在亚洲大陆的外新月地带——从日本到雅加达的一系列岛链——总体情况良好。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外新月地带的发展很像西欧地区。日本，就像联邦德国一样，在1945年进行了非军事化，并被军事占领，随后又部分地重新军事化，并且在美国的监督下被接纳进了世界市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经济巨人。不过，即便在日本经济速度超过联邦德国、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达到惊人高度的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什么人认为美国把日本变成了它的敌手。

然而，东亚的内新月地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不仅控制着上千英里的内新月地带的海岸线，还拥有一部分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土地。如果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打赢任何一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将与中国相似。2000年以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然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使得中国需要通过外新月地带进口自然资源、出口制成品。每年，有价值5万亿美元的商品穿越中国南海，这不仅使得马六甲海峡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使得诸如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这样的小礁石也充满了战略意义。

当毛泽东于1949年掌权时，外新月地带的世界警察们似乎用足以遏制中国经济的岛链包围了中国。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下一剂猛药。在他执政的前5年，他派遣了上百万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威胁要进攻台湾，希望借此打破世界警察的封锁。不过，美国的核威慑迫使毛泽东选择了退让。接着，他决定无视地缘政治，转而全凭意志力来实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上的大跃进。结果，他命令农民们大炼钢铁，最终导致大面积饥荒。毛泽东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号召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打破一切旧的事物（包括经济）。“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带来了灾难。

到了1972年，情况已经很糟，毛泽东感到他必须释放出开放的信号，以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内进行改变。此前，理查德·尼克松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反共头子，他曾试图拉近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共同对抗苏联。而现在，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邀请尼克松来北京。“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尼克松不无夸张地宣称。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比较开明的领导人真正掌握了政权。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持续数十载的年均8%的经济增长来避免更可怕的饥荒的发生。于是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了大门。既然中国无法靠武力冲破岛链，经济上的开放可以改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好处。在20世纪90年代，有1.5亿农民离开了贫困的内陆地区，来到了沿海的工厂工作，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芝加哥的城市人口。农民迁徙到城市之后，其收入平均会增长50%；与此同时，由于新增的城市人口也需要食物，那些仍然务农并且向城市出售食物的农民也可以获得每年6%的收入增长。到2006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是1976年的10倍。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2006年，中国的道路上每天要新增14 000辆汽车，铺设的新路则接近53 000英里。据官方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再新增4亿城市人口。为了容纳这些新增城市人口，中国将要建设的房屋总量是世界上目前正在兴建的房屋总量的一半还多。在1976～2006年，中国占世界经济产量的比例增加了2倍还多，从4.5%上升到了15.4%。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占比则出现了下滑。尽管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占全球GDP的19.5%），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世界警察”现在有了一个对手。

美国之所以让中国成为其对手，其中的原因与19世纪晚期英国让德国和美国成为其对手的原因是一样的：“世界警察”本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件极大的好事。由于来自中国的商品非常便宜，大多数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便他们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中国通过购买高达1万亿美元价值的美国国债，实际上又把它赚得的利润借给了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人就总是有钱继续购买中国的商品。最后，中国的廉价商品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又可以抵消廉价的中国信贷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人大喜过望。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互惠的“世界警察”和它的亚洲朋友称作“中美国”（“Chimenia”）——中国和美国的联合。不过，这个词语真正的巧妙之处在于，“中美国”本身也是一头奇美拉怪兽。整个世界终将从这场迷梦中醒来。无论是在经济学家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每一种行为都有其“顶点”。而一旦越过了这一顶点，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势就会发生变化，反作用力会接踵而至”。

在2004年，趋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年，《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宣称“中国价格”已经变成了“美国工业社会最可怕的两个词之一”。2008年，随着经济规律再次发作、西方世界的资产泡沫破裂，这一变化完成了。到2009年4月，当这次大滑坡还未见底时，世界二十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就聚集在伦敦，起草出一个应对方案。东道主英国的一位与会人士表示，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整个会议期间非常流行的一则笑话能够成真：“过去，资本主义挽救了中国；今后，中国则挽救了资本主义。”

有句谚语说，当心你在祈求什么，因为它没准会成真。对美国的外交人员和工业家来说，中国参与拯救资本主义的任务之中，使得“中国价格”成了最可怕的两个词之一。中国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体量正把西太平洋地区吸引向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就在2009年，韩国、日本都主动向北京示好。缠绕中国的岛链即将断裂。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前景究竟对“世界警察”意味着什么。中国告诉我们，这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从2004年开始，中国就一直

用“和平崛起”描述自己日益提高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坚称，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体系，而是要参与这个体系，并且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为了避免“和平崛起”这个字眼仍显张扬，中国政府又在2008年更进一步，把这个说法换成了“和平发展”。中国的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之中。中国不愿意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而更愿意以德服人，因为合作可以让大家都过得更好。

美国也曾屡屡对自身的政策做出类似的解读。早在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宣称，美国要通过“以身作则的仁爱与同情心”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过，尽管说得动听，美国经常诉诸武力。实际上，纵观历史，巨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往往会伴随着可怕的暴力。15～19世纪的欧洲崛起带来了500年战争，1914～1945年经济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则引发了一场钢铁风暴。或许这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如果西太平洋地区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移动意味着这一地区将脱离美国的轨道的话，那么这可能会给“世界警察”带来致命的后果。

中国的领导人既不会是儒家思想推崇的圣人，也不会是像一些西方批评家指责的恶人。他们只会和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出现过的领导者们那样。但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到警觉。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必须进行这场死亡博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做得一直不错，这就意味着中国像所有成功者一样，在鸽派策略有效时就采取鸽派策略，而在鸽派策略无效时采取鹰派策略。中国并不会用孔子的思想代替麦金德的战略思想。用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话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

中国人意识到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外交上的孤立和战略上的弱势。因此，在毛泽东之后，整整一代中国人一面追求军事现代化，一面又避免发生冲突。在1989～2011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几乎增长了7倍，而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投入甚巨的美国人的军费开支只增长了1/4。[9]

用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的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之间，我们会做出“不可避免的类比”。不过，尽管这两个国家都为了将工业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投入了巨资，但中国花钱的方式要比德国更聪明。德国的威廉皇帝打造了一支战列舰舰队，明目张胆地挑战，而中国则用另一种聪明的方式挑战美国。

中国的投资大部分花在了潜艇、地雷和短程弹道导弹上。这些装备无法挑战美国在海洋上的霸权，但足以让中国的近海成为危险的区域。据中国的一位高级顾问说，北京“试图在太平洋西部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性武器就无法穿越黄海和东海”。中国可能距离成功很近了：2009年，兰德公司进行的战争推演表明，中国到2013年就将有能力赢得在台湾上空的制空权。

中国如果只需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就足以解决所有争端，并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不重要；而这并非现实。到2010

年，中国日渐壮大的实力已经惊动了它的一些邻国，使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巨人。很自然地，当鸽派政策不再奏效时，中国就变得更加鹰派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甚至印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峙活动。围绕着一个又一个无人定居的珊瑚礁，各国的飞机呼啸而过，护卫舰用高压水枪互相射击，渔民遭到抓捕。“中国已经做好钓鱼岛局势恶化的准备。”《环球时报》警告道。

在2011年年中，当环太平洋地区的各国政府都在审视它们的未来选择时，我有幸受邀到堪培拉参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次会议。[10]在澳大利亚看来，该国尤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2009年，当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衰退时，澳大利亚能幸免于此，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对煤炭和铁的巨大需求刺激了矿业和大宗商品的繁荣。到2011年，澳大利亚是富裕国家之中唯一一个实现连续20年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主任、退役少将彼得·艾比盖（Peter Abigail）的话说，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要在某一阶段做出一次抉择：是选择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还是选择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澳大利亚已经暗示了它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2009年公布的一份国防白皮书中写道，“美国的持续存在最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战略稳定。”但正如澳大利亚的记者们无情地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政府的想法根本就是一团浆糊：这份白皮书中先是宣称澳大利亚的安全伙伴有着最重要的位置，接着又开始讨论澳大利亚怎样才能继续赢得经济伙伴的青睐。

我参加的那次会议，旨在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其下一份国防白皮书之前理清这一团乱麻。会上的讨论开放而激烈，从战略的本质一直探讨到城市化和能源问题；而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却能分明感受到整个会议室中弥漫着一种苦恼的情绪。我们讨论的每一种选择似乎都弊大于利。与经济伙伴分道扬镳会毁掉澳大利亚。与安全伙伴分道扬镳会让澳大利亚无力对抗中国。即便澳大利亚神奇般地维持了现有的平衡，矿业的持续增长最终会扭曲其经济结构，进而毁掉澳大利亚。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离开堪培拉的时候，我比来的时候更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不过，就在幕后，更重要的对话正在进行中。起初，这些对话看上去更具有决定性：澳大利亚政府放弃了模棱两可的表态，宣称“澳大利亚与美国将协调双方的军事姿态，为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服务”。2011年11月，贝拉克·奥巴马飞往堪培拉。“不要怀疑，”他对澳大利亚国会说，“美国将在21世纪全力投入亚太地区……我们将调配一切所需的资源，来维持在这一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我们将遵守我们的承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类似的会谈在整个岛链带上进行着。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仿效澳大利亚，挺起了自己的腰杆。接着，是一系列的集体安全协议的签署，一些国家则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转向。

然而，这些新的确定性来得快，去得也快。2013年5月，澳大利亚

新的国防白皮书放弃了之前的强硬表态，并且大幅削减了军事开支。“如果说中国人会将之前的表态视作一块挑衅的红布的话，”位于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认为，“那么我们就难免将澳大利亚的新政策视同升起一面白旗。”一位新上任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对此表示，“美国的力量在衰减之中，领导亚太地区的任务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能力”。

或许，我在堪培拉感到困惑是很正常的。在西太平洋地区，未知的未知所组成的迷雾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浓厚，一切都是未知数。然而，这也是最重要的抉择将发生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应对出现失误，”一位华盛顿的内幕人士坦承，“那将是未来30年内人们所能记住的唯一一件事。”

打破锁链

在应对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可能犯的最可怕的错误与一个世纪前英国对德国可能犯下的错误一样：与之开战。

在华盛顿的专家看来，最易于想象的引发军事冲突的情境，就是中国占据了钓鱼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或是其他类似的领土，并且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软弱反应会使得其盟友抛弃美国，从而打破岛链。然而，几乎没人认为这种情境会成真。2011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请一些专家就未来10年发生中美战争的可能性打分，分数范围从1分（不可能）到10分（肯定会发生）。没有一个专家给出高于5分的分数，平均分仅为2.4分。非专业人士也表示赞同。同一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只有2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作最大的国际威胁，而2009年时这一比例为40%，且当时中国得到的分数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朝鲜所得比例为18%。

之所以说这种“夺岛”情境的发生看起来可能性很低，是因为尽管中国军事实力在进步，但美国仍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中国采取攻势，美国人将采用所谓“空海一体战”对中国发动反击。美国有着完备的电子战方案，并将以此作为攻势的序幕，使中国的电网和金融陷入瘫痪，并使其卫星和监控系统失效，再干扰中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美国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可以在飞行数千英里之后依然保持打击偏差在5~10码之内，从而可以摧毁中国的军用跑道和地对空防御。无法被侦测到的隐形战机（B-2轰炸机、F-22战斗机乃至F-35）将深入内陆，摧毁导弹发射台。中国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丧失主动权。

北京的专家们似乎也认为夺岛是不明智的。实际上，他们认为真正的安全风险并非中国发动的进攻，而是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经将坦克推进到鸭绿江边，还两次威胁要对中国发

动核战争。200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发现美国“增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了美日军事联盟以及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改善了与越南的关系，引诱着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巩固了亲美政府，并且增加了对台湾的军售”，中国似乎在遭到围攻，“美国拓展了其前哨，并从东、南和西这三个方向对我们施压”。在某些人看来，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似乎会鼓励美国在仍然可能的时候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领先优势，无端地对崛起中的敌手发动打击，以此为自己再赢得一辈人的世界警察地位。

当然，这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世界警察，像现实生活中的警察一样，一旦对无辜者动粗就将蒙受巨大的名誉损失，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被打击的对象同时还是世界警察的债主的话（正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对其进行突然袭击就将是非常糟糕的主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像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一样，对外交和经济手段的依赖度与对军事的依赖度一样高。就算美国打赢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这场胜利对美国人的损害程度将几乎近于其对被打击对象的损害程度。

如果说有谁会从这样一场战争中获利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俄罗斯——在1992年《国防计划指导》的起草者心目中是第四有威胁的地区。在10年时间里，他们对俄罗斯复仇的担心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跌落了悬崖。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产值下滑了40%，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5%。1998年，俄罗斯政府债务违约。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2000年，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要低于他们的祖父母辈。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但是人们甚至不知道俄罗斯的导弹是否还能应用于实战。俄军在车臣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战争中，表现得很糟糕。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俄罗斯的人均GDP在2000～2012年增长了一倍。克里姆林宫宣布了一项耗资6 000亿美元的潜艇和导弹革新计划。在原有的苏联红军的基础上，俄罗斯人精选出了规模更小、更加灵活、可以执行出击任务的部队。俄罗斯的威胁程度依然远远低于苏联，而且如若其石油出口收入果真如世界银行所预料的那样从2015年开始下滑，其威胁程度可能会继续下降。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攻击姿态如果将中国推进俄罗斯的怀抱，那么这将是世界警察所能面对的最糟糕的情况。一个控制着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和一大片内新月地带的俄中联盟将是麦金德最大的梦魇。

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着松散的合作，联手阻挠美国在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和朝鲜问题上的一些方案。不过，中俄两国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对越南和印度的军售，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以及两国在矿物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的竞争——也使得两国的合作无法深化。美国如果在战场上击败中国，那么美国非但不能延长其世界警察的任期，还将使其越过其战略“顶点”，使得北京在除了倒向莫斯科之外别无选择。这正是美国一直试图避免的战略灾难。

即便如此，加上自2009年以来发生了诸多的小摩擦和政策转换，使用武力的代价对任何参与方来说都实在太过高昂了，而其所能带来的收益又极其低下。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会在21世纪10年代在东亚地区挑起大国之间的战争——就如同在19世纪70年代，当英国刚刚露出要失去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权的迹象时，人们也可能想象有哪个国家会在欧洲做出这样的事。直到40年之后，随着英国的经济增速持续低于其对手，英国的实力继续相对衰落，最终导致有人点燃了导火线。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类比是需要我们担心的。如果21世纪10～50年代的这40年如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那40年一样发展，那么我们将经历历史上最危险的阶段。

当然，历史并不一定会重演。在未来40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历史并不一定会重演。在未来40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增长可能会陷入停滞，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时那样。或者，美国经济可能会获得新的增长点，正在进行中的从页岩和沥青砂中获取天然气和石油的革命或许会其注入新的动力。通过这一充满希望的革命（也有人把这视作重大的威胁：环保主义人士公开谴责新兴的压裂技术），人们将可以从原本被视作毫无利用价值的源头获得大量的能源。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纳米技术和3D打印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让美国的生产力实现更加迅猛的增长。或许，如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的那样，美国将再一次挫败人们对它的抨击。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被毁掉了，结果美国不仅重整旗鼓，而且还在20世纪40年代打败了纳粹德国。20世纪70年代，又有些人开始唱衰美国，结果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击败了苏联人。或许，美国并不会陷入那场40年的循环，而是从21世纪10年代的颓势中复苏，并且在21世纪20年代胜过中国。

不过，从当前的趋势来看，上述的光明前景不太可能发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增长很可能会放慢，但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从2013年的9.5%下滑到2030年的4%，但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经济的年增速都不会高于2.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期要更加悲观，认为美国在21世纪20年代的年经济增速最高仅为2.25%；还有些金融分析师预计美国长期年均增速仅为1.0%～1.4%。

大部分人都预期中国经济将在2017～2027年超越美国［按照《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说法，这很可能会发生在2019年，并且几乎肯定会在2022年前发生］。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预计，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的GDP将比美国高出5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一数字将超过70%。他们还一致认为，印度经济到那时也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见表7–1）。

表7–1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

	2011年	2030年	2050年
美国	13.6	21.2	38.8
中国	10.8	33.3	66.2
印度	4.1	13.3	43.4

	2012年	2030年	2060年
美国	15.2	23.4	38.0
中国	11.3	30.6	53.9
印度	4.5	13.7	34.7

注：上半部分为普华永道对2011～205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GDP的预测（万亿美元，2011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下半部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2012～206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GDP的预测（万亿美元，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美国之所以能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中国（2012年时，大约是15万亿美元对12万亿美元），而且美国花费在军费上的比例更高。然而，这点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投入在1991～2001年增长了1倍还多，随后又在其后的10年中增长了2倍，但其增速很可能在21世纪10年代放缓。然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在减少。2013年3月，由于没有办法解决其高达16.7万亿美元的巨债（平均到每个纳税人身上是14.8万美元），美国政府只能选择全面削减预算。军事开支在2012年时还高达6 900亿美元，到2013年则削减到4 750亿美元；到2023年，按实际价值衡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将低于其2010年的水平。

中国还要花费几十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军事预算（两国在2012年差距为2 280亿美元）；而即便预算追上了美国的，美军在领先世界一个世纪之后所积累的士气、指挥控制和综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也不会迅速丧失。但这可能并非最重要的一点。英国的海军正面对抗中并不一定会输给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但英国早就在实际上失去了其“世界警察”的地位。如果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再足以供养一支可以迅速威慑任何国家的强大武装力量，那么美国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与英国一样的命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警告称，在21世纪10年代，“美国的基本战略诉求可能被迫发生重大转变……尽管这不会迅速削弱美国或其武装力量，但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已经足够危险”。

2010年，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警告：“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我们的债务问题。”然而，这一说法实际上在两个层面上轻视了美国的问题：首先，债务问题仅仅是美国相对经济衰落这一深层问题的表象（见图7–4）；其次，美国的经济问题不仅威胁其自身的安全，更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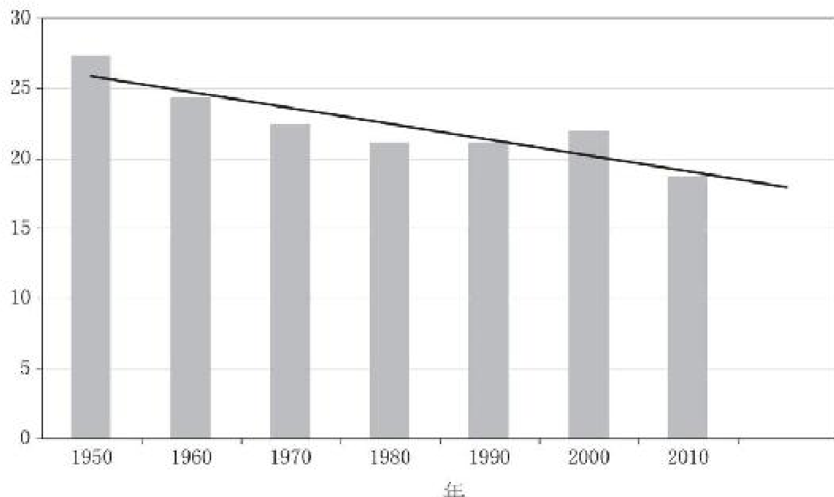


图7–4 下坡路：美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衰落—20世纪50~70年代的逐渐下滑，20世纪80~90年代的部分反弹，以及2000年以来的迅速下滑

如果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中的下行趋势再持续40年，美国将失去其作为“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经济支配权。像1900年前后的英国一样，美国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管辖区交给其盟友，从而使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对21世纪10年代乃至20年代的崛起中的国家来说，做出任何可能导致与美国开战的冒险举动都是愚蠢的。但到了21世纪30~40年代，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如果美国经济无法得到重振，那么21世纪50年代可能就会与20世纪10年代有许多的共同点，因为没人再确信“世界警察”仍然可以靠武力对付任何人了。

危险年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都会为新当选或连任成功的美国总统提供一份战略预见报告。[11]该委员会在2012年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中警告称：“我们正在深入未知水域。”他们认为，在21世纪10年代，真正的问题并非美国未能阻止新的对手的出现，《国防计划指导》的起草者们在20年前担忧的大国之间的政治摩擦可能仅仅是更大的不确定性的冰山一角。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在表面现象之下，是7个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未来10年内慢慢发生：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更多人掌握致命和毁灭性科技，经济实力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前所未有的范围广阔的老龄化、城市化、食物和水源压力，美国重新实现能源自给。这些趋势并非都不利于“世界警察”，但至少它们都让“世界警察”的职责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结构性变化之上，还有6个“可能改变局势的因素……即全球经济、治理、冲突、地区不稳定、技术和美国的角色”。这

些因素可能在任何时刻发挥作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改变地缘政治面貌。而浮在最上层的，是一群短期的“黑天鹅事件”：从流行性疾病，到可能使全球电力供应陷入瘫痪的太阳风暴，再到欧元的崩溃。

在1870～1914年这段不安宁的岁月里，自然有其独有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指出，我们今天还要额外面对一项全新的挑战：气候变化。从1750年到今天，人类已经排放了数以千亿吨计的二氧化碳，而其中有1/4是在2000～2010年之前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超过了百万分之四百，达到了8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从1910～2010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5华氏度，而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个年头都在1998年以后。

迄今为止，这一现象产生的影响还很小，但最坏的影响已经出现在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称作“不稳定弧形带”的地区（见图7–5）。这一新月形区域贫穷、干旱、政治动荡，但又通常拥有丰富的能源储量。从这一地区传出的消息通常都是坏消息。在近几十年中，浇灌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土地的幼发拉底河的水量减少了1/3，而其流域地区的地下水位在2006～2009年每年要下降1英尺。2013年，埃及甚至暗示说，如果埃塞俄比亚执意在尼罗河兴建大型水坝，埃及将不排除诉诸武力。极端气候将给这一弧形地带带来更多的干旱、粮食绝收及数以百万的背井离乡者。这些将诱发更多的布尔战争。

然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气候变化是个彻头彻尾的未知因素：科学家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报告称，“5年期全球气温平均数在过去的10年中保持不变”（见图7–5）。这或许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气温对碳水平变化的敏感度并没有气象学家们想得那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变暖的程度可能就会维持在预测值的低位，即在1985～2035年，全球气温仅仅会提高1华氏度。这也可能是坏消息，因为它可能意味着碳水平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想象得更不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气温有可能会在经历了2002～2012年的平台期之后迅速飙升。尽管很少有什么科学界的争论具有如此非凡的战略性意义，但美国的预算削减方案却迫使中央情报局在2012年底（也就是《2030年全球趋势》出版前不久）关闭了其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中心，而此举可能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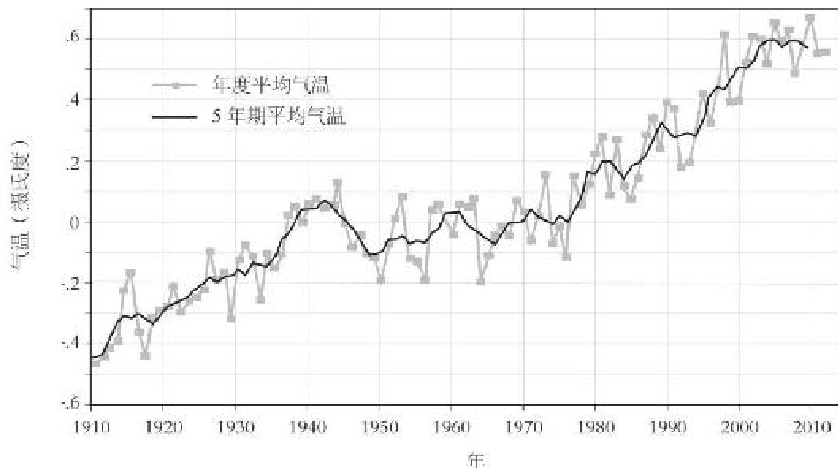


图7–5 战略性科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估算的**1910～2010**年的全球变暖趋势。灰线表示年度平均气温，黑线表示**5**年期平均气温。令许多科学家感到惊讶的是，黑线竟然在**2002**年之后趋于平直

不过，尽管有这些负面因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仍然对远至2030年（也就是该报告研究范围的截止点）的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世界警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但仍然可以胜任其职责；如此一来，尽管“大国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我们不认为……有任何紧张关系或双边冲突足以引发全面的大战”。不仅如此，大国摩擦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呈下降趋势。现在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已经不足以消灭全人类了：如果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发生一场交战双方都竭尽全力的核战争，那么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杀死几亿人。这一数字要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但要比彼得罗夫做出生死抉择的那一刻面临生命危险的人数（超过10亿人）少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的规模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许多大国都准备进一步削减核武器数量；2013年，美国由于资金原因停止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钚生产，从而使得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核武器的制造。

核弹头不仅在数量上减少，其爆炸威力也在减小。核弹技术已经有75年的历史了。在核弹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炸弹从飞机上丢下去如果能落在预定目标位置半英里以内，那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数百万吨级爆炸威力的核武器借助巨大的爆炸威力解决了瞄准问题：它可以直接夷平整座城市。但在今天，精确制导的武器可以将打击精度控制在几英尺之内，这就使得那些巨大而昂贵的氢弹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精准的低当量核弹头，甚至精确制导的常规炸弹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氢弹。

很重要的是，使精确制导炸弹成为可能的计算机技术也让我们拥有了可以投入实战的反导弹防御手段。这项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的防御系统还无法阻挡数百枚具有诱导和反制功能的导弹的猛烈袭击。不过，在1999年至今的16次试验中，美国的陆基中程防御系统拦截了半数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在2012年11月，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取得了更好

的成绩，面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速度更慢、距离更近的火箭弹，该系统拦截了90%的目标（见图7–6）。



图7–6 铁穹：2012年11月17日，以色列一枚反导弹导弹即将拦截一枚射向特拉维夫的火箭弹

资料来源：美联社图片/萨福里尔·阿巴约夫（Tsafrir Abayov）。

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战争的计算机化将会更进一步，并且将使得战争的血腥程度下降，至少在起步阶段会如此。20世纪80年代，当苏联试图镇压阿富汗反抗军时，苏联军队对阿富汗反抗军所在的村庄发动了地毯式的轰炸，造成上万人丧生。与之相反，从2002年开始，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操纵无人机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这些无人机[12]比其他可选武器的造价更低廉（顶级的MQ–9收割者的造价约为2 600万美元，而一架F–35战斗机的预计造价为2.35亿美元），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更少。无人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执行任务期间究竟造成了多少平民死亡，这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各方给出的估算从一两百到一两千不等。不过，即便是最高的估算数字，也要比使用其他手段达成目标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比如派遣特种部队或是动用常规空袭）。

截至2011年，空军无人机已经有过100万小时的现役飞行时间，仅在2011年当年就出击2 000次。通常，无人机会在疑似目标的15 000英尺上空盘旋，既不会被看到，也不会被听到。无人机最长可以盘旋3个星期之久。复杂的摄像头（其造价大约是MQ–1捕食者总造价的1/4）将记录下目标的一举一动，并将图像通过一系列卫星和中继站传送到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在基地中，有两名机组成员坐在虽狭小，但凉爽而舒适的控制室中（我有幸在2013年实地参观过[13]），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盯着发光的监视器，以了解嫌疑目标的“生活模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人机的任务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可能最终会发现嫌疑目标只是一个普通的阿富汗人，仅仅因为线人对他们不满，或是线人的警惕性太高而被错误地指定为目标。不过，如果摄像机真的记录下了一些可疑的行为，地面部队就会得到进行抓捕的命令。为了尽量避免发生枪战，抓捕通常在深夜进行。如果警觉的反抗分子听到了直升机或悍马军车的轰鸣而打算躲藏或是逃跑的话，无人机就会用红外线将他标记出来。这种标记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配备了夜视仪的部队可以借此很方便地进行抓捕。为了尽可能地躲避无人机的注意，圣战者的活动几乎都要瘫痪了。2012年，一份提供给马里叛军的建议书写道，他们应该“避免任何无线电通讯”，“避免在开放场所聚集”。这样一来，他们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行动。

在阿富汗，无人机成了对付叛军行动中的“耳目”，并且在大约1%的任务中还会成为“牙齿”。他们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空军机组成员在哪些情况下才能进行打击。当嫌疑目标进行明显带有敌意的活动时——比如在卡车的尾部架设迫击炮——远在内华达的飞行员只需扣一下操纵杆上的扳机，就可以发射一枚精确制导的“地狱火”导弹干掉他。（在巴基斯坦和也门，美国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参战，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地方有独立运行的秘密无人机项目。由于交战规则不同，且在这些地方没有太多地面部队可以动用，因此，他们可以比美国空军更频繁地使用导弹和炸弹进行打击。不过，在这里，从2010～2013年，平民的伤亡数字也大幅下降了。）

无人机是机器人技术应用的一个小小开端，它正在改变由人类直接参与的常规战争。这一技术的扩展并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快（在2003年，美国联合作战指挥部预测，“到2015～2025年……联军在战术层面上将基本实现机器人化”），但也不像其反对者预计的那么慢。“我很怀疑计算机是否有朝一日能聪明到执行所有的作战任务。”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在2006年说道。他进而预言说：“人们将只会使用机器去做那些简单、肮脏或是危险的工作。”

真实的情况会在这两种极端的设想之间。在过去的40年中，机器正逐渐接手那些节奏最快、技术复杂程度最高的作战任务；而在未来的40年中，这一趋势将会加速。目前，只有靠载人战机取得制空权之后，无人机才会被投入使用。这是因为，如果战争双方还在争夺制空权，行动缓慢的无人机面对敌方战斗机、地对空导弹或是信号屏蔽器的时候，就都只有坐以待毙的份儿了。坐在内华达的操作台前控制阿富汗上空的无人机，这感觉会很奇怪，有点儿像灵魂出窍（我在克里奇空军基地尝试控制过几分钟的模拟器），因为从你移动操纵杆到飞行器做出反应，其间大约有1.5秒的延迟（毕竟信号要通过中继站和卫星环绕地球）。如果有更好的传播技术，或者将飞行员布置在更接近飞行器的位置，可以缩短这一延迟；而考虑到光速也是有极限的，所以这一延迟不可能消失。在电影《壮志凌云》（*Top Gun*）里表现的那种顶尖空军的超音速搏杀中，每一毫秒都可能改变局势。因此，远程控制的飞机永远都无法与载人战斗机进行较量。

2009年发表的一份空军研究报告认为，解决延迟的方法是让战机组成混合编队，用一架载人机作为三架无人机的长机。每一架无人机都有其自己的目标（空对空格斗、压制地面火力、轰炸等），而长机则负责“监督一些决定的执行”。长机可以推翻无人机做出的决定，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系统将可以在无须人类介入的情况下，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作战决策和行动”。

无人战斗机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中。2013年7月，有一架无人战斗机甚至降落在航空母舰的跑道上（见图7–7），而这已经是（人类）海军飞行员从事的各项任务中最为困难的其中一项。空军认为，到21世纪40年代后期，“科技的进步将使得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步骤在几微秒甚至几纳秒之内完成”。不过，如果我们有一天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会冒出来：那为什么还要人类参与其中呢？



图**7–7** 许看不许摸！**2013**年，一架由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制造的**X–47B**无人隐形战斗机从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空呼啸而过。它随后成功在该舰上降落，从而成为史上第一架自行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无人机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图片。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显而易见：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机器。如果苏联人在1983年相信了彼得罗夫的程序，或许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今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在1988年，美国海军“文森尼斯”号倒是相信了他们的机器，结果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造成290名平民丧生。没人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已经没法理解微软的Windows （视窗）系统了，”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的一位研究员开玩笑说，“所以我们当然也没法理解像人类智慧一样复杂的程序。”他继而发问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东西，还将它武装起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十分显而易见：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联合国要求禁止研制和使用“致命自动化机器人”，全球范围的反对杀手机器人的活动也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但一旦到了21世纪50年代，当极超音速战机开始进行相互较量时，能在几纳秒之内完成OODA步骤的机器人无疑会击败反应速度在毫秒数量级的人类。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好辩论的了。在军事革命的历史上，人们总是会研制并使用新的武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敌人可能就会抢先这样做。

在前美国陆军中校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看来，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领域”，因为我们使用的武器已经变得“太快、太小、太多……并且共同构筑成了一个太过复杂的环境，使得人类没有能力指挥这些武器”。机器人技术“正在迅速地把我们引向一个我们并不想要的方向，但是我们很可能无力避免这一趋势”。（我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听过一则笑话：未来的空军将仅由一个人、一条狗和一台计算机组成。人的任务是喂狗，狗的任务则是阻止人接触计算机。）

按照现在的趋势，机器人可能会从21世纪40年代开始在战斗中替代人类。而且，大约就在那一时期，“世界警察”可能会逐渐失去对国际秩序的掌控。在20世纪10年代，正是“世界警察”的衰落与革命性的新型武器（无畏级战列舰、机枪、飞机、速射火炮、内燃机引擎）的组合终结了那个战争规模更小、血腥程度更低的世纪，并且开始了一场钢铁风暴。而我们将在21世纪40年代看到相似的组合再一次出现。

这一相似的组合是否会带来像20世纪10年代一样糟（甚至更糟）的后果，人们意见迥异。战略预测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给出了最具体，也是最大胆的预测。他认为，高度发达的太空情报体系将支配2050年的战争。在他看来，美国的实力将依赖于一系列大型空间站，这些空间站由数十个小卫星环绕并保卫着，就好像今天的航空母舰由驱逐舰和护卫舰保卫着一样。这些围绕地球作轨道运动的舰队将监管地球。它们会在必要时发射导弹打击目标，但更多的时候仅仅是搜集并分析数据，协调极超音速无人机群的行动，并指导地面战争。弗里德曼认为，在地面战场，“关键性的武器将是配备了装甲的步兵——被包裹在动力装甲之内的单兵……他就像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坦克，只是威力更加致命”。

21世纪中叶战争的焦点——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集中兵力”——将是旨在使太空舰队“失明”的电子战和运动战。接着，为机器人提供能量的电厂将遭到攻击。“电力，”弗里德曼认为，“对21世纪战争的意义，就相当于石油对20世纪战争的意义。”他预计，“战争将真的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但鉴于人们武器精度和速度上取得的技术进步，这时的战争将不会是一场总体战”。弗里德曼的意思是，在这样的战争中，平民将只能充当看客，焦急地看着经由机器人技术武装的战士们一决雌雄。一旦战争中的一方输掉了机器人战争，他们将迅速陷入绝望的境地，要么投降，要么死亡。战争到这时就会结束，既不会像彼得罗夫的年代那样可能造成数十亿人死亡，甚至也不会像希特勒的时代那样造成

上亿人死亡。按照弗里德曼的估算，这时的战争，很可能会造成50 000人死亡——仅仅比美国每年死于汽车事故的人多一点儿。

我很愿意相信这个相对光明的情境——谁不会呢？——但过去10 000年中的战争经验告诉我们，要让这一情境成真十分困难。当我在本书第二章中第一次提到军事革命时，我曾说，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大约在4 000年前，亚洲西南部的士兵们用马匹强化了他们自己。这些强化了的战士——双轮战车远胜过了那些依旧依靠自己的双脚的步兵，其带来的战争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像弗里德曼预计的结果。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旦战争一方输掉了战车大战，其步兵和平民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要么投降，要么死亡。

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新的强化方式出现了。在印度，骑在大象上的士兵主宰了战场。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大草原上的人们用高头大马强化了自己，从而涌现出骑兵这一兵种。在这两个时期，一旦战争爆发，步兵和平民通常也只能指望己方会在大象战或骑兵战中胜出，失败的那一方依然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与弗里德曼的设想不同了。无论是双轮战车、大象兵还是骑兵，都不会在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进攻，消灭掉对方的双轮战车、大象兵或骑兵，就立刻罢手。人们并不会在大战结束后冷静地计算利弊得失，让没有防御能力的步兵和平民与胜利方商讨投降事宜。战争，是无法羁绊的狂野暴力。当高科技的骑兵和大象兵的决战尘埃落定之时，失败的一方不论投降与否，通常要面对的命运都是被屠戮。双轮战车主宰战场的时代目睹了无数的惨剧；大象时代的战争是如此惨烈，以至于孔雀王国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拒绝再使用暴力；到了骑兵主宰世界的时代，从匈王阿提拉到成吉思汗，情况变得愈加糟糕。

所有的迹象——尤其是核武器时代的迹象——都表明，如果人类在21世纪中叶爆发大战，那么战争形势很可能不会像弗里德曼设想的那么乐观，而是更像以往的战争。政治学家保罗·布雷肯（Paul Bracken）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核时代。20世纪40～80年代美苏对峙的时期是第一核时代。那是一个可怕但又简单的时代，因为双方一旦开始核战争，必然造成共同毁灭。这反而创造出某种稳定的局面。与之相反，第二核时代在目前看来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保有的核弹头数量要比之前少得多，但第二核时代的形势却绝不简单。比起冷战时期，参与方更多，每一方的武力都更单薄，也没有什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可言。参与方不再受到共同毁灭局面的制约，因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话）都清楚，如果自己可以先发制人，就可以使其死敌丧失进行反击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反导弹防御和“世界警察”的实力仍然保障着秩序。但“世界警察”如果真的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失去其可信度，那么核武器数量的激增、军备竞赛，乃至先发制人的打击都可能会成为现实。

如果在21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发生大战，那么战争很可能不会局限于大国之间以对方的计算机系统、空间站和机器人为目标的高科技战争，而会是一场在南亚、亚洲西南部或者东亚地区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会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混乱、激烈，而且血腥程度要高得多。大规模的电子战、太空战、机器人战、化学战和核战将如同大刀一样砍向对方由数据防御和反导弹系统组成的铠甲。一旦这层铠甲破裂（而且它必将破裂），火焰、辐射和疾病的风暴就将席卷毫无防护的机体。这场战争很可能像以往许多战争一样，双方都并不知道战争的真实胜负走向，直到灾祸突然降临到自己或者对方，甚至双方的头上。

这是个很可怕的情境。然而，如果21世纪10～50年代真的重演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剧本——“世界警察”衰落、未知的未知因素激增、武器变得越发具有毁灭性——那么这个情境就会越来越可能成真。

如果是这样的话，新英格兰地区的那句话或许就是真的了：也许我们真的没法从这儿到那儿。

除非，“那儿”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

合而为一

战略的奥义在于你要知道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去研究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在过去的2　000多年里，倡导和平的人们所设想的“那儿”——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与康德设想的大致相同。他们设想，如果人们能自觉地弃绝暴力，就可以实现那样一个世界。玛格丽特·米德坚称，战争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因此我们也可以再消灭它。歌曲《战争》的词作者认为，站起来高喊“战争毫无益处”就可以终结战争。政治学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但其中很多人也认为，通过做出自觉的选择（建设更好、更民主、更包容的社会），可以让我们从“这儿”到达“那儿”。

然而，我在本书中所追寻的长期历史却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之所以杀戮，是因为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鼓励杀戮。总体而言，我们做出的选择并不会改变这场博弈中的收益，而博弈中的收益情况会改变我们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简简单单地靠决定终止战争来终止战争。

不过，长期历史同时还给出了另一种更加积极的结论。我们并没有陷入红桃皇后效应，并非注定要重演“世界警察”（通过创造出自己的敌手）自我击败的悲剧直到彻底毁灭掉人类文明。在过去的10　000年里，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并非让我们停步不前，而是改造了我们的社会，

改变了博弈中的收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博弈中的收益有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将整个死亡博弈转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正要开始进行死亡博弈的最终局。

要想解释这一隐秘的说辞，我要暂时远离战争的恐怖，重拾起我最近两本拙著——《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中的观点。我在本书第二章的末尾提到过，在这两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指数，用来衡量从冰河时期的末尾至今的15 000年中各个不同的社会在取得其所需资源的能力方面的优劣程度。这个指数的评分从0~1 000分，其中1 000分代表在2000年（亦是该指数终止的年份）时的通常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高分。

有了这个指数，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道，如果我们预测未来的分数，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在任何一种预测中，预测的结果都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假设。因此，我相对保守地发问，如果21世纪社会发展的速度与20世纪时一样，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即便是这样保守的假设，也会带来令人惊讶的结果：到2100年，发展指数将跃升到5 000分。从拉斯科洞窟里的野牛壁画到你今天读的这本书，这中间的发展程度是900分；而从今天到2100年，我们还将取得4 000分的发展。

我只能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这一预测——实际上，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如此迅猛的发展意味着就连人类意识本身都会在这个世纪中发生改变。计算机化不仅在改变着战争，也在改变着一切，包括我们这种动物。生物演化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大脑，使我们可以发明出文化的演化。现在，文化的演化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使得我们创造出的机器将开始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物演化。而这将把死亡博弈转变为死亡的终局，有可能让暴力不再有用武之地。

对于战争的未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会更重要。不过，通过最近一两年的一些交流，我发现技术人士和安全分析人士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技术人士看来，根本就没有“过度乐观”这回事，一切皆有可能，情况会比我们预计的更好。而在国际安全的世界里，坏的总是会变得更坏，情况永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糟糕。安全分析人士经常将技术人士看成是梦想家——他们迷失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看不到战略现实永远会超越那些技术上的玩意儿；而技术人士则经常视安全人士为深深陷入旧模式的恐龙，不明白计算机化将打消他们的一切烦恼。

当然，也有例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试图将这两种观点糅合在一起，而新近出版的、由技术人士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安全专家贾雷德·科翰（Jared Cohen）合著的《新数字时代》（*New Digital Age*）亦如是。冒着精神分裂的危险，我将沿着他们的道路，在本节剩余的部分里先介绍技术人士的预测，再在下一节中切换到安全人士对现实的考量。这两者的结合，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担忧的短期前景。

技术人士的出发点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计算机的功能强大到可以实时控制战斗机，那么它也可以做到更多的事。虽然没人能说准“更多”是多少，但数以百计的未来学家还是给出了他们的预测。很自然地，他们的预测大相径庭。而且，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的预测中找出什么确定无疑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预测中至少会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乔治·赫伯特·威尔斯的有着一个世纪历史的科幻小说一样充满了谬误。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预测拆分开来，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话，当代的未来学家就会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未来学家们一样能够指出那些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大趋势——如果谈到大趋势，那么凡尔纳和威尔斯做出正确预测的地方可能要比错误的更多。

当代未来学家取得最多共识的地方［也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电影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正在与我们的机器融合。这是个很容易的预测，只要看看我们从1958年第一架心脏起搏器投入使用以来（或者可以从使用第一颗假牙、第一条木头假腿算起）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不过，21世纪的人类与机器的融合要更为宏大。不仅仅是我们会与机器融合；通过我们的机器，我们会与彼此相融合。

这一说法背后的思想是很简单的。在你的脑——那团2.7磅重的魔法里（关于人类的脑，我在第六章中讨论了很多），每秒钟有1万万亿个电信号在大约220亿个神经元之间来回传递着。这些信号塑造了你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组成你的记忆的10万亿条信息，从而塑造了你。尽管机器的功能也在进步，但目前还没有哪台机器能接近这一自然奇迹的水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计算机的运算能力、速度和性价比几乎每年都会翻倍。在1965年，在当时的新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130计算机上花上一美元，只能得到每秒千分之一次运算的运算能力。而到了2010年，同样的一美元可以得到超过每秒100亿次运算的运算能力。到本书面世的2014年，这一数字可能已经继续翻倍到了1 000亿次以上。如今，便宜的笔记本式计算机可以比50年前的巨大的大型机以更快的速度做更多的运算。我们甚至可以制造出几个分子大小的计算机，其体积小到可以被注入我们的静脉血管中，以改变我们的细胞对抗癌症。如果时间倒退一个世纪，这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巫术。

在雷·库茨韦尔（Ray Kurzwell）——最著名的技术领域未来学家，时任担任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看来，这样的趋势只要保持到2029年，我们就能拥有功能强大到足以扫描出人类大脑神经元结构的扫描仪和进行相应的实时程序运算的计算机。库茨韦尔认为，到那时，世界上就会有两个你：一个，是原来的未经改良的生物版本的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老去；另一个，是一个新的、不会随时间改变、基于机器的你。库茨韦尔指出，更棒的一点是，基于机器的各个不同的人之间分享信息过程之简单，就如同今天我们在计算机之间传递文件一样。到2045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就将产生极其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它可以

承载全世界80亿人的神经元扫描数据。碳基智能[14]和硅基智能[15]将合并为一个全球意识，其思维能力将让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相形见绌。库茨韦尔将这一刻成为“奇点”：“到这样一个未来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将使其看起来在以无限快的速度发展着。”

这是非凡的想法。当然，会有很多人不认同这样的情景，其中包括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其他的未来学家。他们说话通常很直率。科幻作家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认为，“奇点”只是一场“技术呆们的狂想”；颇具影响力的技术批评家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认为，所有这些“数据未来的鬼扯”不过是“电子时代的辉格党人史学理论”[16]。（我不完全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但显然不是什么赞美。）一位神经科学家在2012年一次会议上的话更加直白。“扯淡。”他说。

不过，也有些人抱着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相似的观点。玻尔曾经对一位同事说：“我们一致认为你的理论很疯狂。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理论是否疯到了有朝一日能够成真的地步。”有些人认为，也许库茨韦尔还不够疯狂。2012年，在未来学家中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预计技术“奇点”将会到来的平均时间点是2040年，这要比库茨韦尔的预计早5年。主管人脑项目的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莱姆（Henry Markram）甚至认为，如果欧盟能够援助10亿欧元的经费，人类在2020年就能达到技术“奇点”。

如果我们从预言转回到实验室，我们会发现（或许并不会感到太惊讶），尽管没有人能预测出具体的结果，但是大的趋势确实正在走向将一切都计算机化的方向。在拙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曾提到过这一领域的发展，所以在此处我不会着墨太多。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讲述两个在脑对脑接口领域（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心灵感应）的重大进展，它们都发生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于2010年出版之后。

要想把人类意识通过机器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能够阅读我们颅内电信号的机器。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们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想让志愿者观看影片片段，与此同时测量血液流经志愿者视觉皮质的情况。接着，他们利用计算机程序将测量到的数据转换成图像。他们得到的结果很粗糙、模糊，甚至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主导这一项目的神经科学家杰克·加兰特（Jack Gallant）却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打开了通往我们意识画面的一扇窗。”

就在几个月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另一支研究团队记录下了测试者在听人说话时的大脑电活动，随后使用计算机将这些信号又翻译成了语句。这两个试验都很麻烦：第一个试验要求志愿者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几个小时，而第二个试验只能在进行脑部手术的病人身上进行，以便将电极直接放进其被打开的颅骨。“要想实现真正的读心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简·史努普（Jan

Schnupp）在评估此项研究时总结道。但他接着补充道，“这不是能或不能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这在未来10年内可能成真”。

要通过互联网实现心灵感应的第二个要求是找到将电信号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的方法。2012年，杜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米盖尔·尼科雷里斯（Miguel Nicolelis）展示了这一方法：他设法让在他祖国巴西的老鼠控制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老鼠的身体。试验开始之前，那些南美洲的老鼠先进行了一项学习：如果它们能在看到闪光后去碰一个杠杆，它们就可以得到食物。连接它们头部的电极将这一脑部活动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了连接北美洲老鼠头部的电极上，结果有70%的时候，那些从未经过训练、也看不见闪光的北美洲老鼠也去触碰了杠杆，得到了食物。

70%的成绩远远称不上完美，老鼠的大脑比起人脑也简单得多，而且推一个杠杆也不算什么太有挑战性的任务。但尽管有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问题，有一件事看起来是肯定的。脑对脑接口技术不会停留在让老鼠通过互联网控制彼此的爪子的程度。这项技术可能会按照与库茨韦尔的设想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尼科雷里斯将库茨韦尔的设想称为“吹大牛”），但它仍然会发展。（实际上，尼科雷里斯预计人类最终实现的目标与库茨韦尔的设想差不多，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实现该设想：他认为，人们并不会把他们的大脑扫描数据上传到计算机上，而是会把小型计算机植入他们的大脑中。）

既然专家们也无法就细节达成共识，那么我们选取某一个预言，然后去苦苦追寻之的意义也不大。然而，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在发生的意义更小。或许，我们应该遵循纳米技术之父、曾经赢得过诺贝尔奖的化学家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充满智慧的名言。斯莫利的定律（我喜欢这么称呼它）告诉我们：“当一名科学家说某件事有可能时，他们通常低估了要实现这件事要花上多少时间。然而，如果科学家说某件事是不可能的，他们通常是错的。”不论脑对脑接口技术的精度如何，或是我们喜欢这项技术与否，它就像陆军中校托马斯·亚当斯口中的战场上的机器人一样，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我们或许不想去，但很可能无法回避的地方。

这个新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的演化中的一个新阶段。早在10万年以前，严酷的冰河时期的生存环境使得有着巨大的脑的惊人变异生物——我们人类——胜过并取代了所有更早的原人种类。那些被取代了的原人也通过有性繁殖带来的随机基因变异创造出了同样的变异体，其中有些也在无尽的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扬光大。原人应该不会情愿创造出最终让自己灭绝的“怪物”，但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有耕作，有收获。现在，在经过了1 000个世纪之后，我们在做着与原人曾做的十分相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的速度要更快，并且不是通过生物的演化，而是通过文化的演化实现的。为了在这个十分拥挤、气候又在变暖的世界里生存，我们正在创造出新的有着巨大的脑的惊人

变异体——用机器将我们未经改良、单独的、生物熟悉的意识融合进某种超个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种终极的开放秩序，它打破了个体之间的界限。年龄、性别、种族、语言、教育程度，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消融进了这个超个体之中。

也许，这一过程会发展到分享思想、记忆和性格为止（尼科雷里斯的设想）。或者，它会发展到个体性和物质化的身体都不再重要（库茨韦尔的设想）。甚至，它可能会走得更远，被我们居高临下地称作“人工智能”的东西可能将彻底取代低效、旧式的动物体智能。我们不知道究竟会怎样，但如果长期的历史具有一些借鉴意义的话，我们不得不怀疑新的变异体——也就是新版本的我们——就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彻底取代旧的我们，就如同我们曾经取代尼安德特人一样。

再一次，我们发现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脑对脑接口技术只不过是一个古老故事的最新篇章罢了。20亿年前，细菌开始相互融合，组成简单的细胞。又过了3亿年，简单的细胞开始融合成更为复杂的细胞；再过了9亿年，复杂的细胞开始融合成多细胞的动物体。在每一个阶段，更简单的生物体会放弃一部分功能（某种意义上，是它们的自由的一部分），以变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物体的更加特别的一部分。细菌不再是细菌，但却成了细胞的一部分；细胞不再是独立的细胞，而获得了动物性，最终又获得了意识；也许，现在，我们即将失去我们独立的动物性，因为我们即将变成一种新的事物。这种新的事物与我们智人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我们与远古的细胞之间的差别。

说得温和一点儿的话，死亡博弈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2　000年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段时间，罗马城严重分裂了。穷人群起反对富人，还把富人称作“寄生虫”。就在局势越发紧张的时候，杰出的元老梅奈纽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来到叛乱者的营地谈和。“很久很久以前，”阿格里帕对他们说，“人体的各个部分并不像今天这样相安无事，而是各有各的想法。”一些器官觉得，胃什么都不做，全靠别的器官供给它食物。“于是，”阿格里帕说，“这些器官决定，从今以后，手不再把食物放到嘴巴里，嘴也不再接受任何食物，牙齿也不再咀嚼。然而，尽管这些愤怒的器官试图制服的是胃，但整个身体却垮掉了。”叛乱者听懂了他的意思。

随着脑对脑接口技术的发展，阿格里帕的比喻就会越接近于现实。或许，这项技术还会让暴力的回报率降到零。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怪兽”也会随着我们基本的动物性一起消失。而且，对于融合在一起的智能来说，靠暴力解决分歧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论在那个时候“分歧”和“暴力”意味着什么），这就好像我不会通过割掉我自己的鼻子来表示对脸的敌意一样。

或许，这一切并不会发生。如果意识可以融合成一个超个体，确实如同细胞可以融合成身体一样，那么与此同时，冲突可能也会演进到新的形态。毕竟，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在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孕妇与她们

尚未出世的婴儿争夺着血液和其中的糖分。如果母亲在这场争夺中过于成功，胎儿就可能受到损害，乃至死亡；如果胎儿太过成功，那么母亲可能就会患上先兆子痫或是妊娠糖尿病，而这可能会威胁母婴双方的生命。超个体可能会面对相似的冲突，或许其中的各部分会对能量展开争夺。

现在，大约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细胞内部正在斗争，其中被称作B染色体的东西靠人体的化学成分过活，却拒不参加基因的交换；大约每500个人中就有一个罹患癌症，因为体内的一些细胞拒绝停止复制，不顾这给身体其他部分带来了多大代价。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这些祸害和外部病毒的侵害，我们的身体演化出了多道微小的防线。超个体可能也需要做类似的事情，甚至可能需要制造出相当于抗体的东西，来消灭外部的入侵者和内部的捣乱鬼。毕竟，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切身体会，在病毒面前，机器就像动物体一样脆弱。

还有许多可以设想的东西。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通过机器连接人脑的技术的加速发展，我们在过去10万年中的死亡博弈中遵循的旧规则即将到达它们的顶点。我们即将进入全新的死亡博弈的终局。我们的表现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边无际的恐怖后果。我们的表现如果很好，那么，在21世纪结束之前，也许长久以来的关于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梦想，就真的可以成为现实了。

死亡博弈的终局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克劳塞维茨说，“但是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是困难的。”在死亡博弈的终局中，情况也是如此。要想在这场博弈中做好，将是件容易事，但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

之所以说这场终局很简单，是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目标——“那儿”——究竟是哪儿，以及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那么，在理论上，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知道怎样从这儿到达那儿。我在上面已经说了，我认为“那儿”就是一切的计算机化，而战争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创造出利维坦及其终极形态——“世界警察”，而它们可以通过把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不可触及的程度来维持和平。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世界警察”，它应当随时准备好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直到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使得“世界警察”的存在不再必要。如果我们无法拥有一个“世界警察”，那么我们唯一可能面对的结果就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重演，而且这一次世界上已经有了核武器。由于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成为“世界警察”的国家，因此，就像亚伯拉罕·林肯在一个半世纪前说过的那样，美国依然是“地球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如果美国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都将失败。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2013年），在美国的政治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有人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应当“更加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应当“收缩”。认为美国应当更加主动的人表示，更加主动的姿态意味着美国仍然要坚持“积极管控全球安全局势与促进自由经济秩序的大战略，这一战略在过去的60年中为美国带来了非凡益处”；而认为美国应当收缩的人表示，“是时候放弃美国的霸权战略，转而采取克制战略了……放弃进行全球改革的重任，把重心放在保护美国狭义的国家安全利益上……这将有助于在长期保障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长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至少是对了一半。美国必须先采取主动姿态，再收缩回来。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但15世纪的欧洲人发动了其对整个世界的500年战争时，冲锋在前的是旧式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会对被征服的人民进行掠夺、征税。然而，500年战争的成功创造出了太过巨大的社会，这导致旧式的帝国主义越过了其“顶点”。到18世纪，能够让“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拳”进行协作的开放秩序开始产生比传统帝国更多的财富和实力。其结果，就是第一个“世界警察”出现了。英国成功地实施管理着全球范围的开放秩序，结果创造出富有而强大的敌国，这样一来，英国体系的成功也越过了它的“顶点”。

接着，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这带来了钢铁风暴和更加强大的“世界警察”——美国。现在，新的“世界警察”的成功正在将世界推向终极的开放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看不见的手”将不再需要“看不见的拳”。而这不仅意味着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由盛转衰，更意味着所有“世界警察”的由盛转衰。今天，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因此它必须采取主动的姿态；而一旦它越过了“世界警察”的“顶点”，美国就需要收缩。“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将让位于“技术统治下的和平”［这个词语来自于未来学家阿耶沙（Ayesha）和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我们将不再需要“世界警察”。

到那时，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简单——直到我们开始问那些安全分析人士第一时间就已经想到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简单的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使用科学技术就消除掉人类的防卫困境。实际上，甚至与机器融合这件事本身就是本章中提及的所有结构性变化、可能改变局势的因素和“黑天鹅事件”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个，因为这一过程将非常不均衡。

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所在的位置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心脏地带圣何塞只有15英里的直线距离。在我所在的这条街朝向圣克鲁兹山一侧，刚刚搬来的新邻居是一名在谷歌眼镜项目上工作的工程师；在我上班的路上，我经常会看到无人驾驶的汽车（它们经常以接近道路速度上限的速度行驶）。然而，如果我生活在刚果或是尼日尔（这两个国家在201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排名榜尾），我想我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邻居，或是见到这样的车辆。圣何塞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而刚果首都金沙萨则是最贫穷、最危险的城市之

一。因此，很自然地，已经很安全、富裕的地方（尤其是圣何塞）朝向万事万物计算机化前进的速度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快。

开放秩序的成功离不开包容，因为其市场越大、自由度越高，整个体系的运转就会越好。因此，技术人员通常对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有信心，认为这一趋势将在中长期打破界限，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纵观历史，不论是农耕技术、利维坦的形成，还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人群相较于后采用的人群总是有优势。开放秩序并不会以平等的条件接纳每一个人，而人们对被开放秩序接纳的热情度也并不相同。在18世纪，殖民美洲的欧洲人把非洲人带进了大西洋的开放秩序之中，但非洲人起初的身份却是奴隶；在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人和美洲人经常使用枪炮迫使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更大的市场。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野蛮的欺凌行径会在21世纪重演（富有的北方国家用武力强迫扫描南方国家人们的大脑？），但在短期内，计算机化很可能会扩大第一世界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未来的10～20年中，计算机化可能会引发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冲突，因为这一趋势将扰乱经济、加剧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已经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行径）。世界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布尔战争乃至政权崩溃。

脑对脑接口技术的破坏性作用还不只体现在贫穷的南方国家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已经经历了程度比较温和的计算机化，而这已经加剧了它们国内的不公平程度。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人类通过机器融合为一体，这种差异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如果一小部分财富精英和智力精英在脑对脑接口技术的发展中领先（看起来这很有可能），那么在短期内，这些技术统治者或许就会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他们所取得的居高临下的地位将是今天顶尖的1%的人群梦想中的地位。

有一则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小说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曾在一次聚会上宣称：“富人与你我不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随即反驳道：“是不一样，他们更有钱。”然而，现在到了菲茨杰拉德反击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种新型的富人真的会变得与其他人不一样。

人们对于预测的结果总是争论不休，这些富人与其他人不同的程度也一样众说纷纭。不过，依我看来，由纳米技术专家转行为小说家（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顾问）的拉梅兹·南姆（Ramez Naam）给出的设想是难以超越的。南姆所写的《联结》（*Nexus*）是我迄今读到的唯一一本带有生物工程学附录的小说。在这本书中，南姆告诉我们，2036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包含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单词。比如，超人类，其定义是“其某一或多个重要方面的能力经过强化，从而超越了普通人类极限的人类”；再比如，后人类，其定义为“经过极端的技术改变的人类，其状态已经超越了超人类，因而不再被视为人类”。按照南姆的《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超人

类是“在人类演化层面上再进一步”，而后人类则是“人类演化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南姆所写的故事发生在2040年。他认为，到那个时候，富有的国家里不仅有了大量的超人类，更产生了最初的少数几个后人类。冲突越来越多。充满理想主义、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少年设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后人类，激发潜能，放下依赖；而保守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试图控制这项技术并保卫原有的人类生存方式；而崛起中的美国的对手试图利用后人类来获得战略优势。在这本书的续集《十字星》（*Crux*）中，恐怖分子也参与其中，他们使用融合了的人类智能进行政治谋杀。整个世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各种人类都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

《联结》和《十字星》都只是故事，但它们很好地描绘出了人类与机器融合或人类通过机器融合之后所带来的混乱，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选择的复杂性。比如，如果“世界警察”过于主动，试图严格控制发展，或是在自身已经越过“顶点”仍然不肯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它将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反对浪潮、力不从心的无力感以及经济上的衰败，而这些很有可能会给它带来它一直试图避免的军事挑战。如果采取这样的战略，那么我们无疑将输掉死亡博弈的终局。在本书中，我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探讨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方式理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似乎会鼓励过度自信的进取行为。由于有着继承自古希腊时期的军事传统，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告诉我们：“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致命的西方军队对其他力量无所畏惧。”但我已经阐述过了，这并非长期历史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实际上，在21世纪，对“世界警察”构成最大挑战的恰恰是非西方的军队。要想维护现有秩序，我们需要依靠的是敏锐的判断力和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而不是什么古希腊的传统。

如果说太过主动或保持主动姿态的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输掉最终局，那么，在另一方面，太过收缩会收缩得太早则会让失败来得更快。如果“世界警察”擅离职守，那么未来倒未必会像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那样目睹危机的慢慢积累，而更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面对突然爆发的大灾难——在那个卑劣而虚伪的10年里，英国这位“世界警察”奄奄一息，美国人不愿意接替英国的未知，而英国的敌手们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惜把一切赌注都押在武力解决的途径之上。从长期来看，“世界警察”必然要收缩，但是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招致灾难。

一切都取决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这一转换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世界警察”在履行其职责期间所面对的越来越多的困难积累情况（如果当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我在前面提到过，在21世纪10年代，乃至21世纪20年代，美国仍将保持无可撼动的地位；而到了21世纪30年代、40年代乃至50年代以后，美国就将越来越难以威慑住它的对手。我还提到，大多数未来学家认为，我们可能在21世纪40年代达到人类与机器实现融合的奇点阶段。如果这些预测都成真的话，我们或许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在21世纪20年代，这个

世界上的麻烦会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严重，局势也会越发紧张；而在这一时期，“世界警察”的实力仍然足以承受这些压力。到了21世纪30年代，“世界警察”将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但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统治下的和平”开始将暴力置于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外，“世界警察”也恰好到了应当收缩的时候。而到了21世纪40～50年代，正当“世界警察”已经无力履行其职责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恰恰不再需要它了。万事大吉。

但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真的会如此遂人心愿吗？我们距离21世纪40年代仅有30年之遥，即便这30年中发生了剧烈的技术变革，我们也远没法确定我们能否在这30年中将自己与机器融合在一起。不过，未来学家们坚持认为，这种误解根源于人们没有看到技术变革的速度：技术变革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不断地翻倍增长，而不是呈线性增长。他们有时候会说，假设你租了一栋夏日别墅。当你来到这栋别墅的时候，池塘中盛开着一朵美丽的百合花。过了一个星期，百合花变成了两朵；又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了4朵。接着，你就很不情愿地回去上班了。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你才终于又有机会继续休假。当你回到这栋别墅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 000朵百合花在迎接你了。你离开时的4朵百合花双倍增长了8次，它们甚至多到把整个池塘遮掩了起来。

假设，在1983年彼得罗夫进行生死抉择的那一年，发生了相当于一朵百合花的技术变革，接着每朵百合花每6年增殖一次。到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百合花已经翻倍了5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32朵百合花——这比1983年时的数量多得多，但远远还不足以遮盖整个池塘。但到了2025年，百合花的数量将达到128朵。到了2043年，也就是库茨韦尔的设想中奇点即将到来之前，我们将有超过1 000朵百合花。最初的池塘——也就是我们，这些未经改良的生物体的人类——将被遮掩在成片盛开的超人类与后人类的技术百合之下。

我们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拥有的那30几朵百合花，代表的就是类似谷歌眼镜、互联网乃至操纵其他老鼠身体的老鼠之类的东西。在人类50 000年以来的生活方式上，这是些不错的小点缀，但也仅此而已。到21世纪20年代末，那时的200朵左右的百合花可能代表着一些时不时会被误认为是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一点点儿心灵感应的苗头以及一些基本上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的人类。但到那个时候，百合花的数量仍然远远不足以遮盖池塘。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将看到曲线拐点（在统计学家的语言中，这一点表示数量增长真正进入迅速增长的阶段）。到那时，每一年人类所看到的变革都会超过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所有变革的总量。到了21世纪40年代，当变革的速度已经快到随时在发生的时候，世界警察就可以退休了。

不过，这些计算的前提是，运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将继续按照过去50年中的速度增长。但这一前提没有遵循斯莫利定律：凡事皆有可能，但其实现所需的时间比我们设想的要长。如果斯莫利定律对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也有效的话，那么当“世界警察”在21世纪40年代失去对世界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可能距离死亡博弈最终局的结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即便技术的百合之花的增殖周期从我之前假设的6年仅仅温和增加到10年，那么这也会使得技术曲线拐点的来临时间推迟到21世纪60年代，并且将奇点的到来推后到21世纪80年代。

如果“世界警察”在21世纪40年代跌倒在地，那么随后就将有70年的时间，人类既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中，也不在“技术统治下的和平”中。在这个斯莫利定律生效了的世界里，全人类不会融入一个单一的超个体中，而是在21世纪50年代融入多个相互不兼容的脑对脑网络中，每一个网络都由一个不同的大国支配。随着这些网络开始争夺中立的市场份额，我们可能会看到19世纪非洲争夺战的高科技版本，各个网络都会试图将对手赶出世界的某一片区域。到那时，气候变化可能会剧烈影响不稳定弧形带，杀手机器人的出现可能会打破力量的均衡局面，与机器融合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可能会成为新的袭击目标。认为自己在技术转型方面拥有暂时优势的国家可能会试图利用这一优势，将自己的意愿用暴力手段强加于他人之上。而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落后的政府或许会孤注一掷，在敌人的优势变得无可撼动前发动袭击。

末日之战即将打响

战争！将会有什么好处？

但我相信，故事的结尾不会是这样的。

我乐观的依据，是长期历史清晰揭示出的人类的过往纪录。我们没能凭愿望就让战争不复存在，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非常善于应对死亡博弈中收益的改变。在我们存在于地球之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好战且热衷于使用暴力的动物，因为这样的性格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自从我们发明了建设性的战争以来的10 000年中，我们在文化上发生了演化，我们的暴力程度变得越来越低，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随着核武器于1945年问世，这场博弈中的收益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而我们的反应也随之加速。因此，今天一个人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是石器时代的大约1/20。

设想一下，假如我在50年前写了这本书，并且在1964年（而不是2014年）出版了这本书——当时，距柏林危机刚刚过去还不到三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两年，中国再过几个月就会试验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再过一年就会在越南登陆；假设我还在这本书中预言说，人类已经十分适应死亡博弈中收益的变化，因此在25年之内，苏联就会放弃使用武力，推倒柏林墙，再自行解体，在这些过程中都不放一枪，更不要提使用什么核导弹了。事实将证明我是对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之中，同样的逻辑让我相信，我们将可以像以往应对常规的博弈那样玩好这场死亡博弈。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容易，但也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很难，因为只有奇点的到来早于“世界警察”的崩溃时，人类才会赢得死亡博弈的终局。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儿”到达“那儿”，那么“世界警察”就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大。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未来的40多年时间里维持其军事开支水平和备战水平，使其仍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利维坦。美国必须能够为了保障全球秩序随时准备好进行武力威吓，甚至真的动用武力。但美国在这方面的花费又不能太高，以免导致倾向于主动出击的政治共识瓦解；美国也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地使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免得它的盟友因此疏远它。要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美国人需要让他们的金融体系良好运转，维持经济增长，在基础科学上进行投资，同时继续寻觅与那些引领美国走过冷战岁月的领导人同样水准的领导者。这很简单，但也很难。

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进程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有可能在“世界警察”衰微而引发新的钢铁风暴之前实现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的转变。但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斯莫利定律生效的情况下，美国也必须随时准备好“付出不论何种代价、承担不论何种负担、面对不论何种艰险”，完成它的使命，就如同约翰·K·肯尼迪在1961年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样。在2013年9月，当本书进入制作过程时，2/3的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机构，他们反对在叙利亚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而美国（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如果一样厌倦了它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我们可没有任何后备方案。

总体来看，美国为保障全球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将惠及其海外盟友，但不可避免地，有的时候未必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们在这场博弈终局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时，它们需要把事实告诉美国，让世界警察听到逆耳忠言；有时，它们需要通过外交、金钱甚至武力手段支持世界警察。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知道应该在何时为全球战略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要意识到这个整体将大于各部分之和。

而最艰难的抉择，将落在“世界警察”的对手身上。它们变得越富有，它们的行动对于这场博弈终局的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100多年以前，“世界警察”英国的两个最大的崛起中的对手是德国和美国。德国的威廉皇帝认为，他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采取那些会动摇全球秩序的冒险举动，而美国则找到了在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仍然能够（至少是大部分时候）支持“世界警察”的办法。“轻声细语，手持大棒。”这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建议。今天崛起的“世界警察”的对手，自己手里就握着大棒。因此，它们的领导人需要在罗斯福和威廉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榜样。美国可以为对手营造和平发展的空间，同时喝止其鲁莽的冲动，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手的抉择。但归根结底，如果美国的对手倾向于罗斯福的程度越高，这个世界赢得死亡博弈最终局的概率也就越大。

有一句罗马格言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做好打仗的准备。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在格劳庇乌山选择了兵戎相见，而不是和谈。在这2 000年里，几乎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句格言依然是真理。《战争》这首歌唱错了。战争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尽管我们不情愿去面对这个事实，但是战争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使人类从暴力死亡率高达10%~20%的石器时代小社会发展到今天暴力死亡率低于1%的巨大的全球化社会的唯一途径。战争让这个星球变得更和平、更繁荣。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程度如此之高，使得战争几乎，但尚未，终结它自己。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这个充满矛盾性的故事的最终的一个矛盾：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一个战争在其中毫无用处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1] 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价。如果按照当前的市场汇率计算，2011年的全球人均GDP更接近于12 000美元。

[2] 玛尔斯和维纳斯：在英文中，火星（Mars）和金星（Venus）分别也有玛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和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的意思。玛尔斯和维纳斯为情人关系。

[3] 就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ISIS（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武装进行了空袭。——译者注

[4] “斯坦”们：指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译者注

[5] 毛拉：对伊斯兰学者的尊称。

[6] 阿亚图拉：对伊斯兰什叶派较高级宗教学者的称呼。

[7] 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

[8]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已经退役的卡尔·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将军及欧文堡的将士们为我安排这次访问。

[9] 如果我们将时间段设置为1998~2010年，也就是美国国防开支的最低点和最高点，那么美国的国防开支差不多增长了一倍，但这一增幅还不到同期中国国防开支增幅的1/3。

[10] 对此次邀请我要再次表示感谢。

[11] 我曾于2011年7月受邀做报告，并参与过数次在硅谷举行的会议。在此，我要感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前任顾问麦特·巴罗斯（Mat Burrows）和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规划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的邀请。

[12] 这里的用词也是有争议的。空军更喜欢使用“远程控制飞机”，旨在强调它们依然是飞机，而且依然有驾驶员在控制；陆军和海军使用“无人飞行载具”；而民间则喜欢用“无人机”这一说法。作为一个平民，我也更愿意用“无人机”。不过，在军事圈里，drones这个词汇通常指那些用来进行射击训练的自动器具。

[13] 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已经退役的卡尔·艾肯伯里将军和克里奇空军基地的工作人员。

[14] 碳基智能：生物体承载的人类智能。——译者注

[15] 硅基智能：计算机承载的智能。——译者注

[16] 辉格党人史学理论：由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从现状出发，把历史解释为不可避免地朝当前的现状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人慷慨的帮助与支持。本书的写作，离不开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院和胡佛研究所的支持，以及我的妻子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的鼓励、耐心和高昂的情绪。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伯基（David Berkey）、劳拉·贝茨（Laura Betzig）、麦特·巴罗斯、埃里克·基斯基（Eric Chinski）、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班宁·加勒特、阿扎尔·盖特、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戴维·霍拉维（David Holloway）、帕拉格·卡纳、菲尔·克莱恩海因茨（Phil Kleinheinz）、史蒂夫·勒布朗（Steve LeBlanc）、拉梅兹·南姆、乔希·奥伯（Josh Ober）、斯蒂芬·平克、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凯茜·圣约翰、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理查德·兰厄姆和艾米·莱盖特（Amy Zegart）阅读并点评了书稿。在此，我要再次感谢他们的建议和支持。由于我的固执，所以有的意见我未能接受；或是由于我的愚钝，有的意见我未能理解，在此我也要为此致歉。

彼得·艾比盖、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阿尔·柏格森（Al Bergesen）、麦特·巴罗斯、班宁·加勒特、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麦克·麦考米克（Mike McCormick）、迪克·奥尼尔（Dick O'Neill）、吉姆·罗宾逊、彼得·图尔钦及诺曼·瓦舒（Norman Vasu）曾邀请我参加十分有收获的会议，卡尔·艾肯伯里则邀请我前往欧文堡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以及位于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和内利斯空军基地。我要对他们致以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良越（Viet Luong）、马克·派（Mark Pye）以及欧文堡、克里奇和内利斯的其他人员对我的帮助。

劳拉·贝茨、乔治·考吉尔（George Cowgill）、阿扎尔·盖特、史蒂夫·哈伯、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彼得·图尔钦和理查德·兰厄姆允许我拜读了他们尚未出版的文章；除他们之外，约斯特·克劳威尔（Jost

Crouwel）、贾雷德·戴蒙德、尼尔·弗格森、维克托·戴维斯·汉森、鲍勃·霍恩（Bob Horn）、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卡拉·克尔凯郭尔（Karla Kierkegaard）、阿德里安娜·梅约（Adrienne Mayor）、乔希·奥伯、理查德·塞勒（Richard Saller）、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罗布·坦皮奥（Rob Tempio）及巴里·温格斯特与我进行了有趣的长谈，这些谈话或多或少地对本书提供了帮助。

最后，本书的出版离不开我的经纪人桑迪·迪迦斯特安（Sandy Dijkstra）和阿拉贝拉·斯特恩（Arabella Stein）的鼓励，以及我的编辑们——FSG出版公司的埃里克·基斯基（Eric Chinski）及Profile Books出版公司的丹尼尔·克鲁的帮助。与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合作十分美妙。



出版说明

《战争》，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作品之一。

一、此书从战争给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客观推动力进行阐述，作者强调的是战争的所谓长期的“建设性”，而非鼓吹战争。同时，此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我社同意作者的说法，请读者在阅读时鉴别。

二、由于东西方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差异，此书对某些具体史实、国家定位的描述和解释，与我国通行的说法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在这次出版时，我社对这些说法稍做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修改的部分，请读者在阅读时鉴别，这些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我社同意作者的说法。

中信出版集团

谁将主宰世界

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

Governing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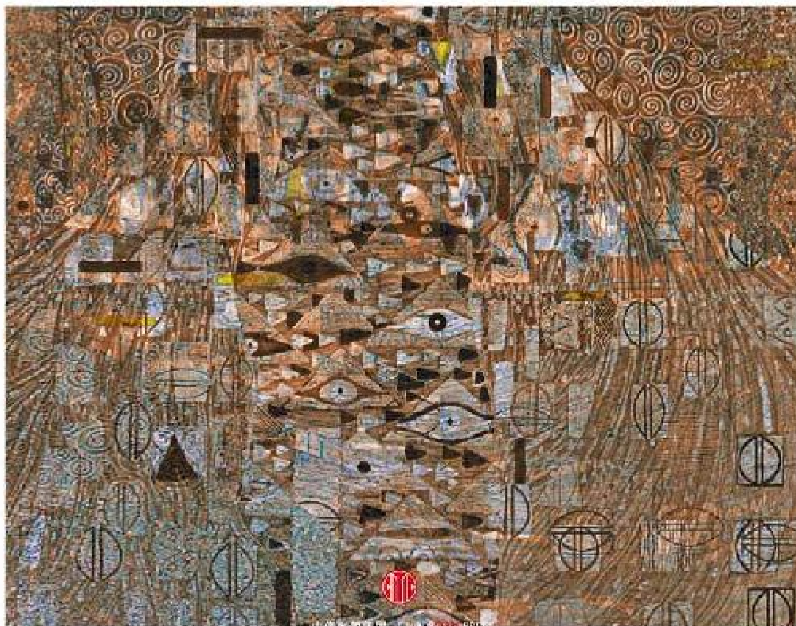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英］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著

胡晓姣　秦雅云　唐萌◎译

回望全球主导权博弈 洞悉世界运转的暗规则
纵观200年政府治理思想与权力的变迁 解构观念新世界

2012年度《金融时报》最佳政治类图书／《华尔街日报》《科克斯书评》鼎力推荐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盛赞



谁将主宰世界

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

（英）马佐尔 著
胡晓姣，秦雅云，唐萌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英）马佐尔著. 胡晓姣，秦雅云，唐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SBN 978–7–5086–5204–7
I. ① 谁… II. ① 马… ② 胡… ③ 秦… ④唐… III. ① 国际政治 - 历史 - 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734号
Governing the World
Copyright© 2012, Mark Mazower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
著 者：[英]马克·马佐尔
译 者：胡晓姣 秦雅云 唐 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京权图字：01–2013–41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204–7/D·310
定 价：65.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版权页

引 言

第一部分 国际主义时代

绪论 一无是处的欧洲协调？（1815~1914年）

第一章 以国际视角统驭全球

第二章 兄弟般的情谊

和平运动：维护世界和平

自由贸易：另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属人主义：民主与和平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铺路

第三章 法律帝国

战争法的重大突破

文明的标准

克里默的仲裁事业

第四章 科学联盟

奥特莱的“曼达纽姆”

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

通用语言

第五章 国际联盟
进退两难的伍德罗·威尔逊
大英帝国就是国际联盟
美国的撤退
政客和专家
第六章 意识形态之战
潘多拉魔盒
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少数民族的权利
等级和种族
委任制度
共产国际
国际主义的问题
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
第二部分 以美国的方式主宰世界
第七章 “国际联盟陨灭，联合国长存”
致美国
美国加入国际联盟
第八章 冷战实录（1945~1949年）
与联合国同在
远离“杂技团”

世界联邦主义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
第九章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
去殖民化
联合国大会的崛起
第十章 重建世界之路（1949~1973年）
“第四点计划”产生的背景
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之路
通往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十一章 来自美国的反对
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
人权和非政府组织的崛起
环境政治：迟暮之年的国际主义
第十二章 国际经济新秩序
海外的银行家
规范世界贸易
全球化：支持与反对
再次关注发展？
第十三章 人权法规
人权干涉

国家保护责任

追捕肇事者

第十四章 何者永存：欧洲危机及后续

斯皮内利之梦：欧洲的过去和未来

主宰世界的奥秘



Governing the World

History of an Idea



引 言

1988年1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冷战结束终于指日可待，千禧年也将由此摆脱冷战的阴霾，为世人带来更多对未来的期冀。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在边境地区进行单方面的大幅裁军，他呼吁“世界新秩序”的到来，提议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苏联的这一转变无疑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国的有识之士为冷战时期的结束而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也提出了他对于“意识形态一事”的看法。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不久，他向国会承诺尽快把军队调离伊拉克，并畅言未来：

> 世界政治终于雨过天晴……世界秩序也终于迎来了破茧成蝶后的新纪元：新时期的人类将从恐怖主义手中勇夺自由，世人必将更加坚定地追求正义与和平，世界也将会更加安稳康定。新时期的世界各国，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弱富强，都将实现繁荣发展，和谐共进。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不遗余力地探寻着通往和平的道路，而千余次的战争冲突却在不断摧残着人类的努力。今天，新世界终于在人类的抗争中到来了。

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而言，超级大国间紧张局势的缓解开启了国际合作及联合国复兴的新时代。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却意味着世界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专制专权。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其1991年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中警告世人说，邪恶势力正在密谋着以人道之名接管世界。几年后，神父蒂姆·拉艾（Tim LaHaye）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问世，这是一部预言世界末日的悬疑小说。小说风靡全球，书中的反基督角色被大胆地设定为英俊潇洒、能言善辩、魅力不凡的年轻联合国秘书长尼古拉·卡帕斯亚（Nicolae Carpathia），但现实中的尼古拉实际上是一个伪装成和平信徒的暴力狂，是个手段残忍暴虐的罗马人，他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建立全球集权的独裁统治。

一些不赞成发展壮大联合国的反对派人士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预言一语点醒。威尔斯在其1993年的科幻小说《未来发展趋势》（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中勾画了世界政府最终胜利的美好画面—他称之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案”。这本书描绘了一场长达10年的欧洲战争，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和人类文明的几近坍塌—这样长时间的混乱仅仅在英语国家独裁统治期间有过短暂的停滞，彼时，他们摧毁了全球各地组织完善的宗教，为世界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和平。几年后，预言照进现实，战争在波兰爆发了，于是这位英

国小说家开始呼吁他的读者为创立世界新秩序、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无数人……将会仇视世界新秩序……并且会做誓死抗争。”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威尔斯写道，“我们将铭记受尽磨难的一代人，或者说受尽磨难的反抗斗士”。在新千年的第一次美国大选中，右翼候选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重申了这句话：“没错，威尔斯先生，我们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受尽磨难的斗士。”布坎南奉行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从他低到0.4%的得票率便可窥见一斑。但即使在乔治·H·W·布什成功当选之前，每次美国国会在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赞助金额进行讨论时，公众对联合国的支持率都会下滑，对国际组织的抨击也愈加激烈，无一例外。新总统公然背弃了他父亲的多边主义道路。“感谢上帝让联合国灭亡。”布什的顾问新保守主义人士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在2003年3月时这样写道，此时正值美国对巴格达大肆轰炸。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得出来威尔斯在《未来发展趋势》中所描写的愿景和蒂姆·莱希、帕特·布坎南、乔治·H·W·布什的世界愿景已是天壤之别。大英帝国的现代主义一派坚信技术统治论，而美国则在20世纪末笃定地走上了自由主义道路，两方相去悬殊。如果一方对其政府及各种机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得自信满满，另一方则会认定“大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对极权主义形成持久威胁。的确，威尔斯时代的多数人都会认为他的想法遥不可及—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就好比将黑鹰直升机坠落事件与世界政治精英密谋的世界秩序相提并论一样毫无意义。当然，自伊拉克方面惨败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恢复了多边主义，乔治·W·布什在第二届任期内极不情愿地回归了多边主义，在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多边主义政策显得更加笃定。不过国际政治的发展轨迹已经清晰可见。我们对国际机制理念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对国际机构笃定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但美国失去的远不只这些。国际主义乌托邦由来已久，占据了过去200年中的大部分历史，涉及的意识形态之广、种类之多自不待言。威尔斯提出的在全球建立一个理性的超国家政府的理念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与威尔斯派不同，共产主义分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探索着彻底超越国家的统一道路，期待着实现各民族的“后政治融合”。在成立世界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阵营之间的中间派国家中进行安然有序的合作（用专业术语来说，即他们主张政府间合作主义，而不是仅仅由各种超级国家机构进行收效甚微的改良），这一理念激发了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对未来的期盼。这些组织纷纷怀揣着希望、幻想和恐惧竭力谋求发展，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期待着人类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全人类的解放我们企足而待。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吹嘘我自己的版本在诸多人类梦想的未来中是多么正确，也不想宣传其中的某一版本如何优于其他版本。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追梦的历史进程，并对其中几个宏伟梦想在人类缔造的国际体制中成为现实的历史过程予以呈现，此外，本书还会探讨这些体制对当今世界产生过哪些影响。

这些理念和体制起源于欧洲，随后传播到大西洋沿岸和全球，在此

期间，西方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的霸权统治正一步步走向衰亡。因此，本书由19世纪早期开篇，以西方为主体，在欧洲复兴的外交家中间徐徐展开。1815年，他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府模型—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以会议的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的“欧洲协调”。从1815年开始，欧洲协调的政客们定期举行会面，防止可能出现的单方称霸行为，镇压革命暴动，将战争扼杀在襁褓之中。不过很快，正反两面的逻辑辩证关系也开始显现。如果说欧洲协调是应对拿破仑的策略，那么19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便是应对欧洲协调的策略。国际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后，受到了各方激进的指控。“民族主义”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信条，国际主义分子也十分拥护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携手同行，协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公平的世界。国际主义分子坚信他们掌握了通往未来的金钥匙，把自己定义为受他们轻视的保守派外交官的反对派，这两派理所当然地水火不容。卡尔·马克思等人会希望工人团结一心，而视马克思如死敌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则希望共和派爱国人士能结成“国际联盟”。新教福音派动员人类加速成立“兄弟会”；商人和记者则呼吁自由贸易和工业文明的传播；科学家期待着全世界实行新的通用语言，传递技术知识，建设团结人类的大工程项目；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政府是问题所在，成立短期的无政府国际组织就会使问题迎刃而解；在法学家看来，政治家是问题的根本，他们督促国家停止战争，利用仲裁或世界法庭解决各国间的分歧。到19世纪末，就连欧洲的秘密警察都在利用国际会议来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成了各方势力的主战场，其中充斥着多种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巨大差异，他们有的在此规划着自己的梦想、有的在此处心积虑地策划着阴谋。

本书的第一部分开启了对这些发展历程的探索之旅，随后几章描写了国际主义是如何受到新世界秩序和理念构架的拥护，以及国际主义是怎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同强权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它们的发展历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尽管受到世界强国的声援资助，它们的成立过程仍然披荆斩棘。说到底，是战争催化了这些组织的诞生。两战间的评论家坚信政治体制需要有机地发展起来。他们认为，政治体制这种特别的人为事物及其新特性都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在他们看来，如果国际联盟的理念能够赢得全球人类的一致认可，它就有时间赢得人们的信任，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这也正是帝国曾走的老路。因此，越来越狭隘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紧张的局势，而这一局势已经从一开始就同新的国际机构联系在一起，世界强国希望利用国际机构实现本国的发展和扩张，普世理想和溢美之词也发源于此。

当然，历史上的大部分强国并没有感受到国际联盟、共产国际以及联合国等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纳粹德国就对国际组织的理念不屑一顾，而处在世界权力顶端的英国和随后的美国为什么又要投入精力和政治资金建设国际机构呢？这就解释了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历史学家的著作表达了对国际主义的欢迎，认为它是国际社会在道德层面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国际组织的设立毫

无疑问是必要的。有些学者认为体制只是强国实现自身利益的保护伞，所以他们与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相反。政治学家已经对多边主义的优点提出了质疑，不过学者和决策人士的对话多数都是围绕着美国进行的：美国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定位以及联合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能有哪些帮助。他们使用的措辞都是能获文学奖的“准科学语言”，其中许多话题是关于理性、责任分担、博弈论和风险逻辑的。不过，这些话题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美国的当权者提供咨询意见，所以很少会提到自由国际主义多种典型形式下的意识形态目标。

实际上，英国和美国都能为自己提供充分的理由去接受国际主义政策中的折中理念。如果说英国人1918年支持国际联盟是为了保存其对欧洲领土的分配权及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人作为大举建设国际联盟的后继者就是要保护世界强国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共识，这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模板框架，让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更能为本国民众所接受，因为民众一直对美国深陷他国事务难以自拔的现象心存不满。美国政府加入国际机构并没有使美国受到很多的限制，而是成功演示了普世主义和例外主义前所未有的结合，它已然能够主导世界的规章法则使其基本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了。同时，当美国的立法者对某些规则不满时，他们总是能为本国争取到豁免权，使其免受规则的束缚。因为每个国际组织都希望美国能以某种形式加入进来，所以这些双重标准也就这样被视而不见了。

因此，国际组织的管理及其内部人员的选拔必然成为并一直都会是那些强国的重要利益所在，从“一战”结束后英国人当选国际联盟秘书长到如今日本人被任命为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负责人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的这一任命是由美国外交官在2009年时精心安排设计的，因为这位日本秘书长“是美国法庭可靠的盟友，他会坚决拥护美国的关键性政策决议”。然而，若单说此事是美国图谋的一次暗箱操作并不准确，也不应仅凭此事就认定美国政府的决策领导人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认为他们一味地鼓吹普世主义，而内心却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真诚是整个国际机制必要的润滑剂，在这一体制下的各个国家休戚相关、盘根错节，如果各国间不能达成广泛共识，不能认同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整个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国际机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

国际机制的发展硕果累累，1945年之后更是成绩卓著。历史证明，任何国家想凭借一己之力掌控那些多边国际机构并没有那么容易。实际上，多边国际组织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这一点一直都是单边主义者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原因，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选择疏远联合国，随后转而支持比较容易控制的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变化也正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复杂的情势、疏离的做法以及紧张的关系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国际机构的扶持，如果不是顶着那些机构的名义行事、借以它们提出的宏大抱负—稳定世界货币、控制流行传染病、传播民主和发展理念来开展工作，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在1945年之后如此迅速地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如今，全球的决策事务越来越多，决策形式也比过去更加多种多样，那些漫不经心的学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那些官僚政治类的首字母缩略词搞得云里雾里了。这些缩略词指代的对象中包括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WEU（西欧联盟）这样的军事联盟；包括典型的政府间组织，从UN（联合国）到ILO　（国际劳工组织）、ICAO（国际民航组织）、ICC（国际商会）、WHO（世界卫生组织）、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专业机构或协定；还包括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ion）、美国和非洲国家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s of American and African states）等地区性机构；还有后帝国际联盟邦，其中有英联邦、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准政体欧盟；还有定期召开的如20国集团峰会（G20）之类的首脑会议等。更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机构，其中许多机构也或多或少地对当今的全球政治产生着影响。

对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政坛进行操控再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控国际政坛更是难乎其难。如果说国际主义在一开始体现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和世界强国的需求，那么现在的国际主义已经明显超越了过去的含义，体现出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多方向化。在过去至少200年的时间里，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中西方国家所占的比例已经迅速下滑，跌到了50%以下，从这一数据来看，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几乎不再可能会有新的突破。像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国力在不断增强，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国际格局（这个令人欣慰的说法也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将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因此，本书必定会以过去所说的第三世界的视角重现历史，将关注焦点放在欧洲和美国，因为是它们创立或者提出了那些意义深远的国际体制和理念。读者若是对国际体制的目标和历史心存困惑，本书的讨论过程可能会为你释疑解惑，加深理解。当下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以及难以言表的政治形式让我们难以认清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究竟走到了何种程度。什么是“主宰”？谁能为“公民社会”谋福利？存在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吗？主宰世界的观点一直在进化，这段进化史可能并不能为上面的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它可以为解决问题的过程提供参考。

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努力的成果。可能没有哪个大学比哥伦比亚大学更有资格回顾国际体制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了，我的同事和学生让我受益匪浅，他们对这个课题的熟知程度无人可与之匹敌。首先，我要感谢下面这些人，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本书的部分乃至整部手稿，衷心感谢他们慷慨无私的帮助：他们是米歇尔·阿里斯维奇（Michele Alacevich）、马修·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马尔瓦·埃尔沙克丽（Marwa　ELshakry）、尼古拉斯·吉约（Nicholas Guilhot）、丹尼尔·伊梅瓦尔（Daniel Immerwahr）、马尔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以及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等人。下面这些人也让我收获良多：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黛博拉·科恩（Deborah Coen）、维姬·德·格拉齐亚（Vicky de Grazia）、尼克·德克

斯（Nick Dirks）、卡萝尔·格鲁克（Carol Gluck）、琼–玛丽·盖恩（Jean-Marie Guehenno）、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格雷格·曼（Greg Mann）、安迪·内森（Andy Nathan）、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里安农·斯蒂芬斯（Rhiannon Stephens）以及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等。我十分感谢我的学生多夫·弗里德曼（Dov Friedman）、艾梅·吉尼尔（Aimee Genell）、米拉·西格尔伯格（Mira Siegelberg）以及娜塔莎·惠特利（Natasha Wheatley），感谢他们在这方面付出的诸多精力和他们对我的激励。我要特别感谢斯蒂芬·沃特海姆，他对本书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批评，另外，从他来到院系看自己是否喜欢这本书的那天起，我们进行了多次对话，让我受益良多，我期待他自己的毕业论文能够尽快完成。本书可谓是一项冗杂的工程，我还要感谢下面这些人，十分感激他们为书中各个章节做出的努力：尼科斯·阿里维扎托斯（Nikos Alivizatos）、玛格丽特·安思蒂（Margaret Anstee）、伊莱亚·阿姆斯特朗（Elia Armstrong）、邓肯·贝尔（Duncan Bell）、伊亚尔·本维尼斯特（Eyal Benveniste）、马努·巴格百（Manu Bhagavan）、弗格斯·布雷姆纳（Fergus Bremner）、克里斯蒂娜·伯内特（Christina Burnett）、布鲁斯·伯恩赛德（Bruce Burnside）、本杰明·科茨（Benjamin Coates）、索尔·杜伯（Saul Dubow）、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简·埃克尔（Jan Eckel）、艾德姆·埃尔代姆（Edhem Eldem）、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Francois Furstenberg）、莫里斯·弗雷泽（Maurice Fraser）、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迈克尔·戈尔丁（Michael Gordin）、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塞西莉亚·格瓦拉（Cecilia Guevara）、威廉·哈根（William Hagen）、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ey）、约翰·凯利（John Kelly）、丹尼尔·拉克（Daniel Laqua）、彼得· 曼德勒（Peter Mandler）、彼得罗斯·玛沃芮迪斯（Petros Mavroidis）、珍妮·莫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约瑟·莫亚（José Moya）、蒂莫西·努南（Timothy Nunan）、丹·普勃什（Dan Plesch）、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格温·鲁滨逊（Gwen Robinson）、卡恩·罗斯（Carne Ross）、史蒂夫·莎宾（Steve Shapin）、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布拉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弗里茨·斯特恩、吉莉安·邰蒂（Gillian Tett）、尼古拉斯·希尔凯洛克斯（Nicholas Theocarakis）、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约瑟夫·韦勒（Joseph Weiler）、卡尔·温纳林德（Carl Wennerlind）以及约翰·威特（John Witt）。这本书有幸能够面世，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观念，我必须要感谢赫尔穆特·伯格霍夫（Helmut Berghoff）、哈利尔·贝尔克塔伊（Halil Berktay）、吉姆·钱德勒（Jim Chandler）、约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斯蒂芬–路德维格·霍夫曼（Stephan-Ludwig Hoffmann）、克劳迪娅·孔茨（Claudia Koonz）、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吉姆·莱宁（Jim Lehning）、约翰·麦高恩（John McGowan）、吉安·普拉喀什（Gyan Prakash）、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Brigitta van Rheinberg）、戴维·普利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苏珊·萨顿（Susan Sutton）以及亚当·图兹（Adam Tooze）等人。

我要再次感谢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和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他们为本书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并在成书的过程中时刻鼓舞着我。我还要感谢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对本书的支持，他是最好的代理商。在起笔写这本书时，我父亲刚刚过世，这才让我开始思考他那个年代留给后世的丰功伟绩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必须感谢我父亲对我的诸多影响，感谢我母亲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最后，感谢我最爱的马尔瓦·埃尔沙克丽（Marwa Elshakry）：我把倾注我心血的这本书献给你和我们的孩子塞尔玛和杰德。

第一部分 国际主义时代



绪论 一无是处的欧洲协调？（1815~1914年）

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818年）

到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那年）为止，年轻的亨利·基辛格已经服完了兵役，并迅速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当时正在做博士毕业论文的收尾工作。他的研究课题看上去很古老，探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是如何维持地区和平的。基辛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时成功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四国同盟”（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及其外交官。拿破仑被流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述四国仍然定期举行会议，法国也在恢复君主政体后被吸纳进来。自此，一旦有威胁欧洲大陆安定的危机出现，几国便会召集会议，共商对策。基辛格从亚琛会议、莱巴赫会议以及特罗保会议（这些总会让我们想起尘封的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利用这一规律为他的雇主美国献计献策。借古观今，以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前外务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为代表的已故欧洲贵族为美国上了生动的一课，即如何制约一个变革中的超级大国—就像法国当年研究苏联一样—并将这种经验运用到国际博弈中。

基辛格之所以对欧洲协调这一课题分外关注，除了因为上述几国缔约结盟的做法外，据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早在那个年代，政客们就已经意识到创新在国际事务中的必要性。基辛格对此了然于心。梅特涅的得力助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曾经将欧洲协调描述为“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同国家及不同王室间的联盟层出不穷且更迭频繁，目的在于维持或打破当时的权力平衡。反法战争之初，各国之间采取的是传统的联盟模式，但是正如根茨在1818年所写的那样，战争结束后新模式横空出世—“大联盟的准则是，在5个主要成员国的引领下，由联邦协定将各同盟国维系在一起”。

尽管拿破仑是这一准则出炉的催化剂，但他治理欧洲的理念却与此大相径庭。早些年前，在从莫斯科撤退的路上，身着皮衣蜷缩在马车里的拿破仑对他那直率的外交部部长科兰古侯爵（the Marquis de Caulaincourt）说，他一直在为“古老欧洲及其文明的利益而战”。科兰古不吝溢美之词地回答说，“那些国家害怕的正是国王陛下您，他们害怕出现一个超级帝国”。法国控制欧洲大陆的意图激起了强烈反抗，并引得各国“不惜举全国之力对抗拿破仑”。每遇法国有意统一之处，欧洲协调必会鼓励其成员各自为政。每逢拿破仑寻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新的统一的法律体系之时，其反对者必会坚持各国保留其各具特色的宪法、法律以及社会形态的观点。拿破仑罢黜先前的统治者并给自己的亲属同

僚加官晋爵，他的对手则希望保护那些惨遭驱逐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助其复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希望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各国之上，而其敌对国则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独揽大权。

然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与法国作对的国家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它们认为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自视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主要力量。1814年3月，奥地利、俄国、英国、普鲁士四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结盟至少20年，并在“滑铁卢战役”后制订了举行周期性会谈的计划，商讨各盟国的“共同利益”。法国也在波旁国王路易十八复位之后加入了该联盟。自此，欧洲的小王室王权被断然地边缘化了，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和平，他们只能妥协接受。“尽管并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但处于第二、第三、第四等级的那些国家只能屈从于由首脑大国做出的一致决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根茨如是说。

这种等级制度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几个大国“代表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根茨对此评论说：“由此，欧洲各国仿佛真的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政治家族，并在其创建的高级法庭的统领下团结一致，欧洲协调各成员国互缔盟约，并向相关的各党派保证会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各自享有的权利。”作为反拿破仑的胜利联盟，欧洲协调已然成了一个政治工具，这个组织与拿破仑的所作所为的唯一不同就是它是以欧洲之名来行使权力和制定法律的。然而，顶着欧洲的名头建立的组织并非少数，所以欧洲大陆上公然挑战欧洲协调的权威、要求自治的小国家从此不再是孤军奋战。

为此，欧洲协调有着非常强烈而保守的使命感。其成员国支持正统王权和阶级制度，更加重视秩序与稳定，而非平等与公正。“拿破仑战争”令根茨和他的几位上司感到惊恐和烦恼，这并非是因为法国对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是因为这些战争意在将革命之火引向各国。根茨曾是哲学家康德的学生，后来他转而支持伯克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无疑意味着整个欧洲的灭亡。对于作为国会议员的英裔爱尔兰人伯克来说，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及推翻一切世袭制度的渴望使革命置身于文明之外，因此，反抗战争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仅是一场不足为惧的闹剧，如今必须要彻底根除他们的反抗思想和势力才能维护正统王权。根茨十分同意伯克的观点，但与伯克不同的是，他认为旧秩序的复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革命前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拯救残留的旧制度，欧洲各国急需一系列全新的安排。“必须为固守陈规而做出变通”：没有人比根茨和梅特涅更理解兰佩杜萨（Lam　Pedusa）关于19世纪政治风云变幻的名著《豹》（The Leopard）中所蕴藏的智慧。

由此看来，欧洲协调开始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权倾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形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欧洲协调成功地使国际关系迅速稳定下来，根茨为此欢欣不已。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欧洲各地呼之欲出的革命暗流。他在1818年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从罗马帝国末期开始，欧洲所有国家的国内武装暴动几成燎原之势，并蓄势待发，革命党羽、革命先驱前赴后继，为此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疲惫不堪，如此声势，他们还是首次

见识到。这是一次斗争，更是一场战争，它决定了新旧模式和新旧社会秩序的生死存亡。”在欧洲各地，包括强盛的英国在内，维护新和平的统治者全都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消灭持续升温的“革命余烬”。在德国的疆土之上，限制思想自由的新规接连出台：带有革命情节和煽动性话语的言论被明令禁止，出版社和邮局遭到严密监控，大学要在监督之下办学，便衣警察潜伏在酒馆和咖啡馆窃听民众的谈话。对此，梅特涅评论道：“目前困扰欧洲的唯一恶疾就是革命无处不在。”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彼得卢屠杀”。当时有很多民众聚集在广场上要求议会进行改革，而骑兵队竟对他们发起了攻击，其中15人惨遭杀害。英国统治阶层也借此表明不会再对革命态势妥协让步，他们即刻立法，明确告知民众：任何人不得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集会，否则将会因“蓄意谋反罪”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协调开始谋求在欧洲大陆实现保守式复兴，这一复兴的实质包括对激进分子的暗中监视，若他们意图挑战统治阶级权威，必要时可将不安定分子们一网打尽。但是，作为这个胜利联盟中的主要人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胃口可要大得多了，他希望把欧洲协调打造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神圣同盟”。有位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遗孀—男爵夫人冯·克吕德娜（von Krudener）对这位沙皇的影响颇深，沙皇曾一度深受其神学思想影响，坚信拿破仑代表的是反基督教的“洪水猛兽”，并认为欧洲的自我救赎只能依靠建立新的基督教派的团结理念来实现（而这一切如果能在沙皇的领导下实现是最好不过的了）。从俄国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伐穿梭在法国大街小巷的那一刻起，沙皇亚历山大和这位男爵夫人就开始勾画这一宗教联盟的蓝图了，“这个联盟以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国家之名将欧洲各国统治者联合在一起，共同维护他们的宗教、和平与正义”。

尽管这种毫不掩饰的虔诚态度和神秘主义做法并没给人们留下好感，但铲除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和平理念却深入人心，梅特涅对此尤为情有独钟。只是稍加改变，“神圣同盟”便发展成了隶属于欧洲协调一派的保守势力。在奥地利西里西亚的会面中，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的君主均反复强调，那些通过革命手段获得政权的国家将被视为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对欧洲协调的耿耿忠心。一旦其他国家感受到来自该国的威胁，上述三国的君主将有权“以和平方式处置他们，如有必要，也会使用武力手段，改造‘逆臣贼子’，使其重新融入伟大的同盟中来”。

而另一方面，英国认为，击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从来就不该是“一个意欲统治世界或是越权干涉他国内政的联盟”。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继任者—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极力反对这种“欧洲警察式的教义”，他认为只有在他国发展严重影响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可以“干涉”别国内政。因此，随着国际组织的风潮初露端倪，各国政府和政客开始就“全球政府”的权限问题争执不休：英国与欧洲的核心帝国之间主要就各国的武力干涉程度问题相持不下，两方争论的焦点是武装干涉他国政事的做法在什么限度内才算是合法的。当

今时代，联合国以保护民众安全为使命，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武装干预，不难发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阶级世界中：一些国家凌驾于他国之上，以共同维护“法律秩序”为名，强行赋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以合法化理由。

干涉主义及其限度问题正是这些年欧洲与美国外交不睦的根本原因，这是欧洲协调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迅速实现了一个保守大国的复兴。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支持下，法国成功地将一个革命政府逐出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王权专治的复辟牵扯到“海上帝国”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权益，这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考虑到神圣同盟有可能会横跨大西洋向美洲大陆输出反革命力量，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警告欧洲不要再来西半球干涉内政。美国的海军力量当时还完全没有形成规模，因此这样的警告几乎没有任何威慑作用。但是这一做法赢得了那位对神圣同盟毫无好感的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支持，他曾经公开呼吁“新世界要维系旧世界的平衡”，他的声援让美国力量倍增。两位政治领袖联手开启了全新的美洲自由国际主义概念，这一概念符合发展的利益，摒弃了复古的观点。不仅如此，坎宁本人还特别对20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做出预判—英美霸权会迅速崛起，而这两国的崛起会否定欧洲协调的外交政策，很多全新的国际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抵制神圣同盟的做法也拯救了共和主义思想。尽管在当时的欧洲，民主的民族主义正遭受强力打压，但是门罗和坎宁向欧洲保守君主政权郑重宣布了美洲的后帝国共和政体，并且一直坚守着民族主义原则。这一点对随后出现的国际思想意义重大：举例来说，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在南美洲的影响力远比在墨西哥湾北部地区大。很多南美人，像智利的卡洛斯·卡尔沃（Carlos Calvo）和亚历杭德罗·阿尔瓦雷斯（Alejandro Alvarez），都是新国际法的重要先驱。应运而生的泛美主义也成为抗衡欧洲日渐僵化的王权及其敌对联盟的新势力。南美人为联盟和联合国做出了贡献，也为战后有关全球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断开渠引流，这些贡献从19世纪东西半球间的敌对外交政策中就已经得到体现，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南北美洲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共御欧洲协调的外交霸权。

从短期来看，欧洲协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时太多事物的存在已危如累卵，只有这一联盟尚属安稳。用当时英国首相卡斯尔雷的话说就是，“这些大国意识到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还要承担共同的使命”。它们举行磋商会来商讨是否采取侵略性举措，甚至像俄国和英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会对自己的单方面举动再三考虑，不敢肆意干涉欧洲政务。实际上，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大国才真正地联合起来，不再各行己道。由于始终对“法国大革命”心存余悸，所有大国都会探讨所签条约是否神圣而不可侵犯，并对议会代表和工人对自身权利的诉求等不断升级的煽动性言论深感担忧，而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自由和关税改革等问题却只字不提。即便是最支持自由事业的英国也不想废除1815年对谷物贸易的管制决定。很多欧洲大陆的政治犯逃亡到英国东南部港

口多佛尔避难，后来又到伦敦街头为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自由事业发表煽动性言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能让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1848年，时任英国首相拉舍尔明确拒绝了欧洲大陆上那些备受压迫的民族的请愿，他们皆因起义反抗欧洲大陆的专制统治而四处流亡，而拉舍尔以“尊重欧洲的政治独立与自由”为由为其做出的冷漠决定开脱。简言之，英国的利益需要通过维护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力度来判定，而欧洲的利益则要视各位最高统治者的自由程度而定，而非一国的主体和权利。1831年的伦敦会议承认比利时为独立国家，与会的几位外交官这样诠释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但是整个欧洲也有自己的权利，这是社会秩序赋予它的权利。”几位外交官此番所指的“社会”仍然是指各个国家的社会状况，而不是那些危险的国内阶级斗争新争端和经济文化新冲突。

然而，那些社会力量却意欲除掉“协调”下的欧洲。欧洲协调维护的政治秩序与今日的政治秩序截然不同。如果将民族政权定义为由占主导力量的民族统治的政权，那么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属于民族政权，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接近于现代社会所理解的典型的民主政权。按照这种说法，德国和意大利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部分专制帝国、少数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一大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统治者、法律和货币。波兰在欧洲大国间的领土争夺战中被彻底瓜分，这件事情倒是生动地诠释了欧洲协调自身的逻辑，然而当民主理念传播开来时，这种瓜分他国的做法便显得越来越不道德。于是这样一个政治万花筒在“一战”时被完全铲除，“新欧洲”开始形成，国际联盟功不可没，该联盟作为反对旧世界的典范，真是既富有戏剧性又颇具抱负。直到此时，国际联盟仍在质疑一个世纪前维也纳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安排。

当时，欧洲协调所制定的秩序已是风烛残年。人们早就应当看出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已是强弩之末—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2年曾经指出这场革命是“一场反民主反自由的复辟运动”—然而如今回头去看，这场革命其实只是“末日”的开端。连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最终也难逃被放逐的命运，在新英格兰的海滨度假胜地霍夫度过了丧失权力后的第一个冬天。而第一位法国总统路易斯·拿破仑则逆潮而动，很快就称帝复辟，像他那位叔叔一样登上了皇帝宝座。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欧洲协调各成员国反目成仇，相继爆发了冲突，并愈演愈烈，这是欧洲协调走向灭亡的开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欧洲协调的转折点，这场揭幕战开启了各大国间异常激烈的新一轮竞争，民族主义思想及德意志的野心就是这场惨烈竞争的导火线，而迅速扩充的武装部队为此埋下了更多隐患。反对联盟的呼声此起彼伏，新科技带来的机械型战争更是加速了欧洲协调的灭亡。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彻底摧毁了旧秩序，欧洲协调的几大国成员于伦敦会面，表明了各国的诉求，却遭到了欧洲巴尔干半岛新兴势力的公然无视。然而，“一战”之后，欧洲协调的残留风气竟然存活了下来。新国际联盟想方设法地要结束这些陈规旧俗，而各大国却无视新规，仍在继续着从前的外交活动：1923年以中介

人身份调和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纷争，1938年又试图在慕尼黑拉拢希特勒。“现实的和平”以失败告终，它宣告了梅特涅秩序在走过巅峰时期后的土崩瓦解。在这100年里，欧洲协调尽管达成了协定，拟定了最基本的博弈规则，却仍不能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发挥功效。

但以历史的视角来看，或许这个组织也并非一无是处。20世纪中叶，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动荡，这与梅特涅时代的稳定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基辛格曾以史为鉴，试图减少这个世界的纷争；他也曾从19世纪的长期和平中发现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治国之道颇具远见。然而，基辛格并非唯一一个有此独到眼光的政治家。纵观朝鲜战争时期，仿佛只有外交手段能够拯救世界，摆脱频繁的地区冲突，相比之下，欧洲协调秩序的蓝图好像只存在于幻影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他曾评价道，“只有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找对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欧洲协调的评价大相径庭。20世纪的世界屠戮盛行，当时的那些所谓的成就却让1914年之前的观察家及评论家们大跌眼镜，深表怀疑。那么欧洲协调带来了百年和平吗？当然没有，自1848年以来，欧洲从未摆脱过战争。民族主义分子（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严词批评欧洲协调无视各国对欧洲事务自由的渴望，更不懂得如何践行自由。民主主义论者则批判欧洲协调的暗箱操作、精英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天性的镇压。像雪莱和拜伦这样的激进分子则对最开始的规模式思潮厌恶至极，以至于完全分不清谁是神圣同盟的专制统治者，谁是诸如卡斯尔雷这样的英国政客。“卡斯尔雷长眠于此，”拜伦写道，“停下来吧，过路人，看看他，赏他些尿再走。”

对于这些人以及更多想法类似的人来说，欧洲协调并没有完全领会国际政府的新理念；相反，它恰恰暴露出各种弊端—专权擅势，好为战事，忽略自由的价值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国际主义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以国际视角统驭全球

这一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尽管许多先进的种族或民族并存于世，他们团结友爱，由相同的国际法、宗教和文明凝聚在一起，却仍旧以独立民族的形式存在。

—弗兰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1867年

和谐共处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主题。《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告诫世人，“天欲善其新，必先毁其旧”，只有这样新世界才能成为“天国”，“豺狼与羔羊同饮同食”。罗马政权曾企图将整个文明世界占为己有，并只用单一的法律体系来统治，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渴望确立“上帝通法”来实现整个地球的统一治理。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和奥斯曼帝国都曾试图以同样的手段让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成为神话般的必然存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尤利西斯一语中的：“无论身处天国、地球，甚或宇宙的中心，都会有高低贵贱，优劣得所。”

然而，全世界的统治者都梦想构建一个全球化的统一社会，这种观念始于近代，是出于对中世纪统一帝国理念的不满。“多数人都惧怕‘世界帝国’这一称谓”，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谟曾写道：“如果能像上帝一样，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统一的帝国的确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人类终究是人类，手握中庸的权力，统一在基督教的团体下才能获得更多的安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则认为，正是欧洲独特的多样性激发了民众的思想意识。欧洲例外主义正是由此开始才为人所知的，在基督教国家的政治体系慢性死亡时，例外主义生根发芽，为现代国际主义奠定了基础。历经几个世纪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国王和王子统治一个国际社会的做法不再受人拥护，人们所希望的是废黜国王的神权，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世界，一个有多个社会共存的国际世界。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早期现代政治理论家，那就是：如果无惧上帝，如何能使各国统治者解重任弃王权，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国际政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无政府体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专制王权一去不返，国民再也不会是统治者意愿的牺牲品。对此，霍布斯悲观地认为，专制王权的缺失会导致冲突无休无止地延续，但是其他人则抱着乐观平静的心态看待这种缺失。那么，是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汀所说的那样，自然法则并不存在呢？早在十六七世纪时，就出现了从自然法则中演绎国家法制的想法；直到18世纪，基于对各条约和各成员平等相处这一权利的尊重，倡导和平的理论家进一步推进了联邦模式的发展。正

如马基亚维利所想，欧洲的异质特点实是优点而并非缺点，像孟德斯鸠、吉本、休谟这样的启蒙思想家都曾将亚洲的王朝与多样性的欧洲大陆相比较，当前者还在封建社会统治下停滞不前的时候，后者却在多国间进行着丰富的货物贸易和思想交流。他们普遍认为，商业能带来和平，各王权与生俱来的竞争关系也在商业的带动下相互制衡。而早期的创作家曾认为统一才是四分五裂的基督教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启蒙哲学家们比较欢迎不同政见，也并不排斥一定矛盾的存在，只要其有利自身即可：一定程度的宇宙和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同时，竞争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推动社会创新，挑战现状中的不和谐因素，为社会带来发展进步。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如果冲突是各国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它并不是什么坏事。

批判家指责说，人们所追捧的政治力量均衡旨在稳固社会现状，而他们对社会、对变革的需求却只是轻描淡写。卢梭孤注一掷地强调只有严格的联邦体制才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由于人们难以想象还有比瑞士共和国更大的国家的存在，所以欧洲必须走向分裂。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认为欧洲大陆上的王国数量层见叠出，以至于持久的和平难以为继。佩因由此发表了有关美洲差异的早期论断，认为美洲大陆就是“人类的救济院”，是躲避专制暴政和残酷镇压的避难所。法国大革命无疑加剧了欧洲大陆的残暴行径。革命理论家认为，旧制度的制衡体系已然没有任何回旋之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才是“人类真正的益友”，它将引导欧洲走向新的道路。而对于反对革命的人士来说则不然，拿破仑只是一个世界帝国的新型复辟者，他意在建立一个世界王权，以便统驭整个欧洲。在这个百家争鸣的启蒙思想家时代，激烈宽泛的辩论一时间风起云涌：首当其冲的争论焦点就是欧洲政治，其次是整个世界的政治本质。其中有两个政体设想由此起源。第一个设想是将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区域，每一部分设立各自的法规、条例和机构；与前者对应的第二个设想是各区域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统治领导的，这一统领无关上帝，更无关自然法则，是由人类自己进行统治。

康德在1795年发表了一篇经典的文章，探讨永久和平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触怒了本国君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因为他的言论违背了国王的宗教主张，而事实上，康德的学术著作大多都无关政治。在当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波兰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欧洲最大王国竟被其邻国瓜分殆尽，顷刻间消失在欧洲的版图之上。这些冲突的发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18世纪时，那些主张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对欧洲文明的温和本性太过自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康德发展起自己的思想，其通往和平之路的理论因此闻名于世，随后的几代思想家在对世界政府的研究过程中深受其影响，他的理论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20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理论家借用康德的理论制定了激进的外交政策，即美国将以和平为使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思想，帮助各国加强民主建设。对于后冷战时期，康德也与启蒙思想先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看好民主这回事，在他看来，政客们的政策远水难解近火，

不能快速解决问题，当然也不能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自由国家和非自由国家。受到传统的阶级思想影响，康德认为共和国而非民主政治才是通往和平的正确道路，这是因为有效的权利分割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实际上，像许多启蒙理论家一样，康德将民主政治单纯地看作一种集权政体，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权利分割，民主政治极有可能演变成复辟的专制制度。康德解释说，共和国才是和平的拥护者，理由显而易见：在共和国体制下，人民才是奋争和平的主力军，而非雇佣兵。一个依赖职业军队的民主政权根本无法将老百姓带向太平盛世。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的是，康德对国际法法学家怀有极重的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法学家只为大国利益效劳，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和平事业毫无意义。实际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只是暂时制止了暴力行径，这种做法非但不利于和平，反而成了和平进程的巨大阻碍：

> 人们自相残害，消灭暴政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取灭亡，他们踩在自己的坟墓上寻找着永久的和平，万国公法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这些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在国与国的冲突中，除了发动战争这样的非法途径，再没有其他合理之法能够解决争端。除非他们愿意像单个的人一样，放弃法律不认可的自由，去适应公法的条条框框。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度，最终统一世界上所有的大小国家，使之在同一国度和平共处。但是从国家的法制角度考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同时又拒绝将正确理论付诸实践。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世界共和”的积极思想就会被取代，随之而来的将是历史的倒退—复古的联盟组织，这样的联盟总是危如累卵，处在瓦解崩塌的边缘，即便他们会制止战争，也还是会忍受敌对势力的反动行径，听之任之，不断做出妥协让步。

因此，康德认为，仅仅以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各国同盟根本无法最终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模式。在一些国家结盟并且不断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过程中，他的一些观点也逐一得到了印证。他指明，没有任何理论体系能够指导这一过程；在这个年代，我们还不能轻而易举地将“组织”问题理论化。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康德认为商业并不是文明的表现，他对欧洲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不抱任何幻想。他批判道：“商人所到之处，无不落下昭著臭名，狼藉声誉（他们的行径同侵略相差无几）。”总体说来，康德的想法就是“世界共和”的发展必然会走向繁荣强盛，主要是因为各地的人们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思考，他们就会发现共和才是人民的利益所在。因此，在康德的文笔中不难发现，他并不认可人民民主世界的言论（这一言论为布什总统所推崇），也不赞同全球一体化信仰者的自由贸易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强烈批判了18世纪末欧洲的政权体制。如果当时的欧洲能走上改革之路，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繁荣富强、颇具影响力的世界领袖，那么人类的发展进程也将随之大踏步地前进，和

平也会与自由和理性一道并驾齐驱。严格意义上说，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认为这一道路的发展进程需要依托理论思想，但身为唯理主义者的康德也同样坚信理性终究会为人性所有，为人性所用。

这些论断对大革命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言貌似已经有些过时了。谈到康德对普遍理性的信念，这些思想家们就会还之以颜色，列举出感性和情绪的重要性。说起康德的世界观，他们则更偏好欧洲一体化和精忠报国的理念。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发表了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论断，他指责大革命就是“破坏欧洲社会的残暴手段”，其中，他所认定的“社会”这一概念，其设定基础并不是理性依据，而是感性依据，是出于对古王权机构的信奉者和宗教信徒的信仰的尊重，而大革命残忍地摧毁了人们对信仰的尊重。伯克认为，变革就是“世界整体的全面分裂”，礼节、习俗和情感这些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变革中受到了激进粗暴的革命情绪的全方面威胁。因此，伯克对变革的批判无关旧启蒙运动愿景中利欲熏心的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针对虚构而出的仅凭感觉和展望达成的统一联盟，这种联盟是对未来欧洲不切实际的缥缈幻想，只是被人为地赋予了传奇色彩罢了。年轻的德国神学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在17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重拾遗失的民族精神，很久以前的欧洲曾是那样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那时，“在这个饱含民族精神的超级帝国上，即便是最边远的地区也会参与到共同利益的谋划中来”。诺瓦利斯认为，欧洲应该摒弃哲学思想和启蒙思想，回到中世纪，传承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和“更加纯粹的宗教”。他的语句旁征博引，颇有深意，他认为世界和平注定只能通过理智的方式实现。“当前这些大国不可能自觉地进行权力制衡。一切和平都只是幻影，不过是暂时休战罢了。从各国内阁的角度来看，形成共同意见实为不易，因此一体化着实难以实现。”在诺瓦利斯看来，不管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人士，他们的诸多诉求都是颇有见地并且大有裨益的，在世界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驱动下，双方必定会共同推动这些诉求的实现。因此，只有信念才能调和敌对双方的矛盾。“只有无条件的信任才能获得救赎，可是究竟怎样让人们像信任上帝的统治一样信任如今的政府呢？”

边沁创造了“国际”一词，在神学主义强调回顾并坚守曾经的信念、教义和上帝之时，边沁表示极不认同。尽管边沁在恐怖袭击的前夕获得了法国国民议会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但他仍然对法国大革命提出过批评。他并不赞同伯克的保守主义观点，也不认可反革命分子的感情用事。他坚持认为，不能将整个世界的种种问题与欧洲统一问题混为一谈。边沁最初很支持法国大革命，但后来革命态势毫无节制，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他开始严厉批判革命，在态度转变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行政合理化，这一观点将激进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思想融为一体，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始终保持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边沁曾试图探究物质和意识的本原问题，也曾努力研究过哲学和形而上学对感觉和量化等问题的影响缘何在不断减弱这一问题。他尤其注重法律的地位，使之具有更新更强大的哲学基础，并成为政府的坚强后盾。

边沁之所以创造出“国际”一词，缘起于他极不认同自己在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的观点。这位老师就是令人敬畏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其著作《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在当时红极一时，堪称全球律法的范本，其倡导的普通法因此广为人知，备受追捧，表面看来可谓一呼百应。而边沁却极少研读普通法，他认为普通法混乱无序，不值一读。1775年左右，边沁在一份未公开出版的手稿中批评布莱克斯通对“国家普通法”的褒奖言过其实。所谓普通法不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法则”吗？边沁和康德一样，认为普遍法得到认同就等同于法律不存在。不然普通法就是条约和外交协议中的明文规定，通常这些也都不算作法律吧？边沁对学术上的不满让他把精力投入到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的创作中，在这部史诗级著作中，他首次向读者介绍了“国际”一词。

至此，一种新的统治理论将法律与哲学有机结合起来。边沁认为，要改善英国政府混乱无序、濒临崩溃的状态，首先要着手健全法律体系，而严谨精确的哲学理论就是制定法律的必要依据。所以，边沁的这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以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理论开篇。他提出人类是按照痛苦和幸福指数来判定一项举措正确与否的。功利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总量，把痛苦降到最低。对个体而言，两者皆可量化，当然对决策者更有价值的指数是群体指数，这也是可以量化的。随后，他开始着手解决一直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对法律体系的分门别类。边沁认为，统治只能分割成两个层次，行政和立法。对于哲学家而言，后者无疑更加重要，因为只有立法才能解决本质问题，而行政只能用来解决临时问题。

在法律分类这一问题上，边沁从哲学层面介绍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法律概念的不同之处。在意识到部分读者可能对新词条困惑不解后，边沁立刻加了脚注做了补充说明：

> 尽管人们希望“国际”这个概念简单易懂，但必须要承认，这毕竟是一个新词，对它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已经用来指代法律的一个分支了，名为“国际法”。这种说法并不具有典型性，若非存在惯例的效力，它倒更像是指代内部判例。

在原书中，边沁似乎只是想阐明这两个术语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对“国际法”一词的原有界定含糊不清：人们需要弄清两件事，一是国内法律和国与国之间法律的明显区别；二是民事纠纷（也就是合同纠纷）与国家间的主权纠纷的差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边沁没有明确说明，就是“各君主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即是否属于国际法范畴？有一种说法是，国际法就是各国意愿和话语权的体现，是一种“伪法律”。最认同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或许就是边沁的弟子约

翰·奥斯汀（John Austin）。边沁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用功利主义理论解释了这一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忽视国际法的立法而只重视国内法律的建设，那么直接后果就是被其他国家占尽先机。"由此看来，由懂法之人策划的国际法律新体系可以为世界所用。他写道："如果眼下必须让某人来编纂一部通用的国际法典，他会以什么为标准来完成呢？自然是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平等权利和共同利益，这也是他作为立法人该有的想法和职责。"当然，首先需要一个国际化思维的社会科学家对全世界的需求指数做出积分运算，文化、地理、气象和其他影响条件的变化指数都需要考虑在内。

这样的法律体系再不是康德所不齿的那样仅是权势的口舌，它必然成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必要基础。制定国际法典的想法让边沁触类旁通地提出了设立国际法庭的构想，国际法庭会对国家间的纠纷做出裁决。在其所著的《普遍永久的和平计划》（Plan for an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一书中，边沁具体描述了这一构想。边沁通常会将晦涩的理论与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他从中发现国际法的"编纂"（边沁创造的又一新词）就是通往世界和平道路上的垫脚石。自此，法律体系得到完善，边沁的法律思想理念广为流传，成为18世纪国际法学家的主流思想之一。

边沁的这部经典作品从首次发行到推出新版本，前后相距近40年，书中所创之词在昔日尚属新词，而今已然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汇。对此，他成就感十足。1823年这部作品再版时边沁曾写道："书中提及的'国际'一词已经完全融入今天的语言体系中，看看那些评论文章和报纸就知道了。"而边沁的追随者们则乐此不疲地继承着他的思想，他们还积极参与到刚刚独立的希腊和埃及的现代化建设的规划中。在一些南美洲国家，边沁理论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争论不休。而南美各国的大部分宪法及教育问题也乱作一团，两个派别各执一词，互不相容。到19世纪中叶，"国际"一词已经发展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派别，和职业技工与资产阶级、制造业与商业的崛起息息相关。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形式就是后拿破仑复辟时期兴起的社会哲学。

于是，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及其副作用催生了"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公众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有位不同寻常的政客一鸣惊人，此人名为阿贝·德·普拉特（Abbé de Pradt），为人机敏善变，他尤其反对本国国王的恶劣行径，用他的话说就是，国王的军事理念使欧洲"满目疮痍，死伤无数"：他号召胜利方摒弃"尚武精神"，返璞归真，让欧洲重新回到"公民国家"的时代。随后，他又说，人们应该意识到公民意见作为一种新权威正在崛起，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文明（这种文明又被普拉特称为"神性"），专制独裁才彻底丧失了法律根据。这种文明赋予了人性思想以新的内涵，让战争变得臭名昭著。但文明与新型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主义、真理、公众性并称为三大旗帜，引领世界走向未来……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尊严。"民意的巨大力量夺取了独裁者的王权，而

这正是人类美好未来的旭日之辉。

多米尼克–乔治–弗雷德里克–迪富尔·德·普拉特（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ufour de Pradt）履历丰富，他曾是革命三级会议上忠诚的君主主义者、普瓦捷教堂的主教、拿破仑时代与梵蒂冈调停的谈判官，还做过法国驻波兰的大使，可是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找到机会来鼓吹和宣扬自己的理论。所以若不对欧洲民众投其所好，他将一无所成。（他的政治生涯顶峰就是在法国复辟后当选了自由党的副主席。）他对拿破仑专制王权的批判以及对曾挫败他的欧洲协调及其保守主义的鞭笞为他赢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思想'的迅猛发展让各国统治阶层应接不暇，因此，各大国曾试图利用国会肃清前路。"1823年的《文学报》（Literary Gazette）如是评论道。但民意的强大力量宣告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人民联盟"的原则受到了政治理论家的广泛赞誉，因为这一原则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欧洲君主为处理欧洲事务所设立的会议联盟和议会制度也为反君主制的民众所用，并将其改进成了开放的民主政治论坛。很快，许多互不相干的团体开始举办见面会、组建联盟组织。直至1848年，"民众的力量"已经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因此他们彻底放弃了对这种政策制定模式的管制。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Frederick Augusus II）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写道："诸王侯贵族代表大会与人民间的巨大分歧由来已久，民众对这样一种阴谋式的聚首总是多有责难。"梅特涅的多种阴谋论反被民众所用：现如今世道变了，国王惧怕人民的谴责，有一股不能掌控的力量左右着现今的政治形势。国际主义的现代含义是国家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合作，而那时这一概念则意味着抛弃边缘思想，向主流思想靠拢，王权不得不适应这个选民和议会力量强盛的时代。

边沁去世两年后（也就是第一艘汽艇横穿大西洋后），有一部小说巨著在巴黎出版。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国际主义（或者说是边沁）对欧洲未来世界的构想。费利克斯·博丹（Felix Bodin）于1834年出版的著作《未来小说》（Le roman de l'avenir）再一次掀起了国际主义的思潮，国际主义就从法属阿尔及利亚和中美洲的中心城市相继兴盛起来，万国大会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举办。不断变换地点的世界会议（有时在飞机上，有时还会在船上）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在一起，使"当代最著名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企业家以及政治家"齐聚一堂。

博丹的作品洋溢着未来主义色彩：飞行机器的描写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大胆预言女性将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终将衰败；巴比伦帝国会以新的面貌重现历史舞台；犹太王国即将创立于世。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新奇想法都基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幻想出了一个全球模范政府作为统领者，引导世界走向未来。从这层意义上看，博丹才是边沁的真正追随者，他穷思极想地描绘出一个幻想的未来蓝图，以便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雏形，而不仅仅是一些"精辟理论的再演绎"。

1771年，法国剧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en

Mercier）的经典空想主义著作《2440年》（L’an 2440）问世，将这部作品与《未来小说》相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自有史记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人类的思想智慧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在梅西耶的空想世界中，只有解散军队、废除奴隶制、解散神职人员、取消税赋才能实现和平，但书中的背景却设置为法国开明王室领导下的理想化城邦。在梅西耶的假想中，不存在国际主义衍生的政治问题和对国际主义的憧憬，这与博丹的描述截然不同。换言之，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间，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协调的灰暗背景下，人们还是萌生了对国际政治的憧憬，国际政治为人们带来了文明的社会氛围，不同的种族、信仰甚至不同的统治手段都能和谐共处，这是前所未有的交融景象。不只如此，这段历史还能映射更多事情，博丹的书中说道，哪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人们对未来世界仍会怀有更多的贪恋，因此他建议正确地看待国际主义。

1839年，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cois Arago）激励人们：“让我们尽情地展望未来吧！”在随后短短的10年间，他成了革命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时，研究欧洲越洋移民史的历史学家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殖民地边界地区，曾经昙花一现的或亢奋或萎靡的精神力量需要人们予以更多的关注，这种精神力量是押给未来的一种赌注。在这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时间和空间越发紧缩，促使这一力量在19世纪瞬时爆发。这种“未来思维”带动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在各类投机活动和土地掠夺过程中，人们利用未来思维思考问题，并因此在难以避免的残败和失望中浴火重生。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未来思维让人们坚定信念。横贯大陆的新型通信基础设施不再是幻想，接连不断的技术创新屡创奇迹。梦想中的未来驱使几十万的欧洲人远走他乡，并期待着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或是南非、澳大利亚、查科的高地农田有所作为。

在这个时代，移民趋势的强劲发展逐渐促成了一种文化，人们越来越看重世界一体化的思想观念。同时，这种观念也引起了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对横跨大陆旅行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时，地理学科腾空出世。地理研究注定会得到政府的大力赞助，一方面，地理作为一门实地考察性科学，是进行军事侵略和获取军事情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地理研究为全宇宙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指南。这是世界地理发展的强盛时代，多家地理周刊畅销全球，例如法国的《环游世界》、协会组织创办的《国家地理社会》等。专门设立的国际测量协会绘制出更精确的世界地图，其科学使命就像无数的考察团和探险家一样，就是为了将世界各民族的思想观念传播至地球的每个角落。这一时期的学术地理界名人辈出。从20世纪的地缘政治学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到语言优美的三卷本《人类历史》（History of Mankind）的作者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雷茨尔（Friedrich Ratzel），再到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普遍论者埃利泽·勒克吕（Elisée Reclus）和彼得·克鲁波特金（Piotr Kropotkin）。左派激进分子认为民族主义的存在原因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地理”一词，地理正是人类部族多样性的体现。这个时代里，学校的墙上贴满了世界地图，中等家庭家中摆放着地球仪，报纸

对去往非洲腹地的大使和官员进行频繁的报道，这一切都为19世纪末对未来政治的全球化意识做出了贡献。在各国瓜分非洲的大背景下，新闻工作者描绘了英国扩张的蓝图，拟订了成立统一联邦的计划。在他们的构想中，七零八落的各个帝国将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政体，政治一体化指日可待。

科学是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有力助推器。1889年，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大力表彰了新成立的英国电气工程学会的伟大发明—电话。用他的话说，电话连通了整个星球，连通了全人类。有了电话，人类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各地的即时新闻、人们的言谈举止尽在掌中，更重要的是电话还可以对此时此刻颁布的政策进行即时分析判断。在汽船、火车、电话、飞行工具、生活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全世界的感知交织交融，密不可分，难以预料的科技进步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科幻冒险游记小说的大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中描写的机动旅行、乘坐潜艇和搭乘热气球，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为科学潜力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为世界文明的变革树立了目标。正如凡尔纳所说的那样，科幻故事中的科学技术为人类统一的国际视野提供了无限想象，并“创造”了大量广泛流传的运载工具。

因此，未来主义小说绝不仅仅是一抹盖住社会经济汹涌暗流的文化泡沫，也不只是文过饰非的华丽辞藻。相反，如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所说，许多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多有所指摘，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伪科幻小说”。然而，就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一社会功能看，这些作品即使无法超越其他文学流派的作品，其作用也是可以与之比肩的。这一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要架空现有的一切，做到对未来绝对的心无旁骛的想象，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惯性思维和旧有习惯带来的思想禁锢。“让我们在这人类统一和宗教共存的美好时代安然地离去吧！”1890年，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如是说。几年后，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提出了与过去的思想完全相左的决定论：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是未来，而非过去。1896年，他在《未来历史片段》（Fragment d’ histoire future）一书中描述了自己构想的世界联邦。

直至19世纪末，蓬勃发展的大量未来主义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国际主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大胆预测，其中多数作品都是对欧洲紧张的战争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的描写。欧洲协调分裂成一些极具竞争力的联盟体系，各国政府为军队建设及增强更具杀伤性的科学技术提高了税赋。小说创作与时俱进，而未来的国际政治形势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明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英国记者乔治·格里菲思（George Griffith）。格里菲思对年轻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影响深远，他是一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儿子艾伦阐明了小说和科技的密切联系，立志想要做一名劳斯莱斯轴流式喷气发动机的工程师及开发人员。格里菲思本人不仅打破了环球旅行的世界纪录，还撰写了《革

命天使》（Angel of the Revolution）一书，书中罗列了1892年发生在世界无政府主义最恐慌时期的奇闻逸事。在故事中，“自由兄弟会“是一个由年老的俄裔犹太人和他的女儿娜塔莎（Natasha）领导的恐怖组织。在两大主要政治联盟发动的一次战争中，欧洲各国被瓦解，这一恐怖组织成了新一任掌权人。他们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该技术的年轻发明家爱上了娜塔莎），并逐渐壮大起来，恰逢此时在美国发生了影响广泛的捍卫华盛顿政府权力的起义。最终他们利用承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飞艇征服了世界，并说服英国人一同前来建设美洲。飞艇、无政府主义、美洲人以及获益的英国人：与伦敦破败的郊区相比，这些才是典型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构成因素。

从全球视野来看，欧洲协调留给世界的是科幻小说巅峰时期所体现的世界观，同时留下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特雷梅因（Tremayne）在伦敦外交会议上那番激动人心的发言，他富有远见地探讨了世界大战的危害。作为革命领袖，特雷梅因为欧洲战败受辱的君主列举了兄弟会的主张—普遍性裁军、土地重新分配及设立国际警察机关，对此，德国皇帝提出了异议：

> “据我们所知，盎格鲁–撒克逊联邦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世界，所以，他们一直在以一个统治者的姿态向世界人民宣传他们的专制手段。我的说法没错吧？”
>
> 特雷梅因沉默着深鞠一躬，继续说道—
>
> “但这一说法无疑否定了除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所有民族的自由。我难以想象，出身自由的人们经过多么艰苦的奋斗才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他们会屈服于这种专制主义的做法吗？如果他们拒绝如此会怎样呢？”
>
> 特雷梅因快速起身，转向德国皇帝，皱紧眉头，目露凶光，对着他说—
>
> “如果德皇陛下您非得称之为专制主义，那么请您记住这是和平的专制而非战争的专制。只有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和将刀尖指向同胞的野蛮家伙才会深受其害……
>
> “您想谴责的只是您失去了暴力侵略的权利。那么现在，最后给您一次权利！就在这，就是现在，您敢不敢发誓您并不知晓联邦理事会的霸权阴谋，并承受您所说之话带来的后果！……”
>
> 这一番意味深长而又直指要害的发言让德国皇帝翻然醒悟。他想起自己的军队被消灭，最坚固的壁垒被拆毁，国库财政大幅亏空，大批男性子民在战争中被残忍杀害。想到这里，他嘴唇发白，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捂住脸颊，发出了轻声的啜泣。这是军国主义思想对新型和平专制主义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抗议。

格里菲思的理想世界是通过革命武装实现和平的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噩梦。毕竟，每每想起欧洲协调和神圣同盟建立的欧洲秩序走向最终灭亡的情形，就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被废黜，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和犹太人成了胜利者。保守党认为，格里菲思的“和平专制主义”说法并不是乌托邦的再现，而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独裁手段，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在格里菲思所述的逸事中，俄国恰如其分地扮演着反派头目，书中讲述的故事是从沙皇秘密警察最保密的休息处得来的。一般来说，人们对反革命警察的奇闻轶事并不陌生，因为这正是《锡安长老会议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所讲述的故事。格里菲思写《毁灭天使》（Angel of Destruction）的那几年，恰逢奥克瑞那警备队（俄国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组织）陷入了与席卷欧洲的无政府恐怖主义的无尽斗争之中。书中的锡安长老设想着有一天非犹太人“被彻底征服，并将其与生俱来的国际权利交给我们，利用自然的地位，让我们能在不使用任何暴力手段的情况下一步步地吞并世界上的所有政权，成立一个超级政府。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名为“超级政府管理协会”的威慑性机构替代现如今的统治者。该机构的职权如螯钳般伸向每个领域，其组织机构庞大异常，征服世界各国无往不利”。《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中描述的超级政府统治方式为：告知人们他们将受政府的保护和照顾，从而让人民欣然接受超级政府的统治；防范恐怖主义未雨绸缪（这一方面，小说映射了现实：奥克瑞那警备队会秘密引爆炸弹以使人民产生反恐意识），进而使统治者有机会展现自己具有保护人民的能力。经济学家会向公众解释接受超级政府统治的必要性。因此，超级政府唯一的威胁是来自皇室王权的遗风和国民暴徒的盲目情绪，但是真正的危险则是这两者将走向中和。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也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书，文中，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取得的每一次发展—从立宪主义、新闻界的发展及扩大的参政权一直到国际仲裁机制的发展—都看成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并为之欢呼雀跃。这些情节的描写引人入胜。故事的结局是政变推翻了专制独裁的世界政府，却拥立了“一个凌驾于整个地球之上的国王，他将统一全世界，从根本上消除世界分歧—国界、民族、宗教、国债”，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它的政治体制虽经过处心积虑的谋划，但它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无尽的暴政。知识分子是愚忠行为的最后践行者：到19世纪末，即便是激进的国际主义反对者也不由自主地开始以国际主义视角思考问题了。

第二章 兄弟般的情谊

我看到旧时贵族领地的边界被打破，

我看到欧洲国王的标志性建筑被夷平，

我看到普通民众开始打造自己的家园（其他一切都要为之让路）。

所有国家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吗？世界各国都会同心协力吗？人类在组建一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吗？看！暴君在颤抖，皇室在陨灭。地球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气势汹汹无法阻挡。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现代岁月”

和平运动：维护世界和平

19世纪上半叶，最热切的国际主义者大都是福音派基督教徒。一位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曾写道："无论是哪一派基督徒，只要他们认为《新约》优于寓言，就有可能认为只要帝王还存在，世界就不会和平。"拿破仑溃败之日也是福音派的期望重燃之时。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的基督教徒们认为周遭的重大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是千禧年到来的前兆。借着海外欧洲势力增强之势，基督教徒们忙于传播他们眼中的文明，为此开设学校，四处分发《圣经》，并发起反饮酒、反奴隶制的运动。1815年《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规定贩卖奴隶为违法行为，反奴隶制运动初获成功。

但是，维护世界和平才是他们的长远目标。过去20年间，洲际战争频发，国内一片萧条，英国的反对者及一些福音派教徒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816年建立了"促进全球长期和平协会"，并称该协会"致力于反战活动，不会弄虚作假"。美国和平协会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除了这些国家级的反战组织之外，还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和平组织，这些组织遍布英美两国。不论意在批判特权还是希望拥有特权，这些和平主义者都给当时的政体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新生力量。当时的人们将这些特定人群定义为"组织狂热者"，他们是最早的"组织狂热者"之一，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具有这种热衷于组织的精神，并称在民主国家出现这种现象十分平常。民意作为新生力量倍受重视，他们这些积极分子认为，"从长远来看，民意才是治国之本"。他们每年都会印制大量小册子，在"伦敦和平协会"成立的第一年，大量小册子被分发出去。他们热情激昂，想着"虽然我们看不到上帝，但他会化身为人，带领他的子民征战，到最后，王位和荣耀、胜利和欢乐都将属于教会"。和平成为这些积极分子的信念，他们看不惯那些"不付出任何努力，只等着上帝帮助的人"，并认为自己的努力已见成效，"民众的思想已有所改变，战争精神已烟消云散"。

虽然这些积极分子组织一次国际会议颇费周折，但是他们组织的所有会议都具有开创性，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纷纷仿效其做法。1840年在伦敦，和平主义者首次召开"反奴隶制大会"，随后的10年中他们发起了十多个国际会议。三年后，应"武装共济会"要求，"全面和平大会"在伦敦召开，相当多的美国人出席会议，这表明自此之后英美两国的和平主义者联系日益紧密。会议发起人称"英美联合"是代表上帝"向全人类播撒文明的种子，传播基督精神。这是一项充满爱的伟大事业"。和平主义者的脾气秉性、行事作风以及工作地点与欧洲协调的政客没什么不同，而且在对世俗权威的态度上，他们内部成员之间也普遍存在着矛盾。在《致全球文明社会政府》（Address to the Civilized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一文中，他们敦促欧洲政客按照规定停止战争。他们试图影

响精英政客们，却又不相信他们，于是提议“为维护全球和平成立中央警戒委员会”，用民意对抗那些试图用战争维护和平的官员。

“博学铁匠”伊莱休·伯里特（Elihu Burritt）原是一名铁匠，后经自学成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名记者，他精通15种语言，是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外交原是贵族精英的职责，但他倡导“民间外交”。1846年8月，伯里特在“世界禁酒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兄弟联盟会”这一概念，并在自己的报纸《基督徒公民》（Christian Citizen）中宣扬和平主义的宏伟事业。梅特涅此前对欧洲内部动乱的暴力镇压为伯里特宣传和平主义奠定了基础，他很快便同贵格会以及渴望自由市场的商人结成了同盟。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签署了3万份文件，期盼着这一运动能够扩散到欧洲和美国。伯里特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站在同一战线上，因为如果他们不再彼此对抗，挑起战争的阶级集团就会遭到极大的阻碍。马克思当然愿意认同伯里特的看法，而且会在批判资本家和工业化的时候采用这一观点。

和平运动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也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随着梅特涅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渗透及184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和平会议（因当时巴黎正在闹革命，因此会议改在布鲁塞尔举行），和平主义看到了希望，并得到了有力宣传，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末达到全盛状态。1849年年初，新任法国总统路易斯·拿破仑的一系列举措更加鼓舞了这些积极分子的士气，他主张各大国解除武装，表示如果英国愿意这样做，法国就会无限降低海军军事装备水平。拿破仑认为这是拉近英法关系的时机。尽管拿破仑的提议可能与和平运动没什么关系，但这至少说明了和平运动者的想法并非不切实际。英国拒绝解除武装的做法没有削弱他们的和平信念，法国随后还是坚持单方面宣布减少武装支出。一位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迄今为止，正统外交家及民间和平推进者一直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而此刻他们第一次有了交集。”

1848年欧洲革命带来的改变初步显现，法国渴望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成为引领变革的主要势力。1849年8月，一次重要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负责在奥赛码头迎接各国代表，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和英国自由贸易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这样声名远扬的人物也出席了会议，以示对拿破仑的支持。与会者中也有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士，比如“美国和平协会”代表威廉·韦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他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奴隶家庭，他们的到来印证了和平运动缘起于平民这一说法。1815年，以梅特涅、卡斯尔雷、塔列朗（Talleyrand）以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列强在此建立了强权统治。而如今，同样在这个城市，生于奴隶家庭的人都可以作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这意味着国际政治出现了新模式。

布朗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被誉为第一个著书立说的非裔美国人。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巴黎和平会议开始时圣塞西莉亚礼堂里空前盛大的场面：好奇的法国观众一拥而入，礼堂里有给尊贵代

表准备的带沙发的包厢，台上挤满了来自欧洲6个国家的代表，大批议会官员进入会场，维克多·雨果发表了“最令人难忘、最意味深长的讲话诉求和平”。雨果期望有一天欧洲各国可以放下武器，成为兄弟，那时“开放的贸易市场和开化的思想交流”将是“唯一的战场”，他称19世纪为“令人惊奇、为人敬仰的新纪元”，这段时期内国际争端会平息，政治经济、科技、工业、哲学、立法将举步向前，最终形成繁荣和谐的景象。布朗在日记中提到：雨果的演讲激情澎湃，“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绅士对他的朋友说，‘他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他讲得很好，不是吗？’”

不过，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布朗参加和平大会。“那个黑鬼还是回他主人的农场干活去吧。”他的一个同胞嘟囔着。有人回应道：“‘美国和平协会’怎么想的？怎么派个黑鬼来巴黎参会？”相反，欧洲自由主义者对布朗还是很友好的，托克维尔夫人也十分和蔼。布朗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会议的政治模糊性，也就此完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重点批判了这次会议禁止讨论实事这一规定。组织者极有可能会将取得的进步归功于“上帝的福祉”，滔滔不绝地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及和平准则的宣传”辩护。但他们一方面由于担心组织内部不够团结，不敢得罪那些法国主办官员；另一方面又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得到更多尊重。几个月前，法国出兵意大利，以期重建教皇制度并扫除罗马那些由加里波第（Garibaldi）和马志尼（Mazzini）领导的共和党人。对于这一言行矛盾的做法，该会议的主办方却要求与会代表集体噤声。布朗说：“他们给自己的嘴上了锁，还把钥匙交给了政府。” 实用主义的精神让各国的决议更加多元化。原先全面谴责战争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可以根据当前局势选择是否要批判战争、减少军事支出，“多国代表大会旨在推翻现行国际法并成立一个可以处理国际争端的高等法庭”。会议领导人似乎当时就预见到70年后凡尔赛也将召开会议，届时将会建立一个符合他们诉求的组织。

因此，对和平运动组织者来说，那时的各种起义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果他们反对战争，那么和平伟业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就像1846年的波兰那样，他们能容忍这一幕两年后在欧洲重现吗？1849年年底，匈牙利政治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抵达伦敦时，前来迎接他的人很多，他用一口莎士比亚腔的英语煽动起民众的反俄情绪，这触怒了维多利亚女王，甚至险些导致英国政府的分裂。于是和平主义者开始探讨是否要帮助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受压迫的国家。但其实布朗早已指出，当意大利人加里波第和马志尼这两位为伦敦争取自由的勇士遭遇袭击时，这些和平主义者却卑鄙地选择了沉默。拿破仑在法国发起武装政变，这不仅令英国感到担忧，还招来新一轮反拿破仑运动，战争的号角越来越近。拿破仑的反对者们称：现在看来，拿破仑之前支持和平运动的做法只是在装模作样，这一点与他的修正主义现实政治理念如出一辙。

和平运动大势已去。而和平主义者的法兰克福聚首吸引了美洲原住

民首领卡波卫教士（Reverend Copway）前往，这也是那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他以“伟大精神”的名义向与会代表传递了和平的信号。1851年，情况有所好转，那年英国在伦敦水晶宫举办世博会，4 000多人来到伦敦爱塞特厅参观、沾博览会的光，和平会议第一次如此吸引国际关注。尽管如此，在布朗这些局内人看来，和平运动仍然气数已尽，这次会议本身还不如此次展览有纪念意义。确切地说，这次展览其实是一次伊莱休·伯里特“兄弟联盟集会”，一次废奴主义者的集会。“美国流亡奴隶”聚集于此，这是“伦敦最大规模的禁酒主义者集会”，大概有15万～20万参观者排着队整齐地进入展厅。

来伦敦参加1851年和平大会的美国人中有当代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而那些“伯爵、公爵、将军、诸侯”都转而支持别的运动了，所以并没有出席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将民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令格里利感到震惊。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和平运动者比任何一个宣传基督教的宗教组织成员都更详细地解释了基督教徒的组织力量。同布朗一样，格里利也察觉到了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对暴行的默许，他们默许欧洲现状，容忍“专制君主”的存在，无视他们对“被压迫国”的欺凌。会议称干涉国际事务“最易带来痛苦和战争”，因此除了谴责殖民主义、要求解除武装外，他们还提出要坚决保持中立，不卷入任何国际纷争。他们以为公众会支持他们，但大家对这套说辞并不买账。此外，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唤起了英国对沙皇俄国的仇恨，加速了和平运动的灭亡。1857年，和平大会委员会解散，而在美国内战期间，这些和平主义激进分子大都支持北部。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说明事实并非福音派和平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战争精神尚未根除。相反，俄国与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成为敌对势力，“欧洲协调”自此分裂。克里米亚战争掀起的战争热潮使波罗的海至高加索地区陷入了长达三年的流血冲突，人们都害怕波兰人与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会陷入一场更惨烈的战争。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缓和了当时动荡的局势，战争暂时停息。但是几年后，俄国入侵高加索，成千上万的山地人逃亡至土耳其，为之后巴尔干半岛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西欧再次陷入暴力冲突。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基督强硬之风初现，教堂中回响着“前进，基督教战士们，向战场进军”的旋律。大环境改变了，国际主义者的态度也不像原先那样激进了，他们实行“曲线救国”，另寻和平之路。他们尝试建立新的体制，减少对公共舆论和上帝的依赖。学会了更多地依靠政治手段后，他们几乎找到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这非常符合他们的理念，即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另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英国议会中的激进人士理查德·科布登是著名的自由贸易推崇者，1847年夏，他应邀前往维也纳，同年长的梅特涅首相共同进餐。身披荣耀的他身负重任出访欧洲。在他的领导下，英国议会刚刚废除《谷物法》，该法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制定，通过限制谷物进口来保护英国农民的利益。《谷物法》废除后，商人、制造商、工人以及记者备受鼓舞，联合起来为自由贸易造势，新创立的《经济学人》杂志就是他们的传声筒。科布登被誉为推进政坛重大变革的第一人，他向世界展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新兴阶级是如何快速掌权的。他成功地将空想国际主义最成功的变体推向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政治。

在现代人眼中，自由贸易就是各国寻求自身利益的借口，是任意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开启国外市场大门的攻城木。尽管自由贸易还伴有关税、技术出口等各种支出，但其实它还有很多伟大之处未被其支持者发现。从科布登到一个世纪后的"田纳西州的科布登"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此人还是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再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家们，他们都将自由贸易视为加强人际沟通、促进世界和平的手段。其拥护者称关税将导致孤立和战争，开放经济则会带来繁荣与和谐，他们将贸易往来视为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节剂。皮尔（Robert Peel）爵士说过："贸易往来是推进文明进程、消除国家间嫉妒情绪、维护全球和平的有效手段。"

科布登1847年的欧洲之行彰显了他的雄心壮志，国际合作与国内改革的内在关联也在此次欧洲之行中显现出来。科布登认为英国已经走在改革的路上，而他的职责是带领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他曾访问北美，听闻美国为响应他废除《谷物法》的决策而降低了本国关税，他很受鼓舞。美国这样做意义重大，因为在鼓吹"保护主义"精神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宣传力度在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之上。然而，推行自由贸易最重要的战场是欧洲，而维也纳又是欧洲的心脏，因此，科布登与梅特涅的会面象征着关于国际秩序新旧理念的碰撞。

74岁的梅特涅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遇到"革命余烬"时，他仍旧精力旺盛，准备随时消灭他们。英国废除《谷物法》那年，奥地利出兵波兰的克拉科夫城镇压城中起义，随后便吞并了该城，波兰最后一个独立城市自此沦陷。就在科布登同梅特涅一起进餐时，哈布斯堡皇室的军队正在攻打意大利城市费拉拉。梅特涅不会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们的革命热情便极大地爆发了，欧洲暴乱频发，几乎推翻了奥地利皇室的地位，梅特涅自己也因此出逃国外。但是，科布登对此并没有感到意外。尽管只是与梅特涅这位维也纳系统的主要创始人举行了简短会面，但他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位年迈的欧洲协调的政治家已经跟不上

欧洲大陆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了。他在与梅特涅会面后写道：

> 执政者治理国家就像医生治病，但他们只看到表面症状，只会做最肤浅的补救，而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会深挖伤及社会体系的病根。梅特涅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治国的人，此类政客将随梅特涅一同被时代抛弃，因为“实验室政府”这种新型政府正逐渐成形，并得到了更多关注，梅特涅不能再强制推行那种老式政府的过时做法了。

“实验室政府”—从这个叫法不难看出这个政府不再是原先那个正统的、拥有无上权力的政府了，而是一个由通晓法律、了解人类需求的专家组成的“科学的”政府。撒切尔夫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解曾体现在她的一句名言中：“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科布登的观点与她截然相反：任何政府要想成功处理国际事务，都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也是他抨击欧洲协调的深层原因，他称欧洲协调反对改革，把人民和土地看作执政者的私有财产，这种做法是不利于他们应对席卷欧洲大陆的巨大变革的。欧洲协调否定社会的变化，对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视而不见。也许暴力镇压起义可以暂时缓解民族主义者的发展势头，但民族主义者并非第一次推行改革，他们不止一次地带来过社会进步。蒸汽和铁路不断推动通讯和运输系统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制造业正处于转型时期，整个地区也在逐渐变成生产商，人们的工作性质和时长也发生了改变，识字率也在快速增长（这给梅特涅的监视和审查系统带来了麻烦），与此相应，阅读人群和创意市场也在扩大。

那些反对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他们肩负着相同的使命，所以遇到困难时会互相寻求帮助，欧洲协调就是这样运作的。像科布登这样的激进人士和大多数的国内改革者一样，他们都认为各国利益息息相关，并以此为原则制定国际合作策略。他们称国内宪法改革就是要给欧洲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思想以重击。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探讨基督徒团契，而不是摆出一副家长说教的姿态，他们看中的是和平而不是稳定，认为只有当人们摒弃了秘密宫廷外交的坏习惯，不再担心要承担高额的战争税，自觉地放下武器用平和的方法解决争端时，和平的局面才会到来。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人类生来向往和平，之所以会有战争只因为先前的领导人无比自私、利欲熏心。因此这个世界只需要简单而彻底的改变—变成一个民主的世界。科布登期待有一天全国人民可以因“种族、宗教、语言”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象征权力的一纸契约”硬绑在一起。

自由贸易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推进贸易文明发展，但康德可能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但纵观18世纪，专制主义评论家们都在称赞自由贸易的优势。因为与那些早年凭借海上实力在欧亚各地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独裁的行径（例如英国治下的殖民地）相比，自由贸易明显更胜一筹。拿破仑的态度发生了转

变，他认为英国正在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剥削欧洲列国，直至任期结束，拿破仑都将英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并宣称自己的贸易封锁体系有利于欧洲大陆的集体利益。这是拿破仑对欧洲的早期预言，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以外的各个强国也会提出这一观点，欧洲一体化衍生的充满竞争性的愿景—欧洲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将深陷冷战泥淖。拿破仑失败后，亲英派全面拥护商业社会。自此，贸易活动变得文明、高效、自由，并且比贸易限制时期更为繁荣，更崇尚和平发展。曾做过拿破仑派驻华沙大使的普拉特对军事打击和贸易精神做过对比，他期望后者能占上风。在1814年发表的《欧洲文明的精神征服和篡夺买卖》（De l'esprit de conquête et de l'usurpation）一文中，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称拿破仑的存在使欧洲成为一个“大牢笼”，而英国则是“自由思想和人类尊严的庇护所”。他借该文呼吁法国放弃军国主义思想，“加入现代欧洲商业化国家的行列中，发展工业，推动文明发展”。

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上半叶，科布登引领的自由贸易运动在同时代的激进国际主义者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但是，自由贸易运动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喜忧参半。因为为推动世界和平而发起的激进运动即使失败也注定会被世人铭记，正如和平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为后人所称赞一样。如果自由贸易运动获得成功，那也是因为他们为政治人物所利用，而他们最初构想的愿景也永远不会实现。白厅官员推行自由贸易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自由贸易起初只是意在维护世界和平，但很快便成了推行帝国政策的手段，英国外交官们随后用大炮和舰艇强行推开了西非、土耳其和中国的经济大门。

十分讽刺的是，科布登本人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他曾完美阐述了推广商业资本主义的益处。正如他1843年在反《谷物法》联盟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

> 什么是自由贸易？为什么要消除各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因为贸易限制背后蕴藏的是骄傲之情、复仇之心、厌恶和嫉妒之感，这些情绪终会爆发，最后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已经考虑到上述情况。很多理论家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即使是对此最不感兴趣的著名理论家大卫·李嘉图也不能否认自由贸易很好地平衡了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这一事实。

> 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息息相关。通过刺激工业发展及鼓励创新有效地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权利，自由贸易可以高效合理地分配劳动力，随着产量增加，大家广泛受益，世界各国被共同的利益维系在一起。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崇尚经济发展的时代，这点从1847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全球经济学家会议上便能看出来。比利时自由贸易协会主席在大会上讲道："我们迎来了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检验各国人民友情，第一次将上帝所说的'互助互爱'变成现实的机会。"《经济学人》那时刚成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传声筒，它旋即刊文启蒙大众，宣传"国际主义"以推广自由贸易主义。

1815年伦敦世博会（科布登是重要的发起人之一）的会场体现了自由贸易的理念。这座以钢铁为骨架、巨型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建筑象征着开放、民主及全球化，是现代技术的杰作。"我们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迎来'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历史时刻。"人类大团结的拥趸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曾这样说道，他还肯定了自由贸易人士和维多利亚时期进步人士的革命热情。

国际主义思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双边通商协定建立了处理国家间事务的新模式，相较欧洲协调的大国协商模式，新模式更加实际、民主，也不那么保守。英法两国同土耳其以及中国签订了通商协定，体现了这一新模式的又一特征：更加全球化。尽管土耳其人不太情愿接受这些做法，欧洲人却认为他们自己在传播文明。在欧洲，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的通商协定是一个分水岭，随着另外60条类似协定的签署，西欧市场联系愈加紧密，在20世纪结束前，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市场。当时的人们都在讨论"欧洲共同利益"，他们认为贸易往来推动了国际主义发展，并且正在威胁着欧洲协调衰败的体制。19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习惯将国际主义看作"发现政治经济体制规则"的主要力量，将"商人"比作"国际沟通合作"的追随者。

科布登被誉为最卓越的"国际人"。1867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讣告撰写人说："尽管那个称呼听上去很奇怪，但那是事实。在他之前，没人有资格被称为'国际人'。" 教化人类的职责落到了科布登身上，他要让人们知道新的政治制度可以消除国家间的疑虑，自由贸易可以证明战争只是"混乱的状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人的决定；人民一旦正确理解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是通往国际主义的一条道路，而不是这条路上的障碍物。民主观念的传播、代议政府形式的扩散以及世界和平进程的推进都源于关税改革承诺："由于目前还不是发展国际主义的最佳时机，仅有部分政治同盟认同国际主义思想，因此科布登认为他当前的工作是为推广国际主义铺路，使国际主义思想为人们熟知，扫除其发展的障碍，拥护一切有利于国际主义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并促使其生效。最重要的是先实现贸易自由。"

正如上面说的那样，自由贸易人士相信唤醒"公众思想"是成功的关键。与福音派一样，他们的共同假设是：人类有共同的追求，因此他们会感受到民主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政府从中作梗，人民就不会自己发起战争。历代自由主义者都坚信这一点，国际联盟创始人也赞同这一观点。政客们使人民卷入战争，他们对利益的追逐将人类自私的本性无限放大，酿成灾祸。因此，人民要结成自由联盟，将不同的思

想汇聚一处，为和平而战。自由贸易是国际主义的指导思想，它不依托机制以外的任何国际组织调低关税的做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有些相似，但不同于当今政坛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自由贸易颠覆了传统观念，无须政治手段就能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仍旧掌权的贵族。自由贸易最终会像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一战”后号召的那样，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人民会成为自由贸易有力的支持者。但那时，威尔逊本人的观念倒像是退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然而1919年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仍然选择强烈地推崇他，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会重拾落后思想。其实，前面几代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科布登晚年就遭遇过相同的困境。

科布登不赞同旧的外交方式，因为那种方式只代表了军国主义贵族这个特定群体的利益。科布登称，政客们贪图个人利益，介入正常的贸易活动，制定了像《谷物法》那样的条规。为了让高额税收和不必要的军备支出看似合理，他们不断重申权利平衡的重要性，并挑起地区间冲突。这样看来，减少征税额度就是一项和平政策了，而权利平衡这个概念“已经荒谬到不能用‘谬论’、‘错误’或是‘欺骗’等词来形容了，甚至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因此科布登主张英国远离一切国际纠纷，是否支持土耳其或攻打俄国都与英国没关系。他认为英国人最好安坐家中，收拾收拾房子，做些喜欢的事挣点钱，而不要“为了谋求邻国的发展，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而整天打打杀杀，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终是徒劳”。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科布登和他的支持者不得不面对正推着政客们走向战争的所谓战争精神。他们向来在意媒体和民众的声音，但现在这些声音变得极具攻击性，他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科布登曾怀疑道：“我们还是理性的、进步的物种吗？”他建议和平主义者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战争的不合理性会不言自明。科布登始终坚信，分析经济现状是对大众最好的教育。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析人士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民众的行为不受理性分析的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呈保守趋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为此调整了功利主义的教义，因为普通民众远不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般理性。19世纪50年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恩底弥翁》（Endymion），书中强烈批判了科布登的极端理性主义。“他们给这些混杂的观点起了个新名字，”一位代表如是说，“他们管这叫‘民意’。”时任英国女王、时尚教母以及保守党领袖泽诺比娅（Zenobia）说：“多么荒谬！这只是一个称谓罢了，别指望他们能像女王或上下议院那样有什么好想法。”媒体人不再理性，他们拟定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报纸头版刊登竞选新闻。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也抱怨道：“尽管身为首相，但我还是要取悦媒体……他们总是嚷嚷着要加强政府干预。媒体很霸道，现在他们让政府也变得霸道了。”如此看来，出版物的论调以及高涨的民意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将国家推向战争。

自由贸易并没有因科布登的去世而被遗忘。未能成功举办的1875年

欧洲关税大会反而成为科布登主义的绝唱。自那以后，这第一位“国际人”逐渐被遗忘，这一点在欧洲大陆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学”逐步登上了舞台。1871年德国重返国际舞台之后，强大的敌对联盟崛起，致使1882年后亚非地区遭受了疯狂的土地掠夺战争，自由贸易的国际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各国更加崇尚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席卷世界，科布登俱乐部遭受围攻，各国纷纷“放弃自由贸易”。然而讽刺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反对自由贸易的时候，曾被科布登批判的大英帝国却视自己为自由贸易的保护者。但在别人看来，英国实行关税改革不过是为了谋取暂时的经济利益。总之，自由贸易运动与和平运动密切相关，同和平运动一样，自由贸易在国际主义盛行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曾辉煌过。一个世纪后，自由贸易再次辉煌。大萧条及“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兴大国，并重提自由贸易。正是因为美国，自由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它的统治地位。

属人主义：民主与和平

维多利亚时期中期，国际主义出现了第三种新兴元素，在当时被称为“属人主义”。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多认为民族自豪感不利于国际和睦以及世界和平。但是这种观点是最近才形成的，自民族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欧洲大陆初现后，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19年，在去巴黎开展国际联盟成立的筹备工作之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先去了趟意大利。在热那亚，威尔逊冒着瓢泼大雨，在该市最杰出的一位伟人的纪念碑前发表了演讲。他说：“他毕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能与他成为同道中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威尔逊的讲话中提到的这个人，也就是纪念碑的主人，正是朱塞佩·马志尼。他是统一意大利的功臣，是推翻梅特涅体系的改革者，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历史上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开创性思想，而马志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只有出现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后，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在他死后很久，人们才认识到这种观点的深远影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称赞的那样，与仅需成立一个世界政府的观点相比，马志尼这种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想法更具优越性。然而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联合国都还只是一个世界政府。总之，马志尼是第一个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考虑国际合作的人，也是历史上持类似观点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个。

最开始，马志尼的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及其背后的神圣同盟。正是因为他们的暴政，加入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的马志尼才被投入大狱，最后又遭到放逐的厄运。这段经历坚定了他反君主政体的信念。1832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并统一意大利，马志尼建立了意大利青年党。不久之后，他写道：“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同那些国王联盟。我们不会欺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依靠国际条约和外交诡计是无法获得自由的。我们不会向会议条款或者君主内阁低头以换取自己的幸福。所以，意大利人民请听好：我们绝不和国王打交道。”

马志尼反对君主，他对早期流亡国外的意大利人提出的世界主义也不全然认同。这些人都认为有些事情比一味顺从国王和君主更重要。但是马志尼认为世界主义者夸大了理性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没有认识到大家联合在一起为“国家”而战才是实现人类和睦最有效的途径。马志尼认为“国家”就是义务和责任的象征，它因无私而高尚。而过时的世界主义崇尚以自我为中心，因而显得自大妄为。马志尼之所以厌恶边沁和功利主义者，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推崇唯物主义。马志尼认为民族主义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精神高度，它的实现需要大家互帮互助，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利益的集体行为。这就好比在一个家庭中，家庭的整体利益凌驾于每位家庭成员的利益之上一

样。国家与其人民之间就是如此，或者往大了说，整个欧洲及其人民的关系也无外乎于此。因此，马志尼改变了观念，转而鼓励欧洲大陆各民族国家以民主形式联盟，即推崇“民族神圣同盟”。青年意大利党成立后三年，马志尼同几个逃亡者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建立了青年欧洲党以配合国内革命，这次革命有可能推翻“神圣同盟”。

现在的人们不太能够接受如此高尚无私的观点，也难以消受关于“意大利灵魂”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讲话。这些讲话曾煽动起一轮又一轮的起义，但是收效甚微，还白白搭上了许多生命。不管怎样，马志尼的能动性、大量的书信作品（仅意大利语版的作品就有94卷之多）以及他的威望都是他的资本，这些资本让他比同时代的和平主义者更有条件解决政治动员时遇到的实际困难。“人民神圣同盟”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沙皇亚历山大（Tsar　Alexander），而马志尼更想做欧洲革命者跨国组织的指挥官。按道理讲，与零星的、互不相关的各种单边行动相比，联合国内部的各种起义推翻“神圣同盟”独裁的胜算更大。马志尼曾写道：“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为同一目标奋斗着的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同时起义，这样我们就会获胜。到了那时，哪位别国的暴君还顾得上管别人的死活呢？”

他痛批科布登的孤立主义，说那项政策“糟透了，是怯懦无能的表现……将无神论带入国际生活，过度追崇个人利益”。马志尼流亡时大都待在伦敦这个反抗君主制的政治中心。他致力于让英国放弃和平主义和不干涉原则，转而开展我们现在所说的人道主义干涉和民主建设。虽然他最终没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联合各种起义对抗君主独裁，但他的影响却依旧广泛。马志尼与卡莱尔（Carlyle）、米尔等杰出的作家素有交情，自己也多有文章发表，这些都使他在英国享有盛誉，其声望及影响也因此从英国迅速扩大至欧洲大陆乃至大西洋地区。

干涉论的提出给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自由派造成了困扰，马志尼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之一。为了让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帮助意大利和其他受压迫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他明确提出了实施国际团结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这个缘由直至今日还能引发共鸣：

> 人们开始意识到……国际责任作为纽带将各国人民维系在一起。因此，如果世界的某个地方，甚或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犯下明显的错误，就会被定罪。其他国家也不会因为与出事地点相隔较远就幸免于难。想象一下，如果在当今年代，土耳其境内也发生了基督教大屠杀，情况会怎样呢？

然而遗憾的是，英国最终没能击败意大利半岛上的奥地利独裁者来帮助希腊人民重获自由（英国曾在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中帮助希腊获胜）。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和英国主流自由主义舆论原本坚守着科布登反对介入一切国际事务的原则，但现在他们的态度却

发生了转变。就连科布登本人也有所动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的民族无须为争取自由而战。马志尼就曾发表文章号召人民反抗，并亲自参与了1848年起义。他认为一旦国家重获自由，就应该发展文明，建立殖民地。在马志尼眼中，意大利注定要承担“时代赋予它的传播文明的责任”。他还建议意大利“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入侵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并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这样一来，自由民主主义同时具有了国际主义（面向欧洲各国时）和帝国主义（处理非欧洲事务时）两种特性。马志尼重视欧洲，20世纪的国际机构依旧深受这种态度影响。

马志尼的“国家纲领”强调自救、互助以及学习。他资助了伦敦中心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专门接收贫困的意大利工人的孩子。马志尼的教义中并不涉及阶级斗争，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试图削弱人们对民族统一的渴望。所以，意大利人直言不讳地说那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危险的。1842年，马志尼撰文称拯救“被共产主义迷惑”的工人十分重要。8年后，他同意在伦敦成立“欧洲中央民主党委员会”，为由民主主义者组成的青年欧洲党提供指导。当时他曾谈到有必要帮助“民主国家”摆脱“鼓吹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类新兴术语的含义尚未定性，且常被误读，但这并不妨碍这两个名称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广泛传播。1846年，半自由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Cracow）爆发了起义，但随后很快遭到奥地利镇压。波兰威胁说要彻底消灭激进运动，这一表态再一次成为头条新闻。在伦敦，宪章运动领导人和诸多记者围堵在一个名为民主党联谊会的激进组织门口为波兰募捐，并号召其他国家的革命移民出钱出力。马志尼担心“民主党联谊会”有社会主义情怀，因此极力回避他们。为了让外交部变得更加民主，他选择支持人民国际联盟，该组织由一个极具竞争力且相当有威望的游说组织创立。在随后的两年中，英国激进媒体同对立方的支持者展开了一次激烈的对话。两位德国激进人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德国民主党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参与了此次对话。

如果说马克思同马志尼的隔空争论对帮助我们了解冷战时期的国际事务十分重要，那么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争论在激进政治思想的较量中就已拉开了序幕。从他们二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国际主义观念：一个是基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民族化解放运动，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下的国际主义。在20世纪，这两种观念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尽管两国迅速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国际秩序这一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引发了两派之间的争论。他们写道：“英国的工人阶级非常清楚，资本家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该有个定论了。”马志尼十分厌恶这种论调，因为他的“人民国际联盟”是“为维护民族利益、促进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而设立的，而维护工人权利不是他们的职责。随后，在4月，马志尼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痛批共产主义。在《民主

思想》（Thoughts upon Democracy）一文中，他称共产主义是对自由、进步和人类道德发展的否定，专断残暴至极，甚至会毁掉全人类。

当时马志尼对马克思及恩格斯尚未特别留意。他的首要攻击目标是边沁掀起的唯物主义思潮，而不是激进的左派。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被激怒了，并迁怒于他。1847年年末，马克思前往英国并给“民主党联谊会”做了演讲。很明显，他的讲话是在反驳马志尼及其国际主义观念。“各国际联盟合在一起，如兄弟般和睦相处，这些都只是资本家们常挂在嘴边的空话，”马克思如是说，“倘若工人阶级可以在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获胜，那就意味着人类摆平了国家间及产业间的各种冲突。而这些冲突正是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的原因。同样，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意味着被压迫民族重获自由。”德国的激进工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织，最近他们将组织的名字由“正义联盟”改为“共产主义联盟”。从英国回到布鲁塞尔后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为该组织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该书的开篇十分有名：“整个欧洲陷入恐慌之中，人们对共产主义充满畏惧。”“古老欧洲的各大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试图驱散这种恐慌感。罗马教皇、俄国沙皇、梅特涅、基佐（Guizot）以及法国激进人士、德国警探都参与其中。”很快，事实便证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就是那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这足以表明马克思反对马志尼计划的重要性。

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志尼与社会主义者持续对抗。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定居伦敦，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潜心做研究。与马志尼相比，马克思更讨厌那些总是缠着他的德国逃亡者。讽刺性文章《逃亡中的伟人》（The Great Men of the Exile）就是马克思对他们的讨伐，该文直至20世纪才得以发表。文中还尖锐地批评了马志尼，称他的国际主张是骗人的把戏。原文如下：

> 1849～1852年的民主派逃亡者上演的大剧早在18年前就拉开了序幕，那时的参演者是1830～1831年煽动政治的流亡者。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政治流亡者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着。他们继续煽动群众，制订各种全球计划，还成立了临时政府，在世界各地发表激昂的言论。这些老手的经验以及骗人的技巧明显强于他们的后辈。18年来，他们习惯了搞些阴谋诡计，四处宣讲，欺骗大众，炫耀自己，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他们就这样练就了敏锐的判断力。马志尼也因此肆无忌惮，认为自己有能力担起“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重担。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铺路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际主义”这个术语几乎等同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苏联成为世界强国之后这种情况更明显了。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主义”的思潮在“第三国际”时达到全盛，人们熟知的“1919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该组织由列宁创立，目的是促进世界范围内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随后，由托洛茨基（Trotsky）领导的“第四国际”就没有那么成功了。

19世纪中期涌现出大量关于国际秩序的构想。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其实就源于这些构想，要正确看待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就不能脱离维多利亚时期这个时代背景。和往常一样，当时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要防止1815年成立的保守组织欧洲协调重掌大权。欧洲协调反对马克思的国际秩序观，并扬言要削弱马克思的势力。但事实却是，到19世纪40年代，就算马克思不向那些威胁和挑战自己思想的国际秩序愿景开火，欧洲协调的国际威望也会日渐衰落的。

当时处于全盛期的自由贸易便是这些愿景之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及他随后驻留过的其他城市，马克思都曾试图让国际主义者自觉改变对传统政治经济的看法：实际上，全球盛行的资本主义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凯旋铺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自由贸易代表大会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贸易，那些自身存在最尖锐矛盾的经济法才能将缺陷暴露在公众视线中，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眼皮底下。一旦所有的矛盾汇聚到一起，两大阵营就会对立起来，冲突便不可避免。而冲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在他主办的新闻杂志中，马克思十分关注自由贸易运动，尤其关注科布登其人。马克思还很关注自由贸易的政治力量和各种艰苦的努力。1857科布登在曼彻斯特选区竞选失败之后，马克思便深刻地领悟到，沙文主义和国外冒险主义的实力比科布登预料的强很多，而科布登一直信赖的民意，更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关于民意，马克思曾讽刺地写道：“平心而论，民众之所以支持帕莫斯顿（Palmerston），一半要归功于他自己，另一半则要感谢科布登的愚蠢。”

在马克思眼中，自由贸易还是顺应历史进程的，而让他更担心的是马志尼正在偏离正确的轨道一意孤行。自1864年起，当时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成为马克思工作的重心，最终使马克思的名字家喻户晓。联合会最初成立时并未明确其主张是什么，对于一个由英国公会组织者创办的协会而言，要形成意识形态立场的确需要时间。协会成立典礼开幕前两天，马克思的一位裁缝朋友约翰内斯·埃卡留斯（Johannes Eccarius）问到这个组织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得到的答案很

模糊，为此他很困惑。他向马克思抱怨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这种情况让我怎么在典礼上发表关于该组织的讲话啊？"到了典礼举行当晚，情况有所好转，会议的主发言人是英国劳工公会的领导乔治·奥哲尔（George Odger）。他概括了波兰当时所处的困境，还谈到英法两国工人阶级联手的重要性，并重点阐述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事业"，需成立有效的"人民互助会"对抗"国王及君主的会议和宴会"。

乔治·奥哲尔这些豪言壮语颇有些马志尼的色彩。马志尼在当时伦敦的欧洲政治逃亡者中很有名，深受奥哲尔爱戴。因此，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在制定纲领的时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志尼思想的左右。那时"意大利工人联合会"正在那不勒斯召开会议，会上宣读组织规章的人也是马志尼的支持者。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认可，被国际工人联合会伦敦委员会采纳。

马克思为这个新建的组织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状。眼前的状况令他十分震惊。他告诉恩格斯："这样的序文冗长无味，根本就是未经慎重思考胡乱写出来在这里滥竽充数的，文中随处可见马志尼的踪迹，根本不算是合格的原则声明。"为销毁该序文，马克思迅速行动，亲自起草了另一版本—《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es）。"该序文全部由我本人编写，剔除了原则声明部分，原先的41条规章浓缩为10条。文章中涉及国际政治的内容中，所有的'民族'字眼都被改为'国家'……我不得不在序言的条款中加入了两个有关'职责'和'正义'的词。"这也是马克思对马志尼思想的妥协，这个两个词也是对马志尼所倡导的"'真相、道德以及公正'等思想的相似表达，只是这样讲会更温和一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历史学家们倒没有受马志尼多大影响，非但没有多受影响，他们还认为该组织的成立会带来共产主义的胜利，该组织会使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以破竹之势在莫斯科发动革命。这些历史学家自然认为第一国际是先驱性组织，该组织让马克思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成立联合会的主意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不过联合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乔治·奥哲尔和威廉·克里默（William Cremer）早在伦敦工人运动时就积累了宝贵的组织经验。而在国外，意大利的统一及美国内战激起了改革的热潮。1863年3月，为了表示对美国北方的支持，国际工人联合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很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克里默便是其中之一。马克思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告诉恩格斯："工人们的发言太精彩了，他们没用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字眼，却将反对资本家的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同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在波兰统治的起义，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要求首相保证不会取消对俄战争。法国是促使劳工国际主义出炉的最后一剂催化剂。1862年，拿破仑三世鲁莽地帮助一些工人参加了伦敦世博会。就是那次，英法两国的工人用一盏茶的工夫便达成共识，计划在伦敦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方便两国工人相互交流。不出所料，联合会第一次召开会议时马克思就已经察觉到了，他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写道："'真正的力量'参与进来了。"

在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工人们在行动。但是，没人知道国际工人联合会要把他们带向何方。是同以前一样追随马志尼和他的民族主义共和制，还是选择马克思那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马志尼的思想作为初期指导思想得到了联合会首份官方报纸《蜂巢》（Beehive）的认可。该报称，“不过度妨碍资本家对其合法权利的追求，工人的权益就有保障了”。马克思本来不会在意这些，但是作为联合会领袖，他每走一步都十分谨慎，这种做法大大出乎那些熟悉他早期文章的人的预料。马克思曾跟恩格斯说过：“让刚刚恢复的运动接受原先那种大胆的言辞需要一些时间。”他起草的成立宣言重点分析了《资本论》中的细节内容，较少使用《共产党宣言》中那种激动人心的措辞。和马志尼一样，马克思也明白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同时展开活动。但是，马克思从工人的激进行为中看到了实现上述理想的曙光—“工人合作已遍及全国”，这为实现“不同国家的工人如兄弟般联合在一起”这一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相同的规划说明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但马志尼不断向英国人鼓吹自己的思想，这一做法令马克思大为恼火。国际基本文件的源文件被送往意大利而不是给他，这也让马克思非常生气。他坚持认为马志尼的公有制构想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制”，马克思对记者如是说。他始终坚信意大利在历史进程中注定失败。1867年9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满心欢喜地写道，许多欧洲工人组织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新一轮革命的到来也许比预期的要早，等到这场革命真的到来时，我们（你和我）就会拥有超强的能量。同马志尼等人30年来的种种行动及其结果相比，我们不需要提供任何资金赞助……这一点实在令人欣慰！”

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遇血腥镇压之后，马志尼与马克思两人终于深入交换了一次意见。这次流血冲突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交战双方是“公社”的支持者和“第三共和国”的军队。战争期间，马克思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但他随后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赞扬公社的成就，这本小册子被广泛传阅。“流血周”内政府军杀死了20多万疑似公社社员。马克思主要通过媒体关注双方战况。“流血周”仅过去两周，马克思就发表了《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联合会总理事会发言》（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n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他的结论是：公社的失败证明了不成熟的革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马克思的分析丝毫没有谈及新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正是这个人，立刻为马克思和共产国际做了有力的宣传：他号召欧洲所有同仁一起努力，消灭这个“孕育战争和仇恨的社会”。尽管马克思与“巴黎公社”没有任何关联，也不想效仿公社的做法，但他的“威望”确实因此提高了不少，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暴露在聚光灯下，尽管并没有多少公社随之曝光，这些报道也并不是为了让世人效仿。但大量的采访和关于马克思的介绍还是随之而来，他几乎成了国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我很荣幸在这个时刻成为伦敦受到诽谤和恐吓最多的人。20年来我的生活平淡无味，我的思想也没有受到重视，这样看来，受到诽谤和污蔑也是件好事。”

与马克思不同，马志尼可不认为“巴黎公社”有什么可称赞的。他认为公社的行为是反国家的，其成员各自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这种做法会引致一场道德灾难。“不计后果地追求地方利益会让他们忘记‘祖国’这个词蕴含的神圣意义。”马志尼如是说。法国内战令他备感担忧。晚年亲见罗马被皮埃蒙特军队侵占以及共和制在法国失败，他的世界仿佛因此崩塌。马志尼与法夫尔看法相同，两人都认为马克思和他的共产国际需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马克思这个德国人就是第二个（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Proudhon），他难以对付，并对当今世界不满，只顾着搞阶级斗争。”这位意大利人认为工人阶级被“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迷惑住了，他将愤怒和担忧化作一篇公开谴责的文章，刊登在1872年的《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中。“共产国际的倡导者是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这个人专横跋扈，忌妒他人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哲学或宗教信仰。恐怕他性格中的愤怒远远多于爱。另外，他的处世态度与蒲鲁东相似。”马志尼进一步提到：“对于欧洲工人组织来说，有一个合理的指导思想应该告知它的追随者：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他自己拒绝加入共产国际也是因为该组织违反了这一原则。不出所料，当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暗示马志尼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时，马克思不以为然，笑着说道：“他只是老式中产阶级共和制的代表，其他什么也不是。”1875年马志尼死后，马克思评价他为“第一国际最不可调和的死敌”。

马志尼与马克思两种不同思想的博弈意义重大。他们一个提倡民族主义，另一个倡导共产主义。自1917年起，因坚持上述两种不同理念，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形成对抗。但是，历史的进程并非直线型。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在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后，都迎来了衰落。我们已经看到巴黎公社是如何削弱马志尼的：其实早在1861年，他就曾写道，“‘民族主义’（Nationality）本是神圣的，但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带有偏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意大利，马志尼的威望也随着他的离世降低了。尤为讽刺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热那亚参拜马志尼雕像的时候，那个国家的人对马志尼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威尔逊这个美国人表现得明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志尼与社会主义者决裂，人气急速下降；另一个原因是，“一战”前的几十年中，温和的、主张安抚的民族主义的处境分外艰难。在德国，民族主义衍生出一股危险的新型政治力量，即俾斯麦当政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当时他们已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脱身。军备竞赛日益激烈，全球各个大国财政预算因此变得紧张。至于自己的思想为何会被东欧不同种族的地区采纳，马志尼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他偶尔会漫不经心地谈到“土耳其帝国残骸上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联盟”，好像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只有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一样。在东南欧地区，他期待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崛起，从而带动“其他12国起义”抵抗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专制。然而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最晚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独立国家的出现，在这片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土地上，新兴国家很可能会相互攻击，战乱不断。

紧接着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规划促成了统一及合并，国家和市场随之由小变大；而在东欧，情况则恰恰相反：大型市场被分成几个小市场，不同市场划分明显，相互间的交流沟通遭遇了新的障碍。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Acton）公爵在一篇文章中最先抨击了民族主义，到了19世纪末，反对民族主义的呼声四起。阿克顿为“帝国”辩护，称其反抗多数的专制，是民权社会的守护者；“帝国包容不同的民族，从不压迫任何民族”。他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越来越多的自由党人也都赞同这一说法，他们质疑对中欧和东欧较大国家和较小国家一视同仁的做法，认为对波兰、匈牙利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鲁塞尼亚这样历史不够悠久的国家就应当区别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尽人意。19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行为，马克思推崇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社会主义路线开始走下坡路，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倡导下，工人力量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去世前曾迅速地把共产国际阵地转移到了纽约，以免被巴枯宁的支持者推翻。在南欧及美国，无政府主义备受工人阶级欢迎。俄国情况大抵相类，19世纪8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风头盖过了马克思理论，随后，依靠潜伏在皇家部队的“地下工作者”的协助，无政府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国际主义，我们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让它永久地存活下来。1907年，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花费数小时探讨无政府主义立场是否正确，新建国际组织的存活时间会不会不及现在的马克思共产国际。潜伏在组织内的卧底和秘密警察制造了一系列暗杀和爆炸事件，无政府主义因此声誉受损，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908年的经典作品《星期四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就是以此为主题创作出来的。到1900年，无政府主义表现为革命社会主义，并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与此同时，在恺撒掌权的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处在议会制度适应期，英国劳工党也经历着类似的事。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左翼评论员、记者约翰·雷（John　Rae）1901年发表评论说：“革命社会主义后期，多了一些机会主义者，少了开始时的热情，演变成诡诈的王朝社会主义，因微薄小利与议会斗争，尽管这会带来危害，但尚未突破现存社会的界限，不像那种殊死一搏的旧式战争那样，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违背了社会现实。”

马克思的想法最终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该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可塑性强。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诠释，他们更多时候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却很少用它指导革命。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一旦在议会有了一席之地，其革命前景就会变得十分惨淡。在外交方面，国际主义表明了其坚持和平的立场。马克思在曾经的和平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曾辩解道：“‘国际工人联合会’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组织，因为它联合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战争还是在1914年爆发了，这就证明社会主义国际化并不足以阻止战争的发生。

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激进国际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的发展路线是相似的：最初对革命前景信心满满，虽收获了几场胜利，但仍有矛盾未得到解决，随后革命陷入僵局，停滞不前。是什么让这三股力量不放弃革命、继续前行呢？答案就是：他们都希望阻止欧洲协调的复辟计划，并坚信会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欧洲事务，这种方法关注政治意识扩张，重视由贸易和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但是这三股改革力量又有着相同的缺点，他们都试图回避已经存在的政治障碍，对自己过度自信，认为改革正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他们都低估了现代国家发起的政治挑战、外交考验以及民族主义斗争。社会舆论的好战情绪、19世纪末保护主义的回归，这些都令自由贸易者以及和平运动参与者感到震惊。马志尼以为，在人类共同目标这点上，民族主义者和他有相同的信念，但是俾斯麦和加富尔却不这样想。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认为选票箱就是个摆设，认为阶级稳定比民族或国家忠诚更为重要，但是欧洲的工人可不这样想，他们希望由自己选出领导人，想要为自己而战。

第三章 法律帝国

质疑社会科学的发明者们，你们凭什么假情假意地认为自己是在造福全人类？难道在你们眼中那6亿“野蛮人”不属于人类么？而事实上，他们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既然你们手握造福全人类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又如此趋炎附势，只将幸福的火种在文明世界传播。难道在你看来，上帝亦是如此曲意逢迎，趋时奉势吗？对于上帝来说，全人类是天下一宗，……要么患难与共，要么共享荣华。

—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四次运动理论及凡人天命理论》

（*Théorie des quatres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1808*年）

从1856年《巴黎宣言》发表为起点，一直到1909年的伦敦会议为止，在这半个世纪里，国际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法的修订与完善工作也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这5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卓绝千古，是此前50年所有的成就总和都无与为比的。

—阿莫斯·赫尔希（Amos Hershey），1912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在欧洲越发根壮叶茂，各国也都在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在此期间，国际主义思想及其行动模式实现了向实际化的新型转变，逐渐摆脱了旧有的单一的革命模式。此时，国际主义已经认识到国家间冲突的持久性特点，于是开始专注于缓解这种冲突的探索研究，旨在发展更为和平的矛盾解决方案；同时，新国际主义思想提供了一套更为系统的哲学原理用以规范统治，它强调建立持久且精简的国际机构的重要性。简而言之，早期的国际主义理念诚然对未来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19世纪末，国际政府新运动的兴起才是国际主义真正的蜕变，这表明国际主义已不再一味地想要脱离统治和权势，而是愿意接受统治，并为之让步。那么现在，历史的转盘指向了19世纪的法律和法学家。

1851年“世界和平大会”在伦敦发出号召，“爱好和平的朋友们，贡献出你们的宝贵建议吧，谈一谈你们对权利法典—《国际法》的看法吧”。与反战主义的反响不同，对法律的号召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共鸣。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出现了一批跨国精锐人士，他们同全世界分享着自己的反战思想，他们认为世界能否得到救赎并继续向前发展在于维也纳会议上制定的保守秩序是否能被打破，并且还要看是否能成功削弱外交

官的无上权力。然而，这群精锐人士的真正目的却是要编纂国际法典，使国际法的实践更加专业化，他们没有运用全民动员的方法，而是建立了一个新学科，并发展出其特有的体系、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创立的这个学科至今仍然以国际法的形式存在着，他们曾经希望该学科能大放异彩，而今这种存在却不过是海市蜃楼。这些精锐人士希望这个学科能够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选择。一位优秀的英国法官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认为，真正利害攸关的是“国际法法学家领导的法学派能否胜过外交官一派”。

他们认为，负责掌控欧洲列强外交政策的那些外交官已经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法可以使他们的工作更轻松，此外还能迎合民意，获取更多人的支持。作为“各国的温和教化者”，国际法提供了一种途径来规范那些对抗不断升级、关系持续紧张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殖民扩张的年代，国际法为各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提供了理性的指导。因此，在19世纪末的重要外交会议上，即使是最不认可国际法的强国也聘请了法律顾问充实他们的谈判队伍。到20世纪初，国际法成了杰出的典范，曾经的空想国际主义者自我统治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

战争法的重大突破

美国内战期间，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德裔美国人弗兰西斯·利伯，请他专门指导联邦士兵如何处置战争中的平民和俘虏。利伯既不是法学家，也不是反战主义者，他对德国民族主义和希腊独立的史实怀有满腔激情，这解释了他为何对美国反战主义者及其宏大规划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强烈认同法律本身带有的教化力量。尽管应当首先肯定利伯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他的指导内容毫无理论体系可言，根本就是各种规定、建议和禁令的大杂烩。但是，这些指导内容受到了国外政客的追捧，19世纪60年代末，利伯与欧洲法学家取得了联系，开始认真考虑编纂国际法一事，希望能以这样一部法律作为改善各国关系的手段。因此，他越来越看重国际主义的影响。离世前不久，他还写道："国际主义是白种人宗教的一部分，它就是国际关系的福音书，总能化干戈为玉帛。"

《利伯法典》（the Lierber Code）颁布的那一年（1863年）见证了人性化战争的又一大进步，也是各国战争法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宣告成立。1859年法国与奥地利联军在意大利北部卡斯蒂廖镇的索尔费里诺与意大利军队爆发了惨烈的战争，在战场上，重伤和垂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横尸遍野。年轻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Henri Dunant）途经此地，决定发起一个中立组织无偿照顾伤病士兵。此时正值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号召对军队医疗系统和职业护理进行改革之后不久，杜南的提议可谓一呼百应。其中一位日内瓦的律师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开始着手成立救护组织的相关事宜。1863年，由他和杜南共同召集的委员会被视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雏形。次年，瑞士议会就此发起会议，会上12个国家签订了一项国际条例，一致决定对战场上的伤员进行救治。

第一次《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之所以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有两个原因：首先，公约是完全脱离了欧洲协调的秩序设立的—它号召了多个欧洲小国，开始便将大国悉数拒之门外，后来才允许这些国家加入。其次，公约摒弃了镇压战争的旧方式，转变为人道主义引导下的法律权威建设。随后发生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撼动了整个欧洲，其死亡人数之多、报复规模之大、在巴黎废墟的终战场面之血腥举世震惊。在战争的余波之下，各地皆处于哀痛之中，争斗者无暇顾及新的《日内瓦公约》，就在此时，怀着满腔改革热情的青年法学家们聚集在了一起。红十字会的莫瓦尼埃对"文明国家如此恶劣的行径"感到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些惨剧就是由战争法相关法律的不完备导致的。其他人一致推举著名的日内瓦律师古斯塔夫·罗兰–雅克明（Gustave Rolin-Jaequemyns）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几年前，他就推出了全球第一份国际

法期刊。1873年，他召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并在比利时的根特创办了一个新的国际法研究所。研究所的宗旨并不是为了组织大型政治运动或类似于过去那种无所事事的休息厅似的和平议事厅，他们想要举办一个国际性论坛，甄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此相聚，形成论坛固有的学者风气。历史学家称这些人为“1873年度人物”，他们一致认为自己是公正的法学家，一生致力于法律的科学研究，他们是情操高尚的捍卫者，只为“保护文明世界的法制意识”。他们中有杰出的瑞士法学家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美国法律的重要编纂者戴维·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他的弟弟塞勒是著名的商业大亨，在大西洋底铺设了美国到英国的海底电缆）、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以及来自低地国家的不计其数的大小人物。研究所接手了罗兰–雅克明的刊物《国际法立法比较》（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e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杂志很快赢得了广泛共识，并且成为宣传该研究所理念的舆论工具。

国际法研究所强调了撤除外交活动支配地位的必要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客，古斯塔夫曾经在《国际法立法比较》的创刊号中宣称：国际事务事关重大，完全交由外交人员去处理是靠不住的。关键在于法律不是由国王制定的，更不是由议会制定的，而是由深层潜在的社会趋势决定的：法学家的职责就是对法律做出解释和说明。古斯塔夫对法学家“职责”的这一定义十分前卫，颠覆了世人对法学家的旧有观念。然而，古斯塔夫的所作所为多是在竭尽所能地提升协会及法学家群体的社会声望，这一定义的价值因此大打折扣，不免被冠以追名逐利的嫌疑。由此，古斯塔夫还督促民众要摈弃两种想法：一是淳朴的乌托邦幻想—幻想能立刻停止一切战争，二是“怯懦心理”—认为国际事务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他认为断言欧洲政治事务毫无意义，人们应该更多关注《国际私法》的编纂工作，更多关注这部法律如何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

很快，国际法研究所及其成员便应多位政客要求开始提供法律服务，充分体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提议下，1874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15国会议，各国均派代表参加，首次尝试多国共同编纂战争法。由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被国际条约束缚，因此，此次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协定，但还是彰显了法学家们取得的重大突破。而实际上，这个新设立的国际法研究所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的10年间，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开展法律编纂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了布鲁塞尔提议的可行性，随后在1880年的牛津大学会议上，终于出版了由自己编纂的战争法指南。

而与会的杰出法学家们的意见也表明其他群体对国际法也越来越关注，觉得该法可以惠及其他群体。俄国学者费多尔·马腾斯（Fedor Martens）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也很受重视。作为一名法学家，他与沙皇关系十分密切。他坚定地认为，国际法的发展会令欧洲列强获益匪浅。英国拥有很强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对缔结法律相互约束的做法并不怎么感兴趣，德国的将领也拒

绝法律限制，他们认为这是对德国权限的战略性削减，而俄国人则举双手赞成通过法律手段转化战争模式的想法。马腾斯声称，“曾在1874年倡导召开布鲁塞尔会议的国家是所有国家中第一个理解现代文明真谛的国家，也是尊重文明爱好者合法意愿的第一个国家”。对于俄国来说，向外界表明其自身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十分重要，因为经常有人说他们秉持原始主义。到了19世纪末，再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对原始主义这一指责无动于衷了。

文明的标准

尽管国际法学家这一新群体总是趾高气扬、自视甚高，他们将自己看作正义的化身，用科学的手段研究法律和社会问题，但不得不说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后期的国际法法学家已然将他们的学科植入到当代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中了，这其中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对欧洲文明优势的信仰。布伦奇利曾经写道："我坚信国际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休戚相关，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也都意味着国际法的长足发展。"拿破仑战争时期，傅立叶曾经多次公开抨击文明这一概念，他认为文明就是一种追逐私利的错误概念，他呼吁哲学家对全人类一视同仁。然而，战争一结束，这种批判浪漫主义也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文明这一概念承载着更通俗的新含义。本杰明·贡斯坦曾经对拿破仑王国的军国主义和大兴商业的不列颠王国的文明影响进行过对比，此后文明的含义便更加通俗易懂了。这个词很快便催生出一个全球文化版图的概念，该版图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展。在法国历史政治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这样的人眼中，文明只属于欧洲列国，也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的依据。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在18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洲的文明进程代表着现代社会已步入了更高级的阶段，城市社会依法而治，在各个国际联盟的荫庇下，欧洲各民族自由向上，国泰民安。相反，诸如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各国就是文明发展的反面教材，这些国家"用极为野蛮的方式统治人民，这种方式曾经在国家机构管理方面的确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在当时这只是国家无能的表现，政府根本无法解决政治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明的这些含义，以一套假想的通用法规为基础，欧洲确立了自己的世界领导权。意大利的马志尼派法学家帕斯夸莱·菲奥雷（Pasquale Fiore）曾用夸张的文字评价说："人类的团结统一有助于人们对依法治国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法制几乎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诚然，全球文化和社会的存在形式大不相同，那些法学家的工作就是向人们展现文明的标准如何能提供一种规范—一套能够用于国际评级及判断外交事务处理是否得体的准则。站在文明发展进程金字塔尖的是欧洲诸国，抑或欧洲曾经的驻领殖民地。紧随其后的是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残暴"政权，它们有过一段制度史，具备一定的国家实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是非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三种层次经久不变，最终自然而然地成了法律教科书中的一部分。1840年时，欧洲列强曾邀请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 加入"欧洲公共体系"。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末期，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受到了同样的邀请。到了1876年近东危机时，欧洲列强便不再发出此类邀请，因为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王国的现代化政治发展迅速，然而欧洲看到两国的迅猛发展后果断制止了它们发展的步伐。

国际法研究所的另一位开山鼻祖—来自爱丁堡的法学教授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在讲授文明社会的三个层次时曾解释道，三个层次的文明社会分别对应着三种接受政治的程度—他分别称之为全体政治、局部政治以及自然政治（或者说人类原始政治）。所有人一致认同原始政治确实没有国际认知，但有些法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和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这样的国家是否具有国际认知一事有待商榷。约翰·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认为，尽管新国际法“是欧洲现代文明的特有产物”，但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而言，应该享有国际法赋予它们的部分权力，但赋予它们全部权利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他人则反驳说：在是否为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只存在是与不是的概念，并不存在半是半不是的说法。除了大多数欧洲人之外，并不存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不管怎样，其他国家的确比欧洲要落后很多—至少在欧洲强国战败于它们之前都是这样的。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表现便是一例，日本赢得了与俄国的著名战役，这无异于引发了世界史上的剧烈地震。人们一直认为文明程度的标准决定了国家等级，而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无疑挑战了这一观点的权威性。一位日本外交官讽刺地说：“至少在现代的野蛮屠杀方面，我们证明了与你们的平等，随后便立马成了坐在谈判桌前的你们所谓的文明人。”

这些法律构想的潜在恶果很快在1884～1885年的柏林殖民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从本质上来说，此次会议的本意是缓和欧洲各国在非洲的殖民竞争，但是充斥其中的却是对文明使命的探讨，借此让与会各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看起来合理合法。会议最终变成了题为“带领本地居民走向先进文明世界的使命的必要性”的讨论大会，法学家们商讨出一套新的章程，譬如在受保护国内“试行文明体制，慎重解决历来的野蛮问题”。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聘请了一位名气很大的英国法学家，同时也是国际法研究所成员之一的特拉弗斯·特威斯（Travers Twiss）爵士作为他的法律公关，因为屡次立下汗马功劳，国王送给他刚果自由邦作为封赏。特威斯不但应邀参与重要会议，起草新宪法（毫无疑问，新宪法最大限度地赋予利奥波德更多权利），同时还被委以重任参与起草用于殖民地统治的法律。因此，法学家们自创了一种程式化语言，以便欧洲各国能用它评估各自对殖民地领土的主权。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程式化语言肩负着拯救封建王朝的使命，使其逐渐清明廉洁起来，诸如责任、关怀、职责等说法一直保留至今，其含义竟然没有任何改变。后殖民时期“国际共同体”留下的词汇表现今仍在联合国机构的相关部门使用。

在柏林时，研究所成员很是赞同局外人的观点。按照荷兰国际法法学家领军人物托比亚斯·阿赛尔（Tobias Asser）的说法，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并不像我们熟悉的欧洲政治手腕那样仅抱有目光短浅的政治意图。总体来说，它的成立是为了巩固文明和财富的成果”。国际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古斯塔夫·罗兰–雅克明对这一高度赞扬的措辞表示赞同，并认为在柏林会议上国际法的众位法学家的确是各尽其能地为各国明确了在非洲的行为准则。罗兰–雅克明倡导“国际主义精神”，但在比利时对刚果自由邦的专制统治一事大白天下时，他却只字不语。他的比利时同僚，第一

位专业的国际法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尼斯（Ernest Nys）认为，1885年的《柏林法案》（Berlin Act）表明了欧洲列强希望扶持非洲并带领他们走上文明之路的决心。他一笔勾销了外界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攻击，并极力为他开脱，说他只是受到了英国商业竞争的驱使才会那样做。

因此，在这样一个殖民主义加速推进的时代，法学家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宣扬“为了世界文明的利益，应当让法律、秩序和真正的自由的光辉恩泽全球”这一理念时，这些人的作用显而易见。只有洛里默（Lorimer）教授例外，他对这个人们普遍接受的崇高信念并不认同，在讲课过程中，他总是一针见血地向学生阐明任何法律规定都是彰显某种权力的方式：

> 文明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国应自觉地为一个落后的种族指明发展方向，实现人类的文明生活，身负这样的使命后，强国就必然要行使其强权。他们为其权力的行使冠以保卫之名，却全然不顾及“被保护”民族的意愿。强国所谓的文明仅仅是出于对权势的贪婪，他们却认为这种文明是理性的、真实的，是在为低等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至少，相较于低等种族荒谬的、表象的近期意愿而言，他们才是真正在为低等种族的长远利益做打算。也就是说，低等种族所期望的一切只有在他们成为文明国家后才能实现，而文明的高等种族此刻已经拥有了这一切。

用通俗点儿的话说，洛里默想要表达的意思简言之就是这些强国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接近于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有义务照管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情愿接受这种关照。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才会产生20世纪的联盟委托权和联合国委任权以及21世纪的“准保护”权。

但是19世纪的国际法具有两面性：法学家在证明海外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同时，还要维护欧洲主权国家在新兴社会的统治权（当时他们想到的主要是美洲）。1868年，弗兰西斯·利伯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章，文中利伯强调了两者的兼容性：“文明国家旨在成立一个共同体，并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它们同受国际法的约束，也共享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有助于确立马志尼视角下的欧洲联盟的设想。

老一代法学理论家在考虑到与欧洲之外的“低等级”种族的外交关系时，在立法中设置了许多禁令以防止双方关系恶化，而在各文明国家之间发展人性化外交关系时，这些阻碍人类文明交流的禁令都遭到了废止。这一新举措的种种影响充分体现在法学家最得意的成就上—海牙国际法会议对战争法的编纂。1898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补办一次大型的国际和平会议，这时的欧洲各国正暗中进行着军备竞赛，各国政客都

为筹集重整军备的费用愁眉不展。然而各与会国齐聚海牙国际法会议之后，尖锐的分歧使会议几近终止。会议上日耳曼各民族间以及比利时与荷兰两国间关于军事占领统治的争论尤为激烈。日耳曼人对他们1870~1871年间在法国的侵略行径记忆犹新，他们妄图实现其占领区人民对他们的无条件服从；这场战争在法国民众来说也同样历历在目，他们希望占领国能够清除平民百姓的债务，同时也提议设置严格的条令对占领国进行约束。所幸，费多尔·马滕斯（Fedor Martens）为两方圆了场，草拟了《海牙公约》在战争法规及惯例的最终序文。序文只模糊地记载道："平民和交战国仍然受到国际法条款的保护和约束，因为这些条款出自各文明国家共同设立的国际法惯例，出自人类文明的公法，出自对公共意识的需求。"

有关军事占领的法律规定本身就是对一国临时政务的管制，虽然另一个国家此时在该国的领土上作威作福，但这条法令却保护了该国的长远主权不受侵害。军事占领的特有概念也是在拿破仑战败后才出现的。过去，一国想获得他国的领土只能通过战争手段达成目的。但欧洲协调体系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因为协调体系的设置本身就默认了成员国君主的军事占领行为。如果欧洲各大王权想要和谐共处，同时欧洲协调又能够有所作为，那么单边战争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考量对其他强国的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双方达成共识，最终签订条约。因此，直到1844年，军事占领作为一国的临时状态才首次得到了正式商讨。

但采用这一途径的初衷是为了欧洲列强的关系顺利发展，所以它并不适用于"蛮夷之族"，因为他们缺少对王权的认知。"蛮夷"之地—比如说北非或者中东地区—符合"被占领"的条件，但实际上，这种"占领"多半是永久性的，正如1875~1878年近东危机期间俄国侵占奥斯曼保加利亚、哈布斯堡强占波斯尼亚一样。保加利亚先是成为自治行政区，随后脱离俄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而波斯尼亚却最终永远成为奥匈帝国的属国。被占领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政府机构都被取缔，俄国对奥斯曼举国上下进行了改革；1878年后，哈布斯堡也在波斯尼亚实行了自己的文明体制。俄国在保加利亚、英国在埃及也皆是如此。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一位法学理论家曾对这种"变相的占领"做过评价：这种占领完全颠覆了各个文明国家在海牙的诸多协定。

1899年各国间战争法的相关谈判确实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他们在法律中明文禁止使用空中轰炸、化学武器、中空弹等军事手段，同时，他们还就军事占领的概念达成一致意见，确认这种军事占领只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一种短期的临时政务状态。但是参与协商讨论的和平主义者对这一界定着实失望。裁军的相关事宜从未得到过认真商讨，很明显，许多强国之所以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主要是惧怕舆论的压力，而他们当日里派代表参加海牙会议也不过是为了安抚国内的舆论罢了。比如，德国外交大臣就曾告诫他的使团说："我们必须向德国民众表现出我们为会议的人道主义事业尽心尽力了，同时还要避忌会议中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十分危险的商讨。"在密切关注军事事宜的地方，军官远比律师更有话语

权。军官将领们并不为自己从事战争职业而负疚—后拿破仑时期的反战情绪早已销声匿迹：正如冯·毛奇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oltke）1880年12月对海德堡大学的法学教授布伦奇里（Bluntschli）所说的那样："永久和平只是一场不能实现的梦，甚至连美好的梦想都算不上。战争才是维护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元素。"

然而，从文明国家的划分标准上来看，《海牙公约》也只意在管制"文明国家"间的冲突。这样一来，从外交领域来说，国际法理论的传播并不包括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庇护。比如说，如果作为"非文明民族"的非洲人或亚洲人企图奋起反抗欧洲文明世界的入侵，国际法就并不适用于他们，也并不会对他们起到保护作用。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国际法已经对殖民军队的行为做出了规范，如有反抗，一定就是"非文明民族"的以身试法。1914年的英国军事法手册明确指出："国际法法规只适用于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冲突双方必须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服从法律做出的判决。国际法法规不适用于非文明国家及部族，这些地方的一切事务由军事指挥官自行裁决，可以借鉴相同情况的特殊案例，从而制定正义和人性化的法规。"

利益互惠是制定"帝国之法"条款的根本条件。有人提出，如果一个敌对国拒绝利益互惠的条件，既固执己见又难以协商，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相关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使之屈服。这种方式在利益互惠原则出现之前就已存世多年，在空军成为殖民统治公认的有力武器后更是大行其道。在美国对伊拉克采取"震慑行动"很久以前，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发起那个极具争议的项目"感性与理智"（用以平定拉拢越共的支持者）半个世纪之前，科尔比的父亲，美国反暴动专家埃尔德里奇·科尔比（Eldridge Colby）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对抗野蛮部族》（How to Fight Savage Tribes）的论文，提出了以暴制暴的想法。文章中分析的对抗野蛮部族的方法清晰明确，一目了然。根据科尔比的说法，与这些原始民族实现理性和谈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 维护国际法的庄严秩序固然很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野蛮民族并不知晓国际法，更不会遵守国际法，反而会利用国际法来制衡遵守国际法的一方，所以必须采取其他措施。这种措施的手段不能比国际法法规的限制来得舒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对法国人而言，兰斯大教堂遭受炮击就是敌人的违法行为，足以激起全民的公愤……而如果一个炮弹从天而降，炸毁了他们信奉的万能之神的神庙，对执迷不悟的野蛮人来说，就是他们的万能之神取消了对他们的恩惠。如果一个世界公认的难以进行文明和谈的部落据点遭到炸弹袭击，那就意味着实力超群、技术领先、武装精良的文明国家已经对其宣战。这种袭击方式不仅可以威慑敌方，而且会令他们毫无抵抗地举手投降。如果不幸有平民伤亡，那也是在告诫敌方如果拒不投降、想要拖延了事，那么伤亡人数只会更多。就这样，

黑白颠倒，一种非人道的暴力行为就成了文明国家的人道手段。

就这样，法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屠杀、空袭炸弹、惯常的拘留的现实依据，欧洲的帝国主义本质暴露无遗，逾越法律的残酷暴行昭然若揭。在比利时对刚果的统治成为野蛮暴政的代名词前，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所著的批判性书籍中就揭露了英埃联军的野蛮行为：为了恩图曼战役中牺牲的48名己方战士，总司令赫伯特·基切纳（Sir Herbert Kitchener）带领配备现代步枪和火炮的英埃联军横扫了苏丹的马赫迪军，残忍杀害了10 000名对方士兵。《海牙公约》对暴行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便是这份公约其实在为如此残忍的暴行保驾护航。1899年，《海牙公约》明确禁止空投炸弹，但只对公约签署国适用。从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首次空投炸弹，到英国空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炸弹袭击，空袭炸弹已然成了殖民列强镇压属国国内反抗势力的廉价武器。难道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真有什么魔力让文明国家的士兵成了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为自己的暴行贴上万能之神和崇高品德的双重标签，以上天之意随意地残害生命，这样的肆意妄为也能借用文明进步和国际法的名义吗？

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 T. Stead）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后不久写道，他对20世纪初始两种极端的国际主义间存在的强烈反差震惊不已。在欧洲内部，文明意味着和平，而在欧洲以外，文明却意味着暴力。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游客躺在埃菲尔铁塔荫蔽下的躺椅上，享受着巨大的蓝色地球（Globe Céleste）上展现的美好世界，人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各种奇迹在眼前发生，诸如第一部有声电影、自动扶梯等。然而，就在此时此刻，斯特德所说的“新国际主义”正远征亚洲，蚕食着中国。他们就像一支国际警务队，其中“汇集了各大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他继续说道，这种“新国际主义”使事态变得更加紧急，《海牙公约》需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指派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查清事实。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世界急需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能否挽救国际警务征途的十字军精神，能否制止强取豪夺、贪得无厌、侵占主权的殖民势力的发展。

不论爆发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各国际联盟军开拓文明的行为已经演变成对中国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镇压，其中以义和团运动最为著名，而这只是更加有力地证实了海牙谈判制定的政策已经岌岌可危。俄国派遣到中国的士兵则严守规定，丝毫不逾越他们所理解的国际法相关条款。俄军士兵严于律己，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对于没收上来的东西他们也对平民做出了补偿。德国军队却采取冷酷残忍的立场，当时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受到法律保护，反而成了德国人疯狂复仇的“合法对象”。德国威廉姆大帝更是臭名昭著，他曾派手下四处散布恐怖谣言，说这些人使用的“匈奴咒术”令各国外交使臣惶恐不已，于是他们为此又发行了一份刊物，并在刊物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走向文明之路”。

因此，所谓“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间尖锐的分歧产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影响；海牙会议制定的众多规则本身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主要因为这些规则给各个党派留下了太多解释权。1914年在比利时，英美通过案例测试证明了德国就是匈奴人的后裔，德国军队实际上只是按照自己对战争法许可的新规定的理解我行我素。在侵占埃及后，英国单方面修改了占领期间的法律法规，这一做法与德军极其相似，他们认为权力由比利时国王转移到侵入势力手中是剥夺了国王对国家的主权控制。德国不但取得了制定及颁布法律的权利，还可以随意任免地方官员，操纵经济为战事做准备。在塞尔维亚的哈布斯堡军队也采取了同样的专制统治，反抗势力一旦出现，就立即被处以极刑，以杀鸡儆猴。哈布斯堡军队一心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试图塑造一个严厉而公平的裁决者身份维护其所谓的公平。事实诚然如此，在前一王权向新的侵略势力移交政权这一问题上，海牙会议的各项规定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因为一旦对此实施明确管制，合约签署国就会无利可图，也就没有国家愿意缔结公约了，因此模棱两可的规定就成了缔结合约的附加条件。

因此，到世纪之交时，在激进批判主义者看来，那些国际法法学家既是问题的解决者，也是问题的制造者，正如他们早期对康德的看法一样。1873年时，成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更甚的是，他们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一时间声名鹊起——到19世纪末，他们公然指责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开始起草政治犯的引渡条约，变得愈加地反民主。法律本身成了掠夺合理化的依据：法律一边为掠夺式的侵略保驾护航，一边还要声称掠夺者才是正义的所在。一些批判人士质疑国际法的内在权威性，他们也确实开始好奇这些对非欧洲人的无节制的暴力恐吓信条是否真的没有危及欧洲的自由信念。法国法学家弗兰兹·德巴赫捏（Frantz Despargnet）就此写道：“传递文明的隐藏权利就是掠夺野蛮民族的国家主权。”查尔斯·萨洛蒙（Charles Salomon）更进一步指出：“当心了！文明的隐藏权利能赋予残忍的侵略袭击以合法的理由，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难道就没有德国文明、斯拉夫文明、拉丁文明的存在吗？我们就只能接受一国凌驾于另一国之上的无上权力吗？”“二战”期间，欧洲各城市惨遭大规模空投导弹袭击，这正是他们曾经对所谓的野蛮人使用的招数，现在全用在了欧洲自己人的身上。这场大战标志着欧洲文明内部霸权统治的终结，有效制止了维多利亚殖民侵略思想的发展。同时，国际法还爆发了信任危机和地位危机，甚至直到现在，国际法再也没有恢复以往的风采和地位。

克里默的仲裁事业

继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后，1907年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和平会议的与会国数量明显增多，非欧洲国家的参会热情大增，尤以美洲最为突出。美国法学家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还代表中国清政府参加了会议。与其同行的是其孙子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二学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这是杜勒斯首次参加外交会议。作为一名资深的美国外交家，约翰·福斯特认为1907年的和平会议“从某些方面来说，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是全球所有国家政治代表的首次会面”。

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后不久修建了和平宫。这座建筑是改变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新生力量的有力见证，虽然它仍然根植于欧洲文明模式之中，却展示了更加包容的姿态。这座新落成的豪华巨型宫殿展现了权威的力量，传递了人们渴望文艺复兴的愿望，其钟塔发出的钟声响彻荷兰大地。宫殿内的审议庭中摆放着雍容的大型通电烛台，屋顶悬挂着华贵的黄铜吊灯，墙上镶嵌着中世纪的新型彩色花窗，整个房间浑然一体，金碧辉煌。走廊里陈设着1907年与会各国带来的各式礼品—意大利的花白大理石、日本的丝质墙帷、瑞士的钟表、波斯的地毯、阿根廷的耶稣雕像，以及俄国赠送的3.2吨重的罕见的碧绿镶金花瓶。而和平宫这座建筑本身的积极意义也不容小觑：海牙会议上，两位世界顶尖的教授级外交官费多·马腾斯和美国的安德鲁·狄更斯·怀特（Andrew Dickens White）之间的对话为和平宫的建造创造了契机，最终美籍苏格兰裔“钢铁大王”、世界首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出资建造了这座宫殿。这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富豪虽然因身为工会组织破坏者而声名狼藉，但是他也为“一战”前十几年里的和平主义事业给予过最为慷慨的资助。

作为第一座私人慈善捐建的宫殿，和平宫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这座建筑成了新国际主义时期处理国际事务的应急中心。这座宫殿以最为具体的方式见证了自梅特涅时期以来世界外交的风云变幻。美国逐渐在各种最高级别的国际外交活动中崭露头角，而正是和平宫见证了美国外交历程的新起点。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职业生涯从一个窘迫的电报员开始，时至今日，他已是世界人民心目中个人奋斗的楷模。他为国际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仲裁法庭的设立方面贡献尤其重大。当狄更斯·怀特向他提起建设和平宫的设想时，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诚意。

然而，说起真正的政治功绩，和平宫不过是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的信仰，别无其他。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由于日俄战争而延后一年举行。最终召开会议后，和平主义者迎来的却是再一次的大失所望。各个强国间

的军备竞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和平会议对此束手无策。和平主义者曾倡导创建国际维和警务队伍，以便使国际法庭对两国争执的仲裁决议能得到更好的执行，但这个想法在会议中却没有得到声援。与第一次和平会议相比，国际法方面也没有取得有建树的成就，众多法学家只能翘首企盼，希望第三次会议能有所突破。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洲际仲裁法规的修订取得了一定进步。1913年，78岁高龄的卡内基亲临和平宫的落成典礼，并亲自为与他齐名的当代伟人—英国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兰德尔·克里默（Randal Cremer）爵士的半身像揭幕，彼时，克里默爵士已因病逝世5年之久。尽管现今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位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前书记，但对于卡内基（或许可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资本家）和卡尔·马克思（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批判家）来说，克里默这个名字让他们终生难忘并由衷敬重。克里默长眠于汉普斯特德公墓，虽然与马克思的巨型半身像仅相距约1.6公里远，他的墓碑却并不显眼，鲜少有人问津。而1864年，马克思组建国际工人联合会时，他只对克里默发出了入会邀请。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国际工人联合会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与克里默的努力密不可分。克里默的父亲是一个马车夫，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抛弃了这个家庭。家庭出身让克里默与旧时的外交政治毫不沾边，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却从事了多年的工人维权工作，为选举制度的改革鞠躬尽瘁，正因如此，出身穷苦的克里默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并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英国人，这正是对他职业生涯的高度表彰。克里默因成立各国议会联盟闻名于世，但他对国际事务的热情却体现在推动仲裁运动这一举措上，这也为他的诺贝尔奖之路奠定了基础。克里默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着短剑对着橄榄枝的浮雕，背景是一本打开的书，书上镌刻着“仲裁协议”4个字。纵观其一生，克里默为国际仲裁运动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仲裁运动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却在战前的几年一直被边缘化，直到战后十几年才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爱好和平的朋友们，尽情欢呼吧，一个受人敬仰的和平社会就要到来了。”克里默1887年在《仲裁者》（the Arbitrator）期刊中如是说。的确，仲裁运动从本质上说就需要结合当代的外交体制，让步于现存的外交体制。这就意味着该运动只是对不同国家的政治运作进行调整和修正，而并不是要进行大范围的彻底革新。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者就提出以仲裁协议替代欧洲原有的外交政策，但当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协调外交体制的瓦解刺激人们不断寻求新方法来改善国际关系。1856年，《巴黎条约》的签订为世界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实际上，该条约只是在对发生争端的所有签约国进行调停。但如何将条约内容付诸实践呢？一些人认为如果各国不进行自我监督的话，那么该条约的所有条款都是毫无意义的。激进的不干涉主义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则认为，从1815年五大强国实际接管欧洲开始，他们便采取了一种理性做法，就是使这种“普遍协调”变成一种合法体制，使之适用于全世界。同时，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小型国际警察队伍用以确保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纠纷的法案能顺

利执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建议制定相关细则以保证各项条约的长久效力，一旦这些条约失去效力，就要及时制定新的规则。他希望“文明世界的各个国家能一致同意制定并遵守这样一部法典”。

理查德·科布登是仲裁机制的忠实支持者，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极力辩护并推销仲裁机制，他指出该机制十分实用，而且“并非是为迎合各国的国会体制而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新千年的信念，更不需要人们对不抵抗政策绝对效忠”。老牌激进主义分子、英国国会议员亨利·理查德（Henry Richard）来自和平运动的腹地，他同科布登一道推进了仲裁运动。1849年，理查德随同科布登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在连任伦敦和平协会秘书长达37年后，理查德于1885年正式卸任。这位“和平使徒”曾经辩称“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传教士和布道者对我们进行的无端指责”显然是在无理取闹。和平运动推进了国际仲裁机制的发展，同时也彰显了其本身的现实主义特点。和平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时间只会让和平沉淀出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特质，一位美国的伟人曾这样赞许1907年海牙会议上投身仲裁运动的与会人员：“他们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理论家，而是政治、外交和战争等多领域的杰出实践家。”

1885年，理查德与世长辞。同年，兰德尔·克里默参加了东伦敦选区的议员选举。竞选中，他不但表达了对劳工阶级的关切，更再次提到了19世纪中叶那些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所倡导的国际法建设目标。作为科布登主义的支持者，克里默坚信仲裁协议是保证各国之间和平相处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早在1868年，克里默就曾初试议员竞选，虽然当时他不幸落选，但他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十分赞成成立“国际仲裁委员会以解决各国间的争端”，从而为世界开辟“和平新时代”。1874年，克里默再一次参加竞选，在竞选宣言中，他提出重新修订国际法的想法，同时，他认为十分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以求和平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执”。他创办的工人和平协会提倡用仲裁机制“替代战争”，随后，工人和平协会逐渐演变成国际仲裁联盟，并组建了自己的发行部门，出版各种宣传手册，抨击当时英国对埃及的主权侵略以及帝国主义的斑斑劣迹。

克里默和倡导仲裁机制的同道中人是19世纪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先驱力量，而此时的马志尼正倡导通过解放斗争和反抗革命等做法来加速实现各国之间的“神圣和谐”，克里默的理念与此大相径庭。马克思的科学主张强调要将未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天堂，这也同克里默一派的观点毫无关联。与两者相比，克里默一派描绘的和平之路循序渐进，清晰明了，是深思熟虑后的智慧结晶。在各方一致认同的法律体系指导下，国会议员和国际陪审员做出了公正裁决，仲裁程序本身也就彰显了理性和权威性。但是，克里默一派最终也没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可能是因为这一派别并不像马志尼和马克思两位领导的派别那样广为人知，因此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默一派一直没有得到世界主要强国的青睐。

与两代和平主义者一样，克里默从美国的外交事务中发现了改变旧

世界、采取外交新模式的最佳途径。他利用国会议员的身份加强了与美国政府的相关交流。对于仲裁机制支持者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因为两方的关系还很脆弱，虽不至反目成仇、引发战争，但一旦出现重大分歧就可能分道扬镳。正是这几年的英美交流为随后的“英美特殊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72年发生了著名的“亚拉巴马号仲裁案”。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为南军制造的巡洋舰“亚拉巴马”号重创北军部队，英国对美方损失的赔偿问题通过仲裁得到了和平解决，同时遏制了美国对加拿大部分领土主权的侵犯，这一事件大力推动了仲裁运动的发展。1895年，在处理英美两国间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时，仲裁机制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美国从中调停。后经过仲裁调解，这一重大国际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当时，伦敦诸多的公众人物一致号召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两大强国建立一个永久实用的仲裁机制，这些人中以威廉·格莱斯顿名气最大，克里默也位列其中。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当时在采访手册中倡议：“开战之前一定要先做个仲裁。”

仲裁运动不仅体现了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和处理问题的策略。英国自由党人清楚地认识到，委内瑞拉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美国意图利用门罗主义做掩护来转变外交态度，旨在控制中南美洲。但是英方并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在西半球乃至全世界的崛起是符合英方利益的，所以他们配合仲裁，因为这样英美的联盟关系才会更为牢固。克里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英美之间的仲裁协议，这是他审时度势之后的决定，这位决策者的仲裁机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取代原有外交理念的实用策略。

克里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选对了同盟。随着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不断攀升，自信的美国统治者在世纪之交时决定采用仲裁机制作为行政手段，同俄国一样，他们通过参与国际法事业树立并巩固本国在世界的威望，根除各方威胁。1890年，美国国际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提议在整个西半球应用“美国的国际法仲裁法规”。这一时期，仲裁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世界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其中尤以美国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最为杰出。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发展小种族外交政策闻名于世，他同样支持仲裁机制，因为这一机制为大国关系提供了和平的保障。1902年，他发起了一次活动，旨在使三年前设立的常设仲裁法院能够发挥实际作用。欧洲的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曾向他抱怨说，新法庭已经变成了一种摆设，没有任何国际争端需要进行仲裁，这样下去，法庭终将变成无关紧要的虚设。为此，罗斯福故意找出与墨西哥的陈年往事，挑起事端，最终两方协定将纠纷交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处理，以显示该机构存在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罗斯福还大力推动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召开，以便能够继续处理1899年第一次会议的未竟之事。当时正值日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紧张的局势延误了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时，罗斯福在双方的和平会谈中扮演了调解人的身份，敦促双方和平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190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罗斯福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发言人为罗斯福宣读了如下颁奖词：

> 12～15年前，和平事业的推进并不像今天这样顺利。当时的和平事业被视为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构想。诚然，人们认为和平的理念是美好的，实际上它却只是理想主义者的天方夜谭。和平是如此的不切实际，与现实生活脱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生存空间。近些年来，各国主要领导人乃至最高元首都开始积极支持和平事业的发展，自此，和平事业的发展境遇发生了彻底改变，和平理念也由此逐渐深入人心。

克里默若能看到这种局面必定深感欣慰。罗斯福之所以发起复兴海牙和平会议的倡议，实际上也是在响应克里默参与创建的“各国议会联盟”的号召。1889年，克里默与其他人一起联合成立了“各国议会联盟”。在该组织内，他身兼副主席和英方联盟议会主席两职。1904年，该组织在美国圣路易斯市召开了“各国议会联盟”代表大会。在19世纪的前十几年里，“各国议会联盟”发展迅猛（该组织至今仍活跃在世界政坛，影响依然很大），克里默通过这一平台大力宣传了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的重要性。在外界看来，发起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人是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然而实际上，若没有克里默，就不会有这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1903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克里默和平奖，而同样获此殊荣的罗斯福总统要比他晚三年，这也是全世界对克里默所做贡献的一种认可。这个来自朴次茅斯的马车夫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一代伟人，这便意味着革命性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国际事务的发展走向。

1905年1月，已逾古稀之年的克里默在迟到的获奖感言中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漫漫人生路。从青年时代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和平主义者到后来的政治实践家，他回想起像他一样的“和平的朝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视为不务实的梦想家。到1903年，仲裁机制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体现。克里默还提到当时刚刚发生在北海的英俄两国险些擦枪走火的事件来佐证自己的仲裁理念：

> 34年前，我还担任国际工人联合会书记一职，我组织提出了一个构想，计划成立一个“国际高级法庭”，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多人的耻笑，被讽刺为空谈家、空想家。这些人斩钉截铁地说任何国家都不会赞同这个想法，成立高级法庭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
> 如今，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说明了一切，尽管在法庭成立初期未能阻止英国和布尔人之间的布尔战争的爆发，且部分国家对国际法庭仍抱有抵触心理，但是目前国际法庭的存在意义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并处于稳步前进的发展趋势。说到这里，还要感谢卡内基先生的慷慨赞助，和平宫为国际高级法庭提供了永久的居所。如果还要说明国际法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最近（1904年10月）的英俄“多格浅滩事件”便足以证明。如果没有国际法庭的存在，俄国和英国可能要花数月的时间考虑这种所谓的暴行是否适合诉

诸仲裁，而这几个月的迟疑就会被激进的媒体利用，被大肆地渲染，煽动民众，激起全民的反抗情绪，最终使争端无法得到妥善的和平解决。幸好，海牙国际法庭已经成立，可以在需要之时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为世界各国所用。尽管英国的几家媒体仍在疯狂地煽动民众，期待英国发起战争解决问题，但两方政府几天内就一致同意提交争端至海牙国际法庭，用和平代替武力解决矛盾。

> 克里默接着又说，在将国际仲裁法庭的构想付诸政治实践时，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显得至关重要。签订仲裁协议的做法很快就流行起来，协议带来的实际价值也证明了仲裁才是各国解决争端的首选方案，而不是裁军。除了对那些曾经给予自己支持的位高权重之人表示感谢之外，克里默还发自内心地对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观众说，这一成就首先是“全人类的胜利”。虽然仲裁机制的确立也是“各国议会联盟”的成果之一，但这一机制却由来已久。19世纪50年代，克里默就已经将国际仲裁机制运用到当时激进的劳工运动积极分子的工作中，并发起了仲裁运动。如今再回头去看几十年前的情景，克里默感慨万千：“当时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和集会，携手共进，在两国进行了多次巡回演讲，让两国的国民进一步谅解对方，化解矛盾。”

然而，没有人比克里默本人更了解仲裁运动了，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只是因为仲裁机制设法得到了政府中一些大人物的帮助。举例来说，克里默在“各国议会联盟”中最重要的工作伙伴、法国的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就曾担任过法国的财政部部长。克里默的另一位拥护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是美国民主党的领袖，也是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的国务卿，克里默曾高度赞赏他，称他才是那个为“各国议会联盟”赢得了仲裁事业的人。共和党方面的杰出代表则是西奥多·罗斯福任期内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他坚信仲裁是美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的重要途径。为了调解西半球各国的争端，他带头创办了仲裁法庭，同各国协商签订了大量的仲裁协议。

1902年，仲裁机制和国际法的拥护者终于可以为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进步感到欣慰了，“世界各国的觉醒”让人们重新理解了世界协调的概念，世人对“处理国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当然，他们也要面临接连不断的异议，因为总会有人认为仲裁机制并不能确保世界和平。左翼分子认为资本主义一日不灭，战争就一日无法避免。右翼分子则想保护本国的特权，因此他们也大力谴责和平运动。当有极受人尊敬的领袖为和平现身说法时，他们甚至抨击和平运动是在利用伟人的形象和思想误导民众。

不过，仲裁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实用主义者，与过去那些成立世界

政府的宏图伟略相比，他们更赞同相对中肯朴素的仲裁流程和目标。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的英国成员约翰·韦斯特莱克评价说，在这个时代，各国逐渐增强了国家的主权意识，仲裁就成了十分实用的手段，用来规范各国的行为，维护世界和平。他曾经写道，20世纪末正处于达尔文时代，人们需要着重考虑人类的进化问题，而仲裁机制正是人类进化的表现。当民族主义不再盛行于世的时候，仲裁机制将会发挥更大的效力。换言之，要极力抑制“国际仲裁向国际司法的转变”。韦斯特莱克建议，各国应该达成一致意见，签订相关限制条款，防止国际仲裁的权利膨胀。这些限制条款基本形成后，各国就不会再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矛盾，只会存有政治层面的争端。诚然，仲裁机制不能解决一切争端，但这一体制也绝不是一无是处的。

1912年，当美国的伊莱休·鲁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同样向仲裁运动的先驱们表达了敬意，他们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使国际事务的处理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他谈道，人们很难一下子就接受达尔文颠覆性的人类进化理论，同理，战争也不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他还呼应韦斯特莱克的观点说，有人妄想成立“一个权力型议会，由专人掌权，利用法律和国际警务力量操控各国政务”，这样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太强烈了。“实用理想主义”则设立了一种“新型的国际行为准则”—比如自1906年以来的113份条约。国际法在全球的地位也因此变得更为稳固，更具备科学的理论基础。如果适当提升该学科的教育水平，国际法的发展定会更进一筹。全世界所有公民都应该学会用“国际化思维模式”思考，因为这样有利于遏制民众的好战思想—“民众的集体意志”才是国际事务中最具说服力的力量。“文明的人类”不再那么粗野，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国内自我约束”的重要性。这样，人类的未来才更为光明，更为美好。

然而，鲁特和其他国际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样，认为仅凭仲裁机制处理国际事务是远远不够的。在欧洲，有些法学家呼吁建立国际法庭，而在美国，这些法学家则在努力探索超越仲裁机制转向“国际司法”的道路，而这正是韦斯特莱克警告世人莫要涉入的雷池。海牙的常设法庭还很弱小，仍然属于边缘化机构，而且尚处在基本起步阶段，这些法学家认为仲裁机制问题很多，当事方总是为了利益妥协让步，无法保持对法律的忠诚。一位著名的希腊国际法法学家曾经写道，新海牙国际法庭并非 “真正的国际审判法庭”，而是“大法官法庭的附属物”，鲁特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他本人也认为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法官会更为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而外交官则必然有所偏倚。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一系列的仲裁协议和规章仅凭自身效力和权限是不足以形成完整统一的国际法体系的。

因此，在20世纪初，很多法学专家开始强调他们所倡导的国际法与国际仲裁机制的不同之处。美国的法律体系自本国的仲裁运动发展而来，又逐渐脱离了这一运动。1905年，美国国际法法学家联合起来成立了全新的美国国际法协会，该协会“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纯粹以国际法法理角度论事，与国际仲裁机制泾渭分明”。在安德鲁·卡内基的再次慷慨

帮助下，他们开始为自己心中的神圣之法寻觅国际后援，希望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形成一个判例法体系。1907年的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上，鲁特本人提出了这一观点，开启了美国对国际法庭理念数十年贡献的新纪元。

一个世纪之后，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阴霾里，美国国际法协会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协会成员共同缅怀伊莱休·鲁特，忆起这位伟人对美国司法事业的贡献，呼吁世人学习鲁特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对民主至上的忠诚信仰。但是将鲁特视为21世纪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灵感之源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这样讲无疑是过度美化了其世界观及时代局限性。鲁特确实对民主事业做出过贡献，但这份贡献也只是一份绵薄之力。由于他信奉精英主义，所以虽然时常提及公众舆论，但他认为民意是可以影响和改变的，而真正的权力应该由少数具备科学理念的法学专家掌控。鲁特的这一看法是狭隘而保守的，他妄想通过法律规范调和利益和公平性之间的矛盾来解决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等各领域的冲突。这当然是一种所谓的“万能适用”观念，也是典型的美国观念。对最高法院运行机制的高度模拟吸引了当代众多法学家和决策者参与其中，在美国称雄世界的时代，正是这些人在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鲁特曾是美国国际法协会的主要成员，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难以置信的是，1897～1920年的几位美国国务卿除一人外都曾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不过，美国国际法协会的影响其实极其有限，在其他世界强国国内并不存在与之相媲美的国际法组织。在美国之外，也很少有哪个国家乐于让一群法学家名不正言不顺地掌控世界的命运。在法国、俄国、英国等国家也不乏守法主义的支持者，但这一思潮的大本营还是美国。然而，即便是在美国，也有诸多质疑指向守法主义，尤以参议院为首。他们极力反对法律对美国统治权的限制和约束。只要国际法计划还需要全美人民的充分参与，守法主义者在发展国际法的路上就会一再遭遇障碍。事实上，大战爆发前，美国参议院就曾悉数否决或严格限制鲁特、布莱恩以及其他人的诸多外交建议，之后不久他们又毅然决然地否决了国际联盟的决议。1945年以后，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确立，自此，其普世主义和例外主义方能协调共存。但那时，国际法的内容与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几乎没有人相信在这样一个战争频发、核武器盛行的时代，国际仲裁机制还能为世界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章 科学联盟

> 不同国家相互合作，共同制定国际宪法，共同应对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以及恩泽这个宇宙中的其他天体上发生的一切，共同关注我们的共同利益，揭露人为划定的政治疆域。许多敬业的知识分子积极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试图消除人类行为方式及外在表现的差异，如果一直容忍这些差异，它们就会被放大，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国家特色，酿成大错……我不想夸大科学探究的文明价值，但关乎重大问题的科学发明把人类联合在一起，当外交手腕无法发挥作用或是在出现危机几近失败时，科学研究就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彼时，科学家将会执掌外交，并学着保卫世界和平。
>
> —阿瑟·舒斯特（Arthur Schuster），
>
> 《国际科学》（International Science，1906年）

欧洲协调没有属于自己的官僚机构，没有设立总部，也没有秘书处。有些激进的论调批评欧洲协调，称他们根本没打算建立一个永久机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或上帝的意愿自然会把我们带上通往和平的道路。此外，资本主义和民意本身也有走向和平的趋势。上述两点可以搭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构架，但不能以此为基础组建机构以实现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如果国际合作只限于欧洲协调与其初始对手之间的往来，那恐怕就没有什么国际“组织”值得一提了。

要了解后来出现的国际组织是如何崭露头角并成为现代政坛的耀眼新星，我们需要补充点别的知识—19世纪中期，科学和技术享有极高的地位，人们对国际化的世界有了科学的认识，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掌握了统计学、工程学、地理学、目录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大量新的专业知识，于是开始放弃废除国家的想法，相反，他们希望成为国家的主人，用专业精英管理代替贵族统治，换掉那些出身名门的业余国家管理者，让受过良好教育、明事理的骨干队伍掌管国家。这些人认为世界基本统一是科学事实，要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就要通过教育培养基督教的怜悯之情、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专业生活有条不紊的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法学家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特例。

社会本身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组建的有机体，这种观点是法学家们看待政府功能的基本原则。维多利亚时期一位重要的统计学家在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上提醒与会者说：“所有政府都急于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而你们要尽量清楚全面地了解社会力量的构成，因为以往都是政府负责掌控这些社会力量，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赞成让社会力量控制政

府。”要达成此目标，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指导手段变得必不可少。该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理智和科学能够让人们看清他们的共同利益并消除偏见，因此人们寄希望于社会学，希望它能促进国际合作。国际主义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让政治自由区的划定成为可能，在政治自由区内不存在国家的党派之争，各领域专家可以相聚于此，搁置不同国家的党派之争，这里没有民族和种族之分，大家是一个整体。

法国贵族圣西蒙（Saint-Simon）伯爵是欧洲研究社会科学组织的先驱理论家，他一生都在为国际主义事业打拼。他同美军将领乔治·华盛顿一道对抗英国，年仅20岁时就提议修建巴拿马运河，还将法国革命的热情同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的热望结合在一起。他对自己充满自信，在追求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时他称自己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才”。圣西蒙是一位具有宏观思维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个将“组织”这个概念引入国际政府并使之成为国际政府重要原则之一的人。

1814年，欧洲协调形成。同年，圣西蒙提议彻底改革外交工作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联邦，不同国家共同拥有同一个国王和议会，欧洲所有人都在这个政治组织中生活。他认为，欧联邦不会立即成形，也绝不会在传统的外交程序下产生。因此，成立一个恰当的组织才是关键所在。

> 一次次召集会议，各种条约、协定和安排部署层出不穷，但是不管你做了什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战争总是无法避免……要想将各个民族重新凝聚在一起，你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一个组织。

20世纪的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圣西蒙预见了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联合国的诞生。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他确实让大众认识到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必要性。圣西蒙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与现在相比，19世纪早期的组织所蕴含的精神更能激起人们的斗志。人类必须赶在《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等经典著作将组织这个词变为20世纪50年代的代名词之前对冷战进行自我反思。对于那些浪漫主义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而言，组织一词具有积极的含义，这一词汇是从生命有机体的研究中提取而来的，与生物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认为，社会和植物一样，都是有机体，依靠新陈代谢成长，随着时间的累积，它们的生存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范围也越来越大。各种机械也是构成这个生机勃勃的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展现出了相同的生命力。在机器人被赋予情感认知能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认为那是自然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圣西蒙的注意力被和平以及兄弟般相亲相爱这两个愿景牢牢吸引着，而工业发展和机械化则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手段。

圣西蒙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将他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1828年，他的一篇文章进入大众视线，根据其中的阐述可见圣西蒙奋斗的最终目标

是彻底实现国际主义："全球大联盟指的是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无论处于何种领域、有何关联，只管联合在一起……只有所有人都朝着和平的方向努力，全球大联盟才能为世人所接受。"圣西蒙十分看重"联盟"，认为这是消除固有敌意的最佳途径。按照他们所绘的蓝图，这个意愿不仅会在街道、村庄、城镇中实现，还会以一个地方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好比一个同心圆，最终遍布全球、涵盖全人类。人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全世界范围内信念和行为的大统一"：

> 当这个伟大的概念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直接目标时，之前社会取得的进步一定会被视为在为此做准备，组织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为统一和全球秩序时代的到来以及实现人类大家庭领土主权的统一治理做铺垫。

梦想全世界和谐共处，赞扬体力劳动者的美德，高度重视资本主义新技术，这三件事放在一起是个异想天开的组合，而有一位怪人却一直致力于促成这个组合，他就是佩尔昂方坦（Père L'Enfantin）—19世纪30年代圣西蒙门徒的领导者。他自称是一个新的宗教组织的"大祭司"，鼓吹自由恋爱以及东西方统一。昂方坦因主张性别平等而激起公愤，被关入法国监狱一阵后，为了促成东西方联姻，他和部分圣西蒙主义者前往埃及。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那个时期，他们极力主张联合地中海人民，从更广范围上讲，他们是世界和谐共处这一主张的忠实信徒。他们梦想着把法国变成"新的麦加"，并绘制了欧洲地图，上面附有铁路路线，还标明了从黎凡特到南美的信徒网。在法国，圣西蒙的信徒包括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劝说主张革命的拿破仑的功臣，正是这些功臣在19世纪50～60年代间开辟了政府和资本主义改革的新纪元。昂方坦的狱友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作为法国参议员闻名历史，他晚年同理查德·科布登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份1860年签署的协定也许是19世纪关于自由贸易的唯一重要协定了。苏伊士运河体现了工程学和世界和谐这一主张的融合，是典型的圣西蒙工程。前北非领导人、工程师费迪南·德·雷赛布就因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名声大震。

按照圣西蒙主义的说法，一切当时看来奇怪的事情到19世纪末都会变得再平常不过。19世纪末，工程师会成为人类的劳工，各种技术会促进人类和谐，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此外，人们也不会认为国际组织原则的"准进化论"有多奇怪了，该理论把生命的起源视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微生物，随着在伟大的生物链中一路进化，最终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结构下达到成熟。国际组织原则的准进化论是技术专家治国这一理念的早期模型，它崇尚国际社会工程化，其推崇者因自己的唯物主义信念感到自豪的同时又对人类完美主义有着近乎迷信的崇拜。许多杰出的国际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本身正不可避免地朝着世界和谐的方向前进，在达尔文之后，这种想法为更多人所接受。在建立英联邦和国际联盟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南非评论家扬·史末资（Jan Smuts）是一位严肃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个人学说"整体论"从进化的角度解

释了国际组织的意义，这一点与圣西蒙的观点十分相似。伍德罗·威尔逊曾为国际联盟正名，指出它的存在代表着组织的博爱之心达到了顶点。史末资和威尔逊这类人是政治家也是管理者，但不能称之为革命者。他们相信改革，并通过新的领导班子利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改造社会。尽管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成立组织机构，但也要确保这些组织由正确的人来领导才行。

此说法下暗含的精英主义被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在埃及期间，弗朗西斯·高尔顿结识了许多圣西蒙主义者，他们的激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对英国国教心灰意冷，梦想着成为“柏拉图口中国家的公民”。高尔顿认为科学的思想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他甚至还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用统计学知识计算过“祷告的功效有多大”。他发现自己掌握了一门社会科学—优生学，并希望借此“在整个王国设置科学祭司职位”用来监督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进步情况。后来，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等人试图通过联合国在全世界宣传高尔顿的构想。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圣西蒙的前任秘书和门徒，他才是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希望由精英人士制定公正的社会法规。在1822年的《社会再组之必要的科学作业方案》（Plan of Scientific Studies Necessary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一文中，他提到系统地采用科学方法解决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和平以及繁荣就会实现。孔德把人类精神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他宣称，继“神学”和“形而上学”两个阶段后，世界进入了“实证研究”阶段，他新创的社会科学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名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是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对孔德而言，这首先是个国家性的学科，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国际主义内涵，就很难做到真正忠于圣西蒙主义。在“非洲争夺战”之前，孔德曾经以为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了，而战争从此后也无从挑起了。军国主义日渐衰落，因此一切尝试建立联盟的政治举措都没有必要了。相反，世界各国应向“同质大家庭的方向发展”。这是超越国家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无结果的世界大同主义”。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就是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对指引人们前行的整体规律的研究。

按此推论，掌握统计学知识是构建优秀政府的关键，这与边沁当年所持的观点一致，因为只有通过可计量的数据和统计研究，我们才能发现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正如一位受欢迎的科学家所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是难以破解的谜；若以群体为单位研究，那就只是个数学问题”。如果数字不会撒谎，那么没有数字的话，政策该如何发挥效力呢？如此看来，统计学家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呈现实际数据那么简单了。他们得知道如何对数据进行分类，这样才能告诉政府其政策法规何时会生效，才能为其指出影响政策效果的外因有哪些。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统计学之父朗贝尔·阿道夫·雅克·凯特莱（Lambert-Adolphe-Jacques Quetelet）的观点来看，社会是受统计学规律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政客的角色便自动降级：除了调整政策以保证各项法律操作顺利、避免各种干扰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为此，政客们必然需要统

计学家的指导。1858年，凯特莱在给从前的学生（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中将统计学描述为“政府专用科学”。

阿尔伯特亲王竭尽全力宣传统计学家的人道主义使命。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致辞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时他向与会的代表表示祝贺，赞扬他们为了全宇宙人类的幸福奔波劳碌。那时，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备受“偏见、责备和攻击”，比如狄更斯就很喜欢嘲讽地模仿统计学家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自夸的口气讲话。但是很快统计学家就摆脱了之前的激进组织，向外界，尤其是承保人、医生和工程师展示了自己的实用价值。他们认为人们是有能力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人类事务数据整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就能像边沁主义畅想的那样，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制定出深谋远虑的法律。

想要达到预期效果，仅搜集数据和统计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搜集的所有信息都分门别类，格式正规，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对比和整合。在进入全球变暖、复杂的国际贸易金融工具公式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跨国及跨行业的数据进行对比需要事先协定，协定内容包括数据以何种形式呈现，事件及其他事情如何分类等等。简言之，在整理和校准资料的过程中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编纂”是边沁创造的又一词汇，这个词成了专家们的战斗口号，因此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统计、核对各种事件、事物和机构的信息，最终整理出分类数据。

如果这种努力可以创建一个全球性的科学组织，催生新的专业论坛及团体，那就离达成建立普遍一致的统计及评估标准这个目标不远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轻松谈论标准。金本位制是货币国际主义的理想标准，而如我们所见，“文明标准”会根据国际法对世界各民族的适用程度提供一个绘图模板。但其实大多数标准并不准确，也不能令人信服，多数时候不过是技术活罢了。阿尔伯特亲王鼎力支持的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展示了精密工程的发展。英国艺术促进会、商业及制造业借此机会呼吁“统一全世界的‘评估’体系”。与此同时，统计学家们正尝试在全世界统一医学术语，以便于统计不同国家的死亡率数据。

标准化工作给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在电报通信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国际联盟国际电报联盟早在1865年就已成立，在此之前，信息交流双方需先将电报信息打印出来，再借助人力将信息送往目的地，这样往往会造成延误，建立联盟就是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国际电报联盟为其成员国提供所有国际信息，将各成员国的电报系统整合成一个单独的网络，制定了发送电报的收费标准，而国际电报联盟就扮演着“票据清算所”的角色。通信量飙升且收费降低，国际电报联盟因此被视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该联盟不强求任何国家加入其中，而其成员国，甚至连那些表现得好像是成员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都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借着同样的契机，万国邮政联盟也于1874年成立了。10年中，评论家们把这些组织看作为未来的世界政府播下的种子。

与此同时，要求统一度量衡的呼声也出现了。1875年，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源自法国的公制单位迅速被多国采用。英国工程师对螺钉和螺栓尺寸的担忧为今天的国际标准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国际标准组织的影响悄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用电器的形状到我们周围的颜色气味，其影响范围极广，可能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了。民间还存在要求统一时间单位的诉求，尤其是在有了无线电报之后，但是国际上的气象学家对此百般阻挠，过了大概40年，国际时间局才在巴黎成立，成为一个永久性机构。人们相信专家们能够促成不同国家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会仅局限在技术问题上，还扩展到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边沁的重要关注点—刑罚政策领域是标准化呼声较高的一个领域，它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而公众健康是另一部分。

这种呼吁的结果是大大小小的会议频频召开，国际工作网随之产生。圣西蒙对协会的实际影响力的预言似乎成真了，“一战”前的观察员认识到这种发展势头“为世界组织注入了巨大动力”。1913年，第一份关于国际主义的论文出炉了，文章主要从“国际外交会议、非官方会议、协会、各类局以及其他组织”等方面探讨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现代社会现象”。粗略估算一下，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那个世纪中，国际系统内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国际政府组织的数量从原先的10个以内激增到50个左右，其中大部分成立于1875年之后。这其中至少有17个组织设有长期总部并配备了官方工作人员。他们帮忙规划铁路网及河道网，规范财产权和度量单位，统一公共健康政策。据一位专家统计，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数量更庞大，从19世纪70年代的区区25个迅速发展到20世纪早期的600多个，其中半数组织才成立几年。

因此，19世纪末的国际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面貌全新的机构，就连欧洲皇室都对这些机构另眼相看，因为他们也想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阿尔伯特亲王和拿破仑大帝是其中的先驱人物，也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两位，其他人不过是效仿他们的做法罢了。国际农业研究所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前身，如果当年意大利国王不资助该研究所，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了。意大利金融专家路易吉·鲁萨蒂（Luigi Luzzatti）称该研究所旨在“迅速解决那些只能靠拥有执法权的科学组织解决的问题”。鲁萨蒂后来成了意大利的首相，他认为此类研究所带来的益处无可限量：它可以改善全世界大多数农耕人口的生存状况，从而抵御社会主义扩张；还可以保护数百万被迫流亡于世界各地的人；最重要的是，受其影响，更多的国际组织会涌现出来。“20世纪将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研究机构联络网络啊！”他兴奋地感叹道。

奥特莱的“曼达纽姆”

利奥波德国王领导下的比利时是欧洲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国家，也是19世纪末国际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中心。利奥波德首次涉足国际主义就把刚果自由邦当作新封建主义的实验品。他的管理方式恶劣至极，对待刚果人民极为凶残，约有数百万人死在他手里，因此比利时政府迫不得已在1908年接管了这片土地。而那时，利奥波德早已转投其他盈利较少但更有价值的国际主义项目了。因急需积极的宣传，他努力把首都布鲁塞尔打造成“国际化”精神的标杆。到1910年，比利时首都成了举办国际活动最多的城市，比伦敦多出一倍，连巴黎都要屈居其后，而柏林（普鲁士人的国际主义者严重缺乏热情）举办国际活动的频率只及布鲁塞尔的1/10。

1907年，一小部分比利时的国际主义者希望通过利奥波德的支持成立一个国际协会中央办事处，他们打算把这个办事处打造成所有组织的“中心组织”。当时，正规化和系统化的政府间合作的全球体系迅速形成，而这个新成立的中央办事处的宗旨在于引领这一潮流。这一组织希望能兼顾核对数据和促进世界和平两项职责，这一理念是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的思想结晶。奥特莱是19世纪末国际主义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是现代信息科学的创始人，杰出的目录学家，也是开创当代数据搜集精英的聚集地—硅谷的先驱。

1868年，奥特莱出生在比利时一个富裕家庭，当时他父亲的有轨电车生意已经遍布全球，赚得盆满钵满，在19世纪中期就已跻身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之列。因此奥特莱生来就具有全球化视野，同时兼具欧洲人的外交特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小的王国究竟凭借什么成为孕育崇尚科学的国际主义的温床呢？除了凭借利奥波德国王本人想要建立良好公众关系的意愿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成就了这个结果。比利时的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之间的矛盾使这个国家从古至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却一直存在着，这种存在象征着乐观主义对欧洲民族主义的胜利。1830年比利时由欧洲协调创立，当时该国国民并不认为语言差异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认为国家内部就一定要统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主义者的积极性自然会提高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多个组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设了长期办事处，为了协调这些组织之间的事务，互享信息，奥特莱提议成立国际协会中央办事处。1907年年初，第二届和平会议在海牙举行，和很多人一样，奥特莱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深感失望，他原本以为这次会议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但会议却一直在讨论如何使世界承受得起战争这个更具局限性也更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奥特莱认为这代表着国际合作精神的挫败，而挫败的原因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法学家、国会

议员、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通力合作。但那时的奥特莱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面对传统外交家和军国主义势力的阻力，国际主义只会愈挫愈勇。总之，他认为比利时这个国家要在争取人类权益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做出表率，在对抗维也纳会议精神、反对欧洲协调及其退化的产物欧洲联盟体系的理念时一直走在世界各国前面。

在全力筹备“国际组织中央办事处”的过程中，奥特莱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数据，因此办事处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一本关于“国际生活”的年刊，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了。因为年刊的旧版略显陈旧落伍且雄心不足，1909年他们对其进行了改进，当年的年刊总页数超过了1 500页，编辑和读者无不对刊物中反映出“国际生活丰富、多产”的数据交口称赞。但是，在国际协调方面，奥特莱的看法可谓高屋建瓴。转年，布鲁塞尔不仅举办了1910年世界博览会，还成为国际协会世界大会的主办方，大会讨论了法律效力问题，商议统一科学术语、重量和度量单位。国际协会联盟的成立就是此次会议的成果之一，该联盟的总部设于奥特莱在布鲁塞尔的中央办事处。

1885年，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地理学家称赞“国际会议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接下来的30年也许是科学技术国际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19世纪5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只举办一到两次国际会议，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多达12次，而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这个数字则达到了30次之多。许多国际组织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实现了相互合作。旅店老板、建筑师、工程师、银行家、精算师以及速记员也争相在19世纪末组织国际会议。不同领域的专业组织越来越多，这是科技知识无国界的理想状态。不同国家科学地分配“精英”劳动力，这不仅是通向真理的捷径，还向政客们证明了国际合作的良好效果。当然，也有一些参与者不与他人合作，只把自己的事业限定在国内。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科研工作和人类社会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个人联系和职业联系相互交错织成的密网把科学家、积极分子和公众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

然而，奥特莱担心的是，这种专业化的现状不仅不能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知识凝聚在一起，反而会使他们各成一派。随着科学调查的推进，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以惊人的速度成倍提高，但是人们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专业化进程的利与弊也成了新的争论焦点，毕竟“专家”这个说法是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但是，奥特莱认为要想顺利推进专业知识，避免其消失或失去意义，协调合作必是不可少的。他的终极目标是编写一本“万能书”，这本书会保持更新，一切有用的知识都能在这里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奥特莱提出“证明文件”这个概念，把事实从众多信息中系统提炼出来。在互联网出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奥特莱相信让人们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就意味着把老式图书馆变成信息中心。与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式的男主角一样，奥特莱先把所有书目数据库的信息整合到一起作为信息源，然后将它们转录为单个词条。1895年，万能书仓库大概收录了40万个词条，在一番艰苦卓绝的工作之后，1903年，词条数达到了300万个，到“一战”爆发时，其中的词条数达到了1 100万个。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

程，却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奥特莱用自己的方式整理着这些信息，发明了“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采用这个分类方法，他还建立了“国际书目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后来几经翻新，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奥特莱的想法远不只编排书目那么简单。他希望把布鲁塞尔打造成世界数据信息中心，有了比利时政府的支持，“国际协会联盟”将成为新型国际组织的协调者，因为物质与精神生活越来越互相依赖，联盟将会发展成为“人类幸福”奋斗的机构。奥特莱梦想打造一个“世界宫殿”—“曼达纽姆”（Mundaneum），并利用国际协会联盟打造国际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这些机构被视为“世界城”的各个“器官”，而“曼达纽姆”则是大脑。“一战”以后，奥特莱委托勒·科尔比西耶（Le　Corbusier）提交了建立世界城的提议，为了使布鲁塞尔的地位合理化并得到巩固，奥特莱提出了一连串建议，世界城的提议也是其中一部分，他希望布鲁塞尔与荷兰的海牙以及瑞士的日内瓦一道，共同扛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旗。

和许多国际主义者一样，奥特莱并不认为“一战”的爆发推翻了他的理论，相反，他觉得这次战争反而证明了其理论的必要性。1914年10月，奥特莱的一个儿子战死沙场，据他自己说，他还到战场上寻找过儿子的尸体，比利时混乱的形势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悲剧。为此，他主张彻底整顿战后的国际秩序。当时的新机构不断涌现，奥特莱计划打造一个“国际组织”，并为此拟订了很多计划，这个组织与即将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产物截然不同。奥特莱描绘了一幅高度集权化的蓝图，这个蓝图中的各个国家都由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有自己的议会、司法部门和执行委员会—国际外交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分配国际利益，国际武装部队是他们的后盾。不同国家组成的代表大会将会制定《国际宪章》，为了与宪章保持一致，这个新组织会“在全球开展活动”，而这正是技术统治论者的梦想。

奥特莱把这个组织的存在视为人类政治演变的最终阶段，从城、郡、公爵领地到民族国家，该组织在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奥特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国家视为最终阶段。“相反，全球精英现在正在探索创造一种兼顾各民族及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组织的可能性。”圣西蒙时代过去100年后，从不同国家发展为一个世界政府的自然演变思想已经成为国际主义的主题。世界和平事业十分重要，不能完全由那些政治家擅自处理，奥特莱总结道：“外交精神不应一家独大。政客、法学家、学者和商人都应各抒己见。”

1914年之前，这种想法十分普遍。但是“一战”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联盟，与早期的理想组织相比，这个组织才是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即便是在凡尔赛，在世界各个大国（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的那些东欧独立国家）中，对奥特莱所持的国家主权边缘化和希望专家主宰世界的想法也鲜有支持者。最终，比利时政府撤销了对奥特莱的资助，“曼达纽姆”及其管理下的各个组织也于1934年关门大吉。该组织的财物不得已一挪再挪，最终只能临时寄放

在大学办公室里。奥特莱呼吁通过“理性、和平的革命”转变人们的世界意识，但现在他的提议越来越无力，他想打造“世界警察力量”、制定《世界宪法》、建立“世界政府”，最后还要制订“世界计划”以“阻止各国由于为自身谋利益而无法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最终筋疲力尽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个想法最后也不了了之。1931年，奥特莱代表“小比利时”发问：“世界啊，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然而，好像没人在听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发出的是一个逝去时代的声音。“二战”爆发后，奥特莱全身心投入到传记写作中，以此记录自己的工作（奥特莱1944年冬与世长辞，此时“二战”即将结束），他置身于一片破败之中：一摞摞散发着腐臭之气的文件、图书，还有堆满工作室和楼梯间的档案。另有一些材料储藏在原先的研究室里，那里的房顶漏雨，鸽子都能飞进来。今天，奥特莱的半身像上还戴着已褪去颜色的花环。

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

为什么奥特莱的宏伟计划却最终幻灭了？毕竟，他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对国际史实有着强烈兴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到“世界大脑”的必要性，这与奥特莱成立知识储备库使所有人皆能受惠的想法如出一辙。两次战争期间，科普读物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也表明这个想法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奥特莱的做法以及他对科学国际主义的追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性。到19世纪80年代，公制运动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的进程一度趋于平稳，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一直提倡的通用体系，但英美两国随后强烈反对这一体系。《公制谬论》（The Metric Fallacy）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Halsey）曾经写道：“星象显示，未来会出现‘英美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套英美制的度量标准。”如果到1950年这两个国家的公制事业还不及一个世纪前，那么政治因素便难辞其咎。

同样，公共卫生改革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投入明显在不断增加，却没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拿破仑战争后，外来传染病侵袭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大部分国家都封锁了隔离疫区。1851年，法国外交部召开了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希望各签约国确保制定统一的准入规制。但是，除非各签约国照章办事，否则签订这种协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当时并不知道利害关系，自尝苦果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尽管整个19世纪霍乱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各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控制疫情。曾有一次霍乱爆发导致6万多人死亡。两年后，也就是1874年，法国提议成立国际流行病机构，但是，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强势帝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这项提议同样以失败告终。1883年，霍乱导致10万多人丧命，死亡人数比1892年只多不少，尽管这样，各国还是没能达成共识。[很多科学家在争论霍乱的病理，其中就有《欧洲霍乱防御》（La défense de l’Europe contre le cholera）一书的作者、法国专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这位先生因他的作家儿子马歇尔更为后人熟知，马歇尔将父亲对疾病和保持卫生的关注写进小说，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公共卫生国际办事处的成立，这是个既官僚又畏首畏尾的组织，在巴黎设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永久秘书处，员工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该组织主要负责通报信息，而不是教育大众，也并未打算积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又对源于黎凡特的时疫耿

耿于怀。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没能得到有效的官方回应。

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治观念的不同会使科学家内部产生隔阂，即使他们把自己看作国际主义者也难以免俗。19世纪的科学进程并不符合“科学无国界”这个说法，尤其是1918年以后，许多国际论坛还给德国科学家下了“逐客令”。奥特莱等老一辈科学国际主义者的特点此时显露无遗，他们完全无视发生的一切。奥特莱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意义何在，对政治上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想法带有鲜明的比利时特色，因为他们都会与处于困境的国家对话，奥特莱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有损他博爱论者的形象。

科学家们越来越受金钱摆布，事事听命于国家。很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非常高昂，独立科学家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奥特莱有自己的钱，在这些钱花光前，他可以搞他自己的研究而不受任何人摆布—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的。但是就算是一个成功的比利时实业家积累的私人资产（比如他父亲的雄厚资产）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宏伟计划。与国家和政客保持距离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会导致资金支持的持续短缺，很多专业组织都因此而受限制，能做的很少，最终成了情报采集中心，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成为活跃的科研机构。一旦国家资助科研（20世纪中期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科学家就有了资金保障，但是他们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束缚自己，还是忠实于各国科学家大联合这个最初的理念？科学军事化让问题变得更糟：在化学和核武器时代，各国强制保密基本科学实验，科学家们因此离奥特莱所说的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通用语言

科学家们的内部冲突频发，这是他们没能在国际生活中成功转变的最根本原因。科学统一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现实是，科学研究其实是项复杂的工作。查明事实的真相不像圣西蒙和孔德说的那样简单，在实验室中，科学分歧与科学一致同等重要，有时，分歧甚至比一致更重要。因此，科学家也许会主张普遍主义，但是一旦涉及科学杂志的专业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如何实现一个目标不仅会存在争论，还经常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有一个专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正浮出水面，这就是对通用语的探索。寻找通用语说明19世纪末人们对国际主义的潜力信心十足。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试图用数学或者符号学体系揭示所有语言或是有实意的句子共有的基层结构，其他人则呼吁创造一种世界通用的新语言。1870年，法国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勒（Alphonse de Candolle，现行植物名称国际码的创作者）发布了一篇关于“主导语言益于科学”的说明文，并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英语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其他人则认为发明一种“人造语言”会更好。“一战”前，全球发明的语言超过12种，但是直至今日最有名的还是要数世界语了。

俄裔犹太语言学家路德维希·柴门霍夫（Ludwig Zamenhof）通晓多国语言，是典型的住过犹太人居住区的孩子，世界语就是他发明的。世界语被视为19世纪晚期东欧帝国边界现实的写照，就像奥特莱的事业反映了比利时的形势一样。1887年，年轻的柴门霍夫用笔名“希望博士”发表了世界语指南，他从高中开始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了。10年前，他在庆祝自己19岁生日时就曾用自己发明的新语言为国际主义献唱圣歌：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Cadó, cadó, jam temp' está;
La to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á.

（各国间的敌意
消失、消失，现在时机已成熟
人类在一个大家庭中
内部必须统一）

由此可见，在柴门霍夫眼中，语言远不只是沟通工具，它可以促进和平，也可以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滋生敌对情绪，在东欧的犹太人中尤其如此。1905年，首届国际通用语大会在法国度假胜地滨海布罗尼召开，与会代表们穿着印有运动标志五角星的服装，先唱了鼓舞士气的马赛曲，又唱了他们的圣歌（“中立语为基础/人们互相了解/就会同意组建一个大家庭”）。柴门霍夫为世界和平以及新的未来做了祈祷。不幸的是，尽管拥有一批杰出的拥护者，但是一些认真的世界语拥护者还是脱离了组织并发明了伊多语，他们认为这个替代品比世界语更好，在与他们的争执中，柴门霍夫的运动很快陷入困境。伊多语搞出的分裂活动令世界语的拥护者十分恼怒。1908年，一位柴门霍夫的支持者写了《全球世界语大会语言委员会报道》（Raporto de la Prezidanto de la Lingva Komitato al la 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一文，文章传达出这种空想式的冒险行为引发的愤怒情绪，并表明了即使是对通用语的探索，在其最真诚的拥护者间也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20世纪末，在地震学这个更加专业的研究领域，关于什么是最根本因素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看法。数据是对所研究事物的真实自然的体现，还是根据分类固有的那些法则所创造出来的，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简言之，数据分类是由世界结构决定的吗，还是说它只是个务实的选择，它受控于它所服务的目的和科学家自建的统计模式？地震学需要共享数据，因而比较倾向国际主义。但是，在以何种方式搜集和公布数据才能让人们最准确地分辨出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地震活动模式的问题上，欧洲知名专家还没能就此达成共识。在国际上，对比不同地方发生的地震与对比同一地方不同时间的地震情况所需信息也不相同。因为地震学的需求，建立标准的呼声普遍存在，但是，由谁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标准的问题却一直没能明确。一门专业科学的用途究竟是什么？人们对此争论不休，互不让步，标准化进程本是悄无声息的，但当谈及究竟采用哪条标准时，往往会引来激烈的争辩。

在上述理由和一些其他原因的限制下，“世界城市”终究不会存在，全球标准化运动也暴露出不足。尽管在当今世界“英寸”也与“米”共存，游客出行也会带上万能充电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插头”，以适应全球不同的供电系统。但是，科学国际主义没能统一所有的事物并不代表它是失败的，只能说明它虔诚的拥护者们过于期望科学国际主义的成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组织，它壮大自身力量，由奥特莱及其他人创办的许多特定的国际专业机构一直存在至今。为协调食品政策和食品产量做出的努力促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立；在这些专业机构的推动下，国际气象组织1946年设计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作为全球标准；同年，相当数量的成立于两战间的小型组织被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大型组织取代。因为民间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对而言没那么引人注意，且基本不存在争执问题，所以它是所有组织中最强大的一个。这些组织仍采用19世纪的旧观念，沿袭了过去的所有组织的内部设置和盲点，因此还是让那些只关注人性不考虑国籍的技术专家制定政策最为妥当。

第五章 国际联盟

> 试想倘若美国放弃了它们一直信奉的孤立主义，那将是件多么鼓舞人心的事。当然前提是它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设下外交圈套，而是出于世界政治国际化的考虑。
>
>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
> 《新共和国周刊》（New Republic，1916年第6期）
>
> 一个旨在为全人类谋求永久和平的高效联盟将为我们带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
> —乔治·伯顿·亚当斯（George Burton Adams），
>
> 《大英帝国及和平联盟》（The British Empire and a League of Peace，1919年）

国际主义交际策略取代了传统外交手段，外交活动一改从前保密性高、排斥性强的特点，变得更加透明，国际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国际主义者推崇各国为推动科技和贸易发展通力合作的做法，认为军国主义和联盟外交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种族的种种限制，许多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成了全球干预政策的支持者。老牌大国之间常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允许其他国家参与。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新成立的专业组织对欧洲以外的小国同样敞开大门，专业人员交流及专业知识共享等方面都很活跃：以埃及为例，在参与万国邮政联盟的创建工作时，该国都还没有拥有完整的主权。尽管当时各个专业组织的资源极为匮乏，但是这些组织仍坚持运作，且运作时间之久令人感叹。

然而，19世纪的国际主义的雄心壮志有多大，它们面临的种种限制就有多大。国际主义对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尤为适用，其运作资金也多来自这些国家。两次海牙国际会议取得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显示，全球主要大国对国际主义的采纳程度仍旧十分有限。他们没能组建类似联合国那样统领全球的国际组织，战前美国呼吁成立国际法庭的提议也遭到冷遇，无疾而终。对历史学家而言，关键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换言之，就是要弄清楚在“一战”期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何能够通力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和平时期世界安全常设组织以及国际联盟。

如果给这个问题一个消极的解释，那也许会是：1815年支持欧洲协调的主要力量到1918年已不复存在，或是影响力已远不及当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为欧洲协调注入强大动力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不复存

在；德国遭受重创，无力反击；俄国也因内战宣告解体。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在1914年还是再次聚首，公开支持国际仲裁机制以及国际法的传播。“一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的领导人也宣称，他们赞同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尽管已将这些主要大国的转变考虑在内，但我们依旧困惑不解：究竟是什么让英国力排众议，笃定地相信国际主义并未失败，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国际地位以及政治意义？更让人吃惊的是，“一战”期间的新兴国家美国也持相同观点。这两个国家究竟为什么对成立一个永久的世界“组织”这种想法情有独钟？许多英国的政治决策者依旧坚持要恢复欧洲协调，事实上这一组织并没有彻底消亡。在英美两国，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坚定地支持新国际主义，他们断言1919年在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可以成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联盟。这些精英中有一位人物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他，世界格局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这个人就是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进退两难的伍德罗·威尔逊

研究国际组织的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更像是圣徒文学，几近完美。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以及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就经常被刻画成人类的救世主形象。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反种族屠杀公约》之父，被世人冠以先知的头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以及为人权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国人勒内·卡森（René Cassin）都拥有大量的拥护者。上述这些历史人物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备受世人赞誉，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与伍德罗·威尔逊相提并论。1918年年末，威尔逊造访巴黎，200万巴黎市民夹道欢迎这位“和平之神”；在意大利的米兰，他同样大获好评，人们称他为“人类的救星”、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摩西”。在威尔逊的支持者看来，他所代表的美国心系世界，不向国内势力低头。他英年早逝，在参议院否决其建立联盟的构想之后抱憾而终，他是为了推进现代化事业而牺牲的。威尔逊于1924年去世。数十年后，他的思想升华为一种主义。乔治·H·W·布什、迪克·切尼（Dick Cheney）以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深受威尔逊思想的影响：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许多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担心美国会放弃秉承了多年的多边原则。老布什总统等人希望效仿威尔逊的做法解决当下的问题。

威尔逊绝对称得上是建立国际联盟的功臣。没有他的支持，英国内阁就不会支持国内的国际主义者，国际联盟也就只能是个构想。伍德罗·威尔逊的一生就像传奇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最精彩之处不在于他克服了当时政治社会的种种缺陷，而是他的一系列政治决策，正是这些决策决定了新兴国际组织的基调及其影响力。当时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遵照的是固有模式，而威尔逊却丝毫不受这种模式的束缚。与伊莱休·鲁特和美国前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同，威尔逊希望国家政权由政客掌握，不想权力落入法学家手中。他坚信国际联盟应该是准议会式的审议庭，而不是可以给出最终裁决的私法裁决庭。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他眼中，各种条例都是集体意愿的根本体现，应顺应集体意愿，随时改进。集体意愿也随时间而变化，时间更迭，集体意愿也会得到印证。这位世界上第一个集体安全组织的创始人竟然对集体安全、国际法律以及组织本身并不感兴趣，这种态度的确出人意料。他把国际联盟的具体事宜交由英国处理。国际联盟半民主商议半官僚决定的体制与英国政府的体制极其相似。换言之，威尔逊的支持者融合了美国的传教热情和英国的帝国作风两种特质，兼具权力和远见。因此，国际联盟为19世纪的帝国与20世纪的民族国家搭建了一座桥梁。

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对欧洲国际主义者的积极工作漠不关心，我们并不觉得意外。美国的联邦制度、受到高度保护的巨大的国际市场、盎

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国会同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都为美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设下了障碍。除此之外，在国际合作的许多领域中（比如国际标准化运动），美国竟然意外地被边缘化。但是，所有这些都算不上决定性因素。如我们所知，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主义事业中。1881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会议，这是此类会议首次将会场设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会议的召开表现了美国寻求全球新定位的意图。此后，越来越多的会议采取了这种做法。

美国为国际仲裁及调停机制新形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与美国守法主义者的指导原则大相径庭。1914年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侧重以仲裁机制解决问题，这种做法为当时的国务卿、共和党人伊莱休·鲁特以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两人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威尔逊之前，律师出身的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更推崇仲裁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作为一名革新论者，塔夫脱认为应该保持“法律及公平原则亘古不变”，同时他还认为成立常设的国际法庭十分必要，在这两种想法的影响下，塔夫脱联合加拿大和英国共同制定了完整的国际仲裁条约。然而，塔夫脱随后发现，参议院是不可能批准这些条款的。当时的历史学家也毫不留情，称这些条约是“马虎起草、多管闲事的典型范例”。这一切都预示着塔夫脱的继任者威尔逊将面临严峻挑战。参议院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根据地，在这里，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坚决反对塔夫脱的行为，伊莱休·鲁特则认为塔夫脱过于草率和激进，他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守法主义者的事业名誉扫地。塔夫脱的前任西奥多·罗斯福当时仍是他政治生涯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罗斯福眼中，塔夫脱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仲裁条约只可能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显示出效力，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是，如果换成两个彼此敌对、关系紧张的国家，这些条约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在1912年的美国大选中，同属共和党的塔夫脱和罗斯福之间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的选票，最终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成功当选总统。在他上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法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他们制定了一些条款，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这些条款说明“一战”之后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国际政府。1910年，罗斯福在发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时就曾竭力主张联合“国际政治力量”，在他看来，如果乏味的道德声明不足以维持和平的话，那么，政治制裁就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手段。“一战”开始后不久，他更是呼吁成立“公正和平的世界联盟”，以便通过“国际警务力量”强制实现法治。但是，要这样一个联盟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哪些问题是其有能力处理的，切忌让其介入一切国际事务。联盟可以借助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但是军事介入仅限于敦促各签约国履行自身义务。如果该联盟获得成功，并且能够控制自身的欲望不自我膨胀的话，就会有更多国家参与进来，慢慢地，国际法以及国际仲裁机制就会成为调解国际争端的方式，最终会在全世界营造和谐共处的氛围。相较之下，由塔夫脱领导的游说组织强制和平同盟会取得的成绩更高，该组织在战争时期大受欢迎，它希望各盟国将一切“可由法院受理的”争端都提交至国际

法庭，由法庭给出最终判决（所有其他争端需由仲裁委员会处理）。此外，所有成员国需要签署协定，协定要求任何未经国际法庭（或仲裁委员会）批准就发起战争的国家将受到其他成员国的制裁。换言之，塔夫脱体系不允许任何成员国违背国际判决的裁定。

但是，上述二人的提议都存在明显缺陷。罗斯福的世界联盟只对少数国家有约束力，还在法律层面抹杀了“至关重要的利益”和“民族荣誉”的重要意义。而在塔夫脱和“强制和平同盟会”的体系下，执行裁决则过于机械化，一旦有国家拒绝借助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其他各国就必须对其发动战争，以示惩罚。此外，仲裁过程也很不严格，没有任何惩治措施保证法庭判决得以落实。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伍德罗·威尔逊对实现国际和平的守法主义者范式那么没耐心了。法学专家及其支持者认为自己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他们一方面盲目迷恋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另一方面却又不知该如何有效落实法律条款。

身为总统，他们都走错了路子。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而是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伍德罗·威尔逊的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受此影响，威尔逊希望立下的协约可以像《圣经》盟约那般神圣，而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契约。同时，他还渴望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会刻意迎合少数权贵的利益（无论如何那些人都可以过得舒适安逸），只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满足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威尔逊认为只要法学家们把所有的细节都处理得准确无误，世界和平就可以实现了，这种想法让他看起来荒唐可笑。在他眼中，言语的作用是鼓舞人心，而不是划定界限。与马志尼一样，威尔逊也认为民主政治属于“道德行为的范畴”（这一说法出自他1815年发表的“现代民主国家”一文）。威尔逊本身既是一位精英人士，又是对人类社会渐进性演化持积极态度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他愿意相信世界人民的政治直觉，认为诸位代表如实地传达了人民的意愿。在他眼中，就算各位代表不可信，世界上最优秀的法律也不会违背人民的初衷。因此，尽管威尔逊有时会发出一些支持“强制和平同盟会”的政治声音，但他的论点和思想受其父的基督教圣约神学以及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完全不同于联盟的主张。1916年5月，威尔逊告诉强制和平同盟会，他渴望看到全球各个国家联合在一起，这样就可避免一切违背圣约条款的战争，也可保障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公正和平的世界联盟”的思想并未触及这一领域，只是致力于让几个立场相同的国家组成一个规模有限的小团队。

守法主义对威尔逊影响深刻，但是对他影响更深刻的还是美国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美洲国家之间的会议”相继在西半球召开，最终促成了泛美联盟。泛美联盟最初只是美国寻求贸易扩张的一种对策，随后逐渐发展为促进西半球各国合作的手段，其总部设在华盛顿。一位观察员曾经写道，在该组织中“21个国家排除语言障碍，共同建立一个组织以商讨国际事务”，仅凭这一点，就没有哪个国际组织能与之相提并论。泛美联盟作为“威尔逊联盟”的前身得到了阿根廷政治家路易斯·德拉戈（Luis Drago）的赞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为全人类的进步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巨大舞台，并且可以与东半球的伟大文明

对抗，以此平衡世界的政治力量。”

19世纪，如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一样主张东西半球合作的政治家总是强调泛美主义是古老欧洲外交模式的替代品。

> 以由衷的信任为基础进行由衷的合作，可以帮助美洲各国摆脱长久以来深深困扰这些古老国家的负担和弊端……美洲国家秉承公正原则，追求共同利益，公平分配利益，做到这些，权力平衡就不再只是假象。在国外，权力不均已引发战争，整个欧洲遍地血流成河。

受到邻国墨西哥革命事业的鼓舞，美国国务院在战争时期一直满怀期待地发展多边关系以谋求和平。实际上，很多有威望的美国人都认为墨西哥面临的危机恰巧可以验证欧洲之法是否适用于美洲国家。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强烈要求组建美洲联盟以恢复南美秩序，他还说这个组织“将是成功的先例，指导欧洲联盟维护欧洲和平”。威尔逊最信任的顾问得克萨斯州的豪斯“上校”也持相同想法。1914年12月，豪斯沉着响应：“一旦实现和平，美洲国家间的协定将成为各国效仿的模板。”但是在这些尝试相继失败后，巴西于1917年提议重拾泛美主义条约。据威尔逊推测，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会教会欧洲人民如何维护战后和平”。如果在由独立民主国家组成的大陆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各国都全力支持通过贸易往来带动国内发展的做法，并承诺保护财产权，那么这片大陆上的统治手段同样也适用于欧洲以及美洲。若有哪个体系可以保证领土完整，而且不把侵略及土地交换看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那么欧洲人对这一体系自会无师自通。1918年夏，英国收到了来自威尔逊顾问豪斯上校的首封来函，信件透露了美国总统的想法，美国对领土完整的关注始于早期的《泛美公约》（Pan-American Pazt）草案，英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

法律编纂和仲裁机制是泛美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威尔逊看来，这些并不是泛美主义的首要特征，1917年1月，他在众议院的讲话“没有胜利的和平”中曾经提到这一点。他的发言列举了数条原因，表明美国需尽心尽力保卫“国际和平协调”组织，称该组织可以给战后的欧洲带来稳定局面。与此同时，他还表明了在西半球实行门罗主义的愿望。

> 我提议，所有国家都应一如既往地奉行门罗主义，使之成为全球通行的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他国主权，每个国家都有权掌握自己的政权，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受阻碍，不受胁迫，毫不畏惧地走出一条与大国强国不同的道路。
>
> 我提议，从今往后所有国家都能远离那些带来纷争的联盟，那些联盟只会让各国陷入对权利的争夺之中，陷入阴谋及

> 自私竞争的泥淖，就连处理本国事务时也要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扰。在强国协调中不存在类似混乱的结盟场面。当我们所有国家都用同一种理念指导行动、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时，我们就会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奋斗，就能在共同的佑护下和谐共处。

1917年4月初，威尔逊在对国会的演讲中声明同德国断交，并敦促美国参与“一战”。这次讲话表明新兴的强国协调与原有的欧洲协调之间隐含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威尔逊还指出，当务之急是要“证明公正与和平原则是在国际生活中对抗自私和独裁的有效手段，在真正实现了自治的自由民族中着意创建这样一个有行动力的协调组织，以此确保这些原则今后能落到实处”。独裁统治者（比如普鲁士王族）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理会人民的意愿。威尔逊明确表示，其实美国同“德国人民”并无不和，在此次战役中，美德两国都是受害者，因为“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与从前那些置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战争并无不同，都是各国统治者遇到问题求助无门，于是便煽动民众挑起战争，以维护各个王朝或者一小部分野心家的利益，他们总是把百姓当作棋子和工具随意摆布”。威尔逊继续他的讲话：“各民主国家只有通力合作，才能维持一个和平联盟的长期稳定发展。所有的独裁政府都不可信，它们不受联盟约束，也不愿执行盟约。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诚实守信的联盟，一种共同协商的合作关系……只有自由的民族才会信守承诺，一起努力打造共同的未来。此外，它们不会为了本国的小利益做出有损于全人类大幸福的事。”为了说明1917年与拿破仑时代完全不同的境况，威尔逊总统在讲话中生动再现了早期共和及民主两党对梅特涅和维也纳体系的批评论调。

与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那些人一样，威尔逊深受充满宗教热情的言论吸引，狂热追捧新教的末世论及马志尼的民族主义思想。美国杰出的新教神学家乔治·戴维斯·赫伦（George Davis Herron）与威尔逊政见一致，把“一战”看作“一黑一白两种执政理念的对抗，而这两种理念的最终目的都是统治世界”。赫伦因第二次婚姻声名狼藉，后来离开美国逃往意大利的热那亚，随后为了追随偶像马志尼和加尔文（Calvin），他又前往日内瓦。在一众不遵循常规的总统密友中，赫伦可能是最有趣的一个了。他将欧洲战争比作基督教对爱的追求与邪恶的利己主义以及好斗精神之间的较量。赫伦笔下尽显对威尔逊的崇拜之情，他曾写道：“威尔逊视博爱之法为唯一实用的社会基础，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世界和平的唯一前提……他巧妙设想、完美规划，期待最终能唤起美利坚的民族尊严，使之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最终带领全世界人民走进上帝的王国。”这正是威尔逊本人夙愿的生动写照。美国参与和平运动的人数众多，他们渴望把世界和平的福音传播到陷落的欧洲，而威尔逊就是这些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但是，总统自己的神学理念还带有浓重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这可以归因于对国内战略的考虑，但同时也具有哲学倾向性：在威尔逊看来，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像所有现行政治规章的基石一样，成为其对民

主和民意做出承诺的坚实后盾，这是典型的精英承诺。从美国参战之日起，威尔逊就有意避开一切有关战争目标的争论。但是，1917年年底布尔什维克党执掌俄国大权之后，开始大规模宣传反战言论，呼吁“民主和平”。至此，威尔逊再想避而不谈战争目标就越来越困难了。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布尔什维克也谴责秘密外交，批判发动“一战”的那些主要人士。但是，与威尔逊相比，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打破外交礼节，否定此前的条约，公开秘密文件，每逢负责外交事务的托洛茨基与德国谈判，他们都会向媒体公布谈话内容。苏维埃政府呼吁全面和平，他们相信所有的政府都承受着巨大的停战压力，他们称自己首先是“所有交战国”的代言人，其次才是苏俄政府的发言人。

美英两国紧随布尔什维克的步伐。当时有消息称苏俄的新领导人正同德国进行谈判，列宁及托洛茨基和同盟国的和平谈判从1917年的冬天一直持续到1918年冬天。这样看来，俄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参战。威尔逊警告参战各国：“人类坚决反对以任何报复手段结束战争的呼声算是被德国那群阴谋大师运用得登峰造极了，他们正把俄国带入歧途。”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迅速响应他的说法，公开表示反对并吞行为，并特别阐明了自己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

这种说法本应同威尔逊息息相关，但事实上将其进行发扬光大的却是列宁。列宁认为这一言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争论的传统，这一争论要追溯到20世纪早期及此前的哈布斯堡辩论。1917年10月，列宁颁布了《和平法令》（Decree on Peace）。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入研究了那些小国的困境：迫于大国的淫威，小国的国民只能委曲求全，违心做事。列宁认为那些小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平法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明确的参考，也为动摇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做出了努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劳埃德·乔治此时都不打算摧毁奥匈帝国（请看仔细，就连列宁都没有提到小国“必须”独立这一说法，这种提法成为后来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附带条件），他们当时都在为欧洲民意同布尔什维克竞争。

然而，威尔逊本人对欧洲政治人种论的细节知之甚少，因此，他仰仗一个秘密的专家团队—也就是所谓的调查团队—来搜集欧洲各民族的基本数据，这些人帮助威尔逊起草了他本人的和平方案。多亏了“调查团队”的专家们，他的方案—通常称为“十四点原则”—涵盖了欧洲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具体信息。对于一些民族问题，他们含糊其辞—比如谈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时，他们会顾左右而言他，避免正面作答。但是，对待另外一些问题时，他们又会做出特别具体而明确的处理—对未来波兰的畅想就是这样。“调查团队”的秘书长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少年老成，曾公开表明要奉行实用主义。因此，“十四点原则”并未对民族自决做出承诺，也未明确勾勒出战后国家的雏形。取而代之的是，威尔逊谈到了国际联盟的重要性，称该联盟会保障成员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这意味着该联盟是一个同泛美联盟一样影响有限的协作组织，或者确切地说，是战时盟国合作的延续。除此之外，“十四点原则”对国际法律只是一笔带过，只在说到恢复比利时独立时谈及此事，并

标明无须再组建新的国际“组织”。

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是威尔逊的搭档。他在“十四点原则”颁布前几天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现得大智若愚。但实际上，他本人要机智聪明得多。他和威尔逊一样，强调了“《维也纳条约》已是过去时”这个事实，并坚持认为只把关注点放在领土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随后，他又用公认的含糊语言强调了“民族自决原则”，并执意要求“国际组织全力以赴，打造一个可以取代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的组织”。英国这样明确表态并非偶然，因为劳埃德·乔治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在这一问题上将威尔逊排挤出局。（因此，威尔逊对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那位英国首相“令人钦佩的率直”的话语总是颇有微词。）在美国，威尔逊一直回避这个话题。但是英国及其帝国兄弟们却是认真地勾画了这个国际组织的轮廓，而且这一画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它们现在迫切地想知道华盛顿是否支持这一想法。

大英帝国就是国际联盟

1918年9月国际联盟成立前夕，时任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打算这样宣布自己的看法："我支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实际上，这个国际联盟早就存在了。大英帝国就是国际联盟。"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英国与真正的国际联盟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将联盟的崛起和帝国的各种思想联系在一起，能帮我们解释这个重要问题：英国人向来十分关注本土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永久和平时期承诺的问题，那么其国内政策的制定情况如何呢？他们会认同国际联盟的主张吗？

在大多数想要维护帝国统治的英国政客眼中，保存英美联盟直至和平到来至关重要。威尔逊也认同这一观点，他随后在伦敦的公开讲话中提到，"我们需要一个实力超群的国家联盟，它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受托人"。这位美国总统赞同维护英美联盟稳固的基本想法，但美国民众却明显希望由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联盟维护这种稳定状态，他们不想要"引起各国混乱的自私联盟"，也不欢迎大洋彼岸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狭隘的民族自豪感。在英国，民众同样迫切希望建立国际联盟。在"实现民主党控制联盟"这样的政治团体中，科布登的继承者们要求停止秘密外交，并呼吁更加民主的外交政策。其他组织，比如国际社会联盟，则基于战前的国际主义观点建立，呼吁有组织的和平活动。劳工党也持相同观点。英国政府中负责决策制定的精英人士观点有很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有关国际组织的言论是荒谬可笑的，其他人则认为那些言论不容忽视且极有可能惠及不列颠岛及整个大英帝国的发展。甚至还有一些人，比如外交次长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伟大的无神论者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的儿子对国际组织的作用深信不疑。在推动国际联盟最终成立的过程中，塞西尔和威尔逊的功劳不分伯仲。

说到战后组织的组织形式，英国不像美国那样重视法治—作为全球第一强国，英国从来不愿寄希望于法律及其潜在的约束力，相反，这个国家更看重政府职责及组织形式这些实际的东西。英国社会政治评论家莱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在殖民地政府机关工作过。他针对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写过一份报告，探讨战争时期国际组织应如何作为。这份报告关于行政事务的论述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国际社会联盟将伍尔夫的这份报告奉为可以向外交部输送组织想法及建议的神奇著作。伍尔夫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共同编著了上述报告的部分内容，他们与罗伯特·塞西尔关系亲密，塞西尔是英国政府中倡导国际联盟理念的先驱，在他的帮助下，伍尔夫的著作《国际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于1916年出版。这本书在政府内部广泛流传，外交部官员也深受触动。据说，政府早期有关"国际联盟下的世界政府"的构想就是由伍尔夫这本著作中的理念拼凑而成的。

尽管一直到1917年事态还不明朗，但有关战后组织的探讨仍是最热门的话题。1917年年初，帝国战争内阁强势的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为各国公使归纳总结了战后的几种主要选择：第一种是，“战后应成立一个类似强制和平同盟会的国际组织”；第二种是，“建立一个同1815年的欧洲协调相仿的强国际联盟”；第三种是，“支持战后组织重走权利平衡之路”。很少有人公开支持第三种论调，政治家们也经常在公开演讲中全面否定这一做法。美国强制和平同盟会、伍尔夫和像布勒斯（Bryce）勋爵这样的自由党人士的思想成为第一种选择的基础，但是这一选择意味着一种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仲裁机制支持者所提倡的集体安全主义的存在。英国相关人士也反对这种观点，寇松（Curzon）勋爵这样的保守派人士担心类似强制和平同盟会的国际组织会限制英国制定本国外交政策的自由。汉基出于相同考虑，也不赞成建立这样的国际组织。但在内阁中，还是可以听到支持者的声音，最为明显的就是罗伯特·塞西尔的支持声。他将继续带领英国代表团在巴黎就组建联盟的相关事宜进行洽谈。塞西尔关于“把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提议广泛流传。他从前的上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自战争打响之日起就在为这一目标奔波，现在塞西尔的这一提议可谓是格雷思想的延续。

这些具有历史视野的外交官对此前计划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分析，迈出了明显的第一步，他们对1815年欧洲协调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欧洲协调的外交政策，最终写就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该报告以委员会主席菲利莫尔（Phillimore）勋爵的名字命名，支持成立国际理事会执行仲裁。此外，报告还包括一份新的国际联盟条例草案，附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及程序，最终被《联盟协约》（League Covenant）采用。尽管同样关注争端解决，但是这一草案完全不同于美国法律专家的解决办法，因为它组建了一个政治组织—国际理事会，并且没有把主要裁决权交给国际法庭。1918年春，菲利莫尔的报告刚刚问世，这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具体结构尚不清晰，英国就迫切希望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回应。但是，威尔逊总统命令他的私人大使豪斯上校不要就此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也不允许他与英方接触。英国多次试图在美国公布菲利莫尔报告的内容，但都被威尔逊冷酷回绝了。使者们向英方传达了他的思想，但内容极其不明确。一年后，英国国际组织联盟惋惜道：“至今，我们仍不清楚威尔逊总统提议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最终意图是什么。”

在等待美国回应的同时，英国按计划继续前行。在为巴黎和平会谈准备期间，罗伯特·塞西尔已经可以交给美国一份关于联盟未来的详细计划了。他们勾画出秘书处、国际万国理事会以及国际法庭的轮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英方的另外一员干将，他压倒了英国政府的反对声音，颠覆了现行的外交程序，在制定联盟蓝图的工作中功勋卓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根本不是英国人，非但如此，在近20年前的布尔战争中，他还是英国交战国军队中的一员。

扬·史末资纵横国际舞台40载，一直以健康、正直的形象示人。他拥

有剑桥大学法学学位，又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布尔战争中，他出色地领导游击队作战，面对战败的事实，他也能坦然接受。南非联邦成立后，他投身其中，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为帝国法规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敦促在南非成立一个新的白人国家，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国家可以调解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争端，并期待两个国家并肩作战，把文明带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因此，他广泛宣传英联邦的思想—对新成立的国际联盟而言，英联邦同泛美主义同属影响深远的范式。

南非尤为推崇英属（白人）国家有机融合这一想法。布尔战争结束之后，年轻的英国智囊团和政治制定者极力促成布尔代表和英方代表的双边会谈，史末资也有此打算。英国政府官员一面为印度局势担忧，一面展望未来，认为今后的世界将是白人国家的联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三国际联盟结合在一起—以他们的发源地英国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同时尊重各国文化的发展，此外还为联盟各国的安全提供统一保障。亚洲和非洲那些不安分的民族给英国官员造成的威胁比德国还要大，他们人数众多，让英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全世界带去文明。英联邦的理论家出于相同考虑，普遍支持进一步拉近英美两国关系的做法。就这样，英联邦成了消除种族忧患和提升国家威望的产物，议会借此机会限制过度扩张的王权，亦即白色人种引以为豪的国际主义。

史末资认为，英联邦的建立可以使南非实现高度自治，这个当时的第一大国的庇护会让南非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上占尽先机。但是，史末资并不满足于此。他是政治上的进化论者（堪与威尔逊相匹），战争期间，他将英联邦视为一个更大的未来政治共同体模型、一个可以凝聚所有文明民族的国际联盟，认为这个联邦可以帮助欧洲恢复昔日的生机，也可以帮助非洲摆脱现在的苦难。这个伟大的目标—史末资时刻铭记帮助非洲的使命，对这个目标念念不忘—还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大英帝国的命运同美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战”已经显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将岌岌可危。联盟的存在可以将两国牢牢绑在一起，直至和平到来。

史末资是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全力支持联盟的理念。1917年全年，他多次公开强调，“军事帝国主义”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由过去漂移到现在”，若想消灭“军事帝国主义”，迎来全球各国和谐共处的和平时代，在军事胜利后一定要取得“精神上的胜利”。史末资称，各国之间已经由武力对抗向和平协作转变，大英帝国就是个实例。“大英帝国，其实我更愿意将其称为……英联邦。”史末资如是说。他进一步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 未来的世界政府将不再以罗马法律中体现的至高无上的帝国思想为基础，这一点我们从英联邦的运转中已经可以窥见一斑了……罗马思想已主导欧洲文明近2 000年，因此，英国宪法和殖民体系中蕴涵的较新的理念只有在完全成熟后，才能在未来几个世纪中真正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史末资认为，随着美国加入“一战”，英法两国向德国及奥匈帝国的独裁统治宣战，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实际上在1917年就已经出现了。“一战”同盟国的行为被视为“为保留欧洲旧的封建制度、阻止人类进步所做的最后挣扎”。史末资十分谨慎地在英美两国之间斡旋着，将道德规范与现实政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一方面声称科学和正义都站在“一战”协约国一方，因为这一新联盟代表着人类政治进程的新阶段，它只会不断适应各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现行制度，却不会取代这些国家；另一方面，当时在东欧仍有人支持德国的恺撒皇帝和奥地利国王，史末资认为，要消除这些支持的声音，推进民主进程是一个有效手段。

史末资的想法是哲学理想和明智策略的结合，并引起了威尔逊总统的强烈共鸣。1918年12月，停战后仅一个月，史末资就四处发放一本名为“一个实用的建议”（A Practical Suggestion）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竭力鼓吹联盟思想的变体。在解除武装这个问题上，他的想法十分激进。他主张的委员会、议会、秘书处三权分立这一提议最终被采纳。他还要求由新成立的组织接管德国的殖民地。史末资认为小册子本身已经拟定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战前守法主义者工作成果的再现。这比塞西尔和菲利莫尔任何提议的内容都要全面，实际上，时至今日，塞西尔还一直想着要与欧洲协调保持一致，他盼望的是设立大国常规会议和永久的秘书处，就像是1815年欧洲协调的升级版。豪斯上校对威尔逊总统要求勾勒的战后国际组织蓝图呼声的回应也不如史末资的呼应来得激进。豪斯上校的草案将重点放在建立仲裁机制和上诉法庭以及常设国际法院上面，这一理念更接近美国战前极度崇尚法律权威的思想。威尔逊欣赏史末资的革新精神，欣赏他能够摆脱原先制度的束缚，或许总统还欣赏他那本反殖民统治的著作吧。总统在乘坐“乔治·华盛顿”号轮船去巴黎时读了史末资的文章，深受其影响，当时只有少数总统私人顾问随行。

在英国，《一个实用的建议》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1918年的平安夜，帝国战争内阁召开会议，谈判桌上，所有与会成员都认为，要想和平解决争端，就必须制定战后安保条约。然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提起“超级国家政府”或“世界政府”。他们提倡的国际联盟究竟是一个常设组织，还是只是欧洲协调的翻版？该组织要如何保证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它会拥有多大的行政权力？它要在多大程度上保卫战后各国的领土完整？所有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答。史末资和菲利莫尔的下属委员会都支持塔夫脱提出的建立“强制和平同盟会”的想法，认为一旦有国家违背协约，就会自动受到制裁。但是，很多保守主义者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反对“集体安保”这个想法。他们担心英国军队介入各国事务，充当国际争端的调停者，还怀疑联盟的军事安排会加强英国的防御工事。劳埃德·乔治一如既往地希望能有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一方面，他强调国际联盟应有效行使自身权利、高效完成任务，而不（用他的话讲）只是一个傀儡组织；另一方面，他又剥夺了国际联盟享有的独立行政权。他更希望权力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尽管劳埃德·乔治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支持史末资，但是在英国政府内阁内部，人们对任何超越建立一个永久的会议体系（1815年欧洲协调的加强

版）的想法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在罗伯特·塞西尔和史末资准备启程去巴黎参加和平会议之时，这一情形至少使塞西尔更加明确了内阁的态度。

然而在巴黎，个人外交登上了历史舞台。“塞西尔–史末资”团队基本无视英国内阁给他们的所有指令。他们利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成功对抗英国首相提出的所有异议。威尔逊本人也写了两篇新文章，一篇是关于保障劳工权利的，另一篇探讨了少数民族及其合法权益，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与他的很多观点一样，总是显得突发奇想，就连总统的私人顾问团队也会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但是，这次威尔逊关注的两个问题加上豪斯上校关于成立常设法院的提议（威尔逊并不支持这个想法）补充了那份夹杂着大量英国想法的草案—在过去两年中，英国政府官员以相当系统的方式拟订了这一草案。在短短11天的时间里，一个由威尔逊担任主席、由其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塞西尔主导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协约，供各位参会代表商讨。这些代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一致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盟这一新组织的决议。

从组织结构上看，国际联盟几乎完全摒弃了尚法主义的典型架构，变得更加倾向于史末资和威尔逊倡导的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模式，这一点令很多美国国际主义者感到沮丧。该联盟有一个相当于由上院组成的立法机构的委员会，委员会中有世界大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还有从较小国家中选出的4个非常任理事国，实行一人一票制。秘书长办公室被定位为联盟决议卑微的执行者，它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外交机构。尚法主义模式留下的只有一项条款，而且是威尔逊被迫加上去的—成立常设国际法院，为国际联盟提供一个有约束力的司法机关，帮助联盟解决各国间的纠纷。

这种结构的缺点十分明显：全体大会很像一个立法机构，却没有立法权。另外，每位理事会成员都拥有否决权。这样看来，这个理事会并不能成什么大气候。秘书处受联盟成员国的管制，没有专属自己的权利，在联盟中充当协调者的卑微角色。国际法庭最终于1922年成立，但这一机构实行的完全不是塔夫脱和鲁特所期待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司法机制。最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联盟只是要求各盟国遵守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规定，但是该组织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法国曾主张加强国际联盟的强制力，但该提议被否决了。国际联盟要求各国承诺将争端提交至仲裁委员会，但除此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举措维护和平。如果哪个成员国无视自己在国际联盟做出的承诺，再度依靠战争解决争端，那么它们最多不过会遭到国际联盟的抵制，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制裁。理事会可以就如何制裁违约国出谋划策，但是它没有权力执行制裁。在我们眼中，这些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其他角度审视国际联盟就会发现，该组织是外交领域的伟大革新，它实现了许多19世纪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对其他人来说，这一组织的成立又代表着实现真理的时代的到来。它罢黜了国际律师的首领地位，限制了仲裁的范围，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戴着假发、身穿大袍的律师们嚷嚷那些空洞无实话语”，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呼吁坚决摒弃尚法主义时曾这样讲过。另外，站在民主的角度观察国际联盟就会发现，该组织关注公共协商，注

重民意，主张社会大众参政议政，重拾了激进思想。上次出现这种现象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当时人们反抗的是欧洲协调。

美国的撤退

1920年1月16日，晌午的阳光从塞纳河照向坐落于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钟房。国际联盟在这一天召开了首次会议，此时距和平会议批准成立国际联盟已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围坐在绿色台面的谈判桌周围，听着理事会首位主席、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的发言。他宣称，“今天是新世界诞生的第一天”。国际联盟总部依旧设在巴黎，已有40多个国家宣布加入该组织，其中包括利比里亚、印度、波斯以及暹罗。那些小国先前加入过一些科技组织，也出席过一些国际会议，现在又跻身国际联盟，这种进步对他们而言顺理成章。然而，这也体现了国际平等的原则：暹罗王子德瓦旺（Devawongse）认为国际联盟可以“帮助小国抵抗强国”，因此强烈支持这一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国际联盟的举措仍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该组织显现出全球主义的姿态，这是冲破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传统界限的关键一步。

但是，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并未出席此次会议：威尔逊总统的缺席使得主会议桌边那把空椅子尤为显眼。尽管他数月前就已返回华盛顿，但在那边，国际联盟事业的进展依旧不尽如人意。在巴黎期间，他几乎不掩饰自己对美国参议院的不屑之感。但是，他低估了说服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的困难程度。因此，威尔逊试图越过政客、直接寻求民意支持的策略在美国并不奏效，这与先前在欧洲遇到的情况大不相同。此外，他也没有真正向民主党人士抛出过橄榄枝，共和党依旧占据着国会的大量席位。1919年夏，在向参议院提交协约的时候，威尔逊傲慢的态度惹恼了不少参议员。

威尔逊在巴黎宣传的那一套几乎与美国民众期望的完全不同。他似乎把国际法深深地埋藏于地下了。《凡尔赛和约》第十条要求联盟成员国保卫凡尔赛边境的安全，这一要求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亨利·卡博特·洛奇当时曾经指出：

> 一提起“和平联盟”，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组织开创了国际法，其重要特征就是建立了强大的国际法庭来解释和规定国际法，所有会员国都是这部法律的强大后援。但是《凡尔赛和约》却与此不同，该和约签订时，国际法庭基本已经消失。我认为就更谈不上还有什么国际法了，巴黎和会已经成了单纯的政治联盟。

总之，国际联盟并不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它根本就不是所谓第三次海牙和平会议的产物，该联盟的提议与强制和平同盟会的提议也没有

什么相似之处。美国那些崇尚法律的国际主义者与洛奇的观点一致。他们也认为威尔逊是以政治因素为基础建立了国际联盟，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在这些人眼中，威尔逊不单单忽略了美国外交政策主张仲裁的传统，他甚至将那些现存的成就也置于危险的境地，总统要求他们加入的那个组织只是一个与试探准议会制度是否可行相关的联盟，并没有立法权，也不像国际法庭那样被明确地定位为冲突的调停者，他们寄希望于法律而不是制裁。从国际联盟协约就可看出，国际联盟更依赖制裁，而不是法律。而一个让情况更复杂的问题是：由谁来行使制裁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国际舆论首当其冲。

洛奇同意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前提是要保障本国的行动自由权，阻碍威尔逊前进步伐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国内反对美国屈从于任何限制性条款的声音。当威尔逊身患疾病但仍到各地演讲，为加入国际联盟造势的时候，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E·博拉（William E. Borah）也在为阻止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奔波于各地。他批评总统牺牲了美国的和平局势也没能为欧洲的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他据理力争，称“美国的体制和欧洲的体制并不相同”。1919年年末，他在国会发表了一篇马拉松式的讲话。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大量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如果国际联盟决定对违反协约的国家发动战争，国会并没有否决权。就算国际联盟理事会内部一致同意发起战争，也不能说明这种战争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美国人民没有必要按照国际联盟的指示行事。威尔逊曾经希望在恢复旧世界的同时建立新世界。而实际上，他只是重新伪装了旧世界，让它看上去和新的一样，因为国际联盟本身会从美国事务中获益。最重要的是，洛奇重申了国际联盟构想创始人的忠告：“任何会让我们卷入纠纷的联盟”都是不受欢迎的，他还夸大了这种做法的危害：

> 我们已经卷入了欧洲事务，因此也让自己陷入了纠纷……我们虽身处于此，却要干涉他们的事务，为他们操心费神。换言之，我们已经失去了自主权，任由欧洲国家摆布。我要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起“无纷争联盟”这个伟大的政策。这一政策已有150年的历史，是美国发展壮大的基础。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曾经高尚的国家如今却要向“武力控制世界这种恶劣行径妥协……也许我们会成为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要以牺牲本国精神为代价”。美国人民会被帝国的种种劣迹玷污。“自由的准则就得给铁血规则让路。”

参议院不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博拉的反对并不是主因，但他确实影响了参议院的决策。国际主义者被分化了，总统自己也已筋疲力尽，还遭受着病痛折磨。他要为错误操控谈判以及妨碍了本应通过的和解协议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国会也强烈反对美国永久服从于一个一般性的国际组织。美国人曾经认为欧洲已经一蹶不振，美利坚民族从欧洲手里接过了道义的大旗，要求美国远离国际纷争的旧话再次提起，这些

旧话就像那些在海外传教的传教士说辞一样深入人心。巴黎会谈表明，即使是威尔逊这样拥有至高权力并且极具魅力的领导人，也要在世界权利版图问世、协定生效之日做出让步。威尔逊称，国际联盟的成立代表着美国改造国际事务的特有方式在海外得到广泛接受，但是美国人认为这一方式带有浓重的欧洲色彩，所以并不买账。

1920年，美国参议院驳回了威尔逊总统申请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一年后，威尔逊结束了自己的任期。此后，国际主义者的内部争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20年代早期，支持者们为国际联盟造势，主张美国加入其中，随后美国民众以各种方式加入支持本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队伍中，人数之众令人咋舌。有证据显示，民众呼吁加入国际联盟的呼声比参议院预想的还要高。卡内基集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私人财团为国际联盟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日内瓦会议理念的支持者成立了智囊团。他们还出版期刊，设立各种机构，并且召开会议，为美国走上国际舞台铺路。“一战”之后，全美各地的图书馆都为具有国际思维的人士设立了专区，大量高中校园内涌现出国际关系社团。但是，征服人心、转变思维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更何况威尔逊总统的支持者多年来对其失败的经历一直记忆犹新。192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加入国际联盟持保留意见。后来，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在其任职期间民众要求加入国际法院的呼声十分强烈，但秉持孤立主义的媒体及国会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因此，他被迫放弃了让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想法。从罗斯福的这些经历中，我们能够读懂为何“二战”为他提供了再次将美国带入国际组织的机会时，他却表现得那样小心翼翼。

在威尔逊总统的继任者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任职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不友好。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丁在提名演讲中称协约是“世界超级政府思想的产物”，但是，在竞选运动中，为了获取党内国际主义人士的支持，他下了很大功夫，声称自己支持巴黎联盟的替代组织。在总统大选期间，强制和平同盟会一直保持缄默。在哈丁获胜之后，该组织逐渐销声匿迹。哈丁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参议员博拉称这个结果意味着“在所有政治联盟或者一切有国外势力加入的联盟组织中，绝对不会出现美国的身影”。哈丁和他的继任者柯立芝（Coolidge）都不打算挑战国内的反对声音。1924年2月，威尔逊去世了。日内瓦政府将大理石制成的桌子安置在国家酒店的花园中，以纪念这位“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国际联盟各成员国的总理以及国家元首都参加了威尔逊的悼念仪式，却唯独不见美国人的身影，甚至连美国驻日内瓦领事也没有现身。

政客和专家

194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最后一次会议在紧张混乱的气氛中结束了。此后很多年中，这个组织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人们忘记了，战前为了庆祝该组织的成立，曾在新建的万国宫埋下了记录这一伟大时刻的秘密容器，也忽略了在那些酝酿着联合国雏形的建筑中的国际联盟曾取得的成就。曾经在国际联盟任职的官员偶尔会写篇报告，或是准备一份工作简述，用来指导由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期间的过渡工作。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国际联盟却是一个失败的组织。

对国际联盟有这样的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威尔逊为了“在全世界给民主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将美国带入了“一战”。但是，国际联盟却允许欧洲在组织内发号施令。联盟没能实现协约做出的在世界范围内削减军备的承诺。时间证明，该组织不但没有改变欧洲协调的外交政策，反而深陷其中，完全按照欧洲协调的理念行事。没有欧洲主要大国的支持，联盟基本沦为其发起国英国和法国执掌世界的工具。但是，这两个国家现在也对该组织失去了信心，致使其在国际安全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人约瑟夫·阿弗诺尔（Joseph Avenol）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期间，联盟的处境十分尴尬，甚至变得卑微。1935年，有人提议牺牲埃塞俄比亚以留住意大利，阿弗诺尔同意了。同样，他还辞退了一些犹太人官员，并多次尝试挽回纳粹德国。在他的领导下，国际联盟并未对第三帝国侵占奥地利的行为加以制止。1939年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时，后者曾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制止这一行为，而国际联盟却对阿尔巴尼亚的请求视而不见。因此，同年秋天，英法两国在未参照联盟协约的情况下就对德宣战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但是，国际联盟自准议会模式确立之日起，就面临着许多影响其发展的关键问题。联盟十分注重民意—这也能解释得通，因为其发起人认为世界人民的意见是最可靠的保障。受此影响，政客们前往日内瓦更像是去上演一出闹剧，而不是严肃地制定政策。当民众的期望如同1932年世界裁军大会时那样高涨，与会国就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逃避失败的责任上，根本就没有心思达成什么协议了。自从1899年海牙会议起，公开外交的这一特点就已经非常明显。人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来，却又失望而归，长此以往，这种不断希望却又不断失望的情绪便摧毁了国际联盟。对理事会做出的统一裁决又使得联盟根本毫无执行力。此外，由于缺乏威慑力—官方不支持该组织关于组建国际联盟警察部队的提议—规章和法律的权威随之逐渐减弱。早在1919年，美国的法律学家就已经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因此，那些强权政治条款给国际联盟布置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联盟的组织结构使其根本不可能放开手脚行动，但是权力平衡原则

又不允许国际联盟没有作为。除此之外，在金钱至上的时代，国际联盟那微不足道的资金让情况越来越糟糕。那时，国际联盟平均每年的资金预算只有500万美元多一点，还不及半个世纪后联合国资金的1/13。在应对重大危机方面—1929年后，世界遭遇了金融危机、军备裁减、德国法西斯入侵希腊的科孚岛和埃塞俄比亚、第三帝国势力扩张，对此，国际联盟也没能给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联盟的结构属于不重视法律的开放式结构，这种结构逐渐削弱了联盟在其他领域建立的政治权威，这种情形通常是诸位联盟创建者完全没有料到的。除万众瞩目的外交领域之外，国际联盟的成就通常影响十分持久，其组织安排影响巨大，且时间长久。尤其是在技术领域，联盟为国际慈善机构合作搭建了平台。科学发展也得到了重大促进，这是“一战”之前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美国国际主义者深度参与其中，为他们在1945年之后重塑美国外交形象积累了经验。在外交上，国际联盟是失败者。但是，作为技术知识和国际行动的起源，国际联盟是威尔逊、史末资以及齐默恩（Zimmern）提倡的国际合作及自然发展的代言人，或者说是受益人。全体大会形式的国际议会用行动证明了它对世界大国的价值就是无能为力。但是，国际官僚机构、技术国际主义、精英人士以及科学专业人士却以其成就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事实上，1919年8月，一个名为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的美国青年精确地预测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帮助国际联盟组建了秘书处，对国际联盟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影响深远且极具说服力的评价：

> 国际联盟的非政治活动会越来越重要，它还会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特别棒的专用场所……到目前为止，全球的国际活动实在太少了……我们可以建立新的规程，开创很多先例，我们可以在追求共同目标的途中感受国际合作。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管有多犹豫不决，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不管经过多么坦白直率的商讨，都是向世界和平跨近了一大步。当下一个萨拉热窝事件出现时，世界会迎来一个在许多不同领域以及国际会议中都算得上先进、成熟的体系。

福斯迪克十分清楚，联盟的发展并非只是依赖此前提到的战前协会主义，这一组织首先是“一战”的产物—从19世纪盛行的议会模式向20世纪中期让人又爱又恨的官僚机构转变的过程中，“一战”也许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全面战争提高了公职人员的威望。他们为战争筹集物资，调度沟通，准备燃料。若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新的战时合作模式也应运而生。协约国海上运输理事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负责调度船只的默默无闻的组织证明了国际事务的执行者并不是外交官，而是各领域的专家。同国内形势一样，在国际范围内政府也是由战

时崛起的新兴官僚阶级重塑的；事实上，新兴官僚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也许更大，因为他们几乎不需要同什么已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做斗争。“一战”结束后，有不少于4个曾经就职于协约国的航运专家出现在国际联盟秘书处，其中就有后来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让·莫内（Jean Monnet），这难道是巧合吗？功能主义—认为很多组织机构通过展示自己的实用价值体现出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当时的大环境催生的结果—本身就由这些经验发展而来的。

秘书处的构成和功能本身并未给威尔逊带来多大烦恼，他不止一次明确地提出放弃执掌新兴国际组织的想法。英美两国经多次会晤最终达成一致，让英国官员掌管国际联盟。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拒绝了这一职务，他们便指派性格拘谨但却有自己行事办法的外交部中级官员埃里克·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出任该职。德拉蒙德是珀斯（Perth）伯爵的弟弟，他自1900年起就在英国外交部工作，还做过总理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的私人秘书。工作努力且不张扬的性格为德拉蒙德赢得了外交部大臣和总理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赏识。身为苏格兰天主教徒，德拉蒙德有独具魅力的性格和谦逊的态度，这些优势让他可以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创立一个国际官僚机构。由于鲜有人关注官僚机构的历史，所以有关德拉蒙德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无论是在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中，德拉蒙德14年的任期比任何一位继任者的都长。毋庸置疑，他就是现代国际组织的奠基人。

国际联盟成立之初前景并不乐观。1919年夏，国际联盟秘书处在伦敦成立，其成员只有4个人，德拉蒙德、他的助理、一位秘书，还有一个女管家，4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工作。几个星期后，他们才租下可胜街的一幢公寓楼。这幢楼曾属于马尔堡公爵，那里的天花板上画着许多丘比特和水中仙女。在这里，德拉蒙德带出了一支年轻而卓越的队伍，队员包括莫内、福斯迪克、英国经济学家亚瑟·索尔特（Arthur Salter）以及美国媒体人亚瑟·斯威策（Arthur Sweetser）。尽管资金有限，德拉蒙德还是成功地把原先专业的国际行政部门转变成了能发挥作用的秘书处。这也体现了思想的转变，人们不再像战时那样崇尚永久存在的组织以及自我管理的做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几个真正关心此事的美国和英国官员认为国际联盟只是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盟国间战时组织。秘书处的规模很小，在鼎盛时期也只有不到650名员工。但是，有了德拉蒙德的领导，加上干劲十足的年轻同事的奋力打拼，国际联盟在影响力和多样性方面比泛美联盟以及先前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突出。（司法部门最初由荷兰人掌权，随后由乌拉圭人接手。其成员只包括来自比利时、古巴、印度、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人。）说得更确切些，国际联盟很快就发展壮大了，这一点出乎创始人的预料。遵循议会模式意味着国际联盟每年只需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联盟官员可以在其他时间内积极展开其他工作。

很快，国际问题就找上门了。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东部边界地区的战争仍在继续，暴乱和起义困扰着工业中心；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中东地区疾病蔓延，人道主义灾害频发。

刚刚建成的国际联盟准备成立新的常设国际法庭，组建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国际卫生局，还打算将构建国际主义机构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但是，尽管雄心勃勃，国际联盟也要按照与德国签署的和平条约管理萨尔兰州和但泽自由市，还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解除土耳其基督教的困境，控制亚美尼亚局势。在国际联盟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由常设机构专门处理。1920年11月，国际联盟将总部搬回中立国瑞士的中心城市日内瓦，用当时一位记者的话说，日内瓦“在国际上是一座微不足道的三线欧洲城市”。在这里，人群迎接前来参加国际联盟首届全体大会的代表们，在卢梭的雕像前聆听讲话。秘书处搬进了湖畔的国家酒店，德拉蒙德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奥匈帝国国王弗朗茨·约瑟夫的嫂子的卧室内。

乔治·斯洛科姆（George Slocombe）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著名作家，他定居在日内瓦。胜利的民主国家那些新外交场馆与其声名狼藉的先驱者的奢华场馆形成鲜明对比，对此斯洛科姆非常震惊。他曾写道，瑞士这个国家似乎正刻意滑入资产阶级迟钝的泥淖：

> 国王、君主和世袭贵族居住的那些宫殿见证了神圣同盟的兴衰，目睹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为争夺一个女人的欢心而发生的争执，亲见了法国改革家塔列朗蓄谋已久设下的圈套。现代的“国际协调”无法找到这些宫殿的替代品，能找到的只有一系列酒店。这些酒店周围的风景看上去毫无二致，都是一片如明信片上掩映在湖后的勃朗峰的画面，都摆放着漆成红色和绿色的豪华家具，都是口味一样的法式大餐，都是一样的抛光松木地板、白色房门以及蕾丝窗帘。这些酒店的经理都是德裔瑞士人，每座酒店的楼梯都吱吱作响，窗户也都是双层的……这些酒店丝毫没有历史气息，也没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的绿色或灰绿色外观，还有老式公交车每天往返科纳温站三次的单调乏味旅程。

然而这个大环境掩盖了政治家们巨大的野心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广泛传播，在这些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频发，其严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在这个状况百出的年代，国际联盟变得十分重要。

战后的两大危机推动国际联盟秘书处从一个羽翼未丰的组织逐步壮大，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危机之一是欧洲和中东地区涌现大批难民。因为遭遇人道主义灾害和流感以及斑疹伤寒这类流行疾病的双重打击，人们无家可归，饱受饥寒。传统的志愿者组织不堪重负，政府就委派其他组织接管其工作。另一大危机是“一战”后席卷西方国家和欧洲中心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迫使政府官员不得不听从专家的意见—1920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称现行货币体制十分不稳固—专家们还要求成立常设机构研究和处理经济及财政问题。德拉蒙德起初很抵触这种超出计划的、扩大国际联盟职责的提议。但是，他的副

手让·莫内认为这是一个良机。莫内的朋友雷蒙德·福斯迪克也这样认为。就在美国确定不加入国际联盟的前几个月内，福斯迪克宣布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但他当时协助推动了凡尔赛的“人性化”外交理念的形成。该理念旨在“通过系统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没有人可以从中谋取私利，也不会有人因此有所损失”。他写道：“这种方法就意味着没完没了的国际会议……不仅可以集中管理各个国际机构，协调其运作，还可以促进它们有秩序地、系统地发展。”

在那些默默努力帮助国际联盟扭转1920年颓势的幕后英雄中，福斯迪克是非常重要的一位。1940年以后，他们还扶持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主义潮流。在威尔逊因国际联盟遭受羞辱的时候，福斯迪克及时赶回美国，组织支持国际联盟的运动。随后，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他在资助国际联盟技术运营时成就显著。新兴国际行政机构的其他官员任职时间较长，但对工作同样热情不减。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把国际劳工组织打造成了资本主义框架下保护工人权益的权威组织。“一战”期间，和莫内一同效力于“协约国海上运输理事会”的阿瑟·索尔特掌权新成立的经济和财政部门，他还负责监管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稳定情况以及希腊和保加利亚的难民安置情况。索尔特的年轻同事中有来自瑞士的经济学家皮尔·雅各布松（Per Jacobsson）。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时间会比其他人迟一些。卢德维克·赖赫曼（Ludwik Rajchman）是波兰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他最初在欧洲东部治理斑疹伤寒，现在则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着力组建国际联盟公共卫生部门。“一战”后，国际联盟在上述人物的推动下发展成欧洲重建的中央机构，并巩固了国际主义者和技术专家之间的联系。当代评论家赞扬“专家委员会在国际上的表现比在国内优秀”。

眼前的危机解决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联盟技术部都维持着令人难忘的高产状态。协约第23条和24条赋予国际联盟贩卖鸦片、白人奴隶买卖以及物资运输的权利，还规定“国际联盟可以为国际办公组织提供帮助，只要这些组织的承办党派符合国际联盟协议基本条款的规定即可”。就这样，国际联盟迅速发展为一个伞状组织，还促进了“一战”前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的发展。搜集资料、处理大量数据信息等职能并不是国际联盟工作最具魅力的地方。但是正如奥特莱在“一战”前称赞的那样，该联盟为今后应对国际问题打下了基础。各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国际联盟官员的常规询问，只要他们不质询、不逼问就好。国际联盟在执行有关销售鸦片和控制卖淫的国际协定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福迪克斯已经认识到，在这些不怎么光鲜的领域中，合作范围可以更广阔：德国和苏联政府在正式加入国际联盟前就与国际联盟技术部门展开合作，美国政府也在战争期间与国际联盟保持着合作关系。国际联盟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欧洲，在技术领域还介入了中国、新加坡和南非。雷蒙德掌权下的卫生组织除了积极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公共健康危机之外，还竭力消除大萧条带来的影响，研究有关亚洲农民公共卫生的殖民地条款。受到危机的影响，殖民政府被迫缩减开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法国、荷兰、美国以及克罗地亚的医生被派往亚洲做报告，探讨土地改革所涉

及的公共卫生问题。1937年举办的国际联盟会议被历史学家称为“首届万隆会议”，在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荷兰东印度群岛召开，会议商讨了农村卫生问题。该会议并不是只把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看作施展能力、干预他国的机会，还具体探讨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还很重要，比如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疫苗对高发流行疾病的抵抗，在多大范围内实施自上而下的干预，以及如何给各种问题开出有效的药剂。他们把公共健康问题同贫穷、土地制度和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日内瓦有关公共卫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却并非全球唯一一个开展此项工作的城市。作为首个此类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实验，这场实验不断积累新的费用、打造新的专家网络，甚至还能开发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思路。

国际联盟的一些新举措的推进并不顺利。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因是否实施新方案而踌躇不决。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就从未就何时重新接纳德国达成共识，该研究所自身还受到精英理念的束缚，无法在文化生产领域施展拳脚。20世纪20年代，所有试图通过科学管理、国际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方法重组国际生活的探讨以及相关会议都没能取得显著成效。关于给恐怖主义刑事定罪的讨论—这是被遗忘的领域，直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袭击后才被历史学家重新提起—因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不了了之，给犯罪定义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国际律师终于在1937年获得胜利，劝服国际联盟接纳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但是，没有几个国家批准这一条约，16年后整个计划才得以实施。构建欧洲电网的想法只是简单提及，但是真正实现已是“二战”之后的事了。

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遭遇经济滑坡，全球的标准不断统一，国际联盟作为这个世界的代理人的日子终结了。在此期间，联盟还遭受了最严重的失败。艾伯特·托马斯在同事的劝阻之下，放弃了在欧洲范围内交换劳工的提议以及可以促成世界交通系统和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工程计划。即便是在1932年他即将离世之前，他的同事也一直没有支持他的想法。国际联盟的主要经济策略即为稳固资本主义，但是那时没有国际货币组织或者世界银行。这两个组织是在这些计划失败后才成立的。在当时，代替这两个组织功能的是相当有势力的“财政委员会”，主要由银行家和财政部官员运作。英国政府和英国央行委派这个机构稳定东欧和中欧的货币体系，重新组建中央银行，为政府制定预算出谋划策，以作为政府为其打开进入西欧资本市场通道的回报。英国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利用国际联盟促成央行间的紧密合作，使之成为国际协调的主要手段。至此，在英国的领导下，法国发展了一套类似的改造计划，这个计划避开了国际联盟。1928年，法国央行行长埃米尔·莫罗（Emile Moreau）在日记中流露出自己的想法：

> 英国是第一个重建稳定且安全的货币体系的欧洲国家。他们利用这一优势，在欧洲建立了名副其实的金融霸权。设在日内瓦的财政委员会（隶属于国际联盟）就是英国执行霸权的工具。

更糟糕的是，整个策略是基于货币主义者对经济健康状况的了解而制定的。这让国际联盟的首要任务变成了“稳定货币体系”这一金本位制度的变体。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袭击欧洲，国际联盟成了各种解决方案竞争的战场。法国提议成立联邦，英国和德国反对法国的提议，认为这种想法意味着欧洲向国际联盟发起挑战，有意疏远美国，还意味着放弃自由贸易。面对各种提议，理事会难以抉择，国际联盟无力应对危机。这次事件震动了欧洲银行系统。在新一轮保护主义的驱动下，成员国转而呼吁美国带领各国摆脱危机。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旨在稳定汇率，推动国际贸易。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的政策（这是新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决定，要求取消金本位制）导致了会议失败，并终止了国际经济合作长达10年之久。国际主义发生了逆转，接下来的40年中，在全世界，独立主权国家成了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单位。

从一开始，秘书处的成员就坚信绝对的公平十分重要：真正的国际主义意味着将事实集合在一起，不偏不倚，不屈从政治大国异想天开的念头。他们为自己能够超脱本国利益为全球服务感到自豪。此外，他们认为自己具有“国际化思维”，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当然，这其中不免有些自欺欺人的人。尽管他们在技术领域的行政表现备受赞誉，但是在一些意识形态中立地区，他们的新举措并未得到落实。国际联盟货币稳定的一揽子计划基本成型。为了让奥地利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不向共产党人投降”，英国外交部正式执行了这一计划。20世纪20年代，在安置希腊难民的过程中，联盟也有同样的担忧。无论是重建村落，还是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联盟帮助成员国的报酬，国际联盟技术运营都高度介入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国际联盟关于公共健康和卫生领域的规章也体现了其家长式作风。托马斯执掌的国际劳工组织在意识形态上最强调保障工人权益。在不友善的资本家组成的右派和主张改革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左派之间，国际劳工组织选择了一条并不稳定的社团主义道路。

更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主义不减的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晚期，所谓的技术服务占据了国际联盟一半以上的预算。每年9月都会召开戏剧性的全体大会，这时都会有很多人涌入日内瓦—“二战”后的曼哈顿也遭遇过类似情况—但是，一旦他们离开，德拉蒙德创建的秘书处就继续运转。尽管国际联盟的领导们都是最专业的公务员，在“一战”中获得了宝贵的政策协调经验，但他们都出人意料地年轻，索尔特被任命的时候只有39岁，莫内只有31岁，因此他们的职业生涯并未随着“二战”而终结，而是继续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帮助国际联盟平稳过渡到联合国。索尔特在联合国负责战后欧洲的重建工作；莫内的朋友波兰人卢兹维克·雷奇曼成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莫内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欧洲一体化事业中。总共有超过200名国际联盟秘书处的官员在联合国继续任职。德拉蒙德、阿弗诺尔和肖恩·莱斯特（Sean Lester）最亲近的三位助手在纽约继续辅佐他们的继任者。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国际联盟的失败，而是它持续的影响。国际联盟遵守道德准则，尊重主权国家的平等性。作为世界领导

者，国际联盟开创了国际主义新体系，终结了神圣联盟和欧洲协调的神话，通过专业技术为民主和社会转型打下了基础。实际上，国际联盟是第一个推崇民主思想、又能认清大国霸权这个事实的组织。从国际联盟坚决反对成立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法政治制度就能看出这一点，之后的联合国更加反对这点，这表明国际联盟创始人希望保护各成员国的政治自主权。国际联盟对主权国家和帝国态度模糊，实施委任管理制度也是出于上述原因。这种国际政府灵活性高、在许多方面都能发挥功效，不仅可以在“二战”之中发挥作用，在未来还会逐步发展壮大，不断完善。

第六章 意识形态之战

如今，我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中天马行空地畅想。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国际联盟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他们满嘴的仁义道德，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是因为他们是军事胜利的受益者。联盟竭力与之前的欧洲协调划清界限，标榜自己与“协调”的专制思想截然不同，可实际上它不过是欧洲列强结盟共事的交际工具。国际联盟与欧洲协调一样，都是确保欧洲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保障各强国权力和利益的手段。不过，这样的组织可不止一个。1919年春天国际联盟在巴黎诞生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人成立了共产国际，马志尼和马克思的经典对峙重现历史舞台。这两大集团一直处于敌对势态，直到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两方才不得不放下旧时恩怨，共同抵御新的敌人、列强中最为激进的反国际主义分子—第三帝国（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纳粹分子是一群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坚决反对国际联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1940年，整个欧洲都掌控在纳粹分子手中，他们甚至将制定国际秩序视作自己的“责任”，任意篡改世界秩序，不惜违背整个欧洲的意愿。作为法西斯的一种变体，第三种“国际主义”就这样诞生于世。自此，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之争势如水火，愈演愈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联盟明确对帝国与国家以及领土与霸权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迫在眉睫。

潘多拉魔盒

1919年1月，去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伍德罗·威尔逊途径意大利，当时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威尔逊所到之处，人们夹道欢迎，只为能看上这位大人物一眼。这也是在任的美国总统对欧洲的首次出访。在热那亚，威尔逊曾两次向欧洲示好以表敬意，而见证这两次友好之举的地点也毫不意外地选在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出生的居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威尔逊同样去拜谒了生于这座城市的另一位伟人朱塞佩·马志尼，并为其敬献了花环。在马志尼的纪念碑前，威尔逊毫不客气地说，马志尼该为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负责：

> 在大西洋彼岸，我们就已经知晓马志尼一生的伟业，在为他感到骄傲的同时，对他在历史上的光辉事迹我们感同身受。我为他的精神能传递给大西洋两岸的后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志尼先生，现在我站在您的纪念碑前，深怀敬意。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全美人民向伟大的马志尼致以崇高的问候和敬意。

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一样，威尔逊也深受欧洲政治理论的影响。大约一个世纪前，马志尼曾经断言民族主义的传播将会促成人类的大团结。伍德罗·威尔逊与马志尼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十分支持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做法，并以这些国家为基础组建了国际联盟。然而，同马志尼一样，威尔逊根本没有考虑到民族的复杂性。对于如何将民族原则运用到如东欧一样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地区的问题，两人也都没有清晰的概念和想法，而当威尔逊清醒地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正如阿克顿勋爵这些19世纪的批评家很久以前就提到的那样，民族自决原则兴致勃勃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结果却发现不仅里面尽是无休止的争端，少数民族问题也被扯进了政治旋涡。

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撰写了两次战争期间“难民问题”重要报告的作者曾经指出：“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不仅制造了难民问题，还为避难国带来了诸多难题和窘境。然而，就是这样可怕的民族主义还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呈现，因为国际团结尽管停滞不前，却也一定程度地遏制了它的发展。令人惊讶的是，那些难民可能也不得不考虑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他们究竟应该去马尼拉、墨尔本还是巴黎寻求庇护。同样令人惊讶的是，1915年9月，亚美尼亚大屠杀爆发，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摩根索（Morgenthau）向9 65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发送求助电报，最终竟然成功获救了。”

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时期，民族肃清政策作为一项处心积虑的军事策略登上了历史舞台。1914年，“一战”爆发，全球范围内的难民危机迅速升温，并随着1918年冬季东欧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战斗升级而愈演愈烈。威尔逊出访意大利的时候，欧洲显然已经爆发了全面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却并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会上对民族政治的拥护使得势态更加严峻，欧洲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强调本国的领土主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新型国家中留有乌克兰、匈牙利、德意志、犹太等民族的人，于是决定强行将这些人从自己的国家中肃清出去。

在巴黎，国际联盟成立大会上探讨的各项事宜中几乎都没有涉及难民问题，在联盟公约中也对难民一事只字未提。过去，各国政府只会在意教会和宣教组的想法和意愿。但是战后的问题冗杂繁重，逐渐削弱了这类团体的能力，降低了其地位。1921年2月，苏俄红十字委员会转而求助于国际联盟，因为联盟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超国家政治权利组织，其权利远远超过了专门的人道主义组织”。从国际联盟的角度来看，一切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接下来的30年，国际联盟也一直怀揣着这种希望运作着。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博士被任命为高级专员前往苏俄帮助当地的难民，联盟各成员国吝啬地只派出几名组员跟随其开展援助之行。带着微薄的预算，南森开启了难民的关怀和安置工作。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有组织的人道国际主义诞生了。

南森面临的长期问题就是大量的苏俄白种难民目前正流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1921年冬天，苏俄颁布法令取消这些流亡难民的国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国获得新的合法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南森为此制定的办法就是发放国际通行的身份证明，即所谓的“南森护照”，这是国际上第一种身份认证文书，持有者在需要身份证明的国家可以获得入境许可和旅行许可。这样看来，苏俄哥萨克的白人军官伊万·索伯列夫（Ivan

Soboleff）可以在中国新疆退出自己原来的苏俄军团、加入中国军队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索伯列夫很快就从中国军队退役，接着用两年时间骑着自行车和摩托车环游了世界，他将记录自己历险故事的著作取名为《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以表达对这纸成就自己历险之旅的身份文书的敬意。

南森护照的出现向世人高调展现了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冲突是如何促成了更加彻底的国际主义的。19世纪末，护照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14～1918年的“一战”为再次使用护照创造了契机。1920年，国际联盟发起了第一次技术会议，并以讨论护照标准化为议题。南森的即兴创作就这样成了世界瞩目的一大课题，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和安全性两者之间关系的反思。由于那些新建的独立主权国家引入了许多公民法，这些法规或排斥少数民族，或（以苏俄为例）驱逐政治敌人。人们因战争的走势而陷入困境，随身的只有当时已不复存在的战败帝国开具的临时证件或出生证明。南森护照为这一新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最终解决了大约45万人的身份证明问题。本应由国家权力部门认证的身份证明现在可以由国际联盟这样的机构自行开具，这表明国际政府的权限有了巨大突破，已经延伸至各国，且越来越具有权威性。

同时，国际联盟还一直监督着巴尔干地区的紧急救助工作，那里有很多来自苏俄、亚美尼亚和希腊的难民，他们住在条件艰苦的帐篷和简陋的房屋中。国际联盟还同近东基金会这样的慈善团体一道（如今在雅典市外的卡萨里阿尼的公路上仍可以看到近东基金会的运动场）组织、资助巨大的帐篷营地，并招来保健专家为难民进行传染病防治。1923年，国际联盟协助希腊政府举债安置了来自小亚细亚的数十万难民，随后成立了难民安置委员会，委员会建立了很多新社区，实际上就是建成了很多小城镇。还有一个新变化不容忽视：1914年以前，人道救援大多只有慈善组织在做，如今人道救援已然成为各国政府的特权。

不能否认，在此类事例中，国际联盟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其衍生的问题却更加棘手，捐赠疲软的态势愈加明显。为了使南森的地位合法化，他的办公室被命名为难民服务中心，挂牌在国际劳工组织下，试图融入国际官僚政治体系。然而，当时各国政府拒绝承认难民问题的永久性，他们并不认为难民问题会是以独立国家形式存在的世界秩序的一个永久特征，这种观点也一直制约着国际联盟（即后来的联合国）组织国际行动的热情，1945年之后，他们再次表现出了这种抵触情绪。难民服务中心的财政因此十分紧张，1930年南森去世后，难民服务中心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生命力。人们记忆中的国际劳工组织服务就是南森的国际难民救助所，而它实际上是个完全自治自主的组织，从未正式成为国际联盟的下属机构。国际联盟及其成员一想到有一个永久的机构保障难民的福利就会感到不悦，他们对此毫不掩饰。终于，在这种内外交迫的境遇下，在收到国际联盟下发的年度津贴的同时，南森办公室接到了要求在10年内结束难民救助工作的指令。

然而，难民问题不但没有任何消失的迹象，反倒愈演愈烈。1929年

后，持续的国际大萧条使难民们更加难以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慈善救助也山穷水尽。从1934年起，国际联盟的苏维埃成员代表团也想方设法阻碍为苏俄白种人谋福利的工作。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从战场和胜利方的弗朗哥政权中流亡出来的难民成了欧洲内战中最为庞大的难民群。除此之外，大量犹太人和左翼分子也被驱逐出德国，他们当中有的趁还能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就逃离了德国。国际联盟一开始特派了一名高级专员救助德国的难民，但后来却拒绝为这名专员提供应有的资助。平衡“难民有序迁移”和“难民吸收能力”这两个问题的政府间对话也毫无进展。更糟糕的是，其他东欧国家开始转而支持与日内瓦方背道而驰的德国一方，并开始纷纷效仿德国。在纳粹新秩序成为既定事实很久之前，强制性大量迁移和大规模驱逐出境的计划就已在酝酿之中了。欧洲的难民问题显然才刚刚开始。

少数民族的权利

除了难民问题外，国际监管的目光也开始投向与其紧密相连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这种关注同样自巴黎开始，那里的犹太人组成的游说组织尤其活跃，他们敦促欧洲列强给东欧的新兴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赋予其国内的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显然，如果想要促成此事，就需要制定某种形式的国际政策，以提供相应的合理支持。到1919年2月时，很多英国外交家已在起草少数民族权利管理体系的各式版本了，这些人深刻意识到这一想法蕴含的巨大影响力。作为所谓的“新国家委员会”的委员，外交部专家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James Headlam-Morley）向他的上级请示应如何理解保障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和政治权利”这一理念：“我猜想这个理念表明那些条约中会写入一些确切条款，由国际联盟来保证其有效执行，通过这种方式，那些新建国家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如果哪些国家没有遵守这些条款中的某些内容，其他国家则有权将其诉至国际联盟。如此看来，让法律部门起草这些条款不是更好吗？这样我们或许会更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呢。”

因为国际联盟这一新建国际组织被赋予监管那些主权国家行为的权力，而这种监管原本通常被视为这些国家自身的权力，因此这整个想法必然极具争议性。此外，与国际法相关的固定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从战略性角度考虑，欧洲列强非常急切地想将这些新的法律义务强加给东欧人，他们坚持认为东欧人不应该实行自治。国际联盟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就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表现一样，对其想当然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及等级森严的世界有着令人惊讶的文明优越感。对于英国、美国和法国代表来说，很明显，以其政治机构的成熟程度和政府内精英人士的学术智慧，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束缚举措。在他们看来，中欧和东欧的新兴国家试图在没有外界强制监管的情况下团结起已经分裂的国家，这明显也是缺乏常识的想当然的表现。1919年春，从波兰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发动了反犹太人的暴力罪行，这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上述想法。

黑德勒姆–莫利本人建议，这项有可能是最具爆炸性影响的法律变革至少还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考虑。第一个是实质性问题：赋予何人权利以及赋予其什么权利。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中，莫利注意到人们可以将西波西米亚的“常住”德国人与搬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时间相对较短的捷克人（比如说维也纳的捷克人）区分开来。（“当然，一国国民出于此类个人原因选择在国外的城市定居时，就不再具备任何享受特殊待遇的资格了。”）换言之，即使同属一个少数民族，有些人也无法同本民族其他人一样平等地享受文化和民族的特权。例如，在公共场合及私下都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确保在学校开设教授民族语言的课程以及在印刷刊物上使用该语言是安全的，甚至还可以为一系列文化活动保驾护航

等，并非同一民族的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

第二个是程序性问题：这些权利的地位如何，谁来赋予这些权利并保障权利不被侵犯？如果没有这一保障，这些权力都将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独立的条约在巴黎拟就，最终欧洲列强和东欧国家双方一致同意签订这些条约。条约为这些国家及其本国领土疆域赢得了国际的认可，反过来，条约不但保证了国内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还为他们争取到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并可在私人和公共教育机构中学习民族语言。第一份此类条约是与波兰签订的，其中包含了向国际联盟理事会上诉的权利。随后列强与另外7国签订了其他条约，同样保留了上诉的权利。这些小国的外交家纷纷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保障为国内政府执政制造了难题，还导致了国中国的产生。

对所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而言，少数民族权利管理体制在指导各国处理国家内部事务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是以往所有国际政策都无法企及的。但麻烦的是，这一体制的设立方式几乎疏离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被指责行为不端的国家因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而感到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国际联盟面对这些国家的不满无计可施。他们拒绝处理个人的投诉，对所有诉讼的审查非常严苛，最终只有少之又少的诉讼通过审查提交至委员会处理。因此，少数民族代表及其支持者们对此灰心丧气，开始发起新的游说组织—欧洲民族委员会，但这并没能有效推进少数民族计划的进程。

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唯一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竟然是德意志民族，这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打过了新边界，数百万德国人被划分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南斯拉夫的国民。他们的被同化速度比巴黎那些外交家想象的要慢得多，他们中的很多人面临着背井离乡的巨大生存压力。波兰不遗余力地强制驱逐德国农民，只有爱沙尼亚在尽力接收这些少数民族，帮他们融入本国的生活中。但是由于两大修正主义势力—德国和匈牙利也将援助本国的外来居民作为两战期间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因此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引发了公众对《凡尔赛和约》公正性的一系列质疑。当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反过来也使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站稳了脚跟。由于英法两国需要在东欧扶植强有力的支持者以应对来自德国和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双重威胁，所以他们对同盟国是否真的遵守所签订的少数民族权利条款并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势力的确日益增强，英法等国对“新兴国家”的威慑力也逐渐减弱。因此，即使是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欧洲的大多数人都不再将保护少数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正如难民问题的先例一样，国际联盟短时间内能够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远不及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口头承诺来得多。

等级和种族

威尔逊救世主似的溢美之词触动了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民众。开罗、孟买、北京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赞扬他对“弱小国家”的责任心。在这样的“威尔逊时刻”，鲜少有人会想到，他的言辞实际上只针对欧洲的民族独立。1919年，美国人只是向英国稍作进言，英国便全力以赴地扫荡了旁遮普邦、阿富汗、埃及地区的动乱，这些事件让世人幡然醒悟，威尔逊的救世主形象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此时毛泽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胡志明（Ho Chi Minh）这些人还只是世界各地的青年民族主义分子中并不出名的一员，正遭受着复辟帝国的全力打压。

同年2月，第一次泛非大会（Pan-African Congress）在巴黎卡普辛大道的一间旅馆内召开，来自非洲、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参与了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相当中肯稳健的要求，包括国际联盟对各国人权的监管、开展成熟的自治项目、保障“文明黑人”的平等权利以及促进非洲的全民教育。与会列强对这些要求视若无睹，全不在乎。社会学家W·E·B杜·博伊斯（W.E.B Du Bois）提议建立一个由非洲人领导的中非国家，这一提议同样被美国代表团晾在一边，他们反而更关注英国和南非著名政治家及布尔人的英雄史末资的提议，也就是说，他们借此明确表示了希望白人管控非洲大陆的想法。

1919年，日本关于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增加种族平等条款的提议惨遭驳斥，这同样揭露了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态度。同非洲不同，日本在巴黎会议的出席被赋予了很大的象征意义：作为一个非欧洲、非基督教的国家被纳入列强之席，巩固本国的国际认可度是其外交政策的重大目标之一。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以英语为母语的代表国怀有极浓的反亚情绪。1910年加拿大颁布的移民法案禁止“不合时宜及不符要求的种族”移民入境。新西兰的政客则呼吁禁止“亚洲鞑靼人”涌入本国。手段最刁钻的反亚国家可能要数澳大利亚了，澳大利亚白人效仿南非，出台了语言测试的政策来驱逐非白种人的移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版社组织发动反日游行，反亚裔联盟也就此成立。1913年，加利福尼亚又出台了《外侨土地法案》（Alien Land Act）专门针对日本移民，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史末资对英美联盟的看法正是根植于这样的种族焦虑中。

当日本代表团从东京启程前往巴黎时，他们也不确定美国人和英国人成立国际联盟的决心有多坚定，这也情有可原，所以日方只能给自己的代表团做出最为模糊的指示—确保“日本避开种族歧视的不利影响”。在巴黎的日本代表团基本奉行了这一原则行事。1919年2月，他们提议“保障国际联盟各成员国的平等权利”，确保各成员国的国民享受同等

待遇。除了澳大利亚（南非小心翼翼地在背后为他们鼓劲）以外的每个国家都赞同日本的提议，一致同意在《联盟公约》（League Covenant）的序文上加上种族平等的条款。当时人们很清楚，这并不是国际联盟为实现全球的广泛平等而做出承诺，而是为了平息日本的不满，因为该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移民政策上受到了诸多歧视和屈辱。当日本向大会呈交他们草拟的提案时，多数国家均投票支持这一提案。然而，主持大会的威尔逊总统却以没有全员通过为由否决了这一议案。威尔逊这一做法无视大会程序，很明显，这是因为他害怕如果通过这一敏感议案，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会掀起轩然大波。对日方来说，让他们心烦意乱的不仅是外交政策惨遭回绝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这个结果还让他们倡导“种族平等”的外交动机被世界所知，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顺利推进本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少数民族同处一个阵营。此次会议唯一的慰藉就是威尔逊许诺日本可以接管德国之前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威尔逊不惜违背自己的民族自决政策，以中国为代价成功地收买了日本。可以这样说，在威尔逊来看，帝国主义的扩张远比全球种族平等的承诺更有诱惑力。

委任制度

不出所料，日本的提议尽管没有通过，却挑动了人们的神经，西方国家的时事评论员越来越担忧可能爆发的“种族狂潮”或是世界范围的“种族意识觉醒”。对“亚洲人崛起”的惧怕彻底扰乱了美国多种族区域的民心，人们对于跨种族婚姻的焦虑越来越严重，甚至由此产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就是如何看待帝国日益紧张的种族问题对世界的影响。享有盛名的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可能算得上如今美国评论国际事务的首席论坛了，1910年在伦敦召开的全球种族大会的前一年，该杂志正是以“种族发展期刊”为名创刊，1919年更名为“国际关系期刊”，后来又改为现名“外交”，并沿用至今。

关心种族问题的不只是美国。英国手握巨大的殖民地主权，并为此肩负了极重的国防预算，它才称得上最为关心种族问题的国家。据1919年参加巴黎会议的杜·博伊斯回忆，“泛非运动”当时尤为活跃，主办的大会经常会吸引威尔斯总统这样的人来参加。次年，马库斯·贾维（Marcus Garvey）及其领导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着重强调了美国黑人的艰难处境和非洲殖民主义的罪恶延续。他们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大型公开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世界黑人权利宣言”。埃及和印度民族主义以来势汹汹的“种族意识觉醒”为契机，对立场不够坚定的平民百姓进行煽动，有组织有秩序的种族平等运动蒸蒸日盛，而此前英国就十分担忧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可能会利用这一问题打击英国。面对这些难题，英方的殖民官员早已预料到了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泛伊斯兰主义不断扩大带来的多重威胁。英国地区委员兼上尉J·E·T·菲利普斯（J. E. T. Philipps）曾经写道（后来由于对间接规则的直率批判，他被迫退出了殖民服务系统）：“亚洲正期待着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刻，非洲也开始有了懵懵懂懂的民族意识，我们究竟希望他们什么时候觉醒呢？”

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遵守文明标准比以往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并没有哪种无可争议的实用政治模式可以全球通用：一方面，19世纪时，欧洲或是美国的民众显然不能接受简单的殖民扩张式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允诺给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同样显得荒谬可笑。在这一方面，国际联盟做出了突出贡献，该组织为欧洲国家与殖民国家的关系下了新的定义，称其为“委任制度”，这一说法体现了殖民统治的真正意义。联盟在认可原有文明标准理念的基础上将其校准为全球性的公认概念，并一直致力于建成一个马志尼范式的国际社会。委任制度实是帝国扩展强权的隐蔽手段。这充分展示出国际联盟所坚守的世界观—无条件地支持帝国主义强权。

英国激进派记者J·A·霍布森（J. A. Hobson）认为“非文明民族”会从

帝国强权统治下的国际化政权中受益，他在布尔战争后提出，国际社会需要对非洲民族进行监管，这是基于“道德诉求的最高标准以及全人类有机整体统一利益的相关概念而得出的结论”。他坚持认为，之所以有战争正是因为有私人金融资本的存在，为此他们肆意掠夺利润丰厚的资源，最终导致战争频发。他继而阐述了“健全帝国主义”的三大条件：

> 对“低等级”种族的政府干预必须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安稳和发展，而不是为了干政国的特有利益。这种干涉必须符合受领导民族发展进步的利益。最后，前两条的执行测定标准不能根据干政国家的独裁意愿或判断而定，而是必须以文明世界的发展进程作为标准来判定其是否符合世界文明以及“低等级”种族的发展利益。

因此，霍布森的中心理论就是由具有公正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对列强的殖民统治进行监管。国际主义并不是帝国统治的对立面，而是文明的教化者。作为科布登传统理念的热情追随者，霍布森曾为他心目中的英雄著书立传，出过一本名为《国际人》（the International Man）的书。霍布森的贡献代表着科布登反帝国主义事业的巨大转折。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帝国主义的快速扩张甚至为广大的欧洲民众所认同，因为在世人眼中，被霍布森美化了的殖民统治只有单纯的意图和无私的目的，那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霍布森对科布登的理论做了发展，他将对“低等级”种族的监管列为世界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这一理念有助于制定联盟政策，直到21世纪仍然以联合国托管制度的形式存在着，也是后来的“保护责任”的原型。

然而，战争本身一直困扰着霍布森。身为国际联盟理念的支持者，他害怕将非欧洲国家排除于联盟之外会导致“国际合作式帝国主义”的产生，“这种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并不亚于过去的民族独立主义，因为这是由各个强盛的白人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其中包含了各国的居心叵测和狂妄自大”。然而，除此之外，却别无他法：对霍布森乃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进步思想家（杜博伊斯也不例外）而言，民族意识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他并没有在非洲或是其他弱势国家看到丝毫民族意识的痕迹。实际上，被殖民者整体来看都像等待文明教化的孩子一样。

持这种理念的国际化为帝国的决策者提供了说辞，在英国尤其如此，他们敢于直面战时所有反对进一步吞并他国领土的声音。1917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评论说，领土吞并是极为肮脏的行为，因为“不应该在不尊重民众意愿的同时还将他们当作个人财产一样任意摆布”。同年5月，劳埃德·乔治在议会宣称英国没有任何吞并的野心，非洲的前途命运都将在和平会议上由世界共同商定。工党则更加直言不讳，他们主张组建一个新的超级国家政权来管理经营非洲殖民地以及奥斯曼帝国阿拉伯省的各项事务。一旦资源竞争导致战争爆发，成立一个监管

各国殖民开发的国际经济体对和平事业将大有裨益。

所有国家皆各怀鬼胎，因此，“一战”非但没能阻止这场非洲掠夺战，反而将蚕食之火烧到了中东地区，“一战”期间，英法两大阵营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the Sykes-Picot Agreement），秘密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信口雌黄，主张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或是阿拉伯联邦国……并支持由阿拉伯首领领导自己的国家”。在此期间，T·E·劳伦斯（T. E. Lawrence）和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积极推进阿拉伯民族事业的进程，终于，英法在战后迅速发表了关于中东事业的联合声明：“处在土耳其人长期镇压下的民族理应得到完全而彻底的解放，政府机关及权力部门也应遵从本土民众的主动权和自由选择权。”虽然这套说辞听起来不错，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处于重要战略地区的民族不可能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帝国的战略需求永远处于第一位。就这样，在英国看来，关键问题便成了是否能争取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到英方阵营，受英方控制领导。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首席行政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仅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不可能通过外交或行政手段成立一个新的伊斯兰独立政权”。其他人则诡计多端，想要利用联盟的授权分一杯羹。1917年10月，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援引罗伯特·塞西尔的言论：“至于英国的利益，我认为，可取的做法是不要过分表现出吞并巴勒斯坦的强烈欲望，也不要一意孤行地在巴勒斯坦建立摄政政府。等到需要强国出面托管时，我们只要执行我们的政策就可以了。当地居民会根据自身意愿和需求达成一致意见选择委任国，而我们则是最有希望当选的一方。”或者正如丘吉尔所写的那样，“‘吞并’的说法并不存在，授予主要强国的委托管理权才是列强掌控各殖民地的必要借口”。

不过，这件事仍旧需要协同美国共同进行。尽管伍德罗·威尔逊并没有实质性的反对方案，但他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领土吞并一事的极力反对。他的顾问乔治·比尔（George Beer）曾经提议对非洲进行国际监管，一项美国起草的联盟公约应声而出：公约将国际联盟称作“委托人”，并认为国际联盟拥有对所有委托统治“领土主权的最终处置权”。比尔本人也清楚这一草案只是对1885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的拓展，但他认为自己的主要创新点在于提议国际联盟拥有“绝对干涉权”。但是这一提案听上去对欧洲各殖民势力来说却过于激进。尤其是法国，它显然只希望“单纯而简单地吞并”以便法国能肆无忌惮地“在热带非洲继续其传播文明之旅”。

一方面，美国想要打破旧有的帝国格局；另一方面，法国希望得到更多的殖民地。处于两者间的英国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根据殖民地居民大致的文明程度，英国将委任统治殖民地划分为三个等级。A等级的委任国（中东）对民族独立有“暂时认识”；B和C等级的委任国（大致为在亚太及非洲较原始的地区）除了换了好听的名头之外，仍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除了委任国的本国居民之外，其他有关各方都很开心。法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和新西兰人）用“殖民地和委任区并不存在真正的区别”的想法来宽慰自己。威尔逊同意保留国际监管制度，经过

协商创建了一个新的常设授权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接受国际联盟委任，替之行驶管辖权的强国势力，并仔细审核他们每年的年终账务。

国际联盟的常设授权委员会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呢？实际上各成员国都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事外，抽身于国际上的各种争执，甚至对与本国政府相关的争辩也不管不顾，这着实让人吃惊。而国际联盟利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国际舆论，1922年南非政府利用空中军事打击镇压了非洲西南部的叛乱，常设授权委员会此时发挥作用，有效阻止了史末资吞并他国领土的贪欲。可能正是以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该委员会才逐步建立了国际监督的制度，并使其受到国际各方的尊重，为战后的非殖民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存在“二战”以及美国反殖民主义（美国忌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同影响，在一个纯粹的帝国霸权或委任统治的环境下，殖民产业还会存在多久呢？更有些人认为，常设授权委员会事实上反而为殖民产业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后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42年就曾坚定地写道：“就国际联盟而言，它希望这些强国能享有对昔日帝国的永久统治权。”

此外，尽管多数自由主义人士都为自己对授权委员会产生的影响欢呼雀跃，但是很显然，委任统治的殖民地居民对这样的统治并不满意。比如，萨摩亚人过去拥有自己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结构，而在接受新西兰的委任统治后，新西兰方却对萨摩亚人的民怨置之不理。同样，澳大利亚统治下的巴布亚没有任何人关心其民生疾苦。受委托统治叙利亚（被认定为A等级委任国）的法国也丝毫不顾及他们所标榜的文明标准：1925年，为了镇压民族起义，法国不惜在大马士革市中心投下导弹。西班牙内战时，小城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这件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恐慌和愤慨，就在此事发生的十几年前，法国的坦克、枪弹、飞机也是以同样的手法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个旧城区从地球上抹去的，而那次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格尔尼卡轰炸更高出几倍。然而，国际社会却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常设授权委员会也只是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要求法国做出相关解释。

同样肆意妄为的还有英国，它们同样对空袭手段情有独钟。丘吉尔本人不仅鼓励使用空袭导弹，还曾在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投放过芥子毒气以镇压“非文明部族”，并且只有出现运输和生产延误时才停止使用空袭。后来在一系列开拓创举的国际会议上，各国决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才制止了英方化学武器的继续使用。与此同时，“空中管制”的委婉说法仍然是主要的军事打击手段，主要用于压制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为了镇压1920年伊拉克的民族分子叛乱，英国损失了近1 000名英国士兵，阿拉伯的死亡人数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之多。常设授权委员会所做的一切就是在1932年授予伊拉克独立自主权（日内瓦本应参与此事，最终却没有任何行动），这是因为英国认为新成立的独立王国比起委任国来说更好驾驭。

不得不说，委任制度也为和平做出过贡献，让部分国家躲过了法西斯的残忍侵略。193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墨索里尼拒绝

接受委任意大利合法统治埃塞俄比亚的建议，更不承认国际联盟的监管制度；相反，他主张纯粹且简单的直接统治。从这个意义上看，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复古的、粗野的、非国际化的殖民地秩序。不过，即便是如此粗野的纳粹分子也会被国际联盟授予的殖民地合法控制权所吸引。“委任”一说灵活的可塑性最终暴露无遗。1940年夏，德国决定将马达加斯加岛用作波兰犹太人的放逐地，第三帝国外交部的犹太专家为此起草了相关方案，同时他们也就此进行商讨，可以利用联盟的委任手段永久地为德国效力，而不是使其单纯地为英国一家服务。仅仅几秒钟时间内，野心勃勃的纳粹公务人员的脑海中便闪过了这种可能性：法国日益衰落，整个欧洲臣服于德国脚下，国际联盟成了法西斯分子的统治工具。这一想法有多么牵强要看以什么角度看待它：英方或法方必然认为该想法荒唐至极，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歪曲和羞辱。而从我们所知道的印度及其他地区民族分子的战时反应来看，对非洲和亚洲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提议罢了，因为在那些地方，重要的并不是帝国主人的身份，而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残酷事实。

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国际社会对那些秉持自由主义的帝国仍旧存在种种反抗和反对的声音，人们仍在努力整合全球的反殖民主义行动。这些做法在某些方面与1848年以前欧洲对神圣同盟的各种抗争如出一辙。1925年，法国对大马士革的轰炸暴行触怒了民意，促成了叙利亚的“反暴行委员会”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殖民政策一再使殖民地居民大失所望。面对这种情况，1927年2月，布鲁塞尔举行了镇压民族分子的大会，此次会议堪称30年后那次万众瞩目的“万隆会议”的先导会议，只是人们都不记得它的这层意义了。布鲁塞尔会议的与会者中包括了首次参加国际会议的印度国会成员以及另外十几个亚非代表。几个月后，印方代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牵头成立了一个临时反帝国主义联盟，他的身份给人以惊人的反差，这位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印方发言人同时也是英方钦点的傀儡领导人。因此，一位职业敏感度很高的记者将1927年的布鲁塞尔大会称为“真正的国际联盟”。

这场来势汹汹的反殖民合作的幕后操盘手就是杰出的共产国际代表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urg），当然还有脱不了干系的“幕后老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实际上就是由共产国际发起的，也就是“反帝联盟”。尼赫鲁在几个月之后访问了莫斯科，尽管这段经历并没有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一分子，但他被苏维埃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深深地折服了，也借此展示了反帝国主义的国际号召力。反帝联盟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日内瓦委任制度的重要制衡方，尤其是在1929年组织内的非共产主义代表遭到共产国际的内部攻击之后。但是，反帝联盟还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因为它是两大势力的历史交叉点：展望未来，它代表着殖民主义分子促成的狼狈为奸的联盟，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对联合国的掌控达到了顶点。回顾过去，它是曾经心怀巨大革命愿景的共产国际最后一次的喘息之机，尽管备受约束却又徒劳无益。这个伟大的组织与国际联盟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还曾是国际联盟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共产国际

英国作家兼记者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一战”时曾在俄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1919年3月，通过一次与布尔什维克的接触，他很意外地参加了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老法庭内举行的会议。穿过两个红军士兵把守的门口后，兰塞姆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屋内的墙壁和地板全都粉刷成了红色。几个横幅挂在墙上，用多种语言写着“第三国际万岁”。看到托洛茨基时，兰塞姆眼前一亮。托洛茨基穿着皮衣皮裤，脚上蹬着一双长筒皮靴，头上戴着印有红军标志的裘皮帽。兰塞姆清楚地记得他是欧洲最为激昂的反军国主义人士之一。屋内最里侧的平台上，列宁正坐在铺着红布的桌后讲话，“当他的发言需要必要的说明时，几乎会用到所有的欧洲语言进行解释，他对这些语言使用自如，毫不做作”。屋内多数都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团，他们在大厅中一排排地有序就座。

兰塞姆很快意识到，自己误闯了第三国际创立大会的会场。由于马克思的参与，人们将1864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称为第一国际。马克思去世后第6年，也就是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此时的社会主义分子和工党才第一次真正成为议会中的一股力量：第二国际的创立日1889年5月1日已然成了一个国际性节日。190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真正的国际办公室，组织各种运动，为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权利。此外，这个办公室还肩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欧洲大获全胜。但1914年，随着战争的爆发，组织内的工人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各奔东西，第二国际在世界上的威望因此大打折扣。以瑞士伯尔尼为据点的一个地下组织在战争中步履维艰，但正是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组织最终得以复兴。列宁为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所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三国际的成立大会。

选择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第三国际，是为了确立列宁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绝对领导权，这样第三国际就可以牢牢掌控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手中。从理论上讲，第三国际以一个超国家组织的形式存在着，其他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都是其分支。实际上，第三国际的成员必须立誓效忠组织并无条件遵守由列宁本人拟定的21点规定。这些条款要求“第三国际”的成员必须摒弃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要立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认可闻名于世的共产国际的权威性。这种依附事实上就是苏俄共产党领导的忠诚武器。作为集权的中心人物，列宁一直避免将新组织发展成为“第二国际的遗骸”。尽管措辞十分强硬，但实际上直到1923年年初，许多紧张的谈判依旧在进行着，这些谈判竭力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成员团结在一起。但是直到法西斯掌控了意大利政权后，这些努力还是没有取得成效，欧洲左派分子又苟延残喘了十多年。

对列宁来说，最终的敌人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背叛者，而是资本主义势力及其帮凶。他草拟的规定中第六条这样写道：

> 每一个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派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以及“社会–和平主义”伪善和虚假的面孔。我们要逐步让工人阶级明白，即使没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颠覆、没有国际法庭的仲裁、没有武器军备的限令、没有国际联盟所谓的“民主”改组，我们依然有能力制止新型的帝国主义战争。

就这样，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19世纪劳工国际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并宣称国际联盟不过是旧时代梅特涅反革命主义的延续。

因此，列宁主义和威尔逊的国际主义从一开始就水火不容，在国际事务中，若一方支持新出现的事物，另一方就立刻提出异议。对抗就是这样开始的，两者总是处在同一事物的对立面。针对列宁对秘密外交的斥责，威尔逊很快出台“十四条”予以回应，他承诺“开放联盟公约的和平条款”，并抛出极为诱人的条件—同意“俄方自主选择国家政体”。1918年，威尔逊仍充满诚意地希望说服“俄罗斯民族”。但内战爆发后，联盟却对苏俄内战多加干预。1919年，激进主义不仅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甚至对美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都使得俄美两方渐行渐远。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然成为国际联盟本身存在的理由。1919年3月，威尔逊自己向劳埃德·乔治透露说：“如果我们允许欧洲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必须将国际联盟打造成友邻的保护者、掠夺方的惩罚者。”国际联盟成立时，苏俄并没有受邀加入，美国的官方立场很明确，他们绝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外交地位。

之所以成立共产国际，不只是为了利用“世界革命的巨大潜能”，还为了避免革命被“团结在伪善的国际联盟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盟”摧毁。共产国际身负重任，必须巩固好各成员对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因为他们才是“历史新纪元”的领导者。然而，共产国际的意义绝不只是如此。作为一个坚定的反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也十分乐意公开探讨—俄国爆发革命的非同小可以及世界各地推动革命的重要意义。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注定到来，那么就需要以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进步。于是，共产国际有了第二层目标，就是在世界各地发展革命力量。列宁身边多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员都长期出门在外，过惯了流亡生活，并精通各国语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内部紧紧凝聚在一起，在“一战”前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很快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更具规模的行动，并成功扭转了第二国际的颓势。他们认为，战争将成为期待已久的全球革命催化剂。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高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重矛盾”即将爆发，国际社会将发生“大地震”，帝国主义制度会分崩离析。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拯救人

类："资本主义统治必然被工人阶级彻底摧毁，这样战争才能停息。废除国界限制，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齐心协力的大家庭，真正实现兄友弟恭，民族自由。"影响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他们在国际联盟的庇护下暗度陈仓，"假仁假义地倡导着和平事业"，另一位苏俄代表说道，他认为西方的和平言论尽是虚情假意。英国和美国嘴上说着"民主外交政策"，实际上它们仍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势力。"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由政府擅自合并给法国，根本没有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爱尔兰、埃及、印度也没有任何国家自主权可言；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都是靠武力成立的。"至于国际联盟：

> 谈到其存在形式，国际联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神圣同盟的变体，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工人革命。宣传发展国际联盟就是混淆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佳方式。多个革命工人共和政体组成的国际公会提出的口号遭到了摒弃，一个宣传虚假民主的国际联合会提出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有人妄图借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间的合作来达到宣传目的。国际联盟就是社会叛徒的一种迷惑手段，它代表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意图分裂无产阶级势力。

列宁称国际联盟为"散发着恶臭的死尸"，是"对抗无产阶级的世界土匪团伙"。列宁和威尔逊的对抗就像是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与马志尼对抗的重现，只不过这次双方投入了更大的赌注。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冷战过程其实就是延续了19世纪互相对立的各种国际秩序概念之间的斗争，只不过从前这些概念是由伦敦街头那些贫困的流亡者明确提出的，而现在则是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郑重提出。除此之外，实际发生的事实则截然不同。共产国际这一组织真正存续的时间只有20几年。但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逐渐掌控苏俄政权，苏俄境外的世界革命前景也逐渐暗淡起来，其外交人员就国际联盟这一组织发表的官方态度也越来越谨慎，甚至有些调和的意味。

尽管列宁几经思索才意识到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注定是一场失败，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僵局才是真正的历史转折点。1920年，英国试图调停波苏战争，苏俄外交部的人民委员则表示，虽然赞赏这一初衷，但是他们并不认可英国的这一举动。他们抗议说苏俄不能接受英方的调停，因为苏俄绝不接受"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政府"对苏俄的任何干涉，当然也不可能接受国际联盟以国际事务仲裁人的身份干预非成员国的事务。"国际联盟内的各成员国将自己视为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超级法庭，苏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强国国际联盟。"在保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两年后，苏联受邀参加在热那亚召开的重建世界经济的国际会议。时任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通晓多国语言，出身于俄国富裕的外交家和法学家的贵族家庭，他毫不在意自己曾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短暂牢狱生活，并四处宣传"旧有社会秩序和正在孕育的新型社会秩序"的融合和共存理

念。他要求参与“国际联盟的盟约修正工作，使其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民族联盟”。

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回应，但苏俄与他国势不两立的时代自此却不复存在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不仅资本主义在欧洲呈现稳定态势，国际联盟也已经很明显地不再需要打压革命。在印度和埃及，全球革命的势头日渐衰落：共产国际大失所望，其原本期待在波斯、亚美尼亚、土耳其和整个中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今这些愿望已全部落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也直线下降。共产国际的黑人办公室呼吁非洲黑人奋起反抗，但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其他地区并没有共产党人，也没有开展任何革命运动。他们也曾动员美国的南方黑人为自己争取民族自决权，但都没有收到成效。共产国际的理念丧失了过去的感染力，苏联的贸易代表团因此开始游说整个欧洲，自此，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认可布尔什维克党合法地位。在苏联内部，布尔什维克国际法的抵制派也不得不同意和解，让步于实用主义。1925年年底，莫斯科积极回应了国际联盟的邀请函，同意参加裁军会议。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就此被彻底边缘化了。相反，列宁的继承人仍想要努力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希望同欧洲强国外交关系常态化，同时他们还积极培养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党派的外交关系。正如我们所知，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威利·明岑贝格的指导下，反殖民主义成了共产国际运动的主题。明岑贝格特意选择了布鲁塞尔会议作为“表演”场地，在此公开了比利时在刚果的种种恶行，同时，柏林反帝同盟简要地召集了欧洲的反帝人士、同道中人和像尼赫鲁、蒋介石这样的反殖民主义人士。但是这次看似精彩的宣传运动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亲信都不看好这次行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亚洲各国的革命远景深感失望的不只是莫斯科一方，大多数中亚居民尤其如此，他们已然被迫接受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尚未明了的观点，对苏联来讲，安全高于革命，这种情形通常使欧洲各股力量保持均衡成为各国关心的头等大事。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工作重点已经明显不在殖民世界一方，随着希特勒势力的壮大，国际联盟和苏联慢慢走到了一起。1934年9月，苏联正式加入国际联盟，成了联盟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国。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苏方最先倡导与联盟合作的典型代表，他十分赞同这一决定，甚至将国际联盟比作苏联自身，因为苏联本身就是由多国结盟组成。斯大林一方则对联盟不抱有幻想，他并不信任所谓的“联合安保力量”，也不觉得他们有能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共识的前景。但是他对共产国际更加不抱希望。然而，同欧洲各国结盟终究是势在必行，加入联盟也意味着苏联接受上述一切条件，并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规矩办事。甚至在斯大林在党内以肃清恐怖分子为由进行肃反运动之前，共产国际对苏联的做法仍耿耿于怀，因为其影响远不及国际联盟那样大。1935年，共产国际最后一次召开会议，此时它再不能为反殖民主义事业做出任何贡献了。1936年，斯大林接受了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的采访。令人瞠目的是，斯大林在采访过程中断然否

认了苏联有向世界输出革命的计划，甚至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位苏联领导人刻意公开表达自己对此事的观点，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因为他们并没忘记斯大林前任领导人那份狂热的国际主义情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放弃了革命的信念，只是在他看来，现在的革命与马上到来的战争和红军的胜利与否息息相关，而与一个他从不信任的组织的未来无甚关联。

斯大林对国际共存一事的基本观点在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会晤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通常引用这次谈话都是在表现威尔斯的忠厚老实，当然这位英国作家一直给人一种很自我很单纯的印象。但斯大林本人在谈话中也表现得极为坦率。在表达了对罗斯福的尊敬之后，他一针见血地分析了“新政”，虽然美国想要拯救资本主义，但他认为美国终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自有矛盾。他并不赞同威尔斯的观点，他认为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会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主体。斯大林对威尔斯说，工程师是在听别人的指挥做事，科学家能做多少贡献就能做多少破坏。单纯为了创造利润而工作的人不会成为“世界的重建者”。只有利用政治力量才能改变世界，而唯一能带领人类前进的就是劳苦大众和他们的代表。在这一描述中，他把工人阶级看作发达世界的领导者、苏联的政治领导人物，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世界变革的先锋战士，但他完全没有提及帝国王权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问题。

国际主义的问题

在多数人眼中，纳粹分子的思想理念简直就是疯狂且丧失理智的妄想，尽管总有人试图改变这种看法，但是在20世纪更大的国际统治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针对自由国际主义的主要假设提出一种更持久不变的批评意见。这种假设不只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和平解决问题的各种条款之间的分歧。与纳粹分子面对异议时的扫荡式反扑相比，修正主义就显得太过羸弱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哲学指导理论代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充分揭露了国际联盟坚持的国际主义的伪善面目。

在国家社会主义看来，国际联盟犯了几个根本性错误。一个就是对国际法的神化和理想化，好像该法能脱离自身所反映的政权关系，完全独立存在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秘空间俯瞰众生一样。德国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国际联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障自由主义的主导权，让历史冻结在英国、法国、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时代，随后再按自由主义的形式重写世界秩序。然而，表面上看这一新组织对外一致倡导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实际上却是总有国家凌驾于他国之上。例如，超级大国永享委员会的常任席位，无须担心会受到像少数民族权利法案这类事物的困扰。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说，真正的权力在于对制定规范准则的掌控，他们有权决定这些规则适用于何人何地。因此，国际联盟只是又一种形式的同盟会，这个组织和以其他不同哲学理论作指导的国家一样（比如法西斯主义指导下的意大利和第三帝国）都是在利用不同的哲学理论凝聚力量。当人们不再认同国际联盟的统治时，它的势力自然就被削弱了。

他们希望取消国际法在管理国家关系方面的主导作用。国际联盟为国际生活引入了“法治化”的概念，因为这样它就可以长久掌控世界秩序，为各国行为和领土疆域划定界限，维护凡尔赛的协议规定。在纳粹社会有机体论的想法中，世界恒久不变、没有争斗是难以置信的。如果不再有国家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地球也将停滞不前；各国不该只听信法学家的言论（理想化的仲裁运动和新型常设法院），因为世上根本没有“公平正义的完美标尺”；更确切地说，同第三帝国的情况一样，法律应当体现民心民意，应当表现为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条文。

纳粹党人借鉴了旧有的德国思想流派的观点，同19世纪其他地区的保守势力一样，不试图使国家服从国际管理，而是主张独立国家的意志和自治高于一切。更有甚者，德国的一些法学家甚至全盘否认国际法的可行性，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对法律毫不隐晦的种族主义解读日渐兴起，这越发鼓励了公开否认国际法的做法。如果政治就是不同种族间的斗争，每个种族都凝聚在自己的国家内，那么事实就是他们不能共享人类社会的任何产物，也无权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这样解

读的话，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本国的法律体系。法律条约也只能在签约国间生效，条约就是“一张废纸”。一位德国法学家公开表示，法律并不能保证种族人质的人身安全。或者换言之，“只有国际法律规范与德意志民族的法律概念相一致时，德国才会认可国际法律准则”。如果血脉是政治归属的标准，那么国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德国人只能忠诚于第三帝国而不是由国界划定的国家。纳粹的法学家不遗余力地散播这一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仅能让德意志民族掌控整个东欧的政治组织，还能让他们如愿对邻邦施压，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权，这样，第三帝国就可以从中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

随着这种想法的产生，国际联盟不再一心想让欧洲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渐渐地，它开始成为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中的一派。纳粹掌权后，德国很快脱离了国际联盟，但是直到1936年，支持国际联盟的英国保守党员仍然认为纳粹德国是有可能重返联盟的，国际联盟同墨索里尼的埃塞俄比亚争端也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第二年，他们才发现一切都是天方夜谭。在英国和法国政府公开表示对国际联盟丧失信心的同时，德意两大主要法西斯势力加入了他们自称的“法西斯轴心国”。1937年年底，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他认为国际联盟已经处于“大厦将倾”的态势；德国政府则表示绝不会考虑重返国际联盟。第三帝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反共产主义同盟就此成立，根据同盟的发言人所说，同盟的意义在于“创建社会新秩序，让生命力顽强的国家能真正地互利共存”。

那么届时纳粹分子会提出什么形式的社会秩序取代国际联盟呢？德国最为突出、最具法律思维的人物卡尔·施密特一直以来都在强烈反对国际联盟。1939年4月，德国占领了布拉格，希特勒的野心首次流露出来，其目的绝不只是团结凝聚德意志民族那么简单。在这个特殊时期，施密特为此做出了解释。他专门指出国际联盟的“普世主义”，并对此进行批判。纳粹分子批评“国际通法”的吹嘘行为轻则是伪善的表现，重则危害世界稳定，那些赞同制定“国际通法”的国家只是想从中得到特别待遇。如果连普世主义本身都是虚伪的，那么就说明唯有在疆域划分明确的政权之下，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带来稳定。施密特以美国为例进行说明：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基础统治了整个西半球，并禁止其他任何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对其强加干涉。

这个大西洋彼岸的实例引发了强烈反响，人人都想知道门罗主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法国衰落前后，希特勒本人曾经指出，全球主要大国各自统治着自己独有的“巨大空间”，只要相互之间达成协议，就可以确保世界和平。“美洲就由美国人捍卫和平、欧洲就由欧洲人来保护和平。”1940年6月，希特勒如此解释道。7月，罗斯福的新闻发言人不经意间说道，美国政府认为“门罗主义适用于每片大陆”，这一说法仿佛赞同了希特勒的观点。两天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断然否定了他的说法，他澄清说，“美国方面没有任何利用门罗主义实施霸权主义的想法”。（一年后，英美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表达了对普世主义、自决权和重建自由社会秩序的决心，随后不久，英国外交部大臣安东尼·伊登

（Anthony Eden）认为十分有必要解释罗斯福–丘吉尔的公告“无关东西方的霸权主义或是区域领导权的一切相关概念”。）

施密特一语中的。他所指出的门罗主义概念对霸权主义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否适用于美国的情形（当然多数非纳粹人士认为适用于美国），霸权主义就是第三帝国意图统治世界的特色理论中的核心。1938年，分析这一课题的重量级文章—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的《霸权》（Die Hegemonie）在柏林发表。当时正值法国衰落时期，德国心急火燎，当时，这篇文章连同施密特的相关著作都为德国对欧洲的看法提供了理论支撑。特里佩尔认为，由一国或几国作为领袖是实现欧洲统一的唯一途径。这一重任就落在了第三帝国肩上，德国同法西斯意大利一道，联合几个小国就可以在任意地方建立保护国，掌握摄政权。因此，霸权最真切地反映出纳粹新秩序中包含的不平等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特里佩尔相比，纳粹党的政治官员当然没那么文绉绉的学者风范。据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所言，在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中，毫无疑问，那些“穷酸的小国家”不是独来独往就是毫无存在感。

但现在还不是单独考虑欧洲大陆的时候，施密特本人认为“全球化思考”才是十分必要的。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的《三方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清楚明白地表现了他们全球外交战略意图的新理念—这是“将在未来掌控世界新秩序的三国”[援引自法国元帅马歇尔·贝当（Marshal Pétain）的评语]取得的成效之一。根据三方公约的序文，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都是“世界各国都应有适合自己的位置”。公约的前两款中明确说明，这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体现的并不是各国平等，而是等级制度，签约国各方都拥有特定的区域统治权—意大利和德国负责欧洲，日本负责“大东亚地区”，其他各国须服从这一规定。但是三国同盟并不稳定：希特勒看上去很真诚地认可美国和英国的地位，德国的目标就是成为英美一样的帝国；美国仍是西半球的霸权统治者；英国也还是“海上帝国”。因此，当在亚洲的争夺战中日本取得了成功而英国失败时，希特勒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所以他一直回避在亚洲和中东使用反殖民主义这张牌。

对于日方而言，他们十分欢迎新的区域主义，因为当时政界对国际联盟的态度至关重要。和施密特一样，两战期间，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极力谴责国际联盟，称其就是“维系现状”的“遮羞布组织”。他们评论说，英国和法国“高喊着所谓的民主作为他们的指导准则，实际上，他们利用国际联盟作为他们国际内政的傀儡，只在涉及本国的既定利益时才会出面讨说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船山新一（Funayama Shin’ichi）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国际联盟所谓的普世主义只不过是阻止东亚各国各民族团结的手段。他倡导的“新国际主义”超越了国际联盟的观念，支持国与国之间通过发动战争进行竞争，这正是区域一体化的形成模式。这一类人把日本对华发动的战争及不断扩大后的世界战争看作一个契机，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的强大的“进步”的东亚模式会成为世界组织结构的区域典范。

然而，类似的霸权概念并没有得到清晰阐释，《三方同盟条约》高度正式的语言比较晦涩难懂，像第三帝国一样的霸权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主张的这些规则的特性也便含混不清了。每个大国在自己的“自治区域内”处理事务或是管理从属民族都要按照法规办事。从理论层面上看，不论是施密特还是特里佩尔都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说明，两人表现得都很慎重，好像都不太信任国际社会民族主义。不过，德国推进霸权成功后，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考虑。希特勒是擅长诸多管理事务的实用主义派，他最终决定在战争结束后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随着战争形势逐渐向对德国不利的方向转变，纳粹分子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设立法规刻不容缓。

法西斯意大利（尤其是他们的外交官）大力鼓吹法西斯国际主义：他们糅合了马志尼和墨索里尼的观点，并希望欧洲国家能明白法西斯轴心国是在为整个欧洲谋福利。随后，当然就是宣传马志尼的法西斯观点，至少要将马志尼思想打造成自由主义一派。正如1936年的时评家所言，马志尼瞬间成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兼容体”。当时，在纽约甚至还成立了一个马志尼协会，专门宣传自由主义价值。就这样，墨索里尼重新弘扬了马志尼的精神。到了1943年，按照意大利的理想形式，欧洲法西斯主义联盟成立，并受到了德国外交部门的认可。除了希特勒曾反对过关于欧洲永久承认各小国家主权的提案外，该组织的发展从未受阻。纳粹党卫军首脑希姆莱（Himmler）手下的智囊团想出了更为阴险歹毒的种族计划。同马志尼的种族观完全不同，他们信奉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同质和纯化欧洲各国的人种来稳定欧洲局势。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人口迁移或放逐；其他情况下，则意味着更为血腥暴力的手段。他们坚信是少数民族的存在使得国际矛盾频发、容易擦枪走火，利用第三帝国的霸权统治彻底消灭其他种族，就会为欧洲各国关系带来和平，从而创建一个“各国种族饱和式”的欧洲大陆。大量独立的羸弱小国只能在第三帝国的羽翼下自保，对德国来说，与成为后进合作伙伴的大国相比，这种情况则更容易掌控。因此，他们不但想分裂波兰，对法国和英国也垂涎欲滴。

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

纳粹在欧洲所占之地的统治开始脱离自己的思想指导，显得自相矛盾，同第三帝国的反殖民主义理念截然不符。对今后更为重要的是，纳粹统治还摧毁了反对者旧有的自由理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对国际法的未来走势最为好奇。1941年，一位因政治流亡国外的法学教授质问道："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 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而成的珍贵的国际主义理论屡受质疑，尤其是那些有利于规范各国关系的法律更是惨遭毒手。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纳粹党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而是因为纳粹手握重权。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是美国杰出的国际联盟支持者，他沮丧地说道："极权主义揭露了国际法的哲学和政治基础中的不当之处。"法律本应是毋庸置疑的公正权威的源头活水，如今却成了一纸空文。对于有些人来说，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建立更为稳固的法律权威，要利用权力制定和维护本国的法律；其他人则怀疑为什么法律只存在于与其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或者说，当法律与该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左时，难道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了吗？19世纪人们对公认的文明标准的信赖也因纳粹的崛起受到重创。如果文明社会不单指欧洲社会，那么会不会有世界公认的"绝对法"存在呢？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意义下，这场大战才标志着"欧洲时代的结束"。

然而更糟糕的是，对于那些期待国际法具有有效的超国家权力的人而言，"一战"仿佛再次肯定了主权的重要意义。在战争早期，曾流行一种"一时冲动"的看法，即将欧洲的独立主权国家视为问题所在，并希望将联邦制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一想法并不持久，到了1942年年底，由于纳粹党人已经完全掌控了欧洲各个小国的主权，人们对重绘欧洲版图、创建联邦制欧洲大陆的想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致。受迫害流亡的政治家带头组织拯救国家的独立运动，并向《大西洋宪章》中的国家自决权条款寻求帮助。在三大巨头中，斯大林是最有力的后盾。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反民族主义派别出现。因此，极为讽刺的是，在战争末期，民族主义的动乱本质就已经显露无遗，民族主义分子已然下定决心铲除少数民族或是彻底将全部少数民族驱逐出境。战争的胜利方再次证明了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接下来就要筹备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而新组织定将比国际联盟走得更远、做得更全面。

第二部分 以美国的方式主宰世界



第二部分



以美国的方式主宰世界

第七章 “国际联盟陨灭，联合国长存”

在遥远的土地上战争肆虐，
无望和恐惧永远不会消除吗？
一直在努力的我们，
能够带来永久的和平吗？
我们恐惧却不迷茫。
时间开启沙漏，细沙涌动，
又一个百年。
黎明降临。

—詹姆斯·肖特维尔（James Shotwell），
《黎明降临？》（“Is It the Dawn?”）

致美国

1940年夏，巴黎的纳粹分子泛滥成灾，活动非常猖獗，国际联盟的命运安危未定。此时在大西洋两岸，一些陈旧的、根深蒂固的假想甚嚣尘上。一些令人担忧的谣言在日内瓦流传，称国际联盟秘书长、原法国财政部官员约瑟夫·阿弗诺尔正准备勾结纳粹。虽然纳粹主义是反国际主义的势力，但是第三帝国的首领们十分清楚同国际组织合作的价值。约瑟夫·戈培尔十分欢迎1935年在柏林举办的监狱专家国际代表大会。1938年，德国人接管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刑警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国际刑警组织，该组织并不希望外界知道其前身曾有纳粹分子介入。1940年夏，希姆莱在纳粹党卫军中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宣布担任国际刑警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德意志帝国银行是应英国央行的要求成立的，行长还是个美国人，但是在战争期间，该银行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比较活跃的会员。但国际联盟毕竟是一个更大的议题，其中承载着更多意义深远的意识形态问题。当时，阿弗诺尔对形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向贝当提出试探性提议。到同年8月，阿弗诺尔疏远了各方势力，从国际联盟卸任。他是国际联盟历史上一个尴尬的人物。

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为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残余部门提供了救助。1920年威尔逊惨败后，美国不再坚守过去脱离世界、保持孤立的传统政策，对国际联盟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超过200名美国官员任职国际联盟，其中不乏高级长官以及杰出官员，除此之外，整个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为国际联盟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屡次尝试拉近与国际联盟的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1933年国际经济合作的失败对此形成强烈冲击。时间回到1919年，当时亚瑟·斯威策成为第一位在国际联盟秘书处任职的美国人，在他的努力下，国际联盟新闻办公室成立了，他自己后来成为联合国新闻办公室的首位负责人。“二战”开战前夜，斯威策正与罗斯福总统商讨拉近美国和国际联盟关系的事情，罗斯福还建议他最好致力于促进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而不是政治合作。斯威策希望在一些新的经济和金融组织中促成国际联盟技术部门和美国的合作。

斯威策1940年5月从欧洲返回美国。回国后他立即展开行动，竭力说服各方支持集结秘书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想法。他的好朋友雷蒙德·福斯迪克此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还是忠实的国际联盟支持者。他的表现如同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负责人一样优秀。该研究所已与国际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冯·诺依曼和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这样杰出的移民学者提供了栖身之地。但是，他们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阿弗诺尔，他不愿意拆分国际联盟各部门；另一个是罗斯福政府。在大选之年，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亲近国际

联盟，会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幸而，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1940年8月，12名国际联盟秘书处的主要成员携家眷来到新泽西工作，在那里安顿下来。其开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设在郊区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餐厅成了战争时期国际联盟在美国的活动中心。战争期间，除了蒙特利尔的国际劳工组织外，研究所是国际联盟唯一有效运转的机构。当时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秘书处多方受阻，这些移居到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关于战后国际要面临的挑战的探讨中，他们是主要的力量。

斯威策和福斯迪克认为集结国际联盟经济学家能够保证美国在战后立即加入国际联盟，因此他们竭力促成这件事。正如斯威策1940年6月给日内瓦国际联盟经济局局长的信中所说：“我坚信，如果这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救你于危难之中，那么它将永远是你可靠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人民同情心重，此刻提供援助会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永远不变。”斯威策和福斯迪克尤为认可国际联盟推崇技术这一特性，都认为这一点非常接近国际主义的核心理念—务实、全球、科学、人道，而这些理念将帮助罗斯福成功做到威尔逊做不到的事情。

美国加入国际联盟

英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英美合作关系是“二战”期间的合作典型，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美国不只要介入战争，还要参与促进战后和平的工作。它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为此制订详细计划。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鼓吹和平只是在浪费时间，不会有成效。然而，当他一心一意想使英国走出眼下的困境时，英国的外交部门已经放眼未来，同时还强调同美国际联盟手合作的重要性。

英国内阁关于战争目的的最初讨论进展缓慢，后来，杰出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推动了这场讨论。汤因比从不介意说出自己的宏伟理想。除了学者这个身份，他还在“一战”时期有关国际联盟思想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此之后，他就一直担任英国外交事务智囊团的负责人，领导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汤因比是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也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他提醒世人，“大陆同海洋形式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对抗将决定世界的未来。汤因比借鉴自由政治思想中过去的比喻，把在军事帝国主义和海洋联邦两者中做出的抉择定义为“民主的英美全球联邦”。但是，这条民主之路需要有人领导，需要一个指引“美英联邦的世界指挥部”……需要“世界霸权暂时落入说英语的人手中”。

汤因比站在全球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一方式明确有力地表达了英国政府最深切的忧虑。英国外交部断定欧洲和帝国都不能为英国提供保障其强国地位的各种资源，因此反复强调同美国合作的重要性。“世界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英美两国间的密切合作。”1940年一位外交官如是说。英国方面几乎没人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那时，唯一不确定的就是美国公众是不是也这样认为。英国新任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子爵称，在伦敦，这种说法很容易被接受，但是“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教条”。英国政府知道美国反对建立永久联盟关系，因此他们每走一步都十分谨慎。可一旦有事情发生，罗斯福政府自有理由同英国接触。苏联加入战争后，事态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唯恐丘吉尔会和斯大林达成秘密协定，从而使“一战”时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功亏一篑。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罗斯福于1941年8月拜访了丘吉尔，两位领导人在普拉森舍海湾举行了秘密会晤。

呈现在英国面前的是一堆基本规章的草案，这些草案构成了《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内容。尽管丘吉尔有所抱怨，但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即少了美国的支持，英国不可能在欧洲战场获胜：因为德意志国防军太厉害了。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世界的未来”就有保障了。事实上，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联合公告的序文上已经谈到了纳粹征服世界的贪欲“威胁着世界文明”。在这个微妙关头，美国尚未加入战争，罗斯福仍旧非常小心谨

慎，不肯轻易做出任何长期有效的和平时期的制度承诺。英国方面则希望有一份公告保证战后成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但是罗斯福对这个提议态度冷淡，他决定不重蹈威尔逊的覆辙，因此更倾向于搁置新的国际联盟的问题，直至美国和英国有了几年执掌世界的经验并彻底击败他们的敌人为止。在返回伦敦的途中，丘吉尔告诉他的内阁成员，《大西洋宪章》“明确暗示了战争结束后，美国会同我们一起维护世界秩序，直到世界变得更加秩序井然为止”。

因此，他们尚未就组织阵线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丘吉尔对国际联盟遭受的批判感到不满，他说“等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让国际联盟回归正轨的时候再商议吧”。他深知要达成这个目标，除非维持战争时期三巨头的合作关系，否则任何计划都是白费。在具有历史思维的人的眼中，这个思路并不意味着回归国际联盟模式—这是个没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的集体安全模式，而是遵循了由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于1815年创立的欧洲协调的外交原则：欧洲局势稳定要靠超级大国的有效管理。正如丘吉尔1944年1月同斯大林说的那样，“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落到了三个主要大国的肩上。如果它们失败了，也许会导致百年的混乱局面。他们唯有足够强大，方能肩负这一重任”。因此，他十分在意英苏关系，并于1942年春迅速同斯大林签署了互助协约。这份协约不只在战时有效，在战后20年同样会发挥作用。此外，丘吉尔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东欧被流放的政治家的不满，直截了当地同苏联讨论了在东欧的影响范围问题。

罗斯福本人也认为任何一个新的世界组织都要赞同由大国高度掌管世界这个想法。他取消了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希望由一个各大国组成的政治指挥中心代替全体大会行使职责。美国国务院遵循这些理念，开始起草组建国际组织的计划。在公开场合，罗斯福的策略是：避开一切有关组织的讨论，强调国际合作在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中可以获得的成就，他希望把美国人民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国际主义上来。在这个层面上，福斯迪克和斯威策的论点对罗斯福而言具有完整的政治意义。1940年，他公开表示欢迎国际联盟官员来到美国。1941年10月，他宣布将在最后一天出席由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会议，这是另一个救助难民的日内瓦组织。至此，他又向前走了一步。罗斯福在会上说，如果想让这个世界的种种伤疤得到永久修复，各国间的全力合作必不可少。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再是单独的水密隔舱，这一点在国际上比在国内更为明显。至此，以“新政”那类政策为基础的战后国际主义大致成形了。

就在几个星期后，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因此被卷入“二战”。英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则投入大量精力将英美两国的作战力量“混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即两国亲密合作，为维护战后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此外，罗斯福有充分的实际理由与他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不仅要和英国建立这种关系，还要和根据租借法案向美国借贷的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但是，随着军事合作的深化，罗斯福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让美国舆论对联盟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对其进行彻底重组，将其打造成一个更大的联合组织。

1941年12月，在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罗斯福偶然提起“联合国”这个说法，说这个说法听起来比当时的多国际联盟合会的名称更能鼓舞人心。他的助手黛西·斯塔克利（Daisy　Stuckley）回忆了当时罗斯福是如何向丘吉尔介绍这个想法的：

> 富兰克林·D·罗斯福回到他的床上，大脑还在不停运转……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名称—联合国！对，就是它了！转天早上，他一吃完早餐就坐上轮椅，穿过大厅，来到丘吉尔的房间。他敲门，没有回应。于是他打开房门进去，坐在椅子上。有人走出去关上了门—他喊着丘吉尔的名字，这家伙从浴室走了出来—一个“粉色的胖子”（罗斯福这样说）正用一条没有针脚的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罗斯福指着他，兴奋地说：“就叫联合国了！”“太棒了！”丘吉尔回应道。

因此，在联合国成为一个和平时期的组织之前，它曾是一个战时联盟，这个联盟就诞生在丘吉尔的房间里。1942年1月，26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些国家包括英美超级帝国、印度、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以及欧洲流亡政府和苏联等国，这就是战时联盟的结成。他们发表联合宣言，表明会一起奋斗直至和平到来，还会维护几个月前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条款。由此开始，“联合国”就成了战时反对轴心国和日本的联盟的代名词，常常被挂在同盟国政客的嘴边，并出现在他们的宣传中。联合国的说法逐渐在法律和外交领域推广开来。1943年，从意大利开始，战败国的投降书中一律将战胜国称作“联合国武装力量”。转年，罗马尼亚的停战协议中指出，罗马尼亚“已按照联合国的要求退出了战争”。1945年5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德国已向联合国投降”。

与此同时，美国首次表现出希望和平时期在更广阔的领域有所作为的意图。华盛顿全面着手策划一个新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接替国际联盟：1941年年初，生于俄国的列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被国务院委任负责组建高度机密的特别调研组的主要部门，这是实现美国目标的第一项工作。帕斯沃尔斯基是科德尔·赫尔的副手，是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主要人物。到1943年后期，他击败了各路对手，也粉碎了他们把整个世界分为极度地区化的亚区域的计划。同时，在坚持大国高度控制世界这一新原则的基础上，帕斯沃尔斯基还廓清了更加遵循国际联盟模式的单一理念。所有这一起都让美国遥遥领先于英国。英国的外交官们只在1944年年初才开始真正关注他们称之为“世界组织计划”的工作。1943年11月他们才得知美国的那些同行想要讨论“新国际联盟这个主题”，但直到那时，这些英国人还认为“让美国和苏联加入一个永久性组织比确定该组织的具体形式来得重要”。1944年夏，具有重大意义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举行的前夕，英国的策划人终于和美国国务院展开了深入对话。美国人提出了“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建议”，让英国人颇为震惊。其实他们不需要如此惊讶：美国国务院在过去两年中一直都在策划这件

事，而且在此之前，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样的智囊团组织中、在帕斯沃尔斯基的家中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中都展开了相关工作。但是，“一战”期间形势变化之剧烈着实令人震惊。

1914~1918年和1940~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讨论有很多重要区别，其中一项就是语域的变化。随着计划从伦敦转向华盛顿，习惯了以经典的牛津剑桥休息室风格思考古雅典智慧的一代人被喜欢讨论法律体系、农业经济或是经济周期的新生代政治决策人取代了。英国政府的员工多是历史学家和古典主义者，而不是具有美国思维的社会学家，因此，他们更关注的是发展与欧洲协调不同的外交政策。令人惊讶的是，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这位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历史家，在为国际组织制订战后计划时最为投入，其地位居然仅次于当时驻“满洲国”的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韦伯斯特欣赏美国人的勇敢，尤其是他们延续并扩展国际联盟技术部工作的做法。正如罗斯福在“四项自由”演说中预测的那样，新政为全球行动制订了具有潜力的计划，战争本身也让针对饥饿和贫穷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击败纳粹后，战胜国毫无疑问会遭遇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危机，官员和技术专家开始着手准备应对危机。一些英国外交官嘲笑美国“像传教士那样热情地在鼓吹新政派……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为管理局是国际社会组织的灵丹妙药”。

那些关注美国的人都明白这项计划的政治原理。如果罗斯福相信让美国人民支持和平时期的国际主义的最好方式是在战争结束前让人们看到它的人道主义潜能，那么，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中记录的那样，英国愿意遵从如下内容：

> 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战后援助计划的成功，美国的贡献都至关重要……但是，我想除了战后援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美国政府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战争结束前，美国越多介入一个国际机构的运作，美国舆论接受战后国际合作的可能就越大，但如果说这届政府正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尝试培育未来国际组织的种子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战后与美国合作十分重要。我承认，我们必须支持美国把联合国打造成有效机制的所有计划。

1943年，罗斯福政府宣布了战后国际经济计划，并对战时罪行做了宣判。同年，联合国首届大会在温泉城弗吉尼亚召开。会议商讨了粮食需求问题，由此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美国政府的做法，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着重做了如下推理：

> 美国总统希望首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召开。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应该更加关注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希望联

合国大会了解美国人民的想法。如果首次会议成功，就可为今后的会议铺路，从而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1943年年底前，联合国的另一个组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也成立了，由原先在纽约任职的民主党人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领导。转年，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此时，联合国的计划仍考虑长远，它重写了国际经济规则。1944年6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吸引了来自44个成员国（地区）的700多位代表。他们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为规范国际货币活动、阻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现谱写规则。曾经摧毁了国际联盟的经济国家主义受到重大国际合作工作的牵制。投机资本的流动受到资本监控的管制，他们降低关税、维持可兑换货币汇率不变，以此推动贸易。英美两国的财政团队并肩作战，他们的计划为两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也许这两个组织几十年后会在全球管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暂时的国际收支平衡把各成员国维系在一起，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为欧洲的战后重建工作提供资金。代表们还同意成立国际贸易组织。但是4年后，关于这项提议的讨论以失败告终，只留下了一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份协定成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参照物。所有这些都是干涉国际资本的具体表现，这远远超越了国际联盟的做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国际联盟及其稳定市场的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却达成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此同时，随着新机构的涌现，旧的组织淡出了历史舞台。国际清算银行在两次战争间歇促进了各国央行合作，这是国际联盟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要作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因战时与德国有所牵连而被取缔—这个决定只在1948年撤销过。东欧各少数民族或被驱逐出境，或遭遇种族灭绝，因此，秘书处中少数派的前景也不明朗。

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十分欢迎这些野心勃勃的想法。1943年11月，早些年国家联盟的创始人、古典主义者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在牛津大学的讲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现代国家的角色转变以及国际主义本质的变化。在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欧洲做过对比后，他说道：

> 看两眼最近的政府文件就知道现在和过去的差别有多大了：比如温泉会议关于全球农业和粮食供给组织的报告，在普林斯顿的国际联盟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关于战争到和平经济转变的批评性报告等等。如今的世界不同了，尽管现在已经到了组装“杀人机器”的最后一步，现代国家却更加了解如何打造有用的组织，如何在经济研究、社会服务、卫生保健以及对抗恐惧和欲望方面开展工作。我们要从事的事业要在危险中前行，要在规模上发展壮大，它与早期的工作不同，而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默里提议的这种计划周密、国家驱动式的国际合作是难以实现的。身为一名希腊学者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他最在意的一直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老练的他已经认识到当今世界不再受古希腊价值观操控了。世界不再需要国际联盟，战前坚信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想法以及草率地呼吁人道的做法已经过时。当今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崇尚科学、可以带来民主的国际协作组织。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火炬，莫里和他的女婿阿诺德·汤因比以及一些英国精英人士甘愿一路扶持美国。

1943年，首次有迹象表明“三巨头”在战后会重返永久的世界安全组织，罗斯福政府走在赢得国内民意支持的路上，调查表明人们强烈支持美国加入战后国际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是国际联盟还是其他形式。国际联盟已经落下了坏名声，并且无法逆转，为打响联合国的知名度，国际联盟协会（League of Nations Association）已经换了名字，公关工作已全面展开：打广告，找来好莱坞女星，创作歌曲为联合国做推广。那年秋天，有两项国会决议呼吁成立战后国际机制。这两项议案得到了大部分赞成票，最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

1943年年末，三巨头最终就成立一个永久的国际安全组织达成一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帝国坍塌后不久，莫斯科就召开了10月会议。会上，三巨头的代表们（中国也出席了会议）宣布他们已经认识到“十分有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全面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要遵循热爱和平的国家享有主权平等这一原则。该组织要不分大小，对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敞开大门。他的职责是保障世界和平，保卫各国安全”。这个组织现在还没有名字，文件选用了战时的旧称“联合国”，意指“强国间结成的联盟”，各国将在联合国里一起商议国际事务。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首次会面，宣布他们作为亲密的合作伙伴会和联合国这个集合了“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一起为世界创造“永久的和平”。

基于帕斯沃尔斯基在华盛顿的工作成果，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份针对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的可行性计划—一个需要全世界参与但不设固定总部的代表大会、一个由四巨头和6~7个按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执行理事会、一个由四巨头控制的执行机构。他们有权处理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的行为。国际联盟也曾允许大国管理世界，而现在大国被赋予了更多权力，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罗斯福还向斯大林介绍了他们可能要面对的新威胁。其中之一便是，如果小国卷入革命、内战或是同邻国发生大范围冲突，他们可以实施贸易禁令或者采取其他“限制”措施。其二，当大国发起进攻时，“四大警察”可以投放炸弹或进入交战国予以反击。罗斯福十分谨慎，他对“如果‘四巨头’是侵略者要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避而不谈。他愿意为避免赋予四大国否决权付出一切代价。他认为斯大林会坚持要求否决权，但他担心这会让新的国际组织无法有效开展工作。

丘吉尔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时而高涨，时而低落。而罗斯福则全身心投入其中，他谨慎小心，从不张扬。关于联合国事业的主要参与人和他

们的想法，我们对斯大林的了解最少。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严厉抨击过国际联盟，说它是穿着和平外衣的帝国主义组织。但是，他一直无暇顾及共产国际。1933年之后，斯大林让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成为事实。斯大林希望苏联能够自由干涉东欧事务，因此，不难预见他会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在战后与英美两国维持友好关系，并且越久越好。这样，苏联就有足够的时间走出被纳粹统治的阴影：只要在联合国的盟友可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并且不损害它的利益，斯大林就没有理由不支持联合国这个最新的英美国际主义的载体。到1943年年末，斯大林极度渴望于转年开启第二战场；他给出的暂缓共产国际的原因之一就是安抚其搭档。罗斯福称美国不会成为战后欧洲警察，要成立联合国执行委员会的计划也不是势在必行。这或许也给斯大林吃了一粒定心丸。

反对罗斯福及其四大警察思想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国人民。美国人民指责罗斯福，说他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还说他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妥协。有报道称，罗斯福政府想联合各大力量，重现19世纪“精密组织下的世界官僚机构”带来的“果实累累的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保守派一听到苏联是联盟成员就毛骨悚然。与此同时，威尔逊派视联合国为神圣同盟——一个不尊重小国权利的帝国主义组织——的再现。国内的反对声音让罗斯福感到沮丧，国会又要求在同德国和日本签署停战协议前不要成立新的组织。这样，罗斯福政府以“诺曼底登陆日”之名发表了简明的计划，该计划缺乏细节内容，重点否定了所有想要“依靠自身警力成为超级大国”的努力。

1944年夏，许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苏联在东线战场的全面胜利让人目瞪口呆，其规模和影响都让诺曼底海滩发生的事件相形见绌。苏联逼退纳粹国防军数百米之远，还将苏联红军带入波兰和巴尔干半岛地区边境。受形势所迫，艾登和丘吉尔相继前往莫斯科澄清事件对欧洲大陆影响范围的问题。这种做法与威尔逊派的普世说并不相符。德意志铜墙铁壁般的保护网还在拉紧，此时，一场重要会晤正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公园秘密进行。联合国安保组织已初具雏形，现在，英国、美国、苏联以及中国的代表正着手充实其结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4个主要问题。其一是除安全问题外，联合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其他事务。比如，当美国提议成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以促进“世界资源充分、高效利用”（一种全球范围的“新政”，也是罗斯福政府一直推行的）时，苏联代表提出反对，说国际联盟之前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的。“首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应该是让一个小规模并且精简的组织维持和平、保障安全。而其他的事情应交由联合国之外的组织处理。但是，美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联合国也涉足福利事业和社会政策这些始于国际联盟的事业，开始在更大范围管理世界。

他们的第二个关注点就是联合国能否随意支配武装力量。苏联主张成立国际空军，这样联合国就成了战时联盟的延续。英国认为这有点儿像世界政府。而美国十分清楚要战胜国会，就要提议各国签署协约，保证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提供武装力量。但是三个国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

表示联合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联合国的成员组成。苏联最初希望联合国的成员应该与1942年1月首份《联合国公告》的签署国保持一致，还主张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也应被接纳。另一方面，美国希望该组织尽可能全球化，即将各成员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降到最低。这样的计划让苏联处于劣势，苏联在联合国寡不敌众，自然得到的支持也更少：毕竟英国可以依赖它的众多领地，美国也有许多南美洲国家支持。如果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根廷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或准法西斯主义国家也得到联合国接纳，那么苏联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他们不仅希望削减联合国大会的规模，还坚持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应以独立国身份加入联合国，在某一阶段，这是一个会让协商完全脱离正轨的要求。双方的让步证明了联合国追求的是普遍性，它对成员国的唯一要求就是“热爱和平”。联合国接纳了少数顺从苏联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由斯大林最初要求的16个减少至2个。

所有这些都遭受着一个重大问题的考验，这个问题几乎摧毁了尚未步入正轨的新组织，这就是新安全理事会中的投票权问题。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中，所有成员国都有投票权。但是美国担心照搬这种体系会让联合国变得和之前的组织一样无所作为，也会影响联合国的工作效果。此外，全面废除投票权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认可的，当然苏联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斯大林担心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在东欧的影响扩张，英美两国会重新审视联盟。1944年10月7日，敦巴顿橡树公园会议结束，投票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这给联合国事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炸弹一旦引爆，危及的将是联合国的核心事业。

当然，大国之间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合作。敦巴顿橡树公园会议结束两天后，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面。在双方外交部部长（外交大臣）的陪同下，这两位领导人通过洽谈达成臭名昭著的《英苏百分比协定》（Percentage Agreement）。这份协定授权英国执掌希腊，苏联也可以称霸其余大部分东欧国家。无论这份协定意在维护长久的友好关系，还是只是希望避免眼前的误会，它具有的神秘性都有些像19世纪的外交模式。这与人们希望联合国所代表的形象不一样。与1945年2月在雅塔尔发表的声明保持一致十分困难—那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声明许诺已经解放了的欧洲人可以自主选择他们的政府。在那次会面中，比这份声明更有意义的是三巨头终于做出让步，就否决权问题达成了一致：实施制裁和动用武力将会受到限制，但是他们的谈话并未涉及大部分安理会成员国关注的问题。一旦斯大林接受了这个提议，就可以继续筹备国际会议，成立新的世界组织。各国一致同意于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会议。

敦巴顿橡树公园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规模营销攻势下，美国国会官员勉强向美国民众公布了议案，强调了他们作为国家安全保卫者的价值。他们鼓吹美国因孤立主义而失败，并且随着德国火箭弹技术不断发展，海洋已经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了。他们在讲话中鲜少提及小国的权益，更多的是如何维护美国的主权。“我们反对所有建立超级大国的想法，”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在1945

年的元旦讲话中说，“这种想法没有，也不会进入我们的议程。”官员们鼓励务实的现实主义—即使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个新的国际组织也至关重要。

这些都旨在转变孤立主义批评者的态度，并且似乎奏效了。据成立于1935年的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统计，1945年4月，81%的美国人赞成加入“一个有武装力量的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尽管这其中很多人相信在今后几十年内美国自己也会卷入战争。但是，资深国际主义者对此态度不一。美国的主流组织支持这种说法—这是美国的“第二次机会”，并且今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但是私下里他们也感到担忧。对维护人权或是去殖民化抑或是加强法治的承诺何时兑现呢？有人答道：“敦巴顿骗局？”很多人好奇小国权益问题进展如何。英国《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认为这种提议是为了将新形式的“神圣同盟”合理化。而且不止《新政治家》有这种想法，英国历史学家、外交家查尔斯·韦伯斯特在他的日记中也曾写道，他们创造了一个“根植于世界组织的大国际联盟”。

罗斯福本人认为旧金山会议开得正是时候，能够及时浇灭英苏两国高涨的战争热情。他希望在战争热情高涨到足以联合各国时采取行动。因此，如果有可能，他们急需在德国被击败前见面。另一方面，这次会议真正的贡献也许是它提供了一次讨论的机会：会议召开前三天，有报道称这次会议有可能剥夺“三巨头的部分权力。至少在表面上能给小国话语权，让它们有存在感”。这个说法忠实地传达了总统的思想。罗斯福知道，在和平年代，这个有些自夸的“国际民主组织”不能靠发号施令管理世界，而是要成为领头人，让自身具有说服力才行。因此，他并不准备召开和平会议，而是在筹备一个类似在独立战争之后巩固了美国统一的制宪会议的行动。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小国的权利，而是美国国会的态度。因为如果这些小国想要一个国际组织，那么它们最终只能接受大国的决定，别无选择。起初罗斯福为避免威尔逊在1919~1920年犯下的错误，一直坚持着战争时期应对国际问题时采用的两党联立的政策。他还确保去旧金山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要包括众议院中两党的领军人物。

罗斯福去世的消息给旧金山会议的开幕式蒙上了阴影，但是正因为这样，代表们才更渴望会议成功。此次会议在形式与思想上都避开了国际联盟，权威人士称赞这个新的国际组织是“国际主义者的第二次机会”。美国政府尤其推崇这一理想化的观点，美国非政府组织也为其做宣传。这种理想主义也反映出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是满怀希望的。然而，罗斯福的逝去确实是全世界的一大损失。如果联合国只有一位创始人，那肯定非这个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魔术师”的人莫属，他才华横溢，可以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况。然而，就算罗斯福还在世，要在1945年把三巨头聚在一起也是一项大工程，这比1815年维持“反拿破仑一世联盟”还困难。然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是拆散三巨头的唯一原因，人们突然认识到原子弹的威力，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发现斯大林确实希望在战后控制东欧各国，而罗斯福一直希望淡化此事。哈里·杜鲁门上任初期希望树立他作为总统的权威，因此对苏联态度强硬，而他的顾问早些时候

也提醒过苏联政府，要其注意东欧的差异会危害“世界合作的整体结构以及它们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

而对那些小国而言，它们主要的疑虑不是那些超级大国会解体。相反，它们倒是很害怕联合国会重蹈历史覆辙，还担心大国以国际主义之名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技术力量强大，因此比神圣同盟更加可怕。因此，在旧金山，它们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联合国大会的权利、人权、殖民地人民的困境以及否决权等问题上，详细地讨论了要取消哪个“程序事项”（雅尔塔会议的说法）。大会还派了一位特使前往苏联消除分歧、挽救联合国。人们对联合国的疑虑从未打消，认为它不但没有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取得发展，反而重拾了19世纪糟糕的处事方法。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批评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本质上不具代表性，也不民主。尽管批评如潮，那些超级大国还是坚持将小国排除在外，英国代表杰布的回忆录中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们对小国的蔑视。他们相信无论那些小国如何抱怨，最终还是会同意大国的决策，因为它们需要一个组织代替国际联盟。那些小国最终也的确会委曲求全地同意大国决策。6月，杜鲁门总统主持了会议闭幕式。一个月后，美国国会以89：2的票数通过了《联合国条约》。凡尔赛会议后令人羞耻的情况不会重现。现在美国加入了这个新的国际组织，英国和苏联也签了字，这样联合国就比它的前身多了一个优势—享有世界强国的支持。

人们精心准备着罗斯福的葬礼。1946年4月，旧金山会议之后一年，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大会。1920年，塞西尔（Cecil）勋爵主持了第一届国际联盟集体大会—称赞国际联盟使组建新的国际组织成为可能。“国际联盟陨灭了，而联合国会长存。”他总结道。至此，移交工作平稳地完成了。曾备受阿弗诺尔关注的宏伟的万国宫现在成了联合国在欧洲的办事处。国际联盟的机构—卫生组织、营养委员会以及知识合作委员会在联合国更加丰厚的资助下，发展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联盟剩余的资产由联合国接管，其中也包括国际联盟的人力资源—原先任职于国际联盟的官员告别了普林斯顿，在这个新兴组织中出任要职。亚瑟·斯威策推动了国际联盟向联合国的过渡。当有人要他对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做一比较时，他说那感觉就像是让正在度蜜月的男人谈他的前妻一样。

但实际上，这位“第二任妻子”和“前妻”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失败的阴影仍笼罩着国际联盟，因此联合国深知对外要与国际联盟划清界限。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联合国仍以由国际联盟开创的三权分立机制为基础，即立法、执行以及理事会三个部门互不干涉。此外，联合国在很多地方只是单纯继续着国际联盟的工作。近代的一位评论员眼光敏锐，如他所说，很少有国际组织会灭亡：它们只会变得默默无闻，又或者如果它们足够幸运，可以随着时代逐渐发展。幸亏在战争期间，帕斯沃尔斯基和他的同事已经开始着手国际联盟的改造工作，才让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改造足以保障其继承组织长久发展。由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所有熟悉19世纪外交的政治家都不会真心想把法国驱逐出去）控制的安理会专门负责世界和平

和安全。联合国代表大会的首要职责是为各国提供一个讨论国际事务的机会，但是有些时候它也会发挥核心作用，这多亏了多年前两个超级大国因冷战而僵持不下。但是1945年时却没人相信联合国代表大会能担此重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是美国新政国际主义的主要成就，是以专家为主导的国际合作的发动机，比国际联盟关注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实，早在1939年，国际联盟的报告就曾推荐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但当时受战争的影响，这项事业一直无法开展。更为消极的是，一项针对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的继承机构联合国国际法庭的新的条例草案出台了，这份草案和海牙会议时的相关草案十分相似：时间会证明，这份草案能发挥的作用少之又少。宪章的序文给了世人一份迟来的承诺：“对人类基本权利、人性尊严和价值的信仰，对男女及大小国平等的坚持。”实际上，强加给成员国的这些义务—例如国际联盟少数民族特权的条约—都被彻底废弃了。

总之，联合国旨在维持战时大国的合作关系。为了避免国际联盟失败的命运，联合国愿付出一切，其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体现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机构才储备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令人震惊的是，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愿意服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非成员国也是这样：宪章的第二条规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非成员国必须服从联合国的规章。”

实际上，三巨头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将新政的科学技术民主以及19世纪欧洲联盟体系的灵活性及强权政治统治融为一体。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罗斯福保留了国际联盟的模式，但是他们通过联合国把世界带回了那个伍德罗·威尔逊反对的时代。三巨头的联盟关系一直延续至战后，至此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联合国发展成为一股令人敬畏的国际治安力量，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曾多次期待这一刻的到来。但是，直到1945年春，人们对联合国依旧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怀疑。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计划夭折，各国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这便意味着联合国宪章中提及的小范围内的集体安全都无法实现。对于斯威策这样的国际联盟元老来说，这些都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关于联合国和国际联盟两者间区别的无休止的争论也是次要的。国际联盟重获新生，可以有尊严地退出历史舞台了。美国为联合国事业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1920年，美国曾经违背过国际主义原则，而今这个重返国际舞台的国家却完全支持这些原则的新组织者—联合国。

第八章 冷战实录（1945~1949年）

同时尚界一样，学术界也是有潮流的。当时，学术界的时尚潮流就是假借作家之手用尽一切讽刺和隐蔽的谩骂手法抨击美国外交史上的“威尔逊主义”……而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只是美国改正了从前一系列的错误观念，开始求实地研究世界的真实本质。

—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

《国家利益研究》（In Search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1952年）

美国上下一致认为国际联盟的相似体联合国就是艾伦·韦尔什·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所说的“和平工厂”。

—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

《正确看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in Perspective，1956年）

无须查阅联合国的参考文献，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找到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部史实记载。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界基本都是描写战时合作破裂和鹰派泰斗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与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等伟人崛世而起的文章。尤其是负责历史编纂工作的凯南，他的作品中满是对复杂国际关系的探讨，他的“围堵”政策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青睐和重用。对于史学家而言，凯南是极具魅力的伟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确是个完美的文体学家，也是一个思维缜密的历史学家，他提议的政策也很有价值。不过，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需要更多地围绕如何利用联合国一事进行思考，而如今的人们很难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凯南也曾承认他忽视了这一点。确实，到1946年年中，决策者一方的战时国际主义已经日渐衰落。还在官僚政治的混乱中探索前进之路的联合国却因为欧洲爆发的冷战受到了排斥。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在美国开始关注并参与进欧洲的政事后就结束了。从1949年起，随着主战场转向亚洲，美国开始实施全球战略，国际机构因此成了美方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尤其在杜鲁门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美国外交新战略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模棱两可的新政策把国际机构视为美方建立全球势力的重要武器。新政策并没有寄希望于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也没有像前几任总统那样取信于国际主义学者。新政策大改过去美国的和平时期之风，融合了理想和欲望，高举自由的旗帜，加强技术革新，在十几个地区设立海军基地。更令世人惊讶的是，这种革新正是利用国际机构组织完成的。简而言之，冷战时期的世界并没有脱离国际主义的发展轨道，相反，冷战时期重新定义了国际主义，制定

了其权限和目标，也重新建立了国际主义同美国强权的关系。

与联合国同在

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单靠某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是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世界大国之间实行了出色的协作策略。美国人民和政府受到这次胜利战争的启发，转变了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人们认识到，在现今的世界，单方面的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这就好比1918年斯帕德战斗机与1945年的B-29轰炸机或是与1970年的喷气式飞机相比一样，已经过时了。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均认识到，人类并不能划定绝对的地域以确保国家利益是安全的。简单说就是，人类已经意识到，和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概念，不仅要恢复和平，更要捍卫和平，这首先需要世界强国的团结协作。

1945年6月，美国国务卿将这份评估报告上交给杜鲁门总统，此时旧金山会议刚刚结束，而建立新的联合国组织已势在必行：只要在10月有足够数量的国家被批准加入联合国，就可以完成正式的组建工作了。不过，新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地位尚不能完全确立，三个超级大国也没有完全认识到新组织的重要意义。在幕后，美国的各级公务人员和军事谋士纷纷帮忙一起策划新联合国的组织机构—陆军部负责规划成型期的国际武装力量，公共卫生专家则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诞生做足铺垫。英国和苏联方面则没有像美国一样为联合国付出很多，因此，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联合国之父”。然而，还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由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彻底改变，美国势必对全球所有潜在威胁给出防御对策，那么，一旦三个超级大国谈判破裂，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由此衍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成立联合国组织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美国民众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有所认知，想让他们慢慢接受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在全球扮演的世界和平保卫者的角色，那么联合国到底对维护这一形象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过去那些年里，美国一直排斥国家之间的永久结盟。现在它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还是会继续过去不结盟的疏离态度呢？

美国方面赞同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因为此前英国接受了联合国创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1946年1月，在伦敦尤为阴郁的深冬季节，联合国各国代表齐聚威斯敏斯特破败而不失宏伟的中央大厅。需要商讨的关键事项有两个：一是任命联合国秘书长，二是决定新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国际联盟的第一位秘书长是苏格兰人埃里克·德拉蒙德，随后是来自法国的阿弗诺尔。（第三任秘书长肖恩·莱斯特主要负责国际联盟的战时运营，并主持了国际联盟的解散清算工作。）在联合国的秘书长选举中，各大强国最终接受特里格夫·赖伊作为首任秘书长的安排，这是因为这届秘书长的任期并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在选举过程中，一国举荐的人

选必会遭到另外两国拆台，如此反复，美国和苏联做出了让步，同意这位脾气暴躁、喜爱夜生活的挪威前任外交部大臣、工党成员出任秘书长一职。作为职业政客，赖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但作为一名官僚就并非如此了。赖伊并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他自认为能出任秘书长一职是由于美国支持他主持大会，美国是在几经考虑后选择了他作为秘书长。更糟的是，他刚上任就发现，五大国已经达成协议，每国都会派出一个助理秘书长协助他工作。很明显，像德拉蒙德一样进行行政管理自治对赖伊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英国外交部官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曾是“二战”时“世界组织”在英国分部的部长。之前，赖伊甚至还想过把杰布调离他在威斯敏斯特用沙袋搭建的办公地，让他加入秘书处的最高权力核心。联合国大会一结束，赖伊就和新同事一同前往纽约，入住华尔道夫酒店。联合国要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具发展前景，其规模设置是过去国际联盟秘书处的4倍。但这并不全然是件好事：由于人员众多，人浮于事，那些能力不凡的元老级官员因为受到能力欠缺的新成员的影响，没能发挥出更大作用，而赖伊一直刻意回避向前国际联盟专家咨询意见。战前的国际联盟机构仍饱受诟病，尤其在苏联1939年因侵略芬兰被开除出组织后，国际联盟就遭到苏联的百般责难。赖伊担心质疑声久久不散会对联合国产生不利影响。

赖伊妥善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总部的难题，此乃一大功绩。欧洲人希望让国际联盟的继任组织仍设置在欧洲：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失去处理国际事务的中心地位这一事实。会晤在柏宁酒店举行，众人在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的房间内探讨时，法国代表警告说：“如果新世界成了世界中心，那欧洲就彻底完了。”其实，此时站在另一方的大多数非欧洲势力都认为，欧洲已经丧失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由于希望联合国与欧洲撇清关系，苏联尤其赞成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瑞士方面则搬出很多预先准备好的理由作为借口，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实际上相当于宣布了联合国总部设在瑞士是不可能的。最终，美国决定接受瑞士的意见，而美国参议院也表示赞同。面对这一结果，英国政府官员查尔斯·韦伯斯特只能宽慰自己说，美国这下没理由说是别人强迫他们接手联合国了：他们必须对联合国的成功与否全权负责。

1945年年末，预备委员会宣布他们的建议是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于是很多美国城市纷纷表达了希望作为总部选址的意愿，其中包括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夏威夷等地；美国国内有6个以上的大城市还为此举行了游说活动。赖伊本人希望总部能设在纽约。但是，由于最初的计划是打造一个全新的国际大都市—根据老一代国际主义者心中布鲁塞尔和海牙未来的样子规划的，因此美国东海岸的三座偏远城镇进入了候选名单，这便引起了格林尼治、康涅狄格州、韦斯切斯特以及纽约等地富豪的不满，他们为此举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抗议活动。1946年年底，联合国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渐入正轨，此时，洛克菲勒家族又一次伸出了援手，联合国大会决议接受洛克菲勒赠予的72 846平方米土地，这块地位于美国东河的海龟湾，曾是曼哈顿市郊的一个屠宰

场。

直到1952年，联合国熠熠生辉的现代化总部才最终落成。在此之前，维护国际和平的许多重要事宜的讨论都是在一些临时场地进行的，其中包括位于布朗克斯区的亨特大学所属的一间改建的体育馆，皇后区法拉盛草地公园上为1939年万国博览会而建的室内溜冰场等等。而秘书处则坐落在长岛成功湖附近的斯佩里陀螺仪公司宽敞的车间内。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在巴黎的夏乐宫召开。8年前，希特勒首次到访巴黎并作短暂停留，法国政府正是在夏乐宫内迎接了他。在这个意义非凡的宫殿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经大会投票正式通过。然而，此类临时的应急手段并没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性。很明显，赖伊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组织领导人。于是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临时授命前往联合国释疑解难，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几个月，其间受到官僚政治的层层挤压，赖伊自己不情愿重组问题频发的秘书处这件事也被嫁祸到他身上，最终，杰克逊只得迫不得已离开了联合国。1947年年初，秘书处内部开始明显表现出对工作条件的极度不满，而当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开始调查美国雇员的政治观点时，秘书处人员则更加人心惶惶。单单考虑到这层原因，就很容易理解杜鲁门政府为何不放心将本国最要紧的外交政策事项交给联合国处理了，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预算甚至少于一个纽约消防部门的预算，让这样的机构处理这些事着实让人不放心。实际上，联合国成立初期经办的外交事务是非常可观的。

新任的秘书长直到最后一刻才选出来，但他与国际联盟的前任秘书长相比的确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联合国宪章》规定他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将事务递交给安理会处理。在国际联盟的委员会议上，德拉蒙德和阿弗诺尔基本保持沉默：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制定议程而是保证议程顺利进行。在联合国大会上，赖伊则既要制定议程，也要保证议程的顺利通过，第一年时，他确实充分抓住了这一机遇。伊朗大使曾前来找他，与他谈论苏联军队仍滞留在伊朗国内一事，经过几番考虑，他决定将此事提交给安理会处理。有趣的是，这件事不仅使苏联代表极为难堪，时任安理会代表、美国的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及其继任者、杜鲁门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都认为赖伊逾越了自己的权限。赖伊极力为自己辩解，终于让别人认识到他并没越权。谈到巴勒斯坦地区时，他也表现得极为活跃。联合国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计划遭到了巴方的拒绝，这件事也令人大跌眼镜，为此，赖伊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成立一支联合国军事部队。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禁止商议成立效忠于联合国的军事部队，所以赖伊向大会提议由他用自己的预算招募一个小型规模的军事部队。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件事也让美方和苏联方面的决策者认识到赖伊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危险人物。赖伊还曾对柏林危机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抨击。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在关于哪个党该成为联合国代表一事上，他也喋喋不休。赖伊虽然很勇敢，但同时又很自负，处事太过情绪化，疑心又很重，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后来赖伊才意识到，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只是横跨于超级大国之间分歧鸿沟之上的桥梁，他之前完全误解了自己的重要作用。他的冲动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冷战不仅明显抑制了已陷入僵局的安理会，而且还搁置了整个联合国的工作，一系列问题因两大超级帝国间的对抗屡遭搁浅。赖伊提交了一项20年计划来解决两国对峙的问题，尽管并不受欢迎，但他为了宣传自己的计划还是带着“和平使命”的初衷开始了伦敦、莫斯科、巴黎和华盛顿的游说旅程，然而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哪个会相信他的说辞。1949年，因为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斯大林很不明智地退出了安理会，这让美方有了可乘之机，美国成功地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开始设法干预朝鲜战争。赖伊出访苏联寻求援助时，苏联方面把他当作美国的傀儡公然忽视他，称他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走狗，还协助他们搞垮了联合国”。

远离“杂技团”

苏联人说得当然不对：美国已经为联合国投入了太多，又怎么会毁掉它呢？美国不仅极力推动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还为它配备了高水准的官员，由此可以让联合国秘书处和美国国务院进行更有效的交流。但是苏联人也认识到美国已经偏离了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政策，确定了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面对抗策略，关于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倒是没错。早在1945年4月，亨利·杜鲁门从罗斯福手里接过政权时，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化。杜鲁门本人大体上是希望推动联合国的发展的，但那几年正值美国不满于同苏联合作政策变化的一派掌控了当局的外交政策，致使联合国本身成了满足美国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副手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就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工作过，他在1945年时还曾极力说服参议院接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可到了1946年，他也开始认为联合国就是一个“杂技团”，随后又把联合国视为“‘小白鼠’帕斯沃尔斯基”创建的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现实主义产物。乔治·凯南对此没有什么更高明的看法，但他在1948年时曾写下自己对此事的独到看法：

> 我们发现自己仍然遭受着那场大战中衍生出的浪漫主义和普世思想的毒害。在美国民众看来，联合国的最初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也许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在这个后战争时期，除了把联合国作为政策实施的奠基石外，我们别无选择。有时，联合国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个组织制造的麻烦要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

这些人本身就不赞同美国太过偏离过去较为保守的政策轨迹，美国过去的形象本来就是超级大国俘获的战利品。但是，不论是像凯南一样担心过度扩张，还是像艾奇逊一样认为美国必须接替英国担当起世界霸主，他们都在避开联合国，并希望能以19世纪欧洲的规则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而不再借鉴伍德罗·威尔逊的理念，从这一点看，这些人倒是同心同德的。

实际上，在美国当局，像凯南一样反对过度扩张的人只占少数。大多数高级政策制定者烦恼的真正问题是全球势力是应该多边发展还是单边称霸。战争时期，罗斯福任命的左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更倾向于世界大同的传统思想，支持同苏联合作。但是，随着冷战的持续升温，裁军对战后美国来说意味着国家安全危险系数持续升高，于是杜鲁门的几个亲信顾问开始进言，称美国已经给予联合国太多的支持，现在理应让美国民众了解即将面临的残酷斗争。这并不意味着要解散联合国，但联合国确实因此成了摆设。

早在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做演讲，在和杜鲁门总统比肩坐于主席台之上时，他就已经有所警觉，此时距离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刚刚过去一个月。人们已经记不清丘吉尔演讲中对联合国的相关评价，但他前瞻性的警告却被人们铭记于心：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尤其提倡及时组建一支联合国军事部队，并坚持认为建设比国际联盟更为成功的新国际组织是极为必要的。但是这一建议听上去更像是对大国结盟的真诚呼吁，希望美国和英国尽可能缔结更为亲密的伙伴关系，共同对抗苏联。大西洋主义的建立是扬·史末资理念的高度再现，他在30年前就曾倡导英美结盟，共同管理国际事务，拯救世界文明。只不过那时的敌人是日耳曼军国主义势力，而现在则是布尔什维克势力，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两次结盟并没有什么区别。与史末资一样，丘吉尔明确表示，结盟政策并没有违背宪章内容，实际上这一政策正好符合联合国的宗旨。

在富尔顿演讲前，丘吉尔同杜鲁门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他们商讨了英美军事合作的重要意义，至少在联合国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之前，这是十分必要的。总之，英国领导人只是为了确认杜鲁门本人对斯大林的看法。两个月前，杜鲁门总统曾在私下询问了他最可靠的咨询顾问，表达了他对苏联一方的担忧，一个月后，华盛顿方即收到了乔治·凯南的著名的“长电报”，随后美国便在莫斯科成立了驻苏联大使馆。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种种行为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这使他获得了重返美国政坛的机会，并最终在国务院内部带头成立了一个新智囊团—“政策规划人员”。尽管智囊团中包括的联合国专家不止一位，但是冗长繁杂的电文还是反映出了凯南的内心困惑。除了凯南以外，还有很多极具势力和影响力的大人物也支持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这其中包括杜鲁门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战争部秘书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和前驻莫斯科大使奇普·波伦（Chip Bohlen）。经过1946年夏季和秋季的酝酿，新战略终于初现端倪，这项战略集中体现了国会中多数共和党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

同年9月，一份颇厚的备忘录重重拍在了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此前，杜鲁门曾要求他的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针对苏联的特点做出全面分析，并要求他给出美国应如何应对的相关意见。克利福德的报告[实际是由他的助理乔治·埃尔西（George Elsey）撰写的]中写道，凯南绝不只是因为联合国体制下三大国理念已经瓦解而鼓吹冷战，报告中描述说，苏联希望倚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世界霸主”，这与美国的价值观极为不符。报告更为详尽地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党派想要称霸世界的势头，并详细列出了苏联违背国际公约的各种行为。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两大超级帝国间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这意味着美国不能把事关国家未来的赌注全都押在联合国上，因为这太过危险，也极不可靠。美国必须制定自己的政策掌控国家的未来之路，所以全球化战略是大势所趋。

与此同时，苏联新任的驻美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他对美国政策的分析电报。报告中同样写道，美国自罗斯福去世后，政策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美国当局正在

杜鲁门的领导下寻求踏上“世界霸主”的道路，意欲把掌控欧洲作为它“称霸世界的第一步”，同时妄图打击苏联日益强大的发展势头，瓦解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诺维科夫提出，美国在军事领域投入了大量经费，并计划在世界各地新建百余个军事基地。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正是美国新出台的“称霸全球”的战略思想。诺维科夫警告道，在关于是否取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国进行了政府对话，在未来的几年里，对话还会继续进行。这些都是美国人处心积虑的阴谋，他们想让“英国成为联合国名义上的领导人，而实际则是想让自己在联合国称王称霸”。 诺维科夫1946年年初的这封电报很明显是对凯南长电报的蓄意回击，现在回想起来，这封电报也不失为一篇中肯且有说服力的时事分析。然而，尽管如此，苏联仍在以传统强权政治模式思考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南本人已经误入歧途，随后也开始固守传统理念）。与此同时，在东欧建立好安全缓冲区后，美国改进了他们的战略理念，一心想要铲除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分子”，这一想法前所未有，更毫无实现的可能。苏联还是19世纪老牌帝国的作风，斯大林基本没把联合国放在心上，也并不认为联合国会发挥什么重要的外交作用，而杜鲁门的做法与其截然相反。问题就在于，联合国是否真能帮助美国一举消灭全世界的共产主义。

1946年10月，杜鲁门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第二次联合国大会，这是大会第一次在美国境内举办，美国向联合国承诺给予大力的安保支持。然而此时，在杜鲁门的白宫中，依赖联合国的可行性以及军事战术的准确性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丘吉尔就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委任这样一个新建的组织来处理核能这样的重要问题简直是胡闹。美国却力图使这一问题国际化，为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制订了“巴鲁克计划”，这种做法迫使苏联对使用核武器完全非法的议案投了反对票，不出所料，该议程最终陷入僵局。关于在宪章中添加允许建立联合国军事部队的对话也不出所料地受阻了，本已确定委任的军队领导人也只能转而寻求其他工作。到1946年年底，在裁军和执法两大敏感问题上，人们已经对世界安全组织有了最初的概念，认识到成立安全组织的重要意义。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由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主要在欧洲发挥作用，美国决定取消这个机构。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决战后人道主义危机而成立，在民主人士赫伯特·雷曼的运营下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多方救援机构，雷曼的副手罗伯特·杰克逊也功不可没。1946年夏，救济总署在欧洲和亚洲地区雇用了12 000多人，救援支出的费用高达几亿美元。但是，因为受到议会的种种指责，雷曼在这项工作结束后就被迫下台了。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当局却想到，如果能够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名向共和党当权的国会申请对外援助拨款，通过的可能性会很大。问题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服务同时也提供给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内。而救济总署在欧洲南部、东部以及亚洲的中国最能发挥作用。这正是西欧国家发达经济体结构的问题所在，杜鲁门政府为此疲惫不堪，凯南、艾奇逊也忧心忡忡。帮助这些国家就意味着一个组织不能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涉及的地域更广。1947年5月，在讨论欧洲的经济复苏计划时，美国国务卿助

理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向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防止另一个善后救济总署的出现。美国这一次要做好掌控全局的准备”。

实际上，克莱顿当时刚刚参加完新成立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欧洲的经济复苏计划，有些人认为美国对西欧的援助也应该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克莱顿尖锐地批评了这些人的观点。但是很快，美国当局也意识到战后欧洲确实需要制订大规模的重建计划。1946年冬天，美国国会决定为欧洲拨出几亿美元的“后善后救济总署”救助款。当时正值冬季临近，希腊却传来了坏消息，英国在希腊扶植的右翼政府不得人心，而且因为经济拮据，英国军队不得不在几周内撤离希腊。

美国此前从未在和平时期关注过希腊的国家安全，而英国撤走驻希腊军队的贸然决定成了杜鲁门政府开启新道路的催化剂。此时，美国国务院已经在解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事上深感力不从心。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早就提出警告说，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欧洲重建问题的严峻形势。因此，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上申请增加对希腊的援助款项，而就在前不久，国会刚刚批准了几乎相同数额款项的希腊救助款。（对土耳其的援助只是为了粉饰美国对希腊过度关注的事实。）只可惜真正常规性的援助请求都被美化成以正压邪的启示录式条款，这显得希腊请求美国干预仿佛是为了在即将爆发的希腊内战中阻止共产主义分子的胜利。

虽然历史学家通常把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作为冷战开始的标志，但美国的舆论反应却令政府颇为担忧。那些政府官员之所以在最后时刻在计划文书中刻意使用一些稍显温和的字眼，就是因为他们肯定早就预感到美国民众会关心这个计划能否得到联合国的批准。但是尽管如此，杜鲁门总统仍然饱受公众的质疑：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大一部分美国民众认为杜鲁门不应该绕过联合国独立处理国际事务。杜鲁门是自门罗以后首位以其名字命名“主义”的美国总统，然而，杜鲁门主义却并没有为他赢得声誉。门罗主义的目标只是限定在有限的地理区域，相比之下，杜鲁门主义则以保护人权自由为名妄图获得毫无限制的霸权，这正是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所以，杜鲁门主义受到了广泛的谴责。一些记者将这一主义称作“适用于全世界的门罗主义”，而这个“新门罗主义”与旧的门罗主义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时评家沃尔特·李普曼严词谴责了杜鲁门主义，称其没有认识到美国真正的战略目标：在美国本该考虑如何加强同西欧的合作伙伴关系时，杜鲁门主义却开启了对苏联周边国家的牵制政策。

李普曼认为，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布实施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政府回归正确外交轨道的体现。他认为应该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美国也应该邀请欧洲各国共同商议救济款的使用事宜。和其他的几位时评家一样，李普曼预想马歇尔计划的影响定会延伸至整个欧洲大陆：他认为，欧洲大陆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必然能让马歇尔计划

发挥出巨大影响。而这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专家草拟的复兴计划如出一辙。不过，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目的全非如此，所幸，斯大林早已洞悉到了这一切并坚信马歇尔计划并不能让美国得偿所愿。斯大林已经警醒地看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想让欧洲的资本主义一派取得胜利，为此，斯大林强迫捷克退出马歇尔的援助计划，并对葡萄牙施压。1947年秋，苏联迅速予以反击，通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制止了东欧国家的结党统一。布尔什维克政党一方开始有针对性地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此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个委员会希望连同东欧与西欧的梦想也被相关国家遗忘了。同时，马歇尔计划的作用却顺利实现了马歇尔和凯南的预期，成功地发挥了复兴西欧的作用，巩固了西欧和美国在经济及安全上的伙伴关系。

曾是19世纪国际思想发源地的欧洲就这样成了冷战第一阶段的主战场，欧洲因此退出了联合国内部的争夺战。这也是联合国和国际联盟最初的本质区别之一，后者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凡尔赛和约》的同盟规定。相反，欧洲倒成了冷战早期两个超级大国成立新国际组织的试验基地。首先，从马歇尔的将军的讲话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国会支持欧洲复兴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就此成立，为随后的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西欧各国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和中央银行的合作。随后，发生了美国外交史上甚为戏剧化的一幕—在和平时代，美国同西欧各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

建立这一军事同盟关系的模板就是1947年签订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这一条约中包含了对联合国问题的讨论以及签署国家间避免战争的必要性等内容，实际上该条约签订的实质就是各国军事联盟的缔结，共同抵御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入侵。美洲国家所指的共御外敌无非就是针对苏联的，而实际上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这种入侵威胁的存在却为巩固反共产主义的忠诚同盟提供了基础保障。两年后，华盛顿方面在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取得了历史性进展。1949年6月，参议院以压倒性投票通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案，《北大西洋公约》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巨大突破，因为这标志着美国首次在和平时期同欧洲强国结成军事联盟。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为82：13，这说明美国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美洲各国签订的条约规定，缔约各国必须依法遵守《联合国宪章》，并承诺行驶其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但是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失去了重要意义。他们不厌其烦地坚持说，美洲国家间的同盟并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结盟。而事实上，这种同盟和过去的军事同盟没有任何区别。与民主党人士相比，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很少在联合国上花时间。他继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缔结了更多的区域性联盟。随着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逐渐扩大，部分国家很害怕卷入冷战受其牵连。因此，国际上不经意间兴起了不结盟运动，形成了鼓励发展中间势力的新一派势力。

世界联邦主义

杜鲁门政府对联合国逐渐形成的复杂态度体现了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果新组织太过美国化或是看上去像美国的傀儡，那么联合国的作用将受到很大的制约。比如说，如果把联合国明确打造成反苏的联盟组织，可能会引起更大关注，但同时也会丧失其作用力。国务卿马歇尔在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述职时，委员会突然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一时间，各位委员提出了各种激进的建议。有的成员希望总统出面提请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对《联合国宪章》进行改革，以便“联合国能颁布执行国际战争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还有人希望废除联合国的否决权，继续实行联合国原子能发展机构的巴鲁克计划，倡导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总之，各种意见都围绕着防止世界大战的再一次爆发而展开，希望联合国能更有效地扮演世界和平捍卫者的角色。

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绝不会获得斯大林的赞成票，而实际上这些建议的真正目的也确实是把联合国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很多发言人都谴责苏联频繁使用否决权（至少已经行使了24次，而美国一次都没使用过），其中一人甚至把苏联共产党描述为“世界上唯一行使职责的国际机构”。反共产主义国会议员中的年青一代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听证会的组织者之一。而此时，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理想主义者的其中一派，他们的日常工作与其他党派截然不同，他们的队伍中也不乏十分优秀的杰出代表。20世纪40年代他们迅速崛起，然后又很快陨落，他们就是世界联邦主义学派。

总的来说，本书想要阐明的是圣西蒙、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保罗·奥特莱所拥护的“世界政府”鲜少有人支持。19世纪的多数国际主义者都相信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存在兼容性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求成立一个协调机构以增强独立主权国家的势力。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政府顷刻间就攫住了人们的想象力。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原子弹的出现以及如何控制原子弹的问题。早在1940年，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的预言式短篇小说《无法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案》（Solution Unsatisfactory）中就预见了放射性武器的发展，这势必会引起关乎世界政府的相关争论：小说中，海因莱因假定了希特勒的失败，还绘声绘色地描写出美国高级官员的争执画面，他们的争论点在于是否要在世界上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或是把握机会成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民主联邦，从而利用世界警察的力量控制这种危险性极高的新型武器，防止各国过度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 “国际联盟……”我听到有人喃喃低语。
>
> “不……并不是国际联盟。因为过去的国际联盟并无实质的

存在意义，也没有什么权势，所以起不到丝毫作用。它只是一个摆设，充其量算个辩论社。而新的联盟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使其发扬光大。”

5年之后，希特勒已然落败，世界各地都充斥着对原子弹的恐惧。谁来控制核能无疑成为重要问题。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一事为旧金山会议投下了阴影，大西洋两岸很多过去曾拥护联合国的国家纷纷表示，既然联合国的成立能够解决此前遗留的问题，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以便有效防止爆发第三次或是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持此观点的人中最先发声的就是物理学家。1945年10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信，他预言联合国不会成为和平的捍卫者，因为它的成立是基于“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之上。他主张说，如果人类想阻止原子战争爆发，需要成立一个“世界联邦协会取代联合国，从而有效规范国际法律秩序”。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发表公开声明，号召世人将成立世界政府作为终极目标。爱因斯坦本人同意担任“原子科学家应急委员会”的主席。1946年，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计划成立一个强大的新型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这一计划可能会使联合国有效控制和遏制核能的发展，这是物理学家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由于苏联并不同意建立该组织的提议，该计划不幸夭折。科学家对这一结果颇为失望，随后，多数科学家接受了华盛顿方面的要求继续原子弹的相关研究，这一运动由此流产。美国众议院设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曾调查过有国际背景的科学家，由于一无所获也就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到1947年年末，信奉联邦主义的科学家明显减少。

美国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高端知识分子也曾怀揣联邦主义的理想。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一些高端知识分子曾经召开会议来应对国际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还为他们理想中的“世界政府”起草了宪法大纲。这个草拟世界宪法的委员会自命不凡，不单单想防范核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威胁，还想利用“世界法”重启建立“世界政府”的理念，也就是要创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他们坚信一场“大范围的世界政府运动”正在不断向前推进，会为世界的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1948年，在经过无数次会晤后，他们拿出了研究报告。报告以十分狂妄的口写道，至多再过50年，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这几乎是当代人的一致意愿”）必然会屹然于世。报告以《职责与权力宣言》开篇，建议召开一次联邦大会，与会代表需要由50万～100万个投票人选举出来。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报告中涉及的一切规划都是以美国为模板。报告中以美国的选举制度为模型，提供了有组织性的区域选举团做参考—包括欧罗巴（Europa，苏联以外的欧洲）、欧亚地区（Eurasia，苏联和东欧地区）、亚非地区（Africa，马格里布至巴基斯坦地带）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不包括南非）。在三年内，新的世界政府会专门创立一门语言

以及通用的世界联邦年历。且不说参差不齐的签署国，报告的内容本身就让人难以置信，报告出版后很快就无人问津，只在反共产主义的刊物上零星地有几句刻薄的评论。（《芝加哥论坛报》告诫读者，这篇文章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卡尔·马克思”的结合体，“会毁掉美国甚至世界各国”。）然而，报告的格式却很正规化、程式化，这背后正是他们通宵达旦的付出，是美国历史上这个昙花一现的联邦主义团体微薄力量的体现。在这个团体看来，联合国并没有什么大作为，还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维持霸权统治、控制世界其他国家的武器”。

比起这些联邦主义团体，世界联邦主义学派都算是现实主义一派了。他们并不像芝加哥大学那些教授一样是理想化的多数派成员，他们认为，联合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取缔。但是他们暂时还不想像那些支持联合国的主流派成员一样成为美国当局的追随者。1947年2月，在杜鲁门主义出现的前夜，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的思想源头正是战时流行的国际联邦主义，这一思想在1940～1941年萌芽，他们在大西洋沿岸国家中的潜在影响一直很大。世界联邦主义学派的成立也得益于他们有一位富有活力的青年主席—26岁的科德·迈耶（Cord Meyer），他头脑灵活，颇具口才，在美国海军服过役，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在关岛作战时受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他还曾在1945年作为资历较浅的官员参加过旧金山会议。迈耶在全美各地演讲游说，鼓动人们支持世界联邦。正是经他之手，世界联邦成了世界第一大联邦主义者的压力集团。1947年9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人支持“应该强化联合国，使之成为世界政府”的观点，这分明是在暗示着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之外寻求美国的安全就要面临政治威胁。同时，世界联邦主义成功说服了美国国会，终于在1948年春为世界联邦主义学派举行了听证会。

1947年，阿根廷宣布将向联合国大会提请取缔否决权的议案，这一做法当然是经过美国同意了的（阿根廷曾在1945年3月向德国宣战，以此博得加入联合国的机会），这件事引起了联合国支持者内心的恐慌。仅仅采用单一的手段是不可能让苏联知难而退的。马歇尔亲自提请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着重研究否决权的更改问题，在苏联看来，最具争议的就是马歇尔还想在安理会陷入僵局之时成立一个处理安全问题的新组织。这些都令莫斯科方面极为不满，苏联代表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坚持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东欧成立后，正如它从外部看上去的那样具有威胁性，它的成立也标志着苏联可能做出退出联合国、重走列宁的革命国际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决定。也正因如此，马歇尔决定从长计议。1948年，他在国会议员面前论述道，联合国改革需要谨慎进行，要避免新组织破裂瓦解，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

在同一听证会发言的世界联邦主义学派主席科德·迈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改革并不会瓦解联合国：联合国已经岌岌可危，否决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如果能赋予联合国更多执行权，利用国际法庭和自身警察力量的权威保障，联合国就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想要赋予联合国权力，使之有效运转，真正需要的是向苏联方面拿出诚意，

给出全面的改革议案与其共同商讨研究。迈耶在委员会面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马歇尔期待的提案终于成功通过，由委员会亲自起草的最终议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拟出，以便“加强联合国的权力，促进国际合作”。

世界联邦主义学派此时达到了它的发展巅峰。此后，该学派在实践中开始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决策。1949年，其成员有约47 000人，达到了历史制高点，他们一致赞成《北大西洋公约》的通过。随后，美国发起朝鲜战争的议案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到1953年时，学派的会员已经下降至15 000人。其中有几千个核心成员一直对学派忠心耿耿，但这其中并不包括科德·迈耶，与年轻时的功绩相比，他后来的事业取得了更为非凡的成就。20世纪40年代末，迈耶就开始配合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同渗透在世界联邦主义学派内的共产党分子博弈。1951年，受到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邀请，迈耶成了中央情报局的正式一员。联邦调查局曾指控他是安全隐患，为了澄清自己，他迅速用行动做出了证明。20世纪50年代，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国际组织分部，暗中为各类媒体和游说团体打通了筹资渠道。1962年起，他开始接受秘密行动。退休时，迈耶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从战争时期的国际主义阵营一直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的内部核心。这段经历简直就是美国国际主义其中一种形式的缩影，这一思潮在战后的短短几年里经历了兴亡祸福。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

人们往往会过高估计凯南对政策的影响力，但毋庸置疑的是，称他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分析家一点儿也不为过。1948年2月，凯南已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的负责人，此时他发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处理国际事务的路线—普世主义观点和排他主义观点。前者强调依靠公理法规解决国家间冲突，重视法律手段多于政治手段，倡导由国际组织和机构作为仲裁，但凯南并不看好这种普世主义。凯南对美国民主感到由衷的质疑，他认为“非美视角”下的外交理念才是外交艺术的真谛所在。因此，他强烈批判避世主义以及一味暗地支持联合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并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理念相似的国家结为“利益和前景一致的真正同盟”，而不是“依靠国际法或国际组织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国际主义的弊端不仅体现在它会导致各国期望的落空，更令人担忧的是，它还会弱化美国的自由，对美国构成羁绊，使其陷入一个“贫瘠而又烦琐的国际议会政治”的窘境。

从国家内部决策机制的角度来看，凯南的分析阐明了新“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要以美国以外的时事分析者的身份思考国际问题。曾是托洛茨基主义拥护者的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出版的畅销书《世界之争》（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正是对反联合国行动的呼吁，他主张抢占战争的发起权，这样才能为美国价值观的发展铺平道路。他很是赞同海因莱因的小说内容，即由美国而不是世界政府垄断原子核武器。像《世界之争》这样的书籍如流星般一闪即过，因为多数人都认为他们的理论太过暴力和粗糙。而长远看来，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由一小拨少数派知识分子策划的颠覆性理念。

后世人所称的“现实主义”发端于战争时期，随着国际联盟的瓦解和纳粹的崛起，现实主义也随之经历了兴衰起伏，尤其是1939年早期捷克斯洛伐克被攻陷时，现实主义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是英国记者兼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一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它抨击了国际联盟及其支持者的痴心妄想。卡尔评价道，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方向会按照他们的所想所念稳步进行。人们不应该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单纯地认为几个追求和平的国家就一定会共享利益。相反，他倡导人们用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思考问题。卡尔一语破的，“道德是权力的产物”。

对于美国来说，1940年夏，欧洲的权力平衡体系发生的改变使美国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战略思想，不再局限于四面环海的西半球安全理念。先锋派战略家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e Earle）—安全研究的学科创始人、卡尔的追随者，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普林斯顿发

起了一次极具影响力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卡尔本人、凯南以及许多其他杰出代表。厄尔在一篇抢眼而又极具争议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H·G·威尔斯所犯的错误，威尔斯认为科学的发展让政治机构和政治进程变得不再重要：威尔斯理想中的国家政体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厄尔坚信美国会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具主导作用。相反，科学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新的威胁，“世界大家庭”的主张会被轻易忽视。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是早期现实主义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提醒人们，他在战时系列讲座提到的“光之子”丝毫没有低估部署的反对力量：一个国际团体并不会因为科技需要它而成为必然的存在。精忠报国之心和权力意志才是它存在的关键因素：“一个国际团体如果想要屹立于世，名留青史，就要让其成员国为抢占全球份额而战，以竞争促进世界的发展。”尼布尔在1944年时这样写道：“在全球性守则的制约下，民族自豪感变得难以实现。”而在真正的普世主义实现之前，“其中的糟粕部分必须被淘汰出局”。有些人认为“否定了国家主权绝对性原则的国际法新定义有助于抹去事实”，然而要制定英明的政策，就要摒弃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这也说明可以利用国际机构的忠诚捍卫者去“反抗世界的无政府状态”。

尼布尔的著作用了庄严的修辞，彰显了伦理责任，影响深远。20世纪40年代神学家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美国政策方向的公众讨论中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观点多从神学角度出发，最后发展成了学术理念和世界政策。他概述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国际机构脱离各国的国家利益，可能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不过，这一观点已经由社会科学家和理论家发展成了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一群从德国流亡来的法学家尤为积极地传播这样一个观点：像乔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约翰·赫茨（John Herz）和沃尔夫冈·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n）这样优秀的学者都从纳粹的崛起和自身的流亡经历中有所领悟，他们认识到，老一代人单纯信奉国际法的做法有待商榷。考虑到权力以及人类的基本权力欲望，需要换一个新的角度思考国际事务，让法律成为政治的从属。这个学科正是国际关系中社会科学的雏形。

汉斯·摩根索可能算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1946年，他的著作《科学人与强权政治》（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为他赢得了大量读者，摩根索在书中表达了对厄尔观点的支持，抨击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天真幻想，他认为他们对人类进步和普世主义理论的信仰过于单纯幼稚。他写道，如果拒绝承认政治斗争的持续性，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不会长存。《科学人》杂志还特别批判了国际法，称它妄想在世界政治的现实中制衡整个世界。不论愿意与否，战争是国际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世界更需要英明的政治家而不是有心无力的法学家：“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法律是什么’，而是‘法律应该如何制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法学家而是政治家。要做的决断不是在合法和违法之间，而是在政治的智慧和愚蠢之间。”

两年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问

世，该书让摩根索享誉全球，成为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教科书之一。本书几乎分毫不差地再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的处理手段，描写了美国摆脱对国际法的幻想后发生的质变。在美国大肆宣传支持联合国时，摩根索利用他所做的战时讲座发展了他的理论，反驳了旧有的国际定式，提醒人们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的追求正是国际政治的动力所在，要提防随意将通用道德准则强加于这些问题之上的做法。这一观点认为国际合作是次要的，充其量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现象，而不是国际事务进化至终端的结点。美国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全球新定位，为此它必须要挣脱过多的条条框框，最适合美国的法则应该兼具联合国的捍卫者和怀疑者两种特质。摩根索的主要目的是让华盛顿方面的决策人士认清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明白冷战并不是一次法则的改革运动，而是一场权力之争。

实际上，跟厄尔和卡尔（以及凯南）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一样，摩根索对国际合作的看法与自己的很多追随者相比更加复杂和细腻。摩根索反对的并不是对国际法本身的诉求或是国际法的理念[奥地利的法学巨匠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过去讲授的法学主导理论]，法律可以而且应该从政治领域剔除出去。支持联合国是件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最基本的重点是权力均衡，尤其是欧洲的均势。在厄尔看来，人们要警惕对国家安全概念或是国家利益概念认识的模糊不清，认清两者的广泛含义至关重要，它们不仅包括军事和地理因素，还包括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的因素。约翰·赫茨的巨著《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该书却最为明确地给与作者志同道合的人指明了中心路线，他们都认为即使权力之争主导了各国的国家体制，但集体安全、利益以及国际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赫茨倡导的是“现实自由主义”，它会为“可实现的理想”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他还提出，人们对国际联盟的披露太过极端，实际上国际联盟在集体安全上身先士卒的政策安排还是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旦接受了赫茨“理想自由主义”的假定，就会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更多共性，主要会得出更多实用的和实践性的世界政策。

尽管远离象牙塔，美国寻求国家安全和国际机构支持这两个目标看上去并不矛盾。毕竟，联合国是由各个大国共同管理的，这与过去的国际联盟截然不同。20世纪前几十年里许多国际组织都尊崇尚法的国际主义，联合国也并非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就连对联合国没什么兴趣的凯南也意识到支持联合国可能会为美国带来好处：比如说，1948年，他也同样支持就苏联封锁柏林一事的相关决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它们加入联合国对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原因和区域条款的重要性一样，它们的加入会巩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同时还能让美国避免被孤立的困扰，而被孤立一直都是杜鲁门政府的心头隐患。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国际主义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凯南或许希望美国能像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一样，但是美国的民众并不接受那样的美国，因为美国好不容易找到了更高远更无私的理由掩护自己，不再像过去十几年那样被世界各国孤立。像联合国这样广受欢迎的组织机构正好为美国提供了融入世界的机会。有了这样的认识，美国的

决策者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他们能在联合国中获得多少权利以及联合国对他们会有多少限制。此后，即使是在与联合国建立密切联系后，美国也只能得到更具灵活性的好处，美国民众也很明显地愿意接受—实际上是十分欢迎—由华盛顿方面组织的联合国国际联盟体系。

美国加入联合国的举措很有积极意义，充满实用性，但单纯指定某一个人为这种方式的设计师是不准确的，这理应是美国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那一定非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莫属。腊斯克的名字并不像才华横溢的凯南一样经常见报，而且，在凯南以美国最伟大的外交政策评论家的身份享誉全球时，腊斯克却因为身陷越南战争而淡出公众视野，逐渐被人们遗忘。不过，尽管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几任总统都在精心培育美国的外交战略，但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益成熟的过程中，腊斯克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却比其他任何人都大。这个来自美国南部的小伙子出身贫寒，20世纪30年代，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得到了留学牛津大学的机会。“二战”爆发后，他开始在太平洋地区服役，见证了美国战时对印度和东南亚的积极援助。在受邀加入国务院之前，在联合国的掩护下，他协助建立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在亚洲时的特殊战时履历以及对英国和英国人经年累月的了解让腊斯克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腊斯克在任国务院驻联合国事务办公室主任时，极力反对国务院内的欧洲主义者，20世纪40年代末，他极力呼吁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联合国纳入考虑范围内。杜鲁门主义公之于世时，他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星期。此时正值批判主义浪潮汹涌之时。其支持联合国的做法终于拨云见日，得以平反。此后，在向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军表明联合国对美国目标的重要意义时，腊斯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教给杜鲁门和马歇尔如何在联合国大会中利用多数的亲美国家的方法，1947年年底，在希腊问题上，他成功地让苏联陷入尴尬境地。同时，他还让两人知道如何在坚持反殖民主义的同时调和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1948年，他利用联合国为印度尼西亚赢得了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同印度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调和过程中，腊斯克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同属联合国的区域安全同盟的需求；与此同时，虽然他支持发展氢弹核武器，但是他相信联合国本身已足以成为美国反苏的有效武器。他甚至还邀请一位共和党人国际主义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作为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这一举措保证了他的政策可以获得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从而顶住麦卡锡主义的压力持续发展下去。

就这样，马歇尔和杜鲁门越来越赏识重用腊斯克。朝鲜战争期间，腊斯克极力推行他的政策遏制朝鲜。在得知朝鲜入侵韩国的第一时间，他就劝说总统将该项事务提交给联合国。因为只要苏联代表一直对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他们就无法行使自己的否决权。杜鲁门对这一提议十分赞赏：他明白，由联合国出面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才是名正言顺的。腊斯克之所以能为美国外交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计划中结合了现实主义和军事野心。一方面，腊斯克坚信国际法的权威性。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一直坚持的反殖民主义开始得到响应，他也开

始在各类演讲中呼吁美国支持亚洲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同时，他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和谈，签订了各区域的安保条约和军事基地协议。他让美国的陆军海军势力成为联合国委任的必不可少的全球维和部队。

如果说杜鲁门的现实主义执政思想主要是受到德国内战理论的影响，那么腊斯克全新的政策理念可能主要基于他学生时代在牛津大学培养的大英帝国国际主义世界观。他曾师从的两个教授都与国际联盟关系甚深，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国际法法学家詹姆斯·布赖尔利（James Brierly），他致力于对国际法的辩护，强烈批判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理念，这也是腊斯克一直坚守的理念。与布赖尔利一样，腊斯克认为法律、道德和权力都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多数的正派英国自由帝国主义人士也都这样认为。教授腊斯克国际关系的老教授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曾在1917～1918年英国为国际联盟起草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同样支持上述观点。20世纪50年代早期，年迈的齐默恩已经从牛津大学退休，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型学院教课，他曾公开敦促这个得意门生接过大英帝国曾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尽可能推动联合国的发展，并为其提供必需的条件，正如以往他希望英国能如此经营两次大战期间的国际联盟一样。在腊斯克看来，很多像齐默恩这样的人都把美国人看作自由火炬的接班人、世界文明标准的捍卫者。过去的古典学家则把美国视为雅典的继承者和现代自由联邦的领袖。

腊斯克的同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继承了他的国际主义理念，而腊斯克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接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一职，任职期间他以其他形式继续坚持着这一理念。（雷蒙德·福斯迪克在1948年时举荐腊斯克进入了基金会的董事会，腊斯克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福斯迪克精神的接班人）离开政界后，他一如既往地热衷于传播自己的政策理念，像一位学院老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传授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例如，1954年，他主持了基金会下的特殊会议，与会者包括众多知名学者和决策人士—沃尔特·李普曼、汉斯·摩根索、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保罗·尼采（Paul Nitze）以及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会上他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做了各式探讨，讨论了像社会科学理论本质、道德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国家利益的定义这类深奥课题。这次会议广受好评，是国际关系学在美国崛起的重要历史标志。此后，腊斯克还利用基金会宣传了外国资金、技术、福利援助在国际主义中的重要意义，沿袭了1939年福斯迪克开创的传统。1962年，他开始鼓励美国对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的国际投资，同时，他还重返政府，成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的国务卿。虽然随着亨利·基辛格势力的崛起，腊斯克的实用国际主义地位最终受到了挑战。但是，很明显，此时美国和联合国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第九章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变革”并不是1917年11月列宁在俄罗斯颠覆了短暂的临时自由政权，而是看起来不那么突出但实际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事件—欧洲对世界400年统治的终结。

—汉斯·科恩（Hans Kohn），《联合国和国家自决权》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1958年）

我活了78年，从未听说过像柬埔寨一样专制统治如此血腥暴力的国家。

—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

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

随着冷战的爆发，曾受万众瞩目、国力遥遥领先的大国苏联突然惊觉自己已经落于下风。斯大林的首席文化理论顾问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1947年在第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上向各代表坦言："各个行业的代表人士，包括科学家、商业团体、青年人、学生，都认为他们之间可以维持良好的国际交流，遇到工作难题时可以沟通经验，互相咨询，他们还能定期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聚会，然而同源共流的各国共产党人，甚至是共产主义盟国却都不愿缔结彼此间友好的纽带关系，这当真是件怪事。"日丹诺夫能这样直言不讳也着实令人惊讶。因为除了这一席话，他一直都在颂扬苏联在创建联合国时表现出的"光辉形象"，也时常赞扬成立联合国的伟大构想，称这个组织会实现"世界民族间真正的合作愿景"。

事实上，苏联在思索外交政策时曾再三审视过联合国的战略地位，但它并没有认真考虑过重获思想意识中心控制权的必要性。1943年共产国际解体时，它已经不再在各强国中发展革命国际主义，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对于苏联来说，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正在变成一个让苏联备感尴尬的地方。1946年在伊朗和希腊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以及1948年安全委员会关于柏林的辩论中，美国的策略大获全胜，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迫使苏联行使否决权，将斯大林不愿提及的事情置于镁光灯下以吸引公众的目光。同时，联合国的人员结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苏联。在联合国秘书处内部，秘书长周围最为亲近的顾问多数都是美国人，其中又有大多数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亲信。相反，苏联人在联合国的高层官员中比例不足1%。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在多数问题的表决中拥有大多数固定的有效支持者，美国还与英联邦国家、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联合起来轻松超越了苏联以及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苏联盟国的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6年里，苏联在安理会的表决中使用了47次之多的否决权，而美国却在20年里从未使用过否决权。"由于联合国是随着冷战的爆发同步发展起来的，"两位美国分析家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联合国已经成了西方强国操纵国际政坛的政治平台甚至是政治工具，而且他们总能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腊斯克的政策看上去已然居于上风，而苏联却陷入了所谓的"永久否决"的困境。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苏联从始至终都对世界一体化组织的概念兴致索然。斯大林之所以参加联合国创立大会，主要是因为他的到场能让苏联的强国特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代表着强国可以利用特权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一直不满于国际联盟的解散，斯大林在其他方面对联合国也并没抱什么希望。同时，斯大林对专业机构的大量增殖颇为不满，所以多数时候都不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对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印尼以及意大利的殖民地等国家和地区，斯大林并没有认识到它们

的重要意义，所以苏联代表也没有打压西方强国在这些地区的各项举措。一般只有当涉及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自身利益时，苏联代表才会行使否决权。因此，国家主权保护是莫斯科方面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苏联共产党最蔑视的就是主张创建世界联邦政府的资产阶级卫道士。早在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就向美国的有关官员明确表示，如果在联合国的决议过程中，不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中行使否决权，苏联宁愿世界上没有联合国的存在。

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想利用否决权架空联合国，防止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过于强大，进而发展成苏联的一大威胁。而美方关于削弱安理会的权力、赋予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更多的权力的提议让斯大林十分困惑不解，在美国提议对《联合国宪章》进行改革时，苏联立刻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成了宪章最坚定的捍卫者。随着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中国的胜利，斯大林限制了联合国的进一步发展，一直阻拦中国作为新成员加入联合国大会。美国曾建议，安理会如果在处理国际和平及安全事务的过程中陷入僵局，就可以将权力交给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这一提议让斯大林的计划看似收到了成效。实际上这个举措与《联合国宪章》的最初理念极不相符，最终还导致了秘书长特吕格夫·赖伊被迫辞职，有评论家指出，正是联合国的这些举动引得莫斯科方面“暴怒”。1951年2月，斯大林严词谴责联合国，称“联合国这一组织正在发展成战争的工具，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想利用联合国发起新的世界战争……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是美国人的组织，它所代表的就是美国这个侵略者的利益”。1952年，两位美国时评家尖锐地评价说，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苏联对联合国的敌意，而是尽管时常谴责联合国，但该国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

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退出联合国的原因是其试图创立新世界组织的计划接连受挫。尽管苏联规划成立的组织既适合冷战时期的共产党人，也适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一派，在此期间苏共还利用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的威望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在“二战”之后，苏共取得的实际政绩却微乎其微。日丹诺夫1947年组织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正是苏联为应对马歇尔计划采取的举措，旨在重组东欧共产主义政党格局，保证共产党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共产主义的党派会议大张旗鼓地召开，而这种会议并不是同盟国间的会议。尽管苏联宣称这次会议标志着“反帝国主义民主同盟阵营”的诞生，但实际上，受邀参加创立大会的只有欧洲人。铁托统治的南斯拉夫本是苏联最为忠诚的追随者之一，可刚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却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独立的想法，这让民主同盟阵营瞬间四分五裂。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因为铁托和斯大林的分裂难以存在下去，此时的东欧也呈倒戈之势，最终这个组织没有撑过10年的时间就全然瓦解了，还不足其前任组织共产国际寿命的一半。

苏联意欲成立的“爱好和平”公民大会更是收效甚微：尽管莫斯科方面成立的像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世界和平党人大会这样的组织都曾一度是联合国的有力竞争者，但这些组织却更如昙花一现。随后，苏联一心想

让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党派联合起来，为此大举召开定期会议，而曾对1919年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颇为信服的友好邦国和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都对苏联的定期会议不胜其烦。南斯拉夫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国都发展起来了，成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强敌，这让会议变得更加烦琐复杂，这些会议除了发表一些令人尴尬的公报外，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成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连古巴共产党都挺进非洲，成了苏联在当地的革命劲敌。而与其同时，联合国在世界的地位不降反升。1947年，日丹诺夫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姿态，他说道，冷战期间各类国际组织如火如荼地创建起来，且多数都是由美国及其盟友负责运营，苏联置身事外的傲慢态度已经让自己疲惫不堪，举步维艰。

因此，苏联一直都没有退出联合国，相反，斯大林去世后，其继任者更加积极地寻求苏联在联合国的新机遇，以求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956年，汉斯·摩根索评价联合国为“大联盟”，其对立面就是苏联及其同盟组成的又一“大联盟”，这一描述若用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的局势还算贴切，但放在当时则未免牵强。直到那时，苏联才开始参与联合国的技术援助工作，重新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新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的劝导下，苏联对朝鲜问题进行了协调，敦促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停火协商。哈马舍尔德还对中国进行了个人访问，此行意义深远，他希望通过协商，中方能归还被击落的美军飞机，苏联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955年，苏联多年来首次抱着认真的态度在裁军与和平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与他国进行了对话，奥地利和平条约因此得以签订，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恢复了正常。最重要的是，那一年可能是联合国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多年来限制别国加入联合国的僵局终于被打破，16个国家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从而开启了联合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10年。

两战期间，苏联的政策是实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而后来成为斯大林继任者的时任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重新解读。苏共考虑到冷战之后与欧洲可能会产生分裂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积极寻求在亚非地区扩大影响力的途径。莫斯科方面渐渐认识到同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时下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苏联笼络联合国的关键意义所在。当然，两个超级大国都喊着反殖民主义的口号，但是美国方面却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颇为尴尬，因为世界的几大殖民势力都是它最亲近的盟友，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还曾极不情愿地对他们进行了公开谴责。相比之下，苏联在反殖民主义道路上畅通无阻，因为它的主要盟友东欧各国在海外没有什么殖民地。1947年，日丹诺夫发表公开声明称，苏联是“世界各国自由和独立的唯一真正的捍卫者，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斯大林不再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他认可第三方“和平阵营”的存在，并认为这一阵营对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至关重要。

斯大林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欧洲的分裂问题上，而他那些比较年

轻的同僚则更为关注未来的发展。当时在法国，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臆造了“第三世界”的说法，这个概念专门用来概括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区，将其视作全球变革的一个区域，彰显其在冷战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更多地关注殖民世界，一改自1934年以来出于强权政治原因的缄默，重新再现了旧时代马克思国际主义的活跃景象，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尤其如此。在此期间，美国也毫不示弱，美苏两方的对抗频频发生，于是，马克思和马志尼的论战再一次在全世界上演，而联合国正是这场争夺的主战场。

去殖民化

如今回想起来不禁令人震惊：1945年后，欧洲很快就不得不交出其占领的殖民地，殖民地的收复进程也着实神速。当然，去殖民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反殖民主义运动在美洲从18世纪末就开始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一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结束，而瓜分非洲和中东的争夺战也在19世纪末才开始。甚至早在“二战”期间，就有一小部分欧洲人预见到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欧洲帝国的殖民势力将会大幅缩水，直至彻底消失。诚然，他们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会引起各殖民地对欧洲统治的大范围反抗，尤其在战争期间，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为突出。而丘吉尔、史末资以及其他人都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型国际安全框架视为对白人统治的巩固，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殖民统治。丘吉尔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1941年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到的“自由”并不适用于欧洲。荷兰的流亡政府同样固执地认为，东西方已经达成互助协议，形成了“共同体主义”，基本排除了亚洲的印尼和南美洲的苏里南独立的可能性。而美国把尚无定论的提议提交给联合国，宣称联合国对所有殖民地负有最终责任，这给了欧洲人当头一棒。在夏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时任殖民署秘书长勒内·普利文（Rene　Pleven）借文明使命之名首先表达了对联合国的支持态度：

> 在这个非常时期，法国当然比以往更能意识到祖国的重要性……时下要推行的新政策规定，已遭受殖民统治数个世纪的殖民国家不再履行“殖民地责任”……“殖民地责任”将由某个国际组织继续履行，所以这一组织必须以正义为美德，具备一定的能力，还要具备勤勉的品质。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愿景都无法通过改革实现，这些都应是临时代理组织的职责，这个组织将以集团的名义，将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不再饱受疾病、蔑视、迷信和暴政的痛苦。

然而，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实力强大的对立势力，并不是只有美国和苏联两国在相互对抗，在反殖民主义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殖民地的独立需求。欧洲的法西斯势力过于自我，过于法西斯主义，他们并不承认国际上对反殖民主义的潜在呼吁，一直到全球反殖民运动兴起，他们才发现此时再加入这个队伍为时已晚。在亚洲，由于日本大打反欧洲统治之牌，所以荷兰、法国及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很快就被终结了。1955年，反对结盟的会议在万隆召开，而根据一位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观点，不结盟运动的号角其实在日本1940～1942年的侵略行为开始时就已吹响了。日本同亚洲民族主义分子的战时合作激起了亚洲地区对欧洲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因此1945年，欧洲在对亚洲地区去殖民化运动进行

百般阻挠时遭到了亚洲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尤以荷兰和法国为甚，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以及法国在中南半岛都不得不以武装暴力手段维持殖民统治。在此之前，印度的国大党组织了反抗游行，局势异常动荡，国民群起反抗英国的统治，数千人被逮捕。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甘地和尼赫鲁出面制止，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明确表示，印度对英国的反抗为世界反欧洲殖民统治复辟的斗争做出了巨大努力："我们的斗争只是全世界各民族反压迫斗争的一个阶段。"

为了维系殖民统治，欧洲霸权国家以偷换殖民概念和武装强权的双重措施应对殖民地人民的抵抗："当地居民"变成了"原住民"，帝国的概念被置换为"联盟"，纳粹分子曾以摄政国的殖民身份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殖民统治，如今也更名为"联邦国"以掩盖其殖民行为。由此，欧洲仍在强行为自己冠以"文明使命"之名以维系其殖民统治。1946年，英国政府的宣传手册中这样写道："英国的帝国主义虽生犹死，如今只在那些批判家的口号里还能听到这个名词罢。"殖民办公室表示："殖民制度就是付费民主的现实阐释。"1944年，法国发表了关于帝国未来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中坚持说："法国海外殖民地的人民不希望任何形式的独立，只希望作为法国的一部分独立存在。"一旦有殖民地百姓通过各种方式反驳这一说法，法国就会对他们开展场面血腥的武装控制行动。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中，上万名当地人被法军射杀，法国在叙利亚及马达加斯加的镇压行动同样异常惨烈。

但是，殖民帝国的统治者可以从美国再一次产生的类殖民想法中受到鼓舞。罗斯福任期内的国务卿助理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本以为可以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而欢呼庆祝了，但此时战争部的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却看到了美国对海外基地的需求。尽管美国国务院为联合国的战后殖民接管草拟了计划，美国海军却认为太平洋的某些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地位，必须由美国自己掌控才行。1944年正是战后美国军事基地建立的开始，美国的帝国基地并不是为了进行殖民而是为了建立陆军和海军基地以及飞地[1]。

因此就不难理解旧金山会议召开的数月间为什么一直没有提到殖民地和托管国的问题。比如说，敦巴顿橡树园提案就没有提到这一问题。1944~1945年的冬天，英国对美国的一项议案提出了反对，该议案提议扩大联合国对各殖民主权的监督力度，而英国则希望削减联合国的权力，让它除了搜集殖民信息之外起不到任何妨碍其殖民统治的作用。"三巨头"最终一致同意由联合国来执行过去国际联盟的授权制度，并从殖民者手中收复殖民领土。（其中也包括自愿接受托管的领土，不过，实际上欧洲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交出这部分领土。）美国海军如愿建立了军事基地，为其定名为"战略互信领土"。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人士的角度来看，这些基地无疑是反殖民主义的巨大失败，因为这就表示美国同意欧洲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尽管旧金山会议在更为开放明朗的环境下举行，但这仍然没能让殖民问题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联合国宪章》则一直规避风险，不愿给出

明确承诺来赋予那些附属地区恢复完全独立的权利，托管的领土因此一直处于联合国的监管下。然而宪章第76款却并没有将托管的最终目的定义为独立，而是给出了一系列虚无缥缈的说法以混淆视听—“以适合托管领土及其人民的特殊国情为原则，并以实现人民流露的自由愿望为目标，按各托管协定的条款规定，最终逐渐发展为自治或独立的国家”。“战略互信领土”也同样受到监督，但并不是由联合国大会或托管理事会负责监督，而是由安理会负责。现存的殖民地也都更名为“非自治地区”，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所有殖民势力都必须“承认这些地区的居民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各殖民势力需不遗余力地把发展国民利益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竭尽全力提高属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殖民势力必须定期向秘书长汇报殖民地的相关信息，他们在离开旧金山时，信心满满地认为联合国可以与帝国统治比肩前行。

的确，从国际联盟时代开始，国际政治就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各大强国的殖民事业也因此被迫中断。联合国大会接过了托管制度的重担，这也是后来联合国大会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会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讨论。宪章为联合国打开了欧洲殖民制度的大门。托管理事会本身并非由联合国的公务人员组成，和过去的旧时授权委员会一样，该机构是由联合国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因此，殖民主义的帝国势力在这里被划为少数派，备受排挤。托管理事会还十分重视民意，欢迎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政治中来。另外，《联合国宪章》尽管承认政治自决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原则，但宪章却也没有明确说明殖民地何时方可独立。

[1]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编者注

联合国大会的崛起

新的托管制度明显弱不禁风，难担重任。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和之前国际联盟的委任制度相比，这一新制度并不能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联合国大会一直想获得“行政管理权”，把殖民地的独立排上日程，让殖民地居民能更多地参与到本国的自主管理中，然而这一想法却未能实现。由于托管理事会的一半委员都来自殖民帝国，除此之外就是其他的安理会常任委员国的代表，所以帝国势力起初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也很少有相左的意见出现，欧洲帝国的殖民统治看上去十分稳定。

若这就是旧时的国际联盟，那必如丁尼生（Tennyson）的《人类议会》（Parliament of Mam）中所呈现的那样，备受欢迎的联盟大会实际上由欧洲全权掌控。1920年，来自48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联盟大会，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代表来自亚洲（其中包括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没有中东代表与会：伊斯兰教代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佛教和儒教代表更是一个都没有。联合国就完全不同，在各大强国的初始代表中有英国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而这些欧洲代表的意见在审议过程中并不像过去的欧洲那样有分量。在联合国最初的51个成员国（或地区）中有27个曾是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其他的就是来自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它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1947年，反殖民运动大举兴起，拉丁美洲的各个国家联合成立了美洲独立领土委员会，“专门抵抗各个地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联合国中阿拉伯成员国和亚洲成员国的数目大量增加，这一进步鼓舞了那些殖民地争取自治权的抗争，从突尼斯到缅甸，这些狭长的领土之上终于燃起了独立自治的星星之火。菲律宾（1946年美国授予其独立自治权）和印度（1947年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首先突出重围获得独立的两个国家，联合国大会自此独立承担起了反殖民主义的伟业。

1946年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幕：印度代表团指控南非歧视其国内的印裔居民。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控告是根本不会得到承认的，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国内法规定对此类问题不予讨论。然而，联合国大会对宪章的这一规定视若无睹，印度人此时也没有完全独立。印度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想要摆脱英国的帝国统治，他们必须把联合国大会当作有力的讲坛，利用这里发出声音，做出成绩。鉴于印度和南非都是大英帝国的属国，按照传统的方式，应该由英国内部裁决这一问题。而印度方面却把这一事件以种族歧视的名义呈交给联合国大会来处理。尽管联合国大会的权力有限，但是印度人想要的是“把史末资将军的独裁政策公之于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他的斑斑劣迹”，这样看来，联合国的确是个理想讲台。

鉴于国际法从19世纪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利益的象征，《联合国宪章》明显也是依据帝国利益而定，所以不难发现，驱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并不是法律文书或是《联合国宪章》，而是政治。美国建议把南非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处理，但这一提议很快被否定，因为种族歧视一直以来都属于政治问题，不应该交由法官进行裁决。传统派人士称，这一问题属于少数民族范畴，联合国应当警惕民族主义的复苏。而对于这一说法，印度坚决反对，称这并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种族问题。在这件事上，印度取得了最终胜利，南非对此极为震惊，因为他们从未料到联合国大会会对本国的内政评头论足。印度这次胜利被誉为民主的胜利。而这个结果同样是一柄双刃剑：对南非内政的谴责成了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最佳表现和对种族隔离宣言的有力反击。然而，在这一案例上，联合国大会除了进行谴责以外并无实权，所以其价值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1947年，作为补偿，英国得到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这件事充分彰显了联合国大会受到的诸多限制。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国大会是主要的决策方，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定通过投票对巴勒斯坦的“分治处理”进行表决，耶路撒冷地区交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由联合国进行管理。决议一旦通过表决立即生效，这让人大跌眼镜，因为这一决议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包庇。政治又一次击败了法律。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由国际法院进行裁决的提议被严词否决，情形与前一年联合国大会对南非问题投票表决时如出一辙。1948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股武装力量之间爆发了战争，起因是前一年的隔离计划大会，激战过后，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了一位调解员，1949年，在他的最终调解下，双方达成休战协议，签订了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案例表明，尽管联合国可以为殖民统治的反抗斗争带来一线希望，但是由于缺少军事力量，其政策就缺乏有效的执行。这同时还说明，1947年第三世界国家选票的影响力还极其有限，无法主导联合国的决定：阿拉伯国家均反对分治决议，但最终反对票却只有13票。上述事实都表明，如果超级大国出面（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独立的事实，苏联随后认可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联合国就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当然，安理会明显是一个颇具深度的政治组织，这就表明，联合国大会同样是政治性组织。但这并不能说明该组织会在冷战时期坚定地支持某一方。不过，从更为具体的意义上来说，联合国大会认为制定基本决策的人并不是法学家，而是全球的政治代表。事实上，联合国大会的崛起是威尔逊思想的体现，他主张由世界议会进行统治，联合国大会的崛起也意味着半个世纪以来法学国际主义的最终失败。法律对政治的让步已经让时评家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敦巴顿橡树园议案。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法庭的学者们举出两战期间的实例警告世人轻视法律的危险：“整个世界一片荒凉。”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和他的法学家祖父参加过1907年的海牙会议，他逐渐意识到，国际法已成为逝去的梦想。1957年，杜勒斯接受报业巨头亨利·卢斯（Henry Luce）采访时，巧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国际法庭确实已经难以发挥作用……虽然手头有许多仲裁协议，但是他们

从未对此善加利用。”原来的国际法研究所对国际法庭政治性选举的做法也颇为担忧。尽管不愿承认，但该研究所真正担心的事情确实是欧洲法官数量的急剧下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评人士推断，“广为人知却没有真正发挥效力的国际法庭”实际上已经拖慢了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进程，因为它毁掉了国际法公平正义的形象。

实际上，联合国大会不但不想与法律审判扯上关系，更不想一味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受其制约。对世界强国而言，单纯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会制度，使联合国大会自成立以来就难以受其掌控，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往往难以预知和操控。联合国大会曾经否决了英、美、法达成的三方共同管理利比亚的协议，尽管鲜少有人记得这一事实，但这绝对体现了联合国大会的魄力。这一否决让时任英国外交部大臣贝文颇为不满，他愤愤地抱怨说，联合国根本就是在扶持振兴“阿拉伯–穆斯林–亚洲的联合集团”。随后，利比亚由联合国大会委任的一名官员进行管理；次年，意大利曾经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也交由另一位联合国官员管理。

美国国务卿乔治·凯南运筹帷幄，他提醒美国政府说，联合国大会也许不会像许多人预想的那样，会如美国所愿成为其忠诚的仆人。尽管联合国大会的各成员国大小各异，政治局势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只要大多数国家同意，联合国大会就可以做出决议。所有政体都可以被视为有主权的实体。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联合国对主权的认证标准更为模糊，也更为宽松。简言之，“只要是在人类历史当前发展阶段成立的一系列偶然的社会团体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凯南估计，联合国当时只有1/4的成员是美国的可靠支持者。在和平和安全等重要问题上，美方还可以如愿以偿，而在殖民问题上，美方的议案则经常被否决。迪安·腊斯克在首轮政策之战中胜出时，凯南就做出了富有远见的论断：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而今这种对峙已经逐渐让位于其他关注点了，联合国大会也就不会再为美国提供那样的有利条件。所有了解凯南的人都不会对他的这一论断感到惊讶：凯南是个性情中人，他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一律持反对意见，而联合国大会把外交官员的权力全部收归己有，也确实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的棘手问题。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自己的“议会制度主题话剧”，联合国也因此成了一个“全新的、运营方式多元化的大剧院”。凯南的失误在于他的错误判断，这是因为他的眼光太过超前。联合国和美国一同奔赴朝鲜战争一事使得国际政治环境危机四伏，这场战争衍生的棘手问题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会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1955年之后，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的数目激增，速度之快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也是导致凯南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1946年，联合国在51个最初成员国（和地区）的基础上新增了4个成员国；1947～1950年，只有1个国家获准加入联合国；1950～1955年间，成员国数目没有任何变化。由于被苏联的阻碍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夹在中间，联合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特里格夫·赖伊不断呼吁把联合国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全球组

织，但是这一号召当时听来只是一种悲鸣罢了。斯大林去世以及达格·哈马舍尔德担任秘书长这两个契机为这一僵局画上了句号。尽管中国的问题仍未解决—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取代中国台湾地区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但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已经对两大超级帝国的遏制主义失去了耐心，它们积极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仅在1955年一年，联合国就新增16个成员国及地区，其中包括刚刚独立的柬埔寨、老挝和利比亚。自此之后，联合国规模急剧扩大。1961年新增23个成员，而随后的10年中，又有33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至此，亚非集团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主导力量。

1955年，万隆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作为真正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世界的根本格局从东西差距转为南北差距。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在未来的任何人类权利公约中都把国家自决权置于中心地位。在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邀请下，有29个亚非国家及殖民地参加了这场盛会：与会者包括反共联盟中的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国、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以及中立国家印度等。1954年，美国创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将冷战的战火引向了亚洲，这就是万隆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尼赫鲁当时明确指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内涵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门罗主义，美国想要单方面驾驭东南亚各国”。苏联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的新型区域军事联盟引起了东南亚及中亚各国的高度警惕，万隆会议的与会者决定避免各国间毫无意义的冲突，要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展畅所欲言。毕竟相比于冷战来说，核武器大决战对各国的基本生存产生的威胁更为严重。甚至连美国的盟友—包括菲律宾和伊拉克在内，也都在为国家自决权据理力争。万隆会议上曾讨论过苏维埃政权在东欧的统治是否也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形式，这一争论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但是各国一致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会议还敦促柬埔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和越南等新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尽快履行义务，让联合国更高效地运作起来，使更多国家加入进来，摆脱世界强国的掌控。

西方观察员为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英国的国际事务理论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中表现了他的敏锐意识。他讲道，自己所说的“万隆势力”完全就是“马志尼革命派联盟”的翻版，这一势力试图把联合国打造成“反殖民运动的机构、神圣同盟的对立面”。另一位英国时评人士准确地预见到，新兴的独立国家会将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为确立阿拉伯及亚洲国家世界地位的一种手段，它们正在诉诸世界，要求赋予参与此次会议的国家更多（由联合国代表）的世界权利，而不是像联合国最初建立时那样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或多或少感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一方面被国内紧张的民权运动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惧怕爆发全球范围的种族战争。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心万隆会议会使“共产主义吞并”整个第三世界，他希望自己能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他还对过去的“泛亚主义”心有余悸：和许多其他国际主义分子一样，他们成长的世界对爆发全球种族冲突普遍心存恐惧。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很慌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迅速发展，而苏联因势利导，比美国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局势，正可谓“民族主义新精神为苏所用”。万隆会议一结束，华盛顿方面的事后调查组总算能稍稍安下心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雄霸”此次会议，许多会议结果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一致，并没有大幅度的偏离。

此次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让艾森豪威尔更加笃定地相信帝国霸权终将灭亡。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公开表明了这一观点，强有力地加速了非洲去殖民化的步伐。艾森豪威尔一反常态，开始接受并拥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分子的掌权者。非裔美国国会议员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 Jr.）参加了万隆会议。回国后，他提醒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在被问到美国应如何增强在亚非地区国家间的影响时，他回答道：“停止支持联合国内的殖民主义帝国；尽快解决美国内部的种族问题，并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外交部中任用更多的黑人。”杜勒斯曾与英国的外交部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商讨过也要组织召开一次“与万隆会议相极的会议”，他们计划在会议上宣布他们有序实施去殖民化政策的打算，借此制衡苏联。如果英国完全赞成，去殖民化的计划就能有效制裁苏联。美国的分析家们1956年1月这样评论道：“全世界人民都意识到殖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便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冷战阶段，全世界人民仍然万众一心，共同肩负着反殖民主义的重任。”从这一点来看，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供了天赐的良机，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才得以成为反殖民主义力量的领导者，而不是欧洲的殖民主义盟友。195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提出赋予联合国特权一事，这一次艾森豪威尔欣然赞成，而提出反对意见的安理会成员则是英法一派。艾森豪威尔准许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组织一个特设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去往中东处理危机。这或许就是联合国和美国共存关系中最显著的特点，它们同生死共存亡，联合国自此开始承担起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同时，这再一次显现出联合国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成功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际组织。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法国《世界报》（Le Monde）在1956年10月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在控制欠发达国家（常常被称为‘自由的第三世界’）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同苏联的对抗。”不过，艾森豪威尔的一举一动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国家自决权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的官方地位仍然受制于欧洲。对于英国和美国的众多观察者来说，帝国的覆灭来势汹汹，令人措手不及，然而如果固守殖民主义帝国，就不利于维持他们所谓的“国际社会”的稳定。用怀特的话说就是：

> 一些原始殖民主义的批判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尽快恢复尚未解放的亚非国家的自由权利，让这些刚刚解放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推进民主进程……历史上，这样的理想化转变被称为“巴尔干化”，这种转变意味着一些弱小国家因为长期的民族不和、残酷纷争逐渐分裂成小邦

> 小国，长久处于独裁和专制的动乱中。它们既不服从于国际法也不接受外交条例的约束，对于周围的大国而言，这些国家就是议会制政府以及战争爆发的所在地。

其他英法时评员则更加无所避讳。他们干脆公开为殖民主义辩护，有人说新出现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掌权者们没有能力统治世界，更有人假模假样地说他们或许懂得如何主宰世界，但是由于过于关注民族主义，由他们统治的未来世界必将成为少数民族以及边缘部落的噩梦。毕竟，尽管万隆与新德里以及北京还有些类似，但万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让与生俱来的帝国主义者担心，也让和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怀特一样善于思考的自由主义人士忧心。怀特在《色彩幕布》（The Color Curtain）一书中曾对这些问题进行过颇具挑衅性的探讨。

美国官方声明，美国主张“进化式自决权”——一个极具威尔逊特点的口号，这个主张让美国时而支持其欧洲同盟，时而站在印度支那以及苏伊士一方谴责欧洲帝国。不过，威尔逊主义在其中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杜勒斯曾经声明：“我们的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一个渴望政治独立的多民族世界。如果一个民族有能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并能为公认的文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而履行职责，这个民族就应当享有独立权。”从这一言论中，可以看出杜勒斯仍试图固守国家文明标准的旧观念。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极为期待向美国挑战。他想向世人展示，苏联有能力在技术发展方面与美国抗衡。因此，赫鲁晓夫执政时，苏联人造卫星发射进太空再次证明了苏联的现代化水平，他还向埃及、印度以及许多国家承诺苏联将会为它们的航空事业提供支持。苏联的一位领导人1958年首次访问非洲，他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上表示，苏联完全支持“国家自决权”原则。因此，当非洲人民被问到近些年他们最支持哪个强国时，不出所料，有25%的人支持苏联，只有3%的人支持美国。对于他们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受压迫民族的团结一致显然比民主更为重要。

1960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进行了投票表决。此时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并没有多少空间留给美国的外交家运作。独立宣言的想法最初来自苏联，但是该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由26个亚非国家共同起草的，大部分是基于全球广泛采用的万隆原则。然而，这一次欧洲乃至美国都投了弃权票。美国方面的弃权是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决定，因为此前英国首相曾为此事求助于他。不过，这次弃权却让美国国内大吃一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写道：“我必须声明，对美国的弃权票，我感到极为震惊和失望。”就连美国的国务卿也没能劝住总统。而艾森豪威尔的反对方则更加坚定地认为，艾森豪威尔在任期之末让欧洲主导了美国的政策走向。实际上，宣言本身并没有任何约束力，它只是陈述了所有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呼吁加快解放殖民地国家的步伐。但是，该宣言却是联合国为抵制欧洲帝国延续而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号召。1961年，在苏联的建议下，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专门监督殖民地独立的进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大会的崛起才显得意义非凡。冷战已经让安理会寸步难行：在20世纪40年代末，安理会平均每年能做出18个委员会决议，而到50年代时，每年的决议尚不足5个。相反，由于各国一致渴望和平，联合国事务处置权慢慢从安理会转移到联合国大会手中，从此以后，联合国大会便开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1955年，联合国大会的增员大大扩大了其影响力，随后十几年中立运动的兴盛也推动了联合国大会的发展。受联合国大会影响，安理会也实现了改革，1965年时，在改革的推动下，安理会成员国由11个增加到15个。联合国大会为民族解放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线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联合国大会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支持。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大会的这类宣传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有时足以消除军事劣势，甚至达到反败为胜的效果。例如，民族解放战线利用联合国对法国频繁施压，并且效果显著，这必然加速了民族独立的进程。戴高乐对此甚为恼火，说联合国大会就是“一群暴乱可耻之徒的议会，大会中永远不会有客观性的探讨，都是恶言谩骂”。他的愤怒正体现了联合国对法国施加的压力，戴高乐只能命令法国军队从殖民地撤退。

约翰·F·肯尼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热衷于宣传反殖民主义理念。1961年继任总统后，肯尼迪开始意识到世界政治力量的天平正在倾斜，他下定决心要在第三世界中赢得声誉和威望。肯尼迪倾向于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和主张。但是，他选择了为人低调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迪安·腊斯克作为他的国务卿，腊斯克正是杜鲁门联合国战略的先锋人物，他过去一直建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走支持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路线。1959年，腊斯克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任职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第三世界就是国际社会“最广泛的基础”，它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想”意义。腊斯克在作为肯尼迪国务卿的两年里，向全世界更为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宗旨，美国同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他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仍然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地方马上就会迎来独立和自由。在仍由不得民心之人掌握政治社会大权及土地的地方，那里的群众将迎来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新时代的英雄儿女会在各个城市大显身手，为他们自己以及国家确立新的雄心壮志，他们需要并将赢得自决权，承担起本国的政治重任。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一帆风顺。在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存在也必将出现各种动乱，但是在这背后会有强有力且充满建设性的力量支撑着国家成功地走过发展的崎岖道路：人民自决权将会在当代乃至后世日益得到巩固，而本民族也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

对于外界而言，在结束了制度相对森严的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之后，这样的雄心壮志令人振奋。过去的殖民世界在美国人的描摹下，重

新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的新面貌。镇压暴动逐渐演变成一项社会工程，技术支持和发展援助逐渐脱离了外交政策，转由工程师及经济学家负责，美国的民族利益自此变得更为广泛，这让诸如凯南一样的时评家们大吃一惊。腊斯克在1965年曾经说道：“美国不再孤立于世，不再只为实现本国的自由和繁荣发展而独自奋斗，美国也不再只关心美洲大陆或西半球的利益而忽略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现代化通信和交通发展之迅速，现代化武器的作用范围之广泛、摧毁力度之巨大都大大缩短了距离和时间。“二战”结束之后，现代化发展为我们的安全提供了诸多保障。如今的安全只是一种相对的安全，这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大环境是安全的。”（这是强调的重点所在。）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再一次定义，对美国的安全而言，看似毫无关联的外界或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和古巴、欧洲、日本一样意义重大。而美国也曾经历过民族解放独立的过程，所以他们正以美利坚合众国之名对民族独立做出独特解释，重新定位自己，并决心帮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美国为发展中国家自由独立所做的努力主要是由美国的自由组织机构完成的—其中包括“和平军团”和“国际发展机构”这样的新型组织。而正如腊斯克的属下所期待的那样，联合国并没有因此受到忽视。美国不可能是世界警察，腊斯克解释说，如果说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社会”是美国的必经之路，那么，联合国在其中的运作就至关重要。他坦率地承认，毕竟“一个国际组织相比于其单个的成员来说更好运作，也更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联合国的旗帜就是‘世界社会’的象征。有些地方只可以高挂联合国的旗帜，而悬挂其他主权国家的国旗会被视为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民族国家的存在，并愿意引导它们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腊斯克曾在演讲中这样解释道，“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联合国宪章》中描绘的“世界社会”—各国独立自主，根据本国需要自由设立自己的政府机构，而国与国之间能实现高效合作，互利共赢”。

美国外交政策逐渐朝着强硬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转变，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任期末初见雏形，在肯尼迪任期内得到大力发展，也让美国和联合国的密切关系更近了一层。苏联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消除国际上的积怨，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具有革命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因此赫鲁晓夫的第三世界美梦最终破灭。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对苏联心灰意冷，因为苏联甚至都没能尽力劝说桑给巴尔的苏丹王，这让这些国家倾向于向中国共产党寻求帮助。（苏联的批判人士曾指出，赫鲁晓夫政府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没能事先规划好苏联的第三世界战略，反而为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终一事无成。）

然而，尽管美国和联合国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之争，但在20世纪60年代，两方的密切关系也经历了短期的破裂，原因就是腊斯克想让联合国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而联合国想自力更生，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基石。冷战思维刻板僵化，认为共产主义无处不在。面对联合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剧变，这种僵化的思维必然会使联合国变成一个容易走向分裂的联合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其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过去由于过度服从美国意愿，触怒了苏联。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达格·哈马舍尔德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外交成就。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让双方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而去殖民化运动的加速发展也赋予了哈马舍尔德新的权力，这些都为他创造了相对自由开放的施政环境，有效地为他所用。同时，他采取的手段和缓而低调，并没有像赖伊一样仅仅意识到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哈马舍尔德在去世后一直被联合国封为史诗级的英雄人物，这还算说得过去，但是他政治策略上的敏锐性以及他对华盛顿方面的关注着实被人为地夸大了。实际上，哈马舍尔德并不在意人权斗争，也不关心联合国的专家技术部门，当然这些实务也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哈马舍尔德很清楚把联合国打造成以秘书长为首的国际行政机关十分重要，这让联合国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联合国的成立者们完全没有预见到联合国会如此发展；另一方面，这样的转变悄无声息，并没有引起各国的注意，这也让这位政治头脑灵活的秘书长把握住了时机，扩大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权力。哈马舍尔德一手操办了苏伊士和黎巴嫩的和解事项，借此证明了他迅速处理殖民危机的能力，展现了联合国在国际上维稳调和的重要角色。

1960年，刚果在后殖民时期爆发了内战，联合国以国际社会和刚果人民之名对这次内战进行了军事干涉，处理刚果危机使联合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此次行动中，哈马舍尔德不幸以身殉职。而刚果实际上并不需要维和，尽管联合国必须以中立势力出现在该国，但这里其实并不存在和平问题。哈马舍尔德的行为让刚果的局势愈加紧张，这引起了苏联的极度不满，赫鲁晓夫为此公然质疑他的公正性，不过哈马舍尔德成功地说服了苏联领导人，向他们展示了联合国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其强大的执行力。不过，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从广义上来说，赫鲁晓夫是对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公平”只是必要的外交辞令，而实际上公平基本上是难以实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哈马舍尔德的一位重要副官在危机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所关联导致了不公平的出现）。哈马舍尔德离世后，他的继任者缅甸外交官吴丹随即运用职权批判了美国在越南的外交政策，由此，华盛顿方面很快改变了以前培养一个强势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想法。

不过，美国对联合国失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联合国对民族自决权的保护推动了马丁·怀特所称的全球范围的“巴尔干化”。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代表就提醒过成立过多难以独立生存的微型国家的危险性。“不必要的政治分裂”也是1960年美国代表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投弃权票的原因之一。事实的确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微型国家数目激增。万国际联盟时期，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就因为国家过于微小，被取消了正式成员国的资格。而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均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并抵制建立成员国优劣等级制度的想法。的确，老牌殖民帝国如果允许联合国存在多种类多层次的成员国制度，他们定然会大受束缚，而他们的这些忧虑会加速这些微型国家加入联合国大会的步伐。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了两大派系，双方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冲突：一方认为，如果想修改成员国等级制度，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国家的主权是平等存在的；另一方则认为，如果对这些微型国家一视同仁，这些小国因为数目众多，会在联合国大会产生过大的影响，导致比例失衡，从长期来看，这会对联合国产生不利影响。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财政赞助国，美国自然会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哈马舍尔德并不甚关心对民族自决权的保护也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很是关注美国方面的利益，他还担心如果没能让联合国实现真正的改善，有效运作起来，那他在两大超级帝国中间的和平维护者的身份就会更加难以扮演。而他之后的下一任秘书长吴丹就截然不同，他十分泰然地看待联合国大会的这些发展。1969年，安理会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考察65个人口不足30万的备选成员国，调查其加入联合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过，事实上，禁止微型国家进入联合国从外交上讲是不可能实现的，1971年不丹的加入以及1974年格林纳达的加入都可以说明美国已经妥协让步了。

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和民族独立等同了起来，但这并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换言之，在联合国大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注视下，联合国除了能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由外，不能再为它们赢得其他令人信服的政治成果了。因此，在新西兰统治下的库克群岛人民为自治进行投票时，联合国大会一边拒绝承认他们行使了自己的“自决权”，一边承诺支持他们继续努力迈向完全独立。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只有15个人口不足百万的成员国，其他多数小国都处于备选状态，排队等待着加入联合国。这些国家不得不等到冷战结束后才能得到能否加入联合国的最终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甚至连安道尔都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了。

1994年，太平洋的小岛帕劳群岛及其两万岛民宣布独立，这也是托管理事会监管的殖民领土中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国际监管制度下的去殖民化尽管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却并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效果。用归谬法来看，微型国家或地区的地位获得承认并在联合国大会中拥有一席之地甚至都不算是民族主义的胜利。马志尼、米尔、马克思都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体的而不是分裂的，所以，现今这种国家分裂增殖的情形定会让他们惊诧万分。同样荒谬的是，托管理事会尽管早已无事可做，却仍然存续下来，成为联合国内部改革过程中几近瘫痪的一个受害者。该理事会并不运作，直至今天只以一个网站的方式存在。与此同时，联合国特殊委员会的去殖民化部门一直监督着西撒哈拉、直布罗陀、马尔维纳斯群岛、托克劳珊瑚环岛和其他几个主要的太平洋群岛以及加勒比群岛，这些地方均属于世界上16个遗留的殖民地（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同时该部门还有重要的周年纪念意义，比如它标志着“世界消灭殖民主义的第二个10年”。

在美国，人们随着这一形势渐渐觉醒。回顾民族自决权崇高原则的历程，一位国务院的历史学家1977年曾经谴责微型国家数量的迅速增加问题，他期待举办一些“凸显大国地位、弱化微型小国的国际会议”，和大国共同与会的不只是来自“巴林、不丹、科摩罗、马尔代夫、卡塔尔、

赛舌尔和苏里南等国的代表，还应该有一些颇具地域特色的国家代表，像阿法斯和埃萨斯、文莱、伊夫尼等国”。不过，用数字表示的问题并不是唯一存在的问题。美国逐渐发现自己在所有问题的表决上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多年来，美国一直谴责苏联对否决权的频繁使用，1970年美国在安理会的一次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否决权，美国站在英国一方反对对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置措施。为了保护犹太人，美国随后投出了更多的否决票，这使美国成了安理会中使用否决权的主要国家之一：1970～1985年的15年间，仅就犹太人问题，美国就行使了17次否决权。1970年，美国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将联合国之于美国的关系描述为“一定程度上损害着美国的利益而绝不是为美国所用”。

所有这些进展都为不结盟运动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一运动不断增强的实力让美国难以接受。1956年，杜勒斯曾批判不结盟和中立是一种“不道德且目光短浅的概念”，他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了摒弃。而美国方面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也从来都是不温不火，有些人曾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反殖民力量，而今这些人都被边缘化了。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不作为反倒使它更像殖民帝国的支持者。同时，“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国数目从1946年的18个增加到1965年的27个，到1973年更是增加到54个，这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已然成为联合国的核心主体。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在那些年高度赞赏联合国。“我们曾以为联合国可能还是会承继国际联盟的命运，世界还是会那么黑暗，尤其是对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而言。”1961年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如是评价。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惊喜地看到，在联合国的控制下，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冷战的两大超级帝国。它们曾在纽约之外召开过两次安全理事会会议（1972年在亚的斯亚贝巴，1973年在巴拿马）。这些领导人想尽量控制联合国的预算，还计划对联合国秘书处进行改革。在1974年年末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谈道：“现在唯一需要去殖民化的就是联合国的秘书处了。”7年后，在不结盟运动的干预下，尽管美国一直反对，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还是成功当选了联合国秘书长。至此，日渐崛起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不结盟运动开始在联合国中手握重权。

实际上，自决权的全球化扩展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成功都对苏联和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颠覆性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一直处于防守态势；到70年代中期，苏联在许多问题上与不结盟运动形成了统一战线，而美国也发现了联合国对自己不利的形势。问题就在于，美方阵营的人一直认为联合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多于美国对联合国的需要。1970年，联合国大会有127个成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亚非国家。从名义上看，联合国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稳定、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立法机构。联合国大会的扩大意味着民族自决原则的胜利，民族自决原则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新国际主义的基础；不但冷战没能阻止这一潮流，当时的一切仿佛都能推动它的发展。但是这一胜利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国家曾退出联合国。相反，与1940年前的国际联盟大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末仍在扩大，其成员增加到188个。不过，联合国大会的重要性是不是也随着成员数的增加而加强了呢？显然不是。去殖民化

本身就不能带来权力，它只是无关宏旨的枝节。联合国大会还远不能对世界大国构成威胁，对大国而言，联合国大会充其量算是个只说不做的清谈俱乐部。联合国政治最多不过是一种符号，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即便如此，去殖民化的胜利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标志着联合国的胜利，更是联合国达到的历史最高点。

第十章 重建世界之路（1949~1973年）

加里·格兰特：贫困国家的那些未被开发的资源应如何处置？桃乐丝·黛：就让它们保持原样吧。

—《春泪溅花红》（That Touch of Mink，1962年）

战后世界发展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出现了“国际经济发展援助”这个概念，这成了当时国际组织永恒不变的特点。

—沃尔夫冈·弗里德曼，1964年

“第四点计划”产生的背景

1948年，杜鲁门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赢得了连任。这标志着美国的政客们开始以更为系统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未来，也标志着杜鲁门重返联合国。杜鲁门此次回归不是为了拉拢苏联，而是要与其一较高下。美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命，这个想法正是他们新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他们认为必须向世界证明，在改善全球贫困人民生活方面，资本主义更胜一筹。此外，杜鲁门要让世界知道，无论列宁怎么说，资本主义都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词。美国政府还希望向世界证明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组织会终结欧洲的帝国制度，而不是使其得到延续，他们要证明各种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协助下可以找到人类发展的秘籍，让大家忘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失败的事实，并相信美国有能力通过科技和专业知识改造世界。这种想法是19世纪科学国际主义的遗产，科学国际主义曾经重塑了一个由决策者和专家主导的时代，如今它将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前景是任何一个国际联盟人都料想不到的。

在杜鲁门1949年1月发表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的新构想成为这届政府的基调。他先对前三项重要内容做了陈述，随后的第四部分内容被称作“第四点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让各国摆脱对美国紧急救援的依赖，计划毫无保留地指出了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并称赞美国的对外援助是在传播世界民主与和平。杜鲁门总统是这样说的：

> 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提高了生活质量，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了让那些贫困地区的人民也可以享受到这些进步，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胆的新计划。
>
>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的生存环境近乎悲惨。他们面临食物短缺和疾病的侵袭。那些地方的经济生活还处于原始阶段。贫穷不仅让当地人民饱受折磨，也阻碍并威胁着那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让人们摆脱贫困折磨的知识和技能……我相信我们掌握的科技知识应该惠及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提高生产力是实现繁荣与和平的重要途径，而充分将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更多领域则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由于杜鲁门之前并未表现出对科学技术课题的关注，因此他的讲话让美国的国际组织支持者以及国务院的技术支持专家们又惊又喜，这些专家还不习惯受到如此关注。杜鲁门认定全球贫困问题正威胁着美国式的生活，他向世界保证将同联合国的专业机构一道在“所有可能的地

方”开展除贫工作。他还称在殖民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巩固联合国的势力，并因此提出了让美国式思维代替帝国主义的计划：“传统的帝国主义掠夺别国的资源，而我们的计划则截然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一个以民主的公平交易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世界各国，也包括我们自己，将会从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善于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计划中收获巨大的利益。”

关于技术支持的讲话很少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当年美国对欧洲的资助力度仍旧让那些苏联时评员心有余悸，但他们忽略了杜鲁门此次仅仅向国会申请了4 500万美元这个事实（最终得到的拨款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出头），理所当然地认为杜鲁门要“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一个美帝国”，在为“彻底控制殖民地和贫困国家”投资。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美国政府计划投放的资源，但是杜鲁门给美国国家利益下了一个惊人的新定义却是真的。显然，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欧洲是否稳定，还取决于能否消除迅速蔓延的贫困给发达国家造成的威胁。这就要求美国重塑自己的全球形象，一个传统战略构想无法企及的形象，一个英国和任何其他欧洲力量都不曾拥有的、在全球具有超大影响力的形象。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解散欧洲帝国，让科学家、银行家和技术顾问取代其地位。美国担心自己会被“东方文明”淹没，因此选择先发制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发动种族战争，而是选择将殖民地国家西化。

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因缺少针对亚洲的系统性政策而苦恼数月。在美国看来，1949年年初，中国的国共解放战争进展得并不顺利，日本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欧洲复兴计划已经表明区域计划是可行的，却也使“东方世界分崩离析”之时人们都袖手旁观这一问题越发难以说清楚。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任何一个“区域的亚洲复兴计划”不仅会重组现存组织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要开始帮助百废待兴的农民团体实现工业化，这就需要对其进行长期投入，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和工业投资。该计划最终很可能会耗费巨资，但启动资金并不太多。一些资深政府决策者担心美国在海外的政策显得过于消极，且看上去太过专注于同共产主义的抗衡，因此向杜鲁门提议美国与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大量的技术培训计划……以及经济援助计划”。

美方的参与人之一、国务院经济学家约瑟夫·科波克（Joseph Coppock）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对这个新途径做了总结：

> 科波克：……美国决定两条路都走，一方面充分利用联合国和专业结构，另一方面用美国双边计划作为补充。
>
> 主持人：这样做是基于政治考虑吗？
>
> 科波克：不是。我只是从实际出发。你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一些国家通过它摆脱了特定的双边关系不是很好吗？现在人们普遍支持通过国际渠道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

> 把本国的专家派往任何一个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去提供援助，这样，来自美国的援助就可以补充联合国的援助了。但是无论如何，美国都是这类知识和技能的主要输出国。不管怎样，各类国际组织中都会有大量的美国人。

实际上，国际组织的存在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尽管与单边行动相比，这种新政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该政策为美国调整自身战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美国政府可以审时度势，决定何时实施多边协助，何时单独行动。

这种两面派的美式国际主义对我们理解为何美国在战后一直资助联合国各个组织至关重要，美国只有在其外交政策分裂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时才暂停了资助。大多数时候，美国都是两手抓，掌权的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国际组织。这一策略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及政治掩护，而代价却小得出奇：1954年全年，联合国及其主要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预算接近8 300万美元，其中美国资助了2 400万美元。那时，美国给希腊一国的捐助就高达6 800万美元，给全世界的资助总额为51亿美元。因此，说强大的美国在资助、控制并塑造联合国系统也不足为奇，所以从一开始就难以界定哪些是国际组织哪些是美国机构。尽管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开始资助联合国，但是与美国的贡献相比，苏联的资助不足挂齿—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仅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助，而美国的资助高达3 800万美元左右。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美国一样影响世界的发展。

“第四点计划”是杜鲁门在“四点行动计划”演说时提出的，是罗斯福新政成就的国际化体现。杜鲁门回忆了战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后称赞说“我国的技术知识还是很有名的”。一些美国人知道如何把“世界上未经开发的河流和落后的村庄”改造成制造财富的“发电机”。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展示了美国无须成为“总规划师”也有能力部署国内力量以改善数百万人民的生活。

>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美国人一样深谙科学技术的新魔力。我们的工程师能把贫瘠的土地、饱受贫穷折磨的河谷改造成绿草茵茵、灯火通明的世外桃源……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一个武器，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赢得亚洲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自然，这一成就的取得要特别感谢民主党的执政理念。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圣西蒙和孔德计划通过社会科学和专业人才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愿景与美国例外主义相互啮合，为这个自认为宽厚无私、杜绝一切帝国主义政纲和私利的国家提供了一份完美的外交政策。菲律宾的传教士、慈善组织乃至政府一直以来都在世代传习

美国的科学技术。1903～1923年，由洛克菲勒大众教育董事会开始，10个促进科学研究的主要基金会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最后一个。尽管这些基金会的日程安排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国际主义眼光，并且对社会改革寄予厚望。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角色更接近“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形势高度紧张时，该机构在意识形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成立被视为美国对极权主义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不违背民主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介入集体资产。这一举动既是对斯大林计划的机敏回应［作家斯图尔·蔡斯（Stuart Chase）1932年曾经发问：“为什么要让苏联人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也是对第三帝国兴建豪华基建工程的有力回击。英国生物学家、优生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后来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他在1931年见证了苏联将“科学精神引入政治和工业领域”。1935年，他造访田纳西州，亲眼见证了他定义的“应用社会科学实验”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成果，看到美国的发展并不落后于苏联，赫胥黎颇感欣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统筹规划农业、工业、发电、洪水防控、疾病控制、公共卫生、教育以及城镇规划等问题，既体现了美国科技现代化的构想，还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政府的倡议。

20世纪30年代，世界陷入战争的泥淖，这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就显得弥足珍贵且意义重大。东欧新兴国家因农民贫苦和人口激增而苦恼不堪。也许是无能为力，也许是根本就不想插手，国际联盟当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然而，东欧人民并不热衷于苏联强制工业化和土地集体所有的模式，也不愿像纳粹分子希望的那样做一辈子贫苦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新政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是，这笔横跨大西洋的交易却出现了两种走向。东欧地区一些颇具革新精神的著名经济学家当时正在积极思考农村贫困问题，想自寻出路。而大战过后，美国的发展理论被一些因政治因素而移居海外的移居者发展到举世瞩目的水平，这些人包括奥地利人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爱沙尼亚人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生于布达佩斯的彼得·鲍尔（Peter Bauer）以及犹太裔德国人汉斯·辛格（Hans Singer）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43～1944年，纳粹分子完全控制了德国。此时，罗森斯坦–罗丹已经开拓性地主张通过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刺激人口众多的“落后”地区发展，以实现“大推进”。他主张要先于市场考虑问题，并向人们展示了如果任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力量会让一国经济停滞不前，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海外资本也许会被用来充实国内资金储备，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的地区为了刺激增长也采用了这种模式。此类情况不仅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欧，亚洲许多地区以及非洲和南美在战后也都有相同经历。罗森斯坦–罗丹于1947年入职当时羽翼未丰的世界银行，后来转而为世界各国政府出谋划策，麻省理工学院也因为他的存在成了极具盛名的冷战发展思想的集训地之一。

美国的发展主义论者是两次世界大战战期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在其他地方也十分盛行。20世纪30年代，南美的出口遭受重创，于是这一地区的各国政府只能通过扩大内需、鼓励制造业等新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忘记这段经历，他们因此成了用进口取代出口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并在战后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欧人主张相对封闭的国内工业化，而美国人则支持用更加开放的经济模式促进发展，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则是高效农业。除上述地区外，发展主义的专家意见还有最后一个来源：帝国。两战期间，英法两国政府不断摸索提高殖民地经济的方法，降低对其资助的力度，通过商品市场管理局和附属基建计划等机构改善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在非洲，那些“熟识当地居民”的地区首领被科学顾问和技术官员取代。政权独立之后，他们的专业知识会受到新一代民族主义分子以及为他们提供建议的国际机构的重视。就这样，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殖民政府中出现了一代技术人员，“二战”后，他们将继续在国际发展机构中任职。

20世纪40年代，这些思潮汇聚于美国，于是，美国成为发展主义思想的中心，当时，战争使整个世界强烈希望一种类似新政的政策出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也许是美国左派最著名的国际主义者。他在1941年称现代科学能“从技术层面让全世界人民吃饱饭”。1940年，国际联盟的技术官员从日内瓦赶来，他们的经济学家根据世界人口的热量摄取值划分世界，统计学家们也提供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国民收入总值供各国对比研究。在国际联盟的努力下，政策规划者们可以应对眼下的战争需求，并且可以探究导致贫穷、饥饿以及失业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地理学家忙于制订宏伟计划以安置世界过剩的人口；人口学家开创性地研究了现代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的社会科学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水平，并且具备了制定更宏大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潜力。

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之路

20世纪40年代，实现发展还有另一种方式，但不是通过某种理论，而是在战时紧急行事调配军需物品。举例来说，中东补给中心是协调整个地中海东部物资的英美办事处，也是战时国际合作的试验地。该中心负责人澳大利亚海军官员罗伯特·杰克逊是一位3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运营下，补给中心的办事效率高得惊人—至少有一位战时英国将军会收到首相这样的指令：“按杰克逊的要求行事，不可违背。丘吉尔嘱。”杰克逊20多岁时就已经负责马耳他的防御工作了，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那段经历让他难忘，此后，这一成功事例还成了此类物资调配任务的典范。但是，物资调配工作面临的挑战不只存在于技术层面—在封闭的环境中，物资十分有限，如何维持生命就成了难题，还有来自人民和社会的挑战：在局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如何说服各行其志的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确实是个挑战。在中东补给中心，杰克逊像战时独裁者一样叫停了阿拉伯地区的食品生产。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试图从整个地区的大局出发，协调农民和消费者的需求。在这几年中，农作物增产，对军队的供给力度也加大了，但并没有以牺牲百姓的健康或生存环境为代价。在一个仍然高度封闭的经济环境下，这种做法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起到了颇有影响力的示范作用。然而，当今人们谈论起中东现代史的时候却鲜少提及这辉煌的一页。

杰克逊也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长官，战争结束后，他升职负责协助运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是实至名归。善后救济总署是联合国援助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机构，该机构的总负责人是经验丰富的美国政治家赫伯特·雷曼，杰克逊十分崇拜他。雷曼负责美国国内政策制定的时候，杰克逊就负责过日常执行事务。在这些实干家及其下属的努力下，1945年后，世界向和平的过渡才没有像“一战”结束时那样带来公共卫生危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量庞大，范围极广，深入苏联和东亚。1946年，由共和党领导的“无作为”国会对此表示抗议，他们以美国的钱不能用来支持共产主义为由，强迫杜鲁门终止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对此，杰克逊和雷曼都十分失望。但是他们已经证明了一个真诚的国际组织是有能力提供援助并且避免社会动荡的，它甚至能够参与到具体的发展工作中去。如果杰克逊能继续连任，协助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让联合国更加高效地运行，那么联合国之后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模样了。但是杰克逊只是行政官员，并不是外交官，他的行事风格适用于战争时期和其他危机时刻，却并不适合和平时期黑暗的国际官僚政治。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散后，其他救助机构纷纷成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联盟时代此类组织的加强版，受其领导人战时经验的影响，这两个组织的思路超前，目标远大。来自美国的经济支持对它们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这两个组织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美国享有

的特权和援助方向对其行事方法和目标的深远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战争的产物，它是1943年在罗斯福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1946年才开始全面运作。该组织的首位总干事、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爵士把战时对全面规划的信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接手了国际联盟关于全球营养需求的工作，同时他还认为有必要成立世界粮食委员会来消灭全球的饥饿问题。该委员会可以强制规定食品价格，并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分配剩余食品。世界粮食委员会由专家而不是各国代表运营：在博伊德·奥尔眼中，这一理念基本上是战时非常流行的国家定量配给和重新分配机制的延续，也是向和平的延伸。许多殖民地国家很欢迎这种理念，但是欧洲和美国的食品生产代表们很想冲破这种思想。国会对此持坚定的反对态度，毕竟，成立一个致力于确保全球人民都能吃饱的国际组织与美国设想的自由贸易机构大相径庭—这件事尤其激怒了1946年时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其愤怒程度不亚于国会对社会主义的愤恨—世界粮食委员会很快就因为一些更平庸的目标被终止了。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着相同的经历。1945年在旧金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专家们提议大会成立一系列国际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就此诞生。尽管该组织1948年才正式成立，但在准备阶段，该组织的员工就参加了1947年抗击埃及霍乱的工作。该组织还在欧洲兴起大规模接种肺结核疫苗的活动，并且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希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培训专业的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但该组织最终还是接管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抗疟疾的工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疟疾。这项工作同时致力于农业，与一些发展专家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该项工作也是主张政府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派与美国主张用先进制药技术消灭疾病派之间激烈争斗的一部分，美国在这场争斗中获得了最终胜利。

在新建的联合国专业机构内部，对这些机构的定位及政策进行初步讨论和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的提议，即让技术支援成为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并鼓励通过联合国实现这种发展。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而言（尤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实际上整个联合国都包含在内，技术支援是一种可行的且相对温和的手段。民主党的成功为杜鲁门政府开辟了自己的筹资渠道。资金不足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因此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组织启动了许多扶持各国的计划，重点向第三帝国派遣美国专家对同行进行培训。此举是冷战时期圣西蒙愿景的放大品，美国就此把资金投到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技术专家队伍中去了。在花费不多的前提下，美国掌握的技术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的发展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展理论逐渐演变为美国的社会科学，其结果之一就是发展工作越来越像全美自上而下的内部事务了，美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越来越少。太多的资金支持不一定都是好事，在战前帝国秩序中，大多数发展计划因受到殖民地精英们的意愿和想法的影响被终止，甚至

被那些精英左右；资金短缺以及殖民政府同非洲和亚洲知识分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影响因素。20世纪30年代，印度国大党设立了一个规划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就是“影子政府”，对于它的存在，英国政府无法坐视不理。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当全世界都在寻求发展时，这种发展却大大偏离了那些正在发生的事实。尽管享受着丰厚的资助（战后，美国对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投资远远超过英国），但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一种“一刀切”方法的严重束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58年美国召开会议讨论非洲发展需求的日程设置时，根本没有非洲人参与其中，该会议甚至没有对非洲大陆发展需求进行过任何评估。会议组织者认为非洲人与受科学驱动的西方专家们不同，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看待问题不够公正。

在这些追逐私利的科学假象背后是美国对发展主义的信奉，这种思想令人担忧。至少在形式上，美国是反对欧洲帝国的，但是这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较少受西方控制的世界，到时所有专家都预言从前的殖民地会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发展理念的背后潜藏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噩梦，即文明的西方被黑色皮肤和棕色皮肤的人淹没。回想1927年，国际劳工组织负责人曾呼吁“让一种超越各国的权力机构合理公正地规范人口分布”，当时这一提议饱受争议。20年后，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坚定的优生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更进一步，建议联合国支持“世界人口政策”出台。第三帝国溃败后，把联合国变成国际优生学机构的想法无疑会带来麻烦，这时联合国秘书长明智地制止了这种想法。（赫胥黎后来成为英国优生学会的主席。）但是，英美人民的担忧却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联合国公布了首份官方的世界人口增长数据后更是如此。美国通过各种基金会、私人组织和后来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控制联合国的热衷者，最终成功建立了一个只能被描述成“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其运作完全不受成员国的约束。

为达到这一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一机构就是美国实行多边发展的首选工具（该机构近年以世界银行之名被人熟知）。巧合的是，在银行内部进行重新自我审视的关头，杜鲁门在1949年的讲话强调了私人投资的地位。该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稳定被战争摧残的欧洲局势，但是在马歇尔计划从联合国手中接过这个任务后，世界银行就要给自己的存在找一个新的理由。银行的董事们最后决定回归他们的长期任务—发展，并向华尔街寻求资助。杜鲁门对发展的推崇正是时候。

我们所熟悉的世界银行正是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在意大利南部、印度和哥伦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任务形成了一系列全面的宏观经济评估数据，以及应对大规模项目的策略，这些项目包括修建钢厂铁和水坝等等，意欲带来变革性影响，同时还可以刺激国内经济并实现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和拉格纳·纳克斯主张的“大推进”。但是世界银行深知有必要在其贷方中建立公信力，因此行为谨慎、保守，还培育了公平和崇尚技术专长的社会风气。杜鲁门政府愿意通过标新立异的进出口银行（其放贷标准并不规范，受政治的影响较大）与墨西哥、印度和巴西这

样的潜在客户建立双边贷款关系，对此，世界银行功不可没。

然而，联合国内部对由美国主导的发展趋势看法不尽相同。许多联合国官员都有在不同国家工作的经历，因此，他们希望从联合国得到的资助远高于美国愿意提供的数额，他们还希望让可以帮助第三世界摆脱依赖商品出口的工业化战略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之前英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会面时已经探讨过，如果要让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发挥功效，应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干预世界经济，只是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再是以欧洲重建为背景，而是以全球发展为背景。

杜鲁门发表“第四点演讲”后，联合国发布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报告，暗示美国的投资应当数目更大且更加系统化，即应当超出白宫预期的数字。第一份报告主张更广泛地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就业，防止大萧条再现；第二份报告分析了“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对贫困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本投资；第三份报告挑选出一些“极为贫困的国家”，并鼓励世界各国对规范贸易市场和商品价格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和其他国家强烈要求美国做出让步。因此，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联合国就成了美国政府观点的替代选择—不以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而是通过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重新分配力量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能否推进如此广泛的发展计划尚不确定。技术支援相对容易，而且不会引起争议，美国也愿意帮助联合国组建相应的部门，这个部门就是之后规模更大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萌芽。但是美国并不希望联合国单独出资赞助发展计划。联合国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世界银行总裁尤金·布莱克（Eugene Black）称他是“联合国内的极端分子”之一，他经过研究支持联合国成立自己的软借贷机构。此时，联合国的专家被派去劝说布莱克扩展银行业务，而当时布莱克最希望的就是给银行保证人赢到3A等级，但这个愿望直到50年代末才实现。实际上，银行的股东们因为担心联合国的政治影响会危及他们在华尔街的信用等级，已经有意将联合国放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对此他们的观点早已达成一致，既认可银行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身份，也保留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的身份。很快，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呼吁联合国开发自己的发展基金，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外，联合国代表大会也通过投票批准了这一提议，这一结果被美国（和英国）官员看作是本国“严重的失败”。尽管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但实际上他们却表现得言行不一：因为他们的资助主要来自美国国会，这样的机构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成立。

1953年，共和党接手白宫后大量减少对外援助，美国把联合国打造成促进发展的主要机构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艾森豪威尔对全球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运动的宏伟目标并不感兴趣。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当美国国际主义者步入某种国内流放的状态，等待新一届更有同情心的政府时，迪安·腊斯克任命国务院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按照雷蒙

德·福斯迪克的想法，把基金会打造成了财力雄厚的投资人，资助美国发展专业技术，以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曾在欧洲高效执行过马歇尔计划的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加入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曾经绕路去了福特基金会，在那里成了全球发展颇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他的加入对联合国来说意义更大。1957年，基于自己在欧洲的经历，保罗·霍夫曼发表了一篇文章鼓励世界银行拥有更多软货币。第二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联合国设立自己的基金资助机构，而霍夫曼是其负责人。1965年，他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首位总干事。尽管有人批评联合国“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却仍是一副穷酸相”，但霍夫曼与白宫民主、共和两党的交情使来自国会的资金资助有了保障，此外，负责马歇尔计划的工作也让欧洲捐助政府对他有了信心。这样，霍夫曼的开发计划署很快就筹集到大量资金，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业资金中位居首位：到1971年，开发计划署每年的支出达到2.9亿美元，这一数额让联合国在公共卫生、教育和其他专设机构的投资相形见绌。霍夫曼负责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不再受传统技术支援的束缚，它同世界银行密切合作（尼克松总统越来越支持这个机构）资助矿产资源的勘测，并为绘制边远地区地图、建立新工业试验基地提供资金，这些为今后吸引银行或国外跨国公司的资本铺好了道路。

华盛顿方面担心苏联会涉足援助政策，给美国造成威胁，因此推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试验，即在联合国内外利用国际组织促进全球资本投资流动。赫鲁晓夫一结束访问中国、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行程，就被任命为新的政党领袖，他强调苏联有意协助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发展”。赫鲁晓夫的这种主张不再是那个莫斯科方面期望看到的、通过共产党实现世界变革的共产国际主义了。这是一个更折中并且体现了机会主义的构想，苏联政府把手伸向由民族主义者控制的精英群体，忽略他们在各自国内打压、边缘化共产党的行为。苏联同此类精英群体联手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或者对列宁的忠诚，而是因为他们要共同抵抗“帝国主义”，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国家经济增长，这才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万隆会议召开的第二年，赫鲁晓夫在他的演讲中宣判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再次提到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特殊理解：

> 列宁曾经预言，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东方各民族会在决定全世界命运的事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并在国际关系中成为新的、更强大的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尽管有些民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了让国民经济独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它们也参与其中并能从社会主义的成就中获利。现在，这些国家不必为了得到现代化装备而央求它们原先的压榨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装备。

尽管苏联的援助力度不及美国—1954～1956年，苏联共资助了10亿美元，恰好是美国的1/5，但这也足以让美国国际主义者感到焦虑，更何况他们知道，对于非洲人民来说，苏联的形象比美国更具吸引力。

在霍夫曼的领导下，联合国开发计划不断扩张，因此美国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发展全面的社会转型理论，超越了杜鲁门的所有先进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人深刻认识到苏联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但他们相信美国有应对能力。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解释经济自给国家的崛起现象，继而对此制订政治方案。英国工业革命突然从乡村转向城市和工业社会，罗斯托视其为其他现代化国家工业革命的原型。他还把马歇尔计划（他曾参与其中）看作同时发展民主和现代工业的政治典范。之后，他评估了欧洲的经验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1960年，罗斯托著书介绍了这些经验，该书被谨慎地命名为《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书中认为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竞争推动了整个计划。书中还描写了沃尔特·惠特曼与卡尔·马克思、美国理想主义者以及反日耳曼唯物主义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实际上，该书就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而著的。

现代化理论为世界通往更加美好和稳定的未来搭建了信心的桥梁，还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间划定了明显的界限。历史是由一种社会通往另一种社会的走廊，所有人都终将从此处走过。而一些正确的思想可以加快这个过程，若是少了这种正确的建议，人们就会像德国人那样误入歧途。人类学家可以解释传统做法和传统信仰带来的悲惨后果，还可以弄清楚重新评估社会价值的障碍是什么；人口统计学家会向人们展示进入一个不用过度消耗资源就能实现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经济学家可以指导投资、制订计划，在最大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在新型社会中，道德标准也更加清晰：第三世界的政府和美国顾问们共同努力缩短过渡期，并确保社会转型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保持一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罗斯托的人，但是他们不满足于只写几本书，他们同样致力于政策调整。罗斯托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现代化是挑战传统的共和党治国方法的有力武器。1957年，他和他的同事马克斯·密立根（Max Millikan）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称他们的做法过于老套和肤浅。他们发表文章说美国过于强调“公约、条约、协商和国际外交政策”了，而在“探究在世界上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的本质”方面是失败的。罗斯托、密立根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合作，他们认为由专家主导的发展可以促进民主和社会转型，这个计划在民族革命时比马克思主义更能激起民众的支持。在通过发展经济自足式增长找出实现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前，要考虑文化变迁、村庄规模和农业技术这些问题。罗斯托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认识到赢得农民阶级的支持、转变农民观念的重要性，他可以用为农民提供农作物种子和专业建议、重新规划村庄等方式实现这个目标。这样做可以迎合农民的利益，减少饥饿，最重要的是可以减缓那些容易变得激进的年轻人涌入城市的速度，这些年轻人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罗斯托的工作基地，现在那里成了研究现代化高级官员的社会科学试验室。而罗斯托本人则成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的政策顾问，他随后在肯尼迪政府担任高级国家安全顾问。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将满之际，发展经济学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门学科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自由市场不足以保证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的思想成为主流。美国的激进民主人士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第三世界精英们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美国的技术支援项目和联合国是这两类人之间的桥梁，是美国实现在第三世界扶持正确的民族主义以便同非洲和亚洲的领导人取得联系、为他们提供建议和支援的手段。1951年，联合国的一个专家队伍建议“落后国家的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中央经济体，以展开经济调查、制订发展计划、为实现这些计划提供必要措施建议并定期汇报进展”。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措施成为全球标准。罗森斯坦–罗丹、W·亚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和汉斯·辛格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学术界、联合国、美国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官员顾问之间转换，他们起草了培训第三世界政府核心队伍的计划。就在这时，大多数后殖民世界政府成立了国家规划机构和工业发展公司，那些地处西方的国家则效仿美国战后的做法，组建了自己的开发机构和部门来带动双边援助。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成为多数美国重点大学的课程，与此相关的文章和学术期刊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美国各党都有这个潮流的支持者，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人造卫星之后这种潮流的影响尤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掌握古巴政权、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开放马格里布加入冷战的较量中后，艾森豪威尔意识到需要通过发展对苏联做出回应：他不仅支持成立美洲开发银行，保证10亿美元启动资金的近一半会划拨到位，还启用新的地区基金资助医疗卫生、住房以及土地改革事业。1960年，他主张在世界银行实现软贷款融通，在他赞赏的银行纪律框架内，这是他们对贫困国家更有力的承诺，对非洲来说尤其如此。

之后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绿灯只是肯尼迪政府中最优秀、最精明的精英们制定的政策之一，这些精英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傲慢不羁，坚信改革的力量。在接受了罗斯托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后，肯尼迪越来越广泛地投入到发展事业中去，这是艾森豪威尔无法与之相比的。肯尼迪曾公开表明反对帝国主义，他强烈希望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们表明美国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他表示美国人“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头人”，然而实际上，他们却让苏联占了先机。肯尼迪推进了由杜鲁门开创的两国派国际主义，创立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开发总署要负责为双边援助提供资金，还要支持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发展计划。1960年9月，肯尼迪前往联合国，成功地将20世纪60年代定义为发展的10年。但从长远来看，这10年间的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其短期成效却广受好评：好莱坞接受了这一主题，1962年，在电影《春泪溅花红》中，加里·格兰特在联合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支持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给桃乐丝·黛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在1963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大会上，肯尼迪呼吁综合治理全球的饥饿问题，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算涨了10倍。用多边手段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愿望和美国希望通过分配剩余粮食获得外交优势的想法相互妥协，成就了世界粮食计划署，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同联合国日益亲密的关系。

在肯尼迪任职时期，繁荣景象的背后隐藏着发展思想残酷的一面，

美国一直认为那是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原则。镇压古巴革命的“猪湾事件”失败后，肯尼迪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另一个美洲国家转型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想法的驱动下，美国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倾向于军国主义。在后殖民时期，美国政府真正关心的不是实行民主还是专政，而是冷战的走向。军官是美国新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196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议依靠第三世界各国的军官促进发展时，与军官合作就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当年肯尼迪迅速投入大笔资金援助玻利维亚军队就是一个例子，玻利维亚立刻用这笔钱粉碎了各类联盟，尤其是组织精密、武装精良的锡矿矿主，还打击了左派势力，并为1964年的政变铺路，这场政变带来了长达20年的军事独裁政体。印尼的军队也在一场残酷的大屠杀中夺得了政权，据估计，有50万人死于这场杀戮。如果说玻利维亚和印尼分别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成功以及胡志明的胜利埋单的话，约翰逊政府不仅批准还赞扬了由美国训练的印尼经济学家在之后的独裁中的表现。随着“拿着枪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这样称呼他们）的出现，独裁者和具有胁迫性的发展主义除了依靠美国的资助和举措，还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伙伴。

越南是现代化理论最后的战场。毕竟，罗斯托在肯尼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时负责这片区域，而且这里还成了所有现代化理论的实验地。约翰逊希望在此建立一个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那样的湄公河流域发展机构，以及一个强制安置点，收留因战略计划而被迫出走的村民。但是这些举措都没能压制越南共产党。心理战的效果越来越糟糕，美国及其同盟又遭遇挫败，罗斯托因此重拾大规模轰炸计划，这是他在从事欧洲的战时轰炸调查工作时学来的。这样，战争和发展自然又被联系在一起，而罗斯托最终成为约翰逊政府主要的鹰派人物之一。在乐观情绪和事态发展的影响下，罗斯托扩大了轰炸范围，犯下了战争罪行。到如今，罗斯托的事业以及现代化理论都没能恢复元气。

尽管这并不绝对意味着镇压行径和独裁主义的复苏，越南境内也很少见到大规模爆炸事件，但这种在战后早期十分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发展主义还是能打压到各种狂妄野心。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专家策划了臭名昭著的脱离实际、过分低估清除灌木丛难度的“坦噶尼喀花生计划”，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植物油出口部门，实现赢利，然而计划实施后，当地却因此成了风沙侵蚀区，耕地也遭到了破坏。相比之下，“沃尔特河流管理局”就很成功了，该局是“后独立”加纳的主要电力来源（现在仍然是），但是为了改造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谷而开展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式的计划不仅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灌溉系统，还向世界展示了野心过大企图改造整个社会是多么愚蠢的行为，除此之外，该局毫无建树。沃尔特河流管理局试图击败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共产主义势力，却在当地引发了动乱，还导致该局要接管这片区域。对增长之谜的技术关键的探索努力（美国发展主义的支持者似乎对此尤为感兴趣）让世界对开发小麦和大米新品种寄予厚望。所谓的绿色革命是冷战时期的宣传术语，用来赞扬美国技术帮助亚洲远离共产主义的举措，这不仅让解释粮食增产这一复杂问题变得简单，还夸大了农作物种子本身可能带来的利益。

与大多数美国人相比，非西方人更热衷于工业化，也更渴望进口替代品，他们不太担心人口增长，认为粮食生产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当然最重要的是，非西方人更能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机构和文化的现状。但是美国的发展专家发现，就算各个援助机构开始着手分析他们资助的计划有可能带来的社会性结果，他们也很难顾及那些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人的想法。分析结果显示了计划可能带来的破坏，他们的想法虽然改变了，但速度缓慢。至此，人们首次得到了可供比对的全球经济数据，而数据传达的信息却不容乐观。如果说原先那些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也有所增长，那么与战后欧洲和美国的繁荣景象相比，那些增长就都微不足道了。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各个国家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多亏了国家收入数据让这一差异明白可见）开始显现。更糟的是，如果不绕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全球贸易扩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就更小了。

一开始能力有限的联合国开发团体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发展，但是该组织在解释做错了什么以及该做什么这些问题时的表现还是难尽人意。1969年的一份惊人的内部报告质疑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效力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种种原因也随之浮出水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定增加预算的领域前夕，这份报告才刚刚出炉。报告涉及的不只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分析联合国发展举措的报告中，它很可能是唯一一份深刻而犀利（幽默）的报告了。罗伯特·杰克逊曾任职于中东补给中心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他领导的优秀团队及其伙伴玛格丽特·安斯蒂（Margaret Anstee，后果成为首位女性联合国副秘书长）是这篇报告的撰写人。该报告是在参考了探究国际合作的数据后撰写的，因此其中的分析极具影响力。

像它的题目所言的那样，这份“能力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联合国的能力辩护与正名。作者们赞同联合国对实行技术合作的承诺，认为联合国最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在他们看来，这一组织的问题是在过去20年中发展的不连贯性。秘书长能力有限，无暇顾及联合国数量庞大的组成部门—这一现象自赖依起，在哈马舍尔德时期加剧，在吴丹成为秘书长时达到顶峰，反美联合国大会（anti-American General Assembly）成为联合国内部又一权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组建的机构缺少总体规划，它们都想从发展中分一杯羹。在这20年间，联合国拥有12个以上的专门机构和一套丝毫不起作用的监管机制，在其成员国的带领下，联合国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噩梦，而不是一个有效的协调者。这一切的结果是，这个国际组织看起来“没有什么高招管理自己”，它的发展计划甩开了该领域的专家，过于集权化。报告的首席作者罗伯特·杰克逊说：

> 联合国的动作变得缓慢，涉及的领域也不及之前广泛，就像个过时的巨人……多年间，我一直在寻觅指导联合国发展体系制定政策、运作组织的“大脑”……但是没有找到……联合国发展体系一直想打一场“贫困之战”，但是没有一个思维缜密

的“大脑”来指引它的行动。这种思维的缺失也许是联合国最大的束缚。没有它，联合国开发体系未来的演变过程很容易重蹈那些过时机构的覆辙。

《能力研究报告》继续发出警告称，如果联合国自身的基础改革失败，那么它作为发展事业领头人的地位将受到其他机构的挑战。

然而，现阶段的联合国是否起到了发展事业领头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商榷。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发起的美国双边援助（它为美国过剩的农作物和多余的设备找到了出路）成长迅速，相比之下，其他的国际机构显得微不足道：到1976年，美国单独给埃及的经济资助就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部预算的三倍。在多边机构中，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领导的世界银行直到20世纪末都扮演着动力源的角色。大概在1970年，基辛格提醒尼克松，尽管对美国来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重要，但是现在“它的重要性尚不及世界银行”。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金额从2.39亿美元提高到5.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国际发展署的软贷款资助增长得更快，由2.88亿美元提高到12.78亿美元。这些数字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是，霍夫曼领导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世界银行合作紧密，甚至以它的名义开发项目。因此在这10年中，世界银行加强了对联合国下属机构的控制，成为全球援助最重要的角色。

这个组织的结构缺陷（被《能力研究报告》毫无保留地披露出来）只是部分原因。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政治上，关于发展的意义和目的的争论以及因此导致的紧张关系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明显，现在，它已导致一场新的国际争论。随着去殖民化国家与南美及中美国家合作的兴起，国际经济构想在联合国有所发展，这给美国的发展思想带来了极大挑战，并预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之路。

通往国际经济新秩序

“富有和贫穷两个世界间的冲突正在恶化，”1975年12月的《时代周刊》撰文道，“它们的战场就是这个世界。”实际上，这场冲突自去殖民化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给予发达国家比以往更多的话语权时就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和日本强势回归，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世界主要的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联盟的身份进行了统一投票。1962年，由中立国家组成的团体在开罗会面，要求展开关于贸易和发展的国际行动以对抗这些挑战。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于同年晚些时候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要求，并提议就此召开联合国会议。

南北战线更加明确了。亚非国家联合体和拉丁美洲国家占据了联合国绝大多数席位。尽管欧洲和美国反对，但这次会议的申请还是获准通过了。1964年，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118个国家出席了此次会议—1947年商讨成立国际贸易组织的会议只有23个国家参加，这意味着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这一事件尤其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凝聚力。七十七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的组织。他们的团结一致给西方外交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们感到了不安。之前，西方世界不仅反对召开会议，还反对选举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担任会议的组织者。但这两项否决最终都被驳回了。普雷维什领导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成了一个杰出的组织，该组织对国际发展事业以及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基于国际贸易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普雷维什主张全球再分配，他宣称，没有一种原则性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世界经济的边缘体要独立，为什么要阻止一个国家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政策。因为当缺乏与之抗衡的势力时，对外贸易便会惹来麻烦，与边缘经济体出口的初级产品相比，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普雷维什还认为贸易是后殖民时期的一种奴役手段；他认为市场应该是仆人而不是主人，否则就是帝国的延续，就算此前帝国已经被消灭，也会因此死而复生。他的报告恰当地总结了当时的批评声音，反映了“一种国际经济政策哲学，可以被描述为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化的贸易保护主义”。

普雷维什接受委派，负责1964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并把它打造成一个超越一切、受联合国秘书处直接干预最少的独立体，他用他的组织天赋和对戏剧性事件的洞察力成功地举办了会议，还很好地宣传了自己的想法。有趣的是，这次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体制中遇到的困难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问题在于成熟市场故意把发展中国家拒之门外：可以起诉欧洲共同市场为保护法国农民而在西欧设立新

的关税壁垒这种做法。这两种说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与普雷维什的观点不同，第二种说法认为问题在于干涉自由贸易的做法，而并非自由贸易本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名字已经表明贸易改革和全球发展事业是相关的。对于前者，正在进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协商找到了改善的办法；而后者则需要更彻底的办法。普雷维什的观点相对温和。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切·格瓦拉发表了一次冗长的演说，他警告各位代表不要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诱惑蒙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样的组织或协定只有一个目的：为保护美元而拯救资本主义。只有落后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才有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终结人与人之间的剥削”。

这些信息获得了善于采纳意见的联合国代表大会的认可。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担心由采矿企业和银行兴起的“经济新殖民主义”会控制它们的资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现状令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对美国和西方的敌意日益增长。尽管这些国家希望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模式不怎么吸引人，但他们还是被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吸引住了。他们同样担心贸易自由化会阻碍自己的发展计划。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打入西方市场的优惠条件或技术援助，还有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低息贷款、商品价格支持以及打破维持海运费用等居高不下的西方卡特尔等等。据普雷维什估算，若想成功，联合国在发展的10年中要保证年增长率至少达到5%，且年出口增长率达到6%才行，或者由西方带动巨大的资本流动增长。肯尼迪的承诺账单已被列出。

这些数字很快就成了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的攻击目标，他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与会者了。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政治上的成功令人惊喜。它赢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缓解了物价暴跌对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在促进第三世界打开欧洲市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之，这次会议鼓舞了七十七国集团中的所有国家。多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会议才最终同意组建一个永久的秘书处负责4年一次的会议。此后的20年，秘书处成功地使南北争端出现在闪光灯前。

然而，将争端置于闪光灯下并不代表有人做出了让步。在此期间召开的一连串会议旨在唤起发达国家的羞耻心，从而坚守各自曾经做出的承诺。但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本身相对较弱，由于各国追求的利益截然不同，该组织内部分裂成好几组核心势力。因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根本无力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甚至无法监督各国的执行情况。它关注的内容越细化—商品价格、货运政策，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就越容易产生分歧，越难达成一致。因此，该组织的领导者倾向让事情停留在抽象理论阶段，而这又容易激起更多不满。1972年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时，激进分子和实用主义者就因为是要拥护这个新的合作组织还是把它当作煽动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产生了激烈分歧。

同年，乔治·H·W·布什（随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样建议总统

尼克松："我们要延续攻势，并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支持联合国的。"越南战争鼓励了联合国大会中的激进分子，反美的声音随之高涨。乔治·H·W·布什遵循自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实行的美国外交路线，建议强调"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但是，当今的国际社会很难接受原先的做法了。相反，数额惊人的战争支出导致了通货膨胀，国际经济也因此失去平衡，许多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国家因此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希望除了控制物价和贸易条件外，集团能在更多领域采取措施。跨国企业的活动开始主导全球制造业，七十七国集团希望控制这些跨国企业，并试图停止有关经济增长的争论，转而探讨不公正问题。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垄断了石油产业，石油价格上涨，西方国家首次在世界经济中丧失了主动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欢欣鼓舞。同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运动会议重申了劳尔·普雷维什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呼吁。第二年，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这一问题，联合国代表大会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发展享有高度优先权，而七十七国集团真正关心的是主权和公正。在国际上，各国应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不受任何干预；他们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发展机制；"对各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全部的、永久的主权"。杜鲁门主张对抗世界性贫穷，怀揣这个梦想的美国现在却因维护大集团和财团的利益而备受谴责。《宣言》称国有化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令美国企业惊愕。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担任总统期间，智利于1972年在圣地亚哥举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令基辛格震惊），引领了国有化之路。国有化让美国的铜矿企业、水泥制造商和银行收益颇丰。短短几年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持有美国原材料的企业有75%被国有化。当美国因切断信贷源头而遭到报复时，国有化展开了新的攻势：它要求推出新的国际贷款方式，并质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杰克逊的《能力研究报告》，联合国当时被设定为经济新秩序的载体。报告写道：

> 作为全球组织，联合国应该有能力全面解决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并确保各国利益均衡。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时，联合国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与其说这是一份声明，不如说它是根据第三世界的需求把联合国打造成世界经济管理者的呐喊。但是这样的说法未必会变成现实。正如我们所见，在之后的10年，美国在"二战"后积极应对一切对其全球统治位置造成极度威胁的事件。联合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它变得默默无闻，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却变得更多地迎合了美国的喜好。

第十一章 来自美国的反对

坐落于纽约东河的联合国各个机构越来越像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两者都在向周边领土奉行的原则和准则挑衅，都是旧势力的残余。

—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结构性冲突》（Structural Conflict，1985年）

伍德罗·威尔逊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过得悄无声息。1974年2月，尼克松被卷入“水门事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中东实施穿梭外交，此时威尔逊的忌日就像遥远的记忆一般。站在威尔逊去世的房间里，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的负责人诚挚地劝诫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应搁置越南问题，牢记美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独特地位并为此努力。之后，人们在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听到了更令人难忘、更激动人心的效忠宣言。讲话人是美国驻印度大使，他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是哈佛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还是位争论发起人，他的想法大胆激进，他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美国称霸世界的想法是威尔逊留下的遗产，莫伊尼汉的讲话重提了这一思想，并对其进行更新改进，打响了美国寻求新的世界领导权的第一枪。

莫伊尼汉是民主党人，他关于美国城市中种族问题的文章备受关注，也引起了尼克松的兴趣。莫伊尼汉向来十分关注国际问题，他那些不同寻常的想法已经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思考“现代社会的挑战”，比如环境问题。莫伊尼汉公开表示他对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及其呼吁规范全球道德观的行为十分敬仰，赞美他对达成美国使命抱有的信心，称赞他在“一战”中动用军事力量拯救“世界自由”并把“文明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侵略的举措。但是，莫伊尼汉指出，威尔逊的功绩并没有得到珍视。在威尔逊的帮助下，各国实现了独立，人民得到了自由，世界秩序得以形成，“借助法律并且对其加以指引，可以使这些国家有效地约束自己”。但是，近来有证据表明，世界秩序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美国正对它一手创建的世界逐渐失去热情。因此，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并重拾基本原则了。

根据莫伊尼汉的说法，“二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就偏离了正轨：这一政策在“改革与干涉主义”和“安全与孤立”之间徘徊不定，杜鲁门主义就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肯尼迪当政时实施现代化改革，越南战争因此而起，最终却因为“安全与孤立”问题而结束。尽管现实如此，威尔逊最初许下的承诺不管对美国还是对全人类而言仍然不失其意义。莫伊尼汉称“威尔逊的世界观已经实现一半了”；世界上大多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

获得独立。但是，威尔逊（以及之前的马志尼）关于当地人民将因此获得更多自由的推测是错的，因为在这些地方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独裁者的折磨。这就需要由美国在全球范围推动自由之战。

莫伊尼汉呼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重新注入道德因素，此举完全不是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外交团队的巧妙攻击。莫伊尼汉在哈佛大学时的老同事亨利·基辛格看待事情的角度与他完全不同。如果说莫伊尼汉的偶像是威尔逊，那基辛格崇拜的则是欧洲协调和权力平衡时期的欧洲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论述了维也纳会议后将世界带入和平时期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那些人所具有的品质。在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的三年，基辛格曾撰文论述政治家和预言家的性格特点。他认为完美的政治家应该谨慎、理智、清楚自己的权力范围，全心全意投入到政治生涯中。他还认为预言家要有革命精神，有打造现实的野心，要专注于正确的事情以及全面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政治家是“欧洲现象”，是科技革命的产物，因此，苏联领导人也是政治家。相反，预言家是超越理智的、超脱的，痴迷于自己华丽言语的：发表此番言论的时候，基辛格一定想到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之间可以相互协商，却没必要同预言家交流。

人们认为基辛格缓和国际关系的政策意在让政治家私下解决冷战问题，也意味着美国将放弃重建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曾让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和种种困难处境的外交政策。基辛格的政策自觉地重回美国19世纪的外交模式—以峰会和私下协商等形式避开官僚机构和那些阻碍大国前行的社会力量和组织机构。对世界末日核大战爆发的担心是美国最大的威胁，避免世界大战再次上演是美国的目标。基辛格已明确地告诉苏联、中国、刚果以及伊朗等国，他并不关心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如何对待他们的人民。1971～1973年，尼克松–基辛格团队改变了美苏关系。然而，中东战争的爆发则表明他们过于关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而忽视了其他的冲突来源。

基辛格一直强调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是现代外交的关键，这种说法在当时遭到了质疑。1972年，有人问乔治·凯南，与25年前相比，现在苏联的威胁有多大。他答道，现在苏联的实力大不如前，而核武器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基辛格认为缓和国际关系是一条较为理智的发展路线，但是他的看法似乎也难离俗套，看上去仍是老生常谈：他希望苏联和美国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各自的影响是有限的，希望美国可以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相比之下，莫伊尼汉则认为美国错在为了解决东西方的冲突而把其他所有关乎世界发展的政策都放在了次要地位。基辛格认为除了可能会造成大国间的相互误解之外，去殖民化形成的南北战线并不重要。而莫伊尼汉则相信美国真正的挑战不是苏联，而是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

1975年3月，莫伊尼汉发表了一篇题为“来自美国的反对”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轰动。他在文中揭露了当联合国这个最有可能实现威尔逊之梦的组织变得越来越难以应付时，新威尔逊主义意味着什么。他认为

随着殖民地自治和国家自主权理念的散播，一个全新的世界诞生了。尽管美国对此比其他各国的贡献都大，但是它在联合国内部已不再受欢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集体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他们反对美国的提议，并在联合国推广自己的集体主义妙策。 1949年，凯南警告说联合国大会像议会一样，最终只会不利于美国的发展。最糟糕的是，美国国务院并不认为联合国有多重要，因此对这一连串的批评无动于衷。

与美国国务院不同，莫伊尼汉当即采取了行动。正如一些美国单边主义者所说，美国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脱离联合国自行展开单边行动了。现在已经有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海洋法》这样的规范制度，这些组织及制度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力，假装它们并不存在，或假装它们不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并非正确选择。美国是时候转变航向了，莫伊尼汉总结道，美国要承认意识形态相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组建联盟的事实，而不是把他们驱逐出联合国，但与此同时还要做议会体制鼓励的事，那就是站在这个联盟的对立面。美国接受自己在国际社会相对孤立的事实之后，就可以着手集中国内思想，在全球开展另一项事业了。在这方面，威尔逊为他们提供了指引。曾经与列宁的激战使很多事物处境危险，若想恢复，美国就要像莫伊尼汉所说的那样支持追求自由一派，抵抗主张公正的另一派，并重申自由主义的价值。美国还要抑制世界范围内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势。自由企业以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需要得到重申。“是时候让人们对美方发言人在国际论坛上陈述的事实心生敬畏了。”

莫伊尼汉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据说基辛格为读完这篇文章还错过了一次约会。福特总统十分激动，任命莫伊尼汉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自己也曾对前些年在联合国大会内部的“多数人的暴政”进行过抨击。就在这时，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批评声音愈加激烈，美国保守派人士是这一声音的主要来源。1973年成立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已经在反对联合国的道路上精进自己的业务，它开展了极富影响力的“联合国评估项目”，强烈批判联合国，这使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敌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在担任美方代表期间曾写道：“从有自由机构之日起，联合国就对道德现状展开了最集中的攻击。”之前任职秘书处的澳大利亚小说家雪莉·哈扎德（Shirley Hazzard）称联合国已无药可救，它在自我毁灭，其他人谈到联合国时也鲜有溢美之词。莫伊尼汉的言辞暗示在耐心、精力、思想以及坚定信念的驱动下，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在这个由华盛顿创建的组织中力挽狂澜，美国还有可能重获世界领导权。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详述莫伊尼汉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7个月间遭受的非议以及听到的各种声音：30年后布什政府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强硬态度和莫伊尼汉如出一辙，但不及他机智，博尔顿遭到的非议倒是令莫伊尼汉望尘莫及的。莫伊尼汉刚到联合国之时，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等起来。莫伊尼汉因没能阻止这这一做法而感到非常恼

怒（尤其是在他准备竞选参议员之际，尽管他一直对此予以否认）。他维护伊朗，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自由运动”，还严厉谴责了联合国在人权和民主方面所获的成绩。这番言论让莫伊尼汉登上了头条新闻。纽约的新闻记者十分钟爱这番言论，而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和基辛格却对此印象并不深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艾弗·理查德（Ivor Richard）呼吁“多一些容忍”，并警告说联合国“不是电影《墓碑镇》里的‘OK畜栏’，我也不是那个西部英雄怀亚特·厄普（Wyatt Earp）”。莫伊尼汉猜想基辛格肯定已经对那些明确攻击自己的行为表现出鼓励的态度了。福特劝他继续留任联合国，但是他还是在1976年2月离开了联合国，为晚些时候的参议员竞选做准备去了。作为纽约参议员，他可以连任24年。

莫伊尼汉的持久贡献是为美国在多层次彻底地应对去殖民化及其后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联合国内部，一些与美国对全球公正定义完全不同的国家组成了势头强劲的联盟。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一改以往缄默的反对手法，公开对几个政治集团实施反击。在其反击目标中，有第三世界呼吁全球经济新秩序带来的挑战，还有人权问题和环境问题。美国当局放弃了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转而支持卡特的“道德理想主义”，随即整顿了西部经济以应对南方落后国家的挑战，同时还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并保障公民权利不被国家侵犯。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仍在为世上的许多独裁者提供庇护。只是受庇护的独裁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投入大量精力创建新秩序，这也是莫伊尼汉呼吁的重塑国际社会的一种体现。基辛格向来尊重国家主权，但现在美国放弃了对基辛格的追随，被莫伊尼汉的朋友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称为“主权个体”的论调对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其结果是，联合国的一些核心机构被边缘化，美国则重新分配力量，为复兴国际经济的市场力量和一些民间人权组织提供支持。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对联合国的敌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便削弱了联合国应对环境问题和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世界的崛起会终结西方国家对世界的统治吗？在某一刻，这个愿景有些类似于七十七国集团渴望国际经济新秩序可以分裂尚不稳定的大西洋联盟的想法。而此时，基辛格的关注点并不在此。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束越南战争和改善美苏关系上，欧洲政客则忙着与第三世界国家搞好关系。他们的援助政策和美国的大不相同，其目标是为第三世界打入欧洲共同体的市场提供便利条件。1973年，欧盟主席、荷兰社会主义者西科·曼斯霍尔特（Sicco Mansholt）与尼克松政府的贸易官员进行会晤时，双方的言辞非常激烈。这次会晤意味着曼斯霍尔特想要摆脱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在南方落后国家中寻求盟友的愿望。“毫无疑问，与美国的关系将退居次要位置。”蒙索尔特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想法。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扩张而出现的那个比美国和苏联规模都大的贸易集团。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刚刚重组的欧洲与初登世界舞台的团结的南方各国建立国际伙伴关系都是正确且明智的，对社会主义人士和20世纪70年代主宰共同体决议的社会民主人士来说更是如此。在他们眼中，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一方受损并不代表另一方就会得益，即南方国家的衰竭必将有损于北方国家。他们沿袭了古老的欧洲思想，其中有社会主义理念，也有法西斯主义主张，他们渴望看到“欧非共生”，希望制造业强大的欧洲和地中海彼岸资源富饶的非洲可以互助共赢。

阿尔及利亚总统、七十七国集团领导人之一的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试图开创合作局面。1973年9月，他接受了比利时一家报纸的采访，在谈到欧洲共同体时，他这样说道：

> 如果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欧非可以互通有无，共同努力实现共赢。欧洲现在站在了十字路口，他们正在缓慢起步，开始探寻自己的国际地位。如果欧洲甘愿成为美利坚帝国忠诚的盟友，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若是他们选择独立于世，那么我们就与之合作，以成大事。

针对华盛顿方面的言论令人担忧，有人认为战后美国整个地缘政治结构的前景都不乐观。1971年，尼克松希望美元贬值，许多美国全球主义者认为这是排外的表现，有重回20世纪30年代“经济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危险，因此对尼克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基辛格也因为向中国示好时忽视了日本、在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时忽略了西欧的重要性而饱受指责。他的对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后来成了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抨击过基辛格，并告诫世人警惕大西洋联盟瓦解。他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同欧洲关系的缓和，这一过程之

初并不正式，随后越来越趋于正式，最后日本也参与进来，美、欧、日三方建立了友好关系。1973年，300名政治家、学者、商人以及劳工代表汇聚在非政府组织“三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戴维·洛克菲勒发起，布热津斯基是其最初的掌舵人。一位与会者归纳出委员会的信条，他曾表示“全球主义和双边主义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三边主义却一定能成功”。洛克菲勒全身心投入其中，这让人们想起了国际联盟（这个组织自威尔逊起，一直持续到福斯迪克和腊斯克时代）在美国称霸全球的事业中持续的影响力。传道者帕特·罗伯逊认为三边委员会是一个“原始世界政府”，起源于“某种邪恶事物的深处”，这位右派人士把三边委员会说得一无是处，左派人士则把它当作报复国际资本主义的工具。当然，后者的主张更接近事实，西方各国及各组织间经济关系的变更加快了美国重获世界领导权的速度。两年后，后来成为七国集团的联盟成立了，这一进程因此变得更加官方化，美国也因此巩固了与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它们组成了战后经济战略的中心轴。1980年，加入三边委员会的国家的出口贸易占全世界出口贸易的2/3，也为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近2/3。委员会的成就削弱了南方国家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南方国家联盟因石油危机也变得不如从前那样团结了。大西洋联盟再次团结一心，拉大了地中海两岸不同世界间的差距：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1978年离世，这便意味着号称“南方–欧洲国家”的联盟走到了尽头。这件事完美地印证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1973年阿尔及尔不结盟运动发生后，他表示需要“采取明确的政治行动甚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的技术和经济问题”。

总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在美国和欧洲的境遇大不相同，美国表现出的与南方世界协商的意愿更为隐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莫伊尼汉向世界保证会放宽西方市场的准入条件，并采取国际措施稳定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基辛格在1976年首次访问非洲期间提议打造一个“国际资源库”。但是在财政部部长威廉·E·西蒙（William E. Simon）和福特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威廉·塞德曼（William Seidman）眼中，即便是这种温和的安抚计划，也脱离实际太远了。威廉·塞德曼就曾警告美国说，不要“为了自由企业制度牺牲我们的基本义务”。

打造自由市场的想法、美国骄傲的态度以及不愿再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系的反美主义，这三种态度的融合让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联合国之前享有的超高民意支持率也迅速下降。盖洛普公司多年来始终没有间断就联合国工作是否到位的问题在美国展开调查。1950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人民对联合国的好评率从未低于50%，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80%甚至更高。但是在1967年，这一数据降到了49%。1971年11月，支持率仅为35%，成为史上最低。1972年1月，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澳大利亚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H·W·布什会面时承认“联合国的威望已陷入低谷”。尼克松也很难安心：“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公众对联合国的支持率在不断下降。国际事务通常都会遭遇美国人民的这种态度。”用前任国务院官员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的话说："美国对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此刻两者相处得并不愉快。"福特政府推迟了给世界银行的拨款，并于1975年在国会和工会的双重压力下宣布退出国际劳工组织。

美国对机构改革有助于联合国监管世界的说法失去了兴趣。荷兰经济学家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曾提出"最佳国际秩序"这个说法，他主张全面扩大联合国权利，并培植大量下属机构—他希望开设世界粮食局、世界矿产资源机构、世界能源研究局、世界技术开发局、国际（环境）控制机构、世界裁军机构以及世界贸易和发展局等国际组织，种类如此繁多，令人瞠目结舌。大西洋彼岸各国对这一诉求持怀疑态度。廷贝亨是位社会主义人士，又在荷兰这个善于规划的国家身经百战，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他忽略了国际形势的走向。美国商务部官员直言不讳地说："当今有两个国际组织相当无用：那就是联合国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美国官员指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称该组织"重复制造危机"，激起了"某些国家无休无止的单边需求"。

美国已经失去了耐心。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未果有很多原因，其中来自美国的反对是首要的。莫伊尼汉激起了反对建立新秩序的情绪，他还敦促美国尽快找到替代方案。毕竟他是位威尔逊主义者。然而，替代方案究竟是否可行尚无定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国国内以及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分裂势力。例如在各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签订的各类战后社团主义契约纷纷解除，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影响下，于1971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否可以被代替不得而知。一些美国时评人相信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已不复存在，美国已经无法再把那些经济规则和制度强加于他国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学者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Roth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曾声称"对全球通用规则的追求必定失败"。他预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很有可能发生内部冲突、最终分裂成互相敌对的各股势力"。其他人则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体制。1977年，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认真思考了被他称为"世界经济在各国操控下的解体"究竟是不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理想归宿"。他在想，如果放宽国际货币制度，允许货币流通，在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各国政府自由选择各自适用的经济制度将会带来多少益处。

但是对美国这个世界领导来说，"操控下的解体"意味着什么呢？赫希这个惊人的用词引起了美国银行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兴趣。那时沃尔克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了。赫希记得1978年11月（也就是赫希英年早逝的那一年），身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沃尔克发表了一次讲话。"危机是可以助力发展的，"他对听众说，"我们要对危机做出回应。"但是沃尔克严词拒绝了赫希，称不需要他的理论。沃尔克明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全球一体化与打造现代化民主国家存在冲突。民主国家意味着各国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许30年后，为实现这两个不同的目标会爆发更严重的冲突。在美国这个正在探寻新方法以稳定世界经济的国家中，身为美国公民，并且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沃尔克接近了问题的中心。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若是如赫希（和英国工党政府）

所愿，赋予各国政府更多自治权的话，那就如同是在切断贸易，阻断金融自由化进程，重走旧路。最大的担忧是退回20世纪30年代。沃尔克警告说：“全球经济秩序正在遭受摧残。”抵抗“转向国内的压力”显得至关重要。在汇率浮动的时代，要为开放的全球经济提供保障，就需要银行家和财政部部长在更大范围内相互协作。稳定经济需要长时间努力，干预货币市场没有任何作用，在国内推行正确的政策才是可行之策。因此，沃尔克得到了与赫希完全不同的结论：没有什么能代替国际财政制度。这样，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在未来，世界货币监管人将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地位，这是国家立法机关和选民难以企及的。

不到一年后，卡特就任命沃尔克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上任后以惊人的速度将利率提高到20%，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由13%降到了3.2%，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是以失业率激增为代价的　（并伴有对邻国墨西哥的经济破坏）。沃尔克只有在战胜了通货膨胀这只猛兽后，方可调低汇率，并为资本流动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但事实上，他终结的不只是通货膨胀，还有发展中国家试图在联合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梦想。美元在危急时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被保住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利被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收回，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借它给美国带来威胁的构想破灭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却因此恢复了自己国际经济操控者的身份。正如切·格瓦拉所言，南方世界联盟瓦解了。世界银行方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把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视为“过时的事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84年的秘书长是位亲美人士，因此该组织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在里根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创造资本主义大转型的过程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只是个没有危害的附属机构。现在不只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连联合国都要退居次要位置了，协调国际经济的职责落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手—这两个组织都受西方世界的操控—美国从此摆脱了投反对票的日子。

人权和非政府组织的崛起

权利问题被莫伊尼汉定义为世界的第二战场。“权利”从来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国际上对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19世纪的外交官最关注的权利问题是信仰的自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联盟曾关注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但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转而重点关注个人权利，因此搁置了集体权利问题。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当时乃至现今都被广泛视为赋予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透过这些现象发掘本质就会发现，列强都在尽力避免被《世界人权宣言》束缚住手脚：英国担心自己会因殖民地问题处于尴尬境地，美国则害怕种族隔离和公民权利问题影响其国际形象，斯大林反对一切“将联合国的权力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的尝试。在1948年，几乎没有其他问题能让三大势力的态度如此一致。

维护人权的计划瘫痪了，希望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调转了方向，由关注个人自由转而推进集体社会经济权，然而他们最关注的却是国家自决权。1955年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代表们称《世界人权宣言》是新殖民化的武器，它借助通用语言，以维护个人权利之名破坏各国文化的完整性。“如果人权是神圣的，”黎巴嫩代表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说，“国家的权利，无论它是大是小，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不顾西方世界的强力反对，联合国大会还是将国家自决权纳入了计划中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份公约将继承《世界人权宣言》的精髓，并赋予其强制力。联合国大会最终决定制定两份独立的公约—一份针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另一份则关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这两份公约中，国家自决权都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成了20世纪50年代反殖民事业的一部分。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发展到高潮便迎合了马志尼的愿景，即人民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弃对私利的追求。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具有作家和激进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他斥责西方世界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称这样会阻碍革命胜利。“个人主义应该最先消失，”1961年法农在《不幸的世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写道：暴力的“净化力”可以驱使“大众”在争夺国家自由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他相信这场斗争会转变人民的观念，使任何煽动者都无法蒙蔽他们的双眼。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或多或少是因为受到了法农那些文字的影响。该宣言表明“服从外国列强的征服、控制和掠夺就是对基本人权的否认”。

20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殖民地赢了争取国家自决权之战，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进入了一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时代。联合国无心思介入此事，其下属机构“人权委员会”也转而关注其他事件。联合国大会重点关

注存在种族隔离问题的南非，以色列、罗德西亚和非洲尚存的殖民地也吸引着联合国大会的注意。到目前为止，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认为，在反殖民地的长期斗争中，人权是一件武器。1976年，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这导致大量东巴基斯坦人民被巴基斯坦军队屠杀；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亚法拉人民遭受爆炸和饥饿的侵袭，然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却对这些始终保持沉默。

冷战期间，美国普遍认为权力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维护人权“注定失败”，因此，为了在更重要的领域保持火力，美国应该忽视人权问题。美国现代化理论变得保守起来，其他时评人称无论如何人权维护都不会成功，从美国利益出发，稳定比民主更为重要。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也在这时选择支持大量政治独裁者。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意大利的贝隆最先获得支持，冷战期间，美国加大了对独裁者的支持。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智利的皮诺切特、刚果的蒙博托、伊朗国王、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葡萄牙的萨拉查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政府等人都曾来过万神庙。但此时，美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认为政治独裁并不可行，人权因此重获重要地位。

缓和国际关系是实现人权的前提，地缘政治转变推翻了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对人权事业也同等重要。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系列国际安全及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冷战双方也因此会面。会议之初，人权问题并未受到重点关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苏联同胞希望时隔数十年后，苏联在1945年对东欧的领土划分可以得到世界的认可；西方国家则希望缓解国际局势，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并促进国际合作。1975年，国际安全和欧洲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将这一事业推向高潮。此次会议最伟大的成就是（至少对苏联人而言）明确了各国边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外一件让苏联人欣慰的事是，各签约国保证不会干涉他国内政。这样看来，《赫尔辛基协议》不过是一份普通的文件罢了。事后，会议又将尊重人权加入法案，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保持一致。然而，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其他外交家都未给予此次会议足够的重视。

尽管最初有美国人权运动者批评《赫尔辛基协议》，但仍有人十分重视法案提及人权问题这一做法。美国和苏联涌现出极为勇敢的人权组织，西欧和美国的人权运动者开始给政府施压，以寻求帮助。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他197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中写下了令人难忘的文字—“在这个拥挤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内务’这种东西！”这本小说只能从苏联私运出国。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5年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维护人权是其秉持的激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在萨哈罗夫的客厅中，“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成立了。“捷克七七宪章小组”也于第二年成立。赫尔辛基条款以及共产主义阵营认同联合国人权新条约的事实都被这两个小组用来支持自己的行动。在制定新的活动框架方面，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很高，这一点是它的一些批评者不愿承认的。

各国希望在道德层面上终止暴政，于是对权利问题做出了调整，此

举并不是庞大政治工程的一部分，西方世界乐于接受这种改变。美国国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4年，曾全力支持人权运动和环保事业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为帮助苏联犹太人提出了一项举措：将贸易和移民自由结合起来。然而，杰克逊并不是第一位关注这个问题的民主党人士：早些时候，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就已关注智利和其他国家违反人权的行为，国会对人权维护日益增长的兴趣使基辛格先见性地在国务院成立了人权部门。但是，在如何将人权与其他外交手段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上，杰克逊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美国新任总统卡特认真执行《赫尔辛基协议》，进一步推进了人权事业，他甚至在197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称维护人权是他任期内的核心任务。他向大众灌输公民道德信仰要成为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坚持认为“美国人民要全身心投入维护人权的事业中去”。入主白宫后不久，他就因中美和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独裁者违反人权而终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并向南非发出警告，称实行种族隔离就是对美国的蔑视。他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实施国内镇压将被视为在威胁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由于美国势力有限，它发出的严正警告往往达不到相应的效果。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也弱化了人权的意义并默认独裁者执政。然而，较之前而言，美国在转变态度后并没有犯下错误。卡特为自由国际主义奠定了人性化基础，他强调自由、权利和民主，这也为美国未来30年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人权事业的这一发展方向离不开此时国际舞台上兴起的新势力。就连在美国调转外交方向、朝着莫伊尼汉提倡的价值观前进时，世界上的另一股力量还在主张正视人权问题，联合国和各成员国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各种团体在非政府组织的带领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成就了这股力量。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国际事务进程中，非政府组织并不是新兴势力。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政府就曾鼓励国民行动起来支持国际和平事业。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宗教和人权团体也曾游说过与会代表。那时，非政府组织已经被接受了，尽管其影响有限，但也已成为国际生活的一部分。许多非政府组织因冷战名声受损。自20世纪20年代起，莫斯科就同一线组织合作。国际学生联盟、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民主律师国际协会由共产主义国家运作，或是受苏联资助。中央情报局介入此领域较晚，但很快便迎头赶上。科德·迈耶是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部门的领导，他曾以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的年轻带头人的身份为人所知。但是，共产主义介入像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这样的组织让迈耶备感失望，因此他加盟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成立了许多反宣传的一线组织。

在其鼎盛时期，中央情报局曾从60多个基金会融资资助100多个此类组织。雕刻家雷吉·巴特勒（Reg Butler）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为纪念“不知名的政治犯”举办的国际雕刻大赛中获胜，最终这项奖金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西柏林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从而羞辱苏联。当今颇负盛名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初也是由中央情报局操办的，该组织是在西柏林声名狼藉的国际自由法学家委员会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它由纳粹创建，却伪装成一个犹太幸存组织。

关于秘密资助和无所作为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子战引人深思：冷战时期会存在真诚且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吗？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Peter Benenson）相信这样的组织不仅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本南森与显贵人士相识，佛朗哥担任元首期间，他还曾前往西班牙听审对工会工人的宣判，本南森知道人们对“两极化的思想”已经厌倦了。1961年他在英国报纸《观察者》（Observer）上刊登长篇文章，提醒读者《世界人权宣言》对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观点自由的承诺，呼吁给“铁幕”两边的各国施压，让它们释放因政治或宗教观点被关押的人：

> 一个星期内，无论你哪天翻开报纸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在世界上某个地方，又有人因政治、宗教观点相异而被当地政府关押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甚至被执行死刑。监狱中有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并非全在铁幕和竹幕之后，狱中人数还在不断上升。读者们深知自己无能为力，因此郁郁寡欢。然而，如果所有人都能化悲愤为力量团结一致，就一定会扭转局面。

文章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本南森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各地自发形成团体，纷纷接纳当地的政治犯。本南森逐渐明白人民有多想参与进来了。他们通过参加运动，在道德或是精神上填补了西方社会群众无法有效参与政治运动的空白。文章见报后一个月，本南森给他最亲近的同事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信的内容是关于这次新兴运动的：

> 这次运动的根本意图是为全球理想主义者搭建一个合作平台，我希望与此相关的人可以牢记这点，但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希望这次运动可以唤起大量理想主义者潜在的热情。这次运动还要吸引正在探索人生理想的年轻人，吸引那些不幸的、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没能充分发挥母性光辉的妇女。如果牢记我们的根本意图就会发现，从长远看，调动人们的热情比救出狱中的囚犯更重要……

这番话传达出一种极为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这场政治行动中，结果并不重要，他们更看重人们的思想转变。但这个结果是十分惊人的。两年中，这个组织不但有了名字，还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它走出西欧，走向美国和世界各地，拓展了国际领域。在成长早期，由于领导不利，该组织的发展步伐缓慢—其秘书长与英国情报人员间的往来被揭露，险些摧毁整个组织，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2 000多位组织成员遍布30多个国家，1977年该组织还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成立于1961年、志在呼吁赦免政治犯的小组织现在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拥有一队志愿者写手。

环境政治：迟暮之年的国际主义

正如为其写略传的那些记者一遍又一遍回忆的那样，罗纳德·里根向人们传达的总是积极信息。但是批评里根的人却认为他的乐观放错了地方，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听到的全是反对声音，已经退回到孤身一人的境地了。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在谈到“迟暮之年的国际主义”时曾发问道：“曾经希望改造世界的那个精力旺盛的美国怎么了？那个在75年前促使百万富翁安德鲁·卡内基这个和平主义者成立基金会的美国哪儿去了？”他抨击里根拒绝承认“国际法院”的司法权、攻击联合国、违背条约还践踏国际法的行为。休斯笔下的里根正在“黑暗中呻吟”，他运用美国人的“乐观”重整军备，非法干涉他国内政，造成赤字膨胀，美元汇率升高。当然，里根的支持者并不这样想，他们想法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民主事业上，还有军备竞赛领域。支持者认为美国已重回国际领导地位，它并没有撤离国际舞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里根对世界领导者的定义限制了联合国，让它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试图建立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疾而终。这一点在环境问题中体现得最淋漓尽致。

10年前，美国还曾在联合国引领过国际环境政治组织，并试图把这个国际组织打造成这一全新领域的领头人。当后殖民时期的南方世界还在追求工业化、寻求解放和促进繁荣的时候，西方民众已经在质疑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是否正确、寻求技术和工业进步的时候是否因索取过多而破坏了环境。《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人们也曾为科学和技术可能引起的后果感到担忧，但最后信任战胜了忧虑。”一些科幻小说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菲利普·K·狄克（Philip K. Dick）1968年的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打造了一个未来世界，在那里，数十年前开战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把旧金山变成了一片毒气弥漫的废墟，还终结了地球上的文明生活：国家政府倒闭，联合国把幸存者安置到太阳系，长久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几乎全面停止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没人记得。第二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学生对越南战争的不满远不及他们对“环境危机”的担忧。随后，我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数百万美国民众参与了环境宣讲会，据估计，单是中央公园就聚集了100万民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了。

对环境的担忧让人们想起曾经因害怕世界人口过剩而产生的感受。这种焦虑随着新马尔萨斯学说的流传和遍布全球的人口控制政策达到顶峰。人口学家称控制人口增长是繁荣的前提，一个社会只有在实现了低生育率之后才算是步入了现代化。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直言不讳，称迅速增长的人口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1966年的《联合国人口宣言》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968年，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警告世人，在今后10年中将有亿万人口死于饥饿。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1969年曾经说过，各成员国须在短短几年内“搁置争论，互相合作，停止军备竞赛，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抑制人口激增努力，同时为发展提供动力”。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绝望之作《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在29个国家卖出900万册，该作品用电脑生成的世界系统模型表明了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工业产出以及食品供应间的相互关系。将数据输入电脑，经系统处理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正在成倍地增长，而农作物产量却在不断缩水，环境恶化程度日益严重。读者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该书传达的信息：地球已然成了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而投下炸弹的就是人类自己。

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政策回应是由美国，尤其是尼克松总统引领的。尼克松对环境问题本身并没有太大兴趣，他看重的是环境问题能够带来的政治回报。尼克松在国内成立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他的资金扶持下，该组织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民间机构。但是，当这位总统意识到这个组织会让他损失保守派的投票和美国企业的支持后，他认为是时候在国内“终止环保项目”了。然而在国际上，出于不同考虑，尼克松的环保事业还在继续：他认为让美国成为环保事业领军者不但不会造成国内选票流失，还会带来诸多好处。而且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制造商们要求他加强全球监管，因为除非外国制造商和美国制造商保持一致，否则美国国内严苛的控制会给美国企业带来不利。为了反驳那些告诉他这事毫无商量余地的人，尼克松让他的首席环境政策顾问罗素·特雷恩（Russell Train）把美国打造成国际事务讨论中的“领军人物”。他和特雷恩都认为环境问题是巩固美苏关系的低调方法，但是多边议程更加重要。此时，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就该发挥作用了。

在世界地球日之前，联合国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就环境问题召开重大会议。对于一个到目前为止最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组织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而最先提出这项挑战的是瑞典人。自战争爆发以来，一些环境保护措施被写入国际法，但是这些措施大都像1946年的“反捕鲸管制公约”一样收效甚微。同样，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也难逃被忽视的命运，直到吴丹于同年任命精力充沛的商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主持会议时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是，人们在会议准备阶段就已经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危机就在眼前。正如一位巴西外交官1971年所说：

> 最近，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环境恶化是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很显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环境遭受污染。但是，各国都要开展他们的发展计划，在他们认为适当的程度内开发自己的资源，制定自己的环境标准。那些试图通过多边或双边关系把大国准则和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或联盟国家的做法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一位来自象牙海岸的代表的发言则更加直白：如果污染意味着工业化，那就污染吧。

在所有南北冲突中，会议把环保问题列为重点。和往常一样，会议颁布了一些听上去很了不起的规章，这些规章几乎囊括了所有人的各种承诺，但是这次会议的真正意义却在于把环境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尤其在发达国家。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许多国家都效仿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了环保部门，各国在环保方面的立法也迅速增加。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一个规模不大的联合国机构诞生了，这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尼克松希望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可见的行动，但是联合国内的地盘战和来自企业的反对减缓了这一进程。如今，一个尽职尽责的国际监督员就环境问题展开调查、促进环保之态已势不可当。正是乔治·凯南这位美国冷战遏制政策的策划人、这位鲜少被视为国际组织信徒的人在《外交》中提到了成立国际环保机构的必要性。在凯南看来，环保可以把超级大国际联盟合起来，让它们用开创新事业来取代日渐式微的冷战，并且重新激发倍感失望的年青一代的热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得益于美国的加入和西方国家渴望在发展中国家获得支持的愿望。该机构计划将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是十分大胆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步。这也只是最初的一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预算太少，最初每年只有2 000万美元左右，这还不及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1/20，也不像后者那样手握实权。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得以成立是因为基层政客不断向高层管理者施压，它在反对声音高涨之前就落成了，而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因为高层要对民意予以回应，组建之时正逢反对声四起—发展中国家担心它们的发展会因此受阻，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支持这项事业。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在国内为环保付出的努力比以往都多。各个环保团体在北欧的活动进展顺利（尽管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的热情减少了）。1973~1974年石油成本剧增，这促进了他们倡导的能源高效利用事业。在欧共体内，欧洲人比联合国更具优势，从酸雨到噪声污染，他们开始着手处理有关环境污染的所有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是环境外交的10年：那10年中签署的环保条约比之前40年的还要多。各国就控制海洋倾倒和来自陆地的海洋污染物问题达成一致后，海水明显变得清澈了。以地中海为例，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污水和石油泄漏曾导致这片海域污染严重。二氧化钛被排入缓水区域，患有肝炎的游客也下水嬉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加入到治理地中海污染的行动中，在它的带领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希腊以及土耳其都加入了清理行动。这个行动并不是为了扩大区域和平，但他们的努力控制了污染水平，尽管海岸周围的城市发展迅速，工业也迅猛发展，但海水仍旧变得更加清澈了。

与此同时，美国民意和科研成果促成了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合作。美国律师不顾气雾剂产业的反对，禁止在气雾剂中添加氯氟烃。在美国发

起一系列反对单边行动呼吁国际合作的运动之后，联合国再次成为该事业中的重要一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的科研调查显示南极洲上方出现了季节性的臭氧空洞，并在逐年扩大。1987年年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蒙特利尔促成了 一项协议，但并没有全面禁止污染行为。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份了不起的协议，各国首次承诺就算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也要保护大气层，并将这个承诺落于纸面。

尽管这些成就惊人，但在其他领域，环保运动就没这么幸运了。禁止向海洋倾倒有毒废物的运动进展并不顺利。《伦敦倾废公约》用词过于含糊，该公约放任那些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并且不予以处罚，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原子能产业这个西方环保人士抗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几乎没受到影响：反对者认为这是个充满危险的产业，而专家们选择镇压关于原子能产业的质疑之声，而对其他领域的环保活动表示支持。关于海底矿产资源的海洋谈判在法律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土地沙漠化的谈判也几乎没有任何成效。斯德哥尔摩开创的国际会议模式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少。如果发展中国家也追求环保，如果西方国家为第三世界提供更先进的援助，那么将发展和环保议程综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布伦特兰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里同时提到了这两个问题，这份报告最大的影响就是让“可持续发展”这个词汇广为流传。

这些问题的确变得越来越棘手了。1972年，环境问题还主要集中在本地或本国范围内，各国政府受民意驱动可以独立高效地处理环境问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之后的国际会议将关注点放在了整个区域乃至全球—区域水资源争夺、土地沙化、全球贫困，还有最重要的气候变化问题，却在这些领域基本毫无建树。热闹的官场并未带来任何帮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虽在种种限制下依旧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但由于规模太小而基本未发挥任何作用。官场混乱，事情变得复杂，各方讨论涉及的范围也更广泛了，但是这些转变都没有明确指出问题所在。从政治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曾是国际环保主义的重要推动者，现在却戏剧性地转变为其反对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里根乐观的心态由来已久。环保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但是不断重现的悲剧和反复被鼓吹的好消息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批评。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关于“未来太空船地球的经济学”的文章拥有众多的读者，他在文中承认人们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再认为它是无边无界的了，但是他继续宣称“人类的创造力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保持不变”这一观点。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这样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类的救世主。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见证了这种乐观主义者的人数的惊人增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悲观主义者的人数。这些乐观的人大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畅销书《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这样的反正统文化的企业家认为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他坚信无论是电子网络还是受市场驱动的网络都是摆脱政治机构和国家暴政的解放力量。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到来时，那些认为命运由自己掌控的人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数字乌托邦，

他们认定科学技术潜能无限，这些先驱者到20世纪中叶可以成为主张通过慈善活动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推崇者。

核战略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曾经供职于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他为斯图尔特·布兰德做了一些不太可能实现的补充设想。但是，他们二人都相信发展的进程足够公开，也相信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可以带来变革，他们都为自己的乐观心态感到骄傲。卡恩被视为彼得·塞勒斯扮演的“奇爱博士”的原型，他认为我们会赢得核战争—如果准备充分，就可以顺利度过核冬天，与消极主义者的抗争也将在政治上大获全胜。环境质量委员会告诉卡特总统地球的前景灰暗，卡恩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1984年共同撰写了《资源丰富的地球》（The Resourceful Earth）一文反驳了委员会的说法。西蒙可能是最热情的“末日终结者”了。他认为创新是“最根本的资源”，他还和《人口爆炸》的作者、同是学者的保罗·埃尔利希打赌，称20世纪80年代的物价不仅不会上涨反而会下降，最终，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局”。西蒙和卡恩的胜利远不只此：从企业家个人主义的可行性到对核战胜利的预估，他们的很多思想都随着里根出任总统而流淌在美国政府的血液中。1983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发表评论说：“10年前，末日论者绘制了一幅寒冷的画面，给地球贴上了灾难的标签。而现在，我们要迎来美国在政治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复兴。”

里根在总统选举中走的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路线，在罗马俱乐部赞助商的眼中，这条路的尽头是黑暗的。在国内，里根政府撤销了10年前的立法，用两年的时间把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预算缩减到原来的2/3。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中，环保意识已深入民心，里根对新的监管机构的攻击实际上是在把美国民众推向环保组织一方。在接受民意调查时，美国民众第一次将“清洁的环境”排在了“完美的性生活”前面。现在，大量美国民众加入了非政府环保组织，他们的游说能力可以为组织筹集到充足的资金，尽管数目不能与公司的相比，但足以支持他们在国内发起强力反攻。

在国际上，当环保政治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时，里根政府却从环保领域大规模撤退。东欧因一系列共产主义计划失败而陷入混乱局面，其中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最为恶劣。但是，正是东欧的环保组织加速了苏联势力的瓦解。在巴西、美洲中部、非洲东部和印度，农民联盟开始发起政治动员，并与西方非政府环保组织建立了联系。20世纪80年代，在各种类别的非政府组织中，环保组织是数量增加最快的。但是，这些都没能影响美国的国内政策，实际上，美国方面根本就没有人为环保事业说话。相反，由于国会对联合国持有的前所未有的敌意，所以里根政府的各种势力竭力推崇批判地看待国际机构。

里根时期的官员公开蔑视多边环保行动，认为这些行动“前途暗淡、注定失败”。美国政府放弃了裁决权，退出了国际法庭这个解决环境相关争端的主要平台。美国还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并暗中破坏《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法规。里根政府反对该项法律的主要规定，因此于1982

年指派理查德·芬克豪瑟（Richard Funkhouser）向国会传达《海洋法公约》的所有理念。芬克豪瑟是一位石油专家，还是前任外交官，现在他被委任为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国际活动办公室的主管了。据芬克豪瑟所言，悲观主义者引领了依赖政府的错误潮流，而乐观主义者则促进了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 有种说法称，尽管自由市场以政府行为作为互补，但它会在环保事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美国正在践行这个想法。技术革新和经济刺激是解决未来环境问题的基础……我们必须相信科学技术和人类的创造力会为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做出贡献。

从里根开始，到之后的乔治·H·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美国政府抛弃了其全球环保事业领导者的身份。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令人非常失望。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响应保护全球湿地和森林的号召：在环境问题上，美国只是禁止使用氯氟烃并承诺保护南极生态系统。克林顿政府倾向于通过被反对者称为“生态圈的科学怪人”的世界银行开展行动，并把环保变成发展事业的附属品，而正是国会渐增的反联合国情绪推动了这种转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注定被无休止的会议缠身，有人试图提高该组织的影响力或是干脆废除这个组织，但这些尝试都徒劳无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是那个规模小、脆弱又缺少资金同时还被边缘化的组织。美国国内的反科学情绪也在此时高涨。《纽约时报》可能会像在世界地球日20周年纪念日时那样把环境描述成“现代的世俗宗教”。现在人们把保护环境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这种信仰又把很多人带到了各种完全不同的路上，这就是问题所在。

全球变暖也许是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打造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最具国际视野的科学组织，该组织发出的预报也越来越具有权威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证明了具有百年历史的科学视角的普遍性，但同样暴露了自身在政治上的局限性。欧洲政府早在1990年就开始采取行动治理环境，里根和布什政府却一直拖延着。乔治·W·布什时期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各种公约。《京都议定书》耗时较长，进展不顺利，美国的阻挠并不是唯一原因。但是，这也再次证明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抛弃多边主义的做法和试图协调国际管理的国内政策。在国会大力推进的领域中（例如改善人权方面），美国国际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在国会反对和抵制的领域中（例如环境问题），国际主义就显得不那么有活力了。莫伊尼汉如此真诚地唤醒了关于伍德罗·威尔逊的记忆，这种记忆传达了双重的信息。

第十二章 国际经济新秩序

> 我们都察觉到国际经济秩序会彻底瓦解。站在这个分叉路口，是跟随英国的脚步继续维持西方自由的金融体系，还是彻底改变？这是一道选择题。之所以提到彻底改变是因为托尼·本恩（Tony　Benn）促成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英国政府远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认为若事实果真如此，那现在整个系统就会开始瓦解。天知道意大利要做什么；法国也可能朝着同样的方向彻底改变。这不仅能复兴经济，还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愿意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个问题。
>
>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威廉姆·D·罗杰斯（William. D. Rogers），
>
> 发表于1976年英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萧条境况重创国际资本主义，1945年之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挽救国际资本主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经济合作是国际联盟最大的败笔。因此，对此做出补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首要任务。国际联盟下属的那些失败的、薄弱的机构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诞生的机构取代了，这两个机构实力强劲，更具影响力，可以监督货币市场，还可以阻止货币混乱和保护主义的现象再次发生。美国政府的战时愿景并没有完全实现：科德尔·赫尔最关心的国际贸易组织没能成立，而本应被解散的“银行人俱乐部”国际清算银行却存续下来了。无论怎样，新的机构和其他组织在一段时间内为西方世界带来了极度繁荣的景象。

从地理角度看，1945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平均。日本成了东亚区域贸易体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西欧经济迅速复兴，在以联邦德国为生产主力军、以伦敦金融城为金融中心的模式下开始一体化进程，它们在各自的区域中心都实现了军事占领，这两个新的节点让旧时的战间半球联合黯然失色。尽管这种新的“美国—西欧—日本”权力集团并非无懈可击，但其实力不仅在对付苏联及其发射的卫星上绰绰有余，而且连应付意外出现的南方世界也不在话下。

但是，在历经25年最持久且最平衡的增长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西欧—日本权力集团的凝聚力开始经受考验。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下降，分配冲突日益加重。国际上，在越南战争的开销迫使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度前，美国原先在生产和贸易领域不容置疑的支配权也动摇了。随后又爆发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危机。20年前，一篇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曾提醒时任国务卿杜勒斯：“随着全球石油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中东

地区，阿拉伯国家将成为价格和供给的最终决定人，当阿拉伯国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加倍提高石油价格时，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73年首次爆发石油危机时，燃料价格激增，加之朝鲜战争以及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的影响，世界经济第一次严重衰退。在增长放缓、失业人口上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并没有得到缓解，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了描述这一史无前例并且神秘莫测的现象，人们创造出了“滞胀”这个词。

也正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新兴的第三世界提出了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美国最担心的是欧洲和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的不同回应会导致政治—经济联盟瓦解，而这个联盟正是战后资本主义复兴和美国发展为世界大国的基础。如今回头去看，这种担忧被过分渲染了。但它确实存在，它不仅影响了自1945年起美国重建世界资本主义的成就规模，还影响了其发展速度。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许会以同样的速度瓦解。30年代早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情况竟然如此相似，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1975年，莫伊尼汉在他那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来自美国的反对》中称，布尔什维克主义（莫伊尼汉和凯南一致认为这一主义薄弱且没有吸引力）并非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全球对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呼吁。也许只有曾经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比如莫伊尼汉本人）才会如此严厉地把第三世界对全球性公正的诉求说成费边主义的传统对早已脱离英国管制的殖民地造成的影响。但是，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初西欧内部的商人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冲突有了全新的意义，更确切地说，这种冲突可以影响整个“宇宙”，那时还没有迹象表明商人会在冲突中获胜。如果英国走上激进的道路（这点看来十分可能），如果欧洲国家不再为苏联入侵带来的威胁感到担忧，而选择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并对美国政府置之不理，那么1945年建立的联盟还剩下什么呢？美国又将成为孤家寡人，并体会从中心地带到被边缘化的感觉。那时，一份美国的评估报告称英国背叛其外交和军事承诺的做法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

如今，除了英国工党界人士，很少有人记得1976年的英镑危机。但是，对于新出现的以金融为基础的美国国际主义而言，这次危机十分重要。在伦敦，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出人意料地辞职了，这一举动导致工党强劲的左派势力和亲美派为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平衡迅速恶化，还引发了全面的英镑危机。内阁的左派人士希望加强保护主义，实施汇率管制，就算会与强大的伦敦金融城为敌，他们也希望刺激国内经济生产增长。新任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和财务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都是大西洋主义者，他们赞成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已经提供了临时支援的组织谈判。但是，想要得到进一步的帮助，就需要接受一些附加条件了。在大西洋主义者备受欢迎时，这就不仅仅意味着英国左派人士、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失败了，还将是西方资本主义改造的第一步。

对接下来的事物而言，“新自由主义”是它们最贴切的标签：其一是拒绝接受已经巩固了西方经济增长的战后“社会法团主义”，其二是重拾货币主义，其三是解除管制。这三方面都意味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其中大多数由美国制定—它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第三世界的愿望，还给大西洋联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全球经济制定了新的规则，其中一些规则在计划之中，但更多的则是无法预料的。美国国内经济金融化为流经华尔街的全球资本盈余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循环机制，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幸而成为一种全新的模式。债权人和债务人需要的机构与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需要的不同，这种机构通过新的渠道建立权威，旧机构的影响力随之降低。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撤回了对联合国的许多支持，美国仍特意给它制定了新的全球定位。如此一来，西方世界的危机在接下来的20年内发展了主宰全球的新模式，这一模式甚至有了独立的意识形态：全球化。

海外的银行家

与以往相比，20世纪70年代的资金流动更加迅速，且受到的限制较少。石油出口商联手石油输出国组织运营成功，获益颇丰，石油美元因此影响着世界经济生活，此外，庞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希望借这笔横财向各地提供贷款。此时，全球金融体系的总资产几乎达到了1 650亿美元，每年借出约350亿美元。凭借约1 000亿美元的收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利用石油税收在发达国家寻求与银行以及投资者的合作机会。问题是，这份能够让正常的出借资产总额相形见绌的巨额盈余究竟掌握在公立银行手中还是私人银行手中？

私人银行家们都在争取这一领域的业务：在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掌舵的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带领下，私人银行家们都在积极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本国银行海外借贷的限制。美国财政部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及其继任者威廉姆·E·西蒙都是自由市场主义者，美国财政部批准了银行家们的提议，并放松了对资本出口的管制。“自那以后，美国国内就很少能找到银行家了。”一位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1973年，国际借贷为美国各个大型银行贡献了1/3的利润，到了197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4。欧洲和日本的银行、经纪人、共同基金、首个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加速发展，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里斯顿等人享受着成功的快感，“国家不会破产”是他的名言。他的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后来更名为花旗银行，该行与摩根大通集团一起引领着为南美借贷者提供联合贷款的事业的发展。

对银行而言，大量石油美元引发的“赌场资本主义”［该说法由最敏锐的时评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最先提出］的出现是一件幸事，而对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这一主义的出现则是一场挑战。美国银行资产负债以及大量资金外流超过了所有人的控制范围，国会担心这会带来消极影响。投机活动会轻而易举地影响到汇率情况。对于像英国这样陷入危机的经济体而言，维持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国遭受英镑危机时，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是约翰尼斯·维特芬（Johannes Witteveen），身为经济学家，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因此，无论从气质还是素养来看，他都不是一位自由市场商人。与他不同的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E·西蒙。他因国内外政府对私企愈加强烈的干预烦扰不堪。自20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增加，西蒙对此也备感惊恐。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拥趸和尼克松以及福特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他决心扭转这一趋势。西蒙清楚地知道，石油危机及其造成的影响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重新塑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

构，让它们成为巩固全球财政纪律的手段。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极为次要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区别看待“生产”流动和“投机”流动，甚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年赋予资本流动自由权之后，仍然坚持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经济活动是十分正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职责是为美元不足的国家提供流动资产，以及监督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情况。在发达国家因经济过热、美元储备不足或是贸易情况急转直下而遭遇暂时性的收支平衡困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都帮助这些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的国家渡过难关。该组织很少要求借款国改变国内政策，还支持他们渴望发展的需求。此外，该组织几乎不介入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经济体。

担心货币不稳定会引发另一次大萧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社会基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起了更加全面的责任，为了稳定新的浮动汇率体制，美国与法国商定的协约赋予了它“严格监督”成员国汇率政策的权力。尽管美国国会不愿意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自己的政策，但一位财政部官员的话劝服了他们。这位官员警告说，如果将货币问题交由市场处理，那就要警惕重回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政策”的危机了。抛开他的自由市场信念，西蒙也认为国际干预是有必要的。之后七国集团的首次会议于1975年在朗布依埃召开。此次会议提倡改变，凸显了为再现西方联合景象打造新的机构和国际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对不同国家而言，“严格监督”的意义也不一样，就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是如此。但是，西蒙以及英国都在1976年的英镑危机中弄清了“严格监督”对它们而言意味着什么，那时英国发现他们要同时和美国财政部以及进入伦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组进行协商。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相信借款国有能力自行在国内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该组织会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这意味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限制公共部门财政预算赤字，迫使政府接受更高的失业率，同时提高征税和改变汇率，其次才是刺激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财政健康的首席医师的时代就此开启，在借款国保证削减公共支出、立下财政和货币目标并保证不会征收新税或限制资本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为该国提供贷款。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是国内重大政策变革的投资者，还是这项事业的工程师。一旦一个国家感受到“条件”的力量，就不会回头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只有26%的贷款是在具有实质意义的条件下借出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达到了66%。尽管上帝只给摩西颁布了十条戒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官员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还是在晚些时候因条件增多感到惊讶。在前所未有的区域扩张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越来越激进的干预行为成了全球金融自由化强大的赞助人。

因追求高利率，这些利润流入美国，又经华尔街的投资人和银行的操作流向世界。除了介入美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和长期赤字的情况之中

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在其他领域干涉美国，它把重塑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这个重任留给了保罗·沃尔克领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低息债务的刺激下，通货膨胀有所缓解，申请贷款变得越来越容易。随着利率下降，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猛增。伴随着新的借款方式的出现，美国企业和个人利用新的贷款形式追求利益：保守估计，1981年房屋贷款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65%，到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35%。金融机构受到的限制更少：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由1981年的22%增长到2008年的117%。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双重压力逼迫各国取消资本限制，因此全球货币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银行皆受困于当前并不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外国资产的股票价值所占百分比由1980年的36%激增到1995年的71%，并在千禧年超越了10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交易的外汇总额轻易地超过了所有政府的外汇储备额。此外，出借方身份的不断变换也使得应对危机越来越困难：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是主要的出借方；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银行成了联合借贷的主要参与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债务证券的购买者又成了主要力量。到1980年，面对敌对金融中心的反抗，美国放弃了规范欧洲美元市场的努力，这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外债激增虽在意料之中，却令人极为担忧。受其影响，货币危机越来越频繁，此时的危机波及范围更广并且更加难以控制。1945～1971年，全球的银行危机或货币危机只有38次，1973～1997年达到了139次。发展中国家早期并未出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只出现过16次，1973年后，银行危机出现了17次，货币危机出现了57次，银行货币双重危机出现了21次。正如《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所言，“金融自由化时代就是……危机频发的时代”。

发达国家汇率浮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情况不稳定局面的根源，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债成了不稳定因素。最初，国债问题还属于国际债务危机范畴，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里根初任总统时并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任期内的一些高级官员没有加入任何国际组织，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定的反对者。但是在看到外债危机被控制住，并且认识到美国银行系统改变主义会引起浩劫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随后称“自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金融混乱给全球带来如此大的威胁”），保罗·沃尔克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破产判决官”。当然，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墨西哥，而是要防止银行大规模倒闭，以免全球资金循环机制停止运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庇护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庇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这样，美国官员们这些真正的操纵者就得到了政治掩护。一直以来流行的放任自由政策让风险落到了借款人肩上，他们还要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国会对这一点向来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并未采取过多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政府眼中，华尔街的利益通常就等同于国家利益。1994年，所有交易的

新兴市场债券中有超过60%是由美国国债支持的，这体现了美国在维持系统运转中的重要性。

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他组织则扮演着国际清算银行的角色，尤其是中央银行家协会。发达国家开创了资本自由的先河，其行动准则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共体等制定。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把这些准则推广至全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劝说南美或东亚国家开展并不受欢迎的国内改革时比美国财政部更具优势。正如一位共和党参议员1984年强调的那样，“如果美国强制债务国改变其国内政策，那这些国家就会认为美国是丑陋无比的。但是，如果整个国际社会都如此，那么我认为真正的改变就会发生，而这正是这些国家需要的”。

但是，只要还有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既合法又有权威的，那它就只能扮演缓冲美国行动和促成美国目的的角色。在这方面，遵守成立之初立下的条款，尊重董事会中非美国成员十分重要。随着组织活动范围大幅扩张（从监督经济活动发展到要求和限制都比之前更具干预性）其合法性遭到了质疑。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都主张资本自由化，但它的成立文件中却并无哪项条款支持这点。美国财政部并不十分担忧，他们准备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一些违背自身意愿的事。相反，来自欧洲的董事成员，那些寻求基于制度来管理全球化事务的人十分忧心。整个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债务人的严格要求符合宪法，人们都在忙于起草修正案。在起草修正案的过程中，可将组织日益增长的权力和野心纳入考虑。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反对制定修正案，他们因此联合在一起，对任何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行为都提出了质疑。也许修正案的负责人雅克·波拉克在他八十几岁时对此事的批评更能说明问题。波拉克是一位荷兰经济学家，他近距离见证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为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做出的各种尝试。“二战”之前，他由国际联盟起步，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40年，国际联盟总部迁至普林斯顿后，他继续任职经济部门，之后又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因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职员相比，波拉克具有他们不具备的宏观经济意识。波拉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走向感到担忧，他害怕如果赋予该组织法律威力，让它推广资本自由化会进一步侵蚀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任感。到1998年，反对修正案的声音过于强大，这一尝试只得搁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限扩张的职权同样威胁到其凭借专业知识树立的权威。美国操控金融机构，并成功地传播了他们眼中的“真理”，这些都彰显了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现代化理论中充满了经济学理论，还兼收了其他学科的内容：是历史知识搭建了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对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并不感兴趣，其职员大都是男性，并且基本都曾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专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他们是抱有合理期望的改革者，他们的改革方案有定式的内部模板

作为比照，这些模板都是高级公式形式的数学模型，即使是数学专家也会对其赞不绝口。培养开业者可能是战后美国大学最成功的课程。在一个或多或少对被服务国的文化、语言或是风俗表示无视的国家中，培养开业者就像培养现今的一些经济学家一样，他们都被告知这种“无视”的做法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并无大碍。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结合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模式：避免大规模财政赤字、削减政府资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有资本私有化以及取消管制。为了概括一系列规则条款，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个说法。如果发展经济学事先考虑到落后的经济体可能需要一系列不同方法来促进自身发展，那么这种新教条就想当然地认为市场自然而然地会奉公守法，弘扬美德。他的支持者没有足够时间起草替代方案：如20世纪90年代的巴西央行行长所说，这次是在“新自由主义和新愚蠢主义”之间的选择。讽刺的是，“华盛顿共识”看待世界的心态几乎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完全一致：认为自己的思想具有改革力量，并准备废除上一代顾问的许多工作成果。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破现存制度的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在全球引起了财产关系的重大改革。水、电、煤、火车以及汽车这些国有资源和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售出：在发达国家，水资源和其他公共资源产业都由私营企业接手。到2000年，法国80%的用水由私营企业提供（20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32%；而在英国、智利和捷克共和国，全国人民用水全部由私营企业提供）。像“英国全国矿工工会”这样有实力的工会被遣散，阻碍投资的障碍被清除，资金调回本国这种做法也被取消。国有企业作为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其份额由1979年的10%下降到2004年的6%，仅英国就由12%下降到2%，降幅达到10个百分点。全世界的私营企业贡献了超过1.25万亿美元。在经济方面，这种做法的成效尚不清晰，它是否带动了生产力尚无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操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收益颇丰，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均也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单在南美洲，7年间有大约2 000家国有企业被解散，它们或是被卖给了外国公司，或是由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这样的超级百万富翁接手，成了他们的印钞机。1987年的墨西哥只有一个百万富翁，到了1995年，1 00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产生了24个百万富翁。但是就在同一时期，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却大幅缩水。

苏联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那里的情况更加严重且显著，西方资本介入和激增的债务最先摧毁了共产主义，随后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哈佛大学最明智的经济学家曾经激励过波兰和南美国家，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也就经济改革咨询过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方案和上一代的现代化理论一样全面且具有紧迫感。20世纪60年代，沃尔特·罗斯托呼吁经济增长实现“持续性上升”，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金融大变革”完善市场经济。1990年，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经济学人》上刊登了题目极具列宁风格的文章《采取什么行动？》（What Is to Be Done），主张“休克疗法”。萨克斯曾希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外援助和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帮助苏联免于重创，

然而现实中的苏联却同时失去了这两样东西，社会因此陷入了退化的困境，并被失业问题困扰。最终，这个原先主张人人平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陷入贫困折磨的不平等的国家。在苏联的乡村，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虽然私有化可以缓解这一情况，但是之后国有产业和采矿基地被收购，一批十分富有的“寡头”诞生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暴跌，人民预期寿命也缩短了。收入差异不断扩大，人们不禁怀念起弗拉基米尔·普京出任总统之前的日子。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首席政治分析员后来回忆道：

> 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经济，随后才是政治。我们看重的是价格自由，产业私有化和真正不受束缚、未经调节的资本主义。我们希望法律法规、文明社会和代议民主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

新自由主义实施的效果怎么样，与同时期中国的发展情况加以对比便可知晓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贫困人口数量迅速缩减，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大震荡，但并未波及中国。中国的起点与苏联相比明显不同，但是之后苏联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据估计，1989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峰值2.7万亿美元，大致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同年的相应数字只有4　510亿美元，是苏联的1/6；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接近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令世人震惊。然而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俄罗斯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2万亿美元（就算把原先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加上也未达到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就算休克疗法没把病人医死，也把他们拉到了死亡边缘。

批评之声接踵而至。墨西哥尤其经受不住美国的金融试验，1982年9月，即将卸任的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公开抨击“这场金融瘟疫导致全世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浩劫”，还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那些“盲目追求霸权利己主义的巫医”。20世纪90年代，结构调整得到大范围推行，类似的批评声音也随之出现。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认识到他们对各国经济的频繁干涉并未带来什么积极影响。批评者称他们的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缺陷。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与更多债务国和优秀的非政府组织联合，提供更加人性化也更有效的借贷。其他国家则质疑称，以经济的有效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制度、价值观和文化确实对结果有影响，那么借贷条件不也应该包括调整社会政策、机构行为乃至文化活动吗？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适应变化的进度缓慢，其职员很难接受危机不只是借款国行为失准导致的、更多的是市场运行模式不当引发的这个事实。他们也不愿意处理市场上的不合理行为，认为市场可以自行修复错误，最终恢复繁荣。大多数职员并不英明，无论是疏于监管的金融市场，还是不必要的严苛的紧缩政策导致的通货紧缩，又或是组织内部规则的缺陷，他们都认识不到是自己制定的政策加剧了这些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势在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上受阻了，这场灾难迅速从泰国蔓延至印尼、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最终压垮了苏哈托政府，还导致韩国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跌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配地位因此遭到质疑。政策调整让这些国家遭受巨额损失，据估计，银行也因此损失了600亿美元。当他们如往常一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时，却没有想到该组织也四面楚歌，自身难保了。

就连20年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如今也站出来批评它了。1992年，乔治·舒尔茨、威廉姆·E·西蒙以及沃尔特·里斯顿联手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谁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ho needs the IMF?），反驳对冲基金经纪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做的依靠私营企业在全球发放信贷不是有效手段的论断，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一步推进自由主义原则。他们在文中称市场和信息分配都不存在问题，道德危机才是问题所在。谁都没想到金融化的程度会如此深入，在金融化的进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规范市场行为，其推出的经济援助计划甚至还有可能加剧了借贷双方的风险。他们在文中总结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效了，成了一个多余并且陈腐的机构。索罗斯先生还建议再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但实际上没必要，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立即废除。"

这三个人的想法与美国国会不谋而合，国会不止一次质疑美国是否还需要国际政府间机构。毕竟，许多有影响力的支持全球金融系统运转的国际组织都十分不正规。比如，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相关人士的许可，信贷风险评估工作交由两大私人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负责。19世纪，这两家公司开始评估铁路系统（到1980年，它们才例行公事地对11个主权国家做出评估），只有这两家公司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整个金融体系的存在才合理。少数评论指出问题所在，称这两家公司的方法论夹杂了猜想和数据，混杂不清，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向。

西蒙和舒尔茨接手美国财政部的20年间，该部门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最显著的是美国由最初的政府间借贷中间人变得越来越关注私营领域资本大规模迅速流动的情况。但是，尽管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满敌意，美国政府依旧不改对它的支持态度。该组织的政府间特性恰恰是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因为若是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就不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此外，该组织还让债务国政府在国内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变得容易了。美国这样做得到了巨大回报。在其他国家，金融化带来了市场规则，也让财政监督产生了风险。而在美国，金融化带来的则是无限量的资本流入和大量贷款。对美国来说，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来稳定金融体系并不用付出太大代价。1999年的《时代周刊》仍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誉为"三个火枪手"中的"消防队"，"三个火枪手"组成了"拯救世界委员会"，他们分别是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鲁宾的副手拉里·萨默斯。世界强国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并委任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府间组织来落实这些规则，在如此集权的形势下，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结束了。

规范世界贸易

1981年秋，里根总统前往坎昆参加会议，接待他的仍是来年即将卸任的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一位官方摄影师抓拍到这样一幅画面：美国新任总统身着衬衫，与一众高级官员坐在最后一排，他们身后就是碧蓝的加勒比海。里根右边坐的是科特迪瓦的外交部部长，后边是南斯拉夫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英迪拉·甘地、赵紫阳和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也位列其中。所有人中只有撒切尔夫人喜欢里根传达的信息，在金融革命真正爆发之前，他已经准备彻底改变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的关系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七十七国集团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减弱了，原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认为有必要把大量的资源从富足的北方世界运到贫困的南方世界，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根据南方的需求制订专门计划。事实上，正是勃兰特促成了坎昆会议。里根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这是把欧洲社会民主推广至全球的好机会。里根注意到，美国政府存在“过度支出、超额征税和过度干预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国际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并且反对成立“新的大型国际组织”。他没有批评联合国，但只称赞了在后麦克纳马拉时代重拾财政保守主义的世界银行，并高度赞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是，里根提出了经济自由、私人投资和全球贸易自由化也是影响发展的因素。10年中，贸易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翻了一番（1970年进出口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11%，还不及1929年经济即将萧条之时高，但是到了1980年，这一比率就超过了20%），这使得“发展”被重新定义，贸易又占据了美国国际主义的中心地位。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降到了历史新低。但随着贸易的发展，国家赤字也愈加严重：贸易不平衡的情况加重，美元全球性流动过剩，不得不向美国回流。

里根的讲话终结了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幻想，也让他们企图通过联合国组建强势机构重新分配资源的梦想破灭了。克林顿沿袭了里根的做法，正是在克林顿时期，贸易自由化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口号，一个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也于1995年成立。美国国会对多边组织的怀疑愈加强烈，这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一个惊人的政治成就，美国政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半个世纪之前，发展中国家反对成立该组织，受战争摧残的欧洲经济体也无力提供有效的支持，在遭到国会反对前，最初的世界贸易组织已注定失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也证明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耐久性。评论人士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蜕变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柏林墙被拆毁了，世界再次就维护贸易自由达成了一致。

但是维护贸易自由要付出什么代价呢？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设在日内瓦湖畔一座新佛罗伦萨风格的别墅里，这里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办公地点，因此总部设在此处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屋内墙上还挂着20世纪20年代的画作：《劳工的尊严》《土壤耕作》《充实的工作》，这些画让我们想起了早期国际生活中关注的那些不同的主题。两战期间，资本家们虽然也担心货币和贸易问题，但还要为劳工以及他们对企业是否忠心耗费精力。1995年，由于苏联已经解体，再也没有哪个执政者认为工人势力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本质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不同于勃兰特期待的新的联合国机构的。它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多数决定出自烟雾缭绕的绿色房间[1]，记者、公众甚至许多世界贸易组织的职员都无权进入这个房间。该组织讨论全球化—源自北方世界、由北方国家操控的全球化：尽管这样，全球化对俄罗斯和中国依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为了打入西方市场，愿意落实部分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新型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人员精简，促成国际协定与落实协定的能力都很突出。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商业准则，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商务仲裁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果，私人律师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世界贸易组织问世于全球经济增长之际，支持者们为此欢欣鼓舞。意大利商人、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任总干事雷纳托·“洛奇”·鲁杰罗（Renato“Rocky”Ruggiero）预测，如果贸易自由化继续发展，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根除世界贫困问题。1996年，面对一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代表时，他宣称：“我们不用再为分散的各国经济体制定合作规则了，我们现在要制定的是全球一体经济的规章制度。”如果切·格瓦拉和普罗维什听到这番言论，应该会感到恐慌吧。

沃尔克20多年前的愿望看似实现了，世界经济不但告别了各自为营的日子，还被重新整合在一起。在某一时刻，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代表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半个世纪前国际贸易组织失败的事实被彻底遗忘了。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批评人士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了“邪恶的铁三角”。外界越来越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也随之成为影响逐步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关注的又一焦点。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关于由谁继任总干事的争斗也削弱了组织的力量。除此之外，大量明显维护美国和欧洲利益的提议遭到发展中国家围攻，这种境况导致了形势恶化，唤醒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幽灵。

2001年后，乔治·W·布什回归单边主义，这才是世界贸易组织衰弱的最主要原因。布什政府把世界贸易组织和他们不喜欢的多边机构混为一谈，并宣称要避开这些机构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区域协定，很明显，他们会最先绕开审议过程极为耗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没人愿意在全球机构中投入政治资本。”《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全球化为何止步不前》（Why Globalization Has Stalled）一文中写道。2006年7月，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宣布贸易谈判正式暂停。

[1]绿色房间：演员休息室。比喻世贸组织活动的神秘性。—编者注

全球化：支持与反对

就在6年前，克林顿总统递交了国情咨文，文风同往常一样，传递了高涨的情绪。“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赶上了好时代。”2000年1月克林顿发表讲话，“我们的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繁荣、进步过，这是一个内无忧、外无患的时代。”如此盛世一部分要归功于政府兢兢业业的工作和谨言慎行的国内政策。这些成就也反映了美国愿意拥护被克林顿称为“当今最明显的事实”的全球化进程。用克林顿的话说，这是“拆除贸易壁垒，联络国家和个人、经济和文化的改革”。

20年前，没有人知道全球化，而今天这个说法却无人不知，并且具有图腾式的意义，这意味着美国国际经济新制度大获全胜。1983年，哈佛商学院教授特德·莱维特（Ted Levitt）就“全球化市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他称世界变为一个大市场，各国拥有相同的愿望和追求。集装箱运货大大削减了运输费用，电子革命改变了银行业和制造业，货币买卖也成了赚钱的买卖。全球化大受欢迎，很多企业急忙向世界证明它们具有全球贸易能力。“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航空公司”是英国航空公司的营销口号，啤酒品牌嘉士伯鼓吹自己“可能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啤酒”。“全球化”是20世纪末的流行词，每个有野心的企业和大学都在夸耀自己的全球性。

当然，支持者认为全球化不只是对世界现状的描述，还是对未来的预报和指引。当时的全球化主义者和他们19世纪的前辈都认为自由贸易会促进世界和谐，凯恩斯学说的式微和新技术的崛起是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前提。各国做出的重要决定是全球化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掩盖了其重要性，只鼓吹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1950～1970年，凯恩斯学说影响了一批经济学家，但现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对市场效率的信任（专家称之为“假说”）击败了凯恩斯学说，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体现了右派思想，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思想和其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一样，都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支配，它的支持者为此感到骄傲：全球化反映了不容置疑的规律—供应关系之间的规律。尽管一些经济专家和商学院教授质疑他们的理论，乐观情绪依旧蔓延开来。道琼斯指数持续上升，偶尔有所下降。金融交易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普遍—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票面价值已经从1987年的8 660亿美元飙升到2007年的454万亿美元，看起来，它还可以创造更多价值。1996年，保罗·沃尔克在美联储的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一度怀疑股票市场是否会遭遇“非理性繁荣时期”。但是信息屏上的数字却继续走高，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他便不再担忧。

并非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尤其是那些死抱着国际主义思想、仇视银行家的人。联合国资深官员厄斯金·柴德斯（Erskine Childers）去世

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主义者自鸣得意的心态。他在文章中称，联合国“正遭受着有史以来最严酷的灭亡威胁”，安理会只是“由几个赤身裸体的、没能力的君王组成的小俱乐部”。北方世界的领导者们—比如七国集团，称他们正在监视“全球经济”（这里的引号是柴德斯加上的），联合国已经没有用了。他控诉“全球化”的口号只是老生常谈，提出全球化只是为这种想法提供理论支持，看似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全球化也似乎能作为一个交互式系统为全世界民族发光发热，而实际上它只意味着强行打开别国经济大门，以便让“有钱可用的人”赚取利益。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雷克萨斯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记录了全球化风尚的高潮，这是惹怒柴德斯的最主要原因。据弗里德曼说，全球化取代了冷战，而美国在这两次大趋势中都胜利了。他写道，这并不是昙花一现，在国际生活中，这种状态会维持很长时间。最新的说法是，他把全球化比作圣西蒙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称科学技术正在改造世界。弗里德曼和许多经济顾问以及银行家一样，认为市场可以在谨慎中前行。现代化要穿上他所说的“黄金紧身衣”—一系列听上去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可怕的政策。“‘黄金紧身衣’是万全之策，”他写道，“它并不总是美好、柔软、令人舒适的，但是它是这个历史阶段里唯一持续有效的办法。”美国坚守着弗里德曼的历史终结论，这和从前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毫无区别。

但是，就像弗里德曼写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如洪水般泛滥，现在突然干涸了。之后乔治·W·布什出任总统，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事件，地球村和企业家精神魔力的光芒被“基地”组织夺去。看起来，新一轮反全球化风潮已经出现了，世界好像就要进入更加黑暗的时代，战争尚未结束，全球化主义者希望世界贸易一体化的美好愿望还没有实现，一些人对全球化的仇视无法消除。“华盛顿共识”的缔造者不仅承认这是个“受损了的品牌名称”，还承认华盛顿共识的结果令人失望。传统自由贸易者和资金经理间产生了隔阂，自由贸易者主要关心商品流通和劳工问题，用传统观念界定生产和资本投资，资金经理则希望看到资本流通畅通无阻。2004年，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提醒读者注意“狂热的金融资本主义暗藏的风险”。同年，《金融时报》记者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1]（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一书中也流露出担忧之情，他怀疑资本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了。里根和他的继任者希望投资者可以享有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但是热钱和高管工资的变化让资金经纪人乃至整个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是在追求短期利益。现在，处于运转状态的整个系统只专注于为少数投资者赚取即时利润，鲜少有人关心资本真正的功能，也很少有人为促进新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而努力。

[1]《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8年7月出版。—编者注

再次关注发展？

就在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渐生嫌隙。世界银行在1981年前大规模扩张业务，但里根政府怀疑它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右翼人士批评它“运行得好像一座苏联工厂”，因此它时刻处于防御状态。世界银行赞成华盛顿共识，宣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还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这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饱受批评时，世界银行又开始为当年的屈从行径感到悔恨。财政部强迫现金储备丰富的世界银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大量资助。1996年，世界银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占其借款总额的2%，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为深重之时，这个数字飙升至近40%。新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不喜欢世界银行屈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也讨厌美国财政部的态度，傲慢的美国财政部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银行会加入计划并不周详的救援工作。

沃尔芬森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公开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该组织采取秘密且程式化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危机导致其“没能完成任务”：危机非但没有被控制住，还变得日益频繁且具有破坏性，他们的思想断送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他写道，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自由的资本市场在促进增长中必不可少，反而有很多实例表明它具有负面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银行要跳出经济盒子思考问题，要提倡民主，反对拖慢增长的腐败现象。制定市场规则的主体是“文明社会”，而不是集权的财政部，开放透明的政策能够带来成功。因此，在“第三条道路”时代，他开创了介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右翼自由放任主义间的第三条路，这对一个经常被这两种政治思想抨击的机构来说极具吸引力。

尽管这条路会遭遇更严厉的批评，但是与反对贸易和资本全球化、自由化的声音相比，与日益秘密的、由高级官员决定的国际经济政策相比，与为了恢复某些政策举行的抗议活动和直接行动以及以暴制暴的行径相比，第三条道路是最了解资本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活力四射的沃尔芬森就是这个运动的产物：1994年，在世界银行庆祝其成立50年时，马德里的抗议活动把喜事变成了一场留给沃尔芬森前任行长处理的公共关系危机。1999年11月，反全球化运动占据了世界新闻头条，世界贸易组织召开年会时，示威者在西雅图街头与警方发生争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外的反贫困集会和抗议活动已司空见惯。据估计，4万多群众参与其中，使这次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因反对一个国际机构而爆发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酝酿了数月的示威活动主要由来自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策划。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和剥削人民的跨国企业的反对者也

参与其中。2000年，教会主导的运动呼吁免除第三世界的欠款，早些年英国就曾爆发规模更大的反八国集团的示威活动，并在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还有一些美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关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问题，反对代替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与发生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战争相比，西雅图之战算得上和平甚至平淡的战争（两年后的热那亚冲突就残酷多了）。但此次事件让反全球化声名大振。技术发展为参与者提供了与华尔街一样的优势—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在瞬间取得联系，搜集和传播资源。

这样的直接行动和草根运动体现了他们眼中的国际主义，即一种极度怀疑当局和现存机构的、希望再现19世纪全球兄弟联盟的国际主义。这些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十分看重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成果，因此他们不可能轻易忽视如何让抗议活动给政府带来压力、给社会带来改变等问题。千禧年活动先是成功劝服了英国首相布莱尔，随后是美国国会承诺免除第三世界的债务，这让我们看到，尽管落实到文件耗时较长，但这种来自底层的压力可以产生确实的成效。沃尔芬森清楚与非政府组织和激进主义分子们建立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他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开创性地接纳了新型合伙人，他们在公共关系方面塑造了世界银行的形象，但在银行决策方面他们的影响力很小。

与沃尔芬森挽救世界银行形象的努力相呼应，出于其他原因，联合国正着手恢复自身声誉。全球资本主义的执行者尚不清楚自己的任务，“文明社会”的各方力量随时待命，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决定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起联合国被边缘化的状况。在发展这个战场上，地形显而易见。在任命安南前，几个联合国机构支持198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关注弱势群体下的经济调整》（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提到的内容，共同反对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备受批评，许多证据表明市场没有平均分配利益，也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强调“人类生活”比那些抽象的“经济”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标准经济学思考问题，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做出的决定是不一样的。个人行为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发展，而教育和体面的生活让人类有能力做出选择。

1997年上任之后，安南在帮助联合国彻底摆脱过去30年的阴影时落实了这些提议。此时，发展意味着与贫困和疾病斗争，这也是安南的战略中心。除了他自己之外，整个联合国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职位分别是世界银行行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干事，这种排位是顺应美国意愿的。因此，具有政治敏锐性的秘书长就要确保发展的定义对美国是有意义的。身为第三条道路时代的领导人，克林顿、托尼·布莱尔还有安南自己都希望摆脱过去不被信任的、大政府“灵丹妙药”的形象，远离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极简主义的失败经历，所以在此期间，对发展的定义在语义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答案存在于20年前商学院提出的一个概念。“合作主宰”起初是一个

含糊的概念，它至少包含两种模式。第一种形式高尚、受人喜爱，即唤起管理者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安全和环保意识；第二种形式较为严苛，认为民主是个问题，认为（失败的）政府妨碍了（有效）治理。“合作主宰”最终融合了这两点：兼具包容、美德和责任感，这同时也表达了对正式的政治机构和具有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特色的大政府的深度怀疑。这个新的概念很快被商人带入国际生活。世界银行一马当先，它先是就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治理危机”做出报告，随后又在1991年经济会议上把“有效治理”列为工作重点。距离合作主宰的图书和文章首次问世仅10年后，“主宰世界”这种说法就随处可见了。1995年，瑞典人创办的主宰世界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这样一份研究报告，并呼吁重新审视联合国以及它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系。联合国甚至资助了名为“主宰世界”的学术期刊。“用‘主宰’这个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形容发生的一切。”一位早期投稿者写道。但它确实代表了一些东西，我们摆脱了那些形式化的公共机构，开始看重规范准则、价值观、管理标准和法律体系，开始接纳社会人士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以此为联合国赢得更多支持者。此时的联合国已经不再是各国间实现相互交流的组织，它只是一个（或者说它的名字意味着）更大的全球网络中心，这个网络囊括了政府、专家、非政府组织还有商人。世界银行也事务缠身，据其发展委员会估算，到2000年，世界银行在全球95个国家开展了超过600项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工作。至此，“治理”不再局限于管理发达国家的政治政策，它通过国际机构的行动为深入干预各国公共管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的行为辩护。

安南拥护美国政府，他很快就发布了新消息，称联合国一方面要与非政府组织和反全球化组织建立联系，另一面要与美国合作。第二年，他成为首个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邀请的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了由企业赞助的聚集了商业领袖和政治领导人的年度内部会议。1999年，安南再次参加经济论坛，他建议在联合国和企业界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提出了“全球契约计划”，并号召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秉承人道主义原则。安南急于让世界认识到资本主义人性化的重要性，还提到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安因素，警告世界如果稍不留心，独裁、恐怖主义和种族屠杀就会卷土重来。2000年，应安南号召，在纽约召开了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这是有史以来与会首脑最多的一次会议，会上再次强调了世界面临的威胁，并试图使联合国成为世界发展的中间人，协调企业和国际机构、交战各方和被战争摧残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协调北方和南方世界。他同时鼓励各方面共同努力，让向来不和的、各自为伍的联合国机构互相合作，但是他让杰克逊的“史前怪物”和它的“头脑”成为主流思想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曾做过记者，与美国联系密切，他在2000年从世界银行调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是他为联合国的发展重新带来了生机，与此同时，联合国的维和地位正值旭日东升。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运营预算翻了一番；以此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时，该数值又翻了一番。在千年首脑会议前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预算达到了历史峰值24亿美元。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甚

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这些进展都是全方位的新突破，联合国致力于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但并不局限在改革旧有体制路线上，它还把发展作为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兼顾人类学和法学的发展，不再只注重经济领域。这些改变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政策有些相似，因为国际社会刚刚从冷战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对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多倾注些精力。在肯尼迪总统的畅销回忆录中提到了这10年的浮华发展，当时的联合国一心致力于推广“千年发展目标”，决心消灭极端贫穷，将每日基本生活开销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削减一半。

千年发展目标主要针对非洲国家。南美和东亚的发展已经十分迅速，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因此有所提高。中国政府在没有联合国帮助的情况下，正以不可思议的极致速度消灭贫困。与此相反，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除了经济上有些许的活跃现象，各种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单是刚果地区的冲突就已经造成至少500万人的死亡，而其艾滋病的肆虐让整个国家的情况雪上加霜，另有许多国家民生凋敝，饥寒交迫，而上层领导集团腐败至极。因此，整个非洲大陆就成了联合国政策的试验基地，实际上非洲也一直都是检验政策实用性的实验室。

安南一直试图重建联合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高大形象，并想利用人性化的发展理念打动美国人民。但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美国和各国间的嫌隙越来越大，安南的计划也因此前功尽弃。即使对发展进行重新定义，也只能博得些美国的注意力：随着克林顿执政时期乐观主义的消散，消除贫困一事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国家安全专家警告说，即使全球化已经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还是会有新型的安全威胁出现—贫富差距问题，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已经席卷了非洲中部地区以及东巴基斯坦，甚至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迅速膨胀的人口数量导致了许多贫困青年的出现，他们极有可能发展成恐怖分子，这种情况是全球主义人士未曾考虑到的。简言之，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贫穷已经成了国际安全的新威胁。贫穷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过去只是人口过多，而现在这已经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联合国因急于向美国证明它的重要地位，便对发展做出了新的定义，并称之为解决世界贫困的“人类安全”问题。然而，在双子塔遭到袭击的几个月后，美国的评论员开始忧心忡忡，担心如果全球发展失败，美国国家安全将会面临怎样的威胁，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发展”和“安全”两个概念从一开始就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全球发展则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安全的大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证明了发展的历史性失败。例如，在2002年的某一期《外交》的一篇文章中，金融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谴责了美国的退缩，称其不敢坚持帝国主义的行事作风。他认为，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援助是历史的选择，是谋求发展的必然道路。诚然，对外援助和全球化都有助于国家建设，但“在那些机能失调的国家里，总是有些顽固派阻拦国家的发展脚步”。国际机构对此无计可施，全球化也黔驴技穷：因此，美国就应该在此时挺身而出，履行它的帝国责任。不过，尽管马拉

比称在这一“帝国主义新时刻”，发展的基本助推力美国身兼重任，但他并没说美国应该独自承担这一责任。他建议和过去一样利用国际组织共同应对这场新的危机，由国际组织提供法律依据，共同分担成本。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不受联合国的干预，并需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处理国家建设的问题”。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考虑到美国彻底的单边主义思想，很少再有人继续支持美国的国际领袖形象。显然，马拉比并不是唯一一个打着具有信服力的新幌子推崇自由国际主义的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正是国家安全新计划的诞生地。布什放弃适当的多边主义精神是个错误，而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对此的评价甚至高于他主张的美国海外扩张计划。和马拉比一样，时政评论员同样认为联合国毫无作为。“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机构秩序……已经濒临瓦解。”他们这样写道。他们提议建立新威尔逊主义式的“民主协调”，把它打造成新型的联合安全组织，承担起对全球的安全责任。这样，世界就会发展成“一个法治、自由的世界”，全球从此和平安定，人民共享“美国式的安乐生活”。持续恶化的贫困问题让国家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弊病层出不穷—独裁领导、环境灾难以及流行疾病，对外援助也因此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看上去精明又实际，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几个最基本的政治事实。发展的确对新兴国家的成立大有裨益，不过，在冷战期间，发展就意味着后殖民地国家已经开始了机械化工作，其重心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现代化理念包括电气化、城镇规划、钢铁主导以及整体改良的农业技术，实现这些当然是具有足够雄心壮志的表现，不过也太过雄心壮志以致力不从心，所以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基本是注定的事实。然而，以他们现在提议中的野心勃勃比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不但要致力于建设堤坝、桥梁、城镇、工厂，还要重建各国社会中的价值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还是在国家政权濒临瓦解的动荡国家，这更是难上加难。试着想象，美国，再加上它的盟友，它们协力组建军队，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跨越巨大的地理障碍，就为了让那些因冲突导致分崩离析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市场民主体制，这简直就是在挑战人类的信仰。兰德公司还尽职尽责地做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要吸取美国成功占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教训。然而事实却是，这些成功事例能提供的经验教训都是反面教材。这两个国家在被占领时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经济体，但是，在20世纪中叶，被占领国和占领国双方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谋划和修整，利用强健的国家机关完成计划、重建和合作事宜。这种外包式服务就是帮助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几个国家进行国家建设，而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都已四分五裂，要在几年之内助其完成修整并实现现代化，这能实现吗？提出问题就要解答问题。

“失忆症”实在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通病，新帝国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显然行不通。他们想要操纵世界回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体制，但他们拒绝承认时代已经变了。另外，扬·史末资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联盟是

建立在国际政府能基本取得突出成就的基础上的，这个成就就是国家自决权的全球化。联合国在某些特定国家仍具有正统的合法地位，而马拉比和其他人却提倡对这些国家进行干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倡导的历史性联盟就必须伴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在其他人眼中，欧洲人仍残留着帝国主义气息，美国加入他们是不是明智之举呢？实际上，随着反对美国对外扩张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建设已经时过境迁。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之后，美国对国家建设本就有限的兴趣已经消失殆尽。

因此，帝国主义观念下的发展/安全关系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证明它的对与错了，这并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但此二者均表明帝国主义的发展/安全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现状经验不足、制空权不强，又极为反对冒进，所以美国缺乏这种持久力或能力来重建发展的领域。事实证明，联合国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帮助。另外，国际新兴力量也对世界的共同发展大有裨益。崛起的中国就承担了非洲和东南亚一系列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承诺发展“南南合作”，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它不仅为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金援助，还为他们提供了自己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中国的资金相对来说并不是十分充裕，但是这种模式下的发展确实极其迅速，西方对安哥拉等地的借贷系统都为此受到了挑战。到2012年年初，中国对拉丁美洲基础设施与发展的借款资助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金额。

中国政府的引导型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型的世界投资模式，尤其是对非洲持续增长的资助发展资金总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统机构构成了挑战，同时，这种模式也像中央集权论的一种复辟，新自由主义革命也可能就此寿终正寝。一种新形式的非洲瓜分行动正在悄然进行，美国评论员对此极为恐慌。不过，从过去的世界银行和其他西方开发机构的非洲和南美借款客户的角度来看，中国提供的资金尽管极为有限，却是极受欢迎的救济款。事实证明，西方法治观念在偏远社会的传播带有着西方自身强大复杂法律体系的传统特点，这种传播缺乏创造性，甚至会造成不稳定现象和暴力事件的发生。西方的一系列政策显得过于仓促又缺乏思考（从结构改革的现代化到沃尔芬森时代世界银行主张实行的全方位社会改革），因而导致了一连串的大混乱现象，这更显得中国的极简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更具有社会责任感。看到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美国的警报危机就显得没那么紧急了。比如说，当看到尼日尔中国制造的新桥取代摇摇欲坠的肯尼迪桥时，美国日渐衰弱的霸权地位和它的国际经济日程就多少有所缓解了。

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发展模式都说明美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的联系十分密切。国际体制向新自由主义的整体转变是由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偏好决定的。如今，这些体制已经日落西山，被边缘化，他们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找到了新的定位，即承担其应对欧元区危机的责任。而它过去第三世界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在尽可能地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议中需要更多的

话语权。世界银行已经开始拥护透明度、协调性和诚信度的原则—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世界银行自上而下的处事方式已经结束，它的未来地位也会大受限制。金融危机中管制松散的市场和无止境的金融化时代仍在经受考验—现在说结束还为时尚早，毕竟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至今仍未平息。但清晰明了的一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应对南部需求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无法继续运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欧洲和美国仍在经济衰退中奋力挣扎，地缘政治的权力天平已经开始倾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巴西。回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或是回到第三世界大团结的那些日子已经再无可能。但在自由市场和国家战略地位这两派拥护者的斗争中，前者已然难以再续昨日辉煌了。

第十三章 人权法规

> 谁有权决定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谁，谁就拥有这个国家的新主权。
>
> —卡尔·施密特，1923年

> 国家主权最基本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这并不仅仅是受全球化和国家合作的推动影响产生的变化。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我认为人权是个人享有的最基本自由权，《联合国宪章》以及随后的国际条约中都规定人权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复兴及传播让人类更重视人权自由。现在再研读《联合国宪章》时，我们就能比以往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宪章的宗旨意在保护人类个体，而不是包庇欺侮人民的人。
>
> —科菲·安南，《主权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1999年）

“上帝创造了国家作为养育人类的摇篮，而上帝赐予的人性才是人类的母亲，”马志尼曾写道，“如果你不热爱人类共同的母亲，你就不可能爱你的同胞兄弟。”这时的人们开始认为，“国家”和“国际”在根本上是互补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关系为创建国际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无论是过去的国际联盟还是如今的联合国，都试图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赋予人民统治国家的权力，同时由国际机构监督国家统治者和人民的合作关系。这一观点在“二战”后更是历久弥坚。但是，民主本身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准入条件，按照本章开始部分安南的那段话，《联合国宪章》在深层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调各国尊重人权和自由，还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各国间和平互信，睦邻友善，却同时接受非民主国家的加入。1945年，国家主权原则占据了主导优势。到冷战末期，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互补说的谬误就越来越明显了：联合国的成员国已经有能力欺压其子民，致使世界爆发人权危机，危害国际和平。因此，在当时的联合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对主权的新意见，主张对其加以限制，这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权革命中已经有所显现。联合国由此担负起了传播文明的新使命，这点和过去的国际联盟极为相似，它开始更加依赖国际法，还呼吁将通用的道德准则写入法律。

因此，冷战后出现的“新世界秩序”最开始并不是由大国军事联盟打造的（海湾战争是个例外），而是由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责任和权力的扩张而形成的，这一点并不在人们的预想之内。受到主权豁免权保护的联合国官员都被安排在科索沃、南苏丹和东帝汶等国。逐渐地，他们不

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保护者—照顾难民，提供物资，他们还是活跃的政治代理人，帮助各国逮捕罪犯、取消或授予选举权。最重要的是，他们还介入该国的国家建设：1989后，安理会至少向12个国家派去过代表团，帮助他们起草新宪法，另外15个以上的国家也收到了同样的协助邀请。

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世界组织的基本政治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主权不再是绝对的政治原则。1945~1970年间，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明显占据了主导优势，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剩无几。然而，单是对滥用人权的监管就完全跟不上这种趋势的快速发展。此时，所有民族的人权自由危在旦夕。随着国家保护责任的成型和随后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投入使用，联合国按照哈马舍尔德的蓝图逐渐步入正轨，成了世界上真正的国际性执法机构。

统治权被削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去强调的通用道德标准的回归。一时间，国际上对“国际社会”道德的呼吁接连不断，这为联合国对别国的干预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利用不言而喻的道德真理以及过去的基督教信条，联合国对别国的武装干预演变成了正义的战争，而以人权为名战胜这些国家的想法却模糊了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人权干涉—战争的另一别名，宣布了统治权的衰弱，同时也弱化了战争法，这让联合国部队（甚至于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非联合国内部的军事联盟也开始了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从国际法中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权力。国家保护责任主要适用于非洲的国内冲突，对于批评家而言，这无疑是19世纪文明世界和未开化世界统治标准的复辟。在国家保护责任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对道德的强调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政治效果。自“二战”以来，新的人道主义对在国际关系中培养道德观念一事充满了雄心壮志，而正因为如此，为实现道德、政治和实用性共同作用的事业也显示出了其局限性和危险性。

人权干涉

1988年12月，冷战进入尾声，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前往奥斯陆，作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代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希望联合国能成为一个英勇的维和机构，他曾如此说道，然而当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受到世界认可的时候，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却并不正视这样的贡献。实际上，在《联合国宪章》中丝毫没有提及联合国的维和任务，这一概念只是由哈马舍尔德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时的奇思妙想衍生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受刚果危机影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刚果行动备受指责，维和事业的运作有所衰退。不过，即便如此，到1988年时，有58个国家的领土上方仍是飘起了联合国国旗，联合国的士兵在全世界进行着他们的维和任务。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致敬于联合国的成绩，并赞扬了联合国作为世界警察为世界和平、正义和法规做出的贡献：

> 维和的真谛就在于让士兵成为和平的守护者而不是战争的工具。这一做法向世人展示了军事领域的非暴力原则，为冲突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为缓解紧张局势带来了新的解决办法，以此让冲突通过协商手段得到解决。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支国际军事力量，不为战争而建、不为霸权而建、不为强国或强国际联盟盟的利益而建，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消除各民族间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乔治·H·W布什总统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才逐渐成长为世界的重要维和力量，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军的第二大部队。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和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标志着一种新型行动主义的出现。这些维和行动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救助了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居民，最终维护了该地区的政治稳定。20世纪70年代，经授权进行的维和行动就有三次，到1988年，联合国没再出动过维和部队。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维和事件竟激增到了38起。1987~1994年，维和部队的士兵从1万人增加到了7万人，联合国的维和预算也从2.3亿迅速膨胀到36亿，联合国其他常规项目的预算为此大幅缩水。在安理会的推动下，联合国真正地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兴国际力量。

根本的问题还是著名的“分裂国家”问题。在这个国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庞大的时代，这个称谓着实奇怪（自“二战”结束后，国家数量增加了4倍），从几个角度看，这个称谓似乎都不太恰当。正如18世纪波兰的分裂一样，人们忽视了这样的现实：许多成功的帝国主义强国在过去分裂他国时都以其本国管理不善为由。事实是，当代欧洲的整部历

史就是几个国家的灭亡—奥匈帝国、普鲁士、苏联，又先后被别国取代的过程。但并不是这几个国家使人们想到了国家分裂：人们关心的不是欧洲古老帝国的必然解体，而是由殖民国家解放独立后的新国家的分裂，这些国家的分裂极可能导致长久的贫困和民族冲突，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它们的分裂让世界上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大范围的饥荒，甚至在2001年后直接导致了许多反西方国家的恐怖组织的产生。到2002年，“国家分裂”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点关注词条。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发表讲话称，“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在告诫人们，防止国家分裂，拯救分裂国家才是“这个时代势在必行的正确策略之一”。

早在10年前，安理会扩大“和平威胁”的概念时，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此概念的扩大，即使是对其表示赞同的观察员都认为其不妥，《联合国宪章》中对“明显侵犯”的释义中包括了“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的非军事不稳定因素”。随后就产生了索马里问题。英国外交官戴维·汉内（David Hannay）称处理索马里问题的文件为“冷战后，联合国快速达成的协议中最令人震惊的单边文件”，安理会在1992年12月授权维和部队进入索马里，理由是这里的“人类正在经历着难以置信的悲剧”。这是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维和任务，但是这次任务却为以后的行动开辟了先河。次年，安理会就以同样的手段对海地进行了内政干涉，理由是海地的国家局势需要“国外势力帮助其判断是非正误”。

索马里的这场灾难几乎让人道主义干涉夭折。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成功地监管了最初的解救行动，随后美国2.5万人的精良武装部队迅速地撤离了索马里，紧接着联合国仅仅向索马里输送了原计划1/3的军事力量。更糟糕的是，美国的一支“地平线”部队留在了索马里，还在1993年10月时，对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Mohammed Aideed）发起了一次拙劣的袭击，原因是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市民击落，冲突中，18个美军士兵和几百名索马里市民被杀。尽管这场武装袭击是由美国发动的，克林顿政府还是为此谴责了联合国。1994年，共和党掌控了美国国会，反联合国的情绪愈加膨胀。美国因此停止资助联合国，联合国陷入了预算危机，致使联合国十几年的维和事业难以继续。除此之外，美国的《国家安全恢复法案》还规定，严格控制受联合国管辖的美国军队的使用。

随后，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惨剧爆发，在两次惨剧中分别有25万人和80万人丧生。这两次悲剧都表明失去美国支持的联合国的权力极为有限。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一心想要维护联合国的公正形象—维和领袖，希望自己不要卷入他国的内战中。为此，他把维和部队的兵权交给了他在巴尔干半岛的特别代表—一位不愿承担风险的日本外交官，把空袭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消息传来时，塞尔维亚的战俘集中营已经零零落落地布满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炮兵获准任意炮轰萨拉热窝，联合国此时的不作为激起了更多的民怨。1994年突然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是对联合国的又一次考验。联合国维和部队刚刚到达基加利，就敦促冲突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然而，可

支配的士兵不过三个营，完全不足以阻止当地政府放任的“反图西人大屠杀”。在安理会还在思虑谋划时，难民已经流落边疆，仅一星期时间，上万人惨遭屠戮。最后，维和部队的确有所增员，却为时已晚，反叛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已经掌控了国家，屠杀也就此结束。

当南斯拉夫冲突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声誉时，西方的决策领导人才立刻改变态度。1995年夏天，近8 000名波斯尼亚籍的穆斯林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奴役时遭到了塞尔维亚预备部队的残忍杀害，而这里竟是联合国荷兰部队为穆斯林提供庇护的营地。受这场大屠杀的影响，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波斯尼亚的指挥官和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科菲·安南指派的代表才最终下令维和部队阻止针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武装势力的恶行。先前下令禁用维和部队实施武力干预的布特罗斯–加利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波斯尼亚，安南则对这次的武装干涉表示赞同。此时，美、英、法三国不得不派军事力量前来支援，因为它们意识到塞尔维亚的反抗已经威胁到了自己军队的地位。这三国插手后，势态很快得到平息，这让联合国方面极为尴尬。几个月间，北约组织的快速反应部队就包围了萨拉热窝，使塞尔维亚人不得不走上了谈判桌。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铁娘子”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对布特罗斯–加利在波斯尼亚的固执不作为的行为十分愤怒，她坚决要求加利离开联合国。由于过去没有过秘书长在第二任期就被罢免的先例，克林顿政府就策划了所谓的“东方快车事件”，意图把加利驱逐出联合国。但美国的这一计划没能奏效，不得不在他的连任表决中公然投以否决票罢免他—安理会成员中唯有美国投了反对票。不过科菲·安南成为加利的继任秘书长一事早已成定局：如果说波斯尼亚一事毁了布特罗斯–加利的声誉，那么只有安南能够驾驭维和部队，他既不会不经思考滥用兵权，也更善于留心美国的喜好。在安南的领导下，联合国秘书处和美国的关系更近一筹，这也是即将到来的新人道主义所需的基本前提之一。

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悲剧说明维和不全是对的，中立主义有时是在纵容犯罪，武装干涉在某些情况下是阻止事态扩大的唯一方法。“维和”的联合国通过强制要求国际各方停止向塞尔维亚输送武器，禁止波斯尼亚人进行自我防御，并封锁了塞尔维亚的所有谈判。美国记者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大卫·里夫（David Rieff）和英国记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都严词谴责了“卢旺达大屠杀”。有了这次大屠杀的教训，他们都意识到，此时他们身负历史重任，急需行动起来防止种族屠杀的再次爆发。波兰籍犹太学者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早在50年前就创造了“种族屠杀”一词，他的作品如今又被人们拿来重新研读。年轻的自由党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高度赞赏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讲述种族屠杀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坚定了他的信念，决心在外交事业上有所作为。即将上任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在飞离处于包围中的萨拉热窝的路上一直冥思苦想，怎样才能“把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激进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以推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过，这些对联合国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现存的部门设置都通过国家来处理国际事务，这些又对现在的国际事务部门有何启示呢？“永不再犯”的确是一个诱人的结果，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有几个评论家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说过，即使联合国在纳粹时期存续了下来，它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干涉德国的内政。新一代人想要避免大范围流血冲突的心情十分迫切，而这正与联合国的机构设置相冲突。联合国缺少自己的军事武装部队，常常受制于安理会各成员国的意见，而在没有快速反应部队的情况下又很难及时应对由各国政府主导的暴力事件，这样一来，联合国就很难实现干涉主义分子对它的期望。而干涉主义分子十分清楚，联合国并不是一个能独立自治的国际组织。布特罗斯–加利之所以在波斯尼亚无所作为正是因为英、法、美三方不愿有所行动。

1998年，南斯拉夫的自治省科索沃爆发危机，在此之后，形势才有所改变，保守主义分子不再固执己见，干涉主义派占了上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取代了律师出身的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担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桀骜不驯地称美国是世界的精神领袖，她在前一年的电视采访中也称美国为“世界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想使用武力就使用武力”是她的著名言论。“我们站得最高，所以我们看得最远。”她指责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将军胆小怕事，并在英国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可靠盟友—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比起谨慎小心的前任首相约翰·梅尔（John Major），布莱尔的战斗热情明显有过之无不及。1999年4月，布莱尔来到芝加哥发表演讲，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他说全球化已经体现在了政治、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诸多领域。世界各地的人权保护对本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国际社会需要体制改革，新法规急需尽快出台，以规范各国的行为。他提出：“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着新的变革。”布莱尔认为，美国必须肩负起领导世界民主事业发展的重任，在世界各地宣传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样才能惩奸除恶，让世界更加安全与和平。

而奥尔布赖特则决心在其任期内坚决杜绝波斯尼亚悲剧再次上演，因此她先发制人，不顾安理会支持与否，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压制塞尔维亚地区的民族肃清杀戮。她认为，国务院内部对新国际主义的抵触是完全错误的。安南十分赞同她的想法（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干涉主义表达了高度的赞同，他的演讲稿由其首席英语演讲顾问撰写，但对于北约组织的轰炸行为他却未表示过谴责），但是安理会又一次地陷入了僵局。不过，安理会的决定并不能影响到奥尔布赖特以及和她想法一样的布莱尔：他们二人一致认为，如果联合国不批准，以干涉主义的名义行动也一样可行。他们全然不顾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大使称这次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立法原则”，北约组织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轰炸了塞尔维亚。就这样，这伙西方势力树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将人权保护凌驾于神圣的国家主权之上，在某些时候甚至逾越联合国，不顾其权威地位，肆意而行，还要强迫联合国认同他们的这些新规矩。

国家保护责任

最为支持联合国的几个重要国家经常对联合国保持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联合国只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领袖，而作为国际主义的精神领袖，为了维护国际精神，联合国本身很可能会忽视其他领域的事务。

20世纪30年代时，像阿尔弗雷德·齐默恩这样的学者就是这样看待国际联盟的，在冷战时期，他们对联合国仍怀着这样的看法：如果联合国真的不能以善行之名有所行动，那就让能有所作为的势力取而代之。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末，迪恩·腊斯克也曾持有类似的看法。美国新一代的全球主义者也不再对联合国抱有期待，他们渐渐开始认同齐默恩的观点，并开始信赖“民主同盟”，他们认为要么主导联合国，要么退出联合国。早在1980年时，英国的民主党多数派联盟就主张这样的看法，“新保守主义派”就是由此生根发芽的。20年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华沙为民主共和体揭幕，称四年后要在联合国成立一个民主核心会议。（至今，民主核心会议仍然存在：直至本书截稿，会议仍在由蒙古国主持办理。）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十分支持核心会议的建立，并一心期待“联合国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机构”，但实际上，核心会议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一直受到联合国之外的民主共和体的威胁，所以它无法发挥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的评论家、新保守主义派和自由国际主义派都一直建议建立民主协调，因为这可以使美国更具实力和影响力，这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了竞选双方政治主张的一大特点。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实力的西方强国想要在联合国内部探究国家主权是否已经不再可能重返过去的神圣地位。它们的这一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指使的，而对联合国来说，这种做法会大大地损害它的权威性，应该加以防范。20世纪时，“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初是指由法律授予的一种权利。另一种观点是，法律的认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照看他的国民。在1996年出版的《主权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一书中，苏丹的外交家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和他的创作伙伴提出，对非洲而言，主权从未受到保护且不受国外干涉势力的侵犯，非洲的主权一直被当作强国的职责所在，一旦强国故意忽视或是肆意犯法，主权就会沦落他手。领土控制是主权的传统概念，而相比于国民“维持生计的生活标准”而言，领土实在不具有什么意义。不能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政府就可能因此失去它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有权甚至奉之谓天职进行干预。

邓的提议曾被加拿大政府成立的一个高级委员会采纳，他们把他的提议作为未来联合国行动的基础规范，以防再次出现科索沃干涉时的法

律问题。“保护责任”的概念在1999年布莱尔的演讲中已经有所暗示。2001年，加拿大的报告中为干涉主义合法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尽管报告中提到要一并废除“干涉”的叫法。但是，报告中建议的干涉条件模糊不清，其概念本身也毫无吸引力，尤其是在美国成功入侵伊拉克被作为国家保护责任的实践楷模之后。尽管如此，安南和他的继任者潘基文都十分拥护这一提议，他们把这个想法作为重塑联合国道德楷模形象以及避免与美国关系进一步破裂的方法。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峰会上，国家保护责任的缩水版获得了各国的普遍认可，其政治方面的原因和道德方面一样：在各国正烦恼布什把国家安全重新打造成先发制人式的新政策时，它却为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提供了平衡点。国家保护责任为联合国重塑了道德制高点的形象，为它重新获得了这部分权力。国家保护责任主张履行一种“国际责任”，以保护那些人权正遭受侵害的世界人民。

然而，尽管国家保护责任让联合国得以重返世界中心，但第一次巴尔干半岛的干涉行动仍然说明干涉行为可能导致太多不可预知的危险后果。推翻专制王权、打败残暴的国民军并不会自动迎来民主的和平时代，甚至有时会助纣为虐、造成贩毒团伙的兴盛。在战后国际社会的构建之路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先后接踵而至，而今随之而来的还有总不按理论发展的混乱的现实。“转变”一词是20世纪末政治学家们最钟爱的词语之一，而“转变”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证实是不会有明朗的结果的。波斯尼亚的悲剧发生后的10年里，国际管理官员还是没能让因战争分裂的国家重获完整。在科索沃，干涉主义起先的确成功地制止了冲突，然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离任后，国家一片混乱，犯罪案件遍地滋生。在新任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视察美军在科索沃的最大军事基地邦德斯蒂尔营时，《时代》周刊撰文表示十分惊讶：“民主机构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多民族的民主政治文化会占据主导优势。它只意味着国家建设预案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让巴尔干半岛的和平部署相对长久一些。”而这一切还都是发生在入侵和占领阿富汗及伊拉克之前。

在这个时代，推进民主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联合国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国帮助建立议会制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从不知道什么是议会民主，而这些成功的实例让那些“分裂国家”甚为烦扰。《外交政策》杂志曾公布过破产国家的指数，根据它的统计，截至2005年，已经有33个国家正经受着分裂的巨大痛苦，还有43个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从那以后，民主指数似乎一直事与愿违。在欧洲委员会任职的英国官员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曾发出警告，要对那些“丛林法则”盛行的地方保持警惕。如果西方国家的干涉行动不顺利，他们应该果断地撤离这些弱肉强食的国家。然而，如果前提是国家保护责任会让势态有所好转，强国怎能单方面撤离呢？

问题之一就是国家保护责任制下的主权讨论已经远远地偏离其初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弗朗西斯·邓的原意并不是指利用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干涉，而是想让中非地区的濒危国家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内部分裂。然而在科索沃危机后，多数评论都围绕着为国际军

事行动制定法律基础而展开，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愈演愈烈的干涉主义加剧了这一态势的发展。因此，尽管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国都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但国家保护责任无论是在理论文字上还是实际行动上着实助长了干涉主义的气焰。2008年，缅甸遭受了强热带风暴的袭击，伤亡惨重，但缅甸军政府却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禁止救援部队入境。此时，法国外交部部长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zhner）提出在缅甸使用国家保护责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争议，不过争议很快就平息下去。潘基文在第二年澄清了这一问题，他的解释虽然牵强但还算具有积极意义，称法国方面的提议只是怕灾难引发某些危险的情况—大屠杀、战争、民族肃清或反人道主义犯罪等。

在科索沃和伊拉克危机爆发前，安南曾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干涉。”然而，潘基文却一直试图把国家保护责任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区分开来，他坚信“保护责任是国家主权的伙伴，而不是破坏主权的敌对方”。对于世界各地国家保护责任的反对者来说，这个说法已经是对他们的一种外交上的尊重了。作为国家保护责任最虔诚的支持者，潘基文并没有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表达对国家保护责任的理解。对于曾自视为人道主义干涉者的国家，国家保护责任是十分理想的工具，因为这个修辞所弘扬的就是普世人性和国际共同体，而非暴力和战争。布什政府在着手统治伊拉克后，开始陷入了后侵略时期危机，美国自由派一直想把政府引向多边主义，但国家保护责任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有两个重要人物发表了重要的观点，她们注定成为奥巴马白宫团队中的一员。她们都是人权事业的先锋代表，一位是战地记者萨曼莎·鲍尔，鲍尔荣获过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3年的普利策奖，她的获奖书籍就是关于美国在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中人权危机的胆怯反应。她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因为美国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许可支持，她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卓越的领导才能可以最终让联合国成为富有效力的国际机构。同时，她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出面全力阻止大屠杀惨剧的发生，防止爆发更大范围的人权危机。尽管鲍尔指出了正确的路线，但她还是认为如果联合国没能担起重任，美国就应该领导世界发展人权自由。鲍尔担心伊拉克被攻陷后，可能会进入“人权领导的真空期”，所以她提出成立“当事人联盟”以避免当联合国起不作用时，仍能有人领导发展人权事业。

另一位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她进一步推动了人权事业的发展。斯劳特和鲍尔不同，她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防止大屠杀本身，她认为美国力量资源的分配才是至关重要的。在斯劳特看来，布什做出的像任命约翰·博尔顿为驻联合国大使等一系列的争议行为并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各地彼此连通的世界。另外，国家保护责任为联合国重登世界的道德制高点创造了机会。斯劳特甚至提议尝试出台一个新的“联合抵制责任”制度以抵制专制统治的国家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类建议表明，道德义务在强权之下已经远远偏离其本身意义，而道德的棍棒在美国人手中，可以挥向任何有丝毫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和地区。

布什执政时期，斯劳特还参与过美国主要两党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的修正过程，这个计划旨在制定美国新版的长期外交策略。令人惊奇的是，2006年在该计划的结论中，他们竟把布什时代的国家安全政策和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由一系列杰出优秀人士打造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彰显了在全球主义崛起的60年后，美国现阶段外交人才的高质量水准。这群杰出的外交人才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中追忆起了外交领域的巨匠乔治·凯南，2005年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家中平静离世，享年101岁。次年，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的报告发表，他们称正是受乔治·凯南的“X文章”影响才立志于外交。不过，他们的报告成果显然与凯南的思想全然不同。凯南从未说过美国的价值观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他的政策路线只是简单地基于国家利益，在他看来，不同的国家会用不同的方式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普林斯顿报告则认为“法治的自由世界”（其自由的类型和法治的概念并没有明确说明）符合全世界的需求。“美国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问话在这里颇有深意地停顿一下，“美国在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什么呢？”凯南一直强烈谴责过度扩大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因为在他看来，像亚洲和非洲这样的地区根本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美国自1949年以来成了世界的义务保护人，高举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其军事保护行动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凯南对此十分反对。而在普林斯顿报告中，仿佛随时随地发生的都是关乎美国利益的重大事件，总而言之，美国的权益无所不在。报告中还充斥着对应急战斗的宣扬，从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到推进民主和扩大人权，美国要在各个领域“为世界而战”。同时，报告还认为1945年后国际机构体制已经“分崩离析”。报告一方面建议强迫联合国各成员国接受国家保护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如果联合国不能如此改革，就由美国发起一个全球性的“民主协调组织”。报告中还说道，领袖要带给人民希望并以此服众，而并不是让人民畏惧他。而与此同时，报告又坚持说自由和法制需要武力为之保驾护航。它还谈到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同时又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线远大于美国的实际地理边境线”。

奥巴马总统看到了美国新一代道德现实主义人才的崛起。萨曼莎·鲍尔成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止大屠杀等事务的高级官员。斯劳特则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参与普林斯顿国家安全计划的其他4人也在政府内担任要职。不出所料，2010年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彰显了这些人的主张。相较于布什，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鲜少提到军事优势，他提及更多的是美国和世界的共同价值观。奥巴马一直致力于建设“国际法律和组织机构的架构”（这与布什完全不同），他提醒国人“勇于承担责任则国家兴盛，反之则要自讨苦吃”，“一个国家要想为世界推进全球化”就必须为权利而战，权利让美国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样，它也会让世界各国“成就自己的伟业”：国家保护责任的实施势在必行，它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绝对不存在比它更好的权利责任理论供各国选择。

美国和联合国在2003年时曾有的分歧如今已经不再存在，至少就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而言，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危机明确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间的同心一致。

安理会表示支持北约介入利比亚危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奥巴马和潘基文两人表示十分赞同，认为这是国家保护责任成为世界政治准则的历史性时刻。而其他安理会成员则严词反对。尽管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该议案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而并非否决票，但包括它们在内的其他强国都强烈反对武装干涉利比亚，认为这是对利比亚当权政府极大的不尊重。中国、巴基斯坦、印度都在辩论中表明了态度，反对借新原则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干涉内政正是美国的用意所在，他们的理由就是有必要防止班加西发生大屠杀惨案。

美国和联合国之间以保护人权之名实现了十分密切的双边合作（如果要说有那么点好处的话，那就是确实制止了大屠杀事件的发生），联合国的其他强国成员也因此对联合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早在美国对科索沃和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就已经有所显现。奥巴马对国家保护责任的全新诠释与乔治·W·布什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也存在着一些一致，那就是他们都把种族屠杀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作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有必要采取先制措施根除这些威胁。在处理这两种威胁时所导致的政治后果都难以说清但又有所暗示。正如在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中对萨达姆·侯赛因实施了绞刑，国家保护责任也并没有权力决定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的去留与否，奥巴马也承认国家保护责任在这点上有所逾越—然而如果卡扎菲政权不被推翻，国家保护责任的任务就不可能结束。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合法就不惜以损害人权为代价？尽管官方对此表示否认，但国家保护责任似乎就是这样执行的。

执行武装干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奥巴马在利比亚讲话时承认，美国并不会对所有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进行干涉，他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以道德为本的外交政策有谨慎明确的规定限制。假如事实真的如他所言，是不是就能够这样认为：只有大屠杀才是国家保护责任的既定目标。其他的种族肃清、人权犯罪以及战争罪三者都不属于国家保护责任的常规注意事由。为什么不是加沙地区或是巴林岛？支持者的回答是：聊胜于无。然而，这种干涉很可能是错误至极的，因为这明显体现了美国对国家保护责任执行的双重标准。重点是，一国领导如何对待其国民并不是国际事务需要关注的唯一问题。如果反人权行为亵渎了一国神圣的领土主权，那么世界就会战争频发，屠杀不断，陷入无尽的恐慌和动乱中，引发各式各样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果20世纪的历史对我们有所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世界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际政局稳定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这些都关乎全人类的集体利益。

另外，人类要谨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保护责任看上去像极了前几个世纪的文明使命和“人道主义”干涉—从英国利用废奴主义合法化其对世界公海的侵略性管辖，到1953年法西斯意大利对其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行为找出的“合理”借口，他们讽刺地称意大利是以“文明”之名镇压贩奴行为。1914年以前，巴尔干的起义军定期向西方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人士寻求援助，让他们帮助自己摆脱土耳其帝国的野蛮统治。这正如

科索沃的解放军向北约组织寻求帮助想要摆脱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统治一样。而这两者分别处于动乱中的不同历史背景下，科索沃解放军的决策领袖却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进行了空袭，其支持者中却鲜少有人由此联想到一个世纪前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空袭，那次入侵正是大规模轰炸理论及实践的鼻祖。西方的此类记忆缺失着实是个问题。其他国家反对国家保护责任的概念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专制独裁或是漠视对人权的保护，事实正如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所说的那样，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早期西方国家对他们内政干涉的悲惨记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人道主义的本质在无穷无尽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简而言之，他们的所见所想正是欧洲和美国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文明标准的老恶魔在1945年时已经被联合国驱除，而如今它又从坟墓中苏醒了。这究竟是19世纪欧洲文明事物的苟延残喘，还是又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新概念的诞生，一切有待考证。

追捕肇事者

如果说在冷战结束后，国际行政机构在维和行动、干涉主义以及国际领土管理的推动下有所发展，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要数法制机构的发展了，其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国际刑法的颁布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上。这的确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这并不仅仅因为法治理念曾有过一段短暂而平凡的历史。两战期间，国际联盟曾有过这样一个关于成立法制机构的探讨，但并没有产生确定性的结论。“二战”后，在纽伦堡举行了对国际战争犯罪的审判，随后就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展开了大量的犯罪调查，还对罪犯一一提起了诉讼。然而，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提案并没有成功通过，到20世纪80年代时，国际法和过去一样成了摆设。

1993年，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并授权该法庭“专门负责审判在前南联盟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国际法因此重现生机，让人眼前一亮—彼时的美国和其他强国都不愿看到这样一个从属机构的成立，因此迟迟不愿有所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任命了几个法官，并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而检察官则由秘书长亲自提名，由安理会进行任命。这样的安排十分有必要，因为这能保证由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保持对国际法庭人员构成的掌控权。一年后，为了平息各方对联合国在卢旺达的不作为行为的批评，安理会在那里成立了第二个法庭以防再次发生屠杀事件。

这两个法庭忙得不可开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160多名个人，并对他们中的64人进行了判决，这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样的大人物。米洛舍维奇是在这里接受战争罪审判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1999年，他因科索沃的民族肃清案件被控告，2001年，他被转移到海牙军事法庭，同样被控以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战争罪罪名。（该案于2002年开始审判，直到2006年米洛舍维奇被发现死于狱中时案件仍未宣判。）卢旺达法庭则审理过50个案件，其中宣判了29件，他们的原则是，罪犯必须要供述他们的犯罪行为。他们还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成立了一个报案部门，并公开披露了大量的案件信息，其信息的透明度堪比审讯笔录。

即便这两个法庭最终被废弃，但它们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即为通用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铺平了道路。1994年时，联合国首次就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开始起草相关法规。终于在1998年《罗马条约》获准通过时，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进入了倒计时阶段。2002年，《罗马条约》获得了60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开始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其管辖权仅限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存在争议的是，其中提到的对侵略罪的管辖权还暂时不能使用，要等到对侵略罪做出明确的定义时才能对其行驶管辖权—最终于2010年

时，《罗马条约》对侵略罪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国际刑事法院各成员才感到一丝欣慰。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甚至威胁联合国，要否决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除非安理会同意为美国人提供豁免权。美国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协议，共同抵制国际刑事法院，拒绝把本国国民交予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这使国际刑事法院的各成员国十分不满。美国更激进的抵制措施是拒绝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除非该成员国同意与美国签订上述的双边协议。尽管受到美国的多方阻挠，国际刑事法院还是突出重围开始运转。

美国由于在对科索沃的国际行动中持续增兵，因此十分惧怕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对北约组织1999年时对塞尔维亚的非法轰炸行为进行了指控，这让克林顿政府感到更加的不安，同时坚定了五角大楼对反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项目的决心。此外，“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大举进行的反恐战争也使布什政府十分担心刑事法院对美国的海外官员实施逮捕和审判。随后，意大利方面宣布23名美国人因涉嫌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规引渡案”，要接受意大利法庭的审判。这些美国人中大部分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驻米兰的负责人，他们被指控2003年在意大利米兰街头绑架了埃及的传教士。随着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秘密审讯基地的曝光，更多类似的指控很可能会出现。换言之，大多数国家已经欣然接受了随后发生的法律主权一事，并在非本国的起诉案件中十分支持法院的判决，而正当此时，反恐战争加剧了各国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一直不愿让自己的审判自治权退居次位。然而，尽管全球金融改革的国际政治形势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美国的愿望和做法，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一直避免不了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心理，但至少在美国的反对人士看来，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势崛起对美国是一场真正的司法挑战，美国必须积极应对。

事实上，和另几个国家司法管辖区的公诉方不同，刑事法院担心美国逍遥法外。但刑事法院对布什先发制人的战争学说合法与否的尖锐问题视而不见。联合国大会对侵略罪的定义已经被普遍接受，布什的先发制人政策看上去正属于侵略罪。法院对外宣称，和其他犯罪行为不同，侵略罪需要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才能认定，所以，法院将不会对非缔约国进行侵略罪的审判：因此，不仅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可以免于接受侵略罪的调查。

不过，国际刑事法院的政治地位日益增长的发展趋势却十分符合美国的意愿：刑事法院最初是由联合国大会发起而设立的，却与安理会十分疏远。但后来，法院渐渐地和安理会缔结了密切的关系。例如，2005年，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提交了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调查申请，强迫苏丹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而苏丹并不是法院的缔约国。该事件的结果也令人惊叹：美国和中国一样，对该项决议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否决票。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大常任理事国共同施压

于非成员国苏丹，迫使苏丹配合新国际刑法的司法程序。

美国的代表声称美国一直把人道主义援助置于限制法院影响之上，这明显就是一句对外的程式化外交辞令。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苏丹会被调查，而美国不会。应美国的请求，安理会规定对苏丹的非政党人员免于指控。因为这条规定，在苏丹的美国救援部队都免遭调查和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的美国公民就会免受一切法律的制裁，因为美国自己也会依法处置犯罪的国民。但是这的确说明，美国既可以让国际刑事法院为我所用，也可以让自己的国民幸免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实际上，本来就很难找到一个更完美的方法，能让国际法完全束缚住一个世界强国。

很快就有人意识到这就是对美国人的例外主义，紧接着，其他强国也恍然大悟，或许它们也可以成为例外，拥有豁免权。2011年春季，安理会决定把卡扎菲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对此，至少有5个国际刑事法院的非缔约国一致支持这一决定，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美国和中国。这项决定再一次显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非缔约国享有的豁免权。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是不是就只是强国用来方便审判弱国的工具呢？很快，非洲人民就有了这样的质疑。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十分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有超过半数的国家成了它的缔约国。但是不难发现，该法院的主要调查、审判对象基本都来自非洲：其中有5次指控是对声名狼藉的乌干达“圣主抵抗军”的领导人，还有几次是对刚果的几个政客，以及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和其他几个苏丹的政治人物，除此之外还对象牙海岸和肯尼亚进行了调查。尤其是对巴希尔的指控让联合国安理会和非洲联盟之间大生嫌隙，该指控还被认为极大地破坏了世界的和平愿景。自那时起，有关国际法院是否公正权威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方争辩称，对非洲的密集指控说明非洲的司法秩序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薄弱。批判方则坚持认为，相比于国际刑事法院接二连三的指控判决，资金援助将更有助于改善非洲国家的司法机制。非洲联盟的部分势力认为非洲过于依赖司法审判，西方则过度夸大了法律权力，寄希望于让法律解决一切冲突，他们想用这种成本较低的政治途径实现和平，但这却要花上更长的时间，从道德上讲这也有不作为的嫌疑。这一点从1945年后欧洲对纳粹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处理方式中就能略见一二。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惩处了几个纳粹关键人物。为了稳定和发展，其国家体制基本保持不变，对纳粹的清理和调查力度也多了一层限制，这样才能让国家休养生息，恢复生机。

国际刑事法院核心的权力失衡说明了冷战之后“人权法”的传播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法院的设立并不是由美国发起的—不但如此，美国一直对它有所隐忍，如果不是因为它听从于安理会的安排，能为美国的军事人员提供完全的豁免权，美国根本不会一直听任它的所作所为。然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史上，国际刑事法院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角色，它是美国利用最久的国际机构之一。作为为美国提供例外身份的国际法机构，它实际拥有的权力要远大于它本身该有的权力。

“公正的涌现”的倡导者认为，联合国体系中新的人道主义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美国的霸权地位没有受到丝毫挑战，许多人权支持者希望他们的普世主义假设能受到美国的关注和参与，以重新振兴他们的理论。不过这只是普世主义人士的一厢情愿。俄罗斯等国曾强烈反对1999年北约组织对科索沃的武装干涉，它们现在意识到或许人权的保护也是他们应该认同的。因为它们可以像美国一样，在得到豁免权的同时参与到国际刑事法院的事务中，利用刑事法院对世界的小国和弱国进行限制。世界强国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设定，中等国家也不会抵制反对，因为它们本来就一直受到世界法规和制度的限制，只有弱势国家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有好有坏。不过国际刑事法院之所以如此强势和有用是因为联合国，最主要的当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可它的合法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刑事法院实际上是国家保护责任的附属品：法规和法律机构的结合让国际干涉成了合法行为，第三世界对此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此外，尽管美国和国际机构一直在对“依法治理”的理论进行创新，但国际法理论实际上从未明确过。《联合国宪章》中对战争与和平的界定早已混淆不清。在冷战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反征服”旧规也支离破碎。在对暴政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处理中，先发制人政策让步于法律，由法律武器来进行公正智能的评判；公众受制于秘密机构和军官士兵、司法服从于行政。关于战争法，在其最初的概念领域，1973年的法学家们已经测试了他们的新学科理论，人性化战争的理想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合法与非法、国内与国外、平民与战士的界限也已经模糊不清。有时，国家为了逃避法律义务而任意修改法律条款—因此，别说是参战，即便是发动战争他们也能用“干涉”、“冲突”等字眼瞒天过海。有时，他们竟信口称是新的叛乱让法律失效的。此时，法律顾问就会现身说法，混淆视听，因为这些法律顾问都是享受行政特权并受官方保护的政府人员。因此，法律言论只在能为政府所用的时候才能公之于众，如果它不利于国家政府，那么它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公众眼前。这让他们更加意识到，他们只能是政治掌权者的工具和仆从。

同时，战争本身可能早已不需要法律的许可。奥巴马政府就史无前例地使用了无人机作为空袭杀手，这让他能够有针对性地对世界各地实施无人机暗杀，美国的无人机任务大幅激增，却还为之正名，称其为“自卫”。如今，美国的无人机项目已经在60多个军事基地和中央情报局基地投入使用，从内华达州到法国驻吉布提的外籍军事基地，无人机无处不在：“机器飞行员”在兰利、弗吉尼亚州、巴格拉姆、俾路支省的终站起飞，分析员只要盯着“死亡电视机”的几小时直播，就能收到无人机的反馈信息。无人机基地的工作人员可能不被视为合法的战士，因此，即便遭到敌人的攻击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对其做出处理，军事法律顾问为此十分焦躁，而此时的技术人员则致力于研究新一代的无人机，能通过预设程序自动完成“追寻、锁定、击杀”的任务。2010年，联合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庭管辖范围外的杀戮的报告，这篇报告少有人知，它意在警告世人“现行法律体系的权限已经过度扩张，变得模糊不清，其中包括人权法、战争法以及管辖国家间武力使用的法律法规，这一问题急需解

决”。

如果有机会看到无人机技术人员的几页工作日记，就会发现“人性化战争”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就是对技术水平的测试。2007年，美国军方下令研究如何建立一个“道德判断自动识别的智能系统”。随着“具有杀伤力的自主机器人”逐步代替战场上的人类士兵，工程师们正在不遗余力地确保这些机器人是“懂伦理道德的机器”，他们试图在机器人的程序中写入战争法和道德品质。工程师们称赞机器人不受人类情感和是非的左右，他们具有高端的信息获取能力，因此机器人在战场上要比人类更为人性化。但是由于机器人的软件程序极其复杂，所以有时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可怕后果，已经有过自动武器造成友军死亡的实例了。随着美国军队逐渐向自动化发展—其他国家军队也多半会紧随其后，人道主义干涉战争的远景将会是由受人类控制的非人类进行的战斗。带着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幻想，2012年2月，《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安全区域，由机器人负责巡逻保卫工作，以此“制止叙利亚频发的屠杀事件”。不过这样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了机器人—比如说，美国的空军部队就表示他们的无人机在有危险时会“自卫式”地开火，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远离国家和平民百姓，以免伤及无辜。未来就是这样的，拥有配备激光制导导弹的无人侦察机的强国只要在电脑终端动动手指就可以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全世界范围内击杀它的敌人了。

杰里米·边沁在两个世纪前就正确地认识到，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普遍幸福，它应该独立于任何国家和信仰而存在。如今却全然相反，法律成了授予许可权的权威手段和舞权弄术的工具，对法律的诉求也是为了平息争议，为例外主义暗度陈仓。如果美国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能在2006年看到发生的一切改变，他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正是在鲁特的帮助下，美国国际法协会得以成立。在他那个年代，国际法是全球通用的神圣信条，他绝对想不到他现今的美国同胞会在这样令人羡慕的处境中，一面赞颂法律的优点，一面尽情享受着法律为他们提供的诸多豁免权。但是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政治优势也让它付出了代价，虽然这份特权优势让美国从世界第二强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国际法的旧时理念曾是巩固国家主权的重要力量，国际法法规为战争树立了行为准则，国际事务的仲裁者也不是政客而是律师。然而现在，国际法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信服力，它再也不能对世界的所有国家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和管理权了。

第十四章 何者永存：欧洲危机及后续

因此，我认为危害民主式的压迫将不会再和过去一样：就现阶段来说，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此类压迫的例子。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跨国监管网络具有技术统治论、社团主义和非民主主义的特质，它被认为是深思熟虑后的最新成果，深受世人追捧。人们称赞跨国监管汇集了全人类的智慧，是当今最优秀最理智的人类成就。

—马丁·夏皮罗（Martin Shapiro），

《全球化将影响欧盟？》（Will the Globe Echo the EU?，2005年）

斯皮内利之梦：欧洲的过去和未来

地中海的阳光炙烤在第勒尼安海的水域上，位于距离意大利海岸线60英里[1]的圣斯蒂法诺的火山小岛和文托泰内岛共同沐浴在这片阳光下。每个小岛的面积都只有几平方英里，岛上干燥炎热，树木很少，满是受尽风吹日晒的光滑岩石，岛上的居民主要是自罗马时代就栖息在这里的蜥蜴和海鸥，再就是政治囚犯。圣斯蒂法诺的面积相比之下更为狭小，但这座小岛却有着非凡的意义。18世纪末，波旁皇室监狱根据完美的边沁主义原则建立于此。至今，波旁监狱的遗迹仍保存在小岛上，周围杂草丛生。稍大些的文托泰内岛上，曾有法西斯统治下混合监狱的行政总部，岛上除了和圣斯蒂法诺一样的险石陡壁之外什么都没有，放眼望去是一小群着装统一的意大利政治犯，他们在“二战”早期被放逐于此，观看着欧洲罪恶源头的一举一动，却憧憬着欧洲美好的未来。1941年夏，著名的《文托泰内宣言》在此诞生。它的主要作者就是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当时他刚刚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后来，他成了战后欧洲主义的传奇人物，也是“二战”后欧洲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促成欧洲联盟的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领袖作用，直到1986年离世，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欧洲一体化的理念。

《文托泰内宣言》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国际联盟的失败以及法西斯和纳粹的崛起。它不仅谴责了国际联盟对国际法幼稚的信任，也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对国家的盲目崇拜。继而，《文托泰内宣言》论述道，民族国家本身已经对当时的和平构成了威胁：欧洲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国际联盟，而是一个成熟的联邦组织。根据马志尼的说法，共产主义被批判其过度宣扬阶级斗争的优点。不过，尽管斯皮内利宣布退出共产党，但是他提供的方式均是共产主义式的路线：他坚信联邦主义的“激进派势力”就是所谓的“人民大众”，但是他们其实只是“严谨型国际主义分子”中的少数派，他们严格地按照列宁主义行事，准备在法西斯和纳粹分子瓦解的关键时刻领导民众走向未来，因为这时的“民众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新时代的到来”。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与当时不同意识形态各派的斗争，而是与企图复辟民族国家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斯皮内利一派的真正任务就是研究如何让联邦组织有效地运作起来，如果个别国家一意孤行，他们就不得不施压让他们认清事实。只有欧洲联邦才能解决多民族、多地貌的问题，欧洲联邦会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导致欧洲大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欧洲已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波及全世界。欧洲应该停止争斗，团结一致，因为全人类都在梦想着“更美好遥远的未来，期待着全球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

这个梦一做就是70年。不过，斯皮内利认为当前欧洲的危机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难以解决。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共同市场正在发展成

一个强大的势力，所以他选择直接通过共同市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绕道而行。他一直不寄希望于依靠政府间的合作实现目标，因此，他一直寻求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机构”—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并希望其凌驾于部长理事会之上。另一反面，他自然十分赞成发展经济联盟并由它促成政治联盟的理念，不过他也担心这一过程可能会太过漫长。此外，他从不排挤和他一样推动欧洲联邦发展的精英人物，因为他很清楚，最终欧洲大陆的所有民众都会一起感恩并祝福联邦的发展。

今天的欧洲联盟虽忠于联邦主义的方法，却面对着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未来，欧盟与《文托泰内宣言》有着难以言喻的复杂关系。欧洲一体化进程是由一位官僚精英推动发展的，他一直认为国家主权是实现一体化的障碍之一，需要慢慢地攻坚克难，但是这位官员完全没有社会团结和人性尊严的概念，而这却是斯皮内利一直所追求的。按宣言所说，联邦是消除不平等、消灭贫困的必要工具。管理化资本主义模式限制了市场和产权的发展，因此，不能完全废除它们，重点工业部门将会实现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工人合作社也将陆续步入正轨。未来的成果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实现一个简单、易管理和更加高尚的联邦理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经济大权将会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统治者手中。

从两方面意义上来讲，人类已经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首先，1941年的《文托泰内宣言》中描述说，要想创建美好的未来，就要在政治上行动起来，动员大众，满怀信心和愿景。而现实中所谓的信心和愿景却都从未出现过。此外，1945～1975年管理化资本主义在战后的西欧创造了多年的奇迹，对此，“文托泰内理念”基本赞成。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托泰内的理想主义者们拒绝随潮流发展转型为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时，由于拥护金融全球化的理念，《文托泰内宣言》在欧洲不再受人追捧。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1941年《文托泰内宣言》的这份情操就像一个“古老”政权一样，它随着圣斯蒂法诺岛上的波旁全景监狱的荒废，也逐渐走向了没落。

这里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标出一个转折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欧还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贸易和经济增长远超于美国，在当时的体制下，欧共体十分强大，各民族国家高度自治。无论是来自外部世界还是欧共体内部国与国间的缓冲力，欧共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坚不可摧，整个欧洲凝为一体，各国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逐渐走向了一体化进程。然而，欧共体的官僚机构一直求强心切，希望让欧共体成为更加完美的联盟，而事实却总是适得其反，体制的发展因此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的财政部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目睹了密特朗政府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体制的辛勤努力付诸东流。作为1985～1995年间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德洛尔决定大力发展欧洲大陆的社会团结事业，同时加快欧洲的市场一体化进程。法国的另一位高级公务人员、经济学家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于1987年接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洛尔在欧洲所推动的一体化和同时发展的国际资本流动规则性自由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位法国官员亨利·沙弗兰斯基（Henri

Chavranski）起到了同样的重要作用。当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国际上默默无闻，却很有影响力，亨利对该组织的“经济自由化法规”的起草过程进行了监督。一位学者称之为“巴黎共识”，相比于美方哗众取宠的版本，“巴黎共识”开启了欧盟乃至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向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壮举。德洛尔的孤注一掷不但可能会让欧洲享受到资本自由化的果实，还会提高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过后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

德洛尔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就是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和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欧盟的成员国数量在10年内增加了一倍，而大多数东欧国家也和平并入欧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欧盟扩张的历史性成就却得不偿失，并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随之而来的竟是欧洲各国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利欲熏心。欧洲格局的再分配本来旨在扶贫济弱，然而欧盟却并未有效地发挥出为弱势地区谋得福利的作用，相反，却为这些弱小国家制造了诸多的不利条件：实际上，“欧洲一体化社会”的纳税能力极为有限，所以一体化社会只能让步，欧洲必须把财政收敛和货币联盟作为更高的目标。因此，欧洲一体化不得不把再分配进程放在第二位，着重治理通货膨胀、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问题。欧共体于1992年2月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旨在强化统一的欧洲市场，加快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推出统一的欧洲货币，而并不是为了改善欧洲的生活水准或是管制资本。

同时，由于欧洲议会和它的国家等效性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可，欧洲民众掌控国际组织的想法因此未能奏效。这并不只是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后议会制度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也是因为随着成员的增多，多数胜于少数原则成了必要的投票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成员国可能要经常签署一些它们并不需要或是没有必要签署的政策—因为签约是它们的义务。正因如此，只有货币统一才能让各国政府交出曾由自己自由决定的财政大权。所谓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从理论层面对赤字支出和债务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它至少规定国家的司法机关不允许参与进来。投票的选民在被询问时显得有些不安，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会这样。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强硬的体制，在2010年以前，《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截至当时，除了卢森堡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所有欧盟国家都违反了该条约的规定。但因为处罚措施较轻，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比以往更显宽松，因此也鲜少有反对的声音。

如果不让立法者来推动一体化进程，谁还能担此重任呢？答案是欧盟，此时的欧盟真正地引领了新的国际主义潮流。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机构就是“欧洲法院”，很奇怪，这个机构常常被忽视，但相比于世界的其他同类机构，它显然手握重权，因为其成员国（尤其强调，这其中并不包括德国，因为德国更倾向于把本国的最高法院作为最终仲裁机构）的国际法院必须服从它的判决。欧洲法院从开始就规定各国的国内法律不能凌驾于欧洲法律之上，并继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欧洲法院可以对社会政策和产业关系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干涉，这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太多关注。作为权威的法律机构，欧洲法院比任何机构都有权出台一

部“新国际法”—它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具有普遍适用性，并高于政治决定权，如今的世界已经很难再成立这样一部国际法了。

比之欧洲法院，监管机构则更为权威和普遍，但对它的界定也更加模糊不清，很少有人重视。行家们甚为熟知的“专家委员会”—一位比利时的政客这样描述它：“利益群体必不可少的工具，欧洲研究生们的噩梦”。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流程来看，布鲁塞尔的立法者通过了一般的行政法，其具体细节是由监管委员会和国家法律专家共同起草的。上千名这样的委员在其中暗箱操作，他们既不公开身份也不具有代表性，而欧洲议会甚至欧洲理事会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越来越多的人批判该体制完全没有民主可言，于是2009年欧盟签订了《里斯本条约》，意在反驳这些异议。不过，尽管《里斯本条约》明确承诺要重振“欧盟的民主风气”，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做到。今天，专家委员会的体系枝繁叶茂，它的程序比以往更为冗杂晦涩，对已经出台的行政法规，它几乎不可能对其做出某些修正或干脆废除它。简单说，欧洲把权力更多地给了监管人员和统治者，而不是立法者和人民大众，这就混淆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限，“导致了国家漏洞的出现，它的体系过于臃肿，因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这种模式的国际一体化很快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成为2010年的欧债危机。童话般的理想世界瞬间崩塌，欧元汇率开始剧烈震荡。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扩张性政策可能已经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因为应对南欧的债务所需的总金额比此前导致危机的数额小得多，比如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耗费的数额就比这笔钱多得多。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结果如何，因为此类政策受到了欧元区统治者和德国政治势力的阻拦。而被卷入这场金融风暴中心的国家不得不省吃俭用：国家收入迅速缩水，工资水平锐减，失业率蹿升，失业者以年轻人为主，几十年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也都付诸东流。

在国家立法机构和政治领导人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只有一个例外十分显眼，它就是德国联邦议院。对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来说，她在欧洲所有的领导官员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除外）扮演着最为关键的决定性角色：相比之下，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都备受冷眼。不过，即使是德国也阻止不了危机的走势。前些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展示了机制体制的弊端，不仅是欧洲的公务人员，包括欧洲官僚机构以外的欧洲组织在内，他们个个手握重权，贪污舞弊。

欧洲政客从2010~2011年一直在协商，希望让希腊加入到欧元区来，为此他们所要克服的唯一阻力就是“信贷危机”，他们得转“危”为“机”—破产的宣告既不该由这些政客来做也不该由任何当选官员来做。只有在主要由银行家组成的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进行过深思熟虑后，才能下定论。这些人应当抛开自己的公司人身份，搁置这种身份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把整个产业看作一个整体，不过该过程少有透

明度可言，所以基本不会公布任何消息。有些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们是欧债危机中的新宠，专做全球风险评估（但它们所做的评估并不成功）。不过，并不是成立了评级小组就能得到评级的权力，他们必须四处游说，并在前些年中做出一系列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必须能使资本市场实现自我调节。

直到2008年，欧洲的政治阶层才开始有所认识，正如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所言，金融市场是“必须驯服的猛兽”。整个金融体系一片混沌，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点：监管部门正在调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潜在的操纵行为，12家银行涉嫌串谋操控欧洲银行同业拆息，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全球逾350万亿美元合约参照的基准利率。《金融时报》用大幅版面刊登了这则消息，报纸最初没有挖掘到不同寻常的细节，使得人们对此事缺乏兴趣，而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很有教益的。如果现代金融生活中那些首字母缩写形式令人费解，那些专业问题很复杂，那些术语很隐晦，那些投入的资金数额多到令人咋舌，那这一切就并非偶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市场”，让“市场”更显神秘，而正是在所谓的“市场”中，暗箱操作才得以进行，市场的不完美以及不均等的敛钱机会也得以掩人耳目。

然而，即便这些因素很好理解，金融危机还是揭露了金融市场保护个人利益的弊端，在个人资产受损时，金融体制让社会来承担他们的损失，替个人偿债，而且社会化债务数额之多令人瞠目结舌。2008~2009年，政府对金融产业的紧急救助金额数目巨大，以至于许多国家的负债率（负债/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了警戒水平，平均都在20%~25%之间。而讽刺的是，不但国家政府为此频发财政危机，许多情况下，金融危机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市场参与者拿到援助资金，并迅速且成功地饱其私囊，而监管系统依然漏洞百出。政客们谴责银行家毫无社会责任感，但对此他们做不出任何有效的回击。相反，中央银行推出新政策，允许欧元贬值，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它是市场天然的调解机制，也是在这个规划毫无可信度的年代能刺激经济复苏的唯一可靠方法。作为问题根源的金融衍生市场，因为不再受到全球金融贸易税和其他新型监管措施的束缚，终于能够有所发展，金融产业也能继续发展，产生更多的新型无担保票据，这样也就能有效地缓解金融危机。也可能是金融领域的领导人在威逼利诱，想要展现他们在统一行动、自我决断、自我保护上与欧洲国家领导人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斯皮内利认为，经济运行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他的这种观点显然已经完全被淘汰了。历史上关系最为牢靠的联盟—欧盟实行了欧元的特别计划，如果通过欧元满足的人类需求并不是市民大众的需求，那也并不稀奇，因为大众对这样的结果并不负有什么责任，银行家们才是经济危机的责任方。在文托泰内的战争时期，金融资本一直被当作一种可控的、可核查的助推力，而投机者则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负有部分责任。相反，随着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货币联盟的发展，金融一体化制造的财富是欧洲各民主政体无法负担的，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也是他们无法解决的。不仅如此，这还大大限制了各个民主政体的权力，削弱了

各金融机构的信用度。欧洲国际主义已经不再是政治自由的源头活水（如19实际的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也不是社会福利的源泉，它已经和国际主义的初衷分道扬镳了。

[1]1英里≈1 609.34米。—编者注

欧洲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正如斯皮内利的宣言所证实的那样，欧洲通常代表着一个更广阔的模范式的理想，这种理想有时是正式的，有时则较为含蓄。尤其在乔治·W·布什的政治手段伤害了与欧洲的盟友情谊时，欧洲试图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习，结成联盟，首次发行共同货币，期望建成“欧洲社会模式”，寻求新的出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4年的论著中写到了关于“欧洲版本的美国梦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破灭的”。托尼·朱特（Tony Judt）在2005年发表了《战后欧洲史》（Postwar），书中他描写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涅槃，欧洲的民众选择支付更高的税款以回报国家为人民提供的“免费或几近免费的医疗保险、提早退休以及众多领域的社会公共福利”。政治评论员斯蒂芬·希尔（Steven Hill）在2009年国家债权危机爆发的前夜描述欧洲大陆为“山上新城”。

就是在这几年，国际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它比以往更为复杂，更为全球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的经验而成，美国的一些时评员对此大加赞赏。他们热情洋溢地评价新形式的国际主义为“新世界秩序”，它看上去像是放大版的欧洲联盟，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下，正式的超国家机构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而起主导作用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中等水平政府官员，他们结成宽松的商业式网络，共同处理和解决问题。这样就不会有明显的冲突，也没有繁文缛节。一切事务都在幕后进行，虽单调乏味又偏技术性，但最终会得到真实的结果。这种新形式的国际主义是一种较为安稳的国际主义标准设置，它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治理，并宣扬民权的发展。政权依旧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不再是通过官僚机构、立法部门或是政治家们来运作了。大型国际机构、正式条约甚至外交家的时代似乎已经开始悄然流逝了。

新的国际主义描绘的不仅仅是欧洲的图景，更是整个世界的全景，这样的图景是令人叹服的：传统的政治学家多数都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很少关注大型的正式机构，它主要依靠非正式的一群小机构和同一水平的机构间关系来运作，并且，这些中小机构并没有政界、商界和民间组织的区别。这一观点说明国际大型组织（比如联合国）虽然是理论方面的领袖，指明了世界发展的方向，但在国际事务中却并没有起到相应的领导作用：

> 主宰世界的整个基础设施体系并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贸易组织。主宰世界是网络式的共同治理，其中包括了反垄断官员，警员，检察官，金融监管人员，情报人员，军队，法官甚至是处于基层的立法人员。

然而，这种描述实际上指的就是一个监管部门和整个网络中人的结合，只有在他们都真诚奉献自我、奉公守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国际事务的“最佳实践”，这虽然索然无味，却是值得尊敬的。这正是效率和技术相结合的法则。很难想象，诚如政治权力一般令人不舒服的事物也可能会影响谈判桌上的辩论方向。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鲜血淋漓，甚至没有犀利尖锐的意见。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幅美好积极的世界治理愿景，用法学学者马尔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的话说就是“主宰世界的最高法院”。

当然，这是个旧观念，它认为只要政客们不插手，让有专业技术知识和有才华的民众接手治理就好了。“一战”之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以及目录学家都很拥护国际主义，这是因为国际主义赋予了他们至高的使命，召唤出了他们对待职业的高尚情操。然而，专家们往往抵抗不住政治场上的硝烟，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等同于政界官员，认为自己更能代表政府。无论专业理论知识是否有关政治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原本中立的科学技术支持哪种政治秩序，哪种政治秩序就具有相对的优势。有些国家希望自己的政治秩序是民主政治，正像美国和多数的西方国家一样。一时间，国际上的很多国家都开始效仿这种政治体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日渐成熟并成果丰硕，这令其他国家很是向往。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处于现代国际治理中心地位的民主问责制已经出现信用赤字，而美国的领导权位和价值观却不能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其他的某些国际势力就是想要一个封闭的世界，尽是官僚机构和游说组织的旧世界，他们仍对拯救国际主义旧梦抱有幻想，那么他们应该活跃在哪里呢？答案可能就是民间社会，因为在那里才会产生奇迹，民众会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已经消失，道德风尚已经取而代之。自1970年开始，90%的非政府组织完成了组建，自“一战”以来，联盟共治的增长速度大幅提升：1994年的《外交部》撰文称其为“全球联盟改革”。许多非政府组织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成为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附属机构，它们接受大量的西方援助资金，对国际事务进行调控。比如说，有2/3的欧盟援助资金要经过非政府组织进行运转。截至2003年，他们支出的货币资金数额比联合国的相关机构或某些成员国都要多很多：像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这样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它们每年的预算都超过一亿美元。然而，基金可能会成为合作的一种形式，许多非政府组织现在都在烦恼怎样才能杜绝投资人的过度独裁，以此来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朝夕万变，非政府组织自己的责任制和透明度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政治学家克利福德·鲍勃（Clifford Bob）一直在探索已经初见端倪和还未显现的事，他曾写道，全球公民社会基本就是一个关系复杂的“达尔文式社会”，多数的西方组织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而多数的非西方组织运动正在努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并不是说非政府组织的缓慢崛起是件坏事，只是它们为国际生活带来的能量必定与他们相对的不透明性相符，事实是，它们的日常工作事项很少以公共理论及真理为据。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带有特殊目的，它们只能作为公益事业的辅助部分而不能有全面

的公益行为，它们提供的方案只会被相关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采纳。

大型慈善基金会作为国际生活民主化的工具更无法令人信服，它也是所谓的公民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在过去的30年里，它在监督巨额个人资产流动方面做出了贡献，包括私人、网络公司以及金融公司的巨额资金流动。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出现不仅仅代表着个人慈善捐助的激增，也代表着慈善本身的转型。新型“慈善资本家”通常十分不满旧有的全球机构，他们希望能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采用未雨绸缪的方式预先募集基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他们想要尽力说服世界各地的首富巨富，让他们慷慨地捐出他们所宣传的巨额财富以回馈社会，这体现的是一种个人观点和偏好。过去，他们通常会用自己的实例影响世界各地的青年“社会企业家”，以此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手段。当然，他们的做法也不尽是优点。他们把自己的商业方法用在社会问题上是在夸大方法技术的作用，却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也忘记了机构本身会束缚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也会经常误用善款，把这些钱投在不该投的地方，他们本可以再三考虑钱款的用处，但他们却任意地捐给了对其知之甚少的各地的组织机构。在过去，这类基金会也会为国际公共机构提供极其必要的援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联盟间的亲密关系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现如今，由于基金会可支配的资金总额不再能负担得起许多历史悠久的国际机构，所以它们不再给国际机构提供资金，而是取而代之，亲自负责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专家抱怨盖茨基金会垄断了疟疾的疾病研究，这会让疟疾科学家形成“垄断联盟”，使他们只为了互相的医学验证而进行研究，这样会阻碍真正的科学辩论。

由政府利用税收资助公共机构的此类科学研究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现在，私人财富终于能身先士卒地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这些专业研究机构捐募财富来组织科研活动了。新机构不再像过去的政府公共组织那样明目张胆地浪费、贪污、傲慢自大，它们看上去晦涩难懂，莫名其妙地不透明。比如说2009年时，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大卫·洛克菲勒发起了一场慈善聚会，他们邀请了志同道合的大慈善家，其中包括了乔治·索罗斯、奥普拉·温弗瑞、特德·特纳等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他们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以应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世界上由来已久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他们于5月5日悉数出现在纽约上东区的宅邸中，这场聚会是保密进行的。令人惊讶的是，聚会上的这些巨富的财产总额约有1 250亿美元，这还不算他们在前12年里已经花掉的十多亿美元。后来，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都享受到了这笔财富，这大大削减了他们本国的社会支出预算。不过，联合国可以通过联合国大会和经济社会委员会等多种手段为自己的政策和行动造势，但“慈善俱乐部”（媒体这样称呼他们）什么宣传工具都没有。他们只是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吗？或者正如一些媒体推测的那样，他们是在决定他们要解决世界人口过剩对世界产生的威胁吗？可能这才是21世纪美国富人最为担心的全球性问题。答案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通过了解私人财富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了解到仅靠这些慈善家是不足以供给全球的公共物资的，运行良好的多边国际组织才能更加系统、更加开放地处理和解决问题。

有些新兴大慈善家对此就会质疑。eBay（易贝，美国在线购物网站）的亿万富翁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曾说道，慈善的全部要点就是在于加速“慈善活动从机构向个人的转变”。对慈善的这一评价暗含亲企业、反政治的态度，现阶段面临的基本挑战很难被掩饰：西方的许多人（不仅仅是网络公司的亿万富翁）已经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无论是对国内政府还是国外机构—国外甚至占有更大比率。国家公务人员遭到民众的唾弃，而企业家则受到民众的极端崇拜。即便不说企业家们的内置优势—他们过目不忘，认真负责，经验丰富，并有能力处理和调解国内社会及各国社会间的政治冲突，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众已经对公共部门的下属机构颇有微词。50年前，有些评论家曾说道，国际上已经不再需要“关系社会”，取而代之的是“机构社会”，他们的意思是说国家间横向关系的旧观念（也就是19世纪外交关系的体现）正在被权力阶级所取代，而随后超国家组织又终结了权力阶级的关系。超国家组织本身高度自治，将强国聚集在一起以实现集中决策。现在来看，这样的趋势已经被逆转，许多曾经颇具权威的管理机构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地位。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无关紧要。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瞬息万变，擅于创新，是一个渗透性强的网络型社会，而这些大型机构是不是真的具有重要意义呢？这些网状关系看上去平等又具有活力，它把各国势力密切地连接了起来。然而，这种国际网络有多种存在方式，其中许多模式对于集体机构来说都不透明且不具代表性。面对这种网状关系，有人欢喜有人忧，它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事半功倍，这一点马克思和列宁就有透彻的理解。网络评论员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他的著作《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一书中谈到了“无组织的组织”，并赞扬了松散组织的时效性，但是它们鲜少有经久流传的政绩。正如19世纪90年代一样，无政府国际主义像流星般一闪即逝。

国际组织的内部运作可能并不怎么民主，这点已经为人熟知。毕竟，它们也主要是行政官僚机构，它们中的世界强国成员为人处事也都像它们一样。国际立法机构也不再寄希望于19世纪的国际主义者，正如欧洲议会和联合国大会一样，它们基本不可能在21世纪有什么大作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公共机构重要地位的沦陷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不过这重新赋予了国家主权重要的意义，还为国际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提供了攻击个体国家国内合法性、国家能力及国家凝聚力的机会。实际上，它们也并不是要消灭民主政治，重建专制政权，也不会有人再去信任专制统治了。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说明这样的转变也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当然是想要架空某些典型的机构，限制他们的行动能力。曾经旨在推进国家主权的机构也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协力遏制这些机构。这不仅是对自治权的限制，也暗指各国在决定加入国际组织并遵守组织的规定时，也必须接受本国自治权的受限。这一变化才是对自治国家最主要的影响。“统治世界的影响力和决策模式已经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科斯肯涅米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这样评价道。

这种对国家主权的多方面侵蚀已经成了世界近些年来的一项重大变

革，这也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世人对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激进态度发生了转变。毕竟，在19世纪风云莫测的政坛中，国际主义是一场杰出的国际运动，它为世界各民族和以自己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赢得了主权。国际主义对民族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影响基本上都是相当正面的。国际主义从1919年起源，当时的国际联盟的宗旨就是打造一个“安全民主”的世界，以帝国思维理解就是打造主权政体的国际社会。1945年后，联合国进一步推广了国家主权的信念，联合国的态度十分坚定，其推广的国家主权的含义也更加深刻。纳粹分子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被正式否决，世界各国对此毫不姑息，欧洲的民主政治也因此得到了保护。殖民主义对国家主权的否定也遭到了全世界的唾弃。世界各国开始提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际边界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民主的含义也有所扩展：“推进社会进步，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选自《联合国宪章》）国际机构让国家复兴和强盛成为可能，随着行政部门的迅速扩张，国家也赋予了它的子民更多权利。

在主权国家的体制建设过程中，美国无疑是世界各方势力中最为重要的一方。当然，美国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一过程，并曾在其中的各个方面有所妥协。比如，1945年后，福利国家迅速壮大，经济国有化开始风靡世界，这是美国的决策人士从未想到过的，而贸易自由化进程却发展得十分缓慢。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和紧张关系都无大碍。巅峰时期的“美国世纪”就是第三世界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国家计划中梦想的鼎盛时期。美国基金会资助过公路、医疗服务、图书馆、学校以及美国社会科学—从中世纪的宏观经济学到现代化理论，这也正是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巨大扩张能力的原因所在。国家逐渐地融入全球的贸易网络中，但同时，资本流动也受到了限制，大体上说，人们是在生产和交换货物的过程中获取利益的。直到1971年，人们才明白，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三要求，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也不会奏效，因为它的附庸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干涉其本国内政。

20世纪70～80年代早期，非政府机构组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是因为美国不再支持国内强势机构的自由主义观念。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迫切地需要重塑国际秩序，优先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就是建立第三世界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为此，美国开始从多个方面采取行动，对中世纪时的赋权政府旧理念进行反驳：国际人权行动主义把赋权政府称为“暴君”，动员全球的民权社团对之进行抵制行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世界新金融化的危机倾向型特点对难以偿债的债务国重新划分了公共和私人债务的界限。随着治理对政府的取代，福利净值受损，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现象也愈加明显。正式机构濒临解体，非正式的经济体—黑市、走私、贩毒网络越来越猖獗，许多国家都被冠以“分裂国家”之名，意在声明“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反过来，国家分裂的危机为入侵、占领提供了可乘之机，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都在国际行政部门名正言顺的治理之下。这绝不是19世纪中叶国际主义解放思潮的复兴，而是全世界国家一个接一个变得“更加贫困、更加羸弱”的表现，它正在以个人主义之名解体人类社

会，把国际组织当作仆从和新范式—高效市场假设及国家保护责任，别有用心的国家想要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可耻目的提供学术理论依据。

如果说国家主权概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还不足以惊扰到美国的主流观察员，部分原因在于国家主权已经被赋予道德层面的内涵，成了“正直道德”的神圣概念，还有部分原因是美国并没有受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主权影响。美国一直保留着例外主义的特殊权力，在过去的50年里，它不断地为自己制造豁免机会，逃避国际上的捆绑责任和义务，其无拘无束的主权牢牢地把握在国会的手中，从未被撼动过。在美国普世主义的言谈举止和例外主义特权的共同保护下，美国在宣传价值观、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鲜少受阻，几乎从未产生政策限制方面的内部成本。实际上，美国的自由一直有增无减，从充满正式条款义务约束的世界（美国国会对这样的世界并不满意）到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美国处心积虑，一步步地为自己的肆无忌惮做好铺垫。对美国强权的畏惧中包括了对国家主权沦陷以及对世界政府的阴森恐怖特权的双重畏惧，在面对这些恐惧时，世界各国应该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美国时代最终结束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另一方面，除去美国的领土边界，国际机构和规则已经明显地成为阻碍国家主权发展的所在，而不再会促进主权发展。国际机构的发展趋势已经严重影响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许多国家也开始不屑于继续接受这些机构的赞助。而对于世人来说，世界真正面临的挑战是气候变化、金融动荡、贫穷、犯罪和疾病，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升温。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逐渐瘫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难以解决威胁世界经济的全球权力失衡，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有效地应对全球变暖的问题。综上，国际治理机构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然而，19世纪流传至今的国际主义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有效的国际主义是基于有效的民族主义而实现的。全世界的选民仍然只效忠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其他任何强权政体。这一事实说明，国际组织机构只能作为社会公益的主要承办商而存在，这也是这些机构所不愿承认的不争事实。

现在，人类马上就要迎来新的时期，随着西方强权走向终点，预言家们开始分析随后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一些美国评论员尤为担心的是，美国可能要丧失现在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但是从更为超然、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讲，历史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对强国而言，它必须利用这些国际机构延长自己的强势统治期限，而这样一来它就会像它的前任强国一样，不再永远处于各国之巅。因此，认为全球平衡需求的转变标志着英美强权时代建立起的国际机构秩序的崩塌，这样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上，从主权问题的角度出发，欧美金融和政治地位的下滑有利有弊。早在1995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就评价道：“要想实现更好地主宰世界，摆脱当今霸权统治，废除毫无作用的否决权，唯一的途径就是促成欧洲和日本双边合作，一步步地结成强势的反对派，同时还要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方面建立友好关系。”看上去，未来的

大国关系可能与现在截然不同，但也是很有效的。日渐崛起的强国，主要就是中国，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怎么感兴趣，至少对它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无好感。它们更加注重对国家主权的保护，并认为保护国内政治自由裁决权是必要的。如果这些新兴大国的影响力持续增长，美国创建的国际组织很可能会沿着新的方向，回到它们最初的设想轨道真正地发展起来。世界将会涌现更多的意见和观点，充实经济思想，改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起主导作用的刻板经济观念。

如何正确构建机构体制是众多意见书和改革提议中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不过，有两个较为根本的改变是需要继续努力实现的。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政治官员已经像担保人一样行动了起来，这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他们还要对金融市场制造商群体言听计从，即使这是他们一直想反驳的。更普遍的现象是，政客们也成了决策方，他们会首先考虑私人利益以及政治说客们的意见，并最终选定其中的某一项政策。他们必须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成为合格的治理者。如果他们不幸失败，他们将失去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他人共同承担统治责任。中世纪时期，国家和主权流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二者都在极端的恶劣环境下证明了自己的意义。20世纪，所有战争的发起方都是几个国家，它们动员了共享福祸的整个周边社会共同战斗，利用业已树立的公平、团结、奉献的典型，操纵公众舆论导向一直到战争结束。人们对政府本质、国家的公益事业和形象的转型并没有特定的模型比照，人民大众也不能万众一心共同打造国家的未来，这样一来，政客们根本没有动力实现真正的改变。他们甚至都得不到本国选民的信任—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客的信任度再创新低—然而，只要这种信任缺失没有演变成暴动、抵抗和对改革的持续施压，他们根本不需要太过在意。

19世纪的国际主义者认为（本书正是从他们的观念开门见山的）人类的未来会进行新的大分配，他们期待并坚信于此，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掌控了一系列的史实发展：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边沁对法律体系的完美理念就是基于他全部有益知识的积累。卡尔·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未来道路的坚定信念也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了解。对于那些20世纪制度的建立者，从史末资到罗斯福，从罗伯特·杰克逊到沃尔特·罗斯托，他们的预言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预见，并且，他们一直认为只要有先见之明，未来是可以预言的，未来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今，现实世界的首要地位受到了网络的威胁—最近有篇文章甚至为现实的“灭亡”而欢呼，未来因此显得比以往更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世界必然会变得私人化、货币化，世界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利润。整个企业界致力于商品化和仿商品化的建设，金融市场也将把未来作为当前值的决定因素，这在100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人比股票经纪人和贸易商更能感受到来自未知未来的压力。然而，这样受金钱驱使的利己主义未来摒弃了公益事业的旧理念模板。

在这个个体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改革的主力军不再是人民大众和各阶级，个人才是世界发展的主动力。还有物品和信息的消费者，这群人的特点就是，比起他们的政治代表和电视中的专家，他们更加信任网

络。如今的治理机构已经不再注重根植于共和国集体价值观的政治原则，尽管他们还是坚持捍卫“资本主义文明”。至于国际生活中的惯例，如今被公认已经固定了下来。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每年都会在联合国大会聚首。他们会讨论改革及华而不实的全球目标，这些讨论多数都不会实现。政客、记者、银行家、商人经常朝圣般地赶往处于高山区并有重兵把守的达沃斯，在这个由企业赞助的成功论坛上，他们可以证实确有一个治理全球的精英人群，能够参与论坛也证明了他们也是这些精英中的一员。各国代表以高效主宰世界为名不断地分权给专家和利己主义的自我监管机构，对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则采取疏离手段，使其只能旁观而无法发表意见。主宰世界的理念已经成了昨日旧梦。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未终结的帝国

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什么成就了帝国的泱泱疆土，帝国又留下了什么？

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得主继《后帖木儿时代》最新力作／《星期日独立报》年度最佳读物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书评》《今日历史》《卫报》《BBC历史杂志》《经济学人》鼎力推荐

[英]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著 冯宇 任思思 李昕◎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终结的帝国 / （英）达尔文著；冯宇，任思思，李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书名原文：Unf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ISBN 978–7–5086–5378–5
I.①未...II.①达... ②冯... ③任... ④李...III.①英国–历史–研究IV.①K5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104号

未终结的帝国
著者：[英]约翰·达尔文
译者：冯宇 任思思 李昕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未终结的帝国

[英] 约翰·达尔文 著
冯宇 任思思 李昕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构想帝国

第二章 接触

第三章 占领

第四章 迁入

第五章 征战

第六章 交通与贸易

第七章 统治方式

第八章 反叛行动

第九章 传教和文化

第十章 保卫帝国

第十一章 帝国谢幕

第十二章 最后且最大的帝国

序言

在史学界，帝国的构建问题引发的观点之强烈往往罕有匹敌。的确，一些帝国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对此问题的道德排斥，以免任何涉及帝国的论著会被认为采取了赞同的态度。而其他学者则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仿佛所有反对帝国的论著都是莫大勇气的体现——似乎它们是在伺机而动，向群情激动的“帝国主义”民众一边倒的舆论发起挑战。这些观点颇为逗趣，却无伤大雅。但是它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尽管对于帝国的善举与罪行的论述向来颇丰，帝国仍然相当神秘，充满了传说与误解。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思维僵化。“帝国”是个宏大的词。然而在它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包含着无数的成员、成群的游说团体、如山的众望——对职业、财富、宗教救赎或仅仅是身体安全的希望。帝国之构成，不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委员会的深思熟虑，也不是出于所谓“不可抵抗的”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压力。正如那些统治我们的当政者一样，普通人的行为也受制于迷茫与迫切的动机及道德观念，正是这些男人（及女人）构成了帝国。这样的说法显然符合英国海外帝国的情况。英国的海外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进取心共同创建的——它并不仅仅是国王们和征服者们努力的结果，更是由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合力造就的。随意的意愿或一时的头脑发热不是一个帝国建立的唯一倚仗，尽管这两者确实必不可少。帝国的建立需要进行繁多的俗务，如勘测目标，建立据点，筹集资金，招募水手、士兵、移民及冒险家，集结同盟（尤其是在宫廷或政府中），制定规则（特别是关于“新发现”大陆上的财产所属问题），规范在外的贸易及道德行为，建构政府等。不难想象这其中多少事务可能出错。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便是与原住民及首领达成一致，使其成为帝国的同盟、附庸或子民。人们经常忘记，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帝国不仅是由帝国主义者自身所构成，同时也是由“帝国缔造者们”在当地吸收的附庸所组成。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帝国内充斥着混合的组成成员、互相冲突的传统，以及种族和民族间悬而未决的界限；这是持续不安定的始作俑者，也是无限活力的源泉。

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帝国。每当我们注视着那些陈旧的世界地图，看着大英帝国的粉红色覆盖的泱泱疆土，我们总是忘了这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帝国，事实上不仅远不能说它已经走到终点，甚至连中点都未达到。直到1914年（有时被认为是帝国的“全盛时期”），这种迹象无处不在：在某些被放弃了的不列颠旧属领土；在构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稀少移民聚居地；在热带非洲衰退（不久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甚至更为衰退）的统治中；在长期的关于何种主权形式能够确保英国统治及平定印度动荡的疑问中；在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一方

面不断声明帝国扩张不会继续而同时却在不断突破的局面中；在国内帝国主义者们认为公众的思想不够帝国主义化的愤怒和焦躁情绪里。的确，那些最狂热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帝国主义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缔造者们遗留给后代的仅仅是一个建筑工地和一些令人绝望的、千疮百孔的建筑设计图，而远不是一座固若金汤的、仅需定期维护的宏伟建筑。

倘若认真审视帝国，它确实背离了它那起初即兴的、临时的特质，但这不无理由。首先，帝国的建立者们对于帝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时的英国国内社会出现了大量相互倾轧的利益诉求及追求不同扩张和帝国形式的说客。例如，对于英国移民来说，开拓殖民地是关键；对英国官员来说，开化当地居民是重点；对于英国传教士来说，使原住民皈依最为紧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通商才是目标（最好是与当地居民，而不是与英国移民、官员或传教士之间的通商）。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存，组成了各怀异心的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目的”。殖民地成了这些党派把控的当地领导人互相争夺主控权的政治战场。其次，这个帝国的“命令与控制”体系一直摇摇欲坠，往往相当混乱。伦敦发出的命令能让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总督们无条件地服从吗？这只是个历史白日梦罢了（做这个梦的人还不少）！这个帝国需要依靠当地精英的合作、移民的忠诚，以及那些早已厌烦了白厅命令的英国官员的（通常是勉强的）默许。而上述任何一点都经不起太多考验，因为它们都受当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问题所影响，而这些都是远在伦敦的政府无法预料的。帝国统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妥协，有些妥协是迫于不时爆发的叛乱——如在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印度及非洲各国。实际上帝国需要不断因地制宜地改良统治方法。“宪政改革”是个高雅词汇，为的只是将新玩家拉入政治阵营，以便扩大（或缩小）目标，或者改变游戏形式。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而是为了确保帝国的延续——确保游戏继续进行。在许多殖民地，哪些人应该服从哪些法令一直充满不确定性。最后，这种帝国行为并不是局限于其本国国内。相较于其他多数帝国而言，大英帝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影响：外界那些吸引其子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经济竞争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最危险的是）地缘战略挑战的出现。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密切关注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更，并且根据新出现的危机或愿景不断地改变计划和优先事项。

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帝国的形式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版本，只有暂行形式而没有所谓的“最终形态”。除非到了那一天，否则没有人能够实际设想（更说不上筹划）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直到最后时刻，英国人自己（起码他们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对于他们的帝国能够以某种形式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而深信不疑，无论这种形式较之于从前有多大程度的衰退。在去殖民化时代（1945~1965年）他们的政策大多是为了维持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隐形帝国而制定。当然现实对这个梦想是个残酷的挑战，可是它的影响如同帝国自身的影响一般，依然挥之不去。

本书旨在研究帝国的构建过程，就英国来说，即指它在三个多世纪里延伸至欧洲版图之外的扩张过程，并探究此过程的中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根源。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学术上的支持，尽管在每个章节都列举出了参考书目，但那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没有这些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此书。牛津大学的同僚及其他的学者的学识和见地使我受益良多，对此我深表感激。我所教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指引我构建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此书得以成形——再次验证了“教学相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弗雷迪·玛顿（Freddie Madden）的巨著，它研究了大英帝国从中世纪直到帝国落幕期间的宪制实践，为理解大英帝国的拜占庭式扩张提供了重要依据。那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英国及海外无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表示感激。我特别需要感谢新西兰新普利茅斯无可挑剔的博物馆和档案馆，那里的员工给予了我大量帮助。

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为教职员工提供的支持和动力，本书以及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将会困难得多。纳菲尔德学院是绝佳的研究及反思之所，极少有机构能够与之相比。我对此，以及对我家人的宽容感激不尽。

一如既往地，我要向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怀德（Simon Winder）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的激情、支持和睿智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裨益。我还要感谢为我编辑手稿的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为我监督制作并提出宝贵建议的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以及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本书所配地图插图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绘制。



历史的后窗

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

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在这些帝国中，英帝国即使不是最宏伟的，也是版图最大的。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大英帝国的历史引起了深刻且激烈的争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尚未终结，虽然前途未定，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虽然犯下许多过错，造成了诸多不公和暴行，而改革来得太迟，内部的矛盾重重，但最终一切总会回到正轨，因为在帝国的中心有一台自我修正装置——自由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权力的运作变得越来越文明。的确，这个“好事多磨”的结果为帝国历史中那些黑暗部分提供了最好的辩护。按照这种观点，帝国所进行的征服与殖民——当地民族被迫迁徙、反抗者被残酷镇压，这一切仅仅是野蛮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安于现状并且无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要将一个民族从迷信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必定非常棘手且常常会十分血腥。

在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帝国发展过程中，英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也在提高。受良心驱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使自己暴富的奴隶制度，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他们不再尝试由伦敦来直接控制殖民者建立的海外领地，而是授予这些领地自治权，以此赢得了它们的效忠。英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依照自由派的观点，放弃了贸易保护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名利双收。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杠杆。因此，H·E·马歇尔（H.E. Marshall）出版于1908年的历史类畅销书《帝国传奇》中充满乐观情绪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事实上，正面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和帝国本身的存在时间一样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宣扬，尽管有些瑕疵，但大英帝国仍是世界“正义的力量”。“白人自治领”成为主权国家（1931年其地位得到正式认可），但依旧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展现了多国联盟如何运作才最终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出现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叛变得异常有感染力，他们公然抨击帝国只是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工具，这甚至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帝国主义》在1902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影响甚微，此时却大受追捧。一位来自特立尼达拉岛的黑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其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工业革命作为英国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建立在帝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先声此时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的声誉便反映了当时对帝国的主流看法。罗兹卒于1902年，没能完全摆脱世人对他的批评，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威尔士亲王和乔治六世分别于1925年和1934年拜访了他在布拉瓦约附近的墓地（今津巴布

韦）。1953年，王太后和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亲自到访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纪念碑的揭幕标志着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众多名流出席了这一活动。通过观看《罗兹在非洲》这部电影，观众会认为罗兹是粗鲁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他善于掌控局势，是帝国缔造者的真正象征。

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类观点开始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帝国的解体就已有预兆，现在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即使是采取较为文明的托管形式，殖民统治也已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点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英国国内的改革派认为，帝国的传统现在似乎成了沉重的负担，帝国的秩序观和等级观已过时，成为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的极大阻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而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如花费在英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上。帝国市场的“疲软”迫使政府过度资助制造业，长期看来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很容易对帝国历史产生负面看法，最温和的观点是帝国对英国不再有意义；最强硬的观点则把那一段经历看作不堪的回忆，正是它使得英国在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受到非殖民化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对这种帝国理想幻灭的消极观点趋之若鹜。如同英国的帝国史学曾经为帝国的麾下疆土和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而高歌，民族主义史学也为国家为了获得独立与自由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鼓掌。来自宗主国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愉快地达成共识，兴高采烈地对帝国的残骸进行鞭挞。

事实上，帝国越是回避这些评论，它受到的攻击就越强烈。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令人信服。就此细论，帝国的过往似乎是当时全球性动荡的极端版本。殖民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它们只能通过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料以换取进口商品，因而进入了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在殖民地中，本地劳工和土地被殖民者占领，剥削者与帝国狼狈为奸。对于南非和研究南非的历史学家而言，种族隔离等诸多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是白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南非的惨痛历史还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殖民和帝国总是建立在种族特权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后的世界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西方最富裕和强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驱动了一切帝国扩张行为，构建了帝国经济支柱，并成了帝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种族压迫。由此帝国成为镇压“庶民阶层”[这个舶来词出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制度化手段。庶民阶层的历史记录了在帝国统治下，那些享受不到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农民，社会边缘群体，例如“部落”人口、森林原住民和印度的贱民、非洲的流动劳工、游牧民、游客和暂住者、女工和妓女，或者更广义上的所有遭受社会及经

济不公的女性。帝国的存在代表了当地统治阶级与帝国政体的合谋。这样的庶民分析模式同样被运用于帝国“本土”。广大民众被帝国精英愚弄，这些人付出血汗，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娱乐埋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没有权力，她们原本低人一等的地位随着拓荒者定居点的男性思潮、殖民战争和帝国统治变得更低。

对庶民历史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帝国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高压统治，其残酷程度远高于那些经过诸多粉饰之后的帝国历史著作所承认的。然而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海外，帝国显然都不仅仅是靠强力来维系其统治。以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为例，除了1857～1858年本地人叛乱时期，欧洲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而在英国本土，妇女以及其他从属地位群体的存在都证明单纯的高压统治是难以维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源自一个已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即统治社会和政治的秘诀在于把控人民的思想。例如，什么是犯罪、发疯，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进步的和原始的，这些概念一旦被确定和接受，就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控制。同时，文化精英集团可以操纵和捍卫他们的特权。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扩展至帝国统治。

文化帝国主义史将帝国描绘成对其子民及所有“东方”民族（对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的统称）的价值观、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的轻视、压制系统。这种文化霸权显然是为了证明外来者统治的合法性，将其确立为真理、进步和自由对抗迷信、落后、专制、奴隶制和野蛮愚昧等因素的巨大胜利。文化帝国主义立足的基础是欧洲（在本书中即英国）相对于作为“他者”的非欧洲国家的显著优越性。在数代学者的足智多谋和实用至上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终于确保了一个殖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被全盘否定，统统归于一种形容——落后。至少这是殖民地民族志及其官方编纂者、地图集及报告、调研、人口统计编著者们的任务。在印度的英国人尤其精于此道。他们天马行空地凭空进行了再创作，编写了大量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落后的民族被帝国主义从无法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但因其太过落后无法独立自主，帝国只好无限期地统治他们。作为统治纲领（及强暴统治的借口），这已经够糟了。而更糟糕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对其治下的民族无所不在的影响。因为在摧毁本土文化的权威地位并强加自己文化的同时，本土精英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外，这还引起了那些受舶来思想所诱惑的少数愿意配合帝国的人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和。这才是帝国带来的最强大而持久的破坏力。帝国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传统”社会概念，并且支持它的盟友抵抗社会和政治变革。更具破坏性的是，它一边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有教养的”精英充当走狗，一边谴责殖民地本土文化为顽固、不完整及劣等的存在，斥责其为故步自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糟粕。

这一切都显示，在帝国史上，意识形态战场的斗争长期存在。我们不应有太多抱怨。毕竟历史是人书写的，而作者的目的必然是“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并将过去与作者眼中的现在联系起来，以及解释这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史学战争”中，就连最久远的过去也逃不过被编

排、被重新征服的命运。对于许多书写过或是仍然在书写帝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有个传教士式的宣传目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深感良心不安，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弊病（尤其是种族歧视）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对帝国史必须采取严谨的研究方法，呈现清楚的信息。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而帝国主义者们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证据——官方文件、私人文件和记录、当时的学术著作、报纸、地图、绘画、相片等所有直观史料，都有可能受到这种企图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帝国史应该着手证明这种帝国主义思维是有欺骗性的、错误的以及极不道德的。帝国史还应该将我们心中那一层在怀旧情绪遮掩下的帝国形象打回原形，揭露源自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西方对非西方民族居高临下的心态。真正的后殖民史应让我们看到客观的帝国历史：那是一段可耻的过去，充满了经济剥削、文化侵略、野蛮行径（和时有发生的暴行）和险恶离间。事实上，向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没有必要对各种各样主张（稍后我们会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对错进行教条式的批判，这些批判对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描述各有局限性。大多数主张立足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上帝国很罕见，所有帝国的出现都是对这个平和世界的反常规的、凶残的侵袭。这是个非常初级的错误，也反映了这些人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帝国由某个种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政治统治的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帝国并不一定导向现代世界。这表明，现代世界和帝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不是只有欧洲的行为、技术或价值观才能导致帝国的形成。这也表明，除非完全摒弃我们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否则帝国并不一定会阻止其统治地区内物质、文化进步。事实上，研究前现代或非欧洲帝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可尽管在这些帝国缺少政治自由，但通常它们在文化上都富于创造性，而且物质丰裕。奇怪的是这种较为公正的观点却没有被用来质疑关于欧洲帝国的教条认识（这肯定会带来相反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对历史的思维定式（这又是个新问题），也导致了一成不变的论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总是毫无悬念地绝对对立，而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当事人被困于一个决定着他们动机、控制着他们行为的观念世界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结论认为，帝国的子民缺少自主性，是命运的牺牲品，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文化发展空间，不能保留也不能发展自己的礼仪、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它臆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全然不受地区、洲际乃至全球大形势的影响。最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该理论把英国自身说成了一个文化、政治的巨无霸——不仅执着于帝国，而且在帝国内部强制实行同一种运行模式：文化控制、经济压榨、强制管控。

无论这种历史理论多么"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它也不能正确地帮我

们理解过去，反而会误导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需要一部更具说服力的帝国史来解释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历史需要公正地对待为数众多、形态各异的殖民社会，并为它们在后殖民时代的继承者们讨回公道。巴巴多斯、乌干达、南非、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维持了70余年。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史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英帝国史也需要承认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英国之所以能在1914年前漫长的19世纪占据全球霸主的地位，正是因为其在政权统治方面维持了社会和文化复杂性（这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产物）。而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善于缔造帝国，部分原因是向海外扩张的前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全面调动了他们广泛的兴趣、技能和行动能力。正是由于英国人在语言、方法及目标上的多样性，“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所用的词汇）一词才有了万花筒般的意义——有的人向往它，有的人排斥它。但大英帝国主义也因此不能维持意识形态的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而根据过去关于帝国的观点，这些是“大英帝国”本应拥有的特性。

或许，一个被我们需要的帝国史应该重视的是，英国是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下为了贸易或掌控权而进驻某个特定地区以获得利益或影响力的。如果不与当地结盟、不与当地人民及首领达成一致，殖民活动几乎不可能展开。当然，去个无人居住（或被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最多用它来流放罪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既然没有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的对象，那么肯定是不会带来收获的。英国人建立的一些桥头堡通常不会延伸到海岸1英里[2]外，当地人可能会包围他们，极力阻止他们与内陆人民和市场进行贸易往来并把持商业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非、印度、中国均是如此），有时当地人甚至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无足轻重，他们往往会给当地统治者和商人提供某种便利，偶尔也带来点小麻烦，但几乎从来不会上升到威胁的程度。为了改变这种地位，英国人就必须先煽风点火，破坏当地政权的稳定局面。这种破坏活动有时是因为伦敦政府决定实现英国的控制，于是出动武力扫平障碍。但是这种决定极少是单方面的意气用事，通常情节会很曲折，带来的影响也很复杂。

这是因为英国人永远只是巨大方程式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前往的地区并不是原始地区，这些地方必定也经历了时间的洗濯和沧桑的变化。在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东南亚、东非、西非等地区的国家，英国人遭遇了极度组织化、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以及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尤其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地区已然走上了商业之路，往往对贸易带来的影响反应迅速。它们和欧洲一样，一派欣欣向荣。在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的模式里出现的任何变化往往都可以扰乱政治秩序，效果就像今天“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新财富造就了社会新贵，一方面扩大了新贵的权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旧利益集团的特权。掌握新技能（或许还有新价值标准）的人对掌握传统技能的人发起了挑战，威胁着他们的地位。新的权力中心和新的国家形式开始出现，有的建立在新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之上，因而政权并不稳固。一旦哪里出了问题，例如经济萧条或贸易中断，支撑政权的收入便会受影响，大危机必随之而

来。这还不是唯一的隐患。随着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海上”危机的威胁也随之而来。此外在世界很多地方，“内陆”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远在德里、北京、阿瓦（缅甸）和库马西（在今天的加纳阿散蒂部落）的内陆帝国统治者可能会想要获得沿海的控制权，并敌视新出现的重商主义国家；又或者他们可能身陷对外反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政治斗争中，如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命运。然而，这些英国人无从察觉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局势，以及在他们地界之外发生的事件，却可能改变所处的环境，从而使英国丧失自己的桥头堡或是滩头阵地。尽管只是第三方，英国商人们也可能会在叛乱和战争中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新贵统治者的邪恶盟友，或是被怀疑为推翻新贵统治的密谋者。英国人在1740年后在印度地区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不得不对之做出反应，或干脆就此离开。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英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殖民者。出于同样的商业目的，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也以大型特许垄断公司的形式（如法国人和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存在于英国殖民者所在的地区。他们与英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影响力和商业优势。一旦殖民地当地出现危机，他们也跟英国人一样坚决地捍卫，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和提升自己的地位。结果便是欧洲各国竞争带来的矛盾与当地统治者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对于在当地的英国人而言，除非他们打算将自己的资源投入这场外交、军事角逐，而且能使远在伦敦的统治者相信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欧洲各国谁能胜出则取决于他们当地的盟友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伦敦方面对印度志在必得，尽管它对印度的帮助仅限于海军支持。然而英国之所以能成功扩大在印度的桥头堡和建立更大统治权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当地权力系统持久顽强地进行渗透、积极在当地征募资源、努力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以适应印度社会环境。为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被派往印度的英国人变成了“英裔印度人”——这个词一直用于指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直到1900年左右。

因此，英国人在试图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往往并不对当地社会采取强硬的方式。即使有时不得不发动暴力入侵（在美洲采用的模式），他们对殖民地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而成：原住民或作为土地卖家，或成为商贸伙伴，或成为战争盟友。移民们必须适应新地貌、新作物品种、新战争形式，他们带上岸的工具、设备、曾经习惯的制度、曾经信奉的价值观都必须根据当地条件做出调整，有时甚至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奴隶被大量从西非进口至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不平等，也形成了与英国本土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压迫体制。但制约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发展的严重劳力短缺问题却得到了解决。对移民社群而言，和其他殖民社会一样，帝国并不只是个统治与征服的英勇故事（尽管这两者可能确实存在），而是更为复杂的现实：需要创建新型或混合型社会，在这里，各自为政的统治观、经济准则、宗教价值观、道德观、财产观、公平观混在一起，等待被修正、改变、接受考验或被弃而不用。因为殖民社会并不是在领地被征服那一刻一蹴而就的。从本书中你能看到，它们的构建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殖民地的

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或多或少都处于不断发生剧变的状态。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清殖民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呢？大约50年前，两位敏锐的从事欧洲帝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绘出了英国在1815年后向世界发展的“帝国扩张路线图”。他们的中心观点包括两个重要主张：英国人不断地寻求最省力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这导致他们尽可能依赖与当地精英的合作（“勾结”）。勾结的逻辑在于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英国人精明地根据利益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愿多浪费一点儿人力或武力。而对本土精英而言，这种经过精心算计的勾结能限制英方的入侵规模，在保存权力的同时还可能会有所收获。这样的合作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模式。在有些地区，英国人能够通过积极的外交打开该地门户，或多或少地保持当地主权完整，如拉丁美洲；而在另一些不太合作的地区，英国采取了强制性手段：如果该地拒绝打开门户，那么英国就干脆使用暴力破门而入。1839~1842年间，英国对中国的做法就是如此。当时为了入侵中国市场，英国人开着汽船堵截了中国的大动脉——长江，逼迫北京让步。从那以后，英国人希望借助几个“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商人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一支炮艇舰队以及位于香港的大海港（当时已为英国属地），在无须亲自劳心劳力地在中国强加自己统治的前提下剥削这个“黄金国度”。但是有时候，武力干涉和通商口岸模式也无法确保英国获得预期的商业控制权，或者有时（通常在没有商机的地区）他们希望霸占那些可俯瞰航道的战略地点以守护将他们的势力范围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这时候，英国人往往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对当地强加统治，废黜当地统治者，设立总督，在地图上将那块地区染为粉红色，彻底纳入英国版图。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有形帝国”，勾结地方精英依然是非常必要的。明智之举是从当地挑选出权力代理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依靠高压的统治既蠢笨又危险，再说千里迢迢从国内拉来英国人填充殖民地的政府机构实在是奢侈的徒劳。众所周知，英国只用了不到1 000名行政人员就治理了人口多达2.5亿的印度。

加拉赫和罗宾逊对历史的洞见一直是大多数帝国史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能对之增加的只有强调从多角度出发以及英国的那些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时有冲突的活动。对商人、传教士、移民、士兵、水手、船主、外交官、人道主义者、投资者和充满希望的创业者来说，帝国代表了无尽的财富或者光明的前程。他们心中理想的“帝国”其实并不相同。“奴隶制的帝国”在19世纪早期被法律废除，富有的奴隶主势力被国内的改革派击垮。出口、就业、利润依赖于“自由贸易的帝国”，而它在贸易保护本能和强烈的自治性方面与“移民的帝国”的共同点寥寥无几。“基督的帝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新教传教士们恨不得将全球都纳入基督信仰之下。还有人希望将帝国作为“煤炭的装卸地、基地和要塞”。互为竞争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争吵不休、摩擦不断，这意味着没有哪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能独自主宰维多利亚时代：他们都给被统治的民族送去资助，以期赢得当权者的友谊，同时不忘给他们虚幻的希望，让他们期盼某天能重获自由。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所在：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但要追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细细地审视它，将它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各个阶段，挖掘使帝国看起来“合理”的理念，追踪帝国统治者依赖的方法，解释导致反叛的仇恨，还原那些常用来镇压反叛的手段，跟随传教士的足迹（体会他们曾受的辛劳），根据地点和特点分析帝国造成的影响。初次接触、占领土地、发动战争、安营扎寨（或者试图安顿下来）、买入卖出（无论公平与否）、确立统治、遭遇反叛、镇压反叛、皈依信仰、重塑身份——正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的行为成就了帝国。

帝国观

对帝国的各种设想在英国由来已久。起初，它混合了领地图谋、行政方式、法律程序和文化优越感等，因而极不稳定，有时还相互冲突。构成帝国组织框架的主要部分早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就已经定下。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应在单一君主制下统治英国的领土。统治权和属下的忠诚高度归于中央，王权不容挑战。可是，忠诚被另外一条原则弱化：除非特意规定，否则英国属地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传统。依据习惯和先例，君主可以通过议会或“国王会同枢密院”两种方式为属地制定法律（立法）。事实上第二种方式更为普遍，因为它更具有灵活性。所谓的“枢密令”是由枢密院批准的行政法令，而枢密院原本是国王最亲近的顾问所组成的小团体，到近代则成了一个实体行政部门。除了财产问题外，国王有权听取属地“臣民”的所有法律上诉。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后殖民时代，一些英联邦国家为了法律程序上的便利依然保留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始至终，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加上（实践中）立法权的分散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人（后来的大不列颠人）的帝国观。

英国人在美洲和亚洲还发明了一些新管理模式。早在1363年，英格兰国王便给在加来的26名英国商人授予自治权，加来后来成了英格兰的重要属地（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失去的属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1423年的《加来大宗物品法》将英国羊毛织品海外垄断权授予加来的一个商人联盟，为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哈得孙湾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又称“不列颠南非公司”）等多个垄断集团树立了先例。1381年的《航海条例》想要限制出入英格兰的贸易商船必须为英国人所有和管控——当然它并不是非常成功。横跨大西洋的商业专营系统的核心也在18世纪和19世纪尽可能地得到了完善。

中世纪的决策者给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不仅仅遗留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从900年（或许更早）开始，英格兰历代国王一直声称对不列颠群岛拥有“至高王权”。忏悔者爱德华自封“大不列颠之

王”。“诺曼世纪”（公元1066~1154年）是个插曲，中断了英国的大一统，英格兰的海上势力也大为衰落。但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先后强势地将爱尔兰（亨利二世于1172年自封为“爱尔兰大领主”）和威尔士纳入版图，爱德华一世攻城略地、大修城堡，苏格兰也差点落入英格兰囊中。英格兰人不仅在爱尔兰与强大的移民们以及爱尔兰本土居民斗争，还在东安格利亚招募移民安置到威尔士，并给予他们地方特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来殖民主义的困境和战术策略。这种英式扩张还反映了英式“文明”观，即社会应该有序而和平，与当时不列颠“外围”领地上通行的观点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英格兰人习惯的是分布紧凑、人口众多的乡村，庄园、农田、谷物共同构成的宜人风景，地主阶级与神职人员共同管理农民，密布的城镇、市场、集市，活跃的土地市场，以使社会具有一定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君主制，以保证和平、建设城镇、征收税款、贸易繁荣。但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社会体系有所不同。在这里的人们以血缘关系为重，他们并不对国王尽忠，而是效忠于同族亲属或宗族首领。他们四处漂泊、以游牧为生，既不习惯定居，也不习惯种植农作物。他们对于财产的观念非常淡薄。宗族之间的冲突（据英格兰观察员称，这是畜牧经济的必然结果）促进了抢掠和奴隶制。它们的城镇稀少、相距甚远，且资金匮乏，更别提什么礼仪了，马背上的牧民根本都不在桌子上就餐，更别说讲究社会礼节。不像英格兰有牧师用严格的社会纪律教化教徒，这里的宗族文化鼓励试婚、离婚，还承认私生子。在英格兰人看来，这是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暴徒横行的社会，唯一的政治生活就是收保护费。因此必须依靠外人强行将秩序和进步带到这里来。为了避免生活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近墨者黑，1366年《基尔肯尼法令》规定了许多英格兰人不得为之的事项，其中包括不准留爱尔兰发型，其目的就是为了禁止英格兰人被同化。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有义务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帝国统治，出于这个强势的逻辑，英格兰将身旁的爱尔兰纳入囊中。

中世纪英格兰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不列颠群岛。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带来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兴趣和主张。1204年英格兰的属地诺曼底被法国夺走。不过英格兰国王们索要位于现在法国西南部的普瓦图和阿基坦，他们从出口葡萄酒的加斯科涅地区及其首府波尔多获取了大笔收入——仅从加斯科涅葡萄酒业征收的税额就与英格兰海关税收总额一样多。英格兰卫戍部队进攻了布列塔尼岛。在海上航道，布列塔尼之于加斯科涅的战略意义正如五百年后的埃及之于印度。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统治经验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帝国观，可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统治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英格兰君主作为阿基坦公爵在形式上仍效忠于法国君主，难免束手束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已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和活跃商品经济的富庶属地，坚持英格兰式文明的优越性实在说不过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到1453年英格兰势力已经被赶出了欧洲大陆，只有加来作为一块飞地。

所谓的时机虽然有些运气成分，但是顺应时势确实非常重要。在接下来那个世纪里，尽管英格兰的目标和野心大幅膨胀，但它的扩张行为都局限于岛上和海上而不是在大陆上。随着西班牙和法国王朝得以巩

固、奥地利和西班牙联盟（两者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英格兰在欧洲只能明哲保身。这种弱势地位在后来英格兰一系列的宗教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先是亨利八世为了婚姻与罗马教廷决裂，接着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努力恢复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再有1558年后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新教，使英格兰站在了当时欧洲和海上霸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对立面。正是亨利坚定地要求宗教自主权，才促成1533年的《上诉法案》宣称英格兰为独立国家，不受任何其他统治者约束。英国新教徒长期忧思不断，一方面要担心被内部推翻，另一方面还要防范外部的入侵（例如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了防止天主教反扑，英格兰草木皆兵，导致了专制、迫害和对西班牙以及后来对法国的臣服，但这些也催生了英格兰的爱国主义和新教认同。1707年，《联合法案》出台之后，这一点帮助化解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仇恨，共同塑造并分享了“英国性”。维多利亚时期，即使远在满布全球的英帝国势力的最边境，“英国性”都能使当地的英国人同仇敌忾，也能激发传教士们如火的热情。不过尽管它力量极大，在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帝国观里，这仍然只是一个要素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公元1560年后人们逐渐拥有的地缘安全意识。出于对外国入侵的恐惧，控制英格兰与低地国家[3]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这里极可能就是西班牙进攻的突破点）以及沟通大西洋与此处的“西方通道”显得非常重要。1560年皇家海军已经成立，并有一整套行政体系为之提供补给服务。1588年英格兰令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到了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荷兰和布列塔尼，先发制人阻止西班牙的再次进犯。苏格兰改革消除了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大威胁，但是爱尔兰新教改革的失败、英属爱尔兰领地的危如累卵、都柏林周边看似安全的领地、爱尔兰成为绕后入侵英格兰跳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大臣们戒心日益激增。16世纪60~80年代，英国卫戍部队从1 500人稳步增长，超过了8 000人。16世纪90年代，英国采取了铁腕举措，决定征战爱尔兰，将原本属于盖尔人的爱尔兰打上英国的烙印。然而和在欧洲一样，英国耗费巨大，胜利却只是昙花一现。但英格兰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英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英国海军在欧洲西北部的积极管制和在爱尔兰全岛的有效统治。这给伦敦政府的战略规划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三个关键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兰在海上的扩张。正如人们常说的，英国人在大西洋上进行的探索和征服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实际上，英国是迫于商业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加斯科涅酒业与波尔多的布料和粮食交易让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大发横财。然而随着1453年英国在法国大部分属地的统治垮台，贸易也大受影响，使得英国人不得不去打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意。他们学会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得以纵横于加勒比海与西非之间的航海知识。布里斯托尔水手开始在大西洋寻找虚无缥缈的“巴西岛”（或许那只是纽芬兰）。热那亚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是个跟哥伦布一样的人物，他受命在北大西洋搜寻一块“新发现的土地”，或许是为了替代布里斯托尔人在与汉萨同盟竞争中失去的冰岛

渔业。起初收获寥寥，但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西南部水手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商人运用新的航海知识动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优势。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抵达西非海岸，在当地买入奴隶再转手卖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

霍金斯的亲戚，也是他的徒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美洲西属港口沿袭了他夹枪带炮做生意的伎俩，捎带红利便是打劫。英国政府"并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同时也不承认1494年教皇"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所有的大西洋专属权。反而，英国政府及其造势者坚持海洋自由论："鉴于海洋及贸易由自然及所有国家共有，从前的教皇和现在的西班牙人无权禁止其他国家依据此法进行交流及贸易往来。"将自己定位为力图突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中国贸易封锁的局外人，以"海洋自由"的主张为武器，英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奉行此道，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1554~1618年）也许是那个时代致力于缔造帝国的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称"有进取心的局外人"。他的英俊外貌和出众文采让他成为伊丽莎白宫中的红人，甚至获封爵位，获赐俸禄和财产。拉雷出生于德文郡名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海上之争以及伊丽莎白政府在爱尔兰遭遇的困境对他而言是个绝佳的契机。拉雷同父异母的兄弟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凭借于16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野蛮残忍地镇压了叛乱的功绩而平步青云。吉尔伯特深信能找到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支持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解决英国的贫困问题。1583年，他航行至纽芬兰，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宣布当地海港和周边区域为英国所有，该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圣约翰。之后吉尔伯特在航行中遇海难失踪，拉雷继承了他的遗志。在拉雷的鼓动下，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84年写下了《论西部的种植业》，第一次公开支持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张。文章拒绝承认西班牙对北美洲的统治权，大力谴责西班牙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敦促进行系统化的殖民以应对国内的失业、人口过多、商业萧条等问题。他声称"那些从前我们需要冒险在欧洲、非洲、亚洲从事商贸而得来的商品……不久之后就能从位于北纬30°~60°的美洲……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殖民的目标在于进口原料并将成品出口给"……领地里雇用的众多穷苦子民……输出成品买入半成品的好处众多，其中之一就是不再会有可怜人盗窃、挨饿或行乞……"跟吉尔伯特一样，拉雷也参与过镇压爱尔兰起义，并在爱尔兰获得大块封地作为奖赏，他将自己从爱尔兰获得的经验运用于美洲探险。拉雷从伦敦的商人那里筹集资金、从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那里寻求帮助，并于1585年和1587年先后两次向距北卡罗来纳海岸不远的罗阿诺克派遣探险队去建立商贸据点，并攻击每年都会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回程的西班牙珍宝船队。像当时的许多伊丽莎白宫廷的风云人物一样，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截断西班牙的财富补给能大幅动摇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减轻它对奉行清教的英格兰的威胁。"正是他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金子危及和扰乱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他如是评价腓力二世。

直到16世纪末，英国人仍然只能对着帝国梦望洋兴叹。他们在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的尝试遭到惨败。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了白银帝国，葡属印度的首府设在“黄金州果阿”，而英国却乏善可陈。荷兰人已经把英国人赶到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收获远非他们的伦敦对手可比。但是对大西洋那边财富的渴望已经深深扎根于脑海，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于是商业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海外去冒险。无敌舰队被击败的那年，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开始撰写《英吉利民族的关键航行》，并于次年出版。1598~1600年他接着又编著了《英吉利民族重大的航海、旅行、交通和发现》，这本著作将英格兰航海经历描绘得如同史诗一般。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证实了哈克卢特和拉雷的断言，即美洲的西班牙势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掠夺刺激了更多的探险行为，其中包括拉雷本人1595年前往被他称为“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王国”的探险。这次同样没什么收获。但是1607年，一个总部在伦敦的财团成功地在罗阿诺克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尽管根基不稳，但至少能勉强挺过在此之前让英国人无功而返的那些灾难。这就是弗吉尼亚。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漫长的17世纪到1713年之间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战火之后，英国转型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地位。在国内，他们初步确立的宪政制度扛过了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激烈的党派之争。英国在17世纪之后势如破竹，彻底拿下了伊丽莎白时期没能征服的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不久后便经历了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考验）使得不列颠大陆不再有分而治之的危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巩固了英国的海上势力和军事力量，英国在西地中海有了两个海军基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战后，英方从签订的和约（所谓的asiento，意为协定）中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权力，终于冲破了美洲的商业封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帝国：英国将定居点散布在北美海岸和加勒比群岛，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和领土遍布伊兹密尔、阿勒颇、巴士拉、阿巴斯港、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英国人控制了纽芬兰大浅滩的大部分渔业，他们在哈得孙湾的皮草贸易能与法国人一较高下，同时，他们沉迷于贩卖奴隶，甚至开始从中国广东买入茶叶。

这种扩张背后的帝国观并不是单一的，但各种帝国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扩张的意义在于使英国变得更加富强。前往近东和印度的商人可能发现新市场，而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可以创造新市场，来自东方的外来商品可以转卖给欧洲客户赚取利润，在殖民地种植的原料可以拉回国进行再加工，既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又能使其增值，还能用于出口再赚一笔，商人和运输业都能受益。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各方争论不休。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公司）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垄断权，那么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会让他们无利可图。而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自私的主张，并且公然提出国王不应该具有授予垄断权的权力。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中有一条尤其具

有震撼力，它认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只能依靠出口金银进行换购，因而势必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需求的降低，这是在损公肥私。最强有力的辩护则称，从印度购入的货物再转手出口至欧洲，从中获得利润足以抵消采购时运往东方的白银。到17世纪末，后面这种转口港理论被广为接受。

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卡里（John Cary）（1650？–1720？）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英国现状与贸易、贫困人群以及税收的关系》（1695年）一文中，卡里强调了种植园对创造就业岗位与贸易的重要意义：

> 我认为英国与它所有的种植园是一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郡县都属于这个整体。因此，我们吃种植园的作物就等于吃自己土地上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农作物销往邻国换取金银，或者换取必须用金银交易的商品，再次给国家带来利润……这本就是在海外开建种植园的目的所在，即英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开展商业和贸易，主要利润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

文章接着指出，为了保证主要收益归于政府，必须规范殖民地贸易，令其首先保证英国船运业的利益。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1696年英国政权正面临革命后的金融和军事危机，此时《航海条例》的执行力度被再次加强。法案严格规定（尽管执行得相当马虎）：无论最终市场在哪里，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产出的原料必须先运往英国，并且只能由英国所属的船只装载。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巨大转口港，英国将会发展得富有而强大。

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18世纪70～80年代的美洲危机期间，这种“转口港帝国主义”是主流观点，掩盖了许多其他的帝国设想和殖民地的异议。它宣称——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帝国形式就是属地一切产出的商品全部运往英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以给商人和国家带来利益。在这种观点下，殖民地经济被套上了“商业紧箍咒”。无论是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还是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都认为自己的自由遭受了侵犯，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巴巴多斯总督甚至公开反叛称：“自由贸易是所有殖民地的生命。”转口港帝国主义的国内支持者们渴望轰开西属美洲帝国的大门，却因需要在欧洲保持审慎态度而不能大动干戈。作为政治主张，它既正式认可移民和种植园主的自治权，又肯定了英国议会时常重申的立法权，即只要愿意，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对此殖民地议会激烈反对。而国内人民也并不把移民和种植园主们当作缔造帝国的英雄。1655年有个英国人去了趟巴巴多斯（当时英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岛屿是英国用来扔垃圾的粪坑：恶棍、妓女，诸如此类的人……”可以想见，巴巴多斯人的观点定然不同，如一个当地爱国者曾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液，我们的心里装着英国精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人声称依

靠海上贸易的商业帝国是自由的秘诀所在，“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非洲奴隶贸易是帝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没有非洲贸易就没有黑奴，没有黑奴就没有糖、姜、染料，没有糖等作物就没有岛屿，没有岛屿就没有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贸易。”这是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713年写下的评价。伦敦政府不仅没有阻止种植园主买入更多奴隶，相反它还否决了殖民地议会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担忧而提出的控制进口奴隶数量的提议。

至于印度，当地的转口港帝国主义不关注征服或统治，因为觉得这些非常不切实际。1694年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垄断权（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对此不予理会，称这是“几个无知的乡绅在胡说八道，他们甚至不具备管理自己个人事务的智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14年后还吞并了它的竞争对手——新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受挫，意识到在亚洲的英国商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就无法抵御不友好的当地统治者，也没有法庭来做出仲裁。东印度公司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并承担自己的开销，负担全副武装的“东印度商船”、设有碉堡的贸易站以及驻扎属地的各级商人的一切费用。合伙人持续地向东印度公司投入资金，对公司而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无特许状商人和投机者排除在生意圈之外。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特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建立起了令人咋舌的新利益关系，其规模大到既不能倒闭，也不可能被政府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帝国的核心。

为旧帝国而生的新帝国？

尽管内部有许多矛盾，当时的英属大西洋帝国仍然可以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白种人）居民（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均享有参选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议会代议制政府职位的权利。他们全部效忠于英国君主，英国庇护他们不受外国威胁。他们也有义务遵守英国议会为帝国贸易制定的法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在那个商业垄断时代，殖民地居民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能保证他们享受繁荣昌盛。尽管在这个“英国人的”世界里令人尴尬地存在着大量奴隶人口，但没关系，把奴隶当作财产而不算在人口内就行了。这就是那个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颂为“各个社群的伟大政治联合”的帝国，他高度崇尚这一帝国形式，反对伦敦政府对自治殖民地强加直接税（印花税）的做法。后来，在英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大力帮助下，这个帝国基本被移民的叛乱所摧毁。虽然它终结了，但英国的“全球”帝国观从此逐渐成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征服计划、新帝国主义和新统治机制。

的确，在美洲的失利不但不能宣告英帝国从内部开始的崩塌，反而揭开了英国版图与野心急剧膨胀的序幕。英帝国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摧毁

了西属美洲帝国和它的商业控制：因为原属于西班牙的盛产白银的殖民地仍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英国夺取了哈瓦那（对西班牙来说它等同于加勒比海的“直布罗陀”），但为了签署和约而不得不将其交还。库克船长始于1769年的太平洋探险显示了英国人挑战西班牙对太平洋地区垄断权和在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找寻新市场和贸易机会的决心。英国人最大的野心或许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至少1788年在博特尼湾建立监狱、开辟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澳大利亚”航线。4年后，1792年，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率领声势庞大的访问团前往北京，以期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全面打开中国贸易市场。至少这一次，英国人遭到了拒绝。但从1793年与法国交战开始，英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推进他们的全球化扩张。为了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从荷兰人手里抢了开普和锡兰，接着又从法国人手里抢了毛里求斯。为了惩罚西班牙与法国联盟，1796年英国夺走了特立尼达岛。在从印度出发的一次远征中，英国人占领了荷兰海外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爪哇岛。后来葡萄牙国王因为惧怕法国人而将宫廷迁至巴西，英国答应对葡萄牙施以援手，条件是葡萄牙要向英国的商业大开国门。1807年，英国人甚至企图“解放”西班牙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以惨败收场。尽管在1815年英国交还了部分领土（最重要的是将爪哇岛交还给新荷兰王国以支持其对抗法国人在欧洲范围内的侵略），然而战争促进了英国对帝国的重新构想。

其中最基本的重构（因为它几乎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是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转口港帝国主义现在可以扩展到全球，而且不需要再投入此前所需的大笔防御费用。这一构想的真正基础是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与欧洲对手们（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势力平衡局面被打破。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欧洲强国拥有将英国排除出欧洲以外地区市场的实力。各国各自为营发展自己重商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原本封锁的贸易区对其他帝国打开了大门。曾经最强大的西属美洲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英国大可将自己视为转口港，而且现在不仅是自己帝国的转口港，甚至是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转口港。英国人很久之后才理解了这次庞大得惊人的领土和思想扩张所带来的影响。从此英国人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自信（虽说还不至自大），斗志昂扬地从经济和政治上入侵亚洲和非洲。但是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危机丛生的18世纪70年代以来暴露的另一个问题。

1757年后，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孟加拉，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4]称之为印度“革命”，这次革命带来了新的前景。公司出兵是由于害怕法国的阴谋诡计和当地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会将他们赶出印度最富裕的市场：这是从1756年加尔各答遭袭的那次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在那次突袭中公司代理人们被扔进了臭名昭著的“黑洞”。在这次攻占中“纳波布”们（指那些在1750~1790年印度盗贼丛生时代迅速发家的公司雇员）大发横财，引起了英国国内的警惕和反感。后来东印度公司在战争中厄运连连，濒临破产（眼看就要导致伦敦金融危机），而且公司雇员在当地鲁莽的冒险主义也需要被约束，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对东印度公司

进行更强力的管控。伯克在对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抨击中突出了滥用职权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腐败导致印度地区需要立刻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使东印度公司政府能够征收更多税款。于是伦敦（至少是在理论上）开始掌控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包括选择总督的权力。一批新官员被征召来管理东印度公司占领的那些地区，这些官员被明令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且严禁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夹杂其中。1793年之后，英国人忧心忡忡，时刻警惕法国人会给公司的印度敌人提供帮助（拿破仑1798年攻占埃及似乎预示了这个目的），在这种局势下，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复兴”，曾经被视为可能成为道德和金融毒瘤的无法无天的“狂野东方”被改造成了帝国的财富源泉。面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对于身处困境的伦敦政府来说，公司的军队和海军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伦敦的战略思维变得全球化，即利用本地人参与到对印度的统治中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产阶级（尤其是苏格兰中产阶级）看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是个体面的职业机会。商业上，英国人意识到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能使其贸易在东方大幅扩张，印度成了英国与那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地区的连接点。对印度人进行直接统治并收取税收以支付统治开支，成了由伦敦政府控制的新兴世界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人已经开始实践三种不同的帝国观以及这三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帝国形式。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以征服为基础的帝国（特别是在印度），开明的改革和公正的领土托管的观念逐渐成形。它声称英国统治能将当地人民“从混乱中挽救出来”，能带着他们逃离迷信、掠夺和暴力，走向秩序的“阳光高地”。该理念最为杰出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曾在印度任最高法院长官，他宣称，随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进行统治，“一个伟大的、惊人的进程——对腐朽社会的重新构建也随之启动”，这个社会早被“专制和混乱”蹂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还有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即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积极为英国在印度的专制开脱，声称那是为了促进印度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可靠方法。他争辩说，在停滞不前或衰落倒退的社会里，要进步就必须注入来自外部的能量，因为只有外部能量才不受当地惯性做法的影响。很多论点大同小异，旨在为英国在1790年后占领的为数众多的与印度情形类似但领土面积较小的地区强加统治进行辩护。对于不具备英国自由民传统的民族而言，旧大西洋帝国模式的代议制政府显然不再合适；如果代议制政府掌握在（通常人数极少的）白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造成麻烦。相对而言，行政权力掌握在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官员手里显然要好得多。

英国（不同于法国或德国）并没有官僚权威的传统，然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即建立以开明的官僚为基础的帝国，尽职尽责地为殖民地无知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理念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的功利主义哲学出现在同一时期。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能通过系统地运用一个关键评判标准，即法律或制度是否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来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一批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专

家们将会是社会转变的中坚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行政改革中能看到边沁思想的影子，但是它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约1790年后印度“治安官制度”的建立。在这里，它与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贵族家长式传统既相互交融又时有对立，因为家长式传统思想守旧，往往对变革缺乏信心。不过，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功利主义深深地烙在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至于印度政府年度报告的标题都是“印度的道德与物质进步”）。通过坚称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无限长、对外来开明人士的需求更胜从前、当地人的不妥协导致不得不使用“粗鲁”的方法，功利主义战胜了人民的反抗和失败带来的挫折（1857年印度大起义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后期这个帝国主义信条看上去多少有点前景黯淡，然而它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时代才消亡。

一个由在英国招募并训练的外派官员所管理的帝国，与18世纪70年代那个被杰斐逊及其伙伴们奋力反抗的第一大英帝国自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那种老式半自治帝国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残存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群再次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帝国形式遭受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政治摩擦被宗教和种族仇恨激化的魁北克（见第八章）。英国激进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允许移民建立“自治政府”，行政权从总督转移到被选举的内阁政治家手中。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自治政府制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被位于伦敦的帝国政府所接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介于从属和分裂之间的过渡状态长久不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很快便会走上美洲殖民地的老路，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事实上，不只在英国国内，在移民社会也萌发了值得注意的新帝国观。它赞扬了英国在对新土地进行殖民方面无与伦比的才能，称颂了英国作为进步推动者的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移民不应该被视为被抛弃之人或“垃圾”，相反，应该珍惜英国与移民者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将移民社会当作新“大英国”的组成部分。“1866~1867年我跟随英格兰环游了世界，”激进的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之旅。历史学家、政论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移民社会在“老英格兰”日趋喧嚣、工业化和堕落的时候，重现了早已消亡的稳定农耕时代英格兰自耕农们的美德。剑桥教授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于1883年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在此书中，他将殖民国家描绘为英国的自然扩张。20年后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号召建立“帝国联邦”，将所有殖民地国家与英国连成一体。就算是那些反对张伯伦政治主张的人也认同“大英国”才是英国的真正应该采取的帝国组织形式。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以及南非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不过他们心中的理想帝国是各国互为身份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作为从属国和臣民组成的。

然而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三种帝国形式对英国来说更为理想，在道德上也最为可取。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的赞歌——《国富论》（1776年）对这种帝国形式做出了概要说明。在“自由贸易帝国”（斯密并没有用这个称呼）中统治是（或者应该是）多余的。自由

商贸关系有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人们自然地认为互补的经济会形成互补的文化，而世界上最绚烂、最复杂、最多样的文化必然通过它的产品向外界传播它的风俗、制度和价值观。“离开我们口岸的并不只是一大包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倡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曾说，“而是种子，把承载着我们的智慧和成熟思想的种子散发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我们的汽船……和我们令人惊叹的铁路就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广告和凭证。”商业和文化吸引力使英国成了这个伟大合作联邦的中心，也使英国人和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们共享和平繁华。自由贸易者认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靠高压统治来维系的帝国，这种形式既劳民伤财又暴力血腥，纯粹是那些日薄西山的贵族为了紧紧攥住权力而怀着莫名的敌意奴役别的民族——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具有诱惑性的说法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自由贸易需要自由劳动力，故而也必然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正是英国“软实力”意识形态的先锋，它鼓励英国人把自己看成解放者，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打开“封闭”的社会和解放人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1839～184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背后就藏着这个道貌岸然的主张。也正是与中国的冲突表明理查德·科布登认为自由贸易的理想会被全世界欣然接受显然是太过乐观了。在科布登的政治对手帕默斯顿（Palmerston）[5]爵士看来，如果自由贸易遭到拒绝，那么显而易见英国应该采取行动，为了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强行迫使他人接受。“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信地写道，“的确不应该用大炮推行贸易，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的贸易，而往往没有武力保护就保证不了安全。”

靠统治来维系的帝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不容置疑，毕竟正是这个帝国打开了印度国门，将印度变成了兰开夏郡及其大批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直到1914年，在英国人的观念里，自由贸易仍是英国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此时自由贸易正在遭受攻击，英国人也已经无力在这个几乎被五大西方势力和日本军国势力所割据的世界里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吉卜林（Kipling）阴郁的《曲终人散》一诗中，日渐衰落的大不列颠前途一片黑暗。著名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论断则更为理智，他说：世界已经变了。曾使英国崛起的海上霸权已经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现在的世界、资源和人力由铁路所连接。自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以来，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第一次有了问鼎世界的能力，致使海军实力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似乎掩盖了即将到来的风险。但是在1918年，德国横扫俄国，并差点实现希特勒式的统治整个欧洲的梦想时，麦金德所预言的大英帝国的尽头令人恐惧地成真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1940年6月，这个预言再一次以噩梦般的形式被验证了。[6]

帝国的异议者

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 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

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

[1] 塞西尔·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金融家和政治家，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的帝国主义者，鼓吹英国“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占据了位于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的河间地区及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并以其名命名为“罗德西亚”。——译者注

[2] 1英里≈1.69公里。——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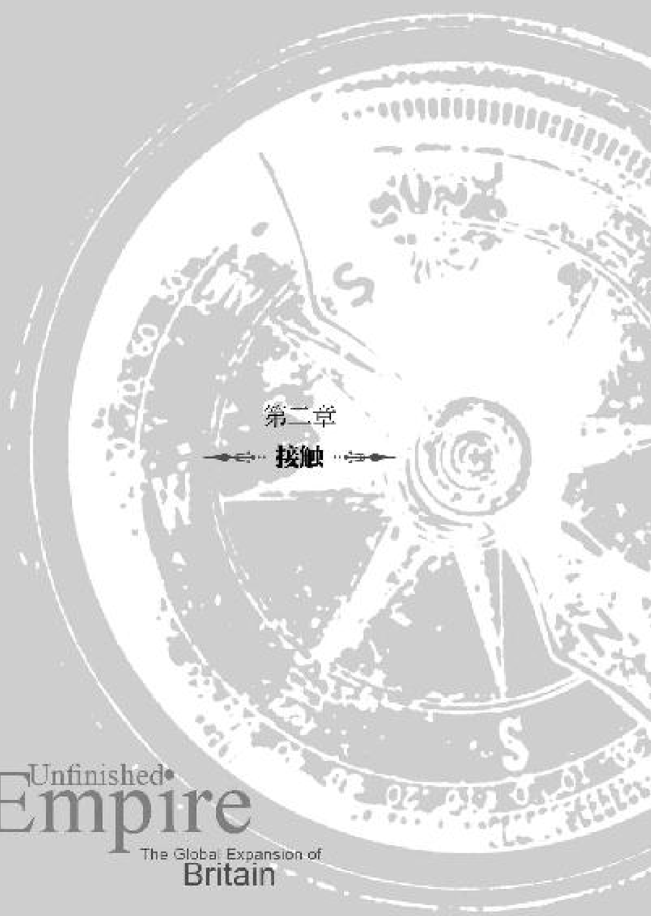
[3]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编者注

[4] 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数千兵力征服了孟加拉，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基础。——译者注

[5] 帕默斯顿（1784~1865），一译巴麦尊，英国政治家，帝国主义者，鼓吹对外扩张政策。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1858，1859~1865），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6] 从作者的论述上看，这里提到的事件应该是德国突袭苏联，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6月。——编者注

第二章 接触



构想帝国是一回事，而构建帝国是另一回事。当然，那些意图缔造帝国的人的说法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在一片陌生的疆土站稳脚跟再简单不过了，只需要一些实用的技能和强大的意志就能办到。让人吃惊的是，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历史学家们都还普遍附和这种观点，似乎入侵者获得成功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回首过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帝国对现今乃至未来仍保持巨大影响，就必然给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投下

阴影。这一观点或许应当称为“入侵者必胜论”，通常会假借“边疆史学”之名。不过该观点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富裕和强大的移民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认可，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建立“殖民地”意味着永久地占领一块别人的土地，同时与祖国或大都会保持联系。乍一看，这和那种与某个遥远的且缺少商业中介的地区进行贸易似乎有着本质区别。故而我们可能会将历史上两次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区别对待：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努力建立仓库和住所为一体的“商栈”。但若我们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区别。其中部分原因是无论移民最初的定居形式是农业型还是贸易型，最后都可能发展为殖民地。到达某个地方的殖民者并不一定打算逗留很长时间。旅居者（而非殖民者）聚集在贸易站，与当地有势力、有组织的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和殖民者并无根本区别。这些旅居者可能会认为有必要保存独特的“共同”特性，并保留内部制度和等级，如果地盘不大，可能还得用些防卫手段，来对抗掠夺和动乱。他们或许还会因为当地传统以及他们自己的喜好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结果是商栈和当地人分隔开来。

不管目的如何，英国入侵者在开始接触殖民地之后都会经历相似的模式，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如何应对当地居民，并希望猜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和商业需求。他们必须精心挑选最佳登陆地点、建立滩头堡。一旦登陆，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周边环境、控制可能的风险。除非携带了大批食物或者有充足的供给，否则在作物生产季结束之前，他们需要寻求当地帮助存储足够的粮食来预防饥荒（1788年博特尼湾成为罪犯流放地，20年后这里仍饱受饥荒之苦）。无论商业是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入侵者们都不得不与当地居民进行非常棘手且结果极不可靠的谈判（我们之后会谈到）以确定交易条款。他们必须决定与相遇的民族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关系以富于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解决争端，这要求他们努力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精神生活。哪怕只是为了了解成本、获得便利和保证健康，他们也必须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滩头堡里女性很少，所以通常他们会为了寻求性伴侣走出滩头堡。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决定是走出去，改变自己的饮食和服饰习惯、业余爱好、道德准则、接受新家庭成员，还是留下来继续与同伴们并肩作战，并在某天荣归故里。最后，除非可以寄希望于祖国派遣大批援军，否则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的关系，祈祷不要发生任何威胁到他们利益或安全的骚乱。

尽管在初次接触殖民地后殖民者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应对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1600～1750年，英国人在大西洋和亚洲建立了一批桥头堡。到18世纪早期，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英属大西洋”——一个建立在种植园和移民定居点基础上的帝国互联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在亚洲仍然保持着海上商业民族的身份，只设置了为数不多的商栈。亚洲统治者的权力牢不可破，贸易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印度的一场革命（在其中

帝国只起了部分煽风点火的作用）给英国人在18世纪下半叶带来了一个次大陆帝国。这是个建立在征服和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相较于“英属大西洋”，它非常依赖当地代理人和盟友，对英国殖民者和移民的吸引力却小得多。由此可见，早期和当地的接触模式对后来的殖民活动影响深远。

称霸大西洋

从西非的冈比亚和“奴隶海岸”（现在的贝宁），经英属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到北美大陆的卡罗来纳、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北至拥有巨大鳕鱼渔场的纽芬兰，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弧线，17世纪后期，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之前苏格兰人基本被排除在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加勒比海成了枢纽，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它进行，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英国人前来。英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扩张紧随西班牙，他们希望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在附近的岛屿或大陆上撞到金银宝藏——拉雷前往位于现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探险也是抱着这个目的。不光想找到自己的宝藏，他们还打定主意打劫西班牙护航舰队，抢夺西班牙运往国内的财富。加勒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可能。

航道是关键因素。哥伦布已经指了条明路，从欧洲出发抵达西印度群岛不再是难事，肯定比迎着西风横渡大西洋要容易得多。一旦进入亚速尔群岛或马德拉群岛区域，从欧洲驶来的船顺信风而行，只需要5～6星期就能抵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即小安的列斯群岛）。西班牙没把这些小岛屿和巴巴多斯看在眼里，而是继续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进军，继而入侵墨西哥。如果说墨西哥和西属秘鲁的白银（先运往巴拿马再运回欧洲）勾起了英国人的贪婪，那么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英国的战略。西班牙的要塞网和强大的海军让英国人无法靠近美洲大陆中心地带建立基地。英国于1624年在圣基茨岛、1627年在巴巴多斯岛建立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远在大陆边缘，表明了英国人此时尚处于弱势。这两个殖民点都不利于拦截金银舰队，因为西班牙人喜欢的返程路线经古巴和佛罗里达间的佛罗里达海峡（船只在这里可以搭上湾流），再向东北沿北美大陆航行，直至盛行西风带将他们送往欧洲方向。哈瓦那拱卫着佛罗里达湾，西班牙人谨慎地把大本营设在哈瓦那就是为了保证这段最宝贵又最易受攻击的返程航道万无一失。

这样一来，英国暂时就没办法打北美大陆的主意了。吉尔伯特和拉雷都曾梦想建立美洲殖民地，但拉雷选择位于现在北卡罗来纳的罗阿诺克岛作为殖民地显然更为明智。它的位置靠北，刚好在西班牙的佛罗里达岗哨范围之外，但又能作为抢夺西班牙船只的基地。英国1607年选择詹姆斯敦作为殖民地也是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攻击（因为它不在海岸线上），或许这也是为了打劫西班牙的返航舰队。英国人在大陆探险行动最终的着眼点都落在了加勒比之上。对于英国人来说，要建立哪种殖民

地，希望遇到怎样的人，都受其影响。确实，第一次前往詹姆斯敦时，在继续驶往切萨皮克之前，英国船只在东加勒比海拖延了一个月之久。由于风系的原因，加勒比海一直是通往美洲的最可行入口。尽管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多数殖民地都建立于弗吉尼亚和1620年清教徒前辈移民的普利茅斯种植园之后，但它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吸引了更多移民，也提供了获取更大财富的机会。17世纪，约有21万移民从不列颠群岛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约17.5万人前往切萨皮克湾地区、“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事实上，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卡罗来纳建立的第三个桥头堡（建立于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之后）其实是“英属”岛屿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衍生物。

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对殖民者来说是一块陌生的疆土。英国人在这里遇到了原住民——加勒比人。加勒比人的名声早已被西班牙人抹黑，按照17世纪早期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嗜好鸡奸、乱伦、通奸、食人，无恶不作。事实上，部分原因是加勒比人对殖民誓死抵抗，因为英国殖民地位于西班牙人未能征服的加勒比东部群岛。和其他新世界殖民地民族一样，加勒比人缺乏对欧亚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因而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的人口在1492~1700年间骤降了约90%。但在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巴布达和安提瓜这些岛屿上，加勒比人驱逐英国人、杀害种植园主，令英国人闻风丧胆。1675年英国侵袭加勒比人的主要据点多米尼加，并屠杀当地居民。但加勒比人仍然没有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既不愿沦为奴隶也不愿离开家园。英国人应该觉得万幸，1655年占领牙买加之前他们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巴巴多斯岛上没有加勒比人，实际上他们登陆时，巴巴多斯荒无人烟。

加勒比人并不是英国人遭遇的唯一或者最激烈的抵抗者。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第一次体验了危险与新奇并存的热带环境，他们为之着迷。英国内科医生及植物学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1660–1753）担任牙买加总督的随行医疗顾问，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个职位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总督不久就去世了）。斯隆在加勒比海地区收集了大量植物及其他标本，并将其分门别类，因而名声大噪，他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及收藏家之一，同时也成了皇家学会的领袖人物。来到牙买加的其他英国人同样热衷于收集和记录这里的独特物种，可见当时英国国内对此兴趣之大。然而对来到牙买加的英国人来说，最先感受到的是对他们健康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加勒比海是健康和生命的禁区：通过蚊虫传播的疟疾、黄热病、登革热与伤寒都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白痢”和“血痢”两种痢疾也同样致命。此外还有会导致瘫痪的“干腹痛”（铅中毒绞痛），这是饮用了用铅壶蒸馏的朗姆酒导致的。

英国人对这些疾病无能为力。博学的特莱伐姆（Trapham）医生1679年出版了《论牙买加岛的健康状况》。但是特莱伐姆和当时许多医生一样坚持体液论，认为一旦4种体液——黑胆汁、黏液、胆液和血液平衡失调，就会引发不同的疾病，因此当时的特效治疗法是用针扎破水疱、放血和通便。这些方法与其说是治病，倒不如说是让病人死得更快。英国人蜂拥而至，追逐发财的梦想，结果大批死去：1700~1750年

到达牙买加的欧洲人多达5万，到了1752年，这些人里只有1万人活了下来。他们逐渐改良了房屋建筑以减少高温和潮湿带来的影响，有时候还要改变饮食和着装习惯。但是主要的适应手段（对那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缩短居留时间：去欧洲度长假，去更北边的大陆疗养，或者干脆把生意扔给中介或亲戚，然后自己赶快回英国。

对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不久后也被包括在内）来说，加勒比海地区还是技术前沿地区。17世纪中期，英国人意识到蔗糖能带来巨大利益，为了财富，他们不得不学习工艺，据说通常是从在巴西的荷兰拓荒者那儿学来的。糖厂（或者能称为动力车间）是种植园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大量甘蔗、劳力和燃料。糖使得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成了富人的专属地，因为蔗糖种植园的购买费和财政支出耗费惊人，那些财力不够的人无法承担。随着蔗糖成为诸多岛屿（尤其是巴巴多斯岛）的主要农作物，原本的白人契约劳工迅速为黑人奴隶所取代，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重要后果。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成了文明的边缘地带，英格兰人（即后来的英国人）为了保证私利而冷血地改变了对种族和奴役的观念。非洲奴隶被界定为一种财产，奴隶主有权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这样一来，奴隶只要出现逃跑行为，就算是犯了盗窃罪，甚至按照法律规定，只要奴隶被认定拥有自主意识（这是对奴隶主的让步，因为奴隶造过反），这些都会被认为是潜在的违法行为。奴隶主对奴隶制以及为了维护它而采取的残暴高压手段振振有词，他们表示奴隶们的愚昧野蛮来自他们的非洲传统，根深蒂固无法改进。巴巴多斯1688年颁布的奴隶法将黑人描述为“天性野蛮、狂野、凶残……而且完全不受制于（白人）国家的法律、习俗和惯例”。奴隶引起了许多问题，尤其是是否应该管制奴隶主对女性奴隶及其身体的权利，以及他们后代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的问题。人们认为对女性奴隶的性压榨（在一宗案件里涉及超过130个女奴）是白人在刻意显示他们对奴隶身体的控制权。

随着奴隶人数的上升（1660年的巴巴多斯、1670年的牙买加和17世纪80年代的背风群岛上，奴隶人数已经超过了白人人数），对奴隶动乱和反叛的恐惧与日俱增。在岛内社会造成了“内部”边界的分化局面，但这不是群岛局势紧张、动荡的唯一原因。此外还有变幻不定的气候、威胁生命的疾病、沉重的债务、对远方市场及价格的依赖、关于边界及土地权利的法律争端（突然和频繁的伤亡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些因素使得群岛一直处于社会实验中所说的那种焦虑不安状态。当时来自英国的访客不屑地评价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的白人社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粗鲁的物质享乐主义者。这从他们一有闲暇就跑到英格兰度假就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来自英国本土的这种优越感十足的看法。英属牙买加除了内部边界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不安全，外部边界外的逃逸奴隶和难民也使英国人如坐针毡。那些逃亡的黑奴被称为“Maroons”，是探险队和战争的目标。在此之上还有外国入侵的威胁。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位于地缘政治交汇点上，在这个区域，西班牙、法国、英国（还得加上荷兰和丹麦）各有所图，很少有安稳的时候。各方势力紧挨着，各国国内或者加勒比海属地发生的任何危机都可能带来海上侵袭，摧毁他们的商业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殖民者

们却无法提前预知。为了保持欧洲内部的权力平衡，英国的外交政策不鼓励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归属问题重新洗牌（故而虽然英国于1762年占取哈瓦那时伤亡惨重，后来还是不得已将它交还）。从16世纪60年代英国海盗踏足之日开始，一直到1815年，加勒比海地区便是欧洲人征服、掠夺和施展暴力的战场，这真是一段令人感到哀伤的历史。

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与大西洋的另一边——西非海岸紧密相连。英国人在西非也是后来者，葡萄牙人首先登陆，然后是荷兰人。英国船长霍金斯于16世纪60年代到达了海岸并带走了一些奴隶。霍金斯驾驶名字极为不敬的“耶稣”号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希望能将奴隶出售给西班牙人。不过当时的英国人还很少从事奴隶贸易：当1620年别人试图向冈比亚河上的英国商人理查德·乔布森出售奴隶时，他回答：“我们民族绝不交易这样的商品，我们也不会买卖彼此。”那时候以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感兴趣的是黄金和其他热带产物，如象牙、蜂蜡、染料木材和胡椒等。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巴巴多斯，商人开始对蔗糖和奴隶感兴趣。到了1672年，有着特许垄断权的皇家非洲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商栈，处理来自西非海岸的奴隶出口业务。即使如此，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其他产品，而它修建堡垒（如著名的位于加纳的海岸角奴隶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它的黄金贸易不受其他欧洲海盗抢掠。

西非对于英国来说意味着商机和海上疆域：种种迹象表示它不会成为加勒比海模式的种植园或殖民地。造成这种形势的因素有好几个。第一，尽管西非的往返航道相对较为便利，但由于风系和西班牙建立的大陆白银帝国的原因，加勒比海仍然是大西洋航行和贸易的中枢。第二，尽管这里也出产热带产物，但由于它同时是臭名昭著的奴隶来源地，西非不具备能让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建立像加勒比海及其他美洲地区那样的种植园体系的条件。首先，那样的体系需要充足的耕地，而且要求耕地能方便地通往海边。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这里主要指英国人）没能在这里推行他们所独有的关于产权的观念。只有产权才能让他们步入商业信用和债务的迷宫，因为它能让业主有资格借贷以买入或清理土地、买入或聘用劳动力，以及在粮食被运往远方市场时也能维持生活。它吸纳投资、促进扩张。在加勒比海地区，（尽管有加勒比人的抵抗）占领土地和引入财产制度还算比较容易，在西非则困难重重。

西非社会有着横跨撒哈拉沙漠与中东和北非（因此西非深受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影响）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其结果之一就是来这里的欧洲人发现这里没有分散的原始部落，有着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包括（现位于加纳的）阿散蒂、阿拉达、达荷美、贝宁和（现尼日利亚的）奥约。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不可能顺从地俯首于欧洲人的统治，也不可能对侵略者投降。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或许曾经嘲笑他们的非洲奴隶野蛮落后，在西非的英国人则要客气得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商业活动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地统治者的心情，一旦“龙颜”不悦，他们的生意就可能告吹。

也就是说，在殖民者与西非进行接触的过程中，非洲本地势力是有

话语权的。西非地理状况更让殖民者无可奈何。除了极少数情况外，西非海岸极不利于海上入侵。沙洲和海浪让欧洲船只止步于大海——因为船只需要当地船民的帮助才能到达陆地。就算欧洲人的堡垒和商栈位于近海，他们也没办法控制周边内陆地区或者对抗当地统治者，也没有动力去尝试。实际上，堡垒里的英国人寥寥无几：部分原因是气候恶劣、疾病肆虐，还有部分原因是西非给英国人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曾经的奴隶贸易中心——现位于贝宁的威达港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威达远离海岸，处于沿海环礁湖之后。要到达那里，英国商人们必须先登上海岸，然后横越环礁湖。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更远的黄金海岸请人划独木舟将他们送抵威达。而威达城本身的“堡垒”仅限于城市周边：包括泥巴墙、土木工程、大炮，甚至还有条护城河（蚊子显然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但这些防御措施是为了抵抗他们的法国邻居和其他对手的，而不是对付当地的非洲人。事实上，因为控制不了登陆地（他们被禁止建筑海边据点），这20个白人和他们的100个黑奴帮手很容易因为扛不住饥饿而投降。这里其实也就是个临时棚屋，英国人从内陆城市萨维买入的奴隶只能先居住在这里，直到下一艘运奴船把他们运走：通常这里会住有600～800个黑奴。

直到18世纪晚期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人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恰当地位，从而不再需要向非洲当地势力表示顺从。1714年，在一场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纷争之后，威达英国堡垒的负责人被当地统治者赶走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可以容忍英国人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既提供了商业便利又不构成政治威胁，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奴隶贸易本身。其他的商业活动可能导致了当地商业阶级的崛起，这些人与英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商业上的收益可能迟早会引起统治精英们的愤恨。但是奴隶贸易却能够让那些有渠道通过战争或强权获取奴隶的人的权力更加稳固，换句话说，它有助于振兴西非强国，让它们更加具备对抗外来入侵的能力。一直到奴隶贸易被废除之后（英国在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英国人才找到在西非腹地扩大控制的策略；而在1750年，在寥寥无几的“近海贸易货船”眼里，这更像是一场最狂野的白日梦。

英格兰人（及后来的英国人）在北美大陆上与原住民和自然环境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斗争。1585年前往罗阿诺克的探险出师不利：当1590年救援船返回此地时发现留在这里的英国人全都消失了，他们的命运如何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1607年英国人第二次前往詹姆斯敦进行探险，尽管计划周详，他们也有意识地吸取了之前在加勒比海和罗阿诺克的经验教训，而且经后来的发掘考察证明其装备异常完善（携带了大量工具和医疗器械），但他们仍然差点全军覆没。这次探险的领队是约翰·史密斯船长，他是一名经历丰富的战士。国内给他的指令也经过了缜密的考虑：占领上游以躲开西班牙的攻击，要在岸上设岗哨；既不要得罪当地居民，也千万不能让他们碰你们的武器、了解你们的病员人数。要确保新开辟的定居点街道笔直，以保证开火的时候没有阻碍，也要避开树木茂密的区域，挑选个好地方开展贸易。事实上，史密斯所接到的指令表明这次探险的大金主——弗吉尼亚公司并不希望新殖民地是个农业社会，他们希望史密斯能找到矿藏（金银美梦挥之不去）并与印第安人

开展贸易。但同时他们还要求史密斯找寻一条“通往另一片大海”的航线。因为和那个时期的很多人一样，他们坚信“美洲”只是某个大陆的狭长地带（可能是根据他们对中美洲的理解而来），并相信只要驶过分水岭就能迅速下行至对面的海岸。弗吉尼亚只是他们通往更重要的目的地——印度群岛和中国的中途补给站。可能正是因为出于这个愿景，所以第一批詹姆斯敦分遣队里有一大部分人（差不多一半）既不是劳工也不是手艺人，而是温文尔雅的绅士。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没有妇女和他们一道。

然而尽管计划周详，此地前几十年的殖民活动一直进展不顺。詹姆斯敦的选址被定在靠近深水的地方（对船只很安全），很好防御，又有足够的饮用淡水。英国人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粮食，还希望能打到足够的鱼作为补贴。可结果詹姆斯敦成了死亡陷阱，登陆的那批人在短短几个月内死了一半。主要原因似乎是它坐落在淡水与海水交汇处，所以扔到水里的东西不会被冲走。英国人喝着混有自己的垃圾的水，后果当然是致命的。鱼也出奇的少，甚至连陆上的猎物都不好捕获。“弗吉尼亚”不仅经历了5年干旱（1607～1612年）——食物和淡水供给因此减少，还遭遇了1607～1608年酷寒的“小冰河期”，此外还有疟疾。到了1609～1610年粮食匮乏的冬天，殖民地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很难与印第安人达成协议。对于跟印第安人的交往，英国人也缜密地计划过。他们原指望印第安人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会渴望贸易。他们知道印第安人喜欢铜，所以随行带了大量的铜。他们预计到很快就会与周边的近邻闹翻，所以期望能与更远的社群培养感情、结成联盟。这一系列有关殖民地发展进程的预感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英国人在切萨皮克湾附近遇到的政治惯例是“威望物品首领制”。这里的部落首领通过分发威望物品给追随者而获得权力。史密斯送了保厄坦部落的酋长一套红布衣服、一条猎犬和一顶帽子。这个酋长或许原本打算利用他的英国关系来巩固自己作为中间人的地位：用英国人带来换取粮食的铜做交易，把铜卖到内地去。但谁都无法指望这种互利关系能稳定持久。

双方摩擦的一个起因是英国人对印第安人偷盗行为的反应。英国人的社会等级分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通过程式化的法律和法庭来解决所有权纠纷，就算是最小的偷窃行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英国人生长于这样的社会中，而且还不时被（牧师等人）告诫这才是符合上帝意愿的有序社会的基础，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周边印第安人淡薄的财产观念，也无法从印第安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在对方看来是在借故滋事，甚至很不道德。英国人没有回馈印第安人的赠礼，反而不时地需要依赖印第安人的粮食，这样一来矛盾就激化了。美洲地区大旱，粮食普遍短缺，在这个时候英国人还企图从保厄坦部落榨取粮食作为“礼物”，这必然导致矛盾。不仅如此，原本为了赢得好感的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贸易不再那么管用，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充斥着他们带来的货品，在印第安人眼里，英国人的价值迅速地一跌再跌。史密斯抱怨道：“对那群野蛮人来说，殖民者的商品早已供大于求。”而且他们

给印第安人提供了私人交易的机会，这样保厄坦部落首领失去了控制英国人提供的重要物品分配的权力。

上述矛盾一旦激化，英国人与当地东道主之间原本潜藏的敌意就浮出了水面。（我们可以认为）保厄坦部落酋长本指望英国人能一直依附于他，只要给他们粮食就好，而他们用来换粮食的商品又能巩固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本意是让英国人成为有用的附属。但是英国人却打定主意让他成为他们的附庸。殖民者人数一直在增加，甚至开始有女性。英国人不打算与印第安人通婚（也许部分原因是通婚并不能使他们获得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或土地）。他们不再满足仅在自己的据点从事贸易活动，而是开始种植自己的作物。他们与周边的其他部落共谋对付保厄坦酋长。1622年，即詹姆斯敦建立15年后，保厄坦酋长决定消灭这群令人讨厌的家伙。于是保厄坦部落向英国殖民者开战，1 200名移民中有超过1/4的人死于这场战争。后来这场战争被奇怪地记载为“起义”（仿佛是在反抗某个合法政权）。但是保厄坦采取行动太晚，英国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挺过这次暴动并发动血腥报复。这次战争事实上成为弗吉尼亚转变为移民殖民地的标志，原本因为与印第安人共有土地而造成的摩擦被就此完结。总督弗朗西斯·怀亚特不容置疑地宣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驱逐野蛮人并占据这片土地以畜养牛、猪等……把那群异教徒留在我方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与其跟他们和平相处、结成联盟，倒不如干脆把他们从我们身边清走。”隔离和驱逐是后来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主要行为特点。与此同时，殖民地开始开辟烟草种植园（用从特立尼达岛带来的幼苗），并于1614年卖出了第一批货。1619年，第一批黑奴抵达殖民地。从开始接触到建立殖民地，英国人只花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这仍然只是一个滩头堡：前方还有大片内陆等着英国人。印第安人节节败退。但是北至最早一批英格兰人于1620年登陆的新英格兰，南至17世纪70年代建立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英国人的“印第安疆域”仅仅覆盖了距离海岸100英里的范围。1700年的南卡罗来纳只有5 000名英国人，大多居住在首府查尔斯顿方圆几英里之内。尽管英国殖民者人口稳步上升，英国人[此时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已经加入了英国人之列，此外还有德国人——所谓的宾夕法尼亚荷兰人和德国人（指17、18世纪由德国南部或瑞士迁至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的后裔）]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印第安人逼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外一边。而且印第安人的抵抗不再是单凭人多势众，17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学会利用英国与法国之间逐渐加剧的地缘政治斗争：17世纪90年代法国人大规模抵达密西西比河下游，标志着法国人努力封闭内陆、对抗英国入侵关键阶段的开始。到1717年，法国军队的前哨驻扎在了亚拉巴马。有一位英国官员曾抱怨：“当下对印第安人政策的重要原则就是维持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平衡。”英国扩张的压力迫使印第安人按易洛魁族模式成立了更多联盟——例如克里克人，或许甚至导致了印第安人形成了民族同一性：1726年的一次印第安人集会宣称：“我们红种人在此聚首。”这些还不是他们的唯一防守方式。印第安人作为毛皮和鹿皮的供应者（萨瓦纳河的奥古斯塔位于佐治亚州，现在以高尔夫球“美国大师赛”闻名于世，是当时的鹿皮贸易中心），是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他们位于森林中的聚居地本身

就是强有力的防御。美洲丛林听上去很浪漫，其实非常险恶。如果没有专业向导，旅行者很快就会迷失方向，丛林里不时出现的沼泽和溪流让人举步维艰，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旅行者都必须随身携带所有口粮，因为恶劣的天气总是拖延行进时间，将人置于生死边缘。1737年3月，经验丰富的边疆开拓者康拉德·韦泽（Conrad　Weiser）历经千辛万苦走出美洲丛林后感叹道：“我们仿佛逃出了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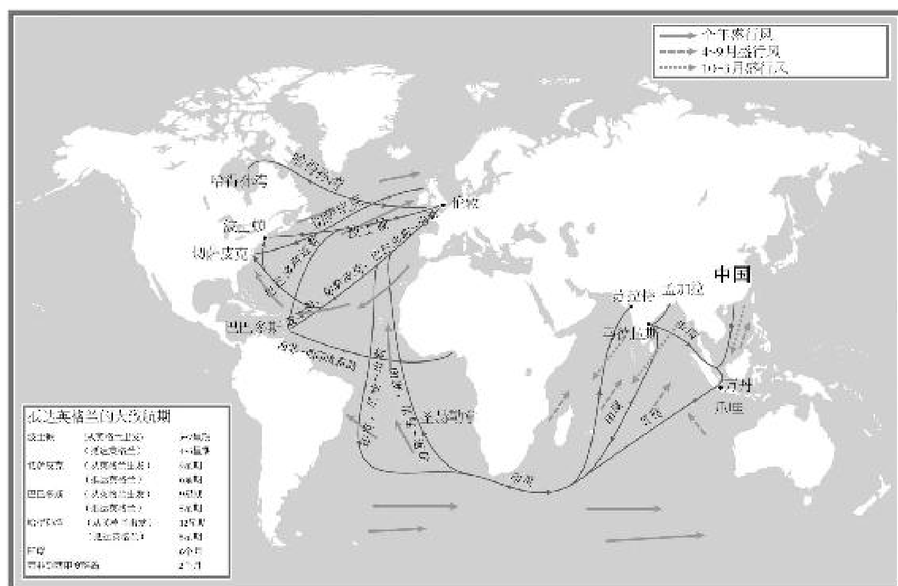


图2–1　航海时代的风系与交通

结果在控制了靠近海岸的“滩涂地带”近一个世纪之后，移民们不得不接受印第安人及印第安领地将永远存在于他们的殖民生活中这个事实。移民定居点陆续地发展至所谓的“后方”：宾夕法尼亚发展得最快，1701年，这里的白人人口为两万，仅仅过了40年，人数就增至原来的5倍；纽约发展得最慢，因为河畔地区被强大的易洛魁联盟控制。边境战争蠢蠢欲动，突然爆发，又偃旗息鼓；其中最猛烈的战争发生在南卡罗来纳，为了俘获奴隶，白人几乎扫平了沿海部落。但是在边境线上的大多数地方，双方都竭力通过谈判或仲裁来消除不可避免的摩擦。殖民者们大力学习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例如狩猎技巧，作物种植（尤其是玉米、豆子和南瓜），桦皮独木舟、雪鞋、鹿皮鞋、鹿皮裤和烟斗的制作。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做向导在丛林中和贸易通道上安全往来。为了帮助双方语言交流，洋泾浜语发展起来了，例如“特拉华行话”。在与印第安人的交往中，英国人不得不采用历史悠久的印第安外交礼仪：会谈时有一大堆参会者（反映出在分权社会里对大多数人意见的重视）、交换礼物、冗长的发言、依靠贝壳串珠而不是纸和笔记录协议条款（因为印第安人不相信纸质协议）。

双方达成了某种平衡状态，但并不是稳定的平衡。欧洲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入侵北美洲，给印第安人及殖民者创造

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交易的货品越来越多，仪式和典礼也发展得更为丰富，包括更多的殉葬品随逝者入土。最为重要的是铁质武器和工具涌入了北美洲，紧接着又有了火器。考古发现，到17世纪中期，印第安人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有一半是通过与白种人交易获得的：他们坚持订制商品以满足他们的习惯和嗜好——例如超轻型火枪。但是他们不得不消耗资产，通常用鹿皮和毛皮来交换这些产品，一旦资源耗尽，他们就只剩下土地了。而且他们的战斗力大为缩减：据称，1738年，天花夺取了近一半切罗基人的生命。殖民者酗酒成性（据计算他们通常一天大约喝7杯烈酒），对印第安人来说，殖民者带来的酒也是个有害的舶来物：移民们的社会习惯、身体素质和饮食习惯降低了酒精对他们的影响，印第安人却没有这些条件。尽管双方不得已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印第安人和移民社会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他们对于土地的观点（对一方意味着物产和利益，对另一方意味着灵魂和历史）一直大相径庭。移民们痛恨森林，恨不得将它付之一炬。在合作外衣下掩盖的是双方对彼此深入骨髓的恨意。在移民社会，无论贫富，他们都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作物或者赚取投机利润；谁要是假装正直抵抗这种利己主义，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头。因此，印第安领地与殖民者之间的平衡归根结底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它取决于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与英国竞争对手们周旋的能力。1759年9月英国人占领了魁北克，随后的《巴黎条约》将法国人赶出了内陆，然后他们就对印第安人发动了正面攻击（他们自己后来都觉得惊慌）。不到一个世纪，“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北美洲就变成了“白人的国度”。

向亚洲扩张

1700年左右，英国人对北大西洋多数地区已经非常了解，而亚洲海上世界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覆盖的面积从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日本，比大西洋世界的海域要大得多，而且离欧洲也远得多。船只从英格兰出发，乘风而行，只需六七个星期就能到达巴巴多斯；驶往印度的船只很少能在4个月内到达，往往需要6个月。这些船只一年四季都可以横跨大西洋，只是舒适和安全程度有点儿区别。如果要去印度，旅客必须及时从英格兰启程，赶上3～10月间的西南季风，将他从好望角送往东北方向；如果他想回程，又得等着东北季风：11～4月的季风能把他吹回好望角。这趟旅途费时费钱，很少有旅客能承担得起频繁的往返（有钱人和大人物除外），这更凸显了距离感和差异感。除了在西非，身处大西洋沿岸种植园的英国人能轻易找到由英国人构成的社群；在加勒比海奴隶殖民地的英国人可能主要是驻军，但起码制度、法律和财产是英式的；在美洲大陆和岛屿上，到1700年已经聚集了约25万英国人。但是亚洲海岸的英国人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个，极少能以百计，而且几乎没有女性。绝不要想当然地认为1750年在印度的英国人会超过四五千甚至更多。美洲殖民者对迅速扩张的使命感使在印度狭小的据点里窝着的英国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他们不敢想象拥有足够的武力威慑身边的当地统

治者们，因为事实刚好相反。在西方的大西洋世界，他们是移民或种植园主，是殖民者或大陆居民，可是在东方，他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客和无名小卒。

他们所涉足的土地上的政权强化了他们这种边缘化的地位。亚洲海域无垠，但是要在这里进行贸易必须获得当地宫廷或他们的代理人的许可（公开的或者默许）：在红海和波斯湾需要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现伊朗）萨非王朝统治者点头；在印度西部和孟加拉需得到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同意——虽然到17世纪末，和桀骜不驯的马拉塔联盟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在印度东南部要得到高康达苏丹国国王的许可，直到莫卧儿入侵推翻了他的统治为止；隔着孟加拉湾还有个暹罗（首都在大城府，今曼谷北边）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统治着东南亚地区——不巴结暹罗国国王显然是不行的；东亚的明清王朝更替导致长时间的动荡，华南地区尤其不太平，但是仍然没有哪个欧洲人胆敢不经过当地政府的许可就贸然在中国大陆上进行贸易活动；日本的“开放世纪”于17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只有荷兰人获得了特许，得以在长崎出岛这个弹丸之地保留了一个商栈。

亚洲的君王、大臣们从来不掩饰对这些来自欧洲的长毛野人的鄙视（后来英国人在亚洲摆出的傲慢姿态与早期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节的那段尴尬回忆形成鲜明对比）。对英国人来说，不仅需要讨亚洲权贵们的欢心，还要面对当地商业对手的激烈竞争。英国人跟随葡萄牙人的脚步到了印度。原本指望靠印尼群岛的胡椒和香料发财，可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让他们从美梦中惊醒了：荷兰人武器更好、组织性更强、资金更雄厚。17世纪晚期，法国印度公司在布列塔尼岛的洛里昂建立基地，它从1673年开始在孟加拉的金德讷格尔及从1699年开始在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成了主要竞争力量。位于通往印度航道上的毛里求斯岛于1715年被法国占领。英国人口中的“港脚贸易”指的是亚洲境内的跨国贸易，早在欧洲船只到来的几个世纪前，本土商人们就开始辛勤地往返于商道上。东非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德迷思商人、从苏拉特来的印度商人、西里伯斯岛的武吉士商人，还有中国商人，他们包揽了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大部分贸易。在所有商团中最让欧洲人眼红的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总部在萨非王朝伊斯法罕的新焦勒法，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将会看到在亚洲的英国人是如何急切地将自己的财富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成功打入这个商业世界分一杯羹，英国商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共同商号。每次前往东方，他们都会“募资”用来购买商品和支付租赁货轮的费用。1600年冬，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特许的垄断权，独享英国与东方之间货物的直接贸易权。为了在现场管理交易，伦敦的董事们派遣了“商船押运员”和“代理人”，直接在船上、商栈或是他们在前景看好的地区设置的贸易站进行贸易。这些实地操作的人员不得不迅速学会大量新知识：他们必须熟知亚洲的航道和复杂的海岸地理、季节、洋流、风向等。为了避免冒犯当地人，想要讨好哪个统治者，他们就必须学会该地方的宫廷礼仪和外交程序。不能忽视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命运

的亚洲各国国内及各国间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剧变。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可能触怒当地统治者，遭到驱逐甚至更惨的下场。在此过程中，他们熟悉了源自波斯和中国之间丰富海上世界语言的混合词汇。18世纪前，一些混合词在印度的英国人之间广为使用，例如“topass”[指雇佣军，通常是基督徒，可能是土耳其语“top-chi”（炮兵）的讹误]、“bafta”（一种白棉布，源于波斯语中的“织物”一词）、“cooly”（指普通劳工，或许源自泰米尔语中的“koli”）、“cot”（指帆布床，是经由葡萄牙人传开的印地语）、“curry”（咖喱，最初源自葡萄牙语）、“godown”（仓库，源于泰米尔语）、“kedgeree”（奶油鱼蛋饭，源于印地语）、“shroff”（钱币兑换商，源自阿拉伯语中的“sarraf”）等。作为在其他伟大文明前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亚洲国家那让人入迷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精妙的哲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英国人眼中的亚洲是一系列海岸：波斯湾的阿拉伯和波斯沿岸地区、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今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胡格利河三角洲（通往暹罗的捷径）、印尼群岛多不胜数的海岸、中国南海海岸以及日本西海岸。首先他们依赖于竞争对手们开拓的领域：他们紧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脚步出海开展贸易活动。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航行是前往爪哇岛的万丹，意图插足荷兰人的香料贸易。1608年的第三次航行才将他们带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暹罗和长崎附近的平户各创建了一个商栈，但这两者都没有成功：平户的事务所在坚持了10年后不得不关闭。英国人设置了一系列前哨开发香料群岛，特别是摩鹿加群岛。他们几次企图打开中国门户：英国人1637年第一次到达广东，结果与当地政府兵戎相见；直到1700年他们才被准许在厦门和广东开展一年一度的贸易活动。此时荷属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把他们轰出了印尼群岛，英国人死抱着苏门答腊西海岸的小据点不放。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东印度公司慢慢地又回到了印度。

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商栈。对北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首都阿格拉和德里以及前往麦加朝圣的印度伊斯兰教教徒来说，苏拉特是个重要港口。英国人从莫卧儿皇帝那里获得了允许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敕令（即许可），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先击败驻扎在苏拉特深水锚地区苏瓦里村庄附近的葡萄牙舰队。英国人被允许开设商栈，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但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他们不能购买房产，商栈也不能设置在河流附近。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最初看好的地点在一个清真寺附近。“我们冒犯了伊斯兰教教徒，尤其是我们的人粗俗地对着墙小便以及做其他肮脏的勾当。”或许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印度政府担心英国人会把商栈打造为船只能轻易进出的堡垒。英国商栈占地面积相当大（里面甚至有土耳其浴室），此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英国人也被允许拥有基础便利设施——公墓。在苏瓦里锚地有码头和仓库，但是一直到那个世纪中期，留在当地的英国人生活起居都一直在海滩上的帐篷里。短暂、忍耐和被监视是他们印度生活的特色总结。

在苏拉特安顿下来后，东印度代理人们的眼光迅速投向远方。1614年，他们派遣了两支队伍从陆地上经由坎大哈去往位于伊斯法罕的波斯大帝阿巴斯一世的宫廷。当时，强大的葡萄牙占据了霍尔木兹，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商业中心，并控制了波斯湾入口。阿巴斯大帝允许英国人自由贸易，这或许是出于与英国人结盟以对付葡萄牙的考虑。英国人知恩图报，于1622年与波斯合力发动战争，将霍尔木兹夷为平地。英国人获得的奖励是在新港城阿巴斯港（英国人称之为“冈布龙”）开设一家商栈以及被许诺分得阿巴斯海关税收的一半。波斯出口最多的是丝绸，对英国人诱惑巨大，但这里气候恶劣、水质糟糕、死亡率居高不下（1617～1652年间，每年约有25%的英国人魂断他乡）、娱乐缺乏，英国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到过此地的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评价说：“冈布龙与地狱只有一线之差。”痢疾、肝炎、疟疾、霍乱甚至瘟疫时常肆虐。用东印度公司流行的话说是“烈酒、羊肉和女人”，酒和性是英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镇上的妓女就在茅草屋里接客），在他们看来也是疾病的主要来源。公司有远离港口的乡间别墅和花园，那里条件相对较好。但是英国人与港口主管官员经常关系紧张，在一次暴力争斗中，6个英国人丧生。而且在东方世界，无处不在的荷兰人也经常出没，波斯湾的英国人需要努力与他们展开竞争。

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和船只仔细梳理印度海岸线，找寻可以进行交易的市场和商品。17世纪40年代，他们到达了孟加拉。那时正对着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已经成了他们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东印度公司称这就是“那个海岸”和“那个海湾”。1617年他们在这里的商业中心默苏利珀德姆开设了商栈，1639年，为了进一步与统治者交好，他们把总部向南移了200英里，迁至马德拉斯帕塔姆（不久后改称“马德拉斯”，现称“金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晚期克莱武踏足英国征服的孟加拉时，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都是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上的大本营。

从英国起航，在海上航行4个月后（罗伯特·克莱武1743年的那次航行历时一年多是因为他的船在巴西搁浅，因而被迫停留了一段时间），首先映入旅行者眼帘的就是马德拉斯：“你将看到左边一线低地出现在波涛汹涌的蓝色海面上。”不久便能看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尖顶。“然后你会看到圣乔治堡和它分布紧凑的房屋，以及靠近它北边那一大片昏暗混乱的建筑……”这里没有码头，船要停在距海岸两英里之外的海上，乘客和货物转乘一种特殊的冲浪艇乘风破浪到达海滩。从海岸往里走，左边有高墙团团围住的“白镇”，里面平顶砖房密集排列，外有护城河和吊桥——这就是圣乔治堡；前方是印度人聚集的“黑镇”，葡萄牙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地产和商栈（“休闲屋”）也在这里。东印度公司以每年400英镑的价钱租用沿海岸线5英里延伸至内陆1英里的地区，如果不再续租还得通过总督的许可。比邻而建的是葡萄牙的老定居点圣多美，号称是圣·托马斯的殉难地。马德拉斯“奠基人”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之所以被吸引至此，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葡萄牙人的热情欢迎。

马德拉斯建成后50年内约有30万人蜂拥而至东印度公司领地。其中英国人人数很少，据估计约有114名平民：27名公司职员，29名经公司

许可来此定居的“自由民”，39名水手，11名寡妇和8名“少女”。卫戍部队总人数增至约400人。无论内心多么排斥，公司成员（公司阶层划分精细，上至总督和理事会，中至“低级”和“高级”商栈，下至新人“书记员”）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英国私营散户的存在，只是在理论上限制他们只能涉及亚洲内部的港脚贸易。私营商们从伦敦带来的资金使东印度公司可动用的资本更为雄厚。由于他们有意定居下来，“白镇”的居民不再全都是暂时居住者，而是趋向稳定。的确，马德拉斯更像是个殖民地（尽管可能是规模最小的殖民地），而不是由漂泊海外归心似箭的过客组成的前哨，有些英国人在这里居住了好几代。但是（除印度人外），马德拉斯并不只有英国人，事实上英国人甚至算不上主要人口，这里最庞大的族群之一是从圣多美来的葡萄牙人，英国人与他们通婚。除此之外还有犹太人，他们为了与附近的高康达做钻石生意而从派瓦、罗得里格斯岛、波尔图、丰塞卡湾来到马德拉斯。这些人不但没有被排斥，反而享受颇高的社会地位：总督和理事会都会出席他们的葬礼。东印度公司还迫切希望将亚美尼亚人吸收进移民定居点，1688年的一份正式协议承诺亚美尼亚人可以在公司领土上享受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使用公司船只以及担任民事公职，东印度公司甚至愿意自己掏腰包给他们盖教堂。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宣称：“他们（亚美尼亚人）本性单纯、没有恶意……头脑冷静、朴素节俭，对印度的所有地区和商品都非常了解。”

秉持世界主义的欧洲社群是如何适应印度南部的生活的？他们做出的最大努力之一便是保有英国生活方式。他们从英国带来火腿、牛舌、奶酪、黄油，可惜是用铅盒装的。他们要消耗大量英国服装和进口酒（从波斯经阿巴斯港进口“设拉子”酒）。宗教信仰仍是英国人的标志，圣公会牧师的存在、每天两次的祈祷和圣玛利亚教堂的修建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特征。但在其他方面，英国人对气候和当地环境做出了妥协。他们的窗户不用玻璃，而用藤条窗帘。比起国内，他们的洗澡次数要频繁得多，但不是为了干净，而是为了降温。尽管去教堂的时候仍必须身着欧洲服饰，但他们习惯了每天至少有部分时间穿着“穆斯林服装”——伊斯兰教教徒喜欢穿宽松短上衣、长裤和拖鞋（后来公司职员被禁止如此穿着）。由于缺少适宜结婚的女性对象，非法同居司空见惯。同时，生活的无趣、不安情绪和酷热高温培养了英国人的其他癖性。无论男女都大量吸烟（约1700年后，他们开始抽起了水烟袋，不再用烟斗）、嚼槟榔（所以牙齿变色，而且需要使用痰盂）、饮酒量惊人（官方规定不得一次饮用超过半品脱白兰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良后果：吵架是经常的，葬礼远远多于婚礼和生育。当时葬礼恐怕是最常见的社会活动之一。

英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南印度的据点是孤立和脆弱的。为了安抚附属于他们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容忍了天主教，这在英国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得不对涌入“黑镇”的大量印度人进行管理，这意味着要起用当地“执法官”维持公平与秩序。有时印度人犯下的罪行明明在英国可以判死刑，但考虑到当地信仰，要尽量避免死刑。马德拉斯的法庭准许印度式宣誓。1688年东印度公司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为了方便征收这里印度居民的赋税，公司设立了由13名市议员组成的市政议会，其中有3

个英国人、3个葡萄牙人、7个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人。英国人最担心周边的印度统治者会对他们进行干涉或采取更糟糕的行动，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内地高康达苏丹国的友好关系，尽力避开封锁威胁。1688年马拉塔对他们发动进攻的可能让英国人陷入恐慌。当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攻陷高康达，英国人谄媚地在马德拉斯大肆庆祝，立刻改投明主，宣布自己效忠于对奥朗则布的封臣海得拉巴尼萨姆和尼萨姆的封臣卡那蒂克纳瓦布[1]，甚至给后者建了个宫殿。然而17世纪末，连“黑镇”都建了防御工事，这暴露出长期以来英国人对周边邻居突然发难的恐惧。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这里的英国人疯狂敛财。无论东印度公司规定如何严格，公司职员和私营商人还是将货品运回英国，并在亚洲内部开展贸易为自己谋私利。事实上公司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偶尔施以警戒。公司有两个主管恰恰是用这种方式在马德拉斯赚取了巨额财富。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于1672年抵达马德拉斯，1687年当上了主管。他的情妇是犹太钻石商人达·派瓦的遗孀，他们俩一起做起了生意。耶鲁的私营贸易一直做到了菲律宾群岛，当1699年回国时，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能过奢华生活和搞慈善——慷慨资助福音宣传协会（英国国教传道团体，负责给马德拉斯派遣传道士）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所当时籍籍无名的学院，现在这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位主管“钻石”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的名声更加不堪。托马斯·皮特的父亲是多赛特郡布兰德福德的教区牧师，1673年皮特作为公然反抗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权的“无许可证商人”来到印度。10年后回国时，他的财富已经足够他购买土地和成为议员。17世纪90年代中期，皮特与东印度公司言归于好，风光回归印度当了主管。他写信告诉国内朋友：“闲暇时间我一般搞园艺和种植。”1702年，他用高达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著名的皮特钻石，1717年以最终售价12.5万英镑[2]卖给了法国摄政王，这笔钱为皮特的家族财富锦上添花。托马斯·皮特的孙子是伟大的国务大臣，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他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带领英国取得胜利；其曾孙“小皮特”后来当了首相。

18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马德拉斯（及印度）的活动模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只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东印度公司就从一个单纯的贸易公司转变成了参与战争、开展外交的机构。它征集和派遣军队。趁着德里的莫卧儿皇帝权力名存实亡，它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中争取盟友。它开始在广大地区获取税收权，有的时候作为奖赏分给它的军事伙伴。想要获取公司大权，要么得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如克莱武），要么得善于筹措资金满足公司的军事和行政需求。是什么导致了这样惊人的变化？

导火索是欧洲冲突。当1744年英国和法国为了奥地利的未来（和欧洲的势力平衡）而开战时，仇恨迅速蔓延至美洲和印度。针对英国在孟加拉湾海军力量的弱点，法国人从据点本地治里向英军发起攻击，并于1746年攻占了马德拉斯。英国人死守着不远处的圣达维德堡，与此同时，英属马德拉斯的盟友和保护人阿尔科特纳瓦布的愤怒和仇恨牵制了

法国总督迪普莱（Dupleix）。1748年硝烟散尽，英国人重获马德拉斯。然而在南印度，一场不曾宣战的战争仍在继续。双方都从国内征召了更多军队。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近2 000名士兵（其中包括500名瑞士雇佣兵），人数是战前马德拉斯卫戍部队的10倍。通过贿赂、威胁以及许诺给盟友提供军事援助，公司努力将法国在南印度最大邦海得拉巴邦的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正当成效要达到巅峰时，公司在孟加拉遭遇了一场骇人的新危机。

1756年，孟加拉纳瓦布将公司赶出了它在加尔各答的堡垒和商栈，部分公司职员身亡，部分人被关押入狱，这场灾难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损失胡格利河上的贸易对公司来说是致命的。孟加拉早已成为公司最宝贵的棉织品来源地，公司依靠在欧洲转售这些棉织品获取大部分利润。东印度公司的反击显示出了自马德拉斯短暂失守后的10年间它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现在它不仅有精兵，还有“强将”克莱武。克莱武是一名出色的将领，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足智多谋，善于发现和维系印度盟友及其军队，这才是胜利的关键。马德拉斯重新归于英国的掌控之中，成了拥有军队、税收和外交能力的国家力量，为英国人回归孟加拉创造了条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吃惊：克莱武处心积虑地利诱敌对将领，用了不到10年就将孟加拉纳瓦布在普拉西的军队驱散殆尽，公司顺理成章地控制了该地税收。随着这第二个大桥头堡的确立，印度最富饶的地区落入了英国手中。40年后，德里的主人变成了东印度公司。昔日这些商人如履薄冰地在海岸上做些生意，如今这片商人开辟的疆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

从接触到占领

18世纪50~60年代，在北美和南亚发生的事件无疑只是移民帝国和东印度公司走向辉煌的开端。那时候没人能预见到后来那惊人的转折，命运和战争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接着美国在1803年获取了大片内陆土地（所谓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3]），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控制也终于在1818年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英方的桥头堡被广大的“接触区”——例如美洲“边疆”、东印度公司首府之外的印度“乡下”（严格地说，是除公司首府所在地之外的其他邦），团团围住。每当英国（或其他欧洲）商人、移民、传教士进驻某地（例如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19世纪40年代后在中国），接触区就随之而来。这些“中间地带”往往要么不受任何人统治（例如1840年前的新西兰），要么山高皇帝远，这里没有法律，只有传统，或通过暴力，或通过私下协议解决问题。无论哪个团体都没有力量（有时是没有动机）将其他人赶出去，一家独大。帝国的强硬面——武力征服、统治、排斥、隔离，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至少在有些外来移民看来，这是个会被后世缅怀的自由时代。“啊！我第一次到新西兰时的那些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某个都柏林教授的孙

子腓特烈·曼宁（Frederick Maning）1833年从塔斯马尼亚到北岛时这样写道，“那时候没有总督、法律和正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曼宁所钟爱的那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商人受到毛利人的礼遇，因为白人商人能提供枪支弹药，他们能给毛利人带来高达“约他自身体重20倍的火枪”，吞并和白种人殖民给这里带来的变化让曼宁心痛不已。18世纪末期，在印度为当地统治者办事的欧洲人，例如海得拉巴的米歇尔·鲁瓦蒙德（Michel Raymond）和阿瓦德的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都作为战士或“代理人”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中间地带的吞并过程缓慢（有时极度缓慢），这是因为帝国缔造者们需要从国内招兵买马、筹募资金，或者在当地征募资源和人力，一步步从桥头堡往外扩张，逐步进占中间地带。

这些接触区给后来的帝国时代留下了相当巨大的遗产——创造了混合文化和人口。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殖民社会的土话、行话、方言夹杂着毛利语和英语；看到新西兰的地图上毛利地名与英国地名一样多，人们大概猜不到其实到1914年毛利人口只占当地总人口的5%；在殖民地种族隔离前，各民族交融产生了“白黑混血儿”“欧非混血儿”“欧亚混血儿”“开普有色人种”和“半血统混血儿”等。或许这个遗产也扎根在记忆中，记载着在接触带来的便利被殖民占领取代之前人们如何生活、如何获取财富。

[1] 尼萨姆：海得拉巴邦君主的称号。纳瓦布：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的总督。——译者注

[2] 一称托马斯·皮特买下钻石的价格是2.4万英镑，卖给法国摄政王的价格是13.5万英镑。疑为原文有误。——译者注

[3]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美国于1803年以大约每英亩三美分向法国购买超过529 911 680英亩（2 144 476平方公里）的土地，该交易的购地所涉土地面积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1英亩≈0.004平方千米。——译者注



1851年8月6日，拉各斯岛（现为尼日利亚最大城市一部分）成了英国的属地。英国领事在汇报中写道：

> 昨天，无数人云集到领事馆观礼，下午一点钟，停泊在附近的普罗米修斯号上的礼炮齐放7响之后，（拉各斯）国王上场了。在与他最重要的4位酋长一同签订完条约之后，他们被领至户外早已

立好的旗杆下，然后宣读（割地）声明，大英帝国旗帜迎风飘展。接着又是21声礼炮，教会学校的孩子们合唱英国国歌……最后是在普罗米修斯号上聚餐，国王多西莫（Docemo）及其统辖的4位酋长，以及几乎所有在此地的欧洲人都被邀请赴宴。

割地条约中的第一条言简意赅：

我，多西莫，经过与我国议会协商，确定献出、转让……拉各斯港及拉各斯岛的所有权、利益、领土和附属权利，将其永久赠予大英帝国女皇及其子嗣和继承人……作为大英帝国直接、完全、绝对的自治领和臣属……

多西莫本人仍然保有国王头衔并享有俸禄。但是显而易见，他在条约上的宣言并非本意，第二天他抱怨道：“（普罗米修斯号的）指挥官逼着我签字，如果我不签，他就会向拉各斯岛开火，只需眨眼工夫就能将拉各斯毁于一旦。”

大约90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附近一个小岛上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幕。“小艇和双桅帆船来到这里，船长领着绅士们登陆。我们从山顶上俯瞰国土、检视海岸，”库克船长在1770年8月22日的航海日志中记录道，“到了6点钟，我们以国王的名义占据了这片土地，挂上了英国国旗，找了些小火器鸣了几响并三声欢呼权作庆贺，船上的船员们与我们热情回应。”除了库克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其他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除了几个没见到人影的“印度人”——库克这么称呼原住民，但库克等人声称那天早些时候看见了“印度人”生的“烟”）；也没人对库克将“整个东海岸……包括海岸上的所有海湾、海港和河流命名为新南威尔士”的行为提出异议。他们坚信没有其他欧洲势力发现过澳大利亚东岸，也坚信这里没有任何首领或者国王，没有需要他们去觐见以表敬意的统治者（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库克兴高采烈地率领船队离开了，澳大利亚东部成了英国的属地，而在这里生活的人还全然不知。

1860年，英国人吞并英属香港殖民地对面的九龙半岛时的仪式更为独特。英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用纸包了一块九龙的泥土递给中国官员，再令中国官员将泥土递回给英方，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英国人当场大声宣读割让声明，英国皇室旗帜冉冉升起，礼炮隆隆作响。在场者为“古老的英格兰”欢呼三声，再为“女王”三呼万岁，英军对空排枪齐射，交接就算完成了：英国成了九龙的主人（除了一块有防御工事的围城——“九龙寨城”，匆忙中，谈判者们莫名其妙地将它遗忘了）。

像这样简单粗糙的仪式却象征了帝国扩张的决定性行为，那就是吞并领土。吞并行为将统治和利益的模糊地带变为了英国君主的正式财产。从此以后，无论这些地区有多么麻烦、棘手或无利可图也不能被轻易放弃。伦敦也必须指导（有时需要大费周章地详细指导）新吞并的领

土该如何治理，需要决定授予新加入的“被统治民族”以及他们原有的统治者何种地位，还必须决定这里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法律，是否应该尊重本土民族对于财产、刑罚和宗教的观念。伦敦政府不久后被迫规定了移民者在属地从当地人手中购买土地的条件，接着又要为移民者是否应该和当地人一样被同一个政权统治而大伤脑筋。关于上述种种问题，没有标准的规则、公式可套用。尽管殖民统治有某些大的框架可循，但是几乎每块新吞并的土地上都有自己的历史，故而需要量身定制具体的统治方案。时间和地点都很重要。有的时候似乎没有当地统治者驱赶殖民者或者打断他们莫名其妙的声明；有的时候，原住民首领，例如国王多西莫可以被轻易地用俸禄打发走；而有的时候，像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wayo），英殖民者只能将他监禁流放。在每次吞并的背后通常隐藏着国内某些特殊的利益，或公或私，总有人大力游说政府吞并某个新行省：任何英方在属地设立的新政府都必须让这些背后的驱动者满意。吞并的条件跟吞并行为本身一样重要。

麦克罗斯基领事和库克船长经历的事件揭示了吞并活动的意义。伦敦将拉各斯收入囊中是有明确目的的：通过进一步控制西非港口来压制奴隶贸易——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尽管统治者承诺驱逐奴隶贩卖商，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原本割让的领土只限于拉各斯岛，内陆并不是伦敦政府的目标。麦克罗斯基收到的指示是和平地与多西莫签订条约，让他自愿献出拉各斯，而无须双方动用武力。多西莫的王位以及他对当地百姓的统治将（至少在表面上）被保留。库克的行动则完全不同，他接收到的指令是含糊不清的。他肩负着占领其他欧洲势力没有涉足过的土地的重任，因为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助于大英帝国日后在南太平洋的海上利益。库克应该在吞并别人的地盘之前先征得当地人的同意。而事实上，当库克登陆澳大利亚的“占领岛”时，他深信当地原住民人口如此稀少、没有长期定居的聚居地，以至于没有统治者能跟他签协议，他也就无法建议当地人并入英国。当然，像这样随意在某个大陆的海滩上登陆就能做出这么大范围的判断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库克当时很可能对这块他为乔治国王占领的土地一无所知，他所进行的吞并仪式有点好笑。我们可以想象类似的情景：一群西非渔民在风暴中被吹得七零八落，最终漂到了冰岛，一看四周无人便欢欣鼓舞地宣布将欧洲并入达荷美。但是库克对当地无定居人口的信念对后来影响很大——因为它成了定论。1819年英国法律界把新南威尔士（库克对此地的命名）定义为“既不是来自征服也不是来自割让，而是被占领的……人迹罕至的土地，随后被我国殖民统治”。澳大利亚依照英国法律是一片杳无人烟的空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从法律上来说根本不存在。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它所造成的后果和纠纷。

上述两个事例凸显了一个重要区别。自15世纪以来，除王朝继承外，欧洲各国还承认两种不同的拥有本国之外领土的合法方式。第一种方式被称为“发现”：不曾被“基督君主”宣布所有，或者没有被欧洲人正式涉足并留下标识的（欧洲和亚洲以外的）海外国家可以被合法获得。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需要与其他基督君主达成共识、避免冲突，而对当地居民和统治者的处置方法则没被考虑在内。第二种方式与第一种

方式截然不同，适用于欧洲、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非洲那些欧洲人发现的被可承认其为国家的地方。在已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只能通过下列两种方式获得土地：割让或征服。割让通常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例如与多西莫国王签订的割地条约，条约中具体说明了将哪些权利让渡给新政权。所谓的双方一致意见经常是通过可疑的手段获得的，但这不会在条约中被提及，也不会影响条约的“合法性”，即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认可。征服则更为艰难，通常也更昂贵。一般说来，英国和欧洲其他帝国一样，更希望用强迫的手段得到割让土地而不是贸然出兵去千里之外求胜利。然而理论上来说能征服是最好的。征服能完全抹杀当地人的权利，征服者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被征服的民族只能仰其鼻息。尽管发现、割让和征服看起来似乎不能作为影响所有民族的基础，但它们绝不仅仅是法律假定。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决定了占领的方式并影响了占领之后的一切事务。

占领归根结底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它折射出这些人或团体的偏见、企盼和抱负。那些希望通过吞并来合法获得领土的人必然有着自己的动机，而政府之所以任他们放手去干也自然有它自己的理由，这些动机和理由对我们理解大英帝国的构建过程至关重要。无论对急于奔向领地财富的占领者而言，还是对领地被统治的人民而言（如我们所见，有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别人占领了，更谈不上同意被统治），占领的实际意义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占领通常导致当地秩序极度混乱，留下一大堆隐患、矛盾和未完成的项目。帝国的构建总在不断继续，就像我们在图纸、建筑工人、甚至建材全都未定的情况下扩建房子，一切都是变数。

动机：为什么需要吞并和占领？

第一个要解决的谜题是为什么英国扩张需要通过吞并领土来正式拓展其统治。人们经常忘了，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的构建过程是由私营企业家而不是国家或“国王”（就英国而言指行政当局）完成的。1585年最早尝试在北美大陆罗阿诺克建立英国殖民地的那次行动是沃尔特·拉雷爵士及其合伙人的私人冒险。罗阿诺克是个悲剧性的尝试：粮食供给不足后，留守定居点的那群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被痛恨他们的印第安人给杀了。第二次冒险是在詹姆斯敦，尽管成功了但是意外频出。建立詹姆斯敦的弗吉尼亚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包括索尔兹伯里爵士、伦敦金融城声名显赫的托马斯·斯迈思爵士以及其他商人和贵族。弗吉尼亚公司于1624年被解散，但是那个世纪后来的日子里，其他公司或个体“领主”们仍然在继续殖民事业。普利茅斯公司（1620年）和新英格兰公司（1630年更名为马萨诸塞公司）推进了“北部殖民地”的建立。位于切萨皮克湾畔的马里兰殖民地是由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爵士于1634年领导建立的，他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海军将领之子、皈依了贵格会的威廉·佩恩开拓了宾夕法尼亚。1670年，8个合伙人合力组织了对南

北卡罗来纳的殖民活动，其中包括约翰·洛克的赞助人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查理二世最亲近的顾问克拉伦登勋爵。

这种模式既不是美洲大陆特有的，也不单属于17世纪。卡莱尔伯爵和另一位对近东及印度有兴趣的伦敦金融城商人科廷爵士分别引领一些互相竞争的英国公司，将目标定为“加勒比群岛”（即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巴巴多斯、圣基茨岛、尼维斯岛和蒙塞拉特岛，这一地区后来发展成为英属西印度群岛。1588年成立的几内亚公司专门负责西非贸易，它最终于1672年发展为皇家非洲公司，主营奴隶贸易。皇家非洲公司在冈比亚河上和海岸角（位于现加纳）的堡垒是英国西非帝国的雏形。两个世纪后，皇家尼日尔公司、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又名“不列颠东非公司”）和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又名“不列颠南非公司”）就像是私人帝国主义马车，拉着多少有些勉强的伦敦政府奋力前行。早在1840年，伦敦政府不情不愿地开始推行吞并政策前，新西兰就已经被新西兰公司变为了英国殖民地。后来成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英属印度最开始由在东印度群岛开展贸易的商人公司起步。1757年后，孟加拉普拉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小规模冲突，公司突然变成了殖民政府。直到又过了一个世纪，北印度发生印度民族起义，亦称“印军叛变”，结果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于1858年终结。[1]

私人构建帝国少不了英国有钱人的支持（至少在最初是这样）。这必然是种投机行为，其中既有一系列可预计的风险，也有不可预计的不确定性。投资者打算将某些高价商品囤积居奇，或者低价（甚至可能不损分毫地）买入土地再将其转手卖给他们征召的移民，以期能挺过风险、抑制不确定因素和获取巨额利润。此外还有其他的动机。正如马里兰是天主教徒的庇护地，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本来是饱受国内宗教压迫的清教徒们的避难之所。后来的殖民地佐治亚是给那些贫困潦倒到在国内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穷人们准备的。在19世纪的东非，英国东非公司不仅计划开展商贸，而且意图让那里的原住民皈依基督教：因为公司的苏格兰赞助人大受戴维·利文斯通的“基督教，通商和文明”主张的鼓舞。罗兹的公司原本的目的是包围南方的布尔共和国，将他们纳入完全由英国人掌控的南部非洲。上述各种情况中某种形式的占领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单纯的贸易公司，如印度或西非的那些贸易公司，也需要有安全的驻地以保证货物和工作人员不受当地人或欧洲竞争者的攻击。东印度公司借由莫卧儿皇帝的敕令得以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建造加设防御工事的商栈，在此之前，他们在苏拉特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商人们共同居住在一座房子里，吃喝拉撒全在一处（就像那些老派牛津学院的做法，室友如需夜不归宿必须先申请）。如果目的是为了建立移民定居点，公司和领主必须购买或夺取领地，驱逐当地人，给前来的移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从政治的角度说，只要当地统治者没兴趣或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外来者驱逐出去，对某块土地拥有的清晰的所有权就足以有效地对抗他们。所有权标志着外来者打算永久居留，而不是短暂停留，这对当地劳工和手艺人更有吸引力，例如大批印度商人和工匠蜂拥而至东印度公司的地盘——马德拉斯的“黑镇”和加尔各答。有了所有权，甚至可以组建小型军队。此外，它还能让英国人在彼此交往中遵从自己的法

律。

那么为什么这些个体帝国主义者要向伦敦政府要求“特许状”呢？毕竟他们没有理由欢迎任何来自外部的控制并且也痛恨白厅的干涉。他们自认为对当地政局了如指掌：他们的人就在当地，能够应对那里的一切困境。在特许状中，他们则不得不承认国内政府对他们在当地的行为拥有最终掌控权。他们或许是个体帝国主义者，但在法律上他们同时也是帝国的代理人：大不列颠的统治始终笼罩在他们占领的所有土地上。因此在1623年，当詹姆斯一世颁发特许状给乔治·卡尔弗特爵士准许其在纽芬兰建立殖民地时（这最终被证明不是一次有前途的冒险），卡尔弗特如同自己身在国内一般认可了英国皇家对这片领土的统治权，并承诺备好白马恭候国王亲临殖民地——国王显然不太可能真的到那里去。1606年的弗吉尼亚特许状约定，国王有权决定殖民地政府形式以及在伦敦任命理事会监管殖民地，此外，任何移居弗吉尼亚的英国人其身份仍然是国王的子民。就连最有独立意识的马萨诸塞公司都承认自己服从英国政府、有义务遵从英国现行的法律。

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从属关系而不是自立门户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是因为4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第一，他们需要外交（或许还要军事）援助。欧洲各国只承认政府发表的领土声明，而帝国缔造者个体需要各国的认可才能合法地将国外竞争者排除在外。当罗兹的“先锋者纵队”行至今天的津巴布韦，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下了最后通牒——以断绝关系（可能还动用了海军施加压力）相要挟，才阻止了葡萄牙对手与其争夺领土所有权。亚洲（尤其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商人在应付不怎么尊重商人的统治者时也愿意有皇家使者撑腰。第二个因素同样重要，个体帝国主义者必须阻止国内的无特许状商人染指利益。获得特许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在某块土地上或者某个贸易链中的垄断专营权。詹姆斯一世在给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中说：“我其他的臣民不得在这些地区或其后方种植或居住……”垄断专营是这种投机行为赢利的关键所在：所有精明的投资者都希望利益最大化。领主们及合伙人们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打击竞争对手，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求官方支持，如有必要甚至诉诸法律，尽一切努力击退任何敢于挑战他们专营权的人——他们必须密切关注法律界和政界的权力平衡。政局的变动可能导致他们的特许状化为泡影，他们的权势将随之崩塌。

特许商人们需要保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这意味着贸易和殖民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内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动机。第三，殖民推动者，例如在印度的大商人们，需要有能管理他们从英国召集的移民和雇工的权力。如果国内不授予他们委任统治权，他们将束手无策，因为需要合法权限才能实施他们签订的协议；需要权力约束他们带来的人以防这些人瓜分他们的领土或干脆撒手不干；需要权力在当地制定规则以及惩处违反了规则的人。在英国，义务、责任或契约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可是一旦出了英国踏上无主之地，如果没有某种权力约束，这种联结必然会烟消云散。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强行要求移民们遵守在国内的那一套。但这种手段太拙劣，且不说成本高昂，往往还不

起作用。这种行为还可能会使殖民推动者们迫切想吸引的那些权贵因此却步。因此第四个原因便是，如果不能保障移民们能继续享有他们在国内的民权——尤其是财产和人身自由，那么想要召集移民或雇工将难上加难。“所有以及每一个……居住于……任何上述殖民地的人，”弗吉尼亚特许状称，“连同他们的子女，享有自由居民和自然主体的一切自由权、公民权和豁免权……与他们在英国本土享受的待遇一致。”

但是我们也应该反过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君主以及后来的英国政府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将英国统治延伸到遥远的未知国度呢？毕竟这可能给英国带来麻烦，威胁到他们在海外的威望以及国内的安全。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一直到帝国末期，这种担忧和焦虑若隐若现，始终持续。更糟糕的是，如果在海外的人员惹了麻烦，无论他们闯了多大的祸，英国政府都无法宣布事不关己，就算他们多么罪有应得都不能任由他们被当地人惩处。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对海外领土拥有统治权能更方便地控制那些刚愎自用的冒险者，防止他们变成真正的大麻烦。17～20世纪，伦敦政府一直打算用这种态度对待大多数移民者的后裔。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帝国，英国政府直到1858年才正式拥有统治权——在1857年东印度公司从起义中侥幸脱困之后。但是正如我们将会谈到的，统治和控制并不是一回事。

早期的动机出于对意外之财的期待。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谨慎地在特许状中标明如果发现了任何贵重金属，其中的1/5需上交皇室。西班牙从西属美洲帝国获得的大量白银使得这个期待显得如此触手可及。不久之后，除了这个发财的目的，政府期待的更多。伊丽莎白女王签发特许状给在东印度的商人（显然他们在煽风点火）是因为害怕与“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高利润贸易会被荷兰人垄断。为什么女王和她的大臣们会关心贸易呢？这是因为那时大家都意识到了贸易能巩固王国的统治，给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贸易要经过海关，贸易税最方便征收。而且大家也都认为从广义上来说贸易对国家的权力至关重要。当时的思想家们坚称出口顺差是商业的主要目标，因为顺差才能保证白银或黄金流入国内，即政府能收获黄金白银或其他财富（除非能像西班牙那样找到自己的银矿，否则只能靠此充实国库）。大量的金银存储能保证国家的繁荣稳定。足够的金银储备能保证货币的稳定性，而货币是绝大多数日常交易的基础：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停滞。此外，金银还是战争基金，有了它才能迅速地从完全没有“战时经济”概念的工业化之前的世界里购买武器、征召雇佣兵。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出口顺差呢？大多数观察者认为最有希望的策略是发掘能以高额利润在欧洲转售的舶来品，例如香料、印度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以及来自西方种植园的毛皮、烟草和糖。

英国政府之所以愿意接受海外探险者的请求，将自身的统治扩展到他们建立的海外帝国中，一方面是因为可以带来不菲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样可以控制贸易，而贸易关乎国家的战略利益。海外殖民冒险者不得随意运送他们的产品。自17世纪50年代开始，一系列法律出台，《航海条例》强令殖民者将任何有价值的（“被列入名单的”）产品

先运往英国港口（在此缴纳赋税），然后才可以再出口。货物还必须用由英国船员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因为在战时，船只和船员都是国家资产，一支大型商船队是海上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些举措是为了保证贸易利润主要流往英国，以及殖民地生产者只能从英国供应商手中购买需要的产品。到了18世纪中期，政府、贸易和代表政府在海外行使统治权的人相互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伦敦政府来说，它指望借着垄断专营贸易大发横财的东印度公司能给它提供贷款。18世纪70年代，对东印度公司垮台及伦敦金融城随之崩溃的恐惧是政府对印度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这个利润和权力方程式之外，还有两个更为悠久的近乎本能的考虑。首先，伦敦的政府，无论是皇室还是议会，都极不愿意放弃国民对他们的忠诚。这或许反映了一个古老的假定，那就是统治者的实力和权威来自对人的控制：人力，而不是土地，才是权力的真正来源。国民的劳动力和生产潜力都属于统治者，否定这种从属关系即为背叛，甚至可以被认定为叛国行为。将统治扩展至海外是为了确保国家对最重要的资产——国民的劳动力和技能的所有权。其次，尤其在前现代时代，统治者对富裕国民在国外建立基地的一切努力有着深深的疑虑，担心这些基地会成为反叛分子的避难所，或者成为敌对势力发动入侵的集结点。英格兰与爱尔兰的联结最早始于强大的边境贵族——人称“强弓手”的彭布鲁克伯爵被邀请领导爱尔兰派系战争中的一方势力。英格兰国王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站稳脚跟并建立统治，于是1171年，亨利二世发动进攻入侵爱尔兰，并于次年在教皇的支持下获取了对爱尔兰的统治权。由此衍生的“强弓手法则”一直为英国政府奉行——英国国民就算到了海外也不能摆脱对英国效忠的义务。根据这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出国的移民和殖民者仍然是国王的子民。此后，1801年的“印度大法官案”中明确规定：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即使居住地属于莫卧儿王朝，他们的国籍仍属于英国。“在东方的任何地区，只要建立了任何据点——哪怕仅仅建立了一个商栈，”判决书上写着，“一旦欧洲人在这些据点所在地区生活及开展贸易，即受到这些据点庇护，并被视为建立据点的国家的国民。”当19世纪30年代心怀不满的布尔人有组织地迁徙出开普殖民地时，英国人仍然坚称一切如常：不管布尔人是否愿意，他们都是英国子民。1836年制定的《好望角处罚法》将英国地方行政官的权力范围扩展到了南纬25°，差不多在今比勒陀利亚（南非东北部城市）北部50英里处。正如一位史学家戏谑道：“这个法令要起作用，得出动一个团的兵力才行。”英国国内政府最讨厌私人个体在新发现的大陆上直接从本土居民手中获得土地。几乎从美洲殖民伊始，国内政府就极力强调只有被授权的、具有被合法赋予“头衔”的权力组织才能进行殖民行为，根据他们的逻辑，不这么做注定会造成麻烦。对于一个将财产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秩序基石的政体而言，如果不这么严格倒奇怪了。

最后，当然政府也并不总让个体帝国主义者在扩张活动中唱主角，事实上帝国版图上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国家直接获得的，其中包括牙买加（1655年）、纽约（1664年）、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1763年）、

澳大利亚东部（1770~1788年）、特立尼达岛（1797年）、开普殖民地、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1815年）、中国香港（1842年）及肯尼亚（1895年）。多种力量导致了上述这些领土扩张活动。有的领土可以看作是因不同理由进行战争的战利品。鉴于英国具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政府很想夺取敌人的殖民地并扰乱其贸易以惩戒对手。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重商主义逻辑，这样可以增加国家财富。就算是后来“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成了主流的商业意识形态，一个地理位置理想的港口（例如香港）也有助于迫使“讨厌的外国人”及其顽抗的统治者们不得不接受开放经济。但最大的担忧往往是关于战略方面的。伦敦政府决定占领加拿大（而不是盛产糖的瓜德罗普岛），因为法国对魁北克及其河边腹地的控制对英属美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好望角，因为它守护着通往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海上航道。出于对荷兰人将好望角转手赠予兵强马壮的拿破仑（或者同样危险的继承者）的恐惧，1815年战争平息后，英国决定不交还好望角给荷兰人。此外，英国还死守住了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将印度洋变成了“英国湖”。这些殖民地是通过割让或征服而非移民所得。如何治理这些领地，将占领转化为统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统治：如何在当地立足

在最初给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颁发的特许状中，英国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组建问题兴趣寥寥。但不久之后就确定了移民应该拥有代议政府。早在1619年，也就是在首次登陆詹姆斯敦12年之后，弗吉尼亚议会举行了投票：16岁以上的男性移民有投票权。1641年，英国君主给总督的指令中明确要求召集由“自治市民”组成的议会。1668年居住在巴巴多斯的移民利用领主间的矛盾争取到了议会自治政府的权力。1691年（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修改后的马萨诸塞特许令规定了移民殖民地的标准范式：殖民地政府由被选举出来的议会、委任的“理事会”、英国政府派来的对国王和大臣负责的总督共同组成。事实上到了1700年，由于移民们的顽强抵抗，皇室在经历连续的挫折后不得不逐渐放弃直接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尝试。1722年，英国枢密院作为殖民地事务的监管机构总结了殖民地法律需要遵循的原则：“鉴于每个英国国民生来就有享受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如果英国国民发现了新的、无人居住的土地，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应服从英国法律，故而新发现的国土也应该在英国法律的管制之下。”此处出人意料的结局是“相悖理论”——该理论规定殖民地法律必须与英国法律一致。而在实际操作中，要想了解英国现行的习惯法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在殖民地看不到官方“法律报告”；此外，到底哪些议会法令适用于殖民地也很不清晰。枢密院采取了一种实际的观点：“在海外定居的英国人是如此之多，且情况各异，因此除了对于单独规定的海外种植园，议会的法案对这部分英国人不具约束力。”从那以后一直到大危机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爆发，除了贸易事项之外，伦敦政府的确几乎对殖民地治理情况不加干涉。正是这点让议会各方利益团

体忧心忡忡。

有时海外领土并不是持有特许状的个体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占领所得，而是通过征服或割让所得，这时情况更为复杂。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征服和割让是不同的，但是这两者通常都以某种形式的协约加以确定："投降条件"后来被加入到条约之中。这是为了限制（有时相当严厉地限制）征服者将新统治体系强加给被征服民族的权力。拿魁北克来说，英国人于1759～1760年夺取了魁北克，随后在1763年《巴黎条约》中，法国正式将其割让给英国，在这里，统治权的权限问题在危险时期造成了相当大的疑虑和混乱。按照条约，英国人必须尊重法裔加拿大人的宗教信仰权，让他们继续保留天主教。但是此地的首任总督接到的命令却要求他引入"英国法律"、按照英属美洲模式组建议会。然而在英国，天主教徒既无权充当陪审员，也不能进入议会，而且英国法律（尤其在财产权方面）与在魁北克通用的法国法律大相径庭。如果按照这些命令来，那么在魁北克的人数少得可怜的新教英国移民（约200人）将掌握惊人的权力，而被统治的加拿大人（多达约6万人）可能会被迫造反。当伦敦政府彻底了解到这个问题时，南方13个殖民地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而魁北克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比南方殖民地还要大，迫切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来平息动荡。1774年，《魁北克法》应运而生。它否决了在魁北克人口中占少数的英国移民要求坚守英国法律制度的主张，允许总督不用考虑宗教背景地挑选殖民地立法机构（即立法会）的成员，而且允许当地延续之前的财产法。就法律方面而言，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为后来获得的那些没有几个（甚至完全没有）英国移民的领地设定了治理模式。在同年一宗案件的审理中（1774年"坎贝尔诉霍尔案"），这种至关重要的模式在类似"英国人……只是居留在此地，不享有有别于当地人的特权"的判决结果中被确定下来。1795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抢到了开普殖民地，英方任命的总督收到的指示仅仅是维持"上述移民定居点在原政府统治期间的法律和制度"。

因此，实际上在帝国庞大的版图上，占领并不意味着英国式统治会被部分或完全引入领土。无论是被条约所限制，还是出于避免当地激烈抵抗的愿望，总之英国人接受了保持该地原有管理和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尽管他们通常会历尽千辛万苦先登上当地政治舞台，但经历种种冲突和重重疑虑之后，他们往往知难而退。例如在斯里兰卡，英国人首先是尝试把马德拉斯的那套管理体制照搬过来，接着全盘推翻；随后又移交给内地康提王国进行实质上的自治，再将它与荷兰人势力强大的沿海诸省联合为一体。1840年，在斯里兰卡被征服（1796年）近50年后，一名英国官员颇为悲伤地感叹："很难说清这里的法律基础到底是什么、源头到底在哪里——这里有罗马–荷兰法系、古老的传统、当地法律、分别适用于印度教及伊斯兰教教徒的法规，在内地还有康提法律。这么多种法律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完全无从了解的。"类似的抱怨在后来的"王家殖民地"帝国里普遍存在。此时说已成功占领为时过早，至多能说是占领尚处于进行之中。

至于占领究竟能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没有哪里比爱尔兰和印度

的情况更为变幻莫测。英格兰国王早在公元1200年前就已经取得了对爱尔兰的支配地位，但是除了在主要港口和靠近都柏林的内地，几乎看不到执行英格兰法律和推行英格兰习俗的希望。仅是劝阻这里的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通婚以及“被同化”就已经够困难的了。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征服爱尔兰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确立英国君主的至高地位，意图让爱尔兰的权贵或首领无法再拒绝向英格兰效忠。但是征服过程中阻力重重，而且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内战和叛乱让英格兰自顾不暇，导致爱尔兰趁机爆发了两次反抗新教统治的大起义。1690年7月1日，威廉三世在博因河畔的胜利似乎解决了问题，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至于曾为詹姆斯二世效力的那些人，他们中很多人的土地被充公。但仍有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爱尔兰是应该算作与英国共享同一个国王的独立王国，还是算作附属国，需要服从英格兰议会（后来成了英国议会）的命令。

1719年议会通过《公告法》立下法律：“爱尔兰王国一直，而且理应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大不列颠联合，隶属于大不列颠皇室……国王陛下经议会上下议院的同意和支持，拥有全面的权力和权威制定法律法规……以管制爱尔兰王国。”据英国官方发言人称，爱尔兰的人口只有两类：不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也就是被征服的民族），就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无论是这两类中的哪类人都受命于英国议会。爱尔兰的新教卫戍部队不敢抱怨，尽管它的领导们竭力将伦敦政府的干涉最小化。但是60年后，当英帝国陷入美洲起义危机时，他们逼迫威斯敏斯特议会放弃它的至高权力，并承认爱尔兰的独立国家地位，将其作为皇室统治下的姊妹王国对待。在经历了内乱纷争（天主教）和法国入侵以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后，由爱尔兰的新教地主们组成的议会终于在1800年被劝诱而自动瓦解，接受了与英国的联合。

尽管到了1757年东印度公司已经有权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堡垒[公司用1 200金币一年的租金（折合约400英镑）租下了马德拉斯] 而无须得到印度统治者的许可，但是直到公司在孟加拉普拉西战役中取得胜利才得以开始控制这些地区。1765年，公司执掌了孟加拉的行政管理权（印度语中称“diwani”）——拥有征收税款的权力，作为回报，东印度公司每年向莫卧儿皇帝进贡固定的金额。实际上，公司掌控了印度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军事实力的支持下，公司采取强势外交政策，将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恒河河谷，一系列恶战之后，东印度公司打压了实力不断壮大的迈索尔，并将势力范围从马德拉斯向腹地推进。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上的角色转换引发了疑问：应该如何界定它的法律地位？伦敦政府（同时也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靠山）担心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会跟不上它的过度扩张，要求对东印度公司在当地的员工严加管控。然而正如当下的银行，东印度公司已经规模庞大到不能倒闭：一旦它破产，就会给英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一系列举措导致了1784年《印度法案》的出台，根据该法案，公司在印度孟买、马德拉斯和孟加拉三大管区的财政预算、对外政策与军事政策、对总督的任免等事宜均由管理委员会和一名内阁官员监管。这个体制一直持续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正式撤销，在此之后，伦敦的总公司和管理委员会被并入印度事务

部，纳入大臣监管之下。

但是印度究竟是什么时候变为“英属”的？占领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早在1757年，东印度公司征服的领土就自动成了国王自治领的一部分。但是公司掌握的绝大部分领土还是来自于莫卧儿皇帝的封赏，公司仍然需要上缴贡品。1772年开始，公司不再进贡，可是直到1800年，东印度公司才正式要求拥有它所掌握的领土上的最高统治权。即使如此，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权力仍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之签订了条约的印度统治者们。那么公司与他们之间应该算是盟友关系还是主仆关系呢？在这方面保持模糊的界定显然更为有利。接着又出现了法律纠纷。1774年在一桩声名狼藉的案件中，南达·库马尔（Nanda Kumar）被加以造假币的罪名并处以极刑。英格兰法律严明，按法律应该用严酷的死刑处决他，而当地的法律对此类罪行的处罚则轻得多。但是，在此案中，是应该按照英格兰法律还是当地法律来判决他呢？相当一部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认为这种将当地社会无法理解的律法和惩罚制度强加于殖民地的行为是不公正的，而且还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编纂法典确实有其必要，但是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要区别对待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在税收、财产观和宗教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英国人强烈反对封建土地占有制，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役或者金钱才能换得土地的使用权。英国人极力推崇的是与之恰恰相反的财产私有化，在他们看来这才是“进步”的秘诀。但是如此激进的变革完全不切实际，甚至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以英国人仅在孟加拉进行了小规模改革，而印度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已有的土地所有制。公司很早就决定避免公开支持基督教或促使当地人皈依，1813年，公司续签了特许状，其中仅仅提到了必须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公司领土，连这个要求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毋庸置疑，福音派在部分英国官员中很有影响力（或许这是公司勉强禁止了寡妇殉葬习俗的原因之一），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内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那些员工面前公开谴责英国政府干涉印度政治实践以及拒绝承认印度主权的行为。“我们政府最大的恶习，”1824年托马斯·芒诺（Thomas Munro）爵士评价道，“就是喜欢搞些新花样。”“我担心某些死脑筋的英国人……会坚持将印度人变成英国人。”

印度地域辽阔，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当地习俗的多样性意味着英国人没有统一的统治模式，而且施行的政策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结果是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无所适从。1830年孟加拉首席法官抱怨说：

> 无论是英国君主的统治性质、法律对议会的从属关系、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和财产，还是统治亿万民众的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和确定的观点……有特别针对印度地区的英国议会法案，也有其他的令人怀疑是否能全部或部分应用于印度或者干脆不适用于印度的法律。这里有英国习惯法和宪法，但是其

> 运用……仍然非常模糊，让人困惑；同时这里也有伊斯兰教教徒的法律和习惯，印度教的法律、习惯和教义，英国君主的特许状、政府的规章制度……英国君主签订的条约、印度政府签订的条约，除此之外，还有欧洲各国法律的影响……

简而言之，印度是个自成一体的独特世界。那么拥有这么混乱的殖民地意义何在呢？

对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占领，一旦占领了某块土地就能将其他势力排除在外，也能切断印度统治者与除英国以外的一切外界联系。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英国人逐渐意识到占领能带来的实际权力有限。印度人的赋税能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对英国有利；印度纺织品制造商也不再能依靠关税保护来限制英国向印度出口商品。但是统治印度人时要小心谨慎，避免与地方势力的意见相冲突——这是从1857年的大起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为了保证这点，不得不构建兼容并包的混合政治体制。在塑造殖民地方面，英国的意愿以及现实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

占地为王：帝国构建最重要的事

“主权”和“占领”都是抽象概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尽管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让律师们手忙脚乱（或许在现实生活中这也正是正常状态），但这并不妨碍英国能进行占领、征服、征税、发动战争或是展开和谈。某个殖民地可能是征服所得或者是由移民占有，甚至是割让所得，不同的获得方式的确影响个人权利——所以这个问题闹到了法庭（继而进入了我们的历史）。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更要紧的是占领会对他们的生计、个人财产、最重要的是地权有何影响。在印度、缅甸和其他属地，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英国统治带来了新的法律，在英式法治下，土地可以被买卖，而且土地拥有者可能因债务而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由此所造成的结果让人是令人感到担忧的。不过除了相对较少的几个特例外（例如欧洲各国在印度、斯里兰卡的茶叶和靛蓝类植物种植园以及后来在马来亚的橡胶植物园），在英属亚洲各国和西非地区，土地并没有大规模地从当地人民手中转移至移民手中。然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南非、中非、东非，保留地制度却很常见，当地人的土地所有权被大规模地剥夺，然后被赶到保留地去。在这些地区，英国的占领行为显得存在感十足，它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究竟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主权（律师们称为“统治权”）和土地的获得（所谓的“土地所有权”）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美洲所获得的最重要的财产”，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655年评价说，“即那些已经建立了殖民地或者移民定居

点的地方，这些地方要么原本无人居住，要么有人居住但是已经同意了殖民者的行为，或者至少也是那些当地人因为人手不够而无法耕种的荒地。上帝创造出土地本来就是为了让人类使用，人类有义务将土地全面开发……”事实上，让人惊讶的是，伦敦政府在殖民北美的第一个世纪里对自己签发的特许状对于当地民族及其土地所有权而言的意义根本不关心。正如克伦威尔所言，尽管早期的特许状明确地赋予了殖民者处理土地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权用暴力从原住民手中夺取土地。这里的假定似乎是印第安人应该被当作彼此相隔离的社群来对待，尽管到底相隔多远才能被算作不处于同一“主权”之下，尚没有定论。至于本土居民的财产权问题，并没有权威看法。克伦威尔的话里巧妙地包含了三种矛盾的观点：第一，最好是能占据无人居住之地；第二，如果该地有人居住，则应先取得居民的“同意”（暗示购买土地）；第三，如果当地居民没有意愿和能力开垦或改善土地质量，那么占有该片土地是在秉承神的旨意。的确，有些相当有影响力的评论者坚持认为占领没被积极开垦的土地聊胜于无，哲学家约翰·洛克著名的论述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当人的劳动与土地相结合，土地才能被划为私有，但这个论述并不适用于迁徙的游牧民族或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

从16~20世纪开始，英格兰人采取了5种不同的方式从原住民手中获取土地。美洲殖民的直接先例是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殖民。都铎王朝的殖民动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爱尔兰各大家族和反叛的权贵中重新确立皇家（以及英格兰的）权威。具体的方法是在难以管理的区域“安插”英格兰移民以及设立英格兰式郡县。以谋反罪被控的爱尔兰人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如果选择服从英格兰，他们能拿回土地的1/3（作为补偿），但是其余2/3则被赐封给所谓的“承办者”，“承办者”获得土地的条件是从英格兰（安置在北爱尔兰地区的移民来自苏格兰）带来移民，以改善土地质量、充当卫戍部队士兵，同时，这些移民被严格禁止与爱尔兰人通婚。沃尔特·拉雷爵士就是这样获得封地的，他拿到了沃特福德、科克郡和蒂珀雷里三个郡共计4万英亩的土地，封地面积之大，堪比王侯。当然，殖民爱尔兰的过程并不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英格兰人的进犯激起了爱尔兰人的猛烈反击和滔天的愤恨，往往要用暴力威胁才能逼迫爱尔兰人大规模迁移。而一些来自英格兰移民的行为也令人失望，当时的人感叹道：“从英格兰出去的移民有……叛国者、杀人犯、盗贼、诈骗犯、骗子……带着别人的妻子私奔的人……离婚的人、生活散漫的人、破产的人……天主教教徒、清教教徒……”。夺取土地只是这场以征服为目的血腥（且代价高昂的）战争的一部分，其真正目的是阻止爱尔兰成为其他势力入侵新教徒统治下的英格兰的基地。这个理由足以让英格兰政府愿意为自己所需的武力埋单。而在美洲殖民地，情况大为不同。

尽管印第安人稀少的人口（尤其是在欧洲人带去的病毒导致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之后）意味着后来成为“13个殖民地”中的很多地区可以被殖民者无声无息、兵不血刃地据为己有，但是在大多数移民定居区，印第安部落显然充当着耕作者（据早期游记记载，印第安人栽种玉米和豆子）和猎人的角色。纵然部分移民及他们在国内的支持者坚称自己有“权

利”占有那些被印第安人忽视的土地，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实现”这个权利；殖民者反而觉得购买土地比抢夺土地更为容易和安全。最近的一份学术研究表明：“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最常见的获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方法就是购买。”幸运的是，印第安人通常很乐意出售自己的土地。他们渴望用出售土地的收益购买各种商品，其中包括火器和酒。有的时候，印第安人也用土地换取移民的支持以对抗敌对部落。一旦移民迁入，他们的活动就会破坏附近印第安人的狩猎场地，对印第安人而言，这些土地的价值也随之消失。而且随着移民人数逐渐超过人口因疾病而骤降的印第安人社群，出售土地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当然，武力和诡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在北美大陆上的力量平衡取决于英国与法国之间势力平衡的时期，签订条约和购买土地仍然是殖民者扩张地盘的主要方式。

所以英国人承认印第安人在那段时期里是“本土土地所有者”。个体移民可以，也的确直接购买了土地，可是要确定他们的所有权（以防其他有意购买者夺走土地）就必须到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绝大多数殖民地都有专门的法律禁止未经政府授权的直接购地行为，有的时候当局要求在进行土地买卖时必须有官方检查员和出售土地的印第安人同时到场。在这种制度下，截至1750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片土地被转手交易，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土地投机者甚至迫切要求或者暗中游说政府签发许可证，以购买西边的土地。但是正在此时，危机爆发了。在七年战争时期，印第安人对英国人的敌意以及他们对法国人的支持反映了印第安人对英国移民者进一步侵犯他们土地的深深恐惧。由于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印第安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徙至毗邻部落的地盘。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辽阔领土。北方的庞蒂亚克部落暴动以及在南方与切罗基部落之间战争的爆发让英国疲于奔命，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参与新的边境战争。《1763年皇家宣言》（以下简称“皇家宣言”）就是为了快刀斩乱麻。“在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欺诈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它声明这些行为“既有损我们的利益，也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极度不满”。出台的解决方案相当极端：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不签发购地许可证，所有进行私人交易的，无论是移民还是印第安人，都被明令禁止。自此以后，唯一购买土地的途径就是由政府出面，通过收购或与印第安部落签订条约获得土地。

这个突如其来的禁令激怒了移民——那些投机土地买卖的人中就包括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标志着外来者与本土居民之间土地交易方式的重大转变。1783年之后，英国政府再也控制不了美洲移民购买土地的行为，这些地区后来发展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联邦政府虽然名义上支持私人不得购买土地的原则，但实际却成了移民（和投机者）实现坐拥更多土地欲望的工具。而在大英帝国，“皇家宣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法律蒙上了一层阴影，它成了移民购买土地的正统原则。但是英国人也注意到了美国一个重要的法律判决。1823年的“约翰逊诉密托施案”否定了私下购买土地的合法性。美国最高法院重申了“皇家宣言”中规定的原则，但是在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著名的司法认定中，这条原则被附加了三个重要条件。第一，他称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发现”权——英国人就是

如此占领美洲大陆的。拥有发现权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的土地就是美国人的，但他同时否定了印第安人有出售土地的权利。第二，马歇尔更正了印第安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论断，裁决印第安人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第三，否定了印第安人随意将土地转让的权利（移民则有此项权利），因为印第安人尚未开化。印第安人“靠狩猎为生，居无定所”，“印第安人随着猎物迁往更为浓密、保护得更完好的森林”。在这里，马歇尔对印第安社会显然抱有一种陈旧且极具争议的观点。然而，正如一位英国官员尖锐地评价：“他毕竟是个美国人（要替美国人说话）。”

“皇家宣言”和马歇尔发表的声明为新西兰的白人殖民做好了准备。19世纪30年代，以悉尼为基地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开始从毛利部落和首领手中购买土地。30年代末，新西兰公司开展的大型移民计划迫使伦敦政府启动新模式。私人土地购买行为不被法律承认，英国移民只能购买英国政府从毛利人社群——而非毛利人个体手中买到的土地。但是英国人认为马歇尔论断中的发现理论并不适用于此地，他们不把新西兰算作发现所得：因为毛利人不是游猎民族，而是开化了的农耕民族。毛利人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统治者”，这其中有深刻的暗示。新西兰之所以成为英国属地并不是因为它是被英国发现或征服，而是因为1840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将它割让了。条约保证毛利人能作为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占有者）“完全地使用以及完整地拥有”他们的土地、森林和渔场，尽管如果他们出售土地就必须出售给英国女王。然而这个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却有些不尽如人意。毛利人渴望出售土地、英国人渴望购买土地，再加上些欺诈、投机和种族对立，战争随之而来，到了那个世纪末，眼看就要灭绝的本土民族手中掌握的土地与签订条约前相比，只剩下了极少的部分。但是正如新西兰近代史所表明的，1840年确立的占领规则结果（出人意料地）意义重大。根据条约规定，毛利人所拥有的权利以及依照条约获得的巨额补偿为毛利人自我意识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对《怀唐伊条约》中的条款的援引重塑了现代新西兰。

另外两个例子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白人移民在非洲可没有惺惺作态地尊重原住民族的财产权。最早的白人移民定居点从开普（当时还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往北延伸，占据了人口稀少且在不断减少的科伊科伊人的土地，移民们与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又称布须曼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恶战。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每当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上遭遇人口较多的科萨部落骚扰，解决争端的方式通常是征求部落首领的同意分配白人和黑人的领地以减少进一步的武装摩擦。所以尽管英国移民在非洲也会签订条约，但是与《怀唐伊条约》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条约并不承认非洲人为土地所有者。相反，英国当局通过征服或割让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再将土地作为“原住民居住地”和“政府赠予地”分别分配给黑人和白人。从开普殖民地向北迁徙的阿非利卡人[2]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们的陆军突击队用武力占领土地，再将土地分配给自己人，并把原住民变为被奴役的劳动力。塞西尔·罗兹的特许公司沿袭了这个传统做法，于1890年占领了今天的津巴布韦，将大片土地分给了“先锋者纵队”队员和公司股东。1893年后恩德贝勒人的抵抗终于被攻破时，被征服土地上

的一切权利被宣布转交给英国王室，这一做法消除了对罗兹之前“征服行动”合法性的法律疑问（因为征服行动必须以英国王室的名义进行）。英国君主的土地专员对罗兹的土地分配进行了认证，尽管东印度公司后来被迫给非洲人留出更多土地。同时，在新东非保护国（今肯尼亚），游牧狩猎民族马赛人被驱逐出后来成为“白色高地”的地区，因为按照计划，该地被留给了不断迁入的白种移民。

然而最让人惊异的还是在澳大利亚。在非洲，殖民者暴力抢夺的土地成了白种移民的财产，但是至少原住民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居住权还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在于原住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土地（到1913年，南非地区实行“最低限度”政策）以及非洲土地应该为部落或氏族集体所有还是为个人所有。可是在澳大利亚，库克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我们之前讲到，库克武断地宣称在澳大利亚没有看到任何有权拥有土地的人，他的说法被信以为真。所以澳大利亚是片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即无主之地。这意味着1788年英国开始占有这片无主之地的时候，英国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土地。在他们试图圈定内陆移民定居点的范围时，他们不仅没有花钱买地反而是让原本居住在这块地方的原住民掏钱以换取继续在此放牧耕作的权利，于是他们与当地人发生了争执。原住民的反抗（在有些地方相当激烈）给英国人出了道法律难题。有些有影响力的人认为原住民应服从英国法律，所以也应受英国法律关于暴力和盗窃罪的惩罚，但是反对的呼声非常强烈。将英国法律推行到白人移民定居点之外的广大原住民居住地域根本不可能。而且，如果原住民可以在英国法庭受审，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在英国法庭提出诉讼？他们会不会提出诉讼争取财产权？他们会不会控告偷了他们土地的人？这样一来白人移民定居点的法律基础就会被摧毁。1841年西澳大利亚总督就指出了这一点，他提出这种提议“站在了皇室在澳大利亚所有土地上拥有的统治权的对立面”。当一群塔斯马尼亚岛的白种人移民从当地原住民部落手中购买今墨尔本周围的土地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笔土地交易被迅速否决，理由是私人购买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在这个理由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果原住民可以出售土地，也就承认了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倘若承认了这一点，那么更多的人会冒出头来，令本来就脆弱的殖民地统治全面崩塌。和大多数法律原则一样，“无主之地”的真正好处就在于它符合当时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白人侵略者的利益。

领地与帝国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帝国都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占领。历史上大多数帝国在其版图内都既有正式统治的区域，也有影响带或非正式统治区，还有与之“联盟”（客气的说法）的附庸国。19世纪，英国人在全球许多地方实践了这种帝国形式：例如拉丁美洲、中东、西非（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东南亚和中国。但在各地采取的方法大为不同。在埃及，卫

戍部队和皇家海军对通往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的海上门户东地中海及红海的掌控权保证了英国的影响力。在中国沿海地区，用武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英国商人（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方人）得以在特别的据点，即所谓的“通商口岸”免受中国当局控制，而海岸和航道入口也随处可见英国炮艇在游弋巡逻。严格地说英国在中国只有一个领地，即分别于1842年和1861年[3]获得的中国永久割让的香港维多利亚港和九龙（今天香港的其他部分当时只是租借给英国政府）。但是在拉丁美洲，情况很不一样。在这里，英国产业众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以商业机构（例如银行）、商业财产（包括农场和牧场）、公共事业（例如电车轨道、供水系统）的形式存在。最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英国人已经在拉丁美洲建好了铁路系统——从阿根廷的大欧斯特或利润颇丰的圣保罗，到委内瑞拉稍微逊色的玻利瓦尔。这些英国产业都由伦敦的金融家而不是由白厅管理。时至1913年，这些产业带来的利润已经占英国海外收入的近1/4，这也是大英帝国能挺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秘诀之一。

那么何不将这些宝贵的产业变成“真正”的占领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只要产业有利可图，那么似乎没有什么必要非得完全占领，毕竟——至少是在拉丁美洲，英国人带来的贸易增长是当地政府喜闻乐见的。除此之外，占领也很劳民伤财。如果当地人民不怎么抵抗，同时在该地区也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兼并领土确实很容易；相反，如果当地人民奋力抵抗，或者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么要兼并领土，就不得不进行昂贵的持久战：英国抢夺美洲新法兰西殖民地的过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只有在战争中取胜才能成功占领。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期，只要情况允许，英国人更倾向于“通过条约兼并”——这是在热带非洲地区的常用模式。由于当时海军和陆军实力有限，想要征服拉丁美洲根本不可能：征服拉美的想法在当时看来是如此让人无法忍受的荒诞不经，至少在伦敦金融界看来如此。而中国（和日本）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使得英国的征服行为不仅徒劳无功，还伤亡惨重。埃及显然是个例外，英国人1882年占领了这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埃及是个地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国家，英国人并没有兼并它。埃及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恨之入骨，多年来，这令英国人忧心忡忡。所以英国人在公开场合一直勉力维持那个尴尬的谎言，号称埃及只是被“临时占领”。

由此可得的结论便是，尽管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的领地看起来浩瀚无际，但这只会给大家对帝国的“本质”造成错误的理解。当时权威的墨卡托地图上标注为英国属地的许多地方其实不过是沙漠或荒野：真正有价值的地区集中在河边、航道边以及（后来的）铁道边的狭长地带。而有些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如我们谈到的，并没有被染成英国红，正式成为英国领地。俗话称，“现实占有败一胜九”（意指占住了的才算数），但是直到19世纪末，帝国实际占领的地区远远不及地图上所见的9/10。

[1]　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则称之为印度叛变或土兵叛变，而独立后的印度则称它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一般指1857～1858年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莫卧儿帝国自此完结，而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亦从此告终，印度开始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2] 阿非利卡人即布尔人。——译者注

[3] 原著中为1861年，据考证为1860年。——编者注

第四章 迁入



“每当英国人谈及或想起英帝国时”，1909年寇松勋爵抱怨说，“他们往往不把印度算在内，只会想起由我们自己民族的男人和女人们建立并居住的殖民地。”作为前印度总督，寇松坚信“亚洲争夺战”将会决定大英帝国的前途，而占领印度则是决定这场战争结果的关键所在。但是他深刻地意识到英国国内对帝国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后来发展成白人自治领的4个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关注相对较少的）

南非。许多“帝国主义者”声称正是这4个自治领提供的额外人力和物力才使英国有能力对抗世界上的新兴势力（德国、俄国和美国）。1903年后，这种期望引发了关税改革以及约瑟夫·张伯伦极力推动的“帝国统一”运动，保守党甚至因此一分为二。在张伯伦宏大的计划里，他呼吁联合所有的移民殖民地建立一个“帝国联邦”，由同一个议会和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尽管这个计划的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在“英属国家”（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张伯伦的追随者们所用的称呼）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合一直到20世纪都是“帝国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

寇松的那番话如果提前25年左右说，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当时的英国人似乎对英国移民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和带来的收益完全漠不关心。1883年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出版了著作《英国的扩张》，在书中，他谴责英国人对移民行动的轻视，认为这是时人闭关自守、思想狭隘的表现。向海外的移民行动被西利称为“英格兰的出埃及记”（西利用“英格兰”和“英格兰人”指代“英国”和“英国人”），在他看来，这是“现代英国史中的重大事件”。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被提及，它也仅被当作一件简单而且必然的事件：“人口过多，又拥有最强大海上实力的国家所向披靡地占据无人居住的国家。”至于扩张的途径和原因，则无人关心。西利呼吁国内的英国人应该承认自己与海外英国人同属于一个“更大的不列颠”，彼此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正是这个主张触发了帝国统一运动和张伯伦的计划。尽管不久之后“帝国联邦”就宣告破产，但是西利的影响深远，英国政界普遍承认海外“扩张”是英国的“天定命运”，并承认“母国”英国与之前建立的移民殖民地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即使不认可西利的这些观点，我们也得承认，从本质上来说，移民对于构建帝国或者“英属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1815～1914年，超过2 200万人从不列颠群岛出发前往海外各地，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人数。当然我们需要谨慎分析这个数据。1815年后移民总数的2/3去了美国而不是英属国家。大概只有总数的1/3回到了英国，其中有些人是为了稍事休整再次前往海外或者开始“连环移民”——一种史学家才刚刚开始研究的移民模式。而且英国人（通常也包括爱尔兰移民）并不是“英属”国家里的唯一移民群体。其他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取道英国。19世纪末期新西兰北岛上有今克罗地亚沿海地区的达尔马提亚人在挖掘埋于地下的贝壳杉树脂。或许是因为觉得他们能适应当地的严寒，乌克兰人被征召至加拿大草原。截至1800年，约有1 000万非洲人被迫横渡大西洋到美洲成为奴隶，其中很大一部分去了英属殖民地，直到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来自印度的移民通常在严格的劳务合同约束下（所谓的“契约”）来到英属热带殖民地（例如斐济、马来亚、缅甸或特立尼达岛）当种植园劳工或者当铁路“工人”修筑乌干达与肯尼亚之间的铁路。部分印度移民到了“白人的国家”（通常来说，这只是个政治宣传术语，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国民全都是白人），在这里，他们和中国移民一样，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仍然激起了当地人的恐慌，当地人担心这些移民会不声不响地反客为主，从而将他们排斥在外。

如此说，来移民和定居以及对所谓“无人居住的国家”的占领是英帝国构建的根基所在。这是最为持久也最为野蛮的殖民形式。然而正如西利暗示的那样，它既不“简单”也不“必然”。没错，我们越是深入探究就越发现它令人费解、错综复杂，就算我们仅仅深究英国移民部分。移民的迁徙并非出于本能。除非是被判以流放的罪犯，否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先得下决心离开故土，然后他们或者他们的雇主还得挑个目的地。移民要到达自己或别人帮他挑选的目的地需要强烈的动机、慎重的计划和周详的组织。而这还不够，到达目的地才是移民定居的第一步，接下来移民们要找到土地或其他方式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进入了一个残酷的世界，在这里，先到者占据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源。他们必须融入未经开发的边陲社会、适应精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学会使用最粗糙的工具尽可能地开发自然环境。他们必须得生产例如谷物、羊毛、黄金之类的经济产物，这样才能保证生计，也能使他们在荒芜之地建立的劳动营地的经济活跃起来，以吸引更多的移民。然而正如稍后我们将看到的，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够成功。

心生离意

不列颠岛向海外移民的习惯由来已久，远早于1815年的大迁徙。最初的目的地是爱尔兰。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伦敦政府鼓励英格兰移民前往爱尔兰占据从造反的爱尔兰贵族和宗族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到16世纪末，爱尔兰南部的芒斯特地区聚集了超过4 000英格兰人，都柏林附近的伦斯特地区的英格兰移民人数大约也有这么多。1600年之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蜂拥而至北爱尔兰地区。截至17世纪40年代，约有10万来自不列颠岛的移民定居于爱尔兰，大大超过了那时远赴大西洋彼岸的人数。1690年7月，博因河战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再次征服爱尔兰之后，移居北爱尔兰的人数达到了8万人之多。当然此时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人数也大步赶上了。到1700年，将近40万人移居美洲，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去气候温和的大陆殖民地，而是去了炎热潮湿的加勒比种植园（当然这里的死亡率也高得多）。在陌生环境的残酷死亡考验之后，大约有23万移民幸存，其中约5万人挺过了加勒比的热带气候。事实上，据估计，17世纪共有大概100万人（其中70%是英格兰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如果拿移民人数与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这次移民的规模比200年后的那次大迁移要大得多。

他们为何要离开不列颠呢？部分原因是在17世纪，内战、叛乱和血腥镇压造成的极度动荡局势影响了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对清教徒还是对天主教徒而言，移民都只有一条出路。他们或由富有同情心的商人和贵族征集，或借由率先移民的那些牧师们提供的帮助前往新英格兰定居。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因素的影响才是最大的。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粮食歉收，再加上“小冰河期”带来的气温骤降，移民的需求更为迫切了。许多离开不列颠的人起初或许并没有打

算在外久留——前往弗吉尼亚的第一批人正是如此，他们原计划只是去开展贸易而不是开辟农业殖民地。而绝大多数横渡大西洋的年轻单身汉是冲着一夜暴富的机会或者高工资而前往盛产烟草、糖和黄金的加勒比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700年后英国国内环境改善以及非洲奴隶将白人劳工挤出糖业生产和加工，移民潮逐渐降温，而1760年后英国的再次萧条、北爱尔兰的土地压力加上七年战争对美洲殖民地的强大宣传效应，移民热又开始不断升温。1760～1775年（1775年美洲独立革命导致交通完全瘫痪），渡过大西洋的移民达到了12.5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新教教徒，是此前几十年间的移民数量的三倍。

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世界性战争，1815年之后大规模人口外流再次兴起。1832年，前往海外的年度移民人口总数首次突破10万。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造成了大移民潮：1841～1850年，170万人离开故土；1853～1860年又有160万人背井离乡；1861～1870年，几乎200万人远走他乡。1853年和1854年，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都超过了1%。19世纪50～60年代，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仍然在移民潮中占绝大多数，而1870年后，英格兰移民开始占据多数。19世纪70年代，移民人数略微下降，但是从8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通常每年移民人数都超过20万，从未低于14万。在之后一场持续到1914年的移民热潮中，超过3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仅1913年一年就有近40万移民。移民目的地的转变同样引人注目。18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英国移民仍然选择前往美国，而1900年之后他们则选择帝国属地。那些年里有超过100万英国人移居加拿大。

一系列的动因推动和拉扯着大批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方面的。爱尔兰大饥荒体现了人口给土地带来的巨大压力已接近极限，而马铃薯在枯萎病之前的高产掩盖了这些压力。甚至在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的迁出人口就已经显著上升，1815～1845年，150万爱尔兰人移居海外。在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地区，居住在边际土地的农民要面对那些急于开创自己的“领地王国”的大地主们（比如说萨瑟兰公爵），所谓的“迁移”（“大清洗”一词是后来才有的）让他们苦不堪言。1815年之后，以及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对许多技术工人来说，尤其是织布工，经济萧条导致了“结构性失业”：棉毛纺织机器使得他们的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技术行业的逐步工业化致使人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继而导致地位）急剧下降。随着英国粮食（尤其是谷物）进口量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并不只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经济开始濒临崩溃。恶劣的天气、贫瘠的土地和糟糕的道路状况加剧了北德文和奇尔特恩思等许多区域农村的贫困程度；来自美洲的竞争导致小麦价格暴跌，使得传统的“谷物生产区”（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大型谷物种植区）的农村劳动力穷困潦倒。

这些经济压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在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在欧洲，人口压力就算不比英国高，也至少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但要么是移民潮发生的时间晚于英国，要么外迁总体人数低于英国。真

正让英国人（以及爱尔兰人）如此热衷于移民的部分原因是观念方面的。自18世纪晚期开始，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在英国取得压倒性的地位。有地有钱的精英阶层迫切地想迅速赚得更多的金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尝试任何可能的手段，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为例，他们就曾投资海盗、殖民、新外贸以及土地的开垦、改良。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人们广泛认为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应该受到保护，以抵抗来自海外的竞争。事实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楚阐述的计划在70年后才得以全面实施，谷物得以进行自由贸易（1846年）、《航海条例》也被废除（1851年）。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主可以随意提高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国家将“联合社”（即工会组织）认定为非法组织，这为多个大型铁路项目扫清了道路，仅在伦敦就有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转行。强调“进步”的观点把经济“增长”视为绝对目标，认为一切为之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是必要的。任何干预经济规律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徒劳或者错误的。当时的英格兰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爱尔兰贫困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移民解决——但是最好不要移到英格兰来。随着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巩固，爱尔兰农业应该终将有利可图，极端自由贸易者理查德·科布登也如此认为。大移民潮过后，爱尔兰元气大伤，这时，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提出的推进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才开始被重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大众而非精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推动着移民潮。尽管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逐渐接受了英国首先是一个商业和工业国家——这正是谷物自由贸易的前提，而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其他社会阶层则持有另一套全然不同的观点。“公平”工资、对技术工种的尊重等概念给劳动阶层对到工厂里做工和“工厂纪律”的憎恨火上浇油。更为根深蒂固的是劳动阶层的财富理想，他们希望能够合法拥有一块可供耕种的土地，即使不作为主要收入，也可以作为养老的保障以防不测。对“副业生产地”（划分为小块的、可供城市工人使用的土地）的要求是19世纪30～40年代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运动——宪章运动的主要主张之一。就算是那些从城镇或城市移居海外的英国人，他们的上一代也是在乡村生活的，其中有些人还有权使用公共用地或林地。如果说经济上的困苦将移民“推”了出去，那么美洲和澳洲这两个目的地所能提供的免费或低价土地就像强大的磁石“拉”着他们前行。当新西兰的移民们被问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们最常提起的就是在这里他们能安稳地拥有土地，哪怕只是一小块。

有离开的愿望和需要是一回事，成功到达某个目的地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候人们是如何移民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选择。1783～1868年间，大约16万罪犯被流放海外，几乎所有的罪犯都被运往了澳大利亚，通常他们要先服满刑期再“刑满释放”。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地主会“协助”他们想赶走的人移民。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曾亲眼目睹斯凯岛上的一小群居民像牲口一样无助地被赶上开往加拿大的轮船。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移民的人还是极小一部分：就算是在大饥荒时期，可能有许许多多人愿意接受他们的地主能把他们送往海外，但是只有不到4%的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发的。

相比而言，政府计划起到的作用更为重大，它征召有移民意向的国民，将他们派往官方认可的目的地。1749年伦敦政府登报征集移民前往当时对抗法军的重要前线基地——今天的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政府承诺土地免费、税收全免，并提供12个月的口粮配给，因此，有2 500人争先恐后地申请参加。1815年以后，由军费预算拨款支付从苏格兰往加拿大运送移民的费用，目的是把守住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所圈成的战略三角地带以防美国入侵。1819年，随着经济萧条加剧，出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政府突然决定出资在南非建立移民定居点：8万人申请，5 000人入选。更为长期的机制是“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从1840~1872年，它利用在澳大利亚土地交易的收入，出资让34万人移民——占所有在帝国属地定居人口的1/4以上。

但是大多数移居英属殖民地的人并不是政府派遣的。另有三种“动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土地公司”，这些公司本来就在美洲殖民地非常活跃，1815年之后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拿大公司、英美公司、南澳大利亚公司、新西兰公司等众多公司的目的是低价购买或者从殖民地政府手中受赠土地，继而将土地转手卖给英国的投资者或者有移民意向的人，买卖通常会附加居住和耕种的条件。对公司来说，它们要大力宣传名下未开发的地产的美好前景，广告中满是热情澎湃的移民或游客吹捧美好的风景和肥沃的土地。第二，大批移民对商人和船主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1830年比迪福德商人托马斯·钱特登出广告宣传他的4艘船“专为家庭度身定做，价格低廉，开往爱德华王子岛、布雷顿和新不伦瑞克省”。这些轮船首航共有74位乘客，都是北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农民、工人和技工”以及他们的家人。把人运出去再从魁北克或加拿大的沿海诸省拉回木材，这实在是一举两得。第三，移民也并不全是被动地等着别人来召集。当时出现了许多移民社团，它们宣传、公布移民信息，有的时候还组织实际的移民活动。1773年苏格兰美洲农民公司在克莱德河谷下游成立了。它的105名会员中既有小农也有技工，他们缴纳小额会费在美国购买土地以及支付赴美选址的先遣团费用。

对于许多想移民的人来说，资金是最大的问题。19世纪中期，渡过大西洋需要每人3~4英镑。对爱尔兰移民来说总花费往往超过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为了凑够钱，最常见的办法——尤其是对于单身汉来说，曾经是签订契约。有移民意向的人承诺为某个商人或者答应把他送往某个美洲港口的船长工作4~5年，这种方式在17世纪广为盛行。双方签订合同（所谓的“契约”），当船到达美洲，船长会拍卖手中的契约，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移民，无论男女，站在码头前沿，看着出价人对他们的劳动力讨价还价再最终敲定价格。1800年之后，白人契约移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另一套系统取而代之：移民作为“地权合伙人”，在“头领”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通常来说，只要头领能带来足够数量的“人头”定居，就能用极其优惠的条件投标买下大块土地。所以他们会登广告招聘志愿者，支付志愿者的路费，可能还会安排“他们的”移民到达许诺的地点。但是19世纪移民们最常用的筹资方法是“家庭自助式”的。一家人相互协作，最有能力、最健康的成员作为先锋率先前往海外，一旦安顿下来赚到了钱，他们就会汇款回国或者从附近的船主处买一张船票把

家人接过来。一个叫玛丽·达根的女孩写信给她的妹妹，随信附上4英镑作为从爱尔兰出发的路费。玛丽告诉妹妹，当她到了魁北克，她可以跟移民中介说自己没钱去金士顿的姐姐那儿，那么中介会给她一张票，还会提供一些口粮。

如果不是处于公众极度关注的大气候之下，移民“生意”不太可能如此兴旺发达。当时的英国社会充斥着各色移民前景的“新闻”。早在17世纪20～30年代就有无数的小册子、剧本和宣传册大肆鼓吹海外移民点的美好和遍地的发财机会。牧师们在布道时进行适当的宣传：约翰·多恩就曾受雇于弗吉尼亚公司。到了18世纪中期，宣传印刷品中加入了让人心生向往的地图：只是哈利法克斯的地图上浓密的森林被刻意淡化，野生动物被忽略，对印第安人也避而不谈。19世纪，《移民指南》在英国大量传播，它们用警告、哄骗、操纵、混淆视听的方式引诱人移民。移民们不得不努力辨别信息的真假：因此或许此时最靠得住的是亲人从海外寄来的信件——就算是这些家书也有可能被东印度公司警惕地篡改过了。或许最重要的是当19世纪50～60年代的大移民潮到来时，英国本土人已经成为一个热衷于迁徙的民族：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从村庄迁移到城镇、从英国各地迁往伦敦大都市。正如俗话所说的“仁爱始于家”，迁徙也始于国内。

到达目的地

对于大多数移民家庭而言，旅途是否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他们或许很走运，航行一帆风顺。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乘着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从欧洲千里迢迢运煤过来的高昂成本和向南航行的便利推迟了帆船向汽船的更新换代，而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船只升级还要更迟一些。乘坐帆船向西渡过大西洋一般需要6个星期，而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可能需要4个月甚至更久。冬季的北大西洋非常不利于航行。从圣劳伦斯河进入加拿大境内的主要入口从11月底到第二年4月被寒冰封住。穿越“咆哮西风带”——从好望角向东通往澳大利亚南角的航道，这里西风带推动着船只飞速航行——咆哮的大风加上海上的惊涛骇浪，即使不摧毁桅杆和船帆，也能使航行旅途如同噩梦。“风高浪急”，一位驶往新西兰的外科医生于1842年记录道，“船只随浪颠簸，大量海水进入船体……”几天之后，“上桅帆脱离船体，深夜两点，主桅帆被风浪撕裂。”当他们终于能靠岸登陆，却发现所谓的港口往往只是几栋房子和商店胡乱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像19世纪40年代的惠灵顿和墨尔本，或者19世纪50年代的达尼丁抑或任意一个有众多苏格兰人前往的位于新斯科舍省或新不伦瑞克省的小港口。1820年，被送往开普的移民们不得不乘风破浪在阿尔哥亚湾——后来的伊丽莎白港所在地登陆。抵达重要的枢纽港（例如魁北克，对继续前往今安大略或悉尼的人来说，它是个总站）不过是通往最终目的地的第一步。但是许多人也会在此停留。继续前行的费用、赚钱的迫切需要、尽快将其他

家庭成员接来的愿望，都使得在城市干活挣钱成为比到内陆开垦土地更好的选择。许多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截至1850年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的人口加起来达到了10万）也助长了这个趋势。在澳大利亚，这种情况更为显著，通往内陆的高昂交通费用、内陆农村对劳动力的低需求以及加工和包装大批羊毛出口物的需要，意味着殖民地主要城市与移民人口稀少的内陆相比发展速度严重不成比例。

而那些继续前进的移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土地：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购买农场的权利。他们或许希望先保障糊口，等到资金逐渐有些富余的时候再出卖农产品换取现金。事实上，土地是所有移民殖民地的“关键”问题：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能和土地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土地是殖民地最有价值的资产，也是税收的来源和最快赚取私人财富的工具。如此一来，在土地获取问题、分配问题以及（最终的）再分配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必然非常激烈。

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殖民地当局都热切地期望能尽快用从英国来的移民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原因很明显：把土地上的森林或灌木清扫一空能使土地变得可耕种，进而能让殖民地自给自足。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美洲殖民地就曾面临饥饿的风险。1788年博特尼湾殖民地建立，20年后，新南威尔士的粮食供应仍然远远称不上“有保障”。1806年总督威廉·布莱（有时被称为“慷慨号船长布莱”）向他的赞助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汇报说：小麦收成很低。布莱急盼着他能送一船大米来救急，同时布莱也派人去中国再调一船大米，但是此外没有别的救援物资，殖民地粮食配给量显然是紧巴巴的。新建立的移民定居点所带来的希望就在于能够生产粮食以供出口，或者能够养活劳动力来地生产例如木材或羊毛等可供出售的出口货物。这些出口商品有时被称作“大宗产品”，对于避免殖民地陷入发展停滞或更糟糕的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吸引国内投资、引起那些掌握资金的权贵们的注意（甚至吸引他们亲自到殖民地来）、加快货币流通。而赢利的贸易又能招来更多的移民，平整出更多土地，进而生产更多农作物。土地买卖可以提高政府收入，使之有能力深挖运河（例如在加拿大）、改善道路以及修建铁路。这种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确保了殖民地的繁荣昌盛。对于移民来说，经济繁荣和财政独立可以支持他们“自治政府”的主张，以便摆脱伦敦政府对他们内部事务的控制。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原住民手中获取土地是第一重需要消除的障碍。正如第三章中论述过的，在美洲殖民地主要是通过购买获取土地。而在后来的加拿大（在1867年之前，严格来说是“英属北美”），购买或者原住民出卖土地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今安大略省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省份中的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地区，在殖民活动开始之前人口就很稀少，而且疾病或内战让人口更为稀少。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要求完全被忽略，尽管移民点建立进程缓慢，但是由于原住民人数量相对较少（据粗略估计，18世纪70年代“有接触”的仅有100万人左右）而且土地幅员辽阔，因此除19世纪三四十年代塔斯马尼亚岛之外，土地获得的难题被掩盖了。在南非，19世纪90年代移民潮之前，

英国移民规模一直很小，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的英属领地以及奥兰治北部的布尔共和国，征服和割让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真正的特例是新西兰，尤其在北岛（大概只有5　000毛利人居住于南岛，被英国兼并时只占总人口的5%），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还未完成的漫长过程中，毛利人的土地权利被逐渐购买（或者说被殖民者用阴谋诡计抹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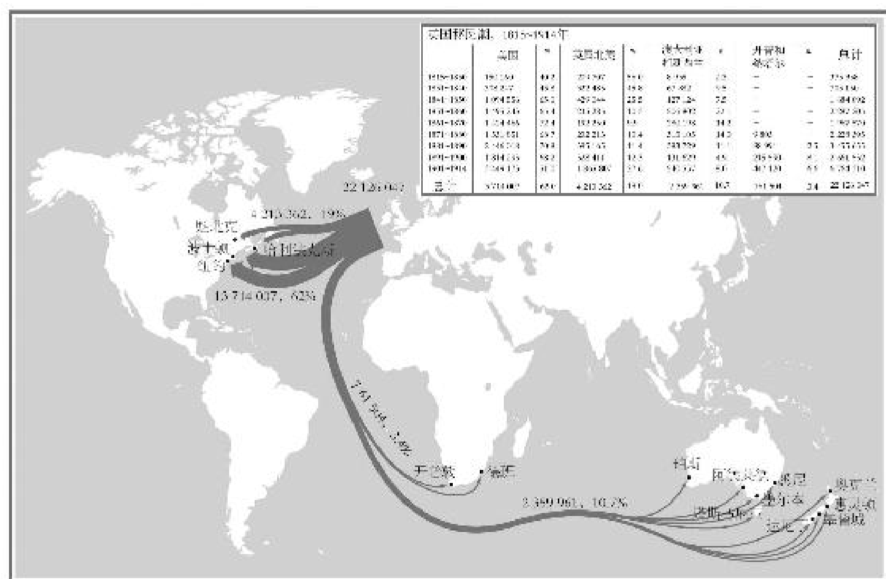


图4 –1 1815~1914年不列颠岛的移民潮

那么到底谁得到了土地呢？答案是往往是少数有广泛人脉的人。当爱德华王子岛（今加拿大大西洋省份之一）在1763年后成为英国领地时，它被分给67个缺席领主，这些人事先申请了赠予地：直到1895年，最后一个缺席地主（或称在外地主）手中的土地才被卖出。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许多亲英分子避难的上加拿大（今安大略），普通移民获得了免费赠予地，但是高层亲英分子、军官和治安官的赠予地面积要大得多，他们每人获得了多达5　000英亩的土地。1820年，在距殖民地首府不远的一个镇区，约60%的可用土地属于这种缺席地主，其中包括土地勘测员（他们因勘测工作而获得了5%的土地），而近30%的土地面积属于皇室和神职人员，以支付政府开销和建立圣公会；只有12%的（位于最差地段的）土地才是留着卖给移民的。50年后，缺席领主的地产中有一大部分仍然是未被清除的森林。在殖民地的另一个地区，一位英裔爱尔兰混血军官——塔尔博特（Talbot）上校从英国召集了成百上千的移民，作为报酬，他获得了多达65 000英亩的土地。到了19世纪30年代，因为政府监管不力，他把持的移民定居点面积近50万英亩。殖民地政府将大块保留地廉价出售给一家大型土地公司——加拿大公司，以换取不受殖民地议会审查的年度收入。但是被贱卖或赠予的土地极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后来赠予制度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将土地划分为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块土地并设定底价，然后再通过拍卖售出，但是此时大部分土地已经是缺席地主的属地。结果尽管成千上万的移民的

确获得了自己的家庭农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43%）直到1848年为止仍然只是佃户，而更多的人只是无土地的劳工。

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南威尔士是个监狱，由政府经营的一个农场提供食物。可是最初这里就存在一小群“自由”民，其中包括官员、新南威尔士军团（一支小型殖民地卫戍部队）的军官以及少数几个商人和移民。总督有权根据个人的贡献赠予土地——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倒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移民们本该为殖民地种植粮食、提供肉类，但是他们马上就养成了不守规矩的坏习惯，无论那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都随意放养牲畜。悉尼的总督们对此忍无可忍，他们希望看到土地上的人们能老老实实地耕作以改善土质。他们也决意要阻止移民擅自占用土地的行为（使用土地但不给钱），不让其扩大殖民地并给本来就紧巴巴的财政增添新负担。一系列新规定出台了，土地赠予制被废除，政府规定了土地最低价格，再将其拍卖。伦敦政府原定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简洁紧凑的殖民地，其中要有一片地带让经验丰富的农民移民们精耕细作。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和伦敦政府的目标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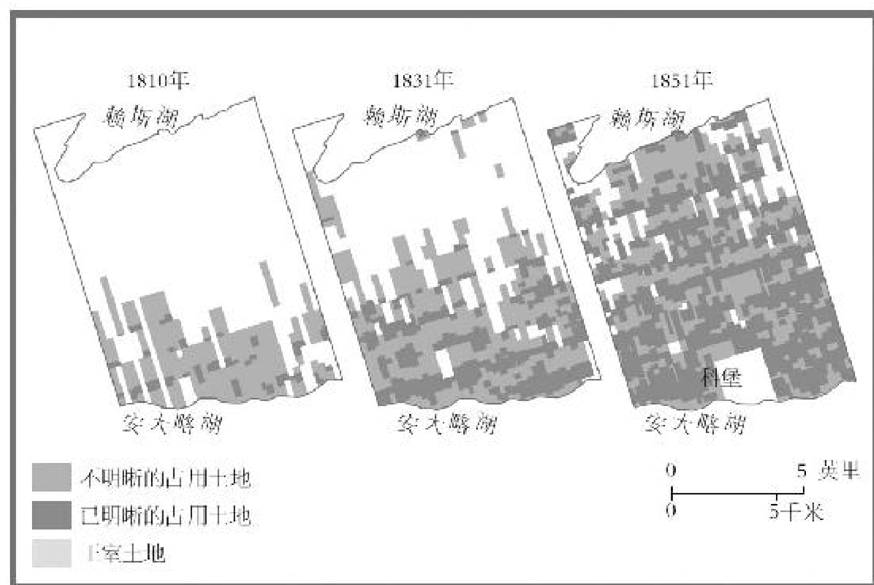


图4–2 上加拿大（安大略）湖岸区划，
展示不明晰产权的土地范围，这些土地常常属于在外地主

真正的症结在于总督的权利不足以控制那些擅自占地的人。据称，擅自占地者“只不过是在追随那些最有影响力、地位最卓绝的殖民者。后者的牛羊牧区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随处可见，可恨的擅自占地者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放牧。”换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在擅自占用土地。在这种利己主义的大潮之下，想要约束他们无异于痴人说梦。政府也想阻止塔斯马尼亚岛来的那群人突然占领菲利普港区（今维多利亚州），但是，就像伦敦政府慨叹的那样：“当大众的主流倾向与法律相左，那么法律就

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应有效力。”伦敦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出售土地的收入补助自由移民，试图用自由移民取代监狱劳工以解决劳动力问题——从1840年开始，英国不再往东澳大利亚流放罪犯。但是政府阻止不了大批土地被出售给投机土地商人，也无法拒绝给擅自占地者发放廉价许可允许他们大行其道占据大片土地。1850年以后无数移民被淘金热吸引而来，一方面，一些移民想拥有小型农场，另一方面，“牧羊王们”用空有其名的地租占据了无边的草场以支持他们的羊毛产业，这两群人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然而殖民地的收入已经逐渐依赖于羊毛出口业，这时双方也只好听之任之，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无论土地如何分配，在移民的农民能买到土地之前都有个重要步骤。在把土地分配给任何新所有者之前，需要绘制一张可靠的地图，所以得先勘测。土地勘测员是移民定居点发展进程中的无名英雄（也有些是恶棍）。在移民殖民地内外，他们都能像全能的女佣，料理一切事务。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只需填补已有地图上的空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当时他们能拿到的地图常常只是粗糙的略图。当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John Turnbull Thomson）1855年到达达尼丁的时候，新西兰南岛内陆的奥塔哥是一片未知之地。而第一张精确的开普地图直到1876年才问世。土地勘测员们还需要标注他们走过的各地的潜在可能性、寻找穿越山脉的路径、推荐最佳修路的线路。他们会遭遇“原住民”，有时，这种遭遇的结果是致命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勘测员被视为白人侵略的先遣兵。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充满激情的植物研究专家或人种学家；有些人用素描和图画记录下了自己的路途，或者写下了游记。日常工作通常都是些粗活。“殖民地土地勘测员，”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描述道，“身穿粗斜条棉布裤和蓝衬衫，头戴巴拿马草帽，脚踏带钉子鞋底的靴子……他随身携带上百种物件，有刀子、针、望远镜、火柴、纸、墨水、线、纽扣，还有必不可少的笔记本；他保持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趟过沼泽和溪流；以一种叫‘丹波’的糕点和咸牛肉干为主食，饮用海量的茶水。”

最好的土地勘测员都是专业人士，精通数学是基本要求。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工作不仅能让他们带薪探险，还给了他们暴富的机会。装备很简单，经纬仪综合了罗盘和望远镜的功能，可以前后翻转。土地勘测员可以利用经纬仪画出两个可见点之间的直线并确定其确切位置，然后在几个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用一根66英尺长的测链丈量直线的长度——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勘测员往往需要披荆斩棘、砍断树木并在地上标注各段的长度。在勘测员完成基线的测量工作并画在自己的地图上后，他就可以开始记录其他地形特征以及给土地划分功能区：例如城镇、土地。土地勘测员才是移民定居点的真正规划者。他在地图和地上所画的线条变成了道路和边界，它们构成了“矩形的被子”，将森林和灌木丛分割成井井有条的网格——与英国中世纪殖民活动建立的乱七八糟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土地勘测员同时也是城镇设计者，他划出笔直的街道把土地等分，还会给勘测的地形挑选名字，有时旧地名被弃而不用，换成新的更气派的名字，有时则借用祖国的河流和山川的名字。

殖民地政府必须勘测领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除非勘测工作已经完成，否则土地买卖无法进行下去，因为自行安排勘测工作所需的费用会让有意向的买主望而却步。可是无论勘测工作进行得如何全面具体（更何况很多勘测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都不能保证移民一定能在此地顺利地生活。买下一块地皮之后，移民可能会发现它地处丛林之中、远离公路，要把行李搬来需要大费周折。而且他买下的地皮可能是沼泽或者酸性土质，要么就是布满岩石或者土壤稀薄，东安大略地区的土地往往如此。1820年被带到开普的那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迫不及待地遗弃了他们的农场。如果平整土地的进程缓慢或者费用高昂，农民可能不得不找其他的工作，例如去修公路或者运河。如果贸易没有形成，那么大张旗鼓兴建的城镇很可能会惨淡萧条。要是收成不好，农民可能会负债累累，甚至因此锒铛入狱；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加拿大的许多农民就沦落到了如此田地。邻居也可能非常不好相处。移民们大量饮酒、性别失衡、生活条件恶劣以及工作竞争激烈，这一切加剧了不稳定性。再加上种族和宗教的对立（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之间，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暴力行为屡见不鲜。

今天的新普利茅斯是一座怡人的城市，它坐落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拥有一座一流的博物馆。但是它的早期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1840年，一群西部地主和商人组建了普利茅斯公司，新普利茅斯就是公司的项目。这些人的动机很复杂。好些年前在此建立的新西兰公司的宗旨是从毛利人那里购买土地以在群岛上建立殖民地，普利茅斯公司中的一些人就与该公司有关系。新西兰公司的灵感来源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eld）那充满吸引力的人格（或许是病态的——他因诱拐一名15岁的女继承人而被判入狱三年）。韦克菲尔德认为殖民作为市场、供应者和资金消费者，是英国繁荣昌盛的必需条件，并称英国人是“天生的殖民者”。但是他也认为殖民地必须经过认真的规划才能保证它们不会退化为不能生产任何出口商品的消费社会。殖民地面临的危险是，如果地价太低廉，那么将不会有人给别人打工，人们都宁愿开辟一片小农场养活自己和家人。掌握资本的有钱人绝不会加入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农”社会，没有社会领导者，殖民地会陷入贫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合理的规划和价格。殖民地的建立必须经过仔细的规划，要有能够吸引富人前来的城镇和便利的设施。最重要的是，土地的价格要够高。那些买了地的人为了物有所值不得不努力经营：他们会有强大的动力去聘用劳工，尽力让土地高产。而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地的移民只能先打几年工才能攒够钱买自己的农场。劳动力和资金相互依存，就会创造利润、促进进步。

韦克菲尔德的想法对几个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承诺创建一个有序的世界，由有学识和有空闲的人来确定这个世界的基调。19世纪30年代，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原住民不为欧洲移民的贪婪和残忍所累，那些坚信只有有规划的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被韦克菲尔德构想下的世界吸引住了。这个有序的世界会给原住民保留土地，会有条不紊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适应商业。当然利他主义绝不是这个构想的中心所在，韦克菲尔德允许土地买主只要留在国内就能出租

或者出售土地以赚取可观的收益。通过从毛利人那里低价买入土地再将其转手出售，普利茅斯公司能够偿付劳动阶层移民的路费，移民定居点也就有了劳动力。

普利茅斯公司的创始人们赞同韦克菲尔德的构想，因为它听起来似乎可以解决德文和康沃尔部分地区的困境和贫穷问题。康沃尔大地主、公司董事之一的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积极地支持“殖民改革”，第一批到达康沃尔的移民中有一部分劳工就是由他招募来的。1840年11月，一艘租用的船只驶向新西兰，事实上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尚未确定。由于自己没有土地，普利茅斯公司从母公司新西兰公司那里买下了约5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土地勘测员弗雷德里克·加灵顿，被先行派往当地挑选的理想地点并为移民的到达做准备。1840年12月，加灵顿抵达了尼克尔森港（现称惠灵顿港）小镇，向新西兰公司代理人提出了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勘察了周围的海岸，寻找港口和可耕平原。新普利茅斯只是个折中的结果，它有许多优势：被库克命名为埃格蒙特山（现称塔拉纳基山）的锥形山峰周围有一片宽广平坦的土地。加灵顿登陆的舒格洛夫山附近，森林植被较为稀薄。当地没有几个毛利人，而他看见的那些原住民也是“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新西兰公司宣称已经购买了这块土地。尽管这里没有安全的登陆点，但是其他备选地点的可耕地又实在太少。于是加灵顿决定就选择了这里。

有很多工作要做。加灵顿协同手下寥寥数个劳工开始点燃蕨类植物、平整土地。要种好农作物，也要使城镇初具雏形。加灵顿聚集了毛利居民，要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土地现在属于他了。“然后我在地上画好方格，”他在日志中写道，“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保留地的价值，他们为之雀跃。”加灵顿凝视着森林，畅想着木材能带来的巨大利润。3月20日，第一批移民到达，新普利茅斯就此建立了。

但是没过多久就出问题了。加灵顿一到尼克尔森港就雇用了一个叫巴雷特的流浪汉。此人原本是罗瑟希德人，在渡过塔斯曼海之前，他在澳大利亚住了几年：新西兰与新南威尔士隔海相望。他以捕鲸为生，在塔拉纳基成了家，接着他给新西兰公司当总管和翻译。加灵顿希望巴雷特能在他与新普利茅斯地区的毛利人之间充当中间人，但是巴雷特突然宣称公司土地的一大部分其实是他和他的（毛利族）孩子们的。或许是在巴雷特的煽动下，其他毛利人也纷纷开始抱怨他们从来都没有把土地出售给新西兰公司——正是新西兰公司把这片土地卖给了普利茅斯公司。加灵顿后来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完全是公平合理的。同时公司在此地的前景堪忧：没有港口是个大问题，所有的物件都不得不用公司的捕鲸船运上海岸——既耗时又费钱。没有几艘船愿意到这里来。公司派驻新普利茅斯的代理人满腹牢骚：“我们与世隔绝，除非走运，否则跟哪里都无法联系。”加灵顿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声称塔拉纳基是“这个国家的花园”、“大粮仓”。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想要很快五谷丰登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拯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地区经济的绵羊饲养业在塔拉纳基山的灌木层地区并不可行。于是他们平整出来的土地没什么希望成为能赢利的农场，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群殖民者对公司

来说是个无底洞，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普利茅斯公司资源更是雪上加霜。一年还没到，普利茅斯公司的银行家们就倒闭了，被迫并入新西兰公司，而新西兰公司显然并不是很关心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生存问题。

当时的形势看不到一点好转的迹象。英国政府1840年吞并了新西兰，但在英国政府眼里白人殖民者仅仅是群讨厌的人——他们可能煽动毛利人、引起殖民战争，这势必让英国政府花费巨大。伦敦的解决方案是严格限制移民购买土地。新西兰公司对这片土地的权利要求遭到政府质疑，被翻来覆去地审查，有几次甚至直接被否定。对于急于购买土地的移民而言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加灵顿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供应新开发的土地，就不会有人来新西兰，而已经来了的人也会离开。还有更糟糕的：新普利茅斯在怀塔拉河沿岸最好的土地遭到了激烈的抢夺，毛利人口开始急速上升。移民们发现之前之所以在此地见不到原住民只是个误会，仅仅是毛利人19世纪20～30年代的“火枪战争”导致的暂时假象。当时火枪流入毛利人手中，有枪的部落对其周边部落和仇家具有了短暂但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战争结束之后，被俘虏的当地人纷纷回归，他们自然就会要回自己的土地。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移民与毛利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英国国内对新普利茅斯的兴趣开始下降。普利茅斯的董事们悲叹：如果没有信件寄回国宣扬殖民地的各种美好（出版了一册宣传书，里面满是对殖民地令人生疑的赞美之词，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怎么能指望吸引到更多的移民？普利茅斯公司代理人警告说：除非有钱人加入，否则公司不得不承担雇用所有移民劳工的费用。而如果付给劳工的工资不够高，劳工会离开新普利茅斯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待遇。一切工作将因此停滞，包括勘测土地和其他工作。

到了移民定居点建立的第三个年头，这个问题已经不再紧要，因为毛利人带来的压力更为迫切。“毛利人将事态升级为危机”，公司代理人愤怒地评价道，就算在“其他国家里原住民与移民也发生了争执”，也应该如此对待毛利人；应该有人把毛利首领蒂劳帕拉哈“抓起来”；但是没有陪审团能将其定罪。与此同时，殖民地里失业的工匠们要求公司给他们工作，并威胁要拉倒代理人的外廊、拆掉他的围栏。几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毛利人正在修建要塞。因为害怕毛利人的抵抗会使土地无法使用，甚至那些买了地的移民也拒绝付钱。普利茅斯公司最终无法让新普利茅斯赢利，移民定居点陷入了极不稳定的状态，而塔拉纳基地区进一步向着白种人与毛利人之间的冲突迈进。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需要驻戍部队和筑起碉堡来自保。1860年3月，第一次塔拉纳基战争爆发。由于战争和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移民所梦想的美好未来才在新普利茅斯和塔拉纳基得以逐渐实现。是铁路和冷藏技术扭转了败局。就像新西兰的其他地区一样，塔拉纳基的小农场主们通过将乳制品和肉销往英国国内消费者而发财致富。

适应

无论目的地是哪儿，移民都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环境。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好望角大概能算得上气候温和，即使如此，它们也给习惯于西北欧独特的农业环境的欧洲人的身体带来了挑战。北美东部茂密的森林是一片具有威胁性的荒野，熊、豹、狼肆虐横行。移民们用形形色色的手工工具如斧子、锯子、锤子、刀枪等对抗自然。树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还普遍相信降低森林覆盖率能使气候升温、缓解北美冬季的酷寒天气，但是清理林地是项极为艰苦的工作。当时有报道称，一个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辛苦劳作也仅能清理掉一英亩林地。一个移民辛苦劳作一辈子开垦出来的土地只够养活自己。那个时候既没有电锯，也没有能将树拉走或者切割成待售木料的机器。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奇异：树木不掉叶子却掉树皮，蜜蜂没有毒针，身上长袋子的哺乳动物，黑天鹅，白鹰。环境恶劣而残酷：澳大利亚的土壤贫瘠，无法留住水分，也缺少植物营养物和微量矿物质；雨季的气候多变。早期殖民者期盼能找到的大型内海最后只是个泡影：澳大利亚内陆不像美国中西部那样可以开垦出大量的农场，而是只有一片干旱贫瘠空荡荡的“不毛之地”。在新西兰，北岛的大部分地区森林密布，丘陵起伏的地形导致走海路比走陆路更方便，因此白人移民聚集的沿海据点之间的主要交通方式就是乘船。在南非，广袤的干旱台地高原截断了“往北的道路”，迫使迁徙的布尔人转向东部边境开始了与科萨人的冲突。



图4–3截至1860年新西兰的白种人移民定居点区域

当然，移民们蜂拥而入的土地并不是原始的处女地。在北美东部，原住民已经修整了林地以适应他们的农业需求。有的地方开阔的林地犹如公园，这是因为当地人会定时焚烧树林清理出场地以种植庄稼或吸引

大型动物前来。早期移民持续深入，在原住民腾出的农田边安家，部分地接受了原住民的饮食习惯。在新西兰，早期移民只要能找到草地养殖绵羊就能安居乐业（新普利茅斯缺点就在于没有草地）。有证据表明新西兰的草原大部分最先由公元1000年前后到达此地的毛利人清理出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澳大利亚：第一批白种人移民在这里继承的自然环境在过去的6万年中一直被人类不断改变。当他们在澳大利亚安下家，本土殖民者们（从东南亚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缩小了森林面积、定期焚烧草地以促进新草生长并吸引小型动物。“要不是有这道简单的工序，”一位早期探险者说，“澳大利亚只怕也跟新西兰和北美一样丛林密布了。”跟新西兰的毛利人一样，这些本土殖民者也将当地的大型动物赶尽杀绝了。结果便是留下了让那些擅自占地的人欣喜若狂的一望无垠的牧场，以及肥美的青草世界，欧洲的绵羊在此到处乱跑而不用受肉食动物的威胁，也不用担心有其他食草性动物与它们抢食。

但是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移民们并不打算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打算是将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带到殖民地来。这样一来，当地的生态环境往往成为受害者，结局大多很悲惨。欧洲人在美洲森林中放养牛和猪，这些牲畜充当了“先锋队”的作用，毁坏了本土人的农田和猎场。由于地价低廉而劳动力昂贵，移民们根本不打算高效地利用土地。流行的做法不是彻底清除掉森林，而是简单粗糙地点火焚烧，然后就在树桩之间的土地上播种。农民尽可能多地收获农作物，接着便彻底遗弃耕地，再到下一个地方去找新地，留下被毁坏的土地和满目疮痍的景象。在澳大利亚，欧洲人带来的牲口迅速把松散脆弱的表层土压实了，原生草类被踩死，地面因此而变得光秃秃的。令第一批欧洲旅行者惊叹的自然草地不到6年就不见了，于是移民只能赶着牲口群另寻出路。在新西兰，移民的急躁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据说移民的主要工具就是一盒火柴。他们直接将森林付之一炬，再把草种撒入灰烬以形成新牧场。他们把绵羊赶来控制灌木丛的生长——这种方法被称为“碾蕨”。羊蹄、松散土、丘陵地形、强风和大雨共同造成了大规模侵蚀，直到20世纪才得到检测和修复。移民决意改变地貌，使之成为他们熟悉的风景。到了19世纪，他们已经开始以工业级规模大张旗鼓地开展这项工作：新西兰的一大片土地被种上了欧洲草类；在澳大利亚，移民很快就坚信本土植物和动物都是无用的，需要从更丰富的环境中引进物种。“环境适应学会”趁势引入鸣禽、花卉、装饰性灌木和树木，以及其他一大群被认为“有用的”物种，其中就包括后来泛滥成灾的兔子和骆驼。结果欧洲的植物和动物（更别说杂草和害虫了）成为甚至比欧洲移民更为成功的殖民者，尤其在那些一年到头都是生长季节和缺乏自然天敌的地区。英国游客在今天的新西兰可能会看到奇怪的标识：“危险!前有黑莓！”。这个警告并非虚张声势，因为黑莓生长得如此猖獗以至于羊会困死在黑莓丛中。一位自然主义的先驱称：黑莓是“可怕的步行者”，总是沿路生长。

大多数破坏作用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只有当破坏极为严重时才会暴露出来。移民社会倾向于忽视移民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定居给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危险。为了吸引钱和人，也就是更多的投资和

移民，保持“正面形象”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无限》在1906年是非常活跃的刊物。那些质疑它所提供的证据的人，或者像格里芬·泰勒那样指出澳大利亚干旱荒芜的恶劣条件的人，都变得不受欢迎：泰勒不久后就离开澳大利亚远走加拿大。另外，移民社会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长期性和独特性。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热衷于将加拿大描述为“一个北方国家，国民是健康、强壮、善良的北方种族的后裔”。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也编造出了类似的故事，将自己描绘为“更优秀的英国人”，比生活在大城市的英国人更健康、更强壮。随着移民定居点人口增加，早期移民所抱怨的千篇一律被各式各样的地方特色所取代。当地的景色变得有“个性”，也变得“美丽生动”。澳大利亚的灌木和加拿大的北部一样被认为充满了浪漫气息，是诸如“加拿大七杰”之类的艺术家们热爱的主题，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象征。

驱逐原住民

在一个新的国度建立“本地认同”（Local identity）必然包括丑陋的一面。英国移民社会一方面（面对国内的一方）表现得很开放，而对另一方面却很封闭。每当遭遇质疑他们土地所有权的原住民，他们的本能反应便是买下原住民的土地，然后将他们请走或者干脆把他们赶走，如果有必要，甚至将他们杀掉。在这些白人国家里，原住民没有立锥之地：最多就是分得一块小小的保留地，让他们慢慢地灭绝（他们的文化和肉体都难逃厄运）。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殖民者对待原住民的方式大有差异，但是原住民都被迫让步。到1914年，他们似乎成了白人占领历史中的注脚，只有新西兰不同，这里的毛利人顽强反抗，争取到了北岛高地，维持了一大块毛利人保留地以及关键的政治权利：在议会中给毛利人保留了4个席位。南非的情况又不一样。殖民者在这里（通过赶尽杀绝的方式）驱赶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桑人（又称布须曼人），但是对科萨人、祖鲁人和其他牧民（他们也种植粮食），这些策略则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且扎根于此。这一策略又对白人有用，因而白人也不愿意把他们完全驱赶出去。在这个发现金矿之前贫穷到无法吸引大规模欧洲移民（英国人的数量通常少于出生在当地的“荷兰人”）的国家，黑人的土地和黑人的劳力同等重要。因此驱逐的方式有所不同。南非的（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奴隶。他们生活在殖民者圈出的“定居点”，被迫用劳力换取生计，法律将他们从白人的南非隔离了出来。尽管四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从文化和道德上来说，他们就是隐形人——强权从心理上把他们排除了出去。

移民还深受外部威胁的困扰——亚洲移民的悄悄入侵。中国人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淘金热中到了澳大利亚，约10年后，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于是一些人又前往新西兰，其他人则渡过太平洋（或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到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先是奔向这里的金矿区，然后在19世纪80年代参加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该铁路横贯美洲大陆，从

东西海岸同时修建最后交汇于落基山脉。印度人被带到了纳塔尔，作为契约劳工在甘蔗园工作；1899~1902年英布战争（又称南非战争、布尔战争）之后，中国人被引入南非兰德金矿充当矿工。在这些地区，白人移民社区的敌意越来越深。白人劳工疑心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会拉低他们的工资、抢夺他们的饭碗：在经济萧条期，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这种恐惧感不断加剧。白人东家厌恶印度人的竞争。此外，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助长了这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到19世纪末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们的国家建构逐渐强调道德和宗教改革、严格的社会规训和民主平等的重要性。外来者、“行事乖张者”、恶棍和无用之人，以及为拓荒生活所抛弃的人，都受到排斥。现代社会要求秩序和进步。显而易见，在这个新的社会阶段，中国人或者印度人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侵入者，他们会对道德凝聚力产生威胁，也会提醒白种人自己粗野、残暴的过去。所以到了1914年，通过了将中国人和印度人驱逐出白人澳大利亚、白人新西兰、白人加拿大和（颇具讽刺意义的）白人南非的法律。

移民是个辛苦的过程，充满了疑虑和不确定性。迁徙有时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但也只不过是个开端。争取土地所有权、开垦土地、改造地貌、定居、驱逐一切敌人，这一切都是艰难的工作：举棋不定会导致高昂的代价，猜测怀疑可能造成满盘皆输。移民社会残酷的种族歧视不过出于恐惧、焦虑和自负，它反映了移民承受的无情压力——一旦定居点陷入萧条、实验失败，那么他们必须不断地继续搬迁。“没有人口，就要灭亡”成了某个移民社会的政治口号。作为民粹主义的座右铭，它适用于所有的移民社会。



殖民战争

1902年12月，伦敦的战争部（负责管理军队的部门）列出了一份《1857~1899年》——即19世纪下半叶两场大战（1854~1856年的克

里米亚战争和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期间的“英国主要战争”清单。根据这张清单，英国参与的战争共有15场，不过其中一些战争包括了好几场战役，而且正如清单的名字所暗示的，在那些规模较小的冲突（例如在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南非的东开普地区以及1870年的加拿大西部）中，如果英国投入的军队人数低于3 000～4 000，则完全被忽略不计。即使如此，这张表格仍然显示了英国在那40多年中军事行动所涉足的范围之广是多么的令人咋舌：1856～1857年在波斯、1857～1859年在印度（印度民族起义）、1858～1860年在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1866年在新西兰、1867～1868年在埃塞俄比亚、1873～1874年在西非（阿散蒂战争）、1878～1880年在阿富汗（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9年在祖鲁地区、1880～1881年在德兰士瓦（第一次布尔战争）、1882年在埃及、1884～1885年在苏丹、1885～1886年在缅甸、1895年在吉德拉尔（位于印度的西北边界）、与马塔贝列人（1896年发生于今津巴布韦境内的马绍那兰战争）、1897～1898年在蒂拉赫（也在印度西北边界）以及1896～1898年的第二次苏丹战争。如果我们把自1600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南美、中东、南非和西非、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参加的所有殖民战争都加入这张清单，人们很容易形成英国人是用别人和自己的鲜血换来帝国的成就这一印象。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上述观点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事实上，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在英国扩张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北美大陆上，移民定居点要发展就不得不时常与美洲原住民人发生摩擦，有的时候是直接用武力对抗他们，有的时候是与法国和西班牙发生冲突使原住民人间接受累。1759～1760年，英国人征服了新法兰西，与原住民之间的摩擦也达到了高潮。英属加勒比海地区领地的扩大是通过与其他殖民者展开竞争、镇压零散的原住民以及反叛或逃跑的奴隶而达成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人的对手众多，情况也各不相同，于是诉诸武力来扩张移民定居点的范围并压制抵抗成了自然的选择。在南非，英国人跟东开普和纳塔尔的恩古尼人打了100年，并在今津巴布韦展开征服并建立了一个国家。发生于1899～1902年间的布尔战争目的是为了打破阿非利卡人（即布尔人）政权的权力，阿非利卡人的政权被纳入了战后成立的南非联邦，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英国殖民地当局享受到了军事胜利带来的红利：西非的阿散蒂人和约鲁巴人，东非的基库尤人、卢奥人和乌干达湖区的一众小国，全部被英国殖民者收入囊中。英国人在中国享受的众多特权以及在中国香港的据点是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1882年9月的泰勒凯比尔之战奠定了英国在中东的权力基础，也致使埃及和对它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于1882～1956年间一直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下。印度的情况也一样。在孟加拉的普拉西（1757年）和布克萨尔（1764年）、南印度的塞林伽巴丹（1799年）和阿索（1803年）、旁遮普的阿利沃和索布劳昂（1846年），英国人借助武力无情地（但远非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一切竞争对手，建立了自己的统治。1800年之前在印度的英国人超过了15万，控制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之一。

当然，英国扩张背后的暴力行动有些并不在帝国当局掌控之中，有些还是有悖掌权者的意愿。移民和商人、探险家和猎奇者、当地盟友和附庸绞尽脑汁利用殖民地当局的弱点或让其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影响殖民地官员的决策。强有力的总督们，例如南非的巴特尔·费里尔（Bartle Frere）和新西兰的乔治·格雷（George Grey），一边策划边境战争一边极力说服伦敦政府相信他们只是关心防御问题。大多数的暴力行动并不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发生在小冲突、袭击、报复行为和警察执法中——这种残酷、不间断、低强度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把本土居民赶走或接受奴役为止。有的时候是“白人”打“黑人”，但是更常见的是冲突的双方都有非欧洲人。在北美洲的英国人利用美洲原住民盟友与法国人（法国人也这么干）以及其他原住民争斗。非洲的英属白人部队往往规模很小，却配有由黑人盟友和随军流动的平民组成的庞大分遣队。1899~1902年间的英布战争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但即使在那时候，交战双方也都招募了非洲人参加作战或者承担诸如侦查、送信等非作战工作。东印度公司赖以征服印度的军队中大部分都是本土的印度兵，对他们而言，为公司效力的荣誉不亚于为任何印度统治者效力。欧裔新西兰人对抵抗的毛利人的进攻主要依靠所谓的库帕帕，即投靠政府以寻求好处的毛利部族。

殖民战争并不只有同一种形式。对国内的英国人来说，最昂贵的战争是与欧洲竞争者之间的，这些战争有时是欧洲某场重大战争的附带事件；而最普通的殖民战争形式则是更为局部的冲突，正如那些出现在战争部清单上的战争。这些局部冲突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其中有些可以被归为直接的征服战，对原住民国家政权（例如祖鲁兰、缅甸、苏丹马赫迪王国）或者对未建国民族（例如基库尤人或毛利人）的战争都属于此类。但是通常情况要模棱两可得多。往往某个地区在被征服很久之后才爆发暴力冲突，暴露出征服的不彻底。只有当名义上的统治转变为真正的干涉，或者移民开始占据土地，被征服的民族才会奋起反抗。因此殖民战争不光是为了征服，也可能是为了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就属于此类。这些殖民战争中交战双方目的迥异：英国人是为了掌控、遏制或者巩固未被彻底征服的地区；当地人则是为了在丧失独立之后尽可能地留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治权。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冲突有可能升级为种族灭绝：尽管英国殖民者本意并非如此，但19世纪的塔斯马尼亚就遭受了这种结局。殖民战争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在英国人看来，最具危险性的冲突是与白种移民的交战，因为对方往往装备精良、组织严密、情报完善——这一点不仅是对于英国军事弱项的情报而言。尽管在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美洲移民从英国的欧洲对手那里获得了关键援助，但是反抗者的持久力和战斗力其实远远超过了英国派去镇压他们的军队。英方出动了一万正规军和忠实的英裔加拿大人民兵组织才镇压了1837~1838年法裔加拿大人起义。1899~1902年与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战争将英国军事力量逼到了极限——暴露了英军明显的缺陷，继而引起了英国人广泛的焦虑。

无论战争是否发生在局部地区，都需要两方（或多方）拿起武器而

非寻求和平、屈服投降或放弃作战目的。通常我们可以说这种有组织性的暴力行为似乎是可接受的风险，只要具备两个大条件：1.势均力敌，双方都有战胜的机会；2.“和平”这个看起来更具有威胁性的选项。当然，事实是，战争从来都没有这么简单，错综复杂的因素都会影响决策。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情报，只有在掌握情报的条件下才能判断风险的大小。一方或双方所能掌握的情报数量可能有限、令人误解或者已经过时，也有可能情报的提供人动机不纯，或者理解能力不够。情报的来源和传递都会让情报产生偏差。然后统治者和将军或地位较低的参与者需要拿着情报去找专家解读，这些专家顾问也同样重要。然而未明说的设想、个人的目标、无知或偏见会影响专家提供的建议和评估。第三，决策是在“哪里”敲定也会对战争的爆发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当地没有强大的中央或缺乏有力的控制，在某个地区擅自开展军事行动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一场小混战（吉卜林称之为“边境站的小战斗”）、一次“全力追击”、一个挑衅的姿势都可能点燃爆炸性事件。就算是最老练的政府也要（现在仍然如此）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危险，以免遭受其累。在殖民条件下，这些危险所带来风险必定很高。

外交之外的关系

引发矛盾的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不同地区所遵从的外交行为准则以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即为何应当如此行事。从外交上讲，欧洲是一个拥有独特习惯的特殊世界。第一，自从文艺复兴甚至更早的时候，欧洲各国就互派常驻大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俏皮话说得好：“派人去国外为自己的国家撒谎。”这些大使中的佼佼者们往国内送回一系列报告：威尼斯大使留下的对英国事务的详细记载对后来的史学家们来说一直是宝贵的历史资源。第二，共享的外交程序协定（包括语言和礼仪的细小变更）提供了一个敏感信号的范围，通过这些信号，两国得以掌握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动。第三，从17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国就已经认可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享受主权：国内事务不容它国干涉，各国作为独立的自治单位存在。

当然，这些不足以限制统治者和专制君主的野心，无法阻止1772~1795年波兰（欧洲最大国之一）遭到三次瓜分的命运，也不能维持欧洲和平。欧洲体系的最大优点在于有不间断的情报流动，在于和平时期有针对外国人境遇的规范，也在于大多数国家中央可以严格控制外部关系。到了18世纪中期或者更早，欧洲人越发将这种地区模式视为理想模式，认为其他人（非欧洲人）的行为是与之相悖的行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国界、有效控制自己国界内的地域、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以及采用“文明的”治安和刑罚手段，这些成了某个国家是否有权与欧洲国家平起平坐的判断标准。可以预见，世界上许多统治者都因为这条标准而落入了“野蛮”一类。这并不会妨碍欧洲国家和这些“野蛮”国家签订条约达成共同利益，或者如1815年后非洲的情况一样，获取当地政府支持废

除奴隶贸易，但它的确意味着欧洲国家是否尊重这些国家的领土、独立甚至财产得依据他们是否有“良好表现”或是否愿意接受贸易而定。“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对西非情况谨慎地评价，“不应该用大炮强制推行贸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没有安全的保障贸易就不可能蓬勃发展，而没有武力保护就不可能维持安全。”他继续说：“占领拉各斯或许能成为压制奴隶贸易和推行合法商业的有效和重要步骤。”正如我们所见，拉各斯就这么被吞并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非洲统治者主权的认可不是建立在合法权利基础之上，而是看它是否能给自己提供方便。

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野蛮类别”的适用度也是有限的。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中国的形象完全与野蛮相反。因为中国生产的奢侈商品深受欧洲人推崇，中国又怎么可能是野蛮的呢？有些评论员甚至拿理性的“士大夫官员”的有序统治与欧洲贵族相比较。中国的问题在于其统治者的世界观中对英国（和欧洲）的定位令人难以接受地低下。1793年伦敦政府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马嘎尔尼勋爵派往中国说服清朝皇帝同意英国在华设置常驻大使馆。马嘎尔尼一到北京就惊恐地发现面圣的礼节需要他双膝及地行“九叩”大礼，跪拜之时额头要触地，也就是“叩头”。在与中国官员愤怒地讨论过后，中方让了步：允许马嘎尔尼仅单膝及地，就我们所知，他最终逃过了行九叩之礼。但是观点的差异不仅在于跪拜之礼。马嘎尔尼努力争取在华设常驻大使馆：“我告诉他（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欧洲主权国家通常会派外交官常驻彼此宫廷，目的是为了增进两国间的友谊以及避免误解。”但是他却被告知“中国从来不这么做，它也从来不往哪个国家派遣大使”，而且只允许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逗留40天。这种轻蔑的应答部分体现了中方井然有序的世界观。中国人对欧洲有所了解，并对当时有关法国的消息大为警惕。[1]但是他们把欧洲人看作“外夷”，对这些远居海外的民族所知甚少且关注得更少。他们的文明世界（即东亚）由承认中国为“中央之国”的至高地位的朝贡国组成，这些附庸国承认中国统治者的“天子”地位。中国人宁可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与欧洲进行贸易交往，也不愿意发展互惠友谊关系。自18世纪早期以来，中国施行的统治系统要求所有外国商人只能去一个贸易口岸（位于广东），在被官方许可的商人集团——商栈做生意，商栈全部设置在江中的一个小岛上，当贸易季节结束时所有外商都要离开。

马嘎尔尼本人告诫不能进攻中国，他将中国比喻为“一艘古老的、疯狂的……战舰”。如果中国衰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可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尤其会受沙俄扩张的冲击。然而约40年后，不稳定的英中关系开始破裂。随着中国放开贸易（东印度公司于1833年丧失了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官方垄断许可），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涌入中国贩卖鸦片——在中国绝对不愁销路的外国商品。当中国当局禁止鸦片进口，接着于1839年4月查封并销毁了商人的存货，英国人驾着战舰进行了反击。但是双方之间无法弥合的文化冲突以及商人反对禁烟而进行的游说活动导致了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入侵中国。“我们已经给了中国人一次惩戒性的教训，”帕默斯顿几年后写到，“除非他们打算把我们当同等的伙伴，否则我们必须将他们的其他任

何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平等的追求却导致了“不平等条约”，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就是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在一系列通商口岸免受中国司法管辖，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还规定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关税最低仅为5%。在那个世纪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的存在以及他们无休止地扩大商业和传教活动的努力不仅造成地方性摩擦不断，同时也成为后两次战争的根本原因。[2]然而英国人抵抗住了瓜分中国或征服中国的诱惑，伦敦的观点是：“一个印度就够了。”或许也如著名国际律师马滕斯（F. F. Martens）所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悠长，不适合殖民式征服。于是英国人转而寄希望于改革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制，强行打开中国门户，建设铁路、发展贸易。中国的主权地位或许惨遭打击，但是英国并不希望它就此灭亡，即使需要在英国的托管之下。这与印度的情况是不同的。

英国人在公元1600年之后作为商人而不是征服者前往印度。作为商人，他们需要讨得地方政府的欢心——主要是德里的莫卧儿皇帝的欢心。无论私底下怀着什么情绪，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在表面上都得小心翼翼地顺从皇帝。当受到皇帝召见，他们身着莫卧儿朝臣的服饰以表明自己是“他的”人。东印度公司在1700年前有过一次挑衅皇帝权威的行为，结局很是凄惨：1688~1689年东印度公司发动战争，派出军事力量想要加强它在印度的地位，结果导致它在苏拉特的商栈被关闭，孟买也被封锁了，公司只能接受皇帝提出的条件以求得和解。1757年，克莱武能在孟加拉普拉西战役中获胜是因为莫卧儿王朝权势衰退，而且有该省伊斯兰教教徒总督的配合。但是即使他取得了普拉西大捷并在后来的布克萨尔战役中再次凯旋，克莱武仍然不愿意改变公司的从属地位、否认莫卧儿王朝的君主地位，他强调这样的举动会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怀疑。国内的政治家也担忧公司的过度扩张会让它破产[继而对伦敦金融城产生巨大的（间接但必然的）“撞击”效应]。1784年的《印度法案》就是为了控制公司在印度政府的权力，它严厉地声明：“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扩大自治领与国家的愿望、荣誉和政策背道而驰。”面对其他强有力的“莫卧儿王朝继承者”（如海得拉巴、迈索尔和马拉塔联盟），公司的政策是维持“均势”。但是随着拿破仑的崛起，一切都改变了：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法国可能给英国的宿敌、迈索尔统治者蒂普苏丹提供援助。英国人决意要建立对抗蒂普苏丹的联盟。总督韦尔斯利勋爵（后来的威灵顿公爵亚瑟的哥哥）拒绝接受任何支持扩张的建议，反而坚持公司的唯一目标是阻止外国势力的入侵（或许只不过是以50步笑百步罢了）。迈索尔遭到攻击，蒂普在1799年首都保卫战中阵亡。法国的威胁解除了（法军被赶出了埃及），但是印度仍然没有平静。

英军在迈索尔的胜利反而加剧了马拉塔联盟与公司之间的仇恨，双方都在力争对莫卧儿皇帝的控制权。德里的莫卧儿傀儡皇帝虽然名存实亡，却仍深受“印度各个阶层人民，尤其是……伊斯兰教教徒的尊敬”。英国人害怕马拉地人、锡克教教徒（旁遮普是另一个继承国家）和北印度的其他好战民族会联合成新的联盟对抗他们。结果便是印度中部和北部战乱频发，直到1818年最后一战中马拉塔战败（旁遮普锡克教徒的独

立状态一直苟延残喘到1849年）。此时英国人才开始认为自己在印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可以册立或废黜印度统治者。但是他们仍然小心谨慎，从不公开否认自己在印度的地位来自莫卧儿皇帝颁给公司的特许令。当“德里的国王”（现在英国人对他的称呼）派遣伟大的智者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作为使者前往伦敦抱怨公司的各种行径，可以想象情形有多么尴尬。一直到1835年公司的钱币上还印着莫卧儿皇帝的头像。1857年印度大起义造成的冲击最终把主权问题提上了日程。最后一任皇帝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与起义有牵连，他试图造反，于是被流放缅甸，于1862年病逝。1858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废除了公司统治，扫清了一切不确定性，它规定：“印度应该在女王的统治之下。”英女王此时成了印度的君主。

因此英国人在印度的政策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出于审慎，他们保留了老一套政府机构的绝大多数部门，即使他们对政府收入系统的压榨程度要高得多。他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咨询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学者。尽管许多英国官员都是坚定的福音派信徒，但是东印度公司统治期间对所有的宗教信仰小心翼翼地持了中立态度。在一系列的征服战争中，他们努力把自己塑造为迫切地索求莫卧儿皇帝的青睐的国家势力之一，而不是外国入侵者。借助这些方式，他们谨慎地把印度当作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野蛮地区来对待。但是他们的考虑还有另外一面。随着统治的巩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是英国统治把印度从混乱之中解救了出来。他们不停地强调那些印度社会中欧洲人难以接受的特征。东印度公司总是将扩张的理由粉饰为不得已的自卫，而扩张背后的动机显然并非如此——从扩张战争中，公司的员工能大赚一笔。东印度公司军队里的军官们搜刮抢掠，公司官员则将收入投资于急于寻求官方靠山以对抗印度债权人的“贸易行”。有个著名的事件：一次，马德拉斯总督拒绝派遣军队去收回公司官员们私下借给阿尔科特统治者的债务，官员们勃然大怒，竟然发动政变把总督扔进了监狱（后来他死在狱中）。在帝国的这个边境前沿，私利和公利往往难以区分。

如果某个时期或地区里移民人数众多，这种“非官方”扩张要比官方推行的扩张所带来的战争风险要难处理得多。在中国和印度，英国人相对稀少，官方的控制力相当强大，当地的抵抗也很强烈。但是还有许多地区的情况与中国和印度不同。第一批抵达新英格兰的移民目无法纪。当清教徒前辈移民们在一个叫迈尔斯·斯坦迪什（Myles Standish）的职业军人带领下登陆时，他们擅自从一个印第安人粮仓中搬取粮食（他们称之为“上天赐予的发现”），几周后又回来再拿了些，并洗劫了印第安人的坟墓和茅屋。恐惧和饥饿造成移民们草木皆兵，再加上对周围的印第安人所知甚少，移民们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对这些没有伤害过他们的原住民采取野蛮的报复行动。没有几个移民有时间或兴趣研究他们的原住民邻居：除了少数几个中间人（通常是商人或者传教士）之外，移民对原住民的价值观、信仰、兴趣和忧虑一无所知，而中间人的观点还往往不被信任。由于没有什么重大事件颠覆他们的世界观，移民社群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偏见，并带着这些偏见对待原住民。相反，出于个人利益，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保留这些偏见，并且在

必要的时候用暴力将其表达出来。对于绝大多数移民社群来说，新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于获得土地。粗糙的农耕方式、经济较富裕的移民对土地投机的热衷、人口的压力造成移民不惜一切代价无止境的扩张。对土地短缺的担忧会赶跑资金，从而使殖民地陷入停滞。所以殖民地绝不敢缺少土地，这导致了殖民者从原住民手中购买（或夺取）土地时通常采用强制性、攻击性或威胁性行为。边境地区要么没有法庭，要么法庭机能不全，无法解决争端使双方都满意，这意味着细小的违法行为（例如偷窃或侵入）轻易就能上升为局部或地区性暴力冲突。双方的报复行为致使彼此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往往要等到原住民彻底放弃抵抗（有时还要更久之后）才能消停。

结果便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在移民遇到原住民的绝大多数地区，“边境战争”是少不了的。1675~1676年的菲利普国王之战（也称为梅塔卡姆战争）中，尽管魁北克的法国人给阿贝内基族提供援助，新英格兰的白种人仍然攻破了该地阿冈昆人民的抵抗，不过英国人的北部边境直到1760年才平静下来。1715~1716年的雅玛西战争发生于南卡罗来纳（白种人在这里鼓励印第安部落互相奴役彼此）；1712~1713年北卡罗来纳对抗塔斯卡洛拉族的战争为白种移民清理出了广大的土地，大量印第安人被血腥屠杀或奴役。在南非，英国人接着与开普北部干旱地区的桑人以及东边的科萨人展开持久战。对于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来说，带着武器、牛群和羊群到来的布尔人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动植物会遭到损害，本来就稀少的水源会更加紧缺。所以桑人的抵抗极其顽强而且致命。与科萨人社群的冲突原因不同，由于布尔人和科萨人都要养牛，所以双方必须争夺草场。18世纪70年代晚期他们狭路相逢，双方长期就放牧权发生争执，牲口盗窃时有发生，报复行动也随之而来。双方对于“边境”（此处指双方都能随便闯入的地带，而不是经过协议划定的边境）都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想要调停难上加难。布尔人因为位于开普敦的殖民地政府不能给他们提供支援而愤怒地宣布独立。直到近一个世纪后战争正式打响之前伦敦政府也不愿意准备资源（经济或军事资源）发动全面征服战。

在遥远的澳大利亚，几乎也是同样的模式。如我们前文所说，这里的英国入侵者直接否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在最初的近50年里，对澳大利亚的入侵基本限于滩头堡，仅仅在近海地区占据了相对较小的地区。原住民撤往内地，发生的种族冲突不多。可是在这个阶段晚期，由于绵羊饲养业蓬勃发展，为了寻找新的草场，白种人掀起了往内地搬迁的热潮。和其他采集狩猎民族一样，澳大利亚原住民也面临着野生动植物消亡以及水源不足的威胁，于是他们采取了游击式的抵抗：偷窃、杀死绵羊，赶跑或谋杀牧羊人。白种人则以血腥暴力镇压作为应对。1837年在新南威尔士的麦奥溪，约25名原住民人被残忍地谋杀，殖民地当局对参与这次屠杀的几个白种人处以绞刑。这件事造成的部分结果是此后大多数边境暴行被干脆隐瞒。19世纪30年代晚期，白种人开始迁往维多利亚东南部树木繁茂且风景宜人的吉布斯兰德。不久后他们就与科奈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攻击。很快，更黑暗的事情发生了：1843年在沃里戈尔溪白种人包围并杀害了150名科奈人，其中包

括妇女和儿童。从那时起到1860年止，几次屠杀后科奈人口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些年证据才浮出水面。

但是如果由此觉得移民们能够为所欲为、随便地击败原住民，那就大错特错了。移民的武器并不总是更精良：通常在白种人大规模到来之前，原住民很不幸地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来）做交易，他们来不及在白种人逼近之前准备好枪支。但是在美洲、新西兰和黑非洲的许多地区可以购买到枪支，当地人也的确在白人势力壮大起来之前便使用了火枪战术。定居点中由农民或商人组成的民兵组织显然不可能在森林或灌木中如履平地地作战，而且他们往往缺乏纪律性，不愿意牺牲，也不情愿离家太久。就算是精于枪战和马上作战的布尔突击队在与科萨人和桑人的战争中也是输赢各半。此外，干旱的北部内陆以及开普东部边境上的浓密灌木也让白种人头痛不已。白人的武器、机动性和防御车阵只有在南非高原一马平川的草地上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与祖鲁人或在德兰士瓦东部的群山及灌木中与佩迪人交战时则用处不大。当然移民也不是完全的“孤立无援”，他们不仅有隐形的盟友——疾病，还有原住民民族内部分裂的问题。或许正是面对顽强的敌手所遭受的挫折致使得边境战争如此激烈。战场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彻底消灭了对方，或者是，例如南非的情况中完全奴役了对方才算是。后来20世纪欧洲常见的恐怖行动、暴行和“总体战”等由此可见端倪。

小型战争：如何排兵布阵

本土的英国人无法忽视这些殖民战争，在当时的道德高尚的人们看来，这些战争是肮脏和令人厌恶的。事实上，在1815年之前，在主流观点看来，英国的扩张和繁荣完全依赖于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实力。在各国商业势力——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竞争激烈的年代里，“军事实力”和“繁荣”紧密相连。重商主义并不赞成自由贸易，而是主张处心积虑地将外国人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剔除出去。英国人迫切地希望打入竞争对手的商业帝国，尤其是打入西班牙从佛罗里达延伸至合恩角（西班牙的加利福尼亚殖民地还得等到18世纪70年代才建成）的广大美洲疆域。他们也害怕如果不采用侵略性的扩张政策，自己的贸易范围就会被对手包围起来、阻碍发展或者干脆丢了地盘。因此只要欧洲局势紧张，各国就忍不住去海外搜刮战利品。这里英国人可以倚仗从1700年开始就已经奠定的称霸于海上的军事实力来弥补陆军的弱势，并（对于需要依靠议会支持的政府而言尤其重要的是）争取爱国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的支持。

出于各种原因，英国军队被派往遥远的海外。加勒比海地区频遭刀兵之灾，因为“糖岛”是殖民地财富最主要的来源。1655年，克伦威尔派遣了一支军队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牙买加。1741年，一支远征军前往攻占西班牙的重要基地卡塔赫纳，结果英军惨败，一万士兵有80%病死。

为了守卫北美殖民地，英国人急于攻占魁北克。法军将魁北克的堡垒建立在峭壁之上，固若金汤，法国人可以在此从容地把守圣劳伦斯以及通往北美内陆的水路入口。1711年，一支超过12 000人的远征军受命抢占此地，结果令人尴尬地失败了：在入河口处由于一场暴风雨损失了几艘战舰，指挥官们斗志尽失，仓皇地放弃了远征。英国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要走运些，新英格兰的4 000殖民地民兵于1745年6月攻下了据守圣劳伦斯湾的路易斯堡——不过《亚琛和约》的签订让英国不得不将其交还。与此同时在印度，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争相寻找盟友、努力破坏对方的贸易。1746年法国人攻占了马德拉斯，英国人随后收复了马德拉斯，但是和平仍然可望而不可即，1754年第一批英国军队被派往印度（在此之前公司一直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加上1748年英国国内出现的诸多“独立公司”和伦敦政府派遣的海军中队的支援）。

1756年七年战争的爆发是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50年里，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印度的殖民战役不再是附带事件，而是英国人为了帝国的生死存亡而进行的世界性战争。事实上，从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其他发生于1793~1815年之间的战争中，确实可以看出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地区的斗争对于保卫英国至关重要，所以往往是从经济上和战略上两方面对抗欧洲敌国。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与拿破仑的长期消耗战中英国取得了两次重大胜利：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大捷以及1815年反法联军在陆上获得的伟大胜利。[3]这一切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海上霸权加上战后的欧洲均势使得英国不用再同18世纪一样时时警惕秉持重商主义的竞争对手。当然英国人还是密切关注法国和俄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意图，担心他们会攫取通往印度的陆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沙皇的军队向里海东边行进，从此英国人对沙俄通往印度的计划严阵以待。但是在世界广大范围内，英国人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正如维多利亚时期一位经历丰富的旅行者所说，仿佛“大海是英国的”。他们大多采取“小包便士”战术将军队化整为零——殖民地小型卫戍部队每次出战只有几星期或几个月时间。他们把远征军派往中国、埃塞俄比亚、西非和埃及，信心满满地认为他们只会面对局部抵抗。在那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大有理由确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只需要投入小规模军队作战，而且战争耗时不会长、耗费相对低廉。

最大的例外是印度。从军事的角度说，印度是兼具债务和资产属性的奇异混合体。到了1840年，东印度公司已经有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最现代的。但是公司也从国内军队招募了两万军人来印度（1847年超过三万人）作为倚仗。印军叛变—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核心，改变了这种军队配备状态：英国不得不派了9万英军恢复英国统治。等到尘埃落定，英国决定削减一半印度兵，而英军卫戍部队人数则扩增到了叛变前的三倍。自此英国兵与印度兵的人数比为1：2，任何叛变迹象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其中一半的英军作为保卫苏伊士以东英帝国属地的战略储备。此举的主要优点就是可以用印度纳税人的钱供养英军，因为印度能支付一切日常开销，最大的缺点则是需要不断输送新人补充人员损耗，因为印度的死亡率仍然奇高。军队剩下的人怨声载道。

大体上1860年之后英国裁掉了超过30万的常备军，其中2/3是印度人或者驻扎在印度的士兵。英国打算保留剩余兵力的一半左右在本土进行训练，密切监视爱尔兰的动态或用以应对欧洲可能发生的紧张局面，其他士兵则被遣往殖民地。英军的基本组织方式是“营”，每个营有30名军官及约900名士兵，既可充作卫戍部队，也能赴海外作战。不设置参谋部，每当需要组织远征军时，指挥官会从自己的圈子里或从有事业心的申请者中挑选中意的人选。由于要去欧洲以外的战场参战，所以指挥官最关心的问题是运输和后勤：得把部队送过去并保证军需供给。在1850年以前，绝大多数高级军官年轻时都参加了1793~1815年间所谓的“大战”，之后的高级军官大都具备在亚洲或者非洲或者与新西兰毛利人作战的经验。到达阵地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决定战斗目标和战术。欧洲战争的游戏规则非常直接，如果军队打了败仗，主权国就会投降并签订条约。但是跟欧洲以外的敌人作战却不能这么想当然。

陆军上校查尔斯·卡尔维尔（Charles　Callwell）189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小型战争：原则与实践》，他在书中归纳了三种不同的战争种类：镇压起义的战役、以征服和吞并为目的的战役以及“洗刷耻辱、报仇雪恨或打倒危险敌人的战役”。卡尔维尔承认小型战争的主要难点是战争条件的多样化，任何对小战争的总结都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遵循的原理。他指出，对于小规模战争来说，“对敌方士气的打击通常比获得战斗胜利重要得多”，而且“有时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会把目标限定在造成常规战争相关法律不会允许的破坏活动”——这个绝妙的措辞掩饰了英军在中国、阿散蒂和缅甸摧毁房屋和农田、洗劫宫殿的暴行。缺乏可靠的情报、在没有道路或铁路的地区要面临的交通问题，再加上疾病带来的威胁赋予了小型战争独特的性质。与现代常规部队之间的战事的不同之处是“小战争主要是与自然抗争”。后勤、情报和对打击敌方士气的追求（愤世嫉俗者会称之为“制造恐慌”）是制胜关键。

事实上在卡尔维尔之前英军就已经在殖民战争中运用他的策略。军事行动通过“纽带”——交通线作为作战单位和大本营的连接枢纽，提供军需补给，如果发生大规模灾难还能作为避难所得以指挥实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线。有时英军也会切断与本部的联系以获得更大的机动性，但是代价很可能非常高昂。要拖着行李搬运车拉着粮食、水和军火，缓慢行军会严重拖后腿，也会在战役中分散火力。英军最大的败仗之一发生在1880年7月阿富汗赫尔曼德谷附近的迈万德，当时一支印英部队采用的行军路线致使1　700多人被对手歼灭，这就是分散兵力的后果。有时为了出其不意地给予敌方致命的袭击，需要牺牲补给。这种策略既是着眼于军事，也注重心理因素。按照惠灵顿的描述：“敌军一露面我们就发动冲击，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卡尔维尔也认为：“对付亚洲军队的方式就应该是直接袭击，用绝对的士气破其斗志。”一次彻底的摧毁就能粉碎敌人的斗志，如果敌人不愿作战，那么英军的战斗目标便转为给对方造成名誉和财产上的最大损失：赶跑统治者、摧毁都城、抢掠一切可以被转移的财产。

但是（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战场并没有这么容易被掌握。从战

术的角度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优势火力（通常是英军所具备的优势）发挥作用。一般英军会列队行军以保证冲击力和速度的最大化，在需要发动最大火力的时候改列成行。这种战术的危险之处是一旦敌军攻势过猛就能冲破阵型，英军必定会溃不成军，就如1879年1月英军在伊桑德尔瓦纳的遭遇。另一种战术——方阵，有时更受欢迎。但这也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要把军队补给和交通工具保护在方阵中心，阵型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放大，防御能力会相应地大幅降低，围在阵中的牛群也会在枪林弹雨中大受惊吓；而如果不管补给和交通工具，敌军又能轻易地把它们掠走，会让英军很被动。方阵能有效地分散敌军火力，敌人无论在哪条边线上都无法投入太多兵力，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敌军集中火力猛攻任何一边，阵型都会被攻破。头脑冷静的敌军可能选择方阵的4个角作为突破口，因为此处与两边的联结最为薄弱。因此，如果敌方火力猛烈，采用方阵迎敌是非常危险的选择。战役指挥官必须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得失：地形、敌军的长处及装备、当地援军、包括白种移民或原住民队伍的忠诚度和士气采用的战术能起到的成效，毕竟指挥官至少需要依靠这些人搜集情报、侦察和参加小规模战斗。英军部队训练有素但数量有限，通常指挥官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有限的兵力发动奇袭、击溃敌军。

交战的另一方情况又如何呢？那些拼死抵抗英国入侵的民族需要时间备战。英军指挥官总是很心急：他们知道伦敦政府耐心有限而他们前途未卜。应对英军的最好战术就是非常规战争，消磨英军的斗志、推高他们的作战成本。但是没几个当地统治者能轻易实现这个战术，因为他们也担心自己的政权会受影响，毕竟非常规战争从本质上要求下放权力。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本土国家政权都经受不起战争的折腾，损失一次收成或者把一部分人从粮食生产中抽调出来都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补给跟不上，抵抗就无从说起。对于人口稀少的民族来说，战场上的人员损耗无法得到弥补：没有医疗条件，伤者也会很快死去。枪支通常还是有的，但往往型号老旧、效率低下，而且抵抗军还不能熟练操作。自从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开始使用速射步枪、笨重的加特林机关枪（当时人称“加特林一卡，地盘准垮”）被马克沁重机枪所代替、英军能有效地利用轻型野战炮（对绝大多数非洲军队来说，这种武器简直就是噩梦），双方火力的巨大差距便造成了伤亡情况的天差地别。1898年9月恩图曼一战中，基钦纳（Kitchener）指挥的英埃部队仅损失了48名士兵，而他的敌人马赫迪军则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所谓的“典型”殖民战争或许并不存在，我们也不应该想当然地断定英国人每次都能凭借士兵的训练有素和先进技术取得胜利。18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美洲用惨痛的代价明白了一队真枪实弹的英国军人也是可能在丛林中被一群“原始落后”的敌人消灭的。1755年7月，布拉多克（Braddock）带领英军试图攻占位于今匹茨堡的杜奎士尼堡，结果遭到印第安人伏击，伤亡惨重，1 200人的队伍死伤了2/3（布拉多克本人也没能逃过一死）。布拉多克惨败的原因包括：没有事先侦察、队伍排列太集中、没有先占领行军路线周边的高地。而英军在印度遭遇的反抗军队通常和他们一样兵强马壮。正是由于对补给的重视（惠灵顿的重要特

点，后来在欧洲派上了大用场），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才能够在战场上坚持得更久，直至把敌军拖垮。东印度公司的巨额收入帮助它支付购买职业军人装备所需的费用，榨干了18世纪晚期所有在印度的军队依赖的所谓“军事劳力动市场”。但是英国的胜利也是有着苛刻条件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叛军广受周边群众的支持，而当地英国的忠诚拥护者被剥夺财产、蓄意谋杀，生活在恐惧之中，英军因而独木难支。第二次英布战争（1899~1902年）中，布尔突击队员“游弋”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农场都可能被用作临时基地，英军对此头痛不已，于是残忍地血洗村庄或将平民集中控制。好在布尔军队规模极小，英国这才于1902年5月取得了不完全的胜利。英军也不是只在对抗欧洲敌军时才会畏缩。背靠阿富汗广大国土的印度西北边境就像个无底洞，英国人只能不停地往里填充兵力。英国分别于1838~1842年以及1878~1880年两次入侵阿富汗，先是出师不利，第二次出兵招致了对方的猛烈报复，最后不得不撤军。位于边境地区的阿富汗部落几乎能召集近50万战士，而且这里地形险恶，到处都是大山、深谷和隘路，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牵制策略：对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贿赂（或者叫“津贴”）、外交手段、周期性地进军以及惩戒式的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军事手册中对此评论道：“只要达到了惩戒目的，就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殖民战争的艺术在于明智地挑选敌手。

沃尔斯利将军

仔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三场战役，我们能更加详细地了解英国的殖民战争方式以及他们的敌人所尝试过的策略。这三场战役都发生在非洲，作战地形却有不同：浓密的森林、开阔的草原、沙漠和三角洲。每一场战役都证明了补给和交通的重要作用：其中两场是有意为之，一场则是无意中造成的。第三场战争是祖鲁战争，小型战争大师沃尔斯利（Wolseley）之所以没来得及赶到战场执行他的战术绝非偶然。沃尔斯利尖锐地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疯狂的行为，继续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行为”。与此相反，沃尔斯利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强加惩罚式的和平，永远地终结祖鲁的国家军事力量。

沃尔斯利因为1873~1874年的阿散蒂战争而名声大震。阿散蒂是一个西非国家，是今加纳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散蒂有一支组织良好的部队（一位参战的英国军官评价其“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白人在海岸上占据了几个破旧的堡垒，招致了阿散蒂统治者们的（阿散蒂土王）憎恨；英国人给芳蒂部落提供庇护，阿散蒂土王不时强调自己对芳蒂的统治权。在双方的不断冲突中，最血腥的一幕发生了：当时的英国总督出兵进攻阿散蒂，结果被盟友背弃——总督和手下的25名白人军官被斩首。因此当1873年3月新一轮入侵阿散蒂军事行动开始时，伦敦政府紧张地关注战事。阿散蒂击溃了芳蒂部落的抵抗力量，于是伦敦政府从西印度群岛团抽调了一营黑人部队，并派遣了100名皇家海军陆战队成

员，但是这批人很快就病倒了。前线催促伦敦出兵阿散蒂首都库马西，而伦敦政府含糊其辞，却派了少将加尼特·沃尔斯利带着手下的30名“特种勤务官”赶赴战场。

沃尔斯利是维多利亚时代技艺精湛主义的典范。他是个爱尔兰新教教徒，他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官，他父亲在他7岁时去世了。沃尔斯利参加了1852年缅甸战争、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平定印军叛变以及1858～1860年的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沃尔斯利在加拿大服役。他于1869年出版的《军人手册》在军中广为流传，显示了他对后勤重要作用的深刻理解。沃尔斯利1870～1871年率远征军前去镇压反抗加拿大接管马尼托巴的混血起义分子，他的领导才得以大放异彩。他显然是应对眼下黄金海岸紧急局势的不二人选。

很难完全确定沃尔斯利当时的意图。我们基本肯定的是他本人坚持认为要打败阿散蒂军就必须借助本土派遣的军队。他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计划，打算从最强阵营挑选一支精锐部队，但是内阁对此不置可否。殖民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勋爵告诉沃尔斯利他应该去寻求“光荣的和平”。出发途中沃尔斯利已经安排从塞拉利昂雇用一些伊斯兰教教徒战士，也征召了一些从拉各斯带来的豪萨人。他手下的核心成员——特种勤务官（其中不乏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出色的英国军人），肩负着从沿海部落征召一支当地人组成的大型部队并带领其作战的重任。“极度的好脾气、亲和力和忍耐力，再加上不可动摇的目的性和决心，是最为重要的。”沃尔斯利如此教导他们。1873年10月初沃尔斯利抵达战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英国人在这里的总部——海岸角奴隶堡的防御，以防距此地仅仅几英里的阿散蒂部落发难。在阿布热坎帕那场混乱的战争中，那些被英国军官用棍棒逼着上战场的芳蒂人很明显在阿散蒂军面前不堪一击。《泰晤士报》通讯记者温伍德·里德嘲讽沃尔斯利是个“滑稽可笑的”光杆司令、对阿散蒂的进攻是彻底的失败，并且他声称自己看到沃尔斯利在灌木丛中如无头苍蝇一般走错了方向。

在此期间，沃尔斯利已经给伦敦传去了不容忽视的消息——他威吓政府：如果再不派兵，英国将输掉这场战争，届时必然颜面尽失。沃尔斯利的名声（以及名声附带而来的宣传效应）意味着他的观点不能轻易被忽略。故消息传到英国国内的那天，他要求派遣的两个营就接到了军令赶赴战地，同时还有一个营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是附加的条件也很严苛，沃尔斯利只能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兵力，只有在确保军事任务能立刻完成的前提下才能动用这些英军。不仅如此，这些援军甚至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之前不得登陆。这种极端谨慎的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军队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是英军深度参与印度战事的后果。但是它主要反映了英军对于这个被称为“白人坟墓”地区的疾病的恐惧。疟疾、黄热病和痢疾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支军队消灭于无形。沃尔斯利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击败阿散蒂。

他已经决定要摧毁阿散蒂的首都库马西，因为这样一来“大捷鼓舞起来的士气”能够“永远地摧毁阿散蒂的军事声望”。沃尔斯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筹谋。他精细地规定了部队着装：灰色的粗花呢夹克和长裤（用以御寒、防发烧）以及头盔（防晒）。为了在密林作战，士兵还需要配备短步枪。每周发放4次酸橙汁，点火驱除“瘴气”，出征之前提供可可、饼干和奎宁。“如果感觉肠胃有任何不适，”沃尔斯利下令说，“马上找军医开药。”当务之急是为进攻库马西准备好前进基地：一个和海岸之间有道路连接，能够提供补给品和装备的内陆军需库。为了修筑道路、搬补给品和运输军队，需要找一大批劳动力：每三个士兵或者每一个军官就需要配一个搬运工。只有当集结工作准备就绪，白种士兵才会登陆，远征才会开始。

沃尔斯利的方法非常粗糙，但他十分幸运。阿散蒂士兵们莫名其妙地撤走了，可能是因为他们也被疾病所累而且也让敌人的顽抗弄得士气大减。沃尔斯利的芳蒂盟友没了合作的兴趣，劳动力和情报都成问题。他的地图也成了废物：原本打算用于架设轻便铁道的沿海平原结果是丘陵地带，他的蒸汽火车头只能在海滩上躺着。但是他的“特种勤务官”没有让他失望，他们通过“贿赂、许诺和略施威胁”（显然是委婉语）搜集了情报。如果搬运工逃掉（据里德称，这些劳工既没吃的又没报酬），英军就会将他们的村庄付之一炬，以儆效尤。当地一些受过训练的人也逐渐被组织成了一支小型军队。英军终于拔营出征。1874年1月21日，英国人渡过了普拉胡河，进入阿散蒂境内。士兵们收到的命令是：“保持冷静、枪口低射、慢速射击、直捣黄龙。”

沃尔斯利运势不减。出征10天后，阿散蒂军在距离库马西几英里的地方与英军对垒，双方进行了12小时激战。在密林里，神出鬼没的阿散蒂狙击手们扰乱着英军的阵形。“在印度或中国的平原上，你可以随时观察周边的环境，因此即便作战时困难重重也没什么，”沃尔斯利寄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但是这里的森林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100码[4]之外的情况，让人时刻紧张。”友军炮火也可能造成伤害，交流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英军只好列成方阵前行，四个角上配有火箭。这场战争中的关键因素是火力的不平衡：英军虽有加特林机枪却并未使用，但是他们的史奈德步枪给他们提供了优势；阿散蒂军也有枪炮，可绝大多数都是被称为“丹麦枪”的滑膛火枪。阿散蒂军的密集发射造成英军高地营25%的死伤，然而（正如里德指出的一样）他们的子弹威力太小，仅能造成轻伤：倘若他们有史奈德步枪，“我们将会遭受重大损失”。经过一天的战争，英军只有6名士兵丧命，而英军的枪炮不断低射，摧毁了阿散蒂军一次次有组织的进攻。几天之后，英军进入了几乎废弃了的库马西。他们争先恐后地冲进有着12个庭院的摩尔人风格的王宫，发现这里满是书籍、钟表、银盘、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份1843年10月17日《泰晤士报》的副本——里德特地记录了下来。但是，他们该做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尽快离开。沃尔斯利的参谋布拉肯伯里（Brackenbury）认为，“再开展任何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追捕国王都是“不可能的”。患病人数在不断增加，补给在不断减

少，沃尔斯利害怕拉长撤退路线会导致无法将伤病员带回海岸。在库马西城仅逗留了一天之后，1874年2月6日一大早，英军四处放火，然后满载着战利品撤军了。两周之后沃尔斯利已经回到了海岸，3月4日他已经上船出海了。3月14日阿散蒂国王签署了条约，宣布放弃对海岸的所有权，并承诺开展自由贸易、开放通往库马西的道路，以及用沙金向英国支付赔款。沃尔斯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就是将白种人军队的死亡率控制在了1%，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这场胜利带来的好处却少得惊人。阿散蒂人养精蓄锐伺机再战。

祖鲁战争的情况不同。自从英国人1843年吞并纳塔尔，他们就开始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祖鲁国的阴影之下。此地的白人无力击败祖鲁，而伦敦政府又无意派兵相助。但是19世纪70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布尔人在德兰士瓦建立的政权摇摇欲坠：在东部边境山区与佩迪人的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将其推向破产边缘。当英国人派代表团决定前往德兰士瓦准备将其和纳塔尔合并时几乎没人反对。在伦敦政府和当地顾问——纳塔尔官员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Theophilus Shepstone）的鼓动下，开普的英国总督认为现在是时候在整个南部非洲施行单一政体、将互相争斗的白人和黑人国家合而为一了。看起来祖鲁国成了最后一个大障碍。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国王当“阿马布托”（即战士），这是祖鲁军事实力的基础。战士被编入军团（根据年龄划分），祖鲁统治者们用总结、改良的复杂演习方法精心训练这些军团：所谓的“角”团将敌军拉入战场再从两翼和后路形成包围圈，强大的侦察以及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长矛攻击是制胜的关键，相当于沃尔斯利的“枪口低射……直捣黄龙”。直到祖鲁势力被灭，英国人才声称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将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个观点受到白人土地投机者的热烈欢迎。

开普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决定趁热打铁。由于此前东开普已经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所以本就有一支小型英国军队在当地。战争结束后，军队赶往北边的纳塔尔。英军对祖鲁稍加挑衅之后，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hwayo）收到了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阿马布托军。当赛奇瓦约拒绝服从时，入侵开始了。弗里尔和他的指挥官切姆斯福德勋爵急于迅速进军制胜，因为伦敦政府并没有批准他们的计划，所以需要赶紧造成既成事实，于是切姆斯福德匆忙行事。他们没有遵从沃尔斯利一贯坚持的耐心集结，三支英军纵队向祖鲁兰长驱直入。其中一支纵队陷入包围无法脱困，另一支在北方被突然冒出来的祖鲁武士团堵截。第三支渡过图盖拉河分成了两部，其中一部由切姆斯福德率领继续潜入敌方进行侦察活动，另一部则在伊桑德尔瓦纳扎营。

接下来在1879年1月22日那天发生的就是一场屠杀：军队中的1 700人里只有不到100人得以逃生，其中既有英国正规军也有白种殖民地居民和黑人。这次事件证明英国人也可能在殖民战争中一败涂地。当时他们的营地太大，无法安全防御，情报又太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不知道祖鲁大军杀到了。来不及备战，营地又无法防御，英军没有摆出方阵而是排成了列，企图借助强大火力阻止祖鲁军队的进攻。但是英军队列太长太单薄，祖鲁有条不紊的攻击马上打破了英军防线，继而进攻侧

翼。英军阵形大乱，分裂成组，与敌人短兵相接。祖鲁军不留俘虏，因此只有那些幸运的（或者有马的）士兵侥幸逃出、捡回条命。直到今天，发生这场战役的狮形山仍然阴气森森，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恐怖一幕。

伊桑德尔瓦纳之役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惨败，在那一天里士兵阵亡的人数是维多利亚时期所有殖民战争之最。两个月后，在更北的坎布拉，一名在阿散蒂服过役的老兵伊芙琳·伍德（Evelyn Wood）指挥一支白人和黑人的混合军队在他的驻守地粉碎了祖鲁军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英国人现在带着4 000人、10门野战炮和两挺加特林机枪杀进了塞奇瓦约在乌伦迪的都城。这次英军组成了方阵，在7月4日的战役中击溃了祖鲁军的进攻（尽管不是很轻松），就此粉碎了祖鲁势力。累积的阵亡人数（尽管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祖鲁军大胜，但他们也损失了许多士兵）无法得到补充。指挥系统解散了，食物也消耗光了，塞奇瓦约本人被俘虏和放逐，祖鲁王国分裂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阿散蒂军的及时撤兵让阿散蒂得以避免全面卷入战争，而塞奇瓦约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这场阿散蒂人极力躲避的战争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方面因素。第一与阿散蒂土王不同的是，塞奇瓦约除了直面战争之外并没有别的选择。他知道屈服就意味着失去权利：英国人给他下的最后通牒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二，阿散蒂有地形复杂的内地可撤，他却无天险可据，也没有条件组织游击战。祖鲁兰的大多数地区都是开阔的草原，英国人可以相对轻松地部署大军，英军的骑兵也能大展身手（而在阿散蒂的地形英军无法使用马匹）。第三，尽管疾病的确是个不可摆脱的问题（虽然沃尔斯利收兵是因为害怕传染病），这里的英军却没有达到因为担心传染病而需要退兵的地步。塞奇瓦约无法做到每当英国人迅速撤回海岸他就谨慎收兵保存实力。一旦迫不得已开始战争，他能够给英军造成沉重打击：将近1 200名英国人以及当地人的分遣队员被歼灭，相比之下，阿散蒂战争中只有极少数英军阵亡。但是因为枪械落后、人力有限、欠缺补给系统，他无法给英军带来足够的打击以迫使其签订停战协定。

沃尔斯利非常震怒，他认为切姆斯福德指挥的这场战役纯属浪费资源，完全不能达到目的。但他没能及时赶到阵地，无法阻止切姆斯福德因塞奇瓦约的战败而获得战功。三年之后，沃尔斯利在埃及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埃及财政已经破产，为了抵制国外势力的干预，开罗成立了民族主义政权（该政权的核心是能承受金融“改革”冲击的军队）。在经历国内激烈的关于埃及问题的争辩之后，格莱斯顿政府已经决定要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权，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对通往印度的便捷航线苏伊士运河产生了威胁。在亚历山大港进行的海上军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不仅远没有达到促使埃及垮台的目的，炮轰反而激起了人民暴动，许多欧洲人被杀死。入侵计划早已拟定，1882年7月初命令传达了下去。英国辛苦从国内军营和地中海基地凑集了25 000人（根据殖民地的标准，这就是一支大部队了），从印度征召了约7 000人（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没人觉得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战争：埃及的地形是个可怕的挑战；

埃军是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军队；民族主义领袖阿拉比上校深得埃及民众支持。英国入侵者只要遭受一次败绩就可能在政治上受到致命的影响：阿拉比的名声将飞涨，而英国人可能会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撤兵。

这正是沃尔斯利擅长解决的难题。他必须决定入侵哪里以及如何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地形是关键。在亚历山大港（进入埃及的必然通道）与开罗之间是尼罗河三角洲，每年8~10月间尼罗河水上涨，洪水泛滥，三角洲大多数地区都被淹没在河水之下，这会给军事行动和行军造成极大困难。沃尔斯利没有选择这里，而是选择了位于苏伊士运河中部的伊斯梅利亚登陆，印度分遣队可以在这里与其会合。除了距离开罗更近之外（距开罗仅75英里），此举的主要好处是军队能够沿着沙漠边缘行军，道路状况良好，适合骑兵行进（如果现在你从开罗去伊斯梅利亚，从主干道上就能看到沙漠的白沙）。这里有一条铁路可以使用，还有一条淡水运河——这是宝贵的资源。但是沃尔斯利必须在阿拉比采取破坏行动之前将军队运上岸并做好进军的准备。他也必须保护好淡水运河和铁路，必须确保在与敌人狭路相逢时一击制胜。



图5–1 1874年阿散蒂战争：沃尔斯利进攻库马西路线图

沃尔斯利采用了他在阿散蒂战争中采取的战术：先建前进补给基地，等军需准备就绪再将大批部队搬来。与此同时阿拉比在泰勒凯尔比准备防守，阻隔通往开罗的道路。从1882年8月底到9月初，英军在大军全力前进之前势如破竹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们面临着一支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军队（约是英军人数的三倍，但是其中有不少“非正规军”）。这支敌军躲在壕沟工事之后，英军的火力不占优势，正面进攻将

遭受沉重的损失。沃尔斯利的主要优点就是治军严明，麾下士兵士气高昂。英军连夜无声无息地就位——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壮举，9月13日拂晓时分，高地旅对埃军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尽管奋力抵抗，但阿拉比的军队仍然很快陷入混乱；据说当阿拉比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士兵们已经四下逃窜了。英军骑兵赶在阿拉比能组织抵抗，或者像沃尔斯利担忧的那样——点火焚烧都城之前疾驰奔往开罗。开罗的总督被劝服放弃抵抗，将卫戍部队开出城外并放下武器。到了15日早晨，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整座城市。几星期后，英军大部离开。在这场争夺埃及统治权的战争中，英军57名士兵和军官阵亡，30人失踪，约400人受伤。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其中的关键就是补给——这是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并确保对敌方造成致命一击的方法。

战争的后果

尽管英国军队并不完美，也曾经遭受过失败，但是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帝国防卫和扩张的有效工具，直到1899~1902年与布尔人那场长久的战争它才显得有些力有不逮。英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后勤——在这一点以及从印度或英国本土装备及派遣军队的非凡速度上，惠灵顿、沃尔斯利及其“接班人”基钦纳勋爵（他也同样善于筹谋、小心谨慎）都是大师。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军的成就主要可以归功于武器的优势——当然（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有轮式运输工具的地区只能依靠人力运送机枪和弹药（一架马克沁重机枪需要5个人才能搬动），因此必须节约使用这些武器。1897年在北尼日利亚发生了两场战役，各持续了两天，为了节省弹药，机枪只被使用了三分钟。而且英军火力的消耗也很高：某位专家曾经估算过，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后不久的著名的罗克渡口战役中，英方守卫军共打出了约20 000发子弹，歼灭了650名祖鲁战士—30多发子弹才能歼灭一名敌军。纪律、士气以及军官不计后果的狂热情绪激发了猛烈的攻击。几乎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好处就是军队随机应变的能力得到加强——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这种能力是必要的，而且英军也逐渐对有些战场了如指掌：最熟悉的就是印度的西北边境和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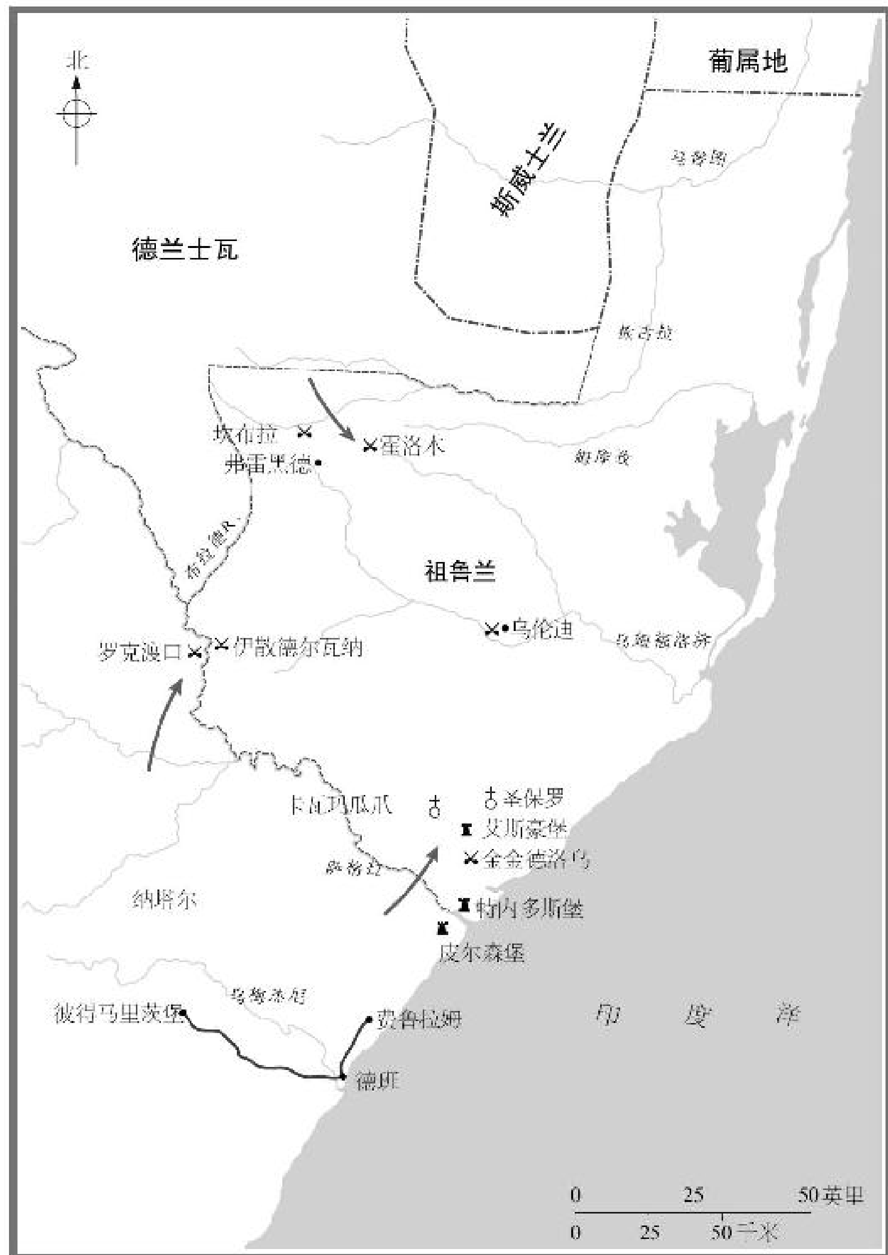


图5–2 1879年祖鲁兰：英军进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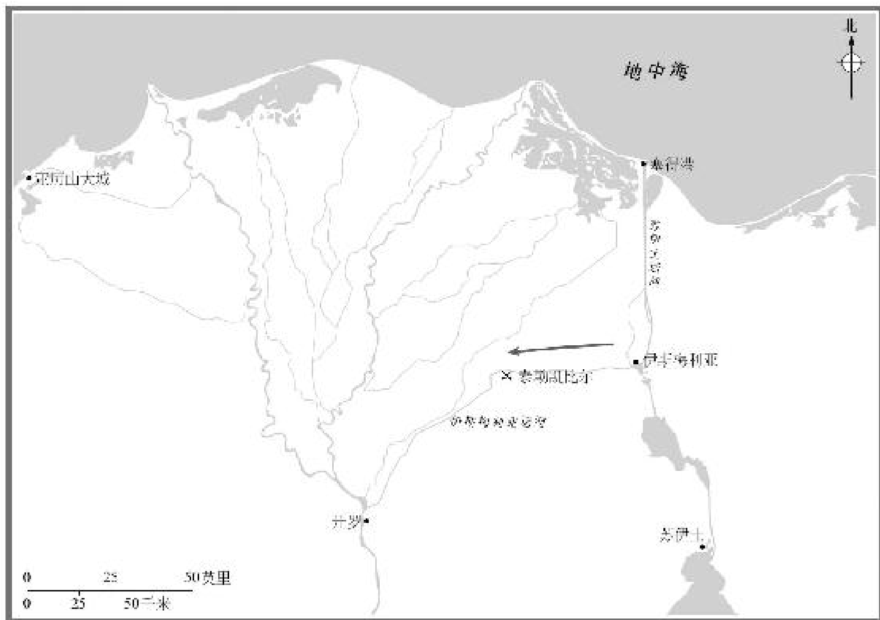


图5–3　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

但是英军并不是单独作战。在印度及周边，一大部分负担落在了“印度兵”的肩上：他们在阿富汗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只要可能（例如阿散蒂和祖鲁战争中），英国人就会招募大批本地人作为非正规军团或分遣队参与战争。这些本地军队的部分任务是为英国白种人军团扫清道路。“当配有本地军团时，”政府训令规定，“先派它检查可能隐藏敌军的丛林或崎岖地形，再命令欧洲军团前进……”当地援军也被征募为后勤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只要有白种移民，他们对当地的了解就能为英军所用。最重要的也许是军队有一个无形的盟友可依赖：英国的海军实力既能为陆军保驾护航也能确保将国内的增援输送到战地，正因如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才得以遍布世界各地。亚洲乃至非洲没有几个地方是英军到达不了的。谁能想得到187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劫持了几个英国人当人质，12　000英军就大军压境入侵了距离大海250英里的峭壁上的默克德拉？他只能绝望地投降或自裁。

但是这段往事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英国扩张中的暴力绝大多数给地方造成了隐蔽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就算在英军参战的地区，许多情况也被忽略或者没被官方记录下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平民伤亡，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布尼奥罗王国（今乌干达西部）发生的情况估量这些暴力战争造成的影响。英国人于1894年入侵布尼奥罗，或许是为了加强对临近的布干达的政治影响，因为与布干达的联盟关系对于稳定英国在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英方军队是一支杂牌军，成员五花八门：有几个喜好探险或寄希望于用特殊任务的报酬偿还债务的英国军官，有一些苏丹雇佣兵，一大群由部落首领带领的瓦甘达族，再加上必不可少的马克沁和哈奇开斯机枪。布尼奥罗战士们在武器上无法与英军抗衡，他们的防御栅栏被英

军远远地用炮轰开，牛群也被英军掠走，村庄被焚毁。英国人对这场攻击和屠杀视若无睹。但是布尼奥罗的国王卡巴雷加得以脱逃，于是抵抗仍在继续。之后10年间断断续续的战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中断了农村经济导致了灾荒，农业倒退了，人们迫于战乱的频繁迁徙导致卫生状况无法保障，继而无法控制疾病。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战争就意味着疾病。这些后果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布尼奥罗陷入贫困人口暴跌，只能痛苦地缓慢恢复元气。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帝国的触角可能给某个地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而不自知。

[1] 此处指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2] 此处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译者注

[3] 此处指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4] 1码≈0.91米。——编者注

第六章

交通与贸易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我认为，”查理二世的廷臣、经济学家塞缪尔·福特雷（Samuel Fortrey）1663年写道，“不应该在海外建立种植园……除非是在那些可能为我们国家增加财富和贸易的国度……”看起来这条意见再明显不过了，毕竟光是建立殖民地就很费钱，管理费用相当昂贵，保卫殖民地的花费更是个无底洞。如果这个殖民地不能使英国贸易增加，那么把它纳入帝国版图又有什么用呢？无利可图的帝国本身就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事实上，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只是论战的开始。从始（约1600年）至终（约1970年），在英国海外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价值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家都认同繁荣和实力紧密相关：贸易能创造财富，有财富就有实力，实力能充当守护神，也应该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大家只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各方观点迥异。最基本的问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具有任何特别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附近的市场货物运输和信贷流通速度都更为快捷，也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舍近求远地一味鼓励“殖民地贸易”真的值得吗？拥有这些殖民地是“增加”了英国的商业活动还是仅仅将其转向了另一个特定的方向？限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将其局限于生产特定的产品并仅销往英国（斯密那个年代的规定）是明智之举吗？没有这条限制的话，殖民地可能更加繁荣昌盛（这是个合理的假定），自由和富饶带来的结果就是它能从英国购买更多商品。如果控制殖民地贸易最多是施加反作用，那么英国的帝国势力何苦顶着风险、承担着巨额成本维持这种状态呢？这个问题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年，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

而且也不见得所有贸易都是好的贸易（至少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一些17世纪的观察者（其中包括詹姆斯一世）对吸烟（弗吉尼亚的经济就是依靠烟草出口）的道德影响有着深深的质疑。吸烟会动摇社会规范、鼓励放荡举止（的确，烟斗一度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红灯区”）。在18世纪，人们曾经担忧从印度进口的奢侈织品会降低英国人的品位、引诱英国人沉溺于所谓的“东方式的”纵欲。中国陶瓷和丝绸涌入英国又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英国人害怕过度消费会导致贪婪，进而腐蚀社会凝聚力。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参与西非奴隶贸易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帝国的掠夺手段遭到了人们的猛烈攻击。英国的海外商业行为，尤其是在帝国或准帝国环境中的商业行为从19世纪开始处于严苛的监督之下，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往往伴随着压制和暴力。英国人在中国销售鸦片、在非洲贩卖枪支、在世界各地出售廉价酒，以极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土地或矿产权（就像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在今天的津巴布韦的行为一样），强迫当地人服劳役修铁路或道路。有些人相信如果发展商业的目的是为了带来和平与文明，那么就应该用和平与文明的方法开展商业，英帝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无疑使得这些人以及人道主义者们义愤填膺。

在上述有关贸易的论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忧虑：英国所受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贸易活动需要国家行为来保障，例如维护帝国统治、吞并新土地、给予优惠和津贴，或者使用武力打开市场，这必然会出现一个疑问：谁获利最多？是不是像亚当·斯密所称的那样，强制殖民地把产品卖给英国的规定是重商主义利益集团积极促成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缔造帝国的基础——重商制度仅仅是少数人致富的工具，牺牲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19世纪中期，伟大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公然抨击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是一个阴谋，是在以世界和平为代价给纯属冗余的贵族谋取财富，而世界和平才是英国富强的真正保证。19世纪末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舆论。激

进分子J·A·霍布森把英国的“热带”帝国（英属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看作金融家的阴谋。伦敦政府受（腐败的）新闻舆论威吓并受信息不足的人民被媒体鼓动产生的“沙文主义”情绪影响，将无数纳税人的钱用于兼并新地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集团获利。在霍布森这里，帝国经济状况再次被描述为一场骗局：少数人赚了钱，而多数人被爱国主义情绪冲昏了头，既没有盼到社会变革，也享受不到和平的自由贸易所能带来的真正繁荣。

这些批判是否中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社会广大民众（不仅仅是激进派）的质疑。人们怀疑帝国与贸易并不是天然的伙伴，用政治力量达到商业目标永远是有关系的圈内人的杰作。这显然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顾虑：帝国的所得会使得特权阶层进一步获得或巩固权力，改变原本的社会、政治平衡，并根据特权阶层的意愿重塑道德和意识形态风气。18世纪晚期，英军对纳波布的攻击是因为人们害怕那些带着不义之财和东方式道德（也即非基督教的）标准的从印度回国的有钱人会购买地产，并跻身于贵族阶层成为新兴统治阶级。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人”，即依靠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的在国外居住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也引起了类似的仇恨。J·A·霍布森（以及其他激进派作家）的论战利用了当时公众对于世界性的财阀阶层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恐惧。约翰内斯堡令人咂舌的金矿（以及通过投机黄金股所获得的利润）就是看得到的证明。人们很容易觉得南非的矿主（塞西尔·罗兹是他们的领袖）连同他们在伦敦金融城的朋友是攻打布尔人的背后推手，正是他们将英国拉入了昂贵的、令人不齿的、持久的战争。接下来必然是辩称保护主义、征兵、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军国主义紧随其后，而民主改革会就此终结。一方面有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坚称死板地坚持自由贸易（1850～1931年英国的主导原则）将置英国于危险的境地，无法应对全球经济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确，有关帝国与贸易的辩论久已有之，早在亚当·斯密之前以及他去世很久之后一直持续不断。这场论战之所以热度不减是因为民众意识到了社会各界的经济安全与海外商业息息相关。

然而对于英国商人和贸易者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具体、实际地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和所有生意人一样，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并维持住）他们的市场。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击败竞争对手。打入市场是商人的第一个任务，往往也是最难的任务。在约1830年之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人面对的是直接的贸易禁令，除了英国本土，他们无法与其他海外帝国进行货品买卖。和英国一样，西班牙也尽可能地在它的美洲帝国施行闭关政策——英国商人对此愤恨不已。葡萄牙在半岛战争中需要依赖英国人对抗法国，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出口商打开殖民地贸易市场。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全都有类似的禁令。日本直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才向英国开放。除了极少数几个荷兰人之外，没有几个欧洲人胆敢冒险挑战隔离原则，因为有这个胆子的都没了命。直到19世纪40年代，与中国通商的唯一合法途径仍是通商口岸。在广东商业制度的约束下，官商（也就是商行）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每当贸易季结束，所有外国商人都被要求离开广州（他们通常

撤离到附近的葡属殖民地——澳门）。直接跟中国顾客做买卖或者出售“未经批准的”商品是被严令禁止的。因此英国商人沿着中国海岸巡游将鸦片出售给中国人的行为是对中国贸易规定的双重挑战，也是战争的起因。就算是在没有这些官僚规定的地区，英国商人也很可能非常不受欢迎。这些地区的中间人已经习惯了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提成，在他们眼里，英国商人的存在显然是个威胁。非洲商人在尼日尔三角洲诸如邦尼、卡拉巴尔这样的港城用战舟舰队（有的船上配有大炮）阻止外国人向上游航行直接进行奴隶和（后来的）棕榈油交易。1832年他们杀害了探险家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er），他是伟大的伯肯黑德企业家麦格雷戈·莱尔德（Macgregor Laird）的搭档，大体上维持了他们的控制直到19世纪80年代。

除了这些人为造成的阻碍，商人们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其他困难，尤其是自然造成的困难。在蒸汽动力运用于航海（在1830年之后的西方世界和1860年之后苏伊士以东）和陆地交通（时间差大致如前）之前，商人们基本上受制于风力和水力，风向和洋流决定他们能去哪儿、何时去哪儿以及拉什么货能赚钱。进入河道网的容易程度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例如著名的刚果盆地与大洋的连接处有瀑布和湍流阻隔，从马塔迪到斯坦利湖（今金沙萨）之间的200多英里路需要乘牛车艰苦跋涉，到达斯坦利湖后又可以乘船航行，这是1890年7月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行程路线。在当时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天候道路的条件下，除了能够自己走着去市场的商品——例如奴隶或澳大利亚绵羊，陆地运输极其昂贵，只有运载奢侈商品才可以承担长距离路程的运输费用。但是即使商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市场，也没人能确保他的货品能顺利地销售。精明的商人会细心地关注顾客的需求和品味。比如，如果主营业务是布料，就必须了解当地社会和宗教信仰能接受的花纹和（尤其是）颜色以及哪些布料种类适合当地的气候和潮流。“每个部落，”在东非探险的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有些气恼地记录着，“都必须要自己专用的棉布类型，要有专用的色彩、尺码和珠子间的着色，不照着办还不行。”通常这都是些小规模市场，但是顾客的喜好差别却很大，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顾客的不同品味，这迫使商人们要巨细靡遗地去了解顾客，对他们来说，这与现代世界贸易中的大容量、大市场营销方法截然不同。

商人不能光顾着销售从英国带来的商品，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开展双向贸易：找到有价值的返航货物，顺便帮助顾客们偿付货款。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在19世纪上半叶日渐衰退，就是因为缺少可拉回国销售的回航货物。于是勇于探险的商人们四处搜寻可买的产品。沙金和象牙引诱着两名前海军军官——费尔韦尔（Farewell）和金（King）于19世纪20年代来到了纳塔尔海岸。他们从今德班的基地战战兢兢地派遣了一支贸易使团去觐见祖鲁国王恰卡。商人们可能还需要等待丰收季节的来临，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合意的货品从遥远的内陆拉到海边。船只在海港等着装满货物返航，但是逗留是要缴纳逾期费用的，所以商人们还需要权衡这满仓货物能带来的利润与逾期费用孰重孰轻。一旦回到英国，他们必须通过在伦敦发展起来的组织化市场（或“交易所”）或者通过拍卖和展

览会把返航货物卖给大批发商（如“蔗糖代理商”）。他们希望促进海外商品的消费量，例如藤黄（一种植物染料）、阿拉伯树胶、古塔波胶（亦称马来胶，用于制作电报电缆）、象牙（19世纪晚期每年有500吨象牙进口至英国，其中河马牙最受欢迎）、鱼胶（从温水鱼鱼鳔提炼出来的胶质）、虫胶以及人们熟知的其他各种涌入英国的大宗品：糖、咖啡、茶叶、木材、原棉、羊毛和谷物。

但是所有商人都知道，打入新市场和在老市场赢利其实都依赖于海外贸易中看不见的因素。他们的优势（英国为商人提供的优势更胜于绝大多数贸易国家）在于廉价信贷。信贷是所有交易的润滑剂。正是由于伦敦能够提供无比充裕的资金（约1800年后银行系统动员了地方储蓄以供伦敦金融城使用），信贷才会如此廉价和易得。长期信用贷款对于远方的市场至关重要，商人能用它购买货品运往国外，出售货品获得收益，或者以物易物把当地的商品运回英国销售，整个交易过程可能长达两年之久。农民、种植园主、牧民、伐木工、野生橡胶采集工和棕榈树栽培者的收入有特定的季节性，他们能给商人们带来宝贵的返航货物，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用贷款垫付货款。信贷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商加入这个贸易网络，促使贸易网络不断膨胀（从19世纪到1913年这段时间里，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膨胀了大约20倍）。但是信贷（或者信用失效）同时也是商人生意中最具风险的因素之一，许许多多的危险会威胁他的收益乃至他的偿付能力。如果某个地区的商业信息有限或完全缺失，商人就不得不判断是否有利用贷款进行商业活动的必要：就算是在国内他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努力偿付即期付款或任何形式的付款。他必须应对价值不断起伏的各国货币：19世纪60年代的加尔各答，贝壳还在作为货币流通：256枚贝壳价值等同于一卢比，缅甸在1852年前并不使用硬币，人们在交易中使用黄金、白银或铅，还需要称重和检验真假。商人在国内的债权人如果陷入危机就会把他一起拖垮，而他的代理人和合伙人也可能会做不明智的投机（每当价格波动，生意人很难抵制投机的诱惑），不声不响就让他血本无归。1815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战火几乎未曾停歇，万一资产被敌军罚没或者市场突然被关闭，就算是最能赢利的投资也可能毁于一旦。詹姆斯·克里斯普（James Crisp）曾遭此厄运，詹姆斯的妻子是著名的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即使1815年战争结束之后，当地的混乱也可能危急商人的生意甚至生命。

无论何时何地，商人和贸易者都面临两大挥之不去的问题，而距离和延迟使得这两大问题更为紧迫。第一个问题是很难获得精确信息——有关于市场、价格、他们要打交道的人们信誉度的信息。在1840年之前的大航海时代以及随后的蒸汽时代里，商人们疯狂地渴求信息。他们会要求他们派驻在当地的人手定期寄信汇报，然后坐立不安地等待邮件。维持一个广泛的通信网络是商业的生命线：在约翰·格莱斯顿（John Gladstone，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父亲）的合伙人看来，在操劳了一天之后寄出20封乃至更多的信件是司空见惯的事。约翰·格莱斯顿本人为了投机美洲玉米而在1791～1792年间跋涉了14 000英里的路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商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倾听各方消息、闲聊八

卦、数海港停泊的船只、提心吊胆地听谣言、关注彼此的行动。他们组成商会，把大家愿意分享的情报搜集起来，并建立“交易所”，在那里列出产品价格。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普及的电报和海底电缆使人们能迅速地获得重要信息：1866年架通了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到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都能直接与伦敦联系。尽管如此，在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商业情报一如既往地通过口头传播。

第二个大问题是信任——经济学家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在绝大多数商业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隔着一长串联系人。在伦敦的商人需要靠得住的海外代理人确保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以公道的价格出售以及收取货款和安排返航货物。商人派驻在当地的人员又需要与另一长串债务人、债权人、供应商、销售员打交道，通常这些地区全无法制可言，语言障碍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无法逾越。他们往往别无他法，只能找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充当中间人——例如中国的“买办”（这个称呼还有葡萄牙的影子）和印度的“杜巴适”（即翻译），这些人作用巨大，他们本身就与商场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能力推进贸易的开展、按时收取货款和维护与当地当权者的关系。远在伦敦的商人没什么办法阻止驻扎在海外市场的手下进行欺诈、盗窃或滥用资金，他们唯一的防范措施就是在挑选合伙人和代理人的时候小心谨慎。他会尽可能地挑选家族成员，要不就挑姻亲。如果要在家族之外选择人选，他更喜欢挑与自己有着共同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人，最好是跟他同一个教堂的会众；共同的种族和地区背景是进一步的保证，故而苏格兰籍的贸易合伙人遍布世界各地。截至1914年，掌控了大部分英国贸易的贸易公司们仍然按照这些历史悠久的原则雇用员工。近至1936年著名的对华贸易公司怡和集团（旧名“渣甸洋行”）总裁还感叹说：

> 尽管我对“英格兰东海岸”（指剑桥）充满敬意，但是我认为英格兰以北的人民最适合从事我们的日常业务……我非常渴望保留公司的苏格兰团体。但是，我并没有轻视大学生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大学生需要有踏实、沉稳的苏格兰人从旁支持辅助。

这位苏格兰总裁凯瑟克（Keswick）想说的似乎是：如果需要高智商，就得找牛津和剑桥的高才生；但是要信任，就得找苏格兰人。

来自牙买加的意见

1792年牙买加议会委员会提出：

> （我们）不得不向议院指出，西印度群岛的甘蔗为祖国带去了

数不尽的利益……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产物与从大不列颠各地运往伦敦港的一样，都是国家财富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每将一英亩土地开发为种植园地，祖国的财富就增长一分。

坐在议会的牙买加种植园主和商人的确有理由认为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尤其是牙买加是英国世界贸易不可或缺的中心。18世纪下半叶，这些岛屿出口至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蔗糖）占出口总量的1/3。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商品被转出口至欧洲：到了1805年，它的咖啡出口量居世界首位。正如议会所说，每年蔗糖缴纳的进口税高达140万英镑，约占海关关税总收益的1/3，大概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12。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中，加勒比海群岛是英国出口商品的最大销售地：1775年它的消费量已经超过了北美大陆，远胜亚洲、是非洲的两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白人）居民富得流油。1770~1775年牙买加自由欧洲人的平均资本净值高达1 200英镑，这个数字几乎是北美大陆最富裕地区（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人均资产净值的10倍，是新英格兰的约40倍。

加勒比海地区的繁荣源于欧洲尤其是英国对蔗糖永无止境的消耗（英国人比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爱吃糖，尤其爱在茶里加糖）。1700~1790年间出口到英国的蔗糖价值翻了4倍，接下来的50年间又涨了两倍。蔗糖既可以加入茶水中调味，也可以加入糖蜜和果酱，因而迅速成了生活忙碌的工业人口首选的“方便食品”。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是英国大西洋贸易的中枢，它贪婪地吸纳进口的奴隶（其中一部分再出口给附近的西属美洲），推动了英国与西非的奴隶贸易（直到1807年奴隶贸易被禁止）。每年都有几十个几内亚人从英国出发去开展奴隶贸易，他们带着货物，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会用这些货物在欧洲或者美洲以物易物，一旦到了奴隶海岸他们就可能要逗留一年之久。通常会有小型船只（“补给船”）随之同行，这些船只源源不断地在大西洋上运输奴隶，直到用来以物易物的货品耗尽为止。到了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航运业约15%的运力用于奴隶贸易。另一面，加勒比海地区从北美购买粮食，雇用新英格兰的海运人力资源运输粮食。加勒比海地区支付的钱大大填充了美洲殖民地的钱包，如果没有这些费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是远远不能从英国购买那么多商品的。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牙买加，也是英国向西属美洲帝国那些理论上封闭的市场走私商品的基地。1813年英国运往加勒比海地区的货物中近半数被再出口至西属美洲。西属美洲多以金条购买这些走私货品。“我倾向于认为，”商人托马斯·欧文（Thomas Irving）1786年写道，“每年我们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不低于100万美元，这不仅为我们西印度群岛和大陆殖民地提供了流通货币，也让我们有能力用真金白银买下大批货物运回英格兰。”一旦送回伦敦，金条便能用于巩固英国的货币供应。在那个货币短缺可能引起贸易停滞的年代，这一点至关重要。

到了18世纪晚期，牙买加已经成为英属糖业群岛中最生机勃勃也最大的一个。1739年，那里有429个蔗糖园，而40年后激增到近800个。

奴隶人口从18世纪30年代的10万人飙升至1810年的35万，几乎占了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奴隶总人口的一半。晚至1817年，牙买加总人口中，在非洲出生的占了1/3。它的白人人口（约2 500人）也是最多的。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得这里的种植园主们得意扬扬，甚至可以称得上趾高气扬。牙买加愤怒地将英国议会对它内部事务的干涉——包括奴隶制度，驳斥为违犯宪法的行为。下议院1823年提出议案反对奴隶制（比彻底废奴早了10年），遭到牙买加议会的公然抨击，称其为“毁灭性破坏……为了讨好狂热分子而牺牲这个曾经宝贵的殖民地（迄今为止被视为英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上的居民”。1831～1832年奴隶起义也被怪在英国议会头上，因为正是对牙买加内务的干涉引起了“邪恶的悸动”。

从牙买加往东（逆风而行）航行两周后到达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圣基茨岛、安提瓜岛、尼维斯岛和蒙塞拉特岛），从1624年（在圣基茨岛）到1632年（在蒙塞拉特岛）英格兰在这里进行了殖民。（1627年被殖民的）巴巴多斯是第一个英属糖业殖民地。蔗糖生产工艺很可能是由荷兰人从巴西传来的：为了保证甘蔗汁的最大产量，甘蔗一被割下就被尽快送往磨坊榨汁，然后在煮糖室将甘蔗汁加热，再从糖蜜中把蔗糖结晶分离出来。整个蔗糖制造过程，无论是在热带气候中种植甘蔗、清除杂草、砍收甘蔗，还是在磨坊榨汁都充满艰辛（虽然没有英国的磨坊那么黑暗，但是更辛苦、危险），正因如此，17世纪晚期来自英国的契约劳工迅速被非洲奴隶所取代。巴巴多斯飞速发展成为帝国的“宝石”，比牙买加获此殊荣要早得多。18世纪早期，巴巴多斯享受着与英国（以当时的标准看）快速、定期的联系。虽然从泰晤士河起航在海峡里逆风而行绝不是美妙的经历——要与盛行西风带做不懈的斗争，但是从普利茅斯或法尔茅斯出发只需要8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就能到达巴巴多斯殖民地的首府布里奇顿，这意味着巴巴多斯比土耳其或当时所谓的“黎凡特”（指今叙利亚、黎巴嫩地区）要近得多。一旦船只到达马德拉岛——通常船员会在此地购买种植园主爱喝的加烈葡萄酒（“马德拉酒”），就能顺信风而行，用不了6星期就能抵达巴巴多斯。截至1700年，每年都有100艘船只从英国驶往巴巴多斯岛，而风向能保证全年都可回航（有时回航旅程需要8～9星期），不像往来于印度的船只要受印度洋随季节而改变的季风风向的影响。正是由于通行的方便以及对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掌控，英国人才能于1655年从西班牙手里夺得牙买加，并得以在1815年前势如破竹地囊括加勒比海的多个地区：1763年获得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多巴哥，1797年获得特立尼达，1803年获得圣卢西亚和德梅拉拉（今圭亚那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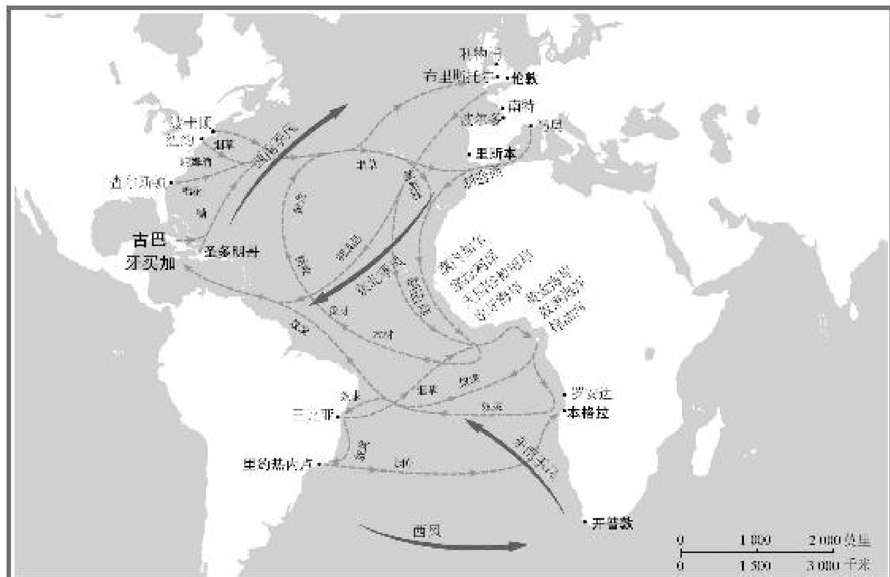


图6–1 18世纪的大西洋商业

英属西印度群岛看似比任何地方都更有说服力，它证明了商业上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依赖于帝国的建立——统治的建立。蔗糖种植园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它也需要稳定持续的信贷和资本来维持榨汁磨坊、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支付购买奴隶的费用，才能周而复始地支付它的运营成本。这意味着种植园主与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如退隐泰晤士谷福利宫的前种植园主威廉·弗里曼（William Freeman）]之间以及富有的不在地种植园主与产地驻守的人员之间保持紧密定期的联系，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大种植园园主，如西蒙·泰勒（Simon Taylor）。保持联系的意义在于能够在需要时求助于英国法律体系，毕竟种植园主的成功和信贷问题经常导致产权纠纷。或许最重要的是，蔗糖种植园要保持生意兴隆就必须要安全稳定，只有祖国（英国）能提供这样的保障。随着群岛上白种人与奴隶之间的人口差距不断增大（尤其在牙买加），帝国卫戍部队和国内援军才能保证时有发生的奴隶骚动不会失控。1791年后海地的革命势力推翻了殖民地统治并引发了英属群岛起义浪潮，这对帝国是个深刻的教训：防卫一刻也不可放松，否则局势将不可掌控。1776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拒绝加入北美大陆奴隶殖民地的起义运动（北美殖民地的白种人人口远多于奴隶人口），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当然也不仅仅是镇压奴隶的问题。自从英国人最早建立殖民地到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稳固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属群岛一直遭受其他跟英国一样实行贸易隔离原则的竞争大国不时的破坏、争夺。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法属马提尼克岛基地的巡洋舰在西印度群岛海域俘获了约1 400名英国商人。1778年英属多米尼加被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力量保护宝贵的海外资产，英属大西洋经济体利润丰厚的贸易早已损失重大。

18世纪80年代之前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谁会质疑在当时

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要繁荣就要掌控大局。正是那些建立了海外帝国并合理利用了帝国体制的地区才真正达到了繁荣。忽视对殖民地经济的监管，以及更糟糕的，任由殖民地被其他国家势力抢占，是愚蠢的叛国行为。这个观点并不像后来的自由贸易者们理解的那么简单，自由贸易者狂热地搬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反驳，却往往对斯密的学说一知半解。其观点的基础仅仅是残酷的现实：前工业世界的机会有限，人们靠天吃饭。天气决定收成，进而控制着工资、生活水平以及增长前景。

有这么一种说法，17世纪50年代～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处于一套条理分明的重商主义理论支配之下，但是史学家早就推翻了这种说法。成千上万的史学家就商业、进步和财富问题发表了论文、演说、记载、传单和对话，他们的作品给予公众不同的指导，突出不同的优先项，（多半是在）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招纳追随者。但是在不同派别的唇枪舌剑之间，我们能看到困扰了英国人很长时间的几个强大假设，其中首要的就是公众对全球经济的消极情绪。当然，当时人们完全了解从哥伦布时代和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开始欧洲贸易活动的对外扩张。英国商人们无比羡慕、甚至可以说愤恨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崛起和荷兰人在亚洲的贸易。当他们意识到英国自己的大西洋殖民地也有商业机会时，他们做出了充满激情的反应。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与黎凡特和印度的贸易越来越举足轻重；18世纪中期之后，对太平洋的探索和逐渐打开的中国市场展现了一条通往新贸易世界的金光大道。但是总体上说，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贸易“总”量（更不用说产量）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能力无限增长。相反，他们以为消费者需求增加的空间有限，很快就会达到饱和点。

这种误解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蒸汽动力被用于陆地交通、纺织和生产金属制品之前，在绝大多数制造领域，生产率的增长非常有限。制造更多的产品就意味着要雇用更多工匠，如果工匠的工资不变或者甚至随市场需要上升，那么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就不太可能下跌。在那个时代，最关键的是顾客能掏出多少钱。如果顾客要买更多的东西，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购买力必须增加。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生存费用，尤其是购买食物的成本，将必须下降，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购买别的商品。但是购买食物的成本可能下降吗？现代的农业化学制品革命和各种新兴技术大幅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此外，家禽饲养也在同步增加。18世纪中期，尽管人们广泛使用改良的耕种和饲养方法（英格兰的农民也确实提高了生产率），但在当时指望食物供应能赶得上人口增长简直是不切实际的——这是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基本论点。相反，看起来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口的增长远超粮食的增长，因为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甚至不得不在边际土地（指贫瘠的、无利润可图的土地）上耕种粮食了。还有个最不可控因素——天气，天气决定一年收成的丰歉。因此经历过17世纪“小冰期”的人们有消极看法也不足为奇。虽然在英国发生的饥荒越来越少，但它就像盘踞在欧洲大陆之上的幽灵，让人不敢掉以轻心。指望依靠从欧洲农场进口便宜的粮食——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那个世纪里（1700～1800年间

英国跟一个或多个邻居打了41年），真是荒唐的乐观。

上述观点的主要思想就是：可供进行贸易活动的总产量不可能增长太多，而且市场的总规模（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英国市场）也被环境限制因素所束缚。尽管亚当·斯密坚称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商业自由会带来生产率增长、刺激贸易发展，但连他也承认迟早有一天（他希望这一天能迟一点到来）每个国家“所获的财富，将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他乐观地加上了一句：“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如果贸易总量或多或少有个定数（不把从新开放国家获得的横财计算在内），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这样一来尽可能地把资源掌握在己方商人和船主手中、在缺乏商业动机的地方用规定下死命令很有意义。确实，如果没有有力的强制保障，即使是暂时的小挫折也可能变为长期的、致命的失败。另外有两个异常强大的假定支持着这种受围心态。

第一个假定着重强调贸易失衡的危险。部分原因是当时人们认为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就业岗位会减少，继而造成人民贫穷、社会动荡。为了填补贸易逆差必然出现黄金外流。东印度公司为了从印度（英国的毛织品在印度销路很差）进口奢侈织品而出口白银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相反，如果贸易能够达到平衡，则能给国家带来黄金。后来的作者们把这种黄金至上的观点斥为“金银通货主义者的谬论”。但是当时社会所担心的是，黄金外流会导致流通的货币减少。如果货币减少，它的实际价值就会上升，工资会缩水，就业率会降低，国内贸易会逐渐衰退。这些担忧在殖民地更为突出。危机或战争会加剧黄金短缺问题。在人们甚至无法想象“军工生产”工业化的年代里，政府需要现金以购买国外装备、聘请雇佣军以及拉拢盟友。因此能够带来黄金收入的贸易是宝贵的：与葡萄牙签订贸易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赚取葡属巴西的黄金。

第二个假定不仅与贸易有关，也关系航海业。因为商船舰队既可以作为辅助部队对抗敌军入侵，又是（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海员的摇篮”——经验丰富的水手在战时可以被强征入伍，故而自从中世纪以来，每届英格兰和英国政府都强调保持一支大型商船舰队的重要性。这些理由是伦敦政府禁止纽芬兰发展为定居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政府规定鳕鱼渔场（高达1/3的英国航海业为渔场工作）必须在深海区，不得发展到海岸。一份官方报告宣布：“在纽芬兰的……女王陛下的子民，绝不允许建立殖民地，也不能……占有……纽芬兰的任何地产。”这条规定背后的理由是自1660年《航海条例》颁布开始，所有从英国属地运往英国的货物都必须用由英国船员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最具有商业头脑的大臣之一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告诫道：“记住，的发展航海是我国的要务。在几个世纪里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海上力量，哪怕是以贸易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知，殖民地无比重要，但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其产出品与

英国类似的那些殖民地（如新英格兰）的价值并不突出，它们只是凸显了那些最重要殖民地的价值。既能够出产如烟草、蔗糖、咖啡、靛青、大米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热带产品，又能够消耗那些在欧洲不好出售的产品，这才算得上是最有价值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被允许生产自己的产品，或把产品直接卖给外国卖家，或购买外国产品、使用外国船只。如果能够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殖民地就相当于英国国土的延伸，（就如牙买加议会所说）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能力，是促进贸易均衡的宝贵工具。可是如果没有贸易控制这个手段——帝国的真正意义所在，诸如牙买加、巴巴多斯或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不仅能给英国的船运和贸易带来增益，也很可能会把好处送给英国的死敌法国和荷兰。虽然1783年北美洲13个殖民地分离出去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并没能像大家预言的那样阻止英美贸易的极速扩张，直到1815年和平稳定到来之前对更自由的贸易的诉求都没有取得多少政治方面的进展。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被亚当·斯密抨击为“重商制度”的其实是几十年来生产者和商人获得的各种保护和特权的复合体，通过将其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这套制度确立了自身的正当性。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商主义已经逐渐瓦解。西印度群岛蔗糖产业的巨大利润一方面由于种植园主采取奴隶制而饱受道德方面的指责，另一方面则面临帝国其他地区种植园主们的严峻挑战，这些地区的成本比西印度地区要低得多，同时还使用“自由”劳工（这是个相对而言的说法）。英国的奴隶贸易已经终止—1807年正式被法律禁止，从1834年开始奴隶制本身也被废除。旧商业格局的第三个支柱是掌握了与印度及中国贸易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但是它恣意妄为地滥用特权，再加上被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赶出欧洲的商人们众怒难平，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撤销。20年后，公司又失去了它最赚钱的垄断权——从广东进口茶叶的特权。

一场商人起义促成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1793~1815年的世界性战争摧毁了作为英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几个帝国，打开了许多原本封闭的殖民地市场。1815年之后，英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和自由度前所未有地宽广。反对帝国贸易（即从殖民地进口商品至英国）保护政策和抗议致使物价居高不下的高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地贸易的特殊待遇和有关航运及海员的严格规定维系着英国的安全和繁荣这种说法在1815年之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在战后萧条时期还有个更大的危机威胁着英国的稳定，那就是食物的价格。粮食的高价造成了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了消费，继而降低了就业率，大批工人下岗，使得“贫困救济”系统更加捉襟见肘。政府的领袖人物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自由贸易的逻辑，却遭到保护主义拥护者的阻挠。自由贸易者们大力抨击所谓的《谷物法》（该法律规定粮食价格不到高位不得进口小麦）是土地贵族（即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滥用权力的结果，因为高粮价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这些贵族。更

糟糕的是，限制廉价食品进口被视为对快速增长的制造业上的双重征税：食品价格不降低，制造商们就无法降低工人们的工资、减少成本，而且也会赶跑那些意图用谷物交换英国商品的潜在顾客。这个观点的最负盛名的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者。李嘉图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从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商那里购买你所需要的商品，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用以集中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商品。这样才能将贸易和“效用”（从商品中获得满足和福利）最大化。

就这样，英国的重商主义赖以立足的旧规则和信念被一系列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各重商主义帝国的解体和工业化逐渐推翻。不过还是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政治危机才给自由贸易扫清了道路。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将蒸汽动力运用于纺纱和织布，或许让英国的制造商们节省了大笔成本，但在19世纪三四十年那种萧条的环境中，它似乎很可能让市场饱和，进而让制造商们破产。所以降低成本和寻找新买家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紧急。甚至连1841～1846年任首相的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也承认的确需要使农业和工业的利益“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尽管在1841年竞选时，他还是《谷物法》的支持者。直到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爆发才推翻了保守势力，粉碎了保护主义的靠山，废除了《谷物法》，也为19世纪50年代几乎完全废除贸易限制埋下了伏笔。幸运的是这次大饥荒与世界贸易大扩张同时发生，验证了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点：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昌盛的秘诀。

从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贸易是不是使得帝国成了多余？在西方世界，答案可能是“差不多，但也不完全是”。19世纪中期，英属西印度群岛从商业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了一潭死水，它已经落在了巴西、古巴和爪哇这些低成本蔗糖生产地之后。美国成了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世纪英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与亚洲贸易的总额）。兰开夏郡的纺织厂用美国南部奴隶们生产的原棉制造棉布——截至1914年都是英国出口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商品。美国人购买英国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但是他们顶住了开展自由贸易的压力。事实上对英国来说，老东北区（指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商业和制造区，纽约居于中心）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与伦敦和利物浦关系紧密。毫无疑问，利物浦靠与美国贸易为生。占据了棉产品贸易75%份额的也即最大公司是美国的布朗兄弟公司，由一个叫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的北爱尔兰移民建立。到了1810年，布朗兄弟公司设立了利物浦分部，由布朗的英国亲戚打理，负责管理棉产品的运输并出售赚得的汇票。1863年，公司的金融业务已经发展壮大到足以在伦敦金融城开设“布朗–希普利商业银行”——最大的美国贸易金融业务银行之一，也是巴林银行的劲敌。巴林银行的许多业务也来自大西洋彼岸：1803年拿破仑决定出售法属北美西部大片内陆时，正是巴林银行为杰斐逊融资购买路易斯安那；1846年当英美两国为“俄勒冈乡村地区”的所有权争执不下时，阿什伯顿（Ashburton）勋爵——也是巴林银行的人，被派去平息矛盾。在商人看来，帝国在北美的残留势力引起的嫌隙、美国人对英国发起的废奴运动的痛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的竞争关系（讽刺的是，美国人还怀疑英国对古巴有图谋）都说明了帝国是商业发展的阻碍而不是助力。

南美洲的情况稍有不同。随着巴西和前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放开，英国商人得以蜂拥而入。可是无论是组织返程贸易还是消除当地政治家和商人的疑虑都需要时间，当英国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使用海上力量向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时，英国商人们集体陈情请求英国停止施压，因为压力起到了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到头来是因为当地的地方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由于英国的坚持说服了南美各国政府放开贸易：一方面是因为有势力的地主急于找市场，另一方面，关税收入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只要是有地方特产且这种特产能被运回欧洲的地区，英国商人就会全力深入。安东尼·吉布斯公司在秘鲁稳稳地抓住了向英国运送作为肥料的海鸟粪的特许权；在巴西（彼时仍是奴隶国家），英国商人进军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蔗糖贸易；当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咖啡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大部分咖啡贸易是由本部设在里约热内卢的约翰斯顿斯公司掌控，而英资圣保罗铁路打通了海岸到咖啡产区的道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英国商号控制了大多数皮革和咸肉贸易。当19世纪七八十年代（紧跟着冻肉和谷物贸易）地区经济腾飞时，英国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当地提供贸易增长所需的银行、保险公司和铁路投资。

帝国的主要武器——英国的海上力量，也不是完全派不上用场，在它的帮助下，英国确保了欧洲各国复兴西班牙帝国的图谋胎死腹中。然而总的来说南美国家具备法律制度（得自殖民历史）和政治意愿来促进市场资本主义和支持开放经济。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占据特殊地位是因为当地经济缺乏信贷资金和商业情报，即对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的有关价格、市场和信用评级的信息匮乏。英国商人既有海外资金的渠道又有信息网络，实力显然更胜当地竞争者，也更有能力安全应对商品贸易的危机。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是加拿大，在这里，帝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作为英属美洲帝国仅存的部分，英属北美洲依赖于与帝国的关系。创建了独立的北部经济的商人们（绝大多数在苏格兰出生或者是苏格兰人的后裔）需要英国的帮助才能逃脱被南方富裕邻居商业兼并（或者干脆征服）的命运。英国开始自由贸易之前，他们的木材和谷物在英国市场享受着帝国特惠制。伦敦政府由于担心美国人的进攻而打算加强卫戍部队（19世纪60年代晚期前英国没有放松过警惕），所以乐意投资于区际铁路。1867～1873年确定了联邦制之后，在区际铁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干线铁路帮助加拿大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当地的中心城市——蒙特利尔的商人们希望将生意发展到内地，而伦敦政府手里掌握了关键区域：五大湖西北方广袤的、（基本上）空旷的土地。直到1869年，这里一直是哈得孙湾公司的领地。英国君主早在1660年就给哈得孙湾公司颁发了特许状，尽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是历任英国政府都保护了它的所有权。正是这片巨幅土地的低价出售再加上英国殖民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加入，1867年之后加拿大才成为真正意义上横贯大陆的自治领。

加拿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创造了集中在其经济中心蒙特利尔圣詹姆斯街（今天的圣雅克街）的商业和金融圈。蒙特利尔银行依靠其在伦敦

的关系网络吸纳信贷和资本，再将钱借贷给客户。它与哈得孙湾公司（该公司仍保留了在北美的商业团体和部分地产）的加拿大合伙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其中包括前皮革贸易商唐纳德·史密斯（Donald Smith），即后来的加拿大首富斯特拉思科纳（Strathcona）勋爵。截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银行最大的合作伙伴是总部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加太铁路竣工于1885年，这条铁路大动脉将加拿大东西海岸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拿大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主要由英国投资者提供经费修建而成。太平洋铁路公司使加拿大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变成蒙特利尔的殖民地，也靠着它才得以确保加拿大的经济能够独立于美国而存在。它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有效垄断横贯大陆的交通以及（尤其是）平原地区出产的出口英国的小麦。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理们梦想加太铁路能成为英国与东亚之间的必经之路，他们完全明白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命运取决于加拿大在帝国中的地位、加拿大对英国君主的忠诚度（对抗美国共和主义）以及流向加拿大的英国移民和资金。所以在战争期间，蒙特利尔的商业精英强调自己的英国特性并对加拿大的支柱——“与英国的关系”保持绝对的忠诚并不奇怪。

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写道：

> 对于欧洲的游客而言，没有哪个地方的吸引力能比得上新加坡的城镇和岛屿……虽然政府官员、卫戍部队和大商贾都是英国人，但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却是中国人。有些中国人是富商、内地的农业家，不过绝大多数是技工和劳工。本土的马来人通常是渔民或船夫，警察也主要由他们担任。有许多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在这里当文员，要不就是中小商人。来自西印度的大批克林人大多是伊斯兰教教徒，他们以及许多阿拉伯人多做些小买卖或者开商店。所有的马夫和洗衣工都是孟加拉人，还有一批人数极少但是声誉极高的帕西商人。除此之外，有一些爪哇水手和本地仆佣以及来自西里伯斯岛、巴厘岛和其他岛屿的贸易商。战舰、许多欧洲国家的贸易商船、成千上万的马来快速帆船、中国平底帆船……小渔船和小客船挤满了港口；城市里满是漂亮的公共建筑和教堂、清真寺、印度教寺庙、中国式寺院、美观的欧式房屋、巨大的仓库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老式克林和中国式集市，郊区布满了中国式和马来式小村舍。

这活脱脱就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小说中描述的世界。这里的商业生活与苏伊士地峡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差不多，截然不同于大西洋经济体。对于欧洲而言，东方的经济体遥不可及：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去往巴巴多斯旅程的三倍。往来于欧洲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由季风控制：3～10月季风将船只从好望角吹往北方，其他时间则将船只吹往南方。在开辟苏伊士运河之前，可以途经埃及和红海或者沿幼发拉底河往下航行至巴士拉和波斯湾运送邮件甚

至一些乘客（通常是逃往他乡躲避瘟疫的人）。但是到了苏伊士以东，横跨大西洋的航运在速度、规律性、便捷性和廉价性上都没有保证。这边没有奴隶经济，无法量产出口至大西洋彼岸的大批主要作物——棉花、蔗糖和咖啡，也没有大型移民社会。（19世纪60年代约有100万名白种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产羊毛和黄金，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经济更适合被当作大西洋经济体的独立部分看待。尽管他们的贸易和交流没有完全将亚洲排除在外，但是他们的确越来越专注于与英国的直接交易。）亚洲、阿拉伯和非洲商人掌握了海岸和内地贸易，而且他们的平底帆船、快速帆船和独桅帆船运送货物的价格只是欧洲船只的1/10，所以无论在何地，欧洲人都免不了要与他们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个世界里商人们需要更多的贸易技巧。五花八门的度量单位（例如印度的ruttees、mashas、拖拉、西尔和莫恩德——孟加拉的莫恩德是孟买的近4倍，中国的斤、担和两）、货币和交易方式（例如中国的银条是按鞋型的“银锭”出售）折射出一个古老复杂、与重商主义关系盘根错节的贸易世界，也反映出大范围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这与大西洋商业的简单明了相去甚远。和其他外来者一样，英国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他们之所以能适应这样的经济环境主要是因为印度。最早英国人是作为印度统治者——德里的莫卧儿王朝的特许经营者在印度做生意。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葡萄牙、荷兰、法国以及亚洲的商人。如果不是有对英贸易的垄断权，商业风险和运营费用早就让东印度公司破产好几次了。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公司贸易范围不断扩张（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繁荣了），公司不声不响地在印度海上站稳了脚跟并拥有了一只小型私人军队，与此同时公司的贸易伙伴——当地的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带来的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因而成了所有欧洲国家东印度公司中最强大的。当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地位被那位靠不住的统治者攻击时，公司在当地驻扎的人手开始着手把公司转型为具有军事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势力，首先是在孟加拉（从1765年开始），截至1820年，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掌控之下。18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阿瓦德，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两年后，在突如其来的印度民族起义之后，公司的统治草草收场，对印度的统治权（直到那时候在法律上还是模糊不清的）落入了英国君主的手中。

普拉西战役之后的100年间印度发生的殖民转变带来了许多商业上的转变。当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的纳瓦布手中接管财政收入时，它分出了部分岁入购买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印度棉纺织品，从此以后公司不再需要往印度运金银。对于公司员工来说这是棵摇钱树，高额工资、福利、公司的新权力所允许的私下交易填满了他们的钱包，有些人甚至因此成了富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被国内道德高尚的人和眼红的人大力抨击）为英国在亚洲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公司的特许状一直允许英国私营商人参与港脚贸易，即亚洲内部的地方贸易。公司的新财产对港脚贸易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新玩家冲着新机遇涌入东方，尤其是在一连串的扩张战争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需创造了很多新机会。第二，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也在寻找投资机遇，所以他们的收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

合法的）大幅推高了港脚贸易的可用资金。第三，公司用这些钱进行投资、监管款项、在投资者“退休”时安排把最后收益汇到英国，这些工作由“经营代理商行”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之后，“经营代理商行”组织管理了绝大部分英国的亚洲贸易。

经营代理商行是什么事都做的全能机构，它们是英国在信贷、远程合作和商业情报上所具备优势的典范。它们提供现金或信贷、充当旅游中介、监管种植园和其他英资商业投资、安排产品的买卖和欧洲“必需品”的进口、提供保险、拥有或租用船只、接受储蓄者的存款——收益率往往高得难以想象。但经营代理行并不是没有风险：在1829~1834年的那场危机中，几乎所有代理行都因为过度投机而倒闭。但是1861年，光在加尔各答就有约70家代理行。它们是英国商业扩张的先锋部队，并在所有可能控制当地贸易的地方建立了分支：缅甸、马来亚、新加坡、波斯湾和东非。例如在缅甸，仰光的经营代理行把控了高利润木材的出口贸易：它们被称为“柚木经办商”；在新加坡，它们买入胡椒、香料、樟脑（用于制作樟脑丸）、蜂蜡、咖啡、黑檀木、玳瑁、沙金和檀香木。分支机构的职员都是年轻的英国人，他们不愿意结婚，住在单身宿舍，无聊了就去找情妇、喝酒或者屠宰动物找乐。但是经营代理行也需要依赖大量的当地中间人，通常是阿拉伯、亚美尼亚、印度（多是帕西人）或中国的商人和投资者。只有这些当地人才能获得顾客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并应付一长串的掮客。复杂的各国度量衡对当地人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了解当地的货币，能够筹集当地信贷并给国外银行无法触及的生产商提供贷款。

英国在东方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取决于印度这个不可或缺的地区。英国与印度之间稳定的资金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印度政府支付给在英国本土投资者和领退休年金者的部分）为这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印度的海军和陆军，或者说英国人在这里招募的人力和资源，是英国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利器。正是孟买海军（后来的印度海军）把波斯湾变成了英国的“湖泊”，守卫着从巴士拉到卡拉奇和孟买的航线。孟买成了大多数伊朗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英国在东非的影响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影响：肯尼亚和乌干达早期殖民时代使用的货币都是卢比。公司（在伦敦政府的许可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攻打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尽管公司主管起初认为占领新加坡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引起纷争（今印度尼西亚于1815年被交还给荷兰人）——胜利的果实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最重要的是，还有中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起一直与中国开展贸易，它购买深受西方国家喜爱的丝绸和陶瓷。但是中国人对英国的商品并不十分感兴趣，英国人只能用美洲的白银支付中国商品（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巨大），中英贸易因而受阻。乍看之下，1760年后英国人对茶叶需求的急速增长使得中英贸易障碍更为加剧，然而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扮演的新角色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公司可以用印度的财政收入购买印度商品，例如原棉和靛青，而中国人也会购买这些印度产品。接下来公司又发现了印度西部和东部都出产鸦片，鸦片销售很快就变为政府垄断，占财政收

入的近1/5。英商在广东的贸易活动处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公司当然不敢在中国当局的眼皮底下出售鸦片，但是它可以把鸦片卖给在印度的港脚贸易商，再由他们把鸦片运往中国销售。一项重大的商业经营活动就这样被付诸行动。公司员工希望把在印度的收入寄回英国，于是与代理人们一起进驻加尔各答或孟买。这些资金继而被用于购买鸦片出口至中国换取茶叶（或者茶叶购买权），然后把茶叶出售给公司换得汇票，再去伦敦的公司总部把汇票兑换成英镑。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资金由印度流回了英国（有时用于在伦敦兑现的汇票是从前来购买茶叶的美洲商人那里买到的），对华贸易就此展开。后来公司丧失了中国贸易垄断权，自由贸易者接手贸易，鸦片贸易也导致了战争。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获胜，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海岸，把鸦片市场进一步扩大，并允许英国商人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通商口岸定居。于是，在通商口岸兴起了一个小型的外国商业社会——配有仓库的大型码头、航运代理商、银行、电报局、海关、俱乐部、单身宿舍和带阳台的住宅楼，应有尽有。约10 000名中国买办在管理与通商口岸之间的内地贸易，而能够提供短期“拆款”的中国钱庄对于通商口岸经济来说同外国银行一样重要。但是最早的胜利是由从印度派遣的军队和船只取得的，在1850~1911年中国动荡的年代里，通商口岸数量稀少的英国人也是去印度（以及香港的海军驻华分队基地）寻求保护。

印度以及它的英国统治者们对东方经济的影响在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的职业生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麦金农是个苏格兰人，出生于克莱德湾入海口的坎培尔敦。早年麦金农在格拉斯哥寻找发财的机会，他迈向成功的关键一步却是1846年作为一家公司（他哥哥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的代表去了加尔各答。只过了一两年他就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后来发展为麦金农——麦肯基公司的合作企业。1852年麦金农在格拉斯哥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管理棉纺织品出口业务。在与麦金农利物浦公司（他哥哥的公司）霍尔的合作下，他成了船运商，也有了自己的船只。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1852~1853年缅甸战争打开了仰光港和伊洛瓦底江贸易，麦金农创建了加尔各答及缅甸航运公司，为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埋下了种子。几年以后，另一家新成立的航运公司竞标印度东海岸的邮政合同。邮政合同以及它所附带的政府津贴是航运成功的关键所在：正是邮政把海上商业与帝国联系在一起。当麦金农1862年1月与巴特尔·弗里尔（Bartle Frere）爵士会面，他的成功便指日可待了。弗里尔即将当上孟买的总督，是印度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他决心在波斯湾加强孟买（和印度）的影响力、促进卡拉奇的贸易，在他看来，麦金农的轮船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理想工具。于是在费里尔的支持下，麦金农赢得了到波斯湾的邮政合同。揣着这笔经费（每年5.5万英镑政府津贴，总额超过100万英镑），麦金农把手头上杂七杂八的轮船与合同合并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新公司的名字很有派头——“英印轮船公司”。这家公司成了印度政府的官方承运商（负责运输军队和邮件）。到了19世纪70年代，加尔各答每5艘船里就有一艘属于英印轮船公司。麦金农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一直致力于寻找拓展这个海上帝国的方法。他尤其注重东非，因为作为一名虔诚的苏格兰人，他被利文斯通推广“基

督教、通商和文明”以消灭异教信仰、奴隶制（以及伊斯兰教教徒统治）的宏伟计划所吸引。而这次投资的悲惨结局是他的不列颠东非公司的失败，或许还加速了他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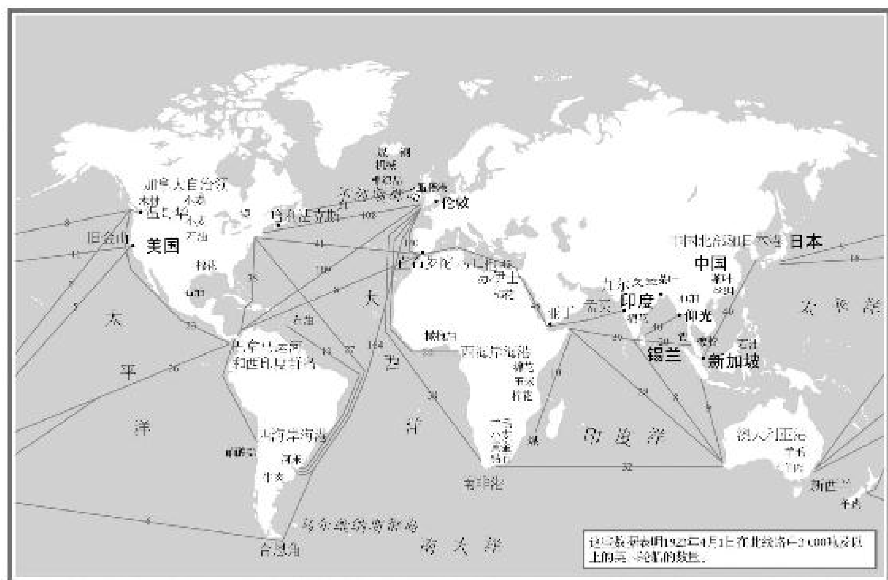


图6–2　1923年英国主要贸易路线和商品

帝国经济

当然，并不是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人独力塑造了东方经济。在广大的南洋海域，从纳塔尔到斐济，印度外来劳工（有些是签订了契约的短期劳工）对种植园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商人和放债人（例如跟着英国人去了缅甸的马德拉斯印度放贷者）对利润的要求比英国同行低得多，他们对商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他们深入亚洲和非洲那些欧洲商人疏忽或者忽略的地区。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竣工通航，东西方经济的联结更加紧密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甚至可以称得上全球经济，交通的进步和电报交流促进了市场融合，普通食品的价格也逐渐趋同，这或许是世界正在逐渐变为单一经济体的最好指示器。而且不仅商品流动增加了，1870年之后来自欧洲的资金流量，包括长期投资和投机性质的“热钱”也迅猛上涨。此外，虽然长距离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但从中国和印度来的移民数量也在增加。

然而对于英国人而言，全球经济的迅速扩张也是个预警，预示着工业和帝国两方面新的竞争对手崛起，尤其是德国。与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不同的是，这次经济全球化发生的背景是世界已经被殖民帝国瓜分完毕，而且，吞并没有“文明”政府统治的土地在这个时代里（在欧洲）被

视为完全合法合理。看起来亚洲和非洲地区商业活动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来代理商和市场的依赖会使这些前现代政权的统治加速衰落，成为地缘政治中新的不稳定区域。更雪上加霜的是，一旦世界贸易出现衰退，无论多么短暂都有可能鼓动强国要求设置贸易封锁区以确保自己的出口贸易在此区域内不受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些顾虑，一场挑战自由贸易、支持帝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运动开始了——用关税壁垒将大英帝国拱卫其中。这样一来，英国工业不会受到国外低成本生产商“倾销”的冲击，英国的就业率不会下降，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某位强烈支持关税改革的人曾称：英国的贫民窟正是不断深入自由贸易的产物。而且（通过降低打入帝国以外海外市场的压力）此举能减小英国与其他竞争者——如德国、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摩擦。

可是在1914年之前，英国选民极力反对关税改革。其中一大原因是不管关税改革派怎么争辩都不能否认全球化经济给英国财富创造了巨大增益的事实。世界贸易的增长，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英国的粮食进口量在1870~1912年之间增长了三倍），是个绝佳的机遇，创造了对长途运输系统的迫切需求，而英国人在运输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此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堪称天下无双，他们拥有无人可比的优势：轮船和铁路。的确，正是蒸汽动力带来的交通成本的大幅降低支撑了贸易的扩张。英属电报公司——例如原曼彻斯特棉花商人约翰·彭德（John Pender）创立的东方电报公司，掌控了商业信息的供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参与商品经济出口自己最占市场优势的产品、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它们对外汇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商、船舶经纪人以及铁路、港口、船只和电报等硬件的需求与日俱增。英国人恰好在这些服务上一直遥遥领先，他们可以通过提供服务在新增贸易上收取丰厚的佣金。最重要的是，新世界经济要求调动额外的资金来修筑新铁路、开展新城市的建设（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上海）、开发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橡胶、锡、铜、金）。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伦敦获得了在全球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的伦敦指的不是伦敦白厅，而是伦敦金融城——位于斯特兰德大街的另一端，占地约一平方英里的商业中心。[1]金融城有限的几条街道、小道、巷子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办公室：清算银行、零售银行、商人银行、海外银行、保险公司、印度铁路公司和南美铁路公司、运输公司、船舶经纪人、著名的对华贸易公司怡和公司、普通商品（如蔗糖）和特殊商品（如人的头发）贸易商、大型帝国公司（如位于伦敦墙路的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以及大量高级专家，如采矿工程师。金融城的两大支柱是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边上坐落着几个码头——伦敦码头、萨里码头、莱姆豪斯码头、西印度码头、东印度码头、米尔瓦尔码头和维多利亚码头。所有这一切象征着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信贷的提供者和海外投资的来源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商业活动。无数商品被运往伦敦，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需要为工业进口大量粮食和原料，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由贸易——商品先运到伦敦再转出口至欧洲的其他市场。专业交易者和商人云集于此，他们对商品进行检验、重新包装、拍卖和出售。但是伦敦还有许多商业交易涉及并未到达伦敦

或其他英国港口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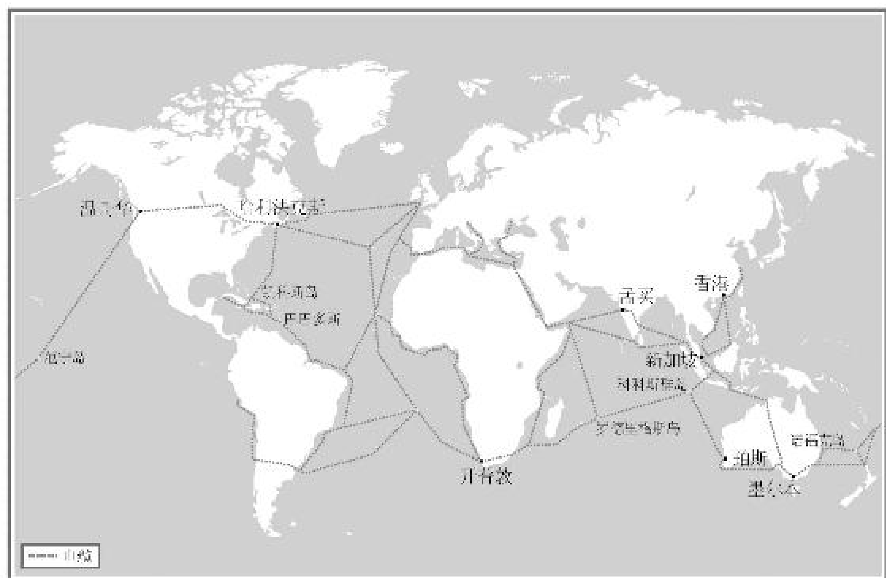


图6–3　1929年英国海底电缆系统

这是因为为了在双边贸易中减少不便、降低成本、缩短延期，世界贸易中很大一部分商业交易使用了“伦敦汇票”。例如，如果A国的商人想从B国购买商品，他可能发现要做成生意并不容易，因为除非两国的进出口基本持平，否则他没办法用钱或者产品进行交易。对于B国的商人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双方需要的是一种共同的结算代币，这种代币必须通用。伦敦汇票满足了这种需求。拿到汇票的人都确信它能在伦敦兑换成任何一种世界货币，或者用于交换他们想要购买的货物。伦敦金融城的交易规模保证了现金和货物的供给，其复杂的商业系统（有偿的）提供了保障。这套系统又依赖于存款池和被不断填充的商人银行提供的短、中、长期信贷款项以及襄助贸易的“承兑公司”。看似杂无头绪的这一套系统之上的主持者是信贷的最大掌控者英格兰银行，它的“银行利率”决定了借贷的成本，从而决定了做生意的成本。英格兰银行是伦敦金融城声誉的守卫者，最重要的是，伦敦汇票的价值基础是商人们对它的信任，英格兰银行则守护了这份信任、保证了汇票的价值。由于（到1913年为止）60%的伦敦汇票牵涉到英国以外的第三方商品交易，伦敦金融城故而对这份信任不得不厚而待之。

伦敦虽然用的是纸币，但是它的货币基础却是黄金。对伦敦汇票信心的终极保障是伦敦（以及英国）对“金本位制”的坚持，这意味着需要满足三个要求。第一，英镑相对于黄金有固定的价值，在需要时可以被兑换为黄金（金币）。第二，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钞票的发行和银行黄金储备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的限制：约3英镑纸币等同于1磅黄金。如此一来，完全排除了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而造成货币贬值或“量化宽松”的可能性，这对为金融城提供了大量流动资金的外国英镑持有者来说

是一剂重要的宽心药。第三，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时必须用黄金支付，这自然导致可用货币的减少和银行利率的上升（又会吸引国外存款人）。事实上，伦敦可以相对轻松地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部分原因是1890年之后在南非兰特、西澳大利亚、育空和其他地区发现的大量金矿导致世界黄金供应量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伦敦能够说服绝大多数欧洲以外的贸易伙伴接受相同的规定，有时候这对他们来说相当痛苦。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想错过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贸易大发展。在小麦、玉米、蔗糖、棉花以及无数其他产品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信誉就是一切。拒绝金本位制就可能沦落至三流的角色。事实上到了1913年有28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另有11个国家共计近9亿人口声称自己实行的是金本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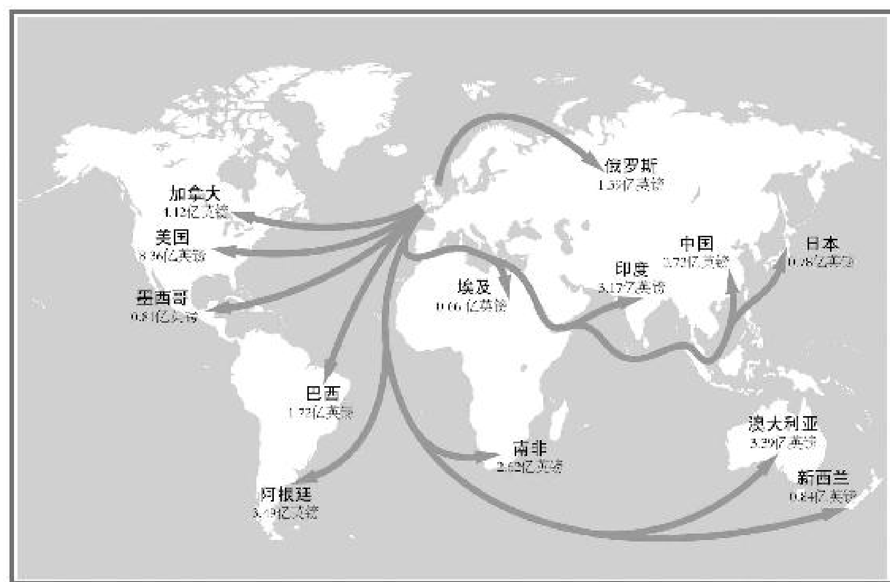


图**6–4**　截至**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

伦敦金融城还有一个诱惑物可以抛出。如果欧洲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经济体急需信贷，那么他们也一定渴求资金以建设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往市场。截至1913年，伦敦大概筹措了全世界半数的外国投资。无论是建筑铁路、挖矿、还是开设种植园，第一步要做的都是为在伦敦发行股票编写计划书。如果运气好（再加上伦敦不太审慎的金融媒体美言几句），股票就能在证券交易所发行，生意也就能开始启动了。未知因素太多，硬信息又太少（常用的策略是征募人员加入董事会充当“小白鼠”造成稳健可靠的假象），谨慎的投资者们倾向于熟悉的技术和“坚挺”的、可兑换的、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如果废除金本位，或者不采用金本位，即使是在新的资金必定能为资金借入国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也可能造成投资紧缺。金本位的保障对于英国投资者将超过1/3的英国总资产（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投到国外起到了助力作用。

伦敦所聚集的商业活动造成了非凡的结果。当然，英国仍然是个以

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它所生产产品的1/4向海外市场出口，棉纺织品（约占总出口1/4）仍然是英国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英国的世界最大商业中心的地位给它带来了最多的财富增长。来自商业服务（如运输、保险等）的隐形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13年增长了约70%，在最高峰期，它为英国赚取了相当于出口收入1/3的收益。1900~1913年，英国在海外的投资由20亿英镑翻了一倍，达到40亿英镑，也带来了同样惊人的海外收益。二者共同保证了国际收支的巨大盈余，而可用于海外再投资的资金也因此不断增长。1914年前已经有迹象表明经济繁荣在逐渐消失，却毫无迹象表明英国人将会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似乎英国人已经是大英帝国乃至“非欧洲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商业繁荣不可或缺的部分。伦敦金融城为世界地图上标为红色的帝国版图增加了一个用债务黏聚、用黄金捍卫的经济帝国。

商业帝国

英国人已经构建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帝国，包含了一个由铁路、电报、电车轨道、供水系统、银行、仓库、码头、矿山和种植园组成的产业帝国。但是他们的商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这个工具——包括通过炮艇和卫戍部队投射出的帝国武力、帝国的统治以及帝国安插的霸占当地资源的外人。答案当然不一而足，视地点而定。英国人给南美洲诸国提供了许多借款，但是但凡可以不动用武力（例如19世纪90年代早期秘鲁的情况），就算是最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有武力干涉的念头，不会动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兵那些劳民伤财的手段”。金融纪律并不是由唐宁街的命令强制执行，而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伦敦的总部“新庭”悄无声息地维持着。在享受内政绝对自治的“白人自治领”，与其说是它们自愿从属于帝国，不如说是它们与帝国积极合作的意愿（以及熟悉的制度和品味）让它们成了英国投资和出口的理想地。但是在欧洲和美洲以外的世界，完全可以说英国贸易需要帝国，或者说由于帝国的存在，英国贸易获益良多。

例如在中国，毋庸置疑，英国以及其他外商如履薄冰。借助武力，他们先是进入中国港口，然后进入内地市场，并通过不时地显示海军军事实力维持自己的威慑力：无处不在的英国炮艇管辖着中国的主要河流和海岸。在中国的英国人深知如果没有通商口岸（在此不受中国税务和法律的制约，外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没有压制中国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多由英国人供职的控制着港口、提供航标的中国海关税务司，他们的生意将无法继续。至少对英国人来说，香港殖民地是中国的直布罗陀，万一事态失控，至少在这里还有最后的安全保障。1899~1901年义和团运动证实了这些“中国通”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支由俄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冲入中国解“北京之围”，援救一小群被义和团包围的西方人。义和团被剿灭，但是伦敦也得出了一个沮丧的结论：其他列强的军队抵华，他们的海军和

陆军无疑也能威慑北京政府，这意味着英国的在华商业需要无限期地借助帝国的帮助。

在非洲，帝国的作用又要不同。在西非，英国人有时使用武力打开贸易通道，强行推行摄政政体以抢占法国帝国关税壁垒之后的潜在价值市场。在东非、中非和南非，帝国的商业意义更加直接。尽管关于非洲的宝藏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但是欧洲人很快发现恶劣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以及交通的困难给发掘财富带来的不便：19世纪90年代中期，从桑给巴尔地区到乌干达需要两个月的“步行”路程。这必然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要积累财富就必须依靠高压统治，至少要达到外来殖民者要求的程度。高压统治意味着可以没收土地、强征劳工，这两者通常同时发生。因此殖民统治对白人统治阶层来说是经济控制的工具：它可以把大块移民定居区域与原住民保留区分割开来，也能征收赋税迫使非洲男性在南部非洲中部地区的农场或者钻石、煤炭、黄金矿区找工作，以满足殖民者对廉价外来劳工的贪婪需求。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无数的非洲男性就被推进了工业世界的辛苦体力劳动，住进了像监狱一样的围地（吃睡都在里面），还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工作纪律——被殴打是家常便饭。例如，南罗德西亚矿区的工作条件恶劣得令人发指。事故、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1906年每1 000个劳工里就有76人死亡（英格兰是16.5人）。非洲人被白人踢死或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白人）陪审团更喜欢将死因判定为“脾肿大”并宣告被告无罪，这种死因出奇地常见。然而直到1914年人们几乎普遍接受了只有白人的统治才能保证经济进步这个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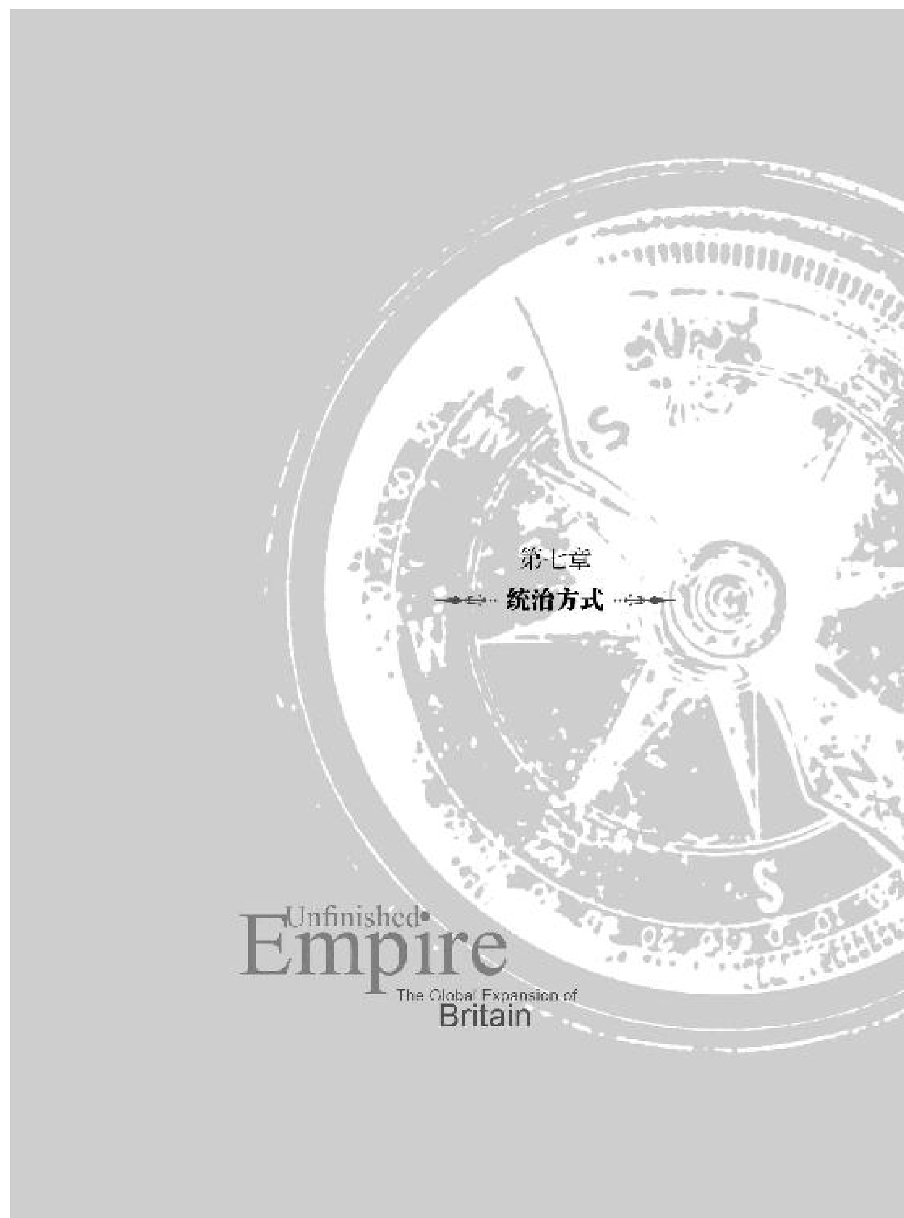
最关键的例子还是印度。如前所述，印度是英国商业进驻亚洲的平台。印度商人和人力是英国商业的辅助力量，有的时候甚至是主要力量。然而印度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它还吸收了绝大部分英国主要出口品——棉布。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统治撬开了它的边境、禁止它实行保护本土纺织品商人的关税政策，而且也因为英国人不断修建更多铁路（用印度的钱）打开它的市场。没有理由认为自治的印度也会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如果印度自治，结果很可能会截然相反。经济情况越来越复杂。印度的大型英国卫戍部队、英国官员的退休金以及印度向伦敦借贷的用于修建铁路的资金，有时并不是出于经济或战略方面的实用性，而纯粹是为了借贷产生的利润，这使得印度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债务人。印度每年用在非英国市场赚得的外汇偿还这些债务。所谓的“国债”（又称“本国费”[2]）把印度的美元和马克（帝国统治的间接红利）输往伦敦，帮助伦敦弥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亏空，对于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是个宝贵的支持。为了保险起见，在世纪之交，卢比的价值被谨慎地设为与英镑价值挂钩。实际上英国人已经吞并了印度经济中能够加强他们的全球经济地位的那些部分。

但是在这个帝国与财富的故事中还缺了一环。关于英国的世界地位，一些敏锐的观察家认为，真正的秘诀是煤。被某位作家称为英国的“黑印度”和另一位作家称为英国的“力量腰带”的是成千上万的煤田，它们为廉价能源提供了充足的源泉，也是英国相对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

富国的一大优势。煤不只是内部资源，截至1913年，它已经成了英国的第三大出口品。煤的出口远至阿根廷，帮助了英国运输业维持盈利。但是煤老大的统治（正如悲观论者所告诫的）不可能万古长青，挖掘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它的地位也很快就受到了石油的威胁。1914年之后，以煤炭为基础、以贸易为生命线的帝国将进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的主要资产将开始不断缩水。

[1] 斯特兰德大街一端为特拉法尔加海战广场，广场以东坐落着英国议会和政府诸多部门，是英国的政治中心。——译者注

[2] 这是加给印度的一种赋税，用于支付英国行政的开支和印度英国殖民政府所欠债务的利息。——译者注



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克·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在其于1915年出版的战时宣传册《中欧》里评论了

（嫉妒地提及）“英帝国主义的非系统性特征”。他写道：“英国的‘海上帝国和殖民帝国’散乱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缺少系统性的组织方式，如同英属世界每一个部分的历史和它们被占领的过程一样……英国人的灵活性就存在于这其中：我们称之为原则，英帝国把其当作操作方式，其领导者具有天生的冷静和适应能力，以及不可动摇的自信……”

这是一个恭维却又深刻的描述。相反，帝国统治的常见形象，就像留着大胡须，穿着短裤的巨人借由意志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愤慨的人民，这其实是一种合意的（或者不合意的）虚构，但我们仍不难发现这常常被标榜为所谓的“历史”，真是令人唏嘘。这样一来，一个标准化了的权力机构的假象形成了，它由伦敦作为中枢展开指挥和控制。而事实绝不是如此。首当其冲的破绽便是大英帝国属地惊人的规模和多样性。到1913年止，1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效忠于英国政府（这还是在把600个左右的印度土邦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历经了几个世纪，这些国家最终成了大英帝国麾下的疆土。它们几乎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多样性，与此同时，其内部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达到了极致。沙漠居民和游牧民，山区居民和部落，矿工、森林居民和渔民团体（比如在纽芬兰），被禁锢于水稻栽培的桎梏中的农民（正如在缅甸三角洲地区）和在温带的自治领的自耕农，奴隶主和奴隶（19世纪30年代以前），种植园经济中的工人和雇主，工业社会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或者更复杂的多样性都能在这个包括了世界许多最大城市以及一些穷乡僻壤的帝国中体现出来。如果说帝国的统治（也许是“施加影响”）目标是达到最低水平的凝聚力和秩序，其践行者不需要审视统治规则，只需要掌握像马基维利所宣扬的统治佛罗伦萨所需的政治手段即可。

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英国在每一个声称对其有某种权威的社会里都面临着它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深藏于宗教信仰的伪装之下，有时则公开进行激烈的抗争活动。“传统”规定了在地方精英眼中何种形式的权力是合法的，好的统治标准是什么样的以及对私人和宗教事务干涉的限度。有意或无意地打破这些规则都有可能是在冒险，甚至导致更糟的结果。在某些情形下，这意味着给予那些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很大的自主权，而这些人通常都声称自己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又或者，这意味着将移民和定居者的权利赋予代议政府或使用英国法律而非当地法律来管理这些人。再者，这样做要求对割让条约或征服中规定的权利进行认真的遵守——这也是在魁北克或前荷属圭亚那的模式。

如果英国政府试图更进一步将单一的统治模式强加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面临激烈的抵抗。若没有征服的计划来彻底重塑这些地区的政治格局，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英国人并不反对大规模的高压政治，但他们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从当地资源（就像在印度一样）得到支持，他们就会对其系统性的开发应用表现得漠不关心。事实上（就如我们所见），纵观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领土割让条约进行扩张，通常借由一些强制手段或移民的迁徙进行攫取。这两者的逻辑都是基于权力的下放。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最终会和当地的权力经纪

人妥协以维护他们的权威并且尽快降低军费。在第二种情形下，他们被逼迫着尽快赋予殖民社群内部自治，殖民社群认为自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粗暴的镇压（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阴影下）令这些宣布了对"与英国的关系"保持忠诚的殖民社群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说只要小心谨慎和耍政治手腕就能确保成功，那么统治一个帝国再容易不过，并且帝国的寿命也会长得多。可就像大多数涉及范围极广的行动一样，帝国的统治往往没那么简单。一个经过一致同意的、条理分明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帝国政策常常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唯一的舵手来驾驶帝国这艘大船。相反，因为统治依靠许多代理人和盟友，太多人互相角力想要掌舵，结果是使得帝国这艘大船看起来左右摇摆呈之字形甚至是U形。另一部分原因是，追求帝国权威的行动常常是相冲突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举例来说，很明显一个有效的统治体系需要强大的收入基础，这也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末美国殖民地的印花税事件到19世纪90年代末塞拉利昂的小屋税务战，英国一再认识到增加新税种会迅速激起反抗。为了维持权力就必须收敛野心：殖民国家不得做过多出格的事情以防其彻底崩塌。同样的抑制因素限制了其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一种观点认为，很明显，如果殖民经济对于英国是有利的，或者能抵偿统治产生的管理花费，那么就应该让它更具活力。不论英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默默地促进自由贸易并培养符合资本家需要的习惯。在各个地方（正如在缅甸和肯尼亚），他们向移入的商人和农民发放执照以鼓励其种植经济作物。但是创造"现代"经济的做法，比如西方产权观念的灌输、自由市场的实施或不限制外国人定居者、种植园主和商人自由发展被英国当局一再地拒绝。因为他们害怕激怒自身所依仗的地方精英。他们对于冒犯当地宗教信仰或广泛支持基督教的传教都感到顾虑重重，尽管他们怀疑，理性地说，伊斯兰教（举个例子）是站不住脚的，印度教是迷信与无知的产物。

因此虽然英国的"政策"走向主要是在伦敦形成的，但并非不考虑地方局势的变化，也留给殖民地官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对殖民地事务实施有效监管，那么任何其他行动都很难展开。这部分是由于"蜗牛般的通信速度"。1774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道："在命令与实施之间，大海翻滚，时光飞逝。"那个时期前往美国殖民地的航行需要13个星期，最少也要4个星期。"在如此大的帝国里，"他告诫同胞们，"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权力的运行效率一定差得多……这是永恒不变的状态，也是这个幅员辽阔而又互不相连的帝国的永恒法则。"在汽船问世以前，发送指令和收到回复之间，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运送邮件的汽船（和铁路）的出现逐渐将时间降低至数星期（到1911年止，到加尔各答需要19天、开普敦20天、新加坡23天、悉尼34天、惠灵顿47天），当电报普及后，这一时间甚至缩短至几小时（尽管由于费用的原因这一方式并不被提倡）。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来管辖帝国事务。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伦敦对帝国的监管被分成了6个部门。大多数殖民地（不是所有）归殖民部监管。19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非洲保护国以及埃及（1882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

苏丹以及在中国通商口岸里的租界（不是香港）起初受外交部管辖。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拥有专门的印度事务部，印度总督受其管辖。总督（有自己的外事办公室）要管理英国在波斯湾、伊朗南部、阿富汗和西藏的利益，与此同时还要治理亚丁和缅甸，帝国在东方的大部分事务也属于其职责范围。其他部门也染指帝国事务这块大馅饼。海军部负责外部防御，这让陆军部格外眼红。陆军部拥有少量的英国步兵营，这是帝国权力重要的储备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在白厅虎视眈眈之下。到19世纪中期，减少公债的不懈努力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财政部推到了顶点。“财政部的爵士们”认为海外开支是下一个需要钳制的项目。他们毫不掩饰对恳求者的公开藐视，寄往陆军部的公文有时只有几个字：其含义不言而喻。就像英国在尼日利亚北部统治的前几年一样，地方财政申请补贴以补足行政管理的开支，为了表示不满，财政部对其实行报复性的“财政控制”：每一项花销，精确到一便士都需要英国政府的批准，且审批过程相当之久，这使得那些不幸的英国官员看到数据后在帐篷里汗流不止，甚至被其逼至崩溃或借酒浇愁。

在这些条件下，伦敦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不是不可能，但的确是极其困难的。不同部门之间重叠的管理范围使得合作变得十分必要。当合作不能达成的时候，争端就得交给内阁来处理，而内阁在夏天也许有几星期的时间都不会召开会议。对于涉及的有关部门，最坏的结果也许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事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在英国生活，它们常常由商人、传教士、人道主义者、前任官员（印度熟手）和移民社群的代表组成。他们常常激昂地四处游说，但收效甚微。这些人在英国不大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其争吵和不满是遥不可及且晦涩难懂的。不过有两点会使他们的抱怨变得更加危险。倘若他们足够团结到高呼殖民地处于危险当中，又或者他们能发现牵动着维多利亚道德底线的那根弦——奴隶制度，强制劳动，金融违规或公娼，他们就可能引发一场骚乱。媒体会变得活跃起来，对议会的盘问会随之而来，某位内阁大臣很可能会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更糟的情况是殖民地爆发动乱或起义，或军事冲突。之后媒体的纠缠可能会持续数星期，而内阁只能空口无凭地承诺已经采取及时的行动控制住了局面。这对于被牵涉的殖民官员来说是面临最大危险的时刻。如果他的失误让某位大臣难堪，其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他也许会在公开急件中被告知，这位大人物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这样的谴责足以对其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将其名字从晋升名单中剔除——尼日利亚北部一位杰出官员就曾经亲身遭遇过这样的经历。又或者他可能会被免职。

殖民部所管辖的帝国包括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动荡的南非，旧西印度殖民地、新近吞并的热带非洲地区（1880年以后）、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一长串较小的属地。这就是殖民部之所以更倾向于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行动的原因。殖民部人力资源稀少：到1914年止，高级官员只有30多人。随着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度的废除，其最辉煌的时刻转瞬即逝——废除奴隶制是其面对不满的移民和种植园主强行推行

的一项重大政策。随着自由贸易的开始，帝国放弃了控制殖民地经济的任何尝试。帝国主要忙于为其形形色色的附属领地选定总督，草拟指示（避免其过分活跃）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以防不测。如果总督越权或（举个例子）容忍奴隶交易和奴隶制度，就会被申饬甚至免职。总督对新法律出台、经费增加、建立新军队或疆域扩张的要求有可能得到同意但更有可能被拒绝。若一个总督背后有靠山，或在媒体里有眼线，或知道利用中枢官员对其所提供情报的依赖，那么他就很难被控制且更别说失去官职。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英国掌控了一个东拼西凑的帝国，帝国里充满了矛盾和奇事，英国的统治时好时坏。帝国的发展虽不稳定但十分迅速。但到19世纪中期，三种不同模式的统治（广义上来说）在三个不同的帝国运作：移民殖民帝国，印度帝国和直辖殖民地帝国（大多数殖民地归属于此大类）。

移民政治

在殖民地的所有民族中，白人移民最难统治，并且给伦敦造成了最多的麻烦。“所有人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事务的干涉只是在添乱，为了避免受到干涉可以采取各种让步和安排，这么做也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说道。他是一位强硬的知识产权律师，并于1836～1848年期间担任殖民部的高级官员。斯蒂芬的外号叫作“比大臣更大臣的斯蒂芬”，这个外号掩盖了他的洞察力，他坚持认为伦敦的干涉常常造成不愉快的结局：“我们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的这些看法主要是针对移民殖民地，而大英帝国的历史中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就像我们之前所见，那些自1607年后移居到美洲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具有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成立代议政府。伦敦政府不仅完全没有否认此种诉求，更是在一系列的宪章中承认这种权利，于是代议机构开始在种植园里涌现。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权力仍然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以及咨议会里由总督亲手选定的咨议员的手中。而事实是，权力的天平并未向他们倾斜，因为民选议会控制了开支，总督得不到资助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到17世纪90年代，英国本土的帝国政府对令人烦恼的殖民地采取了“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任他们处理自己的政治。主要在美洲进行的七年战争（1756～1763）花销巨大，这导致了一种新局面。然而当伦敦敦促美洲民众分担帝国的支出（尤其是帝国庞大的战争债）并设法征收这笔钱时，却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论战，对暴政的指控以及暴力抵抗。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守备部队驻扎的地方，帝国权威彻底崩塌。1781年10月，康华里的军队在约克镇投降之时，帝国的权威完全消失了。

失去北美13块殖民地的打击迫使英国反思。在英帝国在北美的残余部分，即今加拿大东部，伦敦设法通过两种方式支持总督。第一，政府通过授予土地来创造忠心的“贵族阶层”。第二，政府资助其精神盟友圣公会。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说英语的移民憎恶腐败的寡头政治，也厌恶对神职人员保留地的分配不公（圣公会信徒是少数）。在说法语和信奉天主教的下加拿大（今魁北克），宗教仇恨使得这些不平越发强烈。1837年，随着经济萧条日趋严重，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叛乱：说英语的移民所在地上加拿大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起义；下加拿大的叛乱更加持久且惨烈。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省份控制了进出内陆的通道，镇压叛乱需要强大的军队力量。这次危机发生之时，恰逢地中海东部爆发危机，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及关乎比利时未来的一场外交行动之时。英国担心下加拿大变成另一个爱尔兰（叛乱与天主教），因此，必须有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对策的出台需要一些时间。1839年德拉姆（Durham）勋爵领导的委员会发布了报告。德拉姆说道，最佳方案是让英国人大规模移民以压倒恼人的法国人，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他更著名的声明是谴责代议政府的形式是徒劳且不可行的。正如同行政机关不能控制议会，议会也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两者皆会导致政府的软弱。因为当选的议员从来不办公，他们几乎没有欲望展现自制力和判断力。他们不但不给选民提供一个实际的方案，反而成了不负责任的蛊惑民情的议员，对政治秩序造成破坏。应该利用这些人的力量使政府变得更加有秩序。德拉姆的结论是简单的：当选的议员应该组成政府部门（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议会应该有权力开除他们。这是“自治政府”的萌芽，从那一刻起也成为所有英属移民社会的护身符，起到了类似宪法的作用。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移民议员很满意能够在地方事务上几乎获得完全自治。帝国政府只需掌控真正属于帝国的事务：对外事务、国防和宪法的制定。留给移民领导层最重要的事情是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德拉姆的策略过了将近10年才得以实行。伦敦拒绝了权力的划分，德拉姆认为这是危险的做法。总督设法在本地获取支持并成为党派领导。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们面临了由“英语派”和“法语派”的议员组成的同盟，这些人决定夺取实际的行政权力。伦敦屈服了。此后，只有得到了议会支持的议员才能成为咨议会的一员，一旦失去议会支持，他就会被剔除。但是这种制度在加拿大的新省面临巨大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就位，这个新的省是由说英语的上加拿大和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组成的准联邦。总督手下的新部长提议，为那些在1837～1838年动乱期间遭受损失的人进行赔偿，甚至包括（有争议的部分）叛乱的支持者。一场暴风雨来临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者大怒，要求总督必须否决那些不忠的议案，接着便爆发了骚乱和纵火行为，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但是总督埃尔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他否决了议案并告知伦敦政府，他手下的部长们就会辞职且谴责他处事不公。自治政府本想避免的危机又猛烈袭来。若总督想要维持与英国的关系——与帝国及国王的联系，这是超越政党的，总督就必须按照部长们的建议行事，因为他们是议会里的多数党。总督于1849年4月告知殖民部：“如果我不能恢复几个竞争党派之间

的中立性——这是我通过不懈的努力想要维持的状态，那么我也许应该被撤职了……”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久之后，在1850~1852年期间，伦敦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也应该建立自治政府。

让人惊讶的也许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会如此坚持自治，而且为了实现自身的诉求会变得如此咄咄逼人。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极难控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们的这种特点也不是那么让人费解。移民社群很难被欺凌，他们往往比非移民社群更具组织性，并且能熟练使用从本土借鉴而来的机构——协会、政党以及最为重要的媒体。其次，在本地保留民兵的传统意味着许多移民拥有武器：伦敦从未享受过对武力的垄断。第三，即使他们这样做了，用处依旧不大。移民社会的标志是他们与本土有大范围的联系，他们在那里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与本土有宗教和商业交流。因而，对移民社会采用暴力压制（比如1776~1783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可以忽视移民中间的政治活跃分子，这就如同认为白厅的官员能处理英国扩张的事宜一般，是十分荒谬的。他们认为只有本地的移民才能了解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或是在新西兰的利益以及如何推进这些利益。是移民体现了英国的真正美德，展现了真正的英国爱国主义，捍卫了英国的“天命”。[1]移民对帝国的看法在本土慢慢发展，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广泛接纳。

但即使对于有移民社群的殖民地而言，自治政府的设立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有太多的复杂因素可能导致这种做法很危险甚至不可行。这有可能是因为移民或种植园主人数太少，而他们却面对大量的原住民、奴隶或者自由的黑人。基于这类原因，伦敦在特立尼达岛、斯里兰卡和香港阻止了任何形式的代议政府的设立。这种糟糕情况来自一个有理有据的怀疑，一位总督这样说道：“高人一等的种族在农业和商业上的利益一定会和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产生冲突。”这意味着移民会将原住民的土地据为己有，把他们变成农奴，甚至设法消灭他们。撇开本土的人道主义者可能会为“奴隶劳工”呼吁的风险，移民压迫常常潜藏着大范围起义的危险，英国殖民军得像消防队一样迅速集结。第三个复杂因素出现在那些边界还没有确定的殖民地，以及混乱与暴力丛生的地方。如果规模大到本地的移民民兵无法对付，而且将英国殖民军也卷了进来，移民议员对内部安全问题的决定权就被剥夺了，以免他们浪费或滥用英国宝贵的军事力量资源。最后，移民驻地只是殖民权威管辖的一部分，后者管辖的范围还包括了原住民保护国或者间接统治的地区，允许移民实行自治可能会削弱总督在非移民聚居区的地位。

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白人移民者占少数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原住居民与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两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隔阂。但是白人拥有的物质力量明显占优势，而且伦敦自身遵循“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2]的信条，所以原住民没有土地权。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军撤回但并未限制白人对原住民土地的扩张和侵占。新西兰的情况则不同。在新西兰，毛利人拥有在怀唐伊签署的割让条约里保证的土地权。但毛利人依然全副武装，而且他们在某些地方面对的不仅是与少数移民的对抗。伦敦官方认为移民的存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厌恶他们需要依

靠伦敦的帮扶来扩张殖民地的做法。殖民部认为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移民或白人（尤指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限定在一系列圈起来的土地上，然后将新西兰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毛利人聚集的北岛）作为“原住民保护国”，通过地方行政官来统治，地方行政官仅听命于总督而不是移民中的政客。因此，自治政府被准许成立了，但是英国政府与毛利人的关系也因此受阻。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解决办法。白人迅速激增，许多毛利人的土地被出售。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野心勃勃且自信满满的总督乔治·格雷与毛利人展开了战争，以此来树立权威，他派遣了10 000名英国士兵参战，移民也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战争。尽管毛利人最终保留了一部分权利，但白种人的胜利却确保了新西兰到1870年已经成了白人的国家，移民的权力不再被来自伦敦的监管所束缚。

最极端的例子非南非莫属。在南非，每一种复杂性都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了。当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取了开普殖民地以保卫他们前往印度的航路，他们误打误撞地陷入了这片充满冲突的大陆。英国人向本地白人表示拒绝成立代议政府的决定，部分原因是本地白人是荷兰人（他们未必很忠诚），部分原因是对黑人劳工的待遇实施新规，以及废除奴隶制度受到了本地白人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很快发现，将自治政府交给少数移民的做法使他们面临了更加强烈的反对。开普的东部边界是野蛮的战争地带，在那里，荷兰裔南非白人（布尔人）和科萨人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些大规模冲突被白人称为“卡菲尔[3]战争”。当英国殖民军受命保卫边界时（1812年在格雷厄姆斯敦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据点），毫无疑问，移民在殖民地与非洲邻居的关系中拥有绝对发言权。之后问题变得更严峻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臭名昭著的“大迁徙”过程中，心怀不满的布尔农民从侧翼包抄科萨人占有的土地，他们首先向东北方向前进到纳塔尔，当英国占领了纳塔尔后，布尔人又回到了郁郁葱葱的高地草原腹地。布尔人的组织结构是比较原始的（在布尔人派系的纷争中，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出现了），但是他们的火力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骑在马背上的步枪手组成的“突击队”声称对高原草地拥有主权，他们把黑人赶到所谓的“定点位置”，然后征召劳工。结果将南非这片大陆变成了一片广袤且混乱的疆域，黑人在这里如同白人一样，被到处折磨，互相倾轧。英国总督遥望这片大陆的一角，首先被殖民者的无能惹怒了。有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确定：将控制权交给白人——老资格的荷兰人或者（少数）新来的英国人，将会导致一场灾难。

19世纪中期后，静观其变不再是一种选择。在开普的白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就像在其他的移民社群一样。1853年，他们被允许成立了议会，但是议会没有行政权力。伦敦采取了直截了当的策略。“如果殖民者不允许他们自身被统治……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统治的责任。”一位殖民大臣不耐烦地说道。一旦他们照做了，英国殖民军就可以回家了，保卫疆域的任务就落到了移民的肩上。事实上，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伦敦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殖民地为监管非洲人聚居区（包括今西斯凯，特兰斯凯和莱索托）埋单。这些地区是被英国渐渐纳入帝国保护之下的，督拥在这些边界地区总有作为“高级专员”的特殊权威。当1867年发现钻石后，殖民地经济便开始复苏，英国政府设想了一个完美但不具有可操

作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建立一个南部非洲联邦。对所有非洲民族而言，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出台的和谐政策，目的是为了确保疆域的和平。对加拿大模式的借鉴让南非成为一个英属的进步的、可靠的和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两个北方的布尔人共和国的反抗使得这个计划流产了，强硬的布尔勇士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为德兰士瓦省赢得了独立，之前此地于1877～1881年之间被英国人占领。19世纪80年代中期，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黄金，新近富裕起来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看上去很安全：事实上它很快成了在南部非洲地区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威胁到伦敦最为看重的到英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属地的海上通道。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英国移民长期以来对代议制政府的诉求摧毁了克鲁格的国家并且引起了一场战争。

这些“外侨”主要是英国人，他们蜂拥至金矿区，提供了约翰内斯堡急需的技能和商业知识。受到了塞西尔·罗兹和他的朋友们（渴望在非洲南部建立一个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的英国殖民体系），以及新任开普殖民地英国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爵士的鼓舞，他们要求伦敦为其赢得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是被克鲁格以他们是外侨为由否定的。英国内阁发现自身已经陷入与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对抗，布尔人随后发动了战争，争取先发制人来对抗英国的军事压力。随后在1899年10月开始了三年的艰苦战争。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一个不稳定的协议达成了。布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要求，转而支持成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合并组成的南非联邦，联邦实施自治，并且以帝国内属于英国政府管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模板。他们的动机并不令人费解。英国人在南非的白人中间属于少数群体，但他们是举足轻重的，这是由他们在冲突（跟随英国殖民军）里的角色所造就的，最有才干的将军扬·史末资承认，这是白人之间的内战。设法强行建立布尔人共和国是有风险的，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也许在此过程中，白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受到影响。布尔人的妥协塑造了南非接下来80年的历史。自治政府、政治联盟和自治领地位的确立为少数群体的白人移民、布尔人和英国人完全掌控了南非黑人的命运，黑人现在是英国的臣民。最残酷的讽刺就是，移民自治政府和其关于自由的话语开启了种族隔离之路。

英国是否仍旧统治着他们的殖民社会？一位爱开玩笑的殖民地总督也许会问：“什么是统治？”伦敦已经承认了自治政府，而且通过建立联邦，鼓励移民社群变得更加独立。使用武力来阻止他们离开帝国（比如“美国的出逃”）不是可靠的选择。相反，英国人通过三种不同的英国纽带来维持他们的依附。第一种便是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英国人中间的“英国”身份的存在感，让他们认为帝国是白种人的联邦。第二种便是相互间依赖关系意识的树立——无论是财政，商业、战略上都是如此，这就使真正的独立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甚至是危险的。第三种更加微妙。在所有的自治领里，特别是在南非，殖民地通过一系列宪法性规定剥夺了独立的合法性，而这些宪法性规定源于对遥远的英国政府的神秘效忠。通过成立共和国或者离开帝国来放弃这种忠

心，会拆散政治团结的结构，从而引起分裂或更坏的结果。也许这就是最能被接受且能以不显眼的形式出现的统治。

印度：非英国式的统治？

印度与许多其他移民自治政府之间的区别非常大。在印度，由英国本土任命的英国官员行使行政权力，（在1909年之前）不受代议政府任何因素的制约。他们的上级是总督，常常由英国议员担任，这些议员并非新内阁成员的“第二组十一人”（也许他们在向进入“内阁”努力）通常是贵族。移民团体要求在本地实施自治的权利被明确拒绝了。相反，来自于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所谓“治安官”形成了行政上的寡头统治，这被埃德蒙·伯克称为“治安官的王国”，治安官对共同利益有着敏锐的嗅觉——“共同利益高于委派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现在所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不是取决于印度人的观点，而是取决于如何处理他们在本土的靠山和印度的臣民之间的矛盾。他们必须要将印度视为一个对于英国而言是荣誉与利润的来源。他们必须强调他们的政权不仅起到了保护作用，且无可取代。但他们也必须展现印度人的顺从是极其重要的，并且他们作为外国人，其权威不仅是公正的并且是不可动摇的：也就是说抵抗是无用且多余的。

从传统帝国的概念里戏剧性地脱离出来成为不安的深刻来源。在传统概念里，帝国是自由的英国社群在英国商业和战略的保护伞下移民的地方。1765年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所享有的财富和权力也引起了本土的警惕和震惊。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并不像英属北美的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一样，他们更像是（16世纪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引人注目、全能、难以企及的富有。伯克在对黑斯廷斯管理记录的著名的抨击里（英国国会于1788~1795年对黑斯廷斯展开弹劾聆讯）谴责权力的腐败是“东方式”的独裁。“在印度的英国民族，”他高声说道，“……是任人唯亲的官吏的民族。他们组成了一个共和国，一个联邦，而这其中却没有人民。”这其实暗示了这些治安官们在东方领土上染上的多种恶习有可能会被带回英国本土。

这种传统在激进政治中保存了下来。按照这种论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使自己走向了毁灭之路。士兵寻求晋升和掠夺，穷困潦倒的贵族寻求财富：两者对于扩张东印度公司领地、在东方发起战争，甚至是对俄国发起战争都饶有兴趣。为了应付印度人起义的风险（这一点令人震惊地于1857年后成了现实），就需要在本土建立一支随时待命的军队，甚至是建立征兵制度。理查德·科布登说道，英国不再统治印度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一天，会是快乐的一天。但“自由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驳斥了这种观点。其提出者包括政治家、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后为勋爵）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均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麦考利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担任法律委员，密尔担任英国东印

度公司伦敦总部东印度大楼的官员。麦考利反对伯克的“东方梦魇说”，麦考利在1833年著名的演讲中和两篇关于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的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对印度的征服是英雄般的行径，英国人的勇猛和美德遍布征服之处。因为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社会“一片混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了拯救印度的壮举。东印度公司不但不参与掠夺，反而开始了对“已腐烂实体的重建”。密尔在《论代议制政府》中提到了麦考利关于秩序与进步的宏大主题。密尔认为，代议政府是一种方式，并非一种结果。它在印度的过早扩展可能会破坏其终极目标：即建立进步的好政府。开明的英国统治并非对权利和责任的轻率放弃，而是通往自由主义的真正道路。对于印度民族起义的恐惧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在印度维持自由必须有武力的保卫。

事实上，后印度民族起义时期形成的政权更加矛盾。首先，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接手印度的统治权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完成了之前的代管使命。东印度公司不再借机占领土邦——这是起义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王公可以得到片刻的平静。其次，在招募政府公职人员时，英属印度能排除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尽管本地有诸多不满情绪，这个诺言之前只在关系破裂时期才被遵守，直到两次战争期间。第三，对于“进步”的实施，可以巧妙地符合印度人的观念。将基督教强加给印度人或者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句承诺：“在拟定及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将）赋予印度古代的权利、惯例和习俗应有的尊重。”伯克和密尔达成了一致。

但英国究竟是如何统治印度的呢？众所周知，英国人占少数，英属印度是“几百人统治上百万人”的例子。此种情形也是有佐证的。于18世纪90年代成立的统治机构，英属印度治安官体系的人数也不到1 000。与此机构“签订了契约”的人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签订的契约禁止他们经营商业和接受礼物）几乎全是来自英国的白人，大都来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他们于19世纪后期被招募，占据了印度政府中的所有要职，这些职位就像是专门为他们预留的停车位似的。当然，他们不是唯一在印度的欧洲人（“欧洲人”是对白人的通称）。另有好几百人在印度帝国警察署工作（比如作家乔治·奥威尔于20世纪20年代在缅甸担任殖民警察）。1860年之后印度军从250 000人削减到140 000人，到1887年大约有1 600名英国军官，这个数字稳定上涨，直到1914年。1857年以后，在印度还驻扎着一支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一共包括70 000名英国军官和军人。在英国招募的医生、教师和工程师都在官方工资名单上。

有一点不可否认，很少一部分行政精英们管理着印度，他们深深意识到自身相对于被统治对象的外来者身份。“我们充其量就是外星人，最坏不过也就是固执而冷漠的种族，”一位官员于19世纪70年代写道，“我们被召唤去统治的种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群冲动且感情用事的人……我们对他们从来都很强硬，他们对我们也从不坦诚……。”当然，在印度的1/3的土地上，英国的统治都是间接的：统治是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特许状”由印度王公来实行的。印度王公被英国“常驻官员”从不同程度上实施

了监管，这些“常驻官员”部分来自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部分来自印度军的军官。如果英国人一旦认定有管理不当的事件发生（更别提更加严重的不端行为），处罚是——最坏的结果就是免职，但前提是常驻官员能煽动其远方的上级冒着风险卷入这场激变中来。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这是一场充满阴谋诡计的游戏，充满对王公忠诚度的责难和愤怒的抱怨，以及对常驻官员滥用权力的无视。常驻官员也许会默默鼓励印度王公的对手们，以此来检验是否有确有其事。区分身份尊贵的官方标志（特别是头衔，因为王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也许会被约束或拒绝给予。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边境）直到1893年“杜兰线”的出现才划定了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英国人不定时地对全副武装的部落社群施加持续的控制，这些社群来自位于印度河西岸的“殖民区”，但往往最后使用的是边境外交手段，通过使用现金和惩罚性质的巡逻，软硬兼施来达成目的。在突袭与还击的这场游戏中，就像吉卜林指出的一样，“机会在弱者一边”。

印度政府的真正工作其实更加单调乏味。政府工作的范围并不是王宫或是黑暗的山谷，而是印度广袤的农业平原地带，以及成千上万的村庄和农民。印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里维持秩序，无数的人在此寻求安居乐业（其中一些人组成了强大的“村落兄弟会”，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加入），他们都属于田野里长期受苦受累、负债累累的劳工。第二个任务是收取“土地税”，这是印度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印度政府在农业盈余中分得的一杯羹，该税目以现金的形式征收，因为政府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当中的精英人力，也就是治安官，驻扎在大约250个区（这其中很多个区都有超过100万居民）。这些区由英国直接统治的省划分而成。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税吏”是每个区的头领，他负责王宫事务以及收税，同时还需一直监视是否有威胁到英国统治权威的政治动乱的迹象出现。若当地人有对他或其他欧洲人不敬的表现，或是在常常对立的社群之间出现了关系的缓和，则会引起他的疑心，进而导致有警告性的调遣甚至向统治机构发出电报。1897年7月，西北省份（今北方邦）的总督报道，“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尽管“我完全不能肯定地说这已经到达了阴谋的层次”。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并未派遣很多公务员，（也许一个区只有3~4个治安官），对于此类现象，通常的解释是他们在乡村精英当中吸引了一批“合作者”，这些人在乡村的社会权力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这是一种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的解释。为何印度人要与力量微弱的英国入侵者合作，并且还如此自信？为何印度人要交出自己创造的盈余中的大部分，何况这些盈余几乎没有用到改善印度人的生活上来而是用于维持军费以及维持英国守备部队上，更别提欧洲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和薪水了。为什么印度人并没有发动更加普遍的抵抗和起义，反而没有更加成功？至少，这两点也许可以解答部分疑问：第一，英属印度是在非同寻常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第二，他们从印度早期的君主那里继承了遗产。

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第一个100年（1757~1857），在印度的英国

人与其说是一支治理国家的队伍，不如说他们是一支征服力量，东印度公司主要是为战争而形成的一支守备部队的集合。到第一个100年，英国人战胜了、占领了或征服了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每一支重要的地方权力。他们这样做具有战略性的动机（为反对俄国和法国的干涉增添砝码）。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军队（最高峰时拥有超过30万名常备兵），对掠夺有贪婪的欲望，这也造就了一种前冲力。东印度公司为战争自行筹募资金，这也减弱了伦敦反对进一步扩张的影响，因为伦敦方面担心东印度公司破产，甚至在本土出现类似于18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危机。但是在印度的殖民者也十分担心他们零星分布在印度的如马蹄形的各个属地可能会被全副武装的王公随从掠夺。不论动机是什么，东印度公司参与的战争达到了关键的目的。1860年以后（甚至在此很久之前），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一个印度邦在英国统治区发动政治异议或者发动地区级别的反对活动。为了镇压王公们的野心，英国使印度的政治极度地方化。这其实是为了证明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夺行政权力的斗争运动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好处。当然，在英属印度的北部内陆被称为“印度斯坦”的地方，这种运动被大规模的动乱[即1857年发生的印度民族起义（下一章会谈及）]所打破。但令人震惊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领地的大部分结构（尽管并非全部）得以保存了下来。

争夺行政权力的主要战场是税收体系。在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并不需要发明或强加一种新的征收土地税的方式：他们只需从前任统治者那里继承即可。他们有强大的动机使这个制度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行：为东印度公司的战争埋单，（到1813年）资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的确，控制税收制度是在每个区承认英国政治权力的关键。治安官们坚持道，在各个地方，他们发现本该归政府所有的税收被地方豪强抽取了。18世纪渐渐消失的莫卧儿帝国权威以及地方各邦的出现为地方精英创造了极佳的条件，他们作为税吏和秩序监护人的职责可以实现最大化。他们曾经需要缴纳的贡物及税收被转而用作他们自己在当地的权力基础：据点和堡垒，以及号称“刽子手”的私人军队。因此在英国声称殖民权力的各个地方，都紧跟着对税收的严苛把关。税收记录被仔细审查，以前对税收的要求被提出，调查演变成了辱骂。这是一项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印度辅助人员的合作——并且还建立在英国只是在重申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权利的诉求之上。

但这注定是极其困难的。直到英国打垮了更大的地方势力，比如贝那勒斯的查特·辛格或位于迈索尔的恐怖的蒂普苏丹，他们最终于1799年被打败和消灭，英国因此才得以与一些地区强大且全副武装的地方豪强抗衡。在南印度，他们面临着许多“柴明达尔”，柴明达尔在自己的管辖地和要塞统治着小的土邦。英国的策略是镇压他们对税收的诉求并且要求柴明达尔及他们的随从人员解除武装。那些顺从的柴明达尔会得到一次性的税收结算以及永久性固定交税的义务。随着柴明达尔收入的降低，他们要在支付随从和应付东印度公司的税吏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孤立那些反抗的柴明达尔，或者激怒他们发动公开的起义。起义发生之后，也许不是十分迅速，武装的报复便随之而来。或早或晚，东印度公司会派遣一支印度兵来罢免柴明达尔，摧毁他的据点，

并且安置一位更加合作的豪强来取代他的位置。

英国人总能找到富裕的、出身好的、有教养且愿意与新的政治权威或者统治者站在一边的印度人，这些人认为英国对合法权利的诉求比那些奢望在中央权威的残余中分得一杯羹的武士首领（如南部柴明达尔和“北部柴明达尔”）的诉求更加重要。一旦取得了对税收制度的掌控，无论掌控力度是大是小，英国人都能将统治者的法律和行政特权发挥到极致。因此归少数人继承的庄园就归英国控制的“沃兹法院”所有，该法院有其自设的管理者。地区官僚机构的底层阶级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来奖赏那些忠诚的人以及惩罚那些麻烦制造者。名誉上的地方法官组成的骨干队伍由当地精英招募而来，他们审理的案子比较少。被排挤或是免职是极其丢面子的事情，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发生。当然与之相应的也有分配的头衔和荣誉（这是最受欢迎的英国式手段）：这很明显地暗示这种头衔和荣誉的拥有者得到了税吏的青睐，因此也就得到了政府的褒奖。反过来，税吏也明确地表示，一旦发生了动乱，无论是犯罪性质的还是政治性的，他都期待本地的重要人物在第一时间向其报告。一位英国官员说道，这些重要人物知道在他们的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应该对我们做出解释。如有必要，权贵需要被间谍监视。在困难时期，二者被期望组成“忠诚”同盟。的确，在这样一个本土化的制度当中，税吏的技能和力量对于操纵影响政治的多种来源举足轻重。马德拉斯政府称，为了出色地完成其工作，税吏需要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必须精通或熟知当地人的各种语言、性格和生活状况，了解土地使用权的各种解释，知晓公共税收来源以及扩大来源的方式。”从1796年开始，精通某个省的主要语言成了晋升为税吏的条件。税吏同样被要求要到他们管辖的区走访，最多的时候一年要去4次，目的是显示其军事力量并且留心其印度下属。在大多数省，需要对缴纳的土地税做定期的重新评估。这需要由英国的“结算官员”到每个村、每块地做实地调查。这些结算报告涵盖了大量的关于土地肥力、农作物、土地使用权和人口的信息，构成了印度社会历史的重要来源。

英国的统治之所以能成功克服无知和外来性的障碍，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对官僚主义的留存。当然，英国的官员们离机器般高效的工作效率还差得很远。在英国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征服的旁遮普邦，一种朴素的男性思潮被有意地建立了起来。旁遮普邦的治安官生活得很艰辛，并且经常要搬迁，因此他们几乎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想要随身带一架钢琴，那么他一定是怪异的（或者是鲁莽的）。他得到的“奖赏”只会是搬迁得更加频繁。“我会打烂他的钢琴。”一位总督听到后斥责道。就像在任何官僚机构一样，往上爬的路并不总是平坦的。约翰·比姆斯（John Beams）无奈地抱怨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常常决定了晋升。他哭笑不得地回忆起了一个场景：他接到临时通知，集合了一大支舰队来运输军事力量，结果在舰队到达之前不久，他就被其上级打发走了，于是这次行政功绩就归功于上级了，并且这位上级官员还能得到应有的奖赏。同样，治安官的行政范围也是有限的，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过于依赖印度盟友和辅助人员。若他们面临着一个地区势力中的强势派系，那么这些派系对于任命地区官僚机构的影响是难以破除的，即便是在税吏

自己的行政机关或者办公室也是如此。英国人在村级任命事务里的影响力很小，比如警察、税吏或者会计。打造一支高效的、可靠的且不腐败的警察队伍被证明是同样困难的。更糟糕的是，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规模有着严格的限制（因为它要支付的工资和养老金数额巨大），这就意味着官员们经常要在地区之间调动，来弥补人员空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不便。

19世纪70年代，起义被镇压之后，治安官政权面临着潜在的新挑战。印度需要变得更加现代化。于是，英国人开始推进印度的铁路建设。电报、汽船和苏伊士运河将印度与欧洲的距离拉近。印度与欧洲之间、印度次大陆之间，新闻、信息和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更多的印度人开始阅读英语，他们对英国的了解更加深刻，恰巧在此时，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正在改变其权术。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强调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密政治联系是有必要的。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英国化”的呼声开始被重视，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为印度实行自治造势。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就像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迫使治安官更广泛地干预印度人的生活和社会，并且花费更多金钱发展铁路、水利、森林保护、农业、公共卫生以及疫病预防。许多城镇的迅速发展要求对卫生和治安问题有更加系统的处理方法。英国人需要从印度精英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合作。他们需要增加税收，同时需要阻止一种主张，即印度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在孟加拉的某区到1913年为止有403位辩护律师）组成的阶级从道德上来说更有资格统治印度（基于格莱斯顿自由主义）。

治安官的反应就如同被包围的寡头政府一般，但他们依旧不择手段。与治安官同等级的“学者型的政府高官”这个少数群体只会纸上谈兵。他们制造了一股学习人口普查、地名词典、民族志报告和政治史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一系列调查。这并不只是一个数据库。透过他们的视野，印度的各个部分就如同不相容的碎片一般，被种族、语言、宗教、种姓、职业和地区分开，而印度变成了一个“地理名词”。这种观点对说英语的印度人这类“少数群体”代表的印度次大陆无法想象的多样性不以为然。印度是一个政治体的整体概念被重新塑造了——在印度人和英国人眼里一样，这样的做法证明治安官自身的道德权威作为印度进步的、开明的和公正的监护人形象。就本土的观点而言，这次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没有一位英国大臣（不论他的观点是多么开明）胆敢公然批评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治安官对于印度受压迫大众的无私保护在政治话语里成了（也许接近）不容冒犯的事务。

同时在印度，治安官们贯彻了更加迂回的策略。他们承认有必要让印度代表与他们的政府为伍，并且改善政府过度专制的外部形象。印度人被允许进入本地的政府部门，1892年和1909年的改革规定他们可以在省议会作为候选人或当选议员，由省议会负责立法。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最初对这些让步颇为欢迎。这些让步被刻意设计得对说英语的印度精英不那么有吸引力。治安官要确保他们自己手上有决定被代表群体和内容的权力。他们还要维持当选议员与候选人之间的平衡。代议制必

须反映由治安官定义的印度社会的层级结构，所以议会成员并不是由印度人民选举出的，而是由不同种姓、职业、宗教和地区的社群来决定的。治安官还必须确保其行政权力不被议会的程序性规定影响，始终牢牢在握。治安官渐渐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即权力的下放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最佳保证。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印度国大会党的关键要求，这个要求是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人才选拔应该对合适的且合格的印度人开放。治安官统治阶级的种族一致性需要被完好保留。

1914年以前，除了阶段性动乱的爆发以及（欧洲与之相呼应的）孟加拉的激烈的反英运动，几乎没有太多迹象表明英国的统治处于真正的危险当中。认为英国的统治将在30多年以后消失无论是对于英国还是印度理智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很荒谬的。就像英国人承认的那样，英国的统治是有基础的，存在于其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英国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及一支特意由印度人口中非主力群体组成的印度军已经足够强大到能够毫不费力地镇压任何武装起义（今天的印度是一个非武装社会）。1857~1858年英国残暴地对印度进行了“第二次征服”，随之而来的是“白色恐惧”，这些记忆根深蒂固：对于几乎所有的印度人来说，用暴力将英国的统治推翻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治安官统治的第二个明显的优势是在印度的英国人维持了种族纯净，并且潜移默化地被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记忆所强化。他们得到了两点教训，首先，信任当地原住民是有风险的；其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捍卫种族纯净。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宗旨就是团结在一起实行统治。第三个优势是，尽管表面上英国的统治是与当地实际格格不入的殖民政权，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统治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印度统治的古老传统，尤其体现在英属印度的税收制度以及对本地习俗及法律的尊崇上，这些现在已经正式被编成法典。殖民主义在印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指挥系统。它体现了由程序、规则和官方身份组成的一张大网。英裔印度人——不是英国人，被要求参与社会生活并且发表公众看法。他们用一种奇怪的社会和行政术语来表达看法，这种术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印度语。打破这种思维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不管多么坚信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度民族的愿望，英国的统治依然意味着对过去枷锁的幸运逃脱，只要英国应允敞开大门，这就是他们通往未来的理想道路。他们认为若想成功统治，那么刚性的英国品质、个性和良好的体格都应该注入每一位新的印度精英的身体里。这就是之所以莫逊拉尔·尼赫鲁要把他的儿子送去哈罗公学与剑桥大学的原因，他期望儿子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印度治安官而非民族主义政治家。

但如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改变正在酝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抵制无法预知的危机和那些政治天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政府明显的过失迫使治安官将印度推向了自治。同时，圣雄甘地于1920~1922年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的伟大运动，这是一个全新的学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印度国民大会党从一个年会组织变成了一个现代大型运动的发起者。治安官尽管十分失落，但并没有出局。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新的策略来调解冲突和矛盾。但是长久以来握在他们手里的游戏规则已经被永远改变了。

王位背后的耳语

18世纪90年代以来，当英国在一战时期开始占领许多新的殖民地时，英国人对新纳入麾下的附属领地均采用直辖殖民地的形式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很简单，但是鉴于每个地区的实际条件差异，具体的运作是各异的。基本的做法就是保留总督的行政权力，同时在立法机构（即“立法议会”）安排在地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出于谨慎考虑，促进殖民地的权威人士——世袭名流、地主和商人与远方统治者合作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不过，地方代表需要具备两条重要的资质。首先，本地代表常常需要任命及委任，而非选举。其次，这些“非正式议员”数量几乎总是少于所谓的“正式议员”，“正式议员”主要由行政人员构成，并且一般会按照总督的要求投票。因此，这样做会避免美国殖民地曾出现的问题，在那里，掌控财政预算的是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同样，要想真正走上代议政府的道路是希望渺茫的，更不用说自治政府。对于在伦敦的政权捍卫者而言，这才是重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建立代议政府，还是自治政府，都不适用于非欧洲的子民，因而伦敦拒绝了热带殖民地里少数几个白人种植园主和商人对宪法的诉求。这是伦敦采取的一项剥削占人口多数的非白人群体的策略。他们甚至愿意在某些条件下让殖民地的发展进程倒退。1865年牙买加爆发的叛乱暴露了由小部分白人群体支持的代议政府存在的诸多不足，西印度殖民地中的自由黑人或被解放的黑人占据了人口中的大多数，牙买加叛乱后，这些地区都被改为直辖殖民地。

采用直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有诸多便利。通过调整非正式议员的组成和数量，以及拓宽或收窄立法议会的工作范围，这种方式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英国属地。一位工作稍微熟练的总督就能够利用他的任命权阻止不满的发生并且找到新的盟友。但是这种统治方法似乎在相对小规模的社会里才能运作得更好，因为在那里，语言和种族的多样性并不十分突出，或者说人口主要由单一移民构成——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如果这些条件达不到，那么这种统治方式就会受到诸多限制。在西非的殖民飞地，英国的管辖早已深入内陆，一位英国的大臣用生动的词句来描绘这种情形：“与海滩上的要塞仅仅隔了一发炮弹的射程。”但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非洲的分裂，这些小的沿海飞地占领了大量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是欧洲势力与本地殖民官员争抢与威吓的后果。关于统治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在西非和东非，最终结果是确立帝国统治的一种全新方式，这就是“间接统治”，其影响十分深远。

间接统治首先在尼日利亚出现。其提出者是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后为卢格德勋爵），他于1900～1906期间担任北尼日利亚高级官员，1912～1919年期间担任尼日利亚总督。卢格德的事业颇有异国情调。由于失恋，他从印度军队请辞，开始在东非寻求死亡或光荣（很显然更倾向于前者）。19世纪80年代，对于欧洲人而言，东非依旧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卢格德在今马拉维与阿拉伯奴隶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他被英国政府特许的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派往乌干达，为英国宣告权力。与他的苏丹雇佣兵一起，卢格德展现了他在强制外交

和宣传方面的天赋。他著有《英属东非帝国的兴起》一书，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赢得英国是否应该吞并乌干达的争论。卢格德也在媒体或公开平台发起政治运动，激起英国反奴隶的热情。乌干达于1894年被英国吞并。

现在，卢格德有足够的资格担任殖民地总督。另外一位由前任士兵转业的商人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从伦敦得到特许状来保卫英国在尼日尔的利益，以此来反对法国对尼日尔的争夺。戈尔迪于1886年建立了“皇家尼日尔公司”，该公司使用强硬的方法开拓了通往尼日尔内陆的贸易之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与法国从萨赫勒向南进发的先头部队的那场热战，皇家尼日尔公司卷入了该地区的所有战争。卢格德作为戈尔迪皇家尼日尔公司军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就是抵制法国对本地的影响，并且拉拢本地统治者支持皇家尼日尔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财力被证明不足以应付武装斗争，于是公司的财产被国有化（在1898年），从此由伦敦接管。卢格德被任命为高级专员，企图让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诉求成为政治事实。

1900～1906年，卢格德在北尼日利亚领导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在此期间，一个矛盾的副产品诞生了，即间接统治。卢格德的军队除了拥有一些先进的武器外，规模其实很小，并且几乎全部由非洲人组成，这就使卢格德面临了额外的风险。北部富拉尼族的埃米尔[4]统治着“红土筑墙，墙面有浮雕”的城邦，其中卡诺是最强大的，它也是西非内陆的奴隶市场。他们的骑兵希望能控制广袤的大草原。卢格德的军队火力强大和胆量超群，再加上豪萨人对富拉尼族领袖的不忠，这一切使得卢格德获得了胜利。但是卢格德产生了一些错觉。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选择，除了维持现有的政府体制，他只能要求埃米尔承认英国的权威。“我以伊斯兰教先知阿拉和穆罕默德的名义发誓”，誓言是这样的，“我会尽心尽力为爱德华七世陛下服务……我绝不允许自己对国家不忠。”埃米尔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说出这番誓言。以前的秩序被保留了下来：伊斯兰法律和法官、封建贵族和对农牧民的直接征税都是如此。在北尼日利亚的统治仅由少数英国政治官员来完成，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高压，官员们甚至没钱买办公室的设备（卢格德手下的官员必须购置打字机），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随着实行间接统治的英国其实仅拥有有限的权力这一事实得到普遍认可，间接统治开始焕发生机。

但是对于卢格德和他的拥护者而言，间接统治很快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尼日利亚的其他地方，比如拉各斯背后的约鲁巴王国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的伊博民族聚居地，英国人占少数，于是他们倾向于将本地事务交由本地人管理，英国人只要求对他们的过境人员和贸易进行保护。卢格德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必须通过命令的单一链条捍卫英国权威。若想达到此目的，只有通过足够强大的非洲原住民统治者征税或强制执行本地法规来完成，他需要对英国常驻官员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统治才会是有效的：权力是集中的，但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在某些地方，原住民统治者没有这些权力，比如在约鲁巴王国，权力分散在世袭名流中间，而原住民统治者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又

或者在没有首领的伊博人中间存在着需要英国人介入这种反常的现象。“传统的”君主不仅实施名义上的统治，也是实际的统治者。在那些没有首领的地方，需要一位由政府授权的“大人物”站出来。很显然，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之声也是存在的，在尼日利亚南部的英国官员十分愤怒地表明了他们的反对态度。特别是在迄今为止无首领的社会里，这样做会招来骂名。但是在1912年以后，当卢格德带着英国政府的授权回来并将尼日利亚南北部合并时，所有的反对声便戛然而止。

卢格德的成功部分来源于他声望的提高、战时作为总督的成功（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是战争地带）以及他妻子的帮助。他的妻子是弗洛拉·肖（Flora Show）——泰晤士报的编辑。但是卢格德的主张同样有不可否认的逻辑。卢格德认为采取直辖殖民地的模式是虚伪且危险的。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原住民统治者，即使是有文化的，也不见得会说英语，于是不能在主要的机构（也就是立法议会）起作用。相反，立法议会的程序和常规对在沿海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常常是基督徒）的非洲精英（即克里奥尔人）有利，这些人宣称他们代表内陆的非洲人和北部的伊斯兰教教徒，卢格德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这是英国殖民政策里最主要的一种统治方式，”他说道，“也就是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不应该屈从于少数欧洲人或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且欧洲化的原住民的利益，这两类人的利益通常与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是不同的，并且常常是相反的。”其次，采用直辖殖民地模式统治的政府里，通常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此机构先入为主地采用英国的立法程序（包括法律代表）以及陪审团审判。卢格德认为这些毫无疑问是十分可怕的。法官只会再三猜测行政权力的意图，法律的规定会与伊斯兰法律冲突，陪审团常常从少数说英语的人里面选择，见钱眼开的律师转眼成了煽动者：对于一个拥有广大腹地并依靠少数常驻官员的个人权威治理的政府来说，这样的政体本身就预示着骚乱。

卢格德最有力的一张牌是宣称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传统形式的权威将会很容易崩塌，从而导致他们的非洲新子民成为一帮难以控制的暴民。英国在这里没有了在印度的财政基础、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想要像在印度一样完成“骚乱中的救赎”简直不可能。间接统治因此成了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如果1914年以前间接统治难以普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俄国爆发的革命都给帝国自信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卢格德及其拥护者反复给此地区的人民灌输一种全新的思潮。他们声称间接统治是满足英国统治需要的最佳的政体。间接统治是殖民控制能够接受的方式：它结合了自治这种最安全的统治方式与对本地习俗和惯例的科学调整。当卢格德的后继者作为总督列举了间接统治的诸多不足（比如无法促进商业发展，对“授权首领”的辱骂，对“惩罚性巡逻”的持续依赖）后，伦敦给了他冷遇。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发现支持卢格德的主张才是明智的。“在卢格德所有完成的事情或者还未完成的事情中，”他告诉官员，“……政治官员在支持埃米尔权威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政治官员应该只是王位背后的耳语者……而绝不能觊觎王位。”

在英属东非，卢格德提倡的间接统治运用范围更窄。在乌干达，英

国人的确发现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王国。乌干达1900年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其境内最强大的一个布干达王国实行自治，其地位相当于乌干达保护国的一个省，卢格德其实并不赞同条约的内容。“肯尼亚”最初只是重要交通路线上的一条小径：从海上到湖区（即维多利亚湖）的运输路线，在这里可以上船前往被陆地包围的乌干达。正是因为看好在富饶的湖间王国里进行贸易，而不仅仅是看好肯尼亚的前景，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才选择了北部路线，绕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即今坦桑尼亚。这条贸易路线经过了沙漠、森林，穿过了悬崖峭壁，最终到达维多利亚湖。它还通过了一片带状区，东非好战的马赛人是这片土地的领主。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需要“食物补给站”来慰劳辛苦的搬运工。谷物能够从森林和高原的农业人口那里购买，这些人与马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食物市场，以及运输食物的安全通道。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的官员以及帝国官员（通常是同一批人）于1895年接管了这片区域，建立了小型的本地军队，为食物销售者保驾护航。他们与马赛人结盟，那时马赛人被大范围的牛瘟所影响，为了对反抗的基库尤人施加权威，他们决定为基库尤人和马赛人的牛埋单。当乌干达铁路完工（1912年可以到达位于基苏木的湖区），英国人不再依赖脆弱的贸易路线，他们还可以让有限的军队（由大约200名印度士兵和700名非洲士兵组成）发挥更好的作用。

英国人应该怎么统治新保护国里广泛分散的民族？东非保护国专员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爵士说道，1901年他有17个食物补给站，一般有1名欧洲官员以及最多20个士兵。欧洲官员不敢长时间离开食物补给站，而且对于边界之外的地区仅有很少的掌控权。征税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更多的欧洲官员轮流外出，以及更多的警察。“仅有巡视是不够的。为了让野蛮的原住民了解欧洲官员究竟是谁……他应该不停地出现……这里需要的是……持续且稳定的压力。”9年之后，一个更加类似于行政部门的机关出现了。肯尼亚现在有省级专员、区级官员以及区级官员助理，他们被要求一年里进行三个月的“巡视”。一位新的总督吉鲁阿尔（Girouard），他是一名北尼日利亚的退伍老兵，他赞成卢格德的主张。英国的现场专员应该记下本地的风俗和法律。在选择首领、长老、酋长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人们的意愿”，避免搅乱本地继任的规则。通过“原住民机构”来统治是十分关键的：“文明的引进过程中若出现了非国有化或士气低落的倾向，就应该设法避免。”“我警告那些支持直接统治的人，”他继续说道，随着卢格德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允许部落权威崩塌或者被忽略……数量上来说处于绝对少数的群体的我们……就只得去对付暴民了……”

但是在肯尼亚，有一只巨大的苍蝇落在卢格德派的药膏上——实际上是两只。因为伦敦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修铁路，以更好地治理肯尼亚。修建铁路必须要求资金，所以这笔钱就由公认的“骨瘦嶙峋”的政府来埋单。铁路并不是由非洲劳工，而主要是由印度的“苦力”修建的。许多人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开着小店，做着生意。到20世纪20年代，印度人开始提出政治要求。然而，在政治方面，“白色的苍蝇”更大。为了使肯尼亚能存在下去，伦敦决定迅速注入商业经济。这就意味着安排白人农民

为铁路生产货物并且为出口种植农产品。肯尼亚因此很快成了一个行政混合体。移民要求像南非一样自治（以及能够使用黑人劳工和分得大块土地），同时殖民官员被认为要支持部落权威和传统风俗。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合，肯尼亚动荡的历史就起源于此，并且一直延续到“茅茅运动”（1952~1960）时期及以后。

“若征服者威廉拥有马克沁机枪、打字机和一些现代发明，”卢格德的一位官员说道，“他只用很小的力量便可占领英国，他会建立官僚形式的政府，并且只有少数的区级专员分布到各处。”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统治模式尽管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依靠本地的政治盟友——愿意合作的精英，并且他们更喜欢那些他们眼中属于保守势力的人。英国认为自身的统治是加强传统，并且他们也在改善传统。通过要求印度人和非洲人参与不同等级的政治生活、宗教或部落社群，英国人其实加强了控制，在英国统治之前，这种划分不那么固定。也许正是有了惊人的成功，他们织就了由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一张大网，殖民地的民族对此是接受的，至少是默认的。不过当英国人的统治开始依靠原住民盟友——牧师、警察、村长、首领、地主和王室成员，他们最初对本地和地区政治注入的影响就已经获得了军事力量，这一直是英国最终的制裁方式。英国的优势并未完全依赖于武器的强大：他们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未使用马克沁机枪或连发枪。他们的优势在于征兵的方式，常常是在偏远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定期的工资来维持结盟。英国通过给本地的权力掮客特许权来降低支付军事帮助的需要，这也是在完成合作性质的协议（能够稳固英国的控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促成英国成功的还有其他因素。英国权威的秘密在于他们让被征服的民族或多或少处于独立的隔离地带，并且限制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将其尽可能降低到最小。政治联系是纵向的：最顶端的是“压顶石”——只有少数英国官员在顶端。这还不是全部。所有帝国面临的政治风险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会建立自己的本地势力来扩大影响，通过通婚“变成原住民”。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并且19世纪后保护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密。这就是他们的行政框架必须保持的种族团结：背叛本地原住民在文化上是绝不可能的。通过蓄意保持社会距离以及对各种社交严格限制来强化这种团结。不论是不是有意而为，这种做法都给帝国权威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没有了社会交际的通道，印度人和非洲人几乎没有抓住遥远的统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动机的方法。猜测统治者目标和意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官员的秘密活动都是自己来管理的，这种做法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正如一位精明的英国政治家泰然地说道：“从来没人相信我们的善意。”

[1] 19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扩张美国在北美洲的领土，扩大美国政治和经济。——编者注

[2] terra nullius，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未并入任何国家的地区。——编者注

[3] 蔑称，“非洲黑人”。——编者注

[4] 埃米尔，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伊斯兰教教徒统治者。——编者注



“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你被判有罪，你犯了人类能够犯下的最严重、最有害的一种罪行。你被判犯了叛国罪……现在我需要履行令我痛苦的职责，即宣读法庭对你的判决……你将被带到执行死刑的指定地点，被处以绞刑直到你死去……”法官于1885年8月在西加拿大（当时）灰蒙蒙的小城镇里贾纳说道。瑞尔的罪行是领导说法语的混血儿和印第安人反对渥太华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因此也反对英国政府）：用对他的指控来说，他企图“恶意且不忠地……用武力和武器推翻并摧毁依法

建立起来的政府”。三个月后，瑞尔走到了绞刑架前。

反叛与帝国

反叛体现了帝国统治黑暗的一面，反叛的威胁和阴影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现实。屈从与反抗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反叛也没什么稀奇的。殖民地是未开化且动荡之地。在加勒比的种植园维持殖民权威常常是艰难的。总督和种植园主往往一起落马：在一场使用了大炮的战斗后，暴露了自夸倾向的总督被困在自己家中，最终被谋杀；在美国大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富裕种植园主于1676年领导了“贝肯叛乱”，烧毁了殖民地的首府；不走运的马德拉斯总督皮戈特（Pigot）勋爵于1777年被英国官员罢免，并且在拘禁中死去；邦蒂号船长威廉·布莱（Willian Bligh）1808年担任殖民地总督，因激怒了新南威尔士的自由移民，最终在自己床底被守备部队擒获，一年后才被允许坐船离开，他徒劳无功地催促舰长用他的枪“摧毁悉尼”；1808年“朗姆酒起义”的领袖轻松地逃跑了。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闹剧式的。但还有很多事件并非如此。

事实上，实事求是的记述通常都会把英国的扩张看成一个曲折的前进过程：一系列大的突发事件转变了原有的前进方向，或者使进程在自己的轨道中夭折了。这些突发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反叛。最暴烈的一些反叛往往离英国本土非常近：1641年爱尔兰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1689年詹姆斯党叛乱（其失败极大地增强了新教徒的支配地位），还有1798年爆发的第二次大规模起义（促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成立）。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土地战争”导致“自治”成了“解决办法”。1916年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1919~1921年爆发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功的起义，导致了爱尔兰自由邦（今爱尔兰共和国）的诞生。在美国大陆，1763年庞蒂亚克战争引发了大规模原住民在泛阿巴拉契亚内陆的起义，而彼时英国正在为击败法国而庆祝。英国人为阻止接二连三的起义做了让步——起义可能会向东扩展到临近白人定居点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地盘上，这会激怒殖民者，对英国政府来说，他们是更加危险且具有组织性、有武装保护的对手。1775~1783年在北美13个殖民地爆发的大规模移民起义，后来被冠以一个宏大的名字：“美国独立战争”，大英帝国在北美的领地从那之后只剩一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属北美帝国内的印第安人隐隐有壮大的趋势，伦敦担心这将引发白人移民的叛乱。1837~1838年，在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英国主要的担心就是美国的影响（以及直接干涉）：这就是导致英国最终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完全内部自治（“自治政府”）的原因之一，此举也使其他白人移民社会把自治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1815年后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爆发了奴隶起义，尤其是1831年在牙买加爆发了圣诞节起义，有20 000名黑奴加入了起义，这是废奴再也不能被推迟的最后证明。于是，废奴法案于1833年诞生了。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并未摧毁英

属印度，但是它对帝国的自信心和英国人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英国统治形式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1857年以后，英国人因为担心更多的起义而在印度采取严密监视活动的行为遭到了谴责：此举的影响是广泛的。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此后驻扎在印度。在19世纪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的反抗活动阻挠了英国在南非大陆的前进。这种反抗行动在1899~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达到了残酷且血腥的顶点。英布战争的直接结果并未产生大的意义，只是确保了白人移民在中南部非洲相对于非洲人的至上地位，但这场战争却促使英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如果重大的反叛行动塑造了大英帝国的模样（而不是英国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想要英国成为的样子），这种说法也可以应用到那些发生在几乎所有殖民社会的规模要小得多的起义上来。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为英国议会的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在遥远的美国殖民地也爆发了与之相呼应的起义。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和马里兰州都爆发了起义，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总督和他们企图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北美大陆上和英属加勒比的岛屿殖民地同样爆发了有效的抵抗。反抗行动的主要结果是加强了殖民地自治，虽然70年后伦敦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不过他们的这种努力后来都成了徒劳。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属西印度群岛里小型殖民地爆发的奴隶起义，以及于1729~1739年在牙买加爆发所谓的“逃奴之战”，加剧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种植园主的恐慌气氛以及他们对殖民权威的依附心理。除了表达一些类似的不满，他们不敢对北美大陆上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表示支持，因为1770年之后的叛乱分子主要是白人。在19世纪的新西兰，英国1840年与毛利人签订了《怀唐伊条约》，英国人开始面对害怕移民扩张的毛利人社群的抵抗。一些毛利人领导者为了阻止其他毛利土地持有者将土地出售给白人，以及重新夺回他们认为已经丢失的主权，于是在1860~1872年爆发了毛利战争。尽管最后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顽强的抵抗以及移民对于库帕帕帮助的依赖为自己在这片已经大体上成为“白人国家”的土地上保留了重要的政治权利。发生在加拿大的1869~1870年和1885年的两次叛乱，最初是由梅蒂人（1869年）发起，之后是梅蒂人及印第安人一起抵抗白人移民的流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以英国新教徒为主的安大略省。第一次叛乱几乎没有流血，瑞尔的“临时政府”随着沃尔斯利将军和他的军队的到来迅速倒台，沃尔斯利的军队有1 000人，是由英国常备兵和加拿大民兵组成的。伦敦和渥太华都十分不情愿制造出一个政治殉道者。加拿大总理尽管高声宣扬希望抓到瑞尔，却私底下资助他逃跑。第二次叛乱更加严重。瑞尔又一次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次建立在今萨斯喀彻温省的北部。当他的追随者在达克莱克抽回了一支骑警力量并杀死了12个人后，他们又引发了一场由黑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发起的叛乱（北美大草原西部的印第安民族人口大约是20 000）。大约8 000人被派去镇压起义，几十个人被杀死，瑞尔在巴托什一役后投降，之后他的命运就如本章开头所述了。

瑞尔的叛乱和死亡对加拿大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死刑象征着法裔加拿大人为反对安格鲁撒克逊人在加拿大联邦日渐增强的地位所

做出的牺牲。到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移民的涌入，法裔加拿大人成了人口上的少数。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化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几乎让所有加拿大政治家都不得不妥协。在纳塔尔殖民地爆发的巴姆巴萨叛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祖鲁人在1906年发起的暴力叛乱。随着白人移民对强制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祖鲁人丢掉了土地和地位。大英帝国对叛乱的残暴镇压引起了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公开谴责，当时丘吉尔还是伦敦自由党政府里的一名副部长。如果说瑞尔的叛乱企图将“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开，那么巴姆巴萨叛乱则将英国人和荷兰裔南非白人拉到了一起。在关键时刻，南非的白人政治家商量建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邦，对叛乱的担心使得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迫在眉睫，以化解纳塔尔省的英国人对一个由布尔人统治的国家的抵制情绪。

如果我们将对“依法”建立起来的殖民政府的每一次暴力破坏都包括进来，反叛活动的清单可以被无限拉长。当然，我们需要记住“反叛”本身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它既是一个口语用词，可以用于指任何形式的骚乱，无论它多么本地化或者有局限性，它都可以作为政府使用的法律描述以威胁那些不满的人或者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许多反叛活动中，对殖民权威的挑战往往是附带的，而非直接的。1836~1919年，“Moplahs”（或者叫Mappilas，即南印度贫穷的伊斯兰教教徒农民）发起了超过30次的叛乱来反对他们的印度地主，这些叛乱常常是为追回土地做出的报复行动。他们总是被军事行动镇压，军方主要是担心叛乱会扩大到其他地方。这些农民的目的并不是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希望寻求英国的帮助来反对本地的压迫者。英国人自己常常倾向于将武装骚乱归类为犯罪活动或者抢劫行为（强盗行为），并且否认有任何政治目标。军事和财政上的便利可能也会造成对“叛国罪”视而不见。英国拒绝移民用军事行动反对1860年爆发的毛利国王运动的要求，殖民地大臣（在12 000英里之外的伦敦）冷淡地说道：“如果他们（毛利人）仅仅是尊敬他们的国王……并且没有冒犯女王的和平……这样的蠢事应该留给时间去解决。”

但是起义行动常常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不管有没有罢免统治者的雄心壮志。这些行动多少告诉了我们帝国的本质和英国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众所周知，英帝国的统治体系是将权力下放的，尤其是在移民社会。除了在一些“要塞殖民地”，比如直布罗陀海峡或马耳他海峡，英国的统治几乎在每一处都要依赖地方精英的支持，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这样就为帝国节省了一大笔开支：避免了维持昂贵的英国官僚的需要，只除了很小的一部分。也避免了动用大批军事力量来实施政令的需要。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将权力如此大范围地交给本地势力带来了政治上的风险，而且造成了负担。地方“代理人”以及帝国的盟友有他们自己要追求的目标：他们与统治者的部分“协议”就是统治者对他们社会地位和利益含蓄的支持。正因为有这一点优势，地方精英（或白人移民）忍不住要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治下的人民（这是精明的英国人清楚意识到的一种倾向）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若没有持续的监视或行政上的干预（这正是“合作”需要刻意避免的），

那么要限制权力的滥用，甚至判断这给殖民政权带来了何种危险就十分困难了。然而，如果麻烦出现了（比如马帕利亚叛乱，或在新西兰爆发的毛利战争），帝国迟早都要（而且常常很快）动用军事力量。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本地代理和盟友很大程度上依靠未经同意的力量的默许。如果英国失去了高压的手段，或者丢失了相对于地方精英的威信，那么整个统治的结构（和税收）就会迅速崩溃。不管喜不喜欢，合作者必须要相互支持。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注定会担心若不显示帝国的权力，他们对代理人的控制就会被削弱，他们的威信会下降，而且合作的政治成本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高压和合作因此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依靠合作者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帝国权威在臣民相信它的永久性和合法性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在那些权威已经非常有效的地方，这成了“霸权”的一种形式：即对殖民地人民的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控制。如果权威是通过地方精英过滤并且调整到符合他们需求的，那么这种权威就会越发扩散，并且更多地面对本地压力和冲突。而它本可以对臣民保持一些神秘感。臣民的沉默反映了他们并非自愿地同意而是“务实地屈服”，一旦强制的威胁被解除，屈服就会迅速收回。因此，是被统治者的顺从和恐惧才使得如此多的殖民官员对维护个人尊严和威信如此着迷。也正是因为殖民控制的脆弱性才使得反抗活动变得十分危险，而且这也解释了不安的宗主为何要对反抗行动予以残酷的回击。

是什么促使臣民通过集体的抵抗行动来反叛？接下来的案例研究非常详细地分析了缘由。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明显的诱因有可能是生活的苦难或财产损失，但是在多数时候，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最极端的苦难就是以土地为生的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在印度。同样，1833年被释放前在农场和种植园劳作的数量巨大的奴隶（差不多80万人）也遭受了极端的苦难。但是极其贫困的人甚至是奴隶发起的叛乱是间歇性且偶然的。叛乱更可能发生在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之时，也有可能是因为遭到驱逐，以及它们面临新的劳动负担或者（1831年在牙买加奴隶当中出现的）口粮减少。这些人之所以觉得不公平是出于一些新的强制要求，或出于对他们的地位和荣誉的强烈打压。如果整个职业团体或有组织的群体觉得受到了这种威胁，集体反抗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如果不满又多了宗教的因素，这种混合因素引起的效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宗教是大多数殖民社会的黏合剂。几大世界性宗教以及它们本土化了的变体规定了最终被接受的信仰，这些信仰囊括的范围从性道德和两性关系的见解，到关于财产和宇宙形状，无所不包。任何异己的存在都是令人不安的。如果他们有任何企图扰乱宗教惯例或对圣人或圣地不尊重的迹象，都必定会引起麻烦。如果一名宗教的信徒害怕这样的变化会危及他们自己来世的希望，或者玷污了宗教仪式，抵抗的强烈欲望就变得势不可挡。当然，宗教的形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巨大的区别。宗教在某些地方被社会精英控制（比如埃米尔和乌里玛[1]——“有学识的人”——在北尼日利亚），他们常常倾向于降低宗教的极端影响。有些地方的情形正好相反，那里宗教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在社会精英尚未完全

巩固自己地位的边缘地带，宗教狂热（有可能是殉教的传统）有可能会盛行。承诺精神和肉身解放的“先知”和“圣人”的出现可能会给原本也许是无组织的对现状不满者注入一定的目的性、组织性和团结性。在牙买加爆发的叛乱中，浸礼会传教士和传教员带来的影响饱受种植园主诟病。叛乱的煽动者奴隶山姆·夏普（Sam Sharpe）就是这样一位传教士。

因此在那些不满被宗教控制和被能言善道的鼓动者煽动起来的地方，反叛就变得更加常见和危险。在那些地方精英充当殖民国家和其臣民的中间人的地方，地方精英的行为就很关键了。他们有可能会分裂或者遭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压力。只要足够大胆，地方精英对叛乱的反应更可能是始终保持袖手旁观，而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者的看门狗，直到叛乱结束。在新近征服的地区，殖民吞并尚不完全，这种袖手旁观的本能就可能会特别强烈了。在殖民权威尚未根深蒂固、疆域足够辽阔的地方，以及沙漠、沼泽、山地和森林这些为叛乱者和逃跑者提供了安全庇护的地方确实更可能经常发生叛乱。

那些叛乱发生的客观条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叛乱的发生。我们一再看到叛乱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关键的诱因，这些诱因的影响被谣言、假消息和人们的恐惧加剧了。第一个诱因是害怕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报复。在那些叛乱者的意识里，他们的行动常常是防御性的，是为了防止威胁或避免受惩罚。牙买加奴隶叛乱之前，传言肆虐：种植园主打算通过杀死男性奴隶和拒绝解放妇女儿童来阻止废奴。那些被指为不守纪律的奴隶担心可能会受到这样野蛮的惩罚，暴力看起来是比和平屈服更好的选择。弗吉尼亚发生的“特纳起义”（也是在1831年）导致逃亡的奴隶杀死了50多名白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年在牙买加的那场更大的叛乱中，只有两名白人受伤）。在南印度的马帕利亚叛军，担心不体面地死在萨卡尔（政府）的手里，从而更倾向于殉道。在密拉特的印度兵叛乱者深知在英国人回来后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便努力消除英国人统治的所有影响——通过杀死他们抓到的英国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第二个诱因是信仰——常常是被误导了的，这会使叛乱得到更多的支持。也许那些起义的领导者一定要相信他们自己的充满希望的预言，或者消除他们自己的疑虑：他们极少有途径接触到确切的信息。第三个诱因在于，赋予叛乱“逻辑性”的是叛军经常严重低估他们要面临的力量。在那些半文盲社会，通信十分落后，眼前所见便是事实。叛乱者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庞大的势力范围和资源的了解非常有限，叛乱者经常对对手的火力和采取暴行的手段毫无概念。有时候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英国人会离开。事实上，英国人迟早会回来，而且往往会更快，并集结了足以镇压叛乱的力量。英国人仅仅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来消灭牙买加奴隶起义，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虽然不是终止）印度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超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来约束布尔人在1899年寻求的独立，最终导致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消耗战。所有的这些并不能说明每一场叛乱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至少有一次，英国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2]1778年，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为了对抗他国干涉，英国和三个欧洲国家展开了一场海战。结果到了1783年，伦敦放弃了叛乱的北美13个殖民地——但并未放弃北美大陆其他地方。

人们是如何展开叛乱的呢？在叛乱者和政府军或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常常是一系列叛乱行动的高潮，而不是第一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叛乱都要求与整装待发的力量进行近距离对抗。离开和移民是对殖民权威无言的拒绝。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下，这样的“看不见的叛乱”有可能获得程度惊人的自治。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逃亡的奴隶在牙买加山峦起伏的内陆与种植园主的民兵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后，他们获得了一个条约和可观的自由。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从开普殖民地艰难跋涉着离开，他们首先到了纳塔尔，当纳塔尔被占领后，他们又分散到南非内陆广袤的草地高原。英国人要求他们投降，谴责布尔领导者是叛乱者，并于1848年在朋普拉次与之进行了血腥的对抗。不过之后英国人放弃了，承认了布尔人的独立，但后来又后悔了。

在那些无法逃离的地方，需要用直接的行动来中断英国人掌控的权威，并且要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一个叛乱先行者的当务之急是将个人反抗转变为政治行动，以调动更广泛的支持。这对于在赢得（或至少参与）战争或论战是至关重要的。塑造一种广为流传的印象十分重要，那就是政府的权威和赢得权威的条件已经消逝。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警惕的政府会采取收效迅速的那些对抗手段——监禁反叛者、夺取据点、部署军事力量有可能摧毁这种假象并且在起义获得上升势头之前将其平息。起义者不得不迅速行动来逃避这样的命运。他们需要从国家的统治之下逃脱并寻求保护。他们制造的大范围的混乱会分散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其军事力量；毁坏国家的通信网络（电报和铁路），会减缓其反应速度并且延缓信息的返回。但是叛乱者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的支持者形成大规模的团队，最好武装起来，建成一个平行政府或临时政府。最迫切的事是他们获得可以帮助他们粉碎政府对地方合作者的掌控、威胁（或破坏）其间谍和线人网络并削弱其残存的威望的力量。除非他们能够做到这些，否则机会渺茫。他们所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政府军事力量的灾难性瓦解。正是这样一种瓦解——武装暴动的结果，推动了英国在他们强势的时代所要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叛乱。

移民叛乱

英国政府在自身面对的所有叛乱当中最害怕的就是移民者的叛乱。这部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常常会吸引来自海外和英国本土的最为仔细且挑剔的审视。最为重要地，大多数移民社会的特点是，他们与英国有频繁的联系，并且在英国有很多盟友和支持者。那些反叛的殖民者可以轻易地发布信息来满足政府的批评者。所以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要使英国人的观点达成一致注定要难得多——尽管没能达成这个目的反而使叛乱者士气大振。非移民叛乱者与移民叛乱者有着明显且尖锐的对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与他们同行，他们也没有将自身的情况登上媒体的途径。以最坏的角度描述非移民叛乱者的行动和目的，或者强调他们的“野蛮行径”以及否认任何不满的存在往

往要容易得多。这样就多了一个好处，不论英国采取何种残暴的方式来镇压这样的起义，都不会明显地引起本土的注意，甚至不会引起批评性的评论。

这种好处还可以更加深入。英国在移民社会的帝国权威天生就比较脆弱，几乎从移民社会一开始就如此，除非（比如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他们有特别的理由保持忠诚。这种权威既不是建立在合作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些问题的明确批准上，它常常是以某种代议机构体现的。在印度，英国没有对移民社会征税的“权利”，尽管英国已经从印度过去的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权利。而且很早以前就有一条规定：殖民地的法律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否决。总督作为帝国中央的代理人只能控制很少的当地资源，并且眼看着自己的资助被嫉妒的议会削减。如果总督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会面临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指责他侵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并且还会有咄咄逼人的意见说他抱有专制的野心。更糟糕的是，他的臣民拥有不可忽视的动员能力来迅速展开政治行动。报纸和其他纸质媒体比如宣传册或传单更能传递观点。殖民生活的日常机构——陪审团、乡镇会议、甚至是赛马会，可以使地方上的意见组织并团结起来，展示其强大。尤其与大多数非移民人民不同的是，移民社会总是有武装的，而且地方民兵常常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影响力。

对于在伦敦的帝国政府而言，这些都是采取埃德蒙·伯克有名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的极佳理由。但这个精明的建议并不总是可行的，更别说是明智的。第一，几乎很少有问题能比土地问题在移民社会更能引发高涨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投机购买和转卖常常是移民精英财富的主要来源。移民精英必然憎恨任何控制他们土地扩张的行为。不过对于帝国官员而言，移民的逻辑是自私且愚笨的。如果置之不理，和原住民接壤地区的战斗就成了家常便饭，因为原住民不愿失去土地。恢复和平需要帝国军队介入——还有帝国开支。第二，在那些原住民民族享受帝国保护的地方（这也许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的），移民违犯条约触怒了英国的宗教或人道观点，帝国介入也许就很难避免了。第三，移民社会追求经济私利的方式可能是母国所不能接受的。在平常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商业和财政动荡的时期，这可以成为争执的主要原因。如果移民中的政客们不得不取悦苛刻的本地选民，他们的帝国同行同样也得考虑宗主国的利益，并且保留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私心杂念。

1765年8月26日晚上，一大群暴徒袭击了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他当时是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省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副总督。哈钦森和他的家人逃走后，暴徒们花了一整晚有条不紊地劫掠和破坏他的房子，拆毁房子的装饰甚至推倒墙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暴徒行为，逐步地威胁着那些与省政府和英国任命的总督站在一条阵线的殖民精英里的成员。似乎没有控制这些暴力突发事件的方法，事件的受害者从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敌人所操控的力量。受害者们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殖民地已经变得几乎难以控制。“权力在百姓

手里”，哈钦森几个月之后写道，“那些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法律不会生效。”不到10年，随着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发生散乱的交火事件，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了公开叛乱，并且迅速蔓延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

以如此加快的速度陷入暴力和战争并不仅仅是不寻常的：甚至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看起来更像是无理取闹，且充满矛盾。因为（白种）美国人已经享有了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限度的政治自由。选举权比在英国都更广泛，税收更轻。当选议会可以比英国的下议院更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这里没有上议院（成员可以被国王任命），没有赞助资金来帮助英国的大臣们结党营私，如果有了这些资金，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选区的利益即可。土地相对而言更充裕，这使财富分配比在英国本土更加公平——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公平。此外宗教自由也更加广泛。

这种悖论当然是明显且真实的。美国殖民地享有的广泛自治鼓励了“国家党”思想的滋长，这种思想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行政权力，认为行政权力本质上是腐败且专制的。行政权力增长和滥用的威胁要求积极的监视和强有力的抵制传统。只要伦敦坚持有益的忽视，这种思想多少能与对英国议会的至上地位产生理论上的共鸣，并且与对英国关系及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共存。对法国的恐惧和憎恨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片大陆，这也是英裔美国人开展西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忠诚不仅是慎重的，而且是自然的。没有了英国的保护，扩张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在1763年以后——法国的势力被击垮，一切都变了。

危机始于金钱。为了对付激增的债务和平息本土纳税人的愤怒，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受益者（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里收回一些战争的巨大开销，受益者是北美殖民者。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案》，这是一次尝试对北美殖民地使用印花征收不太昂贵的税收的尝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承认了英国权威。结果导致了一场骚乱。“在加拿大和彭萨科拉之间没有一个家庭不知道印花税法案。”哈钦森抱怨道，他本人对这个不考虑后果的愚蠢法案强烈不满。该法案成了公敌——它是英国企图颠覆议会和拆散殖民者自治政府的证明。设法通过殖民地总督的权威以及他们的盟友来实施法案，这让许多美国人发现了由后来被称为“效忠派”或“托利党”带来的潜在危险。帝国的决心并未局限于这个法案。1763年公告（为了阻止类似于庞蒂亚克战争的起义发生）鲁莽地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进行殖民扩张，这激怒了那些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目标和战争果实的人。帝国贸易规则更加严格地实施是为了制止殖民商人对关税的逃避，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反抗情绪，也成为“暴政”的另一个表现。

不难发现，为何有如此多的美国人会相信他们自己是腐败的，贵族精英打算强行实施专制权威，以及在殖民地打压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怀疑这种威胁，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同样有很多的英国激进分子会想要告诉他们，他们是英国和美国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他们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自由。然而，这是从抵抗和抗议（甚至是暴徒恐怖行为）到公开叛乱的危险的一大步。尽管在13块殖民地上都有

对英国的反对派，但这一步最先是在马萨诸塞湾省迈出的，这里也是1765~1775年英国和美国人发生冲突的战场。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的抵制和英国关系的叛乱最为激烈，英国的权威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终结得更彻底。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很多原因的。马萨诸塞湾常常最可能成为一个麻烦的省份，其自治的模式、普遍集会的传统以及广泛的选举权（约有多达80%的成年男性选民）意味着政治权力相当分散。几乎所有男性都具备读写能力，这就为各种类型的印刷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导致了对中央权威深深的怀疑。新教教派中的公理会反对圣公会的等级制度，支持自主“集会”，对任命制官僚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到18世纪中期，新土地的日益短缺，以及不愿意移民的态度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随着土地价格攀升和大地主阶级的出现，反对剥夺自耕农平等权以及不公平的财阀统治的声音开始显现，宗教的“大觉醒”使得反对炫耀和享乐的情绪高涨。像哈钦森这样在政府任职的高官深陷“上层圈子”丑闻，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参与了以牺牲农民、手工艺人和没有土地的穷人的利益来聚集财富和权力的不道德阴谋。

殖民地政治激烈的派系冲突，被开除官员的不满都成了印花税法案点燃的火苗轰炸的对象。此后，在政府任职的精英们徒劳地争取控制当选议会，同时还面临着媒体暴风雨般的辱骂以及暴徒行动的持续威胁。他们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劝说在伦敦的帝国政府放弃提高税收的希望，并且恢复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但是伦敦拒绝了，部分原因是它需要钱，部分原因是如果给马萨诸塞湾省退路的话，会导致帝国权威普遍崩塌，加之对“1763年公告”规定的疆域以及贸易规则失去控制。于是，伦敦打算给马萨诸塞湾省一个教训。1768年9月，一个骑兵中队进入了波士顿港并举起了枪。两个步兵营也登陆来支持总督。但是这场行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辉格党成员的政治宣传取得了成效。英国军队被袭击了，并且挑起了1770年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从这次事件之后英军突然撤退了。但是当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对美国征税时（这次英国授予其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伦敦再一次进行了尝试，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实际上，伦敦采取了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式。军队撤回到本土。波士顿港被封闭了。为了防止陪审团的恐吓，刑事审判在英国进行。马萨诸塞的宪法被修改了。这些就是“不可容忍”法案。听起来是一个普遍的警告。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来自13个殖民地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费城集结，公开谴责对殖民地人民权利的侵害，不过在这个阶段暂未放弃同盟。同时，在马萨诸塞湾省，一场暴力战争逼近了。马萨诸塞湾省最后一任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Thomas Gage）在美国生活了20年，并且与美国人结为连理，对于他而言，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阻止政治上的骚乱变成武装冲突。但是这已经太晚了。1774年9月，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马萨诸塞湾省炸药库收缴火药，这个炸药库是马萨诸塞湾省主要的军火库。但这次行为不但没有让政治热度降温，反而让

他的对手确信他在计划军事上的政变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者。于是他们举行了武装民兵的示威，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英国人，进一步袭击了已知的或可疑的效忠派。几个月之后，盖奇再次行动，这一次他选中了在康科德的军火库。本地民兵事先收到了警告并且提前武装，集结到了一起。一次擦枪走火导致了双方由对抗演变成为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惨烈的交火。英军虽突破重重埋伏艰难返抵波士顿安全地带，却最终造成6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1775年6月，他们在这座城市被敌军包围了。尽管收回了邦克山，能够眺望海港，但由于损失惨重，民兵们放弃了突破包围的一丝希望，叛乱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美国最大最老的殖民地，一位农业贵族回应了号召。他与“民主的”马萨诸塞大相径庭。托马斯·杰斐逊为殖民地议会争取到了与英国议会平等的权利，并且谴责国王没能阻止英国议会进行非法干涉。国王乔治三世于1775年10月告知英国议会美国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起义，而他其实只是在陈述其必然性。

长远看来，我们会发现这是移民叛乱里的极端案例。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不妥协成了一股可怕的风暴。在这个有着强大对抗双方的危险世界里，英国人被抵偿帝国防御开支的紧急需要推着前进。英国人关于经济私利的观点使其放松了对美国贸易的监管，这其实是潜在的致命性让步。他们认为殖民者对于未开拓的内陆的殖民企图是贪婪且鲁莽的，注定会引发争夺疆域的肮脏战争——而伦敦肯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英国人的不幸就是缺乏实现他们意志的几乎所有的手段。他们没有资金来建立强大的效忠派，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人。他们草率地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惜为时已晚。他们缺乏政治智慧，而且不重视本地殖民者。事实上，原因还远远不止这些。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殖民地。除了近期激增的移民潮，美国大体上是由根深蒂固的社群构成，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这个叛乱的暴风眼。这培育了地方的身份认同意识，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湾省，本可以增强效忠派地位的英国移民十分稀少。这一点就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从来就不足以打压强烈的美国情绪，效忠派甚至认为，1763年后他们的行动侵犯了已经被认可的权利。在宣传战中，英国人经常处于不利境地，有一大批媒体反对他们——报纸、漫画、传单和年鉴，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更糟糕的是，最近的一位移民托马斯·潘恩（Tom Paine）——他是塞特福德的一位裁缝，他的小册子《常识》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吹响了号角，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本小册子总共卖出了150 000册。

美国也不是随便从灌木丛中劈出来的一个贫困的前哨基地。18世纪6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经济体，其拥有的财富和专业知识可以用来支撑大型战争。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革命的前奏期间，有一些富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的精英们的存在，他们渴望国家未来能够获得独立。这次移民叛乱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其主要领袖的筹划能力，其中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叛乱最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国外的帮助。美国在1778年对英国人试图协商解决的努力的最后一击来自于法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条约承诺援助交战中的革命派。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英国镇压美国叛乱的斗争重要性有些下

降，因为英国卷入了维护在印度、加勒比以及地中海利益的更广泛的战争中，他们同样担心不列颠本岛被入侵。

60年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面对着另一场起义，这次是在加拿大——英国人之前的跨大西洋帝国的残余。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两次同时发生的起义，当时被称为“上下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两次起义的目标是那些被叛乱者认为是腐败且有过分特权的精英，英国人基本上把殖民地政府交给了他们。在两次起义中，起因都是种族和民族的问题，隔壁的美国若隐若现的身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可是最终的结果和美国的独立完全不同：不是分裂，而是有一个宪法公式使本土自治和英国关系协调共存。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在上加拿大（安大略省）爆发的起义时间更短且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在这里，农民和手工艺人憎恨“家族盟约”——围绕总督出现的一个上层的圈子变成的富有的寡头组织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政府赠地牟利，因而与圣公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公会拥有宝贵的“牧师保留地”。他们与银行家和地产公司也有紧密的同盟。起义是由在英国邓迪出生的威廉姆·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领导的，他于1820年到达加拿大。经历了开始的一些错误之后，麦肯齐找了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那就是竞选记者，工作内容颇有美国小地方的风格，揭露贪污、腐败和特权。他成了省内精英眼里的一根刺，以及“改革者”心里的领导。麦肯齐是美国共和党宪法的支持者，他极力要求并成功地将票投给刚刚来到这个省的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将麦肯齐处在边缘的激进政治变成起义的是他与日俱增的挫败感，因为总督和他的保守党顾问都不会从当选议会被开除，所以广泛的支持不能转换成为行政力量。麦肯齐十分确信（有一些正当理由）他的保守党对手正在利用橙带党（许多新教徒或苏裔爱尔兰人最近来到了上加拿大省）的民兵联盟来侵扰和威胁他。在越来越狂热的气氛中，1837年末他策划将武装示威行进到约克（今多伦多）并且强迫政府做出改变。

这是一次惨败。麦肯齐的先遣部队遭遇了一小群效忠派的火力进攻后迅速撤退。他剩下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好发起一次示威，但他们对大规模的起义并不感到愤怒。领导者逃到了国境外。同时在上加拿大省西部的美国出生的移民发起了第二次起义，他们被说他们面对着被剥夺的命运的谣言激怒，也被麦肯齐“获胜”的假消息鼓舞，不过起义同样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英国人极度怀疑美国人是这些起义背后的黑手。有30 000～40 000名美国人参与了侵入英国领土的阴谋，在华盛顿的伦敦势力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抱怨。“一大帮匪徒和暗杀者，”他说，“正在稳步实施他们的计划来破坏和毁灭英国的领土。”现在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前是跨国小冲突的战地。在一次著名的事件里，一群（效忠派）加拿大人擒获了蒸汽船卡罗琳号，这表明他们怀疑船上搭载的是准备发动侵略的美国人，他们把船点着了，然后把它送到了瀑布的另一边。之后的骚乱很快就导致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对抗。

下加拿大（魁北克）爆发的叛乱更加严重。在暴力冲突的两个阶段，超过250人丧生。其中一位是约瑟夫·沙特朗（Joseph Chartrand），他是蒙特利尔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区的石匠和木匠。在筹钱的时候，也许是从客户那里，他偶然结识了一群年轻人。沙特朗迅速逃跑了，不过他们很快抓住了他并且在路边把他殴打致死。在最后的询问中，这群年轻人才交代他们原本是去参加集会，至少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武装好的。一些目击者声称，在这个教区，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并且“效忠派没有受到保护”。另一个人说道，众所周知沙特朗是一个很暴力的人，并且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间谍。这明确地暗示了沙特朗之所以被谋杀是为了阻止他向议会汇报有一群武装力量在行动，所以那些人才急着要把他杀死。但是为什么乡村会处于叛乱的边缘呢？另一位目击者宣称“帕皮诺先生下令在教堂门边宣读命令，要求人们准备好行进……而那些拒绝的人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不是穷乡僻壤里的土匪，而是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律师，他父亲曾是一位测量员，后来变成了地主。19世纪30年代，帕皮诺在当选议会里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里的领导者。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表达了在下加拿大省政府里说英语的少数群体与法裔加拿大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憎恨日渐加剧。他们不喜欢被这部分少数群体支配商业，再加上他们相信来自英国的移民正在迅速侵蚀下加拿大省中说法语的天主教信徒的人的性格，这一切都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诉求。帕皮诺说道，英国政府想要“让我们去民族化，就是为了让我们英国化”。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目的就是将对议会的控制变成他们对政府的控制。随着斗争的继续，帕皮诺的话语暗示一个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共和国是最终目标。英国少数效忠派对此的反应很愤怒，这种不满在蒙特利尔根深蒂固，这一切使得政治冲突越来越有种族色彩，但并不彻底。在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领导当中，有名叫尼尔森（Nelson）的兄弟俩，（很奇怪的是）他们是前海军军官的儿子。他们俩都是医生，也是激进分子，他们都会在即将发生的起义里扮演比帕皮诺本人更加有力的角色。

随着僵局日渐严重，在伦敦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坚决。为了打破议会对所有公共花销的否决（以此来削弱行政权力），伦敦赋予总督一定权威来控制花销，并且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认为这就是一波镇压的开始，是对他们政治行动的集中攻击。他们谴责伦敦的行为是对他们自由的攻击。他们在乡村的支持者迅速开始集结。他们充分利用了一个旧的本地传统：对那些被控违反社群规范的人们实行惯有的羞辱——这被称为“大胡闹”。有传言说，英国人正在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教区组织警告他们中间的政府官员辞去任职并且切断与外界的联系。1837年11月，政府给那些法裔加拿大人政党下达了叛国罪的拘捕令。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圣丹尼斯和圣查尔斯两个村庄召集武装分子进行大型集会，这两个村庄距离蒙特利尔有30英里。起义开始了。

随后，起义似乎要陷入失败。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打算宣布下加拿大独立。在他们宣布之前，一个英国的独立小分队到达，并且双方开始了

一场枪击战。但这并不包括康科德。叛乱者分散着跑回了乡村。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者跨过了美国边境，差不多有60英里远，途中有8个人被逮捕了。但是英国总督科尔伯恩却告诉伦敦这只不过是茶杯里的一点儿小风暴而已：他抵制了效忠少数派的意见并释放了大多数的囚犯。到1838年4月底，戒严被解除。英国政府的特别专员德拉姆勋爵决定反对把领导者送去审判（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对死刑宣判）的做法，并把这些人流放到百慕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令德拉姆不安的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律师证明他已经越权。囚犯们因此被释放，然后迅速回到美国边境，在那里，一场新的起义正在被策划。英国人开始怀疑有更大范围的阴谋。“一个可怕的组织，被秘密的誓约和秘密的记号捆绑在一起，一定是存在的，”德拉姆向伦敦汇报道，“由于害怕这样的迹象……神秘的组织有时会发出秘密谋杀或大屠杀的威胁或警告，国家里的效忠派居民因此放弃了他们……偏僻的住处。”一些人一起逃离了下加拿大省。一切似乎都已经就绪，就等着起义的爆发。

起义最终在11月初爆发。由于害怕由猎人兄弟会（Freres-Chasseurs）组成的叛乱者网络，一群武装了的居民开始集结：有3 000人在内皮尔维尔集会，这里离美国边境不远，更多的武器被带进来，另一部分人去往蒙特利尔附近的印第安人居留地，希望能缴获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打算通过麦肯齐的支持者在尼亚加拉发动袭击来拖延起义。罗伯特·纳尔逊跨过了边境，并且宣布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不顺利。美国人在边境缴获了藏匿的军火，印第安人杀死或俘虏了攻击者，效忠派民兵（包括5 000名来自上加拿大的英裔加拿大人）和英军扰乱了由罗伯特·纳尔逊和另一个名叫科特（Cote）的法裔加拿大医生领导的叛军力量，并果断地打击了他们。民兵烧毁了疑似叛乱者的房子。叛乱的领导者再一次逃跑了，罗伯特·纳尔逊在返回纽约之前甚至跑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在纽约最后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的论文。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约瑟夫·卡迪纳尔（Joseph Cardinal），是一名领导了对印第安人的攻击的律师，他就是因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的两人之一。总督说，这种极端的例子是必要的，另一些被判有罪的人活着逃跑了。

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由于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以及与比利时和地中海东部（“前往印度的路线”）爆发危机与之相呼应，英国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伦敦派遣了大约10 000人的军队来保障加拿大的安全，这比1775年派给盖奇的更多。英国急需制定政治对策。这个对策出自于德拉姆勋爵，但是绕了好几个圈子。德拉姆发现在英国人与被他称为“加拿大人”的人群之间有着很深的种族敌对。他们的“互相不待见”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当孩子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分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两派，就像他们的家长一般。”加拿大人“发现英国人处处压榨他们，在土地所有权上、在商业上、在零售贸易上……在宗教上，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上”。德拉姆的解决办法是极端的。他说（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停滞不前的人”。如果说在下加拿大占多数的说法语者与上加拿大的更活跃的说英语者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英国来的移民的影响就会很快成为这个落后社会的溶剂。那

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英国化：一个鲜明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会消失。1840年联合法案遵循了德拉姆的对策。但是德拉姆被证明是错误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第二项主张。德拉姆在他1839年的著名报告里说道，叛乱是政治上遭遇挫折的产物。在那些没有办法使行政权力回应本土观点的地方，在那些反对派领导不能参政的地方，政治注定会沦落为不负责任的对民情的煽动，或者最糟糕的情况，沦落为叛乱。最好的解决方案便是执行温和政策。那些享有广泛公众支持的人应该被允许任职。这样做是期望能够防止为了破坏政治秩序的无节制的承诺以及控制权。经过了6年的政治调动，伦敦才接受自治政府——由获得多数支持的人担任部长组成内阁，这是管理殖民地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这套政治运作方式下很多人都有可能上台，结果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曾经的领导路易·伊波利特·拉方丹（Louis-Hippolyte La Fontaine）抓住了机会。拉方丹在起义期间曾经在国外。他回来之后便排挤帕皮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起义期间缺席的行为导致了这种不信任）。他还反驳道，为了保存自身的文化特性（“文化幸存”），要求法裔加拿大人接受和英国的关系并且与上加拿大的改革派合作来建立自治政府。为了反对来自蒙特利尔的英国人凶恶的敌意（对他们而言他是一位隐秘的革命派）和暗杀的威胁并得到一位明智的英国总督的支持，拉方丹让法裔加拿大人服从他的计划。最终他与上加拿大领导的同盟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议会政体。通过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和解，拉方丹（现在基本上被人们遗忘）塑造了现在的加拿大，也是他让自治政府成了结合本地自治与维持英国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

加拿大叛乱并未遵循在美国大规模移民叛乱的革命路线。这其中的一些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在规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加拿大的两次起义里，叛乱者都不能召集足够多的一群拥护者来威慑政府的支持者。没有一次起义与英国人在列克星敦遭遇的那类激动人心的早期失败类似。忠诚的传统（几千名效忠派于1783年出逃美国到加拿大定居）以及最近从英国来的移民浪潮扼杀了麦肯齐赞成的地方共和主义。魁北克的历史学家依旧困惑的原因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叛乱大体上局限在蒙特利尔周围的南部地区，即属于上加拿大的效忠派民兵的范围。推动美国人起义的思想主张在加拿大没有那么强烈和普遍。虽然英国人一直担心这一点，加拿大叛乱者也没有得到美国人足够的同情，这是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区别：外部援助因此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事实上，美国人曾积极地阻止武器跨越边境。此时英国的政治大环境也大不相同了。鼓舞了美国叛乱者的激进浪潮在这里不那么明显也缺乏对议会至高无上的坚定主张以及对税收的要求。伦敦派遣解决危机的总督德拉姆勋爵、西德纳姆（Sydenham）勋爵、查尔斯·巴戈特（Charles Bagot）爵士、查尔斯·梅特卡夫（Charles Metcalfe）爵士以及埃尔金勋爵（西德纳姆，巴戈特和梅特卡夫均逝世过早），他们之间并没有统一思想。但是他们拥有更多的调度空间，并且比处理问题的前辈更有技巧。结果就是给温和派和改革派留下更大的空间来达成妥协，打破僵局。拉方丹有能力展现一名非英国人可以使用“英国式”机构来保留他们的身份——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来紧紧抓住了这个教训。叛乱也许塑造了美国，它同样以更加

微妙的方式塑造了加拿大。

印度民族大起义

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开始只是一场叛乱，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地震。英国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它，并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来镇压它。为了镇压起义，英国出动了超过90 000人的部队，他们大多数是从欧洲紧急赶来的。这次印度民大起义几乎完全是一场发生在北印度的事件，却波及比哈尔以及本德尔肯德，在这里，印度中部高地逐步下降为平原。尽管收到了早期的警报，孟加拉依然保持平静，南部马德拉斯的“管辖区”也是如此。这场地震的真正震中位于斗争失败又获胜的地方——印度斯坦：在德里与勒克瑙之间广大的恒河平原，包括河间冲积地（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区域）、阿瓦德（被英国人叫作奥德）和罗希尔甘德（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他们自从莫卧儿时代起就在那定居）。这里是印度农业的腹地[河间冲积地是“全球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一位早期的总督韦尔斯利（Wellesley）勋爵说道]，也是以前莫卧儿时代的心脏地带、印度帝国历史上的中枢以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化的港湾。没有一位印度的统治者胆敢忽略它，或者允许它落入敌人的手里。英国人从1801年开始占领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在三个关键的地区——旁遮普、阿瓦德和占西，他们的权力是非常新奇的事物。并且他们不能忘记北边不远处就是它们与阿富汗的边界（旁遮普被占领后这条边界更近了），1839～1842年不幸被侵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成为一种长期焦虑的来源。

起义被看作是愤怒、憎恨以及恐惧的巨大结合体，这其中混杂着期盼英国人消失以及以前的印度会回来的希望。若没有最初的密拉特事件，就不会有由这次起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民族大起义。密拉特在德里北部，1857年5月10日星期天，那里发生了叛乱。叛乱本身对英国权威是可怕的威胁和艰巨的挑战，但若不是叛乱释放了英国统治引起的压抑已久的害怕、挫败和仇恨，那么它也不会如此重要了。因为英国对待那些阻挡他们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很粗鲁，甚至很残忍。作为一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力量——大体上是印度人组成的孟加拉军队，他们开始着手将北印度重新塑造为帝国需要的模样。英国于1849年消灭了北印度残余的力量（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的国家）之后，他们采用了“无嗣失权”（没有法定男性继承人）的原则，于1853年接管了重要的土邦占西。就在起义的前夕，英国人粗暴地占领了阿瓦德土邦，其首府在勒克瑙。勒克瑙是印度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印度伊斯兰教文明最大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德里）。他们使最后的佩什瓦王朝继承人（马拉塔联盟的世袭领导者曾一度匹敌英国人，号称印度的强大权力）的强烈仇恨，因为英国没收了他大部分的退休金，这个人就是纳纳·萨希卜（Nana Saheb）。他在比图尔旧城拥有一座幽暗的宫殿，比图尔离坎普尔有14英里，他的代理人被怀疑持续策划阴谋诡计。英国人对在德里的

莫卧儿皇帝展现了正式的（也许是不真实的）敬重，因为他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是他的附庸），现在渐渐被当成无能的退休者来对待。对于一些乌里玛而言，伊斯兰教正处于狂热的faranghi（即法兰克新教教徒）的威胁之中。的确，现在一些英国官员和士兵展现出来的对福音派传教的热情使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们都十分忧虑，由此带来的威胁不时出现在叛乱者的声明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试图利用收取土地税制度标准化的做法将那些有“税收权利”（代表国家有征税的权利，并将一部分交给英属印度税吏）的人排除在外，他们未履行支付的义务，这样就拓宽和加深了起义蓄积的能量。各种因素起到的作用并不均衡，但显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导致了起义。一些人被最大限度地征税却依旧保持忠诚，或者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些人至少受到了农业商业化和叛乱中的糖、鸦片和靛蓝类染料的繁荣的影响。“干旱”地区的人们比那些得到灌溉的地区更加愤怒。所谓的“村落兄弟会”（一个有支配地位的种姓群体）本来控制着税收权利，现在又丢失了，因此他们被逼迫返回这里，仅仅是作为农民，他们不仅丢失了收入，还丢失了地位和荣誉。但是，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很快会有其他因素引发乡村起义。

到1857年，孟加拉原住民步兵的74个团已经非常不满。过低的收入水平、失去的补助、掠夺物和战利品的缺失以及1856年“普遍征兵令”让所有士兵都有义务去海外服役（高级种姓印度人因为宗教原因不能跨海），这一切都导致了不满。英军占领阿瓦德惹怒了大量从阿瓦德出来的人，他们现在也失去了一些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军队主要是从高级种姓印度人、婆罗门和拉其普特人中间招募的。他们不喜欢军队被低层种姓的新加入者稀释，不喜欢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害怕任何宗教侮辱迹象。早在1857年1月，大范围骚乱的迹象就出现了。在3月底，一位名叫潘迪的婆罗门士兵，在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兵营袭击了欧洲军官，而潘迪的同伴在一旁看热闹。潘迪被处以绞刑。同时，英国人开始遣散那些被怀疑不忠的原住民兵团。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但当时暴风雨其实是从遥远的北部、德里附近的密拉特来的。

85名印度士兵拒绝实弹演习，因为害怕涂了猪油蜡的子弹玷污了宗教信仰，麻烦真正开始了。他们被判处10年苦役，在战友面前和一大队英国军团的枪口下，他们被戴上了镣铐。第二天，也许是害怕英国人会过来拿走他们的武器或者取消军团，印度士兵率先发起了攻击。在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追上这群印度兵之前，他们已经杀死了41名白人——包括军官、治安官、妇女和儿童，并且前往德里。这已经让英国人震惊。就在几天之内，他们的行动在整个北印度被效仿。从远方的白沙瓦（开伯尔山口旁），到南边的印多尔，再到东边的迪纳杰布尔，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报道无处不在。

这里关键的事实就是起义的庞大规模。印度士兵在超过40个军事据点发动叛乱。也许一共有大约70 000人参加起义，另外还有30 000人擅离职守。导致起义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尽管证据不足，但这很可能是一

场阴谋。最大的不满情绪存在于印度士官、连长和印度陆军尉官当中，他们对下属的控制往往比其他同级军官对下属的控制更多，其下属一般是从邻里和亲戚中征召而来的。舆论抱怨称白人军官十分懈怠且缺乏真正的权威。但似乎恐惧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叛乱一旦发生就没有后路可退。印度士兵只要卷入其中，不论身处多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被原谅。因为一些怀疑，他的团会被取消，他的生计也随即被毁。如果英军就在附近，那么他的命运可以总结如下：若他在交火中存活了下来，等待他的就是绞刑或者炮刑——英国人恢复了以前莫卧儿时代的惩处办法。1857年6月，加尔各答的报纸《英国人》报道，“刺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度士兵无缘由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起义，同时也害怕政府复仇。有一个冷酷的逻辑：印度士兵逃脱报复的最佳机会就是杀死每一个可能做出对他们不利证明的白人。即使是囚禁对他们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提醒，提醒着他们英国人可能会回来。他们的直觉相信，除非他们能彻底抹除英语，并且不留任何痕迹，否则英国人必然会回来实施他们的报复和暴行。叛乱者有一句俗语，“英国人从来也不会忘记或原谅”。“每一座楼房……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都遭到了“烧毁和破坏”。1857年7月萨哈兰普尔的治安官说道。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士兵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叛乱的结果是摧毁了英国人所依靠的高压政治的基础结构：拉拢当地势力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系统里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随之而来的后果有两个。第一，心怀不满的权贵和他们富有组织性的拥护者也许会摆脱控制。充满魅力的占西邦主妃因为4年前丈夫的死亡被英国人剥夺了马拉塔公主的头衔，随着占西守备部队叛乱，她又重新回到了王位上。也许她想和萨希布（萨希布是佩什瓦的“继承者”）联合来重建旧秩序。“这些英国人是人类宗教的曲解者。”她在公告中宣称。当在坎普尔的英国人向萨希布求助来抵御叛乱的守备部队时，萨希布的机会来了。最开始，他保持中立，不过当印度士兵出发前往德里时，萨希布和他的助理坦提亚·托皮奉劝这些印度士兵返回，并且控制了这些人。阿瓦德的封建大地主（或taluqdars），随着英国人骑上马鞍开始担心自身的命运，因此，他们召集了他们的仆人控制了勒克瑙。阿瓦德的国王被重新扶回了王位。同时在德里，密拉特的印度士兵行进到了这里，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夺回了他以前的王位，重新成为合法权威的来源——但他并未掌握实权。在整个北印度，古老的政体正在回归。当萨希布于1857年8月访问勒克瑙（离坎普尔不远）时，他提醒接待者按照他的地位需要鸣放21响礼炮。但最后只放了11响。

第二个后果让英国人更加担忧。他们也许没把王公放在眼里，但是农民大起义全然是另一回事了。这次农民起义最有可能的诱因就是一些新闻或者谣言，这些谣言声称英国人即将离开而且他们的英属印度已经毁灭。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地区地主或大人物的角色导致的，他们必须决定与谁站在一边。无论叛乱的士兵出现在何处，本地的权力平衡都会被改变。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官员就迅速撤退到最近的要塞。农民行进到城镇中，或者到了地区的中心时，有时候会去洗劫（英语单词“loot”[3]是从乌尔都语借来的），但更常见的做法是烧毁政府机

关，包括它的税收记录和声明。就像100年后英国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人被乡村叛乱的模式给难住了。从一夜间的沦陷到暴力混乱，对他们自身和家庭突然的威胁以及对谁是否忠心的不确定（经常性灾难的诱因）带来了绝望的情绪。更糟糕的是，火器是随处可得的：农业社会并未解除武装。“武装的百姓人数……至少有300万，”《印度之友》愤怒地宣称“他们是印度武装的败类”。也许不那么让人困惑的是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的经济大动脉（英属印度的军事中坚，穿过了大多数叛乱的地区）依旧在运作，附近的人们已经准备好离开。也许这条经济大动脉意味着英国权力曾经到达的地方，也是英国的报复最有可能开始的地方。

对于英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遏制叛乱。他们在印度斯坦的心脏地带鲜有成功。不过在旁遮普，有电报可以提前报信，再加上英国人的无情和不耐烦，使他们恰恰有时间来行动。他们的优势之一就是白人军队的大部分都在这个省内，所以容易被征服，并且会威胁到阿富汗的疆域。即使如此，解除印度军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仍然势必造成血淋淋的杀戮。在白沙瓦，大约有40名叛乱者被枪决，他们变黑了的头部落在旁观者的人群里。这种残忍的示众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英国人能够通过旁遮普的部落首领建立一支很大的“非正规”军事力量。正是这支军队（同在密拉特和其他地方剩余的派遣兵一起）包围了德里。德里看起来是印度起义的首府和中心。

叛乱逐渐演变成了野蛮的肉搏战。有些时候，英国人自以为位于高处，实则被困住了。随着臭名昭著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和他来自旁遮普的军队采取行动，转折点出现了。他是一位在都柏林出生的强壮而有魅力的（有些人说他精神错乱）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当英国人在9月初准备好了重炮之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杀出一条血路冲进要塞城市。不过一旦他们通过了城门，就进入了狭窄的旁道，还会面临军队最害怕的城市里的好斗分子。“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年轻的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写道，“我有幸看到英国士兵始终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也许，足够幸运的是印度士兵的抵抗消失了。他们撤出了城市。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擒获。护送者帮助他的儿子逃跑了，不过后来被英国追捕者追上并且枪杀，这似乎是英国人来破坏王朝延续的蓄意行动，国王的大部分侍从都被迅速处以绞刑。城市陷入了杀戮和洗劫。单单来看城市的1/4部分，就有大约1 400人因为英国军队的报复而被杀害。那些发动攻击的人中有1/3在那一晚丢掉了性命：其中包括差不多600名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包括约翰·尼科尔森），还有将近500名效忠派印度士兵。

如果英国人现在希望起义能平息，那么他们将会十分失望。当他们为占领德里而战斗时，起义的范围更广了，程度也加深了。他们在贝拿勒斯（瓦拉纳西）解除印度士兵武装的企图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英国人制服了他们的抵抗，并且对叛乱者处以绞刑。消息传开后，在安拉阿巴德发生了暴力事件，阿拉哈巴德是亚穆纳河和恒河交汇的重要沿河城市，一些白人在那里被杀。英国人于6月17日到达，他们的报复是残暴的。在接下来的肃清中，几百人被处以绞刑，上千人丧生：大约有6

000人。在坎普尔的上游地区，英国的守备部队向萨希布和他的士兵投降了。在混乱中，英军坐船到下游的航程在中途被射击打断了。接下来发生了大屠杀，以及一起更加臭名远扬的事件：200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城中的一口井里。这是对英国人现有的报复情绪进一步的毁灭性的刺激。同时，萨希布（参与了杀戮）自己在7月初自立为佩什瓦藩王，复辟“马拉塔联盟”的意图非常明显。发生在向西100英里的瓜廖尔的叛乱将一支新的叛乱力量带到了这里。

英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在平原的一端重新占领了德里，在另外一端重新占领了安拉阿巴德，他们仍然要面对在北方的罗希尔甘德以及在南方的本德尔肯德的场面壮观的叛乱。他们不具备再次对当地强加控制的军事实力：来自英国的增援仍然在从开普附近的漫长路途上。但是直到这些力量准备就绪，他们才会放弃上印度。这样做也许会坚定叛乱者的决心，也就是允许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因为政治原因，重新占领坎普尔和勒克瑙（即叛乱地带的主要城市中心）变得紧急并且关键。他们也不能让英国反抗力量的资金陷入未知的命运。例如在阿格拉，英国人一直在等候武装出击队抵抗叛乱者控制的村落，但他们极少与在别处的同胞联系。因此在1857年7月，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手下的一支小军队一路奋斗到坎普尔。不过这位将军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是脆弱的，而且他最初对勒克瑙的进攻也被印度士兵粉碎了。直到11月份他们才将在管辖区[在那里，书籍被用作沙袋——《拉德纳的百科全书》中的120页可以用来阻止一颗火枪子弹]的英国人释放。又过了4个月，他们才获得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同时，他们的仓促返回也导致起义范围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重新占领坎普尔6个月之后，加尔各答的总督向伦敦汇报道：“整个河间冲积地（附近的地区）中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敌人控制……已经很多天没有阿格拉的任何消息。”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印度士兵编队或占领一座城市，他们也缺乏使胜利变得具有决定性或者围捕叛乱者的资源。相反，印度士兵消失在了乡村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或者成了当地权贵征税队伍中的“军事帮扶”。他们还会做什么其他的呢？

但不仅仅是英国人才进退两难。在他们统治消失（有时候是半个月或一年，在那些偏远之处则时间更长）且有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政策就被改变了。当叛乱者领袖出现的时候，一位英国官员说道：“他们的活动一点儿也不匆忙，而是以最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他们通过信件召集了每个村落的柴明达尔（地主），从而榨取他们的顺从和贡物。”一旦这些人拒绝，武装力量就会被派遣至当地。地方精英也许期望建造一个以他们为基础的政权，或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受到恐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被冠以“不忠”的名号。这并不仅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件事关生死的事情。当英国人回到一个地区，他们同样想要得到柴明达尔的拥护。但是没有哪个柴明达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就范的话他们对英国的忠心是否只在表面上被承认。如果英国人相信，或他们的间谍汇报，或者说如果他的敌人声称他不忠诚，那么柴明达尔就会在能够做出抵抗前被处以绞刑。当叛乱者攻陷这座城市的时候，在坎普尔的印度副区长依旧停留在其原位上。英国人回来之后，他被迅速地处以

绞刑。英国采取了戒严的办法，带着仇恨的情绪，绞刑是最后判决采取的默认形式。许多人在他们的地区害怕和讨厌“印度士兵的统治”，更害怕东印度公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命运，这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无视他们的传唤（在英国人的眼里）是明确承认其有罪。如果能够，他们定会实施惩罚。

一旦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沦陷，就终结了一个叛乱者政权的前景（最多是微弱的），这种悲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贯穿了起义的整个过程。这并不等同于一支警队来包围或镇压特定区域的起义，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实际上，英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反对他们的。“正是由于起义的本质，还因为需要确认大部分起义的不可能性，以及把他们带来的罪恶还给他们，区长建议要把叛乱者到过的村庄进行系统禁烧和摧毁。”那些能够携带武器的人都被射杀或被剑杀，他们的住所也被烧掉了，一位Khaki Ressala的成员回忆道，Khaki Ressala是一支英国准正规军。囚犯被处决了。结果常常是将农村人口调动起来，以反对不加选择的杀戮和烧毁的威胁，以此在主要城镇被收复之后延长乡村抵抗的时间。的确，随着英国军队的行进，可以在路边见到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被处以绞刑，这一幕甚至令许多旁观的英国人感到震惊和恶心。

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之时，英国人在恢复叛乱者占有的城市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858年1月恢复了法鲁卡巴德，3月是勒克瑙，4月是占西（这座城市有5 000人被杀），5月是巴罗利，6月是瓜廖尔。占西邦王妃在瓜廖尔过世，不过萨希布以及坦提亚·托皮撤回了乡村。在那里，战争继续。印度士兵在勒克瑙被赶了出来，分散到了阿瓦德来寻求支持——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当英国人追赶他们之时，他们正和taluqdars（他们的要塞被无法穿透的竹子包围）展开一场激烈的最后一搏。到1858年10月止，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仅仅是阿瓦德的1/4投降了，英国警察的公告仍然在传播。在埃塔沃南部平原的边缘，以及本德尔肯德高地，战争一直持续到年末之后。“数百名叛乱者依旧有武装……”1859年7月，一位赫米尔布尔的治安官说道。萨希布消失在了尼泊尔的特莱，这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片丛林沼泽地，他被认为死在了那里。坦提亚·托皮就没有那么幸运：他被英国人抓住了，并处以绞刑。1859年7月，总督宣布了“和平的状态”。起义慢慢平息了。到起义彻底结束的那一天，大约有2 000名英国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将近9 000人因疾病而死。死亡的印度人的数量——印度士兵和治安官，从来都无从知晓，不过一定超过了10万人。

究竟是什么让英国人能够征服起义？从军事上的角度来看，一旦他们在第一阶段的风暴中存活，并且重新集结了旁遮普人和廓尔喀人，他们就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他们拥有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大炮，在火力上远远超过印度士兵，尽管印度士兵非常勇猛地搏斗，且被证明擅长防御，但仍不是英军的对手。虽然困难重重，但英军一直展现出凶猛的好斗性，直到获胜。他们的军官团认为牺牲是一种荣誉，因为这需要展现极大的血气之勇（一种还未探索的社会现象），这也许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进攻德里的过程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英国军官死亡。相反，叛军力

量遭遇了无组织的领导。从政治角度来看，一大批英军的最终回归重建了基于对英国人强势的恐惧之上的平衡，改变了使他们的统治处于危险当中的高压和合作之间的“不平衡”。

印度民族大起义因而不能被看作印度的独立战争：因为它缺乏组织性，思想性和集体团结。起义没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而且起义的范围仅仅限于北印度。起义的爆发依靠孟加拉原住民军队的特别性质，那就是他们是作为衰退的且不满的农民中的精英参战。即使在北印度，起义也是不稳定的。许多印度人因为觉得起义危险且无用所以拒绝参加，而更多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忠诚才是安全的。英国人采取了在其他地区多次使用的模式，但这一次试图预先制止起义的行动却引发了另一场起义。他们的报复行动加剧了当地印度兵强硬的抵抗并且使这种抵抗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些原因，叛乱者和效忠者的动机变得十分难以确定。一些叛乱者被处以绞刑，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是形势、仇恨以及英国人迟钝的受害者。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人常常因为印度人的勇气和宽容才得以存活下来。明智的英国官员费尽力气驱散关于印度士兵暴行的丑陋谣言，阿格拉的情报局长曾撰文称，白人妇女被强奸的传闻绝对是假的。事实上，他们很快变得焦虑起来，因为一旦暴力平息下来，报复行动只会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不出所料，如此大型的起义是具有标志性的。1858年11月，英国女王发布公告，基于宪法权威，英国官方正式从名声扫地的东印度公司接手印度，公告谈到了和解，并且承诺对不同的宗教和种族实施平等对待的政策。但是在很多方面，英国人实施了对印度的第二次征服，并且留下了确切的迹象。在德里的伊斯兰教教徒被驱逐出城；勒克瑙的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并且建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更好的消防通道；坎普尔那口致命的井成了纪念和祭奠的地点——这有意识地提醒着在印度的英国人，种族团结是极大的美德。从政治上来讲，起义让英国人与王公达成妥协，安抚乡村精英并且强调了他们统治的“东方性”和“传统性”。因此，很自觉地，英国女王成了“皇后”，而她的子民对她也表现出相应的尊重。对几乎所有印度人而言，这件事带来的教训是，用武力攻击英国人只会导致灾难。当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时，其领导者常常强调他们的忠心以及对暴力的憎恶。

军事后果也同样引人注目。英国人取消了以前的孟加拉军队，包括其欧洲军团（其中有一部分并入了本土的英军）。当英国人改造军队的时候，首先缩小了规模，他们招募的人几乎全部来自效忠派旁遮普人以及强壮的山区人民——所谓的“善战民族”。北印度平原叛乱的高等种姓的农民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个铁规则被定下来：不论英国的印度军队规模多大，与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相比，绝不能超过2：1的比例——这是一个强大的保险政策，由此产生的花费都落在了印度纳税人的肩上。最终，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遗产”。一位英国官员回忆起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来自印度坎普尔的一位商人签署了商业请愿书。当请愿书呈现在英国专员面前的时候，他对主要签署方

说道：“在叛乱的期间我撞见了你的父亲：他是应该被处以绞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暗示十分明显。签署方在混乱中撤出了，请愿书因此落空。这几乎成了一个陈词滥调，英国人最终是用刀剑来统治——或者是利用其进行威胁的，他们的防备永远也不会放松。也许这次“叛乱”精神的最后一次高潮出现在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在5名欧洲人在这座城市被杀之后，戴尔（Dyer）将军手下的（印度）士兵射杀了将近400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戴尔因此名誉扫地。但是对很多在印度的英国人而言，他是一位在最恰当的时候阻止了一场新叛乱的英雄。

叛乱者和移民

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使印度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并未导致英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征服和掠夺，因为英国人太少，而且他们需要印度人的合作来统治。其他人没那么幸运。由原住民发起的反对殖民国家和社群的抵抗和起义更加具有危险性。移民有着更加强大的动机彻底击垮对方以及对之实现完全的征服。他们不需要那么依靠本地的权力掮客，也不需要为他们寻求的——或者说他们相信的利益而做出妥协。而且一旦移民的桥头堡足够壮大，他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跨过心理上的门槛。他们已经占领了的土地现在成了家园一般的存在（也许还不是祖国）。这里现在是——或者应该是白人的国家，这样一来原住民最多是成了可以剥削的资源，最糟的一种可能是需要被镇压的一般威胁。其的结果就是道德意识的转换，这是极其重要的。原住民理所当然的权利如今被帝国主义重新打上了多余社会的野蛮的遗留物。作为旁观者，谴责这样的转变是很容易的，而认为我们不会屈服于同样的道德诱惑则更容易。

这种斗争的迹象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疆域随处可见：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南非。在加拿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被原住民人口的稀少（部分原因是流入的疾病）以及对土地的有序购买降低了。但这种可能性远没有被完全消除——瑞尔的叛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除了塔斯马尼亚，在那里，由移民民兵和军队发起的蓄意运动逼迫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在1830年后离开海岸，开始了致命的流亡），大部分移民对原住民的袭击是地方性的、非官方的并（在那些有组织的杀戮之处）被刻意保持了低调。因为原住民人没有土地权，疾病又导致了人口的减少，所以不能应付大规模的抵抗，真正的起义——扰乱移民权利或要求移民放弃土地扩张，几乎不会出现。而在新西兰和南非，情况远非如此。

因为1840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英国的权威被扩展到整个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的毛利首领也同意了其中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因此在英国人眼里，毛利人受英国的支配，对英国政府效忠并且需要遵守英国的法律。实际上，理论上的坚硬边缘被妥协缓和了。毛利人可以处理内部的

争端，只要这样做不会损害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或者与英国人制定的法律过分冲突就行。事实上，普遍认为有两个新西兰，一个是毛利人的，另一个是白种人的，这两个新西兰被总督的权威结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总督在毛利人首领中是有权威的，另一方面在移民者的领袖中也有权威。英国人对毛利人表现出反抗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在那些力量不足的地方，英国人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1860年，这种“有限责任”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首先，在移民社会内部，部落的土地所有人对于出售更多土地有着日渐增长的需求，这些人的权利在条约中被视为不可侵犯。条约规定，这些土地先被出售给殖民地当局，然后重新卖给移民。但是，毛利酋长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土地的丧失迟早会引发社会和文化的崩塌。

接下来的是僵持以及之后争执的爆发。在北岛的部分地区，毛利人开始对那些愿意把土地出售给白人的人施加压力。所谓的“国王运动”标志着毛利人需要发出更大的政治声音使总督府听见自己的意见，以此来对抗移民议会和他们喧嚣媒体的咆哮。在伦敦的帝国政府对这类新的毛利人政治主张采取了平静的态度。而移民者（到目前为止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没有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旦允许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来打击毛利人出售土地（他们宣称要通过恐吓来达成），势必会粉碎一个可行的移民社会的前景，并将殖民地推回到之前那种半部落经济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激起阻止自由出售土地的阴谋是一种叛乱的行为。

186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北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塔拉纳基、怀卡托河、普伦蒂湾和东海岸被“蕨类植物中的大火”烧毁了——这是一场发生在“叛乱”毛利人与英国人（移民民兵和常备军）和他们的毛利同盟者Kupapa之间的战争。无论在哪里的战争中，移民者都处于上风，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自私的逻辑。密谋阻止土地的自由出售是一种叛乱行为。而对于叛乱的惩罚是没收土地。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叛乱的人之后可能会请求补偿——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这些土地可以被政府出售，用来抵消镇压起义的花费以及移民对土地的渴求。1863年的《镇压反叛乱法案》为其提供了法律机构。大规模的没收行动标志着冲突的结束，并在那之后继续存在。60年过后，一位司法委员总结道：“在他们参与任何起义之前，原住民都被当作叛乱者对待，并且还针对他们发起过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卫。”

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无情地部署一边倒的没收土地程序清晰地展现了移民的意图。毛利人却逃脱了被无限制的移民权力施加影响的最差结局。他们保留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在移民议会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基本上逃脱了移民者领袖在别的殖民地区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移民者的“中庸之道”反映了新西兰的情形。在这里，征召毛利劳工入伍的需求很低。那些在偏远的“高地中央”以及北岛东部的毛利人土地在这个时候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当没收土地的管理负担威胁到国家破产时，没收充公的程序当然要喊停。因为这样有可能导致绝望的毛利人发起反抗，并且发生战争。毛利人也令英国对其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条约中规定的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对英国政府的要求却无法被否认。与他们似乎注定要

经历人口的下降直至最终的灭绝的命运相比，失去土地似乎更加容易被忍受。现在，一些白人被历史遗迹吸引了过去。这些遗迹反映了毛利人所遭受的苦难，但现在看起来只觉得有趣而已。

不像新西兰殖民地，南非是一片巨大且动荡的大陆，那里诸多政权并立且朝不保夕。牛车旅行者（即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离开了英国人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在陆地包围圈开辟出了他们的征服地带，在那里，非洲人的国家受到了自相残杀的战争的严重影响，这些战争被称作“姆菲卡尼”或“折磨”。他们拒绝了英国的主权，并否认对英国的依附关系。他们占领了非洲人的土地，一方面，急需非洲劳工，另一方面，他们也限制非洲人拥有枪支。他们对英国传教士的怀疑根深蒂固，并且谴责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个尚且存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新教圣徒是一名恶贯满盈的军火走私犯（利文斯通并没有否认这种指控）。但是从19世纪40~80年代起，布尔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扩张。他们的主要国家“南非人共和国”摇摇欲坠，缺少现金和武器来对其非洲邻居（佩迪人，斯威士人，向东的祖鲁人，向北的恩德贝勒人，向西的茨瓦纳人）施加有效的控制。能够用来更好地形容这次暴力的名词是“对抗”而非“起义”。

在开普的东部边界以及英国的纳塔尔，起义的原因和影响可以被看得更清楚。最后一次比较大的起义的发生地位于现在的特兰斯凯地区，大约3 500名科萨人被英国人杀死，他们的牛群被擒获，很多成年人幸存者被派遣到开普作为契约劳工。许多社群的土地被征服或没收了，他们现在聚集到了一起，暴力冲突也随之而来。对枪支的控制是造成紧张局面的最主要原因。1873年，一名纳塔尔酋长Langalibelele违抗了要登记他手下部落成员持有火器的强制令，并且辱骂了提醒他的信使。这导致了军方管制开始实行，移民民兵开始集结。在部落与白人军队发生冲突并且造成一些死亡之后，因为害怕最坏的情况出现，整个部落逃离了他们自己的领地。移民民兵为了寻求报复，在部落领地制造了一片混乱的杀戮，他们放火偷牛，无恶不作。Langalibelele因“起义罪”被带到法庭根据原住民法律审判。接下来上演了一出闹剧，殖民地总督装扮成首席法官，并且在草地的帐篷里主持了审判，他有的时候还会戴着头盔，有时候带着插上羽毛的头圈。审判小组里包括了法官、控方和陪审团，这虽然很费钱，却很方便。但有些奇怪的是，首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到罗本岛，但很快这个惩处被伦敦否决了，因为伦敦认定这超出了总督的权力。

纳塔尔的历史掩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错误认识，那就是英国人对待非洲人比对布尔人更仁慈和开明。纳塔尔于1893年被授予（移民）自治。其白人人口（1891年有大约46 000人，1904年大约有97 000人）的原籍几乎全部是英国。但是其前景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白人一直害怕非洲人起义和北边祖鲁王国长期以来造成的阴影。祖鲁王国在1879年祖鲁战争之后解体，伦敦最终于1897年允许纳塔尔吞并其残余部分。两年之后，殖民地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被吞没。在战争之后的萧条中，麻烦开始了。

诱因是税收问题。移民政府决定通过对成年非洲男性征收投票税来重新振作已经崩溃的财政状况。白人普遍认为原住民本性懒惰，老板抱怨劳工短缺。投票税会逼迫无业人员工作，首领被要求在文职官员的办公室递交所有法律文件。这些政策毫无意外地收到了恶劣的反响，首领企图搪塞了事，但这并未打消殖民官员的疑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不满的情绪演化成了起义。

1906年，在纳塔尔的三个不同地区，不愿意交税的情绪引发了对抗和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两名警察因在离殖民地首府不远的地方争吵而被杀。殖民地官员调集了移民民兵组成的“地区武装”。他们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军队会行进到起义可能发生的地区，并要求这些地区顺从（有一幅现代照片展现了民兵在小山丘上躲在机关枪后排好队，他们对面是首领及其拥护者，英国国旗就在他们头上飘扬着）。在那些居民抽身（尽管这样不明智）的地方，牛群被没收，村庄被烧毁。如果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么这个编队就会被取消。同时，在遥远的北方的祖鲁王国边缘，一位酋长因为被怀疑拒绝投票税而遭到了罢免。这个人就是巴姆巴萨，不过他挣脱了被派去逮捕他的力量，逃到了森林里，与他的继任者展开了游击战。“地区武装”再一次集结，并且部署了同样的战术。它的火力和机动性具有巨大的优势。6月10日，军队在Mome峡谷控制了巴姆巴萨和他的拥护者。大约有1 000人被弹片、子弹和刺刀杀死，很少有人逃脱。但是起义的第三阶段在maphumulo地区继续进行，这里离从海边延伸过来的白人农场及种植园近得多。这里引发暴力的原因并不是对投票税的厌恶，而是因为它被强行实施的方式。白人骑兵的到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没收牛群、不定时发生的暴行（包括谋杀）、殴打和烧毁是他们在该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这样做引起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在他们到来之际，非洲人逃跑了，并且集结在一起互相保护，另一些人则寻求报复。不过当三名白人被杀后，这种警察行动便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也许是担心发生最坏的结果，也许是希望从远处的祖鲁人那里得到帮助，本地首领和他们的拥护者转移到了灌木丛并且准备好了战斗。当地区武装在7月初到来，他们迅速处决了叛乱者：在连续两次交战中，有900多人被杀。反抗被平息了，但是更多的惩罚出现了：掠夺牛群、烧毁土房、杀戮和殴打。整个地区被“消灭且烧毁……一团黑烟悬浮在山谷上，延绵几英里”，一份官方报告中这样描述道。一群美国传教士在“‘沿着散布着被杀害者腐烂的尸体的公路骑行……许多人死了’”之后很快到来了。纳塔尔的死亡人数未知，但一定是数以千计的。

我们如何解释移民极端的和不加选择的暴力回应？白人的视野被压倒性的恐惧统治着。反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看成起义的前奏——这种惊恐在那一年的事件当中遍布全省。尽管祖鲁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英国一直担心祖鲁人的报复，祖鲁王国的国王经常被密切监视。白人对非洲宗教和仪式也同样持有很深的怀疑，而且很快认为它们带有恶意的影响和意图。他们认为“战争医生”激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一位白人在Maphumulo发生暴力期间被杀，其尸块被带去向叛乱者“施压”。这更加确定了他们的信念，那就是他们面临的是野蛮的敌人，这些人不值得怜

悯，因为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其他什么都不懂。这样的看法同样适用于非洲基督徒。的确，独立的非洲教会——所谓的“埃塞俄比亚人”，被强烈怀疑对叛乱有同情之心，这也许是因为非洲基督徒更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并且拥有一些外部支持。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祭司王约翰》稍后迅速出版了，该书对广为流传的白人情绪有着生动的刻画。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农业利益占主导的白人自治政府，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农村地区的白人对于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要求。唯一能让许多白人感受到安全的就是他们的非洲邻居始终意识到一只反对他们的手会招致无法想象的恐怖报复。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除了白人官员依仗的间谍网络，他们对于部落保留地的有效控制非常有限。如果首领不配合，他们几乎没有手段能找出那些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正是手中权力的这种缺陷引发了高压政治最残酷的形式。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惩罚也是集体性的。因为法律的正规过程非常缓慢且容易导致事故，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焦点而不是作为警告而存在，所以恐吓成为首选的手段。准确来说，是移民高压的这些特征加剧了叛乱，让一时的混乱演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1] 乌里玛，伊斯兰教国家的学者、宗教权威或法学家。——编者注

[2] 此处指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相继与美国缔结同盟，共同反对英国。——译者注

[3] “loot”，即“战利品”。——编者注

第九章

传教和文化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帝国的历史常常只以单一维度呈现：帝国官员（或者移民）对支配地位的坚持以及原住民被镇压的经历。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要统治得以展开，需要第二个维度：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讨价还价，或者有时被称为“政治合作”。合作让本地精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特权，并帮助他们控制帝国统治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联系。许多种姓、社群、部落和

个人都被纳入殖民政权当中来提供服务——他们分别作为士兵、办事员、警察和教师，并获取酬劳。帝国的第三个维度是其经济和商业方面。帝国的存在是为了使其“所有者”（理论上至少是涵盖了所有英国人）获利。如果利益在本土的分配倾向于那些拥有社会特权和权力的人，殖民社会帝国的经济同样创造出了赢家和输家。赢家指的是从新的商业连接中获利的人，输家指的是那些局外人或者农奴劳工。对于很多“殖民者”而言，帝国的这种经济维度（以及其不可预知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还有第四个维度，对帝国来说，其影响难以确定。与其他维度相比，它的影响也许是难以测量的，但意义却非常深刻。

第四个层面就是观念性的。当然，殖民关系的许多方面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怎样“看待”它们。愿意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合作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经过计算的或直觉的，这种判断关于可能的选择和他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大英帝国依靠的远远不止是这样实际的计算。它还呈现出一种道德和文化权威，其中暗含的英国人的价值观、信仰、制度和习惯就是标杆，其他一切都应该以其为标准——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达标的。更深的含义是，殖民政权或者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施加压迫或对限制其自由，而是解放、给予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并不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以及带来进步（这是他们肯定会使用的词汇）。那些对当地与英国之间关系表示反对的人不仅很讨厌，而且会显得落后、愚蠢、无知。他们的文明如果不是真正的衰退，起码也是停滞不前的。更糟糕的是，“历史潮流”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这种文化主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控制形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抬头看到了大洋国真理部白色混凝土的正面，他读出了他熟悉的标语：“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在英国殖民者看来，建筑是英国人建立的，街道的名字是他们授予的，雕像和纪念碑见证了他们的胜利和征服，并且研读官方报告里的语言，这样也许就能解读他们的信息：“殖民主义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它就应该在这里存在。你最好适应它。”的确，一群有影响力的作家就强有力地声称，对殖民思想观念刻意的塑造、对“知识”的刻意重造是殖民统治机构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是唯一重要的部分。这样的“认知暴力”为更显见的统治方式签下了保证书。

这种引人注目的想法的最杰出代表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他采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公众讨论都是由规定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规则决定的。那些希望能参与公众讨论的人必须接受这类“话语”的规则，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无知的人、罪犯、古怪的人或疯子。那些控制话语权的人因而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更加可怕的是，这种道德上的话语权虽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地从思想上给原住民判了死刑。一个没有能说出口的想法或者被视为无意义的想法，是没有力量的。在赛义德对其声名狼藉的描写中，一群西方的知识分子将除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学术和文化生活贬低为停滞不前的，这还不是最糟的评价，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将

其贬低为倒退的；那些支持它的社会被认为是腐败的、专制的、残酷的并且软弱的——即使这些社会实际上并不落后也不野蛮。他认为欧洲殖民政权——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私学说的狂热实施者。英国人对原住民文化展开了无休止的抨击，并对“殖民知识”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宣扬，因为这对他们的权力开展十分有利，他们摧毁了被统治者的文化自信。西方科学技术的应用、西方地缘政治形式（领土国家）的强制实行、西方文学形式（特别是小说）的散播甚至是对历史的记叙，都为一种观点增加了分量：只有一种从传统（以及落后）里逃离出来的方式，现代化的也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依靠殖民统治。

这种影响广泛的分析被证明是极其有吸引力的，尽管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这种影响也并未发生变化。与其契合的是，后殖民时代里对种族主义的延续是来源于某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支撑了殖民主义的繁盛时期，同时也成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它同样肯定了一种主张，西方现代化和欧洲帝国（其中英国是最大的）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作为对英国人先前的自满和中立态度的一大挑战，“东方学”的论调所提供的批判公式是一个强有力的砝码。但是，情况往往是这样，通过对这种假设的揭露，我们可以离那个被处心积虑地隐藏的复杂的现实更近一些，现实有可能处于危险的掩饰中。

有三点足以证明东方学不能准确描述英国扩张的文化影响。第一，它忽视了时间与变化的重要性，仿佛单一的态度和方法贯穿了1914年之前的整个时间段。事实上，英国人对非西方文化的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许多之前的正统看法被完全推翻，且这种情况一再地发生。第二（经常被提及的一点），赛义德的论文几乎是单调得有些奇怪。他的论文认为英国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观点是一个整体；推翻平稳的思维定式的重大争论还不曾出现过；文化习俗总是严苛的；那些能发表观点以及管理话语权的人是帝国的同盟者和代理人——就像在后来的纳粹和斯大林国家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第三（最坏的是），他们认定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幸且无助的。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丰富且具有吸引力的反应的记录——利用、适应、接受、拒绝、修正、回收，消失在了一幅粗糙的漫画中，这其中仅有两种可能的反应——反抗或服从，二者必居其一。

真正的情况更加混乱和复杂。这并不仅仅是十分明显且乏味的自明之理，更是直击帝国文化影响的核心问题。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互相之间矛盾心理的力量。当然，在任何殖民场景下，总有一些人会为帝国权力、殖民“使命”和所谓的“进步”的胜利而欢呼。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常常对此表示怀疑、不屑、不安或者挑剔，这种情况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有。他们的影响虽然断断续续，但有时候却极其有力量。在那些被殖民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怀着很深刻而激烈的憎恨之情，他们很坚决地反对外国的文化入侵，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私心。不过有很多人也赞赏它给不同的群体带来了机会、新的精神和个人解放。他们企图与外国文化和解，向其提供服务，乃至管理和利用外国文化，他们的外国政治宗主浑然不知他们的目的。甚至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

安全感、身份甚至是种族地位都渐渐与之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些人我们之后会提到。

知识与帝国

海外帝国的存在产生了海量的文件。在英国殖民早期，大量的私人信件、报告、记述、指示、法律、发票和付款凭据在殖民地的管理者、士兵、商人和殖民者与他们在本土的通信人——官员、商业伙伴、顾客、债权人和家人之间流通。到18世纪晚期，这些文件汇聚成了一股洪流。关于世界最偏远地区的大量信息现在传回了英国。这样英国就有了关于帝国知识可靠的巨型数据库。这些数据的种类千奇百怪：政府报告和统计、图标、地图、调查和计划、外交信件、大使出访的半官方记录[比如麦卡特尼（Macartney）勋爵于1792~1793年之间到访北京]、殖民公司的宣传（新西兰公司吸引了投资者和移民）、探险家的记述[比如芒戈·帕克（Mungo Park），他对于西非的描述来自于藏在帽子里的记录，还有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他伪造的去麦加的危险旅程得到了皇家地理协会的赞助]、科学旅行者的周记[比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他与库克（Cook）一起航行，还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或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先驱传教士的振奋人心的经历[最有名的是戴维·利文斯通1857年的著作《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这是一本广受欢迎的畅销书]、海外报纸的报道（特别是来自于那些认为殖民战争实际上是淘金热的记者专栏）、大量的战利品和工艺品（有动物，也有人，其中一些是购买得来的，一些则是来自于劫掠，他们都被展示给公众）、收藏了大量图像资料的展览馆[这些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官方委托的结果，库克和麦卡特尼都有艺术家跟随他们，东印度公司雇用了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同时还有自由的艺术家是为了追求灵感或出名而作了]。

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和图像的巨大宝库主要有两种功能。这些资料可以被组织成一个系统或档案，这就允许英国人出于商业、战略和宗教等动机而绘制出某个地区的人文和物理情形。王朝的历史、他们军队的状况、地区贸易的流动、人民和部落的迁移、宗教习俗和仪式、社会等级和冲突、原住民知识体系以及它们的守卫者，还有自然和物质世界，这些都受到观察员私下和公开的调查和评估。英国人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了手册，制定了对应的管理规则，然后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做出修改使其循环流通，进而将其压缩成为固定的模式，它们体现了英国人对于他们所进入的新的世界的认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知识所提供的心理预期、经验法则或是地理定向，除了在那些仅能糊口的地方或者在规模很小的群体里，英国人作为外来者很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展开管理活动。他们在非欧洲世界里的庞大存在以及诸多行动带来的与当地的激烈冲突，都要求知识的量产和迅速传播以满足广泛的利益需要。

这些功能中的第二个部分是由第一项衍生出来的。知识的收集、整理和传播要求一个巨大的中转站以及数据库。在这里，信息可以被采集、处理、讨论、分配、购买以及出售。随着19世纪慢慢过去，整个世界成了一体，伦敦成了大英帝国巨大的仓库。一些机构出现了，有一部分高度专门化，一部分是非正式的或私人的，这些机构为海外的使用者和本土的订阅者整合知识，这些订阅者包括职业协会和科学协会、商业协会、博物馆、图书馆和艺术馆。对于英国的利益而言，他们提供的服务非常实用。实际上，这些知识机构还向更广泛的国内观众提供关于帝国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对帝国进行讨论和想象的方式。

但是，认为是这股知识的洪流创造了英国人对于帝国的普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英国收集到的信息来源广泛。它无法被简化为一种公式化的世界观，即为征服和帝国正名或者简单地为英国欺凌弱小的行为辩护。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庞大卷宗每一年都被送回本土来平息议会里的批评声音（也许是要使他们麻木），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使大多数英国公众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继续扩张是一种危险的错误。1837年，有一大群目击者提供了有力证据，他们说服了针对“原住民”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使他们相信殖民扩张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修复的损失。知情人有许多这类关于帝国的记述，记述主要采用控诉的形式——关于不公平、不公正、滥用和无能。作家很少不带目的地进行创作，除非只是为了挣钱。不过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的动机和利益不同一样。一些受欢迎的作家（比如帕克和华莱士）都尽力消除对“不文明的”人民的蔑视。其他人公开警告，例如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他是印度的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他1826年的著作《印度政治史》中，他反对将英国的制度移植到印度并且过多干涉其现存的政治制度的做法。在移民宣传者中间，这种反对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目的是鼓励移民或是把原住民描述成野蛮或危险的存在，除非边境战争正在进行或者他们急需来自本土的帮助。传教士必须使在英国的潜在的捐赠者相信那些“不信教的”人群急需救赎，但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免得救赎泡汤。商业出资者勾画出了未开发的新市场的蓝图（中国特别受青睐），但是他们必须注意避免把它们描绘成不毛之地。

其次，这些作家的文字针对的群体同样被不同的利益和见解分隔开来。他们各自眼中的帝国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军人而言，帝国是一连串的海外补给站，是小型战争的前沿阵地，也是名誉和晋升的源泉。对于绅士科学家而言，帝国是巨大的标本库。对于制造商和商人而言，英国统治的帝国（大约1840年以后）是他们想要征服的自由贸易帝国的一小部分。他们认为东印度公司（1858年以前一直由印度的统治者经营）腐败且浪费，成了阻碍了印度商业发展的障碍物。对于传教士而言，白人殖民充其量也只是不受欢迎而已。对于殖民游说团体以及移民家庭而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帝国至关重要。对于那些英裔印度官员以及他们在本土的同盟者组成的网络而言，正如他们在信件交往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殖民地是大英帝国中的干扰因素。对于每一场关于帝国的热烈的公开讨论中，关于奴隶制度和自由贸易，以及在爱德华七世时期关于关税改革和帝国联邦的争论，两边都有帝国的鼓吹者。

当然，英国人关于帝国的定义不只是游说团体以及利益团体的拼凑。他们围绕着某些宽泛的主张集结起来，这些主张十分模糊，所以能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但是这些主张也在随着时间变化，其影响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并给那些坚定的反对观点和阴谋行动留下了空间。事实上，与其把公众意见看作一种真实的、代表所有人的力量，倒不如把它想象成几个由观点创造者构想出来的意见，在经历互相竞争后赢得了最多的公众支持。如果绝大多数报纸或记者都附和这些观点，并引导公众顺从它们——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那么这种观点就可以宣告取得了胜利。预测公众观点的走向是政治生活中比较危险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里，猜测一种新的情绪上涨之前它可以持续多久是极其困难的。到1830年，这个国家早就有了大约300万人阅读报纸，传播新闻的出版物成千上万，地区之间的差别被政治忠诚度、宗教、职业以及阶级去除了。

在18世纪中期，那些将欧洲殖民扩张的模式斥为可耻且危险的人占据了道德高地。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在他的著作《美洲史》中将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看成使欧洲成为真正商业社会的重要转折点。事实上，商业被看成最高级的社会阶段——超越了狩猎和农业，并且是一个自由且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欧洲殖民——尤其是在美洲（这是罗伯逊的观点），违背了一个高尚的理想。雷纳尔（Raynal）1780年编纂的《两个印度的故事》一书收录了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文章，在狄德罗看来，欧洲殖民的目的是残忍的，远不是为了商业的发展，即对货物和理念自由且平等的交换，殖民是对人民的征服和摧毁。殖民对于欧洲人的影响几乎也是同样的恶劣：他们的情感被自身的暴力行为和由此带来的不幸感染而变得粗俗不堪。事实上，要想统治那些地理位置偏远并且有民族差异的殖民地，从政治上来说是冒险的，而且注定要失败。这些观点在英国的思想家和作家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休谟和爱德华·吉本，众所周知，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警告过一个帝国达到“过度规模”的危险性。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期望有朝一日欧洲和非欧洲世界能够恢复力量平衡，这样欧洲人能够不再作恶从而免受惩罚。埃德蒙·伯克著名的争论提及了反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腐败和暴行，这其中同样反映了欧洲人在海外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给其他文化和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当罪犯殖民地于1788年在植物学湾建立时，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决定与原住民建立友好关系并阻止自己人用武力对待他们就不足为奇了。澳大利亚并不想成为第二个美国。菲利普认为原住民人具有“男子气概的”风度，曼利湾（在今悉尼港）因此得名。自由贸易作为通往文明开化道路的理想，与人道主义情怀的出现相互呼应（本身受到福音教派狂热的影响），它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就像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行一样，会对本地人施行残酷的暴行，这一污点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人抨击的对象。不过即使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仍然有反对者。奴隶制度的支持者也会发起反击：爱德华·朗（Edward

Long），一个种植园主的后代，在他1774年的著作《牙买加史》中为奴隶制度辩护，他认为奴隶制给作为“低等人种”的非洲人带去了秩序和纪律。另一位种植园主，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提倡改良奴隶制度而不是废除它。即使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于对其拥护者政治优势的考虑，奴隶制度的废除被一致认为是一项富有原则性的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英国的大臣们早在1810年就认为代议政府能够被延展到“不论种族的人民身上”是极其荒谬的想法。伯克对将英国统治扩展到印度是危险的这一看法持有保留意见，但这种意见在对抗蒂普苏丹和马拉塔人的战争中遭到了漠视——这一做法作为对抗波拿巴领导下法国的帝国野心的先发制人策略获得了正当性。将行政机构的每一个职位安排给英国人而非印度人变得势在必行，这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成了一项基本原则——一群吵闹的英国求职者有了一个信念，那就是追逐这些大有前途的职位。同时，英国人对亚洲各大帝国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麦卡特尼勋爵在他1792～1793年访问北京之后称中国的局势很不稳定。30年后，奥斯曼帝国被阿伯登（Aberdeen）勋爵肢解了，他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因为“野蛮势力的笨拙结构会因为其自身内部衰退的原因迅速瓦解成碎片”。

因此，随着1833年奴隶制度的废除以及1837年特别委员会《原住民报告》的发布，人道主义浪潮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关于非西方文化地位和前景以及现实中（如果不是理论上的）关于肤色和种族区别的负面观点仍然存在。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对自身的世界地位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并最终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导思想。18世纪的“哲人们”对世界的展望，以及作家的意愿都被西方军事行动和技术的显著优势破坏了，比如18世纪伟大的东方学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试图给予其他文明知识上的平等。同时，曾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功利主义知识分子运动渐渐失去了其作为社会进步的万能钥匙的诉求。功利主义的心理依据是，人的行为是受最大化享乐和最小化痛苦的欲望控制的，这导致了太多问题没有了确切的答案，尤其是关于在不同的社会里享乐和痛苦为何会差别如此巨大的问题。功利主义所坚持的观点是，制度转变的普遍模式会带来一个公正且进步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最终屈服于现实环境的约束，尤其是印度。相反，有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认可，即被功利主义者谴责的“历史的影响”，历史可能在塑造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英国，社会和文化观念造就了两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工业主义及其带来的不满情绪滋生出来的对无政府主义与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宗教因素开始在神学与科学的争论风暴中消失。

预兆源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爆发，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一位圣人（同时也是祸害）。在典型的暴力性语言里，卡莱尔认为在传统的人道主义态度中、功利主义思想里，以及“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放任信条里暗藏道德的缺失，对此他展开了公开抨击。他所选择的目标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这注定会引起最大范围的攻击。他认为废奴的结果就是毁灭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并使解放的奴隶在懒散中耗尽生命。卡莱尔明确声称黑人生来就应该为白人劳动，他向一名

亲奴隶制的粗鲁煽动者寻求帮助的行为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卡莱尔的争论并不标志着英国新的种族偏见思潮的突然到来（就像一些容易激动的评论员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连卡莱尔的朋友（包括约翰·密尔）都觉得他的言辞过于骇人听闻。但他粗野的表达方式已经很自然地招致了普遍的不满。

在19世纪40～50年代成型的新的社会理论中间，关键词是“进化”。这并不是查尔斯·达尔文和《物种起源》提到的进化，它在更早之前就出现了：“当进化论在准备起源之时，”某位风趣的历史学家说道，“达尔文还在3 000英里外的吊床上。”进化论的主要价值在于给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达到了比其他社会更迅速且深远变化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它保留了18世纪关于不同社会阶段相继出现的观点：从狩猎采集阶段、农业社会阶段再到商业社会阶段。进化论对于这种转变的解释是，这是作为对愿望和需求的一种持续调整的过程。从文化和道德层面上来说，进化论最受推崇的部分在于它维护人类一致性的这个信念，这也被很多欧洲宗教和哲学思想所倚仗，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第二个受推崇的原因在于，社会进化可以等同于进步和道德提升，因为成功的适应要求做出正确的选择——包括社会、文化和道德各个方面。社会进化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作为一种了解世界的理论，它具有显著的灵活性。它的信徒可以将其与各种不同的狂热信徒联合起来，并在各种信仰中间（无论是平庸或奇异的）要求占据权威地位。也许这就解释了它为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文化生命力。

习俗、法律和宗教是如何将形形色色的人牵绊在一起的？又是什么造成有些国家繁荣富强、有些国家却贫瘠弱小？这些问题正是社会进化论研究的重点。这几乎相当于直言财富和权力的增加是成功进化的显著标志；商业停滞或政治瓦解标志着社会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或者是事实上的倒退。不过要筛选出能够解释为何一些民族比较发达而另一些则在原地停留的积极因素只是个选择的问题。新教教徒尤其强调其教义倡导的良好的社会行为，或者是它对上帝旨意的深刻理解：新教教徒顺应上帝对世界的安排。律师的关注点是物权法：个人对自身财产拥有权利，不管是继承来的或是遗赠，均不受统治者掠夺或任何干涉，这就解释了财富的积累以及对其明智的使用。政治家称赞代议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作家和记者称赞拥有自由言论的权利，道德家称赞避免了东方式放纵。理智地来看，进化论就像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俱乐部，也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的简单（和循环性）使其成了一个理想的批量产品。它恰恰出现在了最合适的工业时代。它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血液，并根深蒂固地存在下来。

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并没有创造进化论，不过它为进化论者的弓上增加了几根弦。它促进了一种见解的广泛流通（并且增加了科学可信度），这种见解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在“为生存斗争”，因为“自然选择”必然带来灭绝的威胁。遗传的影响能被那些认为遗传特征等同于种族的人所理解并接受。适应能力与肉体特征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一种观点的流行，即专业观察者可以通过测量头部的形状或是鼻子的大小为不同民族

和种族的文化能力排定等级。优生学的吸引力来自于害怕生理退化（达尔文的理论认可）会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导致其倒退。不过有三点应该引起重视：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帝国扩张的宣言。对其很多追随者而言，最佳路线是在巩固生存和警示的斗争中而不是在无用的扩张中诞生的。欧洲人不能在热带气候下繁衍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写道，他们在那里居住就如同潜水员在海底。其次，对达尔文观点的使用和滥用大体上是19世纪90年代活跃气氛的副产品。在那个年代，帝国的、国际的和工业的竞争似乎急剧增长，公众讨论变得更加热烈。美国工业的发展、沙皇俄国、法国和德国的殖民扩张加剧了公众的恐惧。19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1858～1916），他反对用生物论据支持“社会效率”，而“社会效率”解释了欧洲的首要地位。“科学种族主义”只是为争论的一方加上了一枚砝码，并未成为争论的核心。

结果，社会进化论为英国人面对非西方民族时表现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提供了托词。黑人奴隶制度终结，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及各殖民地对英国传教士的温和（如果不是有敌意的）态度使众多观察者清醒地意识到非西方社会的秩序和进步需要英国权威强有力的支持。但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就能将这种观点与吞并非西方国家、否认非西方民族权利或者轻视非西方文化体系联系起来。“粗俗的种族主义”轻视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黑色皮肤的人，但它并非无处不在。大多数英国人拒绝相信1857年关于印度人对待白人采取暴行的故事，这其中夹杂着一种深刻的关于英国人所执行的对待印度人措施的不安。的确，一个近当代的记述，蒙哥马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的《孟加拉军队兵变》将印度士兵刻画为受害者，而英国的“战争英雄”则被描画成病态的大规模屠杀者。英国人对1865年牙买加起义的残酷镇压被调查委员会强烈谴责，该委员会认为这是“野蛮、故意且残忍的”。当伦敦将自治政府让给南非的开普殖民地的时候，该政府坚持让所有肤色的人都参加选举，有资格参选的非白人的数量尽管很少，但对某些地区来说他们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来说，其内部并不总是能够就进步的方向达成一致。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在自由党中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反对英国对埃及民主的压制。在国内的英国人厌恶种族自大以及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的独裁主义。一位自由党大臣将他们比作“沙皇俄国中进行社会压制的官僚体制”。这种厌恶和怀疑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殖民者对待原住民的做法常常招致批评。在这些反应背后有着越来越深的怀疑，即官员和殖民者不是在促进社会进化和进步，而是在毁灭他们的承诺，密谋反对他们本地的真正拥护者。

事实上，英国关于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帝国存在的意义，从大体上来看是达成了一致的，只在细节上有一些区别。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很少会否认英国在全球事务中享有的中心地位：英国的工业、财政、海军以及帝国权力确保了这样的卓越地位。很少有人会怀疑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进化的成功，英国比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更快进化成一个文明、高效且多元化的社会。不过在关于如何更好地保持这种非凡的地位或这种地位是否能够维持的问题上，英国人却很少达成一

致。关于英国应该如何对待不那么“高级”的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不一致声音。正统的观点如是，虽然从文化上而言，伊斯兰教只是停滞的经院哲学的历史遗迹，但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作为一种强制实行的严格社会纪律信条而得到尊重。不过它与一个对伊斯兰教社会更理想化的回应共存，特别是那些被遗弃的[这是一个被威尔弗里德·布朗特（Wilfrid Blunt）、查尔斯·道提（Charles Doughty）和后来的T·E·劳伦斯（T. E. Lawrence）大力推广的传统]。通常人们会将伊斯兰社群划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阳刚”或“尚武”民族，这类人是殖民者极力拉拢的对象；另一类则是听话的农民阶段（“结实的农夫”），也就是在印度的那些英国人所说的“犯罪部落”[1]。维多利亚时期的观点主要分成两派：一些人对现代化亚洲和非洲中最原始或最初的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表现出同情（就像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一样）。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虚伪、无聊、不具代表性的少数群体，他们的动机是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原住民民族中间对于真实传统的追求，在一些陷阱里赋予殖民政权的意愿，并选择王公和首领作为真正的代表。这两大流派都在争论将“落后”民族与白人隔绝开来的优点。保留进步白人的文化活力以及种族凝聚力打动了一些19世纪晚期的观察者，他们认为在一个高度殖民化的世界里，这是不得已的防范行为。对那些认为与之相反的危险看上去更真实的人而言，隔离同样是具有吸引力的：白人贸易、文化和权力的腐蚀性影响会将原住民变成萎靡不振、穷困潦倒、无土地的无产阶级，他们是一大群拥有强烈仇恨情绪的人。

将英国与它的帝国联系起来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大范围的接触以及大量利益关系因此产生了，这并不奇怪，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共识，观念和态度上也有许多差别。在与英国扩张有利害关系的众多支持者中间——殖民官员、军人、商人、移民、传教士、探险者和旅客，同样还包括那些社会改革家，他们关注着海外的帝国以便释放本土的社会压力，同情心注定是不能决定事务的优先级的。对少数激进派而言，帝国是英国腐败的和压制性社会结构的支柱：国内的社会正义要求帝国（某种程度上）的毁灭。对帝国所有坚不可摧的外部而言，关于帝国官方的看法总是定期被道德上的不安干扰，或者被大声疾呼的游说团体动摇。从长远来看，殖民者和他们的领导者在英国从来不缺少一些朋友或支持者来帮助他们，最终将希望纳入到一个自由的“英属世界”，这一点更加重要。英国人完全无意强加给他们的殖民地一种共同的文化，关于殖民地内部对这种文化应该是什么态度以及是否要冒政治风险来推行它的问题，英国也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传教

索尔斯伯里（Salisbury）勋爵（1830–1903）在青年时期说道，传教士是“一位信教的英国人，他的使命是伤害原住民的宗教感情”。这个观点他不会在公众面前提出，尤其在保守党是领导者或者作为首相在位

的时期。对于世俗时代的我们来说，维多利亚时期群体心理中对传教的热情也许是最难以想象的。他们的神学焦虑甚至超过了宗教带给他们的精神慰藉，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14年，甚至是在此之后，传教士被赋予了一种责任感，那就是让公众更加了解帝国。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受到了以戴维·利文斯通为首的大批传教士的启发。事实上，当他被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里（1874年4月他的遗体被从非洲运回到了这里）时，他的影响力之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传教士不只是本土宗教狂热的代理人，即虔信者派来为基督赢得异教徒的人。他也不是作为殖民权力的文化附属品（世俗的历史学家们“高人一等”的假设）——这是对英国新教传播现代研究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传教士远未拥有不受挑战的道德和宗教权威，他发现自己不安地夹在了多股力量中间，这些力量包括他试图改变其信仰的人、殖民地的官员、怀有敌意的移民以及在本土希望听到好消息的赞助人。这些力量带来的束缚之大有时简直难以忍受。

1790年以前，英国的传教热潮主要是关注海外英国人的宗教福祉。18世纪9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先后涌现了6个团体，它们招募、训练、赞助一些宗教信使到非基督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浸信传道会（1792）、无教派之分的伦敦传道会（1795）以及圣公会教堂传教协会（1799）。此种巧合是惊人的，并且隐藏着一定的竞争性。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强烈的福音教派文化的发展，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占有支配地位的力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8世纪30～40年代的福音运动，伴有宗教复兴运动的集会和通俗的表达招致了社会精英的怀疑。这个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感伤革命”使福音派受到尊重。这次革命反对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机械”观点，强调“感性”以及同理心作为社会行为导向的重要性。它要求个人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产生适度的情感来指导正确的行为。福音派的教义与这种情绪达到了完美契合。基督教徒应该努力通过冥想和祈祷建立个人与上帝之间的连接。目标是要获得高度的灵性，（因此）而产生对宗教职责的热衷。之后很自然地，福音教派基督徒应该传播好消息（他的心灵突破），并且帮助其他人这样做。通过自身的直接行动，或者通过第三方（比如传道会）的协助，他就能宣布其追随基督的信念。

由于仓促的城市化进程在道德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带来的不安，以及需要展开行动介入难以控制的穷人中间以重建社会纪律的诉求，这种宗教性的冲动被强化了。对礼仪和道德的改革是福音教派的目标，它与法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压力使提高社会的道德凝聚力变得尤为迫切。它的胜利带来了双重的信仰：英国的存在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英国因其存在给它的人民带来了福音派的职责。几乎与此同时，从18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在太平洋、印度、中国以及西非和南非内部的新世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神圣目的观念被部分传到了国外。从这一刻起，英国人对于帝国的观念被注入了宗教和人道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从未消失。

这些团体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他们自愿承担的责任寻找新成员。对于

富人们而言，传教工作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那些向宗教迈出步伐的人来自于手工艺人的阶级，他们识字且体面，只是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威廉·凯理（William Carey）是印度的首位浸信会传教士，他是来自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位鞋匠；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首位到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接受了成为一名“引导者”的训练。他的同事沃尔特·梅德赫斯特（Walter Medhurst）是一位印刷工；赫德森·泰勒（Hudson Taylor）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他是一位化学家的儿子；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是前往新西兰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是一位屠夫的儿子；在那些前往南非的人中间，詹姆斯·里德（James Read）曾是一位木匠，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t）是一位园丁，而他有名的女婿戴维·利文斯通在存够了钱开始医疗训练之前曾在纺织厂工作。他们卑微的起点并不是巧合。传教的先决条件排除了在本土拥有较好前途的那一部分人。当塞缪尔·马斯登于1811年来到英国（他当时在澳大利亚）为前往新西兰的传教工作招募之时，他发现毛利人对同类相食的崇尚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尊敬。“没有牧师……完成他们的宗教仪式……新西兰的这一特点使其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野蛮。”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抱怨道。相反，他找到了两种“运作方式”。吸引这些传教的新成员的是他们可以被任命为传教士，不必像在本土从事传教士职业的人那样被要求拥有正统的教育背景。传教工作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宗教的成就。的确，比起精神坚守而言，那些传教的人不那么看重正统教育。也许他们才是明智的，园丁或木匠的技能比起那些“绅士般的”成就来得更加实在。完全的信奉取代了怀疑的精神，成为大多数传教士在面对的荒凉的幻灭时所采取的更好的回击。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风格一致。上文提到过的传道会，以及该会很多年以后在外国的传教事例主要集中在德国。东非的第一位CMS（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传教士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Johan Ludwig Krapf），是一位来自威滕伯格的农民的儿子，他于1844年到达了蒙巴萨岛。接下来的30年，德国人在那里为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西非，传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塞拉利昂的“解放了的非洲人”来做的。英属西非伟大的圣公会传教士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是一位来自今尼日利亚西部的约鲁巴人。他50岁时作为一名俘虏被卖掉了，他被放在一艘葡萄牙奴隶的轮船上（也许是开往巴西），第二天又被皇家海军巡逻队抓了回来。他作为解放了的非洲人被送去了塞拉利昂，在那里，从美洲来的解放了的奴隶与之前被俘虏的奴隶组建了说克里奥尔语的社会，还在殖民地的弗拉湾成立了教会学院。因为有着大量的基督徒，弗里敦背靠西非海岸的贸易通道，并借着由约鲁巴人移居而形成的紧密联系，塞拉利昂成了西非基督教传教重要的“分站”。克劳瑟（被英国女王接收）于1864年被任命为“西非各国，甚至超越了自治领范围”的主教。在东非，所谓的“孟买非洲人”（解放的奴隶首先被送去了孟买）之后到了“小型的弗里敦”（这个“弗里敦”临近蒙巴萨岛），扮演了（更加谨慎地说）相似的角色。

除了常规的形象，传教工作其实并不只由男性担任。因为在19世纪早期，“传教士妻子”为福音教做出的努力得到了普遍认可。的确，她们

有的时候被明确看成“女性传教士”，如杰迈玛·汤普森（Jemima Thompson）于1841年出版的合集《英国女传教士回忆录》中提到的一样。讽刺的是，在英国有组织的教堂因此更加限制女性布道的行为，不过从19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带薪传教工作中来。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于1873~1883年之间派遣了16位女性到国外，并且在约20年之后在全球雇用了400多人。在乌干达有一支80人的传教队伍，其中有一半是女性。事实的确如此，一位学者经过统计，到1900年为止，所有英国传教士里面有将近2/3是女性，尽管她们并没有在宗教权威体系里担任要职。招募女性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接近那些在印度与伊斯兰教社会被隔绝的女性的重要性。还有一点也是得到了认可的，即如果基督教要想进入家庭，女性作为母亲而得到拥护也非常关键。“没有虔诚女性的帮助，”伟大的中国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说道，“是不会有一种关于家庭的永久认识的……因此同类型女性劳动者就像……男性一样是必需的。”

招募是一方面，部署又另当别论了。传教士如何到达他的（之后是她的）选定区域呢？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传教或是她的存在会受欢迎，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印度人的反应很紧张，他们不准传教士在其领土出现，直到1813年被本土强烈要求停止这样做，当时议会正在讨论其特许状。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他们被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煽动奴隶的不满。在中国，他们不得不等到英国的军事力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强制打开国门。他们要么被当地人可怕的名声所震慑，就像马斯登抱怨的那样，要么被统治者直接拒绝停留。就像约翰·克拉普夫在东非发现的那样，如果他们被怀疑密谋妨碍奴隶贸易，或者被看作偷窃的侵害对象（克拉普夫有一把步枪，但不能擅自向任何人开枪），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

事实上，尽管能够以帝国追随者的身份进入一个地区，但传教士还必须跨过两个实际的障碍。他们不仅要找到运送他们自己和家人到选定地点的方式，而且之后还要维持定期的联系，因为传教士有薪酬和补给，会被监督（确保他们服从团体的规矩以及其神学）。除去他和家人的衣服、医疗箱，以及“文明的”必需品，比如咖啡、糖和茶叶，他需要一些“装备”让他自己看起来很专业：圣经和书籍的储备是必需的；他可能还会需要工具来完成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比如锹，斧头和锯子，还需要一些东西用来鼓励其皈依者。传教士很少能远离贸易路线经营，或者远离商人的领域。的确，有的时候他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会更加方便。塞缪尔·马斯登坚决地要将毛利人从“黑暗王子”（他的比喻）那里拯救出来，因此他买了自己的轮船（他是一位富人）然后航行了1　200英里，航线从悉尼到新西兰的北岛，目的就是给毛利人买亚麻来换取他的贸易货物。这就是他交朋友的方式，马斯登迅速在北岛的海岸与毛利人社群建立起了联系。40年后，戴维·利文斯通赢得了Makolol（在今赞比亚）人民的支持，因为他承诺帮助他们在遥远的海岸出售象牙。

为了确认不仅是受到了欢迎，而且得到了停留的许可，传教士常常需要提供的不仅是精神慰藉——也许至少需要提供礼物。他也许会被迫

提供枪支——随着詹姆斯·瑞德于1813年发现这一点，传教士渐渐感到这种需求变得难以拒绝，因为这些正是东道主最看重的贸易货物。的确，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是生存要求他们在一个越来越暴力的年代做出这些行为。传教士作为本地争端的仲裁人（利文斯通的角色）、与殖民权威打交道的外交代表，或者反对殖民侵犯的直言不讳的战士，似乎作用不小。传教士作为优秀的语言学家，也许是殖民遭遇里关键的中间人。正是一位传教士翻译了（尽管看上不去并不是很好）《怀唐伊条约》，条约规定1840年1月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传教士的医术是另一项优势。正是医术帮助郭士立到达中国后打破了外国人的禁令，并且于1850年将传教士推荐给祖鲁王姆潘德（Mpande）。对于一些非洲统治者而言，传教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对国家建立做出的贡献。就像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皈依的国王”一样，他们领悟到了宗教在切断亲属、派系和家族关系从而建立更广泛依附中的重要性。当然，这是以教堂与国家之间没有闹翻为前提的。但是明智的做法通常是不把他们所有的赌注押在神学上。布干达国王邀请了伊斯兰教教徒和基督徒到他们自己的王宫，并且让他们彼此猜测，尽管到后来被证明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莱索托的统治者莫舒舒（Moshoeshoe）鼓励信教，他自己却精明地避免皈依基督教，直到生命的尽头。传教士之所以可能受欢迎，有诸多原因，不过也许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承诺给予由外部联系带来的好处——技术，信息，贸易和外交，并不受外在控制。但是对于他们是不是得到允许进行“交易灵魂”却没有保证。他们不大可能碰巧遇上宗教空缺，也不可能避免任何竞争。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通灵专家”，他们的威望（和成功）来自于所谓的“超自然能力”，能够驱赶各种形式的罪恶，并保护社群。这些人当然会憎恨强硬入侵者的到来，还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让他们名誉扫地。站在他们的角度，传教士必须想出一个策略让他们自己迅速且和平地粉碎既定信念的强烈影响。这当然难以做到。

传教的一般平台是传教站。1849年的一次普查显示，在开普殖民地有34个传教站，其中最大的一个可以容纳2 000人，这比平均规模要大得多。一般而言，一个传教站会有一个教堂、一个学校、一个研讨会，以及为传教士和他的同伴们准备的一排房子，同时还有花园以及可以获得食物的耕地。基督日历、钟表和教堂的钟声会规定时间。房子被建成了正方形（而不是圆形的小屋），且带有为保护婚姻隐私的两间独立的房间，这是为了提高（单身）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是传教士的工作重心），还可以将核心家庭与他们其他亲属隔离开来。在南非和西非，传教采用了属于伟大的福音教徒废奴主义者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爵士的一个标语“圣经与犁”。它并未提到皈依者必须知道且系统化地读过《圣经》。犁的使用会让他的心灵升华得更完整。它代表着常规的工作、永久的居所（不会转变耕作）以及谦虚和道德要求的文明的装束（棉质裤子和衣服）。使用犁意味着拒绝锄头和以前的分工方式，即女性在田里工作，而男性打仗、搜寻粮草、狩猎或（像传教士怀疑的）无所事事地酗酒。犁地是男性的工作。宗教教义会让他回到田地而让他的妻子在家锻炼技能同时照顾孩子。《圣经》有

益于思想，犁有益于身体，它们会带来神圣且彻底的革新。

不过哪些人会参与到传教活动中并且服从这些严苛的要求呢？政府给了传教士独立的地盘开宗立教，但批给他们的土地的地址却颇耐人寻味。原本指望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布道或通过集会教化原住民，但这个天真的预期却落了空，教堂不是在敌对的领土上就是被周围的原住民无视，结果使驻点成了勉力支撑的孤堡。在成为尼日利亚南部的地方，独立的传教用的房子被建起来，目的是展示生活的新方式并且摆脱习俗仪式的限制。在这里，会众大部分来自沿海的非洲移民和非洲商人。在南非，那些前来参与传教活动的人大多是绝望且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大陆中黑人之间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战争的受害者。伦敦传道会在Bethelsdorp（今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传教站是科伊科伊人的避难所，有时称为“霍屯督人”或“开普有色人种”，他们避免了在殖民地的农场当农奴劳工的命运。如果布道所被赠予土地（就像在纳塔尔一样），或者传教士买下了农场（就像在纳塔尔的伊登代尔一样），他们就会吸引一帮追随者。身兼通讯员与旅行家的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这样的怀疑派轻蔑地认为传教皈依是骗人的东西。“每一位我遇到的黑人女基督徒都是妓女，每一位黑人男基督徒都是窃贼。”他在1865年的伦敦人类学学会上这样说道。中国的观察者轻蔑地把他们称为“讨米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来寻求住房和食物的，而不是进行宗教启蒙的。至于在印度的传教，类似的控诉也用到了“贱民”皈依者身上。的确，对于那些在传统社会拥有地位的人而言，皈依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在一次传教活动中，皈依要冒着被烧掉船只的风险。皈依者要切断与其他亲戚的关系，还要杜绝他们互相之间的义务，因为这对宗教是不虔诚且不道德的，这都让皈依者处于压力之下。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产生了。

皈依者非常真诚，所以传教士注定要焦虑。强行实施皈依要求生活做出巨大改变的部分原因在于“阻止灵性倒退”。不过他们也不愿意通过繁杂的要求来对潜在的信徒施压。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多配偶习俗。对于福音教派而言，几乎没有一条教义比婚姻关系的圣洁、家庭生活的重要更加珍贵。不过许多传教士认为，强制男性皈依者拒绝拥有多个妻子是过分的要求，传教行为因此被扣上了引起社会混乱的骂名。纳塔尔的主教约翰·科伦索（John Colenso），还有后来西非的主教塞缪尔·克劳瑟都迫切要求他们本土的上级灵活处理此类事务。克劳瑟力劝不应该拒绝一位多配偶妻子的洗礼。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委员会的见解与之针锋相对。“多配偶制度是对上帝法则的违犯。”他们直率地告诉克劳瑟。另一个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基督徒能拥有奴隶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但是在西非和东非，家庭奴隶（与加勒比风格的田间劳工形成对比）的存在在社会关系中过于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迅速根除。让人惊讶的是，在本土的传教总部更愿意妥协。因为相距太远，当下的实际做法无从得知。不过南非的基督教皈依者似乎被允许继续遵循“婚前男方送给女方家的聘礼”的旧俗，这是“买妻子”（常常还有牛）的惯常行为，这在亲戚关系和联姻行为里是很重要的。

不过传教士拥有了他的追随者并且成立了一个定居社群后，他的角

色会变成什么呢？这一点同样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要维持牧师工作的连续性，因为这是对其角色的一种微妙的强调。但是其他人（包括戴维·利文斯通，约翰·克拉普夫和塞缪尔·克劳瑟则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彻底的政策。他们说，传教士应该是先锋派，成立一系列新的传教站，并且不能落后于其他皈依者。对于利文斯通而言，这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了牧师生活。他可以探索在地图上尚未有明确标注的非洲中南部，还可以把注意力从这个伟大的“传教圣人”似乎只有一个（短命的）皈依者的不寻常的事实上移开，从而充分实现自己的这些抱负。这同样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的核心：全世界传教活动是由谁来赞助的？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无限期地提供教牧关怀？这些团体依靠的是私人捐赠，由一大批支持团体、传教委员会和依附于大多数教堂或小教堂的激进分子坚持不懈地聚集起来的。他们为这些传教士支付薪水并帮他们养老。不过这些团体要与其他的慈善对象为吸引公众注意力而竞争。传教士需要将报告寄回本土，而关于这些报告的内容可以从大量的传教文章和日记或者主日学校里传教士的故事里获得副本。那些休假的传教士通过讲座或布道来完成这部分任务。比起无聊的牧师生活，戏剧性的冒险会成为更好的素材。在完成史诗般的跨越非洲之旅后，利文斯通突然名噪一时，这对于他的雇主伦敦传道会而言相当于一种恩惠，因为后者当时负债累累。利文斯通死后的名声（他1873年去世）对于传教事业而言是巨大的财富这一点已得到后世的证实。他英勇且虔诚的名声被一连串传记作者慢慢塑造出来。但是在生活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操控的。作为一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知名人士，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拒绝在公开场合饮酒，而且还常常炫耀地戴着他曾作为探险家的那顶鸭舌帽。不过他悄悄地放弃了伦敦传道会的工作，转而接受了皇家地理协会（从政府那里获得薪水）更慷慨的委任，成为一名沿着赞比西河宣传基督教和发展贸易的命途多舛的远征队伍的领导者。

“贸易、基督教和文明”是利文斯通的行为准则。“我回到非洲是要为贸易和基督教开辟一条大路。”1858年他对参与他在剑桥大学讲座的听众说道。我们应该鼓励非洲人为我们的市场耕作，这是除了福音书之外提升他们的最奏效的方式。他强烈地暗示没有贸易带来的改变，基督教永远也不会扎下根来，传教士也不会被允许走得更远更深。这一点恰巧与亨利·维恩（Henry Venn）的观点契合，后者是圣公会的干事，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工作伟大的战略家。在一篇有名的报告中，维恩制定了传教士的目标：尽快让出主要角色。他坚持道：“本地教堂的生机在于自我管理、自我支持以及自我扩展。”这样的话，“传教以及所有的传教中介都应该被转移到‘更广泛的地区’”。不过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自给自足的本地教堂依旧是被给予厚望的，传教社群很脆弱且规模不大。它们所依靠的自生自灭式文明和贸易进程常常令人失望。传教士被证明很不愿意将控制权交给本地出生的皈依者。在19世纪晚期的西非教会里，不仅看不到黑人取代白人的现象，情况反而恰恰相反。非洲人被认为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效率。这或许是出于自我利益、野性，又或者是由于不断加剧的种族主义所致。不过在中国和印度，侨居的传教士更说明了这个现象。

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皈依的步伐慢得让人绝望。在这些（部分）文明化的社会，传教士面对着反对者的自信、能说会道和坚定。在中国，350名新教传教士通过努力，到1870年为止也仅拥有了6 000名皈依者。在英国统治的印度，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很难称得上理想。在旁遮普省进行了30年的传教工作后，皈依者只剩下5 000名。更糟的是，一些传教士认为，由于接受了最低层次的皈依者，他们正在“垃圾堆里工作”，这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眼里是对基督教的玷污。问题的出路似乎在于让传教工作变成某种让即使是高级种姓的印度人也会仰慕的东西。精英教育成了传教士的目标。在旁遮普邦，他们建立了很多中学，其中包括在德里的圣–史蒂芬学院，它是基于剑桥大学的某个模型而成立的（在大厅里有一个“贵宾席”）。在那里任教的传教士不是之前前往南非开辟荒野的手工业者，而是像查尔斯·弗里尔·安德鲁斯（Charles Freer Andrews）这样的来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人或者古典学者，他于1904年在德里加入了“剑桥兄弟”（Cambridge Brothers）——之后成了甘地的信徒。这些教会学校并没有为改变信仰做出任何尝试，因为这样会赶走他们的学生。的确，他们的大多数学生和老师中的70%是非基督徒。相反，他们反复向学生灌输的是社会服务的理想、课外活动的重要性、性格塑造的必要性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刚毅的美德。查尔斯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如果他们不能为基督教布道，至少可以教授基督教的理念。它在印度精英中间的渗透（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会摧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道德基础，从而为在印度社会的顶层和最底层人民皈依基督教开辟道路。但这种做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教育策略远不是为了促进自主性教堂的发展，它只会强化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因为他们需要依靠英国来找到外籍老师以及用来支付给老师工资的资金来源。

到了19世纪末，大约有4 000名英国新教的传教士在国外（这个数字到1916年达到了7 500）。他们为宗教活动维持了巨大的基础设施。单在南非就有约610个传教站以及5 000个分站，除此之外还有学校。从1916年开始在福特哈尔有南非原住民大学。尽管不是完全不受爱国情绪以及进化所暗示的种族和文化假设的影响，传教士仍努力使他们自己远离帝国统治的中介，因为他们需要皈依者的信任与接受。对于他们与白人殖民者的关系而言更加如此。对于利文斯通而言，贸易和文明意味着排除白人殖民者，而不是鼓励他们参与其中。不过由于他们调解本地承诺与外部联系的努力，传教士面临着对他们福音传教的根深蒂固的抵抗。

这里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基督教的很多典故和组织对不情愿的皈依者而言是很具吸引力的。当地从事者接受传教士的教授与布道、赞美诗的创作与吟诵、“堕落”的圣经意象、挪亚方舟大洪水以及耶稣的第二次临世。这并不矛盾。如同他们要传达的信息一样，传教士的做法对于现有的宗教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他们鼓励革新，这是抵抗的方式之一。不过只要传统观念还能从权威的传统形式那里获得支持，而且他们的修行仍然能博得威望，基督教就只能缓慢发展。到19世纪末，就连那些皈依者们也越来越憎恨外来者对他们施加的精神统治。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涌现了独立的非洲式或“埃塞俄

比亚”教堂，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美国的传统黑人大学获得了神学资格。他们同意这种诉求，即“非洲是非洲人的”，这招来了白人殖民权威和传教士的怀疑与敌意。在20世纪，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教堂跟随，传教士在那里强调的教学与布道被反对恶灵和巫术斗争的仪式取代：在“约旦河”或“毕士大”[2]进行洗礼、说方言、与恶魔搏斗。

的确，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在很多基督徒中间的大扩张延迟到了1900年之后。伟大的基督徒的世纪是20世纪，不是维多利亚时代。这不足为怪。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认为能够通过感染人的事例和传道来创造基督社群的信条是英勇但不是明智的。在那些认为传统社会的形式和观念不起作用的人中间，他们是最成功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过程（包括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必须要等到19世纪晚期及以后，直到本地基督徒达到一定数量，并且更有组织地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信息。帝国的高潮并未带动改变信仰的潮流。

你认为你是谁——帝国与身份

皈依基督教也许是最具戏剧性的，因为它所导致的外部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改变个人身份的意识，这些方式包括实施新的义务和中断以前的义务、要求新的效忠义务以及带来新的团结，在每一种情形下都是在一张新的联络网中超越以前的本地联系甚至是区域的联系。不过我们也许会期望帝国自身能够在被统治的人中间（包括本土的英国人）重塑身份的意识——尽管这并不是个能令其统治者满意的方式。

在塑造英国人民的观念上，帝国的占有究竟起到了多少决定性的作用一直受到热烈的讨论。对一个学派而言，其影响是显著的，甚至让与之有关的探究变得多余。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性别歧视、男权至上的文化、对自然世界及其物种肆意开发的观点、军国主义价值观、对权威的过分敬重以及顽固的阶级制度，这些都可以从对外扩张使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等级制度正统化并压制不同声音的行为和方式中寻找到踪迹。在对帝国主义的鼓吹之下，加上教堂的布道和媒体的支持，文学作品、戏院和音乐厅的宣传，以及被粗糙地再包装而成的“爱国”情绪，本土的英国人重新将自己定义为帝国人民，并带上了帝国的态度和帝国的恶习。对另一学派而言，这些主张都存在方法上的谬误。如果帝国的“真正”意义在于直接统治亚洲人和非洲人，很少有迹象表明除了很小的社会团体之外，这种鼓吹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而帝国官员在这些小团体中被选拔出来。对于其他人来讲，这基本上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然而在流行文化中的某些成分里能找到帝国的资料，或者是对帝国有兴趣的资料。然而这些跟与帝国无关的资料比起来完全无足轻重，这表明帝国对于公众意识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帝国主义者一再重复自己的故事：帝国宣传者必须要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咆哮。

对于这个问题要达成一致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注意：首先，英国人对“帝国”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它不仅（或甚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最高等种族地位获得的替代性满足。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帝国意味着移民（主要是到那些原住民人口很少的国家去）。1914年以前，对于英国人而言，那些殖民国家（不是印度或热带非洲）对帝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社会比英国社会更加民主。英国工人（到1900年为止，6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投票权）认可繁荣的关键是自由贸易，而不是强加给热带人民的封闭市场。自由贸易作为英国的基本政策，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事实上人们广泛认可自由贸易是在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和成立代议制政府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尽管英国人的观点免不了受到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口中，帝国等同于对奴隶制度的打击以及保护海外的基督徒免受非基督徒的压迫的武器。帝国要遵循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承诺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些关于帝国的不同想象——人道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民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有宗教信仰的、军国主义的——都是存在的，是因为英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将帝国看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展现其价值观和目标。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帝国代表的是一种特性，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同版本的英国特性都在争夺空间。

其次，由于人们对帝国的看法各异，所以相同的价值观，或者身份的认同感极难来源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否则帝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将会大得多（时髦的说法是帝国“构建”了英国社会）。就实际情况而言，移民的影响、自由贸易的观念以及传教士的努力都远比种族优越感或由殖民控制带来的替代性满足引发的其他任何情绪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作为一个政治观念上的帝国最终拥有了多重特征，帝国涉及的外部利益的范围之广以及利益诉求之多（包括帝国是为了使殖民地人民获得自治而存在）也导致了帝国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中走向终结。再次，可以被描述为关于何为帝国的这些认识上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究竟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什么内容以及英国的政令可以在何处施行的普遍不确定性。“海洋是属于英国的”，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国防专家说道，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并不鲜见。世界上许多地方即使不在英帝国版图之中也都承认英国所具有的支配性影响力。英国与埃及的关系（1882年被英国军队“临时占领”）一直被掩盖在英国谜一般的外交政策之下。为了口语表达方便，“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一词于19世纪80年代被创造出来，但这又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模糊。所谓“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不限于英帝国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英国势力的所及之处，不过很明显的是，这必然意味着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维持“英国和平”所需要的条件比获得支配地位要微妙得多。

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使帝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支持帝国并不会排除其他的关系或身份，甚至有可能会强化它们。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而言（对爱尔兰人也是），帝国不仅是移民和机会遍布的广大天地，而且还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忠诚，尽管这种集体的忠诚要比组成英国的英格兰与三个联盟的忠诚

逊色得多。苏格兰的例子是最具说服力的。格拉斯哥作为一个伟大商业大都会而崛起，苏格兰商人在印度和非洲贸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苏格兰人在殖民地扮演的角色，苏格兰人对传教努力的承诺（该承诺在极大程度上是因为利文斯通的名声而变得富有影响力的），苏格兰军团参与的帝国战争都有着双重的影响。他们是一个警示——如果有必要的话，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离开了帝国只会是英格兰的一个不重要的关系。他们也是对苏格兰人自我信念的巨大强化：关于苏格兰能够以一个独立的民族社群生存的坚定信念，并且还有独特的传统以及其走向现代化的独有路径。

但是英国究竟是如何以帝国身份凌驾于被殖民者之上的呢？在他们海外统治的亚洲和非洲版图上，他们能够画上新的路线，实施新的法律制度，制定代议制的新规定，宣布文明和进步的新主张。他们能够将殖民人口进行分类，有时甚至能够计算其数量（印度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71年，而在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都很难抽出时间做这件事情）。他们会奖赏那些忠诚的人，惩罚那些不忠诚的人。他们会建造雕像和纪念碑来表明无限期停留的意愿。不过对于帝国蓝图的设计者而言，重新塑造统治区本地身份从来都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对于帝国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缺乏深入殖民基层的资源。大众教育对于他们的殖民政权而言太过昂贵。对于教会团体而言，开展教育的事情主要由组织中层级较低的成员来实施，在非洲尤其如此。他们也不能期望对本地精英施加文化领导权：事实上，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却令人费解。

事实上，他们力量有限，尤其是人力的限制意味着英国人必须依赖于与本地文化保护者的合作，这些人包括本地教师、牧师和法律制定者（就像伊斯兰教的乌里玛）以及口头传统的守护者。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英国人作为统治者，对将习俗编撰成制度的必要性十分着迷。他们想要制定有关权利和索取的规定，这样的话他们的殖民者就有了行动的指南。他们向每个地区的博学之人请教，还跟随首领、权威、大毛拉学习他们的法典。这些专家声称他们的观点在远古的传统中有所体现，而且他们作为“立法者”，享有的特权地位在全球都得到了认可。比如在印度，英国人采取了婆罗门的历史观：印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种姓制度社会，所有种姓阶级都必须顺从婆罗门的权威。

因此，英国人远不会排斥本地文化传统，而是常常与利益团体结盟来制造一个“新的传统”秩序，在这个新的传统秩序中，他们为了互相的利益，重新定义了过去的历史。他们的动机十分明显，但也称不上权谋术。他们认为，没有传统这个支柱，他们的统治对象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变成狂热分子、煽动者、流浪者和暴乱者的猎物。不过，关键是，这样的做法给本地文化精英对西方观念和技术带来的挑战产生了疑虑。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沟通和教学的新模式，从而扩展他们自己的影响，强化他们的信念。在19世纪，伊斯兰教教徒、印度教教徒，以及南传上部座佛教教徒感受到了在精神上“自我强化”的迫切性。这就意味着通过驱赶异教徒的方式来“净化”他们的信念世界，需要做出巨大的努

力：包括对本地特色的精神崇拜、对非正统神或圣人的敬畏或者对来源于其他宗教的活动随意借鉴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这就意味着重新认可原始宗教经典，深入到穷人中间来重获他们的信任并且向他们重新施加道德权威。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传播宗教信念：以西方式的教室以及印刷品作为媒介。这时就需要开发铁路和轮船来增加朝圣者的数量，这些朝圣者会作为拥有净化信念的媒介回来。特别对于伊斯兰教教徒而言，他们需要动员那些有信仰的人——乌玛[3]来唤醒他们集体身份的意识。因为这项宗教活动基本上不会对殖民权威造成公开的挑战，所以英国人表现得无动于衷。不过当政治利用宗教来直接反对他们时，就会激起英国人的愤怒和恐惧。戈登（Gordon）将军1885年在喀土穆殉道于马赫迪派“狂热分子”的手中，这让英国人对伊斯兰教有了深刻的看法。

宗教复兴并不是殖民社会里唯一的文化活动，也不是本地身份认同的唯一原动力。殖民主义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创造了空间来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但这个空间在移民社会里显得更加狭小，原住民在那里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服务阶级，他们熟悉白人统治阶级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这个阶级包括随着殖民主义的到来而熟悉行政的官僚、精通法律的律师以及擅长医疗技术的医生。还有一些老师，他们的任务是要培训这些说英语的精英，以及一些作家和记者，因为他们可以帮助这些“新人”彼此交流，以及与更大的世界交流，正是帝国将这些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英国宗主也许希望这些人的文化野心只会让他们成为帝国忠实的拥护者。不过事实却刚好相反，三个强大的推动力塑造了这个新的社会精英阶级的观念和情感。

第一个动因看起来有些矛盾。对于那些效忠于新统治者的人而言，英国人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自由，英国人允许他们从传统的王公和首领的控制中逃脱出来，或者是从那些比英国人更具压迫性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对于印度的“bhadralok”（“体面的人群”）而言，普拉西战役后孟加拉的伊斯兰教统治阶级被推翻是一个历史性的解脱。随着英国政权的到来，商业和官僚的大好机会也随之而来。加尔各答成了bhadralok实现抱负的大都会。孟加拉也被重新塑造成为bhadralok的国家。人们无法把这次巨大的转变看成是巧合。的确，英国征服印度“凑巧”的特点经常被那些参与1914年以前国民大会党会议的人所引用（并不带有讽刺意味）。

但是，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并不是没有压力的，它们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殖民地孟加拉这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什么才意味着值得敬仰或是体面？个人抱负是如何与宗教义务和家庭的需求达成一致的，尤其是过着“共同”生活的印度“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性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或权利？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因为社会传统要求女性被“隔绝”。什么式样的衣着与休闲的方式是高雅且端庄的？人们应该阅读什么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老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新类型写作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使用。小说[比如般吉姆·钱德拉·查托帕迪亚雅（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的作品，他是

孟加拉首位现代小说家]、报纸[富人泰戈尔（Tagore）家族创办的《国家报纸》]、小册子、诗歌和戏剧都进入了文学领域，在这些平台中，社会问题被频繁地提及，新的社会类型被展示并引起效仿。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被用来传递新类型的信息。这鼓励了新世界、新前景、新历史以及新民族的发展。

第三个动因与爱国情绪以及政治有关。这反映了一种情绪，即除非殖民社群被结合成为一个民族，否则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就无法完成。这种情绪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对英国人表现出的种族歧视以及独裁的憎恨。这就响应了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的观点，自治是道德和政治优势的关键：没有了它，一个民族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受到阻碍。这种观点地在殖民孟加拉最热烈的发言人就是苏伦德拉纳特·巴内杰亚（Surendranath Banejea）。巴内杰亚是一名热心的改革派。他谴责种姓制度、童婚、不允许寡妇再婚等恶劣的旧俗以及对女性的隔绝。英国人在印度的使命是为了促进“具有男子气概、有活力、自食其力的印度性格的形成”以及引进“自治政府的艺术”。巴内杰亚通过他自己的报纸《孟加拉国人》以及政治运动要求宪法的修订应站在印度人的立场上，并要求撤免英国官员的职务。

不过奇怪的是，巴内杰亚和其他来自西印度和北印度的政治官员没有要求中断与英国的关系，这些人于1885年组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相反，他们坚持称愿意保留这种关系，并声称印度的自治政府会让他们更靠近英国。这常常被认为是“虎斑猫政治”，就好像他们不敢轻易冒犯英国人的统治，或者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大型运动一样。这些抱怨是天真的。国民大会党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限制。他们可以发起大型运动，但依靠的只有宗教情感或者人们对社会以及种姓的不满。这两者都会导致可怕的分裂和危险。他们抓住了一点，即印度的民族必须自上而下地建立，方法是慢慢地让群众接近最核心的机构，从议会开始。他们是从英国以及格莱斯顿（Gladstone）身上学到这一点的。的确，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民族主义的信徒。不过他们面临的困境极其凶险。他们不得不劝阻英国官员自愿交出权力，而不是强迫他们来为此战斗，因为那样会带来动乱和冲突。英国人过于看重印度实际上是个悲剧，由于他们不愿意轻易失去它，导致了少数极端分子的滋生：1914年之前的孟加拉出现了炸弹恐吓事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分子又对着被甘地唤醒的大规模民族主义开炮。不过就像第一届国民大会党领导所预见的那样，他们所依靠的那些情绪最终被证明是分裂的终极来源。

第一代印度政治领导人开始尝试将他们眼中的英国政治中的优点移植到本土中来：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民族。在亚洲和非洲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与英国的关系是他们本地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部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沿海民众，他们作为英国商人与内陆人民之间的贸易中间人，拥有一定的特权。所谓的“海峡中国人”（在马来半岛出生的中国人）在英国人于1786年到达南亚的槟榔屿以及1819年到达新加坡的时候，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随着新加坡

与中国之间贸易往来日渐频繁，这些人成了英国商人的中间人并且开始自己做贸易。他们控制了这个区域的鸦片流通，这是英国在新加坡收入的最大来源，就像在印度一样。富有且会说英语的他们填满了英国人设置的官员职位，英国人这样做是为了管理激增的来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因为新加坡是这个区域最繁荣的城市。他们创办了报纸和学校，并且管理着中国移民的公民和宗教生活。他们抨击迷信并且贬低支持“理性的儒家改革”的做法。他们摒弃了长辫子（马尾辫），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着装风格来反映英裔中国人的特征：马甲和蝴蝶领结，还有中山装和旧时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服饰的衣领。这一切都展示了对大英帝国的狂热忠心，1900年，为庆祝英国占领比勒陀利亚，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不过海峡中国人不是英国人的傀儡，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学习也不仅停留在单纯的模仿上。他们保留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血统的强烈意识。他们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祖国”的热爱。他们认为自身有责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在那个时候（大概是1900年），分裂和瓦解似乎是中国注定的命运。因为有英国人做他们的后盾，这些人也许会期待产生很大的影响。英国人也出于自身考虑，鼓励这样的抱负，并且允许他们保留这样一臣二主的行动。中国的革命进程在1918年之后的一次达到了具有威慑力的地步，于是英国开始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帝国而言是一种威胁，海峡中国人便开始向内部张望，并且想象一个没有英国政治统治的未来。就像海峡中国人一样，西非的克里奥尔人是依附于海岸的贸易移民，并且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他们的“家园”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由英国人统治，这里的居民有来自英属北美的解放黑奴和曾经的奴隶以及从皇家海军舰队的奴隶船上下来的“解放的非洲人”。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教、贸易以及文明的代理人。他们在西非沿海拥有商人、传教士、教师以及文员等身份。他们建立了在港口的英国公司与内地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联系。他们中间包括了“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也就是白人与非洲女性的后代。他们敬重教育以及中产阶级一切体面的形式（禁酒除外）。他们学习了英国人的着装以及举止方式，成了“黑皮肤的英国人”，一些人甚至把英格兰叫作“家”。面对着内陆“野蛮的”达荷美王国和阿散蒂王国以及北部好战的约鲁巴州和伊斯兰教酋长国，他们把英国的扩张当作这个地区的地理政治有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就像海峡中国人一样，克里奥尔人这群拥有黑色皮肤的英国人对于本地的生活有着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自认为是在海岸和内陆推广英国影响力的先锋队。他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西非”，幻想某天会成为一个处于英国控制下的伟大的自治领（如同加拿大）。他们对越来越多的英国侨居者的到来表示憎恨，这些英国人里有分别作为行政人员、商人、传教士以及医生克里奥尔人的憎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当英国人决定通过传统的首领和习惯法（不是英国的）来统治新内陆帝国时，他们对被降级为少数群体一事更加愤怒。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富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过于分散，从而不能发动有效的抵抗或者扮演像海峡中国人一样的政治角色。弗里敦毕竟不是新加坡：帝国统治下的西非是4个独立的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们的憎

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却对依靠间接统治的与英国人和传统领导者的联盟建立起来的殖民政权无能为力。

不过也许英国关系中最突出的群体是南非殖民地里的姆丰古人（Mfengu）或芬果族人（Fingoes）。他们究竟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的已经很难确定。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他们起初是所谓的姆菲卡尼（18世纪晚期由于祖鲁王国的崛起引发的争夺人民和土地的非洲内部冲突）的受害者。作为科萨牧民中的难民，他们成了粮食种植者（"'女性'的工作"），之后成了商人，随着科萨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低层次的工作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不信任。1835年，科萨人与英国人之间那场战争的关键时刻到来了。姆丰古人与他们的科萨领主决裂并且与英国人结盟。他们得到了一块赠地，这块地就是后来的西斯凯地区，这成为他们在崭新的东部疆域里开辟出的一片定居地。他们在英国保护下形成一个独立民族的事迹直到今天都被铭记在伟大的公众法案里。1836年5月，在一位名叫约翰·艾利夫（John Ayliff）的传教士的领导下，大约有17 000名姆丰古人在佩迪一个小村庄的牛奶树下发誓对上帝、教会以及英国王室效忠。他们从此成为英国的臣民。接下来的50年里，姆丰古人在开普的边界战争中充当了英国人的辅助力量，他们因此换得了牛群和土地。

姆丰古人迅速地利用教会提供的教育并学会了其传授的技能。到了19世纪末，他们在很远的金伯利和罗得西亚定居，成了开普殖民地的非洲精英。科萨人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姆丰古人是社群中最先进的部分，他们充实了我们的牧师、警察、教师、文员和翻译队伍。他们同样也是最先成为基督徒的……他们坚信传教士的格言，那就是要想成为文明的人，就要成为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也就成了文明的人。"姆丰古人是效忠派，但是他们的效忠并不盲目。他们是在非洲人中间最先实行投票制的（开普的选举权向所有肤色的合格人选开放），也为了反对歧视性的法律而集结过。一位名叫约翰·滕戈·贾巴弗（John Tengo Jabavu）的姆丰古人成了开普的非洲政治领袖兼报纸编辑。正如克里奥尔人和海峡中国人一样，他们与英国的关系带来了一种政治目的和独立身份的意识。在1908年5月，他们庆祝了"芬果族人解放日"，这是对他们效忠英国的直接重申，当时在白人支配下统一南非的协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些行动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在相信英国关系是他们仅有的反对殖民镇压的力量上，姆丰古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那些混血的"开普有色人种"中间，这种信念更加深刻。不过就像克里奥尔人一样，他们发现自己的声明在反对合作政治的残酷现实里显得无足轻重。在南非，地处高位的仍是白人，就像西非的传统统治者一样。

作为外来统治，帝国是文化变迁的媒介。不过这只是很多媒介里的一种。它常常与其他因素一同到来：贸易的扩张、新的消费方式、更快捷的运输方式、读写能力的普及、新的通信方式（包括常规的信件和电报）、教学的新类型、文学的新形式（不仅是报纸和小册子）、新的医疗知识、休闲和品位的新概念、异端且苛求的宗教。也许在帝国成形之

前，这些因素就已经部分地或全部进入了这个区域，并且体现在本地主动性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埃及。帝国也许会加强这些改变，并且为了帝国的优势发掘它们的潜力。不过当地的官员常常含蓄地展现出支持旧秩序的欲望，不管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他们常常能找到那些急于帮助他们的盟友。不过在每一个殖民社会都有很多人赞赏新的文化形式的吸引力。他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个人主义：从习俗、过时的宗教仪式、家族关系的掌控以及固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英国人能兑现的正是要从他们自己社会制度里难以忍受的严苛（尤其是妇女的待遇问题）中逃离出来的承诺。像巴内杰亚或莫逖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的父亲）这样的印度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被后世称作“认知暴力”[4]（殖民权力对以前知识系统的摧毁）的受害者，会感到十分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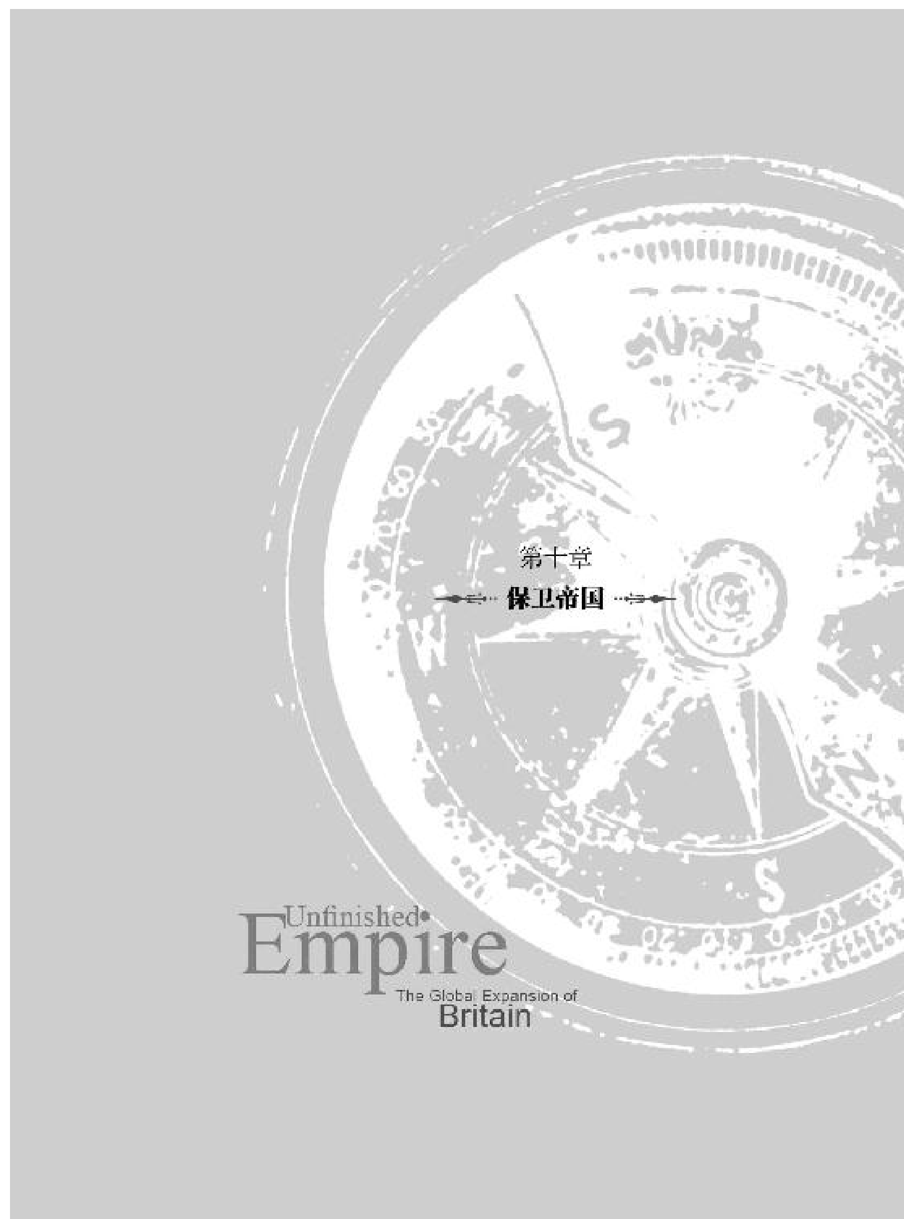
也许不言而喻的是，从文化和政治上来说，帝国虽具有破坏性，但也有创造性。不过作为文化力量，它缺乏连贯性。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帝国都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帝国在不同的地区往往有着不一样的盟友，并且各自又有区别。因为它支持多样化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有些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神秘感油然而生。在非西方世界，帝国有时作为世界的主宰出现，横扫一切阻挡他前进的因素，有时候则像是老朽的旧车，几乎不能上路或者运送乘客。它的政治代言人很少因为其文化力量而自信。他们避免与主要的宗教发生对抗，害怕因为看起来与他们自己的宗教靠得太近而招致质疑。他们鼓励本地精英借鉴殖民主义带来的技术和观念，但是他们无法控制他们制造的这些东西的用途。帝国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产生的广泛影响遭到了宗教和文化复兴的抵抗，这也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甚至也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既然他们无法预知未来，那么他们看到的就只是本地文化的脆弱和静止的状态，以及在其遭遇直接挑战后所引发的混乱和危机。虽然他们声称要推进殖民地进步，但他们也对非西方世界进步的速度充满怀疑。帝国的批评者认为是帝国正在以粗糙的、模仿西方的方法来重新塑造世界，其在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追随者把自己变成了所处环境中的外来者。另一方面，当地文化的卫道士们对帝国的进犯草木皆兵。不过两者却都未能预见对于20世纪中期后到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加速的步伐。正是这种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帝国的影响的现有观点。

[1]　“犯罪部落”也译为“刑事部落”，生活在部落的游牧民族由于1871年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犯罪部落法案》而被污化为“犯罪部落”。——编者注

[2]　“毕士大”：《圣经》中许多残疾人、病人抱着希望而来，盼望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羊门的池子，以期得到奇迹医治。——编者注

[3] Umma，本意为民族，后世历史学家用以指早期麦地那伊斯兰教教徒政权。——编者注

[4]　“认知暴力”是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由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提出。——译者注



肿胀的巨人

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危机将永远隐藏在光亮的阴暗面。这个时刻在七年战争期间到来了，当

时英国人在他们的大西洋领地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在亚洲的帝国。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被迫从全球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无休止地扩张，同时也在各地树敌无数，他们面对着肖尼人、特拉华人、马拉塔人和罗希拉人这些原住民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在欧洲的敌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这种全球化的视角暗含着新的威胁。因为无论南非的边界战争还是美国人的起义现在都可能吸引英国军队，同时转移英国的海上力量。一个版图覆盖全球的帝国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要处理世界各地无休止的危机，当一个地区的危机暴露了其他地区的虚弱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时，它还必须消耗资源来解决困境。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帝国在1763年的胜利只是接下来50年乱局的序曲。

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经历了近20年的世界大战之后，1815年的胜利抹去了50多年来最让人恐惧的事情。不过到19世纪晚期，曾在滑铁卢战役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策略难题再次出现。他们的帝国领土广袤，掌握的资产不管是在地域、人口还是财富上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敌人，他们在非洲以及南亚（缅甸、马来亚以及加里曼丹岛）的分割中择肥而噬。当欧洲的“闯入者”侵犯西非及东非，或者波斯湾这类地区，他们常常会表现得愤怒不堪（有时还真是发了怒），因为这些地区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干涉范围”。那些较为冷静的顾问告诫英国政治家们不要如此嚣张跋扈，以免惹起众怒。一位顾问写道：“有时候在我看来，对于读了我们新闻报道的外国人来说，大英帝国一定是以一个横跨全球的巨人形象出现的，这个巨人有着很大的手指和脚趾，死死抱住整个地球不肯放手，别人哪怕只是轻轻一碰都能引起他的尖叫。”

更糟的是，全世界政治的整体平衡现在似乎朝着反对英国的方向转变。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新兴国要求建立海外帝国，他们对热带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最危险的两个敌人俄国和法国于1894年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法俄同盟”，法国资本催化了沙皇对亚洲的野心。受此影响，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比如葡萄牙或者比利时国王）都变得更加大胆，从而来缠着英国这只狮子的尾巴或者用力拉它的胡须。殖民国家中各阶层的情绪也因为害怕被排除在贸易繁荣且矿产丰富的未被殖民的世界之外，而快要到达歇斯底里的程度。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通信革命更加助涨了这种情绪。汽船和铁路使全球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欧洲潜在的一个省份，并且增加了所有帝国建造者的胃口。在非洲沙漠中铺设铁路带来了如同经济吞并一样的好处。这就创造了一种必须得到保卫的利益。无线电波网络缩短了地区之间的距离。拥护帝国主义的自由作家之间的辩论或竞争不论多么遥远、不得体或者琐碎，都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被传播给公众，从而激起他们的爱国情绪。英国的外交官徒劳地对着法国的“向当局献媚的报纸”发怒，却忘记了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其实与此大同小异。在一片计划、宣传和方案的嘈杂声中（更别说诡计的风暴），人们很容易认为帝国之间的竞争进入到了游戏的结尾。不仅是在美洲，世界各国的边界正在重新划分。各大国的领导人们为了避免本国遭受冷落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分配，不惜冒着爆发冲突的危险展开了博弈。

事实上，1900年后，那些暂时逃脱了瓜分命运的地区的大门开始越来越有可能被打开。欧洲商业、技术和思想冲击的分量会分裂和打击，或者纯粹地摧毁在中国、韩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残存的旧制度。从大西洋到东亚的一大片领土又会以不可预测的顺序被争抢，一群本地行动派和突发事件使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比起之前瓜分非洲时轻松的讨价还价，各大国在争夺殖民地时所冒的风险越来越大，妥协的余地却越来越小。这次的赢家可以尽收好处。奖赏也许就是无限的霸权。

后来，我们知道结果并非如此。不过那些负责保卫英国利益和地位的人的判断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任务难度很大。为了保卫英国的帝国，他们需要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建造舰队和堡垒，或者配置炮艇和驻军，无论多么数量巨大或者分布广泛都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处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策略性的也有政治性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和帝国一样长久。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扩张的地理独特性。英国的帝国形状打破了军事逻辑的任何一条概念。也许有些观念会认为一个有着良好规划的帝国要稳定地向外扩张。其都市中心部分会被最值得信任的地区保卫起来。除了这部分还会有一系列被分级的地区，包括一些不太有价值的地区，以及处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国家”和在必要时能够被放弃的“诉讼领域”。一个经过精心规划的帝国在遇到危险时可以依靠其城墙：罗马的“防线”、中国的“长城”、保卫沙皇俄国占有的大草原的“燧石防线”；希特勒的“西部防线”。躲在这些防御背后，帝国能够重建士气、恢复其力量并重新考虑战争计划。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设计者的模板，大英帝国的版本就只是一个荒谬而拙劣的模仿。其中心和心脏离它最危险的敌人仅22英里，最有价值的领土不是那些排列得离中心很近的契约省份，而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坐帆船需要6个月、坐轮船至少需要3星期才能到达的地方。1860年以后，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驻扎在印度军营，与最近的海港都相距很远。除了印度和加拿大，帝国的大部分就像遍布世界的群岛，从香港一直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大英帝国在与除了沙皇俄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交战时，其力量与分布在海上的众多岛屿势均力敌。”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专家说道。

这种奇异的布局并不是没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也是引来众多讨论的，就是英国与欧洲的联系。一种貌似可信的观点认为，英国卷入欧洲的冲突，加入王朝阴谋的战场和19世纪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分散了其自身的注意力，偏离了其应有的命运，后果是致命的。广阔的海洋以及外面的世界才是它真正的利益所在：它们会以最少的代价带来最大的回报。早在1700年之前，英国的海上优势就已经很明显，能够被用来掠夺对手的领地，同时保护本土岛屿不受任何外来入侵。这在18世纪就是“美洲”战略或“公海”战略。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种战略依旧颇具吸引力，当时对大战再次来临的担心让欧洲两败俱伤的冲突受到普遍的厌恶。消耗英国的力量来保卫一个无法捍卫的和平条约似乎成了“仲夏的疯狂”，尤其是对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和南非这些白人自治领的领导者而言。一位老兵（也是帝国主义者，后来成为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成员）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 Amery）甚至寄希望于通过让德国控制中欧来使英国避免陷入泥潭。不过正如其批评家坚持的，这个战略有着致命的判断性错误。

蓝水战略认为，一旦陷入危机，英国可以抵抗敌人的任何联手。尽管有时候这的确是可能的，却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个难题就是这需要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军队，这支海军不仅要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所拥有的更大，也要比任何联手的敌人所拥有的大。不过一个更大的危险潜伏在阴影之中。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英国的领导者常常警觉欧洲不稳定的政治可能会打破爱争吵的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欧洲的某个大国想要赢得统治的权力并且击败所有其他对手，那么它需要牢牢掌控这片大陆所有的资源：陆军、海军、贸易、财富、工业、航运和人力。它要能控制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能摧毁英国的贸易（欧洲市场对其十分重要），尤其要拥有能迅速震慑或发动侵略的能力。为了防止这样的可怕灾难，蓝水战略帝国主义者的批评家认为，需要时常关注欧洲权力的变化和组合，监控权力平衡的任何微小调整，就像一位现代的地震学家对地震的监测一样。这还只是开始。无休止的情报流通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扩大英国的影响以及（如果需要的话）选择英国的同盟，因此没有哪个单独的权力能成为欧洲的霸主。这样做的残酷逻辑就是如果外交不奏效，英国必须愿意接受混乱的联盟，在盟友身上挥霍资源，或者最差的，派军到大陆战场上战斗。的确，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类似事件之后，除了蓝水战略诱人的吸引，英国领导者接受了英国及其帝国在欧洲必须得到捍卫的事实：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1793~1815年的“大战”）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认为大战仅限于海军实力的人，”英国七年战争时期伟大的战略家皮特（Pitt）说道，“是缺少知识或经验的。”

不过，来自美洲大陆的承诺注定让他们不安，原因至少有4个。第一，惨痛的经验过后，他们明白了大陆战争的极其昂贵。1690年以后的每一次主要战争都产生了巨额债务，增加了赋税，并引起了处于压力之下的本土大范围的动乱。正是诸如此类的压力迫使英国的大臣们于1763年之后开始在美国征税，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二，当军队的规模开始膨胀，大规模征兵也在欧洲大国变得普遍（19世纪的发展趋势）时，有许多警告声音称欧洲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征兵，还会打破英国在军国主义车轮上的自由。第三，那些依靠议会支持的政府（因此也依靠公众观点），也对他们与其他欧洲国家长期结盟感到深深的犹豫，他们生怕一旦结盟形成，本土的意见会左右这种情况。不过他们坚持在所有外交关系中我行我素注定会招致欧洲邻居们的不信任，或者在关键的时刻削弱他们的声音（1914年7月德国人低估英国干预的原因的一种观点）。第四，保卫帝国边界（尤其是在印度）对于一个较小的军队（1914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在12万~18万人之间）而言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不难想象，一个常常在遥远的地点工作的军队，要抵抗“不文明

的”敌人，为了能够迅速反对“一流的”对手是如何部署的。这些“一流的”对手在现代化的条件以及繁重的装备下训练如何战斗。对索尔兹伯里勋爵（不是将军的崇拜者）而言，为了这样的事件训练只不过是在表演。“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中，”他1899年说道，“他们应该练习的是在需要时让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迅速远征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点。你的职责就相当于军事消防队的职业……”

不论他们认为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事务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当欧洲均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时，大多数英国领导者对于对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故意保持含糊不清态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除了欧洲事务的复杂性，保卫帝国也存在着很大争议。最基本的争论是关于何种威胁是最真实的以及谁的需要是最紧急的。在18世纪，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为了寻求英国的保护而与美国殖民者抗争，以此来反对法国人的攻击。在19世纪，开普殖民地的总督与新西兰的移民（惧怕毛利人）、中国的领事和印度的总督为了英帝国主义的长矛——步兵的军营曾一较高下。在20世纪，伦敦面临着让人不安的需求：保卫澳大利亚、埃及、本土岛屿或是大西洋航路（这是最重要的）。与这些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谁来保卫，更是在哪里以及如何保卫。在帝国的几乎每一片疆域，以及沿着其主要路线，似乎总能找到进一步前进的可能：这里的一块锚地、那里的海岸线、堡垒、河流、大山、丘陵、衰退的国家、重要的绿洲和反抗的部落。吞并、占领或军事存在都会缩短路线，降低开销，并且让帝国变得强大，或者看上去强大。经验丰富的政客要学会怀疑。“如果你相信士兵，”索尔斯伯里对一位兴奋的总督说道，“就没有安全可言。”他的侄子A·J·鲍尔福（A. J. Balfour）是少有的认真研究战略的英国首相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怀疑论者。1918年寇松（Curzon）勋爵坚持为了保护印度则需要占领波斯，或许还有高加索。贝尔福说道，进入印度的通道变得离印度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这会被总参谋部向西推进多远。不过就像贝尔福发现的那样，拒绝这样的要求并不总能成功，而且也不总是明智的。大英帝国所拥有的奇特形状实际上是因为需要保护其航道，并且控制其堡垒和缓冲地带，因为它们使帝国得以以较为宽松的方式来统治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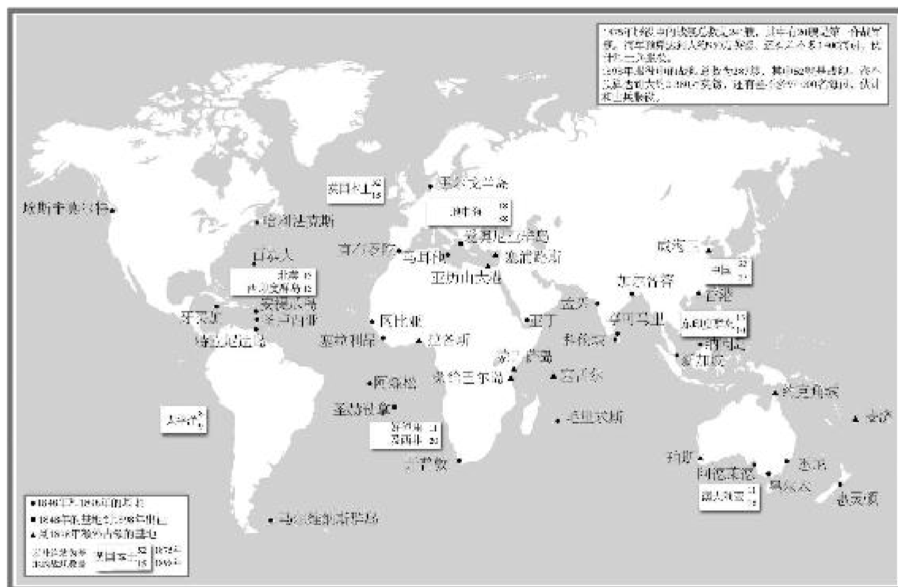


图10–1　1875年和1898年皇家海军及其补给站

海军是英国最主要的武器，在局势紧张时期，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军驻扎在何处。在漫长的18世纪的战争（1690~1815年）中，很显然英国需要海军的“木制城墙”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的威胁。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执行的问题有时候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海军犹豫是否应该对主要的法国海军基地（在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维持封锁来阻止法国舰队冒险进入海峡，可是封锁的消耗是出了名的大，而且在雾天或大风天不能保证这会起效。同样还需要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破旧的船和筋疲力尽的船员们需要定期轮换。还有一个问题是海军的火力是否应该转向其他地方。法国在其地中海沿岸的土伦维持着一个规模很大的舰队。如果法国在战斗中取胜，并且对以布雷斯特作为基地的舰队形成支持，英吉利海峡力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英国的地中海军队被要求来抵抗这支力量。不过战时它应该驻扎在哪里呢？离本土基地太远，因此英国不能封锁土伦。只能退守到直布罗陀海峡来封锁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不过这会让法国的舰队控制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破坏英国贸易以及（更糟的是）与西班牙联合行动。没有一个答案是简单的。另一个难题是要保护商业运输，商船成为敌军巡航舰的猎物。当船只进入爱尔兰海的西部海域和海峡时，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不过保卫护航队对于海军的领导者以及他们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干扰。

这个任务在英雄人物纳尔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则格言中也有所体现：海战的目标就是“对大海的控制”。要想获得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坚决与敌军舰队交战来确定对方的毁灭或被俘获的结局。一旦确保了控制权，管辖海上通道会减少贸易的损失，海军力量能被用来进一步摧毁敌军。这样做的逻辑并不是让封锁陷入僵局，而是找到让敌军不惜一切加入战争的方法。更深层级的逻辑，当然，是海军力量必须在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集中。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逻辑并不经常

受欢迎，尤其是对那些在地球另一端的遥远的殖民地来说，他们非常担心本地入侵。“如果英国舰队在北海被击败，”当时海军部的大臣温斯顿·丘吉尔1913年宣称，“所有他们现在为澳大利亚自治领避开的危险都会解除……太平洋的情形必然会被对北海的局势所牵制。”不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客对日本的海上力量感到十分焦虑，他们很难去相信奥克尼的海军基地是他们区域安全的真正保障。事实上，1914~1918年海战的模式证明了丘吉尔的主张是对的。不过1919年以后，当主要的海军威胁会来自北欧、地中海还是东亚的日本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关于在何处集中英国的海军力量以及如何能够控制大海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英国可能面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联手进行的攻击（1936年之后越发可能）时，这个问题变得几乎无法解决。事实上，此时，英国海上霸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掩盖）的最终消失已经十分迫近。

对于一个如此依靠其海上连接、贸易利润以及最重要的食品进口水平（到19世纪晚期尤其如此）的帝国而言，海军的规模、配置和火力注定是很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对于那些保卫帝国的人而言，这些并不只是他们被迫权衡的事情。他们必须决定在欧洲的哪一部分以及如何保留英国的影响，哪怕并不完全为了英国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必须让自己与欧洲的友好关系和在帝国边界扩张的欲望（大部分摩擦的来源）保持平衡。他们必须要决定在任何特定的地点或者时间扩大帝国或者其影响范围是否会增加其安全或者带来可能的“冒险扩张”——常常是一个不容易做的精细运算。也许他们尤其要留意我们能看到的（后见之明的优势）把控着通往英国世界权力钥匙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条就是避免孤立的必要性。“没有孤立这回事，尤其对一个坐落在世界公路的岛国和海上帝国的中心而言。”一位维多利亚时期末的评论员说道。一个积极的外交策略就是经常被要求要避开这样的梦魇。第二点是帝国给全世界造成的危险可能会被“超级大陆”即欧亚大陆的权力集合（也许是一个大国，也许是一个联盟）所压制。这就是危险所在，1904年，被哈尔福德·麦金德精辟地阐释清楚，它常常困扰着政策制定者。英国人必须决定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减小在亚洲发起的“前进运动”带来的威胁，于是他们在1918年做出了一个突然且重大的决定（我们马上会看到）。第三，如果按照1930年以前还隐而未现的方式，使大英帝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战略性地存活的是一次世界历史上的意外事件。1815年后真正的欧洲均势和东亚的软弱独特的结合为英国的全球帝国主义创造了空间。当这些条件不复存在（就像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威胁要这样做那样），这一艘巨轮（丘吉尔的生动措辞）能否幸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战争的过山车，1755~1815

1755年6月8日，没有宣战，在大西洋西部的一支英国中队拦截了法国一支前往魁北克的运送军队的护航队。大多数人逃跑了，两人被俘虏。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英国人在“和平”正式宣告结束前拦截了300多

艘法国海船。在接下来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为了保卫他们本土的安全，将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海外帝国都卷入了战争。他们经历了从胜利到灾难，从恢复到困境的艰难过程。在让人惊诧的战争高潮中他们经历了从1814年胜利的和平到在欧洲重新奋斗的展望（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取胜）再到1815年6月惠灵顿战役的胜利确保的巨大地理政治的成功。在接下来99年的间隔时期，英国人几乎独享并充分利用了进行海外扩张的优厚条件。

不过在18世纪50年代，大部分任务是防御性的。在他们的北美殖民地，一些迹象让他们警觉到法国人正在从他们帝国的两端加强对异邦内陆的控制，即从魁北克和新奥尔良控制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布拉多克（Braddock）将军领导了一支远征部队，夺取法国控制的杜肯要塞（今匹兹堡），结果成了一次代价高昂的惨败。接下来的三年里，英国人与他们的殖民地民兵与法国在英属北美堡垒包围圈中的对抗努力取得了进展：迪尤肯、泰孔德罗加、路易斯堡（在布雷顿角岛上）以及最重要的堡垒魁北克。在欧洲，他们的地位看上去更不利。他们现有的盟友出现了巨大的反转，这片大陆主要的军事力量法国和奥地利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因为当时奥地利统治了低地国家地区的南部（今比利时）——历史上英国侵略的据点，波旁王朝统治着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是英国在大西洋和美洲最痛恨的对手，这种新格局看上去无比危险。距离法国支持詹姆斯党在英国的最后一次叛乱已经过去10年多了，英国及其大西洋领地被侵略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所以为了避免被孤立并恢复欧洲均势，英国人将自身的命运与奥地利的眼中钉普鲁士的腓特烈联系在了一起，腓烈特曾因企图争夺西里西亚（一个奥地利的省份）而引起了哈布斯堡皇室的愤怒。这看起来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尽管困难重重，腓特烈仍然以赫赫战功证明了他是一位天才的军队指挥官。来自英国的资助支持使他的军队运转良好，腓特烈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尽管对手往往比他要强大很多。同时，胜势也蔓延到了北美战区和海上。1758年，英国人夺取了杜肯和路易斯堡，开辟了进入北美中西部和圣劳伦斯湾的通道，使1759年成为“充满胜利的一年”。在9月份，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领导下的远征军被派去占领魁北克，他们从河里爬出来后遇上了在亚伯拉罕高地的法国驻军。在短暂的杀戮中，他们逼迫法国军队投降，因为手里握着魁北克，他们掌握了通往法属北美的钥匙。两个月之后，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追逐，海军指挥官霍克（Hawke）的海峡舰队将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追逐到了基伯龙湾危险的岩石和暗礁区域，并且在那里将其摧毁。法国海军力量的毁灭终止了任何侵略的可能并将法国的大西洋帝国（包括其加勒比的“糖殖民地”）一起摧毁了。同时在印度，一支强大的被派出去破坏英国贸易并且加强法国的影响（特别是在南亚）的法国分舰队被扣押在海湾直到1761年1月英国人夺取本地治里，这是法国在印度的主要基地。并且一个有趣的结局是，西班牙最终加入了战争（也许是为了限制英国胜利的规模，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762年，英国人夺取了哈瓦那、西班牙的加勒比和直布罗陀来保护其前往墨西哥

的航路，同时还占领了西太平洋的马尼拉，英国人派了不到1 000人的军队，他们是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常备军和印度兵。当一度加入了法国和奥地利反对暴发户普鲁士的沙皇俄国退出战争后，战争彻底宣告结束。

英国获利的规模是惊人的。一个“防御性的”战争给帝国带来了比1775年最狂妄的梦想更不可思议的奖励。1763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人获得了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全部地区，包括西班牙占领的佛罗里达，还有西非的塞内加尔，这是奴隶贸易进行的地方。法国放弃了对南印度的诉求以及在孟加拉维持军事存在的权利，因为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取得了胜利。不过在甜蜜的殖民油膏里有一只很大的欧洲苍蝇。英国的海外胜利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始终无法打败欧洲的法国。他们也不想延长与西班牙的交战。殖民让步对于规劝法国和西班牙争取和平是必要的，这让法国从它占有的德国土地中撤退（对普鲁士的关键保护）并否认与奥地利的盟友关系。法国的瓜德罗普岛、哈瓦那和马尼拉都被退还，以安抚大声疾呼的英国人。一个摆脱了所有对手和攻击危险的海外帝国毕竟不是他们能够驾驭的。事实上，很快就有迹象表明英国人扩张过度了。更糟糕的是，之后即使是他们的胜利也不够强大到能缓解他们在欧洲面临的限制：英国开始有必要避免孤立的境地并维持一个“友好的”均势来阻止一个对抗他们的巨大联合。

如果不是与他们的北美子民闹翻，这件事情也不是迫在眉睫。这与他们为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为了减小军事上的负担，英国的大臣们决定在1763年划定的“公告线”后面限制北美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殖民统治。1763年的“公告线”是穿过森林来限制边界农民和贪婪的土地投机者（其中以乔治·华盛顿为典型代表）扩张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印第安人的土地是无法抵抗的诱惑。为了减少战争债务并阻止本土仇恨的滋生，也为了保护帝国英国大臣们决定向北美殖民地适当地征税。这两个方案最终被证明是极大的政治灾难。到18世纪70年代，他们面临了一次严重的移民叛乱，情况极其危险。在1778年，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法国一直在耐心等待复仇的时机，它加入了这场斗争并且与美国站在一边。西班牙与荷兰也分别于1779年和1780年加入战争，他们都十分急切地要打败过于自负的英国人，并阻止其在大西洋以及亚洲的扩张。（同样也包括他们的加勒比属地、库腊索岛、圣尤斯泰希厄斯岛、苏里南、荷兰统治的锡兰、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香料群岛。）1780年，沙皇俄国精心策划的武装中立团结了其他的欧洲国家来反对英国，因为他们认为中立的运输船不应该被英国人的封锁影响。在这些可怕的情形下，美国人的抗争几乎成了余兴表演。英国人面临着本土被侵略以及丢失其加勒比“皇冠珠宝”（其中最主要的是牙买加）的危机。英国人拥有大约90艘战舰，远远低于法国和西班牙能召集起来与之对抗的总数116。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他们排除了本土海域的威胁，并于1782年在罗德尼（Rodney）的指挥下在“圣徒群岛”（因战斗发生在瓜德罗普岛与多米尼加岛之间的一群小岛上而得名）取得了胜利，重获大西洋的控制权。不过对于北美战争而言，这实在太微不足道而且来得太晚了。在关键的阶段，大西洋的生命线被切断，打击美国的主要力量康

华里的军队被迫在约克镇投降。英国人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欲望，他们开始坐到会议桌前绝望地渴求能够粉碎对抗他们的联合力量。赋予美国独立是唯一确定能够终结殖民地与法国（世界上最坏的国家）的结盟并保留与英国贸易关系的方式。黑暗之中唯一的光明之处是他们的海军在印度取得了胜利。在那里，法国人对海达尔·阿利（Haidar Ali，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头号敌人）的援助被彻底挫败了。如果法国分舰队成功封锁在马德拉斯的英国基地，并且切断与孟加拉的重要连接，海达尔·阿利也许就能打败装备并不强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印度的历史也许因此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在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于1783～1801及1804～1806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领导下，英国人开始复兴海军和外交。1790年，此时已足够强大的英国压制了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对北美太平洋沿岸排他性的控制权，并迫使其正式接受太平洋不再是他们的垄断地带的事实（所谓的“努特卡湾争端”）。三年后，他们和法国开战，这场长达20年的斗争决定了他们全球扩张的命运。这次冲突的规模和时长甚至远远超过了30年前：一方面，陆地力量所拥有的调动欧洲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通过合作以及暴力）震惊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另一方面，海上力量关键要依靠大约1760年以来欧洲殖民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非欧洲世界的贸易增长——尤其是在美洲和南亚。正因为如此，欧洲以及非欧洲的“双重革命”使这场冲突成了“世界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世界的战争”。开始英国只是为了保护其本土岛屿的安全，结果却决定了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欧洲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防御自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英国的帝国制度最薄弱的时刻。“只要让我们做6个小时的海峡主人，”拿破仑说道，“那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拥有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的海上控制权，加上禁止低地国家与大国对抗，这些共同成为保证英国安全的关键。为了反击革命的法国向北部扩张，英国人首先开战。但随着战斗继续，法国的行动被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宏伟的远见激发出来，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出现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这种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贸易。正如英国的战略犹豫不决所反映的一样，如何决定何为最好的抵抗方式是不容易的，更别说怎样有朝一日取得战争的胜利。

很明显，英国要做的就是将法国驱赶出斯凯尔特河的河口，因为这里是侵略的据点。不过当荷兰沦陷而且爱国党去到了法国后，这就不再是一种好的选择。很明显，抑制法国需要多国力量的联合，奥地利是最佳选择。为了在区域联手，英国人需要预付其军队要求的财政支出。在地中海安排部分海军驻守也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鼓舞他们的盟友并且阻止法国对地中海的主导。这还不是全部。一旦被迫从大陆离开，英国人就不得不始终警觉被侵略的危险，这些侵略并不仅是针对英国的，还有可能深入反抗的爱尔兰岛。英国的第一要务是紧密观察和监视法国的军港和西班牙的意图。西班牙是英国短暂的盟友，不过在当时它却是法国的盟友。不过同时，采取蓝水战略是颇具吸引力的：用英国的两栖力量来攫取敌人的殖民属地，1795年后是荷兰，同样还有西班牙和法国。这

并不是唯一的机会主义。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是皮特的得力助手和非官方战略指挥官，他坚持认为英国的“海岛情形以及有限的人口不允许广泛的大陆行动，并且我们相当依赖……贸易和航海的发达程度”，这个结论是“明显的”。英国应该首先致力于扩大其海上力量并且毁灭敌人的海上力量：“我们应该尽早，最好是在战争的开始就切断敌人的贸易资源（并且）不能出任何差错地削弱他们的海上资源”。使英国的这种需求更为紧迫的是对英国制造商采取关闭市场的惩罚以及之后对贸易的破坏。

邓达斯认为在海外贸易和帝国以及帝国在欧洲战争的独特角色之间有一个固有的联系：帝国是军事同盟的军需官。如果英国的贸易摇摇欲坠，随之而来的就是伦敦金融城管理的信用和贷款的复杂制度的崩溃，紧接着便是财政灾难。这也涉及自信的问题。因此保护英国在加勒比的属地是十分关键的，此处仍然是皇冠上的珠宝。邓达斯在1796年8月说道：“失去牙买加，是对我们信用的彻底毁灭。”失去其出口、汇款以及糖税的收入对英国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邓达斯认为印度也是一样（他的三个兄弟在那里寻求财富）。事实上，伦敦很早就认为东印度公司“大到他们不能失去”。不过即使是与对手进行海战，指挥荷兰、西班牙和自己的海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英国人的封锁政策让他们与可能的朋友之间产生了距离。海战需要大量的海军补给品、木材和焦油来维修和建造，这个考虑使波罗的海甚至是科西嘉岛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尤其是在东方世界，还需要安全的基地使轮船能够得到整修，船员们能够恢复精力。在孟加拉湾，英国人没有安全的海港使他们的船安全度过飓风季节，当西南季风在10月变成东北季风之时，飓风季节便来临了。在通信缓慢且不可靠的时代，愿意冒险的精神变得尤其重要，当时追踪敌人的舰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风向和天气的变化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当敌人的海上力量强于你，而你又有许多偏远的属地要保卫，”海军上将肯彭费尔特（Kempenfeldt）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阶段说道，“很难决定怎样才是调配船只的最佳方式。”

不管带来了哪些好处，欧洲的战争对法国殖民地的攻击并不能给关键战场做出真正的贡献，它还使英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794~1801年的加勒比远征中大约有66 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因为疾病）。1797年，当拿破仑杀出一条血路到达意大利时，反对法国的联合瓦解了。因为担心侵略（一小支法国远征军实际上到达了威尔士），而且财政状况混乱，加上海军担心起义的危险，英国人放弃了地中海，决定第二年返回。诱骗奥地利重回战争的代价看起来有着巨大的风险。这恰恰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巨大阴谋不经意地吻合了，拿破仑企图第一阶段（看上去很有可能）征服埃及这个大的东方帝国，然后最终进攻印度。“我们最早和你们结识，”1798年6月，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对他们的印度总督警告道，“我们已经收到情报……一大批轮船、军队、军需品最近在土伦就绪并且开始了航行……（在5月19日）……不是没有可能……它们的目的地是印度，要么经过红海（首先要先占领埃及）要么经过巴士拉。”总督早就决定要攻击蒂普苏丹，他是迈索尔的统治者，并且早就被怀疑和法国人有了将英国驱逐出南印度甚至是整个次大陆的秘密协定。

法国军队的确入侵了埃及。不过在拿破仑能够进一步利用他的妙计之前，他的计划因为纳尔逊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对其舰队的彻底摧毁而泡汤，那是在8月1日，纳尔逊的行动积攒了巨大的勇气并贯彻得十分完美：纳尔逊需要将他的部分舰队航行到固定的法国舰队与海岸之间，这需要冒着让他的船在深度未明的水域里搁浅的风险。他从这样危险的策略中得到的是巨大的好处是“双倍”攻击法国——立刻从两面攻击他们的船，这是一次致命的突击。尼罗河河口海战和第二年韦尔斯利在塞林伽巴丹对抗蒂普苏丹的压倒性胜利终止了法国对印度的威胁。不过这样做和阻止法国对爱尔兰的侵略来响应1798年的起义都不能确保英国安全所要求的在欧洲的力量平衡。

想要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很明显是不可能的，这就让英国人于1801年寻求妥协的和平。不过这个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法国人拒绝从低地国家中撤退，而且马耳他（之前被纳尔逊夺取）的英国人也拒绝这样做。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即1803～1814年之间，英国人获取了他们之前没有获得的海上掌控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伟大胜利中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英国人现在可以随意摘取他们敌人的海外领地，并且不用担心在本土发生危险。在他们以前对特立尼达拉岛和锡兰的征服中又加入了开普殖民地、毛里求斯和爪哇岛。拿破仑于1809年企图对英国实施大陆经济封锁政策，设法将英国从欧洲贸易中排除，这项政策的实施像筛子滴漏一般，还惹恼了他的附庸。当他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来镇压反法起义，一支不受法国干扰的海军补给线支撑了在葡萄牙的惠灵顿的军队，并且允许其渐渐前进到西班牙。不过难题依旧存在。只要拿破仑是欧洲的霸主，英国人就无法确定他何时还会来侵略他们，或者建造一支新的舰队，或者拉拢新的盟友。与此同时，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一支很大的陆军和海军。在战争的后半部分，政府开支花费了将近全国收入的1/4来支付国防费用以及战争产生的巨大公共债务。正是在本土的经济扩张（包括蒸汽动力的巨大发展）使得税务的负担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能够被忍受。

僵局被沙皇俄国反抗拿破仑霸权的行动以及拿破仑1812年侵略沙皇俄国的惨败所打破。起初，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组成的大陆联盟共同反对这位受伤的皇帝。沙皇俄国1813年在莱比锡的压倒性胜利是其侵略法国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序曲。从西班牙来的惠灵顿军队在胜利中起到了作用。不过其更关键的作用是在1815年建立的“百日王朝”中摧毁了拿破仑企图重建他的军事和政治繁荣的疯狂举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对英国人而言）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陆上版，尽管看起来即使是法国的胜利也很有可能无法将拿破仑从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附近集结后的勇猛前进中挽救出来。这几乎必然让法国在陆地和海上遭到失败。这对于英国人希望保留主要战时成果以及在1815年后的全球扩张是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

原因很简单。在可以向前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的战争中，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在战争中与法国僵持，但并没有将法国击败。为了和平解决，1763年，英国人不得不将他们的胜利果实的大部分（瓜德罗普岛、

本地治里、古巴和马尼拉）扔回到桌面上。1805年以后，英国的全球地位从战略上与经济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强大。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他们能够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不管是在大西洋还是印度洋）来维持他们的战争并资助其他人。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部分原因是英国在欧洲之外力量的强大）允许英国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地理战略地位。1815年，为了让不受欢迎的波旁皇族能在巴黎继续存在下去（反对拿破仑复兴的最佳保证）这就意味着交还他们需要交还的产糖的殖民地。为了帮助新晋的“尼德兰王国”保卫低地国家对抗法国，它的宝库爪哇又交到了荷兰人手中。不过英国人仍然控制着马耳他、伊奥尼亚、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他们很快就迫使荷兰人放弃了对新加坡的诉求。法国和西班牙都没资格来争夺这些海战的果实，更别说荷兰人：英国的欧洲盟友几乎都没有兴趣这样做。因此1815年的特殊局面使英国保卫帝国的努力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成功。有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在亭可马里有抗风的海港），他们就拥有了去往印度的干线上所有主要的补给站。在马耳他的大哈伯岛，他们可以观望地中海东部，以及前往东方的“短”路（至今仍是陆上）。有了这些以及在爱尔兰、北美和加勒比的海上基地，他们现在相当于拥有了在航海时代封锁世界的钥匙。

“英国和平”，1815~1914

1815年以后，英国人似乎享有近乎完美的条件来保卫他们拥有的属地，并且还可以为帝国增加新的土地。他们的海军实力让遭受本土入侵的可能大大降低了，除了定期为法国闪电战担心。他们的基地对海道坚不可摧的掌控使得对帝国进行海上攻击（在前一个世纪再普通不过）几乎成了不可能事件。有了汽船、铁路和电报这些更快捷的通信方式，运送货物和步兵营来满足本地应急的需要渐渐变得更容易。同样重要的还有欧洲权力政治的重要变化。对战争、革命和拿破仑军事天才的深深恐惧使欧洲的政治家动摇了，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外交手段。为了保护欧洲脆弱的稳定，他们达成一致，建立一个“音乐会系统”。因此，任何可能会打破欧洲五大权力（沙皇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平衡的对领土控制的变化都要求事先达成共识。任何打破规则的大国都会发现其他各国定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个政策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对于英国而言是巨大的安慰。至此，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欧洲给帝国造成的最大威胁退缩到了阴影里。

当然，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直接。英国人非常担心沙皇俄国缓慢但是不停滞的扩张，有些人说就像冰川一般。沙皇俄国巨大的军队、神秘的政治、无懈可击的海上力量以及不可估量的沙皇野心在英国制造了“恐惧沙皇俄国”的气氛。尼古拉斯表现出了“和拿破仑一样的对英格兰的憎恨”，帕尔默斯顿说道。沿着亚洲疆域内部的军事生命的迹象可以被看作是沙皇计划征服（或者至少是破坏）印度帝国的证据。“哥萨克人和印度兵，这两拨分别来自波罗的海以及英国岛屿的人会在亚洲的中央碰

面。”帕默斯顿预测道。对法国的疑心同样很快复原，但还有对法国权力的担心，这都是建立在其军队的规模和装备之上的。英国人十分怀疑法国对比利时的意图，并且于1839年坚持用条约来确保比利时的中立（1914年被恺撒无视的一纸空文）。他们反对法国对西班牙和意大利再次施加影响。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首先当上了总统，并于1851年当上了皇帝，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卡斯尔雷、坎宁、帕默斯顿、阿伯丁、迪斯罗利和索尔斯伯里都是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伟大制定者，都清楚英国在世界的利益需要通过在欧洲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遏制（他们认为的）某些统治者的本能侵略来保障。正是由于与法国结成了同盟，加上奥地利皇帝施压，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才成为定局。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认为，只要欧洲是“安静的”，他们就能够处理本土抵抗对他们帝国权威构成的威胁。为了镇压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他们将大部分的（英国）军队派去了印度内部。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关注着爱尔兰。帕默斯顿在印度危机最高峰的时期说道：“在爱尔兰最小的爆发”会“比在印度能发生的危机更加撼动我们权力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外部防御的焦虑集中在三个“热点”上：第一个，也是最不严重的一个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狭长边界。美国联邦政府的弱点，“暴徒”[1]（未被授权的扩张主义者，聚集了一帮武装之人来侵略邻国的领土）的猖獗，以及伦敦与华盛顿之间定期的紧张局面都意味着这种危险是真实的，虽然它并不存在，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美国内战期间及战后，这种危机尤其突出，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他们在加拿大薄弱的守备部队，特别是在冬季圣劳伦斯河结冰的时期。第二个是在印度的西北边界，沙皇俄国的影响在里海和中亚的推进一直被紧密监控。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就是被维多利亚时代叫作“近东”的广大地区，从希腊一直到波斯的东部边界。因为他们想要在这里保卫到印度的短途路线（1869年后该路线变成苏伊士运河），驱逐那些来自埃及或者波斯湾附近并且进入印度通道的敌人。的确，印度成了保卫帝国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最易受攻击也最有价值。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留下了两个有趣的遗产。在英国人中间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妄想症的东西，因为他们担心第二次叛乱，所以他们对挑战他们个人尊严的举动（作为统治者的权威）表现得过分紧张。军事失败或者敌人对印度边界的过分靠近都可能引发起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6万～7万名英国士兵（大约是军队的1/3）在1860年以后留在了印度。另一方面，1860年后印度的贸易迅速发展，它作为东非与中国之间海洋区域的中心，无论是作为市场、供应商还是投资，都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不仅是这些，大批英国守备部队驻守在那里（印度人付出代价），改良后的印度军队都成了帝国在亚洲的战略储备、海上力量的矛尖，印度也成了大英帝国进一步扩张的跳板。没有印度的大英帝国是无法想象的。

保卫印度和帝国因此也意味着英国在近东强大的外交和海军的存在，在近东的沙皇俄国和法国，无论共同行动还是分开行动，都有可能粉碎奥斯曼帝国并且瓜分其省份。沙皇俄国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还有他们在高加索的前沿基地，在那里，他们有一支很大的军队，

沙皇想要统治君士坦丁堡和沙皇格勒以及控制土耳其海峡的野心从来未曾熄灭过，都是持续性不安的来源。英国人也没有忘记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所有法国在埃及的利益都招来了怀疑的眼光。防御的主要力量是一支很大的海军分舰队、地中海舰队及其在马耳他的主要补给站，防御的目的是阻止法国和沙皇俄国的推进以及防范奥斯曼帝国。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以及1875年之后这些力量却是不够的。在每一种情形下，都需要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召唤欧洲的盟友共同对抗沙皇俄国的扩张。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人被迫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埃及的危机举起了反对外来政权的旗帜。英国人一方面要顾及他们的个人自尊，另一方面又害怕埃及的动乱会带来他们无法控制的权力的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一切导致了格莱斯顿的内阁在1882年采取了“临时占领”的策略。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冒险的承诺，并引来了其他大国对他们的强烈谴责。在非洲“争夺”期间，他们做出了让步来安抚欧洲的批评者，通过分散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平息悠悠众口。逐渐地，他们在尼罗河的临时占领成了“隐形的保护国”，用克罗默（Cromer）勋爵的话来说，埃及是他们的“中介”，是开罗的“宝座背后的耳语”。脱离英国被无限期地推迟。埃及成了未来中东帝国的核心——用来保卫印度。

图10–2　1881年英国军队的分布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领导者有意（歪曲地）回头看19世纪的中叶，因为那是安定的黄金时代。他们开始怀疑帝国的巨大规模正在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正在失去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男子气概推行英国主张的意愿和手段。这种情绪是由两个让人不安的发展引起的。第一个是欧洲人日渐激增的侵略野心似乎已经超越了欧洲，回到了1815年以前的重商主义时期。法国和沙皇俄国以及他们在近东、亚洲和非洲最危险的敌人形成了防御同盟。威廉二世将“国际政治”作为他的座右

铭，在帝国的太阳下要求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开始建造海军。英国与强大对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第二个便是在非欧洲世界新的危机中心的发展，而那里存在着英国人的巨大利益。沙皇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个新的地区权力）都有很大的诉求：英国人也许会为了他们的份额勇猛战斗。几乎在同一时间，黄金储量丰富的德兰士瓦的兴起打破了南非的权力平衡。这将带来一个可怕的前景：一个独立的寻求法国或德国支持的南非布尔共和国的诞生将会削弱英国对开普的控制权——要知道开普是英国封锁全世界的钥匙之一。德兰士瓦的总统、老斗士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于1899年10月先发制人地侵略开普和纳塔尔，英国人这才发现自身已经陷入战争。当他们遭遇了一系列早期的失败，就像入侵北京的外国军队警告中国的被瓜分迫在眉睫那样，伦敦的反应趋向于恐慌。对于克留格尔最亲密的顾问而言他们的难题是很明显的。扬·史末资1899年写道，大英帝国是“对立民族（开普殖民地、印度、埃及等等）居住的大国，在混乱或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军事组织。大英帝国的主权的施加……更多在于其威望和道德恐吓，而不是真正的军事实力”。

史末资过于乐观。当发现英国与法国和沙皇俄国在近东和东亚有冲突的隐患，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出现了拖延时，这严重刺激了英国人。“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力量，可以强大到击败法国和沙皇俄国，”海军部的第一位大臣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1903年1月说道，“还可以对抗德国。”到1905年，英国在海军上的花费比1899年高出50%。英国人开始了海军竞赛，首先是超过了沙皇俄国和法国，在1908年以后，英国的海军力量已能够对抗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对一些急不可耐的帝国主义者而言，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约瑟夫·张伯伦希望通过关税改革和终结自由贸易来谋划一个由白人殖民地组成的帝国联邦，这就意味着要为了现在这个“疲惫的巨人”团结它的后代。但是将所有殖民地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将会给英国造成沉重的负担，保守党在两次选举胜利后废弃了它。另一些人赞成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同样也是一种幻想：没有哪一届的英国政府敢在和平时期这样做。还有一些人催促与德国建立同盟来对抗法俄同盟。但是这样做的外交代价过高：英国要以本来就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本土各部来捍卫其保卫哈布斯堡家族摇摇欲坠的统治，这只能成为一个悖论。事实上，英国人是幸运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他们与美国时常紧张的关系大有改善。双方都默许了航海合作关系的优势。西奥多·罗斯福说英国的海上霸权“是世界和平的强大保证”。1905年5月，日本在对马岛破坏沙皇俄国的海上权力之时，英国与日本投机取巧的同盟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回报。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在1904年的英法协约中同样规劝法国解决他们的（主要是）非洲分歧。变弱后的俄国也于1907年加入了协约国，平息了在中亚和波斯的紧张局面。现在就只剩下德国人了。

这里的计算十分复杂。德国人的战略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制止英国人卷入欧洲的战争或者与他们进行对抗。一支强大的战舰从北海出击，它对英国船舶和殖民地的袭击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它会使英国丧失在这片大陆上进行干涉的能力，也许是在一场决定性战争爆发的关键

阶段。相反，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要阻止这种威胁需要做两件必要的事情。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坚持的，帝国最好的防御就是阻止敌人的海军离开围绕着欧洲的海域。不过这种观点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如果英国不能作为欧洲的强权之一来阻止欧洲在地缘政治平衡中危险的转变，那么它也无法拥有避免最大危险的方式：整个欧洲用武力或外交团结起来反抗英国。因此英国人开始了庞大的海军项目，以此获得在“所有战舰”或“无畏战舰”中的绝对领先地位。为了将这个想法带回本土，他们在奥克尼的斯卡帕湾集结了军备，将试图从北海逃往大西洋的德国海军封锁起来。为了保证绝对的胜算，他们赶走了德国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所有的现代战船。在所有封锁世界的钥匙中间，斯卡帕湾是最为宏大的。

这应该是奏效的，就像我们会看到的一样，在很多方面的确如此。不过这还不足以威慑德国人在欧洲获胜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建立在对法国的致命一击上——施里芬计划。所以当隐蔽的巴尔干冲突首先影响到奥地利和俄国，德国和法国紧接着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全面战争时，英国人不可能袖手旁观，尽管他们表面的动机是希望柏林能违背比利时的中立。直到和平时代来临，保卫他们帝国的任务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帝国战争，帝国和平，1914~1935

1914~1918年，英国人在三条战线（欧洲、海上以及中东）作战来保卫他们的帝国，并开始了夺取在太平洋和非洲的德国殖民地的行动。澳大利亚和南非军队分别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和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和印度军队分担了大部分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战斗。西线的战争是为了把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的确是一场阻止欧洲屈服于一个主导权力的战争，这将是对英国世界强权的最大威胁。爆发海上战争的部分原因是英国要使德国的公海舰队停留在自己的港口。没必要上演第二次特拉法尔加海战，尽管将军们希望旧景重现。1916年5月的日德兰海战是一次战术上的对峙，不过英国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德国的舰队回国并且停留下来。不过比起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潜水艇战斗的迅速推进，加上他们货物损失的巨大规模，英国人被迫在海上进行防御，直到1918年年末，这种平衡才被打破。这一改变是因为美国在北大西洋海上权力的增加。第三条战线的战争是最具有帝国属性的。当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0月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时，它的军队给英国的两处利益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苏伊士运河（与奥斯曼巴勒斯坦非常接近）和位于阿巴丹岛靠近巴士拉的庞大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保护这些重要的设施需要的背后，隐藏着不那么容易察觉但是十分迫切的重要动机。在他们的印度帝国，英国人统治着人数超过百万的伊斯兰教教徒，对于他们来说，奥斯曼帝国苏丹王就是哈里发（“信徒的首领”），这些

人都效忠于他。一旦惨败，或是未能迅速获胜，都有可能会刺激伊斯兰教教徒，引发圣战，或者鼓舞还没被征服的帕坦人沿着西北边境挑战英国人的耐心。还有一个复杂性在于他们要依靠印度军队（北印度穆斯林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参与他们的中东战争。

英国人计划（之前总是如此）发动一场最划算的战争。在一支（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援助对抗法国人的小规模远征军、海军封锁、一些殖民活动、大量使用“第四条手臂”（财政和物资供给）的支持下，法国和俄国的军队达到了能承受陆战的冲突的规模。不过这（之前总是如此）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16年7月，德国人的攻击力度迫使一大支志愿军在索姆河战役中被派出。巨大的损失规模导致德国不得不求助于征兵。不过在1917年，除了另一次代价高昂的攻击，西部战线陷入了僵局。在中东战争中，对到达达尼尔海峡的渴望以及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帮助俄国战斗是另一次代价高昂的灾难。尽管俄国军队袭击了来自高加索的土耳其人，而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英国力量进展却相当缓慢（英国人于1917年12月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之后进展便停滞了）。战争持续了三年多之后，他们陷入了漩涡中心。

首先，俄国在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就无法再次投入战争。在接下来的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投降”协议让德国人自如地收回了他们东部战线的军队，以便控制乌克兰及其储量巨大的粮仓，还能派遣军事援助包围黑海，帮助它们的奥斯曼同盟国。德国人得到了两个闪闪发光的奖励：俄国在巴库的巨大的油田，还有伊朗北部及其通往中亚、阿富汗最终到达印度道路的控制权。不过西线的前景堪忧。德国大规模的攻击出现重大突破，可能将法国与英国分隔开来，进而占领海岸沿线，迫使英国人撤退（一场1918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使法国人投降。直到1918年7月，英国人面对的前景依然很不乐观，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也许会退出战争。与此同时，如果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通道被打通，整个中东也许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帝国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战时内阁的战略指挥官米尔纳勋爵于1918年6月对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法国和意大利被打到跪地求饶。”

> 很明显，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亚集团会分别成为欧洲以及亚洲中部和北部的主人，甚至到达日本介入阻拦的程度……很明显，除非世界上其他自由的民族、美国、我们的国家以及自治领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德国霸权之下的中欧集团不仅会控制欧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还有整个世界……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整个英帝国将会暴露在遍布全球的同盟国势力面前，对于帝国大脑和中心的不列颠岛而言，它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他总结道：“现在的战斗是为了南亚，尤其是为了非洲（巴勒斯坦桥头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米尔纳的噩梦渐渐消退。到1918年8月，德国人的精力耗尽。他们的军队开始发生内讧；美国大规模增派援军使胜利成为必然；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很快垮台了。大英帝国对于会被分割成为两半的绝望的担心引起了严重的后遗症：英国人产生了一个执念，即不能让其他力量在中东拥有一席之地，无论什么局势，无论这局势发展到哪一步，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必须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尽管在战后他们被迫要做出让步，且在人力和军事预算上都备感压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也反对英国在这个地区拥有全方位的权力，然而从战略和军事意义上来说，现在他们才是中东的主人，并且决定要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下去。他们开始了帝国的大进军，这种进军恰恰是他们在1914年以前大肆宣扬要放弃的。事实上，1918年的死里逃生，加上新战略和技术的发展，让帝国对中东的掌控更加具有价值。1918年以后，有可能挑战英国海上控制权的最大的两支海军是美国和日本海军。为了使他们的舰队在东西方之间迅速往返，苏伊士运河的地位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另一个因素是空中力量的需要。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开罗已经成为航空活动的中心。它将英国与印度联系起来，并且通过中东的空中走廊很快与澳大利亚联系起来。“波斯湾正在成为，”1935年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写道，“空中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与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进行通信的重要通道。”

不过就像英国的领导者熟知的一样，最重要的是在欧洲发生的一切。如果欧洲失去了平衡，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保卫帝国会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并非是决定性的。1919年6月的和平条约施加给德国的制裁（一支小规模军队，海军的损失，领土的削减和财政赔款）使其成了一股强大且心怀不满的势力。欧洲急缺一个建立新平衡的方式。美国成为和平解决的保证人并加入新国际联盟的希望迅速被参议院打消了。苏俄也不再扮演作为德国扩张的障碍的旧角色。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而言，其他的欧洲国家不是潜在的盟友，而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西方政治家与俄国互相给予彼此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东欧现在拥有一大片弱小的国家。同时，法德之间的对立被未偿清的赔款争端加剧，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大陆战争，英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如果（看上去不是没有可能）两个最大的失败者——苏俄和德国选择结盟的话，这种风险就越高。

这场地缘政治困境的可能出路最终被找到了。在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中，法国和德国解决了争端，他们的边界得到了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标志着德国人对进入欧洲新局面的愿望。于是英国人放松下来。的确，他们的全球地位现在看起来比几十年前更加安全，当然这得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算起。美国海军的雄心壮志似乎基本平息了，同时，美国人答应不会建造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而且美国的海军力量不可避免地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分割开来）。除了有关革命阴谋的那些夸张的传闻，苏联是一支弱小的军事力量，它对英国在中东霸权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德国人被迫接受海军缩减带来的殖民地的丧失。日本现在是第三大海军力量，这个消息甚至令堪培拉和惠灵顿战栗。认为日本会发起与“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冲突的担心被温斯顿·丘吉尔无视了，他当时是英国财政大臣，很明显这是陷入船荒的英国将领们使用的

策略。“我们为什么要与日本有一场战争？”他于1924年问道，“在我一生中我不认为有一丝这样的可能。”在《洛迦诺公约》签署后的世界，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能够拥有手段和欲望去攻击英国的世界帝国，大英帝国的领土比任何时候都要大。还有一个更让人安心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大国愿意或能够威胁到帝国权威，因此英国人能够应对任何民族运动，无论是在印度、埃及或者中国，就如同处理、平息或者镇压一个本地问题那样，处理的方式只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

这种让人愉悦的局面持续了不到10年。1931年，日本差点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东京制造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及其对国际联盟规则的公然违背被遗憾地认为是一起局部偶发事件，对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的影响并不大（最初看起来是这样）。但到了1933年1月，另一起事件敲响了更大的警钟。柏林新掌权的是一位尖锐的民族主义领导者（人们的确是这样评价希特勒的），他拒绝承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调解，向调整完毕的“帝国防御”机制扔了一个巨大且危险的扳手。事实上，英国人几乎是立刻开始重新考虑战略设想并且计划重新武装。另一场欧洲战争不再难以想象。不过当他们试图在对付日本侵略带来的危险（对两个太平洋自治领尤其如此）和“最终的敌人”——德国之间找到平衡的同时还应对大萧条并实现经济目标，帝国的政策规划者们因此陷入了争吵当中。这是全球帝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哪个威胁会最早到来？哪里的攻击会是最危险的？何种威慑会起作用？在哪里部署它们？这些都是难题。让这些问题变得更棘手的是由革命性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状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只有英国和法国信守着对现有世界秩序及其财富分配的承诺。英国的领导者未能把握激化了欧洲局势的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英国人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希特勒对外交传统以及对他认为的“劣等种族”的无情蔑视。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过去的历史不能提供指导，他们蒙着眼慢慢摸索着，进入了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最后且最坏的危机中。

经过新加坡的路，1936~1945

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来自日本的潜在危机制造了严重的战略困境。将困境变成危机的是意大利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的攻击。伦敦谴责墨索里尼厚颜无耻的征服运动，但是他们拒绝介入可能引发的海军对抗以及可能的损失中。英国的决策在欧洲和非欧洲都带来了极坏的结果。他们没能阻止墨索里尼的扩张战争，而是逼迫他加入他们的主要敌人的三国同盟之中。从1937年开始，英国面临的危险不断积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一场三条战线上相隔千里的可能的战争。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决定将哪一条当成主要战线，然后承担这样做给其他战线带来的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英国第一次面对敌人的三方联合。1779年，他们在奋力镇压北美叛乱者的同时还面临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然而这个例子很难鼓舞人心。比160年前更糟的

是战事涉及的超远距离，短时间内聚集力量来压制他们的对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这也完全不能跟他们1914年以前遇到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他们同样面临着三方结盟的挑战，但他们有俄国和法国这两个事实上的盟友，这两个盟友能在本土通过集结巨大规模的海军来阻止主要危险。直到1937年，他们的处境都非常不利。英国和法国之间彼此十分不信任，尤其是因为伦敦拒绝与法国那些弱小的东欧盟友扯上关系，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不信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如此糟糕的前景之下，难怪内维尔·张伯伦的政策是最可靠的。张伯伦的计划部分源于对可能的防御费用激增会引发财政崩溃的担心，他打算将英国的资源集中在大规模的轰炸力量上来阻止德国的袭击。这一策略的逻辑在于，如果能避免致命一击，德国人就不会发动另一场长期且胜负难定的战争。这就会给缔造和平的外交以及逐渐改善英国海军的状况并制止日本的扩张留出时间。就是这个逻辑使1938年9～10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成了必然。

危机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展现。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就违反了协定条款并且表现出了他要展开德国霸权的野心。英国人连忙通过分发“保证”给波兰、希腊和土耳其来跟上这种变化。他们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希特勒不愿意展开一场长期战争的幻想上：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西线取得突破或者用空中突袭打败英国（两个基本的假设），那么接下来将会是一场僵局。这个想法开始渐渐散播。当希特勒与斯大林于1939年8月在划分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时，他同样可以使用苏联的资源，包括它的石油。战略封锁并不会伤害到他。当战争在9月爆发，早期的发展看上去确实和预期中的僵局相吻合。不过这场“假战争”作为战略假象被揭露了。在1940年5月～6月，英法联军被希特勒的国防军击溃了，随着失败的法国和英国一起被驱逐出欧洲大陆，希特勒成了欧洲的霸主。经过这次毁灭性的战略惨败，危机迅速扩散到了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

意大利和日本带来的威胁现在成了真正的危险。温斯顿·丘吉尔直到1939年3月都认为，除非英国在西部遭遇失败，否则日本不会退缩。受到法国失败的鼓舞，还因为早就卷入对中国前所未有的侵略之中，日本人进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很快这里就成了法西斯侵略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起点。墨索里尼有了胆量试图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并且没过多久德国就紧跟其后。在本土的英国人面临着几乎每小时一次的侵略威胁，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只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因为取得了对法国海岸的控制，希特勒可以开始利用它们给英国套上绞索：他的潜水艇战争可以威胁到英国本土的物资供给和生存。同时，每一份可以出售的资产（主要是以美元支付）都要用来从中立的美国那里购买急需的设备，而在美国只能用现金购买货物。在欧洲（或者任何没有盟友的其他地方），英国人只能回过头来依靠从他们自己的白人自治领以及他们的印度帝国获得的支持来继续战争。他们只能紧张地观察日本突袭的迹象，因为能与之对抗的海军实力不能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区撤离（更别提空中力量）。即使是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侵略也不能给英国带来很多安慰。希特勒早期的成功以及苏联防御带来的混乱似乎很有可能产生另一个让人震惊的胜利。擅长打硬仗的德国国防军会迅速穿过乌克兰

然后包围黑海。在埃及的英国人会从前线和后方撤离。甚至有可能发生比米尔纳1918年梦魇更大的灾难。大英帝国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就有可能垮掉。

一系列的灾难还没有结束。1940年10月，日本正式加入了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联盟。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并没有针对英国做出任何行动：他们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军事实力。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日本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不过随着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加上美国的石油禁令，日本只能被迫采取进攻。1941年12月上旬，他们在袭击珍珠港前数小时就从东西方向登陆并袭击了英属马来。几乎在几天之内，他们通过闪电进攻和空中管制就打破了英国的防御。“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两艘皇家海军最强大的轮船被丘吉尔派去阻止日本的侵略，但也被空袭摧毁了。到1942年1月中旬，日本人占领了马来半岛首府。2月4日，他们到达新加坡外围。2月15日，新加坡投降。由13万人组成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被一支规模不到这个数字一半的日本力量俘虏。3月9日，日本人在英属缅甸首都仰光几乎俘虏了亚历山大将军，但“他全凭运气逃跑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在一片混乱、耻辱和背叛中崩塌了。到5月中旬，在撤退了900英里之后，最后一支英国力量退回了印度。欧洲失败后，亚洲的失败紧随其后。1942年7月，中东看上去似乎也要失败了。随着轴心国的军队前进到开罗，他们草率地计划要遗弃这座城市。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坚持道，如果开罗被弃，第八军团的南非部队应该要撤退到尼罗河。随着中东前线沦陷在即，其指挥官需要做出严肃的选择。要从日本手里拯救印度，英国人也许必须放弃他们巨大的中东基地。“印度对我们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奥金莱克（Auchinleck）将军告诉丘吉尔：“没有中东我们可以控制印度，但是没有印度我们不能控制中东。”

日本对印度的侵略被一股早到的印度洋季风阻拦了，这股风把所有的道路都变成了泥潭，英国人也因此获利。这也许也是因为到1942年中期，日本的闪电扩张也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6月的中途岛战役使美国人重新获得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现在就不存在要把一大支日本舰队送往印度洋的问题了。英国人在印度依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开始集结一支200多万人的志愿军队，正是这支军队让他们在阿萨姆邦坚持下去并最终于1944～1945年之间奋力回到了缅甸和马来亚。同时，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在阿拉曼的胜利（英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减轻了英国在埃及的压力。德国人开始从北非撤退，向北1　500英里处，德国人在苏联南部的推进因斯大林格勒之战后的精疲力竭而终止。德国和日本看起来大势已去，但德国依然负隅顽抗，毫无缴械投降之意。

1945年8月和平来到亚洲之时，英国人收回了他们失去的殖民地，甚至在中东前所未有地彰显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英国是三个胜利大国之一。不过他们在1940～1942年巨大的战略失败（178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给帝国制度带来了4个不可磨灭的伤害，使他们久久无法从中复原。第一个是他们与4个白人自治领特殊关系的终止。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新加坡之战以后，白人自治领不再把英国视为他们的终极盾牌和保

护者，也不再把英国看成帮助他们实现自由的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部转向了美国——尽管它们依旧对美国心存担忧。的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非常希望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个是英国在印度权力的突然终止。在1942年的绝境中，英国人承诺战后让印度独立。1942年8月，为了镇压“退出印度”起义，他们监禁了数千名激进分子。不过他们也因此丢失了对印度政治的控制权，并且在和平到来之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重新施加他们的权威。他们坚持要有一个统一的印度“自治领”，这个自治领在帝国防御中能够起到以前的老作用，作为英国权力在中东和东亚的补充。随着他们的帝国在1946~1947年的骚乱中瓦解，英国人的这些希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从18世纪80年代起，印度这台英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备用发动机永久失灵了。

失败的第三个结果是经济灾难。内维尔·张伯伦的计划是要拖慢德国的侵略，并且通过经济封锁来扼杀希特勒的野心。甚至连代表着美国公司声音的《财富》杂志都认为英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处于上风。凭借其海外收入及其供应商的巨大网络，英国人可以渡过难关，并且不让贸易实力受损。但希特勒的闪电战让这些全部破灭了。所有的战争动员，减价出售资产来购买美国物资以及（在租借法案的规定下）对出口生产的严格限制让英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国，一直到战争结束，英国都极其依赖美国的帮助。战争的经济利润跨越了大西洋。维持一个帝国的存在就意味着本土贫困的持续，以及新的海外剥削。这两条路英国都走了，都是强制实行的，但没有一条走得长远。

第四个结果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当英国人和法国人于1940年6月输掉了欧洲之战时，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希特勒的胜利是如此巨大，使苏联和美国力量完全站到了他的对立面。1945年5月的巨大胜利不属于英国人，而是属于斯大林。没有任何战后的协议来确保欧洲“安全”，相反，欧洲爆发新战争的风险使英国将资源用到了极限，并且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1948年后，美国成了“自由”欧洲的新监护人。在亚洲，英国将失败转化为了胜利，这和欧洲如出一辙。不过他们同样失去了大部分对战后均势的控制权。随着新崛起的日本帝国的崩溃，美国、苏联和中国填补了空白。没有了印度的英国在亚洲不再意味着强权，他们的帝国命令只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才真正有效。

这次巨大的地缘政治改变的全貌过了很久才展现出来。英国人因为他们反对希特勒的英雄式防御和来之不易的复原而振作起来。不过他们曾经赖以建立和保卫一个世界帝国的条件被1940~1942年间的灾难彻底改变了。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制度、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力量平衡在英国失败的时候开始成形。当英国人意识到的时候，帝国的防线只剩下了最后一道。

[1] “flibuster”，最初使用于17世纪的一个名称，原指所有那些在加勒比海领域抢劫西班牙殖民的海盗。1850年，这个名词被用来称呼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和其他一些在美国组织远征队去推翻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人。之后，“flibuster”就用来指无视国际法律、带领远征队去反抗一个外国政府的冒险家。——译者注

第十一章

帝国谢幕

大英帝国结束的过程几经波折。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后又经历了痛苦的复苏期，但英国领导人们仍然不打算放弃帝国。在上一章中提及的1940～1942年英国经历的地缘政治灾难在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后果。殖民地动荡的政局将英国人驱逐出印度和缅甸。为了安抚民族主义领导人及保持“特殊关系”，他们允许了锡兰的独立。但是他们紧紧地抓住了在马来半岛和香港的据点。虽然他们在巴

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不光彩地结束了，但他们又重新决意在阿拉伯中东地区取得绝对统治权，并控制苏伊士运河。他们认为非洲的自治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他们认为在国内建设福利国家不会与在海外重建帝国相抵触；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帝国的期望更胜从前，企盼帝国能给英国的经济繁荣和战略安全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

尽管关于在苏伊士的鲁莽冒险行为观点迥异，然而英国人在1960年之前几乎毫不怀疑强国的价值。帝国在马来半岛、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殖民地镇压叛乱的方法招来了微词，不过也没有掀起多大风浪。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正统观点仍然认为英国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它与帝国和英联邦（而不是欧洲）之间的贸易。西欧各国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弱国，它们不仅无益反而拖了英国复苏的后腿。英国领导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对帝国的想法已经过时。事实上，他们承认有必要扩大代议制政府，为自治制订时间表并且让少数地区立刻独立。渐渐地，他们不再提及“帝国”，而是将“联邦”的含义（1939年前被看作白人自治领组成的俱乐部）改造成了由愿意（希望如此）在世界事务中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英国前殖民地组成的多种族联盟。他们坚持认为殖民统治的结束象征着英国式帝国统治的成功，统治的结束不过是拉开了更平等的新合作关系的序幕。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英国远远不具备充当这个无形帝国的龙头老大的条件。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哈罗德·威尔逊是1957～1970年英国政坛的领军人物，虽然彼此政见有明显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他们俩都认同的：英国必须是世界强国，必须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1968年1月，这个严重的错觉被现实粉碎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它的阴影却萦绕不散。

离开印度

在长达150余年的岁月里，印度是英国的第二中心，也是英国人统治南亚的据点。英国商人就是从印度这个商业基地向中国进军的，而中国的港口也是被从印度派遣的军队撬开的。印度海军（“孟买舰队”）把英国的海上力量延伸到了波斯湾及周边小国。印度劳工和贸易商为英国的东南亚帝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的出口经济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印度商人和小贩是后来发展为英属东非的地区的商业先锋，而印度苦力修建了乌干达铁路，将内地的被保护国与蒙巴萨海岸连接起来——伦敦政府鼓励白种人在肯尼亚务农就是希望这条铁路能赢利。从亚丁（1937年之前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到缅甸，北及阿富汗、中国西藏和尼泊尔，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英印”利益，英国人在西姆拉、加尔各答，后来又在新德里进行监督。的确，在苏伊士以东的地区，更精确的提法不应该是“大英帝国”而是“英印帝国”。

1900年之后及之前都是如此，将英国人拉入了一场浩大中东冲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突出了这一点。随着战争发展到顶点，英国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印度人力。但是在1918年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统治

印度为帝国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殖民国不断增加的要求，再加上宗教复兴和新文化运动，印度的政治变迁迫使英国人做出了让步：让更多印度“代表”参与统治和经营。1920年以后，英国人面临了一个新的政敌：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国大党最初成立于1885年，原本是个绝对忠诚的上流社会压力集团，圣雄甘地把它改造为南亚的群众运动。它组织的联合抵制、休业罢工、示威活动、抗税运动（例如甘地发起“食盐长征”，领导人民去海边自制免税食盐）以及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目的是为了粉碎英国统治的基础，即印度人对英国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国大党的力量不足以将英国人赶出印度，到了1930年，它已经失去了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教徒中少数民族的支持。国大党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愿意与英国人共享权力，另一派（敏锐地）察觉到英国人正在试图通过将印度“联邦化”成自治省份而分裂国大党——这是巧妙的新的“分而治之”。彼时，印度军队和警察仍然效忠于英国人，而且印度还有一支约7万人的英国卫戍部队，所以革命政变只是个疯狂的梦想。然而，国大党拥有守纪律的成员、广大群众的拥戴和甘地的超凡魅力，因而它仍然拥有力量迫使英国做出重大让步。当1935年实施省自治时，国大党期望在其省权基础上攫取中央最高权力，但是没人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是战争爆发前的局势。国大党的政治家们统治着一些人口最多的省份（但是不包括旁遮普和孟加拉）。英国人则在精心筹划着试图将印度变为“联邦自治领”（理论上与享受完全自治的白人自治领地位平等，但实际上英国会设重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可是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印度约有600个土邦，联邦制的实施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国大党眼中的恶魔维持与英国的条约关系，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了让印度保持平静，英国人意图在战争中把自己的作用最小化，1939~1940年的欧洲僵局极好地配合了他们的印度大计。但是1940年6月大战爆发，中东被卷入战局，18个月后，太平洋及东南亚也陷入战乱，这种麻醉方法不再是良策。此时必须尽快征集一支印度大军、创造大规模战时经济，并用“自由之战”来为世界战争开脱。作为用来刺激印度政治生活狂热化的方法，英方采取的这种策略确实很难被改进。

　　国大党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国大党的政治家们提出，英国需要在结构上进一步做出让步来换取他们的帮助。英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全体辞职，这令接替他们位置的英国官员倍感压力。1940~1941年，英国人一直拒绝给予国大党更多中央权力，但1942年日本入侵马来半岛和缅甸使他们面临了极大的新危机。日本入侵印度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日本战舰已经出现在海岸。团结国大党（以此团结印度人的思想）在此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伦敦派遣政府高级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tafford Cripps，有些人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他很可能是丘吉尔的接班人）率使团去德里谈判。国大党坚持要加强对印度军事行动的掌控力度——这是丘吉尔所不能接受的，谈判因此中止。使团返英，但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了赢得印度人的赞同并给国大党施压，英国人许诺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权。这样一来，伦敦小心翼翼制定的宪法改革计划被永久搁置了。

就算印度保持了平静和秩序，这个迟来的承诺也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大概也会带来相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这片由于世袭等级、宗教和阶级而四分五裂的次大陆，新秩序的来临无疑会被视为是在挑起武装冲突，更何况印度并不是风平浪静。1942年8月，或许是认为日本会进攻印度，又或许是因为与克里普斯使团谈判的失败，甘地和国大党号召广大公民抗命，试图将英国人赶出印度。“退出印度”运动（也称“撤离印度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紧急事件——是自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以来对英国统治的最大威胁。英国人镇压了这场运动（毕竟印度布满了英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国大党成员身陷囹圄，国大党也被禁止活动。这次事件导致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首先，国大党前所未有地坚定了决心，一旦有机会就要彻底摧毁统治机构，而且它对帝国的意图也深表怀疑。第二，国大党被排除出政坛，“穆斯林联盟”有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取得了类似国大党的权力。在战争的后半期，造成群众仇恨和恐惧的因素迅速增长，通货膨胀、食物短缺（1943年孟加拉饥荒导致近200万人民死亡）、为了印度志愿军而招募的超过200万士兵、劳动力往工业中心的迁移，这些都让印度人彼此之间的仇恨越积越深，丝毫不亚于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紧急状态法”在战时压抑了仇恨的爆发，然而随着1945年8月和平的到来，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没有为权力转让扫清道路，反而引爆了火药桶：政党、派系、社团、家族以及个人开始争夺利益或者寻求庇护，武装队伍和自卫团体开始形成，社会和宗教分裂由于仇恨而更加加剧。对于联合省（今北方邦）的伊斯兰教教徒、孟加拉的印度教教徒、旁遮普的印度教和锡克教教徒、地主、贱民[1]、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无技能城市居民来说，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瓦解既让他们害怕也让他们期待。在这个紧张又动荡的环境中，帝国开始谢幕。

伦敦大体上对这些不断升级的、终将瓦解其统治的矛盾全无知觉，它有别的当务之急。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为核心的新一届工党政府决意兑现让印度独立的承诺，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让英国从独立的印度得到更大的好处。如此一来印度将会成为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样的自治领，仍然属于联邦，国王依旧是它的元首，印度人民服从于国王的命令。伦敦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保留原有的印度军队，因为它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对保卫联邦（尤其是在东南亚）都能发挥巨大作用。白厅相信印度的新领导人不会想脱离与西方的关系，而是会继续保持他们与英国的关系。但是和平之后的第一年，伦敦的梦想就破灭了。

在过渡期的第一阶段，首先要进行选举，建立由印度大臣组成的过渡政府。人们很快便发现两个主要党派——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显然不愿通力合作。真纳（Jinnah）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将其从印度分离出去，尽管它的疆界以及它与印度的宪法关系被刻意地模糊化了。1946年英国派出“内阁使团”，试图达成协议保持印度的三层结构，在此协议中印度的省份被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伊斯兰教教徒，另一类主要是印度教教徒，二者在顶层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权力分散的联邦。但是使团未能达成目标。正当政治家们在德里你争我斗的时候，英国在印度的力量开始逐渐外撤。随

着社会与宗教张力增大，维持当地秩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在印度经历了战争的英国官员心力交瘁，归心似箭。在印度的英国士兵也思乡情重，盼望着回归平民生活。更糟糕的是，有迹象表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军事支柱有可能轰然倒塌。1946年年初，皇家印度海军的印度士兵在孟买兵变，比哈尔也发生了警察暴动。有些士兵在战争中叛逃并加入印度国民军与日军作战，政府对这些逃兵的审判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英国人时刻担心兵变会像一颗毒瘤扩散到陆军部队。在总督韦弗尔（Wavell）勋爵看来，到了1946年中期，统治印度的武力显然已经到了它的极限，最多还能勉强支持一年。如果国大党闹事，英国人几乎无能为力：“我对我们能不能镇压得了国大党叛乱表示怀疑。”总督顾问如此评价印度的国内治安。高压统治的工具——英国在印度统治延绵百余年的倚仗终于崩塌了。

现在一个新因素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英国人一直努力让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达成协议以保持印度的统一。到了1946年末，他们改变了原本的计划。内战爆发的迹象与日俱增，此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他们的统治和次大陆被卷入内战之前撤离印度。8月初，仅在加尔各答就有约5000人被杀。首相艾德礼的个人笔记揭示了当时伦敦无比的恐惧感。艾德礼问自己：英国能重新夺回控制权吗？他写道：答案是“显然不能”，因为，他接着解释道：

> 1.考虑到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投入，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游击运动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掌控印度或者再次征服印度；
>
> 2.就算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舆论——尤其是我们党内的舆论也不会支持我们夺回印度；
>
> 3.很难说我们能不能保持印度军队的忠诚度，也很难说我们自己的军队能不能成事；
>
> 4.世界舆论会反对我们……
>
> 5.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印度，我们都没有行政机器实施这样的政策。

但是艾德礼同样很清楚，英国人不可能像韦维尔建议的那样逐省份撤离印度又不引起国内的怒火。艾德礼无可奈何地向熟悉印度的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寻求解决方案。作为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可以全权处理印度事务，他也打算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离开伦敦前，他让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的让步：公开声明英国将在1948年中期结束在印度的统治。

蒙巴顿1947年3月抵达印度的时候仍然坚守着保持一个印度的官方立场，但是他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改变了观点，转而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接受真纳的主张，分裂印度，迫使国大党和尼赫鲁明白任何延迟都会

将印度推向混乱无序。“除非我迅速采取行动，”他在1947年4月的家书中写道，“否则说不定一场真正的内战会在我手里开始。”“我恐怕，”两星期后他写道，“分裂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蒙巴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说服尼赫鲁和国大党的最高领导班子接受他们之前发誓要避免发生的情况。他们勉强接受了，但是与其说是蒙巴顿有说服力，不如说是他们自己认识到如果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发展为战争，作为政治力量的国大党本身也会地位不保。6月底，蒙巴顿兴高采烈地发电报回国：“我们可以把8月15日巴基斯坦的成立看作各方依法做出的决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同意将印度独立从1948年6月提前到1947年8月。分割线很快就定了下来——国界线穿过了旁遮普和孟加拉，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和暴力事件，刻意没有公布出来。

就这样，印度（和巴基斯坦）走到了尼赫鲁口中著名的“与命运的约会”那一天，其后果非常恐怖。分裂远远没有达到平息宗教仇恨的目的，反而带来了抢劫的可能、复仇的机会、对大屠杀的恐惧和对逃离的渴望。它造成了集体疯狂，至少100万人因此死去，超过1 200万人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两个新国家为了争夺克什米尔（注定和印度一样遭受分割）进行了短期战争。英国在印度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给印度留下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仿佛所有人集体失忆了一般，所有的主要政党对其视而不见，反而将这场权力变更讴歌为政治上的胜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许可以理解，毕竟在新国的建设期，需要抚平过去的伤痛、忘却痛苦的失败。而在英国，情况要复杂得多。

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印度人来说，印度独立的方式都是个灾难。印度实现了自治，作为一个自由但统一的整体独立存在，仍旧与过去的统治势力联盟——这是好事；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印度被分裂为两个国家，饱受冲突之苦，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结束的方式深恶痛绝。英国不能再指望印度为联邦的亚洲防卫系统出力，有段时间他们连印度会不会留在英联邦都不确定。作为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立刻暴露了它的脆弱性。然而英国人仍然只记得自己信守了给印度自治的承诺。印度的确没有脱离英联邦，这也造成了权力完美变更的表象。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结束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预示着帝国的立即崩溃，但是它标志着帝国内部凝聚力的破裂以及重要资源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是军事资源，没有这些资源，英帝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统治会迅速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更令人痛苦的或许是，印度的命运告诉人们，如果权力的变更（即多余的政权在严格的监督下退位）可以被视为政治上的胜利，那么它也残酷地告诫着人们在权力变更的时刻，政治上的失败会给人带来多么痛苦的遭遇。在与命运约会时，自由可能在同一刹那得而复失。

衰落的悖论

印度的独立在英国的帝国体系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但是它对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却小得多。实际上，战争结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否定帝国，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帝国意识仍然在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根深蒂固：无论是那些期望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南非的人，还是那些认为自己正在灌木丛中伸张正义的人。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小说（尤其是给年轻人看的流行小说）将英国人描绘为帝国民族：例如在首次出版于1950年的“导人向善”的漫画《雄鹰》中，或者在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G·A·亨蒂（G.A. Henty）的小说（其中有些20世纪60年代再版）中都有所表现。战争的苦难没有削弱英国人的自信，恰恰相反，人们广泛认为最终的胜利证明了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社会凝聚力无可匹敌，也有人把胜利视为（确实有些理由）对英国的科学力量和足智多谋以及工业生产技能的颂词。战争也激起了社会革新意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弗里奇（Beveridge）勋爵在其伟大宣言《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保险的建议，以及《1944年教育法案》提出要为培养人才而构建全国免费中学系统等建议。由于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其他国家的典范，英国人带着复兴了的自信迈入了战后世界。作为议会制政府和现代工业制度的先驱，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事务中仍然会占据中心地位深信不疑，这离坚信英国势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只有一步之遥。对英国来说，帝国既是它的命运也是它的责任。

所以1942年丘吉尔所说的尖锐警言“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绝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算”对战后的政治家们影响深远。至于让印度独立（这是个被反复宣传的历史神话），艾德礼工党政府不仅没有欣然接受，反而忧心忡忡，害怕一旦宣布撤退就会被视作迈出了“大英帝国破产清算的第一步”。任何类似的说法都会被重新措辞，英国人的撤退不能被称为“帝国崩溃的第一步”，而要让人觉得英国是在“自愿将权力移交给民主政府”。所以如果英国人表现得看起来是在“急忙撤退”，后果会是毁灭性的。“我深信，”时任外交大臣、政府的二号人物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告诉艾德礼，“如果你那么做，我们党在这个国家将永无翻身之地……”贝文要求艾德礼在印度问题上坚定立场、重申英国的权威，艾德礼的回答是：为时已晚。当然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印度人民的同情由来已久——他们对帝国不吝于批评。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和道德进步的福音，与开化的殖民地托管统治似乎并不矛盾。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大英帝国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社会改革的责任，使其落入了海外殖民者和国内商业利益的掌控之中。

这种帝国思维习惯并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的，迫切的利己主义不断地给予它强化支持。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人债台高筑。但是有一个经济问题比其他所有问题都更为紧迫：为了重建他们的工业经济，他们必须购买“美元”商品，实际上，当时唯一的物资来源就是美国。可是随着1945年8月《租借法案》的到期，美元供给就此枯竭。更糟糕的是，之后华盛顿政府批准的贷款条款要求英国人尽快放开英镑的自由兑换（意味着英镑与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这使得本来就饱经风霜的英镑雪上加霜，结果是一败涂地。1947年中期，英镑开始实行自由兑换，英镑的价值一落千丈：没人想持有它。得到华盛顿政府的勉强首肯之后，英国

又恢复了外汇管制。在新经济学的鼓吹下，帝国的商业价值一飞冲天。伦敦现在指望它的热带殖民地能挽救它于水火之中。在物资比战争时期还要紧缺的情况下（现在连面包和土豆都是定量供给），英国的热带殖民地能给国内人民带来紧缺的商品：如用于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豆、茶叶、咖啡以及花生制成的人造黄油（黄油现在是奢侈品）。更好的是，英国可以用“疲软的”英镑购买（殖民地供给的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水平）甚至延期支付这些产品。换而言之，这些产品赚取的英镑及对英国产品的购买权被推迟到以后以强制性存款的方式偿付，这样的方式使英国产品得以出口至其他市场赚取珍贵的美元。

殖民地商品还带来了更多利益：可可的出口也能赚取美元。更有价值的是战略物资，例如美国的工业扩张和战后装备改良导致其对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以及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铜产生无止境的需求。这些商品带来的美元收入并没有运回殖民地，而是流往伦敦的“美元总库”，由伦敦政府统一管理。马来半岛的美元收入对于英镑能否从1949年贬值危机中恢复过来意义重大。事实上所有货币与英镑紧密挂钩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被迫接受了英国对于美元的中央管控，并尽量购买用英镑计价的商品。到了1950年，英国对帝国属国的商品出口量创了历史新高。这一切背后的逻辑显而易见。殖民地官员的职责不再仅限于维持秩序和平衡预算，现在他们还要负责提高殖民地经济产量，尽快将他们滞后的经济现代化。殖民国家必须勃然兴起，必须将活力输入更深远的农村地区，商业落后就要受到谴责。殖民地现在拥有新的管理权限，也被鼓励寻找新政治盟友以取代过时的乡下盟友（主要是酋长们）。此时英国不能放松对殖民地资源的掌控：这一点在内阁对待马来半岛共产党起义者的态度中得到了有力体现。同样，守卫中东石油（英国石油消耗量的60%来自于此）和伊朗阿巴丹的大型英属炼油厂也很重要。对于大英帝国的对手来说，英帝国主义似乎并没有衰落，反而更加进取。

并不是只有英国实行了这样的经济殖民主义，所有拥有海外帝国的西欧国家都把自己的殖民地当作国内复兴的工具。但是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迫切的动机维持自己的帝国特权。战争结束时威胁他们安全的主要因素是苏联的向西扩张。波茨坦会议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再加上苏联军事力量的规模以及美国对欧洲防卫系统援助的不确定性，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了：英国和恢复中的法国如何能阻止斯大林进军西欧的脚步？英国人有空军力量——大批轰炸机，但是要进攻苏联的城市却有些鞭长莫及，如果法国机场被进攻的话，英国的空军就更加无法发挥作用了。有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可以从他们在中东的空军基地对苏联在其南部的工业中心发起进攻。这意味着英国要保持在该地的霸权地位，以及保留它的苏伊士运河基地和工厂、商店、营地及训练场——这是个大型军事据点，它的西部边界距离开罗近在咫尺。所以当1946年艾德礼建议撤出中东，在苏联与英属非洲帝国之间退出（用他的话说是“由阿拉伯人和沙漠构成的广阔缓冲区”）时，遭到了贝文和参谋们的激烈反对。贝文说，撤离中东“将重现慕尼黑当年的情形，只不过这次将波及全世界，希腊、土耳其和波斯都会是受害

者……”它会动摇美国对英国恢复能力的信心，也会把印度推向苏联，给自治领造成“难以预计的影响”。如果它与撤离印度同期发生（贝文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1947年1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们是在放弃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此之中蕴含着一个更大的暗示：如果英国人要保持其世界强国的地位（英国毫无疑问是世界强国），他们就必须尽力保留帝国的实体。一旦撤离印度，对中东地区的掌控将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资产。如果放弃中东，不仅不能减轻英国面临的资源困境，反而可能摧毁它残留的世界地位。

英国人坚守了阵地，尽管在埃及和伊拉克纷纷发生了反抗英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坚守了马来半岛，镇压了共产主义起义者，保留了他们在马来半岛的主要基地新加坡——经由苏伊士运河或好望角联通英国与澳大利亚航道的必经之地，毕竟当时总体而言还是个海运时代。在殖民地管理中，英国人也乐于变通：他们通过承诺给予当地更多自治权平息了1948年黄金海岸（今加纳）的暴力示威。尽管1947年8月他们匆忙撤离了印度，英国人仍然心怀希望，盼望能够在贸易和防卫中保持一种特殊的英印关系。他们依然把印度视作军事人力资源储备库。因此当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告诉艾德礼印度将要成为共和国时，艾德礼惊慌失措，因为在当时这被认为是脱离英联邦的行为。艾德礼告诉尼赫鲁：共和国有悖于印度传统。“印度民众真的会支持共和政体吗？……共和主义毕竟是欧洲的舶来品。”尼赫鲁坚持立场，伦敦政府只能焦急地寻找能使共和国与英联邦国身份并存的方法。内阁委员会称：如果让印度脱离英联邦，“将促使它着力创建独立于西方列强的亚洲阵营，甚至可能与西方为敌”。1949年制定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英联邦成员由原来的效忠于英国君主改为承认英国君主为“英联邦王国元首”——这个妥协的结果一直持续至今。

事实上，1945～1951年执政的工党政府不仅没有将英联邦当作一个过时帝国的庄严遗迹，反而决心把它变为加强英国世界势力的新工具。摆脱了从前帝国的独裁、贪婪、剥削传统，现在的英联邦基于自愿、民主和互惠的基础将成员国联系起来。虽然肩膀上压着债务和防卫的千斤重担，但是英国领导人们（或者更抽象地说是英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和命运仍然怀有宏大的愿景。欧内斯特·贝文告诉他的同僚：“应该更加强调建立英联邦防御系统的必要性，它与西方联合防卫组织能够合作构成与美国或苏联势均力敌的阵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1948年3月内阁秘书长写道，“构建强大到足以独立于苏联或美国阵营的西方联合防卫系统并成为其领导者，我们必须尽力使英联邦壮大，并保持我们的中心地位。”英国必须既是欧洲的守护者又是世界强国，这两重身份缺一不可。这个目标基于两个不那么确定的假设，或许是英国人在1914年前形成的观点所致。第一个假设是英国迟早会恢复其1939年前的地位，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投资者和海上霸主，更何况还有近期在原子能和太空的科技成就为其增添助力。由于殖民地生产的食物、原材料和战略物资在这个物资短缺的世界里备受重视，给英帝国提供了额外的优势。第二个假设在贝文的言论中表达得很清楚，那就是英国人不愿屈居于美国之下。一旦他们养精蓄锐、挺过风浪，他们必将重拾往日辉煌，成为

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与新兴的“超级大国”在地位和实力上平起平坐。到那时候他们还拥有广大的帝国领地可以倚仗，大可以与其他两国一较高下。

然而，仅过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便将英国人的希望粉碎成了尘埃。

最后机会

可是在当时看来英国政府的这种想法并不是痴人说梦。1947年是多事之秋，不仅有印度独立的威胁，又赶上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在1947年之后，的确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处境正在好转。一个重要变化是英国与美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虽然有贝文的勇敢言论，但是在确信美国从1948年开始将施以援手帮助西欧抵抗苏联的侵略之后，英国还是松了一大口气。当英国人计划不再当帝国主义者的时候，华盛顿政府不但没有顺水推舟，反而敦促他们（以及法国人）不能放弃，而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只有法国人和英国人才能保护西方利益。英国人称霸阿拉伯中东地区时，美国人默许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在这个时候向英国施压要求他们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走将是个严重的错误。”更没有理由逼迫非洲殖民地进行政治改革。当帝国主义者声称他们的统治将会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适时地给予地方自治权时，华盛顿欣然接受。

冷战遏制政策的实施需要牢牢掌控帝国的版图，这给了帝国新的生机。英国人充当了共产主义的“拦路虎”，故而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取外交支持和物资援助，也可以强调自己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从属者。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对英国人有利。毛泽东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整个朝鲜（与尚不安稳的日本出奇地近）接受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事实让美国不得不大幅扩大在全球的投入，美英之间的友谊因而价值大增。英国人很幸运，他们的帝国大部分领土不会遭受苏联的直接进攻。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早期做出一些警告之外，斯大林居然没有挑战英国在中东的地位，要知道中东是英国人最薄弱的环节。英国主要的希望就是能够以保持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走势以稳定自己的强国优势并牢牢抓住帝国版图（丘吉尔渴望召开“峰会”的目的就在此），以图赢取喘息的时间来实现经济复苏。

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期望也并非过分乐观。凭借国内令人难以忍受的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对出口的极度专注，英国人出口贸易总值从1945年的4亿英镑提高到1951年的25亿英镑，即使是以数量计算（虑及通货膨胀）也比战前增长了75%。英国如此努力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偿还债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本可以带来收益的海外投资在战时不得不被贱卖，英国人必须弥补这部分损失。与此同时，英镑大幅贬值，1949年国

际收支危机进一步让英镑落入谷底：从1英镑可兑换超过4美元跌到只能兑换2.8美元。在上述因素的帮助下，再加上能赚取美元的殖民地产品大受欢迎，英国经济令人欣慰地迅速复苏——尽管我们将看到这次复苏持续的时间极短。

从当时帝国大多数地区的政治格局中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理由相信时间是站在英国这边的。不可否认，印度的剧变和从缅甸的迅速撤离使英国在亚洲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落下了帷幕——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除外。在英属西非的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两地也发生了一些战后骚乱。但是英国人私下将“亚洲人”（当时被称为“亚细亚人”）和其他殖民民族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亚洲人拥有古老的、根深蒂固的高雅文化，强烈的、有组织性的宗教特性，广大的农业人口和无数伟大城市以及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精英，因此亚洲人更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更为仇视外来人口。1945~1948年的帝国危机就是帝国的亚洲危机。1949年亚洲人表现出支持印度的意愿，英国人意识到，如果要让亚洲人与西方人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但是英国人觉得没有理由认为非洲会跟随亚洲的脚步，至少在近几十年里不会如此。非洲没有能与印度国大党、中国国民党、越南独立同盟会或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的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最有势力的非本土宗教是以传教团为中心的基督教。非洲的现代精英人数稀少，而且他们的政治要求相当恭谦有度。在这片大陆上，传统的领导人仍然掌有相当的权力，他们没什么兴趣发起自己控制不了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英国统治在亚洲遭到了被统治民族的激烈反抗，相比之下似乎非洲社会要温顺得多，也好控制得多。由于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背负悠久传统的负担，所以非洲人做出的反应更加积极，在殖民政府的“指导”下发展得更为迅速。

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很是离奇，甚至有些滑稽。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是非洲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欺骗性的断层。在1939年以前，大多数在英国统治下的非洲地区都实行极端的地方分权政策，大部分权力下放到部落属地，“地方当局”（即部落首领）在一名英国地方官员的监督下行使传统权威。非传统政治家没有什么召集拥护者的空间。在殖民地经济陷入萧条的时期，这些管理方式能行得通，政府的主要任务只是平衡紧张的预算。但是1945年之后（如前文所述），英国的首要任务变了。为了把如一潭死水的停滞区变为充满活力的资产，伦敦政府愿意发放信贷和借款，派遣技师和专家，对不经济的农业活动施加严格管控，并制定雄心勃勃的农业发展计划。现在非洲农民不得不（必要时要被强迫）学习如何保护他们的家畜和庄稼不受疾病侵袭、防止土壤被侵蚀。这意味着他们要勤劳地给家畜“洗药浴”、焚烧生病的可可树，还要辛苦地修筑能够阻止雨后水土流失的地形。历史学家们口中的“二次殖民占领”会让农村人口叫苦连天，因为他们难以相信这些繁重的新任务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殖民地主人的利益。尽管他们的产品销路极好，但是他们的收获却几近于零，因为伦敦政府才有定价权，而他们的美元收入也被囤积在伦敦。他们也不太可能欢迎伦敦所鼓励的前往肯尼亚和罗德西亚的新移民潮——这些移民势必霸占更多土地、要求更多劳动力。但是，

除了黄金海岸之外，当时的非洲人民反应沉默。然而，这不过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前夕的宁静。

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有迹象表明，即使大英帝国改头换面也前途有限。朝鲜战争（1950~1953年）是个转折点。一方面，对于陷入困境的美国来说，英国这个盟友更加宝贵了，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决策者决定将“遏制政策”推广到全球范围，他们越发倾向于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埃及）的民族主义者看作对抗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美国人越来越不喜欢已被淘汰的帝国主义朋友，唯恐这会促使民族主义领导者们投入莫斯科阵营。对于英国人来说，朝鲜战争预示着全球性对抗正在不断扩大，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其他负面影响。欧洲内部压力上升，为了保卫联邦德国，英国人被迫派遣陆军长期驻守（这支驻扎在莱茵的军队与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卫戍部队规模一样）。英国人构建英联邦与西欧联盟并领导联盟的希望就这么破裂了（或许这个希望本来就只是个空中楼阁）。随着东西方两大军事阵营对抗的升级，朝鲜使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相信自己可以不支持任何一方。于是就有了1955年万隆会议上宣告的“不结盟运动”。英国人原本希望他们的多种族合作的英联邦能发展为一个亲西方国家的后殖民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显然杜绝了这种可能。这次运动不仅吸引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例如黄金海岸的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也吸引了许多像纳赛尔这样的领导人。而且印度——或者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挑了大梁，这样一来，英国人也不用再指望德里会加入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印英防御体系了。

朝鲜战争也使人意识到英国经济仍然脆弱不堪。战时进口商品的价格飙升，这是造成英国经济困境的一大原因。而且，在华盛顿政府的压力下，艾德礼政府启动了大型军备重整计划，转移了原本用在民用经济和出口贸易上的宝贵人力和资金，其后果很快就在另一场英镑价值危机中体现出来了。尽管后来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1951~1955年）迅速撤销了军备重整计划的绝大部分，但恶果已然铸成。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削减英国的防御经费，因为英国在海外的大批卫戍部队从经济上来说严重阻碍了财富的积累。英国人苦苦挣扎主要是为了通过努力争取贸易顺差让英镑走强，像从前那样成为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英国也能用它作为硬通货储备。1939年以前（1914年前英镑地位更高），这一直是伦敦金融城财富的秘诀，也是英国超强实力的秘诀。但是朝鲜危机暴露出英镑的恢复期很可能会大大延长（这是最好的情况），而且安全边际实际上非常窄。

这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1956年，一枚水雷在一艘战舰船头爆炸，宣告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危机的起因是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民粹主义独裁政权，并将苏伊士运河及其收入收归国有。纳赛尔之所以进行这场（在当时看起来的）危险赌博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撤除了用于建造保障埃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阿斯旺水坝的资金，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怒。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看来，能否逼迫纳赛尔掉转立场并收复苏伊士运河交付给其“合法”所有者英法运河公司是对他本人以及英国声誉的重大考验。华盛顿政府不支持

艾登用武力威胁顽固的纳赛尔，转而采取了一条臭名昭著的策略——与以色列密谋进攻埃及。按计划，首先（英法暗地催促）以色列向埃及发起进攻，然后英法军队打着保护航道的幌子出兵运河区域。只要纳赛尔兵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尽头（甚至更糟）——尽管各方心思不同，但这是伦敦、巴黎和特拉维夫（基于不同原因）都乐于看到的结果。众所周知，这个精密的计划出了严重的纰漏。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没过几天就不得不中止，因为此前被刻意蒙在鼓里的华盛顿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及反对。英国只能颜面扫地地撤军，艾登的健康状况和政治地位都垮了。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眼里，纳赛尔是当时的英雄：民族主义者版的“大卫”宰杀了帝国版的巨人“歌利亚”。[2]

艾登为什么会采取如此风险巨大的冒险行为？从那时开始，有关艾登的动机众说纷纭。就算是在当时，政府内外的评论家都公然指责这是一次不计后果、考虑不周的非法行动：它给英国的声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艾登遭受了华盛顿政府的公开谴责。英国人一直想拉拢的亚非领导人（尤其是尼赫鲁）全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反应激烈。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也表示不赞成。艾登的秘密谋划、对专家意见置若罔闻、多变的情绪和冲动的语言让身边的人心力交瘁。“安东尼，你疯了吗？”据说艾森豪威尔曾在电话里这么问他，可想而知这绝对不是一通愉快的电话。但是艾登在看似疯狂的外表下其实有他自己的考量。

艾登既不是好战分子也不是穷途末路的老派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积极拥护“集体安全”和国联。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他不支持美国向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支持越南的南北分治。同年，他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决定强制执行《苏伊士运河协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了1956年中期所有英国军队撤离运河区域。他的目的是为了终结军事价值有限的这部分兵力投入，并缓和英国与开罗的关系。但是艾登完全没有打算放弃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他有着充分的理由：他和当年的贝文一样，认为中东地区是英国掌握的最有地缘政治价值的资产。这里不仅是苏联扩张的阻碍，还盛产石油，而且英国在此地的最高统治权让伦敦得以要求共同领导西方联盟，抵制在它看来华盛顿政府考虑不周的政策（例如在越南事件上）以及保留英国在世界安稳下来后再次成为独立的世界强国的机会。

纳赛尔的孤注一掷暴露了上述观点的支撑有多么脆弱。艾登对纳赛尔的判断严重有误，纳赛尔远比英国人料想的大胆和雄心勃勃。而且因为怀疑英国人会给他的敌人伊拉克和约旦提供援助，他的处境也显得穷途末路。或许连他也没想到的是英国人既没让他受到国际制裁，也没能夺回运河。等到这一点尘埃落定的时候，轮到艾登走上穷途末路。艾登很清楚英国在当地随意任免政府的权力岌岌可危，纳赛尔的成功“造反”会点燃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如果英国在当地的盟友（尤其是伊朗和约旦的哈桑王族）倒台，那么英国统治权也会跟着终结，英国的世界地位会受到严重影响。艾登拉来的赖以重塑英国在欧洲影响力的资金将很快枯竭。然而他没有忘记英国要重新获得世界领导地位还必须维持它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律的形象。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因而

艾登希望通过勾结以色列绕过这个难题。或许他期望赶紧造成既成事实以平息艾森豪威尔的怒火，毕竟艾森豪威尔也不喜欢纳赛尔。这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在苏伊士所受的屈辱没有促使英国人放弃他们的帝国。他们早已决定让一些殖民地独立：按计划，黄金海岸和马来亚会在1957年独立。苏伊士给英国人的教训（有些没有立刻显现）更为微妙，这些教训表明英国已经丧失了不在华盛顿首肯下独立行动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因为英国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迟迟没有实现。1956年11月，正是英镑疲软让伦敦惊慌失措。英国入侵埃及的消息传来，英镑价值暴跌，白宫声明如果英国不撤军，美国将不会提供任何援助。这个威胁起到了作用。苏伊士运河危机揭示了英国缺乏资源——包括金融实力、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杠杆来维持帝国的影响力，更不要说是在战后中东这个危机四伏的地区了。这次危机还给了人们另外两点认识（或许事后看起来更明显）：第一，它象征着“强国”三分天下时代的结束（如果曾经有过这个时代的话）。同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实际上就是上演了一次成功的“苏伊士运河”行动，这表明华盛顿政府默认了匈牙利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抑制苏联在中东和（不久后）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势力。在这个全新的竞争阶段，西方世界不会再有机会重现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殖民地险情，华盛顿政府与新国家领导人交好的计划也不会再被打乱。第二，一个残酷而清楚的事实是英国已经与意识形态大环境格格不入了。英国人大肆鼓吹自己是自由和进步的拥护者，现在证明这只是个谎言。他们完全得不到进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同情，他们暴露了自己是帝国主义者的心态，并正在企图颠覆《联合国宪章》努力维持的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新世界秩序。此时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在飞速发展，他们渐渐填满了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英国密谋勾结的证据，但英国在他们眼中已经是“头号公敌”，自此以后要以最大的不信任对待英国人。英国的地位一落千丈。

权衡得失

此时的英国领导人仍然在觊觎世界第三强国的地位，就算在物质力量上无法与其他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至少在精神上应该和它们平起平坐。艾登之后的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不像他的主要竞争者R·A·巴特勒，麦克米伦是丘吉尔的门徒。他起先强烈支持苏伊士运河行动。“一定要羞辱纳赛尔……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我们的中东朋友……就会垮台。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毁灭。”在危机逼近时他与艾登的态度如出一辙。当英镑暴跌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要求撤军的，作为财政大臣，他严肃地警告国民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评论家讥讽他“第一个掺和，第一个脱身”。麦克米伦上台后不再纠结于苏伊士问题，而是着手重建英国与美国（艾森豪威尔是他在战争时期的老朋友）以及英联邦

国家的紧密关系，用优雅的风度消除敌意。

和之前的艾登、丘吉尔和贝文一样，麦克米伦坚信英国必须成为三大强国之一。这个信念建立在三个假设上。第一，英国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它的全球关系：与市场、供应商以及需要利用英国金融和运输服务的贸易商的关系。英属企业在共产主义阵营之外无处不在——只有强国地位才能保护这些庞大的帝国资产。要保留和加强英国这个富有活力的经济领域，就必须时常扩大影响力——尤其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时代。第二，麦克米伦与英国主流观点一致，认为美国领导人缺乏经验，也太过鲁莽，不能独自管理西方利益，在全球局势紧张的现阶段，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也绝不能落入莫斯科的斯大林接班人手里。这种对美国领导人满怀优越感的态度与华盛顿在日本和西德取得的胜利形成巨大反差。该观点的真正来源或许是一个衰落帝国对后起之秀的本能憎恶。第三，1957年仍是殖民性质的大英帝国要逐渐转型为自治的英联邦，这需要英国积极地进行运作，麦克米伦预计（他的工党政敌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能够用商誉和影响力获得预期的好处，就可以无限延长这个转型过程。出于上述三个原因，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及（至少在公众场合）展现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对英国无比重要。

事实上，麦克米伦完全不承认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失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相反，他认为世界政局的新阶段为巩固英国作为西方第二大强国的地位提供了良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势力在由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新兴“第三世界”越发如鱼得水。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象征着苏联的强大科技实力，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其高昂的环境代价在当时还没有显现）放射出胜利的光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通往工业化的捷径备受推崇——这一切使得苏联领导人拥有了强大的（或许有点粗野的）领袖魅力。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战或许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麦克米伦看来，英国显然必须在世界各地带头抵制苏联势力，并给支持西方的国家打气——华盛顿政府将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麦克米伦打算通过促使东西方召开有助于缓解冷战紧张气氛的“峰会”（以前丘吉尔也喜欢用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前提是英国（以及他本人）必须到会。

起初，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麦克米伦希望国内的经济改善（他当时的竞选标语是：“你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政府。”）以及国外的外交胜利能给他的保守党政府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从大英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型可以被认为是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的体现，它展现了领导人的超凡眼界，而不是被逼无奈的举措。新国家独立自主，但是用的是英式宪法，对作为英联邦元首的英国君主保持忠诚，这可以被巧妙地表述为英国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帝国使命。怀疑论者和顽固派的反对声音可以通过激起公众的爱国情绪而被掩盖：他们小心翼翼地突出联邦的构想，仅把君主制附带在旁。计划似乎奏效了。1959年10月，麦克米伦在英国大选中高调胜出：他被称为“超级麦克”。但是胜利后不久风向就变了。麦克米伦的计划开始行不通，或许因为它们本来就建立在对英国实力的错

觉而不是现实之上。

麦克米伦计划中的关键是实行峰会外交，只要他在形式上以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身份相等的参会者出现，就能证实英国在超级大国世界里的特权地位。如此一来，麦克米伦就能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能带给他额外的优势：他可以向英联邦的领导人们、殖民地的政治家们以及他的国内批评者们宣告英国仍然是个值得结交的独立强国。但是他期待已久的召开于1960年5月的峰会就是个外交灾难。美国和苏联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U-2侦察机而大吵大闹，尽管麦克米伦竭尽全力平息争吵，但是峰会还是不欢而散。麦克米伦绝望了。据他的私人秘书说，就在这一刻，麦克米伦“突然意识到英国无足轻重”。

祸不单行，1959年帮他赢得了大选的经济复苏在此时恰恰暴露出其脆弱性。增大英国的贸易顺差以使英镑（以及金融城）走强并压制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这一切只是个假象，所有的战后政府都上当了。麦克米伦也上当了。没有繁荣的经济、运输服务、制造业和海外投资的支持，英国的势力将会衰退。赢得经济优势的前景是促使1961年麦克米伦决定英国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谓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原因之一。他想借此让英国重登西欧的领导地位，挽回峰会失败造成的声誉损失。然而在经历了辛苦的谈判并面对了国内他自己党派内部的意见分歧之后，1963年1月戴高乐将军以那句著名的明确的“不”粗暴地拒绝了英国的申请。麦克米伦遭受的羞辱到此终于达到顶点，他的首相之位也不保。戴高乐的一声“不”揭示了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无能为力。戴高乐与联邦德国的联盟（若非如此，他的否决票将是一纸空文）粉碎了英国在欧洲呼风唤雨的美梦，这对英国来说仿佛屋顶塌了一般。

正当这一幕在欧洲上演的时候，非洲正在酝酿一场大危机。英国人原本打算逐步将他们的非洲帝国转变为他们包括波斯湾和南阿拉伯半岛以及连接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印度洋海上走廊这一片巨大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打算在1960年前赋予他们的两个主要西非殖民地独立地位：加纳会在1957年独立，而尼日利亚会在1960年独立。英国人原本认为这两个国家会与伦敦保持密切关系——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没有移民制造麻烦。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英国的计划更加谨慎。在有英国移民的肯尼亚，他们血腥镇压了被称为“茅茅运动”的基库尤人叛乱，造成了大量（基库尤人）伤亡。由于基库尤族是肯尼亚无数部落中最大也是政治上最积极的一个，这么一来想要提高非洲人在殖民地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显然就很困难了。英国真正的计划是在“足够慢地”建立起包括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东非联邦。英国人认为联邦体制能够淡化激发茅茅运动的土地政策的影响，构建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国家，并促进经济发展。中非已经成立了一个联邦，由自治的殖民者统治的南罗德西亚殖民地（今津巴布韦）和北边的两个被保护地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组成。这些成为宪法上的一团乱麻。其他的势力（其中包括两个位于北部的被保护国）的

内部安全仍然由英国人掌控。1953年联邦成立的时候伦敦曾经暗示过，要取得独立主权或者做任何宪法上的变更都必须经过英国政府的许可。伦敦希望它所树立的这个略为自由的范例（种族隔离政策不如南边根深蒂固）可以适当弱化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眼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形象，伦敦毕竟仍然把非洲联盟当成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盟友。

要解决如此多的难题（或怀恨在心的对手）并不容易。到了20世纪5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政局不再是一潭死水。殖民政府的侵略性扩张（包括管制、约束和征兵）以及越来越多的白人农民、矿工、官员、专家的到来使得非洲人民的怨恨不断升级，殖民地统治需要依靠的传统酋长们尤其怒火难平。茅茅运动就是这种仇恨的早期表现。非洲人民越来越害怕殖民入侵会夺走他们更多的土地。英国人为了争取非洲的“温和派”（这类人是殖民政府喜闻乐见的，虽然现实上并不存在）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却发现反抗的呼声更高了，温和派也变成了麻烦派。世界其他地区剧变纷起，要把非洲政治与这股思想浪潮隔绝开来越来越困难——毕竟它承诺了要让非洲脱离外来势力的统治，也不能轻易把新冒出头的民族主义发言人拘禁或流放，因为此类举动很可能引起国外的震怒和国内的不安。然而就在他们被暴风骤雨赶出非洲的前夕，他们仍然难以置信地自信，认为政治变迁的步调依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可惜它几乎完全是判断失误的。

这个错误的判断源于两个（错误的）考虑。首先是因为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乡野之地，英国人认为很难要求马上独立的非洲领导人们（通常被称为“极端分子”）在那些偏远地区集结支持者。他们认为农村人不会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不像容易激动的城里人），而乡村精英们则会感恩戴德地接受殖民政府施舍的权力让步。因此在殖民时期的权力下放举措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英国人在这里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略了农村人对他们的仇恨之深，要不就是误以为农业发展计划会消除这些仇恨。在众多农业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斯温纳顿计划”，它意图在肯尼亚创造出一个非洲的“自耕农”阶层——被满足了的、安于现状的土地所有者必然仇视造反派和温和派。没想到的是，农村非但没有对民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反而成为民族主义的潜在资源库。第二种盘算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英国人认为他们虚有其表的殖民地政府有能力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骚乱：可以把太过嚣张或者有可能引起动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关进监狱，再出动警力和零散的殖民地军队驱散他们的支持者。在茅茅运动时期，这可能未必是错觉，但是英国人依靠基库尤族忠于英国的那部分人镇压了茅茅运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部落参与这次叛乱。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似乎不存在茅茅运动的条件：严重的土地压力、积极的政治领袖[例如被以共谋罪关入狱中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便于游击作战的森林覆盖的腹地。只要是殖民地政府独占武装力量统治手无寸铁的百姓，那些被宣判为极端分子的人就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让步或者身陷囹圄。

从1959年初开始，上述这些“确定无疑的事”被迅速推翻。官员和大臣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尽管表面上他们装得若无其事。3月，危机显

现。变故发生在尼亚萨兰[3]这个贫困的保护地被伦敦强行加入北罗德西亚和南罗德西亚的中非联邦计划（在这两个地区白种人口要多得多）。这个时机并非偶然。伦敦早已公告天下会在1960年决定中非的去向，并决定是否赋予联邦全面独立自主权。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伦敦的最终决断会是“赋予”——但这是有条件的，要确保该地的占人口少数的白种人能掌握控制权。在白人统治下的独立必然意味着土地会按白种移民的意愿重新分配（南罗德西亚已经践行了），原本由黑种人担任的公职也会被白种人代替。因此，当1958年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被释放回国（他先后被囚禁于苏格兰和加纳）带领非洲人争取更多权利时，政治气氛迅速升温。班达发动了近两万人，他猛烈抨击政府的农业规定，号召支持他的民众勇敢争取自由、反抗联邦。尼亚萨兰总督罗伯特·阿米蒂奇（Robert Armitage）爵士坚信班达的意图是为了破坏这块保护地的统治，但他左右为难。伦敦的政策（也就是他的责任）仍旧是支持联邦。他也明白，要使联邦的独立让人无可挑剔（尤其是在国际上）就必须给予尼亚萨兰的非洲人更多政治话语权以及更高的自治权。然而班达造成的影响明显说明非洲人一旦拥有话语权只意味着一件事：中非联邦所代表的一切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

后来发生的事很有戏剧性。随着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尼亚萨兰即将爆发动乱，加之不安分的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在一旁施加压力，尼亚萨兰政府决定阻止班达的活动。1959年3月3日，阿米蒂奇宣布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班达被逮捕，并被押往南罗德西亚的监狱；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被作为非法组织取缔，100多名激进会员被扣押；警方和军方在全国四处搜捕“激进分子”名单上的成员。民众反应激烈，或许是出于自卫，群众聚集在一起。暴乱和示威频起，50多名非洲人身亡，其中单在恩卡塔湾的一次事件中就有20人殒命。规模如此之大的暴力事件自然引来了调查，尽管如此，尼亚萨兰政府及其在伦敦的领导一点儿也不担心。阿米蒂奇声称掌握了班达及其同党计划谋杀白种人、亚洲人和非洲温和派的证据，之所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为了及时阻止茅茅运动再现。最好是这次调查可以揭发班达及其友人是危险的极端分子，必须阻止他们破坏联邦的进程。但是事情并没有像尼亚萨兰政府预想的那样发展。

这次调查由最高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Patrick Devlin）爵士主持，他反而对尼亚萨兰政府提出了控诉。调查结果先是指出所谓的“谋杀阴谋”子虚乌有，进而谴责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集权国家”才会动用的（这勾起了人们对不久前欧洲经历的苦难的回忆），并严厉地指出绝大多数尼亚萨兰非洲人民强烈反对加入联邦。对麦克米伦和他的政府官员们以及阿米蒂奇及殖民地白人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个灭顶之灾。“由此事可见，”麦克米伦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德夫林是个爱尔兰人——他骨子里淌着的芬尼亚人[4]的血，这决定了他的反政府倾向；他还是个堕落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德夫林的调查报告于1959年7月面世，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破坏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并挺过了一场议会辩论。但是尤其对麦克米伦来说，尼亚萨兰危机传达了非洲人民对殖民者不可调和的

仇恨。从此以后没有哪届英国政府会再去对抗非洲民众运动，因为无论预想的收获有多大，都不可能比英国可能遭受的耻辱重要。伦敦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能操纵的非洲代表，才能把更多权利交到他们手上。1960年初，麦克米伦充满热情地给南非议会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这标志着他的非洲之旅的高潮。这次演讲的听众全部都是白种人，麦克米伦告诫他们："变革之风正在拂过这片大陆，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民族意识的上升已经是个政治事实……"他接着重提他最关心的话题："在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独立的亚非民族会投入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至少在南非，他的这番话被当成了耳边风，6个星期后就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

有这么一种传言称从1959年10月开始，麦克米伦和他任命的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决定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英国在非洲的统治，将权力移交给非洲民族主义者，正是他们坚定的自由主义让英国避开了灾难。这个传言主要源自麦克劳德自己的杜撰。事实上这两个人都紧紧地抓住手中的牌守口如瓶（麦克劳德确实也是个职业桥牌玩家），当然这不无道理。他们俩并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也都对迅速的权力过渡有着深深的疑虑。麦克米伦在中非联邦的问题上含糊其辞，他们的主要构想是通过说服白种殖民者和非洲民族主义者接受权力进一步下放的联邦形式以保留中非联邦，可惜两边都不同意。虽然有德夫林的调查报告，麦克劳德仍然不愿就此放弃尼亚萨兰——因为北罗德西亚的非洲领导人也会要求脱离联邦，这样一来中非联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当麦克罗德与海斯廷斯·班达见面时，麦克罗德不仅没有向班达表示称赞，反而把他当"极度虚荣无知的人"打发走了。虽然如此，麦克罗德希望能把班达与他的"极端分子"朋友分开，并通过做出一些明智的让步让班达支持中非联邦。这是一个荒唐（但有启迪意义）的错误判断。英国人既想安抚非洲领导人，又担心控制了地区所有军事力量的白种人会干脆攫取独立权——用白厅的官方话语来说就是："扮演参孙[5]的角色。"麦克米伦不愿为中非联邦的瓦解背负骂名，不愿激起党派右翼的后座议员反叛。结果导致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纷纷夭折的政治干预，却没有制定任何确定的计划。到了1962年初，很明显英国人已经在当地失去了掌控权，也不打算重新夺回统治权。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英国人既无法阻止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非洲民族主义党派上台掌权，也无法免除南罗德西亚的移民掌握的控制权。英国被迫于1963年解散中非联邦、分割联邦资产，他们只留下了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作为英国重要想的标志），而这个硕果仅存的地盘还随时可能单边宣布独立——这无疑显现了英国此时的无能为力。

从麦克米伦发表"变革之风"演讲到中非联邦解体，非洲局势已经大变。其中一个迹象便是戴高乐于1960年突然允许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这让英国人尴尬不已。更重大的是"刚果危机"的爆发。1960年1月，大概是为了安全地设立附庸政权，比利时人仓促允许了广大非洲殖民地独立，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巨变。盛产铜矿的加丹加省旋即在比利时矿产业的公开支持下宣布脱离刚果，中央政权在其他地区也控制不了局势了。在比利时（或许还有美国）的共谋下，总理帕特

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绑架杀害。与此同时，刚果军队（或称治安队）军事叛乱，杀死了几十个白种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无数白人难民南下，途经白人统治的中非联邦前往南非港口回国避难。随着刚果分裂成相互争斗的数个辖地（就像麦克米伦警告的一样），苏联开始拉拢非洲民族主义者，谴责西方国家的阴谋，将刚果遭受的厄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贪婪。

刚果经历的漫长恐怖时期一直牵动着英国人的心，他们更加厌恶使他们泥足深陷的非洲冲突。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于1960年11月记录道："首相和殖民地大臣说他们不想要个阿尔及利亚那样的烂摊子。"刚果则更糟糕，因为它更加靠近英国在中非和东非的遗留领地。在殖民地独立前的日子里，英国人度日如年，越来越害怕莫斯科会对非洲国家产生更大的诱惑力，于是刚果的邻国坦噶尼喀和乌干达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仓促独立。同样的影响在另一个例子中可见一斑：肯尼亚殖民地。

茅茅运动结束后，英国人急于设计一个政权制度以便集合忠诚于英国的非洲人并消除他们对白人移民的主要愤恨。英国人已经开始谨慎地均衡白种人、亚洲人（肯尼亚另一个人数众多的移民民族）和非洲人的政治代表。同时，英国人担心对茅茅运动的妖魔化和被广泛宣传的白种人面临的危险会导致移民背叛英国，麦克劳德提出了一个极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由移民温和派组成的团体——"新肯尼亚团"，麦克劳德的亲兄弟是这个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麦克劳德抓住了这个机会，1960年1月，他在伦敦圣詹姆斯区的兰开斯特宫召集会议。在会上虽然没有具体制定独立时间，但是确定了殖民地的命运将会掌握在非洲人手中。麦克劳德的真正意图是联合新肯尼亚团和非洲温和派——即由非基库尤团体组成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简称KADU），他投出的诱饵是许诺把统治权逐渐转交给以非洲人为主导的肯尼亚政府，该政府将有途径（并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之下）争取民心并控制激进分子。1961年4月，麦克劳德在肯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后给总督致信："很高兴收到你传来的好消息，得知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为主导的政府正在逐渐赢得支持，我非常欣慰。如果这次能成功，它将与我们在兰开斯特宫商定的组织构想完全一致。"麦克劳德丝毫不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告诉总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非常欢迎主要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和新肯尼亚党为基础的肯尼亚政府，我也很乐意看到我们有机会遥遥领先于肯雅塔。"肯雅塔——总督雷尼森（Renison）口中那个"领导非洲走向黑暗和死亡的人"，将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肯尼亚走向未来（他此时仍被囚禁）。

麦克劳德不过是在痴心妄想。很快人们就发现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凝聚力与由基库尤人和卢奥人共建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KANU）竞争。为了赢得更多支持，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不得不恳求伦敦释放肯雅塔，结果肯雅塔一被释放就出任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伦敦政府坐立不安，抱着一线希望想重提（当时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的）东非联邦，把肯尼亚纳入其中，或者把肯尼亚非洲民族

联盟从内部分裂——总之除了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外的一切方法都行。决定伦敦政策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对新一轮对抗的恐惧。据《泰晤士报》报道，肯尼亚关押了8万名前茅茅运动成员。到了1962年初，大局基本已定。新的制宪会议即将召开，接替麦克劳德担任殖民地大臣的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粉碎了英国人残留的非洲统治幻想。他警告内阁同僚说："我们最多能期望把权力有序地交接给一个真心诚意想把肯尼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非洲人政府，期望肯尼亚能避免动乱、内战或倒退到部落制。"让肯尼亚支持西方阵营（到此时）已经成了奢望，顶多能希望它会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说服反对者，麦德宁点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恐惧："茅茅运动的威胁、原先被囚禁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成员以及持续的个人暴行笼罩在一切之上。"这是个转折点。虽然肯雅塔花了好几个月才与少数民族部落达成协议，但是实权已经落入了他手中。1963年12月，在这个三年前人们不敢想象的环境下，肯尼亚独立了，由肯雅塔担任总统。

非洲的动态并不在英国计划当中。在表面上，在英国人撤离非洲那一刻以前，权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原本期望通过逐步让渡政治权利保持他们的势力，而这个期望逐渐落空。英国人看好的非洲温和派领导人没有办法只依靠一半权力维持统治：如果要赢得民心并击退政敌，他们需要全部的权力。当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武力时，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底牌可用于对抗顽固的敌人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相当有技巧地掩饰了自己的无力，也很巧妙地设计出了让自己得以和平撤离的机制。只不过这并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功劳。那些意图接管英方权力的人很清楚自己的统治基础薄弱、掌控权并不完全，因此，贸然动手搞垮英国统治的国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要的是在一切照常运作的前提下取得掌控权，符合宪法上的合法性以及象征性地接管殖民地政权才更加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所以当非殖民化成为大势所趋、独立时间也已经敲定时，他们心甘情愿地摆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感谢英国"送给"他们独立。这样一来，权力的过渡成为和平而庄严的事件，辅以皇家威严。大家心照不宣地上演了一出皆大欢喜的哑剧。

1945年后英国世界地位的巨大改变也影响了英国与老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1939年之前，4个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把英国当作自己利益和安全的守护神，唯英国马首是瞻（当然热情程度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如此，它们与英国之间隔着一个亚洲，作为白人英属国家，它们深感自己的孤立无援，因此对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几乎珍视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然而在南非，白人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是布尔人的后裔，他们则更倾向于脱离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加拿大，英国人占大多数，要保证国内稳定就需要小心地安抚法裔加拿大人对帝国的敌意。尽管如此，在战争爆发时所有自治领都站在了英国这边（南非议会以弱票通过支持英国的建议）。

1940～1942年间，英国在战略上的失败标志了一个重大转变：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反而不在其中）发现了自己对美国势力的

战略依赖性。自1926年以来，它们获得的理论上的主权国地位在此时变得越来越实际，特别是加拿大已经发展为拥有极强军事力量的一大工业国，它的海军对北大西洋海上通路争夺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相对下降（无论是以战略标准还是以经济标准来看）导致了它与自治领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在当时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战后作为“英镑国家”被绑入了伦敦的美元存储计划，这三处都是英国制造业的重要市场。而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联结越来越紧密，在此时已经是个“美元国家”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战后英国移民潮的主要目的地，这三个国家也都仍然承认英国君主是它们的元首。去南非的英国移民不多，但是南非也承认英国君主的领导地位——虽然1948年南非国民党赢得南非联邦大选，开始单独执政。冷战带来的不安以及英国投资的重要性（尤其在金矿上的投入）暂时比共和国孤军奋战要有吸引力——他们仍打着旧时德兰士瓦的Vierkleur旗就是证明。

直到1960年，尽管有战争及其余波的影响，南非的种族政治也导致暗流涌动，但是英国人仍可能相信南非会与旧的英联邦维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是英国重夺世界强国地位的关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对英国高调表示忠心。从某种观点来看，澳大利亚当时与英国的关系比以前还要紧密，这是因为伦敦正在南澳大利亚的伍默拉镇开发和测试英国的核威慑，堪培拉是伦敦的重要伙伴。然而到了1970年，旧英联邦的聚合力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减弱了。最大的变故就是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让麦克米伦大为懊恼的是，南非的脱离实际上是因为英联邦的亚非成员国的坚持。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正在润物细无声地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加拿大人原本强调的英国属性随着“国旗之争”而消散无踪——枫叶旗取代了原来的英国商船旗，而且没有在左上角加上英国国旗。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甚至一度考虑过让加拿大成为共和国。英国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举动震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终结了它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会继续在经济和文化上紧跟英国脚步的想法。1960年，英国为发展本国核导弹的“蓝光”弹道导弹计划失败，1968年又宣布撤离东南亚，英澳“联盟”逐渐破裂。接下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多种族身份（而不是英国身份），越来越认为亚洲——而不是英国，掌握了它们未来的关键。

最后的挣扎

1945~1964年，英国领导人的希望和抱负在冷战竞争和英国的经济困境中摇摆不定。偶尔出现成功的希望（例如麦克米伦的“大计划”），但是随后就被危机和失败以及纳赛尔和戴高乐带来的耻辱粉碎。到了1964年，英国的情绪更加低落了。1964年在大选（和保守党结束执政）不久前，外交大臣R·A·巴特勒冷冰冰地总结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

系："作为实力远逊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看来，美国对我们海外政策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只是有用的，有时是有价值的。"麦克米伦曾经坚持要实现的英美互为支撑的梦想就此破灭。与此同时，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以疯狂的速度给予殖民地独立主权，直到领地中最小、最穷的地区也独立成新兴国家为止。1961~1966年，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西萨摩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马耳他、新加坡、冈比亚、马尔代夫、圭亚那、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巴巴多斯纷纷独立。至于还没有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在刻意拖延，而主要是因为当地政治团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来不及制定立国基本的相关制度。英国人似乎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结束帝国。

故事还没完。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了。担任首相的是艾德礼内阁的老臣——哈罗德·威尔逊。上任前，威尔逊对守旧的保守党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坚称，正是这种态度阻碍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时媒体和社会各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声讨政府（当时的"讽刺运动大爆炸"就是一个表现），舆论认为与帝国相关的陈腐观点和等级态度以及领导人对帝国复兴的幻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无法建立精英统治的元凶。威尔逊的言论无疑与舆论潮流合拍。威尔逊宣称，必须"趁着科技革命白热化"构建一个新英国。但是当他正式就职后，他的这些激进观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很快，威尔逊就开始热情澎湃地谈论英国的世界地位。毕竟，贝文在工党的工会支持者（或许还有许多工人阶级选民）中影响巨大，而他的思想主要是重现英国的"伟大地位"，况且英国的英雄代表温斯顿·丘吉尔尚在世（丘吉尔于1965年1月辞世）。威尔逊也（在更严峻的形势下）继承了麦克米伦的衣钵：相信在西方阵营中，英国至少应该是美国的左膀右臂。维持这个地位成了英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的首要任务。

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是这个观点的中心，它具体表现在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军事投入。英国人在从东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包括波斯湾和前英属马来亚和加里曼丹岛（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广阔海域充当了西方利益的守卫者以及友好国家的保护者。在势力壮大一些后，英国人又重提要守护印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1965年6月哈罗德·威尔逊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暗示会在印度与中国的冲突中支持印度。英国的真正军事负担在于保卫脆弱的南阿拉伯联邦——亚丁的军事基地也被纳入了该联邦，以及保卫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尤其是它的加里曼丹岛领地）对印度尼西亚企图统治整个马来亚的抵抗。苏伊士以东地区也是加强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一个筹码，毕竟澳大利亚仍然是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依旧是英国移民的首选地。但是成本在不断增加。要在这片广大海域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意味着英国人不仅需要海上力量还需要空中力量：要新航空母舰和飞机，还要可以部署这些武器的基地。然而掌权不过几周，工党政府就面临了新一轮的英镑危机，需要大幅削减海外开支。1965年6月，就在威尔逊踌躇满志地指点喜马拉雅山脉的江山时，他的内阁决定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结束，英国就应该立刻离开它的新加坡基地，只在中东小规模地保留军事存在。在美国的强硬施压之

下（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是此时威尔逊及其同僚已经进退维谷。他们急于阻止国内高失业率的爆发，也就是说此时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及提高贸易顺差；他们更加急于控制英镑贬值趋势（当时巨大的贸易逆差威胁着英镑的价值）以体现英国保持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决心。如果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后果将不可预计，当时的主要官员（包括威尔逊本人）全都害怕会被这个“仕途的绊脚石”（一位内阁评论家戏谑的说法）绊倒。威尔逊在1966年6月对一群工党后座议员说：“他绝不能否定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但是总要有人让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一面要考虑偿付能力，一面要维持国家声誉，因而伦敦的政策摇摆不定。1966年春，伦敦宣布英国军队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守一段时间。差不多整整一年后，伦敦决定将军队分为两批撤走，一批于1970~1971年，剩下的于1975~1976年撤离。1976年下半年，在与敌对派系的城市游击队对抗了许久未果之后，英国人撤离了亚丁：南阿拉伯联邦只能听天由命了。同时，一位英国官员被派去波斯湾向那里的领导人们保证无论亚丁形势如何，英国人都会驻守波斯湾。这种折中方案并没有持续多久。11月初，英镑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1月18日，或许是因为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察会让英国丢脸，威尔逊及其同僚只能放弃漫长的抵抗，吞下这剂苦药。英镑贬值15%，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新财政大臣走马上任——这就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出场。詹金斯是个积极拥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谓欧洲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英国在后殖民时代的军事行动，认为那“纯属多余”。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这次战场在白厅。在詹金斯看来，经济复苏需要在国内大幅削减开支，这样一来当然引起了后座议员们的不满，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后座议员的敌意，那么政府必须得做个象征性的牺牲。于是詹金斯挺身而起，不顾激烈的反对强行做了在1971年前终止英国在波斯湾和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决定。1968年1月，威尔逊宣布英国将于1971年底以前撤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英国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一大亚洲势力，威尔逊的演讲给它的这个身份画上了句号。英国在战后为了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而付出的努力也在这一天彻底付诸东流。三年后，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成功的谈判终于为英国赢得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门票。新政府欢欣鼓舞地宣告英国的归宿是欧洲，这无疑抛弃了过时的英联邦——那个模糊的影子帝国。它冰冷地宣称：“英联邦成员国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在政治观念和经济发展上差异巨大……它们与联合王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仍然在不断变化。”这其实就是在说“再见”了。

但是故事仍然没有结束。有些殖民属地仍然存在，它们就像八爪鱼一样死死地扒着帝国不放手。有几个殖民属地是因为太小太穷，英国无法逼迫它们独立；其他的（例如直布罗陀）则是不愿意被伦敦如此直白地踢开。其中三个给英国政府造成了无尽的烦恼：第一个是罗德西亚，从宪法上说，伦敦仍然对它负责——尽管非常不情愿。1965年11月之后，白人殖民政权宣告独立。伦敦政府做出了三次努力希望与其达成协议：伦敦赋予它合法独立，它却让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参政。但是三

次都没能成功。在此期间，这里的非洲政府对伦敦极尽嘲讽，而英国也对它们的政局极力地讽刺挖苦。当1974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统治崩溃，罗德西亚人无法再抵挡游击队的进攻，他们的南非支持者们也慌了神，此时转折点才到来。反叛政府主要受到美国和南非的压力，英国人在这场变故中仅仅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由于只有英国人才有权从宪法上宣布该地独立，于是伦敦成了签订独立协议的舞台，而英国和英联邦国的军队将游击军队控制在被监管的营地以确保双方停战。伦敦习惯了对非洲政治掌握控制权，所以这次白厅期望接下来的大选会把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不那么温和的派系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踢出局。让白厅放下心来的是穆加贝获得胜利后信守了承诺，没有没收白人农民的土地。伦敦的希望到后来才幻灭。

1982年，在另一块帝国遗地——远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另一场更惊险的危机。伦敦同样早就想甩掉这个麻烦的包袱，但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们（从人种上来说是英国人）拒绝接受白厅把他们逐步变为阿根廷国民的官方计划——按计划英国会把群岛割让给阿根廷，再把它们租回来。可以理解，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对官僚主义的信誉有所怀疑，再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的法西斯行为和伦敦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他们更加不愿被并入阿根廷。但当1982年谈判破裂、阿根廷人入侵殖民地时，英国人陷入了两难之地。英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压力迫使阿根廷撤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英国非常遥远，要跨越这么大的距离打反侵略战，从后勤上来说就是个大难题——而灾难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可是如果就此接受既成事实，英国的声誉又会遭受重大损失——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敌人在地处偏远的殖民地对英国主权发起挑战时，英国政府已经退缩了太多次了。但事实上这次事件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海军首席顾问的积极支持下立刻派遣了一支特遣舰队。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她得到了工党的热烈支持。撒切尔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巧妙：英国打出的口号不是“捍卫领土”，而是维护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民族自决权。几周后，外交交涉失败，于是英国人（并不是没有损失和伤亡）退回了岛上，迅速击败了岛上缺少有效指挥的驻军。英国大胜，在帝国节节败退了几十年之后，英国人终于重拾了自信。但是其实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非常走运，他们能看到华盛顿搜集的情报（或许是为了奖励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达成的密切共识），除了人和，还有地利——马尔维纳斯群岛刚好地处阿根廷空军力量覆盖范围的最边沿。阿根廷的战机到达群岛后只能再坚持几分钟飞行时间，英军主力舰队又恰好停在范围之外，阿根廷强大的空中力量实在力有不逮，但也只能称得上险胜。

反思

通常历史学家对英国斩钉截铁地结束大英帝国的决定颇为赞赏，常

常用它来反衬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肮脏的”战争。一个广为流传的（许多政治回忆录都深表认同的）说法是英国人善于践行“有管控的下降”——他们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实际地调整了他们的帝国野心。如前文所述，很显然英国人极度不情愿对抗群众性政治运动（无论是在1945年后的印度还是在1959年后的非洲），但是他们在更有机会、动机更强的时候却没有不情愿动用武力：例如在马来亚、塞浦路斯和肯尼亚。正如本章所述，英国领导人并没有根据英国实力的降低和经济潜力的下降而迅速调整他们对于英国世界地位的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坚信英国仍然是世界霸主——被认作实用主义忠实信徒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为保持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而制定的宏伟计划暴露了他对欧洲政治的认识不足，也显示出他完全没有理解非洲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并不是在嘲笑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因为英国的战后地位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思维的定式也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要当时的决策人理智地判定英国的衰落显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在本章中我们回顾的一系列“错误判断”：例如对印度的错误希望、对非洲的错误预期、认为英国是第三大世界强国的观点、建立在英镑复苏基础上的经济大计、保住中东统治权的努力（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真正原因）、建立不朽而花费不多的世界地位的美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错误判断向我们展示了比后见之明更有趣的事实。它们证明了预测历史变迁是一件危险的事：其中牵涉了太多的因素，在破译正确信号的时候又有太多干扰。它们尤其提醒我们帝国衰落的速度不可预测，帝国衰落的过程更不可预知。例如奥斯曼帝国，它在17世纪中期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人们通常轻蔑地称它为“欧洲病夫”，但是它直到1918年在与两大世界强国进行了艰苦军事斗争之后才解体。另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苏联在突然崩塌的近十年前还被认为是一个攻不破的国家，在“越战”后打击美国信心的那些因素对苏联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它的突然衰落震惊了世界。因此英国领导人没有正确预测英国的未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后一个可能打动我们的观点就是，解释帝国为什么会衰败并不比预测它们的衰败来得简单。或许造成帝国衰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战场上的失利——尽管那意味着要解释为什么会战败。通常帝国衰败的原因有四类：与外国的战争失利或者地缘政治弱势、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合法地位的丧失、帝国中心的内部衰弱——丧失政治意愿或经济实力以及殖民地起义。虽然有时把其中一个原因当作决定性因素很有吸引力（所以民族主义者往往喜欢说是殖民地起义的影响造成了帝国解体），但是这极少能具有说服力——尤其对于像大英帝国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帝国的瓦解看作一个物理性破裂的过程——在一个部分的失误会对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造成无法忍受的应变；为了应对应变，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应力，直至整个系统被分裂或者被更强大的后起之秀逐渐吞噬。本书的论点就是，就英国来说，1939~1942年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失利已经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从那以后，他们系统的整体平衡便被彻底打破，英国的合法地位被损害，与其附庸和臣民的合

作条件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虽然不是立时的）变化。1945年之后，英国领导人徒劳地力图修正不平衡性（尤其是那些极大地将帝国负担转嫁到英国肩上的致命不平衡性），他们计划一边通过承认自治（有时是独立）来缓解主要应力一边保存自己在原统治地的主要影响力。他们为计划正在奏效的迹象而鼓舞，也被反对者或敌人的谨慎而误导。直到1960年，我们仍有可能认为帝国的绝大部分（以更为分散的形式）依然可以保留，虽然联结各部的线已经松散，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切断。但是随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最后一拽，所有的连线都被拉断了，帝国裂为了碎片。剩下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构想未来——以及捏造一个新的过去。

[1] 印度贱民，又称“旃陀罗”，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种分类，主要以不可接触为其特征。——编者注

[2] 大卫和歌利亚出自圣经故事，是一个以弱（大卫）胜强（歌利亚）的故事。——译者注

[3] 尼亚萨兰，即马拉维。——编者注

[4] 芬尼亚人，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勇士。——译者注

[5] 参孙是《圣经》里的人物，他被上帝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译者注

第十二章

最后几最大的帝国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白人移民在吉卜林的诗歌《本地人》里唱道。大英帝国肯定不是最后的帝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把1945年以后美国建立的具有影响力的帝国算在内，也许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尽管它在全球占有优势地位的时间相对而言很短暂（从18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如果我们将（我们也应该）中世纪这个基础包括进来，由伦敦统治的帝国存在

了500多年。我们要摒弃这样一个概念，即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大部分世界历史中，帝国是政治单位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海外帝国建造上与英国是对手，之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俄罗斯至今都是北亚大部分地区的霸主。英国人的动机和策略与那些巨大的亚洲帝国也不是完全不同，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仍被迫要对这些亚洲帝国献殷勤。中国古代的学者–官员相结合的官僚制度使官员们在没有本地纽带的省份中为遥远帝王的理想疲于奔命，这与充斥着英国人的印度治安官制度具有讽刺意味地形成了呼应。印度治安官制度是所谓英国在南亚统治的“钢铁结构”。英国人从之前的莫卧儿统治时期借鉴了许多管理制度。而且就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常常倾向于依据宗教信仰或者通过种族身份的其他标志（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来区别他们的臣民，并不将他们作为具有一致性的臣民整体来统治。

也许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英国人通过建立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人才、货物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也许还是历史性变革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这种流通许多在统治者或者国家的控制之外，或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它的作用在于创造了地区内以及地区之间，甚至是全球连接的新形式。新的贸易关系、新的宗教观念、新的移民社群（有时候三者都有）常常动摇着现有的社会。它们创造着新机会，挑战着旧利益、威胁着旧的等级制度。因为有着外来者拥有的天赋，它们能够为秘密侵略制造条件：有声望的物质文化、引人注目的宗教、商业优势的承诺。这种多元环境适合那些最能够利用这些关系形式的国家，它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这种关系上，并且还往之前最受它们影响的地区中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大帝国和小帝国走上了这条扩张的道路，有时候是在附近，有时候横跨大陆，甚至在一些例子中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

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不过他们必须等到连接的方式已经准备就绪，再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发挥优势。西班牙人建立了欧洲与大西洋的长久连接（斯堪的纳维亚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失败了），葡萄牙人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荷兰人最先发明了控制亚洲货物对欧洲的供给的商业运作方式。英国人很晚才加入这个阵营。不过到了17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掌控在新的全球风险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关键资源。首先，尽管英国在风系中并不完全处于理想状况，近海的位置让它们处于欧洲主要航海贸易的交叉路口：即北欧和地中海之间、大西洋欧洲和美洲之间。作为增长最为迅猛的贸易的中心，它们处于极佳的位置。其次，除了内战的混乱以及1640～1660年之间的革命，建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手段基本算是成功了。一个资金充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能够派遣一支大军前往欧洲（就像在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样），更关键的是，能够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深海海军，这些都在保护（有时是扩展）商业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其对手们必须要扼杀的。第三，英国人开始享受整合良好的国内经济的优势，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经济。的确，伦敦早就开始处于英国内部、横跨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进行

市场信息交换、财政安排的中心位置。伦敦扮演的多重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的中心（也是公共财政的中心）、国内生产及其主要市场最大的消费者以及海外商业巨大的商业海港，它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

不过也许英国在利用和扩张欧洲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英国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观念和目标上强大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英国人构想着帝国的不同类型，寻求与利益群体和臣民不同类型的关系，并且追求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还相互冲突。他们能依靠利益和同情在世界各地吸引一大批合伙人、盟友、代理人、合作者以及皈依者。英国建立的连接点通常是一整套体系。那些不喜欢英国帝国主义某一面的人常常能够在英国身上发现他们更加开明、人道和恭敬的一面。这并不是意外。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到18世纪为止，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接受各种宗教，支持不同的亚文化（地区的、宗教的、知识的以及基于类别的），并具有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影响（福音教义和反对奴隶制度是两个主要的例子）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多元化社会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仅仅出于单一的动机，也不止依靠单一的技术，它所凭借的条件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贵族希望通过海外财富来实现社会抱负，朝臣希望利用英国政府垄断的权利，赞助人和官吏渴望得到殖民委任，天主教教徒和清教教徒渴望得到避难所，奴隶主（在英国有上千名）期望能保证他们的人类财产的安全，废奴主义者专注于镇压奴隶贸易，商人和制造商希望找到市场，移民渴望得到海外免费的空地，牧师和传教士追求“基督的帝国”：所有这些还有更多应征入伍的英国资源都被并入了帝国的雄心壮志中，并且还要扫描全球来发掘新的机会。

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完成这一切，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私营企业般的帝国。国家的角色主要局限于为“公司”或“经营者”授予商业垄断或者司法权力的特许状。殖民美洲，就像和东方做贸易一样，取决于私人资本并且需要冒着个人风险。慢慢地，国家开始更加直接地对这个海外企业进行干涉，并且承担起保护责任。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连贯，监管总体来说也不严格。因为主要的动机是利润而不是教会或国王的荣誉，这是一个商业实验的帝国，而不是一个根据设计来进行统治的帝国。经济生存要求采用庄稼的新种类、农业的新方式以及劳工的新来源。巴巴多斯殖民地建立不到30年时间，种植园里的英国移民就被非洲奴隶所取代。因为他们常常出口同一种农作物（糖、烟草、木材、羊毛），并且向英国寻求贷款和资金，有时候是人力，所以殖民地之间被迫彼此竞争。他们有强大的动机要吸引这三样东西——他们的物权法、征税以及土地分配都有着明确的指向。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尽力在伦敦维持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来为他们殖民地的前景唱赞歌，尽量避免“干涉”（就像奴隶制度的废除），或者要求海军或军事帮助。他们渴望得到来自帝国中心的消息，甚至更加渴望在舰队街[1]和格拉布街[2]生产自己的新闻。如有必要，他们会支持团体和社群来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比如塞西尔·罗兹的“帝国南非协会”。尽管种植园主和移民非常擅长这项活动，但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很快发现了绕开“官方思想”和在英国寻找有影响力的盟友

和朋友的可能性。正是一个这样的游说团体在1900年以后帮助印度将争取自治政府的要求提上了英国的政治日程。

因此，建造帝国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其中政府的政策或白厅的决定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有时候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到18世纪晚期，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海外帝国开始被分为4个不同的分支，几乎是4个不同的“亚帝国”。大约在1830年以后，英国拥有着由当选议会中的移民或种植园主统治的大量自治殖民地（在北美、加勒比和澳大拉西亚），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尽管原始数量因为合并（加勒比的例子）或种植园主自治政府的失败而削减，如此多的附属地，以及伦敦对它们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控制权的事实困惑着外国观察者以及英国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一个殖民地（好像他们仍会这样叫）是有“自治政府”的殖民地，这是宪法上的一个谜。也许更加奇怪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少量在南非的英国白人）的移民社会强调得更多的不是他们与英国的区别，而是他们与英国性的共同之处，甚至是更好的英国性，即英国性的升级版。在20世纪，这种意义上的共有的英国性就如同自我利益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激发了非凡的牺牲精神。

自治殖民地看上去似乎是帝国中很奇怪的部分。不过英国对印度的占领使其成了亚洲的大国，而且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唯一的亚洲大国。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欧洲国家能在遥远的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海外领土，或者获得如此惊人的利益。有印度在手，英国人拥有了在世界的很大范围内施展他们权力的方式，从波斯湾到中国南部海域，甚至在某个时期到达了日本海。部分因素是印度提供的很多商业资产（印度商人，还有棉花和鸦片）。不过印度独有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英国人提供了军队。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印度军队缩水，军队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扩大，英国常规军的2/3（印度人和英国人）都由印度纳税人来养活。以印度为基地的军队在过去和将来都可以为帝国各式各样的目标服务，帝国的目标因此变得很难确认。如果印度的贡献（被印度民族主义者强烈憎恨）成了帝国军事阴谋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和平时期，伦敦在陆军上的花费相对而言较少，在海军上的花费更加大方，这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国防开支在英国还不至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其他国家则很难如此。不过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让人不安：因为印度的国防预算对英国的公共开支很重要，印度人被禁止建立同白人殖民地条款一样的自治政府，以防其当选议会拒绝支付“国内费用”（英国守备部队的租金）或者军队的巨大开支。一直到1939年，这个处于印度宪政发展的中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帝国的第三种类型是真正的大杂烩：英国还有大量面积不大或（常常）不太具有价值的领土，它们是各种基地和堡垒，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中国香港和圣赫勒拿岛（最初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进出印度的小站而被占领），一组热带殖民地，比如锡兰和马来亚这种能获得高利润的种植园殖民地，拥有零星内地的海上桥头堡（就像在东方和西非），其背后是拥有不可限量未来的衰退的“旧”殖民地（英属西印度群

岛的大部分），繁荣的贸易中心（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寥寥可数的一些因为某种原因占领、却又难以抛弃的小地方。它们被独裁统治，就像许多“小印度”一样，但每个地方又有区别。他们的确是两类权力的产物：以英国为基地的海军力量以及以印度为基地的军事（也有海军）力量。看上去随意分布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帝国两个磁极重叠的领域。它们让大英帝国看上去不是拥有边界和限制的可辨认的集团，而是一个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巨大群岛。从政治上来讲，印度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部分英国官员反对克里奥尔政客的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多么英国化、基督化或者忠诚），他们要求共享行政权力，强调承认传统以及寻求传统盟友的必要。这常常是通往“看守帝国主义”的道路：坚持，再坚持，却什么都不做。

帝国的第四种类型几乎是无形的。无形帝国没有总督或国旗、吞并或统治权带来的利益。它依靠着商人和银行家、领事和外交官的影响，有时候在不远处拥有炮艇和守备部队。典型的代表就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商业帝国、被临时占领的埃及，还有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这提醒了我们有时候地图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无形帝国与有形帝国之间在功能上无法分离。非正式殖民地从商业（比如阿根廷）或战略（尤其是埃及）上来说，比正式殖民地更具有价值。一些正式殖民地相当于英国的基地和仓库，从附近涌现的非正式帝国中获得了他们自身的价值，香港就是如此，也许马尔维纳斯群岛也一样。但是无形帝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类别。英国权力的施加是不正式的，因为为这种统治产生花费和付出努力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因为这种统治实在是难以施加。这种妥协取决于当地人的合作以及对手的缺席。如果这些先决条件不存在，就要在坚持更多的控制权（及其承诺和风险）与接受更少的权威之间做出艰难的决定了。1920年后，在中国沿海地区，前有中国爱国主义，后有日本帝国主义，英国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进退两难。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帝国的众多群岛，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不仅是海军和军事力量的衍生物。支持英国扩张的大部分人力资本来自于热衷移民的英国人。正是巨大的移民潮让英国成了“人口统计的帝国主义”的最典型代表，这并不只是统治，而是在实际上占领全球的很多地方。1815～1930年之间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出来的人数是从欧洲其他地方移民出来人数（总数1 900万，意大利占900万，位居次席）的两倍。尽管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在英国这个个案中，它与动态经济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增长。不同的前景让一些英国的地区成了人口的输入区，另一些则成了输出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生态危险增加了一些不安）外流量很大。到19世纪晚期，类似的人口外流同样影响了英格兰的郊区。然而，仿佛是作为补偿，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经济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也许看上去似乎是残酷且不人道的。正是因为移民区域（尤其是在北美）的商业发展让他们能够吸收大量人口的流入，并且有成效地雇佣这些移民。正是英国的工业经济使其大约在1800～1940年之间成为进口农作物、原材料和食品的最大消费者，也成为移民区域巨大的市场。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可以看作是国内经济巨大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料的大

量工作被转移到了海外，同样还有这些工作所需的劳力。

当然，英国从扩张到成为世界权力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取决于商业的成功。综合商业经济过早的发展也承受了工业化带来的沉重负担（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关联），在19世纪，工业化在英国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广泛且迅速。英国海外帝国的商业根源塑造了它的整体特质。在农业帝国，如果统治者要从权力中获取利润，就必须要对其臣民直接收税，必须实施严格的控制（这是有代价和风险的）以防其代理欺骗他从而把他的收入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样做的努力和负担会限制帝国的野心，因为越远的地方越难从中心实施监管。一个商业帝国基本上不受这样的约束，因为它对筹集本地的直接收入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必要实施强权统治。相反，它依靠贸易的利润，对最便捷的地方国内港口进行收税。当英国人不再遵守这条黄金定律（就像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所做一样），灾难迅速出现了。然而，英国对商业帝国规模的检查是的确存在的。只要商业利润被认为是来源于和仔细排除的敌对帝国之间的贸易，就需要拥有昂贵设备的海上力量来实施垄断。在漫长的18世纪，直到1815年，欧洲、美洲以及亚洲之间巨大的贸易扩张伴随着欧洲国家之间长期的海上和殖民战争并非巧合。

众所周知，1783年美国殖民地的丧失并不是英国作为帝国力量衰落的序曲（正如许多当时的悲伤的故事所认为的一样），而是一个不平凡的过渡。1815年以后，大英帝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1940年。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帝国，是因为在他们的全球地位中结合了两次划时代的变化。第一个是海军所达到的成就，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就确保了这种优势，并且从那之后一直让人嫉妒地保持着。因为摧毁了他们主要对手的海上力量，限制他们贸易的障碍就被打破了，需要支付高额保卫费用的威胁也被消除了。因此，整个世界成了他们的市场——至少理论上如此。维持全球帝国身份的代价正在下降。即便如此，如果英国未从商业帝国转型成工业和商业混合经济体，大英帝国也未必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没有工业化，维持一个全球规模的商业帝国的努力也许是无法继续的。英国的世界帝国不是建立在大胆的扩张或者殖民地官员之上，而是建立在煤、棉花和资金之上。

另一个原因在于一个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帝国迅速被无线电绑在一起，这比一个依靠风浪来驱动的帝国更加高效。信息和人才更为迅速的流动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贸易量并且允许资源在地区和目标之间迅速交换。一个明显的便利之处在于军队的部署。电报和蒸汽船允许相对较小的英国军队（大约15万人）和印度军队从全球迅速集结到帝国出现危机的地方，就像随叫随到的消防队。以蒸汽为动力的船只让英国的触角延伸到河流（比如长江），还能延伸到之前无法接近的海岸线（比如红海的海岸线）。随着英国的核心技术铁路的建立，世界的大片新地区触手可及，不管是商业上还是军事上。铁路使英国变成了陆地和海上力量（迄今主要是海上力量）的结合体，这是能力的巨大提升。拥有廉价的纺织品（以蒸汽为驱动力的编织在制造花费上有了大幅的降低）之

后，英国人现在有了在全球渗透市场的方式。通过放出低价贷款，建立廉价运输，他们吸引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制造商进入他们的网络。

因此，工业帝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融合广泛的地区，无论多么遥远，都能形成一个单一的财富和权力体系。这一点从三个方面起作用。首先，通过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无论是出口到英国或者是经过英国），殖民或半殖民经济变得依赖英国为长距离贸易提供的有偿的商业运作方式。一旦它们汇聚到了这一个连接点上，并且为了本地的繁荣而依赖这个连接点，想要撤出来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事实上，总体趋势是要越来越符合连接点的要求，作为对连接点的回报，连接点的经济职能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其次，经济一体化对社会和文化也有影响。在那些把与英国的关系看作他们地位和财富不可分离的支柱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持续成长。它们很渴望促进而不是削弱与英国的关系。贸易带来的财富引发了各国对帝国中心社会和文化的效仿，还刺激了激增的信息量的交换：在帝国不同部分之间，新闻、法律观念、商业和科学调查、幻想类文学和私人信件，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共同的帝国文化纷纷出现。最后，英国的工业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需求、观念和品位的多样性。19世纪中期，英国也是最主要的都市社会之一，它喧闹而富有流动性。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对食品和廉价奢侈品（比如烟草或巧克力）以及对娱乐与知识的需求都让进口量出现了膨胀（1826~1913年之间的烟草进口价值提高了30倍）。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会在英国找不到市场，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商业前景吸引不了英国的投资者、商人和投机商人。处于这种城市–帝国关系网中心的是伦敦，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商业上都是如此，伦敦飞速发展（1801~1911年之间，伦敦的人口从100万上升至700万），直至成为全球性大都会，在帝国的整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伦敦位于（也帮助塑造了）帝国港口城市网络的中心，这些港口城市包括蒙特利尔、开普敦、科伦坡、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墨尔本、悉尼和奥克兰，帝国的大部分的商业交易都是在这些城市之间进行的。大英帝国的特征在都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一特征却并不仅限于英国本土。正是在这些城市桥头堡中，英国的影响被期望深入到殖民地世界的落后内地。

自由贸易是这次巨大的对外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英国人很快忘记了他们1815年之前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他们坚持道，自由贸易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而不是仅有益于他们自己。通过对所有国家实行贸易开放，英国人认为他们已经让世界的其他地方接受了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这样做有可能阻止对抗他们的巨大联盟的形成。不过这样忽略了自由贸易依赖于英国权力发挥的程度。“兰开夏有没有意识到印度棉花的自由进口是通过武力强加给印度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一位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1919年问道，“自由主义类型的自由贸易以及掠夺类型的贸易保护都是大英帝国的政策，并且都是为了战争而塑造的。”英国人利用海上力量塑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德国也建造了自己的公海舰队来制造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碰撞因此不可避

免，麦金德说道。

不过帝国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和战略决定的总和，也不是归于英国的代价和利益的理性计算。帝国的构建是由愿景和梦想来驱动、由神话和狂想来支撑的。那些试图演绎帝国构建的人不要忘记英国人观点的反复无常（他们需要的支持和赞同）。英国在阿富汗和南非不计后果的冒险行动惹怒了选民，他们1880年罢免了迪斯罗利。20年后，索尔斯伯里勋爵抱怨说他是被本土的“沙文主义飓风”拖进南非的战争中的。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英国的统治是通过武力建立并且通过高压来维持的。但是针对原住民的暴力却成了一种惯性而非实际需要。“我注意到印度的所有酒店有一个重要的告示：‘绅士都被严格要求不要袭击仆人’。”1869年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说道。就像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见的非洲矿工时常被施以暴行，这种行为差不多要算是极端行为了。当然，这种蛮不讲理的暴力部分来自于本土的暴力文化：英国人鞭打他们自己的士兵，却没有对印度兵这样做。不过这也来源于他们顽固的信念，他们自认为在种族序列中位居顶端。

这种“庸俗的种族主义”的起源也许是奴隶制度的实行和19世纪晚期反奴隶制度讨论中公众辩护背后的“逻辑”。它之所以在大英帝国得到如此广泛散播的原因是不难想象的。就如同在财富占领和国家建造过程中，国家、民族和人民不同表现的重要作用，它的命运与社会进化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科学的”或“生物的”种族主义真正地帮助了更古老的、更深的以及主要的文化偏见的形成。从智识上来说，社会进化强化了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事实上，这种强化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庸俗的种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复杂高深的知识，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假设和态度的结合体。它认为理所当然的不仅是文明的等级，还有那些处于世界顶端的人们防止自己被“低端人种”“稀释”或推翻的需要。它规定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纯净是防御两种最具威胁的危险的最佳形式：因为种族杂合会导致文明动力的丧失以及对“低等种族”叛乱控制的失效。在帝国的移民殖民地和直接统治地区中，这些种族主义“药片”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在殖民地，甚至是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类的地方，原住民人数缩水到四面楚歌的少数族群，对非欧洲移民的种族驱逐到19世纪晚期成了最紧迫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他们的经济扩张有可能利用亚洲劳工，中国苦力帮忙建造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不过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年代需要处于艰苦的边界社群来建造现代国家。节制、教育、稳定的家庭生活、就业的常规形式，这些都是具有良好政策和良好规范的社会的特征。不过它们的制定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即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个范本。推广现代化的人主要看向了英国，这并不让人惊讶。他们急切地要表明他们的社会是新的英国：对移民群众而言，这里是理想的目的地，他们早就想吸引这些人了。他们认为，为了复制英国，并且最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完善，创造一个基于一致意见的井井有条的国家，需要取得很高程度的文化一致性：英国就是模板。只有让全部的人共同分享英国的高雅文化才能够让身处北美和南太平洋的他们成为真正的不列

颠民族。进行民族构建必然需要展开对“他者”的种族驱逐。

当然，这种高尚的目标被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加强了：白人劳工担心中国、印度和非洲劳工会拉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那些白人来自少数群体的移民殖民地，对文明的渴望和对强壮体格的恐慌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征服者会集结起来反抗他们。在受帝国直接统治地区里（比如在以前的奴隶殖民地），同样的叛乱威胁不管多么偏远也是极大的恐惧。即使在形式上是文明的，这些政权也是真正的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小部分外来群体控制着堡垒。权力和权威倚仗于（也许甚至来自于）军队的团结。随着英国的统治在印度的扩张，坚持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官员可能被拉入与本地印度人合作的关系网中（其行政代理人“消失”在当地社会是所有“统治帝国”面临的破坏的潜在形式）。但是这种需要也是被对起义的担心和事实所大大强化的，尤其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因此，在印度，没有白人能够摆脱无处不在的提醒，这些提醒通过历史、神话和纪念告诉人们，种族纯净是生存的代价。英国人成为热带非洲的统治者时，这种“印度式的”思想变得十分普遍。它从白人英国官员可能被称为“工会”式的观念中获得了大量的额外力量。他们用微妙的表述方式再三地坚持，皮肤的颜色是政治信任唯一确定的标志。通过屈服于非白人议会或者招募非白人官员来削弱白人权威其实是一条通向毁灭的道路。

因此，对殖民帝国和统治帝国而言很普遍的种族纯净的观念与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有遍布帝国的制度和法律机制一起，构建了帝国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在本土得到了强烈的呼应，但也仅仅是呼应。英国人的观念接受许多不同的帝国主张，尤其是英国人移民到海外的“空”地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主张。但与之对立的是，英国从任何层面上而言都不是帝国的产物。它的构成不是由帝国决定的，这是一种时髦但空洞的说法。这样说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早已是格外强大和文化统一的国家（语言和法律是其最显著的例证），远远早于它冲出欧洲范围占领帝国的时间。帝国习俗进入了英国，不过仅仅（就像喝茶的习惯）是在适当地被英国化之后。当它们在本土遭遇了强烈的偏见，比如反对奴隶制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或者向海外异教徒传道的主张，它们想要传播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了。当英国政府决定1960年以后在热带非洲放弃移民少数群体时，种族纯净的呼声证明是它是无法保护自己的。一旦保卫帝国领土看上去成为不能维持的负担，国内帝国主义就会在悲泣中逝去。

所有帝国终将衰落，这是历史的常态：至今为止，所有的帝国无一例外。认为帝国衰落是可预期的，这是很容易的。当帝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时，历史学家甚至不难指出衰落开始的时间点。我们所知道的帝国中的大部分若没有军事、物质或道德的改革，就会有命运的预言和灾难的预测，这是当然的。在一个如同英国一样的多元化社会中，总会有很多反对帝国的声音，但对于帝国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有一致的意见。因此那些不喜欢英国在印度进行独裁统治的人会对英国应该终结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关系的观点感到震惊。更常见的是，他们认为把代议政府扩展

到印度（之后到非洲）会赢得他们对英国自由的世界帝国的永久忠诚。就算是像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一样极端的反帝国主义者，也会期待看到（在1932年）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英国，这样的英国会与其殖民地“合作”。这样的合作与莫斯科和以前的沙皇帝国的合作大同小异。英国的主流观点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很多调整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很肯定的是，帝国作为以英国为中心的国家联合体会存活下来，它们依赖英国的资金、技术和战略防御，也依赖英国的价值观、制度及观念。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它首先来源于一种信念，那就是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且无与伦比的。三个关键的特征可以让英国逃脱所有以前的帝国主义的命运。首先，就英国本身来说，帝国的大脑和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政治上也很自由。当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拒绝经济和社会改变，困扰历史上帝国的顽疾在那里将没有任何市场。观念的自由交换、观点的自由表达以及自由的代议机构形成了强大的保证，政府的宗旨会根据新的压力和需求不断地做出调整。的确，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是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信息和新闻都会以无可匹敌的效率传输到伦敦并且在英国内部传播。他们将这种开放性与以前灭亡帝国的封闭的政治世界和1918年以后崩塌的帝国相比较。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英国的社会是唯一进步的社会。其次，英国人同样自信英国的经济是动态的且适应性很强，这是自由贸易带来的回报。美国的经济也许更加庞大，德国工业也许更加高效，但是英国直到1939年都保持着世界最大交易者和世界最大投资者的头衔。当英国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经济萧条带来的负担在英国和英镑集团内并没有像在美国或德国那么严重。最后，大多数（也许是所有）英国领导者都认为只要采取了正确的防范措施，他们的帝国就会继续享有非凡的地缘战略安全。1815年后，这种观点越来越根深蒂固。帝国的海上特点暴露于任何正面进攻的局限性、大多数英国领地远离欧洲战场，这使英国排除了大多数危险，而这些危险是其他大国需要花高额成本来防御的。英国人在战时能封锁敌军，夺取他们的海外资产，并拥有在海上驾驶他们的船舶这一海上力量的特权。英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是他们摆脱欧洲两败俱伤的争执的坚定性消除了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的可能，并且降低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可能性。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可能消磨了一些这种自信，实际的结果却并不如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所有互相敌对的大国弱点的暴露和分裂。很显然，英国可以在他们中间进行操控，利用他们的分离来抑制任何威胁。

的确，地缘战略安全是帝国的最后希望。只要没有外部敌人进入他们的帝国，那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英国人总能压制任何内部的混乱。只要他们的威望和权威没有被失败削弱，他们就能威慑民族主义运动的分裂要求。事实上，只要英国在欧洲和亚洲维持着独立大国的地位，分裂主义（比如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就只会对处于边缘的极端分子有吸引力：温和且明智的民族主义者只会认为这是徒劳。有了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是天真的，或至少是过于乐观。不过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一点。

对帝国终结的解释充满了不确定性。英国的例子吸引了一批历史专家。他们列出了一系列原因，控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失败。所有这些结论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让这些失败变得代价巨大且越来越致命的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放眼世界历史长河，英国的世界帝国时期只是一个阶段，一个辉煌的瞬间。它的机会是由历史上某些始料未及的局面带来的——欧洲和东亚的情况会同时变得对英国很有利。虚弱且被动的东亚、因各大国相互敌对而处于不牢靠的平衡之中的欧洲，再加上封闭落后的美洲以及混乱的伊斯兰世界都为英国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条件。海上霸权以及丰富的煤矿资源带来的蒸汽动力的崛起使英国能以他们可以承受的代价来抓住这不曾预料的机会。他们安然挺过了19世纪80~90年代帝国竞争的风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活下来，并扩大了领地。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和战争震撼着欧洲和东亚，亚洲的剧变紧跟着欧洲的战略灾难，英国维持世界权力的必要先决条件彻底消失。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秩序诞生了。旧时光从此一去不复返。

[1] 舰队街即英国新闻界的代称。——编者注

[2] 格拉布街是那些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也是英国出版业的中心之一。——编者注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被改变的过去——人类历史中的反事实

[英]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
晏奎 吴篱◎译

英国皇家钦定现代史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不列颠学院院士
另类解读历史，从“假如”中找寻历史的可能与必然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英）埃文斯著；晏奎，吴蕾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ISBN 978–7–5086–5674–8
I.①历…II.①埃… ②晏… ③吴…III.①世界史–研究IV.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1806号
ALTERED PASTS
Copyright © 2014, Richard J. Evan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著者：[英]理查德·J·埃文斯
译者：晏奎 吴蕾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英] 理查德·J·埃文斯 著
晏奎 吴蕾 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克里斯蒂娜

假如我们不曾相遇……

假如希特勒丧命于1930年的一场车祸，纳粹党是否还会上台？“二战”是否还会爆发？假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美国奴隶制是否会更早废除？1860～1865年的独立战争是否就可避免？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是否会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其艺术、文化、社会、科学及经济又将怎样发展？

——理查德·J·埃文斯

史学家……必须对他的题材始终抱有一种非命定论的观点。他必须不断地把自己放在过去的某个点上；在那个点上，各种已知因素似乎仍然能够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他说的是萨拉米斯，那么必须是波斯人可能会赢；如果他说的是雾月政变，那么波拿巴的可耻失败必须要能为人看出……（然而）史学家旨在从人类社会之某一阶段的遗迹中发现某种意义……我们所设定的历史背景，即我们内心的那一创造，只有当我们赋予它一个目标，抑或是通往某个具体结果的一条路径时，它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历史思维总是目的论的……对于历史，该提的问题总是“何去何从”。历史必然被赋予出类拔萃的目的论原则。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转引自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主编
《多样的历史：从伏尔泰到目前》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一厢情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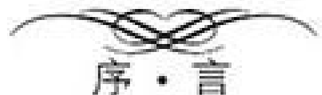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虚拟历史

第三章 未来小说

第四章 可能的世界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序·言

这本小书原是一篇论文，旨在探讨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中使用反事实的问题。所谓反事实，亦即虚拟事实，本书用以指称那些与历史截然不同的其他版本，在这些版本中，历史时间轴上的某一变动便导致了一个与人们已知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所不同的结果。在随后的各章中，我将用实例对此进行详细讨论，这些实例包括：如果英国没有参加“一战”，而是作为中立的非战国作壁上观，结果会是怎样？如果英国在1940年或1941年与德国纳粹单独媾和，又会是怎样的结局？或者，如果英国因不列颠之战失利而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可能会怎么做？第一章简要勾勒反事实的历史发展，从其在19世纪的发端开始，力图阐明反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英美两国重获新生并广受追捧的原因。第二章着重分析人们对使用反事实所持有的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态度，讨论这一题材的主要贡献及其对众多学者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的意义。第三章着眼于历史作家与小说家们因各自目的而重新创造过去所运用的诸种方式，包括构建平行的“另外”历史和基于历史改动而虚构出的未来景象。最后的第四章力图将上述所有内容进行归纳，看看能否从中得出某种结论，即反事实是不是史学家的一种有效工具，如果是，那么应以何种方式，到达何种程度，界限又在哪里。

我最初开始关注反事实是在1998年，当时我参加了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午夜栏目的一场电视辩论，名为“罗宾·戴说书秀”（Robin Day’s Book Talk），参与辩论的另两位嘉宾是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后者刚出版了在该领域具有开拓性的著作《虚拟的历史》[1]（*Virtual History*，1997）。我自己的《为历史而辩》（*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也刚刚出版，反事实历史的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这也是那本书所致力解决的问题。所以，当2002年10月我应邀到位于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举办巴特菲尔德讲座时，我认为这恰好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探讨的绝佳机会。那次讲座内容后来被编辑出版，取名“好似无中生有的讲述”，发表在《BBC历史》杂志2002年第3期第2～4页；随后又应邀在一家美国期刊《从历史的角度说》（*Historically Speaking*）第5期第4卷（2004年3月）上被重印出来，成为好几篇长文的热议主题，我本人的回应也刊印

在同一期里（第28～31页）。整个交流都被收入唐纳德·A·耶克萨的《历史思考的新主题：史学家的对话》（*Recent Themes in Historical Thinking: Historians in Conversation*，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8）第120～130页。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从历史的角度说》上对我的回复，以及两年后他们在编辑出版反事实文集《重塑西方》（*Unmaking the West*）时在前言和结束语里所展开的更加详细的讨论，都让我意识到，我对反事实主义者们的主张最初的反应有些敏感，需要加以反思。在随后的几年里，该主题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给了我进一步重新思考的理由。此外，到目前为止，反事实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也有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理论性探讨，从高度批判到谨慎辩护都有。而这些问题一齐将该主题的辩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以色列历史协会——一个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组织，邀请我开展2013年梅纳赫姆·斯特恩（Menahem Stern）教授纪念讲座，着重从方法论和理论方面，就一些以色列历史主题进行演讲时，我欣然接受了邀请，想趁此次机会重提反事实这一话题，并考虑进行更深一步探讨。本书便是此次讲座的成果。书中内容大致与演讲一致，除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了合并与删略，构成了系列讲座中的第三也是最后一讲。

我首先需要感谢的是以色列历史协会，感谢协会主席伊斯拉埃尔·巴特尔（Israel Bartel）教授、秘书长兹维·耶库迪尔（Zvi Yekutiel）先生，以及各位理事会成员，感谢他们给予我如此殊荣，邀我开展此次讲座。要跟上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埃马纽埃尔·勒罗伊·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彼得·布朗（Peter Brown）、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海因茨·希林（ Heinz Schlling）、汉斯–乌尔希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帕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等各位历史学家们的步伐并非易事，好在有了协会行政主管马雅·艾维尼里–雷布洪（Maayan Avineri-Rebhun）的帮助，他严谨、妥当而又高效的安排使得过程顺利了许多。此外，托维·韦斯（Tovi Weiss）所提供的帮助也不可或缺，还有我住的米什肯努·沙昂尼姆旅馆里的员工，他们尽职尽责地帮助我。米什肯努·沙昂尼姆旅馆是这里的文化中心，修建于山丘上，俯瞰着耶路撒冷老城那令人生畏的城墙。还有到场耐心听我讲座的各位听众，他们的积极提问也使得本书中的讨论得以提升。奥托·多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不仅就该主题向我提出了约翰·赫伊津哈的思想，并且以东道主身份和我一同来往于耶路撒冷及周边，尽显其本人的亲切与风趣，而雅德·比兰（Ya’ad Biran）则充当专业向导，带我游览了城内数不胜数充满魅力的地方。优素福·卡普兰（Yosef Kaplan）教授是梅纳赫姆·斯特恩教授纪念讲座的总编辑，是他让演讲的内容得以出版。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和他的员工，尤其是伦敦分部的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他们努力工作确保该书能按照合约

出版并开展广泛销售（但愿如此）。还有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出版社（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仔细，也都非常专业。我尤其要感谢理查德·普尔特（Richard Pult）与苏珊·阿贝尔（Susan Abel）对写作过程的密切关注，感谢坎农·拉布里（Cannon Labrie）对打字稿所做的专业编辑，感谢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的蒂姆·怀廷（Tim Whiting）对英联邦版所付出的艰辛工作。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拉赫尔·霍夫曼（Rachel Hoffman）、戴维·莫塔戴尔（David Motadel）、佩妮莱·罗热（Pernille Roge）和阿斯特丽·斯文松（Astrid Swenson）都在百忙中阅读校订了打字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克里斯蒂娜·L·科尔顿（Christine L.Corton）以极其专业的眼光审阅了样稿。我对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说不尽的感激之情，但他们无须为本书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理查德·J·埃文斯
2013年7月于剑桥

[1] 《虚拟的历史》一书中文简体版于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第一章　一厢情愿

假如呢？假如希特勒丧命于1930年的一场车祸，纳粹党是否还会上台？“二战”是否还会爆发？600万犹太人又是否还会遭到屠杀？假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美国奴隶制是否会更早废除？1860~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否就可避免？假如贝尔福当年没有签署《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国最终是否还能成立？假如列宁没有在50岁出头时就去世而是多活了20年，那么残酷血腥的斯大林时代是否可以避免？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是否会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其艺术、文化、社会、科学及经济又将怎样发展？假如阿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第二次海湾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正如维克多·雨果在其鸿篇巨作《悲惨世界》开篇中所推测的那样——又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位小说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打了败仗？然而这些既成事实，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事是抹煞不了的。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从未实现，难道还说得上什么可能吗？抑或唯有发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1]”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但正如E·H·卡尔（E. H. Carr）《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由他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特里维廉学院所做的系列演讲集结而成——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不过是一种娱乐性室内游戏而已，是几百年前帕斯卡就曾经讥讽过的一种可笑的推测。帕斯卡曾问道：假如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略微短一点儿，那么她就没那么漂亮，也就不会给本该为击败屋大维而备战的马克·安东尼带去致命的诱惑，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结局又会如何呢？罗马帝国是否会因此而从未建立呢？它依然会建立，哪怕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时间点。起作用的是众多因素，而非一人的好恶。类似的讽刺也可以在18世纪通俗小说中找到，比如《罗伯特骑士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bert Chevalier*）。该书于1732年在巴黎出版，随后很快被翻译为英文，书中假想了美国原住民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就发现了欧洲大陆。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曾取笑牛津大学，称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无聊、最无用的日子。他写道，如果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没有在733年击败摩尔人，伊斯兰教将可能统治整个欧洲，而“牛津的所有学校就都有可能要教学生如何阐释《古兰经》，教士们也都可能要给信众传授穆罕默德的圣训和真言”。显然，吉本认为，至少就牛津大学而言，其结果还是会与现在的情形大同小异。

关于“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在数百年中，很多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过或多或少的猜想。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曾揣测过要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罗马，那么世界究竟会怎样的问题。西班牙骑士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 Martorelli）及其朋友马蒂·朱安·德·加尔巴（Martí Joan de Galba）的传奇故事《白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则在其想象的世界中，让拜占庭帝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而不是相反。

该书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后的数十年里写成的，也是第一次以架空历史的方式出现的作品，具有较为明显的一厢情愿的特征。以理性的方式看待历史，例如像吉本的著作那样，将人类历史视作上帝“神意”的展现，这是对既定事实进行历史书写而非虚构猜测的必要前提。正如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于1835年第一次对该主题进行讨论时，在名为“论未曾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短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神意”这一概念“据为己有”时，这一概念是无法说服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的。这种观点并不新奇，尽管迪斯雷利试图通过引用一些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猜测（尽管只是很简要地猜测）的历史文本对该观点进行支持，例如，假设亚历山大大帝成功占领意大利，查理·马特败给摩尔人，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功登陆英格兰，或者查理一世未被处决，世界究竟会怎么样。迪斯雷利归根结底真正想说的，是历史学家应将“神意”的观点转变为“意外”或他所称的“宿命”的概念。不过，在充分展开这种猜想前，还需要再多进一步。像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一样，吉本依然将时间视为永恒，视人类社会为不变：他笔下的罗马元老很容易被人们想象为头戴假发、在下议院中不停争论的18世纪的绅士们，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品德则颇似吉本在他的同代人身上所发现的品质。如果历史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进程，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眼光，需要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需要赋予每个时代其自身的特殊性，正如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及其史学门徒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认为的那样。

最先详尽地阐释这一观点的是拿破仑皇帝的崇拜者、法国作家路易·若弗鲁瓦（Louis Geoffroy），这不足为奇。的确，拿破仑大帝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便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然后在追想本该如何战胜敌人的梦境中度过了余生。这位昔日的皇帝叹息道，1812年大军靠近莫斯科大门后，如果俄国人没有火烧莫斯科城，他的军队便可在城中越冬，然后“一旦气候转暖，我便可朝敌军挺进；我便能击溃对方；我便会成为敌军帝国的主宰……因为我原本只需要与人和军队开战，而不必与自然开战”。拿破仑被“冬将军”击败的传说便由此诞生。但若弗鲁瓦却认为浇灭莫斯科的熊熊烈火并非成功必需，在1836年的短文《拿破仑征服世界》中，他让拿破仑北上挺进圣彼得堡，击溃俄国军队，俘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占领瑞典。接着恢复波兰王国，完成对西班牙的攻占，继而在剑桥战役中让一支军队登陆雅茅斯北部的东盎格鲁海岸，彻底摧毁由约克公爵带领的23万英军。英格兰从此并入法国，被划分为22个法国行省。截至1817年，他成功将普鲁士从地图上抹去，4年后击败巴勒斯坦一支庞大的穆斯林军队并占领耶路撒冷，摧毁城中所有清真寺，还从萨赫拉清真寺的废墟中将黑石运回法国巴黎。

拿破仑的胜利还远远没有结束。趁着迅猛之势，他随后征服了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他摧毁了除天主教外所有其他宗教圣地，在非洲建立霸权，将美国降于法国管制之下，并于1827年将美国南北部各州的州长召集至巴拿马召开国会使之生效。在他名为“世界统治者”的就职演说中，拿破仑宣告其全球帝国制：“在我的种族内实行世袭，从现在起直

到时间的终结，全世界都将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权力……基督教是世上的唯一宗教。”由于有教皇授予的“全能者”这一新的称号，拿破仑甚至还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因为在其奥地利妻子（仅出于政治联姻）去世后，他再次结婚，迎娶了心爱的约瑟芬。

最后，拿破仑于1832年逝世，一生获得了历史上任何政治家或将军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非但不是一位残酷冷血的独裁者，而且保留了议会，成为一位开明而爱好和平的君主。法兰西的胜利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似乎表明，这一切都主要归功于神意的造化，至少从这个层面上讲，若弗鲁瓦的作品是相当过时的。并且，该作品还无可避免地加入了非常浓厚的历史要素——或者应该称之为伪历史要素：历史进程的某一改变导致了一系列漫长的历史事件无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毫无偏差或逆转的可能，并且直接定下了历史的结局，就像拿破仑在其就职演说“世界统治者”中所宣告的那样。甚至连维克多·雨果也没有设想得这么远，他在《悲惨世界》中认为，神意已经裁定历史不再为拿破仑这样的巨人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滑铁卢战役中，沉闷迟钝、天性愚昧、缺乏想象力的威灵顿反而战胜了天才的拿破仑，这就足以表明在更大意义上，这次战役标志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而非简单表明法兰西军荣的终结。

当然，若弗鲁瓦本人也深知，神意已决定世界不应由拿破仑统治，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会让读者想到现实。他曾多次提到会让拿破仑深感不堪的另一种历史，比如他写到拿破仑可能会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利并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又比如他写拿破仑征服亚洲后站在甲板上行驶在南大西洋时，突然眺望到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圣赫勒拿岛，这一眼让他不寒而栗，并让他暂时从脑海里的幻想中醒了过来，将目光投向环绕在四周的真实环境中。读者们都知道，现实中的拿破仑是在莫斯科大门前被打败的，也都知道俄国人之所以取得1812年的胜利，正因为他们拒绝与这位法兰西皇帝进入一场酣战。就若弗鲁瓦的作品而言，除开这些不足之处，它是第一部获得广泛认可，且论述详细的推测性历史猜想小说。它面世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拿破仑传奇深受热捧的时期，之后又伴随着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尤其是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发动政变以及于第二年以拿破仑三世之名黄袍加身——而风靡了15年。帕斯卡或吉本的奇想则因非常严肃的政治目的而让位给了若弗鲁瓦。若弗鲁瓦本身是拿破仑一世的养子，拿破仑在若弗鲁瓦的父亲于奥斯特里茨战役阵亡后将其置于庇佑之下；若弗鲁瓦本人的全名也并非路易，而是路易–拿破仑。不过，该书的魅力与影响依旧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且不时被再版出来以提醒法国人那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在1937年，作家罗伯特·阿龙（Robert Aron）还执笔进行了反驳。在他的描述中，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但认为战争与征服是不义之事，于是退位并自愿将自己流放至圣赫勒拿岛，展示了其“内心的伟大”与“着眼于必需的见识”。

显然，若弗鲁瓦的描写是在最大尺度上进行的一种主观幻想，是一厢情愿。其作品所运用的方法前提在20年后，也就是1857年，被哲学家

查尔斯·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在一系列文章中采用并系统化，该系列文章随后被出版成书。勒努维耶为该书起名为《乌托时》（*Uchronie*），从此为法国人和德国人所熟知。“勒努维耶虚构出了一段乌托时，一段空想的过去时间。他不按照历史的原样去写，而是写历史本该成为的样子。”如果勒努维耶用“可能成为”取代“本该成为”，可能会显得更诚实一些。他本人的写作方法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他运用图表的形式阐释其方法，图中展示了一系列历史阶段，但其起点时刻却是假想的历史，是从真实的历史中脱轨而来的，亦即用一个时间分裂点阐释历史的最初脱轨。然而，历史的假想轨迹是一条单行线，它将故事毫无偏转地引向想象的未来，而历史的实际轨迹却分裂成众多的短线，也都各有自己的终点，只有当这些短线被引回想象的主线时，它们之间才能被联系起来。关键在于想象轨迹脱离事实的角度，勒努维耶称这取决于作者各自的写作目的。对于勒努维耶来说，他是想通过一段虚构历史来唤起自由意识，从而推动自由进程的发展，他参照政治宽容原则，从罗马时代开始记载宗教发展史。

他首先描写了最初的情形。在涉及罗马人难以容忍犹太教时，他以19世纪中叶法国反犹主义者的典型口吻，称犹太人为梦想“统治世界”的宗教极端分子；他同时描写了罗马人对早期基督教的难以容忍。在这之后，他便进入了历史的最初脱轨：他让马可·奥勒留被人错误地宣告在一场战斗中死去，因此卡修斯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拥护者得以即位，成为新的皇帝。随后，卡修斯与复位后的马可·奥勒留联手，发动了一场革新运动，建立了自由农民制度而非奴隶制度，在历经了诸多的曲折与坎坷之后，最终带领这个西方帝国建立了基于家庭守护神之上的国家宗教，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原则。狂热的东正教在东部大获全胜，从而引发十字军远征，但其所针对的目标却并非耶路撒冷而是罗马。罗马的居民是一支40万人的军队，他们对东部十字军深恶痛绝，企图改变信仰，皈依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耶稣教义，好在双方开战才没有实现这样的皈依。在东方，由于不容异说，政治陷入一片混乱，最终被蛮族打败；西方帝国则因主张宽容的斯多葛学派，而在高卢人、不列颠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民族纷纷宣告独立后依旧存活了下来，而那些民族也并未被宗教冲突所妨碍，建立了欧洲独立国家联盟。同样，在东方，大获全胜的蛮族重新引入了基督教，但经过了改革，没有忏悔室，没有惩戒所，没有修道院，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标志。科学与学术在各地繁荣发展，勒努维耶以呼吁人性结尾，旨在构建一个拥有国际法庭的国际联盟。勒努维耶通过一系列附录将这个结局圆满的故事和天主教长期以来毫无人性的掠夺形成对比，揭示出了理想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的鲜明反差。在他看来，真实的历史唯有在理想的历史映照下才富有意义。实际上，这本书是根据一本旧的手稿翻译而来的，原手稿由一个遭到迫害的不信奉国教的家庭所保存，他们想以此提醒自己：情形本可能是不同的，本可以很轻易变得更好。

然而，无论是迪斯雷利发表在一本无名期刊上的短文（那期刊甚至在英格兰都没有出现过），还是若弗鲁瓦关于拿破仑那鼓舞人心的幻想（尽管只在部分法国读者中大受欢迎），或是勒努维耶那十分深奥而又

被人热烈讨论的反教权主义哲学专著，都没有开启人们对历史另一种进程的推测这一风潮。该类型的文稿只是偶见发表，像英国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的《如果拿破仑当初打赢了滑铁卢战役》一文就是为参加《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在1907年所举办的一场比赛而写的。特里维廉从维克多·雨果的猜想中获得启发，他认为，如果拿破仑当初真的赢得了滑铁卢战役，那么英国或许会被迫与其媾和，而在食古不化的卡斯尔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条件也都可能江河日下（就算有大诗人拜伦领导劳动人民发动反抗，结果也只能以遭到镇压告终，而这位高尚的诗人则将被处以极刑）。英国自由党将会逃到拉丁美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反动的英国政府，并与西班牙联合作战以保留西班牙殖民地；而在欧洲大陆，尽管受到拿破仑的影响，法国的旧制度仍然会多多少少地以从前未改革时的愚民形式持续下去。拿破仑则并没有发起对世界的征服，面对受尽了绵延20余年的战火之苦的法国（或准确地说是整个欧洲），他觉得是时候停止征战了，于是停息下来度过了安定的老年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最后在计划发动统一意大利的新一轮战争的过程中去世，而这次战争也终未爆发。特里维廉热衷于意大利的统一，他曾以三大卷来写意大利建国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同时，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自由派，有一部分辉格传统，他的伯祖父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也是这一传统的一员，是1832年扩大投票权最有力的倡导人之一。在构想拿破仑取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后，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并没有进行积极猜想，反而写成了一个消极的故事，描写出情况原本可能演变得有多恶劣，借此暗示，尽管滑铁卢战役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暂时的政治镇压并造成了经济困难，但因此摧毁了法兰西皇帝的暴政，为19世纪自由主义的多次胜利奠定了基础。当然，实际上特里维廉也非常清楚，这些故事的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就算1815年威灵顿带领的大军战败了，也并非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同盟军可能会再次集结起来战斗并获取最终的胜利；毕竟，在这次战争中，同盟军所拥有的物资和人力都要远远超过资源殆尽的法兰西。因此，特里维廉的这个故事同样是一个主要由政治动机与政治信仰所促成的虚构历史版本。

但是，这种文章的娱乐性功能绝没有消失。1932年，第一部该题材文集面世，由约翰·科林斯·斯夸尔爵士（Sir John Collings Squire）编辑，名为《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If It Had Happened Otherwise*），其中就收录了特里维廉那篇关于滑铁卢的作品。斯夸尔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诗人，骄傲自负而又思想老旧，曾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英国的法西斯联盟，并顽固不化地与现代主义文学为敌。他喜欢将自己塑造为喝着啤酒、喜爱打板球的英国绅士形象，以此来保持他与其姓氏的相称性[2]——的确，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曾习惯于将斯夸尔和他的小团体称为“绅士派”（squirearchy），他发表的许多作品也都较为轻松幽默。在他出版的多本书中，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有《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该书的美国版叫《如果：重写的历史》（*If: Or History Rewritten*）。书中所选文章的作者大都为文人（没有女性作家）。其中许多作者改写历史进程

只是为了娱乐和获得某些效果：通俗史学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就饶有兴趣地想象过，如果1492年摩尔人未能被驱逐出西班牙，那么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地位又将是怎样的？而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则构想了拜伦当上希腊国王的情景。雷诺·纳克斯主教（Monsignor Ronald Knox）的文章则更加具有政治色彩，他描绘了1926年全国总罢工胜利后英国可能呈现的可怕景象：在联合工会及左翼社会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整个英国都可能变得如同苏联那样，教育自由与言论自由遭到镇压，政府掌控着国家的一切。这便是反乌托邦版本历史猜想的又一个例子，正如多年前特里维廉所写的那样。

不过，很大一部分文章作者都借此次斯夸尔出版文集的机会，以最为怀旧的方式沉浸在一厢情愿的假想中。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小小文学幻想》（*Little Literary Fancy*）一文中猜想了如果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alia）迎娶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将会发生的情形——换言之，英格兰有可能也和作者一样，依旧信奉天主教（那样英国和欧洲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更加果敢地采取行动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就可能成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德国通俗史学家及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猜想，如果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三世没有在1888年即位数月后就死于癌症，德国就可能变为议会民主制政体，而非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也就不会在1914年挑起“一战”，不会给德国自身、欧洲乃至世界都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查尔斯·皮特里爵士（Sir Charles Petrie）是一位保守派历史学家，与英国法西斯主义走得比较近（尽管他一直都反对纳粹主义），他之前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个章节也被收录在斯夸尔的文集中，说的是如果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在1745年从汉诺威王朝手中成功夺取王位，那么英国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尤其在文学与文化领域。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如果当年李将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那么最终结果将是英语民族的结合，丘吉尔自身便是这一结合的代表，他父亲是英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对历史选择了错误进程而产生的怀旧与遗憾情绪弥漫在书中的大量文章里，这些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消遣。这便是历史的“假如”版本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在许多年后还会加倍地一再重现。

显然，这些历史幻想大部分都容易受到挑战；至于这些作品所蕴藏的隐喻，若要从完全不同于其作者所猜想的走向去加以推演，也并非什么难事。菲利普·圭达拉所想象的伊斯兰教的欧洲世界（吉本和迪斯雷利曾探讨过该主题，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将好战的法国天主教排除了出去，这些法国天主教徒有可能在教皇的号召下，发动新一轮的十字军远征，去攻打获胜的西班牙摩尔人。在试图控制派系林立而又纷争不断的希腊人方面，大诗人拜伦可能比真正的希腊君主、后来成为倒霉的奥托王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子（Wittelsbach）也幸运不到哪里去。在1926年上演了总罢工的英国工会都是些温和的实用主义者，一提到“苏维埃英格兰”这个想法也可能会像雷诺·纳克斯主教那样感觉惊恐万分。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奥地利的唐·约翰的婚姻也无法使这位苏格兰女王更坚

定，或更理智，或更有能力地去控制那些新教徒，而这位奥地利王子也无疑将会被排挤出英国政坛，正如腓力二世迎娶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情形一样。法国路易十六和其他家族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成为立宪制君主的倾向，一旦能力达到，他们都会恢复专制体制。德国的腓特烈三世原是自由党人士这一说法，也在最近的传记里被证实为纯属神话，他完全就是残忍而肆意妄为的俾斯麦手中的软面团，一个受人摆布的软弱角色。英俊王子查理在后人看来可能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物，然而他却太过软弱、毫无主见，就算坐上王位也不可能大有作为。而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十分强大而独立，就算有个成功的南方邦联也不可能产生与英格兰建立联盟的想法。毫无疑问，这些文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让人信服，而仅仅是为了愉悦，只不过以臆想的方式而已。但已经很明显的是，历史学家们必须比斯夸尔文集中的那些作者更加谨慎，如果他们想要尽可能地让读者信服，就得为那些想象的故事设置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夸尔的文集反映着英国政治的各种变数和焦虑。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很多政治家，包括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和温斯顿·丘吉尔，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英国政治与欧洲政治的轮廓越加清晰，各种各样的臆想才逐渐消失。在随后的几年中，反事实的文章依旧不时出现，有较为严肃的，也有不太严肃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一部堪称鸿篇巨制的多卷本著作，里面收录了一些类似反事实历史的推测性文章，沿着吉本的思路，不但讨论了如果查理·马特没有击败摩尔人法国可能会是什么样，而且对维京人全面征服欧洲的后果进行了想象。1953年，美国作家约瑟夫·沃德·穆尔（Joseph Ward Moore）发表了小说《引达大赦之年》（*Bring the Jubilee*，又名《把银禧带来》），以20世纪中叶为背景，以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大获全胜为开始（小说从美国南北战争这一时间点开始偏离历史轨道，进行反事实描写）。小说中，胜利后的南方邦联占领了南美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但是德国赢得了“一战”并成为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但技术变革则发展迟缓，没有飞机，没有灯泡，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一方面是南方邦联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被逼进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北美地区，还陷入贫穷与种族暴力之中。作者的意图在于颠覆真实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以营造讽刺效果，而并非要设置一个让人信服的反事实场景；并且小说还有明显的科幻特征：作品中的英雄发现了时光倒流的方法（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作者已经预设了一个科技落后的背景），目睹了葛底斯堡战役，无意间改变战争的进程，以至于李将军最后战败，从而将时间轴移回到我们所经历过的真正历史，即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联盟，随后的一切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简单地说，小说中的英雄被困在了他所创造的历史中，因为他所来自的那个世界已悄无痕迹地消失了。

尽管这类题材从未引领主流，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类杂志期刊中也能偶尔找到此类文章，都是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在各自研究领

域内进行的猜想。1961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同时也是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的作者，发表了短文《如果希特勒在“二战”中获胜》，文中将后果描述为纳粹占领了美国并在国内开启犹太人大屠杀。文章旨在考验并唤起美国人对邪恶的纳粹党的记忆，因而讲述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高官，也是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审判再度勾起大众对纳粹所犯下的真实罪行的回忆。夏伊勒是一位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就在德国目睹过纳粹的排犹暴行。他一开始就明白，希特勒享有广大普通德国民众的强力支持，所以他不希望纳粹的这段历史被人遗忘，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在联邦德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背景下。学术方面的其他成果还有：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就反事实叙事法发表了一篇更为严肃的文章，简要分析了如果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功登陆英格兰可能带来的后果：西班牙腓力二世将会占领英格兰并恢复天主教，还会通过控制英国丰富的经济资源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甚至可能使反宗教改革在德国取得胜利并在北美建立起西班牙的统治。

40年后，帕克带着一本文集再次回归到反事实叙事法研究，这一次他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这种猜想方法。他的文章以及其前后许多文集都表现了反事实的一个特点：这种历史性猜想总是选择以论文形式呈现，且通常十分简短。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历史学家们很快便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而更为详尽的反事实猜想则大部分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其中尤为重要的反事实小说成果是1975年面世的意大利作家圭多·莫尔塞利（Guido Morselli）所写的《过去条件式：回顾性假说》（*Past Conditional: A Retrospective Hypothesis*）。该书融合了小说技巧、编年体以及历史叙述，构想了1916年一支奥地利军队通过潜埋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一条秘密通道，对意大利北部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侵略。他们随后又深入法国的南部，从而打破了“一战”陷入僵局后的世界。与此同时，一支英国突击队则劫持了德意志皇帝，后者妄自尊大地提出用8万英国战俘交换自己的性命，这在德国激起愤慨，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赫维希（Betamann Hollweg）被迫辞职，由自由派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取而代之。随后，德国陆军突破了同盟国军队的西部防线，德国海军在北海摧毁了英国海军，最终拉特瑙与同盟国军队达成了停战协定。出人意料的是，拉特瑙在停战协定上并未提出领土要求，而是提议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欧洲邦联，但此举遭到国内反对，拉特瑙在反犹示威游行期间的一场政变中被罢免，由兴登堡（Hindenburg）取代。这位陆军元帅对反抗运动四起的战败国采取强硬管控，随后却被欧洲工会掀起的一场总罢工拉下台，拉特瑙复位，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欧洲邦联。

莫尔塞利付出了一系列极大的努力，从真实的历史战争事件中谨慎提取研究细节，并将之呈现出来。他仅在时间轴上进行微调，因而1920年发生的卡普政变（柏林右翼政变，因一场总罢工而失败）在时间上前移，被交到了兴登堡手上。作者对意大利和西线取得军事突破前的一系列实况战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些内容则取自历史文献。但文中为增

强效果而被改动的历史事实太多，且太过于随心所欲，因此也难以具有说服力。横贯阿尔卑斯山脉的秘密通道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胆的假设，而且这也绝不意味着如莫尔塞利所描写的那样会给奥地利军队带来决定性的优势；这已经不再是改动后的历史环境，而是纯粹的虚构。更有甚者，劫持德意志皇帝这一事件使整个情节都变成了明显的幻想。瓦尔特·拉特瑙的确对欧洲经济统一和一个中央领导下的经济体抱有信念，但也绝不是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商人，政治上属于自由派；而认为他想要试图建立一个与欧洲经济联盟相悖的政治制度这一想法，也再次超出了合理性的极限。说到底，这本书既非十足的反事实历史描述，也非纯粹的反事实虚构小说。总而言之，它只是一个基于主观愿望的美好幻想罢了。莫尔塞利对战争的反事实描写仿效了勒努维耶，不仅以怀旧的乌托邦的形式将更改后的历史呈现出来，甚至同样是以国际联盟这一愿景的实现作为结局。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莫尔塞利所写的时间里，这样一个国际性组织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并非真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

随后一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之死使得所谓“谨慎解放”（cautious liberation）开始蔓延整个西班牙，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加泰罗尼亚作者维克托·阿尔巴（Victor Alba）出版了《1936~1976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历史》（*1936–1976: History of the Second Spanish Republic*）一书，描述了西班牙内战后40年的情形。在他的书中，内战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尽管实际中的第二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正经历着其最后的危机。在他的笔下，政府非但没有沦为糟糕的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从而引发共和党人与民族主义者之间长达三年的敌对冲突，反而在卡萨雷斯·基罗加（Casares Quiroga）的带领下抓获了反叛者，迫使佛朗哥及其将军同僚们提前退休，并通过将近1/3的经济国有化而成功地安抚了左翼势力。这段被篡改的历史，就其出发点而言，有赖于将基罗加塑造为一个坚定而果敢的政治领袖，而不是他原本的样子（实际中的他优柔寡断，并在之后辞职）。同若弗鲁瓦一样，阿尔巴在小说中安排进了真实历史的影子，并一直以来以无序的想象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故事中出现了很多真实人物，其中就包括佛朗哥，1940年德军和意军侵略西班牙时，他恢复了陆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将共和党视作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同盟军。格尔尼卡（Guernica）也如历史记载中那样遭到了德军的轰炸；诗人洛尔卡（Lorca）被人谋杀；内战中的很多事件被转写为西班牙与轴心国之间的冲突。而1989年费尔南多·比斯凯诺·卡萨斯（Fernando Vizcaíno Casas）发表的《红军赢得战争》（*The Reds Won the War*）则回刺了这一具有共和派倾向的美好幻想。阿尔巴煞费苦心地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而比斯凯诺这位极右翼的佛朗哥主义者，则把民族主义者描写成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的工具，他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在没有证实所用证据的情况下，夸大了共和党所屠杀的民族主义者囚犯的数量，同时对自己所在阵营所犯下的暴行轻描淡写或干脆忽略，还诋毁共和党领导人，指责他们是杀人犯。他只顾着沉浸在这种带有明显扭曲性质的描写中，却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作品的合理性，甚至激起了反对者更加极端而强辩的反幻想叙事，比如佛朗哥便在

这种叙事的一开始就被人抛弃在人粪池里淹死。内战及随后而来的数十年的独裁统治所激发出的情绪，在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反事实叙事中得到了应有的表现，战争重新来过，辛辣的讽刺更加明显。

像这样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分裂，有时还可能会滋生出更加铤而走险的反事实版本。1972年，在越南战争造成的政治动荡期间，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就有过这样的幻想：毛泽东与周恩来在1945年1月致信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主动提出前往白宫，就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事宜进行商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这封虚构的信被塔奇曼发表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还随信附上一篇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同意了这个提议，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美国可能被说服不再支持国民党，毛泽东则被说服不再以美国为敌，“从而朝鲜战争也可能不会爆发，一切痛苦的后果也可因此避免……我们也不会参加越南战争”。但大好的机会却溜掉了，按她的推断，这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从中作梗所致。不过，这种场景的现实性最终还是受到了质疑，尤其那时美国对共产主义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和毛泽东结盟对抗蒋介石是毫无可能性的。

而在英格兰，情况却截然相反。斯夸尔那略显零碎的文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其地位。毫无疑问，E·H·卡尔在贬低此类猜想，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室内游戏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正是《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中所收录的那些文章。突破这种局限的努力是在1979年由丹尼尔·斯诺曼（Daniel Snowman）做出的。斯诺曼是一位通俗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和BBC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发表过大量颇有建树、令人称道的历史文章。在出版的文集《假如我曾……10个历史幻想故事》（*If I Had Been…Ten Historical Fantasies*，伦敦，1979）的序言里，斯诺曼毫不隐讳地指出，在类似斯夸尔那样的猜想性历史文章中，“对‘假如’的允许程度没有进行规定，其结果便是任凭心情、天马行空的猜想”。斯诺曼借助了10位专业历史学家的力量，努力降低斯夸尔文集中的大量文章都曾出现的那种明显的主观专断，他要求那些文章的作者：

> 要呈现严格而可靠的历史背景，要对文章所涉及的人物和场景加以力所能及的准确重塑。不应该有预料之外的扭转乾坤之力（deus ex machina），不应该有虚构的暗杀行动，不应该有戏剧性的命运干预，为想象插上人为的翅膀。不仅如此，我们的作者都理应着眼于历史的真实时刻，着眼于当时所做下的决定，而对接下来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测应放在第二位。以此观之，文集中的那些“假如”都是在历史事实所慎重限定的框架内发生的。所做出的改变只是每篇文章的中心人物都做出了一个略微不同于真正历史，但又完全合乎情理的决定。

这里，斯诺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从而有效地限定了猜测的可行限度。最后，他让每位作者通过思考彼此的文章之间的关系进

行总结（所有作家依然均为男性）。这样的做法使得他的文集具有了一种整体性，并在其他几部作品中也有体现。

不过，问题依然是存在的。首先，正如斯诺曼所意识到的，是筛选“伟人”的问题（这些伟人也均为男性），这本身就表明历史是由伟人所创造的，其他力量的贡献则微乎其微，甚至可忽略不计，而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众多历史学家都可以指出其他非人为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有时甚至可代替人的作用。自然，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只有蠢人或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才会将历史的重要进程统统归功于那几个领导者”。话虽这样说，他最后还是没有直面问题，而是选择了回避，只是简单地评论说文集中的那些文章“并非旨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暗示‘伟人’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提供一些史料，为持续不断的争论提供参考”。也许更有趣的一点是，斯诺曼开始谈论自由意愿和决定论，他指出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总是模糊不定的，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们面临着众多具有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但我们只能在发生之后才开始去找寻做出这样选择的主要原因。然而，这样也并未让问题得到解决，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要求那些作者在如此谨慎而狭窄的条件限定下去想象着做一个不同的选择。

然而，如尼尔·弗格森曾指出的那样，更为严重的是，斯诺曼的整部文集都落入了一厢情愿的陷阱之中。如果让历史学家们身处某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位置去思考，没有人会说他能表现得那样敏锐、聪颖或勇敢。所有描写的关键都是让人物变得更加完美，让他避免犯下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错误，让他从历史上倒下的地方站起来获得胜利。因此，在这些文章当中，罗杰·汤普森（Rogen Thompson）化身为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阻止了美国的独立；埃斯蒙德·赖特（Esmond Wright）则化身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防止了其同时代的美国人将不满演变为革命；而彼得·卡尔弗特（Peter Calvert）也化身为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拯救了马克西米利安这位法兰西强加给墨西哥人的皇帝，并为那片纷乱之地带来数十年的安宁；还有莫里斯·皮尔顿（Maurice Pearton），化身为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Owen Dudley Edwards），化身为格莱斯顿（Gladstone），成功地解决爱尔兰问题；哈罗德·舒曼（Harold Shukman），化身为自由民主党成员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亦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几个月内的临时政府总理，阻止了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掌权；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化身为日本武装领导人东条英机，避免了发动对珍珠港的轰炸；罗杰·摩根（Roger Morgan），化身为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1952年斯大林发表演讲之后重新统一德国；菲利普·温莎（Philip Windsor），化身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 ek），成功杜绝了华沙条约组织干预，虽然在真实的历史中，1968年的华沙条约组织推翻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自由共产主义政体；哈罗德·布莱克莫尔（Harold Blakemore），化身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阻止了一场军事政变，在1972~1973年间使智利保持了其社会主义政府。

在斯诺曼的文集中，那些历史学家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那便是所有历史学家永远不该做的一件事：他们在教育已经作古的伟人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避免他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容易生出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去克服。正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关于德国普通民众对纳粹独裁态度的研究当中所说的那样："我会想，如果我身处当时，我会是地下抵抗运动中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那时会深感困惑与无助，正如我笔下的大部分德国民众一样。"我们只能去想象自己可以比过去的那些人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大肆发表后见之明，而且关键的是，我们是一群不同于过去的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斯诺曼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坚称，经过作者加工过后的历史人物的表现必须与我们从历史实证中所认识的身份相符合。但正如他所坦言的那样，这也不能完全回避作者们扮演死去已久的历史人物角色的问题。实际看来，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做的是按自己的希望将笔下的人物进行人格转变：克伦斯基变得更加果断，斯大林在1952年建议德国重新统一的文件上表达得更加真诚，阿连德不再那样糊涂而困惑，东条英机不再那样挑衅好斗，马克西米利安不再那样无助，梯也尔则更具洞察力。如果要让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起作用，势必违背斯诺曼所坚持的尊重人物个性的要求，正如其文集中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比这些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是以讨论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为背景，但除极少数例外，作者们几乎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做下这些不同决定后会产生的结果。就算有过考虑，他们所进行的后续猜测也都非常简短，最多就是一些试探性的讨论。谢尔本避免了美国独立，使伊丽莎白二世在两年后统治了美国；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所取得的胜利在长远看来作用微乎其微，因为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政变和独裁统治，虽然作者也讨论到了一些可能的情形：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因此美国也可能不会介入"一战"，而如果1870年的普法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一战"也同样可以避免。但是中间的几年却留出了空白，结果是这之间本将发生的事件或本该取得的发展也统统没有被考虑到。事实上，归根结底，这些长远的后续猜想不是作者们最感兴趣的，他们只密切着眼于所要求的主要任务，即仔细分析每个历史决定，将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角色去探究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另外，这些猜想为政客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量，以回顾历史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方法，用以反抗或推翻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历史力量。

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是德国古罗马历史研究专家，他在1984年出版的反事实叙事法研究文集却非常不同。他在简短的专题论文《从未发生过的历史》（*History that Never Happened*）中表示："这些文献讨论了历史中的其他可能，从而揭示出那些可以轻易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样的说法显得相当老套，而且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献对于讨论所要揭示的事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德曼特举出的15个例子涵盖了一些熟悉的猜想话题，例如723年（一个以早期科学知识进步为标志的欧洲和平年代）查理·马特战败，1588年（当时英格兰为天主教，大概因腓力二世废黜阿尔巴公爵并宣布宗教容忍政策而变得

自由）西班牙无敌舰队获胜，以及1914年（没有“一战”和“二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没有遭到暗杀。因此，德曼特和其他反事实主义者一样，也都倾向于一厢情愿。尽管如此，他毕竟提出了大量的核心问题，可供该主题的学者们进行思索，比如他认为“脱离事实的可能性猜测是不可能的”“事件要不同程度地进行预定”“不可能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换句话讲，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反事实猜想究竟能够走多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其加以控制或限定？他说得很对，“历史假想必须交由实证合理性进行检验。衡量非真实的标准就是真实本身”。

德曼特的论文为该主题带来了德国式的严谨思维，但是英美式的轻率却很快就再次浮出了水面。那是一本部头并不大的书，共有21篇文章，虽然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大多数作者都是英国和美国的专业历史学家。该书于1985年由法国历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编辑，被命名为《缺少一匹马：历史中的选择与机遇》（*For Want of a Horse: Choice and Chance in History*）（该书名借用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最后一段内容：理查国王因未能找到一匹马骑上逃跑而在战争中被杀，英格兰中世纪就此结束，都铎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封面的广告语为“幽默式猜想”，文集中包含了对众多话题的简要讨论，其中包括鸽子对于法国，罗宋汤和甜菜根汤对于俄罗斯的意义，以及谈论厄运（比如斯图亚特人遭受了出奇多的厄运）、机遇与意外（比如1914年斐迪南大公的汽车在萨拉热窝错误地掉了头，结果导致被刺杀）。实际上，只有5篇文章在真正进行猜想，因为它们主要集中在讨论事件发生的其他可能性上，而非只是叙述事件本身，并强调机遇与意外对扭转事态所起的作用。

还有一些娱乐性文章猜测过：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颇有天赋的棒球手，如果纽约巨人队找他签约而他也接受了邀请，他的人生又将怎样书写（没有古巴革命），或伏尔泰定居在了宾夕法尼亚（他就能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思路），或美国土著女孩宝嘉康蒂没有拯救开拓者约翰·史密斯（弗吉尼亚州就将失利，从此就没有美国革命，也没有美国南北战争），或南方联盟在南北战争中取胜（“南方礼仪”就将扣在联邦的头上），或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大获全胜（英格兰就将再次恢复天主教），或哈钦森总督设法阻止了波士顿茶党（美国将变为“另一个加拿大”）。然而，正像该书的编辑所说的，所有这些的出发点都是重新将“娱乐性和幽默感”引入历史写作，仅此而已。从细微事件中引申出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后果，是构成乐趣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在许多例子中，几乎所有超人的力量都被赋予在了个体行为者的身上：我们真的认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有能力让国内占绝对多数的新教徒都皈依天主教，并且还要求人格也同时皈依吗？我们真的认为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一名专业棒球手，他就将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

浮夸和奇想正是历史猜想一直未被历史学家甚至一些该领域的推进者严肃对待的两个主要原因。历史学家们总是将寻找历史真相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去想象历史本可能怎样发生。当前者面临诸多不同程度的挑战时，后者看起来就变得完全不具可能性，因为从核心处说，历史取

决于证据法规则，然而后者却很少或近乎没有可适用的规则。历史学家们历来都对猜测这种事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通常对“假如”的情形表示反感或不屑一顾。阿维泽尔·塔克（Aviezer Tucker）曾质疑道：“除了可以娱乐性地锻炼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外，史学上的反事实叙事法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在塔克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在“必需”的时候才会含蓄地借用反事实叙事法来说明如果某件事没有发生，那么后果则会有所不同。但他同时也说，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不会这样冒险，称某个原因为“必需的”而非“可能的”或“有利的”，如果不是认为其真的行之有效，他们几乎从不会去猜测事件本可能发生的另外情形。

同时，“假如”问题也时常会威胁到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性质，因为它将所有事情简化为机遇问题。该题材的一些典型例子强调说，微小的原因会导致巨大的事件，比如像帕斯卡猜想的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再短一点儿会发生的情形那样，看上去的确让人觉得有趣。A·J·P·泰勒（A. J. P. Taylor）便是使用这种方法的最好范例，这一点，无论在他的《战争时间表：“一战”是如何开始的》（*War by Timetable: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Began*，1969）中对“一战”爆发的解释，还是他的自传《我的个人历史》（*A Personal History*，1983）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如果所有事情都出于偶然，那么就不可能解释得通，而且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们整体上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受到奚落最多的是H·A·L·费希尔（H. A. L. Fisher），他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欧洲历史的作品中无奈地总结说“历史学家只有一条安全规则：他理应从人类命运发展中认识到偶然性与不可预见性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无法进行总结”。费希尔的观点遭到了排斥，因为总结与解释一直被大部分历史学家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果历史学家不对事情进行解释，他们的身份就降低了，他们就成了历史的记录者。

再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问题一般是针对个体的，正像猜测希特勒死得早些或列宁晚一些去世，那么事情将变得如何不同。甚至连E·H·卡尔也在其晚年打算承认，如果列宁活到了20世纪40年代，那么苏联便有可能避免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大事件起源于小事件的又一个例子，彰显的是一种天真的信仰，即伟人或至少是大人物具有超历史的力量，而这是早年的卡尔所无法认同的。卡尔关于列宁的猜想可视作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这却恰好是他在《历史是什么》中所猛烈抨击的对象。卡尔的例子所揭示的，或许是一种惊人的趋势，是挽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声誉及其合法性的愿望，所以才暗示说是斯大林妨碍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暴力、谋杀、饥荒等，都归罪于单个的人物而非苏联体制本身。他通过强调列宁和斯大林等的个体人物的重要性，来抵制20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历史以及随后文化历史的兴起而出现的远离“伟人”的历史研究趋势（这一趋势在他写作之前就早已开始出现），这是“假如”问题遭到质疑的另一个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回避有关历史其他可能性的猜测，而致力于讲述和解释历史事实。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

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曾经写道："在史学中，在探讨假设某个特定事件以另外的情形发生，或将某个特定人物从某次行动中排除出去后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这样的问题时，通常会避免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这种考虑是徒劳的，也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曾出现过转机的迹象。这种转机来自两方面。首先是量化的经济或者叫计量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在其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中就假设了一个他所谓的反事实假说。他建立了一个统计模型，用以说明如果美国的铁路系统没有建成，其经济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反事实假设的目的，在于用统计方式反映出铁路系统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换句话讲，铁路究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是一次统计实践，它的真正企图并非去想象一个没有铁路系统的美国，并非沉浸于对火车头横穿美国大平原之前的美国西部的怀想之中，也并非在说曾有任何铁路系统不会建成的可能性。它与猜测过去的其他可能性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反事实"概念正如其字面之意，也就是利用一个非事实因素去更好地解释事实结果。正因为其所提出的反事实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这种分析模型才有力量。

福格尔的分析本质上是统计实践：将铁路系统出现（而非消失）作为一系列公式的元，而当铁路系统被放进这些公式时，所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他证明了铁路系统并没有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那么大的作用。相同的方法在经济或计量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也有过运用，不过这样的行为受到了批评，福格尔被指责不应该用这种19世纪的脆弱的计算法来进行这些根本无法胜任的复杂的数字密集运算，不应该将铁路系统的修建与经济其他部分联系（或割裂）起来进行一系列没有证实或许也无法证实的猜想。最终，好与不好，计量经济学家们运用反事实都与研究历史中的机遇与偶然性毫无关系，反倒是研究后者恰会运用到前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假如"的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对已发生事实的其他可能性进行设置。在福格尔所反击的那些批判者看来，这种方法甚至还没有得到计量经济学家的广泛接受。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历史的"假如"进行的猜想，基本上只停留在娱乐层面，虽然偶然会出现一些严肃主题，但也不会特别严肃。到20世纪90年代，情形发生了变化。一大批文章突然涌现，这股出版热潮至今也没有消亡。1997年，尼尔·弗格森编辑了文集《虚拟的历史》，体现并助长了人们对该题材的兴趣。还有一个大部头著作几乎同步面世，其所收录的文章全都出自美国历史学家，即《假如联盟倒塌："二战"的60种可能场景》（*If the Allies Had Fallen: Sixty Alternate Scenarios of World War II*，丹尼斯·E·肖沃特、哈罗德·C·多伊奇编，纽约，1997）。1998年，《军事史季刊》（*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就该主题出版了一个特辑，次年再版时取名《假如呢？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What If? The World's Foremost Military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1999），编辑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是一位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也是《军事史季刊》的创刊编辑。"世界著名"这几个字在随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但考利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接着又出版了两部文集：一是《再假如呢？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More*

What If? Eminent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2001），二是《假如呢？美国：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What If? America: Eminent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2005）。2004年，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发表了文集《本可能是什么样：杰出史学家的12个“假如”历史猜想》（*What Might Have Been: Leading Historians on Twelve “What Ifs” of History*，伦敦，2004）。两年后，里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杰弗里·帕克、菲利普·泰特洛克三人联合出版了《重塑西方：改写世界史的“假如”设想》（*Unmaking the West: “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密歇根，2006）。这一切表明，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反事实历史叙事已然在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一种时尚。

这种风尚一直延续至今。就在2006年，还出版了邓肯·布拉克（Duncan Brack）的文集《戈尔总统……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esident Gore...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06），本书是《波蒂略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ime Minister Portillo...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04）的承继之作，而这本书的后续之作则是《鲍里斯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ime Minister Boris...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11），二者均由邓肯·布拉克和伊恩·戴尔（Iain Dale）共同编辑，而最后这本已经脱离了历史其他可能性猜想题材，步入了更加冒险的未来预测。在所有该题材的作者当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要属已退休的希腊裔美国军人彼得·楚拉斯（Peter Tsouras），迄今为止他已出版6部“另类历史”，第一部是1994年的《D日的灾难：德军击败盟军》（*Disaster at D-Day: The Germans Defeat the Allies*），之后的几部分别涉及斯大林格勒战役、冷战、东方之战、葛底斯堡战役，最后是文集《第三帝国的胜利：“二战”的另一种抉择》（*Third Reich Victorious: Alternate Decisions of World War II*，纽约，2002）。通俗史学家多米尼克·桑迪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于2010～2011年间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英国历史中类似的其他历史可能性。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则撰写了一本专著《假如呢？反事实主义与历史问题》（*What If? Counterfact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伦敦，2008）。毫无疑问，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已经出版的关于该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毫无疑问，将要出版的还会更多，尤其是在英美知识界。

我们该如何解释近来这种反事实历史叙事潮流的出现呢？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Gavriel Rosenfeld）在其具有启迪性的《希特勒未曾打赢的那场战争》（*The War Hitler Never Won*）一书中，第一次将其原因归结于曾在19世纪与20世纪主导西方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衰退与没落。随着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主义或消失，或演变为更加温和而不那么死板的意识形态——就如有人曾经所说的，当所有“主义”都变为“过去式主义”的时候，目的论消失，而历史成为开放式的，从而为对历史本可能选择某个或多个进程的猜想腾出了空间。也许，类似的，随着天佑论历史的结束，迪斯雷利、若弗鲁瓦和勒努维

耶这样的作家得以在19世纪开始思考历史的其他可能性。到20世纪末，进步观连同其意识形态都遭受了沉重打击，未来的确定性甚至可能性都已不存在了。新生的不确定性替代了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全球变暖、恐怖主义、传染病、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众多其他威胁，都造成了大范围的迷失感和焦虑感。对可知未来渐生的怀疑鼓励了人们对过去历史本可能发生的历程进行猜想，因为过去似乎也成了可变的。

伴随这些总体性的文化变迁，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怀疑真实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模糊化，并对时间的线性概念进行质疑。后现代主义恢复了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信任而削弱了科学研究，因为客观性是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学家的典型特点。英国历史学家、工党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在2004年就曾抱怨说，随着严谨的社会历史被移情文化史所代替，“这个充满偶然性和讽刺的后现代世界所给我们的，便是一系列自传语录，每份语录都和其他语录一样正确。每一种历史都和另一种历史一样好，而事实、反事实和虚构的界线则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历史都是‘假如’的历史”。数字革命使我们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过去的摄影记录创造出各类电影，然而在大部分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电脑合成的影像，而非真实历史的呈现，虚拟空间带领我们认识了另一种现实，在那里我们所遇到的人并不一定与他们看起来的样子相符。如今，许多人对中世纪欧洲的了解，都主要是从诸如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或者电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这样的奇幻影像中获得的。在影视作品中，历史被以娱乐资讯的形式呈现，在这种形式下，“基于真实故事的”戏剧性纪录片所播出的频率，远远高于那些不那么有趣、不掺进虚构进行点缀所呈现的历史节目。战争游戏和电脑模拟技术让我们得以重新进入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或场景，改变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的结局。

显然，这种历史中的某些成分可被归为娱乐，但也为反事实历史更严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潜力，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这种历史叙事往往容易出现一厢情愿式的幻想。E·H·卡尔就认为，反事实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在“翻旧账，沉迷幻想，……总而言之，是在刺激人们的遗憾（大多是在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解脱（针对我们无法逃脱的更糟糕的命运）等典型的反事实情绪”。但这样的斥责无疑与他曾对列宁的早逝表示遗憾形成了矛盾。在他看来，未来依然属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所犯的罪过使其实现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对过去的反事实研究几乎总是包含着对如今的政治隐喻，其形式有多种。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曾认为“幻想的场景……趋向于自由政治，通过想象更加美好的另一种过去（而那会将现状变得理想），以隐喻的方式支持人们改变现状”。但无论何时何地，但凡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非保守的政治学说、政府组织、国家体系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那么想要改变的便只有那些保守派人士，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是如此，托尼·布莱尔主政的英国也是如此。

[1]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3页。——编者注

[2] 斯夸尔（Squire）一词有“绅士”的意思。——编者注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第二章　虚拟历史

1997年尼尔·弗格森编辑出版了文集《虚拟的历史》，其主题现在被称为反事实历史。此后，越来越多被作者自称为反事实历史的书籍和文章便开始涌现，仅1990年以来的作品，就比在这之前所有该类型作品总量之和还要多。反事实历史如今出现得如此频繁，因此需要将它们归为一种派别进行研究。它们已不再是什么室内游戏或“幽默文章”（jeux d’esprit）；相反，它们实际上都是相当严肃的。这些文集中的反事实概念，与福格尔等计量经济学家所运用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些历史学家们不是进行理论上的统计计算，而是试着提出一系列严肃的讨论，对确已发生的历史给出别样的合理性阐释。

是什么让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比前辈们所玩的室内游戏或其他人所沉迷的一厢情愿更严肃呢？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公开的目的是要恢复历史中的自由意愿及偶然性，并重新重视人物个体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研究这些历史时人们往往只就非人为因素方面进行考虑。罗伯特·考利在《再假如呢？》的序言里写道：“描写伟人和重要事件的历史已经过时，如今流行的是大趋势，是那些膨胀的、破碎的、终将退却的潮流。在我们一贯的印象中，历史是必然的，那些发生过的事原本就没有以其他方式发生的可能，而人类存在的总体过程中是不存在戏剧性和偶然性的。”与此类似，杰里米·布莱克也认为，反事实历史的目的在于强调“历史变迁中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特点，在于破坏真实历史结果中的一切必然性”。安德鲁·罗伯茨在提倡运用反事实叙事法时称：“当然，这种想法会激怒辉格党、马克思主义者、决定论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坚信是注定的命运、宿命或神意决定了人类存在的人士。”布莱克与罗伯茨都鼓励历史学家们从后见之明的专横中解放出来，去试着将自己置身于过去，亲自去经历、去目睹，从中看到充满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未来。本杰明·乌加夫特（Benjamin Wurgaft）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表示：“通过尝试反事实思考，富有智慧的历史学家们可以将对纯粹偶然性的认识再次带到我们所讲的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文本及争论的这些故事里去。”

同样的，杰弗里·帕克和菲利普·泰特洛克在他们所编辑的文集《重塑西方》中，也谴责在历史学家中出现了一种“对回顾性决定论的偏见”，并称“要消除事后之见这种自鸣得意的现象，最好的办法便是让他们自身认识到，在每个人尚未受到后见之明的浸染前，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是多么的不确定”。西蒙·凯伊（Simon Kaye）在最近一篇讨论反事实叙事法的实用性的文章中称，反事实叙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强调历史当中“人类能动性的重要性”，来应对“当下还相信所谓必然确定性的可悲心态”。有些观点早就屡见不鲜：所有涉及该主题的文章都曾强调过历史当中的可能性与偶然性。例如，1982年约翰·梅里曼就说过“历史学家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可能性所包含的重要性，他们只是力图解释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他还说道：“认识到可能性的重要性将帮助专业历史学家们摆脱想要解释一切事物这种自我放纵的欲望。”20世纪90年代与进入21世纪后，关于反事实历史出现的新进展是人们更频繁而热烈地主张相信历史中的可能性。

大多数沿着这些思路进行反事实历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在政治和方法上都显得保守，这一点并不奇怪。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史学家甚至形成了一个团体：例如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就同时为弗格森与罗伯茨的文集撰稿；罗伯茨本人既为弗格森的文集写稿，也为考利的《再假如呢？》撰稿，当然还为自己的文集撰稿；杰弗里·帕克曾为考利的《假如呢？》和《再假如呢？》以及他自己的文集撰稿；而考利则曾为罗伯茨的书撰稿。正像杰里米·布莱克说的那样，由于反事实主义对“能动性——通常只是少数人的行动”特别重视，所以它显然更受右翼历史学家的欢迎，因为较之于左翼历史学家，“他们有更充分的准备去接受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等观念”。的确，很难看到有以左翼观点写出的反事实文章。无论出现怎样的轩然大波与反对浪潮，总体上左翼都坚信历史的潮流总是会朝着有利的一面滚滚向前。左翼历史学家们认为，既然能把握未来，为什么还要为过去不曾发生的感到遗憾呢？不过，E·H·卡尔对列宁如果活到了更大岁数后来可能发生何事的猜想，却是这个普遍规则的例外；社会主义者猜想，如果左翼能形成统一战线反对希特勒，那么后者便可能无法在1933年执政，这是另一个例外；G·M·特里维廉猜想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同样也是一个例外。但是从总体上看，左翼的这类猜想少之又少，并且相互出现的间隔也十分遥远。此外，某些政治和方法论上的原因也导致了左翼反事实题材文章的相对空缺。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就曾指出：

> “假如”意识下的历史会对目前的政治造成潜在的威胁，对更充分地理解过去也是一种威胁。不必奇怪，所谓进步是很少包含进步本身的，因为它暗示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环境并不重要这样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人是不受任何历史束缚的生物，能遵照自我意愿做出决定。按照安德鲁·罗伯茨的说法，我们应该明白“在人类事务中，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的潜在可能性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也没有必要大呼不公平，因为它们对事件的影响微乎其微。我并不想显得过于决定论主义，但这种保守的、对历史来说显得多余的对于过去的探讨，其政治意图是不难猜测的。

因此，实际上，反事实叙事法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右翼的一项专利。

反事实主义者一贯强调他们坚信偶然性和可能性，并将之视作捍卫个人权利的必然结果。但事实可能不只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么多。E·H·卡尔认为“历史事件中，在一个身处谷底而非顶峰的团体或国家里，强调历史的可能性或意外这种理论是很盛行的”。也许更应该这样说，大多数对本可能发生什么进行的幻想式猜测，其基础都是一种对已发生事实的遗憾与惋惜之情。的确，趋于保守的英国历史学家们或许已经开始强调可能性的作用，并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可能（或者说本应该）出现怎样的不同结局。保守党从1979年开始长期处于支配地位，但随着保守党的女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被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约翰·梅杰所取代，这

种支配地位显然已趋近结束，而梅杰的政治策略逐渐遭到新一代托利党右翼的非议——后者明显属于反事实主义者，政府因内讧而显得懦弱，变得四分五裂，后来在1997年被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所取代。

反事实主义者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他们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安德鲁·罗伯茨就曾提出三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并以他们为例指出："但凡是卡尔、汤普森[1]、霍布斯鲍姆（Hobsbawm）等三人所指责的东西，必定有着值得关注的内容。"但事实上，卡尔并不应该被列入这个名单。在卡尔职业生涯的早期，也就是当他还是外交部官员时，他便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强调可能性的作用或对本可能发生什么进行猜想的做法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是无法成为执政基础的。也正因如此，他对那些注定失败的企图改变真实历史的做法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一顾（他并非像一些人——包括尼尔·弗格森——所误称的那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事情的起因根本没有兴趣，他关注的只是结局）。但他的这种理论却是非常危险的，其将历史研究降格至当今政治附属物的地位，因此并没有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新的社会历史暴露和公开了被遗忘和蹂躏的过去时。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农民千年至福派及地中海地区社会匪徒的研究，到爱德华·汤普森下定决心"将贫穷的织袜工、卢德派[2]（Luddite）佃农、'落后的'手动织布机、'乌托邦'手工匠人，甚至被蛊惑的乔安娜·索斯考特[3]（Joanna Southcott）的追随者，从后辈强烈的优越感中解救出来"等都是证明。卡尔鄙视一切他眼中的历史败笔，这使他将有关历史上的牺牲者与失败者的研究搅和在了一起，并将历史错过的其他可能性及令人沮丧的发展也混淆到了一起进行猜测。

尽管卡尔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比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则一直被置于反事实主义者的火线上。这样的行为因为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马克思主义从学界迅速淡出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事实历史学家们所做的是在鞭笞着一匹意识形态的死马，或者说在开枪打一个稻草人，而他们所批评的却是那些历史学家和所有未被斯大林教条所束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说过的事情。认为历史应该肯定偶然性及可能性的概念这种观点，对于霍布斯鲍姆或汤普森来说并不新鲜，甚至连卡尔的《苏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中也曾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个性特点及各自政策。的确，对历史必然性的各个阶段都教条式地加以坚持，这样的例子只能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的政治教材中才能找到，在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是没有的。即便是斯大林及其同僚，最终也都倒下了，当然，他们始终坚持的是具有相对自治性质的"上层建筑"，或换句话说，斯大林相信，像列宁和他本人这样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具有凌驾于更广泛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结构之上的自由，比如推动伟大的俄国革命，使之在几个月内便从1917年1月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这种革命会导致延绵数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忽略掉这些简单目标，弗格森特意将火力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他们对“自由意志”的蔑视，弗格森指出他们曾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着”，以及马克思曾提问“人们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吗”，而回答是“绝不能”。然而马克思本人并非如这些费尽心思挑选出来的语录所表明的那样，认为人类在巨大的历史因素面前无能为力。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弗格森没有引用到，马克思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并且，马克思从未打算用他的普遍理论去解释特定事件（尽管他在实践中并没有总是坚持如此，但至少他的新闻工作是这样贯彻的），相反，他将其视作理解普遍趋势的辅助。总之，这段言论从根本上讲并非是针对历史，而是关于自由意愿而言的。正如艾伦·梅吉尔（Alan Megill）所说的那样，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人类既是被限定的也是自由的，既屈从于外部力量也能创造和利用这种力量”。弗格森、罗伯茨和其他反事实主义者们的讨论，一方面是基于一种不现实的、极端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又完全屈从于非人为的历史力量，这在实际中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或者说极少数人——才会认同：绝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是发生在这两个想象极端之间的。因此，罗伯茨、布莱克、考利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大胆言论都脱离了主题；每个事件的价值都必须通过历史的检验来判断。

强调人类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对人类活动具有限制性影响的观点的人，并非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历史史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中，以地中海作为隐喻，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历史：静止不变的深层水域象征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民生活；缓慢流动的中间层象征经济和社会变革；而最表面的白沫则象征政治历史。在缩小人类个体的回旋空间上，布罗代尔已经比马克思走得远了很多，这也许是在反映作者自身所处的困境，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布罗代尔撰写这部作品的初稿时，他正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中。对于他来说，现代早期绝大多数人都活在土地上，靠着土地生存，他们如同卑微的昆虫，在面对更大的外部力量时就变得绝望无助。但布罗代尔并未令人满意地将不同层面的历史联系起来，因此也并没有为解决历史起因问题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他没能表现出政治历史是怎样受到更大的外部因素影响的，只是简单地提到在16世纪时从米兰寄一封信到马德里要花费很长时间这样的细节。他对政治历史的描写或多或少是一种独立于社会、经济及环境历史的描写，所以他在这部伟大作品的最后部分里，为人类进行决策制定、陆地和海洋战争，乃至在法庭上的派系争斗，都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体现出对政治事件相对保守的叙述方式。整部作品想要表达的重点是，所有这些政治活动对生活在陆地上的普通劳动人民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小（这是一个带有明显瑕疵的假设，当四处掠夺的军队踏过田地、捣毁了农作物、传播疫病时，农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因此，从布罗代尔将政治事件降格为更大范围的政治力量的附属品

这个层面上来讲，他并非真正的决定论主义者。的确，在对政治历史进行描写时，他和其他反事实主义者一样，也都热衷于反事实叙事法的运用。他曾说：“以历史未曾发生过的样子去重新描写历史，以改变历史中重要事件的发展进程来想象本可能会发生什么，或许是一种坏习惯。尽管这种手法下的写作如同一种幻象，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用自己的方式衡量事件、安排情节、处理人物，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应该为整段历史进程负责的人。”此外，布罗代尔还想象出了这样一个法国：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下令将新教变为法国的国教而没有引起任何重大冲突。

纵然如此，尼尔·弗格森却在其文集《虚拟的历史》的序言中，称他的这部反事实文集是为历史决定论所下的一剂“必要良药”，所针对的既有布罗代尔的实践，也有马克思的说教。那么，什么是决定论呢？反事实历史又是怎能去动摇它的呢？按普通字典的解释，决定论认为事件是（或可能是）由人类意愿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即事情不仅会在人的意愿下发生，还可能是人控制之外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似乎实际上只应该有极少数历史学家会反对决定论；就像滚石乐队提醒我们的那样，你不会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你得到的也不见得是他人想要的。很久以前，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就曾指出，宗教改革与后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争斗是空前的，而最终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不想要的，那便是出现了宗教容忍与启蒙怀疑主义。

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弗格森所说的决定论中，人的意愿并非是由各种非人为力量所限制的，而是受到其他许多非常有必要解决的事情的限制。的确，阿维泽尔·塔克就曾指出，对于弗格森而言，决定论是“一个概念集合，里面包含了他所反对的一切史学主义与方法论”。因此，反过来看这些主义和方法论便显得尤为重要。弗格森给反事实叙事法所贴上的决定论这一标签，其所包含的主要观念有四个。第一，目的论，即描写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被推向某个结局的。像特里维廉这样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便将整个英国历史（同时也通过暗示将其他所有国家的历史）引向自由民主党的建立；而马克思则将历史看作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行进过程。从全球范围看，这两种目的论都将过去的事件及发展沿着一条直线进行了重置，而这条直线也都引向一个还未实现的预测中的未来。塔克认为，称历史是按这种方法被预设的这种说法是无法被证实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对于历史轨道的某一段而言，我们也许可以用反事实假说对其提出质疑，但无法从整体上去否定它，因为我们无从得知这条轨道的终点在哪里。由此可以得出，反事实只能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目的论的历史进行质疑；而假设事件的其他可能性——如在中短期内可以走上别的轨道，任何一个决意坚持目的论之正确性的人，都总是能够用长期事件将其重新拉回来。

弗格森所认为的决定论的第二个观念，是指政治事件由社会及经济力量决定。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这样说过；他们所说的，是从一个社会形态转为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宏观、长期历史发展，相比之下，这

既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不受个别政治事件或军事事件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谈及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不过，这些说法显然会妨碍对宏观趋势的理解，而宏观趋势的重要性又是他们始终都在强调的。弗格森还注意到，后来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从早期的俄国理论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i Plekhanov）开始——是如何将偶然与必然调和到一起的。那就是，声称个体可以影响事情发生的方式、时间和地点，但无法影响历史的总体趋势，因为历史趋势是由更为宽泛的因素，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决定的；他们试图通过这种观点将各种明显的偶然因素——比如战场上的某些军事胜利也可能换一种方式获得，又比如罗伯斯庇尔或波拿巴·拿破仑等这样那样的历史人物，完全可能因为一个机缘而尚未留下其历史印记就黯然离世——与马克思主义所坚信的政治观结合起来，即政治改革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变革无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弗格森认为，通过设置出与社会经济因素毫不相关的另一种历史进程，反事实叙事便能动摇此类言论。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就是将一切都简化为机缘，而对重要历史事件之所以出现的种种日积月累的因素则一概置之不顾。

例如，在回答为何希特勒能上台执政这个问题时，弗格森解释说德国历史学家们“依然死死认定‘德国灾难’的种子是根深蒂固的这一观点”。他真的是在说一切事情都源于偶然吗？解决这一问题的更有效的办法，或许是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观点，按照他的观点，德国的社会结构，俾斯麦以降的德国政治文化的性质，魏玛共和国的软弱，20世纪2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德国那灾难性的经济表现，1919年获胜的协约国以和平条约强加给德国的耻辱，以及类似的其他因素等，全都明显地解释了民主政体的失败原因，但这一切却并未准确地解释纳粹主义获胜的时间表或本质特征，也并没有说清为什么1933年上台执政的是纳粹党及其支持者，而不是（比如说）德国军方支持下的另一种独裁体制形式。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地引证人为因素，诸如希特勒拒绝参加任何联合政治，除非是当政府首脑，以及加入围绕在兴登堡总统身边的阴谋集团，等等。引证这些长期原因并没有让人认为希特勒夺取政权是无可避免的，但强烈暗示了魏玛的民主政体注定会在20世纪30年代垮台。要证明偶然性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需要使用反事实叙事，只需简单对证据进行验证即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关键是要分析出可能性与偶然性究竟是如何在一个限制了其影响范围的背景下产生作用的。

许多反事实主义者的研究起点，都是那些确已发生而又人所共知的偶然性事件：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逃离巴黎，在瓦伦纽斯镇被人截住，导致两人被捕并最终被革命党人处死；1605年企图炸死英国国王和议会的“火药阴谋”失败；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萨拉热窝的错误掉头将其送上了被人暗杀的不归之途；1588年一场恶风吹散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通常，他们都以暗杀目标的意外存活、国王们的意外早逝、后代子嗣的不幸死亡、突然出现的战斗转机等作为他们的推测中心。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否认类似偶然事件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于随之发生的严重后果，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其他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比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路易

十六成功出逃并带着一支奥地利人领导的军队试图镇压革命，那么革命分子想要保护其革命成果就势必付出成倍的努力；1605年英国政治精英之死将会激怒英国新教徒导致其发动对天主教徒的大规模屠杀；如果1914年6月，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没能成功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们势必会再次行动，直到刺杀成功，因此结果会是同样的惨剧；如果1588年西班牙军队成功登陆英格兰，他们将会被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军队联合其他支持者打得一败涂地，而女王从此变得颇受欢迎。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向其他结局，然而这或许需要历史背景中发生更大的改变，才能促成反事实主义者所说的那些影响发挥其作用。像这种反事实在脱离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才能假定其拥有巨大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微小的偶然事件发生变化时，更大范畴内的情形一定还和原来的完全一样，其变化进程确实会有所减缓。

上述例子已经让我们远远脱离了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但这里真正存在的问题并非在于各种更大历史力量的性质，而是其中某件事是如何起到最关键作用的。由此，我们进入目的论的第三种类型，据称这一类型非常容易受到反事实的攻击，即历史是由发展的普遍定律所决定的（如同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规定的那样）。关于历史定律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历史学家们从未真正认同过历史遵循着科学定律意义下的规律这一观点；历史绝不会像化学反应那样严格而可预测地发展。我们可能会强调某些因果关系大于另一些关系，或者运用某个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变体，来帮助我们解释过去，但是如果说到某些历史因素对其他一些事情的影响，比如文化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或军事力量取决于经济力量，这些都是无法说服我们去相信历史的可预见性的。并且，如果我们说一些因素是取决于另一些因素的，那也就意味着一些因素是更加独立于其他因素的。“意外之于系统是相对的，不是非决定性的。”历史学家从不会刻板或坚定不移地运用某个理论；过去的复杂性、无序性以及证据的缺失，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通常“用偶然的干扰变量和辅助理论去阐释为什么历史会明显地偏离他们所钟爱的理论”。用塔克的话来讲，“像这样的史学反事实叙事法是不会对这样的特权理论形成挑战的”。如果决定论是指历史发展是自有定律的，那么按照塔克的话，它也并不能让人清楚“反事实叙事法究竟为何会比明显的历史事实更能反驳这些理论”。

第四，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启发下，弗格森认为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叙述修辞手法——比如将一段历史描写为悲剧或喜剧——是必然具有确定性的，因为它是利用历史的风格而非历史的内容来假设一个特定的结局的。不过在我看来，它根本就不具备什么必然的确定性，因为这种修辞手法并非先于叙述，而是跟随叙述进行的。换言之，我们是先编辑好一段叙述，然后再根据怎样看起来合理来决定它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并且历史书写也并不要求叙述者完全以某种特定的视角去看待离散事件或人物特性；相反，是对其进行评价，并最终以叙述的方式加以呈现。当然，海登·怀特认为任意一种模式下的叙述框架都已预先选定了叙述的构成要素。在他看来，任何历史，如果超越了单纯的编

年史或古物研究，都是一种“元历史”（metahistory），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一种特定的叙述修辞手法，无法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不过当然，任何一位专业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实事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解释性假说，但我们也需要考察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而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因此我们的最终成品很可能会与其最初的样子大相径庭。

怀特认为所有历史都可以用于为数不多的叙述修辞手法的一种或几种，他的这一说法也许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史诗是适用的，比如他所研究的麦考利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之类，但对现代分析史学却不适用，而这恰好是他根本就不予讨论的。事实上，总有证据表明，对于悲剧或喜剧故事也是很难适用的，对此我们既不能轻易忽略，也无法解释清楚。以大多数讲述过苏格兰女王玛丽生平事迹的历史学家为例，他们都将玛丽的一生视为悲剧，认为她是都铎强权政治的牺牲品：玛丽成长于16世纪的法国，她在王位上经历了动荡而坎坷的个人和政治生活，因其天主教身份而被冷酷苛刻的新教徒逐出苏格兰，又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唯恐她会对自己的王位和新教改革构成威胁而遭到囚禁，最终则以进行所谓的一系列篡位阴谋的罪名被处以极刑。但是从未有人企图否认玛丽所受的苦难与最终的处决部分原因是由她自身造成的；而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提及她曾参与“巴宾顿阴谋”或“思罗克莫顿阴谋”（两次都获得了玛丽的认同，也都旨在谋杀伊丽莎白并篡夺其王位），是不会被人当作严肃的历史学家的。

因此在实际使用时，一旦选择了某种特定的叙述模式，便只能用作宏观的道德评判，而不能对证据的特殊性给出任何的特定阐释或道德评判，也无法用以否认偶然性的作用（比如，思罗克莫顿的暴露，就是因女王的情报人员察觉他频繁地造访法国大使馆，显得十分可疑）。而最终，连怀特本人都承认可以通过运用证据来查明历史的真实性或历史中的其他特殊事件（这是怀特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是有人向他指出怀疑论为否认犹太大屠杀敞开了大门之后才做出的让步）。因此，如所有专业历史学家所知，事实证据本身在叙述的塑造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选择适合自己叙述的事实而忽略掉其他事实。因此弗格森所称的“叙述决定论”并非意味着构建某个历史必然形式时的随意加工，再次强调，这也不能轻易说明反事实叙事法对颠覆这种加工有多必要，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叙述定会提及偶然事件，提及那些本可能使结果变得不同的事情。

有时，弗格森在《虚拟的历史》中对决定论的抨击，所针对的似乎已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广泛力量与深层趋势之类的概念，还有因果关系的概念。他以混沌理论的发展和科学上的不确定观为佐证，认为人类事件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制于个体的自由意志，而非更难。对于弗格森来说，几乎所有认为像大英帝国的盛衰或者英国内战爆发这样的大事件或大过程都有着大起因的说法，都该被视作决定论主义的，因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列举出一系列起因或一整套等级时——如上面两个例子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那么他同时就在强烈地暗示事件的必然性。弗格森专门强调了混沌理论，一个经典

的例子是：一只蝴蝶在日本扇动翅膀，最后会导致百慕大发生一场飓风——即微小的起因在不经意间会导致巨大的后果。这个例子深受反事实主义历史学家喜爱，而弗格森在批判梅里曼的文集里则对其嗤之以鼻。那些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混沌无序的（即主要是偶然性的产物）的人，都必须承认更大的因果关系系统依然存在并且决定着事件的总体格局，尽管无法决定这些事件的具体本质或时间。混沌理论在运用于历史学时不容易经受数学论证，在运用于科学时也一样；事实上，它根本就不适用。没有可检验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类事件正变得愈加混沌无序，不管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地球外的宇宙中发生。“相信混沌历史的人，”如塔克指出的，“一定认为反事实情形在起初时条件都相差无几，但结果却迥异。”但是当然，这得依靠将某个特殊的起因或条件独立出来，并证明它比另外的起因或条件都更为必要；换句话讲，如果要构建一个反事实，就必须表明我们所要改变的某个条件或起因是具有决定性的，否则我们就只是简单地更改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对所研究的结局不会起到太大改变。这就让我们再次绕回到了弗格森所认为的过于决定论主义的一系列等级因果概念。

因此，无论从哪种可能的方法上，反事实叙事法都无法像简单事实证据那样去动摇决定论。但是当然，其支持者想要证明反事实叙事法的实用性与必要性，他们的方法也不止这一种。他们可以证明每个特定事件和决策并无必然关联，而是由可能性和偶然性所支配的。通过仔细观察在某一案例（例如“一战”的爆发）中决策人所面临的各种选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做的那些决定。弗格森说，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既定事实的其他可能性进行检验，但是他补充道，关键是这些其他可能性的数量和形式并不是无限的。相反，历史学家们显然应该只考虑那些起码具有合理性的其他结果，换句话说是当代作家们真正考虑和书写的那些可能性（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写出这些猜想，也就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似乎完美而合理。但是，这样做会将冲动行为、人为事故、意外错误之类的其他因素排除在外，从而会将偶然性的作用降低到忽略不计，因为只有经过仔细斟酌和认真辩论的条件才会被考虑进去。并且，在我看来，弗格森承认可能性的数量是有限的，实际上是支持了马克思的论断，即人们无法拥有绝对自由去行使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生活和行为的条件并非他们自身做出的选择，而通常是受制于那些超出了他们的掌控权限的力量。说到底这些力量就是经济、权力政治、文化、社会、智力、地理或其他一些制约着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因素，而并非人类意志本身的缺陷或弱点，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众多独裁统治者，每个人都曾为此付出过代价。同时，这些制约因素也不过就是制约因素而已，在这些制约范围内，决策者依然拥有众多选择，并能从中做出自己的抉择。

比如，1914年7月和8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向德国宣战，二是让英国保持中立国身份作壁上观；在当时的时间背景下，向法国或俄国宣战则不在其选择范围内。假设英国成为中立国这样的反事实叙事能否帮助我们理解格雷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条路呢？在《虚拟的历史》一书中——关

于“德皇的欧洲联盟”的论述——以及《战争的悲悯》（*The Pity of War*）一书中，弗格森详细研究了该问题。他指出，战争过后，参战者和历史学家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鉴于中立的比利时（得到英国保证）遭到了德国侵略，而德国的胜利对欧洲权力均衡构成了威胁，最重要的是还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因此英国加入战争势在必行。中立似乎绝不可能发生。然而弗格森却说：

> 对中立“反事实”的忽略是战后歉意（postwar apologies）的一种情感反映。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无论出于道德还是战略原因，英国都不可能作壁上观。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现代文献（而不是那些残酷的决定论回忆实录），就会发现其实英国当时差一点儿就选择中立了。一方面，奥地利、德国、俄国和法国之间的大陆战争似乎势必会在1914年爆发，这一点似乎不可否认；另一方面，英国决定加入战争却真的并非不可避免。只有试着理解如果当时英国置身事外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才能肯定当时英国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弗格森看来，保持中立可能发生的一切显示，格雷选择加入战争完全是一个错误决定。如果英国能置身事外，则德国的作战目标便会更加适度，德军便能赢得战争。

如果赢得了对欧洲其余国家的霸权（反正到了后来的20世纪末期他们也通过建立和主导欧盟达到了这一目的），德国就不会感到沮丧和挫败，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希特勒和“二战”，没有了1939～1945年间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厮杀，没有了毒气室，也没有了纳粹大屠杀。正如弗格森写的那样：“就算当初英国只是（在1914年）袖手旁观了几周，欧洲大陆可能因此变为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欧盟这样的国家组织，但也不会致使英国的海外势力在深受两次世界大战重创后受到极大削弱。”大英帝国将存活下来，而英国也将在20世纪继续保持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不至于沦落到仅仅成为德国主导下的联合欧洲的一部分。

弗格森写于1997年的反事实猜想，与在其5年之前另一位年轻的英国保守派历史学家约翰·查姆利（John Charmley）所发表的《丘吉尔：荣耀的终结》（*Churchill: The End of Glory*）一书中的内容刚好吻合。查姆利在这部作品中打破了无数禁忌，大肆抨击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中的领导作用。查姆利谴责丘吉尔在1940年“二战”爆发几个月时就任英国首相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那便是继续与希特勒作战。为了战争，他花费了巨额的资金，让英国变得不堪一击，以至于无法在战后继续保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并且，这不仅对英国造成了重创，还影响到了其殖民地，因为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实现独立，而是继续接受来自伦敦的优秀的文明化统治，那么它们各方面的发展都将好很多。丘吉尔将英国的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美国，而后者借给了英国大量资金和战争装备，并借着债务逼迫这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投降——这正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始至终的主要目的之一。罗斯福在和平首脑会议上

轻易就让丘吉尔败下阵来，从而为一个由美国主导而非英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战争并未将波兰从暴政中解救出来。在国内，丘吉尔将全部精力都用于作战，这就使工党的大臣们有机会在他的联合政府中说服选民认可他们的治理能力，从而在1945年的选举中获胜，并在1945~1951年期间建立了在查姆利看来具有灾难性的现代福利国家，培养出了一种依赖和自满的文化，导致英国国力急剧衰退，直到撒切尔夫人实施了激进改革，托利党政治才开始让这个国家悬崖勒马，并在1979年后建立了积极进取的文化。查姆利的结论令人震惊：丘吉尔宣称自己代表大英帝国，代表英国的独立，代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英国；但是到了1945年7月，他的第一个代表就已经近乎失败，第二个代表则完全依赖于美国，至于第三个代表，则在工党选举成功后宣告破灭。

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右翼托利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他在看到查姆利的作品后表示，1940年春天，在英国遭遇敦刻尔克的溃败后，以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为首的亲善派曾呼吁与德国达成妥协以换取和平，如果丘吉尔当初听从了亲善派的建议，那么事情又将有怎样的不同呢？一年后，第三帝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飞抵苏格兰，带来了查姆利所称的“绝妙条款”，然而丘吉尔却愚蠢地拒绝了他。克拉克认为，如果丘吉尔当时与纳粹党达成了和平协议，他就可以将军队从欧洲战场转向远东地区，就可以保护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不受日本侵略，从而得以保留大英帝国。英国退出战场，美国就将不会介入，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就将在东线战场彼此争斗、相持不下，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将会两败俱伤，俄国的势力会因此削弱，以至于无法在战后将手伸向其他东欧国家。并且，在1940年或甚至1941年5月退出战争也并不意味着要丢下欧洲犹太人任其自生自灭，因为那时纳粹的大清洗计划尚未正式展开，而且就算英国决定继续与纳粹作战，这对拯救犹太人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同时，查姆利还指出，事实上在战时与战后苏联全体人民遭受大规模屠杀及强制驱逐时，英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加以阻止。所以，英国也没有理由为在“二战”中的表现感到骄傲。克拉克和查姆利都坚持认为，英国参与到欧洲大陆的力量争夺中，其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

这些反事实猜想都是建立在相当站不住脚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至少在五个主要方面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第一，就1914年8月而言，在德国并不会对英国利益造成威胁这一观点方面，弗格森本人也是自相矛盾的。在《战争的悲悯》中，他的确在某个地方说过，1914年的德国，其力量还不足以对英国构成真正威胁，但他也在另一处明确表示德国当时的战争机器在效率和效果上远远高于英国，因为前者比后者用低很多的经济成本杀死了更多的敌人。实际上，如果探究一下其背后的计算原理，你就能发现，战争中最高效的国家是土耳其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仅在战争上动用了国民总资产中的很小一部分，便成功杀死了各自大量的敌人。说到底，这种计算说明不了太大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真正证据表明，如果英国置身战争之外，德国的战争目标会因此变得更加有限，或者，换句话讲，并没有证据显示英国加入战争后，德国立马就拓展了其原先的战争目标。至于1914年那臭名昭著的“九月计划”，其中的

大部分目标根本与英国毫无关系。那么，在事关英国中立这一反事实叙事中，其第二套经验证据又是什么呢？希特勒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和约条款呢？在占领西欧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将橄榄枝抛向英国，但仔细研究这些演讲便会发现，其内容里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形式的具体措施。真正的谈判从未开始过，因此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可能会立下怎样的条件。毫无疑问，1940年的春天是一个关键时刻，以哈利法克斯为首的亲善派完全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我们不需要通过反事实猜想便可得知。至于鲁道夫·赫斯飞抵苏格兰之事，德国现有的一切史料都表明他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批准，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在得知此事后也都大为震惊和失望。他并没有带来什么绝妙的“条款”，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有力证据证明亲善派有过邀请鲁道夫·赫斯到英国去的意向。

有人可能会认为，就算英国没有加入或周旋于两次大战之中，当时的德国政府最终也会向英国宣战，而且如果德国在与大陆敌人的战斗中取胜，那么它在对英作战中取胜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又或许德国会利用和平妥协的方式将大英帝国一点点地分肢瓦解。起码丘吉尔本人在1940年5月28日那天也是这么对他的战时内阁说的：

> 现在想是否媾和是没有用的，而如果继续战斗，我们应该能争取从德国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德国人会想要我们的舰队——那就等于“裁军”，要我们的海军基地，要我们更多的其他东西。到时我们便会沦为一个奴隶国家，就算在莫斯利或其他什么人的手下建立起一个英国政府，也只不过是希特勒操控的傀儡而已。

丘吉尔的观点为反事实猜想提供了一个远比弗格森或查姆利的成果更好的基础。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英国不加入欧洲大战，而是坐观其他参战国彼此之间一决高下，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提出反“假如”的猜想也是同样可以的，并且和那些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观点一样貌似非常可信。举一个或许可能被称作“反反事实”的关于“二战”的例子，出自左翼历史学家保罗·艾迪生（Paul Addison）：

> 英国……或许不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和平条约，从而使英国本土（英属海峡群岛可能除外）免遭占领之苦。君主制、大本钟、议会之母等还会继续存在，仿佛一切如常。但被包围在一个纳粹化后的欧洲里，战败后的英国将逐渐成为一个附庸国，其国内政治将始终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时刻担心会冒犯德国的阴影之中。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及其支持者的力量或许会破天荒地变得需要加以重视，而法西斯主义则将成为对右翼年轻人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信条。这样离希特勒发起对英国政治中的反德集团的镇压还有多远？离他要求英国在其欧洲计划中共同“解决犹太人问题”又有多远？

这些情形至少与查姆利和克拉克所描绘的一样，看似十分可信。

事实上安德鲁·罗伯茨就支持艾迪生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与英国单独签署合约，那么德国势必会战胜苏联，因为希特勒就不用在地中海（或至少不用在北非）部署军队来支持墨索里尼。与查姆利所声称的相反，希特勒对英国的保证明显缺乏诚意，一旦战胜苏联，下一步便会对英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罗伯茨说，拒绝独善其身这个决定“丘吉尔因此是做对了”。不过，罗伯茨的反事实已经触到并越过了界限，因为就算英国没有加入战争，希特勒是否有能力将苏联打败也是根本无法确定的。C·J·桑瑟姆（C. J. Sansom）在2012年出版反事实小说《统治》（*Dominion*），他将一个20世纪50年代德国统治下的英国作为反事实基础，依然认为东部的战争“总归是无法（对德国而言）取得胜利的；土地面积太过辽阔了，国民也非常不友好”。和罗伯茨所持观点相反，他认为，鉴于意大利在1941年对抗希腊时那令人失望的表现，德国军队破坏“巴巴罗萨计划”以援救失利的意大利（至少到了地中海北部）无论怎样都是很可能发生的。这里的“假如”假设得太大太多，以至于令人无从相信，再考虑到苏联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从“巴巴罗萨计划”一开始，德国在东线投入的军事资源就从未少于其全部的2/3，就算再投入一点儿也不太可能带来多大的改观。

第三，至于大英帝国，没有人能够证明如果英国在1914年或1939~1945年保持中立便能守住这个帝国。自从“提尔皮茨号”计划于19世纪末在北海与英国皇家海军抗衡并将之破坏或者说摧毁掉后，德国的公海舰队就一直在建造之中，因此如果英国真的拒绝加入战争而德国在“一战”中获胜，谁又能说皇帝陛下和他的将军们不会将敌意的目光转向大英帝国呢？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无论是在1914年还是在1939年，德国的长期对外政策都远远不只是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经济霸权。当时有明确迹象表明德国政府除了其他目的外，还对大英帝国及其海外势力发起了挑战。希特勒曾公开表明过他的帝国梦想，弗格森也曾引用过这一表述，借以暗示希特勒想要保留帝国之意，但事实上希特勒是旨在将英帝国树立为德国的榜样。不过，由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创造的另一个反事实故事却是，随着德国征服了英国统治下的中东并威胁侵略印度，德国在东线已然取得胜利，而大英帝国则在其决定是否单独媾和之前就已经轰然倒塌。

当然，实际上有大量证据表明，日渐崛起的美国势力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印度、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断转变与演进，这些都是促使“二战”后去殖民化背后的真正力量，换句话讲，这是纵使英国节约了再多财力与资源，不在战争上花去数十亿英镑，也无法阻挡的进程。桑瑟姆认为，大英帝国自布尔战争后便长期处于不断衰落之中，不加入欧洲战争只会加速这一进程，无论是对于1914年的“一战”，还是对于1940年的“二战”来说，都是如此。他猜测，大英帝国的组成成员，例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都不会在1940年接受单独媾和，而与德国产生关系则将在印度引发无法控制的动乱（1939年正值印度走向主权国之路的时期）。受到压制的英国，其软弱性在全世界眼里

都显而易见，进而可能掀起国家独立运动的高潮，首当其冲的便是南亚。最后便是这样的猜测，即大英帝国如果继续无视在管理帝国中所花费的大量人力与资源，无视其后期统治中那不断加重的负面影响（从肯尼亚及马来亚的暴行到印度饥荒和疾病），说不定英国还发展得更好。毕竟，那些曾受英国统治的后殖民地国家，并非全都幸免于难地发展成或陷入一系列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另外，还有一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即“二战”后的英国，如果能从过度海外投入的巨大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那么对其国内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对英国是有益的，对其曾经的殖民地也是有益的。

第四，将1918年德国主导下的欧洲称为一个欧洲联盟，或将如今的欧盟描述为德国主导欧洲的工具，这种说法从经验上讲都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当弗格森和查姆利还在写作时，德国已转向了国内，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全心致力于将民主德国领入现代世界这一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之中。至于“第四帝国”这一说法则实属危言耸听的幻想；自1945年后，德国便开始对权力产生恐惧，并没有继续执着于权力争夺。而且无论如何，欧盟毕竟是一个规模如此巨大而情况又如此复杂的组织，不可能笼统地将其概括为是由德国主导的。就算稍微更准确一点儿地称其为依靠德国和法国的联合霸权，即法德联盟，这种说法也并不公平，尤其是扩大后的欧盟总共拥有28个成员国（迄今为止），而且这种说法也明显忽略了欧盟在执行重要决定时是需要通过部长理事会的，并且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是实行一票否决权的。的确，德国对欧元区内的南欧经济体实行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是1923年的经历所留下的对通货膨胀的创伤性恐惧，有充分理由表明更强烈的通货膨胀因素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和德国1914年计划建立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所谓中欧经济区是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也完全不同于纳粹德国在20世纪40年代对那些被占领国所进行的掠夺和剥削。所谓“德皇的欧洲联盟”，其基础是“九月计划”和之后起草的战争目标里所设想的领土扩张后的德国，而不是如今面积小得多的德国；其巩固则是靠强权，包括实施独裁和等级制度、剥夺少数群体的人权、遏制联合工会，以及强制实施德国关税、建立德式的国家机构等。我们不必猜测便清楚地知道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新秩序”意味着什么：残酷剥削、大肆屠杀、持续不断的军事化。能说的事情只有一件，即如果纳粹在“二战”中获胜，那么，很大的可能性便是出现谨慎而务实的因素，像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Albert Speer）之类，并创造一个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欧盟那样的“新秩序”。欧盟是立足于和平与谅解两大理想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而和平与谅解之于纳粹分子，包括施佩尔，则是闻所未闻的。

第五，查姆利的反事实暗示着这样的思想，如果工党没有在1945年掌权并进而开创了一个福利国家，那么英国经济就可能会发展得更加成功，因为上进文化势必会取代已有的依赖文化；但这样的反事实猜想却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份报告不仅被工党接受，还得到了保守党的认同，后者在1951年掌权后也未曾企图修改报告结果。战争让福利国家

这一突破党派界限的理念成了人们的共识，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妨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伴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经济腾飞，英国实现了其战后的复苏。而这一景象的转变是缘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时采取了解放经济、将工业及公共事业私有化以及放宽对银行的管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再次为经济的上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她的改革也具有下行趋势，并在2009年的信贷紧缩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彻底地暴露出来。而危机爆发之后，对于那个早在25年前就匆忙实行的自由化的银行体系，政府企图引入适度调控的举措又均以失败告终，更是加重了这一危机。因此，这里的反事实依据同样在经验上太过脆弱，无法支撑这样的反事实猜想。

因此，英国中立这一反事实是经不起仔细检验的。艾迪生、罗伯茨、赫维希、桑瑟姆等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完全相反的猜想，都可以推翻弗格森和查姆利的版本。历史学家们通常对历史解读有着一致的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关于英国，我们却产生了分歧，分歧之处不在各自的阐释，而在真切的事实，当然也可以说想象的事实。问题就在这里。所有作者都是从某个单独事件的改变出发，继而对长远后果进行设想的。对英国在“一战”或“二战”中如果采取中立则结果究竟会怎样的猜想，已经延续了好几十年，一直持续至20世纪末期。以这种方法构建的反事实会出现的问题是，它们非但没能让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想象枷锁里挣脱出来，反而将其束缚在了实际上更为狭窄的另一个枷锁里。这是因为，反事实预设了另一种选择带来的未来，以至于虽然只在讨论“如果 A 发生了而不是 B 发生了，那么结果会如何”，但在随后的设想或假设里却将其转化成了无可避免的一系列其他事情：“如果 A 发生了而不是 B 发生了，那么 C、 D 和 E 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而不是实际发生的 X、 Y 和 Z。”不过当然，数以千计的其他事情也都可能介入进来，或假设已然卷入其中，从而很多事件的实际进程也就变得完全无法预料。比如，假设英国真的没有参与“一战”，那么从德国在“一战”中的获胜，到希特勒的夺权未果，到大英帝国的巍然屹立，直到整个20世纪的结束，所有的一切，都势必因一个假设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化、系列化事件。这样便将可能性与偶然性全都排除在外了。而谈论的也仅限于英德关系，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德国在东欧的行动及其意图、英国殖民者与其殖民地印度和非洲之间的整体发展等，则被彻底忽略掉了。如果中途还出现了其他偶然事件又将发生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反事实的精灵一旦挣出了瓶颈，一切便皆有可能。

这是一种带有严格确定性的条件句，是不会被历史学家们用以解释事物的，因为他们总是给出暂时的试探性结论并大量使用到“可能”这个词。“单一原因”的解释会让历史学家们感到为难；在事情起因未被彻底查明前，我们总喜欢为其列出许多原因，也就是说，既然这些事件拥有如此多原因，那么就算其中某个原因不起作用，其他原因也会替其发挥作用，因此这件事情最后依旧会发生。当然，关键是得从这些原因中寻找出发挥最重要作用的那一个。历史学家通常都会为按等级层次构建出一系列原因——首要原因、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辅助原因等，这些不同层次的原因分别对事件的解释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如果我们想要

寻找“一战”爆发的起因，我们可以认为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遭到暗杀是其一，但这也只能解释为什么奥地利会进攻塞尔维亚（后者曾帮助和支持了那次暗杀），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更为重要的众多因果链，才能解释奥塞冲突为何会引发欧洲各大强国之间的竞逐抗衡，也才能解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为何会引发俄国向奥地利宣战，以及德国又为何向俄国宣战，等等。英国历史学家有时认为，促使英国卷入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入侵比利时，因为英国曾保证过后者的中立性。但这种过分简化的观点已经不再受到普遍认同，历史学家们转而寻找其他因素，从英德展开海军竞赛，直到英国采取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政策。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阐释中，还没有一个是有助于思考“如果事情以其他情况发生会出现怎样的结果”的问题——比如，如果奥地利皇位继承人没有遭到暗杀，如果塞尔维亚彻底无条件地接受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如果俄国克制住没有宣战，等等。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将一连串事件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一一拆开。我们知道英国内阁曾针对是否加入战争产生过激烈争论，而格雷所担心的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欧洲最终也成了事实；我们只需斟酌现有证据就能知道这一切，我们不需要任何反事实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又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样的过程。

艾伦·梅吉尔曾指出，虚拟史学家通常会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一般会落在某个重大决定之前。约翰内斯·布尔霍夫（Johannes Bulhof）也曾指出“反事实都是些‘若p则q’这样的句子，而这些句子中的前提（紧跟在‘若’字之后的内容）事实上都是虚假的”。一般而言，“决定的瞬间”被概念化为一个“偶然的瞬间”，事情被认定为有可能轻易就朝另外方向发展的一个时刻，而反事实历史学家们接下来所做的，便是沿着朝向另外方向发展的某条线路对之后的历史进行推测。但要回答历史在那个特殊时间，以及随后的几个月、几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会怎样发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臆想猜测。这些猜测必然会消除偶然性，而非去强调它的重要性及影响力。正如梅吉尔曾经指出的，“偶然性开辟了两条道路”，因为如果我们以偶然性来开启一个反事实猜想，那么我们也必须将它表现在猜想的早中期、中期以及晚期等阶段，事实上必须将它贯穿于整个过程。因此，“偶然性不是一列可以随便上下的火车”，因此，这种意义下的反事实历史“根本不能遵循任何可以确定的线路。更准确地说，只有在下一个不确定性出现的时候，它才能遵循某条可以确定的线路”。这样它就不再是历史而是虚构，或者说是“幻想史”。相似的，马丁·邦泽尔（Martin Bunzl）也认为，在一条反事实链条上进行的推理演绎，其可信度这一首要条件将随着演绎的一步步发展而逐渐丧失。例如，有反事实称如果戈尔当初被选为总统，美国就不会侵略阿富汗，这就在反事实论证链上省略了无数的中间环节，结尾处的反事实条件变得与最初认为戈尔本可能在竞选中胜出这个完全合理的假设相差甚远，毫无说服力可言。因此，邦泽尔认为某一历史的反事实结果总是想象行为的产物，由于缺乏证据而无法被证实。它们迄今唯一具有的合理性，便是这些想象要受到历史知识的约束。

这一点在许多反事实研究中都曾以多种形式提到过，包括其中一些

专业人士。比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就曾指出，改变后的时间轴所创造出的事实将完全不同于真实时间轴上所发生的事，因为现实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着的；一方面是选择一个因素而让其余因素保持不变，另一方面是从与现实脱节的原点开始去描述各种虚构的后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虚假的。由于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的，因此正如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反事实推测只能局限于对（次等级的）'可能性前提'的想法，即我们用以推测事态发展的那个理论与久恒不变的世界要素应该彼此共存的想法，本身就是随意的。"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把一切都改变？同样，法国作家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在总结反事实观点时也曾说过："反事实的轨迹不可能为单独一条线……它是……一系列不可计数的点，每个点都能任意地辐射出许多可能性。"

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同样在他那被收录进《虚拟的历史》中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一点：

> 在任何历史探索中，偶然性与反事实只在最开始时保持一致。很快，它们便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反事实明显在假设一些不确定的其他发展路径，由于作者已经为它们设计出了一个虚构的未来，所以其清晰度和连贯性是可靠的。相反，如果是强调偶然性，就不仅认为事情不会沿着这些路径展开……而且必然会让所有反事实情形都迅速从自身发展出无尽的可能性。

弗格森和查姆利所进行的那些长远的反事实猜想，甚至克拉克自己所讨论的例子，比如假设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在1776年爆发，那么法国就不会为支持这一运动而在财政支出上不堪重负，从而也不会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这一命题，就连克拉克也认为"过于宏大、过于脱离真实结果，以至于与历史脱节而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此外还有很多说法，其中之一是如果英国在"一战"中保持中立，那么德国主导下的欧盟便会更早许多年诞生；而类似的言论是绝不可能以真正的预测形式出现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具体说明那些与预测相关的成千上万的中间变量。换句话讲，运用"假如"句型去假设一个"长期的"另一种历史发展，是假定了（a）这个过程中一切"未来的"偶然事件与可能性都不存在，（b）既然未来是不可预见不可预测的，那么"最初的"假设事件，即第一件在实际中并没有发生的事，便不会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产生影响。这样就几乎完全将可能性与偶然性从历史中抹去了。对于探究过去的种种可能性，它非但没有重启开发的大门，反而将其关闭了。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一点，即便杰弗里·帕克和菲利普·E·泰特洛克这两位最令人惊喜的反事实历史提倡者也都是承认的。在《重塑西方》一书的结束语里，他们这样写道：

> 有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一件倒霉事接着另一件

倒霉事”，而影响这些事件的多种原因之间只有极少的内部联系；但凡认同这一观点的人，都尤其应该谨防将事件趋势做过度推演，以免将其推进反事实的世界里……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式有着系统的逻辑性——要么是一个将我们持续推往特定的方向的正反馈逻辑，要么是一个将我们关进特定的当前的负反馈逻辑，但凡相信这一观点的人，则应该多一点儿对“假如”猜想的支持，因为那些猜想能让我们看到遥远的假设未来。

因此，在他们看来，凡是强调历史之可能性与偶然性作用的人，都会对反事实的运用没有信心；只有那些相信目的论和决定论的人才会认为它有用。但历史学家们所关心的这两种情形都陷入了一个悖论。相信可能性与偶然性是历史的关键要素的人，无法证明反事实的合理性或有用性；而相信目的论和决定论的人，却怎样也找不到运用它们的必要。

弗格森始终也没有说，英国中立这一反事实猜想有助于我们理解1914年和1940年的那些决定。他只是说“唯有试着理解如果当时英国置身事外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才能确定当时英国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事实是，艾迪生构建的反事实情形，犹如赫维希或桑瑟姆的一样，主要来讲是一个消极猜想，是针对历史必然性而言的，即便是弗格森、查姆利、克拉克等笔下的积极猜想所描绘出的必然性结论，最终也不过是一种明显的一厢情愿而已：与其说是“假如……会怎样”，不如说“假如……就好了”更贴近一些。而这种形式的反事实叙事对于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它关心的并非是爱德华·格雷爵士、温斯顿·丘吉尔等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做了当初那些决定，它关心的是去强调那些似乎可以变得更好的情形，并因此对人们永远摆脱不了的现实扼腕叹息。这种猜想是很容易进行的，因为它不需要真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这样就使得历史学家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当前的政治目的及政治偏见对历史进行重写。克拉克警告说：“对反事实的分析，务必要提防轻易地掉进那种肤浅的论调陷阱，即：如果不是某个最初的错误或某个悲剧性的失误，那么一切都有可能会很美好，而人类便可以从那些不可避免的冲突当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和平进步的黄金时代。”那个黄金时代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并非一个有见地的反事实猜想，而是具有目的性的政治动机下的产物。和丹尼尔·斯诺曼的文集《假如我曾……》中的作者们一样，弗格森也好，查姆利也罢，还有克拉克，每个人都在花费时间告诉过去的人他们本该做些什么，而不是努力去探究他们做了什么，也不解释他们为什么那样做。在历史反事实领域，一厢情愿的渴望随处可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正像克拉克总结的：“寻求安慰的需要大过解释的欲求。”

[1] 汤普森，应指下文出现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编者注

[2] 卢德派，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掀起了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卢德派即指此类强烈反对机械化的人。——编者注

[3] 乔安娜·索斯考特，19世纪英国德文郡的一名妇女，她自称先知，宣称自己是新耶稣之母，将于1814年圣诞节那天分娩。——编者注

[4]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编者注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第三章　未来小说

许多历史话题都曾被处理成反事实叙事。小说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有着同样宽泛的主题选择。但他们的目的却通常有着更加戏剧化的不同。以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为例，他发表于1981年的实验小说《阿尔加拉比亚餐馆》（*L'Algarabie*），讲述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75年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逝世，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随后疯狂四起，这些革命派别有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主义的，最终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在这场内战中，一个新的极左翼巴黎公社成立，并与凡尔赛的法国政府达成协议，二者彼此承认，互不侵犯。在小说中，历史追忆、身份认同、现实与虚构等全都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时刻提醒读者这一切不过是人为的虚构而已。当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丹尼检查站”穿过巴黎公社的围墙时，巴黎便成为另一个柏林，这里的“丹尼检查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它既指联邦德国人通过柏林墙时所要经过的真实的“查理检查站”，又指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真实领袖之一丹尼·科恩–本迪特（Danny Cohn-Bendit）。戴高乐总统之死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在小说里却引发了很多事情，并迅速脱离了人所共知的任何历史轨迹，变为一部变化莫测的后现代主义的想象作品，其主旨并非为了构建任何特定的政治或历史话语，而是为了让读者去体验与思考叙事表现形式的本质特征。

不过，也有许多（尽管不是大多数）小说家在进行反事实描写时，都更严格地遵守了传统的线性描写方法，它们也如同森普伦小说中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因某个历史事实的改变而扩展至历史背景的改变，但它们在展现最终结局时却小心地遵循着逻辑性。小说家们将故事建立在这种反事实描写基础上时，需要对许多话题进行加工处理，常常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明显幻想之中，比如在西班牙作家们的故事中，赢得1936~1939年内战的，往往都是共和党而非佛朗哥将军。特定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戏剧性和历史创伤，以此为基础，无论反事实小说还是非小说作品，往往都倾向于聚焦这样一些内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15年的拿破仑之败，或者法国的1968年大动荡，西班牙的内战及佛朗哥统治，意大利“一战”中民族自豪感的破灭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体，美国的南北战争及随后的越南战争，英国在“二战”中的早早失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利等。天主教徒则一再地详细描写宗教改革运动，描写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6世纪被英国击败，描写其在17世纪的政治立场，描写从“火药阴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间的故事。

但迄今为止，最热门的话题依旧是德国的纳粹独裁统治。想象一旦纳粹在“二战”中获胜将会出现的景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小说家、电视编剧、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等所热衷的“娱乐方式”。为什么是纳粹，而不是别的，比如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在西方的大众记忆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从种族歧视到种族灭绝，再到国际侵略、战争机器、独裁统治，纳粹都是邪恶的化身，是文明进程中最为令人悲痛的例子。至少是自1945年以来，支持纳粹的人或对纳粹主义抱有信念的人，始终只是为数极少又深受公众唾弃的少数团体；而苏联及其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则一直在争取大众的支持，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其成员数一直在缩减，其

共产主义性质也在急剧弱化，但是由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1990年以前一直统领着欧洲，在其他地方甚至时间更长，因此，想象斯大林没有在1953年去世，或者他在1945年入侵西欧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从几十年的观察或经历中就能够知道在他的统治下事情将如何发展。阿维泽尔·塔克曾经说过，关于“一个纳粹获胜后的世界”这类小说性质的另类历史，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可能是缘于一种对世界末日景象主题的艺术魅力的着迷，连续不断地用写实的描述手法呈现出一幅逼真的、令人无比惊骇的另一种世界景象，仿若耶罗尼米斯·博斯[1]（Hieronymus Bosch）手中的画作”。

绝大部分关于纳粹主义的未来小说都源自英美国家。

在美国历史学家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在2011年所编辑的116篇有关纳粹历史猜想的作品清单里，80%都源自英国或美国。这种题材被英美国家所主导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英国和美国都曾站在了“二战”胜利的一方，从而在回想当初差点儿就可能在战争中失败而让纳粹获胜时，会产生一种兴奋感。描写一个屈于纳粹统治下（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可以强化两个国家对这次战争的肯定，认为值得为之一战（虽然偶有争议）。好莱坞在全球电影业占有主导地位，加之英语语言文学的国际文化力量，也同样为纳粹历史猜想式的英美小说的支配地位贡献了力量。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它们在“二战”期间都未曾遭受敌对国的占领；与之相反，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则无须用小说来唤起他们对纳粹统治的恐怖场景的回忆：他们本身就以最直接的方式经历过这一切（就这一点上，日本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统治也与之相似）。对于德国人来说，从道义上讲，去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世界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其一厢情愿似的幻想成分势必非常明显。将纳粹主义的兴起与胜利归咎于单纯的偶然性因素（德国的历史机车遇上的一次“工业事故”，人们有时这么比喻），看上去太像是为德国开脱其罪名所找的借口，而每当有人试图这样做，都往往会在德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但同时，正像罗森菲尔德所说的那样，纳粹主义未来小说中的娱乐性因素，及其被当作流行消遣方式的角色，对于一个被公认为要为犹太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国家而言，这似乎会在道德上显得不负责任，在文化上也会显得肤浅。但尽管如此，罗森菲尔德清单上其余15%的小说均是出自德国人之手，这也许正体现出，在德国文化中对于纳粹及其对世界所犯下的劣行仍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不过在实际中，以该题材进行写作的那些德国作者们在其反事实描写里，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让希特勒获得任何的最终胜利。

在罗森菲尔德的历史猜想小说清单上，有63篇假设纳粹赢得“二战”胜利，29篇假设1945年时希特勒逃离了地堡苟活他处，剩下的18篇则假设希特勒这个人从未存在过。大部分作品都描写到纳粹的胜利及随后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描写对解释希特勒怎么赢、为什么能赢，都并未表现出多大兴趣，这与描写“二战”的军事历史猜想小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作人最为感兴趣的，是运用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战后时代作为背景，去体现人物角色和

战争阴谋，他们将虚构的人物放置于一个梦魇般的场景之中，让他们去面对一系列残酷的道德选择以及一系列有形的、易于想象的危难。这种描写的经典之作自然当属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书中想象了一个由超级大国所主导、集权区分模糊的世界。作品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为原型，但更多是出于奥威尔对后者进行的想象，而非对前者的记忆。从本质上讲，奥威尔的小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进行预警，它不是对过去的既定事实的改写，而是想象了如果英国和欧洲屈服于苏联的威胁将会怎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非一部真正的反事实小说，与那些在战争结束前于英国出版的关于纳粹统治的小说没有太大差别。就像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些未来小说，如萨基[2]的《威廉到来时》（*When William Came*）讲述被踩压于德皇铁蹄下哀苦呻吟的英国，马丁·霍金斯（Martin Hawkins）的《阿道夫到来时》（*When Adolf Came*，伦敦，1943）之类的作品，都是在面对德国威胁时用以巩固英国大众的决心的。比如H·V·莫顿（H.V. Morton）于1942年出版的《我，詹姆斯·布伦特》（*I, James Blunt*），就描写了一位英国人用日记形式记录下其所生活的纳粹统治下的未来英国的情形，借以唤醒人们的认知。用莫顿自己的话说，这种故事是一记警钟，旨在敲醒那些“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者和一厢情愿的人们，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战败将会面对怎样的生活”。

在战争结束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仅仅出现过一部描写英国被德国征服的虚构作品——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的剧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它以回顾式的剧情谴责绥靖政策，赞扬英国的勇敢，除了一些怯懦的卖国贼和失败主义者，英国人勇敢地发起反抗运动，将德国人赶出了岛屿。在精神层面上，这更像是属于战争年代而非战后世界。而另一部更为详细复杂、综合描写德国胜利的作品是兰道夫·罗本（Randolf Robban）于1950年出版的小说《假如德国取胜》（*Si l’Allemagne avait vaincu*），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故事以德国部署原子弹为起点，德国先于其他国家研发出原子弹，并将其投向伦敦和芝加哥，从而结束了战争。之后，德国和日本以战争罪（尤其轰炸他们的城市）对同盟国领导人进行审判，并占领了苏联。但这两个战胜国的关系随后破裂，在一场原子战中被彼此摧毁。通过改变历史迹象，这部以笔名发表的作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获胜的同盟国，旨在鼓励胜者与败者能在后战争年代达成彼此的和解。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下一部反事实作品才面世，即新闻记者科默·克拉克（Comer Clarke）的《假如纳粹来了》（*If the Nazis Had Come*，伦敦，1962）。该书所用的素材有对健在的德军领导人的采访，也有纳粹计划占领不列颠岛的真实文件，描绘了一幅暴政与压迫下的可怕情景。这一情景不仅再现了欧洲大陆上的被占领国的经历，同时影射了由奥威尔首创的“极权主义”概念，将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视作一个庞大的独裁政权，其领导人用暴力实现个人意愿，人民除服从外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暗地发起反抗运动。类似的场景在很多其他故事中也有出现，比如通俗作家C·S·福雷斯特（C. S. Forester）、历史学家休·托马斯（Hugh Thomas）等都有过类似的描写。以C·S·福雷斯特为例，他所塑

造的霍雷肖·霍恩布洛尔舰长这一虚构形象，便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海军的撒手锏。所有这些作者都在描写德国镇压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反抗这一观点上多有着墨，既用以重申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也用以赞扬英国人民的勇敢精神。因此，这些作品依然被认作是属于战时未来小说中反事实题材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都出版于后战争时代，此时的英国需要丘吉尔精神以重振英国士气，因为英国正面临国内紧缩和国外衰弱的双重压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惨败。

伴随这一系列作品的产生，大量的战争电影也出现了，包括《轰炸鲁尔水坝记》（*The Dam Busters*，1955）、《翱翔蓝天》（*Reach for the Sky*，1956）、《俾斯麦舰歼灭战》（*Sink the Bismarck*，1960）、《月光下再见》（*Ill Met by Moonlight*，1957）、《血拼大西洋》（*The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1956）等，这些影片不仅赞颂了英国的军事品格，并且将他们所生活的等级社会合法化，那些军官阶层一个个表情沉闷严肃，讲着一口流利严谨的英式英语，有效地命令着谦卑而顺从的劳动阶级普通人群，以力求庄重与秩序。在这些描述中，普通德国军队或海军官员看上去也都十分得体庄重，反映着英国在西线及北非战争中的经历；只有德国纳粹分子才被塑造成凶残的形象，在与敌人交往中无视战争法和基本的荣耀与正确性原则。因此，就算在战争时期及战后早期，英国在描写德国时也并没有将所有德国人都一概形容得极其邪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战后的新一代渐渐成年之后，便开始对等级制度和盲目的遵从态度产生了质疑，财富与物质主义占领了英国文化，“摇摆的60年代”宣告了个人自由与反抗的新风潮。与此同时，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1965年对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为标志，英国同德国及德国人民公开和解，这使得在描写第三帝国的小说中，“善良的德国人”的成分开始渐渐多起来。在联邦德国，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纳粹年间的社会历史进行详细的深入研究，从而揭露了纳粹政体的制度混乱、宗派林立，也证明了德国社会的许多阶层都与纳粹整体存在分歧的可能性。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极权主义理论被另一颇为迥异的方法论所替代。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在对“一战”中德国的战争目的研究中，还提出了从希特勒到德国皇帝直至更为长远的持续性影响这一棘手而敏感的话题。在这些新兴的德国作品中，有许多都被翻译成了英语，或被研究德国史的新一代英国历史学家广为传播。

所有这些都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下，运用反事实叙事法去探索纳粹“二战”获胜后的世界，尤其是英国，对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来讲越来越显得有趣而具有吸引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小说、剧作、电影、电视剧，也都表现着这样的语境，作品以英国为背景，但德国占领者却似乎并非全都那么残忍冷酷，也似乎并未受到全民的广泛抵制。在贾尔斯·库珀（Giles Cooper）制作的电视剧《另一个人》（*The Other Man*，1964），凯文·布朗洛（Kevin Brownlow）于同年发行的电影《纳粹暴行录》（*It Happened Here*），以及于1978年播出的菲利普·麦凯（Philip Mackie）的三部曲电视剧《一个英国人的城堡》（*An Englishman's Castle*）等作品中，都由英国人出演其中的角色；在直到1978年的很多其他作品中，

包括莱恩·戴顿（Len　Deighton）于同年出版的小说《SS-GB》，也都有英国合作者的参与。对纳粹统治下的英国进行描写的作者中，最著名的当属通俗史学家诺曼·朗迈特（Norman　Longmate），他在1972年出版了名为《如果英国沦陷：纳粹占领计划实录》（*If Britain Had Fallen: The Real Nazi Occupation Plans*）一书（并附电视报道）。该书的基础材料有德国占领英国的真实作战准备与计划，有纳粹曾企图接手的被德国真正占领的那部分英国领土（海峡群岛，紧邻法国海岸），是这些已知的真实经历的混合，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朗迈特因此声称他所描写的“不仅仅是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事，还是那些‘已可能’发生的事”。

在朗迈特的描写中，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惨遭失败，为一场全面侵略做好了铺垫：也是他整部小说中所有其他猜想的基本前提。国王逃到了加拿大；温斯顿·丘吉尔则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阵亡。随着丘吉尔去世，英国就基本放弃了抵抗。纳粹四处寻找一个叛国贼、一个领导傀儡政府的政客，他们碰巧想到了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这个人的名字曾出现于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一名高级外交官）真实的战前日记当中，纳粹将霍尔定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霍尔与法国经谈判达成协议，给了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想要的东西，并还可能与德国站到了同一战线。然而，32年之后，当朗迈特再版这本书时，他改变了心意，认为英国法西斯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才应该是最可能担任英国首相的候选人。莫斯利本人在战后曾宣称，他宁愿自杀也不会做出（叛国）这样的事情，不过那时他还是一名在位的政客，因此这种话不足为信。至于新的国家元首，则“放眼四周，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温莎公爵的名字都会冒出来，充当一个最可能成为亲纳粹政府的国家元首”。这个人甚至都有可能占据王位，他自信可以节制纳粹的极端行径，而要诱惑他那爱慕虚荣的妻子则可以给她一个许诺，让人称她一声“陛下”（英国王室甚至不允许称她为“殿下”）。

朗迈特引用真实的纳粹计划，让占领者推倒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石柱，并将其运到柏林。纳粹分子抢夺并洗劫了目之所及的一切，他们搜刮犹太人的财产，拿走了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的文物并宣称其属于德国，还运走了石油及其他基本必需品以充实德国的武装力量。盖世太保抓捕了已知的反纳粹主义者（似乎有一个随机列表），查禁了包括救世军在内的令他感觉可疑的一些组织。就像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其他国家一样，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不过他们可能会让英国人从此靠右行驶。大量英国年轻人都将被迫作为劳工送往德国，而犹太社区的45万人将被赶聚在一起送进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众所周知，在德国入侵之前，英国军方曾组织过一些“辅助部队”，一旦受到侵略便会通过暗中破坏和打游击的方式去骚扰敌人，但他们却无法长久坚持，并且他们的行动也会激起对方的报复行为。“抵抗”将最有可能以愤懑的不合作形式进行，但合作也可能是有限的。这场噩梦的终结将是美国朝德国投下一颗（或几颗）原子弹，并横跨大西洋前来解放受尽压迫的欧洲各国。

朗迈特的书出版之时，正值新一轮书写与传播的高潮时期，涌现了

一大批描写英国、德国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的那场战争的作品。这一背景的集中体现，是讽刺英国式的“沉闷严肃”，赞扬英国军队的英勇，比如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一群老爹在战斗》（*Dad's Army*），它从1968年一直播到1977年。对20世纪50年代的等级社会与自鸣得意式神话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抨击，但这也同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大不列颠的衰落”的广泛争论，帝国的陨落、英国机构的无能与不足、比起德国相对迟滞的英国经济，都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轮精神探索，并随着1979年后撒切尔首相的保守党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达到了高潮。在这场争论中，英国在过去抵抗德国入侵的决心遭到质疑，成为英国在现在变得软弱无能的一种隐喻。因此很多人便步朗迈特的后尘，指出，至少有些英国人是可能会与占领军合作的。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对德国侵略者的人格化，还产生了对高效、努力与富有创新精神的德国品质的普遍崇拜，认为英国也理应加以效仿。德国汽车公司奥迪的广告标语“*Vorsprung durch Technik*”（科技领导创新）在英国电视上频繁出现，而且是没有翻译的原文，明显传达着更多字面之外的信息。颇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再会，佩特》（*Auf Wiedersehen, Pet*）讲述了一群英国砖瓦工在面临国内的失业问题或工资低廉的情况下，却在德国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和成就感的故事。然而，在80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英国对位于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并获得了胜利，重新将该群岛纳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之后，撒切尔政府转而直面联合工会（撒切尔夫人称其为“内部敌人”），导致警察方队冲击矿工纠察防线时，发生了一系列预料之外的暴力活动。这样的语境为再次使用较为老旧的方式谈论英国奠定了基础，也剥去了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具有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到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再次统一引起了由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政府中一些成员深深的敌意，撒切尔夫人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不安，认为德国势力有可能在“第四帝国”再次兴起，并通过欧洲共同体及其后继者欧盟来主导整个欧洲，由此，关于“二战”的话语又被应用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上。随着撒切尔夫人对欧盟的仇视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保守党议员及作家们都跟随着他们的首相，将欧盟定义为重获新生的德国为实现其霸权所握住的一个筹码。虽然时隔不久，撒切尔夫人便在实用主义内阁成员发起的反叛中被赶下了台，然而损害却业已造成：欧洲怀疑论就此诞生。随着大量攻击德国人为纳粹分子的书刊和文章涌入各大出版社，公众观点再次剧烈转向了反德国一方。英国的民调显示，认为英德两国的友谊较差的受访者从1990的12.7%增加到1994年的38.8%。在1990年的调查中，26%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是一处不错的工作之地，但6年后，这样认为的人则仅有5%。在1987年，26%的英国受访者将德国视作英国最好的朋友，但到1992年，这个数字仅为9%。同时超过53%的人认为纳粹主义可能会在德国再次出现，而在5年之前，只有23%的人这样认为。这些数据与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调查数据大相径庭，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大体上保持不变。英国大众的这种情感变化，在近些年举行的有关“二战”5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包括1989的纪念“二战”爆发、1990年的纪念不列颠之战、1993年

的纪念阿拉曼战役、1995年的纪念欧洲胜利日。

而关于“一战”的言论也同样被引入这一新兴的欧洲怀疑论的话语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保守派议员威廉·卡什（William Cash）于1991年出版的《反对联邦欧洲：为不列颠而战》（*Against a Federal Europe: The Battle for Britain*）。本书的副标题与不列颠之战相呼应，暗示这是对“二战”的一次回放。不过这次，“直冲云霄”的不是别人，而是威廉·卡什，目的是为了搜寻那些他所需要的辉煌时刻。书的一开始——背景设定在1940年，卡什就明确指出了究竟谁是敌人。“英国，”他在书的第一页就发出警告说，“有可能仅仅成为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中的一个郡。”“德国对欧洲的态度，”他警告说，“是由强大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在卡什看来，一个更为融合的欧洲必将等同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它不停地平衡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势必延续或者加剧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不稳定性为1914年、1933年、1939年及1945年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卡什的暗示是，一个由德国主导的紧密融合的欧洲联盟将不会持续太久，而其最终解体则势必带来一系列的混乱与暴力。保守派史学家们也齐声谴责欧盟，称之为德国借以实现其主导地位的工具。至于德国的再次统一，约翰·查姆利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德国还要多久才会认识到自己体型太大了，别人赐予的靴子不够穿？而一旦德国决定换一双更大的鞋子，谁又能阻止得了呢？”从表面看上去，查姆利的这一言论与他本人在此之前所表达的观点（即对英国政府来说，在1940年与德国单独媾和也是合情合理的）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就他在1995年所发表的观点看来，查姆利怎么会认定德国在1940年一定会信守承诺呢？

尽管如此，查姆利的某些新观点还是得到了右翼史学家的认同。欧洲怀疑论这个暗喻“二战”的措辞，利用被操纵的公众对英国最辉煌时刻的记忆，将矛头直接指向德国，视之为布鲁塞尔[3]的代理人，为查姆利和弗格森进行反事实猜想构建了重要背景，尤其是他们所猜测的英国本该在1914年和1940年远离欧洲大陆的种种阵痛而保持“光荣孤立”，从而拯救大英帝国并阻止犹太人大屠杀。在这些作品中，德国对欧盟的主导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也都在1915年的那些推测场景中实现了无战争、无冲突。然而，英国远离欧洲而孤立自保只是欧洲怀疑论的一种美好想象，与被欧洲怀疑论所认为的20世纪90年代的可怕现实形成了明显冲突。在那个对90年代的猜想中，“第四帝国”再次成为征服英国的威胁，因此，没有英国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和平发展的欧洲联合体的反事实猜想被人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从“二战”派生而来的隐喻性表述，旨在应对眼下已然能够察觉的、盛气凌人的、扩张主义的德国的威胁。

反事实历史叙事法于是重新捡拾起那些亦新亦旧的抵抗隐喻，认为在德国征服英国的过程中，与之合作的机会势必非常微小。自由派的《卫报》记者马德琳·邦廷（Madeleine Bunting）的研究认为，朗迈特等早期作者创设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神话，而事实则与那个神话刚好相反，因为海峡群岛的民众不仅没有反抗纳粹占领者，反而一路协助

他们将岛上的犹太人遣往奥斯维辛。针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安德鲁·罗伯茨明确指出：与邦廷所声称的相反的是，海峡群岛并非一个能对该话题进行总结的典型例子，因为群岛上1/3的男性人口遭受了“清洗”；德军在仅有6万人的群岛驻扎了3.7万士兵；岛民们都有服从权威的传统；那里没有强大的联合工会或政治党派，也没有广袤的山区或大城市作为反抗运动的基础。罗伯茨说，不管怎么说，这些群岛居民有半数都是法国人，而较之于法国人，英国人对自己祖国的忠诚要远远胜出很多。曾在战前短暂盛行的绥靖主义，现在已然消失。英国也将不会再有由通敌分子和颠覆分子组成的纳粹“第五纵队”。罗伯茨认为，当丘吉尔在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乔治六世逃亡加拿大之后，温莎公爵完全有可能被说服登上王位，而像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这样的亲纳粹政治家也有可能被说服而成为首相，同样可能被说服当首相的还有塞缪尔·霍尔，但首相人选中不可能有莫斯利，因为德国知道他并不受人欢迎［但这并不妨碍德国人提拔那个更加不受欢迎的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极端绥靖主义者R·A·巴特勒（R. A. Butler），也是单独媾和的又一支持者，则完全可能与德军勾结。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例外而言，因此罗伯茨大胆推测道，假如德国真的占领了英国，“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必定是冷酷无情、满腔怒火、同仇敌忾、全民皆兵的英国人”。甚至对于他文章中的欧洲怀疑论观点，连纳粹控制下的英国出版物也都会竞相刊出：“维希（法国）的鼓吹者强调欧洲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个共同的未来才是恢复荣耀与自尊的催化剂，这样的说辞会在英国被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

在罗伯茨的反事实描述中，德国以欧洲之名占领英国的行为在英国激起了全民公愤，他的这一猜想于多年后的欧文·希尔斯（Owen Sheers）的《反抗》（*Resistance*）中激起了回声。本书描写了一场积极的反抗运动，英国人民坚持与实施占领中的德军斗争，在复辟的爱德华八世指导下，R·A·巴特勒带领的政府实行合作主义，承诺“缩小英德两国间的差异，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美国人和东方布尔什维克党人”。更为直接的是，罗伯茨的欧洲怀疑论主义反事实描写，与他1995年出版的未来小说《亚琛备忘录》（*The Aachen Memorandum*）可谓是不相上下。《亚琛备忘录》将故事设置在21世纪中期的一个想象的未来中，那时的英国已被完全纳入了德国主导下的联邦制的欧洲联盟。英国君主制早已迁移至新西兰，所以如今的学生若在晚宴上提出喝效忠酒则会被牛津开除。英国已经分裂成了多个郡。欧洲的诸多法令管理着国家的日常生活。“无阶级区别法”迫使伯爵法院（Earl’s Court）重新命名，而性交行为要由有关骚扰、健康及保健方面的法令来管理。在历史课本的“去本国化”过程中，纳尔逊的名字被从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去，而他那立于特拉法尔加广场（如今改名为德洛尔广场，名从欧洲委员会主席）的塑像，则被欧盟的奠基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塑像所代替。《劳工方针》保证各个管理者听命于劳资联合会，尤其是来自高层的命令。英国的日常生活则由“联邦风尚”掌控（“联邦”已成为形容“好”或“时尚”的流行语），它规定女人们应该像德国女人那样留腋毛，最为可怕的是，男人们在见面时应该相互亲

吻对方两边脸颊各两次。大陆式有轨电车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伦敦街道上的小汽车与公交车，使从前快捷简便的行程变得无止境的漫长而复杂（据说，在书中所有的预想场景中，这一场景是最不具说服力的）。一条欧洲方针强制要求英国人靠右行驶，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而一支联邦警力，亦即欧洲刑警组织，则和盖世太保的所作所为相差无几（假若英国被纳粹统治）。德语是各个学校里教授的唯一外语。所有这一切都这样的真实，借用书中的英雄（当然会取名“霍雷肖”）的话说即“德国人……几乎操控了整个联盟，还称之为‘帝国’……这是发现没有他人偷听的时候，他们内部的称呼”。无须讳言，霍雷肖领导了一场反抗运动，最终摧毁了让人深恶痛绝的大陆外国人的统治。

如果说预测性小说在于警告英国大众目前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否则会引起各种悲惨的后果，比如《威廉到来时》或《阿道夫到来时》，反事实小说则假定如果纳粹于20世纪40年代占领了英国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并在这样的假设上随意发挥，那么，《亚琛备忘录》则正好位居这两种小说之间。真正的反事实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曾反映欧洲怀疑论的风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小说《祖国》（*Fatherland*，伦敦，1992）。小说没有将故事设置在英国，而是设置在1964年的德国，小说讲述了一名侦探（也是一名党卫军）的故事。在调查一系列谋杀案的过程中，他逐渐揭开了政府的一个秘密计划：清除犹太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主犯，销毁一切残留证据，以便防止那些证据破坏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即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哈里斯知道他要围绕纳粹德国进行描写，而该书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如果柏林（日耳曼尼亚）赢得大战胜利可能出现的场景进行了准确的描述。《祖国》中包含了强烈的欧洲怀疑论的话外音。正如哈里斯在为小说面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花了4年时间来写……一本关于德国超级大国的虚构小说，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它却已经开始变为事实了……事实上，人们无须接受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观点就能发现，对于西欧来说，过去纳粹曾经有过的计划与现在已经发生的（经济方面的）事实真的非常相似。”这样的信息，在描写英美两国与纳粹主义的合作态度时得到了凸显，故事中，英国由复辟后的亲纳粹君主爱德华八世统治，而身为绥靖主义与失败主义者的前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则成了美国总统。刺激、悬疑、精心构思，使这部小说迅速列入畅销之列。不过在同时，如罗森菲尔德所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祖国》在英国取得的商业成功，反映出小说很好地挖掘了英国人的心态，他们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对欧洲融合的愿望，都抱有不确定性。”

该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众多东欧独裁统治的崩溃中获得线索，暗示就算第三帝国获胜，它也将是一个脆弱的结构体，不可能比希特勒存活得更久，并会因其所具有的原始力量与好斗性而很快败下阵来，最终走向注定的衰落与瓦解。与C·J·桑瑟姆于2012年出版的小说《统治》（明显受《祖国》的影响）一样，哈里斯跟随了主流史学，强调了纳粹政体的分裂及其不稳定本质。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两部小说所基于的反事实猜想场景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桑瑟姆并不像其他作者那

样，认为亲纳粹的前君王爱德华八世会复辟而取代其弟弟乔治六世，首先就因为大部分英国人都不会原谅其之前的退位行为，并且德国人也知道他将是“一个如此不具责任感的蠢人，作为君主，对任何政府来讲他都让人头疼”。然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纳粹在任命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克罗地亚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等同样不受欢迎的合作者时，却没有这样的顾虑与踌躇。从乔治六世的真实战时记录来看，假如英国真的沦为纳粹附庸国，他也不可能继续待在英国，尽管没人敢于信誓旦旦地确定这一点。至于让温莎公爵出任纳粹扶持的傀儡君主，则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纳粹要真的把他弄到手会非常之难。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对温莎公爵非常上心，一方面想设法将他送到岛外，先将他转移到葡萄牙，接着到巴哈马，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避免让他落入纳粹手中。

更为严重的是，无论纳粹领导层有多么分裂与不和，哈里斯所描写的场景都与一个德国统治下、处于战后和平时期的稳定的欧洲在历史合理性上相去甚远。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也都认为，对于纳粹而言，战争既是无限度的，更是无尽头的。在其写于1928年但久未出版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场合中，希特勒都十分清楚地说过，占领东欧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德国提供食物供给来源，以免再次像“一战”时那样因遭协约国封锁而使德国深受重创，更是为了让德国成为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土地帝国”（land empire），一个可以为更大规模战争（德国与美国之战）提供长久支撑的土地帝国。因此，假如德国真的摧毁了苏联——一个非常大的“假如”，桑瑟姆曾用以假设20世纪50年代时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依然在一决高下却一直不分胜负——和平也不大可能到来。史学家蒂姆·梅森（Tim Mason）因此写道：“1941年之前，无论人们如何解读希特勒关于将来与美国世界霸权的战争的构想，其在俄罗斯欧洲领土上占据‘生存空间’的构想绝不是终极目标，希特勒不断深思的问题是，一旦德国人发现他们已经无须再与敌人对抗了，那么国民堕落的危险也就种下了。”为了让猜想场景变得合理，哈里斯必须为小说加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即纳粹同意结束战争，他的做法是让希特勒与美国的战争陷入长久的僵持，最后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从我们对希特勒已有的了解来看，希特勒是永远都绝不甘心妥协的，而是正如他所说的，总要“拼个鱼死网破”。对于他而言，唯有成功与灭亡，唯有意志的胜利与万劫不复，绝无折中之选。而从实际来看，德国与美国在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之间不大可能会以僵持告终，更不可能让第三帝国征服英国并与苏联达成和平协议（又一个不可能）。为了支撑自己的幻想，哈里斯改变了事件的必要条件，但他的改变太多太大，因而也已无法使之成为具有可信度的反事实历史，哪怕它用了小说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英国产生的欧洲怀疑论反事实主义，逐渐削弱了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的观点，即认为从长远看来，英国人眼中的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已经出现了“正常化”，并在某些未来小说中得到了呈现。在那些小说中，人物形象都是可变的，纳粹主义已不再仅仅是道德审判的对象，不再仅仅重现盟军那沾沾自喜的抵抗；对于反事实中的纳粹的未

来，英国人的态度、描写也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自我批评的味道。罗森菲尔德在书中每一个可能的阶段里如念咒般不断重复着这些观点。但这样的做法却是非常严重的过度简化。20世纪9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态度急剧恶化，以至于欧洲怀疑论曾一度将纳粹与德国混为一谈，掀起了一场对纳粹获胜后欧洲将出现怎样的场景进行猜测的热潮，这些都说明罗森菲尔德的言论是一个谎言。由于英国对德国及德国历史的态度急剧恶化与罗森菲尔德的理论不相符，于是他索性将其忽略。另外，就事论事地说，“正常化”这一概念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究竟什么样的“正常”才能叫正常？唯有在给定的历史背景中才有可能界定：担心欧洲的未来会由邪恶的纳粹掌管，这在“二战”时期的英国属于正常范围；认为这样的未来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展露或即将展露，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欧洲怀疑论作品中也是常见的。再者，“正常化”本身就是一个预测性概念，其含义是任何事情，一旦变得“正常”，便也总会在未来保持如此。因此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而非历史的观点，是无法被实证性的调查验证的。

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可以抹平其他国家出现的对德态度的转变，这在罗森菲尔德的描述中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整本书中，最不具说服力的是声称20世纪90年代“德国对记忆力量与正义可能性的信念不断衰减”，或“想要使纳粹历史的记忆正常化”。相反，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再次统一，20世纪90年代还见证了许许多多其他事件，包括战争罪审判在整个欧洲的再次进行，犹太大屠杀在欧美人民记忆中的再次浮现，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大屠杀纪念馆在许多国家的开放、曾被忽视的德国集中营遗址变成了开展追悼与相关教育的中心，在新的德国首都柏林立起了深受纳粹之苦的犹太受害者纪念碑，以及对曾经参与纳粹罪行的无数德国机构的揭露（从武装力量到医学界，再到后来的外交部及其外交官），等等。罗森菲尔德的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仅依赖于那个粗制滥造且又被最终证明为多余的“正常化”概念；并且还没有将猜想历史事件——无论真实或虚构的——设置于恰当的历史语境当中。历史语境绝非是一个单独、可预测、向“正常化”行进的线性发展过程；历史语境既是过去的经历，也是现在的经历，充满无从预测的跌宕起伏。

历史语境的变化，在后战争时代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在很多人所能想象的世界里，希特勒从他的柏林地堡中设法逃了出来，并一直活到了后战争时代。类似的大量虚构小说，尤其是那些出自美国人之手的作品，都致力于营造一种假若希特勒未对其所犯罪行付出代价，许多人将会感觉到的那种沮丧感。像菲利普·凡·伦特（Philippe van Rjndt）的《阿道夫·希特勒大审判》（*The Trial of Adolf Hitler*，纽约，1978）、戴维·B·沙尔奈（David B. Charnay）的《魔鬼行动》（*Operation Lucifer: The Chas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Hitler*，伦敦，2001）（这本书大量参照了《阿道夫·希特勒大审判》），还有詹姆斯·马里诺（James Marino）的《阿斯加德方案》（*The Asgard Solution*，纽约，1978）、约瑟夫·海伍德（Joseph Heywood）的《别尔库特》（*The Berkut*，纽

约，1978）等，所有这类著作都满足了这种写作目的，换一种说法，它们就像是一大堆B级电影[4]和漫画故事，都在描绘着没有将活生生的希特勒送上审判庭便可能出现的危险。用这种方法去想象希特勒活下来的故事，都植入了一种政治批判，是对各国政治没能将老纳粹绳之以法的一种反思。这种政治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重启对战犯的审判后变得尤其令人瞩目，比如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以及1964年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等。与此相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那奇怪的短篇小说《逃往圣克里斯托瓦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óbal of A. H*，伦敦，1981），似乎旨在抨击人们对希特勒的痴迷。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有关希特勒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等的大量出现，这种痴迷变得更加显著，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希特勒浪潮”。斯坦纳似乎在告诉我们，苟活在南美丛林中的希特勒已与20世纪晚期没有关系。今天的人们，尤其是犹太人民，不该一再地提起他；相反地，应该将他遗忘，这样才能更为自信、更为乐观地面对未来。

最近出现的一拨书却截然不同，这些书都称希特勒（通常还有他的情妇伊娃·布劳恩）其实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而实际上逃离了地堡。这些书的作者都宣称其作品是基于事实的，有的还是基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开启这一潮流的是英国外科医生W·休·托马斯（W. Hugh Thomas），他在1995年出版的书曾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关注，那本书旨在证明，从柏林地堡上方的帝国总理府花园废墟中找到的烧焦的人体残骸并非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托马斯列举了大量看似具有说服力的法医证据，而他的医学专家资历也增加了其可信度。不过，他曾在多年前就声称，在1945年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中被判终身囚禁、后监禁于柏林外围处的施潘道堡中的纳粹党副党魁鲁道夫·赫斯，其实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人冒充的；类似的，2001年他又将对象指向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目击证人证词中说希姆莱在被捕后于1945年自杀，这一点也得到过英国军队的承认，但托马斯却同样声称自杀的其实另有其人。显然，托马斯非常热衷于发现那些不可能的替身，但他往这一名单上添得越多，其理论反而变得越发不具说服力。要完成这些骗局，需要进行相当大规模的密谋，而在他最近关于希姆莱的书中，已经能非常明显地看到，除了有一些是经过严格检验的医学证据外，没有任何历史的或法医的凭证。

至于真实的赫斯、希特勒、布劳恩、希姆莱等究竟发生了什么，托马斯却无话可说。不过这一空白在新世纪交替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则被许多其他作品用想象填满了，其中就包括罗恩·T·汉斯格（Ron T. Hansig）的《希特勒的逃脱》（*Hitler's Escape*，伦敦，2005）。而引起媒体极大兴趣的是《灰狼：希特勒的逃脱》（*Grey Wolf: The Escape of Adolf Hitler*，伦敦，2011），作者是两位英国记者，杰勒德·威廉斯（Gerrard Williams）与西蒙·邓斯坦（Simon Dunstan）。2013年4月11日，《太阳报》在报道该书时称它“引起了轰动”。在这本书中，希特勒从他的柏林地堡中成功逃脱，与他的情妇伊娃·布劳恩生活在“巴坦哥尼亚的荒野上”。在这期间，根据作者的描述，希特勒夫妇还生育了两个女儿，“她

们大约10年前都还健在”。显然，当红军向柏林发起进攻的时候，希特勒夫妇早已经过一条密道从地堡中逃走了，由两名替身留在地堡中并上演了自杀的骗局，而苏联红军当初所找到的就是这两个替身的烧焦的尸体。希特勒一家则搭乘一艘潜艇逃到了阿根廷，在靠近巴里洛切的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在那里，饱尝折磨的元首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密谋着“第四帝国”的建立，一直活到73岁，于1962年去世。《太阳报》引作者的原话称，这是“历史上最巧妙的手法”：

> 据说，作者在2011年10月28日曾告诉《每日邮报》，说书中的证据“耸人听闻”，他们还告诉《天空新闻》：“我们并不想重写历史，但是我们发现的有关希特勒逃脱的证据却耸人听闻，是不容忽视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希特勒或伊娃·布劳恩之死的法医证明，但他们在阿根廷的生活确有目击证人，而这些证人的讲述又都无不令人信服。”

当然，如同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问题在于作者所添加的尾注变得模糊不清，当涉及是什么支持其关键言论和是否允许读者去检验时，便闭口不谈。另外，他们对证明地堡里的尸体属于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的大量切实证据——包括已被希特勒的牙医验证为实的那些牙齿，都一笔带过或彻底略过不提，被忽略的还有那些由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战争后立即收集的、随后收入《希特勒的最后时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伦敦，1947）中的希特勒随从们的目击实录。最后，作者也并没有对他们所相信的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留有两个女儿生活在阿根廷这件事进行探究。再次，这样一个要依靠假设一个巨大的阴谋去压制真相的理论历经了好几十年，涉及无数专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档案、官员、调查人员、记者及许多其他相关人员。书中很少涉及作者的历史观，作者也忽略了已有的研究，使这部作品成了一种蓄意的欺骗，成了追求真实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败。

从方法论上讲，这类充满谬误的历史调查与否认犹太大屠杀这种政治驱动下的现象是紧密联系的，这种投入了巨大法医力量的政治驱动旨在证明：“二战”期间的600万犹太人并非纳粹所杀，奥斯维辛也没有集中营，希特勒也没有计划要屠杀犹太人，而历史学家们整理出来以证明这些事情的证据，其实都是战后由犹太人策划的阴谋所编造出来的。像托马斯或威廉斯与邓斯坦这样的作者，其目的相对来说是没有政治动机的，也的确不能将他们称为犹太大屠杀的否认者，因为那些杀戮者通常是由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驱动的，借助他们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都有大量学术性的脚注，并都冠之以“历史研究所”之类听起来很庄重的名义）来试图说服人们相信，是庞大而罪恶的犹太阴谋操控着大众媒体、历史专家、政府官员、高等学府及政治党派，目的是要逼迫他们压制真相，为其自身利益而主宰公众的视听。

这种类型的阴谋论，通常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声称已有

知识是“官方”知识因而不可相信。这种理论的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出现在小M·罗伯特·K·特斯克（M. Robert K. Teske，Jr.）的《欧米茄档案：军工/纳粹/外星人关系及“第四帝国”的美国渗透》（*The Omega Files: The Military-Industrial/Nazi/Alien Connection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America by the Fourth Reich*，纽约，2012），该书的宣传简介是这样开始的：

> 你即将阅读到的内容颇具争议性，可能还会冒犯部分读者。建议谨慎阅读。（注：文中所用之“外星的”一词，可任意代之以“恶魔的”“堕落天使”“超自然的”“神秘的”等，因为其中之任何一个，在本书之语境内均可适用。）……如果如已故的J·艾伦·海尼克（J. Allen Hynek）所说的那样，40个人中有1个以上——或者根据最新资料来源来说，10个人中有1人曾因“外星人/秘密政府”计划而被劫持或“处理过”，那么你一定知道曾遭受过这样劫持的某人，而他也知道劫持之事。这里的信息便是专为他们而提供的。而对于那些还不是“UFO（不明飞行物）劫持者”的人，这份档案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而有用的，并可能会在某天拯救你的性命！！！……这份文件中包含了关于全球阴谋的极其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很多细节，这个全球阴谋似乎根植于一个外星人——军工的联合协作当中，目的是要通过实现一个时常被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政府，将所有自由且相亲相爱的地球子民纳入其统治。

书中称飞碟是由纳粹在战争结束前造出的，供第三帝国领导人逃跑时使用。这些领导人之后都藏匿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南极洲）的地堡中，正努力建立那个“世界新秩序”。

这些想法看似异想天开，但由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PPP）于2013年3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则显示，“28%的美国人相信一支秘密的权力精英正手握一份全球主义议程，密谋通过一个全球独裁政府，或者说一个世界新秩序，从而最终统治世界”。29%的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21%的人相信1947年曾在新墨西哥的罗斯韦尔有过UFO坠落事件，而美国政府却将真相掩盖了。类似的看法在共和党人中比在民主党人中更为盛行（尽管民主党人中只有15%相信“世界新秩序”理论，但仍然有6%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是反基督教分子；虽然较之于共和党人的20%，这个数字低了很多，但还是挺令人吃惊的）。这些想法都是对政府极端不信任的一种隐喻式表现，人们将政府象征性地等同于纳粹主义那样的邪恶势力。这种不信任还同时伴随着这样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及那些号称正规出版物的成果，比如大学学者及研究人员的成果，都在蓄意掩埋真相；而只有特斯克、汉斯格、托马斯、威廉斯、邓斯坦等少数人，或形形色色的否认存在大屠杀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深入研究与尖锐洞察力，才有机会发现这些真相。这种类型的推测，或者说这样的伪历史和小说，与反事实历史和小说是不同的，尽管也有明显的关联。它们号称不是对可能发生的另一种事实的呈现，而是对“真正”历史事实的“真实”呈现。

但两者间的界限却极其微小，常常难以识别。

不妨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将其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纽约，1962）的背景设在一个虚构的战后世界，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纳粹和日本取得了胜利，瓜分了战利品，尤其是北美。但与此同时，书中的主人公读过一本现实中真正存在的反事实小说《沉重的蚂蚱》（*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而那本书却描写了现实的另一个版本，故事中德国与日本战败，希特勒被抓获、受审、判决，大英帝国历经战火而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赢得了内战。到小说的结尾处，书中人物发现《沉重的蚂蚱》描述的竟然是真相，而他们自己则是虚构的。这里，科幻叙事与虚构叙事只有短短一步之遥。在这样的科幻小说中，时光之箭被环境折弯，但可以由时光旅行者返回到原始事件去将事情放置进正确的轨道，从而将这支箭扳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实场景，比如20世纪的英国依旧还有异端裁判所，自16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胜利以来，至今英国依旧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与早期的现代西班牙大致相同。不过科幻小说作家倾向于在这样的描写中引入完全无历史依据或甚至不具可能性的情节，诸如未来科技、激光枪、时光机器之类，将读者远远带离他们的反事实叙事。

现实与虚构就这样彼此交织，许许多多的另类历史故事也是如此。在那些故事中，相当多一部分都假设希特勒一直活到了后战争时代，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则假设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执政就已死去，或者虽然活了下来但没能当上德国总理。从大部分看来，这类小说都是一厢情愿式想象的经典案例；无论是想象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总理，还是设想他在战后被送上了审判台，几乎都不言而喻地表达出事情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类题材中也有一小部分作品，特别是喜剧演员斯蒂芬·弗赖伊（Stephen Fry）的《制造历史》（*Making History*，伦敦，1996），则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在纳粹主义的兴起与获胜中，人为的历史与非人为的历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平衡因素？他们的回答是，就算没有希特勒，事情也会以相似的情形发生。你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你认为伟人究竟能将历史进程操控至何种程度（不论其出发点是好还是坏），同时也取决于你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纳粹主义罪行的谴责到底有多深，或者（像弗赖伊那样）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将责任归咎于德国人民。最终，如弗赖伊的小说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幻想——如想象希特勒在战争中苟活了下来——多为娱乐性或其他性质目的。希特勒在纳粹环境中的形象，他所开展的那些集会、游行、演讲以及政治鼓吹活动，一切还那般历历在目，也都吸引着人们去想象他在流亡之时还多少过着传统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过我们从大量证据中就得知，希特勒事实上根本不会想苟活于战败之后。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是在践行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如果他失败（正如在实际中那样），则唯一的出路便是一死，这也是其他众多主要纳粹分子的信念，包括戈培尔、戈林、希姆莱以及众多纳粹将军、政府部长和纳粹高官等，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纷纷自杀，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我殉葬浪潮。

另类历史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流，世界科幻年会自1995年开始便为猜测性历史颁发了两次年度侧面奖[5]（Sidewise Awards）。这一奖项取自默里·莱斯特（Murray Leister）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时空的侧面》（*Sidewise in Time*），小说中，1935年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暴风雨，将地球的某些部分带到了与我们历史类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多种时间轨迹上，在其中一条时间轨道上，罗马帝国一直延续至近代，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还出现了一支罗马军团；而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在一些地区大获全胜；旧金山则被俄国占领。这个故事在科幻小说界大获称道，有效地奠定了现代历史故事的流派基础，并在随后几年中催生了一系列同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世界与虚构的另类历史之间的界限是飘忽不定的，现实世界与被称作现实的另类幻想历史之间的界限也是飘忽不定的。

所有这类作品与更为严肃的反事实历史作品的区别在于，后者通常更加关注事件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在前者中通常都是缺失的或仅仅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反事实历史强调现有因果链中的某一个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导致了随后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变化。而另类历史则只是简单地呈现一个与真实世界相似的世界，而不会仔细探究它是怎样形成的。调查性医学或新闻类历史着力于在改变过的历史中建立一个事实，然后用成百上千页的篇幅去“证明”希特勒在战争后依然苟活于阿根廷，或证明那个囚禁在施潘道的“鲁道夫·赫斯”并非其本人，而对那些所谓的发现究竟会对历史进程造成怎样的影响，则并无真正的兴趣。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来说，这些作品的最大魅力是对那些假想的证据本身的描述机理。

不过，在本质上，反事实历史与虚构历史（由于属于全然的想象而有着更加明显的虚构痕迹）都属同一范畴。虚构历史中的一部分可追溯的记录甚至更长，早在反事实历史变得普遍之前就已经流行。后现代怀疑主义打开了各类作者的思想枷锁，使他们得以想象本可能出现的历史，并且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想象行为与真实历史事件及真实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流派中，读者与作者达成了一种隐性契约：他们都有过短暂的怀疑，因为他们都知道，去想象希特勒在1964年的阿根廷苟且偷生，到底会有多么刺激；去想象英国拒不加入纳粹主导下的欧洲，借以把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这样的做法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说服力；去想象希特勒没有在战后受到制裁，从道德上讲究竟会让人多么遗憾。因此，想要评估反事实叙事法在研究及理解真实历史进程中的实用性或其他作用，我们就必须将这些巴洛克式的光怪陆离的想象产物摒弃一旁，而去试着更加准确地弄清楚反事实究竟是如何与事实联系起来的。

[1] 博斯（约1450—约1516），荷兰籍高产画家，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迪者，奇幻视觉始祖。其画作大量使用各式象征符号，许多在当时都显得艰深晦涩。大多描绘人类罪恶与道德沉沦，以恶魔、半人半兽甚至机械形象表现人之邪恶，画风奇异、魔幻。——译者注

[2] 萨基，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1870—1916）小说家，出生在缅甸，生长在英国，参加“一战”并在前线牺牲。——编者注

[3] 布鲁塞尔指代欧盟。——译者注

[4] B级电影，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普遍布景简陋，道具粗糙毫无质感。——编者注

[5] 侧面奖，一个专门针对架空历史类型小说的幻想小说奖项，下设长篇小说奖和中短篇小说奖。——译者注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第四章　可能的世界

反事实，或者说是历史学家所用的反事实这一术语，往往有着许多不同的伪装形式，因此在对其实用性等作用进行总结之前，有必要先将它们从各种伪装形式中区别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些受政治驱动的猜想作品，比如那些想象纳粹分子在秘密地堡中活了下来并密谋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新秩序之类，无论它们多么广泛地为人所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事实，因为这些故事对探究事件的因果关系没有实际用处。同样，那些没有多少细节的虚假研究，比如希特勒并没有死于柏林地堡或者他逃亡到了阿根廷之类，也都是伪历史调查，并非真正的反事实，因为它们的兴趣只是那个所谓的事实本身，而不是可能导致的结果。还有一些对过去行为的另类书写则是别有用心的，比如斯大林曾试图用喷漆的方式把他从前的对手托洛茨基从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或稍后所拍摄的各种照片中抹去，或者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干脆把托洛茨基赶出历史记载等。这种别有用心的改写，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再现。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内容就是篡改过去的各种报纸，将那些对现任政治首领的一切证据彻底删除。然而，这种以回顾的方式去伪造历史的做法却并不是真正的反事实，因为它所关心的仅仅只是对全部实际历史记载的一种重现书写，而不是提供一种选择，一种因一个小小的改变而导致整体改变的选择。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P先生的书信》（*P's Correspondence*）也属于类似的或与此相关的作品：在他所构想的世界里，拿破仑、雪莱、拜伦等人全都一直到活到了他正在创作的时候（1845年），而没有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早就已经去世了。但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另一个现实，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或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等其他同一类型的小说一样。霍桑笔下的那些人物并没有对1845年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只有他们依旧活着这个猜想本身让人感到有趣而已。同样，那些颇有讽刺意味的另类世界，比如大人国、小人国之类，也没有真的对作者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有过什么改变，它们只不过是那个世界的一面镜子。

历史小说似乎属于反事实范畴。在为约翰·斯夸尔爵士的文集《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所写的序言里，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讨论了他所谓的“想象历史”，其中包括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与本杰明·迪斯雷利[1]（Benjamin Disraeli）的议会小说和政治小说。这些小说都将背景设置在某个可辨识的现代世界或最近的历史世界中——他们的世界设置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并有可辨识的机构，如议会，以及可辨识的人物如首相和主教等，不过所描绘的则是从未发生过的虚构事件和从未存在过的虚构人物。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颇具影响力的中世纪小说开始，很多同一类型的小说都可以说是运用了这种方式，但它们都不是反事实的，因为正如惠勒–贝内特爵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作者并没有为他们所描绘的平行世界架构任何使之得以建立的因果关系。此外，无论是这些作品还是更广范围内的历史小说，也都没有对基本的历史背景做出巨大改写；他们的作品有对话、有性格特征，也有人物形象，但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社会结构，没有组织机构；的确，历史小说家在阅读和参照他们所选定的某一

时期的标准历史作品时，通常会在“了解透彻”这一点上遇到无比巨大的困难；比如，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对都铎政治家兼政客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刻画之所以成为一部杰出的成功之作，囊获了无数奖项和大量读者，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对作品风格、描述方式及结构的出色把控，而且因为其中的历史真实性为整个描述镀上了一层光泽。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战”前写于英国国内的许多小说也不能被归类于反事实，这些小说警告人们，在面对德国的军事扩张时，不能让那种因不涉战而沾沾自喜的情形再继续下去：小说中描写英国受德国军队入侵，最终在德国皇帝的蹂躏下痛不欲生。此外，还有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类似的小说，以及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怀疑论小说，比如安德鲁·罗伯茨的《亚琛备忘录》就想象了21世纪的英国在欧盟统治的未来场景，但这一场景却与20世纪的英国假如真的受到德国统治后可能出现的场景并无二致，也都不属于真正的反事实。罗伯茨想象出的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景象，很显然是基于一个反乌托邦式的真实过去的，不过由于其背景条件是设置在未来的，因此也就无须对已发生过的事实进行任何的更改了。类似地，那些蓄意颠倒历史真相、旨在为讽刺当下局势提供依据的作品，比如乌纳穆诺（Unamuno）或富恩特斯（Fuentes）等西班牙作家的幻想作品，也不是反事实的，因为像玛雅人或印加人发现并征服了欧洲之类的构想并不依靠于改变了的时间轨迹，而是仅仅将事实做了颠倒。无论是基于历史的还是基于虚构的，真正的反事实场景通常会借助经过改变的历史起因而引导出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结局。

很多时候，这些作品是极其无聊的。例如杰里米·布莱克的书就通篇都在描写事情本可能与它们真正发生过的情形如何不同，所有表述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杰里米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一点。他说“统治者和大臣们”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使他们能够藐视政策中的规范性，因为那些政策本来就应该遵循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换句话说，大人物的国家利益观与普通人的国家利益观是不必相同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将限制他们选择自由的因素排除不计，那我们就完全错误地将选择视作是不受约束的了。包括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内的很多统治者，都热衷于对政策进行大起大落的突然改变，但那些改变总归是有可接受的底线的；而大量的俄国沙皇之所以遭到谋杀，正是因为他们突破了那些底线。换个不同的例子来讲，针对弗格森就“一战”爆发的原因所做的分析，阿维泽尔·塔克就曾这样评价道：“弗格森创建了一些去语境化的历史代言人，并将他们从更为宽泛的文化语境和经济语境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些语境阻碍了决定的做出，而这正好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亦即说假如作者是阿斯奎斯（Asquith）政府的一员，那么他也会希望能做出那些决定。同样，为了创造一个反事实，这里也必须将决策制定人塑造为毫无约束的历史代言人，但这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14年做出了参战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又是在更大的语境中做出的，其本身就已表明：就算所有的大臣都反对参加对德战争并因此而辞职，并导致了自由党政府的最终垮台，英国人也迟早总会卷入那场战争。

布莱克的“反事实”观，无非是认为事情本来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结局的，但这无法帮助我们解释事情究竟是怎样或为什么会发展成它们最终的样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更偏向那些“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反事实”，而不是那些“有答案的”反事实。归根结底，他的反事实并非真正的反事实，或者说，并不是该题材的其他典型例子所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反事实。如果要说他的这些作品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便是“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偶然事件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并不是非常大，而且这样也再次将偶然性与反事实叙事法混为一谈了。其他反事实文集中的那些文章则恰恰相反，完全避开了猜测，比如塔克就指出，弗格森那本关于纳粹的欧洲计划的文集中收录的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基于档案资料所写的短文就不是反事实，因为文中根本没有讲到如果将这些计划付诸实现，那么整个战争史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有一种属于更大类别的猜想小说，其内容太过局限，根本不值得被称为反事实小说，那便是数量庞大的以军事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它们认为那些已经发生的战争完全可能发展为另一种情形。毫无疑问，在这些作品中，涵盖面最广的是丹尼斯·E·肖沃特（Dennis E. Showalter）与哈罗德·C·多伊奇（Harald C. Deutsch）于1997年出版的《如果联盟倒塌》（*If the Allied Had Fallen*）。在至少60多篇各不相同的文章中，军事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反事实叙事涵盖了从“如果英国没能将德国无线电通信内容成功解码会怎么样”到“如果斯大林采纳了所谓的沙波什尼科夫方案而沿斯大林防线实施集中抵御会怎么样”。这些猜想许多都是不切实际的（比如，如果希特勒让他的将军们继续干着拿薪水该干的那些工作，而不是一直都在亲自干涉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这些文章许多都非常简短，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二战”中的战略战术的重新改写，旨在修正各种错误，偶尔也强调一下“二战”参与者所做的那些正确决定。

还有一种次要的反事实叙事则在风格和意图上都有所不同，即如果历史上曾经的一两个首相或总统被别的政治家所取代则发生什么？这样的构想在英国极其流行，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市场。英国保守派出版商“政客”（Politico）对反事实写作的有意推动，使其成了一种近乎小型产业的文化现象。邓肯·布拉克2006年出版的文集《戈尔总统……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中，专论政治人物的文章有19篇，大多是一厢情愿的猜想：阿尔·戈尔在2000年11月成为美国总统从而避免了伊拉克战争；自由党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并没有在1929年去世，而是活着拯救了魏玛共和国；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在萨拉热窝射出的那发子弹没有打中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从而20世纪也没发生现实中的种种灾难。邓肯·布拉克和伊恩·戴尔于2003年编辑出版的文集《波蒂略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则更侧重于对英国政客的描写，书中既收录了熟悉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也收录了与之相反的构想文章，可谓二者的混合体。其中有不少文章描写道，就算泰德·希斯在1974年赢得选举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的选举中失败，事情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他们两位编辑出版的另一本文集《鲍里斯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也大致相同。所有这些文集的确都属于反事实叙事作品，不过他们仅着重于描写个别人物，利用的主要是对这些人物的已有认

识，或许再着墨修饰一番，然后便开始认为人物是一切之重，他们（少有例外地）从人物的个人命运的改变出发，继而猜想出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改变。弗朗西斯·贝克特（Francis Beckett）的《未曾有过的首相们》（*The Prime Ministers Who Never Were*，伦敦，2011）则稍有不同，书中选取了个别英国政客，让他们住进了唐宁街10号。但他们的脸上常常挂着犯罪嫌疑人的表情，其中包括欧盟的创建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还有哈利法克斯侯爵，后者做出的继续反抗希特勒的决定在他死后让评论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通览所有这些文集里的那些言辞诙谐、无礼不羁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都是聒噪阶层[2]用以轻松消遣的产物，或许同时也是对有抱负的政客们的隐性鼓舞。

由于这类新型反事实非常强调目的性——这对读者来说可谓幸事一件，所以并不反感将言论与娱乐兼并，也不反对在猜想中加入奇想与幽默。有评论家曾评论罗伯茨文集中的12篇文章都写得不错，全都具有“娱乐性”，并称赞其“好玩”的本质，称该书为“一本关于偶然性与无常性的赞美诗”。幽默元素甚至潜入到了最严肃的反事实写作中，比如在霍尔格·赫维希的描写里，屈从于德国统治下的绥靖主义英国政府就将威廉·乔伊斯[3]（William Joyce），亦即所谓的“呵呵勋爵”（Lord Haw-Haw），任命为BBC总监。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于2010~2011年期间在《新政治家》周刊连载的40篇反事实历史文章，明显是以娱乐性为目的（连载最后是一篇预测性文章，其长度是其他文章的4倍，着重描写戴维·卡梅隆所在的保守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在其头5年（2010~2015年）中的政治表现，尽管这是站在这一时间段末尾的角度来写出的伪历史文章，但这是该系列中唯一真正严肃的一篇。桑迪布鲁克横贯整个有记录的历史，开篇便写屋大维丢掉了亚克提姆战役，从而让埃及取代了罗马（“长远看来，埃及力量崛起势在必行”），而非洲人则在确信了欧洲人的“愚蠢、懒惰及总体的自卑感”后，在一个最佳时机发起了一场“欧洲争夺战”。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之战中失利，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则一直延续到“大酋长”撒切尔统治时期才告结束，同时还成功地维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独立自主（或许这里有一点儿欧洲怀疑主义式的一厢情愿）。英格兰的亨利五世一直活到老年，并一度征服了法兰西（更加一厢情愿），还让圣女贞德做了他的情妇（这倒有可能），不过这个盎格鲁–法兰西联合王国却在后来远离它的臣民，以至于在1789年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领导的共和党暴徒攻占了伦敦塔，使得君主制被就此推翻。在桑德布鲁克的两部幻想小说中，天主教都在英国获胜，而如今的英国则由“红衣教主道金斯”（Cardinal Dawkins）领导，但没能进行工业化，从而陷入了“一场噩梦当中：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左翼对神父与修女的大肆屠杀，以及因马格里奇（Muggendge）的长期极端教士统治而引发的反抗运动”（这与那些一厢情愿地幻想新教在早期现代英国就已失败的常见描述可就背道而驰了）。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风趣，而桑德布鲁克也决意保持这种风格，因此他谨慎地避开了那些有可能让人觉得过于严肃的题材，比如像纳粹对英国的可能占领之类。而在描写当下时，他将引人入胜的反事实叙事更多

地聚焦于英国政治，通过机敏地让那些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发生逆转，巧妙地设置与当下并线的多条线索，增添种种迂回曲折的意料情节，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对于这些充满智慧、巧妙构思的短文，我们不必满心热切地进行多余的分析。当然也不难发现，多数时候桑德布鲁克并非是要呈现一部反事实历史，并不是由事件链中的某个变化引导出一系列其他看似合理的改变，而是描写了一部平行历史，比如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农夫迪克”）并没有退休去乡下，而是成为“快乐君主”（Merry Monarch），至于他的王位继承人，按时间顺序则依次为：“荒淫放荡的乔治·克伦威尔（即现实中的乔治五世）”于19世纪20年代继任；“沉迷于酒池肉林的赫伯特·亨利·克伦威尔（即现实中的H·H·阿斯奎斯，那一时期的真正首相）”于20世纪早期继任；甚至在17世纪由奥利弗创立总统制时，其初选阶段还出现了“克伦威尔兄弟俩，赞美之神和爱德”（即米利班德兄弟，曾于2010年争夺工党领导之位，此处不再赘述）。

在这部由一系列短文组成的长篇作品中，桑德布鲁克遵循了尼尔·弗格森在《虚拟的历史》后记中所设定的步骤。《虚拟的历史》一书描写了从1646~1996年的架空历史，于1996年完成。弗格森十分热衷于攻击“决定论主义者”，后者认为他所描述到的那些有另外可能性的历史进程始终都是无可避免的，弗格森在其后记中将我们所已知的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以一系列“反事实”形式呈现出来，从而一再强调事件的偶然性。该书以保皇党在英国内战中的获胜开头，接着便对那之后的历史展开了叙述：斯图亚特家族成为立宪制君主，其政治灵活性与军事技能使美洲殖民地得以保留，并通过金融改革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此外，工业化的实施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从而平息了工人阶级的不满，马克思因而成了一位“千禧年犹太先知”，而列宁则成了一位东正教神父（之后以德国间谍身份遭到处决）；神圣罗马帝国以奥普联盟的形式实现了改革，又以分权联盟的形式度过了19世纪，并于1915年在“一战”中获得胜利，而英国则保持了中立。其结果是“欧洲联盟”的建立，这个欧洲联盟尊重大英帝国的完整性，但最终还是受纳粹影响而转型成一个“领袖国家”，它还占领了法国并侵略英格兰，迫使后者加入新的“德国–欧洲联盟”。在东部，德国击败了俄国人，不过希特勒却被施陶芬贝格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了，这一事件摧毁了德国士气，朱加什维利族长（斯大林）领导的俄国乘机发起了反击。日本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但后者反攻日本的行动则遭到了失败，最后是俄国控制了欧洲。在英国，撒切尔首相输掉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由迈克尔·富特接任首相之职，但他灾难性的领导不仅致使西方经济政治崩溃，使跨大西洋联盟瓦解，还使大英联合王国也四分五裂。这就为未来的东方统治开辟了道路。

书中前面的文章将所有进程打乱，再聪明地将一切编织在一起，这种具有高度娱乐性的描述能让读者嘴角频频泛出笑意。不过这本书与《虚拟的历史》中的基本思路在许多方面都背道而驰。首先，该书明显地旨在用约翰·斯夸尔爵士文集中的风格来表现某种“游戏精神”（作为娱乐则要高出很多）。然而，弗格森的目的，正如他本人在序言中所说的，则显然是要杜绝这一点，并将反事实历史视为一种严肃的学术工具

来进行创作。其次，该书在其后记中所呈现的实际上并非反事实历史，亦即并非改变某件事或某个环境，并经由一系列富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而导致未来某个时间内的事态发生变化；这个后记也像桑德布鲁克的文章那样，呈现的是一段与真实历史相重合的平行历史，只不过将每个步骤都做了更改。因果关系被抛之于脑后，也并不试图引导读者去考虑事件模式中的某个变化可能会怎样影响到其他事件。比如，它只是单纯地假设如果17世纪时查理一世获胜，那么他也是会将立宪君主制引入英国的，但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去说明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弗格森则必须清楚地说明事件的因果关系，才能将历史大致扳回正轨，因此他不得不写到“一战”和“二战”，否则整个描述便会脱离真实事件的发展路径太远，也就不能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但这整个过程却太过专断，既忽略了可能的因果关系，也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偶然性干扰。

举个例子，在弗格森的“虚拟的历史”中，阿根廷在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中获得了胜利。但他所要表达的核心自然是：如果查理一世在17世纪时战胜了议会党人，那么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虽然难以预测）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并不存在，因为像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这样的事件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事实上这种历史环境又是基于之前的一系列历史环境而产生的，换句话说，这是一条漫长的因果关系链。的确，如果查理一世真的战胜了议会党人，那么340年后的撒切尔夫人就不可能成为英国首相，因为客观环境将不会允许女性参加选举，所以她作为议会代表领导政党这种事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改变历史万花筒的一部分，对其他事件所造成的撼动是非常难以预测的。运用这样的描述方式，弗格森完全摒弃了他在之前的书中所谨慎遵循的一切规则和因果关系，展开了对历史的疯狂幻想。

这种疯狂的幻想也绝非是中立的。一个描写大英帝国（包括北美以及被斯图亚特所统治的地区）与神圣罗马帝国一同存活到了20世纪、没有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许多重大事件的反事实，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一厢情愿，带有隐含报复的性质。尽管阿维泽尔·塔克声称弗格森产生出这些想法是为了实现“某种个人的空想”，但其中却不乏诸多消极元素，尤其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的失败、迈克尔·富特首相的灾难性领导、东方崛起的不祥征兆等，都是指向未来历史的一种警告。保守主义的欧洲怀疑论也再次出现，含沙射影地将欧盟描绘成一个扩张后的德意志帝国，只是在结局处才不得不将其摧毁。这类构想已经走得太远，没有丝毫的可行性，而它们自身也显然地意不在此。仅以两个例子来说：一是即便斯图亚特家族真的在17世纪获得了胜利，若没有更深层的社会及经济因素起作用，也是不大可能使英国从此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二是奉行专制主义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同样是不大可能在工业、政治、科学、技术及社会上取得很大发展，从而足以巩固英国在19世纪的帝国统治的。

正如我在之前已经提到的，如果欧洲真的处于德军的统治之下，那么1915时的大英帝国是无法继续保持其原先的样子的，因为如果那个更加弱小的德国在“一战”中获胜，那么在这之前的15年，德国早就应该在

觊觎英国了。历史记载显示，迈克尔·富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投入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与撒切尔投入的一样多，因此战争的失败同样也会伤及他本人（尽管可能也有人猜测这会使撒切尔在随后的选举中为自己赚得一张同情票）。另外，弗格森的平行描述还与他在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反事实猜想相矛盾。比如，在文集中那篇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曾假设（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如果德国在“一战”中获胜利，则魏玛共和国内就不会怨声四起，不会频发经济灾难，从而也就不会导致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与希特勒的上台，然而弗格森还是在其后记中让希特勒掌权了。虽然我们不会太重视他的后记，但他的这种自相矛盾却无疑反映了个人专断在这类猜想中的流行之广。

对个人专断的质疑在反事实文章里也会得到强调。有些反事实文章，在确定了那个最初的事态变化之后，便开始描述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其他变化，而不是试图构建一个清晰的特例用以说明各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举一个罗伯茨文集中的例子，天主教历史学家安东尼娅·弗雷泽以一个“乐观”场景开头，让1605年的“火药阴谋”成功炸死了国王和议会，之后便是伊丽莎白二世登上王位成为新的君主（史称“冬天女王”，还在161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初以信奉新教的普法尔茨选侯妻子的身份成为波希米亚王位的拥有者，只是因为选侯很快被推翻，所以她对波希米亚王位的占领也就夭折了），天主教与新教徒达成了和解，建立了宗教宽容政策，并与法国结成了紧密联盟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不过，她也提到了一个“历史遭到无情打击”的“悲观”场景，承认了宗教冲突的继续。

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很大一部分反事实猜测在结尾时都总结到，事情最终还是会走向与现实一样的历程。在弗格森的书中，约翰·亚当森描写的查理一世获胜对最终的结局并没有产生多么有意义的影响，因为军队力量将有助于议会势力的日渐强大，从而暗示着内战与查理一世的被处决对历史并非起决定性作用。像弗雷泽的文章一样，这包含了一种强烈的一厢情愿色彩，但同时也承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有限影响，这便否定了编辑者所声称的偶然性与意外在历史中的至高地位。在安妮·萨默塞特（Anne Somerset）的文章中，即使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成功继而菲利普二世征服英国，结局也没有太大改变：恢复天主教并无大碍，英国自主权也会保留，议会依旧召开，莎士比亚照旧写他的惊世之作。在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作品中，当1941年6月德国发起侵略并于6个月后抵达莫斯科的国门时，斯大林慌了阵脚。他逃离了苏联首都（现实中，他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决定留下，但毕竟他曾经差一点儿逃跑），随后苏联被逼弃城。但是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抓获并枪决了斯大林，前者取代了后者之位，伟大的朱可夫元帅成功发动反攻，苏联红军最后依旧赢得了战争。莫洛托夫一直在位，直至1986年逝世，随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在一系列改革后将苏联带向了终结。换句话讲，从长远看来，就算斯大林在1941年12月弃城而逃，对结局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同样地，在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叙述中，日本并没有轰炸珍珠港，可美国还是加入了战争以对抗轴心国；而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得出的结论则是，就算苏联与西方不曾有过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冷战也终究无可避免。

大量的这类文章都会给出理由，用以说明反事实为什么是克服“决定论”的一种工具，但那些理由都存在局限性，从大历史因素优先于更小的、人为的、具有偶然性与随机性的事件与状况这一意义上来说，除了弗格森对一厢情愿式幻想的批判外，就连他那本书中的其他人的文章，还有罗伯茨文集中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再次一头栽进了这样的陷阱：假如事情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则结果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美好。在罗伯茨的文集里，右翼英籍波兰历史学家亚当·扎莫伊斯基（Adam Zamoyski）在文中想象了1812年拿破仑打败俄国后的世界，那是一个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孕育战争民族的世界，俄国则被驱回了欧洲边界，因而无法像现实中那样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去镇压波兰。不过扎莫伊斯基也非常公平地描绘出一个这样的未来：欧洲形成了一个与欧盟极为相似的组织，发展繁荣且紧密团结，但因受制于官僚体系而压制了经济和文化积极性。扎莫伊斯基文章中的欧洲怀疑主义构想十分明显，正像诺曼·斯通（Norman Stone）所猜测的，假如1914年萨拉热窝暗杀斐迪南大公的行动失败了，那么奥斯曼帝国势必会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发生内乱，并被英国和俄国瓜分（从而俄国撤出欧洲，大英帝国势力得以巩固）。缺席了这场盛宴的德国和法国，则联手建立了一个也是类似今天的欧盟的经济联合会，但英国却独善其身，成为发展繁荣的世界强国——又一个欧洲怀疑论主义的一厢情愿幻想。在安德鲁·罗伯茨的文中，列宁在1917年遭到暗杀，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一条更温和的道路，自由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和平手段结束一切，立宪制下的俄国在1938年协助击败了纳粹，推翻了希特勒与他的第三帝国。在所有这些猜想中，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压倒了应有的历史意义，对数十年中各种后果的推测也太过于广泛深远，因而也就无法使人信服。

在罗伯茨的文集中，右翼记者西蒙·赫弗（Simon Heffer）设定首相撒切尔在1984年布莱顿保守党大会的爆炸事件中身亡，（当然，现实中她幸存了下来），其继任者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既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托利党人，又是一位彻底的亲欧洲人士。由于赫塞尔廷在其政党与其亲欧洲政策之间造成了严重分离，才为1992年工党在选举中的成功制造了机会，文章显然落入了“若非天恩眷顾”的模式当中。但伤害已然造成，“英国势必演变成一个高税收、低效率的国家，就像现代的法国、德国或日本那样”。同样，在一篇闹剧式文章中，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猜想，美国总统戈尔出于对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质疑、对政治正确性的顾虑以及对国际组织的尊重等，在面对基地组织于2001年撞毁纽约双子塔事件时，无法给予应有的恰当回应。该类型的针对各种政治驱动的构想还有很多，其根据是，分裂工党的正是撒切尔夫人及其后期所持有的欧洲怀疑论，而赫弗描绘出的法国、德国及日本的负面形象就算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无法为多数人所认同。同样的猜想还有，2000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W·布什被人们一致认为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无能的总统，而他缺乏深思熟虑的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的非法侵

略到最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成果。

大量这类文章都忽略了弗格森曾提过的一个要求，即在创作反事实时，也只有那些经过当代人有意识的真正思考过的可能素材，才值得加以考虑。在实际中，这些文章都将某种神奇的反转力量扔进历史行动当中，要么是一枚置玛格丽特·撒切尔于死地的炸弹，要么是一场使阿尔·戈尔得以上台的选举，或是实际中被打败的某位将军赢得了一场军事胜利，或是其他某个无关决策者的历史情形的颠覆。1914年的格雷，抑或是1940年的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大概就满足弗格森的要求，但没有几个历史学家照着去做，他们在编写反事实场景时，更愿意聚焦那些打上马赛克的历史碎片。当然，这是因为如果要求将某个决定作为写作的起点，那么反事实的操作范围就变得异常狭窄。不过说到底，这个领域本身就已经足够狭窄的了。反事实几乎总是围绕着历史中的政客与政策、外交事务、战争及政府进行假设的，而且也仅仅是对这些领域的事件进行解释。

一些“反事实历史”的提倡者及践行者也赞同这一点，从借助反事实以恢复对伟人的信仰的罗伯特·考利，到类似承认“反驳一切必然性深深吸引着历史学家，他们致力于研究历史中偶然事件与人类行为具有直接的核心影响的那些方面，例如政治历史和军事历史”的杰里米·布莱克。从查理·马特、西班牙无敌舰队，到滑铁卢战役和“二战”，千篇一律的话题在反历史领域中出现的频率高得令人吃惊。在安德鲁·罗伯茨的12篇文章中，有9篇关于战争；另外3篇分别是猜想如果“火药阴谋”成功、如果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布莱顿爆炸事件中身亡，以及如果阿尔·戈尔而非乔治·W·布什在2002年中成功竞选总统，各会发生怎样的情形。事实上，考利的第一部文集就是专门写军事历史的；但也有极少的一些反事实偏离高层政治及战争这一主线，比如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文章就讲如果土豆没有进入欧洲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而《重塑西方》中所收录的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肯尼斯·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文章则讲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史。

正如特里斯特拉姆·亨特所指出的那样，对绝大多数反事实主义者来说，在各种版本的“假如”历史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那些手握权力的人物，是那些将军、总统以及革命者做过什么或没做什么的故事。官僚主义也好，思想观念也罢，抑或是社会阶层，较之于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浮躁或弗朗茨·斐迪南的身体素质，都是不足挂齿的。不过，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反事实描述一旦开始进行，处于幻想之中心地位的人物特征则被拉到了幕后，而注意力则完全集中在了普遍的语境因素上。这些语境因素又因掌权者被杀（或没被杀）或做了一个与实际中刚好相反的决定，或赢得（或失掉）某场战争等其他原因而受到影响。事实上，卢博米尔·多勒策尔（Lubomir Dolezel）就认为，在反事实写作过程中，“历史学家集中于改变重要的（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或军事历史情境”，而不是去改变或塑造某些个别人物。“对于反事实历史来说，人物的有趣之处只在于充当了有关社会历史相关行动的‘领导人’，或偶尔作为重要历史性事件的施动者。”若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则世界政治

秩序将得以改变；若“火药阴谋”成功，则英国将变为天主教国家；若弗朗茨·斐迪南没有遭到暗杀，则“一战”便不会爆发，继而随后的整部欧美历史也将被改写；若英国在“一战”中袖手旁观，那么欧洲联盟就会在那时建立起来。

正如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反事实主义几乎专门聚焦于传统的、过时的、曾在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军事及外交历史。甚至在《重塑西方》一书中，大部分文章也是集中于讲述战争和革命。事实上，或多或少地，这些著作必须这样展开。大规模的反事实叙事是不足为信的，这也是反事实的本质所决定的。例如在杰弗里·霍索恩（Geoffrey Hawthorn）的书中，14世纪末遭受黑死病侵袭的法国，却在18世纪因生育率下降而实现经济加速增长，但无论是极其不可能的起始条件，还是像英国那样因劳工短缺和高度消费需求而促成了300年后的工业发展这样有力的历史关联，全都不足以支持这种大幅的跳跃。同样，乔尔·莫基尔在设想如果没有西方的工业革命全球科学技术将会怎样发展时，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不是被西方甩得足够远，那么东方科学是否就不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经历翻天覆地的发展呢？要想准确地知道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本身就是对反事实历史提出的深远言论进行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不仅是认为，而且是在隐晦地宣称，政治和战争才是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话题；换句话讲，它提倡一种狭隘、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大部分历史学家早已弃之不用的了，但其领域则是反事实几乎总是难以展开的地方。目前，世界上最富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都在倾力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史，研究全球化的、跨国际呈现的历史，而不是研究政治史或外交史。

当谈及一个超越政治或军事的更大范围的历史时，弗格森便又退回了某种决定论主义上。因此，在他的《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弗格森在解释欧洲曾在1815~1914年期间主导世界这一事实时指出：欧洲经济建立于竞争基础上，欧洲科学胜过中国及其他文明国家的科学，欧洲法律尊重产权并使稳定政体得以产生，欧洲医疗提高了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欧洲社会建立于消费文化之上，且欧洲人比世界上其他人都更勤奋。经他一章一章地阐述这些因素，读者对这些内容的印象无可避免地不断累加起来。这些全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其源头可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末——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到了1800年，这些影响因素全都成为现实，使1815年后的欧洲霸权势在必行。替代性假说——即反事实，不会描写这种历史，尽管按照弗格森的观点它们会破坏掉他试图运用的大量解释。

在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改变加工时，如果连弗格森都隐约地承认反事实是不合适的，那么无论是政治驱使下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还是一系列具有可信度的因果关联，当粗心的实践者在试图将反事实运用到某个更加具体的叙事时，他究竟如何才能避免掉入众多的潜在陷阱呢？杰弗里·帕克和菲利普·泰特洛克曾为他们的文集《重塑西方》中的文章制定了一些关于反事实历史的基本原则。按他们所说，必须得有的一个规则是“最小改写”，这个规则与弗格森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要避免个人专

断。另外一个规则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余者皆同”，换句话说，也就是规定反事实必须只能在因果关系链上做一处改变，而其余的一切则需要保持与现实中的一致。因此，正如阿维泽尔·塔克指出的那样，在弗格森的文集中，乔纳森·克拉克的反事实猜想（假设1688年“光荣革命”不曾发生，则美国可能会继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初始条件的改变中就已经忽略了“余者皆同”的规则，也就是说，其初始条件过大，无法使作者的构想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因为英国不得不被彻底地改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体，才有可能避免发生“光荣革命”去推翻天主教独裁统治者詹姆斯二世，产生荷兰新教君主威廉三世。

凭借自我克制而使反事实场景不至于被推到过于遥远的未来，这是帕克和泰特洛克提出的第二条原则，在践行这一规则时，他们还在克拉克关于“长远场景中存在不合理性”那个具有毁灭性的观点之上添加了这样的内容：“作者们越是企图深入探究他们那反事实世界的未来，他们的关联性原则就变得越脆弱。”最后，为了避开卡尔曾谴责过的现象（其他反事实文集中的大量文章也都存在过这种缺陷，即无可救药地陷入自我中心的泥潭），帕克和泰特洛克要求作者们在描写时要观点清晰，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就像所有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那样。以这样的心胸写出的文章才能经受严峻的考验，才能判断其是否为历史知识或历史理解做出了贡献。在该书最后的概述里，两位编辑明确指出，那些“侥幸脱险”的反事实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或事件是多容易就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现代人认识事件的多种可能性是非常有用的。但这并非重点。使用侥幸脱险的反事实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强调这类可能性的局限性以及操作这些反事实时所受到的各种制约。

以描写纳粹党的夺权为例，我曾在我的《第三帝国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指出，1933年摆在德国面前的选择，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二者必一”的选择：要么是军事独裁，要么是纳粹独裁。正如帕克和泰特洛克从亨利·特纳（Henry Turner）的实证研究中受到启发后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从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无论是选民的支持率、自己的经济来源，还是党内的凝聚力，当时的纳粹都是正处在不断衰落之中，而且如果你能理解在1933年1月30日将希特勒送上总理之位的那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谈判所经历的诸多曲折，你便会发现机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谁用反事实来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事实上帕克和泰特洛克也并没有这样做。除此之外，既要侧重描写兴登堡（是他的努力使希特勒成为总理）身边的那一小部分决策者，同时又要不可避免地强调诸如“个人喜恶、受伤情感、友谊恶化、复仇欲望”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样做是忽略了纳粹得以迅速滋生的大规模杀戮性街头暴力的大背景，忽视了德意志国会的全面治理混乱（最终在混乱中解体），忽视了共产主义分子和纳粹分子在议会室中朝彼此高喊各自的口号，又联合一气来否决政府提出的所有措施。这种难耐的情形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尤其当还处在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当中时：1/3的人口失业，全国各地无数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唯有通过某种形式将纳粹引入政府，政治危机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1932年的7月选举到同年的11月选举，纳粹的确在政治上处于衰落期，这使帕彭和兴登堡

身边的保守党成员误以为他们可以控制他们，这后一点虽然是致命的，但并非是关键原因。真正的关键因素是那支纳粹冲锋队，因为正是这支纳粹冲锋队，恰如军队领导人施莱谢尔将军（General Schleicher）所担心的，使得武装暴力不断升级，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深渊。

从1930年最后的民主政府倒台之后，整部德国历史就已收窄了可供选择的空间，排除了重返民主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少是大部分当代人都认可的。可能有人会猜测，像施莱谢尔将军这样的人，如果掌控能力更强些，那么兴许就有可能让代表军队的人上台执掌德国，而不是纳粹；虽然也可能面临两种可能，一是被武力镇压，二是实现某种联合。前者执行起来会非常困难，毕竟冲锋队的数量远远多于军队自身的士兵数。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人们也有理由做如下的猜想：鉴于陆军军官的政策以及重新签署凡尔赛条约、重新武装全体国民、再次武装莱茵区、进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目标，一句话，鉴于他们致力于为1918年的战败一雪前耻，尤其还因为他们将需要把纳粹剔除出局，所以还是会导致一场欧洲整体大战迫在眉睫。而事实上，一个联合政府真的组建了起来，将纳粹、保守党和军队汇集在了一起。希特勒完全压制其联盟搭档，在几个月后建立了一党专政。劲头十足的纳粹分子、无所不在的街头暴力、领导人残忍无情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为假设佐证。

这些想象的场景为理解历史所做的贡献是，它清楚地表明了在1932~1933年，无论是魏玛民主制的立刻恢复，还是维持欧洲的国际现状，都不是当时的可供选项。其意图并非在于主张1933年的德国政治家拥有操纵局势的自由，而恰恰是他们缺少这样的自由。同样，1934年1月，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举行了反抗多尔弗斯独裁的起义，却在几天后便被军队以武力镇压下去了，这段经历也可以表明，就算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联合起来，他们也无力抵抗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纳粹的暴力行径，更别提同时对抗两种力量。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揭露类似叙事中的任何形式的一厢情愿，或换句话说，是为了在描写1932~1933年的德国历史事件时能更加强化真实历史的叙述，而不是强调这一关键点所具有的未来开放性，因为所谓的开放只不过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是开放的。这类猜想非常符合帕克和泰特洛克的“最小改写”或“侥幸脱险”或对可能替代事件的短期猜想等标准，尽管没有达到他们认为这些猜想应该具有的目标，但到底是运用反事实所惯用的方法勉强符合了“反事实”描写。

在另一领域中，有人认为德皇威廉二世没有意识到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的不确定性，而将这个过程视为历史注定的，帕克和泰特洛克对此抱以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讨论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反事实假设，看看要变更19世纪中叶的欧洲历史轨迹，究竟有多么容易或者有多么困难。”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实际上，只要援引俾斯麦、德皇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该话题的言论，就能很容易地得出结论。俾斯麦认为德国在欧洲及世界的地位是不稳定的，而皇帝则不这么认为，但两人都用政治家的言行体现了各自观点，这就是事实。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真实描述，就能很好地说明德国统一的问题——只要我们没有沦为普鲁士派历史学家所持的必然主义牺牲品[4]，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一

个关于萨多瓦战役的简单而真实的描述，而无须进行任何清晰的反事实猜想，便已经能看出偶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当然，皇帝的确认为萨多瓦的胜利是注定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两人的想法；而历史学家也不必为了理解他们的行为而去判定他们的是非，尽管俾斯麦所成就的一切在最后都被皇帝损失殆尽，并带着他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走向了覆灭。总结历史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谁比别人更懂得怎么做才是对的，总结只是对历史的一个总观察罢了。

最后，帕克和泰特洛克都认为，他们所说的“倒推式反事实主义”（reversionary counterfactualism），因为强调的不是短期的偶然性事件，而是长期的大规模过程，这有助于解释诸如工业化进程或国家间力量均衡的变化等，究竟是怎么样和为什么会以那种真实的方式发生。也就是说，反事实猜想最终回到这样一个结论：就算发生了不同的事件、经历了迥异的过程，但一切终究还是会殊途同归。比如，人们可以做这样的构想：希特勒赢得了对苏联的战争，但毁在了美国的原子弹下，所以无论如何，德国最终依然失败了。这里的观点是说，类似的“思想试验”可以帮助衡量各种各样的非人为因素之于历史结局的重要性。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就算不用所谓的思想试验，我们也照样可以轻松地完成这种衡量。并且，这样的衡量似乎也违反了帕克和泰特洛克关于避免对历史进行长远改写的原则。不管怎么说，没有原子弹的介入，纳粹德国也照样被最终打败了，那么构想使用原子弹又有什么意义呢？

帕克和泰特洛克所区分的短期反事实主义与长期反事实主义，与艾伦·梅吉尔所区分的所谓“有节制的反事实历史”（即“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事件的替代可能性”）与“极度反事实历史”或者“虚拟历史”（即“描写了一个从未在现实中发生的过去历史结果”）是颇为相似的。有节制的反事实历史之所以“有节制”，是因为它起源于一个真实事件，以回溯的目光进行重审，从“观察到的影响”引向“假设的结果”。因此，例如约翰·亚当森被收录在弗格森的《虚拟的历史》中的文章《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内战会怎么样？》（*England without Cromwell: What If Charles* I *Had Avoided the Civil War?*），就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即查理一世在1640年和1649年参加战争并失败，最后被处死，取而代之的是对方的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即“护国公”）进行了一系列可能替代性的探究，并且文章的大部分都致力于解释这些替代性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在过去发生。按照梅吉尔的观点，这种反事实历史从认知论上讲是相对能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是从已知证据出发，运用反事实猜想去讨论为什么事实会以现实中的结果结束，而非其他结果。的确，梅吉尔认为对历史中所有因果关系的解释都必定是这种意义上的反事实，因为解释所有因果关系时，都不仅要解释为什么事情会最终发展为我们已知的结局，还要解释它们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其他结果。比如，在解释为什么希特勒能够在1933年上台的原因时，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军队没能掌权，为什么左翼没能成功反抗纳粹，以及为什么没能恢复民主政体。

梅吉尔认为，历史学家们之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反事实，是因为从原理上讲，规律性或恒常性的重复结构或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都是不能作为起因的。比如，我们也许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但是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是所有战争的起因。事实上，认为是帝国主义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说法，但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说法（因为它并没有说明战争为什么会是在那时爆发，也没有说明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不同的阵营）。当然，它暗含了一个反事实，或者从这种意义上说，暗含了对本可能发生什么的一种替代性想象：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就不会有“一战”。但这并非该观点的重点所在：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去讨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则1914年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都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反事实猜想。根据帕克和泰特洛克的“最小改写”原则，历史学家所需要的只是那些概括层次较低的反事实。根据梅吉尔的观点，极度反事实历史并非从一个真实事件反溯到一个假设的起因，而是从一个无形的或者假设的起因开始，继而引向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的一个或一连串事件。换句话讲，“比起通常的、经典的历史学的方法，虚拟历史的方法，能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世界的真相中，因为它所猜想的内容都是被人低估的虚构。”实际上，这些虚构之所以创造了一个能引导反事实猜想的理论，恰好在于它们缺乏任何可以支持反事实猜想的直接证据。这里的观点也因而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历史的。

阿维泽尔·塔克也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过相同的这些观点。塔克指出：“每个反事实都有一个‘余者皆同’条件，即在历史学家的假设中，除了经过检验的因素外，其余的历史事实都要保持不变。”据此，比如我们要构想假如希特勒在“一战”中被杀则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情形时，我们就得同时假设其他所有事情都保持不变，这样我们的构想才具有意义：德国将战败，纳粹党依旧得以建立，只是有了不同的领导人。接着我们才能构想如果没有希特勒，那么纳粹党的政策、选举前景等又会有何不同。换句话讲，反事实必须与我们所进行猜测的话题中的其他事件保持一致：我们改变一个事件，但是让其他所有事件保持不变。而去猜测假如纳粹是亲犹主义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便毫无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极右翼党在“一战”后迅速成为反犹主义者。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为了使反事实具有意义，就必须设置小的改变，而不是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扭转了历史万花筒的一个面，那么我们便可以创造性地去思考这一个改变将会对其他所有事情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每个面都动摇了，那么便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过，谁又能说，如果希特勒在战争中真的被杀，那么纳粹党在这之后是否会以当时处于边缘运动中的德国工人党（纳粹就是从中产生的）的对立方而继续存在呢？“余者皆同”规则会产生无法令人信服的决策，进而会忽略一个被更改的起始点对后续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则是反事实主义者所不愿考虑的。换句话说，其他事情并非必须保持不变，而且余者皆同这一规则本身也同样会排除不可预见的偶然事情出现的可能性。

正如约翰内斯·布尔霍夫所指出的那样，非常之多的历史调查都会用到所谓的“模态”，即“如果a没有发生，那么b也同样不会发生”。这种意义上的反事实已经渗透进历史学中，因为历史学家们关注于解释事情发

生的原因，所以也必将牵涉到对其他事情或替代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的解释。但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将未曾发生但具合理性的替代事件变为一个反事实，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要从这一替代事件出发，进而推断出未曾实现过但具有合理性的一系列结果。不过在实际中，这些结果都不属于解释事情发生的时间、原因等中心任务。正因为如此，比如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那些心甘情愿的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就认为，很多非德国人都曾管理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比如“莱茵哈德行动”中的乌克兰雇佣军，但他们“并不是德国犯下犹太大屠杀罪行的最重要因素”，并且他用一个反事实对此进行支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德国人没有在欧洲（尤其是东欧）寻找助手，那么犹太大屠杀将以另一种情形展开，而德国就可能不会成功杀死如此之多的犹太人。”但这种猜想是用模糊的术语来表达一种可能性，甚至只表达一种概率，因此对于事件本身的解释并不是真正必需的，这一点在戈尔德哈根基于证据的言论中有提到，即“非德国人”不是犹太大屠杀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他们并没有鼓动或支持这件事的发生”。自然，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反事实，即假如德国人没有做出那些他们在历史上曾做出的行为，便不可能有犹太大屠杀。但这一说法实属多余，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从不计其数的证据中早已得知德国人的确发起、倡导并执行了犹太大屠杀，而乌克兰人和其他人都不过是他们的雇佣军而已。所有的因果陈述可能都暗示有其他替代事件，但是，仅仅为了推动因果解释而去考虑这些替代事件及其意义，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邦泽尔指出：“反事实判断是否值得信赖，决定着基于反事实判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如果将反事实判断建立在一个因果结论上，就应该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个因果结论的可靠性有多高？”举个例子，在纳粹占领下的东欧，假如游击队能够动用核武器，那么他们必将打败希特勒的军队。这样的假设初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其背景条件却是不具说服力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拥有核武器，那么势力更强、装备也更好的其他组织一定会先发制人的，其中也包括纳粹，但首当其冲的会是美国，所以这样的假设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条件才能成立。因此，正如邦泽尔所总结的那样，“反事实推理仅仅相当于对背景条件所做的假设”。然而，反事实既可以在某一时间点上往前推，从一个假设事件推进到一个真实事件；也可以往后推，借以看看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或在改变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是否还会发生相同的事件。这种意义上的反事实相当于决定论主义，因为“最为有趣的历史问题必然关乎这样的探究：事实已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结果却为什么依然如故？”

但是，正如许多“长远派”反事实主义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我们尽可能地遵从已知事实，将反事实构想用于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它们最终的样子，上面的说法才是可信的。理解了各种选择和可能性，就能帮助我们从最核心处去理解为什么成为现实的是其中的一件事，且唯独只是那一件事。比如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行动，如果我们想想一旦成功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刺杀者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这些人仅在武装部队中获得了相当有限的支持，所以希特勒之死势必导致内战的爆发，因为党卫军和其他狂热的纳粹军人会

将他们镇压下去，实现复仇。那些密谋者或多或少知道这一点，而他们的诀别书也反映出，他们认为可以先行控制德国而后与同盟国媾和（鉴于同盟国坚持无条件投降政策，这是不现实的），从而至少可以为德国挽回一丝荣誉，因此才有了这次几乎是自我牺牲的行动。然而，鉴于他们对议会制的敌视态度，鉴于他们相信社会不公与政治不公都是必然的，所以即便是希特勒死了，他们也不可能尝试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德国。但这种类型的猜想却有助于正确认识人们在1944年11月时的真正选择，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严密的证据之上的，而那些证据又都体现了当事人对各种选择的认识。

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推测，正如C·J·桑瑟姆所做的，是这样一种构想：德国战胜英国导致欧洲东线的战争持续发展；一场篡夺权力的军事阴谋在1952年获胜，原因在于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持续了8年多，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伤亡；而最关键的是，希特勒已死，这使军队得以从效忠于他的誓言中解脱出来。这样的构想存在诸多的风险条件。鉴于苏联人力资源在数量上远胜过第三帝国，并且在1944年时其武器、弹药及设备制造也远超后者，所以根本不能肯定战争是否还会再持续8年之久；而且也不可能——像其他人也同样猜测的那样——假设双方势均力敌，足以使战斗陷入停顿或僵局。再有，就像菲利普·K·迪克以来的许多作者所猜测的那样，希特勒之死或希特勒的无能或许会在纳粹精英之间引发争夺权力的内讧，但由于希特勒在整个纳粹体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种较量也绝不可能持续太久，无论军队是否会再次发动一次政变也都于事无补。德国的战争墓地通常只会接纳那些被称为“为元首和祖国而陨落”的军人，而任何别的纳粹领袖，无论戈林还是戈培尔，都无法拥有如希特勒一样的领袖魅力。

历史解释通常包括历史必然性概念——也就是必需因素，这种必然性将所有因果关系聚集一处，共同指向一个特定的结局，但它并不决定这一结局会以哪种特定形式发生。例如，我们可以说，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欧战以便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这一初始条件是“二战”爆发的必要条件，但这一条件本身并未解释为什么战争会在1939年9月爆发。而要探究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其他因果关系——比如英国和法国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绥靖政策，却又在1939年抛弃了这一政策，还有德国多次成功地重整了军备等；另外，影响到结果的还有许多偶然性事件，例如希特勒因生病而加快了战争步伐，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会死，从而不能如愿以偿地在1942年发动战争。以塔克的观点，按照这种方法分析，反事实构想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个特定事件可能发生的偶然性究竟有多大。因此，我们不能，也不该想象希特勒压根就没有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企图（这正是绥靖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时，认为希特勒不会在1939年3月进军布拉格的构想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是这件事使绥靖政策走到了尽头）。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想象，假如发生了以下事情，则结果会是怎么样：将军们1938年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初步计划成功了，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纳维尔·张伯伦没有签订那个使他们放弃计划的慕尼黑协定；希特勒没有决定在1937～1938年里加速他的对外扩张。而事实上，在检验这些事件时，我们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进行了这

些猜测，因为这些都是可能轻易改变历史结局的偶然性事件。

在我仔细研读过的那些反事实场景里，最令人惊讶的是反事实主义者们在同一话题上出现的极端分歧，这些分歧之所以产生，一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动机不同，二是由于他们的写作语境各有不同。例如，假设英国在1940年或1941年与纳粹德国签订条约单独媾和，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呢？究竟是希特勒在东线击败苏联，还是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战斗相持不下、陷入僵局呢？抑或是如安德鲁·罗伯茨在2001年所猜测的那样（与他之前在该话题上所持的观点相矛盾），斯大林是否真的会占领整个欧洲，带来惨绝人寰的后果？究竟是大英帝国能因此而得以保全呢，还是希特勒会将他的意愿逐渐强加于英国，将英国的社会机构纳粹化，迫使他们交出英国的犹太人并送往奥斯维辛，并将大英帝国一点点分解呢？又比如，假设纳粹德国真的占领了英国，那么究竟会出现大规模的与德合作呢，还是引发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呢？温莎公爵会不会真的成为亲纳粹的傀儡君王呢？到底是劳埃德·乔治还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会住进与纳粹合作的唐宁街10号呢？抑或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塞缪尔·霍尔爵士或R·A·巴特勒（霍尔格·赫维希为给自己留一条出路，曾让爱德华八世的联合政府由哈利法克斯、霍尔和劳埃德·乔治三人共同领导）？总而言之，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状况及欧洲政治，这些猜想到底能告诉我们哪些我们尚不知道的信息呢？

这类想法在许多其他反事实主义者中也出现过。在对他们的反事实文集中的文章进行综述时，帕克和泰特洛克就曾指出，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对17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的讨论表明，他“认为威廉三世逝世的那一刻有着重大意义，因为他相信这会将英国、欧洲乃至全球历史推向完全不同、无法逆转的进程”；而文集中的另一作者则批判了戈德斯通，认为他这是对某个单一事件进行“长远”推断，所以那位作者“认为这种做法无关紧要，因为威廉的王位首先会由他的妻子玛丽继承，如果玛丽先于威廉去世，则由她的妹妹安妮继承（正如1702年所发生的那样）”。摆在眼前的问题也是反事实历史中最常遇见的问题之一，切斯特顿、弗雷泽、拉塞尔等许多其他学者都从不同侧面对之有过探讨：如果英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不是新教国家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弗雷泽及切斯特顿这两位天主教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所有事情都将变得更好（尽管如我们所见，弗雷泽其实已承认可能不会如此），而戈德斯通的观点则十分悲观。他说，如果1688年奥兰治亲王威廉进入英国失败，那么便没有之后的科技革命，没有议会宪法，没有大英帝国，没有现代世界。但是正如卡拉·加尔迪纳·佩斯塔纳（Carla Gardina Pestana）所指出的，这便需要詹姆斯二世（实际中在1688年被威廉取代）具有“凡人难以企及的、更是斯图亚特国王中极其罕见的政治洞察力”。詹姆斯二世掌控的军事力量必须比实际强大得多，才能将国内的反对势力镇压下去（那时非常严重），而新教势力则必须非常弱。总之，英国将不会甘愿接受路易十四法国所赐的卫星国地位。几十年前曾经爆发过的内战或许又将重新上演。

在方法论方面，佩斯塔纳“不太喜欢戈德斯通在反事实中特别看重某

些形式的因果解释这种做法”，即重视伟人的行动、信仰及个性。的确，戈德斯通让詹姆斯二世除掉了艾萨克·牛顿，并用这一方法去摧毁整个科技革命；然而我们也都知道，17世纪的科技突破涉及非常巨大的一批人，也涉及相当广泛的知识领域。就事件本身而言，戈德斯通可以遵循“最小改写”原则，其通常做法就是佩斯塔纳所说的为达目的而“找个人来杀掉”；但这样就必须忽略“余者皆同”原则（比如让詹姆斯二世成为一个高效的君主）才能让反事实得以继续进行。不仅如此，任何人都可以指出，一些欧洲国家都非常乐意自己的君主属于一个教派，而其治下的臣民则可以信奉另一个不同的教派；他们还可以指出，天主教信仰与科学事业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比如鲁道夫二世就曾赞助过很多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包括第谷·布拉赫和约翰尼斯·开普勒等。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反事实猜想时常——甚至可以说总是——踏在证据的薄冰上，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在选择起始条件时不够谨慎小心，无法区分不同层面的因果关系。反事实猜想都一再地处理那些相当复杂的历史话题，企图通过简单地假设个别行动者的力量足以改变整个事件来“打开戈尔迪之结” [5]。并且，所有反事实都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阐述，而这个历史阐述甚至在时间轴上的第一处改变生效之前就几乎已然陷入巨大的争议之中。比如，有许多反事实文章都以“一战”的爆发为题（这在反事实中非常典型），但这些文章要么是讲弗朗茨·斐迪南未被杀害，要么假设英国外交大臣决定不加入战争，而不是去假设像俄国政府、哈布斯堡王室、塞尔维亚政府等的决策过程所导致的其他结果。由此可见，所有基于战争爆发的反事实，都必须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因果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也是复杂多样、不可预测的。1912～1913年冬天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战争，就显示着各种因果关系的共同作用；同样，他们也可能会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发生类似的共同作用，比如弗朗茨·斐迪南没有遭到枪击之类，尽管谁也不敢非常肯定。由于变量实在太多，因此将单个事件独立出来而将因果关系的整体复杂性降低，以此阐释因果链中某个单一改变所造成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那些立足长远的反事实猜想，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信服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那些猜想在给出初始的更改事件之后，便忽略了因果链上的太多关系。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如果时间轴上的条件被改变了，例如列宁在1917年被困于瑞士而并没能回到俄国之类，你所能说的不过是“‘事情会有很大不同’或‘没有多大不同’。然后你便无法再朝前发展，除非你开始进行虚构”。当然，反事实写作通常都是会朝前发展的，但这就很快又会将它们带入麻烦之中。它们时常沦为一厢情愿的牺牲品。反事实主义者都会给他们的思想试验设置些合理的限制，但又时常因沉醉于猜测想象的刺激而将那些限制统统抛至脑后。弗格森为反事实立下了一些理智而可行的规则，可接着又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规则打破——要么是将猜想带离时间轨迹太远，要么是落入政治驱动下的一厢情愿。帕克和他的同事们都坚持短期的反事实，并以对真实情形的最小化改写为起点，但接着所收录的一系列作品中却又不乏延伸数个世纪、对社会经济的改变进行长远的、大规模的广

泛想象。罗伯茨希望他的文章作者们都能从后见之明的个人专断中挣脱出来，让历史充满偶然和意外，但在他最终所收录的文章中，仍旧有好几篇的总结是“已发生的事实其实是无可避免的”。近年来，每个人都强调说反事实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但是这也无法阻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写一些娱乐性大于信息性的诙谐而怪诞的文章。

在尽力解决这类问题时，德国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霍尔格·赫维希曾坦白地说，在思考假如希特勒赢得了东部战争会发生什么时，“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可能的反事实选项让我感到迷惑。该选择哪一种呢？”事实上，最终选择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意图、政治倾向、事实性知识，以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同时，所做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目的，他们致力于创造出最令人满意、最合乎逻辑以及通常是最具有娱乐性的反事实场景。立足于最小化改写原则，并局限于短期猜想，反事实可以用于阐释那些曾摆在个别政客和政治家面前的各种选择，也可以用于阐释历史背景对那些选择的各种制约性。但是，反事实越是远离其起点，这种作用就会变得越小，而在另一种现实所虚构的世界里走得也就越远。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企图借助那些虚构的世界来放飞他们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桎梏。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挫败感，使他们宁愿生活在托尔金《魔戒》中的中土纪元时代，也不愿生活在真实历史上的中世纪，甘愿选择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理性的伦敦，也不愿选择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个异常复杂的伦敦。在政治动荡与文化焦虑并存、危机四伏、失望情绪蔓延的时代，那些幻想的世界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与帕克和泰特洛克所说的“反事实思想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占有多么核心的地位”相反，我希望我已经证明了它根本就不是核心的，而是边缘的。它可以是有用的，但必须要有特定的严格限定的条件，还必须有严格限定的目的。但是，只要查阅一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以及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数以百计的论文，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只能是：作为现当代的思想政治史的一部分，反事实现象本身是最有用也是最有趣的，就其自身来说也是具有研究意义的，但是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每一本历史书的每一行中，如果要让那些书具有任何思想价值，那么对可能性的评价都是隐藏起来的，也必须是隐藏起来的。”

这样的结论，也是从事反事实主义叙事的部分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的结论，其中既有历史学家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也有文学学者本杰明·乌加夫特。罗森菲尔德认为反事实主义的动机“基本上是现在主义的”，而乌尔加福特则指出“这些问题的提出正好是了解提问者本人之个人偏见与兴趣的最好指南”。尼采曾指出，诸如“如果……会发生什么”之类的问题“让一切事情都具有讽刺意义”。反事实之所以是讽刺性的，因为说到底，它们更加了解的总是当前而非过去。最后的定论或许应该留给瓦尔特·拉特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是反事实的书写对象，他的崇拜者、意大利人圭多·莫尔塞利为他写了一部作品，是最为详尽的反事实小说之一。在往后回顾“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往前憧憬和平到来时他所期望的一个新世界时，拉特瑙这样写道：“历史不是从各种条件中

变出来的；历史讲述现在与过去所发生的事实，而不是现在与过去可能发生的事。”

[1] 本杰明·迪斯雷利是前文出现的艾萨克·迪斯雷利的儿子。——编者注

[2] 聒噪阶层，指好议时政的知识分子阶层。——编者注

[3] 威廉·乔伊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德国广播电台对英广播节目播音员，后以三项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译者注

[4] 普鲁士流派历史学家认为德国统一具有历史必然性，并认为这是普鲁士命运中注定要完成的任务。——译者注

[5] 戈尔迪之结，指棘手的问题或艰难的任务，“打开戈尔迪之结”指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解决问题，此处喻指解决阐述中的棘手问题。——译者注

人类的演变

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美]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
马睿◎译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最新力作

从史前人类，到现代社会
在数万年历史中找寻社会演变的本质
揭示能源力量与人类文明的根本关系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美）莫里斯著；马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How Human Values Evolve
ISBN 978–7–5086–5709–7
I.①人…II.①莫…②马…III.①世界史 - 研究IV.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307号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5 by Ian Morri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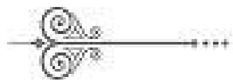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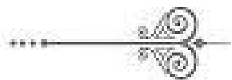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著者：[美]伊恩·莫里斯
译者：马睿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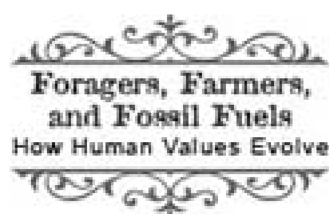
人类的演变

——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马睿 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凯西和动物们




目录

推荐序 价值观缘何而来？

导论

正篇

第一章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第三章 农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时代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评论篇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第七章 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价值观中的永恒、发展与自我

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回应篇

第十章 我对一切事物的正见

致谢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推荐序

价值观缘何而来？

何怀宏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里斯的新书《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是以他2012年末在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坦纳讲座的演讲，以及4位评论人的评论和他的回应为基础结集而成的。此书所围绕的是莫里斯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即他认为在人类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中，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

这三个价值体系就是书名用押头韵——采集者/觅食者（foragers）、农夫/农耕者（farmers）和化石燃料使用者[1]（fossil fuels）——所示的价值观体系，它们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对应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莫里斯有时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2]的说法把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把工业社会称为“因达斯特里亚”（Industria）。

莫里斯认为，第一种“觅食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是很小规模的群体且流动性很大，故而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不过他认为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二种是“农业价值观”的体系，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经过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所以往往建立大的等级社会的国家以保障定居者和平地休养生息。第三种是“化石燃料价值观”的体系，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通过钻取已经转变为煤、气和油的植物化石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故而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价值观念众多且纷纭复杂，莫里斯说他只能在价值观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两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即对待平等与暴力的态度，主要以这两点来标示三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他不回避他的观点可能遇到的批评和定性，诸如简化论、本质论、唯物论、实用主义等，甚至坦承自己就是这样的观点，而只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某种程度上的本质论和简化论。

这的确使熟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们很容易想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这里是某种生产力——觅取能量的方式——直接决定价值观念，他自然也不会引出阶级

斗争的观点，更勿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他是相当赞成今天发达的“化石燃料使用者社会”的主流思想的，赞成社会合作与自由市场，或者如书中一个评论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所说，是赞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更确切地说，他是赞成一种“与时俱进”、因需而变的价值观。如果他生活在过去的社会，他也会接受过去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这倒也是为现代人比较平心静气地看待、理解和同情地解释过去的价值观开辟了一条道路。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背后的哲学是一种功利主义或效益主义，这也可以为同情地理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预防少数人的浪漫政治思想逾越界限而伤至社会提供一个恰当的基础。

莫里斯的观点简单明快，而且的确抓住了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必须获得物质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获得的能量较多才能繁荣，才能发展起一套精致甚至奢华的文化。而且，他对未来虽然也有展望，但没有一套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未来是开放的，有几种可能，包括由碳基生物变为硅基生物的可能，也有核战争的可能。

莫里斯的“价值观三段论”既有一种简化的锋利性，又包含着许多生命的常识，这些常识是拒斥书斋里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的价值观的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即便承认人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之间有某种最初的决定关系，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中介的，比如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它们可能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形成有更直接的作用，还有价值观念和其他观念本身的相互作用，包括这些观念对获取能量方式的反作用，等等。比如说，有时价值观对一个社会的物质能量获取方式甚至能起一种定向的作用，有些文明社会（比如经济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迟迟未进入一种发达的市场和工业社会，正是上层主流价值追求的“志不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最长远的观点和最根本的因素来看，莫里斯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某些根本的共性：人只有吃饭才能生存，只有有丰富的多余产品才能发展。但不容易解释一代代活着的人所面对的生存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而活着的人要对付的却主要是自己的特殊性，那些共性由于太一般甚至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价值观念的恒久性，在变化的价值观念中有没有一些不变的核心价值，莫里斯的确提到了几种，比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等。但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生物演化的结果，乃至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当然，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但他还是坚持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都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其实都是“得其所需”。

莫里斯的分析数据常常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的。他谈到觅食者并

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而农耕者由于其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他们就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3]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 000千卡/人/天。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公里。而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公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莫里斯还谈到通向现代“工业社会”两条路径：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在有些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非自由路径看起来比自由路径的速度更快，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重塑的非自由发展同样也造就了比自由版本更快的经济成长——尽管这里有起点较低的原因，且同时引发了环境灾害的负面外部效应及大规模腐败。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自由路径更为成功，因为它不仅在创造财富和自由方面，还在减少暴力乃至提升平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和《21世纪资本论》[4]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有些不同，在莫里斯看来，从2002年以来，不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虽然数据略有不同，但他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5]的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即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减少暴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使用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采集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耕者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

也就是说，伴随着三个阶段的人们对暴力态度的价值观的变化：即从觅食采集者的比较能容忍暴力，到农耕者的相当不能容忍暴力，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不能容忍暴力，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一段比较平滑的曲线；而平等的情况则有起伏，是从觅食采集者的相当平等，到农耕者的比较能接受不平等，再到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非常要求平等。在觅食者时代，平等只是存在于小范围的群体里面。到了农业社会，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发展，但还不是那么发达的生产力的条件下，要支撑起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很难不采取一种容有等级差别的制度；但人类进展到工业社会，范围达到趋于全球化，则又是相当平等的了，即便国与国

之间还不一样，但还是有人权平等的普遍要求。莫里斯认为，化石燃料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采集者但低于农耕者。然而，莫里斯虽从能量获取者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规模、流动性等方面对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决定这些不同的价值做出了说明，但所提供的因果证据的确还不是很充分。他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与动物有本质差别的人之为人的特性成分，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不变的、非物质需求所能决定的成分的观点也还是可以质疑的。

所以，我以为，在对其观点进行评论的三位著名学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西福德、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Christine M. Korsgaard）、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一位文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评论中，科尔斯戈德的评论还是最富于挑战性的。她提出了一种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说这可以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莫里斯的观点之所以会引发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关系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他认为成文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演化造就的，这就引发了真实道德价值观是否也是如此造就的问题。如果想要让成文价值观能够支持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所必需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必须认定他们的成文价值观就是真实的道德价值观，即他们必须信服，乃至信仰其价值观的正当性和真理性，乃至某种永恒不变性，他们才会有效地履行这一价值观。而价值判断能力在本质上与我们规范性或评价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相关，而这种自我评价的能力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这种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源，虽然它也同样可能被“意识形态”扭曲，引发一整套独属于人类的弊病和错误观念。因此，科尔斯戈德不认为人们的价值观是由人们的能量获取方式塑造的，而是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只不过这种倾向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扭曲。或许我们应该认为，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人类开始可以积聚权力和财产，各种意识形态也开始产生，它们扭曲了真实道德价值观——直到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和普及教育的时代，我们才开始慢慢克服这种扭曲。

莫里斯的回应是：他说他不赞同科尔斯戈德所说的“其他动物不具备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的观点，也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他认为现代人类代表了一个谱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科尔斯戈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人类价值观的确只能由人类所持有，但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即如诗人奥登[6]（Auden）所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所得出的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成文价值观，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而成文价值观就是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

因此，莫里斯说，他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的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演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但是，要让不同时代的人们自己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所以，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要进入的世界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等级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今天的人们不会赞同封建观念，但与其说是这些观念不正确，不如说这些观念过时了，或者说它们只是在“过时”了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莫里斯的回应虽然有他一向直率和坦诚的特点，但在表达和论证上还是过于强势和绝对了。他可能还是过于低估了人与动物的差别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精神性，也没有看到人的价值观念自有其独立于物质需求和功利效用的意义。而即便价值观要充分有效地履行，也必须要有人们对它的信，即信其为真，乃至信其为普遍和永恒的真。虽然这信并不能保证价值观的内容就一定是真，但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规范中一定还是有其客观普遍的真的——比如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生命，不杀害无辜。我想对这一基本价值的普遍性莫里斯估计也不会反对。他对获取物质能量方式的重视，对反对暴力的肯定，就表明实际他还是肯定了在“均富”之先的保存生命的普遍道德原则，所以，他似乎没有必要否定平等，即便在比工业社会更早的时代里平等更多的是体现为平等的生存权利而非平等的财富权利；也没有必要否定存在着真实乃至永恒的基本价值——保存生命。在这一基本点上，莫里斯和他的批评者其实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无论如何，莫里斯的这本新书是富有意义的。莫里斯努力在最低的和最高的，最物质的和最精神的，最基本的和最高超的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虽然将其处理为一种直接的决定性联系肯定会有不少问题，但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这也是在高超理论与意识形态面前捍卫基本常识，有助于防止那种过于强调精神力量的、浪漫的唯意志论在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他的观点也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至少是比较平心静气对待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

[1] 本书中文译名采用了化石燃料使用者对应的“工业时代”。——编者注

[2] 欧内斯特·盖尔纳，见第75页注释①。——编者注

[3]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4]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编者注

[5]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编者注

[6] 奥登，见第273页注释①。——编著注



导论

斯蒂芬·马塞多[1]

伊恩·莫里斯的第11部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2]出版于2010年，此书甫一问世便广受赞誉，被称为“才华横溢”“别出心裁”“震撼人心”的杰作。该书所涉之广、所涵之深，令人惊叹；且文笔优美，读之忘倦。它上溯至15 000年之前，探讨了西方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何以迥然相异，此兴彼衰。该书在结尾提出了人类在未来当如何面对多重生存威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失效、迁徙和疾病”等，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让太多人获益，而这些威胁则是发展带来的令人始料未及的副产品。

继《西方将主宰多久》之后，莫里斯再次彰显他的非凡洞察力，超前论述了某些“无情的物质力量”如何限定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已树立并秉持了两万多年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其中当然包括道德规范。本书源于伊恩·莫里斯2012年11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讲的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坦纳讲座。鉴于莫里斯的论题，我们考虑将其更名为“关于无情的物质力量的坦纳讲座”。

莫里斯的整体论证可大致概括如下。人类的某些基本价值观最初产生于大约10万年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核心问题”[3]（第二章）总是以某种形式反复出现在不同文化中，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第五章）所引发的。莫里斯还提到，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共享其中的一些价值观，此前出版的本系列丛书[4]中的一本也阐述了同一观点，该书作者是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5]。

然而，即便与仅次于我们的最聪明的动物物种相比，人类也拥有明显的优势，我们超乎寻常的高明世故促成了文化的创造与再造。我们发展出价值观、规范、预期和文化形态等复杂系统，以便在周遭环境发生变化时，维持各种必要的合作，提高生存机会。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文

化创新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即生物学随机突变的文化等效物，并且随着这些试验的成功或失败，“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第二章）。

莫里斯为我们展现了人类价值观的宏观历史，识别出连续的三个人类发展阶段有哪些大略的共同点。这些连续阶段中，定义人类文化形态的，是产能递增的能量获取模式：觅食、农耕、化石燃料生产。莫里斯的论点是，这些相继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决定”或至少“限定”了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的形式，继而“决定”或“限定”了可能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人类具有创造性，而相对成功的社会形态又更易传播且更有可能战胜对手，每个时代最终都会选定其所需的价值观。这是“功能学派”的看法，他们将人类价值观看作“适应性特征，随着人们周围的社会体系发生变化，人们对这些特征加以调整，将其效用最大化”（第二章）[6]。

从觅食到农耕，再到消耗化石燃料，在每一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第五章）。因此，靠觅食或狩猎采集谋生的早期社会往往会采纳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制定强有力的共享规范并限制不平等，莫里斯解释了原因），但也相当暴力。农业社会为了实现最优效能，倾向于等级森严，少用暴力。而我们身处其中的化石燃料社会出现于18世纪，这种社会形态往往会在政治和性别方面更加平等，对贫富悬殊相当容忍，且比前两种社会形态都要平和得多。

以上大大简化了莫里斯的论证过程。他还强调了技术创新和地理位置在决定哪些社会能够及如何战胜其他社会的重要作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读者大概很熟悉这些主题，例如海运的创新使得地处海边成为巨大优势，从而成就了伟大的欧洲海洋帝国的崛起。

莫里斯的论述旁征博引，论证清晰睿智。

莫里斯紧凑的五章内容之后便是三位杰出学者以及一位世界闻名的高产文学大师的评论。

理查德·西福德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授，他在希腊文学、宗教、哲学及《圣经新约》等领域著述颇丰。

西福德认为莫里斯过分“拘泥于决定论式的量化范畴”，以致在他粗分的几个人类发展阶段中，价值观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西福德认为，农业社会形态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他以古雅典为例，对莫里斯的决定论提出质疑。和史景迁一样，他也提请大家注意历史记录中通常不包括边缘人群的价值判断这一事实，至少在这些边缘人群没有组织之前如此。西福德质疑，为什么莫里斯所谓农

民的“牢骚不满”不该作为一种缺乏政治力量的平均主义的证据受到严肃对待，这种平均主义的存在挑战了农业社会认可不平等——甚至将其视作“好事”——的观点（第六章）。

莫里斯认为“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西福德在其评述的结尾对该主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饶有兴味的是，他谴责莫里斯本人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更近乎当前“统治阶级”的想法，而非“我们的时代需要的观念”。西福德特别提出，莫里斯受惠于进化理论并强调“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过于不加鉴别地接受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观念”。西福德认为，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时代需要对那些人类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莫里斯本人定义的“待人公平，行事公正，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进行一种更有批判性也更加开明的论述（第六章）。

伊恩·莫里斯近期的研究工作涉及中国和西方的比较发展和未来展望，而本书的第二位评论者恰好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史景迁，他是一位高产作者，算得上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

和其他评论者一样，史景迁既赞赏了莫里斯“杰出的研究技巧”，也表达了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莫里斯的数据发人深思，但如果他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住在“侧翼丘陵地区”或“幸运纬度带”“是什么样子”，他们将受益良多。史景迁认为，相对于这些动听的标签所暗示的境况，实际生活通常要严酷和艰难得多。此外，史景迁和西福德同样认为，莫里斯粗分的几个人类发展阶段囊括了纷繁芜杂的人类经验，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比这具体细致得多的描述。史景迁在评述结尾指出，近几年才发生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战争”就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发展。

第三位评论者是哈佛大学阿瑟·金斯利·波特讲席哲学教授科尔斯戈德，她或许是全球顶尖的康德道德哲学家。她在道德哲学及其历史、实践理性、规范性、主动性和自我认同，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领域均有影响广泛的著作。

科尔斯戈德质疑了莫里斯道德价值观讨论的充分性。她区分了“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前者是具体社会中现实盛行的描述性内容，而后者实际上才是人们应该秉持的真实观念。她认为，“只有当持有成文价值观的人同时也将其当作真实道德价值观时，这些成文价值观才具有莫里斯为其标定的进化和社会功能”。此外，她还指出，从事评判活动的人往往会认为“价值判断可成可败”（第八章）。正如科尔斯戈德所说，“如果价值观只是某种能量获取形式所需要的一种维持社会形态的方法，人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价值观的运作方式。在价值观起作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在践行着真实道德价值观”（第八章）。实际上，她主张道德生活参与者的观点应置于首位，或至少得到认可。科尔斯戈德继而顺水推舟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即“如果人们相信了莫里斯的理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就能存续下去”。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参与者能像莫里斯那样，将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看作对某种能量

获取方式的功利性适应，那么他们是否会认可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不错，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能，她认为：我们需要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判断活动，而其前提就是要明确，我们评判他人时所使用的“真实价值观”不一定等同于我们自身的“规范性的自我观念”。

实际上，科尔斯戈德进一步指出，认为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这种看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因而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大概往往会看到道德以某些形式趋于改善。但她同时承认，这一倾向“很脆弱，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压迫而扭曲”，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大概还包括物质匮乏和不安全感等外部压力。她承认，各种类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都“对人类价值观的塑造施加了压力”，但并不会“完全决定”后者（第八章）。

最后，科尔斯戈德提问道，不知莫里斯是否认为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她尖锐地指出，莫里斯自己的历史解释方法受到一整套科学假设及方法的深刻影响，他本人认为这些是消耗化石燃料的社会才有的。但是，在与农业社会的神学世界观——其认为“存在一位先验之神一统天下”——相比较时，莫里斯并未显示出对他的（也是我们的）科学方法的真实优越性有任何质疑（第八章）。关于历史和科学实践，我们或许会说，莫里斯并非怀疑论者，也不会采纳纯粹的“功能学派”观点，认为每个时代都拥有其所需要的历史或科学。如果这些人类理解模式——科学和历史——可以得到改善（而不仅仅是改变），那么道德伦理为何不可？

最后一位评论者是个高产的作家，她用文学想象探索了人类可能面对的未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50余部诗歌、儿童文学、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的作者，其著作包括《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等等。

阿特伍德对莫里斯的观点表示钦佩，但她力图关注我们危机重重的未来，提出，想象未来需要动用我们的文学想象力，而不能仅靠可量化的数据和学术观察。她同意莫里斯的观点，即人类不断进化的天性中包含着令我们更加可敬或者至少更加复杂的因素，而非“社会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便断言的生性自私好斗的下流坯”。但如果我们所在的脆弱的生物圈当真发生了严重故障，情况将会如何？她说，如今我们彼此联系得如此密切，“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个一体化的大溃败，其后果是过去的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她还担心我们依赖的“科技越复杂”，社会越庞大，“便越会由极其微小的错误导致重大失灵，火车失事的速度就越快，灾难性后果就越严重”。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列举了5种可能造成文明崩溃的冲击：“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阿特伍德又加了两个：海洋和生物工程的崩溃。她在评论最末恳请人们做

些“大战略的思考”，其行文之异彩纷呈、幽默诙谐，是我在转述中无法传达的。

伊恩·莫里斯反唇相讥，纵横捭阖，雄辩到底。莫里斯完全抓住了几位批评家的注意力，如此便愈加阐明和深化了他的论点。他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承认几位批评家的辩论对他很有启发，让他得以进一步阐释能量获取方式如何塑造人类价值观。

就史景迁关于描述还应更加具体的要求，莫里斯明确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解释人们为何拥有当前的价值观，而不是深入理解那些价值观。

针对西福德的批评，即莫里斯未能识别其觅食采集、农耕和消耗化石燃料这三个宽泛的社会范式中的各个变体，莫里斯指出，“农业社会”包括“生活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万年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所以，他有些轻描淡写地承认，其间包含了“很大的差异”。莫里斯认为，雅典等贸易城邦无疑相当有趣，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尽管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不列颠等“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也一样有趣，因为它们正是从其海上贸易网获取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然而，莫里斯坚持认为，雅典人的财富“缓和了但未打破农业世界的束缚”。诸如古希腊和近世的不列颠等表面上的极端例子只是限定了但未能“证明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是错误的”（第十章）。

在其篇幅最长的讨论中，莫里斯开始借其所谓“多层次选择”，阐明了几个先后出现的能量获取模式通过哪些途径塑造了人类的价值观。个体并非被动地由所在社会的能量获取模式来决定其采用哪种价值观。相反，在历史的绵延进程中，在善于创造的人类经过无数次社会试验之后，通过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体制、文化和价值观等手段，在探索能量获取的可用模式上进行了最优化组织的社会，往往会战胜并取代其他组织欠佳的社会。在现有科技下，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必将让位于更有效率的体制和价值观。

在阐明其观点的过程中，莫里斯提到并反驳了科尔斯戈德提出的人们实际秉持的“成文价值观”和应该秉持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莫里斯认为，我们唯一可用的价值观，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持的价值观，因此，科尔斯戈德所谓“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第十章）。莫里斯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阻碍人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充满信心并将其付诸实践。

我们这位坦纳讲座授课人还回应了有关他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责。莫里斯对此表示否认，并进而断言，西福德和科尔斯戈德受到了不合时宜的“本质论”的影响，后者坚信，我们开明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包括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偏爱非暴力的争议解决方式等，更接近于真实道德价值观，甚至构成了“默认”的立场，一旦环境有利，并且社会压

力无须以武力支持社会等级，人类便会自然而然地趋近这些立场。

莫里斯承认，在解释人类如何进化出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复杂的组织形式、判断和创新能力时，无法避免一定要用到某种本质论的观点。我们都还记得，他坚持认为“所有人类”共享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尊重忠诚，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些价值观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时代均得到了重新诠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进行辩护，称其为更好、更真实的道德价值观，但莫里斯却认为，平等主义和非暴力不过是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特定解读：在某些能量获取形式更为先进的社会类型中，这类价值观合乎时宜，但它们却不适用于觅食采集和农业社会。“于我而言，”莫里斯说，“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莫里斯谴责塔利班致力于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并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与科尔斯戈德意见一致，但他坚称，塔利班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首先错在落后”（第十章）。

有人或许会问，“落后”何以变成了这里的主要问题？这是否在断言，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科学地解释（或以历史视角来理解），而非道德评判？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心焦点是道德评价，其他的措辞也许更适合描述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方式：残酷和邪恶，而不仅仅是“落后”或不合时宜。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对于女性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倡导更大的正义，而不仅仅是不同的正义？

更深远的问题是：将道德评价的措辞与体制和社会成就等实用标准联系在一起是否存在危险？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特定创新是否有望提高社会的物质福利和力量，以及其战胜其他社会的能力，却代表了道德堕落？还是说我的言论是由我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关键在于，相对于莫里斯的标准而言，道德评价有望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环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留这一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克服自身所处时代的所有偏见，而只是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如此行事。

前文提到的我们的作者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指责又当如何？莫里斯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又立即坚称，“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第十章）。他还引用了据传是林肯的格言：“……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邪恶精英”还没有强大或聪明到能够长时间地迷惑大众。

这是一个有趣的表达方式，他对此充满信心：人类的创造和常识的力量最终能够颠覆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向少数人输送利益的社会安排。当能量获取的模式让新型社会组织得以向更多人输送比以前更大的富足和/或安全感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类最终会发现并接受新的

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伴的价值观。它进一步表明，等级制度（或中央集权）需要——也必将——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加以“测试”。

对于人类完全能够看穿和打破统治精英自私自利的谎言——当它们的确是谎言时——的这种信心，是否有助于我们挽救有关人类能够在连续的历史阶段中实现真实的道德进步这一理想？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与物质进步有别的）道德进步的观念？莫里斯是否以其自身未加明言的平等主义推论出，少数人不应，并且最终不能，以多数人作为代价而取得成功？

这些，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都留待读者去寻找答案。

在其包罗万象的讨论的结尾，莫里斯再次展望未来，并反思了人类这个物种有无可能正在为自身走向灭绝铺平道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努力想象下一次大洪水发生之后生活将会怎样，莫里斯对此表示欣赏，并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推测。

请相信，阅读本书将是一次既愉快生动又出人意表的刺激之旅，诸位将在一位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的指导之下，跨越宏阔的人类经验；他提出了关于人类价值观之来源和意义的最基本问题，并给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解答。

[1] 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S·洛克菲勒政治学讲席教授。——编者注

[2] 《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编者注

[3] 原文如此，这段话实际引自本书第一章。本书的注释如无特别标注皆为“译者注”。

[4]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类价值观的丛书，本书是其中的一本。——编者注

[5] 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Waal，1948—），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他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系查尔斯·霍华德·坎德勒讲席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著有《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982）和《猿形毕露》（*Our Inner Ape*，2005）等。

[6] 原文如此，此段引文实际引自本书第一章。

正篇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第一章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乔治先生的故事

1982年，我去希腊进行平生第一次考古发掘。我为此激动不已：虽然我在英国有过不少发掘经验，但这一次是全新的体验。我驾驶着老旧的路虎从伯明翰一路开到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那里转乘一辆更加老旧的公交车前往阿西罗斯（Assiros），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那个农庄（图1.1）。在那里，项目进入正轨。我们整天对史前陶器进行计数、称量和归类，等到夕阳西下，就在发掘现场尘土飞扬的前院里喝上一两杯茴香酒，养养精神。

某个傍晚，一个老人侧身骑着驴，用手杖轻敲坐骑，从发掘现场边上的土路经过。他旁边有个徒步行走的老妇，鼓鼓囊囊的麻袋压弯了她的背。他俩经过时，我的一个同学用蹩脚的希腊语问候他们。



图1.1 第一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群体

老人停了下来，满脸笑容。他跟我们的代言人翻译聊了几句，然后两位老人继续向前跋涉。

“那是乔治先生。”我们的翻译说。

“你跟他聊什么了？”有人问道。

“就是问候了一句。还问他为什么不让太太骑驴。”

停了一会儿，有人问：“然后呢？”

“他说他们只有一头驴。”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冲击。在伯明翰，男人骑着驴，却让太太费力扛着大麻袋，会被看作自私（甚至更糟）。然而在阿西罗斯，这么做却顺理成章，其理由也不言自明，以至于乔治先生显然觉得我们的问题很蠢。

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撰写本书，就是试图解释我在阿西罗斯的所见所闻。本书的内容基于2012年10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有关人类价值观的两次坦纳讲座。受邀主讲坦纳讲座是学术生涯的至高荣誉之一，但老实说，我这样的人本来不太可能受邀，所以这更令我备感荣幸。在遇到乔治先生之后的30年里，我从未写过有关道德哲学的只言片语。当然，那件事的细节让我犹豫不决，但仔细考虑之后，我确信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我评论阿西罗斯事件的最佳场所，因为准确地解释乔治先生的话和我自己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就相当于一部近两万年来人类价值观文化演变的通论了。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历史和考古学，而非道德哲学的专业知识背景，我自忖，这样一部人类价值观文化演变通论，道德哲学家或许也会感兴趣。

至于我的观点正确与否，在看过专家点评之后，留与诸位评说。我在前五章陈述理论，第六章到第九章是4位应答者对原讲座的回应——他们分别是古典学者理查德·西福德、汉学家史景迁、哲学家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以及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但我将在第十章做总结陈词，对他们的回应作答。

三种社会体系

过去这四五十年，针对我见到乔治先生、他的驴和他太太时所遭遇的那种文化冲突（以及比这更古怪的），学术界撰写的书籍和论文早已堆积成山。然而，我即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与大多数此类研究全然不同。在我看来，放眼整个地球过去两万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大致交替出现的体系。与每一种价值观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每一种组织形式又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特定方式决定的。归根结底，能量的获取方式不仅能够解释乔治先生说的话，也能够解释他的话为何令我大吃一惊。

不过我得抓紧时机补充一句：因为价值观体系——抑或文化，或者

随你怎么称呼——是无形的存在，如果想用100多页的篇幅来论证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关注较为笼统的价值观体系中具体的子集。因此，我在本书中相对仅限于（包括政治、经济和性别的）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观念，以及人们对待暴力的态度。之所以选择这些主题，部分原因是我对它们感兴趣，此外它们似乎也比较重要。不过我也怀疑价值观的大多数子集都会揭示同样的模式；如若不然，对价值观的不同子集进行比较就会成为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批评家们就会借此曲解我的观点。

第二章到第四章，我将用三章的篇幅展示这三种大致先后交替出现的人类价值观体系的现实。第一种体系，我称之为“觅食价值观”，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生动物来维生。觅食者倾向于看重平等而非大多数类型的等级制度，也比较能够容忍暴力。第二种体系，我称之为“农业价值观”，因为与它相关的社会主要靠驯化的动植物来维持生计。农耕者倾向于更看重等级制度而非平等，比较不能容忍暴力。第三种体系，我称之为“化石燃料价值观”，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以已经转变为煤、天然气和石油的化石的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

这一框架不仅解释了1982年乔治先生的话为何让我觉得如此奇怪（他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农耕阶段，而我已经进入化石燃料阶段了），似乎也对我们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产生了两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如果我的能量获取方式决定价值观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或许能引出两个结论：（1）道德哲学家们力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完美的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努力是徒劳的，以及（2）我们（不管“我们”是谁）如今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实际上很可能——在并不十分久远的将来的某个时间点——变得全然无用。在那个时间点（前提还是如果我是对的），我们会抛弃这些价值观而进入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后化石燃料”阶段。在本书第五章，我提出了一些设想，探讨了那种价值观可能的形态。

历史的诠释与理解

我关于文化冲突的研究与大多数近期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我试图诠释这一经验而不仅仅是理解它。关于此二者的区别，往往要追溯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然而，韦伯并非第一个将理解与诠释[1]作为两种思考社会行为的方式对立起来的学者。这一荣耀似乎要归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2]，他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活动从根本上完全不同。德罗伊森说，历史学家试图理解（这里是指抓住过去的行为者的主观意义）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家试图诠释（这里是指找到原因）研究对象。

韦伯不但极为详细地阐明了德罗伊森最初的表述，而且提出社会学

有第三个目标，既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科学：将诠释与理解合而为一。他指出："当公开的行为及其动机都已被正确理解，且与此同时其关联的意义已经完全能够被理解时，我们就能对某一具体行为过程的因果关系加以正确诠释……如果在意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依据，"他补充道，"那么不管二者之间存在多高的一致性，也不管其概率能够多么精准地计算出来，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完全理解的统计概率，不管我们讨论的是客观进程还是主观过程。"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3]使得韦伯的思想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了广泛的受众，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4]（他最初是帕森斯的学生）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它贴上了一个崭新的标签。"与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写道，"我觉得文化就是那意义之网，因此文化分析并非探索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诠释性科学。"在如此诠释韦伯的基础上，格尔茨认为，要想理解社会行为，就必须进行"长期的、主要是（但并非完全）量化的、高度参与乃至近乎着魔的搜索式田野调查"，从而产生了他所定义的著名标签——"深描"[5]。

按照格尔茨的说法，深描通常应该采用"论文的形式，30页还是300页倒无所谓，这是提出文化诠释乃至该诠释之理论基础的天然体裁"。因此，"一部人种志能否得到关注……不在于它的作者能否在某个偏远的深山老林里获得原始资料，而在于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阐释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把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谜题简化为'在未知背景下，会自然产生哪些我们不熟悉的行为'"。

格尔茨论证了社会学家应该关注理解，而非韦伯所鼓吹的将理解和诠释合而为一，从而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文学者和许多社会学家都步其后尘，将文化冲突从问题转化为机遇。我们应该高兴，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6]（他一度与格尔茨在普林斯顿共事）在我遇到乔治先生的短短几年后写道："我们的祖先所公认的智慧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当无法获知某个谚语、笑话、仪式或诗句的含义时，我们知道自己似乎正在接近某个秘密。如果它的意义在我们玩味的文献中晦涩艰深，我们或许就能揭开一个全然不同的意义体系。这条线索甚至可能引导我们发现一种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

1982年的那一天，我脑中确实闪过一个念头：乔治先生可能在跟我们开玩笑，讥讽我们这些第一世界的来客对其乡村生活方式的倨傲态度。然而事实确是乔治先生骑在驴背上，而他的妻子却背着个大麻袋徒步前行。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把乔治先生的话放在阿斯洛特（Assirote）[7]乡村生活的深描语境下，能够揭示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然而这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我的目标并非理解乔治先生和太太的行为，而是希望能够诠释它。

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利用的这条探索路径不仅要追溯到格尔茨之前，还要追溯到德罗伊森之前。如果追溯得足够远，具体而言，回到18

世纪70年代那半个世纪，就会看到在那个时代，学术界文化研究的主流是诠释而非理解。从孟德斯鸠到亚当·斯密，西欧的一众知识巨匠对有关其他大陆的信息大量涌入所做出的反应和我一样，都是假定人类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阶段（往往是狩猎、畜牧、农业，以及商品经济的某个变体），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体系。

这些理论家中有些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为“哲学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利用史实来回答道德哲学的某些中心问题；而另一些更偏爱“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这个名称，理由也同样站得住脚，即他们知道自己的体系是建立在推测而非真正的史实基础上的。从一开始，推测历史就引来了无情的嘲笑［沃尔特·白哲特[8]讽刺说亚当·斯密“想展示（人类）如何从野人长成了苏格兰人”］和愤怒的攻击［在1773年出版的《历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第一卷中，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尔[9]猛烈抨击了“装腔作势的小休谟们或号称德国小伏尔泰的罗伯逊们”，并立誓要“抓住这些害虫，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到18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断定，没有证据的推测所要付出的代价大大超出了哲学探讨的收获，推测/哲学历史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

然而诠释文化冲突的迫切需求并未消失。19世纪50年代期间及其后，随着传教士和行政管理人员讲述的关于非欧洲人行事如何古怪的故事再度成为热门，学术界发展出新的诠释框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就是后来所知的“古典进化论”（classical evolutionism）。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专业的人类学家证明，古典进化论与18世纪的哲学历史一样，都只是推测而已。诠释再次退却——随后便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的再一次伟大复兴［这次是以所谓“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的形式］。此时，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庞大的考古学和人种学证据体系，而诠释者们也能够通过对大规模数据集进行统计分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到20世纪80年代，深描再次击垮了这第三波诠释者，只不过此次获胜的主要武器是理论而非经验基础。

大概有人想把上述故事诠释为另一项证据，说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根本未曾有过进步，但我不以为然。这个故事真正展现给我们的，是学术进步恰所应有的方式。自18世纪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学者推测了文化变异的原因，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家反驳了他们的观点。在每一轮辩论中，诠释者和理解者都迫使对方拿出更好的理论和数据，而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理解者再居上风，我们这些未来的诠释者也需要重整旗鼓，与之抗衡。

一些“歪论”

要做到这一点，诠释者需要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宽泛的比对，

以此来对特定文化中数以百计的意义深描加以补充。这些补充当属浅描，主要（但并非完全）是定量的，且没有很强的参与性。它们应当是粗放的，因为它们力求在单单一个故事中纳入数百个社会、数千年和数百万人，还应当是简化的，因为它们寻找答案的方式是把充满多样性的亲身经验归结为更简单的基本原则。

我确认的三种价值观体系——觅食者、农耕者以及化石燃料使用者的体系——是韦伯所谓理想类型的实例。韦伯解释说，这些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强调一个或多个观点，并综合很多发散的、分离的、约莫应当在场但偶尔缺失的个体现象所实现的，它们根据那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组成统一的心智建构。就其概念上的纯度而言，这一心智建构绝不可能出现在经验现实中。它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类型将数十亿人的现实生活简化为寥寥数个简单模型，并且因为这些模型包含了如此庞大的经验变异，它们必然充满例外。但是，如果想要找到混沌无序的真实生活背后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条道路必将把我们引向各种"歪论"。首先，它是简化论的。在人文科学的大多数分支及某些社会科学分支中，"简化论者"都是个刻薄的词儿，然而我非但不否认自己持有简化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反而全身心地接受这一指控。我的辩词是，一切学术思想都是简化论。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人都是懒得动脑子。仅举一个例子：我最近有机会查阅马丁·吉尔伯特[10]的温斯顿·丘吉尔8卷本传记（实际出版时分为13册，因为其中某些卷册过厚，无法装订在一副封皮之中）。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传记之一，但它仍然是简化论的。要把任何人的生活归结为纸页上的文字——即使有5 000页之多，必然要把纷繁复杂的现实加以扭曲；把生活在过去两万年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归结为区区几个短小章节，必然会扭曲得更多。但没关系。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是不是简化论者——答案永远是肯定的，而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需要简化到何种程度。大问题往往需要很多的提炼，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的论点同样也是非常唯物论的。我为自己分出的三个阶段所使用的标签暴露了这一点：像18世纪的哲学历史学家们一样，我相信，一个社会可用的能源限定了哪些价值观能够取胜。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的觅食者发现，其社会组织方式的选择范围相当狭窄，这些组织形式往往会有其应得的特定价值观；以驯化的动植物为食的农耕者不得不选择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价值观；而能够利用化石燃料能量的人则会发现，另一种形式的组织和价值观体系最适合他们。如果我是对的，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人类价值观方面，文化、宗教和道德哲学所起的因果作用相当有限。在我分出的三个阶段中，文化、宗教和道德哲学当然塑造了每一个阶段的区域性版本——例如，没有人会混淆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与孔子的《论语》，我在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两部经典。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是，虽然文化传统产生了基于核心主题的各种变体，但能量获取才是驱动大格局的发动机。

此外，我的论点几乎还是普适论的，但不完全如此。我的论点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并不适用，例如从中国的东北绵延到匈牙利的干旱草原。这一地区无法支撑我们通常认为的觅食或农耕生活方式，因为这里几乎长不出（除草之外的）任何植物。但数千年来，那里支撑了独特类型的畜牧社会，其成员食用以草为食的动物（马和牛）。然而，虽然我的框架未能通过普适测试，但它的确囊括了在地球上生存过的占压倒性多数（大约超过95%）的人群。

我还犯了实用主义的错误。价值观是适应性特征，随着人们周围的社会体系发生变化，人们对这些特征加以调整，将其效用最大化。这并不是说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管它此前如何）就是它应有的状态，但的确意味着事物当前的状态（及其此前的状态）就是它一直以来极有可能呈现的状态。价值观是构成更宏大的整体的功能部件。把它们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用想象的天平衡量其轻重并加以评判，这样做并不会引领我们设计出一套通用的完美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作为实际社会体系的要素，永远只存在于真实的世界。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论点显然也是进化论的。人性并非一块白板，任由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随意在上面写下他们想象中的道德体系。我将要说明的三个体系都是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演化适应。

我的意思是说，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正因为如此，生物学家E·O·威尔逊[11]早在40年前就指出：“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

迄今，思考这种可能性的大多是科学家，他们在解释我们如何从类人猿祖先那里继承了公平、公正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人文学者对生物化却明显缺乏热情。或许正是因此，有关人类价值观在近两万年来如何不断演变，以及为什么就公平、公正等具体价值观的意义而言，不同时空的人类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这方面的研究乏善可陈。解释人类价值观的生物基础是一个重大成就，但这仅仅是用进化论解释价值观的第一步。

第二步之肇始在于，除极少数例外，人类是唯一一种发明了文化的动物，其所需的智能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通过教学、模仿等各种传播方式而习得的累积信息体系。我们的道德体系乃是文化适应。随着环境变化，我们像其他生物一样，也会不断进

行生物进化，但只有人类同时也进行着文化演化，改变行为和习惯，使之在周遭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始终有效（甚或愈加有效）。

进化论者对于文化选择的每一个细节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某些学者坚持认为其主要机制很像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在其过程中，一种文化变体之所以能够取代另一种，是因为采用前者的人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有更大的概率存活并将其基因传递下去；其他人则认为，与自然选择无甚共同之处的偏差性传递（一种文化变体取代另一种，是因为前者以更易模仿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才是主力，并且认为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截然不同。选择的传递单位同样充满争议。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两派学者中，一派假设文化复制基因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2]称之为“迷因”）非常相似，整体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而另一派则认为所涉的单位更应当被称为“吸引子”，因为有吸引力的思想被加以创造性地重新诠释，而不是在两个头脑之间如实传递。最终，学者们就文化选择运作的范围（或级别）撰写了海量文献。这又造就了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坚称一切选择最终都会对基因发生作用（个体、亲族和更大的群体只是表达遗传适宜性的不同载体）；另一种则认为选择在多个层面发生作用，他们指出那些在基因层面具有灾难性后果的特性（比如利他主义）之所以能够繁盛，是因为其在更大群体的层面具有高度适应性。

这些都是重要的大问题，不过幸好我们无须等待专家们就机制、单位和选择级别达成共识，便可解释人类价值观的演变过程。“证据表明，文化变体有时是有点儿像基因，有时则断然不像，”进化论科学家彼得·里彻森[13]和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14]如是说，“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达尔文主义的方法都还是有效的。”关于亲族和多层面选择的辩论也是如此。总之，里彻森和博伊德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无人知晓基因遗传如何运作，但这并没有妨碍达尔文推导出自然选择的原理。“同理，”他们说，“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基于我们能够理解的可见特征而建的合理模型，把文化如何储存在大脑里的问题装进黑匣子，继续前进。”他们断定，一旦如此，我们就能看到“某些道德价值观（会变得）更加诱人，因而更有可能在个体之间传播。这些价值观往往会长存，而那些不太诱人的价值观则会消失”。

自冰河期结束以来，人类环境的最大变化是通常被我们称为农业和工业革命的能量获取的爆炸，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主要的价值观体系与三个主要的能量获取体系能够大致重叠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5]指出，整个历史实际上可以浓缩成一个简单的公式C＝E×T，其中C代表文化，E代表能量，而T代表科技。他总结说：“当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加，或者能量转换的科技手段的效率提高，抑或两个因素同时增长时，文化就会发展。”怀特近年来不太流行了，但我将在本书中论证，他的观点大半是正确的。人类在近两万年来所获得的能量呈螺旋式上升，驱动了文化进化的进程，人类的价值观作为其一部分，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以上述方式来考察价值观体系，我们大概还应得出如下结论——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根据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16]的说法，“我们生而正直，但确切地说，我们不得不学习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在哪些事情上正直”，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我们关于何为正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如何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能量的获取方式大致决定了哪些人口制度和组织形式运作最佳，而这些又反过来决定了哪些价值观将成为主流。

进化——无论是文化进化还是生物进化——是通过数百万次微型试验进行的竞争过程。它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某个有机体或社会现今的状态限制了它未来的状态，并且进化通常是混乱、喧嚣，甚至不无暴力的。但随着各种突变之间的竞争尘埃落定，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特征会取代那些表现不佳的特征。我认为，这就是在我粗分的觅食、农耕和使用化石燃料这三个阶段，人类行为、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上为何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的原因——比如，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奴隶制度何以在农业社会如此常见（但并非全部），而在化石燃料社会却如此罕有（但并非完全缺失）。农民往往会选择等级制度，不是因为他们恃强凌弱，而是因为那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化石燃料使用者往往会选择民主，不是因为他们怀瑾握瑜，而是因为能量之丰富使世界大大改观，以至于对当今世界来说民主才是最佳选择。

因此，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我们的主观意愿看似无关痛痒。我个人就曾亲身体会过这种价值观和环境间此进彼退的关系。1986年，在阿西罗斯工作4年以后，我转而研究文化人类学。有一次我去肯尼亚探望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友），她在那里跟卢希亚人学习传统医学。作为来自化石燃料全盛时代的两个研究生，我们俩满脑子当代价值观，特别注意避免像不久前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家那样，让报酬过低的当地工作人员替我们扛东西。但我们发现，在英国剑桥的小酒馆里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说法，在卡卡梅加（Kakamega）和基苏木（Kisumu）之间的丘陵地区却很难付诸实践。该地区当时还主要是个化石燃料前的世界，甚至处于比阿西罗斯更加典型的农耕时代。因此，我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从河里打水回来，捡树枝来烧开水，以供饮用烹煮，或是洗洗涮涮。凯茜要教学，还要采访，我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还要准备在芝加哥大学的求职演讲，我们俩都没时间花几个小时去河边背水。

但是，在那个长期被高失业率所困的农业经济地区，大量本地妇女却有的是时间。我们每天只要花上一美元左右，就可以买回几个小时。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只是个零头而已，但对一个当地家庭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是个双赢的局面，但也是个经典的殖民主义关系，我们不想这么做。我们花了大约一个星期在泥地里来回踉跄，水桶动辄掉落，到家则永远点不着火。最终我们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原则，不得不说，这对每个人都是解脱。金钱易手，采访顺利结束，我也完成了专著，找到了工作，还着实给好几个家庭帮补了家用（图1.2）。

或许是因为我们意志薄弱。换作康德，估计不会如我们这般轻易妥协（虽然我也无法想象他老人家会亲自从河边背水）。不过我怀疑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跟我们做出一样的选择。据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7]在被人指摘前后矛盾时回应说："时过境迁，我的想法自然会跟着变。阁下不是这样吗？"不管凯恩斯是否说过此话，它精准地概括了近两万年来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过数十亿次的场景。生物进化赐予我们的好处之一便是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应该随机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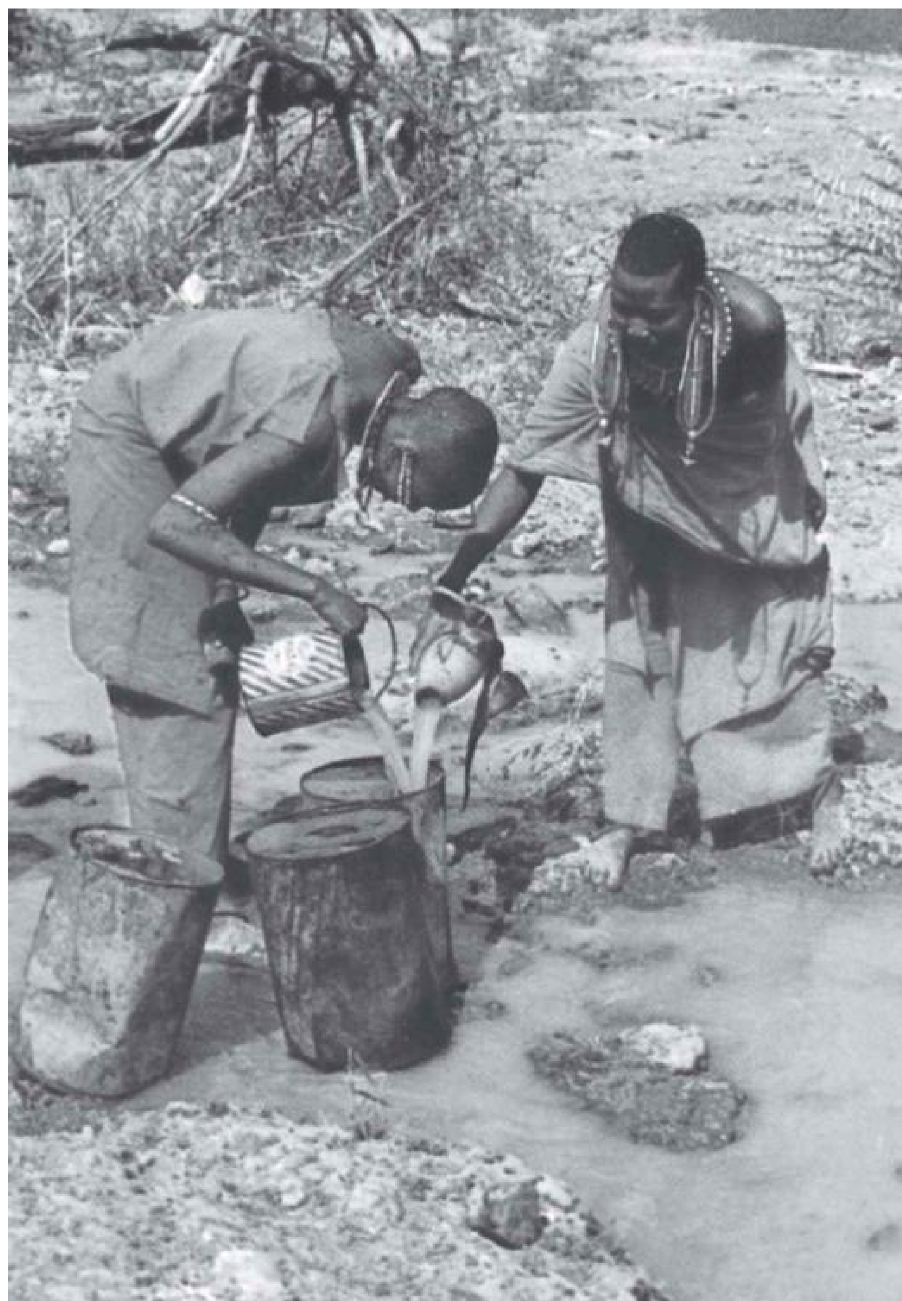


图**1.2** 背水人

肯尼亚妇女在溪边取水（图片来自1986年购于基苏木的一张明信片；作者的收藏）。

历史学家的错误

自哲学历史学家的时代以来，大规模解释模型的建构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测试那些模型。由于理想类型过于混乱，每一种概括都不可避免持续有例外发生；那么，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某个理论的例外太多，因而一定是错误的？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坦纳讲座时，就遇上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受邀离开芝加哥，前去响应科林·伦弗鲁[18]1993年在斯坦福大学主讲的有关考古学、语言与身份认同的讲座。在首日讲座之后召开的研讨会上，伦弗鲁教授和哲学家艾莉森·怀利[19]就证伪展开了热烈讨论。根据他的理论，人口流动和语言变化之间不无联系，在座的考古学家们就此举出了一个又一个例外，但关于该理论是否（或是否可能）已被证伪，一直未有定论。

由生物学家转型为宏观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20]认为，关于这一点以及很多其他观点，“科学史主张：某个学科通常只有在发展出数学理论之后，才会真正成熟”。如果他是对的（我认为确实如此），关于证伪问题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便是驳回格尔茨关于论文是分析文化冲突的天然体裁的说法。我倒不如在本书开头就从能量获取的不同阶段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样本，把它们的价值观体系缩减为一个数字代码，并比较各种价值观体系与能量获取之间的适合度。然后通过X_2（卡方检验）或其他显著性检验就能得出结论，了解在0.05的概率水平，或其他任何看似恰当的阈值上，我们能否反驳这个无效假设（即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没有相关）。我会需要花上数页篇幅来解释我的代码体系和采样策略，不过如果检验表明价值观和能量获取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我便可立即着手解释这一相关性的原因及其可能影响了。

对于很多种大规模跨文化的比较而言，这样做在原则上最为简单易行、一目了然（纵然在实践过程中定量检验的结果往往没那么直观）。大型数据库（尤其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已然存在，还有更好的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然而，这些数据库中有关价值观的信息就乏善可陈了。主要问题在于，道德价值观是标称数据，而非区间数据——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社会中的人群普遍认为贫富不均是好事，而另一个社会的人群认为那是坏事，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两个社会有所不同，传达不了任何其他讯息。人群的态度无法分等或测量：“好”与“坏”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而已（是为“名义”数据[21]），绝非可以用来测量和量化其间距离的连续量表上的数据点（是为“区间”数据）。

由于这些（还有其他）问题的存在，跨文化指数的制作者们往往会

极力避开价值观，我本人在早期尝试量化指标时，也曾奉其为圭臬。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够坚持，就像我在卢希亚人那里不够坚持我的化石燃料价值观一样，确有其他分析家声称他们找到了把人类价值观从标称数据转化为区间数据的方法。从1981年以来，一个名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大型欧洲项目就价值观问题在100个国家采访了逾40万人，并将采访得到的回复在两个数轴上排序。第一个数轴是从“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观（测量对于宗教、家庭和权威的态度），第二个数轴是从“生存”到“自我表达”（涉及人们对人身和经济安全的关注，以及信任和容忍的水平）。然后WVS将用数字表示的分数打包，计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就能在一个价值观坐标图上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进行标注了。

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2]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23]说，所有这些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改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其改变的过程大致是可预测的”。他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发展——从农村主导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基于服务的经济——与我所说的能量获取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我试图在图1.3和图1.4中进行一个更加直接的测试，将WVS的分数与能量获取的原始测量标准关联起来。图1.3是最简版本，坐标的纵轴是WVS的“传统到世俗—理性”数轴上国家的分数，横轴是每个国家农业部门所产生的财富比例。图上体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随着化石燃料取代了农业，价值观也从“传统”转变为“世俗—理性”；但这是一个弱相关，R^2（相关系数）的数值仅为0.24。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图1.3表明，这种关系并不牢靠。只要至少有1/4的国家财富来自农业，价值观就会相当传统，而一旦非农业部门的比例升至75%以上，价值观便会朝着世俗—理性标准迅速转变（不过变异情况很多而绝非铁板一块）。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会看到，史实有力地证实了这一模式。

统计数据就是统计数据，处理WVS的数据有很多方式，但我试过的所有比较都得出了差不多相同的结果。例如，图1.4在纵轴上显示了WVS的每个国家的“传统到世俗—理性”和“生存到自我表达”分数。横轴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综合测度，把农业（即第一产业部门）的产出和工业（即第二产业部门），以及服务业（即第三产业部门）的产出分离开来，然后为每个国家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每个百分比赋值1点，第二产业的每个百分比赋值2点，第三产业的赋值3点。如此一来便产生了更加明显的相关（R^2＝0.43），但整体情况与图1.3无甚差别。经济越不发达，人们就越可能拥有传统价值观，但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虽然变异情况很多而绝非铁板一块）更倾向于理性、世俗和自我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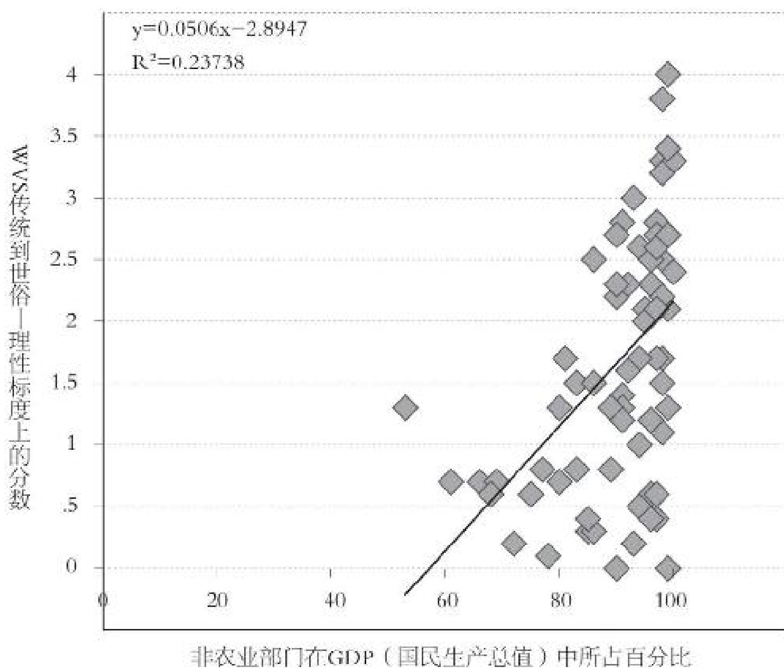


图1.3 价值观和能量获取，第一版

纵轴为WVS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观标度上的国家分数，横轴为每个国家非农业工作所产生的财富比例（$y = 0.0506x - 2.8947$；$R2 = 0.23738$）。

WVS总结道，这一模式如此混乱的原因在于，发展并不是影响价值观的唯一要素。“尽管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可预测的变化，”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说，“文化传统——例如一个社会在历史上是否受到过新教、儒家或共产主义的影响——始终会在该社会的世界观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历史很重要，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反映了现代化驱动力与滞后的传统影响之间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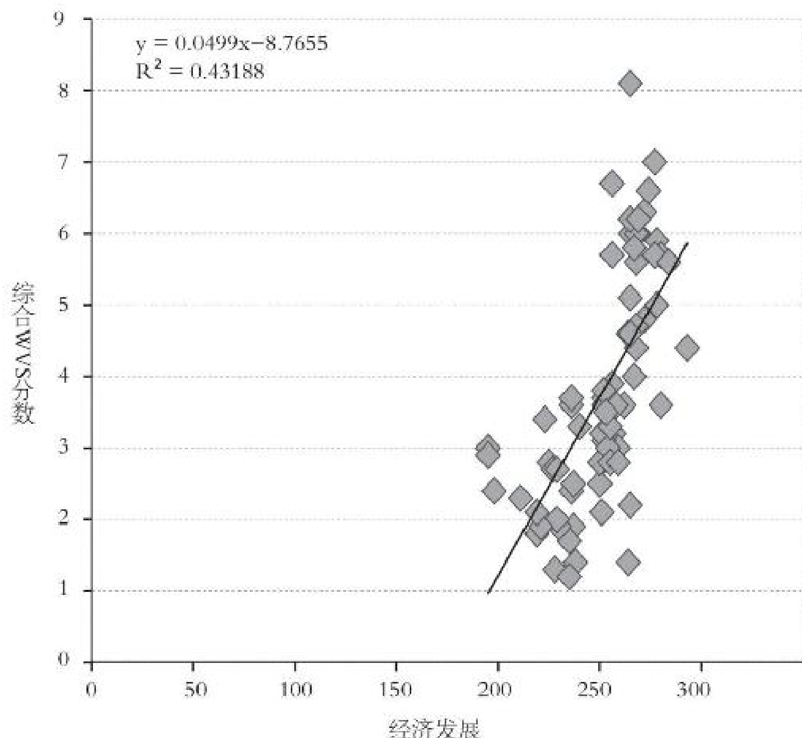


图**1.4** 价值观和能量获取，第二版

纵轴是将WVS的传统到世俗—理性和生存到自我表达标度相结合的综合分数，横轴是反映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的综合分数（y＝0.0499x–8.7655；R2 ＝ 0.43188）。

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基于2010年的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他们研究过的74个国家（图1.5）的“文化地图”，阐明了这一互动。文化和/或语言集群非常醒目，这不会只是巧合，但仍有很多异常情况需要解释。例如，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提出的“天主教欧洲”这一类别，以一条狭窄走廊把波兰和集群中的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与格里为一党之利擅自改划的选区[24]有着惊人的相似。根据各国在该地图上的位置，大多数罗马尼亚人想当穆斯林，而危地马拉人希望成为非洲人，爱尔兰人（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感觉自己当拉美人最合适。希腊和以色列均未在这一版文化地图上标记（它们曾在早期版本中出现过），但它们的WVS分数表明，东正教的家乡还真是在斯洛文尼亚和比利时之间，远离同教派的教友，而犹太国则坐落在天主教欧洲的正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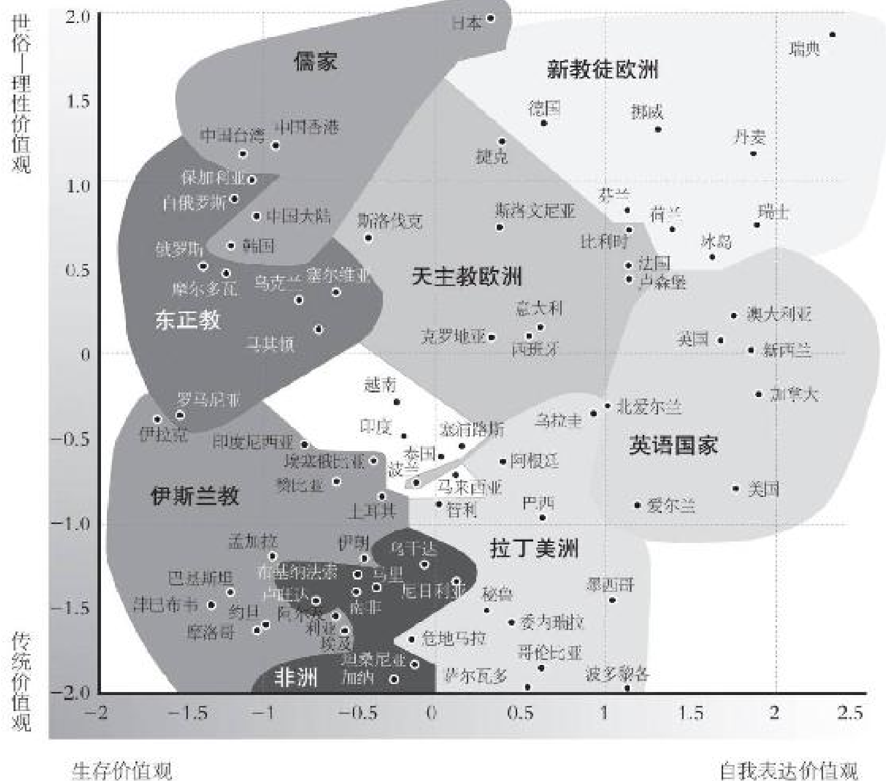


图1.5

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绘制的WVS数据的“文化地图”，显示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间的相关。

这些诡异的结果真是有趣，但最有启发的异常情况是图中央的国家集群。智利、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印度、马来西亚、波兰、泰国、土耳其和越南除了都在经历快速的经济转型之外，几无共同之处。WVS断定，这种情况表明，发展才是驱动价值观的真正力量，而文化只能影响价值观选择的路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经过工业化成长为后工业的知识型社会，”WVS在自己的网站指出，“国家往往会沿对角线移动，从左下角（贫穷）移动到右上角（富裕）。”发展决定了路径，传统无论如何会屈服。拉美和东欧的工业化社会在WVS中的得分均高于非洲和中东的工业欠发达国家，但由于文化的影响，拉美国家往往会在自我表达价值观方面得分较高，而在世俗—理性价值观方面得分较低，而信仰东正教的欧洲人则恰恰相反。

WVS的数据令人浮想联翩。但说到底，它们只从一个非常片面的角度验证了本书的主题。基本问题在于，要得到关于价值观的系统性数据，唯一的方式便是通过民意调查，而这不过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到1981年，也就是WVS开始其研究之时，在较大的单一民族国家中，觅食者仅占极少数。即使在觅食者占人口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博茨瓦纳，也不过只有区区一万多觅食者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远少于该国从

事农业以及在工厂或服务业工作的人口，比值还不到1：200。此外，到1981年，几乎每个农业社会——包括乔治先生所在的马其顿——都在朝着仰仗化石燃料的社会迅速转变。2012年，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农业产生的国家财富比例超过一半。与之相反，在从农业革命上溯至大约公元1500年的整个世界历史上，农业产生的国家财富不到一半的例子大概不到7个。

关于人类价值观和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要进行严格的大样本统计研究，唯一的方法就是限定在近30年，这意味着忽略几乎所有的传说。因此，我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中会求助于更多的传统方法。实际上，本书正是沿着格尔茨推荐的方向所作的一篇论文，提出概略性的建议而非演示各种相关性。我利用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社会学完善的定性概括方法，试图证明人类价值观的三个笼统体系已经存在了近两万年，并且它们与能量获取的几个体系大致相关——简言之，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我的方案是直截了当的。本书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论了觅食采集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在第五章，我提出了能量获取体系为什么会改变，这些改变是否不可避免，以及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等问题。在第六章到第九章，几位专家会解释我的论证有哪些问题，而在第十章，我会试图挽救我的论文，使它不致在几位专家的批评之后一败涂地、一文不值。

[1] “理解”与“诠释”的分歧由来已久，其在20世纪的争论可简单解释如下：实证论要求以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来诠释（erklären）人的行为，因此，在分析哲学中持实证立场的语言分析派，就主张唯有分析性的或是可用经验验证的语句才有意义可言，将种种超出经验范围的命题排除在意义之外。诠释学所承继的“精神科学”传统则向来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中由精神创造出来的特殊产物，必须借由语言媒介去理解（verstehen）人类的行为及其意义。诠释学（乃至更广泛的精神科学）和实证论的冲突就在于，前者所使用的语句是涉及主体与对象关系的意向语句或信念语句，而信念语句对后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故后者不承认诠释学乃至精神科学是真正的科学。

[2]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普鲁士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史学方法的本质是“理解”，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需要和问题去理解历史。

[3]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学者，美国“二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

[4]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美国人类学家，象征人类学的提出者。

[5] 格尔茨在其著名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中借用“深描”一词来表达他认为人种志应满足的写作要求。他认为人类学就是对人类文化的诠释，而人种志就是对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诠释。格尔茨用4种眨眼来说明他的深描概念：1.无意的抽动，抽动眼皮；2.向密友投去的暗号，眨眼示意；3.对眨眼示意的恶作剧模仿；4.小丑在舞台上表演眨眼示意。格尔茨认为这4种眨眼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层面，包含了不同的文化意义，深描就是要区分这4种眨眼的意义。

[6]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是18世纪法国文学史。

[7] 疑应为前文的阿西罗斯（Assiros）。——编者注

[8]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商人、散文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58年后任《经济学人》杂志主编。代表作《物理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1872）强调弱肉强食的普遍性，宣扬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9] 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56—1831），德国历史学家，“普世历史”的先驱，对现代诠释历史学方法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10] 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1936—2015），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荣誉院士，著作逾80部。

[11] 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 ），美国昆虫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其对生态学、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而闻名，著有《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1975）等。

[12]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1976）和《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1986），这两部作品的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分别于2012年9月和2014年8月出版。

[13] 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1943— ），美国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科学与政策系杰出荣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进化、人类生态学。

[14] 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1948—），美国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进化心理学等，尤其是文化的进化根源。

[15] 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1900—1975），美国人类学家，文化进化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以及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

[16]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1963—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他的学术领域是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情绪等。

[17]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抗景气衰退甚至经济萧条。他的思想被称为“凯恩斯学派”，并衍生出数个支系，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8] 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1937— ），英国考古学家、古语言学家，以其在放射性碳定年法、古代语言学、古遗传学等领域的工作，以及防止在考古遗址的掠夺行为而闻名。

[19] 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1954— ），加拿大男女平等主义科学哲学家，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她以其在考古实践中的知识论问题和社会科学中的男女平等主义研究而闻名。

[20]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1957— ），俄裔美国科学家，专长于群体生物学和历史动力学。

[21] “标称数据”的英文原文为“nominal data”，“nominal”的本意是“名义上的”。

[22]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1934— ），美国政治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政治、政治发展和政治哲学等。

[23] 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1964— ），德国政治学家，任职于德国吕讷堡大学，同时担任世界观调查学会的研究主管。

[24] 擅自改划的选区（gerrymander），该词源自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1744—1814）为了党派利益而擅自改划选区，结果选区划分图形似一只蝾螈（salamander），因而产生了混合州长姓氏（Gerry）和蝾螈（salamander）的gerrymander一词。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采集者是什么人？

我就从觅食采集社会谈起吧。“觅食”（foraging），有一篇标准的参考文献帮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是指“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以及捕鱼，而未能驯化植物，且未能驯化除狗之外的动物”（因此，习惯上使用“狩猎—采集者”一词作为“觅食者”的同义词）。另一篇标准文献则指出，这一能量获取方式的后果是，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

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觅食有多种形式（因此，某些人类学家喜欢用“觅食系列”一词），除了范围非常广泛之外，“觅食者”的类别也是开放的。很多社会把觅食和农耕结合起来（人类学家往往称其为“园耕”群体），近几个世代以来，在某些社会，觅食与化石燃料生活的元素也时有结合。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变体和过渡形态，人类学家依然压倒性地认为“觅食者”是个界定相当清晰的分析类别。

我们甚至可以把觅食称为自然的生活方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觅食者，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觅食方式。我们人类的觅食方式是在巨大的中非热带雨林边缘进化而成的，人类本身也是在大约5万～20万年前从智人的某些早期种类中进化而来的，我们从那里出发，逐渐占领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走出非洲的大迁徙始于7万～10万年前，一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宜居的地方定居下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0%，每个人都是觅食者；当然，小部分人类至今还是觅食者。

等公交的马赛人猎手

研究觅食社会的学者有三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史前的考古证据，过去几千年中有文字的社会就其所遭遇的觅食者留下的一系列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以及近100年来的人种志分析。每一类数据均有其自身的问题，但综合在一起来看，它们揭示了鲜明的模式。

对大多数确乎存在过的觅食社会而言，考古学是唯一一个直接证据来源，但它有一个重大缺陷——关于人类价值观这个主题，那些石头和骨头保持着亘古的沉默。无论我们的田野工作和立论如何复杂，对考古学发现的解读总要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在发现物与历史或人种学报告之间寻找相似性。

相反，有关觅食者的近代文字报告却总是围绕价值观问题来讨论，这些报告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受到现代假说的毒害；但它们同样有一个大缺陷——农业社会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为觅食者作传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后者来佐证和渲染自己关于价值观的论调。因此，近世的记录倾向于强调觅食者（在农业社会成员看来）的异己特质。例如，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些关于西伯利亚觅食者的可靠信息，但他还是过于轻信他们不完全是人类。他说，阿里马斯皮人[1]只有一只眼。在他们的北方住着秃头的阿尔吉帕人（Argippaioi）和食人族，再往北去，那里的人每年还会冬眠6个月。希罗多德有时会将非农耕者描述成景仰希腊智慧的落后蛮族，有时又会将他们描述成凸显希腊之衰微的高贵蛮族。农业时代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对觅食者的描绘，多是在重复类似的主题。

过去100年来著述颇丰的现代人种学者发展出一套艰深复杂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关于觅食社会的庞大知识体系。可是我们很难利用这些数据作为研究史前觅食者的间接证据，主要原因是，当代觅食社会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古代或史前的同型社会大不相同。两万年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觅食者。到500年前，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只剩下不到1/10，他们被迫退守在仅占地球1/3的区域。而如今，觅食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1%。这少数遗族大多被禁锢在农耕者们不待见的蛮荒之地，如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圈，或是人类仍未征服的神秘疆土，如亚马孙和刚果的雨林。然而，就算是这些偏远的领地也会引发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经济或政治野心，也就是说，现代政府、市场和品位的影响力已近乎无处不在，除当代最孤立的觅食者之外，无一幸免。（1986年在坦桑尼亚，令我最惊奇的一幅景象是一个手持长矛的马赛人[2]猎手喝着可口可乐等待返回营地的公交车，肩上还扛着他的猎获。实际上这绝非罕见；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狩猎—采集者都过着借助于化石燃料的觅食生活。）



图**2.1** 第二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既然20世纪的觅食者多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而史前觅食者的生存环境更为温和宜居，那么将二者进行比较显然是有问题的。20世纪中叶，几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觅食者类型学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并提出任何类比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观点。这些人类学家声称，现代觅食者绝不是延续古代生活方式的遗族，而分明是现代历史进程——尤其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断言，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无法借助研究当代觅食者来了解史前生活。某些人类学家开始声称，对史前和现代觅食者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本身就暗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把当代觅食者矮化为遗落在人类社会进步之外的“活祖先”，需要在化石燃料社会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

这些结论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使最晦涩难解的交流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层理论，通过民族人类学类比，将发掘出土的遗迹与史前行为联系了起来。当然，其中某些方法不过是精炼的常识，考古学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虽说学术潮流总是此起彼落，但是，诸如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3]在20世纪30年代所得出的很多结论，现在看来大体还是正确的［我在斯坦福的一位同事喜欢强迫研究生们参加人类学统考，逼着他们承认我们有关史前生活的主要思想在1877年，也就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4]出版其《古代社会》（*Ancient Socitey*）那一年之后几无变化］。这位轻率的分析家极有可能错误百出，但史前觅食者所生活的世界的整体轮廓的确已经相当清晰了。

时代的生存方式

觅食者如何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相关的细节极其丰富，但其变化大多只体现在不同的群体栖息在何处而已。对于觅食者而言，地理位置便是一切，这决定了能量的需求和来源。基本上，觅食者的栖息地距离赤道越近，其所需要的热量便越低。在热带，每天区区4 000千卡的热量便可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包括食物、工具、煮食燃料、少量衣物和简易的容身之所。然而，栖息地接近两极地区的觅食者每天可能不得不将两倍的能量消耗在取暖、住房和更厚重的衣物上。赤道觅食者往往会从植物中获取所需的大部分能量，那里的植物（哪怕是沙漠地区）比极地丰富得多；南北两极的觅食者则需从动物（特别是鱼类）那里获得大部分能量。我们没有理由臆测史前的地理限制因素没有这么严苛，事实上在冰河期，这些限制因素还会严峻得多。

当代觅食者通常很擅长评估不同能源的热量成本和效益。传统和信仰的确塑造了他们的觅食策略，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人种志研究，证实了觅食者在分配其时间与精力时所依据的基本理性。考古学家罗伯特·贝廷格[5]指出，人类那些五花八门的狩猎和采集方式可以浓缩成区区5种基本的觅食策略，有关经济理性的假设（往往称为最佳觅食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史前遗迹。

早在1968年，理查德·李[6]和欧文·德沃尔[7]发表其研讨会论文集《人类——狩猎者》（*Man the Hunter*）时，能量限制对于觅食者（包括史前的和当代的）的影响便显而易见了，这部论文集大概是有史以来关于觅食者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李和德沃尔断言，无论觅食者身在何方，以何为食，又如何觅到食物，对野生食物的依赖迫使他们不得不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他们生活在小群体里，并且（2）他们常常四海为家。”

关于如何最贴切地描述觅食者的社会组织，人类学家争论不休。埃尔曼·瑟维斯[8]在其经典书籍《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中指出，觅食者的基本群体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数十人组成的游群。与之相反，艾伦·约翰逊[9]和蒂莫西·厄尔[10]主张，更小的家庭群体意义更大，而蒂莫西·英戈尔德[11]则认为，觅食者群体实际上是由“生产和消耗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组成的，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他猜想，“因此，被我们视作‘家庭’的群体是靠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多点接触而建立，接触则是通过食物和性的交换关系实现的”。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核心的人口因素却从无争议。野生食物资源的低密度意味着大多数当代觅食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很小的群体中度过的，通常仅由2~8个关系密切的人组成。不过，他们全都要依附于比这大得多的群体（至少500人），因为只有这样的规模才能构成足以支撑下去的繁殖种群。如此众多的觅食者聚集一处倒不常见，但就算最小规模的群体也会定期聚成逾50人的较大游群或集合扎营，这些游群/营地网络便可产生所需人口规模的基因库。在丰饶的环境中，人们每年会花更多时间加入这些更大的群体；严峻的环境中则相反。然而，只有在真正富饶的环境中，特别是富有海洋资源的环境中，觅食者才会在几十甚

或数百人规模的群体中长久居住下去。在北美太平洋沿岸的觅食村落，从加州南部的丘马什人[12]到阿拉斯加走廊地带的特林吉人[13]，都是最负盛名的例子。

考古学认为，史前的觅食者生活在大小相若的群体中。在冰河期寒冷干燥的条件下，群体规模很小大概是常态，居住在热带之外的人尤其如此。大约公元前14000年之后，随着世界气候逐渐变暖，群体的规模似乎不断扩大，若干个冰河期后的温带地区能够支撑数百人规模的半永久性村落。有时，这些地区是海洋资源丰富的地带——比如波罗的海南岸附近（约公元前5000年）和日本南部（约公元前3500年），但在少数例子中——特别是公元前13000～前10000年的西南亚，野生动植物食物十分充裕，足以支撑永久性村落。但是，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觅食者又被迫退回到物资匮乏的环境之中。

因为一年之中不同的野生植物次第成熟，不同物种的动物和鱼类迁徙的时间也有先后，当代觅食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机动性。就算小规模的群体也需要巨大的支撑空间，这意味着他们在广袤的地形上分布得非常稀疏。密度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当地的野生资源基础（而这本身又取决于地理条件），不过一般的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不到一人，每十平方英里不到一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觅食群体规模一般都极小，这就意味着劳动分工必然相当简单，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层面，以年龄和性别来进行分工。整体而言，妇女负责采集植物和大部分的烹制，做一些手工劳动，并承担全部的育儿责任；男人负责狩猎，承担大部分手工劳动和一些食品烹制工作。男孩和女孩协助完成一些适合各自性别的工作。近5 000年来，与农业或工业社会保持联系的觅食者往往急于从前者那里购买和使用复杂精密的科技，而觅食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一般都非常简单（尽管通常十分精巧、有效）。纵观历史，在农业社会早已学会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之后，绝大多数的觅食者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不过，尽管科技落后，经济组织相对简单，觅食者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见得很低。如果与野生资源相对的人口密度较低而机动性较高，觅食者往往无须辛苦劳作便可生产出1 500～2 000千卡的食物能量，一个活跃的成年人每天也就需要那么多能量。即使在美国西南部那种严苛的环境中，人们每天也只需平均2～5个小时的觅食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4]曾经给觅食者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称其为“原始富裕社会”。

但“富裕社会”这一标签功过各半，既揭示了实情，也掩饰了真相。萨林斯自己也认识到，觅食的确只需付出相对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食物，但它在提供其他物质产品方面却乏善可陈。萨林斯认为，这一特点倒不影响他的富裕社会理论，因为觅食者不是唯物论者。因此，他总结说，尽管“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他们却并不贫困”。然而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当代觅食者实际

上非常贫困，但认为这应归罪于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剥削，而不是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手段的低效。

在物质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觅食群体之间也各不相同，诸如日本史前的绳文时代[15]文化或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16]等习惯定居的大型群体往往最为富裕，而处于极端环境中，机动性极强的微小群体则最为穷困。但是，我们所有的证据来源——发掘物、近世文献以及人种学——均指向了相同的结论。纵观历史，即使最富裕的觅食者，以农业社会的标准看来也是并日而食，而在化石燃料使用者看来简直就是食不果腹。

更重要的是，富裕社会的标签贬低了一个重要事实：最悠闲的觅食者也会经历野生食物短缺时期的困顿。某些群体（特别是定居性更强的大型群体）有能力储存食物来抵御逆境，但其他群体却无力为之，而觅食者由于经常无处觅食，身体很差（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们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一般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少数人可以活到70岁，半数的儿童通常在15岁前便夭折了，即使能够存活到成年，多半也在50岁前就死了。总而言之，觅食者控制其群体规模，以便依靠野生资源存活下去，并非通过自觉明智地稳定人口，使之低于其领地的承载能力，而是始终经历着人口迅速增长和饥饿这种盛衰荣枯的交替循环。

昆申人的“大酋长”与肖松尼人的“兔老大”

有关觅食者价值观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过去100年间写就的人种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偶尔会就非农耕群体的平等主义和好战性评价一番，但我们真的无从得知当代觅食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态度在人类历史初期的5万多年里是否同样正常。不过，鉴于前文提到的古代和现代觅食者在生计、人口和组织等方面的大量相似之处，那些认为史前和20世纪觅食者在价值观上有云泥之别的人，理应负有举证责任。

人种志学者一度议论，说从北极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觅食者都厌恶政治等级制度。［例如，在《剑桥狩猎—采集者百科全书》（*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nter-Gatherers*）这部杰出著作中，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指出，他们写到的人群都没有制度化的领导者。］不过世事总有例外，特别是那些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可以支撑上百人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一起的社会，尽管某些考古学者声称，就算是这些群体，实际上也不似表面上看来那般等级森严。世界各地的觅食者大概都能理解人类学家理查德·李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17]觅食者那里得到的答案，当他问到昆申人为何没有部落首领时，他们说：“我们当然有酋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酋长……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酋长！”诚然，在相隔半个世界的火地群岛，也曾有觅食者对另一位人类学家说过类似的话：“是的，先生，我们奥纳人[18]有很多首领。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

手。”

觅食群体有时会做出重要的集体决策，特别是在无休止地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关于下一步移居何处的问题，但大多数群体制定了相关策略，让一个人甚或一个小群体很难将整个决策过程控于掌心。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小群体里反复讨论每一个决定，直到逐渐形成共识，在那一刻，就连最强硬的反对者也会变成应声虫，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几乎所有的群体中，人们都会时而参与那种需要领袖的活动，例如著名的肖松尼人[19]的“兔老大”，他们在多个家庭聚集组成游群的时候组织狩猎。不过一旦活动结束，或者游群再次分解为家庭时，这些领袖职位通常会随即烟消云散。太跋扈的人，或者将专横态度延伸到不合适的情境，或企图把暂时的影响力变成约束他人的永久权力的人，鲜有能抵挡住同伴的反对的。

对于企图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人，嘲弄是最常见的回应之一。这方面的最佳案例仍然来自于理查德·李关于昆申人一丝不苟的研究。在卡拉哈里，“逞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20]用来形容自我推销的词儿）的主要施展空间是狩猎，一个有势力的昆申人告诉李：

> 如果某个年轻人猎杀了很多肉食，他就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我们其他人都是他的仆人或手下。我们接受不了这个。我们排斥自吹自擂的人，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会因为傲慢而杀人。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猎获的肉食一点儿用都没有。这样，我们就能让他的心冷静下来，让他整个人平和一些。

有人看见昆申人挖苦自命不凡的“逞能者”，叫他们“大酋长”，并故意忽视他们以示贬损，类似的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例如印度南部的帕利扬人[21]觅食者，坦桑尼亚的哈扎人[22]，以及澳大利亚的努库尔人[23]，人们常常会对野心勃勃者的傲慢冷嘲热讽、无情打击。

如果嘲笑不起作用，觅食者会逐步升级他们的不满。排斥是个常用的技巧，往往直接产生于嘲弄。常见的第一步是人们假装听不见或听不懂逞能者说的话，在他越来越生气时狂笑不已，好几个社会都有这样的记录。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该逞能者可能会被驱除出群一段时期，或是群体的其他成员自行离群，让过错方来追赶他们。

另一个策略是从嘲弄和排斥转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毫不含糊地告诉无礼之人，他或她做错了什么。人类学家弗雷德·迈尔斯[24]在研究西澳大利亚沙漠中的宾士比人[25]时记录过一个插曲，有个人开始觉得自己在游群中出类拔萃，于是决定在不事先征询意见的情况下干预他人。人们嘲弄他、忽略他，当面抱怨他的所为，但一切似乎都没有用——终于有一天他在一个祭典中当场倒地身亡。宾士比人认为，此人一定是因为想当酋长而激怒了某人，导致后者用巫术杀了他，因为（根据迈尔斯对于舆

论的解释）“人只能运用不会对他人的平等和自治造成威胁的方法来维护其个人的威信”。

不过如果嘲弄和批评都不能戳破这位逞能者的面具，感觉不爽的觅食者还可选择一走了之。亚马孙盆地的马奇根加人[26]群体同时践行觅食和少量园耕这两种生活方式，如果某人对另一个人的粗鲁相待感到愤怒，他就会一走了之，进入森林。过一段时间他也许会回来，或者如果他觉得情况无可挽回，就会带全家一起离开。马奇根加人称这种做法为“依什噶那卡”（ishiganaka），他们认为相对于不得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做法更加体面。

不分等级的价值观在经济层面如同政治层面一样旗帜鲜明，不过19世纪有关觅食者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所有物资全部归公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相反，正如约翰逊和厄尔在其有关社会进化的调查中强调的，觅食者“密切关注财产和所有权问题。通常，生产的每一件物品均有一个单独的所有者来决定其用途和去向”。

然而尽管其财产权利相当稳固，却鲜有觅食社会拥有实质性的等级制度。经济学家衡量收入或贫富不均的标准方式是使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量度，该系数以从0（完全平等，也就是说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等量的财富或收入）到1（完全不平等，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拥有一切，而群体中的其他人全无财富或收入）的分数来表示财富或收入的集中度。很少有人类学家计算过觅食者的基尼系数，但这方面最成功的尝试曾调查了非洲、南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5个觅食者群体，得到的分数非常低，基本上都集聚在0.25的平均值周围。（我会接下来的两章里讨论农业社会和化石燃料社会的基尼系数。）

至于觅食者的贫富不均程度为何这么低，原因显而易见：觅食通常需要人们不断迁移。如此一来，积累物质财富不仅困难，而且相当无意义。一方面，拖着物质财产在野外迁徙会令狩猎和采集愈发艰难；另一方面，如果不得不每隔数周便抛弃财产，那些财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体系，事实上对财富的积累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这一概括有两个例外，不过两个例外似乎又都反证了该规则的存在。第一个来自少量史前遗址——首先是俄罗斯东部的索米尔[27]——它们确实保存了贫富不均的证据。在这里，发掘者找到了一个墓葬群，年代测定大约是公元前26000年。大多数墓葬只有少量陪葬品或完全无陪葬，但有两个墓与众不同——一个葬着一位50岁的成年男子，另一个葬着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和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女孩。他们的衣服上缝缀了13 000多颗雕刻的猛犸象牙珠子。尸体周围有数十件象牙饰品，包括一个猛犸象的小雕刻和几支矛，还有逾250颗狐狸牙装饰着成年男子的帽子和男孩的腰带。这些象牙珠子需要一位匠人连续工作两年多才能完成，而用于装饰死者的那些狐狸牙需要杀死60只狐狸。在这里，财富空前集中，而地位尊崇的死者中包括儿童则或许意味着财富甚至权力还可

以继承。索米尔为什么能够出土这些独特的发现物，原因仍不清楚，我们倒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个猎杀猛犸象的特别地点；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这些财富体积微小、便于携带，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狩猎点转移到下一个。索米尔或许表明，如果合乎时宜——比如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变为便携的形式，觅食者也完全可能建立起经济甚或政治等级制度。

第二个例外同样来自北美太平洋沿岸繁荣的觅食者群落。有若干个世纪，由于野生食物（特别是鱼类）供应充裕，这些觅食者得以居住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这些村落有时会有数百居民。鉴于他们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同一个地方，值得费时费力建造房屋和积累财产，而总有些人在这方面会远胜一筹。这里的狩猎物和采集物资非常丰富，以至于丘马什人、努特卡人[28]、瓜基乌图人，以及其他群体甚至可以打破索米尔规则，不再满足于轻巧便携的物品，开始积累体积庞大的不动产。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观点，有一个视角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觅食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小群体把自身看作拥有生产资料的食利阶级。野生植物散布在广袤的区域，野生动物和鱼类不停地迁徙，要阻止他人获取这些资源往往是不可能的，就连北美太平洋沿岸那些富裕的觅食者也无法完全拥有大群的金枪鱼、旗鱼和鲑鱼。对于觅食者而言，最接近于拥有生产资料的是拥有相关的人造工具以便提高其获取野生食物资源的能力，像盛放植物的篮子啦，狩猎时用的诱饵、弓和箭啦，还有畜栏等，但如何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知识通常在觅食者群体内广为流传。大多数觅食者同样知道如何照料树木或灌木丛以提高产量，此举常被看作赋予所有权（例如，肖松尼人会以家庭为单位认领特定的松子果树）。只有在特殊案例中，某些个体才会因为拥有手工制品而获得超出他人的巨大优势，而太平洋沿岸的觅食者社会再次鹤立鸡群。公元800年前后出现了大型出海独木舟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而首个明显的财富等级制度的证据也出现在那个时期，这大概不是巧合。

在几乎所有的觅食社会中，约束财富积累的现实条件，还包括坚定地认为物质等级制度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在大多数社会，儿童在早期教育中便被反复灌输分享的价值观。举一个稍有些令人反胃的例子，一位人种学家曾经看到喀麦隆的一个巴卡[29]人男孩用箭射杀了一只大蜘蛛，然后小心地把可食用部分与他的两个玩伴分享。一个男孩分到了三条腿；另外两人每人得到两条半腿，外加蜘蛛的半个头胸部来补差。

拒绝分享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这在觅食者中间是一桩大罪，和自命不凡一样糟糕。实际上，贪婪和自负在觅食者看来似乎是一回事，前文引述的那位昆申人所说的话就揭示了这一点，他提到成功的年轻猎手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自私的觅食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把物品给予他人，这被某些人类学家称为“强制分享”或者“容忍攫取/盗窃”。

对那些不适应的人来说，强制分享会造成极大的文化冲击。1986年，我妻子的一个朋友当时待在肯尼亚的另一个地区，她犯了一个错

误，宣称自己要租一辆车把行李拉回到内罗毕机场去。没想到的是，似乎但凡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一时间全都出现在她的茅屋前，要求她开车送他们去见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兄弟、牛群和朋友。人们认为那辆车实际上并不是她的；她付了租金，但并没有拥有它，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期待分享这辆车。她意识到，如果拒绝他们，她在肯尼亚的最后几天必定寸步难行，而如果听从他们的要求，那就别想赶上飞机了，于是她取消了预订的车，把行李拽到红土路边，改而等待“马塔图”[30]。

我妻子的这位朋友遭遇的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问题，而史上的大多数觅食者则有充足的现实理由同意强制分享的要求。毕竟，如果一个收获颇丰的猎手没办法为自己或直系亲属储存未来所需的肉食，为什么不把今天的富余分享出去，以待接受慷慨馈赠的人在来日投桃报李呢？

然而，在性别阶序上，觅食者的平等主义就并非通行无碍了。在世界各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应该是觅食者社会的领导者。我在前文引述了一个奥纳人知情者的话，他说“男人都是船长，女人都是水手”，昆申女性觅食者尼萨显然同意这一说法，尼萨因为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31]用她来命名的专著而闻名。有一次，一位涉世未深的青涩少女因为婚礼在即而需要鼓励，尼萨告诉她：“男人不是要杀你的人，而是要娶你的人，他会变得像你爸爸或哥哥一样。”

社会学家一直就男人为何通常在觅食者社会占据上风而争论不休。毕竟，进化论者指出，女性似乎具备不少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然优势。精子和卵子两者对于繁殖均至关重要，但精子数量巨大（一般青年男子每秒钟可以产生大约1　000个精子），因而没有价值，而卵子数量稀少（一般青年女子每个月产生一个），因而显得珍贵。女人应该可以要求男人提供各种服务以换取其获得卵子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男性觅食者对育儿所做的贡献远比雄性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或红毛猩猩（人类在基因上的近亲）要大得多。然而，某些人类学家推测，女人的要价几乎从不包括政治或经济权力，原因在于精液并非男性觅食者推销的唯一产品。因为男人同时还是暴力的主要提供者，女人需要以合理的价位得到保护；因为男人是主要的狩猎者，女人需要以划算的价格得到肉食；还因为共同狩猎训练男人学会了彼此合作和信任，单个女性的议价对象往往是男性同盟而非单个的男性。

但无论细节如何，结果历历可见：男性在觅食者游群中具有支配地位，但鲜有过分的性别等级。受到虐待的妻子常常只需离开她们的丈夫，无须为此承受他人的大惊小怪或指责攻击，人们对婚姻忠诚度和婚前女性贞洁的态度往往相当宽容。尼萨就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是女人，可不要静坐着什么也不干——你还有情人呢。”乱交当然会引来麻烦，也会导致家庭暴力和男性竞争者为讨女人欢心而大打出手，但对不忠行为反应过度的人会遭到嘲笑，而性越轨者却很少被钉上永久的耻辱柱。

性别等级的浅表和婚姻纽带的脆弱，就像是经济和政治等级的浅表和脆弱一样，似乎是觅食作为一种能量提取方式的天然性质所带来的直

接后果。女人采集的食物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赤道附近，那里的植物在多数觅食者的饮食中占很大比例，但分享的风气通常意味着一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这些食物。比起男性农耕者，男性觅食者一般对控制女人——特别是控制女人的繁殖——不那么在乎，主要原因是与农耕者相比，觅食者能继承的东西要少得多。对大多数觅食社会而言，每个人获得野生食物的机会是均等的，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因此，实质性的成功大大取决于狩猎、采集和建立联盟的技巧，而非实物资产的代际传承，这反过来意味着孩童的合法性问题远没有那么重要，毕竟不是只有合法后裔才能继承土地和资产的社会。

尽管如此，但比起农耕者（与化石燃料使用者相比更有可能如此），男性觅食者之间对女人的争夺似乎更容易以暴力收场。某些人类学家对这一点相当质疑，他们认为男性觅食者为争夺女人而搏斗时，“实际上”是在争夺食物或地盘，女人只不过是个引爆点，是为更深层次的竞争提供方便的借口。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总体而言，觅食者们如此一致地谴责男人为争夺女人而诉诸暴力，让人很难不怀疑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在雅诺玛米人（Yanomami）和瓦拉尼人（Waorani）（二者都是居住在亚马孙河上游、将耕种与觅食相结合的部落）中，甚至有证据表明，与不那么暴力的男人相比，暴力倾向较强的男人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和子嗣。

对女人的争夺似乎经常促使男性觅食者使用暴力，远胜过农耕者或化石燃料使用者为同一目的而使用暴力的频率，原因在于所有的争夺都会促使觅食者使用暴力，其频率高得惊人。有关这方面的数据还存在激烈争论，但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认识到，20世纪的普通觅食者至少有10%的概率会死于暴力。在某些群体中（对从事耕种的雅诺玛米人和瓦拉尼人研究最多），超过1/4的男人死于非命。要想确切了解如此级别的致命暴力在史前是否同样正常，唯一能借助的是考古学证据，它们极难诠释，但致命伤口的发生频率（至少已有27具确定是尼安德特人的骸骨样本，以及19具早期现代人类的样本）无疑印证了暴力致死率高的情况。

觅食者游群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差异，其暴力使用频率也不能一概而论，但人类学家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狩猎—采集者有多粗暴。这并不是因为人种学家运气好，到访的都是特别温顺平和的觅食人群，而是因为觅食所要求的社会规模过小，以至于就算谋杀率很高，局外人也很难察觉。如果某个只有数十位成员的游群内暴力死亡率为10%，其间的杀人案件大致是每25年发生一次；并且由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连25个月都很少持续到，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目睹暴力致死事件。正是这个人口统计的现实，使得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32]为其有关昆申人的内容敏感的人种学著作命名为《温雅的人们》——尽管他们的谋杀率堪比可卡因流行高峰期的底特律。人类学家们当然听说过不少谋杀的故事，但他们同样也听过很多觅食者表达对暴力的恐惧，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才把线索整合起来，揭露了可怕的真相。

人类和大多数动物一样，其生物进化的结果是将暴力作为解决纷争的可支配工具之一。尽管如此，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试图用暴力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这样的人很快就会被孤立，对方还可能会联合起来，回敬他以更大的暴力。人们害怕暴力——这一点很明智，并采取措施让暴力丧失其吸引力。在复杂社会里，正如托马斯·霍布斯[33]在《利维坦》中指出的，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垄断武力的合法使用权，以此来惩罚犯罪者。然而觅食者的政治等级过弱，无法建立这样的政府；而且虽说嘲弄、排斥、谴责和一走了之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有用（霍布斯关于利维坦之前的生活的观点——“一团混战”——是个纯粹的思想实验），但它们经常失效，致使超过1/10的觅食者死于暴力。通常，当情绪激昂时——特别是在对付死不悔改的逞能者时，暴力看上去是最不坏的做法。

觅食者虽然难得公开宽恕暴力，但他们往往会承认，在若干种情况下，人可以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暴力行为可能是突然之间怒火万丈扬言杀人，也可能变形为针锋相对的复仇杀人循环，世代传承。有时，暴力甚至会变成一种石器时代的“东方快车谋杀案”[34]，整个群体都认为，制止逞能者的唯一方式便是齐心合力杀了他。在典型的觅食社会，上述这些情况并不会经常发生，但觅食者一致认为，有些时候杀人是正当的，并且不该指责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暴力的人（差不多都是男人）。

因此总体而言，大多数觅食者共有一套明确的平等价值观。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等级制度有着极端负面的看法，但接受尚算温和的性别阶序，并承认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使用暴力。

这些价值观之所以为广大觅食者共享，原因在于它们是经济和社会局限的相当直接的结果，而恰恰是将觅食作为一种能量获取方法，才产生了这些局限。在狩猎—采集者所组成的高机动性的微小群体里，很难建立并维持深层的政治、经济或性别等级，同样，也很难处理各种关系而绝不诉诸暴力。觅食者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必须假设，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人类都曾是觅食者，人们几乎试遍了穷其想象的所有排列组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群体向前文所述的道德平衡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适应了物质现实。各个社会之间的精确平衡点彼此各异，地理条件能够解释大部分变体（特别是解释了我们在太平洋西北地区所见到的那些相对富裕的大型定居群体的异常表现），但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被韦伯称为理想类型的觅食者价值观。只有到了近一万年，在农业诞生之后，这些价值观才开始走下坡路。

[1]　阿里马斯皮人（Arimaspian），传说住在古代东南欧黑海北岸的西西亚北部里菲山脚下的族群。关于里菲山的位置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在乌拉尔山脉，也有人说是在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山脉。

[2]　马赛人（Masai），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一个民族，是东非现在依然活跃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游牧民族，人口将近90万。

[3]　V·戈登·蔡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后转向考古学研究。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对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的史前史观。

[4]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先驱人物，并且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社会理论影响了后来的左派理论家。

[5] 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Bettinger），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

[6] 理查德·李（Richard Lee，1937— ），加拿大人类学家，多伦多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

[7] 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1934—2014），美国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1987~1992年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8] 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1915—1996），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其著作《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出版于1962年。

[9] 艾伦·约翰逊（Allen Johns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系荣休教授。

[10] 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美国经济人类学家，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

[11] 蒂莫西·英戈尔德（Timothy Ingold，1948—），英国人类学家，皇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12] 丘马什人（Chumash），美国原住民种族，历来居住在现加州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带。

[13] 特林吉人（Tlingit），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原住民的一支，特林吉在其本族语言中意为“潮汐之人”。他们过着以渔业为主的半定居式生活，并结合狩猎—采集为生。

[14]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 ），美国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

[15] 绳文时代，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公元前14500~前300年前后的时期，使用绳文式陶器的时代。

[16] 瓜基乌图人（Kwakiutl），主要居住在北温哥华岛，他们已在岛上定居了上千年，至今仍是岛上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昆申人（!Kung San），生活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以及安哥拉境内的非洲原住民，是萨恩人（又称布须曼人）的一支。

[18] 奥纳人（Ona），火地群岛上的印第安原住民族群之一。

[19] 肖松尼人（Shoshone），曾经活跃于北美洲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大部族。

[20] 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美国人类学家，南加州大学生物科学和人类学教授，古道尔研究中心主任。

[21] 帕利扬人（Paliyan），居住在印度南部西高止山脉山地雨林的达罗毗荼人的一支。

[22] 哈扎人（Hadza），坦桑尼亚中北部的少数民族原住民，人口数量低于1 000人。其中约有300~400人以狩猎—采集为生。

[23] 努库尔人（Ngukurr），居住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阿纳姆地南部罗珀河沿岸的隐秘的原住民族群，人口数量为1 000人左右。

[24] 弗雷德·迈尔斯（Fred Myers），纽约大学西尔弗讲席人类学教授。

[25] 宾士比人（Pintupi），居住在澳大利亚西部麦当劳湖和马凯湖的原住民，属于西澳文化的一部分。

[26] 马奇根加人（Machiguenga），居住在秘鲁东南，马丘比丘之东、靠近玻利维亚和巴西边界线的亚马孙盆地丛林中的原住民部族。

[27] 索米尔（Sungir），位于莫斯科以东200千米处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遗址，欧洲现代智人的最早记录之一。

[28] 努特卡人（Nootka），居住在加拿大太平洋西北沿岸地区的原住民部族。

[29] 巴卡（Baka），栖息在喀麦隆东南部雨林、刚果北部、加蓬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

[30] 马塔图（matatu），肯尼亚及周边国家的私家小型公交车。1999年之前，马塔图是肯尼亚内罗毕市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31] 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1945—1996），美国人类学家。她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中间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并以其对这一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性生活的描述而广

为人知。她的著作有《尼萨：一个昆申妇女的生活和言语》（*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 Kung Woman*，1981）以及身后出版的《回到尼萨》（*Return to Nisa*，2000）。

[32] 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1931— ），美国作家。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动物行为、旧石器时代生活以及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申人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著作《温雅的人们》（*The Gentle People*）出版于1959年。

[33]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他的《利维坦》（*Leviathan*，1651）一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

[34] 出自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名的推理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943），讲的是12名乘客合谋杀死了车厢内的第13名乘客——其曾犯下一桩与12名乘客都相关的谋杀案，主角波罗发现了真相，但因对犯人充满“觅食社会价值观”式的同情，而未向公众披露。——原注

第三章
农业时代



农耕者是什么人？

农耕者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在第二章开头，我引用了凯瑟琳·潘特–布里克[1]对觅食者的定义，即“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的人，并因此“生活在小群体里……四海为家”；与之相反，农耕者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生活在大型（往往非常大）的群体中，很少迁徙。觅食者的游群机动性高，规模很小，流离颠沛，却有同伴形影相随；而在农耕者定居的大型村落，世代更迭，山河依旧。

农耕的关键在于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这里是指人类充分干预其他物种的繁殖以制造选择压力，导致这些物种进化成全新的物种，只有在持续的人工干预下才会继续繁殖。

驯化的小麦如今已是人类获取植物蛋白的首要来源，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过世界各地的其他动植物也经历了类似的遗传过程。野生小麦是一年生植物；成熟时它的花序轴（把每一个种子附在植物上的小梗）变软，种子会一颗接一颗落到地上，落地后种子的保护壳破碎，开始萌芽。每年，大概每一两百万株野生小麦中会有一株在一个单基因上发生加强花序轴的随机突变，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成熟后不会落到地上，无法继续传递其基因。如此一来，这些变异的植物就从基因库里消失了（由下一世代里新的随机变异所替代）。但在人类觅食者开始通过收割植物和再种植部分种子来干预野生小麦的基因库后，至少某些变异植物会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基因库中变异的比例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加。计算机模拟表明，变异性状在理论上只需区区数百年便可完全取代原始的野生植物物种，不过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这实际需要几千年的时间。随后，只有在人类继续收割和重新种植的情况下，被驯化的全新小麦物种才有可能繁殖下去，人类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农耕）所生产的卡路里远胜觅食者通过采集野生小麦所获取的热量。驯化的动植物是最早的转基因生物。

“农耕”这一类别所包含的变体比“觅食”还要多，因而本章的篇幅远长于第二章。“农耕者”这一类别同样包含很多过渡型，导致其边界模糊不清。我在第二章里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所谓的“觅食系列”，既有非洲昆

申人那样机动性高、无社会组织的小群体，也有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那样定居的、高度组织化的大型群体，以及中间很多过渡型。但为能恰如其分地讨论农业社会，与其把它想成一个系列，不如想成一个三芒星（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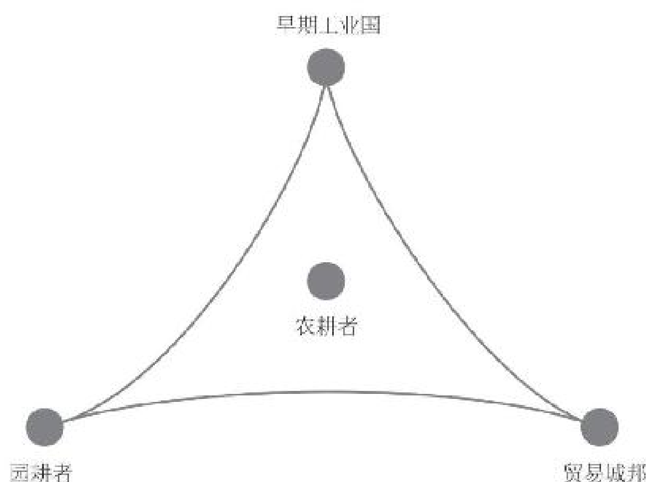


图3.1 农业三芒星

每一个点均代表了一种极端类型，从园耕者到贸易城邦或早期工业国，中心则代表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三芒星中的一个点是诸如南非的马奇根加人（我在第二章简单提到过）等微小规模的群体，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驯化的动植物，但生活方式却更接近觅食者。人类学家通常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园耕者”（horticulturalists）社会或干脆称其为“食物培植者”（food cultivators）社会。第二个点主要包括公元18世纪的农业国，形态千差万别，如中国清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土耳其奥斯曼王朝，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其中一些国家已处在工业革命的边缘；第三个点则是包括古雅典、中世纪威尼斯，或中亚的某些绿洲在内的一些高度贸易化的小城邦，它们在某些方面与化石燃料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不少共同之处。三芒星的中央则是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园耕者与农耕者之间的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某个与众不同的统治精英的崛起视作二者的分野。“只有当培植者融入一个国家社会之后，”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2]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农民》中指出，“也就是说，当培植者必须遵从其社会阶层之外的有权之人的要求和约束时……我们才可以恰当地提及农民这个概念。”历史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至少同样重视农民和早期工业国属民之间的差别，但城邦居民与农民有何不同却乏人问津。

然而，和觅食者的情况一样，即使有各种例外和亚类别存在，也不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理想类型抽象地表述了农耕者社会的核心特征。跨文化的相似性如此有力，以至于早在1954年，在力图比较三个农

耕者社会（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19世纪的英格兰南部和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的一次讲座上，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甚至颇有把握地提出：

> 假设一个农民来自这三个相距很远的社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能被某个带翼的精灵送到其他两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并掌握了所至村落的语言，他很快就会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这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他职业的罗盘还会继续指向同样的道德之北。

本章将用大部分篇幅讨论这些“生活的基本方向”。



图3.2 第三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和觅食一样，农耕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就农耕而言，它出现在考古学家所谓的“侧翼丘陵地区”（参见图3.2；基本上是一条弯曲向上穿过约旦河谷至土耳其边境，然后沿着伊拉克—伊朗边境折返向下的弧线），随后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觅食者和农耕者的扩张在速度、规模和彻底性方面大相径庭。现代人类觅食者用了5万多年（从大约公元前70000～前15000年）才从非洲蔓延到人力可达的每一个适合生存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人口增长了大约60倍（从公元前70000年的大约5万人增长到公元前15000年的300万人），前人类彻底灭绝。反观农耕者，他们只用了区区11　000年（从大约公元前9500～公元1500年）便占据了人力可达的所有适合生存的角落，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了90倍，从大约500万增长到4.5亿。觅食者并没有灭绝，但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率从公元前9500年的约99%大幅下降到公元1800年的约1%。那时，农耕者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5000年了。

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

农业社会的证据来源（考古学、历史文本、人类学）与觅食者社会大致相同，但各个类别的权重却大相径庭。因为所有的农业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发明或接受文字，所以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在当今的伊拉克南部，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但在幸存至今的数以百万计的文本中，大多数都有同一个严重的问题：作者属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小群体，其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这些文字通常是他们为同辈人，或为自己的目的所写。因此，关于占人口3/4或更多的实际从事农耕之人的生活，第一手历史资料能够告诉我们的少之又少。即使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公元前5～前4世纪）和其后的意大利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或许也不过只有1/10的男性公民拥有基本的读写技能，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直到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识字率才攀升至10%以上，即便到了那时，恐怕也只有在西欧和中国的城市才达到了这个比率。真正的大众教育，即逾半数人口能够阅读简单的句子，要到化石燃料时代才实现。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想方设法探究普通农耕者的生活。第一手文本偶尔会留下一些吉光片羽，比如宗教审判官雅克·富尼耶[4]（后来的教宗本笃十二世）的记录，他记录了公元1294～1324年与法国南部蒙塔尤村农民的面谈；但大部分有关农耕经历的证据来自20世纪人类学家、农村社会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考古和论述。农业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其中有些还被饰以具象派艺术）的确让觅食者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实物记录至少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像所有考古证据一样，那些都是无声的证据，必须通过类比来加以诠释。因此，和关于觅食社会的研究一样，尽管社会学家就20世纪的农耕者生活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但以此推断早期的农业社会仍然问题重重。

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希腊奇迹

与觅食者的情况相同，农耕者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的很多方式也都取决于地理环境。起初，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末期，唯一有可能成为农耕者的人群是住在侧翼丘陵地区及此类区域的人，那里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有驯化潜力的大谷粒草种和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又是和觅食者一样，住在这些有利位置的人只能因地制宜地驯化原本就生长在那里的动植物，这意味着当侧翼丘陵地区的第一批农耕者驯化了小麦、大麦、豆子、绵羊、山羊和牛的时候，东亚的农耕者驯化了小米、大米、猪和水牛；中美洲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脉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驼和羊驼；而新几内亚的农耕者驯化了香蕉和芋头。每一个驯化的物种都能产出不同的营养元素，其所需的劳动模式也

不尽相同。

随着这些农业核心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带着这些核心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向外迁徙，寻找新的农田。一波又一波缓慢流动的移民潮把侧翼丘陵地区的初始农作物一路带到如今的法国，以及现代阿富汗境内的梅赫尔格尔[5]，另有移民把中国的农作物带到了日本和婆罗洲，最终横越了大洋洲。然而，把农业带到全新的环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农耕者渐渐认识到，大江大河——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可以用来灌溉、运输和交通往来。这把作物产量和经济整合推向新高。正是在这些江河流域，农耕者建造了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人口呈数十倍地增长，有时甚至达到成百上千倍。然而，如果说靠近大江大河对农耕有利，面朝大海则更是占足了地利。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后期，罗马帝国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盆地，罗马城的居民人数接近100万。东亚没有酷似地中海的地理特征，但公元609年启用的大运河[6]功能颇像人工地中海，把盛产大米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与军队联结起来。到公元700年，长安也有了100万居民。

随着每一个农业核心地区的增长，能量获取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爆炸过程。通过我在《文明的度量》[7]一书中所述的计算方法，一般的富裕觅食者在初步实现驯化的前夜（在侧翼丘陵地区大约是公元前10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8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7000年），每天大约能够获取5　000千卡的热量（千卡/人/天），其中有大约一半是食物，其余的则是燃料、衣物、房舍、制造业、运输和其他活动。大约两千年后，在从事园耕的村落建成之时（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5000年），能量获取上升到大约6 000千卡/人/天。接下来的3 000年间，能量获取更是提高到大约8　000千卡/人/天，因为早期的农耕者学会了如何越发有效地利用驯化的资源（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2000年）。这些农耕者发现，头年在园中种植谷类，来年改种蛋白质丰富的豆类，不但土壤会恢复肥力，他们的膳食也更多样化。如果用粗糙的磨盘碾碎谷物，食物里会残留沙砾，磨损牙齿，因此，他们学会了筛出杂质，以新的方式处理谷物。与此同时，牧人们也认识到，与其在幼仔时就把驯化的动物统统杀掉吃肉，还不如养一些留着剪羊毛、挤奶，用它们的粪便给土地施肥。西南亚的大型驯化哺乳动物比其他地方都多，那里的人们甚至学会了给野兽套上挽具来拉车。此前搬运任何东西都要抬起来扛走，但耕牛的挽力可达人力的三倍。到公元前4000年，牛拉耕犁的发明实现了驯化动植物的聚合。

而那仅仅是开始。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黄河河谷，使用河水灌溉的农耕者获取的能量大约是10　000千卡/人/天，又过了4　000年左右（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某些地区，公元1100年的中国宋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在公元1700年或许也是如此），能量获取又翻了两番。食物在消耗能量中的占比的确增加了，从农业肇始之时的2 000～2 500千卡/人/

天增至约6 000~8 000千卡/人/天，但大部分增量来自以便宜的卡路里来替换昂贵的热量（肉、酒精、栽培的水果等）。在这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农耕者仍然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人均能量获取增加了6倍，达到大约30 000千卡/人/天，似乎已经达到了纯粹的有机经济（图3.3）所能达到的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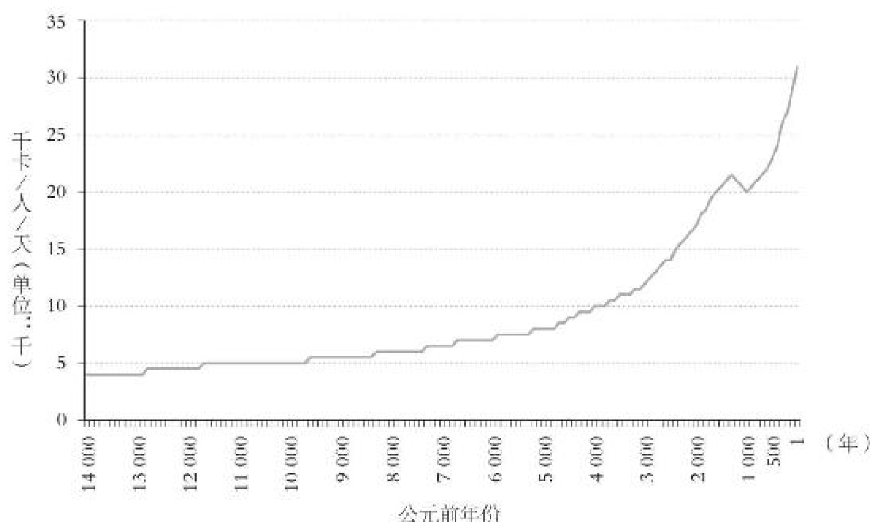


图3.3 峰值能量

公元前14000~前1年，世界人均能量获取的最高水平（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因为野生动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如此之少，觅食者必须颠沛流离，四处寻找其生计所需的资源，但单位面积土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意味着大多数农耕者不必如此。诚然，农业社会也有些成员要不断迁徙：牧人赶着羊群往来于冬季和夏季牧场之间，而在贸易城邦，则有少数人（其数目无法量化，比例较大，但跟农耕者相比仍然是少数人）有时要在海上航行逾100英里[8]之远。某些人漫游的范围显然大胜从前；虽说觅食者不断迁徙，但他们大多只会逗留在方圆数十英里的区域，而到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水手大概已经环航了整个非洲。在公元纪元的头两个世纪，至少某些埃及和印度的水手会定期拜访彼此的故乡。公元2世纪葬在意大利瓦努里（Vagnari）的一个成年男子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表明，他来自东亚，中国的史书似有记载，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过汉朝的都城雒阳。到公元1600年，几个欧洲人扬帆环游了整个世界，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尽管这些环球旅行者不断刷新纪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耕者的生活空间比大多数觅食者还要小得多，这些农耕者一生所到的最远处，距其出生的村落不过三四天脚程。对于在公元1368~1398年统治中国的洪武帝来说，20里路（大约7.5英里）是一个人离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而13世纪的英格兰法律对于“邻里”（一个明理的人从其所在的村庄出行拜访他村的距离）一词划定的畛域也如出一辙，这大概并非巧合。

虽说来自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里充斥着浪子、游吟诗人以及年轻人闯荡四海创造财富的传说，但实际上由于农业所释放出来的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6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反而越来越不可行，因为社会规模的增长更为强劲。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5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人口约35万，比典型的觅食社会高出两到三个量级，而在尼罗河谷、长江与恒河三角洲的灌溉农田，人口密度大概更高。

单个村落的规模增长得更快。冰河期的觅食者穷其一生，见过的最大人群估计也不过数百人，而那一般是在游群聚集的时候，一年也只有那么寥寥几天而已。然而时至公元前7000年，在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加泰土丘[9]常年定居的就有大约1 000人；公元前3500年之后不久，逾万人定居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10]；到了公元前700年，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11]容纳有10万居民；前文也曾提到，公元100年，有100万人住在罗马，这一数字大概比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而到公元700年，中国长安的居民数量也达到了这一规模。罗马帝国和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帝国各自有至少6 000万人；到公元1600年，中国的明朝有1.6亿人口。

每英亩农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才有可能养活这数百万人口，但代价是承星履草、胝肩茧足的劳作。萨林斯的原始富裕社会中相对悠闲的觅食者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所记述的操劳过度的农耕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事稼穑，兀兀穷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12]曾在诗中这样写道——他的《工作与时日》（作于公元前700年前后）是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旨在从农民的角度来描述生活。26个世纪后，意大利南部的一位神父断言：“农民每天就是为了吃饭而工作，为了有力气工作而吃饭；天黑了就睡。”发掘出土的骸骨表明，古代农耕者受到的重复性应力损伤往往比觅食者更多；他们的牙齿常常很糟糕，这是其饮食范围受限，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所致；他们的身高从农耕时代开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明显增高，这是揭示整体营养水平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标。

农耕者需要多么艰辛的劳作才能果腹，不只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域和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的时代处于人口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人口爆炸与萎缩时期交替出现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像觅食者一样，农耕者很少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欧洲这个学者们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地区，考古学数据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每16个世纪左右便翻一番，绘成图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个可怕的崩溃过后，总有突如其来的人口波峰（图3.4）。

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更加丰富的证据让我们得以更精确地追踪这些模型。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气候温暖潮湿，人口稳定增长，气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中世纪暖期”。这迫使农耕者更加艰辛地劳作，

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种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导致这块大陆上的近半数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劳动力比，使之转而有利于幸存者。非技术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5世纪激升至前所未闻的水平，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农耕者又必须以更加努力的劳作换取低廉的报酬（如后文图5.8所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农民们认为15世纪是黄金时代，悠闲度日，以蛋糕和麦芽酒为伴，与他们自己的悲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昆西·亚当斯[13]在记述1800年的故乡时说，当时的农民村落是“用泥浆和茅草盖成的破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满了儿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衬衫外别无他物；更有的一丝不挂，身上满是寄生虫，看上去就像瘟疫横扫之后的埃及大地一样狼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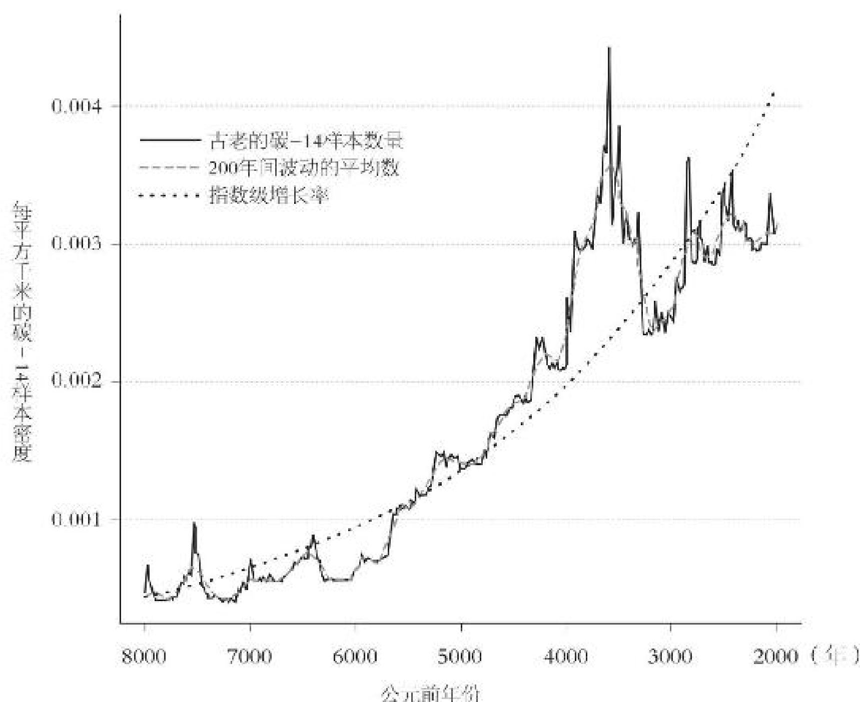


图3.4

根据13 658个公开发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数据来自申南等，2013）测定，欧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间呈指数级增长。在一系列崩溃与繁荣之间，长期趋势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样本N ＝ 13 658；二项分布N ＝ 6 497。）

在每一个来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访客看来，就算在人口周期中最幸福的时段，农民的生活也是污秽、粗野和贫穷的。安东·契诃夫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的短篇小说《农民》（*Peasa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里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贫穷仆役，后来因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庄，但契诃夫说，就连这样一个简朴的人也“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

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契诃夫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精准理解，但应该记住，那至少不像觅食者的生活那样恶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14]估计，古代和中世纪农民养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每天1.50～2.20美元——这当然不算多，但比觅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据我本人关于能量获取的估计，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宋朝这样真正繁荣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荣的觅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诃夫笔下不幸的奇基利杰耶夫也有个小农舍，房子里有俄式茶壶，壶里有茶，还有烧开茶水的炉子。

农业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繁荣，但等级也森严得多。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像是18世纪太平洋西北地区，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觅食社会的财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远不及农业社会。目前有实际统计数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罗马帝国，那里颇有些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位C·凯基利乌斯·伊西多鲁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包括3 600对牛、257 000只其他动物、4 116个奴隶，还有6 000万塞斯特斯[15]的现金（足以供50万人吃上一年）。与此同时，一位名叫L·塔留斯·鲁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级军官单单一次地产交易失败就损失了一亿塞斯特斯的巨资，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16]认为，到公元4世纪，顶级豪门——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罗尼家族（Petronii）和凯奥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尼财富系数在0.42和0.44之间，以当时罗马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层（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从其他罗马人那里榨取了大约80%的理论最大剥削率。这一基尼系数比觅食者的平均系数（第二章提到过），即0.25，要高得多（图3.5），但罗马的不平等情况似乎在农业社会相当典型。另外一项研究比较了13个农业国，计算得出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5，而计算出觅食群体的低系数的那一组人类学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8个小规模农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8。（这个研究小组还研究了4个园耕者群体，发现其平均系数为0.27，仅比觅食者的系数略高，这倒是在意料之中。）

这类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拥挤和繁荣，但更不平等——成为现实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分工复杂度的一次大飞跃。这种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规模远胜家庭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我随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之前，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和觅食社会一样，家庭仍然是农业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位，但家庭内部结构已经面目全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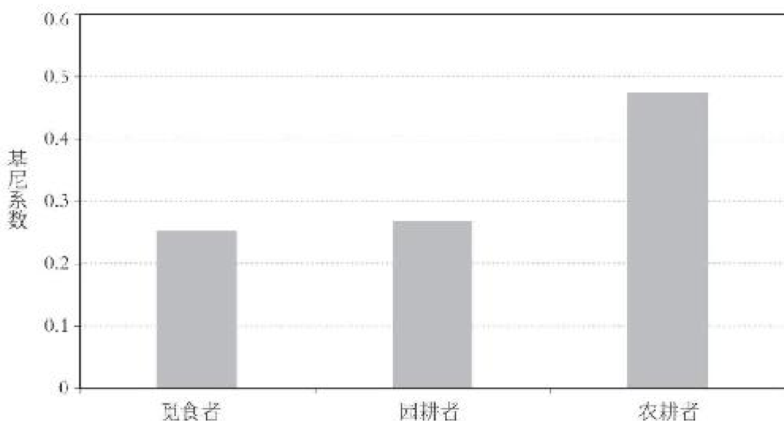


图3.5 贫富不均的衡量

史密斯等人（2010）计算得出的觅食者（0.25）、园耕者（0.27）和农耕者（0.48）的平均贫富基尼系数。罗马帝国的系数大约在0.42～0.44之间；公元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法国的系数为0.59。

这种变化主要由两股力量促成。一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在觅食社会，女人通常承担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而男人承担大部分狩猎工作。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在园耕社会中通常没有多大改变，狩猎和采集仍很重要，田间劳动相当轻微。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片可以用作庭园的土地，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园耕者在大片土地上从事着清闲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除草。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们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作，通过犁地、施肥，甚至灌溉等重体力劳动，期望从每一寸土地上榨出更高的产量。一个社会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男人的上肢力量在田间劳动中发挥的作用越大，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户外活动看成是男人的工作。

这种长期转变一定是把女人驱离田间的重要助推力，而第二个因素——人口因素，可能是一股更大的牵引力，把女人拉回家舍。在农耕出现之前，人口平均每一万年才翻一番，而农业开始之后，不到两千年就会翻一番。和女性觅食者相比，农妇们生的孩子多得多，某些史前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石器时代的人口结构转型”。一般而言，农业社会中的每个妇女会分娩7个婴儿，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或照顾小孩，由于从事犁地劳动的女人很难再肩负这样的重任，人口和劳动模式协力造成了男性（户外）和女性（户内）的分工。

因为，（1）与觅食者带回家的食物相比，农耕者生产的食物往往需要进一步加工（脱粒、筛选、磨碎、烘焙等）；（2）与觅食者的临时窝棚相比，农耕者建造的越来越耐久的房舍需要更多维护和清扫工作；以及（3）这些活动可以由在家里看孩子的女人完成，于是农业的逻辑指向劳动力和空间的一种全新性别分工。显而易见，世界各地的农耕者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应该在田间劳动，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事实上其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以至于从园耕发展而来的农业社会无

一例外地做出了同一决策。

对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17]出土的162具骸骨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7000年的侧翼丘陵地区，劳动的性别重组已经如火如荼。男女两性上背部的脊椎都有所增大，这大概是用头部携带重物所致，但只有女人有明显的关节炎症，这大概是在磨碎谷物时，长时间跪着以及用脚趾作为发力点而导致的。

阿布胡赖拉是个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但即使在罗马帝国，情况也没什么不同——考虑到它可能是最复杂的前工业化经济体，这着实出人意料。地理学者老普林尼[18]说，时至公元前160年代，罗马城里也没有商业化的面包房，因为面包都是女人在家里烤制的。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文字记录表明，家庭之外的受薪工人中，只有1/7是女性，招募女性的职业只有35个，而招募男性的有225个。古典学者苏珊·特雷贾里[19]断言："女人看来都集中在'服务型'工作上（餐饮、青楼）；经营小生意，特别是贩售食品；在店里侍候客人；某些手工业，尤其是布料和服装生产业；诸如制作金箔或美发等'费工'的工作；以及某些奢侈品行当，如香料店等。"

在20世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发现，农业劳作的强度，继承的重要性，以及男性对于女性贞节的迷恋之间存在着强相关。这似乎也是农业逻辑顺理成章的归结。觅食者与年轻一辈分享知识，教他们如何寻找成熟的植物、野味和安全的营地，但农耕者则有实在得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财产。为了在农业世界繁荣兴旺，人们需要房舍、田地和成群的牛羊，更不用提水井、院墙和工具，以及除草、灌溉、修筑梯田和搬移石块等改良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从上一代那里继承遗产乃是生死攸关之事，利害得失重大，农民当然希继承他遗产的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觅食者对于性事较为随意的态度消失了，代之以严厉监管女儿们的婚前贞操（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象征中的象征"）以及对妻子的婚外情严防死守。男人们往往会在30岁上下获得遗产之后结婚，而女人通常15岁左右就嫁了人，此前她们根本没多少时间在情场上厮混。

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模式是否在农业社会初期就已存在，但确有证据暗示如此。很多早期农业社会似乎很痴迷祖先，甚至把祖先当作神灵来祭祀。侧翼丘陵地区的若干个地点显然有祖先崇拜（诡异的半地下房间里供着无颚的人类头骨）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0年，正是驯化开始的时间。到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20]、加泰土丘以及无数其他地方的居民把祖先埋葬在房子下面，并把祖先的头颅割下来妥善保存，往往会在头骨上涂上染了色的石膏，世代相传。当时，侧翼丘陵地区女孩的生活大概已经不再像昆申觅食者尼萨那样。相反，她们在父权之下长大成人，还在少女时代就被转交给几乎与父亲同龄的丈夫来行使夫权。

有关纺织、金属加工、陶器生产和其他活动的20世纪人种学、史学

资料和考古遗迹表明，在大多数农业社会，大部分物质产品都是在家庭内部生产的。古希腊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认为，农民基本上可以在家里实现一切物质产品的自产自用，而无须在外购买、易货或借用。他在《工作与时日》中描述了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手工业体系，女人最重要的责任是纺织布料，而男人在农闲时制造工具（他还就如何制造手推车和耕犁给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

虽然赫西俄德致力于自给自足，但他也认识到农民家庭不可能包办一切，并且随着带有性别色彩的家庭劳动分工日益加剧，家庭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也渐成趋势。赫西俄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村里应该有个铁匠铺（那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中心，当远远避开才好），每个家庭都有其擅长的手艺，大家在集市上交换货品，彼此竞争。“陶匠互憎，工匠相轻”，他的名句如此写道，甚至“乞丐相妒，诗人亦然”。考古学认为，农业社会甫一开始，专业人士（特别是高质量石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者）就变得很重要了。

某些家庭的特长是提供服务。宗教人士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农耕时代早期；考古发掘者令人信服地认为，公元前10000年左右葬于以色列的希拉松塔奇提特[21]的一位跛足老妇是个萨满女巫，据信可以穿越于现实世界与超自然疆界之间，其陪葬品包括50个龟壳，猎杀分块后的一头野猪、一只鹰、一头牛、一只豹子（局部），有点儿恶心的是，还有另一个人的一只脚。在农业社会，祭司的家是公共场所，但关于提供其他各种服务的家庭也都有详尽记录。公元前19世纪产自当今土耳其境内卡内什（Kanesh）的泥板上展示了经营长途贸易网络的亚述人家族企业，在公元前6～4世纪的巴比伦，穆拉疏斯（Murashûs）和埃吉比斯（Egibis）等家族也有庞大的商业运作，留下了浩瀚的相关档案。1 500年后，在开罗、热那亚和中国杭州，也有非常相似的家族企业进行着更加复杂的金融和贸易运作。

不过，既然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分工是农业社会生产规模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工只是为日后的规模经济开了个头而已。在大型农业社会，许多必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家庭级别组织的处理能力。显然，如果只有建筑师的兄弟和堂兄弟们到场，埃及人不可能建起金字塔，也不可能有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这种级别的工作需要超家庭级别的大型组织，在组织构成和永久性上早已远非肖松尼人猎兔手们可比。

农业社会找到了很多方式来组织超家庭级别的工作。某些农业社会组织起规模比家庭更大的亲属群体，提供大规模的工作人口来满足宗教仪式的义务，某些最为雄伟的史前纪念物，包括巨石阵在内，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造的。然而，作为给大规模的永久性组织配备人员的体系，亲属关系似乎太过受限，那些留下书面记录的农业社会似乎更加依赖另外两个机制。

第一个是市场，工人通过市场出售劳力，换取钱币或类似形式的工资。赫西俄德似乎提到过他的农场雇用的帮手，但受薪劳工的历史要长

得多。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前后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的乌尔[22]第三王朝，向在国有作坊和面包房工作的劳工支付工钱（通常翻译为“配给”）。在这些作坊中，一个位于拉格什[23]城的纺织作坊有6 000名雇员。在两千年后的罗马，建造了华美绚丽的大理石建筑，为供应罗马城百万居民的生活之需而装卸粮船的（更不用提35万罗马士兵了），多是成千上万的雇佣劳工，在中世纪和近代，从英格兰到日本再到世界各地，要想调动超出家庭级别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一直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机制。

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企业家（无论乡下的还是城里的）总是在抱怨单纯靠工资很难把可靠的劳动力吸引到市场中去。他们发现，总的来说，任何人，只要其拥有的土地足以支撑家庭需要，都会更偏爱以耕种土地为生，而不是出卖劳力。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24]对最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一——19世纪初期的美国南部的描述，大概与早期的农业社会更加贴合：

> 家庭农场是一个实质性的保障措施，可以对抗饥饿、失业或贫困终老。在高风险金融机构不发达的时代，家庭农场是一种以相当安全的方式积累财富的手段——这笔财富大半来自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清理场地、修建篱笆和排水系统等，自行耕作有助于确保这笔财富的所得源源不断且不致旁落。

基本问题在于，近代农场工人的低产出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量，即雇主聘用一个额外的工人所获得的收益，往往过低，无法支付有吸引力的工资，只要还有其他的谋生之路，人们就不会选择受雇。这促使人们转而选择亲属关系之外的第二个方案，即强迫劳动，来调动家庭所无法提供的更多劳动力。使用暴力压低劳动成本，直到雇主获得的边际产量大于零，奴隶制和农奴制遂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失效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

在觅食社会，强迫劳动几乎闻所未闻。园耕者常常会在袭击和战争中劫掠奴隶，但这些俘虏（特别是女人）一般很快就会被并入掳掠者的亲属结构，而在很多更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奴隶是终身制的，永远是征服者世界的局外人。农业社会之所以转向强迫劳动力，似乎纯属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亲属关系和市场均无法产生足够的劳动力来建造船只、港口、道路、神殿和石碑，没有这些设施，他们（相对）庞大的人口就无法养活自己或维持社会的运营。古代史学家摩西·芬利[25]在其发表于1959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问道：“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吗？”他总结的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如果我们把问题扩展，把所有类型的强迫劳动考虑在内，芬利的答案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农业社会。在极端情况下——古雅典就是其中一例，多达1/3的人是动产奴隶[26]，没有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农业社会凤毛麟角。对能量获取高于10 000千卡/人/天的农业社会而言，强迫劳动像父权制一样，是一项必要

的功能。

然而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光明面是精神生活的专业化，这大大拓展了知识的存量。20世纪考古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展示了文字出现之前觅食者的精神生活有多复杂，但农业社会的文化精英们所取得的成就则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日趋专业化的副产品。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有最完整的考古记录，在驯化的最早期阶段（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6250年的中国），少数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符号来记录家庭账目，但还要五六千年后，才会出现更专业的官僚机制，把这些符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

在中美洲，还没有发现与驯化有关的原始文字，但第一个专属的文字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致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建立最古老的完整农耕系统的时间前后。然而，新世界[27]的知识精英文化的发展落后于旧世界[28]，埃及、黎凡特[29]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都完成了相似的发展。关于文字的使用是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人类学家长年争论不休，但旧世界在农业时代取得了非凡的学术进步，其所倚恃的是专业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巨额的人力资源投资，没有文字则全然不可能达成。

农业社会越来越精密的劳动分工最终取决于另一类专业人士：暴力大师，他们把杀戮的相对优势转变为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在农业发明之后的每一个地区，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垄断合法暴力的政府，但当能量获取上升到10 000千卡/人/天以上，并且城镇人口数超过10 000人时，少数人就冒出来管事了，所有地区都不谋而合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只是发生的具体时间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印度河谷在公元前2500年前，中国北方在公元前1900年，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则晚至公元前100年。

基本定式是，这一新精英阶层的某一位成员自封为王，但为了保住王座，他一定会组织更广泛的联盟，把潜在的对手变成支持者。为罗致势均力敌的同侪，统治者一般会任命后者为贵族，使其可以合法拥有巨额财产，而为了让统治者离不开他们，这些贵族一般会将自己重新包装为有用的专业人士，精通宗教、法律、文化或战争等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精英彼此协作，通过提高税赋、执行法律、举行祭祀、征战邻国、镇压起义等政府活动来协调大型社会的种种活动，这些也是古代和中世纪编年史的全部内容。

图3.6是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30]绘制的一张有关总产出的概略图，高度抽象但非常有用。盖尔纳把这种理想型的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并指出，在这一虚构的典型社会中，“统治阶级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与直接从事农业的生产者，或称农民，界限分明地隔离开来”。图中的复线标注了这一明显的大众—精英分界线，而单线标注了统治阶级内部军事、行政、神职等工作的分工，以及他们自身的等级

排序和法律定义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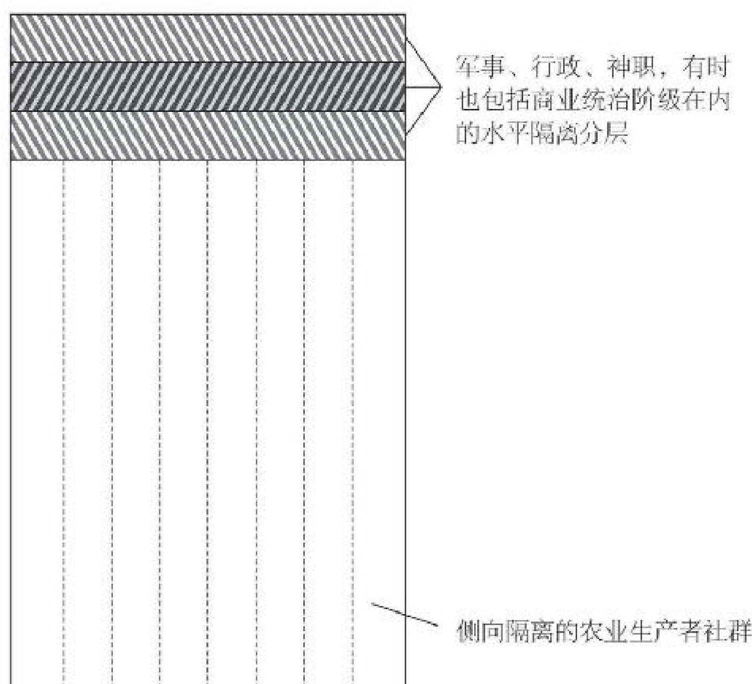


图3.6 阿格拉里亚

哲学家兼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理想型农业社会模式（引自盖尔纳，1983）。

“在顶部水平分层的少数人之下，”盖尔纳解释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是由社会的世俗成员所组成的侧向隔离的小规模社群”——也就是农民村落。盖尔纳将这些小社群描述为“侧向隔离的”，因为农民很少外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多数农民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距其诞生之地步行可及的方圆数十里。在阿格拉里亚，每个小辖区的农民往往都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仪式和传统——盖尔纳说，他们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图中纵向的虚线象征着农民世界的碎片化，这与其统治者生活的大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罗马版的阿格拉里亚，一位皇帝、元老院议员或待遇优厚的教授可以从不列颠远行到叙利亚，一路吃着雀舌，喝着法勒那斯酒[31]，用希腊语和拉丁语闲谈，在路过的每一个村庄显摆同一套关于荷马和维吉尔的诙谐典故。而住在东家土地上的农民走出二三十英里便有身处异乡之感了。盖尔纳说：“国家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国家并不关心如何改善其属民社群的侧向交流。”一个又一个农业贵族承认了如下事实：“我们对于图拉[32]乡下的了解，”俄国的李沃夫大公[33]说（他在图拉度过了19世纪90年代），“并不比对中非的了解多多少。”

社会学家约翰·霍尔[34]在其《权力和自由》一书中表示，帝制中国、印度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天主教社会都可以很容易地套

入盖尔纳的模式，但盖尔纳自己也认识到，仍有一些实例很难与图3.6完美匹配。“阿格拉里亚时代，”他指出，“本质上是一个停滞、压抑和迷信的时期，”然而，他又补充说，“例外确实会发生，古希腊就是一例，但我们都倾向于称之为‘奇迹’。”

正如盖尔纳所说，这些奇迹般的例外大多是城邦。在史前后期的农业社会，这样的城邦组成的网络可能很常见：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河谷、黄河河谷、秘鲁、尤卡坦[35]以及墨西哥谷，似乎都能见到城邦网络繁盛一时，直到其中一个城邦成长的速度超过其他，进而征服和吞并它们，形成一个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而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欧洲和地中海（古腓尼基、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中亚和撒哈拉的各个绿洲，城邦体系得以幸存，甚至有时还会在大帝国的周围欣欣向荣，历史文献对这些时期颇有记述。

几乎所有这些文本记录的城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其倾向于商业，通常是海上贸易。这个特点缓和了其他社会由于农业能量获取的局限而受到的约束。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利用其地处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心的地理优势，进口大部分所需食物，大大提高了人均获得的能量。这不仅使得本章前文提及的高人口密度成为可能，而且维持了经济增长（公元前800～前300年，人均消费可能翻了一番），以致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在化石燃料时期到来之前，无人能望其项背。识字率同样非常高，雅典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爆炸，“古典”的标签便是由此得来。

古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以及若干其他城邦在很多方面似乎要比农业社会更具现代性。图3.7（我本人将古雅典套入盖尔纳模式的尝试，或曰失败的尝试）和图3.6之间的反差很强烈。和大多数其他繁荣的海上贸易城邦一样，雅典也缺乏阿格拉里亚那个高度分层的、与农民大众严格隔离的精英小团体。相反，它只有一个弱分层的上层阶级，其与同样是弱侧向隔离的各个同胞群体之间的区隔是以财富来界定，而不是法律强制的。在雅典和其他数十个希腊的实例中，分层非常弱，以至于国家的管理者不有国王，甚至不只有商业寡头，还有希腊人所谓的“民众权力”，一种由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的民主制度。不出意料，财富等级不甚分明。我的计算表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占有土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38～0.39，而古代历史学家乔赛亚·奥伯[36]估计，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人（包括奴隶在内的全体居民人口）的总体收入不均系数为0.40～0.45——明显低于史密斯等人计算的农业社会收入不均系数的平均值0.48。与觅食社会不同，在这里，拥有财富一般都被看作好事。以希腊的标准来看，某些雅典人确实非常富有，但平均的真实收入也确实很高，发掘出土的房舍遗迹表明，古希腊人的生活条件远胜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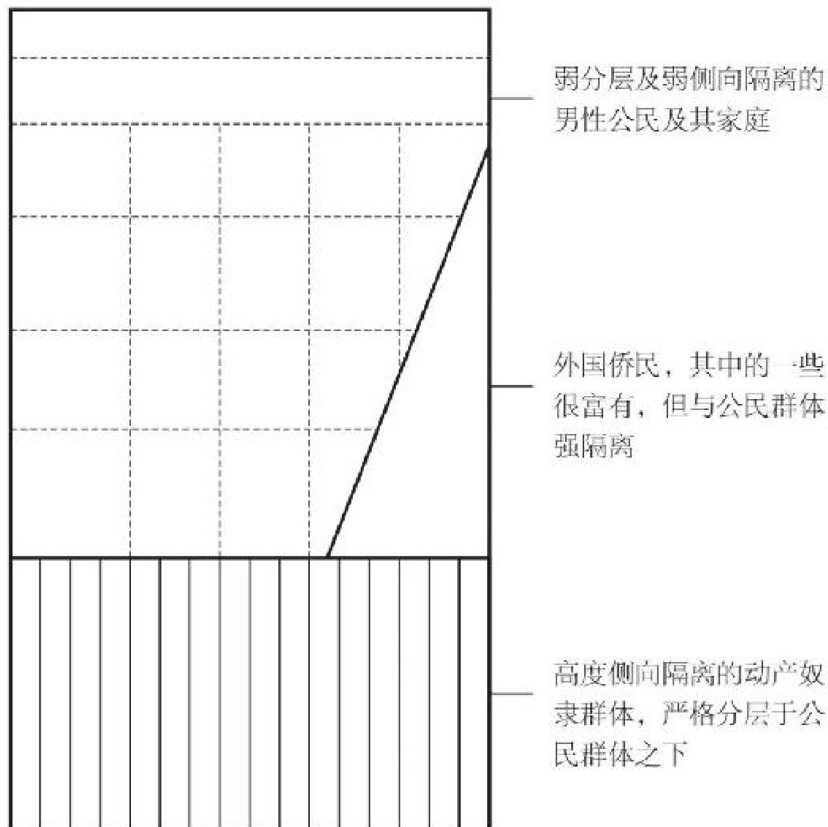


图3.7 希腊奇迹

贸易城邦如何重建阿格拉里亚的一种情形（引自莫里斯，1997）。

即使如此，雅典与阿格拉里亚仍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在弱分层且弱侧向隔离的公民之下则是另一个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4世纪，高度侧向隔离的动产奴隶大概占全部人口的1/3。虽然地中海贸易带来了能量繁荣，但对于雅典和所有其他希腊城邦来说，强迫劳动仍是必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雅典拥有最严格的奴隶制度，奴隶获释率极低，每次赋予获释奴隶以公民权，都必须在国家顶级决策组织（公民大会）进行一次投票表决。雅典还有古代社会中最不合理的性别差异体系。在古希腊的城市中，女人绝无获得公民权的机会。

城邦之所以堪称奇迹，原因之一是它扩大了精英阶层，而不是取消了阿格拉里亚内部的分界。古雅典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大约有1/3的居民（自由成年男性公民加上他们的儿子）属于这一统治精英集团。根据各自的具体问题，历史学家们既可以选择关注这一非凡的成就（被乔赛亚·奥伯称为“杯子半满”的视角），也可以关注非精英雅典人所面临的掠夺和压迫（“杯子半空”的视角）。

就本书提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应该将雅典和其他城邦看作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证实而非证伪了图3.6的模型，正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那些定居、富裕和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社会证实而非证伪了本书第二章提出的觅食者社会模型。一方面，瓜基乌图人和雅典人都找到了把能量获取提高到远超标准水平的方法，并创立了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另一方面，定居觅食者和贸易城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生态区才能繁荣昌盛——对前者而言，是海产资源丰富的海岸带，诸如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或是史上著名的北美西海岸；对后者而言，则是为大型帝国运送补给的贸易路线两侧的地理位置（通常指海上，有时也包括沿河地区，偶尔也包括陆路地区）。

归根结底，定居觅食者无法摆脱狩猎和采集的制约，而贸易城邦也同样受到耕种土地的限制。尽管定居觅食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远超机动性强的觅食群体的正常水平，但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到农业社会的正常水平，同样，尽管贸易城邦支撑着以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人口数量，也没有一个可以突破到化石燃料社会的正常水平。在雅典的例子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城市越来越像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将其他希腊城市纳入其管辖，雅典公民大会开始像图3.6中的分层精英群体那样行使职责，而此前类似图3.7情形的那些属城，在接受雅典统治后，变得更像是图3.6中的那些侧向隔离的社群了。我们在第四章就会看到，摆脱阿格拉里亚的唯一方法便是进行一场工业革命。

阿格拉利亚与因达斯特里亚

在18世纪60年代中的几年里，一个名叫雅各布·古杰尔（Jakob Gujer）的瑞士农民［通常称呼他的绰号克莱因乔戈（Kleinjogg），就是英语里的“小杰克”（Little Jake）］一时间成为举世闻名的农民。医生兼社会改革家J·K·希尔茨尔（J. K. Hirtzel）发现了这位口齿伶俐、雄心勃勃的农民，宣称他是“乡村苏格拉底”。卢梭曾为他高唱赞歌，歌德也曾前往苏黎世乡下拜访过他，克莱因乔戈动用他淳朴的乡人智慧，足以温暖任何启蒙贵族的心灵。“如果咱们俩都做了自己分内的事，结果对咱们都好，”1765年，克莱因乔戈对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欧根（Ludwig Eugen）公爵如是说，“你们王公贵族必须命令我们农民做事，因为你们有时间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至于我们农民，就应该服从你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我们可以把克莱因乔戈拥护的关系称为“旧政”，是工业时代的“新政”实施之前，农业世界普遍遵行的社会契约。它的道理很简单：大自然和众神要求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他们，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忠职守，便皆大欢喜。

早在克莱因乔戈与路德维希·欧根公爵对话的两千年前，在5 000英里之外的东方中国，就有人为“旧政”书写了最响亮有力的宣言。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礼记》宣称：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赫西俄德对此也一清二楚：“当［贵族］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他解释道，“而且没有偏离公正，城市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强。和平，这孩童的保姆，会留在他们这片大地，全知全能的宙斯永不会带给他们战争……土地上结出丰足的食粮。山上橡树林立，顶上结满橡子，蜜蜂翩翩飞舞。毛茸茸的绵羊肥美成群。女人带着孩子，他们的相貌与父母大同小异。”赫西俄德在另一首诗中告诉我们，这样的贵族是宙斯送给人类的礼物。“每一个受神眷顾的贵族在出生时，都得到了伟大宙斯的女儿们赐予的无上光荣，她们把甘霖倾倒在他的舌尖，感恩之言从他的双唇流淌出来。他用睿智明断解决纷争，万民都仰仗着他的威望”，而当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贵族时，“他们像对待神灵一样，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令他在人群中超拔脱俗。这就是缪斯送给人类的神圣礼物”。

“旧政”可以一路回溯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档，拉格什的乌鲁伊尼木基那王[37]制定的法典，这些法典在公元前24世纪60年代撰写于当今的伊拉克南部。乌鲁伊尼木基那宣称他“让拉格什的居民摆脱了高利贷、苛捐杂税、饥饿、盗窃、谋杀和强取豪夺。他创造了自由。寡妇和孤儿不再仰仗当权者的怜悯：正是为了他们，乌鲁伊尼木基那和［神灵］宁吉尔苏[38]订下盟约”。国王作为全体臣民的大总管，代表他们直接与神界交易，保护他们免受掠夺，这一意象是大多数农业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在世界各地，政治等级往往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即位于上层的男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如神一般庄严，并且在诸如法老时期的埃及等极端例子中，统治者实际上就是神。

“旧政”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捆绑在一起并替二者辩护。道德与权力首尾相随：因为神灵偏爱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很富有，而统治者很富有本身就表明神灵偏爱他们。赫西俄德沿用他一贯的直白：“道德和声望听从财富的差遣……耻辱伴随着贫穷，信心伴随着富有。”公元5世纪，距离赫西俄德的时代1 000多年，圣奥古斯丁[39]理所当然地认为，如今突尼斯的穷人并不希望废除不平等制度，而只是想要加入富裕阶层。“当穷人看到”上层阶级，他说，“他们低语、呻吟、赞扬、妒忌，希望与之匹敌，因无法达成心愿而郁郁寡欢。在赞美富人时，他们说：‘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只有这些人才知道该怎么生活。’”

在克莱因乔戈的时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顺乎天意的。1789年，当法国农民终于有机会向国王递交概述其不满的陈情书时，有关贫富不均的抱怨却少得惊人；当改革家走进农庄，他们也没听到多少重新分配财产的诉求。相反，他们深感意外地发现，大多数农民认为大众就应该贫穷，富有的本该是少数人。

盖尔纳认为，阿格拉里亚“夸大而非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统治阶层的隔离程度”。农业社会似乎常常痴迷于等级的象征，把自身细分为法定的阶序，每一个阶序都有明确的标志。“在贵族中，纯粹的绅士用头盔环绕其盾形纹章，［而］骑士则使用马刺和镀金盔甲，”一位17世纪的法国律师如是说，“在平民中，医生、持照经营者和低等爵士各自穿不同样式的斗篷。”早期的现代法国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注意到，在缅甸，“几乎每一件用品和饰物，特别是用在服装上的东西，都彰显着物主的等级”。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大部分时间，人们所用的语言本身也巩固了“旧政”。富人和当权者是政治精英、贵族和绅士；穷人和被统治者是下人、庶民和农奴。20世纪，当人类学家有机会与农业社会成员对谈时，他们经常发现，对于权威有合理的尊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受访者自认为好人的一个关键。例如，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40]谈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文莱和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因为坐久了身体僵直，他决定坐到地上，想着那样更舒坦些，没想到他的同伴们立即跳下长凳，为的是不要坐得高过这位受人尊敬的外国人。布朗请他们坐回长凳上：毕竟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而他本人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好公民，不在乎什么等级阶序。而他们的回答却不容辩驳：“他们说那样看起来不好。”

人类学家发现，虽然现代农民时常抱怨运气不佳，但他们的抱怨颇带着些矛盾心理。村民们往往一面憎恨城里的精英，一面又尊敬他们，恐惧与仰慕等量交加。为了正常运作，在盖尔纳的图中位于复线之下的侧向隔离的农民不得不忙于应付全国的精英成员。农民需要钱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还要缴税，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虽然他们往往很清楚人脉广泛的商人在剥削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笑话我们，”20世纪20年代，印度北部卡里姆普尔[41]某村的一个农民告诉人类学家，“但我们需要布料，而且下一个店主也会跟前一个一样坏。”说此话者怒形于色，但他对教育和精英知识不情不愿的尊敬也显而易见，“你要不是个庄农，就不会知道别人是怎么吓唬我们，占我们便宜的。你们［人类学家］或者城里的老油条不管去哪里都会要人伺候，还真有人伺候你们。我们傻头傻脑的，一看就怕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

大众与精英的互相依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研究农民的人类学先驱之一艾尔弗雷德·克罗伯[42]总结说：“农民……构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会。”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更加犀利，他说农民是“旧文明里的乡下

人……他们敬仰生活方式与其相似但更加文明的绅士阶级或城里人，并受到这些文明人的影响……农村的精神生活，往往还包括道德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他这样总结，因为“鲁莽的多数人的渺小传统”要仰仗“反省的少数人的伟大传统”的领导，“……远在他乡的教师、神父或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农民阶级，或许也反过来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旧政”恰恰处在这伟大和渺小的传统之互动关系的核心，它是双向运作的，为所有相关方设定了责任和权利，因而不出所料，对立双方中任一方的人对另一方的看法往往都十分复杂。例如在中世纪欧洲，贵族创造了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所谓的“一种杂糅的话语，一种文法，农民可以借此被认为既是堕落之人又是道德模范，既理应处于附属地位，又无限接近上帝”。同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价值观的“隐性脚本”（斯科特称其为“隐性”，是因为它们隐藏在精英阶层的“官方”脚本背后，很难译解）是建构在十足的精英世界观之上的，而不是对后者的否决。“无论其是否相信这些规则，”斯科特断言，“利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意识形态资源好处多多，只有傻瓜才不坐享其成。”

觅食者嘲弄、排斥，并最终使用暴力来惩罚那些拒绝分享和轮流负责义务的逞能者，和他们一样，如果农民们认定的卓越阶层看似无视“旧政”，变成了暴君，他们也保留其反抗甚至推翻精英阶层的权利。平权的愤怒浪潮周期性地爆发，贯穿农业社会的始终，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目标鲜有针对不平等的：大多数时候，怒火只是局限在当前掌权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因为他的邪恶行径违反了“旧政”。

如果抗议和威胁无法改变精英的行为，农民们有时会采取直接行动，但在这类行动中，他们一般会坚称自己只攻击地方当局，而非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皇帝或教皇。他们断定，遥不可及的统治者仍然道德高尚，只是他的手下背叛了他（有一句俄罗斯谚语：“沙皇是好的，贵族是坏的”）。农民抵抗运动打击这些邪恶的宠臣，其背后的逻辑是，反叛实际上是帮助国王维持“旧政”。

例如，公元1380年，一个名叫理查德·德莱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兰人“穿过整个伊利[43]镇，命令各个阶层的所有男人参加暴动，随他一起去消灭若干个叛国者，他以国王理查二世和忠诚的平民的名义宣判他们为叛国者”。德莱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随后袭击、抢劫、审判和斩首了一个地方法官，把他的头夹在示众枷上。德莱斯特在被捕时拒绝承认对他的指控，坚称自己有“国王授予的庇护令，保护他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治安法官不为所动。“对于上述审判，事实清楚明白，理查德［·德莱斯特］犯下了上述所有重罪和煽动暴乱罪，”他们记录道，“经上述法官慎重考虑，于上述日期将其处以绞刑。”

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反抗者认为统治者本人违反了“旧政”，政权就变得无路可退，唯有武力镇压，这样一来国家就前途渺茫了。1907年，一

个俄罗斯农民在被问到两年前的和平抗议者遭到屠杀如何改变了他对国家的看法时，他回答说："5年前，大家［对于沙皇］既信仰又恐惧。现在信仰全没了，只剩下了恐惧。"10年之后，沙皇也没了。

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糟糕统治之前3 000年，中国黄河河谷的周部落的首领们就已经有了这一观念，并开始称之为"天命"。他们认为，很久以前，至高的神灵把君权授给商朝的王，但当世君王们的昏庸暴虐表明他们丧失了天命。因此，周王有正当理由反抗商朝，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朝，证明天命如今传给了他们。

其他农业社会也都形成了有几分相似的观念。就在天命从商朝传到周朝的短短几个世代之后，一些犹太人——惊骇于扫罗王的乖戾行为——推断上帝的慈爱已经转向他人。对此《希伯来圣经》是这样记录的："耶和华对［先知］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44]撒母耳立即给大卫施涂油礼，在一场艰苦的内战之后，大卫推翻了扫罗。

统治者失其天命的主张还可以加以拓展，涵盖整个精英阶层，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8世纪先知弥迦推断以色列的法庭"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但弥迦警告他们说，上帝看得见一切；如果他们执意腐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45]赫西俄德也有类似的诗句，他被"吃光了赐予的贵族们"骗走了遗产，怒而警告后者，除非他们改过自新，否则"整个城市就会为一个坏人的罪行付出代价……［宙斯］会给人民降下巨大的灾难，饥荒和瘟疫并行；男人死去。他们的女人无法怀孕，房屋稀少……［宙斯］会消灭他们的大军，摧毁他们的城墙，或者让他们的海船沉入万顷骇浪"。

农业社会的叛乱往往采纳一种"美好旧时光"的形式，坚称其目的只是将"旧政"恢复到先人的标准。关于名声不佳的王，标准的圣经式批评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46]，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有教养的精英能够精准地指出他们认定的道德沦丧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对于罗马贵族政治家萨卢斯特[47]（他本人因行为不检而在公元前50年被驱逐出元老院）而言，美好的旧时光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时就终止了。"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他写道，"在他们身上，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人类学报告表明，较为贫穷的农民至少在某些时候有同样的感受。例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斯里兰卡工作过的一位人类学家发现，"当代兰格马/德维代尼耶[48]的老住户声称，虽然过去不平等和歧视非常普遍［现在也是一样］，但富人和穷人，当权者和无权者，高种姓和低种姓

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仇恨和对抗。”甚至在契诃夫《农民》的悲惨世界里，老头子奥西普也声称：“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要好过些……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可是规矩也大些。”

所有这些挑战权威的事件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或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邪恶之人不遵循“旧政”的为所欲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摒除骄傲，富人就不会为害。”

在有书面证据记录的最早期的农业社会——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2000年末期的中国，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美洲——“旧政”似乎主要依恃着王的神性，就算在我们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复杂社会里，如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或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脉，艺术和建筑证据似乎能够证明同样的原则。通过神职人员、贵族和天神一样的国王从中调停，有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把最渺小卑微的农民与至高无上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等级的基本公正。国王和神职人员之间就如何定义和控制这种观念可能一直冲突不断，在某些例子中——具体而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49]，以及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古王国崩溃之后，这种观念似乎全盘瓦解了。然而，直到公元前1000年，新思想才开始严肃质疑神圣王权是否应该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即使到了那时，这种情况也只发生于欧亚大陆。

我会在第五章再次谈及公元前1000年的这些质疑为何会发生在斯时斯地，但现在我希望用一两页纸的篇幅来讨论对于“旧政”而言，这些新思想意味着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想史学家常常将其描述为“轴心时代”，得名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发出的预言：“历史的轴心当存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我们现在知道的大人物应运而生。”雅斯贝尔斯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佛教徒和耆那教[50]教徒，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51]教徒，以色列的犹太教徒，以及希腊苏格拉底时代以前的哲学家都开始提出有关人类境况的新问题，在其后的1 000年里，这些问题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提出，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础。

我们很难准确界定这些新思潮是靠什么联合起来的，但古典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52]的陈述无疑很有影响：“处处都能发现有人在尝试引入更纯粹、更公正、更完美的观念，他们试图以更普适的原则来解释万事万物”。从中国到地中海，“轴心时代”的著述成为“经典”，作为永恒的道德名篇，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为无数人确定生活的意义提供指导。

很多重要的轴心时代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基本都没有什么著作，这让我们难以知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为，不过就实践的一般原则而言，他们似乎是一致的：面对这个被玷污的世界，人需要超越贫穷、堕落和无常，达到一种超脱现世的至纯至善。这一声言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普遍丧失了信心，都不再相信那个古老的传说：什么伟大的存在之链以神性的王权至臻大美，足以

支撑整个世界的道德秩序。

从中国到希腊，轴心时代理论家们一般认为，现世之外的超然境界——佛教所云之涅槃（字面意义为“吹熄”，系指此界的情感像蜡烛一样被吹灭的思想状态），儒家的“仁”（往往解释为“仁慈”），柏拉图学派的“美”，基督教的“天国”，以及道家的“道”——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定义的，但这些思想虽然在终极目标上含糊其辞，但在关于如何到达那个他方世界这一点上，它们却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些新批评家们认为，天神一般的王和为其服务的神职人员都无法让人超越现世，因而无以稳固道德秩序。超越必须仰仗自我塑造，也就是个人发自内心的向善追求。每一个轴心时代的传统均推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特定方法（佛教徒的冥想，苏格拉底学派的谈话，犹太教的学习，儒家的治学崇礼），所有这些方法——其他方法也一样——均引导信徒走向相同的终点：遵行礼义、清心寡欲、逆来顺受、推己及人。

轴心思想中有很多激进和反主流文化的内容，威胁到了阿格拉里亚的现状。轴心思想家们（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出现的后继者们）往往来自精英阶层的中下层（苏格拉底、孔子、穆罕默德以及大多数希伯来先知均符合这一条件），甚或来自精英阶层之外（如耶稣）。他们还来自大帝国的地理边缘——像孔子的家乡鲁国，佛陀的释迦族，或是以色列、希腊、阿拉伯等周边地区——而不是出自强有力的大国，如中国的魏和赵，印度的摩揭陀[53]，或是亚述、波斯和埃及。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怀疑穷人对富人，卑微者对出身高贵者，甚至女人对男人是否一定要服从。道家和佛教徒往往无视政治等级；儒家、苏格拉底学派和耶稣则谴责统治者的道德缺陷；《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书也明确批评了国王们。农业社会的精英阶层时常还以颜色，迫害、放逐，甚至杀害轴心思想家。但总体而言，所有古代大帝国最终都与批评者合作，给轴心思想修枝剔叶，让信徒中聪明的年轻人归顺体制。

在印度，好战的国王阿育王就表现出这方面的超群技能。公元前3世纪50年代，在消灭了敌国羯陵伽[54]后，他宣布从此遵循“法”（显然是他自己对于佛教的特殊理解）。一方面，这需要他声明放弃战争，但另一方面，这给了他一个稳固的新支柱来支撑“旧政”。他在整个孔雀王朝设置了“‘法’官”，赋权让他们执行一系列新法。阿育王断言，结果是“现世人间的邪恶减少了。人们已经不再饱受其折磨，世上如今只剩下欢乐与和平”。

公元前206年一统中国的汉朝更高一筹，成功地把轴心批判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用财富和声名奖励儒家信徒，鼓励他们宣扬那些强调责任和服从权威，而非直指独立和批评的典籍。王座与儒家官僚的甜蜜关系间或被政变和清洗打断，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

而最辉煌的成功案例当属罗马帝国。公元前2世纪，希腊哲学引起了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冲突，但在接下来的100年左右，国家把斯

多葛主义[55]转变为像儒家一样的公共意识形态。但这一转变完成之后不久，基督教这种更加有力的批评就出现了——罗马还是以镇压应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56]这是耶稣对其弟子所说的名言，但到了公元前400年，罗马帝国的巨富阶层已经完全占据了教堂等级的上层，以至于历史学家彼得·布朗[57]承认：“我想把这个时期叫作‘骆驼时代’。”

事实证明，“旧政”的适应力极强。尽管佛教、儒家和基督教文本始终不遗余力地批判不平等，轴心时代后的政治和经济等级与轴心时代之前一样牢不可破（公元14世纪，一位教皇甚至企图禁止基督徒说耶稣本是穷人）。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农业时代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中东的安萨里[58]，中国的朱熹（1130—1200），欧洲的托马斯·阿奎那[59]——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将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现世生活的等级要求论证成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读过他们的著述，但启迪他们的原则却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我在前文提到，当18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们到城市之外的乡下去寻求支持时，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农民并没有抱怨不平等或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相反，他们大半认为大多数人贫弱而少数人富强是理所当然的。

某些改革家据此总结说，他们遇到的农民饱受贫困的折磨，根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极为悲惨”，1763年，一位丹麦改革家写道：“以至于他们很容易相信，只需一定程度的愚蠢和迟钝便可让生活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而一旦开始思考，一旦丧失了无知和酒精这两大慰藉，农民的快乐——如果他还能享受到任何快乐的话——将立即烟消云散。”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前往摩尔多瓦考察的英国观察家得出了同样居高临下的结论：“［农民们］习惯了他人可能无法忍受的奴役状态，已经无法希冀更好的境遇；他们的习惯性消沉变成了一种天然的麻木和冷漠。”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60]响亮地秉承这一论调，声称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于是接受了奴隶主关于他们是软弱、懒惰、幼稚的“黑鬼”[61]之类的陈词滥调，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暴。

然而，这场关于麻木的辩论，其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前文图3.3所示的情形。觅食者中很少有人能获取超过5 000千卡/人/天的能量，自冰河期最后阶段在公元前9600年结束，其后数千年中，没有一个园耕者的日均能量获取超过10 000千卡。说起来这些觅食者和农耕者一定比任何18世纪的丹麦人或摩尔多瓦人都穷，但他们一般都会拒绝不平等和奴役。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000～前1年，能量获取翻了两番，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却日益根深蒂固。

究其原因，仍然是每一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要想让能量获取远超10 000千卡/人/天，唯一的方式便是发展到阿格拉里亚阶段，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是结构上所必需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

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当这些要求发生改变，且大规模海上贸易体系把某些农业社会推离阿格拉里亚的中心，走向图3.1中的城邦或早期现代社会，人们的态度才会发生转变。例如，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希腊，对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的怒火使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改朝换代，而日益转向对政治不平等的广泛批评。男人从平等已逐渐成为极强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城市启动了关键决策过程，探索所有自由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的做法。既有才干又有积极性的小群体到处演讲并设计了大部分政策，但即使像伯里克利[62]和德摩斯梯尼[63]这样出色的领袖，也必须表现出接受自己与其他任何公民别无二致的观念。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裕的希腊人避免修建奢侈的房屋或坟墓，以免有人指控他们炫富，最富有的人坚称自己实际上也就是普通人。雅典人开始将金融和贸易说成是不道德的“看不见的经济”，富人纷纷藏起自己的不义之财，避免公众的监督。

关于在早期现代西欧兴起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在本书第四章还会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只讨论到17世纪，当能量获取攀升到超过30 000千卡/人/天，旧世界的东西两端都开始看到全面废除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强大需求，仅仅在体制内重新分配人们的位置已难以为继。最著名的平等主义者都出现在英格兰，例如一个名叫理查德·朗博尔德[64]的人在1685年坚称：“没有谁一出世背上就配着鞍子，也没有谁天生就穿着靴子上着靴刺来驾驭别人。”1649年——他的同胞正是在这一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并决定他们不再需要新国王了，阿比泽·库珀[65]把上帝本人称为“万能的平等主义者”。但是，这些英格兰的激进分子并非17世纪40年代绝无仅有的平等主义者；在中国，根据1644年提交的一份官方报告，愤怒的农民：

> 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66]

这种平权的怒火超越了阿格拉里亚主流社会的一切现实，但仍有明显的局限。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幸存至今的资料中看到，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性别平权的可能性。诚然，在20世纪社会学家开始与农妇对话之前，几乎没有人撰写过有关妇女如何看待父权制的只言片语，而男性作者关于女人应该如何思考当然有的是话要说。“夫者天也，”一位佚名的中国作者在公元9世纪的《女孝经》[67]中如是说，“可不务乎？”

对大多数男性作者而言，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回答。如果“妻子和丈夫拥有同样的自由，”公元前51年，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开玩笑说，“犬、马、驴都会因为拥有了这样的自由而东奔西跑，那时男人就必须为它们让路了。”古雅典人虽极为反对男性公民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

但他们觉得阿里斯托芬有关女人拥有政治权力的喜剧简直滑稽透顶。

女人挑战父权价值观的证据乏善可陈，这并不能证明就没有这种观念，而我们也的确偶尔会在资料中瞥见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公元前550年左右，一位名叫岑诺尔（Tsenhor）的埃及妇女不仅本人经商，还执意要求儿女继承等份的遗产。但尽管如此，在横跨四大陆、纵横五千年的史料中，对父权制度的质疑近乎完全缺席，这一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从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约公元前380）中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到薄伽丘的《名媛》（*On Famous Women*，约1360），足足过去了1 500多年。甚至克里斯蒂娜·德·皮桑[68]的《淑女之城》（*Treasury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虽说直言批判了中世纪憎恶女性的风气，也不过是提议精英女性应该和男人受到一样的教育。针对父权制，最接近于近代的批评看来就是所谓的“女人问题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了。1524~1632年，这场著书立说的论战在意大利各城市产生了至少50本书籍，此外还有法国的畅销书和来自英格兰的投稿，然而整理主要论战文献的一位现代编辑指出，整套文献资料所揭示的最惊人的事实，是“为女性辩护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早期现代传统与19和20世纪的政治女权主义传统之间，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某些学者甚至怀疑，“女人问题论战”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而不是对父权制的严肃挑战。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费事来统计它们的数量，但我怀疑，与反对（无论有多温和）父权的农业社会文本相比，强调女人本来就比男人卑微的文本在数量上要多出几十倍。几乎所有的此类文献都是男人写的，而当人种学家在20世纪初期开始就此向女人征询意见时，他们发现很多人接受了性别不平等的基本正当性。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69]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70]在波兰村庄看到的人们的态度——“妻子尊重丈夫的规范包括服从、忠贞、照料丈夫的起居和健康；丈夫对妻子的规范则是善待、忠贞，以及非万不得已，不让妻子去做雇工”——完全可以推广到大多数阿格拉里亚。

在通过农耕获取能量的社会，父权价值观是合理的。压制女性的男权在农业革命之后抬头，不是因为男性农民比男性猎手更加粗野，而是因为这是农民社会中组织劳动的最高效方式。在一个持续争夺有限资源的世界，在最高效的社会取代了效率较低的社会的数千年进程中，因为父权制的运作如此成功，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父权制的价值观，视之为公正合理的。如果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适用，历史和人类学记录中至少会找到一些例子，说明农业社会可以沿着不同的路线而组织，并表达一些不同价值观。

如同对政治和经济等级制度的批判一样，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往往更多的是在清算那些违反了父权制契约条款的男女，而很少拒绝不平等。“总体而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波兰指出，“丈夫和妻子都不应该有任何行为导致对方的社会地位降低，因为这将导致对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降低。”于是乎，保护农业价值观就成了一个群体行动。“女孩的大

多数知识都是由母亲教给她的，”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Michael Mitterauer）和赖因哈德·西德尔（Reinhard Sieder）在谈论典型的欧洲农民女孩时如是说，“在幼年时期，从她的［妈妈］那里她还学会了服从和依靠的态度，这有利于她未来在父权家庭中担任妻子和母亲等角色。”如同觅食者游群集体嘲弄逞能者，整个村落也彼此协作，嘲弄那些给妻子太多自由的丈夫，或者惩罚那些过于主观的妻子。

和一切最佳价值观体系一样，父权制非常灵活，在每一个时代，性格刚毅的女人总能想办法在约束之下辗转腾挪。其中一些很有名，比如安茹的玛格丽特，在15世纪的英格兰，她奋力保护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丈夫国王亨利六世和他们幼小的儿子。“你这人面兽心的怪物呵！”莎士比亚让她的大敌约克公爵对她怒不可遏，“女人是温存、和顺、慈悲、柔和的；/而你却是倔强、固执、心如铁石、毒辣无情的。”一个同时代人称她为“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善用权力而不是受制于人”。而她也始终利用自己的坚毅冷酷来推进身边的男人们的事业。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距离玛格丽特的时代近400年前，富有的寡妇李清照通过全然不同的方式，实现了某种相似的成就，她不仅用怀念亡夫的诗词扬名男人独霸的中国文坛，还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斗，与贪财且虐待她的第二任丈夫离了婚。在不违背农业社会根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李清照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家庭。

而最感人的例子或许是在公元前5年左右离世的一位名叫图里亚（Turia）的罗马女富豪。图里亚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她悲伤的丈夫昆塔斯（Quintus）把自己在葬礼上的长篇致辞铭刻在墓碑上，这块墓碑有大约3/4残存至今。即使以罗马碑文的严苛标准，这段文字也因其情感炽烈、文字感人而胜出一筹。昆塔斯深爱图里亚。“我希望以我的而不是你的不幸来结束我们这场长久的婚姻；那会是更好的结局，”他说，“我生活的宁静与你一并去了……天降的悲痛让我丧失了所有的自制力，悲伤已经彻底压垮了我。”

图里亚是个坚强的女人，不是《女孝经》抑或希腊和罗马哲学家撰写的社会规范中召唤的那种任人践踏的可怜虫。昆塔斯问道：“我为何要提起你的妇德：为何要说起你忠贞顺从，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辛劳纺线，虔诚信仰，衣着得体，仪容端庄？”答案是：因为“很少有女人有此遭遇，受尽折磨”。无论代价如何，图里亚坚持了她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少女，在自家亲属反对其父的意愿时，她赢得了他们的认可；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曾直面全罗马最有权势的人，要求让她被流放的丈夫回家；未能为昆塔斯诞下子嗣时，她主动提出离婚，以便他另行婚配拥有后代。他拒绝了，他们没有子女，但快乐地生活了40年。

阿格拉里亚没有女权主义者，也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大多数人认为等级制度及其无止境的等级阶序是美好生活的道德基础。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莎士比亚的《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的人物优利赛斯（Ulysses）说得更加精辟，

这部作品写于昆塔斯悼念图里亚的大约16个世纪之后。“啊！秩序若是动摇，”他指出，

> 这事业的前途也就黯淡了。若是没有秩序，一切社会团体……
>
> 将如何立于合法地位呢？
>
> 秩序一旦废除，琴弦一经松懈，
>
> 听吧！跟着就是嘈杂的声音；……
>
> 强权即是公理；也可以说，是非原是由公理裁决的，
>
> 此后将无是非可言，亦无公理可言。
>
> 那时节一切都包括在强权里，
>
> 强权包括在意志里，意志包括在欲望里；
>
> 而欲望这东西乃是一只腐蚀一切的饿狼，
>
> 由意志与强权双双支持，
>
> 一定要到处寻觅食物，
>
> 最后吃掉自己。

莎士比亚写下这些诗句之后不到50年，托马斯·霍布斯把优利赛斯的观点变成了政治哲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论点之一：阻止所有的人相互对抗的唯一方式是将等级奉为圭臬，从而产生利维坦——一个足以胁迫其难以驾驭的属民和平生活的强力政府。霍布斯对证据没什么兴趣，而我们现在知道他大体上是正确的。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根据我的计算结果，大半缺乏等级的觅食者的暴力死亡率超过10%，而农耕者的这一比率接近5%，有时还要低得多。

只有在暴力致死率下降的情况下，农耕者才能有效。以野生食物和四处迁徙为生的觅食者，其劳动分工非常简单，在田野中也没什么资产投入。他们当然不会对超过10%的杀戮率甘之如饴，但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确实仍可生活。但农耕者做不到。因为他们依靠的是驯化的能量来源，需要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的田间资产投入，这一切无法在觅食者那样暴力的环境之中幸存。“在这样［暴力］的条件下，”霍布斯说，“工业没有发展空间；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从而土地无人耕种；既无航海，海上进口的商品也无用处；没有宽敞的建筑物；没有交通或移徙设施，这类东西需要很大的力量；关于地貌一无所知；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艺术；没有字母；没有社会；而最糟的是对暴力致死始终怀有恐惧和危险；短暂的人生充满了孤独、贫穷、险恶和残忍。”

但是，如果说农耕把很高的暴力比率变成了一个问题，它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之道。生活在相对空旷环境之中的觅食者在面对攻击时可以选

择逃跑，去新的地方狩猎和采集，但农耕者身陷日益拥挤的环境而无法脱身。因此，农耕者在打赢了和邻国的战争之后，有时会与战败者协作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通常会有强奸、抢劫和奴役肆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其统治者——就像盖尔纳所说的阿格拉里亚一样——“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绥靖其属民，劝导他们努力工作，“恺撒的归恺撒”，彼此之间不要杀戮，也不要破坏彼此的生产资料。成功实施绥靖政策的统治者往往会为了自己的繁荣兴盛而牺牲失败者的利益，在一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净效应是统治者逐渐降低了暴力死亡率。

为实现这些目标，统治者需要让属民相信只有政府有权使用暴力，正如韦伯所说，“只有某些政治社群，即‘国家’，才被认为有能力依靠指令或许可，将任何被其他社群进行人身胁迫的行为‘合法化’”。要试图说服属民自己是唯一获准使用暴力的群体，政府趁手的主要工具是法律，但法律本身的正统性最终取决于政府在武力上的相对优势：

> 为胁迫和进行此种威压之目的，完全成熟的政治社群发展了一个诡辩的规则体系，所谓“正统性”即可归罪于它。这一规则体系组成了“法律秩序”，而这一政治社群被认为是其唯一的规范缔造者，因为在现代，该社群往往已经篡夺了以人身胁迫强行要求他人遵守其规则的权力。

近代国家在垄断合法使用武力方面不如现代国家，但他们沿此道路走得越远，其属民就越不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大多数轴心时代所共享的信仰体系中有关逆来顺受的训令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作用，在罗马帝国以及早期现代的欧洲，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证据，看到男性精英如何逐渐放弃了仇杀权。在这个过程中，“君子”一词起初用于形容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的人，后来转而用于形容能够自我克制之人。

或许是因为强迫劳动——这是阿格拉里亚社会的基础——取决于主人强迫其从属的能力，因而比起运转顺畅的化石燃料社会，农业社会合法暴力的范围更大。公元2世纪的罗马文法学者奥卢斯·格利乌斯[71]记录过一个令人不快的故事，例证了对暴力日益负面的评价与阿格拉里亚的需求之间的紧张状态。格利乌斯说，一天，普鲁塔克[72]这位博学多才的希腊绅士——他曾在百忙之中写过一篇名为“论摆脱愤怒”的文章——决定鞭打自己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抱怨说普鲁塔克犯了他在自己书里批评的毛病；于是，普鲁塔克邀请这个奴隶参加哲学辩论，与此同时，鞭子在他的背上撕扯着皮肉。这就是农业生活中的道德复杂性。

重返阿西罗斯

农业社会是个海纳百川的庞大类别，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系列普遍共享的道德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核心便是等级为善的观念。等级制度反映了自然/神圣的秩序，某些人来到人间就是发号施令的，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必须服从。对暴力的评价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当正统的统治者需要暴力，它就是符合道义的力量；反之则非。

农耕者的价值观与觅食者大不相同，因为两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与野生资源相比，从驯化的来源获取能量产生了不同的限制，也造就了不同的机遇。农耕者只有在等级森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和平的世界里才能幸存，他们因此而重视等级与和平。这正是1982年乔治先生及其妻子认为男人骑驴女人走路是古今常理的原因，虽说当时希腊乡下已然实现了局部电气化，阿西罗斯和塞萨洛尼基之间也有了不大稳定的公交服务，但人们大体上还是生活在农业世界。据我所知，乔治先生并不是野蛮人，他太太也不是个可怜虫；相反，和觅食者一样，农耕者的价值观总是不断进化，以满足物质世界的要求。

[1] 凯瑟琳·潘特–布里克（Catherine Panter-Brick），耶鲁大学人类学、卫生与国际事务教授，她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健康、暴力和适应能力等。

[2] 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美国人类学家，因乡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在人类学中倡导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闻名。其著作《农民》（*Peasants*）出版于1966年。

[3]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美国人类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著有《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1956）等。

[4] 雅克·富尼耶（Jacques Fournier，约1280—1342），早期经历鲜为人知，父母属于中产阶级。富尼耶成为一名熙笃会教士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后任职帕米埃尔主教期间对当地卡特里派残余势力进行了残酷清剿和镇压，以此博得了教会上层的赞誉和垂青。在铲除异端过程中，富尼耶详细记录了卡特里派最后一个据点——蒙塔尤村的所有信息。后来，宗教裁判所卷宗中关于蒙塔尤的档案被带到了罗马，现存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5] 原文如此。梅赫尔格尔（Mehrgarh），位于如今的巴基斯坦境内，是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500~约前2500）考古地点之一。

[6] 大运河，指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其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这里指的是隋代于605年进行的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第二次开凿。——编者注

[7] 《文明的度量》（*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2013）一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6月出版。——编者注

[8]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9] 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安纳托利亚南部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人类定居点遗址。

[10] 乌鲁克（Uruk），苏美尔与巴比伦尼亚的古代城邦之一，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距现在的伊拉克穆萨纳省萨玛沃镇约30千米。

[11] 尼尼微（Nineveh），古代亚述帝国的重镇之一，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在今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

[12] 赫西俄德（Hesiod），古希腊诗人，学者一般认为他生活在约公元前750~约前650年，与荷马同时代。古代作家将希腊宗教习俗的建立归功于赫西俄德与荷马，现代学者认为他是希腊神话、农耕技术、早期经济思想（他有时被认为是世上第一个经济学家）、古希腊天文学，以及古代计时的一个主要来源。《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是唯一公认的他写的长诗。

[13]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6任总统（1825~1829），英格兰后裔。他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

[14] 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1926—2010），英国经济学家，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名誉教授。

[15] 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钱币名。

[16] 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1950— ），牛津大学奇切利讲席中世纪史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

[17] 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位于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河谷的一个考古遗址，是迄今所知叙利亚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存续时代大约是公元前9500~前5000年。

[18]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拉丁文名为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留名后世。

[19] 苏珊·特雷贾里（Susan Treggiari），英国古罗马学者，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古典学院的退休成员。

[20] 杰里科（Jericho），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以北，是一个拥有超过3 000年历史的古城。根据考古发现，早在11 000年前就已有人在此居住。

[21] 希拉松塔奇提特（Hilazon Tachtit），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海以西一地名。2010年，考古学家在这里的一个洞穴发现了史前人类第一场豪华墓葬的遗迹。

[22] 乌尔（Ur），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古城。当时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注入波斯湾的入海口，今天它的遗址位于伊拉克的内地，巴格达以南纳西里耶附近，幼发拉底河的南部。

[23] 拉格什（Lagash），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铁罗，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方向。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0世纪时，拉格什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24] 加文·赖特（Gavin Wright），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威廉·罗伯逊讲席美国经济史教授。他的大部分研究关注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和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经济。

[25] 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美裔英国古典学者。他早年受到麦卡锡安全委员会的指控而被迫移居英国，最终成为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院长。他的代表著作是《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1973）。

[26] 动产奴隶（chattel slaves），指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他们屈服于奴隶主，并可像其他动产一样买卖或出租。

[27] 新世界，指西半球或南、北美洲及其附近岛屿。——编者注

[28] 旧世界，指东半球的殴、亚、非三洲。——编者注

[29] 黎凡特（Levant），一个不精确的历史地理名称，相当于现代所说的东地中海地区，即地中海东部及其岛屿与沿岸各国，包括希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

[30] 欧内斯特·盖尔纳（1925—1995），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在他去世时，《每日电讯》报称其为“世上最有活力的知识分子”，《独立报》称其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单枪匹马的十字军”。他的著作有《思想与变革》（*Thought and Change*，1964）和《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等。

[31] 法勒那斯酒（Falernian wine），古罗马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以生长在法勒那斯峰山坡上的阿里亚尼考葡萄酿造。

[32] 图拉（Tula），俄罗斯欧洲地区的一个市镇，位于莫斯科以南165千米。

[33] 李沃夫大公（Prince Lvov，1861—1925），全名为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李沃夫，俄罗斯宪政民主党政治家。

[34] 约翰·霍尔（John Hall，1949—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教授。其著作《权力和自由》（*Powers and Liberties*）出版于1985年。

[35] 尤卡坦（Yucatan），墨西哥一地名，位于尤卡坦半岛北部，北临墨西哥湾。

[36] 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美国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典政治理论学家，斯坦福大学古典和政治学系教授。

[37] 乌鲁伊尼木基那王（King Uru'inimgina，?——公元前2371），苏美尔城邦拉格什的统治者，在位7年（公元前2378~前2371）。在位其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击了贵族寡头势力，满足了平民的某些要求，恢复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

[38] 宁吉尔苏（Ningirsu），在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为拉格什主神，军神，战神以及掌管暴风、洪水的神。

[39]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罗马帝国末期北非的柏柏尔人，早期西方基

督教的神学家、哲学家。他的著作《忏悔录》（约397年）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至今仍被传颂。

[40] 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m，1934—），美国人类学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

[41] 卡里姆普尔（Karimpur），印度西孟加拉邦纳迪亚县的一个城镇。

[42] 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1876—1960），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把考古学和文化联系起来，为人类学做出了贡献。

[43] 伊利（Ely），英国英格兰东剑桥郡的一个镇子，位于剑桥市东北偏北约14英里。

[44]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旧约·弥迦书》16：1。

[45]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旧约·弥迦书》16：1。

[46]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旧约·列王记下》16：2。

[47] 萨卢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拉丁文全名为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常简称为撒路斯提乌斯。著有《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和《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等。

[48] 兰格马/德维代尼耶（Rangama / Devideniya），斯里兰卡中部省村庄名。

[49] 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公元前2334~前219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早于该地区后来出现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

[50] 耆那教（Jainism），起源于古印度的古老宗教之一，有其独立的信仰和哲学。耆那教对现代印度的影响大于同样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甘地受到许多耆那教的影响。

[51]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

[52]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意大利历史学家，以其历史编纂学的工作而闻名。

[53] 摩揭陀（Magadha），古代中印度的一个重要王国，位于恒河中下游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比哈尔邦的中南部。

[54] 羯陵伽（Kalinga），印度次大陆中央东部的一个古国。相当于今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北部及中央邦的部分。早期史迹已不可考。公元前261年为孔雀王朝阿育王所灭，并入摩揭陀版图。

[55] 斯多葛主义（Stoicism），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思想流派，由哲学家芝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创立。斯多葛派学说以伦理学为重心，秉持泛神物质一元论，强调神、自然与人为一体，“神”是宇宙灵魂和智慧，其理性渗透整个宇宙；个体小“我”必须依照自然而生活，爱人如己，融合于整个大自然。

[56]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9：24。

[57] 彼得·布朗（Peter Brown，1935— ），普林斯顿大学罗林斯讲席历史学荣休教授。

[58] 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波斯裔伊斯兰神学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宇宙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是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59]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

[60] 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1925—2013），美国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以其对美国奴隶制与纳粹集中营的比较性辩论而闻名。

[61] “黑鬼”原文为“sambo”，又写作“zambo”，该词汇源于赞比亚，是18世纪白人对黑人、北美印第安人或黑白混血儿的歧视性统称。

[62]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前429），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他培育了当时被看作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63]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他有大量作品传世，今存演说61篇，系古代雄辩术的典范，但部分疑为伪作。

[64] 理查德·朗博尔德（Richard Rumbold，1622—1685），一名参与了“黑麦屋阴谋”，企

图刺杀英王查理二世及其兄弟——继任的詹姆斯二世的克伦威尔军士兵。

[65] 阿比泽·库珀（Abiezer Cooper），原文如此，疑似指的是阿比泽·科普（Abiezer Coppe，1619—1672），英格兰喧嚣派教徒之一，同时也是一系列宗教预言小册子的作者。所谓的“喧嚣派”是1640年后出现的非国教主义团体中的一个。科普的主要作品之一是1649年发表的一篇反对伪善和不平等的长篇檄文《激愤鼎沸之声》（*Fiery Flying Roll*）。

[66] 莫里斯教授这里引用的是马克·埃尔文教授所著《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1973）一书中的内容，埃尔文教授引用的是傅衣凌先生的专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傅衣凌先生所引的出处则是同治《永新县志》卷15，“武事”。

[67] 《女孝经》传为唐代散郎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所著，引文出自“三才章”。

[68]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4—1430），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威尼斯诗人。其父被任命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皇家占星家，所以她在宫中成长。在文艺复兴前的法国，她维护妇女的事业，倡导给青年妇女平等教育的机会。

[69] 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1863—1947），美国社会学家。他与波兰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合作，在移民社会学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工作。

[70]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1882—1958），波兰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是波兰和美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波兰学术社会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社会学中一个完整的思想学派的创始人。

[71] 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125—180），活跃于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格利乌斯留下《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一书，他在阿提卡过冬时开始写作此书，以消长夜，因此取名为《阿提卡之夜》。该书是他的笔记，记下他所见所闻所读，为后世提供了一部关于那时代的重要史料，许多已散佚的古籍的内容，也保留在其中。

[72]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5），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

第四章
工业时代

化石燃料群体是什么人？

人类自古以来一直依靠太阳能。阳光普照大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换为化学能；动物以植物为食，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人类再以植物和其他动物为食。但近两百年来，人类利用化石固化的太阳能大大增加了能量获取。从大约3亿～3.6亿年前的石炭纪以来，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形成了大量沉淀物，成为化石能源存在的主要形式。化石燃料的开发引起了一场能量繁荣，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的价值观。

化石燃料社会是两次创新的产物。第一次是发现煤炭可以燃烧，释放热量，某些西北欧的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只有到了大约公元1000年（在中国）和1600年（在英格兰），人们才开始将煤炭作为一种能源与木材相提并论。第二次突破是通过燃烧木材把水烧开，随后用蒸汽为活塞提供动力，热量便可转换成动能，最初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埃及工程师发现的，但埃及人空有想法，无甚作为，只是为他们的神灵奉上了利用蒸汽动力自行开阖的庙门。

直到17世纪，化石燃料和蒸汽动力才以一种高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西北欧的煤矿工人发现，他们可以烧自己挖的煤来给发动机提供动力，把水泵出矿井，这样他们就能挖得更深，去寻找更多的煤炭。最早的蒸汽发动机烧掉的煤过多，因而只有在不断供煤的矿井边上使用才划算，但在1776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设法建造了一台加热室与冷凝室分离的发动机，大大降低了煤炭消耗量。实业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如何在各行各业利用蒸汽动力来补充人力和畜力。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价格一泻千里，但因为销量大涨，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 000（图4.1）。能量丰富的时代开始了。

人类当然还需要进食，这意味着驯化的动植物仍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但化石燃料也迅速改变了农耕。19世纪末，火车和蒸汽轮船使得人类运输食物更加方便低廉。20世纪，化肥、拖拉机用汽油，以及抽水灌溉农田所用的电能直接提高了产量。2000年，美国每英亩农田平均吸

收的能量是1900年的80倍，产出是那时的4倍。

像觅食和农耕一样，化石燃料的正式使用也在特定的时间（大约200年前）兴起于特定的地点（西北欧）。但工业革命与前两次能量获取方式转变的巨大差别在于，工业化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了可用能量，以至于最早实现突破的英国（我会在第五章讨论原因）在19世纪能够把其势力部署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甫一开始，其他人就没有时间再独立发明化石燃料工业。1914年，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西方主导的化石燃料经济的一部分，依赖于全球市场，而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利用其作为化石燃料早期采用者的优势，控制了全球84%的大块陆地和100%的海洋。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最大的一次中断——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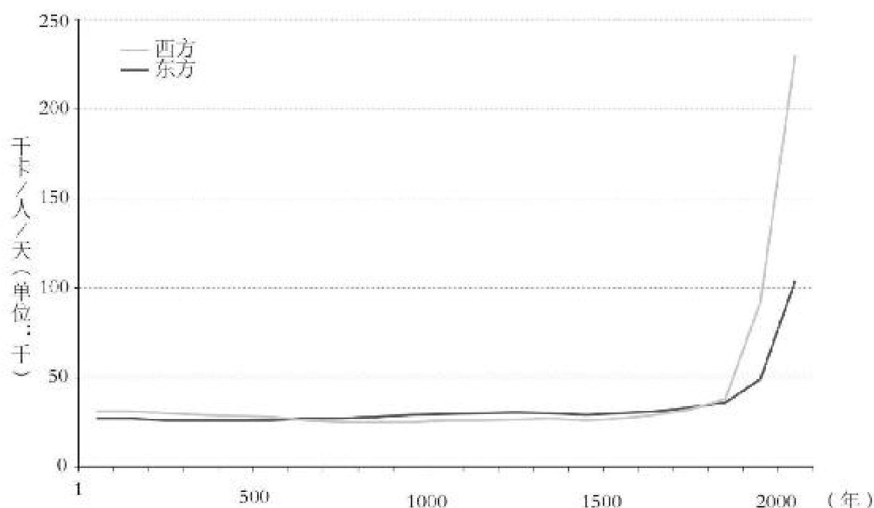


图4.1 能量爆炸

公元1～200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的人均能耗（引自莫里斯，2013）。

信息充足的时代

能量获取的爆发推动了信息技术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因为此，关于近两百年的证据比先前所有时代加起来还要多得多。资料分布很不均匀，富国及其人民留下的记录远非穷国可比，不过随着20世纪徐徐落幕，问题越来越变成了如何筛选过滤海量数据，而不再是竭力寻找信息了。

从阿格拉利亚到因达斯特里亚

化石燃料使用者一直在变革能量的获取方式。在利用煤炭实现首次突破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发明了新的开采方式（如深海钻井和水力压裂法等），学会了新形式的能量输送方法（尤其是电力）。他们还成立了新的商业、法律和金融机构来组织这场能量热潮。这一切发生的速度让当代人目不暇接。“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失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变化刚刚开始时如是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

和早期的几次能量革命一样，最明显的结果是规模上的一次跃升，而化石燃料革命远比觅食或农业能量变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起初，规模剧增集中于西北欧（图4.2）。欧洲人口在19世纪翻了一番，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形象地称其为“白色瘟疫”，不断有婴儿诞生在蒸汽轮船和火车上，随着这些交通工具跃向其他大陆，像传染病一般蔓延全球。1800~1900年，欧洲和北美（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的居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5.8%激增到23.6%。然而，特别是1945年后，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掀起了化石燃料革命，生产规模的增长蔓延到了全球。2000年，欧洲和北美在世界人口的比例缩减为区区13.7%。



图4.2 第四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1800年，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1900年即增长到16亿，2000年为60亿。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千米。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千米，少数城邦（如古雅典）达到了100人/平方千米，而在化石燃料世界，一般整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就超过了200人/平方千米。孟加拉的国土面积为15万平方千米，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1 000人/平方千米，某些城市国家（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超过了6 000人/平方千米。农业社会最大的城市有大约100万人口，但截至1900年，

伦敦人口激增到660万，在我撰写本书时（2014年底），东京拥有3 820万居民（比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

18世纪末，化石燃料已经在试图冲破农业社会的能量限制，西北欧的思想家们才最终阐释了农业生活的根本原则，这是思想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2]认识到尽管人口可以呈指数级增长，大约每20年便可两倍三倍地增加，但食物供应却一般只能线性增长。这意味着尽管好运气（农业创新、好天气等）可以暂时提高生产能力，但从长期来看，需要填饱的肚子永远比可吃的食物数量增长得快，这迫使大众退回到贫困状态。然而在1850年，人们清楚地看到，化石燃料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从产地运输食物到人们的居住地，供应量大幅增加，以至于尽管需求随着人口爆炸而上升，价格仍然下降了。到1900年，西方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比1800年翻了一番，（平均来看）他们个头更高，营养更好，身体更健康，寿命也更长。1900年以来，将化石燃料（以前文提到的化肥、汽油动力的拖拉机和电动马达等形式）直接施用于农田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从1950年以来，化石燃料社会的全球化和绿色革命也将这些收益推广到了全世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延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就在马尔萨斯解释其人口数量与生产力关系的逻辑仅仅几十年前，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也以同样的理性解释了分配的逻辑。他认为，国家的财富并非来自劫掠或垄断，而是来自市场的规模及其所推动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推断，劳动分工本身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即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倾向”。为了追求利润，人们专门从事自己特别擅长或代价低廉的工作，并用劳动成果换取他人尤其擅长或代价低廉的商品和服务。通过创造这类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他们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质量，皆大欢喜。“我们的一日三餐并非仰仗屠夫、酿酒师或面包烘焙师的恩惠，”亚当·斯密评论说，“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通过全力引导产业，使其产量达到最大价值”，亚当·斯密解释道，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赚取利润，在种种情形下，他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不由自主地去达到并非出于本意希望达到的目的……在为自己谋福利的过程中，他往往能够比出于本意更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其含义很明显：参与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人越多，大家就越幸福。

斯密时代的大问题是，农夫虽然比觅食者富裕，但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很低（根据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典型的农民每天的收入相当于1.50～2.20美元，而典型的觅食者只有1.10美元）。因为农民的购买力很弱，他们只能支撑得起小型、无组织的低效市场，而因为市场无法聚集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农业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国家干预和强迫劳动经常是调动工人和商品的最有效方式。

化石燃料改变了市场的结构，形成了反馈回路，扫清了阻碍规模和整合的旧障碍。如果没有市场来吸收商品，使用蒸汽动力来生产大量制成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幸运的是，蒸汽动力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利润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工厂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推动着交易商品的成本一路向下，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它们，而高工资也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工厂工作而不是留在家里务农，这促成了愈发复杂的劳动分工，制造出更多的商品。

化石燃料把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解决了。随着人口爆炸（1780~1830年，英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增至1 400万），18世纪末的很多农民都面临着贫困和饥饿的威胁。19世纪的资料表明，进入受薪劳动力市场会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工人必须服从严格的时间纪律，适应复杂的工厂环境，一切与他们在乡下的所见所闻有着云泥之别；然而仍有数以百万的人选择这样做，因为另一个选项——饥饿更糟糕。

贫苦的农民都渴望到肮脏危险的工厂工作，以至于1780~183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而每个工人的产量提高了25%。工资的提高只在19世纪30年代有所加速，且即使在那时也只有城市工人才享受到这一福利。巨大的原动力来自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攀升，雇主们发现和工人们分享部分利润要比镇压罢工划算得多。（在狄更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时代，工资上涨的速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是另一个巨大的讽刺。）在接下来的50年，工资和生产效率上涨的速度一样，甚至在1880年后超过了后者。到那时，农村的收入也开始上涨。

195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3]猜想，工业化经济中的收入不均遵循倒U型的模式，在早期阶段上升，而后呈下降趋势，从19世纪的文献中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表明，他大体上是正确的。17世纪，英国的收入不均（图4.3）状况呈现出先进的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整个18世纪，收入不均程度陡然放大，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而资本家的利润却持续增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在1830年前后开始提高，但资本回报率上升得更快，1867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55，几乎与有据可查的最不平等的农业社会一样高。但到1913年，基尼系数——尽管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仍然极高——就已经降回到18世纪的水平。在法国，工业化的步伐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真正启动，收入不均也遵循同样的曲线，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1901年回落到0.48；在美国，税后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迅速升高到1860年的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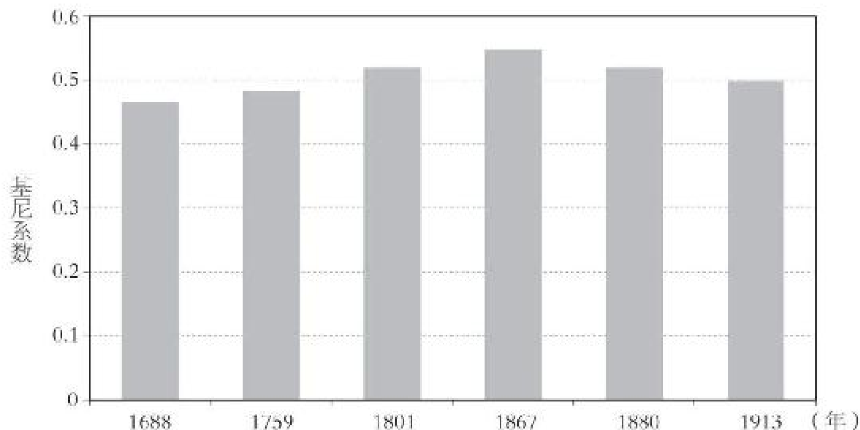


图**4.3** 库兹涅茨曲线

1688~1913年英国的收入不均状况，林德特和威廉森（1983）计算得出。

虽说早期化石燃料社会的收入不均现象持续恶化，化石燃料能量却水涨船高，工资的提高改变了一切。受薪工作足以吸引数以百万的自由工人，工资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强迫劳动的必要性——与日益富裕的受薪工人不同，贫困的农奴和奴隶买不起工厂大量生产的制成品，因而就商业利益而言，强迫劳动就成了经济增长的阻力（特别当使用强迫劳动的是竞争对手时）。社会走向化石燃料的程度越深，对于废除奴隶制和解放奴隶的政治支持也就越多。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48年，大多数欧陆国家废除了农奴制度，就连俄罗斯也在1861年跟风废除了农奴制。1807年，英国在其帝国境内禁止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彻底禁止蓄奴。

农奴主和奴隶主们进行了反击，他们自然更关心自己的沉没成本，而不管什么化石燃料经济的逻辑要求。有时人们可以为其人力资本提出优厚补偿，以此来收买他们，但有时推翻强迫劳动的制度则需要暴力。截至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了400万奴隶，外加皇家海军的西非舰队拦截并释放了15万非洲人，当时他们正被装船，准备横渡大西洋去出售。1888年，最大的奴隶制社会巴西废除了人身束缚，但非洲和中东的最不发达地区仍然延续着强迫劳动（毛里塔尼亚直到1981年才禁止奴隶制），21世纪，世界各地都将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视为非法，这一制度只能改头换面，或见于无法无天的穷乡僻壤。

数千年来，强迫劳动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但化石燃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将其一扫而尽；自由的受薪劳动刚刚取得胜利，化石燃料就又开始着手解决农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古老而又不可或缺的障碍了，那就是性别的劳动分工。和强迫劳动的情况一样，供给和需求两者都对变革有所贡献。在需求一方，从19世纪开始，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机器不断降低整个经济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但提高了对组织的需求；因为女人在脑力上不输男人，也能提供一样的服务，女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规模翻番提供潜在的机遇。白领变成了粉领。

在供给一方，最重要的因素是婴儿。由于婴儿死亡率过高，农民社会要想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就需要妇女平均生育六七次。但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使得女人更高大、更健康，营养更好，因而她们的孩子个头更大、更健康，营养更好，成长得更茁壮。19世纪50年代，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大约有1/4在周岁前就夭折了，但到1970年，夭折率降低到1/50，到2014年，每163个婴儿中才有一个。自“二战”以来，化石燃料助力的交通遍及全球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2/3，2014年，不少于55个国家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比美国还低（在日本这个婴儿最安全的大国，每400个婴儿中只有一个在周岁前夭折）。

在化石燃料到来之前，普通女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和生产，一旦这样做丧失了必要性，父母就日益倾向于在小家庭里尽其可能加大投入饮食和教育，而非生得越多越好。在19世纪结束之前，农业社会的低工资—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的制度就已经开始让步于高工资—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制度（人口统计学家称其为“人口结构转型”）。在20世纪，市场对父母们无须孕育新生的性生活立刻做出了反应，1920年，乳胶避孕套上市，1960年，口服避孕药面世。到2002年，欧盟的妇女平均活产数为1.46，远低于人口替换率，随着1950年后化石燃料遍布全球，总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图4.4）。在化石燃料时代，妇女平均花在生产育儿方面的时间只有几年，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从事受薪工作，提高家庭收入。



图4.4 全球生育率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妇女的平均活产数减半。

在农业世界，妇女留在家中照料众多子女的好处之一，便是她们同时可以完成大量不得不做的家务。这意味着如果家庭决定利用生育率降低的时机让妇女外出从事受薪工作，就必须解决无偿家务由谁来代做的

问题，要知道在此之前，那些家务让女人们整日忙个不停。答案是机器，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4]、阿南特·塞沙德里[5]和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6]称其为“自由的发动机”。因为女人当下的收入潜力值得家庭花钱购买节省劳力的设备，市场很快满足了这一需求。19世纪末，商用洗衣服务大行其道，但电力才是真正消除家务苦差的关键。1928年，洗衣机的年销售量将近100万台。1937年，第一台全自动家用真空吸尘器开始打广告，1938年，定价仅10美元的蒸汽电熨斗在商业营销中大获全胜（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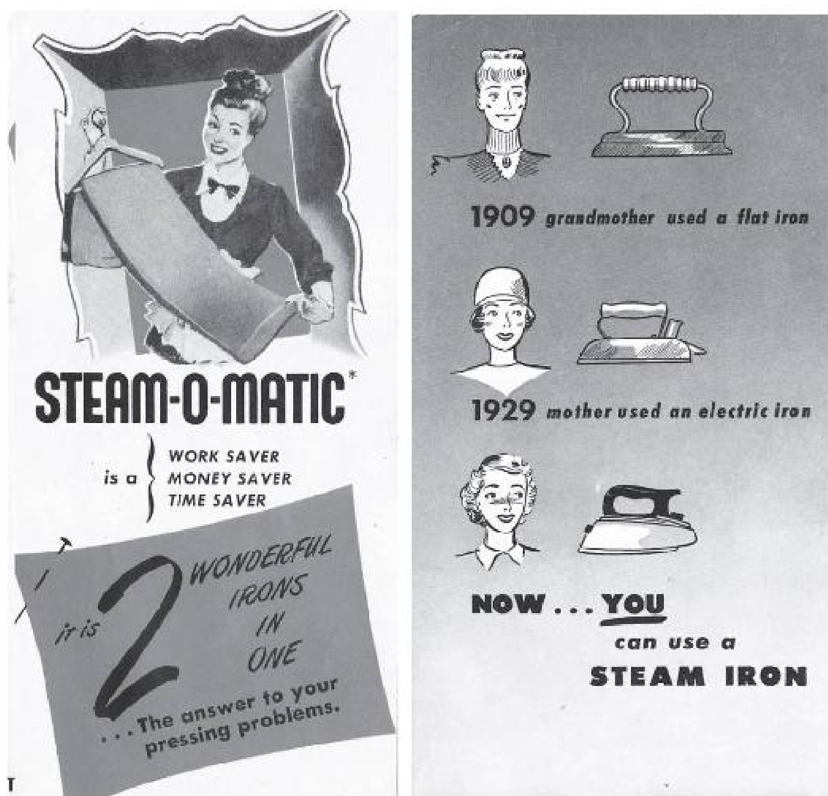


图**4.5** 自由的发动机

蒸汽电熨斗的广告，约1950年（作者的收藏）。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出工作的女人数量慢慢上升，但直到1940年，受薪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女人（甚至在西欧和北美也是如此）仍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薪水较低，工作领域主要是女性独占的内勤、秘书、护理和教育工作。但这种情况在“二战”后迅速发生了改变，1940～1990年，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翻了一番（图4.6）。早在1950年，美国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半是已婚妇女，到20世纪末，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拒绝雇用女性了（尽管女性在大多数职业的顶层人数不足，且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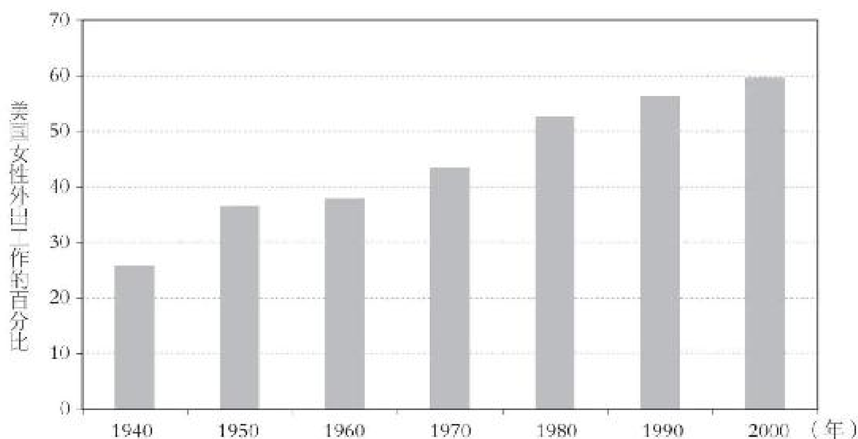


图**4.6** 工作场所的女性

美国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1940～2000年（数据来自J·帕特森，1996，2005）。

阿格拉里亚通过实施差别化来维持社会运转，不仅精英与大众或男人与女人界限分明，信徒与非信徒、好人与坏人、自由人与奴隶，以及其他无数的类别之间全都壁垒森严。在一个彼此之间存在义务和特权的复杂等级制度中，每一个群体均有各自固定的位置，由“旧政”将其联系在一起，并由神灵和暴力威胁予以保障。然而，化石燃料社会则需取消界限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某个群体越能够以图4.7（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完全空白的框图）的反结构来取代图3.6的严格结构，其市场就会越大也越高效，这个群体在化石燃料社会中也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称为“因达斯特里亚”，它和阿格拉里亚一样，是一种理想类型，虽然现实中还没有与其非常接近的社会，但它仍然是公元1800年以来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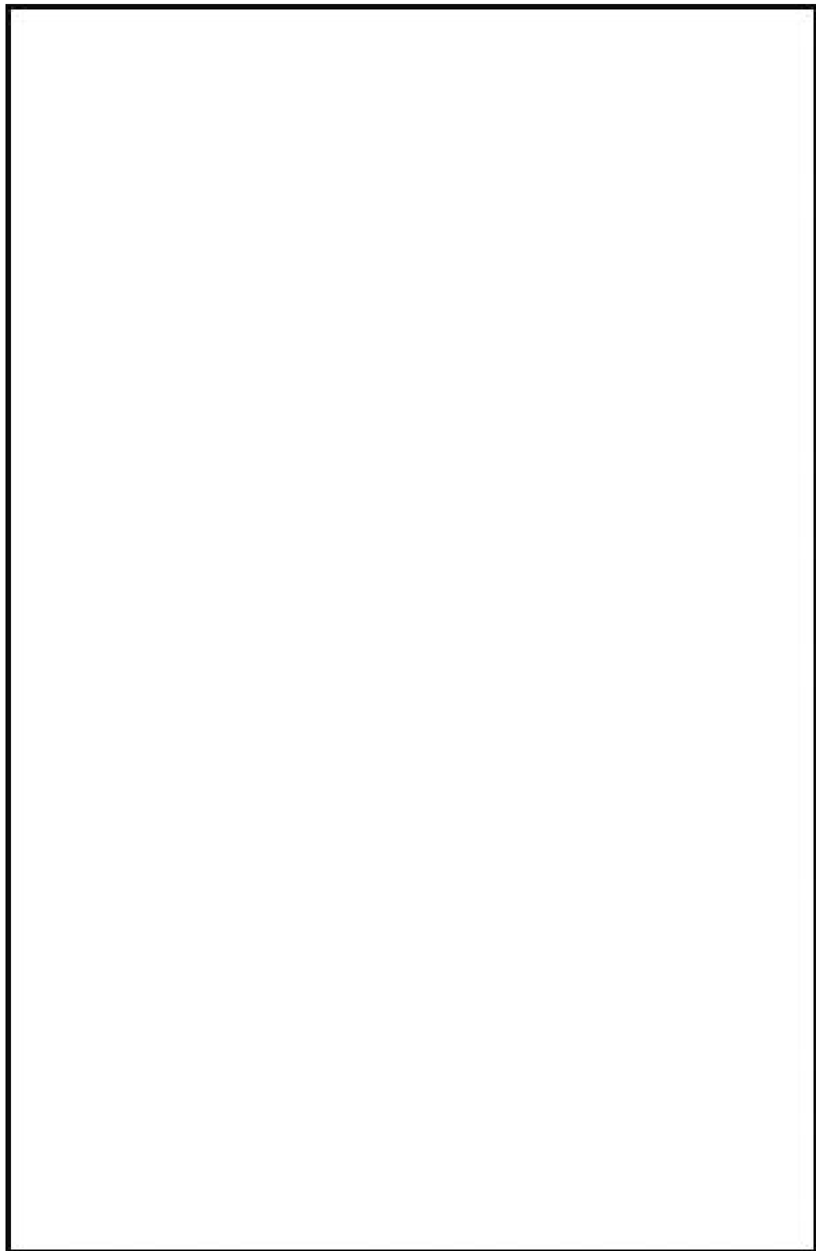


图**4.7** 因达斯特里亚

理想类型的化石燃料社会，全无内部分工，并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

从阿格拉里亚发展到因达斯特里亚，化石燃料社会找到了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是自由的，另一条是非自由的。两种方式都需要扫清图3.6中的界限才能进行下去，但其去除界限的方法大不相同。自由路径包括宣称阿格拉里亚的界限毫无意义，并给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其在农业社会隶属于哪个类别。新型的市场需要吸收和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如果对于礼拜的规程、嫁娶的对象乃至工作的

类型都做出了严格限制的传统规则干扰了这种市场的成长，就必须摒弃那些传统。与此相反，非自由路径的目标不是忽略差异，而是消除差异，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因此，与自由的版本相比，非自由的方法往往是在开倒车，常常会依赖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新版的神圣王权说。这两条路径彼此排斥，任何将其结合的企图都会带来灾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后的情形就是一例。历史学家杰弗里·瓦夫罗[7]指出，虽然奥地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权力“仅仅是要求斯拉夫人用德语和哈布斯堡官场交流，以此来庇护……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认为那根本就是消灭……其他民族的许可证”。自由和非自由路径的不正常妥协最终带来了一场灾难。“奥地利是欧洲的失败者——倒霉蛋，”维也纳的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在1913年承认道：“谁都不喜欢我们，每一场灾难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自由路径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7世纪末的北大西洋沿岸，当时市场的洲际扩张把体系所消耗的能量推高了（我会在第五章回到这一主题）。然而自由路径的真正确立则是在1800年前后，也就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开始之时。近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都在迫害犹太人和任何歪解耶稣的人，然而一朝之间，信仰突然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外人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人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投票权，甚或（最终）通过婚姻融入基督徒的主流社会。实际上在19世纪，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信仰不再是个严重的问题，新的世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迅速蔓延开来。世俗化——社会学家史蒂夫·布鲁斯[8]将其解释为“宗教被取代，不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使得化石燃料世界与农耕者的世界一刀两断。

某些无神论者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他们的满腔热情也堪称虔诚。例如，1871年，临时统治了巴黎的极端左翼公社开始抓捕神父，公社革命法庭的政府检察官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开始审问一名耶稣会修道士，以下便是这段声名狼藉的对话：

里戈：你的职业？

神父：上帝的仆人。

里戈：你的主子住在哪里？

神父：无所不在。

里戈（对书记员说）：把这个记下来。X，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名叫上帝之人的仆人，这个上帝居无定所。

如果不是里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枪杀了那么多神父的话，上面的对话或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数无神论者没这么激进，不过只是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上帝而已。在英国，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从1851年的约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为10%，1998年为7.5%。甚至在宗

教仍然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国，从1939年到20世纪90年代，进教堂的人数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毫不奇怪，随着宗教的撤退，阿格拉里亚社会的一项最显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与政治上无能的大众之间的严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过，古希腊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过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体决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这一界限，而当17和18世纪的西欧能量获取激增之时，这个想法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条款，”1647年，英格兰平等主义者托马斯·雷恩巴勒[9]坚称，“说一个贵族可以选20个议员，绅士可以选两个，而穷人一个也选不了……对于一个完全不能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兰最穷的人不会与之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平等主义者很快就失败了，但1688年后，英格兰的君主们越来越屈服于商业寡头的意志。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大众开放了参政权。

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两个体系都不够民主：二者均禁止女人投票，美国革命容忍大规模的奴隶制，而法国革命则先是堕落成为一场大屠杀，随后又沦为独裁。但随着化石燃料在19世纪重新建构市场，按照人们的意愿把他们从实物支付、以物换物中解放出来，老式的统治精英发现，保护自己的政治特权，抵制新贵资本家或日益壮大的工人参政，变得越来越难了。

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英国的缙绅阶层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很有技巧，他们敷衍、妥协，零零碎碎地让步。而说英语的海外移民往往更加决绝，他们一举接受了民主。然而在欧陆，民主的道路却更加暴力和崎岖。1848年的一波革命大体上都失败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随即又遭到了破坏。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和谐的噪声喧哗，到1914年，西方政府还是全都走向了代议制民主，男性广泛拥有选举权，以及定期选举。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财产、种族、宗教、教育甚至性别的政治参与障碍遭到了攻击，在整个西方几乎处处都摇摇欲坠（奇怪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准许女人投票）。以几乎任何标准来评价，走向民主的国家都胜过了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在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民主化的进程更加缓慢。率先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也走向了民主，但保留了天皇，当时的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只有在20世纪末，化石燃料经济和开放市场渗透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民主才开始茁壮成长。而就算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东和中亚的化石燃料经济依然孱弱并带有试验的性质，那里的民主也是如此。

虽说具体情况始终千差万别，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或称“古典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通常的称呼，以示与20世纪的同名者的区别）往往会将小政府看作实现因达斯特里亚的最佳途径。其基本的原则——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10]嘲讽其为“守夜国家”——是政府应尽可能

地不作为，除保证财产权及保护国家免受攻击之外，政府应将改善大众福利的事情留给自由市场。然而化石燃料社会本身复杂重重，很难严格坚持这些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就已经觉得有必要为工作环境立法，到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自由政体都已将工会合法化并推广了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到19世纪末，很多欧洲人言及“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版本截然不同，并且为了实现更大多数人的福利，它不仅依赖操纵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同样仰仗国家权力的“看不见的拳头”。

政府干预之所以能铺平因达斯特里亚的竞技场，原因是国家能够使用武力来压制反抗，有些时候——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美国南部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的确会使用武力来镇压自己的公民。但总体而言，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自由路径远离国家暴力——这与非自由路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就连最自由的政体也会以不合时宜的手段对待自己国民中的某些群体，认为该把他们隔离起来，以保护可互换公民的同质社群免受传染。例如，英国把贫民聚集到习艺所，而美国先是把很多美国原住民赶出其不断推进的国境线，随后又限制他们住在保留地中，声称其原则是——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2年所说——“独立的农民在各处都是社会的基础，也是自由的真正朋友”。沙俄等自由受限的政体在其自身的工业化革命中拘禁了更多成员。但20世纪出现了更明显的分裂，英国、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自由，抛弃了此类政策，而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国家偏离了轨道，寻求更不自由的解决方案，以驱除出境和斩草除根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拘禁。

自由政体与非自由政体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两种社会的国家力量都大举扩张，因为政府企图动员国家意志和资源。这一趋势直接与19世纪的守夜人传统背道而驰，却与利用激进主义的大政府解决阿格拉里亚遗留下来的差别的“新自由”倾向完全相合。结果便是自由的“新政”在20世纪中期加速前进，彻底取代了阿格拉里亚的“旧政”。

5 000年来，政府一直管理着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权和宗教崇拜，但在20世纪中晚期，大多数“新政”政体（或多或少）也负责教育、卫生、就业和环境。某些政府还制定了工资和价格政策，用公务员取代了市场；其他一些政府则对从煤矿到银行等重要产业实施了国有化。官僚作风和税单激增，过高的累进所得税制把收入不均的状况推回到觅食者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本上是个化石燃料富国俱乐部）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平均为0.40，但政府实施的从富人到穷人的净转移把这一系数降至区区0.26的平均值（图4.8）。就连对财富重新分配没有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那么感兴趣的美国人，其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近0.50降到70年代的0.36。几乎在世界各地，税后基尼系数最急剧的下降都始于“二战”期间，经济学家经常把20世纪40～70年代的这段时期称作“大压缩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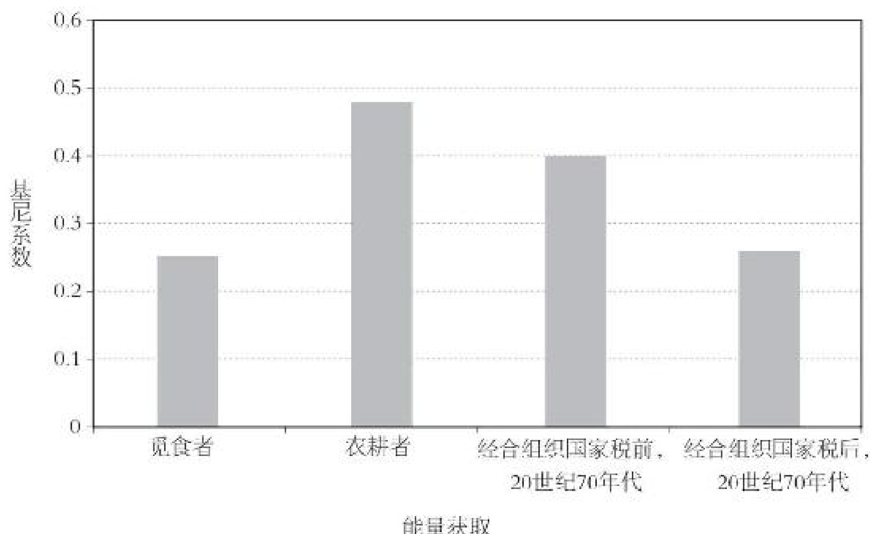


图**4.8** 觅食者、农耕者与化石燃料使用者

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转移已经把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均降低到从觅食者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数据来自史密斯及其他人等，2010；舒及其他人等，2000）。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原因目前仍然争论不已——很多化石燃料国民收入分配的压力降低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税后基尼系数在2012年回升到0.31，而美国的分数爬升到0.38。化石燃料国家内部收入不均的加剧刺激了针对收入最高的1%人士的大规模抗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预测了可怕的后果："当资本收益率超过了生产和收入的成长率，这种现象在19世纪发生过，看来很有可能会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专制而不可持续的不均，这将彻底破坏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知识精英价值观。"

然而大局更加复杂。最明显的是，尽管很多国家2012年的转移后基尼系数比1970年的对等系数高，2012年的系数依然低于农业社会贫富不均的典型基尼系数（0.48左右）——通常要低得多，并且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人均产出大幅提高（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研究，从公元1700年的全球平均615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614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民收入解压甚至还没有开始削弱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用以购买化石燃料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最后，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库兹涅茨在1955年确定他的曲线时，大压缩还主要发生在19世纪就已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所以，尽管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下降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测量，该系数则是升高的，因为化石燃料的西方国家和农业社会的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宽。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11]估计，1820~1950年，全球范围的基尼系数几近翻了两番。但1955~2002年，化石燃料时代走向了全球——结果是，虽然国内的基尼系数如今仍在上升，但全球不均现象的加深如果不是逆转，就是急剧放缓了，取决于2002年的分数是如何计算的（图4.9）。2002年以来，不

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

自由化伴随着化石燃料经济蔓延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以至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激进主义分子言必称全球范围的人权革命。阿格拉里亚内部界限的消除始于19世纪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权利被推到了上一代人也无法想象的疆域。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队里的同性恋问题仍然引起争议，就连自由派政客都同意采取臭名昭著的“别问别说”政策来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到了2011年，一切禁令都解除了，2013年的一份报告结论是，这些变化对军队的战备状态毫无影响。从那时起，逾半数美国人赞成同性婚姻，目前已有16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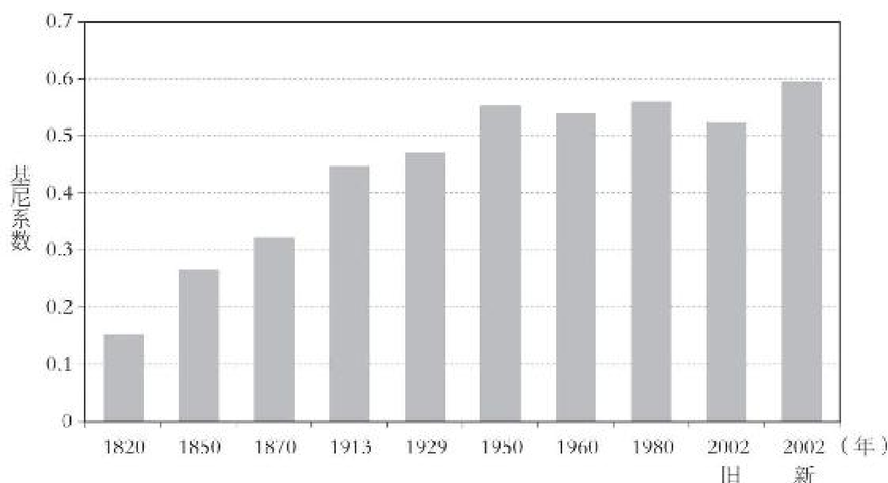


图4.9 大分化之后的大收敛

1820~1950年，西方工业革命几乎把全球的收入不均翻了两番，但自1950年以来，东方的工业革命减缓甚至逆转了这一趋势（数据来自米拉诺维奇，2011，2012）。

如今的权利革命也不仅限于人类。1789年，杰里米·边沁[12]觉得有必要提醒英国人如何善待动物：“问题不是‘它们能否思考’，也不是‘它们能否说话’，而是‘它们能否忍受’。”两百年后，革命如此深化，以至于法律要求瑞士公民在养狗之前必须参加一个为时4个小时的研讨班，讨论有关动物陪伴的原则。1982年，我遇到乔治先生的时候，对待动物的无法形容的残忍行为在希腊并不罕见，但2009年在我睽违将近10年之后重返希腊时，我惊讶地发现，雅典人把水碗放在人行道旁，供走失的动物饮水。然而，像化石燃料世界屡屡发生的情况一样，人类对待其他动物的方式也充满了矛盾。瑞士人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亿万动物正在忍受痛苦，在工业化农场里面临屠杀。“以他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来看，所有的人都是纳粹，”196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13]如此写道，“对于动物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4]。”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物种内部，模式要简单得多。“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宽容、更加温和。”这是乔治·H·W·布什在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

提名时对党派成员说的话，在他发表此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甚至在1988年以前，化石燃料社会（特别是自由派的社会）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平静了下来。1900年，西欧的谋杀率已经下降到低于每1　600人一起，就连在当时谋杀率高出7倍的美国，以此前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也是安全的。化石燃料社会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最血腥的战争，20世纪非自由路径的独裁者们也是最杀人不眨眼的，但当我们把战争、种族灭绝、国家人为导致的饥荒和谋杀的所有伤亡人数加起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夫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

但那仅仅是开始。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世界如此和平，以至于在2012年11月26日发生了无法想象的事情：一整天（实际上将近36个小时）过去了，纽约市没有一个人死于枪击、刀刺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暴力并没有远离，但世界从未如此安全过。

化石燃料社会在通往和平、民主、开放市场、性别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它们就越繁荣昌盛。因此，在短短两个世纪（在整个历史上那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部分世界远离阿格拉里亚，走向了因达斯特里亚。当然，要达到图4.7所示的真正开放的社会空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商业群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仍然远大于普通公民，近期一项对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中姓氏的现况研究表明，因达斯特里亚仍然存在着可清晰界定的血统决定身份的现象。即使如此，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发生如此迅速、受众如此广泛的巨大变化。

科学的发展与更自由的世界

近250年来，道德体系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工业革命释放了大量的能量，那些从阿格拉里亚走向因达斯特里亚的社会从中获得了回报，数十亿人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不到十代人的时间里，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制度在人的观念中早已不再是完全自然和公正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邪恶。这一转变始于北大西洋沿岸，并在那里发展得最快、传播得最远，但随着化石燃料能量和组织在20世纪遍及全球，其影响已经波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

300年前，这样的结果根本就是海市蜃楼。从中国到地中海，反动力量看似打败了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平等主义者”，恢复了阿格拉里亚的传统社会和宗教秩序。只有西北欧是个例外，而就算在那里，例外起初看来效果也相当有限。

欧洲知识分子的古怪非凡早在16世纪便初见端倪。在我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认为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北大西洋沿岸新型经济兴起的反应。这种经济很像是早期让某些城邦繁荣起来的超级版本，将西北欧推离了阿格拉里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解读经典或圣经文本转向试图解释风和潮汐何以来去匆匆，茫茫夜空又为何会有斗转星移，这些问题不久就汇集成为宇宙的力学模型了。

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到处宣讲，说树木的生长并不比钟表的转动更加神秘，或者说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让各地的掌权者深觉他们都是可疑的人物。但随着17世纪逐渐逝去，从大西洋经济中获益最多——并因而从解释世界如何运转中获利最大——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的精英为新式自然科学开辟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他们被允许去寻找证据，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意大利的教皇法庭在1633年觉得有必要胁迫伽利略，让他闭嘴时，英格兰的统治者们却在1687年很放心地容忍牛顿发表他的《数学原理》。

西北欧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把自然界的力学模型扩展到社会秩序中，他们将政治看作一种机械结构，探索哪些类型的机器在其中运行最佳。但直到1700年，新思想对“旧政”的质疑仍然非常有限。甚至连约翰·洛克[15]在其《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的著名主张——因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要求废除王权、贵族政治或英国国教，而在1688年，英国精英并不是靠废除了“旧政”，而是靠妥协，才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把君主羁绊在宪法的大网之中。

对于阿格拉里亚最持久的挑战始于法国。“我们必须检查并搅乱一切，毫无例外也无须谨慎，”1751年，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如此写道，“我们必须把一切旧式愚蠢行径踩在脚下，推翻那些非理性设置的障碍。”伏尔泰在被流放瑞士期间正是这样做的，他公开谴责教堂和国王的特权，为其贴上“败类”的标签，然而勇敢激进如伏尔泰，尚未一并否认阿格拉里亚的皇权和神权基础。他坚称，结束这些丑行的方法不是把法国建成一个共和国，而是向中国学习。他声称欧洲人会看到中国的乾隆皇帝才是一位真正的明君，与倾向于理性而非迷信的儒家文官共商治国之道。

起初，18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与启蒙运动批评家的合作，就像古代皇帝驯服轴心时代思想之最令人不安的暗示一样顺利。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勉强承认：“哲学家应该是全世界的老师，也是王公们的老师，”但他补充说，“他们必须用逻辑思考，我们必须按逻辑行事。”18世纪的国王们自认为是开明的君主，他们以“旧政”的眼光来看待新思想，就像第三章中提到的顿悟人生的农民克莱因乔戈一样。

直到18世纪下半叶，“旧政”本身才受到了真正的压力。1762年，当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宣称，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普遍意志”

时，他仍然是个离经叛道者（尽管他是个著名的文人），不仅被他的故乡日内瓦，也被法国和伯尔尼城邦流放在外。但仅仅25年后，美国的国父们——深深沉浸在大西洋新经济中的人们——就已经远远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认定自己可以用“我们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或国王的名义，来书写他们的新宪法。在那之后不过两年，在法国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1789）的资产阶级绅士便直截了当地声称：“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达。”

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变得与古希腊发明民主的人一样激进，但当化石燃料的能量遍布整个北大西洋世界之时，对“旧政”的挑战就真正开始了。到19世纪中期，那些重新组织、看起来很像图4.7所示结构的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回报，适合这一无界结构的价值观亦盛行一时。到19世纪60年代，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一个世纪之后，在最工业化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发生了转向。精英们逐渐认识到，基于普遍意志而非传统或神授的政治权力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他们发现，在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社群中，普遍意志真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威唯一安全的存在基础。

20世纪第一个10年，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之后，普遍意志已经打败了几乎所有敌对的政治权威。“民主，”哲学家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7]指出，如今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访者告诉民意调查人，他们更喜欢民主，胜过其他任何政治体系。200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全世界有80%的人支持民主，这一比率在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上几无差别（图4.10）。单就“民主”的含义尚有很大的辩论空间，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可能是大部分世界），它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森严的政治等级是邪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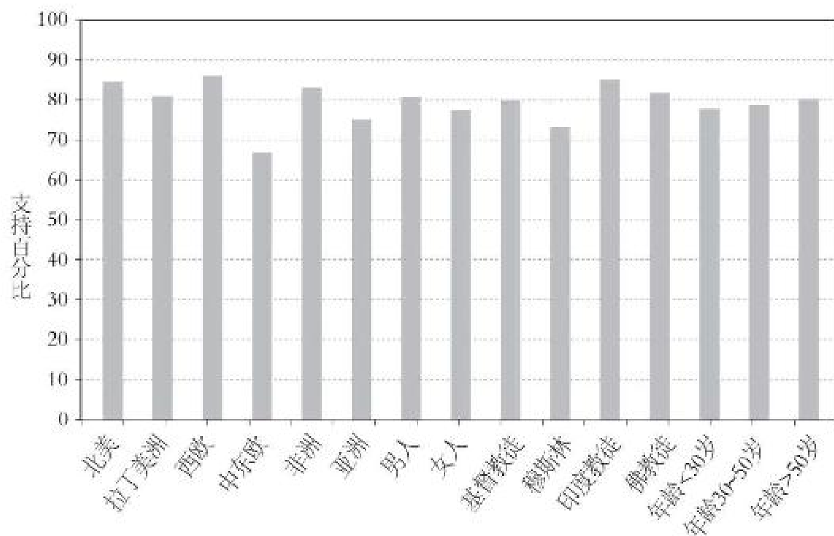


图**4.10** 历史的终点？

对民主的支持率一贯很高，从66%~86%不等，无论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的差别（2007年调查数据）。

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共同持有的对政治等级制度最极端的批评认为，适宜的因达斯特里亚完全不需要统治者。早在1794年，美国的自由主义就已足够强大，认为“政府本身将会毫无用处，而社会则会继续存在，因摆脱枷锁而愈加繁荣”，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觉得他必须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免受这种观念的危害。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恩格斯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政治精英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废除政府。法西斯主义者更是一意孤行，把个人崇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此乔治·奥威尔发明过一个著名的标签：“双想”（doublethink）。通过造就史上最森严的政治等级，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自由路径声称，这样做真的可以消除政治等级。

这些对于普遍意志的独创诠释没有一个是长期可行的。1956年，斯大林去世后仅仅三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便公开谴责个人崇拜。5年后，他试图玩个新花招，提议说苏联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而党就是普遍意志的具体表现。

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处于劣势，这一次是输给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自由论观点。例如，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19]在其影响广泛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建议自由意志主义者：“一个权力仅限于履行契约和保护人民免受武力、盗窃和诈欺所害的最小限度国家是合乎情理的。任何权限更大的国家，”他认为，“都违反了个人不能被迫行事的人权，因而是不正当的”；但没有国家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然而，国家虽然不会自行消失，化石燃料对于森严的政治等级和逞能者的态度还是要更接近于觅食者而非农耕者的观念。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即使民主也必然会产生隶属于固化政治特权阶级的强权精英，但由普通人组成政府、而不是天生统治阶级的观念一贯是民主主义者偏爱的视角。

这些观念之间的斗争可以回溯到现代民主的早期。18世纪80年代，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果必须和“无以复加的无知和堕落，不可一世的顽固和狂妄”之人分享权力，他一定会大惊失色，这倒不足为奇，但就连大平等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承认，他相信只有一个“拥有天赋的才智和美德”的精英小集团才可以“在通才教育之下变成杰出之人，有能力保卫同胞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然而在第一任总统的人选上，美国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天生统治阶级的绝对化身，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对任何形式的实际统治都毫无兴趣。1783年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之时，华盛顿向国会交出了佩剑，宣誓“从此以后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1789年，他勉强暂停闲适的退休生活，出来接受总统的职务，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期满后——一位仰慕者将华盛顿比喻成骄傲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20]，他终于可以得体地“带着满足和快乐回到乡间，继续不受约束的平静劳作生活”，便毫不犹豫地辞官归田了。

华盛顿时代以来，很多美国政治家声明以他为榜样不再恋栈，但也有一些人采取的做法有些细微差别，他们坚称尽管自己显然属于特权精英，但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巨大财富（如1992年的罗斯·佩罗[21]），身处政治王朝（如2000年的乔治·W·布什），甚或两者兼有（如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都无法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声言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这些由于大众不信任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迫使总统候选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有一个副作用（当然并非刻意为之），便是顺从观念的崩溃。1998年，世上最有权力的人比尔·克林顿在一场婚外风流之后几乎被赶下总统的职位；2011年，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22]在被《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第6位之后仅仅一年，就因涉嫌性侵一名饭店女服务生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上被赶下台。这些可不会发生在罗马皇帝身上。

在森严与浅表的等级制度间进行各种妥协作为化石燃料政策的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达斯特里亚似乎需要一个（以阿格拉里亚的标准来看）地位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富有阶层。一方面，拥有富裕中产和劳工阶层，从而为化石燃料经济所产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创造有效需求，是因达斯特里亚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阶层，这些人期望着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才能能够实现物质回报。作为回应，化石燃料价值观近两百年来发生了演变，变得有利于政府干预来减少贫富不均现象——但变化并不是太大。

根据1990年以来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人数变化不定，高值出现在1990年的67%，低值在2008年的58%，而最近的数字为66%（2011年）——希望财富的分配更加平均一些，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52%）、欧盟（60%）和印度（高达82%）的大多数人说，他们认为收入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人都认为经济不平等并非他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欧洲人和中国人将其排在第3位，印度人排在第5位，而美国人将其排在第12位。在被问及减少财富梯度的最佳方法是不是对富人征收更重的赋税时，美国人的意见分布相当平均，52%的人持肯定态度，45%的人持否定态度。至少从1999年以来，人们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当时有45%的人持肯定态度，51%的人持否定态度。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往往反映了更深刻的地区或党派分歧。2013年的调查发现，在欧盟内部，84%的希腊人认为贫富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只有50%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在美国，75%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对富人提高税赋，而只有26%的共和党人持此观点——尽管在2014年，几位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愿意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要想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和文化界就经济等级制度发生的骚动，一种方式是将其看作关于这一主题的论争：在涉及财富时，“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某些人强调机会的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交换，而不必过于在意利益的分配；但另一些人强调结果的平等，他们赞成监管市场行为，以免有人过于超前。大体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论者拥护机会的平等，担心监管会抑制自由（及经济成长）；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般拥护结果的平等，他们更担心为非作歹的富人会破坏自由（及经济成长）。

幸好，近两百年的可用证据十分丰富，我们可以详细追查在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上，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是如何作为两个伟大的试验来解读化石燃料价值观的。20世纪最重要的非自由政体——纳粹德国和苏联——都声称寻求经济结果的平等，但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两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观念之间的紧张。纳粹——毕竟他们对自己正式的叫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强烈拥护结果的平等。“劳工阵线”[23]

的活跃分子强烈要求雇主提供带薪假期、工资协议以及均等的工资，威胁要把持不同意见者送到集中营。但这不能长久；甚至在1933年结束之前，党魁们就已经开始站在老板一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老板支持希特勒野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我们都是劳工的士兵”，同年11月，“劳工阵线”的新领导人在柏林的西门子工厂对工人们说，但“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从令如流。服从和责任都必须是有价值的”。工资在1934年便停滞不前了，接下来的10年，贫富差距高企难下。

社会主义国家跌入了同样的陷阱。面对1921年的大饥荒，列宁放弃了他的战时经济政策，开始鼓励生产。关于列宁对这一政策有多认真，一直众说纷纭；列宁在苏联政治局的同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坚称：“［‘新经济政策’］只是临时的偏离，是一次战术撤退，是为对抗国

际资本主义阵线发起一次全新和决定性的劳工阶级进攻铺平道路。”但列宁本人怀疑，“用资产阶级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尽人皆知。“店铺和商厦一夜间迅速出现，里面神秘地堆满了俄罗斯多年未见的精美货品，”1924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24]注意到，“面庞消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带着渴望的目光凝视着橱窗，谈论着这一伟大的奇迹。”几年后，斯大林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彻底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又是一场灾难。20世纪30年代，随着农业产量的下降，数百万人饥饿致死，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制造了黑市经济，工资和住房的差别继续扩大。苏联日益成为世上最不安定的社会，经济不振，但财富的等级差别变得更加荒唐。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新引进经济机会平等时，整个体系瞬间分崩离析。

在森严和浅表的财富等级之间寻求完美平衡，对自由政体也是一项挑战，但他们的试验却没有那么痛苦。在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叙述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5]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但是，如果将其推至逻辑的极端，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永远是错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指出：“从劳动所得中课税与强迫劳动不相上下”，是自由的因达斯特里亚的对立面。“强夺某人劳动的成果，”诺齐克解释道，“相当于夺走他的时间，并指挥他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人们强迫你在一段时间内去做某种工作，或是无报酬的工作，他们决定你该做什么，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而不由你自己决定。这……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你的主人；他们因此而拥有了对你的所有权。”卢梭更加直言不讳，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我相信奴隶们关心自己的收入远甚于自己的自由。”

然而，拒绝（以税赋的形式）从富人身上榨取强迫劳动，似乎常常意味着（以长时间工作挣取生活工资的形式）从穷人身上榨取另一种强迫劳动，而在整个19世纪，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欧洲占据了优势。在那个世纪末，很多政府同情新自由主义，断定利用国家力量来重新分配财富会产生更大的总成长。这一趋势在“一战”后有所上升，“大萧条”时期更加快了速度，最终在1945年后被奉为准则，产生了各种自由主义的“新政”。1942年，英国政治家威廉·贝弗里奇[26]预言，战后政府的任务将是让世界“尽人类力量之所能，摆脱匮乏、疾病、愚昧、卑劣和懒惰这五大罪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就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消灭这五大罪恶”——同时还要记住，贝弗里奇补充道，“个人高于国家，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这个计划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玩些复杂的小把戏，“战”后的自由经验表明，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矛盾，世上根本没有一体适用的完美解决方案。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演变也反映了这一矛盾，认可了程度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财富等级制度。这里“低”和“过低”的真实含义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相对于富有但增长缓慢的经济体，

在贫困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人们更能够容忍森严的财富等级存在。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从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投票人对待财政保守主义的热情来看，0.25左右的税后基尼系数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可能过低了，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从很多同样的国家对于最富有的1%的普遍愤怒来看，超过0.35的基尼系数可能又过高了。相反，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印度，人们牢骚满腹，但到目前为止还能容忍持续的高分（2009年为0.50）。

和这些对待经济等级制度的复杂态度相比，化石燃料社会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似乎就要直白得多。近至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自觉激进地写下“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没有一个奴隶像一个妻子那样是竭尽一切所能的奴隶，是体现了‘奴隶’这个字眼的全部含意的奴隶”。但从那时起，阿格拉里亚的态度就完全崩溃了。2009年一次在16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6%的受访者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这一回应的国别差距不大，从印度的60%到英国和墨西哥的98%。伊斯兰国家处于这一分布的顶端。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法律保护通常较弱（例如埃及在2014年才通过了一部定义性骚扰的法律），仍有78%的伊朗人，91%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土耳其人，以及93%的巴勒斯坦地区居民认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81%的受访者赞成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性别平等，5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政府目前做得还不够。

跟自由社会比起来，非自由社会在性别等级问题上培养了更加极端的态度，共产主义者一般都会积极促进女性的平等。列宁在1920年指出，“琐碎的家务摧毁、压制、愚化和贬低了”女性。1959年，赫鲁晓夫确信，就女权而言，共产主义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你们想把妇女困在厨房里，”在著名的“厨房辩论”[27]中，他对理查德·尼克松说，但“我们不那样看待女人。我们认为她们更出色”。不用说，现实情况要混乱得多。20世纪20年代确定妇女权利的重要立法通过之后，斯大林在30年代又退回到鼓励生育的政策上；在赫鲁晓夫与尼克松摆好架势准备互攻之时，跟美国相比，的确有更多的苏联妻子们在外工作，但苏联妻子们做家务的时间通常也比美国的妻子们长（也比苏联丈夫们长得多）。而纳粹德国则走向反面，他们挑衅性地将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并坚称生育才是女人的本分。

起初，自由社会对于性别平等比较谨慎。前文提到过，1918年前，几乎没有哪个妇女有投票权，女性从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后才真正开始。1937年，当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为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时，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两种态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间更长：1977年，在被问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时，人们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总的来说，战后变化的速度异乎寻常。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会有喜剧演员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男女平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被贬称为bra burners，“烧胸罩的”）的笑话。然而到2005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28]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问说，男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层占多数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学术场合，大众也觉得难以接受。萨默斯指出，某些实验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认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围的分布范围比女性更广泛，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意味着男人更多地见于分布的两个极端。“这可能会刺激到你们，我的乐观估计，”他若有所思地说，

> 在科学和工程这个特例中有天分的问题，特别是资质的差异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会化和持续的歧视这两个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要是有人能证明这是错的，我当然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我当然最希望只要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由此导致的骚动显然影响了萨默斯发表这段讲话两个月后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纷纷表示对其领导能力没有信心；大概也影响到了萨默斯本人的决定，不到一年后，他辞去了哈佛校长的职务；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候选队伍，可能也是受此影响。

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以消除性别等级的名义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然而自1945年以来，想当然地因生理差别而区分男女两性的阵营显然大大缩水了，而且，我的分析类别中的最后一个——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数几个承认男女两性有巨大差异还算是政治正确的行为领域之一。全世界范围的警方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参与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将近10倍。其解释尚存争议，但有可能是因为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男性中很常见，而在女性中就少见得多。因此，阿格拉里亚对于男性统治普遍持正面评价的突然崩塌与其对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随，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农耕者像觅食者一样暴力，那么，让阿格拉里亚运转顺畅的复杂劳动分工和长途贸易就无法发挥效用了。同理，如果人们还是像农业时代那样用暴力解决纠纷，因达斯特里亚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也是枉然。化石燃料社会有赖于极度和平，强制促成这种和平的列维坦们远比霍布斯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始建于1828年早期工业时代的伦敦，这可不是巧合）。一如既往，人们调整其价值观来反映他们生活其间的新现实。农业社会减少了合法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空间，而化石燃料群体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历史学家马丁·查德尔[29]认为在18世纪之前，“宿命论”一词准确地描

述了全世界对待暴力的普遍态度。反对暴力的人很多（特别是轴心时代的宗教领袖），大多数文明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做了细微的区别，且这种区别往往对其自身有利，但人们一致认为，合法权威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颇值得歌颂。直到18世纪，我们才看到这一价值观模式有了真正的突破，即使在那时，突破也仅限于欧洲及其北美殖民地。就在更多的人开始批评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之时，新的观念——战争是邪恶的，人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浮出水面，而18世纪90年代，在正处工业化期间的英国，一个和平协会公然宣称在原则上反对与法国开战。

随着因达斯特里亚是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这种观念逐渐普及，和平运动——例如对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的抗议——在19世纪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大量受过教育的欧洲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是畸形和不道德的；1899年，26个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而1919年，人们一度燃起了希望，满心指望国际联盟能够从此根除战争。接下来的25年是和平主义的艰难岁月，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学者们成立了思想库（1952年成立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以及1959年成立于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了期刊［1957年创刊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osolutio*）和1964年的《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将武力几无正义的论断奉为圭臬。

和平运动的学者们往往能辨认出被他们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人，这些人“并非排斥一切武装力量：他们允许防御性地使用军队保护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被他们称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更为教条主义的倡导者，这些人“无条件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鼓吹不抵抗”。在20世纪，绝对和平主义者相当罕见，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情况在21世纪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如今有许多人希望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完全拒绝暴力）。

2008~2010年，盖洛普公司就对个人和国家暴力的态度，在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进行了民意调查。69%的受访者声称自己在人际暴力方面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认为武力永远是不正义的，而只有13%的人说使用暴力有时是正确的（其他18%的人要么不予置评，要么说“得看情况”）。然而，对待国家暴力的态度就更加复杂了。在被问到是否可以接受政府在战时屠杀平民时，60%的人回答绝不接受，而21%说有时可以接受。2011年一次皮尤[30]的调查向西方人询问了一个更加笼统的问题，即政府是否有时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世界秩序，结果发现接受国家暴力的群众基础很大，德国有50%的人同意，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75%。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民意调查者发现西方人还是有所保留：大多数欧洲人（66%的法国，76%的德国）和45%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使用武力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

某些战略家的结论是，西方现在进入了一个“后英雄”时代，这个时

代的公民不再认为有任何国家目标重要到造成人员伤亡（无论是施还是受者）也在所不惜的地步。然而，与其说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后英雄主义完全避免杀戮，毋宁说它也跟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参与的冲突性质有关。一旦面对生存威胁，受访者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拥有核武器的民主从未选择哪一个保证单方面裁军的政党入主当政，200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至少有些人愿意考虑核战争。在被问及有没有哪些情况政府（或无核国家的盟国）可以合理地使用核武器时，70%的意大利人和77%的德国人回答“没有”，而只有49%的英国人、43%的法国人、40%的美国人和22%的以色列人持同样看法。人性从未像如今这样和平，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还不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世界。

阿西罗斯之后：塔利班枪击事件

我相信，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在1982年感受到的文化冲击。阿西罗斯至少还有一只脚留在了阿格拉里亚；而我生长于斯的英格兰中部地区自然不同，早在200年前，因达斯特里亚就在那里诞生了。

表4–1总结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表4–1是简化版，这一点我乐于承认，它简化了复杂得多的现实情况，当然会对现实有所扭曲，但我认为这张表格的确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道德体系截然不同。属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类别的人很难在道德问题上彼此认同。

表4–1 价值观的演变：觅食者、农耕者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理想类型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觅食者	农耕者	化石燃料使用者
政治不平等	高	低	高
贫富不均	高	低	中
性别不平等	中	低	高
暴力	中	中/高	高

图4.11更加精简，它进一步简化并无疑进一步扭曲了复杂的文化世界，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为表4–1补充第二个重要的论点。我们在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所有的价值体系均存在差异，而且还能看到某些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比其他的更大。把农业价值观与觅食者和化石燃料时代区隔开来的鸿沟，远大于觅食者价值观与化石燃料价值观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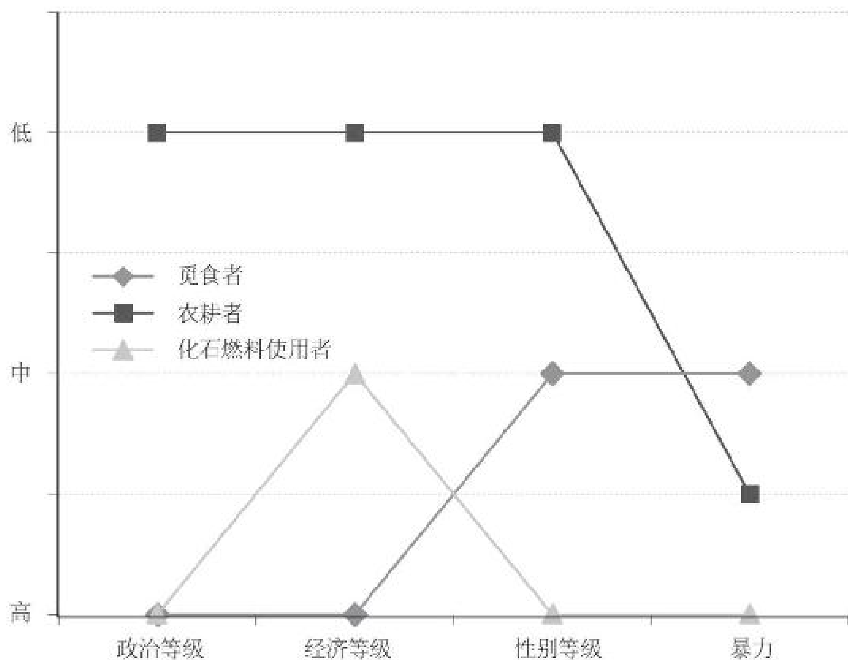


图4.11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以图形表示的价值观体系间的差异。

心理学教授想要测试其有关人脑如何工作的理论时，他们经常会组织自己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不过心理学家自己也经常承认，他们的学生都属于WEIRD群体。心理学术语WEIRD是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派（Democratic）的首字母缩写；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准备好适应因达斯特里亚的那些人（讽世者甚至会说，大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确保学生在毕业时体面地归属于WEIRD群体）。

讲授近代史近30年，我最有体会的事情之一便是，学生们往往会觉得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很难理解，遑论热爱。相反，在这些WEIRD年轻人看来，觅食者及其价值观倒是颇有魅力。当然，世事总有例外；觅食者的行为有时很像野蛮人，而像古雅典这样的贸易城邦却能引起共鸣，至少在我们开始讨论奴隶制和对妇女的压迫之前，大体如此。但总体而言，我们在《尼萨》（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所著的一位昆申人妇女的传记，在第二章提到过）一书中读到的那些觅食者很像我们会在监狱里碰到的人，而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31]中的人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外星球。

关于这一点，我在1996年有过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那是我在斯坦福任教第一年即将结束之时，我办了一次主题为古代和现代奴隶制的本科生研讨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得知几位学生的祖先——高祖（四世祖）或天祖（五世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曾是南方各州的奴隶主。

我的学生无一例外都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亲戚在道德方面落后于时代时，他们大都看上去不大自在，而且就这个问题闪烁其词。随着讨论的扩大，班里的其他学生也提出了他们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拥有奴隶的亲戚或许知道奴隶制是错的，因而他们都是伪君子。又或许奴隶制根本就没有错，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两种观点让同学们更不自在了。

课堂辩论本来就是学术性的，其结论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有时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会因为无法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而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2012年10月9日，就在我开始最终形成本书的系列讲座之前一个星期，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男人爬上一辆校车，问马拉拉·尤萨夫扎伊[32]是否在车上，然后拔出一把柯尔特45式手枪，对着这个16岁女孩的脸部扣动了扳机。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说马拉拉的罪行是：“亲西方，抨击塔利班，还说奥巴马总统是她理想的领导人。”当时尤萨夫扎伊并没有死，塔利班发誓要再次刺杀她（还要杀了她父亲）。

在我的普林斯顿讲座之后，这次枪击事件被讨论了好几次。对于因达斯特里亚的WEIRD归化居民（我怀疑世上没有比普林斯顿更WEIRD的地方了）来说，这次刺杀企图的唯一解释，似乎是塔利班对其深刻的道德缺失感到心虚。女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世界也需要受过教育的女人。尤萨夫扎伊的博客以及对塔利班禁止女孩上学的抗议，在那次袭击之前就已经让她成了一个女英雄。德斯蒙德·图图[33]大主教提名她为国际儿童和平奖的候选人，巴基斯坦致力于现代化的总理也授予她该国的国家青年和平奖。那次遇袭之后，尤萨夫扎伊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塔利班刺杀她的行为的确践踏了最高的道德。

然而塔利班的视角显然有云泥之别。他们关于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强硬版本强调女性要服从，人要尊重神灵认可的政治权威，以及使用暴力是正义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尤萨夫扎伊似乎才是那个践踏最高价值观的人。持这种看法的可不只塔利班：2014年4～6月期间，正当我完成本章写作之时，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34]，（豪萨[35]语名称，大意是“西方教育是邪恶的”）在尼日利亚绑架了逾250名女学生。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该组织的创始人说，其使命是拒绝民主和现代教育（尤其是进化论和地球是圆的这些思想），实施宗教法，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一个发言人说，被绑架的女孩们应该结婚而非上学，他还说，针对她们犯下的罪行，理应将其卖身为奴作为惩罚。

在第三章提到的阿格拉里亚世界中，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很极端，乃至误入了歧途，却并非邪恶组织。一万年来，农业社会经常使用暴力来制止或惩罚对神圣秩序的公然对抗，其中很多可要比尤萨夫扎伊的行为轻得多。就连开明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罪行是腐蚀年轻人和信仰本城不信仰的神灵。博科圣地和塔利班依照阿格拉里亚的规则行事，并依照相应的规则来解释公正、尊重和正派等经过生物演化的人类价值观。关于应该暴力惩罚想上学的女孩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道德败坏的心虚，但他们的确落后于时代了——

就像乔治先生一样，只不过乔治先生要温和得多。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需要塔利班式价值观的时代如今早已逝去。近两百年来，坚持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社会几近灭绝，随着工业化的无情扩张，最后的抵抗者也会消亡。WEIRD将继承这个世界。

我希望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能够解释我在1982年在阿西罗斯遭遇的文化冲击的，是自冰河期以来人类价值观的剧烈演变，推动这种演变的并不是生物变化（动物人在近15 000年来实际发生的变化很小），而是人类的能量获取体系的演变以及这些体系所要求的社会组织类型。不过，我还没有解释为何会发生这种能量、组织和价值观的剧烈共同演变，也没有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随着能量获取体系和组织结构的持续演变，人类价值观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一章会讨论这些问题。

[1]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编者注

[2]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影响深远。

[3]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

[4] 杰里米·格林伍德（Jeremy Greenwood），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5] 阿南特·塞沙德里（Ananth Seshadri），印裔美国经济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教授。

[6] 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Mehmet Yorukoglu），土耳其中央银行经济学家。

[7] 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1960— ），北得克萨斯大学军事史教授。他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从法国大革命到当前的现当代军事史。

[8] 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1954—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在现代世界的宗教性质和宗教与政治的联系方面颇有著述。

[9] 托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sborough，1610—1648），英国内战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议会派）新模范军成员之间关于国会组成的普特尼辩论的主要发言人。

[10]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犹太人法理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

[11]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1953— ），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职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发展和贫富不均。

[12]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效益主义和动物权利的人之一。

[13] 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2—1991），出生于波兰华沙的美国籍犹太裔小说家，使用意第绪语写作，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深刻描绘了波兰和美国的犹太人生活。

[14]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一个灭绝营，位于当时德战区波兰境内。

[15]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689～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论》是其最重要的政治论文。

[16]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博学家、法学家、数学家、启蒙哲学家。

[17]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印度裔经济学家，以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

[1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军人、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以及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

[19]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是当代英语国家哲学界的重要人物，对政治哲学、决策论和知识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在1974年撰写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

[20] 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公元前519—前430），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其事迹在古罗马广为传颂。公元前458年，时任执政官的米努基乌斯所统率的罗马军队遭到意大利埃奎人的包围，退隐务农的他临危受命担任罗马独裁官，以保卫罗马。退敌16天后，他辞职返回农庄。

[21] 罗斯·佩罗（Ross Perot，1930— ），美国商人，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父亲是专门从事棉花合约的商品经纪人。2012年佩罗的身家估计有35亿美元，被《福布斯》列为美国富豪榜第134名。他曾经在1992年和1996年两次参加总统竞选，虽然最终败选，但取得了历来第三党最多的普选票。

[22]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1949— ），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党党员。曾任法国财政部长。他在2007年9月28日获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23] “劳工阵线”（Labor Front），纳粹德国取缔魏玛共和国的自由工会后创立的官方工会组织，它是一个雇主和工人的统一联盟，也是纳粹的统一工会组织。

[24] 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政治行动主义、写作与演说著称。她在20世纪前半叶北美与欧洲的无政府政治哲学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25]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26] 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著名的进步论者和社会改革家，福利国家的理论建构者之一。

[27] “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指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该论战是在厨房的背景前进行的。

[28] 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1954— ），美国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因为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并且在2001～2006年成为哈佛大学的第27任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曾经引发三次政治争议，导致公众向哈佛大学施压，最后他被迫辞职。

[29] 马丁·查德尔（Martin Ceadel），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现为牛津大学新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战争预防的政治，特别是有关英国的部分。

[30] 皮尤，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的一家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

[31] 《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11世纪法国重量级史诗，作者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失传，目前流传下来众多版本。

[32] 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1997— ），巴基斯坦的一位以争取女性教育而闻名的活动家。她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3]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南非开普敦圣公会的前任大主教，也是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34] 博科圣地（Boko Haram），前正式名称为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是一个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有着尼日利亚的“塔利班”之称。他们的目标是主张在尼日利亚全国推行伊斯兰教法，成为哈里发国的一部分。

[35] 豪萨（Hausa），西非萨赫勒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东南部。他们使用属于乍得语族的豪萨语，一般信仰伊斯兰教。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红皇后效应

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试图讲述自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时间点以来，横跨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的故事。我提出，现代人类的价值观初现于大约10万（±5万年）年前，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所引发的，而一旦我们拥有了体大而敏锐的人脑，文化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文化的演变，人类的价值观在近两万年迅速变异，近两百年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我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属于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社会。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

我认为，绝大多数觅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体中，他们一般都认为政治等级和贫富不均是邪恶的。他们更能容忍性别等级，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对暴力有惊人的忍耐力。农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认为森严的政治、财富和性别等级无可指责。但相对于觅食者，他们比较不能容忍人际间的暴力，并将合法使用暴力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者但低于农耕者。

本章结束之后我会把书交给回应者，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提出价值观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接近的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价值观体系对应一种能量获取方式，但现在，我想再提出三个问题，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首先，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其次，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最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我在第一章里引述过博物学家E·O·威尔逊的建议："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现在我想指出，正是为了威尔逊所谓的生物化，我们才应该寻求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威尔逊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里，敦促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撰写一部地球社会物种

目录，从另一个星球前来拜访的动物学家”。他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缩减为生物学的各个专业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都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案；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历史和道德哲学都成了生物学的二级学科。

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著名定义是“后代渐变”，一个半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已经能够探究到细胞内部，来解释驱动一切的机制。巨量基因信息的遗传过程总会产生少量的随机变异。其中大多数无关痛痒；某些是绝对有害的，受体很难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但少数变异则是有益的，遗传到这些变异的生物更可能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通常是很长时间）的流逝，生物间在能量和配偶上展开竞争将意味着高适应性的变异会在基因库中扩散。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日益繁盛，逐渐取代那些适应力较差的。不过反馈过程也同时进行着，因而通过进化更加适应其环境的物种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有时会让它们的进化产生相反的效果。

某些生物学家管这种现象叫作“红皇后效应”，得名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小说中的红皇后把爱丽丝带到一个乡下的疯狂比赛中去。她们跑啊跑，“跑得那么快，好像脚不沾地地在空中滑翔”，卡罗尔说，但随后爱丽丝发现，她们好像一直待在同一棵树下没有移动。“在我们的国度，”爱丽丝告诉皇后，“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皇后震惊之下向爱丽丝解释说：“在这儿，你听我说，你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学家有时会把这种红皇后效应提升为一种进化原则。生物学家发现，如果狐狸经过进化跑得更快，就能抓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活到繁殖的那一刻，然后产下跑得更快的新一代兔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速度最快的狐狸才能抓到足够的兔子，让自身茁壮成长，传递基因。它们都在跑，但两个物种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红皇后效应确实存在，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其效果相当不同。狐狸和兔子不仅要彼此互动，还要和它们所在的整个环境互动。虽说它们可能还待在起跑时的同一棵树下，但树可不再是原来那棵树了：狐狸和兔子之间的赛跑把树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妨抛弃这个现在看来很牵强的比喻，换个更有哲学意味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参加红皇后赛跑的那些物种永远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还有来添乱的：进化竞赛还可能受到外力的极大影响。

我贯穿本书的假设是，通过道德体系和（社会、智力及体力）环境间的往复互动，加之以外部冲击，我们价值观的变化方式近似于基因的变化。狐狸和兔子的赛跑在就性别、求偶和捕食展开的数百万小型生物竞争中上演，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经过数千世代后，即可

使动物本身发生巨大的变化，同理，由于个体能够主观决定是非善恶，价值观与环境之间的竞赛也在数十亿的小型文化竞争中上演。还是同理，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就能够产生文化的巨大变化，但这一次，结果有时只需区区几十年就能显现出来，而无须数千年的漫漫征程。

在本章接下来的篇幅，我会考察从觅食到农业价值观以及从农业到化石燃料价值观的各个变体，继而对所得结论进行外推，来试着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即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又意味着什么）。

“漫长的夏天”与幸运纬度带

我在第三章中指出，动植物驯化最重要的结果是，驯化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能量（虽说这需要人类付出更加辛苦的劳动），而人类随后将很多额外获得的能量转化成了更多的人口。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更加阶层化的组织日益胜出，从而使得阶层化较强的社会战胜并取代了阶层化较弱的社会，在这种新式社会中，那些将公平、公正等概念解释成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制度为善，而通过暴力来解决纷争为恶（除非一个天神般的统治者另有说法）的人，会比不做此解释的人更加兴旺繁盛。

马歇尔·萨林斯在其经典文章《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人们为何选择放弃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换得农耕的束缚和苦役——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称这种选择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1]最近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把农业革命称作“史上最大的骗局”。但进化论者罗伯特·博伊德、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贝廷格认为，我们应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设计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问的是：“农业在更新世期间是否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在全新世期间却是必需的？”我猜这是最有意义的提问方式：从觅食到农耕的转变并非历史的必然——但凡涉及人类，没有什么不可避免，但有利于农耕的或然性累积得太多，以至于这件事不发生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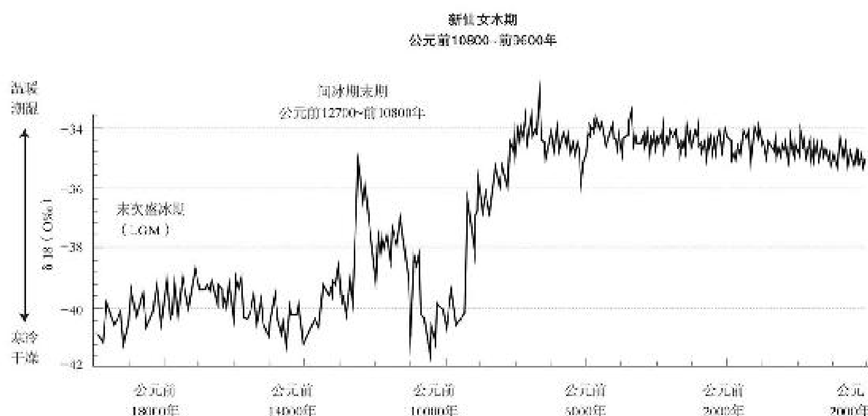


图5.1 全球变暖

近两万年来的温度变化，以极地冰盖中取得的氧同位素重建。

人类开始从事农耕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以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断偏移，公元前14000年后，温度开始上升（尽管有时会反复无常），因为地球轨道的微小倾斜和摆动会产生突如其来的温度骤升或骤降（图5.1）。到公元前12700年，温度接近了现代的水平，通过某些计算得知，温度在短短30年内上升了5°F（华氏度）[2]。冰川融化，大片的低洼平原——包括如今的波斯湾和黑海——沉没于水下。然而，每隔几个世纪的温暖潮湿气候之后便是数个世纪的冰天雪地，公元前10800年前后，一个真正的小冰河期（专家称之为新仙女木期）开始了，把世界带回到一个长达12个世纪的冰河时期。但在其结束之时，世界迅速（“迅速”是以地质学标准来看的这一过程实际延续了两千年）升温，温度甚至比我们如今业已习惯的还要高。正如图5.1所示，公元前9600年以来，气候出现了大量波动，但从未再有过新仙女木期那样的气候。将近12 0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3]所称的“漫长的夏天”里。

漫长的夏天是发明农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就充分性而言，还需要第二个条件：我们。在大约13.5万年前、24万年前和32万年前，冰河期内出现了几个温暖潮湿的中断期（地质学家称其为间冰段），但这些阶段并没有农耕出现，盖因那时真正的现代智人还远未出世。相反，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引发了大致相同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随着世界变暖，植物对太阳能增加的反应是疯狂地繁殖；动物继而对植物的丰足做出反应，它们以植物为食，也开始大量繁殖；人类的近代物种周围有这么多植物和其他动物，看来很容易一饱口腹之欲，其结果也不难揣测。但随着各个动植物物种的数量不断飙升，超过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数量时，种群就崩溃了，永远如此。

在漫长的夏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冷的时间点，地球上只有大约50万人；一万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000

年），有600万人；如今又过去了一万年，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了70亿。打破了繁荣与萧条的人口周期的是漫长的夏天加上现代人类，这使得农耕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某些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在中国到地中海和秘鲁到墨西哥这条地带——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书中称其为“幸运纬度带”——气候和生态共同作用，有利于大粒草类（如野生小麦、大麦和稻米等）和大型多肉动物（如野羊、牛和猪等）的进化。在此处狩猎和采集所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人口因此暴增。

在幸运纬度带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约旦河谷），采摘的收获如此丰饶，以至于觅食游群可以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几乎整年靠一个单一幸运地点周围所产的野生食物为生，有些年头只需待在那里就完全可以填饱肚子。现代人类并非唯一一个能够根据食物的丰足或短缺改变其机动模式的物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有在像我们这样聪明多智的动物进化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下来，更密集地利用村落周边的动植物，有选择地耕种和照管它们，人类无意识地（且非常缓慢地）施加了选择压力，改变了食源的基因结构。

驯化的过程最初发生在幸运纬度带，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比（举例来说）西伯利亚或撒哈拉的人更聪明或更有活力，而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幸运纬度带是可驯化动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地球上各处的人类大体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驯化首先发生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图5.2 第五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出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有力地证明了这一

点。戴蒙德发现，世界上有差不多20万种植物，但人类能吃的只有大约2 000种，其中约有200种有望被驯化。在种子重量至少有10毫克的56种可驯化植物中，有50种的野生祖先原产自幸运纬度带，产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共只有6种。在20世纪科技发达之前，人类能够驯化的体重高于100磅的哺乳动物有14种，其中9种是幸运纬度带的土著。

如此说来，驯化始于幸运纬度带就毫不奇怪了，而在幸运纬度带之内，驯化似乎首次发生在西南亚这一被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的地区（前文第三章中提到过）也同样不足为奇，那里的可驯化生物分布最为集中（图5.3和5.4）。牛、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和燕麦的野生祖先全都是在这里进化的。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标志（异常大的种子和动物的进化，考古学家通常称其为培育）于公元前9500～前9000年之间出现在侧翼丘陵地区，而成熟的驯化始见于公元前75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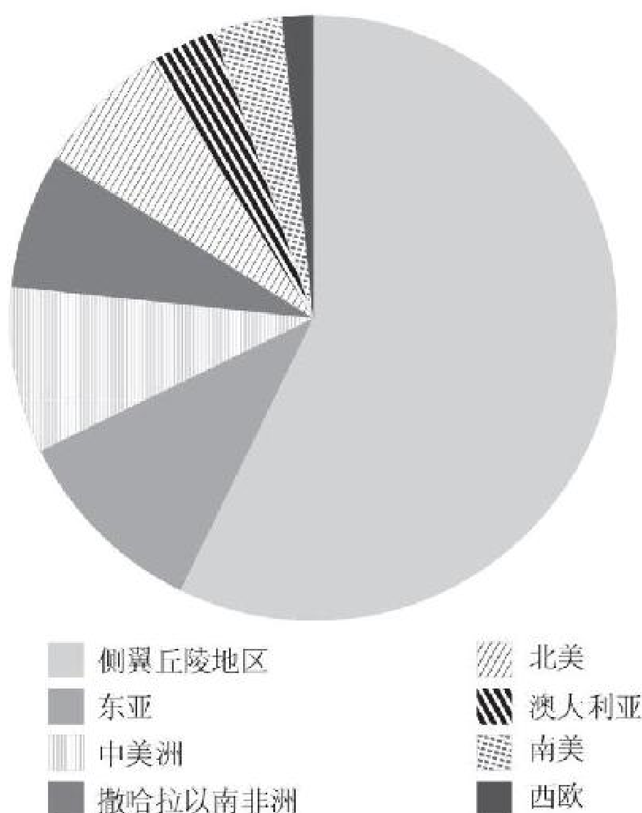


图5.3 种子至少重达10毫克的有望驯化的野生植物分布图

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地区在当时也有高度集中的可驯化动植物，但集中程度不如侧翼丘陵地区。在黄河与长江之间，水稻在公元前7500年已经开始培育，而驯化的时间是公元前5500年之前。在其后的1 000年里，小米和猪也在那里得到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绵羊和山羊的培育和驯化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时间表。到公元前6500年，南瓜、花

生和大刍草[4]在墨西哥得到培育，并于公元前3250年之前驯化，而藜麦、美洲骆和羊驼的培育和驯化时间分别为公元前6500年和公元前2750年之前，地点在秘鲁。有驯化潜力的生物分布的密度与驯化开始的时间之间的吻合度几乎分毫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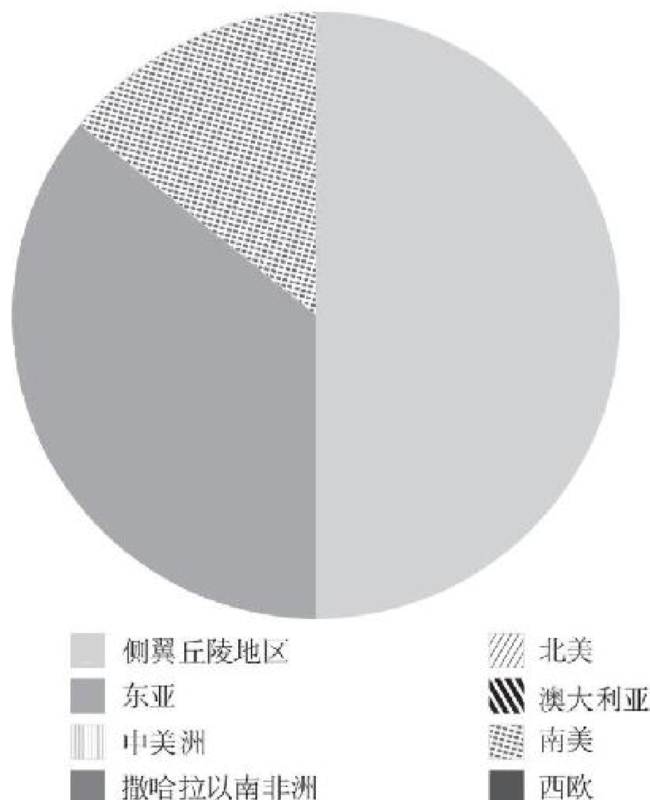


图5.4 体重高于100磅的可驯化哺乳动物分布图

正是这种吻合度才使得萨林斯的问题（人类为何选择农耕的束缚和苦役，而放弃了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显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博伊德等人的改述（问题变成了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之前是否根本不可能，而在那以后却是必需的？）则直击要害。第一批农耕者和我们一样拥有自由意志。随着家庭规模的增长，其可用资源日渐饱和。当原始富裕社会要填饱的肚子越来越多时，他们完全可能直视着孩子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动植物。据我们所知，一万年前，约旦河谷的某些觅食者正是这么做的。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每个家庭每年都必须就该劳作还是挨饿的问题做好多次决定。最重要的是，每当有一个家庭选择加倍努力管理动植物，其他人坚持走老路的收益就会少一点儿。每当有培育者开始认定其花时间关注照看的动植物是他们私人的菜园和畜群，而非大家共有之时，对因循守旧者而言，狩猎和采集就愈加艰难。

顽固和/或英勇地维护旧生活方式的觅食者注定灭亡，因为命运朝着背离他们的方向日益倾斜。

实际上，即使有选择，人们也很少有机会遭遇萨林斯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公元前6000年左右，如果约旦河谷的农耕者抛下耕犁说走就走，他不会跨过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进入觅食者的地盘。相反，他多半会遇上一些精耕细作程度比他差一点儿的人（也许只会锄地而不是犁地施肥），接着又是程度更差的人（也许只是在森林烧荒，在杂草重新占领这块土地之前耕种几日，又继续找下一块地烧荒），最后才会遇到完全仰仗狩猎和采集的人。观念和人始终在广阔的灰色地带摇摆不定。

当人们发现更加勤劳的邻居正在猎杀自己的觅食者生活方式所赖以维系的野生动植物时，他们要么会与这些破坏者展开战斗，要么逃走，要么加入该群体，加强自己的培育工作。人们并没有选择农耕，放弃觅食，而实际上只是决定少花点儿时间狩猎和采集，多花一点儿时间园耕和放牧。后来，他们或许会面对是否要开始除杂草，然后是犁地，再然后是施肥等抉择，但这是婴儿的一串蹒跚学步，而不是一劳永逸式的大跃进，从原始富裕社会一步跨到累断了腰的辛苦劳作和疾病缠身。

总而言之，纵贯数百年，绵延数千里，辛勤劳作的人子孙兴旺；而固守老路子的人却日渐凋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阵线”缓慢向前推进。没有人会选择等级制度和终日辛劳；这些都是悄然降临的。

这一模式在史前最大的例外（本书第二章里提到过的日本绳文时代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富裕觅食者）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则。农业迅速向前推进，穿过中欧和东北亚的平原，直达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和日本海岸（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不到50英里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地点，农业的推进停滞了1 000多年。日本和波罗的海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觅食者实在没有必要辛勤劳作和培育动植物，一旦园耕者试图强行闯入这些狩猎—采集者的乐园，用农田和篱笆来隔断这里的丰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勇猛善战的原住民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情况特殊，农业的浪潮最终还是战胜了阻力继续推进，直到最后，在地球上每一个农业可以获利的角落，都能见到农耕者的身影。因此，我的结论是：从以觅食的方式转变成以农耕的方式获取能量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世界变暖，现代人类进化成功，这一转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海洋城邦与科技革命

那种促成了由觅食向农耕转变的进化竞争力量，很可能继续作用于农耕者，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力求获取更多能量，最终触及农业

体制内所达到的上限。农业因而继续演变，呈现的方式是在数百世代的时间里展开数百万次文化竞争。一旦某个地区开始了培育，驯化的农作物要完全取代野生植物，或者吓人的野生动物完全变异为可爱的农场家畜，通常需要两千年左右。接下来，农夫还需要至少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精炼和改造，创造适宜的农业生活，诸如豆类与谷类轮种来补充土壤养分，加工谷类去除杂质，以及给牛或水牛上挽具来犁地拉车，等等。

图5.5显示了8个主要地区的模型。农耕在其中一个地区完全成型之后，农耕者一般大概需要4 000年来创建城市、政府和文字，向阿格拉里亚过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再过1 000年，这些早期阶段演变为成熟的帝国（这里简单定义为领土远大于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而它们从帝国发展成工业化国家还需要两千年的时间。

各个地区的发展过程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叙事总是大致相同的。大多数农耕者都停留在阿格拉里亚，因为每过一年，总有更多一些野生植物被栽培在耕田里，更多一些土地经历了除草、锄地、犁地、灌溉和施肥。食物供应量不断增加，人类在面对大量食物时的反应跟其他所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把额外的热量变成了更多的自己。不过人类确有其他动物不可能做出的举动：他们重构了社群，创立了能够维系数百、数千，乃至百万规模群体的中央集权。在整个幸运纬度带，人们都走向了阿格拉里亚，这倒未必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是因为另一条道路都被邻近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碾压殆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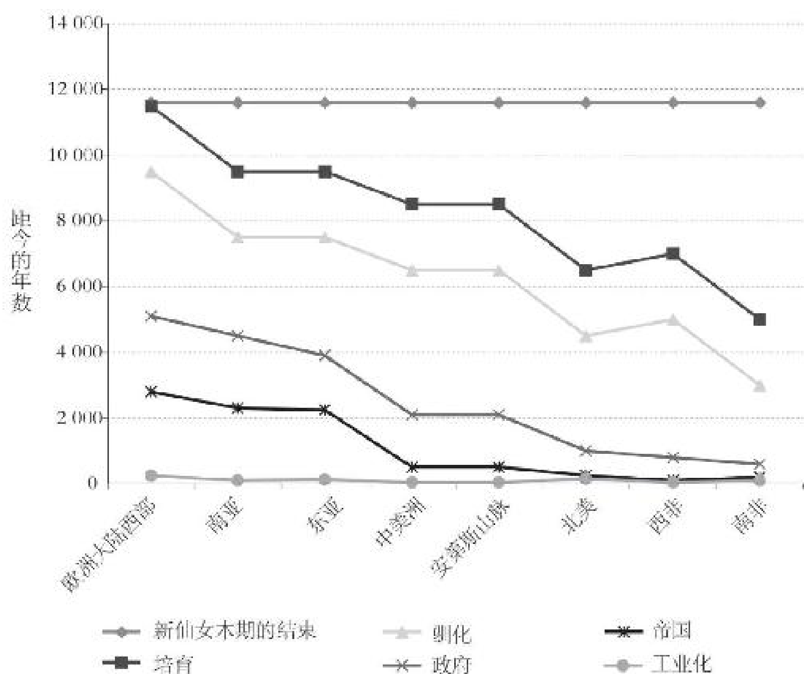


图5.5 时间表

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培育开始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密度，而培育一旦开始，一直到公元1500年，各地都按照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发生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培育到驯化一般需要大约2 000年；从驯化到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成熟的阿格拉里亚社会）又需要3 500～4 000年时间；再过1 000年才可以从城市和国家发展成帝国（这里的简单定义是领土远大于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然后还要2 500年才能从帝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各条发展线之所以在图底趋于聚合，是因为公元1500年后，西欧人在征服新世界的过程中输出了帝国制度，在公元1800年后，西欧人又输出了化石燃料。请注意，纵坐标代表了距今的年数，而不是公元前的具体年份，区域之间的连线仅作视觉辅助之用，而不一定暗示各类做法在区域间传播扩散。

关于早期阿格拉里亚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乃是就我们拥有证据的几乎所有地区而言，将其黏合在一起的居然是宗教。自新仙女木期以降，最壮观的建筑物似乎总有宗教含义，世俗和宗教权威的标志经常相伴相随。如公元前9500年前后在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5]建造的宏伟神殿，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中国东北牛河梁建造的“女神庙”，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6]的巨石头像等；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东南亚的金字塔形建筑；乃至在宗教、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看来总是相互协调的苏美尔、中国商朝和玛雅城邦的早期文字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大概可以假设，随着人们从觅食走向农耕，他们想方设法解决如何利用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来建设规模更大、整合度更高的社会这种集体行动的问题，但在几乎所有地方，最有效的方案看来都是神圣王者的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解决方案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再一次看到了更高效的社会增加能量获取的过程，其扩大了人口规模，那又反过来迫使人们重新组织社会，从而在与经历着同一历程的邻居们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政治单位的规模跃升了一个量级（图5.6），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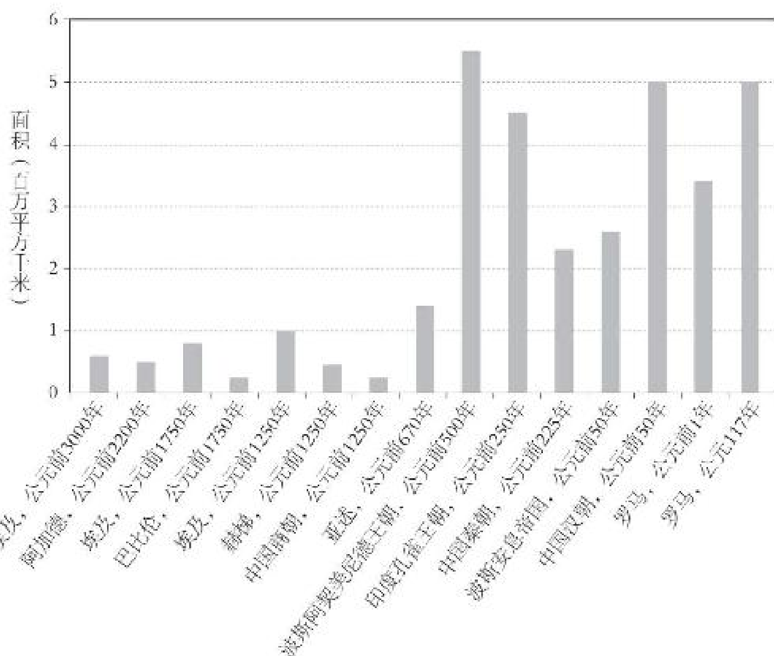


图5.6

公元前3000年～公元117年欧亚大陆各主要政治单位的规模（数据引自塔格佩拉，1978、1979，数据经小幅调整）。

第一个变化是组织上的。我们一而再地看到，不断成长的社会之间的竞争推动着权力来源从宗教权力向官僚政治和军事转变（始于西南亚的亚述人，南亚的难陀王朝[7]和孔雀王朝，以及东亚的秦朝和汉朝）。在这些帝国的间隙，活跃着一些规模较小也更贸易化的城邦（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腓尼基，恒河河谷的弗栗恃[8]氏族国，中国中原的春秋时期城邦），它们往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无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基本规则也能繁荣发展。所有这些间隙的文化最终都被帝国吞并，但在存续期间，它们往往是创新和发明的温床。具体来说，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第二个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也就是第三章中简要谈及的轴心思想的崛起。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口日渐拥挤、竞争愈演愈烈的那片山河，人们竭力寻找通向成功的新道路。我们首先看到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9]（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尝试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字记载足以让我们了解其他统治者是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亚述采纳并逐渐适应那种制度的。统治者、士兵和官僚们对该模式修修补补，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中国大陆上的楚国、齐国和秦国在公元前6世纪分别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最终秦国取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同一过程，直到孔雀王朝——另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王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摩诃婆罗多》称之为“鱼类法则”：在干旱季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我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论及，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欧亚大陆上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高端官僚制度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框架，使人们得以将能量的使用推到前化石燃料社会的最高水平。根据我的计算，能量获取的峰值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略高于30 000千卡/人/天，随后回落。距今1 000年前，中国的宋朝再度达到了同样的水平，随后又回落；大约300年前，中国清朝、西欧，可能也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三度达到这一水平。

这一水平恰是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绝对极限（图5.7）。罗马、宋朝、清朝、莫卧儿王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所处的境地与数千年前幸运纬度带的富裕觅食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后者的发展也达到了绝对极限。这些社会里的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但唯一能够突破这一绝对极限的方法便是革新能量获取的方式——对于觅食者而言，是添上农业，而对于农耕者来说，则是添上化石燃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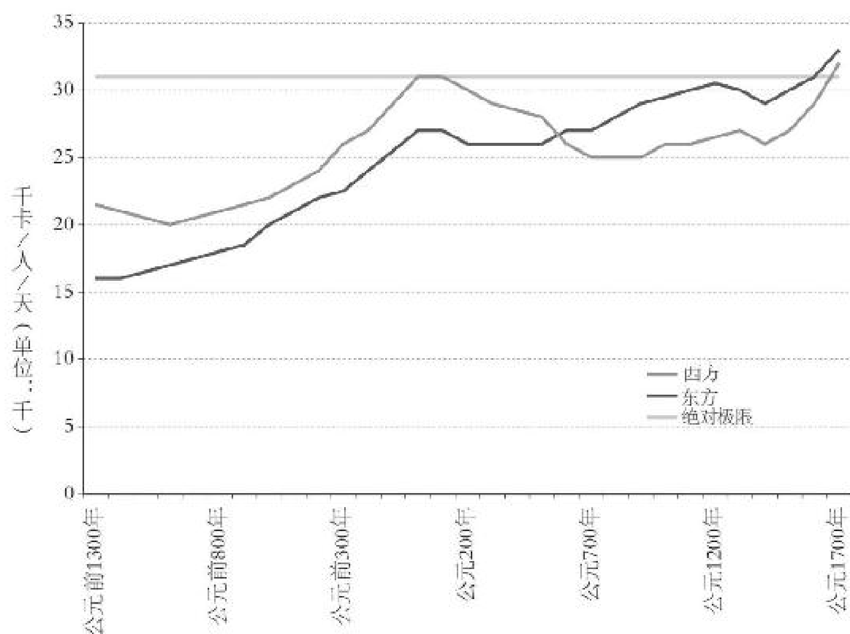


图5.7

公元前1300～公元1700年东西方人均每天能量获取以及限制农业发展的绝对极限（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有些学者完全接受了对史前社会变化的进化论解释，但他们往往回避应用相同的原则来探索较近代时期发展的终极原因，毕竟近代历史的资料详尽，我们对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以及化石燃料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取代农业价值观，与农业革命以及农业价值观能够取代觅食价值观，二者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这两例中，传统的行事方式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都在试图寻找新的方式。他们时常苦于找不到出路。成千上万的觅食社会未能驯化动植物；

只有区区几个做到了。同样，当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等农业社会达到其绝对极限时，大多数将能量获取推高到30 000千卡/人/天的社会都未能突破。

和农业社会一样，化石燃料社会是特定时间（公元1800年前后）在特定的地点（西北欧）实现的一次突破中脱颖而出。但为何始于彼时彼地，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1700年前后，西北欧的技术并未明显优于亚洲，而且，虽然当时欧洲的科学和数学领先，但亚洲人如果想占用那些科学进步的成果，很多都是现成的。比如中国的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就曾经跟随耶稣会修道士数学家学习，甚至学会了如何演奏大键琴。某些学者认为欧洲的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些人关注宗教、更广义的文化、气候或资源，还有些人认为，我们与其探究是什么推动了欧洲进入化石燃料时代，不如考察一下是什么阻碍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

在此前出版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曾论证了化石燃料社会之所以始于彼时彼地，其原因与觅食和农业社会始于各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原因相同：地理条件。从古代直到公元1400年，西北欧一直都在严酷的地理劣势中苦苦挣扎。那里距离真正的行动中心（地中海、中东及南亚和东亚）十分遥远，又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着浩瀚的大西洋，这些都是阻碍贸易的屏障。

但在能够横越大洋的船舰发明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船只大概在公元1200年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不过面对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商业船舰要想进行贸易往来，还要数个世纪的发展。然而到1400年，西欧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远洋航行船只，把狭窄得多的大西洋从障碍变成了高速公路。到1500年，欧洲人已经利用这条高速公路绕过非洲的底部，进入了印度洋，并且因为西欧距离美洲的距离比东亚近得多，因而1492年后，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发现、劫掠了美洲，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把新世界纳入以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中心的经济体。17世纪，北大西洋变成了一种“金发姑娘海”[10]，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大到足以让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态沿着它的非洲、欧洲和美洲沿岸蓬勃发展，小到足以让欧洲的船舰在其间奔忙，在每个地区赚取利润。历史学家称之为“三角贸易”网络，到1700年，大西洋经济已经成为史上最强大的创造财富的机器。

17世纪期间，西北欧利用大西洋周边的所有能源，把能量获取推高了10%，并且，就像雅典和威尼斯等海洋城邦在多个世纪之前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一样，能量红利至少放宽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限制。我在第三章讨论过1600年之后涌现的真正的“平等”运动，在第四章也提到18世纪政治革命。但公元1700年之后的西北欧与早期的城邦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只有18世纪的欧洲学会了开采化石燃料。

14世纪40年代后，黑死病导致1/3～1/2的人死亡，把土地—劳动力的比率变得对工人有利，整个欧洲普通人的收入都急剧上升，但在1500

年，人口的增长又促使工资回落（图5.8）。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到18世纪，南欧和西欧的农民常常赤贫如洗。但在西北欧，大西洋经济的成长速度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不仅让工资保持稳定，实际上在英格兰和荷兰还推高了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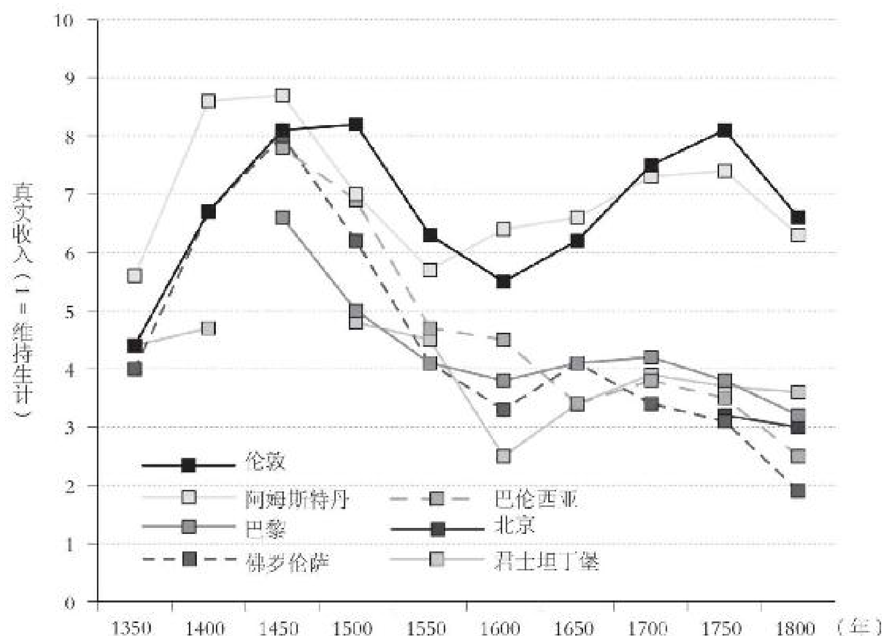


图5.8

公元1350～1800年几个欧洲城市和北京的平均真实收入趋势图（数据源自帕穆克，2007；艾伦及其他人等，2011）。

17和18世纪，全球市场的成长给所有的欧亚企业家带来了动力，刺激他们用廉价的机器动力来补充昂贵的人力劳动，从英格兰的兰开夏郡到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后来启动了化石燃料革命的那些基本技术已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不过西北欧（那里的工资非常高）的人们利用机器进行试验的动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强烈，其中动机最强的是英格兰人。1750年，英格兰的工资水平之高，使得那里的商品价格开始高于某些大陆市场。英格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就毫不奇怪了。不管在英格兰中部长大的人是否愿意承认，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企业家们——博尔顿、瓦特、特里维西克[11]、史蒂芬生等人——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印度，或中东人更聪明、更勇敢、更有想象力。只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形势对英国越来越有利。

将近12 000年前，西南亚的人发明了农业，几千年后，东亚人独立地再次发明了农业，又过了几千年，中南美洲的人第三次发明了农业，在那以后的1 000年里，农业又经历了多次改造。而当西北欧的人发明了化石燃料工业后，别处的人就无法独立发明这种工业了，因为化石燃料使得西北欧的人及其北美殖民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势力拓展到全

球。当时很多社会仍然生活在阿格拉里亚时代，他们对化石燃料社会的抵抗显得不堪一击。1850年，英国成为雄踞世界的巨人。

发生在公元1800年前后的化石燃料突破并非历史的必然，它也不是非发生在西北欧不可，就像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后实现突破并非必然，或是非要发生在西南亚不可。但不断上演的文化演变试验的确预示了两次能量获取方式的突破最终很有可能发生，而地理位置又意味着这些突破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恰恰就是其实际发生之处。同样，一旦发现了耕农和化石燃料，尽管人们并非一定会转而秉持最适于阿格拉里亚和因达斯特里亚的价值观，但那始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绝非必然，但或然率极高。

三个问题的答案

在本章开头我谈到，我希望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觅食到农耕，再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从而产生了我在第二章到第四章里讨论的价值观体系的大革命，我的答案是文化演变。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都是必然的，尽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也指出，其发生无限接近于历史的必然。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前两个答案对于未来一个世纪左右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思考这些问题，课本或许会指给我答案。所有的英国史课本都在1870年前后戛然而止。当时我（或者任何其他人）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但回想起来，1870年——我的高祖父那一代人正忙于像巨人一样雄踞世界之时——的确很适合为英国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现代英国的大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停留在1870年。在18和19世纪把英国推至全球霸主的同一股力量至今仍在起作用——提高能量获取、竞争、开放市场，还有最重要的，一下子缩短了世界的距离。

17和18世纪的远洋轮船使得英国成为大西洋经济体的中心，而将北美、西非和欧陆吸收为它的周边。在接下来的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和电报把世界进一步变小了，英国此前在北美的殖民地发生了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1903年，美国的GDP超过了英国；1913年，其人均工业产值也超过了英国。到20世纪中叶，旧时的大西洋经济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全球经济，美国则以其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直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这个全球经济的核心。

我虽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学里学习过历史，但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跟我保证说，他们的课本的确停留在1970年前后。在那个时间点收尾也很不错，因为美国当时也正在称霸世界，但美国当时的大问题是——现在也是如此——历史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停止的迹象，就像它没

有在1870年前后停止一样。比起此前的蒸汽轮船、火车和电报之于大西洋，集装箱运货船、喷气式飞机，乃至互联网更是把太平洋缩小成一个“内海”，东亚各国从美国核心的周边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同时也发生了自己的工业革命。很多分析师如今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第二个10年初超过美国（尽管它的人均GDP要赶超先进还需要数十年时间）。

这对于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一个流行的理论（至少在西方知识界很流行）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人们采纳曾在19和20世纪横扫欧美的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新闻记者詹姆斯·曼[12]称之为“平稳情境”：东方越富有，其价值观就越接近西方的价值观。自1945年以来，这显然是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真实现象。

然而，很多观察者（包括曼在内）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些批评家认为，亚洲四小龙的西方化与其说是工业化本身的逻辑结果，毋宁说与这些经济体都是美国主导的联盟成员有关。历史似乎表明，如果世界上有某个区域获得了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通常它也会拥有文化上的软实力，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化”实际上会随着美国军事和金融运势而起伏。毕竟，整个20世纪美国的实力与日俱增，鲜有美国人担心美国会被欧洲化，倒是有很多欧洲人抱怨他们的祖国变得美国化了。随着21世纪徐徐展开，或许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抱怨他们被中国化。

另外，还有一些人指出，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或许不是从西方称霸全球转变为东方主导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单一核心的网络。“在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不断成长的经济互通性正在建立优化治理的新规范，”政治经济学家希尔顿·鲁特[13]说，“而不是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汇聚于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会发展出一千种价值观体系，或者会出现一套混合价值观。中国哲学家蒋庆[14]认为，结合三院制议会的儒家思想新解读或许是一种普适的完美体制，而韩国思想家金荣沃（Young-oak Kim）和金桢圭（Jung-kyu Kim）则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可以复兴早已空洞的道德体系。

不过我在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论证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一辩论的参与者们通常称其为“西方式”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似乎更应被称为“化石燃料式”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最初兴起于北大西洋沿岸，因为那里是工业革命肇始之地，但撮要删繁地将其精简为特定的“欧美式”价值观可没什么道理，就像我们不能将农业价值观精简为“西南亚式”价值观，或将觅食价值观精简为“非洲式”价值观。因为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自由主义和民主才遍及全球；并且由于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最适于因达斯特里亚，世界各地的人们才会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它们。日本之所以未能充分实现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与其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经济停滞有很大关系；广大东亚社会之所以未能实现金融制度的自由化，也与其在1997～1998年的大危机有很大关系；印度社会更加自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很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巨大优势。

日本和中国崛起为经济大国是过去50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印度、巴西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分地区的兴起可能将是未来50年的一个重头戏。但在18世纪末始于西北欧的化石燃料革命这个宏大故事中，上述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最近的几个章节而已。现代人类觅食者用了大约6万年才从非洲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产生了狩猎—采集者社会及其价值观。农夫用了不到一万年的时间，从最初位于西南亚的农业核心（以及后来独立发明农业的各个中心）传播到每一个角落，产生了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工业社会很可能只需不到300年便可做到这一点，并在整个世界产生化石燃料社会及其价值观。1982年，当我遇见乔治先生的时候，希腊乡下的农业价值观已然江河日下；到2082年，农业价值观很可能会在地球上绝迹。

然而到那时候，地球上可能会兴起一场全新的能量获取革命。图5.9是我首先发表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的一幅图。在那本书中，我为东方和西方计算了自冰河期结束以来一般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张图显示了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假设在21世纪，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提升的速度与20世纪持平的话，情况将会如何。图中显示出东方逐渐跟上了西方的发展，并将在2103年超过西方。

就算是我自吹自擂吧，但这的确是一张很好的图解。其他优点暂且不提，这张图起码满足了优秀的预测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它非常精确，所以很容易判断我是否正确；其次，真等到有人能够判断时，我早就死了。当然，我的预测绝对有可能大错特错；任何人做出的任何预测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没有道理认为我是个例外。但还有可能既不错也不对，因为这张图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这两条线在横轴的什么位置交叉，而是它们在纵轴的哪一个点上遭遇彼此。就算在我极其保守的假设条件下，即20世纪的增长率会在整个21世纪一直延续下去，到2103年，东方和西方的发展分数也会双双超过5 000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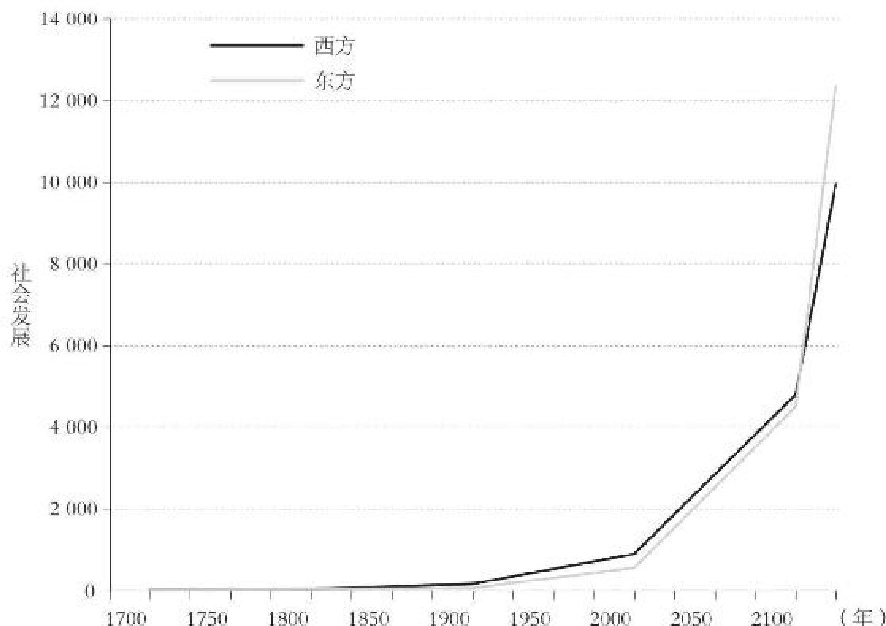


图**5.9** 未来的情况

对21世纪不断攀升的社会发展的保守预测（引自莫里斯，2010）。

从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画[15]到阁下阅读此书，社会发展在我的刻度尺上需要从4点左右上升到大约900点，但从2015~2103年，分数会再提高4 000点——相当于从冰河期以来上升分数的4倍以上，简直难以置信。

这意味着能量获取从23万千卡/人/天跃升到超过100万，城市人口达到1.4亿（想象一下，把东京、墨西哥城、孟买、纽约、圣保罗、德里、上海和半个加尔各答合为一体），武器的发展使得现在的氢弹看起来像火绳枪，还有，很可能会有一场革命，改变了作为人类的意义所在。这张图表暗示着在接下来的100年，人性会发生更多的改变，人类价值观的变化将会超过此前10万年来的变化。

如果这听来夸张，那么请记住，近100年来我们身体发生的变化可算是已经超过了之前10万年的变化。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的人类身高比此前任何时期普遍高4英寸[16]，寿命要长30年，体重高出50%。在罗马人或中国宋朝人看来，我们的世界多半像个魔法王国。各式各样的人通常都会利用科技来强身健体。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搞得到眼镜——这更不可思议了，而且在富国，激光外科手术让我们的视力变得完美，遗传外科手术则会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繁殖后代。300万人带着心脏起搏器四处走动，在2012年奥运会上，一位无腿男子参加了赛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预期科技能够治好某些类型的失明，富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达到100岁，有实用价值的心灵感应将成为现实。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向生物学回馈其成果。

这个过程会把人类带向何方，速度有多快，谁也说不准。某些科技未来主义者预期，未来的这个世纪经历的进化跃进，在意义上和6亿年前从单细胞转变为多细胞生物不相上下，其中最有名的是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他预计21世纪中叶不仅会出现能生成神经元级别人脑扫描图的强大扫描技术，还会出现性能强悍的超级计算机，足以让生物工程师把全球80亿~90亿人的扫描图全部上传并实时运行。库兹维尔认为这事实上相当于把全体人类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生物体。

库兹维尔预计，最快到2045年，此类科技就会成为现实，但还有人比他更加乐观。主持人类大脑计划[17]的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拉姆[18]预测，在欧盟12亿欧元拨款的协助下，2020年前后，他就可以将人类与他们发明的机器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在2012年瑞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不知其名的神经科学家在被问及马克拉姆的豪言时，直言不讳地告诉《自然》杂志："那是胡扯。"

最保险的做法可能就是两面下注了。神经科学家米格尔·尼科莱利[19]曾在2012年使用互联网把巴西的一只大鼠的脑子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只大鼠的脑子连接起来，让南美这只啮齿类动物移动北美大鼠的爪子，他认为库兹维尔的预言"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尼科莱利认为，扫描大脑并把它们在计算机平台上合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补充道，在大脑中嵌入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连接倒属可行，如此殊途同归，我们至少会取得库兹维尔预期的某些成果（分享思想、记忆和个性）。"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掌握正确的读心术，"2012年，扬·施努普（Jan Schnupp，在牛津大学担任神经科学讲座教授）对一家英国报纸如是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有无可能的问题……可以想象它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会变成现实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此言，2014年1月，科学家们宣布日本神户的富士"京"

超级计算机成功模拟了人类大脑的活动，尽管试验仅限于大脑整个神经网络的1%的建模，并需要40分钟来计算人脑在1秒钟处理的问题。正如施努普所说，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然而，该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像'京'超级计算机这样千万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如今能够描绘人脑网络的1%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应用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就能做到单个神经细胞及其神经键水平上的全脑模拟，而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很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出现。"

有鉴于预言家们以往的糟糕记录，所有这些预测结果可能都滑稽得不着边际，但如果要说2112年的人类和2012年坐在房间里听我主讲坦纳讲座的这些人明显属于同一种动物，这种预测可能就更不着边际了。如果能量获取继续飙升到100万千卡/人/天，那么，2112年后的人类——及其价值观——与我们的差别，将不会比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及其价值观）的差别小。

所有这一切都会应验的……当然，也可能不会。

我在本章提出了自冰河期以来的大转变——从觅食到农耕，再到化石燃料——发生的时间，是成功的社会达到其能量获取阶段所能实现的绝对极限，并实际参与了一场大自然的试验之时。在从觅食者转变为农夫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成千上万次，而在农耕者发现化石燃料时，则至少发生了5次（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早期现代欧洲）。人们未能革新其能量获取方式而陷入马尔萨斯式崩溃的实例自是屡见不鲜。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化石燃料是否和觅食及农耕一样，存在一个固有的绝对极限。近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大的政治争议，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 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其中足有1/4是在2000~2010年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气中的碳含量一度达到百万分之四百的峰值，这是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1910~1980年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5℉[20]；史上最热的10年全都是在1998年之后；2014年更是气温最高的一年。如今人们仍在争论如果全球70亿人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并排放废物，会有什么后果（一条有关气候的罕见好消息声称，2002~2012年，全球平均气温实际上停止升高了），但压倒性多数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其结果不啻一场灾难。

过去的每一次大崩溃（我们的史料可以回溯到4 000年之前，即公元前2200年左右阿卡德帝国和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崩溃）都有同样的5种力量牵扯其间：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尽管总是糅杂在其他因素之中，且作用大小无法预测——气候变化。就算是匆匆浏览一下新闻周刊都能看到，将我们送往世界末日的这5位骑师似乎个个蠢蠢欲动，准备在21世纪再次出场。对身处其间的人来说，过去的崩溃一般都恐怖至极，造成了数以百万的非正常死亡，生活标准下降，人类进入漫长的黑暗时代。罗马在公元后头几个世纪达到其能量获取的巅峰，此后过了1 000年，中国宋朝才再次与之平齐，又过了6个世纪，清朝、莫卧儿王朝和欧洲才三度达到相同的水平。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21世纪的任何崩溃都会比这可怕得多。一方面，过去两万年来社会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自然界所进行试验的数目，这意味着我们如今基本上只有一个全球范围的试验，也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再者，我们现在的失败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拥有核武器，而罗马人可没有。好消息是，如今全世界的核弹头数目只相当于1986年的1/20，但坏消息是，扩散的威胁已然失控，扩散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情报分析专家所称的“不稳定弧形地带”从中非直穿东亚。这一弧形地带聚集着世界上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并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我们如今尚不能乐观地预测，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核战争是其最不坏的选择，何况只要强权国家还严重依赖这一地区的能量，我们就不能盲目乐观，说它们可以在——比方说——以色列和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朝鲜及其打击范围内的任何国家之间的核冲突中置身事外。

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可能性将会如何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只需强调一点，即无论我们是飞腾至5　000点，还是崩溃于核冬天，21世纪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即将发生的改变，足以令现代人类进化成功以来的一切往事相形见绌。如果这的确是21世纪的现实，那么近两万年来的经验表明，人类价值观将发生同样天翻地覆的进化。一切自由化进程或许会进一步加速；或许还会走向反面。但无论发生什么，在2103年远未来临之前，我们不妨在表4–1中再加一列，即后化石燃料者的价值观。

爱因斯坦曾经开玩笑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第四次大战中会用什么——石头。"科幻小说圈子里的人非常热衷的一个可能性是，战争让人类退回到觅食阶段，重拾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或者，如果技术未来主义者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的话，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出现。在极端情况下，思想观念的统一与能量获取方式的转变或许能让因达斯特里亚更加完美，产生一个真正没有内部障碍的世界，等级和暴力全都失去了意义。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人类不均衡的技术进步会产生这样一个世界，某些后人类胜过未能进步的智人，其程度甚至比我们的祖先胜过尼安德特人还要彻底。然后，现有版本的人类就会步早期原始人的后尘而在地球上灭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未来人类价值观的讨论也就无关紧要了。

我在本书第一章里提到，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专家，让他们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畅所欲言，讨论我为了解释自己1982年在阿西罗斯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并从中得到的启示，进行这种包罗万象、大笔挥洒的论证，是否有助于思考人类的价值观问题，不过在这里，我还需要再作一些简要的总结。因为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所有的人类共享一套演化而成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公平、爱、忠诚、自尊、体面，以及每个人都很珍视的一整套其他原则。但由于我们又和其他动物不同，近两万年来，我们还经历了文化上的演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了这些生物进化的适应版本。我在本书中论证了能量获取的提高——其本身就是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断累积的知识的几乎必然的文化适应——施加了有利于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的选择压力。因此，随着人们从觅食转向农耕，他们发现阿格拉里亚是个比小型游群更好的生存机器[21]，而随着人们从农耕转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又发现因达斯特里亚是个比阿格拉里亚更好的生存机器。正像能量获取的上升对社会组织的演化施加了选择压力一样，社会组织的演化也对发生生物演化的人类核心价值观施加了选择压力。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觅食者尼萨和希腊乡下的乔治先生，以及身处化石燃料加州的我来说，是非善恶的标准实有天壤之别。

这种经验层面的观察结果不一定意味着天下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观，无论是从各种价值观必然会走向的终极目标，从实用性，或是定言令式[22]，或是差别原则[23]，似乎都可以整理出这样一套普适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我通过论证尝试为"这些"道德准则找到某种经院哲学意义上的、"针尖上的天使"[24]的特质。认为人类价值观纯粹

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唯自然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纯粹的自然，大概现在还都是文盲，大多数人还会在30岁就死去，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可不是什么好的生活基础。现实情况是，价值观无法从持有它们的人类所在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纵观历史，从觅食游群里的老家伙们到柏拉图和孟子，再到康德和罗尔斯[25]，道德哲学家的真正贡献，就是讨论哪种价值观（或是他们希望发挥作用的哪种价值观）最适宜其自身所处的能量获取阶段，而对于适合其他阶段的价值观没什么兴趣，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

当然，那也是个粗枝大叶的批评，拒绝赋予一个完整学科其应具备的普适性。但请允许我在论证的结尾加一个注脚，希望能有所平衡。就算我是对的，就算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道德的哲学化只不过罗列出何为因达斯特里亚模范公民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并试图以此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观念，除此没有什么成就可言，那也比大多数经院学科的成就要大得多。

[1]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 ），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2014），该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出版。

[2] 5℉约等于2.78℃（摄氏度）。

[3] 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1936— ），英国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著有多部深受欢迎的考古学著作。

[4] 大刍草（teosinte），禾本科植物，玉蜀黍属的几个野生物种的统称，原产于中美洲。

[5] 哥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又称哥贝克力石阵，位于土耳其东部乌尔法市郊近十千米处。1994年由一位库尔德牧羊人发现。经鉴定证实，有关遗迹至少有12 000年历史，比金字塔还要早8 000年，是人类至今在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遗迹之一。

[6] 奥尔梅克文明（Olmec），已知最古老的美洲文明之一。它存在和繁盛于公元前1200~前400年的中美洲（现在的墨西哥中南部）。奥尔梅克人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最著名的艺术作品莫过于高达10英尺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

[7] 难陀王朝（Nanda），古印度摩揭陀王国的一个王朝。始于公元前424年，终于前321年，其创建者为摩诃帕德摩·难陀（意译为大红莲难陀）。

[8] 弗栗恃（Vrijji），印度古国，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大国之一。位于恒河北部，领土延伸到今尼泊尔东部。首都为毘舍离（Vaishali）。

[9]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前727），亚述国王（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巴比伦国王（公元前729~前727年在位）。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是亚述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君主之一，更被认为是新亚述帝国的创建者。经过他的努力，亚述国家再次从衰弱走向强盛。

[10] “金发姑娘海”（Goldilocks Ocean），典故出自19世纪英国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的故事》，故事中迷路了的金发姑娘未经允许就进入了熊的房子，她尝了三只碗里的粥，试了三把椅子，又在三张床上躺了躺，最后决定小碗里的粥最可口，小椅子坐着最舒服，小床上躺着最惬意，因为那是最适合她的，不大不小刚刚好。

[11] 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英国发明家、矿业工程师。他在1804年发明了世界上首辆可以实际运作的蒸汽机车。

[12] 詹姆斯·曼（James Mann，1946— ），美国记者和作家，任《华盛顿邮报》和《费城询问报》，1984~1987年曾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3] 希尔顿·鲁特（Hilton Root，1951—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与发展的学术和政策专家。

[14] 蒋庆（1953— ），中国当代儒家学者，以其对新儒家的评论而闻名，著有《公羊学引论》（1995），阐扬《春秋》经传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15] 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画，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蒙特涅克村的韦泽尔峡谷，是著名的石器时代洞穴壁画。1979年，拉斯科洞窟同韦泽尔峡谷内的许多洞穴壁画一起被选为世界遗产。

[16] 4英寸约等于10厘米。

[17] 人类大脑计划，主要由欧盟拨款的10年期大型科研项目，始建于2013年，旨在通过为期10年的研究，提供协作的信息学基础设施，以及啮齿类动物和人类全脑模型的初稿。

[18] 亨利·马克拉姆（Henry Markram，1962—），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蓝脑计划和人类大脑计划的总监。蓝脑计划使用蓝色基因超级电脑运行神经元模拟软件，旨在最终揭示意识的本质。

[19] 米格尔·尼科莱利（Miguel Nicolelis，1961— ），巴西物理学家，以其施加于猴子的读心术而闻名。在美国杜克大学，他和同事们在猴脑中植入了电极阵列，监测猴子的动机意图来控制机械手臂的抓够动作。这套系统一般被称为“脑机接口”。

[20] 1.5℉约等于0.83℃。

[21] 生存机器，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使用的术语。道金斯在书中提出了“复制者”的概念，在“原汤”（primordial soup）中，能够复制自身的分子将获得生存优势，从而开始进化，而生物体内的复制者就是基因。基因制造出“生存机器”以达到传播自己的目的。“生存机器”就是生物体。

[22] 定言令式，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尽管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遵循某种规律，但只有理性生物（人）才具有按照规律的理念而行动的能力（自由意志）。就客观原则对意志的约束规范而言，其命令尽管是强制的，但同时也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命令的程式，就叫作“令式”。令式有两种。如果某种行为无关于任何目的，而出自纯粹客观的必然性，那么这种令式才是定言令式。如果行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则被康德称为“假言令式”。

[23] 差别原则，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中提出的概念。差别原则限制着不平等现象：它只允许不平等以有利于穷人的方式运作。这一点经常被误读为“下渗经济学”；罗尔斯的观点更准确的表达是财富“弥漫”的体系。罗尔斯通过保证社会中穷人的公平交易来补偿自然发生的不平等（如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运动能力等）。

[24] “针尖上的天使”，源于中世纪对天使的性质的争论：它们的形状以及是否存在物质形态等。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会使用这些作为辩论的训练。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论题便是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在上面跳舞？答案是一个（如果天使是物质实体）或者无数个（天使没有物质实体）。这句话常被用作例子来证明中世纪神学的无用和迂腐。

[25] 约翰·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999）、《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2001）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评论篇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理查德·西福德

像伊恩一样，如果我在肯尼亚，也会付钱给当地家庭帮我打水烧水。他得出的经验是，生物进化给了我们常识，让我们学会适应环境。但“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毕竟，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伊恩的讲座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

根据伊恩所言——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 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第一章）。

觅食群体都是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正像伊恩强调的，可供分配的物质财富少得可怜。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也就是说，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

再想想某个古代的农业社会，一个伊恩所谓的阿格拉里亚中的小村子，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在村子内部，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但这些无一可以威胁到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

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但至关重要的是，任何平等主义者的愤怒本身（如果没有大规模组织）或许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也可能在考古记录和史料上了无痕迹。

到目前为止，伊恩可能都会同意我的意见。他在讲座上谈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第三章）。考虑到——据伊恩所说——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公平公正，这倒是毫不奇怪。

但伊恩在其表4–1中，把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标记为“低”。既然伊恩认为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已经成了农业社会的一个“模式”，这两个观点岂非冲突？他的解决方案看来是优先看待对贫富不均的“普遍接受”。但为何要对“普遍接受”给予特别重视，而不是“牢骚不满”呢——或者说，为什么不优先看待如今早已广泛扩散的此两者之间的内部冲突呢？接受（因为看来别无选择）并不等于赞同。

没有政治权力的平等主义或许能在宗教信仰中予以表达。保罗在《加拉太书》[1]（3.28）中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这不是一个政治纲领，恰恰因此，他又在其他地方写道：“你们作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3]［《以弗所书》[4]（6.5）；《歌罗西书》[5]（3.22）］。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只是把平等投射到先验的范畴，就像早期佛教接纳众生并不是要推翻种姓制度一样。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先验的平等主义最终不会引发政治行动，哪怕其无心政治。举例来说，基督教和佛教的平等主义显然都曾激起过政治波澜。

另一方面，关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同意伊恩的看法，认为男性（甚至女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或许因为物质财富的继承而从“中”变为“低”。至于暴力，为什么觅食社会的暴力比农业社会多，主要原因大半还是规模问题。大规模社会不得不发展出各种非暴力的震慑和惩罚形式，比如监禁。它们或许还更需要控制暴力，因为较小的群体内部比较不易发生失控的以暴制暴，人们彼此更加熟悉，何况大群体中一旦暴力失控，扩散的范围也更广。在古希腊，大型群体所面临的以暴制暴的危险是建立城邦的重要动机：为了阻止把政治化的社群卷入相互施暴的混战，需要一个以法庭的形式存在的中立第三方。

这就引出了伊恩所谓“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希腊城邦。

他竭力想让雅典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地例外，指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如此一来，他就降低了两种关系的

重要性，一是经济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脱节（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二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深刻差别。

此外，并不只是说民主的雅典人在经济上远比如今的美国和英国平等得多。包括梭伦[6]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很多古希腊哲学家也比我们如今更加反对个人无节制地累积财富，而且雅典人的国家还强迫富人掏钱建设公共项目。诚然，关于政治平等的重要性，我们听到的远比经济平等多得多，但或许其部分原因是，古代文本往往是由相对富有的人撰写的。然而我们的确听说过大众普遍要求经济平等。我们都听说过雅典的平民们张罗着“他们自己能获得更多，而让富人变得更穷”。一位锡拉库萨[7]的民主领袖曾指责寡头政治独裁者贪婪到了无所不要的地步。

最后，关于雅典人为何不能被边缘化为只能“限定”而无法挑战农业价值观的模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雅典之所以是一个特例，与其更为特别的卓越文化成就绝对密不可分，而其文化成就本身，就包括有力地表达出对雅典全然不同于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这一事实的自豪感，特别是不同于波斯帝国（例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这表明了农业模式所代表的（但通常是受到压抑的）价值观拥有潜在的生命力。

因此，农耕并没有在世界各地产生同样的价值观，相反，它成为产生不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地理条件就是其中之一：希腊城邦依山傍海，彼此分离，因而规模都很小。第三个因素是觅食社会传下来的顽固态度。希腊人用动物献祭，这种行为当是从狩猎时代保留下来的，在《荷马史诗》中有详细的描述。《荷马史诗》的价值观是贵族式的，但在动物献祭做法上却秉承了平等主义：每个人都能分到等量的肉。他们在这最重要的仪式上的平等主义因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两个独特的希腊制度——公民权和铸币（更不要说基督教圣餐了）。我在这里无法讨论其具体过程，而是要强调，首先，这是凸显宗教平等主义的政治意义的另一个实例，其次，动物献祭正是如此而成为一个渠道，让觅食价值观得以在化石燃料社会存续。无论伊恩认为希腊城邦有多边缘化和特殊，长期以来，这个例外——与另一个边缘化的“例外”以色列一样——的影响力要比主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化国王大得多。但伊恩在其讲座中拘泥于决定论式的量化范畴，将不同的文化传统草率地归结为“基于核心主题的各种变体”。

伊恩所谓的“例外”对其整个理论的破坏力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承认的，尤其是考虑到他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理论如今对我们大家或许都很有用。在第二次讲座中，他声称“改变”（能量获取的改变及其所导致的价值观的改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但他将能量获取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做法既非普遍也非必要。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没错，农耕经常要容许大规模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这个小群体还会实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农业社会也可以是小规模的，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在伊恩看来隶属于觅食游群的价值观可能就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没有那么多约束了。

对此，伊恩可能会做出如下答复：“是的，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观点，但我讨论的是两万年的历史，所以必须限制在基本原则（主要在能量获取方面）的范围内。”对于这个答复，我会回应说，我不同意的，恰恰是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正如伊恩本人指出的，数百万年来我们通过生物进化获得了一套价值观，那些是人类当前普遍持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共享的，与之相比，能量获取的形式并不一定是决定人类价值观的更为基本的原则。

这种批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伊恩认为，他关于过去的论述可能会成为人类未来的行事指南。

他并未声称人类的选择是全然无关的。但他的确认为价值观的变化“无限接近于历史的必然”。何况他不认为人类的普遍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 认为人类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唯自然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纯粹的自然，大概现在还都是文盲，大多数人还会在30岁就死去（第五章）。

相反，他声称：

> 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第一章）。

并且因此，

>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首先，伊恩的类比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尽管通过识字教学和延长预期寿命来修正天性（如果可以的话）是合乎情理并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远比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观更有价值的价值观（难道是GDP？），我们很难再找到一种价值观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让我们卸下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包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艰辛，都是值得的（虽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暗中尝试着操纵或抵消那些价值观，有些还很成功）。

其次，伊恩在其论证中暗示——尽管我们面临大量危险——我们还是会被推向行得通的价值观。然而真的是“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

需”吗？其他人声称，每个时代的主体意识永远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思想观念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当然不是。我们的主体意识是否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他们不再是神王，而只是宇宙的主宰（及其拥护者）——的观念呢？是，又不是。但我想以违反直觉的断言结束本文，即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观念。

我的论点事关在选择何为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的偏见。伊恩选择了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观念。他显然优先关注了必然的竞争和可计量性（而非文化或价值观）。他没有提到“共识”一词。但这个概念隐秘地遍布于两次讲座，在那两次讲座中，他没有提到社会冲突（何况是内部的心理冲突）可能与本主题相关：在关于历史变化及其原因的宏论中，这是昭然若揭的遗漏。至于“效率”，他声称从觅食到早期现代社会，“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第五章）。但对效率的追求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根本算不得古代经济体的特征。

这4个概念全都隐含在伊恩的这句话中：

> 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第一章）。

对谁的“效果”？我们又该如何确定某个价值观是否有“效果”？难道要参考GDP吗？

考虑到伊恩对能量的关注完全无可非议，我们就以不断扩大使用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化为例好了。能量使用的需求发生变化，能否把我们推向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当然不能——除非我们自己利用两个内部的资源。其一可称之为理解，这在伊恩的讲座中没有提及。其二可称之为情感，伊恩排除了这一点。

伊恩声称，一切人类价值观都是在用相继出现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人类因此而不断前行。这是资本主义视角的核心理念，它将自身想象为“常识”，伊恩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这种理念。因此，伊恩在普林斯顿开讲座时，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在本书展开讨论的章节之中他也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但资本主义必要的自我扩张的动力及其所产生的价值观，在类别上都不同于它之前的社会。如果我们试图阻止气候变化，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动力，但伊恩在讲座中对此不置一词。此外，很明显，在不平等现象有目共睹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会接受为拯救环境所必需的限制。天上满是私人飞机，为什么我要减少飞行的次数？伊恩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描述的那个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美好未来，根本未曾打消我的疑虑。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乃至人类认识的提高，都远不足以阻止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灾难）。我们还需要以情感维系的价值观。但伊恩摒弃了被他本人描述为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获得的一套普遍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一点具有极大的政治破坏性。这些价值观常常会被献祭给可量化竞争的所谓必然性，现在仍然如此。过去，人们对这些价值观毫无杂念地心向往之，而即使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必要的，如果人类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1] 《加拉太书》（*Galatians*），圣经全书的第48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基督徒的一封信。保罗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很多问题，也指明了公元一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

[2] 希利尼人即希腊人。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3] 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4] 《以弗所书》（*Ephesians*），圣经全书的第10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以弗所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圣母玛利亚终老于此。

[5] 《歌罗西书》（*Colossians*），圣经全书的第51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歌罗西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歌罗西是安纳托利亚的弗里吉亚地区（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古代城市。

[6]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7] 锡拉库萨（Syracuse），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沿海古城，位于岛的东岸，由古希腊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

第七章 思想的局限



史景迁

在对伊恩·莫里斯的坦纳讲座所做的回应中，我强调了我们这两种学究式历史研究方法之间的巨大差异。莫里斯的研究工作架设在复杂的全球规模上，在辽阔的时空中前后穿梭，而我关注的始终是具体的个人，他们在局部层面抒写着繁复纠结的人生故事，一切融合稍纵即逝，组成了过往的人类生活。对莫里斯而言，过去和遥远的历史时空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可以排序和量化；这不无道理，因为莫里斯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将所有的结构和空间囊括其中。其中的每一个片段与其他的成长和变化现象都有线性联系，对那些现象也会严格考察，目的是在实质上全面覆盖时空。正是在该指数的这些分镜头中，我们才能致力于可以精确测量的数字，这反过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绘制指数。

虽说各个类别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叠，莫里斯似乎找到了四组与其指数及其范围特别相关的数据。第一组是（至今仍是）“人均能量获取”，让我们得以看清在不同的社会，能量的提取和使用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那些社会的兴衰起落。为了以论据支持这一主导理念，莫里斯看到了特别突出的一组三个概念。对这三个概念，莫里斯颇有为讨巧地用押头韵给它们命名为：觅食者、农耕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为平衡和标准化测量他的计算结果，莫里斯展示了杰出的研究技巧，从（仅举几例）天文学、地质学、海洋学、植物学、考古学、森林学寻找相关证据。在他的不同研究领域，这种折中主义或许是广大普通和专业读者所要求的，并深化了讨论的动态趋向：例如“城市密度”作为一个主要因素出现在指数中，“发动战争的能力”和“信息技术”技能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信息区段不断累积，加入到复合指数中，也表明还有补充或改进的空间。

如果我对莫里斯的研究工作有一点儿批评的话，当源自他的世界版图在我看来过于温柔了。他选择承担起最不同寻常的任务，因而读者也做好了感情上的准备，在他的引导下去探寻世界的历史。因此，莫里斯需要足够的明晰和胆量与其雄心相匹配，并确保他的主张足够吸引我们的关注。正是这一点，我觉得尽管莫里斯聪明过人，才学博通，但他的表格和叙述仍有脱节，讨论范围也过于简化，或许可以称之为“数据的中产阶级化”。莫里斯将他的研究所获对读者倾囊相授，却独独没有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体察历史“是什么样的”，无论是在“侧翼丘陵地区”，还是在被委婉地命名为“幸运纬度带”的地方。也许命运本来就如莫里斯暗示的

那样仁慈，无论对农耕者还是觅食者都是如此，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怀疑在纷乱芜杂的历史图景中，有同样多的人屈从于野蛮或贪婪的诱惑。我自己对莫里斯的判读将我拉回到一个更加传统的观点，即战争、财富、育儿和疾病，所有这些需求和危险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未稍离——对于散布在全球各个孤立的温暖地带的成千上万，也许是数百万人而言，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当然，那只是我的推测而非史实，然而过往的气氛总是挥之不去，以历史的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对数据本身的性质作一些反思，以此来对这些想法作些总结，或许更有建设性。当我们寻求将过往的模式套入现代框架时，就会遇到一套全然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与术语的描述性用法有关。简言之，问题在于详细叙述，在于计算出一组描述日常生活现实的术语是否在事实上与另一组相契合。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农耕”或“有效”之类明显很简单的词汇，而无须考虑某一特定关系或情境中所涉经验的无数变体。反过来，在特定区域内，那些差异可能看来非常接近（多半是误导）当前的做法，而又在意图和执行上与后者大相径庭。莫里斯当然了解在较长时期内对劳动之定义的交叉，也知道在重叠术语的泥沼中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我只想试举几个例子，拿中国农村来说好了（这碰巧是我本人在历史研究中感兴趣的主要区域，不过其他的例子虽有不同，可能也会同样有力地证明我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要建立某种统计基数的话，特定时期的中国农村无须做任何注解。但为了比较生活质量，并且超越农耕者/觅食者之间的基本区隔，我们就必须对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略作改变。工作是否是个跨越空间或性别的常量？女人的工作时间是否更长？她们在抚养子女时是否工作？家庭的居住空间有多大？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土地面积有多大？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童工劳作模式如何？商业是否与农业劳动融为一体？纺织是否是个惯常的职业，而织布机是否在大小上做了调整，以适合女孩、男孩或老人使用？有权携带武器的是什么人？从事徭役的是什么人，每年干多长时间？谁有权参与国事，无论在哪一个级别？有多少个家庭需要周期性地借钱度过惨淡的月份？有多少焦虑的农民雇佣更穷的农民来照管庄稼和防盗？有多少农民用船把食物运到市场上去？谁来支付道路、桥梁和城墙的建设费用？这只是个简短而随机的因素列表，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像觅食或农耕这种更宏观概念的含义，或有助于我们计算某一特定时间或地点的乡村生活的某些参数。

有关莫里斯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最后一个需要思考的是：他的类别有多稳定？其中就算最大的类别是否能够独立存在？或者事情变化的速度可能比他预见的还要快？试举三例，一是被列为其主要类别之一的发动战争的能力；二是信息技术遍及全球；三是化石燃料。还可以把网络战争作为另一个因素。的确，单是近两年来发生的事件和披露的事实，就足以警惕我们关注新联盟的成形，以及诸多因素已然在改变我们曾认定为永恒的事物。全球集中的新模式是否已在形成？伊恩·莫里斯建造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但世界上没有什么思想可以阻止那座建筑被修正，抑或被改变得面目全非。

第八章
价值观中的永恒、发展与自我



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

觅食者：“我们当然有酋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酋长……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酋长！”

——一位昆申人觅食者

农耕者：“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

——《罗马书》2：14

早期化石燃料使用者：“人类……只会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自治是人性的尊严的基础。”

——伊曼努尔·康德

伊恩·莫里斯向我们保证，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管它此前如何）就是它应有的状态”。然而，莫里斯的臆测引发了一些问题，关于人们实际持有或曾经持有的价值观与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价值观的话）之间关系的问题。

为了讨论起来没那么麻烦，我想先在术语上加以区别，但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我可以把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称为“真实价值观”，但我担心如此一来，某些读者会以为那是“人们真正持有的价值观”的意思，相对于——比方说——“理想价值观”。我可以把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称为“理想”价值观，但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当然代表了它的理想，无论它们是不是该文化应该持有的价值观。另一个选择是把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称为“道德价值观”，但那也会产生混淆，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词是指所讨论的价值观的种类、内容或功能。一般而言，当我们把“道德”价值观看作指导人际关系的价值观，而不是——比方说——指导我们如何评价艺术品或美感的审美价值观时，会这样来做区分。莫里斯关注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我们对暴力和各种形式的平等与等级的态度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道德价值观”，无论其实际表现在某一社会或特定文化的态度中，还是在该社会和文化中理应被奉为圭臬。我的方案是结合所有能用的形容词，将我们应该秉持的价值观称为“真实道德价值观”。

在对立的另一面，我准备从法学理论中借用一个词。在法学理论中，那些实际写下来并在一个社会中执行的法规叫作“成文法”，而那些应该执行的法律（如果有的话）——那些我们可以从道德视角表示赞同的法律，至少在某些传统中被称为“自然法”。这种差别根源于斯多葛派伦理学和从这种伦理学中派生出来的自然法理论，但它可以一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后者把“法律”的概念与自然正义区分开来，断言自然正义当举世皆然，他还说：“［自然正义］并不依赖人们的想法而存在。”因此，我准备把人们实际持有的价值观称为“成文价值观”，并请诸位类比成文法来理解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社会、文化和年代，成文价值观也各不相同。而真实道德价值观，在我看来，并无差别，至少没有本质差别，因为如果——举例来说——觅食者应该支持的价值观与农耕者应该支持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真正本质的差别，那么我们在讨论觅食者与农耕者的差异时，只需讨论二者应支持的更为基本原则性的真实价值观有何不同就可以了。亚里士多德强调，自然正义当举世皆然。早期现代道德哲学家喜欢说价值观是永恒不变的，以此来更加肯定地重申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如今的哲学家不再沉迷于那个说法了，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说法，则不妨把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

莫里斯的观点之所以会引发成文价值观和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关系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他认为成文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进化造就的，这就引发了真实道德价值观是否也是如此造就的问题。莫里斯引用了弗兰斯·德瓦尔同样在普林斯顿所做的坦纳讲座，来支持他自己的说法，即“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我同时也是德瓦尔教授坦纳讲座的评论人，我想在此重复我在该评论中表达过的一个观点，只略作改动。如果我们要谈价值观的进化，就有必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我们价值观的内容发生了进化，而且价值判断的方式本身也必然发生了进化。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价值判断作为一种精神态度，全然不同于喜欢什么东西，或想要什么东西，或本能地被吸引去做什么事情，或感觉不得不做什么事情。后文中我会说明这到底有何不同。无论我们用什么来解释价值观，它必然也能解释那种独特的精神态度或活动的起源。进化的贡献必然包括赋予人类价值判断的能力，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人类价值观的内容。

至于这一点为何重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莫里斯信奉德瓦尔的观点，认为某些其他动物也具有道德价值观。我认为这并不可信，不是因为我觉得其他动物表现恶劣之类的，而是因为我觉得它们缺乏我称之为“价值判断”的那种独特的精神态度。同样，我会在后文解释原因。其次，我认为，一旦我们提醒自己价值判断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就可以看到一条路线，帮助我们识别真实道德价值观。真实道德价值观就是那些正确行使价值判断的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情况有可能是这样：一旦进化将价值判断的能力落实到位，那么决定真实道德价值观之内容的就是适当行使这种能力的行为，而不是进化本身了。

当然，怀疑论者可能会质疑说，“正确行使价值判断”涵盖的范围就太广了。凭借某种能力发生了进化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它没有被正确行使：归根结底，理性本身必然也发生了进化。并且——这是我第三个观点——莫里斯的叙事，或至少我觉得有用的那部分叙事，如果真有什么可以算作正确行使价值判断的话，效果会更好——简单说也就是，如果存在真实道德价值观的话，他的叙事效果会更好。或者说得更慎重一些，如果莫里斯为其创立理论的人们认为事实如此的话，他的叙事效果会更好。只有当持有成文价值观的人同时也将其当作真实道德价值观时，这些成文价值观才具有莫里斯为其标定的进化和社会功能。如果想要让成文价值观能够支持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所必需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必须认定他们的成文价值观就是真实道德价值观，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具备真实道德价值观的概念——他们必须相信，某些形式的人际互动是真正有价值的。

这一点有必要加重强调。莫里斯的叙事引发了有时被哲学家称为“透明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引发了这样一个质疑：如果人们相信了莫里斯的理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就能存续下去。假设人们了解其价值观的作用是支持不同的能量获取方式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形式。农妇是否还愿意接受男性霸权？看起来，如果你了解了“国王乃天神”这一信仰的起源是为了支持某种社会组织形式这一事实，那么你就不太可能会继续这样的信仰了。你还会愿意像对待于你有生杀决断之权的天神那样对国王殷勤侍奉吗？我很怀疑，不过如果你真的愿意，那至少是因为你本人重视那种社会组织形式，并认为那是正确的做法。只有在人们认为价值观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组织形式的作用。因此，人们必须具备真实道德价值观，或任何一种真实价值观的概念。要解释人们为何会具备真实价值观的概念，最自然的方式——也许不是唯一的方式，却是最自然的，就是诉诸一个事实，即这些价值观是真实存在的。

以上这些论证有着悠久的传统。吉尔伯特·哈曼[2]有句名言：我们不需要借用真实道德价值观来解释人们的道德反应，而只需借助他们关于道德价值观的信仰。我的上述论证提出了一个对照点，即我们还必须解释人们何以可能拥有这样的信仰。那些就人们关于道德价值观的信仰做出限定的概念，那些是非和责任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

大卫·休谟和法兰西斯·哈奇森[3]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反对伯纳德·曼德维尔[4]，后者认为美德是政治家创造出来赞美人民克恭克顺的工具。莫里斯的观点有点儿曼德维尔的腔调，因为他把价值观看作对社会有用的，这也是休谟和哈奇森的论证为什么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原因。休谟和哈奇森指出，如果“好”人借以行事的唯一概念是“增加私利”的话，那么就无人会因为受到赞美而感到荣幸或赏识了。如果有人说你很“好”，你只会认为他是在说你在某方面对他有用，那么你没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感到特别高兴，除非那样做也对你有用。而即使那真的对你有用，也不会影响你的自我感觉。只有在人们的确以美德的概念行事之时，我们才能够说服他们相信某些特质是美德，我们也需要解释人们何以最终决定依此行事。那么，美德的概念——自我本身可以以某种方式变得有价值

或失去价值的观念——是根本无法从私利的概念中直接产生的。同样，在讲述人们何以最终拥有了包含特定内容的价值观之前，必须先讲述人们如何拥有了“价值”的概念，必须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某些事情真的有价值或者应该得到重视。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价值判断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一个关于价值判断的哲学问题关注的是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这二者的优先顺序。某些哲学家认为价值观就是存在的——某些事物从内在本质上就是具有价值属性，而价值判断就是对这种属性的回应。这样一来，价值判断的适当性就只和重视那些实际具有价值的事物有关了——就我们手头这个例子而言，就只需要以某种方式来理解独立存在于价值判断能力之外的真实道德价值观就可以了。其他哲学家认为，价值判断先于价值观，因而具有价值的事物只不过是被正确予以价值判断的事物而已。我们因而需要一套不同的叙事来论述正确行使价值判断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结果。虽说这似乎值得一提，但我并不认为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来证明我想证明的论点，因为第二种可能——价值判断先于价值观，而价值观不能独立于价值判断而存在——看起来可能对科学的世界观要更友善一些。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套不同的叙事，论述正确行使价值判断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结果，谈谈除了单纯地理解独立存在的价值观之外的其他问题，那么我们就能证明，真实道德价值观的确存在这一观念与科学世界观之间不存在任何紧张关系。

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很多哲学家，尽管他们各自坚持着截然不同的道德理论，都曾经将价值判断表述为我们对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性或规范性观念。举例来说，“表现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指出，对某一事物进行价值判断不仅仅是希望获得此物，还倾向于鄙视不想要此物的人，且一旦我们自己不再想要此物，也会自我感觉很糟糕。我想吃巧克力冰激凌，但如果不想吃了，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可耻；实际上，我反而可能在很想吃的同时强烈希望自己对它的欲望会消失。但我不可能一边珍视诚实的品质，一边又不觉得做一个寡廉鲜耻的骗子很可耻，或者不特别希望自己既能珍视诚实的品质，又能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人。哈里·法兰克福[5]在他本人的坦纳讲座中，就他所谓的“挂虑”（caring）的态度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我觉得挂虑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法兰克福说：

> 当我们……挂虑某物的时候，我们超越了想要得到它的阶段。我们仍然想要得到它，至少在达成目的之前如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渴望，我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误，甚至如果这种渴望渐渐淡去，我们会倾向于采取措施重新将其唤起。换句话说，挂虑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渴望。

通常的想法是，我们的价值观在本质上都与我们评价性或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有关。价值观的指导作用不仅限于激励我们来满足它

（像某种渴望），还在于激励我们达到它的标准：价值观不仅决定了我们想要实现的状态，还决定了我们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的论证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具备了评价性或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的生物，才具备价值判断的能力。我们暂且回过头看看其他动物，我认为其他动物不具备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规范性的自我观念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反观自身：我们不仅对于世事持有评价性态度，对于我们自身的内在状态和态度本身也可以做出有态度的评价。我们赞同或拒绝自己的喜好与厌恶、魅惑与反感、欢愉与痛苦，冠之以善恶的标签。我们也相应地认为自己可敬或可耻、可爱或可厌、善良或邪恶。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征，使之与其他动物的生活截然不同。某些其他动物可能看来会有骄傲的时刻，但总的来说，它们似乎并不会认为自己可敬或可耻。它们中有些当然希望被爱，但它们似乎并不担心自己是否可爱。我本人的看法是，我们评价性或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或者毋宁说这一能力的源头，也会影响到我们建构自我身份认同。你的价值判断可成可败，因为你的自我身份认同建构也是一种可成可败的活动，取决于它是否将你变成一个内外统一的能动者。

我在前文中提出，对于价值判断之本质的深刻认识或许是我们理解真实道德价值观的关键。真实道德价值观可能是那些正确行使价值判断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显然，必须有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才能够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同样显而易见，我在此也无法建立这样一套理论。但我想指出，价值判断与规范性的自我观念之间的联系至少提供了一种叙事，表明正确行使价值判断可能会达到什么效果。尽管这种联系无可否认有点儿模糊，但如果人拥有一套成文的规范性自我观念，他们可能随时准备提出自己的要求，这看来合乎情理。比如，他们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兴趣，并同样要求他人这么做。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反抗针对他们实施的暴力，并要求他人协助抵抗。他们不愿仅仅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或受制于他人为自身之目的做出的判断。他们将自己看作伊曼努尔·康德所称的“目的自身”或约翰·罗尔斯所称的“各种有效要求的自证之源”，并要求他人也如此看待他们。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伊恩·莫里斯在自己的论证中，将某些价值观显而易见的普遍性——他列举的是“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归因于自从冰河期从事狩猎以来，人类大脑的硬件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我只是想指出，在我们的大脑中，究竟是什么支配了这些价值观。但实际上你是否接受这个观点对我现在提出的观点并不重要。就我现在想要提出的观点而言，重要的是你得承认，如果真实道德价值观的确存在，我们有时候知道这些价值观是什么，那么你也应该认为，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判断能力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的。只要你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该联系是通过正确的推理或理解，还是通过某种其他方式建立的，对当前的讨论无关紧要。如果你这样认为，就会认为价值判断的能力终将依附于真实道德价值观，绝非偶然。毕竟，如果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价值判断可成可败，又有什么理由怀疑真实道德价值观的存在呢？这才是我和莫里斯观点分歧的地

方。

在承认显然存在普遍价值观之后，莫里斯继而声称，“就公平、公正等具体价值观的意义而言，不同时空的人类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归因于不同的能量获取形式所需的不同社会形态。

我当然无意在此否认在关于公平、公正和所应持有的其他价值观方面，人类的观念截然不同这一陈词滥调。众所周知，就等级和统治等莫里斯关注的部分问题，的确如此。但关于这些差异，或许有三个观点需要探讨。我会在后文中分别为它们命名。

> 1.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 positivism），不过我得赶紧补充一句，有很多自称此名的概念与它着实没什么关系。根据这一观点，人类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但人们实际进行价值判断的东西则完全可以归因于社会学力量，而后者又是由进化力量推动的。
>
> 2.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启蒙观点”（enlightenment view）。根据这种启蒙观点，人类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就像学习科学知识的能力一样，这种能力在历史上发展缓慢，因而其真正的对象，即真实道德价值观，迟迟无法进入视野。
>
> 3.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扭曲观点”（distortion view）。根据这种扭曲观点，人类具备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这种倾向性容易受到社会学力量的扭曲。这种观点传统上一直与这样一种说法相关，即我们的价值观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我认为启蒙观点值得一谈，但更值得探讨的则是扭曲观点。毕竟我已经指出，价值判断能力在本质上与我们规范性或评价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相关，而人尽皆知，后一种能力极易产生各种混淆，其中的某些混淆，我们不妨称其为扭曲。规范性地看待自我可能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源，但它同样引发了一整套独属于人类的弊病和错误观念。人们一旦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或者令人讨厌，往往会深感煎熬，甚至可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摆脱这种想法的折磨。弗洛伊德和尼采因为看到了我们价值判断的能力与规范性的自我观念之间的联系，竟然偶尔会将道德本身看成一种疾病。我们的自我价值感让我们易于受到各种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通过扭曲我们的价值观才产生作用的。毕竟，在莫里斯关注的一个例子——性别不平等——中，那显然至少是其发生作用的部分机制。男性等级是通过宣传性别理想，特别是关于女性气质的理想来维系的，这使得女人坚信，如果她们不漂亮、不柔弱、不相夫教子，就一无是处、可耻讨厌。众所周知，性别理想会导致女人注重自己的某种样貌而忽略健康，行事尽力讨男人喜欢而不顾自我主张，为妻子和母亲

的角色做出自我牺牲，而放弃追求自己的权利和幸福。作为一个女人，我想说这类性别理想导致了价值的扭曲，而不仅仅是说它们解释了某些价值观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许我只是无望地困在化石燃料的想法之中而无法自拔，也未可知。

但我不以为然。我已经对我刚才称为社会实证主义的东西提出过一次批评。如果价值观只是某种能量获取形式所需要的一种维持社会形态的方法，人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价值观的运作方式。在价值观起作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在践行着真实道德价值观。现在我承认，如果我试图以某种方式说出这一想法，我可能会遭到有理有据的反对。如果我像以往那样在此语境中断言，除非臣民确实相信君主对他们有着无上权威，否则他们绝不会服从君主，抑或女人如果不认为家庭就是她们的一切，她们也就不会待在家里，你可能就要抗议，说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受到了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或者思考方式会是什么，甚或说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没有被扭曲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当然，我的确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在评估解释价值观差异的三个原因时求助于上述断言似乎不太公平，因为这些断言预先假定了真实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以及在没有扭曲性影响的情况下，我们的价值判断能力会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莫里斯在讲座中引述的一个昆申人觅食者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证据。如果我们将他视为人类的觅食者祖先的一个代表，那也就是说，早在人类价值观历史的源头，就有人表达出了康德哲学的道德自治基本原则——当然，我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酋长，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酋长”这条原则。这种伟大而光荣的思想注定要被国家和教堂控制的力量镇压，最终让普通人确信，他们必须臣服于100年前英国人颇有古意地称之为“上等人”的人。或许莫里斯推测，在这一镇压的背后，是能量获取的需求以某种方式在起作用。

但我并不想说服各位相信我的观点；相反，我要解释莫里斯为什么没能说服我相信他的观点。部分问题在于，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正好具备了其所需要的那种价值观，那么莫里斯提出并解释的每一种价值观都必须对维持其能量获取模式所需的社会形态做出某种积极的贡献。但莫里斯并未能始终证明这一点。有时他证明的，或者说他明确证明的，不过是相反的价值观并不是维持他讨论的社会形态所特别需要的。例如，在论证“自治”这个主题时，莫里斯告诉我们，在觅食社会，“太跋扈的人，或者把专横态度延伸到不合适的情境，或企图把暂时的影响力变成约束他人的永久权力的人，鲜有能抵挡住同伴的反对的”。我们姑且接受因为人口规模更大，独裁式结构是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却不适合觅食社会这个说法。但那并不能证明为什么平等主义结构就是觅食社会所必需的甚或有利于觅食社会：也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我可以想象有人就这个特例会这样答复我：如果觅食者单独外出觅食，他们也许需要学习独立，平等主义结构更能够培养那种独立性。不过要说乱交和对婚姻不忠有利于觅食社会，就让我百思不解了。莫里斯指出，觅食社会不鼓励贫富不均，没有贫富不均就没有什

么可继承的财产，因此孩童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这只能证明基于其能量获取方式，觅食社会没有特别的理由来强制婚姻忠诚，并没有证明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婚姻要采取松散的形式。

另一个未能说服我的是对农耕者为什么支持性别等级这个问题的解释。莫里斯的解释基本上是说，农耕者的生活方式需要一个基于性别的严格的劳动分工。但就算这是对的，也没有解释男性霸权的起因。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以家庭为基地控制着男人，命令他们出去工作挣钱，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干好的事儿，男人一带钱回家，女人就立即把钱据为己有。在整体文化的层面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欣然同意这绝非偶然，但单是劳动分工则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现象。

但这类问题中最明显的是对暴力的容忍。据莫里斯所言，觅食者对暴力的容忍度惊人，农耕者有时也可以接受（我们根本无法容忍的）暴力，而我们化石燃料使用者却坚决反对暴力。也许对于为农耕活动而组织的社会而言，暴力造成的问题大于为觅食而组织的社会，对于工业社会则是更大的问题。但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觅食社会可以容忍暴力。

现在让我公平一些。我已经指出，我不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是由我们的能量获取方式塑造的，而是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只不过这种倾向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扭曲。当然，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也同意觅食者轻易容忍暴力是错误的，那么你就必须同时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轻易容忍，这需要一个解释。因此，就这个例子来说，我的备选解释并不比莫里斯的高明。是怎样的扭曲力量导致觅食者未能注意到人们不该四处杀人，在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觅食者社会，常见的暴力动机是什么。

因此，以下我提出一些非常粗略的推测。首先，我们有时可以注意到，在过去的时代，至少有一些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观念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加社会化和公众化。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你心里认定自己是个好人，人们怎么看你就无关紧要了，但这并非自古皆然。过去的人们在谈及他们的“人格”时，这个词似乎同时表示我们所指的“声望”以及他们的内在身份认同。而且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身份认同会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而遭到破坏甚至摧毁。捍卫荣誉即是在这一公共层面上保护个人的身份认同。所以我们不妨这样推论，为了捍卫荣誉而杀人，在过去看起来可能更像是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视为完全可以容忍的一种暴力形式，也就是自卫。如果这就是觅食者暴力的动机，那么扭曲的根源——或者说与我们的差异的根源好了——就是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认识不足，因而不知道这种看法有多可信。我使用的两个参考资料——理查德·李有关昆申人的专著和弗兰克·马洛[6]关于哈扎人的著作——并没有解释清楚暴力是否跟荣誉感之类的有关。他们确实明确指出暴力经常涉及性事——不忠和妒忌是很多暴力的起因。当然，就性这个话题而言，就算现代人也往往会有非常敏感的评

价性自我观念。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如今在我们中间，有设计定制毒品的人，有花时间设计广告专门诱惑年轻人抽烟的人，有为了给自己省一点儿钱，在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中使用危险的劣质成分的人，还有很多人出于利益动机诱使他人献出生命，或让他人冒着严重的生命危险，而自己却袖手旁观。我猜社会学家在计算死于暴力的人数时，并未把这些人的牺牲品包括在内。而显然，借刀杀人和明火执仗的人一样都是凶手。这让我怀疑“暴力”作为一个有道德意义的类别到底有多大用处。在现代社会，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我们亲力亲为，包括伤害和杀戮在内。

实际上，莫里斯有关暴力的讨论还有一个问题，要指出这个问题我最好还是引用表4–1。莫里斯的著作基于他的讲座，最初在讲座上他使用了“不错”（OK）一词，而在本书中他用的是“中”（middling）。“不错”暗示着“可取”，而“中”则没有任何明显的规范性的意涵，其意义也不明。他在第一章中揭示了使用这个词的理由，在那一章中他讨论为每一个群体对待某种行为的态度赋值，如果认为是好的则随意加1分，认为是坏的则减1分。但在这里，我们头脑中有关道德的哲学概念就至关重要了。哲学家有时会争论，根据关于道德的结果论观念，也就是只关注你做过多少好事，将行为简单地排序为“更好和更坏”，要比分为“禁止、可取和必须”更有意义。根据结果论观念，“中”这个词的使用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好和坏有可能被认为是刻度尺的两端。但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来考察“禁止”和“必须”——在任何意义上，“可取”都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概念。所以，莫里斯在此似乎预设了某种结果论的观点。不论该观点是什么，我觉得无论认为它是“中”还是认为它“不错”，都没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觅食社会容许更多的暴力。没有哪个社会认为暴力是可取的，起码它绝不会像——举例说吧——花一下午的时间看电影那样可以随心所欲。暴力总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说它是可以容忍的，就等于说人们常常认为它是合情合理或情有可原的。在莫里斯本人以及他人对于觅食者态度的描述中，觅食者们显然就是那样看待暴力的。

但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的主要观点只是，我们有各种方法来解释价值观体系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其中有些让我们承认，社会形态乃至造就那些形态的任何事物，都对人类价值观的塑造施加了压力，而无须得出社会形态完全决定了人类价值观之塑造的结论。莫里斯并未向我们证明，他自己的解释比其他某些看似可能的解释——特别是我称之为扭曲观点的那种解释——要更加高明。实际上，单看莫里斯的表4–1，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觅食者的价值观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有着广泛的相似性——据莫里斯记述，他自己的学生也有同样的反应。与其认为价值观是由能量获取的方式决定的，或许我们应该认为，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人类开始可以积聚权力和财产，各种意识形态也开始产生，它们扭曲了真实道德价值观——直到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和普及教育的时代，我们才开始慢慢克服这种扭曲。

我们不清楚莫里斯是否相信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也许他所讲述

的这种故事不一定含有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的确，我们轻易便可以想象出一个与莫里斯相似的故事，说明价值观如何改变，人类看待世界如何运转的观念又如何改变。我们会说，觅食者抱持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世界上居住着无所不在的精灵，万事万物均听从调遣。农耕者坚持神学观，认为存在一位先验之神一统天下。化石燃料者则秉持科学的观点，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直接动因决定的。也许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但即使能够证明这样的观点，我也不认为我们任何人，包括莫里斯在内，会急于放弃万事万物实际上都是由直接动因决定的这种观念。

无论如何，莫里斯在全书中最接近于承认有可能存在人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的，是出现在第五章的一句话，他说有可能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观，无论是从各种价值观必然会走向的终极目标，从实用性，或是定言令式，或是差别原则，似乎都可以整理出这样一套普适价值观。”这句话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们本以为，莫里斯把价值观看作对社会有用的工具会让他致力于发明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计算”出一套最佳价值观。如果我们最终实现了某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能量获取方式——比如经济上可行的太阳能，那时，支持太阳能所要求的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价值观或许就是最佳价值观了。

但不管怎样，我不能确定莫里斯在说有可能存在一套“最佳”价值观时，他到底想要承认什么。正如莫里斯所述，在他讲座之后的讨论中，我们提起了当时刚刚发生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遇刺事件，试图看看我们能否从莫里斯本人那里得出任何道德观点。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以测试我前文中提到的所谓“透明度”。相信莫里斯的理论对莫里斯本人的价值观有何影响？莫里斯记录说我们认为“这次刺杀企图的唯一解释，似乎是塔利班对其深刻的道德缺失感到心虚”。实际上并非如此。某个行为是否错误，与为何有人居然认为它是正确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在就塔利班为什么那样行事或者他们为何认为那是正确的问题选择立场。我们要说的只是这种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就此，正如文本中的讨论一样，莫里斯试图避免提出他本人的任何道德主张。在文中，莫里斯却反而讨论起事情在农业人士和产业工人“看起来会”是怎样的。说来也怪，就在这段之前刚刚另有一番讨论，其中莫里斯指责他自己的学生试图在如何解释某人做了不道德之事的另一个问题——蓄奴问题——上闪烁其词。学生们都可以坦率地说奴隶制是错误的，却不愿将其归咎于道德上“落后于时代”（莫里斯的原话）。我倒觉得学生们抗拒就蓄奴者的不道德行为做过于简化的解释没什么错，就像我认为要解释塔利班对女人的态度，很可能会涉及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包括一些道德上有缺陷的态度、一些真正的宗教信仰，还有人类对性事惯常采取的阴暗态度。但这样的想法无法阻止我们坚信，奴隶制和枪击想要上学的女孩根本就是错误的。

莫里斯的文本有时读来仿佛他本人不是他为之建立理论的人类中的一员，仿佛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于他本人毫无利害关系。我认为这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但莫里斯在提到枪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的塔利班

和绑架尼日利亚女学生的博科圣地“关于应该暴力惩罚想上学的女孩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道德败坏的心虚”时，却显然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如果莫里斯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持有那样的观点并非源自其道德品质上的任何缺陷，我怀疑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但并不否认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为了惩罚女孩想要了解自己生活其间的世界而枪击她们并没有错，或者在历史上并非始终为错，那我只能下结论说他是个道德怀疑论者，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的存在。

[1] 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2] 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1938— ），美国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在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精神哲学、伦理学、道德心理学、认识论、统计学习理论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均有专著。

[3] 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es Hutcheson，1694—1746），爱尔兰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研究的主题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和伦理学，其中以其伦理学著作尤为重要。

[4]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英国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讽刺作家。著有《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等。

[5] 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1929— ），美国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荣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道德哲学、思想与行动哲学，以及17世纪理性主义。他1985年关于“扯淡”这一概念的哲学调查论文《论扯淡》（*On Bullshit*）在2005年再次出版，成为一本出乎意料的畅销书。

[6] 弗兰克·马洛（FrankMarlowe），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讲师，研究领域在于觅食者的行为生态学。著有《哈扎人：坦桑尼亚狩猎—采集者》（*The Hadza: Hunter-Gatherers of Tanzania*，2010）等。

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要向莫里斯教授致以谢意，感谢他趣味盎然、鼓舞人心、融会贯通、惊心动魄的骇人讲座，我预测这个讲座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视频游戏，就像蛇梯棋[1]那样，只不过这个游戏里的蛇要多得多。

先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个小说家——这个称谓一点儿也没让我脸红，特别是自从大脑专家们透露，人类在更新世所发展的叙事技巧是进化的主要推动力以来，它甚至还让我有点儿骄傲。没有叙事的技巧，我们的语言天赋也就是《行尸走肉》[2]的水平，我们也就无法像今天这样来讨论人类的价值观。因此，科学家和哲学家们，请你们不要嘲笑说书人。我这门学科才是真正的基础学科。

但在着手写小说之前，我是在一群生物学家中间长大的，自己也几乎成了一个生物学家。我竭尽所能让自己像个生物学怪人，一直很警惕生化昆虫间谍、人造香肠肉、无头小鸡等等，如此种种，驱使我写下了《羚羊与秧鸡》等作品，在那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最新的玩具：基因工程。我们如今已经可以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并致力于从内到外地改造人类。（提示：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会用生物工程设计出美丽的女性，在她们的基因里嵌入对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欲望哦，等着瞧吧。）

我们曾一度为人类的天赋德行和才智自鸣得意，也曾以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无边无际、无起无极，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些都受到了极大质疑。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引自画家保罗·高更）[3]很长时间以来，这些一直是人类的基本问题，但答案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很重要，因为对第三个问题（我们向何处去？）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解析前两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研究神经元的家伙们、DNA历史学家们，以及一连串的相关研究者都忙着解答这些问题。那些登高博见的生物学家也不例外，比如在弗兰斯·德瓦尔最近出版的《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2010）中，看起来我们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便断言的生性自私好斗的下流坯；以及E·O·威尔逊近期出版的《社会如何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2012）中，看起来在我们从觅食社会走向农业社会，再走向机场要一杯拿铁咖啡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相联系的某些特性终得以幸存。（我要特意补充一句，威尔逊教授在其最近出版的

《人类存在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2014］中，称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关键是人文学科学而非天文数理，怕会令很多人大吃一惊。）

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人们谈论“人类精神”，虽说莫里斯教授提出的人类伦理价值观的钩环扣模式不免让人胆战心惊，我仍不准备放弃这种精神。我们的伦理价值观似乎早已长成了连体婴，而与它们密不可分的另一半，不管它们叫什么，继续点燃了人性之光，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我们，包括晚餐吃什么，如果还有晚餐可吃的话：是生海豹肉、是《奥德赛》里堆在桌上的细嫩光鲜的红肉、是《圣经》里雅各和以扫[4]的传说中那样一碗红豆汤，还是我住的街角上小饭馆里的纯素炖菜。与那些价值观密不可分的还有谁来做这顿晚餐，如果还有晚餐可吃，且还有时间和心情烹饪的话：是妈妈，是奴隶，是巴黎的厨子，是像奴隶般挣扎于家务的妈妈，还是肯德基的高温油炸锅——如果不是自助餐，还有谁来上菜：是妈妈；是鱼贯而入的半裸奴隶；是女服务生；是自助售货机；您好，我是鲍勃，您今天的服务生；是穿着烧烤围裙的爸爸；还是“机器人米尔德丽德”[5]，等等等等。当然还包括谁会吃到晚餐中最好的那部分，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是“英勇的猎户”[6]；是“伟大的勇士”[7]；是贵族地主；是家长制的商人爸爸；是现代女企业家妈妈；是被宠坏的孩子；是“小狗罗弗”[8]；还是“机器人米尔德丽德”，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令人神魂颠倒，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有写作习惯的人，我写充满乐趣、笑话连篇的喧闹游戏，其中的人类大都湮灭无踪——但有些幸存了下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故事情节了，不是吗？

但是，假设真的发生了像我在小说中写到的，或是莫里斯教授暗示的那样的崩溃。你或许会觉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会选择后退一步——从化石燃料的价值观退回到农业价值观，但在社会结构广泛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更可能会即刻扭转到早期的觅食价值观，与之相伴的便是人际暴力。简言之，当人性之光阑珊、警局网络失灵之时，劫匪便会在24小时之内出动。农耕者尚有土地可保，因而有领土可卫，而城市居民丢掉例行工作就成了流浪者，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从下种到收获，那可是个漫长的周期，因而不得不走向乞讨、盗窃和谋杀。

这些场景对小说家都是有价值的情节；实际上，这些都是当前流行的情节，《僵尸启示录》[9]即可为证。但和诸位一样，我也想现实地考察一下人类的生存机会，不光是作为物种的人类，还包括人类社会。正如莫里斯教授指出的，全球化意味着随着供应和分销网络的形成，如今的世界越来越变成了同一个社会——一个社会实验，这得益于化石燃料推动的电力互联。我们正在创建的东西从太空中看起来很像一个巨型大脑，其中数不胜数的神经连接器闪闪发亮，或像个庞大的蚁冢，内含一个电化学通路网络。所以，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个一体化的大溃败，其后果是过去的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

社会的科技越复杂，规模越大，就越会由极其微小的错误导致重大失灵，火车失事的速度就越快，灾难性后果就越严重。恢复运作也就越困难，因为再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修复了。你的汽车、电脑和舷外马达都是数码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崩溃了，它不太可能重建，因为资源提炼和生产的组织运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早已烟消云散。

然而，假设世界不会崩溃。莫里斯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将呈现持续的爬升——这里的“升”一词只体现在图表上。这种扩展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会住在巨型都会区，任何断供都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莫里斯说，就算没有发生任何故障，也意味着我们的变化之巨，很快会将我们认知的五星级人类甩在身后，并且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我们如今认为的仁慈、正直与公正，未来可能会被看作愚蠢和反社会的特质。

正如莫里斯教授指出的，一如既往，来自外部的冲击也会对事件产生影响。他列举了曾经加速或伴随过大型文明崩溃的5种力量：导致世界末日的5位骑师。请注意，它们是天启骑士[10]，而不是天启行人或天启轮滑手：我们的确很喜欢有关马的隐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我颇为不悦地注意到，莫里斯在他列举的三个阶段中遗漏了畜牧，因为如果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11]是对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争均出现在无树大草原上骑马的畜牧者中间，并使人类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彻底的转变，这至少应该得到莫里斯的一点儿关注。

莫里斯的5位骑师包括：迁徙失控、国家失效——即方向和基础结构的崩溃、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这一主题的其他写作者曾指出，最后一个因素会影响食物供应和疾病的传播，这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结果）。

我想在这场末日崩塌中添上第6位天启骑师：海洋的崩溃。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扼杀的手指距离海洋从未如此之近，但如今我们早已来到它的跟前。我们高效的捕鱼技术即将使该技术本身的存在无所依凭。我们在海底搜刮，毁掉了繁殖水域；我们倾倒了大量毒素，比如最近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12]；我们和顶级掠食者鲨鱼开战，导致其捕食对象鳐鱼数量剧增，如今正在大规模捕食中型鱼种。

还有更糟的。数十亿年前，海洋藻类植物产生了人类呼吸的大气，如今，这些藻类仍在产生我们所需的60%～80%的氧气。如果没有了海洋藻类，我们自己就无法生存。越南战争期间，大桶大桶的橙剂[13]被装船运至太平洋的另一端。一旦那些船只沉没或泄漏，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就不可能进行了。请注意：我们必须关注自己赖以存在的物理/化学根基。

还有第7位天启骑师：生物工程。如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好几千年前我们就开始这么做了），还可以通过改造DNA来改变物种。至于摆弄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可谓潜力巨大：我们将无力抵抗改变自身DNA的诱惑。我们还会玩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

当然，所有的乱搞都被冠以最崇高的宗旨，其中之一似乎是少数巨头公司对世界种子市场的垄断（顺便提醒一句：大自然痛恨单一农作物）。

在我们发明的所有工具的协助下，生物工程既可用于我们所定义的“高尚”目的，也可以用于我们定义的“邪恶”目的。那么我们制造的工具是中立的吗？有效定义了高尚和邪恶的元素是不是我们的普遍人性及其价值观——那些我们一直习惯于将其看作不变量的价值观？

莫里斯暗示并非如此。我们制造工具，但工具同样也造就了我们。获取能量的工具就是一个反馈环路——如果你转向农业，就会制造有助于农耕的工具，那些工具反过来会决定你如何看待谁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在农业社会，性别角色和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异，部分原因就是使用农具需要很大的上肢力量。

在化石燃料时代，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走向了更大的平等，因为需要不同的力量和技巧。阅读、写作和打字——从使用工具所需气力的角度来看——是性别中立的，这样一来，基于性别的工资差异就越来越难以存续了。

但是，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化石燃料时代之后会发生什么——人类自身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要维持当前复杂的社会结构大致不变，就必须采用廉价的能量获取新形式，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莫里斯的大规模图表描述的速度燃烧化石燃料，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更不用提随后发生的大洪水和饥荒了。

很多聪明人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些残酷的问题。在此期间，莫里斯教授适时地指出，可能会导致我们溃败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他关注的是核武器，这的确是个隐忧。但是，切尔诺贝利的实例表明，暴露在中高水平辐射之中的大自然还会继续发展，尽管会发生更多的变异，而人类自身的发展却不太理想，我们会长肿瘤，身体也会垮掉。

但无论事情发展的走向如何——像图中的曲棍球棒一样直指向上也罢，倒栽葱全部覆灭也罢——巨大的变化，包括某些我们认为是“好”的行为变化，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物种，以及我们的星球上了。我同意，无人知晓这些场景会如何发生；变量实在是太多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乐于见到的未来是开放式的，那样我就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了。至少对我来说，那还是一线希望。

但我们的确热爱推测未来，这也是有原因的。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恩维尔·塔尔文（Envil Tulving）刚刚在《新科学家杂志》（*New Scientist Magazine*）上发文称，人类伟大的大脑中的情景记忆系统进化的目的和方向不是帮助我们记住过去，所以我们总也记不住车钥匙放哪儿了。相反，这些系统的进化是为了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掌控即将发生的事件。而那正是今天我们在会议室用伟大的人脑所做的事情。

人类在过去也曾经历过一些艰难时刻，我们都挺过来了，存活至

今，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大脑。哦，伟大的大脑！如今，当即将发生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投下一片阴影，吓得我们魂飞魄散时，我们召唤你！我们需要你！你最好做些大战略的思考。

再次感谢莫里斯教授，响亮地唤醒了全人类共同的伟大的大脑。

[1] 蛇梯棋（Snakes and Ladders），源自印度的掷赛游戏，棋盘上除方格外，还绘有梯子和蛇，以随机的骰子决定棋子的步数，途中若抵达梯子或蛇的格子会移至其他格，遇梯则进，遇蛇则退，以抵达终点为胜利。

[2] 《行尸走肉》（*Walking Dead*），改编自同名漫画的美国恐怖电视系列剧，讲述了主人公身陷丧尸占领的末日后世界的故事。

[3]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是保罗·高更在1897年所画的生平最大幅作品。

[4]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以扫是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长子，因为“一碗红豆汤”而随意地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5] “机器人米尔德丽德”（Mildred the Robot），出现在美国儿童电视节目《香蕉船冒险时间》（1968~1970）中的机器人女仆。

[6] 英勇的猎户（Mighty Hunter），出自《圣经·创世纪》10：9。

[7] 伟大的勇士（Mighty Warrior），出自《圣经·创世纪》10：8。

[8] 小狗罗弗（Rover the Dog），罗弗是小狗的常用名。在1905年的一部英国黑白默片《义犬救主》（*Rescued by Rover*）中，一条名叫罗弗的狗引领着主人解救了被绑架的婴儿。1991年还发行过一个电脑解谜游戏《解救罗弗》（*Rescue Rover*）。

[9] 《僵尸启示录》（*Zombie Apocalypse*），2012年美国拍摄的一部讲述末日世界的僵尸恐怖电影。

[10] 天启骑士（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圣经·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四位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但对于四骑士的解释略有争议。

[11] 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英国军事史学家，讲师，作家和记者。其代表作《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9月出版。

[12]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指的是2010年墨西哥湾外海油污外漏事件

[13] 橙剂（Agent Orange），又称落叶剂或枯叶剂，含有大量一类致癌物质。美军在越南战争时期通过除草作战方案与牧场工人行动执行落叶计划，对抗丛林中的越南共产党。在1962~1971年的行动中，美国军用飞机把大量橙剂喷洒在越南的土地上。

回应篇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第十章
我对一切事物的正见



伊恩·莫里斯

我的回应

在学术圈，批评是最诚恳的恭维。因此，我要郑重感谢菲尔·克莱因海因茨（Phil Kleinheinz）、乔希·奥伯（Josh Ober）、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沃尔特·沙伊德尔、保罗·西布赖特、肯·沃德尔（Ken Wardl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以及我那两位孜孜不倦、充满耐心的编辑史蒂夫·马塞多（Steve Macedo）和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他们都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但我更要感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理查德·西福德和史景迁，几位在2012年10月不辞旅途辛劳，来到普林斯顿回应我最初的讲座，现在还甘冒更多的麻烦，修订了他们针对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扩展文本所做的评论。

我喜欢回应。每次我拿起刊载回应的期刊——比如《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或《剑桥考古学杂志》（*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我通常会直奔辩论的部分，读完以后才决定是否阅读原论文。我认为这可不是个糟糕的策略；回应者经常会提出我本人不曾想过的各种问题，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论文会有很大的收获。

但虽然读过那么多回应，我不记得有哪位作者因为受到了令人难堪的批评而宣布撤回自己的主张；我必须承认，我也不想当第一个。但那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以此方式对坦纳讲座者逼供，正是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选择这种形式的原因。于我而言，这一组回应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们的作者——一位小说家、一位哲学家、一位古典学者和一位历史学家——在人类价值观的进化问题上采取了如此不同的角度，围绕该主题涉猎的范围如此广泛，让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来考察我的论证。但是，要对这些回应再做出回应也同样面临着问题。就算我有能力回答回应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也需要再写5章的篇幅（且正像出版社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所言，还需要20年才能写完）。我怀疑谁都不希望如此，虽说阅读诸位的回应的确让我很想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我已经写过一本有关长期暴力史的书，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试着再写一本（或者三本）有关财富、性别和政治的长期史。

那要等下一个机会了；当前，我希望自己的回应更加自如一些。尽管诸位评论者的回应并未让我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忏悔，但它们的确让我看到了我论证中的弱点和组织论据的其他（可能更好的）方式。我花了些时间认真考虑了诸位的回应，现在我觉得，我的论证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假设，这让我提出了两个主张，继而牵涉出两个推论。所谓“假设”是指我并不试图证明（至少是因为我缺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必要知识），而是以其作为出发点的前提；“主张”是指我试图在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中证明的观点；而“推论”是指我无法真正证明，但根据我的主张所提出的符合逻辑的观点。考虑到每一个评论者回应都能（或未能）让我从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希望能在这全书最末一章充分整理这些假设、主张和推论。

两个假设

我不会在假设上花太多时间，因为没有一个回应者直接质疑那两个假设中的任何一个。但我还是想说几句，因为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为我的第二个假设添加了一些重要的限定，也因为这两个假设对于我本章后文中回复科尔斯戈德教授和西福德教授的辩论都很重要。

我的两个假设是：

1.有几个核心价值观是几乎整个人类都珍视的。至于有哪些价值观当位列其中，尚有辩论的空间，但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尊重忠诚、防患未然、敬畏神明似乎都是强有力的参选者。

2.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人类经过生物进化，为适应环境而生成的。

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其他假设。我本可假设人类的思想是一块白板，能够接受任何我们想象得到的价值观，而不是假设全人类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同样，我本可假设人类价值观是通过某种其他机制获得的，比如出自某位智慧设计者之手，抑或根本就是个意外，而不是假设人类价值观是经过生物进化，为适应环境而生成的。所有这些备选假设看来都在道理上符合我的功能学派论点，即不同水平的能量获取促使人们对这些人类核心价值观做出了不同解读。就算生物进化实际上只是幻想，或者只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产生起到了很小的作用，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之所以对世事的态度如此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因于我标记为“文化演变”的那些过程。我提出上述两个假设的原因并非它们是我其他立论成立的绝对必需，而是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相反，白板、智慧设计和意外说看起来全都是错误的。

虽说如前所述，没有一位回应者真正对我的假设提出异议，但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的确重提了她对弗兰斯·德瓦尔的坦纳讲座做出回应时所提出的观点。她在描述我的第二个假设时指出，我不仅应该努力解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内容，还应该首先解释我们共有的价值判断能力。她说，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好的事物做出价值判断不同于仅仅喜欢它。她指出，价值判断就是表明态度，是表示不赞同那些不赋予该事物价值的人。“我不可能一边珍视诚实的品质，”她说，“一边又不觉得做一个寡廉鲜耻的骗子很可耻，或者不特别希望自己既能珍视诚实的品质，又能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人。”价值判断是每个人“评价性或规范性的自我观念”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任何不能践行这一观念的人（同样，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不值得尊重。

这些看来都很合理，或许也就是说，科尔斯戈德教授和我关于生物学在价值判断的进化上所起的作用没有多少异议。生物进化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头颅中放入了2.7磅的魔法，正是这220亿个神经元，每秒钟一万万亿次电讯号的来回反射，让我们拥有了创造复杂价值观体系所需的意识。然而，我虽然十分同意科尔斯戈德此前发表的有关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关系的某些结论，却不赞同她说的“我认为其他动物不具备规范性地看待自我的能力”。“人类，”她解释道，“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反观自身：我们不仅对于世事持有评价性态度，对于我们自身的内在状态和态度本身也可以做出有态度的评价……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征，使之与其他动物的生活截然不同。”

想象其他动物思考、感觉和评价方式的做法是一个古老的哲学传统，至少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我无意加入其中，但我用了很多时间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半个世纪的观察让我对科尔斯戈德的断言产生了怀疑。这里，我可能又要被指控犯了某个主义的错误，这回是行为主义者所称的拟人论（在他们的学说中，这个词通常是指“将人类的心理体验归属于动物”之类的概念）。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的主义，因为对于科尔斯戈德观点的拟人论回应会造成循环论证，把我们讨论的那些属于人类的价值判断能力投射在其他动物身上。不过，我怀疑行为主义者们有些草木皆兵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拟人论。更准确地说，就像德瓦尔对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观察那样：“就动物心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对科学家们的态度看来有些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或她本人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的体验……在熟悉这些物种的人中间，绝对‘不相信’［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也有评价性或规范性自我观念］的人是很罕见的。”

在关于拟人论的争论中，作为我个人的一点儿小小的贡献，我想以我的一条狗米洛作为例子。米洛似乎以自己的方式敏锐地发展出一种等级感，类似于本书第三章提到的那些农耕者。这倒不只是米洛想要在啄序[1]上捍卫自己的地位；更准确地说，它似乎是义无反顾地捍卫我们夫妻俩的地位，其他任何动物——不管是我们家最小的猫咪还是那两匹体型庞大的马，雷和斯马蒂——只要没有意识到我们夫妻俩才是狗中老大（姑且这么说吧），都会遭到米洛的惩罚。米洛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它

视等级为好事，因而极为重视等级，并且认为不这么想的任何动物都是坏蛋。

我无法证明我对米洛价值判断过程的印象是否正确；德瓦尔的认识显然是正确的：发现其他物种有评价性或规范性的自我观念“主要是基于人类的直觉”。但是，现代人类代表了一个谱系的一端，而不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所有动物，这个观念似乎正日益被学界广泛接受。20世纪90年代，古人类学家经常会提到大约5万年前的一次“大跃进”或“人类意识大爆炸”，认为那使得现代人类的认知全然不同于我们所有的祖先；如今，大多数人则喜欢说是近几十万年来的一系列“蹒跚学步”，把智人和其他人类逐渐分开。达尔文指出“人类的心智能力和低等动物在程度上有极大的差别，但在类型上并无不同”，看来是再次抓对了要点。

三个阶段，三种社会形态

我的第一个主张包括两个部分：近两万年来，人们对其经过生物进化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这些解读大体上与人类为从环境中获取能量而采取的三种主要方法相关，即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

4位回应者全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这个主张，但在讨论他们的评论之前，我应该首先承认我的“错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十分正确地“不悦地注意到，莫里斯在他列举的三个阶段中遗漏了畜牧”。虽说对她说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争出现在无树大草原上骑马的畜牧者中间”我还可以吹毛求疵一番，但我一时间却不得不同意她关于无树大草原游牧生活的结论：“使人类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彻底的转变。”我在第一章关于无树大平原畜牧业的讨论过于简略；而当时忽略这一点的唯一理由（除了“畜牧业”的首字母不是F，有可能会毁了我标题押头韵的创意之外）是，我认为这个题目会偏离我的主题太远，而又不值得新增太多篇幅。但很可能如阿特伍德所说，这是一个错误。

这个忏悔就谈到这里，现在我准备集中探讨诸位回应者众多主题中的两点质疑。第一个主要由史景迁提出，涉及我衡量各个时空背景中的能量获取的努力。“当我们寻求将过往的模式套入现代框架时，”史景迁教授评论说，“就会遇到一套全然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与术语的描述性用法有关。简言之，问题在于详细叙述，在于计算出一组描述日常生活现实的术语是否在事实上与另一组相契合。”他最后指出，关键问题是：“他的类别有多稳定？”

不妨从史景迁提到的中国定居点的例子开始谈起。我在绘制社会发展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能量获取的计算时就认识到，这些定居点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类别问题。我用来计算社会发展分数的一个指标便是

一个社会内部最大的定居点的规模。在某些时期和地点，要分出哪些可以算作定居点还比较容易。例如，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村落经常会围着壕沟和栅栏，房屋都在围墙里面，外面则无人居住。因此，考古学家很少会争论村落的起止位置（虽然他们经常会争论如何计算居住在村里的人数）。但在其他的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就是青铜时代早期的城市安阳了（图10.1），它占地逾15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曼哈顿面积的1/3。然而，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开放空间，零星点缀着一些茅屋。考古学家至今仍在争论，安阳是否算是一个单一的定居点，如果不是，那么边界在哪里。



图**10.1** 第十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对此存疑的还不只是考古学家。1986年我在肯尼亚时，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界线分明还记忆犹新，所以卢希亚人的希可可（Shikokho）“村”让我大为迷惑。村子没有边界：只是在一片茫茫无际中散落着茅屋、菜园和开放空间，举目望去，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地平线。就算是本地人，似乎也拿不准希可可村和下一个村子的界线在哪里。

然而，希可可村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的变量，从而成为测量社会发展时产生的一类非常典型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地表调查显示，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曾在集中和分散的定居模式之间大幅摇摆，前者产生了像中国新石器时代（或乔治先生的阿西罗斯）那样可以明确定义的村落，而后者则产生了像安阳（或希可可村）那样松散聚集的家庭。这种左右摇摆的原因本身就非常有趣，就其细节的辩论则提供了一些界定前现代定居地的方法，虽简单粗糙，但尚可使用。

就本书的论证而言，社会发展指数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能量了，好消息是，这方面的界定难题并不像研究定居地那么尖锐。我的分

析计量单位是每天每人消耗的千卡路里能量。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在不同的时空，人均的概念差异极大，但尽管这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却不会影响个体作为消耗单位的首要地位。同样，虽说我们很有必要区别廉价和昂贵卡路里，以及食物与非食物消耗，千卡仍是适用于所有类别的有效测量单位。

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定居点规模、能量获取，还是信息技术和战争潜力等其他指标，社会发展指数要起作用，都要从细节中提取精炼信息，以便找出测量单位，在各种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可比较性与明确性的取舍是否得不偿失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做法是正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但史景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我的提取方法使得我这幅“世界版图［在我看来］过于温柔了”，并且“过于简化，或许可以称之为‘数据的中产阶级化’”。他的结论是，我们最好还是选择“一个更加传统的观点，即战争、财富、育儿和疾病，所有这些需求和危险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未稍离——对于散布在全球各个孤立的温暖地带的成千上万，也许是数百万人而言，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谁也不会否认这一冷酷的现实（希望如此），而且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史景迁的意见，即忽略具体细节的史书撰写非常不得人心，就连我这样被指责为缙绅阶级的人也不例外。然而，史景迁的评论恰恰把我们带回了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出的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还是诠释之间的差异。我在其中指出，要想理解生活在过去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根据史景迁所谓的“传统观点”进行深描，描述其他时空的生活现实，无论其冷酷与否。（史景迁教授自己关于中华帝制晚期的著作正是这一类型的典范。）但为了诠释这些现实，我们必须超越印象派的论文而展开比较和量化。即便史景迁教授认为结果过于温柔和士绅化了，在这一点上我问心无愧。

我想回应的第二个质疑主要是由理查德·西福德提出的。我在第一章提到过，考察理想类型最困难的部分便是无法知道自己在何时出错了。所谓理想类型，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与其模型完全匹配，但是在哪一个节点上它与现实的吻合过于松散，让我们可以断定理想类型是无用的？西福德教授关注古雅典的例子，指出我错误判断了这一点，因而“伊恩所谓的‘例外’对其整个理论的破坏力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承认的”。

为了在相关背景下考察我们的分歧，且容我先简要概括一下我在第三章中就这一点进行的论证。我的“农业社会”类别包括生活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万年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人，所以其间包含了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毫不奇怪。我提出用一个三芒星状图来表示这种多样性（前文图3.1），三芒星的中心是雷德菲尔德和沃尔夫所定义的经典农耕者社会类型，形成了农业社会理想类型内部的一种理想类型。马奇根加人这种更简单的园耕社会构成了三芒星的一个点，其能量获取的水平较低（通常介于5 000~8 000千卡/人/天之间），组织结构和价值观与觅食者有所

重叠。更加复杂的原始工业国（比如早期现代的欧亚国家）和贸易城邦（比如古代和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构成了另外两个点；这几类农业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很高（通常在20 000千卡/人/天以上，有时还会超过25 000），而且其很多组织和文化特征都很像化石燃料社会。

园耕社会成为觅食和农耕者社会之间的历史纽带，正因为如此，它们大多无法完美地套入农业模式。同样，原始工业国也是农民与化石燃料社会之间的历史纽带，也同样有很多农业模式的例外。但是城邦呢？为什么它们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应该成为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却从未产生过一场工业革命？我在第三章提出，这些贸易城邦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它们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的能量缓和了但未打破农业的能量束缚，证实而非证伪了农业模式。西福德教授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古雅典的例子确实证明了能量—价值观之间不存在关联。他认为，我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被迫“降低了两种关系的重要性，一是经济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脱节（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二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深刻差别”。要对此做出回应，我就必须不顾读者的反感深究更多的细枝末节，但既然我关于能量获取与人类价值观相关的主张能够与相关数据完美吻合，我觉得自己不该对此回避不谈。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缺乏古雅典的统计资料，但即使如此，“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这样的说法也太过夸张。政治上被排斥的富人凤毛麟角。雅典法律允许属于公民家庭的自由女性拥有财产（地产除外），但女性的财产实际上是控制在她的“基里奥斯”（kyrios），即“主人”——婚前是她的父亲或兄弟，婚后是丈夫，丈夫死后则是儿子——的手里。女人的“基里奥斯”不能随意处置她的财产（特别是她的嫁妆），但她本人也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根据演说家伊塞优斯[2]发表于公元前4世纪70年代的一篇辩护词，“法律明确禁止儿童经商，禁止妇女经营超过一麦第姆诺[3]大麦价值的交易”（大致足够一个四口之家6天的口粮，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2～3天的工资）。该法律使得自由的女性很难致富，但关于这条法律的确切含义，还有较大的辩论空间，这是希腊史上常有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三个雅典妇女的例子，她们送礼和放贷的金额都百倍于伊塞优斯所提及的限制。每一个故事都有其解读问题，但这些文本的确表明，某些女人有很多钱（至少在其中一个例子中，这笔钱显然来自女人的嫁妆）。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贩卖建筑用茅草的女人似乎在一次交易中挣的钱就相当于依塞优斯提及的限制的20倍。

关于法律和实践之间这些明显的矛盾，古典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激辩不休，他们一般会得出结论说，伊塞优斯有目的地错引了一条法律，该法律允许女性只有在得到其“基里奥斯”的同意后才可进行价值超过一个麦第姆诺的交易。但无论细节为何（实际上当时的法律形势可能也模棱两可），结果一目了然：不少自由的雅典女性从事小规模零售贸易，但她们很少会控制大额交易。少数自由的雅典女性之所以很富有，是因为

她们生在富贵之家和/或嫁入豪门。

但法律上不自由的女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雅典的确有一些富有的奴隶，其中一些是女性。不过其数量很少，而且虽然古雅典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奴隶，但富有的奴隶似乎差不多全部集中在金融行业。有一点是我和西福德教授不谋而合的，雅典人强烈坚持，公民在财务上剥削另一个公民是不道德的。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哪个雅典富人（特别是那些雄心勃勃要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愿意被人看到自己参与了巨额融资，哪怕这类活动是他们资本获利极丰的渠道。他们天才的解决方案便是买进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让后者来经营雅典人所谓的“*aphanês ousia*”，即“看不见的经济”，也就是在幕后调动巨额有息贷款。雅典最大的银行便由前后4任奴隶经理人运营了半个世纪。这些经理人都受到财务激励，激发他们利用出众的才华为主人牟利。一个名叫帕西翁（Pasion）的奴隶银行家后来变成了大富豪，于是他先是花钱买下了自己的自由，后来又买下了银行，继而又借了一大笔钱给雅典人，以至于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授予他公民权。帕西翁的妻子阿尔基珀（Archippe）活跃于银行界，其他几家银行的奴隶的妻女们也是如此。公元前369年帕西翁死后，他生前的奴隶福密俄（Phormion）（他管理这家银行已经有些年头了，并且用所得利润从帕西翁那里买回了自己的自由）娶了阿尔基珀，接管了这个企业，在他自己也被授予雅典公民权后，又把银行的管理权传给了他的奴隶。

这都是些非凡的传奇故事，但如此富有的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也同样格外罕见。有钱的外籍定居者也是一样；虽然有些非常富有的人搬到雅典去享受它的各种设施，但城市里绝大多数的自由外籍人士都是穷苦人，希望在雅典大市场上做生意，过上比家乡更好的生活（雅典禁止外籍人拥有土地）。和每一个农业社会一样，在雅典，政治和经济壁垒紧密相连。大约有1/3的人口是奴隶，而且奴隶被解放的概率很低，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公民权，除非他们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帕西翁和阿尔基珀这种人的小圈子。奴隶、自由人和女自由人几乎没有机会致富。外籍定居者致富的概率一定要高一些，但同样只有幸运的少数人才会被财神关照，虽然有少数生来自由的雅典女人接近富有，却又受到“基里奥斯”的控制，不能随便用钱。

表10–1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性所做的一个聪明的比较，巧妙地总结了古希腊与化石燃料世界相隔的距离。正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说，雅典的例子无法证明价值观体系和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雅典诚然取得了超群的贸易成功和文化成就，但它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中的少数人——成年男性公民——统治着大多数人。不过西福德相当正确地指出，这部分少数人的数量很大，大概占了整个社会的1/3，并且“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别”。

表10–1 尤瓦尔·赫拉利对古代和现代雅典女人所做的比较

女性＝生物类别		女人＝文化类别	
古代雅典	现代雅典	古代雅典	现代雅典
XX染色体	XX染色体	不能投票	可以投票
子宫	子宫	不能当法官	可以当法官
卵巢	卵巢	不能担任政府职务	可以担任政府职务
几乎没有睾酮	几乎没有睾酮	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	可以决定自己的婚姻
很多雌激素	很多雌激素	通常是文盲	通常有文化
可泌乳	可泌乳	法律上属于父亲或丈夫所有	法律上是独立的
完全一样		非常不同	

资料来源：赫拉利。

在我看来，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贸易网络的拓展，一些希腊人开始对以宗教形式来认可政治权力的做法感到厌恶。到公元前5世纪，实行男性公民社群内平等分配权力和自由的城邦逐渐胜过了那些没有实行这种制度的城邦。但这也造成了大多数古代社会都无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诸神不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我们怎样才能过上好生活？我在另一本书中将其描述为“希腊问题”，并论证说希腊的很多成就，从他们非凡的艺术和文学成就到大规模的男性民主，都可以看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尝试。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加以及中央集权的产生，从地中海到中国都在放弃以神权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希腊的试验也不过是该趋势的一个地方版本罢了，但希腊的版本不只产生了与大多数古代社会不同的结果，还产生了不少思想界的辩论，它们与现代社会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关心高度相关。因此，我在第三章得出的结论是，古希腊的例子未能证明能量获取与价值观之间的相关性是错误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恰恰证明了这种相关性是成立的。

西福德教授评论的那一章里提出了很多我乐于跟进的其他观点，但因篇幅有限，我这里再谈一个。他指出：“无论伊恩认为希腊城邦有多边缘化和特殊，长期以来，这个例外——与另一个边缘化的‘例外’以色列一样——的影响力要比主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化国王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种非此即彼的讨论在我看来并无助益。希腊和以色列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都是在抵抗帝政的大规模斗争中成形的。如果没有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犹太人和希腊人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就会大不相同，也会小得多；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有可能毫无建树。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最经久不衰的思想产生于扩张主义帝国边缘的小国——孔子的家乡鲁国，佛陀的释迦族，当然也包括犹大国和希腊，但只有在它们被汉朝、孔雀王朝、唐朝和罗马帝国的精英吸收并鼓励之后，才形成了真正的大众运动。传统的阿格拉里亚人和激进的轴心时代知识分子彼此都需要对方。

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但目前我有理由确信我的第一个主张大体上是

正确的——近两万年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与能量获取的三个笼统的阶段相关。

能量来源与人类价值观

我的第二个主张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上，我认为能量获取和人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因果关系，能量获取的变化推动了人类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因果关系的主张是本书的核心，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教授以及我独立征询意见的几位朋友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我必须动用本章的最大篇幅对此做出充分的回应。

理查德·西福德认为，觅食社会实行平等主义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能量，而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更强，因为“农耕经常要容许大规模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但即使如此，“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解释道，“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同样，在“人口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认为“我们姑且接受因为人口规模更大，独裁式结构是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却不适合觅食社会这个说法。但那并不能证明为什么平等主义结构就是觅食社会所必需的甚或有利于觅食社会：也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了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另一个理论：人类天然就重视浅表的等级制度，但与觅食群体相连的更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允许少数精英来粉碎这种光荣的思想（科尔斯戈德的原话），在这个过程中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西福德说，“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这种观点，”科尔斯戈德认为，“传统上一直与这样一种说法相关，即我们的价值观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只是简要提到了贾雷德·戴蒙德和尤瓦尔·赫拉利分别关于农业之到来的描述，“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和“史上最大的骗局”，而没有对这种替代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我认为，纠正这种遗漏的最佳做法便是把我的话分成两部分，在这一节重点关注能量、规模和等级间的关系，而在下一节再回到意识形态上来。

回应者们看到了规模和等级间的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拉乌尔·纳罗尔[4]就已经证明，成员人数低于100~150人规模的群体罕有过多的永久性结构分化和不平等，而人数多于150~350人的群体则很快会分裂成多个较小的社群，除非他们创建了亚群和永久等级。更多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惊人的一致。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自公元17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10倍，最大城市的规模扩充了30倍，但正像本书第四章所述，政治、经济和性别的等级全都削弱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5]甚至提到过，随着规模的扩大，现代社会结构会出现“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

然而，之所以存在这一模式，是因为规模固然可能是等级制度发生变化的几个直接原因之一，但能量获取却是终极原因。由于社会可用的能量增加，社会的规模也扩大了，当然，能量和规模之间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随着一个群体获得更多的食物热量，其成员通常会把这些额外的食物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如果能量供给停止增长，并且如果人们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规模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大，但最终还是会导致灾难。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挨饿，群体也要么缩小，直到要填饱肚子的人口重新与能量供给保持一致，要么就像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鲁普[6]在50年前证明的，人们会加紧寻找能量，强化生存策略，并再次推动规模的扩大。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在本书中的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读者的反馈，曾让我觉得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未能就能量、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很明确的因果论证，所以在这里我要再尝试一次。在我看来，历史变化大致上可以归结为生物学家所称的多层次选择。这一选择过程在基因、个体、亲族和群体层次上同时进行。后代渐变通过基因发生在所有的四个层次上，但它也通过文化发生在更高的层次，且文化过程主要的发生方式很像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

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几乎没有论及微观与宏观水平的过程之间有何区别。在微观层面，能量获取的变化并未迫使任何人做出特定的行为或思考。

例如在冰河期末期，当世界变暖，食品卡路里日益丰富，没有哪条自然法则要求人们把额外的能量转化为更多的人口。人都拥有自由意志：当他们发现，一天的狩猎或采集所获的热量超过了以往，可以选择休息更多时日或消耗更多的能量（个人消耗或更好地喂养孩子）。考虑到在冰河期结束后的数个世纪，人们数百万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或许有理由假设这两种选择——懒惰和贪婪/亲情——各有其拥趸。在个人层面上，能量的充裕无足轻重。

然而在宏观层面，能量获取几乎推动了一切。平均起来，由于贪婪而辛苦劳作，获取更多能量也吃得更多的人要比那些做出相反选择的懒汉邻居身材更高大，身体更健康。他们会——同样是在平均水平上——

生出更高大健康的婴儿，并且如果他们既贪心又不乏爱心（或者用很多生物学家字斟句酌的说法，像对待自己一样贪心地为亲族攫取利益），他们的后代通常会由于营养充足而比懈怠者的子孙存活的概率更大。成千上万年来，这种情况出现了数百万次，所有这些选择的结果就是贪婪者大半比懒惰者繁殖的多，战胜并取代了后者——或者说，由于懒惰和愚蠢完全不同，懒惰者了解到其生活方式的错误而变得勤奋起来，加入到贪婪者的行列。无论是哪种方式，宏观层面的结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贪婪者逐渐接管了世界。

“贪婪是好的，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了，”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中的虚构人物哥顿·盖柯（Gordon Gekko）如是说，“贪婪是对的。贪婪奏效了。贪婪不但阐明而且近水楼台地抓住了进化精神的本质。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生活、金钱、爱情和知识的无尽欲望——无不标榜着人类前进的浪潮。”当然，电影的结尾处盖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把他拖下地狱的实际上不是他的贪婪：而是他太贪婪了。从单细胞生命到人类，贪婪是一切生命形式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每一个物种的进化最终都能达到自私与合作之间的一个最优平衡点。过于贪婪或过于无私的动物都不太可能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它们的后代也不可能比贪婪程度适中的动物更加兴旺。人类当然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能够进行文化演变，但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最优贪婪程度当调试得与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相当。我在第四章指出，在化石燃料社会，适度的贪婪可以导致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5~0.35之间。当觅食者的贪婪程度合适时，基尼系数低于0.25；当农夫的贪婪程度合适时，这一分数高于（往往大大高于）0.35。哥顿·盖柯的问题是他的心胸太过狭窄，简直像格林奇[7]一样。他的行事手段可能会把基尼系数推高到1.0，没有哪个社会能容忍这种行为。难怪他会锒铛入狱。

与贪婪程度适当的人展开竞争很少能够顺遂。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一条山谷或特定狩猎范围内的觅食者全体签署了一个宗教或文化规约，禁止他们吃得太多，或是给孩子们吃得太好。除非附近山谷或猎场的每一个人——以及相隔一个区域、两个区域，直至若干区域的人——都有同感，这条规约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人们拥有自由意志，这样的结果永远不大可能发生。自我否定会有所回报，但只有当其带来的其他类型的收益超过其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比如在战时通过正面影响来提高群体的团结，或是在饥荒时通过正面影响来训练人们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因此，整体模式便是贪婪者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继承了地球主人的地位，推动人类走向理想水平的自私。

像哥顿·盖柯一样，过于贪婪的觅食者终将付出代价。他们从环境中提取的能量越多，人口数量增长得越多，收益递减的速度就越快，继续获得生活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困难。贪婪的觅食者早晚会遭遇马尔萨斯式限制，虽然——鉴于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详细说明的原因——住在幸运纬度带的少数幸运者通过缓慢走向农耕而学会了从土地中榨取更多的能量，在变成农耕者之后，他们又采纳了等级制度，学会了从农业中榨取

更多的能量。

重申一次，人们完全可以拒绝农耕和等级制度，并且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横跨若干世纪、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决定，我们大概可以假设很多人的确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我们大概还可以假设，当时的狩猎、采集和特权游说者再次学到了那个古老的教训：贪婪是难以抗衡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觅食社会，等级社会也比平等社会更容易组织战争和其他集体活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但阿格拉里亚人迅速扩张，但凡地理环境允许，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上每一个角落。

我在此重申，在这个漫长、艰难的历史上，能量获取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时点上迫使任何人采纳等级制度。相反，在森严的等级制度运行无碍、产生了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的情况下（这是指在冰河期结束后12 00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回报的分配很不平均，在田间、矿井和磨坊里辛苦劳作的数百万农奴和奴隶可能不会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很大的慰藉。但在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其间的人们所受到的惩罚要比等级群体中处于低级别的人更甚，常常会把他们推向灭亡。另一方面，在浅层次的等级制度运行无碍、产生了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的情况下（这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走向平等主义的社会获得了回报，而墨守阿格拉里亚之陈规旧俗的社会却饱受磨难。尽管先进的化石燃料社会的收入鸿沟不断加宽，但哪怕把处于欧盟底层的社会跟阿富汗的最上层相比，前者也享有很多优势。

宏观层面趋向或远离等级制度是微观层面大量决策的非预期后果。要考察理查德·西福德所说的露营假期，这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以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那样崇尚绝对君权的方式组织旅行（“朕即假期”[8]）可没法让如今在周末冲到林中享受安宁的现代人玩得尽兴。毫无疑问，世上肯定有人喜欢独裁式旅游（我记得自己还是一名童子军时，就经常在帐篷里被人呼来喝去的），但我确信，就算在等级相当森严的组织，去乡下进行团队建设时也往往会放松规矩。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平等的肖松尼人的狩猎之旅便是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兔老大”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一旦露营结束，无论是银行家还是美洲原住民，都回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效的方式。露营中体现平等主义的原因并非规模，而是我们人类的灵活性，是这种灵活性让我们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而选择最适宜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

西福德认为是规模而非能量决定了等级制度，作为其论证的一部分，他指出在“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的古代村落，“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尽管他们“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我认为这是把乡村生活浪漫化了。我们对于古代乡村生活所知甚少，有限的资料表明乡下的等级制度的确要比大型城市更加缓和一些，但埃及的凯尔克奥西里斯[9]这个文献记录相对详尽的例子表明，该村落仍然是严格按照性别、年龄和财富来区分等级的。

在证据较新的近代阿格拉里亚社会，乡村的等级愈加明显。以俄国为例，因为我碰巧最近在读这段历史。19世纪60年代，自称平民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往往会像西福德那样想象乡村生活。“他们的哲学的中心内容是，”历史学家奥兰多·菲格斯说，“农民公社的平等主义习俗可以作为社会主义者整顿社会的典范。”但当“深入民间”运动让平民主义者们真正面对农民时，他们发现“mir［村庄］是由一个农民长老组成的大会统治的，这个大会与土地公社一起，几乎监控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平民主义者大惊失色；年轻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忆起，“［穷苦农民们］充满了像狗一样趋炎附势的渴望，让我一看就作呕”。菲格斯写道，平民主义者一般的结论是“村庄是培育诡计、复仇、贪婪、欺诈和卑贱的温床，有时，一个农民会对他的邻居采取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行为；那里可不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们想象的和谐社会的避风港”。

我认为在农民村庄的组织问题上，我跟西福德的辩论实际上只是更大范围的辩论的一部分，后者涉及另一个主义——本质先于存在论。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倒不急着自己认错，而是想指出西福德和科尔斯戈德在声称浅层次的等级制度是“默认”设定，或者说是人性的本质时，都犯了这个错误。

在学术圈内互称对方是本质主义者时，我们通常是在声讨辩论对手想当然地假设分析对象——可以是从分子到人类价值观，再到整个物种的任何东西——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反本质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中，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就算我们的分类看来与外部现实丝丝入扣，它们也从来都不是真实社会建构的，因为一个类别中根本没有两个成员是完全一样的（的确，也没有一个成员会在同一个类别中长期不变）。

然而在现实中，至少在工作日，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质主义者，因为不带上一丁点儿本质先于存在论，我们就完全无法进行思考。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可以延伸到每一个研究领域：“化学、生理学和遗传学成功的背后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论，时至今日，生物学家从事人类基因组计划[10]的研究时（但每个人的基因组都不一样啊！）或是翻开《格雷氏解剖学》[11]时（但每个人的身体是不同的啊！），仍欣然接受这种异端邪说。”这意味着所有有关本质先于存在论的指责实际上争论的都是它如何才算适度的问题。

我的论点，即所有现代人类共有同一个进化而来的本质，其中包括一套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论的主张。然而这实属有所限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部分原因是我认为随着人类生物进化的继续，我们的本质理所当然会发生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坚信人类的部分生物本质就是文化灵活性，包括我们能够重新解读核心价值观，以便在周围的世界发生改变时，可以继续实现效用最大化。我认为，所谓适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最多也就到这个地步。人们从采集坚果发展到犁地时，虽然仍秉承着公平的信条，但他们开始认为，公平就意味着恺撒的归恺撒，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等份的利益；如果跟理查德·西福德一起去露营，他们的公平感就会走向反面。在我看来，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

的浅层次的等级制度始终是我们默认的设置，以及农耕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一万年的论点，当属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要证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大约1 500万年前，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拥有价值观。当时的世界不仅没有人类，其他大猿——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也为数甚少，这些都是在基因上与我们最接近的亲族。当时只有这些现代物种最后的共同祖先在中非雨林的枝条间摇荡，那是一种早已灭绝了的生物，生物学家称之为原型灵长类。

至于原型灵长类为何会进化成像人类和我们的猿类表亲这样天差地别的动物，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生物学家最流行的解释主要关注在刚果盆地的两个部分，猿类为获取能量在这两块地方采集的野生食物数量有小小的差别。但是，关于不同的生物属从共有的基因物质进化出形式决然不同的等级观念和对待暴力的态度这一事实，争议就没有那么大。例如，大猩猩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一只雄性领袖占据着一小群雌性，而非领袖的雄性则通过激烈竞争来统领自己的后宫。一只成功的雄性领袖会垄断其后宫的交配权，并保护妻妾和后代免受攻击。黑猩猩同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形式有所不同。多只雄性（通常有亲缘关系）结群同居，时常争夺统治权。这些竞争可能非常激烈，但成功主要依靠与支持者结盟。雌性彼此之间的协作就要少得多，它们通常随意交配。占据优势的雄性的性行为多于处在被支配地位的雄性，但一个群里的雄性会集体保护雌性和幼仔，这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缘故。倭黑猩猩同样随意交配，但雌性之间的协作远胜于雄性，等级浅表，暴力情况也极少。性行为最多的雄性常常是那些与雌性相处融洽的（或是其母亲在雌性中地位很高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大猩猩和黑猩猩在本质上都有等级制度并使用暴力（尽管方式不同）；倭黑猩猩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但人类与这些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经过进化，我们已经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选择使用何种程度的等级制度和暴力。等级制度运行无碍时，我们就等级森严；等级制度效率不佳时，我们就抛弃它。我们不停地做试验，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个人和群体就繁荣兴旺，而选择错误的就逐渐消失了。在觅食世界，非等级的集体行动通常效果最佳（不过肖松尼人猎兔手或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富裕觅食者并非如此），但这不是因为人类在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义者。毕竟，觅食者的平等不是简单的没有等级制度的问题；总有逞能者企图抢到前头去，却总是被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所称的“逆向统治等级”（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ies）所抑制——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些，就是失败者联盟。

因此，我认为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觅食带给人类的问题可以通过浅表的等级制度和大量暴力得到最佳的解决，权力因而落在了失败者联盟手中。农耕产生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等级制度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逐渐破坏了失败者联盟存在的根基。在大多数时间里，建立了等级组织，并将公正和公平解读为某些人（比如男人和神圣的君主）理

应比其他人（比如女人和农民）获得更多利益的群体，战胜了那些没有这些制度和解读的群体。在例外情况下（多发生于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以及早期现代北大西洋沿岸）程度较轻——在这些地区，更浅层次的等级制度盛行一时。近两百年来，化石燃料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等级制度较弱的组织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公平公正意味着多少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观念在大体上（但并非完全）横扫了这个世界。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理查德·西福德说的“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是错误的。在露营地的觅食者中间，乃至在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占上风的不是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而是众多对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进行的解读中碰巧最有效的一个。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对我的第二个主张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批评，但我认为这些也体现了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她指出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实际上没有证明能量获取推动人们对人类价值观进行特定的解读。相反，她说：“他证明的，或者说他明确证明的，不过是相反的价值观并不是维持他讨论的社会形态所特别需要的。”她说这意味着“莫里斯指出，觅食社会不鼓励贫富不均，没有贫富不均就没有什么可继承的财产，因此孩童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她补充道，“这只能证明基于其能量获取方式，觅食社会没有特别的理由来强制婚姻忠诚，并没有证明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婚姻要采取松散的形式。”同样，在农耕者森严的性别等级的问题上，我强调“一个基于性别的严格的劳动分工……也没有解释男性霸权的起因。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以家庭为基地控制着男人，命令他们出去工作挣钱，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干好的事儿，男人一带钱回家，女人就立即把钱据为己有。”她认为，我关于暴力的思考也有可议之处，因为就算我是对的，“对于为农耕活动而组织的社会而言，暴力造成的问题大于为觅食而组织的社会，对于工业社会则是更大的问题。但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觅食社会可以容忍暴力”。

科尔斯戈德的结论是，我们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并且只要我们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就会按本性行事，而不是根据能量获取来重新解读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她的结论（我在前文引述过），即觅食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比农耕者更加平等是因为“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而她在其后将觅食者之所以“未能注意到人们不该四处杀人，在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的原因解释为“就是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她指出近代人类“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身份认同会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而遭到破坏甚至摧毁”。因此，“为了捍卫荣誉而杀人，在过去看起来可能更像是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视为完全可以容忍的一种暴力形式，也就是自卫”。

这些观点均论证严密有力，但我认为，与其说我本末倒置，不如说我的论述过于浓缩了。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尔斯戈德教授把人类本质的问题设计为非此即彼的模式（我们是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因为答案永远是“两者都是”。要解释觅食者

（化石燃料使用者也日益如此）对待女人性事的随便态度，以及农耕者对此事为什么苛刻得多，最好的办法是将比较男人和女人的进化结果（近5万年来一直相当稳定）与追求这一目标可使用的策略（与能量获取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较，并看到随之发生的平衡偏离。当然，这就需要再谈几句人类进化的题外话。

个体动物通过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获得进化意义上的成功：它们产生的复制品数量越多，其基因永恒存续的机会就越大。但在通过交配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对雄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廉价又容易：在雌性体内射精即可。因此，与很多雌性交配的雄性就会比其他雄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这样一来，雄性经过进化的结果就是希望与很多伴侣交配。而对雌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昂贵又困难，因为她们要怀孕直至分娩。因而如果某个雌性谨慎选择伴侣，只接受有能力给予她强壮、聪明和健康后代的雄性的精液，她就会比其他雌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因此，雌性经过进化，就变得比较挑剔。

在动物的王国，所有这些看来大致都是正确的，但不同物种的进化分歧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性。第一个涉及抚育后代的问题。在某些物种里，后代一生下来就可以四处走动，很少需要甚至根本无须亲代抚育。然而对大多数物种而言，幼仔需要喂养、保护和教育，现代人类是后一种类型的极端例子。因为我们有如此庞大的人脑，就需要大型颅骨，但如果我们像其他大多数哺乳物种的幼仔一样，一直待在母亲子宫里，直到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再出世的话，我们的头就太大了，无法通过母体的产道。经过进化，人类母亲应付这种情况的实际做法是生产早产儿，代价是大大增加了父母抚育婴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育儿开辟了两性战争的一条新阵线。子女需要的照料越多，每个性别把这项任务全扔给对方的意愿就越强烈，懒惰父母的收益也就越大；但如果父母双方都遵循这个策略，孩子就会死掉，懒惰父母的基因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每个物种都进化成各自独特的性别劳动分工，能量获取的形式在结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人类只有在一个事实上与其他动物不同，那就是他们可以经历文化和生物这两种进化，从而走向新的平衡。

大猩猩的进化走向了围绕一夫多妻制雄性领袖而组织的家庭，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走向了不同类型的混居群，而人类则走向了配偶关系。尽管缺乏清晰的细节，但匠人/直立人大概是在1　800万年前开始朝着这一方向进化，发展出独特的能量获取和社会生活的性别分工，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并在做饭和育儿等事务上进行协作（但女人完成大部分工作）。

配偶关系的性别新战场需要同样新的战术。一方面，人类进化出我们独特版本的爱情，让我们彼此间建立起情感纽带，从而更容易合作和彼此信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找到了与这一体系博弈的新办法。女人

可以与一个尽责的扶养者缔约，来实现最大的遗传成功，就算她怀疑他的遗传基因也不妨事，之后她可以为获取精液而摆脱这段关系，把基因优秀的闯入者带回爱巢。男人当然有相反的选择，在别人的爱巢里留下种子，让那些男人来付出养育自己后代的代价。丈夫和妻子都有强烈的动机阻止配偶以这类方式实现繁殖潜力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后代能够使用的资源，还会损害配偶间的信任。嫉妒是一种进化适应。

总而言之，这不仅解释了贯穿人类史的数以百万计的三角恋爱和因之而生的数十亿次痛哭流涕，也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大部分根源。虽然托尔斯泰直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我看来，在这些战争中可以使用的武器不过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羞耻（或者说得更冷酷一些，声誉成本）：遭到背叛的伴侣对全世界宣布，我为他/她付出了那么多，看看这个畜生/贱货对我做了什么！第二种工具是暴力：丈夫的装备一般比妻子更精良一些，不过遭到藐视的女人也能叫来男性亲族把她的浑蛋丈夫打个半死，或是戴了绿帽的丈夫痛打奸夫。最后，我们还有经济工具：如果某个伴侣控制着与生计相关的资源，他/她在性事上就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

每一种武器都是有效的，但其威力取决于人们在面对诱惑时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成本/收益分析。天平的一端是偷情给配偶带来的痛苦（也就是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的机会）或是遭到背叛（也就是允许伴侣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他/她的伴侣要遭受被羞辱、殴打和/或净身出户的痛苦。实际情况所需的算计更加复杂，盖因人人个性不同，亲友的利益和建议也千差万别，邻居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思考。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各有所好——但既然心理学家认为，天平的一端在各个文化中的重量大致相等，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些变量，必须仔细考察天平的另一端。

公式很简单。男人通过羞辱、暴力和经济施加给配偶的痛苦越大，妻子就越有可能忠诚，而丈夫就越有可能偷情；反之亦如是。觅食者（以及化石燃料使用者，只不过后者的程度较低）接受女性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而农耕者拒不接受，原因并非农耕者扭曲了人性的平等本质。这是因为丈夫和妻子能施加给对方多少痛苦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而这又大致取决于社会规模，但最终还要仰仗能量获取。

与觅食相比，农耕在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划出的分界线要明显得多，要求女人集中精力操持家务（食物储存和准备、织布、养育子女之类），要求男人专心一意在外获取能量（田间劳作、改善土壤、狩猎、贸易、战斗、辩论之类）。正如科尔斯戈德所说，如果我们在关于化石燃料的研究中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可以轻易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组织者占据上风，把无甚他用的人打发到田间去为他们劳作，但在现实中，农业社会的组织需求给予了男人向不忠的妻子施加极大经济惩罚的手段，同时也提高了男人未能阻止女人偷情的成本。在大多数时候，女人的不忠暴露之后，她能期待的最好结局也就是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了，

而四处偷情的丈夫面对的最糟情况只是再婚（或是像托尔斯泰小说第一章里提到的奥布朗斯基公爵那样，在沙发上睡三个晚上，直到妻子的怒火平息）。我猜想，罪人们所遭受的羞辱及其对加诸其身的暴力的忍耐，都与不忠的可见经济代价，以及委屈的伴侣手中把握的经济武器的强度密切相关。不过仔细考察这一问题的历史和人种学证据，一定会很有意思。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专注讨论觅食到农耕的转变，而非农耕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但一个完备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两种情况。在我看来，关键的事实是自1800年以来（且特别是自1900年来）能量获取的爆发极大地增加了女人的就业机会以及女人相对于男人的经济力量。正因为如此，丈夫通过经济武器所能施加的痛苦急剧减轻，也正因为如此，加诸女性婚外情上的羞辱和对加诸参与者的暴力的容忍度也急剧下降。因此，化石燃料使用者越来越认为（或谴责），男女两性拥有的性自由大致相等。

还有一个细节：古代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12]和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13]阅读过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草稿，他们两位都向我指出，性价值观的理论一定能够解释如今在很多化石燃料社会中，总生育率为何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进化论科学家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说："考虑一下全部人种学记录中的一个最奇怪的传统吧：竟然存在这样一种亚文化，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拉长他们简历上的出版物清单，而不去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且还更加为此自豪。"作为一个典型的"怪人"，主动选择不要孩子这种奇特亚文化的成员，我该如何自行解释呢？

里彻森和博伊德为这种显然是适应不良的特性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但我怀疑——套用据说是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见证了生育率在20世纪下降的化石燃料社会，同时也见证了财富和权力的上升，但无人能够保证这种关联会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保持下去。随着地球的人口重心转移到非洲，欧洲、东亚以及（程度较轻的）北美或许会为他们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同样，如果我在第五章中做出的任何一条大胆预测最终哪怕只是部分正确，21世纪的后人类大多会生活在网上，进行无性繁殖（如果他们还需要繁殖的话）。在那种情况下，生育率下降也就无足轻重了，而我们这些无子嗣的学者就会被历史记录为先锋人物，大胆走进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领域。

关于性，就谈到这里吧。科尔斯戈德还质疑了我关于暴力的论述。她说，我实际上未能解释觅食者为何如此能忍耐暴力，这是我整个论述里的"问题中最明显的"。然而，我认为我在此处的主要论证问题同样在于论述过于简要，忽略了其进化背景的深入讨论，而我认为科尔斯戈德教授的主要问题则是过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生物学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域，但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意的少数

几点共识之一，便是暴力和嫉妒一样，是一种进化适应。差不多每个动物物种都以某种方式利用暴力来解决争端。在每个物种内，没有哪两只动物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使用暴力——有的性情暴躁，有的是和平主义者，但整体而言，每个物种经过自然和性选择后都会进化到一个暴力使用数量和种类的平衡点。这一平衡取决于该物种的体质禀赋、环境、捕食对象、捕食者、竞争对手，以及一大堆其他因素。随着动物生活环境的改变，它们的暴力模式也发生改变，其结果是在近130万年来，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与它们最后的共同祖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化，以至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很少会杀死对手，而在它们的共同祖先之中，大约有10%～15%死于种内暴力。这一数字与人类觅食者非常接近。

因此，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能够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动物非常相似，但我们又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但可以经历生物进化，在文化上也一样演变。随着我们能量获取的增加，社会的规模和劳动分工的复杂度都提高了。农业社会产生了大量最重要的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暴力专家，他们组成了第一批政府，在近5 000年间，这些专家逐步缩小了其他人为获利而使用武力的范围。我在第三章提到过，我的计算表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政府已经把暴力致死率降到5%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耕者慢慢地能够更好地行使其价值判断的能力了，而是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步提升，提高了个人利用法律为自己牟利的成本。公元200年后，当欧亚大陆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时，那里的暴力致死率又激增回10%——这不是因为此时人们又忘记了该如何正确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政府力量大不如前，不再能将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一定水平，致使它毫无吸引力。公元1400年后，强大有力的政府再度出现，暴力致死率又开始下降。20世纪，这一比率的全球平均值低于2%，而在21世纪则低于1%。

最后我想回应的质疑是针对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了我们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解读这一主张的，这一质疑倒不是本书的回应者提出的。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诸位评论者主要关注的是我的论证逻辑，而其他几位读者提出的意见更偏重于我所谓的历史性异议，质疑了我假设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他们评论说，我将其与化石燃料联系起来的很多价值观在18世纪，乃至17世纪的西欧便已成型。但是，工业革命到18世纪70年代才开始，哪怕在英格兰也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站稳脚跟；如此说来，我怎么能把“化石燃料价值观”称为化石燃料的产物呢？

在本书前文中，我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点儿评述，但因为我组织论证的方式，我的评述散布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中，其中的一些显然是按顺序安排的。我认为，随着人们学会了获取更多能量，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能量和价值观均可无限细分下去，但为了理解大量让人云山雾罩的历史和人类学材料，我把能量获取和价值观都分成了三个理想模式。在第一章里，我引用了韦伯的话：“就其概念上的纯度而言，这一心智建构绝不可能出现在经验现实中。它是一个乌托邦。”但韦伯继续解释说，理想类型与现实自是有所偏差，但它所具备的明晰性完全可以弥补缺憾。在理想类型层面上叙述的历史似乎表明，随着人们从觅食

阶段通过农耕阶段走向化石燃料，他们同样经历了若干种价值观体系，但从个体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层面来描述的话，一切就要混乱得多。

我在第二章特别提到，像日本、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北美太平洋沿岸这类处在资源丰富的海边地区的觅食社会能够获取的能量比内陆觅食社会多得多。尽管这些“富裕觅食者”中无一转变为农耕者，但他们非比寻常的优渥环境允许他们获取与某些农业社会一样多的能量，正因为此，富裕觅食者的规模、财富、等级和价值观都开始偏离理想类型的觅食社会，而走向我们一般会在阿格拉里亚中看到的形态。他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前进是受限的，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会把绳文时代文化遗址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混淆；实际上，允许一些人成为富裕觅食者，和允许其他人成为农耕者，其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全然不同，所以富裕觅食者社会独立发明农业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每一个富裕觅食者社会最终都会被其他地区的农耕者战胜并摧毁。

我在第三章指出，贸易城邦和原始工业国与富裕觅食者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入海通道看来是大多数独特社会的秘密，它们利用自己地处沿海的优势，把能量获取推高到远胜于理想类型农业社会的水平。就像是富裕觅食者的历史重现，它们的规模、整体财富和开放度都有所上升，价值观也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尽管——如我在本章前文中关于雅典的讨论一样——没有一个城邦真正脱离了它的农业根源。同样，也没有一个城邦曾经哪怕接近过工业革命，因为对城邦发展有利的条件并不利于实现化石燃料的突破。因此，农业帝国最终吞并了大多数城邦系统。

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却不同，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英国——确实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我在前文中指出，这是因为英国能够利用其海上贸易网络产生数量真正无与伦比的有机能量，从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刺激英国企业家解决如何利用化石燃料驱动机器的问题。1600年后，随着大西洋经济的起飞，西北欧的能量获取暴涨，到1700年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时期曾达到的最高水平。

随着其社会规模和财富的增加，西北欧尝试了各种新型组织，并且像某些古代和中世纪城邦的居民一样，欲去还留又用力过猛地走向了更加开放的秩序。17世纪40年代，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一些英国人奋不顾身地打破等级和神权，而当伯明翰之外的人还不知道博尔顿和瓦特是何许人也时，一些美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朝着这一方向走得更远了。如果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早500年，在能量获取增长极其缓慢的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它们就真的能证明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价值观转变的主张是错误的了。但因为它们发生在17和18世纪，恰逢欧洲的能量获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之时，我觉得启蒙运动就是能够证明我的论题的有力证据。

很难看出我该如何测试因果关系主张所暗含的反现实，但我的直觉是，如果西北欧的能量获取停滞在35 000千卡/人/天左右（大约是其

1776年的水平），单凭启蒙运动不足以导致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相反，西北欧及其美洲殖民地很可能会经历保守的反对派针对其新思想的运动，18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的经历就是如此。真正重要的是1800年后的能量爆炸，这首先使得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西方世界畅行无阻，继而又推动西方国家走上了激进的新方向。（其他的反现实也大量存在——如果美国革命失败了，能量获取的提高是否还会推动英属美洲走上与历史上的美国一致的路线？英属美洲最终是否会取代英伦三岛，像真实世界里1945年后的美国一样，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核心？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美国是否会变得像拉丁美洲那样，在美洲大陆上缓慢推广奴隶制？又或者，美国是否会发生它自己的工业革命？）

求助于“过渡型”实例常常是学术无赖最后的托词，他们孤注一掷地使用一些历史阶段的理论来规避经验归谬。某些读者无疑会觉得我的论证也当归于此类，甚至是其中更令人遗憾的个例。但在我看来，富裕觅食者、古代和中世纪城邦，以及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的确都是恰恰证明了规则正确性的例外情况，因此我坚持我的第二个主张，即能量获取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人类的价值观。

乔治先生犯错了吗？

1984年，欧内斯特·盖尔纳（我在第三章中称他为阿格拉里亚的发现者）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讲席，成为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当时我还是剑桥的研究生，盖尔纳甫一到校，我和同事们就发现他有个特别让人难堪的习惯。每次开研讨会他都会坐在前排正中，演讲人还在说话时他就睡着了，听众一鼓掌他就惊醒过来，提一个问题，将演讲人的致命错误假设暴露无遗。我最初看到他玩这个把戏是在克里斯托弗·蒂利[14]（如今已是世界一流的考古学理论家，但当时只是个新科哲学博士）做社会学理论和考古学报告时。“他们告诉我，你是个出色的考古学家，”盖尔纳说，“既然如此，干吗要做个糟糕的哲学家呢？”

我觉得盖尔纳说得有道理，而且我近30年的工作都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考古学家应该把哲学留给哲学家去研究。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邀请我做坦纳讲座诱使我走出了这个安逸圈，但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的一句话最终让我看到蒂利说得也有道理。考古学无法避免地具有哲学的意蕴，除非有优秀的哲学家认真精深地研究考古学，否则考古学家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名糟糕的哲学家。

科尔斯戈德教授指出，在研究人类价值观时，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我提出的那一个，即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真实世界的人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解读方式之间的区别，而是“成文价值观”与“真实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区别，她认为前者是指“人们实际持有的价值观”，而后者则

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价值观”。她将该术语的使用追溯至早期现代欧洲，说“如今的哲学家不再沉迷于那个说法了，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说法，则不妨把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差别，看作永恒的价值观与事实上只有特定时空的人们支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解释乔治先生价值观的挑战实际上就变成了解释农耕者为什么会有如此错误的价值观。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尔斯戈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因为我在本书中两个主张的第一个推论，便是她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科尔斯戈德一度说“我们不清楚莫里斯是否相信有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如果从科尔斯戈德使用这一短语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有任何真实道德价值观存在。

我这样说是因为人类价值观只能由人类所持有，而如果人类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价值观（诗人奥登[15]说“先填饱肚子，再谈论道德”）。这必然意味着根据定义，真实人类的价值观就是成文价值观，由我们从世界获取能量的方式所塑造；这正是为什么我说科尔斯戈德提出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都是成文价值观。

就算我们将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我所谓的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这种真实/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也一样毫无意义。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们在依靠觅食生存的真实人类中发生了进化，因此被解读为公正、爱等，这与其从野生动植物中获取能量并与从事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类展开竞争时效果最佳的方式是一致的。试着想象一下，人们不知为何摆脱了获取能量的需求，然后却开始思考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可真是个古怪的行为。实际上，这让我想起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16]痴迷于谁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这个问题，决定做个试验。他下令把两个新生的婴儿隔离抚养，让他们根本听不到其他人类的声音。两年后，试验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孩子们突然伸出双手向他们的看护人喊道：“bekos！”——这是弗里吉亚[17]语“面包”的意思。“埃及人接受了这个证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得出结论说弗里吉亚人比他们自己更古老。”

故事有点儿傻气，但问人们如果他们不属于说某种语言的社群，他们会说哪一种语言，实际上并不比问如果他们不是靠获取能量来生活的真实人类，他们会持有哪种价值观更傻气。就算是经过最无懈可击的推理得出了脱离任何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也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能量获取为前提。理论家往往会认为他们身处其间的能量获取环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同样不用惊讶，他们往往还会下结论说，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优的价值观。

有关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约翰·罗尔斯著名的思想试验。那

个试验要求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起初身处一个“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自己生来是男是女，富有或贫穷，贪婪或懒惰，健康或虚弱，如此等等，我们会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罗尔斯的结论是，人们最终会同意两个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同样自由，以及制定规则限制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对群体中境况最差的人有益的不平等除外。

罗尔斯的著名提议，即我们应该祈望的社会是一个要求我们“分享彼此的命运”，并且“承诺只为共同利益才利用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拒绝等级制度；他辩称：“贵族政治和封建社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把……偶发事件当作隶属于某种程度上封闭的特权社会阶层的归属性基础。”

和罗尔斯一样，我也生长于一个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并且我也认为这种观念很有吸引力——前提是我可以假设无知之幕另一侧的世界也是由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但如果驯化的动植物几乎就是那里唯一的能源呢？毕竟，既然称之为无知之幕，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假设任何事情。就我们所知，我们进入的将是一个农耕者的世界，面对着的是农业社会的关键难题：尽管大规模的协作是我们糊口维生所必需的，但劳动的边际回报通常极低，以致关键任务只有强迫劳动才能完成。同样，和罗尔斯一样，我也没有费心去做任何实际的研究来测试我的先入之见，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在面对出生在农业世界而非化石燃料世界这种可能性时，或许不会选择罗尔斯谨慎指点的平等主义方向。事前的最佳选择或许是更有保留地承诺秉持一整套更粗糙，也更易操作的价值观，那自然是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公平、爱、同情等等，让实际生活在幕布另一侧的人们来决定如何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最佳解读才能远离饥饿和暴力。

盖尔纳或许会将所有这些都看作糟糕的哲学，但在我看来，尽管罗尔斯精辟地阐明了其对自由的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洞察，他却没有以其理性的方式得出科尔斯戈德所称的真实道德价值观，因为这样的永恒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幕布另一侧的物质条件是中世纪，那么秉持封建观念的人们会兴旺昌盛，而平等主义者则不会。如果我的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的区分就是正确且重要的，而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与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则不是。

因此，我不同意科尔斯戈德把我问乔治先生的问题重新组织成一个关于农耕者为何如此大错特错的问题；且由于我不同意农耕者未能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她关于农耕者何以失败的解释自然也与我的解释格格不入。有关农耕者之错，她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理论。第一个她称之为社会实证主义，“人们实际进行价值判断的东西则完全可以归因于社会学力量，而后者又是由进化力量所推动的”；第二个是启蒙观点，“人类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就像学习科学知识的能力一样，这种能力……真实道德价值观，迟迟无法进入视野”；第三个则是扭曲观点，“人类具备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

力天然地倾向于依附真实道德价值观，但这种倾向性容易受到……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科尔斯戈德说得不是很明确，但我认为她是在指出我的论证属于社会实证主义，尽管她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批评听上去说得不太像是我写的这本书。科尔斯戈德说，社会实证主义的主要弱点在于“如果价值观只是某种能量获取形式所需要的一种维持社会形态的方法，人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价值观的运作方式。在价值观起作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在践行着真实道德价值观”。我完全赞同，因此我很自信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社会实证主义者（我是个功能论者，不是社会实证主义者）。

我之所以同意科尔斯戈德所说的除非人们真正相信它们，否则价值观并不成其为价值观，理由是历史和人类学的发现看来很清楚：人们一般的确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所有可以为这两个学科所使用的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以神圣国王为例。普鲁塔克讲过一个很好的故事，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经过10年终于打败了整个波斯帝国，来到印度边境时，他问一个当地的智者：“人如何才能变成神？”这位聪明的名士告诉他：“那要做一些人力难为之事。”我总是想象亚历山大挠着头想自己认识的人里谁做过人力难为的事情？并很快得出了答案：我知道了。那就是我啊。我刚刚征服了波斯。还从来没有哪个凡人有过我这样的成就。我就是神，如果我的朋友背叛了我，我也不该因为杀了他而烦心。

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宙斯之子，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信以为真了，且至少从公元前332年起便开始进行宣传，企图让全天下也信以为真。我们也不知道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似乎在他与智者的对话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命令人们崇拜他时，大多数人只是一笑了之。但在公元前307年，雅典人却愿意为亚历山大的前将军们建造祭台并祭祀他们。一个世纪后，希腊人把他们的国王当作神来崇拜就再正常不过了。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人们是否真的相信那些有严重缺陷的统治者是神灵，但相信后者是事实上的“救世主”大概能以最不费力的方式解释两个明显的事实——这些人所做之事看来超出了凡人所能，并且掌握着超人的权力。

关于古代农民在想什么，我们所知非常有限，但我仍然怀疑当阿格拉里亚社会的成员给予男人凌驾女人、富人凌驾穷人等诸如此类的权力时，是否的确相信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像化石燃料哲学家往往会认为，自己坚信平等的需求就是再正确不过的价值判断。但鉴于我和科尔斯戈德教授似乎在社会实证主义是个糟糕理论这一点上还算意见一致，我这里就不再啰唆了。

我来谈谈她的这句话：“我认为启蒙观点值得一谈，但更值得探讨的则是扭曲观点。”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关于启蒙观点的意见，但这只是因为（正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解释的）我认为启蒙运动本身就是能量获取增长的产物。然而，扭曲观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科尔斯戈德和

西福德都非常重视阿格拉里亚的意识形态，前者说它扭曲了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后者说“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这个小群体还会实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都没有十分严格地定义“意识形态”。诚然，这是社会科学词典里最难定义的词汇之一，但我冒着看似好辩争胜的风险，还是要把他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归结为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18]曾经称作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观点，将意识形态看作一个错误观念的连贯系统，维持着剥削和统治的整体结构”。我在这里引述了阿萨德的话，是因为关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的评注是“姑且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绿野仙踪》理论。和多萝西一样，人类学家［或哲学家、古典学者］撕开了表象话语的面纱，暴露出本质的现实——一个长相普通的老人正忙着在摇一台手动机器”。[19]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你也能永远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据称这话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也可能是P·T·巴纳姆[20]说的）。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显然认为林肯/巴纳姆是错的，他们认为一万年来，阿格拉里亚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女人被男人，穷人被富人，每一个人都被牧师牵着鼻子走，并被洗劫一空。我就是对此不能苟同。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据我们所知，也是整个宇宙中最聪明的）。我们为自己遭遇到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如此说来，如果农业价值观真的只是邪恶精英玩的把戏的话，又如何能存续一万年？我遇过的大多数农民都很精明；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农民却傻到没有猜出魔法师的屏风后面到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幕布。幕布只是现代学者自己想象臆造出来的东西，是“只有一小撮精英才有可能认为等级制度是好事”这一假设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农民拥有农业价值观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当，而是因为他们有常识。常识——我是指人类经过生物进化所得到的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的能力和根据周围环境调整行为的能力——告诉人们，在平均能量获取在8 000～35 000千卡/人/天的任何社会里，农业价值观都是让大多数人温饱和安全的有效手段；当能量获取升高到35 000千卡/人/天以上时，常识又告诉人们，是时候来重新解读他们的价值观了。

我强调常识，因为西福德认为“‘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并非如此。常识绝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恰是意识形态必须奋力战胜的东西。常识并不总是理解现实的好用工具——毕竟，常识告诉我们太阳围着地球转，世界是平的，而空气不是一种物质，但要想明白什么最有效以及我们行为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常识可是个极其有效的工具。神圣国王、男尊女卑和生而为奴都不是事实，但在农业社会，这三种观念都很有效，因此常识告诉人们应该相信它们，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劝说人们忽视常识非常困难，这也正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永远骗住所有的人（就算只有一万年也做不到）。常识是

有腐蚀性的，能像酸性物质一样把意识形态侵蚀殆尽。

西福德在评价我在肯尼亚的卢希亚人中工作的经历时，说出了常识都是意识形态这句话，我认为那次的经历实际上很好地例证了我的观点。1986年，我带着关于殖民主义邪恶罪行的一套坚定的化石燃料假想到达肯尼亚，但很快就屈服于常识，雇用了当地女人来给我送水。“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西福德教授说，“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

我觉得此话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本地人指给我们夫妻俩看，几个废弃的抽水净化站的遗迹上早已杂草丛生。他们解释说，肯尼亚西部太穷了，就算援助组织建造了水站，连付费维护设备运转的人都找不齐，那里没有足够的纳税人或行贿人让远在内罗毕的政府有心顾及此事。但是通过从溪流中拉水换钱，卢希亚妇女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环境。她们在运用自己的常识，从家务转向受薪工作，就像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和欧洲妇女一样。跟我们谈话的卢希亚人看来非常明白，就对待妇女劳动而言，他们从农业价值观转变为化石燃料价值观的速度越快，给肯尼亚西部带来资金和改变生存环境的速度也就越快。

肯尼亚与其邻居坦桑尼亚的反差很能说明问题。坦桑尼亚——当时叫作坦噶尼喀[21]——在1961年脱离英国取得独立，而肯尼亚独立是在1963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并且在斯时那个独立的美丽新世界，两个国家通向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是应该选择基于市场，还是选择社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一目了然。肯尼亚的统治者大体上选择的是前者，让肯尼亚人自由地遵从常识（除非这会导致他们批评统治者），而坦桑尼亚则选择了后者，要求公民的常识服从乌贾马（ujamaa），这是一个斯瓦希里语[22]词汇，意思大致是“像一家人那样团结”。这种意识形态（又称作非洲社会主义）坚决否定了化石燃料世界的很多现实，革命党[23]把600万城镇居民强行迁移到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1961年，坦噶尼喀人就已经比肯尼亚人穷了，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噶尼喀人只能挣64美分，但是到1986年，乌贾马又把坦桑尼亚人的工资降到了51美分。我们夫妻俩那年秋天抵达阿鲁沙[24]时——巧的是那里正是起初宣布乌贾马主义的地方，和肯尼亚相比，那里的食物少得让我们震惊。一天晚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晚餐就是“山羊汤”——泡在温吞水里的一根骨头和少许羊油。因为停电，我们只得在一片黑暗中进餐。但自2001年以来，乌贾马终于让位于常识。坦桑尼亚人全面接受了市场和受薪工作，到2013年，肯尼亚人每挣1美元，坦桑尼亚人就能挣94美分了。

在人类价值观与物质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问题上，我和理查德·西福德意见不同，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对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比较表明，就算在朱利叶斯·尼雷尔[25]的权威及其背后的国家力量的作用之下，乌贾马也只存在了一代人多一点儿的时间，因为常识告诉坦桑尼亚人这不适合现实条件。苏联共产主义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对其数百万国民而言，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时间它似乎仍然能够很好地描述

现实。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放缓，争论也变得很难持续下去，到了80年代，常识让大多数苏联国民看清了现有的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无望的（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到了那个10年的末尾，苏联到了解体的边缘。

科尔斯戈德在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进行的区分，要求她将意识形态看作妨碍人们正确进行价值判断的社会学扭曲——在农业社会这个例子中，一扭曲就是一万年之久。我对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人们对它的解读（主要是由能量获取所驱动的）之间的区分，要求我将意识形态看作某些人从中获利的一派谎言——但谎言鲜见持久者，因为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物质环境中，常识是如此有力的工具，能够揭示何为最适宜的观念。我强调这一定义上的区别，是由于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和科尔斯戈德教授之间的最后一个分歧，关于塔利班在2012年袭击了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这个事件。

科尔斯戈德和我对在普林斯顿讨论这次枪击事件的记忆大相径庭，或许也不足为奇。“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见证人做出了不同的叙述，他们说的话要么是出于对一方或另一方的偏袒，要么就是基于不完整的记忆。”修昔底德[26]早在2 400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从那时到现在，世界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尔斯戈德回忆说我在被问及塔利班的行为是否错误时试图回避做出我本人的道德主张。我并非有意如此，但当时酒足饭饱后一时神虚也未可知，而今白纸黑字，自然能把观点阐述得更明白一些。

袭击尤萨夫扎伊的人当然是错误的，他们最终于2014年9月被捕，当时我正在撰写本章的内容。但如果我是对的，即道德思考的重要区别是存在于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之间，而非存在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我们就必须问清“错误”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她的话来推断，我会猜想在科尔斯戈德看来，错误的行为就是违反了独立于人性的真实道德价值观。于我而言，错误的行为是违反了我所强烈秉持的信条，也就是我对经过生物进化的人类价值观的化石燃料式解读。1982年，我信心十足地认为乔治先生不该自己骑在驴背上而让妻子扛着麻袋在地上走，时至2012年，我当然更有信心地认为塔利班不该枪击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因为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价值观只是对化石燃料所构建之世界的常识性解读，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意识到，坚决秉持农业价值观的人有可能会与我意见相左。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毫不困难地说我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不是因为我能够比他们更好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农业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因为此，我在第四章提出塔利班首先错在落后而非其他。

就我理解，塔利班认为，尤萨夫扎伊如此叫嚣着主张女人受教育的权利，威胁了世界的安全和获得极赎的机会，而且因为致命暴力是对这种极端威胁的适当反应，所以他们选择杀了她。

我在第四章提到的某些民意调查表明，很多化石燃料者也认为当世

界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致命暴力是合适的，这意味着争论焦点变成了有关事实的问题，即怎样才算是威胁。我（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当然不会认同塔利班的看法。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关乎事实的问题，在21世纪初的真实世界里，塔利班错在歪曲了事实。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平，她只是威胁到了宗教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

科尔斯戈德教授不喜欢这种辩论。“莫里斯的文本有时读来仿佛他本人不是他为之建立理论的人类中的一员。”她说，对此我只能回答，如果她认为我来自外星，那么我觉得她该多出去走走。也不只有她如此——就像柯尼斯堡[27]的康德一样，道德哲学家似乎往往很乐于待在家里，因为只和其他WEIRD人士辩论而无法理解像乔治先生这样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前后经历，后者在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就离开美国学术圈，去了印度的布巴内什瓦尔[28]。“我刚到的那几个星期，”他回忆道，

> 充满了震惊和不协调之感。我和男人们一同吃晚餐，他们的妻子默默地伺候着我们，之后就退回到厨房，整晚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们告诉我要对仆人严厉一些，不要再感谢他们为我服务了……我身陷一个性别隔离、等级森严、笃信宗教的社会。

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

> 我喜欢这些招待、帮助和教导我的人。无论我去哪里，人们都对我很和善……我抛弃了起初不自觉地认为这些男人都是性别歧视的压迫者，而把女人、儿童和仆人当作值得同情的无助受害者这种态度，开始看到一个道德的世界，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用人）都是高度互助的。在这个世界里，平等和个人独立并非神圣的价值观。尊敬长者、天神和客人，保护属下，履行与个人角色相关的职责才更重要。

欢迎来到阿格拉里亚。

我会说，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们（不管我们是谁）不解，为什么明明都是通情达理的人，秉持的价值观却与我们如此不同。以我个人而言，正是多出去走走让我得出了本章前文提出的两个主张，并连带着推论出科尔斯戈德对于真实道德价值观和成文价值观之间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乔治先生夫妇的价值观并非永恒价值观的扭曲版本；他们的价值观是对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做的符合常识的解读，数十亿农夫在其能量获取跌至8 000～35 000千卡/天时得出了这种价值观——一旦他们的能量获取上升到35 000千卡以上，就会抛弃这种价值观。

如此看待问题并不是说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更不是说相

信等级制度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阿西罗斯人和布巴内什瓦尔人不是暴君就是受害者。如此看待问题也不是说我就是个道德怀疑论者。我们生活在化石燃料世界；因此，化石燃料价值观就是我们对自己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解读，而农耕者和觅食者的价值观就是错误解读——在因达斯特里亚也变成历史之前，这种价值观将一直是正确的。

21世纪的演变核心

如此就引出了我的主张的第二个推论：对于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在21世纪必会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进化，因为能量获取的变化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理查德·西福德并没有直说我在这点上是错误的，但那似乎是他在第六章里所提主张的弦外之音。我认为，曾经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文化演变竞争过程会继续起作用，其明显的后果有三——首先，能量获取的增长速度会是前所未有的；其次，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科学的革命会反馈到生物进化上来，彻底改变身而为人的意义；再其次，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核战争的风险会增加。然而，西福德认为这种分析“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他没有明说本书威胁到的政见是什么，但他对我本人的政见倒是言之凿凿，他认为是“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观念”。和奥兹国所有其他傀儡一样，我也被一个在幕后拉着控制杆的资本主义魔法师骗得“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资本主义观念”。

我最近几本书的审读者都能保证我不只是个“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见风使舵地改造证据使之符合多元文化路线”，而且还是个“典型的现代学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绝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是个“将主观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包装成客观的学术理论”的家伙，我已经学会了不去过分担心人们对我政治观念的谴责，但西福德教授企图纠正我的右倾主义的努力却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歧，我很想在此多说两句。

西福德指责我错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认作整个历史的逻辑。“但资本主义必要的自我扩张的动力，及其所产生的价值观，”他说，“在类别上都不同于它之前的社会。”如果我对他的论证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人们尽其所能地从环境中攫取其自我扩张活动所要耗费的能量，这种倾向并不是——如我的结论所言——因为我们是动物。相反，这是由资本主义生发的、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他说，看看希腊和罗马，它们表明“但对效率的追求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根本算不得古代经济体的特征”。

恕我不敢苟同。我从西福德关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的著作中学到了

很多，但我觉得他在此处完全搞错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其他社会考量置于效率和利润之前，这一观点可以回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韦伯，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卡尔·波拉尼[29]和摩西·芬利发展出这一观点的复杂版本。但就像基思·霍普金斯[30]在一个世代以前所指出的，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罗马帝国治下发生的非常明显的强力（即人均）经济增长。最新研究已经找到了远古希腊与古典希腊的可比增长率，现在已经很清楚，不仅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地中海经历了公元1800年之前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增长，而且，对经济效率的不懈追逐正是其主要的特点之一。

图10.2总结了第二个证据源，也就是我在本书中不断重复过的：自从冰河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指数级增长。人均经济增长率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事物，只要把现代人和后冰河期“漫长的夏天”放在一起比较，自会得出这个数字。指数级增长早已成为常态；长期以来发生变化的是指数变大了，从而愈发加速了这种扩张。自工业革命肇始、资本主义启程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加了7倍，最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5倍，（我计算得出）知识量增加了860倍，而能量获取增加了逾40倍。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惊异，但它们代表的却是旧模式的加速，而不是全新的模式。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两千年里，地球人口的规模增加了3倍，最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两倍，知识量（同样，还是我自己的计算）增加了10倍，人类可控制的能量增加了8倍。在那之前的1 000年内，人口翻番，城市增长了20倍，知识量翻了两番，能量获取增至3倍多。我们回溯的时间越长，加速度就越小，但自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经济一直呈指数式增长。指数的大小与系统规模、交通强度和现有知识量的规模有关，而这些最终也会被能量获取推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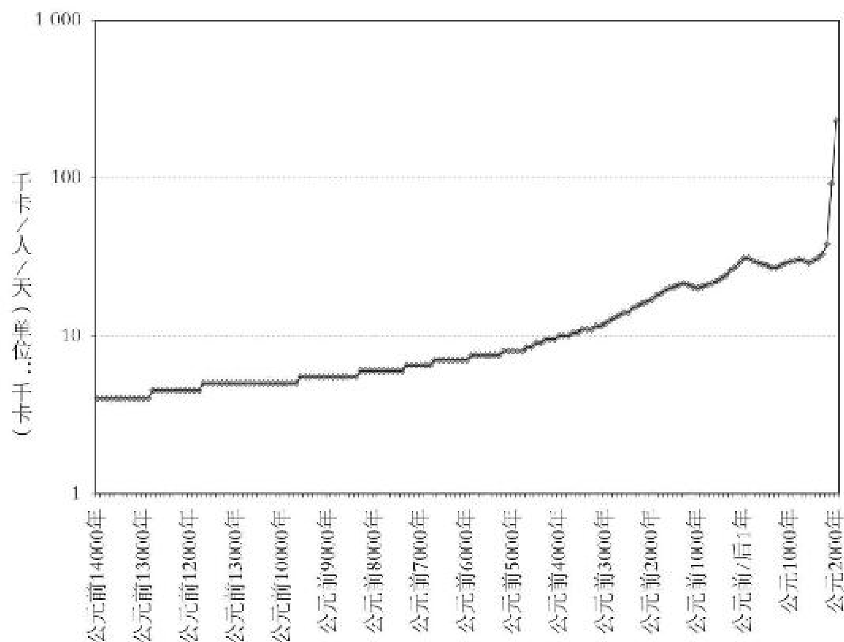


图10.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世界能量获取的峰值

西福德教授说得对，我在本书中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次数不多，但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上了魔法师的当。而是像我在第四章里所讨论的那样，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是化石燃料，而非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我在书中指出，当化石燃料开始让世界充满能量时，人们发现有两种主要方式可以用以组织这种新的丰饶。我管它们叫作自由式和非自由式。长期来看，自由式/资本主义的方法——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自由言论——经证明对于拓展经济极为有效，但在下结论说资本主义具有独特的拓展功能之前，我们应该牢记，比起前工业化时代的任何政治体系，后工业化的几乎所有政治体系，都寻求且实现了更大的经济增长。

例如，1930～1941年，法西斯主义日本的经济每年增长4.1%；1933～1939年，纳粹德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为7.2%；1928（数据可靠的第一年）～1989年，苏联的年平均经济增长达到3.65%，而在这61年间，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25%。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当然会看到不同的数字，然而，每一种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却不会有太大差别。21世纪，非自由经济体比1900年之前任何经济体的增长都快，胜过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在若干阶段的表现。我们当然应该记住，这些比较在某种方面有误导性；例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工业化，而当时的苏联才刚刚开始工业革命，并且刚从可怕的战争中复苏（这意味着苏联式经济体在追赶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唾手可得的丰硕成果）。法西斯主义者严重依赖强制劳动，并且比19世纪的自由社会更不关心破坏环境的事情。如果当年苏联采纳了自由制度，它经济的增长速

度很有可能会更快，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规避这样一个结论，即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是化石燃料，而非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始于早期现代的西欧，因为务实的人们发现，在能量日益丰富的世界，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其他人不认同这一点，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随着文化演变的竞争逻辑开始起效并促成了低效方式的消失，冲突和妥协也随之发生。我认为这也是21世纪的运作原理，并且我对于文化演变会导致最佳的（或者也许是最不差的）结果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西福德却不以为然，他似乎认为我的论证不太像盲目乐观者的杯子半满说。“在不平等现象有目共睹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会接受为拯救环境所必需的限制，”他说，“天上满是私人飞机，为什么我要减少飞行的次数？”

天上的确满是私人飞机（截至2013年，大约有19 258架），但我不相信这真的是我、西福德教授，以及我们这个聒噪阶层的其他成员把自己塞进商业航班的经济舱飞到普林斯顿等学术圣殿的原因，我更不相信这些决定构成了对世界气候的真正威胁。西方人滥用化石燃料在20世纪期间曾把空气中的碳含量推高到百万分之四百，但近10年来，真正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东亚和南亚的工业革命。数亿人仍然缺乏可靠的电力，但这些工业革命正在改变这一现状。如果另外十亿人每人买一个60瓦的灯泡，每天点亮4个小时——这点儿要求当不算过分，世界就需要新增10千兆瓦的发电量。2007年，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将会从每天8 600万桶上升到11 600万桶，即使如此，仍会有14亿人无电可用。为此指责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好处。大问题不是如何推翻幕后的魔法师，而是如何满足新获自由的化石燃料者非常合理的需求，毕竟那些都是好东西，理查德·西福德和我都已经享受好久了。

西福德认为，答案在于“情感维系的价值观”。同样，如果对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能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解释，我会不胜感激，但这里不妨在西福德使用这一术语的语境中继续我的讨论。常识告诉多数人，如果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在谈论气候变化，说化石燃料难辞其咎，还说需要采取行动，那多半就是真理了。很多政治理念的空想家否认这一点，但他们的无知和/或谎言的影响看来日渐衰微。最佳指标正是西福德所警告的资本主义市场：煤炭的份额下降（2008~2014年，全世界最大的私营煤炭公司——美国皮博迪能源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下降了80%），可再生资源的比例上升，就连摩根士丹利的大资本家们也建议把投资从化石燃料转向替代能源。2014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利布雷希（Michael Liebreich）解释道：“投资者日益把化石燃料工业理解为低绩效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行业。人们认为太阳能的成本已一路下跌，风能的成本也很快会降。如果我们能让人们把所有这些都看成是商机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机遇。”

市场不能解决世上所有的困境，但它们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新自由主义的重大发现是，政府干预未必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实际上，它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减少扭曲，改善市场运作。目前，因为市场

并未给排放到大气中的碳定价，买卖双方通常都支付了化石燃料的全部成本。纠正这种市场失效的方法不是什么艰深的学问：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碳排放税的方案和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方案，这些都会减少市场缺陷并使得替代能源更有竞争力，在产生更快的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排放。最大的障碍不是价值观或情感，而是我们无法在谁该承担成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自从《京都议定书》以来几无进展，因为全球层面上的气候威胁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体制之间配合不当。我们试图以19世纪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因此，局部利益常常会无视世界性的义务。

不论有无价值，这就是我的看法。然而我乐于承认，无人可以预见到我们将如何——或者能否——突破限制了化石燃料经济之可能性的绝对极限，就像过去无人可以预见到觅食者或农耕者会如何或能否突破其经济的绝对极限一样。这三次能级大跃迁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然而，就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才华横溢的评论中所说的，这一次真的不同。一万年前，数百个分隔的社会在尝试农耕。大多数社会未能打破绝对极限，给卷入其中的人们带来了马尔萨斯式的悲剧，但少数社会取得了成功。近两千年来，至少有5个社会达到了农业经济的上限；4个社会未能取得突破，但试验仍在继续，直到18世纪末西北欧释放了化石燃料经济。但如今，我们在进行着一场单一的全球试验，一旦失败，无人能够避免这场灾难。

如果我们失败了，这种悖论在进化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一种成功的生命形式在改变全球环境的同时，又恰恰导致该生命形式本身以灭绝收场。在大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一种叫作甲烷八叠球菌的微生物进化出一种从海洋中（以有机碳的形式）获取能量的新方式。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甲烷八叠球菌也疯狂扩繁。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微小的有机体吐出了太多的甲烷，改变了海洋和天空的化学性质。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里，96%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了，海洋的表面温度可能一度高达104℉[31]。在其后的1 000万年里，地球上只散布着极其稀少的宝贵生命（因此，迈克尔·本顿[32]将其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命名为《当物种濒临灭亡》），当动植物再次繁殖时，全新的物种——包括恐龙的祖先——占领了世界。

我们人类是否会步甲烷八叠球菌之后尘，仍有待观察，但我们显然无法对其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像二叠纪的微生物一样，我们也遍布世界，释放了大量碳，引发了大量的灭绝（这不是杞人忧天；当前，每20分钟便有一种植物或陆地动物物种灭绝，生物学家常常把我们的时代称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我们的文化演变看来已经开启了加速生物进化过程的强迫事件——这正是为什么我的论证的第二个推论是，21世纪或许会见证人类价值观被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微生物继承了地球，或者如果强迫事件的选择压力促使我们变异成科技进步的后人类，那么我和回应者们在普林斯顿所做的极端人性化的讨论就会变得全无实际意义了。因此，我认为西福德下面这句话全然不得要领，他说我们可以选择保留某种具体的化石燃料价值观，因为“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

远比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观更有价值的价值观（难道是GDP？），我们很难再找到一种价值观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让我们卸下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包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艰辛，都是值得的（虽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暗中尝试着操纵或抵消那些价值观，有些还很成功）”。我们就什么达成一致可能并不重要。我们当然有选择，就像觅食者在农耕者出现后仍有选择，农耕者在化石燃料使用者登场后也有选择一样，但是，也正如觅食者和农耕者所学到的，有选择与控制结果可不是一回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探索我们所做选择的非预期后果，她称之为“充满乐趣、笑话连篇的喧闹游戏，其中的人类大都湮灭无踪”。比方说，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让美国在一场反伊斯兰教政变后变回到类似阿格拉里亚的社会，而《羚羊与秧鸡》则描述了一个充斥着基因改造的超人类的瘟疫后世界。以该著作为出发点，在本书中她撰写的那一章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崩溃或转变对人类的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你或许会觉得果真如此的话，”她指出，如果21世纪发生了崩溃，“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会选择后退一步——从化石燃料的价值观退回到农业价值观——但在社会结构广泛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更可能会即刻扭转到早期的觅食价值观。”毕竟，她说：“再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修复了。你的汽车、电脑和舷外马达都是数码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崩溃了，它不太可能重建，因为资源提炼和生产的组织运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早已烟消云散。”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丢掉了例行工作就成了流浪者，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从下种到收获，那可是个漫长的周期，因而不得不走向乞讨、盗窃和谋杀”。罗尔斯学派无所凭依。

这些话（通过一个相当迂回的思考过程）让我开始比此前更加谨慎地深思崩溃造成的初始条件会有多少不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里的一场核战争可能会在区区几周内杀死几乎所有的人；而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一场类似战争最终可能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需要数年之久，因为要想用一次打击就把我们一扫而光，现在的核弹头数量不够了。同样，难以应付的生物武器可能会散布全球，突如其来地结束几乎所有的生命，而更加传统的流行病（诸如埃博拉病毒，在我写作之时正频见于报端）可能会一波波地卷土重来，就像过去所有的大瘟疫一样，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降低人口数量。气候的变化也许会以更缓慢的动作造成衰退，逐渐降低农业产量，淹没沿海平原。

崩溃的速度可快可慢。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必须要问：然后如何？我住的地方距离旧金山湾区只有几英里，那里住着将近700万人。两三颗百万吨级破坏力的多弹头导弹就可以杀死那里大半的人口，在浩劫中幸存的不幸的人们也很可能——如阿特伍德所说——射杀彼此或散布在辐射的废墟上忍饥挨饿。此外，细菌会如潮水般淹没郊区，或者不断上升的温度会让送往西夫韦（Safeway）和乔式超市的食品逐渐枯竭。古代与此相当的灾难发生在公元439~600年的意大利，罗马城的

人口从80万剧减到略多于4万。2049年的帕洛阿尔托、圣何塞和奥克兰（Palo Alto）的城市规模或许不会比1849年时更大。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得越多，就越是怀疑崩溃——特别是慢速的崩溃——未必会把时钟拨回到觅食者时代。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多面手，就算是在旧金山湾区的外围，比如圣塔克鲁兹山区（Santa Cruz Mountains，我就住在此处），也绝不缺这样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务农为生，知道如何用脚踏车发电，如何制造短波无线电装置，还能用生物燃料来驱动老式卡车。他们中不少人都有枪，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末日的到来做准备。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东西，还有书籍可资参考。他们很多人肯定会遇难，而我们也许需要像沃尔特·米勒[33]的经典科幻小说《莱伯维兹的赞歌》中的英雄那样的人物来秘密进行世界知识量的储备工作；但我们不会退回到无文字、无科学的觅食世界去。

最有可能的结果也许是一个综合了农耕和化石燃料补丁的混合经济。它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更像是计算机时代开始之前的公元20世纪；在其他方面却更像是公元前20世纪。我想象的整体效果是类似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失败国家，一派混乱的半工业化景象。公元五六世纪期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仍然有用的技能被保存下来，无用的技能就此消失，人们在混乱的新现实中应用常识，调整其价值观。据我猜测，21世纪大灾难的幸存者所面临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果我具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那样的文学天赋，那会是一部小说佳作。

然而，一个能在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上达到5 000点的更加奇点主义[34]的世界，不见得会成就一部小说。如果像阿特伍德所说，生物工程的第一个结果——她的“天启骑士”——是“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会用生物工程设计出美丽的女性，在她们的基因里嵌入对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欲望”，可能还有一些幽默。而如果随后的性选择将其他男性推向了模仿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文化演变，就是令人恐惧的结果了。但还有可能不会有什么与我们切实相关的结果。

阿特伍德说，她在写小说时会假设即使在大灾难之后，“［我们中的］有些幸存了下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故事情节了，不是吗？”我认为，她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观点。阿特伍德在评论开篇无可挑剔地辩称讲故事也可以是一种分析工具，但天启骑士却威胁着要推翻讲故事的必要条件——那些通过叙述来组织经验的人。如果这就是文化演变要引领我们前往的境地，那么我怀疑比起在普林斯顿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辩论之于尼安德特人，22世纪后人类超级生物体的思考和价值观（如果这些词没有用错的话）将更与我们格格不入，也更让我们难以理解。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和阿特伍德一样，认为讲故事是人类境况的关键，他用这样一个问题来结束其优秀的著作《人类简史》：“既然我们很快便能设计我们的欲望，或许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并非‘我们想成为什么’，而是‘我们想要什么’。”思考着阿特伍德的话，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

不应该走得更远。或许真正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想要什么”，而是“对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究竟是否想要”。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原书稿的回应者和其他读者。即使在我以洋洋两万字陈述了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正见之后，在孰对孰错的问题上，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说服了彼此。然而，他们的确让我更深入思考了自己的思想并拓展了新的思路，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想法，也有了更多的书要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啄序（pecking order），或称啄食顺序，指群居动物通过争斗取得社群地位的阶层化及支配等级区分的现象。

[2] 伊塞优斯（Isaeus），古希腊雅典演说家之一，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

[3] 麦第姆诺（medimnos），古希腊的干式计量单位，即谷物度量单位，又译为“干质斗”。

[4] 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1920—1985），美国人类学家。他在促进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5]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兴趣为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市民的社会抵抗与政治参与，以及社会运动等主题。

[6] 埃丝特·博斯鲁普（Esther Boserup，1910—1999），丹麦经济学家。她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和农业发展。

[7] 格林奇（Grinch），苏斯博士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Grinch这个名字大概是来自法语grincheux，意为“坏脾气”。格林奇以其容易被他人的快乐所激怒，并以破坏他人的快乐来获得快乐而闻名。

[8] 原文为法语“*la vacance, c’est moi*”，这是借用了法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路易十四执政达72年之久（1643~1715），他在执政期间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在政治上他崇尚王权至上，“朕即国家”，并用“君权神授”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依据。

[9] 凯尔克奥西里斯（Kerkeosiris），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个村落，位于埃及北部。

[10]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是一项启动于1990年的规模宏大、跨国跨学科的科学探索工程，旨在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指单倍体）中所包含的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辨识其载有的基因及其序列，以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的。

[11] 《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一部人体解剖学英语教科书，解剖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是英国外科医生与解剖学专家亨利·格雷（Henry Gray，1827—1861）。

[12]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1966— ），美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古代社会和经济史，前现代历史人口统计学，以及世界史的比较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等。

[13] 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1958— ），英国经济学家。现任法国图卢兹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图卢兹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14] 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英国考古学家，以其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理论上的贡献而闻名。他现在是伦敦大学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

[15]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16] 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us），古埃及法老，公元前663~前610年在位，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建立者。

[17] 弗里吉亚（Phrygia），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弗里吉亚人是从欧洲迁入小亚细亚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

[18] 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1932—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人类学家。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仪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 《绿野仙踪》（*Wizard of Oz*）中的奥兹魔法师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乘着热气球来到这里的普通人，躲在屏风后面摇着手动机器，造成了表面上的魔法假象。

[20] P. T. 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1810—1891），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

与亚伯拉罕·林肯是同时代人。

[21] 坦噶尼喀（Tanganyika），非洲东部国家坦桑尼亚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是桑给巴尔（Zanzibar）。坦噶尼喀在1961年12月9日~1964年4月26日期间为独立国家。1964年和外海的桑给巴尔岛合并成立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共和国，同年改名为坦桑尼亚共和国。

[22] 斯瓦希里语（Swahili），属于班图语族，是非洲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和阿拉伯语及豪萨语并列非洲三大语言。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的官方语言，也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之一。

[23] 革命党（Party of the Revolution），坦桑尼亚执政党，成立于1977年2月5日，由原坦噶尼喀地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桑给巴尔地区的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首任主席朱利叶斯·尼雷尔。成立后即成为坦桑尼亚执政党至今。

[24] 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东北部一城市，在乞力马扎罗山西南约90千米。

[25] 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政治家，也是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1964~1985）。

[26]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约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传世，该书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27] 柯尼斯堡（Konigsberg），即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位于桑比亚半岛南部。柯尼斯堡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之一，1724年，伊曼努尔·康德即出生于此。

[28] 布巴内什瓦尔（Bhubaneswar），印度东部奥里萨邦首府。该城有2 000多年历史，是奥里萨邦最大城市及该地区的经济和宗教中心。

[29] 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1886—1964），匈牙利裔美国经济史学家、经济人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会学家，以及社会哲学家。

[30] 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1934—2004），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1985~2000年任职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

[31] 104℉相当于40℃。

[32] 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1956—），英国古生物学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地球科学系古脊椎生物学教授。当《当物种濒临灭亡》）（*When Life Nearly Died*）是他的代表作品。

[33] 沃尔特·米勒（Walter Miller，1923—1996），美国天主教科幻小说作家。《莱博维兹的赞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1959）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作品，获得了1961年雨果奖。该书的主题是信仰、知识、权力，特别是核战争和天主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34] 奇点主义（Singularitarianism），是一场由科技奇点的信仰所定义的运动。奇点主义者认为在不远的未来即将发生的超级智能的产生就是所谓的科技奇点，并且我们应该采取审慎的行动来确保奇点有益于人类。



致谢

世上从无单打独斗的作者，如果没有很多人的参与，本书永无面世之日。首先需要向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致谢，2012年11月，中心成员友好地邀请我主讲坦纳讲座。在我起草讲座内容之前，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并且也是普林斯顿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前成员）乔希·奥伯跟我聊了几个晚上的洛斯卡沃斯[1]的玛格丽塔鸡尾酒。等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埃林·格雷厄姆（Erin Graham）把我照顾得很好，听众前来听讲的时候，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心的成员，尤其是所有的回应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克里斯蒂娜·M·科尔斯戈德，理查德·西福德和史景迁——用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向我提出了挑战。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我在该机构获得了坎贝尔国家研究奖）和文理学院的友好支持下，在2013~2014学年期间完成了将两次讲座的内容扩充成本书前五章的大部分工作。在我写作期间，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焦万纳·西瑟拉尼（Giovanna Ceserani）、谢美裕（Meiyu Hsieh）、史蒂夫·勒布朗（Steve LeBlanc）、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和罗布·滕皮奥指导我阅读了一些我自己永远找不到的材料，通过与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和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的谈话，以及向耶路撒冷的圣城大学（al Quds University）和圣经学院奥尔布赖特研究所（Albright Institute at the École Biblique）成员提交的论文修订版，我的论点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所有的章节都起草完毕后，菲尔·克莱因海因茨、乔希·奥伯、凯茜·圣约翰、沃尔特·沙伊德尔、保罗·西布赖特、肯·沃德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读者，以及我的编辑罗布·滕皮奥和史蒂夫·马塞多阅读了手稿，并给了我无法以价值衡量的回馈。米歇尔·安杰尔（Michele Angel）绘制了非同寻常的诸多地图，桑德拉·戴克斯特拉代理机构（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的桑迪·戴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埃莉斯·凯普伦（Elise Capron），安德烈亚·卡瓦拉罗（Andrea Cavallaro）和黎陶（Thao Le），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布·滕皮奥、泰里·奥普雷（Terri O’Prey）和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我的注意力多次偏离之时，亲切而耐心地保持进度。我对他

们所有人深表谢忱，尤其是对凯茜·圣约翰和动物们，他们教会了我有关人类价值观的一切。

伊恩·莫里斯
于加州博尔德溪
2014年10月

[1] 洛斯卡沃斯（Los Cabos），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自治区，位于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最南端。

欧洲

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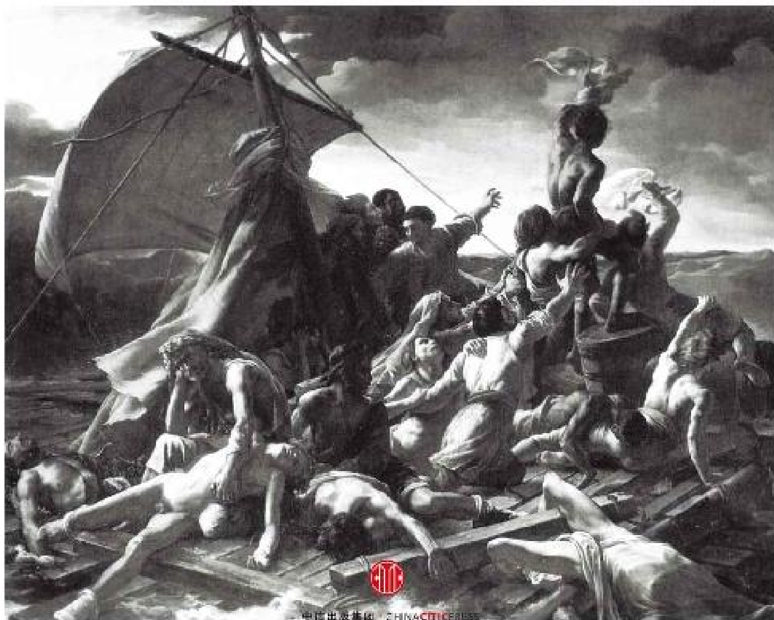
[英] 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著
孟维瞻◎译

完整记录欧洲500年权力争夺史的史诗巨著
展现历史背后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

《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华盛顿时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推荐
《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 盛赞

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英）西姆斯著；孟维瞻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ISBN 978–7–5086–5713–4
I.①欧…II.①西…②孟…III.①欧洲–历史IV.①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643号
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Copyright © 2013 Brendan Simm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著者：[英]布伦丹·西姆斯
译者：孟维瞻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英] 布伦丹·西姆斯 著
孟维瞻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帝国：1453~1648年

第二章 继承：1649~1755年

第三章 革命：1756~1813年

第四章 解放：1814~1866年

第五章 统一：1867~1916年

第六章 乌托邦：1917~1944年

第七章 分裂：1945~1973年

第八章 民主：1974~2011年

结语

致谢

诡诈的天平，

为上帝耶和华所憎恶。

公平的砝码，

为他所喜悦。

——《圣经·旧约·箴言篇II：I》



你或是发号施令的王者，

或是俯首称臣的败将，

赢或输，

刀俎还是鱼肉必居其一。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序言

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能获得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因此，国家为了自我保存，必须竭力组织国内的一切资源。这是国家的最高法则。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政治对话录》
（*A dialogue on politics*，1836年）

当我们审视欧洲的历史时，如果视野仅仅局限于这个地区，则无法真正了解它。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英国前首相

民主国家一般不会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除非当它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
（Sir Halford Mackinder）

我们经常被告知，过去与现在的国家完全不同。在本书所谈及的550余年的历史中，国家过去的行为方式的确与现在不同。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宗教战争、奴隶制、纳粹，甚至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十分陌生。同样，如果我们的祖先看到当今西方社会在普选、种族平等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也一定会困惑不已。更有可能

的是，很多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后人看来同样会莫名其妙。然而，也有一些事情是从未改变的，或者改变得很少、很慢。通过本书你会发现，欧洲人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几个世纪的关注。很多事情都是从15世纪中叶至今的欧洲政治家和世界领袖们（一定程度上这两者不同）所一直关注的大事，讲各种语言的国家都是如此。这些问题包括包围、缓冲、制衡、“失败国家”和“先发制人”这些词汇的概念，帝国的美梦和对安全的诉求，德国作为联结欧洲各部分的中心，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平衡，协商过程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国内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国家理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民众的傲慢与国家焦虑的并存，以及文明的冲突与各文明之间包容性的增长，等等。简言之，本书是对历史的还原。

即便如此，回顾历史一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欧洲的故事中，总是包含着很多与未来世界相关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当代国际体系和国内秩序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路径，而且应该同样关注那些历史没有选择的道路，或者可能会引导世界走向其他方向的道路。我们还是应该给予那些失败者其应得的尊重，尽管这并非易事。毕竟，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甚至希特勒的垮台都并非必然。宗教宽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废除，以及西方民主在欧洲的传播，这一切的到来并非上天注定。当然，这些也不是随机产生的结果。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大国的兴衰、自由的发展以及西方世界的胜利，彼此是密不可分的。上述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西洋两岸的欧洲人下一步会怎么做。当我们书写自己的故事时，历史绝非一本简单的手册，而应该作为我们的一本指南——以揭示这些问题与过去有怎样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本书的最后一章并没有以预言的方式来结尾，而是提出一系列问题。否则，这本书就算不上是一部历史作品了，而只能算是预言。



引言

1450年的欧洲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和中欧就一直共享着一种认同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尊罗马教皇为精神权威，受教育的阶层都学习罗马法和拉丁文。欧洲人还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当时的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已经开始撤离伊比利亚半岛，却正在沿着欧洲的东南翼快速蔓延。多数欧洲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阶级不仅必须向封建主缴纳赋税以获得保护，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获得精神指引。许多自治的城市通常由行业精英和地方行政官共同管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贵族、高级神职人员，有时还包括一些自由城市的行政官，他们会与国王达成安全协议。他们承诺为国王提供一些军事服务与咨询，以换取国王对他们领土的保护和承认。这种封建契约关系是通过代议机构来进行协调的。当时，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代议机构，其中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议会，低地国家的总议会，法兰西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古国卡斯提尔（Castile）的议会，匈牙利、波兰和瑞典的国会，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简言之，在多数国家，国王手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不同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或者更远的亚洲国家，欧洲的政治文化以激烈的公共或半公共的辩论为特征——辩论涉及赋税征收的数量、由谁征收、归谁支配以及为何目的（几乎总是为了军事目的）。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的成立与运作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应受到质疑。人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国王的侵犯总是首要任务。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但精英阶层却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到了整个中世纪的后期，这些人对于政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是社会

的底层，对这种理想的呼声就越高，但他们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理想。争取自由的斗争起初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有时一国的人民也必须借助邻国君主的帮助才能推翻本国的暴君。为此，欧洲人并没有明显的主权意识：很多人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暴君的干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人民需要的，甚至是思想健全的君主义不容辞的责任。

把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强国”或者“国家”，是不恰当的。不过，由于君主们为了扩张或者至少是为了生存，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动员。“国家建设”的过程，自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开始。另外，英格兰、法兰西、卡斯提尔、波兰和勃艮第等国家，对于自己的特殊性、力量和重要性，都有明确的意识。至少，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情况看，此时谈到民族意识并非为时过早的事——通过政治参与、共同的语言以及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民族意识已经在两国人民心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欧洲人还意识到一种共同身份，那就是“基督教国家”——这几乎成了欧洲的同义词，这种表达方式在历次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中经常被使用。由于马可·波罗和其他探险家的旅行，欧洲人知道了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存在，但他们对西半球仍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当时，欧洲人不仅没有“欧洲中心论”的意识，相反，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整个世界以耶路撒冷和圣城伯利恒为中心，而他们位于世界的边缘。正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还是为了从后方偷袭伊斯兰世界，早期的航海探险都是沿非洲西海岸进行的。例如，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就希望从侧翼包围伊斯兰世界，可能的话甚至打算联合传说中位于非洲或亚洲（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在哪儿）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共同对付穆斯林。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今天的摩洛哥的休达（Ceuta）。可以说，欧洲此时的扩张是以自卫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欧洲大陆还处于严重的四分五裂状态，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都充斥着内部斗争与冲突：国王和教皇之间、各大国的君主之间、城邦国家和小国国王之间、各贵族之间、敌对的城市之间，以及农民与地主之间。天主教的统一性遭到了来自英格兰的罗拉德教派（Lollards）、波西米亚的胡斯教派（Hussites）、法兰西南部的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s）以及其他各种教派的挑战，在教会内部也有很多人抗议整个中世纪日益严重的教权滥用现象。与中世纪早期相比，15世纪中叶的欧洲可能还算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仍是一个暴力频发与分裂的时代。意大利的城邦，特别是威尼斯和米兰，总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与此同时，阿拉贡的阿方索（Aragon of Alfonso）国王正企图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和摩尔人在西班牙相互对抗，而穆斯林仍然控制着格拉纳达（Granada）；匈牙利正在酝酿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十字军东征。此外，勃艮第公国的腓力三世也在摩拳擦掌，正犹豫着是该继续十字军东征还是在家门口打一仗；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加紧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帝国，后者信仰东正教；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此时也正愈演愈烈，震撼着整个欧洲大陆。

在这一切纷争的中心，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

领土从西部的布拉班特（Brabant）和荷兰，一直延伸到东部的西里西亚（Silesia），从北部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锡耶纳（Siena）以及东南部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包含了现在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捷克和荷兰的全部，以及比利时、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波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从七大选帝侯中选举产生的，包括三大教会诸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大世俗诸侯（波希米亚国王、莱茵兰–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和勃兰登堡藩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方式是与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各种世俗和教会领袖（包含选帝侯、国王、伯爵、骑士以及城邦的代表）进行协商。德意志人可不是驯服的绵羊，国王会与皇帝做斗争，农民会与地主做斗争，人民通过地方法庭或者帝国法庭不断地与权威做斗争。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欧洲政治的支点，生活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的人民，远多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其中，低地国家、莱茵兰、德意志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都是欧洲最为富饶、充满生机、技术先进的地区。神圣罗马帝国（至少是其中最有实力的几个王国）在英法之间起到了平衡的作用。自从1435年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宣布脱离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之后，英国的征战大业就一蹶不振。勃艮第公爵是法国王室的成员，领土横跨德法边境。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帝国，而查理大帝就是历史上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这个皇位不仅对德意志的诸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对邻国的国王也是一样，特别是对法兰西的诸侯。对于西欧各国的国王来说，谁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谁就可以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且具有普世的权威。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以及值得骄傲的遗产，然而到了15世纪中叶，帝国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438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了成功当选皇帝，做出了一些“选举承诺”，这种妥协让步使得帝国的权力受到削弱。地方上的封建主彼此有矛盾，土匪越来越猖獗，商业发展受制于大量敲诈勒索罪行。此外，帝国的教会也陷入重重危机，又因教权的滥用而变得更加混乱。尤其是，帝国还要努力保证集体防卫。与英国议会不同，德意志帝国议会未能就帝国的税收问题形成一个常规的机制，因此难以支撑帝国与胡斯教派、土耳其人以及越来越危险的法国人所进行的战争。与此同时，帝国还面临着一场痛苦的身份危机：它渴望能够代表整个基督教国家，它包含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如说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捷克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但其大多数臣民却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或至少是会说双语的德意志人。虽然之前他们很少提及“德意志”，但是145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前面加上“德意志”这个前缀。

这本书将展示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在欧洲权力均势中的中心地位，并考察由此发展出来的全球体系，其中各个大国都有不同的战略考量。如果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成为和平力量，那么这里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杠杆；而如果它为邪恶势力所利用，这里就是致命的威胁。这里发生的事，对英格兰来说很重要，因为低地国家成了保护英格兰的屏障，其他大国难以进攻英格兰的南部海岸，同时这也维护了欧洲

的均势；对于西班牙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维持了西班牙帝国的存在，也是西班牙的主要兵源所在地；对西班牙和荷兰来说，这里是其重要的战略腹地，对于后来的奥地利也同样如此；对法国人而言，它既是缓冲地带又是诱人的扩张目标；对普鲁士而言，这里是其东征西扩的最终跳板；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而言，这里也很重要，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曾企图使用诡计占领墨西哥，这对美国造成了威胁；而对于美国和苏联而言，神圣罗马帝国又是它们争夺的对象，两大国都会坚决阻止这里落入对方的手中。

对于任何想要代表欧洲的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所在。几百年来，很多重要人物积极谋求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想要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亨利八世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都想要夺取它，查理五世曾经拥有过它。法国国王中，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都在谋求夺取帝国的皇冠，拿破仑也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要成为这里的主人。而希特勒的野心就再明显不过了，他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企图永远征服这片土地。此外，尽管现在的欧洲联盟与当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所包含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但欧洲联盟确实发源于这片土地，而且秉承了同样的精神。简言之，在过去的550年里，全欧洲的统治权都决定于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这已经成了欧洲领导人们的坚定信念，甚至他们中没有帝国野心的人也这样认为。从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俾斯麦到“一战”中同盟国的高级指挥官，一直到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无不深谙这一点。柏林墙倒塌后，强烈反对北约东扩的俄罗斯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当今那些害怕德国纳粹卷土重来而努力将欧洲联盟维系在一起的精英们，也一定深谙其道——无论是谁，无论花费再多的时间，只要控制了欧洲的中心，就控制了整个欧洲；无论是谁，控制了整个欧洲，就将主宰整个世界。

因此，各国争夺对德意志的控制推动了欧洲内部变化的进程，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英国人推翻了查理一世的统治，因为他未能保护人民自由地信仰新教。法国人与路易十六决裂，因为他试图勾结奥地利王室。俄国人对沙皇感到绝望，因为他没能认真处理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德意志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变革的发源地，宗教改革、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都发源于此，并且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安全以及控制权的追求，也促使欧洲各国不断向外扩张，从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到19世纪列强“瓜分”非洲，无不证实了这一点，而其他地区的去殖民化的过程则显得相当缓慢。诚然，这一切并非全部由德意志人推动，但问题也远非表面这样。

17、18世纪，英国的航海家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实力，努力阻止新大陆的金银流向英国的对手手中。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发表了关于“利用德意志打败美国”的讲话。19世纪末，法国人谋求扩张自己的帝国，以抗衡德意志帝国。此外，英国人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企图在全世界范围解放犹太人，使之与德国

皇帝威廉二世相对抗，这最终导致了“二战”后以色列的建国。

第一章

帝国：1453~1648年

最终，德意志人民一致同意，授予我管理帝国的权力。我认为，上帝也对此满意，并要求我这样做……西班牙的统治权，一并包括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王国、意大利、德意志以及法国的大部，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愿意称之为黄金的产地——西印度群岛……所有这些都难以存在或者保存下去，除非我将西班牙与德意志联结起来，在西班牙国王的头衔前面加上恺撒的名字。

——查理五世，1520年

瑞典统治者要密切关注德意志的局势才能保全自己，因为德意志拥有温和的气候、稠密的人口以及好战的人民。而且太阳底下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具优势的国家能比德意志更适于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君主政体和绝对的统治……现在，如果有哪个君主在这片土地上掌握了，那么所有的邻国都不得不向其臣服。

——约翰·阿德勒·萨尔维马斯（Johan Adler Salvius），
瑞典外交官1646年写于威斯特伐利亚

1453年掀开了现代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纪元。这一年，东方的拜占庭帝国陷落；随后不久，英法百年战争结束，英格兰人被赶出了法国。这两件大事对整个欧洲，特别是对位于德意志心脏地带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现代人一般简称其为“帝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在取得英法战争的胜利之后，很快就对德意志的西部侧翼施压，并企图控制或者至少干预德意志帝国的内政。而在更远的东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重新发起了对东南欧和中欧的入侵。土耳其人冷酷而残忍，他们曾两次攻打到了维也纳城门之下。而应对这些威胁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肩上。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正处于巅峰时代，查理五世不仅控制了中欧、南欧和西北欧的很多地区，而且还统治了美洲新大陆的广阔地带。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保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于维持这一巨大权力非常关键。保住了这个皇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对欧洲大陆的领导权，也就可以掌握在德意志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手们看来，查理五世以及他在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继任者们都有巨大的野心，这个家族企图在欧洲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Universal Monarchy），这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欧洲地缘政治的舞台基本上就演变成了两股势力的较量：一面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尽力维护其帝国统治，一面是它的对手在坚决抵制哈布斯堡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控制。

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百年战争中英格兰被法国打败，使得欧洲各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的挑战，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两种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开始产生。一种是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这样的协商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为政府预留了足够的弹性空间以应对各种挑战，并且能够维持欧洲的均势；另一种是君主制度，既包括像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这样的专制独裁制度，也包括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混合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对于后者来说，具有代议性质的机构依然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国王的权力明显居于优势。与此同时，不论从地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中心地位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宪政结构，以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同时防止自己遭受外国的侵略。

第一个挑战来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年的夏天，在土耳其人的持续围攻下，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强暴和杀害，古老的教堂也被捣毁。而在基督教信徒看来，更为糟糕的是，穆罕默德二世自称是“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人”，他不仅把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先知穆罕默德所认为的世界中心，而且保留了这座城市的名字，并继承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一切欧洲和拜占庭帝国时代的传统。看来，奥斯曼土耳其人重新发动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的目标就是占领整个地中海地区，或者是深入巴尔干半岛，进而挺进欧洲腹地。这样就可以实现其占领罗马帝国并通过控制欧洲来控制整个世界的野心，从而去完成他们的普世使命——推行伊斯兰教教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恐慌，甚至波及遥远的丹麦和挪威。

身兼丹麦国王和挪威国王的克里斯蒂安一世认为："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正是《圣经·启示录》里所描述的来自海洋的野兽。"

16世纪初，在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土耳其开始了扩张。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的君主。后来，其后代在君士坦丁堡大清真寺的大门上面镌刻铭文，宣称"在全知的真主的帮助下，他的军队战无不胜，征服东方和西方，成为世界帝国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联合西班牙的摩尔人以及北非的其他民族，利用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不满，在地中海地区发起了突袭。很快，苏莱曼大帝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国，从"医院骑士团"[1]（Knight Hospitaller）手中夺取了希腊罗兹岛（Rhodes）的军事要塞，控制了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随后，这位苏丹就开始进军欧洲中部地区。1521年，苏莱曼大帝攻陷了贝尔格莱德的堡垒，5年后，他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匈牙利军队。至此，包括肥沃的多瑙河流域在内的东南欧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手中。那些曾经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盾牌和堡垒"的匈牙利贵族，最后也不能幸免。自诩为"王中之王"的苏莱曼大帝，擢升他的贴身侍卫长约翰·佐波尧（John Zapolya）为匈牙利国王。希腊历史学家西奥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警告说，苏莱曼大帝就像"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等待吞噬基督教国家的恶龙"，他"正酝酿着庞大的力量准备从陆路和海路发起针对基督教国家的战争"。1529年，哈布斯堡家族费尽举国之力，才抵挡住了土耳其人的"维也纳之围"。

16世纪50年代末，苏莱曼大帝的继任者们继续向外扩张。1565年，土耳其军队抵达了马耳他的战略要地，差一点儿就将其攻陷了。到了1570年的夏天，土耳其军队登陆塞浦路斯，一年之后占领该岛。在16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正当土耳其人向欧洲进军的同时，海盗和摩里斯科人（Morisco）也不断对西班牙的东海岸进行袭击，他们的骑兵还经常深入内陆地区侵扰。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进一步逼近匈牙利，继而威胁神圣罗马帝国。整个16世纪五六十年代，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之间战争不断。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战之后，到了90年代，战争又重新开始。直到1606年《吉托瓦托洛克和约》（Peace of Zsitva）签署后，奥斯曼帝国对于欧洲中部的威胁才开始减弱，至少暂时是如此。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哈布斯堡家族当作自己建立"世界帝国"的绊脚石，不过哈布斯堡家族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称自己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部分是基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决定了接下来的30年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态势。查理五世不仅统治了西班牙、那不勒斯、低地国家、奥地利和波西米亚，还在美洲新大陆扩张帝国殖民势力。一位西班牙主教因此宣称查理五世为"上帝授予的'罗马人民的国王'[2]和世界的君主"。查理五世建立"世界帝国"的远大目标，似乎使得建立一个统一的天主教帝国成为可能。直到三十年战争之后，查理五世才被迫放弃了主宰欧洲的野心。在这场战争中，查理五世与土耳其、法国和德意志新教诸国作战，但没有取得预期战果。

然而，在短短几十年之后，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显示出了与其父完全一样的强悍力量。腓力二世在勒班陀（Lepanto）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人，控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帝国，开拓了菲律宾这一新殖民地，从新大陆大量输入金银，甚至还在一段时期成为英格兰的王婿，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腓力二世开始越来越多地公开谈论他对欧洲以及世界的雄心。一块纪念与葡萄牙联盟的奖牌后面铭刻着这样的文字："这个世界还不够"（Non sufficit orbis）。西班牙的一座凯旋门上刻着文字，说腓力二世乃"世界之主"，也是"东西方万民之主"。跟他的父亲一样，腓力二世最终还是失败了。

一方面，他疲于镇压低地国家荷兰的反叛；另一方面，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失败，这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性的消耗战。然而，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欧洲的野心尚未终结。17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法国、瑞典、德意志新教诸国以及英格兰联合起来，最终挫败了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称霸欧洲大陆的企图。

神圣罗马帝国处于这场战争的核心位置。德意志其实非常虚弱——虽然不至于像真空一样不存在，但几乎每次欧洲的主要冲突，德意志都无法置身事外。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存在着严重分裂，皇帝、诸侯、城邦以及教会之间矛盾重重——也就是说，德意志人对于外人肆意践踏其领土的行为毫无办法。这一区域（大约是现代的德国、意大利北部以及低地国家）极为重要，是欧洲的战略中心。所有重要国家的利益都经常在此地交错。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他们进军中欧的主要目标。只有在那里才能给予他们的主要敌人——得到德意志诸侯支持的哈布斯堡王朝致命一击。此外，也只有通过占领德意志，苏莱曼大帝才能证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也是苏莱曼大帝"蛙跳式"外交政策的焦点所在——利用德意志诸侯的不满来对付查理五世。当荷兰人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时，他甚至派间谍前往佛兰德地区协助荷兰人。他写道："既然你们已经把剑挥向天主教徒，而且你们的双手已经沾染他们的鲜血，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不遗余力地给予你们同情与关切。"

神圣罗马帝国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战略中也居核心地位。查理五世利用其权势，不仅对其对手法国形成包围态势，而且为收复勃艮第地区提供了跳板。然而，他的强硬态度使得德意志的诸侯与其越来越疏远。1521年4月，诸侯们听到查理五世谈到"现在到处都是各种主啊王啊，这并非我所愿，应该遵循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真正的主只有一个"时，他们都吓得心惊胆战。之后，查理五世强行提名其弟斐迪南（Ferdinand）作为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决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1531年，在黑森（Hesse）和萨克森（Saxony）地区的领导下，新教诸侯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以反抗查理五世。于是，查理五世将地中海地区暂时搁置一边，开始密切关注德意志地区。至16世纪40年代初，查理五世击败法国，并逼迫其在1544年签订的

《克雷皮和约》（Peace of Crépy）中放弃米兰和低地国家，这也导致这些地区从德意志分离出去。1546年，查理五世又将德意志、米兰、萨伏依以及低地国家甚至那不勒斯组成一个在他领导下的共同防御联盟，以对抗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年以后，也就是1547年4月，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Mühlberg）战役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挫败了德意志的反对势力。然而，这一切在帝国内部以及欧洲所激起的强烈反抗使得查理不得不做出让步，他把帝国的遗产分给哈布斯堡家族的不同继承人：西班牙交给了儿子，奥地利交给了弟弟。在这场对付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战争中，查理五世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政治。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的继承人——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仍然深度参与神圣罗马帝国事务。一方面是因为腓力二世对荷兰的战争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下展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腓力二世驻扎在佛兰德的军队补给线——“西班牙之路”正好跨越帝国的边境。这条战略补给线一路从西班牙经由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隘，绕过神圣罗马帝国西部边缘，最后抵达低地国家。路线的大部分穿越了由哈布斯堡王朝在地中海地区、伦巴第以及勃艮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领土。但是，该线路在德意志西部的最后一段是最易受到攻击的薄弱环节。此外，西班牙只有保持住对莱茵河与默兹河（Meuse）交汇处的控制，才能守住佛兰德。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公爵加斯帕尔·德·古斯曼（Gaspar de Guzmán）担心，一旦这些地方失守，西班牙的佛兰德将被“锁在笼子里”。因此，德意志是岌岌可危的西班牙地缘政治大厦的关键环节，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都将导致一发不可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7世纪时西班牙对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远征活动，正是这一优先战略的体现。

相反，对法国来说，掌握帝国的有利位置，对于解除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态势至关重要。当时的法国北面是低地国家，东北是勃艮第公国，东南是米兰，南面是西班牙。法国有两大战略，彼此可以补充，相互配合。

第一个战略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例如，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公然宣布对那不勒斯的企图，希望在那里建立并领导一支全欧洲的十字军以对抗土耳其。其真正目的是攫取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以及恐吓教皇，要求教皇拒绝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加冕，并打破法国的包围圈。当时，波旁王朝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死对头。50多年后，亨利二世武装干涉德意志，这就是著名的“向莱茵河进军”，法国一路收复了梅茨（Metz）、图尔（Toul）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武装干预德意志，以控制哈布斯堡王朝，并建立法国通往神圣罗马帝国的门户。在那场战争快要结束时，法国人终于占据了德意志南部城镇布赖萨赫（Breisach），切断了“西班牙之路”补给线。正像法国大使对黎塞留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所说的：“各大国围绕德意志问题进行的危险较量，即使我们的父辈看了，也会胆战心惊。”

第二个战略就是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结成同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例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是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最早、最狂热的支持者。同样，亨利二世也认为法国的安全取决于能否捍卫德意志人的“自由”，这里其实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诸侯的独立自由。1552年1月，亨利二世在其签署的《香波城堡条约》（Treaty of Chambord）中承诺，将“防止诸侯失去传统的权利和自由，防止德意志人堕落，防止他们陷入残酷的、永久的奴役之中”。同盟将亨利二世宣传为“德意志及其被困诸侯的复仇者”。1609年，亨利四世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吞并德意志西北部的领土克里维斯，从而使其成为西班牙包围法国的又一环。于是，他宣布将全力支持“古老的同盟，并防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牺牲别国为代价进行领土扩张”。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诸侯的控制，也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大战略的核心。黎塞留在1629年写道，西班牙企图“推翻德意志各共和国的法律，从而使自己成为德意志的主人，并将其变为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与亨利二世和亨利四世一样，他也坚信捍卫“德意志的自由”，就是捍卫法国的利益，他努力确保诸侯以及代表大会的权利不被信奉绝对专制主义的德意志皇帝所剥夺。1645年5月，红衣主教去世后，法国外交大臣德布里安伯爵亨利–奥古斯特·德·洛梅尼（Henri-Auguste de Loménie）写道：“削弱奥地利皇室过度膨胀的权力，确立各诸侯国的自由权利，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德意志的自由和法国的安全联系非常紧密，二者不可分割。

16世纪末，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自此之后，德意志对于荷兰的安全来说也变得相当关键。新生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荷兰这一“后花园”——一块西靠北海的土地。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北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良好的地势条件，易守难攻，而它与神圣罗马帝国接壤的东部边境则显得非常薄弱。所以荷兰人的策略就是，将边防哨所尽可能地推进到对面的德意志，这样做的目的，用1587年尼德兰国会的说法就是“拒战火于国门之外”。因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安保策略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推行前沿防御战略。此外，领导荷兰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一个诸侯，荷兰赞美诗描述说他身上流着“德意志的血”，流亡在德意志的荷兰人几乎是在英格兰的两倍。1567年，威廉逃到德意志，并在那里召集了他的大部分部队，发起了他最重要的进攻。他最亲密的盟友普法尔茨伯爵约翰二世·卡齐米日（John Casimir）据守着德意志西部的战略要地。17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觊觎附近的克里维斯地区，这又一次给荷兰人敲响了警钟。于是，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行动。简言之，荷兰人的命运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紧密相连。

对于英格兰来说，神圣罗马帝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16世纪4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加入战争，参与遏制查理五世的扩张，当时他寻求“与德意志诸侯和权贵们建立某种联盟或伙伴关系”。他与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短暂而悲剧的婚姻最初就是拜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利益所赐。后来，德意志开始高度重视低地国家的对外防御工事。该地区被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称为“英格兰的战略缓冲区”，对英格兰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防御意义。1572年，伊丽莎白一世将普法尔茨许给约翰二世·卡齐米日，条件就是后者拒绝在布拉班特为西班牙军队提供补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丽莎白在16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对尼德兰地区进行了军事干预，目的就是防止这一战略要地落入西班牙之手。17世纪初，英格兰因为恐惧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西北部的渗透活动而再次采取行动，大批英格兰士兵被派到克里维斯地区。简言之，英格兰人的大战略越来越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其国家能否获得安全，取决于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能否被友好的力量所控制。

瑞典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德意志的动态。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King Gustav Adolf）和瑞典议会密切关注着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举一动，警惕性逐渐提高。1627年12月，国王警告议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将很快侵入我们的国境”。议会于是同意了国王的建议——“为了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同时把战争的责任置于敌人一方，先发制人才是上策”。此外，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港口是发动进攻的战略要地，只有占领那些地方，才能真正确保本国安全无虞。正如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后来所说的：“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占领了斯特拉松德（Stralsund），那么整个海岸线都将落入其手，瑞典将永无宁日。”所以在1630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海岸的乌泽多姆岛（Usedom）建立桥头堡。根据其顾问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 Adler Salvius）起草的宣言，他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捍卫德意志的自由”来防止天主教国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君主专政。不久，在1631年9月，瑞典国王在布赖腾费尔德（Breitenfeld）战役中重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瑞典军队深入德意志南部，甚至威胁到斐迪南一世最亲密的盟友的首府——慕尼黑。很多人都猜测，瑞典国王企图抢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Johan Georg）甚至指责瑞典总理大臣奥克森谢尔纳企图成为“德意志之主和大独裁者”。

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战略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人们认为它潜藏的资源如此之大，以至于足以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瓦卢瓦王朝（Valois）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已经达到1 500万，而当时的西班牙只有800万。只有法国人口比它多一些，大约在1 600万～2 000万。单纯从数量来讲，德意志拥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质量来讲，德意志雇佣兵特别是重型骑兵的作战技术广受赞誉。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抗击西班牙时所集结的军队中，德意志军人是支柱力量。事实上，到了1600年，很多西班牙人认为，荷兰人已经更加依赖于其德意志盟友，而非英格兰人。西班牙其实也严重依赖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步兵团，有3/4的兵力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至少其西部非常富饶——那里的科隆、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中有着非常活跃的商业团体。帝国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及军事和经济潜力，无怪乎三十年战争临近结束时，瑞典外交官会警告说：“如果有哪个君主在这片土地上掌握了权柄，那么所

有的邻国都不得不向其臣服。”

在意识形态上，神圣罗马帝国对欧洲也有深远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基督教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高于其他一切欧洲国家的君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一些极具野心的欧洲君主，如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英格兰的亨利八世，都曾公开谋求帝国的皇位。其他人，例如法国的亨利二世，不过做得比较含蓄罢了。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如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也宣称要继承古罗马帝国的遗产，更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将欧洲看作世界的中心。最为重要的是，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有权调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资源。因此，欧洲各国要么执着于让自己获得帝国的皇位，要么想办法阻止其落入他人手中。

尽管苏莱曼大帝是一名穆斯林，但他却做过一番努力，试图能合法利用德意志帝国的遗产。他竭力强调他的一神论的理念，并效仿“罗马人民的国王”查理的加冕礼，在自己肖像上画上了皇冠和权杖等西方式的象征符号。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来自威尼斯的顾问协助苏莱曼大帝，在匈牙利以及被其占领的奥地利的部分地区组织了一场西方式的帝国展览，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种程度上，苏莱曼的尊号“大帝”并非穆斯林用语，而是欧洲的用语。很多德意志的诸侯认为，土耳其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能捍卫“德意志的自由”。

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是将其领土控制在一起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意大利战争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利用这一身份调动德意志的军队对抗法国。他的继承人查理五世同样认识到皇位的价值所在，尤其担心法国人觊觎皇位，因为历史上首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帝就是法兰克人。他在选举之前说道：“这是一项如此伟大而崇高的荣誉，世间其他所有头衔在它面前都黯淡无光。”相反，如果帝国的皇位落入法国人之手，就将招致厄运，这会使勃艮第的土地处于德意志和法国的险恶夹缝中，而且帝国的皇位还会让对手在资源和人力上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正如哈布斯堡的首相梅库里诺·加蒂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所说：“一旦掉以轻心，就会将帝国拱手让给法国人，而法国人绝不会拒绝这样一个觊觎已久的大好机遇。如果让法国人得逞，查理五世不仅会保不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土地，还将失去伊比利亚半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查理五世在1519年的神圣罗马帝国选举中，动用了庞大的资源——主要是对德意志诸侯的贿赂，才最终保住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

此后，查理五世对于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权就是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为基础的，他还希望以此建立起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统一的欧洲。1519年，加蒂纳拉曾对查理五世说：“上帝，伟大的造物主，已经恩赐你至高无上的高贵，使你位于基督教世界中的所有君主和诸侯之上，让你成为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和君主，你的祖先中只有查理大帝曾经达到过这样的巅峰。上帝赐予你王权，让你引导世界重新回归到统一。”查理和他的大臣们在为其政策辩护时，一次又一次地“把

西班牙王国的利益放到与神圣罗马帝国利益同等的地位”。但是，查理五世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或者强迫诸侯继续选举他的儿子腓力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腓力也就不能成为他的指定继承人。不过，腓力还是成功保住了西班牙国王的头衔，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依然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尽管如此，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然紧密合作。不管怎样，德意志帝国的皇位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事实迫使法国也把获取帝国皇位作为当务之急。15世纪末，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非常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染指德意志各邦的资源。同时，查理八世自己也想谋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查理八世还铸造了货币，上面印有清晰的铭文，“卡洛斯的最高统治者——查理皇帝”，以此召告自己的抱负。在20年之后的1519年选举中，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帝国皇位的角逐中败给了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认为自己是查理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他宣称自己只不过是要夺回本该属于他的头衔。对法国来说，要摆脱持续被围困的状态，否认哈布斯堡家族对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权至关重要。弗朗索瓦一世解释道：“驱使我夺取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原因，就是阻止所谓的哈布斯堡的国王也这样做，如果对方成功了，他为了扩张其领土和王国，毫无疑问会把我赶出意大利。”此外，弗朗索瓦一世深知，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就能以此来领导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他故意强调“我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开展对土耳其的战争”。大约100年之后，黎塞留的老师约瑟夫神父（Père Joseph）写道，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止西班牙人将他们的帝国交给奥地利王室，以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实现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野心”。

同样，英格兰也非常渴望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151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同时角逐皇位，他的参选反映了英格兰在法国重建大英帝国的野心，以及试图将权力扩展到欧洲的野心。他深刻地意识到法国人的传统观点——英格兰隶属于教皇，而法国却不隶属于任何人。如果亨利想要获得法国的皇位，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背景就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他能在德意志拥有强有力的外交地位，那么就可以从东侧威胁法国人。换句话说，只有经过德意志才能重回法国。一旦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所支持的沃尔西（Wolsey）[3]成为罗马教皇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此英王最初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持强烈的谴责态度。德意志内部也有一些支持英格兰君主的势力，尤为重要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本人对亨利八世表示支持，他当时非常不想让法国人得逞，而他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候选人能否胜出又不是很有信心。然而，亨利八世竞选失利了。但是猜想一下，假如他成功获得帝国的皇位，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将非常有趣。假如他不仅是英格兰的亨利八世，还是德意志的亨利八世，并且如果他的继承人能继续保住这些头衔，历史将被完全改写。英格兰式的政府制度将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在亨利的统治下，加来（Calais）甚至是佛兰德的图尔奈（Tournai），都将派出代表参加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将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英式帝国，或许欧洲也将变成一个更加

英式的欧洲。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各种宗教潮流和政治运动的确铸造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形态，但非根本性的改变。1517年，德意志僧侣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错误。这次“改革”并非只是对神学思想的反叛，还是对神圣罗马帝国长期的内乱与外患做出的反应。路德、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和其他的改革家都高度关注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行为，他们组织了几次活动，号召人们努力抵抗异教徒的入侵。他们试图通过思想精神的改革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他们倡导人们忏悔和祷告，以求净化那些已经使得帝国在东西方的夹击面前虚弱不堪的“芜杂”。路德的言论不仅激起了上层受教育阶层的共鸣，而且得到了农村地区居民的响应，特别是居住在南部和西部的农民，他们把宗教改革看作将自己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以及实现帝国革新并在欧洲重建德意志民族尊严的机遇。因此，几年之后的“农民战争”其实并非局限于当地的扎克雷（Jacquerie）起义，更是一种农民要求参与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普遍呼声。另一方面，很多德意志诸侯则把新教教义看作抵抗外部侵扰的盾牌，同时也是一种用来强化对内统治、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以及没收教会财产来改善自身财政状况的政治工具。

这一政治背景对于16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宗教改革也具有深远意义。对于英格兰的稳定来说，男性继承人并非那么关键——因为女性在英格兰同样拥有合法的继承权，但对于亨利八世所谋求的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来说，男性继承人却非常重要，因为根据《萨利克继承法》（Salic Law），女性是没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资格的。在教皇拒绝他的离婚并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申请后，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后，亨利八世剥夺了教会的土地，这不仅使他在国内的统治得到支持，还为他提供了急需的战争经费。他强制修道院僧人还俗、洗劫修道院、剥夺教会财产，以此在南部海岸修建大规模的防御工事，以抵挡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等天主教国家的威胁。这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其国家安全之间紧密联系的缩影。

宗教改革推动了一种“信仰文化”的诞生，也由此引起了公众对欧洲各国国内以及国际宗教、外交和公共利益的关注。中欧、北欧和西北欧的人们，经常沉浸在宣传宗教改革思想的各种训诫、赞美诗、宣传册和廉价的木版画中。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德意志各地区的统治者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新教教义，主要包括德意志北部和东部、低地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所有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许多地区。新的裂痕形成了，这种裂痕不仅存在于一国内部——很有可能被邻国利用，而且存在于国家之间。除了既存的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联盟，以及对抗暴君独裁统治的共和国联盟，现在又多了个对抗天主教的新教联盟，当然所有这些对抗关系都是双向的。

没有哪个地方比德意志更能深切体会这种分裂和对抗，因为宗教改

革使其整个帝国一分为二。天主教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三足鼎立。16世纪90年代，加尔文教徒中的激进分子聚集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周围，坚决维护“德意志的自由”不受皇帝侵害，并要求在神圣罗马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他们向国外的教友——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国际加尔文教派（Calvinist International）寻求支援，联合起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德意志地区共同竭力捍卫他们的事业。因此，荷兰人、英格兰人和信仰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认为，他们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例如，伊丽莎白的首席顾问大臣威廉·西塞尔就提倡“与所有信仰新教的诸侯结成防御同盟，特别是与德意志帝国中信仰新教的诸侯结盟”。只要帝国不落入敌手，换句话说，只要荷兰人不断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么英格兰自身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到17世纪初，加尔文教继续发动攻势，他们不断地干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运作，甚至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支持下建立起“福音派新教联盟”（Evangelical Union）。作为回应，1609年巴伐利亚公爵建立了“天主教联盟”，由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提供其活动经费。同年，加尔文教派最终退出德意志议会，导致了一场宪制危机。

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将花落谁家，这已经不只是战略和对抗的问题，还是宗教问题。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施蒂里亚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Styria）最有可能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他却是所有新教徒的梦魇。斐迪南虚荣自负，而且从小一直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对于信奉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诸侯来说，斐迪南对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努力支持新教人士成为皇帝，以此来先发制人。然而，新教徒的这一策略不仅会损害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德意志天主教徒的利益，而且会威胁西班牙的地位。1613年9月，西班牙国王的高级顾问唐·巴尔塔萨·德·苏尼加（Don Baltasar de Zúñiga）警告说：“一旦新教皇帝的力量与荷兰等地的异教徒势力结合起来，我们将失去佛兰德那些顺从我们的诸侯，米兰大公国以及意大利的其他部分也会一起失掉。”1618年，西班牙外交官、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全权公使奥内特伯爵伊尼戈·贝莱斯·德·格瓦拉（Inigo Velez de Guevara）也警告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丢掉了德意志，那么我们也会失去整个哈布斯堡王权赖以生存的根基——佛兰德和意大利。”

1618年5月，事态发展到极为紧要的关头，波西米亚贵族选举新教徒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并希望他能夺取帝国的皇位。然而，1619年3月，施蒂里亚公爵斐迪南当选为皇帝，即斐迪南二世。他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中击败波西米亚贵族后，迅速巩固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地位，西班牙军队则直接控制了普法尔茨地区。腓特烈五世被迫放弃他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头衔，取而代之的是斐迪南二世最信任的人——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哈布斯堡王朝对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控制权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德意志内部，现在的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天主教，导致原来的欧洲均势有被打破的危险。正如1621年2月荷兰议会中有人说到的：普法尔茨的最终陷落将会见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被连根拔起，德意志的普世自由被践踏，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帝国的皇位将被西班牙王室据为己有”。

另一方面，尽管宗教经常加剧既存的地缘政治分裂，却永远无法超越政治。例如，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显然超越了其他一切考虑，尽管后者同样信仰天主教。弗朗索瓦一世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土耳其人结盟，一起对抗查理五世。弗朗索瓦说：“我不否认，我非常渴望土耳其人变得强大，并时刻准备征战。我当然并不是为了土耳其人好，毕竟他们是异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力量，耗尽他的财力，以确保其他国家能与这个强大的对手相抗衡。”弗朗索瓦的继任者同样毫不掩饰地利用德意志的新教诸侯来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力量。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支持新教诸侯和瑞典军队，以对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军事打击，尽管法国人与奥地利人都信仰天主教。而苏莱曼大帝则号召其在西班牙的穆斯林支持者们配合路德教派在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行动。

欧洲各国的冲突，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之争，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内政。它在各国甚至全欧洲催生了一个公共领域。关于大战略的辩论成为各国公共政治辩论的主题，我们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证明。15世纪中叶，英格兰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失利，愤怒的英格兰人非常想要搞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以及谁应该为此负责。根据广为流传的书面手稿记载，由此而导致的辩论远远超出议会的范围。对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William de la Pole）的弹劾纷至沓来，时任英格兰皇家枢密顾问官以及英王亨利六世的首席顾问的威廉，被指控背叛了英格兰人在法国的伟大事业，最终被处死。在肯特郡，一场农民起义不断向伦敦蔓延，农民不仅抱怨在当地所受的疾苦，还声讨国王，认为其“一定是听信了谗言，不然为什么他的土地丢失了，商业停摆了，老百姓的生活被毁了，海洋没了，曾经占领的法国也没了”。约克家族的支持者指控英格兰王室的失职导致了在法国的败落。他们质疑英格兰在加来的基地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并指责在兰开斯特的驻军被法国人收买了。因此，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英格兰人的政治辩论都集中于如何重新获得海峡对岸的遗失的土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人在公共领域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信仰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被公认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天主教统治的堡垒。17世纪初，很多英格兰人谴责英国政府与马德里达成的和解，认为这是向暴政的妥协，是对荷兰同胞和广大欧洲大陆新教教徒的背叛。不久之后，对德意志新教徒的遭遇、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失利的种种愤怒，充斥于英格兰人的政治辩论中。

15世纪50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商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西方铅活字印刷术所激起的。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思潮的高涨推动了公共领域中原生态民族主义的产生。最初人们关心神圣罗马帝国整体的衰落，进而开始关注德意志在欧洲的声誉。德意志人认为自己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尽管帝国中有很多不同民族，但他们认为自己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帝国中包含了大量的斯拉夫人（Slav）和罗曼人（Romance）。尽管帝国西边被勃艮第人和法国人所包围，东南边遭受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侵

扰，但由于德意志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帝国始终能够屹立不倒。当然，这也表现在德意志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中，约翰内斯·爱沃提内斯（Johannes Avertinus）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也不断发出呼吁，他们认为国家应尽更大的努力对抗法国及其他侵略者，以捍卫“德意志的自由”。他们坚决要求整治德意志教会的腐败问题，并谴责地方官的违法作乱，因为这不仅会危害社会，还为外敌干预提供了合适的借口。简言之，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仍然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外交政策也决定了整个欧洲的宫廷政治，有时候甚至可以导致整个王朝的兴衰。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截至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势仍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各国在德意志的战略成败对各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618年，西班牙首相、莱尔马公爵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德·桑多瓦尔（Francisco Gomez de Sandoval）在马德里失势，原因是他无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捍卫西班牙的利益。他的继任者苏尼加却凭借在这方面的才能得势，直至1622年去世时仍深受推崇。接替者奥利瓦雷斯（Olivares）则因为西班牙的大战略（特别是西班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略）耗费了巨额财产而饱受诟病。同样在巴黎，法国首相吕伊纳（Luynes）公爵夏尔·德·阿尔贝（Charles d’Albert）因为其德意志战略的失败而在宫廷失去立足之地。他的继任者维厄维尔（Vieuville）公爵夏尔（Charles）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然而，红衣主教黎塞留却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问题上的成功外交而势力大增，得以长期担任首相。

而在英格兰国内，外交事务引发了最为猛烈的国内巨变。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随着奥地利——西班牙帝国的力量席卷德意志，英格兰议会和广大民众反抗王权的怒火也爆发了。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派来说，波西米亚的暴力冲突并非仅仅发生在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正如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1620年在下议院所说：“普法尔茨着火了，新教国家着火了，所有其他国家都着火了……这将威胁到低地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所有新教徒的利益。”国王在议会的反对者认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中，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而又无处不在的集团……其目标在于破坏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新教教会”，而“他们遇到的反抗却微乎其微”。到1642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与反对派开始了一场痛苦的内战。最终，1646年国王被推翻，并于1649年被处死，君主专制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所取代。英格兰议会声明中明确表示英格兰将对普法尔茨和欧洲新教提供支持，简言之，英格兰人推翻查理一世的这场“大反叛”（Great Rebellion），归根到底是源于英格兰新教徒对斯图亚特王朝外交政策的抗议。外交政策的失利最终导致了国内共识的崩溃。在之前的20多年间，英格兰人没能为欧洲新教事业挺身而战，而英格兰最终在1642年走向了内战。

欧洲各国为了能在战争中始终保持战斗力，要么谋求加强国内建设，要么加入更强大的联盟以寻求保护。查理五世意识到，协调好与意大利、德意志以及勃艮第的关系，以对付法国人和新教诸侯，并不那么

容易；除此之外，在另一边，协调好奥地利、匈牙利和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对抗土耳其人，也相当困难。因此，查理五世将中欧地区的防卫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管理事务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分担。1522年，查理五世任命弟弟斐迪南为奥地利的统治者以及自己在德意志的全权代理人。9年后，他强迫德意志诸侯选举他弟弟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即斐迪南一世，这是他的指定继承人，这一举动对东南欧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斐迪南从匈牙利人的废墟中成功拯救了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巩固了自己的东北侧翼。1530年在林兹（Linz），他对由贵族代表组成的议会说：“匈牙利王国必须掌控在奥地利大公或者其他的德意志诸侯手中，否则将无法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几经犹豫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加入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两个例子中，最后达成的协议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即斐迪南承诺保护他们不受土耳其人的侵略。

荷兰人在联合防御上做得更为成功。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曾警告过荷兰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不利于他们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获得独立。16世纪末，荷兰人迅速克服了特殊主义。1572年，荷兰人民推选威廉为“执政”和最高统帅，并赋予他征收赋税的权力，以抵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进攻，还发布公告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以防止内战爆发。三年后，也就是1575年10月，西兰岛（Zealand）加入荷兰，并发表联合声明称：“我们应该摆脱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并寻求国外的帮助。”1579年，荷兰、西兰岛、乌得勒支（Utrecht）的大部分以及格罗宁根（Groningen）缔结了“乌得勒支同盟”，达成了一项非常复杂的关于赋税、信用和战争筹款的一揽子协议。所有这些举措使得尼德兰地区的人民成为可能是欧洲税负最为沉重的人民。这样苛刻的税收政策之所以能持续，完全是因为民众已决心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荷兰人现在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安保政策，他们开始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正是在如此强大的斗争中，诞生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人设法发起战争，而战争也造就了荷兰这个民族。

英格兰人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对国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些比较激进的看法。都铎王朝担心，一旦苏格兰和爱尔兰由敌对势力所控制，英格兰的“后门”就将大开，或者至少导致被包围的态势。伊丽莎白一世的早期干预和长老教会制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英格兰北部边境问题，至少暂时如此。而爱尔兰的问题却棘手得多，那里的人民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当地人对英格兰人的仇恨其实超越了宗教分歧。必须阻止西班牙在那里的渗透活动，还要粉碎盖尔人的叛乱威胁，所以必须找到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正如伊丽莎白一世的首相西塞尔在1560年所警告的：“神圣罗马帝国最近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的实力已大增，而英格兰却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新鲜血液都没有，这样的形势尤为危急。”因此，西塞尔建议：“将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起来，同时兼并爱尔兰，以增加国家的实力，这值得好好考虑。”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合二为一：1603年詹姆斯一世同时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王。几年后，他启动了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没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给定居在那里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教徒。这

样，詹姆斯就基本解决了英格兰西翼的安全问题，并确保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三者在欧洲大舞台上行动一致。

而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一个类似的整合过程也正在进行。条顿骑士团及其在波罗的海的领土的衰落，激起了一股分裂主义浪潮，肆虐着想要吞噬整个地区。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强占了利沃尼亚（Livonia）东北部的纳尔瓦（Narva）。16世纪60年代初，俄国人还攫取了波兰王国（Polish Commonwealth）北部的部分领土。差不多同时期，瑞典人吞并了现在爱沙尼亚北部的领土。被哈布斯堡王朝、崛起的瑞典、俄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大国包围的弱小国家们纷纷合并在一起，以求在危机四伏的险境中自保。1561年，条顿骑士团加入立陶宛大公国，8年之后，他们又一起与波兰王国形成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新建立的庞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几乎延伸到黑海。1592年，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Sigismund Vasa）当选瑞典国王后，两个君主制国家暂时合为一体，联邦的规模变得更为庞大。这个联邦让人们看到了抵挡俄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些许希望。

国家形成与整合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少数族裔问题，其中大多都有宗教信仰。16世纪一直到17世纪初，欧洲各国政府都绞尽脑汁思考该如何同化这群人——是镇压他们还是简单地把他们驱逐出境。同样地，以下两个实例足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西班牙的例子代表了其中一个极端。当地穆斯林少数族裔摩里斯科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勾结，迫使腓力二世在1567年颁布了一项非常严厉的法令。法令要求摩里斯科人三年之内必须学会西班牙语，三年之后，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使用阿拉伯语都将被视为犯罪。摩里斯科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特殊姓氏，也不能穿原来的服饰。腓力二世甚至取缔了穆斯林的公共浴室，这是他们接受洗礼仪式之前要去的场所。当摩里斯科人想要拿他们贡献的巨额税收作为抗议的筹码时，国王的代表告诉他们，“相比财政收入，国王更看重的是宗教信仰”。1568年，摩里斯科人迅速起义，给腓力二世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于是腓力二世不得不调动意大利的军队前来粉碎了叛乱。接着，腓力二世以叛国罪逮捕了所有摩里斯科人，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叛乱。大约8万人带着镣铐被流放到西班牙国内的其他地区，大约1万人仍然留在格拉纳达。与此同时，那些被流放的人则导致了让国家持续头疼的治安问题。1609年，腓力二世的继任者腓力三世将总数达30万的摩里斯科人全部驱逐到北非，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安达鲁斯持续了数百年的伊斯兰文明至此结束。

其他情况下，各国政府一般更倾向于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要么是因为各国政府真的认为供人们忏悔的各个不同的神是共存的，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宽容政策可以加强国内团结以御外侮，或者仅仅是因为需要镇压的教派力量太过强大。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倾向于容忍新教，以便更好地动员其领土内的一切力量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则尝试推行更为有条不紊的宗教宽容政策。1571年，他发布诏令，准许奥地利的路德派贵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自由信仰宗教。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希望在奥地利甚至在整个神圣

罗马帝国内部废除宗教专制政策，他认为这是联合德意志诸侯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唯一机会。简言之，外部威胁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两派对于宗教宽容的迥异态度。

到底是君主专制还是代议制更有利于一国在欧洲之战中胜出？围绕着这个问题，欧洲被划分为两派。佛罗伦萨的政治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他的两本书《君主论》（*The Prince*）和《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中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些书最早试图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新变化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一些概念，并指出这些变化对欧洲各国国内政治架构的影响。在《论李维罗马史》（第一册）的序言中，马基雅维利这样描述：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国家，目的是“更方便和易于自卫”。他强调，这种状态的达成，离不开强大的权力做保障。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告诫说：“如今的诸侯和当代的共和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来进攻和防卫，否则统治者应该感到耻辱。”马基雅维利建立理想共和国的目的倒不是出于公民美德本身，而是因为认为共和国有利于国家的最优战略决策以及进行有效动员。在这里，制胜的关键并不只是简单地集聚资源。马基雅维利警告说：“金钱并非战争的最主要资源，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

佛罗伦萨人认为，国内良好的体制结构是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论李维罗马史》（第六册）中，马基雅维利谈道：“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宪制制度，使国家在情况允许时能够扩大它的领土，并能保住其既得利益。”这里的关键是，让民众有政治参与和政治辩论的权利，这是比庞大而有效的税收基础更为重要的事情。马基雅维利还写道：“相比于一个诸侯，普罗大众的智慧更深厚，也更持久。事实上，平民似乎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能够事先分辨出善与恶。”人民应该有追究国家统治者重大事务责任的权利，因而共和国政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具竞争力。他还说：“只有当一个城邦真正拥有自由的时候，它才能够增加其财政收入和扩大其领土。”所以早在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视角，向我们清晰地阐述了掌握欧洲权力的系列问题，他的论述既适于独裁政体也适于共和国政体。

英格兰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正确性。在与法国的战争失败后，英格兰人得出结论，认为通过议会为国王提供正确的建议是非常关键的。税收应及时征缴——换言之，英格兰作为一个整体应担负起收复法国领土的责任，但是反过来，国王应听取议会和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的意见。英王亨利八世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在苏格兰、爱尔兰，特别是欧洲战场上的巨额军费，就在于他能够和议会亲密合作。如果国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那么议会就批准其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需要的所有军费开支。30多年间，领主和平民甘愿缴纳大量赋税，因此战争压力和王权膨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总体上，议会认同国王的大战略：包括恢复国王在法国的权力，或者至少掌握海峡对岸沿海一带的控制权，还有就是确保敌人无法从爱尔兰和苏格兰袭击英格兰的后方。同样，伊丽莎白一世在欧洲的稳固地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与议会间的协调。相反，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分裂以及议会

和国王间的矛盾最终葬送了英国之前的外交政策成果。

然而，大多数的历史经验似乎证明，强大的王权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得以成功的前提。例如，在法国，对外战争的胜利被视作王权的重新壮大。改革家们的演说倾向于强调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中央政府。诚然，把英格兰人赶出国门是国王和三级会议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有广泛的磋商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靠王权来执行各项政策。1439年，法国议会（即三级会议）丧失了其对地方领主征税——这是一项直接的土地税——的审批同意权。1451年法国中部的地方三级会议也丧失了这一特权。三级会议不仅同意为国王军队的开支埋单，还同意国王自行确定征税的税率。法国国王进行的各种所谓“协商”，本质上是王权和贵族间的互动，并不是对其权力的真正约束。最重要的是，税收的征缴和军队的开支已经完全不需要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如果说在英格兰，议会的地位与其国家实力越来越成正比的话，那么法国人则建立了完全相反的政治文化——尽管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是与王权的强大有密切联系的，但三级会议的地位却日益下降。

然而，很多议会制国家似乎饱受内乱和外患的困扰。即使是伟大的查理五世也不得不面对各种议会：卡斯提尔议会、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以及其他各君主国的小规模代表会议。如果是为了保护西班牙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比如包围纳瓦拉（Navarre）、镇压巴巴里（Barbary）海盗、打击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人等，西班牙议会是很乐意为其埋单的。不过，他们对欧洲中部的战争却并不热心。1527年远征匈牙利的军费提案被驳回，而1535年袭击突尼斯的军费提案则通过了。1538年，西班牙议会拒绝了对法国的战争军费开支后，议会不仅没有对新的军费提案进行投票，反而直接劝说国王查理五世与法国讲和。西班牙议会之所以负担如此沉重，原因之一就是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地区的代表大会非常不合作，导致从这些地区征收上来的税收少得可怜。唯一能弥补这一差额的地区，就是富裕而又拥有高效税收制度的低地国家，但这一地区的人民同样对西班牙国王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1524年2月，尼德兰总督帕尔玛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向查理五世汇报说：“低地国家人民抱怨最厉害的就是，他们总是要负担各种名目的战争开支，却没有哪个战争是为他们而战。”16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了对法战争的最后阶段，尼德兰的三级会议勉强同意缴纳军费。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哈布斯堡王朝后来的统治者们。

在东欧，强大的代议制机构，似乎明显导致了国家表面上的虚弱。当瑞典贵族反叛波兰——立陶宛——瑞典联邦的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时，波兰议会拒绝给国王提供足够的军力镇压叛乱。1599年，齐格蒙特三世被瑞典议会罢黜，瑞典与波兰的联盟也就此瓦解。在俄国，内战之后不久，即1598~1610年，俄国很快就遭到波兰的入侵，这些经历都使得俄国走向了更加严厉的独裁统治。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掌权，终结了俄国长达15年的大动乱（1598~1613年）。对于俄国的精英而言，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似乎显而易见：太多的自由只能招致祸患和民族的软弱；“自由”和“任意”这些词即意味着骚乱和动荡。正因为如此，俄国

社会的发展围绕着如下的原则进行：对内为政府提供服务，对外捍卫其国家主权。诚然，很多俄国人也认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权，绝不应局限于“面包和黄油”这样的基本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事务。然而，俄国人并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正式的代议制机构，诸如国家议会、三级会议、德意志帝国议会或英格兰式的议会。俄国贵族的代表大会叫作“国家杜马”，其名称来源于俄语单词“思考”或者“考虑”，但是国家杜马并没有任何税收控制权。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几乎完全是独裁式的，唯一能对其产生约束的估计就只有俄国广袤无边的土地了。而且，只要新王朝能够使得国家更为强盛，或者至少保证国家安全，那人民就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

类似的状况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也有发生。马克勃兰登堡（Mark Brandenburg）的三级会议确实对诸侯的行为起着制约作用，他们拒绝支持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在克里维斯地区的野心。此外，三级会议还具有批准税收和盟约的权力，这着实是个让选帝侯头疼的大问题。在他看来，三级会议没能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面对17世纪初的挑战，“三级会议成功地把自己的脑袋埋在了马克的沙子里”。如果普鲁士想要在欧洲舞台或者哪怕是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有分量的角色，那么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解决。在17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约翰·西吉斯蒙德的继任者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强烈地意识到王权被团团包围的困境，他无法保护自己分散的领土，甚至无法说服三级会议为国家防御做点儿贡献。1626年7月，他遗憾地说道：“我的土地被这样浪费，而我自己也被这般无视和取笑，这让我痛苦不堪。全世界都在嘲笑我的懦弱和无能吧！”

然而，对共同的政治参与最为不满的，当属神圣罗马帝国自身了。帝国抗击土耳其人的努力宣告失败，抵抗法国人的不断渗透也宣告失败。例如，14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讨论对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一事，但无果而终。德意志诸侯谴责匈牙利密使“连自己的王国都保不住，还企图把德意志卷入他们的灾难里”。1480年夏天，土耳其人重新发起进攻，进军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腓特烈三世发出战争动员，却被德意志帝国议会讥笑为“关于土耳其人的冗长讲话”。同样，腓特烈三世的儿子、继任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被迫把勃艮第割让给法国。总之，神圣罗马帝国在应对边境危机上没能保持住一贯的强势。

出于对外部势力控制的不满，德意志改革家曾数次尝试在神圣罗马帝国进行革新。为此，他们积极提高自身在帝国机构特别是议会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不过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489年，在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won Henneberg）的领导下，改革派在法兰克福议会聚集。几年之内，贝特霍尔德就为皇帝建立起了一个集财产、收入和人头税为一体的一揽子税收方案。作为回报，他被授权负责维护德意志领土内的公共秩序，并进行帝国法庭的改革。要想对外强大，德意志就必须保证国内的和平。皇帝在军事事务上被迫接受议会中的帝国委员会的建议。换言之，正如15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德意志帝国

议会开始在帝国的大战略中谋求参与权。下一步就是整顿德意志的军事秩序。1500年在奥格斯堡议会会议上，帝国被划分为十大区，各区各自承担维护区域内部公共秩序的责任，并担负起对外抗击敌人的职责。这不仅仅是德意志集体安全体系的萌芽，而且是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潜在工具。

16世纪初，帝国委员会反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增加在意大利的军力。看上去似乎帝国委员会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成立了选帝侯联盟，决定在形势必要的时候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帝国议会，并向前推进改革。德意志似乎在寻求实现以议会为基础的民族大团结。在现实中，各方都有意阻碍对方，制造障碍，造成停滞。议会在限制皇帝权力方面被证明非常有效，但他们却无力也不愿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替代性制度。帝国委员会的试验不久就结束了。无论是来自法国人的，还是土耳其人的，又或者是匈牙利人的威胁，甚至是这些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足够强大到使德意志的议会放弃他们的自由而屈服于强大的皇权。另一方面，到了16世纪初，德意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德意志了，它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民族国家特质，正在有力地迎击前方的暴风雨。

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感到，自己难以应付苏莱曼大帝统治之下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1521年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向沃尔姆斯（Worms）议会请求支援，1522年克罗地亚贵族在纽伦堡求救，但帝国议会对一遍一遍的求救呼声基本无视。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号召德意志人支援“勇敢的基督徒克罗地亚民族，因为那里是保护奥地利内地的堡垒和阵地”，结果也是徒劳。对于议会里的诸侯、自由城市和神职人员来说，危险看上去还很遥远，冷眼看着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抵抗土耳其人而自己“搭便车”，似乎是更为舒适的逃避责任的选择。大量宣传册性质的作品都认为，土耳其人并不会立即对他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相反，这些作品却暗示了，这不过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幽灵，以实现其在国内建立集权统治的野心。莫哈奇（Mohacs）之战中，匈牙利的战败确实统一了国内的声音，却短暂而不明显。整个16世纪三四十年代，神圣罗马帝国几次出兵匈牙利，战果喜忧参半。最后，帝国议会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再也没有足够的兴趣，也就没有继续自行出兵。德意志又一次错过了在外部威胁压力下统一全国的机会。

16世纪末，德意志最高军事指挥官拉扎勒斯·冯·施文迪（Lazarus von Schwendi）寻求摆脱德意志军事疲弱状况的方法。面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断引入外部势力来壮大自身力量的情况，施文迪担心这种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将在“可怜的祖国”内部点燃“不信任和分裂的大火”。1569年，他警告道，西班牙人的干预将导致内战，并最终造成“德意志的全面分裂与毁灭以及德意志人福祉的全面下降”。基于此，施文迪要求德意志动员其全部潜力，以捍卫帝国的完整统一。事实上，施文迪认为，如果能够阻止外国继续无节制地从德意志招募雇佣兵，就可以防止德意志继续堕落，同时还可以阻止外部势力入侵德意志，并且德意志帝国能够对“所有外国君主”发号施令，最终在欧洲建立“德意志治下的和平”。他警告说，如果不作为，德意志将像拜占庭帝国一样遗憾地衰落。

在1570年施派尔（Speyer）议会的改革建议中，他提出建立一支永久的德意志帝国军队，负责德意志境内的公共安全，并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指挥。施文迪同时希望，对新教徒的宽容政策能够凝聚德意志人的意志，以共同对抗土耳其人。但是，有一些诸侯仍然无法信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程度甚至远超对奥斯曼军队的恐惧，他们拒绝尝试联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同御敌。因此，德意志在军事上仍是个侏儒。

统治权之争也驱动了欧洲的对外扩张。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伊莎贝尔一世夫妇，以及葡萄牙的君主们开始向地中海南岸扩张，其军队深入北非讨伐摩尔人，并在那里占领了一些领土。目的就是捣毁奥斯曼帝国在那里建立的军事基地，防止其攻击伊比利亚半岛南翼。早期的航海探险活动背后也有同样的意图。从15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极力说服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开辟通往印度的大西洋航路。诚然，对于哥伦布和其他探险家及赞助人而言，对冒险、个人财富以及荣誉的渴望是他们的动力。然而，探险的终极目的却是对奥斯曼帝国发起突袭，进而收复耶路撒冷，这一终极任务被哥伦布描述为“千年之伟业”。对海外新疆土的开拓，不仅可以开辟对奥斯曼帝国的新战线，还能为圣地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必要的资源。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斐迪南二世、伊莎贝尔一世夫妇签署的国书出发。他随身带着一名阿拉伯语翻译（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并承诺“这次航行的全部所得，都将用于征服耶路撒冷的伟大事业”。然而，哥伦布并没有到达亚洲并找到共同对抗穆斯林的同盟，也没有获得东方世界的财富。他最后在加勒比海沿岸登陆，之后西班牙的殖民地迅速建立起来。当时他们误以为那里的原住民是“印度人”（即“印第安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才得以更正。简言之，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其实是他们与伊斯兰世界争夺统治权的结果。同样地，随后进行的殖民活动，则是受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所驱动。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新航路。为协调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之间的殖民关系，1494年6月，由教皇进行仲裁，两国签署了瓜分新大陆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规定，以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4]处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教皇子午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1497~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更近的航线。1502年，哥伦布开始了他第4次探寻印度的航行，他这样做也是希望可以与达·伽马正式相遇。之后的几年间，葡萄牙侵略者不断骚扰波斯湾和红海的穆斯林船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混乱。原本的包围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不现实了。

西班牙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是欧洲形势所需，最初是为了利用新大陆的资源和威望来扭转欧洲大陆的局势。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为西班牙王室征服了墨西哥并攫取了它的白银。诗人卢多维科·阿廖斯托（Ludovico Ariosto）评价说，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日不落帝国”。新大陆在权力均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

是完全听命于欧洲的安排。相对来说，西班牙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仅占用了查理五世非常少的时间，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查理五世在欧洲的野心提供资源支持：从西印度群岛源源不断运来的金银，通常占到西班牙财政总收入的1/5。这些钱并不直接用作对抗法国人、土耳其人和德意志诸侯的军费支出，而是抵押给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富格尔（Fugger）家族，以便皇帝能向其借更多的钱。例如，每年从秘鲁运来的将近200万埃斯库多[5]中，最大的单笔支出流向德意志，其次是低地国家。查理五世在其领土上的巡游情况，也清楚地显示出各地在他心中的战略地位：他出游意大利7次、法国4次、英格兰和非洲各两次，仅在西班牙就有6次长期停留，去佛兰德和德意志的次数则不少于19次，却从未踏足美利坚。他的皇帝身份源于对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而非在全球范围的土地扩张。简言之，是神圣罗马帝国而非新兴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国，为查理五世的野心提供了彰显的舞台，他真正关注的并非大西洋彼岸。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针对西班牙发动海上袭击，不断蚕食其殖民地。殖民地的平衡与否，被认为是整体权力平衡的一部分。英格兰航海家、探险家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作为新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拥有的声望以及雄厚财力，是其在欧洲舞台上的重要砝码。因而，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他著名的《论西部种植》（*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1584）中提到："查理五世凭借如此巨大的财富，从法王那里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大公国及其在意大利、伦巴第、皮埃蒙特和萨伏依的其他领土。"伊丽莎白赞助了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77～1580年的航行，此举不仅是英格兰迈出建立自己海外殖民帝国的第一步，而且包含了阻止金银大量流向佛兰德的目的，因为那里的军队是支持腓力二世的。同样，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美洲大陆的金银不仅支援了西班牙在欧洲的行动，而且支持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付德意志新教徒的行动——这其实是英格兰传统战略理论的一部分。1624年，本杰明·鲁戴尔德爵士（Sir Benjamin Rudyerd）告诉下议院："西班牙本身人口少，天然商品匮乏，西印度群岛的矿藏刺激了其国王谋求统一王权的勃勃野心。"有人则认为，没有比"在西班牙沿海毁坏其船只，干扰其返航路线"更能援助战火纷飞的普法尔茨地区了。英格兰建立海外殖民帝国，有利于保证其在欧洲大陆的堡垒的安全，最终也有利于英格兰王国本土的安全，这种联系将在英格兰接下来大约150年间的战略话语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新大陆的殖民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冲突的延伸。17世纪20年代离开英格兰并最终抵达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们，并没有从此对遥远的旧世界置若罔闻。先是对英格兰感到失望，接着又对与之接触越来越多的荷兰共和国感到失望，清教徒们于是把美洲看作他们准备与"基督的敌人"——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的跳板。他们为英格兰的改革祈祷，为"德意志教堂的悲惨状况"祈祷，也为那里新教事业取得的胜利祈祷。1621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说"波西米亚的状况非常糟糕"，当时是他去马萨诸塞湾的头几年。殖民

地居民密切关注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特别是来自日内瓦、法兰克福、莱顿、海德堡、斯特拉斯堡以及英格兰的消息。他们为普法尔茨的形势感到震颤，也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取得的胜利欢呼。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温斯罗普的儿子斯蒂芬，甚至跋山涉水回到欧洲去支持英格兰内战中的议会派，不过他们所能提供的实质帮助非常有限。相反，正如约翰·温斯罗普所说，清教徒更应该成为“山巅上一座闪闪发光的城，好让人们的眼光都聚焦到我们身上”。这里所热烈庆祝的，不是殖民者与旧世界的疏离，恰好相反，是他们基督教成员的身份及由此产生的义务。对于欧洲的救赎来说，他们所提供的示范效应与他们的实质帮助一样有意义。美洲大陆的移民、英格兰的议会斗争以及欧洲新教徒的事业，三者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更为宏大的命运共同体。

欧洲两项最重要的安排都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这足以体现德意志的中心地位。1555年9月，查理五世与德意志的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和约》（Treaty of Augsburg），他被迫将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部分。查理五世按各领地获得的时间顺序，倒着依次宣布放弃各领地。1555年，他将西班牙王位让与儿子腓力二世。不久之后，他最终放下了最重要的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两年后，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斐迪南一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从神圣罗马帝国中分离出来。从此，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再没有人能统治欧洲如此庞大的领土，奥地利与西班牙永远被分开了。《奥格斯堡和约》提出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承认各诸侯有权自由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和约》还规定，1552年前新教诸侯占有的天主教会土地和没收的天主教会财产不再归还，并确认了路德教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平等关系，尽管加尔文教派并不在此列，但这已经足以恢复德意志以及大部分中欧地区的和平，至少暂时如此。

同样，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也是一项围绕德意志的协议安排。该《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席卷法国、西班牙、瑞典、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很多诸侯国的全欧洲的战争。和约迟迟不能达成，原因是交战各方都无法以体面的方式接受和平，它们总是担心对手不够“诚实”。西班牙极力想要维护它与奥地利王室的统一，从而与维也纳保持战略合作，这使得它不愿意仅仅解决德意志问题，尤其是因为这会让法国人获得德意志帝国西部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希望与瑞典和法国达成和解，使它们远离德意志内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在帝国的权威。法国则试图铲除西班牙对德意志的影响，希望进而打破长久以来哈布斯堡王朝针对法国的包围圈，也希望使诸侯与外国结盟的自主权利合法化，来削弱皇帝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法国更希望通过阻止哈布斯堡家族连任帝国皇位，将其势力连根拔起。对于德意志自身而言，谈判之所以一直被搁置，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拒绝允许帝国（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臣属）的三级会议参加和法国人的谈判。从17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德意志长期分裂，各诸侯已经达成共识，即努力一致面对外部干预，以恢复德意志帝国的完整统一。例如，巴伐利亚天主教选帝侯痛心疾首地表示：“这么多国王和君主赞成帝国的分裂，那么分裂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最终，哈布斯堡王朝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迫使神圣罗马帝国在一些关键点上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德意志诸侯的外交自主权这一点上。法国人也做了妥协，他们没能通过禁止哈布斯堡家族连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令。1648年，《明斯特和约》（Treaty of Mü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Treaty of Osnabrück）的签订，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30年的德意志战争，这两个和约一起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然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却仍在继续。后世的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将这一和约看作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概念的起源。但事实上，和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防止德意志诸侯不受限制地行使主权，以致破坏帝国的宗教和平以及整个欧洲的均衡。和约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德意志不被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防止有人试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王权，不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非德意志人。简言之，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足够强大，能够防止德意志四分五裂并阻挡外国势力入侵，同时又不至于过分强大以致威胁到欧洲的秩序。

这一艰难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宪法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宗教的措施的配合来达成的。在领土条款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或者所认可的变化，改变了欧洲的国际体系。西班牙最终承认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但依然保留了佛兰德和瓦隆尼亚（Wallonia）两个地区，西属尼德兰的范围缩小了。瑞典获取了西波美拉尼亚——从而可以保护其南部海岸线不受侵袭，还得到了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个主教区，同时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占据三个席位。普法尔茨被一分为二：上普法尔茨仍然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公爵继续保有他的选帝侯席位；而横跨“西班牙之路”的下普法尔茨连同它原有的选帝侯席位，一起归到“新教徒”查理·路德维格（Protestant Charles Ludwig）的名下。现在，选帝侯从7位增加到了8位。皇帝做出的主要让步是，和约首次明确规定准许德意志各诸侯国拥有外交自主权，但不得威胁皇帝和帝国的地位，也不能破坏和约规定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条款。而法国人希望把哈布斯堡家族赶下帝国皇位的愿望则落空了。另一方面，奥地利——西班牙王室谋求欧洲统一的野心，不管是真的还是人们幻想的，都得到了遏制。查理五世的幽灵逐渐淡出。

和约规定，罗马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三大主流教派合法共存。在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宗教事务以及各种涉及实质问题的事务，都必须在议会里由天主教和新教代表共同协商解决，不能直接遵从简单的多数决定原则。在各诸侯国的领土内部，统治者必须尊重臣民享有的某些特定权利，其中包括自由改信其他宗教的权利；如果统治者自己改信其他宗教，不能强加给臣民。1624年被称为宗教宽容政策推行的基准年，在这一年享受到宗教宽容政策的少数派不仅可以在未来继续保有此项权利，而且其担任公共职务的权利不得被剥夺。和约中也有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条款。瑞典和法国都以保卫“德意志的自由”为理由参战，并认为“德意志的自由”对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凌驾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上很关键，同时和约也有利于保护瑞典和法国的自由和安全。瑞典外交官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总结了这一联系：对于瑞典的国家安全来说，“波罗的海就像是一条护城河，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

（Mecklenburg）则是缓冲带，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属国就好比是外部工事”。他进一步解释，瑞典的目标就是“恢复德意志的自由……并以此来维护整个欧洲的均衡”。因而，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到国内自由、权力平衡以及外部干预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和瑞典坚持认为它们是德意志各诸侯国的自由的“守卫者”。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完全承认了外部干预的合法性：和约解决了德意志内部的宗教平衡问题，并在国际框架下达成了对德意志事务的安排，实际上则是为外国提供了干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杠杆，这在17世纪末至整个18世纪非常明显。

德意志饱受内战的创伤，外国军队——主要是西班牙、丹麦、瑞典和法国在这里打仗，使德意志蒙受屈辱。诚然，其他国家也有损失，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欧这样损失惨重，德意志人的命运则格外悲惨。当然，战争的创伤并未波及所有地区，有的地区被严重破坏，有的则毫发未伤。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骤降，从原来的2 100万下降到1 300万多一点儿，人口损失是空前的。从人们的讲述和复述中可见，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不复存在，这几乎成了集体性的死亡判决。到17世纪40年代末，诸侯、市民和农民都不得不面对噩梦般的景象：到处都是被破坏的风景、被毁坏的庄稼、人口凋敝的村庄以及被投了毒的水井。然而，对于这一切，人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却是复杂矛盾的。每个人都同意应该保留帝国，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德意志不受外国控制，同时保证德意志不被其内部的某一个国家所控制，但是他们所能达成的共识也仅限于此了。当德意志各邦国面对外部的威胁时，它们是应该对强大的邻国让步以避免冲突，还是应该寻求国内的和谐一致并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以抵挡外敌？威胁“德意志的自由”的，到底是德意志人自己，还是那些名为保护、实为干涉的外部势力？

到了1648年，这场持续了200年的欧洲王权之争陷入了僵局。没有哪股势力有能力主宰神圣罗马帝国进而主宰整个欧洲大陆：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苏莱曼大帝、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以及黎塞留和马扎然，他们都失败了；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看到了新教人士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可能性，至少是把哈布斯堡家族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上拉下来的可能性。然而，结果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自从15世纪中叶被狼狈地赶出法国后，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开始强势回归欧洲政坛；经过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长久的退缩之后，英格兰又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重振雄风。而法国人则从元气大伤的国内宗教战争中走出来，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在中欧和低地国家的势力则从全盛走向衰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承担了抗击土耳其人的“德意志使命”，不过这一点却并不能使他们在欧洲获得至高的地位。在欧洲的外围，瑞典人异军突起，成为欧洲整体力量平衡中的关键一环。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向中欧的进军一度停滞，当然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大国间的竞争也进一步延伸至欧洲以外：哥伦布本来试图开辟新航路，以迂回的方式打击伊斯兰力量，但这最终导致了美洲、亚洲新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外部的力量开始制约或者平衡原来的欧洲。

随着各国加紧强化军事力量，以上所描述的一切驱动了一场遍及欧洲的国内变革。在英格兰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这一过程激发了政治参与的高涨。然而，在法国、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国家，情况却正好相反。相比之下，位于欧洲体系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则零星地做了些努力，试图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但效果并不佳。部分是因为德意志人彼此间不信任，部分是因为邻国有意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会利用德意志的资源来对抗它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很难分清。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个政治框架，即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治野心不会损害欧洲的国际体系。同时，“德意志的自由”在帝国议会和各邦国中得以保存。然而，欧洲的王权之争进一步产生的压力，是会让德意志变成英格兰和荷兰那样的议会政体，还是变成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君主政体，抑或是重新陷入过去200多年来所经受的内忧外患之中呢？此时，还没有最终结论。

[1] “医院骑士团”为隶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军事力量。——编者注

[2] 罗马人民的国王，用于称呼已经当选但尚未接受教皇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编者注

[3] 托马斯·沃尔西（1475—1530），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的英格兰政治家，亨利八世时任枢机主教。——编者注

[4] 里格，陆地及海洋的古老测量单位，1里格相当于4.8千米。——编者注

[5] 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货币单位。——译者注

第二章

继承：1649~1755年

帝国（德意志）是主干，也是欧洲的中心……德意志是其他欧洲国家扔来掷去的一颗球……德意志是欧洲大国争夺欧洲统治权的战场。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70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各诸侯国国王权威的侵犯，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君主制国家变得可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自己看作德意志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欧洲各国之间的均势也将因此而遭到破坏，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法国外交部首席专员，1729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欧洲主要大国间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位继承权始终是欧洲各国争端的焦点。宗教信仰的差异仍然是各国间的主要分歧。在帝国内部，甚至整个欧洲，宗教问题曾屡次引发冲突。在各种冲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以及各王朝的权力继承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从根本上讲，绝大多数的政治问题都与德意志密切相关。在此后的数百年中，欧洲人一直为以下几个问题争论不休：西班牙遗留在德意志帝国的权力真空应该如何来填补，如何解决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在瑞典的力量迅速下降后，各国应该如何瓜分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和波罗的海的领土，等等。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因为一系列颇具争议的王朝继承问题而纠缠和争斗不休，例如德意志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公国的继承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继承问题，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西班牙以及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整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问题。每一次争端，都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引发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战争。

1648年后，德意志宪法——《帝国宪法》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制定完成。这部宪法不仅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也是维持欧洲各国力量均势的支柱。帝国议会确立了双重干涉机制。对于违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款的诸侯，德意志帝国议会拥有介入与干涉的权威。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德意志各邦国之间的互相争斗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避免局部性的骚乱波及整个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因此，德意志的各个诸侯国实际上并不拥有主权，尽管它们可以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主权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帝国议会经常对各国进行“干涉”，即对那些危及宗教和谐、滥用权力或者用其他各种方式破坏帝国稳定的诸侯进行威胁和干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诸侯的权力会被暂时甚至永久剥夺。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宪法》也得到瑞典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担保”，它们分别负责保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利益，确保德意志不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控制德意志帝国，不可能主导整个欧洲国际体系，整个欧洲似乎可以共享太平了。

在过去的30年中，德意志一直是欧洲的交通要塞。现在，德意志人决定尽最大努力减少外国对德意志的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各诸侯团结起来，以帝国议会为中心，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帝国政府，那么上述愿望就有可能实现。从理论上讲，只有帝国统一起来，德意志皇帝与各诸侯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帝国的主权。为了保卫领土的安全，德意志帝国需要建立一支军队，以攘外安内。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如何解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遗留问题，是下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主要任务。17世纪50年代，帝国议会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1654年，“罗马人民的国王”斐迪南逝世。德意志各选帝侯在几经犹豫后，决定推选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继任，而由年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支持的候选人则没有当选。虽然一些法国外交官和亲波旁王朝的德意志诸侯此前也为其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为其做过推荐，但此人仍未得到选帝侯们的支持。1658年，也就是利奥波德一世继任皇帝的同一

年，许多德意志诸侯国在法国的支持下组成了“莱茵联盟”，以抵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它们的控制，保证自身的安全。在法国公使的怂恿下，莱茵联盟提出，它们可以承认利奥波德为皇帝，但其权力必须得到限制。

德意志的西部和东北边境的冲突正在持续升温，因此，维护德意志内部的和平稳定就成为当务之急。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法西战争又打了10年的时间。从低地国家到位于勃艮第公国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这里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在战争中变得动荡不安。英国的干涉使得动荡更加严重。英国“护国主”克伦威尔改变了外交方针，不再以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作为唯一目标。现在，他的首要目标是在欧洲大陆推动新教的发展，打击天主教的势力，这也是英国议会长期以来的要求。然而事与愿违，尽管荷兰人与英国人同样信奉新教，但荷兰拒绝放弃自己的殖民与商业利益，拒绝与英国合作。1651年，英国曾经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规定凡从欧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送。后来，英国试图拉拢荷兰，以建立一个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因此它表示可以废除《航海条例》。然而，荷兰依然拒绝与英国合作。最终，在1653～1654年，克伦威尔以武力打败了荷兰。之后，英国又自称代表瓦勒度派（Vaudois）新教徒的利益，对萨伏依公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外交与军事干涉，理由是这些新教徒长期受到信仰天主教的萨伏依公爵的压迫。之后，克伦威尔终于向西班牙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他一直把西班牙看作“基督的敌人”，要挫败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

1655年，克伦威尔出兵讨伐西班牙，并远征加勒比海地区，占领了牙买加。这一“西半球计划”背后的战略目的，并不是要在海外开拓出一个新的大英帝国，而是要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资源，为英国霸权提供支持。正如曾经在西印度担任种植园主的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所说：“奥地利王室（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和支柱）的繁荣和力量，有赖于美洲的银矿；如果奥地利（通常指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这一切，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将很快失去他的三重皇冠。”然而，这场战争冲击最大的对象还是欧洲自身。1657年，克伦威尔与法国结盟。在他的坚持下，红衣教主马扎然同意放松对胡格诺教徒的限制。一年后，英法联军在沙丘（Dunes）战役中大败西班牙。1659年，西班牙向英国和法国妥协，并签订《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比利牛斯和约》规定：“那条自古将高卢和西班牙分隔开来的山脉，从今以后将成为两个王国之间的分界线。”此外，英国以此吞并了敦刻尔克，将其作为自己称霸欧洲的桥头堡。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此时的英国人已经对内部的倾轧和对外战争感到厌倦。很快，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即位。自此，英国的这场短暂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扩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低地国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诸侯国，开始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控制权的争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正处在这场混战的前沿地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腓特烈·

威廉（Friedrich Wilhelm）通过吞并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土地，保护了自己的北翼，此外还获得了马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卡明和明登等地区，巩固了其在德意志北部的地位。这个公国甚至比德意志新教势力的源头——萨克森公国还要大。即便如此，勃兰登堡也曾深陷地缘政治的冲突，当时的勃兰登堡军队根本无力阻止交战各方肆意横穿和掠夺自己的领土。此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作为勃兰登堡主要对手的瑞典，在西波美拉尼亚地区获得了一个据点，随时可以进攻勃兰登堡公国。更糟的是，瑞典在与波兰的战争中进展顺利，这意味着勃兰登堡即将陷入被两面包围的危险之中。1660年5月，《奥利瓦条约》（Treaty of Oliva）签订，战争宣告结束——这一次，大选帝侯终于能松一口气了。然而，勃兰登堡终有一天要和瑞典一决雌雄，这是不争的事实。后来，大选帝侯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发出警告：我们渴望和平，但能做到未雨绸缪才是更好的选择。他写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只是隔岸观火，认为战争离你的国家还很遥远，那么悲剧终将会在你的土地上上演。”

德意志内部战争的结束和欧洲各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对欧洲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世纪30年代，法国人停止内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展开了夺取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权的战争。然而，德意志内部的冲突，引发了法国国内新一轮的动乱。黎塞留的积极外交政策在法国精英阶层中一直颇受争议。1642年黎塞留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继续沿用这一政策。法国人指责黎塞留和马扎然二人，说他们为了挑起战争和筹集战争经费，而冷酷无情地对传统特权阶级进行压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人相信，二人长期掌权，将会使欧洲各国间的冲突永无休止。当马扎然计划与西班牙开战并征服低地国家时，很多法国人都不同意。尽管此时德意志内部的均势已经有了保障，但法国人脆弱的共识还是瓦解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不久，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s）[1]的法官与大批贵族发起了一场叛乱，即“投石党运动”。这一运动针对的不仅是国王的外交政策，更针对马扎然的税收集中政策。政府为筹集对西班牙的战争军费而加重人们的负担，导致马扎然受到人们的一致谴责。除此以外，人们还指责他未能保卫法国的边境，“将战争作为自己暴政和强盗行为的借口”，疏远盟友以及丢失那些“依据条约应属于法国的土地”。直到1653年，法国国王的军队才完全控制局面。国王被迫认识到，法国不仅应该用外部威胁来维系国家内部的团结，也应该巩固内部团结以牵制外部势力，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欧洲东部的国家来说，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王软弱无力，无法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1652年，该国确立了自由否决权，波兰王国无力阻止这项制度。根据该制度，议会中任何一名波兰贵族投出的否决票都可以导致议会——又称色姆（Sejm）——瘫痪。波兰贵族人数众多，其中10%的人口都有投票权，这一比例比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同荷兰和英国的议会一样，该制度的出台将会大大提高波兰人参与国家权力的积极性。然而，事实上，波兰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大约由50多个

半主权的邦国组成，每个邦国由贵族领导，它们能够独立地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由于议会中仅仅一张否决票就能阻止一项决议的通过，因此事实上议会根本无法处理任何实际问题，这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假如议会能够整合全体波兰人的利益，并且动员必要的资源，那么波兰这个人口众多、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合王国的巨大潜力，就会实际发挥出来。即使这无法实现，还可以让某一个强大的公国来领导整个联邦，或许这也可以打破这一制度上的僵局，这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可以对法国或者普鲁士实施强硬政策。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波兰的实力都会有所增强。唯有如此，波兰才可以傲视诸如瑞典和普鲁士这样的邻邦。

如同勃兰登堡大选帝侯一样，俄国沙皇也诞生于17世纪的动乱年代。历代沙皇决心创造一个内部稳定的国家，以保护和扩张领土。1649年，沙皇颁布新的《法律大全》，确认了农奴制度和新的社会经济秩序，规定农奴在田地干活、贵族负责管理国家事务。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Afanasy Ordin-Nashchokin）是俄国的第一位首相，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领导制订了一项系统的国内发展计划，其中包括简化和废止部分税收项目，以及建立商业远航队。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德意志式”的官僚制国家，这有利于抵御外敌的入侵，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罗曼诺夫家族的扩张野心。不过，在俄国发展的过程中，代议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俄国杜马（由家世显赫的贵族组成的议会）的成员是由沙皇自己来任命的，他们在国内外事务问题上向沙皇提供建议，并且可以在军队、司法部门、外交使团及行政机构中任职。然而事实上，只有缙绅会议或称国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议机构——能够参与投票的不仅有贵族，还有牧师、商人、市民，甚至部分农民。在整个17世纪，缙绅会议在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1613年新任沙皇的选举，以及在对波兰战争中的征税和募兵，等等。此外，1649年，缙绅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法律大全》，确立了农奴制。17世纪50年代，缙绅会议曾两度召开，讨论是否应将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纳入沙皇保护范围等相关事宜。但后来随着沙皇权力的稳定，缙绅会议开始退居二线。不同于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俄国的君主政体和代议机构并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强大。

然而，最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腓特烈·威廉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普鲁士位于波兰、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严格的制度，才能有效保卫国家的安全。他认为：“联盟固然是很好的选择，但自力更生至为关键，更有利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大选帝侯的这番话，深深影响了他与德意志议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议会都是保守而狭隘的，它惧怕君主的专制政策，并且拒绝抵制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此外，1649年大选帝侯计划与瑞典开战，议会直接拒绝为其提供经费。在议会中，部分代表所持的外交主张与大选帝侯有所不同；东普鲁士地区的代表更加倾向于效仿邻国波兰，实施比较自由的政策。在大

选帝侯眼中，这些代表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心。他的一名下属曾说："这些人对自己国家的存亡漠不关心。"事实上，要想维护国家的安全，就必须剥夺各公国的独立性。

1653年5月，来自瑞典的威胁与日俱增，德意志各邦国派代表开会。它们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增加财政预算，以支持帝国的共同防御。此时，大选帝侯要求建立一个国家财政体系，以贯彻其"武装防御"的政策，并捍卫自己的"地位"。迫于巨大压力，各邦国最终承认，大选帝侯的要求是"必要的"，并同意交出批准税收的权力。尽管如此，诸侯仍然凌驾于农民阶层之上，他们拥有广泛的封建权利，并在军队及行政机关享有特权，不过他们参与协商的权力却大打折扣。这样，凡是那些"关乎生死的重要之事"（如外交政策和战争），大选帝侯就可以直接决策，不必受到诸侯们的掣肘。两年后，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战争动员，大选帝侯建立了军需总部。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的士兵的人数增加了10倍之多。尽管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然拒绝承认大选帝侯的权力，但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势头有增无减。瑞典也是如此，战争的压力最终促使政治精英们同意恢复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议会的权力被削弱。这是一次彻底的国内改革，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与军事资源，以保卫国家、抵御外国势力。

1661年，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他一心想要获得个人的荣耀，也想为整个法国赢得荣耀。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荣誉本身，也是为了巩固君主制度在法国的地位。此时，他没有忘记投石党运动的教训。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人及后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路易十四政策的目标依然是寻求国家的安全，因为法国君主制国家的基本战略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哈布斯堡王朝依旧在北、东、南三面包围着法国；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则仍存在于低地国家的南部、弗朗什–孔泰、伦巴第以及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为了应对目前的困境，路易十四试图将西班牙人驱赶到远离法国北部边界的区域，并且推动法国向东稳步扩张至勃艮第、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争夺意大利北部地区。此外，他还打算联合德意志的新教诸侯，进行"蛙跳式"外交，以应对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他还想让法国参与波兰王位的竞争，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从两边包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并借此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斡旋。路易十四不仅仅想联合其他法语地区，还想重新征服法国曾经统治的所有地区，这是他的"历史"诉求。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路易十四试图染指神圣罗马帝国内政。他"奥古斯都式"的形象，似乎让人们回想起了古罗马时代。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考量，他的大战略的关注重点是神圣罗马帝国。17世纪50年代末，路易十四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候选人的愿望落空。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他认为，即使自己不能成功，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法国王储能有此机会。此外，路易十四还决心保卫法国东部和北部的边界，以免其受到西班牙及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友的袭击。1664年，路易十四誓称"要比以前更积极地参与德意志事务"。

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国内变革，路易十四的雄心壮志才能变为现实。1666年，年富力强的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三年后，他着手实施首轮军事改革，其中包括建立战争委员会、任命军需官以及实现武器标准化等。他使用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办法，有效地迫使法国贵族入伍服役。这样，法国王室的军队就被改造成了一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在国内，王室军队完全垄断了武力；在整个欧洲，他们更是令人闻风丧胆。从此，贵族的地位受到大大削弱，和投石党运动时期无法相比。不仅如此，面对日趋专制的国王，他们还必须表现得俯首帖耳。为了增加法国的人口，壮大国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1666年，政府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与此同时，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担任财政大臣，对皇室财政进行了整顿，实施强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后来他成为海军大臣，推动海外“新法兰西”殖民地的建立，特别是在加拿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声誉和资源，以应付欧洲的冲突，打击国王的敌人。事实上，科尔贝的经济政策使得法国面临的冲突变得更多了。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并未能够在法国获得绝对权力。国王的权威依然受到各种地方势力以及利益团体的限制，法国的人口和财政潜力尚未被完全开发。

路易十四的伟大的强权抱负不仅强有力地塑造了法国社会，同时他本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亦是巩固国内君主制稳定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偏远的地区，例如朗格多克（Languedoc），他也坚持捍卫法国的天主教，抵御新教徒的渗透与入侵。此外，挫败哈布斯堡王朝的“险恶计划”也是路易十四维护自身合法性的要务。地方上的精英们歌颂“太阳王”的万丈光芒，并期待那些胆敢公然挑衅国王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个评论家感叹道：“每当国王赢得一场战役、占领一座城池或者征服一个行省，法国人民就会盛装打扮、点燃篝火，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把自己同国王的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这种场面在精神上弥补了路易十四的军事失利，慰藉了他所有的苦楚。”当然，这种局面极可能造成潜在的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在欧洲舞台上的挫败感会严重危及法国的王权。

此时，法国即将对神圣罗马帝国发动一场外交和军事突袭。1665年9月，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去世。由于腓力四世的女儿嫁给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根据布拉班特“继承法”要求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低地国家的领土。这里说的“继承法”是一种古老的地方习俗，即规定女儿在私法上享有继承权，但这种习俗从未运用于国际政治事务中。路易十四的要求被西班牙拒绝后，他于1667年5月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史称遗产继承战争（War of Devolution）。法国最终大败西班牙军队，吞并了位于西班牙北部边境上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此时，英国可以协助法国保护其南北两翼，5年前深陷财政危机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敦刻尔克地区卖给了路易十四。此外，查理二世的王妃是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因此这位英国国王对葡萄牙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给予了军事支持。英、法、葡三国的配合，使得西班牙的力量被削弱，其军队被迫撤回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荷兰人没有参与这场争夺，一方面是由于荷兰正在与英国作战，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大议长约翰·德·维特

（Johann de Witt）希望缓和与路易十四的关系，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然而后来形势变得清晰起来，路易十四针对低地国家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他大举进犯德意志的前奏。正如法国驻美因茨的公使所说：“只有建立起一道从莱茵河延伸至科隆的屏障，法国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证。”此时的路易十四，又开始对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感兴趣。他宣称：即日起，此前法国和巴伐利亚以及勃兰登堡等盟国签订的条约，根据惯例要增加以下条款——一旦帝国的皇位空缺，这些国家应拥护路易十四成为候选人。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根本无能为力。自1660年起，奥斯曼土耳其将搁置已久的进攻匈牙利计划重新提上了日程。1663年4月，在法国的秘密支持下，奥斯曼帝国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宣战。最终，此次战役以奥斯曼军队在圣哥达的惨败宣告结束。然而，法国代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对此事进行了外交干涉，因此，尽管奥地利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占领多少领土。自此，奥地利再次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之中，在外交与军事上疲于应付。

法土联军逐渐威胁到德意志帝国的完整性，但这也推动了德意志宪制结构的发展。1662年2月，新一届帝国议会召开，议会讨论了如何应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犯。在1663年1月的一次会议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坚持认为，他无法单独肩负战争的重担。他号召代表们通过“共同的讨论以及建立强大的联盟”来“保卫我们所深爱的德意志民族的领土安全”。此后不久，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来自路易十四的威胁，特别是他入侵西属尼德兰之后产生的问题。这一时期，帝国议会都是在雷根斯堡召开的——当时这座城市是德意志帝国的法定首都，也是帝国的交流中心。在这里，帝国议会对各类议案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尽管这些决议很少能被真正落实。这里成为世界第二大宣传册、报纸以及其他政治媒体的发行平台，规模仅次于伦敦。在此后的20年中，帝国议会始终坚称，自己拥有对外宣战的权利。此外，议会还探讨了如何才能最好地调动帝国的庞大资源以应对外敌。英国也是如此——在各种国际事件的巨大压力下，议会被授予了更多的权力。然而，帝国议会是否有能力运用其新的权威为德意志各邦国提供保护，以及议会下设各部门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否会继续阻碍议会的协调行动，仍需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看到路易十四的侵略步伐不断推进，其他欧洲国家也越发不安。1668年，德意志帝国的“担保国”英国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试图与荷兰共和国和瑞典组建一个三国同盟，来牵制路易十四。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同盟很快便土崩瓦解了。同年，在法国的资助和英国军队的支持下，葡萄牙从西班牙独立，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力量。17世纪60年代末，查理二世已完全受制于路易十四，双方于1670年6月签订了《多佛秘密条约》（Secret Treaty of Dover）。该条约规定，查理二世同意支持法国攻打荷兰，以此作为路易十四向英国提供军事支援并帮助英国恢复天主教以及君主权力的回报。此时，路易十四又把目光转向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他眼中，这是法国征服整个西北欧的障碍。1670年4月，他吞并了洛林地区，就此切断了勃艮第公国（弗朗什–孔

泰）和西属尼德兰之间的联系。西班牙军队全线溃败，1672年2月，西班牙——荷兰联盟已经难以为继，这预示了欧洲未来局势的变化。两个月后，路易十四开始行动：法国军队穿过西属尼德兰，进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并一路驱散了抵抗的军队。在自西向东进攻荷兰时，法国军队傲慢地强行通过了法国盟国普鲁士所属的克利夫斯地区。路易十四来势汹汹，势不可当。

然而，法国国王似乎做得太过火了，局势很快变得不利于他。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荷兰议会任命了一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为执政，他一生致力于抵抗法国。面对飞扬跋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的诸侯们力图维护“德意志的自由”；而威廉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便是捍卫欧洲的“自由”，以阻止路易十四打破欧洲权力平衡的企图。二者的含义是一样的。而一直倡导对法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德·维特兄弟，则遭到支持奥兰治亲王的暴民的杀害。荷兰共和国有可能即将被法国征服，这不仅刺激了维也纳和柏林的国王们，更震撼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74年5月，德意志帝国议会宣布展开针对路易十四的“帝国战争”——法国首次被称作“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同年6月，普鲁士加入对抗法国的行列。路易十四试图反击反法联盟，他支持瑞典，以向大选帝侯的北翼施压。此外，1674年西西里岛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墨西拿起义（Messina revolt），路易十四支持该起义，使其坚持了4年。同年，英国开始攻打荷兰。其间，年轻的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即后来的马尔伯勒公爵，被派往德意志支援路易十四，对付反法联盟。1674年8月，荷兰人单方面媾和，同英国签订和约以确保自身的独立。1675年，大选帝侯在费尔贝林（Fehrbellin）一战中大败路易十四的盟国瑞典，瑞典被迫求和。17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事力量开始瓦解。1678年，法荷签订《奈梅亨和约》（Treaty of Nijmegen），战争宣告结束。西班牙被迫进一步向路易十四割让领土：圣奥梅尔（Saint-Omer）、康布雷（Cambrai）和沙勒罗伊（Charleroi）以北地区，以及弗朗什–孔泰的全部地区，都交给了法国。然而，路易十四仍然坚信，低地国家以及德意志会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此时发生的一切，对中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内政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7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国爆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即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成千上万的小册子、讲话稿漫天纷飞——这种情景不仅出现在英国和荷兰这种政治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地区，甚至还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当时，很多评论文章以月刊或者年度评论的形式发表，各种关于帝国内政外交的辩论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大幅提高。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想阻止路易十四的扩张，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中就有不少认为，在贸易和意识形态领域，荷兰是比法国更大的威胁。此时，许多荷兰人仍旧认同德·维特兄弟的对法绥靖政策，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同情法国，而是出于谨慎考虑。同样，德意志人也并不都主张反击路易十四——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路易十四有助于防止某个诸侯称霸整个德意志。尽管如此，多数欧洲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也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议会成员，最终还是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法

王路易十四想要效法查理五世，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新教徒对路易十四最为恐惧，他们将其看作欧洲天主教的代言人，认为其试图颠覆欧洲宗教改革。

德意志是博弈中的关键。路易十四想要控制德意志帝国，进而获得德意志的资源和声望。与此同时，很多德意志人担心路易十四想要谋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甚至计划暗杀皇帝。英国的辉格党人认为，英国应该保卫低地国家与德意志帝国的安全，这样才能捍卫欧洲的均势与英国的自由，而且，早在17世纪20年代，一些英国议员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1675年4月，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Sir Thomas Littleton）向议会发出警告：“路易十四将把佛兰德、德意志、弗朗什–孔泰等地区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这一扩张行为是极其危险的。”而与此同时，辉格党正在对查理二世的外交政策进行无情的抨击。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在1677～1678年议会开会时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以查理二世行事失误为由来约束国王的特权。

此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了。在遗产继承战争期间，德意志帝国议会并没有介入战争，没有对西属尼德兰进行支援。对于洛林公爵在1670年的支援请求，帝国议会也没有理会。但是，法国出兵攻打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举动，深深地震动了自满的德意志人。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对普法尔茨的大肆掠夺，以及他平时对德意志的恶劣态度，引起了德意志人对法国的反感和厌恶，并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羞耻感。德意志的报刊和小册子谴责路易十四为“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撒旦的长子”和彻头彻尾的反基督者。还有很多德意志人指责法国人的堕落，说他们轻佻而且性变态，像奴隶一样屈服在其国王的暴虐之下。事实上，德意志人对路易十四的敌意，并不仅仅是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或者排外情绪，更多的是由于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做派和宗教限制政策。保卫“德意志的自由”是德意志民族的传统观念，而路易十四破坏了这个观念，因此诸侯们在各种场合（包括各邦国国内和帝国议会）对法国的行为进行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反法战争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许多德意志人、荷兰人和英国的辉格党人都认为，路易十四是“政治与宗教共存”这一原则的致命威胁，这个原则是欧洲各国人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其间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德意志人想要保卫的不仅仅是德意志的土地，还有德意志的自由。

17世纪末德意志面临的战略威胁促使人们共同呼吁对帝国的军事制度进行改革。1667年，塞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在一本著名的匿名宣传册中呼吁实现德意志的“内部统一”，并谴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陌生人（外国势力）根据自己的特殊意志来塑造德意志的机会”。当时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观点。而颇具争议性的是他提出的“将15世纪末的思想变为现实——设立帝国委员会，以在外交事务上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建议。虽然有人认为，各邦国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的比例，应与该国对帝国国防事务的贡献相符，但大多数人对建立帝国常备军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正如普芬多夫警告人们的那样，设立常备军会导致国家的“军事专制”。因此，虽然此时的德意志人

希望结束冲突和威胁，但他们还并没有想好要以何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渐渐地，欧洲的战争已不仅仅停留在欧洲大陆范围内，还延伸到了对贸易和海外殖民地资源的争夺。风靡一时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科尔贝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改善本国的贸易、商业远洋或者制造业现状，只能通过夺取另一个国家的贸易、航运业或者产业资源来实现。”后来居上的国家总是试图“赶超”那些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因此，当时欧洲各国大战略的核心是，尽可能多地占领海外殖民地，获取更大的国际贸易份额，削弱敌国的实力。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并非最终目的，却是实现更为远大的目标的重要方式。例如，西班牙人在三十年战争后失去了对中欧和西北欧的统治权，因此他们更加努力地保护其海外殖民地和贸易资源，以希望恢复其在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地位。

路易十四的对外扩张改善了法国的边境安全状况。在签订《奈梅亨和约》后，路易十四手下的总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沃邦（Sébastien de Vauban）加固了法国东北部的新边界。然而路易十四的目的不仅是要确保自身不受攻击，还要效仿黎塞留，在其邻国建立“口岸”，以此牵制邻国，使其与法国保持一致。虽然路易十四已经获得了意大利北部的皮内罗洛（Pinerolo）要塞地区，并在1681年吞并了卡萨莱（Casale）附近的地区，有效包围了萨伏依，但他仍对神圣罗马帝国忧心忡忡。由于西班牙的软弱无力，佛兰德对法国的威胁已经很小了；英国的查理二世和1685年即位的詹姆斯二世也与法国交好，而且英国国内政局一直不稳。因此，此时法国最主要的威胁还是东边的奥地利，当时奥地利有荷兰和普鲁士的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是德意志帝国中的强邦，1670年，二者曾经出手保护了荷兰，现在三国一致对付法国。因此，1680年开始，路易十四建立了“统一法庭”（Chambers of Reunion），其功能是伪造各种历史文书和契约，为法国的东扩提供合法性依据，这样法国可以进一步吞并德意志的土地。1681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然而，他的每一步扩张都会进一步增加法国的北部和东部的脆弱性，因此他必须掠夺更多的土地才能弥补这一问题。同时，“统一法庭”的职权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预感到大难临头的西班牙在1683年12月先发制人进攻法国，却以失败告终。路易十四并没有停止他扩张的脚步，1684年他占领了卢森堡。他的所作所为彻底将法国置于德意志的对立面。1684年6月，卢瓦侯爵发表讲话：“从现在起，德意志人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从西边进攻神圣罗马帝国，是因为此时的奥地利人又一次受到法国“蛙跳式”外交政策的影响而分心。1683年年初，土耳其军队继续北进，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大批被流放的匈牙利基督徒。同年6月，土耳其兵临维也纳城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感到大事不妙，慌忙逃离维也纳，他的行为为当地人所不齿。不过，教皇英诺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收留了这位狼狈逃亡的皇帝。在教皇看来，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因此应该为奥地利提供帮助。尽管教皇自己并没有多少军队，但天主教廷有很多外交和财

政资源，可以支持基督教国家对土耳其的讨伐。此前，教皇也曾试图采取“蛙跳式”外交：1683年，他曾经派使节来到萨非王朝（即波斯），想劝说国王从东面进攻土耳其；此外，他还想劝说阿比西尼亚人进攻土耳其的属地埃及——显然，关于祭司王约翰的故事还在流传。不过，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实施。教皇还进行了其他的努力。他协调波兰和俄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双方集结军队以对付奥斯曼帝国。波兰认为，奥斯曼帝国严重威胁了波兰在黑海地区的省份，因此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很快同意向南进攻，打击奥斯曼帝国。除此之外，教皇还协调奥地利和波兰签订了一份协议。1683年9月11日，索别斯基到达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一同进攻奥斯曼的军队。自此，土耳其军队的号角声再也没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响起。17世纪末，欧洲的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各国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异教徒的入侵，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欧洲人又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当时，德意志皇帝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各国矛盾重重，而土耳其人的入侵使得欧洲人再一次团结起来。

此时，土耳其人依然可能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然在集中本国资源以对付土耳其人。1684年8月，利奥波德一世与路易十四签署了协议，以换取对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自由控制权。17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避免德意志的基督徒分裂而导致战争，教皇决定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以继续击退土耳其人的入侵。此时，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贵族可以自由决定本国是否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一部分。之后，德意志全民族团结起来，发动一系列战役讨伐奥斯曼帝国，最终将其永远驱逐出匈牙利。1685年，汉诺威、巴伐利亚、莱茵、士瓦本（Swabia）和科隆共派遣近三万人参战。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团结的一次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15年里，尽管有时奥斯曼军队会反扑，但其总体军力每况愈下：斯拉沃尼亚（Slavonia）的穆斯林被德意志联军残忍驱逐，布达被攻占，接着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也被攻占。此时，奥地利军队已经向南深入到了贝尔格莱德。1684年，利奥波德甚至向沙皇派遣密使，邀请他参战。俄国人如期加入了反对土耳其的神圣同盟，并于1687年进入克里米亚。然而，奥地利人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遭到法国的进一步蚕食。同过去一样，双方针对普法尔茨和莱茵河谷地区的争夺又一次进入白热化阶段。1685年，路易十四借妻妹伊丽莎白·夏洛特（Elizabeth Charlotte）的名义，要求获得普法尔茨的部分地区。而此时，夏洛特的哥哥查理死后，其继承权争议还没有得到解决。在大部分德意志人看来，路易十四提出的这一要求，将会对德意志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胁。最终，利奥波德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拒绝接受法国的要求，这等于使自己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除此之外，1685年8月，勃兰登堡大选帝侯结束了同荷兰缔结的反法联盟。此前，在东方战场上，普鲁士人曾受到惨痛的教训，他们本来有可能在战场上击败瑞典，却眼睁睁看着瑞典人在法国的资助下重新高调地坐在谈判桌旁。因此，大选帝侯认为，如果普鲁士想要保卫波美拉尼亚地区，就必须在欧洲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者至少要参与牵制法国的

行动。路易十四善于拉拢其他国家，他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无人能及。但从长远来看，他因此所承受的痛苦也是最多的，他很难维持对自己有利的联盟。1686年7月，为了阻止法国继续扩张，瑞典、西班牙、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其他邦国最终联合起来，组成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即后人所说的“大同盟”（Grand Alliance）。

路易十四决定尽早派兵德意志纵身挺进，以防止奥地利把部署在匈牙利的军队抽调到西线。卢瓦侯爵告诉沃邦：“国王刚刚收到了土耳其军队战败的消息，因此国王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前推进防御工事，这有利于法国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1688年6月，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去世，路易十四不顾德意志人的反对，强行任命了一位新的、与法国交好的继任者。1688年9月末，路易十四派遣军队进入普法尔茨，再一次对该地区进行破坏，而他在德意志和欧洲也因此更加声名狼藉。路易十四手下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杜拉斯公爵（Duke of Duras）哀叹道：“摧毁沃尔姆斯和施派尔这样著名的城市，会让当地人感到极其痛苦；我不得不向国王指出，这场破坏将给他的声誉以及他在全世界的荣耀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月，勃兰登堡–普鲁士、不伦瑞克（Brunswick）、黑森和符腾堡（Württemberg）都承诺出兵支援奥兰治亲王威廉。此后不久，神圣罗马帝国向路易十四宣战。1689年5月，荷兰与利奥波德达成一致，决定联手对付法国，迫使法国退回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国界之内。不仅如此，荷兰还承诺，支持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主张，并支持其子约瑟夫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1690年1月，约瑟夫如期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被授权调动整个德意志的资源来牵制法国。1690年7月，西班牙加入反对法国的战争。同年10月，萨伏依也加入了战争。这是一场新的争夺对德意志和欧洲控制权的战争。

路易十四的野心和欲望极度膨胀，也导致法国内部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动。即使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荷兰各省仍没有太在意法国的威胁，威廉很难劝说所有人一致对付法国。例如，当路易十四进攻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要塞时，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Friesland）两省的议会却认为危险还很远，因此它们将自己的军队召回，甚至破坏荷兰执政调集军队的努力。而到了17世纪80年代末，即便是那些疑心最重的寡头政客也已明白必须反抗路易十四。因此，随着法国威胁的上升，荷兰执政与各省之间的僵局与分歧基本上是解决了。然而英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国王与贵族并不团结。英国人看到德意志的土地逐渐被法国蚕食，特别是辉格党人眼中“德意志新教堡垒”斯特拉斯堡的沦陷，使得很多人认为这种趋势将会影响到英国的自由。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反对国王的外交政策，达到了自17世纪60年代后的新高潮。甚至，一部分托利党人也改变了看法：以前他们反对荷兰甚于反对法国，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军与扩大殖民地，不愿意在欧洲大陆打昂贵的战争；而现在，他们为“德意志门户”的失守而哀叹。

对于外交政策的方向，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英国人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国王的作用很重要，有的人则表示反对。很多托

利党人支持打击路易十四，但他们又认为，应该加强国王的权力，以领导英国人对抗法国。查理二世也在尽力尝试消弭国内的分歧。例如，1680年10月的议会（人们都认为这届议会将会极其混乱）一开始，查理二世就指出：“国家内部的分歧可能会让英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大打折扣。”与托利党不同，辉格党人非常关注清教徒在国内的地位。根据一位评论人士的说法：“这些清教徒寻求的，不仅是迫使国王解除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还要让国王承诺，以后如再发生战争，需提前告知他们战争的意图是什么。不过，当时宣战权等事务还是取决于国王的个人意志，依然是国王的特权。”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然而，他公开支持天主教的做法被人认为是在向路易十四献媚。同年11月，他将议会解散，引发一片批评之声，议员和民众都对此持反对意见。詹姆斯二世及其御用文人认为，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恢复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但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强化君主专制和官僚统治。当时，国王想集中精力对付荷兰，辉格党人则认为法国才是主要威胁，而且应该扩大议会制政府的权力。17世纪80年代末，形势发展到了紧要关头。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出生，这个儿子信仰天主教。詹姆斯二世与第一任妻子有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不过她们都信仰新教；根据继承法，这个信仰天主教的儿子应比两个女儿有优先继承权。

然而，当时荷兰面临的最直接威胁还是路易十四对普法尔茨的入侵。由于战争迫在眉睫，奥兰治亲王威廉最终决定于1688年11月进攻英国。因为荷兰人相信，只有恢复英国的立宪制政府，才能使英国人加入抵抗路易十四的队伍，共同维护欧洲的自由。威廉认为自己是国际军队的首领；他在英国有一些支持者，如伯内特主教（Bishop Burnet）号召英国同胞不要畏首畏尾，要关心欧洲大陆政局，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宗教。他将英国人比作信奉新教的以色列人，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同样，正是不断恶化的欧洲政局让辉格党的贵族们确信，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奥兰治亲王威廉成为英国的“拯救者”，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辉格党人之所以抛弃詹姆斯二世，主要原因还是欧洲政局的变化，当时离詹姆斯二世信仰天主教的儿子继承王位的时间还差得很远。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迫逃跑，威廉从荷兰入主英国，被拥戴为新国王，即威廉三世。这场革命是当时国际体系的产物，其目的是恢复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路易十四最终没能阻止威廉的行动，因为直至最后关头，他还认为威廉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德意志。

1688～1697年，法国与众多中西欧国家之间爆发了九年战争。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欧洲的战争，其主要战场是佛兰德、莱茵兰–普法尔茨和意大利北部。战争期间，英国、荷兰以及其他帝国，纷纷将各类资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些地区。低地国家尤其成了必争之地，西班牙甚至把自己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这里。此外，与这场大战伴随的还有一系列地区冲突，比如1689～1691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进行的英国王位继承战争，以及土耳其战争等，所有的这些战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路易十四支持詹姆斯二世反对英国议会；威廉三世则紧追詹姆斯二世至爱尔兰，并在博因河（Boyne）和奥格里姆（Aughrim）大败詹姆斯二世的军队。此后，威廉向一位德意志的盟友致歉，表示自己“不得不到爱尔

兰”这个可能使他“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地方去；他还说，一旦击溃詹姆斯二世及其党羽，他就将返回低地国家和德意志，“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路易十四还煽动土耳其人向德意志施加压力。但荷兰和英国通过外交手段暂时稳住了土耳其，延缓了其军事行动，以使利奥波德一世能有更多的精力处理德意志事务。1692年，利奥波德一世任命乔治·路易为汉诺威选帝侯，这壮大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并且有利于继续对法国和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这也再一次证明，德意志帝国的内部结构与欧洲的整体局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九年战争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公共领域的发展。在英国、荷兰共和国和北美殖民地的议会，公共领域的发展最为蓬勃。在这些国家，政府要想参与某项军事行动，必须先说服广大政治参与者，以便使军费提案通过，为战争准备人力和财力资源。此时，伦敦出现了一家独立报社，满足了公众对欧洲大陆新闻不断增加的好奇心。在德意志，尽管公众意见对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并不强，但有文化的人也非常希望了解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事件。德意志作家卡斯帕·施皮勒（Kaspar Spieler）在1695年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讽刺：“他们急匆匆地奔向邮局和报刊亭，迫切地想要知道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皇或者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正在做些什么……实际上，这些事与他们自己联系不大，就好比他们想要知道月亮上到底住的是人还是神一样。”

九年战争引发了新一轮的、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包括资源开采、军事动员和官僚系统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异军突起，成为海上强国。16世纪末，荷兰开辟海上航道，并发展了超强的财政和军事组织能力，击败了拥有更多资源的腓力二世。17世纪90年代，英国人吸收了荷兰人的部分理念，建立了欧洲最为强大和“现代化”的国家。1694年，新的英格兰银行成立，承担政府债务的管理工作，同时，结构复杂的股票和金融市场也成立了。此外，东印度公司也成立了，这是一家半国有的机构。正是因为英国人有成熟的议会制政府，并在反对国内外暴政的问题上有广泛的政治共识，他们才能够有如此多的创举。1694年，威廉三世签署了议会通过的《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届议会。此外，审查制度的废除则使得人们拥有在议会内外谈论政治和贸易问题的自由。在整个17世纪90年代，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一直都是如何打好仗：辉格党支持威廉三世对欧洲大陆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托利党则更倾向于发展海洋战略，扩大殖民地范围。但在如下问题上，两党几乎没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应该阻止路易十四的侵略行动”，都认为“自由的人民需要一个强大、富强的国家来保护他们”。17世纪90年代，下议院宣布：“国家要为战争做必要的准备，但不能做有可能破坏宪政的事情。”最终，威廉三世和他的议会筹集到了大量的军费，以对抗路易十四，其中有至少1/3的钱是通过长期贷款的方式（而不是财政收入）筹集到的。从此，英国成为欧洲最为自由的一片土地，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与英国不同，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都选择了专制主义的道路，以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例如，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实施了“收回”政策，即

从贵族手中收回王室的土地——如此一来，国王的财政力量得到了大幅加强。另外，他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将军事和财政统一起来，该制度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与税收及兵役联系起来。该制度实施了数十年的时间，到17世纪末，瑞典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军费支出占国家总资产的比例，为全欧洲最高。在哈布斯堡王朝，利奥波德一世努力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他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与法国及土耳其交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匈牙利新获得的领土给他带来了改革的契机。可是，与英国的境况大不相同的是，利奥波德的债权人于1680年拒绝继续为他提供贷款，除非他答应对国内腐败的财政管理制度进行整顿。利奥波德没有和各邦国合作推进改革；从1681年开始，他试图单方面推行一个新的金融体系。8年后，利奥波德的顾问建议先将匈牙利作为改革的样板，在那里建立常备军、提高征税的额度，并安排移民来开发这片新的土地。德意志的一些中小邦国，也积极参加帝国的建设，以增强帝国的防御力量。然而，各国的国内改革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人们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距。许多欧洲人（甚至包括德意志人在内）都在不断试图逃避国家的登记、管制、培训、税收和兵役等政策。从中世纪起，匈牙利的贵族就享有这样一项特权：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公然反对王权。然而，利奥波德不仅没能成功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还被迫同意匈牙利继续运行自己独立且低效的财政政策。同样，查理十一世的政策也引来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贵族的公开反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在帕特库尔（Johan Patkul）伯爵的领导下，与波兰等国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甚至邀请这些国家来一同分割瑞典，以恢复自己的传统自由权利。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有的人支持集权，有的人支持采取代议制，双方争议尤为激烈。托利党人及英王任命的总督认为，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应该利用美洲来制约路易十四的力量。他们认为，尽管英国在美洲拥有大片土地，但都管理混乱，效率远远不及法属加拿大。法国人在那里有高效的军事管理制度，尽管他们人口少，但多数男性都在服兵役。而英属新英格兰则“分裂严重，各地区各自为政，政府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公众的利益”。这些人认为，只有建立集权制的殖民政府，才能有效调动当地的所有资源，增强英国在欧洲的实力，以抵御法国的进攻，并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不受法国侵犯。与托利党不同，多数辉格党移民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显得非常激进。他们认为，路易十四是“基督教的敌人”，他控制了德意志的教堂，“一直在蹂躏欧洲，是一个无比暴虐和狡诈的君主”。1686年，清教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布道中告诉人们：“风水轮流转，现在机会属于美利坚人民。”当时总督呼吁新英格兰的人民做好军事准备，但辉格党人却拒绝支持，他们指责这些计划是在秘密地剥夺人们的自由。辉格党人拒绝所有的集权式的改革计划，尤其是征兵制度，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将各新教殖民地联合起来。

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战争、动员和纵横捭阖之后，法国和“大同盟”双方都没能取得完全胜利。其间，路易十四在意大利、德意志和海上取得了巨大胜利。詹姆斯二世曾在爱尔兰登陆，试图恢复王位，但在

1691年被打败。当时，为了对付法国，英国几乎把全部兵力都部署在了德意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威廉三世也始终没能给法国致命一击。而此时的奥地利人正艰难地进行着东西两线作战。1690年，土耳其重新占领贝尔格莱德。在得到德意志各邦的大力支持后，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再次对土耳其发起进攻，但是德意志人依然忙于两线作战，无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此时双方的战斗陷入了僵局。1694年，法国军队入侵加泰罗尼亚，并于三年后占领巴塞罗那。尽管如此，路易十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尽管萨伏依公国的国王维克托·阿玛迪厄斯（Victor Amadeus）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盟友，但他是战局的风向标。1696年，萨伏依公国倒戈，与法国结盟。同时，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财政已经耗尽。战争双方都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以期结束战争。

1697年9月，双方签订《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战争宣告结束。路易十四竭尽全力，保住了斯特拉斯堡。虽然德意志各国诸侯和民众对此非常不满，但他们也没办法。巴登侯爵（Margrave of Baden）抱怨道："如果德意志不收回斯特拉斯堡及其防御工事，那么德意志的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但在其他方面，路易十四却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支持下，荷兰军队在西属尼德兰的要塞驻军，阻挡了法国通往低地国家的战略要地。对于德意志来说，在神圣罗马帝国多数公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依然是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支柱。为表彰乔治·路易在对抗法国和土耳其军队时所做的卓越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他为选帝侯。此外，路易十四表示承认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里斯维克和约》规定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属于法国，并规定法国拥有对新法兰西（即加拿大）和阿卡迪亚（Acadia）的控制权。不过，和约并没有过多涉及欧洲以外的领土划分问题，这说明各国主要关注的还是欧洲的力量均势。《里斯维克和约》的签订，正式确认了过去30年欧洲新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哈布斯堡王朝已经不再是欧洲各国的威胁，而路易十四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则成为各国最为担忧的问题。

北欧和东欧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也初步形成。1696年6月，扬·索别斯基去世，波兰复兴的努力也结束了。谁来继承王位，事关重大。同年，沙皇彼得一世微服出巡——他希望能够获得西欧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回国后更好地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此时，沙皇俄国刚刚摆脱与世隔绝的状态，向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共和国派遣了外交代表，不久又向英国和普鲁士派遣了大使。一个月后，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去世，查理十二世继承王位但尚且年幼。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大败土耳其，1699年，各国与土耳其签订《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大片土地割让给奥地利，包括匈牙利、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以及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波兰获得了波多利亚（Podolia）、卡梅尼采（Kamenice）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而俄国则得到了亚速海周边地区。

然而，就在欧洲迎来18世纪的曙光之前，发生了两件让人始料不及

的事情，中西欧、东北欧的两大国际关系体系几乎同时卷入了重大的危机之中。此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即卡洛斯二世）生命垂危，他愚蠢又无后，谁会接替他成为西班牙国王呢？欧洲各大国都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路易十四试图让自己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Philip of Anjou）来继承西班牙王位。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将会出现一个庞大的波旁帝国——包括法国、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西班牙海外殖民地以及西属尼德兰，这个帝国将比查理五世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还要强大和恐怖。利奥波德一世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企图让次子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两大分支重新统一起来，其他欧洲国家同样非常担忧。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对西班牙的土地进行分割。但在1699～1700年，许多方案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没能实现，各方无法妥协。1700年11月查理二世逝世时，各国依然没能达成一致。查理二世在遗嘱中明确表示：西班牙的领土不得分割，西班牙王位由法国王太子的次子安茹公爵继承；如果他拒绝，则由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

这给路易十四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这场斗争的胜者将获得西班牙的一切。1701年2月，在法国军队和顾问的护送下，安茹公爵在马德里继承王位，即腓力五世。但路易十四却并不打算把腓力排除在法国的王位继承人之外，也许将来腓力还可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扬扬得意地说道："这样比利牛斯山这一障碍就不复存在了。"同月，路易十四派军队进入西属尼德兰，将荷兰驻军驱逐。此时，对于法国的对手来说，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并非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不是西班牙本身，而是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如果法国的对手能够控制这些地方，同时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控制比利牛斯山以南，那么就可以形成对法国的包围。相反，如果路易十四控制了这些地方，那么英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将永无宁日。现在，法国军队占领了西属尼德兰，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自然会采取措施，以阻止法国的扩张。1701年9月初，英国、荷兰以及德意志帝国组成了新的大同盟以遏制路易十四。此后不久，詹姆斯二世在流亡途中去世，路易十四宣布承认其子詹姆斯三世为英国国王。1702年5月，法国正式对英国宣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18世纪欧洲的第一场战争，各大国争夺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在奥地利，利奥波德一世长子约瑟夫是主战派的代表，他决心彻底消除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他们还强烈希望将法国人赶出米兰——在利奥波德一世眼中，米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路易十四来说，米兰则是他进攻奥地利的行动中心。哈布斯堡王朝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其能够继承西班牙王位。奥地利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领导德意志各邦国对法国进行讨伐。1700年年底，为了感谢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他"普鲁士'里面的'国王"[2]的称号；1701年，腓特烈三世加冕为国王，称腓特烈一世。1702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式向法国宣战，巴登–巴登边区伯爵路德维希·威廉（Ludwig Wilhelm）担任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在莱茵地区的最高统帅，向法国发起猛烈进攻。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如巴登公

爵、汉诺威选帝侯）都也加入了反法联盟，只有两个诸侯是支持法国的：科隆选帝侯约瑟夫·克莱门斯（Joseph Clemens）和他的哥哥——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埃曼努埃尔（Maximilian II Emanuel）。

神圣罗马帝国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相对的，意大利、西班牙及海外殖民地是战争的次要战场。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向法国护航队发起进攻，按照英国海军部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切断法国军队赖以生存的资金和金属板的供给”。1703年，英国皇家海军认为有必要对西班牙属地哈瓦那发动突袭，这样有助于“重创波旁家族，以配合哈布斯堡王朝的行动”。1704年，路易十四试图调集自己的主力军队和驻守在巴伐利亚的分遣队袭击维也纳，给德意志致命一击。英国驻柏林公使发出警告：“可怜的德意志，现在似乎离毁灭不远了”。然而，同年8月，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在德意志南部地区遭到英荷联军的重创，这就是布伦海姆（Blenheim）之战，当时英荷联军的统帅正是马尔伯勒公爵。同年，一支英国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有效地封锁了地中海海域。1705年，利奥波德一世去世，约瑟夫一世继位，他被视作“德意志事业”的积极倡导者。1706年，奥地利——萨伏依军队将法国军队从意大利北部地区驱逐。查理大公仍然控制着他在西班牙获得的领土，而加泰罗尼亚和其他地区反对腓力五世的起义也对他起到了帮助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在德意志和佛兰德，英国、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还在对路易十四进行持续的打击。1706年，路易十四在拉米伊（Ramillies）战役中战败，而他在德意志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和科隆选帝侯，则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赶出了德意志。路易十四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当中欧、西欧和南欧正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争论不休时，北欧和东欧也因波兰和瑞典王位的继承问题而不得安宁。邻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潜在实力十分担忧，当然它们也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弱点。波兰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外部力量的介入，也使得波兰成为大国瓜分的对象。在扬·索别斯基统治时期，波兰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在17世纪末，它的领土迅速扩张，并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如果波兰能够成功进行改革，那么俄国和普鲁士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现在波兰处于混乱之中，但普鲁士和俄国是不会允许波兰落入敌国手里的。因此，1697年，彼得一世以对波开战威胁波兰贵族，要求他们选举来自法国的孔蒂亲王（Prince Conti）担任波兰国王。但最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击败孔蒂亲王成功当选国王，即奥古斯特二世。这是因为，奥古斯特向波兰贵族大量行贿，同时，波兰人也相信，奥古斯特最有希望带领波兰人从奥斯曼手中夺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tz-Podolsk）要塞。奥古斯特也确实不负众望，很快收复了该要塞。正如普鲁士“里面的”国王腓特烈一世所说，现在俄普两国的战略是，阻止萨克森人在波兰共和国建立专制统治。尤其是因为对于普鲁士来说，波兰——萨克森联盟是一个针对自己的包围圈，普鲁士将被迫两面受敌。换句话说，波兰的“自由”对于俄普两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真正将这片土地推进动乱深渊的是发生在瑞典的一个意外事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年轻而缺乏经验，邻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丹麦人打算利用查理十二世重建自己的波罗的海帝国，俄国人想要收回诺夫哥罗德（Novgorod），而新当选的波兰国王则意欲将波兰的疆域扩大到波罗的海的利沃尼亚。1699年9月，丹麦和波兰就瑞典问题签署了一份条约，两个月后俄国也加入。这一联盟的设计者是利沃尼亚的贵族约翰·帕特库利伯爵（Count Johan Patkul），他一直试图让自己和臣民摆脱瑞典国王的统治，因此选择了背叛瑞典。1700年8月，丹麦、波兰和俄国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开战。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新当选的瑞典国王竟是一位军事天才。1700年11月，查理十二世御驾亲征，在纳尔瓦战役中打败了俄国军队，这给了彼得一世的大国梦以沉重一击。甚至12个月后俄国驻维也纳的公使依然有种强烈的耻辱感，他说："奥地利人曾嘲笑我们……我们一定要争取再打一场胜仗，哪怕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以便能让沙皇名扬欧洲。"在接下来的4年里，查理十二世横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但也为后来他遭遇的一系列惨败埋下了伏笔。

最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大战是两场相互独立的战争。然而，1706年，这一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查理十二世的胜利在瑞典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军事辩论。有人认为，瑞典的头号敌人是俄国，因此瑞典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波罗的海的安全，这是瑞典的第一道防线。查理十二世的顾问尼尔斯·利勒罗斯（Nils Lillieroth）就持这一观点。如果这一地区失守，那么彼得一世必然会对瑞典的属地芬兰造成威胁，甚至最终威胁到瑞典本土。因此，预防性措施是必要的，甚至瑞典有必要占领普斯科夫（Pskow）附近的俄国土地，以扩大缓冲区。不过，查理十二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波兰——萨克森联盟才是瑞典的主要对手。他希望让自己欣赏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Stanislas Leszczyński）成为波兰国王。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给现任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以致命的一击，因此，1706年9月他下令直接进攻萨克森。查理十二世认为，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他代表西里西亚新教徒的利益，因此他有权让自己的军队在德意志的领土上肆意穿行。早在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时期，瑞典就将德意志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重心，这一点在查理十二世时期又一次体现出来。

1706年秋，查理十二世横扫中欧国家，反法大同盟陷入恐慌。1706年8月，马尔伯勒公爵在给荷兰首相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瑞典国王不是冲着匈牙利来的，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将会深陷困境。"马尔伯勒公爵认为，查理十二世将会破坏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削弱其对法作战的力量。德意志北部的一些邦国（如普鲁士和汉诺威）把军队派到了西边，现在它们担心自己的后方遭遇袭击。查理十二世的猛烈进攻很快就使得萨克森人投降：1706年10月，双方在萨克森签订《阿尔特兰施塔特条约》（Treaty of Altransädt），奥古斯特二世彻底投降，并放弃了波兰的王位。马尔伯勒公爵警告人们，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瑞典国王可能会"寻找借口进一步入侵德意志帝国"，这是他们"唯一需要担心和避免的"。为此，1707年，马尔伯勒公爵与查理十二世在阿尔特兰施塔特会面，并成功说服瑞典调转枪口，向东进攻俄国，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则在西里西亚的新教徒问题上做出了妥协。至此，德意志各公国及反法联盟国家都长舒了一口气。

北方大战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都不仅仅是军事和外交舞曲，而是殊死的搏斗。这两场战争的结果都事关生死——对于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的战士们来说如此，对于那些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中的平民百姓亦是如此。整个欧洲，无论是政府、反叛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生存的挣扎之中。法国人担心自己在北边、南边、东边和东南边被哈布斯堡王朝包围。路易十四对17世纪50年代的投石党运动记忆犹新，他不愿意让历史重演，更不愿回到16世纪末宗教战争的混乱时期。德意志的爱国人士试图夺回阿尔萨斯，至少防止法国进一步占领德意志的西部土地。很多中小型公国（如萨伏依）也参加了战争，它们不愿意自己被降级，甚至试图跻身一流公国的行列。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来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是欧洲权力平衡的核心，只有维护均势，他们的自由、财产和生命权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路易十四获得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绝对的欧洲霸主；一旦他控制西属尼德兰，那么就将对英国与荷兰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1701年6月，英国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述了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联："我是多么热爱和平，我认为真理（即新教和代议制政府）与和平是相伴而生的，但如果没有了自由，和平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欧洲均势遭到破坏，和平也难以获得保证。"

为了在恶劣环境下保持竞争力，欧洲各国试图通过行政、军事甚至宪政改革来提升本国的凝聚力。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对奥地利、波西米亚以及匈牙利旧的行政体制进行了精简——该体系冗杂且易于产生摩擦。约瑟夫一世设立了多个小型机构，代替了僵化的枢密院会议，每一个小型机构都负责特定的地理范围。他还大幅削减了枢密院的人数，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困难，同时可以改善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奥地利人很难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出色，很难在多个战区进行快速部署。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为了应对大同盟的威胁，他再次增加了国民的税赋。在九年战争期间以及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的时候，路易十四开始征收人头税——这是法国政府第一次向所有臣民直接征税。与传统的租税不同，每一个臣民，不论等级、地位，都要向国王缴纳人头税。几年后，路易十四又开始向臣民征收另一项直接税——什一税。这些新的税种加起来，占到整个国家税收的1/4。贵族们也是要缴纳这些税的，但与他们的总收入相比，这些税只是九牛一毛。如果他们能缴纳更多的税，那么法国的军事和外交实力将会大幅提升。不过，与哈布斯堡王朝一样，路易十四也必须十分谨慎，避免征税过重，避免与农民、公职人员、享有免税权的贵族以及其他的既得利益团体对立起来，因为整个国家最终还是要依靠这些人的力量。事实上，路易十四的权力不仅远远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在国内资源分配问题上，国王与贵族之间不得不相互妥协，这样也有利于法国在海外获得更大的荣誉。在北欧和东欧，北方大战的压力也对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99年，沙皇彼得一世解散了"射击军"（该禁卫军由火枪手组成，其权力过度膨胀但军事能力落后），只组建了一支常备军部队。

几年后，彼得沙皇设立了中央指挥部，并于1718年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

战略压力也促使某些欧洲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宪政改革。170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该法案确定安妮女王的继承人为詹姆斯一世的孙女——汉诺威选帝侯的索菲亚公主以及她的子嗣（必须为新教徒），并明确地将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这一法案的意义在于保障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不受斯图亚特王室的后代及其法国支持者的破坏。然而，苏格兰的爱丁堡议会非常不满威斯敏斯特议会没有事先询问其意见就通过该法案，并很快出台了自行制定的法案，该法案只规定苏格兰国王必须是新教徒，没有规定具体什么人有权继承王位。这就为斯图亚特王室复辟提供了可能，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仍然可以担任苏格兰国王。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英格兰与苏格兰分裂，甚至会导致法国联合苏格兰包围英格兰。一般来说，要想对抗法国，英格兰必须与苏格兰通力合作。如果双方分别制定自己的贸易和殖民政策，那么就会大大削弱英国抵抗法国的能力。不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精英达成了一致意见：无论英格兰与苏格兰存在怎样的分歧，都要争取团结，因为遏制路易十四才是第一要务。因此，1707年，英格兰国会和苏格兰国会分别通过法案，即《联合法案》（Act of Union）。法案规定：苏格兰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席位，并保留自己的法律和教育体制，但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外交和安全政策。联合王国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对付法国，正是这场战争促成了联合王国的诞生，双方联合一致，阻止路易十四建立天主教“世界帝国”的企图。贿赂、恐吓或者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都不能使联合王国有如此稳固的团结。

在西班牙，战争同样导致了巨大的宪政变革。最初，冲突似乎能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1705年10月，反法同盟军队占领巴塞罗那后，很多贵族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引发了叛乱。同年11月，这些贵族要求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腓力五世却认为，西班牙之所以在战争中表现不力，并不是因为国王与贵族们缺乏商讨，而是因为西班牙各个地区的不团结与相互猜忌。当时西班牙由很多王国构成，采取共主联邦制。1707年，腓力五世推动将卡斯提尔、阿拉贡两个王国合并，将阿拉贡、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起来。这样，在西班牙内部，只有纳瓦拉和巴斯克（Basque）两个省还保留着自治权，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体化。之前查理五世、腓力二世和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也想这样做，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但与英国不同的是，西班牙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是通过议会实现的，相反是以牺牲代议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在法国，战争的压力并没有扫清长期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因素。1706年，反法联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法国元帅旺多姆（Vendôme）对战局非常担忧，因此建议路易十四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以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从1614年起，三级会议就很少召开了）。然而，路易十四却拒绝了他的这一建议，他害怕一旦向民众让步，民众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此时，法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最高法院的法律功能的制约，它有权通过或驳回新的税收法令。

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80年代遭到灾难性的战略失败，这引发了其国内政治戏剧性的后果。1686年，布达落入神圣罗马帝国之手，引发了巨大震撼，并波及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新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穆罕默德四世的统治；而他的兄弟苏莱曼二世则取而代之成为苏丹；土耳其首相（又称大维齐尔）也被处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由于外交政策的判断失误，穆罕默德四世和詹姆斯二世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一直保持中立。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在维也纳和森塔（Zenta）遭遇惨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眼中，《卡尔洛夫奇条约》并不是自己与基督教欧洲和平共处的开始，而仅仅是一份休战协定，是奥斯曼帝国再次进攻前的喘息。他们以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人签订的“胡达比亚（hudabiya）协定”为启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神学上的正当理由。然而，这在国内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策；苏莱曼二世的继承人苏丹王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II）迁都埃迪尔内（Edirne）绝非偶然，他是为了尽可能地摆脱《卡尔洛夫奇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带给自己的困扰。1703年，君士坦丁堡的新军发动暴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叛乱的爆发是因为当地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例如延迟发放津贴——十分不满。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有很大不满。人们指责穆斯塔法二世慵懒腐败，不过人们最憎恨的是他向别国割让了大部分土地。之后，穆斯塔法二世被废黜，其弟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继任苏丹。

1707年，查理十二世撤出萨克森地区，这样中西欧的很多国家似乎可以避免同时遭遇两场战争的境地。1704年之后，反法大同盟希望能够乘胜追击，并最终使法国妥协。尽管反法联盟在德意志、佛兰德和波河流域（Po Valley）打败了路易十四，但联盟依然很难进攻法国本土以迫使其屈服。约瑟夫一世试图说服各诸侯，共同努力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建立“帝国堡垒”，防止法国进一步扩张。但多数诸侯没有支持这个想法。约瑟夫一世宣称，自己在意大利的战争是为了“帝国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很多诸侯却对他表示怀疑。早在1500年左右，类似的问题就曾困扰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使是之前曾对法国态度强硬的英国人和荷兰人，这次也没能与约瑟夫一世达成多少共识——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提出与路易十四和解。因此，战争陷入了僵局。1707年，查理大公在西班牙的阿尔曼萨（Almansa）遭遇惨败，引发了英国议会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一年后，反法联盟在佛兰德的奥德纳尔德（Oudenaarde）获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此时，双方都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和解。

此时，德意志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威胁，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颇为担忧。之前，勃兰登堡大选帝侯配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法国发动战争，因此获得了国王的称号。但是，仅仅几年之后，维也纳方面就开始对其感到担忧。因为没过多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野心就显露无遗：1702年，他试图取代威廉家族，兼任荷兰共和国的执政，不过这一企图没有成功。一年后，普鲁士人试图将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安斯巴赫

（An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据为己有，却遭到了奥地利控制的宫廷会议的阻挠。当时，普鲁士统治者还是小心翼翼、谨慎行事的。1705年5月，腓特烈一世在其第一份政治遗嘱中嘱咐其继承人：如果对外开战，务必“非常小心”，因为新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周边都是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充满嫉妒和敌意”。不过，维也纳方面并没有被普鲁士的假象所欺骗。约瑟夫一世的首相在1706年说道：“尽管法国实力非常强大，但法国对我们的威胁，比不上普鲁士的威胁……路易十四只是会侵略他的邻国，而一旦普鲁士背叛我们，那么他们将直接插入我们的心脏。”因此，此时与路易十四议和，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1709年5月，战争双方开始谈判。1710年冬天，谈判在荷兰海牙等地继续进行。在谈判中，双方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西班牙，而是德意志。为了释放某些善意，路易十四从伊比利亚半岛撤回了大部分军队，但他不同意反法联盟废黜腓力五世的要求。他表示，不排除以后可以劝说自己的孙子将西班牙的王位让给查理大公。对于领土要求，路易十四坚决拒绝做出让步。反法联盟要求路易十四从佛兰德的蒙斯（Mons）和那慕尔（Namur）两地撤离，拆除在莱茵河西岸所建立的所有要塞，并且将莱茵河畔的布赖萨赫交还给德意志帝国，同时将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和巴伐利亚选帝侯流放。路易十四坚决拒绝，因为答应这些条件就等于彻底破坏了自己和前辈的所有努力，导致法国在德意志的利益全部丧失。法国正是通过上述“门户”来对德意志施加影响的，一旦放弃这些地区，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从东边和北边进攻法国。因此，路易十四必须拒绝反法联盟提出的上述条件，战争不得不继续进行。

争夺领土和修建防御工事是制约路易十四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能改变法国政权的性质，后者或许有更重要的意义。反法联盟中的一些领导者开始认为，保卫英国和荷兰自由的最佳方式也许就在于促进欧洲人的自由，特别是促进法国人的自由。1706年，为了获得佛兰德的布拉班特的民众的支持，马尔伯勒公爵向他们保证，他将说服维也纳方面尊重民众享有的传统宪法权利。同年，一支有组织的英国两栖远征队向法国的吉耶纳（Guyenne）进发，并携带了反法联盟的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反法联盟支持促进法国人的自由，将支持法国恢复《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保证宗教宽容，并恢复召开已逐渐被废弃的三级会议。1709年6月，马尔伯勒公爵这样写道：如果可以的话，“大同盟将要求法国重新恢复三级会议，以共同管理国家，我相信如此一来，基督教国家获得和平、免遭侵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此时，反法联盟各国所考虑的并不是要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强加给法国，而是要恢复法国人所享有的传统自由，使法国人摆脱其国王的压迫。反法联盟希望，如果法国人民有了更多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宪法和财政制度来制约波旁王朝的扩张。

马尔伯勒公爵还引出了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悖论之一。他和很多人都认为，在某一个时期，如果宪法自由是英国强大的基础，那么一旦英国支持其他国家的自由（即使与英国式的自由不完全相同），就会增加自己的盟友，而不会壮大自己的对手。然而，事实上，“扩大法国民众的

政治参与就可以使法国变得和平”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反而可能会让法国民众更加支持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1709年6月，路易十四拒绝了反法联盟提出的要求，他通过各地的行政长官和主教，向民众解释了为什么法国还要继续进行战争。他说：“战争让众多忠诚的子民遭受不幸，我愿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确信，我的子民们会拒绝接受他们提出的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会拒绝接受损害法国人荣耀的一切条件。”法国国内所有教区的神职人员都向民众宣读了路易十四的这封信，人们纷纷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政策表示支持。

由于和平谈判暂时停滞，战争重新开始。1709年8月，法国挫败了反法联盟攻占巴塞尔的企图。一个月后，双方在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展开残酷而血腥的拉锯战。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英国民众和议会越来越质疑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性。1709年11月，托利党的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在威斯敏斯特的圣保罗大教堂进行布道，言辞激烈地反对政府，并很快引发了一场暴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是因为不少人不满意政府的外交政策。暴徒高喊着“支持萨谢弗雷尔、支持和平”的口号，袭击异议者所在的教堂，并试图扰乱英格兰银行。紧接着，前线也传来了坏消息。1710年，英国派往西班牙的远征军在布里韦加（Brihuega）被击溃，而奥地利的援军则在比利亚维西奥萨（Villa Viciosa）遭遇惨败。一年后，法国军队进一步向伊比利亚半岛深处进发。安妮女王对辉格党政府的欧洲大陆战争政策非常不信任，因此宣布罢免了所有大臣的职务，责成托利党人组建一个新内阁。新内阁的战争政策不再以欧洲大陆为重点，而是以海洋和殖民地为重点。此后不久，辉格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他们的大战略已经失去了信心。

1711年4月中旬，约瑟夫一世皇帝猝然离世，身后无子。6个月后，他的弟弟查理大公继承皇位，即查理六世。查理六世本来正在率领反法联盟军队在西班牙作战，以夺取西班牙王位，现在他急忙撤出伊比利亚半岛，以保证自己顺利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此时，查理六世有可能会重建当年查理五世的辉煌。英国的政策显得举棋不定。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认为：“如果查理六世同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主宰，那么战争的体系就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不过，辉格党仍然认为法国的力量过于强大，法国才是英国的敌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强大起来，才能平衡法国的力量。但是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英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继续与欧洲大陆国家作战。国会上议院要求重新任命将军，1711年12月，马尔伯勒公爵被罢免职务。当时英国在佛兰德的人力和物力已经几乎耗竭，资源被转移到了北美战场，但1711年英国远征队在与魁北克作战时还是遭遇惨败。1712年年初，英国基本停止了在欧洲的军事行动。此时，其他交战国也都精疲力竭。对于荷兰人来说，法国的力量终于得到了遏制，因此也想结束战争。只有查理六世还想继续进行战争，他希望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最终，1713年4月，英、荷与法国签订《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1714年3月，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签订《拉什塔特和约》（Treaty of Rastatt）。战争基本结束，但和平断断续续遭到破坏。

欧洲其他大国试图通过《乌德勒支和约》来遏制法国。德意志帝国收回了重镇凯尔（Kehl），将法国军队挡在了莱茵河的另一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属尼德兰重新由奥地利控制，这样法国的活动受到了直接的限制。1714年，英国安妮女王逝世，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德维格继任，成为新的英国国王，即乔治一世。此前，英国和荷兰明确承诺，要共同保卫要塞，以防止法国的进攻。“恐法”的英国新国王同意与荷兰合作，兑现英国之前的承诺。乔治一世能担任英国国王非常偶然，荷兰给他帮过不少忙。此时英国和汉诺威是由同一个君主来统治，这样就等于说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因此它有责任保卫德意志北部的安全。因此，英国的宪政自由就与欧洲各国的均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失去了很多位于意大利的领土，现在只剩下了伦巴第。萨伏依公国依然保持独立地位，成为路易十四的领土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之间的缓冲地。萨伏依公国失去了伦巴第，为此感到失望，但根据《乌得勒支和约》它又获得了西西里作为补偿（后来和约又做了修改，将撒丁岛交给萨伏依公国）。英国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对出入地中海的航道进行了严格控制，严重削弱了法国在地中海西部海域的优势地位。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更具战略意义的梅诺岛，这里不但能阻断法军的资源供给，还能够监视法国海军驻扎在土伦（Toulon）的舰队的动向。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国决定正式承认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并抛弃曾经支持自己的加泰罗尼亚盟国，但它要求腓力五世必须放弃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西班牙和法国以后不得合并。

在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的过程中，英国非常关注贸易和海外领地的问题。这是因为，二者不仅仅有经济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英国获得了整个纽芬兰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并得到了这两个地区的渔场——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训练场地。另外，英国还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阿西恩托（Asiento），垄断了南美地区的贸易，尤其是奴隶买卖市场。后来，这些业务交由英国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负责，该公司由托利党于1711年创立，托利党试图以此与辉格党控制的英格兰银行及东印度公司相抗衡。该公司不仅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个人利益，还为政府借款筹措资金，以支持政府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自此，奴隶贸易和欧洲的权力均势二者之间产生了直接关联。西属尼德兰交由奥地利而非荷兰控制，但荷兰获得了一些专属贸易特权；为了维持阿姆斯特丹在地缘上的优势地位，荷兰人依然对斯凯尔特河（River Scheldt）实施禁航，因此，荷兰人在经济方面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的，这些经济收益为荷兰人派兵驻守要塞提供了帮助。同样，英国外交大臣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也在寻求与法国签署贸易条约的机会，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金钱上的收益或者从波旁王朝获得什么“帮助”，而是因为他认为英国只有在开放的经济竞争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一来，对荷兰和英国来说，欧洲的贸易发展与战略均势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1700～1701年，路易十四曾经有美好的愿望，但后来他接连遭遇失败，愿望难以实现。他虽然攻占了魁北克，但依然无法参加西班牙的殖民贸易，无法以此获取暴利。他还被迫将英国的“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

德华·斯图亚特（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从巴黎郊区的圣日耳曼流放到洛林。敦刻尔克的要塞曾是法国向英国发动进攻的重要基地，法国的私掠者也屡次在这里对英荷船队进行袭击，但这里很快就要被拆除了。路易十四还曾希望巴伐利亚选帝侯能用自己家族的世袭财产，来向他换取更为富庶的西属尼德兰，然而这一愿望也破灭了。不过，尽管如此，此时的法国已经摆脱了被其他强国包围的局面，200年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了。从此，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国家成为法国的友好邻邦，路易十四心满意足。西班牙将尼德兰交给奥地利，这样西班牙就不可能从南北两侧同时对法国施压。目前德意志尚未统一，因此法国东部国界尚未确定，那里依然有一片真空地带。查理六世也感到有些失望，他曾经想用偏僻的西属尼德兰换取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巴伐利亚，但没有成功；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土地，但海上强国却利用其优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限制；此外，他仍将自己视作合法的西班牙国王。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还是今非昔比，它得到了西班牙本土以外的绝大部分领土——包括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岛屿。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乌得勒支和约》只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而无法解决未来的问题。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路易十五即位。至此，法国不再实行扩张政策，因此，《乌得勒支和约》遏制法国的这一主要初衷就显得多余了。路易十五亲政之前，摄政大臣没有对外执行强硬的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延续了20年左右，法国只是被动地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反应。英国的“王位觊觎者”詹姆斯三世已经失去了法国的支持，他被驱逐到了阿维尼翁（Avignon），后来又被赶到了“阿尔卑斯山南边”的罗马。此时，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真正推动力来自较为边缘的地方。此刻，北方大战依然没有结束，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德意志北部都处于战争状态。1709年，彼得一世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战役中出人意料但又决定性地打败了查理十二世：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大国在东欧的崛起，其对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平衡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年，德意志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写道：“从此，整个欧洲都将把目光投向沙皇，他将在欧洲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很多人说，沙皇将成为欧洲大陆的一股可怕力量，俄国人就好比是来自北方的‘土耳其人’。”

沙皇的主要目标是要将瑞典军队从德意志北部地区赶出去，在那里站稳脚跟，并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获得选举权和发言权。这意味着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遗产将被最终摧毁，瑞典将遭受致命一击。1711年，彼得一世在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的波美拉尼亚港口包围瑞典驻军，他的儿子迎娶了不伦瑞克–沃尔芬布特尔（BrunswickWolfenbüttel）公爵的女儿。一年后，瑞典军队入侵梅克伦堡公国，冲突进一步波及德意志北部海岸，俄国军队在那里对瑞典军队进行反击。1715年5月，奥地利枢密院会议发出警告，称“这场战争将很快使整个德意志帝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716年4月，彼得一世与梅克伦堡公国的卡尔·利奥波德（Karl Leopold）结盟，并将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他。俄国通过联姻方式，

将自己的联盟网络覆盖到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一年后，彼得一世与中国清朝签订条约，就西伯利亚的边界问题达成一致，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瑞典。为了能够适时向瑞典发动进攻，俄国调集大量军队驻扎哥本哈根，另外一部分军队则驻扎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此刻，俄国军队有能力横扫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彻底击败瑞典并颠覆德意志，这样整个欧洲的均势就被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战局的变化，包括瑞典的老朋友法国、波罗的海地区贸易霸主荷兰、把波罗的海当作重要海军补给品来源的英国，当然还有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包括汉诺威（汉诺威选帝侯自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在内的所有德意志公国。

沙皇俄国的野心不仅威胁到众多德意志公国的安全，也会破坏它们的“自由”。卡尔·利奥波德公爵希望从沙皇那里得到支持，目的是对梅克伦堡公国内部的一些贵族进行残酷镇压。这些贵族不满利奥波德公爵的残暴行径，1719年，德意志帝国议会决定对卡尔·利奥波德公爵进行讨伐，并由汉诺威公国来领导这一军事行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布公告，称卡尔·利奥波德公爵企图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剥夺其公国的人民“长久以来享有的特权、自由和权利”，目的就在于迫使他们成为“专制的奴隶”。很快，在瓦尔德米赫伦战役中，利奥波德的军队和他的俄国援军被打败。9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又一次进行了干预。利奥波德被指控破坏地方法庭、颁布“血腥的法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法令，指控利奥波德公爵对大量臣民进行生理虐待，其中还附有一张公爵对地方官严刑拷打的图片。人们纷纷谴责利奥波德的“专制统治”，担心他的残忍行为会引起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骚乱。帝国法令警告说，利奥波德的暴行“也许会使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卷入危险的混乱之中”。特别要提的一点是，这场冲突为沙皇提供了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尽管各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存在分歧，并经常因此引发战争，但此时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各国的深层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很多国家认为，只有管理有序、政治安定的邻邦才是好的邻邦。

面对众多欧洲国家的联合抵御，彼得一世不得不从北德意志撤军，并表示愿意议和。1721年，各方签订了《尼斯塔德条约》（Treaty of Nystad），北方大战结束。对于瑞典来说，该条约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瑞典失去了在波罗的海东海岸的全部防线，包括利夫兰、爱沙尼亚以及芬兰省的卡累利阿（Karelia）。在德意志，瑞典将不来梅和韦尔登割让给了汉诺威公国，但仍控制着西波美拉尼亚。换言之，其他国家不太可能从南边进攻瑞典，并且从理论上讲，它仍然能够对德意志的事务施加一定影响。但事实上，瑞典的大国之路已经终结，它失去了对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

北方大战也对波兰的地位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尽管一开始并不显著。波兰贵族施拉赫塔（Szlachta）既是一个好战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共和制度的支持者，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外战争。与英国和瑞典的议会不同，波兰议会并不是民众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是用来制约萨克森国王野心的平台，因此波兰议会不会支持发动任何对外军事行动。由于议会拒绝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捍卫波兰独立的

希望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此时，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希望让自己所属的韦廷（Wettin）家族长期控制波兰的王位，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他的目的，第一是要削弱贵族的力量（传统上贵族拥有选举波兰国王的权利），第二是打击外来力量的干预（很久以来外部力量经常利用波兰宪法来干预国王的选举）。因此，俄国和普鲁士必然会想办法阻止奥古斯特二世。1720年2月，彼得一世与普鲁士结盟，双方均表示要捍卫波兰宪法，反对奥古斯特二世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一个月后，奥古斯特二世不得不表示屈服，并告知奥地利、英国和瑞典，他放弃了改革计划，愿意接受俄国的监督。这样，俄国人可以用各种办法来颠覆波兰–立陶宛联邦，他们支持波兰的宗教异见者，并且拉拢波兰的某些公国来反对另一些公国，以制造联邦内部的矛盾。在波兰人心中，不仅应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小的公国的权利，还应该保卫国家不受欺负。

《乌得勒支和约》也没能解决大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争夺，意大利问题依然非常棘手。战后，西班牙的国力有所增强，一是因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合并，国家实现了一体化，二是因为1707～1715年腓力五世在其法国顾问的帮助下进行了政府改革。尽管西班牙失去了尼德兰，但也因此减轻了防务负担，并且西班牙的舰队与陆军依然非常强大，实力不减当年。在首相阿尔韦罗尼（Giulio Alberoni）枢机主教的怂恿下，腓力五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打算利用西班牙的现有优势，来尽可能多地夺回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土地，以便让自己的儿子将来继承那里的统治权。此外，腓力五世宣称自己依然有权继承法国的王位，这显然是在企图破坏《乌德勒支和约》。面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波罗的海和德意志问题上已经合作过的英法两国走得更近了，1716年两国正式结盟。不过，这却没能使腓力五世打消之前的念头—1717年7月，他夺回了曾经属于西班牙的撒丁岛，并于一年后入侵西西里岛，赶走了奥地利的卫戍部队。毋庸置疑，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不勒斯。腓力五世的侵略行为对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半岛的地位产生了威胁，一旦西班牙称霸地中海，那么其他国家将遭受重大损失。1718年10月，在英国正式宣战前夕，英国皇家海军先发制人，在西西里岛的帕塞罗角（Cape Passaro）附近突袭并全歼西班牙舰队。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不勒斯，也是为了消除西班牙海军的威胁。

此后不久，英国、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组成四国同盟，共同遏制腓力五世。1719年1月，英法同时与西班牙开战，数月后法国进攻西班牙北部地区。英国皇家海军袭击了加利西亚（Galicia），并将所有西班牙船只都赶出了西地中海地区。为了报复，1719年4月，腓力五世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在苏格兰的造反行为。然而不久他就难以支撑了，被迫将阿尔韦罗尼枢机主教免职，囚禁自己的妻子，并向四国同盟妥协。签订和约时，西班牙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所有领土。在这场冲突中，只有萨伏依和奥地利是受益方——二者相互交换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所有权，这样双方都获得了更易于控制的领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乌得勒支和约》对维护战后秩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而问题在于：对于维护欧洲均势来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是比

法国更大的威胁。1699年，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的剩余领土，1714年又获得了奥属尼德兰、米兰和那不勒斯；《帕萨罗维茨条约》（Treaty of Passarowitz）的签订结束了1716~1718年的奥土战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获得贝尔格莱德、巴纳特（Banat）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部分地区。此时，奥地利甚至计划放弃难以保护的撒丁岛，以换取西西里岛，目的是保护那不勒斯，以便进一步增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1720年是哈布斯堡王朝扩张的顶峰时期，很多人认为，此时想建立“世界帝国”的不是法国，而是奥地利。查理六世是好战分子，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他依然没有忘记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甚至想重建查理五世时期的辉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各方担忧的是法国，现在担忧的则是奥地利。查理六世还强化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并在一系列激烈的宗教冲突中站在天主教一边。

对于乔治一世和英国政府来说，奥地利的野心不仅危害到汉诺威的土地和德意志的新教，还对整个欧洲平衡的基础——德意志帝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英国国务大臣查理·汤森（Charles Townsend）担心，由于奥地利人认为自己“能力远超其他人”，因此希望“不受任何国家干预，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这个世界”。此时，法国的摄政王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奥地利在尼德兰的势力对法国构成的威胁，并试图解决各种飞地问题，免得使欧洲各国的边境变得复杂。总之，法国人决定削减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拥有的资源。18世纪初，法国外交家们曾不断警告人们：德意志有数量庞大的“天然士兵”。法国外交大臣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膨胀”深感焦虑。1718年3月，他强调“保护德意志各邦国的权利和自由，是防止法国在德意志建立专制主义的唯一办法”。1719年，英国和汉诺威对普法尔茨进行干涉，法国表示支持。法国表示支持普法尔茨的新教徒的权利，支持他们反对天主教的政府，而最终目的是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25年，法国和英国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世界帝国”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这次危机源于法国王室的婚姻问题。路易十五希望尽早确立王嗣，以巩固法国国王的权力。他打消了迎娶年仅7岁的西班牙公主的念头，转而决定迎娶已经下台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女儿玛丽亚·莱什琴斯卡（Maria Leszczyńska）。腓力五世及王后伊丽莎白认为，路易十五的行为对他们是一种公开侮辱，因此试图与自己曾经恨之入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拉近关系。5月，奥地利和西班牙结盟，这对欧洲的整体均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查理六世保证，不会阻碍西班牙收回直布罗陀海峡和梅诺卡岛，由于妻子伊丽莎白的关系，他还同意腓力五世的长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拥有意大利的某些公国。就其本身而言，西班牙还授予了刚建立的奥地利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以贸易特权——几年前，该公司曾试图进入殖民地的市场，以赚取大钱。如果这些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论一下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与一位西班牙诸侯的联姻经历，当然这最后并未成功。

如果奥地利和西班牙结盟，那么英国和法国就将要面对一个庞大的集团，其势力从英吉利海峡的佛兰德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最南端，从西里西亚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和直布罗陀海峡。汤森发出警告："如果奥地利的某些土地也成为西班牙广阔领土的一部分，一个崭新的国家将会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新的威胁，这个庞大帝国将会比查理五世时期的西班牙更加可怕"。更糟糕的是，奥地利夺取德意志的野心将得到西班牙新世界公司（Spanish New World）提供的黄金资助，甚至还有奥斯坦德公司的资助——这一问题更让法国和英国担心。现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了共鸣，它们都担心德意志被一个强大的帝国所"控制"，害怕出现一个"绝对"权力。一位法国外交家抱怨道：现在的情况比1648年之前还要糟糕。因此，1725年9月，英国和法国签订《汉诺威条约》（Treaty of Hanover），组成防御同盟，以制约奥地利和西班牙。

由于此时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对付奥地利和西班牙，俄国企图趁机再次全面控制波罗的海。1725~1726年，俄国首相奥斯特曼伯爵（Count Ostermann）在备忘录中说：这些计划的核心是要与奥地利结盟，"神圣罗马帝国不仅能帮俄国对抗瑞典、土耳其和波兰，还能打消其他国家进攻俄国的念头"。1726年8月初，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最终撕掉伪装，加入了《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为了防止波兰的兼并，俄国军队率先占领了库尔兰（Courland），防止其被波兰吞并。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俄国的计划不仅威胁到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罗的海（那里是两国海军供给的重要来源），还可能让彼得一世当年企图占领德意志北部以至整个德意志的计划死灰复燃。两国试图威胁要进攻俄国西部边境，但效果不佳，没有对俄国起到威慑作用。英国皇家海军派遣了一支舰队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并说服瑞典加入了汉诺威同盟。与此同时，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试图拉拢土耳其政府，从南面进攻俄国。按照汤森的说法，这一计划是为了"让女沙皇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这一边，这样她就不太可能继续给欧洲各国找麻烦了"——这一说法完美地阐释了欧洲均势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联。

1725~1727年，从波罗的海地区到黑海，从英吉利海峡到伊比里亚半岛，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僵局之中。西班牙试图包围直布罗陀海峡，尽管它感到力不从心。不过，整个欧洲的战略重点还是德意志帝国，其中包括佛兰德，查理六世已经威胁到了汉诺威，更确切地说，他可以在佛兰德调集资源，以此作为基地直接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威胁。这也就是英国海军一直要集中精力攻击西班牙的银色舰队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残酷的劫掠，更是一种战略，目的是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获得财富，削弱其在中欧的权力地位。这也是英法联军在德意志集结大量军队的原因，这里是遏制查理六世的最有利的位置。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纠纷，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冲突。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场对抗中有两大力量：代议制国家与绝对主义国家。英国与荷兰议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西班牙——奥地利轴心的威胁，而西奥两国在国内奉行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压制本国代议机构的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欧洲分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自由"国家，

另一边则是“专制”国家。英国和荷兰的时事评论者早就开始使用这两个词了，而从17世纪末开始，这两个词在中欧国家的公共领域中出现得更为频繁。从18世纪初到中叶，德意志帝国中读报者的数量，从25万增长到了50万。有些批评性文章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不愿接受“秘密政治”，而是要求政务透明。在讽刺诗、布道词、期刊和“政治谈话”中，人们要求德意志的统治者们（特别是皇帝）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外交政策上的责任，这是“帝国”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这说明，德意志人对于国家的关心，已不仅仅限于德意志本国的政治，还包括对整个欧洲的均势问题的关注——这正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所系。正如《和平信使》（*Friedens-Courier*）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能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即使他自己不想去读书读报，至少也会时不时问问他的邻居，外面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这些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创办的，但这并不表示德意志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最终，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奥地利，都无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长期维持与英法同盟的对抗。叶卡捷琳娜一世并不希望在波罗的海海域遭遇英国皇家海军，而奥斯曼土耳其则拒绝攻打俄国。唯一一场交火发生在直布罗陀海峡外的公海上，交战双方是英国和西班牙。最终这场战争还是通过外交和威慑得以避免。

哈布斯堡集团固然很强大，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但它本身又是十分脆弱的。很明显的是，查理六世不太可能有男性子嗣了——这不仅会导致王位继承权的争议，还为邻国在他死后干预其国家提供了可能。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查理六世在1713年4月的“国事诏书”中规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必须完整地进行传承，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应该是查理六世的子女，而后才是他的长兄——已经病亡的约瑟夫一世的子女。这样，自1717年5月起，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娅·特蕾莎应该成为继承人。不过，查理六世心里却并不安稳，因为他明白，虽然约瑟夫一世的两个女婿——巴伐利亚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已经以自己妻子的名义宣布放弃一切应得的权利，但一旦时机出现，他们很可能会试图夺回这些权利。因此，为了确保皇位的顺利继承，他设立了代议机构。1722年年中，他还说服了匈牙利人与他合作。作为回报，他承认匈牙利人享有某些特权。之后，查理六世试图与其他强国缓和关系，以避免死后出现麻烦。1725年奥地利与西班牙签订条约，1726年与俄国签订条约，1731年与英国签订条约，1732年与德意志签订条约。与此同时，查理六世常常被迫做出让步。例如，为了回报巴伐利亚在1716年奥土战争中向奥地利提供军事支援，查理六世同意将约瑟夫一世的一个女儿嫁给巴伐利亚人。尽管查理六世试图避免自己死后出现麻烦，但效果并不佳，其他欧洲强国已经看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弱点，企图为自己谋利。

对于法国来说，更是如此。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18世纪30年代，法国试图重新在欧洲舞台上发挥作用。1729年，一个王子出生并被立为王嗣，这使法国人认

为自己的国家非常稳定，他们变得更加积极起来。而另一方面，由于英法同盟对法国的帮助越来越小，法国人开始感到失望，同时英法在贸易政策以及对德政策上分歧也越来越大。法国已经开始在敦刻尔克周围对港口设施进行秘密重建，并大量投资海军建设。法国的经济增速惊人，其殖民地的扩张也异常迅速，其中在美洲最为明显。但法国对外政策中主要关注的还是奥地利不断增长的实力。正如一名法国外交部官员在1729年所说的："奥地利实力的增强将迫使德意志帝国变成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拥有对全体德意志人的绝对权力，并且将会打破欧洲的均势。"

欧洲其他国家本来并未意识到法国权力的增长。荷兰共和国内部存在问题，并且贸易能力下降，因此无法与其他国家协调应对法国。奥地利希望制约法国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势力，而佛兰德成了奥地利的软肋，它担心一旦开战，自己的防务压力将大大增加。低地国家对英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这里却无法对英国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同时，尽管法国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国家，但其经济发展迅速。英国感到震惊，因此不得不决定与查理六世握手言和，恢复以前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抗衡的政策。1731年，英国加入《维也纳条约》，与奥地利结盟，表示支持查理六世颁布的"国事诏书"。得到英国的支持后，查理六世认为，现在它有能力要求德意志议会批准其"国事诏书"。1731年，各选帝侯进行投票，结果以六票同意、三票反对通过了"诏书"。

英国的政策并没有有效遏制法国，反而让其更加坚持要打败奥地利。1733年，法国与西班牙波旁王朝缔结《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这标志着法国将要与西班牙合作，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不过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共同阵线，以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权为借口来打压哈布斯堡王朝。不过，此时最要紧的是要阻止查理六世控制整个德意志。在此之前，法国要做的是解决波兰的王位继承权问题。自1733年2月初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去世后，波兰王位继承权成为欧洲的头等大事。法国推举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再次成为波兰国王，他曾在北方战争期间短暂担任国王，并且他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路易十五。斯坦尼斯瓦夫备受瞩目，如果是自由选举，波兰贵族一定会拥护此人为国王。但事实上，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们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未来。1733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体系深陷危机。在俄国人看来，一旦波兰出现一位改革派的国王，那么混乱的波兰将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这并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对于奥地利来说，一旦法国人实现其计划，那么奥地利将夹在法国与波兰中间，斯坦尼斯瓦夫将与其女婿路易十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当法国人试图说服土耳其首相支持斯坦尼斯瓦夫时，奥地利更加感到担心了。因此，奥地利和俄国希望依然让萨克森选帝侯来兼任波兰国王，以维持现状，挫败法国的计划。这件事关乎哈布斯堡王朝未来的命运，以及它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

因此，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基本上并不在波兰本土进行这一点不足为奇。1733年9月，波兰议会选举斯坦尼斯瓦夫为波兰国王。不久战争开

始，一边是奥地利与俄国，另一边是法国与西班牙。但是，法国帮不上斯坦尼斯瓦夫什么忙，他在波兰的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战争主要是在波兰的西边进行。由于法国曾经与荷兰签订条约，因此战争期间奥属尼德兰保持中立，没有与法国发生战争。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所有属地均遭到了攻击：战争刚一开始，洛林就被法国顺利拿下；1733年10月，意大利北部遭到了法国——撒丁联军的进攻；1734年2月，那不勒斯遭到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而德意志本身也遭到了法国的进攻，尽管1734年4月德意志各邦已经成功说服皇帝向法国宣战。面对嚣张的法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陷入了困境。尽管英国曾加入《维也纳条约》，但此时它断然拒绝向奥地利提供任何帮助。最后，还是俄国人出手救了奥地利，使其没有输得更惨。俄国士兵行军1 000多公里，于1735年8月抵达普法尔茨。1735年10月，查理六世被迫议和。和约规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交给波旁王朝的唐·卡洛斯来统治，但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国王不得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同意由萨克森选帝侯来兼任波兰国王；作为交换，斯坦尼斯瓦夫被封为洛林公爵——这也就意味着，在他去世后，洛林将直接成为法国的领土。因此，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

18世纪初出现了持续的全球性动乱，这促使欧洲各国继续巩固国内的团结，并汲取更多的资源，以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例如，1715年，哈布斯堡家族劝说匈牙利人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常备军。一年后，奥地利枢密院成立财政事务部，以提高奥地利的财政协调水平。此后不久，有人向皇帝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应该进行适度的裁军，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不过当时没有人听取这个建议。哈布斯堡王朝并没能将各个省份统一起来，也没有将各省的代议机构统一起来，因此无法建立起共同防御体系。根本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只存在各个省自己的利益。奥地利的很多属地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与安全，而不为奥地利的整体防务做出贡献。只有波西米亚为奥地利的整体防御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与奥地利稍有不同，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贵族失去了免税权，国王直接向贵族征税，并且取消了贵族的很多特权。但国王并没有做得太过分，以免破坏脆弱的国内共识。1733年，法国政府再次收取什一税，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募集资金。但迫于贵族和教士们的压力，国王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取消了这项税赋，因此，之后法国政府的收入大大减少，这种情况在整个18世纪曾反复出现。长期受到国王压制的最高法院，声称自己有权批准新的税收项目。在18世纪的多数时间，尽管奥地利和法国实力强大，但内部矛盾重重，国家的管理遇到了各种困难。

俄国也希望通过国内改革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彼得一世并没有将西欧和中欧的政治规范（如协商和“自由”）带到俄国。俄国看到了波兰的混乱，因此吸取了教训，决定放弃让俄国走向自由化的尝试。彼得一世所理解的“西方化”，并非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专制国家，以实现经济增长，并有效开发资源”。事实上，俄国社会与政府关注的是如何增强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这样，贵族们的特权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就产生了直接关联。1722年，政府制定了一

套“等级表”，清楚地确定了贵族的各等级，以及军队和行政官僚的各等级，并且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回报，政府允许贵族以任何方式剥削农奴。用今天的话说，18世纪初的俄国尽管不自由，但它是由精英阶层来领导的。从经济上看，沙皇的政策是失败的。尽管俄国仍然是欧洲最为富有的国家，但它人口基数大，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俄国的人均财富依然很低，经济发展状况也很落后。尽管如此，沙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还是很成功的。俄国的常备军数量庞大，有十多万人，因此这为俄国日后争夺欧洲霸权奠定了基础。由于人口数量庞大，俄国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及时获得人员补给。

与其他欧洲大国不同，普鲁士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水平。17世纪，普鲁士国王同意贵族采取农奴制，但作为交换，贵族一般不参与制定税收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后，贵族多次提出，要求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并不同意。他警告贵族，表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稳定国家的主权”。在此后的20年中，他实施了多项政府改革措施，以提高政府效率，并于1722年建立最高行政机构——最高总管理处。在接下来的10年里，腓特烈·威廉一世建立了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农奴编入特定的建制和区域。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真正的“军事——土地综合体”诞生了，贵族成为国家公务员和军官，而农奴则负责耕种以及充当普通士兵。他还建立了一个国家粮仓体系，旨在为军队提供补给，同时防备饥荒的出现。这样，民众的福利就与其战争义务密切相关。这一高效的体制确保了国家有充足的兵员，也帮助腓特烈·威廉一世减少了对雇佣兵的依赖：军队中2/3的士兵是普鲁士本国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不过，即使是在普鲁士，也有一些无所事事的懒人，因为在普鲁士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城镇人）由于某种原因是可以免服兵役的。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潜力依然尚未展示出来。

多数国家的改革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专制主义是最好的指导思想，不仅最有利于管理国内事务，也最有助于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这种思想认为，议会制和社团制都会导致国家的腐败与混乱，并且无法有效保卫国家的安全。基于这个理念，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的“改革派”试图限制议会的权力，呼吁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府，以抵御外部强权的进攻。相反，一些“爱国者”却主张，只有恢复贵族民主制（即所谓的“黄金自由”）才能防止外部国家控制波兰。在瑞典，为了减少外部干涉，国王在1723年试图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但没能成功。荷兰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得荷兰元气大伤，因此陷入了长期的衰落。1716~1717年，荷兰共和国大议长西蒙·凡·斯林格兰特（Simon van Slingelandt）在国家议会上号召对荷兰政府以及决策机制进行改革。他特别强调，中央政府有权立法并通过税收政策，无须再由各省议会进行批准。然而斯林格兰特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各省认为法国已经不再是荷兰的威胁，因此各省不愿放弃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对半世袭的执政制度非常反感，它们将中央集权制看作执政制度的复辟。此时的荷兰共和国已经衰落，它无法成为大国争霸的缓冲国，也无法维护欧洲的均势，这对欧洲整体有很大影响。

英国也是如此，议会制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大臣或其代言人认为，频繁的议会选举会给“阴谋集团和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认为国家的联盟政策要表现出灵活性，不要与某个国家绑在一起。因此，1716年年中，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年法案》（Septennial Act），将大选的时间由之前的每三年一次延长至每七年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大臣认为应该采取常备军制度，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如此，以“镇压国内暴乱、抵御外国入侵，以更有效地应对欧洲局势的变化”。相反，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一些人则针对上述观点表达了比较激进的批评，他们要求政府在指定外交政策时要对议会负责，政府要向议会提供相关文件，政府缔结的条约要由议会批准，政府对外国的援助也要由议会来确认。一位议员认为，常备军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并且政府不应该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来强化专制统治。他还说，很多国家“为了制约邻国的野心和维护力量均衡”而“使其人民失去了自由”。

当时欧洲人有一种普遍看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王权受到了约束，那么该国对外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就一定会被削弱。表面上看，英国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看法。不过，事实上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体系有两个优势：其一，英国人参与政治的门槛非常高，因此英国成了欧洲最有信誉的国家，尽管其人口总数并不多，但它有强大的财政资源调动能力，并且经济上有很大潜力。其二，英国议会和公共领域较为发达，英国人可以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完善相关制度，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意，同时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因此，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人自由的提高反而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而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却因民众自由的提高而导致了国家的悲惨结局，如波兰–立陶宛联邦。

同样，奥斯曼土耳其也是因为受到了外部威胁才提高了内部的凝聚力。土耳其新军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抱怨道，奥斯曼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都在倒退——“我们缺少经费和火炮，决策缓慢，军队战斗力很差，又不服从管理”。不幸的是，与欧洲其他国家（无论是议会制国家还是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结构与传统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军队很难进行改革。鉴于此，土耳其统治者开始逐渐将权力下放到地方。然而，这种挑战性的改革并没能促进奥斯曼帝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土耳其的统治者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是小范围进行秘密讨论，拒绝与臣民进行商议。土耳其拒绝效仿欧洲国家（至少是西欧国家），没有加强中央集权，也没有进行世俗化改革，没有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奥斯曼军队战败，引发了民众对于道德和精神复兴的强烈渴望。很多穆斯林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之所以如此软弱，并非是由于技术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缺乏虔诚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是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异端”——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才更加符合伊斯兰教义。正因为如此，18世纪阿拉伯的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呼吁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革，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教的“正道”，同时整肃社会风尚，净化人们的心灵。18世纪末，他与一位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Muhammad ibn Saud）结成宗教、军事联盟，号召阿拉伯半岛的民众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异端统治。换言之，土耳其进攻维也纳的失败，导致了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宗教极端主义运动。

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都可以增强国家的实力。通过海外扩张来掠夺资源显然可以获得大量收益，但此时收益正在逐渐减少。西班牙是典型例子，它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在中、南美洲地区的军事扩张。而此时其他欧洲大国逐渐不再采取直接扩张的方式，而是设法获得间接收益。例如，英国和法国就认为，和平时期发展殖民地贸易和渔业是训练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方式。更广泛地说，所有的大国都将海外贸易（更广泛地说是商业）看作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法国首相弗勒里主教（Cardinal Fleury）的授意下，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外交家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提出："如果我们的商业繁荣，那么我们的军事实力就会强大；如果商业萎缩，那么士兵的人数就会减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供养他们。"在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这类观点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尤其是在北欧和东欧，不少民众对发展殖民公司缺乏兴趣。因此，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普鲁士在西非的殖民地——大腓特烈堡[3]位于现加纳境内）卖给了荷兰人，他认为这个地方没什么意义。

奥地利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损失惨重，但其所蒙受的屈辱还远不止于此。俄国同意对奥地利提供军事支持，并且同意奥地利的"国事诏书"，但俄国人出价很高，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俄国希望奥地利能够支持自己向南扩张，挤压奥斯曼帝国的空间，至少是对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进行干涉。俄国的战争计划是：获得对黑海北岸的全部控制权，兼并克里米亚半岛，并占领摩尔达维亚（Moldavia）及瓦拉几亚。不过，这才是俄国大战略的第一步。俄国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向南扩张，并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736年，上述三年计划的制订者——陆军元帅布尔哈尔德·米尼赫（Field Marshal Münnich）说："我们的女沙皇安娜一世将在希腊最为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兼任希腊女王，并将为全世界带来和平……无论沙皇是在法兰克福加冕，还是在伊斯坦布尔加冕，她都是俄国的沙皇，没有人会质疑。"换句话说，俄国向南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帝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以告诉世人，沙皇的头衔不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赐予的。

可是，局势并没有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想象的那么顺利。1736年4月，俄国进攻土耳其，一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开始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然而，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对奥地利和俄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俄奥联军被迫撤退，奥斯曼帝国重新占领了1717~1718年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的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立了17世纪末土耳其曾建立的从亚速海到贝尔格莱德的重要战略防线。这是近十年来奥地利人第二次蒙受奇耻大辱。哈布斯堡王朝的弱点，在于其属地的零散分布，以及哈布斯堡政府过于烦琐的行政和决策制度——这常常会引发政府的瘫痪。1735年英国驻维也纳的一名公使提到："即便是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奥地利政府在解决之前也会先制定一份备忘录，而制定备

忘录时肯定需要先召开一场会议；如果有一个小镇着火了，那么也一定会先开一场会议，以商议是否应该将火扑灭以及如何扑灭的问题。”换句话说，君主制国家的决策效率很低，尽管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憎恶代议制，但后者具有更高的决策能力。事实上，在18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官僚化越来越强，导致决策的有效性越来越差；相反，英国的代议制政府却显得很有弹性，能够制定非常明确的目标，具有高效的执行能力。

与此同时，英国的政治体系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显得非常脆弱。18世纪3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在海外领土与海洋利益问题上不断产生摩擦，这导致了不少英国人对西班牙的仇视与敌意。1731年，英国一艘商船的船长詹金斯（Jenkins）称，他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域遭到西班牙当局的人员登船搜掠，而且还将他的一只耳朵割下。这一事件导致英西两国紧张情绪的升级。议会内外有很多批评者，要求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他们认为法院和政府不仅“腐败”，而且无能。在野党辉格党的议员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强调，议会是“国王陛下的委员会”，要为国王服务，议会有权力对国家的外交行为进行检查与监督。由于民众要求政府对西班牙开战，并用小册子进行宣传，同时议会中也有很多人反对与西班牙妥协，英国内阁试图与西班牙妥协的计划最终流产。1739年11月，英国首相对西班牙宣战，史称“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英国人希望重现著名探险家、航海家弗朗西斯·德拉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当年的风采，抢夺西班牙的船只，占领其殖民地。当时不少人非常乐观，正如一位社会名流所说，这场战争“能够帮助那些被西班牙奴役的人，我们要让他们摆脱束缚”。也有人对战争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西班牙很快就会反扑。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发出警告：“西班牙人正在收缩，但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事实与沃波尔预测的一致：尽管英国迅速取得了几场胜利，并且占领了贝约港（Portobello）[4]，但很快英国军队就在哥伦比亚的要塞城市——卡塔赫纳（Cartagena）伤亡惨重。

英国盲目扩充海军、抢占殖民地，导致它在欧洲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并且政府在国内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法国又开始在欧洲大陆动作频繁，它与瑞典签订了财政互助条约，甚至还和遭受重创的哈布斯堡王朝重修旧好。1738年12月，法国与西班牙王室宣布联姻计划，这些对英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此外，普鲁士已经威胁到了汉诺威的安全，与汉诺威同出一脉的英国王室陷入了恐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从侧翼威胁法国，因此法国可以集中精力调动所有资源来对付英国，削弱英国的海上力量，因此英国意识到了危险。英国一位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通过陆地战争来转移法国的注意力，否则我们就会面临法国的威胁，我们无力与之对抗。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恐怕明年春天或夏天时，不列颠群岛就会沦为战场了。”至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的海洋安全要依赖于欧洲大陆的均势。

到18世纪30年代末，德意志的未来发展仍然是英国、法国和整个中欧国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1738~1739年，法国首相弗勒里主教和其他

大臣多次强调，保持德意志帝国的现状是维系法国安全的关键。英国一直试图保持哈布斯堡帝国的完整，而弗勒里则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使其出现一个对法国有利的国王。为确保哈布斯堡王朝以后不会再对法国的东翼构成威胁，弗勒里设法让奥地利国王不再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奥地利就无法再利用德意志的资源来对付波旁王朝了。这项计划非常紧迫，因为法国担心，如果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Francis Stephen）登基，他将利用自己的地位从法国手中夺回洛林，并复辟洛林公国。因此，在1740年10月查理六世去世后，法国人支持特蕾莎担任奥地利国王，其他人只能接受事实，承认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不过，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奥地利王位，而在于谁将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8世纪40年代末，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对于德意志控制权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具有戏剧性的阶段。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一个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局势的平衡，这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逝世后，年轻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了王位。很多人认为，这位年轻的国王是在其父亲的残酷教育下长大的，因此一定会非常文弱。但事实上，腓特烈二世已经立志，要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他不想虚度一生，而是要成为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指挥官。他希望在外交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让民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拥护他的领导，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早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经下令取缔柏林的所有报纸，因为他认为媒体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鲁士只允许极少数的几家报纸发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722年创办的《柏林特权日报》（*Berliner Privilegierte Zeitung*）——正如它的名字那样，这份报纸享有特权，是普鲁士政府特许发行的，垄断了几乎整个国家的报业。腓特烈二世上台后，采取了不同于其父亲的政策，开始鼓励公共领域的发展。尽管国家对报纸管控得依然很严厉，但柏林已经有几家非常著名的报纸开始广泛发行了。最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希望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来，以获得德意志人的广泛支持，当然他也试图强化普鲁士自身的安全。

腓特烈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普鲁士的最薄弱环节——领土的“碎片化”问题。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历史》（*History of my own times*）中提到：“普鲁士领土的形状不规则，有很多省是狭长的、分散的、碎片状的，从东部的库尔兰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布拉班特。因此，普鲁士的邻国很多。如果不能消除领土的分散状态，那么普鲁士将无法展现自己的实力，而且会暴露在众多敌人面前。”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如果他像前几任选帝侯和国王一样，仅仅关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问题，那么普鲁士的地位只能缓慢提升。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既是普鲁士的威胁，又是它的机遇。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王朝下属的一个省，资源富饶且人口稠密。这个省毗邻勃兰登堡的核心区域，对于这座城市的归属问题，普鲁士一直是持不明确的立场。此外，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也曾经想继承奥地利的王位，他失败后试图要求奥地利将西里西亚转交给他，作为对自己的补偿。这对于普鲁士来说

是真正的威胁，因为这将导致普鲁士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腓特烈二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波兰国王的计划。1740年11月初，腓特烈二世发出警告：“如果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率先发起进攻，我们将难以阻止萨克森夺取西里西亚。”

因此，1740年12月，腓特烈二世决定先发制人。他没有宣布开战，就直接进攻西里西亚，并迅速占领了该省的大部分土地。腓特烈二世非常有智慧，把握住了开战的时机。奥地利的旧友英国在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时损失惨重。而奥地利的另一个盟友沙皇俄国，则在1740年11月女沙皇安娜一世去世后，陷入了王位继承的争端之中。此时，查理六世逝世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空虚，有两位候选人正在争夺，一位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弗朗茨·斯蒂芬（即特蕾莎的丈夫），另一位是法国支持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贝特（Charles Albert）。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为腓特烈二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他对西里西亚的入侵释放了强大的破坏性力量，这是10年来德意志帝国内部乃至欧洲内部各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尽管法国、萨克森、巴伐利亚、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都曾经郑重表示，要遵守“国事诏书”，但此时它们却纷纷反悔。它们看到奥地利的特蕾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一拥而上，试图从她那里获得好处。西班牙占领了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这些土地原本属于奥地利。1741年5月，西班牙承诺，支持查理·阿尔贝特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要求阿尔贝特承认西班牙对这些新土地的所有权。同年6月，法国与腓特烈二世缔结防御联盟。法国承认，下西里西亚省和布雷斯劳（Breslau）归腓特烈二世所有；作为回报，腓特烈二世同意，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中，投票支持法国推出的候选人查理·阿尔贝特。9月，萨克森进攻奥地利，企图夺取西里西亚。12月，查理·阿尔贝特宣称自己为波西米亚国王。之后，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袭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1742年1月，选帝侯选举查理·阿尔贝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七世。这是数百年来，哈布斯堡家族第一次丢掉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

这场冲突被称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这场战争应该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牵涉的不仅仅是奥地利王位，还包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正如南部地区事务国务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所说，英国担心查理·阿尔贝特继承皇位，会“最终导致整个神圣罗马帝国落入法国之手”。这不仅会破坏欧洲的均势，还会使低地国家失去其“屏障”作用，威胁英国与荷兰共和国的安全。因此，1742年，英国军队进驻德意志和低地国家；1743年，荷兰军队也加入。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进入地中海海域，对西班牙海军进行阻截；1742年8月，一支英军编队出现在那不勒斯，而这里正是唐·卡洛斯的地盘。唐·卡洛斯不得不从意大利北部地区撤军，否则他的首都就很可能被占领。自己的领土纷纷丢失，特蕾莎并没有无动于衷。尽管她的军队曾数次被腓特烈二世打败，但她并未气馁，而是调集了大批人马；1742年1月，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特（Piedmont）加入奥地利阵营。一年后，一支盎格鲁——德意志联军在

德廷根（Dettingen）大败法国军队，很快，巴伐利亚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撤退。哈布斯堡王朝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1743年10月，法国与西班牙签订《第二次家族盟约》（Second Family Compact），希望借此进一步对英国和奥地利施压。之后，西班牙王子唐·腓力（Don Philip）第二次结婚，娶了法国人，因此获得了米兰、帕尔马（Parma）和皮亚琴察（Piacenza）等地区。这样法西两国的合作就更加密切了，它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的海外行动，西班牙还收复了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海峡。1744年春，路易十五公开向英国和奥地利宣战。不久，法国军队进入奥属尼德兰地区，直接遭遇英奥联军以及荷兰边界卫戍部队。1744年8月，西班牙及那不勒斯军队瓦解了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南部的图谋。1745年，法国支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三世的儿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入侵英国并夺取王位，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打败英国，如达不到这一目标，至少也要转移英国对欧洲主战区的注意力。可是这非常困难。同年，英国皇家海军和北美殖民地的民兵发动联合行动，占领了法国的要塞——加拿大海岸上的路易斯堡（Louisburg）。但在1745年5月的丰特努瓦（Fontenoy）战役中，法国打败了驻扎在低地国家的英奥联军，征服了佛兰德；在这次战役中，詹姆斯二世党人中的一些人组成了“爱尔兰旅”（Irish Brigade），他们配合法国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腓特烈二世表现得非常明智。在莫尔维茨（Mollwitz）战役中，普鲁士大败奥地利军队，但腓特烈二世同意让英国做中间人，与奥地利进行和谈。1741年10月，普奥两国达成克莱因——施内尔多夫（Klein-Schnellendorf）休战协定。1742年7月，腓特烈二世又与特蕾莎签订《柏林和约》（Peace of Berlin），规定下西里西亚省归腓特烈二世所有。他说：“作为一个国王，要有能力适时停止战争；如果强行获取别人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失去；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那么他最终会失去获得它们的满足感。”他继续说道：“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欧洲形势的变化，耐心地看看我们从战争中获得了什么。中庸和平静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变得高贵，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并维护这一地位。”然而，奥地利军队很快发起反击，这迫使腓特烈二世不得不重新加入战争。1744年5月，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和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被奥地利围困，腓特烈二世与这三个公国组成法兰克福同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同年8月，腓特烈二世进攻波西米亚，以建立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地带。

1740～1744年，哈布斯堡王室面临着多重困境，它在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领土均面临着威胁。奥地利无法同时应对所有困难，因此必须决定首先解决哪个问题。考尼茨伯爵文策尔·安东（Wenzel Anton）是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后来担任过驻萨伏依公使，他认为德意志的问题才是奥地利的当务之急。1744年1月，他建议奥地利军队不必再继续追击意大利的反叛者，而是要“关注德意志的各种问题”。他认为，此时奥地利的主要威胁是普鲁士，因此奥地利的目标应该是收复西里西亚，或者是用边疆地区的领土来换取巴伐利亚。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考尼茨对德意志的重视是从技术角度考量的，或者说是从近乎“代数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地理上看，与意大利和佛兰德比较，德意志是最靠近奥地利的，其潜在资源也是最为丰富的。当然，他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德意志民族正在变得越来越团结，奥地利必须宣称自己在德意志内部的正统与合法地位。因此，奥地利不仅要应对来自德意志内部（即普鲁士）的威胁，还要迎接外部（即法国）的挑战。奥地利制作了不少宣传册，呼吁德意志人从法国手中收回阿尔萨斯，呼吁德意志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宿敌的威胁。奥地利女王的丈夫——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被描述成德意志的英雄，人们希望他能从法国手中收回洛林。

1744年11月，普鲁士军队被赶出波西米亚。两个月后，也就是1745年年初，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七世意外去世，弗朗茨·斯蒂芬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朗茨一世。这样，哈布斯堡王朝重新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同月，特蕾莎与英国、萨克森以及荷兰签订《华沙条约》（Treaty of Warsaw），共同对抗普鲁士。然而，她并没能取得胜利，在索尔（Soor）战役和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战役中，她被腓特烈二世亲自击败。1745年，奥地利被迫与普鲁士签订《德累斯顿和约》（Treaty of Dresden），再次确认西里西亚归普鲁士所有。哈布斯堡王朝对中欧地区的过分关注，导致其忽视了自己长期以来肩负的责任——保卫低地国家的“要塞”。英国——汉诺威军队以及一小部分涣散的荷兰军队，试图阻挡法国的进军，但他们失败了。1746年2月，布鲁塞尔沦陷，法国军队马上就要横扫荷兰共和国。自从路易十四时代结束之后，荷兰和英国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严峻的威胁。

这一切对于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在18世纪40年代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巩固了其君主制政体，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法国人一致认为，英国是自己的威胁，哈布斯堡的“专制主义”则是更大的威胁，这样法国人的凝聚力就更强了。在丰特努瓦战役中，法军大败英奥联军，法国人欢欣鼓舞。正如拿破仑后来所说的，这场胜利“使得法国的君主制延续了40年”。战争结束后，阿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在给哲学家伏尔泰的信中说：“只要维持法国的霸权，法国人就能获得幸福，因为现在法国有能力维护欧洲的公平。”当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法国无法维持目前的霸权地位，那么法国人的生活将陷入不幸。

相反，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为了确保匈牙利信守承诺，并在战争中承担义务，特蕾莎不得不再次向匈牙利贵族做出让步。不过，她还是尽可能地对各公国的权力进行限制，尝试建立集中式的管理体系、增加税收、扩大兵源，并且广泛地调动资源，以收复西里西亚。尽管首相豪格维茨伯爵（Count Haugwitz）没能达到女王的预期，但他还是成功筹集到了空前巨额的资金，组建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军队。女王还试图为自己寻找替罪羊，她指责波西米亚的贵族、犹太人背叛了奥地利，与普鲁士勾结。1744年，她以此为借口驱逐了生

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称这些人是内奸。女王的行为引发了欧洲多国的犹太人的抗议活动，整个欧洲的商人和犹太人不断进行抗议和请愿，规模空前。他们抗议的目标不仅是女王本人，还包括那些对奥地利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如英国。汉堡的犹太人宣称："这一事件关系到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整个犹太人群体。犹太人就是一群羔羊，如果一只羊遭受到了打击，那么整个羊群都会感同身受。"事实上，女王的盟友英国确实介入了此事。英国国务大臣哈灵顿勋爵（Lord Harrington）对奥地利女王的使节说："贵国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将会损害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不利于我们共同对抗法国。"一开始，面对犹太人的请愿，女王充耳不闻，但她很快改变了态度，并最终允许这些犹太人重返家园。这是欧洲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为保护非基督教团体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尽管并没有完全成功。

这场战争也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世纪30年代，公众和议会的对立导致首相沃波尔开始奉行绥靖政策。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失利，导致沃波尔面临危机。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没能维护好欧洲各国之间的均势。1741年2月，议会就沃波尔内阁进行信任投票，一些反对他的议员指责："在他任职期间，欧洲的均势遭到了破坏；法国波旁王朝势力扩张，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受到了削弱，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此后的两年中，沃波尔一直饱受批评，很多人不仅要求罢免他的首相职务，还要求将其弹劾、逮捕甚至判刑。法国推举的查理·阿尔贝特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沃波尔的地位更加受到动摇。1742年3月，沃波尔辞职。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对他进行质询并且追究法律责任，但他逃过了这些劫难。他的继任者卡特里特勋爵（Lord Carteret）同样在德意志问题上陷入困境：一是因为他给在英国服役的汉诺威士兵提供的拨款存在争议，二是因为他没能成功遏制腓特烈二世的扩张。

在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的影响更富有戏剧性。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后，荷兰进入了"无执政时代"，国家由各省的摄政者与议会来统治。各省不愿意交出自治权，即使是在面临外交与政治压力的时候，它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过，由于法国继续向南侵犯，各省摄政者又希望恢复执政制度，以便重新与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抵御法国。荷兰的一些宣传者则提醒民众，不要忘记1672年的教训（当时德·维特兄弟由于未能遏制法国而被愤怒的荷兰民众活活打死）。1747年4月中旬，人们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此时一支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了佛兰德，企图占领整个荷兰共和国。荷兰人很清楚法国要做什么，一位拥护荷兰联邦制的高级官员对法国大使说："你们在毁灭我们，你们想要成为荷兰的执政。"很快，英国的一支海军舰队在西兰岛发动政变，荷兰民众给予了热情支持。各种反对法国的组织在荷兰街头欢呼雀跃，整个国家充满着激情与偏执。威廉四世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荷兰执政，他也是奥兰治家族的首位世袭执政，其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然而，无论是英国的努力，还是执政一职的重新设立，都没能阻止法国入侵尼德兰的脚步。1747年5月，荷兰要塞城市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沦陷，似乎整个共和国就要被法国占领了。

最终，东方崛起的大国决定了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命运。腓特烈二世对特蕾莎的进攻，以及后来他组建的反奥联盟，触犯了俄国的利益，俄国对此坚决反对。但当时俄国皇位空缺，政府无法正常运转，又与瑞典战事不断，因此俄国首相认为，此时不得不对普鲁士采取绥靖政策。1740年12月，俄国与普鲁士签订条约。1741年12月，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Tsarina Elizabeth）成为俄国女沙皇。她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沙俄帝国北部地区的防御工事。1742年3月，俄国人公开要求芬兰断绝与瑞典的同盟关系。尽管芬兰没有接受俄国的要求，但俄国成功地建立了一座保卫圣彼得堡的要塞。1743年8月，瑞典被迫与俄国签订《奥布和约》（Treaty of Abo），又名《图尔库和约》（Treaty of Turku）。一年后，俄国女沙皇获得了瑞典的王位继承权，并在斯德哥尔摩附近驻军，以防丹麦人介入。这样，俄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将注意力转向德意志了。1746年，女沙皇与奥地利结盟，并签订秘密条约，一旦打败普鲁士就将对其领土进行分割。1747年，奥地利与俄国签订军事协定，之后俄国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德意志。

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的介入，对于整个欧洲的局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腓特烈二世担心特蕾莎与伊丽莎白一世关系更近，因此，1745年年底，他决定与特蕾莎议和。尽管此时腓特烈二世在军事上仍占据上风，但他认为尽早议和可以避免招惹俄国。俄国军队非常强大，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德意志。英国外交官桑威奇勋爵（Lord Sandwich）认为，俄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部队”，法国也非常关注俄国的一举一动。此时，法国海军陷入了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不断抢夺法国的商船，并且偷袭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国领土也出现了严重困难，企业破产、资源短缺、通货膨胀不断发生，糖、咖啡和鳕鱼供不应求。1747年末，斯坦维尔侯爵（Marquis de Stainville）哀叹道，法国的“贸易额缩水了一亿法郎”。1746年，法意联军被驱逐出意大利。尽管法国在尼德兰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法国人并不怎么高兴。此时，欧洲其他国家都非常警惕法国。对于法国来说，一旦俄国与奥地利联手，那么这支强大的军队就可以从东边直接进攻法国，这样法国即使占领了整个低地国家，也无法抵挡得住俄国的进攻。因此，虽然法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但是它非常担心俄国，因此还是决定与荷兰、奥地利等国议和，尽管它极不情愿。10年来，俄国军队又一次兵不血刃就成了中欧和西欧各国的仲裁人。

1748年，各方签订《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法国从低地国家撤军，以重新获得路易斯堡。这再一次证明，英国一直是将欧洲作为其大战略的重心。特蕾莎试图巩固丈夫的权力，并尽最大努力保证奥地利国土的完整。然而，结果并不如她所愿，她没能成功收回西里西亚。普鲁士依然控制着西里西亚，腓特烈二世将其看作自己的外交成就。奥地利被迫割让一部分意大利领地给西班牙和撒丁尼亚，但依然控制着意大利的北部。法国觉得自己在《亚琛和约》中吃了亏，民众批评政府接受了“愚蠢的和平”。很多人不断抨击法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批评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如政府没能有效支援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觊觎者”以对付英国——汉诺威联军等。

尽管法国失利了，但它下定决心，在下一轮与英国的较量中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获得胜利。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100多年间，欧洲地缘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德意志是欧洲所有大国关注的焦点。对于英国和荷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巩固低地国家的防御工事，以抵御法国的进攻，同时必须阻止法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于奥地利来说，德意志是哈布斯堡王朝维护其合法性与权力的主要来源。对于法国来说，它要防止德意志成为敌国从东面进攻自己的跳板，也要防止德意志邦国与其他反法力量（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联合起来。而两个刚刚崛起的大国——俄国和普鲁士则将神圣罗马帝国看作展示自己实力的主战场。各强国在海外相互争夺殖民地，抢夺资源，以此作为与欧洲其他强国争夺影响力的砝码。德意志则处于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尽管各邦国之间的宗教分歧已经越来越小，但各大国对德意志的争夺却越来越激烈。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邦国及其“保护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强国迫使弱国服从自己，各国以各种文明的行为准则来处理彼此的矛盾。尽管德意志各邦国一直试图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但始终没有成功。在欧洲的舞台上，德意志各邦国依然显得非常被动，无法发挥主动的作用。

到18世纪中叶，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经非常清晰。1683年，土耳其在维也纳的城墙下被奥地利打得大败，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波尔塔瓦战败后，瑞典人一蹶不振；荷兰国力则不断下降，尽管速度缓慢，但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虽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三个国家仍然举足轻重，但它们已经算不上一流大国，无法参与对中欧控制权的争夺。波兰的地位也江河日下，其他国家认为波兰已经是弱国，而非强国。尽管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国家整体上是完整的，实力尚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下决心，要向侵略者们复仇，夺回失去的土地。在这场争夺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刚刚崛起的普鲁士，它获得了西里西亚。俄国的力量也在上升，它似乎正在向西扩展力量，势不可挡。与之相反，尽管法国已经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失利中恢复过来，但它并没能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夺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英国煞费苦心地构建了一个安全体系，以保卫其南部沿海的安全，同时维护整个欧洲大陆的均势，但随着荷兰的衰落，英国的安全体系也受到了威胁。简而言之，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第一，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并且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不过双方争夺的中心是德意志；第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夺战愈演愈烈。这两大冲突最终将合并，演变成一场更激烈的冲突，从而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1] 巴黎高等法院，法国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编者注

[2] 普鲁士“里面的”国王不是“勃兰登堡国王”，也不是“普鲁士‘之’国王”，因为：第一，神圣罗马帝国内除了一般由皇帝兼任的罗马人民的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以外不能有别的国王；第二，普鲁士仍有一部分是波兰领土。——译者注

[3]　大腓特烈堡，普鲁士王国的殖民地“勃兰登堡黄金海岸”的首府，存在于1682~1717年。——编者注

[4] 贝约港，即今天的波多贝罗。——译者注

第三章

革命：1756~1813年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我们受政治体制的困扰，我们是邻国的猎物，是它们嘲笑的对象；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我们是杰出的民族，却互不团结；我们因分裂而变得虚弱；尽管我们强大，却相互伤害，无力拯救自己；我们对名誉无动于衷，对法律漠不关心……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却受人轻视，我们本应该生活得十分幸福，实际上却十分悲惨。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
（Friedrich Carl von Moser）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枢密院委员，1766年

德意志历史是一部皇帝、诸侯与邦国之间的战争史；同时，也是诸侯之间的战争史、邦国之间的战争史；是强大的一方无法无天，弱小的一方屡受压迫的历史；是外国人对他们进行侵犯与密谋的历史；是人力、财力被强制剥削的历史；是外国人对他们强制征用或直接杀戮、隔离的历史；是愚钝、困惑和可悲的历史。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amilton）
《联邦党人文集》（第19篇），1787年

我们可以看到，该条约的废除（奥地利与法国1756年签订的条约）对欧洲和法国来说都是外交事务的一次革命，巴士底监狱的毁灭为我们国家带来了重生。太棒了！太棒了！国民议会和公众旁听席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皮埃尔·韦尼奥（Pierre Vergniaud）
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演讲，1792年

18世纪50年代中期，欧洲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外交革命”，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互为死敌，但此时它们却成了朋友，并且联合俄国一同对抗普鲁士和英国。这导致了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战争结果是，普鲁士确立了大国地位，英国巩固了殖民霸权，俄国的领土扩张势不可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东欧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鲁士在德意志占据主导地位，它在两个战场上对波旁王朝构成了致命威胁。到18世纪后半期，欧洲几个大国或者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或者与神圣罗马帝国有密切的关系：法国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英国开始了汉诺威王朝时期，并与汉诺威公国结盟，这样它就成了低地国家的保护国，而且有责任保证德意志的秩序。除了这些表面现象，七年战争还为18世纪最后2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奠定了基础。就在这时，北美13个殖民地决定联合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英国的束缚，向宗主国宣战。英国不关心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尤其不关心自己在德意志的利益，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北美，这直接导致了北美民众的反抗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也正是在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辩论，很多人质疑波旁王朝的战略以及国内政治制度，人们希望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这场长时间的辩论，最终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达到高潮。这两件大事导致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宪政和意识形态的诞生，新秩序横跨整个欧洲和大西洋，而欧洲中东部依然处于旧秩序统治之下，新旧秩序的断层线由此而生。欧洲各国出现了新旧两种组织结构，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政治制度能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欧洲，帝国与共和国两种政体相互对抗；在大西洋两岸，旧的帝国与新的合众国相互对抗。不过，各方争夺的焦点依然是德意志和低地国家，因为谁控制了那一片土地，谁就能主导整个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

此时的法国当时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已经执行了数百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不过，现在它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奥地利，而是英国。此时的英国已经占据了广大的殖民地，有巨大的优势。1750年12月，法国派往加拿大的总督发出警告：“英国人可以从美洲获得大量的资源，但其他国家却无法得到，因此英国实力大增，在欧洲占据了巨大的优势，特别是有利于它控制德意志和佛兰德。”此外，法国也越来越担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51年1月，法国政府的一位德意志问题专家发出警告：“英国正在积极发展与普鲁士的关系，它们可能会结盟，这将给神圣罗马帝国带来致命的威胁，同时也会损害法国在德意志的利益。”他还说道：“德意志帝国宪法是法国能够在德意志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同时也是莱茵河畔各君主国得以存在的基础；保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可以使各邦国有着彼此不同的利益，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控制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同时，法国也有很多人逐渐担心俄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因为近期俄国曾两次干涉法国在德意志的行动，使得法国遭受了重大损失。此时，奥地利已经不是法国的敌人，因为法国的盟友——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可以起到制约奥地利的作用。而俄国成了法国的心腹之患，正如德布罗意伯爵（Count de Broglie）后来所指出的，

法国人想要将俄国“推回到广阔的沙漠中去，使它无法再参与中欧事务，地位降级”。

在此期间，哈布斯堡王朝与俄国正在讨论应该如何对付腓特烈二世。1749年3月，奥地利驻亚琛首席谈判代表考尼茨伯爵在备忘录中首次指出：过去奥地利一直与英国结盟，并且与法国互为宿敌，但如今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必要调整政策。考尼茨伯爵向奥地利政府提出建议：我们应该与宿敌法国结盟，至少与其缓和关系，以共同对付腓特烈二世，因为现在普鲁士才是奥地利的最大威胁。俄国一直把普鲁士看作一个二流国家，但由于普鲁士单方面占领了西里西亚，俄国非常恼火，因为普鲁士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结构平衡。俄国将腓特烈二世视为俄国在北方所面临的威胁，因为1747年5月普鲁士国王与瑞典组成了防御性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同时，瑞典正在与土耳其进行协商，以建立针对俄国的包围圈。俄国感到了威胁，必须着手应对。1753年4月，俄国决定尽可能地通过外交手段来遏制普鲁士，必要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英国也在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18世纪40年代末的历史说明，英国原有的欧洲大陆政策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对其进行修正。此时的荷兰已经非常虚弱，无法再成为保卫低地国家的堡垒。18世纪三四十年代，哈布斯堡王朝遭遇重创，丧失了大量领土，它也无法成为保卫低地国家的堡垒。这样，英国防范法国进攻的屏障就变得不安全了。而这时，英国认为法国成了自己的威胁，因为法国正在北美快速扩展势力，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动摇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英国在北美建立的13个殖民地，是英国税收的重要来源，也给英国提供了训练有素的水手和海军补给。1750年，纽卡斯尔公爵警告：“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失去了在美洲的领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那么法国将很有可能随时与我们开战。”面对新形势，英国朝野开始进行辩论。在公共领域，不少时政评论人士和议员认为，英国应该以发展海上力量为战略重心，贯彻“蓝水”政策，保卫在北美的殖民地，避免在欧洲大陆承担过重的义务。不过，辉格党政府相信，遏制法国的关键依然在于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的牵制作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英国必须保证由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否则将导致致命后果。为此，英国努力说服德意志各选帝侯选举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以保证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去世后，她的儿子约瑟夫能够自动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在18世纪50年代初，这项计划是英国的主要外交任务。英国试图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

欧洲的紧张局势，对大西洋另一岸的美洲也有很大影响。英国在北美的移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共同身份与利益安全问题，他们与英国政府相配合，与法国争夺殖民地。他们将北美战场看作英法两国在欧洲争霸的一个分战场。波士顿人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将法国看作“令所有欧洲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他认为，如果法国人的势力不能得到遏制，那么他们将很快来骚扰美洲，利用山川等自然天险把美洲弄得与欧洲一样支离破碎。因此，英国在北美的移民要求英国政府向北

美增兵，以打击法国，消除波旁王朝对英国移民的威胁，尤其是要摧毁法国人在魁北克的据点，以打破法国对英国移民的包围。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关于人口增长的观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一文中指出：“他们应该在美洲的西部建立新的殖民地，这样可以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压力，为新的移民提供急需的生活空间。”因此，富兰克林认为：“只要一个人在西部发现一块土地没有主人，那么这块地就属于他了；或者只要他把当地的原住民驱赶走，这块地也就属于他了。”

然而，这很难成为现实，因为英国移民没有什么武器装备，根本没有能力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富兰克林痛惜道：“如今，我们就像亚麻布没有织好时的丝线一样，因为没有连接起来，所以没有力量；而一旦联合起来，我们就会变得强大，甚至所向披靡。”这段话写于1754年，当时英国政府在纽约殖民地的奥尔巴尼（Albany）召集各殖民地的代表开会，讨论加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以共同防范法国人和印第安人。英国政府的代表认为，大家不应该再单独地、自发地对付印第安人，而是应该聚集资源、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威胁。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成功，出席会议的各殖民地代表均反对这种倡议。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之前吃过很多亏，无法单独应对威胁，但其代表也一样反对该倡议。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总督认为：“各殖民地的代表们不同意英国政府在奥尔巴尼会议上提出的倡议，因为他们认为各殖民地的自由与特权会被侵犯。”

在18世纪50年代初，英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在1752年签订的《阿兰胡埃斯条约》（Treaty of Aranjuez）中，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同意缓和关系，停止争夺意大利的土地，这样三国可以集中精力共同对付英国和普鲁士。英国试图让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选帝侯选举奥地利女王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以便日后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但这项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奥地利人并不想疏远法国。1755年，英国派往北美的远征军指挥官爱德华·布拉多克（Edward Braddock）少将在莫农加希拉镇（Monongahela）的一次战斗中遭到了法国支持的印第安人的袭击，伤重身亡。1756年5月，荷兰宣布中立，这对欧洲旧的国际关系秩序是一次冲击。在南边，萨克森人打算支持奥地利，共同对付普鲁士。由于萨克森一直与波兰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萨克森人把普鲁士看作横在他们与波兰王国之间的楔子，一直想将其除掉。1756年5月，奥地利与法国最终实现了和解，双方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之前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即之前统治法国的瓦卢瓦王朝）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而现在两国却成了盟友。这的确是一场外交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似乎出现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普鲁士被迫把西里西亚还给奥地利，把波美拉尼亚还给瑞典，把马德堡割让给萨克森（可能性更大），把东普鲁士割让给波兰（作为对波兰将其东部领土割让给俄国的补偿）或者是直接割让给俄国，考尼茨伯爵很期待普鲁士“全盘皆输”。

为防止噩梦成真，腓特烈二世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统一起来。他写道：“我看到，一些小的邦国正在努力发展工业实力，将国内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他们就能够在与大国的对抗中保全自己。”腓特烈二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已经建立了新的行政区划制度，规定贵族担任军官，农奴担任士兵，这样普鲁士的兵源就得到了充分保障。作为回报，国王认为他有责任保护贵族，因为“贵族是军队中最闪耀的部分，也是维护其王冠的中坚力量”。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行政制度，以从民众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腓特烈二世执政期间，普鲁士的税收额度增长了三倍。在1745~1756年的和平时期，普鲁士税收的83%都用于国防事务。腓特烈二世还调和与宗教异议人士之间的关系：他向天主教徒伸出了橄榄枝，特别是向那些生活在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徒，因为这一地区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过，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德意志。他必须阻止哈布斯堡王室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来调动整个帝国的力量反对普鲁士。他这样写道：“从斐迪南一世起，奥地利王室就不断尝试在德意志建立绝对的专制权力。为防止奥地利的计划得逞，就必须保证德意志的自由，即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各邦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腓特烈二世还认为，只有保证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均势，才能保证整个欧洲的均势。一旦哈布斯堡王朝颠覆了这种均势，那么他们最终会控制整个欧洲，进而蚕食掉普鲁士。但此时，普鲁士国王在德意志内部并没有可靠的盟友，其他国家也并不支持普鲁士。只有英国是例外，因为英普两国在1756年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协定》，规定英国保护普鲁士不受到俄国等国家的入侵，同时普鲁士协助英国保护汉诺威。同时，普鲁士的政策使得奥地利将其视为威胁，奥地利试图利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资源来反对普鲁士。

1755~1756年，欧洲和美洲大陆上即将爆发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普鲁士都试图先发制人，以取得有利时机。英国采取空前残忍的措施，来防范反对派威胁国内安全。在苏格兰高地，英国政府对小土地所有者展开了“清除”行动，鼓励或者强迫他们移民到海外。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廉价土地，但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镇压詹姆斯二世党，防止法国与这些人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在北美，英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新斯科舍的那些讲法语的、信仰天主教的阿卡迪亚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的眼中钉。1755年，这个棘手问题得到了处理。英国政府将大部分阿卡迪亚人（大概7 000人）驱逐到了其他13个殖民地（主要是马萨诸塞、弗吉尼亚、马里兰以及路易斯安那），并将其分散安置。这样，他们就不会对英国政府构成太大威胁了。上述两个事件中，英国政府为了缓解其战略困境，不惜采取类似于“种族清洗”的方式。

腓特烈二世也采取了极端措施来打击反对者。外交革命之后，他逐渐开始担心萨克森。因为萨克森距离普鲁士非常近，就好像“一把指向勃兰登堡心脏的利刃”，随时有可能会威胁普鲁士的安全。腓特烈二世安插在萨克森外交部的眼线告诉他，一旦时机成熟，萨克森选帝侯就会撕掉他的面具，联合特蕾莎、路易十五和沙皇一起进攻普鲁士。之前，俄国想立即进攻普鲁士，但奥地利要求俄国再等一年。为防止遭遇不测，腓

特烈二世决定尽快行动。1756年8月，他进攻萨克森，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公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位于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档案馆，试图找到萨克森阴谋瓜分普鲁士的文件，这样就可以证明普鲁士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同年，普鲁士高调将这些文件公布。腓特烈二世想让所有的德意志人知道："萨克森正在阴谋进攻普鲁士，而普鲁士只是在进行自卫"。同时，他试图阻止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不利于普鲁士的决议，这样他可以继续占领萨克森。然而，1757年1月，德意志帝国议会还是通过了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并组建了一支讨伐普鲁士的军队，尽管速度非常慢。很快，法国决定联合奥地利一同进攻普鲁士。

这就是七年战争。一开始，战局非常不利于英国和普鲁士。1756年夏天，法国军队占领了梅诺卡岛，英舰受损较大，英国放弃了援救梅诺卡岛的行动，岛上守军因孤立无援而投降。为了彻底羞辱英国，1756年年末，法国军队大规模入侵英国，英国被迫使用了汉诺威雇佣兵，保卫英国的南部海岸。到了1757年，形势才稍微有所好转，但英国在北美正在遭受更严重的困境。当时，英国派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率领一支远征军去保守汉诺威，但这支军队与法军交战之后，立即被打败，并签订了投降书。普鲁士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此时普、奥军队在波西米亚陷入胶着状态，1757年6月普鲁士在科林（Kolin）战役中被奥地利打得惨败。在西部战场，1757年5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并且法国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向德意志派遣了一支10万人组成的部队，以协助奥地利打击腓特烈二世。法国还承诺给奥地利提供经济援助，直到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在东部战场，俄国军队夺取了梅梅尔（Memel）。1757年8月下旬，俄军在大耶格尔斯多夫（Grossjägerndorf）战役中一举将普鲁士军队击溃。在北部战场，瑞典在4个月后向波美拉尼亚进军。这样，腓特烈二世完全被包围了。不过，他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了1757年11月的罗斯巴赫（Rossbach）战役的胜利，击溃了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奥地利率领的德意志帝国军队成了世人的笑柄，其指挥官无奈地说道，他自己宁可战死，都不愿意再带领这支军队作战。不久，腓特烈二世在洛伊滕（Leuthen）战役中，再次轻松打败奥地利。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宣布结束与法国之间的停战状态，组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其中包括英国士兵以及来自汉诺威和德意志的雇佣兵，共同保卫德意志的北部。1758年年初，斐迪南·冯·不伦瑞克打得法国军队狼狈而逃。

这场战争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有着重大影响。英国在1756～1757年的失利，引发了一场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恐慌。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里，约翰·布朗（John Brown）主教认为，英国之所以在欧洲遭受屈辱，是因为它"非常无能、骄奢和自私"。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的道德重生，即建立一支真正的国民义勇军，重新发扬英国人的男子气概。后来，民众的军事热情转变成了参政意识。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在1757年布道时说道："每一个臣民，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战士。"1757年英国通过的《国民军法案》就反映了这种精神。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应该提高士兵的医疗福利水平，他们正在国外打仗，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其中很多人战死在德意志，尸

体“腐烂成片”。在法国，伏尔泰描述道，法国在罗斯巴赫战役中遭受的耻辱，已经超过了“百年战争”。人们指责士兵“骄奢淫逸”，“像女子一样懦弱”，甚至认为整个国家都已经“腐化堕落”。

不过，战争对各国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上层政治和国家的大战略。对于法国来说，罗斯巴赫战役是继1704年布伦海姆战役之后的最大一次惨败，法国人对这场灾难感到震惊。首相贝尼斯主教（Cardinal de Bernis）遭到了全国人的指责，从此他再也没有挽回自己的声誉。他后来写道：“当时法国军队训练不足，不遵守命令，而且没有战斗力，各级军官没有战斗力，全国人都意志消沉。”一年不到，贝尼斯就下台了。在英国，军事失利使得当时的内阁倒台，议会选举威廉·皮特（老皮特）为首相，组成新内阁。同时，战争也加剧了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分裂：辉格党主张继续在欧洲进行军事和外交活动，而托利党想要丢掉“在欧洲大陆上的战略累赘”，集中精力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利用海上力量打败法国。老皮特设法调和两派的分歧，兼顾欧洲和海外。他在“德意志”和海外进行大量的投资，但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欧洲，一方面，他希望阻止法国在欧洲获得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他努力发挥英国在海外的优势。1759年对于英国来说是“胜利之年”，事实证明，老皮特的战略是正确的。法国最重要的糖料来源地——瓜德罗普岛在7月被英军占领；8月初，英、普联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明登（Minden）又重挫法国；同月，一支法国舰队在葡萄牙南部的拉各斯湾（Bay of Lagos）被英军歼灭；9月中旬，英军占领了魁北克。老皮特认为：“如果英国不利用德意志的战事来牵制法国，那么法国就会将更多的军事力量投放到北美，这样英国在北美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加……可以说，是德意志拯救了英国在北美的地盘。”换句话说，英国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军事行动保卫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帝国。

相比之下，法国从未确立过这样一种全局战略。从1756年开始，法国全国民众就大战略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一直持续了30年，并且主导着法国的政治。民众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国当初是否应该与奥地利结盟。不少人认为，法国与奥地利结盟，严重违背了法国的外交传统，法国王宫里面有一些人依然坚决把奥地利看作主要敌人。有一位著名诗人指责法国政府背弃了与瑞典、土耳其和波兰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不少在职的外交官认为，法国联合俄国、奥地利来制约普鲁士的做法很难取得效果；并且，法国允许俄国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很多人在道德上感到恐惧，因此自然会表达出上述看法，不少人认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应负主要责任，与奥地利结盟牺牲了法国的利益。法国在罗斯巴赫战役遭遇的惨败似乎证明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不少人原本并不反对与奥地利结盟，但随着战争的失利，他们越来越坚定地反对这一政策。在巴黎，到处可以见到抨击法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小册子。

法国新任首相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减少了法国在德意志的承诺，以便在西班牙的帮助下集中精力在海外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然而，这项新的战略没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1760年蒙特利尔失守，

1762年西班牙参战并配合法国作战，结果西班牙的殖民地反而大片失守。英国远征军迅速占领了马尼拉和哈瓦那。不过，腓特烈二世则差一点儿彻底失败，他多次败在了奥地利的“手上”，奥地利甚至在1760年10月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柏林。俄国则给了普鲁士最致命的一击。在1758年的曹恩道夫（Zorndorf）战役中，俄军把腓特烈二世的军队打得动弹不得；在1759年的库勒斯道夫（Kunersdorf）战役中，俄国令腓特烈二世遭遇到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当时，腓特烈二世只能期待“奇迹”出现了。果然，1762年2月，奇迹真的出现了——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去世了。继位的是在普鲁士出生的彼得三世，他在5月抛弃了奥法联盟，甚至在6月和腓特烈二世签订了联盟条约，站在了普鲁士一边。

但是，腓特烈二世并没有完全扭转局势。俄国国内很多贵族对来自德意志的彼得三世不满，最终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于7月发动政变，将其废黜并杀害，她自立为沙皇，这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撤销了和普鲁士签订的联盟条约，但也并不想再与普鲁士继续交战。此时的英国也已经相当疲惫，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它看到法国正在向德意志挺进，担心普鲁士无法抵御法国的进攻，因此决定放弃欧洲大陆战场，优先保护自己殖民地的安全。英国新国王乔治三世及其大臣、议会、臣民都对“德意志战争”感到厌倦，因此1762年5月，英国决定抛弃腓特烈二世。面对这种局面和这样一致的意见，腓特烈二世尽管感到愤怒，但也无可奈何，最终同意停战。在1763年，英法两国签订《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结束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Treaty of Hubertusburg），结束了德意志战争。普鲁士依然占领着西里西亚，也没有“补偿”奥地利的损失。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据点；英国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原属法国的地区，还在印度、加勒比海和西非获得了新的土地；西班牙重新获得了哈瓦那和马尼拉，但要将佛罗里达让给英国；法国将路易斯安那让给了西班牙，作为对西班牙参战并支持法国的酬谢，当时的路易斯安那要比现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大得多。这样，全球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英国在神圣罗马帝国所推行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成为世界霸主。欧洲当时是全球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现在欧洲的战略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普鲁士的力量在不断上升，而奥地利和法国则日渐衰落。

在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战败国，人们纷纷要求追究政府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首相舒瓦瑟尔公爵认为，法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当初法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同时作战，导致法国无法应对。他认为，法国当初不应该大规模地卷入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而应该利用其盟国奥地利的力量来牵制英国，这样法国就不必在德意志战场上投入巨大的精力，并且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海上力量，与英国争夺殖民地。但是，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这些人认为，法国在1756年之后的所有战略都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奥地利依然是法国最主要的敌人，法国根本不应与英国为敌。他们还强调，1763年之后，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保持联盟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这说明法国国王根本没有从七年战争中吸取教训。他们批评法国国

王对奥地利疏于防范，这会导致法国在中、东欧力量的缩减，尤其是在德意志的力量的缩减。不少法国外交官也担心，法国国王的错误战略会导致俄国进一步向西挺进，甚至畅通无阻地征服西欧国家。有一位法国官员指出，俄国人有巨大的野心，“他们试图在波兰制造混乱，趁机将其征服，同时他们想要在德意志扩大影响力，最终进军到莱茵河畔……俄国人将会率领一群由亚洲人组成的军队，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全部占领，他们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大屠杀，会把农奴制扩展到我们的国家，甚至会把我们的人民迁移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他强调，法国必须保证德意志的安全，德意志是抵挡俄国专制统治的长城。法国资深外交官、德意志问题专家路易斯–加布里埃尔·比亚–南希（Louis-Gabriel du Buat-Nancy）警告，法国应该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保持平衡，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任何一方吞并另一方，毕竟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会颠覆现有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简言之，法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认为，前任政府没能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

法国很多批评人士已经察觉到，法国在罗斯巴赫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仅仅因为某一项政策，而是因为法国整个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出了问题。自中世纪以来，王室成员的权力以及贵族的特权，都是以军功为基础的，这也是一项基本的封建契约原则。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对军队和贵族来说都是重大的打击。人们意识到，才能比特权更加重要。这样，国王和贵族的合法性逐渐丧失，而这一定会引起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增强法国的国力，民众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究竟哪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能让法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最具竞争力？多数人认为，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很多弊端，世袭贵族无才无能，卖官鬻爵现象严重，政府效率低下。首相舒瓦瑟尔公爵和大多数军事改革家都倾向于采用普鲁士或者俄国的模式，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凭借对国家的贡献而得到应有的奖励。还有不少人更喜欢英国的商业性贵族模式。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将两种体制的优点结合起来。有一小部分人，比如让–雅克·卢梭，支持建立一支公民军队。法国在战争中的失利促使更多人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阿贝·马布利（Abbé Mably）认为，国家应该根据一个人拥有多少土地来对他征税，但是国王则依然坚持征收人头税，并且试图将对贵族征收的人头税增加一倍。贵族为此非常不满，导致了自17世纪后半期以来贵族对国王的第一次抗议。他们在抗议书中写道：“国家”不应该只向贵族征税，也应该增加对平民的征税。所有这些批评声音给当时的法国政府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威胁。如果法国再取得一次胜利，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能够团结起来，但如果它再一次遭遇失败，国家就会垮掉。

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遭遇惨败，1763年后它持续受到来自英国的威胁，这引发了一场彻底的国内改革。这场改革对西班牙在欧洲大国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西班牙本土的安全取决于它在美洲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在美洲统治着900万人，这和西班牙本土的人口数量差不多，那里还埋藏着至关重要的金银财富。为此，1763年，西班牙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以保卫西属印度群岛的安全。据报道，当时西

班牙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美洲的管理，需要招募更多的士兵，需要建立更多的防御工程。究竟需要多少人，只有政府内部人士才知道。1765年，政府招募了大量人员，将他们派往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招募了一些人去秘鲁和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工作。新的官员工作效率高，很快取代了旧的官员，不过他们人脉关系少，一开始工作时很不适应当地情况。西班牙政府还在加勒比的殖民地使用大量的奴隶，强迫他们在大种植园劳动。古巴是奴隶最集中的地区，西班牙想以此来提高糖料作物的产量。到了18世纪末，从非洲运过来的黑人奴隶源源不断。因此，奴隶制对于维持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哈布斯堡王朝也是七年战争中的战败者，因此在整个18世纪60年代，统治阶层在不断地对此进行反省。其中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以首相考尼茨为代表，他认为应该对普鲁士进行战争报复；另一派以特蕾莎女王的儿子约瑟夫为代表，他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奥地利可以与腓特烈二世和解，因为他认为俄国才是奥地利最主要的威胁。约瑟夫与母亲共同处理政务，1764年他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于次年继承父亲弗朗茨一世的皇位，即约瑟夫二世。如何吸取战争失败的教训，以及如何进行国内改革，这两位领导人也有不同的意见。约瑟夫二世要求立即增加军队开支，并扩大军队规模，因此这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考尼茨则持不同意见，他希望从长计议，认为应该保持经济的增长，使国家有更高的税收收入，最终壮大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不过，对于两人来说，国内政治都不是他们的首要考虑，他们都将外交政策看作主要任务，而国内改革只是服务于外交事务的。1770年3月，政府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包括人口、资源、畜力和其他财富，政府希望能够对国情有更清楚的了解，为未来的战争动员做准备。

这场战争也激发了德意志人对神圣罗马帝国未来的前途进行热烈的讨论。有一些人因为看到腓特烈二世在罗斯巴赫战役中打败了法国而备受鼓舞，将他看作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认为只有腓特烈二世才能粉碎路易十五进一步“分裂”德意志的企图。不过也有一些德意志人并不喜欢腓特烈二世，因为他曾经进攻过萨克森，因此不同的人对他持不同的看法。不过，德意志人在两个问题上持一致的看法。第一，德意志人非常热爱神圣罗马帝国，并且对其感到自豪。人们认为，各诸侯国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帝国则代表着正义与法制，帝国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帝国可以保护德意志的每一个农民，甚至是最穷困的人，保证人们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奴隶，否则他们就要被英国人掠夺到苏格兰高地，或者被法国人掠夺到阿卡迪亚。尽管帝国法庭已经变得僵化，但它毕竟代表着正义，人们希望正义可以慢慢普及到帝国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共同信仰并没有使帝国议会焕发生机，但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创伤后，人们认为应该保留议会的存在。第二，1756～1763年，外国的军队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帝国的土地，这让很多德意志人体会到，他们的政府是多么脆弱。1765年，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出版了一本名叫《关于德意志国民精神》的小册子，他对这种感受进行了描述。他说，德意志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缓解国内紧张局势和阻止国外侵略的政府，“如果德意志

人团结起来，就没有人敢侵略我们”。然而，改革的热情很快就逐渐淡化。心灰意冷的莫泽在1768年评论说：“在帝国战争和帝国军队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如此严重、众多并且多样，因此只要德意志帝国的宪政体制不发生改变，它就无法阻止其他国家再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

在遥远的东方，俄国正在仔细思考如何提升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就军事而言，俄国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不过，俄国的统治者也痛苦地意识到，要想长久维持俄国在欧洲的竞争力，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国内改革。1767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对政府下达的《圣谕》的第一行中就写道：“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在第一段中她写道，俄国“通过引进欧洲的传统风俗”，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不过，当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想学习欧洲其他国家的代议制，而是学习君主专制制度。在《圣谕》的第二段中，她解释道，这是因为“俄国幅员辽阔，君主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才能进行高效的决策”。她继续写道：“君主制政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所有臣民的幸福以及整个国家和政府的荣耀，君主可以领导国家扩张领土，带领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有了这种荣耀，君主制统治下的臣民才可能有自由的意识，这或许会给臣民甚至是自由本身带来幸福。”换句话说，尽管俄国人并不是很自由，但他们的国家可以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人可以从这种荣耀中得到补偿。

普鲁士和英国是七年战争中的两个战胜国。战争结束后，两个国家依然有种不安全感，不过它们对自己的国内政治制度感到骄傲。1763年之后，腓特烈二世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来自俄国的威胁。俄国就像“一座雪山”，一旦它发生雪崩，就会立刻吞没普鲁士。1764年普鲁士与俄国的短暂联盟曾经使腓特烈二世稍稍放松，但很快卡捷琳娜二世就宣布废除盟约。1768年，腓特烈二世在政治遗嘱中写道：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不能保全自己，因为“我们正在被比我们更强大的敌人所包围，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普鲁士国王并不认为国家需要进行一场社会改革，也不认为应该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相反，他相信，只有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国家才能渡过难关。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也曾经想要废除农奴制，但它认为“军事——土地综合体”制度是成功的，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在西里西亚有两个骑兵团，但奥地利政府很难为其提供财政支持；现在，普鲁士占领了西里西亚，它有一个高效的政府，因此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要好一些。1763年，普鲁士军队的人数为15万，到1777年底扩张到了接近19万。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军队人数接近20万。在这一期间，腓特烈二世一直对邻国非常恐惧。他曾经对一个高级外交官说：“你制服的徽章上，应该是一只猴子，而不是一只黑鹰，普鲁士现在不得不像一只聪明的猴子一样，模仿其他大国。”

对于英国来说，七年战争的结束有着直接的政治和战略意义。首相老皮特受到了公共舆论强烈抨击，因为在普鲁士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没有及时向“宽宏大量”的腓特烈二世提供支持。1763年4月上旬，他为此辞职。与此同时，英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全国人民都感到非常骄傲和自满。不少人认为，胜利的原因是英国商业的发

达和道德的优越。这种狂妄也在英国外交政策上有所体现，英国经常向法国和西班牙展示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例如，在1763年，一支海军舰队被派到开曼群岛和特克斯群岛去威吓法国，后来又被派到洪都拉斯湾去威吓西班牙。这些措施都很奏效，并且英国人都感到高兴，不过这也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声誉，使得其他国家认为英国非常傲慢。尤其重要的是，英国关注海军的发展，而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它很少出席欧洲外交和军事活动。英国对神圣罗马帝国事务的漠不关心，使得它被孤立起来，久而久之这一点就变得很危险。此外，英国人很快发现，七年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永久性地清除波旁王朝的幽灵。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型商业中心或交易站，而仅仅是一个庞大的领土帝国。这个帝国的边界更加脆弱，更加难以保卫，使英国面临更多的危险。在西边，西班牙经常想蚕食英国殖民地的领土，在密西西比河谷，印第安人部落经常骚扰英国的殖民地。北边是法国人的聚居地——魁北克，那里人口众多，英国无法将他们赶走，而且他们随时可能威胁英国殖民地的安全。1763～1764年爆发了庞蒂亚克战争（Pontiac’s War），即渥太华的印第安人部族联盟反对五大湖区的英国人的战争。这再一次暴露了英国殖民地的防御工事的缺陷。

英国政府迅速做出决策，加强在北美殖民地的防御力量，以取得更稳定的立足。首先，1763年10月，政府发布公告，停止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地区继续移民。这项措施目的在于安抚住那里的印第安人，缓和法国和西班牙对英国扩大殖民地的恐惧，同时缩短英国殖民地的周长，以减轻防御压力。其次，英国政府计划将在海外的军事力量扩大一倍，其中2/3的军队被部署在北美，大部分驻守在西边的边界，另外1/3部署在加勒比海附近。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对本岛民众欠下累累债务，已无力支付海外驻军的经费，负担只能由殖民地的人民来承担。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谈道：“保护和服从是相互的……政府为了保护殖民地的移民，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因此现在政府呼吁殖民地的民众为公共支出贡献自己的一点儿力量。”为此，格伦维尔颁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糖蜜法案》（Sugar Act），之后又颁布了《印花税法》（Stamp Act），提高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移民的税赋。这两个法案的目的在于，为驻守在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边界的军队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很快，爱尔兰及印度也实施了类似的措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

七年战争也对一些弱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也在不断地努力，希望能提升在欧洲的竞争力。例如，波兰–立陶宛联邦试图减轻对外国的依赖，重新增强自己的独立性。1717年，俄国只允许波兰保留2.4万人的军队，但波兰人力资源的潜力非常巨大。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大资本家就有能力供养大量的军队，其中最有实力的是迈克尔·拉齐维乌（Michael Radziwill），他能供养一万名士兵。但由于外国的干涉，以及国内的长期分裂与混乱，波兰–立陶宛联邦无法拥有力量更强的军队。波兰一直实行“自由否决权”，贵族可以在议会开会时否决国王的各种重要决议。1763年，时任俄国首相说：“波兰正不断地陷入混乱，只要波兰保留着目前的宪政制度，它就会软弱不堪，欧洲强国不

值得在它上面浪费心思。”欧洲各国军队肆意穿越波兰的土地，波兰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欧洲的旅店”。1764年11月，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August Poniatowski）被选举为波兰国王，他试图改变现状。他成立了统一的外交部门，以防止大资本家各自为政，还增加了军队数量，确定全国通用的固定税率以增加税收。最重要的是，斯坦尼斯瓦夫二世试图废除贵族享有的“自由否决权”，削减议会的权力。

无论是战争的赢家还是输家，都最关心一个话题——哪一种政府和社会组织形式是最具竞争力的？各国国内纷纷展开辩论，以希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而根据历史记录，在1740～1763年间，各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则很少。有人认为，商业化的代议制国家是最具有优势的，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通过税收和信贷支持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两线作战，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财政与军事能力。更重要的是，英国允许民众就外交政策进行辩论，因此国家可以吸收各种好的建议，民众也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不过，其他的代议制国家则没有表现出英国那样的优势，瑞典和波兰都在逐渐走下坡路。君主专制国家也展现出了类似的情形，有的很成功，有的则很失败。荷兰恢复执政制度后，在外交上依然表现不佳，国家江河日下，很难重现17世纪末的雄风。法国国王的权力不断增加，但在罗斯巴赫战役中被打得惨败，并且丢失了在海外的大片领地。普鲁士则与荷兰、法国大不相同，在腓特烈二世的坚强领导下，普鲁士实现了高度的军国主义化，克服了一切困难。在1752年和1768年的两次秘密政治遗嘱中，腓特烈二世强调了个人集权统治的优越性。他声称，绝对的君主权力有利于迅速解决各种危机，而各种代议制或协商制政体只能使国家变得毫无效率。这就是七年战争的终极悖论：英国和普鲁士是战争的两个战胜国，但它们一个是典型的代议制，另一个是典型的绝对君主制，因此很难说哪一种政体更加优越。

七年战争导致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出现了变化，同时各国的殖民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因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危机。起初，在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中，民众与政府爆发了矛盾；后来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殖民地也爆发了矛盾。1755年，英国指挥官布拉多克在莫农加希拉镇遭到法国支持的印第安人的袭击，这次战役堪比欧洲的罗斯巴赫会战。当时，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就是布拉多克的下属，他目睹了布拉多克战死，对此记忆深刻。1763年，英国政府规定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最西界限，这导致很多英国移民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俄亥俄山谷作为七年战争的胜利成果。他们认为，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应该对殖民地的范围做出限制。不少民众到各殖民地的议会进行游说，明确表示他们不仅希望扩大领土，而且希望使国家变得强大。他们希望把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统一起来，从大西洋到墨西哥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殖民地的扩张，已经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前奏，事实上这也正是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

英国和西班牙试图对殖民政策进行改革，但很快就面临困难。格伦

维尔1765年颁布了《印花税法》，以扩大税收，解决英国在北美的军费问题。不过，这引发了殖民地民众的激烈抗议，最后政府不得不废除该税法。1767年颁布的《汤森法案》（Townsend Duties）也是有着同样的初衷，但最后同样不得不废除。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移民希望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英国的军队，并接受英国政府更多的管理，尽管他们很不情愿。不过，要让他们自己花钱来支付英国政府军队的开支，这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的，他们希望打破英国政府规定的殖民地边界，向西边继续移民。这样，殖民地的民众和英国政府在战略、宪政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英国政府本希望通过改革殖民政策，维护其殖民帝国的稳定，但现在反而导致了殖民地民众对自己的不满。与英国类似，西班牙也希望加强其在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并试图让生活在殖民地的移民支持政府的强国计划，不过这同样遭遇了持久的阻力，甚至导致1765年发生在基多（Quito）和普韦布洛（Pueblo）的反抗事件。

大约同一时间，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的改革也得罪了波兰国内外的既得利益者。1766年10月，在普鲁士和俄国的干预下，波兰被迫放弃了实施固定税率的计划。这导致国家无法建立独立的税收体系，因而波兰国王无法为国防筹集必要的资金。叶卡捷琳娜二世还试图挑拨离间国内各派力量，鼓动一部分人造反。波兰有一半人口（大约500万）是天主教徒，其他400万隶属于东仪天主教会，即完全承认罗马教廷地位的东方公教会。在剩余的人中，有50万是俄罗斯东正教徒，另外50万是新教徒，他们被其他波兰人看作“异教徒”。1767年，在俄国的支持下，新教和东正教徒要求获得宗教权利。1768年，在俄国的胁迫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同意签署一项永久性的条约，同意保护东正教徒和新教徒的权利。不过，这件事也强化了俄国对波兰的控制权，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显然不满意。因此一部分波兰爱国者组成联盟进行反抗，他们宣布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为俄国的傀儡，内战爆发。这样，俄国人以保护东正教徒为借口，出兵干预波兰内政。奥斯曼土耳其担心波兰完全被俄国控制，因为那样将给其北部边界带来威胁，因此，土耳其人决定先进攻俄国。哥萨克骑兵在追捕波兰人的时候，擅自进入了土耳其领土，土耳其便以此为借口对俄国宣战。

不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很快就打败了土耳其人。1770年7月，土耳其舰队在切什梅（Chesme）海战中被俄国舰队彻底打败，俄军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并打算向瓦拉几亚进军。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恐慌，两国担心，一旦叶卡捷琳娜二世彻底打败土耳其，她就将获得巨大的收益，使得俄国力量大大增强，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那样的话，哈布斯堡王朝不仅东面将会受到俄国的威胁，南面也同样会受到威胁。腓特烈二世担心，如果俄国打败了土耳其，那么它将会更加轻易地控制波兰，那样，它下一步就会干涉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事务。两国认为，除了战争之外，解决波兰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波兰的土地平均瓜分。1772年8月，俄、普、奥三国宣布将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瓜分：波兰东部的一大块土地归俄国所有，奥地利获得了相对繁荣的加利西亚省，腓特烈获得了面积很小，但是具有重要战

略价值的西普鲁士（这块地方连接着普鲁士本土与其飞地——东普鲁士）。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奥地利女王特蕾莎知道这样做缺乏道义上的理由，但现实非常残酷，她也只能如此，否则她将得不到波兰的任何利益。她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但她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正如腓特烈二世所说：“她哭了，但她达到目的了。”

两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强迫土耳其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和约》（Treaty of Kutchuk Kainarji）。尽管俄国只获得了黑海周围的土地，但它打通了黑海出海口。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获得了提升。土耳其被迫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但这个新国家事实上只是俄国的傀儡，很快就并入了俄国版图。沙皇还迫使土耳其承认，她是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权利的保护人，正如俄国长期“保护”波兰的东正教徒那样。差不多一年之后，即1775年5月，奥地利攫取了布科维纳（Bukovina），拓展了其东部边界。

所有这些事件，不仅对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有重要意义，也对整个欧洲格局有重要意义。以前，欧洲国家试图阻止俄国参与中欧事务，但现在这种努力失败了。爱尔兰作家、英国议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写道：“俄国势不可挡而又野心极大，而波兰是德意志和北方各国对抗俄国的天然屏障。如今波兰被瓜分，这是对德意志秩序的完全破坏，也是对北欧秩序的破坏，波兰现在可能成为俄国进入德意志的跳板。”也许俄国人将会有更多的行动，各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争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国际危机对西欧各国的国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戏剧性的。法国统治者意识到，要想维护政权的稳定，就要有更稳定的财政基础。这是上述国际危机对法国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法国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但高等法院表示反对，要求国王颁布的财政法令必须得到高等法院的批准，否则将被视为无效。同时，高等法院还强硬地提高了法国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的门槛。然而，法国在七年战争中遭遇了重大损失，1763年之后，海军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成本，因此必须扩大税收、增加借款。因此，政府与高等法院的冲突不可调和，愈演愈烈。1768年，布列塔尼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对抗，当地的法院指责省长非法提高税率。巴黎高等法院和其他地区的法院，都对布列塔尼的地方法院表示支持，对抗因此陷入僵局。一年后，法国财政审计总长提醒国王“陛下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了”，但路易十五却无能为力。1771年1月，国王的宠臣莫普（Maupeou）试图剥夺高等法院的权力，但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18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国际动荡，强化了部分欧洲人的干涉主义情节。在70年代，至少三名德意志伯爵因“滥用权力”被送进了监狱。在英国，杰出的作家和议会议员，如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和伯克，都支持科西嘉岛和波兰人民的“自由”事业。1768年，法国将科西嘉岛的独立运动领袖巴斯夸·帕欧里（Pasquale Paoli）驱逐出岛，之后法国占领了科西嘉岛。当然，很多人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事业，支持对破坏其他国家自由的行为进行干涉，是出于某种个

人利益。的确，一个大国要保护某一个小国人民的权利，首先这个大国的人要有某种情感，同情和支持这个小国的自由事业，同时这也必须符合大国的战略利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例如，之所以有很多英国人同情科西嘉人争取“自由”的事业，是因为英国人认为那样做有利于遏制法国，有利于维护英国自己的利益。事实上，有些国家宣称要保卫其他国家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个国家自己也经常侵犯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宣称要保卫德意志宪法，以及俄国宣称要保卫波兰的“自由”，实际上法国和俄国都有自己真正的意图。很多时候，一个欧洲大国会宣称支持另一个小国人民的“自由”，而有的时候这个大国又会侵犯别的小国，试图让其永远依赖于自己。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这种矛盾的政策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英国人并不只是关心其他国家民众的权益，他们更关心英国属地的人道状况。圣文森岛（St Vincent）上的加勒比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岛原本属于法国，后来英国将其吞并，用于为巴巴多斯岛（Barbados）提供食物。英国有些人声称，圣文森岛上的加勒比人与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上的法国人进行勾结。因此圣文森岛上的种植园主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这些加勒比人全部消灭，但后来政府没有那样做，因为不少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后来政府又考虑将其放逐，但又觉得难以实施。最后，政府决定将这些人全部赶到岛上的一小块保留地中。为此，加勒比人坚决反抗，导致了1772年军队与加勒比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军队的暴行导致了议会中很多议员表示不满，他们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对违反人道主义的官员进行惩罚。议员巴洛·特雷西柯西克（Barlow Trescothick）对战争进行了谴责，反对军队伤害“无辜的和并无恶意的人们”。同一年，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不过该判决对英国的殖民地没有约束力，而且依然有很多英国商船在大西洋两岸从事贩奴活动。不久之后，议会开始对圣文森岛事件进行调查，以保护加勒比人的权益。这是一种真实的、公认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他国家也对英国表示认可。

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越来越多的人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批评。生活在北美的英国移民也为科西嘉岛人民争取“自由”事业的失败而感到惋惜，同时他们也对科西嘉领袖帕欧里所取得的胜利敬佩不已。此时，生活在北美的英国移民希望越过英国政府规定的最西边界，继续扩展殖民地。但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引发了北美民众的不满。此外，由于经费不足，英国政府逐渐拆除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用来抵御印第安人骚扰的堡垒，而且那些土地本不属于英国所有，而是属于西班牙和法国。英国在北美的移民也对此表示不满。英国政府原本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担负起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防御费用，但东印度公司在1772年破产了，英国政府一下子没了军费来源，事情进入了紧急关头。1773年5月，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打算出台《茶叶法》（Tea Act）来挽救东印度公司，但这项政策非常不受人欢迎。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放弃了在北美（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和东肯塔基）建立新殖民地的计划，英国已经筹备此项计划很久，并将其命名为“万达利亚”（Vandalia），以纪念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王后夏洛特（来自德

意志）的祖先。1774年5月，英国从南美洲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撤离，目的是节省一些经费，同时也可以缓和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因此，北美殖民地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此时大英帝国已经开始倒塌。的确，正是因为殖民地的人民先感受到了大英帝国的衰落，他们才会起来造反，而不是因为殖民地人民造反导致了这个帝国的衰落。

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是压倒英国在北美殖民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法案承认，法裔加拿大人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和权利。尽管法案得到了生活在魁北克的法裔的支持，但生活在13个殖民地的英裔则普遍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新教信仰会受到威胁。不过，他们最反对的是该法案规定英国移民禁止再向政府规定的殖民地最西边界以外进行扩张。同时法案还规定，俄亥俄和密西西比之间的所有土地都要并入魁北克。这是1763年之后英国政府与北美扩张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分歧。很多英国移民担心，该法案将导致13个殖民地被专制主义政府所包围，最终导致他们被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下。因此，1775年，北美的英国移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们不同意政府规定的宪政安排，也不同意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方向。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开国之父中的一员，他曾经回忆道："北美人民独立与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我曾经信奉的首要原则，就是要保卫我们自己不受法国侵犯。"

北美人民自发建立了武装组织，并很快与英国政府的军队在莱克星顿发生了交火。那里响起的枪声"被全世界听见"，这不仅仅因为这次事件预示着"自由"黎明的到来，而且因为它还对国际体系带来了某种影响。其中，它对欧洲均势造成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如果英国失去了北美，那么它将无法应对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它们在大西洋对岸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而其他欧洲强国认为，一旦英国镇压了北美人民的反抗，那么英国的力量将再次上升，其他国家无法与之匹敌。波旁家族统治的两个国家——法国和西班牙也非常为难，它们都想利用北美人民来牵制英国，但谁都不愿意首先与北美的反抗者公开结盟，因为那样做将会开辟一个危险的先例，毕竟英国是合法的宪政国家。西班牙尤其不敢这样做，因为此时西班牙在南美的庞大殖民帝国也摇摇欲坠，那里的民众同样正在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不过，法国和西班牙还是希望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以杀杀英国的威风。1775年年底，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Count de Vergennes）曾说道："一旦北美的反抗者获胜，英国的力量就会下降，我们的力量将会相应上升。"

北美人民认为，要想成功实现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将这场冲突国际化，以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我们必须要说服欧洲，美国的事业是全人类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保卫自己的自由，就是在保卫欧洲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指欧洲各国的宪政"自由"，即各国之间的均势。1776年3月，北美人民组织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外事工作，以获得外部的支持，并委托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同时，他们也派遣使节来到维也纳，防止英国利用德意志雇佣兵来对付北美人民。实际上，英国在北美的军队中，至少有1/3的人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各个邦国的雇佣兵。北美人民清楚地知道，一旦欧洲的自由受到

了破坏，那么他们自己的安全也将会受到威胁，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历史就是教训。这种逻辑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北美人民还认为他们自己是英国国王的忠实臣民，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与欧洲其他国家公开结盟。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撰写了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他说："只有我们获得独立，才能保证自己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进而保卫革命的成果。"

发展外交是保护革命、捍卫独立的方式之一。不过，很多北美人民已经对自己的安全与使命有了更广泛的理解。从一开始，他们就相信，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建立的国家是例外的，他们的经验是可输出的。潘恩说："北美人民已经开始进行抵抗，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世界；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能获得什么利益，他们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人类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希望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在帝国时代，美国代表了人民的自决权；君主制时代，美国代表了共和主义；在传统的绝对主义国家林立的时代，美国代表了宪政精神"。他还说："思想会比军队更厉害，会穿越最坚固的堡垒，思想会比外交有更强大的力量。"他预测，"不管是莱茵河、英吉利海峡，还是大西洋，都不能阻止思想的进步；它将永远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并最终征服世界"。潘恩相信，随着各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减少武器的使用，自由的传播最终将会缔造全世界的和平。不过，尽管潘恩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干涉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所有的国际战争，他认为国际战争只是某些人的阴谋，他们想征服和欺骗其他国家的人民。然而，很多美国人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要想保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积极地、由近及远地向全世界传播自由的思想。只要美国人坚持这种信仰，那么美国就一定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逐渐地改变这个世界。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正式公布，但这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宣言明确表示，13个殖民地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这里"国家"（states）一词使用的是复数形式。然而，为了准备对英国的战争，美国必须尽快采取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征。1777年11月，在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后，大陆会议于19日通过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授予全国政府处理货币、税收和信贷事务的权力。各州都不再独立发行货币，并且同意将自己的税收所得及土地价值中的一部分上缴给大陆会议。《邦联条例》尽管增进了整个合众国的凝聚力，但解决得并不完美。各州自愿向大陆会议上缴自己的税收，但它们经常会拖欠上缴。此时，大陆会议唯一的惩罚措施就是对拖欠税款的州进行"公开谴责"。因此，尽管美国人赢得了独立战争，但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邦联"，实际上既不是单一制国家，也不是合众国。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和他的首相考尼茨决定，要改写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版图。1777年下半年，约瑟夫二世开始付诸实践。正好，巴伐利亚选帝侯没有人能够继承爵位，应该由其近亲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Karl Theodor）继承。不过，特奥多尔对巴伐利亚继承权兴趣不大。约瑟夫二世则派遣外交官，说服特奥多尔将巴

伐利亚给予奥地利，奥地利则把奥属尼德兰的部分领土给普法尔茨作为补偿。这样，约瑟夫二世就可以放弃远离奥地利的尼德兰，换取离自己较近的巴伐利亚。不过，约瑟夫二世的突然行动立刻引发了腓特烈二世的强烈不满，他担心这将改变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均势。腓特烈二世的目标是保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现状，以防止奥地利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来做出对普鲁士不利的事情。事实上，腓特烈二世越来越把自己看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反对者”，他试图团结德意志的中小国家，捍卫德意志的领土现状。由于此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依然是盟友，因此发生在美洲和德意志两地的冲突，很有可能会将法国和西班牙卷入，这有可能会演变成类似于七年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冲突。

1778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法国陷入了两难境地。1778年2月，路易十六声称，根据条约的规定，他要对奥地利的安全提供保障，“我们必须保证法国在德意志的声誉，之前我们的声誉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维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法国王室的最重要任务”。但是，路易十六在权衡利弊后，并没有贸然出兵。这是因为，此时法国有机会在北美给英国以致命一击，一旦法国干预德意志事务，就会导致分心，无法集中精力对付英国。最终，法国决定不介入中欧事务，准备任由其自然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北美人民的大陆军于1777年在萨拉托加（Saratoga）打败了英国政府军队。法国受到鼓舞，认为有机可乘，因此于1778年对英国宣战，1779年西班牙也加入战争。英国本土侥幸逃脱了法西联军的入侵。一年后，荷兰海军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失利，因此荷兰也决定加入反英同盟。大约同一时间，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在战争时期能够与交战国进行正常贸易，宣布成立“武装中立同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以使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地在交战国港口及其沿岸航行。用英国一位海军军官的话说，此时英国几乎是“在与全世界开战……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力量将会把我们的国家瓜分，我们将任由他们处置”。

面对这些挑战，英国政府进行了空前的战争动员。1778~1780年，皇家海军将守卫本土海岸线的战舰的数量增加了50%，海军人数也增加了50%左右。英国政府试图动员爱尔兰人参军，那里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尽管那里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多数。同时，爱尔兰的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徒加入政府的军队，不过英国政府进行了劝导。1778年，政府首次出台实质性的措施，以安抚天主教徒，第二年又制定了保护“异端”教徒的法案。不过，很多英国人仍然担心，英国的代议制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制更有优势。过去50年的历史证明，波兰、瑞典以及荷兰的“自由”政体都逐渐没落；而中东欧的那些独裁专制国家似乎越来越占据优势，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简单，有利于军事动员和对外扩张。正如1778年3月中旬英国的一位大臣所指出的：“欧洲内陆的那些军事大国已经积聚了无数财富，也将其臣民塑造成了一支支强大的军队，未来它们将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英国在财政和军事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潜力，但这并没有扭转其在北美的颓势，也没能在最急迫的时候有效保卫其海上霸权。英国在欧

洲奉行孤立政策，这最终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一次，法国波旁王朝没有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在大西洋战场的力量超过了英国，英国辉格党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法国不仅暂时获得了对北美附近海域的制海权，还成功进入北美大陆，为华盛顿提供支援。1781年，法美联军在约克镇包围了英军的主力，英军被迫投降。诺斯勋爵领导的内阁不久就垮台了，新内阁决定与法、美议和。

1783年，美英两国签署《巴黎和约》，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这标志着国际政治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英国丧失了大片殖民地——部分被法国、西班牙获得，同时被迫承认北美13个殖民地获得独立。英国保留了直布罗陀，但被迫把佛罗里达和梅诺卡岛交给西班牙，法国再次获得路易斯安那。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感慨地说，法国的这次胜利“洗刷了1763年失败的耻辱”。更重要的是，西半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强国。当时一些富有远见的人就预言，美国将很快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听完《美国独立宣言》后说：“英国只是一个岛国，它将很快衰落，只能为它过去的勇敢感到骄傲，这将是可笑的。尽管过去英国人发誓，要把自己的首都建得与巴黎一样大，但以后英国人将不得不遵守美国的法律，或许伦敦将听从纽约或者费城的安排。”一位法国人曾经预言，北美13个殖民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而一名英国驻巴黎的外交官感到难以置信，他反唇相讥道：“是的，先生，而且他们都将说英语，每个人都是。”

美国独立战争对欧洲政治的影响非常具有戏剧性。在法国，人们重新对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表示支持。一位评论人士说：“法国取得胜利了……你们自己在家里、在公共场所、在咖啡店里，甚至是在酒店里，都可以想象法国将英国打败的情景，英国的海军完全被吞没。你们不断地喝着酒、享受着复仇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消逝了。法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法国大部分军费是通过贷款获得，而不是通过征收而获得。要想保证军费，就必须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国际金融市场、法国国内金融市场，都要求法国政府提高透明度，民众也有这样的要求。1781年2月，法国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出版了其著名的《财政报告》（*Compte Rendu*），当年就卖出了10万份。他本来是想促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协商，进而提高政府的信誉，但事与愿违，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反而下降了。1783年秋天，法国政府财政濒临破产。

法国不仅面临着金融困境，还面临着战略困境。法国因忙于与英国作战，所以没有介入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但这为俄国干预神圣罗马帝国事务打开了大门。18世纪70年代初，叶卡捷琳娜二世扩大了俄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她安排了她的儿子（继承人）与两位德意志公主的婚姻。1773年，她的儿子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一位公主，后来这位公主早逝，他又娶了符腾堡的一位公主。此外，俄国向德意志帝国议会以及部分小的邦国派遣了更多的外交官。尽管德意志人都已经公认叶卡捷琳娜是俄国的沙皇，但她并不满足，她要求在德意志有更大的发言权，甚至是决定权。1779年10月，她说：“俄国长久以

来都渴望获得一项特权，即成为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担保者。这是因为，正是这个特权使得法国在欧洲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影响力。”她努力调停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使得双方签订了《特申条约》（Treat of Teschen），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约瑟夫二世被迫让步。其中，真正重要的条款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担保人。一位英国外交官说道：“现在，我们必须把俄国看作德意志的仲裁者。”1778年12月，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法国代表抱怨道，法国对德意志政治长达150年的主导权正在被俄国所代替。正如韦尔热纳在1779年评论的那样：“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大体来说，德意志有能力伤害法国。德意志是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不能从宪法上对这个国家进行限制，那么其权力将无法受到制约，它将超过我们，成为我们的威胁……因此，我们要想保卫自己的安全，要想保持自己的优势，就必须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维持其现有的宪法，防止其团结起来。”一旦神圣罗马帝国被某一个敌国所控制，法国就将陷入危险。

英国在战争中失利，美国宣布独立，人们都在争论英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英国要想东山再起，就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国内政治改革；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只需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进行反省就已经足够。还有一些人提出，政府应该扩大公民权，这对于动员全国力量，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是必要的。不少人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改革”使国家的金融秩序恢复稳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英国的大战略。民众认为，英国可以在美洲重建其殖民帝国，并且会比之前的面积更大。英国之所以有这个实力，是因为在整个美洲，依然有很多人支持英国，其中很多人是刚刚获得自由的黑奴。1788年，英国首次有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特别是加拿大，新的殖民地很快建成，老的殖民地也发展迅速。不过，英国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其盟友关系，特别是在中欧。保守党不得不放弃其“蓝水”（blue water）战略，因为英国不得不再次关注欧洲事务，无法集中精力发展海洋力量。1783年12月，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议员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评论道：“凡是关注我们国家利益的人，都希望重新建立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英国不应再让自己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

18世纪80年代中期，约瑟夫二世进行了一系列国内改革，以加强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除了匈牙利及其世袭领地之外，奥地利政府废除了其他所有地方的通行费，政府还提高了对部分行会的限制。约瑟夫二世试图逐渐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1781年，他发布《宽容令》（Toleration Edict），放宽了对犹太教徒和新教徒的限制，其目的是动员宗教“异端”人士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可以防止其他强国（尤其是普鲁士和俄国）获得战略优势。约瑟夫二世试图改革宗教仪式，限制各级主教的权力，限制主教同教皇的联系，同时关闭了大量的修道院。他的目的是强化自己的权威，减少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干预，使得宗教更加适合人民的需要。他努力削弱各地代议机构的权力，尤其是在匈牙利和奥属尼德兰，以此加强自己的权力。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约瑟夫已经做好准备，来解决最大的难题——农奴制。他认为，这需要调整君

主、贵族和农奴三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

约瑟夫二世试图通过上述改革，使得奥地利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但这又导致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内那些权势人物（如神职人员和匈牙利的贵族）不满瑟夫二世的改革，他们不仅试图煽动国内的叛乱，还有可能会投靠敌国。约瑟夫二世禁止教皇干预奥地利事务，同时限制主教的权力，这等于颠覆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制度，一些既得利益者因此非常愤怒。他的强硬政策使得很多德意志诸侯认为，他不仅不会维护德意志的宪政秩序，还有可能会破坏其他邦国的主权。约瑟夫二世决心巩固和扩大奥地利的领土，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因此他的政策备受争议。1784年11月，他试图再次用奥属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很多人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再次控制整个德意志，建立“世界帝国”，颠覆整个欧洲的均势。约瑟夫二世公然蔑视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导致很多诸侯——如腓特烈二世、美因茨选帝侯公开反对他。1785年，部分诸侯国结盟，共同应对奥地利的威胁。这说明，当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出现威胁时，各邦国依然能够进行外交协调，以应对威胁。约瑟夫二世又一次被迫让步，他的外交政策代价巨大，且遭遇了失败，导致国内民众普遍对其不满。

这时的俄国统治者显得很明智，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没有趁机扩大在德意志内部的影响力，而是试图与奥地利结盟，以向南部扩大领土。因此，俄国并不打算在中欧扩大势力范围，而是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扩展利益，以巩固自己“第三罗马”的形象。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和约》，规定俄国有责任保护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涉土耳其内政。叶卡捷琳娜二世尽最大努力来使用这项特权。此外，根据该条约，克里木汗国脱离土耳其的统治而“独立”。很快，这个汗国就出现了两股力量，有的人支持俄国，有的人支持土耳其，双方爆发内战。1776年1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军队干涉内战，并于1783年彻底得到了克里米亚。事实上，她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即“希腊计划”，包括攻占君士坦丁堡、恢复东正教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地位，以及强化俄国作为“第三罗马”的形象。本着这样的精神，177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将自己新出生的孙子命名为“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同音。同时，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军事基地建立了一座拱门，上面雕刻着一句话：“这里是通往拜占庭之路”。

奥斯曼帝国感受到了危险，因此，它在1787年决定先向俄国发起进攻。但是，土耳其军队战斗力非常差，俄国很快进行反击，并进入土耳其领土，一直向南进攻。奥地利、普鲁士这两大中欧强国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如果奥地利不采取行动，那么奥斯曼帝国就将被俄国吞并，至少其欧洲领土将会被俄国吞并，这将导致俄国从东边包围哈布斯堡帝国。因此，1787年年底，约瑟夫二世加入战争。表面上，他站在了俄国一边，但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俄国将土耳其全部吞并。普鲁士则对奥地利非常警惕。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其侄子继承王位，即腓特烈·威廉二世。他认为，一旦奥地利、俄国联合起来将奥斯曼帝国打败，那么普鲁

士将会陷入不利境地。此时，普鲁士的西边正在受到威胁，荷兰共和国爆发了“爱国党”（Patriot　Party）领导的起义，他们反对荷兰执政威廉五世。由于“爱国党”背后有法国的支持，而法国又是奥地利的盟友，因此奥地利有可能在东西两面对普鲁士构成威胁。很快，“爱国党”推翻了威廉五世，并抓走了威廉五世的妻子——同时也是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妹妹，因此普鲁士国王决定对“爱国党”采取行动。1787年，他率兵入侵荷兰，恢复了奥兰治王朝，威廉五世复辟。一年后，普鲁士与荷兰、英国结盟。这样，普鲁士的西边暂时安全了，因此腓特烈·威廉二世开始与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1788年1月，普鲁士首相透露了一项“宏伟计划”，即试图让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各自得到一部分土地，以制约奥地利和俄国的势力。普鲁士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有限的扩张，但奥地利必须放弃加利西亚，将其交给波兰。作为对普鲁士的回报，波兰将但泽（Danzig）和托恩（Thorn）割让给普鲁士。约瑟夫二世对此非常生气，他宣称“宁愿发动战争毁灭这一切，也不会允许普鲁士国王获得一个小村落，更休想实现什么‘宏伟计划’”。那年夏天，瑞典进攻俄国，试图帮助奥斯曼帝国，缓解其压力。一场范围更大的欧洲战争似乎快要发生了。

美利坚合众国是欧洲移民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洲的局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评论道：“一片乌云已经在欧洲上空飘浮了很长时间，如果它变成一场暴风雨，谁能保证这场雨一点点都不会落在我们美国人的头上？”他还说：“无论我们保持中立还是克制，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多时候，和平与战争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即使我们变得温顺，也无法保证别人对我们温顺；即使我们没有野心，也不一定能让别人对我们没有野心。”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撤走了驻守在这里的海军。而美国自己的海军非常弱小，因此美国商船不断遭受北非巴巴里海盗的攻击。此时，美国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小小的海盗的侵害。这并不仅仅关乎美国的“荣誉”：美国人对商业的积极追求，不断给予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力量，使其在与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中能够生存下来。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商业受到阻碍，那么它将失去竞争力。1785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接到了的黎波里驻英国大使发来的通知：“无论任何国家，凡是拒绝承认《古兰经》权威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对这些人发动战争，并且要抓到这些人，让这些人成为我们的奴隶。”美国试图与有着强大海军力量的巴巴里海盗讨价还价，但后者越来越得寸进尺。换句话说，此时美国无法保卫其海上安全，因此不得不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欺负。

此时，英、法、西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还紧紧地包围着美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1784年，西班牙关闭了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并且在南边的佛罗里达对美国形成威胁，同时在得克萨斯加强防御工事。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愤怒。1786年，有人在镇民大会和法院会议上散发公开信，并且流传很广：“以色列人的后代成了埃及人的奴隶，我们是不是也要成为西班牙人的奴隶？”此外，美国外交国务秘书（后来改称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想知道，法国是不是“已经完全放弃占领

整个美洲大陆的企图了”。美国担心欧洲人在美国西边建立新的殖民地，因此美国政府发起了西进运动，鼓励人们在新的土地上探险和定居。不过，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英国。此时，英国已经牢牢控制了加拿大，并且重新获得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丢掉的制海权。美国人强烈怀疑，英国不仅在煽动印第安人部落反抗美国政府，还在对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提供支持。1787年12月中旬，汉密尔顿说道：“英国、西班牙以及我们周围的印第安人部落……从缅因到佐治亚，快要把美国包围起来了。”当初正是因为美国人不满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而英国又无法提供保护，所以美国人选择独立。而现在，事实上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更重要的是，独立战争时期的宪政安排已经完全不适合解决18世纪80年代末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统一的行政领导人，国会没有权力规定税收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必须得到所有州的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欠下的债务大部分由各个州来分摊，而每一个州又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因此其信用面临破产。美国没有统一的军队，因为各州不能就军队的供养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很多美国人担心，军队可能会导致民众的自由被破坏。的确，这时的美国像是一盘散沙，联邦政府软弱无力，以至于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个联邦将无法维持，国家将被分成很多部分，甚至导致内乱。美国的最主要的威胁来自西边，美国人对此尤为担心。汉密尔顿已经预见到：“在美国西边的那片广阔土地上，未来将会爆发领土争端，威胁美国的安全。”此外，美国现在还没有能力在西部边境建立可靠的防线，因此其他国家可能会趁机占领真空地带，威胁美国的安全。甚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移民，可能会申请加入大英帝国或者西班牙，甚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样的话，美国就会面临更大的威胁，这是美国人最担忧的。因此，现在的美国人面临抉择：要么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协调全体美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并进行领土扩张；要么美国爆发内战，最终成为其他国家扩张其势力的牺牲品。

因此，1787年，美国13个州的代表齐聚费城，以修改《邦联条例》、制定宪法。但是在会议上，产生了两派意见——“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双方激烈辩论。“联邦党”占据上风，他们以汉密尔顿、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代表，三人曾经合著《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因此被称为“联邦党人”。三人认为，外交政策是美国面临的最关键任务。1787年11月，汉密尔顿曾写道：“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外部的危险，这一原则是对国家政策的最有力的指导。”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封建体系”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这个帝国“软弱无力，不能管理自己内部的成员，无法保障自己不受外部威胁，并且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他们评论道：“德意志帝国的各个邦国彼此相互嫉妒、分歧不断，有的过于骄傲和自负，为了主权问题而矛盾重重，德意志帝国议会效率低下。我们不能成为第二个德意志帝国，必须时刻做好战争的准备，不能因为烦琐的讨论而耽误了时间，否则敌人早就在战场上打败我们了。”二人认为：“即使德意志帝国克服各种困难，可以实现统

一，它的邻国也不会允许这样一场革命发生，因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会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还指出：“美国也不能效仿波兰，因为波兰的每一个邦国都有自治权和自卫权，因此整个联邦是一盘散沙，不得不听任其强大邻国的摆布，最终它1/3的人口和领土被其‘仁慈的’邻国夺走了。”“联邦党人”认为，英国是唯一一个可以效仿的例子。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共同抗击敌人”。杰伊引用了安妮女王1706年写给苏格兰议会的信，并且认为现在的联合王国是一个“完美的联盟”，完全适合美利坚合众国效仿。

1787～1788年，美国宪法在费城获得通过。这部宪法是美国人对英国、德意志、波兰以及自己民族的历史经验所做的总结。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美国宪法的序言称，我们决心“要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根据宪法规定，美国国会做出的所有决定无须各州一致同意，只需多数决定即可，没有任何一个州拥有否决权。宪法还确立了总统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系，总统有权制定外交政策和缔结条约，不过条约要在得到国会两院的批准后才能生效。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前者由各州平等分配议席，后者由各州按照人口比例分配议席。为了吸取波兰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南卡罗来纳农场主、州议会议员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建议下，美国确立了“选举人团”或“总统选举团”制度，以减少国内党争，同时避免外国势力的贿选行为。同时，各州在战争中所欠下的债务都由联邦政府来承担，以恢复政府的“公共信用”。宪法承认了奴隶制的存在，但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此外，宪法允许将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获得的土地之上。不过，各州同意，将在20年内废除奴隶贸易，北方各州普遍希望整个奴隶制能够逐渐被废除。同年，国会制定了《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规定合众国的领土扩张要以接收新的州加入合众国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新州的地位要与已经加入合众国的州完全平等，而不是扩大某一个原有的州的面积。同时，《西北法令》也规定，北美五大湖南边、俄亥俄河北边的土地，应该为自由州，而非蓄奴州。很快，国会又通过了《西南法令》（Southwest Ordinance），允许在西边、南边新加入合众国的州实行奴隶制。1788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与欧洲国家一样，美国通过宪法重塑了内部的政治，以使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更具竞争力。

美国没有模仿普鲁士和俄国的军事制度。这两个国家按军功来奖赏战士，形成一个强大的“军功贵族”阶层，通过这种制度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尽管美国面临战略困境，但并没有学习这两个国家。的确，有一些爱国人士建议，可以按照官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表现来论功行赏，以建立一个贵族阶层，世袭其爵位，目的是强化人们参与保卫国家的积极性。“辛辛那提协会”（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军官“联谊协会”，组织者建立基金，为退伍老兵提供抚恤，以使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经为美国人的自由与权利所做的努力与牺牲”，以此来“巩固美利坚合众国的团结，捍卫国家的荣誉”，同时“对功勋卓著的军官及其家属表达敬意”。不过，尽管伟大的建国之父们（尤其是华盛顿）曾经欣然接受邀请，表示愿意加入该协会，但协会依然受到

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认为，这将导致在美洲大陆培养出来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这是违背合众国宪法的。最后，美国没有采用军功制度，而是建立常备军制度，同时辅之以民兵制度。民兵制度容易培养出强壮的战士，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规定：“纪律严明的民兵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时间会告诉我们，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这两种战争动员方式，究竟哪个会更加有效。

一场类似的激烈辩论也在中东欧展开。奥斯曼帝国在1787~1788年的俄土战争中被打败，割让了大片领土。波兰人感到非常担心，他们担心自己也会步其后尘。当时的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是一位改革家，他决心让国家壮大起来，以免在俄国的压力下不战而败。1788年10月，他召集了一个四年议会。与以往的议会不同，这届议会没有在6个星期后闭会，而是决定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强化中央集权，使波兰联邦变得更加强大。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制定了改革议程，处理国内的各种问题，包括军队和金融改革。同时，他决心废除糟糕的自由否决制，以使国家政令统一。他希望通过这些改革，防止波兰再次分裂，否则这个联邦在18世纪末就要不复存在了。同时，他也准备与俄、普等国家结盟。1789年5月，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见面，并告诉她，波兰改革之后可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配合俄国进攻土耳其，双方可以分享从土耳其获得的土地。他要求获得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一个黑海港口，以补偿1772年波兰失去的土地。但这项提议遭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拒绝，不过她勉强同意撤走部署在波兰边界的军队。20多年来，波兰似乎第一次重新变成了欧洲舞台上的一个独立国家。

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帝国像波兰那样被其他的国家所瓜分，同时各个诸侯也担心自己成为奥地利或者普鲁士的傀儡，因此它也希望改革帝国的制度。1760~1780年，各个邦国矛盾重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纷争不断，导致德意志议会几乎陷于瘫痪。但在必要的时候，各诸侯依然能够彼此协调，共同应对外敌。1787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副首相（同时被认为是首相接班人）卡尔·冯·达尔贝格（Karlvon von Dalberg）主教发起了一场改革，旨在恢复帝国的凝聚力，实现共同目标。他指出：“德意志帝国宪法已经变得脆弱，导致整个帝国被它的邻国所鄙视。”他声称，解决办法是，在尊重帝国“永久宪法”的前提下，再制定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办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议会产生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负责日常政策的制定。同时，还有一些人呼吁，民众应该更广泛地参与帝国的政治事务。178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传道者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普法伊费尔（Christoph Ludwig Pfeiffer）曾指出，帝国选举不应该只是9个选帝侯的事情，应该由帝国议会中所有邦国的代表来决定。不过，这些提议并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与美国不同，德意志帝国的各个邦国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想保卫国家的安全，就必须集中帝国的权力，但这又会破坏各个邦国的“自由”。直到这个时候，这个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18世纪80年代末，欧洲国际体系的变化对法国的影响是最明显的，

导致了法国政治出现了惊人的变化。1786年8月，法国财政总监承认，法国政府已经陷于破产。1787年2月，路易十六被迫召开贵族会议，试图增加对特权等级的税收，但遭到了贵族的抵制，三个月后会议解散，财政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结果，当1787年9月普鲁士入侵荷兰时，法国由于没有经费而无法进行干预，这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丢脸的事。法国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说道："法国已经倒塌了，我怀疑它还能否再站起来。"外交政策的失败，使得法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彻底失去了耐心，最终导致旧政权的合法性面临巨大危机。人们认为，国王和王后都应该对外交政策的失败负责任。法国人反对与奥地利保持同盟关系，因此对奥地利公主、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非常反感。不少人认为，这位王后将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带到了法国，而且操纵大权、败坏政治、放纵挥霍，造成了恶劣影响。事实上，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她的哥哥约瑟夫二世曾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法国的盟友，而她却为自己的哥哥辩护，没有维护法国的利益。普通民众也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非常反感，底层百姓认为她粗俗、下流、令人厌恶。不过，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一点是，她奢侈无度，导致了国家的破产，同时她还败坏了政治风气。王室的失败政策使得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批评人士问一位大臣："现在政府还能运行得下去吗？如果得不到民众的同意，政府还能有钱可花吗？"这句话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法兰西要想维持其大国地位，就必须增加税收，但只有扩大政治参与，民众才有可能支持政府的税收政策。

此时，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越来越陷入窘境。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民众和金融市场都已经对波旁王朝的大战略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将钱借给这个政府。这意味着，法国将难以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压力，除非贷款人能够获得非常高的利息。这导致法国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迅速下降。1789年3月，外交大臣发出警告，如果法国再不解决国内危机，如果它依然无法恢复其力量，那么整个国家的外交事务将一事无成。而外交的不利境地，使得政权更加丧失合法性，因此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些大臣想出了不少应急之策，如强制增加税收，并向巴黎高等法院施加压力，但这些愚蠢的做法使得旧政权面临更多的危机。如果此时法国打一场胜仗，帮助荷兰恢复自由，或许有助于法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有的人强烈指出，这样做有助于避免法国走向歧途，或许可以挽救国家。然而，这无法成为现实，因为法国政府"在镇压本国人民时，总是显得非常积极；而在抗击外敌时，总是变得极其软弱"。换句话说，法国政府拒绝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保卫自己在欧洲的战略利益，它只能与自己的人民相对抗。

1788年8月中旬，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从1614年开始，法国已经有将近200年时间没有召开三级会议了。民众起草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本来，民众并不想推翻君主制。当时很多人依然认为，君主制政体最有利于维护法国国内的平静，最有利于抗击外部侵略。民众也并非特别反对贵族制度，而是认为这种制度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的利益服务。1789年5月，三级会议终于召开。此时，民众已经对

国王和大臣感到失望，因此希望以三级会议为契机，推动国家的改革。三级会议的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传统上，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每个等级各有一票表决权。但此时，投票规则发生了变化，每一个代表均有投票权。这样，由于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较多，因此他们把握了主动权。国王拒绝了第三等级的要求，因此6月中旬，第三等级的代表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并宣称要制定一部新的法国宪法。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而不少农民则感到巨大的恐慌，他们担心奥地利的入侵以及贵族的镇压，因此他们攻打贵族的庄园，并烧毁地契。但此时，改革者们并不想摧毁君主制本身，而是想维护其存在。一位律师曾经这样说过："君主制符合客观与主观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并不是要削弱它，而是要使其更加完善、更加强大。"路易十六如果能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他依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并持续到18世纪的最后10年。这次革命有很多原因，其主要原因是，法国人决心要让自己的社会变得更加完善，以在欧洲舞台上重建大国地位。如何对待贵族，成为这次革命的核心议题。之前，改革者认为贵族会支持自己，但事与愿违。因此，到了1789年，改革者决定不再说服贵族支持自己。8月初，国民议会发表声明，废除贵族享有的封建特权，新的社会秩序应该以才能和贡献为基础，而不是以出身和血统为基础。8月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颁布。11月，第一等级的特权也被废除，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将教会的财产国有化，并将教会的土地变卖，利润以"指券"（assignats）[1]的形式充公。1790年2月中旬，国民议会宣布，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统治而归国家管理。6月，贵族的特权最终被正式废除。之后，国民议会规定政教分离，教会不得凌驾于政府之上，并且要求教士宣誓忠于国家。国民议会规定法语为全国通行语言，并对一些少数族群（如布列塔尼人、佛兰芒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日耳曼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使用法语作为沟通语言，同时在西部和南部一些方言较重的地区推广标准的法语。正如天主教神父、改革者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所说，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法国变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消除各族群的差异，使之成为一个民族"。

最初，其他欧洲大国没有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危险"，甚至不少国家的统治者对法国民众持同情态度。很多英国人认为，法国民众是受到了英国辉格党光荣革命的鼓舞，因此他们坚信法国人最终一定会获得自由。普鲁士首相认为，法国将出现一个开明的政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也对此表示欢迎。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干预法国大革命，没有计划使用武力恢复法国君主的绝对权威。1789年7月底，奥地利首相考尼茨明确表示："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当时的德意志显得比较安静，没有怎么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只是在德意志西部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活动，后来列日王子主教区也发生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活动，不过很快均被镇压。在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则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1789年年底，他废除农奴制的计划在匈牙利这个极其保守的地方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同一年，约瑟夫

二世试图废除奥属尼德兰的代议机构，但遭到了武力反抗。奥地利各地的暴乱都显示出了离心倾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希望加强中央集权，以提高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但很多人拒绝服从中央政府，只尊重地方精英的权威。

1790年，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一书出版。伯克认为，这场革命是对传统、宗教、财产和“骑士精神”的攻击，是“建立在感情、习惯和道德舆论基础之上的”。不过当时很少有人同意伯克的观点。在这本书的开头，伯克说道：“法国、整个欧洲甚至欧洲以外的地方，似乎都已经处于危急之中，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事件。”《法国革命论》不仅是文学和政治上的一座里程碑，也在出版业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卖了1.7万～1.9万册，读过这本书的人则更多，与这本书相关的小册子有100多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对雅各宾派进行口诛笔伐。他谴责说，这些信奉“武装教义”（armed doctrine）的人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其危险程度已经不亚于当年曾经称霸欧洲的路易十四。他最为担心的是，法国的革命将会对“中欧”造成影响，由于德意志的各个邦国“彼此联系紧密”，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可能会一下子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伯克引经据典，认为欧洲其他国家必须保卫自己的安全，防止遭受法国革命的冲击。他支持欧洲国家对法国进行干涉，明确反对“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这个“国际法中的错误原则”。

其他国家对法国的危机很少表示关注，主要原因是它们正在集中精力处理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很多国家的统治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会彻底摧毁法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影响力。巴士底狱被攻占后，英国外交大臣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评论道：“目前的形势对于法国来说是致命的，法国内部的混乱一定会导致其国力的衰落，因此这是对英国非常有利的时机。”普鲁士人也对法国旧政权的垮台感到高兴，因为普鲁士的宿敌奥地利现在已经失去了法国波旁王朝这个盟友。1789年8月，巴士底狱被攻占一个月之后，普鲁士国王就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年底对奥地利发动进攻，除非约瑟夫二世在巴尔干问题上做出让步。几个月过后，他宣布派兵进入位于奥属尼德兰的列日王子主教区，镇压了那里的反政府革命。他并非要帮助奥地利恢复统治，而是要占领该地区，削弱奥地利。1790年1月，法国正陷入混乱，普鲁士则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从两面包围奥地利。一场欧洲大战似乎马上就要爆发。

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在就奴隶制的存废问题进行辩论。1787年5月底，一部分议员、医生、神职人员在伦敦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忠诚于宗教精神与人道主义，他们强烈呼吁废除整个奴隶制，尤其是要求取缔横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1791年4月中旬，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的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这个问题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当然，奴隶并不仅仅是西方人慈善行为的被动接受者。1791年8月，法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植园奴隶起义。黑人奴隶抗议法国新政府，因为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继续实行奴隶制，没有将

《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权利推广到有色人种。这些黑人奴隶大多来自非洲，起义军的领袖将自己看作非洲部落的首领，而不是所有人民的代表。他们模仿非洲的王国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同样坚持实行奴隶制。同白人殖民者一样，黑人起义领袖也将另外一些黑人俘虏贩卖到西班牙和英国。对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西班牙来说，这次起义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每年要从加勒比和美洲的种植园中获得大量的税收，这是欧洲国家维持其国力的基础之一。它们担心圣多明各和海地的黑人奴隶起义会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南美洲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因此，奴隶制的存在对于维系欧洲各国的力量均衡有重要作用。

法国大革命原本并没有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注意，但革命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欧洲国际关系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第一个变化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1790年2月下旬，约瑟夫二世去世，其弟利奥波德二世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他发现他哥哥的激进改革措施已经引发了国内危机，因此他决定调整政策。同时，他决定修复与北部邻国之间的关系。1790年7月，他决定放弃约瑟夫二世时期对土耳其的战争政策，同时缓和与普鲁士的关系。两国达成《赖兴巴赫协定》（Convention of Reichenbach），决定抛弃前嫌。由于一时难以在巴尔干获得新的领土，利奥波德二世同意放弃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同时普鲁士答应，以后将继续支持哈布斯堡家族人士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协定的内容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大宿敌能走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地震。德意志其他邦国感到极其不安，它们担心神圣罗马帝国将被哈布斯堡、霍亨索伦这两大家族瓜分。最重要的是，普、奥两国决定合作对付法国，而当时法国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国家。普鲁士开始制订计划，准备吞并尤利希（Jülich），并要求法国补偿普鲁士的损失（因为法国占领了阿尔萨斯）。

另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变化，是法国大战略的巨大变化。法国革命者认为，奥地利再一次成为法国的主要敌人，英国已经不是主要敌人。法国再一次将其大战略的重心转向东方，而不是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此时，波旁王朝试图利用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缺陷，逐步蚕食其领土，以扩大法国的疆界，并巩固自己的边防。法国人认为，必须保卫自己的“天然边界”——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这对于地缘政治具有重要意义。1790年3月上旬，一位资深作家对法国“宪法之友”社团说：“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边界，法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卫自己边界的极限。”这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莱茵兰和普法尔茨，将成为法国与普、奥两国交战的最前线。法国新的领导人强调，应该将革命推广到整个欧洲，这样才有利于欧洲的团结与法国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革命价值观的输出对于法国非常重要。这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在一个由旧体制主导的欧洲，法国不会获得安全，大革命的成果无法得到保障。1791年7月，有人曾给巴黎外交委员会写信：“只有当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暴君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担心战争。”

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了法国革命者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说，德意志的一切事物——各式各样的小型邦国以及反动教会

对土地的分割都与新秩序格格不入，都是法国革命者所鄙视的。德意志的一些贵族和阿尔萨斯的主教曾经向帝国议会和皇帝请愿，抗议自己的封建特权和教权被废除，法国革命者对这些贵族表示嘲讽和嗤之以鼻。更糟糕的是，法国旧政权的流亡者在德意志西部的军营中安身（尤其是在靠近科布伦茨的地方），他们寻找机会，试图反攻倒算、复辟旧政权。如果他们与德意志的一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那么法国新政权将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1791年8月，那个时刻似乎到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萨克森发表“皮尔尼茨宣言”，表示了对法国局势的担忧。皮埃尔·勒布伦（Pierre LeBrun）曾经是一名激进的记者，后来担任了法国外交部部长。他认为：“皮尔尼茨宣言意味着专制暴君正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由的国家。”1792年2月，托马斯·潘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我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消灭德意志的那些暴君们，进而实现整个德意志的自由。只有当整个欧洲成为革命者的世界时，法国才有可能得到和平与安全。”潘恩早年曾经反对任何国家对外输出自由，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看法。

外部压力也对法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者原本并不想推翻国王，相反，他们让国王继续掌管外交事务。然而，1790年夏天，英国和西班牙为争夺太平洋东北沿岸的殖民地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努特卡湾危机（Nootka Sound crisis）。5月，法国新任外交大臣蒙莫兰伯爵（Count de Montmorin）告诉国民议会，国王将遵守与西班牙的家族盟约，因此将站在西班牙一边对英国宣战。这引起了不少革命者的愤怒，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在没有得到国民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国王没有权力这样做；或许是因为，有人认为法国不应该再履行过去签订的条约，不应该再为其他专制国家做出牺牲；或许是因为有人担心国王会利用这次战争来恢复旧的专制统治。多数人都认为，一个共和制的法国，更有利于维护法国的和平；当法国周围的国家都成为共和国时，法国的和平更有保障。只有少数人认为“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泛滥都不是好事情”。因此，5月底，国民会议通过法令，澄清了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国王依然有权任免大臣、外交官和军官，但宣战权将不再由国王所有，而是由国民议会所有。同时，国民议会强调法国不能对其他国家发动征服战争，也不能侵犯其他国家的自由；违反这些法令的大臣将会受到起诉。此外，革命者要求法国实行透明的外交政策，废除秘密外交，罢免旧体制中那些不合格的外交官。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出现了，它挑战了欧洲国际体系合法性的基础。

1791年11月初，国民议会颁布法令，所有政治流亡者必须上缴其财产，否则将予以没收。路易十六否决了这一法令。之后，国民议会决定对政治流亡者先行采取行动，并要求路易十六告诉德意志帝国西部的诸侯们，不得再继续收留法国的政治流亡者，必须将其驱逐。如果德意志的诸侯们拒绝这么做，那么法国将自己执行该行动，也就是说将对德意志帝国的这些邦国发起进攻。路易十六表示支持这项法令，因为他将这次战争看作恢复自己权力的机会。如果战争能打赢，那么他可以将人们团结到自己身边；如果战争失败，那么他可以趁机将革命势力消灭。而背地里，他又勾结其他大国，希望它们能帮助自己恢复权威。王后和布

勒特伊男爵（Baron de Breteuil）也鼓励他这么做，并与奥地利进行秘密联络。1792年1月底，法国向奥地利发出了最后的通牒。3月初，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Francois Dumouriez）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他是一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4月中旬，法国对奥地利宣战。法国宣战的借口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试图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尤其是“他宣称要支持德意志的诸侯获得法国的土地”，法国人认为这是对“法国主权”的直接侮辱。6月13日，普鲁士加入战争，第一次反法联盟形成。1792年7月底，反法联军指挥官不伦瑞克公爵发表宣言，表示“阿尔萨斯和洛林应该归德意志的诸侯所有”，并且德意志应该“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帝国”，同时“反法联军应该努力恢复法国的秩序，结束法国的混乱状态”。显然，这两个目标是相互联系的，只有打败了法国，才能从法国手里获得领土。至此，法国大革命战争终于爆发。

在法国人看来，这既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也是一场战略之争，很多法国人认为二者是无法分开的。法国在对奥地利的宣战书中称自己只是在抵抗侵略，而不是在侵略他国。同时，法国人强调“不会破坏其他任何民族的自由”。1792年11月中旬，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颁布《对外国人民友好和援助法案》，保证“将对那些希望获得自由的民族给以支持，并提供帮助”。国民公会不仅拥有立法权，还有行政权，它命令法国军队给外国人民送去帮助，并“保护那些已经获得自由或者希望获得自由的民族”。此时，法国必须首先解决比利时问题，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普奥联军距离法国最近的补给站。如果法国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不可能实现其“天然疆界”的愿望。同时，比利时的革命者要求得到法国的帮助。1792年3月～1793年4月，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和皮埃尔·勒布伦相继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他们认为，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从奥属尼德兰驱逐，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对法国友好的、由雅各宾派控制的共和国。皮埃尔–约瑟夫·康邦（Pierre-Joseph Cambon）认为：“如果奥属尼德兰的人无法自己完成革命，那么我们有必要帮助他们，我们应该暂时接管那里的权力，以最好地维护那里的人们的利益。”

俄国一直置身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1791年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想协助维护德意志的秩序。当时这位女沙皇正在集中处理自己家门口的问题，没有精力参与德意志事务。后来，她之所以支持普、奥干涉法国，并为其提供道德支持，是因为她想趁波兰虚弱的时候，联合普、奥两国对波兰进行瓜分。当时情况比较紧迫，她不得不对波兰下手，因为，1791年5月，波兰已经制定了一部新宪法，目的在于使得波兰联邦强大起来，以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延续其生命。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波兰的改革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波兰的改革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正好相反，波兰《五三宪法》规定萨克森可永久世袭、兼任波兰国王。同时，新宪法不顾贵族的反对，废除了贵族的“自由否决权”，加强了国王的集权，试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叶卡捷琳娜二世正是因为担心波兰会变得强大起来，才反对波兰的新宪法。因此，1793年1月，叶卡捷琳娜二世说服腓特烈·威廉二世放弃斯坦尼斯瓦夫，两国再次共同瓜分波兰。普鲁士获得了波兰西部的大部

分土地，俄国获得了东部的大部分土地，并且两国强迫波兰废除新宪法，恢复贵族的“自由否决权”以及他们选举国王的权力。1793年9月，在波兰的最后一次议会中，全体议员以“沉默”的方式进行抗议，但还是被迫批准了将自己分割开来的决定。一年后，波兰人在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sciuszko）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试图捍卫自己的独立，但最后以失败告终。1795年，俄、普、奥三国代表再次签订瓜分条约，将波兰的国土全部瓜分。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得波兰最终亡国，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其他国家或许已经从中有所借鉴。

与波兰相邻的德意志，对于波兰的命运深感震惊。一方面，大多数德意志人认为，波兰是一个迷信的、堕落的、懒惰的、倒退的、残忍的、固执的民族，波兰被瓜分是应该的；只有将波兰瓜分后，其内部的各教派、各少数族群才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另一方面，德意志与波兰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联邦，内部分裂严重，外面被强国所包围。一位宣传家警告人们：“如果德意志帝国不进行及时的改革，那么波兰的命运或许会在德意志重演。”主张德意志帝国改革的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 Jacob Moser）也警告人们：“当波兰完全被瓜分时，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同时，1792年9月中旬，不伦瑞克公爵领导下的奥普联军在瓦尔密（Valmy）与法军遭遇。仅仅用了几个月，法军重挫奥普联军，将其赶出法国境内，迫使其退到奥属尼德兰和德意志西部。11月底，法军占领萨伏依。之后，法军试图进入低地国家，但这损害了英国的安全，导致英法两国关系紧张。1793年2月，法国国民公会向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宣战，一个月后法国与西班发生了冲突。所有这些使得法国政治变得更加激进，同时战争使得不少民众出现了妄想症。1792年4月底，法国攻打比利时失利，不少人认为是因为路易十六在暗中破坏法国的军事行动，人们怀疑国王组建了一个神秘的“奥地利委员会”（Austrian Committee），与奥地利相互勾结。5月底，国民公会规定，所有的教士必须宣誓不得违反1791年颁布的新宪法，拒绝宣誓的教士一律被流放。9月，革命政府对通敌者、叛国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处决，整个国家笼罩在恐怖气氛中。很快，不少人怀疑路易十六与外国势力相勾结。8月初，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并且以叛国罪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793年1月底，国王最终被送上断头台。之后，旧政权的统治者纷纷被审判、处决，同时法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4月，法国在战争中一度受挫，因此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以配合战争。9月，土伦的要塞落入英国手中，法国人认为这是叛国者与外国相勾结的结果，因此开始大规模处决叛国者。

此时，法国已经被敌国包围了，革命者不得不对社会进行改革，以应对外部的挑战。2月底，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征用30万士兵，几个月后革命军队成立。国民公会宣布将教会的土地没收，以这些财产为基础，政府发行指券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此外政府还强制要求富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军队的开支。1793年8月底，在法国国防部长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建议下，国民公会宣布“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为国

家服务，每一个人要随时做好应征入伍的准备”。卡诺动员全民参军，因此被称为“胜利的组织者”。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愿意这样做。很多人不愿意参军，布列塔尼的保皇党发动了反革命叛乱，旺代（Vendée）地区的农民也反对共和国政府；此外，法国南部也有一些人造反，他们多年来一直不服从巴黎中央政府的权威。很快，这些反革命团体开始与英国合作，18世纪90年代，英国多次派遣军队试图在法国西南沿岸登陆，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法国共和国政府使用了极其暴力的方式。1793年10月，国民公会对西部的军队发出命令：“自由的战士们，你们必须剿灭旺代的土匪。”军队镇压旺代叛乱时，手段非常残忍，他们对叛军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将其直接烧死、淹死。在这个省，有10多万人被杀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约1/5的住宅被摧毁。国民公会之所以下令残酷镇压旺代叛乱，是因为革命者认为，反叛者一直在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同时革命者也认为，只有将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全部杀掉，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才能出现。

法国大革命使得整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全部释放出来，法国国力迅速强大，超越了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当时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法国建立了一套完美的国内组织模式，可以有效地进行对外军事行动，这种模式不仅优于专制主义国家，而且其协商性财政–军事体制的效率已经超过了英国。例如，托马斯·潘恩预测，英国的君主–议会混合制，已经不适合时代需要，最终将会摧毁这个伟大的国家，而欧洲大陆的那些君主国家，也都被一群寄生虫式的贵族所拖垮。他认为，美国和法国的这种现代共和制才是适合时代需要的，它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进行战争”。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法国军队占领了低地国家、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北部。法国这样做的动机不仅仅是要建立“天然疆界”，更是希望消灭各国的反动政府。法国革命者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终结战争，此时他们并不想让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1792年12月中旬，国民公会发表声明：“法兰西人民宣布，任何不承认或者拒绝接受自由、平等原则的人，以及任何希望保留、复辟国王权力和封建特权的人，都将被视为法兰西人民的敌人。”国民公会表示，法国将会一直战斗到底，直到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接受平等原则且建立一个“自由并且对法国友好的政府”。从国民议会到立法议会，从国民公会到后来的督政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届政府，其首要目标并非是要获得在欧洲的绝对权力，而是要确立欧洲的永久和平，以实现法国的绝对安全。

然而，革命者们很快发现，法国的每一次扩张并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安全，而是变得更不安全。比利时被占领后，很多法国人认为应该趁势进军荷兰，目的是防止其加入反法联盟。正如国防部部长迪穆里埃所说，法国试图“防止荷兰加入一个强大的、可以摧毁我们的联盟”，同时“没有荷兰，我们在比利时就会站不住脚”。1793年2月，法军第一次试图进攻荷兰，但没有成功；1794年年底，法军成功了；到1795年1月中旬，阿姆斯特丹被占领。4个月后，法国与荷兰的雅各宾派共同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在意大利，从1796年开始，杰出的年轻将军拿破仑·波拿巴带领法国军队迅速推进，从北向南一直攻打到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并且在意大利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政

权：1796年建立了奇斯帕达纳共和国（Cispadane Republic），1797年建立了奇萨尔皮尼共和国（Cisalpine）和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1798年建立了罗马共和国，1799年建立了帕尔瑟诺佩共和国（Parthenopean Republic）。1798年3月，法国占领瑞士，建立了“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从这些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法国不仅处于恐惧之中，而且贪婪无度。

不过，此时法国最关心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德意志。从1791年春天起，法国外交官就准备改造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准备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小的邦国合并，建立大的邦国，这样可以建立缓冲地，以保护法国边境的安全。法国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地缘政治安排，是因为法国人心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理念。1795年，法国一位革命者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国组成的庞大怪物……我们必须将革命推广到那里，消灭这个庞大怪物，法兰西共和国将不懈奋斗，最终摧毁这个帝国。”督政府时期，一名顾问也说过：“一个皇帝领导着众多的邦国，这个怪物是我们法国的敌人。”法国人深感不安。法国要想建立“天然疆界”，就必须将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内部的飞地——如蒙贝利亚尔——全部清除，同时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全部兼并。法国还和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雅各宾派合作，尝试在各地建立共和国，美因茨共和国便是其中一个短命的共和国。很多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对法国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法国人是来解放自己的。他们认为德意志是一个旧式的封建社会，而法国则代表了“理性”与效率。不久，法国的革命者发现，上述做法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因为它缺乏合法性，并且导致了外交事务的低效。新建立的那些共和国尽管是法国的盟友，但对法国没有什么帮助；相反，为了支撑这些共和国，法国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因此，法国决定停止建立新的共和国，搁置在德意志南部建立共和国的计划。

在莱茵河东岸，德意志的诸侯们看到这一切，觉得越来越恐惧。之前，德意志的中小国家担心整个帝国会向波兰那样，被普、奥两个大国瓜分。但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被法国吞并。而中小邦国没有什么力量，它们要想对付某一个大国，就必须与其他大国合作，这使得它们陷入困境。符腾堡的腓特烈公爵（Duke Frederick）等人公开表示，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领土成为大国的“玩具”。可是，他们的砝码又非常少，不得不受制于大国。1795年，巴伐利亚驻维也纳公使说：“神圣罗马帝国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国、英国和法国。”到18世纪90年代末，德意志的诸侯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个大国再会为他们火中取栗了。因此，诸侯们不得不就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改革问题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辩论。1790年，勒内·卡尔·冯·森根堡（Renatus Karl von Senckenberg）曾经说，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组建共同阵线，一致对外，欧洲才不会有任何国家敢欺负他们。不少人同意他的看法。奥地利首相甚至说，全体德意志人应该来一场“全民战争”，即德语中的“全民防御”。1794年9月底，德意志中小邦国的领导人在威斯巴登（Wilhelmsbad）召开会议，最后一次尝试进行联合防御，以保卫帝国的安全。但是，他们的努力受到了维也纳方面的阻碍。奥地利担心，哈

布斯堡王朝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可能会受到削弱，同时担心普鲁士可能会趁机独大。

德意志的多数邦国希望与法国媾和。1794年年末，帝国议会认为，国王应该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与法国媾和。换句话说，神圣罗马帝国准备承认革命后的法国作为帝国的担保国。普鲁士是第一个退出反法联盟的国家。1795年4月，法国热月党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Treaty of Basel），普鲁士承认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并承诺不再参加反法联盟，而是严格保持中立。作为回报，法国承诺将维护德意志北部的中立，并且允许普鲁士对那里占据主导地位。两国就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达成协议，普鲁士不对分界线以西的邦国的安全负责。两国还签订秘密协议，允许法国最终吞并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此时，只有奥地利下定决心要与法国战斗到底。但奥地利面临着困难，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其他邦国越来越不愿承担对抗法国的责任。奥地利担心，如果战争长期持续，那么自己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削弱。奥地利统治者在德意志南部采取高压政策，激起了当地民众和统治者的联合反抗。利奥波德二世早逝后，弗朗茨二世继任帝国皇帝。1795~1796年，弗朗茨二世试图利用其在意大利的属地，从后方进攻法国，以缓解法国对德意志的压力，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很多人纷纷指责弗朗茨二世为了其在意大利的利益而牺牲了德意志的安全，再次犯了300多年前其先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曾经犯过的错误。

更糟糕的是，弗朗茨二世远逊于其对手——法国派往意大利的新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指责巴黎的热月党人表现糟糕，认为它已经不适合领导国家。1797年9月，他将自己的战绩转化为政治资本，联合盟友发动“雾月政变”。督政府被推翻，拿破仑宣布建立“执政府”。一开始，拿破仑似乎并没有打算制定一个大战略蓝图，他对自己的或别人提出的计划都持怀疑态度。后来曾长期辅佐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回忆说：“拿破仑从来不制订什么计划，他从来都是根据刚刚发生的事情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拿破仑的字典里面经常出现的是“光荣”和“命运”这两个词。但二者本身并没有构成大战略，因为事情总是处于变化和冲突之中。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政策中发现某些规律。首先，拿破仑试图控制整个欧洲，将其统一起来，并使之为法国的利益服务。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先控制德意志的资源，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使之为法国的利益服务。这种做法意味着法国必须进行长期的对外扩张，不仅要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为敌，还要与俄国和英国这两个更加强大的国家为敌，它们是欧洲秩序的最终裁决者。要想对付俄国，不仅要先征服德意志，还要控制波兰、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要想对付英国，削弱其权力基础，法国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进攻英国本土：或者夺取英国的海外殖民帝国（这是英国权力的来源）。后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曾经回忆道，他当时的目标就是“重建波兰王国，使之成为反对俄国野蛮人的屏障；将奥地利分割，在意大利建立法国的附庸国，让匈牙利独立；粉碎普鲁士；在英国和爱尔兰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控制埃及，并将土耳其的势力赶出欧洲，解放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

面对法国的压力，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与法国媾和。1797年10月，双方签订《坎波福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这标志着欧洲地缘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奥地利将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割让给法国，换取距离自己较近的威尼西亚，威尼西亚不再是独立的国家。此外，奥地利放弃对德意志西部的宗主权，不再统治低地国家。不过，这一条约还有更深刻的影响。1797年11月，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拉施塔特召开，由于《坎波福米奥条约》规定莱茵河左岸归法国所有，因此议会讨论如何对这一地区的诸侯们给予补偿。这样，法国就完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领土分配的仲裁者。在波旁王朝时期，法国对德意志的政策是，维持帝国内部的复杂结构，以使其相互制约；但拿破仑的政策是合并一些小的邦国，建立面积比较大的共和国，使之成为法国的附庸。不过，同一年，拿破仑在一次讲话中将神圣罗马帝国称为“一个长期被无数人侵犯过的老妓女”，这预示了神圣罗马帝国下一步的命运。因此，《坎波福米奥条约》实际上只是一个停战协定，一年后法国再次发动了争夺德意志的战争。与之前法国的革命者相比，法国的新统治者拿破仑的外交政策更具颠覆性，他完全改变了欧洲国际体系。他之所以能掌权，就是因为他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承诺将会比之前的督政府干得更出色，下一步将会与旧的欧洲决战。正是他的外交战略，使得他有能力“完成”法国国内的革命。君主制的崩溃使得法国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大大提升了法国对外作战的能力。

1798~1799年，拿破仑继续在多个方向发动进攻。他派出外交官，负责德意志领土的分割与重组，很多国家被无情地消灭。1798年1月，法国占领瑞士，以扩大法国的领土，同时保障阿尔卑斯山山口的安全。1798年夏天和秋天，爱尔兰发生了反对英国的起义，法国向爱尔兰派出军队，以打击英国，不过此次战略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大约同一时间，拿破仑踏上埃及的土地，并与奥斯曼帝国开战；第二年他又入侵巴勒斯坦。拿破仑并非想要向东扩展领土，而是意图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打击英国在印度的力量，以削弱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拿破仑对其外交部部长塔列朗（Talleyrand）说：“要想真正摧毁英国，我们就要先夺取埃及。”同时，法国军队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推进，在1799年占领了那不勒斯。在加勒比海和大洋深处，法国不断对英国的船只进行骚扰。加勒比是英国的主要糖料生产地，英国及其盟友以此获得了大量的经费，因此法国试图切断其糖料供给。拿破仑还试图夺回原本属于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在战术上是进攻性的，但在战略上依然是防御性的。不过，实际上这里所说的防御性和进攻性战略没有什么区别：法国要想获得绝对安全，就必须让其所有邻国（无论远还是近）陷入绝对的不安全。

拿破仑上述一系列新的进攻行动，使得欧洲其他大国立即做出反应。法国进攻瑞士和奥斯曼帝国后，奥地利外交大臣图古特（Thugut）感到深深的忧虑，但他最担心的还是德意志的安全。1798年7月，他写道：“如果法国继续控制瑞士，士瓦本就会爆发革命，之后遍及整个德意志……一旦德意志被毁灭，那么整个欧洲就将发生剧变。”他担心，一旦德意志不复存在，那么欧洲其他国家也将被法国占领。俄国也持同样的

观点。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逝世，保罗一世继任新沙皇。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法国大革命更加敌视，而且对拿破仑进军地中海和黎凡特的行动深深担忧。最重要的是，保罗一世想要恢复德意志各邦国之间的均势，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晚年所忽视的。有一位巴伐利亚外交官曾说，过去俄国一直很被动，如今“它作为主角积极投入保卫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因此，1798～1799年，在英国的资助下，奥俄联军对法国驻扎在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军队发起进攻。同时，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第二次反法联盟正式组建。

面对新一轮的国际冲突，英国寻求规避其战略软肋，并使内部凝聚力最大化。1798年爱尔兰发生叛乱，法国趁机向爱尔兰派遣远征军，这再一次证明了英国的西侧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敌人可以通过广阔的海洋对英国构成威胁。1800年，威廉·皮特（小皮特）内阁提出《联合法案》（Act of Union），意图将英国和爱尔兰的议会合并。不少人认为，政府应该放松对天主教的管理，这样可以缓解英国与爱尔兰绝大多数人之间的矛盾，并有助于天主教徒参军，共同对抗法国的侵略。英国驻爱尔兰的一位官员说：“如果英国不能让它与爱尔兰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那么欧洲其他国家将会控制爱尔兰，尤其是法国。”不过，政府最后没有这样做，因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宗教为理由对其进行了阻止。

而此时，站在风暴中心的德意志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德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变得团结起来，它缺乏凝聚力，无法将敌人拒之门外。19世纪初，一位宣传家希望“德意志人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样我们自己才可以最终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享有我们自己的资源”，只有如此，“德意志才不会成为外国军队争夺的牺牲品，我们的人民才可以摆脱暴君的专制统治”。此时，仍然有人希望德意志的某一个大国能够肩负起历史使命，实现统一德意志的大业。例如，德意志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希望普鲁士成为“领导德意志统一的中心力量……它保护德意志的领土不被掠夺，使民族免受外国的压迫”。然而，此时的普鲁士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从1795年起，普鲁士不得不放弃对德意志人民的承诺，逐渐收缩其力量，退守到德意志北部和东部的狭小地带。这说明，在1800年左右，德意志依然没有展现出其全部潜力。德意志有2/3的人（1 600万人）没有生活在普鲁士或奥地利，他们的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

拿破仑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也影响了大西洋的另一岸。18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一直警惕地观察着欧洲发生的变化。由于英国对法国采取海上封锁政策，美国的一些船只也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劫掠，这导致了美国对英国日渐不满。1794年，约翰·杰伊代表美国，与英国签署了通商与航海条约，达成妥协。此外，法国的野心也直接给美国带来了危险。法国试图购买佛罗里达，1800年10月又与西班牙签订了《圣伊尔德丰索密约》（Treaty of San Ildefonso），准备将原属西班牙的路易斯安那全部占领。这导致美国政府非常恐慌。同时，美、法两国海军不断发生冲突，双方“不宣而战”，战斗从1797年一直延续到1800年。这些事件说明，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国际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所要讨论的中心

议题。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曾说："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是当时我们国家国内政治的主要分歧。"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1794年签订的《杰伊条约》（Jay Treaty）只在参议院通过，没有在众议院通过，该条约和其他国际事务问题成为179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

正在此时，第二次反法联盟破裂了。尽管英国不断地劝说普鲁士加入联盟，但普鲁士还是拒绝了。俄、奥两国发生了严重分歧，无法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地相互配合。英、俄两国则就地中海问题矛盾不断，甚至爆发冲突，其中核心问题集中于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马耳他岛。英国皇家海军对待中立船只的政策，也与俄国产生了分歧。为了对抗英国的海洋单边政策，沙皇发起了第二次"武装中立同盟"，普鲁士、丹麦、瑞典纷纷加入，这使得英、俄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法国大革命爆发近10年之后，拿破仑已经控制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土地，他以此为基础与英国对抗。在法国取得马伦哥会战的胜利之前，法国预备队曾经对奥地利发表公告："奥地利的官兵都受到了英国人的欺骗，英国人希望法国和奥地利之间战争不断，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以此推高糖料和咖啡的价格，以牟取暴利。"在圣彼得堡，也有一些人劝沙皇不要与法国作对。大臣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Fedor Rostopchin）劝沙皇从中欧撤军，不必与法国争夺优势。他认为，俄国应该集中精力对付英国，并与奥地利、法国一起瓜分奥斯曼帝国。1801年年初，保罗一世甚至准备派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进攻英属印度。但他与法国结盟的计划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几个月后，有人发动宫廷政变，将其刺杀，导致上述计划搁浅。1801年2月，奥地利已经支撑不住，被迫与拿破仑签订《吕内维尔和约》（Treaty of Lunéville）。1802年3月底，英国也与法国签订了《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暂时休战。

这两个条约给了拿破仑重建法国海外殖民帝国的机会，他想以此获得巨大的资源，以保证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同时防止英国趁机获得这些领地，以及联合其他国家再次与法国作对。这项计划的核心就是占领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土，并且重新占领富饶的海地。然而，拿破仑建立一个"新法兰西"的计划，几乎不可能成功。法军在海地遭遇了疾病，并且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最终没能重新占领海地。拿破仑获得路易斯安那的计划也没有实现。美国政府决心通过外交手段以及必要的军事行动，来防止法国的势力再次出现在自己的西边和南边。美国总统杰斐逊提醒法国谈判代表："如果法国占领路易斯安那，那么大西洋两岸将会爆发一场大的冲突。"由于美国坚决反对，拿破仑不得不让步，决定将整片领土以巨额卖给美国：或者按8 000万美元的总价来出售，或者按每英亩4美分的价格出售。他用这笔钱来发展军事力量，准备与英国进行下一轮的较量。巴林银行提供融资，协助美国政府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这样，拿破仑获得了大笔军费，英国的资本家们采取投机策略，试图讨好拿破仑，获得好处。这笔生意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拿破仑永远放弃了在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想法。美国则将自己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扩大的部分就是未来的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蒙大拿州、艾奥瓦州、堪萨斯

州、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欧洲帝国是拿破仑的战略重心。拿破仑通过《吕内维尔和约》与《亚眠和约》完全控制了西欧和南欧。法国早就占领了比利时，并建立了傀儡国——巴伐利亚共和国。这样，英国长期以来用以保护自己免受法国入侵的“防护带”就被拆毁了。此外，拿破仑还完全控制了意大利，将皮埃蒙特直接并入法国，又在意大利半岛上其他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傀儡共和国。伊比利亚半岛也被拿破仑收入囊中。从1796年开始，西班牙成为法国的盟国，而当时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国，因此为了对抗英国，拿破仑要求西班牙进攻葡萄牙。不过，中欧问题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依然存在；尽管奥地利和普鲁士已经受到重挫，但它们并未向法国屈服。俄国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试图阻止法国对中欧的进一步蚕食，而英国依然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组建一个新的反法联盟。欧洲几乎每一个大国在中欧都有重要的利益，或许在这里它们可能会最后一决雌雄。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是一位坚定的反对拿破仑的宣传者，他说：“德意志是欧洲的中心焦点，如果德意志的存在不能得到保证，那么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将失去自身的独立。”

1803年，帝国议会通过重要决议，决定将神圣罗马帝国邦国的数量减少。显然，对德意志的政治结构形成致命一击的并不是法国。德意志的大、中邦国试图瓜分和吞并小邦的领土。尽管奥地利和普鲁士被法国打得一塌糊涂，但在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前10年，这两个国家依然获利非常多。它们与法国做了交易，将离自己较远的领土割让给法国，换取离自己较近的、面积较大的领土。不过，相对而言，中等国家的获益是最多的。法国因为占领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而承诺对这些国家进行“补偿”，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吞并了离自己较近的小邦，其领土总面积比之前大大增加。这三个邦国将法国看作恩主，因此对拿破仑的忠诚已经超过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忠诚。同时，很多德意志人将拿破仑看作真正的皇帝。拿破仑本人也希望实现这个愿望，因此1804年5月，他自称法兰西帝国皇帝。1804年12月，罗马教皇用查理大帝的皇冠为拿破仑加冕，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拿破仑举行全面投票，以此来证明自己称帝的合法性。直到今天，法国的硬币上还刻有“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皇帝”的字样。为回应法国的行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也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皇帝”。因此，这时的中欧有四大帝国在相互争斗——法兰西帝国、沙俄帝国、奥地利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结果。1803年，拿破仑和英国之间重新爆发战争。表面上看，战争的原因是双方想争夺马耳他，但实际上是因为英国担心法国试图满足其在欧洲更大的野心。小皮特内阁已经放弃了将法国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计划，但他仍然希望能劝说法国人撤出荷兰。尤其是，英国决心阻止拿破仑获得德意志北部，其目的或许在于保卫荷兰东侧的安全，或许是想保护英国在汉诺威的遗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想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完整，这是整个欧洲均势的基础。类似地，180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重申，神圣罗马帝国的“独

立和安全”是整个欧洲“未来的安全”的核心。因此，他希望与法国联合起来，共同控制德意志，在此基础上，1802年6月，帝国议会同意了俄国的计划。沙皇的顾问亚历山大·库拉金（Alexander Borisovich Kurakin）称，俄法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得沙皇成为“德意志的保卫者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天使”。但是，法国没有同意俄国的计划，而是重新向德意志发动进攻，并于1803年底占领汉诺威，一年后又在德意志北部抓走了英国外交官乔治·朗博尔德（George Rumbold）。很多迹象表明，法国准备继续破坏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完整，因此亚历山大一世不得不搁置之前的计划。当时图古特已经不再担任奥地利外交大臣，但他依然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将1804~1805年的拿破仑描述为“新查理曼大帝”，称拿破仑已经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搜刮了不少财富，“这意味着他统治世界的能力绰绰有余”。

1804~1805年，俄、奥、英组建第三次反法联盟，一致对付拿破仑。反法联盟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建立能有效抵御法国的地缘政治屏障，还包括制定必要的国内政策，以配合对外军事行动。亚历山大一世宣称，支持各民族的自觉权，要帮助其他国家从法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804年9月，他表示：“这个原则以人类的神圣权利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沙皇计划联合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荷兰和瑞士，共同包围拿破仑；德意志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的地方，应该被合并成一个稳固的联邦，以延缓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4个月后，小皮特提出了一份与俄国相似的“欧洲重建计划”，但这项计划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内涵。他认为，应该将热那亚并入皮埃蒙特，以增强后者实力，进而将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势力清除出去。不过，英国最关注的是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屏障。英国希望重建荷兰，建立一系列新的要塞，从巴塞尔一直绵延到科布伦茨（Koblenz）；同时，英国认为，应该让普鲁士扩大面积，兼并之前的奥属尼德兰、卢森堡以及德意志西部的部分土地。英国表示愿意与俄国合作，共同保卫欧洲的领土划分不被改变。

普鲁士是改变战局的关键。如果英、俄能够说服或者胁迫普鲁士加入第三次反法联盟，那么拿破仑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会受到冲击。因此，1805~1806年，法国和反法联盟都纷纷派出特使来到波茨坦，双方争相拉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普鲁士国内有两派意见，豪格维茨男爵（Baron Haugwitz）是亲法派，他主张普鲁士保持中立；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男爵（Baron Karl Hardenberg）和卡尔·冯·施泰因男爵（Baron Karl Stein）是亲俄派，主张普鲁士加入反法联盟。这使得腓特烈·威廉三世非常为难。1805年10月，他下定决心，准备加入反法联盟。然而，很快奥地利在乌尔姆（Ulm）战役中被法国打败，12月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中又被打败。沙皇被迫下令俄军向东撤退，奥地利没有办法，只能向法国求和，双方签订《普莱斯堡和约》（Treaty of Pressburg）。不久后，普鲁士被迫与法国签订《申布伦和约》（Treaty of Schönbrunn），与此同时，拿破仑吞并了汉诺威。

拿破仑已经将哈布斯堡王朝赶出了德意志，现在他试图接收神圣罗

马帝国。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有一些重要人物支持拿破仑成为帝国的主人。1804年曾经参加过拿破仑加冕仪式的神圣罗马帝国首相达尔贝格，恳请拿破仑将德意志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并恢复帝国的宪法体制。他希望拿破仑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二个查理曼大帝，将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统一起来，“实现罗马帝国的再次复兴”。1806年2月，拿破仑写信给教皇庇护七世，称自己就是查理曼大帝，他不仅是法国的国王，也是伦巴第的国王。他授意政府发表公告，要求自己的亲属担任欧洲其他各个国家的国王，凡不符合这个条件的王朝一律不予承认。1806年5月，达尔贝格任命拿破仑的叔叔红衣主教约瑟夫·菲希（Cardinal Fesch）担任神圣罗马帝国副首相，即未来的首相。三个月后，他帮助拿破仑制订了一份正式计划，准备将帝国变成一个在拿破仑保护下的联邦。几个月后，普鲁士意识到，拿破仑将对帝国造成巨大威胁，因此突然决定再次与法国开战。然而，在1806年10月的耶拿（Jena）战役中，普鲁士再次战败。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调停下，普鲁士没有亡国，但其大片领土被剥夺。

现在，拿破仑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主人，因此也是欧洲的主人。普鲁士被迫交出了它在德意志北部的领土，以及之前在瓜分波兰时获得的大部分利益。奥地利将威尼西亚、伊斯特里亚（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割让给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并且将提洛尔（Tyrol）割让给巴伐利亚王国。1805~1806年间，巴伐利亚王国和德意志的其他几个中等邦国都是拿破仑的附庸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建议拿破仑不要过分削弱奥地利，这样可以阻止俄国的势力进入德意志及中欧，但拿破仑没有听取他的建议。拿破仑的计划是将整个德意志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下，以此来对抗沙皇。最终，由于与拿破仑发生了分歧，塔列朗被迫辞职，他越来越相信，拿破仑的野心将会导致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法国的联盟。拿破仑帮助波兰复国，并成立了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此外，拿破仑还在德意志的西部和北部建立了一系列国家，符腾堡、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都被升格为王国，巴登成为大公国。然而，让很多德意志人失望的是，拿破仑并没有给自己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相反的是，他亲手消灭了这个庞大的怪物。他成立了莱茵联邦，除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的所有德意志邦国全部纷纷加入。一个月后，他命令哈布斯堡王朝上交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弗朗茨二世被迫同意。不过，8月初，弗朗茨二世单方面宣布将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拿破仑窃取皇位。这样，存在近800年之久的德意志政治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德意志邦国的数量缩减到40个左右。此前，法国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担保者，现在则成了终结者，德意志开始了新一轮的领土整合。

这场地缘政治地震引发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动。1807年6月，以俄国为首的第4次反法联盟在弗里德兰战役中被法国打败，被迫与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俄国保证，放弃对德意志的任何企图，并宣布易北河和涅曼河之间的区域为缓冲区，使法国处于俄国炮弹的射程之外。一年后，法、俄两国皇帝在爱尔福特（Erfurt）的图林根小镇会晤，双方重新肯定了在德意志问题上的一致

意见。奥地利资深外交家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痛苦地发现，拿破仑试图让德意志和波兰成为其盟友，而奥地利则成了这个“三明治”中的一块肉。1807年7月，他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被莱茵联邦包围了，如果我们想要与法国开战，就必须从东西两边同时发动进攻，但那样十分困难。”普鲁士也基本上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从1807年起，它就一直被夹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之间。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奥、普这两个大国暂时没有选择，它们只能乞求与法国和解。简而言之，拿破仑已经拥有了整个德意志，通过莱茵联邦，他可以获得整个德意志的资源。数十万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和其他新兵都宣誓效忠于法国，德意志为拿破仑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服务于拿破仑未来的军事行动。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还是对德意志民众的政治灵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06年，纽伦堡的一位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德意志在最耻辱的时候》（*Germany In Her Deepest Humiliation*）。书中讨论了大多数德意志人如何看待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后来，拿破仑将帕尔姆处决，但这增加了民众对他的愤恨。1808年，地理学家奥古斯特·佐伊（August Zeune）痛苦地说，拿破仑对待德意志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德意志人）被交换、被出卖、被割让、被践踏……像对待球一样，被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拿破仑的征服为他在欧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甚至已经超越了路易十四和查理五世，但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现在他不得不去征服更多的地方，而且在自己帝国的内部也不得不加强军事化统治。此外，俄国和英国尚未向拿破仑屈服。拿破仑准备先对付英国，因此他对俄国采取了温和的政策，愿意承认东欧为沙皇的势力范围。1805年10月，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法国舰队遭遇惨败，这使得法国暂时无法通过海战使英国屈服。1806年11月，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Berlin Decree），宣布实行“大陆封锁”政策，目的是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离开，最终摧毁英国的经济。英国针锋相对，1807年1月颁布枢密令，用走私的方式来打破封锁。英国以走私贸易（包括伪装的中立国贸易）作为破坏封锁的有力手段，不过英国与南、北美洲的贸易还是损失惨重。1807年10月，拿破仑逼迫西班牙允许法国军队穿过其领土进攻葡萄牙，以使英国失去它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盟友。这项战略标志着拿破仑放弃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转而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迫使其屈服。1808年3月，西班牙发生了宫廷政变，有人试图将法国扶植的傀儡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de Godoy）赶下台。拿破仑以此为借口，对西班牙发动全面入侵。

欧洲的战争依然正在持续，这对拿破仑的国内政策有很大影响，对法国的附属国也有很大影响。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者试图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以及一个平等的社会，这样可以使国家重新强大起来，恢复其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不过，拿破仑则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他认为这是维持法国军事优势地位的关键。因此，他决定在自己的帝国内部再次进行分封，并且鼓励他的盟国也这样做。1802年5月，拿破仑创立了“军团勋章”，以奖励那些忠诚的军人，以及在政府辛勤工作

的人。他还试图修复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双方达成协定：他为神职人员提供薪水，但同时要对教会进行严格控制。曾经在巴黎圣母院为拿破仑举行加冕礼的教皇庇护七世向拿破仑发出祝福，支持他的雄心壮志。不过，1808年3月，他又对贵族制度进行了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一个人为民众做出的贡献越多，其地位就越高，并且贵族的头衔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不过，与其他的封建社会不同，拿破仑努力防止血统取代功绩。他规定，如果贵族的下一代不能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他就会失去贵族的头衔。拿破仑占领了意大利、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大片土地，为新贵族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封地。

在法国所控制的附庸国，拿破仑也要求它们进行类似的改革，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调动资源，动员军事力量，为新的对外扩张提供支持。事实上，在18世纪，欧洲很多国家的统治者都进行过类似的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国内关税壁垒，以刺激经济发展，从税收中获得更多收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废除行会制度，进行财政改革，以缓解国家债务；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使得国内不同地区的民众相互融合，同时没收教会的部分财产，推进世俗化。拿破仑在法国及其附庸国采用征兵制，以满足他不断扩充军队的需要。上述改革政策，“整合”了整个欧洲，使其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当然，法国在这个体系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体系是不平等的，内部并不团结。例如，1810年8月，拿破仑颁布《特里亚农敕令》（Trianon Decrees），规定法国商船享有与英国交换某些商品的权利，并且法国可以将这些商品转卖给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与英国做贸易的权利。他辩解称：“只要是对法国有好处的事情，就会对大家都有好处。”他还说：“现在欧洲各国差别很大，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实力超强的大国来主导其他各国，目前法国是最合适的国家，它有足够的权威，能够促使各国彼此和谐共处。”

不可避免的是，法国过于自负的政策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不满。在拿破仑直接占领或者有效控制的区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18世纪90年代末，法国军队的暴行导致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揭竿而起；在19世纪的前10年中，西班牙人以及奥地利的提洛尔人也相继起义，反抗法国的压迫。起义此起彼伏，但动机并不相同。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提洛尔人的反抗运动主要是由地方性因素导致的，他们不满法国破坏宗教的行为，无法忍受法国的税收政策，也不愿意充当拿破仑战争的炮灰。在德意志，一些反抗运动的性质很难判断，起义者既是爱国者，又是强盗。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曾经说过，欧洲其他国家不会欢迎法国“全副武装的传教士”。他的话是对的——法国强行输出“理性”“博爱”“平等”和“自由”，但其他国家的民众并不接受，他们已经饱受法国的压迫。拿破仑的外交部部长塔列朗曾提醒过他：“我坚信，一个国家通过武力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由’的做法注定会失败，其他国家只可能会憎恨这种‘自由’。”

面对拿破仑的霸权，其他欧洲独立国家也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改革。在普鲁士，军事——农业复合体曾经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发挥过很大的作

用，但普鲁士在耶拿会战中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这种制度的弊端。哈登贝格男爵和施泰因男爵发起了一场彻底的改革。1807年9月，哈登贝格在他的《里加备忘录》（Riga Memorandum）中指出：“普鲁士王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必须集中力量，合理地组织政府，并系统地协调国内事务的各个方面，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强大邻国的猎物。”所以，1807～1813年，普鲁士国王取消了冗余的顾问，确立了大臣的“责任制”，以提高决策效率；任人唯贤，完善官僚体系；废除行会制度，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解放农奴，建立自由的市场，废除旧的行政区划，确立法国式的征兵制度；放松对犹太人的限制。之前，普鲁士曾经屡次被法国打败，不少人据此认为，应该保留贵族的特权，保持军队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这样才能提高战斗力。不过现在不少人改变了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事化国家，使得国家变得坚不可摧。也有人呼吁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全国性的“代议机构”，以动员全民，与拿破仑做最后的斗争。

拿破仑的扩张也使得英国国内出现了激烈的辩论，精英们就改革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1801年，国王拒绝放松对爱尔兰天主教的压制政策，小皮特内阁辞职。但1805～1807年，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1808年，塞尔科克伯爵（Earl of Selkirk）在一本小册子里写道：“我们周围的国家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现在，英国在欧洲大陆一个盟友都没有了，法国的人口数量又远远超过英国，英国要想不被法国消灭，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空前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动用内部资源”。或许，提高税收和征募新兵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必须释放英国社会隐藏的潜能，才能壮大国家的力量。一位激进的辉格党议员曾经说：“为避免我们的土地被外国征服，我们必须取消国内的压迫性政策，必须要提高军事力量，必须进行改革。”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一直主张进行选举改革。1809年，他说：“英国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在乔治三世的领导下进行议会改革，或者被拿破仑一世所征服。”不过，此时的英国政府仍然拒绝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尽管有的大臣试图再次改革宗教政策，缓解对天主教徒的压迫政策，但议会在1807年还是否决了相关的议案。

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也引发了英国国内关于国家大战略方向的激烈争论。过去，英国一直主张干涉欧洲大陆的政治，但现在英国已经没有那种能力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一直是小皮特的政治对手。1806～1807年，福克斯加入“贤能内阁”（The Ministry of All the Talents），并担任外交大臣。他主张与拿破仑讲和，以集中精力进行海外殖民地扩张。这个“全球”战略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废除国际奴隶交易，英国议会在1807年通过了相关法律。同一年，美国也效仿英国。美国各州曾经在1787年制定宪法时达成协议，准备在20年之后废除奴隶贸易，并且禁止所有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进行奴隶买卖活动。这标志着一个新的、颠覆性的国际秩序出现了，英国皇家海军利用其强大的力量，在公海地区对贩奴者进行追捕和打击。波特兰公爵（Lord Portland）在担任英国首相后，重新将战略中心放在欧洲。英国派军队到斯特拉松德，试图为普鲁士和俄国提供帮助。拿破仑与沙

皇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后，法国可以调动整个欧洲大陆的力量来反对英国，但英国并没有绝望。1807年9月，法国即将占领丹麦，为防止丹麦舰队落入法国手中，英国决定先发制人，摧毁了丹麦的舰船，不过这也导致哥本哈根不少平民死亡。一年后，英国派军队到伊比利亚半岛，支持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抵抗拿破仑。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尤其是在德意志，英国派出了间谍，资助那些反对拿破仑的媒体，并且向当地的游击队提供武器。

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陷入困境，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趁机行动起来，准备最后一次进攻拿破仑。18世纪末的战争使得奥地利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同时奥地利失去了在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的资本市场。为缓解困境，政府采取分级所得税制。为解决决策过程中的混乱问题，1801年成立了国务院，协调各位大臣的决策。1805年的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一支后备军，宗旨是为全民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是，奥地利利用德意志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来反对法国。然而，匈牙利人拒绝配合奥地利政府，他们试图利用法国人来迫使奥地利做出让步。在1807～1808年的普雷斯堡议会上，匈牙利代表拒绝支持扩大税收，也拒绝扩大兵役。奥地利政府被迫软化立场，放弃了在匈牙利招募士兵加入后备军的计划，因此，奥地利后备军的范围仅仅覆盖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为主的省份。在约瑟夫二世时期，奥地利的官僚机构曾经备受人们指责。奥地利要想对抗拿破仑，就必须进行国内改革，但这又极有可能导致国内爆发革命。1809年，奥地利决定再一次对拿破仑宣战，不过这个决策非常仓促。尽管奥地利在阿斯佩恩——艾斯林（Aspern-Essling）战役中取得了重要胜利，但奥地利严重误判了形势。奥地利以为自己会得到俄、普两国的支持，但当时俄国正忙于处理波罗的海、黑海和巴尔干事务，因此按兵不动；普鲁士因为担心得罪拿破仑而拒绝对奥地利提供帮助。1809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勉强打败了奥地利，双方都伤亡惨重。双方签订条约，奥地利丧失了大片领土，几乎成为一个内陆国家。拿破仑占领了南欧的一些领土，直接控制莱茵联邦，并与波兰大公国结盟。这样奥地利完全被包围了，几乎变成了法国的卫星国。梅特涅对奥地利皇帝说："现在奥地利只能服从于法国，这样我们在国际体系中才能获得安全，也许有一天俄国人会来帮助我们。"之后，奥地利皇帝被迫将女儿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嫁给拿破仑，对于奥地利来说，这是一次耻辱。

对于拿破仑，下一步的关键是控制德意志，将俄国永远挡在欧洲大门之外。这是18世纪法国历任战略家都没有实现的目标。拿破仑相信，不能作茧自缚，不能将自己一直关在经济和军事堡垒里面，必须继续扩张。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封锁"体系来实现整个欧洲的经济融合，但这项计划失败了。因为这个体系并非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而是完全体现了法国人的自私。此时，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都陷入低迷，市场趋于萎缩。法国之前的一些富裕省份，如阿尔萨斯，问题尤其严重。大陆封锁政策存在很多漏洞，英国在欧洲大陆沿岸进行走私活动，法国海军无法进行有效监督。1810年，拿破仑占领了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德意志北部沿海地区，以填补封锁大陆政策中的漏洞。其中，奥尔登堡

（Oldenburg）也被法国占领，而那里的统治者与沙皇的关系非常密切。拿破仑帮助波兰复国，使其成为反对沙皇的缓冲区，这使得沙皇非常不满。奥地利被迫将加利西亚割让给华沙大公国，波兰军队的数量也大幅增加。然而，不久之后拿破仑下定决心：必须通过武力来摧毁俄国。这就是拿破仑要面临的安全两难：每次他征服新的领土后，都感到不安全，因此需要征服更多的领土。这导致了一种破坏性的恶性循环，最终只能导致他的失败。

法国的势力已经抵达俄国的西部边界，因此俄国统治者就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人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对拿破仑进行打击，这是阻止危险的唯一办法。但亚历山大一世对此非常反对，他不愿意激怒拿破仑，所以他禁止在涅曼河右岸建造防御堡垒和炮台。最后，德意志问题使得沙皇下定决心，要与拿破仑对抗到底。1812年4月，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拿破仑从普鲁士、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撤军，削减在但泽的驻军，同时要求法国应对奥尔登堡公爵做出补偿，并放弃占领。同月，俄国与瑞典结盟，打算共同袭击德意志北部海岸；瑞典得到了挪威，作为俄国兼并芬兰（原属瑞典）的补偿。这样，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在所难免。

拿破仑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也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鉴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力量不断上升，英国决定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发展海军，以弥补自己的劣势。1807年英国远征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1808年颁布枢密令，都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贸易利益。同时，英国强制征召了不少美国海员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1811年的泛印度大起义中，英国参与了镇压。上述事件都使得美国人提高了警惕。不过，这些事情可能还不足以让两国关系破裂，令双方不可调和的是后来的领土问题。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在美洲的力量摇摇欲坠，美国决心防止其他任何大国来填补拉美的真空。因此，1811年初，麦迪逊总统要求国会同意占领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尤其是西佛罗里达。从18世纪中叶开始，西部领土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和美国，这也是美国内政和外交中的重要问题。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理由是他密谋将路易斯安那从联邦分离出去，建立一个英国支持的独立国家。尽管后来伯尔被判无罪，但这件事加剧了美英两国的矛盾。此时，美国国内有两种对立的声音，一部分人主张对英国采取小心谨慎的政策，另一部分人支持用战争的方式扩展领土，这部分人被称为“鹰派”。英国在加拿大有大片的殖民地，美国人对此非常忧虑。并且此时，美国人担心自己的西边、西南边、加勒比地区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遭到英国的渗透。英国皇家海军的傲慢行为激怒了美国，美国试图打破英国的包围圈。1812年6月，美国对英国宣战，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半球的主导权问题。

同月，拿破仑率领多国组成的联军，越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境内。他想与俄国决战，以便最终控制中欧。这支60万人的大军里，只有一半是法国人，其他的士兵来自荷兰、意大利、波兰，以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和莱茵联邦。当然，法国本身的疆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此时的莱茵河左岸、德意志西部也算法国的领土。在

拿破仑的要求下，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出兵协助，它们分别拱卫着拿破仑大军的南北两翼。事实上，如果没有对德意志的控制，拿破仑对俄国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一开始，法军进展很顺利，到了初冬，沙皇的军队在博罗季诺战役中遭遇惨败，莫斯科被占领。法军长驱直入，俄国无法阻挡，导致了俄国国内的动荡。如果俄军进一步败退，很有可能会发生针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政变。然而，几个月后，俄国的严寒迫使拿破仑撤退。到1812年年末，拿破仑这支筋疲力尽的军队已经被彻底赶出了俄国领土。

如今，所有德意志人都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法军正在被俄军紧紧追赶，双方随时可能会穿越波兰，来到中欧。威灵顿公爵率领英、西、葡三国组成的联军，在西班牙打败了法国军队，这使得拿破仑再次遭受重创。不过，此时法国人还都支持拿破仑，并不愿意将之抛弃。早在1798年，他就在埃及的战场上绝处逢生，后来在无数次战争中他都成功地扭转乾坤。诗人歌德曾经写道："如果你愿意，摇一摇你的枷锁，这个人对你而言实在是太强大了。"此时，如果德意志犯一个小错误，它就可能会毁灭。梅特涅警告道："无论是奥地利，还是欧洲仲裁者（即俄国），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不让自己遭受毁灭。"俄军正在向西追赶法军，普鲁士位于俄军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普鲁士面临抉择。在1812年末、1813年初，腓特烈·威廉三世一直在犹豫，他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遵守对拿破仑的承诺，或者加入反法联盟。他的优柔寡断使得一些官员非常着急。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从霍亨索伦家族中另择一个人担任国王，以做出果断决策。1812年，负责守卫波罗的海的普鲁士将军约克·冯·瓦滕堡（York von Wartenburg），在没有得到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与俄军签订《陶罗根协定》（Convention of Tauroggen），要求普鲁士军队保持中立，不会阻拦俄军追击法军。最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们聚集在一起，在没有得到国王授权的情况下，宣布全民皆兵，共同打击法军。看到这个形势，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得不同意对法国宣战。可以说，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是由全民共同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由国王自己决定的。

俄国内部也有两种意见，有人主张进入德意志内部，将法国势力驱逐出去，有人则对此表示反对。普鲁士的改革派施泰因男爵流亡到俄国后，为沙皇服务。他强烈呼吁亚历山大一世重建中欧秩序，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而很多俄国官员和贵族建议沙皇保持克制，他们担心俄国会陷入中欧的泥潭，毕竟中欧远离俄国，不会影响到俄国的安全。最后，亚历山大一世决心一劳永逸地消灭拿破仑。在18世纪，俄国就希望成为德意志的仲裁者，现在实现这一使命的时刻已经到来。1813年2月，腓特烈·威廉三世终于下定决心加入反法联盟，2月底，普、俄两国签订《卡利施条约》（Treaty of Kalisch），结为同盟。俄国支持普鲁士恢复其在1806年时的疆界，使普鲁士重新成为大国。1813年3月，亚历山大一世告诉俄国驻柏林大使，俄国的目的是要让普鲁士成为"俄国的先锋"，使自己免受来自西方国家的进攻。1813年3月底，腓特烈·威廉三世签署《卡利施条约》，他与亚历山大一世共同承诺，将努力使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普鲁士成立了以施泰因男爵为首的中央行政委员

会，并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德意志各个地区，目的在于整合德意志西部、南部的各个邦国。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致我的臣民》（*An Mein Volk*）一文中，以响亮的声音，呼吁他所有的臣民起来反抗，将法国军队赶出去。1813年5月，瑞典军队在德意志北部登陆。1813年6月，英、俄、普签订《赖兴巴赫条约》，英国承诺增加对俄、普两国的援助。

此时，奥地利仍然在犹豫。梅特涅担心，如果联军迅速、彻底打败拿破仑，那么德意志内部的均势将会被永远打破。如果法国霸权被俄国霸权取代，那么奥地利依然会面临危险，梅特涅也不愿意让普鲁士从中捞取大量好处。因此，他试图与莱茵联盟的国家发展关系。正好，当法国被俄国打败后，莱茵联盟试图寻找一个新的靠山，奥地利正是最佳选择。在1812年10月~1813年11月期间，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宣布脱离拿破仑的控制，它们希望自己的领土能获得保障。梅特涅向它们承诺，将会组建一个普、奥之外的“第三德意志”。梅特涅也曾经试图拉拢法国，依然想让法国成为平衡沙皇野心的强大力量。不过，梅特涅并没有成功。1813年6月底，拿破仑与梅特涅在德累斯顿会晤。拿破仑不仅坚决拒绝了梅特涅的建议，还强硬地宣称，他要消灭数百万敌军，重建昔日的辉煌。最终，1813年9月初，奥地利与俄、普两国签订《特普利兹条约》（Treaty of Teplitz），加入反法联盟。三国承诺，将“解散莱茵联邦，使位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各个邦国获得完全的独立”。同时，三国还表示将再次瓜分波兰。解放德意志的最后一战即将开始。

此时，反对拿破仑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包括了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普鲁士人口中，服兵役的比例已经超过10%，超过了其他几个国家，当然也因为逃兵而损失了一小部分人。德意志的一些爱国学生和工人还自发组建了“自由军团”。尽管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不是正规军，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唤起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这时，唯一对拿破仑保持忠诚的就是萨克森。由于普鲁士一直想吞并萨克森，因此萨克森只能站在拿破仑一边。拿破仑一直顽强战斗，在德累斯顿和包岑（Bautzen）获得胜利。但这已经无法挽救其失败的命运。1813年10月中旬，双方在莱比锡进行最后的决战，这是欧洲各国实现民族解放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德意志人；另一方是普鲁士人、俄国人、一部分德意志人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最终，经过三天的激烈交战，拿破仑被彻底打败，这场争夺中欧霸权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如今，拿破仑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欧洲新秩序即将出现。

在18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地缘政治表现为三场革命。前两场大革命发生在美国和法国，都是源于对旧体制的反叛。而且，英国限制在北美的殖民地扩张，拒绝向西扩展领土，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更重要的原因。法国波旁王朝在中欧的外交收缩，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更重要的原因。革命后的美国和法国都进行了内部整合，以提高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制定了宪法，法国则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和拿破仑的战争。不过，美国和法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一方面，美国将英国（而

非法国）视为最大威胁；另一方面，法国优先关注的是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德意志）的控制权。这就导致了第三场革命，也是一场地缘政治巨变：革命后的法国在拿破仑的带领下，摧毁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均势，最终也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本身，颠覆了整个欧洲的均势。法国不断地吞并、分割其他国家，拿破仑在法国和他占领的地方强制推行改革，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为了战胜拿破仑也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些最终改变了欧洲大陆（特别是德意志）的面貌。与此同时，当法国和西班牙的势力从美洲退出后，美国努力防止英国填补这一地区的真空，因此美国确立了对美洲大陆的霸权。此外，美国一直在关注欧洲的局势变化，它依然认为欧洲会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自己构成威胁。未来，美国与欧洲大陆君主专制国家之间的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上述三场连续发生的革命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德意志的那些小邦，它们在新的领土重组的过程中被吞没。普鲁士和奥地利存活了下来，领土也扩大了不少，但它们已经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非常脆弱，处境非常不利。英国在北美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它已经重新确立了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并且有力地驾驭着欧洲的均势。法国国力逐渐下降，在强大的反法联盟面前，拿破仑帝国最终崩溃。七年战争之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们。他们脱离了英国殖民帝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并且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合众国。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迅速崛起，势力深入奥斯曼帝国和中欧，最重要的是，它成为德意志的仲裁者。不过，目前的美国和俄国依然十分脆弱，它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扩张欲望，因此一定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利益冲突。此外，俄国国内盛行农奴制，美国也保留着黑人奴隶制，这是两国的独特之处。这样，两国国内都缺乏凝聚力，无法动员所有的力量，难以实现其扩张野心。因此，欧洲各国的官方与公众普遍将美国和俄国视为自己的威胁，这不仅仅是战略利益上的威胁，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在下一个阶段，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主题将会是“解放”：从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从农奴制和黑人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1] 指券是1789～1796年间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可作货币流通的有价证券。发行指券是资产阶级掠夺国有资产、进行商业投机和掠夺下层群众的工具。——编者注

第四章

解放：1814～1866年

决定祖国（德国）命运的色子，没有依循光明的力量下落。我们只能凭借勇敢和忠诚的态度，通过传播对一切外国事物的真切的憎恨，从内部建立起我们的祖国。经历无数的暴风骤雨，我们终将越来越团结。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Ernst Moritz Arndt），1814年

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使命是什么？……是解放。不仅要解放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以及其他同样遭受压迫的民族，还要解放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将欧洲从权贵阶级铁一般的强硬控制中解放出来了。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德意志邦联（The Germanic Confederation）是一个多方意志的产物，并非仅仅是一个由成员国自愿联合而形成的联合体。如果其成员国想要修改邦联的规定，它们必须先与邦联之外的其他国家协商。德意志邦联是一个拥有不同特点和类型的邦国的联合体，它是1815年在维也纳签订的一系列欧洲条约的产物。这些条约创立了对欧洲的总体安排，而德意志邦联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1850年12月3日

维也纳会议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结束了英美之间的争斗，并且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在欧洲，根据这些条约，旧有的神圣罗马帝国得以重建，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的国际秩序得到重新确立，目的是遏制法国。俄国通过这些条约，保留住了它扩张后所得的领土。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得到了大量领土，并因此重振雄风：前者在南方和东南方获得了大量土地，后者则在西边获得了大量土地。欧洲地缘政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并对未来50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这一体系的支点，德意志所受到的影响，要比欧洲其他地区更为显著。在北美，美国将英国赶出了西部，但它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张仍然遭到了其他主要大国的反对。不仅如此，这些条约中与各国国内政策相关的条款，对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产生了全面的地缘政治影响。条约写入了解放犹太人、禁止国际贩奴贸易以及鼓励实行宪政制度等条款，因此国内的冲突取代了国际的冲突，并且使得美国同绝大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彻底分道扬镳。曾经作为地缘政治经典主题的“缓冲区”“包围”和“扩张”等词汇，现在被“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和“奴隶解放”等词汇所代替。在这个过程即将完成的时候，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以寻求国家的统一，他们希望在强国林立、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存活下来，尽管这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失败，丧失了对德意志的控制，他在欧洲的地位迅速一落千丈。莱茵联邦宣布倒戈，不再支持拿破仑，因而反法同盟的军队迅速壮大。此时，反法同盟的国家向西推进，准备进军法国。与此同时，威灵顿公爵从西班牙穿越比利牛斯山，一路向北挺进。虽然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对反法同盟的军队进行了英勇反抗，但他们还是很快覆灭了。1814年3月中旬，拿破仑无奈地签署了《枫丹白露条约》（Treaty of Fontainebleau），宣布退位，尽管保留皇帝名号，但他要立即前往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island of Elba）居住。波旁王朝复辟了，路易十八成为法国国王。法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巴黎和约》，和约对法国做出了宽大的处理，允许法国保留其1792年之前的领土，萨伏依仍然归法国所有。1814年9月，各战胜国派代表前往维也纳，寻求建立稳定的战后秩序。然而，不久之后，拿破仑竟然避开守卫的监视，从厄尔巴岛逃回了法国。他得到了法国军队的热情拥护，并宣布重新成为皇帝，史称“百日王朝”。法国人早已厌倦了波旁王朝，他们热烈地欢迎拿破仑的回归，希望夺回法国在过去20年间曾经拥有的霸权。欧洲其他强国感到震惊，英国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驻扎在美国，因此被打得措手不及。尽管拿破仑一开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他最终被反法联军打败。反法联军由很多国家的士兵组成，其中以德意志人为多。拿破仑再次被流放，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t.Helena），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法国。

与此同时，英国与美国争夺五大湖的战争，也达到了高潮。美国国会中的“好战鹰派”希望把加拿大从英国的统治下迅速“解放”出来，但这个希望很快破灭了。英国打败了拿破仑，因此它可以从欧洲战场上抽调

出更多的军队，来到大西洋彼岸对付美国。两国随即在海上和陆上展开了漫长的竞赛。战争使得合众国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南部和西部，基本都支持麦迪逊总统的决定；但是由联邦党人控制的新英格兰地区则坚决反对。北方的几个州，要么拒绝向加拿大派遣民兵，要么在战争刚爆发时就撤回了军队。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强烈谴责联邦政府在缺乏足够理由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联邦政府发动这场战争，其真正动机在于征服和野心”，并宣称“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是要保卫我们的海岸与土地，没有任何一个道德高尚且信仰虔诚的人会赞同发动这次战争”。现在，联邦内部意见对立，似乎就要分裂。不过，美国在后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尽管来得太晚，但使得英国被迫向美国求和。由于当时还没有电报，通信手段非常落后，所以在和约签署之后的数天，美军还在新奥尔良与英军作战，并大败英军，这是美国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胜利。由于美军打败了英军，美国的国内矛盾勉强有所缓和，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此时，维也纳会议正上演着精彩好戏。会议的首要议题就是通过重组领土来防止法国以后再次进行扩张。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认为：“要想维持法国的秩序，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必须保持其强大的实力。”在巴黎建立一个温和的政权，也有利于压制法国的冒险主义。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几乎同样紧迫，即如何对付俄国力量的膨胀。当时，俄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中欧和西欧，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大为震惊。1815年9月初，沙皇检阅了他部署在巴黎近郊的香巴尼（Champagne）平原上的15万军队和540门大炮。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阅兵，这说明沙皇已经成为欧洲的仲裁人。场面非常震撼，参加阅兵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军官——普鲁士国王、奥地利皇帝、威灵顿公爵——都对此印象深刻。

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真正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德国问题”。1814年2月，盟国承诺，将建立一个中欧框架，“德意志各主权邦国将组成一个邦联，维系彼此的联系，并且以此保证整个德意志的独立”。8个月后，卡斯尔雷宣称，德意志应该成为俄国与法国之间的纽带，并调节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德意志可以用于遏制俄、法两国的势力，同时又不让这两个国家感受到威胁。英国下定决心，要阻止俄国填补中欧的权力真空。卡斯尔雷在外交上的老上级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警告道：“尽管波兰已经复国，但大部分地区却归了俄国，这会导致俄国的边界线向西大大推进……甚至已经进入德意志的心脏地带。”与此同时，奥地利首相急切地想要阻止普鲁士获得在整个德意志的霸权以及获得过多的领土，尤其是要防止其获得萨克森。萨克森曾经是拿破仑的盟国，现在也成了战败国，这里是普、奥两个大国之间的重要缓冲区。最后，在1815年末，各大国签署了条约，条约的特征是：各大国争相拉拢英国、遏制法国，同时俄国受到了排挤。

根据《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Final Act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法国必须归还其在1789~1792年之间获得的所有土地，并支付巨额赔款。波兰依然由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在沙皇所占

有的那一部分土地上，建立一个王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议会。沙皇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获得的绝大多数领土，依然允许保留，如从土耳其夺取的比萨拉比亚，以及从瑞典夺取的芬兰。瑞典则获得了西边的部分土地，以作为补偿。1814年1月，丹麦和瑞典曾经签订和约，瑞典在斯堪的纳维亚占据优势地位，它从丹麦的手中夺取了挪威，丹麦因此损失了40%的人口和85%的土地。皮埃蒙特——撒丁王国（Piedmont-Sardinia）从法国手中收回了萨伏依，还得到了其他一些领土，因为欧洲其他国家想以此阻止法国对意大利的领土企图。奥地利获得了伦巴第和威尼西亚，还获得了古代的威尼西亚共和国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沿海地区，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支系在亚平宁半岛所拥有的部分土地，如托斯卡纳（Tuscany）、摩德纳（Modena）和帕尔马（Parma）。这样，奥地利增强了其在亚平宁半岛上的战略纵深。各国保证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

然而，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奥地利将比利时割让给荷兰，形成了荷兰联合王国（Kingdom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这里被看作防范法国向低地国家扩张的防波堤；奥地利还永远放弃了西部被称为“前奥地利”（Anterior Austria）的地区。普鲁士希望获得相邻的土地，让国土连成一片，但这个希望基本破灭了；普鲁士只能勉强获得萨克森北部的土地，而不是得到整个萨克森王国。然而，普鲁士还是获得了一份大礼，即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正如同卡斯尔雷所指出的，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让普鲁士与法国进行更多的军事接触，以便有效抵制法国获取低地国家和莱茵河左岸领土的野心”。普鲁士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成功抵制了英国针对比利时南部大片土地提出的要求。18世纪90年代以前，德意志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存在着众多诸侯国。到维也纳会议的时候，大多数诸侯国都没有保留下来，但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公国，则在拿破仑战败后逃过了一劫，并且领土还有所扩大。英国虽然没有在欧洲大陆获得大量土地，但它还是保住了最新获得的一些殖民地，包括锡兰和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此外它还获得了很多基地，如马耳他；并且英国与汉诺威王国组成了“共主邦联”。英国表现得很克制，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1814年4月中旬，卡斯尔雷说：“我们的声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珍贵，这代表了我们在这个大陆上的力量、权力和信心。”他最大限度地坚持这个立场，促成了1815年俄、普、奥、英四国同盟的成立。《四国同盟条约》的第6条规定，各方承诺定期举行会晤，以保持欧洲各国均势状态，处理其他各国共同关切的紧迫问题。上述这些安排被统称为“维也纳体系”。

卡斯尔雷决心与欧洲强国合作，而不是支配其他国家，这对奴隶制问题产生了影响。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对维也纳会议进行抨击，对沙皇和普鲁士国王进行指责，并要求禁止奴隶贸易。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建议，英国可以把“德意志的小片儿土地”割让给法国，作为结束奴隶贸易的补偿，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法国采纳。英国的废奴主义者认为，《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并没有立即结束所有的国际贩奴贸易；他们还表示，只要法国在其殖民地上进行奴隶贸易，

英国就有权吞并这块土地，但这没有反映在《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中。辉格党的格伦维尔勋爵大声疾呼：“我们应该主导这场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大英帝国应该发挥其最大的权力，它的意见就应该是最后的决定。”绝大多数欧洲强国（包括很多反对奴隶制的国家）都担心，英国这样做只是想掩盖其海上力量的扩张，想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寻求扩大制海权。法国尤其认为，被迫结束贩奴贸易，是无法容忍的耻辱。沙皇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建议成立海上联盟以镇压贩奴贸易。卡斯尔雷担心，如果对法国的波旁王朝施加太多的压力，就可能会损害法国民众对复辟王朝的支持，因此英国没有太强求法国。最终，各国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贩奴贸易“违反人性原则和普遍道德”，是必须废除的。当时，这只是一个雄伟的设想，但后来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已经明确显露出来。

维也纳体系不仅规定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新边界，而且对各国的国内结构做了规定。英国和欧洲东部的几大强国都反对共和主义，它们支持“君主制原则”。英国更偏爱君主立宪制，欧洲东部的强国则坚持认为，臣民应该与君主“合作”，以维持绝对主义政治体系。俄国扶植“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为傀儡国，但又允许其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宪法；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许多诸侯，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被继续保留或被授予了宪法；1814~1815年，普鲁士针对颁布宪法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法国，反法同盟复辟了波旁王朝，但国王的权威受到权利宪章和议会（由极少数人选举产生的）的制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国民众的军事冒险主义绑架政府。同时，法国议会的立法，要先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审查，以保证这些国家利益的安全。甚至，其他国家要求路易十八每次在议会致辞之前，首先接受对其讲话稿的审查。盟国还在法国派驻军队，以监视拿破仑的余党，确保法国全额支付战争赔款，并对荷兰提供支持，防止法国修改维也纳体系的安排。反法同盟的总体意图是，各国恢复正统君主，并扶植其发展壮大，以抵挡各国下层革命，既使其能够有效地抵抗外部的入侵，又保证其不会威胁邻国。

新秩序的核心是建立德意志邦联，以取代已经灭亡的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德意志邦联的目的在于维护欧洲平衡，一方面要使其强大到能够遏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德意志不会过分强大，防止其自身具有霸权野心。《德意志邦联法案》（German Federal Act）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其序言呼吁建立一个“强大和持久的联盟，维护德意志的独立，保证欧洲的和平与平衡”。德意志邦联是一个维护德意志整体利益的共同体，法案明确禁止由于战略原因而牺牲任何一个邦国。其中，第11条要求成员国在遭受入侵时要互相帮助，禁止任何一国与侵略者单独媾和，任何一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时不能威胁邦联的统一。为此，邦联的国防由各成员国共同负责，包括普鲁士、奥地利、“第三德意志”（即除普鲁士、奥地利之外的德意志各中小邦国），以及西部的一系列“堡垒”——美因兹、兰道（Landau）、卢森堡，后来拉施塔特（Rastatt）和乌尔姆也参加了防务。邦联的议会设立在法兰克福，实际上由奥地利控制，议会负责整个邦联的政治协调。同时，邦联负责维持德意志内部的政治平衡，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平衡，以及各成员国内部的

政治平衡。这些安排都至关重要，有利于防止外部力量的介入，以及外国利用德意志各邦国之间的矛盾而坐收渔利。德意志邦联的所有安排，由《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所有签约国来保证；事实上，德意志邦联的宪法，也被写入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它可以看作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些安排可以算得上是一场欧洲的地缘政治革命。18世纪时俄国已经开始向西推进，现在它依然势不可挡：俄国的傀儡国——“波兰会议王国”已经使得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感到恐惧。丹麦被摧毁，已经不再是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强国，它的注意力不得不再次转向南方。但是，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德意志。在过去的100年中，普鲁士主要是向东发展，它因此逐渐成为强国；而现在它成为抵御法国的屏障，其战略意义主要在西边。几个世纪以来，奥地利一直在西欧拥有巨大的势力范围，它一直影响着莱茵兰、勃艮第和低地国家的政治；而现在它在巴尔干、东欧以及意大利获得了大片领土。大国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战争的最后阶段，各国懂得了合作与克制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持续渗透到了1815年以后的外交中。与此同时，对于各国的内部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废除奴隶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治压迫、打击激进的颠覆破坏活动——各大国取得了广泛共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50年中，我们将看到，这些安排的确缓解了各国之间的矛盾。会议刚刚结束时，各国都理解共识的重要性，这对于维护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欧洲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又纷纷忘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1814年12月，英美两国签订《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正式结束了战争，这同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场战争是美国独立以后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大国的战争，美国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双方都同意废除奴隶贸易，尽管事实上奴隶制度本身依然得以存在。英国归还了五大湖周围的争议领土，并承诺遣返那些从美国白人手中逃脱的奴隶们。英国没有兑现第二项承诺，而是向美国支付一大笔补偿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英帝国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后还将继续展开较量。两国仍将在北美地区争夺影响力，此时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线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两国争夺的主要战场，将是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各国都承诺，要废除奴隶贸易；而美国的决心则越来越坚定，反对欧洲国家干涉西半球的任何事务。因此，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欧洲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却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美国依然保护奴隶贸易，却反对欧洲在西半球的扩张。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不止一次导致彼此的冲突，最终将会导致战争。

拿破仑已经被永远软禁在南大西洋的海岛上，欧洲很多国家试图享受战后的“和平红利”。在英国，政府不再执行“财政——军事化国家”的政策，转而成为一个“自由放任式国家”。军队从60万减少到10万，其中大部分驻扎在海外。这的确是基于财政考虑，但同时也反映出了英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1816年，年轻的辉格党人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发表演讲，反对增加陆军的军事开支，理由是“这会导致英国从一个海军国家变为陆军国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陆国家，而无法继续拥有众多的海岛”。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开始裁减军队人数，降低公共开支，以解决在拿破仑战争中所欠下的债务。哈布斯堡王朝想办法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来筹集经费，尽量避免召集匈牙利议会。普鲁士国王没有兑现颁布宪法的承诺，也没有建立代议制机构。不过，普鲁士政府同意，在询问人民意见之前，不会增加税收或者贷款，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所有的大国野心。因此，1820年普鲁士制定了《国家债务法》，规定不会在代议制会议召开之前就增加税收或者贷款。1823年，作为权宜之计，腓特烈·威廉三世设置了一个由贵族控制的地方会议体系。这只是咨询性的机构，没有财政权力，一开始，人们对这些机构没什么兴趣，极少有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到目前为止，东部君主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但这样的局面要想保持，前提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不会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内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美国密切关注着欧洲的发展情况。维也纳会议上各国宣称支持“君主制原则”，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将这个原则看作意识形态威胁。此时，有两个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需要美国立即采取行动。美国与英国作战时，巴巴里海盗问题重新出现，威胁美国的商贸安全。因此，1815年，美国派出一支舰队，惩罚阿尔及尔的奥玛尔·帕夏（Omar Pasha），摧毁其舰队并占领其港口。在更靠近美国国土的地方，西班牙皇家舰队对佛罗里达的控制力减弱，使得这一半岛上出现了权力真空。此时，美国必须对佛罗里达采取必要的措施。尽管这块土地本身价值不大，但美国不能允许它“落入海洋强敌的手中”，特别是落入英国手中，否则会导致英国从南北方向形成对美国的包围。因此在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1820年，由于缅因州的成立，美国的北方边界得到了巩固。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求美国政府做出巨大的努力，以提高军事实力，抵御欧洲的干涉，同时美国应该抓紧一切机会进行领土扩张。1816年，国会通过一份法案，决定扩大海军力量，以弥补1812年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明显问题。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经常被神化为作风强硬的个人主义者，此时他也坚决支持海军扩建，认为其非常必要。1817年3月，他批评国会“过度节省开支”，指责国会丧失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在海外的角色”的远见。他大声疾呼：“如果每一个人都手握一把枪，那么即使全欧洲都联合起来，也伤不到我们。”后来，杰克逊成为总统后，欧洲是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总统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内容都是与外交事务相关的。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做出的安排很快就受到了挑战。法国国力迅速恢复：尽管规模较小，但法国还是重新组建了军队。1818年，法国清偿了所有的赔款，各国将占领军撤走，并通过投票方式确定实行“有选择性的征兵制”。此时，法国的战略意图基本是防御性的。当年夏天，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法国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结论是：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并且建设更牢固的要塞，才能够保证安全，抵御德意志邦联的威胁。实际上，在1870年普鲁士进攻法国之前，德意志始

终是法国决策者的心头大患，是战略讨论时的主要议题。类似地，在1815年以后的50年间，大英帝国首要的战略关切依然是欧洲：欧洲关乎英伦诸岛的安危，尤其是要保卫伦敦和英国南部沿海地区免受法国的入侵。东边和南边也有一些国家使得英国非常担忧。1815年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显示出了极大的克制，但是俄国国力的增加还是让邻国感到不安。尤其让英国担心的是，俄国将其大部分的军队（超过2/3）部署在波兰与俄国的边界线上，甚至在波兰境内。在意大利，皮埃蒙特–萨伏依王国扩大了其领土，但它却感到脆弱和不安，因此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在萨伏依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国王在表面上“支持”亚平宁半岛上的革命民族主义潮流，以此来“扼杀”革命，“事实上国王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领袖”。现在，皮埃蒙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地缘政治理念，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要想建立领土缓冲区，以保障王朝的安全，就必须支持意大利民族的统一事业，并使国王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导者。

1815年以后，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民众不断批评政府，并形成了革命运动，这挑战了欧洲的稳定。在法国议会和民众中，复仇主义的声浪开始出现，这是对欧洲的最严重的潜在威胁。1817年波旁王朝制定了宪法章程，而在议会选举出来的代表中，有近40%的人都是“百日王朝”时期的拿破仑支持者，甚至许多保皇党也强烈地认为法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他们不遗余力地抨击波旁政府，指责其纵容外国势力干涉法国的内政。这些人反对1815年的《巴黎条约》，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导致法国被敌国包围。政府的沉默使得民众失望，人们看不到法国的伟大希望。尤其是，批评者要求收回莱茵兰和萨伏依，这两块天然疆界既可以作为缓冲区，又可以作为一道泄洪闸，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军队可以如洪水般淹没意大利和德国。但是，波旁王朝对民众采取压制和限制措施，全国只有10万人拥有公民选举权，导致民众难以改变政府的作为，并且政府反对用冒险主义的对外政策来挽救民心。然而，由于民众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完全有可能导致法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

在莱茵河的另一岸，民众也对现状不满。在德意志的民众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兴起，他们对维也纳会议的安排表示不满。很多批评者认为，德意志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将推动自由主义改革，有利于国家强大起来，抵御外国的侵略。很多人对邦联制度不满，因为各诸侯国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不利于自由主义改革和国家的富强。尽管法国战败，但德意志民众一直非常恐惧法国。著名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约瑟夫·格雷斯（Joseph　Görres）警告：“在波旁王朝这朵百合花上，还有拿破仑的蜜蜂和马蜂正在寻找花蜜。”而此时，由于民众对邦联制度不满，他们非常敌视那些德国统一的阻碍者。自由民族主义者领导各种示威运动，一开始只是由几百名学生参加的“决斗兄弟会”，到后来则是大规模的群众集会。1817年，为纪念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系列文章发表300周年，学生们组织了“瓦尔特堡（Wartburgfest）集会”。1819年，曾经长期在俄国沙皇宫廷担任职务的德国保守派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被一名激进的学生当作民族敌

人而谋杀，使得整个运动发展到高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担心德意志的革命立即爆发，同时他试图避免其他国家的干涉，因此他说服普鲁士政府执行“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以镇压民族统一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所有人都在猜测，一旦德意志的自由民族主义力量冲破这些枷锁，或者当某些国家出于自身目的而利用这股力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将矛头对准了维也纳体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欧洲发生了社会与政治剧变，意大利也爆发了“复兴运动”，其特征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大利出现了一些非法的秘密团体，如烧炭党人（Carbonari），他们抨击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控制，也批评意大利各邦国对奥地利的屈服以及对本国民众的镇压。最重要的是，批评者不满意意大利长期保持分裂状态，他们对现状感到失望，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意大利人“共同身份感”的增强，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信仰：世界各国的领土面积和规模正在增大，要想在一个弱肉强食、掠夺成性的世界中求得生存，意大利人就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同样，在俄国，人们越来越对现存秩序不满，尤其是对沙皇的外交政策不满。无数秘密、半秘密的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并且很多退役军官加入这些组织，使得其规模迅速扩大。一些公共场所的扩展，方便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此这种不满的声音更加强大了：19世纪的前25年，俄国出现了120份新的杂志，并且每年的增长速率都在加快。波兰是争论的焦点，一些俄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特别是1817年成立的“南部社团”（Southern Society）和“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认为波兰是一个潜在的盟友，而其他人则对波兰有很深的疑心。1815年5月，亚历山大一世同意波兰王国成立，并且表示以后将帮助这个新的国家“发展壮大”，这时俄国人认为，沙皇似乎要放弃1772年所获得的领土。还有很多人批评，沙皇没有充分地保护东正教，没有代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教徒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导致了严重危机。1819年，沙皇的亲信、前俄国军官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Alexander Ypsilanti）领导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他是一位希腊的爱国者，其目标是推翻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附近省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统治。到1821年，战斗蔓延到伯罗奔尼撒以及希腊。1822年1月，希腊国家会议选举了一位总统，并宣布成立希腊共和国，通过宪法。土耳其决定以极端残暴的方式镇压起义，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教格里高利五世（Gregorius V）被土耳其政府当众绞死。1822年，土耳其人屠杀或流放了希俄斯岛（Chios）上所有的人。与此同时，美洲爆发独立运动，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岌岌可危。绝大多数西班牙人对美洲的独立运动表示恐惧，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西班牙人想利用其庞大的殖民帝国，来恢复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至少殖民地有利于防止西班牙再次遭受侵略。因此，1820年1月和2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收复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

而，正当国王将军队集结在加的斯（Cadiz），并准备将其运送到南美时，一些自由主义的军官宣布起义，要求政府恢复1812年宪法，最后演变成了全国的内战。几个月以后，1820年7月，意大利南部的“烧炭党”与一些自由主义军官联合起来，共同发动起义，反对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国王被迫根据西班牙1812年宪法颁布两西西里王国的新宪法。很快，葡萄牙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到1821年春天，革命的精神向北蔓延。3月初，皮埃蒙特的部分军官发动起义，要求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一世（Victor Emmanuel I）颁布新宪法，并要求意大利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

当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这在英国最为突出，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贸易。但在1817年，废奴运动遭遇了严重挫折，在“路易斯判决”（Le Louis judgment）中，英国法院认定，如果某个可疑的运奴船属于其他国家，在没有得到该国允许的情况下，英国皇家海军没有权力阻止或搜查该运奴船。英国法院认为：“英国不能通过践踏其他国家的独立来推进非洲的解放，我们的确应该建立一个伟大的原则，但我们不能为此而牺牲其他早已确立的伟大原则。”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废除奴隶贸易的前提是先与其他国家达成外交共识，英国应避免单方面的行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共识基本达成之后，由于受到法律规范的限制，英国政府还是难以落实废奴政策。因此，在19世纪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大西洋上的非法贩奴贸易依然进行得红红火火。为此，废奴主义的活动者以及支持废奴的议员，不断向内阁及各大臣施加压力，要求更强有力地部署海军，打击西非海岸上的贩奴站以及在大西洋两岸穿梭的贩奴船。19世纪20年代初，希腊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希腊人的苦难得到了很多国家人民的同情。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以及西欧和中欧的多数国家都支持希腊的解放事业。他们当中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浪漫主义者，尽管原因不同，但他们都同情希腊民众。很多民众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干预，以阻止其暴行。还有一些人自愿来到希腊，为这个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英国诗人拜伦就是其中的一位。

希腊、拉丁美洲、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如何处理这些危机，各国之间有很大分歧，各国内部也有很大分歧，这种现象持续存在于19世纪20年代初。一方面，在大多数时间，多数欧洲列强都认为，这些起义说明，欧洲各国以及殖民地社会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颠覆性倾向，有可能会扰乱现存的秩序和国家体系。梅特涅是最典型的一位人物，他坚决支持建立一个“中央调查委员会”，以侦察全世界的“革命阴谋”。亚历山大一世以前并不把自由主义力量放在眼里，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使他深感震惊，因此他与梅特涅达成了共识。这一时期，普鲁士一直对梅特涅唯命是从，因此，对于上述问题，普鲁士支持梅特涅的立场。在巴黎，复辟的波旁王朝同样对革命活动深感不安，担心革命会对法国与西班牙、皮埃蒙特之间的边境地区产生不良影响。英国一般对于干预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持谨慎态度，但1821年1月卡斯尔雷宣布“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出现不安定的因素，并且对另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基本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时，英国政府将坚定地支持任何国家对此进行干涉，以

保护各国的合法利益”。他不反对干涉原则本身，但反对某些国家逆潮流而动，反对有的国家以此来实现其不正当的利益。

此时，各列强考虑的是1815年以后的地缘政治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它们试图以革命为契机，实现自己的利益。对法国而言，干预西班牙或意大利，有助于法国趁机摆脱维也纳体系对自己的限制。尽管当时民众不支持政府，但干预政策有助于暂时团结民意。对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言，西属美洲革命的爆发有利于它们趁机寻求领土扩张、谋求商业利益。对俄国而言，希腊的起义有利于亚历山大一世在凯瑟琳大帝奠定的基础上，再次向南扩张领土。各国都想扩张，因此一定会产生矛盾，各大国不会甘心将机会留给对手。俄国担心，西班牙被驱除出拉美后，其他列强会在那里建立起垄断地位。亚历山大一世甚至怀疑，拉美的叛乱，其实就是英国人阴谋的一部分，英国想将美洲的所有财富全部据为己有。梅特涅担心俄国势力扩张到多瑙河诸公国，那样会导致奥地利帝国在东南方向陷入更进一步的包围之中。他认为，法国对意大利的渗透，是比革命本身更为严重的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法国跨过比利牛斯山干预西班牙，梅特涅陷入两难，态度犹豫不决。西班牙波旁王朝复辟之后，亚历山大想主导西班牙的事务，这让其他国家更加惶恐不安。卡斯尔雷警告道：“干涉主义的普遍原则，会导致俄国人提出让人无法抗拒的要求，他们可以在德意志邦联的土地上肆意妄为，甚至长驱直入到欧洲最远的角落。”简而言之，尽管从意识形态上看，各国都反对革命，但最让各国担心的是某一个大国获得独冠群雄的战略优势。

1820年11月，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特罗保（Troppau）召开会议。各国一致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发生革命，导致政府出现变更，并且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神圣同盟有权通过和平方式恢复该国原来的政府，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在这个基础上，1821年，三国在莱巴赫召开会议，授权奥地利对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进行干预。意大利的革命被镇压后，欧洲列强又在维罗纳（Verona）召开会议。表面上看，会议是要讨论在原来爆发革命的地方进行改革，以防止再次发生革命；不过很快各国出现了分歧，代表们争论该如何解决希腊问题和西班牙问题；会场上充满火药味，尤其是因为法国代表想利用这次机会，要求变更莱茵河的边界。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823年4月，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预，绞杀了西班牙的革命，并且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王位。然而，梅特涅其实非常反对法国的单边行动。在维罗纳会议上，各国一直在对干涉问题进行争论，但代表们却回避了与德意志邦联相关的问题。卡斯尔雷认为：“德意志邦联的安全与欧洲安全是密不可分的，欧洲是一个整体。”不过，他也坚定地认为：“革命带来的威胁是直接的、迅猛的，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动用军事手段；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干涉德意志的事务。”

然而，干涉原则最强烈的反对者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政府和公众都认为，西班牙和希腊（尤其是前者）是抵御欧洲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法国镇压西班牙的革命后，还试图向大西洋彼岸派出海军，以消灭拉美的革命者，并把法国和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亲王们送到那里，

建立一系列保守的君主政体。此时，美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怀疑，欧洲列强有意对原本属于西班牙的土地进行“重新殖民”，并且将其“完全瓜分”。一个令人震惊的前景展现在眼前：俄国可能会夺取加利福尼亚、秘鲁和智利；法国可能会夺取墨西哥。亚当斯表示：“我们知道法国一直密谋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君主国，并让波旁王朝的一个亲王去那里担任国王。如果英国不能阻止法国占领墨西哥，那么它也会趁机捞一笔好处，它至少会夺取古巴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如果古巴被英国占据，墨西哥被法国控制，那么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境地？”换言之，美国将被欧洲大国包围，而这些大国又对美国充满敌意。

1823年12月初，美国总统门罗第7次向国会做年度报告（即国情咨文），此时的美国就正面临着上述国际环境。他说道：“欧洲是全球的1/4，我们与之交往甚深，并且我们源于这个地方；对于欧洲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忧心忡忡，但我们仅仅是旁观者而已。”他警告说：“虽然美国承诺尊重各国现有的殖民地，但如果欧洲国家对新兴的拉丁美洲共和国进行压迫，或者如果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任何地区扩展其殖民体系，我们都会将其看作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明确宣布，“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当作殖民的对象”。换句话说，“门罗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也不意味着美国只关注西半球，而是反映了美国人一贯的信仰。他们认为，欧洲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

19世纪20年代的国际动荡席卷整个欧洲。1825年，干涉意大利所造成的巨大代价迫使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召开匈牙利议会。随即出现僵局：哈布斯堡王朝拒绝了马扎尔人领导人——伊斯特凡·赛切尼（István Széchenyi）——的要求，匈牙利语没能成为官方语言；而奥地利政府则空手而归，没有实现扩大财政预算的目的。在英国，国际局势引发了一场有关改革的讨论，其中拿破仑战争对英国内政的影响最大。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天主教解放法》，规定给予天主教徒以平等的公民权利，支持者十分感激威灵顿公爵。威灵顿在议会中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如果没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贡献，自己是无法成功打败拿破仑的。在俄国，战略决策问题导致国内政治出现混乱，困扰着沙皇政权。朝廷中的“战争派”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做的努力远远不够，他没有对希腊的东正教同胞提供帮助。一个由自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地下组织——救济同盟（Union for Salvation），也认为沙皇做得不够。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一时间无人继承皇位，导致出现权力真空。由于沙皇没能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很多自由派军官决定发动起义，准备逮捕整个沙皇家族，并废除农奴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尽管起义被镇压，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不遗余力地镇压革命，但他以后在制定大战略时，也不得不考虑自由派的声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列强开始仔细考虑如何应对希腊危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希腊持续不断的动乱深感不安，1825年2月，他指派他的埃及总督（即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镇压起义。阿

里同意出兵，他的条件是要求获得叙利亚。很快，他率领强大的军队挺进希腊，血腥残忍地镇压了起义。俄国有很多个支持希腊人的团体，这些人极力游说沙皇，要求对奥斯曼苏丹进行干预。和民众一样，尼古拉一世也对希腊表示同情。1826年4月，他在圣彼得堡与英国代表会晤，双方同意将共同调停希腊事务，同时保证不在希腊获得任何商业或领土利益。6个月后，英、法、俄三国代表在阿克曼会晤，他们认为，希腊应该成为土耳其的半自治属国。巴黎和伦敦都希望，一个强大的希腊应该成为有效抵御俄国扩张的堡垒，而非沙皇扩张的代言人。无论如何，英国首相更加关心的是，如何防止俄国干预德意志事务，而不是防止俄国干预巴尔干事务。很多人对希腊人表示人道支持，反对土耳其的残暴行径，这也推动了英、法、俄三国尽快采取措施。英法海军开始进行干涉，并于1827年10月在纳瓦里诺（Navarino）完全摧毁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年底，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决定先发制人，宣布对俄国发动“神圣战争”，试图对反土联盟进行反击。但土耳其很快力量不支，1829年9月，土耳其人签署《阿德里安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被迫做出妥协。希腊独立，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获得自治，而俄国只在高加索地区获得了非常小的一块土地。

围绕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拉丁美洲问题产生的争论，暂时转移了各国对欧洲政治中最重大的问题——德国的未来——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越来越担心法国力量的复兴。而奥地利对此态度冷漠，这使得普鲁士的新外交大臣贝恩斯托夫伯爵（Count Bernstorff）十分丧气，他开始扶植德意志的中小邦国，它们也担心再次遭受法国的侵略。贝恩斯托夫伯爵实施更加强硬的政策，其核心是成立一个关税联盟。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而非商业性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冯·莫茨（Friedrich von Motz）预言，“政治联盟”将会成为“商业联盟的必然结果”。他总结道，这一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和保护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它能够真正获得内部自由和外部自由”。这是普鲁士高官第一次清楚地指出，只有德意志实现统一，普鲁士才能获得安全。

在莱茵河彼岸，法国的观察人士也备感焦虑，他们也看到了德意志军事力量的壮大。在议会内部，更多是议会外部，有许多人对国王和大臣进行批评和指责，要求他们尽快修改被法国人恨之入骨的“1815年条约”。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认为：“一场反对维也纳宫廷的战争，或许有助于结束国内臣民对我的不满，并且我还可以大规模地任意占领其他国家。”不过，法国没有对哈布斯堡王朝下手，而是选择在北非扩展力量，压缩奥斯曼帝国的势力。1830年7月初，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尔，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巴巴里海盗一劳永逸地连根除掉，还有部分原因是在南翼扩充力量，以防止国家再次被其他大国占领，但主要原因在于恢复政府在民众中的地位。但这为时已晚。月末，由于人们长期不满复辟波旁王朝的国内政策，并且认为这个政府无能，无法恢复法国在欧洲应有的地位，“七月革命”终于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国王被废黜，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被拥戴登上王位，成为“平民国王”。

接下来的两年中，革命者的不满情绪传遍欧洲。这些不满是对法国“七月革命”的呼应，至少是与其同时发生的。1830年8月末，比利时人反抗荷兰联合王国国王威廉四世，并宣布独立；卢森堡也出现反抗运动，反抗者声称自己属于比利时治下，这是对德意志邦联的挑战。三个月后，华沙的波兰人起义，反抗俄国的统治。而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依然相对平静，只是萨克森和不伦瑞克出现了革命。1831年初，意大利的帕尔马和摩德纳发生了起义。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民众对选举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持续发酵。1831年末，由于穆罕默德·阿里干预希腊失败，苏丹又拒绝将叙利亚赏予阿里作为补偿，阿里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恶化，最终他与苏丹决裂，并向苏丹开战，试图进攻君士坦丁堡。1832年12月，阿里在科尼亚（Konya）战役中重创土耳其军队。然而此时，沙皇尼古拉并不希望阿里推翻整个土耳其，一旦如此，阿里就有可能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联合起来，从东边发动对俄国的进攻。因此，从大西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乃至更远的地方，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动荡。

这些动荡对于欧洲稳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19世纪20年代。这一次，革命打击了法国自身。对于梅特涅这样顽固的反动分子而言，革命将对整个大陆产生猛烈的影响，而且同样明显的一点是，各地的革命是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只是巧合。长期以来，他一直怀疑，有一股阴险的力量在暗地里精心策划着这些暴力行为。1831年8月，梅特涅警告一名俄国外交官：“巴黎有一股人在操纵着各国的革命，一旦他们胜利，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不复存在。”然而，对于维也纳体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地缘政治上的因素。种种迹象显示，法国的新政权将会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1831年1月中旬，让-马克西姆利安·拉马克将军（General Lamarque）在议会发表演讲，他宣称：“巴黎的大炮将会让滑铁卢的大炮哑然失声！”法国激进分子不断要求在欧洲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解放战争，或者至少出动远征军，向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人民施以援手。这不仅反映出，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本身就有对外传播的需要，更反映出这样一种重要的信仰：只有当全部欧洲实现“自由”时，法国才能保证其革命的安全。法国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多人支持波兰人民。1832年1月，法国派军队抵达意大利中部城市安科纳（Ancona），以密切监视奥地利军队在教皇国（Papal States）的举动。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最让人担心的是奥地利要求同比利时合并。甚至，比利时人自己主动提出，要求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小儿子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担任比利时国王，取代荷兰国王威廉对比利时的统治。尽管此事最后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实现，但比利时事实上成为法国的友好国家。

简而言之，1830~1832年的革命沉重打击了维也纳体系，特别是动摇了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现存秩序。法国与比利时建立了友好关系，将摧毁1815年建立起的屏障，使得英格兰南部的海岸面临遭受法国进攻的可能，并且使德意志邦联的西部边界也面临着法国的威胁。法国获得了大片的领土，这将会破坏欧洲的均势。这远远要超过沙皇领土扩张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德意志邦联面临的所有内部或外部威胁，都会

对国际关系稳定造成致命破坏，也是对英国安全的致命破坏。1832年9月，英国驻奥地利大使称：“德意志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并且实行君主制和联邦制，这才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这样，它不仅不会侵略别的国家，而且可以抵挡东边的或西边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因此它应该成为欧洲和平的中流砥柱。”然而，此时德意志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一旦这成为事实，也会破坏欧洲的均势。因此，英国驻德意志邦联大使发出警告：“英国要反对德意志人对统一的过分追求。”此时，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似乎在所难免。1831年巴黎一份左翼报纸讽刺道：“所有这些看起来很像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敌对的各国似乎都不在意打一场全面的战争。”

从一开始，梅特涅和尼古拉一世就要求对革命行为进行讨伐；不过其他列强对此很漠然，它们不愿直面这些挑战。它们同意对法国进行遏制，而非直接毁灭法国。它们不希望干预法国的革命，只有当法国越过莱茵河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时，才会将其立即击退。1830年12月，伦敦会议做出了对比利时的前途至关重要安排。会议允许比利时脱离荷兰，但前提条件是比利时必须成为中立国，并且其君主不会引发争议，也就是说法国人不能成为比利时的君主。为了提高奥地利外交的信誉，梅特涅派军队扑灭了意大利革命。同时，德意志邦联组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由普鲁士领导，以抵抗法国的威胁。德意志的革命也被迅速镇压。比利时的情况更为复杂：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失去比利时的现实，8月初荷兰军队试图收复比利时。法国以此为借口反过来对荷兰进行干涉，并在安特卫普（Antwerp）包围了威廉的军队。法兰西人为此而欢呼，但英、普、奥、俄也正在对此密切关注。直到1832年末，荷兰军队才被征服，这确保了刚刚成为中立国的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之后，法国军队很快撤退。与此同时，1831年9月，沙皇镇压了波兰人的革命。1833年2月，应苏丹的请求，沙皇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派出军队，阻止了穆罕默德·阿里进军的脚步。接下来，1833年7月，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安吉阿尔–凯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对于沙皇而言这显然是一次胜利。根据条约，发生战争时，俄国的军舰可以使用海峡，而其他国家的海军将不可以从此处通过。

当1833年末、1834年初的战争硝烟散去时，横贯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新轮廓已经清晰可见。其中，奥斯曼帝国成为俄国用来防御其他国家的屏障，君士坦丁堡成为俄国通往地中海的突破口。当时，尽管俄国获得了新的影响力，但它依然保持节制，部分原因在于俄国已经内化了维也纳体系的规则，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俄国担心招致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反对，担心出现反对自己的均势联盟。若干年后，当俄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缅希科夫（Alexander Menshikov）呼吁进一步向南扩张时，却遭到了外交大臣查理斯·德·内塞尔罗德（Charles de Nesselrode）的反对，他认为这会导致英法的不满，导致它们在黑海建立海军基地。

自由民族主义带来的挑战受到了制约，但是没有被完全控制住。根据1830年《伦敦条约》，希腊正式独立，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已经难以维持在其西部的统治，其稳定进一步受到威胁。约有3/4的希腊族人仍

居住在希腊本国以外的地方，如马其顿、塞萨利（Thessaly）、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以及附近的岛屿。希腊政府希望将所有的希腊族人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宏伟设想”。在接下来90多年里，上述“宏伟设想”成了希腊国内政治中主要的争论话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原本四分五裂的社会里唯一的共同原则。

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领导了“青年意大利”（Young Italy）运动。1931年，他在《青年意大利成员总则》中指出，亚平宁半岛需要实现统一，因为“没有统一，就没有真正的力量；目前意大利被强大、统一的国家所包围，它们猜忌意大利，因此意大利需要力量”。“青年意大利”运动反对联邦主义：“如果意大利也像瑞士那样，被削弱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力量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必然会受制于邻国的势力。”马志尼认为，自己统一意大利的计划是实现整个欧洲统一的宏伟远景的一部分，这是“意大利为全人类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我们注定要完成”。他坚信自己会最终取得胜利，因为他相信“欧洲正在经历一系列进步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将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引领欧洲社会向前发展，并形成广泛而统一的整体”。1834年4月，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部分人士在瑞士伯尔尼成立了“青年欧洲”组织，表达对意大利统一的憧憬。该组织希望凭借自己的理想信念，颠覆现存国际秩序，至少在当时，他们是反对使用阴谋手段的。

最为重要的是，德国地缘政治的变化已经从1815年就开始了，而1830～1832年的革命加速了这个变化。奥地利过分关注意大利发生的各种事情，而无暇顾及德意志邦联的整体防务，也很少顾及卢森堡的防务。对于中等的德意志邦国来说，它们显然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例如，1819～1830年，巴伐利亚的军队开支每年都减少超过1/3。巴伐利亚首相卡尔·奥古斯都·冯·旺根海姆（Karl August von Wangenheim）甚至认为，自己的国家对德意志邦联的防务贡献最少，反而是一件自豪的事情。德意志邦联的堡垒和要塞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普鲁士决心承担卢森堡的防务，奥地利则没有承担该责任。普鲁士这么做，并非只是出于对德意志的情感，还在于它越来越确信，普鲁士要想保证自己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就应该将整个德意志团结起来并为德意志的利益服务。同时，巴登、符腾堡，甚至巴伐利亚等邦国都意识到，只有柏林才能保护它们免受法国入侵。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在1831年写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南德意志’‘北德意志’，我只知道‘德意志’，只有与普鲁士建立坚实的联系，我们才能获得安全。”德意志内部的革命被平息后不久，1833年普鲁士组建了著名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并且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都同意加入。黑森——达姆施塔特首相弗雷尔·冯·蒂尔（Freiherr von Thil）认为，该同盟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我不想隐瞒实情，一旦我们通过商业方式同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就必然会与之产生政治情感。”

革命危机同样大大推动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绪的发展。1832年，“德意志支持言论自由爱国主义协会”成立。它迅速在全国各地吸纳

了5 000多名成员，并在同年组织了“汉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这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起义，有两万多名德国人参加，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爱国立场。在南德意志各邦议会的内外，民众的自由主义思潮爆发，其中以毗邻法国的各邦（如巴登）最为明显，它们向普鲁士寻求援助，希望获得安全保护。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Johan Georg Wirth）——一名来自巴伐利亚的巴拉汀民主党成员——呼吁组成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宪政国家联盟。在普鲁士，自由主义者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呼吁进行宪政改革，以“在国家内部和其对外关系方面维护和提升国家的实力”，尤其要加大遏制法国的力度。在德意志的民众之中，自由民族主义的力量开始增长。他们认为，德意志的当务之急就是实现国家统一，以抵御法国的威胁。德意志议会议员约瑟夫·楚·扎尔姆–迪克（Joseph zu Salm-Dyck）亲王对国内政治革命和对外防御之间的联系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1831年1月，他在给莱茵兰总督的信中写道：“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能消除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差异，防止其造成有害影响，这样国内不同的地区就会逐渐融合，整个民族最终会团结起来。”他还指出“法国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并对其邻国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它有自由的政体；只有当普鲁士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导者，它才能获得同样的力量和影响。”

德意志境内事态的发展受到了西面和东面国家的密切关注。普鲁士动员的速度和规模极大地震撼了法国军方。此后，他们将普鲁士而不是俄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法国更加担心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力量。1832年7月，法国外交官阿道夫·德·布尔克内（Adolphe de Bourqueney）评论道：“我们必须坚决维护维也纳体系，必须保证德意志小公国的独立，这是我们对德意志的政策的基础。请放手处理你们的任务，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国的消失，不管这个邦国有多小。”从自身立场出发，俄国人将奥地利和普鲁士视为对抗法国革命的大坝或防波堤，认为它们能够阻挡法国的革命狂潮，防止其颠覆俄国，至少在革命狂潮到达波兰或俄国之前降低其破坏力。出于这样的考虑，沙皇向柏林施加压力，要求柏林撤掉那些希望同自由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大臣。19世纪30年代初，莫茨去世，保守派弗里德里希·安茨隆（Friedrich Ancillon）取代贝恩斯托夫成为外交大臣，沙皇得以为所欲为。1833年，三国代表在慕尼黑城郊会晤，一致同意将继续坚持保守主义原则，以维护中欧和奥斯曼帝国的现状，防止出现破坏稳定的因素。两年后，普鲁士与俄国在波兰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来表现两个国家的团结。“反对革命”的诉求将欧洲列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西欧，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并开始应对其挑战。英国的外交政策尤其表现出了解放主义式的色彩，还不时显示出弥赛亚情结。这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意识，正如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指出的：“欧洲的和平和英国自身的安全都仰赖于维护自由，以及保证其他所有国家的独立。”他写道，英国的自由之所以能维持，靠的是其贯穿整个欧洲的防务力量，因此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英国的“天然盟友”。1832年，帕默斯顿表示：“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应该以友善的方式，通过忠告和建议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以维护自由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独

立；凡是不断努力地在追求建立理性政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英国的道德感召力，英国将力图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其文明。”换言之，英国将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不愿接受的人，但是英国保证支持愿意主动追求自由的国家——那些“自发地”为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努力奋斗”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主战场是国际奴隶贸易，奴隶制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1833年，大英帝国终于在其全境内（包括英国本土及全部海外殖民地）彻底废除奴隶制，受此影响，一年之后法国废奴组织成立。现在，英法两国的民众都反对奴隶贸易，并且掀起了骚动。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之间有可能进行联合行动，实施更加有力的反对奴隶贸易的政策，以彻底消灭奴隶贸易。1807年以后，在执行该政策的过程中，英国皇家海军在几乎所有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刚刚独立的中、南美洲国家，也很快废除了奴隶制。1820年，西班牙曾经规定进口奴隶是合法的，现在英国强迫西班牙废除该规定。此时西班牙只有一块较大的殖民地——古巴，英国持续对西班牙施压，要求其完全废除在古巴实行的奴隶制度。1835年，伦敦和马德里达成条约，规定对奴隶贸易进行限制。当时，西班牙没有认真遵守这项协议，但这使得国际间做出更多努力来推动奴隶贸易的废除。1838年，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反奴隶贸易协会”，两年以后各国在伦敦达成了《世界废奴公约》（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此时，葡萄牙依然有人向巴西运送奴隶以牟取暴利，他们的商船依然游弋在大西洋上。这导致加入《世界废奴公约》的国家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另一方面，不管是在国内政策中还是对外政策中，奴隶制的问题在美国也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而就在此时，新兴的棉花经济正在美国南方发展迅速。1820年1月，美国南北双方的政府达成《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规定北纬36度30分线为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但是，南北双方依然都不满意，都对《密苏里妥协案》进行攻击。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了《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要求彻底废除奴隶制。此时，北方各州的民意变得越来越激进，即使他们不直接反对南方的奴隶制，也至少反对将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刚获得的领土。就南方人而言，他们在看待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时都表现得顾虑重重。在更远的西部，法国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并且一度占领了韦拉克鲁斯（Veracruz），目的是逼迫墨西哥偿还债款；法国还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积极的活动，试图攫取利益。显而易见，此时美国西部和南部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必须向这里进行扩张。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其他的国家也会这么做。但是，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南北双方有重大的分歧。而美国继续进行领土扩张，就会导致南北冲突加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西进运动曾经进展迅速，但现在不得不停止了20年。

然而，欧洲才是新的地缘政治焦点。1830年之后，法国基本确立了自由且温和的政治体制，1832年英国也巩固了自由且温和的政治体制，因此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接近。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基本上是自

由立宪主义政府。因此英、法、西、葡形成了一个四国同盟。这个同盟与1833年俄、普、奥三皇协议针锋相对。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对此欣喜若狂：“我们西方的四国同盟将联合起来，对抗暴君政府组成的三皇同盟。”欧洲大陆现在被分裂成为两大阵营，双方的意识形态迥异。自由主义者曾经对亚历山大一世充满希望，但现在他们对尼古拉一世非常失望，他们将沙俄帝国看作全欧反动力量的堡垒。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作家罗伯特·布雷姆纳（Robert Bremner）曾指出，欧洲各出版社的很多书籍把俄国描绘成“疆域最辽阔、不可抵挡……但又最为强大、最可怕、最顽固的极权国家”，说“它威胁着人类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场冷战中，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这是东西方对抗的主战场。19世纪20年代起，葡萄牙的内战持续不断。西班牙的内战则爆发于1833年。斐迪南七世去世，年仅三岁的伊莎贝拉二世即位，然而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亲王立刻发动叛乱，他宣称自己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卡洛斯派的支持者，主要是旧贵族和保守分子，东方三国——俄、普、奥——支持卡洛斯夺权，并为他提供军队、资金和外交支持。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则反对卡洛斯，拥护伊莎贝拉二世，在整个30年代，他们至少6次要求其他国家进行干预。英国和法国决定向西班牙派出海军，并在外交上提供支持，还给军队提供了很多贷款。法国内政部长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宣称，西班牙的局势关乎法国的国家利益，法国必须保卫西班牙的自由主义。此外，梯也尔认为，西班牙是法国的邻国，保护西班牙就是保护法国的利益，因此法国有权进行干预。18世纪90年代，伯克就曾认为，法国关乎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有权干预法国的事务，以维护自己的安全。梯也尔与伯克二人的说辞一模一样。对于帕默斯顿而言，“西方同盟”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伊比利亚半岛的宪政主义，这是保护英国自由的第一道防线。

19世纪30年代末，西欧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开始碎裂。在英法两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自由国际主义。在法国，议会和公众认为，政府对于整个欧洲大陆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努力还不够，他们还认为，政府应该提高法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因为对西班牙采取谨慎的政策而遭受民众的抨击，他还因容忍奥地利军队镇压克拉科夫自由城的动乱而招致批评。在英国，自由主义又被分为两个阵营：一派以帕默斯顿为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另一派以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进行干预。在英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俄国是最大的威胁，其中自由主义者最为明显。但科布登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反对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他努力淡化沙皇的威胁，而且还相信，积极的对外干预会导致国内政治的退步；大规模的常备军、沉重的国家债务、庞大的殖民地，都会给英国带来沉重的负担。科布登坚决主张废除《谷物法》（Corn Laws），他认为《谷物法》的目的是维护贵族在政府、社会和军队中的利益。废除《谷物法》和推动国际自由贸易，是保护国内自由主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利器。

最后，19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是被一系列事件而非各种

意见粉碎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伊比利亚半岛、海外和其他地区，英法两国都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两国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到穆罕默德·阿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时候，两国关系急转直下。1839年，阿里宣布埃及独立，导致奥斯曼苏丹对埃及大举进攻。法国把阿里看作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推动者，它支持埃及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进军。这出大戏上演至一半时，另一场危机在大马士革爆发。法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向阿里提供了证据，导致阿里对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则消息于1840年初传到欧洲。英国自由派民众非常厌恶奴隶制，现在又看到犹太人遭到了埃及人的屠杀，因此更加愤怒。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如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爵士（Sir Thomas Fowell Buxton），以及爱尔兰议会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开始大展身手。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以及各政党的领导人都非常担心法国在近东的渗透活动。梅特涅也对法国表示担忧，在这一问题上，他确信能从普鲁士那里得到外交支持。俄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看到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推进现代化，他们深感恐惧。因此，1840年7月中旬，英、奥、俄、普四国同意对奥斯曼帝国提供支持，保护博斯普鲁斯海峡免遭第三方占领。1840年9月，皇家海军被派往黎巴嫩，英国和奥地利陆战队在贝鲁特北部登陆，逼迫穆罕默德·阿里放弃叙利亚。帕默斯顿告诉英国领事，要让阿里明确无误地意识到，他在大马士革犯下了“严重的野蛮暴行”，必须进行反思。面对四国的联合阻击，阿里只好释放了犹太人，并撤出叙利亚。在欧洲历史上，列强经常会先惹出祸患，然后再自行解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法国，“东方危机”导致议会和民众非常愤怒。法国人非常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他们把阿里看作现代化的推动者，同时认为他可以阻止俄国的扩张，并且制约英国的“海上暴政”。1839年，法国人对阿里的支持行动达到高潮。7月，法国政府轻松地获得了海军预算，以扩充地中海舰队。然而，这一行动的最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要增加法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而在于确保法国在莱茵河边界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在这个背景下，1840年7月，英、奥、俄、普达成关于海峡问题的四国协议，巴黎被排除在外，因此法国人感到愤怒就不足为奇了。媒体、议会和公众对于这样的羞辱十分气愤。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警告：“如果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王朝劝说自己的民众对这种事情袖手旁观，那么它就不可能避免被推翻的命运。”愤怒的公众要求发动战争并进行选举改革。英、奥在贝鲁特的登陆，导致法国有人试图暗杀国王，以扭转外交上的被动。梯也尔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加大赌注，要求修改莱茵河的边界线，以“补偿”法国在近东的损失。他做足表面功夫，将莱茵兰的军事地图挂在办公室，威胁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属地（那里是奥地利的“软肋”），并大谈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以平息和牵制国内民众的意见。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宣称：“我宁愿倒在莱茵河或多瑙河的岸边，也不愿倒在圣丹尼街的阴沟里。”换言之，法国政府已别无选择，要么把战争引向德意志，要么与自己的民众开战。

法国的叫嚣传到莱茵河的另一边，导致德意志人做出反应，整个邦

联被民族主义的巨浪所淹没。其中，南部和西部的民族主义最为明显，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家乡第二次被法国占领。然而，事态的发展再一次暴露了德意志邦联在国防上的致命弱点。离法国较近的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和其他中小国家只能召集很少的士兵，根本无法应战。匈牙利议会争吵不休，不能批准奥地利的国防预算；奥地利过多地卷入了意大利的事务，已经债台高筑，也无法应对法国的挑战。这一次，迎接挑战的又是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内，普鲁士整顿邦联西部的要塞，使其恢复秩序，还动员了将近20万人。最后，路易–菲利普胆怯了，梯也尔被迫辞职，法国做出让步，战争得以避免。

1839～1840年的中东欧危机，引发了欧洲各国外交和国内政治的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使得德意志其他邦国更倾向于向普鲁士寻求保护，以抵御法国的复仇主义。尽管这些邦国并不愿意在军事上完全从属于柏林，但它们也不得不承认：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抵挡得住法国的。过去它们很排斥普鲁士，但现在不得不将自己的未来命运交给普鲁士。受莱茵危机的影响，德意志的自由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开始兴起，超越了邦国的界限。莱茵自由主义者大卫·汉泽曼曾写道：“德意志帝国必须强大而有力，因为我们的邻居十分危险。在东面，横卧着俄国，这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扩张主义者，它已经对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如波兰）形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着东普鲁士。西面则横陈着法国，它的内部非常团结，民众好战而且不安分，这种本性是十分危险的，他们要求重新划定莱茵地区的边界线，这种顽固的信念令我们无法接受。因此，普鲁士要开始着手统一德意志，使它不再是‘欧洲所有大战的战场’。”这是一份写于1840年的备忘录，后来得到广泛传播。德意志的其他自由主义者（包括南方的自由主义者）也都表达了类似观点，思想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法国的政策效果适得其反，最后伤害了自己的利益。1840年11月，梅特涅曾说：“梯也尔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得德意志变得如此团结；而当年拿破仑用了10年时间来镇压德意志人，才使得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反对他。”

同德意志之前的几位君主一样，德意志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国内政治结构应该反映对外政策的需要。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将其视为建立宪政政府的要求。汉泽曼说，普鲁士由“广泛而分散”的省组成，与之相应，它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的、普遍的和具有民族性的”爱国主义，才能将其团结在一起；他断言，“只有人们获得自由，普鲁士人的爱国主义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者通过一整套内部改革来寻求改善自己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不再受制于东部和西部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罗伯特·普鲁茨（Robert Prutz）认为：“若一个民族内部实现了统一，人民获得了解放，那么它将成为一个伟大且强大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尤其希望使得中产阶级发挥其强大力量，他们认为只有民意、大众军事力量和“同质性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而传统的君主力量已经不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呼吁普鲁士发挥其作用，成为德意志的“民族代表”，最终缔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整个民族抵挡外部的侵略。

1839～1840年的系列事件同样导致巴尔干发生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法国试图染指博斯普鲁斯海峡，被俄国挫败。但1841年夏天，英、奥、普、法、俄、奥斯曼帝国签订的《伦敦海峡公约》（London Convention），使得俄国利益大大受损，外交上遭受失败。因为公约明确规定，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行，俄国的特权被剥夺。更令人担心的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濒临崩溃。在阿里及其他实力派的影响下，帝国有解体的趋势。1844年1月，沙皇访问伦敦，并提醒英国政府考虑：一旦“发生了不可预见的事情”，导致君士坦丁堡出现权力真空，应该如何进行应对。英国没有加入对奥斯曼帝国的掠夺，而是试图鼓励苏丹进行改革，以防止土耳其内部崩溃，以及免于遭受外部攻击。这项努力的核心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伦敦表示，它希望奥斯曼帝国进行国内改革，伦敦并不想羞辱或者控制奥斯曼帝国，而是支持它增强实力，以抵抗外部侵略者，降低其内部动荡的危险。帕默斯顿曾对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Tanzimat）运动[1]进行如下评论：“土耳其没有理由成为一个不受人尊重的大国。”西方国家邀请土耳其加入国际社会，并不是要让其臣服于西方。

不过，在大西洋彼岸，西欧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对其造成了最为强烈的影响。1839年，法国政府宣布其有意废除奴隶制，并将在6年后完全实现（即允许殖民地有过渡期），因此开始逐渐限制和禁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后，帕默斯顿一直拒绝承认其独立。直到1841年得克萨斯公开声明放弃奴隶制，帕默斯顿才承认其独立。同年5月，帕默斯顿表示，英国希望与欧洲其他五国结束漫长的谈判，并尽快签订一项条约。美国奴隶主越来越忧心忡忡地关注着这些发展态势。1843年8月，美国国务卿阿贝尔·厄普舒尔（Abel P. Upshur）预测“英格兰决心在整个美洲大陆和各岛屿上废除奴隶制”。美国南方的战略家们逐步得出结论，为了谋求生存，必须扩大奴隶制的范围。而为了游说国会，提高话语权，奴隶主们必须掌控美国的对外政策工具，并结束20年的相对战略克制，寻求扩张领土。1844年，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表示，他将进一步进行领土扩张，以捍卫美国的利益。在竞选辩论中，他提到了与邻国的关系、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提到了欧洲的发展情况。最后，他顺利当选总统。

此时，欧洲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跨国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断层线。大马士革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西欧和中欧爆发出来的反犹情绪，导致184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建立国际家园。1840年8月，艾萨克·莱泽尔（Isaac Leeser）拉比在费城犹太人大会上说道：“尽管我们无法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无法安全地生活，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视彼此为手足，不管他们的家在热带还是极地。”生活在英法的很多犹太富豪，为犹太活动者提供财政与道德支持，他们开始锁定目标，将斗争矛头对准那些公开从事反犹政策的政府和组织。因此，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和法国人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前往大马士革，要求释放被抓捕的犹太人。俄国的一些犹太人，被政府威胁驱除出定居区，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替这些人主持公道。在国际上，犹太人与每个国家分别较量，特别是与沙俄帝国较量。不过，犹太人的主要斗

争焦点，是罗马天主教。当然，犹太人的过激反应反而更刺激了反犹主义的发展，使他们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1840年，法国天主教报纸《世界报》（*Univers*）大声疾呼："希伯来人的民族性没有消亡，阿尔萨斯、科隆东部以及梅塞尔的犹太教徒，与罗斯柴尔德和克雷米厄先生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宗教联系。"该报纸还谈到："他们依然非常团结，全世界的犹太人希望联合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行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希望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财富，控制几乎整个欧洲的舆论。"这就是犹太国际主义的悖论，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试图不让其他民族歧视自己，但恰恰相反，他们的激进做法，使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变得更加偏执，因此导致了更多的迫害。

犹太国际主义遍布世界，而非局限于某些国家。大多数犹太人相信，只有当更多的欧洲人在社会上与政治上实现解放时，他们自己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斗争方式会加剧各国的反犹主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保卫自己的权利可能会导致损害其他民族的权利。1840年，蒙蒂菲奥里前往大马士革之前，他宣称自己要为"全人类的要求"辩护："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遭受迫害、忍受苦难，我们有权获得解放。"蒙蒂菲奥里解释说，他来到大马士革，并非仅仅为了犹太人的团结，而是有更广泛的目的，那就是"向东方国家的政府倡导更为开明的立法原则……尤其要劝说政府废除酷刑，将法律权威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防止权力的武断与专制"。这些"人道主义"努力背后的目的，不是要让东方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是要让这些国家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在国际上生存下来。

19世纪40年代还出现了另一个欧洲跨国地缘政治现象。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紧随其后。工业化、城镇化、铁路大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工人阶级"萌芽的出现——这些现象遍及整个欧洲，每个国家发展程度不同，速度不一。同样，由于生产的异化，工厂里发生了抗议事件，阶级矛盾加剧。在40年代初，一位年轻的激进记者卡尔·马克思目睹了这一切。他居住在普鲁士的莱茵兰地区，并在那里著述。莱茵兰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地区，当时德国正在这里修建几条最早的铁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提出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是一个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的过程。1844年，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他们看来，目前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广泛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将逐渐与之接近。只有当欧洲各国的工人们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已经超过了工人与压迫者之间的共同点，这时共产主义才能实现。1845年9月末，一部分英国左翼宪章派运动者、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在伦敦集会，成立"民主派兄弟协会"（Fraternal Democrats）。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参加会议，但他们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际由此诞生。

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国际环境保持相对稳定，但从1845年起，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都开始显现出来。当年12月，面对英法向墨西哥渗透的威胁，以及合众国周边地区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如火如荼，美国将得克萨斯吞并，并设为蓄奴州。美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要扩张领土，好先发制人对付欧洲；部分原因在于南方游说集团要求在新领土上推广奴隶制度，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抵御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威胁。边界紧张很快升级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墨西哥被打败，损失了大片领土。

欧洲各国也发生了动乱，各国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其发生的背景是，英法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此外英国还担心蒸汽机船的出现会威胁英国海军的优势地位。在1844～1845年间，部分法国私人武装对英国南部海岸进行了第一波入侵。1845年6月，帕默斯顿在下议院发出警告："英吉利海峡不再是屏障，蒸汽机船可以轻易地通过以前不能通过的地方，海峡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河。"1846年，英国女王的妹妹与菲利普国王的王储之间的婚姻被破坏，导致英法友好关系恶化。这场变局惹恼了英国，英国本来希望将女王的妹妹嫁给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的堂兄弟。1847年之前，英国还持续遭受法国一些私人武装的进攻威胁，受到极大震动。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内，加利西亚的一群波兰人发动叛乱，奥地利当局艰难地将其镇压下去，并且进行了血腥屠杀。但德意志的事态是最严重的。8月初，丹麦国王克里斯汀八世（Christian VIII）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称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此时，荷尔斯泰因还是德意志邦联的一个成员。丹麦国王不仅冒犯了德意志邦联，而且冒犯了德意志民族运动，因为德意志人将这两个公国看作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同欧洲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对话相互影响。法国军队可能从南部入侵英国，因此英国国内开始讨论备战问题。当时很多英国人认为，从1815年起，英国军备一直准备不足，到19世纪40年代更加严重。为创造性地应对这一挑战，伦敦政府大力执行科布登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实现国际和平。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常被视作英国社会变化的重要反映，事实上对外政策也是导致该法废除的重要原因。人们希望，《谷物法》的废除能够摧毁土地主的力量，从而破坏英国军国主义的国内根基；更希望各国之间能够在贸易上有紧密的联系，从而消除战争爆发的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相互依赖"）。科布登预测，自由贸易将会开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摧毁"种族、宗教和语言间的相互敌对"，使得"庞大而全能的帝国……以及规模巨大的陆军与海军"变得多余。在法国，奥尔良王朝无法推翻维也纳会议的安排，也无法修改其安排，因此该王朝的合法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840年，社会主义者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说道："正是因为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失信，让我们如此强烈地渴望建立民主政权，这是引发国内剧烈震荡的主要原因。"之后，在执政者、大量和平主义的民众，以及为数更多的民族主义鹰派民众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国家逐渐被撕裂。在1846年的竞选中，对外政策问题尤为惹人注目，这使得更多的人被动员过来参

加投票，远远超出了有权投票的人数。

在莱茵河的另一边，由于丹麦国王想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为己有，德意志民众感到非常愤怒。而邦联却无法有效应对此事，梅特涅表现得十分漠然。在巴登，激进人士弗里德里希·赫克（Friedrich Hecker）威胁道，如果邦联和各公国们拒绝行动，他将要向这两个公国派出志愿军。此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柏林。海德堡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G·格维努斯（G. G. Gervinus）说："现在普鲁士必须领导德意志，这需要做三件事，普鲁士必须颁布宪法，这部宪法必须允许新闻自由，并尝试采取强势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在很长时间里，柏林犹豫不决。之后柏林不得不承认，普鲁士位于东西方之间，其地缘政治非常特殊，因此要想保卫自身安全，就必须动员足够的军事和后勤力量。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国内民众更加广泛地参与政治。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普鲁士政府要想征收新税款，或者发放巨额的贷款，就必须得到代议机构的同意，而这又是国王和保守派都极力避免的事情。1845年秋天之后，法国政府开始建造铁路网络，这威胁到了德意志邦联西部边界的安全。因此，普鲁士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了。1846年4月，德意志邦联委员会强调，德意志也应该建立自己的铁路体系。此时，普鲁士必须解决财政问题，这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不过，德意志邦联又一次犹豫了。意大利的革命愈演愈烈，奥地利陷入其泥潭，因此无暇顾及修建铁路一事；此外，德意志南部邦国甚至无法就铁轨规格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德意志急需拥有自己的铁路体系，如果要实现这个目的，普鲁士必须承担其领导地位。但是，要想修建铁路，就必须扩大财政支出，因此普鲁士不得不对其政治经济进行彻底改革。摆脱财政与政治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召集全德意志的代表会议，以批准一项非常税，用于铁路建设。因此，1846年，腓特烈·威廉四世最终克服种种阻力，召集了邦联议会，并准备在第二年召开。1847年夏天，邦联议会最终得以召开，自由主义者利用这个全国性的讲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5月，《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创刊，自由民族主义者变得更有信心了，他们更加积极地在这个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有三个主要要求：要使德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外交上要结束对俄国的依赖；确立积极的对外政策，德意志各邦国统一行动，以追求政治统一。只有普鲁士政府与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联合起来，上述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在议会开幕致辞中，普鲁士副司令路德维格·冯·希尔（Ludwig von Thile）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普鲁士居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因而被称为德意志的卫士，因为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构成了德意志的中流砥柱，敌人要先踏过我们的尸体，才能继续渗透进整个德意志。"为此，普鲁士政府认为，应该建立一条铁路，以联结普鲁士的两个部分，这不仅在商业上是必需的，而且在战略上也是至关重要的。绝大部分自由派代表同意这样的分析。一位代表说："如果我们的兄弟不能赶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将会……被哥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淹没。"但是，他们怀疑政府是否有决心和毅力来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还决心利用

普鲁士在财政上的困境来推动宪政改革。腓特烈·威廉四世想修建东部铁路，要求联合议会投票支持他的经费请求。但联合议会表示，国王必须先在普鲁士建立一个常设的代表机构，否则他们将拒绝国王的请求。此外，代表们还强迫威廉同意进行其他各种改革，例如将解放犹太人扩展到普鲁士所有的省份。很快，汉泽曼要求普鲁士采取行动，维护德意志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利益。同时，在德意志中南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相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统一，以及如何进行社会和宪政改革。

在奥地利，梅特涅也面临着财政与政治困境。1842年开始的铁路建设项目需要一笔巨额资金，此外他还要设法抑制意大利的革命。此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逐渐获得了匈牙利的领导权，他提出激进主张，要求匈牙利独立，因此他拒绝为奥地利提供财政支持。而如果奥地利在其他地区增加税赋，则可能会激发动荡。梅特涅要想实现其目的，就必须做出让步，同意进行宪政改革，而这又是他非常憎恶的。因此，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国际货币市场借款，但是其前提是哈布斯堡王朝必须保证在国内外的信用。这是因为，当维也纳的辛迪加（大财团）同意向政府提供大量贷款时，其条件是公共债券的等级不能下降到票面价值之下。更严重的问题是，反对派赢得了1847年的匈牙利议会选举。因此，19世纪40年代末，奥地利逐渐陷入财政与政治困境，整个国家几乎要窒息。后来法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1787～1788年，法国的旧制度基本上被摧毁，为了存活下去，法国政府不得不对民众做出让步。

很快，中西欧国家发生了两次连锁性危机，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845～1846年，欧洲许多国家粮食歉收，穷困潦倒的手工业者日渐不安。1847年，信贷危机、激增的失业率，以及不断攀升的利率，使得政府面临严重的困境。当时，正好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不过，真正给现存秩序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各国对外政策的失败。1847年的瑞士危机，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瑞士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信仰天主教的诸州组成了一个“独立联盟”，想脱离伯尔尼政府的领导。最后，信仰自由主义的新教诸州取得了内战的胜利。《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规定，各大国是瑞士宪法的担保人。但是，事实上，奥地利与法国各自支持瑞士的两个教派，前者支持保守的天主教徒，后者支持信仰自由主义的新教徒。因此，两国在外交上各自支持其代理人，很有可能会陷入一场意识形态冲突。此时，不仅仅是瑞士面临着危机，德意志以及整个欧洲体系都难以维持其稳定。梅特涅担心，瑞士自由派的胜利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德意志南部爆发革命。此时，德意志南部各邦的自由派，正在密切注意着瑞士局势的发展，他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支持瑞士的自由派。尤其是瑞士自由派的民兵在内战中表现出色，让德意志人印象深刻，他们希望以此为榜样。但是，梅特涅没有能够影响瑞士的局势，最终天主教诸州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梅特涅缺乏财政资源。

1847年年末，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危机形成合力，迅速摧毁了

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旧制度的合法性，也摧毁了其财政信用。法国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已走到穷途末路。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越来越担心普鲁士力量的崛起，也越来越忧虑东部边境的安全。法国对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保持沉默，也没有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反对奥地利的斗争提供支持，这些都导致法国政府受到国内民众的严厉抨击。维克多·雨果在议会中赞美拿破仑，谴责法国人仅仅追求物质利益。在整个巴黎，两万多人举办“宴会”（实际上是示威），要求获得更大范围的选举权，要求政府推行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以摧毁1815年的凡尔赛体系，并对意大利、波兰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提供支持。在奥地利，梅特涅曾下决心吸取约瑟夫二世的经验教训，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困于一个恶性循环：“外交与政治冲突引发国内动荡，继而再引发财政紧缩。”1848年3月初，由于公债猛跌，银行被迫终止业务。政府想办法筹集资产，来使自己摆脱财政困境。因此，正如1789年的法国那样，早在第一批示威者走上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头之前，民众对各国政府的财政和外交政策的严厉批评，就已经完全侵蚀掉了现有秩序的力量。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在批评声中倒台的。”

革命首先爆发于旧秩序最为脆弱的地方：巴勒莫（Palermo）。革命很快从西西里传播到欧洲大陆，不久两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被迫颁布宪法。皮埃蒙特与托斯卡纳的统治者，试图在自己的领地上阻止革命发生，因此他们也决定颁布宪法。不过，这些事件的力量还不算大，还不足以引发欧洲剧变。2月，巴黎爆发革命，其形式与意大利完全不同。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被迫出逃，共和国宣告成立，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温和派组成联盟，这已经对整个维也纳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在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特别是巴登和普鲁士的莱茵省，现在已经战云密布。法国可能很快就要发动进攻，而这几个地区的当局却无法有效应对，它们不能建立共同防务，导致其合法性受到削弱。在意大利，革命者夺取了威尼斯和米兰的政权，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被迫退却，只能躲到防御要塞之中。当年年末，意大利革命者又占领了罗马。大约同一时间，柏林也被革命者控制了，普鲁士国王被迫同意制定宪法，并表示要努力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样席卷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巴登、巴伐利亚等邦国。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自由主义发动暴乱，迫使梅特涅出逃，他们与维也纳的保守派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此外，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控制了匈牙利、布拉格和克拉科夫。

各国的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构成了对维也纳体系的巨大挑战，但是革命颠覆活动带来的潜在地缘政治影响使得英国和俄国——现在只有这两个大国没有爆发革命——深感不安。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自由民族主义者都制定了新的对外政策，这将对欧洲的保守主义构成威胁，这是永久性的战争宣言。革命者试图组织一次“十字军东征”，以解放波兰和意大利，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且击退沙皇的残暴干涉。巴黎的激进主义者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持意大利的革命者。普鲁士新成立的自由派政府决心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派出军队，支援当地的德意志

民族主义者抵抗丹麦人。他们还考虑向沙皇开战，以援助波兰人。在意大利，革命者不仅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还希望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马志尼宣称："我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意大利的统一，全体意大利人将紧密团结于罗马，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到整个欧洲。"马志尼的革命计划，与皮埃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有相似之处。阿尔伯特发誓要"单独"打败奥地利，以此激发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奥地利曾经小心翼翼地在亚平宁半岛上建立起权力平衡，而阿尔伯特发誓要颠覆这种平衡。在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部，各地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揭竿而起，这对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似乎预示着奥地利这个大国的崩溃。

自由民族主义者的目光其实并不现实，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他们在制定战略时依然显示出了敏锐的意识。法国和德国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哈布斯堡帝国，而是更加庞大的沙俄帝国，它被看作反动分子的最后帮凶。即使是最乐观的激进分子也并不认为可以摧毁它，而只能是遏制其力量。事实上，此时法国倾向于利用德意志邦联来阻止俄国的干涉。法国外交部长呼吁与德意志建立兄弟关系，重建"自由和独立的"波兰，使其成为东部的缓冲区。出于同样的原因，两国还希望尽可能地维持奥地利的强大。为此，法国新总理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提出将多瑙河流域的几个公国划给哈布斯堡帝国，作为对其失去意大利的补偿。1848年7月，法国外长朱尔·巴斯蒂德（Jules Bastide）解释说，一个扩大的奥地利将会成为"防御俄国的屏障"，可以防止其控制整个东欧。巴黎建议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以暂时缓解僵局，既支持东欧的民族主义者，又支持奥地利扩展领土。同样，德意志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在法兰克福集会，他们支持波兰复国，并成为欧洲的自由主义堡垒，对抗沙皇的残暴干涉。

民众与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导致革命变得偏激。这在法国尤其明显，法国人很快开始反感拉马丁谨小慎微的政策。1848年5月中旬，法国制宪议会遭到左翼示威者的冲击，他们要求出兵德意志，以震慑普鲁士，同时给波兰人提供帮助。示威者要求，这一行动的军费由富人来承担，政府应该向富人增加征税。不过，左翼人士最后没有达到其目的。不久之后，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选入国民议会，在12月的总统选举中，他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法国人举行这次总统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尽管不是马上）修改维也纳体系。一年之后，路易·波拿巴本人吹嘘道："我使用拿破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要实现一项计划。"他还说，"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修正我们的领土边界"。看到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国总统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对德意志议会的议员们说："你们可以看到，法国人正在莱茵河对德意志进行威胁。我希望，当我号召我的臣民拿起武器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辜负父辈人的努力，就像1813年时一样光荣地保卫我们的边界。"他甚至要求在西面建立起"铜墙铁壁"，以阻挡法国的进攻。不过，就短期来看，路易·波拿巴并不想进攻德意志。1849年4月，他向罗马派出远征军，以防止奥地利向罗马共和国进攻。他支持流亡的教皇重返罗马，并提供保护。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平息本国天主教徒的不满，但主要原因在于重新确立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权威，并借此使新政权得到公众的广泛

支持。

革命还导致了更为激进的地缘政治变化。1848年1月底，为了响应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该组织的纲领。在经过一阵疾风骤雨式的写作之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出版了。此时巴黎正好爆发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这样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2]两人指出，共产主义之所以的确存在，是因为"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承认其是一股力量"[3]。他们认为，与其他所有的劳动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不同，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自己的共同利益，并且其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4]。他们还指出，事实上工人阶级没有国家，这是因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5]。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被剥削者将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与压迫者之间的竞争将成为新的地缘政治。这才是唯一的答案，它将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冲突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当人和人之间的剥削不复存在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剥削也会同样结束"[6]。

所有这些都对英国和俄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重建波兰的计划，威胁到了沙俄帝国的核心利益。1848年3月，俄国外交官彼得·冯·迈恩多夫（Peter von Meyendorff）警告道："波兰人所理解的波兰，其领土已经达到了维斯瓦河（Vistula）和多瑙河的河口，还达到了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斯摩棱斯克。"而且，"一旦波兰占领这些地方，就会像楔子一样嵌入俄国，破坏俄国在政治和地理上的统一，俄国将被迫成为亚洲国家，等于说退到200年之前的样子"。因此，阻止波兰的复国，是"每一个俄国人的事业"。英国同样担心意大利的形势，因为意大利是阻止法国力量扩张的屏障，而意大利革命将不利于英国。1848年6月，帕默斯顿曾指出，现在意大利已经不再是英国的"阿亚克斯之盾"，而是"阿喀琉斯之踵"。帕默斯顿已经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将很快退出亚平宁半岛，因此他和首相罗素开始寻找抵御法国的新办法。

但是，在1848~1849年，各方力量角逐的主战场其实是德意志，保守派、自由派、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欧洲诸大国，都在这里进行争夺。这里的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颠覆维也纳体系的整个基础。英国人看到，哈布斯堡王朝正在走下坡路，甚至即将崩溃，英国人对此深表关切。1848年4月底，英国驻慕尼黑大使约翰·米尔班克爵士（Sir John Milbanke）警告道："如果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邦联，那么普鲁士的实力就会壮大，这将会彻底改变欧洲的权力平衡；这将摧毁构成欧洲国家法律基础的各项条约，大国将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对其他国家宣战。"

在分歧的另一边，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期待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主义者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德意

志，因为这里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7]他们认为，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比，这场革命注定会发生在“文明更加先进的条件下”，同时“无产阶级是更加先进的阶级”[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相信“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注定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9]。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自由派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宪政的德国，以取代以维也纳为核心的松散的邦联集团。但是，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新的德国由谁来领导？应该成为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排除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小德意志”，还是应该成为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涵盖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大德意志”？

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意识到，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对整体的均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这样一个德国与极富活力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那么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1848年4月，俄国外交大臣内斯尔罗德评价道：“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德意志正在兴起一股新的力量，即将出现一个统一的、民主的、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这将会给我们带来极大困难。”圣彼得堡尤为担心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局势，这里影响到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安全。英国和俄国并不反对“德意志统一”这个想法本身，但是它们对于这个新的国家应具备怎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存在很大的分歧。早在1848年3月，帕默斯顿就对“任何旨在巩固德意志，使其变得更加团结和更具政治活力”以“有效增加欧洲均势的安全”的创议都十分欢迎。1849年7月帕默斯顿表示，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温和的、自由的、统一的德意志，“将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一道坚固屏障，它将有助于抑制法国和排挤俄国”。但是，沙皇则希望看到一个在普鲁士或奥地利领导下的强大而保守的德意志，或者由二者共同支配。俄国认为，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有助于压制邦联内的革命活动，停止对波兰的干涉，成为一个强大堡垒，阻止法国革命思想的传播。因此，俄国坚决反对德意志统一后形成一个民主国家。

奥地利提出了关于中欧的最为激进的计划。哈布斯堡王朝决心维持其在德意志的地位，并且通过进一步的中央集权使帝国更加具有效率。1848年年末，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Schwarzenberg）提出一项计划，要创建一个“伟大、团结、强大的”德意志，其包括目前德意志邦联的所有领土，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属地，是一个“有7000万臣民的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表面目的，是让德意志能够阻挡其他大国的侵袭，但其他国家则反对这项计划，认为这会威胁欧洲的均势。法国警告说，法国无法容忍德意志邦联大规模地扩张领土，因为那样会极大地增强邦联的军事实力。法国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可能会在东侧对自己进行施压，尤其是利用伦巴第来威胁法国的安全。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英国持有相同的观点。1850年11月中旬，首相罗素警告道：“哈布斯堡家族可能会以邦联的名义来利用德意志的民众，以此对付法国或比利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将破坏欧洲的均势。”两国都认为，德意志邦联的领土和宪政秩序，对于欧洲均势和“国际公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能被单方面改变。俄国人则希望出现一个强大而保守的德意志，但还没准备好通过发动一场欧洲战争来实现这个愿望。在各大国的反对下，奥地利被迫让

步，施瓦岑贝格的计划胎死腹中。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有很多原因。城乡之间，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存在各种分歧，破坏了革命的统一。很多时候，统治者给农民很多利益，将其收买，因此农民退化成了庞大的保守力量；在意大利，哈布斯堡王朝也给了农民很多好处，因为这有利于统治者对付庞大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革命者。在经过了革命初期的动荡之后，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整个欧洲的保守势力集结起来，创办自己的报纸，开展舆论攻势。法兰克福自由主义者支持普鲁士国王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的皇帝。但普鲁士国王表示拒绝，他反对接受“贫贱之人”所施舍的皇位，只有当所有的邦国都同意时，他才会将德意志统一起来。在1847～1848年的革命中，军队被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在关键的时刻，军队领袖背叛了革命，使得革命成果付诸东流。普鲁士的普里特维茨将军（General Prittwitz）、法国的卡芬雅克将军（General Cavaignac）以及奥地利驻意大利北部的总司令拉德茨基元帅（Marshal Radetzky），在关键时刻都给革命以致命一击。在中东欧，1848年似乎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人民的春天”即将到来。但很快，各个国家分歧严重，争得不可开交。

欧洲革命者在战略上的失败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848年3月，法国总理拉马丁照会其他国家，公开放弃任何以武力破坏维也纳体系的意图。他宣称：“法兰西共和国恢复了在欧洲强国中的地位，民众非常高兴，我们愿意接受领土现状，因为这是法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法国保证不会在其邻国进行秘密的颠覆活动，也不会进行煽动性的宣传。”显而易见，19世纪40年代末频繁出现的“泛自由主义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仅如此，许多法国人都对德意志的统一深感不安，即使是在自由派领导下的统一，法国仍然会不安。《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1848年警告，统一的德意志将成为一个庞大的怪兽，法国必须注意。法国外交部长巴斯蒂德担心，如果全部4500万德国人都追随“同一个力量中心”，那么法国将前途堪忧。他支持使德意志保持分裂状态，以使各邦国彼此制约。英国和俄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均势非常关切，它们强迫普鲁士与丹麦签订了《马尔默停战协定》（Armistice of Malmo）。普鲁士本来试图从丹麦手中夺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没有成功。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被迫批准了这一停战协定，德意志人民蒙受巨大耻辱。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革命者对此心存畏惧。在意大利，撒丁（皮埃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两度被奥地利军队击败，被迫让位于自己的儿子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由于皮埃蒙特是一个缓冲国，因此它并没有被占领，而是几乎毫发无损地存活了下来。最后，1849年，俄国人武力干涉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复辟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最终，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宣称的相反，反革命的力量被证明是国际性的，而革命运动并不是国际性的，它依然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内部。自由派与工人并没有联合起来，而保守派却与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

尽管1848年革命失败了，但其还是对地缘政治有重要影响，导致了各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局。1849年11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他积极地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谈判，要求法国向莱茵兰地区扩展领土，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三国新获得了一些土地，试图以此平衡三国的力量。路易·波拿巴追求积极的对外政策，同时他也诉诸民粹主义，支持公民获得更广泛的权利。1851年12月初，他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完全掌握了政权，1852年2月，他再次赢得了总统选举。当年11月，他宣布举行全民公决，再次恢复了帝制，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称“拿破仑三世”。新宪法赋予国王以近乎绝对的权力，可以垄断立法权。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也是不行的。拿破仑三世宣布“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表达和申诉自己的意见”。他追求高度积极的对外政策，因为他具有“新波拿巴主义”的雄心，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法国民意，修正凡尔赛体系。法国重新树立坚定的意志，坚持要求解决如下问题：莱茵河边界问题、意大利问题，以及恢复法国昔日的“荣光”。

1848~1849年的革命给奥地利带来了创伤，尽管俄国帮助奥地利镇压了革命，但奥地利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为医治创伤，奥地利试图建立一个“新专制主义”（neoabsolutist）的国家，以推动现代化。1851年政府颁布《西尔维西特赋权法》（Sylvester Patent），试图推动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与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尽管土地改革姗姗来迟，但在某种层面上，这些办法是成功的：对外贸易翻番，国家税收增加了2/3，匈牙利开始发挥出财政力量。然而，对哈布斯堡王室不利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匈牙利人对政府更加不满，现在他们要比过去多交4倍的税，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也是如此，斯拉夫人也对改革怨声载道。在奥地利以北的普鲁士，已经选出了新的王国议会。尽管新议会是以有限的三级财产公民权为基础的，但它不失时机地要求尽更大的努力来支持“德意志”的利益和预算控制。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各邦国的议会也是如此。此外，德意志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对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都进行了长久而深刻的反思，并越来越对路易·波拿巴重提法国对莱茵河边界的领土主张感到不安。正如《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在1850年11月报道的：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的土地会再一次成为自负的外国人的角斗场，我们要流血，要为他们的争吵付出代价”，三十年战争时期就是如此，我们遭受了严重损失；17世纪中叶，各个国家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里角逐，各种悲剧、大屠杀、分裂和屈辱不断在这里上演。1853年圣诞节前后，《科隆日报》（*Kolnische Zeitung*）警告道：德意志“不会认为自己同波兰的命运无关”。这些自由主义者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实现德意志统一，就必须与普鲁士政府进行妥协，因为只有普鲁士才能带领德意志走向统一。他们不仅要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做出选择，还要在自由（Freiheit）与统一（Einheit）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此时的普鲁士保守派和政府，不愿意与民族主义团体过于亲近。一方面，他们害怕被自由主义病毒玷污；另一方面，正如俾斯麦在1851年3月对议会所说的，议会对预算的控制将无法保证政府对外政策

的连贯性。两年后，他向王储递交简报，并说：“普鲁士的伟大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和自由思想获得，我们需要的是坚强、果敢而又充满智慧的统治者，来精心发展这个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因此，他主张：“每一个普鲁士人所应享有的自由是有限的，必须与公共福利相符，必须与普鲁士在欧洲政治中所从事的事业相符，不能更多。”他明确指出：“即使没有议会制政府，人们也不会失去这种自由。”

19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一轮危机席卷欧洲和全球。面对埃及的进犯和西欧的干涉，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昏庸无能。沙皇对局势深感不安，决定先发制人，以在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之际确保自己的利益份额。尼古拉一世曾发表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手中有一个病人，他病入膏肓。如果有一天，他逃脱了我们的手掌心，尤其是在我们做好一切安排之前他逃脱了，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不幸。”1853年2月，俄国外交大臣缅希科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臣民交由沙皇俄国来“保护”。5个月后，俄国军队占领了多瑙河沿岸各公国，迫使苏丹对俄宣战。1853年11月，沙皇要求多瑙河沿岸各公国、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并扩大希腊的领土，他还呼吁所有基督教徒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当月，俄国海军在黑海的锡诺普（Sinope）摧毁了一支土耳其舰队。法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但俄国对此置若罔闻。相反，1854年3月，俄国军队跨过多瑙河并向南挺进。

这些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真正的问题并非奥斯曼帝国，而是如何维护德意志的现状以及欧洲的整体均势。对于维也纳而言，俄国军队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存在，扩大了对哈布斯堡帝国东部边界的包围圈，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俄国人赶出这一地区。法国和英国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它们最关注的是中欧的安全，其次是土耳其，再次是印度。1848~1849年，俄国曾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后来又对德意志进行外交干预，现在它又占领了多瑙河沿岸各公国。这似乎预示着，沙皇不仅要瓜分奥斯曼帝国，还要主宰整个欧洲。1854年2月，英国议会就战争问题进行大辩论，罗素认为英国应该向俄国宣战：“这不仅是要保护土耳其，更是要保护德意志和所有欧洲国家的独立。”同样，外交大臣克拉伦敦勋爵（Lord Clarendon）强调：“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德意志必须成为对抗俄国入侵的中坚堡垒。”法国对此表示赞同。

英国、法国对俄宣战，并派出数量庞大的远征军进攻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很快撒丁王国（皮埃蒙特）也对俄宣战。在接下来的两年间，战局起伏不定。一开始，西方国家战事不顺利，但1855年9月西方国家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使得沙皇威风扫地。不过，德意志国家参战之后，才真正给沙皇以决定性的打击。普鲁士表面中立，但奥地利说服普鲁士支持其诉求，即保护多瑙河沿岸的奥地利人，同时两国签订防御联盟协议。这意味着德意志的两大国家可能会同时从西边打击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撤军。在战斗期间，奥地利的一支游击队抢先占领了要塞，导致俄国失去了进攻土耳其的前沿基地，也失去了在陆上经由最短路线对敌

实施致命打击的机会。1855年3月，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同年12月，奥地利加入英法阵营，共同向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沙皇结束敌对行为，否则三国将联合进攻俄国。俄国陷于孤立，亚历山大二世被迫求和。1856年，各国签署《巴黎条约》，这是对沙皇俄国野心的一次毁灭性打击。沙皇不得不放弃了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也失去了对巴尔干基督教徒“圣地”的保护权，俄国舰队被禁止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也不得在这里建立兵工厂。《巴黎条约》的序文指出，土耳其的独立和统一是“欧洲和平”的核心，第二条要求土耳其统治者“利用国际公法和欧洲协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各国邀请奥斯曼帝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给予其平等待遇，因为各国认为它的稳定对于国际和平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波及全世界。有的美国人担心，英法会利用这次胜利趁机增加对美国和西半球的干涉。如果英法的军队能够跨越海洋，在欧洲的另一端打仗，并将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俄国，那么它们也完全能够跨过大西洋来干涉美国。因此，在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对俄国表示支持。然而，最让美国人担心的还是奴隶制问题。土耳其担心英法对自己发动十字军东征，因此于1856年宣布废除奴隶制，以此作为见面礼，彬彬有礼地加入了国际社会。土耳其的决定，使得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更显孤立。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奴隶制问题导致不同力量之间矛盾的激化。一直以来，南方人反对在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以北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土地上废除奴隶制。密苏里州参议员戴维·艾奇逊（David R. Aitchison）曾说：“南方人担心自己会被自由州所包围，这样他们将不断受到废奴主义者的攻击。”1854年，国会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这是南方人的胜利。根据法案规定，蓄奴州的范围向北扩展。法案基本反映了南方白人的利益，《密苏里妥协案》基本作废。同时，奴隶主希望继续在南方扩大利益范围，目的是抵销自由州力量的增长。他们寻求增加蓄奴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想方设法阻止来自英法两国的废奴主义思想在该地区的传播。1854年秋天，美国制订了一个夺取古巴的秘密计划，即《奥斯坦德宣言》（Ostende Manifesto）。此时，英国正因为克里米亚战争而无暇他顾，美国外交官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强行解放古巴。185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布坎南提出计划，希望以购买方式获得古巴，在必要时可以诉诸武力。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并以此赢得选举。三年后，布坎南向国会提出建议，请求为此划拨3 000万美元。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赤裸裸地体现着奴隶主的利益。

不过，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中欧的地缘政治影响是最大的。一直以来，沙皇都试图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良好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沙皇更加偏向后者。然而，在战争中，两国都不支持俄国的立场，因此俄国对二者深感失望和怨恨。普鲁士在战争中不情愿地采取了中立政策，而奥地利则对俄国发出了羞辱性的最后通牒，因此俄国对奥地利更加不满。从此以后，俄国人将奥地利视为其征服巴尔干的最主要障碍。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很多俄国人喊出了“越过维也纳直达君士坦丁

堡”的口号，圣彼得堡的沙皇也认同这个想法。更重要的是，俄国决心削弱奥地利，想方设法破坏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因此，1856年8月底，俄国新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公布了一份经过广泛讨论的通告，称沙皇将不再支持其他国家的君主们。其所表达的信息显而易见：一旦奥地利再发生革命，哈布斯堡王朝将无法得到俄国的支持，它只能独自面对挑战。

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引发了持续的国内改革。俄国的战败，说明传统的社会形态已经无法应对19世纪中叶西方强国带来的挑战。问题在于，由于农奴身份的限制，帝国庞大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被转化为军事力量，只有大约1/10的人能够服兵役。显然，沙皇政权面临着选择：俄国必须改革土地制度，否则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较量中将很有可能再次战败。因此，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向权贵们发出敕令——农奴制将被废除。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为了安抚权贵，沙皇对此进行了解释："自上而下"的改革总比农奴们自发地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要好得多，必须防止革命的发生。1861年2月中旬，沙皇最终签署立法，开始执行决定。但是，沙皇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式的政治参与，坚决反对做出任何让步。之后，俄国的社会与经济开始实现现代化，但政治制度依然发展停滞。很多观察人士都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进行评论。改革活动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俄国是"用电报的成吉思汗"。

克里米亚战争同样深深地影响了大英帝国的国内政治。英国曾经战事不顺，在克里米亚半岛上一度受挫，导致了议会和公众的普遍恐慌。1855年1月，英国下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成立一个调查驻克里米亚英军状况的特别委员会。同时下议院提出了对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的不信任案，将其赶下台。帕默斯顿取代阿伯丁担任首相，人们相信他能引领战争走向胜利。但是，民众在一个问题上有很大分歧，即如何使英国社会融入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如何最好地使英国与欧洲的需要相一致。塞缪尔·莫利（Samuel Morley）曾经是诺丁汉的一位针织物制造商，后来担任议会议员。1855年6月，他指出，战争的失利说明政府缺乏合法性，缺乏民众的支持；政府应该通过军事和财政改革，使民众对其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一些人对之前的保守党政府进行指责，并且批评军队的不专业，认为军队中大量存在的军衔买卖现象，违反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在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批评家们看来，这些荒谬的现象说明英国"贵族"统治模式已经落后不堪，国家软弱无力，无法与外敌抗衡。英国必须在国内及殖民地进行新一轮改革，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建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并且对外交部进行了改革，大幅增加军队开支。伦敦还试图改组东印度公司，使其实现现代化，以使印度做好准备，抵抗俄国的进攻。但是，这些改革引发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英国费尽力气才将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

不过，受到克里米亚战争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加富尔（Cavour）首相积极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因此与英法建立起

了友好关系。现在，他希望利用这种友好关系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对加富尔而言，只有实现意大利的国家统一，皮埃蒙特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加富尔的理念不同于社会中激进分子的理念，但二者又是相呼应的，有着共同的目标。威尼斯人丹尼尔·马宁（Daniel Manin）、西西里人朱塞佩·法里纳（Giuseppe la Farina）以及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都是激进分子。其中加里波第最为著名，从1856年7月起，他成为保卫罗马共和国的中流砥柱。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这些人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们希望使意大利成为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邦联，当然更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他们认为，皮埃蒙特是意大利最强大的邦国，是带领意大利人摆脱奥地利的控制的唯一希望。加富尔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1857年，他写道："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皮埃蒙特需要在意大利树立坚定的立场，采取果断的措施；因为上帝有意让皮埃蒙特成为意大利唯一自由而独立的地方，皮埃蒙特必须利用其自由和独立，在全欧洲面前为这个不幸的半岛的统一事业呼告请愿。"1858年7月，他与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Plombières）会晤，商讨如何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此时局势已变得极为有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曾"背叛"俄国，因此俄国耿耿于怀，对意大利的局势袖手旁观。1859年3月初，法俄签订密约，沙皇表示接受意大利的变局，同意促使德意志邦联保持中立，不干预意大利；作为回报，法国暗示将允许沙皇修改《巴黎条约》中与黑海事务有关的条款。在英国，民众也十分支持意大利，政府也越来越相信，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哈布斯堡王朝相比，一个强大的意大利更能有效地牵制法国。事实上，不管是加富尔还是拿破仑三世，都不希望使意大利完全统一。二人在普隆比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秘约：皮埃蒙特吞并意大利北部领土，但尼斯和萨伏依必须割让给法国，作为对法国的补偿与报答；此外，罗马和那不勒斯继续保持独立（这对平息法国国内天主教的情绪至关重要）；托斯卡纳和教皇国将被并入中意大利王国（Kingdom of Central Italy）；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意大利邦联（Italian Confederation），将这些邦国联系在一起。

1859年4月，维也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皮埃蒙特停止军事备战，否则将首先对其发动进攻。事实证明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奥地利没有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战争危机，这破坏了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德意志邦联对奥地利的这一举动尤其反感，因为大部分邦国不愿意与法国发生战争，也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野心而牺牲自己。一开始，普鲁士严守中立。很快，奥地利在马真塔（Magenta）和索尔费里诺（Solferino）战役中遭受惨败。但是，就在此时，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邦联开始支持奥地利的立场，因为它们担心奥地利军队会全线崩溃。德意志邦联调动了大量军队，部署在法国东部边界，以对其实施威胁。拿破仑三世开始变得胆怯：由于担心普鲁士的干涉，他在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与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达成协议，但这与他在普隆比埃所构想的蓝图相差甚远。奥地利将伦巴第割让给拿破仑三世，之后拿破仑三世又将伦巴第转交给了皮埃蒙特，但是中部意大利各公国都依然保持独立。民族主义者非常愤怒，加富尔愤怒地辞去

了首相职务。短短不到10年间，“德意志牌”第二次在欧洲游戏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要阻止意大利统一的潮流，为时已晚。奥地利的势力开始从意大利撤出，群众运动利用此时的权力真空，夺取了意大利中部的控制权。而后，皮埃蒙特的军队以“恢复秩序”为借口，趁机占领这些地区。很快，这些地方举行了全民公决，承认皮埃蒙特的占领权。不久，加里波第自发组建了一支国民志愿军，并占领了两西西里王国，推翻了那里的波旁王朝。之后，皮埃蒙特的军队接管两西西里王国。这不仅是为了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也是为了确保群众运动不会失控。1860年10月，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它的领土包括除尼斯、萨伏依（这两块地方已经割让给了法国，作为对其提供军事援助的回报）、罗马（教皇国）以及威尼西亚（这里暂时仍由奥地利控制）以外的整个亚平宁半岛。这是维也纳体系第一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意大利战争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奥地利而言，这是拿破仑战争以后首次丧失领土。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放弃“新专制主义”，并尝试通过自由化改革来巩固其帝国。对拿破仑三世而言，这是一场胜利，法国恢复了1815年失去的部分领土。拿破仑三世曾经认为，按照“民族”边界来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完全符合法国的利益。事实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之前，法国国内有很多人希望为国家的“光荣”事业而奋斗，他们曾批评政府，而现在他们哑口无言。在英国，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使得英国人感到很矛盾。一方面，法国吞并萨伏依、奥地利的失败，以及法国的海军野心，使得英国再次感受到法国的威胁，英国再次掀起了“志愿者”运动。而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胜利，使得英国人更加坚信自由主义一定会获得胜利。英国人相信，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不可阻挡地将欧洲推向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最终整个欧洲将成为英国这样的现代化社会。有人问格莱斯顿，是什么让他从一个保守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他的回答干脆利落：“意大利。”

不过，受意大利战争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德意志。奥地利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遭受惨败，德意志其他邦国不愿意卷入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因此，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威望进一步下降。不过，意大利战争也增进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德意志人依然同情奥地利，不管怎么说，奥地利仍是团结的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德意志人可以效仿意大利人，实现自己的民族统一。1859年8月中旬，民族主义的自由派成立了“民族联盟”（Nationalverein），其目标是将德意志变成一个国家，并建立一个统一的议会。它要求废除德意志邦联，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将所有政治和军事权力移交给普鲁士，直到实现统一。早在1848~1849年，普鲁士民众曾要求霍亨索伦王朝承担起自由宪政主义的“德意志使命”，当时霍亨索伦王朝表示拒绝。现在，很多人再次要求它承担起这一使命。阿道夫·德·布尔克内是一名资深的法国外交官，他警告，拿破仑三世已经开启了中欧的潘多拉魔盒。他在1859年写道：“我们已经玩弄了太多的‘民族主义’的空泛浮夸的字眼，而德意志的民族主

义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毫无疑问，我们再次勾起了德国人对法国的厌恶和反感。”

1859年，德意志人的动员行动使拿破仑三世感到震惊。但这也说明，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意志还远远没有做好军事准备。德意志人的统一信念，使得两个与改革问题相关的辩论贯穿于下一个10年的发展。普鲁士致力于更有效地应对法国的下一次挑战，但不出所料，奥地利领导下的其他德意志邦国反对普鲁士的尝试，因为多数邦国不愿丧失主权。在普鲁士内部，政府现在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财政紧缩严重限制了军队的规模，导致军队人数不能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事实上，在19世纪50年代，只有一半符合参军条件的人被征入伍。军队统帅与摄政王威廉亲王希望引入为时三年的士兵训练期，这样可以扩大正规军的规模；传统的后备军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但普鲁士议会中强大的自由派集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些人，连同“民族联盟”中的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者，都认为没有必要提高备战的级别，目前无须过于提防法国。1860年6月初，该组织的报纸宣称“没有人会再怀疑德意志的莱茵边界正受到法国攻击的威胁”。然而，上述改革措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同时，公民民兵将被政府控制，导致很多民众深感不安。与多数人的观点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修宪会强化普鲁士王国的内部团结，这是抵御外侮所必需的。目前各方的观点不一致，在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改革问题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德意志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糟糕。霍亨索伦王朝和德意志邦联依然觉得自己被困在欧洲的中心，被夹在沙俄帝国和法国之间。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胜，并在意大利战争中获益，因此越来越趾高气扬。1815年开始，普鲁士成了德意志邦联西大门的守卫者，它一直试图将整个德意志团结在自身周围。奥地利坚决反对普鲁士的计划，“第三德意志”也反对通过放弃主权来获得普鲁士的保护。因此，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带来政治统一，邦联的改革似乎比以往更加困难。对于霍亨索伦王朝而言，保守的王朝统治已无法满足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因此，到19世纪50年代末，普鲁士的领导地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各种问题相互联系，但又非常棘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整个德意志，抑或是在整个欧洲，普鲁士政府都面临着各种麻烦。

然而，此时的俾斯麦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将这些不利因素转化为普鲁士的优势。很早就有人指出，普鲁士要想获得安全，就必须成为整个德意志的领导者。1858年，俾斯麦观察到：“德意志特殊论、普鲁士特殊论都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他认为，只有确保了“安全边界”，普鲁士才能得以生存。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安全边界”，一是领导德意志邦联进行改革，二是直接的领土吞并。1859年，他指出：“普鲁士的天然边界，至少应该达到波罗的海、北海、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康斯坦茨湖（Lake of Constance）。”在这个实现“安全边界”的过程中，普鲁士将逐渐成为整个德意志的主导者，“第三德意志”的中小邦国将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俾斯麦需要做以下事情：（1）对欧洲现有

的领土秩序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并使其他大国感到放心；如果有国家表示反对，普鲁士就想办法鼓励它；（2）排挤奥地利的势力，至少应与其势均力敌；（3）争取得到“第三德意志”的支持，消灭那些拒绝与普鲁士合作的邦国；（4）收编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人士；（5）说服议会中的自由派，以确保为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遭到反对就绕开议会。1862年9月末，在俾斯麦出任首席大臣的数月之前，俾斯麦私下宣称：“我首先关心的是重组军队，无论是否得到议会的支持，我都会这样做……一旦军队强大到令人生畏的地步，我就会找借口向奥地利宣战，同时解散德意志议会，征服小邦国，并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置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当时与其交谈的人，是英国未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rnin Disraeli）。后来迪斯雷利曾对奥地利大使说：“小心那个人，他言出必行。”

普鲁士努力发展壮大，并强化德意志的凝聚力，以在欧洲的不稳定秩序中获得生存。此时，美国国内的矛盾也在1860年总统大选期间发展到了紧急关头。此时，危机爆发的原因并非北方民众要求废除奴隶制；事实上，除了少数最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容忍奴隶制的存在：多数人更希望逐渐废除奴隶制，以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奴隶的解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合众国的分裂，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南方不断进行挑衅。南方要求扩大蓄奴州的范围，进而推广奴隶制，否则就要宣布脱离合众国。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承诺不会吸收古巴为蓄奴州。林肯赢得总统选举之后，美西之间关于购买古巴的谈判告吹。选举刚刚结束，佐治亚州参议员菲利蒙·特雷西（Philemon Tracy）警告林肯：“联邦将不可能获得哪怕一英寸的新领土。”更加糟糕的是，此时奴隶制已经在国际上被完全孤立。英国清晰地表明，它坚决反对美国吞并古巴，并对马德里施压，要求颁布解放古巴奴隶的法令。1861年2月中旬，俄国废除农奴制。此时美国已经成了文明世界中唯一保留奴隶制的国家。华盛顿拒绝扩大奴隶制的范围，令南方非常不满，同时世界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奴隶制，因此南方决定率先发动进攻。1861年4月，南方炮兵部队炮击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要塞，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南方各州宣布脱离合众国，并成立了一个联盟国，明确表示要与坚持废奴主义的北方划清界限。“联盟国”的宪法要求扩大领土，并扩展奴隶制的范围，新领土必须是蓄奴州。因此，南方对合众国发动战争的原因，与当年北美13块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领土扩张。

英国和法国都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似乎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以此削弱对方。1862年，拿破仑三世对英国驻巴黎大使说：“英国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有利的机会来打压美国人的骄傲了，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建立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了。”英国计划干涉美国，但英国打算在“联盟国”挑起战争之前暂时按兵不动。尽管美国南方奉行奴隶制，但英国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如格莱斯顿）却依然支持南方。然而，英国民众非常厌恶奴隶制，他们坚决反对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南方。法国以此为机会，公开干涉墨西哥，拿破仑三世希望扶植哈布斯堡王室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派出大量军队，护送马克西米利安

抵达墨西哥，其中包括几千名来自埃及（当时是法国的盟国）的军人；这再一次证明，欧洲国家不干预中东事务，并不能保证欧洲国家不会利用中东来干涉西半球的事务。这些行动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在1864年的竞选中，共和党人警告道："美国人民反对任何欧洲国家用武力来推翻或者用诡计来颠覆西半球上的任何一个共和制政府，我们绝不会对此漠不关心。"事实上，"凡是对美国的和平与独立构成威胁的国家，美国人都会始终保持警惕，任何国家想在美国的家门口用武力扶植某个君主制政府以建立据点的诡计，我们都是不会接受的"。可是，当时美国政府正在与南方叛军交战，根本无暇他顾。

南方无法有效地进行军事动员，同时林肯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其他国家没有干涉美国南北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南方叛军的失败。英国民众并不反对英国政府干预并削弱美国，但却强烈反对英国政府支持奴隶制。英国为南方提供了"阿拉巴马号"巡洋舰，摧毁了合众国的多艘商船，导致英美紧张关系加剧。1863年秋天，林肯甚至警告：如果英国继续为南方建造军舰，用来打破合众国对南方的封锁，那么合众国将对英国开战。此时，拿破仑三世依旧痴迷于墨西哥，但他的帝国野心在这里四处碰壁，因此无暇顾及美国事务。这样，"联盟国"的叛军只能孤军苦战，由于北方在军队人数以及工业能力上拥有巨大优势，南方逐渐落于下风。1865年，南方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合众国军队投降。内战结束，美国重新获得统一。

在欧洲，德意志人民更加热情地寻求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英国、法国以及奥地利相互斗智斗勇。俾斯麦制订了一个激进的统一计划；英法奉行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反对普鲁士；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都十分保守的强国。这样，谁能争取到俄国，谁就会占据有利地位。凭借着好的运气和判断力，普鲁士首相争取到了俄国的支持。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波兰人备受鼓舞；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胜利，也激励了波兰民众；同时，波兰还有希望获得法国的援助。波兰人准备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家，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以此奋起反抗沙皇的残暴统治。此时，圣彼得堡方面感到惊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担心再次出现一个"克里米亚联盟"。英法两国的公众十分同情波兰人，两国政府也对波兰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头支持。但是，英法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因此这只能延长波兰人的痛苦，最后波兰的起义难免会被俄国军队镇压。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沮丧地说："如果英国政府不打算参战，那就应该直接说出来，不要再让波兰人牺牲生命，不要再让波兰人因缺少援助而越来越痛苦。"此时，奥地利急于平息国内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波兰裔民众的怨言，因此决定保持中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就曾冒犯过俄国，现在它又一次得罪了俄国。与英、法、奥不同，这一次俾斯麦坚定地支持沙皇。两国达成协定，普鲁士封锁了与波兰之间的边界。

此时，俾斯麦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他准备利用下一个机会，推动德意志的统一。1863年3月，丹麦王国宣布将石勒苏益格并入本国。在

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的施压下，德意志邦联议会向丹麦宣战。包括居住于普鲁士以外的大部分德意志自由主义者，都坚决支持俾斯麦的政策。换言之，普鲁士传统的战略思想现在已经被整个民族所广泛接受。与1848年不同，这一次俄国袖手旁观；法国也是如此，它还希望利用这次事件造成的动荡，再召开一次“维也纳会议”，以获得更多的利益。1864年春天和夏天，德意志和奥地利军队大败丹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由维也纳和柏林共管。英国无法干预此事，不得不置身局外并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们欢欣鼓舞。尽管他们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但他们这一次决定配合普鲁士政府的政策，默许政府可以在不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就征收税款以维持军队的运作。俾斯麦一箭双雕，解决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双重困难。

俾斯麦从外部动摇了维也纳体系的根基，而欧洲秩序的稳定正面临着其内部的威胁。工业化促进了无产阶级大发展，带来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并最终导致了国际政治组织的建立。1863年7月，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举行集会，支持波兰独立。与其自由主义同人一样，他们视沙俄帝国为欧洲最反动的力量，并因此将任何反对俄国的力量视为进步的因素。德意志民族主义尤其受到欢迎。早在1848年8月，马克思就曾写道：“德意志人有权收复石勒苏益格，因为这代表着文明战胜野蛮，也意味着进步战胜保守。”1864年9月，多个左翼组织相聚在一起，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史称“第一国际”，它负责领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一支全新的欧洲力量诞生了，它创造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口号，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在接下来的10年中，各国的工人领袖们多次聚在一起召开会议。这股力量创造了新的地缘政治阵线，意味着打破了传统。

不过在当时，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并非工人运动，而是各国政府支持下的激进主义运动。1865年，俾斯麦转而对付奥地利，他认为奥地利是普鲁士领土扩张和实现德意志民族抱负的最大障碍。维也纳处境不利，在丹麦战争中，它仅仅与普鲁士保持着微弱的联系，并且匈牙利人非常反对奥地利参加丹麦战争。占匈牙利人口多数的马扎尔人坚决反对奥地利扩大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反对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匈牙利爱国主义领袖弗伦茨·迪克在1861年警告道：“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匈牙利长期拒绝为哈布斯堡王朝出力，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这已经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致命弱点。如果匈牙利履行其责任，为哈布斯堡王朝贡献税赋，那么奥地利的财政赤字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此时，俄国继续对普鲁士持中立态度，与俾斯麦保持友好关系。1865年9月，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接替内斯尔罗德，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在与另一个人聊天时，他说道：“我们目前同外国的关系，形成于波兰危机时期。”他继续说道，俄国反对法国革命式的“国家主义原则”，法国人认为“德意志是通往波兰的道路”。他强调，俄国一直都很看重德意志的地位，普鲁士与俄国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因此俄国应该支持普鲁士主宰德意志。

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过去10年中，拿破仑三世是最大的赢家，他计划利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对立，来维护自己在德意志的利益。然而，在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和积极维护法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他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他没能保护波兰，导致他在国内丢尽颜面，但是批评者真正担心的是德意志问题。拿破仑三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推动民族主义，削弱奥地利，但又鼓励普鲁士的发展壮大。很多人认为，他违反了法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防止在其领土东侧崛起一个强大的德意志。1865年4月，经验丰富的梯也尔在议会发出警告："我之所以反对意大利的统一，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注定会是德意志统一的蓝本。"1865年8月，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条约》（Convention of Gastein），法国民众与拿破仑三世深感震惊，因为普、奥两国在没有知会法国的情况下，就直接宣布接管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虽然出现了这些不祥预兆，但在不久之后的普奥战争中，拿破仑三世还是没有给奥地利提供帮助。他过于关注墨西哥的局势而无暇他顾。由于美国南方在内战中失败，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也就越来越面临着窘境。此时的英国，也因为过于关注海外殖民事务而无法顾及欧洲局势。英国财政大臣迪斯雷利解释道："英国不再只是一个欧洲的强国，而是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的中心……她更像是一个亚洲强国，而不像是欧洲强国。"

1866年，俾斯麦对奥地利发动进攻。他拒绝支持维也纳和"第三德意志"提出的邦联改革议案。4月，这位普鲁士首相宣布与意大利结盟，承诺让意大利得到威尼西亚，这样可以从南侧对奥地利发动进攻。他还鼓动匈牙利的分裂主义运动，以削弱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匈牙利的势力。当月，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本应由奥地利负责管理的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它得到了德意志邦联中几乎所有的中小国家的支持。奥地利之所以决定参战，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其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但主要还是为了消除普鲁士的挑战，以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让世人震惊的是，普鲁士军队利用新建设的铁路网络在波西米亚迅速完成集结，并在1866年6月的萨多瓦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尽管"第三德意志"的中小国家在与普鲁士交战时取得了一些小范围的胜利，但是它们很快就支持不住了。8月，奥地利同意签订《布拉格条约》（Treaty of Prague），它被排挤出德意志邦联。两个月后，在《维也纳条约》中，奥地利将威尼西亚割让给法国，之后法国将威尼西亚送给意大利。普鲁士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法兰克福。普鲁士成立了其领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强迫22个邦国加入。德意志南部的邦国仍保持独立，但普鲁士强迫它们签署秘密军事协议，这使得它们与普鲁士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是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德意志的绝大部分第一次被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支配。德意志各邦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即将到来的是欧洲各国争夺霸权的新时代。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50年间，欧洲的地缘政治仍然与整个世界相联系。列强在埃及、叙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新的人道主义地缘政治开始出现，其核心内容是废除奴隶制和保护犹太人。很早就

有人相信，良好的国内治理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是相互联系的。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英法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激化，同时英法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加。而且英法两国差一点儿干涉美国的内战。不过，问题的核心仍在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德意志。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正是德意志邦联。在这里，席卷整个大陆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对整个欧洲的均势都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最终，这些压力摧毁了中欧的秩序，并为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德意志不再是一个松散的邦联，不再饱受其他国家的制约，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

这一进程中的失败者，是国际体系中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初，“美利坚联盟国”已被摧毁，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惨遭失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被排挤出了德意志。相反，英国的国力则变得更加强大，它坚决反对奴隶制，并且使其成为一项国际规范；它维持了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支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因此成为欧洲外交的胜利者。法国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其中最让法国满意的是遏制了俄国的势力，并且摧毁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力。此时，最为成功的国家应该是林肯领导下的美国，它不仅避免了内部分裂，还阻止了外国的干涉。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普鲁士，吸收了宪政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张，整个国家的前途一片光明。尽管德意志的统一尚未完成，美国的领土扩张也尚未完成，但两个国家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强国地位的康庄大道，而这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时代的曙光的来临。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大众参与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欧洲地缘政治带入不可预知的方向，最终导致两大联盟体系之间的对决。

[1] “坦齐马特”即土耳其语的“改革”，此次改革运动又称“仁政改革”，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倾向。——编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编著注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编著注

[8] 同上

[9] 同上

第五章

统一：1867～1916年

普鲁士国王陛下代表北德意志邦联、巴伐利亚国王陛下、符腾堡国王殿下、巴登大公殿下、黑森大公殿下……决定结成永久联盟，保护联邦领土。

——《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

先生们，设想一下，这十多年来，战争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们头上——如果战争爆发，没人能够预见它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它将如何结束。欧洲诸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军备战，各国将在战场上相遇……先生们，这可能会是一场七年战争，也可能会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唉，第一个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将令整个欧洲付之一炬！

——赫尔穆特·冯·（老）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1890年5月

19世纪60年代中期，德意志统一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这两大国家完成统一，使得欧洲乃至全球的形势彻底改变。在美国，南北方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最终以1865年美利坚联盟国的投降而告终。一年后，普鲁士在萨多瓦大败奥地利，双方签订《布拉格条约》，确立了普鲁士对德意志的主导权。战争结束后，美国与德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对力量均衡产生了巨大影响。两国都有强大的资源，但二者都没能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感到放心，甚至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矛盾。与普鲁士一样，统一后的德国依然主要关注其周边形势，力图打破包围圈；而内战之后的美国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周边的威胁。两个国家的社会内部都有着深刻的分歧，涉及文化、地区、政治和经济领域，这影响了它们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认知。同样，老牌强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现在也面临着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新威胁。这导致欧洲各国及美国对地缘政治学兴趣的爆发性增长。尤其是德国的崛起，对未来50年的历史形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先是影响到了欧洲各国，后来又影响到了美国。因此，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本章内容的最后时期，德、美两国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后发生了冲突。这两个权力中心开始了相互竞争，究竟哪一方会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占据上风？这要到20世纪中叶才能有定论。

美国北方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为美国带来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长期闭关自守的僵局被打破。1868年12月，约翰逊总统告诉国会："我们应进行一项全面的国家政策，即占领附近的土地与岛屿，并将其纳入我们的合众国。"对于居住在北美大陆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印第安人来说，这些政策是坏消息。在接下来的30年中，随着合众国向西拓展领土以及很多新州的成立，印第安人被逐步剥夺权利，并被边缘化，甚至很多时候被直接杀害。美国的扩张目标还使那些在美洲有着重大利益的欧洲列强感到不安。墨西哥问题尤其紧迫，当时法国正在对墨西哥进行干涉，并扶植了一个傀儡国王。甚至在埃及帕夏的协助下，拿破仑三世还从埃及招募雇佣军，运到墨西哥来作战。法国的做法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及意识形态威胁。法国在美国的后院扶植了一个傀儡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是对"门罗宣言"的直接侵犯。1865年9月，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警告埃及人："随着内战结束，美国国会和总统现在已经团结一致，将会关切美洲大陆上所有自由共和制国家的安全。"美国使者直接警告埃及帕夏伊斯梅尔（Ismail）："你应其他列强的要求向墨西哥派遣军队；现在美国可能会应其他友好国家的要求向你们埃及派遣军队。"美国支持墨西哥游击队反抗法国，很快法国与埃及军队决定放弃马克西米利安，不久这位傀儡国王被墨西哥共和派逮捕并处决。

华盛顿现在转而对付英国。英国阻碍了美国领土向北扩展，南北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出现了海洋问题争端。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南北战争期间，英国为南方军队制造的"阿拉巴马号"巡洋舰使得北方军队遭受重大损失，战争结束后美国要求英国对此进行赔偿。1869年1月，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英美两国政府签订的妥协协定。同年5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甚至要求英国放弃在北美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在合众国的东南方向，局势有了新的变化。西班牙一直担心美国以废除奴隶制为借口吞并古巴。而1868年，古巴又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这使得局势更为紧张。

在欧洲，推动国际关系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力量，是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普鲁士实际上是北德意志邦联的精神主宰者，这个邦联包括萨克森、上黑森省、梅克伦堡和其他较小的邦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将北德意志邦联称为“普鲁士展开的臂膀”。北德意志邦联的议会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这是俾斯麦意图拉拢资产阶级而做出的让步。不过，由于德国尚未统一，普鲁士与其他邦国签订的各种文件依然有效。德意志关税同盟中，不属于北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如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建立了关税同盟议会，并派驻代表。俾斯麦希望，上述机构与制度可以调动民众对下一阶段的统一计划的支持，同时限制其他邦国的权力。俾斯麦坚信，普鲁士要想获得安全，就应该与德意志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并建立牢固的堡垒。

然而，南部各邦国都有自己的想法，它们并不想并入统一的德国。尽管关税同盟为这些邦国提供了经济利益，并且它们能与工业发展迅速的普鲁士进行合作，但它们并不想交出宝贵的主权，也不想把自己的臣民交给普鲁士。因此，经济合作不一定会导致政治联盟的形成。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所有的中等邦国都站在了奥地利一边。尽管奥地利已经退出了德意志邦联，但这些邦国并没有自动向普鲁士寻求庇护。相反，在1868年3月的关税同盟议会选举中，南部各州都反对与普鲁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869年，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个邦国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民族主义者也表现不佳。一年之后，著名的自由派作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itag）悲叹道：“南德意志的各州并没有逐渐向我们靠拢；北德意志的立法进程每向前走一步，南方就与我们愈加疏远。之后呢？我们依然会永久分离。”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北德意志邦联议会中的民族主义者对俾斯麦进行批评，指责其未能尽快承认巴登加入邦联，没有保护巴登免受法国的威胁，因此耽误了德意志进一步走向统一。1869年4月，自由民族主义者卡尔·特文斯滕（Karl Twesten）以预算批准作为要挟，要求政府允许民众更为开放地讨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只有强大的外部威胁才能产生必要的地缘政治动力来完成统一计划，当然也可以巩固俾斯麦在国内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和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突然爆发，对欧洲各国的大战略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英国并没有对德意志局势的发展感到忧虑。1866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表示：“这对我们与其说是损失，不如说是获益，普鲁士在两个侵略性的大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堡垒。”19世纪6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发展使很多英国人相信，英国需要调动新的资源以捍卫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1866年4月，格莱斯顿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说

明公民权的扩大可以为国家带来很多好处，因此“政府可以有效扩大其权力，国家将会获得更大的动力”。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公民权得以扩大。改革法案的通过有其深刻的国内原因，但当时英国议会也强烈地意识到，这对于保持和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英国开始探索，通过不断扩大海外殖民地来提高帝国的防卫能力。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构成严重威胁。受美国的影响，1865年，英国决定效仿美国，在北美建立另一个联邦。1867年，各英属北美殖民地组成统一的加拿大自治领。

此时，维也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不在德意志范围内浪费精力而专注于巴尔干；有人则主张，应想办法阻止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至少应该通过联合法国、德意志南部诸州来延缓德意志的统一。萨多瓦战役之后，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曾发誓：“我们应该完全离开德意志邦联，不管这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我们曾经与德意志诸邦结盟，但现在应该离开，这对于奥地利来说将会是一件幸事。”与之相反，奥地利新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博伊斯特伯爵（Coun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认为，奥地利可以与拿破仑三世结盟，以制约普鲁士；即使法国扩大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势力，“我们也不应该退缩，而是应该继续留在德意志”。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也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宪政改革现在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奥地利战败，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答应匈牙利人的部分要求，长期以来，占匈牙利人口多数的马扎尔人一直对奥地利不满，这限制了奥地利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1867年，维也纳终于与布达佩斯相“妥协”。匈牙利不仅保留了自己的议会，还在财政、立法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而且有自己的地方防卫军。在形式上，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地位是平等的，二者共同组成一个二元君主制国家——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希望，新的宪政结构能够释放能量，使这个帝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更有竞争力。

在圣彼得堡，俄国统治者仍然普遍认为，支持俾斯麦在德意志壮大其力量，是削弱法国的最有效方法。1856年，《巴黎和约》规定俄国军舰不得出入黑海，俄国人对此非常痛恨，而一旦德意志壮大起来，俄国就有可能修改该规定。不过，政坛中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1865年，俄国各大城市废除了新闻预审查制度，这极大地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新闻自由迅速发展。崇尚斯拉夫文化的I·S·阿克萨科夫（I. S. Aksakov）以及莫斯科报业巨头米哈伊尔·卡特科夫（M. N. Katkov）认为，俄国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普鲁士，德意志统一事业的发展是对巴尔干地区的致命威胁，甚至会影响到俄国本土。正如俾斯麦团结整个德意志那样，俄国也应该团结所有的斯拉夫人。与英国一样，俄国试图通过在中亚和东亚扩展殖民地来增加其在欧洲的影响力。1864年12月，戈尔恰科夫指出：“美国在美洲扩张，法国在非洲扩张，英国在印度扩张，同样，我们俄国应该效仿它们，我们也应该扩张。”他还说：“俄国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而非出于我们的野心，否则我们很难在这个世界

上生存。”朝野中很多人反对俄国东扩，他们认为俄国的核心利益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巴尔干，向东扩张会分散俄国的精力。1865年3月，卡特科夫抱怨说：“俄国在亚洲的壮大，肯定会削弱其在欧洲的影响力。俄国之所以是一个大国，其根基不是在亚洲，而在于其对西部边疆与黑海的控制权。我们的历史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

1866年之后普鲁士的崛起明显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墨西哥惨败，同时俾斯麦打败了奥地利，将法国撇在一边，使得法国非常尴尬。为获得补偿，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德意志西部的部分土地，以及卢森堡和比利时。1866年9月，法国外交大臣拉瓦莱特侯爵（Marquis de la Valette）为上述要求进行辩解，他表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得人们团结在一起，成为更大的组织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人能够保持中立。”为了实现其帝国野心，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在国内做出让步，以支持其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1867年1月中旬，内阁各大臣在议会发言，并接受议员的质询。一年后，政府取消了对新闻的限制，同时议会辩论可以更加开放。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攻击政府的无能。在议会中，梯也尔指责拿破仑三世，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德意志日渐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年轻、有活力、大胆而且野心勃勃，而且就在法国的东部边界，这导致法国数百年来的战略功亏一篑。”1867年3月，梯也尔怒吼道：“绝对不能再犯错误了！”19世纪60年代即将结束，显然，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必须在外交上获得一些胜利，否则他就会在国内遭受更多的批评。

此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外交活动打破了僵局，从而继续推进德意志的统一。1867年，他暗中支持法国对卢森堡的领土要求，这件事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但他坚持抵赖。1868年3月，他与沙皇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确保俄国能够制衡奥匈帝国的力量。1869年的3～4月，法国企图接管比利时的部分铁路系统，俾斯麦利用国际争议，将矛头指向法国。同年，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普鲁士支持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成为候选人。这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Duc de Gramont）发誓，法国绝对不会允许来自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成为西班牙国王，不会允许他佩戴“查理五世的皇冠”。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包围了法国，当时法国面临战略困境，现在法国人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巴黎和其他地区的法国人感到很愤怒，普鲁士人现在不仅来到了莱茵河的另一边，甚至还要染指比利牛斯山脉的南部。拿破仑三世认为，利奥波德将会把西班牙变成俾斯麦的附庸国。尽管这种可能性不一定存在，但法国依然决定先发制人，向普鲁士发起挑战。法国首相埃米尔·奥利维耶（Emile Ollivier）坦率地承认，法国政府想利用这场危机来转移和解决国内问题。他说：“必须表现出坚定和志气，否则我们将无法应付国内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者。”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把与法国大使交谈的内容，从埃姆斯向俾斯麦发出电报。但俾斯麦篡改了“埃姆斯密电”，添加了刺激法国的话，并故意泄露给法国。法国非常愤怒，宣布对普鲁士开战。

拿破仑三世取得胜利的最好机会，是迅速把军队推进到德意志境

内，在普鲁士调动资源之前，发挥其野战军的优势。正如俾斯麦所料，法国对德意志的侵略，迫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南德意志诸邦投入俾斯麦的怀抱。甚至，很多曾经对德意志的统一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是反对由普鲁士来领导德意志的人——现在都开始反对法国。俾斯麦现在有了新的使命，他将领导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共同对抗德意志的宿敌。7月中旬，弗朗茨·约瑟夫宣布中立，拒绝支持法国，这主要是因为拿破仑三世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他的弟弟、墨西哥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南德意志诸邦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一开始它们比较犹豫，但很快它们都表示愿意追随普鲁士，共同为德意志而战斗。即使是那些曾经在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的邦国（如汉诺威），也加入了对法国的战争。在短短几个月内，法国军队在色当（Sedan）被击败，拿破仑三世成了俘虏。1871年5月，威廉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加冕典礼，正式宣布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

从任何标准看，统一后的德国都是一个巨人。其人口有4 100万，在欧洲仅次于沙俄帝国（7 700万）。而当时法国人口只有3 600万，奥匈帝国也只有约3 600万，英国只有3 100万。相比之下，1850年时的普鲁士人口只有1 600万，但德国统一后，人口迅速增加，而法国则近乎停滞。人口优势有利于德国迅速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同时，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以及首屈一指的军队。当时，能与德国的实力相抗衡的国家，只有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1871年2月，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对国会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现在已经被欧洲国家采纳，其原则是培养自由的、自律的人，我们美国人的思想正在欧洲普及开来，影响力越来越大。"有的杂志将俾斯麦称为德国的"国父"，好比美国的"华盛顿"。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个强大的新兴实体位于欧洲的心脏部位。现在，中欧已经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里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奥地利也被永远地排挤出了德意志。在过去的几百年内，中欧由众多小的邦国组成，即使在最近的7年中，也有将近40个不同的实体，而现在这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接下来的10年中，这一事实将主导欧洲主要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

法军在色当惨败以及拿破仑三世被俘，摧毁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现在很多法国人相信，只有在国内进行一场革命才能挽救整个民族。于是，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为首的国防政府接管所有权力，并组建了国民自卫军。此时发生的事件，与1792年非常相似。所以很多法国人都相信，民族主义浪潮、自由主义的洪流、激进主义的热情能够将德国人赶出法国。然而，第二年伊始，德国迫使法国新政府签订停战协议，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巨额赔款。在随后的选举中，梯也尔领导的求和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波拿巴分子彻底落败。在波尔多，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很快决定接受俾斯麦的要求。1871年3月，议会准备就和平条约进行表决，但这导致了"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主要由工人组成，他们反对议和，坚持要求继续战斗。一方面，他们想维护国家荣誉；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议和是保皇派的阴谋，说这是复辟帝制的特洛伊木马。两个月之

后，“巴黎公社”起义被政府镇压。

这一切都迫使法国人重新开始。1871年之后，法国的主要战略威胁依然是德国。1872年1月，法国著名的文学和文化杂志《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做出这样的描述：“霍亨索伦家族注定要永远战争，就像拿破仑一样，因为它永远不满足自己的所得……”同样，法国国内政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收回阿尔萨斯–洛林，或者至少恢复法国在欧洲国际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过去右翼曾经反对关注世界事务，而现在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左翼中的鸽派现在已经变成了鹰派，他们主张对外奉行强硬政策，并维护民族利益。1872年、1873年和1875年，政府颁布一系列军事法规，将兵役期限增加到5年，这使得法国成为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尽管法国的征兵制度依然存在缺陷）。法国成立了强大的行政执行机构，总统由公民直选产生，拥有君主般的权力，而且不必对议会负责。

在东欧和东南欧，法国的战败导致了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奥匈帝国首相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决定退出德意志，但又与俾斯麦修复了关系。他希望获得俾斯麦的帮助，以对付俄国和镇压国内的革命。由于法国被削弱，已经难以成为反对俄国的力量，因此博伊斯特希望与德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中欧”，重建失去的平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已经承认了新的权力政治现实，不想再与俾斯麦为敌，同时也是为了应对俄国对奥匈帝国中的泛斯拉夫主义（尤其是在波希米亚）的支持，再有就是要应对国内的反抗情绪。对俄国来说，法国的战败为其提供了新的机会，它可以重新向南发展势力，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获得利益。1870年11月，沙皇单方面宣布废除《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准备将军舰部署在黑海，试图再次入侵奥斯曼帝国。然而，局势很快变得清晰，在俄国实现其“历史使命”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严重障碍。尽管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刚刚退出德意志和意大利，但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决心阻止沙皇在东南方向包围奥匈帝国。1870年，俄国将军罗斯季斯拉夫·法捷耶夫（Rostislav Fadeyev）在他著名的《论东方问题》（*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一书中曾经指出：“俄国要想通往君士坦丁堡，必须先经过维也纳。”然而，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认为，他们实现抱负的真正障碍其实是德国，德国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者。1870~1871年，俄国两大报纸——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莫斯科公报》（*Moscow Gazette*）以及《声音报》（*The Voice*）——发表了大量的反德文章。他们谴责“普鲁士正在支配欧洲”，并声称“一种无法抑制的自然倾向，促使德国走上了征服之路”。但是，当时沙皇的官方外交政策中并没有使用这种说辞。在意识形态上，沙皇依然支持俾斯麦，并且支持德国的统一，因为俄国人非常痛恨克里米亚体系。对于俄国的君臣来说，其主要敌人依然是英国而不是德国。

英国很快认识到了德国统一的时代意义，然而两国之间的共识也随之结束。有人认为，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说明它是欧洲平衡的潜在威胁。1870年11月下旬，格莱斯顿警告道：“德国很快就会开始其扩张行动，它的军队将会跨出国界，来到我们这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应

对其挑战，就像当年各国在克里米亚阻止俄国的扩张一样。”三年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拉塞尔（Odo Russell）提醒道，俾斯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永远抑制法国，而且是要实现“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霸权”。然而，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件好事，德国对英国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事实上，拿破仑三世的战败，降低了法国入侵英国南部海岸的危险。许多外交官和评论者的看法并不持悲观态度。例如，资深外交官罗伯特·莫里尔（Robert Morier）认为，欧洲中心出现一个新教国家是一个好事，这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潜在的自由主义热情，能够遏制法国和俄国的势力。另外，很多之前对德国持怀疑态度的人，包括罗素，也都逐渐接受了俾斯麦的承诺，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知足”的国家。不过，1870～1871年的战争之所以重要，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这导致了德国的统一，而在于这标志着法国的崩溃。迪斯雷利在一次容易令人误解的讲话中，把这种发展描述为“德国革命”的主要结果。

英国人最敏锐地感觉到，与美国和俄国相比，法国已经处于弱势。俄国撕毁黑海条款，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因为一旦俄国进入中亚，那么它将很快抵达阿富汗，然后就会染指印度。同样，英国大使洛夫特斯勋爵（Lord Loftus）也认为，法国战败后，新的形势将对英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现在英国不会再受到美国的骚扰。1871年5月，英美两国正式签署《华盛顿条约》。同时，英美邀请德国作为仲裁国，并于1872年夏天解决了关于“阿拉巴马号”战舰的赔偿问题。在此背景下，德国统一带来了独特的问题。洛夫特斯表示，“尽管法国的野心导致其犯了错误，但它为英国提供了很多服务，比如在美洲、印度和中国。相比之下，德国在这些地区无法为英国提供服务，因此它不能成为英国的盟友”。简而言之，一开始英国并不担心德国会有殖民野心和海军能力，而是担心它没有野心和能力。

法国的崩溃也对英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德国的统一显然是一个野蛮的过程，这破坏了自由贸易的理念，也使国际法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自由主义价值将会盛行；没有战争，或无须军事捍卫的理念将不再可信。之前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将会使得战争不复存在，国家不需要再通过武力来保卫自己，而随着德国的统一，这种说法变得不可信。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德比勋爵（Lord Derby）无情地指出：“格莱斯顿真的相信科布登的理论，即当人们变得文明时，战争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在普法战争中，自由派感到震惊和困惑。”现在，战争的恐慌已经笼罩全国。有一些未来学的作品很畅销，它们预测德国会入侵和征服英国。例如，当时的军官、后来的国会议员G·T·切斯尼所撰写的著名小说《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于1871年出版。该书假设，普鲁士对英国发动攻击，并且全歼英国本土缺乏训练的民兵，而当时英国将常备军部署在了海外。此时英国似乎离“欧洲”大陆非常之近。

很多英国人认为，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好处理新的安全威胁。长久以来，自由派和激进派一直在批评那些贵族，说他们“怯懦”、因循守旧，认为军队改革势在必行。普法战争使得很多保守派相信，应该废除

军队中贵族的特权，改变其不合理的传统做法；很多自由主义者也相信，他们要想获得自由，就应依赖于高效的军队。1871年，格莱斯顿内阁的陆军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艰难地促成议会通过了一项军事法案。他的改革终结了最恶劣的积习，即买卖军衔，并促成了19世纪末英国军队的更进一步发展。此时，对于格莱斯顿来说，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无法进行，他也预料到，取消所得税也是不可能的。1871年4月，财政大臣罗伯特·洛（Robert Lowe）提交了一份预算计划，由于陆军需要更多的开支，所得税要增加1%的税率。之前，政府想通过使土地遗产税的税率翻番来扩大军事开支，但由于民众强烈反对而不得不作罢，政府只能用提高所得税的办法来代替。后来，格莱斯顿想废除所得税，因此要求陆军和海军削减其开支，但后者拒绝这样做。1874年1月，首相不得不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格莱斯顿在大选中失败，被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取代。可以说，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普法战争造成的。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在欧洲的力量有限，它试图通过海外扩张来巩固和提升其全球地位。1871年7月，受德国统一的影响，“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的支持者在伦敦举行集会。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应该将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紧密地整合起来，以捍卫英国的利益；跨大西洋的电缆的铺设让这种设想第一次具备了技术基础。1872年，英国允许南非开普省成立自治政府，英国希望该省不仅可以自行承担防卫，还可以作为英国向非洲内部扩张的基地。4年后，迪斯雷利使得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王”，英国效仿古老的俄国和新的德意志帝国，建立了双重君主制度。帝国的扩张，也为英国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普世传播提供了一个机会，普鲁士在欧洲的扩张曾经大大破坏了这些价值。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认为，殖民地可以“恢复世界对英国的尊重”。此时，英国扩展其价值观的主要手段是开展运动，以废除奴隶制和取缔在非洲的奴隶贸易。1872年，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被斯坦利营救，他讲述了黑人所遭遇的各种不幸，使得反奴隶制运动达到了高潮。第二年，议会和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要求政府干预东非，制裁贩卖奴隶的行为，与敌人做斗争。英国对埃及施加压力，要求其承诺废除奴隶制。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对国际关系体系的严峻挑战。在德国统一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迅速发展壮大，同时在北美获得了大约10万工人的支持；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美国其实是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有效部分。1871年，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明确指出各国之间的团结是获得胜利的关键。歌曲号召工人向暴君开展斗争，以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这首歌使得财富所有者感到震惊，并且影响到了欧洲各国的战略家，因为各国保卫其主权的士兵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招募的。一开始，第一国际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包括了马克思、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马志尼和奥古斯特·巴枯宁等很多人的追随者；后来，第一国际被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主导。在1872年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这不是简单的怨恨或宗派主义。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得工

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如果社会主义者想要通过革命来实现其改造世界的抱负，那么他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建立统一的领导。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认为：“只有当全国、全世界的劳动群众的力量紧密联合在一起，工人阶级才能……发挥其所有力量。民主集中制才是工人阶级胜利的关键。”时间会证明，民主集中制的设想，其实几乎与民主无关，其所有内容便是集权。

俾斯麦宣称新德国是一个“知足”的国家，并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野心。然而，德意志帝国依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东边是俄国，尽管其统治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但其国家依然在向前发展；西边是法国，这个国家完全不甘心在1870～1871年战争中的惨败。接下来的20年中，“敌国同盟的噩梦”反复萦绕在俾斯麦心头。他担心当年的考尼茨联盟会再次出现，即奥地利联合法、俄孤立普鲁士。更糟糕的是，这种包围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使得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冲突更为严重。俾斯麦是一个坚定的新教保守派，他认为德国周边的国家都是敌人：英国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法国的保皇党和天主教复仇主义，革命性的泛斯拉夫主义，还有第一国际下属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类激进派。整个19世纪70年代，法国复仇主义带有明显的天主教和保皇派色彩，所以俾斯麦一直用怀疑的目光，警惕着德国数百万天主教徒，因为其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德意志被普鲁士统一。他认为教皇也是一个危险人物，尽管教皇宣称自己的教义是无误的。在俾斯麦看来，教皇会破坏德国人对国家的忠诚，甚至可能会被阴险之人利用，成为天主教的法国用来压制新教的德国的工具。他将天主教徒与社会民主党、汉诺威的君主以及波兰人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帝国的敌人”，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风险。

1871年时，刚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些真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德意志帝国宪法》实际上只是建立了一个使各王国、公国一致对外的“德意志合众国”。德意志的统一靠的是德意志皇帝及其任命的帝国宰相的意志。根据宪法，在战时“德意志皇帝有权决定帝国军队的部署、分配和安排”；在和平时期，“军队的编制规模……由德意志帝国议会决定”。帝国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由全国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这意味着，帝国国防将成为国内政治辩论的主题。这样一来，外交政策、预算控制以及越来越广泛的政治参与，三者是彼此直接联系的，德国未来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另一方面，统一的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议会负责征收直接税，承担国防使命的帝国政府只能征收间接税。因此，帝国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它能承担的武装力量规模大大小于德国的人口规模所允许的比例，适合服役的国民中只有少部分被征召入伍。军方高层以及普鲁士的保守派都默许了这种政策，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政府打压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其近40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财政与经济潜力。

俾斯麦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应对帝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在国内，他启动了一场“文化斗争”。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反对教会干预政治，

在他们的支持下，俾斯麦设法打压天主教徒。不少神父被投入监狱，天主教刊物遭到骚扰，恐惧和恫吓的气氛弥漫在议会和公共领域当中。在国外，俾斯麦巧妙地设计了一套“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并苦心经营。与英、法、俄不同，俾斯麦对海外殖民扩张不感兴趣。有人曾经回忆俾斯麦的谈话，说：“宰相拒绝以任何方式讨论殖民扩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德国没有保护殖民地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可以通过扩展殖民地来有效减轻普法战争之后的领土损失，而俾斯麦关注的是德国在欧洲的安全，对海外领土不感兴趣。他曾经说过：“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德国的这种克制态度，使美国人感到很放心。1871年12月，俾斯麦告诉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说：“我们没有任何兴趣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据点，并且我们明确承认……美国在美洲地区拥有绝对的影响力。”俾斯麦认为，德国应该是欧洲战略平衡的砝码，如果欧洲共有三个强国，那么德国就应联合其中一个强国；如果欧洲共有五个强国，那么德国就应联合其中两个强国。这意味着，德国要么与奥匈帝国结盟，要么与俄国结盟，以处理东欧事务。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应该反对英国和法国。因此，1873年，在俾斯麦的努力下，威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成同盟，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缓解奥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如果二者关系不可调和，那么俾斯麦就不得不在二者之间选边站。同时，这也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欧洲三个保守大国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它们将联合保卫“高级的秩序”，应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威胁。而俾斯麦所有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永远孤立法国。德法两国一直是宿敌，矛盾无法调和。1874年2月下旬，他写道：“我相信，当法国出现在欧洲的舞台上，并且能够再次与其他国家结盟时，它对我们的威胁就已经开始了。”

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通过了新的陆军法，并且在军事上开支巨大，导致德法矛盾更加尖锐。1875年3月，有位记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如果法国不废除新的陆军法，那么德法两国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很多人认为，这位记者是在传达俾斯麦的意图。俾斯麦是想羞辱法国，迫使其放弃军事备战政策，并且让其他欧洲强国认为法国这个盟友不可信赖。俾斯麦的战争叫嚣并非仅仅是装腔作势，也不仅仅是在转移国内的批评，而是威慑政策的一部分。1875年5月下旬，他称“危机已经达到高潮，战争马上就要到来”，“我们不随便攻击别人，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剑拔出鞘”。然而，俾斯麦的策略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他并没有成功孤立法国，其他列强反而认为德国成了威胁，它们担心欧洲的平衡被破坏。其中，俄国公开拒绝支持俾斯麦，并表示反对进一步削弱法国的力量。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明显偏向巴黎，以希望保持欧洲大陆各国的权力平衡。法国坚持执行其陆军法，俾斯麦被迫退缩。他想要保证德国的绝对安全，至少避免法国在西边进攻德国，但这导致整个欧洲出现了一种不安全感，各国纷纷怀疑德国。

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农民揭竿而起，反抗穆斯林统治者。一年后，动乱蔓延到保加利亚。土耳其人以极端残暴的方式进行镇压，政府纵容士兵肆意烧毁村庄，数万平民被

杀害，令人想起了当年土耳其在希腊的暴行。“保加利亚的恐怖”很快为全世界所知，并在英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反对党自由党的领袖格莱斯顿高呼“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人性”，要求政府“尽力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将土耳其的势力赶出保加利亚，结束其暴行”。巴尔干发生的事件，使得俄国民众的地缘政治意识增强。发生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的大屠杀，掀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爱国狂潮。俄国的农民平时很少关注其他国家，现在他们也变得狂热起来。新闻界以及普通民众都进行了各种宣传，一直要求政府对巴尔干进行军事干预，很多志愿者要求奔赴那里去援助他们的同胞。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俄国宣称对奥斯曼帝国没有领土要求，而是要捍卫正义的原则。戈尔恰科夫指出：“土耳其有权享有独立和领土完整，但它不能违背全人类的基本原则，不能破坏基督教欧洲的和平。”1878年1月，沙皇的军队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很快，奥斯曼苏丹被迫求和。1878年3月，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Treaty of San Stefano）。由于其他列强的干涉，俄国没能够侵占土耳其的土地，但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被剥夺了一大块。根据条约，建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公国，北起多瑙河，南到爱琴海，东起黑海，西至（但不包括）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地区的战略版图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

俄土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大大削减，其他欧洲列强对俄国表示警惕。奥地利担心，俄国接下来将要对付自己。英国同样被俄国的扩张吓坏了。1876年12月，迪斯雷利指出，英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支持巴尔干基督徒的野心，而是确保俄国不能染指土耳其。如果《圣斯特法诺和约》中的规定成为事实，一个在沙皇保护之下的大保加利亚公国建立，那么俄国将获得进军君士坦丁堡的便利基地。因此，英国向海峡地区派遣了皇家海军的一支中队。此外，对于俾斯麦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土耳其的福利”，也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已经对俄国臣服，一旦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违背承诺，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俾斯麦一直避免在俄、奥两国选边站；而中立政策也无法解决问题，那样会削弱德国的影响力。1877年6月中旬，俾斯麦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口述，被整理成著名的《基辛根温泉备忘录》（Kissinger Diktat）。他强调，欧洲局势的不稳定发展可能会再次导致“噩梦般的联盟”。德国应该努力防止自己被包围，这是一项长期战略，也是“俾斯麦体系”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德国的安全与欧洲的整体平衡息息相关。

因此，俾斯麦认为，德国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掮客”，“不为自己索取领土和安全利益，但要关注欧洲的整体政治局势，使得欧洲所有国家（法国除外）对德国产生信任甚至依赖，防止出现一个针对德国的联盟，防止德国被包围”。这意味着，德国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且要关注盟友的利益，减少各盟友之间的摩擦，防止欧洲局势不稳定，避免法国坐收渔利。1878年，俾斯麦主持召开柏林会议，对《圣斯特法诺和约》进行了修改。保加利亚依然获得自治权，但领土被大大削减，之前的“大保加利亚”被分为三部分：土耳其收回马其顿；在巴尔干山脉以南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称为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只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地区。此外，奥匈帝国被允

许占据并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是直接吞并。英国得到了塞浦路斯，因而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了一个基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保卫海峡的安全。各大国承诺，将努力维持这些安排，防止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一方面，各大国想巩固“文明”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它们是想防止巴尔干周围的国家对这一地区进行干预。新生国家——保加利亚公国、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被要求承诺不歧视少数族裔，特别是不能歧视犹太人。正如一名英国外交官所说：“犹太人处于文明世界的保护之中。”以此推论，只有那些拥有良好管理制度的政体，才能够维护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俾斯麦曾经说，巴尔干没有什么价值，还“不值波美拉尼亚士兵的尸骨”。而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已经成了巴尔干地区人权的保证人。

德国在柏林会议上的调解，塑造了未来10年的欧洲各国政治。大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被瓜分，导致俄国公众非常愤怒。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伊万·阿克萨科夫谴责“柏林会议是针对俄国人民的公开阴谋……俄国派出的代表过于软弱”。一些人抨击沙皇制度本身，认为这种制度非常腐朽，已被证明无法捍卫国家利益。有一些革命者开始宣传口号，“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仍然没有宪政：俄罗斯帝国以及天朝中国”，使得俄国警察非常紧张。在英国，迪斯雷利没有正确预知和处理保加利亚发生的恐怖屠杀；此后，在非洲和阿富汗，他的政策也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人权问题。这导致19世纪70年代末，他的执政面临着挑战。当时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正在领导“中洛锡安运动”（Midlothian campaign），强调“共同人性”和“人类的兄弟情谊”，他批评保守党政府的外交缺乏道德性。格莱斯顿认为，有些英国人屠杀黑人或阿富汗人以获取赤裸裸的殖民利益，保守党政府没有及时进行阻止；此外，政府没有在欧洲和世界大力传播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想。换句话说，英国的价值观输出并非狂妄自大，而是被看作一种正当的外交政策。1880年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这说明此时的英国民众更加欣赏格莱斯顿的理念，对迪斯雷利的国际政策表示不满。

然而，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的动乱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影响了俾斯麦的战略思想。很显然，此时俾斯麦必须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做出根本性的选择，他不能再耽搁了。俾斯麦倾向于支持奥匈帝国，发展德奥友好关系，这样可以团结中欧力量，共同应对来自东西两侧的攻击。俾斯麦在1879年表示：“如果德国和奥地利团结一致，我们就可以对付任何敌人，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认识到，与奥地利的合作容易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机联系，我们不应签订那种普通的、公开的条约，而是应该将这种关系写入两国的法律之中，并且两国同时推出新的法律，以确认这种关系”。数十年前，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曾经想建立一个有7 000万人口的庞大的德意志帝国，但最后没有成功。现在，俾斯麦试图再次这样做。现在俾斯麦已经摒弃了文化战争，以尽量拉拢天主教徒，团结奥地利。1879年10月初，德奥两国签订同盟条约。双方承诺，一旦任何一方遭受俄国的攻击，彼此应互相帮助。这是一项秘密条约，德国并不想过于刺激俄国，以便在必要的

时候还可以笼络俄国。不管怎样，俾斯麦认为，他已经在新的“考尼茨联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德、奥、俄这三个大国中，德国已经与其中一个结盟，因此占据了多数地位。但是，如果把英、法加进来，德国能否在这5个国家中占据多数？要做到这一点，俾斯麦必须离间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必须让俄国与英法保持距离。这里，俾斯麦可能会把某一项劣势变为优势。19世纪70年代末，天主教已经不再是德国的威胁（原因是法国对天主教士的选举权进行了一些限制），俾斯麦开始越来越担心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担心他们会颠覆政权。德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法律。此外，1880年，格莱斯顿再次赢得选举，连任首相，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在国际上推广自由主义，这也引起了俾斯麦的担忧。俾斯麦开始了他的政治赌博，他准备夸大欧洲君主制国家面临的威胁，以便于拉拢俄国。1881年3月中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俄国受到重创。事实上，只有俄国政府认同以下观点：整个欧洲的保守势力要想维持团结，就必须处理好自下而上的威胁；只有各国压制住国内的批评者，才能维持友好的国际关系。俾斯麦也接受了该观点，因此1881年6月，他促成了德、奥、俄三国签订协定，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他宣称“现在法俄联合起来对付德国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不过，当时奥、俄两国之间一直矛盾重重。此外，为了安全起见，1882年5月中旬，俾斯麦又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了“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主要目的是保护哈布斯堡王朝南翼的安全，使奥地利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俄国。

19世纪80年代，新的国际联盟关系也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俄奥关系恶化，以及俄德关系质量的下降，沙皇政府越来越关心西部边疆的安全，那里居住着大量的非俄罗斯族人。俄国政府对波兰人进行“俄罗斯化”，对德意志人也是如此。此时，波兰的犹太人尤其倒霉，俄国的农民一直非常排斥犹太人，政府也认为犹太人不可靠，不愿意他们生活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例如，俄国战争大臣宣布，从今以后军队的医务人员中，犹太人不能超过5%，理由是犹太教徒被认为“缺乏履行其职责的自觉性，并在军队卫生服务中产生不良影响”。可以肯定的是，1881～1882年发生在基辅、敖德萨（Odessa）和波多利亚（Podolia）的屠杀都是自发发生的，并不是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而屠杀犹太人，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些屠杀。内务大臣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Count N. P. Ignatiev）伯爵指责波兰人和犹太人建立了各种“虚无主义的秘密组织”。数十万犹太人被迫逃离俄国控制下的波兰，来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和美国，人道主义组织和犹太人组织纷纷动员起来表达他们的愤慨：沙俄帝国现在已经成了典型的压迫者，它不仅与中西欧的共和国的理念相冲突，也与美国的理念相冲突。

在这期间，欧洲始终流行着这样一种尖锐的观点：国家的内部结构要服从于保证外部安全的需要。俾斯麦继续声称，德国正面临着危险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执行机构，必须对议会的权力进行明确的限制。在英国，公众和议会意见的“反复无常”，导致政府无法

做出连贯的大战略，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曾对此表示遗憾。上述二人的观点在精英阶层有很大影响力，他们都认为，行政部门或者君主的权力应该高于人民主权。这种观点的假定是：选民一般不热衷于战争，而政府要相对好战。英国改革家约翰·莫利（John Morley）热切地相信，一个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将会反对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者呼吁，议会应该更多地参与对外事务。部分原因是为了使议会行使其监督权力；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相信，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对于动员全国力量来保卫国家切身利益是必要的。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少数人的权利，他们倡导人道主义，尤其反对奴隶制，并且鼓励国家对外进行干预。总之，大众地缘政治观念的发展，往往导致各国的好战性更加强烈，这对国际关系体系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在整个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始终忙于殖民扩张和殖民地重组，以获得更多的人力、经济资源、领土和威信，用于抗衡其他欧洲国家。在法国，很多人认为殖民扩张是必要的。在整个70年代，包括总理甘必大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可以用殖民地来和德国做交易，以收回阿尔萨斯–洛林。还有人认为，拥有强大的殖民地可以抵销与强大邻国之间的差距。内阁部长保罗·伯特（Paul Bert）表示："扩大殖民地可以使国家获得更多的能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回阿尔萨斯–洛林。"1881年，法国先于意大利吞并突尼斯，并于1885年远征印度支那半岛，抵达了越南北圻地区。同时，在大英帝国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成立一个"帝国联邦"。1885年8月下旬，在著名的墨尔本讲坛上，澳大利亚作家爱德华·莫里斯（Edward Morris）警告说："未来属于大国，目前德国还没有达到其最大的国家版图，它还将继续扩大。"他预测："未来的三大帝国为美国、俄国和德国，如果英国不想被完全消灭，那么它就应该更有效地将各殖民地纳入到其帝国防御体系之中。"这位"政体设计师"建议，澳大利亚的各省应该联合起来，大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也应该这样做；同时，每一块殖民地都应该与英国建立"联邦"关系。许多人担心，如果大英帝国放松了对各殖民地的控制，那么这将导致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悲剧重演，进而导致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下降，使得帝国面临危机。

殖民扩张不仅是一种地缘政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程：这两种动机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非洲。列强现有的殖民地，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部落的不稳定性的威胁。列强把曾经在欧洲长期实践过的原则推广到了其他地区。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表示，在欧洲，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永久无政府状态"或者"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邻国就有义务"派出使节对其进行监护"或者"将其分割"。法国殖民者认为，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很难获得安全保障，除非平定南部边缘的游牧民族，并且控制从地中海到象牙海岸据点之间的全部土地。同样，英国战略家试图在掠夺成性的祖鲁人（Zulus）与同样躁动不安的南非白人（位于好望角省）之间保持中立。尤其重要的是，欧洲列强想要填补非洲内陆的"权力真空"，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其现有的殖民地不受周围野蛮人的攻击，部分

原因是为了保护其资源，部分原因是为了取得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地位。扩大殖民地的中心内容，是要取缔东非地区的奴隶贸易。许多欧洲人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而且也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稳定非洲大陆的必要之举。当时，很多阿拉伯的奴隶贩子通过数千只小船，将奴隶从非洲运送到红海和亚丁湾以外的地区，因此英国很难使用海军来取缔奴隶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帮助非洲人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建立文明的秩序，就必须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大陆扩张”，深入非洲深处，粉碎阿拉伯人的掠夺行为，同时阻止某些非洲黑人来协助这些贩子。英国舆论对这种做法表示支持。英国人要帮助非洲黑人做出选择，是让他们继续当阿拉伯人的奴隶，还是让他们接受欧洲国家的管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非洲中部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的支点。法国从西北方向进入非洲，而英国从南部和东北部进入非洲。俾斯麦担心，刚果盆地的有色人种可能会为法国提供大量的兵源，并且法国可能会以此来对付德国，而德国目前还没有机会在非洲建立殖民地。因此，俾斯麦呼吁欧洲列强在柏林召开会议。1884年12月到1885年2月下旬，柏林会议召开，讨论了非洲的未来安排。会议决定，确保刚果盆地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随后的“抢夺”中，非洲大陆的大部分被列强瓜分。伦敦得到了贝专纳（Bechuanaland）、英属东非和英属索马里。法国得到了贝宁（Benin）、加蓬（Gabon）、马达加斯加，以及西非的很多地区。德国占领了西南非、德属东非、多哥（Togo）和喀麦隆。此外，德国还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了一些领土，如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外殖民帝国。刚果盆地具有重要的意义，欧洲列强不允许其巨大的潜在资源被某一个大国单独控制。比利时是一个小国，不会侵犯其他国家，因此各国决定由比利时来控制刚果盆地。很多人认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是一个年轻的、思想自由的君主，他将废除刚果盆地的奴隶贸易，使那里的居民生活焕然一新。俾斯麦不得不再次处理离德国边界很远的地方的事件，以确保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因此，非洲中部发生的这些事件与中欧是有密切联系的。

列强将其生活方式带到殖民地，推动了那里的现代化，然而这却导致了当地人民的坚强反抗。当时，埃及人非常希望在欧洲人面前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履行了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条约。因此埃及人也向南扩张，并且取缔了那里的奴隶贸易。苏丹的穆斯林贵族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依赖于奴隶制，他们反对埃及的扩张，反对废除奴隶贸易。1881年，一位苏丹民族英雄，自称“马赫迪”，领导苏丹人反对埃及的扩张。1883年，英国退役军官、被封帕夏的希克斯（Hicks Pasha）率领埃及军队镇压起义，但遭到马赫迪军队的伏击，几乎全部被歼灭。两年后，即1885年2月，经过长期的围攻，叛军最终占领喀土穆（Khartoum），并杀死了埃及驻苏丹总督戈登——一位来自英国的传奇将军。马赫迪获得胜利后，宣布发动“圣战”，谴责埃及人是伊斯兰教的叛徒，并恢复奴隶制。之后，他又宣布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家，并担任国家元首。大约在同一时间，第一次英布战争爆发。1881年，布尔人（南非白人）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击败了英国军队，阻断了英国从开普省向北推进的企图。三年后，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金矿的发现，为布尔

人提供了财富，让他们可以从欧洲购买武器。

在西方国家内部，殖民扩张一直饱受争议。有人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强烈质疑殖民扩张行为的道德属性。也有人强烈质疑，欧洲的价值观是否能够输出到其他地方，甚至有人认为不应将欧洲的价值观输出到欧洲以外的世界。一位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写道，“我们认为，所有的经验都显示，我们不应过早地将我们独特的文明引入非常落后的部落”，“对于奴隶制，我们只需要阻止有人将奴隶从非洲出口到西欧就已经不错了；至于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任其发展吧”。另一种反对意见是，欧洲国家在亚洲和非洲耗费了太多精力，导致自己分心，无法应对家门口的安全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情地抨击殖民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会导致国家浪费资源，不利于德国与沙皇专制统治的决战。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不反对俄国向中亚扩张，但前提是政府不能减弱其在巴尔干的“历史使命”。在法国，这种批评声音最为明显。多数法国人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与德国算账，而不是在海外搞各种没有价值的事情。1885年，法国在越南东京地区被中国远征军打败，法国政府面临危机，茹费里（Jules　Ferry）内阁被迫下台。著名的激进派报纸评论道：“为了印度支那的几座没有价值的矿山，茹费里忽视了德国这个主要敌人，我们的安全、尊严和希望全部受到损害。”

1885年9月，保加利亚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突然驱逐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长官，宣布东鲁米利亚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这件事提醒了各列强，欧洲事务才是最重要的。此时，保加利亚的民族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俄国的控制，因此俄国深感不安。1886年秋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向保加利亚大公发出威胁，要求他接受一个亲俄的人作为大公继承人。俄国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一部分亲俄军官发动政变，强迫大公退位。这件事导致奥地利强烈不满。1886年底和1887年初，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已经到了全面开战的边缘。经过俾斯麦调解，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俾斯麦担心奥俄两国发生冲突，那样德国会被夹在中间，无法做出选择，而且他不愿意自己的新盟友——哈布斯堡王朝——受辱。最后，俾斯麦说服俄国人做出让步。保加利亚议会选举表面上中立的斐迪南一世担任新大公，他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家族。俾斯麦一直认为，德国的安全离不开其他地区的稳定；远离中欧的地方如果发生动荡，也会影响德国的安全。他再一次实践了这一原则。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保加利亚危机的余震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保加利亚人自己获得了解放，不再是沙皇的傀儡。英国人第一次看到，巴尔干并非仅仅是俄国的傀儡，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可能成为制约圣彼得堡的力量。这使得英国尝试容忍土耳其的专制统治，尽量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土耳其的暴行视而不见。英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土耳其作为一个屏障，阻止俄国的扩张。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也及时提醒了奥地利，俄国的扩张会不断带来危险。而俄国的民众对俾斯麦宣称的“公正”并不买账。泛斯拉夫主义者大声感叹：俾斯麦

宣称自己很“公正”，但实际上是在破坏俄国的利益，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已经全面减小，黑海海峡的出海口又被堵塞了，使得俄国难以实现其“历史使命”。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俄国人越来越恐惧德国，这种气氛充斥于媒体之中，也充斥于沙皇身边的圈子。在法国，民众也对德国非常反感。1886～1889年，乔治·布朗热将军（General Georges Boulanger）在政坛上很有影响力，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在担任战争部长期间，他承诺将弥合国内的分歧，做好与俾斯麦决战的准备。

在德国，保加利亚危机导致民众和国会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进行尖锐的批评。1886年8月，比较有影响力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发表社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反对俄国，并将俄国称作意识形态威胁和战略威胁。还有很多人认为，俾斯麦不能有效应对来自法国的威胁，不能遏制法国力量的壮大。国家自由党是当时的重要政党，其党魁鲁道夫·冯·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呼吁德国与法国再发起一次战争，不仅要保证阿尔萨斯–洛林的安全，更要“保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永久安全”。军队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先发制人向法国发起进攻。不过，俾斯麦没有采取过激行动。经过与沙皇的谈判，1887年6月中旬，两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原则上同意让俄国获得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不过，这个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秘密条约。俾斯麦和沙皇都知道，两国的民众并不同意签订这样一个条约。1888年2月，《德奥同盟》的具体内容被公布，德国民众对其内容困惑不解，产生了争论，因为德国对俄国的承诺与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承诺是彼此矛盾的。4个月后，事情发展到了顶点，俄奥两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差一点儿引发战争，危机一直持续到1889年。德国的驻外使馆、报纸以及议会，纷纷要求俾斯麦“澄清”其真实外交意图。俾斯麦曾经试图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但现在已经难以为继。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888年，年轻的威廉二世继承帝位。他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德国现在不得不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由于意识形态、国内和军事上的原因，德国应该选择支持维也纳。1889年，德皇迫使俾斯麦宣布《再保险条约》不再续期，这个举动说明俄德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同年，威廉二世第一次访问奥斯曼帝国，这遭到了俄国的抨击。这次访问，标志着德国在《再保险条约》中对黑海海峡问题的承诺现在已完全无效。1890年3月，俾斯麦辞职。一年后，俄国开始与法国合作，共同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两国海军之间还进行各种交流，各领域的互动增强。最终，1893年两国建立了全面的防御联盟，1894年1月正式签订军事协定。尽管两国在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上存在很多分歧，但两国有共同的安全关切，因此它们可以走到一起。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引起了英国的警惕。对此，1889年，英国皇家海军宣布“双强标准”，规定“英国的海军实力应该保持在世界第一位，并且是第二、第三海军强国的实力之和”。法俄同盟像晴天霹雳一样，深深地打击了德国。从1871年以来，俾斯麦所最担心的事情——法国和俄国组成军事包围圈来对付德国——最终还是发生了。

面对新的威胁，德国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891～1892年，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制订了“施利芬计划”的初稿。该计划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必须迅速击败法国，以免遭到法俄联军的同时进攻，腹背受敌。除了军事手段以外，德国只能依赖与奥匈帝国的联盟。新宰相莱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承认，他的才能不及俾斯麦，他不能像俾斯麦那样同时“玩五个玻璃球”，只能“同时在空中保持两个玻璃球”。不过，卡普里维之所以要拉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才能，也不是因为他别无选择。确切地说，对于如何保障德国的安全，他和俾斯麦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有自己的“新思维”。俾斯麦是通过维持一个复杂的联盟体系来保证德国的安全，就好像是同时玩弄几个“玻璃球”。新首相认为，这种策略迟早会失效。他试图在中欧建立一个强大的、拥有1.3亿人口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贸易联盟。他设想，这个联盟在经济上能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帝国相抗衡，在军事和领土上能与沙皇俄国相抗衡。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上，德国受困于“中间地带”，而卡普里维则提出了一种空间上的新思维。卡普里维担心，如果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来养活自己，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被迫移民出境，导致人口减少——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威胁。他警告说：“我们国家资源有限，因此一定会导致人力、物力的流失。”德国的对外移民使美国获得了很多好处，同时德国的两个潜在对手——英国和加拿大——也获得了好处。此外，19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执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鉴于这些情况，卡普里维开始奉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1891年德国与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缔结条约；1893～1894年间，他又计划与西班牙、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国签订一系列协议。上述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追求全球性的商业主导地位，而是要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安全。

法俄和解对各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面临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加，德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改革来提高防御能力。德皇推动教育改革，他曾宣称：“我正在寻找优秀的战士，培养强有力的人，他们将是未来的知识界领袖，也是服务于祖国的人。”德国需要解决国内的各种矛盾，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等各种反对派，可能会导致国内局势的紧张。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德国的军费预算增加了一倍，这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政府必须尽可能多地得到各党派、团体的支持。例如，1891年，政府不得不向天主教中央党做出让步，在教育问题上妥协，目的是让陆军法案能够通过。然而，这遭到了新教的反对，使得德皇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卡普里维宣布辞职，他希望这样做能换取国内的团结，以保证国家的安全。然而一年之后，陆军法案还是被议会否决了，德皇不得不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1895年3月，另一场政治危机爆发了。普鲁士陆军大臣和帝国外交国务秘书再次指出，政府应该向天主教中央党做出让步，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保证陆军法案通过，然而又一次遭遇阻力。当年，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之中，政府曾经反对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而现在，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政府不得不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德国社会和政界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反，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非常高兴，他们认为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基本符合自己的意愿。同时，他们也把俄国看作假想敌，支持政府制定针对俄国的战略——这是德国政策制定的基础。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无论是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还是信仰国际主义的工人阶级，都比精英阶层更加敌视沙皇。一些民众创建了各种军事协会和联合会，体现了反俄思想。1894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成立了泛德联盟（Pan-German League）。当时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总结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在政府压制之下的愤怒之情。1895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座。他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德国已经统一，但他已经步入老年，这只不过是一次返老还童的恶作剧。若德国参与争夺全球权力，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应该避免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

俄法两国组成了反对德国的联盟，这也影响到了两国各自的内政。1892年，在圣彼得堡，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相信，俄国要想恢复其国际地位，就必须进行经济和社会转型。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他拒绝与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避免俄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1894年，俄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用以防范德国。1893年，俄国对西部边境地区安全的忧虑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俄国人的反犹主义情绪，其中以基希纳乌（Kishinev）最为明显。不过，这并没有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反犹浪潮。然而，在法国，国内各族群之间的共识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法俄关系的改善，导致法国人与国内小型犹太社区之间的关系恶化。1886年，反犹主义作家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德吕蒙要求法国政府对付和压制犹太人，称犹太人是德国派往法国的奸细。他宣称，法国要想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就要先净化国内环境，清除犹太人。很快，他的想法不仅得到了右派的广泛认可，而且得到了很多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1894年秋天和冬天，事件达到了顶点，有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上尉，被指控在一封信中向德国出卖了有关新式武器的最高秘密。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并且是一个犹太人，因此他本人被认为是德国的间谍。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为他犯有间谍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并且流放到一个岛上。然而，后来人们发现，真正的间谍并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1898年1月，作家埃米勒·左拉（Emile Zola）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拆》（J'accuse），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要求为他平反。左拉认为，保守派中的阴谋者对德雷福斯栽赃陷害，并且破坏司法公正。

面对整个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发展，犹太人开始反击。在地方，他们组建了自卫团体或政党，例如俄国和波兰两国的犹太人在1897年成立了总工会。犹太教徒还试图通过施加金融和外交压力，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罗斯柴尔德家族、俾斯麦的心腹格尔森·布莱施罗德（Gerson Bleichroeder）以及其他犹太银行家拒绝为俄国提供贷款，以此抗议1881年屠杀犹太人事件、1886年基辅驱逐犹太人事件、

1891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驱逐犹太人事件，以及俄国的其他歧视性政策。然而，还有一些犹太人则开始选择更激进的手段，来反抗愈演愈烈的国际反犹主义。1896年，奥地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出版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他提出，犹太人应该建立一个自治国家。在这场新的运动中，必须有意识地使犹太人获得各种锻炼，发展智力、强健体魄，把胆小的“咖啡馆犹太人”变成麦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所说的“肌肉犹太人”。这本书标志着国际犹太运动取得了新突破。然而，犹太人越是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就越会有更多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犹太人正在制造一场国际阴谋。1903年，在沙皇秘密警察的怂恿下，有人在俄国出版了一本反犹太主义的书，名为《锡安长老会纪要》，描述了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者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因此，犹太人面临着“安全两难”。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又称“锡安主义”，1897年该组织在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个世俗组织，其特征与取向有非常鲜明的德国气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赫茨尔是俾斯麦的狂热崇拜者，德语被确定为工作语言，柏林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执行机构的所在地。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想实现复国不能仅仅依靠自己，而是应该借助某一个大国的力量。赫茨尔希望，这个大国是德意志帝国——他认为在19世纪末，德国是欧洲最进步的国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的性格，只能在这个伟大的、强大的、道德的德国的保护下，才能变得更为健康，因为德国有高效的管理模式和严格的组织制度。犹太复国主义使得犹太人更加热爱德国，不论如何，这里是我们的灵魂归宿。”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摩西·卡尔瓦里（Moses Calvary）写道：“幸亏有德国，我们才能再次成为犹太人。”他总结道：“德国养育了我们，赋予我们生命力，这就是鲜活的证据：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送给犹太教的礼物。”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各大国将关注点转向国际舞台，他们设法获得或者保卫在全世界的威望和资源，以维持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欧洲列强迫使病入膏肓的清朝政府做出让步，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非洲，马赫迪大起义被镇压之后，苏丹及其周围国家软弱不堪，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这里就成了列强争夺的主战场。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和法国的远征军从各个方向入侵该地区。1896年，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希望迅速扩张领土。非洲南部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因为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从葡萄牙手里夺取了一块殖民地，并将其改名为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列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之后，在阿杜瓦（Adowa）战役中遭到惨败，被迫放弃入侵计划。1895~1896年，罗得斯一手制造了“詹姆逊袭击事件”，企图推翻布尔人对非洲南部的控制权，但最后彻底失败。更重要的是，在远东地区，欧洲国家的野心与日本的野心发生了冲突。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但很快欧洲国家向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日本被迫让步。显然，远东各国的命运并不是由远东的国家自己决定，而是由欧洲列强决定，亚洲国家希

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世界的另一头，美国也在摩拳擦掌。此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已经基本完成，领土已经基本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因此美国开始重新将注意力转向国外。19世纪90年代初，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出版，让美国重新认识了全球海军力量平衡的重要性。此时，近在咫尺的古巴，再次进入美国的视野。1895年，古巴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全面起义。很快，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导致10万人死于饥荒、疾病和战争，同时西班牙将很多古巴居民抓进了集中营，进行残酷迫害。美国民众对此深感震惊。1895年12月，美国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求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决议，以支持古巴恢复自由。国会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古巴独立。但此时，民主党的总统史蒂芬·克利夫兰（Stephen Cleveland）却犹豫不决。

古巴问题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人道主义意义，更具有战略意义。很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应该保卫其他国家的“自由”，这对于防止“专制”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合众国的南翼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外部国家可能会趁机介入，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也就是说，美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其他国家，或者至少想要保护其侧翼的安全。然而，美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的海军实力不仅远弱于英国，而且难以与西班牙匹敌，甚至连智利都不如。美国的陆军也并不强大，仅能够对付印第安人的部落。没有疑问，美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巨人，到1890年其制造业产出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军事方面仍然是一个侏儒。所有这些都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影响。只有当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成功地实现融合，并放弃他们对自己原来的国家的忠诚之后，美国才有可能在海外实现其壮举。更广泛地说，要想使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建设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教育、完善的基础设施，并且政府应该增加税收，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能挖掘自己的全部潜力，实现其全球使命。在189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赢得了选举，他提出对内要进行改革，对外要进行海军扩张，并推行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试图冲出法国和俄国的包围圈。德国战略的关键，是拉拢英国。当时英国是欧洲唯一的尚未结盟的大国，如果德国能够确保与英国结盟，那么它就是五强中的三强之一，这样可以大大减小法国在其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不过，此时英国依然在经营其海外殖民地，试图尽量避免卷入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纷争。当英国取消与德国的贸易条约时，威廉二世愤恨地说道：“假如当初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有威望的舰队，英国就不会废止条约。”德皇开始相信，只有当德国也拥有海军，并建立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的时候，英国才会真正将德国当作其合作伙伴。此外，德国的战略家，以及很多民众开始认同“世界帝国学派”，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理念。他们认为，任何国家一旦成为一个

全球帝国，就会拥有巨大的地缘经济实力，足以粉碎弱小的中欧国家集团。著名学者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警告说：“现在全世界有三个巨大的帝国，他们有领土野心，并且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扩大贸易和出口额。这些国家不断地进行征服和扩张，将会压制甚至摧毁其他所有的小国。大国在经济上封锁小国，让小国无法生存，最终扼杀小国。”因此，1896年1月中旬，威廉二世宣称：“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帝国。”一年后，他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主持新的海军扩建计划。1898年，第一部海军法案出台。

德国大战略从欧洲转向“全球”，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很多德国人认为，欧洲以外已经出现了新的权力中心，这使得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受到了影响。威廉二世担心，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会阻止他的全球计划。1895年，他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准备建立一个由德、法、俄组成的“大陆联盟”，以遏制英、美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1896年9月，威廉二世在布雷斯劳（Breslau）与沙皇会晤，他提出建议，整个欧洲大陆应该团结起来，与日益强大的美国相抗衡。同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布尔人）粉碎了英国人制造的詹姆森袭击事件，威廉二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给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送贺电。此后，德国开始对非洲南部有更浓厚的兴趣。1897年11月，德国占领了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一年后，德皇第二次高调公开访问奥斯曼帝国，并在巴勒斯坦停留。不久，德国一家公司受命承建通往巴格达及波斯湾的铁路，这就是“柏林——巴格达”铁路。不过，德国在全球搞的这些行动，其真正意图是要让英国感到恐慌，进而不得不与德国结盟，共同反对法国和俄国。从本质上讲，德国的“世界政策”并非是要谋求对世界的主导权，而是更好地与欧洲其他国家争夺霸权。

法俄和解已经使英国警惕，而德国的这些举动使得英国更加惊恐。沙俄对中亚和远东的入侵、法国对苏丹的渗透、布尔人对南非的统治，以及美国在美洲的扩张，都已经给大英帝国造成了威胁。而威廉二世发出的“克鲁格电报”（Kruger Telegram）也激怒了英国官方和民间舆论。一名英国外交官认为，这份电报表明“德国政府决心在非洲东南部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公布了其海军计划，导致英德关系进一步紧张。在1898年8月的英德秘密协定中，柏林同意不再支持布尔人，来换取占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但后来德国又破坏了该协定。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的“厌德症”越来越明显。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中，辉煌之下隐藏着英国人深深的不安。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著名的诗歌中将这种不安描绘得淋漓尽致。

我们声名远扬的海军消失了；

战火沉没在沙丘和海岬：

看，我们昨日的所有绚丽

都已经成为历史！

请各国分给我们一点儿辉煌吧，

免得我们忘记——免得我们忘记！

英国人已经坚持了近10年的“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必须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两个国家海军力量之和——如今已不再适用。英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它或者在新的世界中寻找盟友，或者从早已疏远的传统欧洲国家中寻找。

1898~1903年，一系列危机爆发，全球局势骤然紧张，导致国际体系发生巨大转变。古巴最先爆发危机，西班牙对古巴的镇压使得那里的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对古巴局势进行干预。美国政府担心古巴落入其他强国手中，因此最终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告诉批评者：“不能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别的国家，属于别的国家，而与我们无关。”相反，他认为：“古巴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1898年4月底，美国总统决定先发制人，根据国会通过的决议，他对西班牙宣战，并单方面承认古巴独立。6个月后，麦金莱指出，这是一场“人道主义战争”，是“把握机遇、扩展自由边界”的有利时机。西班牙的陆军和海军很快被打败。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处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共和党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警告说：“现在门罗主义无法适用于海地和圣多明各，因此我们无法防止其他国家介入这两个地区的事务。一旦我们对古巴置之不理，那么古巴也会成为这样的地区。”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在中非争夺统治权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也达到了顶点。由于意大利在阿杜瓦战役中的惨败、埃及帝国的崩溃以及苏丹马赫迪起义的失败，英法两国开始迅速填补那里的权力真空。1898年初，法国探险家、军官让–巴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到达法绍达（Fashoda）；两周后，他遇到了在恩图曼（Omdurman）击溃马赫迪军队的英国将军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两支军队险些发生冲突。自从马赫迪占领喀土穆之后，英法两国就“谁将接管埃及”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似乎要点燃欧洲的全面战火。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发动战争扩大其殖民地以制衡德国；或者通过减少殖民据点缓和与英国的关系，进而制衡德国。二者的目标是一样的。最后，法国决定对英国让步，它以最高市价卖掉了它在中非的殖民地。法国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部分殖民地，也是为了缓和与英国的关系。这样，英法两国有可能达成协约，这是法国在欧洲的安全基础。

英国的注意力现在转移到了非洲南部，自从“詹姆森袭击”的阴谋失败之后，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英国并非看重南非的矿产财富，以及传说中的黄金和钻石。英国真正看重的是，南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因为它是德班

（Durban）海军基地的重要腹地，保卫着英国直达印度的航线。英国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列强之手，尤其是德国，后者本来就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坦桑尼亚（位于南非东北方向）和纳米比亚（位于南非西北方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鲁格清楚，这里很有可能会被英国吞并，因此他决定先下手。1899年10月，他对开普省发起了闪电式的袭击，第二次英布战争爆发。英国处于劣势，调动了殖民地的力量才勉强进行反击。此后，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是否会支持布尔人，对南非进行干预，并趁机削弱大英帝国，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和西班牙所做的那样。在欧洲很多国家，支持布尔人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法国、德国和爱尔兰。1900年，巴黎和圣彼得堡出台了一项联合军事计划，根据该计划，法国打算突袭英国，而俄国打算入侵阿富汗，削弱英国在那里的势力。甚至还有人谈到，应该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瓜分——西班牙占领直布罗陀，法国在非洲获取利益，而俄国在中亚扩展地盘。然而，就像萨拉托加战役一样，战局总是变化不定的。1902年5月，英国打败了布尔人。

非洲的形势对于欧洲和全球的平衡非常重要，然而与列强在远东的争夺相比，非洲其实算不了什么。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认为："世界的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谁了解了那个帝国……谁就握有开启未来5个世纪世界政治大门的钥匙。"中华帝国软弱无能，已经形成权力真空，列强纷纷来到中国，寻找资源、声望和市场，防止这些东西被对手抢走。俄国在中国的北方扩展势力，于1898年3月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此举触怒了日本人，因为三年前日本迫于国际压力将辽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纷纷向清朝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看到中华帝国受到各国列强的侵略，决定揭竿而起，反抗外国势力。西方国家联合干涉，镇压了"义和团起义"。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势力要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中国，而是因为西方国家之间彼此矛盾重重，每一个国家都担心其竞争对手可能会谋求单方面优势。由于列强在中国彼此牵制，因此它们没有能够完全瓜分中国，这与之前很多人的预期并不一样。

在世纪之交，全球性的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一直奉行孤立外交政策，但在英布战争期间，没有国家支持英国，导致英国国内对大战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dsdowne）认为，"英国不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的策略已经过时，这是"落伍的套路"和"老式迷信"。他在1902年写道："初步看来，只要不会引起其他国家与我们的敌对，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盟友，这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但问题是，英国应该与哪些国家结盟？应该与哪些国家为敌？此时，英国已经逐渐忘记了与法国的恩怨，但在北非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俄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这是20世纪英国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目的就是针对俄国。然而，英国的最大忧虑还是德国。德国不加掩饰地支持布尔人，并且确立了巨大的海军野心，它已经成为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直接挑战。1903年1月，即将成为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表示，柏林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和威胁”。当年4月下旬，格雷在一次发言中总结了这一普遍感受，他说：“有人认为，德国的殖民野心、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已经使之成为英国的重要对手和敌人。”总之，到1903年底，德国已经取代俄国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顾虑。

德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威胁，这对英国的海洋战略和帝国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英国曾以为它的全球地位依赖于其庞大的殖民地。1901年1月，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表示：“只要我们统治了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我们就会立刻降为三流国家。”但现在英国需要的不再是殖民地，而是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便能够介入欧洲大陆的局势。1901年的军队改革法案是英国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随后，1902年英国成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虽然名叫“帝国防务”，但它主要关注的是欧洲的军事形势。同年，英国又建立了“本土舰队”，应对德国海军的挑战。很快，英国海军部非常重视本土舰队，并给予其大量资源。英国派往全世界的殖民者已经意识到：如果英国打算在全球舞台上做得更少，那么英国的各殖民地将不得不做得更多。德国在太平洋扩展势力，以及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特别是这一点，都使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者感到忧虑。1889年，澳大利亚6个殖民地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谈判，以组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此时，前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府总理、澳大利亚“联邦之父”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决定加速这一谈判。1900年，6块殖民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居民进行投票，决定成立联邦。这说明，当时分离民族主义的势头并没有上升，而是正相反。殖民地的人民决心保持与英国的联系，以便最终从英国获得保护。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平等地分担大英帝国的防卫责任。英国依然是世界的警长，澳大利亚即将成为英国管理南太平洋的助手。

英布战争，以及德国对英国威胁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英国的社会问题。如果军队仅仅是由“农民加步枪”组成，英国怎么可能与配备现代化武器的欧洲对手相抗衡？也有人严重怀疑英国的人口素质是否适合长期作战——许多城市新兵的身体素质很差，说明这个民族的血统已经“退化”。这些情绪引发了“国家效能”运动，旨在使英国变成生产力更强、更理性、更强大的国家。1902年2月，全民兵役制联盟成立，要求国家实行征兵制，从而“将国防负担平均分配给所有的阶级，而不是主要由无产阶级承担”。一年后，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及其领导的关税改革同盟，倡议实行“帝国特惠制”，以反对不公平的国外进口（即使这会导致竞争减少，以及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他的目的是让殖民地更紧密地与英国联系在一起，将大英帝国转变为能与德国和美国平等竞争的强大贸易集团。“帝国特惠制”的观点认为，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钱，为必要的社会改革提供资金，以团结人民迎接即将到来的巨大挑战。关税改革很快导致保守党内部出现两种观点：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

德国的全球野心也使得美国非常忧虑。美西战争期间，一支庞大的

德国海军中队曾出现在马尼拉湾（Manila Bay），德国在太平洋的野心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从1901年开始，德国军舰还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上巡航。一年后，德国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向委内瑞拉索债，封锁并炮击委内瑞拉港口，在美国的干预下德国被迫退出。美国要求德国承诺不进行领土扩张，但德国拒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警告德国外交官，他不反对其他国家“斥责”行为不端的南美洲国家，但他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南美洲获取“额外的领土”，而且他也反对美国自己这样做。1904年德国要求在圣多明各获得一个港口，华盛顿对此感到震惊。此时，罗斯福将德国看成“将来可能与我们发生冲突的唯一国家”，表示“美国极其渴望将德国赶出西半球”。1866~1871年中欧发生的地缘政治革命现在最终影响到了美国的海岸。

为应对安全上的挑战，罗斯福不仅采取了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措施，而且采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措施。他告诉国会：“如果我们政策错误，或者表现得软弱，就会导致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各个文明国家之间越来越疏远。最终，这需要文明国家联合进行干预。”他坚持认为，干预的目标是“促进当地人的发展，使他们能逐渐参与自己的政府”。他还认为，美国价值观的推进——如果可能，就用“柔声的宣传”；如果有必要，则挥舞“大棒”——是国际的长远和平和稳定的最佳保证，因而也是美国安全的最佳保证。例如，1903年俄国基希纳乌屠杀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向圣彼得堡提出抗议。英美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互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具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基础，即反对俄国，尤其是反对德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即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和德皇的绝对主义。可以肯定，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红种人、黄种人和棕种人非常鄙视，他们也害怕斯拉夫人，不过目前他们最恐惧的是条顿人（即德国人）。1898年，美国国务卿海伊表示：“整个德国充满着贪欲和对我们的仇恨。”几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告诉英国外交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美国人会把英国视为敌人，而德国则是美国海军的宿敌。”

罗斯福认为，要想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用积极向上的精神，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他意识到，“目前美国公民的目无法纪、腐败的泛滥，以及暴力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在国外颜面扫地”。此外，尽管罗斯福赞美大多数美国人所拥有的创业精神，但他担心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不仅会导致民众成为“大公司”的奴隶，而且会“破坏工人阶级的活力”。出于这个原因，总统支持工会，“以更好地保护工人的个人权利”。他还发起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并且坚定地推行“反托拉斯运动”，因为他相信，合众国政府完全可以自行“与大公司打交道”。罗斯福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众移民到美国，只要“合适的”外国人均可以成为美国人。他不是以“出生地或信仰”来界定谁为“合适的”，而是根据外国人是否具有“良好的美国精神”，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灵、道德责任感、崇高的抱负以及健全的常识”，来界定谁为“合适的”。他这样做，不仅因为他认为“只有质量高的人才能成为美国人”，而且因为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向国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1900年左右，在全球动荡之际，德国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大国。但

它却并不满足。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旨在增加德意志帝国的资源、声望以及外交回旋余地，然而实际上却使其变得更加不安全。1900年6月，德国大张旗鼓地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故意高喊“德国人走在最前面”，这让俄国和日本大为恼火。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但困难重重：1898~1902年两国之间谈判失败，因为伦敦不愿意承诺在欧洲保卫德国，而柏林也拒绝在亚洲为英军提供支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的海军计划不仅难以威慑英国和美国，反而招致了它们的敌意。另一方面，美国打败西班牙、英国打败布尔人，使得德国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海军是不行的。因此，柏林决定继续大力发展海军，以免遭到英国的进攻。受到“哥本哈根恐惧症”的启发，德国外交大臣冯·比洛伯爵（Count von Bülow）警告说：“我们的海军现在占据劣势，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发展海军，如同飞蛾在化茧成蝶之前那样。”“哥本哈根恐惧症”这一术语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1807年英国摧毁了丹麦舰队，以防止其落入拿破仑手中。

1904年2月，日本在中国的旅顺港对沙俄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突袭，以阻止沙俄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这两个大国在中国东北和公海持续激战。令人惊讶的是，俄军很快处于劣势，被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击败。俄国得到的国际支持非常少，只有门的内哥罗以“泛斯拉夫团结”的名义对日本宣战；由于遭受俄国的长期迫害，犹太银行家拒绝为俄国提供资金，使得俄国难以坚持战争。1905年2月下旬，俄军在奉天（今沈阳）遭遇惨败；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中，全军覆没。俄国向日本求和，被迫撤出满洲，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旅顺港交给日本，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优先权（5年后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俄国侥幸免除了对日赔款，总算挽回了最后一点儿尊严。俄国的耻辱几乎是彻头彻尾的，俄国的失败对全球秩序及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俄国的失败是政治落后的结果。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政府，而沙俄帝国不是。因此，西方人将日本的胜利看作西方价值观的又一次胜利，这意味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政府。1904年7月，日俄战争进行到高潮时，西奥多·罗斯福写道，日本是“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民族，它应该拥有与其他文明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时，他对俄国不抱任何期望，除非“俄国人民能够走上自由、开明、自治的道路”。在俄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批评沙皇政权，他们的观点与罗斯福相似。俄国不断向东扩张，民众对此不满；更重要的是，东扩政策导致俄国忽视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天然”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俄国国内，民众对政府更加不满。1904年7月，内政大臣普勒维（Plehwe）被暗杀。1904年11月，民众组织了各种“宴会”，组织者有意识地模仿1848年的巴黎革命，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专制制度。1905年1月，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2月，沙皇最终同意建立一个国家咨询机构——国家杜马。国家杜马只是名义上的议会，并无实权。它通过有限制的、非直接的方式选举产生，无法满足民众对自由权利的诉求，不过这是政治改革的开始。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敕令，称将保证公民享有自由权，包括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国家杜马有权批准法律。与此同时，俄国试图实行征兵制，以建立一支更加可靠和有效的军队。这是一种有限的政治现代化改革，其目的是发掘俄国社会的潜力，实施一项宏大的工程——重建俄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俄国的战略利益。

日俄战争使得俄国的全球政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时英国和法国开始警惕国力不断上升的德国。英德海军竞赛不断升级，这并非对抗的根本原因，而是对抗的表现。在伦敦看来，威廉二世试图打破欧洲的均势。英国并不考虑德国在短期内可以建造多少艘军舰。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战略原则是：必须保持欧洲大陆均势，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资源，否则英国皇家海军将难以对其进行遏制。此外，有人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失败，会使它更加依赖德国，甚至两国可能会组成联盟。因此，1904年4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被称为“诚挚协约”（Entente Cordiale）。这并非是一个军事盟约，而是两国之间达成的谅解。具体而言，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做了交易——摩洛哥归法国，但法国放弃在埃及的殖民地。“诚挚协约”并未涉及两军的任何官方合作。与法俄同盟不同，英法之间没有规定具体的针对德国的作战计划。法国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它起初并不坚持要求英国对法国做出军事承诺，而是试图增加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道德责任感，从而将两国更深地联结在一起。英国希望能得到法国的帮助，以便一同对付俄国，这是英国的主要目的。不过，整体上看，信号是明确的：尽管英国和法国并没有承诺将一同遏制德国，但它们建立了新的友谊，这会对欧洲的均势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有利于约束德国。

英法关系开始接近，这个消息使德国感到惊讶。俾斯麦一直担心其他敌对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现在这个噩梦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写道，现在这种情况让他想起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之前所面临的困境。媒体又一次渲染，称德国已经被“四面包围”，这种描述让人联想起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大众地缘政治学。德皇担心德国被法俄两国同时夹攻，因此德国领导层开始寻找办法，以避免导致可怕的结果。1905年，德国总参谋部出台了施利芬计划的最终版本，旨在使德国有效应对敌国的包围。施利芬警告：“如果德国失败了，那么大门将被打开，吊桥将被放下，百万军队将穿越孚日山脉（Vosges）、默兹河、涅曼河、布格河（Bug），甚至越过伊松佐河（Isonzo）和阿尔卑斯山，然后进入中欧，最终他们将会摧毁我们的国家。”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德国不应坐以待毙，而是应该主动出击。但是，德国外交大臣比洛伯爵并没有接受这些要求，他采取了与俾斯麦相似的政策。在这个包围圈中，法国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德国决定向法国施加压力，以打破敌国对自己的包围。1905~1906年摩洛哥危机爆发，德国反对法国干涉摩洛哥内政，宣称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威廉二世要求就北非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准备在会议上分化敌国、孤立法国。德国的目的是打破包围圈，以使得自己获得更多的安全。

起初，德国的计划很顺利。1905年3月，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Tangier），他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保卫摩洛哥的领土完

整，防止法国逐渐将摩洛哥变成其保护国。此时，法国得不到俄国的有效支持，也无法依靠英国，因此1905年6月法国公开做出让步，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被迫辞职。7月下旬，德皇通过与沙皇在比约克岛（Björkö）缔结防御同盟，以扩大自己的优势，集中精力应对法国。但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很快重新转向法国；此外，沙皇受到了各大臣的压力，不得不拒绝与德国结盟。在这个时候，英国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906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次批准英法两军参谋部之间的会谈。同时，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也升级了——英国海军正在集中精力建造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战列舰——“无畏舰”（Dreadnought）。英国很多政治家对德国的工业能力有很深的了解。例如，前首相阿瑟·贝尔福警告说，英国在船坞、工厂、舰炮和装甲方面将被德国超越，“如果德国认为战舰很重要，那么他们的建造速度将比我们更快”。1906年1月，根据德皇的要求，关于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但此时德国已完全被孤立。会议承认摩洛哥独立，但规定法国依然掌管摩洛哥的内政及警察事务，因此事实上法国是胜利者。德国一直想突破包围圈，但结果是自己被束缚得更紧。

1907年1月，英国外交部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在其著名的《英国与法德关系现状备忘录》中总结了英国对德国的新看法。他认为：“尽管英国被深海包围，但它并不安全；事实上，按字面意思理解，凡是沿海的国家，都是英国的邻居，它们都有可能入侵英国。”这意味着，英国的最高利益并不是“自由交往和贸易”，而是确保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会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英国会迅速丧失其海军优势）。反过来，这意味着，英国必须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并维持欧洲国家的力量均势，这“几乎是一项自然法则”。克劳认为，这个法则已经受到了德国的威胁，德国在南非、中国挑衅英国的利益，同时不断扩充海军。他还指出：“德国试图建立一个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并在荷兰、北欧、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建立据点，蚕食其他国家；德国实现上述计划的基础，是对欧洲自由的破坏。”他进行了如下总结：德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霸权与海洋优势，这将威胁其邻国的独立，最终将危及英格兰的生存，因此英国必须制止德国的计划。

对于德国来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发生。俄国在远东的失败使得它不得不重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地区。而此时德国也在这里扩展势力，俄国人早已把德国看作实现其野心的主要障碍。威廉二世保护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利益，大力推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建设，并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保护伞，支持后者维护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又一次想到了英国人。尽管俄国与英国在波斯、中亚地区有尖锐的矛盾，但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对巴尔干和地中海东部的兴趣已明显下降。特别是，两国对君士坦丁堡这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小。因此，1907年8月下旬，两国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史称“英俄协约”。两国同意将波斯分成三个部分，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对于西藏和阿富汗问题，双方也划分了势力范围。与“英法协约”一样，英俄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以便更好地维护各自在欧洲的利益。一位德国

驻俄国外交官讽刺道：“英、法、俄三国越来越接近，这其实是对德国的恭维，尽管这让我们非常苦恼；这三个国家畏惧我们的陆军、海军、商业，以及我们的总体发展能力。”

1904～1907年发生了一场外交革命：日本在远东打败了俄国，同时英、法、俄形成了“三国协约”。这对欧洲国际关系以及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内部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很多人要求进行国内改革，以挽救这个垂死的帝国。1908年7月底，青年土耳其党的部分军官发动政变，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II）恢复1876年宪法，再次召开议会。一年后，哈米德二世被废黜，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控制了政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新政府试图重新整合社会，制定更加有效的对外政策。此时，新政府的最大愿望是恢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控制（该地区自1878年以来一直被奥匈帝国占领，虽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以土耳其革命为契机，开始有所行动。保加利亚趁机宣布完全独立，塞尔维亚宣称要控制波斯尼亚，导致奥匈帝国突然失去了对其南部势力范围的控制权。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埃伦塔尔男爵（Baron Aerenthal），单方面宣布将派军队进入上述两个地区，以填补那里的真空。对于奥匈帝国的行为，俄国只能生气，但无能为力，因为俄国认为自己已经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得了军舰出入黑海海峡的权利。在德国看来，这个问题是对“英俄协约”的一次检验。1908年10月初，以“灰衣主教”著称的德国外交要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指出：“奥地利是在为自己的私利而战，不过我们也应该加入这场战斗，我们要打破英国的霸权，打破敌国对我们的包围。”

1904～1910年，欧洲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领土兼并、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这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在德国，总体上看，民众对国际形势感到焦虑，同时不满意政府的外交与殖民政策。舆论对政府的批评呈现出多种形式，有人批评政府违反人道主义，有人认为政府战略失误，还有人认为政府违反宪法。例如，20世纪初，非洲西南部的赫雷罗族人（Herero）揭竿而起，反对德国的统治，德国对其进行了大屠杀。1906年11月，德国中央党指责军官冯·特罗塔（von Trotha）滥用暴力。1907年，政府在陆军预算问题上受到阻碍，1908年在海军预算问题上也受到了阻碍。总体来说，民众并不是反对军费本身，而是关心军费是如何花费的，以及用在了什么地方。此时，德国正变得越来越孤立，特别是在英俄协约签订之后，议会和媒体逐渐对政府失去了耐心。1908年12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感叹道，德国四周的“铁链”正在收紧。

俄国也是如此，国内政治的中心议题也是外交政策。新成立的国家杜马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其捍卫俄国的利益。温和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要求在外交政策上有发言权。他们认为，如果俄国不进行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就永远无法在欧洲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失利，使得议会成为攻击专制制度的论坛。俄国朝野多数人认为，俄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付德国。很多保守派对英法的

自由主义表示敌视，他们同情德皇，想回到三皇同盟甚至神圣同盟的时代。然而，主流舆论是强烈反对德国的。十月党人认为，“俄国与日耳曼民族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立宪民主党领袖鲍威尔·米留科夫（P. N. Miliukov）也坚持反对“日耳曼文明”。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晰，如果俄国的专制政体不能抵抗德国的扩张，不能保卫俄国的伟大地位，那么沙皇的统治就将被自由政体所取代。

此时，英国人正在讨论如何动员整个民族和帝国的力量来应对德国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仍然是英国国内政治的核心。关税改革遭到自由党以及很多保守党人的强力抵制，他们认为改革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还推高了基本食品的价格。1905年12月，阿瑟·贝尔福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他被迫辞职并解散议会。在1906年1月的大选中，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领导的自由党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关税改革被搁置。与保守党不同，自由党政府试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增强英国的国力。1907年，陆军大臣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出台预备役法案，规定对学校和大学的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种制度与征兵制和“军国主义”不同，但同样能够提高英国民众的道德意志和身体素质，做好与德国打仗的准备。与此同时，自由党政府试图推行社会福利改革方案，尤其是采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以使工人阶级融入国家生活，减少他们的不满。英国想在外交上推行强硬政策，同时在国内提高公平，二者在概念上是互补的，在财政上似乎是矛盾的。预算强硬派想知道政府到底想要什么：“是要无畏舰还是养老金”，是要枪炮还是黄油？

事情在1909年发展到了顶点，当时有一条重要情报被公开，称德国正在全力发展海军；此外还有传言，称德国派间谍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收集情报，并监视英国的南部海岸，从而使得局势变得更糟。当年10月，英国政府成立秘密情报局（后来发展成为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以专门对付德国的渗透活动。海军预算是一个更有争议性的问题。1909年7月下旬，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莱姆豪斯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称英国需要更多的无畏舰；他对地主精英进行批评，认为他们拒绝支持新的税收政策，导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费用来支付军舰的建造。换句话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再符合国家利益。劳合·乔治的观点与欧洲大陆的改革者很相似，他认为，“土地所有权不仅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职责，在过去一直是如此。地主阶级应该为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做出贡献，协助修缮破损的村庄，并且照顾穷困的村民，这都是土地所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政府就应该考虑出台新的土地政策”。1909年11月底，劳合·乔治提出的“人民预算”在下议院通过，但在保守党人较多的上议院没有通过。1910年，英国进行大选。这次大选的主要议题包括：是否应该限制上议院的权力，是否应该改革财富分配政策，谁应该为国防与安全埋单，应该如何重塑英国社会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在这次大选中，自由党和保守党势均力敌，自由党稍稍领先，最终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成了联合政府。大选后，上议院的否决权受到限制，劳合·乔治得以进行社会福利改革，海军也有了极大发展。

国际事件也促使妇女地位发生变化。在中西欧，爱国主义成为一些妇女表达政治参与的诉求的手段。当然，女性更积极地表达爱国主义政治诉求，以及更广泛地参与慈善活动，并非是追求“进步”或女权主义的表现。很多时候，女性做出了更多的自我牺牲，巩固了原本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不过，越来越多的女性利用自己对国家事业的贡献来争取更多的权利，甚至要求获得公民权。当时英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妇女首先提出上述要求，这并非偶然。英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始终处于大战之中，而且战事一直不顺利。1903年英布战争结束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创办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Union）；两年后，她的女儿克丽丝特贝尔（Christabel）在自由党曼彻斯特会议上表达诉求，要求赋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创办“争取妇女选举权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对于上述现象，各国的政府人士、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派都保持警惕。起初，政治人士对妇女权利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不少人认识到，女性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因此可以开发这个新的源泉。此外，人们一致认为，女性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国家的活力与人口的数量，而且关系着国家能否有充足的服兵役的年轻男性。这种情绪在英国尤为强烈，在布尔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担心生育质量的下滑。不过，人们关注的仅仅是母亲，而不是所有的女性。助产员的培训制度创立于1902年，8年后议会通过了相关的法案。1907年，首相劳合·乔治发起了“国家婴儿周”活动，其口号是“在英国，做婴儿比做军人更加危险”。但就当时而言，欧洲各国政府和男性们还不能拿定主意，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女性的权利。是应该仅仅让女性生活在家庭中，养育新的士兵，还是应该全面赋予女性以公民权，鼓励其走向社会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德国感到了地缘政治上的危机，从焦虑变为偏执。10月，德皇感叹道，德国遭遇的外交“围堵”正在“平静地、不可改变地、必然地”进行着。在欧洲五大国中，德国仅仅与一个国家结盟，而另外三个都是德国的敌人。不过，从军事意义上讲，这种状况是否会导致德国遭到包围，还不好说。如何制定战略，柏林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德皇和他的新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都认为，德国需要“打破”合围之势，所有人对此都表示支持，但对于如何实施该战略存在三种不同看法。1907年6月，外交大臣比洛等人指出：“只要我们与奥匈帝国维系在中欧的坚定联盟，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风浪。”但德皇等人并不满意于此，他们坚决主张扩大海军开支，相关法案于1907年11月正式提出，1908年由国会通过。贝特曼宰相则属于温和派，从1909年起他就主张缩减海军计划，收敛殖民野心，以便与伦敦和解。德国本想同时实施上述三种策略，即强化与奥匈帝国的联盟、加强海军力量、设法缓解与英国的关系，但效果不佳，没有任何一种策略使得德国变得更加安全。奥匈帝国国内分裂严重，即使意大利保持中立，德奥两国也无法抗衡三个协约国，而且事实上意大利很难保持中立。德皇扩大海军军费的计划刺激了英国，因此英

国于1909年2月开始执行其庞大的无畏舰计划。贝特曼对伦敦的示好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英国不打算帮助德国防范法国或俄国，并未制定具体的军事措施。

1911年5月，摩洛哥内部的骚乱不断升级，应摩洛哥苏丹的邀请，法国派出军队占领了非斯（Fez）。法国的举动打破了各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脆弱共识。因此，德国决定做最后一搏，它试图打破包围圈，并且认为法国是包围圈中最薄弱的环节。德国反对法国独吞好处，要求法国对它做出“补偿”。并且，7月初，德国装甲巡洋舰“豹号”（Panther）出现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Agadir）港口，直接威胁法国。这种行为让巴黎和伦敦变得更加紧密，劳合·乔治发表强有力的讲话，以支持法国。奥匈帝国仍持观望态度。11月初，德国不得不承认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但德国要求换取法属刚果的一小块土地以挽回面子。历史再次重演，德国本来试图打破束缚，但结果是自己被束缚得更紧。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在欧洲引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和国内动荡。1911年11月，意大利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利比亚和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即将完全崩溃，这引发了巴尔干地缘政治的变化，自1908年以来，这里一直勉强维持着平衡。俄国担心，土耳其海峡会遭到来自南边的威胁，它试图保护海峡，防止意大利的染指。奥匈帝国也觉得意大利正在逐渐威胁其侧翼，因此其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Count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要求先发制人，杀杀意大利的威风。欧洲各强国都看到了机会，准备一劳永逸地夺取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土地。1911年底，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开始谈判，搁置分歧，共同反对土耳其。巴尔干半岛正在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远东地区，日本最终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半岛，作为其西边的缓冲区。此举引发了中国的愤怒，也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尽管美国还不是非常焦虑，但它认为一场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战争正在迫近。清朝政府无力阻止自身被瓜分的命运，愤怒的中国人揭竿而起，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领袖孙中山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在世界的另一边，墨西哥人民开始反抗长期在位的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他是美国支持的傀儡。墨西哥内战爆发后，美国对这个南边的国家感到不安。

对于华盛顿来说，墨西哥革命与摩洛哥危机是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非常担心会有某一个欧洲强国填补墨西哥的权力真空。而很多墨西哥人的确希望能够与某一个欧洲国家联合，以制衡北边的美国。过去墨西哥曾经选择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结盟，而现在他们决定投入德国的怀抱。1911年，总统莱昂·德·拉·巴拉（León de la Barra）告诉德国大使：“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将着眼于依赖欧洲，尤其是德国。”因此华盛顿意识到，欧洲权力均衡一旦偏向德国，那么德国很快就会插手西半球的事务。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英国维护欧洲均势的努力表示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写道：“如果英格兰可以保持欧洲的权力均势，那自然很好；如果英国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就不得不插手，至少暂时是为了重建欧洲的均势。”因此说，美国并没有陷入孤立主义的无知，其外交官敏锐地意

识到了欧洲局势的变化，他们提醒道，德国有可能会先行对美国发动袭击。德国是位于大西洋另一边的新兴强国，它有着巨大的海洋野心，而墨西哥只是美国家门口的一个弱国，但如果二者联合起来，那么将会成为美国的巨大威胁。总之，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美国人担心“豹号”将会再次跳跃，横渡大西洋。

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层暂时放弃了“世界政策”，转而专注于家门口的安全。就像贝特曼1911年11月对国会所说的：“德国只有维持其在欧洲大陆上的强大实力，才能继续执行其强有力的全球政策。”相应地，海军至上主义者提出的“我们的未来在海洋”的口号则被抛弃。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是一位政论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德皇的政策。他对此评论道：“现在我们重新意识到，我们的未来在欧洲大陆。”如此一来，精英和民众更加意识到，德国处于被“包围”状态。1912年12月，总参谋长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认为，德国仍然“被敌人三面包围”，而且由于俄国的军备增加及铁路建设，德国与俄国的相对军事平衡也在逐渐被打破。面对这种困境，帝国领导层中的部分人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再次呼吁进行预防性战争，以防止敌方联军进一步威胁德国。但是，在1912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过他们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

协约国也更加团结、更加紧密。法国民众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就在边界的另一边，因此“民族觉醒”的思潮席卷法国。1911年8月，法国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制订了强行攻打德国的“17号计划”。长期以来被殖民扩张问题掩盖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迅速重新成为首要议题。1912年1月，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担任法国总理，他试图制服德国。对英国来说，它再次关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英国自己的安全。亨利·威尔逊爵士（Sir Henry Wilson）是一位高级军官，他具有强烈的反德思想，他公开主张英国承担欧洲大陆的军事义务，当然他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极大的鼓励。1912年6月，英法在海军问题上达成协议，法国在地中海保持主导地位，这样英国可以专注于北海地区，集中主要力量保护其近海地带。1913年4月，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说，欧洲是“暴风雨的发源地”。

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支配着各国的国内政治。在德国，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耻引发了民众和议会不断攻击政府外交政策的软弱。泛德意志主义者要求发动战争，国家自由党领袖贝瑟曼（Basserman）亦是如此。在1911年11月一次帝国议会上发生了混乱，宰相被人指责政策不当，导致德国跌出“大国行列”。中左翼当时代表着绝大多数德国人的观点，他们关注的是德国能否顶得住俄国的进攻，以及草率的殖民冒险是否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在俄国，国家杜马对沙皇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耐烦。主要的批评声音来自十月党人领袖——古契科夫（Guchkov）。古契科夫一直批评沙皇效率低下，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缺乏协调。他呼吁增强陆军力量，以捍卫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和中欧的利益；不过他反对增

强海军力量，因为那样做意味着重新承担对远东的义务。

欧洲大陆的各国政府现在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的军事能力。争论的核心是国防政策问题，以及国防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问题。1912年6月，俄国国家杜马批准大幅增加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费开支，主要用于对付德国。一个月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奥匈帝国政府20多年来第一次打破了马扎尔人的蓄意阻挠，通过了增加军队人数的决议。法国政府试图决定将兵役时间延长到三年，以此抗衡德国的优势。柏林方面试图制定陆军法案，以应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但立刻陷入了困境。军队中保守的贵族希望维持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们不愿让平民子弟获得晋升的机会，也不想让中产阶级担任军官。右派人士还有更广泛的焦虑，军队人数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国家将对这些人征收直接财产税。更糟糕的是，当时的帝国议会由社会民主党主导—1912年1月，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后成为第一大党。这意味着议会将减少征收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因为间接税对工人阶级来说负担较重。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自由派都不反对扩大军备。1913年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宣称："社会民主党始终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地理和政治情况决定我们要有强有力的国防。"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都把沙皇俄国看作意识形态上的死敌，在许多方面，二者甚至比德国统治者还要强硬。自由派中的左翼人士将旧的军官阶层看作腐朽势力，认为他们痴迷于形式主义，而不务正业。社会民主党希望改革旧有模式，要让战争变得更有效。年轻的自由派人士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认为："德意志帝国应该对外强大，对内实行自由政策——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1913年6月，帝国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增加直接税，以增加军队人数。德国议会制度的缓慢发展，与战争准备这两个过程正在同时进行。

然而，德国面临着一个致命困难。德意志帝国也许是"多次统一战争"的产物，但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德国是一个联邦，各州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着广泛的权力，同时可以自行制定财政政策。普鲁士议会代表着帝国人口中的2/3，它支持通过直接税，以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经费，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因此，尽管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由于有些州拒绝配合，国家的军备开支总额一直受到限制。相反，法国、俄国并不如德国富裕，但它们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其军备开支总额要超过德国（尤其是俄国，军费大大超过德国）。德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清楚地意识到，正是这个原因，德国在军备竞赛中反而远远比不上法、俄两个相对较穷的国家。上述矛盾使得德国更有可能走向战争，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军备开支太多，而恰恰是因为其军备开支太少。

沙皇政府也试图整合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俄国成为一个强国，但并不是很成功。的确，国家杜马一直坚定地支持俄国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至少在原则上支持扩大国防开支。但问题是，国家杜马是以财产权为基础选举产生的，因此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它强烈反对征收直接税，这意味着杜马无法为军费扩张提供有效的支持。俄国的税款中，只

有7%是直接税，而在英国直接税所占比例高达30%。此外，杜马中的一些议员认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即使不能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也应该努力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古契科夫看来，中产阶级关乎俄国的强国地位。1913年11月他表示：“我们必须调动那些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俄国才能更为强大。”不过，到1914年初，俄国政治已陷入僵局：民众希望政府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又不愿意让政府扩大军费支出；政府希望增税，以筹集军费，但又不愿意与杜马合作，不愿意启动政治改革。一场成功的战争可能会挽救沙皇政权，但战争一旦失败，就会摧毁沙皇的统治。

英国国内政治也陷入了僵局，但情况与俄国大不相同。1910年的选举之后，自由党政府一直依赖于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才勉强保住了下议院的多数席位。英国政府希望改善与爱尔兰人的关系，这不仅是出于政治机会主义，而且还因为在即将来临的欧洲冲突中爱尔兰人对英国政府采取了合作态度。爱尔兰议会党的领袖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强烈支持英国的对外扩张，他希望扩大爱尔兰的自治权，同时平等地参与到帝国事务之中。事实上，当时英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仍然由威斯敏斯特议会牢牢控制着。1912年，爱尔兰自治的第三个法案在英国下院获得通过，但遭到上院的否决，不过如果英王签署，两年后该法案仍然可以生效。这项措施引起了爱尔兰内部的矛盾，以新教徒为主的联合派（Irish Unionists）强烈反对该法案，1912年北爱尔兰（即厄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签订了《庄严盟约》（Uister Covenant），强调保卫英国的统一，在必要的时候要以武力反击爱尔兰的自治，1913年初他们成立了厄尔斯特志愿军。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做出回应，建立自己的准军事化部队，双方都从德国进口武器。在英国高级军官亨利·威尔逊爵士的怂恿下，英国派驻爱尔兰的官员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帮助爱尔兰的民间力量执行地方自治法案。到1914年初，英国处于内战的边缘，这对英国有明显的战略影响：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一直与英国的敌人相勾结，甚至有“保皇派”暗示说英王不值得他们效忠，而应该效忠于德国皇帝。

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大部分欧洲列强带来了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反对欧洲战争。他们希望将各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发动“总罢工”，以便瘫痪资本主义的战争机器。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挑战，因为这阻碍了他们的计划。虽然多数社会主义者将民族主义看成一种“虚假意识”而不屑一顾，但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它“进步”的潜力，特别是在阶级分化不是很成熟的地方。奥地利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是一位非常了解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个体和文化都应该保留其自主权，这是必要的；不过国家也非常重要，国家是一个建立在所有公民平等的基础上的统一组织。此外，当时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1913年）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决乃至脱离某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是只要一个民族仍然处于某个国家之中，它就不应该要求获得自治或其他特殊权利，否则会导致削弱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阶级和国家（民族）之间的张力一直存

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之中。

与此同时，摩洛哥和墨西哥危机的影响依然在大西洋两岸回荡。1912年10月，“巴尔干同盟”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土耳其被迫求和。1913年5月，各方签订《伦敦条约》，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退出欧洲，仅保留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区域。与此同时，墨西哥的民主改革者弗兰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于1913年2月被谋杀。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上台，但很快他成为军事独裁者，与美国分道扬镳，转而投靠德国。对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来说，这是一个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挑战。1913年11月下旬，他向其他列强发出照会：“韦尔塔的篡权将会威胁美洲的和平与发展，使得墨西哥有序的自治发展变得不再可能。”总之，华盛顿方面决心阻止它的南翼受到德国的威胁，坚决反对德国单方面派遣巡洋舰来保护它的侨民。美国对韦尔塔的军队实施武器禁运，英国也加入其中。只有德国拒绝执行禁运，并对墨西哥这位军事独裁者提供外交、道义甚至后勤方面的支持。

如何填补墨西哥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所产生的权力真空，这在1914年初成为棘手的问题。对于土耳其而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它失去了80%的欧洲领土和16%的人口（400万），约40万难民拥入安纳托利亚半岛。更糟的是，君士坦丁堡的西边已经没有多少领土，国都危险地暴露在他国的攻击之下，而且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带——安纳托利亚半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该地区大约1/5的人口是非穆斯林，如果在该地区实行与巴尔干地区相同的原则，那么该帝国很快就会荡然无存。过去，土耳其的安全依赖于欧洲列强，但现在这种机制已经被摧毁。英法两国正在集中精力，联合俄国一起围堵德国，早已放弃了对土耳其的保卫义务。欧洲列强利用国际规则，将奥斯曼帝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要求其必须屈从于巴尔干民族主义者的要求。1912年10月中旬，一位土耳其记者写道：“现在，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荣誉和人民的尊严无法通过陈旧的国际法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战争实现。”土耳其要想重回欧洲，就必须依靠一个新的、更可靠的大国盟友，这个盟友只可能是德国。

巴尔干战争也影响了塞尔维亚的战略定向。塞尔维亚不愿意遭到奥匈帝国的侵略，因此其安全机构与民间秘密组织——“黑手会”（Black Hand）联合起来，计划在俄国的支持下对抗奥匈帝国。沙俄支持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俄国将奥匈帝国及其后台德国视为主要战略障碍，它们阻碍了俄国实现其在土耳其海峡的“历史使命”。而且，由于德国不断在土耳其进行渗透，并且土耳其正在备战，俄国必须抢占先机，防止自己陷于被动局面。1913年底，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率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土耳其，负责训练和指挥土耳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队。俄国对此坚决反对，做出强硬表态。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要求出台一个“行动方案”以确保“土耳其海峡的历史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他还起草了通过突

袭来夺取海峡的详细计划。此外，他警告说："只有进行一场欧洲大战，我们的海峡行动才能得以进行。"他们需要制服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俄国军需总长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认为："到君士坦丁堡的最短和最安全的作战路线，就是穿越维也纳……和柏林。"柏林仍是俄国通往君士坦丁堡路上的障碍。

1914年的春末和夏季，大西洋两岸酝酿已久的危机突然爆发。当威尔逊总统听说墨西哥的韦尔塔政权准备在韦拉克鲁斯提取德国送来的军火时，他下令占领那个港口。4月下旬，美国占领该港口，这激起了墨西哥民族主义者对美国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威尔逊并不想永久性地占领墨西哥的任何土地，因为那样做会遭到美国国内反帝主义者和南方白人的坚决反对。不过，他也不能马上就撤军，那样做会导致德国填补墨西哥的权力真空，这是对韦尔塔专制政权的纵容。威尔逊认为，要想解决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两难，就要让墨西哥实现民主化。1914年5月，他在一篇报纸上撰文："他们说，韦尔塔等人宣称墨西哥人不适合自治，但我认为，只要正确引导，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适合自治。"短短几个月后，韦尔塔就被赶下台，立宪派领导人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担任总统。不久，美军撤出墨西哥。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武器其实都来自美国的军火商。他们之所以先把武器运送到汉堡，然后再运送到墨西哥，实际上是为了避开美国的禁运政策。不过，这一事件后，美国更加担心德国在自己的南边扩张势力。

1914年6月下旬，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被黑手会的成员刺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谋杀，塞尔维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事先都知道要发生这件事，而且很可能得到了俄国的支持。对于维也纳方面来说，这次谋杀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储被邻国的安全机构所支持的恐怖分子刺杀，因此它必须做出反击，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对它发起袭击。正如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ount Leopold Berchtold）所说，如果我们不反击，就相当于"我们放弃了大国地位"。奥匈帝国政府认为，必须严惩塞尔维亚，并且要防止它以后再次挑衅，因此对塞尔维亚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一位评论人士称，这份最后通牒是迄今为止一个主权国家讨伐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最为可怕的文件。毫无疑问，塞尔维亚的独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通牒反映了奥地利人这样的看法：过去发生的事件证明，如果塞尔维亚继续维持其主权，那么奥匈帝国的安全与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奥匈帝国必须惩罚塞尔维亚，同时它也在执行一项更广泛的计划。贝希托尔德决定，"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用军事的方式解决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无可挽回的关系"。简而言之，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将打破过去几年其他国家对奥匈帝国的包围。

德国决定最大限度地支持它的盟友。一旦奥匈帝国崩溃，那么德国就会完全被协约国包围，而且暂时安全的南翼也将会面临威胁。德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危机打破法俄两国对德国的包围。如果俄国没有支持

塞尔维亚，或者未能获得英法的支持，那么俄国就会遭受耻辱，而且这比波斯尼亚危机中协约国遭受的耻辱还要大得多。如果俄国援助塞尔维亚，那么德国就会认定战争在所难免，尽管局势不是很有利，但德国也不得不冒险参战。7月初，德皇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迅速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就连一向温和的宰相贝特曼此时也支持发动预防性战争。他当时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果断，那么未来就属于不断壮大的俄国，并将成为我们更可怕的梦魇。"摩洛哥的教训已经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必须联合奥匈帝国，二者必须并肩作战。此外，德国的公众舆论也支持战争，连首鼠两端的社会民主党也表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承诺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德国希望不扩大战争的范围，但对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它也知道这是难以控制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对抗在所难免，一场欧洲危机也即将爆发。俄国的行动最终使得冲突演变成了世界性的战火。圣彼得堡迈出了第一步，也是不可扭转的一步，这导致了列强之间的军事对抗。部分原因是，俄国无法再次遭受波斯尼亚危机那样的耻辱。萨宗诺夫警告说，如果沙皇向德国让步，就等于"辱没俄国人民的名声"，"俄国人不会原谅沙皇"。出于这个原因，俄国不得不支持塞尔维亚。不过，危机也给俄国带来了机遇，这是俄国实现其在土耳其海峡"历史使命"的一个机会：俄国可以让英、法两国与德国交战，这样英、法就无法顾及土耳其海峡问题，因此等于扫清了俄国前往君士坦丁堡路上的障碍。法国很快表示愿意支持俄国，它别无选择，必须防止自己被孤立；英国的表态则比较含糊，它仍然希望战争能限制在局部范围内。7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对塞尔维亚宣战。一天后，俄国宣布进行局部性军事动员，但它仅仅想针对奥匈帝国开战；两天后，又宣布全面动员，对德国宣战。

因此，俄国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此后，战争按照"计划表"自动上演。俄国的军事动员意味着，施利芬计划执行的前提受到了威胁。因此，德国不得不立即进行军事动员，以避免自己陷入法俄的夹击。德国希望利用它的铁路网优势，争取在另一个对手赶到之前打败其中一个对手。8月1日，德国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对俄宣战；正如俄国所料，很快法国也宣布军事动员，德国被迫向法国进攻。8月2日，德国要求其军队能够自由通行比利时；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德国开始执行施利芬计划，入侵比利时。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数周以来都在担心，他私下承诺的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能否得到议会的批准，因为这远远超出了英法协约所规定的义务。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牺牲法国的利益，与德国讨价还价，那么我们国家的名誉将彻底败坏。"无论如何，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让比利时放弃中立政策，因此英国承诺对比利时提供保护。8月5日，英国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是当时英国著名的自由和平主义者，也是科布登的追随者。他在1913年出版的《大幻觉》（*Great Illusion*）一书中指出，国家之间的商业联系使得战争不再可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保证各国之间的和平。然而，这个论断却没有成为现实，投资者和银行家陷入绝望，欧洲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德国和奥匈帝国发动战争，希望能打破几十年来越来越困扰它们的“包围圈”。贝希托尔德指出了“永久削弱俄国”的必要性。1914年9月，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良好战绩，毫无疑问导致其野心膨胀。贝特曼指出：“要想保证德意志帝国西边和东边的永久安全，就必须全力削弱法国，使其永远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必须把俄国的势力赶走，离德国东部边境越远越好，而且要终结俄国人对异族的统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必须把比利时变成附庸，让荷兰“独立”，将中欧变成德国控制下的单一经济空间。换言之，欧洲的地缘政治秩序应该完全重组，以保证德国永久的、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英国、法国和俄国也努力通过战争来遏制德国的扩张。俄国国防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说道：“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摧毁德国国力。”他希望消灭阻碍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最后一个大国集团。根据1915年3月的《伦敦条约》，英国和法国正式支持俄国吞并海峡地区、马尔马拉海以及伊姆罗兹岛（Imbros）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这样，俄国就可以将势力扩张到爱琴海，以保护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英法之所以支持俄国，是因为它们希望俄国能下决心，尽一切能力与德国作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把这个问题看作“决定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法国外交部长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把沙皇“推向德国的怀抱”。

此时，战争的结果无法预测。1914年各国的国防开支和军备仅仅反映的是战前的军事格局。而各国的潜力是不同的，因此力量平衡的实际情况被掩盖了。1913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军费开支总额，比德国和奥匈帝国总额的两倍还要多。就工业潜力而言，协约国比同盟国稍好一点儿，但不是决定性的。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德国并不比英国多太多，而奥匈帝国则远落后于法国和俄国。就人口而言，双方差距更大：三个协约国的总人口几乎是同盟国的两倍。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德国的军队更为有效。德国迅速横扫比利时，这与施利芬预期的差不多；而法国在南部的攻击则没有这么成功。如果不是以下两个原因，法国军队将会陷于前后两难困境。首先，俄国军队进入东普鲁士的速度比预期的更快，尽管俄军被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打败，但德国为牵制沙皇调集了西线战区极度需要的军队，这样法国的压力就小了许多。其次，德国的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国远征军的力量。德皇可能是认为英国远征军规模小，或者认为其战斗力弱，因此将其看成“微不足道的军队”而不予理会。在这支远征军中，印度分遣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英国内阁成员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所写的那样，印度人在1914年秋天“帮助拯救了协约国和世界文明的事业”。这样，德军的右翼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包围英法军队的程度，而且法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反击阻止了德军的前进。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后，双方进入堑壕战。

之后的战局不是静态的，也并非发生在地缘政治的真空之中。随着佛兰德、皮卡第（Picardy）和孚日山脉的战线连成了一片，各国决策者试图从侧翼包围敌人，或者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打开局面。目前，主战场依然是在西线。在接下来的4年中，双方都发起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

进攻，都试图给对方以决定性的一击。在东线，战争基本上表现为运动战。鉴于上述事实，德国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同盟国试图打破包围圈，至少击败其中一个主要的敌人。1914年11月，土耳其加入德国一边作战，试图阻止俄国占领海峡的意图，以重建土耳其在欧洲的地位。1915年10月，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希望挽回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损失。此外，德国试图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迫使英国屈服，但由于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强烈抗议，德国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在东线，奥匈帝国感到塞尔维亚难以对付，很快又陷入了与俄国交战的困境。相比之下，德国的援军表现得很出色：1915年年底，德国基本占领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残余部队逃往科孚岛（Corfu）。同年，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Gorlice-Tarnów）会战中，俄国遭遇惨败，被迫后撤数百英里。德军统帅部中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为首的“东部派”认为，应该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攻势，以逼迫俄国谈判。这样，德国可以把战争资源从东线转移到佛兰德，以进行最后的决战。与前一种战略不同，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认为，德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西线，以对付英国和法国。法金汉得到了德皇的支持，德国人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攻势，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是战争的高潮。正如法金汉所说，德国希望“用血的代价让法国屈服”，并强迫法国求和。

协约国起初通过外交手段包围同盟国的战略也同样不成功。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加入协约国，贝特曼担心日本会向欧洲派兵，但是日本仅仅进攻和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意大利则见风使舵，尽管它表面上忠于三国同盟，但它与奥地利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意大利想利用战争的机会，实现其领土安全，正如首相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所说，“不能再让其他国家吞并意大利的陆上领土”。意大利要求获得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阻止奥地利染指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领土，并且尽可能防止俄国将势力扩展到地中海。在部分上述地区，意大利人只占少数。1915年4月，意大利与协约国签订《伦敦条约》，协约国保证支持意大利的上述诉求，不久意大利对德国宣战。理论上，意大利的背叛使得同盟国的“软腹”暴露在外。不过，整体的军事平衡并没有发生转变。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意大利人在其北部边境也陷入了堑壕战的泥潭。协约国通过外交努力，说服罗马尼亚进攻奥匈帝国。罗马尼亚的目的是吞并特兰西瓦尼亚，但这对战局也没有太大影响。1916年夏天，德国发动闪击战，罗马尼亚军队被打败，整个国家几乎被德国占领。

在军事上，协约国试图收紧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包围圈，或者凭借军队人数的优势将其打败，或者通过严密的海上封锁将其饿死和困死。协约国不仅包围了德国和奥匈帝国，还通过其海外殖民地将土耳其包围起来。同时，英国和法国试图加大对西线战场的投入，以摧毁敌人，协约国最高统帅部认为西线是主要战场。1914～1915年，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试图攻占达达尼尔海峡，但最后行动失败。丘吉尔希望这样做不仅可以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开辟通往俄国南部的路径，还可以防止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潜艇基地，阻止德国在中东扩张，同时这也可以作为一场军事演习，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对付德国提供经验。此外，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加利波利（Gallipoli）战役中伤亡惨重，造成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期间，英国和法国在西线发动了一系列攻势。1915年12月法国元帅霞飞在《尚蒂伊备忘录》（Chantilly Memorandum）中曾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打垮德奥军队”，但主要目标是德国。自战争伊始，协约国没有盲目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的袭击，而是在西线的多个战线中发动连续进攻。1916年7～9月英军在索姆河（Somme）沿岸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标志着攻势达到了高峰。尽管协约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但德国损耗严重，逐渐不支。

双方还企图削弱对方政府在国内的执政基础，同时在对方的海外殖民地挖墙脚。德皇在战争前夕说道：“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领事，一定要煽动整个伊斯兰世界，共同反对英国这个可恶的、虚伪的、丧尽天良的商业民族。”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支持发展德国与“真主”世界之间的关系，德裔犹太外交官马克斯·冯·奥本海姆（Max von Oppenheim）更加高度称赞这种关系。同时，德国还在印度大搞宣传，煽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以反对英国殖民者，不过收效甚微。德国还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提供支持，为他们输送武器，支持他们在1916年复活节发动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与此同时，德国和奥匈帝国采取种种策略，支持俄国国内的反政府活动，并煽动民族矛盾与分裂。德国支持乌克兰的解放运动，1916年8月德国支持乌克兰与波兰合并（德国成为其保护国）。一位德国政客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煽动俄国国内的革命，从而使协约国分裂，那么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德国试图通过颠覆和渗透的方式来削弱美国。美国有些兵工厂正在为协约国提供武器，德国秘密地在这些工厂和船舶里放置炸弹。实际上，这种破坏行动没有什么效果，但是被发现之后，德美关系严重受损。而德国在墨西哥的计划进展得比较顺利。1914年美国从墨西哥撤军之后，这里很快再次爆发内战。德国试图阻止英国海军从墨西哥获得石油等重要物资。不过，德国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美国陷入墨西哥的泥潭。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认为：“这种战略非常值得，如果美国卷入墨西哥战争，它在欧洲就会分心，就无法对英国提供足够的支持。”1916年3月初，墨西哥军阀庞丘·维拉（PanchoVilla）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哥伦布镇（Columbus）杀害了几名美国人，尽管这不一定是德国直接指使的，但肯定是经德国同意了的。

协约国则向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分裂势力提供支持。1915年5月，英国政府在伦敦发起成立南斯拉夫委员会，旨在笼络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建立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以削弱奥匈帝国。克罗地亚领导人弗拉诺·苏皮洛（Frano Supilo）解释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意大利就会像吃通心粉一样吞噬我们”。英国还鼓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在极富魅力的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 G. Masaryk）的领导下反对德国的统治。在中东，英国与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进行磋商，以帮助他们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英国认为亚美尼亚对自己很有利用价值。因为如果亚美尼亚能够脱离土耳其而独立（比今天的亚美尼亚面积大得多），那么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铁路

就会被切断，俄军可以从北边长驱直入进攻土耳其，英军可以从埃及直接进攻土耳其，这样协约国可以强化围困土耳其及其盟友的包围圈。1916年年初，麦加领导人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英国派驻埃及的高级专员）进行联络，准备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同年晚些时候，英法两国缔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nt agreement），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属于英国势力范围，而大叙利亚属于法国势力范围。但是，到了1916年年底，上述努力仍然没有对战争结果起到决定作用。

此时美国仍保持中立，但它密切关注欧洲的战况，尤其是德国的行动。华盛顿实际上支持协约国，因为它们在利用美国的金融和工业资源时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华盛顿可以因此而获益。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差点儿和它打起来，豪华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击沉后，美国险些对德宣战。美国一直非常关注西半球的稳定问题，时刻准备应对挑战。早在1914年11月，威尔逊的心腹、陆军上校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就担心“巴西是德国染指的主要目标”，他判断德皇不再认为门罗主义适用于赤道以南地区。但主要的问题依然是墨西哥。1915年10月，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表示：“华盛顿非常清楚德国的意图，德国想要让墨西哥保持混乱状态，然后美国不得不进行干预。”他强调，美国应该尽可能避免那样做，“我们必须重视与德国的关系，我们与墨西哥的所有交往都必须考虑到与德国的关系”。然而，庞丘·维拉袭击哥伦布镇后，威尔逊不得不予以回击。1916年3月下旬，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率领军队越过边境，向墨西哥兴师问罪。此次行动没有成功俘获维拉，反而引发广大墨西哥人民的愤怒，最终无功而返。美国曾经承诺，不会吞并拉丁美洲的任何国家，但现在它干预拉丁美洲的行为遭到广泛谴责。在上述所有这些事件中，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减少后院的不稳定性，而且要防止别国在拉丁美洲产生影响，防止有欧洲国家从南边威胁美国的安全。

战争支配着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首先，战争有助于愈合各国内部的裂痕。在奥匈帝国，政府干脆利用这个机会让议会休会。爱尔兰支持自治的人与忠于英国的人，并肩与德国作战，而不是互相争斗。英国保守党支持自由党政府的战争努力，英国不仅仅要保护比利时，还要防止法国被德国打垮，防止欧洲的均势被破坏。左翼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反对德国的克虏伯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支持对德作战。在法国，左派和右派联合起来，组成“神圣联盟”，共同抗击入侵者。俄国民众坚定支持沙皇的政策，此时沙皇集中精力对付日耳曼人，并努力实现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历史使命”。国家杜马表决通过了税收和贷款法案，为战争提供支持。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签署了“国内和平”协议，团结对外，不再找政府的麻烦；德皇宣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政党，只有德国人”。1914年，议会中所有的政党都支持政府发行战争贷款。如果没有这些国内的共识，战争将无法进行下去，共识破裂的国家将很快被打败。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支持战争，主要原因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虚假意识”，而是担心德国落入沙

皇之手；同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支持战争，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法国落入德皇之手，那样将遭受更残暴的统治。事实上，“第二国际”想要利用工人总罢工将帝国主义战争扼杀在摇篮中并且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从未落实过。

1915～1916年，战争支配了法国和英国的高层政治。两国都在探讨如下问题：军事指挥官的任命、资源的开采以及一些新战略的效果问题（例如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否能够缩短战争时间；在西线对德国进行毁灭性打击，是否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1915年5月，英国面临弹药危机，全国缺乏火炮和弹药，战时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感到巨大困难，他不得不团结战争经验丰富的保守党组建联合政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战争。5个月后，以勒内·维维安尼（René Viviani）为首的法国内阁由于战事不利，没有通过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战争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一直在关注战争的进展，1916年6月议员安德烈·马其诺（在凡尔登战役中不幸残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拍案而起，痛斥“最高统帅部计划的失败和行动的迟钝”。1916年12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不得不下台，取而代之的是“能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自由党激进派人物——劳合·乔治。比较而言，英国在制定战争政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政治的开放性，尤其是坚持“议会至上”的原则。例如，加利波利战役的失败使得丘吉尔中断了其政治生涯，同时在1916年中，议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因此，即使是在世界大战最为紧张的时期，英国的政治依然是开放的，民众依然可以批评政府在战略上的失误。

在美国，民众对战争态度存在严重分歧。国际主义者主张介入战争，这些人主要是东部沿海的精英阶层，如共和党重要人物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协约国，认为德国是欧洲均势的主要威胁。他们经常批评威尔逊的政策导致国家军备废弛，将来会无法抵御德国的侵略。他们要求对国防事务进行调查，还为国家安全联盟——美国一个亲协约国的组织——的工作提供支持。1916年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批准大幅增加海军军费，这反映了美国对德国意图的恐慌。战争的头两年，数千名美国志愿者来到欧洲服役，他们大多数人加入了英国或法国军队。相比之下，德裔美国人也发起了游说活动，他们则倾向于支持同盟国。美国大多数犹太人也支持同盟国，主要原因是俄国曾推行反犹主义。不过，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卷入欧洲的冲突。1916年威尔逊赢得连任，正是因为他承诺美国保持中立。

这场战争对各国的社会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14年开始，交战双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人力和经济资源。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实行了征兵制度，而英国在战争初期依然采取志愿军制度。这种状况无法长久维持，自由党（其中许多人是激进主义者）和保守党均对此提出了批评。1915年夏天，有人发表了“全民皆兵”的宣言，要求“每一个健康的男子，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必须听命”。1916年中期，英国正式实行征兵制度；由于爱尔兰是政治敏感地区，因此那里的人可以暂时免于兵役。

劳合·乔治支持该法案，他认为“每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当它遭遇到挑战时，当它的自由受到威胁时，都会诉诸强制力保卫自己”。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意识到，这将不会是一场短期战争。但即便如此，各国政府还是很快被补给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劳合·乔治领导的军需部成立之后，英国的“弹药危机”才得以缓解。一年后，法国政府成立了国家企业联合会，以便更有效地管理战时经济，最终国家企业联合会不仅负责原材料的供应工作，还设定价格，控制资本流动；其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年轻官员叫让·莫内（Jean Monnet），后来成为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在欧洲各国，自由资本主义原则暂时被国家干预主义和社团主义取代，以适应战争需要。这样，各国的实力都有了巨大提高，连之前实行“自由”制度的英国也是如此。其中，实力增长最快的是德国，在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强有力的领导下，国家潜能被有效地激发了出来。1916年，德国执行兴登堡计划，动员全社会备战；同年12月执行“爱国主义支援前线法”，将17～60岁的非工农业男性都招进了军队。这种“战时政策”保证了德国即使在寡不敌众、被包围、原材料和食品供应被切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坚持战斗。

不过，协约国的力量依然领先。法国的整个殖民帝国，一共有5 000万居民，它只需要其中的50万人即可，要么将其部署在西线对抗德国，要么部署在中东对土耳其作战。英国则更成功地利用了其殖民地的人力资源，它将加拿大远征军中的40万人运送到了西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提供了数十万的兵力，澳大利亚总理承诺，将对母国英国提供支持，“直到最后一个人战死、最后一个先令花完”。此外，还有超过7万南非白人（绝大多数讲英语）和大约4万黑人被运送到了欧洲；约100万印度人是在印度次大陆以外服役，许多人来到了欧洲战场。在佛兰德的战场上，德国人并没有直接与英国人交战，而是与亚洲人以及来自英国其他属国的军队作战。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国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到1916年底，仅加拿大就生产了英国总弹药需求的1/4左右；英国的战争开支，都是来自它在各殖民地的财政收入或贷款（只有南非部分地区除外）。因此，全球大部分地区事实上都卷入了战争，各国共同反对德国建立欧洲大陆的霸权。

德意志帝国被世界各国看作敌人，现在它开始调动离本土较近的新资源以自救。德国总参谋长法金汉冷峻地指出，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将“不得不放弃它的主权”，并成为“德国的一个‘马克’”。此时的奥匈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民族主义颠覆活动愈演愈烈，军队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因此它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德国的附庸。尽管匈牙利与奥地利一直有矛盾，但马扎尔人中的精英也不得不暂时与奥地利联合。正如匈牙利首席大臣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在1915年4月指出的：“匈牙利只有与奥地利联合，才能阻止斯拉夫主义继续冲击亚得里亚海西海岸……匈牙利的命运与奥匈帝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9月初，奥匈帝国同意与德国组成联合最高统帅部，由兴登堡担任元帅，奥匈帝国军队听从德国的指挥。大约同时，德国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发表了一本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小册子

——《中欧》（*Mitteleuropa*），支持德国占领多瑙河盆地以打破包围圈。换句话说，只有控制了中欧的人口和工业潜力，德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战争的压力使得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变得更加偏执。国家和民众草木皆兵，认为敌人无处不在；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审查制度和警察监视也成为常态。在英国，暴徒以德国人的名义砸碎了商店的窗户，有近三万名"外国人"被拘禁。爱国的女权主义者将德国人描述为"掠夺成性"的"男子"。英国王室由于具有德国血统，因此被迫改名为"温莎王朝"（House of Windsor），以便与德国脱离干系。德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讽刺说："英国人现在应该把莎士比亚戏剧的标题改为《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风流娘儿们》（*Merry Wives of Saxe-Coburg-Gotha*）。"为强化监管，英国试图推出身份证制度，但最终由于遭到普遍反对而搁置。法国人普遍对德国间谍感到恐慌，他们认为德国间谍无处不在，导致成千上万人被拘禁。沙皇俄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反对"外国人"的暴乱频繁发生。欧洲各国以更加偏执、更加极端的态度对待犹太人。1916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要求官方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确定是否有大量的犹太人正在前线服役，是否有犹太人在后方搞破坏，以及是否有犹太人大发战争横财。白俄罗斯的帕莱是犹太人聚居区，沙皇当局认为那里的犹太人都是德国间谍。整个战争期间，俄国在乌克兰进行大屠杀，甚至把成千上万的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当作潜在的安全威胁，将其驱逐出境。尽管犹太人被虐待，但是和奥斯曼帝国对待亚美尼亚人的做法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土耳其当局确信亚美尼亚人串通俄国军队以帮助其穿过高加索山脉，因此对亚美尼亚人展开了系统性的驱逐和屠杀。

不过，在其他方面，战争则产生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有利于妇女的解放。工人阶级的女性很快在蓬勃发展的军火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而中产阶级和贵族妇女则投入到了各种志愿活动或护理工作中。欧洲各国需要妇女提供后勤工作，因此数百万妇女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力量。过去有人认为，国家不应征召妇女入伍，而且国际妇女运动应该以维持和平为宗旨，而不是倡导战争。但现在，欧洲的女性表示反对上述观点。资深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埃米琳·潘克赫斯特问道："当我们的国家被拒服兵役者、消极抵抗者以及逃避责任者把持的时候，情况会非常糟糕，任何一个女性可能会袖手旁观吗？"多数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仅应该要求获得公民权，也应该承担爱国义务。此外，战争的压力也改善了民众的福利。这种情况在法国最为明显，政府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不仅取决于他的生产贡献，还取决于他要抚养、赡养的家庭人数。政府出台鼓励生育、扶持困难家庭的政策，不仅是为了维持和平，而且是为了在战争导致大量死亡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出生率。因此，尽管政府的政策违反了"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其原因与性别政治无关，而是完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

在中东欧，战争对社会和政治的挑战最为强烈，人们感受得最为深刻。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在战争爆发后不久预言："旧阶级和种姓制度已经过时了，无论输赢，最终我们都会走向纯粹的民主。"尽管德意志帝

国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但在战争过程中，许多文化和社会的界限都被打破了。军官团不再那么排斥下层中产阶级，甚至一些贵族军官逝世后，工人阶级的士兵获得晋升并填补了空缺。更紧迫的问题仍然是政治参与。1916年底，国家自由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宪法和预算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议会来影响外交和战略政策的制定，由于战争关乎性命，因此各党派力图争取控制战争进程的权利。不过，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如果右翼政党宣称，德国应该兼并某个国家以保卫德国的安全，那么这些人也会予以支持；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才能迫使英国屈服，才能打破德国遭遇的封锁，那么这些人就会说，那就发动吧！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民众要比精英更加关注地缘政治问题。不过民众也有更深层次的要求，他们要求废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推行全国普选，以便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对付协约国。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逻辑，就是因为外交政策对一国政策的影响往往居于首要地位。马克斯·韦伯警告普鲁士保守派道：“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重视外交政策，并以外交政策的需要来安排国内政治秩序。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民主化’的后果，但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种后果，他就不应该执行大国外交政策。”

在俄国，立宪派也利用战争，坚持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1915年2月上旬开始，国家杜马有权参加财政预算秘密会议，有权听取战争大臣的报告。由于俄国频频战败，杜马开始对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1915年6月初，国家杜马要求撤换国防大臣和内政大臣，不久立宪民主党人呼吁“政府应该想办法赢得民众的信心与支持”。战争开始后不久，国防大臣和内政大臣被得到国家杜马支持的人取代。1915年秋天，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联合起来组成“进步阵营”，控制了国家杜马席位的多数，他们再次提出“政府要获得民众的信心”，并且要求改组军队最高指挥部。这次，沙皇没有支持杜马，而是要求杜马休会，拒绝任命新的最高指挥官，他亲自接管了战争指挥的工作。沙皇认为，战争的成败关系到王朝的生存，因此他决定采取冒险的战略，以扭转不利战局。1916年夏天，俄国再次遭遇失败，民众和国家杜马指责专制制度无法捍卫国家利益。11月中旬，俄国又遭遇惨败，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问国家杜马：“是因为军队愚蠢，还是因为他们叛国？”此时的俄国非常像当年的法国垂死专制王朝，人们集中批判沙皇家族的腐败，指责沙皇被其宠臣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严重蒙蔽，甚至认为拉斯普京在战争中秘密支持德国。1916年12月底，一些爱国人士谋杀了拉斯普京。显然，如果下一年前线再次传来战败的消息，那么沙皇专制统治的日子将屈指可数。

美国南北战争与德国统一之后，一场世界大战席卷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直到1916年战争接近尾声时，人们依然不知道，哪个大国将会是赢家，哪个将会是输家。美国南北战争与德国统一这两件大事一直主导着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大战略及其国内政治；鼓舞了民众、媒体和议会对政治的参与，甚至影响了那些专制国家；推动了英国的殖民扩张以及英国内部的帝国重组。经过两年的战争，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看上去势均力敌：同盟国位于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已

经积聚了强大的实力，因此即使英、法、俄联合起来，也无法将其打败；同样，同盟国一时间也无法打败协约国。因此，只有当一种新的欧洲地缘政治出现时，僵局才能被打破。这就是：美国加入与德国的对抗。

第六章

乌托邦：1917~1944年

文明将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烈焰燃烧殆尽。在这场可怕的浩劫之后，会出现一群新的政府……而第一批强大起来的人将是德国人……他们的国家具有高效的组织性，背后还有俄国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源，德国会控制俄国。而且一旦德国和日本联合，那亚洲也要服从于它。

——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1919年

如果我们能估计得长远一些，未来是否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即欧亚大陆成为一个巨大的统一的整体，并且被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所征服？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一旦上述情况成为事实，将会是对世界自由的巨大威胁？我们应如何用我们新型的政治制度来应对上述情况？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1919年

谁能控制欧洲，谁就能领导世界。因此，我们奋斗的目标仍然是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是只有德国才能将欧洲联结起来。

——阿道夫·希特勒，1943年

1917年是欧洲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分水岭，这一年先后发生了三件大事：俄国革命、美国加入“一战”、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该宣言许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在随后的30多年中，这一系列事件对地缘政治及各国的国内政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欧洲和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动荡时代。这场动荡的标志是两大力量——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冲突，二者都试图统一欧洲。同时，也表现为三大“乌托邦”之间的冲突：民主、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这场斗争的焦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新秩序就是为了遏制和改变德国。同时，从地缘政治上看，德国承受着来自苏维埃革命的压力。此外，《贝尔福宣言》也将矛头指向德国，而后来的纳粹也产生于德国。德国的实力问题也是欧洲内部政治的焦点：德意志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受到《凡尔赛和约》的制约；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对德国进行遏制；苏联还希望利用德国，将革命输出到中欧，随后又迫切地要遏制希特勒。德国周围的国家，不论远近，其主要目标依然是阻止德国与自己的敌国联手，同时它们还要确保德国没有称霸的野心。对德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制定自己的大战略和发展国内政治，以防止自己被另外一个全球性大国打败，同时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自己的联盟。但是，德国的这两个计划都失败了，因而给自己造成了灾难。

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德意志第二帝国动用军事、外交和国内的所有力量，来解决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断绝英国的物资，1917年2月，德国重新对英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潘乔·维拉（Pancho Villa）率军突袭美国新墨西哥州后，美国的反应非常软弱。这让柏林更加胆大，不再担心自己会刺激美国了。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对墨西哥发出了一封电报，声称“在德国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如果墨西哥站在德国一边，那么德国就许诺将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交还给墨西哥”，帝国海军已经接到命令，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墨西哥人提供武器。同时，德国开始调集所有剩余的经济资源，试图击败协约国。但这很难，因为当时德国已经是四面楚歌，它与传统的原材料供应地的联系已经被切断。战时资源局局长拉特瑙通过改善生产流程，使产量最大化，减少经济封锁带来的不利影响，缓解了一部分困境。然而，通过直接榨取工人的汗水来增加产量的效果是有限的。显而易见的是，只有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德国才能不被“满世界的敌人”打败。出于这个原因，1917年德皇发布复活节文告，称在战争结束后拟废除歧视性的“三级选举法”。

在大英帝国，由于伦敦急需动员更多的人力来对付德国，它不得不重新审视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为避免各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英国很早就取消了征兵制度。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被英国镇压后，爱尔兰人一直对英国不满，而如今英国准备在爱尔兰恢复征兵制，这等于在爱尔兰人的伤口上撒盐。因此，爱尔兰激进的分离主义势力——新芬运动（Sinn Féin movement）越来越强大，相对温和的党派越来越衰落。相比之下，英国要想在其他殖民地获得持续不断的军事支持，就必须与当

地人民进行更多的协商，同时给予殖民地人民更多的政治平等。英军在西线的军事失利，使得各殖民地的领导人非常愤怒，他们要求参与英国大战略的制定。为了响应这些呼吁，1917年春天，英国政府成立了帝国战争内阁，并承诺“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将与英联邦中的各自治领进行持续的协商，并耐心地听取它们对大英帝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几个月后，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指出：“战争结束后，南亚次大陆民众的自治意识将逐渐增强，一个自治的政府迟早会出现。”英国与德国的战争使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民众在政治上觉醒了，他们越来越要求获得自治权。而爱尔兰民众的自治观念早已出现，战争影响了其内部的政治辩论。

在俄国，独裁的沙皇政府没能实现其诺言，它无法战胜德国，但这让更多的人支持扩大政治参与。立宪民主党与拥护君主立宪制的十月党人认为，只有真正的议会制政府，才能动员整个俄国社会来抵抗德军。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一个说法，称俄国皇室及高层官员中存在一个“卖国集团”，他们被犹太人和德国人收买，其中沙皇的宠臣拉斯普廷就是最大的卖国贼。因此，到1917年初，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失去其合法性，非常像1789年的法国波旁王朝。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曾经被判处死刑，成为丈夫的替罪羊；与路易十六相似，此时的尼古拉二世也无法真正维护俄国的利益，因为一些“为德国利益服务的人”搞了很多阴谋诡计。1917年2月底，在持续不断的罢工抗议和军事叛乱中，沙皇的独裁统治最终被推翻。李沃夫王子（Prince Lvov）领导成立临时政府，任命米留可夫为外长，临时政府决心寻找机会，再同德国决战。换句话说，“第一次”俄国革命并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反对无能的沙皇，当时俄国人想鼓足勇气再同德国决战。

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也改变了欧洲的局势。由于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英国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齐默尔曼电报”，2月底，英国将这封电报交给美国。电报声称，如果墨西哥与德国结盟，德国就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还给墨西哥。美国人看到电报后非常愤怒。不久，美国船只沉没的消息登上了报纸的头条。很多美国人开始警惕起来，他们认为德国人想把欧洲的“中心地带”全部控制起来。威尔逊声称：“德国想要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欧洲的中心，之后再穿越地中海，直接控制亚洲的中心。”综上所述，事态的发展使得很多美国人相信，欧洲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德国霸权的威胁，将会对整个西半球的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不仅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商业利益，还可能会破坏美国的领土完整。因此，只有直接介入欧洲，美国才能遏制敌人，才能减少威胁。威尔逊总统警告，如果美国袖手旁观，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德国的势力将从汉堡直接延伸到巴格达，控制世界的中心”。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从威尔逊总统的视角来看，德意志帝国也是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严重挑战。威尔逊在国会做演讲时，号召议员支持对德战争。他指出：“必须维护世界的安全，以保卫民主，和平必须建立在政治自由

的坚实基础之上。”他解释说，德国的侵略政策，就是威廉家族的独裁统治的产物，“德国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破坏世界的和平，就是因为德国人民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美国政府坚信，要想保卫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保卫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威尔逊的目的并非“通过维护世界的安全以保卫民主”，而是要通过扩展民主制度来保卫美国的安全。

因此，到1917年夏天，德国面临的战略态势日益严峻。从5月底开始，法国和英国持续从西线给德国施加军事压力，进攻阿拉斯（Arras）、伊普尔（Ypres）和苏瓦松（Soissons）等地区。同时，意大利在伊松佐对奥地利发动进攻。6月底，俄国临时政府授权勃鲁西洛夫（Brusilov）在东线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击。奥匈帝国受到俄国和意大利的两面夹击，已经精疲力竭了。在南边，英国重新发动进攻，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将战线向前推进。由于美国如期派出大量军队来欧洲作战，柏林面临的局势更为严峻了，它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德国中央党领导人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提出了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内容是德国放弃已吞并的其他国家的领土。1917年7月，该方案被提交到德意志帝国议会，并得到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而通过，这也反映出了德国政局的新变化。同月，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辞职，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担任帝国的新任宰相。但在10月，米夏埃利斯失去了帝国议会的信任，冯·赫特林伯爵（Count von Hertling）取代了他的位置。德意志的立宪过程开始于1914年之前，但一直发展缓慢，而如今在战争的压力之下开始加速发展。

此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很快重新获得了战争主动权。1917年10月底，德国和奥地利联合进攻，将防守在卡波雷托（Caporetto）的意军打得丢盔卸甲，几乎就让罗马被迫求和了。不过，德国真正的致命一击是在东线。德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hlmann）曾说：“在敌军的战线中，俄国似乎是最脆弱的一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逐渐让俄军放松警惕，然后寻找时机除掉他们。这就是我们在战线后方对俄国进行破坏性活动的目的——首先是激化俄国内部的分裂倾向，支持布尔什维克，离间它与政府的关系；为了执行这一战略，德国还要定期给布尔什维克支付报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坐在一列封闭的火车中，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边界，取道瑞典和芬兰，最后回到俄国。1917年7月，勃鲁西洛夫第二次进攻失败以后，列宁这一派终于在争论中占据上风。他们控制了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提出了“面包与和平”的口号。此时，一场关于俄国未来外交政策方向的激烈辩论在圣彼得堡展开。有些人仍然强烈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至少反对仓促讲和，反对在对自己不利的条件下讲和。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颁布了《和平法令》。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同时还宣布“废除秘密外交”。12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简言之，列宁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德国的，列宁将其传播到俄国，而德国最高统帅部则利用这个计划诱使俄国退出战争。

因此，1917年年底，协约国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俄国的东线如

此，其他战线也是如此。1917年，协约国的力量曾经有所发展，但很快又一次在中东和西线陷入困境。意军需要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否则他们的存在也难以为继。在高加索，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俄军撤退了。在东线，一旦柏林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德国就会从东线抽出大量军队，将其投入到西线并与协约国进行最后的决战。如果德军先于美军赶到西线，那么协约国定输无疑。更糟糕的是，现在德军已经控制了中东欧的所有资源，德意志仍在与奥匈帝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1918年4月，威尔逊在巴尔的摩演讲时曾警告：德国试图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与此相似，大英帝国政治家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担心“德军霸权下的中央集团不仅会控制欧亚大部分地区，还可能控制全世界”。

形势紧迫，现在协约国必须从德军及同盟国手中夺回主动权。1917年11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发表了一项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家园。就中东的战场而言，这一招可以先发制人，防止土耳其人破坏苏伊士运河，防止大英帝国被分成两半。当时土耳其的后台是德国，他们正在巴勒斯坦扩张力量。从战略上看，给犹太人划出一块土地，可以保证英国到埃及的通道的畅通。更广义地说，《贝尔福宣言》是一次政治和意识形态赌注，目的是使英国得到全球犹太人的支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说：“我们没有夸大其词，全球犹太人的力量非常大。”不过，尽管多数犹太人为了祖国的事业，对英国的倡议表示出了热情的支持，但是他们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支持同盟国。这是因为，以前作为协约国的俄国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而且很多犹太人，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指望德国保护他们的文明价值观。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等犹太人领袖经常说，如果协约国不能在巴勒斯坦给我们提供一个家园，那么德国皇帝就会出手帮助我们。不管怎样，是英国人有求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犹太人有求于英国人。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最初考虑的不是协约国能够为犹太人做些什么，而是犹太人能帮协约国反对德国做些什么。

不久以后，也就是1918年1月，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点计划”，目的是防止德国控制欧洲，同时以民主、民族自决和地缘政治为基础，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第六点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俄国”；第八点要求“德军撤出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第九点要求“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第十点要求“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不过这里并没有提到奥匈帝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统一，以协助其他国家制约德国；第十一点要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当时这三个国家被德、奥两国侵占；第十二点要求“达达尼尔海峡在大国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除了巴勒斯坦之外的所有阿拉伯民族，都应该被保证拥有自治权，但他们的外交政策还是要由英国来负责；第十三点要求“重建独立的波兰，大国保证波兰拥有出海口，并且这个国家要毫无争议地由波兰人组成”；最后一点——第十四点要求“成立一个国际联合机构以维持世界和平及各国的领土完整”。这十四项要求并不是建立在任何抽象的原则之上的，而是为了削弱德国，以控制德国在欧洲的权势。

此时，苏维埃俄国也需要果断行动起来。尽管协约国强烈反对俄国革命给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秩序带来的威胁，但协约国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其在东线的地位。贝尔福并不认为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比其他所有事情都重要，1918年4月，他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能够与英国合作以反对德国，那么英国就有必要将它看作‘事实上’的俄国政府”。两个月后，英国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警告称：“如果德国控制了俄国，那么它将不需要占领全部欧洲，它可以集中力量，通过陆路来进攻埃及或者印度。”因此，1918年7月初，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决定进行军事干预，对俄国革命者发动进攻，其主要目的是继续加强对德国的攻势。

“十四点计划”激起了俄国革命者之间激烈的辩论，这涉及整个革命的本质问题。列夫·托洛茨基警告：“如果欧洲人民不能够揭竿而起推翻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会被粉碎……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反革命的势力会以两种方式被消灭：一种方式是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彼此消灭（正如列宁所说，“这样的浪潮最终注定要使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毁灭”）；另一种方式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通过世界革命的方式，将帝国主义政府消灭。但是，目前的事实是，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团结起来，并没有揭竿而起，因此俄国革命者只能暂时依靠自己的力量。此外，根据马克思的预言，共产主义将首先在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但是，事实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了政权，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绝大多数。这次革命发生在了一个本来不应该发生革命的国家。列宁也承认：“当下别无选择，只能在国际工人阶级同盟出现之前，坚守我们的岗位、保卫我们的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同盟一定会出现，尽管比我们希望的要慢一点儿。”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约使得苏联付出了巨大代价。托洛茨基后来说：“现在要紧咬牙关，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在和约中，苏联割让了大片领土，以换取和平。正如列宁所说，和约给苏联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巩固国内的革命力量。但是，德国根本没有把和约当作一回事，而是继续攻击苏联。同时，其他同盟国也开始进攻苏俄，乌克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运动，波罗的海省份以及原属沙俄帝国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的国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少数派，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提出的排外政策。他们认为，保护苏联不受外国侵略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立宪会议，用民主制度取代共产主义政权，并动员全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做斗争。而列宁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要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就要进行残酷的战争，以反对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列宁发起和亲自批准了大规模的枪决、逮捕和放逐，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民众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日益恶化的战局，也影响到了协约国及其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尽管没有苏俄那么激烈。1917~1918年间，法国政坛一直在围绕战争问题

展开辩论。1917年3月，一场重要争论开始兴起，争论围绕着议会是否有权利秘密地讨论国家的战略。在这场争论中，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内阁被迫辞职。同年夏天，法军重新发起攻击，但惨遭失败，士兵伤亡惨重，导致法军全体兵变。战事失败与兵变，导致很多人非常恐惧，大家互相猜疑谁是德国的奸细、谁是叛国贼。右翼分子指控内政部长路易–让·马尔维（Louis-Jean Malvy）是间谍，因为他没能在战争初期就逮捕潜在的颠覆分子。1917年7月，激进党的领导人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议会以“叛国罪”为由，要求将马尔维逮捕。一个月后，由于军事上屡战屡败，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内阁被迫辞职。保罗·潘勒韦（Paul Painlevé）组建新一届内阁，但在1917年11月，意大利被德国打垮，同时东线战事不利，因此潘勒韦也很快下台了。之后，克里孟梭担任总理，这一届内阁全部都是强硬派。1918年1月，克里孟梭将前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以叛国罪逮捕，卡约曾经是激进党领导人，曾支持与德国媾和。3月，克里孟梭向议会表达了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宣称：“对于国内政策问题，我会发动战争；外交政策问题，我还是会发动战争。”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大西洋远处的英国，几乎是同样的情况，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影响了英国的国内政治。1917年7月，帕斯尚尔战役开始，英国军队伤亡惨重，最终促使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之后他向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提出辞呈，要求不再担任内阁职务，但乔治不同意他辞职。次年初，两个有权有势的将军公开批评首相的人力管理政策，经历了一番周折，首相终于摆脱了困难。不过，首相仍然担心英军不足以抵挡德军的最后一击。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不得不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亨利·威尔逊爵士。美国也开始进行全国动员。1916年，美国的陆军规模排名世界第17；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通过强行征兵制度增加了400万士兵，其中有一半人被派往法国。战争花费远远超过了自宪法颁布以来的所有联邦支出，国库在战争中疯狂发售“自由债券”，用于战争融资。政府还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威尔逊总统提名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负责管理，此人原来是一名记者。该机构招募了7万名“临时工”，出席全国各地的市政厅会议，共举办了750万场活动，向民众宣传“民主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德裔美国人遭到流放，德国泡菜也要改名为“胜利卷心菜”。政府1917年制定了《反间谍法》，1918年制定了《惩治叛乱法》，封锁了国内的批评声。警察和治安人员把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者和反战抗议者，很多人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被共和党政府释放。另一方面，战争动员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怀，他们能够通过服兵役以要求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大举进攻，这拉开了欧洲最后决战的序幕。大约在同时，德国开始使用飞机和齐柏林飞艇来攻击英国的城市，同时也使用了新式的镁铝合金燃烧弹，以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在东线，德军继续深入乌克兰。在公海，U型潜艇重创协约国的商船。几个月

间，战争胜负难料。不过，德军无法阻止大批美军穿过大西洋，德军的空袭也逐渐失去效力。在西线，英法两国任命元帅福煦（Marshal Foch）元帅为协约国最高司令，这也是两国第一次在军事上的成功合作。到1918年夏天，德军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进退维谷。1918年6月，美军参加贝洛森林之战，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8月初，英法两国在亚眠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称这次失败为“德军的倒霉日”。

1918年10月初，自由派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ce Max von Baden）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接受了威尔逊提出的民主计划。不久以后，协约国突破了坚不可摧的“兴登堡防线”。与此同时，协约国最终突破了萨洛尼卡战线，迫使保加利亚于9月底投降。英军在巴勒斯坦重创奥斯曼土耳其的防线，10月底，意军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中将奥匈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此时，奥匈帝国正在逐渐瓦解，帝国内部正在掀起一场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浪潮。德国新政府希望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之上与协约国进行谈判，并对协约国进行试探，以实现和平。10月底，基尔港（Kiel）的德国水兵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反对帝国海军当局，骚乱很快扩展到全国。德国爆发革命，德皇被迫宣布退位，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签订停战协定。

“一战”结束了，协约国的胜利有很多原因。一部分原因是，协约国在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方面有强大的优势，德国不能与之相比。消耗战消耗了德国的几乎全部兵力，1918年，美国和福煦给了德国以致命一击。另一个事实是，由于遭到封锁，德国国内资源几乎耗尽。不过，军队的数量并不一定决定着战争的结果。例如，尽管俄国有大批军队，但它依然屡战屡败。的确，从1914年战争爆发开始，只有英法两国顶着压力坚持到了最后。虽然法国于1917年发生了兵变，但是国家仍然团结一致，逃兵感到羞愧，也回到了前线。相比之下，同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因此被迫退出了战争。1918年，德军和奥匈帝国都自行瓦解了。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德国国内的社会不公变得更加严重，这导致民众大量死亡、人口减少；在奥匈帝国，民族对立严重，皇帝无法控制局面。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在战争中不断经受挫折，但只有它们完好无损地挺过来了。双方力量相当，协约国是险胜。

反对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围绕德国问题，协约国之间展开了斗争。关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不仅胜利的各国存在着分歧，英、法、美三国国内也存在着分歧。这场辩论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巴黎，在那里，人们计算了战争的代价：130万人葬身战场，300万人受伤，许多人终生残疾。超过100万的法国妇女和儿童沦为寡妇或孤儿，只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救济。法国的人口出生率本来就不高，战争期间出生率又骤降，而且很难恢复。法国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德国拆分成一些更小的国家。1918年10月，法国就要赢得胜利的时候，其外交备忘录上有这样一句话：“为确保持久的和平，必须毁灭俾斯麦的遗产。”即使不这样做，很多法国人也要求，在东部边境建立更大的缓冲区。法军最高司令福煦元帅发起了一次大型的新闻宣传运动，声称法国只有控制莱茵

地区，才能建立有效的缓冲区，才能保卫法国的安全。克里孟梭政府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样做会毁掉法国与英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最终，克里孟梭的意见占据上风。法国强迫德国签订了十分严苛的和约，目的是防止德国寻找机会报复。

然而，英国和美国怀疑法国在中欧地区的野心。两国相信，解决德国问题的最好方法并不是改变它的实力，而是改变它的行为。伦敦和华盛顿持相同观点，它们认为，威廉帝国之所以对外侵略，是因为德国国内缺乏自由主义。因此，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摧毁德国的独裁专制统治，并将自由民主引入德国。英国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在战后曾说："如果德国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它就不会再次上演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及其追随者那样的荒唐事了，这主要需要德国本国民众的努力，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外部的压力。"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顾问威廉·哈尔伯特·道森（William Harbutt Dawson）认为："不幸的事实依然存在，要想让德意志民族摆脱政治枷锁，不能仅依赖于其自己的意愿。"与很多英美国家的人的观点相似，道森认为，"只有外国进行干涉，德国原来的制度才能被根除，50年的时间已经证明，德国的旧制度是欧洲瘟疫的中心"。

此外，布尔什维克问题使得德国问题进一步恶化。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俄国的革命者认为，他们在1917年期盼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到来。列宁为此欢欣鼓舞，他说："德国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德国革命结束时，德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夺取政治权力……现在，即使是各国最盲目的工人都能看清楚，布尔什维克以全世界工人的革命作为根基，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他还说："俄国工人将明白，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为国际主义事业做出伟大的牺牲……客观环境会要求我们为德国人民提供帮助，这一天正在到来。"在《致欧美工人的信》中，列宁解释道："德国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德国的革命是极其重要而且典型的。"他认为，一旦德国将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欧洲其他国家也会效仿，但如果反动势力恢复了上风，就连俄国革命都不可能存在多久。因此，当"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成立并与"国际资产阶级"分庭抗礼时，这个新组织的官方用语不是俄语，甚至不是英语，而是德语。

而对协约国而言，他们陷入了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急于阻止其势力进入中欧新生的真空区。英国和美国很快便认识到，若想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德国加入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或者至少避免德国变为布尔什维克国家。1918年10月（甚至在战争还没结束时），美国国务卿兰辛就警告说："一定不能让布尔什维克控制中欧人民，一旦他们得逞，中欧将产生比普鲁士主义还要大的威胁，整个世界就将遭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丘吉尔呼吁"建立一个强大而又和平的德国，不攻击我们的盟国法国，但同时要让德国成为一座道德壁垒来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要建立一道堤坝，用和平、合法、美德以及忍耐，来反对来自东方的红色洪水猛兽"。

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确认了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命运，该和

约签订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5周年纪念日。协约国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求与战略关切，条约体现了各国之间的妥协。条约的目的在于抑制德国扩张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保持德国作为防止布尔什维克扩张的堡垒。德国放弃了所有殖民地，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石勒苏益格北部归还丹麦，奥伊彭（Eupen）和马尔默迪（Malmedy）被割让给比利时，而萨尔的未来则由全民投票来决定。在德国东边，德国放弃了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Wartheland），波兰复国，并且接管这些地区；梅梅尔起初由法国管辖，随后被移交给新独立的国家立陶宛；但泽被确立为一座“自由市”；对于上西里西亚的重要工业区以及东普鲁士的南半部分，波兰人和德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决定由全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总之，德国失去了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此外，德国还受到了其他形式的惩罚，如限制军备、被剥夺殖民地、支付赔款。莱茵兰和普法尔茨将被英国、法国、美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10年左右，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德国在形式上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德国。德国被禁止在边境附近修建防御工事；德国新的国防军的人数不能超过10万，并且完全由职业军人担任；德国不准采用征兵制以及其他形式的短期服役；德国不允许拥有飞机和坦克，大部分海军军舰将被移交给战胜国。从此，德国在军事上毫无招架之力，其最重要的河流——莱茵河、多瑙河、奥得河和易北河——都处于国际管控之下。最后，《凡尔赛和约》第231条规定，德国应该赔偿其他国家的战争损失，应以现金或其他方式支付赔款共计2　260亿马克。这样，欧洲的中心就被中立化了，并且由战胜国联合监管。

《凡尔赛和约》还成立了国际联盟，以支持欧洲新的领土划分。《国际联盟盟约》已经被写入了《凡尔赛和约》第一部分的前26条之中。国际联盟总部设在日内瓦，由国联大会和行政院组成。国联大会包括了全体会员国，行政院由5个战胜国组成，即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但德国和苏联都没有被允许加入国际联盟。联盟的初衷是遏制德国，同时也遏制苏联，其方式是保障《凡尔赛和约》的领土安排，同时严格执行削减德国军备的条款。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成员国应“尊重和维护……国际联盟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一旦发生任何侵略，或出现任何侵略的威胁或危险，行政院应提出相应措施，以保证各国履行上述责任”。总而言之，国际联盟的建立与垮台都与《凡尔赛和约》以及对德国的遏制政策相联系。

威尔逊总统并不想让国际联盟仅仅成为一个以遏制德国为目的的松散的“神圣联盟”。他始终希望，一旦德国表现出了民主政治的迹象，就应接纳其为完全会员国，国际联盟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遏制苏联。因此，威尔逊力图将中欧问题的解决看作是改变整个国际关系行为的一部分。威尔逊的核心观点是普遍性的裁军：《凡尔赛和约》清楚地规定了对德国的限制，但其目的是“为所有国家的普遍裁军做准备”。再者，国际联盟不仅是要改变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改变国内政府的行为，其方式是建立难民委员会、卫生组织、禁奴委员会、女性合法地位研究委员会及其他各种跨国机构。最重要的是，联盟保证了一系列双边的少数

族裔条约得以实施，以保护所有居民基本的宗教权、公民权和文化权。由于英国籍犹太人吕西安·沃尔夫（Lucien Wolf）在人权维护方面的努力，如今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能够享受到全面的公民权，并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机构的强制保护。这些权利继而被推广到了所有族裔。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族裔的权利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并不需要外力的支撑。各国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国内冲突，防止国际局势的紧张以致演变成战争。

尽管国际联盟创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欧洲的均势，但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德意志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崩溃了，但战胜国并不想让每一块领土碎片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那样做会导致有的地方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一旦这种做法成为先例，战胜国内部可能也变得不稳定，各种破坏活动会更加频繁。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样做会导致出现权力真空，迅速加剧大国之间的争夺与敌对。同时，这些土地也不能只被战胜国瓜分，因为威尔逊总统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将不会同意这样做。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托管”制度（或称“委任统治”制度），即国际联盟授权某一个协约国或其他国家来暂时管理原来战败国的殖民地和省份，直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完全做好独立的准备。显然法国极力反对这种制度，因为它希望占领新的土地，以扩张自己的人力资源，从而遏制德国。尽管如此，国际法明确规定，禁止托管国家在托管地上修筑防御工事或者训练部队，以防止有的国家借机扩张权力，防止国际均势被破坏。在此基础上，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外约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巴勒斯坦也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英国在那里代表国际联盟执行了《贝尔福宣言》。叙利亚（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成为法国的托管地。威尔逊和许多阿拉伯人的希望落空了，他们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者像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所设想的邦联国家。德国坚决反对整个托管制度，因为托管制度剥夺了它原来的几乎全部殖民地，并且没有分到任何托管地，德国强烈支持各托管地尽早实现独立。

无论对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1918年之后，欧美各国的国内政治都是由《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主导的。在德国，战争的失败、领土的丧失、巨额的赔款，都给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这是一次民族耻辱，深深地印刻在德国民众的心中，这可以与三十年战争或者拿破仑的侵略相提并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感叹说：“《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无法实现的，它是德国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也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推手。”德国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警告说，国际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对德国的围堵”。马克斯·韦伯劝告德国政府拒绝这个条约，即使德国被某个协约国全部占领也在所不惜，因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是侮辱性的，使得这个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成了残废。然而，德国军队领导人还是放弃了重新开战的念头，因为那样做将导致德国彻底失败，并且德国领土可能会被协约国瓜分。当下，德国人的头等要事是保障国家的完整，这也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要做的。德国国内示威运动、革命此起彼伏，威胁德国的统

一，也可能会为协约国的干预提供借口，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残酷镇压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领导的左翼起义，同时消灭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建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德国政府忍辱负重，勉强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然而，如果说战败与革命是对德国的致命威胁，那么它们也代表了一个机会——与联邦传统的决裂。之前很长时间，德国一直具有联邦传统，因此难以真正发挥其财政与军事上的潜能。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的军队永久统一起来。以前，这几个地区的军队难以统一指挥，只有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才能勉强接受统一的指挥。1919年10月，魏玛共和国成立了新的国防部，不仅对柏林、斯图加特、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的战争部门进行了整合，而且承担了以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职能。同样，在《魏玛宪法》通过之前的辩论中，起草了宪法大部分内容的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律师指出："德国人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我们要以一个帝国的身份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与世界打交道，这样才能维持德国的存在。"《魏玛宪法》缔造了一个更为集权的德国，各地区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尤其是财政权），这与1871年时大为不同。德国开始拥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财政权，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欧洲的权力均势。因此，1919年的德意志共和国要比1871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拥有更大的潜力。

此外，对于战胜国来说，《凡尔赛和约》其实并没有带来多少喜悦。法国无法再坚持把莱茵兰地区作为它的边境主张，转而接受将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劳合·乔治对法国承诺，一旦法国无端遭受来自德国的侵略，英国将对法国提供援助，不过这个承诺非常无力。福煦元帅强烈谴责：《凡尔赛和约》对法国来说就是一个"投降协定"，谁签订谁就是"叛徒"。和约在国民议会的通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19年11月的选举中，克里孟梭和他的"国家联盟"顺利赢得选举，这说明民众支持他的战争政策以及处理战败国的政策。从此，如何巩固胜利、如何进行国内重建以及如何修复战争的破坏等问题长期影响着法国的国内政治。法国一直强调德国应该支付战争赔款，一方面可以降低法国人的税收，另一方面可以让民众获得安全感，认为德国的威胁已经被遏制。法国政府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是增加人口数量，人口不足将致使法国未来容易遭受军事进攻，因此政府鼓励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以解决劳动力问题。工厂的托儿所、社会住房以及其他国家福利，不再服从社会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而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为目的。在经济领域，商务部长艾蒂安·克莱蒙泰尔（Étienne Clémentel）提出将英国与美国的制度混合，从而实现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的分配。这项建议旨在提高法国的生产率，使其免受自由市场的摧残。殖民地部长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起草了一份有关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发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以补偿法国目前在欧洲的损失。

在意大利，一些批评者称，"残缺的胜利"否定了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应有的收益。共和派报纸《意大利人》（*L'Italia del Popolo*）称："让我

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被打败了，被威尔逊的政策打败了，作为意大利人也被打败了。我们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领导的政府被迫下台，他的继任者弗朗西斯科·尼蒂（Francesco Nitti）面临着来自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挑战。邓南遮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诗人和冒险家，1919年9月，他从南斯拉夫人手里夺回了阜姆港（该港口位于今天克罗地亚的里耶卡）。与此同时，意大利民主政府正忙于解决《凡尔赛和约》产生的连带效应，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面临着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分裂。在同年年底的意大利大选中，自由执政联盟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而形形色色的扩张主义者及其政党十分猖獗。所有这一切的最大受益人是本尼托·墨索里尼。他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对经济发展进行干涉，同时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组织的法西斯政党“黑衫党”运动（成立于1919年3月）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承诺将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政策，以建立一个强势的意大利，提高意大利在国际上的地位。

英国对胜利的庆祝同样没有持续多久。战争结束之后，劳合·乔治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就像一名候选人所说的，战争结束是建立在“榨取德国，直到管子吱吱作响”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爱尔兰，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开始追求自治，开始他们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但很快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英国各地，数百万的退伍军人要重新找工作，他们的未来依然很不确定。此时，英国人已经激情消退，憎恶战争带来的损失。法国人怀恨英国、排斥英国，很多英国人开始觉得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认为德国需要复兴和重建。因此，1919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r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时，他只是推开了一扇已经打开了的门。凯恩斯曾经是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他认为对德国索要的惩罚性赔偿完全是对英国经济的自我惩罚。他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英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欧洲经济的普遍复苏，而这一切只能从莱茵河开始。迫使德国人以出口的方式支付赔款，将削弱英国产品的地位。此外，他还警告说：“《凡尔赛和约》中没有提到如何实现欧洲经济的复苏，没有提到如何使德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好邻居，没有提到如何稳定欧洲的新兴国家，也没有提到如何改造苏联。”

在美国，1920年，《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成为威尔逊总统所属的民主党能否连续执政的基础。他曾反问道：“我怎么可能拒绝《凡尔赛和约》呢？怎么可能打破世界的心脏呢？”《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规定，签约国应承诺保卫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威尔逊对此大加颂扬，他认为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主心骨”，应该承担“世界领导”的责任。威尔逊反对孤立主义，坚决支持加入国际联盟。但共和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共和党过去一直倡导国际主义。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等人批评威尔逊的做法，认为《国际联盟盟约》只是一些华丽的辞藻，是一个脆弱和无效的条约。同样，前共和党总统霍华德·塔夫脱（Howard Taft）虽然也非常支持第10条，但他并不同意威尔逊的做法。塔夫脱认为：“威尔逊承担的只是一种空泛的道德义务、一种良心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美国应该保护其他国家免受侵略，这是一种

绝对的责任。特别是，共和党认为，美国应该为法国提供实实在在的安全保护，防止法国被德国侵略，但威尔逊却对此表示反对。换句话说，共和党并不是批评国际联盟使美国卷入过多的国际事务，而是批评威尔逊政府做得还不够，既不全面也不有效。

最终，《国际联盟盟约》未获2/3以上参议员的支持，因此没有被批准。1920年，威尔逊身患重病，无法参加总统选举，结果民主党失去了执政权。因此，美国既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也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因此它不是和约的担保者。美国人可能没有打破世界的心脏，但他们肯定破坏了1919年巴黎和会所设计的地缘政治架构（该架构旨在遏制德国权势的复兴）。

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切基本上都尘埃落定了，一场根本性的地缘政治革命在欧洲发生，同时也波及全世界其他地区。大英帝国成为中东、中亚、非洲以及大洋洲无可争议的霸主。英国现在处于权力的顶峰，拥有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巨大的军工经济基础，足以为战争提供保障。在远东地区，日本已经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它要面对的是俄国、中国和美国。其中，俄国是一个欧洲帝国，中国积贫积弱，只有美国是日本的对手。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已经全部消失。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它们建立在原来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之上。最重要的是，虽然德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并且受到《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但它依然是欧洲除苏联外最大的国家，而且相对而言，它甚至比1914年以前更加强大。德国的东边和东南边，已经没有强大的帝国与之抗衡，而且1921年德国的钢产量是法国的三倍，人口也越来越多于法国。更糟糕的是，正如麦金德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书中警告的那样，“心脏地带”包括前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是一个“庞大的人力三角基地”，不受“海权”的控制，因此这个“心脏地带”成了对西方民主政治潜在的致命威胁。

在新的10年中，凡尔赛体系面临的挑战不断升级。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即将取得俄国内战的胜利，协约国准备撤出其海上干预力量。此时，列宁下令红军进攻其西边的邻国——波兰，波兰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指挥官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决定先发制人。4月下旬，波兰军队越过边界，快速推进并深入乌克兰境内，一个月后攻占基辅。弗兰格尔领导的“白卫军”从克里米亚向北直插。然而，1920年夏天，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发动进攻，将波兰人赶回了华沙。如果红军能突破波兰人的最后防线，就可以在波兰催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把德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界线就将移动到莱茵和鲁尔地区，而不是乌克兰。7月下旬，红军越过了布格河（Bug），德国工人拒绝为波兰人运送战争物资，就连德国保守派都幸灾乐祸地说，这是毕苏斯基应得的报应。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德国共产党人的言辞比之前更具有民族主义的特点。

看到此情此景，协约国受到震撼，它们向波兰派出了一个军事代表团。法国非常担心，一旦波兰战败，德国就可以兵不血刃恢复其1914年以前的东部边界。那样的话，德国将自称是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唯一堡垒，并以此为筹码来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军备限制条款。法国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波兰的革命，而是要让革命浪潮远离德国。不过，最终波兰工人并没有起义支持苏联，而是支持毕苏斯基击退红军。1920年8月下旬，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波兰军队在维斯瓦河战役中奇迹般地、决定性地击败了红军。1921年3月《里加条约》（Treaty of Riga）签订，暂时解决了东欧的边界问题。苏联不得不接受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但它重申了对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前沙皇帝国在高加索和远东的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波兰从立陶宛那里夺走了维尔纽斯，并继续占领。至此，争夺沙皇帝国遗产的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目前最严峻的挑战是德国的修正主义。德意志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帝国沦为受害者，它自己正在变成殖民地。德意志在海外的殖民地几乎全部被剥夺，很多德意志人生活的土地也不再隶属于德国，德意志本国成了英美“卡特尔”的债务奴隶。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柏林力求减少甚至免除战争赔偿，要求修正其领土，获得重新武装的权利，同时还试图加入国际联盟。同时，它还想参与托管海外领土，以获得与其他大国的平等地位。短期内，德国缺乏军事实力，但它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宣称自己没有支付赔款的能力。德国宣称自己对世界经济具有关键作用，一旦德国经济瓦解，那么中欧就有陷入战争的危险。逐渐地，德国希望利用自己巨大的经济潜力，迫使其他国家统一修改《凡尔赛和约》。柏林手中的另一张王牌就是苏联——如果德国与苏联合作并对波兰进行包围，那么德国将有可能说服莫斯科减少对德国内政的干预，而且会迫使西方国家更加有求于德国。德国试图同时打出上述两张牌——经济实力以及苏联，不过这样做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看，德国应该选择西方；而在战略上，德国应该选择东方。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德国始终面临着两难，这导致德国在地缘政治上高度矛盾的政策。

此时，苏联依然相信，资本主义世界对自己的包围将导致自己的毁灭。苏联开始采用双轨战略。为了给敌国造成麻烦，1920~1923年间，莫斯科在中欧地区数次煽动起义，尤其是在德国。同时，苏联试图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以分化协约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借此可以向波兰施压。1920年，苏联与德国开始了秘密的军事合作，以克服《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到20年代中期，效果开始显现。1922年，苏联与德国在拉巴洛（Rapallo）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个消息让伦敦、华盛顿尤其是巴黎的脊梁骨发凉。

在那时，在南欧，凡尔赛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并且掌握了意大利的政权。他承诺，不仅要解决国家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还要使意大利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他的野心是，通过“驱逐那些寄生虫”和打破“其他国家在地中海对意大利的封锁”，使地中海真正成为“意大利的内湖”。墨索里尼认为，意大

利需要开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间”，不仅应该获得一块关键性的领土，还应该获得能够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墨索里尼的战略会威胁到法国在北非的领地，也会破坏大英帝国的根基，因为此时通往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出口（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埃及）都处于英国的控制中，意大利的舰队目前无法自由出入地中海；同时，墨索里尼的战略也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领土完整构成了挑战。意大利独裁者自己也承认，要想实现这样的计划，就必须“与德国站在一起”。

协约国各大国商议如何对付苏联，它们达成了广泛的协议，认为必须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法国的鼓励下，1921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组建了“小协约国”，这样做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付匈牙利的修正主义，但法国希望这个组织也能有助于遏制苏联。同时，协约国还打算在俄国以前的边疆地区建立一个“东欧合众国”，不过该计划难以实现，最后不得不放弃。协约国还有另一个共识，它们认为墨索里尼是另一个威胁，意大利威胁到了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也威胁到了非洲和巴尔干的稳定。不久，1923年，意大利试图占领希腊的科孚岛，英国皇家海军介入并阻止意大利接管该岛，这就是“科孚岛事件”。最后，墨索里尼被迫让步，但这件事给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带来了头疼的问题，意大利的扩张越来越影响到两国的利益。

德国完全是另一回事。法国认为，苏联、地中海、东欧地区发生的各种动荡事件，背后都有德国的影子，法国认为德国利用各种机会给法国制造麻烦。不过，最主要的威胁还是直接来自莱茵兰地区。法军最高指挥官福煦元帅警告说，只要德国军官的核心力量被保留，德国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1920年，法国与比利时签订军事协议，1921年又与波兰签订协议，这样可以在德国的东侧制约德国。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军队曾经占领鲁尔的三个城镇，以此警告德国，要求德国不要拖欠战争赔款。而与法国不同，英国和美国则执行了温和的对德政策。1922年3月，美国表示，美军可以在一年之内从莱茵兰撤出。

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导致苏联国内发生了一场激进的变革。由于世界革命尚未到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农民达成和解，以发展经济。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内部凝聚力，以抵御外敌的进攻。1921年，苏联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保存余粮，允许有限度地发展自由市场，同时允许外国在苏联投资，以使苏联获得外国的技术。1922年1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议：“由于外国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干涉我们，因此我们有必要重建和恢复经济……努力与其他国家发展最快的、最广泛的贸易往来，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人员，允许他们开发利用俄国的自然财富，并以贷款的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对于苏联的安全来说，这些措施至关重要，苏联表示愿意支付前沙皇政府欠西方资产阶级的债务。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很乐意把绳子卖给我们，我们以后可以再用绳子勒死他们。”这句话虽然广为流传，但真实性有待考证。

英法两国力图保卫和扩张海外殖民地，以增强在欧洲的影响力。1919年1月，芒然将军（General Mangin）指出："法国并没有在地中海或撒哈拉地区停止扩张，它正在进军刚果……法国建立了一个比欧洲更广阔的帝国，在半个世纪内其人口一度达到了一亿。"法国拥有如此庞大的殖民地和军队，其真正价值在于以此来反对德国。在法国驻莱茵兰的军队中，有几万人来自西非和北非。对于这种做法，很多前协约国表示批评，种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纷纷表示谴责。H·M·斯万维克夫人（Mrs. H. M. Swanwick）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一名成员，她曾多次说过："为了全世界各种族的利益和实现所有妇女的安全，我们在一起集会，要求国际联盟禁止任何国家将原住民带到欧洲作为战争目的而使用，原住民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维持自己的治安。"法国对德国的占领，也在德国人心中留下长期的心理创伤。1920年4月，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曾对德国议会说："法国军国主义正在践踏德国的土地，塞内加尔的黑人正在糟蹋法兰克福大学和歌德的故居。"在德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法国殖民者对德国最致命的威胁，不仅反映在法国对德国主权的破坏上，更反映在对德国文化与"种族"完整性的破坏上。

到1923年年初，法国决定不再等待英美的安全保障，也不再期待德国会改过自新。英美原以为法国会一直保持克制，但现在法国决定采取强硬行动。法国无法接受现状，因为法国国内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它在经济与人口方面正在面临越来越糟糕的形势。因此，1923年1月，法国再一次以德国拖欠赔款为由，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重要城市，这一次很可能是蓄意而为。法国与盟国比利时占领了整个鲁尔地区。同月，立陶宛出兵占领了德国东部的梅梅尔，德国的大部分工业以及上百万的居民，都被外国控制了。在莱茵兰和普法尔茨，法国继续支持那里的分离主义运动。维尔海姆·古诺（Wilhelm Cuno）领导的政府以"消极抵抗"来回应法国的军事行动。德国政府动员民众拒绝与法国合作，支持民众举行罢工，以此来消磨法国人的斗志，使法国人感受不到军事上的优越感。法国的军事行动，在国际上遭到了公开批评。但德国政府还要向罢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同时，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混乱，这迅速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很多人陷入贫困，尤其是那些损失毕生积蓄的中产阶级。1923年8月，古诺受到民众的质疑，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担任总理。到9月底，德国政府已经精疲力竭，被迫取消"消极抵抗"，并且承认斗争失败。德国民众认为国家蒙受屈辱，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德国共产党再一次趁机发动革命，但没有成功。同时，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右翼激进分子——阿道夫·希特勒也趁机策划了一场武装政变，即"啤酒馆暴动"事件。但1923年11月政府镇压了这场暴动，希特勒被逮捕、审判并被关进监狱。

鲁尔危机使得各欧美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战略。而德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起义的失败，最终使得苏联领导层也转变其战略，不再试图推动世界革命，而是开始努力实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24年1月，列宁逝世，欧洲局势的变化以及苏联政策的调整，使得斯大林在苏联政坛占据优势地位。当时斯大林有三个竞争对手：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诺

维也夫以及尼古拉·布哈林。这三个人似乎依然支持推动世界革命，但斯大林可能很早就已经怀疑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在短期内，苏联开始采取了与西方和解的政策。因此，1924年苏联得到了英国的外交承认，1925年又得到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在德国，施特雷泽曼已经不再担任总理，但他在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的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开始意识到，“修正主义政治”已经难以为继，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破产。尽管施特雷泽曼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吞并那些原来属于德意志的领土，但他也清楚，现在的德国还过于孱弱，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或外交斗争来推翻《凡尔赛和约》。基于以上考量，施特雷泽曼打算放弃重新武装和金融欺诈，希望把德国的安全与整个欧洲的安全联系在一起，把德国的经济繁荣与整个欧洲的繁荣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才是摆脱《凡尔赛和约》束缚的最好方式。他计划通过金融上的互相依赖，来推动欧洲的合作，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德国与其他大国的平等地位。几个月后，施特雷泽曼说道：“当一个人欠下很多债务的时候，债权人会发现，一旦债务人垮掉了，债权人的生存也会面临危险。”换句话说，德国应该努力说服其他大国，它们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德国，否则它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对于法国来说，1920～1923年的那种直接的军事干预政策是无法奏效的。法国只能接受现实。用赔款问题来遏制德国，使得法国不得不付出极高的外交和经济代价。庞加莱（Poincaré）等强硬派认为，保持对德国的永久战略优势是非常必要的。鲁尔危机后，这些人的势力逐渐减弱，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等温和派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法国开始调整其大战略。之前，法国的战略是向莱茵兰派驻军队，将防线建在德国领土范围内；而现在，法国开始改变战略，准备在境内构筑一条防御工事，以确保本国安全。不过，当时法国更强调通过多边的政策来约束德国，即从法律、经济和政治上对德国进行全方位的限制，以抑制或者稀释德国残留的修正主义。

此时的欧洲，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倡导合作精神。1923年，很多德国和法国的精英，开始倡导建立一个“国际泛欧联盟”。1924年，“国际泛欧联盟”的创始人——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Count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创办了一份杂志，名为《泛欧论》（*Paneuropa*），他鼓励民众参与到无党派的运动中，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此时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类似的组织和出版物，它们号召欧洲人淡化分歧、摒弃民族主义、崇尚共同的遗产和价值观，并紧密团结，保护自己免于受到来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有时还要抵御来自美国物质主义的侵袭。康登霍维–凯勒奇本人的观点是团结欧洲，而不是反对美国：他主张效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欧洲的文化传统。几年之内，“国际泛欧联盟”在德国拥有了众多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德国议会议长、民主党主席和前经济部长。而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就是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当时的外交部长白里安则出任“国际泛欧联盟”的名誉主席。

对于英美两国来说，1923年的鲁尔危机说明两国有必要重新探讨德

国问题。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认为，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这件事说明法国依然有主导中欧的“历史渴望”。同样，1923年10月初，寇松曾经指责法国“企图主导欧洲大陆”。出于这个原因，伦敦拒绝承认所谓的“普法尔茨自治政府”，认为其仅仅是法国的傀儡。此外，1925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曾写道：“无论是法国摧毁德国，还是苏联与德国形成联盟并且主导整个欧洲大陆，抑或是有任何国家主导低地国家，都是对我们的巨大威胁，我们无法承担这样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解决方案，既要体谅法国的安全关切，又要承认德国的平等地位，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相互制约。此时，美国也在转变其对欧政策，英美两国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美国，农业和工业游说团体逐渐达成共识，正如一位发言人在1922年2月所说的：“我们的利益与欧洲利益不可分割，只有当欧洲重组完成，并拥有健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国内享受正常健康的时光。”此外，鲁尔危机导致中欧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如果英美两国不去填补，苏联就会去填补。

目前美国的外交是由共和党的国际主义者掌控的，他们希望通过积极的对外经济干预来寻求国际局势的稳定。1924年4月初，政府提出了一项由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起草的计划，旨在舒缓德国因赔款而承受的巨大财政压力，并允许德国向美国贷款，希望通过发展德国的经济来刺激整个欧洲的经济繁荣。这项计划终结了各国之间的零和博弈，避免各国再毫无意义地争斗下去，当然美国的目的也并非是要主导欧洲。1924年6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没有任何担当“世界警察”的想法。道威斯计划只是为了使德国在经济上能够获得独立，这样对美国有好处。1923年9月底，鲁尔地区的大资本家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邀请美国大使前往柏林，支持一场墨索里尼式的政变，企图颠覆共和制度。当时，华盛顿方面陷入恐慌，却拿不出什么方案来阻止右翼政变的发生。美国政府以为共产主义革命才是最具有危险性的，却从来没有想象过，保守主义者居然也会发动政变。美国共和党的国际主义者们仍然试图维持德国民主政体的稳定，只要德国稳定，中欧就可以稳定，就可以遏制布尔什维克的扩张。此时的美国并不想控制欧洲，而是要阻止欧洲国家再次威胁世界的和平，尤其是要阻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兴。

一年后，1925年10月，张伯伦、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缔结了《洛迦诺公约》（Locarno Agreement），旨在实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之间互不侵犯，英国和意大利是这个条约的保障国。德国接受了西边领土的现状，放弃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作为回报，国际联盟接受德国为成员国，各大国承认德国的平等地位，尽管德国依然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反对苏联的集体军事行动。为了安全起见，1926年4月底，施特雷泽曼还与苏联签订了友好中立条约。这些安排与道威斯计划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尝试，旨在解决德国的地位问题，为稳固欧洲的稳定奠定基础。一种新的合作精神备受推崇，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被认为是两位新的和平精神的缔造者，他们被共同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洛迦诺，白里安宣称“欧洲

大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各种问题”。但事实上，只有西部解决了问题，英国拒绝向法国、比利时、东欧和中欧做出安全承诺。张伯伦学着俾斯麦的口吻声称：“英国政府不可能会让自己的近卫步兵团冒一丝一毫的危险去保卫波兰。”事实上，德国明确拒绝承认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这表明德国企图在不远的将来寻找时机改变其边界。只有时间能够证明，欧洲的和平是否如《洛迦诺公约》签订者们所相信的那样不可分割。举个例子，美国驻英国大使不同意这种解决边界问题的方式，他预测这只会“确定下一次战争的起点”，也就是说，下一次战争将在波兰和德国的边界线上爆发。

在接下来几年中，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主导了欧洲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在德国，施特雷泽曼努力使这两项内容在议会通过，但他受到了右翼势力的谴责，这些人说他向协约国——特别是向美国人和犹太金融家们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共产主义者则指责他将把整个德国变成国际资本家的奴隶。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的宣言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开始产生影响力。这本书将国际政治描述成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认为这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支柱”。希特勒认为，德意志帝国正处于危险之中，苏联、中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形成了几个巨大的陆块，它们使德国变成了侏儒。他表示：“这些国家在空间范围上都是德国领土面积的十几倍。”的确，希特勒认为：“如果仅仅从领土的角度来看，与那些所谓的世界强国相比，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好像是完全消失了。”因此，希特勒声称，“恢复1914年的领土边界”是一个政治谬论，因为“1914年德国领土一点都不合乎逻辑，它既不能完整涵盖德意志民族，也不利于地缘军事的权宜之计”。如果德国仅仅想恢复1914年时的领土，只会让德国退回到“一战”之前的那种困难局面，德国的领土将永远被世界大国所包围。

希特勒认为，解决方案是“在增加国家人口与提高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创造一种健全、可行、自然的关系”。德国应该由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来领导，“必须努力消灭人口与空间之间的比例失调”。这意味着，德国东边的土地与土壤——俄国及其附庸国应该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那里，德意志人能够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这样可以扩大领土，与其他大国相抗衡。争夺生存空间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希特勒为此规划了国内的先决条件：将全体德意志人联合起来，以主张德国的生存权利，去除那些“有害”的元素，以防止人民的堕落与受到迷惑。这里所说的有害元素，主要是指犹太人，希特勒认为犹太人不仅威胁到了德国的种族纯度，还是国际财阀和共产主义阴谋的直接幕后推手。因此，希特勒非常强调外交与内政的不可分割性。

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使得苏联和波兰深感不安。在莫斯科看来，欧洲主要强国之间的和解就是一项针对苏联和波兰的阴谋。同时，中欧的国际局势变得更加恶化。正如《消息报》在1925年5月所指出的，苏联害怕“德国明确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并加入国际联盟，客观上，这只会引起德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不过，国际形势的变化，增强了斯大林在苏联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使

得他在党内的地位得以强化，同时也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洛迦诺公约》引发了波兰的一场危机，西方强国似乎同情德国修正主义，反而抛弃了波兰。波兰最为担心的是，德国会利用其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身份，来修改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款，这将不利于波兰的利益。曾经担任波兰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毕苏斯基元帅指出："任何一个诚实的波兰人，在听到'洛迦诺'这个词语后都会对此嗤之以鼻。"1926年4月，当施特雷泽曼与苏联签署友好中立条约时，波兰人感到危险更近了，因为波兰受到了德国与苏联的包围。一个月后，毕苏斯基元帅发动了政变，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使波兰在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此时，波兰人对各种少数族裔（包括德意志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越来越恐惧，波兰人认为这些少数族裔不忠诚于国家。1926年甚至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很多犹太人被迫出逃，其中有一个名叫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年轻人逃到了巴勒斯坦，后来他成了以色列的总理。

新的欧洲解决方案彻底改变了大英帝国。1925年，当帝国防务委员会讨论欧洲安全公约问题时，英国政府迅速意识到，在解决这项问题之前，必须先和各自治领进行商议。如果不这样做，英国的国防政策就很有可能会陷入"瘫痪"。1926年1月，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起草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泛不列颠"帝国组织，以应对德国力量的复兴、阻止"欧洲的巴尔干化"并且压制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崛起。因此，1926年10~11月，帝国会议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英国、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爱尔兰自由邦的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会议承认，各自治领拥有平等的地位，各自治领有权自由退出大英帝国。作为交换，所有出席会议的政府首脑——除了爱尔兰自由邦的领导人W·T·科斯格雷夫（W. T. Cosgrave）——都承诺，一旦发生战争，会对英国提供帮助。不久之后，各自治领开始正式协商与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威斯敏斯特法案》的制定，正式确认了各自治领与母国之间的平等地位。一个崭新的大英帝国出现了，各自治领同意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意见统一。

《洛迦诺公约》确立了国际政治的全新合作框架，这缓解了西欧的紧张局势。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在经历数次争论后，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一年后，驻扎在莱茵兰的国际军事委员会终于撤出。但是，法国人很快就发现，法国的安全顾虑与德国的平等需求是不可调和的。《凡尔赛和约》明确要求，德国应该放弃武装，并且全世界各国应该普遍裁军。尤其是法国，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它做了很多努力，希望永远使德国处于战略劣势。法国认为，要想阻止德国这个邻国将巨大的人口和军事工业潜能转化为实际的国力，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德国的经济实力被大规模削弱，法国的安全与欧洲的稳定才能得到保障。面对法国的要求，德国显然感到很憎恶，英美两国也觉得很过分。法国一位官员曾说："我们很难要求克虏伯军工厂停止运营，只去生产犁，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它就可以立即生产枪支。"此外，与法国的预期相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裁军。1927年夏天，各海军强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未能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

怪乎德国现在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并要求其他国家承认自己的军事平等地位。

白里安认为，自己可能会与施特雷泽曼的关系破裂，同时他还担心美国会对欧洲事务不管不顾，因此1927年4月他造访了华盛顿，建议法、美两国间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法国人确实需要美国来为欧洲的现状提供担保，但华盛顿坚持认为，仅仅与法国签署条约没有什么意义。美国要求签署一项范围更广的条约，希望所有大国都能来签署。最终，1928年8月，白里安与美国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Frank B. Kellogg）签订了著名的《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宣布除非是自卫，否则，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是不合法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项公约，这与美国长期倡导的非强制性国际合作理念非常一致。根据凯洛格的要求，这项公约并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因此每一个缔约国都非常清楚，自卫权是可以进行十分宽泛的解读的，事实上该公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力。举个例子，就像法国在1920年和1923年所做的那样，为了防止德国重新武装而占领了德国的部分地区，这时德国是否应该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主权？显然，法国和德国都可以说自己正在进行自卫。这次，美国又没能解决德国问题。同年，法国国防部长安德烈·马其诺（André Maginot）批准了法国东部边境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建设。仍是同年，法国回到了金本位制，继续扩大黄金储备，到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黄金储备国。法国试图以此获得更大的经济优势，以更好地对付德国。

克里姆林宫同样十分怀疑《非战公约》能否真的有利于国际和平和国际友好。相反，苏联领导人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革命长期存在下去，那么苏联就必须调动所有的国内资源，以驱逐一切入侵者。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宣称：“战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而苏联只有很少的时间来为战争做准备。”苏联加强了对青年人的军事训练。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明确提及了苏联遭受其他国家进攻的可能，因此苏联必须抓紧时间实现工业化。这样，新经济政策以及农业生产中的自由市场都被抛弃了，苏联决定不再依赖外国专家和外国供应商。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以生产出过剩的食物，用以养活工厂中的工人们。这样，工厂就可以不断生产出武器装备，以保障苏联的安全。要建立集体农庄，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很多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因而被枪决。农民们将农业集体化称作是“第二次农奴化”，农民成为新的农奴，以满足国家的外部需要。因此，1927年和1928年与1917年大不相同。这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而这场转变是为外交政策服务的。“斯大林主义”开始诞生了。

道威斯计划和《非战公约》是希特勒在1928年撰写其第二本书时的背景。这本书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出版，通篇谈论的都是外交政策。这本书展示了希特勒自1923年底写完《我的奋斗》之后，他的战略构想是如何形成的。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经济进行广泛的介入，随着德国在工业和文化上逐渐强大起来，希特勒开始越来越关注美国的权势。他指出，德国国内的人口已经达到极限，而美国由于具有庞大的领土，“美利

坚联盟”还可以继续增长几个世纪。他接着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是高质量的种族，它制定了特殊的移民政策，而旧的欧洲在人种上越来越堕落，无法与美国相比，这逐渐导致美国人可以决定世界各国的命运。”有的人希望欧洲模仿美国，建立一个联盟，以使欧洲免受美国霸权的威胁。希特勒对这种“泛欧洲”的理想嗤之以鼻。他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种族“价值观”，一切都会适得其反；如果没有正确的种族政策，那么即使是一个强大的欧洲，也会成为犹太人的势力范围，欧洲各国会成为犹太人的奴隶，永远不可能与“美利坚联盟”相匹敌。这就是希特勒对施特雷泽曼、白里安和康登霍维–凯勒奇的回答。没有其他办法：德意志人几乎不可能与美国人抗衡，除非德意志帝国能够将自己的领土“大规模地向东扩张”。

1928年8月，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再次看到了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当时华盛顿宣布了一项由银行家J.P.摩根（J. P. Morgan）和欧文·杨格（Owen Young）提出的用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新计划。但是，几个月后，1929年10月底，华尔街股市爆发灾难，摧毁了美国的经济中心。这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十分深远：美国在欧洲的利益被彻底削弱；美国被迫收回了很多对欧洲国家的贷款，这些贷款是魏玛共和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保障解决德国领土问题和赔款问题的基础。“杨格计划”中设立的国际结算银行受信贷危机的影响而遭到削弱。美国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依赖于美国市场和资本的欧洲经济也遭受了一场剧烈的经济衰退。然而，尽管股市崩溃及后来的经济萧条造成了破坏损失，但这还不足以将欧洲和美国拉入深渊。恰恰相反，真正给世界经济带来致命打击的是一场中欧霸权竞争。

到1929年年底，德国的国内政治开始变得右倾化，这并非因为华尔街的崩溃，而是因为一些德国人试图抵制杨格计划。希特勒以及报业巨头、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客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fred Hugenberg）等人对这项赔款计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新的巴黎强制命令”，按照这个计划，德国要一直赔款，直到1988年，德国人在整个世纪都要沦为他人的奴隶。尽管右翼分子在大选中得到的支持率还很低，但关于赔款问题的辩论，使得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这些人想继续通过选举动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最终夺取政权。1930年3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杨格计划，但民众依然有不同的意见。希特勒决定以此为契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竭力提高席位数量。6个月后，在议会选举中，经济问题不再是主导议题，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赔款问题和重新武装问题。最终，纳粹党获得了将近20%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此时，德国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势，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只能靠颁布法令来勉强维持秩序。

法国对这一切表示警惕。白里安现在做出了最后尝试，试图保持各大国的稳定平衡关系，以阻止德国的野心、保证法国的安全。他建议将欧洲联系起来，法国可以让渡一部分主权，以使欧洲其他国家同意永远一致行动，限制德国的权力。1930年5月，白里安公布了一份“欧洲联邦联盟”的详细计划，这就好像是一个拥有常设执行机构的“欧洲会议”。整

个计划的核心是经济合作，但是白里安强调“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要由安全问题严格决定”。但是，英国拒绝参加这项计划。整体上看，德国对此也相当冷淡，仅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士那里获得了一些支持。德国国务秘书冯·比洛（Von Bülow）认为，该计划只是法国试图在德国身上施加“新的束缚”的又一次尝试。相反，德国更愿意巩固在中欧的权力，特别是强化与奥地利的合作。1930年7月初，德国政府拒绝了白里安提出的计划。

很快，巴黎和柏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30年8月底，德国外交部部长，朱利叶斯·库尔修斯（Julius Curtius）提出了一项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税联盟计划，旨在将更广阔的东欧及东南欧地区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先是奥地利，然后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甚至可能连波兰也包含其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欧洲的很多地区将在德国的领导下实现经济统一，这是白里安要坚决制止的；同时，德国与奥地利可能会在实质上合并，这是《凡尔赛和约》明令禁止的。到1931年3月中旬，库尔修斯在维也纳签署了协议。一个月后，一位德国高级外交官希望用强制的手段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联盟；他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该联盟，会对波兰形成包围之势，这使得德国能以强势姿态解决东方边界的领土争议问题。作为反击，法国试图大幅提升经济实力（与1929年后的英美相比是增加了），因此在1931年5月击垮了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即维也纳信贷银行。这引发了德国银行业的危机，将整个国家引向了经济崩溃，而这最终又加剧了美国的经济萧条。法国摧毁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前一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00万，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0多万，而且还在继续上涨。类似地，美国1930年的失业率高达9%，但在1931年底则上涨到了16%，到1932年则到了24%，形势非常严峻。换句话说，引发经济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欧洲地缘政治危机，而非其他事件。

现在，各国都指望着能在下一轮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有所突破。1932年2月，会议召开，很多人都不知道柏林和巴黎双方能否达成一致，使双方都满意。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安全保障，法国不可能承认德国在军事上的平等地位；而一旦谈判破裂，德国政府就会重整军备，并大规模扩军。两国正在进行一场竞赛，德国力图获得军事平等地位，它正在全力以赴。德国总理布吕宁坦陈，他希望德国能够在外交上获得成功，这样就可以缓解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分歧。法国坚决反对德国与奥地利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并且阻止德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实现其诉求，这使得布吕宁受到德国国内右翼势力的猛烈抨击。1932年5月，布吕宁不得不下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失去了国防军与总统兴登堡的支持。然而，很快，就在他下台后不久，英、法、美三国在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承认了德国的军事平等地位。这位总理过去曾经说，希望自己不要“功亏一篑”，他所指的就是军备扩充问题，而非经济复苏问题。然而，对于他自己来说，他还是“功亏一篑”了。

1932年7月的选举中，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他利用了人们对失业率持续增长的不满，以及人们对《凡尔赛和

约》的憎恨，使自己成功赢得了选举。不过，这次选举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数超过半数，因此兴登堡决定任命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为总理。此时，军备扩张是德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巴本决定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巴本向法国和波兰示好，改变了洛迦诺会议中的立场，表示承认其东部边界，并且愿意提供安全保证。同时，巴本还愿意与两国合作，共同对抗苏联。他还同意与两国建立关税同盟，以换取法国同意彻底取消对德国的赔款索求，并承认德国军备上的完全“平等”地位。在1932年6月和7月的洛桑会议上，各国宣布取消对德国的赔款索求，德国只需再支付最后一次赔款。但是，法国拒绝在军备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允许德国在莱茵兰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希特勒领导的民族主义右翼以及共产主义者，都严厉抨击巴本，称他是“投降者”。当时的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甚至对巴本表示蔑视，称这是一次“战败”。1932年12月初，兴登堡免除了巴本的总理职位，但新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是政治僵局更加严重了。尽管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失去了几百万张选票，但它依然是议会第一大党，同时，共产党的得票数明显增加。兴登堡任命施莱谢尔为总理，希望他能勉强维持政府的运作。尽管民族主义者和国防军批评施莱谢尔的政策，但他依然拒绝全面扩充军备；尽管日内瓦会议原则上允许德国这么做，但他依然决定暂缓执行。1933年1月，兴登堡罢免了施莱谢尔，决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被很多人给予厚望，政客们希望他能统一国内的各种意见。他把那些自己信任的保守派分子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目的是让德国复兴，并且成为大国。因此，纳粹党之所以能控制德国，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大萧条，更主要的是与重新武装问题相关。同时，由于很多德国人坚持修正主义，使得希特勒成为受益者。

希特勒之所以能掌权，是因为民众和精英希望推翻《凡尔赛和约》，而他响应了大多数德国人的诉求。此时德国人普遍认为，德国是欧洲的中心，它被四周潜在的敌人包围，因此需要更多的领土来抵御外敌。然而，德国1919年的领土使其根本无法抵御外敌。很大程度上，希特勒是普鲁士——德意志几百年的战略传统的拥护者。然而，希特勒并不满足于传统的战略思维，而是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地缘政治思想。他认为，多数民族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的要求并不能使德国变得更安全，他们仅仅是要求很小的领土变动。他坚持认为，只有夺取东部的“生存空间”，才能获得大片重要土地，才能使德意志帝国在由法国、大英帝国、苏联、特别是“美利坚联盟”主导的世界中存活下来，而那些国家又都受到犹太人的操控。这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不过希特勒的野心并非没有边界。他并不想获得全球霸权，但他坚持认为只有向东扩张领土，才能使德国保持独立，从而避免被其他世界大国所控制。他曾说，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就消失。事实上，这种说法并非不切实际和傲慢自大。这句话反映了他的信念，即如果德国不能获得足够的土地，它就有被吞噬的风险。他希望德国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犹太人”的大决战，将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在他自己死后。

希特勒现在开始改造政府和社会，为战争做准备。他上台后不久，

德国议会大厦发生了共产党人的“纵火”案件，希特勒以此制造民众对共产党的仇恨，宣布取缔共产党。同时，他还对其他党派实施一系列高压强制措施，很多人被抓进了集中营。1933年3月初，议会在一片恫吓和恐怖的氛围中重新进行选举。尽管纳粹党获得了更多的席位，但仍未达到议会多数。希特勒相信，他能够得到民族主义右翼的大力支持。尽管天主教中央党不是很支持希特勒，但很快也不得不屈服于希特勒的淫威。1933年3月底，国会投票通过了《授权法案》（Enabling Act），赋予希特勒非常巨大的权力。他实际上成了最高法律的制定者，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而无须征求议会的意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纳粹党进行了所谓的“一体化”，将所有地区、所有行政机构以及所有社会机构都纳入严格的控制之中。纳粹党还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机构，如冲锋队、党卫队，其势力遍及全国，用以镇压反对人士。到1933年年中，尽管希特勒尚未获得绝对权力，但他已经在德国建立了非常稳固的统治。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任何人都难以推翻其统治。

早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德国就已经开始重整军备，现在更是加快了速度。希特勒扩充德国国防军，大力发展坦克、飞机等武器，这些都是《凡尔赛和约》中禁止德国拥有的。1934年，希特勒下令处死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hm），因为罗姆试图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希特勒反对用冲锋队代替国防军，主张扩充国防军，并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为巩固其统治，他开始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与改造。希特勒狂热地相信，德国只有实现了内部统一和种族净化，才能在即将发生的斗争中存活下来。他强制要求部分民众参与义务劳动，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并进行军事动员。他宣扬，只有通过全民动员，才能消灭阶级之间的矛盾，使德国社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或者“种族共同体”，这个社会中只有“民族同志”，而没有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他鼓励妇女结婚、居家和抚养下一代德国战士。希特勒声称：“妇女每生一个孩子，都等同于一场战斗，这是一场为了民族生存的战斗。”他要求所有未结婚的男性和女性缴纳“单身税”。希特勒还试图与教皇缔结一个协定，以消除德国天主教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之间的矛盾。最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坚决反对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威胁德国的凝聚力，将其看作德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他禁止犹太人在政府中任职，并限制其经济生活。不过，当时他没有立即对犹太人采取更为极端的政策，因为他担心刺激英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也担心引发“世界犹太人”的报复。

起初，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参与国际政治。由于德国尚未完成重新武装，因此他担心在此时受到其他国家的进攻。1933年2月初，在一次对军官们的讲话中，希特勒表达了对法国及其“东方盟友”的担忧，他害怕这些国家在德国完成转型之前就发动进攻。年底他又说：“如果这些国家得知德国正在策划一场战争，这将会对我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情报部门报告，波兰可能正在筹划对德国的进攻。因此，希特勒采用了多种手段，如蒙骗、安抚、引诱，尽量淡化一些军事色彩，以蒙蔽其他国家。法国和英国受到了蒙骗，他们认为德国空军的实际力量并不怎么强大。1934年1月，希特勒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此突出法国和波兰对德国的包围。不过，希特勒还是明显暴露了自己的侵略意图。他终止

了与莫斯科的秘密军事合作，日内瓦裁军谈判无果而终，不久他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此外，他还授意奥地利纳粹党，令其鼓吹德奥合并。1934年7月，奥地利纳粹党认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决定发动政变，尽管政变失败，但他们成功刺杀了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希特勒决心振兴德国，主导欧洲中部，并摧毁凡尔赛体系。此时，他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德国的政策引起了其他欧洲大国的恐慌。1934年，希特勒对奥地利的阴谋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反对。为阻止希特勒的行动，墨索里尼向奥意边境的布伦纳罗山口（Brenner Pass）派遣军队，希特勒随即后撤。苏联领导人逐渐对纳粹警惕起来，他们读到了《我的奋斗》，尤其是"俄国及其附庸国"那一部分使苏联开始对纳粹的意识形态表示担忧，认为纳粹的侵略矛头直指苏联。1933年，一位资深的共产主义宣传人士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警告说，希特勒正在"推翻凡尔赛体系"。斯大林以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试图建立一个安全相互保障体系，以约束希特勒的行动，必要时可以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来遏制德国。因此，苏联在1934年加入了国际联盟。同年，共产国际决定不再与社会民主党为敌，并呼吁整个欧洲结成一个"反法西斯阵线"，团结各个党派来应对希特勒。同时，苏联也开始试探英国与法国的态度，发展外交关系。然而，苏联依然感到不安，它担心西方各国可能会与希特勒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它必须小心翼翼地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往来，以防止它们走得太近而对苏联不利。

毫无疑问，对巴黎、华沙和伦敦来说，希特勒的德国的确是一个威胁。1933年3月，波兰占领了但泽旁边的维斯特布拉德半岛（Westerplatte），以此表明捍卫领土的强烈决心。波兰甚至曾严肃地考虑，趁德国军备扩充完成之前，与法国联合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不过法国对此却并没有兴趣。1932年12月~1934年1月，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他试图让法、英、意、德四国签订一个协定，以保障和平，不过这项努力失败了。之后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路易·巴都（Louis Barthou）也支持类似的计划，他认为要想解决问题，就应与苏联结盟来反对德国。1934年9月中旬，他帮助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该组织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在伦敦，1934年2月，军需部曾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尽管日本和意大利也是英国的严重威胁，但德国才是英国"最大的潜在敌人"。英国的当务之急是防备德国，而不应将精力分散到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1934年7月，英国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一旦欧洲大陆发生战争，可以及时调动军事力量进行应对。不过，当时英国内阁与议会中很少有人主张竭尽全力地用武力对抗德国，只有温斯顿·丘吉尔等少数有识之士主张这样做。当时丘吉尔所属的政党并没有执政，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德意志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是西方世界最强有力、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德国人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希特勒，我们更应该全力反对德国，不可延误时机。德国的空军已经强大起来，很多人越来越担心。正因为如此，1934年7月，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一次关于英国皇家空军是否应该扩大规模的辩论上对议会发出警告："自空军出现的那一天

起，国境就不再有意义。”他继续说，“当你想要保卫英格兰时，你想到的不应该是多佛的白色悬崖，而应该是莱茵河，那里才是我们的国界所在。”

在大西洋彼岸，当时希特勒引起的恐慌相对较小。1933年1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不希望因为分散注意力而破坏了自己恢复国内经济的计划。此外，他的密友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坚定地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基础，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为了制约德国和日本，罗斯福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1933年11月承认了苏联。无论如何，尽管在1933～1934年，希特勒已经表现出了军事侵略的欲望，但当时西方各国并未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也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战线。它们从未想过要推翻希特勒或者使用武力来恢复德国的民主制度。

同样，纳粹的威胁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立即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意识到，如果不能应对侵略，那么他在国内的权威就会受到削弱。他在1933年说道：“如果人民感受到了遭受战争的危险，而政府又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那么人民就不可能尊重这样的政府。”因此它进一步强化了对共产党和民众的控制。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苏联已经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现在斯大林决定加速集体化，但这导致了1933年乌克兰的大饥荒。同年，斯大林开始进行“大清洗”，很多人被定为“叛国罪”。其中，曾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列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被处决，季诺维也夫则被指控伙同国外法西斯和托派分子反对苏联。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进行了多项运动（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击那些被怀疑与外部敌人勾结的团体。在莫斯科，针对如何对付希特勒的问题，高层领导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集体化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等人，对李维诺夫的政策表示质疑，他们反对与欧洲国家结盟，也反对通过国际联盟来制约希特勒。此时，斯大林支持李维诺夫的政策，但没有人比斯大林自己更清楚：当苏联面对外敌威胁的时候，斯大林在国内的权力是最稳固的，而一旦外敌消失，他的权力可能就会遭到削弱。

希特勒的崛起也明显影响了英法两国在1933年之后的国内政治。1933年10月，在竞争激烈的东富勒姆补缺选举中，民众大多支持和平主义，反对英国扩军备战，因此，反对扩大军备开支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在1935年的大选中，两大主要政党都反对大规模扩充军备。工党力量不支，最后获胜的是保守党。新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后来曾承认，一旦他在选举中稍微改变其立场，他就会失败，甚至变得臭名昭著。民众之所以对战争犹豫，是因为很多人害怕遭受空袭，人们认为空袭会导致数十万人的伤亡。在下议院中，辩论的主要议题是外交政策以及备战策略。媒体、议会以及很多公共利益集团都已经精疲力竭，很少宣传提高对空军的投入；不少人希望可以通过海军封锁来最终打败希特勒，因此不必扩大空军。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关心欧洲的力量均势，也很少有人愿意为维持欧洲均势而投入巨大的

精力。在公众看来，上一代海军至上主义者推崇的“蓝水”政策，已经被“蓝天”战略取代，旨在尽可能减少英国对欧洲事务的介入。

在法国，1934年2月，在巴黎的法国众议院（下议院）外面，爆发了数次大规模的右翼骚乱。左翼人士将这些骚乱看作企图建立纳粹或墨索里尼式独裁统治的尝试，因此左翼积极响应莫斯科所提出的建立“人民阵线”以抵御法西斯的号召。1934年6月，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签署了一项联合协定，一个月后部分激进派也加入其中。与英国不同，法国的左翼政党迅速改变立场，认为必须靠武力才能反对纳粹。问题在于，这时的法国社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和平主义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很多人对战壕有着惨痛的回忆，因此普遍具有“对战争的恐惧”。新闻界的很多重要部门都被德国和意大利所用，教师和工会成员们都强烈反对与希特勒发生军事对抗。在法国，有将近1/3的入伍男性都被认定不适合服兵役，而德国士兵则身强体壮，不适合服兵役的只有不到1/6。因此，英法两国都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民众怀疑民主制度是否足够强大到能够战胜独裁者，或者说这样做是否值得。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不少人支持右翼，他们同情法西斯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更好地表达出国家意愿。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打败希特勒，那么就支持他。

独裁者们的挑战还影响到了英法两国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关系。1930年年底，英国财政部副大臣沃伦·费希尔（Warren Fisher）曾指出，大英帝国的首要任务是“制约几个世纪以来深受野蛮权力哲学的影响的日耳曼部落”。另一方面，英国尤其应该获得各自治领的支持，这对于打败德国至关重要，但这并不容易。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的民众中，仍然有很多人怀疑是否有必要与德军对抗，以及这么做是否是明智的。尤其是很多人担心，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威胁。一些地区的民众（如南非白人和法裔加拿大人）反对英国的战争政策，因此英国无法依靠这些人。魁北克领导人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警告说：“绝不允许大英帝国将加拿大拖入任何新的战争。”193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India Act），同意国民大会党的要求，允许印度实行省自治。当时的印度次大陆依然是大英帝国的战略储备地，伦敦支付管理印度的部分费用，伦敦依然能够调配印度的军队或劳动力，用于管理其整个东西方的属地。

与英法两国不同，美国在1933年之后的第一年中几乎没有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突变的影响。可以确信的是，经济大萧条的痛苦经历意味着美国人已普遍对民主的前景感到焦虑。不过，与欧洲不同，美国只有极小部分人支持纳粹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不过，美国人也并没有将独裁者看作一种威胁，至少当下不是威胁。此时很少有美国人呼吁与欧洲民主国家保持团结，也很少有人呼吁保护犹太人并使他们不受歧视。罗斯福总统政策忙于“新政”，这是一次国家干预经济的巨大试验，他并没有打算让美国社会为下一次冲突做好准备。他提到的“战争”是用于对抗大萧条的，而不是对抗邻国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罗斯福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如设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公共事业振兴署，并制

订了其他旨在帮助美国摆脱萧条，或者至少缓解萧条影响的计划。某些重大工程的建设，并非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这在所有大国中可能是第一次出现。

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宣布建立新的纳粹国防军，将编制从10万人扩充到至少50万人。他还公开宣布扩建空军力量。这些举动都是在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德国完全实现了重新武装，因此这有可能完全改变整个欧洲的力量平衡。这一次，其他大国反应迅速。4月中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结成了“斯特雷萨阵线”，表示将捍卫《洛迦诺公约》和《凡尔赛和约》，并遏制德国的进一步扩张行动。5月初，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一个相互援助协定，尽管该协定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样，德国就处在了1917年以来最严峻的包围圈中。此时，希特勒需要迅速做出行动，以防止自己被包围圈收缩得更紧，防止他所推行的军事化转型被扼杀在摇篮里。他必须想办法突破包围，避免德国再次受到压制。

1935年6月底，希特勒的努力有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其他国家的反德阵线。他说服英国签署了一项海军协定，在协定中，他宣布放弃收回德国的殖民地。此外，他同意将德国海军规模限制在不超过英国海军的1/3，承诺不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争，明确承认了英国海军的优势地位。此时的英国海军仍然具有优势，对于英国来说，用军控协议来牵制德国可以算作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也有人认为，英国这样做是在逃避其对欧洲大陆的义务，这仅仅是防御性的政策，不能有效遏制德国。因此，希特勒用这种办法，破坏了英国在斯特雷萨阵线中所做的承诺。不过，在1935年10月之前，德国始终处于极其危险的局面之中。10月，墨索里尼误解了斯特雷萨阵线的精神，他试图通过入侵埃塞俄比亚来实现意大利的强国地位，同时增加其在英法两国面前炫耀的资本。但令他震惊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政府遭遇了巨大的民意压力，因此强烈反对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尽管如此，两国并未要求国际联盟对墨索里尼实施有效制裁，尤其没有对意大利进行石油禁运，因此墨索里尼得以继续猖獗。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则对意大利在非洲的野心公开表达了同情，同时他还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承认意大利对南波尔扎诺（South Tyrol）的主权，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领土问题。这样，斯特雷萨阵线就解体了。本来，欧洲各国可以通过这个广泛的阵线，来遏制德国的复兴，但现在失败了。

1936年3月底，希特勒派兵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表示着他已经迅速地突破了包围圈。这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也是对斯特雷萨阵线国家的一次直接挑战。之后，希特勒宣布：“接下来的48小时，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法军进入莱茵兰地区，那我们就不得不夹着尾巴撤退了，因为我们能够支配的军事资源，完全不足以支撑我们进行任何一次抵抗。”然而，英法两国竟然没有对德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希特勒得逞了。很快，希特勒加快了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动员。1936年8月，他构想出了一个“四年计划”——这个用词暗示，他的速度将比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更快，以此为他在1940年或1941年发动战争做

准备，该计划由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负责。他们制定的口号是“实现经济与原材料的自给自足”，尽管他们清楚，重整军备将会扭曲德国的经济，但他们还是要求民众背负这一沉重负担。1936年年底，戈林曾经说：“我们将面临与他国的冲突，这要求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我们将永远扩充装备、增加武器。现在唯一关键的，就是胜利还是失败。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经济就能得到充分的赔偿。如果我们总是计较各种利益得失，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政治上的需求。”

德国重新进驻莱茵兰，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影响了各国的国内政治。其他国家也不得不进行应对。1936年10月，比利时放弃了1920年与法国签订的军事协定，以保证比利时的领土完整，让国家保持中立。希特勒突然进军莱茵兰，引发了英法两国国内的激烈争论。英国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希特勒仅仅是回到了他的“后院”。更多的人担心，如果此时与法国商议如何应对德国，就有可能会刺激希特勒，从而将两国拖入一场新的欧洲大陆战争。法国与英国不同，德国的冒险行动极大地影响到了法国1936年4月的议会选举。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新总理承诺团结整个国家，并与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做斗争。他准备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转型计划，使法国国内更加平等，并提高应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实力。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得到了延长，法兰西银行开始由国家部分掌控，小麦的价格被固定，1936年8月，军事工业被国有化。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得到允许，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几乎达到整个国家预算的1/3。此时，法国正在做最坏的准备。

这样，欧洲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法国的人民阵线，另一个是德国、意大利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其他国家开始选边站。1936年年初，西班牙左翼人士领导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政府。7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策动民族主义者发动反叛，整个国家陷入内战。许多人意识到，西班牙内战反映的是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与国际人民阵线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场独裁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西班牙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关键位置，因此这场内战至关重要，关乎由哪种力量控制整个欧洲的问题。希特勒派遣远征军，前来帮助佛朗哥，以便从法国南侧对法国施压，形成对法国的包围，威胁巴黎政府。这与当年查理五世对法国的包围战略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率先发动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一旦德国取得胜利，就会对法国的内政造成重要影响，使得西班牙与法国倒向德国一边，共同对付苏联。墨索里尼则派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支持西班牙的叛军。斯大林一度犹豫，但最终决定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政府。然而，布鲁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则决定不支持西班牙政府，1936年8月，法国宣布采取不干涉政策。英国也采取了与法国一样的政策。英法两国宣布采取武器禁运政策，而这又等于支持了西班牙叛军，因为他们有较好的武器装备。之后，上千名来自法、英、德、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志愿者组成了“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进行战斗。

当欧洲陷入西班牙内战的漩涡时，地中海彼岸正在酝酿另一场危机。1936年，受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的鼓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起暴动，并持续了三年，他们反抗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企图驱逐犹太定居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对阿拉伯人发起了反击，他们建立了“伊尔贡”（Irgun）和“贝塔”（Betar）等秘密组织，这是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武装反抗敌人，结果是出现了惨烈的游击战。最终，20世纪30年代末，伦敦向这里派遣了大量军队（约占整个英国军队的10%），来保卫这块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狭小土地。1937年，在骚乱最严重的时候，皮尔委员会提议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并且重新安置人口。阿拉伯领导人害怕自己太弱小，无法战胜英国帝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他们转向纳粹德国，以寻求意识形态鼓舞和实际帮助。然而，当时希特勒对阿拉伯人的兴趣，远不及阿拉伯人对他的兴趣那样浓厚。这位独裁者依然在尝试将德国的犹太人驱逐出欧洲，也许会将其赶到非洲。1938年，他批准将犹太人放逐到马达加斯加。因此，对于希特勒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并非威胁，反而有利于他将更多的犹太人赶到那里。

1936年年底，希特勒重新掌控了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他不仅突破了法国与波兰对德国的包围，还打破了斯特雷萨阵线，成功分化了英、法、意三国。他将美国看作他最后的一个敌人，不过此时美国并没有对德国进行干预。希特勒恢复了德国的全部主权，控制了萨尔和莱茵兰，并迅速发展军备。以前，墨索里尼与希特勒都对奥地利有野心，因此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矛盾。但在阿比西尼亚危机爆发后，墨索里尼开始改变主意，越来越倒向德国一边。1936年7月，墨索里尼任命加莱阿佐·齐亚诺（Cialeazzo Ciano）为新任外交部部长，齐亚诺试图让意大利的外交“法西斯化”，并引导国家向着更为“革命”、更为亲德的方向前进。10月，两国正式缔结条约，即“柏林——罗马轴心”。一个月后，希特勒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后来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的，苏联现在遭到了轴心国的东西夹击。不过，德国更大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针对大英帝国的全球“包围圈”，以防止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这样，一个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就诞生了，轴心国的独裁者们不仅与苏联共产主义为敌，也与西方民主国家为敌。

斯大林的反应非常激烈。他对于国外势力的颠覆活动越来越惶恐，因此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洗”行动，希望借此巩固他对共产党和国家的控制。最有能力的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因被指控“勾结德国”并犯有“叛国罪”而遭处决，数万红军军官受到牵连，并一同被杀害。数十万普通民众也被枪决，不计其数的人被送到古拉格劳改营（劳改营遍布西伯利亚，共有100多所）。富农是农民阶级中规模较大的一类群体，他们被指控建立了一个“俄罗斯总军事联盟”并与日本勾结，因此整个富农阶层被消灭。此外，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还有强烈的种族因素，凡是“敌对种族”都被系统地列入“清洗”的目标。朝鲜人被驱逐出远东各省，防止他们与日本勾结。1937～1938年间，有约10万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人被枪决，当局将其视作潜在的安全威胁。一方面，

苏联长期以来不断进行各种大屠杀；另一方面，这也是俄罗斯人长期的、合乎逻辑的传统，当他们面对外部敌人的时候，就不得不进行强制性的现代化，难免会出现大屠杀。这一时期，一共有约80万人被杀害，400万人受到了影响。

在世界的另一边，轴心国的结盟带来的地缘政治演变引发了罗斯福总统的强烈反应。无论是向东看还是向西看，他都认为法西斯国家的勾结将从长远上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欧洲，独裁者们蠢蠢欲动，策划侵略；在亚洲，日本自恃《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支持，于1937年7月初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侵略。那一年，记者利文斯顿·哈特利（Livingston Hartley）发表了《美国害怕吗？》（*Is America Afraid*？）一文，他认为，一旦欧洲由某一个国家（如德国）所控制，并且亚洲也由某一个国家（如日本）所控制，这就会形成对美国的包围，威胁美国的安全，同样这也会导致民主制度被独裁统治所包围。1937年10月初，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一场演说，被称作"隔离演说"，媒体广泛进行报道。罗斯福说："不要以为美国会逃避，不要以为美国会祈求对方仁慈，不要以为西半球不会遭到攻击……当流行疾病开始蔓延时，社会会支持对患者实行隔离，不使疾病蔓延，以保护整个社会的健康。"不过，此时罗斯福并没有完全放弃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希望。他认为，如果能够满足希特勒的合理要求，那么欧洲的问题就可以从整体上得到解决，进而或许可以遏制希特勒的野心。因此，他批准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出访欧洲大陆，在各大国之间进行调停。无论是"威尔斯计划"的"胡萝卜"，还是"隔离演说"的"大棒"，都说明美国已经再次介入了欧洲地缘政治。

在柏林，美国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如同一道闪电，震惊了希特勒。希特勒原来的战略是：先控制中欧，然后摧毁苏联，以确保德意志在欧洲东部的生存空间。如果不这样做，第三帝国就不可能抵御美国的强大力量。但1937年10月初，罗斯福给了希特勒突然一击，使得希特勒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时间表。此后，希特勒不得不考虑到美国对德国的敌对态度。这意味着，德国国内的转型以及巩固其对中欧的控制这两件事都不得不加速进行。因此，1937年11月初，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召集了一次会议，各军政领导人都前来参加。此时，这位独裁者感到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他说："我的决心不会改变，到1943~1945年时，我要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只有当德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且从欧洲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时，第三帝国才有能力存活。"因此他下令，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德国的第一步就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与此同时，希特勒加快了国内转型的步伐。1938年2月，他罢免了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和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Freiherr von Fritsch）的职务。之后他任命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为陆军总司令，这两个人都对希特勒更加忠诚。他还寻找机会免除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的职务，任命激进纳粹分子约阿希姆·冯·里

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部长。此时，德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已经完全被希特勒所掌控。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奥地利，控制奥地利不仅能大大增加第三帝国的人口，带来经济繁荣，还可以使德国随时能够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希特勒已经创造出了另一个机会，的确，形势的发展使得他不得不出手。1938年3月初，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宣布将就是否与德国合并一事举行全民公决。他希望在公投中对相关的表述进行修改，并且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民众否决“合并”。希特勒立即采取行动，利用奥地利亲德分子们的狂热，抢占先机占领了奥地利。这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插手。4月初，希特勒下令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徽章从维也纳移至纳粹党的发源地——纽伦堡。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暗示了神圣罗马帝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结合。

现在，距离完全控制中欧，希特勒只有最后一个任务了，就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有着数量庞大的德意志人，占这一地区人口的1/3以上。这里的德意志人一直希望使苏台德地区成为德国的一部分。此时，英法两国都没有意愿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这反映出了一种普遍看法，柏林有权就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对捷克政府表示不满，并且希特勒的目标是有限的，他并不想进一步侵略其他地区。但事实上，英法两个大国拒绝干涉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得罪德国，此时的德国已经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德国在“一战”中曾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任何一个对此有所记忆的人，都不会想再冒一次发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1938年时，英法两国总参谋部都强烈反对与德国进行地面战争。同时，他们也反对在中欧与希特勒作战的同时，又在地中海与墨索里尼作战。英国不仅担心德、意两国，还担心日本。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现实层面的原因，两国都不想与斯大林进行合作。此外，英联邦的自治领也都坚决反对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这样做将会破坏大英帝国的团结，而各自治领又是支撑英国在欧洲地位的基础。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曾经坚决主张抵制德国的扩张，但此时他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他反对刺激希特勒。因此，“绥靖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反对者很难动摇其立场。当希特勒向奥地利下达最后通牒时，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向范西塔特问道：“在演讲时，你可以表现得很勇敢，但你真的会去打仗吗？”范西塔特回答：“不会。”卡多根反驳道：“那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最窝囊的事，莫过于你逼一个小个子去和一个大个子打架，但你又不愿意去帮助那个小个子。”

出于这个原因，西方各国的领导人不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和平的最根本威胁，也不认为纳粹主义与西方其他国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938年11月初，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告诉议会：“即使我们参加调停，也不会做太多事情。现在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我们无法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对于英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与其敌国进行合作，以促进国际商品的交换，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际关系进行管控，以此促进所有国家的福祉。”当希特勒发

动意识形态战争的意图昭然若揭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依然没有进行干预，而是继续坚持与《洛迦诺公约》的精神相一致的战略。斯大林竭力构建一个反对德国的共同外交阵线，但英法表示拒绝，它们认为这将与其目标背道而驰。然而，德意两国的独裁者们并没有与英法进行什么建设性的合作，也没有承诺什么义务，他们得寸进尺，逼迫英法做出让步，但又不断提出更多的新要求。

1938年秋天，希特勒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手，他宣称自己代表着苏台德地区少数民族的权利。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只能独自面对德国的进攻。尽管斯大林想提供军事援助，但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不同意让苏联军队从自己的领土过境，它们害怕苏联军队来了以后就会拒绝撤离。墨索里尼强烈支持希特勒。英国和法国对布拉格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其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让步，因此，尽管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捷克还是决定停止抗争。9月底，张伯伦乘坐飞机来到德国，想以和平方式解决捷克问题。他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表示同意希特勒吞并整个苏台德地区——这是一个半圆形地区，环绕着波西米亚，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并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不仅领土受到侵害，军事上也失去了自卫能力。现在，捷克只剩下波西米亚了，德国人要想占领整个捷克也是非常容易的。张伯伦回到英国后居然宣称：“《慕尼黑协定》换来了一代人的和平！”

《慕尼黑协定》对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法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法国人希望能够抵制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在英国，“绥靖派”和“抵抗派”之间长期存在争论，即如何应对德国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工党成员不再坚持和平主义，而是认为必须阻止希特勒的行动。以《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为代表的左翼媒体现在开始竭力批判绥靖政策。保守党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丘吉尔、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以及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等人认为，对德国让步只能使其得寸进尺；不过，张伯伦等多数人还是认为，一旦对德国发动战争，那么西方的文明就有可能受到损害，并且将为共产主义占领整个欧洲打开大门。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等人甚至将希特勒看作“西方世界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堡垒”。1938年10月底~11月初的补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了，当时自由党、工党和保守派等不同派别均集结在一起，支持“反绥靖主义”。在牛津，他们的竞选宣传声称：“谁给保守党候选人投票，谁就是在给希特勒投票。”不过，保守党候选人还是在得票锐减的情况下勉强胜出。然而，三周后，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选区所获得的多数票被取消了，很多人认为，这件事说明很多民众反对绥靖主义。这里传达的信息很清楚：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现在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德国，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的胜利，有效地阻止了统治阶层中其他人对他的批评。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和其他一些军方人士曾希望推翻希特勒的统治，他们反对希特勒将德国拖入一场毁灭性战争。然而，现在希特勒势头正盛，这些人不得不取消计划。此外，这些人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张伯伦将这些人看作“雅

各宾派”，认为他们在德国国内缺乏合法性。此时，希特勒开始对国内的反对者进行清洗。1938年11月9日，希特勒纵容党卫队和暴民，对德国全境的犹太人展开袭击，破坏他们的教堂，掠夺他们的财产，这就是“水晶之夜”事件。一个月后，里宾特洛甫坚持认为，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人，都应从外交接待处清除出去。1939年1月底，希特勒开始说出更加骇人的话。他对国会说：“如果欧洲和其他国家从事国际金融业的犹太人能再一次成功地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赢得胜利的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是犹太人，恰恰相反，结果会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换句话说，希特勒将他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看作一场大战略，而不仅仅是一项国内政策。

1939年3月，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占领布拉格。英国和法国再一次屈服了，国际联盟没有采取措施，美国也保持沉默。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了德国的保护地，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成为德国的卫星国，自此，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捷克的军队归希特勒所有，许多先进的装甲战车以及波西米亚的工业设施都成为德国的囊中之物。德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大增加，有利于希特勒为发动战争做准备。1938～1939年时，各国还曾想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而现在，中小国家纷纷急于与德国媾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都向德国寻求保护。此外，有的国家也开始了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它们长期以来就有扩张的野心，同时，它们也相信，对自己的克制只能导致让对手获利、让自己吃亏。1938年底，波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泰斯辰（Teschen），之前这是两国的争议土地；匈牙利吞并了斯洛伐克南部的一大片狭长地带，那里主要居住着马扎尔人。看到希特勒达到了目的，墨索里尼也眼红了，他希望效仿希特勒，因此，1939年4月，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无论如何，此时欧洲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方面是希特勒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效仿希特勒而导致的。

然而，谈及英国和法国的国内政治，人们对绥靖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巨大转变。希特勒对布拉格的占领使得民众和媒体有所警觉，他们开始质疑本国政府对德国的战略，不再对本国政府抱有信心。英法两国的议会更加质疑本国政府的政策。在英国，反对党议员不断地抨击张伯伦的政策；使张伯伦更为头疼的是，保守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主张抵抗德国，他们要求建立超党派内阁。实际上，这已经使得英国成为反对希特勒的“人民阵线”中的一员。法国的情形也与其类似，以外交部部长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为代表的绥靖派，力量不如以总理达拉第为首的抵抗派。英法两国的社会已经开始做抵抗德国的准备。

现在，伦敦和巴黎不得不承认，希特勒不仅已经完全主导了中欧——英法对此尽管非常担忧，却还是能够容忍，他还打算依靠德国的优势打破整个欧洲的力量均势。2月底，英国内阁达成共识，一旦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发动攻击，英国就将对德国宣战，同时英国公开表示保证法国的安全。因此，在1939年1月，整个欧洲大陆都被动员起来了，很快英法两国的官员开始展开密集的会谈，两国真正走到了一

起，“英法协约”复活了。不过，仅仅在西边划定界限还是远远不够的，德国在东欧的扩张必须被制止（当时不断有传闻，称德国即将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只有迫使希特勒在东西两线作战，才有可能打败他，至少说可以更容易地阻止他，因此英法必须与波兰结成同盟。于是，1939年3月，英法正式宣布将保障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尽管它们并不能完全保障这两个国家的领土现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解决波兰与德国之间的领土问题提供空间，同时也是为阻止希特勒直接吞并这两个国家，防止他利用这两个国家的资源来实现其战争目的。

希特勒的行动也深深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看法。罗斯福对民事部门和国防部门的负责人说，自1818年“神圣同盟”以来，美国首次面临着“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可能的进攻。如果德国能够打败或者控制英国皇家海军，就会导致海上均势的巨大变化，从而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几乎与此同时，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中，罗斯福指出：与之前的几十年相比，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空军的发展）使得我们面临着潜在的攻击，危险离我们更近了。此外，独裁者不仅在战略上威胁美国，也在意识形态上威胁美国，的确，罗斯福正在不断思考这两种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末，罗斯福总是有一种忧虑，他担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在墨西哥做出西班牙所发生的那种事情”，即“组织一场革命，一场法西斯主义的革命”。罗斯福因此认为，反对欧洲独裁者的斗争其实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美国要想获得安全，就必须保证西半球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

然而，斯大林现在确信，西欧国家对共同阵线没有兴趣，恰恰相反，每一种迹象都表明，英法两国希望利用希特勒来遏制苏联。因此，1939年3月，斯大林公开警告“苏联会保持警惕，绝不允许那些挑起战争的人把我们的国家拖入冲突之中”，同时他也宣称自己“不会给他人火中取栗”。他提议，法国、英国、苏联应该建立联盟，以保证东欧的领土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英法两国已经表示要解决东欧的领土问题，苏联只是加入其中，本来这算不上什么困难的事情，但这却导致苏联与英法之间漫长的协商，甚至持续了一个夏天。之所以难以达成协议，是因为波兰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帮助，因为波兰担心那样做会导致波兰政府无法对白俄罗斯裔、乌克兰裔占多数的省份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英法对波兰的军事力量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它们以为波兰能够抵挡德国的进攻。现在，东京和柏林对苏联进行两面夹击，为打破这个局面，苏联必须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同月，苏联与日本在蒙古国的诺门罕交战，苏联粉碎了日本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少在当下，苏联的东翼已经安全了，现在斯大林可以专心对付希特勒了。

对于希特勒而言，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困境之中。罗斯福开始使用更加激进的语言，这令希特勒非常担心。他也相信，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决战将会提前到来。因此，他下令执行“Z计划”，建造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即“帝国海军”，以将德国的空军投送到大西洋，不仅要能对付英国，还要能对付美国。3月，希特勒准备在非洲扩张殖民地，同时他还拉拢西班牙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举动针对的是大西洋彼岸的

美国，而非苏联。1939年4月，他正式废除了英德海军协定，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英国承诺保障波兰安全的回应，同时他也承认，德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海上冲突马上就要到来。

然而，正是在东欧，希特勒感到时间紧迫，因此决定加紧制定新的侵略计划。德国要想与其他大国抗衡，尤其是美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占领东部的生存空间，以实现这个目的。1938年10月底，苏台德危机刚结束时，希特勒试图拉近与波兰之间的关系，建议与波兰合作，共同进攻苏联。希特勒想收回但泽自由市，并借道波兰以进攻苏联，作为回报，他支持波兰从乌克兰那里收回部分领土。换句话说，如果波兰同意与德国合作，那么就可以成为德国的小伙伴，德国没有必要将其消灭。这样，波兰的地位就可以介于德国的同盟国（如意大利）与卫星国（如斯洛伐克）之间，这同样有利于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然而，令希特勒感到吃惊和恼怒的是，波兰人拒绝了他的提议。更糟糕的是，英法为波兰提供安全保障，使得德国再一次陷入包围圈。1939年3月，柏林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谈论这件事，这给希特勒的大战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波兰位于德国与苏联之间，希特勒要想征服苏联、获得战略纵深，并实现其生存空间计划，就必须先征服波兰。因此，希特勒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冒险，他开始转向接近斯大林，以清除进攻前的最后一道障碍。

1939年8月，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首先提出签订该条约，而斯大林认为，对于苏联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有利于获得东欧的大部分土地。如果没有这个条约，希特勒就可能会占领东欧的大部分领土，甚至可能联合英法来对付苏联。斯大林同样在打持久战，8月中旬，他曾经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说，一旦英法集团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苏联就可以乘虚而入，使得德国变成苏联势力的一部分，获利的将会是苏联。斯大林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波兰，而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他害怕希特勒会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第一条就是关于立陶宛的，第二条才是与波兰相关的。条约中之所以提及波兰，是为了标出德国向东扩张进入波兰后的最东界限，而非划出明确的苏联占领区。所以，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标志着一场苏联与德国联合反对现有欧洲领土秩序的战争的爆发。然而，这两位独裁者都没能够让战争朝着既定方向发展，他们的合作也没有成功。希特勒本打算联合波兰共同入侵苏联，斯大林则希望加入英法阵线来反对纳粹德国。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但两国其实非常不愿意卷入战争，它们根本就没有竭尽全力地从西边进攻德国。此时，两国仍然希望让德国妥协，以恢复和平，这样就可以保证德国的完整，使德国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道坚实的堡垒。现在，就连斯大林自己也认为，一旦德国失败，就会导致欧洲的均势被打破，并使苏联暴露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之下。德国进攻波兰后，波兰的防线迅速崩溃。9月17日，斯大林派遣红军进入波兰东部地区（也就是在同一天，苏联在诺门罕战役中彻底打败日本）。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德国人与俄国人第4次瓜分波兰。之后，德国与苏联开始紧密合作，斯大林向希特勒输送各种重要的原材

料，支持他与英法的战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从德国跑到苏联的共产党员遣送回德国，党卫队也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遣送到苏联。两国的情报部门都对波兰的知识分子和军官进行无情的镇压。1939年11月，斯大林进攻芬兰，希望能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带，以保卫彼得格勒。德国与苏联试图对东欧与北欧的各国领土进行全面的重组。

战争给各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却各不相同。与1914年不同，“二战”爆发后，法国并没有立即成为一个“神圣同盟”，各党派和阶级并没有团结一致，甚至在表面上都不团结。正相反，左翼和右翼、左翼绥靖派和右翼绥靖派以及左翼抵抗派和右翼抵抗派之间的隔阂与分歧不断加深。由于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而法国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莫斯科指示法国共产党，不要与政府进行任何合作；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离开法国军队，逃到了苏联。法国的军备生产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政府奉行经济自由原则，将军备生产交给了私营企业。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宣传上，整个国家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军队认为，只要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种错觉使他们疏于防范，没有积极备战。但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完全改变了东欧的秩序。

在英国，战争爆发后，政府无法遏制希特勒的侵略，这使得张伯伦内阁岌岌可危。最终，首相不得不顺应民众、新闻界和议会的要求，决心采取行动对抗德国。结果，虽然英国人并非慷慨激昂，但至少他们保持了团结。后来，欧洲所有大国都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只有英国没有被占领，相反，它一直能够不断地对德国进行直接打击。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各自治领的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各自治领决定加入战争，共同反对纳粹；只有爱尔兰宣布中立，没有加入战争。战争爆发后，英国的战时经济政策执行得很顺利，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支持工业主与工会之间进行合作，以提升武器生产能力。

极权主义国家则不同，它们采取的是更为激进的内部政策。苏联占领波兰东部领土后，斯大林在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消灭了资产阶级。他担心资产阶级会组成“第五纵队”并暗中协助轴心国，因此1940年4~5月，他下令在卡廷森林杀害了数千名被抓捕的波兰官员。希特勒同样强化了对国内以及德国新占领的领土的控制。1939年9月底，他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为全国警察总长，负责领导所有的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人。一个月后，希特勒批准开始实施一项“安乐死”计划，旨在铲除“无价值的生命”，并且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生理素质，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已经在波罗的海和俄国定居的德意志人都被要求回到德国，以增强德国的实力。希特勒再次警告，犹太人会因将欧洲再次拖入战争而遭到惩罚。波兰的犹太人被驱赶到了贫民区，数万犹太人被集体枪决。然而，此时希特勒并没有杀害德国的犹太人，可能是他受到了美国的警告。1940年7月，希特勒直接将犹太人称为德国手中的“人质”。尽管希特勒费了不少口舌，但他并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战争总动员。希特勒并没有动员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在这方面德国远远落后于英国，他更关心如何维持消费品的供给。德国

虽然大力发展各种武器，但武器的质量并不高，一旦德国与英法直接开战，德国可能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消耗战。在“一战”期间，由于协约国对德国的封锁，德国国内问题严重，最后导致了崩溃，现在希特勒决心不再重蹈“一战”的覆辙。

征服波兰后，希特勒开始焦虑，如何在美国介入前逐步结束西线战争并保护在东部的生存空间。1939年9月底，他展开了“和平攻势”，希望能让英国和法国妥协，换取和平。如果英法答应他，那么他肯定会执行最初的计划，即进攻苏联。但是，伦敦和巴黎反对他控制波兰，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要求。更糟糕的是，在德国看来，英法正准备切断德国的铁矿石供给线，一旦挪威与英法站在一起，德国就难以获得铁矿石。所以，1940年4～5月，希特勒被迫做出一项临时的决定。为防止英法占领挪威，他决定先发制人，先后入侵挪威、丹麦，以确保交通线路的安全。很快，希特勒又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发动闪电袭击。他原以为这项行动会持续数年，但仅仅在几天内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几星期之内，低地国家完全被占领，法国被打得溃不成军，英国远征军也遭到重创。英法两国唯一幸运的事，就是40万人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德国在西线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改变了欧洲政治。从1940年6月起，希特勒不仅控制了整个中欧，还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以及法国北部、低地国家、丹麦和挪威。法国的其他地区则建立起了一个德国扶植的傀儡政府。贝当元帅以及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在法国南部建立了“维希”政权，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实际上完全受德国的摆布。这个政权希望与德国进行“合作”，以维持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传统的欧洲均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德国的霸权。这引发了一场领土争夺，改变了欧洲的版图。对于那些尚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而言，希特勒不仅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机遇。希特勒占领了很多领土，苏联领导人也决心占领同样多的领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苏联要防止德国的势力距离本土太近，防止国境受到德国的威胁。所以，法国沦陷后不久，斯大林就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一个月后，他又迫使罗马尼亚向苏联割让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他还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这不仅是为了提防德国，也是为了驱逐英国的势力。他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对苏联的安全而言也是一个长期的威胁。

墨索里尼看到了法国的崩溃，他认为这是一个契机，因此准备抓紧时间，在东南欧和地中海地区建立其法西斯帝国。1940年6月，他在法国南部发动了一场迟来的进攻，但结果却是完全失败，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法国南部获得了一块土地。之后不久，他在北非对英国军队发动进攻，但再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然后，10月底，墨索里尼入侵希腊，他希望能够建立起在巴尔干的霸权，以此来平衡希特勒在中欧和西欧的主导地位。这一次，意大利军队再次陷入泥潭，希腊人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难以实现其目的。而更为糟糕的是，1940年11月，英国袭击了意大利在塔兰托（Taranto）的军港，很多军舰被英国飞机炸沉。墨索里尼

这下彻底遭到了羞辱，一连串的败仗削弱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统治集团中首次出现了分裂。长期以来，外交政策是墨索里尼维持其法西斯统治的工具，现在由于对外政策失败，他的统治开始受到威胁。法国沦陷后，西班牙独裁者也想从中分一杯羹。1940年6月中旬，佛朗哥的军队占领了本来处于“国际共管”区域的自由市丹吉尔，意大利又没有抢占先机。1940年10月，希特勒在昂达伊（Hendaye）与佛朗哥会晤，但他没有能够说服佛朗哥放弃中立。希特勒希望西班牙协助进攻英国，佛朗哥很想这样做，但他并没有答应。真正的问题在于，佛朗哥有很多领土要求，他要求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奥兰（阿尔及利亚一座城市）和摩洛哥。希特勒无法答应这些要求，因此如果那样的话，他与贝当合作共同对付英国的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同时也会触怒墨索里尼。简而言之，西班牙之所以没有参加战争，不是因为佛朗哥没有野心，而是因为希特勒无法答应佛朗哥的要求。

1940年5月，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英国议会展开辩论，张伯伦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有些人将这次辩论错误地称作“挪威问题辩论”）。丘吉尔担任首相，组建新政府，他决心斗争到底，竭尽全力为夺取胜利做出努力，必要时他宁愿在军事、经济、社会和宪法方面做出任何牺牲。1940年6月中旬，丘吉尔向法国提出建议，要求将英、法两国合并（包括合并国籍，并组成联合政府），其目的是让法国坚持对德作战，同时保护法国军舰的安全。换句话说，现在纳粹的威胁太明显了，法国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投降德国，另一条路是将自己的主权让给英国。不久之后，法国投降了德国，希特勒建议英国也投降德国，丘吉尔严词拒绝。那年夏天，英国皇家空军粉碎了纳粹空军控制英格兰领空的企图。尽管当时德国在空军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它能否打败英国海军，依然存在疑问。希特勒并没有打算与英国作战，如果战争可以避免，他就不会进攻英国。但伦敦拒绝允许德国支配中东欧，希特勒非常不满。最后，希特勒取消了“海狮行动”，放弃了入侵英国南部海岸的计划。

法国的沦陷给大英帝国带来了重大影响，英国现在成了反对希特勒的最后一道防线。丘吉尔打算，如果英国本土也被纳粹征服的话就到加拿大继续斗争，英国还可以依赖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资源，寻找时机进行反攻。因此，此时英国并非孤立的。数百名优秀的“帝国”飞行员参加了不列颠空战，取得出色成绩。从人口比例上来看，在所有参战国中，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生产的步枪数量要多于英国本土的生产数量，它们还制造了上万架飞机；加拿大的经济实力与意大利相当。在接下来的5年中，数百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民众都在努力进行生产，为英国提供各种作战物资。很多印度人也是如此，无论喜欢与否，他们都身处战争之中。1940年5月后，印度军队的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200万人，英国系统地调用印度的资源，以支持战争。很快，在几乎所有的方面，整个大英帝国的工业产出就超过了德国及其控制的欧洲领土的工业产出，只有在步枪数量上落后于德国。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一直专注于与大英帝国的战争。法国沦陷后不久，他就暗示其军事下属，他打算在下一次机遇来临时进攻苏联。在那一年夏天和秋天，他没能征服英国，丘吉尔拒绝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拒绝与德国瓜分世界。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要在美国介入之前将英国和苏联占领。1940年9月底，他联合意大利和日本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到年底，他制订了一份进攻苏联的详细计划，即“巴巴罗萨计划”，并且宣布执行。但是，此时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他还不能立即进攻苏联。首先，他要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力量，保证南翼的安全。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的冒险行动失败，促使英国军队前来帮助希腊。更糟的是，意大利在北非的进攻不仅失败了，而且还导致英国在1941年初对其发起了毁灭性的反击。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反对南斯拉夫政府与德国结盟）发动政变，造成了巨大影响。所以，1941年2月，希特勒派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来到北非，以求力挽狂澜，其目的是让北非成为德国的一个补给站，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短时间内，北非的英国军队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两个月后，希特勒吞并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德国与意大利联合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北部是由克罗地亚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建立的傀儡政府，南部是由塞尔维亚人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建立的傀儡政府。希特勒本不打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占领欧洲这么多地方，这些仓促战略决策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意大利的失败和隆美尔的成功迫使希特勒系统地思考中东的局势。他正在筹划一项大的钳形战略，在这项战略中，非洲军团向东进军，穿过埃及和巴勒斯坦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从乌克兰向南推进，穿过高加索山脉并与隆美尔汇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现在将希特勒看作最大的希望，他们想以此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甚至驱逐出整个中东。1941年1月，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尼（Amin al-Husseini）请求与希特勒结成战略伙伴，共同对抗“英国–犹太人联盟”。一旦他们真的联合起来，英国在这一地区开采和出口石油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大穆夫提全力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甚至包括肉体灭绝。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认为，中东局势的进展使德国看到了希望。伊拉克发生了政变，亲德分子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掌握政权，并施行了对犹太人的屠杀，里宾特洛甫受到了鼓舞。然而，阿里很快就被英国打败了。在维希政权和叙利亚当局的协助下，德国向摩苏尔派遣了两只空军中队，但没过几天，两支中队的飞机就被一一击落。不过，对希特勒而言，中东算不上其大战略的重要部分。中东各国领导人对希特勒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希特勒对中东的兴趣。

真正让这位独裁者担心的其实是美国。法国的沦陷使得罗斯福总统感到惊恐。他认为，德国的胜利使欧洲的权力平衡乃至全球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打算继承法国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属地。罗斯福担心，希特勒真正的目标是通往大西洋，希特勒很有可能是想在伊比利亚半岛，甚至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设立据点，以实现这个目标。此时，在美国国内，怀疑论者和孤立主义者的数量依

然大大超过干预主义者。因此，尽管罗斯福想阻止德国的行动，但他受制于民意，不得不暂缓执行。现在罗斯福可以做的就是支持英国，以预防德国入侵拉丁美洲。1940年9月初，他与英国达成了“基地租用协议”，即美国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旧的驱逐舰，以换取使用英国在西半球的基地。这项举动显然是直接针对希特勒的，不过罗斯福不必这样公开说，可以说，这是美国在接管英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当时英国在西半球已经衰落）。同月，国会同意实施义务兵役制度，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采用义务兵役制。

1940年11月，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现在他已经不必再使用什么策略，而可以开始认真地遏制希特勒了。1940年12月末，他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他告诉整个国家，美国是“民主世界的兵工厂”，是对抗独裁者的中坚力量。1941年3月，罗斯福制定了《租借法案》并获得通过。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大量的战争物资“租借”（或者直接转移）给缺乏现金的英国和中国。正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宣告了对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战争”。《租借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当天，罗斯福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公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年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3月底，总统和各部门负责人认为，一旦美国与轴心国发生冲突，美国将优先解决“德国问题”，所有的战争计划都将针对大西洋、德国以及整个第三帝国。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1941年4月，美国与日本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目的是稳住日本，先集中全力对付德国。美国政策的大方向是以打击德国为优先目标，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希特勒并不知道美国的军事计划，他认为华盛顿正在被“世界犹太人”所操纵，他试图援助日本，因为一旦日本战败，他就不得不独自面对美国的全线进攻。希特勒相信，他与罗斯福之间的公开冲突几个月之后就会到来，因此他向东京做出了重要的承诺，一旦未来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他将对日本提供支持。

因此，6月22日，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希特勒的军队阵容强大，除了纳粹德国国防军之外，还有盟国及卫星国的军队，如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中立的西班牙（佛朗哥派遣“蓝色军团”参战），此外还包括来自法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志愿者”。希特勒调动了几乎整个欧洲的资源，来支持其战略。他的目标不仅是铲除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至少将其驱逐到乌拉尔山脉以东，更是想获得生存空间。他认为，德国被犹太人、英国和美国包围，德国与这些势力的大决战已经越来越近了，没有生存空间，德国就无法存活。为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疯狂地征服土地，将其作为德意志人的殖民地，同时清除所有的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势力。一开始，纳粹军队处死了很多苏联的官员，并且怀疑或认定他们是犹太人的特工。后来，凡是纳粹军队所到之处，就伴随着残酷的大屠杀。党卫队的特别行动队屠杀了数十万的犹太男性，女性和孩子暂时被放过。

斯大林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总体动员。他宣布，这场斗争“并不能看作是两个军队之间的……普通战争”，而是一场“自由制度对抗奴隶制

度”的“保卫祖国的战争”。在西部边境，很多重要的工业区面临着被德国人占领的危险，因此斯大林决定把这些工业拆迁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安全地带。很快，这些新的工业区又生产出了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数百万士兵被征召入伍，许多在古拉格劳改营受到折磨的军官都被释放，并在前线作战。苏联的全国民众备受鼓舞、斗志高昂。此时，斯大林逐渐开始激发民众的东正教情感。为了抗击侵略，民众自发地流露出了宗教情感，斯大林政府决定恢复东正教莫斯科总主教的职务。斯大林并非要宣传东正教，而是要对民众的宗教热忱进行妥善的利用，一旦政策错误，东正教也可能会成为直接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工具。不过，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异议人士依然被残酷地镇压：战争期间，约250万人被送到古拉格劳改营，数十万德国人和车臣人被流放，防止他们与希特勒相勾结。到1941年底，苏联截获了重要情报，即日本不打算进攻苏联东部，而是打算进攻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下令，将红军在西伯利亚的强大力量调到莫斯科附近。德军企图占领莫斯科，但遭到了苏联红军的阻击，因此无法达到目的。此时，还没有人能知道战争的结果，但有一点很明确，德军要想迅速打败苏联已经不可能了。

这时，罗斯福进一步向希特勒施加压力。斯大林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美国可以在苏联前线的任何地点部署兵力，以帮助苏联抗击德军。不过，罗斯福并没有同意斯大林的请求，因为当时美国民众依然强烈反对美国正式参战。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给斯大林送去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解冻了苏联政府的资产，停止将《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用于苏联，允许苏联船只来美国接受援助。1941年8月中旬，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的一艘军舰上会晤，并签署《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宪章宣布“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其基础是“尊重人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反对任何不符合人民愿望的领土变更”，并且“两国将在彻底摧毁纳粹暴政之后，恢复世界的和平”，同时“对于那些威胁或可能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国家，将解除其武装”。

《大西洋宪章》的关键词是“彻底摧毁纳粹暴政”。《大西洋宪章》其实就是一项大战略，目的是打败希特勒；同时它也是《凡尔赛和约》的再现，规定将再一次解除德国的武装。这份文件非同寻常，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参战，罗斯福签订《大西洋宪章》时，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接下来的一个月，罗斯福对美国驱逐舰下令，只要看到德国军舰或潜艇，就立即开火。在1941年9月11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警告整个国家：“当你看到一条响尾蛇准备向你攻击时，你不会等它咬了你再去制伏它的。”所有听了这次讲话的人——包括柏林的纳粹领导人都会相信，这是罗斯福对德国独裁者发出的警告。事实上，德国已经准备好要与美国开战。

在这个背景下，交战双方的领导人都做出了重大决定。随着德国军队深入苏联领土，日本已经准备在1941年8月放弃中立，并从东面攻击苏联。罗斯福担心，这可能会给俄国人带来致命一击，甚至导致希特勒夺取苏联庞大的资源。因此，罗斯福下令对日本执行石油和钢铁的禁

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但更主要的作用是阻止了日本对苏联的袭击。此时，战争马上就要进入关键时刻：日本人需要确保其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以便获得那里的石油，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之下，并且放弃所有企图支配亚洲的野心。几乎在同时——我们无法得知确切时间，希特勒决定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无论他们身处欧洲的东部、南部、西部还是北部。希特勒召集经济、行政、外交和警察等各部门的负责人，为这项政策的制订执行具体的计划。希特勒准备在所有战线上与“世界犹太人”展开决战。之后不久，1941年12月初，希特勒向日本人重申，他将与日本人联合起来，共同对美国作战。

12月7日，日本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此时，希特勒坚决承诺，支持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德国独裁者相信，要想防止日本迅速崩溃，就必须让美国同时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作战。一旦日本失败，那么美国就可以集中其军事力量于欧洲。因此，11月11日，希特勒对美宣战，这让德国最高统帅部——尤其是海军都异常高兴，过去德军只能偷偷摸摸地与美军作战，现在则可以公开作战了。然而，事实上，希特勒以前经常担心的事现在终于发生了。德国已经被全世界所包围，他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政策，导致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美国的大资本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本来，希特勒想先夺取欧洲东部的生存空间，然后再向全世界开战；但现在，他还没有夺取足够的生存空间，就已经遭到了全世界的共同反对。这成了历史上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假如希特勒没有咬上罗斯福的诱饵，并且美国没有积极地在欧洲参战，那么战争的结果将会如何？

1941年年末，两大对立的集团形成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角逐。一个是由英国、苏联和美国组成“大同盟”——这个词是丘吉尔从他的祖先马尔伯勒公爵那里借用来的；另一个则是由德国、意大利、日本及其盟国和卫星国组成的轴心国。1942年1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承诺将“动用所有的资源以打败希特勒”。后来这些国家建立了“联合国”。与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为了解决德国问题而设立的。在之后近6个月的时间里，轴心国似乎越来越占据上风。日本肆无忌惮地袭击美国，占领了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很快相继沦陷；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在美国海岸线向没有受到保护的美国船只肆意发动袭击；德军再次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抵伏尔加河畔的伏尔加格勒，并向南推进至高加索山脉，企图夺取那里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油田；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似乎马上就要占领埃及，并且迫近巴勒斯坦。1942年夏天，德国军队从北部和西部向中东地区集结，同时日本空军偷袭斯里兰卡和印度洋，两大轴心国在印度“会师”不是没有可能。

两大联盟均展开了大规模的国内动员，调集各种资源，集中人力。整个美国的经济现在都在为战争服务，并且很快其实力就超过了轴心国。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总统以及新政的支持者，他们拒绝接受商界领袖的意见，要为更远大的目标而努力。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政府

制订的生产计划远远超过了日常的生活需要。美国的武器不仅可以用于美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还可以用于援助英国和苏联。1942年，希特勒任命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掌管战时经济。他鼓励创新，改革组织方式，并且使用奴工，使得德国的军备生产能力大大提升。1943年初，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宣布要打一场“总体战”，以此强化对民众的心理动员。很大程度上，苏联的经济也要依赖古拉格劳改营的奴工。很快，在关键的军备领域，苏联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第三帝国。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应该是英国的战争动员。尽管英国无法从欧洲大陆获得重要的原材料，也无法与欧洲大陆进行贸易，但它生产出的武器数量也远远多于德国，尽管质量不一定比德国好。英国不但能够坚持对德作战，1941年6月之后，它还能向苏联提供大量的物资。数百万人被征召入伍，加入海军。自始至终，议会始终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最基本的公民自由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英国显示出了强大的战争能力，这再一次说明，民主制度完全有利于实现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并且其动员能力远远超过独裁国家。

与之相反，德国则依赖于对被征服领土的开采和殖民。这些土地上原来的居民都遭到了镇压、驱逐，甚至经常惨遭杀害。1941年1月，德国制订了“东方总计划”，并且在之后的两年进行过多次修改。根据计划，德国准备将大批德意志人迁移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上居住。这些土地上原来的约3 000万居民被驱逐到西伯利亚西部，取而代之的是约1 500万德国居民。这样，相当于把德国的卫戍部队与战略预备人员的数量提高了一倍。这项计划还准备将乌克兰变成第三帝国的“粮仓”，正如希特勒所说，“这样一来，没有人能够再让我们挨饿了”。在德国内部，纳粹推广“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准备将德国变成一个单一种族的共同体，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分子清除。通过这种方式，德国可以变得强大起来，并能能够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美国的大资本家相抗衡，打破它们的包围。纳粹相信，这将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将彻底改变企业僵化的生产方式，释放民众的激情与能量。实际上，不平等依然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但在军队中，之前的等级制已经被消灭了，原来的军官大量战死，使得来自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士兵晋升为军官。为了动员更多的女性参战，纳粹放宽了对妇女的限制，妇女可以做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事情。还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那些出身卑微的军官们往往更加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战争后期更加明显。希特勒希望，在战争结束后，他能够建设一个福利国家，对民众做出一些回报，如建设高速公路、保障就业、提供住房、设立假日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既想建立一个种族乌托邦，又想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与德国不同，在各民主国家，战争加速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并且福利制度无所不包。1941年，在工党的倡议下，英国联合政府批准了一项报告，旨在实现英国社会的一场全面变革。在这个基础上，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正式发表，它建议确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改善公共住房并全面改善社会福利系统。主要目的是提高社会凝聚力，并增强人口实力，这对于支撑英国的大国地位是非常必要

的，战时如此，战后也是如此。报告也清楚地表明了对家庭和妇女健康的态度，强调保障产妇的福利，以此来提高生育率。贝弗里奇写道：“在未来的30年中，妇女和母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她们关乎英国种族能否得以延续，以及英国人的理想能否实现。”目前，报告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前线的士兵，同时鼓励后方的民众，回报他们抗击希特勒的努力。美国也有类似的发展，美国“福利国家”的规模空前扩大。在大西洋的两岸，福利与战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其逻辑不言自明：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政府要动员自己的民众保卫家园，那么就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家园，这样保卫家园才是有意义的。

战争也有利于美国社会的融合，同时有利于各种族的解放。在美国军队中，来自全国的各种背景的人都在一起服役，整个国家变得更有凝聚力。为了不影响白种人的作战效果，非洲裔美国人（黑人）没有被安排与白人一同作战。因为担心削弱高加索分队的作战效果，非洲裔美国人被分割成了小分队，但这是历史上黑人第一次大规模参加战争，他们展现了爱国情怀，并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数百万的美国妇女来到工厂和农场工作，其中很多妇女都已经成家。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路易斯·麦克谢里（Louis McSherry）将军曾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参加工作的母亲提供充足的设施，以供她们抚养孩子。”这一切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因为政府要为所有的劳动力提供报酬。很多造船厂均设立了托儿所，这导致造船的成本提高，进而船的价格也提高了。换句话说，这场反对希特勒的斗争，改变了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女性的生活。在1943年5月的《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中，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名画《铆工露斯》（Rosie the Riveter）就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一位倔强的女工踩踏着一本《我的奋斗》，同时抓紧时间工作。

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各交战国用尽一切力气排除社会中的异己分子。在英国，政府的偏执妄想以及民众的排外心理，使得数千名来自中欧的难民被拘留——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被怀疑有可能是“第五纵队”。与此类似，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下令拘禁了很多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反映了美国西部沿海地区的民众依然对亚洲人存有偏见，但其主要的动机并非种族歧视，而是为了防止日本人的间谍和破坏行动。斯大林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他下令将某些民族“整体流放”，他认为这些民族背叛了政府，或者与敌国合作。大批德意志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都受到了怀疑，他们被“整体迁徙”到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过着艰苦的生活。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背后也有其战略动机，否则他也不至于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他认为犹太人正在直接操纵着一个庞大的国际集团，这个国际集团直接反对德国。因此，控制犹太人甚至对其进行肉体消灭，是纳粹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1941年底之前，希特勒并没有对西欧的犹太人展开大屠杀，目的是把他们当作人质，来对美国进行要挟。但现在，德国已经开始直接进攻美国。因此，希特勒对美宣战仅几天后，他就向其下属公开了其计划。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决

心对犹太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他预言，如果犹太人引发了一场新的世界战争，那么就应该将他们彻底消灭。这不是空谈，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灭绝犹太人只能是必然的结果。”1942年1月，纳粹政府在柏林郊外的万湖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被推迟了很长时间，会议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有500万犹太人被杀害或流放。其中，德国的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境内杀害了100万人，还有很多人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另外一些人被驱逐出中欧、南欧和西欧，或者被关进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卢布林集中营以及马伊达内克集中营。1943年10月，希姆莱对波森的党卫队领导人说，歼灭犹太人的计划对于维持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是必要的。他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基础，是我们历史存在的前提。我们是位于欧洲中心的民族，四面环绕着敌人……这样的民族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质量与价值。”因此，“最终解决方法”只能是对德国经典的“包围”策略以及“中心论”思想的极端阐释。

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战争目的和作战策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对于如何管理战后的欧洲，如何安排战后的国际秩序，三国之间则存在更大的分歧。从一开始，罗斯福就主张由“四架马车”——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共同支配战后的世界，四国将组建并主导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代替原来的国际联盟。丘吉尔则希望让法国也加入进来，以此来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斯大林则对1815年之后的“欧洲协调”非常感兴趣，但他坚持认为，要确保苏联的安全，就必须吞并周边的大片领土，并且在苏联与德国之间建立一系列受莫斯科控制的缓冲国。罗斯福的观点则是相反的，他坚持认为，欧洲不应被分割，不应成为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二战”的爆发，就是这种错误的做法所致，美国舆论也非常支持罗斯福。因此，三国决定，建立有三国外长组成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以彼此协调立场。

但所有问题的核心依然在于德国。斯大林要求将德国肢解成如下部分：莱茵兰应该独立，巴伐利亚也应该独立，其他地区（包括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也共同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将东普鲁士割让给波兰。正如莫洛托夫所说，“为了保证未来的和平，必须确保德国无法构成威胁”。罗斯福提出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方案，他认为应该把德国分成6个部分：黑森、汉诺威及德国西北部、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普鲁士（包括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以及东普鲁士；两个具有战争潜力的重要地区——鲁尔和萨尔，将执行国际共管。副国务卿威尔斯认为：“只有将德国分割，才可能对德国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并治愈他们的侵略性格。”丘吉尔更加痛恨德国，认为应该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他时常提起，应该把德国“阉割”，或者将其变成一个“肥胖而虚弱”的国家，以防止其以后再发动战争。但另一方面，丘吉尔也认为，这样做会导致让斯大林填补这一地区的真空。因此他警告内阁：“不要太过分地削弱德国，我们或许需要它来对抗俄国人。”然而，大多数的英国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支持把德国分割，即使这样可能会让苏联成为中欧的霸主，也应该这样做。

要想遏制战后的德国，并且消除苏联的影响，关键在于实现欧洲的

复兴和统一，或者至少实现西欧的复兴和统一。1942年10月，丘吉尔曾说："欧洲在未来将会成为另一个美国……欧洲将建立自己的国际警察，解除普鲁士的武装。"在美国尤其支持欧洲的统一。美国国务院支持欧洲大陆经济的一体化，认为这将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美国的发展。理论上说，这既能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又能将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生产，从而有利于保障世界的权力平衡。但美国也担心将来的欧洲会出现另一个希特勒，他将掌控欧洲的关税同盟，并以此来反对美国。

此时，同盟国唯一的共识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希特勒单独媾和。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国和美国宣布将持续对纳粹作战，直到它最后"无条件投降"，几个月后斯大林也对此表示赞成。在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希特勒是最大的敌人，因此要集中力量，先消灭希特勒，再集中全力对付日本。不过，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主张"亚洲第一"。对于英国来说，希特勒显然是最大的敌人，这没有任何争议。1942年，英美两国发布联合公报，称"德国是首要敌人，打败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旦消灭了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将很快被打败"。不过，在战术上，华盛顿和英国也存在严重的分歧。要打败希特勒，就必须进行渡海作战，而什么时候登陆、在哪里登陆，双方意见有所不同。英国人倾向于在地中海采取军事行动，在欧洲南部"拖垮"希特勒；而美国的指挥官们则认为，应在法国北部登陆，以使德国精疲力竭。

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这些分歧更加白热化。最后英国的方案占据了上风，即在地中海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在法国北部采取行动。因此，要想执行这个方案，盟军就需要大量地使用空军，然而伦敦和华盛顿再一次产生了战术分歧。为减少损失，英国皇家空军都是在晚上出动，为了打击德军士气，英国空军试图通过轰炸德国居民区来弥补精准度上的不足。美国空军则相反，他们喜欢针对滚珠轴承厂和合成燃料厂这样的关键工业进行精准轰炸。两种战术相互结合，开创了一条对抗德国的全新阵线。数十万德国军民在轰炸中身亡，德国的军工生产被严重破坏，国内和前线的士气都一落千丈。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德军不得不将80万士兵调到空军，以增强其防空能力。德军出动了数千架最新式的战斗机，以及数千名最出色的飞行员。英美的空袭分散了德军的空军力量，因此削弱了纳粹空军对东欧的制空权。

希特勒在欧洲所调动的资源，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感到畏惧。然而，英国、苏联和美国联合起来则产生了更强大的力量，与德国相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整个1942年，德国越来越失去主动权。隆美尔在尼罗河三角洲遭到拦截，已经难以再向前推进；几个月后，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第八集团军在阿拉曼（El Alamein）发起进攻，最终将轴心国军队驱逐出了北非。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先是在珊瑚海海战中遭到阻击，之后又在1942年5月的中途岛海战中遭受重创，几乎所有的航空母舰都被炸沉。现在，美国逐渐重新控制太平洋的主动权，对日本采取"跳岛战术"，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了。希特勒试图夺取高加

索的油田，但没有成功，并且在1942年的夏季攻势中进展不利。到1942年年末，德国第六军团被包围在了伏尔加格勒，并且在1943年2月被迫投降。几个月后，希特勒在“突尼斯”遭到惨败，几乎整个北非军团都向盟军投降了。现在，他只能故作友好地向斯大林提议单独媾和，但遭到拒绝。德国想通过潜艇战来饿死英国人，这个计划几乎就要成功了，但在1943年春天的大西洋海战中，德军的潜艇损失惨重，输掉了这次战役。同年夏天，希特勒在库尔斯克发起坦克战，但再次落败。不久之后，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遭遇惨败，在之后的法西斯党委员会上，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受到指责。很快，墨索里尼被免除职务，意大利新政府决定改变立场，不再与同盟国为敌。现在，希特勒已经完全处于守势，他所能做的，就是将欧洲变成堡垒，以做最后的挣扎。

此时，德国的战略是动员欧洲大陆的力量，来反对同盟国。1943年5月初，希特勒对各地方的长官们说：“谁控制了欧洲，谁就会掌握世界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斗争目标，但是只有德国才能赋予欧洲一个统一的结构。”纳粹党竭尽全力，宣传“欧洲要对布尔什维克进行‘十字军东征’”。现在，希特勒的处境很像当年的拿破仑，他不仅要依赖于对欧洲的占领，还要依赖于各卫星国。不过，各卫星国对希特勒领导的“新秩序”，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国家积极与德国合作，有的则是有条件地对希特勒表示支持。德国的卫星国有：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德国在这些国家榨取资源的效果非常明显。德国榨取占领区的经济资源，以保证纳粹国防军有足够的装备。其中两个地区对德国最重要，一个是法国和比利时地区，另一个是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这里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德国在东欧的占领区。这说明，“生存空间”理论纯属荒谬。此外，德国在其本土使用了数百万的奴工，但并非所有的奴工都是被强迫劳动的。纳粹在整个欧洲大陆招募各种志愿者，他们有的被派去守卫“大西洋长城”，以防止英美军队在欧洲西海岸登陆，有的被派去抵御苏联红军。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的计划，即在德国霸权的领导下，将整个欧洲的民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1943年9月，英国外交部提出，在打败德国后，欧洲可以建立一个邦联。希特勒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他认为欧洲其他国家只是他的仆人，而非合作伙伴。

1944年6月初，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军队从英吉利海峡向法国北部发动猛攻，发起“诺曼底登陆”。两星期之后，苏联红军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这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陆地战役。没过多久，苏联军队就收复了全部国土，并将战线推进到了寇松线以西。1944年8月，为了阻止斯大林的军队占领波兰，波兰资产阶级领导的“救国军”在华沙发动起义。他们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想在苏联占领波兰之前先把纳粹的势力驱逐出去。斯大林袖手旁观，拒绝提供援助，因此起义被德军镇压了。不久之后，苏联红军继续西进。英美在诺曼底的登陆战持续了6个星期，最后盟军攻破德军的防线，并开始进军巴黎。由于德军节节败退，德国内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希特勒。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1944年7月的炸弹袭击事件，独裁者差一点儿被炸死。1944年底，希特勒曾打算在阿登高地来一次反扑，但这场赌博还是失败了。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想和霸权图谋已经最终破灭。相反，在整个中欧，出现了一系列权力真空地带。反对纳粹德国的大战基本结束，而争夺德国的战争即将开始。

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三大乌托邦，它们之间的冲突已经遍布全球每一块大陆。然而，最主要的焦点却永远是欧洲，尤其是德国。1917年以后，德国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争夺的对象。为了摆脱困境，德国领导人试图在其他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以抵销其他大国的权力。在“一战”中，德国追求建立“中欧帝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试图确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而希特勒则提出种族灭绝的“生存空间”理论。德国的战略曾经数次几乎成功，却都功亏一篑。在1917~1918年间，以及1937~1942年间，德国曾两次差一点儿就掌握了欧洲大陆的霸权和世界霸权。但最终，在“美利坚联盟”、大英帝国以及其他同盟国的联合打击下，德意志帝国不堪重负。纳粹建立乌托邦的梦想，最终完全破灭。一个新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形成，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开始对峙。德国已经成为废墟，新的两大集团将在这片废墟上展开一场新的冲突和较量。

第七章

分裂：1945~1973年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和民族主义在亚洲、非洲甚至南美洲人民中的兴起，世界上能够相互对峙的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受历史和地理法则驱使，这两个大国会努力在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增强实力，并相互对抗。同理，两个超级大国会成为欧洲的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早晚会发现它们得寻求欧洲唯一的伟大民族——德意志人民——的帮助。

——阿道夫·希特勒，1945年4月

假如没有真正的欧洲联邦，德国一旦恢复成为强大的独立国家，就会再次试图统治世界；假如没有真正的欧洲联邦，同时德国不能恢复成独立国家，那么俄国人就会统治世界……这就是实情。显然，德国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做如此安排，以便能够防止任何国家恣意利用德国的人口优势和军事工业潜力。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8年

德国和柏林使一切黯然失色；当然，德国是位于欧洲中心的历史性平衡者，也是我们的历史性敌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今天它又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柏林就是冷战的前线。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1962~1986年）

1945年之后，分裂是世界的主要事实。从意识形态来看，全球分为民主国家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像朝鲜、巴勒斯坦和越南等重要地区也分裂了。欧洲自身也分裂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组织。然而，矛盾的核心集中在分裂的德国——一个分裂的国家，它不仅处于一个分裂的大陆的中心，也处于一个分裂的世界的中心。国际政治主要围绕争夺德国而展开。冷战的双方都想争取到德国，至少不让德国倾向于另一方。同时，双方也决心阻止德国强权的再度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同时进行，二者有相似的目的，那就是让美国的军事力量长期存在于欧洲，使华盛顿成为欧洲国家的保护者。德国问题也影响了法国、英国、苏联的国内政治，当然也包括德国本身，它力图重获主权，重新成为独立国家。

“二战”后期，第三帝国垂死挣扎。从诺曼底、意大利、波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西部，希特勒的军队节节败退，虽然试图对盟军负隅顽抗，但困难重重。1944年8月，希特勒的军队从法国北部匆忙撤退，盟军在阿尔萨斯–洛林和低地国家的战线得以稳固。9月，英国、美国和波兰的伞兵试图占领默兹河、瓦尔河和位于阿纳姆（Arnhem）的莱茵河下游的桥梁，结果伤亡惨重，被德军击退。在东部地区，红军行进到维斯瓦河，后暂停前进。然而，不久之后，盟军再次在所有前线大举进攻。德国的东边盟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背叛德国：罗马尼亚在8月底倒戈，保加利亚在9月初倒戈，一周后，芬兰人被迫休战。1944年12月，匈牙利也试图倒戈，但被德国察觉，之后遭到德国强行阻止；德国推翻了当时统治匈牙利的霍尔蒂将军（Admiral Horthy），扶植另一个更为圆滑的人物继续担任德国的傀儡。那年年末，盟军部队已经到达德国本土：苏联红军深入东普鲁士，英美联军在亚琛附近取得了立足点。过不了多久，盟军就会将德国剩下的领土全部占领，结束希特勒的统治。

战后秩序的问题迫在眉睫。尽管近20年来，斯大林和丘吉尔一直在相互怀疑，但他们最终同意将在东南欧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在1944年10月的“百分比协定”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同时希腊划入英美势力范围，并且规定双方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德军的撤退导致南斯拉夫内部政局混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领导游击队与各种右翼和中间派人士作战。在希腊方面，1944年12月，英国迅速干涉希腊内政，与希腊共产党发生战争，但斯大林决定遵守承诺，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而在东欧，盟国暂时尚未撕破脸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在苏联西部边界上建立了一条“防疫封锁线”，而现在斯大林下定决心，阻止“防疫封锁线”再次形成。特别是在华沙，对于任何可能与苏联敌对的政府，斯大林都断然拒绝提供任何支持。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一致同意，波兰的东部边界定在原来的“寇松线”，因此东部边界与华沙更近了。“寇松线”多少反映了波兰和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之间的语言界线。同时，作为补偿，“波兰在北面和西面获得了大量的领土”，因此波兰整个领土被西移了。

当然，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德国。罗斯福认为，德国应当受

到惩罚，应该将其分割，要求它支付赔款，以削弱其国力。美国财政部认为，这不仅是最公正的方式，也是管理德国最廉价的方式。“摩根索计划”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名字命名，1944年末，英国和美国采纳了这一计划。该计划认为，应该削弱德国的工业化程度，以摧毁其发动战争的能力。大约同一时期，美国占领军当局下令，德国将被视为战败国，而不是被解放国，要对该国精英进行彻底的“去纳粹化”。美国占领军当局也建议，将德国分割，作为“阻止德国重整军备、防止其再次入侵他国的措施”。在盟军即将最终打败德国之际，西方国家开始阐述其处理德国的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则有不同的看法，它倾向于支持德国的再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认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民用了75年才逐渐实现国家的复兴，因此盟军有足够的时间对德国进行改造，消除纳粹主义对德国人的影响。他认为阻止新的侵略的最好方式是构建强有力的民主结构，像《凡尔赛条约》那样的惩罚性（或者更恶劣）的和平，只会使情况更糟。此外，与凯恩斯在1919年时指出的一样，国务院认为，总体上欧洲经济的健康运行有赖于德国经济的增长。摩根索提出的德国“农牧化”以及几乎所有人都要承担的巨额赔款，不仅会使德国长期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会让整个欧洲都如此，其后果是减少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专家警告说，德国的分裂将会是一场“大灾难”，不仅会延缓经济复苏，助长极端主义发展，而且会导致战胜国就战利品问题出现内讧。英国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英国认为，尽管“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确是欧洲稳定的主要威胁，但丘吉尔反复告诫大家“过分削弱德国”也是危险的。丘吉尔认为，“如果德国被毁灭并就此屈服，那么若俄国人选择从北海和大西洋水路行进的话，他们很快就能进入德国”。因此，阻止俄国威胁欧洲的最佳方式就是重建一个强大的德国。

斯大林尚未做出选择。他认为，无论希特勒式的人物下场如何，德国人民始终存在。1945年3月，他激动地说：“我们正在击溃德国人，很多人认为德国人再也无法威胁我们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痛恨德国人！……我们不可能永久性地毁灭德国人，他们仍在我们周围，将来依然会是我们的威胁。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以前的盟友将会拯救德国人，给他们提供帮助……因此，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对我们发动另一次进攻。”一方面，斯大林担心魏玛式复仇主义再次出现。因此，斯大林最初期盼美国长期驻扎在欧洲，至少能与欧洲保持联系。为了安全起见，他设计了一系列联盟，以减少苏联面临的威胁：1943年末，苏联与捷克流亡政府签订条约；1944年12月，与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签订了条约；1945年4月，与波兰、南斯拉夫签订条约。另一方面，斯大林很快认为，要想控制住德国，不应削弱而应增强德国的实力。1943年，他成立了一个“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这一组织由被俘的德国高级官员组成，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德国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这一措施和随后的一系列措施旨在恢复普鲁士与俄罗斯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且使苏联能够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来为自身服务。为了尽量影响德国向共产主义转

变，斯大林还培养了强大的德国共产党——至少吸收了那些同时经历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次清洗的人。最后一点，斯大林故意留下一个问题，使其悬而未决，即波兰领土问题。波兰在其西边新获得的土地，是应该确认归属波兰，还是应该归还德国？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看未来哪一种形势会有利于他。

雅尔塔会议力图协调各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冲突意见。德国被分成四大占领区：苏联占领区、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和法国占领区。德国还要支付大量赔款，主要以物品形式，如“设备、机床、船舰、全部车辆……移走这些器械主要是为了毁掉德国的战争潜力”。英国人、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承诺“采取措施，使德国完全裁军、等军事化和保持分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确保未来和平和安全的必备条件”。战争胜利后，成立“盟国管制理事会”来管理德国。最后，在实现对德国的控制后，盟军尝试将世界团结起来，并成立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组织。各国协议宣布召开“联合国家会议”，会议成员由目前所有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1945年3月1日宣布对共同敌人开战的联合国家”组成。这一举措将建立一个“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综合国际组织”。简言之，联合国的前身，就是在“二战”中反对德国的各国联盟，其范围已经超出了国际联盟。

上述所有事件都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将贯穿整个欧洲大陆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美国的信念：阻止另一场战争爆发的唯一途径是确保经济资源的平均分配，保证“所有民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美国人在宣言中明确声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实现“国内和平”，并且“帮助受害民族的紧急措施”得以落实，各国就要“成立能广泛代表人民、包含所有民主派别的临时政治机构”，接下来“通过自由选举成立能代表人民意愿的正式政府机构”。换言之，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新秩序，并非是西方国家打算将东欧各国出卖给斯大林，而是要推动一场遍及所有大陆的民主革命。

尽管盟国的团结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希特勒坚信，只要他能坚持战斗到盟国解体，他就能再现腓特烈大帝的伟业。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后，“元首大人”坚信，正如1762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彼得三世与普鲁士讲和，美国新总统会带领美国退出联盟。然而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宣布继续战斗，希特勒的这一希望破灭了。最后一次惨烈的战争发生在柏林，战争的一方是苏联红军，另一方是纳粹德国国防军和冲锋队，还有一些德国的附庸军队——包括部分法国人、佛兰德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俄罗斯人。结果毫无疑问。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他立下遗嘱，传位给海军司令邓尼茨元帅。5月8日，德国新政府投降。经过美国、苏联、英国和其他联合国家的共同努力，经历了近6年，盟国终于迫使第三帝国及其欧洲盟国屈服。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45年所写的，战争表明“德国能与整个世界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德国塑造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也体现了这一点。

德国投降两个月后，获胜的盟国在波茨坦召开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德国以后绝不会再对邻国或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四大

占领区已经划好：苏联占领区包括梅克伦堡、图林根、勃兰登堡周围的普鲁士各省和萨克森；美国占领区是德国西南部；英国占领区是德国西北部；后来英美将莱茵兰南部、普法尔茨、巴登和符腾堡南部划出，作法国占领区。同时，原来的首都柏林也被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一块分给一个国家。与德国类似，奥地利作为战败国也被划分成四个占领区：苏联占领区位于“下奥地利”；美国占领区在萨尔斯堡和林茨周围；英国占领区在南部，包括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法国占领区在西部，以因斯布鲁克为中心。同柏林一样，位于苏联占领区的首都维也纳，也被分成了四个部分，由四大国占领。此外，曾被德国占领的奥伊彭和马尔梅迪归还比利时，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德国北边的石勒苏益格归还丹麦。这些决定实际上恢复了1919年的对德和约，但德国东边的领土则有巨大的变化。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尽管“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限定，需要进一步和平解决”——而东普鲁士则归属波兰和苏联两国。几百年来，这三个地区都是由德意志的诸侯统治的，其人口几乎全部为德意志人。只有上西里西亚例外，在那里德意志人只勉强超过了总人口的半数。总而言之，德国人失去了约1/3的战前领土。

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边界也有很大变化。斯大林拒绝放弃1939~1940年间得到的土地：之前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之前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波罗的海诸国，当然还有波兰东部。如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所言，之所以吞并波兰的部分领土，并不仅仅是出于对邻国的担忧。他强调道：“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更深层的。历史上，波兰一直是敌人入侵俄罗斯的通道……为了侵犯我们国家，德国人曾两次穿过波兰。”换言之，正是德国问题推动了东欧国家重新划定领土。从人种学的角度看，东欧的变化更加惊人。实际上，顿河与比斯开湾之间的整个犹太民族都被杀光了。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全体德国人被向西驱逐到盟国占领区，总人数达750万；苏台德的300万德国人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表示，德国“在战争中表现得惨无人道，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纯粹的披着人皮的野兽。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共和国内永久清算德国问题”。在平斯克、里沃夫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波兰人也被向西驱逐，定居在德国人空出来的地区。尽管，有的地方的确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和德国人，以及在斯洛伐克南部的匈牙利人，但是数百年来中东欧地区特有的民族多样化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

这些巨变带来了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欧洲的中心被破坏了，德国不再是独立的国家，产生的真空由法国、英国、美国、苏联的占领军队填补。从领土来看，俄国的力量向西扩张，几乎与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一样。但是在现实中，斯大林伸得更远。大量的红军出现在波兰、德国中部以及奥地利东部。尽管苏联并未直接将势力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但这三个国家现在都紧紧追随斯大林。从长远角度看，人种变化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此时，德意志人的生存地区主要被限制在奥德–尼斯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区域，原来东易北河地区的德意志精英现在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这大大改变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的构

成，因此也可能改变德国的战略方向。纳粹大屠杀也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欧洲犹太人的大部分被杀掉了，但是欧洲的反犹主义依然盛行。大屠杀的幸存者被鄙视、驱逐，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惨遭杀害，如战后不久发生在波兰凯尔采的屠杀事件。这一切对受害者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犹太人在欧洲没有未来，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拿起自己的武器来保卫家园，他们才是安全的。很多犹太难民开始逃离，奔赴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乡。“伊尔根”（Irgun）、“哈加纳”（Haganah）和“斯特恩帮”（Stern Gang）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再次变得活跃起来。这些游击队发动运动，试图驱赶在中东的英国人。

随着德国势力被削弱，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各盟国开始构想新的国际秩序。1945年5~6月，盟国召开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联合国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构成，安全理事会由“二战”中反法西斯的五大盟国组成：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中国。以联合国为中心，还成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以促进经济繁荣，华盛顿认为这样能促进国际和平。美国助理国务卿在1945年表示，“市场上相互敌对的国家，无法在会议桌上保持长久的友谊”。另外，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够防止争端升级为战争。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安理会采取一票否决制。英国公务员、历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曾秘密参与过《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一票否决制使得联合国“表面上是一个全球性组织，但实际上是大国的联盟”。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大多数国家，也有很大的期待。

根据最初的设想，联合国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俱乐部。这一点具体体现在盟国对待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上，当时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非常厌恶西班牙。因此，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只要西班牙是独裁国家，就应该禁止它加入联合国。1945年8月，丹吉尔问题使得西班牙与联合国成员国的关系紧张起来。5年前，佛朗哥占领了该港口；现在美国要求西班牙归还该港口，而且告知佛朗哥，只有当西班牙“再次成为民主国家”，它才会被允许加入联合国。斯大林更加反对西班牙加入联合国，他试图动员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共同反对佛朗哥。尤其是因为，佛朗哥被控庇护纳粹余党，允许德国科学家在西班牙研究原子弹。之后，相关特别委员会向安理会报告，虽然西班牙无疑是法西斯独裁政权，并且曾勾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国际摩擦，不过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依然在“从事侵略活动”。同时委员会还通过联合国大会，向佛朗哥下达最后通牒，命令其在15个月内放弃政权，否则西班牙就再也没有机会加入联合国了。尽管这一建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很明显，这件事说明联合国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干预性的国际组织。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一些天真的国际法学家又对联合国进行了改造，这个组织便不再是干预性的组织，而盲目坚持主权至上的原则。

在东欧国家及非欧洲国家的民主推广问题上，盟国之间的分歧很大。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经不起考验，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允许中东欧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声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建立自由选举的政府，就肯定是反对苏联的，我们不允

许。”然而，目前斯大林并没有直接控制中东欧的所有国家。对于波兰和德国东部这样的战略要地，斯大林直接控制；但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允许这些国家举行选举。同样，欧洲主要强国也不急于在其海外殖民地组织选举，因为那些地区的人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选择成为英联邦或者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欧洲人普遍认为，在非洲、中东、亚洲以及印度次大陆地区，宗教与种族问题错综复杂。一旦这些地区的人们广泛地参与政治，便会导致很多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历史上的流血冲突重现。

1945年秋，国际军事和外交的焦点开始转移到远东。在那里，日本人仍在负隅顽抗，拒绝向美国投降。美国军事力量分布在太平洋各岛屿，显得比较分散。英国向远东输送了大量兵力，其中一个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帝国利益，另一目的是应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断增长的忧虑情绪，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华盛顿示好，促使美国参与欧洲战后安全建设。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致命的原子弹，又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20万日本人丧命，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平民。这一新型致命武器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不久后，斯大林表示，“广岛震动了整个世界，平衡被打破了”。美国下决心保持核武器的垄断地位：1946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将核能技术转交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亲密的盟友。事实上，要想以战略强制为目的使用原子弹，存在很多严重的道德、政治和操作上的障碍。在美国的4年核垄断期间，美国仅使用过一次核武器威胁，目的是加速苏联从伊朗撤军。如斯大林反复所言，关键问题是保持镇静，他授意本国的科学家加速研究原子弹，并且不得耽搁。不仅苏联如此，美国的盟友也是如此，它们也感觉受到了核武器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英国相关负责人坚持认为，他们需要“把握一切大局”，并开始训练如何运输和投放原子弹，尽管他们还没有掌握原子弹技术。简言之，原子弹的发展引发了一场极端的军备竞赛，这与数年前的情形非常相似。我们发现，核武器显然与欧洲地缘政治的传统问题相互作用——尤其是德国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缘政治的传统问题。

“二战”的残酷性及战后的不确定性促使欧洲各国认为，欧洲应集体性地表明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经济和政治特征。在这场争论中，两名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和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起草了“为自由、团结的欧洲而奋斗”的宣言。他们谴责“资本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认为这样的国家倾向于发动毁灭性战争。斯皮内利和罗西强调，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是破除传统的均势观点，使欧洲不再是分裂的各主权国家，而是成立“欧洲联邦”，进而建立全新的欧洲共生体系。他们表示，“欧洲合众国，是由现有的各联邦国家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共和国”。他们还指出，实现这一蓝图的最佳时机就是德国战败后的混乱时期。“此时，各国遭到严重破坏，迫切等待新信息的民众像正在燃烧熔化的物质一样，他们能轻易被塑造成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群体。”欧洲大陆将是一张白板，因此能够形成一个新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而是为了防止内部的

分裂。

“二战”的范围几乎遍及全世界的战争影响以及很多国家被法西斯占领的经历，从根本上影响了“二战”之后各国的国内政治。然而，这些经历并没有引起政治联合或一体化的剧烈运动。相反，在各国战争结束后的首次选举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为战争负责，谁应该为当初遏制德国的失败负责。此外，很多人也关心战后重建问题，以及与士兵复员相关的经济问题。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中，丘吉尔意外落败，令人吃惊。事实上，这并非是由他个人原因导致的，而是因为当时的民粹激进主义势不可挡。实际原因是，民众不满当初英国对德国执行了绥靖政策，结果导致法国沦陷，英国陷入危机。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评论道：“不是丘吉尔输掉了1945年的选举，而是张伯伦的灵魂导致保守党在选举中落败。”相似地，1945年10月举行的法国议会选举中，焦点问题是谁应该为1940年法国的沦陷负责，如何处理维希傀儡政府的官员，以及如何防止德国的复兴。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心，远超过对斯大林的担心，而且当时人们对欧洲统一也不是很感兴趣。民众一致摒弃了贝当元帅，认为他是民族的耻辱。选举结果是，法国共产党获得了略高于1/4的选票，成为议会最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也获得了几乎同样多的选票，各派力量大致相当。戴高乐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连任总统，战争期间他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巨大支持，尽管有一些人认为他过于保守。在英国，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美国的《租借法案》不再有效，这导致英国陷入财政危机。此时，战后重建和帝国的防御费用必须由英国独自承担。新的工党政府承诺将执行“新耶路撒冷”计划，同时实现英国远大的战略目标并承担国际责任。但工党如何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一切尚不可知。

战争的经历、国际主义志向的延续，以及战后的财政紧缩，对欧洲殖民帝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维护其海外财产、重申对轴心国曾经占领土地的控制权，是其根本要求。这不仅是为了补充两国本土所缺失的资源，也是为了提高二者自身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德国投降后第一天戴高乐就宣布，收回“我们的印度支那”十分重要，这样法国的地位将会“提升”。戴高乐宣称：“在拥有海外领地的国家中，法国是大国，没有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是大国。”类似地，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声称：“我们有必要使用非洲的资源来支持欧洲西部的联合……以组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无论在人口还是在生产力方面，都能与西半球和苏联集团平起平坐，这是美国的《租借法案》终止后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刚开始时，美国对于欧洲重建殖民帝国这一企图十分蔑视。由于美国就是通过革命赢得独立的，多数美国政客和政治家最初对于越南人、印尼人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抱有同情。1945年，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法国人被当地人赶出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让戴高乐十分愤怒。在调停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之后，美国也向伦敦方面施压，要求其撤出巴勒斯坦。华盛顿还阻止荷兰从苏加诺（Sukarno）手中夺回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苏加诺一直坚决抵抗殖民统治。美国发出警告，如果

西欧国家继续浪费本就稀少的资源去追求殖民统治，那么美国将不再给予他们经济支持。总体而言，美国急于展示出一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姿态，一方面是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因为国内舆论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联合国中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

同时，在欧洲和中东的边缘地区，斯大林和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他无情地压制波兰和德国占领区内所有的政治独立倾向，而这违反了《雅尔塔协定》。另一方面，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暂时愿意留一些空间让它们发展民主政治，只要从战略上控制这些国家，使其严格符合苏联的要求即可。苏联允许芬兰选择本国的政治道路，前提是芬兰在外交政策方面严格保持中立，这样它可以作为西北方向的缓冲器。斯大林对新的领土分配也十分满意，他可以使所有的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而他正需要这种团结来防止德国的复兴。然而，对于高加索地区，斯大林表示："我不喜欢我们在这里的边界。"因此，在得到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后，苏联决定不遵守战时协议，不但没有在战争结束后按时撤离伊朗，还向土耳其施压，确保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联合管理权。同时，1946年年初，希腊爆发大规模内战，政府损失极大，内战双方是希腊共产党和英国支持的保皇党政府。伦敦和华盛顿方面错误地认为，斯大林是希腊共产党力量壮大的幕后推手。实际上，希腊游击队主要是从铁托那里得到的支持，铁托希望把讲斯拉夫语的马其顿纳入南斯拉夫。

苏联和西方盟国间信任的瓦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共言论和秘密简报之中。1946年2月底，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年轻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送了一份秘密简报，分析苏联的政策。该简报就是后来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在该简报中，凯南回顾了斯大林近来的举动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他文章中，凯南警告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政治力量，盲目地坚信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只是临时协议而不会持久。它相信，要想自己站稳脚跟，就必须干扰我们社会内部的和谐，毁掉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的国际权威。"换言之，苏联不仅是一个战略威胁，还是意识形态威胁；事实上，正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才使得它成为战略威胁。3月初，已不担任首相的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讲一开始时，他说："自由、不受束缚的选举权以及英美人民享有的其他自由，都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些自由应该存在于每个村舍之中。"他接着说，但事实上，"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丘吉尔看来，捍卫欧洲自由与防止另一场欧洲大战是不可分割的。

此时，苏联领导人也认为，两大集团之间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抗正在加剧。1946年9月，苏联外交官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问及美国的政策。他在简报中警告说："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向垄断资本帝国主义发展，其特征是寻求世界霸权。美国有一套广泛的扩张计划，力图在国界之外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而且在不断地研发新式武器，这一切看起来都十分阴险。"简言之，

美国的目标是“限制”并“消除苏联对邻国的影响”，更广义地说，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莫斯科。

这一切都反映了盟国关于中欧问题的共识的破裂，同时也在这一共识的破裂中得到了反映。理想情况下，双方都希望占领并拥有整个德国，但是谁也无法实现，苏联和西方盟国都决心尽可能保留德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或者至少不能让德国落入对方手中。其实，斯大林已经提前行动了。就在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表示愿意和德国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尽可能延迟将什切青移交给波兰人。西方要求苏联正式废除普鲁士的建制，斯大林则拖延执行这一要求。斯大林还授意德国共产党强烈反对法国。1946年4月底，在苏联占领区内，斯大林将原来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目的是利用新成立的统一社会党，在整个西部占领区扩大苏联的影响力。三个月后，在一次演讲中，莫洛托夫直接呼吁给德国人民一个团结、独立的德国。然而，事情发展并不如意，并没有达到斯大林的预期，部分原因是苏联军队与德国人处于敌对状态——杀戮、大规模强奸时常发生，苏联系统性地破坏了德国的工业；另一部分原因是共产主义本身与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工人阶级格格不入。斯大林在德国孤立无援，陷入困境。同时，他好像也没有下定决心，是由苏联直接统治德国，还是先将德国削弱后再使之保持中立，还是将两种方案以某种形式结合起来。

西方国家根据苏联已有的活动，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了对德政策。华盛顿希望与德国民族主义者合作。1946年5月，美国人在占领区单边废除了赔偿要求。当年秋季，在斯图加特的一次会议中，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宣布，美国不仅会继续致力于欧洲事务，而且将支持德国人的自决权，甚至认为德国人有权提出修改奥德河——尼斯河的边界。不过，华盛顿坚持认为，新的德国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在西方控制下的那部分应该如此。在美军占领区总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D. Clay）将军的指导下，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占领区开始了彻底的改造。克莱与联邦德国精英密切合作，在德国西部重新建立起参与式的政治结构。1946年6月，在美国和英国占领区，当局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科隆前任市长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选举中表现尤其出色。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还特别强调对德国人的“再教育”，使他们远离纳粹主义，重归西方价值。当年末，美英两国宣布，他们打算将占领区合并，建立“美英占领区”（Bizonia）。克莱坚信，尽管对德国来说，长期的分裂是一场“灾难”，但是一旦苏联控制全部德国，那么将是“对西方文明乃至世界和平更大的威胁”。

和美国不同，英国和法国对德国民主的前景表示怀疑，非常反对德国的统一。贝文警告，“再次统一的德国会倒向这边或者那边，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的问题”。英国很乐意跟随美国的计划，使德国民主化，将西部各占领区合并，但是这是一种确立德国分裂的方式，而不是阻止德国分裂的方式。而对于法国来说，它强烈反对以任何方式恢复德国的统一。法国控制并开采德国资源，用各种办法压制其邻国。另一方面，法

国也担心，德国可能会陷入东方阵营。因此，1946年3月，法国勉强同意不再要求将莱茵——鲁尔区从德国分离出来。但同时也在思考新的遏制德国的方式，即通过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来最终防止德国成为侵略国家。后来，戴高乐将军在他的某一段“退职”时期，甚至写道，法国“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注定要成为欧洲联盟的倡导者”。事实上，欧洲联盟的主要目的就要为了解决德国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在地中海东部所做出的承诺，代价是十分巨大的。1947年2月，伦敦突然宣布希望将保护希腊的昂贵任务转移给美国。指挥棒从伦敦传到了华盛顿手中，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有保护地中海东部的责任，也有保卫欧洲整体平衡的使命。1947年6月，乔治·凯南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解释了新政策。文章重申了他在机密的“长电报”中的论述，再次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凯南表示，“意识形态”告诉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外部世界对苏联怀有敌意，最终，他们有责任推翻国界外的政治力量”。因此“长期和平共存”是不可能的。然而，凯南同时也宣称，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阻碍，因为资本主义胜过共产主义不可避免，我们不必刻意使之发生，只需等待即可。因此，克里姆林宫将避免“冒险主义”，“他们不会因为在更强的力量面前退缩而悔恨”。所以，对美国来说，正确的方式不是以“强硬”的方式回击苏联，而是“对俄国人的扩张保持长期的耐心，同时以坚定、警惕的方式对其进行遏制”。

对美国来说，“遏制”斯大林的主要前线是在欧洲。194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一份资料，将美国的盟国按照重要性依次列出：英国、法国、德国排在前面，之后是比利时，再后面是日本、中国、韩国和菲律宾。此时苏联已经控制了欧洲大块地盘，危险的是，苏联还想控制中欧和西欧。因此，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华盛顿需要重新团结欧洲大陆（至少是西欧）来对抗斯大林。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欧洲经济恢复速度要比预期慢得多。1947年年初，整个欧洲大陆还十分萧条；失业现象无处不在，配给制仍在实施，民众对资本主义，甚至民主的信心都很低。美国人担心，这种社会经济真空会被共产主义填补，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政党有很强的势力，而德国的情况最为糟糕。

因此，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公布“欧洲复兴计划”。美国表示愿意向欧洲国家提供大量资金以填补“财政缺口”，这项计划不仅面向法国、英国和德国（主要受益方）、意大利以及其他“铁幕”以西的国家，同时也面向东欧国家和苏联。然而，德国是关键。马歇尔在国会表示：“欧洲复兴包括德国的复兴，因为没有德国经济的复兴，就没有欧洲经济的复兴。”这项计划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在商业方面，而是在战略方面（当时美国的出口总额占全部GDP的比重不足5%）。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既要削弱德国复仇主义的威胁，又要在中欧抵制苏联的渗透。甚至美国开放市场的承诺，也主要是基于“自由贸易会降低战争风险”的理念。

与苏联的公开对抗，激发美国进一步采取行动，以促进西欧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统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布鲁塞尔条约》，西欧国家形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目的之一是阻止德国的复兴，但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签约国承诺共同反抗外部入侵，1948年9月，它们已经开始计划如何阻止苏联的入侵：建立联合空军，建立联合最高统帅部。然而，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这个新的联盟体系还不够。这些国家都经历过战争，坚信某种形式的联邦主义或主权共享制度，对于防止再次发生野蛮的战争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的威胁不过是强化了这一观点。华盛顿希望遏制德国，使欧洲大陆反对苏联，所以也大力支持上述观点。杜鲁门表示自己“更喜欢欧洲合众国”。1948年5月初，在丘吉尔的主持下，数百名欧洲政治家、工会成员、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的代表在海牙开会，这就是“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保守党重要人物哈罗德·麦克米伦、时任法国政府部长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法国前总统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意大利政治家斯皮内利，等等。1787年，为了防止内部分裂、抵抗外部侵略，北美各殖民地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建立了美国中央政府，并制定了宪法。而此次海牙大会，似乎就要成为欧洲的“费城制宪会议”。

然而，与美国开国之父们不同，在海牙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并未能实现建立欧洲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的。他们无法达成共识，欧洲联盟应该是一个高于国家的机构，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机构？在这一点上，法国和很多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支持建立一个欧洲联邦。英国也认为欧洲之间应该有更紧密的合作，英国希望能借此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地位，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不过，伦敦拒绝把自己的主权并入更大的实体，它支持欧洲大陆的统一，但自己并不打算参加。英联邦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英国人认为，欧洲政治统一是一种修复行为，而修复的对象是最初没有被破坏的事物；而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它在“二战”中没有被打败和被占领，因此无须参加欧洲的统一。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表示：欧洲各国进行合作，甚至是“精神联盟”都可以，但完全的政治统一不行。华盛顿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可以建立起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美国的政策转变为“遏制”，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美国不再对南欧和拉美的右翼独裁者施加太多的压力，几年之内，美国与佛朗哥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开始使用西班牙的海军与空军基地。另一方面，美国决定与苏联对抗，这对于德国西部占领区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奥姆·萨金特爵士（Sir Orme Sargent）曾说：“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德国能建立自由制度，那么将会决定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命运。”因此，在德国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既能防止苏联的渗透，又能有利于保护西方世界的安全，同时又保证德国不会并且没有兴趣控制欧洲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德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民主制度。1947年，盟国正式废除了普鲁士的建制。盟国宣称“普鲁士的建制始终代表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反动要素”。在1948年4~6月历时三个月达成的伦敦协

议中，法国勉强同意建立独立的联邦德国。

在欧洲，民主和自决是对付斯大林的有力武器，但是殖民地的人民也可能用这个原则来反对西方强国。在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得英国殖民政权瘫痪，结果导致了1947年印度的分裂和独立。印度分裂成了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印度西部和孟加拉地区）和印度教徒的印度。印度的独立对英国的打击很大：英国失去了在印度的军事据点，而正是印度的资源支撑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东部的领地的统治，现在印度已经无法为英国提供人力和财力。如贝文1948年年初所言，伦敦希望在“剩下的殖民地开采资源”，并且通过加强与各白人政权之间的合作来弥补损失。例如，澳大利亚同意支持英国在中东的立场，加拿大仍然支持英国维护欧洲的平衡。但是，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独立战略。这一点从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中便可以看出来。三国成为联盟，而大英帝国却没有加入这个联盟。

1947年9月，迫于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英国宣布放弃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将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并从这一地区撤军。1947年11月底，联合国宣布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犹太居民同意遵守这一决议，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强烈反对这一决议。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几个月内阿拉伯国家彻底失败。之后，在5月，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约旦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尽管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都签署了国际武器禁运令，但以色列还是再次获胜。几十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或是逃跑，或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驱逐，这个经历后来被称为“灾难日”（Nakba）。此外，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王国管理。以色列这个新国家是欧洲在中东核心地区的一个移植，其领导人大多出生于德国或东欧。尽管以色列的人口数量远远不及阿拉伯人，但前者采用的是欧洲的管理方式、征兵制度和选拔制度。因此，尽管以色列的人口数约为巴勒斯坦的一半，但其军队人数要多于巴勒斯坦的军队。以色列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不久，以色列劳动部长莫迪凯·本托夫（Mordechai Bentov）说道：“众所周知的是，战争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前线的胜败，也取决于后方的胜败，在现代的战争条件下，必须采用总体动员的方式。”

西方国家一致想将苏联的势力遏制在欧洲范围之内，斯大林的做法是：加强对中东欧的控制。1947年夏，当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府对马歇尔计划表现出极大兴趣时，斯大林担心它们会被纳入西方阵营，因此强迫它们拒绝美国的援助。1947年9月，斯大林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取代共产国际，使东欧各执政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确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符合莫斯科的利益。情报局的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到1948年年末，苏联将共产主义制度赋予所有的中东欧国家。然而，斯大林没有打算在法国和意大利推动共产主义革命。因为目前时机不成熟，那样做会使两国的资产阶级找到借口，以除掉两国的共产党。斯大林尤其认为，在外围地区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挑衅。他明确表示愿意

和丘吉尔一同遵守“百分比协议”，也愿意限制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这导致他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矛盾加剧，后者一直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1948年6月，斯大林终于失去了耐心，尤其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正值柏林危机时又陷入巴尔干的泥潭，斯大林担心顾此失彼。铁托受到苏联的公开谴责，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从此这两位领导人成了宿敌。为了防范斯大林，铁托向西方国家靠拢，切断了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因此希腊共产党的战斗很快就失败了。

当然，德国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1947年3～4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各国未能达成共识。尤其是美国不愿意再支持苏联向西部占领区索要赔偿的要求，正如共和党老党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说的：“实际上，这将使苏联成为整个德国的统治者——包括鲁尔区，继而整个欧洲都会被它控制。”斯大林认为，美英占领区的合并、货币改革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都是西方国家在为建立联邦德国做准备，它们最终的目标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严重威胁了斯大林在欧洲的地位，他决心解除这一威胁。1948年3月底，苏联撤回了四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代表。6月底，德国西部开始进行货币改革之后，斯大林立即对西柏林（由美国、英国、法国占领）实施封锁，切断水、电和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陆路通道。斯大林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将西方国家赶出柏林，而是要迫使西方国家停止将德国纳入自己的阵营。东西方争夺在中欧的控制权，已经进入了新的更为激烈的阶段。

作为回应，西方国家加大了对苏联的“遏制”，尤其是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的“遏制”。1948年至1949年冬，西方国家通过空中通道，向西柏林运送物资，斯大林被迫解除封锁，柏林危机结束。1949年4月初，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共同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国一致同意，“任何国家对于一个或多个欧洲和北美成员国的武力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所有成员国将联合采取防卫”。北约的建立，重要性不亚于一场和平时期的地缘政治革命：此时，美国和加拿大成为1945年后区域秩序的保证者，而且北美和欧洲之间长期的“命运共同体”也有了国际法的依据。北约主要针对的是苏联，但对很多成员国来说，防止德国复兴也是目的之一。正如北约首任秘书长、绰号“哈巴狗”的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所言：“北约的作用是，请来美国人，赶走俄国人，压制德国人。”

不久之后，西方盟国决定冒一次险，在德国建立民主制度。这被看作最佳策略，既能使德国免于落入斯大林手中，又能将德国纳入反共的统一战线中。1949年5月底，美、英、法占领区合并，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联邦德国。美国在德国的一位联络官员称，“德国宪法的起草，主要是为了国际目的”。这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每一个组成单位都有较大的自治权。这与历史上的德意志邦联以及第二帝国很相似，而与极权制的魏玛共和国以及第三帝国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德国依然有强大的联邦主义传统；也说明，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依然希望阻止德

国的复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国家暂时不允许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武装力量。为了确保苏联不会秘密控制新政权，联邦德国《基本法》（即宪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权，有效地保证了国家不会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同时非常有利于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西方国家邀请联邦德国加入新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可以确保联邦德国政府不会执行经济保护主义，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德国的国内政治，与整个欧洲的平衡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有很多人对联邦德国的发展前景表示怀疑，但民主制度还是在联邦德国日渐兴盛。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以及经济和劳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努力促成了经济繁荣发展，并稳定了政党体系。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制度下，劳资关系和谐、财富分配合理，社会经济的动荡已经成为过去。之前，魏玛共和国曾饱受动荡的摧残，“二战”后德国也曾一度动荡。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它们共同反对极权主义，打击纳粹主义。然而，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真正严峻的问题是苏联的威胁。苏联与其东欧邻国已经达成和解，共同反对西方国家。因此，阿登纳迫切希望与法国恢复邦交，这场外交革命将长期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的主要支柱。

斯大林与西方的对抗，是影响欧美各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因素；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持续担忧，是影响各国国内政治的次要因素。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主要围绕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展开争论。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次选战主要是一次民众对其遏制政策的满意度的调查。相反，新成立的进步党领导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则非常希望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共和党人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罗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为代表的鼓励主义者，他反对马歇尔计划，认为那是一件奢侈的荒唐事；另一派以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为代表，他拒绝孤立主义，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遏制政策的支持者，最终杜威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们都未能对杜鲁门造成重大打击，也没有将“导致中欧两亿人落入苏联魔爪”的责任归咎于杜鲁门。最后，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杜鲁门再次赢得选举。这次胜利至少应归功于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毫不退让，尤其是在柏林危机期间。

另一方面，法国的当务之急是应对德国力量的复兴。1948年7月，法国民众抗议总理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同意建立联邦德国，结果导致他下台，由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继任。1948年，意大利大选对共产党十分不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天主教民主党的直接支持。在英国，执政的工党和在野的保守党，都极力维持英国的影响力。工党的宣传册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是英国实行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前提。”英国两党间就大战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每个党的内部也对此进行了辩论。尤其是执政的工党，一部分人希望与莫斯科缓和关系，另一部分人则支持遏制政策。然而，舆论逐渐转向反对莫斯科。1947年，工党国际部秘书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发表《桌上的牌》

（Cards on the Table）一文，强烈呼吁英国放弃中立态度，遏制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发展。相似地，贝文指出："我们不应仅仅从物质基础上蔑视共产主义，还应该从意识形态上确立对共产主义的优势，我们应该大力推广公民权和人权。"或许，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会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同等的距离，但是他们无法在自由和独裁之间保持中立。

冷战也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政府结构。1945年，英国建立联合情报委员会，以整合各种重要的战略信息，供首相参阅。这样做的目的是，完善国际情报机构，准备反击苏联的颠覆，为英国做好最坏打算。法国也建立或整合了类似的机构。战争结束后，两国都保留了征兵制度。然而，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相比，英法两国的变化还不算什么。美国政府加强了国内动员能力，以使政府权力最大化，应对各种挑战。这样，遏制政策被强化了。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安全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还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很多其他机构。美国继续采用义务兵役制，规定年轻的美国男子需要服役。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军事化。"大政府"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二战"时期迅速扩张，战后被保留了下来。从地缘政治导向、国内政治以及美国人的心态与习惯上看，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了。

很多人担心西方式的政体无法抵挡住苏联式的集权政体。例如，希利就提醒大家注意，莫斯科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因此，苏联能够制定灵活的政策，从而紧密配合变化中的国家利益。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英国建立联合情报委员会，都是在试图弥补两国在这方面的缺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正在模仿苏联的体制。尤其在美国，大众和国会依然对政府持敌视态度。国会严格监管政府的财政支出，短期内，这可能会对行政当局有约束作用，并且制约国家安全部门的活动；从长远看，这将使美国更加高效有力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在过去，巨大的外部压力会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增强国家的恢复能力。但在冷战前期并非如此，很多西方国家都因为太担心重建问题，而没有考虑为下次战争做准备。然而，在美国，很多人认为，面对苏联的挑战，需要重新审视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尤其是在南方，他们在那里受到严重歧视。一方面，这是因为有些人担心，共产党会利用非洲裔美国人的不满来毁掉美国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很多人希望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下次战争做准备。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执行主席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曾指出："在全球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国的民主体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它能否从全体人民的内心和精神信念中召集力量。"他解释道："黑人希望改变，不仅是为了保存并强化他们在国内的权利，也是为了使自己在全球反独裁斗争中发挥作用。"苏联常常用种族歧视攻击美国，尤其在德国问题上美国很尴尬，因为在驻德美军中黑人的比例超过10%，他们原本应该成为反共产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的民主大使。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是一位主张种族隔离的军人，也是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参议员。他的言论严

重妨碍了美国在作为“冷战前线”的德国所做的努力。因此，美国黑人的解放与美国争取对中欧的控制权是紧密相连的。

男性和女性的权利问题也在全球引起激烈争论。1948年12月初，美国大选后不到一个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序言宣称，“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着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个自由、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的基础，这是因为“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玷污了人类良心的野蛮暴行”——这明显是指被打败的纳粹主义；也是因为，“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会导致“对暴政和压迫的反抗”。不管怎样，提倡人权不仅被视为善行，还可以避免国际战争和内战的发生。人权的首要权利就是：每个人不受歧视地享有自由权，“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地享有这些权利。此外，《宣言》规定奴隶制，奴隶买卖，任意逮捕、拘留和流放的行为都将被禁止。《宣言》的国际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宣言》强化了欧美国家对抗斯大林的力度。两年后，欧洲主要国家签署《欧洲人权公约》，这是冷战的产物。另外，正如罗斯福遗孀埃莉诺所言，自由迁徙和移居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而苏联尤其破坏了这项人权，因为苏联囚禁了本国和附属国的大量人民。另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尤其强调“自决权”，这样殖民地的人民就可以借此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1947～1948年，国际形势对苏联的国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这个政权感受到了双重威胁：来自西方的外部攻击，来自国内异议人士的内部威胁。在战争时期，苏联曾勉强给予其人民一些自由权利，但战后再次将其剥夺。铁托对斯大林的背叛引发了斯大林对苏共内部新一轮清洗，他努力清除潜在的异端分子。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规模扩大，囚禁的人数超过以往。然而，苏联国内政策中，最为惊人的一个转变，是对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回应。为了使英国难堪，斯大林之前一直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使形势发生逆转。以色列第一任驻苏联大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夫人到达苏联后，受到了苏联的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由于斯大林的偏执，他开始担心，犹太复国主义正在与美国人联合起来策划反对他。斯大林甚至宣称：“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的情报特工。”接下来的4年中，苏联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浪潮：没有任何证据，犹太医生就被指控试图毒杀斯大林；犹太人中的共产党员被谋杀或监禁。东欧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由于有犹太血统，被指控为“托洛茨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很明显，相关罪名或多或少都与他的种族背景有关系。国际反犹太主义确实重新抬头了。这是犹太人的安全困境：他们建立以色列国的目的，是防止反犹太主义；以色列国的建立，反而使得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愈演愈烈。

作为对西方国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回应，1949年年末斯大林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了与现有政策保持一致，他并没有试图使德国永远保持分裂。恰恰相反，建立民主德国的目的是为了给德国统一

提供另一种选择。民主德国的成立宣言中称："这不是建立了民主德国政权或民主德国政府，而是建立一个所有德国人的政府。"不过，民主德国暂时不允许有自己的武装，至少表面上如此。对斯大林来说，这样做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够阻止联邦德国再次被军事化。因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成了两块试验田，以判断哪种社会模式最能满足德国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民族需要。斯大林也在继续推行他的核武器计划。1949年8月，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尽管多年来苏联核武库的规模不如美国，但毕竟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无法再对苏联进行核讹诈。

同时，为了迫使美国放松对欧洲的控制，尤其是对德国的控制，苏联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向美国施压。直到最近，俄国人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各种事情分散了当时苏联对欧洲的注意力，使其疲于应付。1945年3月，纳粹德国即将被打败的时候，斯大林同意支持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并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同年，在中国的长期内战中，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希望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洗刷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被外国势力统治的"耻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动力。然而，同等重要的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教义的践行与输出。毛泽东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并将其经验输出到邻国，一方面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其他方式能保证国内革命的安全。因此，中国选择效仿苏联，毕竟斯大林被视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中国继承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如"包围"、应对外部威胁。1950年，中苏之间如期签订条约，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联合苏联以对抗西方国家。换言之，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两种力量的推动：中国领导人对本国问题的关心，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感。后者发源于100年前的德国，这场国际革命起源于中欧，但在远东达到了其顶峰。

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对德政策的调整，以及共产主义在东亚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再动员。这场变革的范围更加广泛。1950年1月，杜鲁门命令研制更致命的核武器——氢弹。几个月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文件要求增加对武器的投资，以应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挑战。该文件警告说，美国绝不能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美国绝不能在苏联的压力下让步，否则会导致苏联最后控制整个欧亚大陆。麦金德的启示言犹在耳。

冷战的主要战场仍是欧洲。但由于对亚洲局势的担忧，以及克里姆林宫的进攻，美国开始与欧洲国家协调立场。正是由于这种担忧，美国制定了一些针对北亚和东亚的政策，如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韩国的李承晚独裁统治给以支持，帮助他们抵抗内外共产主义的势力。对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盛顿非常支持这些地区的反殖民力量，美国认为这些力量是合法的，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则不合法。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支持英国、法国和荷兰努力维系其殖民帝国，因为这些国家位于反对苏联的前线，美国需要和欧洲国家合作。美国国务院表示："荷兰是美国对欧政策的强大支持

者……如果荷兰不能保持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地位，那么荷兰政府的稳定就将遭到严重破坏；一旦荷兰政府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可能对美国在西欧的地位非常不利。”对于美国来说，欧洲是最重要的战场，尤其是德国。

1950年6月末，朝鲜战争爆发，局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也许这并不是斯大林挑唆的，但斯大林可能预先知道金日成的行动，并默许了。华盛顿对此极为震惊，西欧国家更加感到恐惧。西方认为，金日成对韩国的袭击，意味着下一步将是共产主义世界对西方世界更大规模的袭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正因为如此，美国决定立即派军队支持即将崩溃的韩国。法国外交部长、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舒曼非常支持美国介入朝鲜半岛，他曾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重蹈历史覆辙。”舒曼所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不久之后，美国说服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支持发动反对金日成的战争，这也是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的首次军事行动。英国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军队，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和土耳其也派了军队。当时联邦德国没有军队，因此无法派兵参战。这些国家并不是要保护韩国的独裁者李承晚，而是要打一场全球战争，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扩张。

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将主要军队派往亚洲，因此在欧洲（主要是莱茵河和易北河沿线）需要部署更多的军队，以对苏联进行威慑。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需要某种形式的长期的欧洲防务一体化，以便利用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资源。同时，美国也可以通过对联邦德国进行重新武装来达到上述目的。在接下来的约5年时间里，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都由如下相关的问题所主导。美国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对苏联进行威慑？当然这可能会对德国的邻国产生潜在的危险。或者，是否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的欧洲跨国政治一体化（在一体化中，德国和其他国家都放弃主权）来削弱德国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历了著名的经济奇迹—1951年年末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多久之后，德国的经济力量会转变成政治和军事力量？德国力量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西方世界的强大？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给以回答。

华盛顿方面的倾向十分明显。只有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实现联合（至少是西欧各国之间相互协调）才能调动经济、道德和军事力量，来阻止斯大林的扩张，减轻美国的负担。军事方面，这个计划的核心是重新武装德国，要么是美国单独支持武装德国，要么是将其当作欧洲政治一体化的一部分来实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称：“西欧国家如果不借助德国的力量，就根本无法实现自身的安全。”唯一的问题是，德国是“与西欧其他国家融为一体，还是单独成为一个大国”。因此，1950年9月，美国表示，是否向欧洲派遣更多的军队，要依据英法是否接受联邦德国派出大量的士兵参加北约。同时，华盛顿将欧洲一体化的计划视为制约德国权力的关键。1950年4月，前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警告说：“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欧洲联盟，就不太可能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长久之计。”简言之，欧洲的统一旨在对德国和苏联进

行“双重遏制”。

为了欧洲一体化，美国不仅提供强有力的外交支持，还在私下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援。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对大量的政治、文化活动提供资助，以支持欧洲的统一或团结。英国秘密情报局也参与了类似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各国的反苏联的工会、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政党、1950年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成立于1951年）、成立于1952年的秘密组织“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此外，英美两国还支持了一些欧洲的出版物，如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主编的《月刊》（*Der Monat*，创办于1948年），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标志性的前线城市——西柏林；还有广为阅读的《邂逅》（*Encounter*）杂志（创办于1953年）。英国还对另外一些活动提供资助，英国外交部情报研究部暗中资助《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一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苏联展开了毁灭性的批判。保守主义者、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走到一起，他们所要捍卫的主要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欧洲价值观”，如民主、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依然坚持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美国与苏联两个极端模式之间的道路。《欧洲人权公约》得到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温和左派人士的共同支持。1950年各国签署该条约，西方国家力图在冷战中占领道德高地。一场为欧洲灵魂而战的战争——尤其关乎德国的前途命运开始了。

195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提议，法国与德国可以建立一个煤钢资源联合管理机构。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经济管理的方式；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将德国发动战争的潜力置于多边控制之下。舒曼宣称：“1939年之前，我们没有建立统一的欧洲，所以发生了战争。”实际上，法国的目的是：实现德国的欧洲化，从而避免欧洲被德国化。英国对该计划表示高度怀疑——这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反对主权让渡，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经济依然主要依靠英联邦及其殖民帝国。1951年，英国对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一半，在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阿登纳领导的联邦德国政府支持舒曼计划，一方面将其视为使德国重返外交舞台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也的确相信欧洲各国的共同命运。最初华盛顿方面还持保留态度，但是欧洲各国进一步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优势如此引人注目，华盛顿因此对舒曼计划表示支持。实际上，在法国人起草计划时，舒曼也与美国人进行了密切的合作。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这是实现欧洲政治统一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始终是共同防务。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与共同的欧洲“文明”还远远不够。西欧国家主要担心的是苏联的威胁，其次担心的是德国的复兴，这些担心会促使一些国家放弃主权，或者至少同意共享主权，如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甚至可能包括英国。美国对法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同意德国的重新武装。1950年10月底，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René Pleven）对此做出回应，提议建立欧洲防务

共同体（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他说，这将是“在欧洲单一的政治和军事权威之下，人和武器装备的完全合并”，德国士兵可以组成较小的单位，在重要的前线参与作战。1952年5月底，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下，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初，英国对此表示漠视，并拒绝接受这一计划，认为它会削弱自身的主权。1953年3月，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署国又试图建立另一个欧洲的跨国机构——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以负责管理防务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各国确立了条约的草案。这个机构不仅包括各国政府首脑执行委员会、法院和经济社会委员会，也包括一个两院制的欧洲议会。其中，一个院的议员由共同体成员国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称为“代表”；另一个院的议员由各国政府任命，代表各国全体人民，称为“参议员”。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它衍生出的政治一体化已经具有欧洲政府的特征，是欧洲政府的雏形。很快，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四国议会批准了该条约，意大利议会稍有推迟，但还是批准了。除英国以外的西欧各国似乎正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以消除彼此之间的不和谐，建立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

对于这些进展，莫斯科越来越警惕。自从拿破仑和希特勒发起对俄罗斯的“十字军东征”之后，俄罗斯人就一直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视为潜在威胁。而且，在欧洲防务共同体这个保护伞之下，德国将重新武装，苏联认为这是巨大的危险。1952年4月初，斯大林警告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美国人将会把联邦德国拉入北约，他们会让联邦德国建立自己的军队。阿登纳处于美国人的掌控之中，所有的原法西斯分子和军官还活着。事实上，联邦德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此时，苏联竭尽全力阻止西欧防务一体化。苏联试图利用英国和法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担忧来阻止西欧防务一体化。此外，苏联还指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其本国的议会中阻止相关法案的通过。在外交战线上，莫斯科开展了和平攻势，意在表明苏联不是西欧的威胁，因此西欧防务联合显得没有必要。后来，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失败，苏联趁机在日内瓦和平谈判中支持法国的撤军计划，并帮助法国人挽回面子。苏联的条件是，要求法国拒绝参加防务共同体。

然而，莫斯科主要针对的目标其实是联邦德国。如果能够离间联邦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那么将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造成严重打击。这件事有些紧急，之苏联想把民主德国作为一块磁石，以此吸引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站在苏联一边。但由于效果不佳，苏联已经对此失望了。相反，民主德国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权显然无法满足民主德国人民的物质需求，民主德国人民羡慕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同时，乌布利希也无法满足民主德国人民的精神需求，因为民主德国人民越来越发现，乌布利希政权是苏联人用坦克扶植起来的一个独裁政权。因此，数百万民主德国人拥向联邦德国，而只有一小部分联邦德国人来到民主德国。当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边界并不严密，人们有办法通过。过去，苏联认为，这有利于向联邦德国进行渗透。而现在，这已经成了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伤口，民主德国人大量拥入联邦德

国，用不了多久民主德国就可能没有人了。此外，为了避免授人以柄，防止阿登纳和美国人找到借口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苏联只许乌布利希拥有少数秘密的、准军事的警察，而没有正规的军队。这些警察全部忙于对内镇压，没有什么战斗力，对红军用处不大。乌布利希越来越满足于统治一个小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他不愿民主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民主国家。简言之，乌布利希已经成为苏联的负资产。“二战”后期以来斯大林对德国政策的基础正在被迅速摧毁。

因此，1952年3月初，斯大林最后一次尝试打破僵局。在一系列的公报中——史称“斯大林笔记”——他向西方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与西方达成协议。苏联愿意从占领区撤军，而且允许德国再次统一，以换取德国的非军事化和保持中立。和1945年那个时候相比，斯大林可选的方案已经少得多了。不过，对他来说，目前这个方案也有其优点，就是可以丢掉乌布利希政权这个负资产，同时可以迫使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延缓联邦德国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笔记”是针对美、英、法三个国家的，但是斯大林实际上是做给波恩政府和广大的联邦德国民众看的，他仍在试图兜售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使联邦德国支持他的主张。然而，阿登纳不为所动，没有上钩。相反，他加快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步伐，强化联邦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纽带”。阿登纳试图说服西方盟国：德国军国主义已经与希特勒和普鲁士容克阶级一同灭亡了，因此德国的军事传统将不再是威胁，而是能够服务于西方国家的事业。例如，1951年4月，阿登纳宣布，德国国防军里面很多军人与纳粹并无关系，这些人是清白的，他们“光荣”地从战争中幸存，并且在德国人民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阿登纳看来，尽管德国犯了很多历史错误，但他也许能从政治上予以挽救。同时，他尝试修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尽力修复在犹太人心中的形象。德国总理努力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1952年两国达成赔偿协议，德国以此弥补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过。在这种情形下，阿登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建议，以此表明他拒绝在两大阵营间摇摆不定，而是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起，全力支持西方一体化的事业。

此时，斯大林十分沮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之前，斯大林强迫东欧卫星国迅速进行工业化，建立国有制经济和一党专制统治。但对于民主德国，斯大林则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进行阻止。斯大林的用意是安抚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现在斯大林则完全改变了政策。1952年7月，他命令乌布利希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德国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进行了夸张的宣传，称准备建立更多的工厂、没收更多的“资本主义”企业、镇压教会，并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尽管军队事实上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由苏联控制的）。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与斯大林的期望恰恰相反。乌布利希的统治没有得到加强，相反又有大量的民主德国人因经济和政治原因逃到联邦德国，逃亡者数量翻了一番，逃兵现象也非常普遍。苏联本想扶植乌布利希政权，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联邦德国民众，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苏联情报机构坦言：“对于联邦德国的民众来说，民主德国政权已经不再有一丝吸引力了。”

朝鲜战争、欧洲军事一体化以及德国局势的发展使得国际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并且对欧美各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问题成为1952年美国大选的焦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参加竞选总统。他是“二战”时期的盟军欧洲最高司令，也曾担任过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当时，共和党内部呼声最高的人选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他以主张“亚洲政策优先”而著名。艾森豪威尔则不同意塔夫托的观点，认为那样做会对集体安全和德国的重新武装造成不利影响。艾森豪威尔宣称，只有他自己才能拯救北约。1952年3月，他曾说：“德国是国际关系中各国博弈的关键，而德国正在被美国忽视。”艾森豪威尔承诺，将会结束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曾经把这场战争形容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展开的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在欧洲，艾森豪威尔则努力对苏联采取“推回”政策。最终，他轻松赢了大选。1953年3月初，斯大林逝世后，如何应对德国不断恶化的局势，成为苏联的主要政治问题。苏联的“三驾马车”——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突然要求民主德国改变路线，迫使乌布利希放松压迫政策，这是一次巨大的政策转变。他们要求民主德国立即停止“社会主义建设项目”，同时在农村取消集体化政策。这是由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最先提出的，目的是减少逃向联邦德国的人数。然而几个月后，效果事与愿违。莫斯科采取的新政策使得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与联邦德国统一，代表人物是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rnstadt）；还有一部分人担心自己成为苏联战略的牺牲品，如乌布利希。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工人利用新获得的自由权发起了一场示威，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甚至要求德国统一。最终，乌布利希被迫请求苏联介入，以平息局势，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死了很多士兵，苏联的名声也受到了损害。苏联的德国政策再一次破产。6月底，贝利亚被他的同僚逮捕，并被以某种罪名处死。他倒台的原因很多，尤其是有人担心他会策划谋杀同僚。不过正是因为贝利亚的德国政策失败，他的政敌才找到了借口，才能如此轻易地联合起来对付他。贝利亚被处死的两年后，赫鲁晓夫在政坛上击败了主要对手马林科夫，后者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共中央委员会给马林科夫定的主要罪名是，他过去曾经支持过贝利亚在民主德国的政策，而其过于自由化的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换言之，赫鲁晓夫之所以能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标榜自己是苏联关键利益的维护者，尤其是他宣称维护了苏联在德国的利益。

在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也是其国内政治议题的核心。由温和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支持德国重新武装，并希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然而，也有一些持不同看法的官员。例如，阿登纳政府中的内务部长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就反对德国重新武装，他因此于1950年辞职。他既担心引发另一场战争，又认为这会毁掉德国统一的希望。而联邦德国另一个重要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则强烈反对阿登纳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这种外交政策会导致德国进一步分裂。社会民主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

其理论基础，但与共产党有很大不同。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是一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严厉指责阿登纳，称其为“西方联盟的总理”。不少德国民众支持舒马赫的观点。同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方案，越来越多人认为至少应当考虑一下，因为这有可能会实现德国的统一。还有很多人对重新武装表示怀疑，他们的态度是，可以接受重新武装，但“别算上我”。不过，最终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了总理的外交政策，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安全。1953年9月初，阿登纳在大选中以压倒性多数取得胜利。当然，他之所以获胜，主要原因是民众支持他的经济政策，其次是支持他坚定不移地倒向西方的政策。

1950年之后，英国政治也深受新的国际危机的影响。国防开支不断上升（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这与维护海外殖民帝国、进行朝鲜战争、研发原子弹（1950年试验成功）和防范苏联对欧洲的入侵有关，为此政府忍痛削减国内开支。1951年春，财政大臣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提议增加对奢侈品的征税，甚至要求人们在治疗眼睛、牙齿时多纳税。他的目的是，使政府有更多的钱来制造武器。劳工大臣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对此提出抗议并辞职，他反对因重整军备而缩减社会开支。一些左派人士也支持贝文的做法，如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和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因此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事实上，盖茨克削减社会开支的政策根本起不到作用，因为1951年9月英国遭受的收支平衡危机主要是由巨额国防支出引起的，尤其是英国驻莱茵河军队的大量开支。大约同一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官方数据显示英国落后于联邦德国。在1951年10月的大选中，工党失败，保守党以微弱多数险胜。在这次大选中，外交政策是核心问题，人们并不支持英国参加朝鲜战争，也反对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同时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摇摇欲坠。工党曾经自诩为“和平的政党”，宣称要把国家从托利党好战分子的手里救出来。而保守党则指责工党要为英国国际地位的下滑负责任，并谴责工党对苏联的绥靖政策。媒体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谁拿着核按钮？”1951年末，核按钮不再由工党控制，而是交给了保守党，丘吉尔再次上台并成为首相。

20世纪50年代，围绕外交和国防政策，英国国内政治迅速出现了两大对立阵营。工党内部就德国问题展开全面的争论。工党多数人反对共产主义，如希利和盖茨克，他们强烈支持北约的发展，他们同意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在多边框架内对联邦德国进行限制。他们指出，欧洲防务共同体超越了狭隘的国界，有助于应对当务之急，同时也与工党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因此，1952年，盖茨克警告一部分工会组织，面对斯大林的威胁，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分裂”了，那么各国就会“像希特勒的受害者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盖茨克及其支持者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并不是因为他们被中央情报局收买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依然是“自由世界”最好的保卫者。当然，工党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非常怀疑美国的可靠性，认为美国人是好战分子和物质至上主义者。这些人也极力反对联邦德国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或其他组织的庇护下实现重新武装。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美国持不同的看法，但英国对德政策

的分歧则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经超越了左和右的界限。有两个人最为坚决地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即安奈林·贝文和休·道尔顿（Hugh Dalton），前者属于左翼，后者则是坚定的右翼。1954年，工党大会勉强同意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但很多老百姓依然对德国表示怀疑，工党只能用集团投票的办法否决了一些人的反对意见。

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获胜，美国宣布新的外交和防御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激动地指着地图称："从德国到东亚这个辽阔的区域，包括苏联和中国，苏联共产党完全控制了这些地方。"他警告大家，莫斯科对西方采取的是"包围"战略，而且"二战"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人口从2亿增长到了8亿，是以前的4倍。欧亚大陆的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共产主义手中。实际上，这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对共产主义仅仅采取遏制政策是不够的，有必要对苏联采取积极的"推回"政策，以防止苏联势力扩张。意识形态与战略是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苏联长期控制东欧，"将构成对西欧和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正因为如此，华盛顿重申了其"传统政策"，承认"所有人都有独立的权利和自由选择政府的权利"。因此，"让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是美国的基本利益需要"。接着，美国政要发表了大量演说，加强广播和心理战来反对东方集团。美国甚至将这个办法用到了伊斯兰世界，美国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看作反对苏联的杠杆。中央情报局开始培养激进主义分子，如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他是"穆斯林兄弟会"中的重要人物。同时，中央情报局也资助慕尼黑的清真寺建设，各国穆斯林来到慕尼黑，在这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可能面临着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西方国家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人权，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府可以此获得本国国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此打击苏联在东欧的势力。但是，这也是双刃剑，有其不利的一面。在亚洲和非洲，一些民族主义者以民族自决权为武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者。此外，美国政府与拉美、中东和亚洲的很多威权政府合作，打击这些国家的平民运动。美国认为，这些平民运动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它们得到了苏联或中国的支持。美国与威权政府的合作，被认为是违反人权的行为。过去，殖民地是欧洲国家的正资产，现在却成了负资产。华盛顿则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做出了承诺，声称要保护所有盟国，但这样做太分散，以至于削弱了对欧洲的军事承诺，也让自己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

艾森豪威尔的大战略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实现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因为美国的安全依赖于经济上的强大。和其他许多共和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担心，"军事——工业复合体"（这是他后来在离任演说中使用的术语）不仅不能保卫自由，而且会逐渐吞没自由。为此，1953年7月底，艾森豪威尔刚刚上任就迅速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他还削减常规军事力量的开支，建立强大的核军备，这样既能省钱，又能弥补常规军事的不

足。这一战略反映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中，又称“新视野”（New Look）计划，后来北约的MC48文件与此一致，即用“大规模报复”的方式来回击苏联的进攻。同时，他还提出了各种裁军建议，当然这些都是话语上的策略，目的是使苏联自乱阵脚。上述两个政策——依赖核武器和削减财政开支，其重心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因为只有北约或者欧洲防务共同体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常规武器方面还是在核武器方面），美国的负担才能有所减轻，否则美国将背上沉重的军事与财政包袱。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军事合作。法国外长让·莫内（Jean Monnet）曾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的首任主席，也是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是莫内的强大支持者。欧洲防务共同体似乎既能防止苏联的威胁，又能消除美国总统“一直以来对德国重新武装的种种顾虑，包括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建立，以及总参谋部的成立”。因此，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对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说：“欧洲防务共同体是最合适的机构，只有在这个机构中，德国才能为西方军事力量的发展做出贡献，没有这个机构北约将会瓦解。”

然而，法国国内强烈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这最终使艾森豪威尔的努力付诸东流。1954年6月，胡志明的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胡志明是越南北部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法国请求美国直接给以军事支援，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担任总理后不久，宣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7月底，各主要国家签订《日内瓦协议》，印度支那的冲突暂告结束，法国放弃了在那里的殖民地。根据协议，老挝和柬埔寨成为独立国家，越南则分成南北两部分，北方由共产党控制，并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南方是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越南共和国。

然而，法国的政治对整个欧洲造成了很大影响。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使得法国民众不再希望美国来领导欧洲。尤其是在德国重新武装以及欧洲军事一体化的问题上，法国人也不愿意再听从美国的意见。此外，斯大林去世，法国人不再觉得苏联那么可怕。法国国民议会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议员强烈批评欧洲防务共同体，认为它未能充分保证德国军国主义不再复苏。还有的人认为，英国拒绝加入使得该组织的作用大打折扣。紧接着，在1954年8月底的国民议会投票中，《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被多数人否决，尽管不是压倒性多数。这是决定性的“反对票”。欧洲防务共同体以及与之伴随的欧洲军事一体化，受到了巨大挫折，从此夭折。无论如何，“欧洲”即使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像18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那样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欧洲各国不是当时美国的13个州。

在20世纪50年代余下的几年中，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夭折一直影响着欧洲的地缘政治。欧洲形成了政治真空，英国趁机掌握了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主导权。1954年10月底，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领导下，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领导人聚在一起签署了《巴黎协定》，他们一致同意“促进欧洲团

结，鼓励欧洲逐步实现一体化”。1955年5月，《巴黎协定》生效，西欧联盟正式成立。不过，西欧联盟与欧洲防务共同体及欧洲政治共同体大不相同，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没有超越国家的权力，因此英国觉得可以接受。尽管欧洲防务共同体夭折，但欧洲国家还是因西欧联盟而感到慰藉。联邦德国再次站到了欧洲舞台之上，但由于法国的要求，德国的主权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阿登纳不得不发表单边声明，表示在得不到西欧联盟允许的情况下，德国不会拥有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不会发展导弹，不会建立大型海军和空军。德国军队的规模将受到限制，盟军军队将继续长期驻扎德国，不仅是为了防止苏联的侵略，也是为了防止德国以后再侵略其他国家。同时，欧美国家有权介入德国事务，以保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制度，阻止德国擅自发展核武器或化学武器，同时避免联邦德国试图以武力实现德国统一。换言之，联邦德国未来在政治上获得的自由，对于西欧未来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莫内受到了很大挫折。他开始认为，欧洲的联合必须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欧洲各大国政府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1955年，他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组成。同年6月初，欧洲煤钢共同体国家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开会，以加强跨国经济联系。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外交大臣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海关联盟——一般称为“共同市场”，目的是将各国的交通与民用核能联合起来。英国不是煤钢共同体成员国，它试图推动各国建立更加宽松的自由贸易联系，但是徒劳无功。英国认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联合会导致西欧分裂，不仅难以牵制德国，反而会“提供一种方式使得德国再次确立霸权”。历史上，欧美很多地方曾经出现过各种国家联合，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美国的联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联合。但欧美国家尚未形成更大规模的联合。现在，更大规模的联合正在出现，一方面是经济联盟，另一方面是防务一体化。

美国开始推动联邦德国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重新武装。1955年5月初，《德国基本法》被废除，德国被允许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久后，杜勒斯对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做出了极大让步，并且他强烈指责法国，重申美国对德国的援助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杜勒斯也为德国提出了条件，即“统一后的德国既不中立化，也不解除武装，也不能脱离北约”。同时，联邦德国负责分担一部分美国占领军的开支，将其部分财政收入转移给美国，以抵消部分战争赔款。大约同一时期，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成立，以将欧洲各国的核技术人员集中起来，同时防止联邦德国单独研制原子武器。不管怎样，提供军事安全的主要角色是北约，而不是任何欧洲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西欧人民对进一步发展政治军事一体化的需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争论减弱了，但是在欧洲双重危机中尚未解决的潜在问题突然爆发出来。莫斯科、伦敦、巴黎、开罗、特拉维夫的发展相互重叠，构成连锁反应，欧洲大陆面临着

一场大的危机。冲突首先在莫斯科爆发，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彻底震动了苏联决策者。1955年5月中旬，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仅仅一周之后，赫鲁晓夫就做出回应。他决定建立一个与北约针锋相对的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这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正式的军事联盟，东方集团的全部国家（包括民主德国）均加入该组织。第二天，苏联领导人批准了《奥地利国家条约》。根据该条约，四大国同意结束对奥地利的分区占领，同时确保奥地利成为中立国家。事实上，这一协定并不是针对奥地利的，而是做给德国人看的，苏联意在向德国人表明，德国也可以在中立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统一。然而，阿登纳依然没上钩，还是坚决进行重新武装。同时，联邦德国领导人变得更加强势起来，1955年12月，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整个德国，其他任何国家只要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邦德国就不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只有苏联是例外。”这就是著名的“哈尔斯坦主义”。

这一切使莫斯科方面深感震惊。赫鲁晓夫对他儿子说：“只有联邦德国人有可能在欧洲掀起一场新的战争。”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使苏联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这又影响了华约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所有成员国最终确立一党制，以国有制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社会各阶层全面军事化，执政党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这些变化导致各国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权贵阶层，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听从莫斯科的安排，莫斯科也给了他们很多奖励，使他们获得很多经济特权。与北约一样，华约的战略操作中心也是在德国，特别是在莱茵河地区。但两大组织又有很大不同：北约是由美国领导的，但它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各国有很大的自主性；而华约则完全由莫斯科控制。1955年5月底，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元帅（Marshal Bulganin）访问贝尔格莱德，试图修复与铁托的关系。两个月后，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试图与艾森豪威尔达成谅解，两人主要讨论了德国未来的地位问题。然而，美国并不同意苏联的计划，美国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举行全国性的自由选举，否则美国不会支持德国的统一。而自由选举将导致民主德国政权立刻瓦解，这是苏联无法接受的。同时，美国也不允许德国成为中立国家，艾森豪威尔发出警告：“德国在欧洲的中心，这个由8 000万勤劳的人民组成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苏联在德国的影响力突然下降，使赫鲁晓夫开始积极干预第三世界国家事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漠不关心。1956年年初，苏联领导人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表示“期盼世界历史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这是列宁曾经预言过的时期，东方世界的人民将发挥积极作用，决定世界命运，他们将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强大的力量”。这意味着，苏联有必要修改其意识形态。过去，苏联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而现在苏联则试图团结世界上所有对西方不满的国家，与这些国家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莫斯科努力与埃及领导人贾迈勒·纳赛尔（Gamal Nasser）建立友好关系，以牵制英法两国，同时打破美国从南部对苏联的包围。同时，埃及的共产党支持纳赛尔的统治，因此受到了埃及秘密警察的庇护。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试图提高其欧洲卫星国的生存能力，同时重新唤起苏联国内曾经被斯大林恐怖统治压抑多年的活力，这样做可以巩固苏维埃政权。1956年2月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并宣布苏联将实施新政策，进行去斯大林化。古拉格劳改营中的几百万囚犯被释放，共产党重新掌握对劳改营的控制权，官僚系统不再负责这一事务。赫鲁晓夫还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红场。几个月后，苏联领导人批准免去匈牙利强硬派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的职务，由温和派领导人取而代之。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同意结束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lsaw Gomulka）的流放生活，哥穆尔卡重新担任波兰领导人，之前他一直对管理国家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而不是对苏联唯命是从。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如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改革只是刺激东欧各国人民要求获得更多的自由。1956年10月底，有两个东欧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危机。在波兰，暴乱的主要原因是物资短缺，当然波兰人一直以来也对苏联非常不满。而在匈牙利，暴乱则迅速恶化，匈牙利执政党和苏联驻军难以控制局势。当时，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试图学习奥地利的经验，使匈牙利摆脱莫斯科的直接控制，同时也摆脱华约的控制。匈牙利的工人和学生准备与苏联红军一决胜负，美国则不断地为这些人打气，向他们进行反苏宣传。联邦德国宣布重新武装的一年后，苏联在中东欧陷入困局，处境越来越艰难。

就在此时，英国和法国正努力对付埃及总统纳赛尔。纳赛尔上校从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实际上这些武器来自苏联——同时他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法两国认为，一旦失去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两国在埃及甚至整个中东的地位就会动摇，甚至在欧洲的地位也会下降。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反对法国殖民当局，巴黎深感震惊，并且这次反抗运动对法国的核试验基地构成了威胁。此外，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开始反抗英国当局，英国格外紧张，因为这威胁了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主要基地。另外，应对埃及的挑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欧洲国家调动非洲大陆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因此，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强烈支持英法以“欧洲利益”为名义进行军事干预。9月初，法国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秘密提议建立英法联合国——这是1940年丘吉尔计划的再现，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两个国家之间的团结，展示它们将协调行动。伦敦拒绝这些提议，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国家主权，但又确实同意同特拉维夫方面协调联合行动，以对抗纳赛尔。以色列没有从美国那里买到武器来对付阿拉伯人，因此它愿意接受法国的建议，这样它就可以从法国得到大量武器。10月底，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巴黎近郊的塞夫勒（Sèvres）签订秘密协议，以色列同意对埃及发动进攻，之后英法两国介入战争，名义上是使战斗双方“脱离接触”，实际上则是趁机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控制权。

形势瞬息万变，东欧和中东的危机很快达到了高潮。10月29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突袭。一天后，由于担心新的匈牙利政府退出华约（不久后匈牙利的确这么做了），赫鲁晓夫命令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波兰

则不同，它并没有打算摆脱苏联的直接控制，因此苏联没有进行干涉，允许波兰政府拥有自主权。同一天，英法两国开始执行“火枪手行动”，这是在塞夫勒秘密会议上制订的军事干预计划。西欧联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它是坚定的旁观者），都在口头上明确表示向英法提供支持。埃及迅速被以色列军队击溃，同时匈牙利人正在自己的首都殊死抵抗苏联的入侵。在联合国，英法两国受到了多国的无情嘲笑，全世界人都认为他们在冒“殖民主义”的风险。而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却没怎么受到世界的关注。本来美国希望可以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冷战，但现在它不得不先解决埃及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对英法感到愤怒，一方面是因为这场危机打断了他与阿拉伯各国民族主义者合作的计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讨厌英法的“帝国主义”，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下个月将再次参加总统选举。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埃及的危机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再关注匈牙利的局势，这导致赫鲁晓夫借此恢复了苏联在东欧的控制权。匈牙利人遭到苏联的镇压，而美国无暇顾及，只能袖手旁观。艾森豪威尔立即在安理会发起决议草案，要求英国、法国、以色列三国立即停火，停止进攻埃及。但是决议草案没有通过，因为英法在安理会动用了否决权。之后艾森豪威尔转向更强硬的措施，对英法两国施加巨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排挤两国，另一方面抛售英镑公债。法国其实已经在财政上做了一些准备，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英国很快就屈服了，因为英镑难以支撑。最终，英法还是对美国让步了，当年年底它们彻底从苏伊士运河区域撤离。英法在中东的失败严重打击了它们在中东的地位，并且对于两国在欧洲的主导权也是致命一击。

美国介入埃及战争，并且支持纳赛尔，使得法国认为华盛顿永远不再值得信任。因此，法国更加努力地发展核武器，紧紧控制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核设施和试验基地。与法国不同，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的深刻教训是，以后不能再得罪美国，不能再站在错误的立场。另外，伦敦方面也深刻意识到，它的殖民帝国曾经是维护英国在欧洲地位的支柱，但现在殖民地已经成了它的负资产，不利于英国团结世界上其他国家反对共产主义。捍卫欧洲民主与维护海外殖民地，已经成了矛盾，英国不能兼得二者，尽管前者的实现似乎要依赖于后者。1957年，英国结束了在塞浦路斯的战争，释放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族领导人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MakariosIII）。三年后，尽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与占多数的希腊族之间依然有很大矛盾，但伦敦还是决定允许塞浦路斯独立，条件是英国能够继续使用在这里的军事基地。此外，英国也放弃了它在亚非两洲的大部分殖民地，以便更好地关注它在欧洲的命运。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减少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对英国的怀疑。当初英国建立其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同样的原因使得英国放弃了殖民帝国。现在，英国的战略目标是：（1）服从美国的愿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友好关系；（2）指责苏联对人权的侵犯行为；（3）为英国回归“欧洲”铺平道路。

苏伊士运河危机还打破了西欧各国的力量均衡。正如1957年1月初

英国财政大臣所言，苏伊士运河战争对英国的最大打击是使得英国“在战后经济疲软”。当年夏天，伦敦再次遭遇英镑危机：尽管工资很高，但通货膨胀加剧，针对英镑的汇率投机再次出现。政府的公共支出很高，因此政府必须放弃某些东西以减少其财政压力：要么是大炮，要么是黄油。英国选择了黄油，放弃了大炮，预算困难暂时得到缓解，民众稍微平静了下来。1957年，麦克米伦告诉公众“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尽管民众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但英国也付出了代价，它在欧洲的地位下降了。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被迫削减英国皇家空军和英国驻莱茵军队的规模。由于成本原因，兵役制度被取消，因此英国更加依赖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地位下降，而联邦德国开始崛起，它的经济飞速发展。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开始要求在军事上与其他欧洲国家享有平等地位，尤其是核武器方面。

最重要的是，195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欧洲一体化带来了新的巨大动力。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在美国对英法下达最后通牒后，阿登纳对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说：“你可以通过欧洲来报复美国。”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同样认为，为了平衡苏联和美国，欧洲必须在经济上团结起来。然而，此时，英国仍不愿意为了加入经济联盟而削弱自己的主权，也不愿与英联邦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它还担心德国会通过经济联盟谋求恢复大国地位。麦克米伦发出警告，这将导致“西欧实际上被德国控制，德国在经济上壮大后，这个联盟将成为德国恢复其权力的工具。我们之前已经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政策失误，可能难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巴黎也有这样的担忧，不过态度有所松动，此时它坚信德法两国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不是军事一体化）是防止德国入侵的最好办法。

1957年3月底，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下，两年前参加墨西拿会议的6个国家签署了《罗马条约》。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致同意，在第二年年初建立一个共同经济市场。在1958年7月的斯特雷萨会议上，六国决定制定共同农业政策，以解决生产过剩、稳定农产品市场并使其免遭外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这样，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初步形成了，这是一个海关和经济联盟，与19世纪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很多相似之处，目的是实现欧洲“更紧密”的政治联盟。不过，英国依然没有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它通过西欧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持联系。不过，《罗马条约》开创的欧洲一体化，与之前的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欧洲经济共同体不涉及军事问题（军事合作由北约来承担），也不直接承担保护成员国民众的民主权利的责任；第二，与联合王国（英格兰、苏格兰之间的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不同，欧洲一体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指出：“欧洲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次性联合而成的，它是由实实在在的每一步积累而成的，欧洲的团结将逐步实现。”

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莫斯科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以及处死曾在南斯拉夫大使

馆避难的纳吉，彻底破坏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刚刚修复的关系。同时，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有明显的恶化。问题出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世界革命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由谁来领导？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并否定斯大林之后，中国严厉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苏联违反了共产主义的原则。中苏争论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政权在中东欧的命运。中国认为波兰、匈牙利发生的动乱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的政策，认为这两个事件都是“去斯大林化”导致的直接后果。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反映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此外，苏联在平定匈牙利局势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引起更多的混乱。东欧领导人对此感到高兴，他们迅速求助于中国，因为这样可以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尽可能地获得一些独立权。例如，1955年11月，民主德国执政党高调宣布，将采取中国的方法对现存的私营企业进行改造，他们没有采取苏联的方法。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说：“我们绝不害怕核战争。”1957年1月，在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毛泽东成为会议的主角。中共领导人所做的这些事，限制了赫鲁晓夫摆布中东欧国家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末，一系列新的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欧洲和国际局势的新一轮冲突。法国总统戴高乐准备放弃部分殖民地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他坚定地发展核能力，在欧洲其他国家面前摆出独立的姿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法国昔日的“荣耀”。1958年，戴高乐要求北约内部设立一个由英、法、美组成的“三方委员会”，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德国，另一方面是谋求在军事问题上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然而，华盛顿拒绝了这一要求，为表达不满，戴高乐于1959年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指挥序列。同年，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推翻了亲美的独裁者。一年后，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其战略自信。1961年，阿尔及利亚发生暴乱，当地的白人殖民者和军官宣布不再效忠法国，戴高乐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这些措施使得法国政府能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欧洲事务。

此时的赫鲁晓夫正在努力应对联邦德国的崛起。1957年春，波恩政府正式通知莫斯科，它将开始发展军事核武器。苏联预计，几年之内联邦德国国防军将会发展到约50万人，而且会配有原子弹装备。因此，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记者报道说，赫鲁晓夫的偏执日趋增强，不断提起德国1941年发动的突然袭击，并且谈及德国的“复仇主义”，他还说阿登纳是兴登堡式人物，可能会再次掀起纳粹主义。不过，以上还都不足为奇，使赫鲁晓夫完全绝望的是民主德国政权的摇摇欲坠。194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万难民逃离民主德国，并且这种情况正在加剧。然而赫鲁晓夫不敢撤掉乌布利希，甚至不敢太强烈地谴责他，因为毛泽东曾告诉苏联不要侵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苏联的摇尾狗，不过在1959~1960年，受中国的支持，乌布利希开始推动农业集体化。他们已经估计到，农业集体化肯定会导致食品供应的减少。当时中国缺少食品，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给民主德国提供了大量的食品，以表示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使他们更有能力对抗西方。简言之，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旦民主德国人口流失严重，并且发生经济崩溃，那么联邦德国就会吞并民主德

国；此外，假如德国真的实现统一，那么它一定会加入北约，并且两个德国的所有核武器都要归北约所有，那样苏联将遭受巨大的战略损失。

赫鲁晓夫还有一张王牌：柏林。他有句名言，称“柏林是西方的睾丸，每一次我想让西方尖叫，就从柏林入手”。1958年11月，苏联领导人向美、英、法三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就德国问题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否则苏联就要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将柏林完全交给乌布利希掌管。这明确暗示，民主德国将关闭西方国家通往西柏林的通道，西柏林将再次被封锁。在接下来的两年，赫鲁晓夫与西方的关系暂时缓和。1959年1月，他绕过波恩直接向华盛顿方面提出建议，不过没有立即得到华盛顿的回应。之后，赫鲁晓夫向阿登纳提出建议：两个德国可以组成一个邦联，或者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统一事宜。阿登纳对此予以拒绝，他表示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权，也拒绝承认与波兰的边界现状（即奥德河–尼斯河一线）。赫鲁晓夫又转向戴高乐求助，不过，1960年3~4月期间，两人在巴黎会面时，戴高乐很明显希望保持德国分裂的状态，他并不同意苏联的计划，不同意让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邦联。同时，赫鲁晓夫决心扩大苏联的核武库，以尽快达到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华盛顿以平等的方式对待苏联。这样，如果再发生一次柏林危机，苏联会比1948年的时候有更充分的准备，当时美国保持着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苏联对战略导弹的重视程度要超过陆军、海军和空军，投入了大量的资源。1959年，战略导弹获得了独立的编制。

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伦敦持观望态度，并不想与莫斯科直接发生对抗。而杜勒斯则准备奉行“战争边缘政策”。1958年11月，麦克米伦警告艾森豪威尔：“英国不打算为了柏林的200万德国人而让自己毁灭，那样做不值得，毕竟德国曾经是英国的敌人。”此时，英国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基本战略。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在财政和技术方面越来越显得落后，令其倍感痛苦。1957年，英国在百慕大与美国签订双边协议，尽管双方开始了核武器的合作，但英国处于劣势。1960年，劣势再次显露，由于技术问题，英国不得不取消其独立导弹体系“蓝光火箭”，该体系曾是英国人的骄傲。此外，维持对“殖民帝国”的管理，消耗了大量的成本，威胁到英国继续履行其欧洲责任的能力，而此时欧洲对于英国更加重要。麦克米伦感到，只有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才有希望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1961年7月，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过，英国将欧洲置于其外交政策的首位，也使得它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更加疏远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动荡也影响了各国的国内政治。1957年10月，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苏联在太空和核武器领域的进展，大大增加了美国对自身创新能力的危机感。1958年7月底，美国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同年通过《国防教育法》，这些都旨在提高美国人的自信心。很多精英也感到，美国政府对于越南共和国的支持不够，当时越南共和国面临着共产主义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所有这些因素——人造卫星危机、越南，尤其是“导弹差

距”——都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所利用。1960年11月，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已过世的父亲在芝加哥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些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外交政策平台，主张推行强硬政策。

肯尼迪将“导弹差距”归咎于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指责并不符合事实。肯尼迪打算逐渐推进新的“前沿部署”计划，其核心是国家安全。他认为，美国国防的关键在于全世界按照西方的标准实现政治经济现代化。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是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他坚信，通过美国的援助，尤其是明智的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崛起”，并且可以通过削减贫困使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西方轨道。艾森豪威尔将德国视为“欧洲的中心堡垒”，肯尼迪则对德国不怎么感兴趣，他努力绕过波恩，以实现冷战的解冻。肯尼迪是“新边疆”政策的倡导者。据颇具影响力的副国务卿乔治·保尔（George Ball）回忆，肯尼迪最初将德国看作一个容易导致更大冲突的麻烦。美国领导人似乎有了全新的看法。

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是肯尼迪新的大战略的一部分，那么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摒弃就是另一部分。艾森豪威尔认为，一旦发生重大危机，美国就应立即使用核武器。但是随着苏联的核力量逐渐与美国相当，“大规模报复战略”越来越不现实，这导致美国可能不得不使用核报复的方式来处理常规的冲突，因此决策陷入两难。肯尼迪准备以“灵活反应战略”取而代之。肯尼迪的首席军事顾问麦克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指出，这一战略包括“应对所有可能挑战的能力、处理任何危机的能力，无论是核战争还是一般的渗透或侵略”。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欧洲提升北约的常规力量，及时牵制苏联，防止最后发生核战争。在世界其他地方，“灵活反应战略”不仅要求美国部署更多的常规地面部队，也要求美国提升情报收集和“反暴乱”的能力。美国选择将印度支那作为试验场，以推行“灵活反应战略”，美国向那里派遣了大量的文职人员和军事顾问，后来还包括很多野战部队。华盛顿方面担心，一旦共产主义占领西贡，那么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苏联煽动的革命会一直蔓延到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激进政权连在一起。

不过，肯尼迪政府很快就陷入困境。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没有让越南南部的人民更加支持美国，也没有削弱越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影响力。有很多人认为，尽管越南共和国军队一直在努力提高战斗力，但始终无法平息暴乱。而在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推翻不受欢迎的吴庭艳政权，同时直接向越南派军解决问题。然而，总统暂时不愿意在越南进一步扩大战争，也没有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而介入。与乔治·保尔的观点不同，肯尼迪认为德国才是主要的前线，印度支那会让他分心。

此时，柏林危机已经到达高潮。正如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对美国人所说的，柏林这个城市已经成了“历史潮流的中心”。此时，苏联领导人认为，民主德国有可能会立即瓦解并被联邦德国迅速吞并。赫

鲁晓夫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联邦德国国防军将抵达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也就离我们的边界更近了”。1961年6月，赫鲁晓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德国是“问题的关键”。他要求美国承认苏联卫星国的边界，尤其是民主德国的边界，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更糟糕的是，肯尼迪发誓要保卫西柏林，甚至不惜一战。与此同时，毛泽东则站在赫鲁晓夫一边，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因此，1961年8月中旬，莫斯科最终允许乌布利希沿着东、西柏林的边界建立更大的隔离墙，防止更多的民主德国人逃到联邦德国，凡是试图逃脱的人，一律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击毙。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民主德国领导人“惹恼了”苏联。这样，越南人民军和民主德国军队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保护本国和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而是监禁本国人民。“铁幕”下的最后一条缝隙也被填补了，但代价是共产主义承认了自己在战略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弱势。

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没有达到目的，而是受到羞辱，之后他开始寻找各种办法来报复。1962年4月，他对国防部长说，要“将一只刺猬塞进山姆大叔的裤子里”。因此，一个月后，他下令将中程核导弹运至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从美国的南边向其施压，以此削弱和分散其在德国的力量，他至少希望能迫使美国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部队（位于苏联、土耳其的边界处）。然而，1962年10月中旬，苏联的导弹尚未在古巴部署完成，就已经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肯尼迪要求苏联立即撤出导弹，因为这些导弹能够轻易地打到美国城市，美国无法对此有所防备。美国认为，这是对美国门罗主义的公然挑战，因此下令海军对古巴实施封锁。肯尼迪立即发现，这件事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时，他对英国首相表示：“我不需要对你说明，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行动可能与柏林问题有某种联系。”此时，一场核对抗正迅速地向全世界袭来。另外，华盛顿尚不知道苏联在古巴的“顾问”已经获得批准，可以自行决定在岛上使用战术导弹。只要苏联对美国发动袭击（甚至只是一次纯粹的常规性袭击），就可能立即导致核报复。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希望能出现这样一场战争，他们迫切需要用战争来揭露美国的软弱，使美国暴露其“纸老虎”的本质，这样可以将自由战争推广到整个拉美。然而，赫鲁晓夫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有先发动袭击。他告诉卡斯特罗：“如果莫斯科首先向敌人领土发起核打击，这就将导致一场热核战争，殃及全世界。”他提醒古巴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死亡”。几天后，赫鲁晓夫对美国让步了，宣布从古巴撤回导弹部队。作为交换，美国承诺悄悄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这样战争得以避免。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对于苏联来说，幸运的是，欧洲的对抗是可以控制的，局面没有一发不可收拾。1961年年底，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翻脸，使得莫斯科失去了亚得里亚海的几个港口，不过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其他东欧国家并没有与苏联交恶。然而，在远东，中苏关系恶化使得苏联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宣布撤回所有来中国的专家，并拒绝与中国在核项目上继续合作。此外，毛泽东还批评苏联对越南胡志明的支持远远

不够。1962年10~11月，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焦头烂额，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支持印度。1949年以来，美国决策者一直梦想着中苏破裂，而此时中苏破裂已经公开化了，毛泽东不会再“一边倒”。两年后，中国在罗布泊沙漠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此时被中美两国的核力量从东西两侧包围。20世纪40年代以来，两极体系一直主导地缘政治，而现在变成了三极体系。

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对西欧（尤其是德国）也产生了持续影响。一方面，肯尼迪在导弹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增加了西方国家民众和政治家的信心，尤其鼓舞了西柏林的民众。西柏林的民众感到，赫鲁晓夫企图再次对西柏林施压，因此他们认为：“尽管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大西洋的另一头，但其实苏联是针对我们的。”另一方面，很多德国人（包括总理阿登纳）对美国感到非常失望，认为美国总统没有对柏林墙的建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们开始怀疑肯尼迪和英国人，认为他们实际上希望德国保持分裂。德国人弄不清楚“灵活反应战略”的军事含义，因此感到不安。他们认为，“灵活反应战略”剥夺了美国对德国的核保护，同时又使他们面临着北约和华约之间常规战争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华盛顿没有就古巴问题咨询盟国，因此联邦德国、英国、法国都感到愤怒。在遥远的加勒比海群岛上，一场危机使得他们与核毁灭如此接近。

在欧洲，一场激烈的外交争夺战拉开帷幕。联邦德国努力摆脱在军事上的劣势，而西方国家努力把联邦德国拉入自己阵营，至少不能让联邦德国为苏联阵营效力。1961年年末、1962年年初，法国高级外交官克里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发起欧洲政治联盟（European Political Union）的计划，该计划的意图是，在法国领导下加强西欧各国间的外交合作，补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损失和弥补美国在欧洲的核威慑力量的逐渐减弱。1962年4月，富歇计划最终破产，因为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拒绝法国提出的政府间合作方式，它们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建立超国家联盟。而且，戴高乐对美国抱有敌意，也反对英国参与欧洲事务，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对法国的这种做法十分警惕。这一切使华盛顿方面对西方联盟的总体状况极为担忧，尤其是德国的未来。肯尼迪给出回应，提出“大西洋计划”以更新北约组织，将联邦德国与西方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同时满足联邦德国的一部分要求，调动更多的欧洲力量以共同对抗苏联。此外，肯尼迪开始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其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构思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共享海上核威慑力，这将由北约组织来控制，而不是由美国来控制，肯尼迪认为联邦德国会全面加入。他希望，这一切能再次带来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大潮，他认为超国家的一体化要比法国提出的政府间一体化更好。他也希望英国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1962年年末，华盛顿强烈支持伦敦第二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外，在拿骚峰会上，肯尼迪向麦克米伦承诺，年末将向英国提供北极星核导弹，并且这些导弹将在多边核力量的保护下送达英国。然而，1963年1月中旬，戴高乐单边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请求。他宣布：“如果英国加入，欧洲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那样欧洲会依赖美国，受美国的控制，这是法国不能接受的。”

接下来的两年中，多边核力量计划和相关的政治一体化进程主导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法国一直对联邦德国非常警惕，不希望联邦德国以任何方式控制核武器。因此在一次记者会上，戴高乐宣布法国不会参加多边核力量计划，同时也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3年1月底，在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周后，法德两国签订了《爱丽舍条约》，这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其主张。戴高乐是想以此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制造分歧，使得美国支持下的两个一体化（欧洲防务和政治一体化）分离，从而形成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联盟。戴高乐似乎计划将这个协议扩大为更深层的双重联盟，建立共同的机构，协调外交政策，确立可能的联合公民权。不过，很短时间内，由于美国的施压以及阿登纳政府内部的反对，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国的意志行事。联邦德国依然对跨大西洋联盟和多边核力量表示支持，赞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支持欧洲超国家一体化。一定程度上，这使得《爱丽舍条约》的内容缺乏实质内容，仅仅成为法德友好关系的象征性表达。此时美国开始矛盾地看待欧洲一体化，因为欧洲一体化既可以用来反对苏联，也可以用来反对美国。但是戴高乐的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又回到了原点。

大体上，此时的肯尼迪依然专注于德国问题，尤其是柏林问题。他需要派遣大规模的常规部队来保卫西柏林，这就是“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概念的基础。1963年6月底，肯尼迪来到西柏林，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说，在演说中称自己是“柏林人”。他呼吁柏林市民看看柏林外面的世界，看看“全世界自由的发展趋势”。他还要求外面的人来到柏林，了解一下柏林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亲身感受一下两个柏林的巨大差异：一个是自由和繁荣的西柏林，另一个是落后与充满压迫的东柏林。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尽一切努力鼓舞西欧人民（尤其是联邦德国人民）在冷战对峙的前线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当然，与前任一样，肯尼迪也非常警惕德国力量的复兴。为此，1963年夏，肯尼迪政府迫使波恩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Nuclear Partial Test Ban Treaty），这阻止了联邦德国独立发展核威慑力的可能。联邦德国政府则担心，条约会使得德国永远不能独立发展核武器，永远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是一位资深的保守派政治家，曾担任过联邦德国国防部长，他称这是“核武器的《凡尔赛条约》”。因此，联邦德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美国与联邦德国还达成了另一项协定：“只要德国政府和人民相信美国会保护德国，德国就不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简言之，和其他很多国际组织、条约与机构一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目的是遏制德国。

这一切使多边核力量的推进更为迫切。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之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继续推进这项战略，部分原因是越南战争的军费越来越高，他急于让欧洲来平分防务负担。然而，他的主要担忧还是德国。他表示：“该计划的目的是使德国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边，不要让他们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在约翰逊政府看来，欧洲问题，尤其是德国问题，是与越南战争紧密相关的。如果美国不能控制西贡，联邦德国就会怀疑美国保卫西柏林的能力，进而联邦德国就不

得不与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表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的联盟体系。"联邦德国政府也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1965年6月，联邦德国新任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要求美国继续在越南作战，否则"德国人就会告诉自己，正如美国没有能力控制越南共和国一样，如果德国受到严重威胁，美国也无法保护西柏林"。

1963～1964年，美国和"欧洲之父"莫内一起努力，恢复欧洲一体化进程。1964年11月初，联邦德国政府最终邀请欧洲伙伴国共同研究莫内提出的方案：建立更高层次上的政治联盟，并且与华盛顿合作，通过多边核力量来建立共同防务体系。同时，波恩希望巴黎能在农业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得双方能就此达成共识。11月底，欧洲议会召集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开会，各国达成一致，准备启动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并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并与美国确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欧洲大陆又一次充满活力，一个民主的欧洲超级国家再次被各国提上议程。

此时，戴高乐再次想尽一切办法要控制波恩。他努力限制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减少美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对于欧洲的政治合作，戴高乐要求必须限制政府间的合作形式，或者至少要由法国来领导，否则法国会一概拒绝。1964年7月，戴高乐在访问波恩时，与其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他严厉指责波恩政府要求波恩必须在巴黎或华盛顿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戴高乐还表示，如果联邦德国无法与法国以政府间的方式进行安全合作——如《爱丽舍条约》所设想的那样——那么法国将退出所有的经济合作。由此可见，戴高乐没有选择搁置安全目标，在农业问题上让步，而是要利用经济合作来达到战略目的。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力，戴高乐从1964年年中开始与莫斯科进一步发展关系。法国之所以奉行这种"东方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持对德国的震慑力，并不是说真的希望东西方之间实现缓和。德国的一些观察人士——包括阿登纳——认为法国是在重新采取"包围"德国的政策。

在莫斯科，多边核力量使得苏联再次经历噩梦。20世纪50年代末，前一次噩梦曾经导致第二次柏林危机。1964年夏，赫鲁晓夫派女婿前往联邦德国，劝说联邦德国不要继续发展核武器。同时，他授权向民主德国军队提供战术核武器。当然，如果能与波恩达成协议，他就会将战术核武器从民主德国撤回。1965年4月底，法、苏发表联合公报，声明德国必须永久放弃核武器。不久之后，戴高乐开始对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威胁：1965年7月起，他要求法国代表抵制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导致共同体瘫痪，这就是"空椅子政策"。表面上，法国是在抗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财政和农业政策，但真正的目的是迫使波恩屈服，阻止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经济问题上采取多数投票制，防止法国的主权被削弱。英国也十分担心，多边核力量计划会使德国在核武器上与英国处于平等地位。约翰逊总统被法国弄得精疲力竭。同时，由于美国担心激怒苏联，以及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最终美国同意取消多边核力量计划。1961～1962年，东西关系最为紧张，但之后有所缓和，因此西方国家在安全合作上的压力也有所减少。不久，联邦德国废除了原子事务

部。随着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取消，联邦德国追求核武器的野心破灭了，它建立超国家的欧洲防务一体化的目标也失败了，建立全面的政治联盟更是不可能的了。

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国内政治。防务问题是联邦德国国内政治的主题，典型例子是关于星际战斗机的争议，以及1962年的“明镜事件”。星际战斗机是一种昂贵却明显不可靠的喷气机，它在首次使用时就出现了撞机事件，导致几位德国飞行员的殒命。1962年，《明镜》周刊记者批评联邦德国国防军战备低劣，政府恼羞成怒，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下令逮捕相关记者。此外，经验丰富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因为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付出了代价。他将波恩和华盛顿、伦敦的关系写进了《爱丽舍条约》，导致其政府中的很多阁僚感到愤怒。他的政府中，多数人是“大西洋主义者”，尤其是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经济部长艾哈德和国防部长冯·哈塞尔（von Hassel）。阿登纳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不久后就被迫辞职了，继任总理艾哈德是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失败致使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中旬，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他在农业方面荒谬的改革，混乱的官僚制度“改革”以及他个人粗暴的、不体面的行为作风。然而，批判的重点是赫鲁晓夫的国家安全政策。有的高级领导人批评赫鲁晓夫痴迷于发展核武器，却未能让苏联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挽回颜面。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无论如何，苏联不值得为古巴一战。还有不少人指责赫鲁晓夫没有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不仅打败了苏联的朋友——印度，还刚刚在苏联的东部边界成功地执行了核计划。然而，真正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是德国问题。赫鲁晓夫派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Alexei Adzhubei）去波恩后，表达了与波恩做交易的想法。赫鲁晓夫打算牺牲乌布利希，以使联邦德国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这使得中国和苏联的很多政要非常警惕，他们将民主德国看作避免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好保证。当有德国媒体报道说“阿朱别伊想要和岳父谈谈拆掉柏林墙的事”，这些政要十分愤怒。面对大量的猛烈批判，赫鲁晓夫被迫辞职。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说：“为什么赫鲁晓夫被免职了？当然是因为他把阿朱别伊派到了波恩，把事情搞砸了。”正是苏联的德国政策使得赫鲁晓夫得以上台，又是德国政策的失败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下台。

在1964年的美国大选中，外交政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很多温和的保守派，原因是他反对将民权法案强加给每一个州。不过，导致他没有赢得总统选举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复杂多变。戈德华特支持在越南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开玩笑说“我要把核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间里”。民主党的电视商业广告多次警告，他的好斗性格可能会导致核战争，媒体经常批评他不明智。相反，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约翰逊，在外交政策方面给人的印象是稳健而有效。1964年11月，绝大多数美国人选择了约翰逊，因为人们相信约翰逊不仅能给民众提供足

够的黄油，而且有能力用武器来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繁荣。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国际压力也影响了冷战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努力创造一个“伟大社会”，以最终支持美国的超级大国梦想。他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案，涉及健康、福利、教育，也尝试处理美国社会的核心不治之症：种族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在以暴力方式对待南方的黑人，这违反了自由原则和道德原则。冷战开始时，种族歧视导致全世界对美国进行非议——它使得美国的朋友们感到尴尬，让苏联有了抨击美国的借口。此时，国际局势要求美国解决种族问题、消弭种族差距。美国只有使国内实情与对外宣传保持一致才能调动各个群体，在国际上与敌对势力做斗争，并奖励那些在前线战斗的人。为此，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推动国会通过《民权法案》，法案规定所有种族享有平等的民权，确认种族隔离是违法行为，要求不得歧视黑人和随意剥夺其民权。简言之，约翰逊政府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国内改革，这不仅是要让美国人自己能和平相处，也是为了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天定命运”。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执行了与赫鲁晓夫相反的政策。他不再削减军事开支，而是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目的是与美国平起平坐。苏联的国内结构不同于别的国家，似乎能够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根据传统的观点，计划经济体制允许莫斯科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建设，而不会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这样军事开支占苏联经济的比重就会很大。西方国家则不同，市场会引起竞争，同时人们对商品有自己的需求。简言之，苏联没有美国那样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确，法国、英国、联邦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依然愿意投入巨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多数国家在和平时期依然实行征兵制。不过这些国家并不想成为大国，因此也不需要国内社会服务于国家的外交，西欧的国家与社会不再处于备战状态。过去几个世纪无休无止的战争对欧洲社会造成了影响，同理，现在的“长期和平”也会影响各国国内的政治结构。欧洲国家一般不再将外交事务置于首位，只有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依然如此。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争议刚平息，国际局势就又因三件事而再次陷入动荡。这三件事看似彼此孤立，实则相互紧密联系。危机是从欧洲开始的。当时国际局势发生了两大变化，戴高乐借此表达看法，他希望在法国的领导下推动“欧洲”制定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此时不仅联邦德国的核野心最终被遏制，也使得俄罗斯人不会立即成为欧洲的威胁。1966年3月，戴高乐决定，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原来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总部是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现在不得不转移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蒙斯。三个月后，戴高乐高调访问莫斯科，接下来的几年中还访问了波兰和罗马尼亚。尽管法国依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俄罗斯人进攻欧洲，法国应该还会与其盟友站在一起，然而，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举动，还是极大地动摇了北约的政治和战略团结。人们都不知道，法国部署在巴登–符腾堡和巴勒斯坦的军队将会采取怎样的行

动。西方国家的防御体系已经出现了漏洞，而漏洞就在最前线——德国。

很明显，这些事件将引起美国的极大反应，但是恰逢此时，逐渐升级的越南战争意味着约翰逊总统无法在欧洲集中精力。事实证明，西贡的新政权还不如吴庭艳，新政权更加软弱无力，无法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而共产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受到了河内和中苏两国的支持。约翰逊总统此时决定升级美国的行动。

就在东南亚战火不断时，中东地区再一次动荡起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人感到在边界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在魅力超凡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ir Arafat）的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不断升级。约旦忙于派遣军队，埃及则更为积极，准备最终和以色列开展一场决战。1967年5月，纳赛尔命令驻扎在西奈半岛缓冲区的联合国部队撤离，并再一次关闭了蒂朗海峡。一个月后，以色列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向埃及、约旦、叙利亚发动袭击。不到一周，阿拉伯军队就在闪电战中被摧毁了。德裔犹太金融家西格蒙德·沃伯格（Siegmund Warburg）称赞说，以色列就是18世纪的普鲁士，有着非凡的攻击力和先发制人的震慑力。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本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自身，也改变了中东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一方面，以色列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地区霸主，并借此成为美国制约苏联的重要伙伴；另一方面，以色列占领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来自联合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调查。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越南战争、中东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影响较小，但仍很重要）等事件，一直主导着全球地缘政治和各国国内政治。美国努力寻求盟国支持其在越南的战争，例如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建议“把一些德国人拉入战场”。这场“更多旗帜”运动获得了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但是约翰逊在欧洲一无所获，他完全没有劝动或吓住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1965年，德国总理艾哈德拒绝派出联邦国防军以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对此，华盛顿开始减少在欧洲的投入。1966年3月，三万美军在没有事先跟波恩方面打招呼的情况下从德国撤出。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如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甚至呼吁美国军队完全从德国撤离。

当美国在东南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时，英国再次转向欧洲以实现其在欧洲的使命，它尤其关注德国事务和英国驻莱茵地区的军队。1966年的英镑危机和国防开支削减表明，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1967年5月，基于战略考虑，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次伦敦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次英国得到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支持，而且戴高乐因北约问题在欧洲被孤立，法国的“空椅子”策略也对伦敦有利。当时英国急于让自身经济趋于平稳，这种迫切心情在6个月后凸显出来，当时持续的投机倒把行动再次导致了英镑危机。然而，仅一周

后，第二次申请就被戴高乐否决了。法国总统再次表示，英国的加入只会成为美国控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特洛伊木马。不过，英国还是没有放弃，又做了更大的努力。1968年1月，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东岸”撤离，暗示白人享有的特惠关税将被取消。此时的英联邦已经不再有多少战略和经济意义，英国和加拿大防御关系的确立是通过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而不是伦敦。

联邦德国也非常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波恩方面认为，戴高乐正在努力与苏联接近，因此自己是吃亏者，它开始对历史上德国在欧洲的“中心地带”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波恩也发现，自己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受到了歧视，条约规定联邦德国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而且当时“多边核力量”计划已经瓦解，很多人认为在核武器问题上联邦德国与有核国家串通一气。此时，波恩担心英国会减少驻莱茵地区的军队，也担心美国将部署在德国的军队逐渐转移到越南，还为要给外国驻军支付更多费用感到忧虑。1966年11月初，在如何支付美国驻军的开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削减政府开支——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艾哈德政府垮台。库尔特·基辛格（Kurt Kiesinger）担任新总理，新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的“大联盟”执政。新政府开始探讨能否结束东西方对峙，以及能否解决德国分裂带来的问题。1967年6月，新总理表示：“德国，一个再次统一的德国，如果太强大，就无法在力量均衡中发挥作用；如果太弱小，则无法独立地将各种力量平衡在自己周围。因为如果德国实现统一，那么它无法简单地加入一边或另一边。我们能看到的，只能是两个分裂的德国变得越来越团结，这将成为克服欧洲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德国新政府调整政策的第一步，就是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因为这一信条导致联邦德国拒绝和任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除外）。

简言之，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大国都因某种原因渴望缓解紧张关系，起码在欧洲是这样的。1967年6月底，约翰逊总统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在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会面，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谈充满着友好气氛。半年后，北约国家采纳了《哈默尔报告》（Harmel Report），即在不削弱军事安全前提下，尽全力实现与苏联的缓和，并制定相关政策，从而降低战争的可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失败使得各国迫切需要展开谈判以防止核扩散。已经具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绝不希望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尤其是，各国认为阻止德国发展独立的核能力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主要的无核国家——其中德国是最重要的——都迫切避免出现某种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它们不愿意永远处于核劣势。1968年达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两种立场之间的妥协。各签约国承诺，无核国家不应再发展核武器，但各国有权和平使用原子能。

越南战争、中苏分裂和第三次中东战争导致欧洲各国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发生大震动。1968～1969年，西欧和美国的一些城市突然爆发骚乱，学生奋起对抗警察，抨击政治和教育制度，逐渐地，他们开始与整个社会进行对抗。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六十八斗士”联盟，它由多种力量

组成，包括女权主义者、民权工人、学生激进分子和毛泽东主义者，他们普遍对西方现代性感到厌恶，联盟超越了阶级与种族的界限。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反文化”的生活方式，主张性体验、摇滚音乐和娱乐麻醉，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对“男权”和“剥削”性的社会规则。然而，这场全球运动的核心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愤怒，这些人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和全球的战争。这些人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看作魔鬼，也将美国在西欧、拉美和亚洲的走狗看作魔鬼，同时也反对以色列，要求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1967年，很多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包括越南战争的升级，接着电视中出现了大屠杀的画面，中情局还在玻利维亚策划了对切·格瓦拉的谋杀，此外以色列在大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后显示出非常不可一世的姿态。

这次革命的先锋队并不是北美和西欧的无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不仅软化了，而且陷入了各种错误的意识之中，工人被“压抑的宽容”所欺骗，他们误以为自己在享受真正的民主。“压抑的宽容”这一术语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教授于1965年首次提出的。这场大批判不是由工人发起的，而是由一些学生激进分子发起的，他们受过教育，认为自己已经“觉醒”。他们的策略是，想办法激怒政府，使后者采取“应对措施”，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不满意政府的做法，从而就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激进分子。同时，这些革命者非常愿意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者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来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将切·格瓦拉式的革命引入欧洲。同时，他们也愿意与作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合作。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他们希望伟大的转变从南半球的贫民窟开始，再逐渐扩散到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就是“国际主义的”“六十八斗士”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爱尔兰以及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因。

1968～1969年，一波接一波的民粹运动和骚乱冲击着西方国家的政府。在1968年美国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暴乱者和警察大打出手，大会变成了战场。在纽约的哈得逊河沿岸，爱国的码头工人（通常是东欧移民者的后代）袭击了抗议的学生，工人怀疑学生将祖国出卖给了共产主义。这个刚刚遭受民权运动的暴乱摧残的国家现在几乎陷入了战争。在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震撼力极大，连戴高乐总统都不得不秘密逃往法国在巴登的驻军那里，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去与那里的军官商讨如何进行军事干预。在北爱尔兰，大批的天主教徒揭竿而起。他们借用了美国民权运动和学生抗议的用语，将自己的社区变成了街垒。分离主义者爱尔兰共和军则抓住机会，重新与英国政府进行武装对抗，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这些事件对西方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美国国内正陷入分裂，美国军队却被派到越南的小块土地上战斗；法国似乎将要爆发另一场革命；而受北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影响，英国可能会失去战略地位重要的阿尔斯特海军基地。

然而，关键是德国。正如戴高乐冷静观察到的那样，很多最著名的革命人士都是德国人。尤其是法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

（Daniel　Cohn-Bendit）——被称为“红色丹尼”——和联邦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后者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但从没屈服于德国分裂的现状。后来，有一位法国的抗议者称：“就是在柏林，我们学会了如何上街游行。”杜奇克认为，德国民众的抗争是反抗帝国主义发动越南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同时它本身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在联邦德国，有一些抗议者甚至认为自己生活在殖民地。1967年夏天，杜奇克在一篇匿名文章里做出如下推测：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柏林自由市”，那么它将成为“未来德国重新统一的战略传动带”；他将这座城市看作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世界的中心。按照法国革命理论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说法，这将引起“焦点”效应。通过“焦点”，“武装的先锋队能够通过主观行动为革命创造客观条件”。杜奇克还认为，他们应该努力推翻波恩政府，迫使北约势力撤出，这样德国就不会再永久分裂，德国也不会再成为“欧洲列强镇压革命的工具”。一旦上述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就可能会崩溃，苏联就会同意德国的统一，并且同意从德国撤出军队。因此，外交政策就是德国革命的核心，比其他更为重要。1966年以来，这些人举办各种展览，发表文章，或者组织游行，目的是让学生们相信，美国正在印度支那进行一场“殖民战争”；“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说，美国正在发动“一场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种族屠杀”。危机过后，德国的示威者更加努力揭露美国的真实面目，他们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唱着“美国就是冲锋队，美国就是党卫队”，他们将美国政府比作上一代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做伤天害理的事。一年后，印度支那的战争达到高潮，中东的冲突进一步刺激了德国学生。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桥头堡。

国际形势也引起了苏联集团内部的动乱。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苏联的犹太人热情洋溢地给予支持，他们的大规模活动吓坏了斯大林。同样，1967年以色列打败了苏联的盟友——阿拉伯国家，苏联的犹太人欢欣鼓舞，他们再一次激怒了俄罗斯人。随后，苏联开始了新一轮的反犹太宣传，反对国内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苏联的犹太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系统性歧视。同时，莫斯科非常焦虑地盯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自由派分子利用新的缓和精神挑战强硬派。1968年1月，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保守派领袖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y）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改革派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提出了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如废除新闻审查制，承认民众有批评政府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那年整个夏天，杜布切克担心匈牙利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重演，因此反复向苏联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不会脱离华约。但是，莫斯科依然十分担忧，因为和西方的骚乱一样，颠覆性运动的火花会跨越国界，迅速导致大规模冲突，政府无法进行控制。

最终，没有一个国家的抗议运动成功推翻政府。1968年8月，苏联武力粉碎了“布拉格之春”；经过所谓的“友好协商”之后，捷共宣布停止改革。三个月后，苏联炮制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宣布苏联永远不允许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当然，“勃列日涅夫主义”主

要是一种战略，但也反映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信念，即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因此应该是不可逆转的。在西方，抗议者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工人也参加了运动，但他们并没有与学生合作。而在之后的大选中，戴高乐轻松地实现了连任。联邦德国政府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幸存了下来。北爱尔兰受到强烈震动，但是英国军队成功地控制了局势。在西方，投票箱使得抗议者停止了活动；在东方，在苏联的武力威胁下，抗议者也停止了活动。只有极少数的抗议者——尤其是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德国“赤军”（Rote Armee Fraktion）——继续武装反抗本国政府。

国际形势的确立即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国内变化，反过来后者又导致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变革。这些变化是通过选举而非革命暴力实现的。1968年11月，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大选，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党政府在印度支那战争上丧失了民心，民众不相信民主党政府能够处理好外交事务。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上台执政，他们非常清楚美国该如何重建自己的国际地位。1969年4月底，全民公决失败后，戴高乐辞职，这次事件可能不是由外交政策引起的，但是它产生了极大的战略影响，法国正在逐步放弃戴高乐将军的“宏伟”政策。6个月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联邦德国总理。一方面是因为他承诺“将冒险为民众争取更多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似乎制定了一套连贯的政策，以减轻冷战的紧张状态。尽管他目前不能结束德国的分裂，但至少能让民众更好地忍受分裂状态。

1969年，即将就任的尼克松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宏大：“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并使西贡政府能够抵挡住共产党发起的新的进攻；与欧洲伙伴重建被破坏的联盟；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尽管在一个美国已经失去绝对优势的世界里，这个平衡将是不稳定的。要想保持“公信力”，军事大棒或军事威胁是战略的核心。然而，美国新政策的核心还是外交。尼克松试图与苏联在很多问题上建立合作关系，一些合作对苏联来说比对美国更加重要。尼克松、基辛格努力与苏联建立“联动关系”，可以用来实现美国的利益，尤其是从印度支那脱身。另外，通过利用中苏破裂，基辛格希望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建立“三角关系”。1969年春夏，中苏边界极度紧张，中国越来越担心苏联会先发制人采取核打击。此时美国明确对苏联表示，任何对中国的攻击都是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

基辛格的榜样是俾斯麦，他称赞俾斯麦是一位“白色革命者”。基辛格为了确保美国总能成为世界三大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国）之一而采取的方式也无疑带有俾斯麦的风格。和联邦德国总理一样，这位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与国会之间有一些摩擦。在他看来，国内政策需要符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需要，美国要保持自身的“权威意志”。但事实上，基辛格与梅特涅更为相似，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延缓美国的衰落（他自己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不是尝试建立新的动态权力结构。无论如何，基辛格对“地缘政治”一词有灵活的理解。他更加重视“现实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例如美国承诺在全球推广民主和人权），他认为

外交不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区域性的霸权国，其实都是美国的潜在盟友，华盛顿与它们建立了很广泛的联系，这有利于美国的现实利益。1969年7月底，尼克松总统在关岛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宣布了这一新的理念，后来被称作“尼克松主义”。一年后他提醒国会，这次讲话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将参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防御与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构思所有的计划，不会规划所有的项目，不会执行所有的决定，也无法承担保卫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义务”。

对于联邦德国新总理勃兰特来说，美国驻军的减少既是威胁也是机会。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困境、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以及北约军队士气的低落，显然北约已经没有能力保证联邦德国的安全。因此，联邦德国和莫斯科的和解十分必要。此外，勃兰特希望利用美国陷入越南之际，确立联邦德国独立的外交政策，目的是使两个德国更加紧密，同时使整个东西方更加紧密。这就是“新东方政策”，其长期目标当然是实现德国统一，但是目前勃兰特的目标是，通过放宽旅游限制和其他“小措施”使普通德国人生活得更好。联邦德国外交家提出“接受分裂，然后才能克服分裂”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勃兰特希望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变得越来越相似。然而，“新东方政策”的核心是新的地缘政治。所有东欧国家领导人，尤其是苏联领导人，都对此给予了响应。同时，波恩方面需要保证北约盟国不会贸然行动，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为此，联邦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政策上做出极大让步，这使法国农民获利极大。最初，美国担心联邦德国会脱离北约，与莫斯科达成单边交易，就像1922年德国与苏俄签订的《拉巴洛条约》一样。然而，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相信，“新东方政策”可以作为美国政策的补充，有利于美国与苏联达成和解。

莫斯科十分警惕地看待美国和德国间的缓和政策，并且在战略上进行应付。中苏两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两岸相互对峙，毛泽东加强核武器和常规军建设。苏联领导人发现，苏联在西面被北约包围，在东面被中国包围，他们越来越觉得陷入困境。因此，对苏联而言，与美国、德国恢复友好关系十分重要，这也是防止尼克松和毛泽东走到一起而导致苏联利益受损的重要手段。莫斯科越来越担心，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会冲垮民主德国的防御，早晚有一天导致德国的统一。苏联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曾说，在这种环境下，最好的做法就是，试着利用莫斯科目前的实力地位让波恩接受德国的领土现状；另一种方式是，苏联直接兼并民主德国，以使越发嚣张的联邦德国“理解”苏联的需要。

与此同时，勃兰特继续推行“新东方政策”。1970年8月中旬，联邦德国与苏联达成《莫斯科条约》，条约里勃兰特实际上承认了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德河——尼斯河边界，而之前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德国明确表示放弃通过武力来改变边界现状的意图。12月初，联邦德国又和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内容与《莫斯科条约》相似。几天后，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的纪念碑前下跪，这代表一种姿态——德国忏悔纳粹犯下的罪行。1971年9月初，四大国最终解决了柏林地位问题。1972

年年底，在地缘政治基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两个德国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确立了关于“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关系的原则。然而，尽管苏联和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联邦德国依然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权，也不派遣全权大使。相反，波恩只同意设立“永久代表”，并建立一个单独的政府部门，只处理“两个德国之间的事务”。作为回报，民主德国政权允许两国之间的一些旅游活动，尤其是在东西柏林之间。不过，民主德国对旅游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和限制，仅指定了少数的边界区域。一年后，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条约，同意不再支持苏台德的德意志人谋求独立。两个德国获准同时加入联合国。联邦德国没有改变任何领土现状，而是确认了领土现状，它改变了东西方的动态，因此引发了欧洲核心地区的一场根本的地缘政治变化。

此时，苏联对这些事情非常满意。1972年6月，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称：“战后首次，一个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德国的合法继承者——在条约里承认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以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秩序。”他继续说道，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西部边界更加稳固了”，莫斯科可以更自信地面对东边的北京了。同时，苏联政府能够通过利用西方的投资、低价收购剩余农产品获利，这是尼克松用来安抚苏联的“甜味剂”（当然，美国国内的农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苏联首要关注的不是毛泽东或经济因素，而是德国。苏联的美国事务专家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回忆：“我们感到需要保持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基辛格认为这是毛泽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柏林的影响更大，几乎是决定性影响。稳住民主德国局面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我们不希望危及这一点。”简言之，苏联支持与美国的缓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苏联解决德国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如果说国际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国内政治，那么1969~1970年的缓和则使各国国内发生了新的、复杂的变化。在民主德国，乌布利希被迫辞去领导人的职务，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继任，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导致高层领导人的更迭。尽管新旧两位领导人在缓和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昂纳克对莫斯科表现得更加奉承，因此莫斯科更喜欢他。与民主德国类似，东方政策主导了联邦德国的党派政治。在联邦德国宣布放弃对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领土要求，以及放弃苏台德的德意志人重返祖国的要求后，很多民族主义者表示反对，因此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生活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数百万德意志人，更加表示反对。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领导的保守政党，猛烈地批评联邦德国与东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1970~197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几位高层人物宣布退党，它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也是如此。但是，最终，东方条约在议会通过。1972年11月，勃兰特在大选中轻松赢得胜利，这不仅是民众对他的国内政策的支持，也是对其东方政策的支持，因为东方政策在这次竞选中是主要议题。1973年7月底，在联邦宪法法院，勃兰特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法律挑战，最终东方条约获得了法院的承认。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1967年的失败以及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促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更加依赖自己的努力，而且他们试图通过恐怖手段使中东冲突“全球化”。同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激进分子稳步转向暴力行动。巴勒斯坦逐渐取代越南成为欧洲的最主要担忧，这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969年夏天，一个德国学生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在约旦的训练营。同年9月9日，就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周年纪念日，德国激进分子试图炸掉西柏林的犹太社区中心，同时犹太墓地遭到亵渎。接下来，激进分子宣布对此事件负责，他们声称“这种行为不是极右主义的过分行为，而是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重要部分”。声明人还强调“以色列的历史不合法性”，宣布他们“将与阿拉伯游击队员合作，建立明确而简单的团结关系”。换言之，国际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回归了。

在美国，抗议活动逐渐从街道、大学校园转向了国会。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蔓延，美国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和人员伤亡，但依然没有能够有效阻止。对此，国会极为不满，很多议员不再支持政府的军事行动，要求撤军。1970年9月，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试图迫使所有美国军队在年底前从印度支那撤出，但尼克松没有理会。然而，1971年1月，国会废除了北部湾决议案，该决议案曾授权约翰逊对越南采取进一步行动。半年后，前海军战士、国防分析家、曾经支持过越南战争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最终成功劝说《纽约时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这份文件直接记录了美国是如何输掉印度支那战争的。此时，尼克松需要保持在国际上的信誉，这促使其政府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国内的反对者，甚至经常会使用违法的手段，包括入室行窃、窃听和其他“卑鄙手段”。不过，他这样做主要并非出于党派政治的考虑，其实是为了国家安全。为了减少埃尔斯伯格造成的负面影响，阻止他在中美谈判的关键时刻使美国政府丢脸，1971年白宫下令盗取他的精神病治疗记录。一年后，还是同一团伙，破门闯入了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这次却遭到逮捕。尼克松顿时大惊失色，他被迫用各种办法来掩饰自己，最初，这种掩饰是成功的。他并不是要掩饰进入民主党办公室行窃的行为，因为他的确事先并不知情。他真正担忧的是，调查线索可能会追踪到他最初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所犯的罪行。

基辛格数年来一直谨慎地通过“秘密渠道”来拓展外交。1972年1月，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来到北京，并与毛泽东见面，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毛泽东担心，欧洲关系的缓和，会增加苏联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压力，所以急于与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4个月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会晤，并轰动一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样就限制了两国使用防御性武器，以使得“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依然有效。尼克松取得了出色的外交成果，不亚于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左翼代表人物乔治·麦戈文。正因为如此，在197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尼克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1969年戴高乐辞职以后，法国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劣势。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法国担心美苏共同统治全球，尤其是在欧洲。作为应对，巴黎开始动员欧洲其他国家与法国合作，尤其是联邦德国，以相互协调政策，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平衡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力量。但法国没能如愿，“欧洲”没有填补衰落的美国留下的真空。欧洲国家似乎不必再对德国进行遏制，苏联的威胁也减小了，法国很难动员其他国家一致行动。此外，美国的政策改变了。经济衰退摧毁了美国的经济信心，美国担心在与欧洲的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心理上说，尼克松十分警惕盟国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基辛格支持欧洲国家之间进行“协调”，甚至支持建立一个权力更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反对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骑墙态度。美国政府此时重新强调发展与各个盟国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关系。简言之，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推迟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这个时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1969年，伦敦第三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可能是因为英国经济低迷，因此对这次申请一直很担心。不过，英国主要还是基于政治和战略考量，目的是恢复历史上英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对此，英国国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之初，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只有不到1/5的人积极支持。由于1967年英国申请失败，民众对工党仍有广泛不满。1970年的大选，竞争异常激烈。欧洲问题是影响这次大选的重要因素，尽管不是决定性因素。最终，英国人选择了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担任首相。此外，由于英国国内支持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加上外交部信息研究部、议会议员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英国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改变了看法。1973年的第一天，英国终于被接纳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爱尔兰也同时加入。然而，由于伦敦强烈支持“政府间”的合作方式，而不是“超国家”的合作方式，欧洲共同体并没有被“深化”，而是被“拓宽”了。无论如何，“角色定位”的问题依然主导着英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1973年开始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好像能够使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挣脱出来，以便投入更多精力维护自己在欧洲摇摇欲坠的地位。1月底，基辛格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最终签订《巴黎协定》。美国同意撤军，以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

美国曾经一度忽视欧洲，而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重返欧洲舞台。1966年以后，美国在欧洲越来越像一个配角。1973年，基辛格的“欧洲年”政策是为了改革北约，通过一系列的仪式以实现新的“大西洋宪章”的共同目标。1974年年初，北约与苏联在维也纳举行对话，目的是实现“相互均衡裁军”，以限制中欧的军备竞赛。然而，与预期不同，联系美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纽带并没有被更新。失败的原因很多，尤其是因为西欧国家憎恨基辛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们不愿意对美国唯唯诺诺。但是，欧美之间分歧的核心在于新的中东冲突，这场冲突是由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 Sadat）挑起的。1970年年初，基辛格决心诱使开罗进入西方阵营，这更令欧洲人感到不安；1971年，基辛格开辟了另一个争取埃及的“秘密渠道”。不过，当时萨达特没有与

美国走到一起。1973年10月，利用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发起突然袭击，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的北侧。

萨达特和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突然进攻使以色列猝不及防。然而，几天之内，美国迅速向以色列输入大量武器，局势得以逆转。以色列在军事上转败为胜，在戈兰高地粉碎了叙利亚的进攻，并把大部分埃及军队困在苏伊士运河。很快，地区危机转变成了欧洲危机和全球危机。苏联竭尽全力想避免损坏与盟友的关系，因此开始对以色列进行核威胁。作为回应，美国也对苏联进行核警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报复美国向以色列供应武器，宣布减少石油生产总量，对美国以及所有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的欧洲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这导致油价增加到4倍，各地加油站排起了长队。欧洲各国政府惊慌失措，努力和以色列、美国撇清关系。比利时的机场拒绝为美国提供服务；谣传英国暂时禁止美国使用塞浦路斯军事基地，甚至一向对美国友好的联邦德国也抱怨美国使用他们的港口向以色列运输战争物资。美欧关系直线下滑。基辛格有句广为引用的话：“我不关心北约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太恶心了。”无论如何，中东、欧洲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在接下来的30年中，这一点变得更为清晰。

1945年之后的3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因素。在某些地区，这种冲突导致直接的军事对抗。美国在东亚发动了两场战争（即对苏联的盟国——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同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还差点儿卷入一场核冲突。然而，真正的问题一直是在德国。正是在德国，尤其是在柏林，核大战离得最近，同时这里也是美苏最有可能打起常规战争的地方。对这个地区及其资源的控制情况，将决定冲突发生与否，以及冲突的程度。因此，美苏在其他所有地区的对峙，都要放到以日耳曼为中心的框架中进行诠释。这次争夺尚未决出赢家和输家。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在欧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是它们依然是核武器国家，依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联邦德国领土的保卫者。战争结束以来，联邦德国的发展突飞猛进，东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它回归国际体系，但是这个国家仍是“半主权”国家，距离东西统一的实现还是很远。当然，美国和苏联以不同的方式主导着各自的阵营，但是这两个体系谁将最终在欧洲获得胜利，目前还不清楚。

第八章

民主：1974～2011年

德国人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在过去10～15年间变得相当强大……我们必须谨小慎微，以免别国觉得我们的国家太强大、太重要而招致危险。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联邦德国总理，1979年2月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

当今世上，民主革命正集聚着新的力量……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黑海的瓦尔纳，极权政府用了30多年建立起了政权合法性。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敢施行自由选举，诞生于刺刀下的政权是无本之木。我们必须坚定信念，相信自由不是少数幸运者的特权，而是全人类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1982年6月

对世界历史而言，什么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受到煽动的穆斯林，还是中欧的解放、冷战的终结？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1998年1月

通过缓和政策来解决德国问题的策略并没有持续多久。短短几年，苏联利用其在全球获得的收益，企图攫取在欧洲的优势，这让欧洲各国惴惴不安。尤其是德国，它成为全心痛苦的“第二冷战”的战场。新型跨大西洋民主地缘政治主导了这场“战争”，它最终打破了华沙条约，分裂了苏联，并促成了两德统一。与普遍的预言不同，欧洲心脏地区的政权更迭并未破坏权力均势，一是因为德国没有表现出霸权野心，二是因为欧洲加快了一体化的步伐以制约新崛起的大国。只有当俄罗斯的权力在东方复兴，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兴起时，德国才有机会展示其权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足。美国在越南受挫，国内分歧严重，西欧大国也是如此。在1974年11月签署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Vladivostok Agreement）中，莫斯科在保持常规军力的优势下，获得了与美国核均势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德国问题通过缓和政策似乎得以解决。苏联的当务之急是促使北约通过一项协议，确保《波茨坦协定》不被破坏。为了这一目的，苏联外交官敦促各方尽快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以保证现有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并为和平解决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平台。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并分化西方联盟，苏联寻求机会在中欧地区亮剑，将大量的常规武装部队驻扎在民主德国的领土上。此外，1974年年末，莫斯科成功试验了SS–20型导弹——一种移动式中程武器，这让北约在前沿防御体系上的优势大打折扣。苏联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进行了秘密部署，旨在迫使美国停止在联邦德国构筑前沿防御体系，并加强对波恩的军事压力。当时联邦德国是西方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苏联的丹尼洛维奇将军如此回忆：“有了SS–20，我们就能着手更深层次的‘常规’行动，我们能立刻挟持整个欧洲。”正如联邦德国一份国防文件所说：“在苏联任何针对中欧的军事打击中，波恩都将首当其冲，并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苏联加大了对欧洲反政府团体的支持，尤其是联邦德国的团体。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兵极大地鼓舞了苏联，苏联开始加紧对第三世界的干预。由于受到莫斯科的刺激，美国盟国的独立倾向增强，再加上地区动荡，缓和政策下脆弱的均势难以为继。在阿富汗，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King Zahir Shah）的亲西方政府被左翼军官颠覆，这些军官试图倒向莫斯科，并对美国的亲密盟友巴基斯坦重提边境要求。1974年4月，葡萄牙右翼独裁政权被一群军官推翻——他们决心终结成本巨大的非洲殖民战争。此时，苏联急切希望这一地区的共产党赢得大选或者发动政变，以削弱西方在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并使北约在亚速尔群岛的重要军事部署陷入困境。不久后，土耳其先发制人，入侵塞浦路斯，以防止该国激进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对土耳其族人进行种族清洗。这使得雅典军政府立即垮台，并在希腊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反美情绪。希腊退出北约军事指挥部，以此抗议北约未能约束其另一个成员国土耳其的行为。让西方国家更为担忧的是，意大利共产党赢得不少选票，很有可能会在不久后加入联合政府。当时流传，“欧洲共产主义”的选票箱不仅会出现在意大利，更会遍布整个欧洲。1975年11月，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世，

其继任者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决定举行选举，新成立的政府似乎对美国持敌视态度。当时，直布罗陀海峡成为西方孤立的据点，同时西班牙撤出了西撒哈拉，使得该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截至1975年底，北约的南部侧翼已经岌岌可危。

由于苏联实力在全球范围空前崛起，各国产生了极大的战略不稳定感，华盛顿、西欧各国和美国国会对此反应不一。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确信，美国的全球实力正在衰落。他决心提高美国的信誉，以全面对抗苏联的优势，并以美国的地区优势为“杠杆”迫使莫斯科尊重华盛顿在其他地区的利益。美国在全球大力扩展盟友，拉拢以色列、南非、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等国家。此时，南非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安哥拉；1974年印尼进攻东帝汶，美国表示容忍；摩洛哥被允许控制西撒哈拉。1973年4月，基辛格“穿梭”于中东各国，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积极斡旋。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都属于地区力量平衡问题，在美国人看来，它们都不及美国的全球“声誉”来得重要。基辛格担心，欧洲人会觉得，如果美国连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都保护不了，那凭什么保护欧洲？

然而，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在德国，德国的中部前线正被苏联步步逼近。由于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兵，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增加了10%。但是，与苏联雄厚的常规军事装备相比，这还远远不够。另外，美国那些在越南作战的军队，素质很差。“酗酒和吸毒问题严重，泛滥成灾。”曾于1974年就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的亚历山大·黑格（General Al Haig）将军回忆道，“我们的国家还远远没有准备好。”雪上加霜的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一方面是因为西欧人决意不允许超级大国在非洲和中东进行对抗，因为这会破坏欧洲来之不易的缓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不再全力捍卫欧洲的安全。为了向欧洲盟友表明捍卫中欧地区边界的决心，美国在汉堡地区增加了上千人的兵力。

在这期间，美国饱受国内危机之苦，国内行政体系受到严重影响。水门事件的调查最终使白宫易主，尼克松总统受到弹劾与指控，最终于1974年8月引咎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继任总统，并沿袭了缓和政策，基辛格则继续担任国务卿。同时，立法机关加强了对外交决策机制的控制。1974年11月，要求减少美国干预海外事务的鸽派——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取得国会的控制权。次年年初，国会表决停止对越南共和国西贡政府的所有资助，导致其无力抵抗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一轮攻势。

如果这些事件都被纳入经典的“均势”传统中，那么新的地缘政治即将诞生，并超越均势。20世纪70年代初，“人权运动”的影响蔓延到西方政坛，成为新地缘政治的一股智力支持。反殖民运动结束后，以及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开始大量地清算国内的反对者，受到国际关注。西方游说集团，如大赦国际和议会委员会，借此广泛宣传和推广它们所推崇的全球道德观。那些苏联的异见人士，如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被西方世界奉为座上宾。这种反苏情绪是由民主党议员、国防专家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挑起的，他对基辛格的政策十分不满，认为苏联利用了缓和政策，使得美国人吃了亏。杰克逊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告诉国会，“人类唯一的救赎，在于每个人把每件事当作自己的职责，在于东方密切关心西方的思想，西方密切关注东方的时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话开始对国际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1974年，杰克逊说服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这是国会通过的《贸易改革法案》的附案。《修正案》要求美国“继续为基本的人权而奋斗”，反对给予“剥夺公民的移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最惠国待遇。这一举措直接打击了基辛格与苏联建立经济联系的努力。作为一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反对一切把人权追求奉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观点。他告诉尼克松：“即使苏联人把犹太人放进毒气室，这也不是美国需要关心的，而是人道主义者才要关心的。”实际上，该法案并未特别针对某个宗教团体，但是在莫斯科禁止犹太人出境的背景下出台的。不久后，在国会的压力下，福特政府在国务院设立人权署。换言之，美国立法机构打破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杰克逊强力支持以色列并坚持捍卫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权，但中东问题并非该《修正案》的核心。杰克逊企图利用该《修正案》对苏联暴政进行大规模的舆论攻击，并借此削弱缓和政策，因为他认为该政策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莫斯科的致命要害——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修筑柏林墙——是禁止公民自由流动。如果将这一点公之于众，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损害苏联政权的名誉，并鼓舞苏联国内的反对者从内部侵蚀苏联政权。简而言之，杰克逊确信，那些对内压迫人民的政权，对外必定有侵略的野心，而宣扬人权与民主能促进世界和平。也就是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不是要国会为苏联的犹太人做些什么，而是让苏联的犹太人为美国的大战略做些什么。

苏联日益成为欧洲国家的威胁，这促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欧开始关注一件事：如何让世界听到他们共同的声音，至少让全欧洲能听到。1974年，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成立，由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实际上，理事会是由巴黎、波恩和伦敦主导的，并为欧洲各国制定共同的战略提供平台。很多人认为，这一政府间的组织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到1974年年末，欧洲经济共同体委派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Leo Tindemans）调查如何提前实现组建“欧洲联盟”的承诺。首相的结论是，欧洲人普遍感到“脆弱与无力”，所以，他们必须“组成一致战线以御外敌”，并利用欧洲“集体的力量”来捍卫国际争端中的公平和法理。他提出“只有欧洲建立起共同的防御政策，欧洲联盟才算是真正建立”。廷德曼斯提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欧洲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统一采取政策，合作生产武器，并扩大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权力。廷德曼斯还特别强调了民主，认为它既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的标准，也是联盟内部运转的模式。欧洲委员会主席应由

欧洲理事会委任，但关键需要征得欧洲议会的同意。这就意味着，欧洲议会将由普选产生，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同时第一次全欧洲的选举将在20世纪70年代末举行。换言之，欧洲要想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应先获得民主合法性。

很快，当欧洲在赫尔辛基和日内瓦同苏联就边界问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成立问题进行谈判时，欧洲的新声音很快得到了关注。尤其是英国，按照英国年轻外交官乔治·沃尔登（George Walden）的说法，英国正在利用这个论坛继续着“另一种更为微妙的冷战”，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确保真正地减少欧洲内部的壁垒”，并“确保普遍地传播自由”。然而，基辛格拒绝这么做，他认为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应划清界限。不过，正因为基辛格拒绝加入讨论，欧洲人才能够放手对苏联提出明确的要求，至少让它正式承诺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这样，签订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协定”就成为可能了。

1975年6月，《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问世，随后美国、苏联以及北约、华约的所有成员国均签署了它，这能反映出新旧地缘政治的全貌。该议定书要求各方尊重现有边界不可侵犯，并在新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下合作。这使苏联自1945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得到承认，并确认它与美国的平等地位，对苏联而言，这是一大胜利。“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条款对苏联也是一大利好。不过该条款与欧洲提倡的缔约国应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和信仰自由”的条款相悖。议定书确认保障人员与思想的自由流动，表明了它保障移民权利的立场。尽管苏联被迫同意了这些条款，却并不打算真正去遵守。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勉强做了公开的国际承诺，引发了一定的反响。当时，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国际上还没有能够强制执行上述条款的机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科意识到，正是为了确保苏联1945年后占领的领土的合法性而推动的进程，反而拆散了整个苏联阵营。

不过，基辛格并不怎么重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称其可能是由“斯瓦希里语”写成的。他更关心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快速蔓延。1975年4月，在日益强大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进攻下，西贡沦陷，美国大使馆陷入羞辱与混乱。基辛格从加强外交着手，抢先阻止共产主义在地中海的传播。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被迫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搁置争端，至少停止了战争。至于意大利，福特总统警告说，美国会“极力阻止共产主义参与组建政府”。另外，美国决定让民主进程在各国自由发展。在希腊，军政府没有被左翼取代，而是被温和的亲欧派取代。1975年，葡萄牙共产党只得到了1/5选票，共产党企图推翻现政权的计划破产，葡萄牙仍是大西洋联盟的忠实成员。在西班牙，民主转型催生了温和的社会党政府，打开了其加入北约的大门。简而言之，南欧的民主化巩固而非损害了西方联盟。

1974~1976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对全球民主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国际事件。英国国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要讨论欧洲一体化问题，以及经济危机的恶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1975年6月初，英国工

党政府就是否继续保留欧共体成员资格进行了全民公决。由此产生的大辩论不仅使国家分裂，政党分裂，甚至导致很多家庭也分裂了。最后，只有2/3的选民支持留在欧共体。英格兰的民众更加支持留在欧共体，比例大幅超过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严峻的国际形势——西贡沦陷以及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的结果。一年后，英镑危机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出手救援，这标志着经济危机达到高潮、震动全国。这对英国战略地位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英国计划削减驻德部队并从塞浦路斯撤军，以缓解公共财政危机。在这一背景下，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新的保守党领袖，以英国的衰弱为借口对执政党进行了有力的批评。1976年1月中旬，她警告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im Callaghan）说："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护人民，抵御外患，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她指责工党，"当英国及其盟友遭受来自扩张主义大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时，你们却解散了我们的防御体系"。由于这一番强烈的反共演说，苏联媒体为撒切尔冠上了"铁娘子"的绰号。

在联邦德国，对外政策依然是国内政治的核心。1974年，维利·勃兰特总理被迫辞职，因其私人助理君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被曝是苏联间谍。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任外交部长。两人都致力于延续缓和政策和东方政策，但更加注重国家稳定而不是"人权"。同时，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赤军"不断发动袭击，改组后又称"巴德尔——迈因霍夫组织"（Baader-Meinhof Group）。1975年，部分"赤军"头目被逮捕、审判及处决。1976年，几个巴勒斯坦人和"赤军"分子劫持了一架法航客机，令飞机转航至乌干达恩德培市，并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监狱中的数名囚犯。恐怖分子拘禁了犹太人乘客（包括那些没有以色列护照的犹太人），释放了其他人。一年后，联邦德国境内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德意志之秋"是恐怖事件的顶峰。在这次事件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一名成员在没有得到其组织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行动，劫持了乘坐汉莎航空飞机的联邦德国著名实业家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Martin Schleyer）。恐怖分子要求德国和土耳其政府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不久后，德国特种部队对飞机进行猛攻，试图解救被劫持者，但这导致施莱尔被杀，同时恐怖分子也被打死。1976～1977年间的一系列事件说明，联邦德国面临的威胁同全球激进的反西方势力紧密相连。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对苏联集团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每个签署国都必须公开宣布遵守《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这在克里姆林宫、东欧各国首都以及整个社会掀起激烈的争论。"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虽然"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的确很好"，但他担心"信息流通"与"扩大交流"会使边界形同虚设。就如安德罗波夫所害怕的那样，异议集团很快就援引《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要求获得政治、宗教和公民的权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东方集团的内政逐渐被国际化，这令苏联十分难堪，镇压工作也更加艰难。1975年，著名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获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给苏联的当头一棒。同年，美国议员代表团访苏，会见了苏联的另一名异见者

——尤里·奥尔洛夫（Yuri Orlov）。1976年5月，萨哈罗夫与奥尔洛夫建立公共组织，以协助《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在苏联实施。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人士要求将议定书加入《宪法》第77条的“传播自由”中。

缓和政策的式微与《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实施进程改变了美国的政治。1976年大选中，对外政策成为初选的主导因素。两党的批评家们哀悼美国在全球的撤退，要求以核武器打造更强战线，并废除《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因为苏联背信弃义，它为了自身的目的根本不打算尊重人权。1976年，亨利·杰克逊及其心腹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还有1974年因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而辞职的军备控制专家保罗·尼采（Paul Nitze），创立“当前危险委员会”，以防御猖狂的苏联。杰克逊为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但还是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击败。卡特坚定地承诺保障人权，同时乐观地认为美苏之间可以达成共识。共和党也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攻击。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福特总统艰难地抵挡住了来自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挑战。里根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指责福特对西贡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苏联的攻势妥协退却。在电视辩论中，福特犯下致命错误，称“不相信波兰人觉得自己受苏联控制”，这令他丧失了波兰裔选民的支持，也失去了工业核心区其他族裔的选票，从而输掉了选举。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

卡特新政府采用双向战略，但很快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卡特承诺，让美国对外政策“恢复道德与人权”，这标志着既与共产主义对抗，又与右翼统治抗争。确实，“人权”是他任期内的主要口号。另一方面，卡特力争减少国际冲突，试图与苏联在军备控制上达成理解，并调解各地的宗教冲突，尤其是中东地区。

卡特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对于与苏联的核平衡并不感兴趣，这与西欧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联邦德国对此尤其感到不安，当时美国与苏联间的暧昧话语越来越多，并且东欧政府对待异见人士的手法日趋强硬。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并不掩饰自己对卡特的看法，认为他十分“天真”。施密特担心，卡特会破坏联邦德国与苏联之间来之不易的“实质性”合作，包括旅游、移民和贸易。然而，真正加深美欧分歧的是，施密特担心卡特在核威慑问题上不够坚定，无法承诺保护联邦德国的防御中线。众所皆知，卡特想废除所有原子武器，这将使欧洲受到苏联先进常规武器的威胁。更直接的是，有传言说，美国正在考虑，一旦苏联发动进攻，就将放弃德国前线，这激怒了波恩政府。而且1977年苏联部署SS–20导弹时，美国就已觉察却并未充分采取行动，德国对此尤为不安。

当时的欧洲人需要物质和道德的双重武装，而那时的华盛顿却显然能力有限，这使得西欧人民更加团结。1979年6月上旬，欧洲议会进行了第一次选举，投票率超过60%。同年，欧洲货币体系诞生。该体系由联邦德国与法国主导，英国不参与其内。然而，最重要的发展还是在政

治方面：欧洲向“前所未有的团结”更进一步。而此时的施密特十分忧虑，担心德国的“无意识的、危险的崛起，会被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看作西方的第二大力量”。他甚至害怕，“苏联领导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合作会损害联邦德国利益”。因此，施密特试图把德国置于更广阔的欧洲体系中。换言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增强欧洲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德国进行自我约束。

在1979年的瓜德罗普岛峰会上，欧洲人终于促成卡特进行“双轨决策”。北约宣称，愿与苏联进一步商讨削减核武器，但又决定在1983年前部署百余中程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以防谈判无法达到满意的预期。“挥舞大棒”是对缓和政策的补充，比这更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对加入大西洋联盟的看法。同时，1979年7月，在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下，卡特政府向阿富汗派兵，支援当地人对抗喀布尔的共产党政权。布热津斯基的计划是，刺激苏联介入，然后制造越南式的混乱，引发苏联边界冲突，这样莫斯科就会放松对中欧与东欧的控制。

1979年，各国爆发了一系列危机，重塑了世界和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一直延续到冷战之后。1979年1月中旬，伊朗国王逃亡国外。此前几个月，示威者一直抗议他的专制统治，反对他与美国、以色列的外交结盟。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其宪法承诺“不断努力，直到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不久后，一群学生袭击美国使馆，劫持了60多名外交官作为人质。一个月后，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对河内和莫斯科给予警告。此外，中苏边界的冲突也不断加剧。7月，萨达姆·侯赛因担任伊拉克总统，获得了绝对权力。他试图获得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因此一年后对伊朗发动进攻。1979年11月中旬，一个国际瓦哈比派（Wahabis）组织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对沙特阿拉伯国王表示抗议，反对其屈从美国。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产油富国，其政府对这起事件深感震惊，因此招来法国雇佣兵（据说这些人已经改信伊斯兰教）咨询对策，并下令进攻清真寺，将幸存的恐怖分子斩首。同时，在几个产油国，什叶派开始公开反对政府的统治，但遭到了镇压。

这一系列事件对中东地缘政治和全球均势产生的渐进性影响十分重大。德黑兰开始支持其邻国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同时也支持黎巴嫩的伊斯兰武装。在沙特阿拉伯，很多人反对国王用雇佣兵镇压清真寺的暴乱，有一部分人，比如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主张用武力来反抗美国及其在中东的盟友。为应对威胁，沙特阿拉伯政府支持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以显示自己对伊斯兰教义的遵守。这些都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义的传播开始对中亚国家产生影响。然而，最令苏联人忧心的是，阿富汗的亲苏共产主义政权可能受到伊朗、巴基斯坦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渗透，而巴基斯坦是进行渗透工作的基地。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3月中旬说道：“我们极为重视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这标志着阿拉伯力量的重生，也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最佳堡垒。”1979年3月，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发生了一起短暂的血腥叛乱，苏联和阿富汗政府认为这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干

预的结果。一年内，情势逐步升温。到11月，苏联担心，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政权会在几个月内垮台，甚至有可能会投靠美国。因此，该年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将阿明暗杀，扶植更为亲苏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事实上，苏联的目的更像是一场仅仅针对阿富汗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保证其社会主义政权不垮掉，这一行动并非是苏联向印度洋扩张的前奏曲。但是，莫斯科不偏不倚地掉进了布热津斯基的圈套。苏联正式越过边界的那一天，布热津斯基就写信给卡特，说美国可以让苏联陷入另一场“越南战争”了。

1980年1月，总统宣布了“卡特主义”。卡特把“阿富汗等如今被苏联军队威胁的地区”定义为“具有极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因为它“拥有世界上2/3的可出口石油”。因此，他宣称，“如果有外部力量意图控制波斯湾地区，那将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将会遭到“任何形式的抵制，包括武装力量的抵抗”。同时，他要求参议院搁置批准《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从而使该条约流产。大规模的常规军力扩张计划已经展开，并开始加速。美国至少增派了3万兵力在欧洲长期部署。当时，北约成员国在增加国防开支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约成员国商讨之后，决定发起“旋风行动”，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来全面支持阿富汗的“圣战者”组织[1]抵抗苏联。其真正目的，不是将苏联挡在阿富汗之外，也不是挡在海湾之外，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损耗其兵力，尤其是在欧洲战场。

1979年的动荡令美国与西欧分歧加深。西欧希望美国专注苏联对德国的威胁，并尽可能在全球延续缓和政策。当美国连同中国、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只有联邦德国政府勉强跟随，而其他北约成员国（挪威除外）则没有真正抵制。中东分裂也日益严重，1979年，伊朗革命使得石油价格猛增，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这使得欧洲开始重视他们脆弱的能源前线。1980年6月，欧共体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家园”（Palestinian homeland），并建议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以后的阿以和谈。

缓和政策的破产与中东的新局势重塑了英国国内政治。1979年5月，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轻松赢下选举。她在经济问题上下了很多功夫，但她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她对苏联强硬的态度。这两件事息息相关：撒切尔对外采用丘吉尔式的立场，对内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以缓解英国的经济下滑。1979年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东西冲突升级，欧洲政治严重分化。右派和中间派主张向华盛顿靠拢，而左派分成两个阵营：有人主张忠实于北约，有人主张中立地反美。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的计划，仍需欧洲各国议会的批准，这影响了各国的国内政治。在联邦德国，施密特受到来自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日益增加的压力。1980年1月，德国绿党成立，它是一个支持环保的政党，致力于推动德国建立无核区，这说明旧的共识已支离破碎。1980年年底，在英国工党的党内选举中，提倡单方面裁军的迈克尔·富特，以微弱优势击败坚定支持北约的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成为工党领袖。

事实上，整个西欧的政党活动分子与民间团体都试图发动人们反对与日俱增的核战争威胁。1980年4月，在英国，一些国会议员、知识分子、艺术家、教会领袖和工会领导者集体呼吁欧洲核裁军。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理论上赞成停止部署SS–20和潘兴II导弹，但苏联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意味着北约只可能进行单方面约束。莫斯科察觉到，这是让西欧（至少是部分国家）脱离北约的机会，便着手进行系统化的渗透，并秘密资助那些倡导核裁军的团体。

在美国，对外政策依然主导着国内政治。民主党的“勺子”杰克逊自己并非参议员，他这一派的民主党正和共和党结盟，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更有见地”。缓和政策的破产以及经济的崩溃是1980年选举中最大的话题。卡特试图把里根刻画成危险的、缺乏经验的极端分子，却没有成功。他的挑战者里根具有极富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精神，并表明决心，要重建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共和党最后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民票，也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举人票。

如果说缓和政策破产对苏联集团并无太大影响，那么《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则不同。1980年7月和8月，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发生动乱，震惊全国。9月，在魅力超群的造船厂工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的带领下，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团结工会受到了美国和梵蒂冈的秘密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是波兰人出身，梵蒂冈的教皇也是波兰人。接下来的几年，波兰一直笼罩在宗教暴乱的阴影下，暴乱分子的目的是抵制共产党领导及其苏联支持者。这对莫斯科无疑是致命的威胁。波兰是苏联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是华约的第一战略梯队，地缘意义重大，而且波兰国内部署有大量的战术核导弹，是苏联军事集团连接民主德国的关键枢纽。没有波兰，苏联在德国的影响力将会尽失。1981年12月中，在苏联的支持下，波兰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宣布军事戒严，暂时控制住了事态。

1979~1980年，英美两国政府各自换届后，采取了新的战略政策。1981年1月，在美国新政府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总统宣布废除缓和政策，认为“苏联利用这条单行道大肆扩充军备”。里根相信，越战后美国的虚弱给了苏联人可乘之机，他将采取强硬姿态与之谈判。事实上，总统决心利用美国的长期经济优势向苏联施压，迫使莫斯科接受“现实主义”的军控协议。因此，总统大幅增加了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支出。1981年11月，里根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和中短程导弹谈判。18个月后，他宣布发展太空导弹防御系统，即“战略防御计划”，也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目的是防止苏联的核弹头射向美国。

然而，比军事和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里根对共产主义集团发起的意识形态进攻。他谴责苏联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帝国”。此外，里根支持苏联国内的宗教与政治不同政见者，把民主作为他大战略的核心。美国政府认为，民主是抵御苏联扩张的可靠堡垒，并且相信拥有民主政治文

化的国家不会兵戎相见。在政治学中，这被称为“民主和平论”。里根说：“自由的人民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组建政府进行统治，他们不会对邻国发动战争。自由的人民享有经济良机，他们受法律保护，法律尊重个人尊严，所以他们不会去寻求控制别国。”他在另一个场合说道：“自由与民主是和平的最佳保障，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会发起战争。”

里根不仅有豪言壮语，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来促进民主。1982年，美国恢复纪念“国家沦陷日”，该节日是纪念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东欧人民的。大约在同一时期，在里根增进“民主基础设施”（即自由出版、结社、加入政党、接受高等教育等权利）建设的要求下，1983年美国政府监督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以鼓励全球各国建立代议制政府。里根决心用民主和人权击垮整个苏联阵营。1981年4月，中央情报局秘密与以色列情报机关商定，由其在东欧建立广泛的颠覆网络——尤其是在波兰，以服务于美国的新战略。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军事戒严时，里根看到了机会。到1982年6月上旬，里根会见了教皇，商议秘密为团结工会提供帮助。他还争取与美国强烈反共的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进行合作。因此，苏联在阿富汗遭到军事挫折的同时，也被迫在东欧采取防御措施。

1982年，两起地区危机震惊了欧洲各国，也更加坚定了它们团结一致的决心。1982年4月初，阿根廷军政府急欲稳固其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因此坚决支持国内长期存在的对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呼吁，宣布进攻该岛，驱逐了岛上英国薄弱的卫戍部队。伦敦认为，对独裁者入侵的让步是对英国声誉的严重损害，并很可能引发国内政局动荡。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布莱克勋爵说：“在南大西洋坚决捍卫自由，是与捍卫欧洲自由直接相关的。我们的行为将鼓舞北约盟国，为了自由，在关键时刻，英国会做好准备为信念而战。”因此，当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决定派出海军驱逐阿根廷人时，议会和群众对她非常支持，甚至包括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另一次危机发生在中东。1982年6月上旬，为回应巴勒斯坦人在中东及其他地区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捣毁驻扎在此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在南部建立缓冲区。以军迅速挺进贝鲁特外围之后，开始炮轰城内疑似巴解组织的据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贝卡谷地，以色列空军与叙利亚空军展开对垒，坦克出动，炮兵交火。黎巴嫩首都内，发生了血腥残忍的事件，以色列支持的基督徒民兵和亲以民兵大规模地残杀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最终决定撤往突尼斯，但以色列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安全。黎巴嫩南部和东北部的什叶派教徒群聚而来，在伊朗的帮助下成立了“真主党”，它宣誓要将所有以色列人驱出黎巴嫩，并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

两场战争都对超级大国有重大影响。阿根廷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及英国重夺该岛的决心，令华盛顿十分尴尬。阿根廷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友，是反苏的重要力量，它协助训练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这些武装分子反对当时的尼加拉瓜执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后者是一个亲苏政党。里根的一些智囊，尤其是驻英大使吉恩·柯克帕特里克

（Jeane Kirkpatrick），建议他不要与英国“帝国主义”走得太近。不过，最终美国还是选择支持英国，因为对美国来说，英国比阿根廷更加亲近，是更重要的盟友，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支持对美国至关重要。因此，里根总统很快与撒切尔建立统一战线，批准了关键的军事援助，帮助英国在1982年夏重新夺回岛屿。此外，法国也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援。同样，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因为以色列是防御地中海东部的关键盟国。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中东事态，而是美国的欧洲战略。1983年，美国建立了新的中东联合军事指挥部——中央司令部，其覆盖辖区包括以色列、埃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部分原欧洲司令部。另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援，仅为冷战期间支援联邦德国的1/10，这足以说明美国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正如葛罗米柯在1983年警告华约国家外长们时所说的那样，莫斯科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欧洲、远东和印度洋的敌人包围。而最让苏联担心的还是联邦德国国防军。因此，1983年10月中旬的柏林会议上，华约同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北约取得军事优势”。莫斯科在中线部署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中程核导弹。在西欧各国，尤其是严以待阵的施密特政府面前，苏联开始寻求加强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重新采用缓和政策。苏联为任何可能削弱西方凝聚力的力量提供秘密资助，如英国矿工工会，工党，某些左翼政客，核裁军活动者以及彼得拉·凯利（Petra Kelly）、格特·巴斯蒂安（Gert Bastian）等德国绿党杰出人物。然而，战略防御计划让苏联领导人十分绝望，如果该计划成功，美苏核战争将会提前爆发。苏联所害怕的袭击，“一纳秒之内就会来临，所以苏军总参谋部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关键决策”。苏联本土已被北约和中国包围，这下还要面临来自太空的封锁威胁。

所有这些都使西方盟国之间的嫌隙加深。和卡特一样，里根常遭到西方领导人或私下或公开的鄙夷，他们认为里根太“天真”。然而这一次，重要的不是美国总统被苏联愚弄，而是他强硬的反共立场会引发全球性的对抗。最后，很多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担心里根的道德专制会损害缓和政策的“实际”收益。里根对欧洲事务的无知让施密特极为震惊，他害怕里根早前在削减新式武器谈判上的傲慢态度会使自己受到国内反核人士的责难。此外，修建从苏联到西欧的输油管线也加重了美欧之间紧张的局势。美国认为，这项工程将造成西欧对苏联的能源依赖，有战略危险，必须停止，而它自己正向苏联廉价销售剩余的小麦。更重要的是，波恩和华盛顿在美国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联邦德国认为此举会破坏缓和。战略防御计划进一步震惊了欧洲：该计划并未事先征得欧洲的同意，也没有提到将导弹防御网延伸至欧洲。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担心战略防御计划只保护美国本土，并造成美国安全与欧洲安全的分离，从而使欧洲更易遭受袭击。

美欧在“第二次冷战”及应对策略上各执一词，这促成了西欧各国间新一轮的融和与合作。1981年，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把整个欧共体向东地中海延伸。5年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同时，苏联的威胁推动法德两国政治军事合作进入新的阶段。1983年，巴黎推动建立了欧

洲防御计划（EDI），命名为“尤里卡计划”（EUREKA），意欲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抗衡。1984年，欧洲议会批准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计划改革欧共体，“组建一个更紧密的联盟来维护和平与自由”。4个月后，法国发起提案，为西欧联盟注入了新活力，推动了欧洲军事一体化的发展。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她试图利用欧共体来扩大欧洲的自由市场。1985年6月，在米兰的欧洲理事会上，撒切尔支持“政治合作”计划，即外交政策合作计划，因为“西方需要团结一致，抵御东方集团”，尤其是要保卫德国。1985年年底，各国就《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达成一致，次年2月签署生效，这是对英国建议的回应。它简化了欧共体的经济决策，并按照巴黎和波恩的意愿加强了欧洲政治合作。

事实证明，对内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表现出捍卫自由的强硬态度，是撒切尔和里根的制胜法门。在国防问题上的分歧，让工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对阿根廷军政府的强硬态度受到质疑，有些人认为他并非出于爱国的赤诚，而是因为他深谙欧洲安全局势。在1983年的选举宣言中，工党承诺进行单边核裁军，并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Gerald Kaufman）把这一宣言描述成“世上最长的绝命书”。但最后撒切尔以一场大胜赢下选举。在美国，里根1984年成功连任，防御问题是其竞选的核心议题。这样，英美民主地缘政治联盟的良好关系又延续了4年。

此时，在联邦德国国内正上演着一场真正的关于大战略的辩论之战。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批准双轨决策之前，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将无法在联邦德国部署，整个北约战略也会悬而不定。施密特一直为说服本党和群众而努力，但越来越多的人反对部署导弹。1981年10月，大约30万抗议者会聚波恩；1982年“复活节游行”期间，约有50万人上街参加示威活动。施密特渐渐失去对本党的控制，社会民主党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无条件地恢复缓和政策和单边核裁军。年轻一辈的社会民主党人，如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反对整个威慑概念。他们认为，出于历史原因，德国有责任继续坚持和平政策。1982年，施密特的自由主义盟友自由民主党对政府的左倾路线表示担忧，尤其不支持其防御政策，因而它背弃了施密特，加入了反对势力。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则坚决支持部署导弹，基民盟内大多数人持同样态度。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社会民主党政府中曾担任部长，在科尔的基民盟政府中依然担任部长，他支持科尔的政策。1983年3月，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合作，轻松赢下选举，尽管当时整个国家在防御问题上依然有较明显的两极看法。1983年11月之前，联邦议院同意，如果谈判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就着手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这样，苏联欲将波恩从北约分离的意图失败了。

在苏联，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动荡使“鹰派人物”大受裨益。勃列日涅夫死后，1982年11月，克格勃前主席、强硬派人士尤里·安德罗波

夫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突然逝世，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延续了他的强硬战略。一年后，契尔年科也突然逝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事实上，在华约国家，从精英到民众都忧心忡忡。此外，在乐观的公共生产数据背后，苏联经济其实已停滞了10年。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缩小，如今却又开始扩大。谁也不知道，苏联政府需要多久才能补上巨额经费开销。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苏联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之中，这更损害了苏联国民的斗志。

20世纪8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大战略陷入泥沼。苏联红军在阿富汗陷入困境，1986年2月，新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形容阿富汗战争是“一个流血的伤口”。不满情绪在应征入伍的士兵以及士兵家属中普遍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内回流。在欧洲，西方的科技优势愈加明显，如北约常规武器中的“智能武器”，以及“战略防御计划”“芯片革命”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其先进的工业经济的繁荣。苏联分化欧洲与华盛顿联盟的努力也告失败。破坏力极大的巡航导弹和潘兴II导弹已经部署完毕，1985年联邦德国甚至加入了战略防御计划。东欧国家政府的眼中钉——团结工会和其他异见团体——也渐渐成为苏联的烦恼。此外，低效的中央计划机制、低油价（沙特造成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都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此，苏联在经济上再也无力支持苏联红军，也无法资助中东和第三世界的一系列盟友。因此，苏联领导人必须要寻找新出路。

与同其竞争的欧洲国家一样，苏联打算通过国内改革来应对战略颓势。戈尔巴乔夫在就任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宣布“将与好战的北约达成军事——战略平等”。和沙皇时代的旧式改革者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考虑的不是实现经济自由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或民主程度，而是如何改变落后的科技和低经济增长率。他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国内改革不仅仅是要提高军事动员能力，也不仅仅是要对外增强国家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试图揭露并改革他所认为的基本体制的弊端。他还希望对不同政见者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以改善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因人权问题而被损坏的国际形象。如今，戈尔巴乔夫宣布进行“改革”（“加速苏联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和推动“公开性”。他相信，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能够动员知识界，并减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异见者被释放，警察控制放松，民权组织开始出现，俄罗斯东正教会逐渐复苏，许多公共活动从秘密状态变得公开并且生气勃勃。政府结构简化、效率提高。长期僵化、贪污腐败的政党领导人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活力的改革者。然而，这种改革依然没有涉及民主。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似，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经济现代化来增强国力，但并未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

在国际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不是在重复缓和，而是采取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即相互依存。这位苏联新领导人邀请西方国家重启军控谈判，条件是美国搁置战略防御计划，并从第三世界撤军。然而，在一些

关键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最初战略是苏联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反映。他加紧同西方争夺阿富汗，并在欧洲加强战略核武器的部署。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第一次出国就访问了巴黎，试图以此分化西方联盟。然而，他的战略重点关注的是民主德国问题，并且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改革”政策推向东方集团，尤其是民主德国，以提高其抵御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莫斯科必须努力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波恩政府打交道。戈尔巴乔夫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它的北约盟友喜不喜欢，联邦德国都是世界权力平衡中的重要筹码，而且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还会增加。”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没有德国，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欧洲政策。”因此，莫斯科有必要与波恩重新交好，德国有可能重新统一，苏联应该准备好这张“王牌”。

同时，戈尔巴乔夫相信，欧洲合作式的政治文化使各国对德国的恐惧日益减少。1989年4月，苏联改革家、对外政策专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Vyacheslav Dashichev）撰写了一份纪要，题为“‘欧洲共同的家园’与德国问题”，承认民主德国政权坚持不了太久了，苏联期望联邦德国能够帮助民主德国进行基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防止发生大规模动乱。在苏联政治局中，改革者的强力支持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几个月后声称：“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在欧洲核心地区，即德国的领土上，必须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欧洲一体化，至少是欧洲合作，是这一进程的关键。”雅科夫列夫还预言：“欧洲国家将会有一个共同的议会，处理共同的事务和贸易关系，各国的边界将会开放。”他还说：“如果‘欧洲共同的家园’能够建立，并且能够成功开创功能性的经济联合，如果这一联盟能够保障劳工的社会利益，那么它就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就要准备与欧洲合作。”事实上，苏联正在静候良机，以重新加入欧洲——一个解决了德国问题的欧洲。

在中欧，“公开性”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德国大众中迅速出现一股“戈尔巴乔夫热”，他们相信，救世主似的苏联领导人有能力终结冷战，让他们不再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戈尔巴乔夫“欧洲共同的家园”的概念引起广泛共鸣。德国历史学家开始公开地谈论“欧洲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德国的中心地位，以理解惨痛的历史教训。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甚至立陶宛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奥地利和德国的知识分子相互交流，讨论“欧洲心脏地带”的概念。相比之下，在东欧和东南欧，共产主义衰落，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中亚人甚至乌克兰人都开始躁动不安。同时，“公开性”也把俄国民族主义的幽灵从瓶子里放了出来。巴尔干半岛的共产主义政权，甚至把民族主义奉为新的正统意识形态。在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holae Ceauşescu）试图镇压人数众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口较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一直是农村“体制化”运动中被宣传的典型。1984年末，保加利亚政府突然将矛头转向当地土耳其人，强迫他们改名，限制他们使用土耳其语，关闭清真寺，

声称是为了消灭被称为“第五纵队”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上台，他一直倡导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

形势很快明朗起来，即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并没有达成其目标，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经济改革不够彻底，没有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另外，由于实施了“公开性”，改革的失败被揭露出来，人民议论纷纷。苏联本指望华约盟友——尤其是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支持改革，最后这一希望也破灭了。在国际阵线上，戈尔巴乔夫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以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撒切尔此前也声明，戈尔巴乔夫是值得合作的人。然而，与他的主要目标——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之间的关系发展则不是很顺利。科尔起初轻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他是“像戈培尔一样的政治宣传者”。同样，里根一开始也很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初衷，主要因为对方加剧了阿富汗战争。1986年，美国国会授权华盛顿向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高级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此外，里根坚决反对将搁置战略防御计划作为达成武器限制协议的前提。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苏联即将输掉这场军备竞赛。更糟糕的是，联邦德国已经发现自己拥有非常充分的军事能力。1986年10月，戈尔巴乔夫警告政治局：“苏联将被拉入一场超出我们能力的军备竞赛，并且我们可能会输掉，因为我们的能力已达到极限。更糟糕的是，我们知道日本和联邦德国将会很快加入其中，成为美国的筹码……如果新一轮军备竞赛开始，我们的经济将不堪重负。”

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进行更彻底的国内改革，对外改善同别国的外交关系。他开始提到，共产党和苏联需要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他反复说：“我们需要民主，就如需要空气。”眼下，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民主，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而是通过复兴苏维埃和在苏联共产党内引入选举机制，回归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和从前一样，他试图扩大国内政治参与，把国家从持续停滞中拯救出来，并获得国际认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北约新一轮武器部署前与其达成军控协议，他不再坚持要求里根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峰会上，苏联和美国迅速达成协议，即《彻底销毁两国中程核导弹条约》，也即《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几乎所有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戈尔巴乔夫还决定撤出阿富汗，此决定早已做出，但直到第二年初才公开宣布。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正逐步崩溃，这一趋势在波兰尤为明显，但在民主德国形势最为险峻。自1987年起，苏联专家就开始预言，苏联的东欧集团即将破裂。

然而，德国问题的重新出现引起了多国的忧虑，不只是莫斯科。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二战”的阴影中长大，她与她的同胞都密切关注着德国，尤其关注联邦德国的发展。科尔和密特朗倡议重建“巴黎——波恩轴心”，共同组建“欧洲军团”，但这些并未使撒切尔安心。这种焦虑与她对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jors）的敌意融合在一起。在撒切尔看来，德洛尔是个激进派，他对成员国干涉太多。撒切尔重新提

及几十年前的说法，强调英国的“岛屿地位”，将英吉利海峡比作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说的“护城河”。撒切尔担心英国主权会受损，担心德国直接控制英国，或者通过欧洲代理人来控制英国。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撒切尔一直把苏联当作平衡欧洲各国力量的砝码。她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不想要德国统一，统一将改变战后边界，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因为这会破坏国际形势，危及我们的安全。”

联邦德国同苏联关系的缓和，加剧了其同北约盟国的紧张关系。《中导条约》签署前，里根并未事先同联邦德国商讨，这让波恩大为光火，因为波恩担心中程导弹销毁后，短程导弹（如“长毛”）却能被大量保留。“分离”的幽灵又回来了。在这件事上，左派和右派高度统一。保守派中坚分子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Alfred Dregger）做出过深刻的评论：“射程越短，对德国越危险。”看起来，德国似乎无法逃脱“欧洲中心”的影响。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热”在公众中的流行，使得联邦德国社会的军事化更加难以为继。人民怨声载道，抱怨训练中低空飞行的北约飞机、军事演习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坦克训练在北德平原上留下的巨大刈痕。北约已成功完成其使命，将华约和社产主义政府推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也暗示北约的存在已经显得多余。

1988年夏，发生了一系列连锁性的国内改革与地缘政治变化，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地理与意识形态的格局。苏联刚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圣战”分子就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了。1988年8月，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恐怖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组成了后来所说的“基地”组织（al- Qaeda），致力于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家，打击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的联盟。“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如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宣称，和以色列决一死战的时刻已经来临，阿富汗是“圣战”行动的“坚实堡垒”。而以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为首的主流派坚持认为，当务之急是巩固他们在阿富汗的地位。“基地”组织主流派不打算与犹太人正面交锋，而是帮助穆斯林游击队抗击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权，以此创造一个“基地”，袭击美国的中东盟友，并最终攻击“遥远的敌人”——美国。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释放出要与以色列和解的信号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宣布成立，它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之一。1988年8月中旬，哈马斯组织公布了其宪章，其宪章由多种理念综合而成：传统的对犹太人的敌视思想、恢复巴勒斯坦领土完整的决心，以及近代欧洲式的反犹主义。宪章宣言中写道：“我们与犹太人的斗争是伟大而严肃的，这是十分重要、十分严肃的。”尤其是，哈马斯经常援引《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 of the Elders of Zion），声称犹太人是一个危险的秘密组织，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贝尔福宣言》、“一战”后哈里发帝国的毁灭，犹太人都是主要推手。他们还声称，国际联盟是犹太人统治世界的工具，犹太人还是发动“二战”的幕后黑手。哈马斯的宪章暗示：“如果不是犹太人染指世界，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

然而目前，戈尔巴乔夫依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这位苏联领导人知道，他已完全无法继续维持符合苏联意愿的全球军事形势。军费开支必

须削减，尤其是在中东欧，那里的单项开支数额最大。为了紧跟里根的军备计划，莫斯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只得作罢。因此，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人，主要削减在东欧的驻军，并撤回所有短程核导弹。他还公开表示，允许华约成员国自由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勃列日涅夫主义不复存在了。同月，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为了争得民众支持，他还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中2/3的代表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选出。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前提是他们的政纲“不与苏联宪法或法律冲突”。但事实证明，这一规定在实际中并没有被强制执行，一些反对苏联体制的人也当选了。在波兰，因为新一轮的骚乱，政府与团结工会不得不进行“圆桌谈判”，并在不久后同意举行自由选举。

中东欧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真空迅速被民主革命填满，并在1989年一年之内席卷了整个华约集团。1989年3月下旬，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一大批激进的代表当选，他们决心继续改革。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国家大获全胜，甚至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发现他们已经与莫斯科处于敌对位置了。大约在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也同意举行选举。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彻底击败共产党，波兰国内开始协商移交政权的事宜。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共产党领袖们不敢肯定，莫斯科新的政治风气所代表的是永久的政策转型，还是又一次的短暂“偏离”（之前曾多次发生过政策偏离）。昂纳克宣称，柏林墙还将耸立50年，甚至100年。齐奥塞斯库一直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如今也开始未雨绸缪。现在的问题是：苏联红军已经无法再给他们帮忙了，波兰也完全“丢失”了，东欧领导人是该让步，还是该采取强力的解决方法？

1989年6月下旬，匈牙利当局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导致局势陷入危机。由于华约国家的公民在节假日可以自由进入匈牙利旅游，数千名民主德国游客借此机会途经奥地利拥向联邦德国，其他人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寻求避难。当昂纳克政府允许这些人离开民主德国时，成百上千的绝望男女试图登上西去的火车。1989年10月，大批人占领了莱比锡、东柏林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他们要求改革。最后关头，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宣布改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代昂纳克，却并未能平息局势。11月初，民主德国政府打开柏林墙，引来大片欢呼，很快政府开始同反对派进行协商。几十万民主德国人拥入联邦德国。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政权也坚持不住了。此外，在那年年末，罗马尼亚人占领首都，齐奥塞斯库在逃亡过程中被逮捕，并被迅速处死，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统治崩溃。这样，《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逻辑终于在苏维埃帝国发挥了作用。一旦自由移民的原则在一国被承认，专制体系则自然会瓦解。事实也证明布热津斯基的论断是正确的：对阿富汗的入侵削弱了苏联对华约国家的控制力。俄国民主活动人士、战略分析家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Andrei Piontkovsky）写道：“东欧的真正的解放者，与其说是克里姆林宫走廊里的智囊，还不如说是阿富汗山区里的‘圣战者’组织。”

现在，民主——民族主义的病毒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发生了变异。1990年3月，在民主德国的选举中，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压倒性地赢得选举，事实上民主德国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了。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德国统一，人们反复呼喊：“我们是一个民族。”大约在同时，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不久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宣布独立。苏联的军事介入暂时遏制了分裂的势头。但红军已经身陷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靠它来维持苏联在国内外的权威是极其不稳固的。同年6月，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政府中唯一的执政党了。一个月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等主要激进分子宣布退出苏共。1990年6月中旬，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宣布成为主权国家，苏联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分裂为几个部分。4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民族主义者赢得选举，宣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1990年12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米洛舍维奇赢得大选。只有在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其主要政治力量还宣称要维护南斯拉夫联邦的完整。

1989~1990年的民主革命很快引发了欧洲国际体系的危机。首当其冲的是德国。1989年11月下旬，科尔总理把握先机，宣布“十点计划”以“结束欧洲和德国的分裂”。他设想，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先组成一个邦联，然后再“逐渐成为一个联邦”，最终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个进程，是与两德之间的对话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相统一的。科尔说：“欧洲共同体不能止步于易北河，它必须向东边延伸，为一个真正全面的欧洲联盟打下基础。”两个因素致使科尔如此急迫：第一，大批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需要安置，如果所有德国人都集中在联邦德国的领土上，会十分危险；第二，他敏锐地察觉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地位摇摇欲坠，他的改革可能随时被颠覆，就像之苏联的那些改革者一样。这次机会非常难得，稍纵即逝，科尔试图把握住这次机会，推动德国统一。

民主德国政权的垮台和科尔积极推动统一，引发了欧洲各国的恐慌。柏林墙倒塌一天后，戈尔巴乔夫警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联邦德国政府带有情绪化的声明，是对战后既成事实的否定，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仅仅是中欧，更大范围内都将发生动荡。”英国和法国也坚决反对德国统一，他们认为，这将破坏欧洲的均势。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新产生的民主政府也反对两德统一，它们担心德国会要求改变边界现状和遣返难民。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这些国家试图阻止德国统一，至少是延缓其统一的进程。戈尔巴乔夫不断重复，他不能接受两德统一。法国总统甚至单独访问了民主德国，希望加强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政权的力量，阻止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波兰人坚持认为，无论德国人想以什么方式解决问题，都必须找波兰商议。最坚定的反对者或许是撒切尔，她认为“德国将再一次主导整个欧洲”。她在首相乡间别墅召集了专家特别会议，讨论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可以“信任”。

而美国的态度则很坚决。华盛顿很早就明确表示，支持德国统一，期待与新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保证德国的统

一不会破坏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否则就会让苏联有机可乘。因此，在11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应该支持德国的自决权，而非某个特定的结果。"并明确指出，"统一必须是和平的、渐进的，德国要尊重现有边界，并且维持德国在北约和欧共体中的成员身份"。

1990年5月，苏联领导人最终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让步。然而，莫斯科依旧渴望"解决"德国问题，把新兴崛起的德国封存在欧洲体系的约束之下。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强调："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欧洲'问题和德国问题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斩不断的联系。"布什私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再进一步向东扩张。法国也改变了立场。最终，撒切尔也不再坚持己见。6月初，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宣布组建货币联盟。当月，在著名的高加索峰会（Caucasus Summit）上，科尔与戈尔巴乔夫讨论了统一的细节，尤其是联邦德国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问题。德国与波兰在奥德河——尼斯河（Oder-Neisse）的边界问题最终确定下来，德国表示接受现状，尽管科尔曾因故一度踌躇过。1990年10月初，德国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保留了北约成员国身份。一个月后，苏联、美国和欧洲各国同意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框架下达成《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条约规定大量削减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驻兵数量，并规定苏联军队将在1994年前全部撤出德国。经历了40多年的分裂，欧洲中心获得了重建，实现了和平。

德国统一、中东欧政权的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一体化浪潮，对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撒切尔因其在国内不受欢迎的政策（尤其是人头税）而遭到批评。不过，保守党内部之所以有人反对她，是因为不支持她的对欧政策，尤其是她坚决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是汇率机制的坚定支持者，1989年11月他在巨大争议中辞职。几周后，撒切尔下台，约翰·梅杰（John Major）接替了首相职务。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因其外交政策而饱受诟病，人们批评他默许德国统一，让苏联在欧洲的利益受损。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当时是苏联党内的高官，他提醒政治局提防"新慕尼黑阴谋"。8月，愤怒的保守派发动"八一九政变"，试图罢免戈尔巴乔夫，以此作为重振苏联力量的第一步。很快政变便遭到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主席、改革派领导人叶利钦的阻挠，军队没有站在政变者这一边，以防止国内出现内战。毫无疑问，德国统一最主要的受益者是总理科尔。1990年12月，他第三次当选德国总理。

1989~1990年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分水岭。德国的统一对欧洲汇率机制产生巨大影响。该机制的作用是限制欧共体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确保其稳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做准备。些许犹豫后，1990年10月德国统一时，英国终于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德国被迫提高利率以应对两德统一造成的巨大通胀威胁。这也给欧洲其他经济体带来了不小压力，尤其是英国。英国不得不力挺英镑以应对马克的冲击，为此英国财政一度损失巨大，当时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家亟须更低水平的汇率以增加出口。事实上，不到两年，在英镑经历了血腥的"黑色星期三"之后，英国不得不羞愤地退出欧洲汇率机

制。英德关系急剧恶化，两国甚至开始了相互攻讦的“谴责游戏”。1992年9月中旬，伦敦从德国央行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那里得知，英镑估价过高，导致大批投机分子闻风而动。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个征兆，原本计划用来削弱和约束德国的欧洲联合体系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实力。

不过，德国国内却并未表现出激进化、战略冒进主义或领导欧洲的野心。统一之后，民众对移民者爆发了短暂的排外情绪，不久便逐渐平息。与之前相比，极右翼党派在统一后的选举中并未得到比之前更多的选票，国内也没有出现反犹主义浪潮。德国民主恢复了活力。另外，统一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之前的预期，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德国政治家对核武器毫无兴趣，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也排斥外交激进主义和军事干涉，它以“平民国家”自居。同时德国政治精英们始终希望加强同北约和欧盟的多边合作。德国要求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得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它们认为这能使新兴强国更紧密地参与到全球问题的管理中来。然而在遭到意大利的强烈反对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整个德国都“畏惧权力”，更惧怕军事冲突。“我们把战争留给美国人”——这是接下来的10年里在德国最盛行的观点。

1990年8月初，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并宣布吞并科威特。在西方国家看来，更糟糕的是，萨达姆似乎要继续向南行动，入侵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控制全球大部分的石油供应。沙特王室拒绝了本·拉登和其他阿富汗“圣战”老兵的援助，转而向美国求援。大约在同时，南斯拉夫联邦分裂了。1990年夏秋之交时，贝尔格莱德政府支持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与克罗地亚警察发生冲突。次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军与斯洛文尼亚地方武装力量发生战争。1991年夏末秋初，数十万克罗地亚人被南斯拉夫人民军和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逐出家园。1992年4月，塞尔维亚开始进攻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聚居区，很快战火蔓延至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到秋天时，他们杀害了数万名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并驱逐了数十万人，包围了萨拉热窝，控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领土。然而，在所有的事件中，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苏联的解体。“八一九政变”被平息后，戈尔巴乔夫威严扫地，他发现鲍里斯·叶利钦不仅在智谋上胜过自己，而且还决心统治独立的俄罗斯。1991年12月初，乌克兰全民公决支持独立。一周后，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同意解散苏联。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中亚各共和国、高加索各共和国，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大局已定，戈尔巴乔夫在当月末宣布辞职。

接下来的10年里，如何处理这三项危机的争论支配着欧洲地缘政治。迟疑之后，布什总统决定，必须让萨达姆撤出科威特。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1991年1月中旬前撤出科威特，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法国和英国派出大量部队，土耳其提供军事基地。而德国以宪法为由没有出兵。多国部队

发起“沙漠风暴”行动，从空中和地面发动迅速进攻，萨达姆很快就被打败。苏联撤离之后，如何填补中东欧的权力真空，各国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冷战结束是打破旧联盟体系的最佳时机，它们可以同苏联或者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它们希望，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将会取代旧的大西洋联盟的很多功能，并逐渐使欧洲人从美国的保护伞中解放出来。

因此，欧洲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国最初反对北约东扩。很多人甚至认为北约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尤其是法国，它试图用“双重”北约体系取代现有的美国主导的体系。“双重”北约意味着欧洲面临的所有严重威胁都将由欧洲人自己来解决。事实上，这意味着欧洲人不再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威胁，而将其降到了第二位。伦敦也反对北约扩张，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认为，那样做并不能给东欧带来安全。不同的是，德国人主张北约东扩，因为这样能保障德国的侧翼，并使其从“二战”后的对抗前线的位置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坚持保留外国驻军，特别是美国驻军，以保证国家安全，确保其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中欧的安全依然和整个欧洲的安全密不可分。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争论是：一派希望收纳新成员国，“拓宽”联盟，以应对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德国统一；另一派希望“深化”联盟，加强现有成员国之间的纽带联系。英国人害怕被德国控制，决心保卫国家主权，他们是热烈的“拓宽者”，希望减缓一体化扩大的进程。法国人也希望制约统一后的德国，他们是坚定的“深化者”，尤其在政治与军事方面。法国总统密特朗反对东扩，并指出这要在“好几十年后”才会发生。他提议建立一个临时的“欧洲联邦”来取代“拓宽”政策。德国人则既支持拓宽也支持深化，一方面是出于妥协，另一方面是因为更强大、更紧密的“欧洲”能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未来。此外，德国人知道，德国的统一只有成为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才可能被其他国家接受。因此，1989年12月初，柏林墙倒塌仅一个月后，欧洲理事会在斯特拉斯堡讨论中东欧的变局，尤其是德国力量的崛起。他们同意在欧洲货币联盟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政府间会议，加快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的建立。该会议于1990年6月底在都柏林理事会召开后正式运行。其结果是牺牲德国马克来结束德国的分裂。

现在，欧洲大陆国家加紧推动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1991年10月，巴黎说服波恩组建跨国军队——即“欧洲军团”，以“尽到对欧盟的责任”。几个月后，1992年欧共体在马斯特里赫特进行高级别会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其核心内容是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与防务政策。成员国同意“积极地、无条件地支持欧盟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忠诚对待，互相扶持”。共识一旦达成，成员国须承诺“使其国家政策符合欧洲的共同立场”。欧盟采用有效多数制的投票方式，但任何一个国家均有否决权。这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催生了“自由否决权”，这导致欧盟在国际上的行为缺乏连贯性。很多欧洲人希望欧盟摆脱比利时外长马克·伊斯更斯（Mark Eyskens）在海湾战争时形容的形象——欧洲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军事上的蠕虫”。

南斯拉夫是欧盟面临的第一场考验。卢森堡外长雅克·普斯（Jacques Poos）称之为“欧洲时刻”。欧盟“三驾马车”的部长们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积极斡旋，希望双方尽快停火。但他们所有的努力和倡议都因欧盟成员国难以完全达成共识而功亏一篑。最初，所有人都认同，最好保留南斯拉夫联邦，让其为了最终加入欧盟做好准备；有人几乎把米洛舍维奇当作巴尔干的林肯，因为他执意阻止国家分裂。然而，在他建立“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的野心昭然若揭后，欧盟成员国的战略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英国政府认为，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并未对英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紧迫威胁，他们害怕被卷入无止境的游击战中，并认为对种族冲突进行干涉的效果，要比实用主义的政策更加糟糕。法国决心抢先阻止德国向南扩大势力范围，防止整个中欧被德国人主导。1991年年末，德国迫使欧洲共同体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克罗地亚战争就此结束，而德国的做法并未对未来波斯尼亚的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这让巴黎相信，德国对该地区有秘密的野心。希腊公开表达了对塞尔维亚的同情。因此，1992年春波斯尼亚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家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即防止冲突扩大，尤其防止冲突向南扩展到马其顿共和国。因为马其顿刚刚独立，它和希腊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导致土耳其等地区强国的介入。

欧洲共同政策的致命缺陷还在于，其几乎没有任何集体执行力。众所周知，英国和法国有军事实力，但拒绝干涉米洛舍维奇政权。德国以宪法为由，拒绝介入北约以外的地区，并以“科尔主义”为借口，拒不对在“二战”中受到纳粹迫害的国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奥斯维辛便成为种族清洗的一大证据。事实证明，“欧洲”毫无影响力可言。由于集体军事上的无能，欧共体的调停者成了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民兵的羞辱对象。斯拉沃尼亚东部的巴洛克小镇武科瓦尔被夷为平地，拥有非凡建筑成就的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不断被炮轰、围攻。1991年秋，联合国的一项贸易禁令在该地区强制执行——最初由西欧联盟监督实施，加剧了交战双方实力的不平衡，且明显有利于塞尔维亚一方，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从南斯拉夫人民军处获得武器。到1992年年初，欧盟被迫承认调停失败。联合国接手工作，监督分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进行调停，但这也未取得进展。波斯尼亚依旧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欧盟正在向东扩张。1991～1992年间，欧盟同中东欧一些国家达成了联系国协议，1993年，欧洲理事会宣布，欢迎“联系国”加入欧盟，只要它们满足入盟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即可。苏联阵营里的国家十分热切地渴望加入欧盟，从而终结它们与主流世界隔绝的状态。1994年，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总统在布拉格会集，在德国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正式请求加入欧盟。一年后，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为苏东国家入盟打开了希望之门。德国对周围出现的一系列友好的民主国家极为满意，同时它还希望通过让渡部分主权和扩大联盟来稀释本国的实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具有威胁性。

美国政府欣然接受欧盟扩张到原华约国家，并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赞赏有加，因为欧洲强大了，就能分担更多维护世界新秩序的责

任。布什与欧洲国家的看法一致，认为欧洲应尽可能久地存在下去。然而，华盛顿坚决反对削弱北约力量，它厌恶欧洲军团，认为这会削弱大西洋联盟。欧盟军事指挥部的建立对美国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将被排除出西欧联盟的海军部队，而该部队正在负责监控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武器禁运。到1991年年末，美欧联盟间的关系跌至最低谷。

1993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就职时，就面临着国会和民众要求削减欧洲安全开支的压力。与此同时，亚洲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四小龙”引领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极速发展威胁到了东亚，甚至全球的力量均衡。事实上，新任总统不仅立即重申了欧洲在美国大战略中的首要性，还把它作为新民主地缘政治的重头戏。根据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Tony Lake）构想的“扩展民主”政策，西方式的民主最能保障美国安全。扩展民主是美国的全球构想，但主要运用于中东欧地区。为了这个目的，克林顿赞成欧盟东扩，他在1994年1月说道，这对于“把苏联阵营里的国家锁在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进程中”十分重要。此外，他还决心把北约的扩张作为补充，在1994年年初的北约峰会中，克林顿说：“将北约扩展到东方的新民主国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北约东扩的第一步是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重点不只在于军事合作，还包括民主改革、经济自由化以及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以防止另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克林顿警告说：“如果民主在东方失败，那么东方的暴力与动荡将再一次伤及我们，以及其他民主国家。”

同样，俄罗斯也正在全力应对如何填补西侧权力真空的问题。在首席对外政策智囊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y Burbulis）的建议下，1991年2月，叶利钦也曾经考虑过要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不过俄罗斯并不想真正这样做。惨淡的经济状况、极低的石油价格使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下降，有人甚至称其为“伏尔加河上的魏玛共和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越来越感觉到西方正利用俄罗斯的衰弱挤压其战略空间，以及苏联解体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认为自己正被排斥在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欧洲共同家园”之外。莫斯科尤其反对北约扩张。失去对东欧的控制权是一回事，现在眼看着潜在的敌方联盟在东部边界安营扎寨又是另一回事。叶利钦最初接受北约扩张，至少同意扩展到波兰，但很快改变了想法。他警告说：“那些坚持北约扩张的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战火可能席卷整个欧洲。”此后，叶利钦开始采用更积极的对外政策。在波斯尼亚问题上，俄罗斯越来越支持塞尔维亚人，倒不是出于对他们民族事业的同情，而是为了加强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莫斯科开始大规模地介入它所说的“邻近”国家或“内部”地区。1995年12月，叶利钦决定对车臣武装发动进攻，以夺取控制权。但这一行动以彻底的惨败告终，俄军陷入痛苦的游击战。

此时，克林顿的扩展民主战略在波斯尼亚搁浅，先是欧盟，后是联合国，都无力阻止塞族人建立纯粹血统的“大塞尔维亚”国家。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警告说：“大胆的暴君和一个可怕的民族正在观望世界能否容忍其‘种族清洗’政策。”1994年12月，在

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出现了激烈的争吵，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提醒与会者：“欧洲人将继续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受苦并死去，和他们一同死去的还有欧洲可以终结这一恐惧的希望。”北约不得不加入人道主义救援并提供空中支援，但北约受到了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微观管理的束缚，而英法政府则只保护本国军队的安全和援助地面上的工人。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rner）遗憾地说道：“我是世界历史上最强的军事组织的首脑，但我也无能为力。”

1993年，华盛顿开始要求北约军事介入，以支持波斯尼亚政府。然而，英国和法国当场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它们认为，无依据地干涉他国内战，不仅不能达到军事作用，并且只会使冲突加剧。1993年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劝说欧洲解除对波斯尼亚政府的军备禁令，并劝说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展开空袭，即“解除与空袭”计划，但该计划遭到拒绝。同时，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持续进行，以1995年6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为高潮。在联合国的眼皮底下，斯雷布雷尼察的东部聚居区里，成千上万穆斯林男人和孩子被杀。此时，克林顿政府决定在波斯尼亚和北约问题上迫使欧洲人采取行动。美国外交官从中调解，促使萨拉热窝政府和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分离主义者停战，并秘密向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军事支援，同时派美国退伍军人训练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总统领导的克罗地亚正规军。1994年12月，华盛顿终于迫使北约外长们开始着手东扩。自此，问题不再是“是否”吸收苏联集团的国家，而是“何时”开始东扩。1995年9～10月，北约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以回击其此前在萨拉热窝的轰炸行动。同时，波斯尼亚军队和克罗地亚正规军发展壮大。几周内，塞尔维亚防线崩溃，米洛舍维奇总统不得不强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接受停火，各方在美国代顿谈判并达成了和平协议。这是北约在“非”美国领导下打的第一次欧洲战争，并获得了胜利。

大部分欧洲社会很少留意这类事件，他们希望获得“和平红利”，却不愿承担额外的防务负担。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用武力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尤其在德国，还有少部分人抗议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屠杀事件。在英国，梅杰的保守党政府也常受到保守党内“疑欧派”的抨击，他们决心保卫英国主权“不受布鲁塞尔人和德国人的支配”。1995年夏，梅杰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最终他保住了首相的官位，却威严扫地。1991～1995年间的国际剧变丝毫没有影响到德国1994年的大选，科尔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功连任总理。剧变也未影响到梅杰，他于1992年4月意外获胜。然而5年后，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战胜梅杰，出任英国首相。决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通常是领导人的经济管理能力，或者是政府的廉洁程度以及治理能力。长期以来，对外政策支配着欧洲国内政治，但现在这种模式不复存在。在大西洋彼岸，对外政策同样失去了主导地位。乔治·布什尽管赢得了伊拉克战争，却输掉了总统选举。克林顿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别傻了，这是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选民不再那么看重美国的世界地位，也可能是因为美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

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外政策对国内政治有巨大的影响。绝大部分俄罗斯公民认为，苏联解体削弱了他们的国际地位。西方介入南斯拉夫，北约东扩，以及很多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的耻辱感，引发了群众和精英分子对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只会向西方点头说“是”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成了众矢之的，因为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他一直在采取亲西方政策。在精英分子和知识界中，欧亚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相继复兴，一小部分志愿者开始支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由于很多人对叶利钦的经济政策不满，尤其是对俄罗斯国力衰弱不满，共产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俄罗斯，提高国际影响力和重建“强势政府”的渴望被称为“强国主义”。1993年9月底、10月初，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领导的议会反抗叶利钦，迫使总统派出坦克镇压他们。两个月后，叶利钦通过新宪法，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俄罗斯处于西方话语的支配之下，俄罗斯人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主权，而现在俄罗斯人则开始强调不可分割的“大俄罗斯”。这样，1996年叶利钦再次赢得选举胜利，也就不足为奇。

在西欧，波斯尼亚战争留下了巨大的战略遗产。尽管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的希望，本来可以被称作“欧洲时刻”，但欧盟和欧洲国家集体表现无能，它们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更不用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联合国也显得无能，在西方和穆斯林国家中，它信誉扫地。相反，冷战后，美国最初本来希望减少在欧洲的军事承诺，而现在却当之无愧地成了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新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狂热的干涉主义者，她作为克林顿在联合国的代表，屡次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与英国和法国发生冲突，甚至强调说美国才是该问题上“不可缺少的国家”。最后，华盛顿对欧洲国家软硬皆施。如今，大西洋两岸都已广泛接受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这不仅是为了缓解民众的苦难，更是为了捍卫西方安全的根基——西方价值观。现实主义者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坚持国家利益，其观点不同于人道主义者，二者有巨大分歧。现实主义的观点已经难以为继，换言之，“现实主义”不够用了，甚至不再是现实的了。

1995年2月，美国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反映出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基于“和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威胁我们利益的可能性更小，并更倾向于同美国合作”的假定，克林顿总统承诺重视应对相关威胁，以保卫民主理念与民主习惯，他表示要“扩大民主市场共同体”，“尤其是在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比如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地区”。克林顿也支持远东各国建立参与性的民主政府，他尤其反对“民主不适合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论调。扩展民主战略的唯一例外，就是中东。在这里，《国家安全战略》只提到，要对伊朗和伊拉克实行“双重遏制”，并且“支持和平进程，同时保障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的安全，让石油价格在合理的区间内自由浮动”。这里对促进民主只字未提，因为美国决策者担心那样做会激起中东民众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浪潮。

欧盟成员国内，波斯尼亚问题导致了英国和德国的战略转向。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1997年的选举中，曾抨击梅杰政府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失败，强调道德与对外政策的联系，重申英国例外主义的概念。他在曼彻斯特的布里奇沃特大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几个世纪以来，领导其他国家是英国的使命；如今，欧洲是英国发挥权力和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如果英国想继续保持其全球地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英国就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然而，布莱尔拒绝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做法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1997年10月，新政府宣布，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决策，都要通过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5项经济"测试"，以检验英国经济与已启动的欧元区的长期兼容性。这种做法尤其给欧洲军事一体化增加了困难，而军事一体化是英国影响欧洲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热衷于积极参与欧洲与世界事务。

德国则经历了更为惊人的转变。在克罗地亚问题上，前期持激进立场的波恩政府，后来变得沉默无能，不愿采取军事手段，它为此感到羞愧。当时，战争正在继续，人民伤亡在增加，德国民众和精英分子愈加一致，希望派出军队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德国政府也急欲参与，以减少南侧的威胁，恢复大西洋联盟的信誉，表明德国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心。1994年，北约要求德国空军人员在侦察机空中警报与控制系统（AWACS）技术上同它合作，支持其维持波斯尼亚禁飞区的行动，于是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德国政坛的一场辩论，即是否应该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这导致一场政治分裂，该问题具有爆炸性：科尔的执政盟友——自由民主党——同意进行军事部署，但政府的这一决策面临着联邦宪法法院的合法性审查。如此一来，决策受到了宪法的制约。一年后，德国飞机参与北约空中舰队，协助结束了战争。在接下来的议会辩论中，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强烈反对干涉行为，但这两个党内部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介入，绿党的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是其中之一。1998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赢得选举胜利，他在新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换言之，波斯尼亚战争开启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再军事化。

波斯尼亚问题解决之后，北约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力支持下迅速扩张。1995年9月，北约公布了扩大计划。其重点在于，通过促进和保卫民主，提高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在中东欧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会有利于西方安全。因此，所有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必须证明，它们拥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有效的民主政治体系，并且能够公平对待少数民族，承诺和平解决争端，有能力为北约的军事行动做出贡献，必要时还要在北约区域之外做出贡献。1997年7月初，在马德里峰会上，北约邀请波兰、捷克共和国与匈牙利加入联盟，并计划在2000年前处理它们的申请。

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统一后的德国。1994年起，德国将柏林确定为新的首都。1997年11月，外交部秘书长汉斯–弗里德里希·冯·普勒茨（Hans-Friedrich von Ploetz）指出："这是德国自存在以来，第一次被

盟友而非敌人包围，它们不再视我们为威胁。”然而，这并未使柏林在战略上得到满足。普勒茨引用了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政治是历史的女儿，历史是地理的女儿。”他还指出，德国人需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将自己的安全置于欧洲“不可逆转的和平秩序”中。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曾警告说：“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德国都是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如果遭遇危险，其他国家都不应袖手旁观，否则很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我们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长远来说，为了规避风险而不采取行动，会比有潜在的危险的行动更加危险。如果我们不敢直面危险，那么危险就会找上门来。”

欧盟在前南斯拉夫集体行动的失败和对美国力量的轻微焦虑，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飞跃。1995年前南斯拉夫事件中，欧盟求助美国出面干预，让欧洲各国领导人颜面尽失，欧盟首脑们决心不在欧洲大陆重蹈这种覆辙，于是他们大力加强彼此间的政治凝聚力和欧盟的军事实力。他们再也不必害怕德国或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外部敌人，也没有“他者”这一共同敌人需要应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担心历史的重演，害怕旧的梦魇复活，将联合中的欧洲撕得粉碎。波斯尼亚就是前车之鉴，欧盟首脑们决心让这种事不再发生。为此，他们特别强调“能力与期望的差距”：欧洲人希望解决家门口的问题，却缺少解决的办法。也是出于此原因，在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中，欧盟曾试图讨论过自身的核心弱点：在部长理事会中，决议需要一致通过，导致欧盟工作效率不高；轮值主席国制度，导致欧盟缺乏政策连续性。根据《阿姆斯特丹条约》，欧盟新设了“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开启了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的入盟谈判。欧盟的扩大将提升欧洲的国际地位，欧盟将会有新的邻居，使欧洲更和平、更团结、更安定。1996年6月，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担任轮值主席期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了。

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大屠杀，使伊斯兰世界意识到，在对外政策上须协同一致。国际上很多人认为，当时穆斯林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守势，在巴勒斯坦、波斯尼亚、克什米尔、车臣等地他们都处于劣势。阿富汗战争之后，大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高加索人、中亚人和其他穆斯林游击队战士来到波斯尼亚，继续参加“圣战”。波斯尼亚人的遭遇在欧洲穆斯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994年5月，波黑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2]说道：“我们是生是死并不重要，教训就摆在这里，显而易见——穆斯林集团必须永远保持警惕，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永远不能指望任何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给我们提供援助。”在西欧的穆斯林移民中，上述口号得到了响应，这在英国最为明显。有一次，在伦敦东部的游行中，有的标语上写着“今天的波斯尼亚就是明天的布里克巷”。一些后来成名的英国“圣战”主义者，如策划绑架并谋杀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奥玛·谢赫（Omar Sheikh）、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穆阿扎姆·贝格（Moazzam Begg），都是在波斯尼亚事件后变得更为激进的。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穆斯林地缘

政治的兴起并不是对西方干涉的回应，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干涉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行为的回应。

同时，全球的伊斯兰主义也正经历着战略转型。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很多外国“圣战者”也相继离开：本·拉登回到沙特阿拉伯，其他人去了埃及、北非或波斯尼亚，他们要寻找更富饶的沃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1994年，一群阿富汗宗教学生组建了“塔利班”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消灭那些导致国家分裂的军阀。两年后，巴基斯坦希望扩大在阿富汗的战略纵深，以抵御印度，因此它开始支持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塔利班迅速横扫整个喀布尔地区。本·拉登也重回阿富汗，帮助塔利班“解放”其他地区。他欲借阿富汗为基地，给美国、犹太人及其盟友以致命一击。1996年8月下旬，在兴都库什山，他发表了《抗击美国占领两个圣殿的“圣战”宣言》。

上述种种事实，导致了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中亚和南亚的新的地缘宗教断层。不过，断层并未经过巴尔干地区，这与部分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因此，“基地”组织并未在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中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在西欧的穆斯林移民社区中，渐渐产生了伊斯兰和西方新的交战前线。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与英国本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在英国首都汇集，并彼此影响。

1998年，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与科索沃的解放军公开爆发了战争，西方的扩展民主战略受到了考验。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看来，这次冲突是对北约和欧盟的考验。如果不阻止米洛舍维奇而是放纵其行为，那么巴尔干地区将再次发生种族清洗，不仅会给这个地区造成灾难，还会对西方制度的信誉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大批难民拥入马其顿，严重威胁了当地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脆弱的平衡。如果马其顿爆发内战，那么外部势力将会插手，而希腊和土耳其的卷入将会导致冲突升级。塞尔维亚领导人无视不要伤害平民的最后通牒，1999年北约（德国也参与其中）发动了大规模空中打击，意在逼其就范。最终，在残酷的空袭、北约后期开始准备的地面作战以及莫斯科调停的多重作用下，1999年6月，米洛舍维奇被迫让步，同意从科索沃撤走军队，并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监督，北约可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后来，欧盟与塞尔维亚签订了《稳定与联系协定》（*Stability Pact*），旨在促进该地区的整体转型，即发展自由市场、保护人权与完善代议制政府。

世纪之交，似乎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有一点似乎已成事实：民主的扩展有利于稳定国家、保护少数民族，并减少武装冲突。到2000年，世界上有60%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比1974年增长了不少。在中东欧，独裁统治已成为过去。历史似乎到了终结的时刻，尽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0年前就这么说过。1999年4月，布莱尔在他的“芝加哥演讲”中，总结出了乐观的新共识。他大力宣扬“国际共同体”的概念，即全球各国的相互依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彼此成为邻里。布莱尔已经不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至上的规范，他认为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对道德的凌辱，而且这种行径会导致不稳定的扩

散，以致威胁发达国家的安全。他还说道："价值观是可以与利益融为一体的。如果我们能建立并宣扬自由、法治、人权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那么这也将有利于我们的国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会令我们更加安全。"

在德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努力承担大国责任。在科索沃战争正酣之际，社会民主党人、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不再表现得像个侵略者——就像1945年之前那样，而是捍卫人权的斗士。"正是沙尔平所坚持的"不要袖手旁观"的决心，说服了德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不再固执地坚持国际法中所说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科尔主义规定禁止德国军队进入纳粹国防军曾侵略过的地区；而新的"菲舍尔主义"（Fischer Doctrine）则不同，它主张，恰恰是因为纳粹在那些地区犯下罪行，德国人才更有责任在该地区防止罪行重演。新政府力图调整德国的战略，使其更加积极、更加具有能动性。1999年9月中旬，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宣称："如今，德国已是欧洲大国。"议会从波恩搬到柏林更是对这一转变的最好阐释。施罗德强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源于欧洲，为了欧洲，并属于欧洲"。很明显，德国正准备以欧洲大陆的中心为立足点。

巴尔干半岛危机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欧盟前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Chris Patten）指出，巴尔干危机是"战后欧洲的最低谷，它暴露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虚荣和我们的合作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首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把巴尔干地区称为"欧盟对外政策的滥觞"。欧盟不愿再重蹈在波斯尼亚的覆辙。尽管相比之下科索沃战争的经历要比波斯尼亚好得多，但很多欧洲领导人依然对他们在战役中过于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感到震惊。因此，在21世纪到来之际，欧洲政治军事一体化开始加速发展，同时德国主导了北约东扩的进程。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盟议会会议中，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指出，为了深化一体化，保持扩张的动力，加强抵御危机的能力，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核心欧洲"。菲舍尔说道："这就需要欧盟更加透明和民主，大国应该努力保障欧洲议会的运行，各国应对欧盟机制有极大的信任，同时我们应尝试直接选举欧盟理事会主席。"菲舍尔希望，一体化的加深能够"战胜那些内生于德国和欧洲中心地区的危险和诱惑"。换言之，欧盟应超越欧洲中心地带。

对于联合的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各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许多人认为，欧洲是新形式的"人民"力量的先锋，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因此欧洲不该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他们更希望欧洲成为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了一种法律秩序，而非超级大国，因此没有必要使欧洲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欧洲一体化是为了解决战争问题，尤其是防止德国的侵略。欧洲应当利用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来防止冲突、重建战后社会，欧盟可以和平地扩大以传播其价值观。德国人尤其为这种一体化所吸引，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必为了保障欧洲的利益而被迫向外派遣军队了。同时，前南斯拉夫的惨痛教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恐惧，让大部分欧洲人意识到：他们需要更有效的手段，以防止危险发生。

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刚刚结束，欧盟首脑会议在科隆召开，欧盟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这次会议将欧盟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制定一个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接下来的9个月，欧盟设立了政治安全委员会、欧洲军事委员会和欧洲军队。同年，欧盟任命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两个月后，在欧盟委员会赫尔辛基会议上，欧盟确定了其“首要目标”，并承诺组建一个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解决相关国家的国内冲突。同时，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不断加深拓宽。欧盟与巴尔干国家签订了《稳定与联系协定》，一旦它们满足布鲁塞尔的入盟条件，就有机会加入欧盟。1999年12月，欧盟在尼斯会议上决定，于2000年开始启动与马耳他、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的入盟谈判。上述协定的签署，以及欧盟的扩大，都需要得到各成员国的批准。

欧盟的扩大和北约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1999年3月，捷克、匈牙利与波兰加入北约，加强了北约对中欧的控制。一个月后的华盛顿峰会上，北约宣布了针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扩大计划，北约的意图不仅是要填满中欧地区的权力真空，更是想将边界拓展到波罗的海与黑海。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成为北约成员或潜在成员，是巩固其脆弱的民主的有效方式，“加入欧洲”也是如此。2001年秋，在德国领导下，欧洲人成功开展了第一次军事行动，他们指挥一支北约军队进入马其顿，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政府之间进行维和行动。同年，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选票数排名第二，得以参与组建政府，这时欧盟似乎准备要大显身手了。次年年初，其他14个欧盟成员国对奥地利进行外交与文化制裁，包括中止双边关系、取消联合军演、孤立奥地利使节，以及拒绝给予奥地利国际邮政组织的候选国资格。无奈之下，自由党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感到羞辱，他宣布自己支持欧洲的价值观，最终被迫辞去了自由党领导人的职务，并退出联合政府。

然而，在欧洲一体化的计划中，有很多“定时炸弹”，在一定时间可能会发生爆炸。欧盟创立了货币联盟，并打算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不是首先建立平行的、单一的政治权威。1999年1月，货币联盟成立，各国达成共识，如果有国家遭遇财政危机，欧盟或者其成员国并没有义务自动帮它们脱离困境。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仅仅有权调整利率、控制货币供应。它无权干涉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或财政预算，欧洲议会以及其他类似机构同样无权插手。

总而言之，菲舍尔曾经指出的欧洲“民主赤字”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当然，各国的民选政府同意让渡与共享主权，但民众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而是对一体化表示质疑。21世纪之初，整个一体化进程都遭遇了一系列的民主与选举障碍。2000年9月，丹麦人在全民公决中拒绝加入欧元区。和英国一样，丹麦将继续使用本国货币。9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6月，欧盟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爱尔兰全民公投否决了《尼斯条约》（Nice Treaty）。条约在爱尔兰这样一个低投票率的国家都遭

遇了挫折，这似乎在逼着欧洲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军队却得不到军费的超级组织。由于欧盟扩大需要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因此布鲁塞尔开始向都柏林施压，要求爱尔兰重新投票。由于现在的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二战”的创伤和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欧盟是“官僚政治”，并且质疑牺牲国家主权的必要性。没有证据表明，使用共同的货币就一定能建成不可动摇的共同体，就好比关税联盟没能给19世纪的德意志带来政治统一。

因此，哪怕20世纪90年代的外部挑战要求“加强欧洲化”，欧洲民众也不会因此参与共同防御或经济管理事务，各国民众也并不会联合要求参与欧洲事务。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只是虚张之事。欧洲几乎从未出现过“公共领域”，更别说针对安全问题的泛欧洲公众辩论了，即使有那么一点儿讨论，也是闭塞的、小范围的、零碎的，并高度精英化的。有迹象显示，未来的欧洲会遇到一些麻烦，尤其是在北约扩张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扩张和未来10年的扩张计划，预示北约可能建立双重体系，因为旧体系里中欧、东南欧和东欧地区获得的安全保障，要比位于“核心”的西欧国家少得多。民主德国地区以前并没有部署过盟国的核武器或常规军队，也没有制订过保卫新防线的积极作战计划。此外，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导致另一些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安全感激增，最典型的就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莫斯科十分担心这些国家会加入北约，因此对它们进行威胁，要求其不要加入北约。而这样做，又再次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它们更加希望加入北约。简而言之，这一切说明北约必须继续东扩，直到与俄罗斯接壤，或者将其吸收。

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所惧怕的。十多年发展下来，俄罗斯战略家越发担心会被“包围”：东面被中国包围，南面被宗教极端主义国家阿富汗、中亚、伊朗和高加索（尤其是车臣地区）包围，更可怕的是西面被北约包围。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重视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他们认为，西方试图主导欧亚“世界岛”，继而主宰世界。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无视俄罗斯的反对，这让俄罗斯更加焦虑。克里姆林宫想知道，什么可以阻止大西洋联盟将“人道主义干涉”和“国际共同体”这类新概念用于车臣地区乃至俄罗斯全国，以及如何才能抵御西方的干涉？

科索沃战争对各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影响，在欧洲和大西洋彼岸迥然不同。在200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主要议题。在美国两党进行了10年的战略性合作之后，已经明显可以看出，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之间的观点有巨大差别。前副总统戈尔是波斯尼亚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持者，他打算继续推行克林顿政府的干预政策；相反，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则非常怀疑和反对美国参与其他国家的建设，他希望美国成为“更谦逊的国家”。同样，2001年6月，科索沃战争对托尼·布莱尔的连任也未能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尽管布莱尔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强烈支持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另一方面，科索沃战争使俄罗斯政府承受了很大压力，北约不顾俄罗斯

的反对而执意东扩，使俄罗斯面临更大的不安全感。因此，俄罗斯的领导人交接不得不提前进行。1999年8月，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疲惫不堪的叶利钦指定默默无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为他的继任者。新总统曾在德国当过中层情报员，1989年苏联解体让他印象深刻。他被尊称为德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深信柏林的中心地位在地缘政治上十分重要。2000年3月末，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由于普京是“代总统”，并且有能力操控安全部门和地方政府为自己服务，因此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赢得了超过半数选票，无须第二轮投票就轻松赢得选举。他的目标很明确：杜绝国内腐败，阻止北约入侵，试图通过德国和法国瓦解大西洋联盟，以及解决车臣问题，最终实现俄罗斯的复兴。

接下来的10年里，俄罗斯政府开始着手进行彻底的国内改革，使俄罗斯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在国内政治改革过程中，“西罗维基”（Siloviki）的权力有所扩大，“西罗维基”泛指俄罗斯的安全部门，主要是内政部门和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俄罗斯变成了“主权民主”国家，这个概念无关政治参与，更多的是强调国家的统一。普京上台后，政府重新控制了自然资源，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所有权，地方寡头受到法律的清算，这些人麻烦不断，甚至锒铛入狱。总而言之，俄罗斯重新进行国有化，或者说是加强了国家对所有与外交相关的国内部门的掌控，包括交通、通信、财政和国防工业。进行上述改革的部分原因，是应对车臣问题引起的国内宗教极端主义，而恐怖威胁常常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加强媒体审查的借口。许多著名记者因为批评克里姆林宫而遭到了神秘暗杀。更重要的是，莫斯科试图阻止西方通过民主革命操纵俄罗斯。民主革命是西方惯用的手段，它推翻了米洛舍维奇，并吞噬着俄罗斯的邻邦。然而，普京的主要目标是重申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尤其是向美国展示其国力，并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2001年9月11日清晨，“基地”组织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将它们当作人肉炸弹，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和五角大楼。行凶者全部来自中东，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人，袭击的主使者是本·拉登，由其领导的阿富汗“基地”组织策划。这次袭击，不仅是对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标志性建筑的攻击，也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攻击。布什总统宣布展开“全球反恐战争”。英国首相布莱尔立即表示支持，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承诺“无条件地与美国合作”。法国的《世界报》甚至宣称：“如今我们都是美国人。”北约宣布“基地”组织袭击了它的防区范围，这触发了其宪章的第五条原则，即成员集体自卫原则。在柏林，德国国防部长称：德国将“在兴都库什山布防，并派遣军队”。施罗德说：“通过这些努力，德国将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履行其不断增加的责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东、宗教极端主义、阿富汗和欧洲被置于同一场战争之中。宗教极端主义最早始于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这场战役阻止了奥斯曼帝国攻入欧洲的行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为了保卫中东免受苏联入侵，鼓励并支持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现在宗教极端主义绕了一圈，又重新将目标对准西方。

“9·11”事件推动了欧洲的政治与军事一体化进程。“全球反恐战

争”并不像以前那样是以统一欧洲为目的的战争，但它依然包含了欧洲人的自我身份界定，以将自己与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区分开。人们普遍相信，不论外部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还是西方世界内部的激进的穆斯林移民团体的威胁，都需要欧洲加强统一与合作来共同应对。一些人希望在新的危险面前，国家为了集体安全能够和别国让渡与分享主权。2001年12月，德国外长菲舍尔说道：“欧洲是因危机与压力发展起来的，而非信念。”这里用了俾斯麦的典故，他认为德国统一靠的是“血与铁”，而非“演讲和决议”。如今，菲舍尔宣称：“显而易见的是，欧洲主要大国的实力已不够。”正是在2001年年末，欧盟国家齐聚拉肯，通过了一项“欧洲能力行动计划”（European Capabilities Action Plan）。该计划采用了一个宽泛的对欧洲的定义，其序言称，“欧盟的唯一边界是民主和人权”。2002年2月，欧盟制宪筹委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了未来起草《欧盟宪法草案》的问题。

在和谐的外表之下，巨大的战略差异已经撕裂了联盟。对于事件的优先次序，各国无法达成共识。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坚持认为，焦点应该放在地中海，因为地中海南部是北非，那里是一个不安定地区，可能是大量的经济或政治移民的来源，马格里布国家也是大部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发源地。相反，东欧人主要担心俄罗斯，他们希望欧盟，尤其是大西洋联盟能够牵制俄罗斯。根据北约战略“新概念”，在2002年11月的布拉格峰会上，北约与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进行入盟谈判，这些国家将于2004年3月末加入北约。大约同时，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也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另一方面，巴黎和柏林越来越怀疑北约东扩的必要性，因为东扩不再是保障德国安全的必要手段，相反会招致莫斯科的反感。

各国对“全球反恐战争”的下一步行动看法不一，这是导致欧盟瘫痪的真正原因。对于一些美国人和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解决“基地”组织和宗教极端主义最好的方法是组织全球警察联合行动。他们呼吁用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外交来对付恐怖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外交，常常包括民主国家利用专制国家来镇压“恐怖主义”。在他们看来，对于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有必要进行让步，同时对以色列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来缓和这些国家民众对西方的不满。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民众普遍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基地”组织的核心战略目标，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受欢迎的根源。颇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则认为：“9·11”事件最惨重的代价，就是“现实主义”范式在中东的失败。他认为，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同中东那些“温和的”专制政府保持着浮士德式的交易：美国保障其安全，这些国家可以肆意践踏人权；作为交换，这些国家保证国际石油供应，同时镇压其人民。他指出，这一趋势可能发展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或者无政府状态，就如1992年阿尔及利亚取消选举结果后产生的混乱。9月12日，新保守主义者宣称：“现实主义”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缓和中东的反西方情绪，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毕竟，“9·11”事件

的劫机者大部分来自美国的两个“盟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而非巴勒斯坦。新保守主义者建议：现代美国不应再依赖那些专制政权了，美国应该在中东推行民主化，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推翻那些压迫民众的政权。

布什总统听取了这一建议。“民主和平”的思想再次成为美国战略的支柱。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将民主扩张推广到中东，取消了该地区的特殊待遇和特殊地位。这表明，美国不再坐以待毙，而是未雨绸缪，消除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宣布，针对“基地”组织、“圣战者”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时，华盛顿将目标对准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他是中东最专横的统治者，长期对外侵略扩张，并试图发展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民主国家，不应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美国应该将矛头对准中东地区最不民主的国家。

欧洲精英赞同美国新战略中的大部分内容。2003年，欧盟发布了第一份《欧洲安全战略》报告，反映出欧洲的共识。该报告告诫说：“冷战前和冷战时期，我们传统概念中的自我防御，针对的是侵略者造成的威胁。而新的威胁则不同，我们的第一条防御战线，不是在国内，而应该是在国外。”换言之，袖手旁观或者在欧盟的边界线上进行巡逻都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障欧盟的安全，我们需要在危险进入我们的边界之前，就介入并建立缓冲地带。报告中还写道：“即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地缘依然是重要因素。欧盟周边的国家，对于欧盟有重要意义，这些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乎欧盟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欧盟不仅希望扩张边界，还宣布了新的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创造一个诸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所说的“朋友圈”，为欧盟内部核心筑起堡垒。简而言之，欧盟不仅要扩大其领土，更要扩大其观念。也就是说，价值观的传播，会使联盟更加安全。

然而，铲除萨达姆的决定严重分化了欧洲与美国，也使欧洲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英国首相布莱尔支持这一决定，主要因为他在1999年芝加哥演讲中大篇幅谈论萨达姆·侯赛因，那时小布什还仅仅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说，布莱尔看到，“9·11”事件是一个机遇，尽管它引发了全球震动，但我们可以利用这次事件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安全的世界。他说：“万花筒已被摇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给了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机会。”在他看来，诸如萨达姆这样的统治者，不仅压迫国内人民，而且激发了这些国家内部民众对西方的广泛敌意，这才是引发恐怖主义的根源。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西班牙首相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称为“新欧洲”的大部分苏联集团国家，都赞同英美对伊拉克的立场。另一方面，巴黎与柏林并不相信萨达姆是西方的严重威胁，它们担心，为了消灭他而发起的战争将会代价高昂，并分散西方国家对付恐怖主义的精力。同时，它们还决心同伦敦争夺欧洲领导权，动员欧盟的资源，使欧盟成为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的一极。法国威胁

使用否决权以阻止英美的企图，不允许安理会通过一个授权对伊动武的新决议。

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态度更为坚决，他在2002年的大选中向民众保证，就算联合国授权，德国也不会支持攻打伊拉克。这一决定是德国发展独立于美国的“德国道路”的一部分。在汉诺威市的广场上，施罗德向民众宣告：“美国为其他国家做榜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美国，人们常常破产，受到剥削，不得不担心年老后谁来照顾他们；但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德国政府对待人民的方式。”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告诫说：“不要拿战争和军事干涉当儿戏，我们绝不会同流合污。”跨大西洋联盟建立以来，这是德国第一次在国际政治敏感问题上公开地、强烈地与美国决裂。

2003年3月，美英联军开始攻打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很快被推翻，独裁者和逊尼派的统治在伊拉克终结。这让大部分什叶派迎来了短暂的美好时光。然而，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不同，主要战役结束之后，美国国内反对军事行动的呼声并没有减弱。一部分原因是，美军没有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曾流亡叙利亚的前伊拉克复兴党人、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分子、一部分担心失去特权的逊尼派人士，以及国际“圣战者”，纷纷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军队的占领。因此伊拉克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暴乱，激化了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争论与矛盾。从2003年年末到2004年，美国艰难地控制着伊拉克的事态。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前景十分渺茫。同时，欧洲东部边缘也陷入混乱。事实很快清楚地说明，普京总统的“主权民主”不仅意味着要让俄罗斯的邻国获得真正的主权，还意味着俄罗斯的做法会限制这些国家的民主的发展。2003年9月，俄罗斯发起“单一经济区域”（Single Economic Space）计划，即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克兰开展广泛的合作，代替名存实亡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及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chenko）领导的反对派强烈反对该计划，因此基辅政府要想通过该计划，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莫斯科开始公开干涉乌克兰内政，支持亲俄的总统候选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他的权力根基在乌克兰东部的俄语区。2005年，白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紧张局势。白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波兰裔人，希望得到波兰政府的保护，他们与莫斯科支持的总统卢卡申科（Lukashenko）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伊拉克危机和俄罗斯想重新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逐渐对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外交方面，巴黎和柏林希望与莫斯科更加密切地合作，制衡他们眼中的美国霸权，并且确保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尤其是天然气，因为很多欧洲国家的能源进口都依赖于俄罗斯。2003年3月，三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如德国总理所说，如果三国能够联合起来，他们就有可能与美国相抗衡。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后，在法国与德国的带领下，反对美英联盟的欧盟国家在卢森堡聚集。年末，施罗德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德国工业争取更多的贸易机会，当时德国经济刚刚走出萧条时期。他对所谓的人权问题几乎不感兴趣，并提议

放松欧盟对北京的武器禁运。法国与德国同意暂时搁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设定的部分标准，暂时对联盟内部的各种违规行为不管不问。之前的历代德国领导人都重视大西洋联盟，而施罗德则不同，他反复强调德国的欧洲任务，以及其独特的“德国道路”。如今，他和他的法国盟友决心继续推动一体化，提升欧洲的实力，以便与美国抗衡。欧洲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精英们普遍希望，欧洲能在世界舞台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03年4月中旬，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签署了入盟草案。这意味着，一年之内，又将有一亿人加入欧盟。2004年6月，克罗地亚成为候选国。6个月后，欧盟开始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谈判，两国被准许在2005年4月加入欧盟。同时，联盟开始加强政治融合与军事实力。2003年，在那不勒斯峰会上，欧盟拟在布鲁塞尔建立军事总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欧盟制宪会议制定的《欧盟宪法》草案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到2004年10月末，欧盟成员国政府签署了《欧盟宪法》。这不仅是一个量变，也是一个质变，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权力将逐渐转移到联盟层面。服从有效多数制投票的国家，其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这稀释了各国的主权，尤其是在司法与民政方面。欧洲议会被赋予了更多权力，希望它能够帮助促进欧盟的民主合法性。然而，欧盟最大的创新还在于国防和对外政策。《欧盟宪法》规定将设立两个新的职务：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部长。但这些还不是欧盟发展的最后步骤。《欧盟宪法》的序文重申建立“史上最紧密的联盟”的承诺。现在，《欧盟宪法》的实施只差正式批准了。

在欧盟大多数国家，《欧盟宪法》只需政府决定是否批准，如德国、英国等国家，《欧盟宪法》在这些国家的通过并未受到太大的阻碍。然而，在需要多数投票通过的国家，批准条约的进程并不顺利。与美国不同，欧盟是由各国政府组成，而非人民，更非大众。2005年5月末，法国民众否决了宪法条约，不久荷兰民众也否决了它。一体化计划之下的“民主赤字”暴露无遗：欧盟试图对外输出民主，而自己却没有民主。当民众被问及为何不支持《欧盟宪法》时，他们说没有任何必要放弃本国的主权，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战略的角度都是如此。这种“欧洲”理想事实上缺少推动力。短期来看，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的否决，迫使欧盟需重新调整《欧盟宪法》的框架，重新设定议程，以再次尝试。但是深层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欧洲中心的这几个大国，如何才能对全欧洲的人民负责？反过来说，目前欧洲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各国民众如何才能参与欧盟发展的大政方针，创造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对于欧洲应该扩展到什么地步，各国一直分歧不断。欧盟的东扩已经满足了德国的需要，因此北约东扩对德国的意义已经不大。德国外交部长如此评价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这是一个历史时刻，这将是德国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处于欧洲核心，周边没有直接的威胁，我们也没有威胁别人。”对于许多德国人

而言，如今的“欧洲”是为德国服务的，比起向南或向东扩展，他们更希望拉起吊桥，在堡垒中以逸待劳。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巴黎与柏林在军事方面已经安全，它们希望安抚克里姆林宫，确保获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而英国、波兰、波罗的海等其他处于前线的国家，希望有大国力量来填补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权力真空地带。而乌克兰的入盟问题，则导致西方与俄罗斯矛盾的尖锐化。2005年4月末，基辅终于与北约开始入盟谈判。就在前一年的年末，由于大选引发的争议，使得整个国家曾经陷入危机。当时执政党被指控试图以舞弊的方式操纵选举，而莫斯科竟然公开对其表示支持。在之后的“橙色革命”中，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示威者占据上风，亲西方的尤先科上台执政，他决心让乌克兰向欧盟靠拢。

伊拉克冲突和“全球反恐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01年开始，美国不断卷入各种战争。在国内，人们处于高度焦虑之中，积极为战争提供准备，同时战争也为领导人带来了明显的政治收益。2004年1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老兵约翰·克里（John Kerry）未能说服美国群众，未能证明自己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人们普遍相信，国家安全问题决定着选举的结果。因此，小布什获得连任，他宣称将继续推动“全球反恐战争”和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欧洲，伊拉克战争使民众变得越发激进，那些支持发动战争的政府大多陷入尴尬，而反对发动战争的政府则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施罗德意外地赢得德国2002年大选，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处理东部洪灾时显示出超凡的领导力，但主要是因为他曾警告选民——德国人可能卷入中东战争。在伦敦，党派政治常常被外交事务左右，甚至有人试图弹劾布莱尔，说他“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犯下重罪、行为不端”。不过这些事件的政治后果十分有限。在2005年5月的选举中，布莱尔史无前例地第三次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使工党连续执政长达三届。尽管英国人对伊拉克战争有所抱怨，对他奉承美国的行为有所不满，支持他的人减少了许多，但他还是赢得了大选。与之相反的是，尽管施罗德反对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但在之后的大选中，他还是没能赢得大选。2005年，安吉拉·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在法国，尼古拉·萨科奇一向支持美国，2007年他赢得大选，成为总统。

欧洲穆斯林普遍认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伊拉克，而是针对伊斯兰世界本身。如今，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外交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了敏感问题。在这样的国家，移民者的后代非常关注其所在国家的对外战略。2005年左右，一连串的伊斯兰恐怖事件震惊了欧洲社会，这些事件受到某种伊斯兰战略和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全球反恐战争”推动了这种思潮的泛滥，但这种思潮早于“全球反恐战争”。长期以来，宗教极端组织的领导人都宣称，伊斯兰的所有昔日领土，包括西班牙南部和巴尔干半岛大部，都应该被收复。许多成长在英国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英国也应是他们的领地。2004年3月，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马德里地铁安置炸弹，造成大量民众伤亡；2005年6月初，生于英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袭击伦敦，导致许多人丧命；类似的悲剧也曾在欧洲其他国家上演。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一个新的战场被开辟

了。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结束的500多年后，以及奥斯曼人在维也纳被击退的400多年后，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又一次在欧洲挑起战火。而这一次，战争不仅仅是发生在欧洲之外，更多的是在欧洲内部。

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将反犹太主义作为其核心思想。反犹太主义被重新引入欧洲，并演变成了反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它认为美国和欧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盟或棋子。在穆斯林和许多西方人看来，“全球反恐战争”、进攻伊拉克，以及装模作样的民主推广，其实都是阴谋，其幕后的主使者是信奉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犹太人和在背后操纵他们的以色列。2003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说：“如今，犹太人在幕后主宰世界，他们让别人为他们征战和送死。”《锡安长老会纪要》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唆使伪造的一份文件，此时它重新被人提起，很多人再次否认存在“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许多西欧国家，尤其是东正教地区，犹太人遭到越来越多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许多攻击是由“传统的”极右派实施的，但大部分攻击来自穆斯林移民社区。这一浪潮滋养了以色列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去合法化”，欧洲很多人并不反对犹太教，这些人对以色列表示同情与支持。

“全球反恐战争”有一种重塑欧洲国内政治的潜力，就如过去的内忧外患一样。在各国争相抑制恐怖主义威胁和反西方的移民社区的挑战时，它们的政治体制不得不面对一个经典问题——如何保持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然而，欧洲大多国家并未采取任何系统性措施以改造社会和经济。在俄罗斯，普京把对外政策放在首位，试图改变社会经济关系，保护国家主权不受西方侵蚀。这一努力在20世纪末一度失败，至今也未能成功。与2001年后的美国不同，新世纪的欧洲社会依旧是和平的，尽管在“二战”之后，曾经有无数年轻男女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拼死搏斗甚至丧生。

同时，北约和欧盟也加速扩张。2007年1月，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乌克兰努力进行经济改革，建立公民社会，为入盟做准备。当年年末，在里斯本，欧盟成员国同意对《欧盟宪法》进行微调，重申将欧盟发展为军事联盟的目标。批准新宪法的进程重新开始。2006年9月末，北约与高加索地区国家格鲁吉亚进行了“密切谈话”。巴黎和柏林极力反对北约的这种行为，在这一点上，默克尔继续坚持施罗德的立场，因为上述做法可能会激怒俄罗斯，并导致北约的过度扩张。两个月后，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被邀请加入入盟谈判，两年后正式加入北约。2008年4月，北约在布加勒斯特进行了一场争论激烈的峰会，北约向马其顿保证，在其解决了与希腊的争端之后，就将受邀加入北约；北约还呼吁同波黑开启密切谈话。最有争议的是，北约不顾法、德两国反对，告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如果它们能解决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那么它们以后就将有机会加入北约。

2008年，不断升级的危机震动了整个欧洲。2月，科索沃议会单边

宣布将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这个事件暴露了联盟内部深刻的分裂。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22个欧盟国家承认了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但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均拒绝给予承认。因为，这些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类似的少数民族问题：希腊国内有马其顿人和斯拉夫人，塞浦路斯国内有土耳其人，西班牙国内有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国内部有很多匈牙利少数民族。欧洲议会本来拟通过决议，承认科索沃独立，但后来不了了之，一直没有承认。不久之后，即2008年6月，爱尔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里斯本条约》。投票结果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低投票率，有些人害怕爱尔兰中立的传统被打破而被卷入“欧洲战争”，有些人担心新加入的东欧国家会动摇欧盟的根基，有些人对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和“不民主”感到不满，还有些人认为《里斯本条约》威胁到了国家主权，等等。由于欧盟采取“全体一致”的原则，并且欧盟不能轻易将某一个国家开除，因此在爱尔兰人改变主意之前，进一步一体化的计划将被搁置下来。

两个月后，欧洲受到另一场危机的打击。在北约宣布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原则上可以入盟之后，俄罗斯开始向高加索国家增加压力，其方式是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从格鲁吉亚独立。这两个地区既有俄罗斯人，也有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决心坚定，一直想加入北约。在是否加入北约的全民公决中，有3/4以上的民众表示支持。根据北约的规定，其他国家入盟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已经解决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萨卡什维利做出了一项不顾后果的决定。2008年8月，萨卡什维利大举进攻妄图分裂的南奥塞梯。莫斯科迅速做出反应，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派兵保护当地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坦克向格鲁吉亚南部进发，不仅危及格鲁吉亚领土完整，还威胁到了东——西输油管道的安全。2008年9月，西方金融体系突然崩溃，欧洲开始退缩。危机始于美国华尔街，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为标志，进而席卷了整个美国，并蔓延到大西洋彼岸。在欧洲，银行开始破产，尤其是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德国最为明显。金融危机后，巨大的经济衰落随之而来。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陷入萧条，英国相对缓和，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则较为严重，房地产、零售业和许多其他行业陷入急剧衰退之中。

华盛顿和欧洲各国政府争相回应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武装干涉。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美国仍深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他失去了人民支持，缺乏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能力。在伦敦，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新领袖大卫·卡梅隆达成共识，决定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手段。保加利亚人、捷克人、丹麦人、波罗的海人和波兰人都惧怕俄罗斯，但他们也支持对俄强硬。拉脱维亚提议抵制在俄罗斯旅游胜地索契举办的2014年冬奥会，并向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然而，除了表面功夫，欧洲国家并未对莫斯科采取任何措施，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和德国的反对。法国总统萨科奇匆忙来到俄罗斯进行调停，试图使双方停火，但效果不佳，不仅没有恢复格鲁吉亚对争议地区的主权，反而使得俄罗斯军队对格鲁吉亚土地的占领变得合理化。

欧洲国家难以就如何应对经济危机达成共识。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朗采用了一揽子计划来稳定金融体系，刺激经济。该计划主要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印发更多的纸币。在欧元区，因为成员国政府把货币主权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所以它们能采取的对策十分有限。德国经济亟须低通胀率，它强烈反对承担额外债务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开销。欧洲央行需要遵从德国的利益，因此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德国确实持续保持了高出口和较高的收支顺差。在过去的15年间，德国经济默默无闻，如今又再次成为欧洲工业和金融强国。在柏林墙倒塌、南斯拉夫战争20年之后，科索沃战争、欧元区建立10年之后，“世界反恐战争”8年之后，欧盟各国在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上依旧难以达成共识。

日积月累，这些危机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惨淡的经济状况，对外政策不再是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支配性因素，不过在外交方面，美国人依然面临着两项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承诺继续推动民主扩张，呼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和“建立世界民主国家的联盟”，他谴责俄罗斯在高加索的“残忍行径”。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则指责共和党把美国拖入了一场不必要的、非法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认为，共和党忽略了在阿富汗的“必要”战争，没有注意到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勾结行为，这些导致了美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很明显，奥巴马并未针对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做出批评。他还从道德、谋略和可行性方面，质疑将民主输出看作保证国家安全的手段。2008年11月初，奥巴马轻松赢得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混血总统，他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白人。

奥巴马新政府采用了和前任政府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2009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刻意回避了人权问题。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奥巴马拒绝接见他。同时，美国还“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放弃在中东欧的地面导弹拦截系统。宏观层面，新政府表示不再推行民主演变政策，而是依靠其盟友即各国的独裁政权来镇压反美势力，同时在伊斯兰世界改善美国形象。在欧洲，新总统主要关注的是德国。小布什政府重点关注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而奥巴马却不以为然，他把柏林作为其欧洲之行的重点。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曾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克林顿时代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曾强调新时期德国的重要性。他说：“德国而非美国，才是北约的权力掮客，至少在东扩进程中是这样的，如果要重建北约联盟，美国必须把德国作为首要关注点。”美国政府对柏林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在阿富汗的“反恐浪潮”中派遣更多兵力。

不久，美国的大战略陷入了困境。美国放弃针对莫斯科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引起了轩然大波。除了英国，欧洲各国都拒绝支持奥巴马，这些国家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已拒绝向阿富汗增兵。跨大西洋的短暂蜜月期是基于一个误解之上的：奥巴马想当然地认为欧洲会多派兵力，欧洲却希望奥巴马少做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德国，阿富汗战争后政府受到民众的严格监督。公众舆论以及许多政治家，都要求撤回

德国国防军。尽管他们驻扎在相对安全的地区，目的是重建而非战斗，但德国部队还是略有伤亡。诚然，德军伤亡人数远不如美国和英国，但是对一个和平国家来说，这已是天文数字。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绿党领袖菲舍尔、法国绿党领袖龚本第（Cohn-Bendit），都支持本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而现在他们却改变了看法，现在他们反对向阿富汗增派旋风式战斗机。默克尔总理一再拒绝华盛顿的增兵请求，也拒绝同意更粗暴的干涉规则。显然，德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不想再出力。

同时，欧洲精力充沛地重新回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工作上来，各国说服爱尔兰在2009年再次举行公投。由于要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高投票率，这次条约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如期生效，设立了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并设立了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然而，这并没有提高欧盟的权力和权威，甚至恰恰相反。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并不是高知名度的人物，如托尼·布莱尔，很多人曾看好他，但他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备受争议；也非约施卡·菲舍尔；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则由毫无名气的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出任，她曾任英国贸易专员。另外，2009年欧盟选举的最大特点既非欧洲怀疑主义者的胜利（那些反对欧盟的政党都发展得极为不顺），也非欧洲民众的广泛参与（尽管他们的国家面临巨大经济、战略危机），而是一种普遍的冷漠。不仅那些支持一体化的精英没有向民众展示他们该如何做，而且在经济危机的关头，欧洲民众自己也没有去争取他们参与保卫共同繁荣与安全的权利。不管怎样，“民主赤字”都将继续侵蚀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欧盟依然是一个“民主混合体”，是代议制国家的联盟，但其本身并不具备民主性。它并不能调动力量，而只会分散力量。

因此，在2010～2011年间的一系列新的危机面前，欧盟显得无力回天。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如政府无作为、低税收收入、严重的偷税漏税、欧元区债务危机，等等。这些都要归咎于货币联盟的低利率政策。同时，被戏称为“欧猪五国”（PIIGS）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纷纷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当年春天，希腊政府试图减少开支以平衡债务的举措引发了雅典民众的骚乱。一年后，希腊人再次游行，反对新一轮的紧缩政策。在爱尔兰，国家承收了银行的巨额债务，使整个财政体系处于崩溃边缘。那里的人民更愿意接受财政削减政策，希望“欧洲”能向自己施以援手。同时，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共财政也处于崩溃边缘，甚至连比利时这种“核心”国家的前途也不明朗。在爱尔兰和地中海地区，许多国际投资者严重受制于政府公债，他们考虑是否要“抛售”所持有的债券，换取更稳定的债券如德国的债券。到2011年年初，欧洲多国的财政系统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中东突然发生混乱。2011年1月，突尼斯独裁者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反对者赶下台——他们要求结束腐败与独裁统治。一个月后，在一场类似的政治运动中，统治埃及多年的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推翻。不久之后，利比亚东部发生武装起义，民众反对在位已久的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

菲，但卡扎菲的军队逐渐控制住了西部的局面，并试图收复东部的失地，进攻反政府军的大本营。2011年3月，叙利亚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这个春天，中东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安宁无事，动荡甚至波及海湾国家巴林，在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要求逊尼派的王室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中东国家文化传统多种多样，政治传统各异，教派林立，各种思潮交汇在此，而将它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西方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责任的追求。与推翻伊朗国王的伊斯兰革命完全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对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发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抗议者广泛批评美欧支持中东独裁者的行为，但他们丝毫不愿看到本国同以色列或西方发生任何冲突。总而言之，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相比，“阿拉伯之春”与1989年的中东欧民主运动更为相似，但是直到2011年中期，中东地区的前景仍不明朗。

欧洲和美国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它们一直认为，中东独裁者尤其是穆巴拉克，是维护当地稳定的力量，是“全球反恐战争”的盟友。卡扎菲是布莱尔不久前好不容易才拉入西方阵营的，一些人甚至更看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但是，“阿拉伯之春”简直是一场梦魇，它驱逐了西方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新旧朋友，威胁也门、巴林、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盟国的稳定。现在，西方领导人担心，大众政治的崛起会让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取得优势，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这将导致中东国家对西方与以色列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进而引发大批的经济移民和极端分子北进，穿越地中海并来到欧洲。出于以上考虑，美国和欧洲各国起初并不欢迎突尼斯和埃及的转型。但是转型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而且势如破竹。人们便普遍认为，这些地区的民主转变会让西方国家更安全。布什总统当年费尽心机想要实现的事，如今轻轻松松地落到了奥巴马的手中。

然而真正的转变开始于利比亚。2011年3月，卡扎菲几乎要将反对派的军队消灭了，并威胁说“要像追兔子一样追赶他们”。起初奥巴马总统拒绝干预，任由法国和英国进行空袭，以保卫反对派首都班加西的安全。不过，由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在内部不断向总统施压，华盛顿才转而在二线采取行动，为英法的空袭提供支持，阿拉伯联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德国出人意料地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弃权，德国认为军事干涉违背了国际法，而且会使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民众更加敌视西方，这会使得该地区的民主转型成为一种危险。许多欧洲人同意这一观点，却鲜有人愿意公开表明立场。空袭迅速打击了利比亚政府军，使其损失惨重，最终卡扎菲政权被推翻。这次军事干涉以“人道主义”自居，而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担心卡扎菲重新控制这个国家，担心当地的民主运动失去动力。欧盟担心利比亚会上演一场波斯尼亚式的旷日持久的危机，不利于欧盟南部边缘的稳定。因此，“人道主义干涉”、对外推广捍卫民主和现实主义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将被重新定义。

欧债危机才是欧洲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希腊与爱尔兰真的陷入主权债务违约，那么这将令神圣的政府债券信誉扫地。同时，大批投资者逃离国债市场，会加速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崩溃，甚至

还可能摧毁整个欧元体系，使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陷入萧条。因此，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通过一系列紧急救助措施（大部分由德国资助），即通过高利率的贷款以弥补财政亏空，来维持爱尔兰和希腊的财政。作为回报，两国要采取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以早日将国家财政拉回正常的轨道。德国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德国国内曾就此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支持者认为希腊或者爱尔兰中的任何一国破产都会摧毁德国的银行系统，因为德国银行购买了大量的相关债券；而反对者则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紧急救援，认为这是毫无远见并且无关紧要的经济投入，很多选民在地区选举中表达了这种观点。2011年中期，为了避免丧失更多的选票，默克尔总理不再与巴黎并肩保护债券持有人，并坚持认为国际投资者也应当分担部分损失。这一立场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有负面影响：一方面这种做法激怒了法国人，因为法国的银行受希腊债务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这会增加欧洲其他地区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这一切俨然成了欧洲一体化计划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或者说可能是极限的挑战。在笔者撰写本书时，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欧洲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表明，所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只是徒有虚名。没有美国的后勤保障，欧洲就无法进行干涉。美国前国防部长用幽默的语言，一语道破了美欧之间的依赖关系。许多人质疑道，如果欧洲对付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对手都如此战战兢兢，它如何同大国匹敌？如何能对付正在复兴中的俄罗斯？关键是欧洲国家未能解决欧债危机。事实证明，所谓全能的欧洲央行，最终还是要依靠各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德国的支持，而且它还缺乏挑战国际货币市场的金融实力。欧洲急需团结、机制和能力。不管怎样，2010年和2011年的事实证明，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欧洲再一次毅然拒绝走向政治统一。外部挑战持续分裂着欧洲，而非使它更加团结。

事无巨细是欧洲一体化计划的核心的最大缺陷。德国是一体化的中流砥柱与最后的“救火队长”，但它正在逐渐背离欧盟。2009年，备受尊崇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如果没有人民的首肯，德国不会继续参与一体化。同时，德国人厌倦了“拨款联盟”，认为这是在替那些长期管理不善的国家埋单。可以说，随着历史的包袱被抛之脑后，德国正逐渐成为独立而“自信”的“正常”国家。然而与20世纪初不同，这一进程并未使德国在欧洲或是世界舞台更加活跃，结果恰恰相反。正是德国军队的节制而非野心使得欧盟在战略上显得瘫痪。如今，德国在民主市场经济的泡沫中平安无事，并准备从世界舞台上隐退，它将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而正是这种做法，在不经意间大幅提升了德国的经济实力，而它强大的经济实力让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惴惴不安。德国领导人越来越不愿意支持对中东的军事干涉，因为这样违背民意。德国政府也不愿意因为北约东扩的问题得罪俄罗斯，因为德国担心俄罗斯的能源报复行动。德国的地区选举对欧洲来说越来越重要，就像几个世纪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对周边小诸侯国的影响巨大一样。德国“脱离欧盟核心”，不过问欧盟事务，重新启用马克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会引发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恐慌，重新引发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德情绪。本来，这种反德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了，但现在又开始出现

了。简而言之，从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欧洲人依然在不断地专注怎样把欧洲核心地区整合好。统一后，沉寂了十几年的德国问题又回来了。

[1] “圣战者”组织，（尤指阿富汗或伊朗的）穆斯林游击队。——编者注

[2] 穆夫提，伊斯兰教职称谓，即教法说明官。大穆夫提为最高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结语

> 历史……不是一本提供了既定配方的食谱。它用类比而非格言来教育人们。通过可比较的不同情境，它阐明行为的不同结果，然而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探索哪些事情是有可比性的。
>
> ——亨利·基辛格，1979年1月

这本书涵盖了500多年的欧洲历史，讨论了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干涉、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我们了解了历史上很多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民族性格以及不同的文化，我们从神圣罗马帝国一直讲到第三帝国，谈论了各种专制王权、代议制政府，最后讲到了欧盟。尽管时间、地点各有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国家历史上，地缘政治的主题总是不断上演。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一些模式和问题，它们指引我们未来的路途。

最根本的问题一直都是，欧洲能否统一为单一的力量，或者由某一个强大的力量所主导。历史上，查理五世、路易十四等人曾试图打造“世界帝国”，腓力二世认为统治整个世界都“不够”，苏莱曼大帝及其后继者野心勃勃，拿破仑差点儿征服整个欧洲大陆，德意志帝国曾追求欧洲中心主义，希特勒妄想建立其“千秋”帝国，苏联渴望建立社会主义，以及今天北约和欧盟希望建立民主地缘政治体系。在以上所有的事件中，德国都是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地区，因为它位于欧洲心脏部位，战略地位重要，并且它在近代早期表现出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潜力，而且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赋予了它政治合法性。19世纪末，俾斯麦将这种潜在的能力激发起来，德国一直主导着欧洲政治，直到希特勒倒台。在后来的冷战中，争夺对德国的控制权，是苏联和西方两大对立政治集团的首要目标。柏林墙倒塌，统一后的德国重新回到实力的巅峰，尽管这一过程比人们预期的要慢。如今，德国主导着欧盟。一次又一次，从《威斯特伐

利亚条约》到《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再到西欧联盟的建立，柏林墙倒塌后欧洲一体化达到新高潮，德国内部秩序和欧洲和平的联系越发明显。许多最重要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联盟、联合国、欧洲一体化计划、《核不扩散条约》、北约（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建立的初衷，无非是想限制德国或者调动它的力量。

德国也是欧洲各种思想斗争的战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南翼是抵抗伊斯兰的最重要的前哨阵地，土耳其人曾两次试图入侵维也纳。它也是天主教和新教交战的战场，这在三十年战争时达到高潮，并且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派之争依然存在于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在19世纪的德国，保守的专制君主与自由派及立宪主义者之间有长期的激烈交锋。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在“一战”之前，在各国的社会党中，德国社会党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德国人还创造了纳粹主义。最后，民主力量与共产主义力量，也在德国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柏林，这个拥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曾经被一分为二，柏林的分裂标志着德国的分裂、欧洲的分裂乃至世界的分裂。冷战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终结。如今，欧洲是将发展成为一个更紧密的联盟，还是将保持为一个邦联，决定权在德国。

欧洲的均势尤其是德国的未来，受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大国——美国的特别关注。北美曾经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争夺的地方，三国的争抢鼓舞了殖民者寻求独立的信念，并帮助他们实现了独立。尽管美国曾周期性地试图奉行孤立政策，但这个新共和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局势。在西半球，欧洲与美国相互竞争影响力，而当欧洲国家试图在美国侧翼地区建立殖民堡垒的时候，它们给美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华盛顿逐渐学会了与控制加拿大的英国和平相处，却奋力抵制欧洲对拉丁美洲的渗透。美国反对英国在古巴推行奴隶制，反对拿破仑三世试图在墨西哥建立附属帝国，反对德意志帝国与墨西哥强化联系，也反对苏联把古巴作为反对美国的桥头堡。美国战略家担心，一旦其中一国在欧洲成为主导力量，那么该国随即会将其专制统治和思想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所以，美国人密切关注拿破仑战争、19世纪初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以及德意志帝国与第三帝国的野心。“二战”后，华盛顿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决定不让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落入敌人手中。美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产物，如今它对欧洲的影响力空前强大。

如果以一串预言和劝告作为本书的结尾，那就太哗众取宠了。所以，我以一串疑问作为本书的结尾。

本书出版之际，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当欧洲市场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法德领导的欧元区能否继续存活下来。没有人知道，欧元区是否会被外部力量碾碎，是否会像大陆封锁体系、中欧帝国和“欧洲堡垒”一样崩塌。欧洲各国能否在“阿拉伯之春”、东边俄罗斯膨胀的野心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与机遇中，找到共同的立足点，抑或是分崩离析？欧洲人是否会坚持把欧盟当作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尽管欧盟能帮助各国更好地共存，但它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也许也有

人会总结出，只有仿照18世纪北美各殖民地建立的宪政制度，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即各殖民地之间建立基于共同债务的强大联盟，议会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建立强大的、对议会负责的中央机构，同时建立共同的军队来抵抗共同的敌人。

只有两个国家可以打开深化一体化的门锁：一是英国，因为它拥有当今欧洲最可靠的军事力量；二是德国，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对单一市场和欧元的运作十分重要。它们会不会一起转动锁匙？英国会不会成为欧洲一体化计划中的“普鲁士”，推进安全一体化，提供欧洲迫切所需的可靠的军事力量？英国人自亨利八世、马尔堡和卡斯尔雷或者更早就开始努力融入欧洲，现在的英国是否会欣然接受成为欧洲一员的宿命？它是否会支持欧洲统一的探索，即使只是像局外人一样提供外部支撑？还是说，为了替国内价值观及其对外输出辩护，英国会背弃欧洲，从而毁灭一切建立强大联盟的希望？而德国一方，是否会回归“拉帕洛”（Rapallo）传统，永久地阻止北约扩张，脱离共同货币联盟而追逐狭隘的财政收益？或者，柏林是否会以放弃民主控制下的欧盟货币作为实现德国经济霸权的手段，长久来看这将摧毁欧盟，从而大幅提升德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因此，德国会不会承认，在追求建立民主联盟的过程中，俾斯麦与希特勒都徒然无功，德国却成为一种“对于世界太小，对于欧洲又太大”的临界重量？

本书开头提到，在15世纪中叶，当欧洲人面临奥斯曼人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本书认为，只有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欧洲才能联合，例如当欧洲各国应对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时候。所以，只有重大的外部威胁才能使今天的欧洲统一起来。那么，威胁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是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对抗（即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引发的欧俄之间的矛盾），还是在中东与伊斯兰势力进行决战，还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与敌对的力量做斗争？当然欧洲也有可能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壮大到欧洲的核心利益区，发展成为对西方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挑战。欧洲将怎样面对这些威胁？是向东、向南扩张，一直到达到自然地理边界，还是不可渗透的政治边界？“中间地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否会被吸收进欧洲，以终结不稳定的隐患和消除被俄罗斯占领的危险？欧洲是否会成为更加统一的国际力量，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它的陆军和海军，能否成为联盟的一部分？或者，欧洲是否会躲避挑战，偃旗息鼓，甚至分崩离析？如果真的是这样，历史将把欧盟评价为一场恶作剧，这个组织代价极高，但又非常幼稚；同时，欧洲成为强大力量的计划也会宣告终结，整个大陆将进入垂垂暮年。



致谢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许多人曾给予我帮助，请恕我不能一一言谢。但我还是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一并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人：安东焕（Doohwan Ahn）、伊利亚·别尔科维奇（Ilya Berkovich）、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阿恩特·布兰德克（Arndt Brendecke）、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尼古拉·克雷格（Nicola Craig）、杰弗里·邓伯克（Geoffrey Dumbreck）、黑兹尔·邓恩（Hazel Dunn）、利亚姆·菲茨杰拉德（Liam Fitzgerald）、尼克·盖亚特（Nick Guyatt）、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拉腊·海默特·克里斯多夫·希尔（Lara Heimert Christopher Hill）、雷切尔·霍夫曼（Rachel Hoffman）、查理·拉德曼（Charlie Laderman）、米兰达·朗（Miranda Long）、罗杰·拉瓦特（Roger Lovatt）、斯科特·曼德布洛特（Scott Mandelbrote）、海因里希·迈耶（Heinrich Meier）、帕克里特·米尔顿（Patrick Milton）、威廉·马利根（William Mulligan）、詹姆斯·卡尔顿·佩吉特（James Carleton Paget）、马泰亚·彼得（Mateja Peter）、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丹尼尔·罗宾逊（Daniel Robinson）、詹姆斯·罗杰斯（James Rogers）、克里斯多夫·罗斯（Christopher Ross）、莉莎·索塔切克（Liza Soutchek）、简·韦尔梅朗（Jan Vermeiren）、鲍勃·威尔金森（Bob Wilkinson）、乔基姆·惠利（Joachim Whaley）以及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感谢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与学生，感谢彼得学院的阿德里安·狄克逊（Adrian Dixon），以及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安妮塔·布尼安（Anita Bunyan），以及我的父母戴维·西姆斯（David Simms）与安格丽特·西姆斯（Anngret Simms）。最后，感谢我的孩子们：休（Hugh）、凯瑟琳（Katherine），还有最年长的康斯坦丝（Constance），我把此书献给你们。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版权页
扉页
推荐序 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溯源：东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长岁月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后来居上：东方领先的世纪
第五章 东方的周朝、秦朝，西方的亚述帝国和罗马帝国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附录 社会发展指数：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的基本轮廓
致谢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第七章：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致谢
梦游者
版权页
扉页
献给约瑟夫和亚历山大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通往萨拉热窝事件之路
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第二章 无个性的帝国
第二部分 欧洲的分裂
第三章 由多极到两极：欧洲在1887~1907年
第四章 欧洲外交政策的多种声音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第六章 最后的机会：1912~1914年的缓和与危险
第三部分 危机
第七章 萨拉热窝谋杀案
第八章 扩张的旋涡
第九章 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第十章 最后的通牒
第十一章 枪声响起
第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结语
权力的艺术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序 世界之希望
第一部分 继位
第一章 幸运之子
第二章 什么决定了我的命运
第三章 革命的根源
第四章 诱惑和考验
第五章 充满欲望和否定的世界
第二部分 革命
第六章 惊心动魄
第七章 和平遥遥无期
第八章 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
第九章 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第十章 责任的吸引力
第三部分 改革者和州长
第十一章 自由的议程

第十二章 棘手的州长职务
第十三章 蒙蒂塞洛的英军
第十四章 超越死亡的炽热感情
第四部分 失意的议员
第十五章 重返政治舞台
第十六章 一场为了赢得尊重的战斗
第十七章 消失的城市和终生的劝告
第五部分 世界是他的舞台
第十八章 浮华的欧陆
第十九章 知识的世界
第二十章 头脑和心灵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第二十二章 巴黎的条约
第六部分 首任国务卿
第二十三章 纽约的新职位
第二十四章 杰斐逊先生太讲民主了
第二十五章 两只斗鸡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风暴
第七部分 反对党领袖
第二十七章 蛰居蒙蒂塞洛
第二十八章 就任副总统
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第三十章 亚当斯对阵杰斐逊：第二回合
第三十一章 危急之秋
第八部分 美国总统
第三十二章 新秩序开始
第三十三章 踌躇满志的总统
第三十四章 胜利、丑闻与隐疾
第三十五章 有如神助
第三十六章 举国欢腾
第三十七章 黑暗大阴谋
第三十八章 这该死的禁运
第三十九章 告别终极权力
第九部分 蒙蒂塞洛之主
第四十章 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
第四十一章 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
第四十二章 联邦的丧钟
第四十三章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
后记 所有荣耀归于杰斐逊
作者摘记及致谢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
前言
送葬人之友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将怪兽放入囚笼：建设性的战争
第三章 蛮族的反击：反建设性的战争（1~1415年）
第四章 500年战争：欧洲（几乎）征服世界（1415~1914年）
第五章 钢铁风暴：争夺欧洲的战争（1914年至20世纪80年代）
第六章 赤牙血爪：贡贝黑猩猩为何走向战争
第七章 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坚帝国（1989年~？）
致谢
出版说明
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引 言
第一部分 国际主义时代
绪论 一无是处的欧洲协调？（1815~1914年）
第一章 以国际视角统驭全球
第二章 兄弟般的情谊
和平运动：维护世界和平
自由贸易：另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属人主义：民主与和平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铺路
第三章 法律帝国
战争法的重大突破
文明的标准
克里默的仲裁事业
第四章 科学联盟
奥特莱的“曼达纽姆”
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
通用语言
第五章 国际联盟
进退两难的伍德罗·威尔逊
大英帝国就是国际联盟
美国的撤退
政客和专家
第六章 意识形态之战
潘多拉魔盒
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少数民族的权利

等级和种族
委任制度
共产国际
国际主义的问题
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
第二部分 以美国的方式主宰世界
第七章 “国际联盟陨灭，联合国长存”
致美国
美国加入国际联盟
第八章 冷战实录（1945~1949年）
与联合国同在
远离“杂技团”
世界联邦主义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
第九章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
去殖民化
联合国大会的崛起
第十章 重建世界之路（1949~1973年）
“第四点计划”产生的背景
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之路
通往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十一章 来自美国的反对
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
人权和非政府组织的崛起
环境政治：迟暮之年的国际主义
第十二章 国际经济新秩序
海外的银行家
规范世界贸易
全球化：支持与反对
再次关注发展？
第十三章 人权法规
人权干涉
国家保护责任
追捕肇事者
第十四章 何者永存：欧洲危机及后续
斯皮内利之梦：欧洲的过去和未来
主宰世界的奥秘
未终结的帝国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构想帝国

  - 第二章 接触
  - 第三章 占领
  - 第四章 迁入
  - 第五章 征战
  - 第六章 交通与贸易
  - 第七章 统治方式
  - 第八章 反叛行动
  - 第九章 传教和文化
  - 第十章 保卫帝国
  - 第十一章 帝国谢幕
  - 第十二章 最后且最大的帝国
-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 版权页
  - 扉页
  - 目录
  - 序言
  - 第一章 一厢情愿
  - 第二章 虚拟历史
  - 第三章 未来小说
  - 第四章 可能的世界
- 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 版权页
  - 扉页
  - 目录
  - 推荐序
  - 价值观缘何而来？
  - 导论
  - 正篇
    - 第一章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 第三章 农业时代
    - 第四章 工业时代
    -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 评论篇
    - 第六章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更美好吗？
    - 第七章 思想的局限
    - 第八章 价值观中的永恒、发展与自我
    - 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 回应篇
    - 第十章 我对一切事物的正见
  - 致谢
- 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帝国：1453~1648年
第二章 继承：1649~1755年
第三章 革命：1756~1813年
第四章 解放：1814~1866年
第五章 统一：1867~1916年
第六章 乌托邦：1917~1944年
第七章 分裂：1945~1973年
第八章 民主：1974~2011年
结语
致谢